前　　言

我国历史编纂学一向受重视的是编年、纪传和纪事本末三种主要体裁。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虽各有其长处，但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及经过情况，不便于完整地加以记述。如编年体以年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以致“首尾难稽”；而纪传体以人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致使“宾主莫辨”。纪事本末体则以事件为中心，将重要史事分别列目，独立成篇，各篇又按年月顺序进行编写，可使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始末原委，一目了然。然而，历史现象是复杂的，单一体裁的史书往往不能全面系统地反映更为广泛的社会现象，因此，这三种主要传统史体，又必须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才能起到相辅相成的功用。

1986年，《中国历史大事编年》出版后，不少同志曾提出如能再编纂一套纪事本末体的大型历史工具书，与《编年》对照使用，可以便于读者了解史事脉络及全过程。然兹事体大，诚如章学诚氏所言“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滥”。加

以当时我们教学任务繁重，未能立即着手进行。前年，史学界同行再次提出此事，我们重新研究了这一选题，认为此项工程虽然浩大，但是为了填补已出版史籍在这方面的空阙，适应大、中学文科教师从事教学和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及一般干部群众学习祖国历史的参考，我们决心实现这一宿愿。经过多方奔走，组织强大编写队伍，并与出版社协商，解决出版方面存在的困难，在全体作者的共同协作下，经过三年的努力，这部具有学术价值的纪事本末体大型历史工具书——《中国历史大事本末》终于诞生了。

纪事本末体史书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袁枢读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选择《资治通鉴》所记重大历史事件，仍按《通鉴》原来年次，抄撮原文和司马光的史论，每事一篇，详记始末，自立标题，自为首尾，袁枢本人没有增删一个字。这样共纂成二百三十九个条目，成《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章学诚评论袁书说："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袁枢的书不仅方便了《通鉴》的读者，而且开创了历史编纂学的一种新体裁。

在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的影响下，明清时期产生了十余种纪事本末体史籍，形成了历史编纂学方面的一大流派。其中重要的有明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和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等。《宋史纪事本末》义例与袁书基本相同，但它取资纪传体《宋史》，兼及辽、金、元史，从而扩大了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取材，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明史纪事本末》则打破了只限于取资一部书的成规，"广稽博采，勒成一编"，首创采群书而为书，把纪事本末体史书的编纂，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比《明史纪事本末》成书稍晚

的《左传纪事本末》，则正文全取“左氏传文，罕有所遗”，这与《通鉴纪事本末》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著者在正文之外，又增辟了史实补逸、考辨等项目，同时还参以作者自己的意见，谓之“发明”。又因此书曾进呈康熙，在每卷之后，还以“臣士奇曰”的形式附加一篇史事评论，使纪事本末体史书又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历史大事本末》编写组在参考前人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史学的新发展，选择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具有重要意义、重大影响的事件四百六十题，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宗教、典章制度、中外关系等等，尽可能地把每一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完整、详明地反映出来，使读者“一览了然”。题名《中国历史大事本末》，不曰《纪事本末》，委实不敢谓已作到“网罗隐括，无遗无滥”也。

在编纂中，我们坚持科学性和知识性并重的原则，除以古文献为主要依据外，并注意吸收和利用古今学术研究成果及近年来发现的考古资料，同时加强对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述，以补前代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不足。

鉴于古代纪事本末体史书，因受时代的局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偏见。我们力求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记叙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注意材料和观点的统一，寓观点于叙事之中。为了准确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尽可能地做到事事有出处，不傅会，不臆断。但对有些记述歧互，说法不一的史料，则作一些必要的史实考辨，或以一说为主，或并存它说，以备参考。其有踳驳不伦、传闻失实者，则加以厘正之。

在行文上，我们力求做到简明易晓，避免征引过繁。但记叙每一事件又必须完整、翔实，使之系统化、通俗化。引用旧史文句，一般不加改动，有些文句确实费解，转译又恐失真，则用括注办法略作诠释，以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意。

《中国历史大事本末》在编写组织上，采取集体协作、分工负责制。由张习孔、林岷任全书主编，各段主要编写人员分工如下：

先秦——孟世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秦汉——林岷（中国戏曲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张习孔（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

三国两晋南北朝——刘宁勋（北京出版社编审）、许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隋唐五代——刘占武（北京市一〇一中历史学高级教师）、任雪芳（北京商务印书馆编审）；

宋辽夏金——朱筱新（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元——赵秉崑（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李桂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教授）；

明——高平（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王红（北京教育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清（前期）——李景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

清（后期）——王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历史悠久，上下五千年，重大史事错综复杂，头绪纷繁。限于我们的理论水平和专业水平，本书无论在题目选拟、编纂方法和内容叙写上，不当和误漏之处，自知在所难免，切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批评指正！

本书在即将出版前夕，得到台湾金骏国际机构黄正吉总裁的参与和支持，特此附记。

张习孔　林岷

一九九四　国庆节

编　　例

一、《中国历史大事本末》的编辑时间，上起古代，下迄清亡（公元 1911 年）。全书分为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夏金、元、明、清等八个部分。

二、文中纪时，按年、季、月、日顺序。纪年先帝王年号，再括注公元纪年。帝王年号用汉字，公元纪年用阿拉伯字。

三、各个朝代所用历法不同，不能强求统一。为求真实，本书仍依旧史所记月历排次；全书月份，古代部分系农历，用汉字；清代后期系公历，用阿拉伯字，有关部分并列太平天国历。

四、关于人民反抗运动，按其性质分别书为“起义”或“暴动”（性质明确的），或“起事”（性质不够明确的）。

五、古代地名一般的都括注今址。古今相同者在括号内注明今属何省、市、自治区。

六、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中一人多名者，则于旧说外，括注新说。

目　录

先　秦

秦　汉

目　　录

三国两晋南北朝

隋唐五代

目　　录

两宋

辽

西夏

金

目　录

元

明

目　录

清（前期）

清（后期）

先秦

炎黄阪泉之战

炎、黄即传说时代的炎帝、黄帝，为氏族社会姜姓和姬姓两部落首领，也是华夏各族之共同祖先。

炎帝，又称炎帝氏①、赤帝、烈山氏②，烈又作丽、连，或称魁隗氏③。一说炎帝即神农氏，单称神农。炎帝为身号，神农为世号④，长于姜水之滨，遂以姜为姓。相传其母任姒，有娇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有感神龙于华阳的常羊，生炎帝于列山石室。“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⑤，“始作耒耜教民耕种，其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⑥。

姜水即岐水，在今陕西岐山县南⑦，“初都陈，又徙鲁”，是姜姓部落自西向东迁徙，先居于陈，即今河南淮阳，后又迁居于鲁，即今山东曲阜。

我国传说时代大体来说，经历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几个较原始的阶段。自黄帝至尧、舜、禹，则处于氏族制的末期，已是基本定居农耕。古文献中对此有各种描述，如“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

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⑧。上古之世皆穴居野处，与禽兽杂处，有巢氏时才以木造屋居住，以避禽兽虫蛇的侵害。燧人氏时发明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使吃后人少疾病，结束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有巢氏、燧人氏谁先谁后，因系口耳相传，无从考究，但是从各种记载中所描述上古的社会情形来看，无疑先民们是经历过这一发展阶段的。

伏羲氏，即太皞，故又称太皞伏羲氏，太皞又作大昊。伏羲又作宓羲、庖羲、炮羲、伏戏，或称羲皇。相传在有巢氏、燧人氏之后，发明结绳制罔罟，用以捕鱼猎禽兽。又观察了天象、地理、鸟兽活动之迹和根据身体眼耳口鼻和山泽雷风等各种自然现象创造出“八卦”⑨。又创制“俪皮嫁娶之礼”⑩，即以一双鹿皮为定婚之礼。太皞伏羲氏之后则是神农氏。

神农氏“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⑪。氏族社会原始农耕“刀耕火种”，生产工具很原始，起土工具只是一根尖头木棒。相传神农氏发明的耒就是在尖头木棒上端装一横柄，下端近尖头处装一横木。起土时两手握上端横柄，以足蹬踏下端横木，则入土深，起土多。耜就是在耒下尖端再装上一个骨或石制宽尖器，类似后世之铲形器。使用耒耜耕作，大大提高生产效率，成为农耕中一飞跃性变化。故《周书》中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⑫有其比木棒更先进的生产工具耒耜，即可锄耨开垦荒地，使五谷兴旺。但当时的农耕种植产量并不丰富，所以又有神农氏教民说：“士有当年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

矣。故夫亲耕妻亲绩。”⑬这也就是神农氏时代农耕生产的描述，此时生产力还不高，所生产的农作物还无丰富之积蓄，男人要是不耕种，则当年就无粮食，女人要是不纺不织，则当年就无衣穿。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古代社会的经济生活，就是以“男耕女织”为基础。

相传我国最早以物易物的市场，也是神农氏所发明，所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⑭。虽然男耕女织，才能不受饥寒，但还是比“刀耕火种”的原始农耕有了发展，所以才有多余之物用于市场交换。

神农氏亦是我国传说的中医药发明者。上古原始先民“穴居野处”，农业种植尚未发展，只知采摘野草，树木果实以充饥，或是捕捞螺蚌为食，多误食而发生疾病或中毒，轻者伤残，重者丧命。神农氏之时，除教民以耒耜耕种五谷，辨别土地之干、湿、高、下，种植相宜的作植外，还亲自“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⑮。这反映了我国最早寻找中草药的实践。“毒，并非是指必定毒死人的药物，而是指具有某些医疗作用的药物，古人经过尝用，它们具有无毒、小毒，或较大毒性的分别，这是实践过程中积累的认识”⑯。故神农氏“一日而遇七十毒”则是辨别药性，我国藏医学有“无毒不成药”之说，亦为尝百草辨药性实践之证。

黄帝，又称黄帝氏⑰、轩辕、帝轩、轩黄。“有土德之瑞，土色黄，故称黄帝，犹神农火德王而称炎帝然也”⑱。生于姬水之滨，遂以姬为姓，居于轩辕之丘，故称轩辕氏。国于有熊，又称有熊氏。姬水或说在今陕西岐山东北。相传其母名附宝，亦出自少典氏族，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生黄帝。

“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19]。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正妃，次妃为方雷氏之女女节，后又娶彤鱼氏之女和悔母为妃，此即“四母”，生二十五子[20]。

相传黄帝曾“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21]。这是我国使用铜的最早记载。据一般的推算黄帝所处的历史年代，距今约五千至四千五百年之间。从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约6800－6300年的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一个黄铜片。距今约5000年左右甘肃东乡县林家村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发现最早的青铜刀和青铜碎片。距今约4500至4000年的山东胶县三里河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两件铸成的黄铜锥。青铜的冶炼和青铜器的出现，表明社会由石器时代过渡到青铜时代，标志着社会的巨大变革。社会性质的飞跃，也是关系古代文明起源的大问题。考古资料证明，自黄帝以前，我国已向青铜时代过渡，黄帝时采铜铸鼎之事有可能存在过。

古代社会中所说的文明时代或文明的起源，一般地说，应具备：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城市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四种标志。有这四种标志就证明已经是文明社会，如果这四种标志尚不完善，只能说是预示着文明即将来到。两千多年来所说我国有记载的历史是起自黄帝，《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司马迁亦是从以黄帝为首的《五帝本纪》开始记载。故说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有许多发明创造。相传其中一些就是出自黄帝和其臣。黄帝制作衣冠，使之穿戴有制，造火食，“蒸谷为饭”[22]。黄帝史官沮诵、苍颉作书。苍颉作书契之说，古文献记载颇多。如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

也，初造书契。”表明汉字最早的创造者乃是苍颉。从考古资料证明，汉字的产生非一人所为，而是有很长的发展史。由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到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陶尊上的原始文字，也有一千多年。如果推定黄帝时有能记事的汉字，则又有几百年的发展，故所谓苍颉造字之说不足信。而《世本》中说“沮诵、苍颉作书”，理解为用汉字记事则是有可能性的。故东汉时宋衷注《世本》说：“黄帝之世，始立史官，沮诵、苍颉居其职矣，至于夏商乃置左右，言则左史书之，动则右史书之。故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㉓

黄帝“考定星历”，命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㉔。我国历法起自何时，目前尚无定论，但上古之民因生活需要，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到观察日月星辰变化，植物荣枯，动物出伏而调整生活和生产规律是很早的。距今五、六千年的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陶器上的原始文字“炅”，“𡶒”就是太阳（日）升出后有光（火）和太阳是由山上出现的象形。《尚书·尧典》中记载总命羲和，分命仲、叔、和、仲，“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定四时成岁”。《尧典》是周代史官们根据先辈口耳相授而写成的“观象受时”，所反映时代目前尚无定论，亦必非唐尧之时，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个“地支”相配，组成的六十个“甲子”，也是用以纪日月。商代甲骨文中已用来纪日，夏王朝诸王中有孔甲、胤甲、履癸的名号，证明“甲子”

产生于比夏更早的时代。

作为古代人们“左准绳，右规矩”的算数，起源很早，最初的数字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陶器上就有丨（一）、‖（二）、×（五）、十（七）、][（八）。表示完整从一至九的符号，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器物上就已具备。故黄帝时形成有规律的算数亦有可能。古乐律有所谓“阳律六，阴律六”，即十二律吕，非为伶伦所作，清代人已有辩述㉕。《吕氏春秋·古乐》中说黄帝令伶伦作律，伶伦取竹制成筒，吹出十二律之音。此即笛箫之类的乐器。考古资料证明，早在距今七千多年的河南舞阳贾湖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出土了多孔骨笛，其中一支用猛禽腿骨制成的七孔笛，长22.2公分，尚能吹出悠扬乐音。因此可推测伶伦所作应是改造或总结前人所作，而非始作。黄帝之正妃，西陵氏女嫘（或作累、雷）祖，相传是最初教民养蚕者，被后世尊为蚕神，称“先蚕”。黄帝时还有一些其它发明创造，因传说不一，难以探究。总之，“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㉖，是中华民族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象征。

炎帝自西率领姜姓氏族东迁于陈以后，得到东部一些氏族的拥戴，其势力一直发展到东海之滨。相传族居于东海之滨的夙沙氏（又作宿沙，在今山东胶县一带），是以煮海盐为业的氏族，因不愿臣服炎帝，炎帝则退而修德。夙沙氏族首领，不听夙沙氏族的箕文劝告，夙沙氏之民则杀其首领归炎帝㉗。炎帝尽收其民，遂迁居于鲁，势力进一步壮大。而此时各氏族、部落间都在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地方，于是互相攻伐，暴虐人民。炎帝不能征伐，又率其族人向北迁徙。

当此氏族、部落互相攻战时期，黄帝也率族众由西向东迁

徙。与此同时，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也在发展自己的势力。相传蚩尤是“神农之臣”㉘，或说“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㉙。他“受葛卢山之金而作剑、铠、矛、戟”㉚，即以炼青铜作兵器。在诸多氏族、部落互相攻伐中，黄帝族的势力最强，又深得许多氏族、部落的拥戴。“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㉛。黄帝在得到“诸侯咸归”后，势力又进一步壮大。于是先作两手准备，一方面扩大兵源，训练兵力，另一方面据气候变化耕种五谷，积蓄粮食，安抚四方万民。“熊罴貔貅貙虎”乃是六个以动物为图腾的氏族或部落，也就是归顺的“诸侯”。黄帝在充分准备后，联合一些氏族、部落组成联军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展开激战。黄帝“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阪泉之战的结果是以黄帝为首的氏族联合军战胜。黄帝之志欲统一四方“诸侯”，故战胜炎帝后，尚未行其志，蚩尤又与黄帝争战。

黄帝与蚩尤之战较与炎帝之战还激烈。相传蚩尤有兄弟八十一人，都是“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㉜。这记载使用一些形象化之词来形容蚩尤的“兄弟”，虽难以置信，然说明蚩尤的势力比炎帝大，兵力比炎帝强。所以黄帝只得“征师诸侯”，再次联合氏族、部落的兵力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今河北涿鹿县东南），擒杀蚩尤。或说：“轩辕征师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为大雾，军士昏迷。轩辕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禽蚩尤，戮于中冀，名其地曰绝辔之野。”㉝蚩尤其人，传说不一，有说是三苗之君，有说是庶人之贪者。司马迁于《五帝本纪》中，描述有史可考的最早两次战争，必是有所本。黄帝两战取

胜以后，为华夏各氏族走向部落联盟，最后形成中华民族前身，华夏诸族奠定基础。

注　释

①《左传·昭公十七年》。

②《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国语·鲁语上》。

③《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

④《潜夫论·五德志》、《世本·帝系》宋衷注。

⑤《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

⑥《太平御览》卷七八引《礼·含文嘉》。

⑦《水经·渭水注》。

⑧《韩非子·五蠹》。

⑨《周易·系辞下》。

⑩《世本·作》。

⑪《周易·系辞下》。

⑫⑬《太平御览》卷七八引。

⑭《周易·系辞下》。

⑮《淮南子·修务》。

⑯赵朴珊著：《中国古代医学》第6页，中华书局，1983年。

⑰《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⑱《史记·五帝本纪》《索隐》。

⑲《大戴礼·五帝德》。

⑳《国语·晋语四》。

㉑《史记·封禅书》

㉒《世本·作》张澍补注，《韩非子·五蠹》。

㉓《初学记》卷二一《史传第二》。

㉔《史记·历书》《索隐》引《世本》。

㉕《崔东壁遗书》，《补上古考信录》卷上。

㉖《国语·鲁语上》。

㉗《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

㉘《世本·作》宋衷注。

㉙《路史·后纪四》《蚩尤传》。

㉚《管子·地数》。

㉛《史记·五帝本纪》。

㉜《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龙鱼河图》。

㉝刘恕：《通鉴外纪》。

先秦

尧舜禅让

尧、舜即传说时代的唐尧、虞舜。为氏族社会末期陶唐氏和有虞氏两部落首领。在华夏部落联盟中以尧为首领，因年老将职位主动让给舜，这种原始的民主禅让制为后世史家所称颂。

尧，又称唐尧，陶唐氏，名放勋。祁姓，或说姓伊祁氏①。母为陈丰氏女，名庆都。一说“尧初生时，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长儒之家，故从母所居为姓也”②。初居于唐，后居于陶，都平阳。唐即西周初所灭的唐国，在今山西翼城西。“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③。平阳故城据唐朝李泰等著《括地志·晋州临汾县》记载：“平阳故城即晋州城西面，今平阳故城东面也。《城记》云尧筑也。”今山西临汾市东南即古平阳，距市东七十里的临汾县郭行乡乔村有尧陵，相传即尧所葬之处。陶，后世称陶城，在今山西永济县北。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县东南）。“三战，然后得行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

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当宁居”。由东方向北发展的神农氏，由南方向北发展的蚩尤和由西向东发展的黄帝汇合于涿鹿之野，经过争战之后，黄帝取得胜利，得到各氏族、部落的拥戴被推举为部落联盟首领——“天子”。其后凡有不顺服者都被黄帝征伐，黄帝为华夏部落联盟奋斗一生“未当宁居”。为黄帝统一各氏族，领导部落联盟的部落首领还有少昊、颛顼、帝喾（kù 酷）等。按汉代儒家的观点，万世皆系于黄帝，故黄帝起，似有一个系统的更替世系。所以《五帝本纪》中说：“帝颛顼高阳者，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又“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又“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而舜则为颛顼的七世孙。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就是司马迁编排的“五帝”。而在其它古文献中，对“五帝”的编排又有所不同。《礼记·月令》是：太昊（伏羲）、炎帝（神农）、黄帝、少昊、颛顼④。皇甫谧《帝王世纪》是：少昊、颛顼、高辛、唐、虞⑤。宋胡宏《皇王大纪》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⑥。这些传说时代的古帝王，并没有继承关系，“五帝不同族”是前人早已论定。这些所谓的“帝王”也只是一些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首领，黄帝以下的少昊、颛顼、帝喾、尧、舜、共工、伯益、皋陶、禹等也与黄帝无直接族源关系。

黄帝战胜炎帝和蚩尤以后，“邑于涿鹿之阿（涿鹿山下），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⑦。所谓“迁徙往来无常处”，也是氏族社会中氏族、部落的特征。由血缘氏族的联合到以地域部落的联盟，就是由游牧氏族或部落走向基本定居农耕。故黄帝族之后裔最后来到黄河

中下游流域建立起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部落联盟。经少昊、颛顼、帝喾相继作联盟首领后，逐渐巩固和发展壮大。到尧舜时已成为全国诸氏族一强大部落联盟。

少皞，又作小皞，皞又作昊。称金天氏⑧，又称穷桑氏⑨，名挚。“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⑩。“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⑪。以鸟为图腾，崇拜鸟是古东夷部落各氏族之特征，这已为山东大汶口文化的考古出土的器物上鸟形刻划或造形所证明。故少昊是东夷部落首领而加盟华夏部落联盟的。

颛顼，称高阳氏。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为民师而命以民事”⑫，即以人民之事来命官。“有才子八人：苍舒、隤敳、梼戭、大临、尨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⑬。所谓“才子八人”，即八个氏族首领加盟颛顼部落。颛顼氏族可能为神农氏东迁于鲁后拥戴神农的“诸侯”之一，出自古东夷。

帝喾，喾又作俈，称高辛氏⑭，偺，又作俊。一说“高辛地名．因以为号。喾，名也”⑮。或说“帝俈高辛，姬姓也，其母生见其神异，自言其名曰岌。龆龀有圣德，年十五而佐颛顼，十三登位，都亳，以人事纪官也”⑯。亳在今河南偃师县。也“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⑰。这“才子八人”，即是两个大氏族的八个支族首领加盟帝喾部落。帝喾之族可能出自黄帝族之后裔。

舜，又称虞舜，有虞氏。名重华，又名都君⑱，姚姓。其父名瞽叟，“瞽叟姓妫。妻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故姓姚”⑲。姚墟在古雷泽县东（今山东荷泽东北）。《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

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舜父瞽叟顽，母嚚，弟象傲，皆欲杀舜，舜顺适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相传舜都蒲坂在今山西永济西，历山所说甚多，或说在今山西永济，或说在今山西翼城，或说在今山东济南市，或说在今山东荷泽，或说在今浙江余姚。寿丘在今山东曲阜市。

我国氏族社会发展到尧舜时期，大区域的部落联盟已是相当完善和强大。以尧为首领的华夏部落联盟，不但能紧密地团结各氏族，而且还实行原始民主制，或称军事民主制。由于尧领导有方，这个部落联盟才得以发展壮大。所以《尚书·尧典》中说尧是“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里的“百姓”乃是指在加盟的各氏族、部落首领。

《孟子·滕文公上》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此描述是尧舜时期黄河中下游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自然景观。考古发掘资料证明，河南龙山文化是属于由氏族制向奴隶制过渡的一种文化。这一类型的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陕西东部、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在河南东部和河北南部也有发现。一般将这种文化称为“华夏文化”。典型的文化遗址有：河南洛阳王湾三期，临汝煤山，山西夏县东下冯襄汾陶寺等等。经测定这一类型文化遗址年代为公元前2500至1900年，这段时间与历史时期的尧、舜、禹基本相同。这些遗址的分布地域也与传说中的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后氏活动地域基本一致，这些地域也是当时水患最多的地域之一。

尧欲选联盟首领的继承人，征询在联盟任职的各氏族、部落的首领之意，放齐说："嗣子丹朱开明。"尧认为丹朱"顽凶，不用"。灌兜荐举共工，尧说："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⑳《帝王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㉑尧子丹朱是个"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额额（无休止），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绝）厥世"㉒。这样一个骄奢淫逸，无所不为的凶顽子弟，尧当然不用。共工相传是炎帝之后裔，世代作水官，尧时之共工是共工氏族的首领。颛顼时之共工曾和瑞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㉓。

相传当时洪水不断，尧在联盟议事会上说："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㉔与会者都说鲧可以。尧认为鲧性很戾，易违负教命，危害同族，不能用。主管四方的"诸侯"四岳认为无他人可用，不妨让鲧试试，尧从四岳之意用鲧治水，结果九年都不成功。

尧年老欲让位，在联盟议事会上要众人举荐继位者，众人举荐处于民间的鳏夫虞舜。尧问其人如何？四岳说舜为盲者之子，虽父顽，母嚚，弟傲，但能和睦以孝，厚道为善，不奸猾，于是尧以二女为妻。时舜年三十，尧以二女妻之以观其内，又使九男同相处以观其外。《列女传·有虞二妃》载："有虞二妃，帝尧二女也，长娥皇，次女英。"舜被举荐后助尧治理联盟之事二十年，尧使摄政。摄政八年尧死，舜欲将联盟首领让给丹朱，而各氏族、部落首领都拥戴舜，于是舜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

尧时的华夏部落联盟中，加盟的氏族中如禹（夏后氏）、皋陶（gāoyáo 高姚。偃姓始祖）、契（xiè 谢。商族始祖）、后稷（周族始祖）、伯夷（齐太公始祖）、伯益即伯翳（秦、赵始

祖）、彭祖（夏商时封于大彭，亦称彭祖）、夔、龙、倕等，都有具体分工职事。舜在议事会中与四岳商议后，命禹为掌平水土的“司空”，后稷为掌耕种五谷的农官，契为掌五教的“司徒”，皋陶为掌五刑的狱官，倕为掌百工的工官，伯益为掌山泽的虞官，伯夷为掌祭祀的礼官，夔为掌教音律的乐官，龙为掌纳言的谏官。

舜还向部落联盟议事会举荐高阳氏时的“八恺”和高辛氏时的“八元”，即很早就加盟的十六个氏族首领，到尧时应是这十六个氏族之后裔在联盟中任职。“八恺”分管按时序治理土地，“八元”分管四方传布五教。同时又“流四凶族，浑沌、穷奇、梼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魑魅”[25]。浑沌是帝鸿氏时的不才子，其后裔即讙兜；穷奇是少昊氏时的不才子，即共工；梼杌是颛顼氏时的不才子，其后裔即鲧；饕餮是缙云氏时的不才子，其后裔是三苗。所谓“四凶族”，就是四个氏族、部落首领，舜将其流放到离联盟所在的中原地区以外较远之地，谓其去抵御山精海怪。舜的举荐“八恺”、“八元”和流放“四凶族”，反映出华夏部落联盟在融合、分化、争斗中重新调整组合，巩固联盟的势力，向统一全国过渡。

鲧受尧命平治洪水，是以共工曾用过的“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26]。害人的老方法，即是铲平高地，填高低地筑堤堵水。而鲧治水后，洪水仍横流泛滥，被舜以“治水无状”之罪放逐羽山（今江苏赣榆县西南）。舜征询治水的人，四岳举荐在联盟任“司空”的禹。相传禹是鲧之子，受命治水时年方二十。“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27]，吸取鲧“功之不成”的经验，采用“疏川导滞，钟水丰物”[28]的方法，在契、后稷、皋陶、伯益等协助下，经十三年“以告成功于天

下，天下于是太平治”㉙。于是舜仿尧之例禅位于禹。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苍梧即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南，零陵在今宁远东南。相传舜的二妃娥皇、女英随舜南巡。舜死后，娥皇、女英亦死于江、湘之间，“谓之湘君”㉚。

《尚书·尧典》中记载尧总命羲、和、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和仲、和叔“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定四时成岁”㉛。这是命羲、和、天、地二官及四子“观象受时”制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天，置闰月和分一年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之分，首先要定“二分二至”，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而定二分二至的标准是鸟、火、虚、昴四星，这四星在《尧典》中都有明确记载，这种依靠观察斗柄和一些恒星出没、南中，来决定时令季节，制订历法的“观象授时”方法，是否产生于尧舜或更早的黄帝时期，目前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史中，尚无定论。而《尧典》又是周代史官们根据先辈们口耳相授而写成的，很难确定其可靠之时代。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反映日食、月食、星辰的天象资料，有反映年、月、旬、日的历法资料，还有大量反映气象的资料，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有“二分二至”的资料。从大量有关农业的资料来看，商代只有春种，秋收二季，似春夏秋冬四时尚未明确划分。当然商代甲骨文只是一种祭祀占卜和与此有关的记事刻辞，有一定的局限性，不能以此证明《尧典》中所记载的时代性，且附于此以备参考。

注　释

①《史记·五帝本纪》《正义》。

②《史记·五帝本纪》《索引》引皇甫谧云。

③《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纪》。

④参见《吕氏春秋·十二纪》《淮南子·天文》。

⑤《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⑥参见清朝梁玉绳著《史记志疑·五帝本纪》。

⑦《史记·五帝本纪》。

⑧《左传·昭公元年》。

⑨《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⑩《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帝王世纪》。

⑪⑫《左传·昭公十七年》。

⑬⑭《左传·文公十八年》。

⑮《史记·五帝本纪》《索引》引宋衷说。

⑯《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

⑰《左传·文公十八年》。

⑱《孟子·万章上》。

⑲《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孔安国说。

⑳《史记·五帝本纪》。

㉑《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

㉒《尚书·益稷》。

㉓《淮南子·天文》。

㉔《史记·五帝本纪》。

㉕《左传·文公十八年》。

㉖《国语·周语下》。

㉗《史记·夏本纪》。

㉘《国语·周语下》。

㉙《史记·夏本纪》。

㉚《太平御览》卷一三五引《列女传》。

㉛《左传·昭公十七年》。

先秦

大禹治水

禹，亦作帍。称夏禹、大禹、伯禹、戎禹。名文命，又名高密，姒姓。夏后氏首领，夏王朝建立人，“父传子，家天下”之开创者。相传其父即尧时治洪水失败的鲧，鲧妻有莘氏女，名女志，或说名修己①，生禹于西羌。或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②。广柔在今四川汶川西北，石纽山在县西。尧封禹于夏，“夏者，帝禹封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③。外方即外方山，今河南登封嵩山，阳翟即今禹县。娶涂山氏女，名女娇，生子名启。

涂山氏之族居地，古文献中有不同之说。因涂山之名在史籍中有多处，禹娶涂山氏就有今浙江绍兴市西北之涂山④，今四川巴县东⑤，今安徽怀远县东⑥诸说。这些说法与禹活动之地不合。《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周本纪》中记载周武王灭商后，武王因失眠对周公说：“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

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雒汭、伊汭”即洛水入黄河处，“三涂”即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伊河北岸。“岳”即太行山，“天室”即嵩山。“有夏之居”据《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故此地区是夏禹最早活动之地，涂山氏族居地应是伊水近处的三涂山，不会是距“有夏之居”很远之地。

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各氏族、部落组成的联合体——华夏部落联盟，发展到尧舜时已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一个集团。从组织结构上看，已具有最早国家的形势，从军事实力上看，能够和驩兜、共工、三苗、鲧这样一些较大氏族、部落争斗中战胜而将其列为“四凶族”逐放出中原地区⑦。从所控制的地域上看，除以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外，正在向四周发展，舜晚年之南巡狩，死于苍梧之野（今湖南宁远县南），说明其势力已跨长江以南地区。当时最大危害是洪水泛滥，如不治理水患，则会危及这个强大部落联盟的巩固。尧作为联盟部落的首领，首先是治理水患，故在联盟议事会上提出：“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⑧主管四方事务的“四岳”官举荐鲧。尧对鲧有所认识，说鲧是“方命圮族”不可用⑨，即不听教命，易危害同族。“四岳”请以试用，于是尧命鲧治理洪水。鲧以共工曾用过的“欲壅防百川，堕高堙庳”⑩，这是失败的方法，即铲平高地，填高低地的老方法筑堤堵水。鲧不仅仍用此方法，还加高筑堤来堵水。相传“鲧作城”⑪，与此有关。结果是九年“功用不成”，被舜以“治水无状，乃殛于羽山以死”⑫。羽山在今江苏赣榆县西南，《山海经·南山经》郭璞注：“今东海祝其县西南有羽山，即鲧所殛处。”

鲧死后，舜举荐禹续鲧之业治水。禹为人“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⑬。受命治水后，邀请联盟中任各种职事的一些氏族、部落首领，如皋陶（gāoyáo 高姚）、契（xiè 谢）、后稷、伯益等人协助治水平土。“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⑭。总结鲧治水失败的教训，首先是命各地“诸侯”率领人民参加治水平土，然后禹率人“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五帝本纪》）。即勘察高山，大川水的自然情形，对山川泽薮作测量，树立标记，何山应治理，何川该疏导，然后制订“疏川导滞，钟山丰物”的计划。这是一个变水患为水利的方法，不但能使横流泛滥成灾的水经疏导归于河川，同时还可利用泽、薮、洼地聚积一定水量，在天旱时有丰富水源供给百物使用。尤其为后世人们所称颂的是禹治水患同时还“尽力乎沟洫”⑮，即在田间出沟洫，既能排除积水，又能灌溉农田。

大禹治水平土地区，如据《尚书·禹贡》，《史记·夏本纪》所载来看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的山和水。几乎是现在大半个国土。治理的结果有《禹贡》记载：“九州攸同，四隩（方）既居，九山刊（除草木）旅（能设祭坛）、九川涤（疏通）源、九泽既陂（障）、四海会同。”这是战国时期人们的愿望。现存《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大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比较丰富，也渴望全国统一，因此根据口耳相授传下来的《禹贡》作了意向性加工。“九州”之说春秋以前尚无，而且《周礼》、《尔雅》、《吕氏春秋》中所列的“九州”也与《禹贡》中名称、地区有所不同。

尧、舜、禹时期的华夏部落联盟主要活动是在黄河中下游

流域，中原是中心区域。从有关尧、舜、禹活动的记载和考古的资料证明，今河南西部伊水、洛水流域，山西南部的汾水流域，远在四千年前就是氏族、部落较集中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人口多，而且不少的平原或丘陵地已经开发为农耕地。每当洪水季节，黄河及其支流就要发生泛滥。《孟子·滕文公上》描述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这种自然景观，应当是有根据的。故大禹治水平土的中心是在伊水、洛水流域和汾水下游流域。在大禹精神感召下，黄河中下游流域各氏族、部落也在本地区治水平土。据《禹贡》所载，可以认为当时所治的山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和山东五省境内。

在陕西境内有：岍山，在今陇县南。岐山，在今岐山县。荆山，在今富平县。梁山，在今韩城市西北部。太华山，在今华阴市。

在山西境内有：雷首山，在今永济县。太岳山，在今霍县。析城山，在今阳城县西南。恒山，在今浑源县。太行山，跨今山西、河北两省，其主峰在今山西晋城县。

在河南境内有：王屋山，在今济源市西北。抵柱山，在今三门峡市。熊耳山，在今卢氏县。外方山，即嵩山，在今登封县。桐柏山，在今桐柏县。在山东境内有：陪尾山，在今泗水县。

大禹治水的目的是疏导横流，使其畅流无阻，由小河归大河，经黄河入海，或是引向大泽积蓄。故所治理的水当是与黄河有关的河流，这些河流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四省境内。

在陕西境内有：沣水，古沣水发源于秦岭，北流经长安入渭水，旧河道今已淹没。渭水，发源于今甘肃渭源县西鸟鼠山，东流入陕，汇集沣水，泾水、漆水、沮水经渭南、华县、孟源入黄河。

在山西境内有：汾水，发源于今宁武县管涔山，经山西中部于河津县西南入黄河。漳水，北源为清漳水，发源于今昔阳县；南源为浊漳水，发源于长子县。两水在河北涉县境内汇合向东，流经大名县入卫河，古漳水分三道，今存二道。

在河南境内有：洛水，发源于今陕西洛南县西北冢岭山，南流入河南，在洛阳与瀍（chán 缠）、涧二水汇合，经偃师县与伊水总汇合，流经巩县入黄河。伊水，发源于熊耳山，向东北在偃师与洛水汇合。济水，发源于今济源市西王屋山，向东南穿过黄河入山东，由山东西北入海。古济水下游故道后来为黄河所夺，已不存在。

在山东境内有：雝（yōng 雍）水，古雝水为济水支流，流经荷泽县。沮水，为雝水支流，两水在荷泽县汇合后流入雷夏泽。古雝水、沮水故道已不存在。

《禹贡》中记载一些大泽，相传也是大禹治水的工程，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内有：

荥泽，在河南荥阳北，古与济水和黄河相通，西汉以后渐淤塞。

孟诸泽，在河南商丘东北和虞城西北间，元朝后渐淤塞。

雷夏泽，又称雷泽，在山东荷泽市东北，古雝水注入此泽，唐朝以后渐淤塞。

荷泽，在山东定陶东北，唐朝以后渐淤塞。

大野泽，在山东巨野北，古济水流经此，宋以后渐干涸。

大陆泽，在河北隆尧、巨鹿、任县之间。太行山诸水汇集此泽中，下泄入漳水。古大陆泽占地很广，故又称广阿泽或巨鹿泽，后渐淤塞，不复存在。

大禹凿龙门也是治水一大工程。龙门山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今陕西韩城市北，黄河自北南流至此为一峡谷，禹于此凿开扩大流量⑯。一说在今河南洛阳市南⑰。

大禹治水的事迹有许多都是传说，但是，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公而忘私的精神，给中华民族树立了一个光辉形象，鼓舞着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大禹是治水平土的领导者，在治水的过程中，是“身执耒锸，以为民先”⑱。即手执起土之耒锸，亲自参加，给参加治水的人民作出榜样。墨子称道说：“禹亲自操橐耜而九（纠）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⑲禹这样沐雨栉风，连腿上的汗毛都磨光的治水，是为了安置好各地氏族、部落，不再受水患之苦，他“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⑳，这种一心为民大公无私的精神一直为后世人所颂扬。孔子说：“禹，吾无间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㉑即大禹是个无可非议的人，吃得很简单，而以丰富的牺牲来祭祀鬼神，穿得简朴，而祭祀时能穿上庄重之礼服，住得很简陋，而能全力治水平土开沟洫。

东周时期，周景王（前 544 - 前 525 在位）命刘定公去颍地慰劳赵孟，住在洛汭（今河南偃师县洛、伊河交汇处）岸边。刘定公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远绩禹功，而大庇民乎！”㉒即歌颂大禹的功劳、德行，没有大禹，我们都要变成鱼，之所以我与你还穿戴着礼服来治民，面对诸

侯，都是大禹之力量，你何不永远地继承禹的功绩而更多地爱护人民？这是刘定公触景而生发的对大禹治水功劳的赞美之辞。

大禹为治水平土在外奔波十三年终于大功告成。"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因大禹治水有功，功德甚大，"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23]。

以尧舜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发展至禹时，因禹领导中原地区各氏族、部落人民，在黄河中下游流域治水平土成功，舜让位给禹。而禹在治水平土过程中一心为公，艰苦奋斗的精神又深深感动了各地区的氏族、部落，所谓"声教讫于四海"[24]，都自动起来治理本地区的水患，故治水之迹遍于"九州"，禹因此而得到各地区氏族、部落首领和人民的拥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夏王朝建立，禹都于何地？《史记·封禅书》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正义》："《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又《汲冢古文》云："禹都阳城。"平阳在今山西临汾西南，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自三十年代初，从田野考古来探索夏朝遗迹的工作就已开始，到五十年代又集中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汾水中下游流域。1975 年至 1981 年，在登封县告城镇西发掘称为"王城岗遗址"，是龙山文化遗存，文化层初步判定为五期。在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两座相连夯土城堡遗址，测定年代距今 4000 ±

65年，相当于公元前2050年左右。在告城镇北侧发现自春秋至汉，唐连续使用过的古阳城城垣遗址，出土战国时期的陶器上有“阳城”、“阳城仓器”陶文戳记㉕。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从年代上看，此“王城岗遗址”相当于古文献中记载夏代早期的纪年，“禹都阳城”或“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有可能就是在告城镇。附此以备考。

注 释

①《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

②扬雄《蜀王本纪》、《史记·六国年表序》《集解》，引皇甫谧曰：“孟子称，禹生石纽，西夷人也。”

③《史记·夏本纪》《正义》。

④《越绝书》卷八《记地传》。

⑤《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⑥《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当涂”注。

⑦《左传·文公十八年》。

⑧《史记·五帝本纪》。

⑨《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作“负命毁族”。

⑩《国语·周语下》。

⑪《世本·作》。

⑫《史记·夏本纪》。

⑬《大戴礼·五帝德》。

⑭《国语·周语下》。

⑮《论语·泰伯》。

⑯《水经·河水注》。

⑰《汉书·沟洫志》，《淮南子·人间》。

⑱《韩非子·五蠹》。

⑲《庄子·天下》。

⑳《史记·夏本纪》。

㉑《论语·泰伯》。

㉒《左传·昭公元年》。

㉓《史记·夏本纪》。

㉔《尚书·禹贡》。

㉕《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载《文物》1983年第3期。

先秦

少康中兴

少康，夏朝第六位国王，因恢复夏王朝，使其继续发展，后世史家称为“少康中兴”。

我国氏族社会末期，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建立起的各氏族、部落联合体——华夏部落联盟，在以尧、舜相继为首领时期逐渐发展壮大。因黄河中下游流域洪水横流，水患不止，尧命鲧治水，九年不成功，鲧被放逐而死，舜举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鲧治水失败之教训，采用“疏川导滞、钟水丰物”①的方法，“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②，终于治理好水患，深得天下人的拥戴，舜将联盟首领让位给禹。此时我国正处于禹统一全国，建立王朝和华夏族形成的前夕。各区域的氏族、部落联盟或一些大部落之间兼并战日益加剧。以禹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在向长江中下游流域发展势力时，受到想向黄河流域发展的三苗部落阻挡，双方经长期战争，三苗失败，禹之势力向南延伸。地处东方的东夷部落势力也很强，禹伐三苗时，曾想联合东夷，可是“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③。虽如此，禹也未伐过东夷。华夏部落联盟中的契、皋陶、伯益等，都是

出自东夷的氏族首领，又是助禹治水有功之臣，故东夷在禹战胜三苗后也就归服于禹。对江南和东夷统一后，“禹南省方，济于江”④，巡视到淮河东岸，“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⑤。涂山又名当涂山，在今安徽蚌埠市西。“涂山大会”标志禹向天下诸侯宣告夏王朝的诞生。其后禹南巡至越地（今浙江省）的苗山（又称茅山、防山，在今绍兴市境内）。“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⑥。这标志着禹开始行使国王权，也是夏王朝天子以威力诛杀诸侯之始。相传禹死后就埋葬在苗山。

禹生前仍按联盟传统，由议事会中举荐皋陶为继位人，皋陶早死，又荐伯益。禹死后，发生“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⑦。“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⑧。于是“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避）居箕山之阳”⑨。箕山在今河南登封县东南。部落联盟时期原始民主的“禅让制”此时已不再适用，氏族社会那种“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大同”世界已经结束，取代的是“父传子，家天下”，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或传说“益干启位，启杀之”⑩，反映这时期形势发展，不容逆转。

启，又称夏后伯启，夏后启，或作夏后开（避汉景帝刘启讳，以开代启）。母，涂山氏之女，名女娇，生启四日禹启行治水，遂名启。继位后，“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⑪。有扈，又作有鄠、有户，姒姓诸侯。今陕西户县一带为其活动中心，舜、禹时因其势力向东发展，为禹所伐。相传“禹攻有扈，其用兵不止”⑫。禹曾三战而有扈氏不服，“禹于是修教三年有扈氏请服”⑬。有扈氏不服启的原因，或说是

"为义"，因为"有扈，夏启之庶兄也。以尧舜举贤，禹独与子，故伐启，启亡之"⑭。无论有扈氏是要与启争夺王位，或是"为义"，都反映出夏王朝建立之初政权尚不稳定。夏启与有扈氏在甘之战，也是夏王朝的第一次大战役。夏启在召"六卿"用兵时誓词中指责有扈氏的罪名是"威侮五行，怠弃三正"⑮。此"五行"是上天之意，"三正"是臣正，人臣之意。战于甘的甘地在今何处？历来注疏家认为在今户县境内，近年来又有河南洛阳市南、郑州市西、甘水沿岸等诸说，难以判定。甘之战以有扈氏被灭而结束。其后有"启征西河"⑯之说，武观以西河叛启，启命彭伯寿率师征讨，"武观来归"⑰。武观，又作五观。西河在今河南滑县和浚县一带。或说武观为启之子，"忘伯禹之命"⑱，故启命彭伯寿征讨，不可信。

启死，子太康即位，迁都于斟寻（今河南巩义市）。"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为羿所逐，不得返国"⑲。《楚辞·离骚》中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即少康不遵禹，启之乐，放纵自娱，不思患难，不图后世，结果失国，至使兄弟五人居住闾巷。《尚书》佚篇有《五子之歌》。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书序》有："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孔颖达疏其意是：太康与昆弟五人畋猎于洛水之南，为羿所逐，不得返国，其母在洛水边等待，作歌以叙其事。

羿，即后羿，又称有穷后羿，为有穷国之君⑳。相传羿是一个善射的氏族，出自东夷部落，故又称夷羿。其先世世代皆称羿，帝喾时，羿被命为"射正"，赐与彤弓素矢，封于鉏（今河南濮阳西南）㉑。"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

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邱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擒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为天子”㉒。这是一个含有历史资料的神话故事，所谓“十日并出”即是一次烈日延续很长时期的大旱，久旱不雨，至使“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我国民族社会中人们抵抗水旱自然灾害的能力很低，故往往要加以神化。尧时的羿是被后世称为抗旱英雄，“帝尧之臣”，即本于此。经尧、舜、禹入夏时，羿是有穷氏（族居地在今河南东北部）首领，即所谓有穷国君。

太康即位后，只知“盘于游田，不恤民事”，将王朝政事怠废。于是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㉓。穷石在今河南孟县（一说在巩义）。所谓代夏政，就是用武力阻止太康返回夏都，以有穷来替代夏王朝，但羿并未将夏王朝完全推翻。太康被阻于洛水之南，流落在外，其后定居一地，此地即秦汉时的阳夏，后改称太康县，即今河南太康县。太康被羿阻返的同时，在斟寻的夏都中由太康之弟仲康继位为夏王，一批忠于夏的臣僚扶佐的小朝庭，仍然在行使王权。《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有：“《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这是我国最早日食的文字记载，“日月交会谓之辰”，“房”是指日月各自所处之位置。“辰不集于房”，即日月交会未进入正常位置。日食时天突然黑暗，至使乐师们奏起鼓，农官驰，百姓们也奔跑。造成这次混乱局面是天文官羲和的失职。据《尚书·胤征》中载，此次日食就是发生在仲康时。因羲和沉湎于酒，迷乱本姓，擅离职守，未及时观察天象，废时乱日。仲康命掌管六军的胤侯率兵前去征讨羲和，按罪正法。

仲康死，子相继位，在王室诸大臣和一些忠于夏的诸侯保

护下，迁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依同姓诸侯斟灌氏、斟寻氏”㉔。两个姒姓诸侯所封地为：斟灌氏在今山东寿光，斟寻氏即太康建都的斟寻（今河南巩义），后羿取代夏政后，斟寻氏被迫迁去与斟灌为邻（今山东潍坊市）。因二斟所处是东夷之地。故相迁居帝丘后，还发生过征淮夷、风夷、黄夷，于夷亦曾朝相㉕。《后汉书·东夷传》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这些所谓“近海之夷”，早在禹时就臣服于夏，太康政衰，后羿代夏后，有的夷人叛夏，故才有夏后相征伐之事。

后羿取代夏政后，“持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尨（móng 茫）圉而用寒浞”㉖。后羿也是不恤民事，沉淫田猎，不用助他取代夏政的四个“贤臣”㉗，而用寒浞。浞原是寒国（今山东潍坊市东北）一奸诈子弟，被国君伯明逐出寒国，为羿收养。信而使之，以为知己。寒浞乘机行媚于羿之内室，贿赂于同僚，愚弄欺诈人民。而羿只乐于游田，浞则暗中取代有穷国之准备，内外无人敢揭露其阴谋，而羿仍不改游田之乐，结果从田猎返回时被家众杀后烹其肉，让羿子食，其子不忍食父肉，被杀于国门。寒浞遂占其羿之妻室，后生二子，长名浇，次名豷（yì 意）。及长，亦是奸诈伪作而不德于民。寒浞命浇率师灭斟灌氏及斟寻氏，使浇居于过（今山东掖县北），使豷居于戈（今河南杞县与太康一带）。

迁居帝丘的夏后相，仍在行使王权，对有穷国寒浞是一种威胁，故灭二斟氏后，又命浇率师至帝丘杀相。相妃后缗，是有仍氏之女，已有身孕，从墙穴中逃归有仍氏（族居地在今山东济宁市）生子即少康。及长，有仍君命为主管畜牧之牧正，以避免浇加害。后浇知少康乃相之子，遂派其臣椒至有仍寻

杀，少康逃至有虞（族居地在今河南虞城），有虞君虞思命为主管膳食的庖正，以此避浇之害。又以二女嫁少康为妻，“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㉘。纶地在虞城东。少康能德于众，开始谋划恢复夏王朝的统治，召集夏王朝之遗众，安抚原有的职官。派女艾潜入过监视浇之行动，派子季杼入戈诱惑豷。

寒浞杀羿父子时，夏臣伯靡逃奔有鬲氏（族居地在今山东乐陵南），以夏后氏之名召收斟灌，斟寻二氏之余众，重新武装配合少康，先灭居过的浇，季杼杀豷灭戈，寒浞亦被杀，有穷灭亡，遂“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㉙。于是夏的臣众奉少康从纶回归夏都，诸侯知少康恢复夏，都前往朝贺。至此被有穷后羿取代约八年，寒浞杀后羿继续约三十二年，共四十年左右的夏王权，经三世三王又得以在全国恢复行使。

少康复位后，为安定民心，先是“复田稷”㉚。稷是管理按时播种五谷之农官。《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注：“弃，废也。衰，谓启子太康废稷之官，不复务农。”周族始祖后稷，尧舜时任稷官，助夏禹治水。太康“不恤民事”。

废稷官，故少康恢复其官。少康又“使商侯冥治河”㉛，治河即治水。《国语·鲁语上》有：“冥勤官而水死。”韦昭注：“冥，契后六世孙，根圉之子也，为夏水官，勤于其职而死于水也。”契是商族始祖，尧舜时为掌五教之“司徒”，助夏禹治水。入夏后契子孙封为商侯，故少康使冥治水。自此夏王朝渐兴旺，后世史家遂称“少康中兴”。

注 释

①《国语·周语下》。

②《史记·夏本纪》。

③《战国策·魏策二》。

④《淮南子·精神》。

⑤《左传·哀公七年》。

⑥《韩非子·饰邪》。

⑦《史记·夏本纪》。

⑧《孟子·万章上》。

⑨《史记·夏本纪》。

⑩《晋书·束皙传》引《竹书纪年》，又《战国策·燕策一》，《史记·燕召公世家》。

⑪《史记·夏本纪》。

⑫《庄子·人间世》。

⑬《说苑·政理》。

⑭《淮南子·齐俗》高诱注。

⑮《尚书·甘誓》。

⑯古本《竹书纪年》。

⑰今本《竹书纪年》。

⑱《逸周书·尝麦》。

⑲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孔传。

⑳《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

㉑《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

㉒《淮南子·本经》。

㉓《左传·襄公四年》。

㉔《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

㉕古本《竹书纪年》。

㉖《左传·襄公四年》。

㉗《左传·襄公四年》杜预注。

㉘㉙《左传·哀公元年》。

㉚㉛今本《竹书纪年》。

商汤灭夏

商汤，又称成汤、武汤、汤、武王、唐、天乙。殷墟甲骨文作大乙，周原甲骨文称成唐，周金文中亦称成唐①。又名履。《竹书纪年》："汤有七名。"②殷墟卜辞中又称高祖乙，商先公示癸之子③。商王朝的建立人。

商族自始祖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之后，历世首领皆为夏的诸侯。先公冥，甲骨文作季，曾作夏水正，在治水中殉职，故《国语·鲁语上》谓："冥勤其官而水死。"

商是一个古老氏族，起源地区至今未决。自东汉郑玄说："商国在太华之阳。"④历来多从其说商族起自西方。近代以来又有东方说⑤、东北方说⑥、江浙（南方）说⑦。其中东方说主要是起源于今山东地区，由东向西而迁徙，定居于今河南商丘，以地为名称商，史学界中同意此说者较多。甲骨文中证明商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自五十年代末，在山东泰安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以后，考古学界和古史学界大多认为大汶口文化是古东夷文化或传说中的少昊氏族的部落文化。在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岳石文化陶器中有鸟的造型或纹饰，不少

的学者以此为据探讨商氏族可能出自古东夷部落或少昊部落。

西方说主要认为起源于今陕西地区，目前仍是学者探讨的问题。东北方说主要认为起源于今辽河流域，也是目前学者探讨的问题。江浙（南方）说目前影响不大。

司马迁根据古史传说资料写成《史记·殷本纪》，是较完整地记载商族和商王世系的古文献。开篇即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于百姓，百姓以平。""玄鸟生商"的神话传说最早见于《诗经·商颂》，《玄鸟》中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彼域四方。"《长发》中说："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达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是春秋时期宋国人歌颂祖先业绩的叙事诗，是根据先人口耳相授流传下来的资料所作，对其祖先的来历已不清楚，只知是古帝命玄鸟所生之商，此商系泛指商族。"宅殷土芒芒"则是形容商族在迁徙过程中发展壮大，"武汤"则是指商汤，诗中未说明商就是契。《长发》中的"玄王桓拨"才是指契为玄王。《国语·周语下》："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鲁语上》："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汤。"《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司马迁在《殷本纪》中编排了契父为帝喾，三国时的谯周就认为："契生尧代，舜始举之，必非喾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与宗妇三人浴于川，玄鸟遗卵，简狄吞之，则简狄非帝喾次妃明也。"⑧其后史家信疑兼有，故商族

先祖自契以上无世序可考。"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说明已是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夏王朝产生前夕，契非处于"只知其母"的母系氏族时代。

《殷本纪》："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此商先公世序，未完全得到甲骨文中证实，卜辞中有祭祀土、季、王亥、上甲、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即《殷本纪》中的相土、冥、振、微、报乙、报丙、报丁、主壬、主癸。微以下六世世序《殷本纪》中报乙、报丙、报丁排列颠例。《国语·鲁语上》称"上甲微"则微是名。

卜辞中又有王亘一名，《楚辞·天问》中有"该秉季德"，"恒秉季德"。王国维认为"王亥与上甲微之间当有王恒一世"⑨。商之先公在古文献中有的亦有史迹可寻。如"契居蕃，昭明居砥石"（《世本·居》）；"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颂》）；"取于相土之东都"（《左传·定公四年》）；"相土居商丘"（《世本·居》；"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襄公九年》）；"相土作乘马"（《世本·作》）；"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管子·轻重戊》）；"冥勤其官而水死"（《鲁语上》）；"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山海经·大荒东经》引《竹书》）；"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鲁语上》）。

《殷本纪》："成汤，自契至汤八迁。"商汤灭夏前的八次迁徙的具体地方，西晋皇甫谧认为："史失其传，故不得详。"⑩近代以来学者多有探讨，仍未得全部解决，近几十年来又根据先商考古文化在今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区作进一步探求，目前仍无定论。

夏王朝历十六世，传至第十七个夏王履癸时已有约五百年（约前21世纪－前17世纪）的历史。履癸名桀，是夏王朝最后一个君王，被历代史家列为我国古史上王朝暴君之首。《史记·夏本纪》说："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孔甲是夏王朝第十四个君王，桀的曾祖，他"好方鬼神，事淫乱"（《夏本纪》）。夏王朝末期已是诸侯叛离，桀又不修德而压榨掠夺百姓。古文献中对桀暴虐荒淫记载较多，其中有的是不实之词，但有的也是事实，如为得到美女而任意征伐诸侯，如伐有施氏（在今山东滕州）得妹喜，伐岷山氏（即有缗氏，在今山东金乡）得琬、琰二女。三女争宠而乱朝政。还任意伐灭诸侯，如"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会诸侯于仍，有缗氏逃归，遂灭有缗"（今本《竹书纪年》）。有仍氏故地在今山东济宁。"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左传·昭公十一年》）。为寻乐，"夏桀作倾宫、瑶台、殚百姓之财"（《汲冢古文》）⑪。又拒谏杀大臣，如"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而杀之"（《韩诗外传集释》）。而"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吕氏春

秋·先识》)。

夏桀还自比太阳，谓“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吾亦亡矣”(《尚书大传》)⑫。故民皆咒骂他“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在众叛亲离，民心怨怒的形势下，商汤则准备伐夏。

商汤欲得民心，首先是修德。“汤修德，诸侯皆归商”(《史记·夏本纪》)。“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史记·殷本纪》)。这就是历史上“网开三面”成语的根据。商汤修德，深得民心。故《墨子·非命》中谓“汤时诸侯与之，贤士归之”。

商汤在争取民心归顺后，首先对不归顺的诸侯进行征伐，第一个被征伐的就是与商为邻的葛伯，其事在《孟子》中有详细记载：“孟子曰：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为何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葛伯祭祀与否本与商关系不大，汤为其扩大势力，作灭夏准备则藉口灭葛，这就是汤“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开始。接着对拥夏的势力进行征伐，如《诗经·长发》记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韦，即豕韦，彭姓，夏诸侯国。顾，己姓，亦是夏诸侯。昆

吾，己姓，为夏伯。诗中之意是商汤伐灭韦豕和顾两夏的属国后，遂伐昆吾，夏桀。《史记·殷本纪》："当是时，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

商汤伐夏桀之前，为了翦除夏的势力，除征伐葛、豕韦、顾、昆吾等夏的属国外，还从夏王朝内部作了瓦解的间谍活动。伊尹在间夏中起着重要作用。古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国语·晋语一》："史苏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韦昭注："伊尹，汤相伊挚也，自夏适殷也。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孙子兵法·用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吕氏春秋·慎大》："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警，大臣同患，弗周而叛。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于妹喜，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于妹喜。妹喜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东方日胜，西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于国，西以进。"商汤在准备灭夏过程中，夏桀曾召见汤而囚于夏台（即均台，在今河南禹县），后又释放。

伊尹在灭夏中起很大的作用。《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

衡。阿衡欲奸（请说）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伊尹亦见于甲骨文，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如“乙亥贞：侑伊尹，乙亥贞：其侑伊尹，二牛。”（《簠室殷契征文》人名1）。“侑”是祭名，“二牛”是用二头牛作牺牲。卜辞中又称伊，因是有功的旧老臣，故配祭先王还列为首位。周金文中称为“伊小臣”（《叔尸镈》）。

伊尹非名阿衡，伊氏，名挚⑬。“尹”乃官名，亦见于甲骨文。“阿衡”亦是官名，又称“保衡”。相传伊尹出生于伊水边⑭（或说在今河南伊川），成长后流落到有莘氏（今河南开封县陈留镇，一说在今山东曹县）。助商汤灭夏，被汤任为右相，辅佐汤治理国政。

助商汤灭夏的还有仲虺（huǐ 毁，古文献中又作蘬、儡、傀、虺等）。相传是夏王朝车正奚仲之后裔。《左传·定公元年》：“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薛即今山东滕州南。仲虺主要助汤管理内政。

商汤在内政和外交上得到仲虺和伊尹之佐，遂率师出发前举行誓师会，其誓词即《尚书》中的《汤誓》。誓师后商军与夏军会战于鸣条，夏军溃败，夏桀逃往三朡（今山东汶上县北），商军征三朡。夏桀又逃往南巢之山，被困而死，夏王朝遂灭亡。“汤放桀而复薄（亳），三千诸侯大会。汤退再拜，从诸侯之位。汤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处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纪之，唯有道者宜久处之。汤以此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后汤即天子之位”⑮，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商王朝遂建立。

《周易·革》中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史家称之为“成汤革命”。夏商两代活动的地望，历代史家作了许多考证，但目前仍有分歧。“汤居亳与葛为邻”，此亳是商汤灭夏前的族居之地。《尚书·立政》有“三亳阪尹”的记载。晋皇甫谧认为：“三亳，三处之地皆名为亳。蒙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西亳。”⑯又“自契至汤八迁者，皇甫谧云史失其传故不得详，是八迁地名不可知也。……然则殷有三亳，二在梁国，一在河洛之间。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蒙为北亳，即景亳，是汤所受命也；偃师为西亳，即盘庚所徙者也。《立政》之篇曰：‘三亳阪尹’是也。”⑰。皇甫谧所说的南亳即今河南商丘北，北亳即今山东曹县，西亳即今河南偃师。故目前学者有的认为商汤灭夏前居之亳在今商丘北，葛国在今河南宁陵北。有的则认为在今曹县，宁陵北与商丘和曹县皆相邻。有的根据自五十年代以来在今河南郑州市发现先商文化遗存，与汤所居的亳相合，认为郑州才是汤灭夏前所居之亳，郑州附近的叫葛城之地即葛国。有的根据甲骨卜辞中有亳、亳土的记载⑱，认为汤居之亳应在今河南濮阳境。

商汤灭夏后建都之地，历代虽有不同的说法，但以西亳说为最早，《汉书·地理志上》河南郡·偃师县，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其后多从其说。1983年夏，在河南偃师城西尸乡沟一带发现一座古城遗址。经过八十年代多次发掘，已发现七座城门和许多纵横交错的大道，城中有若干建筑和一座大型宫殿的遗迹和基址。因此不少的学者认为这就是汤都的西亳遗存。

被商汤所征伐的韦、顾、昆吾的地望，历代无大分歧。豕韦，《左传·襄公二十年》：“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

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杜预注：“豕韦，国名。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豕韦故国在今河南滑县东，而长垣县与滑县南北相邻，故有的认为是在长垣县北。顾，甲骨文中有此地名如：“癸亥卜，黄贞：王旬亡祸，在九月。征人方，在顾。”郭沫若认为：“顾即古顾国，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⑲又“则顾地当于山东求之。余谓此古顾国也。《商颂·长发》‘韦顾既伐’，王应麟云《郡县志》：‘顾城在濮州范县东二十八里，夏之顾国。’《左传》哀二十一年‘公及齐侯、邾子盟于顾’，杜预云‘齐地’者即此。今山东范县东南五十里有顾城是也”⑳昆吾是夏王朝的一个重要的诸侯国。《后汉书·郡国志》东郡·濮阳古昆吾国。梁刘昭补注：“杜预曰帝丘，昆吾氏因之，故曰昆吾之墟，县城内有颛顼冢。”今河南濮县境即夏昆吾国。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韦就是今河南郑州，顾在今河北原阳、武陟一带，昆吾在今河南新郑、密县一带㉑。在此以备一说。

古文献中记载的鸣条地望有几处。《尚书·汤誓序》：“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郑玄认为：“鸣条，南夷地名。”㉒《帝王世纪》：“《孟子》，桀卒于鸣条，乃在东夷之地。或言陈留平丘今有鸣条亭也。唯孔安国注《尚书》云，鸣条在安邑西。考三说之验，孔说近之。”甲骨文中有地名攸，如“癸酉卜，在攸，派贞：王旬无祸，王来征人方”。郭沫若考释此片卜辞说：“攸字，王襄谓絛省，疑即鸣条。案其说近是。《天问》‘何条放致罚’，鸣条正省称条。《夏本纪》‘桀走鸣条，遂放而死’。《集解》引孔安国曰‘地在安邑之西’，郑玄曰‘南夷地名’，二说不同。考《鲁语》言‘桀奔南巢’，南巢故城在今安徽桐城县南六十五里（据《寰宇

记》)，与鸣条纵然非一地，亦必相近，则郑说是也。”㉓故目前古史学界关于鸣条地望主要有今河南封丘东，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两说。“桀奔南巢”的南巢主要有今安徽寿县、桐城。或根据《荀子·解蔽》中的“桀死于亭山”，认为亭山即历山，为南巢之山，即今中条山的历山，此山距安邑不远，南巢在此附近。附此以备一说。

注　释

①《齐侯钟》铭文。

②《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③“示癸”，《史记·殷本纪》作“主癸”。

④《史记·殷本纪》《集解》引。

⑤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十。

⑥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5年。

⑦卫聚贤：《殷人自江浙迁徙河南》、《江苏研究》第3卷5、6期1933年。

⑧《史记·殷本纪》《索隐》引《古史考》。

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

⑩《诗经·商颂·玄鸟》孔颖达疏引皇甫谧说。

⑪《文选·东京赋》注引。

⑫《史记·殷本纪》《集解》引。

⑬《孙子兵法·用间》曹操注。

⑭《吕氏春秋·本味》。

⑮《逸周书·殷祝》。

⑯《尚书·立政》孔颖达疏。

⑰《诗经·商颂·玄鸟》孔颖达疏。

⑱《金璋所藏甲骨卜辞》584片，《殷契粹编》20、21、22片。

⑲《卜辞通纂》考释 570 片。

⑳《卜辞通纂》考释 743 片。范县今属河南。

㉑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㉒ 孔颖达疏引郑玄说。

㉓《卜辞通纂》考释 574 片。

先秦

伊尹放太甲

商汤伐夏，在鸣条会战，夏桀失败奔南巢后，被放逐而死，约有五百年（约前21世纪—前17世纪）历史的夏朝遂灭亡。商汤在亳大会诸侯登王位，为商王朝的第一个王。建王都于亳。

商汤灭夏前是夏的一个诸侯国，古文献中称为“汤处亳，七十里”①，或“古者汤以薄（亳），武王以滈，皆百里之地也”②。汤以一个只有不足百里土地之诸侯，为何能灭亡夏王朝？《孟子·离娄上》有：“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诗》云：‘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此之谓也。”夏桀就是“暴其民甚”，因此才“身弑国亡”。《诗经·大雅·荡》中的“殷鉴不远，在夏之世”，说明夏灭亡，就是殷的一面镜子。对人民的残暴，不得人心，则会被人民推翻，故汤登上商王朝的王位后，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首先就是对人民的态度。《史记·殷本纪》载：“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

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汤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这是汤伐夏前和伊尹的一段对话，汤已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看到人民的态度，人心的背向，就知国家能不能治理好。虽然伊尹说了一翻颂扬之词，汤仍然说你们要是不遵命，就要受严励惩罚，不能有所赦免。灭夏以后汤又再次告诫诸侯大臣们要“有功于民”。《殷本纪》中引了《汤诰》之话：“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这些告诫诸侯、群臣之词，就是吸取夏桀暴虐于民而亡国的教训。故商建立之初，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首先是致力于安定人民的生活，使被夏桀压榨得无以聊生的人民得以安居乐业。

商汤“有功于民”的具体表现，见于古文献的是“汤祷桑林”③。《吕氏春秋·顺民》中有具体的描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于是剪其发，郦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汤祷桑林”不是虚构的故事。因甲骨文中有一“烄”（jiāo 交）字，是个象形字，原形上作立一正面人形，下作一火形，卜辞中用作祭名，是郊祀之祭。《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预注：“巫尪，女巫也，主祈祷请雨也。”故“烄”为焚烧人以求雨。《淮南子》中有“汤时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汤曰：我本卜祭为民，岂乎自当之，乃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④。武丁时期卜辞有“贞：勿烄，无其雨？贞：烄妫，有从雨”⑤。证明商自汤以来郊祭祀

天求雨都是用人作牺牲，只是汤不愿在刚建国时就以此伤害民心才以自己的发爪代替。此亦说明商王朝初年汤是实行的“以宽治民”政策⑥，故商族的统治才得以巩固和发展。

汤死，应由长子太丁继王位，但据《史记·殷本纪》载：“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而甲骨文中祭祀直系先王太丁的卜辞不少，祀典也很隆重，合祭时用牲多达“百羌、百牢”⑦。说明太丁亦有可能曾即位。《殷本纪》说太丁未立，仲虺、伊尹扶立太丁弟外丙。外丙甲骨文作“卜丙”，在位约三年死。仲虺、伊尹又扶立外丙弟仲壬，仲壬不见于甲骨文。仲壬时仲虺死。仲壬在位约四年死，伊尹扶立太丁之子太甲为商王。太甲是汤的嫡长孙，甲骨文中祭祀太甲的卜辞很多，祀典很隆重，专祭时用牛羊为牺牲一般用数头，多至三十牛或三十牢。用人作牺牲时最多时达“百羌”⑧，与大乙、大丁、祖乙合祭时用“百鬯、百羌、卯三百”⑨。鬯是一种加香草酿制的香酒，专用于祀神。羌是羌部落之人，被俘后作人牲。卯是祭祀时的用牲法，即对剖牛羊豕作牺牲。

伊尹是助商汤灭夏的功臣，可以说汤若无伊尹之助，仅以一个只有七十里地方的诸侯小国，要灭夏王朝是很困难。伊尹的身世传说不一，司马迁编写《殷本纪》时是采取两说并存：“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奸汤而无由，乃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或曰，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汤举任以国政。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据先秦古文献所载之传说，多认为伊尹出生于伊水之滨，成长在有莘氏之族。有莘氏或作有侁氏，姓姒氏，与夏后氏同族。因见夏桀暴虐伤民，才去夏适商，往返数次间夏。所以孟子说：“五就汤，五就桀者，伊

尹也”（《孟子·告子下》）。伊尹与汤的关系并非一般。《吕氏春秋·本味》记载有：“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于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汤得伊尹，祓之于庙，爝以爟火，衅以牺猳。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得而为之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后可具。”此是带有神话的传说，司马迁取其后一部分写入《殷本纪》，《集解》引《列女传》说：“汤妃有莘氏之女，”而伊尹是以有莘氏媵臣入商。所以目前有史学家认为汤妃即伊尹之妹，汤与伊尹是甥舅，商与有莘氏是姻亲关系。伊尹除了他自身的见识和才干外，在商王朝不仅是有重大贡献的功臣，是居于众臣之首的右相，就是在商族王室中还是一位有姻亲关系的长辈，因此在商王朝初期才有很高的地位和威望，能左右王室之事。

伊尹放太甲是商王朝初期一件大事，古文献多有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孟子·万章上》：“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于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此内容亦见于伪古文《尚书·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司马迁据所见先秦文献在《殷本纪》中作了更具体的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

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立太甲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帝太甲，称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正义》引："《晋太康地记》云：'尸乡南有亳阪，东有城，太甲所放处也。'按：尸乡在洛州偃师县西南五里也。"又引《帝王世纪》："伊尹名挚，为汤相，号阿衡，年百岁卒，大雾三日，沃丁以天子礼葬之。"桐宫，在商初王都郊外，为皇陵所在地，此地建有离宫，相传汤亦葬于此地。

伊尹放太甲于桐宫，后又还政于太甲之事，先秦文献大多相同，故历代史家多称颂伊尹是一位具有大仁大义美德的贤相、圣人。到了战国时期儒家的国家观形成理论体系过程中，则出现一种相反的说法。即见于西晋武帝太康二年（281）从汲郡魏王墓中盗掘出来的《竹书纪年》或称《汲冢书》、《汲冢纪年》。在今所见的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伊尹放太甲的记载是："仲任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放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自西晋以后一些文献中引《竹书纪年》皆有"太甲杀伊尹"之事。其后信其说者有之，批评者有之，至今仍是两说并存。按照儒家的国家观来说，臣放逐君是大逆不道，应视为乱臣贼子，其罪当斩，但是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的孟子就不以伊尹是篡位之逆臣。《孟子·尽心下》中有："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也’。”公孙丑对伊尹放太甲提出疑问，孟子的回答则是肯定的，即“有伊尹之志”就不是篡位。在战国时期儒家的国家观在形成体系过程中，对君臣关系有过一些不同的看法，《竹书纪年》所载伊尹放太甲就是这种国家观中的一种。

伊尹放太甲后是否篡位自立，后又为太甲所杀？如果是如此，则应是逆臣，当为商王室后人所耻。而甲骨文中祭祀伊尹的卜辞很多，祀典亦很隆重，专祭时用牲一般也是二、三牢或二至五牛，还有多至十羊者⑩。商王祭祀先王时还以伊尹配享，如“…丑，贞：王祝伊尹，取祖乙鱼，伐告于父丁、小乙、祖丁、羌甲、祖辛”⑪。此卜辞中王即商王，“取”是祭名，“伐”是用牲之法，即杀牲之祭。或说“伐”是舞祭。祭祀六个商先王时，乃以伊尹居于首位配享，地位之尊并非一般。还有伊尹配祀大乙（汤）的卜辞⑫，汤在甲骨文中称大乙，是建商之君，而伊尹是建商之功臣，故君臣合祀共享。《诗经·商颂·长发》有：“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此诗之意是颂扬商汤灭夏，得伊尹之助，故祭祀汤时以伊尹配祀同享。又《楚辞·天问》有：“初汤臣挚，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此辞之意是叙商汤得伊尹（名挚）之辅佐，灭夏桀之后作了商王，故伊尹得到商人尊敬，以王之礼得到祭祀，并且延续至商的子孙。卜辞中又有“甲申卜，侑伊尹五示”⑬；“侑，岁于伊二十示又三”⑭；“侑于十立伊又九”⑮。辞中之“侑”、“岁”是祭名，“示”、“立”是主之意，即神主，或称“神位”，俗谓“神主牌”。“伊尹五示”是祭祀卜辞中称为“旧臣”的五个有功于商王朝的老臣，也称先臣。“伊二十三示”是以伊尹配自大乙（汤）起的二十三位先王。“十立伊又九”有两释：一释为以伊

尹配祀九位先王；一释为祭祀以伊尹为首的九个先臣。有学者对卜辞中的“伊尹示”和“伊示”皆释为是祭祀伊尹家族或伊氏族。然目前所知商代甲骨卜辞皆是商王室的祭祀记录，是否有非商族之卜辞，或商王因伊尹及伊氏族与商族和商王室有特殊关系而祭祀，尚可继续探讨。

从以上的一些先秦文献和甲骨卜辞对伊尹的颂扬和祭祀证明，伊尹是商初逆臣的可能性极小。放太甲于桐，又被太甲潜出桐所杀，则太甲以后历代商王不可能再将这个乱臣贼子请入宗庙隆重祭，更不配列于先王之祀典中。

《史记·殷本纪》中排列商王朝初期的王位世序是汤、太丁(早逝未即位)、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有学者根据甲骨卜辞中周祭祀谱，排列的世序与《殷本纪》有所不同，虽无太大差错，但有错位者，其世序为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无仲壬与沃丁两王。故疑此两王是否即位为王，据《殷本纪》是：“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但卜辞中太丁一直是列于直系先王中受祭。此世序问题尚需今后发现新资料来校正。

商王朝自汤建立，经伊尹之辅佐，太甲修德，诸侯归服，人民经过修养生息，商的统治得以巩固，开始进入一个发展时期。故史书中称太甲为中兴之主，尊为太宗。据《殷本纪》载：“沃丁崩，弟太庚立，是为帝太庚。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太庚、小甲、雍己三位商王皆见于甲骨文。太甲之后传至雍己时，因王朝势力渐衰弱，失去对方国的控制，故诸侯或不朝，或叛商，处于衰落时期。

注　释

①《淮南子·泰族》。

②《荀子·议兵》。

③此事内容各书记载详略不同，见于《国语·周语上》、《荀子·大略》、《墨子·兼爱下》、《说苑·君道》等。

④《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

⑤《前》5、33、2。

⑥《国语·鲁语上》。

⑦《佚》873。

⑧《粹》190。

⑨《后》上28、3。

⑩《墟后》2446。

⑪《屯南》2342。

⑫《后》上22、1，《粹》151等片。

⑬《墟后》2588，又2520片亦有"伊五示"《综图》243同文。

⑭《佚》211。

⑮《粹》174。

先秦

祖乙兴殷

商自太甲"反善自责"，伊尹迎归复位以后，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和发展，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发展时期。太甲死后，中经沃丁、太庚、小甲，传至雍己时，由于王室的腐败，生活奢靡，贪得无厌，对人民的压榨、剥削加重，对政事懈怠，全国臣服于商的方国、诸侯的势力也在发展。商王雍己在位时有的诸侯或不朝，或叛商，商王朝的统治势力受到削弱，处于"殷道衰"的时期。

雍己在位约十二三年①，死后由弟太戊继王位②，伊尹之孙或曾孙伊陟为相辅政。太戊在甲骨文中作"大戊"或"天戊"；伊陟作"戊陟"③，祭祀大戊的卜辞多见于商王祖庚、祖甲时期。因太戊是直系先王，故祀典还是较为隆重，用牲常有三至五牢。《史记·殷本纪》载："亳有祥桑榖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关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而祥桑枯死。"在王都亳发现桑树和榖树（即楮树）共生，而且是"一暮大拱"，这对迷信鬼神很深的商人来说，当然是视为妖异，伊陟不愧是伊尹

之后商，借此事劝太戊修德，德政一清，共生之桑穀也就枯死。其实是在伊陟、臣扈、巫咸一班朝中大臣的劝戒下，太戊采取措施，勤于王政，修德治国，振兴了王朝的统治。所以《殷本纪》称“殷道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此文是司马迁根据《尚书·无逸》所载而写。《无逸》中说：“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只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历代注疏家都说“殷王中宗”是指太戊。太戊是商代“中兴之王”，在位七十五年，是商王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君王④。甲骨卜辞中“中宗祖乙”的记载如“其侑中宗祖乙，有羌”⑤；“执其用自中宗祖乙，王受佑”⑥；“中宗祖乙，岁……”⑦。辞中“侑”“岁”皆是祭名，“羌”是羌部落之人。《竹书纪年》记载：“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居庇。”⑧这与甲骨卜辞一致。可证注疏家们认为是太戊则有误，《尚书·无逸》中所称的中宗应是商王祖乙。

由于太戊修德治国，商王朝重新振兴，方国、诸侯又重新来朝或归服。地处东方的“九夷”是古东夷中分化出的九个部落。《后汉书·东夷传》谓：“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东夷与商有族源关系，商汤伐夏时曾助过汤。其事据《说苑·权谋》载：“汤欲伐桀，伊尹曰，请且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迁桀南巢氏焉。”此事未见于先秦文献，但商汤伐夏得东夷部落之帮助应是可能的。故太戊振兴商王朝后，九夷亦来朝。

地处西方的西戎见“殷道复兴”亦入商王都朝贺。所谓“西戎来宾，王使王孟聘西戎”⑨。《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丈夫国”。郭璞注云：“殷帝太戊使王孟采药，从西王母至此，绝粮，不能进，食木实，衣木皮，终身无妻，而生二子，从形中出，其父即死，是为丈夫民。”⑩此是一个神话故事，其内容可能是采自“太戊使王孟聘西戎”的传说。然其有古史史迹，说明商王朝与西戎有交往，中原文化早在商代就与西戎文化有交流。

秦人的祖先与商人的祖先同族。据《史记·秦本纪》载，秦之始祖大业与商始祖契一样，也是“玄鸟卵”所生，即是以“玄鸟”为图腾，同是出自东方古东夷的少昊部落。当然在传说时代秦人之祖先还不称秦，而是“姓嬴氏”，即嬴氏族。据《秦本纪》记载，在秦之祖先中，伯益是“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传至费昌时，正当夏桀之时，“去夏归商，为汤御，以败桀于鸣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帝太戊闻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侯”。中衍在商王太戊时已不再是一个驾车人，而是监管造车和驾车的车正，是商之诸侯，称“费侯”⑪。商、秦在太戊时由君臣关系发展到更深一层的姻亲关系。

商王朝自太甲以后一度中衰，经太戊振兴，又发展到一个兴旺发达时期。《史记·殷本纪》载：“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为帝外壬。《仲丁》书阙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为帝河亶甲。河亶甲时，殷复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商王大戊死后所继位的四个

商王的庙号皆见于甲骨文中。仲丁在甲骨文中作中丁，为直系先王。祭祀中丁的卜辞在武丁时期较少，主要见于祖庚、祖甲和帝乙、帝辛时期的周祭中。如武丁时期有"勿告于中丁"⑫，"己卯卜、翌庚辰，侑于大庚至于中丁一牢"⑬。前一辞是专祭，"告"是祭名；后一辞是合祭，辞意是："己卯日占卜，次日是庚辰，以一牢为牺牲，侑祭大庚，小甲、雍己、大戊、中丁五位先王。"卜辞中的牢有两个字形，一从牛，一从羊作宰，此两字甲骨学者解释各不相同⑭。外壬在甲骨文作卜壬，为傍系先王。祭祀卜壬的卜辞较少，而且只见于帝乙、帝辛时期周祭中。河亶甲在甲骨文中作戔甲，为傍系先王。祭祀戔甲的卜辞皆见于商王祖庚、祖甲和帝乙、帝辛时期周祭中。

仲丁继位后，东夷九夷中的兰夷叛商，仲丁出兵征伐。仲丁死后由其弟外壬继位。外壬时姺、邳两个诸侯叛商王朝⑮。姺，又作侁、侁氏，即汤时有莘氏之后。"汤妃有莘氏之女"，商建立后封有莘氏世代为诸侯。姺，甲骨文中作先，称先侯。记事刻辞中有"先致五十"的记载⑯。武丁时期卜辞有"王命吴垦田于先侯"⑰。邳是夏禹时车正奚仲所居之地（在今江苏邳县西南）的氏族，汤建国后封邳氏为诸侯。商初本与王朝的关系较为密切，但后来是视商王朝的兴衰而服叛。"先致五十"是先臣服时向商王朝进贡五十个龟（或龟甲）。商王曾命令吴（诸侯）在先侯进行开垦农田。卜辞中也有"伐先"的记载⑱，则是叛商时被征伐。姺、邳两诸侯皆是姒姓，自夏归商，服叛无常。故《左传·昭公元年》说："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都是虞、夏、商、周影响很大的反叛诸侯。

外壬死后由其弟河亶甲继位。由于在外壬时姺、邳两个姒

姓诸侯叛商王朝，于是引起连锁反应。兰夷在仲丁时曾被征伐过，此时又首先叛商。面对诸侯叛商的局面，河亶甲只得将王都由隞迁于相，迁都后又出兵征服了兰夷。商的诸侯之一的大彭（今江苏徐州），见邳侯叛商遂由彭伯率兵征服了邳侯。侁侯见邳侯被征服，遂逃至班方（确切今地待考）。彭伯和韦伯率兵征伐班方。班方被征服后，侁侯亦再次臣商。韦伯即豕韦之后裔，彭姓，亦是商之方伯⑲。河亶甲虽又迁都，又征伐兰夷，又借助彭、韦二方伯征服邳、侁。但同时也削弱了商王朝的势力。

河亶甲死后，由其子祖乙继位。"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祖乙在甲骨文中称作祖乙、下乙、中宗祖乙、高祖乙（高祖乙的祖乙二字为合文）。卜辞中的高祖乙大多见于武乙时期，曾被误认为是指大乙的庙号。因祖乙是直系先王，故祭祀的卜辞在先王中是最多的，祀典很隆重。合祭时备用的牺牲多至"百鬯、百羌、卯三百牢"⑳。专祭时用牲也不少，如卜辞中有："甲午卜，贞：翌乙未，侑于祖乙，羌十人，又卯五牢又一牛，五月。甲午卜，贞：翌乙未，侑于祖乙，羌十又五，卯五牢又一牛，五月。"㉑此辞的"羌"不是名词的羌人，是祭祀动词，意为杀、伐。又如："贞：三十伐下乙，勿三十下乙。"㉒辞中的"伐"是祭名，为杀牲之祭。或说此伐祭，为执干舞祭。后世商王对祖乙视为是能使王朝复兴的中兴之主，不但祀典隆重，还常与商汤合祭，如卜辞有"三示𫑘大乙、大甲、祖乙五牢"㉓，"侑伐于五示，上甲、成、大丁、大甲、祖乙"㉔。辞中的"𫑘"是祭名，成即成汤。由所举之卜辞证明祖乙在商王室后人的心目中的位置确实重于大戊，"庙为中宗"者确系祖乙。故《晏子春秋·内谏》载："汤、太

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

祖乙振兴商王朝之事迹古文献中缺具体记载。只有《尚书·君奭》和《殷本纪》载祖乙时在朝辅佐任职的是巫贤，此巫贤则是两书中所载太戊时贤臣巫咸之子。巫咸辅佐太戊有功，被伊陟赞扬，谓“治王家有成”。曾作《咸艾》、《太戊》两篇称赞。《史记·天官书》说巫咸精于星象，则应是一天文官，巫贤也应是祖乙时的天文官。甲骨文中有爻戊、咸戊、尽戊，甲骨学者认为“戊”系官名，有祭祀他们的卜辞。故咸戊、尽戊可能就是巫咸、巫贤等商之先臣。

东汉史家班固认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其实正十二也。”㉕天文学家张衡也认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居相圮耿，不常厥土。”㉖所谓“前八”是商汤建商王朝前商族八次迁陡族居地。“后五”是指商王朝建立后的五次迁都。后五次迁都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算法，然仲丁迁于隞、河亶甲迁于相、祖乙迁于邢的这三次皆在其中。

隞又作嚣。较具体的地望是《帝王世纪》中谓“仲丁徙嚣或敖，今河南之敖仓是也”㉗。其后《水经·济水注》、《括地志》、《太平寰宇记》等书中以敖为仲丁所迁之地。敖在今河南荥阳东北部。根据考古调查的结果，目前还未在此地发现可以证明敖就是仲丁所迁都之故地。

相较具体的地望也是见于《帝王世纪》谓“河亶甲徙相，在河北”㉘。《殷本纪》《集解》引“孔安国曰：地名，在河北”。所说的河北即黄河之北。而《正义》引“《括地志》云：故殷城在相州内黄县东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筑都之，故名殷城也”。按此说，相在今河南内黄东南，历代学者多从其说。亦有认为在今江苏徐州市南，安徽宿县之北的符离集，或认为

应在洛阳以西，陕西以东的豫西地区去探求。

“祖乙迁于邢”、“祖乙圮于耿”、“祖乙居庇”三地，历来说法颇多，皆各有所据，摘要举其数说。

邢即今河北邢台说。《汉书地理志下》襄国县，班固自注：“故邢国”。《括地志》：“邢国故城在邢州外城内西南角。《十三州志》云：‘殷时邢国。周封周公旦子为邢侯，都此’。”

耿即今山西河津县说。《殷本纪》《索引》：“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东皮氏县有耿乡。”

河南武陟与温县说。《说文解字》：“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内怀。”段玉裁注：“今河南怀庆府武陟县。县西南十一里有故怀城。”王国维认为在今河南温县东㉙。丁山认为在今山东定陶㉚。

庇在今山东或河南朝歌以北说。丁山认为庇即费，在“鲁国西南之费邑”即今山东定陶㉛。陈梦家认为在今山东泗水东东界㉜。岑仲勉认为庇即邶，在朝歌的北方。即今河南淇县以北㉝。

以考古材料证之：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初，在今河北省发现不少的商文化遗存，其中以河北省会石家庄以南较为密集。重要的文化遗存中有邢台市的贾村、尹郭、曹演庄等十多处。1978年3月，在石家庄与邢台之间的元氏县西张村发掘西周墓葬中出土青铜器《臣谏簋》，铭文中除出现于古文献中未见的“軧侯”的軧国外，还有“邢侯”。学者大多认为此邢侯就是周初封之邢国。1991年末在邢台市南小汪村发现一处周代遗存，从西周墓中出土一块刻有文字的西周甲骨。从几座较大的西周墓中出土一些青铜器。初步可以证明西周初的邢国就在邢台。此地就是商代的井方之地，“祖乙迁于邢”，有可能即为

此地。

注 释

①《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史记》："帝雍己在位十二年崩。"《通鉴外纪》作"十三年"。

②据甲骨卜辞周祭中排列太戊应是雍己之兄。

③《殷图》13、1。

④见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诗经·商颂·烈祖》郑玄笺等。

⑤《甲》1481。

⑥《续存》上795。

⑦据甲骨卜辞1802。

⑧《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⑨今本《竹书纪年》。

⑩袁柯校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⑪今本《竹书纪年》。

⑫《乙》4626。

⑬《后》下40、11。

⑭孟世凯：《甲骨学小词典》"牢宰"条。

⑮今本《竹书纪年》。

⑯《缀》137反。

⑰天津博物馆藏拓片。

⑱《前》2、3、1。

⑲《国语·郑语》有"大彭、豕韦为商伯矣"。

⑳《后》上28、5。

㉑《佚》154。

㉒《丙》304。

㉓《佚》917。

㉔《丙》38。

㉕《尚书序》孔颖达疏引。

㉖《西京赋》。

㉗《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㉘《太平御览》卷一五五引。

㉙《说耿》《观堂集林》卷一二。

㉚㉛《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

㉜《殷墟卜辞综述》。

㉝《黄河变迁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

先秦

盘庚迁殷

商王朝自祖乙继河亶甲即位以后，得巫贤辅佐，使一度中衰的王朝又复兴，被后世称为是与汤、太甲、武丁一样的“天下盛君”。祖乙死后，由其子祖辛继位。甲骨文中亦作祖辛，为直系先王。商王文丁时期有祭祀“三祖辛”的卜辞，第一位就是祖乙之子的祖辛，第二位是盘庚之弟小辛，第三位是祖甲之子廪辛。继祖辛王位的是其弟沃甲，沃甲《世本》中作开甲。甲骨文中作羌甲，为旁系先王。祭祀羌甲的卜辞虽然不少，但无特别隆重的祀典。沃甲在位时间较短，死后由祖辛之子祖丁继位。甲骨文中亦作祖丁，又称为小丁，后祖丁，为直系先王。祭祀祖丁的卜辞很多，祀典也很隆重，用牲之数有时多达五十牢①。祖丁死后，由沃甲之子南庚继位，甲骨文中亦作南庚，为旁系先王。祭祀南庚的卜辞也很多，以专祭为主。祖丁死后，在王位继承上王室内部发生了争夺的混乱局面，最后虽由南庚争得王位，但他控制不住混乱的局面，只好采取迁都来避免王族中的矛盾争斗。据《竹书纪年》：“南庚更，自庇迁于奄。”②更是南庚名，庇是祖乙所迁之地，在今山东鱼台

附近。南庚即位后将王都迁于奄，即今山东曲阜。庇、奄两地虽相距不远，但对王族矛盾仍能起暂缓的作用。

南庚死后，由祖丁之子阳甲继位。甲骨文中阳甲是一个合文，因原形是一动物象形字与甲字合成，故历来各家考释各异，有喙甲、兔甲、象甲、訾甲、鲁甲等名。虽各释不同，但都肯定其世序为《史记·殷本纪》中祖丁之子阳甲，为旁系先王。祭祀阳甲的卜辞大多见于祖庚、祖甲时期和帝乙、帝辛时期。《史记·殷本纪》谓"自中丁以来，废適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商王朝的王位继承是以"父死子继"为主，无子才能弟及。历代商王又是妻妾众多，子弟亦不少，故形成自仲丁以后九世发生争夺王位的混乱局面。其中只有祖乙即位后得以控制王室内的混乱，使商王朝一度中兴。阳甲也是争夺而继位，不但未能缓和王族内的矛盾，反而更加深争斗。于是王朝对诸侯、方国又失控，出现诸侯不朝的局面，商王朝又处于一个衰弱时期。

阳甲死后，由其弟盘庚继位。盘庚，或作般庚，商朝第二十位国王。甲骨文作般庚或凡庚，为旁系先王。祭祀盘庚的卜辞不多，主要见于祖庚、祖甲时期和帝乙、帝辛时期。据《竹书纪年》："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③又"盘庚旬，自奄迁于北蒙，曰殷"④。又"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⑤。旬是盘庚名，即位后迁王都于殷。"殷墟"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定公四年》，谓"……命以《康诰》，而封于殷墟，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但无具体的方位。《竹书纪年》中的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此邺即春秋时齐桓公所筑的邺城⑥，即今河北临漳县城西南的邺北城遗址。由邺向南四十里（或谓三十里）是邺城距殷墟的大致距离，虽有方位，但

仍无具体地方。《史记·项羽本纪》中载项羽和章邯“与期洹水南，殷墟上”立盟之事。这就具体地指明殷墟是在洹水之南岸。《水经·洹水注》谓“洹水出山东，经殷墟北”。《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四十六里。”又“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相州为北魏天兴四年（401）所设置，治所在邺城。北周大象二年（580）移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南，隋朝又移至今安阳市。

清朝光绪末年，河南安阳县城西北郊小屯村农民在农田中常挖出古代各种遗物，其中有村民称之为“龙骨”者，因上有“刻划”，为古董商收购，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带至天津出售，为古物爱好者孟定生、王襄两位秀才发现所谓“龙骨”上之“刻划”，实是古代文字称之为“古简”。次年这些“古简”携至北京售与作团练大臣的王懿荣。在北京作候补知府的金石学家刘铁云（即刘鹗）在王懿荣家见到这些甲骨，经辨认上面的文字是殷商古文字⑦。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王懿荣殉职，其子王汉甫将所购甲骨售给刘铁云。光绪二十九年（1903）刘铁云著录的甲骨文第一部书《铁云藏龟》出版，并在《自序》中指出是“殷人刀笔文字”。此后引起学术界之重视和搜求、研究。民国十七年（1928）至二十六年（193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十五次考古发掘。其中除十二次发掘出数万刻有文字的甲骨外，在小屯村还发现了商王朝的宫殿建筑基址，在侯家庄西北岗还发现了王陵墓葬等。证明此地区就是《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云：“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

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盘庚自奄迁到殷，即现在安阳市西北部以小屯村为中心的周围一带地区，这里也就是商王朝后半期的王都。

盘庚迁殷在商王朝约六百年的历史上来说，是一件历史转折的大事，因其后的二百七十三年再未迁徙过都城。但自《史记·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谓：“纣都朝歌，在卫州东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殷王武丁始都之。《帝王世纪》云，帝乙复济河北，徙朝歌，其子纣仍都焉。”其后遂有盘庚迁殷后仍有迁都之说，至今古史学界仍各说其是。朝歌在今河南淇县，按《竹书纪年》所载，是商纣（帝辛）时，扩大商都之活动范围，在朝歌建立离宫别馆，鹿台即在朝歌⑧，为商纣末年主要活动之一邑，即今河南淇县。

盘庚迁殷的原因历来有不同的说法，纵观两千多年来主要有以下诸说：

1. 避水患说。《尚书·盘庚》中有“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为孔安国传谓“水泉沉溺，故荡析离居，无安定之极，徙以为之极”。此后孔颖达的《尚书正义》、蔡沈的《书集传》、林之奇的《尚书全解》等沿其说。现代学者中陈梦家在《殷墟卜辞综述》中⑨，顾颉刚、刘起釪在《盘庚三篇校释译论下》中⑩，都认为：因水患影响到商王朝的统治下的人民生活，引起社会不安定，为避免社会矛盾加剧，斗争的激化，就要迁都。

2. 去奢行俭说。《说苑·反质》引“墨子曰，……殷之盘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迁于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变天下之视。”《后汉书·郎顗传》：“昔盘庚迁殷，去奢行俭。”此后魏、晋以降的史家多沿其说，到了清朝则被怀疑，认为不可

靠，如宋翔凤在《尚书略说》中指出："如以奢侈逾礼为宫室衣食之奢淫，则盘庚为政，虽尚都耿，法度可纯，何必谋徙。"

3．游牧游耕说。近代学者有的认为商代盘庚迁殷之前尚处于"游牧经济"的发展阶段，才不断迁徙。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认为："殷之多迁都，实含古代游牧行国之性质。其谓诸帝因水患而徙者，未足为据也。"⑪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认为："大抵商民族在盘庚以前都还是迁移无定的游牧民族，到盘庚时才渐有定住的倾向。……定住倾向的生产当在牧畜的末期，有农业种植发生的时候。在盘庚当时初步的农业是必然有的。"⑫目前对此大多持异议，然支持者亦有之。

4．王室内部矛盾和政治斗争说。此说自五十年代以来较为流行。有的学者用阶级斗争学说去分析，一段时期影响较大，然史料缺其证。故近年又有寻找适合于控制诸侯、方国的中心地点之论。

总之，"盘庚迁殷"原因诸说不同，在未发现新资料前，短时期尚难达到共识。

商王盘庚决定迁殷时，引起王族中不少人反对，因这些贵族不但在旧都据有大量财富，而且还有各自的势力。他们恐迁至新王都后不但财富要受一定损失，势力也会削弱，很难再重新恢复。于是散播流言，蛊惑人心，欺骗平民，至使不少平民也反对迁都。盘庚在迁殷前后对臣民们有三次训话，这些告诫之词由史官作了记录，就是流传于后世编在《尚书·商书》中的《盘庚篇》。

今天所见《尚书》中的《盘庚》有上中下三部分，又称《盘庚》三篇，《尚书》中的《盘庚》大部分是商代原文，有的

文字经周代人加工润色后写定，而且三部分的分法与盘庚迁殷前后训话顺序不合。经过古史学家顾颉刚研究整理，将三次训话重新排列为合于迁殷前后的顺序。

《尚书·盘庚》中的中篇主要内容是盘庚决定率臣民渡河迁殷前，首先将反对迁都的贵族和平民召到王庭的训话。从这篇告诫的训词中，充分看出《礼记·表记》中所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盘庚正是利用殷人敬畏上帝、祖先和迷信神鬼的思想，多处用上帝、先王来威吓臣民。谁要反对迁都，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必然受到上帝和先王的责罚。因臣民们已死的先祖先父在阴间还侍奉着商先王，仍在先王那里供职，还会责罚这些不听命的儿孙们。先王和其臣民之先祖先父还会降祸福于人间。

经过盘庚耐心、尽情的开导和告诫，他终于说服了反对迁殷的臣民，顺利地率商王朝的王室贵族和臣民渡河将王都迁于殷。

《尚书·盘庚》中的下篇主要内容是盘庚率臣民迁于殷后，安顿好所有臣民的邑里居处后，按各自的位置进行整顿，向王朝中众官吏的训话，仍是以上帝的旨意要求百官不要只图安逸，不要违背神的意愿，不敢违背占卜，发扬神龟的吉示。不要贪财货，对于为人民安居作出成绩的官吏，才能任用和受到敬重。不要积聚财富，增加家业来养肥自己，要使人民也能获得好处。

《尚书·盘庚》中的上篇，是盘庚率臣民迁于殷以后一段时间，臣民住不惯这个新王都，说出了一些不适之言。盘庚叫王室贵戚和亲近大臣们去向臣民传达他的话，强调迁都是敬承天命，遵循祖宗们迁都之先例，说明迁都的重要性，向臣民讲清

道理，并对那些散布流言惑众的官吏提出警告。

经过盘庚迁殷前后的三次训话、告诫，臣民们安心居于新王都，各尽职守，从事生产，使商王朝的统治又稳定下来。故《殷本纪》中谓盘庚迁殷以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殷墟出土的约十万片商代甲骨就是自盘庚迁殷后的遗物，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当时王朝的遗文。目前一般认为殷墟甲骨文的时限是盘庚迁殷至纣之灭的二百七十三年，但在甲骨文分期断代上，自盘庚迁殷至武丁二世四王列为第一期（一般又统称武丁时期），盘庚、小辛、小乙三王时期之物未能区别出来。商王朝最后一王帝辛，即纣王时的甲骨文也未能辨认出。故有学者认为商王朝自盘庚迁殷以后，帝乙或帝辛时又迁过都，即由殷迁至朝歌，但朝歌故址即今河南淇县一直未发现有甲骨文出土。《史记》《殷本纪》和《周本纪》皆记载周武王出兵伐纣，纣发兵拒之于牧野，纣兵败后，登鹿台自焚而死。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七十里，当时谓“商郊”或“纣之南郊”。鹿台在朝歌城中。目前学者中多认为朝歌是纣之游幸场所，在此建有“离宫别馆”，与殷墟的王都是一体，不完全是独立的王都，故才未发现商末的遗物遗文。孰是孰非无定，附此作备考。

注 释

①《铁》35、1。

②③《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④《水经·洹水注》引。

⑤《史记·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

⑥见《管子·小匡》。

⑦ 据刘蕙荪著《老残游记补编》（文艺出版社，1992 年）第 226～229 页所记，甲骨文为刘铁云于 1900 年所考释出来。

⑧《史记·殷本纪》《集解》引。

⑨ 科学出版社，1956 年。

⑩《历史学》，1979 年第 2 期。

⑪ 读书上册 134 页，正中书局，1947 年。

⑫ 读书 171 页，人民出版社，1954 年。

先秦

武丁治国

武丁，又称殷武，殷墟甲骨文亦作武丁，名昭①，商朝第二十三位国王。商王小乙（名敛）之子，继小乙即位。在位五十九年，约于公元前十三世纪中后期②。因治国有方，振兴了商王朝，死后被尊为高宗。

商王朝自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一带地区）以后，贵族们多不适应新王都之环境，民心亦动荡。盘庚死后，由其弟小辛（名颂）继位，国势又渐衰弱，小辛在位约二十年死，弟小乙继位。小乙继位以后见国势衰弱，民有怨言。为观察民间疾苦，命太子武丁至民间长期居住，并与人民共耕作，使其“知稼穑之艰难”③。相传武丁到民间去后，较长时间是在黄河沿岸的地方，他在民间除观察民情，体验稼穑艰难之外，还见到一位有贤名叫甘盘的人，并向甘盘学习，请教治国之道④。

甘盘，有的古文献中又作甘般，殷墟甲骨文中有人名“师般”，如武丁时期卜辞有“命师般……在北爯册”⑤。辞中“爯册”，即“称册”，意思是：奉王命册封⑥。这条卜辞中间

有残缺，其大意是：商王命令师般在北地（或族）册封。亦可释为：师般奉商王之命在北地（或族）册封。董作宾认为："卜辞中甘盘正作师盘。称师，如吕尚称师尚父，以示尊崇贤正之意。"⑦此即互证《尚书·君奭》中"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之可信。

小乙在位约二十余年死后，武丁回王都继位。按照当时的礼制，要守孝三年，而且"三年不言，政事决定于冢宰"⑧。这就是"古者，天子崩，王世子听政于冢宰三年"的具体表现⑨，也就是在守孝三年的时间中，不过问国政，政事皆由"三公"大臣去处理。武丁虽"三年不言"国政，但他仍然在思考如何振兴王朝。因他曾长期处于民间，深知民间疾苦，稼穑之艰难。也知一些有才之贤人隐于民间，如他曾向其求教的甘盘。他还访知有一个叫做说（yuè 悦）的人，因犯罪而成为"胥靡"，即犯罪而服劳役之刑徒古代称做"胥靡"，或作"胥縻"。

《礼记·表记》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是对商代统治者迷信虚无飘渺鬼神的描述。作为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武丁，凡事也必须要"先鬼而后礼"。他深知要振兴王朝，使国势复强，需要有才有能的辅佐大臣，而像说这样处于胥靡中的人，要直接下令从胥靡中解脱出来授以三公之位，必然要受到朝中卿士们的反对。于是他就利用统治者迷信鬼神之心态，而将说请入朝中为辅佐大臣。司马迁根据先秦时期古文献中有关记载，在《史记·殷本纪》中作了生动形象的描写："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以梦所见视群臣百吏，皆非也。于是迺（乃）使百工营求之野，得说于傅险中。是时说为胥靡，筑于傅险。见于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与语，果

圣人，举以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险姓之，号曰傅说。"⑩《集解》引孔安国之说："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经，有涧水坏道，常使胥靡刑人筑护此道。说贤而隐，代胥靡筑之，以供食也。"据考证傅岩在虞虢之界，即今山西平陆与河南三门峡市之间。

傅说为商武丁振兴王朝的中兴名臣，多见于古文献记载，但目前所见殷墟甲骨文中尚未发现有祭祀传说的卜辞，或说卜辞中之"梦父"就是傅说⑪。

武丁即位后"乃或亮阴，三年不言"⑫。"亮阴"又作"谅闇"、"涼闇"或"梁闇"。有作守孝解，有作沉默解，或作患喉疾解。总之，三年不过问政事。三年后以夜梦得傅说为辅佐，同时辅佐武丁的还有甘盘⑬、祖己⑭。商王朝自阳甲继位以来，历盘庚、小辛、小乙皆是兄弟相及王位，宗庙不修，政教废弛，故国势衰弱。武丁欲复成汤之道，举行肜祭（为伐鼓之再祭，次日配龠再祭），肜祭祀先祖成汤，引来一只雄雉（野鸡）登鼎耳而鸣。武丁大惧，以为不祥，与诸贤臣商议，祖己进言说：王不用怕，只要先修政行德，多为民作政事，做到"敬民常祀"，就会免除不祥之事。于是"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复兴"⑮。

殷墟出土的甲骨，是商王朝后半期的遗物，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当时的遗文。经过甲骨学家研究后，将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的遗文，大致区别出五个时期。第一期就是武丁及盘庚、小辛、小乙四王之物。甲骨文字大多为商王祭祀时占卜的记事刻辞，甲骨学中称作"卜辞"。少数为非占卜的记事刻辞，甲骨学中称作"记事刻辞"。从卜辞中发现了一批官阶并不高，但权力很大的史官，这些史官专管祭祀、执行占

卜，能代上帝鬼神言事，也能替商王在甲骨上占卜和判断吉凶。他们相当于周代的卜正或卜人，甲骨学家称他们为“贞人”，即问事的人。武丁时期的贞人目前发现有近五十个⑯。这批贞人中有许多就是氏族首领或成员，他们的职务是世代相传。在武丁振兴商王朝中也起了和甘盘、傅说、祖己的辅佐作用。

从卜辞中看，商代的许多氏族、方国对商王朝是服叛无常，每当王朝强大时期臣服者多叛者少，一旦王朝势弱则叛者定会增多。《史记·殷本纪》中之“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殷复兴，诸侯归之”，与卜辞所反映的情况吻合。故要振兴王朝必须内修政事，外服诸侯。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是古代社会生活之根本。商人迷信鬼神，统治者是“先鬼而后礼”，凡事必经过祭祀占卜而后决，故卜辞中有大量反映农业生产的记录。如“求年”、“求禾”、“受年”、“受禾”，就是祈求禾谷丰登、授予好收成之意⑰。武丁时期占卜禾谷丰登、祈求有好收成的卜辞很多，祈求的对象有先公先王，如夒（náo 挠）、冥、王亥、上甲、示壬、太甲、祖乙及河、岳自然神。有按方位祭祀祈求，如“今岁商受年”、“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⑱。卜辞中的“商”是指商中央王畿。有按谷类作物祈求，如“受黍年”、“受稷年”、“受来年”、“受稻年”等。农业之丰歉是要依靠雨水是否充足，故卜辞中又有“帝命雨弗足年？帝命雨足年”⑲？这是一条对贞的卜辞，辞中之帝即上帝，意思为上帝会不会命令下雨使庄稼丰收，如果不雨则是上帝降旱灾，如卜辞有占卜，“不雨，帝佳熯我”，“帝其降我熯，一月”⑳，熯即旱。

对于开垦农田，武丁时期卜辞中也有许多反映，如“命尹垦田于羊”、“命曼垦田于先侯”、“命禽垦田于京”㉑。此三条辞中的“尹”是官名，“曼”、“禽”皆人名，“羊”地名，即羊方之地，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羊头山一带。“先侯”是商诸侯族居地，在今河南陈留镇东。“京”是商西部农猎区，在今河南沁阳附近。相传武丁曾封季父曼于河北，称蔓侯。辞中“曼”即武丁时之诸侯。“禽”是武丁王朝一位帅军之武将㉒。由此可知武丁对于开垦农田，扩大土地种植面积是很重视，所垦之地区已远离王畿。

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呼……耤受年”、“众作耤不丧”㉓。“耤”即耤田，为商王亲耕之田。“众”即众人，大众，为从事农耕的生产者。后一条卜辞之意是：占卜命大众去耕种王田，会不会有人丧失。管理耕种王田的官吏在卜辞中称作“小耤臣”。我国古代所谓“王亲耕之田为耤田”。其实是借民力治田，国王只是按礼制去巡视，故武丁卜辞有“王其观耤叀往，十二月”㉔。辞中的“叀”是虚词，全辞之意是：商王（武丁）在十二月往耤田中去巡视。总之，武丁时期还有不少反映农业生产的卜辞，这就充分地补足古文献中所缺，说明武丁在振兴商王朝过程中，首先是发展农业生产以安定社会生活来加强国势。

在古代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从甲骨卜辞中来看，商王朝天天有祭祀，事事必占卜，神权大于王权。武丁振兴商王朝另一突出的贡献就是以武力征伐四方，巩固商王朝的统一和扩大疆域。《诗经·商颂》是商族后代宋国人歌颂其祖先的乐歌。对武丁之颂辞是：“武王孙子，武丁靡不胜，龙旗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㉕意思

是：成汤之孙武丁，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以插有龙旗的兵车十乘就得到诸侯们之拥护，无不奉黍稷来助祭，千里王畿内，人民安居，而且还将疆域开拓至四海。《周易·既济》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今本《竹书纪年》武丁，“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㉖；《商颂·殷武》有“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此两条关于武丁征伐的材料，是目前古文献中仅见的具体记载。

武丁征伐四方之情况，在甲骨文中有大量的记载。从占卜征伐的卜辞中得知武丁时期有两个长期与商王朝为敌的方国——𢀛方和土方。此两方国不见于后世的古文献中，而在卜辞中则有较为具体的反映，仅收入《甲骨文合集》中就近七百条。如武丁时期卜辞中常有占卜“𢀛方其出”“𢀛方弗出”的记录，虽然几乎是年年月月的祭祀上帝和祖先，祈求保佑不使𢀛方来侵挠，但仍然无济于事。𢀛方和土方侵挠的地区不断扩大，甚至侵入商王都之郊外。如长地（族）的长双角来报告武丁，𢀛方从西边侵入王畿内的农田抢掠。过了二十九天沚䧅（武丁朝的武将）向武丁报告，土方进入王都东郊，抢掠二邑（村）、𢀛方也侵入西郊农田。又如在某年七月己丑日，长地（族）长双化向武丁报告，𢀛方进入商郊丰地抢掠。其后又有长戈化报告，𢀛方从西边进入商郊抢掠㉗。

商王朝的𢀛方、土方的活动地域较大，从卜辞中来看，他们的活动主要是在商的西部和西北部，故𢀛方之族居地大体是在今内蒙河套至山西西北部一带；土方之族居地在𢀛方东部，在今山西北部。与土方相邻的一些氏族，方国如象土、牧、沚、𠚤等臣属于武丁王朝亦常遭𢀛方与土方之侵挠，甚至距𢀛方较远的戉，其族居地在今山西平陆一带，也曾受到游离南下的𢀛方之人骚挠，常向武丁告急。所以武丁为了维护王朝的统

一，社会生活的安定，不得不对两方国长期动用“三千”、“五千”的兵员，最后终于征灭。故在武丁之后的卜辞中，不再见有土方之踪迹，而𢀛方偶有一二见，亦是残余而已。可以说武丁征伐𢀛方、土方是自卫战，而且最终取胜，安定了商西北方之疆土。

武丁用兵于商西北方之方国还有一个方方，方方在卜辞中又称傚方。据考证此方方即夏朝“少康即位，方夷来宾”之方夷㉘。方方在某年六月曾侵入臣服于商王朝的𢦏（氏族），俘去十五人，次日又俘去十六人㉙。又曾侵沚和进攻武丁派驻北方地区之驻守史㉚。方方与沚为邻，其族居地亦在今山西北或西北部，最终为武丁征服，故卜辞中有“今日命方归”之占卜㉛。

武丁与诸方国的征战，从目前所见，除上举三个之外，还有免方、龙方、虎方、马方、印方、羌方、夷方、旨方、基方、湔方、典方、𢦔方、鬼方、周、归、下危等。其中羌方是羌人的一部，羌在商是一大部落，分为若干支，除羌方外，见于卜辞的还有北羌、马羌、羌龙等。这些羌人活动地域很大，主要分布在今内蒙古西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北羌、马羌、羌龙、羌方活动地区距离王畿不算远，大体在今山西西北和陕西北部一带，武丁王朝对待羌人十分残酷，俘虏后往往用作人祭，甚至用百羌作祭祀之牺牲㉜。但终武丁之世仍未完全征服羌人。

夷方在武丁时期卜辞中只称夷。古本《竹书纪年》夏纪有“后芬即位，三年，九夷来御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此即其后所称之东夷，分布在今河南东部、山东南部、江苏西部和安徽一带地区。对夷征

伐的卜辞数量较少，而且规模不大。

武丁征伐诸方并非每次都是亲征，有的是命王朝的武将，如禽、沚戫；有的是命王室诸妇，如妇好、妇井；有的是命王室诸子，如子㽙、子效；有的是命诸侯、方伯，如仓侯虎、鬲、雀、亘。征服后的民族、方国地区就派武官驻守，如东史、南史、西史、北史，就是驻王畿以外四方的驻守史官。有的就是以臣服者封为驻守史，如西史旨；有的就地封侯，如雀侯、周方伯。还在臣服者地区修建城邑，建立居民点，如卜辞中有"基方作墉"㉝，意为在基方修建城邑。

从以上所举卜辞来看，武丁经过对诸方国的征伐后，其势力已进一步扩大，北方已至今内蒙古南部和山西北部。西方已至甘肃、陕西一带，东方至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其南的奋伐荆楚，在卜辞中只有武丁晚期的"伐归伯"㉞。"归"即今湖北秭归。1974年在湖北黄陂县滠店发掘出的盘龙城遗址，就是一座商代中期遗址，证明是商的一个重要方国所在地。故武丁时其势力南方已达长江中游地区。

注 释

① 古本《竹书纪年》殷纪缺武丁，今本"名昭"。

② 商朝积年古文献中说法不一，故各王在位时间目前尚不能确定。

③《尚书·无逸》。

④ 伪古文《尚书·说命》、《汉书·古今人表》卷二，颜师古注："甘盘，武丁师也。"

⑤《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384片。

⑥ 孟世凯著：《甲骨学小词典》"再册"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

⑦《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刊1933年出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

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上册。

⑧《史记·殷本纪》。

⑨《礼记·檀弓下》。

⑩《国语·楚语上》与此同意。

⑪《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又丁山：《商周史料考证》第 75 页，中华书局，1988 年。

⑫《尚书·无逸》。

⑬《史记·燕世家》《集解》引孔安国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后有傅说。”

⑭《尚书·高宗肜日》、《史记·殷本纪》。

⑮《史记·殷本纪》。

⑯ 孟世凯著：《甲骨学小词典》附录三《各家所定甲骨卜辞贞人时期表》。

⑰《甲骨学小词典》“求年”、“求禾”、“受年”、“受禾”条。

⑱ 依次见于《契》493，《乙》5242，《粹》904，《乙》3409，《粹》906 等片。

⑲《前》1、50、1。

⑳《龟》1、25、13，《丙》63。

㉑ 依次见于《前》2、37、6，《合集》22、9473。

㉒ 此龠字之隶定非原意，只是为印刷方便之暂定。

㉓《合集》9506，9508。

㉔《合集》9500。

㉕《商颂·玄鸟》。

㉖《易·未济》九四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㉗ 有舌方、土方之卜辞皆见于《合集》6057－6454 片。

㉘ 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 555 片。

㉙《菁》5。

㉚《合集》6728、6771（正）。

㉛《前》5、29、2。

㉜《续存》上295。

㉝《缀合》121。

㉞《粹》1180。

牧野之战

商王朝经在位五十九年的商王武丁励精图治振兴以后，出现了目前各种史料中所见最强盛的时期。武丁死后，其子祖庚继位。祖庚死后，由其弟祖甲继位。祖庚，甲骨文中作合文。祖甲时卜辞称兄庚。廪辛、康丁时期卜辞称父庚。武乙、文丁时期卜辞称祖庚，为旁系先王。祖甲，甲骨文中作合文。廪辛、康丁时期卜辞称父甲。武乙、文丁时期卜辞称祖甲。《国语·周语下》谓“帝甲乱之，七世而陨”。韦昭注：“帝甲，汤后二十五世也。乱汤之法，至纣七世而亡也。”《史记·殷本纪》：“帝甲淫乱，殷复衰。帝甲崩，子帝廪辛立，帝廪辛崩，弟庚（康）丁立，是为帝庚（康）丁，帝庚（康）丁崩，子帝武乙立。”

商王廪辛或称冯辛，不见于甲骨文。康丁，《殷本纪》误作庚丁，祖甲之子，廪辛之弟。甲骨文作合文，又称康祖丁，为直系先王。武乙，甲骨文中作合文，又称武祖乙，为直系先王。《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

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帝太（文）丁立。帝太（文）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商王朝对神鬼非常敬畏，迷信很深。《礼记·表记》谓“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殷墟出土的约十万片商代后半期的有字甲骨，绝大多数是祭祀时占卜的记事卜辞，证明商王凡事必向神鬼祈求占卜而后决断。但并非每个商王对此都深信不疑，武乙的与偶人博，射天，都说明了武乙思想上对神权的藐视，试图以此来冲破神权，加强王权。从甲骨卜辞中来看，自武乙、文丁时期，代替上帝鬼神言事的贞人开始减少，由商王亲自掌占卜，也透露出王权与神权之争，神权在削弱，王权在加强。武乙喜田猎，在外打猎时被雷电击死是偶然之事。《史记·封禅书》和《三代世表》谓武乙是“慢神而震死”，乃是迷信思想，不足取信。

《尚书·无逸》中记周公之语，对商王朝中祖乙、武丁、祖甲作了颂扬之后谓“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这是周公有意贬低商末诸王的不实之词。从甲骨文来看，自一代英王武丁时起，就有大量的田猎卜辞，这不是单纯的“盘游”，而是开发农田，消除兽害，保护庄稼的一项生产活动，同时又是一项训练士卒的军事演习和补充部分生活资料的活动，更非“惟耽乐之从”。自祖甲以后也非尽是些短命的商王，虽目前还不能完全确定每位商王在位的准确时间，但除廪辛、康丁两王外，其他诸王在位时间都在十年以上。因商王们是多妻，子弟不少，一般继位时年岁都不小，不应是些短命商王。

武乙被雷电击死，其子文丁继位。文丁，《殷本纪》、《后

汉书·西羌传》误作太丁。甲骨文中作文武丁，为直系先王。商王武乙时，周族先王季历（又称王季、公季）为商之诸侯（甲骨文中称周侯、周方伯），据《竹书纪年》载："武乙继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①文丁即位后，族居于燕京山（今山西静乐东北）一带的燕京之戎叛商，周季历率周人征伐，结果被戎人大败。两年后"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殷牧师"②。余无之戎是族居在今山西长治市西北一带的戎人，因为叛商，被周季历征服，文丁封季历为掌握西部征伐大权的牧师。其后季历又征服始乎戎，其势力逐渐东进，文丁待季历向商王朝献俘时，赐与圭瓒、香酒，并命为方伯，同时又将季历囚禁而死，史称"文丁杀季历"。商周关系自此交恶。

文丁死后，其子帝乙继位。帝乙，周原甲骨文和商末铜器铭文中皆称作文武帝乙。地处东南方的人方叛商，帝乙始征人方。帝乙死后，其子帝辛继位。

帝辛，名纣，又称受、受辛、商辛、殷辛王纣、商王受、商王纣、商纣、季纣等。商王朝最后一王。《史记·殷本纪》："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为帝辛，天下谓之纣。"微子启虽然是长子，因母是帝乙之妾未能继位。而纣是怎样一个人？据《殷本纪》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其它古文献所载是："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③"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④。从这些叙述中看出纣是一个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言善辨的聪明人，也是一个生性残忍、

好大喜功、酷好声色的国王。

商自帝乙时，王朝的统治就受到诸侯、方国的挑战。周人的时服时叛，东夷人方的叛变，西方昆夷也叛商，虽尚未动摇商的统治，但已潜伏着较大的危机。帝辛继位以后，对外是采取武力镇压，故《左传》中有“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⑤；“纣克东夷而陨其身”⑥；“纣之百克而卒无后”⑦。《吕氏春秋·古乐》谓“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黎为商之诸侯国，在今山西黎城，纣在黎国举行大蒐，是武力示威，企图以武力来威胁而聚敛诸侯、方国的财货，于是引起诸侯、方国反叛。东夷本与商族有族源关系（认为商族起源于东方的学者，皆同意其是出自古东夷部落），因不满商纣的压榨而叛商。帝乙时东夷中的人方叛商，被帝乙征伐。商纣时又有人方之外的诸夷叛商。商纣集中兵力征服东夷，结果被周武王乘机而灭商。故《左传》谓之“陨其身”、“卒无后”。

《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朝歌在今河南淇县，邯郸即今河北邯郸市，沙丘在今河北广宗县大平台村一带。《国语·晋语一》谓“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韦昭注：“有苏，己姓之国，妲己，其女也。胶鬲，殷贤臣也，自殷适周，佐武王以亡殷也。”有苏氏为商之属国，其故地在

今河南武陟，商纣伐有苏获得美女妲己后，宠爱到言听计从，于是多在离宫别馆寻欢作乐。历代史家都将商王朝的灭亡归之于商纣宠妲己，妲己干政所致，事实上非尽如此。《尚书·微子》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微子若曰：太师、少师谏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服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津涯，殷遂丧”。微子是商纣之庶兄，是商王朝末年的贤臣。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纣既立，不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不听。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灭阢（音耆）国，惧祸至，以告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于是微子度纣终不可谏，欲死之，及去，未能自决，乃问于太师、少师，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陈于上。纣沈湎于酒，妇人是用，乱败汤德于下。殷既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小民乃并兴，相为敌雠。今殷其典丧！若涉水无津涯，殷遂丧。”《尚书·微子》中无“妇人是用”，只说拼命饮酒，败坏祖先的美德于后世。殷王朝上下大小官吏们都作偷窃奸邪的事，至于卿士师长们更是不守法，犯了罪都能逃出法网。故小民们都起来造反，与王朝为敌。这样殷就要丧亡，如涉大水一样茫茫然，即不见津渡，也不见涯岸，殷很快就要灭亡。《孟子·离娄上》给夏商两王朝的灭亡作了结论，谓“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故商之亡国并非是妲己一人之过。

商纣时社会矛盾加深，激化的主要原因是商王朝内部的腐败。商纣为了声色淫乐，大兴土木，首先扩大商王都的范围，南之朝歌，北之邯郸、沙丘皆建离宫别馆。以朝歌为别都，建

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⑧，"纣造倾宫、作琼室，七年乃成"⑨。建钜桥仓，厚赋税以充实积蓄供其挥霍。故《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谓"殷之衰也，其王纣作为倾宫、灵台"。《韩非子·难势》谓："桀纣为高台深池以尽民力。"厚赋税必增加诸侯、方国的负担，建馆台必用民力，无休止的压榨，必然引起人民反抗。

对于诸侯、方国和人民的反抗，商纣是采用征伐和重刑的高压政策。《殷本纪》载"百姓怨望而诸有叛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烙）之法。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烙）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而用费仲为政。费仲善谀，好利，殷人弗亲；纣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商纣对臣民的暴虐，诛杀大臣、重用谄媚好利的小人，引起众叛亲离，怨声四起。而纣之叔父、王子比干，庶兄微子多次劝谏，纣不但不听反而"剖比干，观其心"。于是微子与大师、少师谋后遂逃去。箕子亦是纣之叔父，被纣囚禁。商容是王室贵族，掌朝中祭祀、宴乐之典乐官，深受人民爱戴的贤臣，亦被纣罢官。王朝中的另外两乐官，太师疵和少师彊见商朝早晚必亡，于是抱了乐器投奔周。

贤臣祖伊，是武丁王朝贤臣祖己之后裔，见周西伯姬昌，即周文王，先后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北）、芮（今陕西大荔东）之矛盾，征伐过犬戎（西戎的一支）、密须（今甘肃灵台

西）、邢（今河南沁阳西北），并将黎国征灭，其势力逐渐伸入商之腹地。加之周文王行善修德，四方归周者甚众。甚至商之老臣鬻（yù 玉）子、辛甲大夫等都投奔了周。商之诸侯孤竹君之两子伯夷、叔齐也弃商奔周。祖伊认为周西伯坐大，将不利于商，奔告纣。纣对祖伊说："我有天命，怕什么。"

周文王最后征伐的是崇国（今陕西户县东），因崇侯虎曾向商纣告密，而他被纣囚于羑里。灭崇后在沣水西岸建丰邑（今陕西长安西北），将周都由岐下（今陕西周原）迁至丰。次年西伯姬昌死，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所谓"修文王绪业"，就是行德修善，继续收买人心，积蓄力量准备伐商。文王时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⑩。武王即位的第九年（或说十一年），据《周本纪》所记"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牌位），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又"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盟津即孟津，即今河南孟津。周武王"东观兵，至于盟津"。是伐商前的一次势力检验，试探是否有伐商的力量。出乎预料的是不约而来孟津会合的有八百诸侯，所谓诸侯，也就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氏族，方国首领，而且多是商王朝西部的。周武王派人到朝歌刺探军情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未敢继续东进而还师。

《周本纪》："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疪、少师疆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偏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又"二月甲

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前往助周武王伐纣的还有诸侯兵车四千乘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的人。周武王就是率周和诸侯的军队以及来自汉水、渭水、黄河流域的八国联军东进伐纣。二月周军至商郊牧野，并在牧野举行誓师。誓词载于《尚书·牧誓》中。牧野在今河南淇县南七十里。

《周本纪》："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叛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

《殷本纪》："周武王于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县之大白旗。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

周灭商牧野之战，双方皆出动数以万计之兵力。由于纣军"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①"便未经激烈大战就以纣兵败自焚而告结束，商王朝遂灭亡。但是由于古文献中所载各不尽相同，给后世史家留下一些至今难解的问题，附其主要的略述如下：

1. 灭商年代：各种有关的记载只有"二月，甲子日昧爽"，纣兵败灭商，无具体的年代。甲子日昧爽克商，已被1976年在陕西临潼零口乡发现西周早期青铜器《利簋》上铭文所证实。其铭四行三十三字："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

鼎、克。昏夙有商。辛未王在阑自，赐右史利金，用作旃公宝尊彝。”而灭商年代，到目前所知，国内外史学、天文学史研究中共有二十多种说法。在大陆一般教科书仍采用近代学者们根据《竹书纪年》所载西周积年共257年，推定为公元前1027年。

2. 商王朝的积年：《左传·宣公三年》："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孟子·尽心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竹书纪年》："汤灭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岁四百九十六年。"⑫谯周《古史考》："殷凡三十一世，六百余年。"⑬各书所载不同。目前据甲骨卜辞中的世序，结合史书记载，一般采用商王朝应为三十一王，有约六百年的历史。商王朝建灭具体年待考。

3. 牧野之战中双方用兵数量，古文献中有不同的记载。如周武王的虎贲军，就有三千、八百、四百、三百四种记载⑭。先秦文献中大多载为三千人。商纣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也有不同之说。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卷三谓“三代用兵无近百万者，况纣止发畿内之兵，安能如此其多”。故现代著述中皆改用十七万⑮。

注　释

①《太平御览》卷八三引。

②《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③《荀子·非相》。

④《史记·殷本纪》引《帝王世纪》。

⑤ 昭公四年。

⑥ 昭公十一年。

⑦ 宣公十二年。

⑧《殷本纪》《集解》引《新序》。

⑨《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引《世纪》。

⑩《论语·泰伯》。

⑪《尚书·武成》。

⑫⑬《史记·殷本纪》《集解》引。

⑭ 依次见于《周本纪》、《风俗通·皇霸、三王》、《墨子·明鬼下》、《尚书·牧誓》。

⑮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1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刘泽华等著《中国古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

先秦

周公东征

《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灭商以后，“封商纣子禄父、殷之余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牧野一战，周武王灭商，沿商汤灭夏之例，封纣之子武庚禄父于殷为殷侯“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史记·殷本纪》）。周武王灭商，可以说带有些偶然性。以一个“小邦周”的力量灭了有强大势力的“大邑商”之后，都不知如何办？加之商王朝在全国的势力仍未削弱，虽封武庚留在殷都续殷祀，又不放心。于是除了作些安抚殷遗民之事外，就是设立“三监”来监视武庚及殷遗民。

“三监”，据《周本纪》《正义》引《汉书·地理志·河内郡》谓“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邶、鄘、卫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鄘，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又引《帝王世纪》云：“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

之；殷都以西为鄘，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是为三监"。司马迁的《史记》在《周本纪》，齐、鲁、管蔡、卫、宋等《世家》和《太史公自序》中，皆以管叔、蔡叔和武庚为"三监"，而是监殷遗民。《逸周书·作雒》载"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尚书大传》亦谓"三监"为管蔡霍三叔，所监的是武庚和殷遗民。故"三监"应为周文王的三个儿子，即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一作武）。

《周本纪》："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正义》："周，镐京也。武王伐纣，还至镐京，忧未定天之保安，故自夜不得寐也。"周武王虽灭了商，但见大半个国土还是商人的势力，回到镐京坐下来冷静考虑，商王朝虽灭，然基本力量尚存，尽管封了些亲信在东方各地，但不知怎样去统治才能使殷遗民们臣服其统治。一想到这些就彻夜难眠。

灭商后两年，周武王病死。子姬诵继位，即周成王。《周本纪》："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叛周。"这是司马迁根据先秦文献提炼出来的概括记述。《尚书·大诰序》："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伪《孔传》："三监，管、蔡、商。淮夷，徐，奄之属背叛周。"这里指出叛周的不仅是"三监"，还有淮夷。《尚书大传》："武王死，成王幼，周公盛养成王，使召公奭为傅。周公身居位，听天下为政。管叔、蔡叔疑周公，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王！'奄君、薄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事之时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叛也。"①这里说禄父和"三监"叛周是奄君

的煽动。《尚书·金滕》："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伪《孔传》："武王死，周公摄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于国，以诬周公，以惑成王。三叔以周大圣，有次立之势。遂生流言。"这里所说对周公造流言的是三叔，《逸周书·作雒》："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叛。"②从以上所举的各种记载来看，"三监"和武庚叛周，是"三叔"疑周公要篡成王之位，故散播流言。奄君乘机煽动武庚叛。参加叛周的有淮夷、徐、奄、薄姑、熊、盈等东南诸国。《逸周书·作雒》说有十七国，《吕氏春秋·察微》说是"东夷八国"。商末周初仍然是"小邦林立"。分布在今山东、江苏、安徽和河南东部一带地区的夷人皆称东夷。《后汉书·东夷传》所谓夷有九种，即"犬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其实尚不止九种，凡分布于东部和东南部的氏族、方国皆称东夷。

历来对"三监"叛周的原因有诸种说法。从"三叔"来说似是与周公争夺王权，武庚及东夷是助"三叔"反叛。或说是"三叔"伙同武庚反周复商，得到东夷之助。这都是有据有理，然皆为现象而非实质，其实质应从商周两族所处的社会阶段和社会生活中去探索。

周灭商前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农耕小国，只有百里的土地③，自称"小邦周"④，"小国"⑤。周原甲骨文是出土于周古公亶父迁于岐下的周原，大多是周文王时的遗文。其中一片就是周文王在商王帝乙宗庙中祭祀成汤，表示为商之属国⑥。周之先祖自夏朝时就失其稷官而变戎俗⑦。直到古公亶父时才迁于岐下贬戎狄之俗，筑邑定居⑧。到季历和文王时农耕有所发展，也是接受了商的农业文化所致⑨。《诗经·豳风·七月》

是较完整反映灭商前周族的农事诗，虽然有不少美化，但仍然看出氏族成员一年要不断劳动，农耕加上田猎才能满足贵族们需要。故“一直到武王克商以前，周大概尚在氏族社会末期父家长家庭公社阶段”⑩。所以灭商后，落后的周人从农村来到大邑商后，武王的三个亲弟虽是去监视武庚和殷遗民，但只两年时间，“三叔”就被商发达的文化，富裕的社会生活所吸引，从思想意识上被演变。制造周公流言只是借口，实质是想助武庚恢复原有社会生活。商是出自古东夷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入商以后东夷诸氏族、方国虽时服时叛，只是中央王朝与地方诸侯的关系，而周灭商是灭族问题，虽未将商人诛尽，但商人从此不再居于统治地位，沦为被统治、被奴役者。

东夷十七国或八国助武庚，伙同“三监”叛周，是因东夷诸国与商有族缘关系，与商族共存亡的问题。如奄君是奄地（今山东曲阜）之君，奄是商王南庚、阳甲所居之旧都。盘庚自奄迁殷以后，此地或封商王室中的贵族，或封当地氏族、方国首领为君作商王朝的屏藩。商末帝乙、帝辛征伐人方，征服后为开发东南地区则以重兵留守，商被灭后，东夷诸国就与商军联合助武庚反周。

由于武庚伙同“三监”和东夷诸国的叛周，使刚建的周王朝面临“若涉渊水”⑪的困难。加之王朝中一批新贵族贪生怕死，反对周公平叛。面对王朝内外的压力，周公表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雄才大略。他首先耐心地说服周王朝中反对平叛的新贵们，同时争取商遗民中的贵族们的支持。东征前的这篇讲话内容载于《尚书·大诰》中。主要内容大意是：“上帝已降大祸于我国，西土有很大的灾难。殷之余孽武庚也想复辟而作乱。只要有十夫助我，我就能决心平叛，办到文王、武王想要

办到的大功。我要进行平叛的东征，已经从占卜上得到了吉兆。”周公深知商人迷信鬼神，相信占卜，而周人也深信不疑。所以用占卜后得到吉兆是上帝所示来对贵族们进行说服。结果得到周王朝大多数贵族和商遗民中部分贵族的支持。于是开始东征。

周公东征一事，古文献虽多有记载，但都很简略。总的说来是周公经过“内弭父兄，外抚诸侯”⑫，这样一个安抚内外的过程以后，就亲率大军东进。首先诛了武庚和商王室中参与叛乱的势力，其次杀了管叔和蔡叔，流放了霍叔。然后再挥师向东南进发，经过三年的征伐，才将东方诸国中参与叛周的方国征服。《孟子·滕文公下》谓周公东征“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

周初青铜器铭文中亦有一些记载了周公东征一事。如《小臣单觯》、《塱方鼎》、《禽簋》、《保卣》等。《保卣》铭中有“王令保（召公）及（逮捕）殷东国五侯（徐、奄、熊、盈、薄姑），征兄（诞荒）六品（遂灭六国）”。《塱方鼎》铭中有“隹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哉。公归，荐于周庙”。虽然周公花费了三年时间进行艰苦征伐，但最终取得了胜利。给西周王朝在东方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周公东征后，进行了第二次大分封。封微子启于宋（今河南商丘南），以续殷祀。为了便于控制东方地区，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市），在东都又建成周安置殷遗民。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于成王。

关于对殷遗民的处置问题。周公东征取胜以后，大批殷遗民，主要是商王室和在各地的贵族被迁往西土。自本世纪六

十年代以来，先后在陕西、甘肃一些地方发现了不少的西周初至晚期的青铜器，其中有些是一个家庭的铜器群。根据这些家族的铜器群的族徽和铭文内容来断定，都是西迁殷遗民之物。故周公东征后，在西迁殷遗民时不仅只迁至成周一处，也迁了不少至宗周和周人的发祥地区。

注 释

① 《诗经·邶鄘卫谱》疏引。

② 今本《竹书纪年》有"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

③ 《孟子·公孙丑》。

④ 《尚书·大诰》。

⑤ 《尚书·多士》。

⑥ 徐中舒：《周原甲骨初论》。

⑦ 《史记·周本纪》，《匈奴列传》。

⑧ 《史记·周本纪》。

⑨ 郭沫若：《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

⑩ 斯维至：《早周的历史初探》。

⑪ 《尚书·大诰》。

⑫ 《逸周书·作雒》。

先秦

成康之治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联合犬戎所杀，次年周平王迁到东都洛邑。后世史家遂将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王朝至幽王被杀的这段历史称为西周。西周初经周公旦辅政治理，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成王、康王沿周公制定的国策治国，使周王朝的统治更加巩固，迈上了发展的轨道，受到后世史家的称道，谓“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废）四十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周公东征取胜之后，稳住东方地区的形势。可是在东方广大地区仍然分布大量的殷遗民，尤其是被周人称为“殷顽民”的原商王室的贵族。周公甚为耽心的就是这些“殷顽民”，如不加以控制、安置，他们还会寻找机会再次叛周。早在武王灭商后，就为此而彻夜不眠，曾与周公作了长夜计议，提出一个控制东方地区长治久安的规划，即在伊、洛营建东都。《逸周书·度邑》载武王说：“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洛，无远天室。”武王未能亲自营建东都就病逝①。

周公不愧是西周王朝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熟知夏殷两朝兴亡的历史经验，他的深谋远虑不仅表现在坚定的东征，并取得胜利方面，也表现在根据武王生前所选定的地址和规划而完成营建东都洛邑，妥善的安置殷遗民。《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鲁世家》："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雒邑。"司马迁编写西周历史上的大事，主要是取材于《尚书》中的《康诰》、《召诰》、《洛诰》、《多士》以及《逸周书》等先秦古文献。《书序》中谓"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洛诰》"。"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

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一件西周青铜器《何尊》，有铭文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个字，记载有周初营建成周之事。全文是：

"隹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隹武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乌呼！尔有唯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劳于天，彻命敬，共哉。叀王恭德裕天，顺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障彝。隹王五祀。"

大意是：周王初迁于成周，按武王的礼举行福祭。四月丙戌这

天，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说："武王灭大邑商，曾廷告于天说，要建都城于天下之中心，从这里来治民。你们这些小子当年还无知，现在要学长辈公氏的榜样，有功劳于天，完全听命就会受到尊敬。王是敬德于天的，按天意行事，王颁诰训，赐何贝三十朋，何作器纪念。"这件事是在周成王五年。

《何尊》的出土地方是陕西宝鸡，这地区是西周初虢仲的封邑，称虢公，即西虢公（小虢）是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②。其后人在成王时随同东迁成周，成王诰训颁赐之后，作宝器留念。故此器铭文是研究西周史重要的史料，所记内容不仅与《尚书》中有关篇章所记相合，也证实了周公在成王时营建了东都成周，而周成王五年将王都由宗周迁于成周。有学者认为西周时是丰镐与东都成周两王都并存，关中之镐京（宗周）为西都，洛邑之成周称东都，两都相距千里，皆为王畿之地。成周处于"天下之中"，对诸侯朝会，四方入贡，交通东方地区十分便利。更重要的对东方原商王朝统治地的殷遗民势力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

成周建成，将商王室原来的贵族，主要是参与叛周的"殷顽民"强迫迁到成周，在王城派驻八师兵力，一方面监管"殷顽民"，另一方面监视东方地区。

周公东征，亲自率军，用了三年时间，直到东方地区的海边，亲见夏、商时期那种"万国"、"万邦"的"小邦林立"的局面。东征"灭国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③。这些大大小小的氏族、方国分布在虎豹犀象出没的地区，其中许多还在这种自然生态环境中过着较原始的生活。如何来统治这些"万国"、"万邦"，是周公和周王朝新贵们所考虑的重要问题。武王灭商后就彻夜不眠地考虑过如何来统治商土的遗民及其势

力。《史记·周本纪》载武王灭商后“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这种追封是兴灭国继绝世之举，是武王为收买人心而作。又“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这种赐封功臣，未考虑对巩固周王朝起多大作用。按《周本纪》所载，管、蔡亦是功臣受封，结果反被演变而叛周。说明周人以一个落后的农耕民族灭了先进的大邑商，仍按落后的思想意识来统治殷遗民，又引起东夷中一些方国助武庚叛周。

周公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制定周人统治殷遗民的策略。借鉴夏商两朝兴亡的经验，制定了周初的分封制度。周人总结历史经验，从中吸取教训，应当说从周文王就已注意到。《诗经·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颠沛之揭。枝叶未有害，木实先拨。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周武王灭商后，也在总结商亡国的经验。《史记·周本纪》：“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王。箕子不忍言殷恶。”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奭在《尚书·召诰》中说得很具体：“我不可监于有夏，亦不可监于有殷。”而《君奭》中载周公曰：“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从周人总结夏商两朝的历史经验中，周公认识到一个战略上的问题，即是诸侯对于王朝的拱卫作用。如夏末的韦、顾、昆吾是夏的异姓诸侯。“韦、顾既伐，昆吾夏桀”④。三个诸侯被商汤伐灭，夏桀也就被灭。商末的黎、邘、崇等诸侯是商西部的拱卫者，周文王伐灭后，武王则可长驱直入抵商郊牧野灭纣。

《尚书·酒诰》中有“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

周公认为是商已有拱卫商王朝的诸侯，这些都是商之藩屏。为了周人的长治久安，首先就是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制定分封制的原则是“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⑤。所以《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谓“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这是春秋时期周大夫富辰所说的一段周公分封的话。可见这次周公封藩屏周，皆是姬姓同族为主，“文之昭”十六个、“武之穆”四个、“周公之胤”六个。《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藩屏周。”这是王子朝告诸侯的话，说明康王时所封的仍然是姬姓周族人。

周公所封的诸侯有多少？《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谓“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谓“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吕氏春秋·观世》谓“周公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虽然所记不同，但所封姬姓之国多是在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和战略要地。如原商王畿地区封康叔为卫，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一带）、邢（今河北邢台市）、茅（今山东金乡西南）、胙（今河南延津西北）、祭（今河南新郑东北），都是“周公之胤”。实际周公所封的姬姓诸侯远不止数十人。除了分封同姓者外，还有不少异姓诸侯，如姜、己、任、姞、姒、子、偃、嬴、防、妘、曹、芈、熊、归、允、曼等等皆受封于各地。

分封诸侯在待遇上有等差。姬姓诸侯受封国除有土地和人

口外，还可以分得被征服的人。如分给鲁“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给卫康叔“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晋分得“怀姓九宗”⑥。这些殷民皆是有技术专长的氏族，其后在发展周王朝的社会经济上起了很大作用。异姓诸侯国，则有所不同，如功劳卓著的太公望封于齐，则是“有分土无分民”⑦。分封赐土、赐民之记载除见于古文献外，还见于周金文，如《史墙盘》、《瘐钟》，记武王时周公主持分来邑之事。《宜侯夨殷》记康王册命，即封夨于宜地为侯，赐田、赐民之事。《盂鼎》是康王对盂的册命等。分封过程中的册命制度的建立是周公为巩固周王朝统治实行的政治措施。所以分封制建立以后，从成王，康王有效的沿袭下来，使西周王朝的统治从动荡走上了安定和发展。

周公制定分封建侯的制度，连同武王灭商所封的功臣，前代帝王的后裔续祀之国，在西周初的国土上就形成了以周人为主干的一系列亲疏兼备的关系网，这对西周初期周人的统治及其后的稳固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东之齐、鲁，南之吴、楚，北之燕，西是周人发祥之地，又封有康叔于晋，原商王畿及近畿地区有卫。故《左传·昭公九年》载周王朝的詹桓伯的话：“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实际上就是西周初期的行政区划，分封制的后果是给后世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公不仅是个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还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改革家。在制定分封建侯制度的同时“制礼作乐”。《尚书

大传》谓："周公相成王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是西周初历史的概括，也是周公辅成王所作的七件大事。前四件历来无可疑，五、六两件后世史家认识上有分歧。《何尊》出土后，证明成王五年建成洛邑，迁居成周。《礼记·明堂位》谓："周公相武王以伐纣，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鲁国季文所说"先君周公制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礼是观察德行，德行用来处理大事，大事又是用来衡量功劳，功劳又是用来取食于人民。所以周公制定之礼是衡量功劳食禄的标准。西周初期与分封建侯同时产生的礼乐制度是当时政治形势之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并非后世之传说。《左传·昭公二年》载"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⑧。韩宣子参观了鲁国的国史馆后才明白周公之德和周王朝得以巩固的原因在于有周公制定之礼。

礼、乐，非周公的创造，他只是在殷人礼、乐基础上加以改革。礼、乐产生于原始社会的原始宗教。对自然界一切现象不可知的神秘，原始人群对自然神的祈求要由巫来举行祭仪，这种礼仪是勾通神人的方式。原始礼仪要以舞助祭，有舞必有歌，有歌则有乐。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礼乐则随着社会的进步形成各自朝代的一套完整的制度。夏朝礼乐制度所知甚少，商朝礼乐制度，虽知不完整，但从殷墟甲骨卜辞中来看，殷人信鬼神，"先鬼而礼"，应是有一套完整而严格实行的礼乐制度。

故《说文》谓“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从示，从丰”。

周人文化比商人的要落后，自周先公王季时开始接受商文化。文王作过研究，武王来不及研究就死，周公为了周王朝统治的长远利益而将商的礼乐改革为适于周人统治的礼乐，曾费过一翻心思。《孟子·离娄下》谓：“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清人崔述认为：“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后能得之也。”⑨周公所制定之礼是哪些，历代学者都只能说大致情形，因为缺乏可靠的具体资料。现存《周礼》一书决不是周公所作，一般认为此是战国成书，集入后世不少的礼制资料，但也保存许多西周时期的礼制资料。周公所作之礼，除《周礼》一书外，《礼记》和《仪礼》中也有所存留。总的来说“制礼作乐”的核心是明尊卑，别贵贱的等级差别。《礼记·曲礼》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故周公的礼乐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等所有的意识形态。

乐是指音律，现存《诗经》中《雅》、《颂》都是配有音乐，无论是庙堂祭祀，朝中宴飨，有歌舞则配音乐，都是清正之音，从上到下都有定制。孔子曾说：“吾自卫反鲁，然后正乐，《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韶》、《武》为乐舞。春秋末孔子整理六《经》时，《乐经》尚存，其后失传。

周公相成王所实行的七件大事，目的是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分封制和改革礼乐制度后建立起一套大宗与小宗宝塔式的宗法制度。以周天子为核心，周王室贵族，周族宗室亲戚，姬姓或异姓诸侯，四方放射式统治着西周国土。各种严格的礼乐制度又紧紧维系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这就强化了统治机构，牢固地维护了周天子的统治。

周公相成王七年还政于成王，他“北面就群臣之位”。周公病死后，成王仍遵周公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治国，使得“民和睦，颂声兴”。四夷来宾，贡献方物。“肃慎来贺”贡楛矢，石砮。成王因病临终时“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无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偏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平，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也就是成王、康王遵守周公所制定的各种制度，才使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巩固，稳步地迈上了发展的轨道，使得人民生活安定，四方诸侯臣服。

注 释

① 有的学者认为周武王时已开始建东都。

② 《左传·僖公五年》杜预注。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诗经·商颂·长发》。

⑤ 《左传·成公四年》。

⑥ 《左传·定公四年》。

⑦《汉书·地理志》。

⑧ 此《周礼》非今传之《周礼》。

⑨《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之五,《周公相成王下》。

先秦

昭王南征

西周王朝经周公辅佐成王治国，取得有利于巩固王朝的效果，出现了“成康之治”稳定发展的局面。康王姬钊死后，其子姬瑕继位，即是周昭王，昭王或称昭后①，为西周王朝的第四位国王。

昭王南征，去而不返。对于周人来说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故“周人讳之”②。因为昭王南征楚而被淹死于汉水中，未给诸侯发讣告，具体情况讳莫如深，留下来的史料很少，就连司马迁编写的《史记·周本纪》也只用了两句话，即“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南巡狩征何处也不说，据《左传·僖公四年》载：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之师伐蔡。蔡败溃，则挥师伐楚。楚子遣使质问齐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代表齐桓公回答：从前召康公（即召公奭）命我们先君太公（望）时说过：“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并赐我们先君有权征伐能到之处，东至大海，西至黄河，

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你们不向王室进贡包茅，周王祭祀之祭物也不供，则无束茅灌酒祀神，寡人就是为此而兴师问罪。“昭王南征而不复（还），”寡人也以此问罪。楚使则说：“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各诸侯军只得前进到陉（山名，楚之北塞，在今河南漯河市北）就停止，驻师于此地。

以上这段记载很明确地说昭王是南征，不是一般的巡狩，所征就是楚国，结果淹死在水中。《吕氏春秋·音初》中关于昭王南征楚被淹死有一段具体描述：“周昭王亲将征荆蛮。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陨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为长公。”③昭王南征荆楚，返还时渡汉水，船体坏而淹在水中。辛余靡是昭王的侍卫长，又称辛伯，或作辛由靡、辛游靡。虽然身高、臂长、力大，仍未能救得昭王和祭公，只捞得二人的尸体。

关于周昭王被淹死于汉水中的原因另有一说是：昭王亲率大军征伐楚国，引起江汉人民的不满，汉水之滨的人用胶粘住船体，待昭王等人上船行至途中，水将胶泡化而船解体，昭王等人沉于水中。此是西晋皇甫谧说④，可靠性不大。无论是楚人胶船，或是船超重而自行解体，都说明昭王南征荆楚渡汉水时被淹未能生还。

《周本纪》谓“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此是司马迁因昭王被淹死于水中用的掩饰词。西周王朝经过“成康之治”，到昭王时仍处于发展时期。1976年12月，陕西扶风县法门乡庄白村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共出土青铜器一百零三件。有铭文的七十四件，其中有五十五件

是西周时期微氏家族的遗物。微国即《尚书·牧誓》中的“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和《立政》中的“夷、微、卢、烝”之微。微在商王朝时是一方国，周武王伐纣时，微和其它七国协助武王灭商。在这批西周时期微氏家族的遗物中，有一件称作《墙盘》或《史墙盘》的铜器。上有铭文十八行，二百八十四个字。内容记叙微氏家族七世先祖与周王朝的关系，墙从周穆王时就在朝庭任史官。故记叙了周文王、武王、成王、昭王、穆王时的大事。此器是作于周共王时，因他是位史官，所述之事都是以史官记载历史的观点来说，而昭王南征伐楚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铭中有“弘鲁邵（昭）王，广笞楚荆，唯狩南行”。此与其它古文献中所记相同，但是以一种颂扬昭王的口吻来说的。

自周灭商以后，先是武王和周公致力于对付商王朝的遗民，巩固周王朝的统治。周公秉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洛邑，迁殷遗民，诛“三监”，东征，分封建侯，制礼作乐等，都是为了周人的长治久安。还政成王以后，成、康两王沿周公制定的基本国策发展，出现了“成康之治”的兴盛局面。昭王继位以后，在先王创建的基业之上，也要有一番作为。所谓“法文、武，远绩以成名”（《国语·齐语》）。远绩就要再行扩大统治范围，发展势力，首先就是指向还不太顺服的南方。选定南方最大的楚国为征伐对象，当是昭王雄心壮志的表现，具有先祖周公之遗风。昭王南征伐楚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军事行动，许多周王室的贵族都随同出征，从一些青铜器铭文中就反映出来。如《䧹驭簋》中有“䧹驭（御）从王南征，伐楚荆”。《过伯簋》中有“过伯从王伐反荆”。《逋簋》中有“逋从王伐荆”⑤。可见随同出征的除有祭公，辛伯（辛余靡）外，还有䧹、过伯、

逾这些方伯和朝臣。昭王南征伐楚的兵力，目前据《竹书纪年》所记："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⑥六师，据徐中舒先生考证："西六师为王之禁军，《大雅·朴棫》之诗云：'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六师应即金文的西六师。西六师为王禁卫，随时皆在王之左右，所以王行而'六师及之'。"⑦《朴棫》郑笺："于，往。迈，行。及，与也。周王往行，谓出兵征伐也，二千五百人为师。今王与师行者，殷末之制也。"故昭王最少是率一万五千人的兵力伐楚。伐楚从昭王十六年开始，到十九年以"丧六师于汉"和昭王、祭公等人溺水而死告终。三年征伐虽失败，对周王朝的天子声威有损，但仍显示了昭王的雄心壮志，因从各种资料中来看，王师不是败于战场，而是因西北地区的周人不谙水性而吃亏，应当说是意外的事故。

昭王南征，伐荆楚，是事出有因。西周王朝自周公东征、分封、制礼作乐以后，总的来说是巩固了王朝的统治，但东南和南方始终是一个不安定的地区，南方的楚就是周王朝不放心的一个大国。相传楚之先祖是祝融氏之后，其后分化很多，故在楚史研究中，对其族源有出自东方、出自西方、出自南方、出自中原等诸说。作为一个较早形成一个地区方国的楚来说，应是以江汉流域为根据地。在夏商时期的一个大的方国、部落、活动范围很大，联系也很广。古文献中从以王朝为中心的观点出发，往往把中原地区以外的各族称之为蛮夷，认为文化落后，不知礼仪。近几十年来的考古资料表明并非如此，如东夷的文化并不落后，楚文化也不低。在商代，楚是商王朝的南土中的一个大方国，虽曾与商王朝抗争，受到商王武丁的征伐，最终还是臣服，受商文化影响较大，这也是考古资料中有

所证明的。

《史记·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楚世家》载楚王熊通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又"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所谓"文王之师"即投奔周文王后作文王之官，楚周关系自文王始。鬻熊因早死，其后人皆事周，并助武王灭商。但周成王分封时，因是楚蛮（又称荆蛮），只封以子男之田。周原出土的西周甲骨文有"楚子来告"之卜辞，证明楚确未列为侯伯。《礼记·曲礼下》："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可见楚之先祖虽对周是勤劳王事，有功之臣，早在商代已经是一个较大的方国，但周王朝总是视为蛮夷。而楚也自称为蛮夷，如《史记·楚世家》载：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成王分封时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姬姓则封土分口，外加赏赐，而异姓之楚，则只有"子男五十里"⑧，其余赏赐全无。相反还要加上进贡之义务⑨。《国语·晋语八》载"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卑（牟）守燎，故不与盟"。此中"置茅蕝"、"设望表"、"守燎"都是燎祭山川诸神的郊祀由楚承担，就是因为"楚为荆蛮""故不与盟"，仅仅派去守燎，即看守以柴燃烧祀天的火堆。这种歧视在楚人心目中当然难以忍受。楚人自商代就有与王朝分庭抗礼之事，当然对周王朝也不例外。管仲代表齐桓公回答楚

使的话就有“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可见连国之大事的祭祀也不放在眼里，完全是公开的对抗。

楚不贡作祭祀用的包茅，当然惹怒了周王朝，昭王也就以此为借口亲自率师南征。有的学者认为西周青铜器《中方鼎》和《中甗》上的铭文所载内容是同一回事，记叙了“周昭王命令南宫伐反虎方的那年，命令中先巡视‘南国’为大军南征‘贯行’，并为周昭王建立行宫。中受命行动，至曾国时，周昭王又派史儿传达命令，奖赏中，并要中以周朝名义出使汉东北各国。接着，中先后巡视了方、邓、浒诸国，并在鄂（西鄂，今河南南阳县南）驻扎下来。同时白买父派人戍汉、中、州（一说汉中州指汉水中的小州）诸地。至此，中的大功告成”⑩。两器铭文中的王如确指周昭王，则说明昭王南征是早就有计划而作了充分准备的。

楚国自昭王南征失败以后，更是雄心勃勃，借此侵占江汉流域不少小国的土地、人口，扩大其势力范围。由于楚的影响所及，使一些原来商的诸侯、方国又企图叛周。被周公征伐过的徐夷，虽然在成王时也受周王朝之封为子男，也封与五十里之地，但仍然在蓄集力量，势力仍很强盛，而且在东夷中徐是最大的一国。周穆王时，徐之国君公开称王。《后汉书·东夷传》谓“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可见是周王朝东方的一个大国。徐国的中心地区即今安徽泗县一带。徐偃王为其发展势力，扩大土地率九夷之师西进，当然与楚发生矛盾，被楚阻其西进，于是向北到了黄河之滨，周穆王如不征伐，则可能与周王朝平分天下。于是周穆王派造父速驰调军征伐，在

周军的反击后，徐偃王才退向徐山之下，徐山在今江苏徐州市南七十里。楚国在周军击败徐之后其势力又有所发展，为其后称王与周王朝再次分庭抗礼准备了条件。

关于周昭王南征荆楚，在先秦史研究中还有一说，即认为是两次。第一次是昭王十六年，第二次是昭王十九年。以最近论述为例，两次说的根据是：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十六年，伐楚荆，涉汉，遇大兕。"《楚辞·天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雉系兕之误。青铜器《馭簋》、《逋簋》、《作册夨令簋》等铭文所记从王伐荆、楚，都是指的这一次，"这次伐楚凯旋而归"。第二次是昭王十九年，古本《竹书纪年》有两条记载，一是"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另一条是"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青铜器《史墙盘》铭文赞颂昭王一生的主要功绩就是"广批楚荆，隹狩南行"⑪。附此以备一说。

注　释

①《楚辞·天问》。

②《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

③《左传·僖公四年》《正义》引。

④《史记·周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

⑤铭文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

⑥《初学记》卷七地部下引。

⑦《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学报》1959年第3期。

⑧《礼记·王制》。

⑨《左传·昭公十二年》。

⑩罗运环著《楚国八百年》9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⑪刘韵叶：《周昭王初论》，载《第二次西周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

先秦

穆王西行

穆王，或作缪王，周昭王之子姬满①。昭王南征荆楚，溺死汉水中，姬满继王位，是西周王朝的第五位国王。《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也。"穆王也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周天子，在他心目中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②。故他有雄心要"周行天下"，使天下土地上都要有他经过的车辙马迹。虽然他即位时已有五十岁，但仍有此壮志，应算是一位有所作为的国王。《穆天子传》中将他描述成一个神话人物，也不是凭空想象。其父昭王南征荆楚，欲使南方地区诸国完全臣服，作进一步巩固西周王朝在南方地区的统治，结果被溺死于汉水中。穆王不仅西征犬戎，还南伐徐，大会诸侯于涂山，比其父昭王更有作为。

《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祭公字谋父，是周公旦之后，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中所载“封建亲戚，以蕃屏周”之“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的祭国。当时被封在王畿内之地，即今河南新郑东北。祭公谋父是昭王南征时随同出征而同时被淹死于汉水中的祭公之子。穆王时祭公谋父为周王朝卿士。他劝谏穆王不可征犬戎的理由是周的先王，只以德来教化，不轻意以兵征伐，用兵戈以时，则有威慑力，随意用兵则无威慑力，谁也不畏惧。虽然祭公谋父给穆王讲了不少的利害关系，远祖先王，尤其是周武王灭商的历史和“先王之制”及“先王之训”，但穆王不听，仍西征犬戎。

穆王征犬戎的具体资料在史籍中所见甚少，而仅有数条还有所不同。如《国语·周语上》谓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史记·周本纪》沿袭《周语》之说。其中有祭公谋父劝谏穆王说：“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犬戎树敦，率归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正义》：“贾逵云：‘大毕、伯士，犬戎氏之二君也。白狼、白鹿，犬戎之职贡也。’按：大毕、伯士终后，犬戎氏常以其职来王。”穆王征犬戎取得胜利，得到犬戎之君贡献的四头白狼和四头白鹿。殷人尚白，以白为贵，周人尚赤，以赤为贵。穆王时去殷只有百年左右，周人继承商人文化，其习尚有自身之特点，但仍有不少殷人的习尚，白狼、白鹿不可多得，作为职贡，以此稀有之物进献，乃是臣服周王朝最忠心的表示。或认为白狼、白鹿是西戎部族名，似无充分根据。《穆天子传》谓“天子北征于犬戎”。《纪年》又曰：“取其五王以东。”《后汉书·西羌传》：“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

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西羌传》是综合以前文献所载穆王征犬戎之资料编写，应是较合乎史实。

犬戎，又作畎戎。又称畎夷、昆夷、绲夷、混夷等。是西北地区戎人的一个较大的部落。殷墟甲骨卜辞中有"犬侯"或说此即商代之犬戎之长③。《尚书大传》："文王四年伐畎夷。"《史记·周本纪》文王受命"明年，伐犬戎"。商末周初犬戎常游牧于泾水和渭水流域，中心活动地区在今陕西岐山一带。前引祭公谋公劝谏穆王之话有"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可知周初犬戎与周王朝有贡纳关系，所贡之物主要是马匹。犬戎人与周人也有贸易往来，主要也是与马匹作交换。穆王时犬戎势力逐渐强大，已对周王朝构成威胁，故周穆王才决定对其征伐。太原是春秋时对今宁夏固原县与甘肃平凉市所辖一带地区的称法，穆王为了便于控制和打通往西北地区的道路，才将一部分犬戎迁于太原。但是穆王此举就给西周灭亡伏下祸根，周幽王时申侯联合犬戎进攻宗周，镐京被焚毁，幽王被杀，皆是犬戎所为。故《史记·周本纪》谓之穆王即位后"王道衰微"。

《史记·秦本纪》："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騮、绿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赵世家》谓"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騮、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守，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两处所记一事，基本相同。《赵世家》说明"西巡狩，见西王母"，此与古本《竹书纪年》"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亦相同。说明周穆王西行到了昆

仑之丘是根据穆王西征犬戎一事加工而成的故事。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的故事，见于《穆天子传》一书。

西晋太康二年（281）或说是咸宁五年（279），汲郡（今河南汲县）一个叫不准的盗墓贼，盗掘了一座古墓，此是战国时魏襄王之墓，在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西晋王朝知道此事后命中书监荀勖等人，将不准所毁剩余之简运回整理，除《纪年》外，还有一部《周王游行纪》，后来称作《穆天子传》或《穆王传》。现在所见《穆天子传》六卷，共有八千五百一十四字。前四卷记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之故事。即周穆王十三年，用伯父为向导，乘造父驾的八骏马车，带着大队人马和许多中原的精美丝织物、工艺品，从宗周（当时是成周）出发，渡黄河往北经滹沱之阳（今山西北部滹沱河北岸），到达犬戎之地，受到戎人的迎送。又西行到宗河部落的鄁（pēi 裴）人地区，其首领柏絮亦热情接待，并以毛皮和马匹献穆王。再溯黄河而上向西行，经乐都、积石等地（今青海、甘肃境内），再向西行就到了春山、珠泽，来到了昆仑之丘。继续往西行三千里经过曹奴人、剞闾氏、鄄韩氏等居住的地方，就到达西王母之邦，会见了西王母，向西王母及臣僚们赠送所带去的礼物，西王母特意邀请穆王一行到西方风景最美的瑶池，设盛宴款待，西王母和穆王还即席以诗歌酬答。穆王登上西王母之邦的弇（yān 奄）山，亲笔书写“西王母之山”五字，还栽了一棵树作为标志，表示周王朝承认此地是西王母之邦的土地。最后穆王一行带着西方地区的土特产从天山北路返回宗周。往返行程三万五千里，所经之地包括今天的河南、山西、内蒙、宁夏、青海、新疆、甘肃、陕西等省、区。

《穆天子传》中所记周穆王西行，会见西王母的故事，是

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学作品，成书应是在战国时期。因书中所述地理知识，在此之前不大可能知道。入春秋以后，大国争霸，各诸侯战事不止，周王朝大统一的局面不复存在，周天子只是名誉上的共主。无休止的战争给各族人民带来苦难，书的作者代表了各族人民渴望统一、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互相交流的思想。书中所描写的西北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和一些山川地名，说明作者对这一地区有一定了解，也有可能到过这些地方。故《穆天子传》虽是借穆王西征犬戎之事来加工的神话似的故事，但其中也存留不少先秦时期西北地区的人文地理资料。

有的学者认为："《穆天子传》应视为故事体文学作品，但也可多少看到史实的反映。穆王远征之扈从有毛班，井利、鄒父、许男、曹侯、穆王之坐乘为超腾八骏及御造父。迎接他们的有河宗之属，有西方王母之国。详述了此间昆仑积石两黄河源头地区的知识，亦多处涉及帝丘之祭祀。故事整体显然形成于战国后期，然而穆王扈从之臣中，毛班可推定为金文《班殷》之作器者，井利可推定为以井伯为右者之《利鼎》的作器者，这些彝器皆可视为昭、穆时期或穆、共时期之物。"④此可备一说。

周穆王西行后伐徐偃王之事，说法颇异，徐偃王其人《荀子·非相》中说他是"目可瞻马"，杨倞注："瞻马，言不能俯视细物，远望才见马，"即是一个远视眼。《尸子》中说他是"有筋而无骨"。《淮南子·人间》中说他是个"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但是被楚王灭之。《史记》中说是为周穆王大破之。《后汉书·东夷传》中谓"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

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得骥騄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此记载虽较完整，亦有可信之史实，但攻徐偃王是楚文王，就引起历代史家之怀疑，自三国时谯周的《古史考》到清人崔述的《丰镐考信录》（卷六）、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等，皆认为楚文王要晚于周穆王三百余年，岂能助穆王伐徐偃王。有学者认为："《东夷传中》之楚文王伐徐偃，亦见于《说苑·指武》，然其时间不符，这时楚还不可能奉行周命。大约被楚追逐北上之徐偃，为周所征伐并使之归服。"⑤此说可从。

周昭王南征后，楚国势力日益发展。徐国有地方五百里，国君徐偃王又行仁义，归附者多达三十六国，其势力也不小，是西周王朝东方一个大国。徐的中心地区在楚之东，即今安徽泗县一带。由此向西发展，必然要受到楚的阻止，《礼记·檀弓》载邾娄考公死，徐国使容居吊丧，容居说："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驹王即徐偃王。"西讨济于河"，即向西征讨到达黄河边。此可能徐偃王向西进受到阻止才向北济于河。从先秦文献有关徐偃王的描述来看，徐偃王在穆王时"率九夷以伐宗周"的可能性不大。既已"西至河上"，当时引起穆王的恐惧，命造父速回调军阻止。也有可能命造父告楚，相约一同伐徐偃王。徐偃王受阻后不能前进，又不忍使自己的军队受损才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而名其山为徐山。徐山在今江苏徐州市南七十里。

周穆王三十七年，曾伐越，东至九江，此九江指今湖北广

济、黄梅一带诸水。此地区为楚国所有，故是一次伐楚之举。《左传·昭公四年》："穆有涂山之会。"杜预注："周穆王会诸侯于涂山。涂山在寿春东北。"故周穆王不仅西行，也南征，终于在涂山会诸侯。

注 释

① 《国语·周语上》："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生穆王焉。"

② 《诗经·小雅·北山》。

③ 拙著《甲骨学小词典》"犬侯"条。

④ 日本白川静著《西周史略》中译本 61－62 页，三秦出版社，1992 年。

⑤ 日本白川静著《西周史略》中译本 65 页，三秦出版社，1992 年。

先秦

共和行政

公元前841年，对熟知我国古代历史的人来说，是个难忘之年，因此年是我国这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史最早有确切纪年的开始。司马迁编写《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即从此年写起，是年在先秦史中称为“共和元年”。西周王朝自穆王以后，经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到厉王时，贪财好利，对“国人”横征暴敛，激起“国人”暴动，将厉王流放，朝中无王，出现“共和摄国政”之局面，史称“共和行政”。

周穆王死后，由其子姬伊扈，一作繄扈继位，即周共王（共又作恭）。曾游于泾水，密国之君康公从共王游，有三美女奔密康公。康公之母说：“必致之于王（献给共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美），王田（猎）不取群（不多取），公行不下众（诸侯不敢诬众），王御（妇官）不参一族（不用一族之女），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汝），而何德以堪之（有何德行以胜任）？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何况你这种小人之类乎）？小丑备物，终必亡。”①康公不献共王，一年后，共王则出兵灭密。密为姬姓诸侯小国，故地为西

汉所置的阴密县，即今甘肃灵台县西南。

共王死后，由其子姬囏（《系本》作坚）继位，即周懿王。因戎人、狄人不断入侵，王室逐衰。懿王将王都由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镐京乡落水村附近）迁于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懿王死后，由穆王子，共王弟姬辟方继位，即周孝王。是时，秦之先人族居犬丘（即西犬丘，在今甘肃天水一带）②，过着畜牧生活。秦非子善养马，犬丘之马繁殖颇盛，犬丘人告于周孝王。孝王召非子主管在汧水与渭水之间养马，马大繁殖。“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③。秦自此逐渐发展。

周孝王死，由其子姬燮继位，即周夷王。西周王朝自共、懿两王时，王室势力渐衰，诸侯势力渐强。至夷王时，出现“夷王衰弱，荒服不朝”④的局面。但是，周天子的安危仍为诸侯所关心，故夷王因恶疾缠身，诸侯仍普遍祭祀山川而为夷王身体健康祈祷⑤。周天子本是高高在上，而夷王则由“天子不下堂而见诸侯”变为“下堂而见诸侯”⑥。为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夷王曾烹杀齐哀公⑦。穆王时曾迁部分戎人至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夷王时太原之戎反周，夷王“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诗经·小雅》的《采薇》、《出车》、《六月》等诗中记述夷王伐猃狁。清朝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虢川司出土的西周晚期青铜器《虢季子白盘》⑧铭文8行111个字，内容即夷王时，虢季子白征伐猃狁获胜的事。

周夷王死，其子姬胡继位，即周厉王。西周社会自共王时逐渐发生变化，那种由周天子一统天下、至尊无上的局面渐受

冲击。首先是从社会经济变化开始。1975年2月，陕西岐山县董家村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三十七件，其中有铭文的三十件⑨。从铭文中得知，这是一位叫裘卫的官员和家族及后人的遗物。裘卫是穆王和共王时的人物，从作于共王三年的《卫盉》、五年的《五祀卫鼎》和九年的《卫鼎》铭中得知，如矩伯、裘卫等一般的臣僚，已经可以自由买卖土地，甚至邑里也可以自由买卖⑩。作于孝王时期的《曶鼎》铭中，记述了匡偷了曶之禾，曶告于东宫，东宫判匡以“七田”赔赏曶。《散氏盘》也是孝王时期之器，铭文中也记述了有关土地掠夺诉讼的审判。即矢氏掠夺了散氏田地，作为赔偿，划定矢氏应付给散氏的土地疆界。交付土地时，双方当事人都参加了定界、盟誓。由所举的这些铭文中反映出西周社会中的“公田”已大量地在转换为私田，不仅可以自由买卖，而且还能作赔偿。土地私有的发展，促使社会经济中各方面也进一步向私有制转化。

周厉王是一位“荒沉于酒，淫于妇人”⑪、贪婪、好利、暴虐的天子。荣国（今陕西户西县）的夷公，人称荣夷公者，是一个贪婪、好利的奸佞小人。他善于不择手段的聚敛财富，厉王对他十分信任。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⑫和“田里不鬻”⑬的土地国有被逐渐扩大的私田和买卖土地所冲击，不少的山林泽薮也渐被贵族、官吏所占有而成为私有财产。许多平民也是依靠山林泽薮的林木、果实、鱼虾为生。荣夷公见这些出产丰富资源的山林泽薮有利可图，乃向厉王建议所有这些资源都应归天子所有，朝廷应实行专利。除朝廷之外，其他人禁止到山林泽薮去获取资源谋生。

大夫芮良夫，是姬姓诸侯，封于芮（今陕西大荔东南）。

见厉王采纳荣夷公之建议，实行“专利”之禁令，乃谏厉王说：“王室其将卑乎（衰败）？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祸害）。夫利，百物之所生，天地之所载也（自然界中所产生），而有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怒甚多（激怨很多民众），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应将有利之物开放，赋与天神和民众），使神人百物无不得极（公正），犹日怵惕（恐惧）惧怨之来也。……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⑭厉王不但不听芮良夫的劝谏，反而以荣夷为卿士，主管朝中政事。厉王的暴虐、奢侈、傲慢、不听劝谏而继续实行专利，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于是“国人谤王”。在西周和春秋有“国”、“野”之分。一般说，国人是指居住在城中和附近郊区的人，但成份较复杂，史学界中认识也不同，西周的国人到春秋时有所变化。总的来看，西周的国人主要包括中、小贵族、平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因国人指责厉王之声不断，卿士邵公（邵康公之孙穆公虎）谏厉王说：“民不堪命矣。”⑮厉王甚怒，得卫国之巫，使监视指责厉王之人，发现后报告厉王，则被厉王处死。于是国人不敢再言，但道路相见乃以目示意，诸侯亦不朝。厉王知国人不敢再谤王，甚喜。告诉邵公说：“吾能弭谤矣（阻止指责之言），乃不敢言。”⑯邵公对厉王说：“是障（堵塞）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流水），川壅而溃（流水堵塞而堤决），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人民也是如此）。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要使流水不溃决，只能疏导），为民者宣之使言（对人民要使他能够自由言论）。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献诗以讽谏），瞽（盲者，乐人）献曲，史

（太史）献书，师（乐师）箴（上箴戒之文），瞍（无眸子之人）赋（念诗以谏），矇（盲者）诵（弦歌讽诵劝谏之言），百工（技术工匠）谏，庶人传语（在街巷相互传言），近臣（侍王之小臣）尽规（劝），亲戚补察（补过失，察政事），瞽、史教诲，耆、艾修之（师、傅修理瞽、史之教，以达于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逆）。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平原、低凹潮湿、低平、肥沃之土地），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民之善言实行，民之败言备考），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能几何？”⑰厉王不听邵公劝告，国人都不敢言。

《史记·秦本纪》：“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古本《竹书纪年》亦谓“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今本《竹书纪年》亦谓：“三年，淮夷侵洛，王命虢公长父征之，不克。”厉王不听芮良夫、邵公之劝谏，坚持实行“专利”，聚敛国人之财，引起诸侯反叛，国人实在忍无可忍，乃相聚造反，袭击厉王，厉王出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后世史家称此历史事件为“厉王流彘”或“国人暴动”。

宋朝发现一个作于周宣王时《塱盨》（sèxū 塞须）⑱，有铭文156个字，载周宣王告诫臣属记住周厉王时国人暴动的历史教训。其中一段是：“有进退，雩邦人、正人、师氏人，有辠有故（辜）、迺（乃）藉倗即汝，迺繇宕，俾复虐逐氒（厥）君氒师，迺作余一人咎。”此铭文中的“邦人”即国人，“正

人”即工正，管理各种手工业之官吏和工匠，“师氏人”即军队中下级军官和兵卒。从铭文中可看出厉王时的这次暴动规模很大，参加的群众很广泛。

《国语·周语上》：“彘之乱，宣王在邵公之宫，国人围之。邵公曰：‘昔吾骤（多次）谏王，王不从，是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怨恨）而怒乎！夫事君者险而不怼，怨而不怒，况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国人暴动，厉王出逃于彘，厉王之子姬静，隐藏于邵公之家。国人得知，又包围了邵公之家，欲杀太子静，邵公只好以自己的儿子代替太子交出而被国人所杀。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国人将邵公之子当太子杀后，“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召公、周公（周公旦次子之后）二相行国政，称为“共和”的这一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司马迁编著《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也是从此年起，我国历史上有确切之纪年，也是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

西周“共和行政”，古文献有两说，周、召二公行政为一说。另一说见于《史记·周本纪》索隐引《汲冢纪年》谓“‘共伯和干王位’。共音恭。共，国；伯，爵；和，其名；干，篡也。言共伯摄王政，故云‘干王位’也”。又《史记·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索引》所据是战国时人所作的《纪年》，《正义》所据亦是战国时齐国鲁仲连所作的《鲁连子》一书（已佚）。此一说同是据战国时人的记载，又有不同的认

识，一认为："干（篡）王位，"另一认为"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据《吕氏春秋·开春》："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来稽矣。周厉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魏晋以来，注疏家各取其是。迄至清代，崔述则辨其伪："共伯是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后，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焉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竹书纪年》，唐人多称述之者，其文往往与《史记》异。以经传考之，自周东迁以后，《史记》不如《纪年》得实；自周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近正。"⑲

郭沫若据青铜器《师毁毁》铭文中有"白和父"⑳，《师嫠毁》铭文中有"师和父"㉑，认为即共伯和。方诗铭认为："共伯和干王位为西周末年大事，而《史记·周本纪》综述儒家传统之说，认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则显与史实不合。"㉒此两说并存，供参证。

注　释

①《国语·周语上》，又《史记·周本纪》。

② 林剑鸣：《秦史稿》52页注16，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③《史记·秦本纪》。

④《后汉书·西羌传》。

⑤《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⑥《礼记·郊特牲》。

⑦《史记·齐世家》。

⑧ 作此器的时代主要有周夷王、周宣王两说。

⑨《文物》1976年第5期。

⑩ 裘卫诸器铭文从赵光贤释，见所著《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⑪《太平御览》卷八五引《帝王世纪》。

⑫《诗经·小雅·北山》。

⑬《礼记·王制》。

⑭《史记·周本纪》。

⑮⑯《国语·周语上》。

⑰《国语·周语上》，《史记·周本纪》同。

⑱ 薛尚功：《钟鼎款识》卷15。

⑲《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卷七。

⑳《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14。

㉑ 林剑鸣：《秦史稿》1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㉒《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宣王中兴

西周厉王贪婪、好利、暴虐，听信荣夷公之言，对国土上的山林川泽实行专利，禁止人民利用山林川泽中出产的资源，使大量以此谋生的人民失去资源，引起人民的不满，怨声载道。厉王又不听贤臣芮良夫之劝谏，对人民的怨言看作是对自己的诽谤，于是采用高压政策，使卫巫监视有怨言而指责王者，发现后则处死，于是“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自诩为“能弭谤”。邵公又劝谏其不能因民有怨言而堵塞言路，厉王仍不听。三年后国人暴动，袭击厉王之宫，厉王逃奔于彘（今山西霍县）。厉王之子，太子静藏匿邵公家中，国人得知后又包围邵公之家，欲杀太子静，邵公将自己之子代替太子静交暴动的国人处死。

厉王流于彘，西周王朝无王，邵公、周公二相行国政，称为“共和行政”。一说为共伯和行政①。我国历史上有确切之纪年即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

西周“共和”十四年（前828），周厉王流死于彘，太子静在邵公家已成长，于是邵公、周公共同立姬静为王②，即周

宣王。

宣王自幼成长于邵公之家，受邵公之教诲，知厉王对国人的暴虐，即位后又得周、邵二相辅政，深知要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必须要革新政治，效法文、武、成、康四位先王统治时的传统作风，王朝才能复兴。故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前 827 - 前 782）中，有所作为，振兴王朝。被颂为“任贤使能，周室中兴”③。后世史家称为“宣王中兴”。

周宣王即位以后，面对厉王时造成的不得民心的局面，得周公、邵公、尹吉甫、仲山父等一班贤臣辅佐，对内忧外患，采取兴利除弊，励精图治的王政，在较短的时间里就改变了人民对王室失去的信任，得到人民的拥护，为臣民们所称颂，后人也颂为“宣王承厉王之烈（继承了厉王衰乱之余政），内有拨乱之志（拨乱反正），遇灾而惧（旱灾而忧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见宣王对国事之忧）”④。宣王拨乱反正，恢复了文、武、成、康时治国之业绩，尤其是以厉王时对人民之暴政，堵塞言路，镇压国人，引起国人暴动为教训，告诫臣民。其具体内容亦见于青铜铭文中。

著名的西周晚期青铜器《毛公鼎》，相传是清朝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这个重 34．7 公斤之鼎腹内有铭文 32 行，499 字，为目前所见先秦时期铭文最长的青铜器。铭文记载周宣王诰词，主要内容有：追述文王、武王为建国君臣相得，治理国家，出现兴盛业绩；到西周晚期政局不清，王朝不安定；策命毛公治理国家之事，受予毛公宣示王命的大权；告诫臣僚们，不要壅塞民意，要广开言路，下情上达，不要贪污中饱，鱼肉鳏寡。对属僚们要严加管束，不准沉湎于酒；赏赐毛公厝

秬鬯、命服、车马、兵器。从这些铭文内容来看，周宣王是决心除弊，重振西周王朝。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⑤。周宣王即位以后，将传统的“籍礼”废除，“籍礼”就是籍田的典礼。这种每年春天都要举行的古礼，起源很早，至迟也在氏族社会末期，因其农业生产有较快的发展，农业成为主要的生产活动，实行集体耕种时是由部落酋长或氏族族长带领族众在农田中劳动，每次耕种开始时都要举行一种仪式，既是祭田祖之礼，也是鼓励族众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到商代发展为“劦田令”。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己巳卜、殻贞：王大命众人曰，劦田，其受年，十一月。”⑥对于这条卜辞，史学界中有不同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是商王命令众人合力（劦）去耕田，以得到丰收年成（其受年)。另一种则认为“劦”字是祭名，“劦田”是祭祀田祖，十一月劦田是岁终报功之祭。两种解释的不同关键在“十一月”。

周代籍田之礼是在春天举行，即在春耕之季，由周天子率百官在王田中举行籍礼。在太史的引导下，周王到田中，“王耕坺（一起土)、班（次）三之，庶民终于千亩”⑦。周天子虽是象征性地在田中第一个跖耒起土而耕，百官也随之起土三下。表示天子都亲临耕种以劝农，起了动员民众耕种千亩王田，即借民力助耕公田的作用。商代也有类似周代的“籍田”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武丁时期卜辞有“丙子卜，呼…籍受年”⑧。“贞：众作籍不丧”⑨。前一辞意为籍田丰收，后一辞意为众人耕作籍田，无逃跑之事发生。故周的籍田当是商代“劦田”、“籍”的发展形成。因商代季节、岁首不同，尤其是岁首尚不固定⑩，故“劦田”在十一月，非周的春天，可以说

“沓田令”是“耤田令”的前身，而“沓田令”来自民族公社之“合亩共耕”⑪。

周宣王要废除事实上在厉王时已经解体公田的“耤田”典礼。卿士虢文公（虢仲之后）劝谏宣王，谓：“不可。民众之大事在农，祭祀上帝之贡品也出自农，民众仰仗生息的资财也依靠农事供给。因农事是关系到人们生存的大事，故从事掌管农事的稷官就是大官。自古以来太史都要按季节举行耤田之礼，王和百官都要亲自参加。民众见天子和百官都亲自下田耕种，皆受其鼓舞而安心农事，不违农时修治田土，不敢懈怠进行耕种，因而获得丰收。如此，财用不乏，民用和同。王事唯农是务，不干挠农事，不误农时，民众一年三季务农，一季习武，如此征伐则有威，守则有财。如果这样做，神灵喜悦，民众会衣食充足，祭祀和赏赐的物品和财帛也充足。今天子要废除先王行之有功的传统耤田之礼，将来连祭祀神灵的物品也匮乏，民众生活资料也被堵塞，怎能又求福用民?”⑫宣王不听虢文公之谏，仍“不耤千亩”。

周宣王“不耤千亩”是西周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自共王以来，由周天子一统天下，至尊无上的局面渐受冲击，社会经济也开始起变化。以井田为基础的公田，开始大量地转化为私田，土地不但可以自由买卖，还可以作赔偿。迄至厉王时，公田进一步解体，私田随之而增加，耤田之礼已不再起作用。宣王不得不顺应形势的变化，废除耤田之礼。故“不耤千亩”，实质上是宣告井田制的解体。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的现实，宣王“不耤千亩”，实则起了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的作用。

周孝王时封秦以土地，为附庸。周厉王时，西戎乘周王朝中混乱，势力增大，威胁王朝。宣王四年（前 824），宣王封

秦的四世主秦仲为大夫，其地位比附庸高，王命秦仲伐西戎，结果战败被杀。秦仲有子五人，宣王召长子给七千兵卒，命兄弟五人再伐西戎，结果大败西戎，收回被侵占失地。宣王封长子为西垂大夫，居犬丘（今甘肃礼县），称为庄公⑬，秦始强大。

周宣王十一年（前 817）春，鲁国武公敖，带领长子括、少子戏到周，朝见宣王。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国太子。大夫仲山父（封于樊，即今陕西西安南，故又称樊仲，樊穆仲，樊仲山父）劝谏宣王："废长立少，不顺；不顺，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诛之，故出令不可不顺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塞，不行），若弗（不）从而诛之，是自诛王命也，诛之亦失，不诛亦失（失其王命），王其图之。"⑭宣王不听，仍立戏为鲁国太子。是年夏，武公回鲁国后死去，戏继位为君，即鲁懿公。十年后，即宣王二十一年（前 807），括之子伯御与鲁人攻杀懿公，伯御自立为君。

周宣王振兴西周王朝，国势有所增强，则对北方的猃狁、南方的淮夷、荆楚大举征伐。夷王时曾对猃狁征伐，并获得胜利，厉王时猃狁乘周王朝内乱，又卷土重来入侵周。猃狁以焦获（今陕西泾阳西北）为据点，多次侵入到镐、方、泾阳甚至深入到周王畿。宣王五年（前 823）六月，宣王命尹吉父（又作尹吉甫）率师攻猃狁，大获全胜。猃狁向北败逃。因尹吉父征伐猃狁获胜有功，为世人所歌颂，《诗经·小雅·六月》即是称颂尹吉父征伐猃狁的叙事诗。传世的西周晚期青铜器《兮甲盘》（或称《兮伯吉父盘》）⑮，有铭文 133 字，是一篇诗体式

的记功铭文。铭文中的“兮伯吉父”即兮氏，名甲。伯吉父（甫）是字。文献中称尹吉甫（尹是官名）也就是“兮伯吉父”。按铭文内容，兮甲是随同周王伐玁狁，有折首执讯之功，又被命治理成周，向四方征收粮草军需辎重之事。今本《竹书纪年》亦载：“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玁狁，至太原。”与《诗》、金文所记是一事。

玁狁被周宣王和尹吉父征伐败逃北方以后，宣王封韩侯（韩之始封在今山西河津，开国君主是周成王之弟）于韩（今陕西韩城），在此筑城以镇守北方诸蛮⑯。自此周王朝北方得以暂时的安宁。

北方平服以后，宣王又挥师向南征伐荆楚、淮夷和徐夷。宣王六年（前822），卿士方叔受王命为将，率三千戎车之师南征荆楚。《诗经·小雅·采芑》是歌颂宣王命方叔南征荆楚的叙事诗，其中有“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之句。可见荆楚与周王朝为仇敌，方叔虽然年老，但谋略不老，征战还能取胜，斩杀俘虏敌人。传世青铜器《师寰簋》⑰是宣王时器，为师寰所作。师是官名，寰是人名，此器和盖都有铭文，各为113字和117字。内容是记载师寰奉王命率领诸侯的军队征伐淮夷，他在征战中老诚持重，有谋略斩获不少，立下战功之事，故史学界一般认为，师寰和方叔为一人。

征伐淮夷除师寰外，宣王还命“召穆公帅师伐淮夷”⑱。据《诗经·大雅·江汉序》：“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命召虎平淮夷。”《江汉》是歌颂召虎，即召穆公平淮夷的叙事诗，内容是宣王命召虎平了淮夷，开辟了疆土直达南海，因召虎能宣布王命治理其事，宣王策命，赏赐，召虎拜受称颂宣

王。

周宣王还亲自率师征徐夷。随同宣王出征的有皇父、程伯、休父等卿士。征伐徐夷的胜利，使四方平服。故《诗经·大雅·常武》歌颂为："王犹（道）允（信）塞（实），徐方（夷）既来。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朝）。徐方不回（违），王曰还归（班师回归）。"

在南征平服荆楚、淮夷、徐夷后，宣王封他的元舅"作邑于谢"（今河南南阳东南）建立申国（今南阳东北）为申伯，镇守南国，勉励申伯要做南国诸侯之榜样，保卫周王朝的南土，并给予申伯丰厚的赏赐⑲。故被颂为"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⑳。宣王即位数年，北伐南征，开拓疆土，封邦建国，亲爱诸侯，褒崇赏赐，四方平服，振兴国势，史家称颂为"中兴之主"。

伴随社会发展，宣王中兴也潜伏着危机。不断征伐，国力消耗，到宣王晚年，国势又渐衰弱。宣王三十二年（前796），宣王率师伐鲁国，杀其君伯御。采纳仲山父之建议，立鲁懿公之弟称为鲁君，即鲁孝公，干涉诸侯国内政，引起诸侯的不满。"自是后，诸侯多叛王命"㉑。宣王三十一年，遣兵伐太原之戎，不胜。三十六年（前792）遣兵与晋穆侯联军伐条戎、奔戎（均族居于今山西中条山北一带），又不胜而回。三十九年（前789），伐申戎（西申，活动于今陕西，山西间）获胜。伐姜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王师战败，"丧南国之师"㉒。多次征伐失败，国力受到很大削弱。

《史记·周本纪》："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所谓"料民"，就是调查户口，清点人数。由于西周晚期私田大量增加，

贵族们为了控制更多供使役的劳力，隐匿户口人数，致使王朝的兵源与服役人数减少。宣王实行清查户口的举措，必然要触动贵族们的利益，故遭到强烈的反对。仲山父劝谏宣王"民不可料也"，理由是自古无清查户口的王朝，因户口人数有专司其事官吏管，不清查也知道。如果清查会引起天怒人怨，诸侯远避不朝，有害无益。宣王不听，仍"料民"。

周宣王即位以后，面对衰败的局面，决心改革，先是"不籍千亩"，后是"料民太原"。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已不是宣王的一些改革所能阻止，所以到他儿子幽王即位后不久，西周王朝也就灭亡了。

注 释

① 见本卷"共和行政"。

② 周宣王静之静字或作靖，二字相同。

③《诗经·大雅·烝民序》。

④《诗经·大雅·云汉序》。

⑤《国语·周语上》，《史记·周本纪》。

⑥《殷墟书契续编》2、28、5 又《甲骨文合集》第一册 1－5 号，上引一条为残辞互补为全辞。

⑦《国语·周语上》。

⑧《甲骨文合集》第 9506 号。

⑨《甲骨文合集》第 8 号。

⑩ 张培瑜、孟世凯：《商代历法的月名、季节和岁首》刊《先秦史研究》，中国先秦史学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1987 年。

⑪ 杨向奎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⑫ 据《国语·周语上》译其大意。

⑬《史记·桀本纪》。

⑭《史记·鲁世家》。
⑮《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43。
⑯《诗经·大雅·韩奕》。
⑰《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46。
⑱今本《竹书纪年》。
⑲《诗经·大雅·崧高》。
⑳《诗经·大雅·崧山序》。
㉑《史记·鲁世家》。
㉒《国语·周语上》。

先秦

平王东迁

周宣王振兴西周王朝，实行一些改革，使社会得以安定，生产有所恢复，国力有所增强，被颂为中兴之主。他在位时间长达46年，但晚年所作所为不得人心，引起诸侯不满，如宣王三十二年（前796），率师伐鲁国杀伯御；四十三年（前785），杀无罪大臣杜伯、杜伯子隰叔避乱逃奔于晋。自三十一年（前797）起，伐太原之戎、条戎、奔戎、甲戎皆战败，战于千亩，尽丧“南国之师”，使国力削弱，王朝又不安宁。

周宣王四十六年（前782），宣王死，太子宫涅继位，即周幽王。周幽王是与夏桀、商纣齐名的暴虐之君。

周幽王即位次年（前780），镐京和泾、渭、洛（北洛水）三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这次地震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中有完整的反映：“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zú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这完全是一次大地震的情况实录：地震发生前首先是有如雷声的地声和如闪电般的地光，紧接就发生山摇地动的强震，引起人们惊慌不安，众多河水沸腾外溢，山颠突然崩塌。高地陷裂成峡谷，深谷挤压成丘

陵。这种犹如电闪雷鸣般的山崩地裂的大地震，其震级和烈度是相当大的，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肯定是巨大的。

大夫伯阳父（又作甫）说："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次序）；若过（失）其序，民乱之也（人民生活被打乱）。阳（气）伏而不能出，阴（气）迫而不能蒸（发上升），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泾、渭、洛三水发生地震）是阳失其所而填（冲击）阴也。阳失而在阴（在阴气之下），原必塞（地震而泉源堵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水土气通、演生万物）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缺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水）、洛（水）竭（干涸）而夏亡，河（黄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如同）二代（夏商）之季（末年）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兆）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到十则更改）也。天之所弃（弃周），不过其纪（过不了十年）。"①

伯阳父对造成"三川竭、岐山崩"的强烈地震发生原因的分析是有一定的科学性。以伊、洛、河竭为征兆而夏、商灭亡，认为幽王也是处于夏、商的末年，预言不过十年西周也会灭亡，将大的自然灾害与王朝兴亡联系，是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认识。但根据周宣王末年和幽王初年的社会又处于动荡不安，矛盾重重的形势来看，由地震而预感幽王的统治不得人心，不会长久也是必然的。因发生这样山崩地裂的大地震，给人民的生命财产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幽王不但未采取抗震救灾，关心人民的疾苦，恢复社会安定，重建家园的任何措施，反而一味奢侈享乐，尤其是信任"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用为卿士，掌管政事，引起国人强烈的不满。

周幽王曾伐姒姓的有褒国（今陕西汉中市西北），褒人以

美女褒姒献给幽王，为幽王所宠爱，褒姒生子伯服（或作伯盘）。幽王正妃是申侯（西申，族居今陕西和山西间）之女，立为后，生子宜臼，立为太子。周幽王三年（前779），幽王欲废申后，立褒姒为后。废太子宜臼，立伯服为太子，于是引起王室中的不满。王朝中诸大臣除虢石父之流外，皆认为废后立妃、废长立庶不合祖宗典制。太史伯阳翻阅《周史记》后，总结自文王、武王建国以后的历史，认为“周亡矣”。他说《训语》中有记载：“夏朝衰弱时，褒地之神变化为二条龙，共处于王庭，并说我们是褒地的二君。夏王使太史占卜，占卜的结果是，杀、赶走、留下都不吉。再占卜是否请留下龙涎，得到吉兆，于是举行祭祀，在简策上写明请留下龙涎。结果龙涎则留下而去，太史将龙涎盛于匣中保藏。这个盛有龙涎的匣传到商，西周时都没有开过，可是到周厉王末年，厉王命将匣启开，则龙涎流于朝庭，不可除去。厉王使妇人裸而鼓噪，龙涎则变为一只黑色蜥蜴进入王宫，宫内一童妾正好遇上，此童妾成长后而怀孕，到周宣王时而生一女，因是无夫而生育，惧怕受责罚，将此女婴抛弃。曾有童谣说：‘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檿弧是桑木制的弓，箕服是箕草编的箭袋。周宣王得知有一对夫妇在卖檿弧箕服，下命捉其杀之。夫妇连夜逃走，于途中闻路旁有婴儿啼哭，则拾而收养。夫妇逃至褒国，周幽王伐褒时，此弃婴已成长为一美女，褒人以此女献幽王，此即褒姒。”②

太史伯阳所引经据典叙述的完全是一个神话故事，反映出我国古代神话往往是与历史大事件相联系。历来朝臣们，尤其是太史为了劝谏国君，大多要引述神话传说或自造神话，以达到劝谏的目的。后世史家因缺乏应有的史实，往往以这些神话

来作补足。当然，有的神话传说也保存有信史资料，只要剔除神化的部分，则有可取之史料。加之夏、商、西周三代亡国之君的主要罪状都是因宠爱后妃，唯妇人之言是从，怠懈政事，沉湎酒色而亡国。细究之后，会发现其中多有雷同之处。故后世对这些后妃加之为非正常生人，夏桀的妹喜为女兵，商纣的妲己为九尾狐所变，褒姒则是妖女。实则三代之亡与她们无直接关系，是历史进程中必然结果。

周宣王末年，连年征伐，多有不克，国力消耗，王朝渐衰。幽王即位，镐京及三川大地震，造成人民死亡和流离失所。虢石父等奸臣当政，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幽王初年灾荒饥馑造成人民大量流亡，戎人又乘机入侵，造成"四夷交侵"的局面③。《诗经·小雅·雨无正》中有："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大雅·召旻》中有："旻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之句。此两诗中所反映皆是幽王时饥馑情况，前诗之意是："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饥馑，而杀伐四国之人。"后诗之意是："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饥馑侵削。④"故西周灭亡与大地震后又出现灾荒饥馑是主要原因⑤。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只是导火线而已。

由于戎人乘周王朝遭受自然灾害之机，入侵周。故幽王三年（前779），命伯士率师伐六济之戎，战败，伯士亦战死。早在周宣王即位后，因秦仲伐西戎战死，给兵七千，命秦仲的五个儿子复伐西戎，获胜，立长子为秦君（即庄公），并格升为西垂大夫，秦庄公对周王在西垂的统治更是尽心尽力地维护。秦庄公生有三子，长子叫世父，曾发誓说："西戎杀了我祖父，我非杀戎王，否则不敢入邑。"于是将太子的位置也让给其弟，自己作伐西戎的战备。周幽王五年（前777），秦庄

公死，世父弟继位，即秦襄公。此时戎人的势力又有发展，尤其是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失败后，西戎更加猖獗。虽然秦襄公为分化西戎的势力，将妹妹缪嬴嫁给族居在丰岐的西戎中一支的戎王，周人称为丰王。但次年戎人仍进攻秦的犬丘，世父出兵还击，不但未能获胜反被戎人所虏，一年多后才被放回，可见此时戎人势力强大，对周王朝已构成一种很大的威胁。

周幽王八年（前774），幽王终于废太后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宜臼被逐，逃奔申侯。申为姜姓之国，相传为伯夷之后，又称西申或姜氏之戎。申后即申侯之女，宜臼为申侯的外孙。

周幽王宠褒姒，褒姒不爱笑，幽王欲使其笑，多方逗引仍不笑。于是命举烽火，击鼓示警。诸侯见王都已举烽火，以为有敌侵犯王都，则日夜兼程至王都。褒姒见诸侯们纷纷赶来，神色紧张而疲顿，则大笑，幽王很高兴。其后又数次以此来逗引褒姒，诸侯被戏弄而不再驰至王都。史家称此为“烽火戏诸侯”。

烽燧是古代报警讯号。在王都与通往各诸侯国沿途所能见的距离高地筑台，台上放置柴草畜粪，日焚畜粪则浓烟上升称之为烽。夜则焚柴草火光冲天，称之为燧。台则称之为“烽燧台”或“烽火台”。王与诸侯有约，王都有警，则举烽燧，各台相传递。诸侯见后都要率军日夜兼程赶至王都以救护。

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7），周宣王封同母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⑥，即郑桓公，桓公在郑甚得百姓的爱戴。至周幽王八年（前774），幽王命郑桓公友任司徒，掌管土地和户籍。郑桓公能团结周和东土之人民，得人民的爱戴。作司徒一年，见幽王宠褒姒，信任虢石父，国人不满，诸侯多叛，王室

多事，非常惧怕。于是向太史伯请教逃到什么地方可免遭乱。太史伯给他分析周王朝的形势，认为：王室将衰，戎、狄势力必盛，不可怕。在成周（洛邑）之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晋、隗、霍、杨、魏、芮；东有齐、鲁、曹、宋、滕、薛、邹、莒。这些除与周是同姓的封国，就是异姓亲戚诸侯，其余则是蛮、荆、戎、狄之人。非亲戚者不可靠，不能去，要去只能去济、洛、河、颍四条河之间地方。郑桓公问及何以能去？太史伯说：其地与虢、郐二国相近，二国之君虢叔、郐仲依其所处地方的阻险，皆有骄侈怠慢之心，又贪而好利，甚不得民心。若要避周王室之乱，请求到虢、郐二国去居住，他们见你现在任司徒有权，再加上向他们送些财宝行贿，他们会允许。虢、郐的人民也是你管的民，他们如乘王室之乱而背叛你，则可以成周之众讨伐，二国之民必然拥护你。若得到二国，则相近的八个邑也就会归你所有。郑桓公又欲去南方和西方，太史伯认为不可去，并分析其不可去之原因。于是郑桓公决定东迁。

周幽王九年（前 773），郑桓公经幽王批准，将族人、商遗民、财产等东迁到虢（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和郐（kuài快，又作会、桧、侩，今河南密县东南）之间。东迁后，郑桓公仍留周王朝中供职。

《左传·昭公四年》载春秋时楚大夫椒举（伍举）所说："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这是对夏、商、西周三代亡国原因之一的结论。而周幽王较之桀、纣还更昏聩，即位后遇上大地震，不见救灾振济，不修德爱民，"民卒流亡"，国力大损，不

是和集戎狄，还一再征伐，结果军败将死。故《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谓："至于幽王，天不弔（保）周，王昏不若（顺），用愆厥位（故失其王位）。携王奸命（违反天命），诸侯替之（废除），而建王嗣（立平王），用迁郏鄏（洛邑王城，今洛阳市西）。"

周幽王十年（前772），幽王与诸侯在太室（今河南登封嵩山）会盟。因废太子宜臼，又欲杀除，宜臼逃至申。故幽王会盟伐申，引起诸侯不满，戎狄首先叛变。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申侯乘诸侯不朝周，戎狄反叛之机，联合曾（或作缯、鄫，今河南方城一带）、犬戎进攻镐京。幽王命举烽火召诸侯兵救王都之危，诸侯以为又是在逗引褒姒笑，按兵不救。于是申人、曾人、犬戎入镐京，戎人杀幽王于骊山下（今陕西临潼东南），并杀司徒郑桓公友、太子伯服，褒姒被虏，周王室的宝器、财物全部抢走。诗人以此谓之："赫赫宗周，褒姒灭之。"⑦自周武王立国至此约二百六、七十年的西周王朝遂灭亡。

周幽王被杀，申侯、鲁侯、许文公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即周平王。同时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称携王。形成周有二王并立之局面。童书业认为："虢公翰似即虢石甫。二文相核，知褒姒与携王及虢石甫盖为一党。又携王之'携'或非地名，而为谥法。《逸周书·谥法》：'怠政外交曰携。'谓之'外交'或携王为叔带之流，其立殆亦托庇于戎人，故为'勤王'之晋文侯所杀，否则缯为姒姓国，何以反与姜后母家西申及犬戎等相结而亡周乎？《诗》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似已明示西周灭亡之故矣。"⑧

幽王被杀，镐京遭劫掠，王宫残破。晋文侯、卫武公、郑

武公、秦襄公皆出兵救周，击败犬戎后，见镐京破败不堪，于是由晋、卫、郑、秦以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居王成。自此史家称为东周。因“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又以兵护送平王东迁，故“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⑨。此后秦正式成为诸侯大国，开始与中原诸侯“通使聘享之礼”。晋文侯于周平王十一年（前760）杀携王，结束东周初二王并立的局面。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为何不臧”。这是先秦文献中最早有明确的年月日记载的日蚀记录。“这里面所记下来的日食和月食，古今中外许多学者做了考证。有的认为是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日的日食及九月望日的月食，化为儒略历应为公元前776年9月6日和8月21日；也有人认为指的是平王三十六年，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的这次日食，在其前有着频繁的月食出现。看来后者是可靠的，因为前者在中国看不到”⑩。附此备考。

注 释

①《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上》。

② 据《史记·周本纪》，《国语·郑语》。

③《后汉书·西羌传》。

④朱熹《诗集传序》。

⑤《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七。

⑥ 梁玉绳《史记志疑·郑世家》：“庶弟误。”

⑦《诗经·小雅·正月》。

⑧《春秋左传研究》第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⑨《史记·秦本纪》。

⑪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著：《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

先秦

周郑之争

周幽王十一年（前771），西周王朝最后一王幽王，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今陕西临潼东南）下，镐京被劫掠，西周灭亡。申侯、鲁侯、许文公立太子宜臼于申为周王，即周平王。镐京残破，迫近西戎，周平王元年（前770）由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以兵护卫平王，东迁洛邑，东周自此开始。

周平王东迁洛邑以后，从元年开始封有功的诸侯。秦襄公将兵救周，作战甚出力，又以兵护送平王东迁，故封秦襄公为诸侯，赐给岐（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以西土地，自此秦国逐渐强大，与中原诸侯"通使聘享之礼"①。因秦襄公受封，又列为诸侯，就要占有岐以西之地。但当时这些地区仍然为戎人、狄人所占据，而自西周末期处于西北高原的戎狄势力十分强大。故秦襄公"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②。秦襄公欲征伐西戎，作了长时间的备战，又训练出一支较大的军队。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石鼓文，郭沫若考订为秦襄公八年，即周平王元年（前770）所刻③。石鼓文主要内容是田猎，三代君王的每一次规模较大的田猎，也就是一次军事

演习，由石鼓文中看出秦襄公时已有一支装备较全的军队。可是这支秦军还不足以击败西戎，所以秦襄公十二年（前766），率师伐西戎至岐山，结果襄公战死。其子继位，即秦文公，即位后居西垂（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文公三年（前763），“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所谓“东猎”实是一次东征，因秦去游牧生活未远，以猎来扩大其领土。汧即汧水，今改名为千河，渭即渭水，两河交会之处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宝鸡县东。此两河间又是秦先祖非子奉周孝王命畜养马之地区，故文公在此筑城而居。文公十三年（前753）秦开始有记载的历史，人民也多归教化。周平王二十一年即文公十六年（前750），“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④。此时已是“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⑤。虽然秦文公战败西戎，收复岐地一带，并将岐以东地区献周王室，但周王室已无力去治理，仍归秦所有，秦因败戎人，地方扩大，势力大增。

晋文侯是与郑、卫、秦以兵平戎人之乱，护卫周平王东迁功臣。晋文侯名仇，字义和，晋穆侯之子。因有功，周平王“锡晋文侯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⑥。《尚书·文侯之命》即是表扬和赏赐晋文侯之作。文中有“父义和！汝克绍乃显祖”之句，是赞扬文侯能够继承其显祖叔虞之业绩。叔虞是周武王之子，周成王之弟。成王时封叔虞于唐国故地，都唐（今山西翼城西）在黄河、汾水以东方百里之地，故称唐叔虞。叔虞子燮（一作燮父）徙居晋水旁，改唐为晋，称晋侯，传至晋穆侯时，已是周宣王十七年（前811）。周宣王四十三年（前785），晋穆侯死，弟殇叔自立为晋侯，太子仇出奔。周幽王元

年（前 781），即殇叔自立四年，太子仇返晋，率领徒众袭杀殇叔而自立，即晋文侯。平王东迁后，晋文侯为维护周王朝的统一，于周平王十一年（前 760）杀王子携王余臣，结束了东周初年周王朝二王并立的局面。

犬戎杀周幽王，卫国“武公将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为公”⑦。卫国的始封国君是周武王之弟康叔。周成王即位初年，商武庚与“三监”叛周，周公诛武庚，平“三监”叛乱后，将原商王都及附近地区和商遗民亡族分给康叔建立卫国，都于朝歌（今河南淇县）。周公恐康叔年少，不懂治国，于是告戒康叔说：“‘必求殷之贤人君子长者，问其先殷所以兴，所以亡，而务爱民’。告以纣所以亡者以淫于酒，酒之失，妇人是用，故纣之乱自此始。为《梓材》，示君子可法则。故谓之《康诰》、《酒诰》、《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国，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民大说。”⑧卫武公是继卫釐侯即位，是年为周宣王十六年（前 812）。因卫武公即位后，能继承康叔之政，百姓和集，故为周王朝卿士。《诗经·卫风·淇奥序》认为此诗是：“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礼乐法度），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后世史家称之为“圣君”。周平王十三年（前 758），卫武公死，在位五十五年。其子杨继位，即卫庄公。庄公长子完立为太子，宠妾生子州吁。州吁好武，庄公使将兵。大夫石腊劝谏，庄公不听。州吁又与石腊子石厚结交同游，石腊戒其子，亦不听。周平王三十五年（前 735），卫庄公死，太子完继位，即卫桓公。桓公因其弟州吁骄奢而贬责，州吁出逃。周桓王元年，郑桓公十六年（前 719），州吁袭杀桓公，自立为君。州吁好武，未能和集百姓，卫人皆不拥戴。石厚向其父请教怎样才能安定州吁君位？石腊说只有朝见

周王，得到周王的认可才行。石厚问如何才能朝见周王？石腊说："陈桓公方有宠于王，陈、卫方睦，若朝陈请使，必可得（见）也。"⑨州吁与石厚遂赴陈国。石腊遣使告请陈桓公说："卫小国，我（石腊）年事已高，无能为力。州吁、石厚是弑我国君之人，请协助除去。"于是陈桓公拘二人，请卫国派人前来处理。卫国派右宰丑杀州吁于濮（今安徽亳县东南），石腊遣獳羊肩杀石厚于陈。卫国又派使至邢（今河北邢台市）迎回公子晋继位，即卫宣公。时人赞石腊为"大义灭亲"。

郑桓公友，周幽王末年任命为司徒。年余，与幽王同时被犬戎杀于骊山下，其子掘突继位，即郑武公。武公协同以兵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平王三年（前768），周平王任命郑武公继其郑桓公之职为司徒，协掌朝中政事。郑武公即位次年（前769）灭郐（今河南密县东南），四年（前767）灭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国土扩大。六年（前765），武公因国土扩大遂迁都于新郑（今河南新郑），一说"郑迁于溱（颍水支流），洧（洧水支流）"⑩。此时的郑是春秋初期的大国，势力较强。

郑武公夫人为申侯女，叫武姜。武姜生长子寤生时是难产，武姜不爱。又生少子叔段，受到宠爱，欲立叔段为太子，武公不许。周平王二十七年（前743），武公死，太子寤生继位，即郑庄公。以祭（zhài 债）仲（又作蔡仲、祭足、祭仲足、仲子）为卿。庄公即位后封其弟叔段于京（今河南荥阳东南），谓"京城大叔"。祭仲劝阻，认为"京大于国，非所以封庶也"。叔段至京城，积极备战，与其母武姜密谋欲袭郑。周平王四十九年，郑庄公二十年（前722），叔段果然袭郑，武姜为内应。庄公以兵伐叔段，京城人叛叔段，叔段逃至鄢（今河南鄢陵西北），又伐鄢，叔段逃奔共（卫邑，今河南辉县），

此在史书上谓之“郑伯克段于鄢”。故叔段又称“共叔段”。郑庄公因叔段之叛，迁其母武姜于城颍（今河南襄城东北）。发誓“不至黄泉，毋相见也”。后思母，用颍谷（今河南登封南）封人（官名）颍考叔的建议，掘地为隧道，在隧道与武姜相见，此即“黄泉相见”之故事。

郑庄公虽为周平王的卿士，但为解决与其弟叔段及其母武姜之矛盾，常不在朝中处理政事。西虢公在周王朝与郑庄公同为卿士，平王为此欲由虢公（西虢）分其权，郑庄公知后质问平王，平王否认有其事，亦惧怕庄公不信，提出“周郑交质”。即周以王子孤入郑为人质，郑以公子忽入周为人质。君臣交质，是周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说明周天子威信已下降与诸侯大国同等。

周平王五十一年（前720），周平王宜臼死，因太子泄父早死，由太孙林继位，即周桓王。郑庄公在平王时，依仗祖桓公，父武公对周王室有功，在朝庭供职不尽力。卫国因叔段与其子滑奔卫而伐郑，并取郑国之廪延（今河南延津北），庄公遂以周王的军队和虢国（西虢）军队伐卫国。次年（前721）又命大夫再次率军伐卫以报失廪延之仇。周桓王即位后，对郑庄公专横跋扈很是不满，于是仍欲由虢公分其权。郑庄公得知后，就派祭仲率军将温地（今河南温县）周王室田中之麦割去，秋天又将成周（今洛阳东）之禾也割去。于是周、郑关系开始恶化。

周桓王元年（前719）夏天，卫、宋、陈、蔡四国之军伐郑，围郑东门，五日而去。到秋天卫、宋、陈、蔡和鲁五国又伐郑，败郑之徒兵，并割郑之禾而去。次年夏天，郑伐卫。秋天卫借燕（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军伐郑，郑败燕军。郑庄

公又率王军、郑军同郕军伐宋，攻至宋都城外。冬天，宋军伐郑，围郑之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一年中频繁的战争使郑庄公意识到周桓王在诸侯国中仍有影响，若与周王室关系破裂，各诸侯国更会以此为名加以讨伐。而且失去在周王朝中的卿士之地位，对自己不利。故周桓王三年即郑庄公二十七年（前717），郑庄公亲至王都朝见桓王，但桓王不加礼遇。周桓公（即周公黑肩）对桓王说："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依靠晋、郑），善郑以劝来者（以礼善待郑国，鼓励后来的人），犹惧不蔇（还恐其不来），况不礼焉（何况不加礼遇）！郑不来矣。"⑪桓王见郑庄公来朝，对自己的不加礼遇尚无怨言，于是两年后（前715），任命虢公为右卿士，以分郑庄公之权，仍任命郑庄公为左卿士。是年秋天，郑庄公为了表示接受桓王的任命，还与齐僖公一同朝见桓王。郑庄公的退让求全并未改变周桓王对他的看法，故郑庄公于周桓王五年（前715）遣大夫宛至鲁国，请求以郑的祊田（今山东费县东）交换鲁国的许田（今河南许昌东）。郑鲁两诸侯换田之事，说明周天子巡狩礼制的崩溃，周与郑自此矛盾加深。四年后（前711），郑庄公与鲁桓公在越地会盟，正式换田。

按古礼，周天子每年有一次到各地方去巡视，目的是观察诸侯的政绩，谓之"巡狩"。诸侯也要定期到周王都朝见天子，谓之"述职"即"述其所治国之功职"⑫。天子巡狩时要祭祀名山大川，郑桓公友时起参与周天子祭祀泰山，在泰山附近之祊田就是分给郑国的助祭田。鲁国的许田是赐与周公的采地。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弱，周天子无力再巡狩，而诸侯势力增强。郑庄公以祊田交换许田，借口是许田距郑国近，祊田距鲁国近，实际是藐视周天子，周王室的权威进一步下降。

周桓王八年，郑庄公三十二年（前712）周桓王将周武王时司寇苏忿生封地的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陆、隤、怀十二邑（分布在今河南温县，修武、孟县、获嘉、武陟、济源等县），换取郑国的邬、刘、蒍、邘四邑（分布在今河南偃师、孟津、沁县等县）。苏忿生的封地早已不属于周王室所有，苏氏后人当然不执行桓王之命，于是郑国不但未获得十二邑，反失去四邑。

周桓王十三年，郑庄公三十七年（前707），夏天，“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⑬。周桓王免去郑庄公左卿士，郑庄公不去周朝见，是周郑繻（rú 如，或 xū 需）葛（即长葛，在今河南长葛东北）之战的导火线。是年秋天，周桓王亲率周军与蔡、卫、陈等国诸侯军伐郑。两军在繻葛布阵；周桓王率主力为中军，虢公林父（周王卿士）率右军，蔡、卫两国之军随同，周公黑肩率右军，陈国军随同，这种阵法称“鸟阵雁行”。郑公子元分析了蔡、卫、陈三国军队认为皆无战心和斗志，提出分左拒（方队为拒）、右拒、中军三军对阵之法，即以郑国的祭仲为左拒，进攻虢公林父所率右军的蔡、卫军，以郑国的曼伯为右拒，进攻周公黑肩所率左军的陈国军，而郑庄公所率的中军在左、右拒之后，由原繁、高渠弥护卫庄公中军。这种阵法称为“鱼丽之阵”。丽与罹同音互通，有陷入其中之意。

郑庄公采用公子元布阵之法，战斗开始由左、右二拒挥动大旗，击鼓向周阵进攻，蔡、卫、陈之军先弃阵败逃，周右、左二军亦溃乱。周桓王中军见右、左二军败阵，亦乱阵脚，郑庄公率中军与左、右二拒亦合攻桓王的中军，周军大败。郑祝聃射中桓王之肩，桓王见郑军势大，亦负伤指挥周军撤退，祝聃请郑庄公追击。庄公说：“君子不宜过份逼人，何况我们已

是敢于欺凌天子？如果是为了挽救自己，保证国家无损，就不能过份。”是夜郑庄公派祭仲去慰问周桓王和随征的人。

繻葛之战拉开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兼并战争的序幕。郑是姬姓诸侯，郑庄公是被迫与周桓王进行一场较大的自卫战。入东周以后，“王室衰微”，平王时期的周王朝已实际降为一个二等国，但桓王即位后仍然要以天下宗主自居，一再不自量力，逆时代潮流而动。繻葛一战不但落得“王卒大败”，自己也中了一箭，使其受命于天的天子威风扫地，唯我独尊的地位被打破。自后不再有力控制诸侯国，诸侯国对周天子也不再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周天子的权威也由至尊变为被诸侯利用来作以强凌弱、争权称霸的工具。这是历史进程必然的结果，非周桓王所能逆转，从此开始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新时代。

注　释

①《史记·秦本纪》。

②《诗经·秦风·小戎序》。

③《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科学出版社，1982年。

④《史记·秦本纪》。

⑤《史记·周本纪》。

⑥《尚书序》。

⑦⑧《史记·卫康叔世家》。

⑨《左传·隐公四年》。

⑩今本《竹书纪年》。

⑪《左传·隐公六年》。

⑫《左传·昭公五年》杜预注。

⑬《左传·桓公五年》。

先秦

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三年即鲁庄公十年（前684），齐桓公因齐公子纠奔鲁返国之事伐鲁国，鲁庄公与曹刿（一作沫或翙）迎战，两军战于长勺（今山东曲阜市北）。鲁庄公采纳曹刿的意见，击败齐军，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齐桓公虽然战败，但吸取其教训，在国内实行改革，加强力量，数年后遂确立为春秋时期以来第一个称霸诸侯的地位。

春秋时期是先秦历史中一个“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期。之所以称为“春秋时期”是自西周以来，周王朝和各诸侯国史官所记录的国史，除楚国称为“梼杌”外，都称为“春秋”。因史官们记录国史是按一年春夏秋冬四季顺序来记，取其春秋二字代表国史通名。墨子曾读过周、燕、宋、齐的《春秋》①。后存下来的只有鲁国《春秋》，这部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历十二个国君，共二百四十二年（《左传经》多二年，到哀公十八年）的鲁国《春秋》，除鲁国之事件外，还涉及有关其它国家，故以此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

鲁国是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封同姓功臣时，封周公旦于曲阜（今山东曲阜市），为鲁公。周公不就封，仍留朝中佐武王。周成王时周公摄政，使周公子伯禽就封，仍称鲁公。自伯禽后代代相传，至鲁武公已是周宣王时。周宣王二十一年（前807），宣王伐鲁，杀伯御，立鲁懿公之弟为君，即鲁孝公。孝公死于周平王二年（前769），其子弗湟继位，即鲁惠公。惠公在位四十六年，死于周平王四十八年（前723），惠公夫人无子早逝，继夫人声子所生之子名息姑（一作息），以长庶子身份摄国政，即鲁隐公。隐公元年，春秋时期开始。

鲁隐公十一年即周桓王八年（前712），因鲁隐公是以庶兄身份代太子允（惠公子）摄国政，公子翚（羽父）杀隐公，立允，即鲁桓公。鲁桓公十八年即周庄王三年（前694），鲁桓公赴齐国，因夫人姜氏（文姜）是齐襄公之妹，与桓公同行返齐。齐襄公在泺（今山东济南市西南）与桓公相会后，遂与姜氏到齐都。齐襄公与其妹通奸，桓公得知怒责夫人姜氏，姜氏告诉齐襄公。四月丙子日，齐襄公设宴款待桓公，桓公醉，齐襄公派力大的公子彭生抱桓公上车，借此将桓公肋骨拉断而死车中。鲁国向齐国提出抗议，并要求惩治彭生。齐襄公遂归罪于彭生，杀彭生以谢鲁国。鲁国太子同继位，即鲁庄公。

地处山东北部的齐国，是周武王灭商后首封姜尚之国，都营丘（胡公静时，迁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周成王时姜太公因年老回到齐国，成王命齐得专征伐，为一诸侯大国。姜太公死后，其子丁公吕伋（一作及）继位。周康王时吕伋为周王朝重要将领，其后又曾参与征伐东南方国，西周青铜器《班簋》，其铭文198字②，内容有："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意为国王命毛公征伐东国，命吕伯（即吕伋）为右师辅

翼。吕伋后代代相传，至齐庄公已是周宣王时。庄公死于周平王四十年（前731），在位六十四年，在这段时间因周王室衰弱，政权不稳，“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国依仗其有专征伐的特权，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海滨自然资源丰富的条件，发展其势力。

齐庄公死，其子禄父继位，即齐僖（釐）公。僖公初期，齐、鲁、郑三国结盟，常以宋、卫、许等国君不朝周天子，不奉王命，进行征伐。鲁隐公九年即周桓王六年（前714），齐僖公、鲁隐公响应周王之命，会于防（鲁邑，今山东费县东北），策划如何伐宋。一年后（前712），齐、鲁、郑三国联军伐许，攻下许都（今河南许昌东），齐僖公将许国土割让给鲁，鲁隐公不受。给郑，郑庄公见伐许之理由是许国不供周王之职贡，许被伐后已服罪，便赦其罪，还其国。

齐僖公在用武力作后盾的情况下，对诸侯间的矛盾也作不动武的调解。鲁隐公八年即周桓王六年（前715），僖公调解了宋、卫两国与郑国的矛盾。宋殇公、卫宣公与僖公盟于瓦屋（今河南温县北）。故《国语·郑语》称：“齐庄、僖于是乎小伯。”所谓“小伯”也就是诸侯国的小霸主。齐僖公在位三十三年，死于鲁桓公十四年（前698）。子诸儿继位，即齐襄公。

齐襄公，一个荒淫乱伦的暴君，言行无常，人不知所措。即位以后，“高台广池，湛乐饮酒，田猎毕弋，不听国政。卑圣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陈列）妾数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而戎士冻饥，戎马待游车之弊（游车陈旧才作戎车），戎士待陈妾之余（陈妾食剩下的才给戎士食）。倡优侏儒在前，而贤大夫在后”③。又“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于妇人，数欺大臣”④。齐国在襄公这种统治下，

许多有识之士，预感将祸及其身，于是逃避于他国。襄公弟公子纠之母是鲁国女，于是在管仲和召忽保护下逃奔鲁国；鲍叔牙估计齐将有乱，遂保护公子小白逃奔莒国。

鲁桓公八年，周庄王十一年即齐襄公十二年（前686），最初襄公派大夫连称、管至父戍守葵丘（今山东临淄西），约定瓜熟时去，来年瓜熟时派人替换。来年瓜熟时二人请替换，襄公则不许，二人怨怒，于是准备作乱。公孙无知是襄公叔伯兄弟，曾受僖公之宠，襄公为太子时，无知与其享受同等待遇，对此襄公不满。即位后则削去无知的待遇，无知怨恨。连、管二人与无知合谋。连称的堂妹为襄公妃，不受宠，连称遂使她提供襄公行止，并转告无知之意："如果事成，则以她为新君夫人。"是年冬十二月，襄公游于姑棼（即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北），又到贝丘（即今博兴南的贝丘聚）打猎。连称三人知道后，布置党羽准备袭击襄公。襄公打猎时射一大野猪，野猪负伤站立而啼，襄公惧怕坠车伤足失鞋，回宫后责令徒人费（一作茀）找鞋，未见。襄公则鞭费，费出宫见无知、连称、管至父率徒众包围宫门。无知欲擒费，费以鞭伤示无知，并说由他先入宫，以免惊动襄公。无知等人在宫外等待。费入宫藏襄公于门后，以小臣孟阳卧床替襄公。无知等人待良久，则杀入宫，先杀床上的孟阳，见门下有足，遂杀襄公。无知自立为齐国君。次年春，无知游于癸丘，被曾为他虐待过的癸丘大夫雍廪（一作林）所杀，于是齐国又开始君位之争夺。

公孙无知被杀后，齐国无君，流亡在莒国的公子小白自幼与大夫高傒友善。故作为齐国世卿的高氏、国氏在议立新君时，先暗中派人往莒国召小白回齐为君。鲁庄公知齐国无君，派军队护送流亡于鲁国的公子纠回鲁争夺君位。鲁、莒二国护

送纠、小白之军在途中相遇，护送纠的管仲将兵挡道，并向小白射一箭，箭中小白衣带钩，小白倒下装死。鲁军以为小白已死，则放心缓行。而小白则令车队急行，先入齐，有高、国二卿为内应，遂即位于齐国君，即齐桓公。桓公即位后，发兵抵拒护送纠的鲁军入齐。护送纠的鲁军行六日才到齐，知小白已即位，并发兵拒入，于是驻军于临淄以东的乾时（今山东桓台南）。鲁庄公遂率军伐齐，战于乾时，结果鲁军大败，庄公丧失兵车，只得另乘车逃回鲁国。

鲁国战败，齐桓公命鲍叔牙率军赴鲁，向鲁庄公说："子纠，亲兄弟，不忍诛，请君杀之。召忽、管仲，仇人也。请交给齐国，将他们剁成肉酱才甘心，否则将围攻鲁国。"鲁庄公被逼而杀公子纠，召忽不愿返齐而自杀。管仲自知返齐后桓公必重用，遂请自囚交鲍叔牙带回齐国。行至齐地的堂阜（今山东蒙阴西北），鲍叔牙将管仲放出囚车，至齐国向桓公推荐管仲，说他治国的才干高于高傒，可以为相。桓公厚礼相待，任为相，掌国政。

管仲为相三个月，向齐桓公推荐治事之臣，说："升降揖让，进退闲息，辨辞之刚柔（接待宾客的礼仪），臣不如隰朋，请立为大行（主管外交礼宾的官）。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发展农业生产），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主管农业生产的官）。平原广收，车不结辙，士不旋踵，鼓之士视死如归（军事训练，领导士卒打仗），臣不如王子城（又作成）父，请立为大司马（主管军事的官）。决狱折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司法审判），臣不如宾胥（一作须）无，请立为大司理（主管司法的官）。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挠富贵（不避死，不图富贵的忠言直谏），臣不如东郭

牙，请立以为大谏之官。”⑤齐桓公皆一一任命，归管仲领导。而鲍叔牙甘居管仲之下，以协助管仲治政，此时齐国可谓人才称盛。

鲁庄公十年即周庄王十三年（前684），为齐桓公即位第二年，他还为公子纠之事对鲁国仍耿耿于怀，遂于春天派大军伐鲁国。鲁得知，鲁庄公亦率军迎战，两军在鲁国都曲阜之北的长勺相遇，鲁庄公准备迎战。鲁国人曹刿（一作曹沫）要去求见庄公，同乡人对他说：“战争之事自有食肉的人去谋划，何必去过问？”曹刿说：“当官的人目光短浅，未能有远谋。”于是进见庄公。问何以战？庄公说：“安身保命的衣食，不敢独自享用，必定要分给他人。”曹刿说：“小恩小惠不能遍及众人，人民不会跟从你。”庄公说：“祭祀所用的牛羊、玉帛不敢任意增加，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一定实事求是。”曹刿说：“一念之诚不能说明一切，神灵不会致福。”庄公说：“大小案件，虽不能详察，但必定要酌情办理。”曹刿说：“这是为民尽点力，可以一战，开战时请让我同去。”庄公同意，与曹刿同乘一辆兵车赴战场。

齐军在长勺依仗人多势大，首先向鲁发起攻击。鲁庄公亲自督战，欲击鼓催鲁军进攻，曹刿阻止说：“不可。”待齐军第三次击鼓冲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庄公击鼓，鲁军反攻，齐军溃败而退。庄公欲挥军追击，曹刿又阻止，并下车查看齐军兵车轮迹，又登车瞭望败退的齐军后说：“可以追击。”鲁军遂奋起追击，齐军大败逃走。

鲁军战胜齐军以后，鲁庄公问曹刿，齐军多于鲁军，何以能取胜？曹刿说：“作战要有勇气，一鼓作气，再鼓而衰，三鼓而士气竭。彼军士气已衰竭而我军士气正旺盛，故能战胜。

大国军队难以猜测，恐其在败退后有埋伏，所以我才下车查看，见其车轮迹散乱，又登车瞭望，见军中旗帜也倒下，说明齐军已溃不成军，故才令其追击。"⑥此即史称“曹刿论战”。曹刿的论战在齐鲁“长勺之战”中，创立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例。

曹刿是鲁国人，有勇力，其事迹在《左传》只有“长勺之战”中论战（庄公十年）和谏鲁庄公至齐观社（庄公二十三年）两事。而《管子·大匡》、《战国策·齐策》则载有曹沫（刿）劫齐桓公事，《史记》中的《齐世家》、《鲁世家》、《管仲列传》、《鲁仲连列传》和《刺客列传》又五记其事。以《齐世家》所记最详，谓：“五年，伐鲁，鲁将师败。鲁庄公请献遂邑以平，桓公许，与鲁会柯而盟。鲁将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于坛上，曰：‘反鲁之侵地！’桓公许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后悔，欲无与鲁地而杀曹沫。管仲曰：‘夫劫许之而倍信杀之，愈一小快耳，而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于是遂与曹沫三败所亡地于鲁。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此一事件后世史家有认为与史实不合之处较多，清代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就曾辨其不合之处。

《史记志疑·刺客列传》谓：“案：劫桓归地一节，《年表》，齐、鲁《世家》、《管仲》、《鲁连》、《自序传》皆述之，此传尤详。《荆轲传》载燕丹语，仍《国策》并及其事，盖本《公羊》也。《公羊》汉始著竹帛，不足尽信，即如归汶阳田在齐顷公时，当鲁成二年，乃《公羊》以为桓公盟柯，因曹子劫而归之，其妄可见。况鲁未尝战败失地，何用要劫？曹子非操匕首之人，春秋初亦无操匕首之习，前贤谓战国好事者为之耳。仲

连遣燕将书云‘亡地五百里’，《吕览贵信》云‘封以汶阳南四百里’，《管子》多后人参入，而其《大匡篇》但云‘与地以汶为竟也’。《齐策》及《淮南汜论》云‘丧地千里’。鲁地安得如此之广？汶阳安得如此这大？不辨而知其诬诞矣。”因清初高士奇在所著《左传纪事本末》卷十八“齐桓公之伯”一章据《公羊传》和《史记》详述其事的始末。故长期以来，疑者，信者参半。1992年3月出版的《齐国史》中论及齐桓公首霸时，采用曹沫劫持齐桓公之事件⑦。故一并附于此以参考。

注 释

①《墨子·明鬼下》。

②《文物》1972年第9期。

③《管子·小匡》。

④《史记·齐世家》。

⑤《管子·小匡》。

⑥《左传·庄公十年》。

⑦王阁森，唐致卿著：《齐国史》第205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先秦

齐桓公始霸

春秋时期"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小白，是齐襄公之弟，因襄公被公子无知等人所杀，由莒国返齐为君，任用管仲为相治国。管仲提出改革政策的建议，得到齐桓公的同意实施，于是齐国社会安定，人心思治，消除了齐襄公荒淫暴虐所造成的创伤。不久出现人民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的局面，社会生产有较大发展，国力增强，给齐桓公称霸诸侯奠害基础。周王室虽然衰微，但周天子仍然是诸侯的偶像，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而四夷对中原的侵犯是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是对周天子的冒犯，齐桓公则举"尊王攘夷"之旗帜，以此来号召诸侯。周惠王十年（前667），赐命齐桓公为诸侯之长，故在位四十三年（前685－前643）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建立显赫霸业。孔子称赞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假如无）管钟，吾其被发左衽（散披头发，衣襟从左开）矣。"①

齐桓公霸业离不开管仲的改革治国。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名夷吾，字仲，或敬仲，颍上人（今安徽颍上

县)。先祖姬姓，父叫管严，原出身于贵族，后因家道中落，降为平民。自少年时就与鲍叔牙友善，鲍叔牙知其有才能，很敬重他。与鲍叔牙合伙经商，常在分财物时多拿，鲍叔牙知其家贫，又有老母要赡养，不以为是贪财。管仲给鲍叔牙出计谋事，但多不成，鲍叔牙不以为是他愚笨，而是机会未到。管仲曾三次作官，三次被罢官，鲍叔牙不以为他无才，而是不逢时。管仲曾三战三败，鲍叔牙不以为他无能，而是知其还有老母在堂。管仲跟随公子纠奔鲁，公子纠失败被杀，召忽自杀，鲁庄公将其囚送还齐，鲍叔牙不以其为耻，反将他放出囚车推荐给齐桓公。故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②后世称为"管鲍之交"。

管仲在时机未到时，经商、谋事、作官、从军都未发挥其才能。但他自知乱世出英雄，胸怀大志等待时机为国家建功立业。管仲返齐后，齐桓公以礼相待，欲以鲍叔牙为相，鲍叔牙辞而荐管仲说："君将治齐，即高傒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国国重，不可失也。"③又说："臣之所以不若夷吾者五：宽惠柔民（以宽厚得民心，予民实惠，使民安居乐业），弗若也；治国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结（团结）于百姓，弗若也，制礼义可法四方（制定礼义制度使四方照办），弗若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④于是齐桓公不以管仲为贫贱，不记管仲护送公子纠返齐途中自己的一箭之仇，破格任管仲为相。管仲又推荐隰朋、宁戚、王子城父、宾须无、东郭牙五位贤才任事⑤。鲍叔牙为大夫居管仲之下，齐世卿，公族国氏，高氏全力支持。于是齐国人才聚集，治国有方，管仲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都为桓公接受推行。

为富国强兵，首先要改革政治，管仲提出："修旧法，择其善者而业用之，遂滋民与无财（扶持贫困之民，振兴实业），而敬百姓，则国安矣。"⑥这是改革的纲领，具有革命意义。所谓"修旧法"就是整饬宗周的礼制。对文王、武王、周公的旧法，根据当时的形势，齐国的国情，择其适用的保留下再加以创新而使用。管仲的政治改革纲领，考虑到旧贵族、特权阶层的阻力。故齐桓王问政时，他则说："昔吾先王周昭王、穆王、世法文武之远迹，以成其名，"⑦借此来减少保守的贵族，特权阶层的反对，使改革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是政治和思想观念的基础。社会经济的改革是管仲富国强兵的主要内容。《管子》一书中虽有后人之作，但保存不少管仲经济思想，可以看出管仲是充分认识到只有物质经济利益作为政治教化的基础，才能使国富民强，根据"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其中具五民（士农商工贾）"⑧的具体国情，首先就从土地和工商业开始兴利除弊的改革来带动其它的改革。

齐国自建立以来，土地制度也是"井田制"，这种"同耕而耦"的集体劳动生产，使生产者无积极性，生产效率很低，农奴又常怠工逃亡。西周中期以来，这种土地制度已适应不了人口的增长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出现较多的买卖，抵押、赏赐土地的情况。助耕公田的产品也采取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混合的收取方式，大量产生的私田则是收取租税。仍然保留的公室领地，仍是"借民之力助耕"的劳役地租，由于苦乐不均，农民生产积极性仍受其压抑，只是应付贵族们而耕作粗放，不能

尽力，于是出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⑨。可见公田中因无人除耕，长满害草，实际上成半荒芜。管仲深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实社会中土地制度已起变化，针对各种土地的情况，要进行清查，故采取“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⑩的措施。所谓“相地衰征”就是观测评定田地的好坏，分出肥沃与贫瘠之田，以此定等级，按等征收实物赋税，这样农民就不会迁徙或逃亡。相地衰征的措施将农田好坏均匀，按等征税并不是长期不变，而是要定期调整轮换，以此来调整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在以农立国的古代社会中，对旧有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创新，给齐国的农业大发展，国富民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人出身的管仲，深知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故在社会经济改革中，充分利用齐国负山带海，盛产渔盐的有利条件，对人们不可缺少的盐铁，实行“官山海”⑪，首创盐铁专卖政策。因为盐铁是销售量最多的两种商品，而生产盐和铁是要有一定条件，不是在任何地方就能随便生产。管仲算出两本账，盐帐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口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三分之一升），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小孩）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铁帐谓：“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然后才能成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辇者（作人拉的车和马驾的车），必有一斤（斧）、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⑫。除织、耕、木工工具要用铁外，军用的刀、枪、剑、戟、戈、矛等也需用大量铁。这些一般生活中和军事上必须的物质，不实行专卖则不能保证人民生活安定，军事力量强大，同时以此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促使商品在流通中更加完善和发展。

在实行盐铁专卖同时，以减免关税来鼓励贸易，使商品更加流通，市场商业活动更加活跃。为促使商品更加发展，实行国家铸造金属货币和对货币的管理。管仲“设轻重九府”⑬，即设立大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职内、职金、职币九种掌管财政、货币的职官。

在军事上，管仲提出“作内政以寄军令”⑭的治军方针。即将地方行政组织和军事编制结合起来，实行兵民合一，寄兵于民，平时是乡农，战时是士卒。地方行政编制是：国中十五个士乡，五家为一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皆是地方行政单位。以此行政编制为基础编制的军制是：一轨各家出一人为“伍”设轨长。里出五十人为“小戎”设里有司。连出二百人为“卒”，设连长。乡（十连）共二千人为“旅”，设良乡人。五乡共一万人为“军”。十五个士乡共三万人组成三军。由齐桓公统率一军，国氏、高氏二卿各统率一军，这样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很大提高。

在管仲相齐后进行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改革同时，齐桓公对外开始征伐。即位次年（前684），因桓公即位前在鲍叔牙保护下，一行奔莒国时途经谭（一作郯，今山东济南市东南），谭国小，未能接待，桓公即位，谭君又未前去祝贺。故派军伐谭，谭君逃奔莒国，谭国被灭。

鲁庄公十二年即周庄王十五年（前682）秋天，宋国闵公与大夫南宫万游猎于蒙泽（今河南商丘北）。南宫万称赞鲁庄公，宋闵公则骂南宫万为鲁虏（鲁国俘虏）。南宫万自被鲁俘放回以后，最忌说他是鲁虏，故被激怒而杀闵公。宋大夫仇牧、太宰华督（即华父督）亦被杀，南宫万立公子游为君，公子御说等诸公子惧祸及其身，逃奔萧国（宋附庸国，今安徽萧

县西北)。冬十月，萧叔大心（萧大夫）请曹国出兵攻伐南宫万，南宫万逃奔陈国，公子游被杀，立闵公弟御说为君，即宋桓公。宋请求陈国诛弑君之臣，陈宣公杀南宫万。

宋国有弑君之乱，齐桓公欲创霸业，故于鲁庄公十三年即齐桓公五年（公元前 681）春天，邀请宋、陈、蔡、邾，遂等国君在北杏（齐地，今山东东阿西北）会盟，春秋时期诸侯主持会盟从此开始，也是齐桓公创建霸业的第一次主盟。遂国君，妫姓，是鲁国的附庸（今山东肥城南），未参加北杏会盟，齐桓公于是年六月派军伐灭，并留军戍守。鲁庄公见齐势力向南伸延，有所顾忌，于冬天与齐桓公相会于柯（齐邑，今山东阳谷东）结盟。

先是鲁国在庄公十年（前 684）的长勺之战中大败齐军，势力有所增强，当年六月齐、宋联军伐鲁，驻军于郎（今曲阜市南)，鲁公子偃见宋军不整，遂以虎皮蒙马，出南城门击宋军，鲁庄公亦率军助攻，大败宋军于乘丘（曲阜西北)，宋将南宫万就是在此战役中被俘。齐军见宋军败，亦还军。次年夏天，宋闵公为报乘丘战败之仇，又伐鲁。宋军至鄑（鲁邑，今山东汶上县南）尚未列阵，鲁军则出击，大败宋军。自此鲁宋矛盾加深。鲁与齐在柯结盟和解后，刚即位二年的宋桓公对齐桓公很不满，宋与齐的关系破裂。鲁庄公十四年、周僖王二年即齐桓公六年（前 680）春天，齐桓公联合陈、曹两国欲伐宋，请周僖王派军相助，周天子派大夫单伯前往会见三国国君，表示支持。郑国此时正值厉公复位，见周天子派单伯支持伐宋，亦加盟三国伐宋。是年夏天，单伯率军前往助战，于是齐桓公就以周天子之命伐宋，此是继郑庄公之后以周天子之命讨伐诸侯的又一诸侯国。在强大军事压力下，宋桓公只得求

和。冬天，齐桓公同意宋桓公求和，与周单伯、卫惠公、郑厉公、宋桓公于鄄（juàn 绢，卫邑，今山东鄄城北）会盟。这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作法，成为春秋时期称霸诸侯必举的旗号。

次年，即齐桓公七年（前 679）春天，齐桓公再次邀请宋桓公、陈宣公、卫惠公、郑厉公于鄄会盟，各诸侯国都表示归附齐国。这次是由齐桓公主持会盟，为诸侯之长，是其称霸之始。

郳，是自商代就有的古国，见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兒伯”⑮。入周以后为邾国所灭，以其子孙留故地（今山东滕县东），为邾附庸，春秋初属宋。鲁庄公十五年（前 679），宋国以郳背叛，请齐、邾之军助其伐郳，郳君依附齐国以尊周王，周僖王命为小邾子。郑国与宋国是世仇，郑厉公乘宋伐郳之机出兵攻宋。次年夏天，齐桓公以郑厉公乘机攻宋，是违背鄄之盟，遂联合宋、卫两国伐郑国。郑厉公曾于鲁桓公十五年（前 697），入居栎（郑邑，今河南禹县），复位时未及时向楚通告，于是楚出兵攻郑到了栎，郑厉公见腹背受敌，只好向齐桓公求和。十二月，齐桓公与宋、陈、卫、郑、许、滑、滕七国君在幽（宋地）结盟。

郑厉公虽参加幽之结盟，但仍不甘心服齐。鲁庄公十八年（前 676）春天，周惠王即位，虢公丑、晋献公诡诸至周朝贺，周惠王设飨醴，赐宴后又赏玉和马匹。郑厉公遂和虢公、晋献公派天王大臣原庄公到陈国迎接陈妫立为惠王后，大有联合西方诸侯而挟天子之意。

曾被齐桓公灭了的遂，因遂人不服，遂的因氏、颌氏、工娄氏、须遂氏等宗族于鲁庄公十七年（前 677）夏天，设宴招

待戎守遂的齐军，齐士卒喝醉后皆被杀。鲁庄公见郑厉公与齐桓公有争霸之意，遂人又叛齐，于是也反齐。

鲁庄公十九年即周惠王二年（前675）秋天，周惠王的异母弟王子颓与蒍国、边伯、子禽、祝跪、詹父五个大夫攻惠王，失败后，颓逃奔温，温之苏氏又奉颓至卫国，卫国与燕国（南燕）军助颓伐惠王，惠王出奔栎，五大夫遂立颓为王。次年春天，郑厉王未能调解王室纷争，于是先执南燕君仲父。鲁庄公二十一年即周惠王四年（前673），郑厉公、虢公丑率军奉周惠王伐王子颓，颓及五大夫被杀，惠王复位。封赐郑厉公和虢公丑，郑厉公平定王室之乱立功后，受到诸侯的重视。这一系列事件对齐桓公的霸业产生了动摇。不久郑厉公死，郑国势力日衰，齐桓公才又重振霸业，鲁庄公二十七年即齐桓公十九年（前667）夏天，齐桓公再次与鲁、宋、陈、郑之君在幽结盟。冬天，周惠王派召伯廖赴齐，正式赐命桓公为诸侯之长，并命其讨伐助王颓为乱的卫国。次年齐桓公率军伐卫，数其罪，卫惠公请罪，并贿赂齐桓公，齐军取赂而还。至此，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才得以最后巩固。

注　释

①《论语·宪问》。

②《列子·力命》、《史记·管晏列传》。

③《史记·齐世家》。

④《国语·齐语》。

⑤见本卷《长勺之战》。

⑥《国语·齐语》。

⑦《管子·小匡》。

⑧《史记·货殖列传》。

⑨《诗经·齐风·甫田》。

⑩《国语·齐语》。

⑪⑫《管子·海王》。

⑬《史记·货殖列传》。

⑭《管子·小匡》。

⑮《殷墟书契后编》下4、11片。

先秦

召陵之盟

齐国于桓公十九年（前667）夏天，与鲁、宋、陈、郑四国君相会于幽，四国君共推齐桓公为诸侯长。冬天，周惠王派卿士召伯廖赴齐，赐命齐桓为侯伯（诸侯之长），正式承认齐国的霸主地位，齐国得专征伐的特权。受命时周惠王还命齐桓公讨伐卫国协助王子颓叛乱的罪行，于是齐桓公与鲁庄公在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相会，商讨伐卫国之事。次年二月，齐国以周天子之命讨伐卫国，责备卫国协助叛乱之罪，卫军败，卫惠公纳赂求和。秋天，楚国令尹子元以战车百乘伐郑，自外郭的纯门入，攻到城郭内的逵市。楚军见悬门不发（门悬有机关不发射），说着楚语出来的是郑军，子元怀疑郑国人设有埋伏，急命退军，正值齐率鲁、宋之军赶到，楚军连夜逃遁。此即齐桓公第一次阻止楚国北上中原。当齐桓公在执行诸侯长之责，尊王攘夷过程中，又于鲁僖公四年，齐桓公三十年（前656）率诸侯伐蔡，后又借机伐楚，但与楚不战而和，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结盟而还。

齐桓公自始霸诸侯起，就一直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团结中

原各诸侯，对侵挠中原的夷狄给予防御征伐，因此得到诸侯的拥护和周天子的支持。

分布于今山西太原至河北玉田西北无终山一带的戎人，种族较多，流动范围较大。历史上有北戎、山戎、代戎、无终等等名称。周宣王三十八年（前790），晋穆侯伐北戎，北戎败于汾隰（今山西襄汾以北，洪洞以南汾河两岸），周平王二年（前769），邢侯败北戎（分散在太行山北段一支），入春秋以后，北戎的势力增强，分布在今河北北部和东部的山戎屡侵扰燕国。齐桓公二十二年即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山戎侵燕，燕庄公向齐桓公告急，齐桓公欲伐山戎，与鲁庄公在济水旁相会，拟请鲁庄公率军同往征伐，鲁庄公虽同意，又惧其路途遥远，迟迟不愿出兵。齐桓公便与管仲、隰朋率军北伐山戎以救燕。

“管仲、隰朋从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反（返），迷惑失道（路）。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跟随老马），遂得道。行山中无水，隰朋曰：‘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蚁壤（蚂蚁窝）一寸仞（堆出土一寸高）有水。’乃掘地，遂得水”①。孤竹是自商代就有的古国②，在今河北卢龙、栾县一带。齐桓公北征山戎还到令支（今河北迁安），行军千里，终于战胜山戎而“剃（击败）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③。在归齐时，燕庄公感谢齐桓公的存亡之德，“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遂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以燕庄公送到之地割给燕国），命燕公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④。

征戎救燕后，齐桓公因鲁庄公未同征山戎欲伐鲁，为管仲

阻止，听从管仲建议，以得山戎宝器献捷于周公之庙，于是服齐者又有燕和鲁。

今河北邢台市，是商代井方的活动中心地。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市区及其周围发现不少商代文化遗存，五十年代发掘的曹演庄商遗址，证明是商代一重要地区。1978 年 3 月邢台市北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出土的青铜器《臣谏簋》，铭文中记载有邢侯出兵战戎的记载。八十年代在市区及其四周连续发现西周遗存。1990 年 12 月在市西西周遗址中出土一片有文字西周卜骨，证明此地即西周的邢国，为西周初封周公旦之子所建立。

鲁庄公三十二年即齐桓公二十四年（前 662）冬天，分布在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北南部的赤狄（狄人的一种）侵扰邢国，邢侯向齐求救。管仲力主救邢，请桓公尽诸侯长之责。次年春天，齐派军救邢，大败赤狄。过二年（前 659）春天，赤狄又再次攻邢国，邢国军民被击溃。齐联宋、曹军救邢，再次击散赤狄，并追击远去。为使邢国避赤狄侵扰，齐桓公派人治办各种器具，将邢人迁往仪狄，在仪狄筑新城使居住。仪狄城故地历来有两说，一说在今山东聊城西南，一说在今邢台市西一百四十里的浆水村，至今史学界仍各从一说。

卫国国君懿公赤，是个只知吃渴淫乐的昏君，还爱好养鹤，所养的鹤能乘车，有爵禄，比大夫还尊贵。鲁闵公二年，卫懿公九年（前 660）赤狄伐卫国，懿公欲发兵，士卒们说："鹤有禄位，让鹤去打仗吧。"结果士卒无战心，被狄人在荧泽击溃。赤狄攻入卫都，懿公被杀，卫军民亦遭屠杀。宋桓公率军渡河救卫，只救出卫遗民七百三十人，加上共、滕两卫邑的居民共五千人，住于曹（卫邑，今河南滑县西南），立申为君，

即卫戴公。齐桓公派其子无亏率兵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戍守曹邑。卫戴公立一年死，齐桓公立戴公之弟，即卫文公。齐桓公又动员各诸侯国一同为卫国修筑楚丘城（今河南滑县东）。卫文公在齐桓公的全力支持下，励精图治，所谓“文公初立，轻赋平罪（平判刑罚），身自劳，与百姓同苦，以收卫民”⑤。不久便使国力有较大的增强，兵车由三十乘增加到三百乘。齐桓公迁邢存卫之事，为诸侯所称颂，故史称“邢迁如归，卫国忘亡”⑥。即邢国虽然迁到仪狄，仍然如回到原来邢都；卫国灭后又复国，忘其曾灭亡过。

鲁国庄公有三弟，长庆父、次叔牙、幼季友。又有三子，叫般（一作班）、启方、申，都不是嫡子。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庄公病，问叔牙“谁人可继位？”叔牙说“庆父有才”。庄公又问季友，季友说“臣以死奉立般”。季友当时任鲁国上卿，掌大权，遂借庄公之命要叔牙去到大夫鍼巫氏家，使鍼巫备毒酒对叔牙说：“饮此酒后，后人可在鲁国，不然死后无后人。”叔牙则饮而死，鲁立其子为叔孙氏。八月癸亥日，庄公死，季友立公子般。十月，庆父使圉人（养马的马夫）荦杀公子般，立八岁的公子启方（《史记》作开，避汉景帝讳）为鲁君，即鲁闵公，季友避乱逃奔陈国。鲁闵公元年（前661）秋八月，闵公请齐桓公从陈国召回季友。冬天，桓公派仲孙湫到鲁国慰问，仲孙湫回齐后向桓公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桓公问怎样才能除庆父？仲孙湫说祸害不完，将自取灭亡。桓公问可否用武力攻取鲁国？仲孙湫说不可以，鲁国还执掌《周礼》，而《周礼》是立国之本，臣闻之，国将亡，本必先颠覆，枝叶也一同断落。鲁国不弃《周礼》，未可动也。国君应作安定鲁难而亲近它，亲其有礼仪之国，依靠稳定坚固

之国，离间内部涣散之国，灭其昏乱之国，才是霸王之器物。鲁国果不出仲孙父之预料，庆父欲自立为君，在次年（前660）八月，派大夫卜齮袭杀鲁闵公。庆父两年连弑两国君，自知罪孽深重，遂逃至莒国（今山东莒县）。季友立公子申为君，即鲁僖公。季友贿赂莒国以交回庆父，莒国君逼庆父回鲁，庆父行至鲁国的密邑（今山东沂水西南），先让公子鱼回鲁请求赦免其罪，不许。公子鱼哭着回密邑，庆父听见哭声知不赦，遂自缢。其子公孙敖继其族中地位，即孟孙氏。其后鲁国渐由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友之季孙氏三家势力所控制。

鲁国庆父自缢后，曾参与弑君的鲁庄公夫人哀姜逃至邾国，齐桓公派人捕杀，以其尸体运回鲁国埋葬。是年冬天，齐桓公派上卿高子至鲁国订盟。高子率南阳（齐下邑）之军到鲁国承认公子申为鲁君，并帮助修复因内乱被破坏的鲁国都从鹿门至争门的城防。齐桓公息难存鲁，亲近鲁国人民，尊重保存周礼的鲁国文化，深得鲁人民的拥护，鲁人传为美谈，称“犹望高子也”⑦。齐桓公在诸侯中的威望更加提高。

地处南方的楚国，其先是一个古老的氏族，相传为颛顼之后，始祖季连，芈（mǐ 米）姓。夏商时称荆、荆楚。夏桀时有“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之说⑧。商王武丁曾征伐过荆楚⑨。周原甲骨文有“今秋楚子来告”之辞⑩。先祖鬻熊在周文王时作官，三传至熊绎，因勤劳王事，被周成王封于楚，封以子男之田，居丹阳（今湖北姊归东南），虽以蛮夷自称，但文化发展不亚于中原各国。周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不与盟。周昭王南征，伐过荆楚。或说昭王南征渡汉水被溺死与楚人有关。周夷王时王室微弱，诸侯或不朝，相攻伐。楚熊渠甚得江汉间的人民拥戴，也兴师伐庸（今湖北竹山西南）、

扬越（一作杨粤，今湖南长沙北，湖北沔阳南一带）至于鄂（今湖北鄂城）。熊渠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即中原）之号谥”⑪。于是立长子康为句亶王，次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楚遂成为江汉地区一大国。周厉王时楚惧怕厉王征伐，自动取消王号。其后西周王朝多次征伐南方，楚被迫南迁。入春秋以后楚国势力虽不及中原诸侯大国，但逐渐在发展，到熊通（楚武王）时，已能与中原诸侯大国抗衡。

熊通欲进入中原，但受中原各诸侯大国之阻，于是向汉水以东扩展，先将矛头指向“汉阳诸姬”（姬姓国）中最大的随国（今湖北随州市）。随国是周武王或成王时所封的姬姓诸侯，入春秋后是汉水诸姬姓国的盟主。鲁桓公六年即楚武王三十五年（前706）春天，熊通率军伐随国，随侯说：“我无罪”，熊通说：“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号。”⑫随侯入周请示，周桓王不准。熊通只得与随订盟而撤军。一年后（前704）熊通又伐随，战于速杞（随地，今湖北应山县），随败，求和，熊通遂自立为王，即楚武王。鲁庄公四年即楚武王五十一年（前690）三月，楚武王伐随国，死于军中，子熊赀继位，即楚文王，次年楚文王迁都于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楚武王、文王时期，连年征伐，服随、申两国，灭邓（曼姓，今湖北襄樊北邓城镇）、息（一作鄎，姬姓，今河南息县西南）等国，疆土扩展到汉水中游，势力增强。鲁庄公十九年即楚文王十五年（前675）春天⑬，楚文王率军伐巴（姬姓，今湖北江陵以北，襄阳以南当是巴国所在地）胜巴军后又伐黄（嬴姓，今河南潢川西），自黄返军至湫（今湖北宜城东南）而死。子熊艰继位，即堵敖。堵敖立五年（前672），欲杀其弟熊恽（一作頵），恽

奔随国，与随袭杀堵敖而继位，即楚成王。

楚成王“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祭肉），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⑭。故到楚成王时不仅疆土增大，势力也很强，又拟北进中原。鲁庄公二十八年即楚成王六年（前666）秋天，楚令尹子元（文王弟，王子善）率兵车六百乘伐郑国，郑得齐、鲁、宋军支援，楚才连夜撤军。楚势力强大，又欲多次北上中原，对齐桓公的霸业构成很大威胁。鲁僖公元年即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八月，楚成王因郑国亲齐国，出兵伐郑。齐桓公邀集宋、鲁、郑、曹、邾五国君在柽（chēng 称，陈邑，今河南淮阳北）相会，谋救郑之策。次年楚伐郑，楚斗章囚郑聃伯。翌年秋天，齐桓公又邀集鲁、宋和新依附的江（嬴姓，今河南息县西南）、黄国君在阳谷（齐邑，今山东东平西北）会盟，谋救郑之策。鲁僖公未到会，齐桓公自阳谷派使至鲁敦请，会后鲁僖公派上卿公子友至齐加盟，共议伐楚。

鲁僖公四年即齐桓公三十年（前656）春天，齐桓公会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联军伐楚的同盟蔡国，蔡军被击溃。遂乘楚未加防备之机，挥师伐楚国。楚派使质问：“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代桓公回答：“昔召康公命我们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过滤之意）酒，寡人是征（问罪）。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⑮

楚使回答：“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昭王之不复（还），君其问诸水滨。”⑯齐桓公见楚国不肯屈服，于是

进军，驻于陉（陉山，楚之北塞，今河南漯河市东）。夏天，楚成王派大夫屈完来到齐桓公的联军军营讲和，齐桓公命联军退后驻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

齐桓公退军召陵后，陈列好所率的八国军队，请楚大夫屈完一同乘兵车作了一次军事检阅。桓公对屈完说："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屈完说："君若以德绥（安抚）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⑰桓公见屈完言辞不示弱，于是和楚国罢战和好，共同订立盟约。

楚文王元年（前689）楚国迁都于郢，其后称为郢都，遗址在今湖北江陵县城北五公里的纪南城。本世纪五十年代末，湖北省考古工作者在此遗址进行探测、试掘，其后发掘。城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4.5公里，南北宽3.6公里。面积达24平方公里。发现城门七座，西垣北门宽15米多，三个门道，中道宽7米。城外护城河宽达80米，城市已发现的水井有400以上。宫殿区位于城中部偏东南处，宫城内台基分布有序，呈中轴线排列，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其它有铁制镰、锄、斧、凿、削、鱼钩和铜兵器等。墓葬主要分布城外三、四十公里范围内。从遗址大体规模看来，确实是春秋时一大都会。

《左传·僖公四年》所载楚大夫屈完所说："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方城是山、是城、是长城，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左传·僖公四年》杜预注："方城山在南阳叶县。"《后汉书·郡国志》南阳郡下："叶有长山，曰方城。"《元和郡县志》："方城山在方城县东北五十里，"以方城为山名。《国语·齐语》韦昭注："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荀子·坠形》："天下

九塞，方城为其中之一，”以方城为塞名。《汉书·地理志》南阳郡叶县下：“叶，楚叶公邑，（南）有长城，号四方城。”楚自武王熊通以后，拓地千里，国力大增，一直想北上中原与各诸侯争雄，而中原各国南下攻楚者在春秋前期很少。楚国是进攻多而防御少，无必要修筑如同北方各国的长城，只利用山势险阻，筑塞防守就可以，故楚国方城应是山塞。

以上两说附此备考。

注 释

①《韩非子·说林上》。

② 殷墟甲骨卜辞中称“竹侯”。

③《国语·齐语》。

④⑤《史记·齐世家》。

⑥《左传·闵公二年》。

⑦《春秋公羊传·闵公二年》。

⑧ 今本《竹书纪年》。

⑨《诗经·商颂·殷武》。

⑩《周原甲骨文》H11：83片。

⑪《史记·齐世家》。

⑫《史记·楚世家》。

⑬ 楚文王在位《左传》中载是十五年。

⑭《史记·楚世家》。

⑮⑯⑰《左传·僖公四年》。

先秦

泓水之战

齐桓公率齐、鲁、宋、陈、卫、郑、许、曹八国之军，于鲁僖公四年（前656）伐蔡国后又借机伐楚国，驻军召陵，与楚大夫屈完谈判，和平解决订盟而撤军，又一次起到了团结诸侯共尊周室的作用。其后十余年里，齐桓公仍高举“尊王攘夷”这面大旗，挟天子以令诸侯，代周天子行诛伐。对诸侯示之以仁、拘之以利、结之以信、威之以武、安内攘外，以尊周室，“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春秋五霸中其它四霸也是继承这一套来创霸业，但各国具体情况不一，历史进程中变化多端，故有的成功，有的只是昙花一现。宋国的襄公兹甫即是在春秋争霸中昙花一现的历史人物。鲁僖公二十二年即宋襄公十三年（前638），宋、楚两国之军在泓水北岸（已淹没，在今河南柘城西北）交战，宋军大败，宋襄公亦伤。此战宋国损失惨重，自此国势一蹶不振，刚创霸业也就告终。

鲁僖公五年即齐桓公三十一年（前655）周惠王宠少子带，欲废太子郑而立少子带，齐桓公知其事则邀请鲁、宋、陈、卫、郑、许、曹七国君会于首止（卫地，今河南淮阳东），

共同与周太子郑订盟，以确定周太子的地位。周惠王恨齐桓公将集会诸侯定太子郑之位，遂派周公（宰孔）召郑文公，对文公说：我很体谅你服从齐国，现在要你从楚国，以晋国作辅助，这样就可稍安。文公受宠若惊，但又惧怕齐桓公，所以便率军前往首止赴会，订盟确立周太子郑时，则不与盟欲逃会。郑大夫孔叔劝止说“作为国君不可轻率，轻率行动会失去盟国的支持，祸患就要发生。待祸患发生再去乞求加盟，损失会更多，你必然会后悔莫及”。文公不听，丢下郑军自己回郑国。次年夏天，齐桓公因郑文公在首止不盟而逃会，遂率鲁、宋、陈、卫、曹国的联军讨伐郑国，围郑之新城（今河南密县东南）。齐桓公对诸侯宣告郑文公之罪。秋天，楚国围攻齐之盟国许国，目的是解郑之危，齐桓公果然撤围郑的诸侯联军，解救许国后还军。齐桓公这次伐郑，因楚国出兵救郑，郑、楚又是奉周惠王之命行事，所以只得收兵而还。

鲁僖公七年即齐桓公三十三年（前653）春天，齐国再出兵讨伐郑国，孔叔以国家安危再次劝郑文公“下齐以救郑”，和齐与诸侯结盟，郑文公还要等待再决定。夏天，郑国杀死从楚国叛逃投郑，作郑执政的申侯，以取悦齐国，并向诸侯求和。秋七月，齐桓公邀请鲁僖公、宋桓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在宁母（鲁邑，今山东鱼台境）相会，商议与郑国订盟之事。郑文公派太子华到会听命。太子华向齐桓公说，郑国的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实际上是叛齐的主谋，若除掉三族，我郑国就可以成为齐国的内臣，对君王无所不利。齐桓公将允许，管仲劝阻说，会合诸侯应当以礼和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又说，如果用德来安抚，加上教训，郑国不接受，然后率诸侯伐郑，郑国挽救灭亡都来不及。如领其罪人攻郑，则郑就

有话说，也会失去人心。不要允许，郑必然受盟。于是齐桓公没有采纳郑太子华之策，太子华因此得罪于郑。冬天，郑文公到齐国与齐桓公结盟。

郑文公未彻底执行周惠王之受命，从楚背齐，而是又回到齐的盟国中。是年闰十二月周惠王死，太子郑继位，即周襄王。因恐其弟叔带（王子带）争位，秘不发丧，先告难于齐国，请助其确立王位。次年（前 652）正月，齐桓公邀请鲁、宋、卫、许、曹等国国君和陈世子与周襄王派出的大夫在洮（曹邑，今山东鄄城西南）订盟。郑文公因是重新服齐，也请求加盟，齐桓公率各国诸侯确认太子郑的王位。于是周襄王才讣告天下，为周惠王发丧。

鲁僖公九年即齐桓公三十五年（前 651）三月，在位三十年的宋桓公御说死，太子兹甫（父）继位，即宋襄公。襄公尚未葬宋桓公时，适逢齐桓公于九月邀请诸侯在葵丘相会，于是宋襄公就前往参加。参加这次会的有鲁、宋、卫、郑、许、曹等国国君，周襄王派周公宰孔参加。齐桓公召集这次会的目的一是订盟修好，二是表示尊崇新即位的周襄王。周襄王派宰孔赐给齐桓公祭祀文王、武王的胙（祭肉），并传达襄王之命说："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桓公认为对天子的赐命，不下拜不合礼仪，于是下拜受领。称齐桓公为伯舅，是周天子对异姓诸侯的称谓，古称七十岁为耋。秋天，齐桓公再会诸侯于葵丘，订盟约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①这次订盟据《孟子·告子下》载，诸侯们绑缚了作牺牲的牛，把盟书放在它身上，没有歃血。因相信诸侯不敢负约。盟约内容是：第一条，诛责不孝之人，不要废立太子，不要以妾为妻。第二条，尊重贤人，培养人才，表彰有道德的

人。第三条，敬老慈幼，不要怠慢贵宾与旅客。第四条，士的官职不要世代相传，官事不要兼摄，录用士要选有贤才的，不要独断专横杀大夫。第五条，不要到处筑堤防，不要禁止邻国来购买粮食，不要有所封赏而不报告（盟主）。此次会盟是齐桓公霸业的鼎盛时期。是年冬天，晋国发生内乱，齐桓公开始介入，是将霸业发展到西方诸侯国的开始。

鲁庄公十五年（前 679），即齐桓公开始称霸之年，曲沃武公攻伐晋侯缗，攻入翼城（又称绛，晋都，今山西翼城南），杀晋侯缗，尽有晋之地。次年冬天，曲沃武公灭翼后，尽收晋公室的重器宝玉贿赂周僖王。周僖王见其曲沃武公如此尊重他，就派卿士虢公宣布武公以一军为晋国君，列为诸侯，至此，晋国复归统一。晋武公为晋侯二年死，其子诡诸继位，即晋献公。晋献公原配贾君无子，不能立为夫人。于是纳其父妾齐姜，生秦穆公夫人和太子申生，又娶二戎女，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献公五年（前 672）伐骊戎（族居于今陕西临潼一带），灭其君，得骊姬及其妹皆纳入室，骊姬生奚齐，其妹生卓子，骊姬受宠被立为夫人。献公年老，欲废太子申生，立奚齐为太子。但申生、重耳、夷吾三位公子皆有师保私属一班人，势力很大。骊姬遂先收买献公宠臣梁五和关东五，利用“二五”将三位公子调出国都。“二五”以曲沃为宗庙所在地，蒲（今山西永济蒲州）、屈（今山西吉县北）为边防重地，请献公分派公子们去驻守。献公惑其言，高兴听从。于是派申生去曲沃，重耳去蒲城，夷吾去屈城，只有奚齐和卓子留在绛都。“二五”与骊姬又陷害在外的公子，献公又惑其言，废太子申生，立奚齐为太子。后又离间献公父子关系，申生自杀，重耳、夷吾逃奔。

鲁僖公九年即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晋献公病危，托命于大夫荀息，命荀息作奚齐之师。是年九月，献公死，荀息立奚齐为君。中大夫里克联合大夫丕郑，率领在外三个公子私属杀死奚齐。荀息又立卓子。十一月，里克等又杀卓子，荀息亦自杀。晋国无君，由谁来继位？里克、丕郑等大臣欲立重耳，吕甥、郤芮等大臣欲立夷吾。两派分别派使到重耳逃奔的狄，夷吾逃奔的梁（今陕西韩城）召两公子。重耳有远虑，不返以观变化。夷吾急欲继位，派吕甥、郤芮入秦，以重金和割地贿赂秦穆公，请秦军护送返晋。晋国发生内乱，齐桓公派隰朋率军入晋。次年（前650），会合周、秦之军，立夷吾为晋国君，即晋惠公。

鲁僖公十一年即周襄王四年（前649）夏天，周襄王之弟叔带（王子带）企图得到王位，召集王城附近的杨泉、泉皋、伊洛诸戎人攻王城，秦、晋两国出兵助襄王击戎人保王城。次年冬天，齐桓公派管仲、隰朋分赴周、晋调和此次攻战之事，促成双方媾和。周襄王欲以上卿之礼对待管仲，管仲三让后受下卿之礼。

鲁僖公十三年即齐桓公三十九年（前647）夏天，伊、洛的戎人犯周、淮夷（分布于淮水中下游之夷人）侵杞国（杞，商时古国，初在今河南杞县，入春秋以后，杞成公东迁于今山东安丘一带）。齐桓公邀请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国君会于咸（卫邑，今河南濮阳东南），谋成周迁杞之策。秋天，派诸侯联军戍守周以防御戎人。次年春，齐桓公迁杞于缘陵（今山东昌乐东南），发动诸侯为杞筑城，给兵车百乘，士卒千人戍守。两年后（前644）的冬天，淮夷逼鄫国（姒姓，今山东苍山西北），齐桓公会合鲁、宋、陈、卫、郑、许、邢、

曹等诸侯军于淮，为鄫国筑城。但发生役人骚乱，城未能筑成。

鲁僖公十五年即齐桓公四十一年（前645），管仲病危，齐桓公探视，询问管仲谁可继他为相，管仲荐隰朋。管仲临终前又请桓公逐易牙、竖刁、开方和御医常之巫等佞幸小人，认为这些小人为讨好桓公，杀子、自宫、背亲等事都干得出，留在身边是祸害。管仲死后，桓公尽逐易牙、竖刁等人，以隰朋为相，但不久隰朋亦死，鲍叔牙为相。桓公逐易牙、竖刁等人后，“食不甘味，心不怡，苛病起，朝不肃”②。于是又复召回易牙、竖刁等人复职，后则内外勾结专擅公室大权。鲁僖公十七年即齐桓公四十三年（前643）冬天，齐桓公病危，易牙、竖刁、常之巫共同作乱，将宫门堵塞，筑高墙阻断人通行。桓公儿子为夺君位而斗争，不顾桓公病事。桓公死后六十七日，尸虫自户中出，才入宫收敛，过三月才发丧。桓公诸子是：无亏、元、昭、商人、雍。桓公曾将太子昭托宋襄公作齐储君。桓公死，众臣立无亏为太子，太子昭奔宋国投宋襄公。齐国内乱。次年春天，宋襄公率宋、曹、卫、邾四国之军入齐国平乱，送太子昭返齐继位。齐国人杀死无亏，公子潘、商人、元、雍集死党抗拒宋的联军，为宋军击败于甗（yǎn 演，今山东济南市历城），宋襄公遂立太子昭为国君，即齐孝公。

宋襄公自即位以来，宋国国力有很大的增强，齐桓公一死，中原诸侯无霸主，宋襄公遂想继齐桓公称霸，适逢齐国诸公子作乱，平齐乱以后，宋襄公自恃有功，开始以霸主的姿态出现。鲁僖公十九年即宋襄公十年（前641）三月，襄公因滕国（姬姓，今山东滕县西南）宣公婴齐对襄公不满，被襄公逮捕。六月，宋襄公又邀请曹、邾、鄫会于曹之南郊，由他主

盟，鄫国君迟到，襄公使邾国君将鄫国君逮来杀祭睢水之社（神），想借此来使东夷归附。司马子鱼批评他说，杀人祭祀，有谁来享用？齐桓公恢复了三个灭亡的国家以使诸侯归附，义士还说他德薄，你今一会就暴虐两国之君，又用来祭淫昏的鬼神，还想当霸主，实在太困难了，我看你求得善终就不错。秋天，宋襄公因在曹国都南郊会盟时，曹共公未尽地主之礼，给他送羊，派军包围曹国都，又受到子鱼的批评。宋襄公的暴虐行为，引起诸侯的不满，同时思念齐桓公对诸侯的礼遇。是年冬天，应陈穆公之邀请，蔡、楚、郑国国君在齐国相会怀念齐桓公之德，结为同盟。

鲁僖公二十一年即宋襄公十二年（前639）春天，宋襄公邀请齐孝公、楚成王在鹿上（宋地，今安徽阜阳南）相会。此前公子目夷（即子鱼）曾劝阻，襄公不听。相会时襄公请楚成王支持他为盟主，楚成王表面允许，于是订盟。秋天，宋襄公遂以诸侯盟主的身份邀集诸侯前往盂（宋地，今河南睢县境内）相会。公子目夷劝谏襄公说："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③襄公说已和楚约好，不用兵车，只带随从，叫"无兵车之会"。而楚成王则"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④。于是楚埋伏兵车于盂，宋襄公到后尚未当成盟主就被楚军逮捕。襄公向目夷说："不听你的劝谏，以至于此，你快回宋守国"。目夷逃回宋国，设防坚守。楚军伐宋至宋都见其已设防，楚成王对宋人说，不投降则杀死宋国君，宋人则说："吾国已有君矣。"⑤楚成王知其杀了宋襄公也得不到宋国。于是派宜申至周向周王献捷，以此来下台撤军。冬天，楚成王邀请鲁、陈、蔡、郑、许、曹等国君会于薄（即宋亳，今河南商丘北）。鲁僖公为宋襄公说情，楚成王借机释

放宋襄公，由目夷接回国。

次年（前638）夏天，宋襄公仍不甘心被楚所辱，欲联合卫、许、滕国之军讨伐亲楚国的郑国。大司马公孙固劝谏说："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⑥宋国是商代微子之后，故谓"弃商久矣"。宋襄公想复祖业已不可能，公孙固劝他不如与楚和好，不打仗。宋襄公不听。楚成王为救郑，率军伐宋，十一月一日，两军在泓水（已淹没，在今河南柘城西北）相遇。宋军在北岸已列阵，楚军正渡水。公孙固向襄公说："彼众我寡，可半渡而击。"襄公不同意。楚军渡水之后正在列阵，公孙固又请趁楚列阵混乱之际发起攻击，襄公认为讲仁义的人不能乘人之危。楚军列好阵后宋军才攻击，结果被反击，宋军大败。襄公的腿也受重伤，左右护卫也被全歼。

泓水一战，宋军惨败，宋国人皆埋怨襄公，襄公则发表一番"古之为军"，"临大事不忘大礼"，⑦所谓君子不伤害已受伤的人，不擒有黑白头发的"二毛"人，不在险隘之处阻击，不攻击未列成阵的敌人等等的迂腐言论⑧。公子目夷斥襄公不懂作战之理才打败仗，还不如投降好。此一战宋襄公只好放弃称霸之企图。故"所谓'宋襄霸业'，实楚成霸业"⑨。次年（前637）五月，宋襄公因腿伤而病死，子王臣继位，即宋成公。第二年（前636）秋天，宋与楚媾和，宋成公到楚国会见楚成王。返回时进入郑国，郑文公设享礼招待宋成公，自后宋亦成为楚之盟国。

注　释

①《左传·僖公九年》。

②《吕氏春秋·知接》。

③《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④《史记·楚世家》。

⑤《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

⑥《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⑦《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

⑧《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⑨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54页。

先秦

城濮之战

晋献公晚年为女色所迷，宠骊姬姐妹，欲废太子申生，另立骊姬所生之子奚齐为太子。然而申生、重耳、夷吾等公子都有师保私属，势力颇大，骊姬未敢贸然行事。骊姬勾结献公宠臣梁五、东关五促使献公将太子派守曲沃、重耳派守蒲、夷吾派守屈，后骊姬又离间献公父子关系。献公二十二年（前655），申生献祭肉于献公，骊姬下毒于肉中，诬申生欲害献公，重耳、夷吾二位公子也参与其谋。献公大怒，欲除去三子，申生惧而自缢于新城（曲沃），重耳、夷吾各据蒲、屈自保。史称晋“骊姬之乱”。

鲁僖公九年即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九月，晋献公诡诸死，受托的大夫荀息立奚齐。冬天奚齐被大夫里克杀死，荀息立卓子（骊姬之妹所生），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亦自杀。里克欲迎重耳返晋为君，重耳拒回。吕甥，郤芮欲迎夷吾，夷吾急欲回晋继位，以割地求秦穆公以军队护送返晋，秦穆公派百里奚率军护送。齐桓公率诸侯军入晋平乱，派隰朋率军与秦军汇合护送夷吾返晋继位，即晋惠公。惠公在位时，因未兑现割

让河外五城，晋、秦关系恶化，秦伐晋战事起，“韩原之战”晋败，惠公被俘，媾和后晋以太子圉入秦作人质，惠公获释。惠公十四年（前637）九月，惠公病死，由秦潜逃回的太子圉继位，即晋怀公。次年二月，晋国人民知重耳在秦国，遂暗中劝其返晋为君，秦穆公用兵送重耳返晋入曲沃，怀公北逃，重耳派人杀怀公于高梁（今山西临汾东北）。重耳在秦军护卫下，回到晋国即位，即晋文公。晋文公四年（前632），晋、楚两军在城濮（今河南范县南濮城镇）进行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争。

宋、楚两国在泓水之战（前638）后，因宋败，楚胜，宋襄公死，继位的宋成公向楚归附，楚国势力大增。楚成王三十五年（前637）秋天，楚成王因陈国亲近宋而派子玉（成得臣）率军讨伐，攻取了陈国的焦（今安徽亳县）、夷（又名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两邑，同时还为顿国（姬姓，今河南商水东南，后迁于项城西）筑城。过一年（前635），陈攻顿国，顿国君逃奔楚国，楚令尹子玉又率军再次攻围陈国，迫使陈归附楚国，将顿国君送回顿国。次年（前634）秋天，楚成王以夔国（与楚同姓，今湖北秭归东）不祭祀祝融和鬻熊为借口，派子玉、斗宜申率军伐灭夔国。自齐桓公死后，中原诸侯虽宋襄公欲创霸业，但暴虐诸侯，称霸未成即被楚败，而楚成王在此时间已成为事实上的霸主。

晋国因晋献公晚年废嫡立庶、引起骊姬和“二五”作乱。晋献公逼太子申生自杀。重耳、夷吾在蒲、屈自守。献公派寺人（宦者）披（字楚伯，官勃鞮，或作勃貂）到蒲城杀重耳，重耳翻墙逃，寺人披追至只斩其衣袂，重耳遂带从人投奔母家狄。《国语·晋语四》载僖负羁说：“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逃

亡），卿材三人从之。”韦昭注：“三人，狐偃、赵衰、贾佗。”《左传·昭公十三年》载叔向说：“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宠于献。好学而不贰（二心），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杜预注：“狐偃、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从出。”《史记·晋世家》载：“是时重耳年四十三。”①

晋献公死后，逃奔梁的夷吾在秦、齐帮助下返晋即位。晋惠公即位后，派邳郑赴秦国表示感谢，转达惠公之意，借口国人反对割让国土，不给秦“河外列城五”，秦、晋两国关系恶化。《史记·晋世家》：夷吾“乃使郤芮厚赂秦，约曰，即得入，请以晋河西之地与秦。”《左传·僖公十五年》：“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界），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以《左传》所记为确。

晋惠公因重耳在外，怕里克为内应遂囚里克，对他说：“没有你寡人不得立，可是你连杀二君，一大夫，我作为你的国君不是也危险？”里克说：“不有所废，君何以兴？欲诛之，其无辞乎？乃言为此！臣闻命矣。”里克知惠公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遂自刎而死。惠公四年（前647），晋国大旱，人民饥荒。惠公派使至秦国请卖粟给晋救饥荒，秦穆公听从大夫百里奚建议，认为灾害各国都要发生，应当救济邻国人民，于是秦国粮食由秦都雍（今陕西凤翔）装运至渭水上船，沿渭水东下运抵黄河，再溯河水运至汾水抵晋都。粮船络绎千余里，甚为壮观，故史称“泛舟之役”。次年，秦国也发生饥荒，秦穆公请晋国卖粮救饥荒。晋惠公与群臣商议，大夫庆郑主张支援，惠公之舅父虢射则反对，惠公同意虢之议，拒绝卖粮给秦国。于是秦穆公以晋屡次负秦，秦人愤怒，遂决心伐晋。

周平王东迁，秦襄公以军护送有功，被周平王封为诸侯，

赐岐以西之地，自此秦国从西垂向东发展，经近百年的努力终于巩固在宗周故土的统治。鲁庄公十七年（前 677），秦德公继位后，将国都由平阳（今陕西宝鸡平阳镇）迁往雍邑，以便向东发展。晋献公五年（前 672）伐骊戎，灭其君，是有意阻止秦国向东推进。但秦宣公在河阳（晋邑，今河南孟县西）败晋军，显示出秦国的势力已胜于晋国。秦穆公即位（前 659），即率军伐茅津之戎（今山西平陆一带）获胜，秦国势力已逼近晋国。但是晋献公也未坐视，遂于次年夏天，晋献公用屈地出产的马，垂棘（今山西潞城北）出产的璧，贿赂虞国（姬姓，今山西平陆境内）公，要求借道路从虞国通过去伐虢国，虞公不但同意借道，还主动为晋军作前导。晋国里克、荀息率军攻下虢都下阳（今平陆南），虢被逼迁都上阳（今河南三门峡市东南）。两年后（前 655）十二月，晋又向虞借道伐虢。破虢上阳，灭虢。晋军回来时顺道又灭虞国，逮捕虞公和百里奚。虢、虞地处于秦晋两国战略要塞，是晋有意阻秦，可见两国争战已不是偶然的。晋惠公拒秦求粟只是秦伐晋的导火线。

晋惠公六年即秦穆公十五年（前 645）九月，秦穆公率军渡河东进伐晋国，晋惠公率军抵御。秦、楚两军在韩原（今山西河津与万荣间），惠公自将上军，韩简将下军。初战，秦有所失，穆公几乎被擒。再战，晋军全军溃败，晋惠公和随从大臣被俘，秦穆公得胜还军，囚晋惠公于灵台（今陕西户县）。秦穆公于王城（今陕西大荔东）与诸大臣商议如何处理惠公，议决为晋割地与秦，送晋太子入秦为质。秦穆公夫人是晋惠公的姐姐，亦代为求情。十月晋派吕甥至秦王城谈判，晋许割“河外列五城”给秦，太子圉入秦为人质，秦释放惠公回晋。秦、晋议和成，惠公将返晋，派郤乞先行回晋安抚国人，以缓

和因战败带来不安定的情绪和矛盾。于是吕甥举行“朝国人”大会，以君命下令“作爰田”、“作州兵”。爰田，又作辕田、袁田。因古文献记载太略，历来解释不尽相同，一种认为分公田以赏国人，或是抽公田之税以赏国人，是标志井田制的瓦解，赏赐对象主要是在韩原之战中阵亡士卒的家属。另一种认为不是一种土地制度的变革，只是一种赏赐。“作州兵”即按州的行政单位交纳军赋，与“作丘甲”、“作丘赋”大体相同，以此来补韩原之战中兵甲之损失，此事原为权宜之计，后来形成晋国各阶层作战立功的意识，培养起晋人英勇杀敌的精神。是年十一月，秦穆公释放晋惠公返晋国。

晋惠公返国后，恐重耳在外得诸侯支持对己不利，又派寺人披去狄行刺，重耳得知，遂率领狐偃、赵衰等随从离开住了十二年的狄人部落投奔齐国。经过卫国时卫文公不接待，走到五鹿（卫地，今河北大名东）向农民讨食，农民无食只给一块土，重耳愤怒欲打农民，狐偃阻止，说：“此是预示着上天赐给你土地”，于是重耳拜受。重耳一行到齐国，齐桓公以贵宾礼接待，并以宗女姜氏给重耳作妻子，又赐马八十匹，重耳则安心住了两年。齐桓公死，齐国发生诸公子争君位之乱。狐偃、赵衰等劝重耳启行，姜氏妻子贤，亦劝其不应图安逸，要志在四方，否则会败坏名声，并与狐偃秘谋，用酒灌醉重耳启行。待重耳酒醒后已离齐国很远，欲以戈击狐偃，被狐偃说服而行。

重耳一行离开齐国到曹国，曹共公听说重耳是骈胁（肋骨相连），乘重耳洗澡时观看，此是不礼貌之举动。而曹国大夫僖负羁之妻子观其随从诸人后说：“晋公子之从者，都是相国之才，回国后必然得志于诸侯而诛杀无礼者，曹国则当其首。”

并要僖负羁以礼对待，僖负羁则馈赠一盘食物，藏璧玉于盘中。重耳受其食物而还璧玉。到达宋国时，正值宋襄公刚在泓水之战中战败，只赠马八十匹。到郑国时，郑文公不以礼接待。到达楚国后，楚成王以国君之礼接待，在宴会上，楚成王问："公子若返晋国，则何以报不穀（古代诸侯自称的谦辞，穀，善也）？"重耳说："子女玉帛，则君有之。羽毛齿革，则君地生焉。其波及晋国者，君之余也。其何以报君？"楚成王一定要重耳说如何报答，重耳说："若以君之灵，得反晋国。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避君三舍（九十里）。若不获命，其左执鞭弭（马鞭和弓箭），左属橐鞬（箭袋和弓套），以与君周旋。"②楚子玉请成王杀重耳，成王不许。重耳在楚数月，成王以楚距晋遥远，跨越数国送重耳回晋国诸多不便，此时楚与秦关系较好，秦与晋相邻，又是大国，遂厚赠重耳送至秦国。到秦国后，秦穆公以宗女五人给重耳作妻妾，五女中有晋太子圉在秦作人质时娶的秦宗室女怀嬴，太子圉逃回晋国继位，抛下妻子。

重耳由秦穆公送回晋国作了国君（前635）。晋文公在外十九年，辗转八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③。吕甥、郤芮惧文公诛杀，遂秘谋杀文公，寺人披向文公告密，秦穆公诱杀吕、郤二人。自此晋文公则致力于国内改革和创建霸业。

鲁僖公二十四年即周襄王十七年（前636），两年前郑国征服滑国，郑军撤走后，滑就叛郑改亲卫国。是年夏郑文公派公子士泄、大夫俞弥率军再伐滑。周襄王派伯服，游孙伯到郑国调解，郑文公扣留二使，襄王以狄人之军讨伐郑，攻下栎邑，襄王结好狄人，娶狄女隗氏立为王后。王子带原与狄人是

旧好，隗氏与王子带通奸，襄王则废黜狄后隗氏。狄人怨怒，勾结王子带共同攻伐襄王，败王军，俘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襄王出奔于汜（今河南襄城南），王子带则带着隗氏出居温（今河南温县西）。襄王在汜派使向晋、秦、鲁等诸侯告难。次年秦穆公得知周王室有难，率军驻于河上，拟与晋文公接纳襄王。狐偃向晋文公说："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是）大义也，继文（侯）之业，而宣（传）信（义）于诸侯，今为可矣"④。于是晋文公谢止秦穆公，率左右两军，兼程倍道赶赴救难。三月甲辰日，晋军到达阳樊（今河南济源东南）。用右军围温，左军至汜迎接周襄王，四月丁巳日，晋文公送襄王返王城。右军攻破温，俘王子带，杀于隰城，周乱平，襄王遂将畿内的阳樊、温、原（今河南济原北）、州（今河南沁阳东）、陉（今沁阳西南）、纽、攒矛（皆在今河南修武北）八邑赐给晋文公，八邑多为王子带的封地，均位于黄河北岸。晋国有此八邑，拓地至中原。

晋文公欲阻止楚国北上争霸，在国内奖励生产，发展军事力量。晋文公四年（前633），文公在原有二军的基础上"作三军，谋元帅"。在被庐阅兵，为此为训练士卒之常法，把晋全国军队编为中、上、下三军，中军统上军，上军统下军。改革国君为全军统帅的旧制，以郤縠将中军，郤溱为副；狐毛将上军，狐偃为副；栾枝将下军，先轸为副。此即是晋国最早的六卿。又命荀林父为国君御戎，魏犨（chōu仇，即魏武子）为戎右。这样，晋成为军事大国。在此前一年（前634），宋成公叛楚亲晋，齐孝公伐鲁，鲁国向楚求救出兵。楚成王派兵伐宋、鲁两国，楚军围宋邑缗（今山东金乡东北）。是年冬天，楚又联合陈、蔡、郑、许四国攻宋，围宋都，宋大夫公孙固到

晋国告急。晋文公与大臣商议是否救宋，先轸说："报施救患（报宋曾赠马），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就在此举）。"狐偃说："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⑤文公遂决定伐曹、卫两国。

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春天，晋文公伐曹国，向卫国借道路，卫国拒绝。晋军退到今河南汲县渡黄河，从卫国南进兵伐曹国。晋军攻入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活捉曹共公，交宋国。正月戊申日攻占五鹿（卫邑，今河南濮阳北），晋文公与齐昭公盟于卫地敛盂（今濮阳东南）。卫国危机，卫成公求和，晋文公不许。卫国人逐卫成公于襄牛（卫邑，今河南范县），大夫元咺立成公子叔武为卫君。

晋文公虽连胜曹、卫二国，但楚国子玉仍围宋都不撤军。先轸建议宋国贿赂齐、秦两国，由二国出面与楚国讲和，晋国则割曹、卫之地给宋，楚必然不同意，就会激起齐、秦和晋对付楚国。晋文公采纳了此"喜赂怒顽"的离间计。楚成王深知不可与晋战，"知难而退"，于是退至申（今河南南阳市），命申叔自榖撤军，命子玉解宋都之围。子玉刚愎自用，欲胜晋军显示才干，故不听命。子玉攻宋久而不破，求战心切，遂派宛春至晋，提出恢复卫成公君位，还曹国地方，就解宋都之围。晋文公私许战后复还曹、卫为君，曹、卫遂叛楚亲晋，同时又扣留宛春于卫国以激怒子玉。子玉撤宋都之围，率军进攻晋军，晋文公下令晋军后退三舍（九十华里），以实现在楚时"退辟三舍"的许诺。四月戊辰日，晋军退于城濮。

晋、楚兵力是：晋虽有齐、宋、秦军，而实际参战只有晋的"三军"有兵车七百乘，士卒三万七千人。楚虽有陈、蔡、郑、许军，实际参战是楚、陈、蔡三国军，楚军是子玉率领的

西广、东宫与若敖六卒（王宫卫队，王族士卒），加上申、息二邑的地方军，在数量、装备上优于晋国。双方兵力布署为：晋的三军，由先轸任中军元帅，指挥全军，郤溱为副。狐毛任上军主将，狐偃为副。栾枝任下军主将，胥臣为副。楚的三军，子玉亲自指挥中军，即楚军。右军由子上指挥陈、蔡军，左军由子西指挥申、息地方军。战斗一开始，晋以下军分为二队，胥臣率一队将驾车的马蒙上虎皮，先冲击楚右军的陈、蔡军，陈、蔡军溃败，蔡公子印被杀。栾枝率另一队佯败，狐毛竖起中军旗，充中军后退，诱楚中军深入。狐毛、狐偃的上军击败子西指挥的左军申、息军后，和晋中军先轸、郤溱夹击子玉的中军。子玉见楚阵的右、左两军皆溃败，忙收军撤退，楚军未受损失。一场在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以晋胜楚败而结束。楚成王派使告诉子玉："大夫若活着回楚，又有何面目见申、息的父老呢？"子玉走到连穀（楚地）自杀而死。

城濮之战结束后，楚国的盟国纷纷倒向晋国，与之结盟。同年五月，晋文公请周襄王到郑国的践土（今河南荥阳东）大会诸侯。周襄王赐晋文公，大辂之服、戎辂之服、彤弓等物和虎贲三百人，策命为侯伯。晋文公正式成为齐桓公后的霸主。

注　释

①晋重耳年纪，史学界目前仍各从一说。

②《左传·鲁僖公二十三年》。

③《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④《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⑤《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先秦

弦高犒秦师

秦国自文公三年（前763），率兵卒七百人“东猎”，用近一年时间，到达“汧渭之会”，看中此地，拟在此筑城居住。秦文公十六年（前750），第一次伐戎，给戎人首领丰王一次有力打击，控制岐以西地区。岐地原是周族故土，即后来所称的周原，是一片富庶地区。周人在此奠定了农业基础，秦人迁至此又经营五十年，为秦国奠定最初发展的基础。

鲁隐公七年即秦文公五十年（前716），秦文公死，太子早死，太孙继位，即秦宪公。秦宪公在《史记·秦本纪》中作宁公。1978年1月在陕西宝鸡杨家沟乡太公庙村发现的《秦公钟》和《秦公镈》铭文中作宪公，与《秦始皇本纪》中相同，证明宁公系宪公之误①。秦宪公二年（前714），自西垂迁都平阳（今陕西宝鸡县东阳平村）。次年，宪公伐荡社之戎（今陕西兴平和长安县一带），戎人亳王逃往西戎，秦国势力向东方推进。宪公之后的武公时（前697—前678），秦国势力又有较大发展，西自今甘肃中部，东至华山都是秦的势力范围。德公二年（前675），又从平阳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在雍

建筑规模宏伟的都城和宫殿②，自此雍都成为秦国的政治中心。经宣公、成公到穆公即位后，不但可以在西戎称霸，也能与晋国抗争，成为春秋时期一强大国家。

晋、楚“城濮之战”以后，晋、秦关系良好，晋文公欲惩罚郑国，请秦穆公出兵联合讨伐郑国，郑国大夫离间秦、晋关系，秦与郑国结盟退军，秦、晋关系破裂。晋文公死后，秦穆公伐郑国，出兵途中遇郑国商人弦高，弦高以佯称奉郑国君命来犒秦军，同时急告郑国作准备，秦军知郑已有准备，只得回军。郑国之危亡被机智的商人弦高转危为安。

晋、楚“城濮之战”（前632），晋文公战胜楚军后，又在践土大会诸侯，与齐、宋、鲁、蔡、郑、莒等国君和卫侯之弟叔武订盟，陈穆公因城濮战中助楚，只来听命，未参加订盟。周襄王亲自到会，晋文公向襄王献俘，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成为齐桓公后受命的霸主。十月，晋文公因卫国与许国未参加践土之盟，欲联合诸侯军讨伐，又恐诸侯不服，于是请周襄王以“狩于河阳”之名，参加诸侯之会。又以朝周王之名邀请诸侯会于温（晋邑，今河南温县西），到会的有齐、宋、鲁、蔡、陈、郑、莒、邾等国之君和秦国代表。晋文公率诸侯到践土朝周王。为巩固霸主的地位，必须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故晋国在温会之后又“作三行”，即在原左、右二行基础上改编步卒为三行，以荀林父为中行将，屠击为右行将，先蔑为左行将。这是为抵御戎狄而扩编的步兵。因为戎狄无兵车，难用兵车取胜，在当时晋国算是首屈一指的军事大国。两年后（前629）的秋天，晋国在清原（今山西稷山东南）举行阅兵，又将三行改编为新上、新下两军，赵衰为新上军将，箕郑为副；胥婴为新下军将，先都为副。其目的仍是为

抵御狄人。

郑文公三十六年（前637），晋公子重耳流亡至郑国。郑文公不以礼接待，文公弟叔瞻劝其兄说："晋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罹外之患，而天不靖晋国。殆将启之，二也。有三士（指狐偃、赵衰、贾佗）足以上人，而从之，三也。晋、郑同侪（同辈），其过子弟（晋国子弟经过郑国），固将礼焉，况天之所启乎！"③文公说："诸侯亡公子过此者众，安可尽礼！"④叔瞻说："君不礼，不如杀之，且后为国患。"⑤文公不听。重耳回国即位以后，对郑国耿耿于怀，何况"城濮之战"郑文公又站在楚国一方。晋文公七年即郑文公四十三年（前630）九月，晋文公联合秦穆公讨伐郑国，指责郑国的罪状就是晋文公流亡时过郑，郑文公不以礼接待，晋、楚"城濮之战"时，郑文公又是助楚攻晋。晋国提出要郑国交出叔瞻以杀戮，郑文公恐惧，不敢告诉叔瞻，叔瞻得知后，告诉郑文公："臣谓君，君不听臣，晋卒为患。然晋所以围郑，以詹，詹死而赦郑国，詹之愿也。"⑥乃自杀。于是郑文公将叔瞻尸交给晋国。

晋、秦军围郑并未因郑国交出叔瞻而解围，晋文公定要将郑文公羞辱一番才肯撤军。晋军驻在函陵（今河南新郑北），秦军驻在氾南（今河南中牟南）。郑国大夫佚之狐向郑文公说："国危矣！若使烛之武见秦军，师必退。"文公允许。烛之武推辞说："臣之壮也，犹不如人；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文公说："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过也。然郑亡，子亦有不利焉。"⑦烛之武遂连夜用绳索悬城而下，求见秦穆公，对穆公说：秦、晋围郑国，郑国君也知道要被灭亡了，如果灭亡郑国对君王有益，就要劳烦秦国。越过别国老远的来占

这块土地，君王也知道是很困难的，哪能用灭亡郑国来给邻国增加好处？邻国加强，君王就会削弱，如果不灭郑国，将它作为秦东道主，秦国使者往来，郑国可以提供所缺乏的东西，这对君王来说也很有益。而且君王也曾给晋君好处，许下给君王焦、瑕（均在今河南陕县南）两地，但晋惠公早上渡河回国，晚上就设防把守，拒绝割地，君王是知道的。况且晋国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既在东边向郑国开拓疆土，又欲肆意向西开拓。若不损害秦国的疆土，又到何处去取得呢？损害秦来利晋，对谁有利，请君王选择。秦穆公听了烛之武的分析后，很高兴，于是与郑文公结盟。留下杞子、逢孙、杨孙三人率军戍守郑都城后就撤围回国。

郑文公有五子，妾燕姞所生叫子兰。与其叔父子仪之妃陈妫通奸所生的叫子华、子臧，文公欲除去此二子，使人诱子华杀于南里。子臧逃奔宋国，又买通强盗杀子臧于陈国与宋国之间。又娶江女生子士，派往楚国被楚人毒死。又娶苏女生子瑕、子俞弥。子俞弥早死，子瑕被大夫泄驾陷害，文公也不喜。于是文公下令放逐群公子。子兰逃奔晋国，受到晋文公宠爱，求晋文公送回郑国立为太子。秦、晋两国讨伐郑国时，随晋文公同去。秦穆公撤郑之围还军后，子兰请晋文公不要围郑。晋文公允许。使晋军待命于晋东部边境。郑国大夫石甲夫、侯宣多以迎接子兰回郑国立为太子为条件，请晋国撤军，晋文公允许，遂撤军回国。

鲁僖公三十二年即晋文公九年（前628）十二月，晋文公重耳死，其子驩（一作欢）继位，即晋襄公。《史记·晋世家》载："重耳出亡凡十九岁而得入（晋），时年六十二矣，晋人多附焉。"晋文公在位八年，终年已经七十岁。《国语·晋语四》

载："晋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流亡）。"则终年只有四十四岁。是年，郑文公亦死，太子兰继位，即郑穆公。

晋文公在位虽只有八年，但创立了霸业，取得诸侯霸主的地位，他作霸主时是："其务不繁诸侯，令诸侯三岁而聘（问），五岁而朝（周王），有事而会（相会），不协（和）而盟。"⑧在晋国内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改革，在短短数年间，促进社会安定，人心向上，生产发展，国力增强，出现"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局面⑨，为其后晋国在诸侯大国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奠定基础。

晋文公和郑文公都死，晋、郑两国都处在国丧中。秦国留守成郑国的杞子遂派人密报秦穆公："郑人使我掌（管）北门之管（锁钥），若其潜师以来，国可得也。"⑩秦穆公问大夫蹇叔，蹇叔坚决反对去袭取郑国。他认为：出动军队到如此远的地方去是很不利的。长途跋涉军队也会因疲劳而丧失战斗力，如此长距离的行军不可能不使郑国知道而有所防备。秦穆公不听，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为将，率军前往偷袭郑国。

秦国三将率军出发之日，蹇叔和百里奚二人对出征将士大哭。秦穆公得知，怒骂二人老而不死。蹇叔之子亦在出征军中，蹇叔哭而送之，说："晋人御师必于殽（音摇，山名，在河南三门峡市北），殽有二陵（山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周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次年（前627年）春天，秦师遂东进。

百里奚原来是虞国大夫，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秋天，晋献公派荀息率军向虞国借道伐虢，大夫宫之奇劝阻虞公说："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

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⑪虞公不听，还是借道给晋国。宫之奇为了避祸，带着族人离开虞国，临行时说：“虞不腊矣！”（意思是说虞国来不及举行年终腊祭，就要灭亡）！八月甲午日，晋军围虢都上阳，十二月攻破上阳，灭虢国，虢公丑逃往京城。晋返军时顺道灭虞国，逮捕虞公和百里奚。将百里奚送给秦穆公夫人（晋献公之女）为媵臣（陪嫁奴隶），以示侮辱。在送往秦国途中，百里奚逃脱到楚国的宛（今河南南阳市），被楚国人逮住。秦穆公知百里奚贤，欲以重金赎回，恐楚人不放，于是派人去以五张羊皮赎回秦国。其时百里奚已七十余岁，秦穆公与谈国事后大悦，委以国政，人称为“五羖（gǔ古，羊皮）大夫”。百里奚又推荐患难之友蹇叔，秦穆公派使以厚礼请蹇叔到秦国命为上大夫⑫。

秦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率军袭郑国。次年（前627）春天，秦军经过成周北门，周大夫王孙满尚幼，见秦军向周王都致敬时，军容不整，骄傲十足。就向周襄王说：“秦师轻而无礼，必败。轻则寡（少）谋，无礼则脱（不认真），入险而脱，又不能谋，岂能无败乎？”⑬秦军经过周王都以后到滑国（姬姓小国，今河南偃师东南），遇到一位郑国商人弦高，他是贩牛到周去卖。弦高见秦军要去伐郑，则伪称自己是郑国使臣，受郑穆公之命，知秦军将去郑国特来犒赏，并以四张熟牛皮，十二头牛送上。同时急派人赶回郑国报告郑穆公作准备。郑穆公先派人去客馆观察在郑戍守的三位秦将，见已整装待发，又命大夫皇武子去向他们辞谢。孟明视等人知道郑国已有准备，又不便无功而返，只好灭滑国而回军。戍守郑国的三秦将知事情败露，于是杞子逃往齐国，逢孙、杨孙逃往宋

国。

晋文公死后尚未殡葬，晋襄公在丧服期中，知秦国偷袭郑未成而灭滑，君臣都以秦国无礼，以“秦不哀吾丧而伐同姓（滑国姬姓），秦则无礼”。“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为理由，调集兵力，并传告陆浑之戎起兵支援。晋襄公身着黑色丧服亲率晋军直奔河之南，埋伏于崤山两侧。秦军远涉数国，疲惫而回，行至崤山突被晋军伏击，秦军尚未还击就全军覆没。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被活捉。此即晋、秦“崤之战”。秦军之败，实与郑国商人弦高的机智而阻秦军袭郑有一定关系。

晋襄公得胜回晋后，其母文嬴（即怀嬴）因见娘家三将被俘，请求襄公将其释放回秦国，由秦穆公去处置。襄公释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回秦。晋先轸得知襄公释秦三将之囚已返秦，遂责襄公，襄公派阳处父追三将至黄河岸边，三将已经上船开行。阳处父忙将驾车之左马解下，对三将说是奉襄公之命前来赠马送行。孟明视则表谢意而去。回到秦国，秦穆公素服出城迎三将，并伤心地哭道：“我不听蹇叔、百里奚的忠告，才使你们受到耻辱，都是我的罪过，你们无罪。”于是复孟明视三人之职。秦穆公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向臣下检讨，不愧为一代君主。秦、晋两国长期争战的序幕从“崤之战”拉开。

注　释

①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已指出。

②1973 年发掘出的雍城遗址呈方形，东西长约 3300 米，南北宽约 3200 米。

③《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④⑤《史记·晋世家》。

⑥《史记·郑世家》。

⑦《左传·僖公三十年》。

⑧《左传·宣公三年》。

⑨《国语·晋语》。

⑩《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又《史记·秦本纪》、《晋世家》、《郑世家》都记是郑国人。今从《左传》。

⑪《左传》鲁僖公五年。

⑫《史记·秦本纪》。

⑬《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秦霸西戎

秦穆公欲袭取郑国，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将率军东进袭郑，途中被郑国贩牛商人弦高机智阻止。秦军返回时在崤山遭晋军伏击，全军覆没，三将被俘。后应晋襄公之母文嬴之请求，晋襄公释放三将回秦。秦穆公素服迎至郊外，承担失败之罪。留传下来收入《尚书》中的《秦誓》，学者中大多认为是作于晋于崤山伏击败秦军之后，是秦穆公的“罪己诏”。文中大意说：人只顾顺从自己，就会多出错误。责备别人不难，受到别人责备，如流水一样顺畅的听从，就困难了。我对自己的错误心中很难受，但时间已经过去，追不回来了。此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秦穆公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意思一样。所以秦穆公不但没有责备孟明视等三将，反而复其职，益加厚待。

秦穆公是位善于总结教训，敢于承担罪责而厚待臣下的君主，故才有不少有用之人为他效命，使秦国在他在位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①。

秦穆公三十五年即晋襄公三年（前625），秦穆公为报崤

山失败之仇，命孟明视为将，率秦军伐晋。二月，晋襄公亲率晋军抵御，以先且居为中军将，赵衰为副，王官无地为先且居驾战车，狐鞫居作车右。甲子日，两军在彭衙（秦地，今陕西澄城西北）相遇。晋将狼瞫（shěn 审）率领所属士卒首先冲入秦军阵中，英勇奋战，虽然死在阵中，但晋军一齐跟上，大败秦军。此次战役是秦向晋进攻，实际是崤山之战的继续。由于准备不充分，又复仇心切，故又以失败而结束。

两次战役失败后，秦穆公并未对孟明视的信用产生动摇，为其使国内政事更加完善，任用孟明视"增修国政，重施于民"②。是年冬天，晋国乘秦国在国内实行改革的机会，又进行一次报复性攻伐。参加这次攻伐的有晋国先且居、宋国的公子成、陈国的辕选、郑国的公子归生。其结果是攻取秦国的汪（今陕西澄城西）和彭衙。

秦穆公为政治国，不仅在中原诸侯国中有影响，也在戎人中产生很大影响。戎王派由余（一作繇余）使秦国观礼。由余原是晋国人，后流落到戎人部落，作了戎王的部属。因由余会说晋国话，故被派出使秦国。由余到秦国以后，秦穆公让由余参观秦的宫室，所聚积的财富，由余看后说："使鬼为之，则劳神。使人为之，亦苦民矣。"③穆公见出语不凡，于是向他请教治国之道。由余说：臣听说，往往是以俭得之，以奢失之。穆公问：何以见得？由余举其尧、舜、禹以俭有天下，诸侯归服。自夏后氏亡后，殷人则大肆奢侈，归服之国就少多。所以说"节俭是治国之道"。于是穆公召蹇叔商议，蹇叔建议找主管全国财政的内史廖商议。穆公说："寡人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圣人也，寡人之害，将奈何？"内史廖说："臣闻戎王之居，僻陋而道远，未闻中国之声。君其遗（送）

之女乐，以乱其政；为由余请期（延长回戎日期），以疏其谏（劝止戎王），彼君臣有间（隔阂）而后可图（谋取）也。”④穆公采纳，遂派内史廖送二列（一列八人）女乐去给戎王，并请求延长由余在秦国的日期，戎王同意。戎王见到秦国女乐很高兴，设帐饮宴，天天听乐，终年不逐水草迁居，牛马无水草而死了一半。由余从秦国回来见到戎王如此沉湎女乐，劝谏戎王，戎王不听。由余生气而再到秦国，穆公迎接拜为上卿。穆公从由余口中得知戎王的兵力和地理形势，就作伐戎的准备。

秦穆公三十六年即晋襄公四年（前623），孟明视助其治国有方，秦穆公充分信任，并对其它将士也给与厚待。四月，又派孟明视为将，亲自率秦军伐晋国。这时的秦军如晋国赵衰所说："惧而增德，不可当也。"⑤意谓秦军失败后，惧怕再失败，进而修德，加强训练，再战就锐不可当。这次正如赵衰预料一样，秦军渡过黄河后就将渡船烧毁，表示一去不返。晋军见秦军来势凶猛，不敢出战只得坚守。秦军先就占据了王官（今山西闻喜西）及鄗（一作郊，今闻喜西北小邑）。然后从茅津（今山西平陆茅津渡）渡河，到崤山，在三年前被晋军伏击之地，"封殽（崤）中尸，为发丧，哭之三日"⑥。封尸，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埋葬战死的秦军尸骨。一种是"积土为封识"，即树立纪念的标志。秦穆公在封尸、发丧、哭三日的活动中，对将士们发表了"罪己诏"，即《秦誓》。穆公在崤地办完秦军丧事后还军。

秦穆公三十七年即晋襄公五年（前623），晋襄公为报复秦国伐晋攻取王官，秋天派军伐秦，围攻秦的邧、新城（皆在今陕西澄城境内）两邑。因上卿由余的策划，秦穆公派军伐戎王，并占领戎王之地。所以当晋军伐秦时，没有以更多兵力与

晋交战，秦国先后攻占了十多个戎人之地，被称为“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秦穆公因经营西戎之地有功，周襄公命召公过前往祝贺，并赐给金（铜）鼓。

鲁文公六年即秦穆公三十九年（前621）夏天，秦穆公任好死，太子罃继位，即秦康公。穆公葬于雍，用177人殉葬，“秦之良臣子舆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⑦。子舆氏即子车氏，是秦国大夫，奄息、仲行、鍼虎为子车氏的三个儿子，都是秦国的良臣。用近二百人作殉葬，引起秦国人民的不满，作了一首名为《黄鸟》之诗来表示哀怨，即《诗经·秦风·黄鸟》，全诗共三章，内容是：

交交黄鸟，（往来飞翔的黄鸟）
止于棘。　（停在荆棘枝上）
谁从穆公，（谁为穆公殉葬呢）
子车奄息。（是子车氏的奄息）
维此奄息，（就是这个奄息）
百夫之特。（百里挑一的杰出人物）
临其穴，　（来到自己的墓穴前）
惴惴其慄。（也忍不住地战栗）
彼苍者天，（苍天啊苍天）
歼我良人。（为何要全杀好人呢）
如可赎兮，（要是能够赎的话）
人百其身。（愿以一百人代替都行）

交交黄鸟，（往来飞翔的黄鸟）

止于桑。　(停在桑树上)
谁从穆公，(谁为穆公殉葬呢)
子车仲行。(是子车氏的仲行)
维此仲行，(就是这个仲行)
百夫之防。(他一人能当百人)
临其穴，　(来到自己的墓穴前)
惴惴其慄。(也忍不住地战栗)
彼苍天者，(苍天啊苍天)
歼我良人。(为何要全杀好人呢)
如可赎兮，(要是能够赎的话)
人百其身。(愿以一百人代替都行)

交交黄鸟，(往来飞翔的黄鸟)
止于楚。　(停在荆树上)
谁从穆公，(谁为穆公殉葬呢)
子车鍼虎。(子车氏的鍼虎)
维此鍼虎，(就是这个鍼虎)
百夫之御。(他一人能抵御百人)
临其穴，　(来到他的墓穴前)
惴惴其慄。(也忍不住地战栗)
彼苍天者，(苍天啊苍天)
歼我良人。(为何要全杀好人呢)
如可赎兮，(要是能够赎的话)
人百其身。(愿以一百人代替都行)

诗中未见直接反对人殉的词句，但质问“歼我良人”，就

是对秦国自武公时起实行人殉制度的谴责。秦武公（前697—前678在位）死时，开始实行以人殉葬之制，"从死者六十六人"⑧。此后近六十年未见秦人反对这种惨无人道的制度，但在其它诸侯国中人祭、人殉则遭到普遍的反对。如宋襄公十年（前641）六月，宋襄公欲称霸，想当霸主，邀请诸侯在曹国南郊会盟，鄫国君迟到，襄公则命邾国君将鄫国君逮捕杀祭睢水的社神（土地神），司马子鱼（公子目夷）则反对说："古时候六畜尚不能互相用来祭祀，小事的祭祀还不用大牲，何况敢于用人来祭呢？祭祀是为人，只有人才是神之主，杀人来祭祀，谁来享用？"⑨又如晋国大夫魏武子（魏犨），有一个宠妾，未生过儿子。魏武子临终时，嘱其子魏颗，在他死后将宠妾殉葬。魏武子死后，魏颗不但未殉父妾，反将其改嫁，他不尊父命的理由很充分，他认为父在病中昏聩，是说的胡话⑩。春秋末齐国景公时大夫子车（又称北郭子车，北郭佐）死，其妻与家大夫（家宰）商议要用人殉葬。子车的弟弟子亢（孔子弟子）反对说："用活人殉葬是不合于礼的，虽然不合于礼，你们一定要用人殉葬，则要用哥哥在病中侍候他最亲近的人。谁最合适呢？当然只有嫂嫂和家大夫。"子车妻与家宰见要将自己殉葬，只好放弃人殉的打算⑪。春秋以后虽然人殉未完全绝迹，但如秦穆公死后用如此多的人来殉葬的作法已不复存在。

注　释

①《史记·秦本纪》。

②《左传·文公二年》。

③《史记·秦本纪》。

④《韩非子·十过》。

⑤《左传·文公二年》。

⑥⑦⑧《史记·秦本纪》。

⑨《左传·僖公十九年》。

⑩《左传·宣公十五年》。

⑪《礼记·檀弓下》。

先秦

楚庄王问鼎

楚国在城濮败于晋国，中原诸侯纷纷转向晋国。郑国原本亲楚，城濮战中郑文公还派军助楚。楚子玉败后，郑文公派大夫子人九为使到晋国请罪求和。城濮之战刚过一月，郑国就叛楚国，郑文公与晋文公在衡雍（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南）结盟。晋文公在践土会盟，参加的就有齐、鲁、宋、郑、卫、莒等国，也就是在这次会盟中，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诸侯之长。楚成王在城濮战前就"知难而退"，子玉在战中所率领的中军战中未受太大的损失就撤军，所以楚国的军事力量仍然很强。楚国的最大损失是同盟国中只剩下许国，冬天，许又被晋文公率诸侯围攻，因此楚要与晋争霸困难较大。

楚成王四十四年即晋文公九年（前628）春天，楚成王派大夫门章到晋国讲和，晋国则派大夫阳处父到楚国问聘，自此晋、楚两国正式建立交往关系①。楚成王死后，楚穆王的势力又有所增强，欲与晋争霸，未实现而死；其子楚庄王才实现北上"观兵问鼎"和其后称霸中原的愿望。

楚穆王十二年（前614），楚穆王死，太子旅（一作侣）

继位，即楚庄王。其时庄王年纪较轻②，亲楚的诸侯都又纷纷叛楚从晋。次年春，周顷王壬臣死，其子班继位，即周匡王。因周公阅和王孙苏两个卿士争政，所以连顷王死的讣告都未发，诸侯也未往吊。是年六月，晋国执政赵盾（赵宣子）因卫、郑两国已亲晋，遂邀请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君会于新城（一说宋地，今河南商丘西南。一说郑地，今河南密县东南）订盟。秋天，周公阅和王孙苏争政之事尚未解决，于是告到晋国，请诸侯之长的晋灵公解决。灵公命赵盾调解平息。这时楚也发生内乱，因令尹子孔，太师潘崇伐群舒，留公子燮和大司马子仪（门克）在都城辅佐庄王，二人乘机作乱，加固郢都城墙，派人去杀子孔，但未成功。八月，二人挟持庄王离郢都，欲去商密。庐（今湖北南漳东）大夫戢梨、辅佐叔麇诱杀二人，庄王才得回郢都。二人作乱是事出有因。早在楚成王三十七年（前635）秋天，秦、晋伐鄀（下鄀）国，鄀君投降，子仪被秦军所俘，后秦怨晋，欲与楚国拉关系，遂放子仪回楚表示友好，子仪因此以为有功，欲想得高官，终未满足而生怨。公子燮也是想当令尹未得而生怨，故借机作乱。

楚国的内乱虽然平服，但晋国赵盾在新城与诸侯会盟后，中原诸侯除蔡国外，皆归服晋国。故楚庄王二年即晋灵公九年（前612）夏天，因新城之盟蔡庄侯未参加，所以晋国郤缺奉晋灵公之命率晋上、下两军伐蔡国，攻至蔡都，与蔡庄侯订立“城下之盟”还军。晋国征服蔡国后，楚国在晋文公死后一度争取到的中原诸侯国已全失去，晋国仍是中原诸侯的霸主。楚欲北上称霸的愿望受到很大威胁。

次年（前611）秋天，楚国发生大饥荒，于是戎（戎蛮，分布于今河南中南部）先伐其西南部，又伐其东南部。庸（即

助周武王伐商纣的八国中的庸国，在今湖北竹山西）人率群蛮（在庸附近的戎蛮）叛楚。麇人率百濮聚集于选（楚地），也将伐楚。楚国见形势很紧张，于是封锁通往北方的门户，所谓“申、息之北门不启”③。以防止晋和中原诸侯南下攻楚。楚国群臣商议是否迁都于阪高（今地有：湖北荆门西南；当阳东北；襄阳西三说），大夫蔿贾（名伯嬴）说：“不可以，我们能往，寇也能往，不如伐庸。庸与百濮认为我们遭饥荒不能出兵打仗，故纷纷攻伐我们。如果我们出兵，他们必惧而散去。百濮分散居住，将各回其邑，谁还有空谋取别人。”庄王采纳蔿贾的主张，出兵以后没有多长时间，百濮与麇就各自撤退而回。但伐庸就不是如此顺利，楚军经庐向西至句澨（楚地，今湖北均县西北），派庐大夫戢梨率军攻庸，到达方城。庄王采用大夫师叔的意见“与之遇以骄之”的策略，即与交战使其骄傲，“彼骄我怒”时一举歼灭。庄王乘驲（传车）赶到前线，会师于临品（今湖北均县南），又请秦、巴两国出兵相助，将三国联军分为二队，子越自石溪、子贝自仞（皆是通往庸国道路）同时向庸国进攻，群蛮见楚军势大，首先向楚订盟，于是三国联军遂将庸攻灭。

《史记·楚世家》载：“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飞）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罢淫乐，听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悦）。

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八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周郊。"

楚庄王"一鸣惊人"的故事，最早见于《韩非子·喻老》、《吕氏春秋·重言》。《史记·滑稽列传》中则是淳于髡说齐威王，齐威王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伍举是伍参之子，是楚康王时人，故《史记》有误④。按《左传》所记是庄王即位二年，被"二子作乱"挟持出走。三年"乘驲，会师于临品"，无即位三年不听政之事。

楚国自灭庸以后，形势转危为安，庄王欲北上与晋国争霸。此时晋国在中原诸侯国的威信下降，原因是：晋灵公九年（前612）十一月，齐国侵鲁国，晋邀请宋、卫、蔡、陈、郑、许、曹盟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商议伐齐国，新即位的齐懿公向晋国行贿。晋灵公受贿后撤伐齐之议还军，后齐又伐鲁。第三年（前610）冬天，宋襄公夫人派卫伯乘昭公在孟诸田猎时杀昭公，立昭公弟公子鲍，即宋文公。次年春天晋国赵盾派荀林父率晋、卫、陈、郑联军讨伐宋国弑君之罪。宋文公向晋灵公行贿，晋受贿后命撤军。晋灵公两次受贿而不主持公道，在诸侯中引起不满。

鲁宣公元年即楚庄王六年（前608），郑穆公认为晋灵公是个无信誉的人，伐齐、伐宋都是因受贿而撤军，故"晋不足与也，遂受盟于楚"⑤。秋天，楚庄王以陈、宋两国叛楚亲晋，遂率楚、郑之军攻陈国，伐宋国，晋赵盾率军伐郑以救陈、宋两国。会合宋、陈、卫、曹四国之军于棐林（郑地，今河南尉氏西）。楚庄王派𫇭贾率军救郑，两军在北林（郑地，今河南新郑北）相遇，晋军战败，大夫解扬被俘。

在晋、楚两国争霸中，秦国在其中举足轻重。自从秦国在

“崤山之战”后，基本上与楚国联盟。晋国在北林失利后，想拉拢秦国，故晋赵穿建议侵秦的与国崇，以求与秦和解。冬天赵穿侵崇，秦不与和解，晋又伐郑国，报复北林之失利，仍然无功而还。次年（前607）二月，郑国受楚庄王之命，由公子归生率军伐宋国。宋国的华元、乐吕率军与郑军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柘城西北），宋军战败，华元被囚，乐吕被俘。宋国以兵车百乘，文马四百匹赎华元，车马未交齐而华元逃回。夏天，秦军伐晋，以报复上年晋军侵崇之战，围焦（今河南陕县南），赵盾率军解围。又会合宋、卫、陈之军伐郑。楚庄王派门椒（子越，又名伯芬）救郑。晋、楚为争霸正争战不休时，九月晋灵公暴虐，赵盾劝谏不听，反欲杀赵盾，赵盾出逃，赵穿遂杀灵公于桃园中。赵盾未逃出境而回，派赵穿至周接回襄公弟黑臀为君，即晋成公。晋国太史董狐认为“亡不越境，返不讨贼”记载为“赵盾弑其君”。晋国易君后未影响争霸。同时，楚庄王也在积极向北发展。

周定王元年即楚庄王八年（前606）春天，楚庄王率军伐陆浑之戎。陆浑之戎原族居于瓜州（今甘肃敦煌县西），西周初，因助周王有功，曾受封，称子。后迁至伊水流域（今河南伊河流域），春秋时仍名陆浑，属晋势力范围。因散居于黄河之南，熊耳山之北的阴地，故又称“阴戎”或“阴地之戎”。庄王伐陆浑之戎也是与晋争霸的一举，但未灭其族。庄王经过伊水到达洛水沿岸，此是周王的王都近郊。庄王“观兵于周疆”，即陈兵于周王朝的王畿内以示威。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慰劳庄王，庄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王孙满说：“不在于鼎的大小、轻重，而在于德。当年夏朝正是有德时，将各地山川奇物画成图象，让九州之长官贡献青铜，铸成九鼎，鼎上铸有

百物图象，使人民知道神物和奸物。所以人民入川泽山林，就不会不顺利。山精海怪也碰不上。因此上下和平，得上天保佑。夏桀缺德灭亡后，九鼎为商朝得到，其历史有六百年。商纣暴虐灭亡，九鼎为周朝得到。有美好的德行，鼎虽小也重。如奸邪昏乱，鼎虽大也轻。天赐福给明德之人，是有时限的。成王定鼎于郏鄏（今洛阳王成），占卜得知将传三十世，七百年，这是上天之命。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所以鼎之轻重，不可以问也。"⑥庄王"观兵问鼎"之鼎，是夏、商、周三代王朝权力的象征。庄王率兵陈列于周王畿就是对周天子的藐视，问鼎大小轻重，想逼周天子而让天下与楚国。经王孙满讲一番"在德不在鼎"的理由之后，庄王知周天子还不能取代，只好率军离开周王畿回楚。

鲁文公十四年即周顷王六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⑦。星孛就是彗星，彗星的出现是较为罕见的天象。哈雷彗星平均每七十六年多才过近日点，因体积大而明亮，用肉眼能看到。所以这次所见彗星是世界上关于哈雷彗星最早、最可靠的记录。

注　释

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②《国语·楚语上》："庄王方弱。"韦昭注："未二十。"

③《左传·文公十六年》。

④梁玉绳：《史记志疑·楚世家》。

⑤《左传·宣公元年》。

⑥据《左传·宣公三年》。

⑦《左传·文公十四年》。

先秦

邲之战

晋、楚两国邲（今河南荥阳东北）之战，是春秋时期楚庄王创立霸业的一次大战役。交战的结果，楚军大胜晋军，楚庄王的称霸中原得以巩固。

周定王元年即楚庄王八年（前 606）春天，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中原”后，便致力于与晋争夺郑、陈、宋三国的战争。是年夏天，因郑国亲晋结盟，楚出兵伐郑。十月，郑穆公兰死，其子夷继位，即郑灵公。

鲁宣公四年即楚庄王九年（前 605）七月，楚令尹子越（门椒、又称门越椒）率若敖氏（楚国贵族，自楚成王时子文为令尹后，其后令尹都出自此家族）作乱，乘楚庄王北上中原未回，囚芳贾于轑阳（今河南南阳市）而杀害，驻军于烝野（今河南新野），阻止庄王回国。庄王以文、成、穆三王的子孙作人质讲和，子越不许，并在漳澨（今湖北荆门西）列军欲攻庄王。庄王只得用兵攻若敖氏，双方战于皋浒（今湖北襄阳西北，一说在枝江）。子越虽连射两箭，虽未中庄王，但王军恐惧后退。庄王为安定军心，亲自擂鼓助战，指挥王军反击，子

越所率的若敖氏大败，子越被杀，遂毁若敖氏，只有子越之子伯贲逃奔晋国。子文之孙、子扬之子克黄当时任箴尹(官名)，出使齐国，返回时行至宋国，得知楚乱，其家族被灭。有人劝他不可回楚国，他说要以国家的使命为重，回楚后遂自缚投案，庄王念其祖父子文治国的功劳，仍复官职，以继子文之嗣。

楚庄王平定子越、若敖氏之乱以后，消除内忧，为争霸创造有利条件。庄王任命芀贾之孙叔敖（一作芀敖，《孙叔敖碑》作芀饶。或作芀艾猎）为令尹。孙叔敖执政时期，治理楚国成绩卓著，执政数年楚国即称霸。治楚之政首先是兴修水利：兴修了期思陂、芍陂、云泽大泽之池。这对以水稻种植为主要粮食作物的南方地区，无疑是促进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为频繁的战争提供了粮食保证。其次是整顿军事：规定行军出发之前必派先遣队侦察是否安全；兵车右边士卒必须紧靠车辕走，出战前左边士卒必须准备好宿营的物资；全军由中军统一指挥，精锐列于主将后，使其在紧急时机动应战。又将庄王的卫队分为左、右两队，称左广、右广。各队要建立旗帜以示区别，宿营时要轮流巡逻等等。再次是廉政以身作则：所谓“孙叔敖相楚，栈车（古代用竹木作成的车），牝（母）马，粝（粗糙米）饼菜羹，枯鱼之膳，冬羔裘（冬天穿羊皮衣），夏葛衣（夏天穿葛衣，不穿丝绸衣），面有饥色，则良大夫也，其俭逼下（其节俭逼得相位之下的官员也得如此）”①。又“孙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国大治，庄王以伯（霸）。叔敖妻不衣帛，马不食粟，尝乘栈车，牝马，披羖羊之裘”②。可见孙叔敖不仅本身俭仆，连家属也不因是相国夫人而高贵。因此在短时期就使“楚国大治，庄王以伯”。

晋、楚争霸中原，主要是争夺郑、陈、宋三国为同盟，因

此三国遭受的战争苦难也最多。尤其是郑、陈两国随时要叛服于晋、楚以求生存。自楚庄王“观兵周疆，问鼎中原”后，郑国就首先被楚讨伐，但未服。次年（前605）六月，郑灵公就被“染指于鼎”③的公子宋（字子公）与公子归生（字子家）杀死，灵公弟坚继位，即郑襄公。是年冬天，楚国以郑未归服楚而伐郑国，郑仍不服。郑襄公元年（前604）冬天，楚国又攻郑国，郑国仍未服，陈国见郑国又被楚伐，遂叛晋服楚，晋成公派荀林父率军伐陈以救郑。郑襄公二年（前603）冬天，楚国又再次伐郑国。郑与楚讲和，楚才撤军。郑襄公三年（前602），因郑襄公自即位后，连年被楚国讨伐，只得与楚和，是年冬天，在公子宋的谋划下，郑国与晋讲和，公子宋也参加会盟。于是晋成公邀请宋、鲁、卫、郑、曹国君在黑壤（即黄父，今山西翼城东北）会盟，周定王派卿士王叔桓公到会监盟。郑襄公五年（前600）九月，晋成公死，其子獳（一作据）继位，即晋景公。十月，楚庄王率军伐郑国，晋景公命郤缺（一说为荀林父）率军救郑国，郑襄公率军败楚军于柳棼（郑地）。郑国人都高兴，只有子良担心地说：是国家的灾祸，我死之日不会太远了。郑襄公六年（前599）冬天，楚庄王又率军伐郑国，晋国士会率晋、宋、卫、曹四国联军救郑国，两军在颍水北岸相遇，楚军被联军打败而退。四国联军遂留戍郑国，以防备楚国再来攻伐。郑襄公八年（前597），楚庄王又伐郑国，郑国败降。

自郑襄公即位时起，楚共七次伐郑国，郑国人民几乎连年遭受战争之苦。而陈国同样也受楚、晋不断的攻伐。陈灵公十年（前604），晋国荀林父为救郑国而伐陈国。次年，晋国赵盾、卫孙免伐陈国。陈灵公十三年（前601）冬天，陈与晋讲

和，楚国又伐陈国，陈国只得又归服楚。次年秋天，晋成公邀请宋、卫、郑、曹和陈国之君盟于扈，陈灵公因归服楚国未参加会盟，会后晋出兵伐陈国。正当陈国连年遭受战争之苦难时，陈灵公确在作荒淫无耻之事。先是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都与夏姬（夏征舒之母）通奸，君臣穿着夏姬的内衣戏于朝庭。大夫泄治劝阻，孔宁、仪行请灵公杀泄治。陈灵公十五年（前 599）夏天，灵公和孔宁、仪行父在夏家饮酒，灵公戏问夏征舒像谁？仪行父说“似君”。夏征舒这时已是卿士，闻其戏弄自己，则恼羞成怒。待酒后灵公出来，夏征舒埋伏在马房中以箭射死灵公，孔宁、仪行父出逃楚国。“灵公太子午奔晋，征舒自立为陈侯”④。

楚庄王十六年（前 598）冬天，楚庄王因为陈国夏征舒弑灵公发生内乱，率诸侯伐陈，至陈国告诉国人说：“不要惊慌，我只诛夏征舒而已。杀了夏征舒以后，将陈国作为楚国的县。”当时大夫申叔时出使齐国回来，而楚群臣都祝贺庄王灭陈设县，只有申叔时不贺。庄王问不贺的原因，申叔时说：“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很大，讨伐杀戮，是君王的大义，俗语说：‘牵牛践踏别人的田，田主把牛夺去，牵牛的人有罪，夺其牛不是罚得太重吗？’今君王率诸侯说以义伐有罪的人，现在又将陈国作为楚的县，这就是贪其富了。以伐有罪号召诸侯，而以贪心来结束，怕是不行的？故我才不祝贺。”⑤于是庄王恢复了陈国，以太子午继位，即陈成公。“诸侯闻之，皆朝于楚”。⑥

楚庄王十七年即晋景公三年（前 597）春天，楚庄王因郑襄公既降，又亲晋国，率军伐郑，围郑都十七天，郑国都人民和守城将士在城墙上大哭，庄王退兵。郑都人将城墙修补好，

楚军再次包围郑都，围攻三个月被攻破，楚军入城，郑襄公肉袒牵羊在路旁迎接楚庄王，并说："孤不能承天意，不能事君王，使君王怀怒来到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要俘孤到江南，放到海滨，也唯命是从。要将郑国分赐诸侯，要将郑国人作为臣妾，也唯命是从。如果君王念于以前的楚、郑盟好，向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求福。不灭其社稷，使改事君王，同于楚的九县，是君王之恩惠，孤之愿也。"⑦庄王的左右随从认为得到的国家，不可以赦免。庄王认为郑国君能自下于人，必能取信和用其民。于是后退三十里，与郑国结盟，郑国派襄公之弟，大夫子良入楚国为人质。

楚庄王率军围郑时，郑国向晋国告急。六月，晋国派军救郑国。晋军以荀林父为中军将，先縠为副。士会为上军将，郤克为副。赵朔为下军将，栾书为副。赵括、赵婴齐为中军大夫。巩朔、韩穿为上军大夫。荀首、赵同为下军大夫。韩厥为司马。晋军赶赴黄河边时，郑国已经降楚国，荀林父欲回军，他认为：未能赶到郑国而劳民，出兵有何用！待楚军去后再出兵攻郑也不晚。士会也同意还军，他详细分析了楚国的形势，认为：楚庄王伐郑国，是因恨郑国三心二意的可怜卑下之相。叛则伐，服则赦免，德和刑都有。伐叛是刑，和服是德，二者都成立。楚国无隙可乘，故不能对楚攻伐，应知难而退。但先縠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晋国之所以称霸诸侯，就是因为军队勇敢，臣僚们尽力，今失去诸侯，不能说是尽力。有敌不去战斗，说不上是武勇，由于我们不去战斗而失去霸主的地位，还不如去死。而且既然已经出军到此，得知敌人强而退却，不是大丈夫的行为，命为统军主帅，结果是无大丈夫的行为。这只有你们才能办到，我是办不到。遂率领部分军队渡河。下军大

夫荀首见此情况，认为：先縠的军队此去必败，即使不战死而还，治罪也难免。司马韩厥也劝荀林父，认为：如先縠偏师陷敌，主帅罪也大，作为主帅，部下不听命，谁之罪？不如全军渡河攻战，战而失败，大家共同承担罪责，可以减轻主帅的罪责。于是荀林父下令渡河进军⑧。

楚庄王所率的楚军是由沈尹为中军将，子重（公子婴齐）为左军将，子反（公子侧）为右军将。原打算到黄河去饮马以后回国，所以驻军于郔（今河南郑州市北）。得知晋军渡河，庄王不想战而回国。宠臣伍参主战，令尹孙叔敖主和，二人发生争论。伍参对庄王说："晋国执军政的荀林父是新上台的，不能很好行使命令。副手先縠又是个刚愎不仁，不肯听命的人。三个统帅要行使权力都无法办，谁都不听上级的命令。若与一战，晋军必败。"⑨庄王听后虽不舒服，也只好告诉令尹，将军队转向北面驻于管（今河南郑州市）以待晋军。

晋军渡过黄河后，驻于敖、鄗二山之间（今河南荥阳北）与楚军对峙。郑国大夫皇戌到晋军中诱使晋与楚战，说郑可在楚后两面夹击，楚军必败。此时晋荀林父仍举棋不定，战与不战在晋军将士中仍争论不休。而楚庄王此时仍不欲与晋战，故派使至晋军讲和，荀林父命士会谈判，同意罢战讲和。楚使回营途中，先縠派赵括追上楚使说：讲和是说错了，我君命我们与你们决战。楚庄王未听赵括所言，再次派使至晋军中讲和，并约定订盟日期。在此过程中，晋、楚双方主战派都私自挑战。晋军中的魏锜、赵旃都各自向楚挑战。楚军中的许伯还单车至晋挑战。

晋魏锜向楚军挑战，被楚军击败而逃，楚庄王率左广（兵车三十乘）追击。荀林父见魏锜和赵旃违反军令私自出战，无

办法制止，又怕他们受损失，便派兵车去接应。此时晋军中无应变措施，只有士会和郤克作一些准备，中军大夫赵婴齐准备了渡河的船只。交战势在必行。于是楚令尹下令反击晋军，两军遂在邲（今河南荥阳东北）相遇，楚军快速接近晋军，荀林父无准备，又见势不利，遂退军，亲自击鼓下命“先济（渡）者有赏”。晋军慌忙逃奔河边，争船抢渡，先上船的急于开船，遂砍断后来攀船舷的手指，船中断指多到可以用手捧。只有上军士会、郤克因先有准备，遂在撤退时于途中设埋伏以阻止楚军追击，其余二军损失惨重，不少士卒淹死河中。黄河边上喧嚣之声彻夜不断。

次日，楚军驻于衡雍（今河南原阳西南），楚将潘党建议，修筑一高台，将晋军的尸体列于台上，以展示这次战争胜利。楚庄王不同意，认为晋国士卒是为他们国君而丧命，不能如此对待丧身的士卒。于是就在黄河岸边祭祀河神，修建神庙向先王告捷后率军回楚。邲之战后，楚庄王称霸中原的霸业得以巩固。

注 释

①《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②《新论·国是》。

③《左传·宣公四年》、《史记·郑世家》。

④梁玉绳：《史记志疑·陈杞世家》认为夏征舒未自立为陈侯，太子午也未奔晋。

⑤据《史记·楚世家》。

⑥《淮南子·人间》。

⑦据《史记·楚世家》，《史记·郑世家》亦同。

⑧⑨据《左传·宣公十二年》。

先秦

楚围宋都

晋、楚争霸中原，郑、陈、宋三国是主要的争夺对象。楚庄王六年（前608）秋天，楚庄王因陈、宋两国叛楚归服晋国，遂率军伐两国。晋国得知，派赵盾率军邀请宋、陈、卫、曹四国之军汇合于棐林（今河南新郑北），准备伐亲楚的郑国以救陈、宋之危。在北林（今河南郑州南）与楚国支援郑国之军相遇，结果晋军战败，大夫解扬也被楚军俘虏。次年春天，郑国受楚庄王的指派伐宋国，郑穆公只得派公子归生率军伐宋。宋国大夫华元、司空乐吕率军抵御。二月壬子日，两军大战于大棘（宋地，今河南睢县南），宋军战败，华元被囚，乐吕被捉，俘获战车四百六十乘，士卒二百五十人，斩首百人。后宋国欲赎华元，而华元逃回宋国。

楚庄王十六年即宋文公十三年（前598）夏天，楚庄王派左尹子重（公子婴齐）伐宋国。楚庄王虽三次伐宋国，宋文公仍未服。邲之战后，晋虽败于楚，宋国仍是晋国的盟国。是年（前597）冬天，楚庄王率军伐萧国（宋附庸国，今安徽萧县西北），宋国华椒率蔡国军队援救萧国，萧国军在战斗中抓获

楚国熊相宜僚和公子丙。楚庄王派使告诉萧国说：不杀二人，即退兵。萧人不听，将熊相宜僚和公子丙杀死。庄王大怒，遂围萧国都，萧军溃败。宋虽未能救萧之败，但与楚更加敌对。不久，晋国的先縠、宋国华椒、卫国孔达与曹国代表在清丘（卫邑，今河南濮阳东南）结盟。其后，宋因陈国归服楚国而伐陈。卫国因在卫成公与陈共公时有盟约，谁被大国讨伐就要救援，所以卫国孔达背清丘之盟率军救陈。宋国的这些行动，都是为楚庄王所不容的，故决心惩罚宋国。

楚庄王十九年即宋文公十六年（前595）夏天，楚庄王率军伐宋国，以惩罚在前一年救萧和伐陈国之举动。但是宋国仍不服楚，依旧亲晋与楚为敌。是年夏天，晋国的先縠勾结赤狄伐晋，赤狄攻到清原（晋地，今山西稷山东南），被晋军抵御。冬天，晋景公追究在邲战中失败的责任和赤狄伐晋到达清原的原因，自然就追到了先縠的头上。因邲战后晋国急需要稳定诸侯的离心，清丘之盟晋派先縠去主盟就是要稳定宋、卫、曹三国。先縠却在这次会上挑动宋国去伐陈国，结果卫国又因与陈国有旧好而助陈。邲战的罪魁祸首，破坏清丘之盟，勾结赤狄进攻母国，数罪并罚，先縠被杀，尽灭其族。肃清内患之后，晋国因宋伐陈时，卫国背清丘之盟而救陈，故遣使至卫国抗议。向卫穆公提出，如果卫国不追究救陈的罪责，晋国将派兵伐卫国。正卿孔达说："如有利于社稷，请以我（向晋）解说，罪责在我，因我是执政，面对大国的讨伐，还能将责任推给谁？我愿意为此而死。"①孔达自缢而死。卫国派人向晋国作了解释，避免了晋国的讨伐，并将此事向诸侯通报。卫国因孔达辅佐卫成公有功，使其子复其父职。由此事件可以看出晋虽在邲战中失败，但在诸侯中的霸主威信仍存在，宋与晋关系也

较其它国家更紧密，这也是为楚庄王所不安的。

楚庄王于是年（前595）九月，派申舟（即子舟、无畏）出使齐国，派公子冯出使晋国。春秋时期诸侯国大大小小遍及全国，从一国出使到较远之一国，则要穿越数国。从楚国至齐国必经过宋国，从楚国至晋国必经过郑国。庄王嘱咐申舟、公子冯，出使齐、晋两国，不要先向宋、郑两国借道。古礼，凡经他国之境，必须"假道"，即借道路过境，此为"过邦假道"之礼②。此礼之意是表示对主权国之尊重，否则就是侵犯主权，轻则谴责，重则讨伐。

宋国与楚国为敌，楚庄王派申舟出使齐国过宋国不先借道，就是对宋的藐视。加之申舟又是宋国的仇人，致使宋国不能容忍。早在楚穆王九年即宋昭公三年（前617）冬天，楚穆王欲伐宋国，与陈共公、郑穆公、蔡庄侯联合率军驻在厥貉（今河南项城境内）。宋司寇华御事（华元父）说："楚国要我们归服，我们是不是先归服？何必如此来诱我们！我们实在无能力，但人民是没有罪的。"③于是就亲自去迎接楚穆王，表示慰劳，并听命。又引导楚穆王到孟诸（宋地，今河南商丘东北）去打猎。围猎时宋昭公为右翼，郑穆公为左翼。复遂为右司马、子朱和申舟为左司马。楚命大家于次日晨于车中装取火工具出发。但宋昭公认为这是楚穆王在役使宋、郑两国国君，未照办。申舟则倚楚之势责打宋昭公的仆人，并在全军中示众。责仆伤主，这是对宋国君主一种极不礼貌的行为，引起宋国人的痛恨。而这次申舟作为楚使过宋，又不先借道，申舟本不愿作这次使者，但又王命难违，所以临行时他对庄王说："郑国人明白，但宋国人愚蠢，出使晋国（经过郑国）没有危险，而我这次去（经过宋国）必死无疑。"庄王说："如果杀了

你，我将讨伐宋国。”④申舟只好把儿子犀带去见庄王，托咐后事而行。

申舟到达宋国没有先行借道之礼，被宋国扣留。宋华元说：“过我国而不请求借道，是把我国当作楚的边鄙县，这岂不是亡国？杀了楚的使者，楚国必然攻打我国，攻打也是亡国，反正都是亡国。”于是杀了申舟⑤。楚庄王得知申舟在宋国被杀，甩袖而起，十分愤怒，决定出兵伐宋。

是年九月起，楚庄王率军伐宋国，包围了宋国都。宋国派大夫乐婴齐至晋国告急，晋景公欲派军救宋，大臣们不同意。伯宗说，古人说“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即鞭长莫及）。天意使楚强，不可与争。于是景公同意不救宋国，便派解扬到宋国，告诉宋文公不要向楚投降，佯称“晋军已经出发，不久将至”。解扬过郑国时被郑人捉住送给楚国，楚庄王用重礼贿赂解扬，要他至宋国后劝宋降楚国，解扬不同意，经再三威逼才同意。但解扬登上楼车后，遂将晋景公之命照样转告，庄王欲杀他。解扬则说：“国君订的命令就是道义，臣接受命令就是信用，信用贯彻道义就是利益。谋划不失利以保卫社稷，就是人民之主人。道义不能有两种信用，信用不能受两种命令。君王贿赂臣，就是不知命令的意义。受君命而出使，宁死也不废君命。这不是能以贿赂办得到的，臣所以允许你的说法，是借此完成君命。死而完成使命，是臣的福气。寡君有守信用之臣，臣死得其所，又有何求？”⑥庄王只好释放他回国。

宋国相信晋国的救援军会来，于是坚守不降楚。楚从头一年九月围宋都至次年五月，仍不见宋降，庄王欲撤军。申犀在庄王马前叩首，请求为父申舟报仇。庄王无言以对。为庄王驾车的申叔时建议，在城外修房建屋，分其士卒作农民种地，以

示长期围困，宋必然投降。庄王听从。宋国见楚军行动而惧怕，便派华元深夜潜入楚军营中，登上主将子反的床，叫起子反，要求楚军后退三十里，则两国可以讲和。他对子反说："寡君派我来将宋都内的困难告诉你，敝邑已经是易子而食(交换儿子杀来吃)，拆尸骨烧饭。尽管如此，但在城墙下面订立盟约，宁肯让国亡也不能订。只有你们后退三十里，才能唯命是从。"⑦子反见华元深夜一人闯楚军营，也很惧怕，便同意华元的话，与华元订盟，并向庄王报告。庄王下令楚军后退三十里。于是宋国与楚国讲和订盟，以华元为人质。盟书中有"我无尔诈，尔无我虞"⑧。即楚国不诈宋国，宋国不防备楚国。这样宋国都被围长达九个月后才解围⑨。这是春秋时期诸侯国都被围困时间最长的一次。

晋国欺骗宋国，不派兵救宋，至使宋都被楚军围困九个月，鲁国宣公得知，听从大夫孟献子的建议：小国要免于大国的攻伐，只有派使去向大国聘问，献玉帛等财物。使得大国朝廷中摆满进献的财物，这样就有进献的功劳，可以免除罪过。如果当大国来责罚时才去进献，就为时太晚。现在趁楚国驻军宋国，赶去进献⑩。于是派孟献子为使，前往宋国向楚庄王进献财物，以讨好楚国。至此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鼎盛时期。

注　释

①据《左传·宣公十四年》。

②《仪礼·聘礼》。

③据《左传·文公十年》。

④⑤⑥⑦据《左传·宣公十四年》。

⑧《左传·宣公十五年》。

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宋世家》、《楚世家》皆载楚围宋都五月。《左传》、《吕氏春秋》中的《慎势》、《行论》皆作九个月。司马迁可能以五月解围而误成五个月。

⑩据《左传·宣公十五年》。

鞍战与匮盟

楚国与晋国争霸中原八十余年，给中原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中原各中、小诸侯国迫于军事压力，不得不周旋于楚、晋两国间。所谓“敬共币帛（恭敬供给财货），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境（晋、楚二国边境），以待强者而庇民焉（等待强者来保护人民）”①。因宋国坚持不服楚，结果被楚庄王率军围困九个月，至使宋都人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②，逼使宋国只得服从楚国。晋国失去宋国以后，只好将精力转向北方对付狄人，以安定后方。与此同时，齐国与楚国亲近，又对付鲁、卫等国。于是晋国与齐国大战于鞍（今山东济南市西），齐国战败，与晋国结盟。楚国为救齐，出兵伐鲁、卫两国。因鲁国向楚国行贿，于是十四国与楚国盟于蜀（今山东泰安东南）。这次结盟缺乏诚意，被称之为“匮盟”。

晋国失去宋、鲁两国，称霸中原受到挫折，为了安定后方，扩大势力范围和疆土，便集中力量对付狄人。

狄人之狄，一作翟，是古老部族，自商代就存在《竹书纪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商

末周初散居于今陕西东部，山西太行山一带。因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其后逐渐向东南游动。至春秋初，已进入鲁、卫地界，散居于今陕西东部，山西、河北、山东西部和河南北部地区。春秋初，狄人分化，较大的支系有赤狄、白狄、长狄、众狄等部。其中赤狄因穿赤色衣服而得名，势力最强，能统率其他各部。赤狄中又分东山、皋落氏、廧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部。主要分布于今山西长治北和山西、河北、河南交界地区，和晋人杂居之赤狄，与晋国常相攻战。

白狄因穿白衣服而得名，最初主要分布在今陕西北部，晋国重耳（文公）、夷吾（惠公）的母舅家即出自白狄。后从西向东游动到今河北，分布在此地区的鲜虞、肥、鼓、仇由等，即白狄支系，长狄又称鄋、鄋瞒，大人、大人之国等。因其人高大而得名。孔子认为：“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③春秋时向东游动，跨过太行山直到鲁、卫边界的山谷地带。

与晋人杂居的狄人长期以来互相攻战。晋文公五年（前632），晋国“作三行”就是为便于与狄人作战。因为狄人是步战，不用战车。晋的“三行”都是步卒。晋文公八年（前629），晋国又罢“三行”，另作新上、新下两军，亦是步卒，仍是便于与狄人作战。自春秋以来，狄人不时地攻伐周王都和邢、卫、齐、晋等国。如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赤狄伐邢国。次年春天，齐桓公率军伐赤狄救邢国。一年后（前659），赤狄又伐邢，攻破邢国。齐桓公联合宋、曹两国军击败赤狄，迁邢于夷狄，为其筑新城，并派军戍守，以防止赤狄再次伐邢。又如，晋献公二十二年（前655），晋国发生内乱，公子重耳逃奔狄（重耳母舅家）一年后，晋国里克率军伐狄。次

年，狄又伐鲁。晋惠公七年（前644），狄人伐晋，攻取晋国的狐厨、受铎，并渡过汾水攻至昆都（三地皆在今山西临汾一带）。齐昭公三年（前630），赤狄攻齐国。次年，狄人伐卫国，围卫都楚丘（今河南滑县东），逼使卫国迁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过一年卫伐狄，与狄讲和。

长狄中势力最强的鄋瞒（古书中常以此名代表长狄）伐齐（前605）。齐大夫王子城父率军败鄋瞒，杀其君长荣如。其后卫国又攻伐，杀其君简如，长狄之势力受削弱。晋灵公时，长狄乘晋国因争立新国君内乱，又先后攻齐、鲁、宋等国。鲁文公十一年（前616）秋天，鄋瞒袭齐国后，又攻鲁国。鲁大夫叔孙得臣（庄伯）率军击败鄋瞒于咸（今山东巨野东南），杀其君侨如。长狄余部众拥立侨如弟焚如，后焚如投奔赤狄潞氏（即潞国，在今山西潞城东北）。潞子婴（国君）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为相执政时杀了夫人，又伤子婴的眼睛。晋景公六年（前594）六月，景公欲伐潞国，晋国诸大夫都不同意，认为酆舒有三项突出的才干，不如等他的后任。只有伯宗主张讨伐，他认为，狄人有五罪：一、不祭祀。二、好喝酒。三、废弃贤人仲章不用，而侵夺黎氏（黎侯国）的土地。四、杀我国君的姐姐。五、伤害国君的眼睛。如持其才而不用德，后任的人也会这样。于是景公派荀林父率军伐赤狄，败赤狄于曲梁（今河北鸡泽西），遂灭潞国。潞相酆舒逃奔卫国，卫国引渡晋国，被景公诛杀。七月，景公在稷（今山西稷山县南）检阅军队，欲增援魏颗抵御伐晋的秦军，因秦军被魏颗打败后，景公就向东查看灭潞国后所得到的土地，并将狄人侵夺黎国的土地归还黎侯，恢复黎国后还军。返国后，景公将狄人一千家赏赐给伐狄有功的荀林父。将瓜衍之县（今山西孝义北）

赏赐给士伯。次年春天，景公派士会率军伐赤狄，攻灭甲氏（初族居于今山西沁县，后迁至河北鸡泽西）、留吁、铎辰（均在今山西屯留，长治市一带）等部，三月向周王献俘。

晋景公十二年（前588），晋国伐灭赤狄的甲氏、留吁、铎辰之后，这些狄余民逃入廧咎如（今河南安阳市西）。是年秋天，晋国派郤克联合卫国的孙良夫率军伐灭廧咎如。至此，赤狄各部被晋所灭，晋国疆土扩展到太行山以东，今河北省的一部分为晋国所有。

齐国自桓公创立霸业，一直率诸侯"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从桓公病到死"五子争位"，齐国内乱，致使霸业中衰。宋襄公一度想继齐桓公称霸，也以昙花一现而告终。齐孝公（前642－前633年）即位后，以霸主自居，擅自会盟，又出兵伐鲁国，被鲁大夫展喜批评为违背齐桓公遗命，不能团结诸侯匡救天下④。孝公死后，继位的齐昭公于晋、楚城濮之战（前632）时，派齐军加入晋国的联军。城濮战后，晋文公召集朝周天子的"践土之盟"，齐昭公亦参加。此后齐国忙于处理内乱，无力顾及争霸。

鲁文公十四年即齐昭公二十年（前613）五月，齐昭公死，其子舍继位为国君。昭公之弟商人，因齐桓公死后争位未成功，于是在暗中结交贤士，拢络人心，见侄舍立为君，就于七月乙卯夜杀齐君舍，自立为君，即齐懿公。即位元年（前612）秋天，懿公率军伐鲁国，攻至鲁都西郊。鲁文公派季文子（季孙行父）告难于晋灵公。十一月，晋灵公邀请宋、鲁、卫、陈、蔡、郑、许、曹等国君盟于扈（郑地，今河南原阳西），因齐擅自伐鲁，共商伐齐。齐懿公向晋灵公行贿，晋国受赂不谋伐齐而还军。晋撤军后齐军又伐鲁，仍攻至鲁都西

郊。懿公三年（前 610）夏天，齐再伐鲁，仍攻至鲁都西郊，鲁文公求和。齐、鲁两国君在谷（齐邑，今山东东阿）订盟。次年五月，齐懿公被弑。起因是懿公作公子时，与邴歜（音触）父亲同去打猎，争猎获物而不胜，记其仇，后邴之父死。懿公即位后，则掘出尸体，断其足，派邴歜为他驾车。又将闫职（一作庸职）之妻纳入宫中，使闫职为骖乘（车右陪乘）。三人同游于申池，被邴、闫二人弑于车上，将懿公尸体抛于竹林中。二人从容而去，无人阻挡，是国人恨懿公暴虐之故。齐人立公子元为国君，即齐惠公。惠公在位时齐国处于相对稳定时期。

晋、楚两国争霸中，齐国和鲁国亲晋而敌楚。但齐国又想恢复霸业，不时地攻伐鲁国，每次都因晋国出面干涉而未发生大战役。鲁国感到力量不敌齐国，需要加强国力，进行改革。鲁国的社会生产力自西周以来，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农业，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自西周中期开始解体的公田制，虽也影响到鲁国，可是鲁国是保存西周礼制最完整之国，对旧体制改变较少。入春秋以来，虽能在大国争霸中求生存，一旦发生战争就感力量不足。故鲁宣公十五年（前 594），实行一种田制改革即“初税亩”，就是将土地全都交给耕者去经营，按田亩征收实物税。这种新税制的实行就标志着井田制在鲁国已开始瓦解。初税亩实施后，使国家的财政收入有所增加，但对于应付战争还是不够，故又在鲁成公元年（前 590）“作丘甲”，即向居住在郊外乡间的农业生产者征收军事装备，为扩大兵源，允许农民入武当兵。鲁国的“初税亩”和“作丘甲”两项改革措施，对鲁国国力的增强起了促进作用。历来对此两项改革措施，有不同的认识，至今在史学界仍有分歧，但对增加国家收

入，增强兵力并无大分歧。

晋景公八年即齐顷公七年（前592）春天，晋景公欲会诸侯，派郤克出使齐国邀请齐顷公与会，同时在齐国的还有鲁国的季孙行父，卫国的孙良夫。来齐的三位宾客都各有残疾，郤克跛，季孙行父秃头，孙良夫一眼瞎。景公之母萧同叔子暗中观看，见其三位宾客的形像则笑出声⑤，郤克感到受辱，很是愤怒，发誓要报复。郤克留其随从栾京庐于齐待命，遂先回晋，请晋景公出兵伐齐，景公不许。又请以自己的家众去讨伐，仍不许，因此就暂时作罢。不久，晋景公邀请鲁、卫、曹、邾和齐国君在断道（今山西沁县东北）相会，商议讨伐不忠于晋的盟国。齐顷公恐其受到指责而不到会，只派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四个大夫前去参加。四个大夫行至途中，高固恐其前去被郤克执杀，遂逃去，其他三人至晋被捉，其后也逃回⑥。于是齐国叛晋。次年春天，晋景公会同卫国太子臧率军伐齐国，攻至齐国的阳谷（今山东东平西北）。齐顷公请与晋盟，两国君订盟于缯（齐地），齐国的公子强入晋为人质，晋军还国。夏天，鲁国因齐与晋订盟，恐齐国攻伐，晋不救援，遂派使楚国，请求楚庄王派军伐齐。此时已是七月，正值楚庄王死，其子审继位，即楚共王。共王以楚国在丧服期不宜用兵而辞鲁之请。十月，鲁国又发生内乱，因鲁桓公之族的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即“三桓”的势力日渐增大，超过公室，公室卑微。公孙归父由于其父襄仲立了鲁宣公而受宠信，见三桓的势强，欲除掉三桓而恢复鲁公室的权威，便与鲁宣公谋划欲借晋国势力除掉三桓。于是去晋国聘问，求晋帮助除掉三桓。冬天，鲁宣公死，季孙氏乘机驱逐东门氏，三桓立宣公之子黑肱继位，即鲁成公。公孙归父回鲁途中，知自己家族东

门氏被逐，宣公死，就举行一次复命之礼和一次哭宣公之丧礼后逃往齐国。

晋景公十一年即齐顷公十年（前589）春天，齐顷公率军伐鲁，攻至鲁都北郊，占领了龙（今山东泰安东南），向南攻至巢丘（今山东泰安南）。

齐顷公征伐鲁国的同时，又派军伐卫国。卫穆公派孙良夫、石稷、宁相、向禽率军抵御。两军在新筑（卫地，今河北魏县南）相遇，卫军战败。卫军统帅孙良夫被新筑大夫于奚所救才未当俘虏，于是驻军于新筑，入晋求救。鲁国也派臧宣叔入晋求救。晋国此时是郤克执政，晋景公允许鲁、卫两国之请。遂命郤克为中军帅，率兵车八百乘，以士燮为上军将，栾书为下军将，韩厥为司马，出兵伐齐国。鲁国的臧宣叔作晋军向导，鲁成公又派季文子率军会合晋军。卫国孙良夫、曹国公子首亦率军相助。六月，晋、鲁、卫、曹联军与齐军在鞍相遇。

癸酉日，双方在鞍列开阵式。齐军是由邴夏为齐顷公驾车，逄丑父为车右。晋军由解张为郤克驾车，郑丘缓为车右。齐顷公说："待灭晋军后再吃早饭。"于是马不披甲就驰向晋军。战斗一开始，郤克就为箭所伤，血流入靴中，初仍坚持击鼓指挥。后来郤克说："我不能坚持！"解张说："刚开始我的手和臂就被箭射中，我折箭后继续驾车，左边车轮都被血染成红色，哪敢说受伤，你还是忍着吧。"郑丘缓说："从开战，遇到危险，我都下去推车，你了解吗？"解张鼓励郤克说："军的耳目，在我的旗鼓，进退都听从它，此车一人坐镇，战事即可成功，为何因伤而坏国君大事，披甲执戈本来就是去拼死，只伤未死，你还要尽力为之。"⑦于是左手握马辔，右手以鼓槌

击鼓，驰而不停。全军都跟上冲入齐阵中，齐军大败，晋军追击，围华不注山。韩厥紧追齐顷公之车，在情急时，车右逢丑父与顷公交换位置，但车又被树挂住而停，韩厥赶至，欲擒顷公，逢丑父使顷公下车取水，才乘机而逃未被擒。齐军溃败后，晋、鲁、卫联军追赶齐军至齐的丘舆，马陉（皆在今山东青州市南）。

齐军败，齐顷公向晋国求和，派使送灭纪国时所得的甗、玉磬和土地。晋国坚持要萧夫人作人质，将齐国田垄全改为东西向才准和，齐国见其条件苛刻，表示不和则再战。在鲁、卫两国君劝谏后，晋景公与齐顷公讲和，齐国退还侵占鲁、卫之地⑧。

是年冬天，楚为报复卫、鲁两国助晋败齐于鞍，楚令尹子重（公子婴齐）率全军伐卫国，并攻占鲁国的蜀，鲁成公派臧宣叔向楚求和，臧宣叔认为，楚军远离本国长久在外，本来就将退兵，无功而受名之事不愿受。楚军又攻至阳桥（今山东泰安西北），鲁成公派仲孙蔑（孟献子）前去向楚行贿，送去木工、裁缝、织工各百人，又以公子衡为人质。楚令尹子重同意讲和。十一月，楚公子婴齐、鲁成公、蔡侯、许男、秦国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孙去疾以及曹、邾、薛、鄫的代表和齐国大夫等十四国在蜀地会盟。这是春秋以来参加会盟之国最多的一次。有关这次会盟，《春秋经》中没有记载各国参加会盟大夫之名，是由于结盟者缺乏诚意，因为惧怕晋国与楚国偷偷结盟，故称之为“匮盟”。

注　释

①《左传·襄公八年》。

②《左传·襄公十五年》。

③《国语·鲁语下》。

④据《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⑤此事历来有不同的看法，如童书业在《春秋左传研究》第68页中认为“其事诚为传说，甚不足信”。

⑥《左传·宣公十七年》。

⑦据《左传·鲁成公二年》，又《史记·晋世家》。

⑧《左传·成公二年》。

马陵会盟

晋国自邲之战（前597）后，争霸之势大衰，同盟之国所剩无几。齐国原与晋亲与楚敌，见宋被楚庄王率军围攻九个月，晋国也未能相救，晋国又致力于伐狄，安定后方，遂乘机攻伐鲁、卫等国，想恢复齐的霸业。鞍之战（前589）晋大败齐军后，晋霸的势力又开始恢复。所谓秦、狄、齐、楚四强中，只有楚国仍能与晋抗衡。楚共王七年即晋景公十六年（前584）秋天，楚国伐郑国，晋景公会诸侯救援，郑败楚军，囚楚郧公钟仪，献给晋。八月，晋会诸侯于马陵（今河北大名东南），重温一年前在虫牢（郑地，今河南封丘北）之盟。

鞍战之后，楚共王见晋败齐，势力复强，借机伐卫，又攻鲁，搞了一次有十四个国家和君主代表参加的"蜀之盟"，许多国家迫于楚之势，又怕晋之伐，实际上是不得已而参加这次无诚意之盟。尽管是无诚意之盟，但参加国家之多是春秋以来会盟之最，这无疑对晋国又是一次挑战。晋国与楚国又开始为争夺诸侯国而战，于是郑国在两国争霸中又成为被攻伐的对象。邲之战就是因楚伐郑，晋国救郑而引起的，但郑国在晋军

未到之前已降楚国，战后郑和许两国君又朝楚庄王。此事晋未忘记，故在鞍战之次年（前588）春天，晋景公会同鲁、宋、卫、曹四国君率军伐郑国，晋军深入至郑地。郑国公子偃率军抵御，在东部边境鄤地设下埋伏，败晋军于丘舆（郑地），郑襄公派皇戌到楚国献俘。郑国败晋后，自恃力量不小，又有楚国为依靠，以许国不事郑国为由，襄公就派子良率军伐许国，攻占许田（今河南许昌市东南）。

晋景公十三年即郑襄公十八年（前587）二月，在位十八年的郑襄公死，其子费（一作溃）继位，即郑悼公。是年十一月，郑国公孙申率军到许国划定前一年伐许所占土地疆界，但被许国人击败于展陂（今河南许昌市西北），于是郑悼公率军攻许国，占领许国的鉏任、泠敦（皆在今许昌市附近），晋景公见许被郑攻伐，遂派栾书为中军将，荀首为副，士燮为上军副帅，率领晋军伐郑救许。攻占了郑国的汜（北汜，今河南荥阳西北）、祭（今河南郑州市北）二邑。楚共王知晋国伐郑救许，遂派子反率军救郑国，郑悼公与许灵公向子反争讼是非，皇戌代郑悼公陈述。子反不能决定谁是谁非，要他们到楚国去由楚共王来判断。次年夏天，许灵公到楚国控告郑悼公。六月，郑悼公去楚国争辩，结果“讼不胜”。楚国拘留了郑国的皇戌、子国（郑穆公之子），郑悼公回国后即派公子偃赴晋国请和。八月，郑悼公和晋大夫赵同在垂棘（晋地，今山西潞城北）结盟修好。十二月己丑日，晋景公因郑国已和晋结盟，遂邀请鲁、齐、宋、卫、郑、曹、邾、杞等国君会于虫牢（郑地，今河南封丘北）订盟。此时中原各诸侯国对晋、楚两国都不能不服，只好以本国的出产不时向两方纳贡，以求得自安。

吴国，也称句吴、攻吴、攻敔、工𫊸，或称吴、干、吴

干、邗等。于是古越族的一支族，商代末吴灭干建立干吴国。根据《左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以及《论语》、《穆天子传》、《韩诗外传》、《论衡》等先秦、两汉古籍所载，商末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因知太王欲使其弟季历和季历子昌（周文王）继位，于是二人逃奔荆蛮①，文身断发，从吴俗，吴地归服者千余家，拥戴太伯为主。在蕃篱（今无锡县梅村）筑城建都后将都迁于吴（今江苏苏州市）。太伯死后由仲雍继位，号吴（虞）仲。仲雍死后，三传至周章时，周武王灭商纣，封吴仲为诸侯。1954年在江苏丹徒县烟墩山西周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宜侯夨簋》②，是一件周康王时所作之器。有铭文12行，125字。内容是周康王南巡，视察新征服东国地区，到达东南吴地，主持宜侯改封仪式，这是有关吴国早期历史的资料。

鲁宣公八年即楚庄王十三年（前601）夏天，楚国因分布在今安徽巢湖区域的群舒叛楚，出兵伐舒蓼③（今安徽舒城南）。灭舒蓼后，与吴国和越国会盟，这是春秋以来，吴、越两国始与楚国的结盟归服。吴国传至寿梦时开始称王（前585），次年正月，寿梦率军北上伐郯（tán谈，西周封的己姓国，今山东郯城西南），郯国与吴国媾和。

晋景公十五年（前585），景公欲迁新都，与大夫们商议选址，大夫们主张迁到郇瑕氏（古国，即郇国，在今山西临猗西南）故地。景公询问韩献子（韩厥）之意，韩献子认为：郇瑕氏故地土薄水浅，污染多，百姓在那种地方容易得风湿脚肿的疾病。不如迁至新田，那里土厚水深，不易得病，有汾、浍二水冲走污物，百姓定能安居乐业。于是景公决定自绛（即翼，今山西翼城南）迁至新田，称为新降（今山西侯马市区西

北部）。此晋国晚期的都城新田遗址，自 1952 年发现并发掘，后来在 1959 年至 1965 年又陆续发掘，基本将这座都城遗址全貌清理出来。该城是由六座城址组成，分布在今山西侯马市西北部。最大的城址由白店、台神、牛村、平望四座故城连成一片，在这片故城东面是呈王故城，东北是马庄故城。牛村故城南面是铸铜遗址。故城遗址东南就是“侯马盟书”出土地。

是年六月，郑悼公死，悼公弟睔（gùn 棍）继位，即郑成公。夏天，楚共王因郑国与晋国结盟，派子重率军伐郑。冬天，晋景公命中军帅栾书（武子）率六军救郑国，与楚军在绕角（今山东鲁山县东）相遇，楚军撤退。晋军遂转回伐蔡国。楚国公子申、公子成率申、息两县之军救蔡，在桑隧（今河南确山东）相遇。晋国赵旃、赵括欲战，请示栾书，栾书将允许。中军副将荀首、上军副将士燮、新中军将韩厥谏止，于是栾书率晋军还国。

晋国与楚国为争夺霸权，几乎连年征战，鞍之战后，晋国又重振旗鼓对付楚国势力北上。晋景公加强了军事力量，如“作六军”（前 588），即原三军外，又建立新三军，合为六军。同时，又利用外交手段来对付楚国。楚国申公巫臣（屈巫），出身于贵族。鲁宣公十年（前 599），陈灵公与大夫仪行父、孔宁同淫于大夫夏征舒之母夏姬。征舒弑灵公，陈国内乱。次年，楚庄王率诸侯之军伐陈国，诛夏征舒，获夏姬。司马子反欲娶夏姬，申公巫臣劝谏而止，庄王将夏姬赏给连尹襄老。晋、楚邲战中（前 597），连尹襄老战死，尸体被晋军抢去。夏姬为襄老之子黑腰占有。申公巫臣欲得夏姬，遂密告夏姬，郑与晋结盟，可由郑国向晋国要回襄老之尸体归葬于楚国。夏姬是郑国女，听巫臣之话认为合理，于是请求楚庄王同意后至

郑国。楚共王元年（前590）巫臣出使齐国，回国途经郑国，遂娶夏姬为妻。原欲携夏姬投奔齐国，逢鞍战中齐国战败，遂投奔晋国。晋景公封巫臣为邢地（今河南温县东北）大夫。楚国子反得知巫臣娶夏姬奔晋，自己受欺骗，乃杀巫臣之族子子闫、子荡和清尹弗忌以及襄老之子黑腰，并分其室。巫臣深恶痛绝，欲借机报楚之仇。

晋景公十六年即吴王寿梦二年（前584），巫臣向景公建议，联结吴国以对付楚国。景公同意，遂派巫臣为使至吴国。吴王寿梦见巫臣到吴国，很高兴，于是与晋国交往，这是吴国第一次与中原诸侯通使往来。巫臣又带去"两之一卒"④，即兵车三十辆，一偏十五辆，合两偏成一卒。教吴国人学习陆战，使用兵车。教吴人射箭、驾车、布阵等，学会后，背叛楚国而与晋国结盟。恐吴人不放心，又将自己的儿子狐庸留在吴国，任吴国的外交官。于是吴国开始强大，攻占楚国之地。先伐巢国（今安徽瓦埠湖东南），又伐徐国（今江苏泗洪南）。楚国的执政子重来回奔命。在马陵会盟时，吴国又攻到州来（今安徽凤台），子重、子反一年七次奉命抵御吴军。楚国所属在东南的夷蛮各部，几乎尽为吴国占有，使得楚国不能再全力北上争夺霸权。

是年秋天，楚国子重（公子婴齐）伐郑国，率军驻于汜（南汜，郑地，今河南襄城）。晋景公邀请齐、宋、卫、鲁、曹、莒、邾、杞等国君相会商议救郑国。此时郑国大夫共仲、侯羽围攻楚军，并俘囚楚国的郧公钟仪，献给晋景公。八月，因为郑国俘楚钟仪，莒国归服晋国，故晋景公与齐、宋、卫、鲁、曹、莒、邾、杞和郑的国君在马陵结盟，同时也是重温一年前在虫牢的盟约。

马陵之盟后，晋国将楚国的钟仪带回晋国，把他囚禁在军用的仓库里。这是自鞍战之后晋景公恢复霸业的又一次成功。

注 释

①关于太伯、仲雍让贤奔吴之事，近代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可能。崔述认为“难取信”（见《崔东壁遗书》卷八《丰镐考信录》）。近十多年来，又有学者根据陕西考古出土资料，认为太伯、仲雍所奔之吴，应在陕西境内。

②《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③《左传·宣公八年》杜预注：“舒、蓼，二国名。”

④《左传·成公七年》。

华元弭兵

晋景公晚年，为重振晋国的霸业，除军事的征伐外，还接受楚国投奔晋的申公巫臣建议，用联吴攻楚的外交手段。派巫臣出使吴国修好，并带去兵车，教吴人学会使用兵车和阵战，促使吴国叛楚，牵制楚国的军事力量，楚国由此在中原的战事连年失败。而在东被吴攻，北被晋阻的形势下，楚国的霸业开始由盛渐衰。

晋、楚两国争霸，几乎是每年都有攻战，这不仅使两国为争夺霸权而精疲力尽，也使中原的各诸侯国，遭受长期战争的破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还要负担各种繁重的军赋、服军役。故各国都普遍地呼吁弭（mǐ 弥，息也）兵罢战，给人们一个安定、喘息的时间。宋国的执政大夫华元，认清了这一形势，就主动地开展外交活动弭兵。他的行动不仅得到晋、楚两国君的同意，也得到各诸侯国的支持。于是，晋厉公二年、楚共王十二年即宋共公十年（前 579），晋、楚两国和宋华元在宋国西门外订立弭兵之盟，史称“华元弭兵”、“西门之盟”，也就是春秋时期第一次弭兵之盟。

晋国在马陵之盟后，欲打通通向吴国的道路。晋景公十七年（前583）春天，景公派栾书率军攻蔡国，又顺道伐楚国，击败楚军的抵御，俘虏楚大夫申骊。又攻归服楚国的沈国（即聃国，今河南平舆北），攻破沈都，俘沈国君揖。郑成公知晋伐蔡国，遂率军前往与晋军汇合。行至许国都东门外，见许国毫无戒备，于是乘机攻其东门，抢夺不少东西。秋天，景公又派申公巫臣出使吴国。巫臣到莒国（今山东莒县）借道，莒国君按礼接待了巫臣。冬天，景公派士燮出使鲁国聘问，请鲁成公出兵协助伐郯国，说郯国背晋事吴。鲁成公知这是借故伐郯国，因郯（今山东郯城北）与鲁国相近，故成公贿赂士燮，请缓伐郯国。士燮以"君命无贰，失信不立"拒绝。季孙惧怕，便派宣伯率军协助。于是晋国汇合鲁、齐、邾国进攻郯国。因为郯国是通往吴国的又一个必经之国，郯如服晋，则去吴国就更方便。

当晋景公致力于打通东方通往吴国之路时，是年六月，晋国内发生内乱。晋成公之女、景公之姊赵庄姬，是赵盾之子赵朔的妻子，赵盾的弟弟赵婴齐与侄媳赵庄姬通奸。景公十四年（前586）赵婴齐的两个哥哥赵同、赵括将他流放到齐国。婴齐对赵同、赵括说："有我在，可借庄姬之力保护赵氏族人。将我流放，你们两个兄长就会有大祸，而且人各自都有能作的和不能作的，赦免我又有什么坏处?"①二人不听，仍放逐，庄姬对赵同、赵括怀恨在心，待机报复二人。两年后，庄姬就向景公诬告赵同、赵括反对景公，要造反。晋国栾氏、郤氏本来就与赵氏不和，忌恨赵氏权势太大，这时出来为庄姬作证。景公遂命军队讨伐赵氏，杀赵同、赵括。只有庄姬所生之子赵武，随庄姬入宫中避难。景公将赵氏的田地赐给祁奚。韩厥向

景公说："赵衰、赵盾之功岂可忘乎？奈何绝祀？"②景公才让赵武继承赵氏，将田地还给赵武。

据《史记·赵世家》和《韩世家》所述是：屠岸贾是晋灵公的宠臣，到景公时作司寇，欲诛赵氏，遂借赵穿弑灵公之事，说赵盾是主谋、贼首，并遍告诸将，要惩罚在朝的赵氏子孙。韩厥劝阻，屠岸贾不听，于是擅自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弑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灭其族。赵朔妻为成公姊，有身孕，逃入景公宫中藏匿。不久赵朔妻生一男，屠岸贾得知，入宫搜索。赵朔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友人程婴商议救赵氏孤儿，由程婴用自己之子换出赵氏孤儿，公孙杵臼将程婴子抱入家中，再由程婴出面告密，诸将遂以兵攻公孙杵臼，杀公孙杵臼与程婴子。程婴遂抱赵氏孤儿藏匿山中。十五年后景公病中问及赵氏是否还有子孙？韩厥知赵氏孤儿尚在，乃以实告景公。于是景公与韩厥商议立赵氏孤儿，召入宫中，诸将入宫问病时，景公用韩厥之众，胁迫诸将见赵氏孤儿。赵孤名武。诸将不得已，将杀赵氏责任推给屠岸贾。于是召赵武、程婴拜诸将，诸将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还给赵武田邑如故。程婴救赵氏孤儿的任务完成，为报答公孙杵臼而自杀。后世演义为"搜孤救孤"的小说，戏曲，即以此为据。但是此记载与《左传》、《国语》和《史记·晋世家》所载不合，前人已有论证③。

晋国内乱虽然平息，但晋景公在晚年争霸中一些作为也引起中小诸侯不满，出现"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的局面④。即为归还汶阳之田的原故，诸侯也不一心一意地相信晋国。起因是晋景公十七年（前583）春天，景公派韩穿出使鲁国，告诉鲁成公，在鞍之战后，命齐国将侵占鲁国汶阳之田归

还鲁国；现在又要鲁成公将汶阳之田再给与齐国。作为大国盟主，命令出尔反尔，何况汶阳之田本来就是鲁国的田地，是齐国在六年前攻鲁国时所侵占。故诸侯对晋国产生离心，失去对景公的信任。景公得知诸侯的情况，也很惧怕因此失去诸侯，所以在是年春天，邀请鲁、齐、宋、卫、郑、曹、莒、杞等国君在蒲（卫地，今河南长垣东）相会，以重温马陵会盟之友好。景公原打算邀请吴王寿梦，作初次会面，但吴王未到。故景公想以此来巩固霸权的愿望也未能完全实现，只逼鲁国给齐国汶阳之田，算是使齐国再次靠拢晋国。

楚国见晋国在争夺诸侯，也不甘心，便派使者携带重礼贿赂郑成公。郑成公受贿后，与楚公子成在邓（今湖北襄樊市西北）相会。可是这年秋天，郑成公又亲自到晋国朝见景公。景公因郑成公不久前曾与楚公子成相会，所以就命人在铜鞮（晋邑，今山西沁县南）将郑成公拘留，又派栾书率军去攻郑国，郑国派大夫伯蠲向晋请和，但被晋杀死。两国交兵，不斩使节，晋国如此作法是违反国际礼节的。于是楚共王乘机派子重率军伐陈国以救郑国。

晋景公见楚国出兵北伐陈，欲与楚媾和，遂亲自到囚禁楚大夫钟仪的军械库去见钟仪，询问钟仪在楚的官职，钟仪说是乐官，又询问钟仪的身世。范文子认为钟仪是位君子，应当放回楚国，结晋、楚的友好。晋景公释放钟仪回楚，转达与楚和好之意。但楚国北伐陈并未停止，是年冬天，又将伐陈之军移向东面伐莒，莒国无备，至使莒国两邑，渠丘（今山东莒县东南），郓（今山东沂水县东北）和莒城被攻陷。但在楚军攻入渠丘时，楚公子平被莒人捉住杀死。楚国伐陈、攻莒也并未压服两国。于是楚共王派公子辰（子商）赴晋国，以回报晋释放

钟仪回楚，并同意与晋国修好。

秦国本与晋国不和，对晋国也是有“贰心”。见楚伐陈、攻莒，也乘机与白狄伐晋。晋国见秦与白狄出兵攻晋，恐腹背受敌。于是在次年（前581）春天，派大夫籴茷赴楚国聘问，一方面是回报去年冬天楚公子辰使晋，另一方面是巩固与楚的和好。

郑国见国君成公被扣留在晋尚不放还，于是在是年三月，先立公子繻为国君，立一月被郑人杀死，另立太子髡顽为君。栾书建议：因郑国已立新君，我们拘留郑国君，等于拘留一个普通人，并无用处，不如伐郑国，同时送回郑国君，以此来求和。此时，晋景公已病，不能视事。五月，晋国立太子州蒲（一作寿曼）为君主政，遂邀请齐、宋、鲁、卫、曹等国君率军共同伐郑国。郑公子喜（子罕）以郑襄公宗庙中的钟贿赂晋国，于是郑国子然和晋及诸侯在修泽（郑邑，今河南原阳西南）结盟，郑国子驷作人质。辛巳日，郑成公回到郑国复位。六月丙午日，在位十九年，恢复晋国霸业的景公病死于厕中。太子州蒲正式继位，即晋厉公。

晋厉公元年（前580），新继位的厉公欲罢战，与诸侯修好。是年冬天，晋、秦两国约定在令狐（晋邑，今山西临猗西）相会结盟。晋厉公先到令狐，秦桓公到王城（秦邑，今陕西大荔东）后不肯渡黄河至令狐。于是两国隔着黄河各派使节代表国君会盟。秦国派大夫史颗到令狐与晋厉公结盟。晋国派大夫郤犨（郤克从父兄弟）到王城与秦桓公结盟。范文子认为这样隔河各自之盟，毫无意义，因为没有诚意。果然如范文子所言“夹河之盟”后，秦国就背盟。

宋国执政大夫华元，见晋国与楚国使节往还，又欲与秦结

盟，送郑国君回国等动作，看清了经长期争霸战争后，晋、楚都欲罢战修养生息。而中原各中、小国家早就盼望大国能息兵罢战，不再给国家和人民制造苦难。而晋国执政大夫栾书，楚国令尹子重都与华元友善，于是华元主动为弭兵之事活动奔走。这年（前580）冬天，华元分赴楚、晋两国，促成两国同意弭兵。次年五月，华元的外交活动成功，晋厉公派士燮为代表，楚共王派公子罢、许偃为代表至宋国。癸亥日，晋、楚两国代表在华元的陪同下，于宋国西门外会谈订盟。盟约规定：凡晋、楚两国不以武力相加，好恶同之，同济灾害危亡，救援饥荒祸患。若有加害楚国的，则晋国讨伐。有加害晋国的，楚也是如此。使节往来，道路不要设障碍。协商不和，讨伐背叛（晋、楚者），谁要背约，神灵共诛。使覆其师，不保其国⑤。史书中称这次自春秋以来的弭兵会盟为"华元弭兵"或"西门之盟"，也就是第一次弭兵之盟。

华元为弭兵而开展的外交活动，在中原诸侯国家都引起关注和支持。尤其如宋、郑、卫受害最多的国家都盼望华元活动成功。"西门之盟"缔约后，郑成公亲自赴晋国听取盟约的内容。夏天，晋厉公和鲁成公、卫穆公在琐泽（卫邑，今河北大名东南）相会，听取晋、楚两国和好的情况。晋厉公又派郤至到楚国聘问，并且参加盟约，受到楚共王的享礼招待，子反作相礼者。冬天，楚共王派公子罢赴晋国回聘，同时参加盟约。十二月，晋厉公和楚公子罢盟于赤棘（晋地）。这些活动都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华元弭兵"的成果。

注 释

①据《左传·成公五年》。

②《史记·晋世家》。

③《史记会注考证·赵世家》考证。

④《左传·成公九年》。

⑤据《左传·成公十二年》。

鄢陵之战

晋、楚两国争霸，战祸不断，晋国迫于各诸侯国的舆论压力，“诸侯贰于晋”，形势对晋国不利，加之秦国与白狄乘机攻晋。晋景公死后，新继位的厉公亦怕腹背受敌，遂继景公晚年的政策，对楚国采取缓和友好的态度。在宋国执政华元的外交活动下，晋、楚两国的代表于晋厉公二年即楚共王十二年（前579），在宋国西门外订立弭兵盟约，这就是春秋时期第一次“弭兵之盟”，也称“华元弭兵”、“西门之盟”。传统说法是晋国首倡这次弭兵之盟，应当说由于形势的发展，晋、楚两国都有此愿望，华元就是抓住这样的时机促成这次会盟。这次会盟对晋国很有利，与楚国和解，能集中力量对付秦国的攻伐；与楚息兵罢战，得中原各诸侯国的支持和信任，争取到更多的盟国。但是这种会盟和所订的盟约，因缺乏基础和实质诚意，在双方喘息仅三年，又毁约而战。晋厉公六年即楚共王十六年（前575）夏天，晋、楚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北）又进行战争。

晋厉公三年即秦桓公二十七年（前578），晋厉公因在前一年晋、楚两国订立了弭兵罢战的“西门之盟”，赢得了集中

精力对付秦国的时间。于是年四月，派吕相（即魏相，晋武子魏锜之子。因食采邑于吕，故称吕相，又称吕宣子）赴秦国，宣布晋国与秦国断绝外交，还发表了一番断交原因的言论，这实际上就是一篇伐秦的檄文。吕相先肯定晋献公与秦穆公时的友好，“戮（努）力同心，申（明）之以盟誓，重之（再）以昏（婚）姻（加以巩固）”①。然后历数自晋献公以后秦国的罪状，如晋文公死后秦国不派使参加葬礼，历次的大小晋秦之战争一律归之于秦国不遵守盟誓，背信弃义。凡是晋国有背盟之事，则强辞夺理地加以辩解。全部言辞充满晋国历代君主是一贯正确的形象，而秦国则是罪行累累，应加讨伐。由于言辞善辩，又有声有色，遂成后世讨伐檄文的名篇，称为《吕相绝秦》。

吕相绝秦之后，晋厉公借诸侯至周朝见周简王之机会，与齐、宋、卫、鲁、郑、曹、邾、滕等国国君相会，要求各诸侯国出兵协同晋国伐秦国。是年五月，晋厉公和周大夫刘康公、成肃公率诸侯讨伐秦国。晋军由栾书任中军将，荀庚为副。士燮为上军将，郤锜为副。韩厥为下军将，荀罃为副。赵旃为新军将，郤至为副。郤毅驾御车，栾鍼为车右。丁亥日，诸侯联军与秦军交战于秦的麻遂（今陕西泾阳北），大败秦军，秦将成差和不更（秦国官名）女父（人名）被俘。联军乘胜渡过泾水，到达侯丽（今陕西礼泉东）后还军。晋厉公亲自到新占领的秦地新楚（今陕西大荔，朝邑境内）迎接凯旋的晋军。这是自秦康公之后，晋国与秦国交战，秦军第一次如此大败，也是晋军第一次深入秦国腹地。

在这次战役中曹宣公死于军中。是年六月，曹宣公庶弟（一说庶子）负刍杀太子自立，即曹成公。次年十月，卫定公

死，子衎（kàn 看）继位，即卫献公。秦桓公死，太子后伯车继位，即秦景公。

晋厉公五年即楚共王十五年（前 576）六月，楚共王欲北上伐郑、卫两国。子囊（楚庄之子，公子贞）劝谏说：新近才和晋国订了盟约，现在就背约，恐怕不能这样！子反认为：敌人动向有利于我们就可以去进攻，管它结不结盟。于是楚共王率军北上伐郑国，到达暴隧（郑邑，今河南原阳西南）后，又转向伐卫国，到达首止（即首戴邑，今河南睢县东南）。同时郑国也不畏楚国，子罕率军袭击楚国，攻占了楚的新石（今河南叶县境内）。

晋国知楚国背盟伐郑、卫两国，栾书想要对楚国报复。韩厥以为：不用，让楚自己加重其罪，人民将会背叛，无人服军役，谁去为其作战？故晋国这次未出兵。但在十一月，晋士燮、鲁叔孙侨如、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鳝、邾国代表与吴国代表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相会，欲利用吴抗楚，这是吴国开始与中原诸侯会盟。

次年（前 575）春天，楚共王在武城（今河南南阳市北），因前一年郑国子罕不畏楚而袭取新石，就派公子成赴郑国请和。条件是将汝阴（今河南商丘、宁陵间）让给郑国，郑国背叛晋国，郑国子驷与楚共王在武城结盟。四月，亲宋国的滕文公死，郑国乘滕国有丧事，由子罕率军伐宋国。宋国的将钼、乐惧率军抵御，败郑军于汋陂（今河南商丘与宁陵间）。宋军退兵驻于夫渠（在汋陂附近），宋因战胜郑军而不加戒备，结果被郑军偷袭，败宋军于汋陵（在汋陂附近），将钼、乐惧被郑军所俘。

郑国与楚国结盟而叛晋，又伐宋国，晋的同盟者卫献公首

先率军讨伐郑国，攻至鸣雁（郑邑，今河南杞县北)。晋国见卫国已主动讨伐郑国，范文子主张立即出兵伐郑。栾书也表示同意。于是晋厉公决定出兵伐郑国。由栾书任中军将，士燮为副。郤锜为上军将，荀偃为副。韩厥为下军将，郤至为新军副将，荀罃留守，郤犨到卫国和齐国，栾黡至鲁国请求出兵协助。四月戊寅日，晋国伐郑国的大军出发。

郑国得知晋国已出兵，急派使赴楚国求救，郑大夫姚句耳也一同前往楚国。楚共王决定出兵救郑，由司马子反率中军，令尹子重率左军，右尹子辛（公子壬夫）率右军。楚军出发途经申地，子反入申邑去拜访告老在家的申叔时，征求这次出兵的意见。申叔时开始说了德、义、礼、信是作战条件的道理，然后才指出，现在楚国对内抛弃人民，对外绝其友好，亵渎所订的神圣的盟约，而且还说话不算数，不顾一切违反形势而发动战争，以人民的疲劳来求得快意，人民不知道什么是信用，故进退都是罪过。人们为自己的后果耽心，还有谁愿去作牺牲！最后对子反说：你好自为之，我再也见不到你了②。

五月，晋军渡过黄河，据报楚军将至。中军副将士燮不主张和楚军对阵，认为不与楚战可缓和忧患，争取诸侯，让有力量的去对付。栾书则反对不战而回。六月，两军在鄢陵相遇。士燮仍不欲战，郤至主战。当晋军将帅们还为战与不战辩论的时候，楚军则先发制人。甲午日晨，楚军逼近晋军结营地列阵，晋军忧虑。范匄（范文子之子）献计说：我们将井填塞，将灶铲平，在营中列阵，将行列距离放宽，空出通道，又有何惧？其父士燮执戈赶走他说：国家存亡，是天意，小孩子懂得什么？栾书说：楚军轻窕，固守营垒，等它三日必然会退走，然后追击，必然获胜。郤至也分析楚军有六个弱点：令尹与司

马不和；楚军疲于战争；助战郑国军行列不整；附从楚军的蛮夷小国军队不会列阵；战斗时机不好；士卒在阵前喧哗，各顾其后，没有斗志。于是决定与楚军战③。

楚共王登巢车（瞭望车）以望晋军，子重派太宰伯州犁（晋国伯宗之子，前一年"三郤"害死伯宗，伯州犁逃往楚国）站在共王身后回答晋军的活动情况。晋厉公在巢车上望楚军时，苗贲皇（楚国子越椒之子，三十年前楚庄王本以斗氏为主体的若敖氏之乱时，逃往晋国，晋封于苗地）站在厉公身侧回答楚军活动的情况，晋军将士见楚军多，又有知晋军内情的伯州犁为楚共王作参谋，有些惧怕。苗贲皇说：楚军的精锐是中军王卒，请用晋的精锐先击楚之左右军，然后集中三军攻其王卒，必大败楚军④。厉公从其谋。战斗开始，双方前进，因是泥沼较多的地区，晋厉公所乘之车陷于泥沼。栾书欲以自己车载厉公，其子栾鍼谓其父：不能侵权、弃职、慢军。不让栾书载厉公，他将厉公车从泥沼中掀出。

对战时，晋魏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共王急召神射手养由基射魏锜，给了两支箭，而养由基只用一箭就射死魏锜，剩下一支复王命。晋郤至三次碰上楚王车，见到共王，则三次肃拜而退。韩厥追赶郑成公，即将追上而停止，说："不可以再辱国君。"郤至追赶郑成公，即将追上也停止，说："伤害国君要受刑罚。"晋军追击楚军到险地，楚的养由基箭无虚发，力士叔山冉奋力抓起晋军士卒投击晋的兵车，断其车轼，晋军才停止追击。楚公子茷被俘，栾鍼夺取令尹子重的帅旗。

战斗从凌晨到见星光才休战。楚子反命军吏查伤亡，补充士卒，配备兵车，鸡鸣而食，等待命令。晋军将士得知楚军的情况后很耽心。苗贲皇让晋军也作好备战，明日再战，并将俘

虏到的楚兵放回。楚共王得知，召子反商议对策，但子反因小臣谷阳竖献酒喝醉不能前去见共王。共王于是乘夜黑时，带楚军逃走。

楚军回到瑕（楚邑），共王派使对子反说：过去大夫打败仗，国君不在军中，你要负罪责，这次你没有过错，因为有我在。子反再拜稽首说：君赐臣死，死也甘愿，我的士卒逃走，是我的罪过。令尹子重则派使对子反说：过去打败仗的人，下场你也听说过，为何不打算怎样办？于是子反自杀⑤。共王知子重派使说反之事，急使人去阻止时，为时已晚。

鄢陵之战因争夺郑国而起，但郑国未能因晋胜而服晋。是年秋天，晋厉公与齐灵公、鲁成公、卫献公、宋国华元、邾国代表在沙随（宋地，今河南宁陵北）相会，谋划伐郑国。其后不久，晋厉公遂与周卿士尹子率齐、鲁、邾等国联军伐郑国，同时又伐陈国，攻至鸣鹿（陈邑，今河南鹿邑西），伐蔡国，诸侯联军驻在颍上（颍水旁，在今河南禹县境内）。戊午日，郑国子罕率军夜袭，宋、齐、卫之军皆溃败。故晋、楚两国争霸战争并未就此而止。

注　释

①《左传·成公十三年》。

②③④⑤据《左传·成公十六年》。

晋悼公复霸

鄢陵战前，晋军将帅初恐惧，被形势所逼，结果败楚军获胜。但晋国对楚国的势力仍有戒心，要阻止楚再北上争霸，只有继续联合吴国来牵制楚国。楚国自鄢陵之战后，加以吴国势力渐强的威胁，争夺中原诸侯之势渐衰。晋国要复霸中原，除以武力与楚争战，在国内也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晋厉公感到“三郤”的势力过大，大夫专权，互不团结，欲除其势力，结果被栾书、中行偃执弑。悼公即位后，知人善任，修旧功，施德惠，缓和大臣间的矛盾，又使晋国霸业重振。

宋国是晋的盟国，在鄢陵之战前一年，即宋共公十三年（前 576），国内发生内乱。六月，宋共公死。八月，葬共公。设置六卿：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一作唐山）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另又以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太宰，鱼府为少宰。荡泽欲削弱公室势力，杀公子肥（宋文公之子）。又欲杀华元，华元出奔晋国，左师鱼石追至黄河边上阻止了华元，华元请求讨伐荡泽，鱼石同意。回到宋以后，派华喜、公孙师率国人攻杀荡泽。

宋国的华元、华喜是戴公之后代，公孙师是庄公的后代，鱼石、荡泽、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人是出自桓公之族。荡泽被杀，五人恐惧，遂出逃到楚国。华元则以向戌（宋桓公曾孙）为左师，老佐为司马，乐裔为司寇，以安定局势。于是立共公少子成，即宋平公。

宋平公三年（前573）六月，郑成公率军伐宋国，到达宋都西北门（曹门）外，会合楚共王率的楚军攻取朝郏（宋邑，今河南永城西）。楚国子辛、郑国皇辰伐城郜，攻取幽丘（两地皆宋邑），又攻取彭城（宋邑，今江苏徐州市）。将投奔楚的鱼石等五个大夫安置在彭城，派兵车三百乘戍守后还军。楚共王如此的安置，是作为进攻宋国的据点，故引起宋国的恐惧。七月，华元派司马老佐，司徒华喜率军围攻彭城，未攻下时，司马老佐死。十一月，楚共王派子重率军救彭城伐宋国，华元赴晋国告急求救。此时晋国栾书已死，执政大夫是韩厥，认为“成霸安疆（土），自宋始矣”①。遂发兵，途中遇楚军，楚军畏晋军，只好撤军回楚。

鄢陵战后，晋厉公七年（前574），郑国子驷伐晋，攻至虚、滑两地（皆在今河南偃师境）。卫国北宫括率军救晋伐郑国，攻至高氏（今河南禹县西）。五月，郑国以太子髡顽和大夫侯獳（nuò 糯）去楚国作人质为条件，楚国派公子成、公子寅到郑国戍守。此后，五月和十月，晋厉公两次会诸侯之军伐郑国，都未使郑国归服。

晋厉公自鄢陵一战打败楚国以后，欲除国中的强宗大族，而立自己亲信的大夫。立亲信大夫就需赏赐土地，但晋国的土地已被强族大夫分光，只有从这些强族中夺取。在晋国强族中，以“三郤”（郤锜、郤犨、郤至）为首的郤氏，栾书为首

的栾氏，中行偃为首的中行氏权势最重。厉公的亲信大夫是胥童、夷阳五（即夷羊五）、长鱼矫等。

鄢陵之战后，郤至以为功大，郤氏也以此为骄傲。晋成公六年（前601），赵盾死后，由郤缺继赵盾执政。胥克时任下军佐，因患神经病被郤缺免职，其子胥童怀恨在心。郤锜曾经夺了夷阳五的田地。郤犨曾与长鱼矫争田而将长鱼矫囚禁，将他和父母妻子同系于一根车辕上。"三郤"都与厉公亲信大夫结怨。栾书因鄢陵战中郤至不从自己计划，未能败楚军而结怨。遂利用被俘的楚公子茷诬告郤至，说他勾结楚共王伐晋，待晋战败后将去周迎回孙周（周子）回晋即位。厉公依栾书之计，派郤至出使周王室聘问，栾书派人让孙周接见郤至，厉公派人暗中监视，得知孙周会见郤至，于是决心除"三郤"。

十二月壬午日，胥童、夷阳五、长鱼矫、清沸魋杀郤锜、郤犨、郤至三人。胥童又率甲士劫栾书、中行偃于朝中，长鱼矫请厉公处死二人，厉公未允许，长鱼矫逃奔狄，厉公复栾书、中行偃之职，不久，厉公去亲信大夫匠骊氏家中游玩，被栾书、中行偃拘捕。闰月乙卯日，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次年（前573）正月庚申日，栾书、中行偃派大夫程滑弑厉公，用车一乘，葬于翼邑东门外。又派荀罃、士鲂到周京师迎回晋襄公玄孙周子（一作子周）继位，即晋悼公。悼公即位时，只有十四岁。他对臣僚们说："孤开始未想到作国君，现在既然如此，也是天意。既然要求有国君，就要发布命令。立国君而又不听他的，国君还有何用?"群臣表示："敢不唯命是听（从）。"②于是与大夫们订盟，在武公庙接受臣僚们朝贺。

悼公即位后，首先清理整顿朝中不称职的大臣，驱逐了夷阳五等七人。悼公有一个哥哥是个不能辨别豆和麦的白痴，也

不让当朝臣。然后任命百官：任魏相、士鲂、魏颉、赵武等一批老臣之后为卿；任荀家、荀会、栾黡、韩无忌为公族大夫，命他们教训卿的子弟恭敬、节俭、孝顺、友爱；任士渥浊为太傅，命他学习范武子（士会）的法规；任右行辛为司空，命他学习士蔿的法规；以弁纠驾国君战车，校正所管的驾车者；以荀宾作国君车右，训练驾车的勇士以备用；祁奚为中军尉，羊舌职为副。魏绛为司马。张老为侯奄（中军侦察官）。铎遏寇为上军尉。籍偃为上军司马，训练步卒、车兵，使之服从命令。程郑为乘马御，管辖六驺，训练礼仪。悼公新任命的这一批新臣僚，才干称职，德行称爵，上下有礼，不相欺凌，受到人民的拥护。这就为恢复霸业奠定了基础。是年秋天，在位十八年的鲁成公死，子午继位，即鲁襄公。

鲁襄公元年即晋悼公二年（前572）春天，晋国命栾黡率军会合鲁国仲孙蔑（孟献子）、宋国华元、卫国宁殖以及曹、莒、邾、滕、薛等国军队为宋国伐彭城。在彭城的宋国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大夫投降，晋国将他们安置在瓠丘（即壶丘，今山西垣曲东南）。因齐国未派军参加晋国伐彭城，晋国讨伐齐国。二月，齐灵公谢罪，以太子光入晋为人质。五月，晋国韩厥、中行偃奉命率诸侯之军伐郑国。攻破郑国外城，败郑步兵于洧上（即洧水，流经郑都之南）。晋军攻郑国时，齐、鲁、邾、杞等诸侯军驻于鄫（今山东苍山西北），以等待晋军。晋军伐郑后会合诸侯之军南伐楚国，攻楚之焦、夷（皆在今安徽亳州市境）二地。又伐陈、晋悼公和卫献公率军驻于戚（卫邑，今河南濮阳市东），作为增援。

楚共王得知晋伐郑国，遂于秋天派大夫子辛率军伐宋救郑。攻至宋的吕（今江苏徐州市东南）、留（今江苏沛县东

南）。郑国大夫子然亦率军伐宋国，攻取宋的犬丘（今河南永城西北）。

晋悼公三年即郑成公十四年（前571）六月，郑国在位十四年的成公死，子髡顽（一作恽）继位，即郑僖公。郑国子驷、子罕、子国执国政。七月，晋国荀罃、鲁国仲孙蔑、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曹、邾两国代表在戚相会，谋划伐郑国。冬天，又再相会于戚，齐国崔杼、滕、薛、小邾三国代表亦参加，仍谋划伐郑国。仲孙蔑在七月之会上提出修筑虎牢城以逼郑国归服，即在原郑国归邑（今河南荥阳西北，后属晋）筑虎牢城。因齐国未派大夫参加相会，晋国不放心，缓行其议。后晋国以筑城事征求齐国意见，齐国表示支持，遂修筑。郑国被逼，只得叛楚服晋国。这是晋悼公即位后霸业上取得的一次成功。

次年（前570）六月，晋悼公、周顷公、鲁襄公、宋平公、卫献公、郑僖公、莒、邾两国君以及齐世子光于己未日在鸡泽（卫邑，今河北鸡泽南）相会。晋悼公派荀会到淮水岸边迎接吴王寿梦，吴王寿梦因道路太远，未能到会。吴王虽未到会，但表明晋、吴联盟。此时楚国伐陈，陈国成公派袁侨到鸡泽请盟归服晋国，并求诸侯出兵伐楚。因为楚国的子辛作令尹后，经常出兵侵凌小国。

晋悼公五年（前569）冬天，山戎无终部的首领嘉父，派使臣孟乐到晋国，通过魏绛（魏庄子）的关系进贡虎豹之皮，请求和好。晋悼公认为戎狄不讲信义，贪得无厌，不如讨伐。魏绛劝谏说：和戎有五利：一是戎人逐水草居，看重的是财货，土地则不重视，土地可用财货去换取；二是使边境安宁，人民安心生产；三是戎狄服晋，四邻震动，诸侯因晋国的威力

而慑服；四是以德安抚戎人，不动军旅，不用干戈；五是鉴于夏朝后羿的教训，用德和戎，远的前来，近的安心③。于是，悼公派魏绛和戎人各部结盟，使晋国无戎患之忧，人民安居乐业。

次年（前568）夏天，吴王寿梦派大夫寿越赴晋国，解释鸡泽之会时，吴王不能到会的原因，并请与中原诸侯修好，晋悼公表示谅解，将安排一次与诸侯相会。九月丙午日，晋悼公与鲁、宋、陈、卫、郑、曹、莒、滕、薛以及齐世子光和吴国、鄫国代表在戚相会。晋悼公命诸侯留军戍守陈国以防止楚国伐陈国。这是晋国自悼公即位后，诸侯到会最多的一次。冬天，楚国令尹子囊（公子贞）率军伐陈国，晋悼公会合十国诸侯军救陈。

一年之后（前566）楚国子囊再次率军围陈国，十二月，晋悼公邀请鲁、宋、陈、卫、郑、曹、莒、邾等国君在郑相会，谋划救陈国。郑僖公自从当太子时，就与子罕、子丰有矛盾，这次去郑与诸侯相会时，郑僖公对同去的子驷又很不礼貌，于是行至鄵（郑邑）时，子驷派人乘夜弑僖公，而以得急病而死向诸侯报丧。僖公之子嘉，时年五岁，郑国大夫遂以嘉继位，即郑简公。陈国哀公本已到会，由于怕被楚国扣留，不待会议结束而逃走。

晋悼公恢复霸业，主要是争夺中原诸侯国，如宋、郑、卫更是大国争夺的主要对象。而这些诸侯国为了在晋、楚长期争霸中求得相对的安宁，只好在两国中周旋应付。郑简公即位元年（前565）夏天，郑国子国、子耳为讨好于晋国，率军伐楚的盟国蔡国，俘蔡司马公子燮，郑国诸大夫皆喜，唯有子国的儿子子产（公孙侨）忧虑说：小国无文德，而有武功，祸莫大

焉。楚人来讨（伐），能不从？若从，晋师必至。晋、楚伐郑，从今往后郑国在四五年内不得安宁④。不出子产所料，是年冬天，楚国子囊率军伐郑国，讨其伐蔡之罪。郑国大夫们各持己见，子驷、子国、子耳要从楚国。子孔、子乔、子展要事晋国。子驷说：民急矣，姑且从楚以缓和人民的苦难。晋师至，我们又顺从晋。恭敬的准备好财货，等待来攻伐的，这就是小国所能做的。牺牲玉帛，放在两边的边境，等待强者来保护人民。敌人不为害，人民不劳困，不也是很好吗？这种"牺牲玉帛，待于二境"⑤，就是春秋时期在大国争霸中求生存的中小诸侯国实况。

因为郑国从楚国，晋国当然不能坐视，次年（前 564）十月，晋悼公邀集诸侯之军和出动晋国的八卿伐郑国。鲁国季武子、齐国崔杼、宋国皇郧和荀罃、士匄所率中军围攻郑之东门。卫国北宫括、曹、邾两国军和荀偃、韩起所率上军围攻郑之西门。滕、薛两国军和栾黡、士鲂所率下军围攻郑之北门。杞、郳两国军和赵武、魏绛砍去路旁树以开道。甲戌日，驻军于汜（东汜、郑地。今河南荥阳西北），晋悼公命诸侯积极备战，准备攻城。郑国恐惧，简公派使向晋求和。荀偃建议：先围城，等待楚军救郑时与楚战，如此郑国的求和才有诚意。智罃建议：先与郑结盟而还军。采用疲劳楚军的办法，将四军分为三军，加上诸侯的精锐部队，楚军来则轮流与战。这样我军可以以逸待劳，使楚军疲惫不堪。是时，因诸侯们都不愿打仗，晋才同意与郑讲和。十一月己亥日，晋和郑同各参战诸侯结盟于戏（今河南登封嵩山北），但晋国感到未能完全使郑归服，故十二月癸亥日，又再次率诸侯军伐郑，围攻郑都三门，因长期在外，军队疲劳，只得还军。

是年，秦景公派使向楚共王求兵伐晋国，共王允许。子囊说：不可。当今吾不能与晋争。晋君用人是依据能力，所选拔的人都很胜任，任命官员后政策不改变。晋国的卿也不争位，而是让给有能力的人，大夫不失职，士努力教育人民，庶人致力于农耕，商工皂隶也不改变其业。韩厥老了，由知罃继他执政。范匄比中行偃年少而在中行偃之上，使其为中军副。韩起比栾黡年少，而在栾黡、士鲂之上，使其为上军副。魏绛功多，因赵武贤而甘愿作他的辅佑。君明、臣忠、上谦让、下努力。这时正是晋国兴旺时，不能抵挡。只有事奉才行，请君王考虑⑥。共王为其已许秦不失言，在秦伐晋时率军驻于武城（楚邑，今河南南阳市北）作为支援。

楚国子囊的这番对晋悼公即位后的分析，概括了晋悼公恢复霸业的条件，之所以能复霸中原，也就是具有这些有利条件。但此时的霸业已失去了齐桓公、晋文公时期“尊王攘夷”，保护中小诸侯国，促进社会生产的性质，而是一种强权政治。

注　释

①《左传·成公十八年》。

②据《左传·成公十八年》。

③据《左传·襄公四年》。

④据《左传·襄公八年》。

⑤⑥《左传·襄公八年》。

先秦

鲁三分公室

鲁国在晋、楚争霸中，也是两大国争夺的对象，虽然未如宋、郑、卫受害多，但也要常以财货向两国行贿、讨好，以求得暂时的安宁。齐、鲁两国是东方大国，两相为邻。齐国自孝公以来，欲恢复桓公时的霸业，而鲁国则是齐国首先攻伐的对象。在晋、楚争霸中，齐先盟于楚对抗晋，鲁是晋的盟国，齐助楚也是首先攻伐鲁国。如鲁文公十五年（前612）齐国伐鲁西鄙，虽然季文子（季孙行父）向晋告急，晋灵公也与诸侯会议救鲁，但齐向晋行贿，晋国也就还军不管。齐国第二次伐鲁西鄙。鲁文公也只好派襄仲（庄公之子，公子遂。又称仲遂、东门遂、东门襄仲）向齐国行贿，两国才在郪（今山东临淄附近）结盟。鲁文公十七年（前610年），齐国又伐鲁国西鄙，鲁国再次求和，两国盟于谷（齐邑，今山东东阿境内）。鲁文公死（前609），襄仲欲立敬嬴所生之子倭，叔仲不同意。襄仲向齐惠公请求，惠公刚继位，为了亲近鲁国，遂同意襄仲所求。十月，襄仲就杀了齐女哀姜所生的太子恶和恶之弟视，而立倭为君，即鲁宣公。鲁国公室因此衰弱，而“三桓”势力强

大。“三桓”即鲁桓公之族的仲孙氏、叔孙氏、季孙氏。

鲁宣公元年（前608）夏天，鲁宣公因得到齐惠公的支持才登上君位，为表示感谢齐国，派季文子赴齐，并以济西之田作为谢礼。于是鲁宣公和齐惠公在平州（齐邑，今山东莱芜西）相会。襄仲至齐国，拜谢两国君相会修好。鲁宣公七年（前602）夏天，齐惠公会同鲁宣公率军伐莱国（古国，今山东昌邑东南，一说黄县东南）。宣公九年（前600），鲁国又攻取曹姓小国根牟（今山东沂南东南）。次年秋，公孙归父（子家）率军伐邾国，攻取邾的旧都绎（今山东曲阜市东南）。次年（前598）夏天，公孙归父又会同齐大夫伐莒国（今山东莒县）。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宣公为适应形势的发展，改革田税，实行“初税亩”，标志井田制在鲁国的瓦解。

鲁宣公十八年（前591）十月，公孙归父因是襄仲之子，由于其父立宣公，受到宣公之宠。他见“三桓”的势力强大，公室衰弱，想要张大公室势力，自己又无其力，于是和宣公谋划只有去晋国聘问，借用晋国的力量除去“三桓”。宣公派公孙归父赴晋聘问。不久，宣公死。季文子在朝中说：使我国杀嫡立庶，失大援者，襄仲①。季文子所说的失大援者，就是指楚国，晋国和齐国。于是季孙氏驱逐了东门氏。公孙归父从晋国返鲁，走到笙（鲁地，今山东荷泽北），得知宣公已死，就地设立土坛行复命礼，之后又哭奠宣公，遂逃往齐国。宣公因齐国与晋国结盟，惧怕齐伐鲁，故在死前派使至楚国请求出兵伐齐。适楚庄王死，遂以丧期为由而拒绝出兵。宣公死后，其子黑肱继位，即鲁成公。

成公即位后，见楚不支援伐齐，又怕晋、齐伐鲁，为加强军事力量，增加军赋，于是“作丘甲”。臧宣叔（即宣叔，臧

文仲之子，名许)，下令鲁国人整治军赋，修缮城郭，完备城防。并说："齐、楚结好，我（国）新与晋盟，晋、楚争盟，齐师必至，虽晋人伐齐，楚必救之，是齐、楚同我也。知难而有备，乃可以逞（解除祸患）。"②次年（前589)，发生"鞍之战"和无诚意的"匮盟"。"鞍战"和"匮盟"都是因鲁国和卫国向晋国请求出兵伐齐而引起的③。

鲁国与晋结盟，归服晋以后不仅是求得晋国保护而过安宁生活，而是要为盟主服务，听从盟主的命令。如鲁成公六年（前585)，晋景公命鲁国派兵伐宋。鲁成公派仲孙蔑、叔孙侨如率师伐宋国，两年后，晋景公派韩穿出使鲁国，命令将齐侵夺的汶阳之田还齐。汶阳之田齐国本已归还鲁国，现在又要奉命再给齐国。晋景公晚年作这种荒唐之事当然引起诸侯不满。故季文子在给韩穿饯行的酒宴上，私自对韩穿说："大国处理事务应当合理义，并以此来作盟主。这样诸侯才怀念盟主德行，畏惧讨伐，才没有三心二意。说到汶阳之田，原是敝国的土地，齐国用武力侵占，后来贵国对齐用武，齐国又归还给敝国。现在又有不同命令说：'归还给齐国。'信是以行义，义以完成命令，是小国所盼望的作法。信不可知，义无所立，四方诸侯谁还能够一心相信贵国。《诗》中说：'女子并无过，男士却有错。男士没有准，前后都不一。'七年中，一给一夺，前后不一，一个男士前后不一，尚且丧偶，何况是霸主呢？霸主应当以德，而前后不一，怎能长久得到诸侯拥护？《诗》中说：'谋略缺远见，因而极力劝谏。'行父恐晋国不能深谋远虑而失去诸侯，所以才私和你说。"④

又如，鲁成公十年（前581）七月，因晋景公死，鲁成公赴晋国吊丧，结果被晋国怀疑鲁国亲楚国，借口要给景公送葬

将成公扣下。冬天，葬景公，送葬的诸侯只有鲁成公。故鲁国人以此为耻辱。次年三月，鲁成公与晋国订立不背晋的盟约后才被放回鲁国。

鲁国“三桓”中的季孙氏，自季文子在鲁宣公时执国政开始，就深得人们的赞扬和爱戴。驱逐东门氏就是他的主意，“作丘甲”也是他见鲁国在军事力量上弱，才被齐国攻伐，故提出增加军赋，扩大兵源的改革措施。鞍之战，也是由他率鲁军参战。鲁成公六年（前585）二月，季文子因在鞍战立了功而建立武宫，受到人们指责为不合礼。依靠别人来救乱取胜是不能建立武宫的。

叔孙侨如与鲁成公的母亲穆姜通奸，欲除掉季文子和仲孙蔑而夺取家产，还与穆姜合谋欲以公子偃取代成公。成公十六年（前575），鲁成公与季文子率军参加晋国和诸侯联军伐郑国。叔孙侨如派使告诉晋国郤犨：“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如同晋国有栾氏、范氏。政令就是他们制定的，现在他们谋划说：‘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可事齐、楚，哪怕亡国，也不从晋国。’晋国如果要想得志于鲁国，就请将季孙行父留下杀了他，我把仲孙蔑处死。”⑤于是晋人在九月拘留了季文子。成公回国途中派子叔申伯至晋请求郤犨放回季文子。晋的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于鲁（国），相二君矣（宣公、成公）。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可不谓忠乎？相信奸而弃忠良，怎样能向诸侯交待？”⑥于是同意与鲁讲和，放了季文子。十月，驱逐叔孙侨如，与大夫们结盟。叔孙侨如逃往齐国。十二月，季文子与晋郤犨盟于扈。回到鲁国后，刺杀了公子偃，从齐国将叔孙豹召回国而立为叔孙氏的继承人。

鲁成公十八年（前573）秋天，鲁成公死，子午继位，即

鲁襄公。据《史记·鲁世家》载："是时襄公三岁也。"襄公五年（前568）冬天，历经鲁国宣、成、襄三君执国政的季文子死。他是"家无衣帛之妾，厩无食粟之马，府无金玉，以相三君"⑦。一生清苦廉洁，为后人称颂。

鲁襄公十一年（前562），鲁国执政季武子宿（一作夙，季文子之子），分公室二军为三军。即由原有的上军、下军，再增加一个中军，扩大为三军。由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各家率一军。按周礼的军制是：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鲁国初封时是三军，其后削弱，只有二军。春秋时仍是寓兵于农，平时务农，战时披甲上阵。平民也可当兵，也是战时入武。每户要有一人服兵役，按军事组织编入军籍，军事装备由入武户自备，另按行政和田制单位出军赋。故掌握了军队不仅有兵源，也就有其军赋，实质上是形成政治上的势力。季武子的"作三军"就是将国君的军事实力分转于三家大夫手中，成为"三分公室各有其一"⑧。

季武子决定"作三军"时，告诉叔孙穆子（叔孙豹）。穆子有些不放心，认为这样大权要由季孙氏来掌管，不一定搞得好。在季武子一再要求下，穆子才同意，但又提出要立盟誓。于是在僖公的宗庙门前立盟，在鲁国都东南方的五父衢（道名）诅咒。三家各自改编军队，要是不够，将自己的家兵（臣）也补编其中，原是公室的军籍也全变为各家的军籍。季孙氏将所属乡邑入武的人免征税，不入者则加倍征收，又将一部分赋税献给公室。叔孙氏只将入武的赋税由自己收取，其余则仍归公室。孟孙氏只把入武的一半归自己，其余全归公室。这样由三家一分，公室自然就没有实力而受到削弱，三家掌握实际民力与物力。

鲁国是保存周礼最多和最完整的国家，入春秋以后，社会变革较慢，季孙氏在促进社会改革中起了主要作用。三分公室表面是“三桓”大夫与鲁君权与利之争，实质上是鲁国又一次社会改革。到鲁昭王五年（前537），又废中军而改作四军，进一步降低公室的地位，而四军中季孙氏取其二，叔孙氏、孟孙氏各占一军，改为征兵或征税制，向昭公缴纳贡赋。

注 释

①《史记·鲁周公世家》。

②《左传·成公元年》。

③见本卷《鞍战与匮盟》。

④据《左传·成公八年》。

⑤⑥据《左传·成公十六年》

⑦《史记·鲁世家》。

⑧《左传·襄公十一年》。

向戌弭兵

"春秋无义战"①。在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中，仅据鲁国史《春秋经》的记载，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多达约五百次，朝聘盟会四百五十次。这些活动都是诸侯大国对小国、强国对弱国剥削掠夺。在长期的争霸过程中，晋、楚两国交战十七次，晋、秦两国交战十八次。郑国受大国攻伐七十二次，宋国四十六次。如果说在齐桓公、晋文公争霸时，还带有保护中小国，安定社会生活，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到春秋中后期的晋、楚、吴、越的争霸，就是一种强权政治，纯属是掠夺领地，扩大势力范围。

第一次弭兵会盟，即"华元弭兵"（前579)，晋、楚两国只维持了三年不战，伴随鄢陵之战（前575)，弭兵罢战遂宣告破产。此后三十年间，中原各诸侯国又再卷入战火中。停止战争，安定社会，使人民安居乐业，发展生产，是当时各诸侯国和人民的共同愿望。甚至晋国六卿因忙于兼并土地，抢夺政权，对争霸战争也不感兴趣，宋国的左师向戌认识到再次弭兵的条件已成，遂奔走各国，促成第二次弭兵会盟。

晋悼公与楚国争霸，郑国始终周旋于两国。晋悼公十一年(前564)，晋国的八个卿大夫会同诸侯联军伐郑国，郑国与晋盟于戏。晋还军后，楚共王又率军伐郑国，郑国子驷准备和楚国订盟。子孔、子蟜认为："与大国盟，口血未干而背之（背叛盟誓）可乎？"子驷、子展认为："吾盟固云（本来就说）：'唯强是从。'（谁强大就服从谁）今楚师至，晋（国）不我就（不救我们），则楚强矣（楚就是强大国家）。盟誓之言，岂敢背之。且要盟无质（而且要挟下的盟誓无诚意）神弗临也（神灵不会降临），所临唯信（所降临的是有诚意的盟誓），信者，言之瑞也（是言语之凭据），善之主也（善良之主体），是故临之（所以神灵才降临）。明神不蠲要盟（明白的神灵认为要挟的盟是不干净的），背之可也。"②这说明春秋时期的会盟，尤其是在中小国对大国只能如此的"唯强是从"，神灵也不会降临至祸，不讲信义，随时可背叛。因此与楚国大夫公子罢戎进入郑国都，同盟中分里。

次年，郑国发生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五族作乱，杀子驷、子国、子耳，劫持郑简公。子西、子产、子蟜率众平乱，杀尉止、子师仆。侯晋逃往晋国，堵女父、司臣、尉止之子尉翩，司齐逃往宋国。子孔继续执政。晋国为了对付郑国，又命诸侯之军扩建虎牢城（筑虎牢城之事在公元前571年）而戍守。晋军驻在虎牢城附近的梧（今河南荥阳西）和制（今荥阳西北）。晋悼公命士鲂、魏绛戍守。郑国惧怕，与晋国和诸侯讲和结盟。不久，楚国令尹子囊率军救郑，留守的晋军知敌不过楚军而撤退，郑国又与楚国讲和结盟。

郑简公四年（前562）夏天，郑国耽心晋、楚两国攻伐，朝中大夫们商议对策，认为：不从晋国，国家几乎灭亡，楚国

弱于晋国。而晋国又不急需要郑国，如果晋国急需要，楚国就会避开晋国。只有想法使晋国来攻伐郑国，然亲晋国，楚国就不敢来伐郑国。子展建议：只有向宋国挑衅，激怒晋国，晋国和诸侯之军就会来讨伐。于是，子展率军伐宋国。晋悼公果然率十一个诸侯国之军伐郑，郑国请求和解结盟。秋天，在亳北（今河南郑州北）订盟。盟书大意：凡我同盟，不囤积粮食，不垄断山川之利，不保护罪人，不留藏奸邪。救灾荒，恤祸乱，同好恶，辅助王室。若有触犯这些命令，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的群神，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察的神共同诛杀，使其失去人民，丧君灭族，亡国亡家③。这样的盟书如同子驷、子展所说的是"要盟无质"神灵不会降临，郑国仍然奉行"唯强是从"。所以不久楚国令尹子囊请求秦国支援伐郑国，秦右大夫詹就率军同楚共王伐郑，郑简公不待楚，秦军至就迎着楚共王表示服楚，并与楚、秦联军伐宋国。九月，晋国和诸侯联军又伐郑，讨其背亳北之盟，联军到郑都东门外示威，郑国派王子伯骈求和。甲戌日，晋赵武进入郑都与简公结盟。十月丁亥日，郑子展出城与晋国结盟。

齐国在春秋中后期，也多次欲与晋、楚争霸，大有三足鼎立之势。鲁国与齐国为邻，是东方两大国，齐国要争霸，首先受害的就是鲁国，而齐国对晋国，则保持一个不即不离的态度。齐灵公十年（前572），晋会诸侯于彭城，齐国未派军参加，晋国讨伐，齐灵公只得请罪，并以太子光入晋国为人质。次年，晋国会诸侯修筑虎牢城，齐国又不派军参加。晋国怀疑齐国有心向楚，于是晋国还以筑城之事征求齐国意见，得齐的同意后才修筑。齐灵公二十年（前562），亳北之盟，对大多数诸侯说是一种应付，齐国更是采取消极的态度。其后参加诸

侯联军讨伐，都是消极对待。

齐灵公二十四年（前558）夏天，齐灵公率军伐鲁国，围成（今山东宁阳北）。是年十一月，晋悼公死，子彪继位，即晋平公。一年后（前556），齐又伐鲁国，灵公率军围鲁的桃（即洮，今山东汶上北），高厚围臧纥（武仲）于防（今山东泗水县西南），鲁军增援后才退齐军。次年冬天，齐灵公又率军伐鲁国，攻至鲁北鄙。晋平公会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郳等十一国君于鲁国济水之滨，重温两年前（前557）诸侯于溴梁（今河南济源西）相会的盟誓，齐灵公未到。之后，晋会同诸侯军伐齐，齐灵公在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抵御。夙沙卫劝灵公："不能战，莫如守险。"④灵公不听。诸侯军进攻，齐军战死很多。晋国范宣子告诉齐大夫析文子，鲁、莒两国都以车千乘助战。析文子告诉灵公，灵公恐惧，登上巫山望见晋军人多，连夜率军偷偷逃回临淄。次日师旷对晋平公说："鸟乌之声乐(欢乐)，齐师其遁(已逃走)。"⑤晋大夫邢伯告诉中行伯（献子），有班马之声（马互不相见而嘶鸣）。叔向也对晋平公说，"城上有乌（乌鸦），齐师其遁"⑥。十一月初一，联军进入阴平，然后追齐军。晋国荀偃攻取京兹、魏绛攻取邿、赵武围卢（三地都是齐的险隘，在阴平周围），联军遂围齐都临淄。次年正月，伐齐的诸侯与齐国正在督扬（即祝柯，今山东长清东北）结盟，誓词有"大毋侵小"。

是年七月，齐灵公死。灵公初以光为太子，因宠妾戎子生子牙，遂废光，立牙为太子。灵公病时，大夫崔杼（武子）迎回光立为太子，灵公死后，以光继位，即齐庄公。次年（前553）六月，晋因齐在丧期，与齐讲和。晋平公会宋、鲁、卫、郑、曹、莒、邾、滕、薛、杞、郳等国君与齐庄公在澶渊（卫

地，今河南濮阳西北）结盟。

齐庄公六年（前548）齐国发生内乱。棠邑大夫棠公之妻美，棠公死后，崔杼娶为妻。齐庄公与其通奸，多次去崔杼家，并以崔杼帽子赏赐人，崔杼因此怀恨。庄公即位后的第二年，晋国发生内乱，栾盈及同党中衍喜等五人逃往齐国，庄公不听晏婴劝谏，收留栾盈等人。次年（前550），庄公助栾盈返晋作乱，又乘乱伐晋国。崔杼欲与晋合谋伐齐国，借此杀庄公，但无机会。庄公鞭打宦者贾举，贾举遂为崔杼提供庄公的行止。五月，莒国君朝齐，庄公设宴招待，崔杼推说有病不视事。次日乙亥，庄公到崔杼家探病，又和崔杼妻相混。宦者阻其侍卫入内，崔杼遂率家众攻弑庄公。丁丑日，崔杼立庄公异母弟杵臼为君，即齐景公。景公即位后，任崔杼为右相，庆封为左相。齐国太史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载入史册，崔杼杀太史，太史的两个兄弟仍然如此写，崔杼又杀之。太史少弟仍复书"崔杼弑其君"，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得知连杀三个太史，于是抱简而来，知已经书于史册才返回。齐景公元年（前547），庆封灭崔氏家族，崔杼自杀。

楚国由于吴国的渐强，受到牵制，与晋国争霸的力量日见衰弱，但又不甘心服从晋国。楚共王二十九年（前562），楚国欲伐郑国，还要"乞旅于秦"⑦。吴王寿梦二十五年（前561）九月，寿梦死。寿梦有四子，长子诸樊，次子馀祭，三子余昧（一作夷末），四子季札。因季札贤，寿梦原想立季札为太子，季扎坚辞让诸樊，故由诸樊继位为吴王。诸樊即位后迁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市）。次年九月，楚共王死，其子昭继位，即楚康王。吴国乘楚国在丧服期而出兵伐楚。楚国派养由基和司马子庚抵御，战于庸浦（楚地，今安徽无为南），大败

吴军，俘吴公子党。第二年正月，吴国向晋国告败于楚事，请求晋国率诸侯之军伐楚。晋国范宣子（士匄）率诸侯大夫会于向（郑地，今河南尉氏西南）商议助吴伐楚之事，诸大夫不同意伐楚。范宣子以乘丧服期讨伐是不道德而辞吴国。是年秋，楚康王为报复庸浦之战，派令尹子囊率军伐吴国，因吴军不出而还。子囊率楚军殿后，以为吴军无能而不加警戒，吴军则从要隘皋舟突击，将楚军拦腰击溃，俘楚公子宜谷。

楚康王十二年（前548）秋天，楚国令尹选子冯死，屈建（子木）为令尹。冬天，屈建命芳掩为司马治理军赋，清查甲兵。芳掩将土地分为九类：山林、薮泽、京陵、淳卤（盐碱地）、疆潦（板结易潦地）、偃潴（下湿地）、原防（堤防间小块地）、隰皋（水边淤地）、衍沃（平而肥沃地）。根据这九类来定不同军赋和甲兵数量。因前一年楚国用水军攻吴国（即“舟师之役”），无功而还。故是年十二月，吴王率军伐楚，以报复“舟师之役”，攻楚巢门。楚王用巢门牛臣之计，开门用箭射死樊诸。吴国按制由馀祭继位为吴王。

晋平公十年（前548），晋国赵武（文子）继范匄执政。他根据当时列国的形势，需要求得一个安定的和平环境而提出：“令薄诸侯之币而重其礼（减少诸侯贡品而重视礼仪）。”“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战争可以稍为消除）！齐崔、庆新得政（齐国崔杼、庆封新当政），将求善于诸侯（都要谋求与诸侯友善）。武也知楚令尹（赵武与楚国令尹屈建友善）。若敬行其礼（如恭敬执行礼仪），道之以文辞（用文辞引导），以靖诸侯（以安定诸侯），兵可以弭（可以息兵罢战）。”⑧

第一次弭兵，是宋国华元倡议促成，只维持了三年，因发生鄢陵之战而破产。此后的三十年中，晋、楚争霸战争仍不

断。加上齐、吴多次想争夺，至使中原地区战祸不断，人民深受苦难，人民反战，诸侯也厌战。因而宋国执政大夫向戌又出来促弭兵，因他与晋国正卿赵武、楚令尹屈建都是好友，只有他来争取弭兵最为可行。于是，在宋平公三十年（前546）秋天，向戌先赴晋国，告诉赵武欲召开诸侯弭兵之会。赵武与大夫们商议，韩宣子说："战争，是人民的残害者，财产的蛀虫，小国的大灾难，要将息兵罢战，虽不一定能办到，但必须允许，若不允许，楚国允许后，以此来号召诸侯，则我晋国就要失去霸主的地位了。"⑨如此，晋国就同意向戌的建议。向戌又到了楚国，楚国也同意。到齐国后，齐景公感到为难。陈文子（须元）认为：晋、楚都同意，齐国不同意将失去人心。故齐国也同意。又告于秦国，秦国也同意。告于各个中小国家，都表示同意。于是决定这次弭兵之会仍在宋国举行。

从五月甲辰日开始，首先到达宋国的是赵武。之后，是郑国的良霄，鲁国的叔孙豹，齐国的庆封、陈文子，卫国的石恶，晋国的荀盈，邾国君文公；楚公子黑肱，陈国的孔奂，蔡国的公子归生，曹、许两国大夫也陆续到宋国。七月辛巳日，仍在宋国都蒙门外结盟。但在结盟将举行时，晋、楚、秦、齐等大国，为地位、盟约内容等事明争暗斗，气氛也不友好。在歃血盟誓时，晋、楚两国都要争先，楚国人还内穿甲衣，甚至"楚令尹子木欲袭晋军"⑩。经过向戌的劝说，赵武才让楚屈建居先作主盟。盟誓主要内容仍然是：晋、楚及其从国互相朝会，不要用兵，不要再残害人民，要利小国等。这就是第二次弭兵会盟。也称"向戌弭兵"。

向戌弭兵的效果是"不义之战"相对减少，但中小诸侯国的负担反而加重。原来只是将牺牲玉帛置于晋、楚两国边境

上，“唯强是从”，谁强就向谁进贡。现在是晋、楚都要贡，负担由一国变为两国。如鲁国向晋国的进贡和朝贺的负担就比以前多得多。晋国司马女叔侯向晋平公说：“鲁之于晋也（鲁国对于晋国），职贡不乏（贡品不缺乏），玩（物）好时至（按时送到），公卿大夫相继于朝（来朝贺），史不绝书（史官没有中断过记载），府无虚月（国库中每月都不空）。”⑪。楚灵王六年（前535），楚灵王建成章华之台。伍举说：“今君为此台也，国民罢（疲劳）焉，财用尽焉，年谷败焉（误农时），百官烦焉，举国留（治）之，数年乃成。”⑫修了个劳民伤财的台后，灵王原打算举行落成典礼，邀请中原诸侯参加，借此可从诸侯贺礼中捞些财帛，但遭诸侯们拒绝，只有鲁昭公前往参加。途经郑国时，郑简公还要设宴招待⑬。晋平公二十四年（前534），晋国建成虎祁之宫，落成典礼，鲁昭公、郑简公都前往晋国祝贺⑭。

注　释

①《孟子·尽心下》。

②《左传·襄公九年》。

③据《左传·襄公十一年》。

④⑤⑥《左传·襄公十八年》。

⑦《左传·襄公十一年》。

⑧《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⑨据《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⑩《国语·晋语八》。

⑪《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⑫《国语·楚语上》。

⑬《左传·昭公七年》。

⑭《左传·昭公八年》。

子产相郑

春秋末期各诸侯都在自谋出路，各国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调整各种关系，加强实力。于是出现一些具有远见和改革思想的政治家。郑国的子产就是其中之一。

子产名侨（又作乔），又字子美，公孙氏，又称公孙侨。因谥为成子，故又称公孙成子。子国之子。自青年时就有远见，常发表政治见解。郑简公元年（前565），郑国伐蔡国，俘虏蔡的公子燮，诸大夫皆喜，唯有子产忧，认为“从今后郑国在四五年内不得安宁”①。显示出子产有敏锐的政治眼光。而是年冬天，楚国令尹子囊就率军伐郑国，讨其伐蔡之罪。次年晋国荀罃、范宣子等率晋中、上、下、新四军和诸侯联军伐郑，围攻郑东、西、北三门。第三年，诸侯之军扩建虎牢城，晋国士鲂，魏绛留戍，逼郑与晋及诸侯讲和。第四年，因子展伐宋国，晋悼公会同诸侯伐郑国，耀兵于郑都南门外，郑简公只得再次请盟，遂盟于亳。不久，楚国令尹子囊乞师于秦国，与秦右大夫詹率军伐郑国。于是，晋国与诸侯军以郑国背叛亳北之盟而伐郑。这正如子产所说四、五年内不得安宁。

郑简公三年（前 563），因在郑国出兵抵御晋和诸侯军伐郑的战役中，执政的子驷，对贵族尉氏的尉止无好印象，出战前减少尉止所率的兵车。战斗中尉止获得的俘虏，子驷也要争夺。又抑制住对尉止的不满，说尉止率的兵车太多，不合于礼，不让尉止献俘。子驷曾在整顿田界，开通田中沟洫时，使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田地。所以这五个宗族就聚集一伙不得志的人，凭藉公子族结党的关系发动叛乱。

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众攻入晋国执政办公的西宫，杀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司徒子孔（公子嘉）事先知其五人要叛乱而避开，所以没有死，郑简公也被劫持到北宫里。子西（子驷之子）得知，收了父尸后，在家未置警戒就去追赶叛乱者。但叛乱者已入北宫，子西回家欲武装家众，但家臣和妾婢大多都逃走，财物也多丢失。子产得知五人叛乱，立即设置门卫，分派各种官员坚守岗位，关闭府库，收藏好重要物件，布置完防备后，将士卒编列完毕，率领兵车七十乘，攻叛乱者所占据的北宫。子蟜率领国人援助，杀尉止、子师仆，随叛者尽都被杀。只有侯晋逃奔晋国，堵女父、司臣、尉翩（尉止之子）、司齐逃往宋国，叛乱遂平。从子产指挥平息这次叛乱来看，他是临乱不慌，分派布置有序，初露与众不同的才能。

平叛以后，子孔执掌国政，遂擅自制定盟约，要众官员按其执政者的规定行事，不得参与朝政，官员们不从，子孔便欲杀不从者。子产劝止，要他将盟书焚毁。子孔不同意说："为书（制定盟书）以定国（安定国家），众怒而焚（毁）之，是众为政也，国（事）难（办）乎！"子产对他说："众怒难犯，专（横）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危险的办法）。

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你可得到所想要的），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不是可行吗）？专欲无成，犯众兴祸（触犯众人产生祸患），子必从之。”②于是在仓门外焚毁盟书，官员们才安心。

郑简公十一年（前555）十月，简公率军参加诸侯联军与晋伐齐国，命子孔、子西、子展守国。子孔独断专横，视大夫为仇敌，欲除掉诸大夫，便叛晋亲楚，想借楚军来郑国除诸大夫，于是便秘派使至楚国与楚令尹子庚（公子嘉）联络。子庚本不同意，但楚康王命其前往，子庚只得率军赴郑国。子展、子西预知子孔的阴谋，就加强城守。子孔见阴谋败露，不敢与楚军会面，楚令尹子庚遂率军转攻郑国的费滑、胥靡、献于、雍梁等地（皆在今河南偃师一带），又攻至虫牢（今河南封丘北），然后还军南归。

次年（前554）八月，因子孔的独断专横激怒郑国人，要追究他在九年前的五族作乱，事先知道而不举报，又私通楚国，要楚军讨伐自己的国家的罪行。于是子孔调集自己和子良、子革等家族的甲士戒备。甲辰日，子展、子西率国人讨伐，杀子孔而分其家产。郑国人以子展执政，子西听政，立子产为卿。子产就是在郑国内外纷繁的斗争中走上政治舞台的。

郑简公十七年（前549）二月，简公赴晋国，子西随同前往。子产托子西到晋国转致晋国执政范宣子一信。因晋国自范宣子执国政后，诸侯朝见晋国的贡品很重，郑国人深为忧虑。故子产的信中说：“您执掌晋国之政，四邻诸侯不知您的德，只知贡品太重，侨也感到迷惑。侨闻君子执掌国家者，不是担心无贿赂，而是担心无好名声。诸侯之贿赂聚于公室，诸侯就会离心。若您依赖于此，则晋国就会不统一。诸侯有离心，则

晋国就会受损害。晋国不统一，则您的家就会受损害。为何不明白呢！哪还要用贿赂？好名声，如同载德之车。德，是国家的根基，有根基才不能毁坏，不也是应致力于此吗？有德则快乐，快乐就能长久。《诗》中说：'快乐啊快乐，是邦家根基。'这就是有美德吧！'上帝临汝，无三心二意'。这就是好名声吧！用谅解来扬德，就可以载上好名前进，使远方人来，近处人安心。您愿意别人说：'您养活我？'还是说：'您榨取我养活自己？'象有象牙而毁掉自身，是由于象牙值钱的原因。"③

范宣子读了子产的信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诸侯的贡品。此次郑简公朝见晋国，一是请求减轻贡品，二是因陈国仗恃大国的势力而欺凌郑国，故请求晋国向陈国问罪。

次年六月，子展、子产率兵车七百乘伐陈国，半夜突击攻入陈都。陈哀公扶其太子偃师逃到坟堆间。子展禁止士卒入陈哀公的宫室内，并和子产亲自守门。陈哀公自缚请罪，郑军才回国。秋天，子产向晋国去献伐陈的战利品，身着戎装。晋平公问陈国之罪，子产作了回答。问何故侵小（国）？子产回答：过去天子之地，方千里，诸侯方百里，以此递降。今大国之地，方数千里，若不是侵夺小国，何以有如此之大？又问为何着戎装？子产回答：这是天子旧制，献捷着戎装，不敢废弃④。十月，子西再次伐陈国，陈国请和。

郑简公十九年（前 547），简公赏赐伐陈国的功臣，三月初一，举行赏赐享礼。赐子展八个邑，赐子产六邑，子产以礼辞。简公坚持要赐，最后子产只受三个邑。公孙挥观察子产的作风后说子产将要执国政了，谦让而又不失礼仪⑤。

郑执政大夫伯有（即良霄，郑公子去疾之孙）嗜酒如命，在家挖一地下室贮酒，作长夜之饮。对政事则专横跋扈，因酗

酒又常不上朝而懈怠政事。郑简公二十三年（前543），简公命伯有出使楚国，他不愿去，迫使公孙黑（子皙）去，自己回家饮酒。当公孙黑从楚回郑以后去见他，他仍在家饮酒不问政事。于是公孙黑召集驷氏家族甲士攻伐伯有，焚烧其家。伯有带醉逃到雍梁（郑邑，今河南禹县东北），待酒醒后才明白事情真象，于是又逃到许国。郑简公与大夫在大宫结盟，又和国人在国都城盟誓，不准伯有回国。伯有知道郑国人结盟是反对他，则很生气，又听说子皮的甲士未参加攻伐他，很高兴说："子皮与我是同伙了！"便潜回郑国。癸丑日晨，从墓门的下水洞进入郑都，依靠马师颉用襄库皮甲装备士卒攻旧北门。驷带以士卒攻伐伯有，两方都争取子产站在自己一方。子产说："兄弟间已闹得如此，我只有从天所愿。"伯有战死在羊肉店前，子产给伯有穿上衣服，并抚尸号哭，不久将伯有葬于斗城。驷氏家族与伯有一直有仇，因此对子产不满，想杀子产，子皮怒而制止说："礼，国之干也，杀有礼，祸莫大焉。"子产才免于死。

伯有死后，子皮执政。子皮见子产贤而有才，就让子产执政。子产推辞说："国小而偪（逼近大国），族大宠多（家族庞大受宠的又多）不可为也（不可能管理好）。"⑥在子皮劝说下，子产三让后才受政。

子产上任后根据郑国"族大宠多"的特点，首先安抚容易引起矛盾作乱的世家大族。如丰卷祭祀先祖，僭越用君主礼，子产不准。丰卷欲杀子产，被子皮制止，逐丰卷出国。子产请郑简公保丰卷家产，三年后丰卷回国，子产将家产归还。然后严厉制裁不守法之世家之弟，如大夫徐无犯之妹美，公孙楚（子南）与公孙黑争聘，告于子产。子产使女自选，徐之妹亲

自进定公孙楚。事后，公孙黑仍不甘心，欲杀公孙楚而夺其妻。公孙楚得知，遂以戈追击公孙黑，子产拘捕公孙楚流放于吴国。公孙黑仍不甘心，欲用族众除公孙楚族人，杀公孙楚，后因犯病才未成功。子产得知，急从外地赶回国都，命有司列出公孙黑的三条死罪，迫公孙黑自杀，并暴尸于周市之衢，尸傍写上罪状⑦。子产就是如此用"宽猛相济"的原则来治理郑国。

子产从郑简公二十三年（前543）开始执政，到郑定公八年（前522）死，这二十一年里，对郑国作了整肃和改革。"子产使都鄙有章（城乡有所区别），上下有服（上下尊卑各有其职），田有封洫（田地有四界水沟），庐井有伍（庐舍之民编为伍卒）"⑧。凡大夫忠俭者，给予肯定和表彰，奢侈不守法的，则依法严惩。"子产之从政也，择能而使之"⑨。如能断决大事的冯简子，擅长文辞的子大叔，能知四方诸侯情况的公孙挥（子羽），能出谋策划的裨谌等，子产都充分给予信任使用，大事皆与商议而后行。故卫国的北宫文子随同卫襄公赴楚国，路过郑国，北宫文子进入郑国都聘问。郑国的公孙挥、冯简子和子大叔接待北宫文子，作得十分有礼。北宫文子出来以后，对卫襄公说：郑国的一切都合礼仪，是其数世之福，恐怕不会再有大国去讨伐它了。

郑国人喜欢到乡校去议论国政。然明向子产建议毁掉乡校，子产说："人们早晚办完事去到乡校，议论政事的好坏，说得对的我就照办，他们认为不好的，我就改正，他们是我的老师。如何毁掉它？我听说用忠善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以权势来防止怨恨的。以权势岂能制止议论？就如防止河水一样，只用堤防，一旦决堤，伤人必多，我不能挽救。不如趁其小决

时加以疏导；不如我知道后当成治病的良药。”然明认为如果如此做下去，这不仅是有利于二三位大臣之事，而是有利于郑国。后来孔子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⑩子皮认为子产有能力治理郑国，所以将国政完全交给他去执掌。子产执政三年，郑国人赞颂说：“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栽培）。子产而死（死后），谁其嗣之（谁来继承）。”⑪

郑简公二十八（前538）秋天，子产“作丘赋”，即改革军赋，与鲁国“作丘甲”类似，以乡鄙中一丘为单位，出军事装备，国人服兵役，以此来增加军赋。于是遭国人反对，咒骂子产，子产说：“骂有何妨碍，如有利于社稷，生死都不管。我听说为善者不能改变法度，所以能成功。人民虽不满意，但法度不能变。”⑫于是坚持作丘赋。

郑简公三十年（前536），三月，子产将郑国的刑法条文铸于铜鼎上，公诸于众，以为常法，称“刑书”。这样，其后用刑就有依据，对于那些权贵们的不法行为起一些限制作用。这就触怒了那些利益既得者，甚至晋国的叔向（即叔肸、羊舌肸）写信给子产，在信中说：“开始我对你抱有希望，现在没有了。先王议事以是非来判罪，不制定刑罚，惧怕人民有争夺之心。都不能禁止，因此才用道义来防范，用政令来约束。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定禄位，以勉励服从的人；严判断刑，以威胁犯法的人。”又说：“民知有法律，就对上面不畏惧，都有争夺之心，可以用刑书作根据，而且微幸以成功，就不能治了。夏（朝）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朝）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种刑的产生，都在晚年。”又说：“你在世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吧！肸听说，

'国将亡，必多法'说的就是这个吧！"⑬

子产复信回答叔向说："如你所说。侨不才，不能想到子孙，我只是救当代。既不承命，敢忘大惠（赐教）！"⑭尽管遭到国内外的一些人的反对，子产还是公布了刑书，这是我国第一次公布的法律条文。

在对外上，子产反对强权外交，维护国家的独立。在朝见、聘问、会盟、接待等活动中，都是按礼而行。在对待晋、楚两国国君和大夫们，都是强调郑国是桓公所建，对周室有功，也是和大国一样，是独立诸侯国。遇大国君臣态度傲慢时，则引用历史上先君们是如何按礼来办的事例说明道理。如郑简公二十四年（前542）六月，子产陪同简公赴晋国朝见晋平公。晋平公借故不见，"子产使尽坏其馆之垣，而纳车马焉"⑮。即弄坏晋国接待宾馆的墙，将郑国车马进住。晋大夫士文伯指责子产，子产据理回答，其中有"侨听说文公作霸主时，自己的宫室简陋，没有亭台楼阁，但招待诸侯的宾馆却建得很好，有各种人侍候客人，有宾至如归之感。现在你们建的铜鞮宫大数里，而招待诸侯的馆舍如同奴隶的住房，门进不了车马，若不弄坏墙，连进贡的礼品也无处放"。士文伯无言以对，只得向赵武报告。赵武说"这是我们的过错"，派士文伯向子产道歉。晋平公也按礼用盛大的国宴接待了郑简公，然后送他们回去。

注 释

①见本卷《晋悼公复霸》。

②《左传·襄公十年》。

③据《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④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⑤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⑥《左传·襄公三十年》。

⑦《左传·昭公二年》。

⑧《左传·襄公三十年》。

⑨⑩《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⑪《左传·襄公三十年》。

⑫据《左传·昭公四年》。

⑬⑭据《左传·昭公六年》。

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先秦

专诸刺王僚

吴国与晋国结盟以后，一直在牵制楚国的力量，使楚国北上与晋争霸有后顾之忧。自吴王寿梦与晋及诸侯在戚（今河南濮阳北）相会（前568）后，吴、晋联盟更加巩固。寿梦死（前561），其子诸樊继位为吴王。次年，楚共王死，诸樊乘楚国有丧，伐楚，被楚大夫养由基败于庸浦（楚地，今安徽无为南），吴公子党被俘。第二年（前559）秋天，楚康王为报复上年吴伐楚，派令尹子囊率军伐吴。被吴军在皋舟（吴之要隘）拦击，败楚军。楚公子宜谷被俘。楚康王十一年（前549）夏天，康王率水师伐吴国，因不设赏罚，无功而还。冬天，吴国为报复“舟师之役”，召集楚的属国舒鸠，舒鸠遂叛楚国。楚康王欲伐舒鸠，但舒鸠否认叛楚，于是退军。次年七月，舒鸠终于叛楚，楚令尹子木率军讨伐，吴国出兵救舒鸠，两军相持七日，结果吴军被楚军战败，遂围攻舒鸠，舒鸠被击溃。八月，楚灭舒鸠。是年十二月，吴王诸樊率军伐楚，从报复“舟师之役”，攻巢（今安徽瓦埠湖南），诸樊中箭而死。诸樊弟余祭继位。

吴王余祭元年（前 547）夏天，楚康王联合秦军伐吴国，至雩娄（今河南商城东），得知吴国有戒备，遂还军伐郑国。四年（前 544）夏天，吴国伐越国，用被俘的吴国人守门，派去看守船只。吴王余祭观看船只时，看守船只的吴国人用刀杀死余祭。余祭弟夷末（一作余昧或勾余）继王位。①

是年，吴国派公子季札到中原各诸侯国聘问。季札先到鲁国，鲁国保存很多周的礼乐，要求听周乐，鲁乐工为他表演《周南》、《召南》等诗歌和《象箾》、《南籥》等乐舞，他都一一作赞美。季札离开鲁国后去齐国，见到晏平仲（晏婴、晏子），叫晏子速将封邑和掌管政事交公，可以免避祸难。后来晏子照办，结果免于栾氏、高氏发动的祸难。季札到了郑国，见子产，如旧相识。对子产说："你将执政，执政后，用礼来慎重办事，否则郑国将衰败。"②到了卫国，见到蘧瑗、史鳍、史狗、公子荆、公叔发，公子朝，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故"③。到晋国后，喜欢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认为晋国之政将要集中在这三家。

齐景公三年（前 545）冬天，齐国大夫庆封骄横，被齐国公族栾氏（子雅）、高氏（子尾）、大夫陈须无、鲍国逐出齐国，先逃奔鲁，齐派使责问鲁国。庆封乃逃往吴国，吴王夷末封他居于朱方(今江苏丹徒东南)，庆封聚其族人"富于其旧"④，即财产比过去还多。吴王夷末六年（前 538）七月，楚灵王率蔡、陈、许、胡、沈、淮夷等国国君以军伐吴国。楚大夫屈申（屈荡之子）围朱方。八月甲申日，攻下朱方，逮住庆封而将族人尽灭。楚灵王将杀庆封，椒举（即伍举）劝谏，灵王不听。让庆封背上斧钺，在诸侯军中游行示众，要庆封说：不要像齐国庆封，弑其国君，削弱国君孤儿，来与大夫会盟。而庆

封则说：不要像楚共王之庶子围，弑其君兄之子员而取代他，来和诸侯会盟⑤。灵王急命将庆封杀死。

是年冬天，吴国兴师伐楚国，以报复楚伐吴“朱方之役”。攻到楚的棘（今河南永城南）、栎（今河南新蔡北）、麻（今安徽砀山东）。楚国的箴尹宣咎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薳启疆在巢（今安徽瓦埠湖南）、然丹在州来（今安徽凤台）修筑城以防备吴国进攻。次年十月楚灵王会蔡、陈、许、顿、沈、徐、越及东夷等国之军伐吴国。越国大夫常寿过率军会楚灵王于琐（今安徽霍丘东），知吴国军队已出动，薳启疆率军跟从迎战，但准备不足，被吴军败于鹊岸（今安徽无为西南江岸）。灵王率大军在罗汭（今河南罗山境）渡淮河向东进发，知吴国已有准备，不能攻入吴国，无功而回。

吴王夷末八年（前536）九月，徐国君仪楚到楚国聘问，楚灵王以徐国亲吴国而要逮捕仪楚，仪楚逃回徐后叛楚。灵王派大夫薳泄率军讨伐，吴国出兵救徐国。楚令尹子荡率军伐吴，子荡从豫章（今安徽寿县至合肥一带地区）集中军队，驻在乾溪（今安徽亳县东南），吴国军队在房钟（今安徽蒙城西南）击败楚军，子荡归罪于薳泄，将其杀害。

楚灵王十一年（前530）冬天，灵王冬猎于州来，派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率军围徐国，以威胁吴国。灵王驻军乾溪增援。次年夏天，楚国发生内乱，灵王弟公子子比（子干）、公子弃疾、公子黑肱，乘灵王驻军于乾溪，率军攻占郢都，杀太子禄，立子比为王。又使人至乾溪传言，郢都已立新王，先回郢都者复职与田邑。众人遂弃灵王而回，灵王自杀于乾溪。弃疾又欺子比、黑肱说灵王率军回郢，二子遂自杀。于是弃疾继王位，即楚平王。围徐的楚军得知楚内

乱，遂解徐围还军，吴军追击，败楚军于豫章，俘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五人。秋天，吴国乘楚国在灵王的丧期，出兵攻取州来。

吴王夷末十七年（前 527）正月，夷末死，按吴人的传统，王位应当由夷末弟季札继承，季札贤而让。于是由夷末之子僚继王位，称吴王僚，或王僚。

吴王僚即位二年（前 525）冬天，命公子光率水军伐楚国。是时楚国阳匄为令尹，不主战，司马子鱼主战。于是，两军战于长岸（今安徽当涂西）。子鱼先战死，楚军跟上后，大败吴军，获吴王所乘的余皇船。吴公子光又以计败楚军，夺回余皇船。此长岸之战，吴、楚两败俱伤。

楚平王当公子时曾出使蔡国聘问，郹阳（今河南新蔡境内）封人之女私奔于他，生子建。即位后，立建为太子。派伍奢（伍举之子）为太子师，费无忌（一作极）为少师辅助。无忌不受太子建之宠，故想陷害太子建，于是向平王说，太子建已十五岁应当娶妻。平王派无忌到秦国为太子建求亲，无忌见秦女美，便先回国对平王说秦女美，要平王自娶，于是平王自纳秦女。太子建之母蔡女不受平王宠爱，无忌又常向平王说太子建坏话。平王想扩大疆土，向南发展，无忌乘机说，派太子建到城父（今河南宝丰东）驻守，以便和北方交通，平王便派太子建去城父。

楚平王七年（前 522）三月，费无忌向平王诬告太子建和伍奢，说二人要以城父为据点，勾结北方诸侯，危害楚国。平王遂命将伍奢逮捕，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建。奋扬先派人告诉太子建，让其逃走，故奋扬尚未到达时，太子建已向宋国逃奔。奋扬请城父大夫逮捕自己送到郢都，平王问为何告诉太

子建？奋扬答：当初君王对我说，去事奉建要像事奉我一样，臣下不才，只执行原来之令，不忍执行后来的令，既而后悔，已来不及⑥。平王只好放了奋扬命回城父仍作司马。

费无忌又对平王说：伍奢二子有才干，如果去吴国，将使楚国担忧。何不以赦免其父为名召他们回来。平王即命伍奢召回二子。伍尚是棠邑大夫，伍员（胥、伍子胥）亦在棠邑，闻召可免父死。伍尚对伍员说：你到吴国去，我回去送死。我的才智不如你，我死了你还能报仇。伍奢得知伍员不回，说：楚国君臣恐不能按时吃饭了！平王命杀伍奢、伍尚，伍员逃到吴国⑦。

吴王僚八年即楚平王十年（前519）七月，吴王僚率军伐得而复失的州来。楚令尹子瑕（阳匄）带病和司马薳越率楚和蔡、陈、许、顿、胡、沈等国之军奔命救州来。两军在钟离相遇，令尹子瑕死于军中，楚军心涣散，士气大受影响。吴公子光对楚军一方作分析认为："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贱越非正卿，地位不高）而不能整（肃军队），无大威命，楚可败也。"⑧吴王僚同意公子光的分析和对战役的布署。两军战于鸡父（今河南固始东南），吴军先用罪徒作敢死队出阵，冲击陈、胡、沈三小国军阵，楚军阵乱，再以吴的正规三军攻击。结果各小国军先溃败，楚军也跟着崩溃，吴军以少胜多。楚太子建之母因太子建逃离楚国后，遂回母家郹阳。召吴人到郹阳，是年十月甲申日，吴国太子诸樊到郹阳，建母开城门放入，诸樊将她和宝器带回吴国。楚司马薳越未追上，遂自缢于薳澨（今湖北钟祥南）。

次年（前518）十月，楚平王率水军侵略吴地。越国公子仓和大夫寿梦率军随同楚军，吴军紧追楚军，平王到了圉阳

（今安徽巢县南）后还军。于是吴军乘楚军无备，攻破巢和钟离两邑。

楚平王十三年（前 516）九月，楚平王熊居（弃疾）死，太子轸（一作珍）继王位，即楚昭王。次年春天，吴王僚乘楚有丧，派其弟掩余，烛庸率军伐楚的六（今安徽六安东北）、潜（今安徽霍山南）。楚左司马沈尹戌率军于穷（今安徽霍丘西南）阻止吴军，左尹郤宛、工尹麇亦率军阻吴军，令尹子常率水军遏制吴水军，使吴军进退两难。

伍子胥自楚逃往宋国时，太子建已在宋，但宋国是年（前 522）发生华定、华亥和向宁与宋元公争政之乱。遂与太子建奔郑国，郑国接纳善待。太子建又去晋国，晋顷公要建回郑作晋的内应而灭郑，建回郑国因从人泄其谋而被郑定公诛杀。伍子胥遂逃向吴国。途经吴、楚边境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西北小砚山上），几被关吏所捉。于是徒步而行，至吴国又因病只得沿途乞食。到吴都后投公子光，由公子光引见给吴王僚。子胥建议王僚出兵破楚，公子光以子胥为报私仇才劝其伐楚，要王僚不听。子胥知公子光欲杀王僚自立，不可以说外事，遂退耕于乡村，暗访刺客，得专诸（一作鱄设诸）进与公子光。当吴军乘楚丧伐楚，被楚军所阻，国内空虚，公子光认为此机不可失，遂与专诸谋刺王僚，专诸说："王僚可以去杀，我母老子弱，如何办？"公子光说："我就是你。"⑨据《史记·刺客列传》载："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中，而具酒请王僚。王僚使兵陈自宫至光家，门户阶陛左右，皆王僚之亲戚也。夹立侍，皆持长铍（兵器），酒既酣，公子光详为足疾，入窟室中，使专诸置匕首鱼炙之腹中而进之。既至王前，专诸擘鱼，因此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杀专诸，王人扰乱。公子

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尽灭之。遂自立为王，是为阖闾。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为上卿。”⑩阖闾也作阖庐。王僚被杀后，率军伐楚的公子掩余逃往徐，公子烛庸逃往钟吾（今江苏宿迁北)。楚国知吴国内乱，遂还军。

吴王阖闾三年（前512）冬天，吴王要徐国逮捕掩余，要钟吾逮捕烛庸，吴两公子遂逃往楚国。楚昭王命人在养（今河南沈丘东南）筑城以安置吴国二公子，又给城父、胡（今安徽阜阳）之田，以为吴国之祸患。子西劝谏，昭王不听。吴王欲伐楚，伍子胥建议以“三师以肄（劳)”的作战方针，即组织三支军队常出，楚军出则归，“彼归则出”⑪。待楚军疲劳后，再集中三军攻楚，必然获胜。吴王听从。次年吴军侵挠楚的夷、潜、六等地，楚军疲于奔命。齐国人孙武（即孙子）字长卿，齐田氏之后，齐内乱，奔吴避乱，伍子胥引荐给吴王阖闾，为吴国治军。传世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因春秋《经》、《传》未见孙武事迹。1972年山东临沂汉墓出土《孙子》残篇，其中有《吴问》证明孙武和《孙子兵法》的真实性。

鲁定公四年即吴王阖闾九年（前506）三月，晋定公用周王之命为名，在周王室刘文公的参加下，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与十八个诸侯国会盟，参加的有宋、蔡、卫、陈、郑、许、曹、莒、邾、顿、胡、滕、薛、杞、小邾和齐国大夫。因为楚昭王和令尹子常在前一年勒索蔡昭侯和唐成侯，蔡昭侯赴晋国与其子为人质，请晋出兵伐楚国，故这次晋大会诸侯是商议伐楚国之事。但晋国荀寅向蔡昭侯索贿未成，向范宣子说不宜伐楚，晋国遂辞蔡国不伐楚，晋国因此而失信于诸侯。蔡昭公只好又以子为人质，请吴国伐楚，阖闾允许。是年十一月，在蔡、唐两军引导下，吴王率军伐楚。吴军乘船到蔡国，捨船

登陆取道豫章西进。楚左司马戌向子常建议："你先与吴军周旋于汉水，我先控制方城外，摧毁吴的船只，回来堵住大隧、直辕、冥阨（三地即九里、武胜、平靖三关）。你渡汉水攻伐，而我自后追击，必获大胜。"⑫子常争功心切，先渡汉水而列阵，自小别至大别（三山皆分布于汉阳之北），三战皆败，子常想逃走，被大夫史皇劝阻。庚午日，吴、楚两军在柏举（今湖北麻城东北）对阵。阖闾之弟夫概认为：子常不仁，其臣没有拼死之志，先伐、其卒必逃，而后大军跟上，必胜⑬。吴王不许。但夫概以自己所率五千兵击子常，子常军逃走，楚军大乱，吴军追至清发（今汉水支流涢水）。楚军半渡，吴军追至攻击，楚军大败于雍澨，吴军五战皆胜。楚昭王得知楚军大败，遂逃出郢都，吴军占领郢都。昭王逃至云梦泽，被盗攻击，肩上受伤，逃往随国。楚大夫申包胥到秦国求援，哭于秦朝廷七日，秦哀公才同意出兵。次年，秦、楚败吴军。

注　释

①《史记·吴太伯世家》，以余祭在位十七年 误。

②《史记·郑世家》。

③《史记·卫康叔世家》。

④《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⑤《史记·楚世家》。

⑥⑦据《左传·昭公二十年》。

⑧《左传·昭公二十三年》。

⑨据《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⑩见《史记·吴太伯世家》。

⑪《左传·昭公三十年》。

⑫⑬据《左传·定公四年》。

先秦

勾践灭吴

春秋末，地处今浙江一带的越国，势力逐渐强大，最后取代楚国与吴争霸。晋国与楚国争霸中，楚国的势力被吴国削弱。吴、楚柏举一战（前506），楚军被吴军击败，楚昭王出逃随国。次年，楚借秦国之力，两次败吴军，昭王还郢都。但第二年（前504）夏天，吴太子终累（一说夫差）率军伐楚，大败楚的水军，并俘其帅潘子臣、小惟子和大夫七人。又败楚大夫子期所率陆军于繁扬（今河南新蔡北），逼得楚国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东南），此后楚国再也无力争霸。当吴国取代楚国北上争霸之时，越国的势力得到发展，吴、越两国形成春秋末期两个抗争大国。吴王夫差二年，越王勾践三年（前494），吴王伐越国，败越军于夫椒（今江苏太湖中的西洞庭山，或说即夫山在今浙江绍兴市西北），越王勾践请和，入吴为人质，卑事吴王。三年后遣返回越国。于是，尝胆明志，苦身焦思。“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了吴国而成霸业。

越国之始祖据司马迁所说，是夏禹之苗裔，夏少康的庶子无余，封于会稽。即禹东巡狩，会诸侯，致“四方群神”计功

行赏的会稽（今浙江绍兴市）。越人也是“文身断发”，“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与吴国阖闾发生战争。允常死后，其子勾践继位为越王①。故越国自无余之后经夏、商、西周到春秋早期，历史无系统的记载。《左传·宣公八年》载：“楚为众舒叛故，伐舒、蓼，灭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吴、越而还。”鲁宣公八年（前601）即楚庄王十三年，楚国灭群舒，以滑汭（今河南滑县东）划定东疆界，与越国结盟。此后越国消声匿迹。鲁昭公五年即楚灵王四年（前537）十月，楚灵王会合蔡、陈、许、顿、沈、徐等国之军伐吴国，越国大夫常寿过率军与楚灵王在琑（楚地，今安徽霍丘东）汇合。由于楚军骄而无备，被吴军在鹊岸（今安徽无为西南江岸）击败。这是七十年后又见越国出现。大夫常寿过是率兵之将，可知其社会发展情况与吴国应当基本相同。二十年后，鲁昭公二十四年即楚平王十一年（前518）十月，平王率水军到吴国边境巡视，准备伐吴。越国大夫胥犴到豫章的江边慰劳楚平王，越国公子仓还将所乘的船赠给平王。公子仓和大夫寿梦还率军跟随平王伐吴。楚被吴战败，吴攻取楚的巢和钟离两邑。此时期见越国复出活动的具体资料，当是越允常在位之时。

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夏，吴伐越，始用师于越也。”杜预注：“自此之前，虽疆事小争，未尝用大兵”。此年（前510）是吴王阖闾五年，越国君当是允常。从此开始了吴、越两国争霸之战。

鲁定公十四年即越王勾践元年（前496），越国君允常死，其子勾践继王位。吴王阖闾乘越丧出兵伐越。“越王勾践使死士，三行，至吴陈（阵前），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此）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槜李（即醉李，今浙江嘉兴南），射伤吴

王阖闾”②。吴军败还，至离槜李七里的陉地，阖闾临死时，谓其子夫差说：“夫差，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回答：“唯(是)，不敢忘！三年乃报越。”③阖闾死后，子夫差继王位。

夫差报仇心切，即位后的第二年（前494)，就日夜调兵遣将准备伐越。越王勾践欲待吴军未出发时就先伐吴。大夫范蠡劝谏，勾践不听，遂兴师伐吴。吴王集中精兵击越军，败越军于夫椒，遂深入越国。勾践用所剩的五千甲士保卫会稽，吴军围会稽。勾践对范蠡说：“不听你的劝谏，才至于此，现在如何办?”范蠡回答：只有卑辞厚礼向吴王求和。勾践派大夫文种通过贿赂吴国太宰嚭向吴王求和。吴王将要允许，伍子胥劝吴王勿许，并举出夏代少康恢复夏王朝之历史教训和分析吴越两国同处三江区，不能共存的形势，主张灭越国。夫差不听。伍子胥退而告诉别人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④即越国用十年发展生产增强国力，十年训练军民，二十年后，吴国就要变成池沼废墟了！夫差最终同意与越国讲和，条件是越王勾践和大夫范蠡入吴为人质。勾践将越国政授与大夫文种，命文种留守会稽，随同夫差回吴国。

夫椒之战后，吴以为越是小国，自此再也不会抬头，遂放心北进中原图霸。是年八月，伐陈国。楚国大夫们都很惧怕，子西分析认为：阖闾时，尚能节俭，与民共甘苦。听说夫差是个吃喝玩乐，视民如仇的人，他自己会先失败，怎能打败楚国。次年十一月，吴国应蔡昭侯之请，派军队入蔡（今河南新蔡)，迁蔡于州来（下蔡，今安徽凤台)，蔡人哭而迁祖墓，皆怨昭侯。过一年后（前491）二月，蔡昭公欲去吴国，诸大夫恐又迁国，众从公孙翩射杀昭侯，蔡大夫文之锴又射杀公孙

翩，逐公孙辰，而杀公孙姓，公孙盱。蔡昭侯墓于 1955 年在安徽寿县西门内发现，出土随葬品 584 件，其中青铜器 486 件。另有金叶，玉器骨和漆器等。青铜器大都是蔡器，少数是吴器。有两件吴王光鉴，是吴嫁女于蔡之媵器。蔡器中有成套礼器和乐器，多有铭文，是研究蔡国和蔡吴关系重要的历史资料。

吴王夫差五年即越王勾践六年（前 491），勾践在吴国三年，卑身事夫差，夫差遣而归越国。夫差对越国无防备，遂一心北上征伐。

吴王夫差七年（前 489），吴国因陈国亲楚国而伐陈。楚昭王救陈，驻军于城父，病死于军中，楚遂秘而退军。昭王子章，越女所生，迎立为君，即楚惠王。次年夏，夫差会鲁哀公于鄫（今山东苍山西北），向鲁征取百牢的享礼。按周朝礼制，周王会诸侯，享礼十二牢。吴国虽超标要求，鲁惧吴，仍照办。夫差九年（前 497）春天，夫差助邾国伐鲁国。吴军至泗上，鲁大夫微虎挑选有若（孔子弟子）等三百人组成敢死队，准备夜袭吴王，夫差得知，一夕三迁其驻地，鲁见吴不可灭，遂与吴国结盟。是年夏天，夫差命伯嚭率军伐邾国。因邾隐公，要邾大夫们奉太子革执政。夫差十年（前 486），夫差欲伐齐、晋，霸中原。遂于邗（今江苏扬州市西，或说东南）筑城，凿邗江（即邗沟，又名邗溟沟、中渎水），以通江、淮为漕运，是我国和世界上最早的运河。夫差十一年（前 485）二月，夫差率师北上，会鲁、邾、郯国君伐齐国。齐大夫陈乞杀齐悼公以谢吴军。吴大夫徐承率水军自海上入齐，齐军战败吴水军，吴军还国。这是我国第一次从文献中所见的海军。齐悼公死后由其子壬继位，即齐简公。

夫差十二年（前 484），齐国因上一年鲁国助吴伐齐，遂派国书、高无邳率军伐鲁。为冉求（孔子弟子）所败，齐军连夜逃走。夫差知齐国伐鲁，遂与鲁联合出兵伐齐。夫差自统中军，吴以胥门巢为上军将，王子姑曹为下军将，展如为右军将。齐以国书为中军将，高无邳为上军将，宗楼为下军将，五月甲戌日，两军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南），大败齐军，俘齐国的国书，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五个大夫和兵车八百乘、斩首三千，献于鲁哀公。

吴国将出兵伐齐国时，越王勾践前往吴国朝见。夫差及诸大夫皆喜，只有伍子胥忧。他劝谏夫差说：勾践是心腹大患不应伐齐而当伐越。夫差不听，命伍子胥出使齐国，子胥将其子托给齐大夫鲍氏。夫差自艾陵回吴后，得知其事，大怒，赐子胥剑自刎。子胥临死时说："以悬吾目于东门，以见越之入，吴国之亡也。"夫差说："孤不使大夫（指子胥）得有见也。"遂用皮囊盛其尸投入江中⑤。

夫差十三年（前 483）秋天，夫差会鲁哀公、卫出公和宋国大夫皇瑗于郧（今山东莒县南）。卫出公后至，夫差欲逮捕出公。子贡游说太宰伯嚭，晓以利害，卫出公乃得免。

越王勾践自夫差赦免返国后，"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视）胆，饮食亦尝胆也，曰：'汝忘会稽之耻耶？'身自耕作，夫人自织（布作衣），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待）宾客，振（济）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⑥，国政委于大夫文种，治军训练士卒委于范蠡。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国力有所增强，遂欲兴兵伐吴以报仇。夫差会诸侯于郧之后，次年夏天又率军北上会诸侯。留太子友、王子地、王孙弥庸、寿於姚等守国。勾践见吴国内空虚，与范蠡商议伐吴之事，范

蠡同意。于是兴兵，发水兵（习流）二千人，训练有素的甲士（教士）四万人，亲兵近军（君子）六千人，军官（诸御）千人伐吴国。六月丙子日，越大夫畴无余、讴阳率军先到吴都郊外。王孙弥庸以所属五千人出击，王子地助战。乙酉日，两军对战，越军败，畴无余、讴阳被俘。勾践率大军到吴后，丙戌日复战，大败吴军。俘太子友、王孙弥庸、寿於姚。丁亥日，越军占领吴都。此时夫差正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定公会盟。七月辛丑日，吴晋两国君在会上为谁主盟而争论。夫差以是太伯之后自居，说："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说："于姬姓，我为伯（诸侯之长）。"⑦吴都失守的信息报至黄池，夫差先封锁消息，将知此事之七人斩于帐下。最后才让晋为主盟⑧，立盟后率军回。夫差派使以厚礼请与勾践求和，越自度未能灭吴，许与吴和。

越王勾践十九年，即吴王夫差十八年（前478）三月，勾践率军伐吴，两军会于笠泽（又名囿，今淞江入太湖处），越军先以左右两翼扰吴军，待吴军分兵抵御时，越则以三军击吴中军，吴军大乱而败。五年后，勾践二十四年，即夫差二十三年（前473）十一月，勾践兴兵再次伐吴国，大破吴军。吴王夫差被俘，囚于姑苏山（今江苏苏州西南）。夫差派公孙雄（或作王孙雄，王孙骆），肉袒膝行求和。向勾践说："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⑨勾践欲允许公孙雄之请求，仍用二十年前夫差对越的处理。范蠡提醒勾践，二十二年的谋划，一旦放弃，特受其害，勾践欲听范蠡之言，又不忍杀夫差。于是对吴使说："吾置王甬东（越地，今浙江舟山普陀北），君百家。"

夫差表示谢意，说："吾老矣，不能事君王。"又自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夫差遂自杀，勾践命送归其尸厚葬⑩。吴国遂灭亡，勾践命诛杀吴太宰嚭。

越王勾践灭吴国后，率兵北渡淮水，与齐、晋诸侯在徐州（齐邑，今山东滕县东南）相会，向周王室致贡，周元王命使赐勾践祭肉，封为伯，为诸侯之长。勾践以淮上的地方给楚国，将吴国侵占宋国的地方归还宋国，给鲁国泗东方百里的地方。越兵横行于江、淮，号称霸王。

勾践灭吴国以后，为向北扩张，称霸中原，曾徙都瑯琊（今山东胶南市），在黄海之滨筑瑯琊台，台周七里以望海。又起台馆，建望越楼于台上，以望会稽。越都瑯琊二百二十四年，约在勾践灭吴后一年（前472）徙至瑯琊，经八位国君至楚考烈王并越于瑯琊（前249）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缺载这段历史。近人多有据《越绝书》、《吴越春秋》、《水经·潍水注》所补述。蒙文通著有《越史丛考》，考证越徙都瑯琊史事，目前已为多数史家所认可。

助勾践灭吴的两个功臣，跟从勾践二十余年，共过患难。勾践灭吴后，原是楚国宛（今河南南阳市）人的范蠡（字少伯），被勾践封为上将军。范蠡认为："大名天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安处。"于是向勾践递了辞呈以后，装上私有财宝，带领私属徒众，乘舟浮海以行，终未返回。后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经商致富，号陶朱公⑪。

另一位是文种，原是楚国郢人，字少禽（一作子禽）。勾践灭吴后，仍事勾践，范蠡自齐致信于他，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供患难，不可供安乐"⑫。劝文种离开越国，文种未去，结果被勾践赐剑自

杀。

注 释

①《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有误。自少康至春秋末，有一千五百年以上，不止"二十余世"。

②《史记·越世家》。

③《左传·定公十四年》。

④《左传·哀公元年》。

⑤《国语·吴语》。

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⑦《史记·吴太伯世家》。

⑧⑨⑩⑪⑫《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先秦

孔子游列国

孔子自己说是商代人的后裔①。因周武王伐纣灭商后，先是封纣之子武庚禄父于殷，续殷祀。武王死后，成王即位，武庚与“三监”叛周，周公诛武庚，平“三监”，改封纣兄微子启于宋。孔子先祖弗父何是宋闵公的嫡子，让位给其弟宋厉公。弗父何的曾孙是正考父，据说是辅佐三世宋君，为上卿。正考父时五世亲尽，别为公族，姓孔氏。正考父之子即孔父嘉，此时已是春秋初期。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宋穆公病，召孔父嘉托孤，谓：“我死后，必立夷也。”穆公死，孔父嘉遂立夷为君，即宋殇公。鲁桓公二年，即宋殇公十年（前 710），宋殇公即位十年，凡十一战，民不堪其苦。太宰华督以此而杀司马孔父嘉，并夺其妻。殇公怒，华督又杀殇公，从郑迎立公子冯为君，即宋庄公。宋国内乱，孔父嘉被杀后，家人逃往鲁国，在陬（zōu 邹）邑（今山东曲阜南）定居。

孔氏在鲁数传至孔子之父陬叔纥时，已是春秋后期。鲁襄公时，陬邑大夫叔梁纥是个大力士。襄公十年（前 563），晋悼公率诸侯军攻偪阳（妘姓小国，今山东枣庄市南），围偪阳

城，偪阳人开门，诸侯军入城时，偪阳人欲放下城门将士卒夹于两门间。叔梁纥则奋力用手举起城门，让士卒出而未被伤害，为此而立功。襄公十七年（前556）秋天，齐国伐鲁，齐高厚围臧纥（武仲）的防邑（今山东泗水县西南）。叔梁纥和臧畴、臧贾兄弟率甲士三百人，夜袭齐军，救出臧纥。齐败退。

叔梁纥娶颜氏女，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生孔子，"生而首上圩顶（头顶中间低而周围高）故因名丘"。字仲尼，姓孔氏。孔子生后不久叔梁纥死，葬于防山（今山东曲阜市东尼山）。孔子自儿童时就喜好"陈俎豆，设礼容"②，即摆设祭祀的礼器，学行祭礼。孔子青少年时，因家贫且贱，做过不少自食其力的事，他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③青年时，做过看守粮库和养牛羊的苑囿的小吏，当过管财务的小官。看守苑囿时，将牛羊喂养得很肥壮。理财时，帐目很清楚。十五岁时立志读书，学习过礼、乐、射、御、书、数。主要是学习礼仪，学习做人的道理。

鲁昭公十七年（前525），孔子二十七岁时，郯国国君到鲁国朝见。昭公设宴招待郯君，因郯君是少皞氏之后裔，叔孙昭子问起少皞氏以鸟为官名是何故？郯君从黄帝氏设官定名，分职讲到少皞氏的设官定名分职。即是远古各氏族以所崇拜的图腾命名职官和分工的历史。孔子听说郯君在讲述历史，遂见郯君，向其学习。后来告诉别人说，我曾经听说"在天子那里失传的官制，在四夷中还能学到"，这是可以相信的④。孔子不仅对历史感兴趣，还曾向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厉乡曲里人，曾任周守藏史的老聃（李耳，字伯阳，号聃，即老子）问礼，访苌弘学乐，向师襄学琴。虽然他向老子问礼的确切时

间尚无定论，但是总是在三十岁左右。鲁国孟僖子曾对孔子有一番评价，认为从他的家族出身来看，是出自懂礼仪的家族，而孔子又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所以临死前还遗嘱其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去拜孔子为师。是年，孔子已经三十四岁。

鲁昭公二十五年（前 517）九月，鲁国因为政在季氏郈，臧二氏对季氏又不满。季平子与郈昭伯斗鸡赌金，发生矛盾。昭公率众攻季平子，于是引起“三桓”逐昭公。昭公出奔于齐国。孔子见鲁国发生内乱，遂离鲁到齐国。因齐景公与晏婴到鲁国时，曾向孔子求教过秦穆公称霸之事。故孔子到齐国后，景公向孔子问政。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孔子公开向国君宣传的政治观点。此时齐国是陈氏擅权，故景公很同意。景公又问治国之政，孔子说：“政在节财。”景公很高兴，欲重用孔子，封他田地，而晏婴则认为孔子理论繁琐，不可以治国，劝阻景公不用。景公说：“吾老矣，弗（不）能用也。”⑤孔子遂离开齐国回鲁国。

孔子回鲁后，对“三桓”专政很不满意，因为执掌国政不仅是大夫，甚至陪臣也执国政。这种僭越是与孔子主张的君君、臣臣不相容，认为已到了“天下无道”的情况。鲁昭公被“三桓”逐出奔齐国后，齐景公命攻取鲁国的郓邑（今山东郓城东），安置昭公居住。一年后（前 515），鲁国孟懿子、阳虎率军伐郓，败昭公的随从。昭公只得迁于乾侯（今河北成安东南），过一年便死在乾侯。这个保存周礼最多的礼义之邦之国君，就这样死于异国他乡。故孔子感叹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传至十世很少能继续的）；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

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⑥于是，孔子开始在鲁国从事学术和教书活动。各诸侯国都知孔子的学识渊博，来了不少的子弟学习，孔子开了私人讲学之先河。

鲁昭公死后，由其弟宋继位，即鲁定公。定公初年，季氏家臣阳虎（即阳货）、公山不狃等家臣权重与“三桓”闹矛盾，阳虎囚季桓子，孔子也认为是僭越无道。阳虎欲请孔子作官，被孔子谢绝。因孔子是主张礼、仁和爱人的，故他骂阳虎是“亲富不亲仁”。定公八年（前 502）阳虎作乱，欲谋杀季桓子，被“三桓”打败，阳虎据阳关（今山东泰安市东南汶水东岸）叛。次年，鲁军伐阳关，阳虎先逃往齐国，后又逃到晋国，作了赵鞅家臣。

鲁定公九年（前 501），定公任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时间，四方诸侯都效法。孔子遂由中都宰升任司空，又由司空升为大司寇。为政三月，则诛杀少正卯（少正，有说氏族名，有说为官名）。次年，齐、鲁两国讲和，鲁定公和齐景公会于祝其（即夹谷，今山东莱芜东南）孔子相定公赴会。立盟时孔子为鲁相礼，齐国想利用莱人武装劫持鲁定公，被孔子义正辞严斥退。过一年，孔子参与鲁国的“堕三都”的事件。当时“三桓”各有自己的私邑，即郈、费、郕三邑。在私邑中筑有百雉都城，有自己的武装。孔子建议：“毁掉这三个私邑城。”“三桓”也同意，叔孙氏的郈先堕。将堕季孙氏的费邑时，家臣公山不狃和叔孙辄率费邑人攻鲁国都，孔子命申句须、乐颀击败，将费都毁掉。要堕郕时，孟孙氏家臣公敛父对孟孙说没有郕就没有孟孙氏，不用理它，结果郕都未毁。“堕三都”是强公室，弱私门之举，当然不受“三桓”欢迎，便排挤孔子。于是在鲁定公十三年（前 497），孔子离鲁周游列国，是年孔子

已五十五岁。

孔子离开鲁国时，曾任季氏中都宰的子路，武城宰的冉求随行侍候老师。第一站就先到卫国，住了十个月离开。向南往陈国，经过郑国的匡（今河南扶沟县西南）邑时，因孔子长得和阳虎相像，被匡人当作阳虎拘留了五天，后知是圣人孔子才释放。不久孔子一行又返回卫国。卫灵公夫人南子要求见孔子，孔子不得已和南子隔着帷幕见一面，引起子路的不高兴。离开卫国，经过曹国到宋国。在大树下与随从弟子习礼。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孔子弟子叫快逃，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奈何我不得）。"离开宋国后到郑国，与弟子走失，独立于东门，被郑国人形容为"累累然如丧家之狗"⑦。到了陈国，住了三年又回到卫国。受到卫灵公的迎接，灵公年老，怠于政事，终不用孔子，孔子只好又离卫国。将西入晋见赵简子，到了黄河边，得知窦鸣犊和舜华西两个晋国贤大夫被赵简子杀害。于是再返卫国，受到卫灵公冷遇遂又到陈国。不久由陈国到了蔡国，此时是鲁哀公四年（前491），孔子六十岁。是年，蔡大夫公孙翩杀蔡昭侯，立其子朔，即蔡成侯。因蔡国发生内乱，楚国伐蔡国。次年孔子自蔡国到叶（楚邑，今河南叶县西南）。叶邑大夫叶诸梁向孔子问政，孔子答："近者悦，远者来。"⑧他日，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答。孔子得知，说："由（子路名由）尔何不对曰'其为人也，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⑨

又由叶返回蔡国，途中因使子路问渡口，被长沮、桀溺两位农民批评为"只逃避坏人，而不避世之人"。又遇上隐者荷蓧丈人，讥孔子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孔子在蔡国住了三年。遇上吴国伐陈国，楚国救陈，驻军于城父，知得孔

子在陈国与蔡国之间。楚派使聘孔子至楚，孔子将往。陈、蔡两国大夫惧怕孔子去楚国对他们不利，于是，发徒役围孔子于野外，不能前行。并绝其粮食，使孔子一行人不得食，从者生病不起。但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子路问孔子："君子亦有穷乎?"孔子说："君子故穷，小人穷斯滥矣。"⑩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尝尽艰苦，遭桓魋之难，受匡人之围，绝粮于陈，忍耐各种逃世者的讥讽，国君的冷遇。但孔子始终坚守自励，自得其乐。鲁哀公十一年（前483），孔子又返回卫国。由于冉求以孔子是各国知名的圣人，要求季康子召回孔子。鲁国遂以重礼派使至卫国召回孔子，结束了周游列国的生活。回鲁国后，鲁哀公问政，孔子说："政在选臣。"季康子与孔子政见不合，遂不用孔子。孔子时已六十八岁高龄，见周室衰微，礼乐废弃，《诗》、《书》缺，于是潜心整理《诗》、《书》、《礼》、《乐》。又喜欢研究周《易》。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其弟子有三千人，精通"六艺"者七十二人。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四月，孔子逝世，享年七十三岁（一说七十二岁）。孔子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为后世树立了讲礼义的榜样，为历代人们所尊崇。

我国最早的、目前所能见到的一部编年史为鲁国《春秋》，记载了鲁国历史大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改编而成。哀公十五、十六年，是孔子门人续作。共记载鲁国十二君（即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的历史大事。

注　释

①《礼记·檀弓上》："而丘也，殷人也。"

②《史记·孔子世家》。

③《论语·子罕》。

④据《左传·昭公十七年》。

⑤《史记·孔子世家》。

⑥《论语·季氏》。

⑦《史记·孔子世家》。

⑧《论语·子路》。

⑨《史记·孔子世家》。又《论语·述而》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之句。

⑩《论语·卫灵公》。

先秦

三家分晋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中原，长期攻伐不止。各诸侯国在长期争战中都起着变化，大国并小国，强国吞弱国。诸侯下属卿大夫的势力日益强大，争掌国政，互相攻伐。到春秋末年，出现了“政自大夫出”的卿大夫专政局面。卿大夫本来是国君的助手，辅佐国君治国，但后来发展为左右国政任意废立国君，建立自己的私邑、武装等等。最后取代原有的国君，建立起国家。晋国就是这样被瓜分为韩、赵、魏三国。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就是从晋国被韩、赵、魏三家卿大夫瓜分以后开始。

晋国在春秋时期称霸时间较长。自晋文公建立霸业起（前632），直到春秋后期的晋平公时，由于六卿持政，“晋政多门”①，诸侯无所是从。六卿对争霸兴趣不大，对争权的兴趣大，把力量用在内部争权夺利上，霸业才开始衰落。

早在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国的吴王夷末，命其弟季札（即延陵季子，延州来季子）出使北方诸侯国，以通友好。季札到晋国时对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说：“晋国其萃于三族乎！”②季札在晋国很短的时间，就看出晋国六卿中，

赵、韩、魏三族有发展的前途，不能不说是他的眼光敏锐。四十年后，吴王阖闾与吴将孙武对话，即《孙子》中的《吴问》。吴王问："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对："范、中行是（氏）先亡。""孰为之次？""知是（氏）为次。"这是根据晋国当时的形势作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故晋国在春秋后期虽霸业衰弱，但国内六卿的动向很为各诸侯国所注意和研究、分析，观察变化。

晋国的卿大夫，在晋文公创立霸业时有十几家，在晋霸中原时都不同程度的出过力，立过功。如栾、郤、原、狐、祁、羊舌、庆、续、伯等诸氏，到春秋后期不是被灭，就是被降，不再列为卿大夫。到晋悼公时（前572—前557），实际只存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家的势力，这六卿一直控制着晋国军政大权。晋平公时（前557—前531），六卿强、公室弱的形势已完全形成。但也还有极少的卿族有一定势力和占有领地。平公六年（前552），范宣子执政，逐栾盈，杀其党羽箕遗、黄渊、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师、申书、羊舌虎、叔黑等十位大夫。栾盈逃往楚国，次年又奔齐。在齐庄公帮助下又返晋困守曲沃为乱。诸侯第二次"弭兵大会"后，诸侯的争夺战争暂时缓和。六卿遂先后灭栾氏、庆氏。到晋顷公十二年（前514），灭祁、杨二氏，以祁氏之领地七邑为七县，杨氏之三邑为三县。至此，晋国只剩下范、中行、知、韩、赵、魏六家。此后，各家都在为互相兼并作准备。

建立自己的根据地。赵氏的领地最多，除占有以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西）为据点的今山西十多个县之外，还有以邯郸为据点的今河北几个县。范氏除以范（今河北范县）、朝歌（今河南淇县）为据点外，只有三、四邑。魏氏以安邑

(今山西夏县西北）为据点，还占有今山西运城地区大部分。韩氏以平阳（今山西临汾市西南)，先后也只有七邑。中行和知氏是由荀氏分化出来。晋武公时灭荀，封大夫原黯在荀地。荀息，荀林父即其后人。晋文公时封荀林父为中行将，改为中行氏，林父弟荀首食采邑于智（今山西临猗)，则为智氏。春秋后期这两氏领地不多，因史料缺乏，具体地方不明。

培植势力，收养谋臣招纳斗士。为互相兼并，相攻战的需要，六卿都在招纳斗士，训练家臣，收养谋臣，为其谋划。如赵氏的邮无正（伯乐)、张孟谈、邮无恤（王良）等，都是起作用的谋臣，此后发展为战国养士之风。

勾结他国，争取外援。六卿与其他诸侯国的卿大夫互相勾接，互相援助。如范氏与鲁国的季孙氏。赵氏与鲁阳虎、卫蒯聩都是如此。齐、鲁、宋、卫等国国君都各选晋六卿之一、二相助。

六卿的兼并斗争早在晋定公时就开始，定公十二年（前500)，赵鞅率军伐卫国，卫以五百家献赵鞅，赵鞅使居邯郸。定公十五年（前497)，赵鞅欲将五百家迁于晋阳。鞅的从弟邯郸午（邯郸大夫）不许。赵鞅召午至晋阳杀害。午之子赵稷与家臣涉宾率邯郸人叛鞅。邯郸午是荀寅（中行文子）的外甥，荀寅与范吉射（范昭子）是姻亲。六月，赵鞅以军围邯郸。七月范氏、中行氏、邯郸人联合攻赵鞅，赵鞅北奔晋阳。智跞请定公讨伐三氏。定公遂与韩、魏、智合力攻败。范吉射、中行寅逃往朝歌。十二月，韩不信、魏侈奉定公命召回赵鞅重新执政。1956 年 12 月在山西侯马市发现的“盟书”，是写在圭形玉石片上的盟约，就是反映赵鞅为团结族人，共同对敌，多次举行盟誓的情况。

赵鞅重新执政后，先发兵围朝歌，范吉射、中行寅坚守。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八月，齐国以粟助范氏，郑国大夫子般，子姚率军押送，范吉射前去迎接。赵鞅率军与送粮军相遇于戚（今河南濮阳北），赵鞅在此誓师，发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以功做官），人臣隶圉免（免除奴隶身份）。"③大大鼓舞士气。结果在铁丘（戚地之南）大败送粮的郑军，获得齐粟千车，使中行寅困在朝歌得不到粮食供给。次年，赵鞅又以重兵围攻朝歌，中行寅不能再守，遂突围北逃邯郸。第二年（前491）九月，赵鞅移军围邯郸。十一月，邯郸人降。中行寅逃往鲜虞（今河北定州市），赵稷逃往临（晋邑，今河北临城西南）。十二月，齐国助中行寅伐晋，攻取邢（今河北邢台市）、任（今河北任县东南）、栾（今河北栾城）、鄗（今河北赵县南）、逆畤（今河北保定西南）、阴人（今山西灵石县城南关）、盂（今山西太原市东北）、壶口（今山西壶关）。欲以柏人（今河北隆尧西）为中心重建范氏基地。次年赵鞅又攻柏人，范吉射、中行寅逃往齐国。邯郸、柏人等地归赵鞅所有。二氏余邑尽入公室。范、中行二实已被灭。

赵、韩、魏、知四氏灭范、中行以后，赵鞅先后对相助过范、中行二氏的卫国、鲜虞、齐国用兵，皆取胜而还。与此同时四卿以其实力将领地继续扩大。如灭仇由国（也作厹由，仇首），"知伯将伐仇由，而道难不通。乃铸大钟遗仇由之君，仇由君大悦，除道将纳之（清除道路接纳）。赤章曼枝曰：'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来，卒（必然）随之，不可纳之。'仇由之君不听，遂纳之，而仇由亡矣"④。仇由国在今山西盂县东北，灭仇由后，该地归知氏所有。晋出公十六

年（前459），荀瑶伐中山国（春秋时狄人所建，又称鲜虞。在今河北正定东北），攻取穷鱼之丘⑤。领地从西向东扩展到今河北定州市一带。出公十七年（前458），赵鞅死，赵无恤（襄子）就穿着孝服北上夏屋山（又名华屋山），宴请代王。命厨师借进食之时击杀代王，取其代（今河北蔚县东北代王城）地封兄伯鲁子周为代成君。

晋国剩下的四卿中，知瑶野心最大，也最骄横。晋出公二十一年（前454）⑥。知瑶与韩虔、魏驹、赵无恤瓜分原范氏、中行氏的领地，因三十年前范吉射、中行寅败逃齐国时除柏人、邯郸外，二氏领地已归入晋公室，四卿又重新瓜分，等于瓜分晋公室之土地。晋出公愤怒，欲借齐、鲁两国之军来晋干涉四卿。四卿反将出公逐出晋国，出公赴齐国途中死去。知瑶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即晋哀公（又作懿公），知瑶立新君之后，独揽晋国大权，凡政事哀公不得过问，成为一个傀儡国君。知瑶又假哀公之命，要韩、赵、魏三家各献出一部分领地给公室。欲以此来削弱三家，增强自家实力。三家中韩、魏两家势力较弱，表示让出一部分领地。而赵无恤寸土不让。知瑶怒，遂率韩、魏二家之众攻赵无恤。无恤退守晋阳。晋阳为赵之根据地，城池坚固，储备丰足，晋阳人民又爱赵氏。故围攻三年不下。知瑶遂引汾水灌其城，水入城浸“三版”（八尺为一版）。城中“悬釜而炊，易子而食”⑦。虽坚守不降，但无恤仍然恐惧，遂与家臣张孟谈商议。张孟谈建议利用韩、魏与知氏之矛盾分化两家。于是张孟谈夜半乘船潜出城游说韩、魏，说明“唇忘齿寒”之理。又以败知氏后，归还被知瑶所夺土地，三家平分知氏领地为条件。韩、魏被说服，三家遂联合攻知瑶。知瑶败后被杀，三家共分其地，知氏遂被灭。

知氏灭后，韩、赵、魏三家谁也不想灭谁，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家势力比晋公室强大，公室虽无力对付三家，但三家也担心一旦被公室夺去权力。所以在晋幽公元年（前 433），乘晋敬公死，幽公刚即位尚无势力之时，共谋进一步削弱公室。于是，除曲沃（今山西闻喜东北）和晋都绛（今山西曲沃西北）之外的土地和人民都被三家瓜分。此后，晋国君地位降于三家之下，晋君有事还要去朝三家。

晋幽公九年（前 425），赵无恤（襄子）死，其子浣立，即献侯，徙都中牟（今河南鹤壁西），献侯年少，赵襄子之弟嘉（桓子），逐献侯自立于代。是年韩虎（康子）死，其子启章立，即韩武子。次年，赵桓子死，国人以桓子立不是赵襄子之意，遂杀其子，将被逐的献侯迎回复位。幽公十八年（前416），“幽公淫妇人，夜窃出邑中，盗杀幽公”⑧。魏文侯率军平乱，立幽公之子止，即晋烈公。烈公七年（前 409），赵献侯死，子籍立，即赵烈侯。韩武子死，子虔立，即韩景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韩、赵、魏三家同时派使朝周王。周威烈王册封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即韩景侯、赵烈侯、魏文侯。册封后，三家各自建立宗庙，定国都。韩国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赵国都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或说在今河南中牟东），魏国都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后来三国都又有迁徙：韩哀侯时灭郑国，迁都到新郑（今河南新郑）；赵敬侯时迁于邯郸（今河北邯郸市）；魏惠王时迁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

晋烈公在位二十七年死（前 389），子立，即晋桓公。

周烈王七年（前 369），韩懿侯、赵成侯迁晋桓公于屯留（今山西屯留南）。此后晋国就从历史中消失。

注　释

①《左传·成公十六年》。

②《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③《左传·哀公二年》。

④《韩非子·说林》。

⑤古本《竹书纪年》。

⑥此从《史记·赵世家》和《六国年表》。

⑦《史记·赵世家》。

⑧《史记·晋世家》。

先秦

田氏代齐

春秋后期，齐国的田完（即田敬仲。又称陈完，陈敬仲。田、陈古音同，相通）的五世孙田桓子（即陈无宇），联合齐国鲍氏，攻灭栾、高（齐惠公之后）二氏。以二氏家产分国人，收买人心，更加提高田氏在齐国的威望。田桓子死后，其子田乞（田僖子）继位，事齐景公（前547—前490），灭国、高（齐文公之后）二氏。景公死后，他立齐悼公，杀晏孺子。任悼公时的相，开始专齐国政。其子田常（田成子）继续专齐国政，齐人杀齐悼公，田常立齐简公。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杀齐简公和右相监止等，完全控制国政。田常死后，其子盘（一作班，即田襄子）继为齐相。到周安王十一年（前391），田和（田齐太公）迁齐康公于海上，使食一城，以奉其祀。姜氏齐国遂被田氏所取代。

取代姜氏齐国的田氏，原是来自春秋初期的陈国。陈国的开国君主胡公满，相传是虞舜之后裔，妫姓。周武王灭商后，被封于陈（今河南淮阳）。传到陈厉公（名跃）时，已是鲁桓公六年（前706）。陈厉公之子陈完，曾被周太史预卜其子孙

必在异国取得国家①。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载：陈国"厉公既立，娶蔡女。蔡女淫于蔡人，数归。厉公亦数如蔡。桓公之少子林怨厉公杀其父与兄，乃令蔡人诱厉公而杀之。林自立，是为庄公。故陈完不得立，为陈（国）大夫"。鲁庄王二年（前692），陈庄公死，弟杵臼继位，即陈宣公。鲁庄公十二年即陈宣公十一年（前682），杀太子禦寇。因禦寇与陈完友爱，恐惧祸及其身，乃逃往齐国。齐桓公想以陈完为卿。他辞道，他是逃难之臣，幸得收留，已是国君的恩惠，不敢当高位②。齐桓公遂任命他为工正，即管理工匠的长官。因作齐国之官，不便再以陈完称，遂以同音之田代陈，即为田完。齐国贵族大夫懿仲，以女嫁田完。田完死后，谥为敬仲，故又称田敬仲或陈敬仲。田完之子叫穉孟夷（一作夷孟思）。穉孟夷之子叫湣孟庄（一作闽孟克）。湣孟庄之子须无，即田文子。此时已是齐庄公在位（前553—前548），田须无事齐庄公，与晏婴同为齐国大夫。齐庄公四年（前550），晋国栾盈作乱后奔齐。齐庄公助栾盈，欲出兵伐晋国，田须无与晏婴劝谏庄公，庄公不听，出兵伐晋国，及闻栾氏败才还军。

田须无死后，其子无宇，即田桓子。齐国公族栾氏、高氏（齐惠公之后）专权，田无宇联合鲍国攻灭栾、高二氏。将二氏土地、资财分给被二氏打击、排斥的贵族和地位已下降的贵族子弟。于是在国人中得到好评。田氏的威望更加提高。田无宇死后，其子田乞，即田僖子继续为齐国大夫。此时已是春秋后期，各诸侯国都不同程度地起了变化。一般的都是卿大夫的势力增强，而公室的统治力逐渐削弱。

田乞是齐景公时的大夫，为壮大自己的势力，深知只有争取民心。于是，田乞在收取赋税时，以小斗收进，给予民时大

斗贷出，行阴德于民，而景公不禁。因此而深得民心，田氏宗族愈强。晏婴见此情形，累劝谏景公，要景公提高警惕，防止田氏势力继续壮大。景公不但不听，反而将晏婴支出齐国，派其出使晋国。晏婴与晋国叔向友善，到晋国后私下对叔向说起田氏在齐国的所作所为，其结论是：齐国之政，必然要归田氏所有③。

齐景公五十五年（前 493），晋国的范氏、中行氏被晋定公与韩、魏、知联合击败，逃往朝歌。晋赵鞅复职后，以兵围困朝歌。范吉射、中行寅向齐景公请求援以粟。田乞劝谏景公“不可救”。景公不听。结果被赵鞅击败，夺去粟米千车。

齐景公五十八年（前 490）九月，景公病，因太子早死。故景公临终时托孤于左相国惠子、右相高昭子立少子荼为太子。景公死后，高、国二相立荼，即安孺子（一作晏儒子）诸公子俱诛，公子嘉、公子驹、公子黔奔卫，公子钼、公子阳生奔鲁。田乞素喜公子阳生，他本想立阳生。故二相立公子荼，他不高兴，于是决心除去二相，每当上朝时都带上兵车，并对诸大夫说，高、国二氏将作乱，请诸大夫共同除去。次年六月，田乞与鲍牧以及诸大夫共同攻高、国二氏。国夏(惠子)逃往莒国，高张(昭子)、晏圉(晏婴之子)、弦施逃往鲁国。④田乞遂从鲁国迎公子阳生回齐为君，即齐悼公。悼公命田乞为相，开始专齐国政。齐悼公派朱毛告诉田乞：国君不同于器物，不可以有二个⑤。田乞尚不忍除去安孺子，悼公遂命朱毛将晏孺子迁于骀。朱毛恐骀人不从，就于途中将安孺子杀害。

齐悼公四年（前 485），吴王夫差率军北上，会鲁、邾、郯之君伐齐国。齐人杀悼公以谢吴军。《左传·哀公十年》载：“齐人杀悼公。”《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载：“鲍牧与齐悼有郄、

弑悼公。齐人共立其子壬，是为简公。”是年，田乞死，子田常（陈恒）立，即田成子。田常与监止（一作阚止）为简公的左右相。田常欲排斥监止，但监止得简公信任，权不能除。田常欲扩大势力，继续做收买人心，争取人民支持的事。仍学田乞之政，“以大斗出贷，以小斗收”。同时在田氏管辖区域内，发展社会经济，如整市场、稳定物价。凡是山上出的，海里产的都能上市，使市场商品丰富。比起公室所管辖区域好得多，故得到人民的歌颂。田成子知人心已归田氏。遂于齐简公四年（前481）夏天杀简公。孔子在鲁国闻之，三朝鲁哀公请鲁国出兵伐齐国。鲁哀公以齐强鲁弱而辞拒。田常立简公之弟骜为齐君，既齐平公。

“田常既杀简公，惧诸共诛己，乃尽归（还）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因此）齐复定（恢复安定）”。田常对平公说：“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罚之人所恶，臣请行之。”⑥换句话说，就是要齐国君只管做好事，惩罚人的事由田氏来做。实际上就是进一步地掌握齐国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于是先后在五年时间，将齐国剩下的还有一定势力的鲍氏、晏氏和监止三个公族诛杀，并占其地。又割占安平（今山东临淄东）以东至瑯琊（今山东胶南市）为自己的封邑，这样齐平公的公室食邑就所剩无几。田氏不仅掌握了齐国的一切政权，也占有齐国的大部分土地。田常又选国中美女数百人入于后宫，而使宾客舍人出入后宫都不禁止。故在生活的享乐上也超过齐君。

齐平公二十五年（前456），平公死，子积（一作匝）继位，即齐宣公。是年田常亦死，子盘（一作班）立，即田襄子。田盘为齐宣公相国。两年后，晋国韩、赵、魏三家灭知

氏，尽分其地。田盘也在齐国分使田氏宗族子弟到齐各邑去作大夫，以便进一步控制齐国各城邑。田盘死后，子白立，即田庄子。田白仍事宣公为相。宣公四十三年（前413），田白率军伐魏国，毁黄城（今山东冠县南），又围阳狐（今山东阳谷西北）。次年又率军伐鲁国，攻至莒（今山东莒县），安陵（今山东曹县东）。

齐宣公五十一年（前405），宣公死，子贷继位，即齐康公。这是姜氏齐国的最后一位国君。是年田白亦死，子田和立，即田氏齐国太公。因齐康公是个荒淫而不理国政的人，田和遂于康公十四年（前391），将康迁于海上，给一城，以奉其先祀。姜氏齐国为田氏齐国所代替。

田齐太公三年（前387），太公与魏文侯在浊泽（今河南白沙水库东）相会。请魏文侯向周天子及诸侯说情，立齐相田和为诸侯。周安王允许，封田和为诸侯。田氏齐国正式进入诸侯之列。姜氏齐国康公在海上一城，居住到周安王二十三年（前379）才死去。姜太公所受封的齐国至此完全消失。

注　释

①《史记·陈杞世家》。

②《左传·庄公十二年》。

③据《左传·昭公三年》。

④⑤《左传·哀公六年》。

⑥《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先秦

吴起伏王尸

先秦时代著名的军事家吴起，生年不详。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出身于一个“家累万金”的富有之家，却是一个有钱无势之家。吴起为其仕途，曾四处奔走寻找门路，以求其能作一官半职。花钱不少，家产荡尽，成为一个破落子弟，遂遭邻里乡人之讥讽。吴起杀了诽谤他的三十多人，可知吴起性情之残忍。杀人后出卫国东门，临行与其母诀别，发誓说：“起不卿相，不复入卫。”①吴起曾先去向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学儒术。不久吴起之母死，吴起未回卫国奔母丧，此为儒家之大忌，故为曾申所鄙视，不与吴起交往，绝其师生关系。此后吴起遂弃儒学兵法，到鲁国去事鲁国君。

齐国伐鲁国，鲁公不用吴起为将。因吴起之妻是齐女，吴起乃“杀妻以求将”，以杀害妻子来表示忠于鲁国。于是鲁君用吴起为将，以败齐军。因鲁是礼义之邦，儒家先师孔子家乡，对吴起杀妻求将，视为不合礼义，遭到大夫们的非议、排斥，鲁君谢而不用吴起。

吴起离鲁去魏国，住魏国大夫翟璜家，经翟璜推荐给魏文

侯。魏文侯问李克："吴起是怎样的人？"李克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②于是魏文侯用吴起为将。约在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文侯派吴起率军西伐秦国，攻取秦之五城，攻占河西之地（今陕西大荔县以东）。魏文侯四十年（前406），文侯命乐羊伐中山国（今河北正定东北），吴起和西门豹奉命率兵助乐羊，灭中山。约在一年后（前404），文侯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西河指魏国境内黄河流经地区），负责防御秦国，保卫魏国西部边境的重任，自此吴起之名声大噪。

吴起治军能与士卒共甘苦，虽身为将领，能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与士卒同背负粮食行军。"卒有病疽者（伤口化脓），（吴）起为吮之。卒母（亲）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不退缩），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③。可见吴起的治军与一般不同，待士卒如亲人，士卒才能去拼死。而他的军纪更严明，故才能尽得军心。

在守西河时，吴起根据实践写了一部《吴起兵法》，是我国先秦军事史兵书中，与《孙子兵法》具有相同的重要意义的著作。在战争频繁的战国时期，研究兵书者不少，所谓"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④。可见凡谈兵论战的人，无不读孙、吴的兵书。《吴起兵法》原书已失，《汉书·艺文志》兵家有《吴子》四十八篇，今本只有六篇，已非原书。

吴起不但是一位将才，也是一位相才。在守西河二十七年中，将此地区治理得兵强民富。他守西河的原则是"在德不在险"。故经他的治理，使西河地区府库充实，万民安居，"秦兵

不敢东乡（向），韩、赵宾从”⑤。

魏文侯五十年（前396，一作前395），文侯死，其子击继位，即魏武侯。因吴起治理西河有名，武侯率臣僚与吴起泛舟西河（今陕西与山西交界黄河中一段），武侯谓吴起：“美哉呼，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吴起举出过去三苗、夏桀和商纣都有险可依的山河，但不修德，仍然被灭，然后说：“若君不修德，舟中人尽为敌国也。”⑥武侯听后大为赞赏，称之为“圣人之言也”。也因此而引起大夫王错等人的忌恨。“公元前390年左右，因为魏武侯的大臣王错的排挤，吴起由魏入楚”⑦。

楚国在春秋后期争霸中原的势力衰弱，甚至吴王阖闾在柏举一战（前506年），攻入楚的郢都，两年后只得暂迁都于鄀（今湖北宜城东南）。后因吴、越矛盾激化和吴北上中原争霸，楚国的势力又有所增强。但国内新旧势力的斗争一直不断。楚昭王死（前489），其子章继位，即楚惠王。惠王二年（前487），令尹子西从吴国召回白公胜（平王时被费无极陷害其父太子建，被废出奔，在郑国被杀，胜与伍员逃往吴国），任为巢（今安徽寿县南）大夫，号白公（县邑之长尊称）。惠公十年（前479），吴伐楚，白公胜败吴军。率军入郢都献捷，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于朝中，又劫持惠王。叶公子高率方城外之众讨伐白公胜，白公胜失败逃入山中自缢而死。对于白公胜事件，传统的说法是“白公胜之乱”。郭沫若认为是一次革命⑧，即新旧势力的变革斗争的失败。

入战国时期以后，楚国是复兴或是腐败，目前史学界认识上有分歧。但是在“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的大势影响下，楚国的权臣与国君、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矛盾日益尖锐。

出现“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上逼主而下虐民”，“贫国兵弱”的局面⑨。唯一的出路只有变法图新。吴起正是在这种形势中来到楚国。

楚悼王素闻吴起贤，先任命为宛（今河南南阳市）守，以防御魏国和韩国。一年后被悼王任命为令尹。这是楚国的执政大臣，辅佐楚王处理军政大事。

吴起任令尹后，为着手解决楚国存在的问题，曾向楚大夫屈宜臼请教。“屈公曰：‘子将奈何？’吴起曰：‘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其有余而继其不足。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屈公曰：‘吾闻，昔善治国家者，不变故，不易常。今子将均楚国之爵而平其禄，损有余而继其不足，是变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闻，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⑩屈宜臼是楚的旧贵族，对吴起治理楚的想法认为变故易常，是大逆不道，持反对的态度，甚至说吴起要如此作是“祸人”。但是未能动摇吴起改革的主张和决心。

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他对屈宜臼所说的一段话，具体作法是：

削弱大臣的重权，裁减无能之官。所谓“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卑减大臣之威重”⑪。因“大臣的威重”就会“上逼主而下虐民”。故对这些旧贵族，几代大夫的权势，采取“均爵平禄”的办法，爵禄低，权势也就小。权小钱也就少，就无所依仗去上逼主而下虐民。具体作法是“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⑫，将那些只知依仗权势而无任何管理能力的人罢官不用，重复虚设之官也裁减。“使封君子孙三世而收爵禄”⑬，使那些依靠先辈功劳而有权有势的不孝子孙，不得子子孙孙永保爵禄。

迁贵人充实荒凉之区。吴起主张“损有余而继其不足”的具体作法就是“贵人往实广虚之地”⑭，即是将那些无任何办事能力和闲散官员下放到楚国的荒凉地区，因楚地广人稀，有不少地区需要充实官员去领导开发。这样既削弱了旧贵族的势力，又开发了荒凉之地区。

加强军事力量。即“厉甲兵”，或说是“要在强兵”⑮。其作法是“禁游客之民，精耕战之士”⑯，也就是禁止脱离农耕和当兵成为游民，奖励既能很好从事农耕，又能当兵打仗的人。从均爵平禄中收入奉禄中来补充军费，这就是“以奉选练之士”⑰，同时加强备战“以时争利于天下”。“三家分晋”以后，韩、赵、魏三家又开始争夺霸权。三家的军事力量都不弱，如楚国不强兵，就不能对付三家的攻伐。所以吴起提出加强备战，郢都城是两版垣筑成，吴起见其简陋，变为四版垣⑱。

经过吴起的变法图强，使楚国初见成效。《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载吴起变法以后，“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诸侯患楚之强”。按此说，楚国在吴起变法后已成为当时最强的国家。“南平百越”或作“南收扬越”⑲即向南开拓了疆土。“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⑳。楚悼王十九年（前 383），赵敬侯兴兵伐卫国，卫国向魏国求救。魏武侯率军攻赵救卫，败赵军。次年，卫国反击赵国，攻占赵的刚平（今河南清丰西南），又攻中牟（今河南鹤壁市西）。赵国只得向楚国借兵㉑。再一年，楚救赵攻魏，“战于州西，出于梁门，军舍林中（今河南尉氏西），马饮于大河”㉒。赵国反攻，攻占魏的棘蒲（今河北魏县南）、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此后赵国遂与楚国结盟。

楚悼王二十一年（前 381），悼王死，太子臧继位，即楚

肃王。积恨多时的贵族们因其皆甚苦之㉓。“故楚之贵戚尽欲害吴起”㉔。这批保守势力联合起来进攻吴起。时吴起正在为悼王治丧之所，吴起见贵族们执兵器前来围攻，遂走向悼王尸体旁。贵族们见吴起在王尸旁就用箭射，吴起伏在王尸上被射而死。后又被贵族们将尸体用车裂。因这些贵族们是乱箭齐发，只图射杀吴起，就忘了楚国之法律，故悼王之尸体上也被箭射中。“荆国之法。丽兵于王尸者（加兵器于王的尸体者），尽加重罪，逮三族”㉕。所以，葬了悼王后，肃王即位，“乃使令尹尽诛射吴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余家”㉖。就连参加射杀吴起的贵族阳城君畏罪逃亡后，肃王亦命没收其封邑㉗。后世史家认为这是吴起的智慧，知射中王尸之罪是要被诛杀灭族，故将死时还在与旧贵族作斗争。

吴起的变法时间不长，效果不是很大，但也给旧贵族们一次打击。虽然其后楚国大政仍为贵族所控制，但没有很快地被灭掉，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不能说与吴起的改革没有关系。

注 释

①②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④《韩非子·五蠹》。

⑤⑥《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⑦杨宽《战国史》第 17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⑧《奴隶制时代》第 6 页，人民出版社，1973 年。

⑨《韩非子·和氏》。

⑩《说苑·指武》，又《淮南子·道应》。

⑪《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⑫《战国策·秦策三》。

⑬《韩非子·和氏》。

⑭《吕氏春秋·贵卒》。

⑮《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⑯《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⑰《韩非子·和氏》。

⑱《吕氏春秋·义赏》。

⑲《战国策·秦策三》。

⑳《后汉书·南蛮传》。

㉑《史记·赵世家》。

㉒《战国策·齐策五》。

㉓《吕氏春秋·贵卒》。

㉔《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㉕《吕氏春秋·贵卒》。

㉖《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㉗《吕氏春秋·上德》。

齐威王改革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都产生一些具有新思想、有远见的国君。他们选贤任能、任法去私，富国强兵，为扩大势力范围，积极向外开拓疆域。为此他们任用一批新兴力量进行变法改革，对一些旧制度、旧传统、旧习俗进行冲击，从而达到富国强兵、与国争胜之目的。齐国变法改革是紧随各诸侯大国之后，从齐威王才开始。

魏国是最早进行变法改革的国家。魏文侯（前445—前395在位）即位以后，就决心励精图治，变革图强。先后任用魏成子（文侯之弟）、翟璜、李悝为相，又有吴起、李克、乐羊、西门豹等一批善于治军、治民的人才，使魏国在当时成为最强一国。尤其是经过李悝的变法改革，魏国的变化较为突出。

李悝，是一个具有法家思想的政治家，作魏相十年中最大的贡献就是对魏国变法改革。变法的主要内容就是："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废除田土疆界，鼓励农民从事耕作，发展农业生产，促进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发

展。“平粜法”就是收成好之年，由官府收购一定数量的粮食（即籴），欠收之年由官府平价卖给粮食（即粜）。以此来保证国家赋税收入，又制定一部《法经》，规定刑罚来维护社会秩序。

赵国也在魏国之后进行改革。赵烈侯六年（前403），公仲连向赵烈侯举荐牛畜、荀欣、徐越等一批有识之士负责各种政事，在这批人的主张下，“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①。选用人才，使用有能力的官吏，理财要节用，考察标准是功和德，不合格就不用。所以赵国在当时也算是一个强国。

楚国也在楚悼王时任用吴起进行变法改革，也取得成效②。

韩国在韩昭侯八年（前355），任命申不害（郑国人）为相，进行变法改革。申不害是讲“法”与“术”的，主张以法治政，用术为手段推行法。君主要集权，才能用术去驾驭群臣，统治人民。故“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我”③。

秦国孝公任用商鞅变法改革，也在韩国用申不害变法改革前一年开始④。

在各诸侯大国变法改革形势威胁下，齐国在这方面显得比秦国还落后。自田齐太公田和死（前384）后，一度陷于内乱中。即齐侯剡九年(前375)，桓公午杀齐侯剡自立⑤，诸侯国趁其内乱而伐齐。如桓公二年（前373），燕国伐齐，败齐于林营（一作林孤）；魏国伐齐，攻至博陵（今山东茌平西北）；鲁国伐齐，攻入阳关（今山东泰安东南）。次年（前372），卫国伐齐，攻取薛陵（今山东阳谷东北）。五年（前370），赵国伐齐，攻取甄（即鄄，今山东鄄城北）。七年（前

368)，赵国又伐齐，攻至齐长城，不久又将所侵占之地归还齐国。

齐国在这种形势下，桓公午不得不考虑如何摆脱困境。从传世的青铜器，桓公午十四年的《陈侯午敦》，有铭文 36 字，其中有“群诸侯献金”的内容来看⑥，桓公末年可能与诸侯国的关系有所改善。桓公午死（前 357），次年，其子因齐继位，即齐威王。即位之后并不理朝，政事皆委托诸大夫。一个叫邹忌的人，带着琴见齐威王，用鼓琴节奏快慢来劝说齐威王，谓“夫治国家而弭（安定）人民”⑦，即治好国是为了使人民生活安定的道理来说动齐威王。于是威王任用邹忌为齐相，辅佐自己整顿朝政，决心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传世青铜器《陈侯因資敦》，出自齐威王时器，有铭文 79 字，内容有“扬皇考昭统（发扬先祖先父们有功的业绩），高祖黄帝（远到高祖黄帝）尔嗣桓文(近到桓公，文公)，朝问诸侯(使诸侯来朝聘)”⑧。这段铭中反映了齐威王的决心。

齐威王在邹忌的辅佐下，进行变法改革，其主要内容有：

修明法令，整顿吏治，即所谓“修法律而督奸吏”⑨。为了解吏治，派亲信到各地调查地方官吏的情况，结果七十二人中“赏一人，诛一人”⑩。召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大夫，对他说：“自子（你）之居即墨也，毁言（抵毁的言论）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开辟农田），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没有给我左右的官员送礼行贿为你说好话），”被赏给万家的奉禄。又召阿邑大夫，对他说：“自子之守阿，誉言（赞扬的言论）日闻。然使使（派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国）攻甄，子弗（不）能救。卫（国）取（攻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你）

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以钱财厚礼贿赂走后门，求我的左右官员给你说赞扬的话）。”当日就将阿大夫和为阿大夫在齐威王前说假话的人都烹杀⑪。

重视人才，选贤任能。邹忌很重视推荐有用之才，而齐威王将这些人才视为“国宝”。如齐威王二年（前355），齐威王与魏惠王会猎于郊。“惠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梁王（即魏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直径一寸）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为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我当成宝的与王不同）。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有盼子（田盼）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赵田猎不敢过东边黄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燕、赵人祭门求福，怕齐侵伐），徙而从者七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何止才照十二乘车）。”⑫由于齐威王重视人才，孙膑这样的将才也被争取到齐国。田齐桓公午时，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设置“稷下学宫”，齐威王时，又以优厚的待遇吸收来大量知识分子，为培养人才，发展文化事业作出不朽贡献。

广开言路，鼓励臣民进谏。邹忌认为：“齐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⑬因为都有求于王，只有歌功颂德，不会对王说真话，这样王的过错、缺点都不知道。建议齐威王广开言路，鼓励臣民进谏。于是，齐威王“仍下令群臣吏民：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还不时有进谏的）。期年（一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想说也无可说的）。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在朝廷上就可以战胜别国）”⑭。此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反映出齐威王是接受邹忌的意见，作了些纳谏之事。

齐威王在邹忌的协助下进行的政治改革，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改变了原来的状况，而实现了国富兵强的愿望。因此才能在“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前353）和“伐魏救韩”的马陵之战（前342）中取得胜利，成为“最强于诸侯”的国家⑮。

注　释

①《史记·赵世家》。

②见本卷《吴起伏王尸》。

③《史记·赵世家》。

④见本卷《商鞅变法》。

⑤《史记·田齐世家》《索引》引《纪年》、《春秋后传》。

⑥《史记·田齐世家》。

⑦《三代吉金文存》第八卷42页。

⑧《三代吉金文存》第九卷17页。

⑨《史记·田世家》。

⑩《史记·滑稽列传》。

⑪⑫《史记·田世家》。

⑬⑭《战国策·齐策一》。

⑮《史记·田齐世家》。

先秦

桂陵之战

齐国虽在战国时期改革比魏国晚，但齐威王在邹忌的协助下进行的改革还是比较成功，因此也强大起来。齐威王四年即魏惠王十七年（前353），爆发齐国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魏国主将庞涓在这次战役中被生擒，魏军大败，充分显示出齐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次著名的战役就是根据军事家孙膑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布署取胜的。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生于齐国的“阿、鄄之间”①。阿邑在今山东阳谷之东北，鄄邑在今山东鄄城，两地相距百里以上，但此地区是齐国的西南边境，和魏、赵两国相邻。或说“孙膑，楚人，为齐臣”②。春秋时孙武死于吴国，其子孙流落楚国，孙膑是否就是楚国人，目前学术界认识不一致。孙膑的兵法是向谁学的，也不清楚。《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只说：“孙滨常与庞涓俱学兵法。”孙膑能刻苦学习，掌握的东西比庞涓多，而庞涓是志大才疏，图功好利之人。魏国是战国时变法改革最早的诸侯国，当时是最强大的一国。魏惠王（又称梁惠王，前369—前335在位）时庞涓到魏国，被惠王任命为

将军。

庞涓自知在军事学上不如孙膑，孙膑一旦为国君所用将对自己不利，乃邀孙膑到魏国。孙膑到魏国不久，庞涓心生毒计，以孙膑犯法为由，将孙膑处以膑刑，即截去双膝盖骨。后又处以刖刑，即斩其双足，并被黥面，在面上刺划，使孙膑变成一个残废人。孙膑明知是庞涓有意残害自己，也就顽强地活下来。庞涓将孙膑隐藏，不让他露面。孙膑身处逆境，思念齐国。

齐国派人出使魏国，到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孙膑设法秘密见齐国使臣，对齐使纵论天下形势，齐使以为是奇才。遂将孙膑藏于车中偷载回齐国，投在齐将田忌（即田期，田期忌，又称陈忌）门下作门客，田忌与孙膑交谈后，见其有才，待如上宾。田忌与齐王及诸公子赛马，孙膑告诉田忌取胜之术。临到比赛时，孙膑要田忌以下等马对上等马，以上等马对中等马，以中等马对下等马。结果一负二胜，"卒得王千金"③。齐威王询问谁出此计？于是田忌向威王推荐孙膑，威王与孙膑谈兵法后，遂任命孙膑为军师。

孙膑和孙武一样著有兵书，司马迁在《史记》中两处皆记"孙子膑脚而论兵法"④；"孙子膑脚，兵法修列"⑤。《汉书·艺文志》兵家亦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东汉以后此书不见著录。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发现大批竹简，有《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孙膑兵法》之竹简有四百四十多枚，编辑为三十篇，一万一千多字出版。使其自东汉以后亡失了一千七百多年的珍贵史料又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这部《孙膑兵法》共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孙膑本人作品，论用兵之法。如《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

情》、《杀士》等篇。另一部分是其弟子记述孙膑的言行，论兵法的记录，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篇。孙膑由田忌引见齐威王时，威王问兵法，就见于《见威王》、《威王问》篇中。

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大国也和春秋时期一样，势力强的大国都在争取与国，谁争取得多，谁的势力就愈大，就可以称霸，不仅小国要朝见，还有贡赋。因此自战国初期各国就拉开架式，争夺战、会盟等活动就频繁出现。齐威王即位元年（前356），鲁共侯、卫成侯、韩昭侯和宋桓侯入魏国朝魏惠王，魏王以霸主自居。次年（前355），魏惠王就入齐国与威王相会，猎于郊，“论宝”。三年（前354），赵国伐卫国，攻占赵的漆（今河南长垣西北）和富丘，就在此城筑城，威胁卫国附于赵国。魏国救赵，率宋、卫之军伐赵，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市）。秦国也乘机伐魏，败魏军于元里（今陕西城澄城东南），斩首七千，又攻占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同时秦又派公孙壮（或说公子壮）率军伐韩国，围韩国之焦（今河南尉氏西北），未攻下。齐威王派军伐燕国，战于沟水（今河北蓟县运河上游），齐军败逃。

齐威王四年即魏惠王十七年（前353），因卫国已是魏国的与国，赵国攻占卫国的城邑，魏国不能坐视，于是派大军八万人，以庞涓为将，率军至茌丘（今河南濮阳南），攻取卫国被赵所占之地，然后直抵赵国都邯郸。赵国派使向齐国告急，齐威王召朝臣们商议是否救赵？齐相邹忌不主张救，齐将段于纶主张救，谓“弗救则我不利”。威王问何不利？段于纶认为魏国吞并赵国以后，必然将矛头指向齐国，故不利于齐。于是，威王决定出兵救赵国⑥。

齐威王出兵救赵国，欲以孙膑为将，孙膑辞谢说："刑余之人不可（为将）。"⑦于是威王命田忌为将，任孙膑为军师，居于辎车中出计谋划，齐国也出兵八万由田忌、孙膑率领。出发前商议作战方案时，田忌欲引兵直接攻魏军以解救邯郸之围。孙膑不同意，认为"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解决复杂纠纷之乱，不能用拳头去打击），救斗者不搏撠（解救两国间的战斗，不能用手一样去拼搏），批亢捣虚（应当避免直接硬拼，而只能捣其空虚之处），形格势禁（这样形隔势也禁），则自为解耳（则彼此就自然解决）。今梁（魏国）、赵相攻，轻兵锐卒必竭于外（精兵锐卒必然全都在外面），老弱罢（疲）于内，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你不如引兵急攻魏都大梁），据其街路、衝（冲）其方虚，彼必释（解除）赵而自救。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⑧田忌同意孙膑的作战方案。遂率军先攻平陵（今山东曹县西），这是处于宋、卫之间的战略要地，但孙膑建议攻平陵只是为了麻痹敌人，他说："平陵，其城小而县大，人众甲兵盛，东阳战邑，难攻也。吾将示之疑（麻痹）。吾攻平陵，南有宋，北有卫，当涂（途）有市丘，是吾粮涂绝也，吾将示之不智事（我将显示出是不明智之事）。"⑨于是田忌按孙膑的作战布署，率军奔平陵，临近平陵时，孙膑要田忌将参战中齐城、高唐二都大夫派去攻平陵。明知这位都大夫能力较弱，必然失败，但为了吸引魏军，麻痹庞涓，必须这样做。

孙膑又要田忌派遣一支人数少的士卒轻车赶至大梁之郊"以怒其气（激怒魏之士气）"⑩。又以少数兵卒随其后"以示吾军之寡"⑪。而庞涓知齐军南下攻平陵，认为不能攻下，并未在意，仍继续攻邯郸。后又知齐军在平陵失败，遂挥军猛攻

邯郸。是年七月，庞涓得知齐军攻大梁，遂丢下辎重车辆，率轻骑精锐士卒，日夜赶赴大梁。孙膑见庞涓已中计，遂调动齐军主力埋伏于桂陵（今山东荷泽东北，一说在今河南长垣西南）。当庞涓行至时，果然中埋伏，魏军大败，庞涓被擒⑫。

桂陵之战齐国取得胜利，与孙膑的作战方针和具体的布署分不开，从战役的开始到结束都充分显示出孙膑的军事才能。他采用避实就虚，攻其大梁，使庞涓必救，中伏而败被擒，创造了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战役，使魏国的霸业受到初次打击。

注　释

①《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②《吕氏春秋·不二》高诱注。

③《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④《史记·太史公自序》。

⑤《史记·报任少卿书》。

⑥《战国策·齐策一》。

⑦⑧《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⑨⑩⑪⑫《孙膑兵法·擒庞涓》。

先秦

马陵之战

魏国虽在“桂陵之战”中遭惨败，但仍不失为一强国，战败后仍攻取赵都邯郸。其后十年中，魏国与齐、秦、楚等国又互相攻伐，最后导致齐、魏两国又在马陵大战，齐国军师孙膑用“进兵减灶”之计在马陵道大败魏军，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擒。

自1972年在山东临沂西汉墓中发现《孙膑兵法》的竹简以后，证明魏将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擒。但在十年以后的马陵之战中，庞涓又在魏国为将参战。经学者考证，认为先秦时期两国交兵，有的主将被俘后又放回国再度为将的事例也有，如春秋时，秦国的孟明视在“殽之战”（前627）中被晋军擒获，其后又释放回秦国，秦穆公仍用为将①。庞涓可能就是被齐国释放回魏国再度为将。

齐、魏马陵之战的马陵今地问题，历来有河北大名附近的元城，山东鄄城，河南范县、濮县，山东莘县等诸说。近年史学界根据《孙膑兵法》和山东郯城县出土的资料，对郯城县的马陵山作实地考查和论证，学者大多认为郯城县的马陵山的马

陵道就是"马陵之战"的古战场②。

齐、魏桂陵之战尚在进行时，楚国的楚宣王就派大将景舍率军伐魏救赵，攻取魏的睢水和涉水之间一些地方（今河南东部）。次年（前352），齐、宋、卫联军攻魏邑襄陵（今河南睢县）。魏惠王因头一年韩昭侯朝见了魏，故调动韩国之军击败齐、卫、宋联军。齐威王只得请楚将景舍出面向魏惠王求和，双方遂罢战。但是本年因秦孝公升任商鞅为大良造，商鞅遂率军伐魏，攻占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第二年（前351），魏惠王将占领的邯郸归还赵国，与赵成侯在漳水上结盟，并强逼泗上十二诸侯朝魏国，拟组织力量对付齐、秦两国。

周显王二十五年即魏惠王二十六年（前344），魏惠王欲以朝见周天子为名，召集诸侯小国举行会盟，谋划伐秦国。"秦王（秦孝公）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城墙上的矮墙）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布置城防守将等待魏国进攻）。卫鞅谋于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于天下，有十二诸侯而朝天子，其与必众，故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见魏王，则臣请必北（败）魏矣！'秦王许诺。卫鞅见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于天下矣。今大王之所以十二诸侯，非宋、卫也，则邹、鲁、陈、蔡。此国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东伐齐，则赵必从矣。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从矣。大王有伐齐、楚心，而从天下之志，则王业见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魏王说（悦）于卫鞅之言也。故身广公宫，制丹衣，柱建九斿（liú留，天子旗帜），七星之旟（yú与，绘有猛禽的旗），此天子之位也"③。魏惠王被卫鞅说动，遂按天子的建制，扩建宫室，制衣服，用天子之旗帜。

因为还有一个名誉上的周天子，不便称天子，遂公开称王，于是召集宋、卫、邹、鲁等国国君会于逢泽（今河南开封市南）。秦孝公派公子少官率军参加逢泽之会④。魏惠王遂率与会诸侯及秦公子少官去朝见周天子——周显王。所谓魏惠王“乘夏车，称夏王，朝为天子，天下皆从”⑤。魏惠王凭其势力自以为王，并非所有诸侯皆服。逢泽之会是想使诸侯大国都参加，但遭韩、楚等国的抵制，更为齐国所不容。故两国再次发生大战是不可避免。

魏惠王二十八年即韩昭侯二十一年（前342），魏惠王派穰疵（一作穰苴或襄疵）伐韩国，战于梁（即南梁，今河南临汝西）、赫（即霍，今临汝西南），败韩将孔夜⑥。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召大臣们商议如何救韩，问大臣们：“早救之，孰与晚救之便（是早救，还是晚救，何者方便有利）？张丏对曰：‘晚救之，韩且折而入于魏（晚救，韩国就要崩溃被魏所占领），不如早救之。’”⑦邹忌主张勿救，田忌相反。争论不决时，孙膑说：“夫韩、魏之兵未弊（疲劳）而救之，是吾代（替）韩受魏之兵（作战），顾反听命于韩也。且魏有破（韩）国之志，韩见亡（见到要被灭亡），必东面而愬（告诉）于齐矣。吾因深（阴）结韩之亲，而晚承（受）魏之弊，则可重而得尊名也（重其利而得到尊名）。”⑧齐威王认为孙膑的这一计谋很好，于是秘密告诉韩国使臣，齐国决定出兵救韩，让韩使臣先回韩国，与魏国对峙。韩国恃其有齐国援助，则和魏军奋战，但五战而五败。韩国又遣使告诉齐国。次年，齐国见韩、魏两军五战后皆疲弊，便发兵救韩。

齐威王以田忌、田婴（一说田盼）为将，孙膑为军师率齐军直奔大梁伐魏救韩。“魏惠王起境内众”，派太子申率十万大

军将出发攻齐。有一食客向魏惠王建议："太子年少，不习于兵。田盼宿将也，而孙子（孙膑）善用兵，战必不胜，不胜必禽（擒）。"⑨魏惠王不听，仍派太子申率军，调庞涓助太子申攻齐军。

孙膑对田忌出谋说："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视）齐，齐号（称）为怯（懦），善战者因其势而利导之。《兵法》（说）：'百里而趋利者蹶（挫败）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行军做饭的灶），明日为五万灶（减去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⑩这是孙膑采用"进兵减灶"之法来迷惑庞涓，造成齐军入魏国境以后，在进军途中士卒日渐锐减的假象。"庞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齐军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逃亡）者过半矣。'乃弃其步军，与其轻锐倍日并行逐之"⑪。孙膑计算庞涓行程，料定当晚庞涓必然追逐到马陵山的马陵道，遂在此设下埋伏，并将道旁一大树剥去树皮写上"庞涓死于此树下"。从《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反映出，孙膑对于设埋伏，作了精心布置。因马陵道狭窄，两旁多阻隘，便于掩护自己而迷惑敌人。诱使魏军"应猝窘处隘塞死地之中"。

庞涓率轻骑精兵追至马陵道时已经天黑。庞涓到大树下见上有字，举火照之辨认，知其中计，但为时已晚。此时齐军万箭俱发，魏军大乱相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遂自刎而死。齐军乘胜反击，破魏十万大军，俘虏太子申。据《孟子·梁惠王上》载"梁惠王曰：及寡人之身，东败一齐，长子死焉"。魏太子申不是当时被杀，而是被俘之后才死。

马陵之战齐大获全胜，主要是孙膑的计谋，孙膑在此战中充分发挥了军事才能，自此便名扬天下。

战后第二年（前 340），商鞅对秦孝公说，乘魏新败，诸侯叛魏之时出兵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⑫。孝公同意，遂派商鞅率军伐魏，魏国派公子卬（áng 昂）率军抵御。两军相遇，商鞅致书公子卬说：“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欲与公子面相见盟，欢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信以为然。会盟而饮酒，商鞅埋伏甲士袭击，公子卬被俘，攻其魏军，大获全胜。魏惠王大惧。因魏国连年与齐、秦及诸侯国争战，国内已被战争消耗空虚，兵源也不足。于是，割还河西部分地区给秦，向秦国求和。

秦孝公二十三年即魏惠王二十一年（前 339），秦国又攻魏，败魏军于岸门（今山西河津县南），俘虏魏将魏错。次年，秦再攻魏，秦将率大荔之戎进围合阳（今陕西合阳东南）。

自马陵之战后魏国又连遭秦国攻伐，势力日见衰弱，称霸气势也消散，而齐国则势力更强，取代魏国成为东方第一强国。

注　释

①参见杨宽：《战国史》第 320 页。又王焕春：《重解千古马陵之疑》，刊《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见《孙膑兵法暨马陵之战研究》。

③《战国策·齐策五》。

④“逢泽之会”的年代，盟主，从杨宽《战国史》的考订。

⑤《战国策·秦策四》。

⑥《水经·渠水注》引《经年》。

⑦《战国策·齐策一》。

⑧《史记·田世家》。

⑨《战国策·魏策二》。

⑩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⑫《史记·商君列传》。

先秦

商鞅变法

春秋末，各诸侯大国内部都不同程度地起变化，只有秦国变化不太大，在诸侯中算是个落后国。如《史记·秦本纪》所载："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顾及）外事，三晋（韩、赵、魏）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这是秦孝公即位元年（前361），发奋图强，下求贤令中的一段。是对秦国从厉共公（前476—前443在位）到出子，即献公即位前的秦国形势的总结。但是，在他之前的几位国君，也不是都甘心落后，在当时各国形势影响下，也作过一些变革，如简公七年（前408），魏文侯伐秦，攻占秦国河西之地（今陕西、山西交界的黄河以西，北洛水以东及北一片地区）。秦退守洛水，沿洛水设防。损失大片疆土之后，简公有所觉悟，在中原诸侯国各种变法、改革影响下，也"初租禾"即实行实物地租。献公时（前384—前362在位），想改变秦国内忧外困的局面，也进行一些变革。即位元年，废除残酷野蛮的人殉制度。第二年，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于栎阳（今陕西临潼武家镇东，东北距今富平县约十公

里)。

秦都栎阳遗址已在六十年代发现，据1963年和1964年的初步勘查，其都城遗址东西宽1.8公里，南北长2.2公里。有城门六座，城内有街道三条，东西向两条，南北向一条。在遗址中出土有金、铜器。据判断，应是秦献公迁都时所修筑①。

献公迁于栎阳的目的，主要是距魏国较近，自秦失去河西之地后，想收复而无力，献公迁于此当是有收复河西失地之意。同时，也是更接近中原国家，便于吸收先进的治国经验。

献公迁都后又增设一些县，如献公六年（前379），增设蒲（今山西隰县西北）、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和善明氏等县。次年，“初行为市”，准许在国都内从事商业活动。

献公的变革措施虽然不多，但也取得初步成效。这主要是表现在对外军事方面。如献公十九年（前366）韩懿侯与魏惠王在宅阳（今河南郑州北）相会。秦出兵攻韩魏联军，大败联军于洛阳（今河南洛阳东北)。献公二十一年（前364），秦军伐魏，攻至河东，在石门（今山西运城西南），大败魏军，斩首六万级，赵军救魏，秦军乃退。此一战影响很大，连名存实亡的周天子——周显王也向献公祝贺，献公遂自称为伯。献公二十三年（前362）魏相公叔痤率军与韩、赵两国大战。韩、赵军败于浍水（今山西曲沃东）北岸。献公趁两国鏖战之时，派庶长国率军伐魏国，大败魏军于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擒魏公叔痤，攻占庞城（今陕西韩城东南)。

献公死，其子渠梁继位，即秦孝公。二十一岁的秦孝公，欲继其父献公之事业，发奋图强，复修穆公霸业，乃广泛招收有用之人才，孝公元年下一道招贤令，令中总结自先祖穆公以来的秦国形势，最后说：“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

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②商鞅就是在这时到秦国。

商鞅，原来是卫国国君后裔，所以又叫卫鞅或公孙鞅，入秦国后为秦孝公所用，封为商君，故称商鞅。

商鞅从少年时期就“好刑名之学”③。魏惠王五年（前365），商鞅到魏国。这是战国时期变法改革最早的诸侯国，魏文侯时，法家李悝（kuī亏）为相，主持变法，废除“世卿世禄”的制度，按功和论才选拔官吏，又“尽地力之教”奖励耕作，增加产量等等。李悝还汇集各国刑典，编著为《法经》六篇。经过李悝的变法治理，魏国富强于别国。商鞅虽是三十年后才到魏国，但法家的思想影响还继续存在，尤其是《法经》对商鞅的思想影响较大。但是商鞅在魏国也只是学习了一些法家的理论，也没有被重用，只在魏相公叔痤门下作一名小官——中庶子。公叔痤见商鞅有才干，欲提升官职，尚未实现，公叔痤就病。魏惠王探视公叔痤之病时，问及后事，要公叔痤荐举接任的人。公叔痤对惠王说：“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请王委以国政）。”又说：“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④公叔痤死后，惠王以公叔痤是病中说的胡话，既未用，也未杀。

商鞅得知秦孝公下令招贤，遂带着李悝的《法经》离开魏国到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引见，三次见到孝公。第一次对孝公说以“帝道”，这是道家学派的学说。孝公时听时睡，没有兴趣。第二次对孝公说以“王道”，这是儒家学派的学说。孝公仍无兴趣，责备景监给荐来个无用之人。第三次是请求后才得见，对孝公说以“霸道”，这是法家学派的学说。孝公兴趣大增，“语数日不厌”⑤。于是，孝公决定重用商鞅，准备

实行变法图强。

秦孝公虽听了商鞅变法图强的理论，也准备按商鞅的主张去变法，但也有顾虑，因为商鞅的变法定会遭保守势力的反对。于是，先在大臣们中讨论。孝公召集商鞅、甘龙、杜挚三个大夫“讨正法之本，求使民之道”⑥。孝公说：“代立（即位）不忘社稷，君之道也。错法务民主张（执行法令，努力宣扬君主的威德），臣之行也（臣应该执行）。今吾欲变法以治，更礼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议我也。”商鞅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劝孝公要变法就要有决心，不怕有人反对，要强国必须变法。孝公很同意商鞅的说法。

甘龙、杜挚这两个保守势力的旧贵族代表则坚持反对商鞅变法的主张，认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只能遵循旧制旧礼进行治国才是走正道。又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他们所说的“圣人”也就是古代的帝王。商鞅针对他们这些僵化的思想、保守的言论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又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主张“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⑦。经过辩论后，孝公终于下决心变法。任命商鞅制定变法措施。

商鞅变法先后两次，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孝公任命商鞅为左庶长（秦国二十等爵的第十级），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 加强户口管理，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秦献公时已实行户口登记制度，商鞅更加严密户口管理。按五家为“伍”，十家为“什”来编定户口数，使五家互相监视，一家犯法，四家连坐，同样受罚，不举报要处以腰斩。举报者，如杀敌人一

样的受奖。隐藏罪犯，按投敌论处。旅客住店要有官府凭证，留无证明者住宿，店主与“奸人”同罪。

2. 奖励军功、禁止私斗。规定按军功大小赏赐二十等爵的制度。甲士斩一敌首赏爵一级，想当官则赐以五十石的奉禄。私斗者按情节轻重处以不同的刑罚。

3. 废除旧有的世卿世禄制，重新确定爵位和等级。无军功者不列入宗室之籍，不得享有宗室之特权。按对国家贡献大小定其爵位、田宅、仆婢和车马器物等的占有量，僭越者受罚。

4. 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开荒生产者受奖。凡从事“本业”——男耕女织，使粟帛多者免除本身徭役，从事“末利”——商业及懒怠而贫者，要全家没收入官府为奴。

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害怕）私斗，乡邑大治。”于是，商鞅因变法改革有功，被孝公提拔为大良造（亦称大上造，是秦二十等爵的第十六级），掌握军政大权。

秦献公迁都栎阳后，对魏国的战争取得不少的胜利，魏国在连遭失败的情况下，只得将国都由安邑迁往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秦孝公因商鞅第一次变法改革初见成效以后，为了战备上和发展生产的需要，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将国都由栎阳迁往咸阳（今陕西咸阳市），由商鞅监督修建咸阳宫。咸阳秦都遗址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已连续数次调查和试掘，遗址范围约长6公里，宽4公里，在咸阳宫遗址中出土一些残存物。因为咸阳是秦国最后一个都城，到秦王朝灭亡时项羽火烧咸阳宫，大火三月不灭，未剩什么遗物。

在迁都的过程中，商鞅又进行第二次变法改革。主要内容大体来说有：

1. 在全国推行县制，新法规定，原有的相邻小乡邑合并，设置四十一县（《秦本纪》、《商君列传》为三十一县），县设县令、县丞，由秦君直接任免。

2. 废除井田制，"开阡陌封疆"，使"民得买卖"。将井田上纵横疆界废除，承认土地私有，人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家只按土地多少来征收赋税。

3. 统一度量衡制，颁布度量衡标准器。对于征收赋税，俸禄制和商业贸易都有统一的标准。1956年上海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商鞅方升》，升的三边和底部刻有铭文，左边刻记秦孝公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之事。顶边刻"重泉"二字，右边刻一"临"字。底部刻秦始皇二十六年诏书。

4. 焚诗书、明法令。商鞅为打击儒家的复古思想，采取焚烧儒家经典《诗》、《书》。又根据李悝的《法经》制定法律，明令颁行。对后世法律的制定影响很大。

商鞅变法改革近二十年，取得不小的功绩。对内打击旧贵族的保守势力，促进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国力增强，人民富裕。将一个落后的秦国变为发展中的秦国，为成为一个强大的秦国，灭六国而统一中国的秦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外改变了"诸侯卑秦"的局面。商鞅几次率军对外战争和开展外交活动都取得成功，使魏、赵两国不敢再轻视秦国，还收回了部分河西之地。

秦孝公因商鞅有功于秦，遂封他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十五邑，号商君。因商鞅对顽固贵族和反对变法改革，以身试法的人，进行了毫不留情地打击。引起了这些人的反

对，所谓“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⑧。

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孝公死，太子驷继位，即秦惠文王。旧贵族们见时机已到，公子虔等人诬告商鞅欲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得知后出逃，至关下时天已晚，乃投宿旅店，遭店主拒绝他住宿，因商鞅没有官府凭证，店主还对他说是“商君之法”规定。商鞅逃奔魏国，但魏与商鞅有怨，拒绝他的避乱，又只得回到秦国入他的封邑商，并组织徒属抗秦，向北袭郑（郑桓公最初的封邑，今陕西华县北）。惠文王发兵攻商鞅，商鞅兵败被杀于彤（今华县西），又处以车裂之刑，并灭其族。商鞅变法虽然失败，但此后，秦国被法家的思想所统治，秦也成为一个有法可依，以法治国的国家，商秧变法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注　释

①《文物》1966年第一期。

②《史记·秦本纪》。

③④⑤《史记·商君列传》。

⑥⑦《商君书·更法》。

⑧《史记·商君列传》。

合纵连横

各大国纷争，攻战不止。魏、赵、韩、齐、秦、楚、燕形成“战国七雄”。在激烈的斗争中，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外交和军事活动中就产生了“合纵”与“连横”。据《韩非子·五蠹》中的解释：“从（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这是一些游说之士，研究形势的变化，奔走于各国之间开展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各国间的矛盾斗争也很复杂，加以形势变化多端，故“合纵”、“连横”也不稳定，“朝秦暮楚”亦是常有。纵横家主要是鼓吹合纵、连横的活动可以“从（纵）成必霸，横成必王”①。

过去有关“合纵”、“连横”的记述，多以苏秦和张仪同时在七大国中奔走游说，两人主张针锋相对，把有的事说成是苏秦的。司马迁曾表示怀疑②。其后学者也多有疑意。1973 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出土帛书，其中有《战国纵横家书》，存有二十七章，共一万一千余字。其中十一章的内容皆见于现行的《战国策》和《史记》。另外十六章是佚文。记载苏秦的内容有十五章之多，从中可知苏秦的活动比张仪晚，张仪死后才

见苏秦的活动。

马陵之战后一年（前341），魏国受到齐、秦、赵三国的夹击。五月，齐国田盼率齐、宋两国军攻魏国东鄙，围平阳（今河南滑县东南）。九月，秦国商鞅率军攻魏西鄙。十月，赵军攻魏北鄙。第二年秦商鞅攻魏诱擒魏公子卬，魏割让部分河西之地与秦国。其后三年秦、赵又相继攻魏。虽未根本削弱魏国实力，但使魏处于困境。是时惠施为相，魏惠王召惠施说："夫齐，寡人之仇也，怨之至死不忘。国虽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惠施回答："不可。臣闻之，王者得度（法度），而霸者知计。今王，所以告臣者，疏（忽略）于度而远于计，王固先属怨于赵（桂陵之战因齐救赵而起），而后与齐战，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齐，则必为楚擒矣。是王以楚毁齐也。"③惠施根据当时形势，劝魏惠王暂时妥协，不穿王服屈节去朝见齐威王。魏惠王认为惠施之计很好，便通过齐相田婴的关系，于齐威王二十三年即魏惠王后元年（前334），率领韩昭侯和诸小国国君到齐国的徐州（今山东滕县东南）朝见齐威王。齐相田婴，魏相惠施一同参加朝见礼。魏、韩及小国国君尊齐威王为王，齐国也承认魏惠王为王（魏早在逢泽之会时自称为王）。此即"徐州相王"。齐国虽与魏国互相称王，但实际上势力已超过魏国。

齐、魏"徐州相王"，大有分霸之势，楚、赵、秦当然不能坐视。就是魏王不派人去游说楚国，使"合其斗"，楚国也会伐齐。次年（前333），楚伐齐国围徐州，败齐将申缚。赵国亦攻魏的黄城（今河南内黄西北），未攻下，就在漳、滏

（今滏阳河）间筑长城以防齐、魏。

秦惠文王六年（前332），因秦起用了魏国阴晋（今陕西华县东）人公孙衍（犀首）为大良造。魏在是年献阴晋与秦求和，秦改名为宁秦。一年后，秦公孙衍又攻魏，俘魏将龙贾，斩首八万。逼魏献河西其余之地。

秦惠文王九年（前329），游说之士、纵横学家张仪到秦国。公孙衍又离开秦国到魏国，魏国用以为将。次年，秦国设置国相，用张仪为相。

张仪，魏国人，事鬼谷子学纵横之术。学成游说各国，曾在楚国与楚相饮酒，楚国丢失璧玉，门下人说"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④。并将他痛打后驱逐，遂西入秦。

与孟子同时的纵横家景春说："公孙衍、张仪岂不成大夫哉（难道不是个真正的大夫吗）？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安静后而天下罢兵息战）。"⑤可见这些纵横家在当时所起的作用。

齐威王三十四年（前323），张仪会齐、楚大臣于啮桑（今江苏沛县西南），企图结束齐、楚敌对，以此向魏施加压力，推行连横之策，有利于秦向东发展。与此同时，公孙衍游说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以对抗秦国，这就是公孙衍推行的合纵之策。但是齐国借口中山国小，反对中山称王，企图使魏、韩、赵与齐结盟，中山只依附于齐。这样齐国就可成东方各国的盟主，如此啮桑之会自然失败。

张仪因联齐、楚失败，被秦惠文王罢相，他就到魏国。魏惠王因惠施联齐之事未成，将他驱逐，改任张仪为魏相。张仪劝魏惠王事秦，惠王不听。齐国首先反对张仪连横之策，支持公孙衍的合纵，并积极活动，使齐、楚、赵、韩、燕五国联合

反对张仪的连横。齐宣王元年（前 319），五国支持公孙衍作了魏相，张仪被逐，又回到秦国。于是齐、楚、魏、赵、韩、燕六国合纵形成。是年，魏惠王死，子嗣继位，即魏襄王。

次年（前 318），公孙衍发动魏、赵、韩、燕、楚五国攻秦国，共推举楚怀王为纵约长，秦出兵与五国联军在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交战，结果秦败五国联军。第二年（前 317），秦军又与魏、赵、韩战于修鱼（今河南原阳西南），秦败三晋之军，俘韩将鲰、申差、败赵公子渴、韩公子奂，斩首八万。六国纵约也就解散。

燕国在春秋时期与中原诸侯国交际较少，战国初期燕国疆域有所扩大，势力也不强，因地处北方较为偏僻地区，也很少受大国的攻伐。自燕文公即位（前 361）后，才逐渐与中原诸侯国有较多的交往，遂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燕王哙即位（前 320）后，受到各国变法改革图强的影响，也实行改革，但他所信任的燕相子之是个独断专横的人，与鹿毛寿（一作潘寿）勾结，于燕王哙五年（前 316）逼着燕王哙学尧舜而让国，由子之行国政。但子之为政三年，暴虐人民，人民怨恨，燕国内乱（前 314），齐国派匡章率兵伐燕。燕王哙被杀，子之被醢，燕人又反对齐国，齐才撤军。赵国从韩国召回燕公子职入燕继位，即燕昭王。

公孙衍的六国合纵失败后，东方的齐、西方的秦这两大国都在自谋出路，如何才能建立“王业”使各国服从。秦国在“王业”建立上出现不同意见。张仪主张攻韩国，劫持周天子而“挟天子以令天下”；司马错则反对，认为如此会得恶名而实不利。他说：“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广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

（业）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变）。夫蜀，西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⑥而巴、蜀有水道可通楚国，所谓“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⑦。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主张。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从石牛道伐蜀，蜀王率军至葭萌（今四川剑阁东北）抵御秦军，结果兵败被杀，蜀被灭。之后，张仪、司马错又攻灭巴国（今四川重庆市）。两年后秦王封蜀王之子公子通为蜀侯。

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秦派魏章、樗里疾、甘茂伐楚国，韩国助秦攻楚。大败楚军于丹阳（今河南西峡丹水以北），俘其楚将屈丐和逢侯丑等七十余人，斩首八万，取汉中地六百里，置汉中郡（今陕西汉中地区，郡治南郑）。次年，秦国欲与楚讲和，原归还汉中一半之地，楚怀王恨张仪，不愿得地而得张仪。张仪出使楚，被囚禁，怀王欲杀张仪。张仪以重金贿赂怀王宠臣靳尚和宠妃，二人进言才得释放。张仪游说楚、韩、齐、赵、燕五国连横事秦国，五国同意，张仪因此被秦惠文王封给六邑，号武信君。但是不久惠文王死，其子荡继位，即秦武王。武王作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即位后，群臣对张仪又多诋毁。于是，张仪的连横又破产。次年，张仪惧武王诛杀，假说齐王恨自己，如派他去魏国，齐国必伐魏，齐魏交兵，秦则可乘机伐韩，入三川而挟周天子。秦武王果然派张仪出使魏国，魏襄王用为相，一年而死。

周赧王二十七年（前288），由于秦国欲号令天下，便取

上帝之帝为号。但又惧怕被各国反对，于是拉拢齐国也称帝。“穰侯相秦而齐强，穰侯欲立秦为帝，而齐不听，因请立齐为东帝，而乃能成也”⑧。穰侯即魏冉。是年十月，魏冉出使齐国，约齐闵王同时称帝，秦称西帝，齐称东帝。这也是秦国采用连横之策，企图以此来联合五国对付赵国，灭赵后瓜分其地。所谓“且五国之主，尝合衡谋伐赵，疏分（瓜分）赵壤(国土)”⑨。还订立了盟约“都之盘盂”，约定共同出兵时间。是年十二月，齐先废除帝号，背秦，吕礼自齐入秦，秦国也废除帝号复称王。

秦、齐称帝，其余五国十分紧张，因此加紧破坏秦、齐联盟，最终导致两国也废除称帝，这主要是苏秦从燕国到齐国推行合纵的结果。

苏秦，是继张仪之后的纵横家代表人物，东周洛阳乘轩里（今河南洛阳东）人，自称是“进取之臣”，“以不复其常为进者”⑩。与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奉阳君李兑，秦国穰侯魏冉等人参加合纵、连横活动。苏秦始终事燕昭王，为其出谋划策，奔走于齐、赵、魏等之间。主要是挑起齐与赵国矛盾，以防止攻燕。

周赧王二十八年（前287），苏秦和李兑发动魏、赵、韩、齐、楚五国攻秦，五国联军驻于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之间，静观秦国动向。秦昭王迫五国压力废除帝号，并割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河南济源南）、高平（今济源西南）给魏国，又还王公、符逾（今地不知）两地给赵国⑪，五国遂罢战。次年，因宋王偃的荒淫暴虐，“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⑫。苏秦劝齐闵王乘机攻宋。魏、楚两国也出兵争夺宋地。故杀宋王偃，灭宋

后，三国瓜分宋地。

周赧王三十一年（前 284），秦昭王和魏昭王在宜阳（今河南宜阳西）相会，又和韩厘侯在新城（今河南伊川西南）相见。燕昭王也赴赵，会赵惠文王。这些相会都是为了伐齐作准备。燕国自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以招贤者”。于是乐毅自魏、邹衍自齐、剧辛自赵纷纷到燕国。又“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⑬。经过二十八年奋发图强，使诸侯刮目相看，故伐齐主力就由燕国担任。

燕国上将军乐毅（魏国乐羊之后代）率燕、秦、赵、韩、魏五国联军伐齐。齐军大败，攻下齐国七十余城。楚国派淖齿救齐，齐任为相，淖齿欲与燕分齐地，遂杀齐闵王。于是齐国只剩即墨和莒两城未攻下，其它城邑皆被五国瓜分。这一战使齐国势力大受损失，也帮助秦国控制东方六国创造了条件，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有利基础。

注　释

①《韩非子·忠孝》。

②《史记·苏秦列传·太史公序》。

③《战国策·魏策二》。

④《史记·张仪列传》。

⑤《孟子·滕文公下》。

⑥《战国策·秦策一》。

⑦《华阳国志·蜀志》。

⑧《韩非子·内储下》。

⑨《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一章。

⑩《战国纵横家书》第五章。

⑪《战国纵横家书》第二十一章。

⑫《史记·宋微子世家》。

⑬《史记·燕世家》。

先秦

长平之战

长平之战是战国后期赵秦两国间的决定性的战役。战国中期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以后，国富兵强，频繁东进，三晋的魏、韩被秦攻伐，割地求和。楚国在倾襄王十九年（前280），被秦国司马错发陇西之卒由蜀攻楚，楚割上庸（今湖北竹溪东南）及汉水以北之地与秦求和，但两年之后（前278）秦将白起攻取楚之郢都（今湖北江陵西北），楚只得向东徙都于陈（今河南淮阳），秦置南郡，以郢为郡治。白起因此被封为武安君。齐国自燕昭公二十八年（前284），被燕将乐毅率五国之军攻破后，势力削弱。燕国在昭公即位前无大势力，昭公时虽势力有所增强，但不能与秦抗衡。唯有赵国还能与强秦抗衡。长平之战，赵国军力损失惨重，此后一蹶不整。秦因此更加强大，最后灭六国而统一。

赵国早在赵烈侯七年（前402），相国公仲连就进行改革。公仲连举荐牛畜、荀欣、徐越三人，三人劝烈侯“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①。烈侯听从，实行改革。赵的改革虽不如魏、秦那样轰轰烈烈，但是有其成效，在

频繁争斗中势力日强。与魏、齐、秦的战役中各有胜败。桂陵之战就是因赵攻卫，迫卫成侯朝见赵成侯，魏惠王为救卫而进攻邯郸而引起。赵肃侯二十四年（前326），肃侯死，子雍继位，即赵武灵王。安葬肃侯时“秦、楚、燕、齐、魏出锐师各万人来会葬”②。这种异乎寻常的举动，是对新即位的赵武灵王的示威。此后十几年中齐、秦、魏不断攻伐赵国，使赵武灵王意识到赵国出路仍在增强军事力量。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一月，武灵王“大朝信宫，召肥义与议天下，五日而毕”③。之后，武灵王向北侵入中山国，到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又至代（今河北蔚县东北），北至无穷（今河北张北南长城外，当时此地有无穷门），西至黄河，登黄华（山名）之上。

赵武灵王在中山国观察各地以后，遂召大臣楼缓商议“胡服”之事，理由是“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西有林胡、楼烦、秦、韩之边，而无强兵之救，是亡社稷”。楼缓表示同意。因为东胡、林胡、楼烦，还有北边的匈奴，都是些游牧部族，经常以骑兵侵入赵国，破坏边疆农业生产，扰乱人民生活。所以学习这些部族的衣着，便于骑马射箭，才能对付这些部族，故称“胡服骑射”。所谓胡服，即是短衣，便裤，束皮带，用带勾，穿皮靴。但是，在大臣中对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却有阻力。除了肥义、楼缓外，公子成、赵文、赵燕等人都不同意。公子成认为是“袭远方之服（衣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④。赵造认为：“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俗而动”⑤。武灵王针锋相对说：“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霸）不同教而政，智者作教，而愚者制（停止，不变）焉。”又说：“古今不同俗，何古之法？”“以古制今者，不达于事之变。”⑥

君臣经过激烈的辩论后，终于说服这些保守派，遂下《胡服令》。并将新攻取的原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改为“骑邑”，用来训练骑兵。

次年，赵武灵王便进攻中山国及胡人之地，攻至榆中（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东部），林胡向赵国贡献马匹才撤军。第二年又攻中山国，中山献出四邑请和才撤军。三年后（前301），赵国再攻中山国，中山国君逃奔齐国。

赵武灵王二十六年（前300），赵国又伐中山国，北攻至燕、代，西至云中（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南）、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破林胡、楼烦，置方中、雁门、代郡。遂在此一带修筑长城。

次年，赵武灵王传国于太子何，即赵惠文王。自号“主父”。使肥义为相国，辅佐惠文王。

赵惠文王三年（前296），赵国攻灭中山国。中山国为春秋末白狄别族所建立，又称鲜虞。在今河北正定东北，战国初都于顾（今河北定县），魏文侯四十年（前406），被魏国乐羊攻灭，不久复国，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东北）。“五国相王”时，中山亦在其中，曾攻燕国。赵攻灭后迁其中山王于肤施（今河北平山北）。1974年至1978年，在河北平山县城北发现中山国晚期都城灵寿的遗址，发掘两座中山王陵。1号墓西边藏器坑出土铜礼器，有九鼎、四簋。墓中随葬的《中山王礜鼎壶》和《嗣子盗壶》共有铭文1101字。这是研究中山国的重要史料。

赵惠文王四年（前295），因在赵武灵王即位后立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娶吴广之女孟姚为妃，生子何，因有宠，遂废章立何为太子。灭中山后封公子章于代郡东安阳（今河北阳原东

南），号安阳君，使田不礼为相。是年，赵主父和惠文王游沙丘（今河北广宗东北王固村），分宫而居。公子章与其相田不礼乘机作乱，杀肥义。公子成和李兑发四邑之兵救乱，公子章败逃至沙丘，主父接纳。公子成和李兑围主父宫，遂杀公子章与田不礼。公子成和李兑又惧怕主父责怪被杀，乃围主父宫三月，将主父饿死于沙丘宫。惠王年少无力对付，以公子成为相，封为安平君，以李兑为司寇，二人遂专赵国政。

赵惠文王十六年（前283），赵将廉颇伐齐，攻取齐之晋阳（今山东郓城西）。惠文王拜廉颇为上卿。

赵国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以十五城交换。宦者令缪贤的舍人蔺相如请赵王，愿持璧赴秦。蔺相如至秦，见秦王有诈，欲骗取和氏璧，遂"完璧归赵"。赵惠文王拜为上大夫。

秦昭王二十八年即赵惠文王二十年（前279），秦、赵两王会于渑池（今河南渑池西）修好。蔺相如随从赵王，廉颇送至边境告别时说："王行，度（估计）道里（道路距离）会遇之礼毕，还，不过三十日。三十日不还，则请立太子为王，以绝秦望。"⑦在会上秦王以势压人，请赵王鼓瑟，并要史官记录。蔺相如复请秦王击缶，秦王不肯，蔺相如以气势逼秦王一击，也让赵史官记录。为赵国争得外交上的胜利。回赵后，惠文王拜蔺相如为上卿，位于廉颇之右（以右为尊）。廉颇不服，多次想辱蔺相如，相如多次退让。廉颇后来得知相如退让，是怕赵国将相失和，秦国不惧而攻赵国，于是向蔺相如"负荆请罪"，将相和好。

是年，齐国田单在即墨摆"火牛阵"大败燕军，杀燕将骑劫，陆续收复失去的七十余城，使齐复国。齐襄王封田单为安平君。但齐国也不能恢复原有的实力。

秦昭王三十七年即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前270），秦国派中更（秦爵十三级）胡阳率兵攻赵，围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次年，赵惠文王派赵奢率兵往救。阏与地险且狭，赵奢令军离邯郸三十里屯军二十八日，待秦军懈怠后，遂二日一夜赶到阏与，发万人占据北山，居高临下，大破秦军，围得解。赵奢因此被封为马服君。

此时，范睢已西入秦国，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范睢，又作范且，字叔，魏国人，为魏中大夫须贾家臣。受须贾陷害，为魏相魏齐打伤，被郑安平藏匿。秦国王稽出使魏国，遂偷载入秦国荐于秦王。秦王用其谋攻魏国接连取胜，于是以范睢为相。

赵惠文王三十三年（前266），惠文王死，太子丹继位，即赵孝成王。

秦昭王四十五年即赵孝成王四年（前262），秦将白起伐韩国，攻取韩的野王（今河南沁阳），断上党（今山西长子西南）与韩国都新郑之路。韩国恐惧，使冯亭处理此事，上党郡守冯亭欲将上党郡十七县献给赵国以联赵抗秦。赵王召赵豹商议，赵豹不主张要，召赵胜（平原君）商议。赵胜主张要⑧。赵孝成王采纳接受的主张，封冯亭为华阳君，派廉颇驻守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以拒秦军。秦派白起、王龁攻长平，自此拉开长平之战的序幕。次年，王龁攻占上党。

秦昭王四十六年，赵孝成王六年（前260）四月，秦王龁攻长平，斩赵的偏将。六月，秦军再攻赵军，攻占两城，擒四尉官。七月，因廉颇固守不出战，赵王遂数次遣使责廉颇催战。此时秦将范睢派人持重金至赵国行反间计，散布说：“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子赵括将耳，廉颇易与，且降矣。”⑨赵

王正怨廉颇不出战，遂中其计，起用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奢之子）代替廉颇为将。

赵括到长平后则大举出兵攻秦军。秦则暗中以白起为主将，王龁为副，白起采用迂回运动战略，先在正面佯败退，以两支奇兵迂回，一支袭赵军之后，另一支切断赵军壁垒，将赵军断为二，绝其粮道，赵军只得坚守以待援军。秦王得知，亲至河内，赐民爵一级。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都至长平，用以堵截赵的救兵和粮运。赵军被困四十六日，饥饿乏食。赵括分赵军为四队，轮番突围，皆不成功。赵括自率精兵突围，被秦军射死。赵卒四十多万投降，白起仅放归年幼的二百四十人。其余因恐其为乱，全部“坑之”（活埋）。赵国这次战役前后损失四十五万人。历时三年的长平之战结束。

次年，秦国范睢因怕白起功大，不主张继续伐赵，秦遂许赵割地求和。是年九月，秦派五大夫王陵攻赵都邯郸，邯郸人上下同心坚守抗秦。第二年正月，围攻邯郸的秦军死伤很多，范睢起用郑安平为将继续围攻邯郸。

赵孝成王九年（前 257），秦围邯郸三年，赵平原君夫人是魏公子信陵君（魏无忌）之姊，数次请魏国出兵救赵。魏王派晋鄙率兵十万往救，秦国派使威胁魏王，魏王恐惧，派人止晋驻军于壁邺（今河北磁县南），名为救赵，实是观望，魏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才使邯郸之危解除。此后整个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长平之战，秦坑赵卒四十万，历来就有人怀疑。近年来在研究赵国史中，有些学者对此作了研究考证，认为当时赵国男子充其量也只有四十万，全国兵力也只有二十万。坑四十万之数恐怕不实⑩。附此备考。

注释

①②③④《史记·赵世家》。

⑤⑥《战国策·赵策二》。

⑦《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⑧《战国策·赵策一》、《史记·赵世家》。

⑨《史记·白起列传》。

⑩宋裕：《白起坑赵卒四十万质疑》，《晋阳学刊》1983年第3期。
舒永梧：《长平之战活埋赵卒四十万质疑》，《文史杂志》1990年第3期。

先秦

百家争鸣

《荀子·解蔽》："今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汉书·艺文志》列诸子一百九十八家，其中包括西汉诸子，举其成数而言"百家"，后世称"诸子百家"都是指先秦时期的诸子。班固将先秦诸子分为十大家，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十家是：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因当时对"小说家"的看法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途）说者之所造也"①。这种马路新闻，孔子称为"小道"，不成体系，故只有"九家而已"。

儒家，创始人是孔子，继承发展的是战国时期的孟子（约前372—前289），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名轲，字子舆。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或说尊称为荀卿）。孔子晚年对先秦"六经"作整理和研究，从传统文化中归纳出"礼"（乐包括在其中），把商、西周的等级礼制转变为具有内在意识、有个人自觉性的伦理道德的礼。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爱人"（《论语·颜渊》），"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爱人"就是爱护一切人。这是人类社会最基

本、也是人摆脱神的意志而具有的本性。孔子不迷信鬼神，不信天命，“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所说的天，与商、西周所说的天神不一样。虽然孟子、荀子也论述天、天命，但已经是人格化的天，命并不是由天神来安排。儒家所提倡的东西都是以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为基点。孟子说：“人之有（为）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商之始祖）为司徒（掌教化之官），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儒家著作中类似这样的观点很多，即借古人之口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主张，这就是所提倡的礼。人活着仅仅是为了吃饱、穿暖、过得舒服则是“近于禽兽”，故必须加以教化，教之以礼。综观儒家著述，礼规范了社会中每个人都有一定位置；有应尽的责任、义务；有获得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而且应做到“仁”，要有恻隐之心，共同献出爱人之心。否则就不合乎礼。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生长在鲁国都曲阜相邻的邹，是鲁公族孟孙氏之后代，接受了鲁文化和孔子思想而加以发展。生长在战国末年的赵国人荀子，不仅接受了儒家学说，而且根据当时社会情况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时新兴的地主阶层已完全上升为统治阶层，商业和手工业加速发展，大批商人在社会生活中起较大作用，人际关系也在社会大动荡中重新调整，就必须给“礼”注入新内容。荀子给“礼”注入的是法治，这就使儒家学说更具有生命力，奠定了其后历代王朝统治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发展为中华文化最有光辉点的一种学说。

春秋战国是先秦时代大动荡、大组合的时期，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每个社会成员从思想上、生活态度和行为方

面都在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总的来看，都是在儒家的“礼”之原则中来调整。由商、西周的“礼”发展到此时的“礼”，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它的意义不仅在“百家争鸣”中体现，更多地是对其后两千年中华文化发展的影响。故除儒家外，各家无论具体学说的主张如何，都直接或间接的与“礼”有关系。

道家，创始人是老子，或说即李耳，字聃，又字伯阳。有说即老莱子、周太史儋。春秋末楚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老子对周礼很熟习，见“礼崩乐坏”，“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诸侯纷争，于是产生超越现实的思想。一部五千字的《老子》（《道德经》），虽非全是他所著，但记载其学术思想，政治态度。学说主要是个“道”字，表示宇宙万物，包罗万象。“道”的表现是“无”，虚无飘渺的观念。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②。“二”即阴阳，阴阳结合生万物。老子既反对“礼治”，也反对“法治”，主张“愚治”，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③。为最早的“愚民政策”，被后世历代统治者所采用。

老子对一切事物认识到是矛盾两方面，如：有无、大小、难易、长短、刚柔、强弱等等，也看到对立的统一。但面对春秋末的社会现实，则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社会作用。不如儒家实际，儒家能用教来调整人际关系，以适应社会发展、变化。故老子主张超越现实的“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④。

战国初期，田齐桓公午在齐都临淄的稷门（西门）附近设置“稷下学宫”，招纳上千的知识分子在那里讲学，是当时最

大一个学术活动中心，自由言论场所，被称之为“稷下之学”，或“稷下学派”。田齐尊崇黄帝、道家始祖老子，故又称“稷下学派”为“黄老学派”。其实“稷下”并非一派；田骈（又称陈骈，齐国人），慎到（赵国人）为一派，关尹（尹喜）为一派，宋钘（即宋轻，宋荣子，宋国人）和学生尹文为一派。宋、尹继承老子学说而又加以改造，将老子的主张与儒家的主张结合，推崇明君、圣贤。主张适应新形势的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等级，以此调整人际关系。田、慎则由道家转变为法家，其著述、事迹和学说失传。关尹当时与老子齐名，是老子思想继承者，《老子》一书就是由关尹整理为上下两篇保存传世。

庄子（约前369—前286），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名周，曾为蒙邑漆园吏。虽未到过稷下学宫，也不是稷下学派成员，但是道家知名之士。从现存《庄子》三十三篇中看，庄子思想是老子思想的发展，他的“道”是一种浑沌的自然主义，认为宇宙万物皆是“道”，而“道”即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认为世间无是非、善恶、美丑之区别，一切只有“我”。是逃避社会现实，取消人的社会生活的消极思想。

名家，是战国时的“辩者”，又称“刑名之家”。《汉书·艺文志》列为名家。代表人物是惠施（约前370—前310），宋国人，庄子之友。曾在魏惠王时作过魏相，同魏惠王朝见过齐威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⑤。是个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曾和庄子辩论过“万物毕（完全）同，毕异”⑥。惠施的著述已失传，只在《庄子·天下》中保存有“历物十事”，从中可看出主要思想是“合同异”，即事物的同异。对物质世界的认识

是“名”与“实”的关系。

公孙龙，战国末年赵国人，曾为平原君赵胜门客，也是名家代表人物。他的“离坚白”说，代表继惠施之后名家一派。现存《公孙龙子》六篇，其中《坚白论》、《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和《名实论》是公孙龙所作。“白马非马”论就是公孙龙著名的辩论。

春秋以来的名辨思潮发展到战国末，主要对“名”和“实”的名词概念辨析，虽在许多问题中陷入诡辩，但是对开发人的智力思维，深化对各种事物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

“百家争鸣”不仅仅代表士这个阶层和新兴地主、商人的利益，还有代表中下层劳动者利益的思想和学派的墨家和农家。

墨家，创始人墨子（约前468—前376），名翟，宋国人。出身低贱，做过工匠，自称“贱人”。宋昭公时，曾任大夫，后长期居于鲁国。公输般（鲁班）为楚国造攻城的云梯，欲攻宋国。墨子得知后，自鲁国步行十日夜到楚国郢都，见公输般“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器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⑦。于是阻止楚国攻宋。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从《墨子》一书中反映出主要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十项。思想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这又比儒家的“爱人”具体。儒家不言利，墨子重利。“尚贤”、“尚同”、“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等都和儒家主张针锋相对。在战国中期前的争鸣中，与儒家形成两大派。墨子对事物认识的方法和辨别是非标准的“三表法”仅凭单纯的经验论，最后难免陷入宗教迷信中去。墨家后来分为相夫氏、相里氏、邓陵氏三

派，但作用不大，战国中期后遂衰落。

农家，代表人物是楚国人许行，与孟子同时代。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和“市贾不贰”。这种要求统治者与劳动者同劳动，同食和公平交易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但给后世影响较大。其言论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约前305—前240）。一作驺衍。齐国人。阴阳学派是在春秋“五行”思想基础上发展形成。兼容自然科学与宗教迷信。邹衍游历过魏、赵、燕、秦等国。辩驳过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公孙龙因此在赵国被丢官。阴阳家的著述已失传，邹衍学说只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和《史记》中残存一些。主要是“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认为历史是按金、木、水、火、土“五行”顺序转运。天人结合，人王应天运而生。为后世帝王“奉天承运”提供理论依据。

法家，既是“百家争鸣”中一学派，也是在与旧势力斗争中产生的新兴政治势力。法家主张变法、改革，目的是打击旧贵族的保守势力。因此易得国君支持。战国初期魏相李悝的变法改革和以后吴起、商鞅的变法改革，充分体现法家的主张和目的。李悝的《法经》和《李子》虽已失传，但在《汉书·食货志》、《晋书·刑法志》还存有一些。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事荀子。曾建议韩王变法，未与采纳，遂著书立说。后被李斯逼而自杀。他继承前期法家的思想，又加以发展为“法”“术”、“势”结合的法治思想。从后人编辑成《韩非子》一书中，见其是集法家之大成。其思想、主张，吸收后儒荀子的礼、法兼治，王、霸兼用。改造了老子的“道”，主张中央集权、君主

专制。提出"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重耕战，轻商学，以武力统一，以武力治国，反对是古非今，宗教迷信。为后世的专制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

反对墨家学说，只有一个魏国人杨朱。虽影响也不小，但是代表的是一种小私有者的狭隘思想。一切都是"为我"、"贵己"。故孟子抨击其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其著述失传。

兵家，是在春秋战国战争频繁下产生，代表人物有孙武、吴起、孙膑等人，其事迹见于本卷有关篇章。

注释

①《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

②《老子》第四十二章。

③《老子》第六十五章。

④《老子》第八十章。

⑤⑥《庄子·天下》。

⑦《墨子·公输》。

先秦

秦统一六国

长期无休止的战争，给人们带来长期的苦难。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①这正是战国时期的写照。长平一战，秦坑赵卒四十万，赵国在此战之先后死四十五万。秦与魏、韩联军"伊阙之战"（前293），白起大胜联军，斩首二十四万。秦、楚"鄢之战"（前279），白起引水灌城，死军民数十万。秦与赵、魏联军"华阳之战"（前273），白起大胜联军，斩首十五万，沉其卒二万于河中。仅就秦军杀死三晋和楚四国之人已超过百万。秦国是战国后期战争最频繁的国家，秦军死亡虽无明文记载，但也"死伤者众"②。因此人们渴望休战，要消除战乱，只有统一，而秦国自昭王时期就已具备了统一六国的基础。

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秦军伐韩国，攻取韩的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西周君（西周为战国时小国，公元前367年，韩国以武力分裂为西周、东周两小国）恐惧，背叛秦国与诸侯合纵，"将天下锐师出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攻秦，令秦无得通阳城。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奔秦，

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③。秦迁西周君于悬（dǎn 但）狐（今河南临汝西北），西周遂灭亡。是年，名为天子的周赧王死，周王朝自此结束。当“长平之战”时，楚伐鲁，攻取徐州。是年，楚灭鲁国，迁鲁君于莒。

秦昭王五十三年（前254），魏国乘攻取秦国陶郡之余威，伐灭卫国。

秦昭王五十六年（前251），昭王死，太子柱继位，即秦孝文王。是年，燕国伐赵，赵廉颇败燕军。廉颇被封为信平君。次年，秦孝文王死，子楚继位，即庄襄王。尊华夏夫人为华阳太后，夏姬为夏太后。夏姬为子楚之生母。秦庄襄王时，吕不韦为相国。秦国之政由吕不韦所左右。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在韩国经商，所谓“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④。后到赵都邯郸经商，见到秦国在赵国为人质的异人（即子楚），认为“奇货可居”，遂与之结交。异人是秦昭王之孙，安国君太子柱（即孝文王）之子。安国君有子二十余人，异人非长子，不受生母夏姬的宠爱，故入赵为人质。异人在赵“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⑤。正在异人处于困境，不得意时，遇上吕不韦这个富商大贾。吕不韦对异人分析了秦王室内部的矛盾情况，表示愿意助其争取立嗣。

吕不韦送五百金给异人在邯郸广为结交，争取好名声，又以五百金购奇物好玩作为礼品带上到秦国去打点。到秦后“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交诸侯宾客遍天下”。又说子楚在赵国“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⑥。又说子楚在赵思念秦国，愿作华阳夫人之子。如果华阳夫人认为子，将来立为嗣，则“异人无国而有国，王后无子而

有子”⑦。经华阳夫人之姊劝说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又劝说安国君太子柱，再加之异人在邯郸打点结交的宾客纷纷称赞，安国君终于将异人立为嗣子，异人也从赵国回秦国。吕不韦在给异人出谋时，异人曾说“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⑧。故子楚即位后，就按诺言让吕不韦作了相国，封为文信侯，以蓝田（今陕西蓝田西）十二县为食邑，后又改封至三川郡，食洛阳十万户。

秦庄襄王在位三年死（前247），太子政继位，即秦王政。政即位时只有十三岁，吕不韦继续为相国，称为“仲父”，辅佐秦王政，秦国军政大权皆集于吕不韦一身。吕不韦除了操纵秦国的一切大权外，还效法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招养大批的食客于门下，“至食客三千人”⑨。但吕不韦养士的目的不是出谋划策，敢死拼命，而是要他们制造舆论，为统一六国作理论准备。在吕不韦主持下，吕氏门中的宾客们“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⑩。“乃使其客人人著其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⑪。这是一部战国末年学者的论文集。《汉书·艺文志》列《吕氏春秋》为杂家，谓“兼儒、墨，合名、法”。

秦庄襄王子楚元年（前249），吕不韦任秦相国后，适逢东周君见西周被灭，欲联合诸侯伐秦，于是吕不韦率军攻灭东周于巩（今河南巩县西南）的小国。又派蒙骜伐韩国，攻取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荥阳（今荥阳东北）。这样秦遂将已占领的原西周、东周之地合此二地，设置三川郡（郡治洛阳），至此秦国领土东界已至魏都大梁地界。

在秦国不停地向东方进行兼并战的同时，东方六国也在为

扩大自己的势力互相攻伐兼并。客观上给秦国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是年，楚灭鲁国，迁鲁于卞（今山东泗水东）。次年，楚国又改封春申君黄歇于吴（今江苏苏州市），看来楚国兼并土地扩大，但这正是给秦统一创造方便条件。

秦庄襄王三年（前 247），秦将王龁伐韩，攻取上党全部土地。秦设置太原郡（郡治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秦将蒙骜伐魏，败魏军。魏安厘王从赵召回信陵君（窃符救赵后，魏无忌留居邯郸），任上将军。信陵君率五国之兵大败秦军于河外。"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⑫。秦国惧怕信陵君攻秦，遂于次年以万金派人入魏施反间计，抵毁信陵君在外流亡十年，与诸侯有勾结，现在将兵，诸侯畏其威，欲共立为魏王。于是，魏安厘王罢信陵君的官。两年后，信陵君忧愤死，魏安厘王亦死。秦再派蒙骜伐魏，攻取二十余城，秦设置东郡（郡治在今河南濮阳西南）。

秦王政六年（前 241），秦伐魏，攻取魏的朝歌（即原卫国都，今河南淇县），濮阳，迁原卫国君角于野王。赵国庞煖率赵、楚、魏、韩、燕五国之兵攻秦，攻至蕞（今陕西临潼北），被秦军击败，五国联军遂撤兵。这是战国最后一次合纵，此后形势急转直下。

吕不韦的舍人嫪毒（láo ǎi 劳矮），与秦太后私通，得太后宠幸，门下食客千余人，家僮数千，权势很大。秦王政八年（前 239），嫪毒被封为长信侯，赐山阳、河西两郡为封地，取代吕不韦决断国政。次年，秦王政二十二岁，亲自主政。秦王政至旧都雍行加冠礼。嫪毒乘机发兵作乱，攻雍的蕲年宫。秦王发兵平乱，俘嫪毒以车裂，夷其三族。平定内乱之后，秦王

政遂致力于伐六国。

李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荀子的学生。入秦国求仕途，作吕不韦的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⑬。李斯向秦王建议：“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除（如同灶上扫除一样），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⑭。因此被升为长吏，后又拜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秦王下“逐客令”，原因是外来的游说之士，大多是来离间秦国，故宗室大臣们上书请逐去这些外来客。李斯上书秦王政，列举许多客卿对秦国建立了很大功劳，不应一概排斥。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秦王政遂废除逐客令。

自秦王政十三年（前234）起，秦派桓齮率兵攻赵国平阳（今河北磁县东南），武城（今磁县西南），杀赵将扈辄，斩首十万。次年，赵国派大将李牧败秦军于肥（今河北晋县西），桓齮畏罪逃往燕。李牧被封为武安君。第二年（前232）李牧再败秦军，但赵军死伤亦惨重。

秦王政十七年（前230），秦派内史滕攻韩国，俘韩王安，尽占其地，韩国灭亡。秦设置颍川郡（郡治，即韩的旧都阳翟，今河南禹县）。次年，秦王翦率军攻赵国，围邯郸。赵李牧、司马尚御敌。秦国用重金贿赂赵王宠臣郭开，造谣说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迁中计，杀李牧，废司马尚。第二年（前228），秦将王翦、羌瘣攻赵，杀赵葱，破邯郸，俘赵王迁。赵公子嘉率其族众数百人逃往代郡，自立为王。秦设置邯郸郡（郡治邯郸）。

燕国太子丹，曾在赵国为人质，秦王政生于赵国，少年时与太子丹友善。秦王政即位后，太子丹又入质于秦国，秦王政待之不礼，太子丹自秦逃回燕国。秦王政二十年（前227），

秦攻燕国，燕太子丹恐惧，遂寻得卫人荆柯入秦，入咸阳，称献地图给秦王政，图中藏匕首，欲乘机刺杀秦王，未成功而被杀。次年，秦军攻破燕国，燕王喜和太子丹率精兵退至辽东。秦派李信追上，燕王喜只得杀太子丹，以头献秦王。

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派大将王贲攻魏国，围大梁；又引黄河、大沟之水灌大梁城，城坏，魏王假被俘，魏国遂灭亡。秦又派李信攻楚国，但被楚军战败。次年，秦派王翦、蒙武率军六十万再伐楚国，大败楚军于蕲南。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秦将王翦、蒙武攻败楚军，破寿春（今安徽寿县），俘楚王负刍，楚国灭亡。次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俘燕王喜，燕国灭亡。王贲又攻代，俘代王嘉，赵国彻底灭亡。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1），秦将王贲由燕攻入齐国临淄，俘齐王田建，齐国灭亡。至此，秦国全灭东方六国，统一中国。

注 释

①《孟子·离娄上》。
②《战国策·齐策五》。
③《史记·周本纪》。
④⑤⑥《史记·吕不韦列传》。
⑦《战国策·秦策五》。
⑧⑨《史记·吕不韦列传》。
⑩《史记·十二诸侯年表》。
⑪《史记·吕不韦列传》。
⑫《史记·魏公子列传》。
⑬⑭《史记·李斯列传》。

附录：先秦大事年表

传说时代

有巢氏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多，人民为避其禽兽虫蛇，有巢氏则构木为巢，过巢居生活。

燧人氏 上古之世，人民生食而伤害肠胃，民多疾病。燧人氏乃钻木取火，教民熟食。

伏羲氏 亦作伏戏，宓羲，包牺，或称牺皇，皇羲。伏羲之世，天下禽兽多，伏羲氏制作网罟，教民田猎，猎禽兽，捕鱼虾。又订嫁娶之制。一说伏羲即太皞（太昊），为古东夷部落首领，居于陈（今河南淮阳）。以龙命官，即以龙为其族图腾。

神农氏 神农氏之时，衣食不足，疾病生。神农砍木为耜，揉木为耒，教民播种五谷。尝百草之味，察水土之甘苦，一日遇七十毒，遂发明医药。教民男耕女织，不受饥寒。又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发明自由交换的市场。其后繁衍东徙至黄河中游，其支系又南迁，分散于江汉中游流域。

炎帝 又称炎帝氏，赤帝，烈山氏（烈或作丽，连），或称魁隗

氏，长于姜水（渭水支流，今陕西岐山南）之滨，遂以姜为姓。其后氏族迁徙，“初都陈，又徙鲁”。一说炎帝即神农氏。其支系活动于南方，欲向北发展，与黄帝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之野。

黄帝 又称黄帝氏、轩辕、帝轩、轩黄。长于姬水（一说即岐水，一说即冀水）之滨，遂以姬为姓，又为公孙氏。相传黄帝时有百官、其臣发明颇多，如书契、占日月星气、律历、甲子、算术。黄帝妃嫘祖开始养蚕治丝织衣。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而胜。又与蚩尤战于涿鹿（今河北涿鹿南），蚩尤战败被杀。

尧 又称唐尧，名放勋，陶唐氏首领。舜被推选为华夏部落联盟首领。命鲧治洪水，九年不成功，年老让舜为联盟首领。曾居冀方（今河北唐县境）、晋阳（今山西太原附近）、平阳（今山西临汾市）。

舜 又称虞舜，名重华，姚姓。有虞氏首领，因尧年老，在华夏部落联盟中代尧摄政，放逐治水不成功的鲧，命鲧子禹治水。尧死，舜被推举为联盟首领，年老让禹摄政。南巡守至苍梧山下（今湖南宁远南），死于苍梧，葬于九嶷（宁远东南）。

夏朝远祖

禹 姒姓，名文命，字高密，鲧之子。相传生于西羌，迁至嵩山下（今河南登封）。原为夏氏族酋长，在华夏部落联盟时期，受联盟领袖舜的任命继承鲧治理洪水。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因治水有功，代舜为部落联盟领袖。三苗不服，伐三苗获胜。涂山大会诸侯，“执玉帛者万国”。夏王朝开始建立。东巡狩至会稽大会诸侯，计功行赏。诛防风氏。病死于会稽。子启继王位。建都之地有阳城（今河南登封告城镇）、阳翟（今河南禹县）、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和晋阳（今山西太原市南晋源镇）等地说法。

启 又称夏后启，或夏后开，“后”是王之意。相传禹曾选定益

(伯益)作为继承人，禹死后，“诸侯皆去益而朝启”。启继位开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王位继承制。有扈氏不服，大战于甘，灭有扈氏。于钧台大会诸侯。征西河诛武观。启死，子太康继王位。

太康　启之长子，迁都于斟鄩(今河南巩县一带)。只知盘游，不恤民事。被有穷氏的后羿所逐，向东流落于阳夏(今河南太康)。

后羿　是有穷氏(今河南东北部一带)的方伯。相传是尧时以善射著称的羿之后代，禹时受封于鉏(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康东流，后羿自鉏迁于穷石(今河南孟县，或说在巩县)“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为寒国(今山东潍县东北)的奸诈子弟寒浞所杀。寒浞夺取有穷国之政权。

仲康　太康之弟。太康被逐久而不归，在夏旧臣们保护下作了夏王。记录最早的日食。

相　仲康之子。继仲康为夏王，迁居帝丘(今河南濮阳)，得斟灌氏(今山东寿光)和斟鄩氏(今山东潍县)的帮助，征淮夷、风夷和黄夷。寒浞命长子浇灭斟灌氏和斟鄩氏。杀相。

少康　相之子。浇杀相时，相妃后缗已怀孕，从城墙洞中逃出投奔有仍氏(今山东济宁)。生少康于有仍，成长后为有仍氏牧正。后又投奔有虞(今河南虞城)为有虞庖正。伯靡杀寒浞，灭有穷。女艾杀浇，灭过国。相子季杼杀豷灭戈国。少康复夏王位，重振夏王朝，史称“少康中兴”。少康死，子杼继王位。相传少康作秫酒。

履癸　名桀，发之子。即位后王都迁回斟鄩。伐有施氏，有施氏进献妹喜。筑倾宫，瑶台，敛百姓之财。灭有缗氏，伐岷山。作酒池。杀关龙逢。商汤举兵伐桀，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或说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桀败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被商汤流放南巢而死。

商族远祖

契　商始祖。相传为黄帝之后。母叫简狄，为有娀氏之女，帝喾

之次妃。拾玄鸟蛋吞食后生契。夏禹治水时，任司徒之职。佐禹治水有功，华夏部落联盟领袖舜以契所居之地商（今河南商丘）封其族。

昭明　契之子。居砥石（今河北石家庄以南，邢台以北，或说在辽水发源处），夏王朝封为商侯。

相土　昭明之子。迁居商。相传相土是马车的发明者。夏太康失国，有穷后羿无力顾及东方，相土向东发展，势力抵达黄河之滨。建立东都（今山东泰山附近）。相传相土曾为夏司马。

亥　又作王亥、该、核、垓、胲，甲骨文中称高祖亥、高祖王亥。冥之长子。驯服牛为负重工具。与其弟恒（甲骨中称王亙）率商族赶着牛羊在部落间贸易，为有易氏棉臣所杀。

上甲微（又作微），甲骨文中称上甲。王亥之子。夏王泄命上甲微继王亥为商侯。上甲微借河伯之力，打败有易氏，杀棉臣。商王朝建立后，祭祀先公从上甲微开始。史书称上甲微能继承契之事业，振兴商族。

汤　又作商汤、成汤、武汤、天乙、天乙汤。甲骨文中称唐、成、大乙、天乙。金文和周原甲骨文中称成唐。名履，主癸之子。商族从始祖契至汤迁居八次，汤定居于亳（有南亳，在今河南商丘北；北亳，在今山东曹县两说，另有西亳，今河南偃师，郑亳，今郑州市等说）夏桀暴虐，人民不满，汤任用虺和伊尹为左右相，积蓄力量灭夏。先灭为邻的葛（今河南宁陵北），再灭韦（今河南滑县东）、顾（今山东鄄城东南）、昆吾（今河南濮阳境内，或说在新郑境内），“十一征而天下无敌”。最后伐夏，和桀大战于鸣条（今河南封丘东，或说在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桀败走三朡（今山东定陶北），后又逃至南巢（今安徽寿县东南）被擒，流放而死。夏灭亡，商王朝建立。又十三年汤长子太丁早死，次子外丙继王位。

太甲　名至，甲骨文作大甲，太丁之子。继位后暴虐，乱德，不遵汤法。被伊尹囚于桐宫（今河南偃师附近）。伊尹摄政。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改过后伊尹还政。一说伊尹逐放太甲，篡位自立。七

年后太甲自桐宫出，杀伊尹，复王位。太甲死，子沃丁继王位。

太戊 名密，甲骨文作大戊或天戊。太庚之子。任伊陟为相。臣扈、巫咸辅政。桑谷共生于朝中。伊陟戒太戊，勤于王政，修德治国，王朝复兴，诸侯归顺。太戊死，子仲丁继王位。

祖乙 名胜，甲骨文作祖乙、下乙，又称中宗祖乙、高祖乙（祖乙二字为合文）。仲丁之子。王都迁于耿（一作邢，今河南北邢台市）。任巫咸之子巫贤为相。又迁都于庇（今山东鱼台附近）。巫贤、彭伯、韦伯辅佐，生产有所发展，商王朝复兴。祖乙死，子祖辛继王位。

盘庚 名旬，甲骨文作般庚。祖丁之子。为振兴王朝，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迁都前后以臣民有三次训话，即《尚书》中的《盘庚》三篇。《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盘庚死，弟小辛继王位。

史家将盘庚迁殷后至商纣王灭亡，称为商王朝的后半期，殷墟甲骨文就是盘庚迁殷后商王朝的遗物。甲骨文就是此后半期的文字。

武丁 名昭，甲骨文亦作武丁，史书中称高宗。小乙之子。守孝三年不问政事。借梦召见傅说，任傅说为相。以甘盘、祖己辅政。听后妻言，流放孝己。飞雉入太庙登鼎耳而鸣。祖己劝武丁修政行德，王朝复兴。发展农牧生产。伐舌方、土方，征西羌、东夷，对四方方国、部落用兵。扩大商王朝统治范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子祖庚继王位。

武乙 名瞿，甲骨文作武乙、称武祖乙。康丁之子。继康丁征伐诸方国。受周侯季历以征伐大权。赏赐季历土地、美玉、良马。破神权，加强王权，痛打木偶。革囊盛血作天神而射。猎于河渭间，被雷电击死。在位约三十五年。子文丁继王位。

文丁 名托，甲骨文作文武丁。武乙之子。周季历勤劳王事，助商征燕京戎（今山西静乐东北）、余吾戎（今山西长治西北）。命季历为牧师。杀周季历。在位约十三年死。子帝乙继王位。

帝乙 名羡，周原甲骨文和金文作文武帝乙。文丁之子。将其妹嫁周侯姬昌。封姬昌为西伯，得专征伐。征人方、盂方。在位约二十余

年死，子帝辛继王位。

帝辛　名受，又称纣或受辛。帝乙之子。商王朝最后一王。又叫纣王。即位后，建离宫别馆于朝歌（今河南淇县）。修林苑亭台于甘郸（今河北邯郸市）、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厚赋税以充实鹿台之钱、巨桥之粟。压榨诸侯，为黎（今山西黎城）之蒐。伐东夷，大军留皮东南。聚集逋逃助纣为虐。宠妲己，作酒池肉林，为长夜之饮。刚愎拒谏，醢梅伯、九侯。囚西伯姬昌，逐商容出朝。囚箕子，杀比干，暴虐日盛。周武王出兵伐纣，大战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商军前徒倒戈，纣登鹿台自焚而死，商朝遂亡。

周族先祖

后稷　名弃，周族始祖。传说为姜嫄（姜原）踏巨人足迹而生。舜封弃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南）。姬姓。

古公亶父　公叔祖类之子。因戎、狄之逼，由豳迁岐山下之周原（今陕西岐山），革除戎、狄习俗，营建城郭宗庙宫室，开垦荒地，发展农业。周族渐强，号周太王。其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奔江南，后来建立吴国。

季历　又称公季、周王季，古公第三子。商武乙三十四年，季历朝商。三十五年，攻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商文丁二年，周攻燕京之戎，大败。四年，攻余无之戎，克之。被商封季历为牧师。七年，周攻破始呼之戎；十一年，又败翳徒之戎。季历旋为文丁所杀。

周文王　名昌，季历子。被商封为西伯，纣囚西伯于羑里，周臣太颠、闳夭、散宜生等献美女名马等于纣，纣释放。解决虞（今山西平陆）、芮（今陕西大荔）两国争端，两国附周。败戎人，攻灭密须（即密，今甘肃灵台西南）、黎（今山西长治西南）、邘（今河南沁阳西北）、崇（今河南嵩县北）等国。建都丰邑（今陕西西安沣水西岸）。招纳贤士，至者有吕尚（即太公望等人）。

周武王　名发，文王子。即位后以吕尚为师，周公旦为辅，东至盟津（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会诸侯，与会者传有八百诸侯。此是观兵孟津。两年后再出兵伐纣。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国助周伐商，战于牧野，纣军前徒倒戈，商纣自焚，商王朝灭亡。西周建立，第一次分封诸侯。封纣子武庚于殷，置"三监"。

成王　武王子，即位时年幼，周公辅政。武庚和"三监"叛，周公平叛，东征。大举分封诸侯，营建成周。周公制礼作乐。还政于成王。

康王　伐鬼方，封宜侯，"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称"成康之治"。

昭王　成王子，伐荆楚、涉汉水，丧六师于汉水，去不返。

穆王　昭王子，西征犬戎，又西行，见西毋、征淮夷、伐越至于九江。

共王　灭密国，据《卫盉》、《卫鼎》铭文记载，井田制开始崩溃。

懿王　王室衰微，徙都犬丘。

孝王　封非子于秦，主马政，袭嬴姓。

夷王　蜀人、吕人献美女。烹齐哀公。命虢公帅六师伐太原之戎。与东南方的淮夷、群舒战争。

厉王　实行"专利"与"弥谤"的高压政策。国人暴动，厉王流彘。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841 年	共和元年	周公、召公执政，称"共和行政"。
前 828 年	共和十四年	周厉王死于彘，周宣王即位。秦仲立为大夫。
前 816 年	周宣王十二年	周宣王"不籍千亩"。"宣告"井田制解体。周宣王立戏为鲁太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789 年	周宣王三十九年	周与姜戎战于千亩，丧南国之师。周宣王料民于太原，清查人口。
前 781 年	周幽王元年	周幽王立。
前 779 年	周幽王三年	周幽王宠褒姒。
前 774 年	周幽王八年	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
前 771 年	周幽王十一年	申侯联合曾侯、犬戎攻周，幽王被杀于骊山下，西周亡。
前 770 年	周平王元年	周平王立，东迁洛邑，东周开始。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周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
前 762 年	周平王九年	秦文公迁都于汧，向东开拓。
前 760 年	周平王十一年	晋文侯攻杀王子余臣。
前 745 年	周平王二十六年	晋昭侯封成师于曲沃，为曲沃桓叔，晋国公族内部斗争从此开始。
前 740 年	周平王三十一年	楚熊通杀蚡冒自立为武王。
前 739 年	周平王三十二年	晋潘党杀昭侯欲立桓叔，不遑。晋人立昭侯子孝侯。
前 729 年	周平王四十二年	宋武公传位于弟不传子，宋内争从此开始。
前 724 年	周平王四十七年	晋曲沃庄伯杀孝侯，晋人立孝侯之子鄂侯。
前 722 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 鲁隐公元年	鲁隐公即位。《春秋》一书从此开始记事。郑庄公平定其弟叔段之乱。
前 720 年	鲁隐公三年	周郑交换人质。周平王死，其孙林即位为周桓王。郑掠取周麦、禾，周郑关系破裂。
前 719 年	鲁隐公四年	卫州吁杀卫桓公自立。宋、卫、陈、蔡四国伐郑，围郑东门五日。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718年	鲁隐公五年	晋曲沃庄伯攻鄂侯，鄂侯奔随。
前715年	鲁隐公八年	郑、鲁议换祊、许之田。
前714年	鲁隐公九年	郑设伏兵败北戎。秦宁公迁都平阳。
前713年	鲁隐公十年	郑、齐、鲁以王命伐宋，讨伐不朝见周王。郑、齐灭郕国，讨不从王命伐宋。
前712年	鲁隐公十一年	郑、齐败许，讨不从王命伐宋。鲁大夫羽父杀隐公。
前709年	鲁桓公三年	晋曲沃武公杀晋哀侯，晋人立其子小子侯。
前707年	鲁桓公五年	周桓王伐郑战于𦈡葛，郑将祝冉射王中肩，王师败。
前706年	鲁桓公六年	楚伐随。山戎伐齐，郑救齐，败戎师。
前704年	鲁桓公八年	楚熊通自号为武王。
前701年	鲁桓公十一年	郑庄公死，宋人逼祭仲立郑厉公。
前697年	鲁桓公十五年	秦伐彭戏氏戎，东至华山。郑厉公谋杀权臣祭仲不成功，出亡。昭公入郑。
前695年	鲁桓公十七年	郑高渠弥杀郑昭公，立子亹为君。
前694年	鲁桓公十八年	齐襄公使公子彭生杀鲁桓公。
前690年	鲁庄公四年	齐灭纪。楚武王死于伐随途中。
前689年	鲁庄公五年	楚文王即位，迁都于郢。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688年	鲁庄公六年	楚伐申、伐邓。秦灭邽、冀戎为县。
前687年	鲁庄公七年	秦县杜、郑。
前686年	鲁庄公八年	齐连称管至父杀襄公，立公孙无知。
前685年	鲁庄公九年	齐杀无知。齐桓公即位。齐、鲁战于乾时，鲁军败。
前684年	鲁庄公十年	齐鲁战于长勺，齐军败。楚伐蔡，齐灭谭。
前682年	鲁庄公十二年	宋南宫万杀闵公。宋人杀万，立桓公。
前681年	鲁庄公十三年	齐桓公与郑、陈、蔡、邾等国盟于北杏，谋平宋乱，第一次主盟诸侯。齐灭遂。
前680年	鲁庄公十四年	郑厉公复入郑为君。楚灭息。
前679年	鲁庄公十五年	齐、鲁、郑、宋、卫、陈于鄄结盟，齐桓公为诸侯长，称霸开始。
前678年	鲁庄公十六年	晋曲沃武公灭晋侯，周王以一军封武公为晋侯。秦武公死，用六十六人殉葬。
前677年	鲁庄公十七年	秦德公迁都雍。梁伯、芮伯西朝秦。
前675年	鲁庄公十九年	周王子颓攻逐惠王。楚文王死。
前673年	鲁庄公二十一年	郑厉公、虢公攻杀王子颓，平定王室内乱，周王将虎牢以东地赐给郑。郑厉公死。
前672年	鲁庄公二十二年	陈公子完出奔齐，为齐工正，陈氏于齐定居。
前670—669年	鲁庄公二十四年一二十五年	晋献公翦除桓庄二族，诛杀群公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663年	鲁庄公三十一年	齐桓公伐山戎救燕。
前661年	鲁闵公元年	狄人伐邢，齐伐狄，救邢。晋作二军。灭耿、霍、魏，并赐大夫赵夙耿，毕万魏。
前660年	鲁闵公二年	庆父杀鲁闵公，鲁人杀庆父。狄攻卫，卫懿公战死。卫先后立戴公、文公，暂居曹，后迁于楚丘。
前659年	鲁僖公元年	秦穆公即位。齐桓公迁邢国于夷仪。
前658年	鲁僖公二年	晋献公借道于虞伐虢。
前656年	鲁僖公四年	齐楚召陵之盟。晋杀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夷吾相继出逃。
前655年	鲁僖公五年	晋灭虢、虞。
前651年	鲁僖公九年	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晋献公死，晋发生内乱，秦穆公立晋惠公。宋襄公立。
前647年	鲁僖公十三年	秦国借粮给晋国，从水道由雍运到绛都，称为“泛舟之役”，是漕运的最早纪录。
前645年	鲁僖公十五年	秦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晋作爰田，作州兵。
前643年	鲁僖公十七年	齐桓公死，诸子争立，齐内乱。
前638年	鲁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与楚战于泓，宋军败，襄公受伤而死。
前636年	鲁僖公二十四年	晋文公立。周王子带作乱，周襄王逃于汜。
前635年	鲁僖公二十五年	晋文公围攻王子带，迎回襄王，安定王室。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633 年	鲁僖公二十七年	楚令尹子玉伐宋。晋文公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伐曹、卫，救宋国。
前 632 年	鲁僖公二十八年	晋楚战于城濮，楚军败，子玉自杀。晋文公会诸侯于践土，定霸业。冬，晋文公死。
前 627 年	鲁僖公三十三年	秦袭郑，郑商人弦高假命犒劳秦师。秦晋战于崤山，秦军败，孟明视等三帅被俘。
前 625 年	鲁文公二年	秦晋战于彭衙，秦军败。
前 624 年	鲁文公三年	秦伐晋，渡河焚舟，取晋地王官和郊。秦穆公封尸于崤山。后向西发展，称霸西戎。
前 623 年	鲁文公四年	楚灭江。秦称霸西戎。
前 622 年	鲁文公五年	楚灭六，伐蓼。秦师入鄀。
前 621 年	鲁文公六年	秦穆公死，用一百七十七人殉葬。晋蒐于夷，赵盾为正卿，执国政。
前 613 年	鲁文公十四年	楚庄王即位。周匡王立，两卿争政。
前 611 年	鲁文公十六年	楚灭庸。
前 607 年	鲁宣公二年	郑宋战于大棘，宋主将华元被俘。晋赵穿杀灵公。
前 606 年	鲁宣公三年	楚庄王伐陆浑之戎，陈兵周王室边境，问鼎中原。
前 605 年	鲁宣公四年	楚庄王平定令尹斗越椒之乱。
前 601 年	鲁宣公八年	楚灭舒、蓼。楚与吴越结盟。
前 597 年	鲁宣公十二年	楚伐郑，围郑都三个月。郑降楚。晋楚邲之战，晋军败。晋大夫先縠在清丘与宋、卫、曹结盟。
前 595—594 年	鲁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楚围宋九个月，晋不救，宋降楚。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前 594 年	鲁宣公十五年	鲁国初税亩。晋灭赤狄潞氏，次年灭甲氏、留吁。
前 590 年	鲁成公元年	鲁作丘甲。
前 589 年	鲁成公二年	晋军鞌之战，齐败。楚于蜀主盟诸侯。
前 588 年	鲁成公三年	晋楚交换邲之战俘虏。晋作六军。
前 585 年	鲁成公六年	晋迁都新田。吴王寿梦立。
前 584 年	鲁成公七年	晋派巫臣使吴，实行联吴牵制楚策略。吴攻入楚地州来。
前 583 年	鲁成公八年	晋栾书伐蔡，顺道伐楚，获楚将申骊。晋杀大夫赵同、赵括。
前 580 年	鲁成公十一年	晋秦隔河为令狐之盟。
前 579 年	鲁成公十二年	由宋华元发起，在宋国西门召开弭兵大会。
前 578 年	鲁成公十三年	秦晋战于麻隧，秦军大败，军帅被俘。
前 576 年	鲁成公十五年	晋会诸侯于钟离，开始与吴会盟。宋华元平定桓族荡氏之乱。晋“三郤”谗杀伯宗。
前 575 年	鲁成公十六年	郑伐宋，郑败宋军，获宋将。晋楚战于鄢陵，楚师大败，中军帅司马子反自杀。
前 574 年	鲁成公十七年	晋厉公杀大夫郤至、郤犨、郤锜。楚公子橐帅军灭舒庸。
前 573 年	鲁成公十八年	晋栾书，中行偃杀厉公，立晋悼公。楚共王、郑成公伐宋，纳宋叛臣鱼石于彭城，楚留三百乘戍守，以阻隔晋吴通路。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572年	鲁襄公元年	晋军围宋彭城，囚鱼石等五大夫。晋韩厥败郑徒兵于洧上。
前571年	鲁襄公二年	晋筑虎牢关威胁郑国。楚左司马公子申受小国贿赂，被杀。
前570年	鲁襄公三年	楚令尹子重伐吴，大败，遇心疾而死。吴夺楚鸠兹。晋祁奚举贤。鸡泽之会，晋悼公弟扬干扰乱军行，魏绛杀其车夫。
前569年	鲁襄公四年	晋大夫魏绛提出和戎政策。
前567年	鲁襄公六年	莒人灭鄫。齐人灭莱，扩大疆土一倍以上。
前565年	鲁襄公八年	郑伐蔡获胜，子产反对伐楚盟国。
前564年	鲁襄公九年	晋大夫智罃提出分晋军与诸侯军作三部分，轮番伐楚以疲劳楚军，收到预期效果。
前563年	鲁襄公十年	晋灭偪阳给予宋国。郑国为田洫，司氏等五族杀执政者子驷等人。晋再次城虎牢，并派兵戍守。
前562年	鲁襄公十一年	鲁国作三军。"三家"三分公室。秦晋战于栎，晋败。
前560年	鲁襄公十三年	晋蒐于绵上，重新任命三军统帅。吴王诸樊即位。楚吴庸浦之战，吴败。
前559年	鲁襄公十四年	晋人执戎子驹支。晋秦"迁延之役"。孙林父逐卫献公。晋去新军，恢复三军建制。楚令尹子囊伐吴，不胜而死。
前557年	鲁襄公十六年	晋鲁等十一国溴梁会盟。晋楚战于湛坂，楚军败，晋军追楚军至方城外。
前555年	鲁襄公十八年	晋鲁等十二国伐齐，战于平阴，齐大败。
前554年	鲁襄公十九年	郑子产为卿，执政。
前552年	鲁襄公二十一年	晋大夫栾盈出奔楚，内部斗争加剧。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551年	鲁襄公二十二年	孔子出生。
前550年	鲁襄公二十三年	陈役人杀大夫庆寅、庆虎。栾盈入晋曲沃、绛都，被杀。齐伐晋获胜，取朝歌。
前549年	鲁襄公二十四年	晋执政范匄接受子产意见，减轻诸侯对晋国的贡纳。楚以舟师伐吴，不设赏罚，无功而回。
前548年	鲁襄公二十五年	齐大夫崔杼杀庄公，史官秉笔直书。郑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攻入陈都。楚司马芳掩制军赋，"书土田"、"量入修赋"，实行赋税改革。楚灭舒鸠。吴楚巢之战，楚军射死吴君诸樊。
前547年	鲁襄公二十六年	卫大夫宁喜杀卫侯剽，献公复国。楚大夫声子论楚材晋用。宋平公杀太子痤。
前546年	鲁襄公二十七年	卫献公杀大夫宁喜。七月，十四国在宋都西门召开第二次弭兵大会。
前544年	鲁襄公二十九年	吴季子札周游列国，在鲁观乐。越俘杀死吴君馀祭。
前543年	鲁襄公三十年	郑子产作封洫。
前538年	鲁昭公四年	楚会诸侯于申，取吴朱方，灭赖。吴伐楚，入楚三邑。郑作丘赋。
前537年	鲁昭公五年	鲁去中军，恢复二军，四分公室。
前536年	鲁昭公六年	郑子产铸刑书。楚伐徐、吴。
前534年	鲁昭公八年	楚初次灭陈，弭兵盟约受到破坏。
前532年	鲁昭公十年	齐国陈、鲍攻栾、高族，陈氏始大。
前530年	鲁昭公十二年	鲁国季氏家臣南蒯据费邑叛季氏。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529 年	鲁昭公十三年	楚灵王死于乾溪，公子弃疾即位为平王。吴败楚军于豫章，获楚五帅。又吞并楚州来。晋大会诸侯于平丘，晋于邾南阅兵，出动兵车四千乘。
前 525 年	鲁昭公十七年	郯子聘鲁讲古史。楚败吴军于长岸。
前 522 年	鲁昭公二十年	楚灭伍氏族，伍子胥奔吴。宋国华氏之乱开始。卫国齐豹之乱。
前 521 年	鲁昭公二十一年	宋华氏被晋卫齐和宋联军打败，次年逃亡到楚。
前 520 年	鲁昭公二十二年	周王子朝之乱起。
前 519 年	鲁昭公二十三年	吴楚鸡父之战，吴败楚及小国之师。
前 518 年	鲁昭公二十四年	楚出水军侵吴疆，赵助楚。吴灭楚之巢，钟离。
前 517 年	鲁昭公二十五年	鲁国季氏逐昭公。
前 515 年	鲁昭公二十七年	吴专诸刺王僚，公子光即位为阖庐。
前 514 年	鲁昭公二十八年	晋灭祁氏，羊舌氏族，分县设官。魏舒任贤。
前 513 年	鲁昭公二十九年	晋铸刑鼎。
前 512 年	鲁昭公三十年	吴灭徐。又谋伐楚。
前 510 年	鲁昭公三十二年	吴伐越。晋士弥牟率领诸侯役人营成周城。由于计算精确，准时完工。鲁昭公死于乾侯。
前 508 年	鲁定公二年	吴败楚于豫章。
前 506 年	鲁定公四年	晋会诸侯于召陵，威逼楚国。吴楚柏举大战，吴军入楚郢都。楚昭王避难于随国。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505 年	鲁定公五年	王子朝在楚被杀。楚申包胥乞秦师救楚。越军攻吴。鲁国阳虎、公山不狃反叛，阳虎专国政。
前 504 年	鲁定公六年	吴舟师败楚军于繁扬。楚迁都于鄀。
前 502 年	鲁定公八年	鲁阳虎攻"三家"，不克。奔讙阳关以叛。
前 501 年	鲁定公九年	郑驷歂杀邓析，用其竹刑。鲁"三家"联军败阳虎。
前 500 年	鲁定公十年	齐鲁夹谷会盟，孔子相鲁君与盟取得外交胜利。鲁侯犯据郈邑叛叔孙氏，旋败。
前 498 年	鲁定公十二年	鲁国堕三都。
前 497 年	鲁定公十三年	晋国赵氏与范氏、中行氏之战开始。孔子开始周游各国。
前 496 年	鲁定公十四年	吴越檇李之战，吴王阖庐受伤而死。
前 494 年	鲁哀公元年	吴越夫椒之战，越败求和。
前 493 年	鲁哀公二年	晋赵氏与郑战于铁。赵简子誓师。
前 486 年	鲁哀公九年	吴修邗沟，通江淮——中国运河之始。
前 485 年	鲁哀公十年	吴鲁联军伐齐，吴从海道进军——中国使用海军之始。
前 484 年	鲁哀公十一年	吴齐艾陵之战，齐师大败。夫差杀伍子胥。孔子归鲁。
前 483 年	鲁哀公十二年	鲁用田赋。
前 482 年	鲁哀公十三年	吴晋黄池之会。越乘虚袭吴，焚烧吴都姑苏。
前 481 年	鲁哀公十四年	宋国桓魋之乱。鲁国公孙宿据郕邑叛孟孙氏。齐国田常杀简公。
前 480 年	鲁哀公十五年	卫蒯聩复国。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479 年	鲁哀公十六年	楚国白公胜之乱。孔子死。《春秋》一书纪年，至此结束。
前 478 年	鲁哀公十七年	吴越笠泽之战，越进击吴都姑苏。卫国人杀庄公。
前 475 年	鲁哀公二十年	越国再次进攻吴国，围困姑苏。
前 473 年	鲁哀公二十二年	越灭吴。夫差自杀。
前 470 年	鲁哀公二十五年	卫国工匠起义，卫出公被逐。
前 464 年	鲁悼公四年	晋伐郑。晋赵氏、智氏开始有隙。
前 453 年	周贞定王十六年	晋韩赵魏三家灭智氏。
前 452 年	周贞定王十七年	晋“三家”逐晋出公。
前 424 年	周威烈王二年	魏文侯立。
前 403 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晋“三家”被册命为诸侯。
前 386 年	周安王十六年	齐田和立为诸侯。
前 382 年	周安王二十年	吴起在楚变法，次年被杀。
前 381 年	周安王二十一年	赵楚伐魏。
前 379 年	周安王二十三年	越迁都于吴。
前 375 年	周烈王喜元年	韩灭郑，并迁都于郑。
前 367 年	周显王二年	赵与韩分裂周。
前 362 年	周显王七年	魏与韩赵之战。秦魏之战。
前 361 年	周显王八年	魏迁都大梁。商鞅入秦。
前 357 年	周显王十二年	邹忌相齐。
前 356 年	周显王十三年	秦孝公任用商鞅，秦开始变法。
前 353 年	周显王十六年	魏攻入赵都邯郸。齐、魏桂陵之战。
前 352 年	周显王十七年	秦升商鞅为大良造。魏筑长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351 年	周显王十八年	申不害相韩。
前 350 年	周显王十九年	商鞅第二次变法。
前 346 年	周显王二十三年	商鞅刑太子师傅。
前 344 年	周显王二十五年	逢泽之会。
前 343 年	周显王二十六年	马陵之战。
前 338 年	周显王三十一年	秦孝公死，商鞅被害。
前 334 年	周显王三十五年	魏、齐“徐州相王”。
前 329 年	周显王四十年	张仪入秦。次年相秦。
前 323 年	周显王四十六年	五国相王。
前 318 年	周慎靓王三年	楚、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攻秦。
前 316 年	周慎靓王五年	秦灭巴蜀。燕王哙让国。
前 307 年	周赧王八年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前 305 年	周赧王十年	赵伐中山。
前 300 年	周赧王十五年	赵再攻中山。
前 299 年	周赧王十六年	赵武灵王传国于何。
前 296 年	周赧王十九年	赵灭中山。
前 295 年	周赧王二十年	赵沙丘之乱。赵主父饿死。
前 293 年	周赧王二十二年	秦、韩、魏伊阙之战。
前 288 年	周赧王二十七年	秦、齐称帝，两个月去帝号。
前 287 年	周赧王二十八年	苏秦、李兑约五国攻秦。
前 286 年	周赧王二十九年	齐灭宋。
前 284 年	周赧王三十一年	乐毅破齐。
前 283 年	周赧王三十二年	蔺相如完璧归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279年	周赧王三十六年	秦赵渑池之会。齐将田单复国。
前278年	周赧王三十七年	秦攻占楚国都郢，楚迁都于陈。
前270年	周赧王四十五年	范雎至秦。
前269年	周赧王四十六年	赵奢破秦军于阏与。
前266年	周赧王四十九年	范雎相秦。
前262年	周赧王五十三年	赵接受上党，廉颇拒秦于长平。
前260年	周赧王五十五年	赵括败于长平。秦白起坑赵卒。
前257年	周赧王五十八年	信陵君窃符救赵。
前256年	周赧王五十九年	秦灭西周。
前254年	秦昭王五十三年	魏灭卫。
前249年	秦庄襄王子楚元年	吕不韦相秦。秦灭东周。楚灭鲁。
前239年	秦王政八年	秦封嫪毐为长信侯。《吕氏春秋》问世。
前238年	秦王政九年	秦平嫪毐之乱。
前230年	秦王政十七年	秦灭韩。
前227年	秦王政二十年	荆轲刺秦王。
前225年	秦王政二十二年	秦灭魏。
前223年	秦王政二十四年	秦灭楚。
前222年	秦王政二十五年	秦灭燕、赵。
前221年	秦王政二十六年	秦灭齐，统一六国。

秦汉

秦朝建立

从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在首尾十年间，秦王政陆续攻灭韩、魏、楚、燕、赵、齐六国，结束了战国时期的割据局面。从此"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

殷、周和春秋战国时期，最高统治者一般都称为"王"。秦王政并六国后，认为"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下令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认为，秦王政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上尊号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朕"。秦王去"泰"取"皇"，用上古帝位号，称"皇帝"，其他如议。并废除谥法，自号"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①。秦朝皇帝虽然二世而亡，但"皇帝"这一名号却为历代封建王朝所袭用。

为加强中央集权，秦王朝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严密统治机构和封建官僚制度。在皇帝之下，中央设丞相（掌全国政务）、御史大夫（辅助丞相，主管监察、执法）、太尉（掌全国军事），合称三公。下设奉常（掌宗庙礼仪）、郎中令（掌

皇帝侍从警卫)、廷尉（掌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经济)、典客（掌对外及少数民族事务)、宗正（掌皇族事务)、卫尉（掌宫廷警卫)、太仆（掌皇帝车舆及马政)、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供皇室)，合称九卿。此外，还设有掌治宫室的将作少府，掌通古今以备顾问的博士，掌征伐的前后左右将军等。上述官僚，均由皇帝任免，概不世袭。

丞相王绾认为："诸侯新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镇之，请立诸子，"②要求恢复分封制。始皇下其议于群臣讨论，群臣皆表示同意。只有廷尉李斯持异议。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③始皇采纳李斯建议，分全国为内史、北地、陇西、上郡、九原、三川、砀郡、颍川、南阳、邯郸、上谷、巨鹿、渔阳、右北平、河东、上党、太原、代郡、雁门、云中、辽东、辽西、东郡、齐郡、薛郡、琅邪、泗水、汉中、巴郡、蜀郡、会稽、九江、鄣郡、南郡、长沙、黔中等三十六郡④。此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又增立闽中、南海、桂林、象郡，共四十郡⑤。郡置守（掌一郡政务)、尉（辅助郡守并掌军事)、监（掌监察，直属御史大夫)。郡下设县，县设令、长（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主管一县政务。县以下还有乡、亭两级行政组织，"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续汉书·百官志》五："有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乡人。"注引《汉官》云："乡户五千则置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巡禁贼盗"⑥。

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秦王朝，秦始皇还采取了一系列统一制度的措施。秦统一中国以前，货币异常复杂，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为了发展封建经济，秦始皇下令以原秦国制度为基础进行统一。货币：战国时钱币形制不一，三晋为布钱，燕、齐为刀钱，楚有铜贝（蚁鼻），秦、周为圆钱。当时，黄金为各国通用交换媒介。秦始皇改以黄金为上币，镒为单位，重二十两（一说重二十四两）；以圆形方孔之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废除原在秦国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度量衡：以秦国“衡石丈尺”为标准，全国划一。度以寸、尺、丈为单位，采取十进位制；量以龠（音月）、合（读葛）、升、斗、桶（斛）为单位，基本采取十进位制（其中二龠＝一合，是例外）；衡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规定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

与此同时，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建议，下令对各国原来使用的文字进行整理，“罢其不与秦文合者”⑦，规定以原来秦国的小篆为公文法令的标准文字。为推行统一书体，秦始皇命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字体编撰《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作为标准文字范本。以后因为政府公文繁多，程邈又根据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加以省改，整理出更为简便的新书体——隶书，作为日用文字在全国范围推广。虽然如此，但大篆、小篆仍为一般著作家通用的文字。

秦始皇还依据秦法，统一法律制度，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秦律》。根据1975年12月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区出土的秦代竹简，有《田律》、《厩苑律》、《金布律》（关于国家财会、物资管理、借贷等的规定）、《关市律》、《置吏律》

等约三十余种，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此外，秦统一后，还下令统一全国车轨，规定轨距宽六尺；统一田亩，每亩定为二百四十方步。

战国时期，由于长期战争，各诸侯国在各地修筑了不少关塞堡垒。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立即下令拆除阻碍交通的全部壁障。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筑令坚实而使隆高），树以青松”⑧。为加强关中与河套地区的联系，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又命蒙恬修建一条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至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的直道，凿山填谷一千八百里，至三十七年（前210）始初步完成⑨。以上“驰道”、“直道”，再加上统一中国后在西南边疆修筑的“五尺道”（栈道，广五尺），以及在今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之间修筑的新道，构成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

为了防止封建贵族割据势力再起，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曾多次进行大规模移民。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⑩。与此同时，“收天下兵（古者以铜为兵器），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各重二十四万斤。”）⑪

秦始皇不但建立了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和制度，而且还采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之说，来为秦朝统治寻找根据。终始五德说认为，各个相袭的朝代以土、木、金、火、水等五德的顺序进行统治，周而复始。秦始皇自以为得水德，水色黑，因此秦国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与水德相应的数是六，所以纪数用六（阴数），如六尺为一步，驾车用六马，车

轨宽六尺，符长六尺，冠高六寸。历法以亥月（亥属水）即十月为岁首，等等。

秦始皇在帝位十二年，为宣扬皇帝声威，扩大政治影响，巩固新建的秦王朝，大规模出巡天下五次，主要的是到华中、华东、华北等六国旧地。沿途祭祀名山大川，刻石颂扬秦功德。这些与他的上述作为，对于巩固秦的统一，都具有一定积极作用。

注　释

①②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

⑤《晋书·地理志》。此外，秦郡还有四十二郡（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和四十六郡（谭其骧《秦郡新考》，载《浙江学报》第二卷第一期）、四十八郡（王国维《秦郡考》，载《观堂集林》）诸种说法。

⑥《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⑦许慎《说文解字叙》。

⑧《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⑨⑩⑪《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秦汉

焚书坑儒

秦始皇称帝前，用了十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统一大业。他在帝位十二年，又采取了整齐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对巩固秦统一具有一定意义。然而秦始皇在政治、经济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早在公元前221年称帝之初，在建立国家体制问题上就曾发生过一场争论，最后采纳李斯意见，在全国确立了郡县制，但政治思想方面的斗争并未因此终结。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在宴会上，仆射（音叶）周青臣颂扬始皇功德说："他时秦地不过千里，赖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①始皇听后十分喜悦。可是复古派、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站出来反对周青臣的颂词，再次提出恢复殷周分封制的主张，他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同"猝"突然之意）有田常（齐世卿，杀简公）、六

卿（晋国智、范、中行、韩、赵、魏，共分晋）之臣，无辅拂（通“弼”，辅弼即宰相），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②

秦始皇听后，未置可否，将两种不同意见交臣下讨论。针对淳于越反对郡县制的主张，丞相李斯指出，古今时代不同，治理的方法也不同。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接着就将矛头对准“诸生”，说这些儒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道古以害今”，如不加以禁止，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③，统一可能遭到破坏。

于是他向秦始皇提出如下的建议：史书非《秦纪》皆烧之。博士官可藏《诗》、《书》、百家语，除此外凡天下有私藏者，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有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者，黥为城旦（四岁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严禁私学，有愿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付诸施行。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极力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一些方士即投其所好，骗取富贵。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有齐人徐市（音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④，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之”⑤。因事本虚妄，徐等乃谎言：因风“未能至，望见之焉”。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巡行至碣石（河北乐亭西南），又派燕人卢生去寻求仙人，继而又令韩终、侯公、石生等去求仙人及不死之药。卢生等当然无处寻觅仙人与仙药，于是向始皇献伪造《录图书》（如后世谶纬之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遣将军

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伐匈奴（当时称匈奴为胡）。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卢生又说始皇"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愿上所居毋令人知"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⑦。始皇帝果真照办，但不死之药仍不可得。

秦法规定：所献之方无效验者，就要处死。卢生便与另一方士侯生相谋：始皇如此专断暴戾，"以刑杀为威"，博士"备员弗用"，"未可为求仙药"⑧，于是乃亡去。始皇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终）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⑨

这时，方士卢生早已逃去。始皇鉴于方士对他的欺骗并勾结儒生暗中诽谤其"贪于权势"，"刚戾自用"⑩，便派御史案问在咸阳的诸生，诸生互相举发，始皇亲自圈定四百六十余人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加以逮捕，皆坑杀"使天下知之，以惩后"⑪。"益发谪徙边"⑫。始皇长子扶苏劝谏始皇："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⑬始皇怒，使扶苏至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监蒙恬军。

秦王朝对于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儒生），在这次坑杀和流徙之后，接着又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大屠杀。始皇"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⑭。其后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⑮。马端临对此发为议论说："然则秦之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⑯，孔甲（即孔鲋，孔子的八世孙）持礼器，发

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⑰。

秦始皇焚书坑儒对于先秦古文献的保存和学术的传授，造成巨大损失，但是秦始皇并未达到其"燔灭文章以愚黔首"（鲁迅语）的目的。当时民间私藏书籍仍不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而不少儒者，或者隐逸山林，皓首穷经，如伏生（原为秦博士，治《尚书》，秦焚书，伏生壁藏之，汉文帝诏太常，使掌故朝错往受之）、田何（今文《易》学的开创者）、浮丘伯（治《诗经》的学者）等；或者怀抱志气，等待时机，如孔鲋及鲁国诸儒；或则隐姓埋名，致力于反秦运动，如张良、陈余、郦食其、陆贾等，即是最好的说明。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⑦《通鉴》卷七，秦始皇帝三十五年。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⑨《史记·秦始皇本纪》。又据日本史籍《神皇正统记·孝灵天皇》记载："四十五年乙卯，始皇即位，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之药于日本。……其后三十五年，彼国因焚书坑儒，孔子之全经遂存于日本。"在日本南至九州，北达北海道都广泛流传徐福东渡的故事，尤其在纪伊半岛上的和歌山县的新宫市相传为徐福的旧地，许多徐福的遗迹至今犹存。其中有"秦徐福之墓"（前208年病死），墓侧尚存有"七冢之碑"（他的七位家室）。在徐福墓北有阿倾贺神社，内设有徐福祠和徐福宫。在新井町的大明神社和佐贺市金立町金神社中，所供奉的神像，都是徐福的塑像，其神采奕奕，终年香火不断。今天，和歌山县文化财产保护委员会已把徐福墓和祠宇列入保护史迹，并成立了"徐福会"。每年八月，日本各地的人民纷纷前来凭吊这位伟大的中国古代航海家。

⑩⑪⑫⑬《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⑭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O《学校考》。

⑯据《汉书·叔孙通传》：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曰：‘楚戍卒攻蕲入陈，于公何如?’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叛乱）将则反，罪死无赦!’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诸生言皆非。夫天下为一家……且明主在上，法令具于下，吏人人奉职，四方辐辏，安有反者！此特群盗鼠窃狗盗，何足置齿牙间哉？郡守尉今捕诛，何足忧?’二世喜，……乃赐通帛二十疋，衣一袭，拜为博士。通已出，反舍，诸生曰：‘生何言之谀也?’通曰：‘公不知，我几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今山东曲阜)”。

⑰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O《学校考》。

秦汉

经略边疆

秦灭六国后，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虽已结束，但在边境上，秦国军队仍在继续进行着战斗，通过战争，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终于建立起来。

秦统一前，在今天我国的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湖南一带居住着与中原华夏族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统称为“越”人，因其分部众多，又称为“百越”。越人“断发文身，错臂左衽”①。依山傍海，从事渔猎和农业。其中著名的则有于越（今绍兴一带）、瓯越（亦称东瓯、东越，在今浙江南部的瓯江流域，以温州为中心）、闽越（在今福建沿海一带，以福州为中心）、南越（在今广东岭南地区）和西瓯（在今广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

秦始皇在公元前223年灭楚之后，就降服了于越，在那里设置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后，又发动了统一百越的战争，首先征服了东瓯、闽越地区，在那里设置了闽中郡，随后又命令尉屠睢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南下，向岭南和西瓯地区进军。秦军遭到越族的抵抗，同时因

运粮困难，相持达三年之久，未能获得胜利。秦始皇为了支援征服岭南一带的战争，命令监御史禄，在广西兴安县北开凿了一条运河，即灵渠。

灵渠是一条长约三十公里的渠道，用来连接湘水和漓水，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之间的交通，解决运输粮饷的困难。灵渠的规划布局，和都江堰十分相似：有分湘江入漓水铧嘴；有防洪设备——大小天平，以宣泄湘江汛期多余的水量，工程十分复杂，显示了古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几千年来，灵渠对促进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它在世界航运工程史上占有光辉的地位。直到明、清时期，灵渠仍被称为"三楚两粤之咽喉"②。大约在始皇二十八年，灵渠凿通后，粮道打通，对南越的进军才得以顺利进行。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 214），秦军遭到越人袭击，屠睢被杀，秦始皇又增派援军，"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指今五岭以南地区）③，终于征服了越族，建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次年，又迁徙了五十万罪徒戍守和开垦五岭，与越人杂居，从而加速了民族融合和这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在西南地区，今天的云南境内，以滇池为中心，散布着氐、羌、百濮和百越等族群。滇西北有笮人，滇东北有僰人，滇东有夜郎，滇池及其周围是以"滇"人为首的"靡莫之属"居住地，洱海及其附近地区则是"嶲、昆明"人游牧之地。在统一中国之前，秦国的统治势力，曾经通过蜀郡太守达到今天云南的北部和西北部。但是，由于交通阻隔，西南边疆同内地的联系仍然十分困难。秦始皇三十五年（前 212），始皇曾派常頞（音鄂），在原来僰道的基础上，修了一条通往云南、贵

州地区的道路，约五尺宽，称为“五尺道”。它的修成，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统治之下。秦统一六国后，就在这里“置吏”，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里正式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④。

在东北和北方，是“胡”人和匈奴聚居、游牧的地方。东胡人分布在辽河上游、老哈河、西拉木伦河一直到今辽阳、锦西、旅大一带。匈奴人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很早就与汉族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朝时称为荤粥（薰鬻），西周时称为严允，是胡族的一支。战国时期始称匈奴，当时还处于奴隶制萌芽阶段。由于它同秦、赵、燕三国接壤，匈奴奴隶主贵族经常骚扰三国边境，掠夺牲畜、人口和财物。

秦、赵、燕三国都在与匈奴交界处修筑长城，并派重兵戍守。长城在防御上有一定作用，但它并不能阻断民族之间的矛盾。所以，战争一直未断。战国末年，赵名将李牧曾出动战车一千三百乘，骑兵一万三千人，步兵五万人，弓箭手十万人，与匈奴展开会战，大破匈奴十余万骑。匈奴势力大大削弱，此后十余年间，不敢南犯。后来秦与六国进行兼并战争，匈奴又乘机发动进攻，各国忙于火併，对匈奴不能进行有效的抗击。秦的北方河套地区曾被匈奴占去，对秦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当时在秦民中就流传着“亡秦者胡也”⑤的说法（匈奴也称为胡）。

秦统一六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同匈奴族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于是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⑥，一举夺回了河套南北地区，取得了军事上

的重大胜利。在河套设置了三十四个县⑦，重新设置九原郡。公元前211年，又迁内地三万户到北河、榆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东北岸）屯垦。当时人们把这一新开垦的地区，叫做“新秦”。这一次大规模移民，在经济上、军事上均有着重要意义，它不仅起到阻止匈奴军事进扰的作用，而且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

匈奴族虽然受到严重损失，但其实力尚未受到彻底打击，对内地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秦一直不敢回师，需要时刻防备匈奴人的进攻。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征调民夫，大规模修筑长城，把以前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再加以修补和扩充，西起陇西郡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境），东至辽东郡的碣石，沿广阔的黄河，依峻峭的阴山，经蒙古草原，蜿蜒曲折，筑成一条长达五千余公里的城防。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秦代万里长城。秦长城遗址在山西大同和甘肃岷县仍可见。以后历代对长城又有所增修，特别是明代，又对长城进行了一次全面整修改建，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的万里长城。

万里长城，对于抵御匈奴奴隶主的骚扰，保障内地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安定，起了重要的作用。秦统治者为了修长城，动用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而且由于无限制地役使民夫，致使十分之六的人民被折磨死，民间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虽非事实，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劳动人民对秦朝繁重徭役的控诉。长城作为一项建筑则是十分伟大的，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中华民族悠久文明的象征。

秦朝通过数年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及对边疆的经略，秦的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简称

北户，泛指五岭以南地区。一说指今越南中部一带），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⑧，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在这样广大的地区，居住着各族人民，他们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下生活，这对于促进各族人民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加速民族融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秦朝在古代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秦人”同后来的“汉人”、“唐人”一样，成了世界各国对中国人民的代称，欧洲人至今仍称中国为 China，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就是由“秦”演变来的。

注 释

①《战国策》卷一九《赵策》。

②《修复陡河碑》。

③《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④见《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⑤《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⑥《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为十万，《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万。

⑦《史记》《汉书》中的《匈奴传》记载为四十四县，《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为三十四县。

⑧《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淮南子·人间训》。

秦汉

秦之暴政

早在秦统一全国之前，就有人说过，秦始皇"少恩而虎狼心"，"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尉缭语），虽然全国统一，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但是秦始皇的卑劣本性恶性发展，他和秦二世的残暴统治，严重违反了人民的愿望，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难。

秦始皇为了提高皇帝的权威和满足他穷奢极侈的生活，修建了许多劳民伤财的土木工程。在京都咸阳和故都雍（今陕西凤翔东），本已有不少豪华宏丽的宫殿，但始皇并不满足，在与东方六国战争过程中，他就在咸阳大兴土木，每灭一国就仿造其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依样修造，共造一百四十多处宫殿，以至"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①，在消灭六国后，更是大肆修造，如始皇二十七年（前220），"作信宫渭南"②。信宫又称咸阳宫，"因北陵宫殿，端门四达，以制紫宫，象帝居，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③。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21）决定兴建

朝宫于渭水南岸的上林苑中。这座朝宫的前殿就是有名的阿房宫④。阿房宫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庭中可容纳万人，殿中能立五丈高的大旗。晚唐诗人杜牧在他的《阿房宫赋》中形容这一工程的修建说"蜀山兀，阿房出"，工程之大可想而知。此外还在关中修建宫殿三百所，关外四百多所，又"咸阳之旁二百里内，宫观二百七十"⑤，这么多的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⑥，在咸阳附近的宫殿都以"复道甬道相连"⑦。以上的诸书记载，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明⑧。

秦始皇不仅为他生前修建了豪华的宫殿，而且还为他死后准备了同样豪华的陵墓。这就是与阿房宫齐名的骊山墓。此墓位于骊山北麓（今陕西临潼县东南），高五十余丈，周围面积五里有余。墓内建有各式各样的宫殿，用明珠作成日月星辰，象征天体；用水银作成江湖河海，象征地形；以人鱼膏为烛，以期长明。还有各种珍奇异宝，陈列其中。

我们仅从现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东侧的兵马俑坑，就可证明史书上记述并非夸大。在目前试掘的一号、二号、三号墓，面积共约二万七千多平方米，陶俑、陶马、步骑兵、武士俑共六、七千件。这仅是始皇陵整个工程中较次要的一部分，至于陵墓的主要部分——墓室内部的豪华宏丽从秦俑坑即可推知。秦始皇的穷奢极欲，充分反映了他和他所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贪婪、腐朽、暴虐的本性。

秦朝的徭役是极其繁重的。秦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左右，秦始皇把大批农民罚做刑徒，驱使他们终年从事奴隶式的劳动，仅修建阿房宫和骊山墓两项工程，就役使了民工"七十余万人"⑨。从各地运送材料，临时征发的人还不在其内，像这样大规模的工程，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是惊人的。再加上防备

匈奴的士卒三十万⑩，戍守五岭的五十万，如果再加上修驰道及从事运输的人员，全国服役人数不下三百万，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⑪。

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秦法规定，闾左贫民本来不应和罪人、赘婿和贾人一样被“谪戍”（充军），但由于戍役项目繁多，大量农民动辄被罚作罪人派去从事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甚至男子不够，由女子担负苦役即“丁男披甲，丁女转输”⑫。董仲舒说秦的“力役三十倍于古”，虽不免夸大，但秦朝力役比前朝繁重确是事实。

秦的赋税也像徭役一样残酷。田租、口赋、刍藁以及各种杂税，据《汉书·食货志》说就要“收泰半(三分之二)之赋”⑬，这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史书记载，秦朝官吏用清查户口的办法，按人口数目摊派赋税，即人头税，用簸箕夺走了农民仅有的一点粮食，这就是所说的“头会箕敛”⑭。而所有收上来的赋税，全部“输于少府”⑮，供皇室享用。在统治者敲骨吸髓的苛敛下，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⑯的严重局面，许多人走投无路，“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⑰。

秦朝严刑酷法更是令人发指。除在黥、劓（音义）、笞、阬、腰斩、车裂、枭首、弃市等等外，还动辄“族诛”、“连坐”（即一人犯法，罪灭三族，一家犯法，邻里连坐）。各级官吏多为杀人刽子手，“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胜数”⑱。由于刑罚繁苛，造成了“赭衣塞路，囹圄成市”⑲的惨状。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陨石堕于东郡（今河南濮阳县），有人在上面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七个

字，秦始皇派御史去查捕，无结果，于是就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他在出巡途中病死，丞相李斯和宦官赵高矫诏逼死应继承帝位的始皇帝长子扶苏，捕杀大将蒙恬，立少子（第十八子）胡亥为二世皇帝。秦二世异常昏庸，比秦始皇更为残暴，在葬秦始皇时，他下令“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⑳。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又怕泄露陵墓内的机密，把修陵的工匠全部活埋在墓中通路㉑。他继续修建劳民伤财的阿房宫，为了防范农民的反抗，他又征发五万人到咸阳服役，专门为他豢养大量的狗马禽兽，以供游猎取乐。咸阳的粮食不足用，便下令郡县大规模调运谷物、草料、运输的役夫还需自带干粮，不许食用咸阳周围三百里以内的谷米㉒。

胡亥信任宦官赵高，赵高是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阴谋夺取帝位，他唆使胡亥，大杀功臣和诸公子，到后来连丞相李斯也受他陷害，被腰斩于咸阳市。胡亥在赵高的怂恿合谋下，任意胡为，本来已很严酷的刑法，更加严酷，人民随时会遭到残害，以至“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㉓。如此无度的浪费社会财富和滥发徭役，给生产带来灾难性的破坏，加上“法令诛罚，日益深刻”㉔，激起人民群众的愤怒和反抗，以致“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仇”㉕，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暴动终于爆发，导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

注　释

①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③《三辅黄图》。

④关于阿房宫的记载，诸书颇不一致。据《三辅黄图》：“阿房宫，

亦曰阿城，惠文王造。宫未成而亡，始皇广其宫，规恢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十余里，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这里所说的阿房宫的规模为三百余里。《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说"……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这里说"阿房"只是朝宫的前殿。又《水经注·渭水》引《关中记》云："阿房殿在长安西南二十里，殿东西千步，南北三百步，庭中受十万人。"这里明确地说是阿房殿。

观上述诸说，朝宫之前殿应为阿房宫，但也可称朝宫为阿房宫。

⑤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⑦《三辅黄图》。

⑧参阅《文物》1976年第十一期。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⑩《淮南子·人间训》载"发卒五十万"。《续汉书·郡国志》引《帝王世纪》载"四十万"。

⑪林剑鸣《秦史稿》第393页。《中国古代史》（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福建人民出版社）264页为二百万。

⑫《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⑬《淮南子·兵略训》、《史记·淮南王传》中均有记载。

⑭《史记·张耳陈余列传》。

⑮《淮南子·氾胜训》。

⑯《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

⑰《汉书》卷六四下《严安传》。

⑱《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⑲《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⑳㉑㉒《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㉓㉔《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㉕《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秦汉

大泽烽火

一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冬十月，始皇东巡，少子胡亥、左丞相李斯、中车府令赵高等随行。北归途中，至平原津（今山东德州市南）病重。乃令赵高作书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①书已封，在赵高处，未付使者。秋七月，始皇死于沙丘（今河北平乡东北）。丞相李斯以始皇病死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辒辌，音温凉，有窗牖之灵车），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独胡亥、赵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赵高生而隐宫，通狱法，始皇曾使其教胡亥决狱。尝犯法，蒙毅依律断高死罪，后为始皇赦免。高由是与蒙氏结怨，因乘机与胡亥、李斯谋议，篡改始皇诏书，立胡亥为太子，赐扶苏、蒙恬死。扶苏见诏书自杀，蒙恬疑有诈，不肯死，下狱。胡亥至咸阳发丧，袭位，是为二世皇帝。

二世任赵高为郎中令，掌领宿卫侍从。赵高于二世面前日夜毁恶蒙恬、蒙毅兄弟，求其罪过。二世兄子子婴谏其不可"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二世不听，遂杀蒙毅，蒙恬吞药自杀②。二世谓赵高曰："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

穷心志之所乐，以终吾年寿，可乎?”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陛下安得为此乐乎?”③赵高因劝二世严法刻刑，诛灭大臣及宗室，然后收举遗民，贫者富之，贱者贵之，远者近之，使成亲信。于是二世“更为法律”，愈加严酷，杀公子十二人，公主十人，株连者不可胜数。于是，“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④。秦既发生内变，民久郁思动，遂乘间而起。

秦二世元年（前 209）七月，二世发闾左（据《汉书·食货志》颜师古注：“闾，里门也，言居在里门之左者一切发之。”）九百人戍守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行到蕲（qí 奇）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西南），天降大雨，道路不通，预计不能按期到达。秦法，“失期当斩”。时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雇农陈胜（字涉）与阳夏（今河南太康）贫农吴广（字叔）亦在戍中，为屯长。（据《商君书·境内篇》：“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二人私下计议：“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为国事而死）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⑤吴广以为然。

为了号召群众，陈胜、吴广用“鱼腹丹书”、“篝火狐鸣”制造起义舆论：“大楚兴，陈胜王。”并伺机杀死两名押送将尉，令其徒属曰：“公等皆失期当斩；假令毋斩，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则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

乎!”⑥众皆从之。陈胜遂以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名义，为天下倡，筑坛为盟，称大楚，并提出“伐无道，诛暴秦”的革命口号。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首先攻下大泽乡，进而攻占蕲县及附近各县。及攻占陈县（今河南淮阳）时，义军拥有战车六七百辆，骑兵千余人，步兵数万人。陈中豪杰父老谓陈胜曰：“将军身被坚执锐，率士卒以诛暴秦，复立楚社稷，存亡继绝，功德宜为王。”⑦时魏国名士张耳、陈余亡匿在陈，献议陈胜“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为秦益（增加）敌”⑧。陈胜不听，决心建立政权与秦对抗，乃自立为王，号为张楚（即大楚。《广雅》张，大也。）陈余劝陈胜在西攻咸阳前，应派兵攻取河北。陈胜乃以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邵骚为护军，以张耳、陈余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赵地。此时农民起义风暴席卷全国，诸郡县之民苦秦苛法，“斩木为兵，揭竿为旗”⑨，争杀长吏以应陈胜。“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起义军内部，除大泽乡起义骨干外，参加者越来越多，其中有旧六国贵族、官吏、游士，如魏咎、周市（fú 福）、蔡赐、张耳、陈余、周文、朱房、胡武等，还有以孔鲋（孔子后裔）为首的一些儒生。

秦使从东方至咸阳，告义军蜂起。二世怒，下吏治罪。后至使者曰：“群盗鼠窃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尽得，不足忧。”⑩二世悦。

陈胜封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攻荥阳。除派武臣、张耳、陈余攻取赵地外，又令魏人周市攻取魏地，令汝阴人邓宗攻取九江郡。陈胜闻周文（即周章）习军事，颁给将军印，使攻关中。周文收集沿途义军数十万人越过函谷关，一举进攻至戏（今陕西临潼关）。二世大惊，因发近县兵马不及，采纳少府

（秦九卿之一）章邯献计，下令赦免骊山刑徒，发给武器，令章邯率领，抗击周文。周文军败，向东撤退。武臣进军至邯郸，闻周文败退，在张耳，陈余等谋划下，自立为赵王，以陈余为大将军，张耳为右丞相。陈胜大怒，但为促其西击秦兵，接受柱国房君谋，派人往贺。张耳、陈余察觉陈胜用意，拒绝西进，令部将韩广攻燕，李良攻常山，张黡攻上党，欲承秦楚之敝，争夺天下。

秦二世二年（前208）十一月，周文退出函谷关，屯兵曹阳（今河南灵宝东南）二月余，章邯追击至渑池（今河南铁门），周文兵败自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守荥阳，吴广久攻不克；将军田臧闻周文已败，秦军将至，遂与诸将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败，不如少遣兵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指吴广）骄，不知兵权，不足与计事，恐败。"⑪因相与矫陈王令杀死吴广。陈胜使人赐田臧楚令尹印，以为上将。田臧留李归等少数兵力围困荥阳，自率主力至敖仓（今荥阳西北）迎击秦军，兵败身亡。章邯击李归于荥阳城下，李归败死。

先是，陈胜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乱，有轻秦之意，不复设备。博士孔鲋谏曰："臣闻兵法：'不恃敌之不我攻，恃吾不可攻。'今王恃敌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无及也。"⑫陈胜拒绝了孔鲋的正确意见。此时，起义军处于极其不利地位，陈县只有张贺率领的一支军队，形势非常危险。陈胜见秦军已逼近陈县，乃亲自出城督战。十一月，张贺战死，陈县已不能守。十二月，秦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佐章邯击楚。陈胜退至下城父（今安徽蒙城西北），为其车夫庄贾杀害，庄贾投秦，陈县失守，起义军主力溃败。不久，陈胜部将吕臣率"苍

头军”收复陈县，处决庄贾，葬陈王于砀（今安徽砀山县），谥为隐王。正月，秦军再攻陈县，吕臣退出陈县，与英布（尝受黥刑，遣戍骊山，故亦称黥布）领导的起义军数千人汇合，击败秦军，再次收复陈县。

陈胜王凡六月，当他在陈县为王时，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前来求见，宫门令不肯通报。陈胜出门，故人遮道而呼陈涉之名。陈胜乃载与俱归。后客出入放纵，与人谈论陈胜昔时情况。陈胜部下谓陈胜曰：“客愚无知，专妄言，轻威。”⑬陈胜下令将客斩首。于是陈胜故人纷纷离去，无敢近者。陈胜以朱房为中正（掌管人事之官），胡武为司过（掌纠察群臣过失之官），专管考核群臣。朱房、胡武擅权跋扈，为陈胜所信用，诸将以故不亲附；再加起义军战略和军事指挥的错误，竟致败亡。司马迁说：陈胜虽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终亡秦，由涉首事也”⑭。

注　释

①《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

②《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史记·李斯列传》称：“且蒙恬已死，蒙毅将兵在外。”

③《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

④《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⑤⑥《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⑦⑧《史记》卷八九《张耳陈余列传》。

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引贾谊语。

⑩《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⑪《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⑫《资治通鉴》卷七，秦二世皇帝元年。

⑬⑭《史记》卷四八《陈涉世家》。

秦汉

豪杰亡秦

秦二世二年（前208）腊月，陈胜败死后，反秦斗争暂时受挫，但为时不久，斗争的新高潮又复兴起。领导这次斗争的是项羽和刘邦。

项梁，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出身于楚国旧贵族，项氏世代为楚将，封于项（今河南项城东北），故以项为氏。项梁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子，因尝杀人，与兄子项籍（字羽）避仇吴（今江苏苏州）中。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陈胜、吴广起事消息传到吴时，项梁、项羽杀死会稽郡（治所在吴县）守殷通，响应起事，得精兵八千人。项梁自任会稽守，项羽为裨将（副将，裨读皮），占领会稽郡所属各县。项羽当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项梁叔侄举事的同时，沛（今江苏沛县）人刘邦亦起兵响应陈胜。刘邦，字季，初为泗水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中途逃亡。自度至则皆亡，到丰（今江苏丰县）西泽中亭，他停下来饮酒。至夜，他释放全部刑徒，说："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①刑徒中有十余名壮士愿意跟随刘邦。他们夜从

小道过泽中，有一大蛇当道，刘邦说："壮士行，何畏!"于是拔剑斩蛇，从此隐藏在芒、砀（今安徽砀山东，芒山在其北）山林水泊之间活动，沛县农民闻讯纷纷前来参加。陈胜起事后，在沛吏萧何、曹参支持下，杀死沛令，收兵二千余人，起兵称沛公。

秦二世二年（前 208）正月，奉陈胜命进攻广陵之召平，得知陈王兵败，章邯将至，乃渡江矫陈王令，拜项梁为楚上柱国，使引兵西击秦。于是项梁、项羽率领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江而西。二月，项梁军渡江后，东阳（今江苏盱眙东）令史陈婴率领二万人来会。渡淮以后，英布、蒲将军也率部来归，反秦队伍迅速扩大到六、七万人，屯军下邳（今江苏宿迁西北)。

是时，吴广部下秦嘉得知陈胜兵败，乃立楚国旧贵族景驹为楚王，驻军彭城东，欲与项梁对抗。项梁对军吏说："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背）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②乃进兵击秦嘉，在胡陵（今山东鱼台东南）击杀秦嘉，收降了他的部众，景驹走死梁地。项梁率军西进，与秦将章邯遇于栗县（今河南夏邑)。项梁令部将朱鸡石、余樊君与战，余樊军战死，朱鸡石败走至胡陵。项梁率军取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并诛朱鸡石，以惩其败军之罪。与此同时，项梁使项羽攻打襄城（今属河南省)，由于秦军坚守，久攻不下。及城克，项羽坑杀全部守城士卒③。

项梁得知陈胜已死的确实消息，乃召集诸将在薛商讨大计。此时，正在率兵与秦军苦战不利的刘邦亦应召前往。居鄛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蠭午(犹言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④因劝项

梁立楚后，以便号召群众。项梁采纳他的建议，于民间求得为人牧羊的楚怀王之孙名心者，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六月，立以为王，仍称楚怀王（义帝），以陈婴为上柱国，封五县，佐怀王都盱眙（今安徽盱眙北），项梁自号为武信君，实际上已成为各地反秦势力的领袖。

这年七月，项梁引军击败章邯军于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章邯西走。项梁独自率兵追击，又在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东将秦军打败。与此同时，项羽、刘邦率领的另一支部队也攻下城阳（今山东菏泽东北）。八月，项梁又亲自率兵北到东方重镇定陶（今山东定陶北），再破秦军。而项羽、刘邦统领的楚军则西向与秦军激战于雍丘（今河南杞县），刘邦部下五大夫将曹参在战斗中斩杀秦三川郡守李由（李斯之子）。楚军取得连续胜利，项梁“益轻秦，有骄色”。宋义向项梁进谏说：“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为君畏之。”⑤项梁并未在意，乃遣宋义出使齐国。宋义于途中与齐使者高陵君显相遇，知其欲见项梁，遂对他说：“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⑥秦果乘项梁轻敌麻痹之际，补充了章邯军，乘夜偷袭定陶，楚军大败，项梁被杀，定陶落入秦军之手。

其时，项羽、刘邦正在率兵攻打陈留（今河南陈留东北）未下，闻项梁死，士卒恐，乃与将军吕臣俱引兵而东，从怀王自盱眙都彭城。吕臣和项羽分别驻军彭城东西两面，刘邦率领本部人马驻扎砀郡，以成犄角之势。楚怀王任命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为武安侯。反秦军在怀王的统一号令下，重整旗鼓，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章邯在攻下定陶，斩杀项梁之后，“以为楚地兵不足忧”，

乃领兵渡河向赵进击，大败赵军，攻入邯郸。此时，赵王歇和国相张耳等皆被逼入巨鹿（今河北平乡）城中。只有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驻扎在巨鹿城北。章邯令秦将王离、涉间率领秦军将巨鹿城紧紧围住。章邯则领兵驻扎在巨鹿南之棘原，作为后援；同时在棘原至巨鹿之间筑成一条甬道，为秦军运送粮秣。在形势危急下，赵王歇曾多次派人向楚怀王求救。先是高陵君显在楚，曾向楚怀王称赞宋义"知兵"，怀王召见宋义，与计事而大加赏识，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主力军前往救赵，所有将领皆归宋义统领，号为"卿子冠军"。同时，另派刘邦率领一部分军队西进，直取关中（今陕西中部地区）。

秦二世三年（前 207）冬十月，宋义率领援军行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南），留屯四十六日仍不肯前进。项羽进谏说："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⑦宋义不顾大局，竟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先使秦赵互斗。他认为若秦"战胜则兵疲，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⑧。下令对军中勇猛好斗、强不可使之士卒"皆斩之"。宋义还遣其子宋襄赴齐为相，亲自送至无盐（今山东东平东），饮酒高会。当时，岁饥民贫，军中已无现粮，士兵只能食芋菽，又值天寒大雨，士兵冻饥。项羽非常愤慨，对宋义说："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⑨项羽在盛怒之下，利用辰朝之机，于帐中杀死宋义，然后下令军中说："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诸将一致拥护项羽诛杀

宋义的正义行动，共同商议立项羽为假上将军，并派人追杀宋义之子宋襄，然后命桓楚向楚怀王报命。怀王于是封项羽为上将军，英布和蒲将军所部统归项羽指挥。

项羽遣英布和蒲将军率领二万士兵渡过漳水，切断秦军运粮甬道，使秦将王离军队粮饷无以为继。然后，项羽亲率全部兵马渡过漳水，下令“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⑩。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全军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楚军来到战场，首先将秦将王离的军队加以包围，以雷霆万钧之势，同秦军展开激战。在战斗中，楚军“无不以一当十”，向秦军猛冲、猛打、猛追，“呼声动天地”。经过九次激烈战斗，大败秦军。章邯引兵退走，援赵的燕、齐等路诸侯兵乃敢协助楚军向秦军进攻。在战斗中，楚军杀死秦将苏角，俘虏王离，涉间自杀。当楚军同秦军激战时，各路救赵诸侯军将领皆畏敌如虎，只能筑垒自保，“从壁上观”。楚军打败秦军，项羽召见各路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⑪。项羽从此威震天下，成为“诸侯上将军”，各路诸侯军皆受其节制。

王离军被项羽消灭以后，章邯退守棘原，项羽驻军漳水之南，两军暂时形成对峙局面。由于秦军屡次败退，秦二世使人责备章邯；丞相赵高怕受连累，拒见章邯使者长史欣。长史欣向章邯报告赵高专权朝中，并有加害之意。恰在此时，陈余亦致书章邯，劝其倒戈反秦。陈余以白起、蒙恬大有功于秦，最后终不免被杀害为例，指出秦朝对待大臣，“有功亦诛，无功亦诛”，向他分析当今形势：“天之亡秦，无愚智皆知之，”提醒他为自身计，莫如“还兵与诸侯为从（合纵），约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称孤”⑫。章邯狐疑，暗中派人向项羽求和。

约尚未成，项羽派蒲将军率一部分兵力昼夜兼程追赶，渡三户津（今河北临漳西），击败秦军，切断章邯军的退路。项羽又率主力猛攻，再破秦军于汙水（漳水支流，在今临漳附近）上。章邯迭遭失败，既无援军，又恐为二世和赵高加罪，再次派人乞降。项羽因军粮不足，准其所请。秦二世三年（前207）七月，章邯率领秦军二十多万人，在洹（音桓）水南岸的殷墟（今河南安阳西）投降。项羽领导的反秦军获得了全歼秦军主力部队的重大胜利。

在项羽率军北进的同时，刘邦率领的万人小部队也开始向西进攻。为了完成早日进入关中的艰巨任务，刘邦受命后，立即积极准备，整顿内部。一路上，刘邦收集陈胜、项梁的散卒，不断壮大军事力量。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乘巨鹿决战之机，由砀率军北上，联合彭越领导的反秦军千余人，进攻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不利，还至栗县，编并了刚武侯（史失其名）的部队四千余人，声势渐大。然后折而向西，过高阳（今河南杞县西）时，采纳里监门郦食其（yì jī异基）的献计，首先攻破天下要冲且积粟甚多的陈留，得到充分的补给，并收编郦商（食其之弟）军四千人，为西进击秦壮大了战斗力量。四月，刘邦率军南下，攻占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张良率军随之。刘邦留韩王成守阳翟，以牵制河南的秦军，自率大军进逼南阳。六月，刘邦在南阳郡大破南阳守齮（yǐ倚），齮退守宛城（今河南南阳）。

刘邦急于入关，准备越宛西进。张良谏阻说："沛公虽欲急入关，秦兵尚众，距险。今不下宛，宛从后击，强秦在前，此危道也。"⑬刘邦采纳张良建议，乃乘夜引兵从他道还，更旗帜，黎明，围宛城三匝。后接受南阳守舍人陈恢意见，与守

宛秦军“约降”，乃以齮为殷侯，封陈恢千户。宛城和平解决后，刘邦率军继续西进，一路势如破竹。至丹水（今河南淅州），高武侯鳃、襄侯王陵降。刘邦又东取胡阳（今河南唐河南），西克析（今河南内乡西北）、郦（今河南内乡东北）两城，肃清了南阳地区的秦军。所过之处，刘邦下令军兵不得掳掠，受到广大秦民的欢迎。此时，“自关以东，大抵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向”⑬。秦王朝已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赵高恐二世罪及其身，乃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及其弟郎中令赵成密谋，逼杀胡亥，另立子婴为秦王，准备重整旗鼓，进行反扑。九月，子婴诛杀赵高，灭三族，并派兵防守峣关（今陕西蓝田东南），企图阻止反秦军西进。峣关前据峣岭，后枕蒉山，地形险要，是武关以西靠近咸阳的最后一关。刘邦采用张良献计，一面派人于山上多张旗帜，作为疑兵；一面遣郦生、陆贾往说秦将，诱之以利，以松懈其斗志。然后乘其无备，绕过峣关，翻越蒉山，大败秦军于蓝田，粉碎了秦王朝的最后抵抗。

汉高帝元年（前206）冬十月，刘邦率军进至霸上（今西安市东南），进逼咸阳，仅仅做了四十六日秦王的子婴只得“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在轵道（今西安市东）旁，向刘邦大军投降。秦王朝十五年的残暴统治，终于被埋葬在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

注 释

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⑬《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⑭《资治通鉴》卷八秦二世皇帝三年。

秦汉

鸿 门 宴

秦二世二年（前208）闰九月，楚怀王命宋义、项羽、范增北上救赵，又派刘邦西进咸阳，并与诸将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为王。

秦二世三年（前207）春二月，刘邦乘项羽正在巨鹿与秦主力决战之机，取道南阳，乘虚西进。八月，刘邦攻破关中的险要门户武关（今陕西商南县东南），进逼咸阳。这时，赵高已逼死秦二世，另立二世的侄子子婴为秦王，其后子婴又杀赵高。汉高帝元年（前206），刘邦率军进驻霸上（今西安市东），秦王子婴自知无力抵抗，向农民军投降。

在豪杰亡秦后，农民军的首领项羽、刘邦，分别形成了两个新的集团，双方为争夺封建统治权，展开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秦亡，刘邦进入咸阳，见到宫室富丽堂皇，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欲"止宫休舍"。诸将也争先恐后去抢夺金帛财物。刘邦妻妹夫樊哙进谏说："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侈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

留宫中。"①张良亦劝刘邦采纳樊哙之言。刘邦接受劝告，封闭了秦朝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十一月，召集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②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③宣布废除秦朝的一些严刑苛法，表示"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且吾所以还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约束耳"④。于是派人偕同秦吏将此决定告谕诸县乡邑。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犒劳军士。沛公谦辞说："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⑤这些措施，深得人心，秦民唯恐沛公不为秦王。因此刘邦迅速占据关中地区。

与刘邦相反，年仅 25 岁的项羽在巨鹿九战章邯获胜后，随即统率各路诸侯军和秦朝降军向关中进发，准备最后推翻秦王朝。秦朝降军沿途受到诸侯军的侮辱，私下多有怨言。项羽恐其发生变乱，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不如击杀之……。"⑥于是在大军到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时，乘夜把二十万秦降卒坑杀在县城南，只留下章邯、司马欣、董翳（音易）三名降将，随同入关。

当项羽率兵向函谷关进发时，刘邦惟恐当不成关中王，早已派军拒守，项羽不得入关。又听说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立即派英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十二月中旬，项羽率大军来到戏（今陕西临潼东北）下，屯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与刘邦军直接对峙。

刘邦部下左司马曹无伤听说项羽对刘邦十分不满，便乘机讨好项羽，以求封赏。他派人密报项羽："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的谋士范增亦对项羽说："沛公

居山东时（今崤山之东），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忽失。”⑦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⑧设宴犒劳士兵，定于翌日晨出兵灭刘邦，由曹无伤做内应。

当时项羽有四十万大军，号称百万，驻扎鸿门。刘邦只有十万人，号称二十万，屯扎霸上，在军事力量上处于劣势。两军相距仅四十里。

楚左尹项伯，系项羽叔父，早年曾因杀人，逃至下邳，投奔张良，张良收留他，成为好友。这时张良已从沛公，项伯乃夜驰入沛公军，私见张良，要张良随他一同离去，以免此难。张良说：“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⑨于是乃具以事实告刘邦，刘邦大惊。张良乃出邀项伯一同来见刘邦，刘邦敬酒祝贺，并与项伯约为婚姻，说：“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背）德也。”⑩项伯许诺，临行时嘱咐刘邦明日要亲自早来面谢项王。项伯连夜回到军营，将沛公所言一一转告项羽，并藉机向项羽进言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⑪。项羽允诺。

沛公翌晨率百余骑来至项羽军中，只见军营戒备森严。刘邦偕张良入内，见项羽，便主动谢罪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误会）。”⑫项羽闻言，脱口答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

以至此。”⑬由于沛公小心恭谨，解除项羽疑虑，于是项羽在军营设宴款待沛公。

宴席上，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席间范增多次目示项羽，并曾三举所佩玉玦（音决）暗示项羽，杀死刘邦，项羽却置之不理。范增焦急，起身出召项羽叔伯兄弟项庄，对他说“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⑭。项庄应诺，于是来到酒席宴前敬酒，请以剑舞助兴。

项伯察觉出项庄舞剑的真意，于是亦拔剑，与项庄对舞，常用身体保护刘邦，使项庄无法下手击杀刘邦。

张良见此情景，连忙离开座席，到军门外去找樊哙，告知他今日情况紧急，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听后，急切地说：“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⑮说罢，一手持剑，一手持盾，撞倒卫士，闯入营门，赶到宴前，面对项羽怒目而视，头发竖起，目眶瞪裂。项羽见此大惊，按剑问是何人？张良说：“沛公之参乘（卫士）樊哙。”⑯项王说：“壮士！赐之卮酒，”⑰樊哙拜谢而起，一饮而尽。项羽又命人赐与一生彘肩（生猪腿）。樊哙置盾牌于地，将生猪腿置于盾牌上，用剑切割食之，项王问其能再饮否？樊哙回答说：“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⑱接着樊哙义正辞严地对项羽说：“秦王有虎狼心，……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⑲项羽听后，未加置答，赐他在张良身边坐下。

须臾，刘邦起身去厕所，因招樊哙一同离席。刘邦犹豫不

辞而别，恐有失礼。樊哙说："如今人方为刀俎（菜刀和案板），我为鱼肉，何辞为？"⑳于是刘邦决定留下张良，向项羽辞谢，并将带来的一双白璧和一对玉斗交给张良，要他献给项羽和范增。刘邦弃置车骑，单人独骑，由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员大将护卫着，从骊山脚下，经芷阳（今陕西长安县东白鹿原霸川上的西陂），从小路，奔回霸上军营，较大路约近二十里。

张良估计刘邦将至军营，便回到宴席上向项羽辞谢说："沛公不胜桮杓（酒量小也），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㉑项羽连忙说："沛公安在？"㉒张良回答说："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责备他），脱身独去，已至军矣。"㉓。项羽接过白璧，放在席上。范增接过玉斗，放在地上，用剑击碎，气愤地说："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㉔项羽见范增动怒，不与计较，起身入内，范增亦去。项伯与张良相顾微笑，徐徐引退，刘邦逃回大营，立即诛杀卖主求荣的曹无伤。

鸿门宴后数日，项羽进入咸阳，杀掉秦王子婴，烧毁秦宫室"大火三月不息"㉕。收刮民财，秦民大失所望。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又以盟主的身份，号令天下，列土分封十八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都南郑。接着，项羽又杀楚怀王。项羽的分封措施，违背了历史发展趋势，同时也因分封不均引起各集团间的矛盾。因而分封未久，田荣即在齐地起兵，自立为齐王；彭越在梁地起兵，反抗项羽。刘邦早已心怀不满，这年八月，也乘机进兵关中。从此，刘邦与项羽展开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②③④⑤《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㉕《汉书》卷一《高帝纪》上。

秦汉

韩信破赵之战

韩信破赵之战是楚汉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直接作战的双方不是楚和汉，而是汉和赵，因为赵是站在楚这一方的。汉高帝元年（前206）十月，刘邦进入咸阳。次月，悉召诸县父老豪杰与之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①深受秦民的拥护。项羽在巨鹿消灭秦军主力后，声势日大。他率领诸侯军入关前，为了防止秦降卒叛变，曾坑杀二十万人于新安（今河南渑池东）城南。这种坑杀降卒的残暴行为，引起了关中人民的仇恨。项羽进军至函谷关时，闻刘邦已定关中，大怒，使英布等攻破函谷关，驻军鸿门（今陕西临潼东），从此，刘项之间矛盾日益加剧。不久，项羽进入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掠取宝货、妇女，秦民对之更加怨恨。

汉高帝元年（前206）二月，项羽凭借军事上的压倒优势，自立为西楚霸王②，统辖梁、楚等九郡之地（今浙江、江苏、山东西南、河南东部），都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为诸侯王的盟主；同时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项羽蓄意要把刘邦驱逐

出关，但已与刘邦和解，又恐怕承担"负约"恶名，乃同范增密谋："以巴蜀道险，秦之迁人（被迁徙的罪人）皆居之，"③乃藉口"巴蜀亦关中地"，因而将巴蜀、汉中之地封刘邦，立为汉王，都南郑，胁迫他离开关中。在项羽分封诸侯王之前，韩生曾向其献计说："关中阻山带河，四塞之地，地肥饶，可都以霸。"④项羽见秦宫室残破，又心思东归，却认为"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⑤！拒绝了韩生的建议。为了制服刘邦，乃三分关中，封秦降将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长史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董翳为翟王，王上郡。企图通过此三人控制关中，将刘邦困锁在边险地区，使之不能东进。田荣、陈余、彭越等虽拥有部分实力，因未从项羽击秦，故均未封王。项羽此举，既违背当时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也为后来的纷争埋下了祸根。

刘邦失去关中，极为不满，欲以武力同项羽争夺。部下周勃、灌婴、樊哙等都认为强弱不敌，不可妄动。萧何向刘邦进谏说："今众弗如，百战百败，……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即关中，因被项羽分封给秦三降将，故名），天下可图也。"⑥刘邦采纳萧何之议，被迫前往汉中就国，随之各诸侯亦皆罢兵就国。张良送刘邦至褒中，因劝刘邦烧毁所过栈道（险绝之处，傍山架木，以通道路），以防诸侯军偷袭，并向项羽表示无东向之意。

汉高帝元年（前206）五月，田荣首先起兵反楚，击走项羽所立之齐王田都；六月又追杀胶东王田市，自立为齐王。其后又联合拥众万余人占据梁地（今河南东部）的彭越，击杀济北王田安，占据三齐（齐、胶东、济北三王封地，在今山东地区），并指使彭越攻楚。赵将陈余在田荣的支持下，驱逐了项

羽派往赵国的常山王张耳（张耳后降汉），迎故赵王歇为赵王，陈余为代王。项羽既处于盟主地位，对山东等地的公然叛乱，不能坐视不顾，于是立刻调动人马，征讨田荣等人，因而为刘邦创造了乘隙东进的良机。

关东战争始发，韩信便向刘邦详尽地分析了双方政治得失及发展趋势。韩信，淮阴（今属江苏省）人，秦末农民战争中，初属项羽，未被重用。继归刘邦，因官职小而逃离，经萧何力荐，始得重用，拜为大将。他认为项羽不能任用贤将，是"匹夫之勇"。且"项羽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⑦。反之，"大王（指刘邦）之入武关，秋毫无所害，除秦苛法，与秦民约法三章耳，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⑧。最后建议刘邦举兵东向，"三秦可传檄而定"。刘邦采纳韩信献策，一面命萧何收取巴、蜀租赋，供应军需；一面部署部队，准备出击。八月，刘邦率军潜出故道（又名陈仓道，北起陈仓，南至汉中），袭击雍王章邯，连败章邯军于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好畤（今陕西乾县东），进围废丘（雍王都城，在今陕西兴平东南）；又遣诸将攻取陇西、北地、上郡，迫使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投降。接着立即派薛欧、王吸出武关，联合南阳王陵军（秦末起事军之一，时已归汉），迅速地向东进攻，但被楚军拒于阳夏（今河南太康）。项羽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命他领兵阻击汉军东进。为了坚定项羽以主力攻击齐、梁的决心，刘邦使张良致书项羽，表示："汉王失职（指失去关中王的职位），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⑨又故意将齐、梁的反书送给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羽因此决心以主力击齐，对西方暂取守势。项羽采取先齐后汉的战略，为刘邦继

续东进创造了有利条件。

汉高帝二年（前 205）春正月，项羽在城阳（今山东莒县）与田荣进行会战，田荣败走平原，为平原民所杀。项羽另立田假为齐王，进军北海（今山东北部），沿途烧夷城郭、室屋、坑杀田荣降卒，掳掠老弱妇女，引起齐人仇怨和反抗。田荣之弟田横乘机收集齐亡卒数万人，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反攻城阳，与楚对抗。项羽连战不能取胜，因被牵制于齐境。

刘邦乘项羽攻齐之机，由函谷关出陕县，进略中原，塞王欣、翟王翳、河南王申阳皆降。继又派韩王信（战国韩襄王之孙）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击降郑昌，控制了洛阳地区。为扫除继续东进的后顾之忧，刘邦宣布诸将凡以郡率领万人归降者，即封万户；同时，抚慰关外父老；派兵缮治河上要塞；开放秦朝苑囿园地，准许百姓耕种。这些措施对于尔后东进，起了有利作用。三月，刘邦乘项羽进军北海，深入齐境之际，又率军由临晋（今陕西大荔东）东渡黄河，迫使魏王豹投降；又攻下河内（今河南所属黄河以北地区），虏殷王司马卬（áng昂），置河内郡。项羽都尉陈平于此时投降刘邦，当日拜为都尉，使典护军。然后刘邦又南渡平阴津，至洛阳，接受新城三老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发使遍告诸侯说："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⑪宣称要"悉发关内兵，收三河（河南、河东、河内）士"，与诸侯王同击项羽，为义帝报仇。四月，刘邦乘齐楚胶着于城阳之际，率五诸侯（颜师古云：五诸侯者，谓常山、河南、韩、魏、殷也）兵，凡五十六万人，东向伐楚。军至外黄（今河南杞县东北），彭越率所部三万余人归汉。刘邦拜彭越为魏相国，命他继续率部略定梁地。

项羽闻刘邦东进，仍坚持先破齐而后击汉的战略，他命令诸将继续率主力击齐，自率精兵三万人由鲁（今山东曲阜）南出胡陵（今山东金乡南鱼台），救彭城。未及到达，刘邦已乘隙攻入彭城。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刘邦的头脑，入彭城后，即“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⑪。对项羽是否会回师反击毫无戒备。项羽进至萧县（属江苏省），“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⑫。汉军被压迫于穀、泗水（两水均在今徐州境内）中，死者十余万人。幸存汉军向南方山地溃退，楚军又追击至灵壁（今安徽宿县西）以东的睢水上，汉军抢渡睢水，又有十余万人被淹死。汉军尸体填满河中，水为之不流。会大风骤起，沙石风扬，刘邦因得率数十骑逃出重围，奔至下邑（今江苏砀山东），途中遇其子孝惠和女儿鲁元公主，同车载行。不料楚军随后追来，刘邦在危急中，为了轻车迅跑，几次推堕二子车下。幸亏身为太仆的夏侯婴下车收载，二子才得脱险。审食其保护刘邦之父太公及其妻吕雉从沛县逃出，寻找刘邦，中途被楚军俘获，留作人质。

刘邦在睢水惨败，主力被歼，齐、赵亦反汉与楚讲和，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如陈余归楚，司马欣、董翳乘机逃奔项羽，形势对刘邦非常不利。刘邦认识到楚军兵强将勇，不可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他向群臣说：“吾欲捐关以东等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献计说：“九江王布（英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⑬刘邦同意张良的计划，决定派谒者随何出使九江，往说英布，使其进攻楚军侧背，牵制项羽。另派人去梁地联结彭越。命韩信率一部分兵力，逐次歼灭黄河以北的割据势力。随

即撤军至荥阳，深沟高垒，扼守险要，企图与项羽进行长期周旋。

汉高帝二年（前 205）五月，汉军在正面战场阻止了楚军西进，但由于魏王豹背汉降楚，侧背上出现了危局。为拔掉这根背上芒刺，刘邦曾派郦食其往说魏王豹，未能生效，于是决定以韩信为左丞相，与灌婴、曹参等共同击魏。

魏王豹得知汉军进攻消息，便以柏直为大将，统率全军，扼守蒲坂，堵塞临晋津（今陕西大荔县境）渡口，准备迎战。蒲坂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西，黄河东岸，面对陕西省朝邑县，为山西、陕西交通要道。远在战国时期，魏国即在此处筑浦坂关，极其坚固险峻。柏直除在此地部署重兵外，还组织一支别动部队，沿河巡逻；同时驱逐全部民船，不准在河中来往停泊。汉军欲渡河进击，只有攻打蒲坂要塞，别无他途。八月，汉军进入魏境。韩信见蒲坂形势险要，魏军防守严密，如果正面攻坚很难取胜。因此，经过研究以后，决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术。他设营于蒲坂对面，故意在渡口附近遍插红旗，陈列许多船只，佯作由临晋渡河模样，暗中却调动军队，出其不意地从夏阳（今陕西韩城南）用木罂（小口木桶）运兵渡河，奔袭魏军后方安邑（今山西运城东）。魏王豹得报大惊，慌忙带领军队回救，结果被汉军杀得大败。九月，汉军又攻占魏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魏王豹被擒，又投降了汉军。韩信平定魏地，获得了北进的初步胜利。

赵王歇和陈余在楚汉睢水会战后，叛汉降楚，赵王歇仍被封为赵王。赵歇感激陈余，立陈余为代王。因赵国新建，陈余留赵辅助赵歇，委托丞相夏说（读悦）负责治理代国。赵国（在今河北省中部及西南部）和代国（在今河北省西北部）奉

项羽命令，监视汉军，成为汉北方的劲敌。此外，北面还有一个脆弱的割据势力——燕。在东方，位居山东的田齐，历经战乱，只图据地自保，已无力进行攻战。针对此一情况，韩信向刘邦提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西与大王会于荥阳”⑭的战略计划。刘邦批准韩信的作战方案，派他和张耳领兵数万去攻灭代、赵。

闰九月，韩信首先攻下代国，擒代相夏说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北）。经过灭魏、平代两大战役，韩信收其精兵补充荥阳正面战场，接着越过太行山东进，乘胜击赵。冬十月，汉军发动对赵国的进攻。赵将陈余集中号称二十万的兵力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占据有利地形，立下壁垒，准备与汉军决战。战前，赵国谋士李左车依据双方实际情况认为，韩信、张耳新破代国，乘胜来攻赵国，士气正在旺盛，其锋不可当。但他也看到汉军有致命弱点：汉军不远千里而来，运输困难，军粮必不充足。因此，他向陈余提出：“足下深沟高垒，坚营勿与战。”⑮自请率兵三万人，绝汉军粮道，使韩信“前不得斗，退不得还”，不出十日，可以战败韩信。陈余平时常自诩所领为“义兵”，不用诈谋奇计，他对李左车说：“韩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击，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矣。”⑯他还援引《孙子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的条文，作为拒绝李左车合乎实际建议的根据。韩信侦知陈余不用李左车献计，甚是高兴，乃大胆地指挥大军进至井陉口以西三十里的地方驻扎下来。夜半，选派两千名轻骑兵，每人手持一面红旗，从山间小路迂回到赵军大本营侧隐蔽起来。临出发前，韩信告诫军士说：“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你等）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⑰韩信布置完毕，即传令小食，对军吏说：“今日

破赵会食!”军吏虽佯应“诺”，但犹未敢深信。韩信乃派兵万人作为先遣部队，先从隘路进至绵蔓水（今河北井陉东）东岸背水立阵，以引起赵军的轻视。赵军望见汉军背水列阵，皆大笑韩信不知用兵之道。

拂晓，韩信建大将旗鼓，率主力鼓行出井陉口，以诱赵军出击。双方激战良久，韩信、张耳佯弃旗鼓，假意败退，进入背水阵。赵军见状，认为汉军已败，遂倾巢而出，争夺汉军旗鼓，追逐韩信、张耳。韩信派出的两千名骑兵乘虚进占赵军壁垒，拔下赵帜，更立汉军旗帜。赵军攻打背水汉军，久战不胜，准备回保营垒，突见壁上汉军旗帜迎风招展，以为赵军将帅被俘，顿时大乱，人人争先逃命。赵将虽然竭力制止，斩杀不少溃逃士兵，但仍无法禁止。汉军内外夹击，赵军腹背受敌，全部崩溃。陈余在泜水（井陉山附近河流，东流入绵蔓水）上被杀，赵王歇和李左车均被俘。韩信取得了井陉战役的完全胜利。

战争结束，汉军将士纷纷呈献斩获的敌军首级和俘虏，互相庆功。有些将领问韩信说：“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泽，今者将军令臣等反背水阵，……然竟以胜，此何术也?”韩信回答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谓‘驱市人而战之’，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为战；今予之生地，皆走，宁尚可得而用之乎?”⑬意思是说：汉军新募者多，平素又缺乏训练，战志不够坚强。因此，必须将其安置在无后退之路的“死地”，才能奋勇战斗，死里求生。反之，将其部署在安全地带，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优势的赵军猛扑过来，军卒必然要争先逃走，又如何能拼死对敌呢！背水立阵，就是“置之亡地而后存”这

一军事学说的实际应用。诸将听了韩信的解说，无不悦服。

接着，韩信向李左车请教破燕、齐之策。李左车认为，经过灭魏破赵战役，汉军已众劳卒疲，如果继续攻燕，可能顿兵坚城之下，旷日持久。为今之计，莫如案甲休兵，抚镇赵民，摆出进兵燕国的态势，然后派遣一辩士持书去宣扬汉军声威，劝其归降，燕国必然不敢不从。燕国已从，齐国亦必从风而服。此即兵法上所说的“先声后实”的战法。韩信照计实行，遣使使燕，燕国果然从风而靡。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远袭齐国，击溃齐军二十万人，使项羽不能全力应付成皋正面战场，为刘邦实施战略大反攻，最后消灭项羽创造了条件。

注　释

①《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②旧名江陵为南楚，吴为东楚，彭城为西楚。

③④《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⑤《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⑥《资治通鉴》卷九，汉高帝元年。

⑦⑧《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⑨《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⑩《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⑪⑫《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⑬《汉书》卷四〇《张陈王周传》。

⑭《汉书》卷三四《韩彭英卢吴传》。

⑮《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⑯⑰《资治通鉴》卷一〇，汉高帝三年。

⑱《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秦汉

楚汉成皋之战

成皋之战是楚、汉两军在荥阳（属河南省）、成皋（今荥阳西北）一带相持两年多的一次战争，是楚汉战争中汉军由防守转入进攻的转折性战争。

刘邦在彭城大败后，主力被歼，诸侯又纷纷背汉向楚。刘邦只得收集残败部队，扼守险要，采取持久防御的战略。汉高帝二年（前205）五月，刘邦至荥阳，各地败军皆来会合，不久，萧何亦征调关中老弱及未傅者（即未达服兵役年龄者）送至荥阳。汉军得到补充和休整，士气重新振作起来。此时，楚军已进至荥阳地区，与汉军战于京、索（均在荥阳之南）之间。楚军骑兵众多，给汉军以极大威胁。为了有效地抵御楚军骑兵的攻击，刘邦命令灌婴、李必、骆甲等组织了一支骑兵部队，大破楚骑于荥阳以东，使楚军不能越过荥阳西进。敖仓位于荥阳西北、黄河南岸敖山之上。秦时曾在此筑城储粮，成为闻名天下的谷仓。为保证军粮供应，刘邦命令部下于荥阳、敖仓间修筑甬道（两侧有土墙的运粮道路），直达黄河，派将军周勃坚守敖仓粮库，从而转入了持久防御。

在荥阳防守暂时布置停当以后，考虑到后方的巩固，刘邦六月间又回到关中，指挥汉军引水攻破废丘，章邯自杀，雍地彻底平定，于此置河上（即左冯翊）、渭南（京兆）、中地（右扶风）、北地、陇西五郡。在刘邦回荥阳前，命令萧何以丞相身份侍奉太子盈守关中，镇抚百姓，制定法令，设置县邑，调查户口，转运关中粮食、兵员，支援前线。

为了扭转被动，争取主动，造成反攻的有利形势，刘邦在扼险固守荥阳的同时，派大将韩信去平定背汉降楚的魏王豹，接着又批准韩信北破燕、赵，东攻田齐的作战计划。韩信在井陉（今河北井陉东）背水为阵，大败赵军，慑降燕国，从而解除汉军左翼的威胁。九江王英布为楚军著名勇将，屡立战功，颇受项羽器重，不仅封地广大，而且邻近楚国，成为汉在南方的威胁。刘邦在彭城败退途中，曾谓左右说："孰能为我使九江，令之发兵背楚，留项王数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①可见英布的向背，对汉的关系甚为重大。此时，项羽与英布之间已经有了嫌隙。项羽击齐，英布称病不往，仅派出数千人去应付；汉军攻破彭城，英布又称病不去救援。项羽多次派人责问，英布心怀恐惧，双方猜忌日深，因而为刘邦策反以可乘之机。

汉高帝三年（前 204）十一月，随何奉刘邦之命前往九江游说英布。随何见到英布，开门见山地向他指出英、项之间的矛盾说："项王伐齐……大王宜悉淮南之众，身自将之，为楚军前锋，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汉王战于彭城，项王未出齐也，大王宜埽（尽发）淮南之兵渡淮，日夜会战彭城下。大王乃抚万人之众，无一人渡淮者，垂拱（垂衣拱手）而观其孰胜。夫托国于人者，固若是

乎?”②随何的话已经击中英布要害。接着随何又说明此行目的:“臣非以淮南士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发兵而背楚,项王必留;留数月,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臣请与大王提剑(指挥所部)而归汉,汉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况淮南,淮南必大王有也。”③英布心许叛楚助汉,但又不敢与项羽公开决裂。适值项羽派使者来九江要求英布发兵,随何当机立断,当着楚使者的面宣布:“九江王已归汉,楚何以得发兵?”④事已泄露,英布骑虎难下,不得不杀死楚使,立即出兵攻楚。至此,汉军解除了来自南面的威胁。项羽得知英布背楚归汉,不得不分兵一部由项声、龙且率领前去进攻九江。双方交战数月,英布兵败,乃与随何由小道归汉。

汉高帝三年(前204)十二月,楚军加紧进攻荥阳,数次侵夺汉军甬道,给汉军军粮供应造成困难。刘邦与部属计议破楚之策。郦食其建议立六国之后以分楚之势,事未及行,为张良所谏阻。同年四月,楚军围攻荥阳甚急,刘邦提出“割荥阳以西者为汉”的缓兵之计,项羽有意和解,为范增所反对,劝项羽急攻荥阳,刘邦非常忧虑。汉谋臣陈平为刘邦划反间之策说:“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⑤刘邦于是予陈平黄金数万斤,使广布间谍,宣言楚将钟离昧等功多,但未能得到封地,都想与汉联合,共同消灭项氏,分地称王。项羽果然中计,怀疑其部属,甚至连追随其多年富有谋略的范增亦愤而离去,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楚国领导核心日趋分裂。

五月,荥阳危在旦夕,汉军将领纪信与陈平研究解脱之

急，纪信谓刘邦曰："事急矣！臣请诳楚，王可以间出。"⑥当夜，汉军开荥阳东门，先出两千名装扮成士兵之妇女，楚军误以为汉军，从四面围攻上来。接着，纪信乘王车、黄伞，左树大纛旗，俨然帝王出行仪仗，从城中缓缓而来，随从士兵且行且呼："食尽，汉王降！"楚军闻刘邦亲自出城请降，皆至城东聚观。刘邦乘混乱之机率领数十名亲信骑兵，从西门遁出，奔往成皋。临行前，刘邦令韩王信与周苛、枞公、魏豹等坚守荥阳。项羽识破真相后，烧杀纪信，同时命令军士，猛攻荥阳。荥阳守将周苛、枞公认为魏王豹反复无常，难与守城，因将魏豹杀死。

刘邦逃入关中，征得一部分兵员后，仍准备夺回荥阳。谋士辕生认为不妥，他向刘邦献计说："汉与楚相距荥阳数岁，汉常困。愿君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安抚）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者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⑦刘邦从其计，进军宛（今河南南阳）、叶（今河南叶县）间，与英布合兵，然后向武关进发，果然调动了项羽南下求战。此时项羽后方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原来彭越曾在秦末参加农民起义，在反秦战争中立下不少功劳。秦亡后，他还拥有一支万人的队伍，但项羽未予封地，因此彭越怀恨在心。楚汉战争爆发，他归顺了刘邦。彭城之战刘邦失败后，彭越率游军经常在黄河沿岸活动，袭击楚军粮食补给线。及项羽领兵南下，攻打宛、叶，彭越又率部渡过睢水，与楚国大将项声，薛公战于下邳（今江苏邳县），攻杀薛公，直接威胁着楚都彭城。项羽首尾不得兼顾，乃留终公守城皋，亲率大军，东攻彭越，刘邦乘机击破终公，夺回成皋。六月，

项羽击败彭越，闻汉军已得成皋，立即挥师西进，一举攻克荥阳城。汉军守将周苛、枞公因拒绝降楚被杀，韩王信被俘虏，楚军包围成皋。刘邦见楚军攻势凌厉，成皋已不能坚守，乃独与夏侯婴共车从北门出逃，向北渡过黄河，至小修武（今河南获嘉县）。成皋又落入楚军之手。

汉军退出成皋后，在巩县（今河南荥阳西）筑起一道防线，以阻止楚军继续西进。此时，韩信、张耳已攻破赵国，主力部队正屯驻在黄河北岸地区休整。刘邦渡河至韩信大营，夺其印符，收回其所指挥的大部军队，用以加强巩县正面战场。随后即令张耳负责防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命他率领部分军队，东进击齐。为了加强敌后行动，八月，刘邦派将军刘贾、卢绾率领步兵两万人，骑兵数百名，从白马津（旧黄河渡口，在今河南滑县北）渡河深入楚地，协助彭越，烧楚粮草、物资，以断其补给。彭越得到刘贾、卢绾的支援后，一连攻占原由楚军占领的睢阳（今河南商丘市南）、外黄（今河南杞县东）等十七城，截断了楚军成皋与彭城之间的联系。楚军侧背受到巨大威胁，项羽不得不停止攻势，再次亲击彭越。九月，项羽率军东征，临行前郑重地嘱咐大司马曹咎，要他“谨守成皋，若汉挑战，慎勿与战，无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⑧。

汉高帝四年（前 203）十月，刘邦乘楚军主力东调，远离成皋之际，再次渡河，复攻成皋。曹咎最初还能依照项羽指示，紧闭城门，坚守不战。刘邦见此情景，乃采用“激将法”，派人至楚军阵前叫骂，一连数日，曹咎按捺不住，终于在盛怒之下，领兵出击。楚军在渡汜水（在今河南荥阳县境内，北流入黄河，现已湮没）时，因缺乏周密计划和严密组织，人多船

少，互相争渡。汉军采用“半渡而击”的战术，水陆夹攻、矢箭交集，楚军乱成一团，被杀得人仰马翻，落水而死者不计其数。曹咎自知违反项羽军令，失守成皋，难以活命，与另一守将司马欣皆在汜水上自刎毙命。汉军乘胜收复成皋，驻军广武山（在荥阳东北）上，就近取用敖仓粟供应军食，并包围楚将钟离昧于荥阳以东。

项羽东征彭越，连续收复十几座城池。正想彻底消灭彭越，不料传来汜水惨败，曹咎自杀的消息，乃急忙由睢阳率军回救，汉军凭藉险要，坚守不战。楚军几次东奔西驰，极为疲惫。项羽无奈，只得在广武驻扎下来。广武本是有名大山，山势险峻，山中断涧，划分为东西两峰。刘邦占据西峰，项羽占据东峰，两军隔涧，形成对峙局面。项羽欲战不能，欲退不得，前后受制，左右为难。数月之后，楚军缺粮，项羽心中十分忧虑。他在无计可施之下，乃命人将他俘获的太公（刘邦之父）置于肉案之上，隔涧对刘邦说：“今不急下，吾烹太公。”孰料刘邦不为所动，从容对项羽说：“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⑨项羽大怒，欲杀太公。项伯劝阻说：“天下事未可知，且为天下者不顾家，虽杀之无益，只益祸耳!”⑩项羽只得作罢。

项羽求战心切，用言语刺激刘邦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独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⑪刘邦识破项羽进退两难的心理，乃巧妙地回答说：“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并在两军阵前揭露项羽犯下的十大罪状，以打击其军心士气。这十大罪状的主要内容为：违约背盟，任意封王；矫杀卿子冠军；擅劫诸侯兵入关；烧秦宫

室，掘始皇墓，收取其财，以为私有；诈坑降卒，残暴成性；逐杀义帝，大逆不道；为政不平，立约不信。最后，刘邦进一步轻蔑地挖苦说："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指项羽），使刑余罪人击公，何苦乃与公挑战！"⑫项羽听后，气得暴跳如雷，乃伏弩射击刘邦，正中其胸。刘邦机警地抚摸足部说："虏中吾指！"刘邦因为创伤严重，卧床不起，为了安定军心，张良强请刘邦起行劳军。刘邦忍着伤痛在军营中巡视了一番，就急忙回到成皋城中，进行调养。

正当楚军汜水惨败，刘邦再次收复成皋之际，韩信远征齐国，也取得重大胜利。汉高帝四年（前203）十月，韩信攻破齐历下（今山东历城），进据齐都临淄。齐王率军退至高密，向楚求救。韩信入齐，威胁楚国侧背，项羽乃派大将龙且率领二十万人北上，与齐军会于高密。当时龙且部下有人看出汉军远来求战，孤军深入的弱点，建议龙且"不如深壁，令齐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失陷地区人民）"⑬，共同抗击汉军，汉军无所得食，可以不战而胜。但龙且素轻韩信，存有轻敌之心，且思战胜之后，可以占有齐国之半。乃不听深壁之计，急与汉军决战。十一月，齐楚联军与汉军夹潍水（今山东潍河，在潍县东）列阵对峙。韩信乃于夜间命人置备万余沙袋，用以塞水上游。天明后，引军进击龙且，佯败退走，龙且以为韩信怯战，乃引兵渡水追击。韩信使人决开沙袋放水，河水暴涨，龙且军被截成两段。韩信挥军反击，全歼已渡齐楚军，龙且自杀，潍水东岸楚军皆散走。汉军乘胜消灭残敌，追杀齐王广于城阳（今山东莒县），完全占领了齐地。

刘邦病愈，西入关中，至栎阳（今陕西临潼东），抚慰当地父老，调集关中兵马，返回广武，准备乘机发动攻势，打败

项羽。是年春二月，刘邦接受张良、陈平建议，为调动韩信协力灭楚，派张良持印到军中立韩信为齐王；七月，又封黥布为淮南王。八月，韩信率兵自齐南下，准备直捣彭城。成皋汉军经过长时期休整，又得到关中兵力的补充和从燕地调来的轻骑，实力大增。项羽自知少助食尽，心中十分焦急。恰在此时，刘邦先后遣陆贾、侯公面见项羽，要求释放太公和吕雉。项羽乃与刘邦约定，中分天下，割鸿沟（在河南中牟县，即今之贾鲁河）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归还太公、吕雉，项羽撤兵东归。至此，楚汉进行两年又五个月的成皋之战予以结束，楚汉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注　释

①②③④《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

⑤《史记》卷五六《陈丞相世家》。

⑥《资治通鉴》卷一〇，汉高帝三年。

⑦《汉书》卷一《高帝纪》。

⑧《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⑨⑩⑪《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⑫《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⑬《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秦汉

垓下悲歌

鸿沟"中分天下"的和局，使楚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划界后，项羽准备离开广武向东进发，刘邦亦欲西归。张良、陈平向刘邦建议说："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之，楚兵罢（疲）食尽，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①汉王采纳其献策。先是韩信破齐，杀龙且，请自立为齐王，刘邦为征调其兵击楚，勉强同意，但未划给封地。汉四年（前203），项羽曾派武涉往说韩信反汉连楚，三分天下王之，韩信不纳。之后齐人蒯通（即蒯彻）知天下权在韩信，又往见韩信曰："当今两主（指刘邦、项羽）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诚能听臣之计，莫若两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②韩信犹豫，不肯背汉，遂谢蒯彻。汉五年（前202）冬，刘邦军在固陵（今河南淮阴县西北）追上了楚军，即召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合击楚军。然而韩信、彭越不肯会击，楚反攻，大败汉军。刘邦退入营壁，深堑防守。他对张良说"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③？张良说"……信、越未有分地

（未为分划疆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④。于是刘邦乃取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至海之地封韩信；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之地封给彭越；并派使者通知韩信和彭越“并力击楚”。韩信、彭越得到封地许诺后，乃回报刘邦“请今进兵”⑤。韩信从齐地进兵，刘贾军南渡淮水，围寿春，诱降楚大司马周殷叛楚，举九江兵迎黥布，皆来会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

刘邦和韩、彭大军围垓下数重。这时项羽仅十万人，兵少食尽，士气低落，与汉交战多次未能取胜，入壁自守。为了瓦解楚军斗志，韩信使士兵对楚营高声呼叫：人心都背楚，天下已属刘，韩信屯垓下，要斩霸王头。项羽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立即率十万大军冲到垓下，未遇韩信，后面却来追兵。项羽一筹莫展，夜深人静，汉军四面皆唱楚歌，勾起思乡之情，不少士兵逃跑，连季布、项伯、钟离眛也悄悄离去。项羽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⑥于是夜起与他最宠爱的妃子虞姬诀别。项羽面对着绝望的前途，心乱如麻，不禁泪下，乃慷慨悲歌，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⑦歌罢美人和之："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⑧歌罢自刎而死，项王与左右皆泣。

于是，项羽决定乘夜突围，他率领八百多名精壮士兵南去。刘邦急派灌婴率五千骑兵追赶。项羽过淮河，仅余百余骑，行至阴陵（今安徽和县北）迷道，问一田父，田父故意指错方向，使项羽军陷入沼泽，被汉军追上。项羽率兵逃到东城（今安徽定远县东南），仅余二十八骑。而汉军追兵数千人。项

羽估计无法逃脱，对骑士们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因而也）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即连战连捷），为诸君溃围，斩将，刈（夺也）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⑨说罢，将二十八人分成四队，竟然杀退了汉兵，他又带领剩下的二十六人欲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四十里长江北岸的乌江浦），乌江亭长将船靠岸边，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足以称王）。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⑩。项羽笑答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⑪于是项羽牵过所乘乌骓马，又对乌江亭长说："吾知公长者，吾骑此马五岁，所当无敌，尝一日行千里，不忍杀之，以赐公。"⑫乃命骑士皆下马步行，手持短兵器与汉军接战。战斗中，项羽亲自杀死汉兵几百人，自己也受伤十余处。项羽回身见汉骑将吕马童，说"若非吾故人乎"⑬？吕马童对汉将王翳说"此项王也"⑭。项羽说："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我为你做件好事吧）。"⑮说罢自刎而死。这位豪气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年仅31岁。京剧《霸王别姬》就是根据这段史实编演的。

司马迁说："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⑯表现了这位史学家对项羽的赞叹和惋惜的情怀。

项羽的历史功绩不可磨灭，但他失败的历史教训却值得深

思。他之所以失败，诚如他自己所云："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翦伯赞先生解释说："'战'也者，即主观的创造，而'天'也者，则为客观的倾向。项羽的失败，不在他主观创力的不强；而正是由于他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倾向。"⑰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

汉五年（前201），诸侯及将相均尊刘邦为帝，是为西汉王朝。

注　释

①《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②《史记》卷九二《淮阴侯列传》。

③④⑤⑥⑦《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⑧《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注引《楚汉春秋》。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史记》卷七《项羽本纪》。

⑰翦伯赞：《秦汉史》第1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秦汉

刘邦建立西汉

高帝五年（前202）十二月，刘邦击灭项羽，二月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附近）①，国号汉，史称“西汉”或前汉。刘邦先定都洛阳，不久迁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秦汉之际，海内溃叛，天下大乱，攻战杀伐，将近十年。其间人民前赴矢石、后堕溪谷而死者，不下数百万人。加以兵祸之中，又益之以荒年，“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②。至西汉初，“大城名都，民人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裁什二三”③。生产破坏，经济凋敝，“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④。面对这种荒凉残破的局面，如何稳定封建秩序，复苏封建经济，已成为摆在西汉统治者面前的首要问题。刘邦命陆贾著书论说秦失天下的原因，陆贾在其所著《新语》一书的《无为》篇中指出：秦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从陆贾所揭示的历史教训中，汉初统治者认识到，在当时的历史形势下，只有轻徭薄赋，约法省禁，才能缓和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汉

高祖采纳了陆贾提出的这一“黄老无为”政治思想，从建立西汉政权开始，即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士复员，“兵皆罢归家”⑤。军队官兵复员为民，“以有功劳行田宅”，即按本人功劳大小，给予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⑥意谓，原籍东方六国的官兵，愿留在关中者，得免除十二年徭役，回归原籍者，免徭役六年。

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无爵或爵位在大夫（第五级爵）以下者，“皆赐爵为大夫”，原位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公大夫（七级）以上者，“皆令食邑”⑦，并优先给予田宅，其地位与新朝的县令、县丞相等。七大夫以下者，一律免除本人及全家徭赋。

三、招抚流亡。号召在战乱中流亡山泽不书名数（不著户籍）的人户，“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⑧。

四、释放奴婢。汉初因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当时社会上存在大量的奴婢，使汉王朝直接控制的依附农民更加减少。释放奴婢是增加农业劳动人口，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的途径之一。因此，刘邦即位后，即诏令“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⑨，即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

五、“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⑩。

六、重农抑商。汉初继承秦朝“上农除末”的农本思想，对工商业采取抑制的政策，以保证以小农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得以发展。刘邦诏“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⑪。此外，还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准入仕，进一步从政治上压制商人，限制商业的发展，防止农业劳动力的流散。

七、鼓励增殖人口。汉高帝七年（前 200），刘邦下令，凡“民产子”，可以免除二年徭役。

在政治制度上，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九卿（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尉、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和少府）分别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刘邦之后，三公、九卿名称虽时有改变，但一直发挥着国家机器的中枢作用。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郡县两级制度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制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亭。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在军制方面，汉初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两军，以拱卫京师，“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⑫。在地方，“高祖命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拉弓张弩）、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车兵）、骑士（骑兵）、材官（步兵）、楼船（水兵）。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⑬。这些地方军队，郡国由郡守和郡尉掌管，王国由国相和中尉掌管。

在法律方面，刘邦入关之初，与秦民“约法三章”，作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认为“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⑭。于是命令萧何在秦六律基础上，制定汉律。萧何芟除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增加部主见知之条文，“益《事律》、《擅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⑮，因称《九章律》。

在赋役方面，西汉政权建立之后，即进行全国人口登记，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依据户籍向人民课赋征役。首先是田

租，规定“什五税一”[16]；其次是口赋（人头税），按照年龄分为算赋和口钱，“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17]。凡七岁至十四岁，不论男女，每口每年缴纳二十钱，敬奉天子，称为口赋。汉朝还规定，成年男子都要为政府服役，“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18]。

刘邦及其部属总结所以能够战胜项羽，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刘邦善于用人。汉初辅佐刘邦平定天下的“开国元勋”，除张良外，如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周勃、樊哙、彭越、黥布等，大都出身寒微，刘邦皆能量才任用，使其为效死力。西汉建国后，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主要官吏，大部分由其属下充任，地方小吏则由一部分秦朝旧官吏继任。除此而外，在社会上还有不少“贤士大夫”处于闲散地位。为了网罗这批人才，充实各级政府，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发布诏令，布告天下：“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19]即是说，贤人才士肯为西汉政府效力者，将分派各种不同官职。对于德才出众者，郡守要亲自登门劝请，派人驾车送至京师，并将其行状年纪，报告至相国府，以备差遣。如果地方官发现贤才隐瞒不报，一经查出，即予免职。刘邦此项措施，对于巩固新建立的西汉政权，起到积极作用。

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一，汉高帝九年（前198），刘邦采纳刘敬（娄敬）献策，将盘踞在东方原六国之后以及豪家大族，迁至关中。娄敬完成和亲任务从匈奴归来后，向刘邦建议说：“今陛下虽都关中，实少人。北近胡寇（指匈奴），东有六国之族，宗强，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20]他认

为，关中一带，经过战乱，地旷人稀，北有匈奴，近者距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日夜可至京师。秦时东方六国之后，仍有相当实力。一旦发生变故，将会两面受敌。为策万全，巩固西汉王朝，不如"徙齐诸田、楚昭、屈、景、燕、赵、韩、魏后，及豪杰名家居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变，亦足率以东伐，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㉑。于是刘邦乃使刘敬迁豪族大姓十余万口于关中，给予良田美宅。其后，又陆续将诸功臣家、官吏世家、高赀富人和豪杰兼并之家迁至关中。

在楚汉战争时期，刘邦为了战胜项羽，争取反楚力量，曾把一些势力强大的将领分封为王。汉初，被分封的异姓诸侯王计有七个，即楚王韩信（先封齐王）、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此外，还封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三人为列侯。异姓王占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从汉高帝五年（前202）至高帝十二年（前195），七年之间，刘邦借口他们谋反，先后消灭楚、韩、赵、梁、淮南和燕等六王。只有吴芮由于其封国僻远，势力最小，暂时保留下来。在消灭异姓诸王的同时，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㉒，又在异姓诸王的旧土上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㉓。为了控制诸侯王国，刘邦规定王国的相、太傅、内史、中尉等重要军政官吏均由中央委派，并规定无中央虎符不得发兵。刘邦在位期间，由于诸侯王均为刘邦子弟，而且大抵年纪较轻，还易控制，其弊端尚未暴露。但随着诸侯王的成长，地方势力日益坐大，"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㉔，王国得以自征租赋，自筹货币，自行纪年，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至文帝、景帝之时，终于爆发了中央与王国之

间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注　释

①《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②《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③《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④《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⑤⑥⑦⑧⑨《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⑩《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⑪《史记》卷三O《平准书》。

⑫《文献通考》卷一五O，《兵考》二O。

⑬《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下注引《汉官仪》。

⑭《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⑮《通典》卷一六三《刑一》。

⑯《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⑰《汉书》卷一《高帝纪》四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⑱《汉书》卷一《高帝纪》二年如淳注引《汉仪注》。

⑲《汉书》卷一《高帝纪》。

⑳㉑《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㉒《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㉓《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㉔《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秦汉

汉匈和亲

匈奴是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其人以游牧为生，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但在某些地点也建有一些军用壁垒、城堡，并有少量的农业生产。匈奴人好征战，手持长器弓矢，短器刀鋋（音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①。匈奴人作战时，“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趣（趋）利”②。

秦初，匈奴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将蒙恬打败了匈奴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重置九原郡（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以防匈奴南侵。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头曼单于收复河南地，至其子冒顿（音墨毒）单于乘楚汉战争之际，以“控弦之士”三十余万，东败东胡，西破月氏，北征丁令、坚昆等地（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并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南部），使“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③。匈奴的统治区域东起朝鲜边界，横跨蒙古高原，向西与氐羌相接，向南伸延到河套以至于今晋北、陕北一带。冒顿把这一广

大地区分为中、左、右三部，中部由冒顿自辖，与汉的代郡、云中郡相对；左部居东方；右部居西方，由左右屠耆王（贤王）分领。他们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

为了防御匈奴进攻，汉高祖刘邦把韩王信封于代北。汉高帝六年（前201），匈奴大举进攻马邑（今山西朔县），韩王信投降匈奴。次年，又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于平城之白登山（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并讨伐韩王信，时值"大寒雨雪，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于是冒顿阳败走诱汉兵"④。汉军中了匈奴的诱兵之计，在白登山被冒顿骑兵围困七天七夜，和主力部队完全断绝联系。最后刘邦用陈平秘计，派人重赂冒顿阏氏（音焉支，匈奴单于之妻，犹汉言皇后），始得脱险，至平城，汉大军到，匈奴解围去，汉亦罢兵归。

白登战后，冒顿单于仍不断进攻北部边境，代王喜吓得弃掉封国逃回长安。高帝数苦北边，谋对策，问刘敬。刘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陛下诚能以適（同嫡）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⑤由于汉初战争破坏，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刘邦接受了刘敬的建议。汉高祖九年（前198），刘邦取家人子（宫人）为长公主嫁与匈奴单于，每年送去大量的絮、缯、酒、食物，并开关市进行交易，与匈奴约为兄弟，以缓和匈奴的侵扰。

刘邦以后的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时期，基本形势没有大的变化，西汉政府继续执行刘邦与匈奴的"和亲"政策。据历史记载，惠帝三年（前192）、文帝六年（前174）、文帝后

元二年（前 162）、景帝元年（前 156）、景帝二年（前 155）、景帝五年（前 152），汉朝皇帝都曾经送宗女嫁给匈奴单于，或重申坚持与匈奴实行“和亲”。汉政府馈赠单于的礼物也逐年增多。如汉文帝六年与匈奴“和亲”时，一次就赠送单于锦绣衣袍、黄金装饰的带子、黄金带钩、汉族人用的篦梳、还有几十匹刺绣、织锦等大量贵重物品。汉初七、八十年间的“和亲”政策，带来了相对和平局面，有利于两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西汉政府与匈奴同意在边界地区“通关市”，允许两地间的贸易交换。于是，匈奴人带着驴、马、羊、驼、兽皮等物产在“关市”与汉族商人交换缯、帛、酒和粮食。“关市”贸易，一时相当繁盛。

但是这种“和亲”政策，说到底是带有贡纳性质的政治联姻。西汉统治者当时实行这一政策，也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的。“和亲”并未能阻挡匈奴贵族的掠夺。从汉高祖到汉景帝的七十多年间，匈奴贵族一有机会，仍然不断地攻掠汉朝边郡。每次进攻都要“杀掠人民”，抢劫牲畜。特别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和辽东（今辽宁省南部）两郡受害最深，每年都有一万多人被匈奴贵族杀害或掠去为奴。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些防备工作。公家养马，多至三十万匹，为建设强大骑兵创造了条件。到了汉武帝时，由于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又无内顾之忧，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建立起来，便放弃对匈奴单方面退让的和亲政策，向匈奴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击战争，从此，西汉与匈奴“绝和亲”八十多年。

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的纷争混战，最后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决心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

迫西迁。到汉宣帝时，匈奴在汉军连续打击下，已日趋衰落，因而被匈奴征服、奴役的丁零等部族，纷纷脱离匈奴控制，并配合汉军进攻匈奴，匈奴再也无力向汉朝发动进攻。而西汉王朝也由于长期战争，使内部矛盾日益尖锐。于是，汉政府与匈奴间的战争渐渐平息，又重新恢复了两族间的“和亲”。不过，这已是汉朝略占优势的形势下，双方走向妥协的产物，与汉初的和亲，虽然都是政治联姻，情况已不相同。宣帝甘露三年（前51）和宣帝黄龙元年（前49），呼韩邪单于两次到长安觐见汉帝。汉宣帝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他的礼遇位置，超过汉朝各诸侯王之上，同时还赠送“冠带、衣裳、黄金玺、戾绶、玉具、剑、佩刀，弓一张、矢四发、棨戟十，安车一乘，鞍勒一具，马十五匹，黄金二十斤，钱二十万，衣被七十七袭，锦绣、绮縠、杂帛八千匹，絮六千斤”⑥。表示对呼韩邪政权的支持和友好。呼韩邪单于也向汉宣帝表示，愿意留居漠南，协助汉政府保护边境域塞。双方建立了和平相处，互相支持的关系。

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汉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出兵杀死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实现了重新统一整个匈奴的愿望。汉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前33），呼韩邪单于第三次到长安朝见汉帝，“礼赐如初，加衣服锦帛絮，皆倍于黄龙时。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牆（或作嫱、樯）字昭君赐单于”⑦。王昭君容貌丰美，仪态大方，通情识理，深得呼韩邪单于的倾心敬爱，特加称号“宁胡阏氏”（希望通过这次和亲，建立永远和好安宁关系之意），汉元帝也很高兴，下诏“改元为竟宁”⑧（表示取得了永远和平相处的局面），恢复了旧日的和亲，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战争。

"昭君出塞"后，一直生活在匈奴游牧地区到死，在她影响下，她的子女及周围人都努力维护汉匈友好关系，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和亲后的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百姓)亡干戈之役"⑨的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代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和洽的有力证明。

注 释

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②③《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④《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⑤《史记》卷九九《刘敬传》。

⑥《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⑦《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⑧《汉书》卷九《元帝纪》。

⑨《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秦汉

诸吕之乱

高帝十二年（前195）四月，刘邦病死，五月，太子刘盈年十七岁，即位，是为惠帝。惠帝即位之初还亲理朝政，但其为人仁弱，虽继承大统，而一切国家大政，皆操诸吕后之手。吕后，名雉，小字娥姁（xǔ许）。刘邦微时，吕后尝居田中耨。刘邦亡命芒砀山时，吕后常往相从。彭城之役，吕后与太公同为项羽所俘。后楚汉议和，始得释归。刘邦即天子位，吕后遂为皇后。吕后性情刚毅，多疑好杀，曾协助刘邦诛杀韩信、彭越等大臣。高帝十年（前197），定陶戚姬有宠于刘邦，生赵王如意。吕后年长失宠，刘邦欲废太子刘盈而立如意，后得大臣力争，始得不废，吕后因此对戚姬及赵王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刘邦死，惠帝立，吕后为皇太后，第一件事即命人幽禁戚夫人于永巷（别宫名，有长巷，故名），髡钳（剃发，以铁束颈），衣赭衣（罪衣），令其舂米。戚夫人边舂边叹息说："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死罪）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汝？"①吕后闻知大怒说："乃欲倚汝子邪？"乃召赵王如意入京，乘惠帝晨出射猎之机，使人

鸩杀之。又"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以药熏耳使聋），饮瘖（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②。吕雉阴鸷残忍竟至于此！

吕后意识到，惠帝接受的是一个外重内轻的天下。一方面，刘氏诸王，非其伯叔，即其兄弟，刘盈仁弱，非其对手。另一方面，功臣宿将陈平、灌婴、周勃、樊哙等皆手握重兵，造成对中央政府的威胁。吕后具有极大政治野心，刘邦一死，她就同其亲信审食其密谋尽诛诸将，然后发丧。吕后对审食其说："诸将故与帝（指刘邦）为编户（列次名籍）民，北面为臣，心常怏怏（不快之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族诛功臣），天下不安。"③有人将此消息告之郦商，郦商往见审食其说："吾闻帝已崩，四日不发丧，欲诛诸将，诚如此，天下危矣。"④现诸宿将皆领重兵在外，"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⑤。届时"大臣内叛，诸侯外反"⑥，国家危亡可翘首而待。吕后估计实力不足，乃迫不得已暂时中止诛杀诸将的阴谋。但在惠帝君国期间，吕后无日不在计划巩固中央与削弱诸王及元老宿将的方策，只是因为准备尚未完成，并未采取攻势而已。

惠帝七年（前188）八月，惠帝死，无子，吕后乃取惠帝宫人幼子，谓为惠帝子，杀其母而立为帝，吕后临朝称制。高后元年（前187）冬，吕后议欲立诸吕为王，征询右丞相王陵意见，王陵回答说："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⑦吕后不悦，又问左丞相陈平、太尉周勃。陈平、周勃回答说："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⑧吕后喜。罢朝后，王陵

责备陈平、周勃不应违背刘邦誓言在吕后面前“阿意背约”。陈平、周勃说：“于今面折廷争，臣不如君；夫全社稷，定刘氏之后；君亦不如臣。”⑨十一月，吕后拜王陵为少帝太傅，用明升暗降之术，夺去王陵相权。遂以左丞相陈平为右丞相；以其亲信审食其为左丞相，令监宫中，如郎中令，公卿奏事皆通过审食其作出裁决。然后又布置党羽，培养亲信，乃大封吕氏，立兄子吕台、吕产、吕禄及吕通（吕台之子）四人为王，封诸吕凡六人皆为列侯，追尊其父吕公为吕宣王，兄周吕侯为悼武王。同时还封其所爱后宫美人之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山（《汉书·高后纪》作弘）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⑩。在一切布置停当之后，乃开始向诸侯王进攻。高后七年（前181），吕后先后杀赵王友、共王恢及燕王建子，而以吕氏代之。

吕后称制凡八年。当病笃时，为了实现其生前未能完成之计划，又作了一番最后安排：任命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产为相国，居南军。并郑重地告诫吕产、吕禄说：“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⑪为防范拥刘大臣夺取中央政权，吕后叮嘱吕产、吕禄要“据兵卫宫，慎毋送丧”⑫，言罢死去。

吕禄、吕产专兵秉政，自知违背高帝誓约，恐为大臣及诸侯王所杀，因图谋作乱。其时，刘悼惠王子朱虚侯刘章在长安，其妻为吕禄之女，因得知吕氏阴谋。刘章恐事发牵连自身，乃秘密派心腹告知其兄齐哀王，欲使其发兵西向，刘章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为内应，诛杀诸吕而立齐王。齐王乃与其舅父驷钧、郎中令祝午、中尉魏勃阴谋发兵。可是齐相召平反对，竟发卒围王宫。魏勃诓召平说：“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

验也，而相君围王固善。勃请为君将兵卫王。”⑬召平信以为真，魏勃既掌握兵权，遂指挥部队包围了相府，召平被迫自杀。于是齐王以驷钧为相，魏勃为将军，祝午为内史，征发国中全部人马，诛讨诸吕。同时，齐王又使祝午东向欺骗琅邪王（刘泽）说：“吕氏作乱，齐王发兵欲西诛之。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使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⑭琅邪王相信祝午之言，乃西行见齐王。齐王因而扣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征发琅邪国全部兵马，与其本部人马合兵一处，统领西进。琅邪王向齐王建议说：“大王高皇帝嫡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⑮齐王同意，乃备车送琅邪王。齐王遂率兵马西攻济南（吕氏封地），并致各诸侯王书，列举诸吕罪行说：“诸吕擅自尊官，聚兵严威，劫列侯忠臣，矫制以令天下，宗庙所以危。寡人率兵入诛不当为王者。”⑯吕产、吕禄闻齐王兴兵，乃遣大将军灌婴领兵迎击。灌婴进至荥阳，乃与部下计议说：“诸吕拥兵关中，欲危刘氏而自立。今我破齐还报，此益吕氏之资也。”⑰乃驻兵荥阳，派使者通知齐王，欲与连合，等待吕氏有所举动，即共同发兵诛讨。齐王得报，乃还兵西界待时进讨。

太尉周勃因诸吕擅权，不得掌管军队，乃与丞相陈平商议：曲周侯郦商老病在家，其子郦寄与吕禄友善，可令人劫持郦商，然后令其子郦寄去至吕禄住所，劝其之国守藩（吕禄封赵王），“归还将印，以兵属太尉；请梁王（吕产）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⑱。吕禄准备接受郦寄建议，欲归还将印，同

时将此事告知吕产及诸吕老人，诸吕意见不一，吕禄同郦寄一起出外游猎，中途路过其姑吕媭住所，将上述决定告知吕媭，吕媭听后大怒说："若为将而弃军，吕氏今无处矣!"于是尽将其所藏珠玉宝器投掷堂下，说："毋为他人守也"⑲。

是年九月，平阳侯曹窋（zhuó 茁，曹参之子）代行御史大夫事，前往面见相国吕产议事。适值郎中令贾寿使齐归来，尽告灌婴与齐楚联合欲诛诸吕情状，因责怪吕产说："王不早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⑳乃催促吕产迅速入宫。曹窋听后，将贾寿与吕产谈话驰告陈平和周勃。周勃欲接管北军，但无天子符节，不得入。时襄平侯纪通为符节令，乃使周勃诈称天子之命进入北军。周勃又派郦寄和典客（九卿之一，掌宾客朝觐之事）刘揭劝说吕禄"急归将军印辞去，不然，祸且起"㉑。吕禄以郦寄为好友，不会欺骗自己，遂解下印绶付与典客，而以兵权交给太尉周勃。周勃进入军门后，向全军发布命令说："为吕氏右袒（脱衣袖而露肉也），为刘氏左袒。"㉒军中将吏皆左袒，表示拥护刘氏。周勃因得掌管北军，成为北军的真正统帅。当时南军尚在吕产手中，丞相陈平乃召朱虚侯刘章协助周勃。周勃命令刘章监守军门，令曹窋通知卫尉，不许吕产进入殿门。吕产此时还不知吕禄已离开北军，欲率兵进入未央宫作乱，为卫殿武士所阻，徘徊不得入。曹窋将此情况急告周勃，周勃尚恐不胜诸吕，未敢宣布下令讨伐。便急遣朱虚侯刘章立即入宫保卫少帝。刘章率兵千人，进入未央宫掖门（旁门），望见吕产在廷中徘徊。等到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挥兵向吕产进攻，吕产退走，值天空大风骤起，吕产部下慌乱，无心战斗，刘章追杀吕产于郎中府吏厕中。

刘章已杀吕产，少帝命谒者（郎中令属官，掌宾赞受事）

持节慰劳刘章。刘章欲夺节信，谒者不肯，刘章乃与谒者同乘一车，因节信驰入长乐宫，斩长乐卫尉吕更始。然后回到北军，向太尉周勃报告。周勃拜贺刘章说："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㉓遂遣人分头尽捕诸吕男女，不论老少全部诛杀。吕禄被捕斩，吕媭被笞杀。然后周勃又派刘章将诛杀诸吕满门事告知齐王，令其罢兵回藩。灌婴亦从荥阳撤兵回朝。诸吕之乱至此彻底平定。

注　释

①《汉书》卷九七《外戚传》上。

②《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③《汉书》卷一《高帝纪》下。

④⑤⑥《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⑦⑧⑨⑩⑪⑫《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⑬《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⑭《史记》卷五二《齐悼惠王世家》。

⑮《资治通鉴》卷一三，高后八年。

⑯⑰⑱⑲⑳《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㉑《汉书》卷三《高后纪》。

㉒㉓《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

秦汉

文景之治

由于秦朝统治的残暴和秦末连年战争，西汉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凋敝不堪，史载当时“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盖藏”①。汉高祖采用道家“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实行“与民休息”的无为政治。惠帝、吕后时期（前194—前180）丞相曹参沿袭萧何辅佐汉高祖的成规，“举事无所变更”②。到了文帝、景帝时（前179—前141）继续“与民休息”，使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刘恒，刘邦中子，高帝十年（前196）立为代王。丞相陈平、太尉周勃等人平定诸吕叛乱后，为了恢复政治局面的稳定，宗室大臣们经过反复慎重谋议，决心迎立“仁孝宽厚”的代王为帝，是为汉文帝，“天下诸侯万民皆以为宜”③，可谓是众望所归。刘恒在位凡二十三年。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公元前157年即位，是为汉景帝，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即位后，结束了诸吕篡权所造成的混乱状态，在高、惠着力恢复农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基础上，采取“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措施。

一、减免田租算赋。秦时，收大半之赋，文帝实行“减省租赋”④。文帝前二年（前178）和前十二年曾两次实行减收“今年田租之半”，即由汉初的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从文帝十三年以后直到他死前的十一年间，又下诏完全免收田租。景帝元年，复收田租之半，即三十税一；并明文规定田租为三十税一，以后相沿不变。文帝时，算赋（人头税）也由每年百二十钱减为四十钱。

二、减轻徭役。文帝二年下诏“务省繇（同徭）费以便民”⑤，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为“三年而一事”⑥。同年诏令列侯之国，因“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⑦，令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可减轻关东漕送京师之苦。又可减少地方徭役、卫卒。景帝二年（前155），又将秦时十七岁傅籍为公家服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为二十三岁，是武、昭时事）。

三、提倡节俭。史称“孝文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饰，无所增益”⑧。“损食膳，不听乐”⑨，欲建一座露台，召来工匠估算，需用黄金一百斤。文帝认为“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⑩！遂取消营建计划。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平时身着黑色厚缯，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⑪。

四、重农抑商，入粟拜爵。文帝对发展农业生产非常重视，曾经多次发布诏令劝农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本”，“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⑫。具体办法是“驱民地着”，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严格户籍制度，不许迁徙。同时实行贵粟

政策来打击商人、高利贷者对农业经济的破坏。他接受政治家晁错"贵粟"的主张。为了提高谷价，不使谷贱伤农，晁错向文帝提出"入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主要是商人）用粮食换取国家的爵位。晁错认为，这一办法实行后，边境和郡县的积粟（粮食储存）都可以得到充足保证，这样就有条件免除天下田租。入粟拜爵办法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可以暂时得到改善。

五、平狱缓刑。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⑬，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沿袭秦律的严刑苛法。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元年下诏废除。又十三年，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联接），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⑭文帝怜悲其意，下令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时又减轻笞刑。文帝时许多官吏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但责大指，不求细苛，因此有"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⑮，及"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同悦）喜"，"犯者寡"⑯之说。

六、改革吏治，任用贤良。文帝主张用廉者、长者为吏，从中央到地方，从大臣到一般官吏，多用长者廉者为吏。文帝时大胆起用有胆识、有能力的新人，其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对张释之、周亚夫的任用。张释之，初以赀为骑郎，十年不得调。后因论述"秦失汉兴"显出其政治见解；面折廷争，执法不阿显出其政治品德而受到文帝赏识，被提升至廷尉，成为"天下名臣"⑰。而周亚夫，原为河内守。为防备匈奴被任命为将军

驻军细柳。文帝劳军时，见其治军严明，赞叹为“真将军”，临终还对太子说“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⑱。不出文帝所料，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即由亚夫平定。文帝还广泛吸收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参与管理政事，他即位第二年，即下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⑲。以后又诏举贤良文学士，并亲览对策。他还防止宠臣弄权和外戚掌权。他任用贤良这就改变了一代吏风，使他的各项措施得以顺利实施。

西汉初年“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⑳，到了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㉑，户口繁殖如此迅速，而粮价亦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上下饶羡”㉒。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国家已较富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㉓。可见文帝、景帝在治理封建国家中是有业绩的。封建史家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司马迁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㉔。班固说“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寖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㉕。司马光说“是以海内安宁，家给人足，后世鲜能及之”㉖。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其实质是为了保护地主阶级长治久安而采取的一种调节政策，是地主阶级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农民实行的一种权宜之计，客观上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农民进行生产的要求，因而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注 释

①《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上。

②《史记》卷五四《曹相国世家》。

③《汉书》卷四《文帝纪》。

④《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⑤《汉书》卷四《文帝纪》。

⑥《汉书》卷六四《贾捐之传》。

⑦⑧⑨《汉书》卷四《文帝纪》。

⑩《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⑪《汉书》卷四《文帝纪》赞。

⑫《汉书》卷四《文帝纪》。

⑬⑭⑮《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⑯《汉书》卷五一《贾山传》。

⑰《汉书》卷五〇《张释之传》。

⑱《汉书》卷四〇《周亚夫传》。

⑲《汉书》卷四《文帝纪》。

⑳㉑《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序。

㉒《太平御览》卷三五引桓谭《新论》。

㉓《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㉔《史记》卷二五《律书》。

㉕《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㉖《资治通鉴》汉文帝后七年。

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是西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究其性质，则是地方割据与中央集权的斗争。

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集中力量击溃强大的项羽势力，被迫分封了一批异姓诸侯王。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敖、韩王信、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异姓诸王据有关东广大地区，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成为统一的隐患。为巩固汉朝的统治，刘邦采取果断措施，逐一铲除异姓诸王，他先后消灭了韩信等六个诸侯王。只有长沙王由于其封国僻远，又处于汉与南越的中间地带，可以起缓冲作用，所以直到文帝时才由于无后而国除。

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刘邦以“海内新定，同姓寡少，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①。诸侯王国封域范围十分广大，辖地共达三十九郡，约当于战国后期的关东六国故地，其中“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②。而当时中央直辖领地则“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

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③。中央辖郡范围，约当于战国后期的秦国。其东、南、北三面，均为诸侯王国封域，形成“诸侯比境，周匝三垂”之势，依旧是干弱枝强的局面。为了控制诸侯王国，汉政府规定中央派太傅辅王，派丞相统王国众事；诸侯王必须用“汉法”，不得擅为法令；没有皇帝的虎符、诏书，诸侯王不得擅自发兵；不经皇帝准许，诸侯王不得擅自赐爵、赦死罪。但是王国得自置御史大夫以下官吏，自征租赋，自铸货币，自行纪年，实际上仍然处于半独立状态。

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原为巩固中央，欲以血缘关系作为政治支柱。但分封早已成为一种落后的政治制度，结果适得其反。公元前195年，刘邦死，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惠帝懦弱不喜权术，大权操纵在他母亲吕后手中。吕后一面打击、铲除刘氏诸侯王，一面分封诸吕及亲吕势力为王。至吕后八年（前180）吕后死前，诸侯王国一变而为十四国，原刘姓王国仅存齐、楚、代、淮南、吴五国，其他九国，除吴氏长沙国外，均为吕氏集团所据有。吕氏死后，以周勃、陈平为首的元老大臣用计夺得兵权，与朱虚侯刘章（齐王襄之弟）共诛吕氏一族。诸吕势力被消灭后，陈平、周勃密迎代王刘恒入继大统，是为文帝。刘恒为高祖刘邦中子，惠帝之异母弟，即位之年，才二十四岁。文帝即位之初，诸吕虽诛，但他以藩王入承帝统，威信未立，羽翼未丰，而刘氏诸王则已屡代藩封，基础已固，他们据有“跨州兼郡，连城数十”④的广大国土，自置丞相以外的官吏，掌握着地方财政、军事大权。又以新诛诸吕，气焰万丈。但文帝为人谨慎而有谋略，他即位后，对诸王采取优容政策：如吴王濞称病不朝而仍赐以几杖，淮南王长骄

蹇，击杀审食其而仍赦其无罪。可见当时中央政权之衰微，而诸侯王则益骄纵。他们擅改法令，自置官属，各据一方，目无天子。如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⑤。他占有五十余城，并宣布吴国“百姓无赋”，引诱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投到吴国，以增加王国的劳动力。文帝同父异母弟淮南王刘长也采取同一办法，招引许多西汉政府直辖区的农民和逃亡罪犯，“为治家室，赐与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⑥。甚至“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儗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⑦，成为独立王国。

诸侯王国的势力日益强大，对朝廷态度也异常傲慢，甚至乘隙举兵叛乱。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谋划，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王和济北王。城阳王刘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出击匈奴之际，发兵叛乱，进攻荥阳，事败自杀。文帝六年（前174），最为骄恣的淮南王刘长遣人与棘蒲侯太子柴奇密谋在谷口（今西安市北）举兵反叛，失败后，被废徙蜀，死于道中。其他诸侯王也积聚力量，相机而动。

当西汉政权受到同姓王势力严重威胁时，朝廷中出现一些力主加强皇权的政论家，其中最著名的是贾谊和晁错。

贾谊（前201—前168），河南洛阳人，二十余岁即被文帝擢为太中大夫。他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政治见解，曾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提出深刻的建议。他的建议和主张大都包括在上给文帝的《陈政事疏》（即《治安策》）中。他在疏中尽情极致地向皇帝指出诸侯王的专横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

(指淮南厉王刘长)，亲兄之子西向而击（指济北王兴居欲西袭荥阳），今吴又见告（被人告发）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最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⑧因此，贾谊极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他认为，当时最严重的问题是诸侯王势力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方病大瘇（肿），一胫之大几如要（腰），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伸）。”⑨指出这种本末倒置、尾大不掉的情形，是最可痛心的事，必须立即扭转，否则必成痼疾，难以为治。他向文帝建议：“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小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最后达到“辐辏并进归命天子。”⑩文帝十二年（前168），贾谊因怀才不遇而死，但他的《治安策》毕竟使文帝受到影响。文帝十六年（前164），分齐国之地为七国⑪，分淮南国之地为三国⑫，实际上就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治方案之实现。

继贾谊之后，与贾谊持相同见解的有晁错。晁错（前200—前154），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年少时学法令，又从伏生受《尚书》，为文帝太子舍人。他屡次向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土。景帝即位后，晁错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其时诸侯王愈益骄横，渐至目无法纪，晁错建“削藩之策”。他明确指出：诸侯王势力日益强大，“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⑬。景帝三年（前154），用晁错之策，削楚王东海郡，削赵王常山郡，削胶西王六县，以次削夺。景帝的削藩，引起诸侯王的震恐。当“汉廷臣方议削

吴"时，"吴王恐削地无已，因以此发谋，故举事"⑭。吴王濞先后与楚王戊、胶西王卬、胶东王雄渠、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赵王遂等串通，于公元前154年正月同时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閭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实际起兵的只有七国，史称"吴楚七国之乱"。在七王中，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为了诛"贼臣"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刘濞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三年（前195）。前一年，异姓王英布因谋反，为高祖击杀于吴越，时刘濞年仅二十，曾以骑将从征。刘邦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士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王三郡五十三城。吴国的鄣郡（辖今江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亡命者"从事铸钱、煮盐，收其利以足国用。吴国由于经济富饶，境内不征赋税，不愿亲服徭役的更卒，可以出钱由政府雇人代役，王国按照"平价"付给受雇者佣值，因而得到百姓的支持。经过三十余年的经营，吴国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十分雄厚。七国之乱，吴为谋主，与它的经济优势有很大关系。再有，文帝时，吴国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弈争执，为汉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吴王刘濞的怨恨，自此二十多年称病不朝。文帝初立，只得赐几杖以示优容，此后刘濞愈益骄横，失藩臣礼，以至举兵叛乱。

如何对待吴楚叛乱，西汉朝廷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晁

错力主以武力平叛。建议景帝亲自领兵出征，并积极筹划军备供应。曾经接受吴王刘濞财货的吴相爰盎则坚决反对，他阴谋离间晁错与景帝的关系，说诸王无非因晁错主张削藩而反，“方今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⑮。在爰盎的蛊惑下，景帝被迫错杀了晁错。但七国志在推翻汉中央政府，谋取最高领导权，是以晁错虽诛，而七国之兵不解。景帝至此开始醒悟，决定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统率三十六将军东击吴楚；另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并以窦婴为大将军屯于荥阳，监督进攻齐、赵的军队。

七国反后，吴楚合兵西进，梁首当其冲，成为叛军进攻的第一个目标。梁能否抵挡住吴楚的进攻，关系着战争的全局。指挥主要战场作战的周亚夫，是一个熟习韬略的将军。他过去屯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防备匈奴时，曾因治军严谨，受到文帝的称赞。文帝临终时嘱咐景帝：“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⑯所以当七国举兵反叛时，景帝命他担负进击吴楚联军的重任。周亚夫受命太尉，出发前曾向景帝报告作战方案说：“楚兵剽轻（剽悍轻捷），难与争锋。愿以梁委之（拖住它），绝其粮道，乃可制。”⑰周亚夫很明白，此计施行，必然会结怨于梁王（景帝之弟），故先请示景帝。经景帝批准，亚夫即大胆地按计划实行。

周亚夫率军从长安出发，准备会师洛阳。当行经霸上（在长安东）时，赵涉拦马向亚夫建策说：“吴王素富，怀辑（集）死士久矣。此知将军且行，必置间人于殽（山）渑（池）阸狭之间。且兵事尚神秘，将军何不从此右去，走蓝田，出武关，抵洛阳！间（迂回）不过差一二日，直入武库（洛阳有武库），

击鸣鼓。诸侯闻之，以为将军从天而下也。”⑱于是周亚夫立即改变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据有武库和敖仓之粟。由于第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周亚夫高兴地说：“吾据荥阳，荥阳以东无足忧者。”⑲

周亚夫到洛阳后，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立即派兵清除了殽、渑间的吴楚伏兵。军到淮阳，又向绛侯（周勃）故客邓都尉问计。邓都尉建议说：“吴兵锐甚，难与争锋，楚兵轻，不能久。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引兵东北壁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以梁委吴，吴必尽锐攻之。将军深沟高垒，使轻兵绝淮泗口（今江苏淮阴县西泗水入淮之口，又名清口），塞吴饷道。彼吴梁相敝而粮食竭，乃以全强制其疲极，破吴必矣。”⑳由于邓都尉的意见与周亚夫的作战计划不谋而合，更加坚定了周夫亚实施原订方案的决心。

吴楚方面。吴王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兵屯聚（集中一路）而西，无他奇道，难以立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㉑吴王太子谏阻说：“王以反为名，此兵（兵权）难以借人，人亦且反王，奈何。”㉒刘濞因而未采纳田禄伯奇正并用之策。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向刘濞建议说：“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不下，直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无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大王徐行，留下（攻打）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㉓吴王以此问吴老将，老将皆认为，年青人只能冲锋陷阵，安知大计。于是吴王又拒绝采纳桓将军

避短用长、速据中原战略要地的建议。

汉景帝前三年（前154）正月，吴王濞亲率二十万大军从广陵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兵。他一面派周丘乘夜袭占下邳（今江苏邳县），向北略取城邑；一面发书遍告诸侯：声称起兵目的在于诛杀晁错，以清君侧，并宣扬吴国声威，说吴国地方三千里，拥有精兵五十万，还有南越兵三十万人听从调遣。刘濞部署进军路线：长沙王子"定长沙以北，西走蜀、汉中"；南越、楚王、淮南三王，"与寡人西面"；齐诸王与赵王"定河间、河内，或入临晋关（今陕西大庆关），或与寡人会洛阳"；"燕王北定代、云中，转（联合）胡众入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走长安"。从南到北，各路叛军合纵西向，直逼汉都长安。最后宣布赏赐办法："能斩捕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㉔

吴楚联军向梁国进攻，棘壁（今河南柘城东北）一战，歼灭梁军数万人，乘胜向前推进。"梁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㉕，梁军退守睢阳（梁都，今河南商丘市）。当时，周亚夫已率军抵荥阳，"吴方攻梁，梁急，请救"㉖，亚夫按原订计划"引兵东北走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深壁而守"㉗。梁王对周亚夫见死不救异常恼怒，"上书言景帝，景帝使使诏救梁"㉘。亚夫仍不直接出兵救梁，只派遣轻骑兵迂回至吴楚联军背后，绝其粮道，并在吴楚军攻梁时，将主力推进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在此情况下，梁王只得依靠本国的力量作战。他派韩安国和张羽为将军，"跪送"他们将兵出战，"折吴兵于东界"。由于"张羽力战，安国持重"，梁军击败吴兵，"以故吴不能过梁"㉙。于是叛军转攻下邑，企图寻求汉

军主力决战。周亚夫仍深沟高垒，坚壁不战。吴楚联军既顿挫于睢阳，又不得逞于下邑，加之汉军断其饷道，粮食不继，在粮尽兵疲，士卒饥死叛散的情况下，不得不引兵退却。周亚夫乘机派精兵追击，大破吴楚联军。吴王濞率麾下壮士千人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诱杀吴王濞，献其首级于汉。楚王戊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吴楚两军首先败亡，七国之乱基本平定。

当吴楚联军向梁进攻之际，胶东、胶西、济南、淄川、赵等王国亦同时举兵西向。由于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据城自守，胶西等王国军乃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能下，从而为汉军从容集中兵力提供了时间。当栾布率军到达齐地时，胶西、胶东、淄川、济南等国军队，在兵疲意沮的情况下，全被击破。胶西王自杀，其余各王均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还参与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临淄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当他听说栾布将移兵伐齐时，畏罪自杀。赵王刘遂在河北暗结匈奴，并集结兵力于西境，欲待吴楚军破梁以后，并力西攻长安。但当郦寄军向他进攻时，赵军立即退保邯郸，负隅固守，汉军久攻邯郸不下。匈奴闻吴楚兵败，不肯发兵助赵。栾布在击灭胶西等四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赵王于城破后自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至此全部结束。

七国之乱既平，景帝"感吴楚之难，始抑损诸侯王"㉚。景帝中五年（前 145），下令改革诸侯王国官制，"令诸侯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㉛。剥夺诸侯王的治民权，以削弱王国的分权势力。同时在经济上，取消"高祖时诸侯皆赋"的特

权，改为“诸侯独得食租税”㉜，使其不再具有与中央相对抗的物质条件。从此以后，地方割据的局面，遂告结束，中央集权日益高涨，西汉的政权开始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注　释

①②《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③《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④⑤《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⑥⑦《汉书》卷四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⑧⑨⑩《汉书》卷四八《贾谊传》。

⑪齐分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

⑫淮南分为淮南、衡山、庐江三国。

⑬《汉书》卷四九《晁错传》。

⑭《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⑮《汉书》卷四九《爰盎传》。

⑯⑰《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⑱《资治通鉴》卷一六，汉景帝前三年。

⑲⑳《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㉑㉒㉓㉔《汉书》卷三五《荆燕吴传》。

㉕《史记》卷一〇六《吴王濞列传》。

㉖㉗㉘《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

㉙《汉书》卷五二《韩安国传》。

㉚《续汉书·百官志》。

㉛《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㉜《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

秦汉

武帝之治绩

公元前141年，景帝死，太子刘彻即皇帝位，是为汉武帝。明年，称建元元年，自古帝王有年号，始于此。从此以后，西汉的政治走向一个新的阶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得到加强。在他统治的五十多年间，形成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以适应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

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广开仕途，招揽人才。建元元年（前140），“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①。其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②。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③。自是以后，郡国岁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予以确立下来。元光五年（前130），又下令“征吏民有明当时之务习先圣之术者”，每岁遣诣京师，以备选用。但察举制开始颁行时，有些郡国执行不力，因此元朔元年（前128）又严令各郡国“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

免”④。用以督促察举制度的实行。武帝时期，号称文学之士的董仲舒、公孙弘、司马相如、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倪宽、终军等，皆由考选推荐或上书言事而获得官职。《汉书·董仲舒传》云：“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数。”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以五经博士置弟子员，每年考试一次，能通一经以上者，即可补文学掌故，成绩优良者可任郎官。元狩六年（前117），又诏“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⑤。汉武帝通过察举，征召和“公车上书”等途径，选拔了大量人材，为西汉封建王朝统治服务，出现了“汉之得人，于兹为盛”⑥的局面。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封建中央集权，继续奉行景帝时期的“削藩”政策。武帝之世，诸侯王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⑦，威胁着西汉中央政权。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即允许“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⑧。是年春正月，首先批准梁王、城阳王以封邑分给诸弟，“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之”⑨。西汉一代王子侯计四百零八人，其中大部为汉武帝实行“推恩令”时所封。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⑩。王国领地日益缩小，势力大大削弱。元狩元年（前122）冬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被杀，党羽死者数万人。武帝于是“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⑪。“左官律”规定，在诸侯王国任官者称为左官，不得入朝任职，以示歧视。“附益法”严禁封国官吏阿媚王侯，结党营私。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藉口诸侯王和列侯所

献“酎金”（酎音酬，汉制：每年八月，举行饮酎大典，祭祀宗庙，诸侯王和列侯都要献酎金助祭）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削夺列侯爵位凡一百零六人。丞相赵周坐知而不举，下狱，自杀。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仍存在，然“诸侯惟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⑫，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一方的局面。

在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打击地方豪强的措施，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一些强宗豪族。他们依仗权势，武断乡曲，欺凌百姓，兼并土地，独霸一方，对封建制度构成严重威胁。汉武帝对于这些豪强，一方面继续推行汉初以来迁徙关中的办法，使之“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不诛而害除”的目的。另一方面，则任用酷吏，诛锄豪强。如张汤为御史大夫，“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以虚诬助法，言不公平也）”⑬。王温舒为河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族灭），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赃”⑭。而是对“郡守尉诸侯相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效王温舒等”⑮。酷吏的活动，对于加强皇权，抑制豪强放恣起了显著作用。但是有些酷吏本身即是豪强，他们在诛锄豪强的同时，也必然使百姓受到祸殃。《汉书·刑法志》说：“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以致“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⑯，即是最好的说明。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专制主义皇权，还采取了削弱丞相权力的措施。汉初官制，基本上沿秦之旧，刘邦以功臣为丞相，丞相权重位隆。景帝时，高祖功臣死亡殆尽，陶青、刘舍等人以功臣子列侯继为丞相，丞相权力有所削弱。但

至武帝时，皇帝与丞相在权力上仍存在矛盾。元朔五年（前124），汉武帝任命公孙弘为丞相。公孙弘起自“布衣”，少时家贫，曾牧豕海上，在朝无所援接，凡事唯唯诺诺，顺旨行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⑰。从此，丞相居职“充位”而已。武帝还从贤良文学及上书言事者中，提拔一批人才，在其本职之外，另加侍中、给事中、常侍等官衔，使其出入禁省，随侍左右，参与大计。他们与为皇帝掌书札的尚书，形成一个宫内决策机构，称为“中朝”或“内朝”；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则逐渐成为处理一般事务的政务机关。

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课，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部（州），每部设刺史一人，每年八月刺史巡视所部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⑱。六条的内容是：“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刻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⑲。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置司隶校尉，率京师官徒“捕巫蛊，督大奸猾”⑳。后罢其兵，巡察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弘农郡。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加强了中央对郡国的控制，起了强干弱枝的积极作用。

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对外用兵，军费大增，加上浩繁的宫廷奢靡生活开支，造成府库空虚，财源枯竭。为了解决财政

经济困难，在张汤、桑弘羊的协助下，汉武帝批准实行币制改革，盐铁官营，制定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法，用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稳定社会经济。

汉初，国家未有建立统一币制，允许郡国和私人自由铸钱，因而各种钱币大小不一，轻重不等，严重影响社会生产和交换，而且为企图进行割据的诸侯王图谋不轨创造了条件。《盐铁论·错币篇》记载："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山东奸猾，咸聚吴国。"至景帝时终于酿成吴楚七国之乱。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颁布禁止郡国铸钱之令，专令中央所设水衡都尉所属钟官、辨铜、技巧三官㉑负责铸造五铢钱（亦称三官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负责审查铜的质量成色，技巧负责刻范。他还责成各郡国将以前所铸旧币全部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由于五铢钱重如其文，质量很高，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当时的标准货币，得到长期的流通。

冶铁煮盐事业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元狩中，任用大冶铁家孔仅、大盐商东郭咸阳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任用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主持计算，建立筦盐铁和均输，平准制度。筦盐是在产盐区设立盐官，募人煮盐，产品由官府收购发售。筦铁是在产铁区设立铁官，经营冶采铸造，发售铁器。"敢私铸铁器鬻盐者，钛（dì弟，钳也）左趾，没入其器物"㉒。至于"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在所县"㉓。当时所设的盐官遍及二十八郡国，计有三十余处；铁官遍及四十郡国，计有四十余处。盐铁官统属中央大农管理。诸侯王国以前自置之盐铁官，则由大农所设盐铁官代替。

汉武帝在推行盐铁官营的同时，又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均输即调剂运输之意。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郡国置均输官，归大司农领导，专门负责管理、调度，征发郡国的各种货物，并负责向京师运送。均输法的推行，消除了郡国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㉔的弊端。同时，在京师置平准官，接受各地均输货物，"贵则卖之，贱则买之"㉕，以调剂市场的有无，使"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㉖。实行的结果"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富商大贾的经济势力，元狩四年（前119），武帝"初算缗钱"㉗，规定商人及手工业者，无论有无市籍，其"贳贷卖买、居邑、贮积诸物及商以取利者"，都须向政府申报，每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作坊主凡四千抽一算。另外，除官吏、三老、北边骑士外，有轺车（一马车也）者一乘一算；商贾人一乘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商人有产不报或报而不实，"罚戍边一岁，没入缗钱"㉘；贾人有市籍及其家属，皆不得"名田"（占有土地），以便于农民耕种。有敢违犯禁令者，没收其土地和财货。算缗令公布之后，"富豪皆争匿财"㉙，与政府相对抗。元鼎三年（前114），武帝又下"告缗令"，鼓励人民告发那些呈报财产不实者，并规定告发者可以分取违法商人财产的半数。武帝以杨可主持其事，命杜周处理案件，一时之间，"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万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㉚。工商业主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上林苑的府库重新充盈起来，西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注　释

①《汉书·武帝纪》。

②《汉书·董仲舒传》。

③《汉书·武帝纪》。

④⑤《汉书》卷六《武帝纪》。

⑥《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⑦⑧《汉书》卷六四《主父偃传》上。

⑨《汉书》卷六《武帝纪》。

⑩《史记》卷一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⑪⑫《汉书》卷一四《诸侯王表序》。

⑬《汉书》卷五九《张汤传》。

⑭⑮⑯《汉书》卷九〇《酷吏传》。

⑰《汉书》卷五八《公孙弘传》。

⑱⑲《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师古注引《汉官典职仪》。

⑳《汉书》卷一九《百官公卿表》上。

㉑陈直《汉书新证》(修订本)。旧说认为三官中有均输令，无技巧令。

㉒㉓《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㉔《盐铁论·本议篇》。

㉕㉖《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㉗《汉书》卷六《武帝纪》。

㉘㉙《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㉚《史记》卷三〇《平准书》。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同时，与之相应的是在政治思想上实行了尊崇儒术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

汉初在政治思想上以黄老的无为而治为指导思想，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生产逐渐恢复，封建统治秩序渐趋巩固。文景之时，“流民既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①。在政治思想上出现了由无为到有为，由道家到儒家的嬗变趋势。文帝时，政论家贾谊根据当时匈奴对汉嫚侮侵掠，诸侯王势力凌驾朝廷，封地超过古制等问题，上疏陈政事，提出变无为为有为的主张。景帝即位，擢晁错为御史大夫，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法令多所更定，主张募兵充实塞下，积极防御匈奴攻掠；又上削藩策，建议逐步削夺诸侯王国封地，以巩固中央政权。在文化典籍上，其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②。而儒家学说更是卓然复兴，出现各种不同学派。《汉书·儒林传序》云：“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

《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此种形势，为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而首先提出这一主张的则是董仲舒。

董仲舒（前179—前104），广川（今河北枣强）人，是西汉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学派大师。他少治《春秋》，潜心钻研孔子学说，景帝时为博士。武帝即位之初，曾接连三次诏举贤良方正，策问古今治乱之道和天人关系等问题。董仲舒三次上书应对，即所谓“天人三策”，受到武帝的称赞。先后出任为江都王和胶西王国相，正身率下，教令国中。晚年退居在家，以修学著书为事，著作流传至今的有《春秋繁露》一书。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③他所说的“大一统”，即诸侯皆系统于天子，不得自专。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在哲学理论上，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认为人们所具有的一切，都是从天而来，此之谓“人副天数”，即“天人合一”。他还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天意的表现。“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④。“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⑤。人民服从皇帝，即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在宣扬“君权神授”的同时，也企图对皇权略加限制。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⑥因此人君必须“强勉行道”⑦，此即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

董仲舒认为，“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⑧。“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⑨。从此观点出发，他反对重大变

革，主张一切要“法古”，要“以古准今”⑩。但是他认为，朝代更换，也有举偏补弊的问题。他说：“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⑪秦朝是乱世，是“朽木粪墙”，无可修治，汉继大乱之后，必须改弦更张，效法天道，才能“善治”，此之谓“更化”。因此他反对“汉承秦制”而专靠法治的作法。他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⑫人君的统治必须阴阳相兼，德刑并用，以德为主，以刑辅德。由此他提出“明教化”、“正法度”，限民名田，禁止专杀奴婢等等措施。在他看来，“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⑬，所以改制并不影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不影响封建皇权的巩固。

董仲舒还吸收先秦法家韩非的思想，提出了“三纲”理论，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附会于天意，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⑭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封建社会“纲常名教”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曾经长期地为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他的学说，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融合道家、法家和阴阳家中的封建专制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经典，从而为封建统治者加强集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政治上加强集权，反映到学术思想上则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有鉴于此，在建元元年（前140）举贤良对策的第三策中，正式向汉武帝提出“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⑮。武帝嘉纳其言，于同年采纳丞相王绾之奏，皆罢“治申（不害）、商（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二

年（前139）冬，卫绾病免，武帝以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窦婴、田蚡皆好儒术，推荐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太皇窦太后（武帝祖母）素好黄老之术，非薄《五经》。御史大夫赵绾奏请武帝毋向窦太后奏事，郎中令王臧建言立明堂辟雍。太后大怒，借故下狱，二人皆自杀，罢去丞相窦婴、太尉田蚡职务。儒家势力暂时受到打击。五年（前136）春，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被立于学官。六年（前135），窦太后死，武帝起用"隆推儒术"的田蚡为丞相。田蚡"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⑯。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至此得以真正实现。从此以后，官吏来源主要出自儒生，如"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⑰，天下学士靡然向风，而"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⑱。儒家学说得到蓬勃发展，取得支配地位，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注释

①《汉书》卷一六《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②《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附刘歆传）。

③《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④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地篇》。

⑤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⑥⑦⑧⑨⑩⑪⑫《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⑬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

⑭董仲舒《春秋繁露·基义》。

⑮《汉书·董仲舒传》。

⑯⑰⑱《汉书》卷八八《儒林传序》。

秦汉

汉匈战争

西汉时期，汉政权的最大外来威胁是来自北方的匈奴。汉高帝时，采用刘敬献计，以宗室女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丝絮酒米等财物，约为兄弟，冒顿单于的进犯稍有收敛。刘邦死后，冒顿公然致书吕后狂妄地宣称："数至边境，愿游中国，"并以极其侮嫚的词语戏弄吕后说："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与娱同），愿以所有，易其所无。"①对于这样露骨的挑衅和侮辱，西汉政府由于国力不足，无法抗击，吕后只得命人答书说："单于不忘弊邑，赐之以书，弊邑恐惧。退日自图，年老气衰，发齿堕落，行步失度，单于过（误也）听，不足以自汙。弊邑无罪，宜在见赦。"②卑躬屈膝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最后还是献马、和亲，以求一时的安宁。

文、景之世，冒顿死，其子老上、孙军臣相继立为匈奴单于。西汉政府虽然继续奉行和亲政策，通关市、厚馈赠，但仍无法遏止匈奴铁骑的侵犯和掳掠。文帝十四年（前166）冬，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今宁夏固原西北）、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彭阳（今甘肃镇原东南），纵骑兵入烧回

中宫（在今陕西陇县西北），前锋直抵雍县（今陕西凤翔）、甘泉（今陕西淳化西北），距长安仅二百里。文帝命张相如为大将军，大发车骑前往抵御，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将匈奴骑兵逐出塞外。景帝时，著名政论家晁错曾提出“徙民实边”，亦兵亦农，亦耕亦战，以备匈奴的策略，为景帝采纳。吴楚反，匈奴欲与赵王合谋入边。后汉军破赵，匈奴亦罢兵。景帝仍然对匈奴实行和亲政策，但直至景帝末年，匈奴始终未能停止对汉朝边境进行小规模的骚扰。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即位后，在西汉前期积累雄厚财富和平定七国之乱后形成的统一力量的基础上，决定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为了作好充分准备，在政治、外交和军事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武帝即位的第一年，即下令全国各地“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③，并亲自向他们策问古今的治国之道。《汉书·东方朔传》亦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之士多上书言得失。”武帝从中拔擢董仲舒、严助、朱买臣、司马相如、东方朔等人，予以破格任用。这样，汉王朝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都增添了新的血液，扩大了封建统治的基础。在外交上，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得悉月氏王为匈奴所杀，月氏余众遁往西域、意图报复的情况后，决定派张骞出使西域，联合月氏夹击匈奴。此行虽然未能成功，但西汉政府因此对西域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为孤立匈奴和尔后沟通西域起了一定作用。在军事上，汉武帝认识到，要想战胜匈奴，非建立一支骑兵部队不可。因为骑射是匈奴的长技，以前晁错在向汉文帝上《言兵事疏》中曾经谈到匈奴骑兵说：“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与犹如）也；险道倾仄（斜坡），且

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疲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④武帝即位后，针对这一情况，在过去马政建设的基础上，除令各郡县大量扩建骑兵外，中央也直接训练骑兵。当时设置的屯骑、越骑、长水、胡骑、虎贲、射声、中垒、步兵等八校尉，其中有四个是与建设骑兵有关的。在骑射训练方面，也以匈奴的技术为标准，一方面选召许多精于骑射的“六郡良家子”⑤为郎，担任皇帝的侍卫；另一方面，又雇用长于骑射的匈奴人，来担任教官。经过不断的努力，一支强大的训练有素的骑兵队伍终于建立起来，为对匈奴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汉武帝对匈奴的反击战，开始于元光二年（前133）。是年夏六月，武帝命雁门马邑人聂宜出塞，引诱匈奴军臣单于进占马邑（今山西朔县），派遣李广、韩安国等五将军率汉军三十余万埋伏在马邑附近山谷中，待匈奴军队入伏后予以歼灭。军臣单于率匈奴骑兵十万人如期入武州塞（今山西左云县），行至距马邑百余里处，见畜群布野，无人管理，心生疑虑。继进至汉“亭”（边防设施）时，俘汉巡边尉史，得知汉方诱兵之计，军臣单于大惊，慌忙退归。自此以后，匈奴屡次大规模进攻西汉边郡，汉军也多次发动反击和进攻。在长期的战争中，影响较大的有汉攻匈奴的三次战役。

一、河南之战

元朔二年（前127）春，匈奴侵扰上谷（郡治在今河北怀来县东南）、渔阳（郡治在今北京密云县西南），杀掠吏民数千人。武帝采取胡骑东进、汉骑西击的避实就虚作战方针，命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出云中，沿河西进，对盘踞河套及其以

南的匈奴楼烦王、白羊王的军队，进行突然袭击，歼灭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乘胜进至高阙（塞名，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沿黄河折而南下，直达陇西（今甘肃临洮县），夺回河套南部地区，于其地设置朔方（郡治在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郡治在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二郡，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旧长城。同年夏，汉王朝募民十万口徙于朔方，以充实边防力量。

匈奴贵族不甘心于河南的失败，于元朔三年和四年，又先后数次侵入代郡（郡治在今河北蔚县西南）、雁门（郡治在今山西右玉县东南）、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延安），杀掠吏民数千人。元朔五年（前124）春，匈奴右贤王又数次侵扰朔方，企图夺回河南地区。武帝为了确保朔方，派将军卫青督苏建等六将军领兵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深入塞外六七百里，乘夜包围右贤王的王庭。右贤王酒醉，突遭袭击，在惊惶中，仅率壮骑数百人突围北逃。汉军虏获匈奴裨王（小王）以下一万五千人，获牲畜数十万头，大胜而归。武帝派使者迎接凯旋的汉军，在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统领诸将。这次战役，巩固了汉王朝在战略要地河套南部的统治，不仅解除了匈奴对首都长安的严重威胁，而且构成了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开始转入有利地位。

同年秋，匈奴又出动骑兵万人侵入代郡，大肆杀掠。为了进一步打击匈奴主力，巩固边防，武帝于元朔六年（前123）二月，命大将军卫青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将军，率领十万余骑，由定襄北进数百里，在漠南歼灭匈奴军数千人。卫青之甥、年仅十八岁的骠姚校尉霍去病，也率领八百精骑，参与战役，在战斗中冲锋陷阵，获得歼

敌二千余人的辉煌战果。战后，全军返回定襄、云中、雁门，经过短期休整后，于夏四月再出定襄，击歼匈奴军万余人。但苏建和赵信率领的三千名骑兵，与匈奴单于军队遭遇，损失惨重，苏建突围逃回；赵信原是匈奴小王，在失败后又率残部八百余人投降匈奴。赵信向匈奴单于伊稚斜建议，将匈奴军队转移到大漠以北，以诱汉军，待其疲困，然后出而击之。伊稚斜单于纳其献计，决定暂作战略上的撤退，将主力远徙漠北。

二、河西之战

西汉河南之战的胜利，使匈奴在沙漠以南的广大地区，仅剩下东面左贤王和河西匈奴的军队。河西即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称河西走廊，向为中国通西域的道路。从这两方面匈奴军队力量来看，无疑是左贤王较强。但河西匈奴控扼通西域的要道，对汉朝的威胁，又较左贤王为重。在匈奴主力转移漠北，北部边防趋于缓和的情况下，武帝为了打开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北边防，于元狩二年（前 121）春，命骠骑将军（“骠骑”是骁勇的意思）霍去病率领精骑一万人，由陇西出塞。汉军在霍去病的指挥下，勇猛向西挺进，经历五个匈奴王国（部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县东南）千余里，在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下，与匈奴短兵相接，击杀折兰王、卢胡王（一作卢侯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以下八千九百余人，并且缴获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佛像）。浑邪王、休屠王等率败军逃遁。

为了彻底歼灭河西匈奴有生力量，同年夏，霍去病与公孙敖率领数万骑兵，从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省环县东南）出

发，向河西进军。同时，张骞、李广领万余骑兵，从右北平（今河北省平泉县）出发，以左贤王为进攻目标，以策应霍去病的行动。

李广率四千名骑兵先行，北进数百里，为匈奴左贤王的四万名骑兵包围，力战二日，死者过半，杀敌亦过当（超过相抵之数）。张骞率主力赶至，左贤王见不能取胜，乃引兵退去。汉军因疲劳过甚，亦未追击而还。

霍去病和公孙敖由北地出发后，以迅速行动向河西实施大迂回，越过居延泽（在今内蒙古西北部）、小月氏（未西迁而仍留居的月氏人），深入二千余里，在祁连山麓（今甘肃张掖西南）与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展开激战，获得决定性的胜利。计接受匈奴单桓王、酋涂王等两千五百人的投降，俘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百余人，歼灭匈奴军队三万二千人。汉军亦损伤约十分之三。匈奴单于恼恨浑邪王、休屠王两次战败，损伤惨重，欲加诛罚。两王连遭汉军重创，士气受到严重挫折，又怕单于降罪，乃于是年秋共谋降汉，派使者向正在黄河沿岸督修城堡的大行（执掌异族归化投顺事务的官）李息接洽。武帝闻奏，恐匈奴诈降袭边，即令霍去病率军前往受降。休屠王临时反悔，为浑邪王所杀，部众也被兼并。霍去病率军渡河后，与浑邪王的部队对面相望。浑邪王属下裨将望见汉军，心存疑惧，不欲投降，准备逃走。当此紧要关头，霍去病当机立断，亲率精骑驰入匈奴营中，与浑邪王会晤，斩杀企图逃亡的八千人，并先遣浑邪王乘轺传先至行在所（长安），去见汉武帝。然后亲率匈奴投降官兵四万多人回到长安。其后，汉武帝将匈奴降众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沿边五郡，因其故俗为“五属国”。西汉王朝在浑邪王、休

屠王故地陆续设立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得河西四郡，不但阻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通，这对西汉和匈奴势力的消长，发生了显著的作用。河西水草肥美，匈奴失去河西，在经济上受到很大损失。所以匈奴人歌曰："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马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⑥

三、漠北之战

汉军在河西大捷以后，匈奴在军事形势上的右翼力量已经显著削弱；但单于兵力的中坚部分，对汉朝的威胁依然很大。河西之战的第二年，即元狩三年（前 120）秋，匈奴又派骑兵数万人侵入右北平、定襄，杀掠吏民千余人，并企图引诱汉军深入，乘远道疲困予以歼灭。

汉武帝决心彻底解除来自匈奴的侵扰，为此目的，他一方面采取整理币制、专卖盐铁、加重商税等措施，以解决战时经济的困难；一方面乘匈奴势衰之际，集中兵力，深入打击其主力。元狩四年（前 119）春，他召集众将商议进军漠北说："翕侯赵信为单于画计，常以为汉兵不能度幕（沙漠）轻留（轻入久留），今大发卒，其势必得所欲。"⑦他利用赵信的错误判断，因势利导，确定集中兵力、深入漠北、歼灭匈奴主力的作战方案。随即集中兵力十万人，组成两大骑兵集团，令卫青、霍去病各领骑兵五万，分东西两路，远征漠北。同时令李广为前将军，公孙贺为左将军，赵食其为右将军，曹襄为后将军，皆归卫青指挥。由于此次用兵，是准备在沙漠地区与匈奴主力决战，大量人马的物资供应和军需品的运输补给，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武帝在连年战争军马不足的情况下，决定

组织“私负从马十四万匹”⑧，随军行动；并以步兵数十万人，紧随大军之后转运辎重，以保证这次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

汉军大出击的消息传至匈奴，赵信向单于献策说：“汉军即度幕，人马疲，匈奴可坐收虏耳。”⑨伊稚邪单于纳其议，将全部辎重转移至远北，以精兵待于漠北。汉军原拟由定襄北进，并由霍去病专力对付单于。但在进军途中，捕得匈奴俘虏，得知单于驻地所在，于是又改令霍去病从代郡出击，卫青仍按原定计划出定襄。卫青率领精兵直趋单于驻地，命令李广与赵食其合兵一处，从东道进发，约定在战场会齐。卫青率军出塞后，北进千余里，渡过大沙漠，望见伊稚邪单于的军队正严阵以待。卫青临危不惧，他下令用武刚车（四周及车顶用皮革做防护的兵车）自环为营，然后派出五千名精骑去向敌阵冲锋。伊稚邪也以万骑应战。这时，天近黄昏，狂风陡起，沙砾击面，两军对面不相见。卫青乘势派出部队从左右翼迂回，包围单于的营阵。单于见汉军人数众多，士气旺盛，自度不能取胜，慌忙骑上善走骡，率领数百名精骑，向西北方向突围逃去。两军激战至深夜，杀伤相当。卫青发现单于逃走，立刻派出轻骑连夜追击，匈奴人马纷纷溃散。及至天明，汉军深入二百余里，未获单于踪迹，计俘斩匈奴官兵一万九千人。汉军一直挺进到寘颜山（寘音田，寘颜山在今外蒙古纳拉特山）赵信城（赵信降匈奴后所建）。汉军在赵信城缴获匈奴大批积粟，补充了军用。大军驻留一日后，尽焚其城余粟奏凯而还。

根据汉武帝的作战计划，霍去病统率的东路是主力军，因而配备兵力最强，所领骑兵皆“敢力战深入之士”⑩，所属将领，如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都尉卫山，校尉李敢和徐自为

等人，都是有名的猛将。他的部队中还有一部分是先前匈奴的降将，他们熟知地理，惯于在沙漠中行军。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和右北平，北上行军二千余里，越过大沙漠，与匈奴左贤王军遭遇，大败左贤王，击溃其主力部队，俘获左贤王属下三个小王，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八十三人，捕斩七万四百余人。左贤王及其将领弃军逃走，汉军追至狼居胥山（今外蒙古乌兰巴托以东），在其主峰上建立高坛，祭告天地，然后班师凯旋。

这次漠北决战，卫青所到寘颜山和霍去病所到狼居胥山，都在瀚海大沙漠以北，已深入匈奴腹地。汉朝两路大军追击匈奴，出塞二千余里；共歼敌九万余人，夺回了匈奴在大漠以南的所有草地，"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⑪，基本上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汉军亦有不小损失，士兵死亡数万人，军马十一万余匹。

注释

①②《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③《汉书》卷六《武帝纪》。

④《汉书》卷四九《爰盎晁错传》。

⑤六郡：陇西郡、天水郡、安定郡、上郡、北地郡、西河郡。良家子：地主官宦人家子弟。

⑥《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注引《西河旧事》。

⑦《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

⑧《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⑨⑩《汉书》卷五五《卫青霍去病传》。

⑪《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上。

秦汉

张骞通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西汉以来，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葱岭（旧对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喀喇昆仑山西部诸山的总称）以东，被称为西域，是为狭义之西域。广义的西域，则把葱岭以西，亚洲西部和欧洲东部一带地方，也包括在这一地理概念之内。西域境内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二部。南部为塔里木盆地，北部为准噶尔盆地。西汉初年，西域分为三十六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①，其中绝大多数国家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的南北边缘。南缘自楼兰（在罗布泊附近，昭帝元凤四年更名鄯善）沿昆仑山路而西，至于莎车（今新疆莎车），凡十国，是谓“南道诸国”②。北缘自疏勒（今新疆喀什市）沿天山南麓而东，至于狐胡（今新疆吐鲁番县西北），凡十二国，是谓“北道诸国”③。南、北道诸国，人口多者才八万人（龟兹），少者仅数百人（狐胡），多以种植和畜牧为生，有城郭庐舍，故统称之曰“城郭诸国”。自莎车以西南，分布于帕米尔高原山谷之间者凡十国，是谓“葱岭诸国”④。这些国家由于耕地

面积限制，大多过着随畜转徙的游牧生活。此外，天山北麓还有蒲类、蒲类后国、单桓、乌孙等国，其中乌孙最大，有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军队十八万八千人，过着随畜逐水草的生活。

公元前二世纪，匈奴征服了西域，匈奴日逐王置“僮仆都尉”于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向西域各国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先是，原居敦煌、祁连之间的“行国”大月氏，有户十万，口四十万，控弦十余万人，故对匈奴未加重视。后被匈奴冒顿单于打败。冒顿死后，其子稽粥立，是为老上单于。“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⑤，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成为“世仇”。大月氏人远遁，过大宛（今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征服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建都妫水（今阿姆河），以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⑥。汉武帝闻说西迁的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意，乃募人出使大月氏，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汉中人张骞“以郎（皇帝的侍从）应募，使月氏”⑦。

建元三年（前138），张骞与堂邑氏、胡奴甘父等百余人，从陇西出发，西行途中，为匈奴俘获，匈奴单于谓之曰：“月氏在吾北，汉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汉肯听我乎？”因拘留张骞十余年，“予妻，有子，然骞持汉节不失”⑧。张骞羁留匈奴日久，监守稍宽，一日，张骞乘间与其属取道车师（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经焉耆、龟兹（今新疆库车东）、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葱岭，到达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一路上跋山涉水，艰苦备尝，有时一连几日无食可进，赖堂邑父“射禽兽给食”。因此，从匈奴西部至大宛，共走了数十日。大宛早闻汉朝强大富饶，“欲通不得”，见到张骞，喜出望外，

问其意欲何往？张骞说："为汉使月氏，而为匈奴所闭道。今亡，唯王使人导送我，诚得至，返汉，汉之赂遗（馈赠之意）王财物不可胜言。"⑨大宛王乃派遣向导引张骞等人至康居（今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东南），又由康居到了大夏，找到大月氏。此时，大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占有大夏的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安居乐业，"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⑩。张骞在大月氏居留一年多，不得要领，乃取道羌中归国，不料中途又被匈奴俘获，拘禁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张骞乘匈奴军臣单于死，国内发生内乱，乃与胡妻及堂邑父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奉使出行时，率领百余人，此时仅二人得还。张骞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西域情况，武帝很是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拜张骞为太中大夫，堂邑父为奉使君。张骞此次西行虽未完成原定任务，但却在中西交通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第二次出使奠定了基础。

早在先秦时代，我国内地和西域即有所往来，清代学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一七《西域土地内属略》载，唐虞三代西域和内地即有交往。我国古代典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西域的记载和传说，《山海经·大荒西经》、《穆天子传》对葱岭以东的山川形势及风土物产均有较多记载。但作为官方正式使节，张骞及其随从却是第一次开通西域，开辟了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获得了大量关于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的资料，因此班固称张骞此行为"凿空"。

张骞回到汉朝的前一年（前127），匈奴再度进攻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和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杀掠吏民千余人。武帝遣将军卫青、李息率汉军由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出发，然后向西迂回，直插陇西，于黄河南岸打败匈奴白

羊王和楼烦王，收复河南地（今黄河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主父偃的献计，于此设置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杭锦旗北），并招募十余万人修筑城池，屯田积谷，以加强河南地的防御。但匈奴仍然不断向汉朝发动进攻。元朔六年（前123），张骞以校尉军职，随卫青再次出击匈奴，由于他对匈奴情况比较熟悉，“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⑪。汉武帝因张骞屡建军功，又曾出使西域，乃封张骞为“博望侯”。

汉武帝听张骞报告说“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⑫，又闻骞言“身毒国（今印度）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去蜀不远矣”⑬。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遣使自巴蜀四道并出，求身毒国，企图开辟一条经身毒至大夏的交通线，但未能成功。元狩二年（前121），为了打通通往西域道路，汉武帝组织了对匈奴的第二次大战役，张骞以卫尉（掌管宫门警卫的高级军官）军职与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郡治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出发，以策应骠骑将军霍去病主攻的部队。张骞、李广一路虽然战斗失利，然而霍去病却大胆深入，向西挺进二千里，歼灭匈奴兵数万人，直逼祁连山下。匈奴浑邪王率四万人归汉，西汉政府取得河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在河西走廊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以保护西域交通。元狩四年（前119），汉政府又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击匈奴的战役。汉武帝命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人，步兵数十万人，分出定襄（郡治在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代郡（今河北蔚县东北）长驱直入，挺进至今蒙古大沙漠以北，大败匈奴单于和左贤王，匈奴远遁，势力日渐衰落，汉朝与西域间的交通基本上得到畅通。

为了“断匈奴右臂”，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张骞建

议汉朝"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⑭。乌孙是一个逐水草迁徙的"行国"。原居敦煌和祁连山之间，后被大月氏人打败，被迫归服匈奴，大月氏遂占有其地。后来，大月氏为匈奴所破，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乌孙在匈奴的帮助下，又将大月氏人逐出伊犁河流域，于其地重建家园。武帝时乌孙强盛，"不肯复朝事匈奴，匈奴遣兵击之，不胜"⑮。因此，汉武帝对于张骞的建议很是赞同，于是拜张骞为中郎将（负责统领皇帝侍卫的高级官吏），再次派他出使西域。张骞率领随从三百人，马各二匹，牛羊以万数，帛钜万。此外，还有一些"持节"副使，偕张骞同行，以便沿途派往各地。

张骞等人至乌孙，正值乌孙发生争夺王位继承权的内争，几乎使乌孙一分为三。张骞见乌孙昆莫（王号）猎骄靡，转达汉武帝旨意说："乌孙能东居故地，则汉遣公主为夫人，结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⑯乌孙远离汉朝，又不知汉国力强弱，加以长期依附匈奴，大臣皆不欲东徙。此时，猎骄靡已经年迈，对于国事不能专断，因此，对于联汉灭胡之事，未能做出决定。张骞无奈，即分遣副使至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今苏联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境内）、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和身毒等地，自己决定回朝复命。乌孙特遣使者数十人，携带良马数十匹及译员、向导等，随张骞一道赴汉朝报谢，并藉以了解汉朝情况。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回到汉朝，汉武帝嘉奖他的出使功绩，拜为大行（即大行令，是负责接待宾客和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高级官员），列于九卿。乌孙使者，来到长安，见到汉朝地广人众，国家富强，回国后

向乌孙王做了报告，“其国后乃益重汉”⑰。明年，张骞去世。其后年余，张骞派往大夏等地的副使，分别偕同对方报聘使者来到长安。从此，中西交通频繁，贸易大盛，汉朝派往西域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返”⑱。西域的使者和商人，也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云集汉朝边塞。所谓“驰命走驲，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⑲，即是此种情况的写照。从此，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张骞通西域，在中国史、亚洲史，尤其是在中西交通史上，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和影响。

注　释

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南道十国：楼兰、且末、婼羌、小宛、精绝、扜弥、戎卢、渠勒、于阗、莎车。

③北道十二国：疏勒、尉头、温宿、姑墨、龟兹、乌垒、焉耆、尉犁、危须、渠犁、山国、狐胡。

④葱岭十国：皮山、西夜子合、乌托、蒲犁、依耐、无雷、难兜、桃槐、捐毒、休循。

⑤⑥《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⑦⑧《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⑨⑩《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⑪《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⑫⑬《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⑭⑮《汉书》卷六一《张骞传》。

⑯⑰《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⑱《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

⑲《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论》。

广开三边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不但政令统一，经济繁荣，而且在奠定我国疆域的事业中，也创造了空前辉煌的纪录。

东南沿海一带，是秦汉时期百越之族的聚居地。其中居住在现在浙江省南部的越人，汉代称作“东瓯”；居住在现在福建省境内的称作“闽越”；居住在两广地区的称作“南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在百越之地设置会稽、闽中（治今福建福州市）、南海（治今广东广州市）、桂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南）、象郡（治今广西崇左县），进行统治。当时百越之族，在秦朝地方政府统治之下，输纳租税；或退入山岳地带，继续与秦朝政府对抗。秦末，中原大乱，百越之族群起叛乱。当陈涉起事时，今浙江、福建一带的越族，在其君长无诸和摇的领导下，参加了刘邦反秦的战争。刘邦即位，封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治（今福建福州市）。其后惠帝三年，又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景帝时，东瓯曾参加吴王濞之叛，后其王为汉政府所收买，诱杀吴王濞于丹徒。刘濞的

儿子逃到闽越，怂恿闽越攻打东瓯。武帝初即位，闽越发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武帝派严助发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兵浮海往救，闽越军闻讯退走。东瓯为避免再受攻击，请求内迁，汉朝将其一部分越人，迁徙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他们从此成为西汉的编户齐民。

南越，秦时已置郡，秦末变乱时，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奉命代理南海尉事，他乘机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初，刘邦派陆贾通使南越，赵佗表示愿意臣服于汉，汉封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因汉对南越实行铁器封锁，赵佗乃自称南越武帝，脱离汉朝，并发兵进攻长沙王国边邑，大败汉兵。文帝即位后，派人整修赵佗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南）的祖坟，优待他留在老家的亲属，并再派陆贾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和汉恢复原来的关系。景帝时，赵佗遣使朝请，表示臣服，但在国中仍用帝号。建元六年（前 135），闽越出兵攻打南越，武帝派王恢、韩安国发兵往援。汉兵未至，闽越王弟余善杀闽越王郢归汉。武帝立前闽越王无诸之孙丑为越繇王，立余善为东越王，共治闽越。元鼎六年（前 111），东越王余善又反汉自立为武帝，进攻豫章郡，杀汉地方官吏。武帝派韩说等领兵进讨，东越贵族同越繇王等共杀余善请降。武帝认为闽越地形险阻，叛服无常，便改封越繇王及东越一些贵族为侯，将当地越人迁徙到江淮地区。江淮之间的东瓯人和闽越人此后逐渐与汉人相融合。

元鼎四年（前 113），南越王赵兴和樛（音流）太后愿意内属，请求汉朝撤除边境关塞，要求同内地诸侯同样对待。武帝允准，赐南越丞相吕嘉银印，并赐内史、太傅、中尉等主要官吏印绶，其余官吏仍由南越王自己署置，取消南越沿用的古

代肉刑，奉行统一的汉法。吕嘉在南越历相三王，宗族七十多人都身居要职，实权超过王室，因此，不甘心放弃半独立地位，他代表越人贵族势力阻止赵兴内属无效，于是在元鼎五年夏起兵反叛，杀死南越王赵兴、樛太后以及汉朝使者，另立建德为王。汉武帝闻讯，派路博德为伏波将军，杨仆为楼船将军，率领十万大军攻入南越，招纳越人，夺得番禺（今广州市）。吕嘉等兵败逃走，南越守军大部分投降，吕嘉被追兵俘斩，南越各地官员纷纷迎降。武帝封许多南越贵族为列侯，取消南越国，划分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由西汉中央政府直接管辖。

汉朝时候，对居住在我国西南山麓地带的诸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大体说来，贵州西部有夜郎、且兰，云南滇池区域有滇，洱海区域有巂（音西）、昆明，四川西南部有邛都，成都西南有徙（音斯）、筰都，成都以北有冉駹（音忙）。甘肃南部的白马氐，当时也列在西南夷中。西南夷各族的语言、习俗各不相同，夜郎、滇、邛都等族人民习惯于梳椎发，从事农耕，有邑聚和"君长"；巂、昆明等族习俗编发，随畜迁徙，过着游牧生活，无"君长"。西南夷各族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处于原始社会，有的已进入奴隶社会。

西汉初年，西南夷地区与巴蜀地区联系密切，经常进行商业贸易往来。汉人商贾从西南夷中运出筰马、髦牛和僰僮（僰族奴隶，僰音博）及金、银、铜、象牙等。巴蜀的铁器、枸（音举）酱和其他商品也运入西南夷地区。建元六年（前135），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发现蜀地出产的枸酱，探知从蜀经西南夷地区，有路可以通达南越，因而上书向武帝建言："南越王黄屋左纛（皇帝车辇及装饰），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

实一州主也。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①武帝允其所请，派唐蒙率兵千人，辎重队伍万余人，携带缯帛等礼物，前去招降夜郎。夜郎侯多同及其附近小邑贪图汉王朝财物，同意归汉。于是汉在其地置犍为郡（治僰道，今四川宜宾），并动工修建从僰道直通夜郎牂柯江（今北盘江）的山路。武帝又听从司马相如的建议，派他去招抚邛都、筰都、冉駹等部。这些君长也喜好汉王朝的厚赐，愿意归附。汉在其地置一都尉，设十余县，隶属于蜀郡（治成都，今属四川省）。后来因接受御史大夫公孙弘的建议，欲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汉廷一度放弃经营西南夷。

张骞在中亚的大夏时，曾发现邛竹杖和蜀布，据说来自身毒（印度），因而得知巴蜀与身毒可以交通。元狩元年（前122），张骞自大夏归国，向武帝报告上述情况，建议重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遣使者自巴蜀四出寻找通身毒的道路。汉使到达滇国，由于昆明、嶲等族贪图财利，杀害汉使，抢掠财物，阻闭通路，汉使寻求身毒道路之目的未能达到。滇王曾同汉使谈话，问汉使曰："汉孰与我大？"夜郎侯也曾有过同样故事，"夜郎自大"的典故，即本于此。

元鼎五年（前112），南越反，汉发夜郎附近诸部兵攻南越，且兰君以此反汉，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次年，汉兵从巴蜀南下，攻下且兰，在其地置牂柯郡（治所在今贵州黄平县西南）。夜郎侯初倚南越，及汉灭南越，遂归降汉朝，汉武帝封他为夜郎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乃以邛都为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市东），以筰都为沈黎郡（治所在今四川汉源县东北），以冉駹为汶山郡（治所在今四川茂汶县北），

以白马为武都郡（治所在今甘肃武都县东北）。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兵攻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县东），同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于是今西南大部分地区均归入西汉版图，汉朝的西南边界扩展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

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乌桓、鲜卑等少数族，汉代称之为“东胡”。乌桓活动于西喇木伦河以北的乌桓山一带。乌桓人“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②。他们也经营农业，种植耐寒耐旱的穄和东墙（黑色糜子）。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妇女能刺绣，善于编织毛织品。乌桓部落中“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推为大人”。自“大人以下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③，仍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西汉初年，乌桓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臣服于匈奴，每年被迫缴纳牛马羊皮。汉武帝派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左部后，乌桓被徙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今河北北部及辽宁南部），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统辖。

鲜卑最初与乌桓同为东胡部落，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公元前三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亦向西南推进，居住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与乌桓为邻，也受匈奴贵族的奴役。

西汉时期，东夷之族，也分化为许多部族或种族。其分布于今日沈阳以北者曰夫余，分布于鸭绿江北岸者曰高句骊，分布于朝鲜半岛之东者曰涉貉（音汇莫），之西者曰朝鲜。秦末，中原大乱，燕、齐、赵人，避乱而徙往辽东者数万口。汉初，“燕王卢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聚党千余人椎结

（发髻）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浿水（今朝鲜清川江），居秦故空地上下鄣（云鄣，属乐浪郡），稍役属真番（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今朝鲜平壤）”④。卫满在朝鲜建立了政权，当时朝鲜的疆域大致包括今辽宁东部、吉林西南和朝鲜半岛的西北部。汉辽东太守和卫满相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⑤。卫满利用这一政治优势，逐步统一了朝鲜北部。元朔元年（前128），涉貉君主南闾率其部属二十八万人归服汉朝，汉以其地为苍海郡（今朝鲜北部东海岸）。后来卫满传位于其孙右渠，右渠大量招诱逃亡汉人，又不入觐汉朝皇帝，并阻遏半岛上其他小国。元封三年（前109），汉武帝派涉何出使朝鲜，晓谕右渠遵守前约，右渠终不肯奉诏。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左将军荀彘出辽东，两路讨伐右渠。次年，朝鲜贵族大臣参等使人杀右渠来降。武帝封参等为列侯，分其地为四郡：乐浪郡（治朝鲜，今平壤）、玄菟郡（初治夫租，今朝鲜咸兴，后迁高句骊，今辽宁新宾西）、临屯郡（治东暆，今朝鲜江陵）、真番郡（约在今朝鲜信川一带），辖境南至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

西汉的疆域在武帝后期达到极盛。由于扩展太快，建置过多，兵力和财力不能适应，加上有些地方官的苛政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此，其后在局部地区曾有所收缩。如武帝末年撤消了沈黎郡，并入了相邻的蜀郡。但总的来说，从武帝以后，西汉的疆域基本上是稳定的。汉武帝时期疆域的扩展和边疆的开发，为以后中国的广袤疆域奠定了初步基础。

注　释

①《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

②③《后汉书》卷九〇《乌桓鲜卑列传》。

④⑤《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秦汉

苏武出使不辱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 119），在北之战中，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击败匈奴以后，匈奴的势力逐渐衰落，但还具有一定战斗力量。在此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双方一面持续战争，一面相互遣使往来，表面上为寻求友好，实则窥探对方虚实，因此，扣留对方和杀戮来使之事，时有发生。匈奴曾拘留汉使郭吉、路充国等十余名。太初四年（前 101），匈奴呴犁湖单于死，其弟且鞮（jū dī 驹低）侯立为单于，汉武帝欲藉征大宛之威胁迫匈奴，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时，齐襄公之九世祖为纪侯所谮而烹杀于周，鲁庄公四年，齐襄公灭纪），《春秋》大（敬）之。"①且鞮侯单于初立，恐汉袭之，乃曰："我儿子，安敢望（怨望之意）汉天子，汉天子，我丈人行（辈也）也。"②因而派使臣去长安修好，并将以前扣留在匈奴的路充国等十几名西汉使者释放回国。为回报匈奴，答其善意，天汉元年（前 100），汉武帝派中郎将苏武作为使臣，携带厚礼，送还匈奴被拘留在汉使者。

苏武（前？—前60），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市南）人。为人廉洁正直，而且有胆量，有骨气。苏武奉命后，乃偕同副使张胜、随员常惠等带领一百多人从长安出发，一路晓行夜宿，历尽艰苦，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匈奴单于王廷。苏武献上汉天子所赐厚礼，匈奴单于非但未表谢意，反而露出骄矜之色，使苏武等汉使大失所望。

苏武办完使事，准备启程回国，正在此时，不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在苏武出使匈奴期间，匈奴贵族缑王与降将卫律部下虞常等七十余人，阴谋劫掠单于母阏氏归汉。虞常在汉时素与张胜相知，暗中将此事告知了张胜，并准备杀死卫律，为汉朝立功，张胜亦表赞同。其后月余，一日，单于外出射猎，虞常与七十余人欲发，在举事前夕，其中一人出首告密，单于子弟发兵进攻虞常等人，缑王等人皆战死，虞常被执获。单于射猎归来，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乃使卫律查办此事。张胜恐虞常供出自己，只得将前情告知苏武。苏武闻之，惊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见犯乃死（被侵犯而死），重负国。"③欲引刀自裁，张胜和常惠连忙上前制止。虞常在卫律的严刑拷问下，果然供出了与张胜密谋情况。单于在盛怒之下，召集匈奴贵族商议，欲尽诛杀汉朝使者。单于身边一名大臣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因谋杀卫律而杀汉使，未免处罚太重，如果谋杀单于，又当治以何罪？不如趁此机会胁迫汉使归降匈奴。单于命卫律召苏武前来听审。苏武对张胜、常惠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④当即拔出佩刀自刺，卫律见状大惊，急上前抱持，并立即命人召医急救。苏武气绝，半日复苏。常惠等痛哭不已，将苏武抬回营帐。张胜被匈奴拘禁。且鞮侯单于得知审讯情况，对于苏武忠于汉朝的气节，十分敬重，朝夕

遣人问候苏武病状，并暗中晓谕卫律设法使苏武归降。

当苏武伤势渐愈时，单于使人通知苏武、张胜同去观审虞常，欲因此迫使苏武归降。卫律当场将虞常斩首，然后威胁说："汉使张胜谋杀单于近臣（卫律自称），当死，单于募降者赦罪！"⑤举剑向张胜砍来，张胜慌忙跪地请降。卫律又对苏武说："副有罪，当相坐（连带治罪）。"苏武曰："本无谋，又非亲属，何谓相坐！"卫律又举剑向苏武作砍杀状，苏武神色自若，安然不动。卫律急忙收剑入鞘，无耻地向苏武夸耀其投降匈奴后所获荣华富贵，妄图以此来动摇苏武的忠节，苏武置之不理。卫律又改颜施加压力说："君因我降，与君为兄弟；今不听吾计，后虽欲复见我，尚可得乎?"苏武听后，大怒骂道："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对匈奴的贬称），何以汝为见（清人王念孙以为此句当作"何以见汝为"，意为见你干什么）！且单于信汝，使决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斗两主（使汉天子与匈奴单于互相争斗），观祸败！……若知我不降明（言汝明白地知道我不会投降），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⑥苏武义正词严地一番答话，使卫律明白苏武终不可屈致，乃如实地向匈奴单于作了报告。单于听说苏武如此忠义，心中十分敬重，益欲使其归降。乃命人将苏武囚禁于大窖中，不予饮食，以为如此可以使苏武归降。适值天降大雪，苏武在冻饿之下，只好以雪团和着毡毛一起吞食，竟数日不死。匈奴单于惊奇，以为有神明暗助苏武。于是乃将苏武迁至白雪皑皑、杳无人烟的北海（匈奴北界，即今贝加尔湖）上，使牧羝羊（公羊）。临行时，单于对苏武说，待公羊产生子羊，苏武才能回国。同时将苏武的属员常惠等人，分别置其他处所，不得与苏武相见。

苏武来到荒凉的沙漠苦海，得不到匈奴供给的粮食，只好掘取野鼠储藏的草籽用以充饥。他每日拄着“汉节”（汉武帝差他出使匈奴的符节）牧羊，不论朝夕从不离手，因此时间一长，节旄（节上的牦牛尾毛）脱落净尽。时光荏苒，春去秋来，苏武已度过五六个寒暑，苏武怀念祖国的心情并未削减。一日，苏武正在牧羊，忽听远处传来马蹄声，苏武正在惊疑间，一个匈奴贵族打扮的官员来到面前，苏武定睛一看，原来是汉朝的骑都尉（骑兵统带官）李陵。李陵，字少卿，汉名将李广之孙。在汉朝时，与苏武俱为侍中，且系好友。苏武出使匈奴之明年，汉武帝任命他为骑都尉，率兵五千，与匈奴交战，战败投降匈奴。李陵虽知苏武被困在匈奴，却无面目去见故友。过了很久，单于知李陵与苏武相善，乃命令李陵去北海劝苏武归降。

李陵来到北海上，为苏武置酒设乐。叙说朋友交谊后，向苏武说明单于使其前来劝说归顺之事。李陵首先告知苏武家庭的不幸遭遇：老母已死，兄弟皆坐事自杀，苏武妻子年少，闻已改嫁，女弟、儿女，十余年来，存亡不可知；接着自叙始降匈奴时忽忽如狂的内疚心情，表示对苏武此时的心境很是理解，然后又联系到汉武帝对大臣的残酷寡恩说：“陛下春秋高，法令无常，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⑦为如此皇帝自苦如此，实不值得，不如归顺匈奴。苏武爽直地向李陵剖明心迹说：“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提拔之意）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近臣之意），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无所恨，愿勿复再言！”⑧李陵与苏武盘桓数日，终不能动其心，李陵见其至诚，惭愧地与苏武挥泪告别。李陵

使其妻子赠给苏武牛羊数十头，以改善其日常生活。

后元二年（前87），李陵又至北海上，将汉武帝去世的消息告知了苏武。苏武听后，南向号哭，悲痛异常。明年，昭帝（武帝之子）即位，是时，匈奴且鞮侯单于早已死去。昭帝始元二年（前85），匈奴壶衍鞮单于即位。由于连年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渴望和平。同时，匈奴新单于初立，国内乖离，贵族争夺，常恐汉军来袭，乃采纳卫律之谋，与汉朝恢复和亲和正常往来。昭帝始元六年（前81），汉与匈奴议和，要求匈奴把苏武、马宏（前使西域为匈奴所获，亦不肯降）等人放还，竟遭到匈奴的拒绝。匈奴诡称苏武已死。后来，汉使又来到匈奴，汉朝被囚禁在匈奴的使者常惠买通守者，得夜见汉使，将苏武的真实情况告诉汉使，并教给汉使营救苏武的计策。

翌日，汉使面见壶衍鞮单于，对单于说：一日，汉朝皇帝在上林苑（汉朝宫苑，在今陕西西安市西）中射猎，射中一只大雁。大雁足上系有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正在北海牧羊。汉使以此责问单于，为何向汉朝隐瞒苏武的真相？单于听后，异常惊慌，环视左右大臣，个个目瞪口呆，无言以对。单于无奈，只得如实地对汉使说："武等实在。"为了避免再引起汉匈战争，答应释放苏武回国。汉使向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表示祝贺。李陵闻知，亦为苏武置酒祝贺说："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⑨然后又向苏武倾诉了自己兵败降胡后，仍时刻不忘报效汉朝的心情，由于汉武帝族诛其家，为世大辱，他才断绝回汉念头，成为异域之人。因起舞与苏武作别，歌曰："径（穿过之意）万里兮度沙幕，为君（指汉武帝）将兮奋匈奴（与匈

奴作战)。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隤（同颓，丧失)。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⑪李陵歌罢，流着眼泪，与苏武诀别。始元六年（前81）春，苏武率领以前留居匈奴的汉朝官员九人，一同回到汉朝首都长安。苏武出使时，正当壮年，回国时，已经须发尽白。汉昭帝为了表彰苏武出使的功绩，拜他为典属国（负责少数民族及属国事务的高级官员)，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住宅一处。常惠、徐圣、赵终根三人皆拜为中郎（官员，掌宿卫侍值，属郎中令)。赐帛各二百匹。其余六人，各赐钱十万，免除终身徭役，使归家养老。宣帝（前73—前49）时，封苏武为关内侯，食邑三百户。久之，以苏武为节操素著老臣，令苏武只在朔望朝见天子，号称“祭酒”，优崇甚厚。苏武每次获得皇帝的赏赐，皆分赐与昆弟、故人，家无余财。当时的王公大臣如许广汉（宣帝皇后之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等，皆十分敬重苏武。苏武在匈奴生的儿子苏通国被接回汉朝，任为郎官。

宣帝神爵二年（前60)，苏武病故，享年八十多岁。甘露三年（前51)，匈奴单于来汉朝见，汉宣帝思念功臣，命画工绘十一大臣之像于麒麟阁（在未央宫中)，以表彰其功德，苏武即为其中之一。苏武的崇高民族气节，两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和敬仰。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他那首气贯长虹的《正气歌》中提出历史上许多气节高尚的英雄人物，其中“在汉苏武节”之句，即为赞扬苏武坚贞不屈的名句。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二一，汉武帝太初四年。

②《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③④⑤⑥⑦⑧⑨⑪《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附苏武传。

秦汉

司马迁撰《史记》

西汉时期，我国史学得到新的发展，出现了纪传体的历史巨著。其代表作是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

《史记》是司马迁所作，它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称“太史记”。“史记”本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代，封建经济有很大发展，文化学术也随之出现繁荣局面，地主阶级为巩固政权，借鉴前代统治经验，迫切要求编写一部通史，以“通古今之变”①。于是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史记》就是在这种客观形势下出现的。

司马迁（前145—前86）②，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人（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他六岁时随父亲司马谈到京都长安。司马谈的远祖世代为史官，在他前几代曾一度中断，这时又被召入京师，直到元封元年（前110），在中央政府共任三十年太史令。太史令是负责管理皇家

图书、收集史料、编写国史、研究天文历法的官员。司马谈学识渊博，著有《论六家要旨》，对先秦的主要学术流派做了颇有见地的论述。他有感于国史多年无人编撰，决心编写一部通史，从构思到史料都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并写出部分篇章。但愿望未及实现即故去。临终前嘱咐儿子完成他的未竟事业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③。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起端于司马谈，为继承父亲遗志而作。

司马迁生活在这个家庭，得到父亲培养，十岁已读大量的今文书籍，并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篆文）著作，诸如《尚书》、《左传》、《国语》、《世本》，都一览无遗。后又从董仲舒、孔安国学习《公羊春秋》、《古文尚书》，二十岁时，他怀着远大抱负和对祖国的深沉热爱，游历东南名山大川。以后，他又结合奉使出征，随汉武帝外出巡行封禅，到过更多的地方。他一生除今闽、广外，各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通过实地调查，为后来写作《史记》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谈死后三年，38岁（前108）的司马迁承袭父亲官职任太史令，从而有机会阅读大量的国家藏书，"绅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④。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同时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李陵败降匈奴，朝中一些大臣趁机落井下石，说李陵坏话。司马迁对此不平，认为李陵虽举事不当，但他艰苦奋战，功绩显著，投降实属无奈，从他平素为人及敌我实力对比分析，司马迁认为李陵是有功的，投降是出于不得已，他一定会寻找时机报答皇恩。司马迁在朝廷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认为司马迁赞扬李陵就是有意诋毁与他同时出征的李广利（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便将司马迁下狱，

又于第二年下蚕室，处以腐刑（即宫刑）。他认为受此刑是奇耻大辱，他在给友人任安信中说："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⑤他虽万分痛苦，但对事业的执着追求，使他效法古代"倜傥非常之人"在逆境中发愤的先例，决心活下来，在狱中怀着悲愤继续写作。这一遭遇更加深了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认识，对他的封建异端和非正统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出狱后，他继续担任中书令，更加奋发地写作。太始四年（前93），他53岁时，终于完成这部空前的历史巨著。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探究社会发展，总结历史经验）。不久这位史坛上的启明星便溘然长逝。这部遗著到汉宣帝时才由他的外孙杨恽公诸于世。

《史记》记事始于传说中的皇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把几千年间零散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审核、排比，"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⑥，分别归类于一百多个历史人物传记中。《史记》叙述上下三千年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通史。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历代帝王的言行和政事，从五帝开始，至汉武帝为止，这是本书的总纲。"世家"记载诸侯国的兴衰，及其子孙世袭（如《越王勾践世家》、《留侯世家》）。"列传"主要记载官僚、士大夫、名人等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写一个人物的，后人称之为"专传"（如《淮阴侯列传》）；写两个或两个以上人物的，后人称之为"合传"（如《廉颇与蔺

相如列传》)；把类似的人物记在一起，不管他们是否同时代的人的，后人称之为“类传”（如游侠列传》)；此外还有“附传”；也有少数民族和邻国的历史（如《匈奴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表”是利用表格的形式记叙错综复杂的人物、史事，作为本纪和列传的补充。“表”又分为年表、世表、月表三种。年表是按年代编排的（如《六国年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世表是因为年代久远，不好按年记载（如《三代世表》)；月表如《秦楚之际月表》，是因楚汉相争仅几年，事件变化多端，按年记叙不足以反映丰富的历史现实。“书”则是分专题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专篇。如《平准书》系统地叙述了汉代社会经济情况；《河渠书》叙述了历代水利情况；《历书》、《天官书》叙述了当时的历法和天文学的概况。

就全书的体例而言，世家、本纪和列传都是人物方面的传记，是全书的主体，也是思想性、艺术性最强的部分，因而价值最高。又通过书、表互相配合补充，使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是一部具有一定规模的百科全书。人们把《史记》的编写方法，叫做《纪传体》。用此法编写历史，是司马迁的创造。在它之前的史书，或以年代为顺序的“编年体”（如《春秋》)，或以地域为限的“国别史”（如《国语》、《战国策》)，而《史记》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继《史记》之后的正史（从《汉书》至《清史稿》）都沿袭了《史记》所开创的纪传体例，在写作方法上司马迁把自己的观点是非褒贬贯穿在叙事当中，即“寓论于史”。在篇末，还往往用“太史公曰”的形式，以简洁的语言写成史论。

司马迁对调查得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核实、去伪存真，因而使《史记》记述的真实性较可靠，如《史

记·殷本纪》中所记的殷代先公先王，与河南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对勘，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殷本纪》差错甚少⑦。司马迁这种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态度，使《史记》获得了崇高的声誉，被称为"实录"⑧，成为千古不朽的信史。

就《史记》一书的思想价值而言，表现了比较进步的历史观。首先，《史记》一书，比较重视社会经济的记载。司马迁意识到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引起政治的变动，他试图通过经济现象来考察社会历史的演变，所以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作《平准书》，以观事变。"在它的影响下，后世正史都沿袭它的体例，设《食货志》。其次，《史记》在评价、论断史事方面，并没有完全为儒家思想所束缚，而是能够较多地反映历史的真实面目，在某些方面作出较为科学的论断。如他敢于揭露封建帝王的腐朽与贪婪，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某一个侧面。对于汉代开国皇帝刘邦，除赞扬他建立西汉的功绩外，对他如地痞流氓、好酒贪色，好吹牛说大话，为人残酷的性格，也形象地加以刻画；对汉武帝迷信方术，重用酷吏的过失，也丝毫不加掩饰。同时，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底层人物充满同情和歌颂，为他们立了许多类传，如《游侠》、《滑稽》、《日者》、《龟策》、《货殖》等，记录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尤其可贵的是，他把陈胜起事与孔子作《春秋》相提并论，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⑨因此，司马迁把陈涉列为世家，与历代侯王勋臣同列。同时，把项羽列入本纪，不以成败论英雄，都反映他具有远见卓识。班固作《汉书》，虽然照抄《史记》，却把陈涉编入列传，并删去"由涉首事"这句颂扬的话。一扬一贬，相比之

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是比班固进步的。班固批评司马迁"是非颇缪于圣人"，正是司马迁史学思想上的贡献所在，也更可证明班固是站在封建正统，也就是正宗儒学立场上来立论的，是不公允不全面的，丝毫无损于《史记》的光辉。

《史记》在文学上的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在注意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其文章之美，古今称道，一方面是议论卓越，一方面是纪事生动。它在纪传中，塑造了众多而鲜明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写叱咤风云的项羽，豁达大度不拘小节的刘邦，机智勇敢的蔺相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委身太子丹、西刺秦王的荆轲。……《史记》共塑造了几百个人。每个人物都以特有的性格来感动人，不使人感到雷同，表现了司马迁有高超的艺术刻划才能。他的刻划方法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去塑造，用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细节来描写，通过人物的语言来描述。"火牛阵"、"鸿门宴"，"垓下之战"等等有许多生动的场面，既是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文学的再创造。在语言上也是十分注意以平易代艰深，广泛地运用口语，使人感到绘声绘色，生动优美，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如同一篇篇有趣的小说。而语言之精确、逻辑之严密，又使人感到像一篇篇科学论文。《史记》不愧为一部具有高度艺术性的文学巨著，如果说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诗人，司马迁则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史学家、散文家，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很中肯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其中许多动人的故事，如《霸王别姬》、《将相和》都成为后世小说和戏剧的题材。

我们在充分肯定《史记》的同时，也应指出，司马迁著书，终极目的仍然是维护封建统治，他的历史观还有不少唯心

主义成分。如认为秦的统一是“天所助焉”⑩，刘邦是“受命而帝”⑪，这主要是由于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造成的，不能苛求古人。司马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所以，他一直被尊奉为我国古代的史学大师；《史记》被认为是我国古代史书中最卓越的著作，至今仍有不朽的价值。

《史记》问世后，对史学、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历代的史学家、文学家多从《史记》中吸收丰富的营养，每个时代都出现了专门研究《史记》的学者。仅是历代为《史记》作注的就很多，现存最早的旧注是刘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它主要利用封建经典和各种史书来注释文义，吸收了前人的一些成果。唐朝司马贞作《史记索隐》，既注音，又释义，比《集解》前进了一步。唐朝张守节花费了毕生的精力，写了《史记正义》，比《集解》、《索隐》又有所提高。

这三家的注释，人们公认是《史记》旧注的代表作，称为《史记》三家注。最早的三家注都是各自单行，到宋朝，才把三家注排列在《史记》正文之下。在世界各国也不断出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如日本人泷川龟太郎编著《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颇有参考价值。

注 释

①《汉书·司马迁传》载《报任安书》。

②关于司马迁生卒年代说法不一。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卒于公元前86年，郭沫若认为生于公元前135年，卒于公元前93年（见《历史研究》1955年第六期）。今从王说。

③④《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

⑤《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⑥《史记》卷一三O《太史公自序》。

⑦王国维《观堂集林》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⑧《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赞》。

⑨《史记》卷一三O《太史公自序》。

⑩《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序》。

⑪《史记》卷一六《秦楚之际月表序》。

秦汉

巫蛊之祸

巫蛊①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一起宫廷内部斗争。

征和元年（前92）夏，汉武帝居建章宫休养，恍惚间见一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宫门名），疑其图谋不轨，命人收捕。男子在惊恐中弃剑逃去，追之不及，武帝怒斩门守。冬十一月，紧闭长安城门，发动三辅骑士大肆搜索上林苑周围数百里凡十一日。巫蛊事件于此爆发。

丞相公孙贺之夫人君孺为卫皇后（武帝皇后）子夫之姊，因此有宠于武帝。公孙贺子敬声依仗权势，骄奢淫逸，不顾朝廷法纪，竟擅自挪用北军军费一千九百万钱。事发后，被拘捕入狱。恰在此时，武帝下诏急捕阳陵（今陕西咸阳县）大侠朱安世归案，公孙贺乃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武帝许之。后公孙贺果然将朱安世捕获，投之狱中。朱安世从狱中上书，告发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并在武帝赴甘泉宫途中，使巫者于当道埋偶人，以恶言诅咒武帝。武帝下令将公孙贺父子逮捕下狱，考验属实；公孙贺父子被处死，族诛全家。武帝乃以中山靖王子刘屈氂（máo 毛）为丞相。征和二年（前

91）闰四月，诸邑公主（卫皇后之女）、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因巫蛊事件被牵连处死。

先是，武帝年二十九，卫皇后生戾太子，甚是钟爱。及长，武帝以太子"性仁恕温谨，嫌其材能少，不类己"②；同时，所宠幸王夫人、李夫人和李姬又各生一子，因此卫皇后及戾太子恩宠渐衰，常有不自安之意。武帝对卫后弟大将军卫青说："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③卫青顿首叩谢。武帝每次出外巡幸，常以国家大事付托太子。武帝任用酷吏，用法严刻，太子宽厚，多所平反，"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④。元封五年（前106），卫青去世，朝中邪臣以太子无复外家以为凭依，竟欲构陷太子。

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长安，率皆以邪道欺骗群众，使用变幻多端的手法，以达到一己私欲。有些女巫往来宫中，教唆后宫美人于房中埋木偶人祭祀，可以免除灾祸。美人由于妒忌怨恨，彼此间互相告讦对方用木偶诅咒皇帝无道。武帝大怒，下令诛杀后宫美人并连及大臣凡数百人。武帝心怀疑忌，常昼寝，梦见数千木偶人持杖向其打来；惊醒后，身体感到不爽，精神恍惚，神疲健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皇后有隙，见武帝年老多病，恐一旦死去，太子即位，将不利于己，因而萌发奸谋，言武帝病源在于巫蛊。于是武帝即以江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先是，江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逃至京师，告发太子丹阴事，太子丹因被废黜。武帝召见江充，见其容貌魁梧，衣著洁丽，与其议论政事，又多称意，因此大悦，拜为直指绣衣使者⑤。使其督察贵戚及近臣违反法纪者。江充

受任后，检举揭发，无所迴避，武帝以其任事忠直，大加信用。江充曾随从武帝巡幸甘泉宫，遇太子家使者乘车马行于驰道（天子驰走车马之御路）中，江充将人及车马扣留交吏议处。太子闻知后，使人向江充请求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指武帝）闻之，以教敕无素者（言平素对左右人不加管束）。"⑥江充置之不理，仍将此事上奏武帝。武帝称赞说："人臣当如是矣。"自此更加信用江充，擢为水衡都尉（官名，掌上林苑兼保管皇室财物及铸钱），威震京师。

江充率领胡巫掘地求偶人，拘捕夜祠及视鬼之人，同时派遣巫者污染地上，以为祭祠之处，用来诬陷无辜吏民；然后收捕审讯，使用烧铁钳灼等酷刑，强令服罪。于是庶民被迫互相以巫蛊攀扯，官吏则劾以大逆无道之罪；当时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因巫蛊罪而死者前后数万人，莫敢讼其冤者。江充察知武帝怀疑左右皆有巫蛊祝诅嫌疑，乃假藉胡巫檀何之言谓武帝说："宫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愈也）。"⑦于是武帝乃使江充入宫禁中，毁坏御座、掘地求蛊；并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办理此事。江充先后命人至后宫希幸夫人、皇后、太子宫中，掘地纵横，以至太子、皇后无复施床之地。江充为诬陷太子，先使胡巫作桐木人埋太子宫中，及掘出后说："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⑧太子闻知大惧，问计于少傅石德，石德亦惧受牵连而被诛杀，因对太子说："前丞相父子（指公孙贺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假托天子诏命）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⑨太子犹豫不决，将往甘泉谢罪。江充紧逼不舍，必欲置太子于死地而后已。太子无奈，只得按

照石德策划实行。秋七月，太子令其宾客诈称皇帝使者，收捕江充等人。按道侯韩说怀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使者"击杀韩说。太子亲临监斩江充，骂曰："赵虏（江充，赵人）！前乱乃国王父子（充前告赵太子丹阴事，因使太子见废）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⑩并命人将胡巫烧死于上林苑中。

太子命舍人无且持节乘夜进入未央宫，通过长御（皇后近侍）倚华将捕斩江充事报告给卫皇后，并请调拨宫中厩车以载射士，动用武帝兵器，发给长乐宫卫兵。是长安城中秩序混乱，或言太子谋反。黄门苏文从宫中逃出，直奔甘泉，向武帝报告太子谋反。武帝认为太子所以有此行动，乃是由于巫蛊之事心怀恐惧，又愤恨江充等人。乃派遣使者召太子，使者不敢见太子，回来向武帝谎称"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⑪。武帝听后大怒，丞相刘屈氂闻变，弃其印绶，拔身而逃，派丞相长史乘急传驿马报告武帝。武帝怒，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马为橹（盾牌），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⑫太子宣言告令百官说："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⑬武帝车驾从甘泉来到长安城西建章宫，下诏调发三辅兵马，中央二千石以下官员，皆由丞相统一指挥。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免长安京师诸官府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别统领，同时派长安囚徒如侯持节调发长水、宣曲胡骑，皆整装来会，侍郎马通追捕如侯，告胡人说："节有诈，勿听也！"⑭因斩杀如侯。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授与节符，令其发兵，任安拜受后，闭门不出。太子只得引兵而去，纠集长安市民数万人，至长乐宫西阙下，正与刘屈氂统率的军队相遇，双方交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城沟中。当时，民间皆

传说“太子反”，因此士兵不附太子，转向丞相一方。太子兵败，从南城门逃出。刘屈氂欲斩城门守卫司直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谏阻说：“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⑮刘屈氂遂释放田仁。武帝闻知大怒，下令责问暴胜之，胜之恐惧自杀。武帝又诏令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以天子策书收皇后玺绶，皇后自杀。武帝因任安为官多年，老于事故，“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下令与田仁并处腰斩。平日出入太子宫门之宾客，皆被株连处死；追随太子发兵者，则以谋反罪灭族。吏士被胁迫者，一律徙敦煌郡。在武帝盛怒下，群臣忧惧，不知所出。壶关三老令狐茂（《通鉴考异》引《汉武帝故事》作郑茂）上书武帝为太子辩冤说：“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江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⑯请求武帝“极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武帝览书后，有所感悟，然而并未立即下诏赦太子之罪。太子出亡，东至湖县（今河南阌乡东），隐藏在泉鸠里一民户家中，主人家贫，常靠卖屦所得以供太子。太子在湖城有一富友，命人前往传呼，因被发觉。是年八月，地方官吏围捕太子。太子自料不能脱逃，遂入室自缢而死。

征和三年（前90）九月，吏民以巫蛊互相告发者，经过查验多与事实不符，武帝亦颇知太子为江充所迫，恐惧无以自明，并无谋反之意。此时，适值高寝郎（高庙卫寝之郎）田千秋上书，为太子讼冤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⑰武帝大为感悟，于是召见田千秋，立拜千秋为大鸿胪（九卿之一），同时下令族灭江充家，焚烧黄门苏文于渭桥上。武帝哀怜太子无辜而

死，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城。

注　释

①巫蛊——即以巫术害人之意。

②③④《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⑤官名，亦称绣衣直指。汉武帝末年为镇压各地农民起义而设。使者为皇帝特派，着绣衣，可持节发兵，并有权诛杀办事不力的地方官员。

⑥《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太始三年。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二年。

⑰《资治通鉴》卷二二，汉武帝征和三年。

霍光废立

后元二年（前87）二月，汉武帝于五柞宫病笃，大臣霍光问后事，武帝曰："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封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子，入汉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为车骑将军，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武帝死，皇太子弗陵嗣位，年八岁，是为孝昭皇帝。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领尚书事，辅政。

先是，武帝欲立少子弗陵为太子，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独居骄蹇，重演吕后专权故事，乃使黄门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以赐奉车都尉霍光。后数日，武帝令人引持弗陵母钩弋夫人送掖庭狱，赐死。

霍光受诏后，朝中政令，悉由所出，天下人莫不想望其风采，一时间权倾朝野。然光为人沉静详审，资性端正，为朝廷内外所敬重。昭帝始元二年（前85）春，霍光被封为博陆（今河北蠡县南）侯。有人建言霍光："今将军当盛位，帝春秋富，宜纳宗室，又多与大臣共事，反诸吕道（一反诸吕排斥刘氏宗室专权而亡的作法），如是则可以免患。"①霍光采纳建言

者之议，乃于宗室中留意选择可委以重任者，遂拜楚元王孙辟疆及宗室刘长乐皆为光禄大夫、辟疆并为长乐宫卫尉（汉九卿之一）。元凤元年（前80）冬十月，霍光以前朝旧臣尚书令张安世（故御史大夫张汤之子）志行纯笃，乃启奏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作为自己的副贰。又以杜延年揭发燕王（昭帝兄）、盖长公主、上官桀父子、桑弘羊谋反，有忠节，擢为太仆（九卿之一），右曹给事中（加官，掌顾问应对，得出入宫中）。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得收宽严相济之效。自平燕王叛后，霍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②。

元平元年（前74）夏四月，昭帝死，无嗣。当时武帝之子只有广陵王刘胥尚存，霍光与大臣商议立嗣问题，群臣均主张立广陵王。但广陵王好倡乐逸游，动作无法度，霍光内不自安。适有郎官上书言："周太王废太伯立王季（太伯之弟），文王舍伯邑考（文王长子）立武王，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③郎言正合霍光之意，于是霍光以郎所上书交丞相杨敞等传阅，当日奏请皇太后，诏遣行（代行）大鸿胪（汉九卿之一）事少府史乐成、宗正刘德、光禄大夫丙吉、中郎将利汉等迎接昌邑王刘贺（武帝子昌邑哀王髆〔bó博〕之子），乘七乘传，来到长安官邸。

原来昌邑王刘贺，也是一个狂纵无节的王子，武帝丧时，刘贺仍游猎不止。王国属官王吉、龚遂等均曾切谏，刘贺或置若罔闻，或当时接受，其后复放纵自若。及征书至，夜漏未尽一刻，但刘贺于翌日中午始启程，于申时（下午三至五时）急行至定陶，行程一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中尉王吉奏书戒之曰："今大王以丧事征，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

慎毋有所发（谓兴举众事)！大将军（指霍光）仁爱、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闻；……布政施教，海内晏然，虽周公、伊尹无以加也。……臣愿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听之，大王垂拱（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南面而已。”④

昌邑王一路不忘游乐，车驾行到济阳（今河南兰考东北），派人求长鸣鸡（自南诏来，形矮而大，鸣声圆长，一鸣半刻），以为玩好。过弘农时，遣大奴名善者用衣车（有遮蔽的车）载女子。至湖（即湖县，在今河南灵宝西北），长安使者见此情景，召昌邑王国相安乐进行责备，安乐将此事告知龚遂，龚遂入见昌邑王，问有无其事，昌邑王谎称“无有”。龚遂说：“即无有，何爱一善（即大奴名善者）以毁行义，请收属吏（将大奴拘捕付吏审问），以湔洒大王！”⑤于是揪住大奴善交给卫士长依法惩办。

刘贺来到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大鸿胪郊迎，侍从奉上乘舆（皇帝坐的车驾）。昌邑王命太仆寿成驾车，郎中令龚遂为参乘（亦作骖乘，即陪乘）。车驾将至长安未央宫东阙（宫门），龚遂对刘贺说：“昌邑吊哭帐在是阙外驰道北，未至帐所，有南北行道，马足未至数步；大王宜下车，向阙西面伏哭，尽哀止。”⑥刘贺按照龚遂的嘱咐尽哭如仪。六月，昌邑王接受皇帝玺绶，即皇帝位；尊皇后曰皇太后。

昌邑王立为天子后，淫戏无度。原昌邑官属皆被征至长安，往往超擢拜官。昌邑国相安乐迁升长安宫卫尉（汉九卿之一）。龚遂见此情景，甚为忧虑，乃流涕对安乐说：“王立为天子，日益骄溢，谏之不复听。……君陛下故相，宜极谏争！”⑦龚遂和太仆丞张敞均以“国辅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辈先迁”为非，劝其“诡（反也）祸为福，皆放逐之”⑧！刘贺

不听。霍光闻知昌邑王“所为谇（违背也）道”，心中忧懑，私下向所亲故吏大司农田延年问计。田延年提出要霍光建白太后“更选贤而立之”。并援引伊尹相殷，废太甲以安宗庙故事作为根据。霍光乃荐举延年为给事中（将军、列侯、九卿以至黄门郎、谒者等的加官。均给事殿中，备顾问应对，讨论政事），与车骑将军张安世密谋对策。计议已定，霍光使延年先报知丞相杨敞，杨敞惊惧，不知所应，在夫人启示下，乃许诺延年：“请奉大将军教令！”霍光遂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于未央宫举行会议。霍光首先对诸大臣说：“昌邑王行昏乱，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田延年乃离席按剑，对群臣说：“先帝属将军（指霍光）以幼孤，寄将军以天下，以将军忠贤能安刘氏也。今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如令汉家绝祀，将军虽死，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乎？今日之议，不得旋踵（宜速决）。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于是群臣皆叩头曰：“万姓之命，在于将军，唯大将军令！”⑨

霍光率群臣朝见太后，详奏昌邑王不可继承皇位情景。皇太后乃驱车来到未央宫承明殿，诏令宫廷卫士不许昌邑王的臣下入内。昌邑王朝见太后回至所属之温室殿后，殿门即闭。霍光命令侍卫将昌邑王群臣全部驱赶至金马门外，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骑收捕二百余人，皆送廷尉诏狱（奉诏拘禁犯人的监狱）议处。有顷，太后有诏召昌邑王，此时昌邑王始感事态严重，心怀恐惧。太后盛服坐武帐中，侍御、武士数百人皆手持兵器陈列殿下，群臣按官品大小依次上殿，然后召昌邑王伏前听诏。尚书令宣读霍光与诸大臣连名给皇太后的上奏，具言昌邑王于汉昭帝死后，典丧不按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掠

抢民女，与昭帝宫人淫乱。滥赐昌邑王旧属官爵印绶，受玺二十七日，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宗庙重于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⑩！皇太后诏曰：“可。”霍光令昌邑王起，拜受诏，然后解其玺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马门，霍光与群臣将昌邑王送至官邸。不久，太后又采纳群臣奏言，诏命刘贺回到昌邑（今山东金乡西北），赐汤沐邑二千户，国除。昌邑群臣“坐无辅导之谊，陷王于恶”⑪被诛杀者二百余人。只有中尉王吉、郎中令龚遂及昌邑王师王式以忠直多次进谏，得减死，髡为城旦。

皇帝是封建国家的象征，昌邑既废，立谁为君？此为当时汉朝廷之大事。霍光与张安世等诸大臣议论此事，未能作出决定。大将军长史、光禄大夫给事中丙吉上书霍光曰：“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宫中旁舍，妃嫔所住之处）、外家（病已先在外家史氏）者，吉前使居郡邸（即郡邸狱，巫蛊事起，病已始生数月，亦被收系于此，武帝征召丙吉治巫蛊郡邸狱）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义……决定大策！”⑫秋七月，霍光召集丞相以下百官议定所立，决定上奏皇太后请立病已为帝，皇太后诏曰：“可。”霍光遣宗正、太仆以轻车奉迎病已入未央宫，见太后，群臣奉上玺绶，即皇帝位，是为中宗孝宣皇帝。十一月，立许倢伃为皇后。

宣帝本始元年（前73）春，诏有司论定策安宗庙功，益封大将军霍光万七千户，与前所食凡二万户。车骑将军张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赐爵关内侯者八人。霍光曾表示归政，宣帝谦让不受，令诸事皆先报告霍光，然后上奏。自

昭帝时，霍光家族即权倾中外，声势煊赫，霍光兄弟、子婿、外孙皆身居要职，党亲连体。及昌邑王废，光权益重。

本始三年（前 71）春正月，许皇后死。先是霍光夫人霍显欲使其小女成君立为皇后，无由得进。会许后将娩，病，霍显因串通宫中女医淳于衍，令其于许皇后分娩后，投毒药中，许后饮药而死。事后吏捕诸医，劾淳于衍侍疾无状，收系诏狱。霍显惟恐阴谋败露，即将事件原委悉告霍光，霍光大惊。会奏疏上，霍光阅后在奏疏上题写“勿论”二字，遂寝其事。本始四年春三月，霍光女成君入宫，立为皇后。

地节二年（前 68）春，霍光病重，皇帝亲自临问，霍光上书谢恩，请求将其博陆侯国封邑三千户，封给其兄霍去病之孙霍山为列侯。当日，宣帝拜霍光之子霍禹为右将军。三月，霍光死。四月，宣帝又封霍山为东平侯，使以奉车都尉领尚书事。

明年，夏四月，立刘奭为皇太子，以丙吉为太傅，太中大夫疏广为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许广汉为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孙中郎将霍云为冠阳侯。霍显闻立许后子为太子，怒不可遏，以至呕血，曰：“此乃民间时子，安得立！即后有子（言即使霍女生子），反为王邪?”⑬乃又唆使其女成君令毒杀太子，由于太子保姆监护严密，未能得逞。霍显认为霍光生前功勋卓著，子侄、兄弟、诸婿占据权要，更加骄奢放纵，无所顾忌。

宣帝在民间时，即闻知霍氏家族权势尊盛，不知加以节制。后拜魏相为丞相，多次赐宴言事；平恩侯许广汉（宣帝岳丈）、侍中金安上等均得径入宫中奏事；又宣帝为防壅蔽，下令准许吏民得奏封事（即臣民上书，为防泄密，得以黑囊缄封）。通过以上各种渠道，颇闻霍显毒杀许后之事，但尚未完

全证实。为防霍氏放纵不制，危乱国家，乃将霍氏家族及其亲属在兵官者，一一调离原职，以损夺其权。霍禹虽保留大司马官号，但不予印绶，并罢去其右将军领兵实权。霍显及霍禹等见霍氏权势日见削夺，常相对啼泣，互相埋怨。霍山谓霍显曰："我家兄弟诸婿多不谨，又闻民间讙言（众口一声）霍氏毒杀许皇后，宁有是邪?"⑭霍显惶恐，即具以事实真相告知霍山、霍云、霍禹等。于是以霍禹为首的霍氏家族及其亲党准备先发制人，诛杀丞相魏相、平恩侯许广汉，然后废宣帝而立霍禹为帝。事发，霍云、霍山、范明友（霍光婿）自杀，霍禹腰斩，霍显及诸姊妹皆弃市；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十家。太仆杜延年以霍氏旧人，亦坐免官。八月，皇后霍氏废。霍光宗族，至是诛夷殆尽。

注 释

①②③《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④⑤⑥⑦⑧《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

⑨⑩《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⑪《资治通鉴》卷二四，汉昭帝元平元年。

⑫《汉书》卷七四《丙吉传》。

⑬《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地节三年。

⑭《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秦汉

昭宣中兴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罢轮台屯田”的罪己诏书，“深陈既往之悔”，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①，以示与民更始。武帝死后，少子刘弗陵即位，是为昭帝。昭帝年幼，一切政事听任霍光处理。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②。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昭帝始元四年（前83）颁布特赦令：“辞讼在后二年（武帝后元二年）前皆勿听治”③。昭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减免百姓田租，免收赈贷种食，诏止民出马，勿敛马口钱（牲畜税）。元凤四年（前76），昭帝行加冠礼，下令“毋收（元凤）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④。以上这些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复苏有了可能。昭帝还于始元六年召集郡国贤良文学，问民疾苦，议罢盐铁榷酤；多次派兵击败匈奴、乌桓的攻扰。

元平元年（前74），昭帝死，因无嗣子，霍光等大臣奏请

皇太后迎立在民间的刘询（原名病已）为帝，是为宣帝。宣帝幼遭巫蛊之变，被关押于郡邸狱中，后养于祖母史氏家，长期生活在民间，对民间疾苦和吏治得失多有了解，这对其即位后的施政具有直接的影响。

宣帝初即位，委政于霍光。地节二年（前68），霍光死后，宣帝始亲政事。他着力整顿吏治，强化皇帝权威。为了打破霍氏左右朝政的局面，亲政伊始，即令群臣得奏封事（古时臣下上书奏事，防有泄漏，用袋封缄），以通下情。并规定"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以傅(敷陈)奏其言，考试功能"⑤。地节四年（前66），因大司马霍禹（霍光之子）与其母霍显等谋反，诛灭霍氏家族，并废皇后霍氏，从而彻底消除了霍氏的势力。

宣帝为政，十分重视吏治，特别是地方官吏的选用，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⑥！凡拜刺史、守、相，宣帝都亲自召见，询问治安之术。其政清者辄以玺书勉励，给以褒扬。渤海（郡治浮阳，故城址在今河北沧县东南）岁饥，人民不断起事。宣帝拜龚遂为渤海太守，问"何以治渤海？"遂对曰："臣闻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唯缓之，然后可治。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从事"⑦。宣帝许之。龚遂到任，移书敕属县："悉罢逐捕盗贼吏。诸持鉏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持兵（兵器）者乃为盗贼"⑧。持兵者闻遂教令，即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农具，于是悉平，民安土乐业。龚遂开仓济民，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郡中皆有蓄积，诏狱止息。龚遂入为水衡都尉（总管治水及上林苑）。对于公卿大臣，则多从有政绩的地方官中选拔。如北海

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⑨。召信臣由郡太守迁升为少府。史称“汉世良吏，于是为盛”⑩。宣帝不仅重视官吏的选拔，也很注意以刑名（亦作形名，即循名责实之意）考核臣下。当时，一班地位很高的大臣，如平通侯杨恽、光禄大夫王迁、京兆尹赵广汉、司隶校尉盖饶宽等皆因罪被处死。太子刘奭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为持刑太深，建议重用儒生。宣帝训斥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⑪！另一方面，宣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进一步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酷法。元康二年（前64），下令赦免那些触犯他本人名讳的人。地节三年（前67），因廷尉史路温舒上书，设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四人，以慎刑狱。次年又令郡国呈报狱囚被掠笞瘐死的姓名、属县、官爵、邑里，由丞相、御史统计上奏皇帝，此外，还蠲除了一些苛法。

宣帝图治的另一重要方面，则是轻徭薄赋，发展生产。地节元年（前69），诏令假（权借）郡国贫民田。地节三年，又诏“池（陂池）籞（禁苑）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不出算赋及给徭役）”⑫。此外，还屡次蠲免和削减田租、算赋、口钱。本始四年（前70）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赈贷困乏。其令太官（秦汉时掌皇帝饮食宴会之官，属少府）捐膳省宰（屠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京师各官署之令丞）上书入谷，输长安仓，助贷贫民”⑬。地节四年（前66），郡国多被水灾，皇帝遣使循行郡国，发放赈贷。同时命令各地降低盐价，以减轻百姓负担。诏曰：“盐，民之食，而价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价”⑭。为节省转漕，而利农民，宣帝采纳大司农中丞耿

寿昌奏言："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增其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⑮。这些措施对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比较显著的效果。元康年间，由于"比年丰稔，谷石五钱"⑯，创西汉以来最低的谷价记录。

汉宣帝在位期间，对于文化学术事业也很重视。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于甘露三年（前51），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施雠、梁丘临、林尊、周堪、张山拊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讲论五经异同，由宣帝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

宣帝时，西汉王朝与周边少数族的关系大体上相安无事。神爵元年（前61），汉将赵充国击败先零羌，羌人降者逾万。次年，羌人若零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率四千余人降汉，汉政府设置金城属国，以安置降羌，从而挫败了羌豪借助匈奴势力以隔绝汉朝与西域往来通道的图谋。三年，匈奴日逐王率其众降汉，骑都尉郑吉发西域诸国五万人迎之。郑吉威震西域，遂并护车师以西北道，号都护。汉之号令行于西域，匈奴为奴役西域而设置的僮仆都尉不得不废除。甘露二年（前52），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叩塞称臣，原来畏服匈奴的乌孙及其西至安息诸国，也转而尊汉。以是边境晏然，徭役省减，为西汉政治的安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昭帝、宣帝在位期间，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匈奴和亲，百姓充实，特别是宣帝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史称中兴。

注 释

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③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⑤《汉书》卷八《宣帝纪》。

⑥⑦⑧⑨⑩《汉书》卷八九《循吏传》。

⑪《汉书》卷九《元帝纪》。

⑫⑬⑭《汉书》卷八《宣帝纪》。

⑮《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五凤四年。

⑯《资治通鉴》卷二五，汉宣帝元康四年。

盐 铁 会 议

盐铁会议是西汉昭帝时中央政府组织的一次有名的讨论国家内外政策的会议。

汉武帝元封至太初年间，桑弘羊先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农令、大司农，制定并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及酒类专卖等重要财政政策，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盐铁官营等政策也存在一些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给农民造成烦苦，迫使农民反抗斗争日益频繁。加以连年对外战争，国帑匮乏，边用不足。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武帝面对现实，不得不考虑改变其内外政策。征和四年（前 89），武帝在其所下著名的轮台诏令中提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养马者得免徭役）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西汉初年的“与民休息”政策。

轮台诏是汉武帝晚年的一项重大决策，也是他的内外政策的一个转折点。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认识并不一致。后元二年

（前87），汉武帝死，少子弗陵即位，是为昭帝。遗诏以奉车都尉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与桑弘羊、金日磾、上官桀、田千秋等共同辅政。由于武帝以后，中朝权力多在尚书，加以武帝病危时，嘱托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②。所以武帝死后，“政事一决大将军光”③。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④。为了统一大臣们的思想，保证武帝轮台诏令的贯彻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有功名的儒生）文学（地方上有名气的儒生），询问民间疾苦所在，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会议。

盐铁会议的双方代表人物，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当局，一方是霍光支持下的民间代表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汝南朱子伯、中山刘子雍、九江祝生等六十余人⑤。这次会议前后进行了两次，前一阶段可以说是正式的会议，以盐铁、均输、酒榷等官营财政经济政策之兴废为讨论主题。后一阶段是在正式会议结束后，贤良文学向丞相、御史大夫辞行时所进行的又一场辩论，可以说是前次会议的继续，这次会议是以继续抗击匈奴完成武帝遗志为主题。两次会议的内容，汉武帝时庐江太守丞汝南人桓宽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经过“推衍”，“增广”，整理成《盐铁论》一书。全书共分六十篇，各立标题，内容前后连贯，再现了盐铁会议的辩论情况。从《盐铁论》全书看来，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民间疾苦的原因问题。文学首先提出：“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⑥又说：“山海者，财用之宝

路（重要来源）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生命线）也。……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夫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⑦因此，文学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⑧，将从事盐铁等事业的劳动力都调回到农业上去，认为这是“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之道，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文学所说的“进本”，就是重农，“退末”就是抑商（按此指官营商业），这是他们反对盐铁等官营政策的理论根据。贤良也对盐铁官营进行了非议，一则曰：“县官（朝廷）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务必符合指标），不给（给，通洽；不给，不合之意）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痛快）。是以农夫作剧（劳作繁重），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⑨再则曰：“卒徒工匠，故（从前）民得占租（依法向政府缴纳租税）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价），器和利（锋利）而中用（合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质劣），用费不省，卒徒烦（烦苦）而力作不尽（不尽力工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⑩

除盐铁官营政策外，文学还对桑弘羊推行的均输平准政策进行抨击说：“间者（近来）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与百姓讨价还价，从中取利）。……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官府乱发号令），阖门擅市（垄断市场），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各官署自采所需物资），则吏容奸豪（官吏和奸商互相勾结）。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囤积居奇），轻贾（不法商人）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⑪

对于国家铸钱，算缗告缗等政策，贤良文学也持指责态

度，认为这些政策的实行将“与人以患”。最后在辩论言行问题时，贤良认为“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放弃盐铁官营政策），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⑫。

御史大夫桑弘羊坚定地站在捍卫官营、反对私营的立场，对贤良文学的主张进行了答辩。他对贤良文学所提到官营事业中的一些流弊，并不完全否认，他说：“故扇水（地名，今址不详）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质量优良）’，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⑬。他认为盐铁官营政策在执行中的一些流弊，是由于某些不良官吏造成的，不能因此即加以否定。他提出盐铁官营政策应当继续实行的理由如下：

第一，桑弘羊从封建国家的法权观念出发，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山林川泽等自然资料，为最高封建统治者所占有，乃为理所当然之事：“家人（即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⑭

第二，有利于抗击匈奴，巩固边防。桑弘羊说：“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侵掠）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指中原地区）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俘虏）也，故修障塞（防御据点），饬（整修）烽燧（烽火燧烟），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增加货财收入），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守备）之用，使备乘塞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⑮

第三，有利于国计民生，征外安内。桑弘羊所处的时代，正是西汉政府大举反击匈奴入侵的时代。汉武帝用兵数十年之

久，每次出兵动辄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军费开支相当巨大，仅元狩四年（前 119），汉武帝为奖赏卫青、霍去病两路出击匈奴大军的有功人员即用去五十万金⑯。而这些费用都需出自官营事业之利入。故桑弘羊说："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⑰。元狩三年（前 120）秋，"山东（指函谷关以东）大水，民多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kuài 快，堆积秣草的房舍）以赈贫民"⑱。桑弘羊据以回答文学说："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当作贾万物，意为买卖各种货物）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⑲

第四，有利于摧抑豪强兼并之路，维护国家统一。桑弘羊以为"权利之处，必在深山大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⑳。为摧毁地方割据势力的物质基础，桑弘羊主张由国家统一盐铁，禁止人民私铸钱币。他说："只有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㉑。实行官营，乃所以"抑制兼并"，"排富商大贾"，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㉒，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有益的。

二、关于对匈奴的和战问题。在此问题上，桑弘羊与贤良文学持完全相反意见。贤良文学以"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作为理论根据，攻击反匈战争是"废道德而任兵革，……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㉓，造成"田地日荒，城廓空虚"㉔。他们指出"苦师劳众"的原因，"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指天子）计过

也”㉕。甚至指名道姓地攻击桑弘羊的抗匈主张说：“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越王勾践破擒吴王夫差），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议，听君之计，吴越王之任种（文种）、蠡（范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疲备）之效，匈奴不为加俛（俛，同俯，加俛，更加屈服），而百姓黎民以弊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㉖

因此，贤良文学认为，“方今为县官计者，莫名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修文德而已”㉗。只有如此，才能使“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㉘。“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恃（疲劳人民）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㉙。

桑弘羊坚决反对贤良文学对匈奴和亲的主张。他总结了西汉历史上的和亲政策并未能制止匈奴侵扰的经验和教训。他说：“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馈赠）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改变入侵行为），而暴害滋甚。先帝（指武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坏，故广将帅，招奋击（招募奋勇杀敌的武士），以诛厥罪。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府（收藏档案之所），何命（何谓）亡十获一乎。”㉚指出匈奴“贪侵盗驱（贪得无厌，掠夺人畜），长诈谋（崇尚诈谋）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㉛，对如此一贯背信弃义的敌人，只有通过战争加以制服，“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㉜。

桑弘羊还指出，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兴义兵，以诛

暴强"的民族自卫战争，是"所以匡难避害，以为黎民远虑"㉝的正义战争，并非为了横斥地开辟疆土。虽然进行反击战，要付出一定代价，但终于制止了边患，保证了汉朝的安全，"初虽劳苦，卒获其庆"㉞。

桑弘羊对抗击匈奴战争的一些论点及对贤良文学的争辩，基本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因此是具有说服力的。但在昭帝时，形势已有所变化，匈奴在元狩四年（前119）漠北之战后，已然远遁大漠以北，对汉朝的威胁已大大减弱，加以汉朝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倘再坚持出兵彻底降服匈奴，就显得与轮台诏令精神有些不合。

三、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理论思想问题。贤良文学信奉儒家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用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他们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说："二世信赵高之计，深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欺压）民重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期（约定）俱起方面而攻秦，闻不一期（不到一年）而社稷为墟。乌在其能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㉟因此得出结论说："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㊱

贤良文学还认为，严刑峻法，酷吏政治，只能增加犯法人数，造成社会动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深或浅，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㊲。加以"当今所谓良吏者，……文诛假法（深文罗致，假借法令），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

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38]，更加激起人民的不满和反抗。最后他们向桑弘羊提出警告说：“严刑峻法，不可久也。”[39]

桑弘羊与贤良文学相反，他祖述法家，崇尚法治。他以为古今时势不同，因而用以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也应有所不同。他主张根据现实情况决定施政方针，所谓“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刓弊（刓音完，刓弊，谓百姓贫弊，为巧诈以避法也。）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40]。是不会收到实效的。他认为法乃至高无上之原理，有法则治，无法则乱。“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网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41]。他的助手御史们也补充说：“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并举“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42]，作为论证。

桑弘羊不但主张以法治民，而又特别强调严刑峻法。他举商鞅为例说：“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饰政教，奸伪无所容，”[43]“商君刑（罚）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枷），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44]

桑弘羊坚持的法治主张，是与前面所说的经济政策相联系的。他主张法治，固然是为了镇压人民的反抗，同时也是为了保证他所提倡的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实施。如他的助手御史在发言中说：“张廷尉（武帝时酷吏张汤）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并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暴虐）寡。大夫各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

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征而用足。”㊺

此外，这次会议上的争论还涉及到农业的基本政策，对儒家学派的评价，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对接待外宾的礼节等问题。

盐铁会议反映了西汉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特别是轮台诏令发布后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会后虽然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却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最后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㊻。“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了肯定，对“昭宣中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　释

①《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下。

②《汉书》卷六八《霍光传》。

③《汉书》卷六六《田千秋传》。

④《汉书》卷七《昭帝纪》。

⑤桓宽《盐换论·杂论》。

⑥《盐铁论·本议》。

⑦⑧《盐铁论·禁耕》。

⑨⑩《盐铁论·水旱》。

⑪《盐铁论·本议》。

⑫《盐铁论·能言》。

⑬《盐铁论·复古》。

⑭《盐铁论·禁耕》。

⑮《盐铁论·本议》。

⑯《史记》卷三十《平准书》。

⑰《盐铁论·非鞅》。

⑱《资治通鉴》卷一九，汉武帝元狩三年。

⑲《盐铁论·力耕》。

⑳《盐铁论·禁耕》。

㉑《盐铁论·错币》。

㉒《盐铁论·轻重》。

㉓《盐铁论·本议》。

㉔《盐铁论·未通》。

㉕《盐铁论·地广》。

㉖《盐铁论·伐功》。

㉗《盐铁论·击之》。

㉘《盐铁论·结和》。

㉙《盐铁论·击之》。

㉚《盐铁论·结和》。

㉛㉜《盐铁论·和亲》。

㉝《盐铁论·结和》。

㉞《盐铁论·诛秦》。

㉟《盐铁论·诏圣》。

㊱㊲《盐铁论·刑德》。

㊳《盐铁论·申韩》。

㊴《盐铁论·诏圣》。

㊵《盐铁论·大论》。

㊶《盐铁论·刑法》。

㊷《盐铁论·申韩》。

㊸《盐铁论·非鞅》。

㊹《盐铁论·刑法》。

㊺《盐铁论·轻重》。

㊻《盐铁论·取下》。

秦汉

赵充国招抚西羌

羌族是我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散居在今甘肃、新疆南部，青海、西藏东北部和四川西部。远在先秦时，羌人已见于我国古代文献记载："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①羌人有火葬习俗，"羌人死，燔而扬其灰"②。战国初年，羌人无弋爰剑（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称雄于河、湟间，爰剑及其子孙，从此即成为羌人世袭酋长。以后羌人人口逐渐增殖，分为很多部落，"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③。

西汉初年，匈奴强大，羌人臣服于匈奴，一部分请求内迁。汉景帝允许研种（爰剑五世孙研时武力最强，固以为种号）留何率族人迁于陇西郡狄道（今甘肃临洮）、安故（今甘肃临洮南）、临洮（今甘肃岷县）、氐道（今甘肃西和西北）、羌道（今甘肃岷县南）。为了反击匈奴侵扰，汉武帝在河西列置四郡，以隔绝羌人与匈奴的联系，并派军队进入湟中（今青海湟水两岸一带），在今甘肃永登县境筑令居塞。羌人曾与匈

奴连兵十余万攻令居塞，围枹罕（今甘肃临夏西南），汉遣李息等率兵十万征服了羌人，并设护羌校尉统领。昭帝时，又置金城郡，辖地西及湟源，南至夏河。

宣帝时，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神爵元年（前61），汉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行视诸羌，“安国至，召先零诸豪三十余人，以尤桀黠者皆斩之，纵兵击其种人，斩首千余级”④。于是诸降羌及归义侯杨玉等恐怒，遂联络小种背叛犯塞，围攻城邑，杀汉长吏。安国为羌人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重，退至令居，将上述情况上报朝廷。时赵充国年已七十余，自荐将兵到金城，解决西羌问题。

赵充国（前137—前52），字翁孙，原为陇西郡上邽（今甘肃天水）人，后徙金城郡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早年为骑士，以六郡（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大略，熟读兵法，明晓周边少数民族事务。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李广利进击匈奴，为匈奴骑兵包围，汉军乏食数日，死伤甚多。赵充国率百余名壮士陷阵突围，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大军因此解围。以战功拜为中郎，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充国以大将军护军都尉将兵击定武都氐人，迁中郎将，还为水衡都尉。又领兵出击匈奴，俘西祁王，擢升为后将军兼水衡都尉。后与大将军霍光定策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年间（前73—前70），又以蒲类将军征匈奴，斩获数百级，还为后将军、少府。

是年六月，赵充国至金城，其时虽有骑兵一万余人，可以渡河进击；但为慎重计，他当夜派遣三名校尉衔枚先渡，渡河后，即建立营阵，大军相继于天明前依次渡河完毕。羌骑约百人来至汉军营旁，赵充国疑为羌人诱兵，不许军士出击。至

夜，充国率军登上落都山（今青海乐都县附近），召集诸军校司马说："假如羌人派出几千人马拒守四望陿（今青海乐都县东南）中，我兵岂得进入，以是知羌人不晓用兵之道。"赵充国率军出征，无论行止都能随时保持戒备状态，并且常以远斥候（侦察兵）为务，行必为战备，止必坚营壁，先计而后战。由于他能够持重，爱惜士卒，因此士兵都乐为其效力。羌人虽然几次派兵挑战，但充国坚守不动。先是罕（同罕）、幵（jiān坚）首领靡当儿使其弟雕库至金城向汉西部都尉告密说"先零欲反"。后数日，果反。雕库有不少种人在先零军中，都尉乃扣留雕库以为人质。赵充国欲以威信招降罕、幵及被劫掠者，以瓦解羌豪阴谋，俟其疲剧，然后出兵进击。乃遣归雕库使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天子告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斩，除罪，仍以功大小赐钱有差，又以其所捕妻子、财物尽与之。"⑤

是时，汉宣帝已经征集内部兵屯边者六万人，准备进攻西羌。酒泉太守辛武贤为希功邀赏，奏请朝廷于七月上旬进兵，攻打罕、幵，"夺其畜产，虏其妻子，复引兵还，冬复击之"⑥。他认为汉兵频繁出击，羌人必然因震惊而破败。汉宣帝将辛武贤的奏疏交与赵充国，令其与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共同研究，是否可行。充国及长史董通年以为，汉军迂回千里，深入击羌，大军粮草转输困难，羌人如据险守隘，以绝粮道，必有伤危之忧。辛武贤以为"可夺其畜产，虏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计也"⑦。赵充国提出宜"捐罕、幵闇昧之过，隐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诛以震动之"，罕、幵当能悔过反善，因而赦免其罪，再选择良吏进行抚集，这样可全师保边，实为上策。宣帝乃下其书与公卿大臣讨论，议者咸以为先零兵盛，

而又凭藉罕、幵之助，如不先破罕、幵，则先零亦未可图。于是宣帝乃拜侍中许延寿为强弩将军，拜酒泉太守辛武贤为破羌将军，并赐玺书表扬其进攻之策。同时以诏书责备赵充国"欲以岁数而胜微（久历年岁，乃胜小敌）"，令其引兵与辛武贤并进击羌。充国以为将任兵在外，宜便宜从事，以安国家。乃上书谢罪，并向宣帝陈述攻守利害，以为先零首帅杨玉欲为背叛，故与罕、幵解仇结约。如果先击罕羌，先零必然来援。击之并无必胜把握，反使先零得以施德于罕羌，以坚其约。羌兵联合，兵马增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⑧。为今之计，宜"先诛先零已，则罕、幵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幵不服，涉（到）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⑨。宣帝览毕奏书，批准赵充国的计划。

赵充国率汉军来到先零屯兵处所。羌人由于屯驻日久，不见汉军动静，不免懈弛，望见汉军，皆惊慌放弃车重，欲渡湟水逃走。由于道路险狭，赵充国命令军士徐徐追赶。有的部属认为宜急行追赶，赵充国喻诸军校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回顾），急之则还致死（返还尽力死战）。"⑪在汉军追击下，羌人赴水溺死者数百人，投降及被斩杀者五百余人，汉军虏获马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大军到达罕地，赵充国下令军士不许焚烧居所及于田中樵采放牧。罕人闻知，喜相谓曰："汉果不击我矣！"羌帅靡忘前来归服，充国赐给饮食，欲遣其归谕种人，充国部属皆认为"反虏不可擅遣"。正在争论间，汉宣帝玺书到来，准靡忘将功赎罪。由于汉政府及赵充国对羌人的政策得当，罕羌竟不烦兵而下。

其年秋，充国病，宣帝赐书慰问，并命破羌将军辛武贤至

屯所，作为赵充国副手，诏令十二月进攻先零羌。当时羌人降汉者已达万余人，充国料其最后必然败坏，欲撤还骑兵进行屯田，以待羌人之敝。奏未及上，会得进兵玺书。充国子中郎将赵卬忧惧，恐拂宣帝意旨，使客谏充国因疾留屯，不必上书争论。充国叹息说："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为忠言。"遂上屯田奏，大意说："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臣愿罢骑兵，留步兵分屯要害处，人二十亩，益积蓄，省大费，谨上田处及器用簿。"⑪宣帝览奏，报曰："皇帝问后将军，言欲罢骑兵万人留田，即如将军之计，虏当何时伏诛，兵当何时得决？熟计其便，复奏。"⑫充国上书陈述说："今虏亡其美地荐（稠也）草，愁于寄托远遁，骨肉离心，人有叛志，而明主班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⑬。因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九部），吏士万人，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虏，令不得归肥饶之地，贫破其众，以成羌虏相叛之渐，二也。居民得并田作，不失农业，三也。军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岁，罢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谷（从水上运粮）至临羌，以示羌虏，扬威武，传世折冲（击退敌人）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伐材，缮治邮亭（古代递送文书歇宿的馆舍），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侥幸（言不可必胜）；不出，令反叛之虏窜于风寒之地，离（遭遇也）霜露、疾疫、瘃堕（因寒冷而堕指，瘃音竹）之患，坐得必胜之道，七也。无经阻（经历险阻）、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重，外不令虏得乘间之势，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幵、小幵（皆羌种名）使生他变之忧。十也。治湟陿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

制西域，伸威千里，从枕席上过师（桥成军行安易，若于枕席上过也），十一也。大费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⑭宣帝对充国所奏仍有疑虑，再次赐报曰：“兵决可期月而望者，谓今冬邪，谓何时也？将军独不计虏闻兵颇罢，且丁壮相聚，攻扰田者及道上屯兵，复杀掠人民，将何以止之？将军熟计复奏！”充国奉命复奏曰：“先零羌精兵，今余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冀，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他最后恳切地向宣帝表明心迹说：“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穷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无尺寸之功，媮（苟且也）得远嫌之便（即无违旨之嫌），而无后咎余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⑮

赵充国的奏疏每次送达朝廷，宣帝辄令群臣讨论。初时同意充国奏议者不过什三，后什五，最后则至什八。宣帝诘问前时反对赵充国的大臣，皆顿首服。丞相魏相说：“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指充国）数画军策，其言常是，臣任（保也）其计必可用也。”宣帝于是赐书充国，嘉纳其议，并令其上报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字。同时，考虑罢骑兵后，恐羌人乘机进犯，亦以破羌、强弩将军数言当击，于是两从其计，诏破羌将军辛武贤、强弩将军许延寿与中郎将赵卬出击。结果许延寿降羌四千余人；辛武贤斩首二千级；赵卬斩降二千余级；充国所降复得五千余人。宣帝下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

神爵二年（前60）夏五月，赵充国奏言：“羌本可（大约）五万人军，凡斩首七千六百级，降者三万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饿死者五六千人，定计（以定数计算）遗脱与煎巩、黄

羝（皆羌小种）俱亡者不过四千人。羌靡忘（羌首领）等自诡必得（言自己可以承担追回逃亡之责），请罢屯兵！”宣帝同意他的奏请。赵充国整军而还。

同年秋，羌首领若零、离留、且种、儿库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首级及诸羌豪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皆率煎巩、黄羝之属四千余人降汉。汉朝廷封若零、弟泽二人为帅众王，其余皆为侯、为君。始设置金城属国以处降羌。汉政府的以上措施，促进了羌族地区的发展和羌、汉两族的融合。终西汉之世，我国西部边境地区，比较安定，与赵充国的经略，有一定关系。

注 释

①《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②《太平御览》卷七九四引《庄子》。

③《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④《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⑤《资治通鉴》卷二六，汉宣帝神爵元年。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汉书》卷六九《赵充国传》。

秦汉

经今古文之争

儒学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著作，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训释和阐发，形成了经学。

汉朝自武帝以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授出现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往往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为了进一步统一儒家学说，加强思想统治，诏萧望之、刘向、韦玄成、薛广德等儒生，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异同，由他亲自裁定评判。经过这次会议，博士员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谷梁”。到了宣帝末年，五经共有十二家博士①。博士就是经师，他们的任务是记诵和阐释儒家经典。他们解经繁密驳杂，有时一经的解释达百余万言。博士有弟子，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以后递增，成帝时多至三千人，东汉顺帝时甚至达到三万人。经学昌盛和博士弟子众多，主要是由于经学从理论上为汉朝的统治进行了辩护，因此

统治者对儒生实行了广开“禄利之路”②。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搜集与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敕令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同时设写书之官抄写书籍。当时集中的图书数量颇多，外廷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宫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③，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已初具规模。以后，汉成帝命陈农访求天下遗书，从此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日益丰富。成帝以图书既多，杂乱无章，乃派员分别整理而以刘向总其事。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任宏校兵书，尹咸校数术（占卜之书），李柱国校方技（医药之书）。每一书校毕，都由刘向条成篇目，写出提要。后刘向子刘歆继承父业，完成这一工作，并且总括群篇，撮其指要，写出了《七略》一书：《辑略》（诸书总要）、《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总共著录图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大致都保存在《汉书·艺文志》中④。

刘歆在校书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经书的不同底本，因而导致了经学内部今文经和古文经的区分和两派的争论。原来西汉博士所传述的儒家经典，是根据战国以来学者师徒父子口耳相传，用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记录，到汉代才一一写成定本。而民间却仍有用秦以前古文字写成的经书，相传出于孔子住宅壁中和民间。如武帝末，鲁共王（刘馀）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礼》和《论语》、《孝经》等，都是用古文字书写的，因被称为“古文经”。而原来用隶书字体写的便被称为“今文经”。

今文经和古文经不仅字体不同，篇章多少不同，而且对经学内容的解释也有很大差异。今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致用”，着重章句推衍，结合阴阳五行灾异和刑名学说来

发挥经文的“微言大义”，提倡大一统、尊君抑臣、正名分等思想。其特色是结合当时政治需要为现实服务。古文经学解释经义，主要在于“通经识古”，详于训诂，把儒学经典视为古代历史资料，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借题发挥。它在理论上没有重大发明，但在认辨解释先秦文字的过程中，建立了系统的训诂方法，有一定的贡献。今文经出现较早，董仲舒以治今文经《春秋公羊传》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在他的建议下，今文经陆续被立为学官。如《诗》有鲁、齐、韩三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丘、京；《礼》有大、小戴；《春秋》有严、颜（均为公羊家）等，都先后被立为博士⑤。古文经晚出，遭到今文经派的排斥，长期不得立于学官。

西汉末年，刘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⑥，以与今文博士相抗衡。哀帝命他与五经博士讨论，但博士们多不赞成，或不肯表示意见，或说《尚书》二十九篇已完备，或说左氏不传《春秋》。刘歆因而写了一篇著名的《让太常博士书》，他一方面攻击今文经传是“因陋就寡”，“保残守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残缺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⑦的缘故。另一方面则竭力宣传古文经传的可靠，认为它可以补现有经传的残缺，如《古文尚书》较伏生所传多十六篇等；它又可以校补现有经传的脱误，较现有经传为可信。如刘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⑧。由于刘歆言词激切，遭到今文学家和当权官员们的怨恨和猛烈攻击。当时任大司空的儒者师丹，对于刘歆的主张极力反对，向哀帝表奏刘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⑨。刘

歆虽未遭到哀帝斥责，但由是忤执政大臣，刘歆惧诛，求出补吏，从此离开长安，到外地任职，这次争论以无结果而告终。此后，经学出现了今文和古文两个派别，争论异常激烈。

原来，汉朝自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通晓儒家的“五经”，就成为人们仕进的重要途径。武帝还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⑩。当时所建立的学官，大抵是今文经学家。由于今文家的学说受到了国家法令的提倡，士子们当然趋之若鹜，国家选拔官吏，也大都以这些学说为准则。久而久之，朝廷中的大臣，自然也以今文经学的信徒为主。这些人一旦进入仕途，自然要把自己信奉的说法视为唯一合于孔子之道的“真理”。学派门户之见与利禄之争交织在一起，相持不下。

平帝时，王莽当权，由于托古改制的需要，刘歆借机把《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毛诗》立于学官，后又立《乐经》为博士，《周官经》六篇也立为博士，古文经学逐渐成为官学。

东汉光武帝即位，聚集四方学者于京师洛阳，废除王莽时所立的古文经博士，复立今文经十四博士，建武年间，大司徒韩歆又提出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又引起一场争论，最后由光武帝决定立《左氏春秋》为博士，因“群议讙哗”，不久又废。章帝时，曾在洛阳北宫白虎观，召集群儒讲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主持，并作结论。白虎观会议的结果，由著名史学家班固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它集中了今文经学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了解汉代今文经学的重要资料。终汉之世，古文经没有再立于学官。可是由于古文经学在内容上胜过今文，再加上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家中出了几位大师，如贾

逵、服虔、马融、郑玄等都是古文家或兼通今古。马融是马太后（明帝皇后）的侄子，贵族地位足以保卫他的经师地位。他学问广博，通各经，门下有好几千名学生，因此，古文派地位就更高了。他的学生郑玄，名望尤高。在马融、郑玄兼采今古文注经的影响下，今古文渐趋于混同。汉末，经董卓之乱，博士失官守近三十年，今文经学遂日益衰微。

注　释

①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观堂集林》卷四。

②《汉书》卷八八《儒林传赞》。

③《汉书》卷三O《艺文志》如淳注引刘歆《七略》。

④《隋书·经籍志》作三万三千九十卷。

⑤参见周予同：《经今古文学》。

⑥⑦⑧⑨《汉书》卷三六《楚元王传》。

⑩《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秦汉

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年代遥远，今日欲考出其确切年月，已不可能。但据有关文献记载，可能大体上确定其在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

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至五世纪的古印度，开始主要流行于恒河中上游一带地方。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及其以后，佛教向印度各地以及周围国家传播，向南传到斯里兰卡和东南亚国家；向北传入大夏、安息并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域各国传播。汉武帝打通西域交通以后，佛教逐渐传入中国内地。在西汉末年，西域各国到汉的外交使节、侍子以及商人中可能已有一些佛教信徒。三国时魏国鱼豢所著《魏略·西戎传》（《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博士弟子景庐（《魏书·释老志》作'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曰复立（《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文作"复豆"）者，其人也。《浮屠》所载临蒲塞、桑门、伯闻、疏问、白疏间、比丘、晨门，皆弟子号。"①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的国家之一，直接派僧侣来中国首都向博士弟

子口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说明佛教已引起当时社会上某些人们的注意。这是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东汉初年，在统治阶级上层已有信奉佛教者。当时人们把佛教这种外来宗教看做是中国流行的各种神仙方术中的一种，把佛陀依附于黄老进行祭祀，以祈求祥瑞。《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记载：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诏令天下死罪皆入缣赎。英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代表朝廷主持封国政务之官员）曰：'托在蕃辅，过恶累积，欢喜天恩，奉送缣帛，以赎愆罪。'"国相立即将此情况上报皇帝。明帝下诏书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即优婆塞——男信士）、桑门（沙门）之盛馔。"并把这个诏书下达给各封国的国傅。

以上记载，是中国正史中最早的佛教掌故。中国人信仰佛教之见于史籍者，楚王刘英是第一人。楚王英为光武帝之子，建武十七年（41）被封为楚王。史籍揭示楚王英信仰浮屠之教，为永平八年。其信奉浮屠之始，当更在永平八年之前。由此可知在明帝永平八年之前，中国已有佛教传入，但它只是作为当时流行的重视祭祀的黄老方术之一种，成为当时一部分中国人民之信仰，在社会上没有发生重大影响。可是，从明帝给楚王英的诏令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佛教，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默认，甚至给予以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流传着汉明帝永平年间因梦见佛陀而派人到西域求法的说法，并以此作为佛教正式传入我国的开始。这种说法几乎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承认。例如：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给石虎奏议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②唐太

宗《三藏圣教序》有："大教之兴，基于西土，腾汉庭而皎梦，照东域而流慈；"③唐代著名古文家韩愈在其上给宪宗的《论佛骨表》中也有："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汉明帝时始有佛法……。"

从现有资料进行考察，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之说，虽然带有一些虚构成分，但其基本情节还是比较可信的，只不过它不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只能说明印度佛教进一步向中国传播而已。

关于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的记载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其中最早的记载是著于东汉的《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佛教语，泛指一切有生命者）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此外，东汉末年的《牟子理惑论》、晋王浮《老子化胡经》、东晋袁宏《后汉纪》、宋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南齐王琰《冥祥记》、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梁慧皎《高僧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东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等书，皆有明帝感梦求法的记载，但在时间和细节上各有不同。这主要是由于东汉以后，佛教与道教的斗争激烈，佛教徒为了抬高佛教的地位，有意添枝加叶，把汉明帝求法的故事尽可能地完备起来的

缘故。如佛教徒鉴于传说中汉明帝派遣的使者中有"张骞"的名字，惟恐与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张骞相混淆，而遭到论敌的攻击，因而便把张骞的名字删除，而易为蔡愔，王琰的《冥祥记》就是这样改的。

佛教虽在西汉之际已传入中国内地，但发展极为缓慢。根据现存可靠资料，在东汉末年以前，除传说西汉哀帝时大月氏使者口授的《浮屠经》和东汉明帝时译者不明的《四十二章经》以外，没有其他佛经传译。而到东汉末年，由于儒家思想统治地位动摇，对人们的束缚力量下降，佛教思想有机会与其他各家思想同时传播；而且由于社会长期动乱不定和危机严重，它可以与老庄的消极无为和悲观厌世思想一起受到人们的欢迎。东汉桓帝时，安息僧人安世高来到东汉首都洛阳，译出小乘佛教基本经典《阿含经》的许多单品（章）小经。他是佛教经典的第一个中文翻译家。据梁启超说："其书传于今者，真伪合计，尚三十余种，其为中国佛教开山之祖，固无待言"④。旧说安世高翻译佛经时住在洛阳，并且还有一位中国人临淮（今安徽宿迁西北）严浮调做他的助手。安世高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到处宣传佛教教义。灵帝末年，中原战乱，安世高避乱到江南传教，最后死于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从安世高起，那些用古印度文字所写的佛经，才第一次有几种中国文字的译本。

安世高所译佛经多属小乘佛教。所谓"小乘"是公元前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乘"是梵语运载物（如车、船）的意思。大乘佛教自称能运载无数众生超脱苦海，达到彼岸，而说小乘佛教只能运载少量生灵达到彼岸。安世高所译经籍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小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和

修行方法，中国内地早期佛教信徒可以通过这些经籍加深对佛教的理解。因其所译经典“义理明析，文字允正”⑤，在佛教史上很有影响。

在中国第一次把大乘般若学⑥传入汉地的僧人是支娄迦谶，简称支谶，原籍大月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讽诵群经，志存宣法”⑦，于汉桓帝建和元年（147）来到洛阳，至灵帝中平年间（184—189），共译出佛经十四（或作十五）部。他也有两个中国人做助手，一是洛阳孟福（字元士），一是南阳张莲（字少安）。从此看来，当桓、灵之际，中国已有不少佛经中文译本，这就说明当时的佛教，已经渐渐成为中国人的宗教。

注　释

①从《魏略》对《浮屠经》的解释来看，最早的《浮屠经》大概叫做《复豆经》，引文中的“复立”当按照《世说新语》注的引文改作“复豆”（宋徐铉《说文解字》注，“豆”、“徒侯切”），与“浮屠”（佛陀）同音，而在佛教流行以后才按当时的译法改为《浮屠经》。由于它是早期的翻译佛经，在使用词语方面很不规范。

②梁慧皎：《高僧传·佛图澄传》。

③唐道宣：《广弘明集》卷二二。

④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饮冰室文集》卷五九。

⑤梁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三《安世高传》。

⑥般若学：魏晋时期与禅学并行的佛学两大派别之一。禅学偏重宗教修持，主要流行于北方；般若学偏重教义的研究，主要流行于南方。

⑦梁慧皎：《高僧传·支娄迦谶传》。

秦汉

王莽托古改制

在西汉和东汉历史之间，有一个历时十五年的新朝，这个代汉建立新朝的篡窃者，就是汉朝的外戚王莽。王莽夺取政权后，打出复古的旗号，进行“改制”，历史上称作“王莽改制”。

西汉后期，当权的一些贵族官僚，不是骄奢淫逸，便是贪婪成性，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沦为官私奴婢，社会险象丛生。成帝时，西汉王朝已经走向崩溃的道路。当时，在一般人民乃至中下层官吏中间，都希望能有一个比较正派的人物出来执掌朝政，改变这种混乱状况。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这个志大才疏的野心家，认为天与人归，时机成熟，便破门而出，粉墨登场，用阴谋手段做起皇帝来。

王莽字巨君，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因为孝元皇后的裙带关系，外戚王氏家族在元帝、成帝时期长期地把持朝廷大权，这就为王莽后来篡夺政权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3年，汉成帝刘骜即位，皇太后王氏专权，以其兄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河平二年（27），王凤的五个弟弟谭、商、立、

根、逢时同日封侯。时人谓之"五侯"。王莽之父王曼早死，未得封侯，故王莽早年生活不如诸父兄弟。他自知孤贫，"因折节为恭俭，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①。其伯父王凤病危时，"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②。以此获得姑母和诸伯叔的欢心。王凤临死前，把他托付给王太后和成帝，使他做了黄门郎，不久，又升迁为射声校尉。永始元年（前16），元后要成帝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王莽嗣爵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近臣）。王莽虽封侯，而态度愈益恭谨，以邀取名誉。他倾家财赈施宾客，招纳名士，结交公卿大夫；又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的罪过，获得了忠直的名声。成帝绥和元年（前8），在他姑母的安排下，王莽代王根为大司马。他爵位愈尊，矫情伪饰愈甚。妻子见客，衣不曳地，布蔽膝，人以为使婢。第二年，成帝死去，刘欣以元帝庶孙继承皇位，是为哀帝。哀帝祖母傅氏和母亲丁氏两家外戚集团因近亲关系把持朝政。王莽暂时告退回到自己的封国，伺机再起。哀帝是一个短命天子，只做了五年皇帝就死去，元后即日收取了皇帝玺印，召王莽进宫，于是王莽在元后的诏令下重新做了大司马辅政。公元1年，王莽奉元后命立中山王刘衎〔kǎn 侃〕为帝，是为平帝，年仅九岁。元后以七十二岁高龄临朝称制，一切政事悉由王莽处理。

王莽在受命辅政以后，便积极扩大和巩固王氏集团势力，排除和消灭异己。凡是与王莽不合的人，都"傅致其罪"，罢去官职，甚至连他的叔父王立也遭到他的排斥，被遣就国。于是"附顺者拔擢，忤恨者诛灭，以王舜、王邑为腹心，甄丰、甄邯主击断。平晏领机事，刘歆典文章，孙建为爪牙"③。西

汉政权已为王莽集团所控制。王莽常以周公自命，他对圣经贤传中所记周公辅成王而后来自己即于王位的故事，甚感兴趣。传说中谓周公摄政时，交趾南面曾有越裳国前来中国献白雉，王莽也于平帝元始元年（1）遣人示意益州（今云南晋宁县）塞外蛮夷，自称越裳氏重译来汉廷，献白雉一，黑雉二，以符合于周公的故事。王莽奏请元后下诏，用白雉祭祀宗庙。于是群臣盛陈王莽功德，实无异于周公辅佐成王；周公托号于周，王莽有定国安汉之功，宜赐号为"安汉公"。元后乃下诏封王莽为太傅，号曰安汉公，位在三公之上。

王莽被晋封为安汉公后，便利用太后的宠信，笼络大小官僚，大封其集团党羽，以扩大并巩固自己的势力。他奏请增加大臣们的俸禄、爵秩，续封宗室后裔因罪失爵者，使之重新得到封邑。朝臣皆秉承王莽旨意行事，使莽声望日隆。不久，又示意公卿奏言"太后春秋高，不宜亲省小事"，元后乃下诏曰："自今以来，惟封爵乃以闻，他事安汉公四辅（王莽为太傅，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甄丰为少傅，称四辅）平决。州牧、二千石及茂才吏初除奏事者，辄引入，至近署对安汉公，考故官，问新职，以知其称否。"④是时王莽的权势已与皇帝不相上下。

为了控制宫闱，以固其权，王莽又发动爪牙，假借民意，请立其女为平帝后。元始三年（3）春，有司奏请："故事：聘皇后，黄金二万斤，为（合）钱二万万。"⑤王莽表示辞让，只受四千万，而以其余部分分给十一媵家（陪嫁人家）及九族贫者。按照古礼，皇后之父应有百里之封。王莽之女既被立为皇后，于是又有人请以新野之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益封给王莽，以满百里之数。王莽之志原不在百里，因而故辞不受，欲以辞

封邀取名誉而实现其代汉自立的目的。据说是时“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者，前后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见者（被接见的）皆叩头言，宜极加赏于安汉公”⑥。王莽的党羽大司徒司直陈崇为迎合王莽，使张敞（汉宣帝时名臣）之孙张竦草奏，盛称王莽功德，几乎把圣经贤传上的美词引用殆尽，然后建议：“宜恢公(指王莽)国令如周公，建立公子(长子)令如伯禽，所赐之品亦皆如之。”⑦元始四年（4）春，太保王舜等及吏民八千余人向元后上书说：“伊尹为阿衡，周公为太宰”，莽兼二人之德，宜封为宰衡。朝廷照准。王莽又佯做辞让，最后元后下诏：“尚书勿复受公之让奏，”王莽才视事就职。自是王莽爵为新都侯，号为安汉公，官为宰衡、太傅、大司马，真可谓爵贵号尊官重矣。

王莽为了笼络知识分子，在就宰衡之年，“为学者筑舍万区（小室）……征天下通一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即《史籀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⑧。这些异能之士后来都成为王莽的号筒。

这年秋季，王莽派遣分行天下的八名观风使者回到洛阳，称说“天下风俗齐同”，并假借郡国百姓名义，制造歌谣三万言，称颂王莽的功德。王莽在朝廷的声威愈隆。于是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张纯等九百零二人，奏请赐王莽九锡。元后照准。王莽从皇家领受了衣服、车马、弓矢、斧钺、秬鬯（音巨畅，美酒）、乐器、朱户、纳陛、虎贲等九种显示尊荣的赏赐和权益，开了后来大臣受尊宠的先例。

王莽受封为安汉公，官居宰衡，与周公在西周时的地位很

相像，他本人也很希望成为周公。于是泉陵侯刘庆上书说："周成王幼少，称孺子，周公居摄。今帝富于春秋，宜令安汉公行天子事，如周公。"⑨刘庆的奏书一上，群臣争相附合。当王莽日益走近皇帝宝座时，这个"富于春秋"但不是孺子的平帝，只得夭折而亡。王莽从刘氏皇族中找了一个年仅两岁的广戚侯刘显的子婴，立为皇帝。紧接着"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⑩的符命天书，就应时出现。于是王莽公然由安汉公成为摄皇帝、假皇帝。

居摄元年（6）四月，安众侯刘崇起兵反抗。次年九月，东郡太守翟义聚众讨伐王莽，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移檄郡国，言莽"毒杀平帝，摄天子位，欲绝汉室，今共行天罚诛莽"⑪，众至十万人。这时长安附近槐里男子赵朋、霍鸿等，亦集合十万以上的农民，起兵反莽，以响应翟义的号召。但是这些反莽势力，都为王莽所消灭。自是王莽自谓"威德日盛，获天人助，遂谋即真之事矣"⑫。因而不久便有铜符帛书出现，其文曰："天告帝符，献者封侯，承天命，用神令。"⑬这显然是天命攸归了。不久，又有一个"素无行，好为大言"的梓潼人哀章，做了一只铜柜，制作两道封书题签，其一书曰："天帝行玺金匮图，"其二书曰："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⑭某者，高皇帝名也。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遵照天命行事。哀章持铜匮至高庙以付仆射。仆射上报，王莽不敢违抗天命，只好到高帝祠庙拜受金匮神禅，御王冠，即真天子位，改国号曰"新"，改年号为始建国元年（9），西汉王朝便寿终正寝。

西汉王朝虽然结束，但西汉社会遗留下来的隐患和危机依然存在。为了解决这些社会危机和矛盾，王莽附会《周礼》，

实行托古改制。

始建国元年（9），王莽下诏，历数西汉社会兼并之弊，其中最主要的是土地问题和奴婢问题。诏令说："秦为无道，厚赋税以自供奉，罢（疲）民力以极欲。坏圣制，废井田。是以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乃）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控制）民臣，专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掠）卖人妻子，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分取田地产物，勒索佃农租税），厥名三十税一，实什税五也。父子夫妇，终年耕耘，所得不足以自存。"⑮针对以上情况，王莽提出王田制度和奴婢政策，规定：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之家，占田一井（九百亩）；原有男口不足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者，把多出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有敢诋毁井田制度、惑乱人心者，流放边远地区，以儆效尤。

王莽颁布这一诏令的目的，并非想要真正解决土地问题和奴婢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冻结土地和奴婢的买卖，藉以缓和土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在此以后，官僚富商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以此获罪者不可胜数，于是他们的代言人区（音欧）博公开出来反对。区博上书给王莽说："井田虽圣王法，其废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从。秦知顺民之心，可以获大利也，故灭庐井而置阡陌，遂王诸夏，讫今海内未厌其敝。今欲违民心，追复千载绝迹，虽尧舜复起，而无百年之渐（渐进过程），弗能行也。天下初定，万民新附，诚未可实行。"⑯由于官僚富贾的反对，王莽被迫于始建国四年，下令取消。其诏令

曰："诸名（私人占有）食（朝廷赏赐）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⑰王莽试图解决当前最主要的社会矛盾的尝试，到此已完全失败。

王莽另一项经济改革政策，是实行五均、赊贷与六筦（管）。始建国二年（10）二月，王莽下令实行五均六筦，企图以此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并且使封建国家获得经济利益。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都市设立"五均司市师"，管理市场。各城市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每季的中月，司市师评定本地物价，定出法定的标准价格，叫做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自相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须品滞销时，则由司市师按本价收买，不令折钱。

五均官除平准物价以外，还有一个向农民办理借贷的任务。民因祭祀或丧葬需钱可向钱府借贷，不取利息。祭祀贷款归还日期不得超过十日；丧事贷款归还日期限定为三个月。如果因欲经营生产而缺少本钱，也可低利借贷，年收利息不得过十分之一。

六筦是由国家掌握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等五种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名山大泽，向在名山大泽中采取众物的人课税。实行六筦的理由，照王莽自己的说法是："夫盐，食肴之将（主也）；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要（要挟）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管理）之。"⑱由此看来，王莽实行的六筦政策，即统制重要经济事业的政策。六筦

中除五均赊贷一项是平准法的新发展以外，其余五项都在汉武帝时实行过。王莽用来推行五均六筦的人，多是一些巨商富贾，如洛阳薛子仲、张长叔和临淄伟姓，都是家资千万的富商，这与武帝时以贾人为盐铁官一样。但是武帝凭借强大的国家力量，能够基本上控制管理盐铁的官吏；而王莽则缺乏这样的力量，对他们则是无能为力。这些富商巨贾乘传求利，与郡县官吏通同作弊，盘剥人民，损公肥私，即所谓“奸吏猾民，并侵众庶，各不安生”⑲。纳言冯常谏王莽废除六筦，荆州牧费兴提出，对荆州“盗贼”要“阔其租赋”、“解释安集”，都被免官。直至地皇三年（22），王莽见四方盗起，攻城杀吏，知天下溃叛，事穷计迫，“乃议遣风俗大夫司国宪等分行天下，除井田、奴婢、山泽六筦之禁，即位以来诏令不便于民者皆收还之”⑳。使者未及出发，刘秀兄弟及李通等已起兵反莽，事实上六筦政策，已自动取消。

在王莽的改制中，给社会经济造成最大混乱的是货币的屡次改革。王莽从当“摄皇帝”开始，前后进行过四次货币改革。这些改革主要是以新铸的劣质货币代替原来质量较高的旧币，然后再以更劣的货币兑换原来铸造的劣币，而且品类繁多，换算困难，甚至连古代的原始货币龟、贝也拿来应用。王莽不知道钱币的价值要由它所包含的内在价值、金属价值来决定，而只是一味用法令来强行变更，这就注定其必然失败。

第一次改革是在居摄二年（7）王莽居摄时，下令于当时通用的五铢钱外，另铸大钱（重 12 铢，值五铢钱 50）。又造契刀（值五铢钱 500）、错刀（值五铢钱 5000），与五铢钱并行。这种做法的掠夺性异常明显，大钱与五铢钱的重量是 12:5，而价值却规定为 50:1，重量和价值相差极其悬殊。

第二次改革是在始建国元年（9）王莽称帝后。这次又废除错刀、契刀及五铢钱，另造小钱（重一铢），与大钱同时并行。并下令以一个五铢钱兑换一个重一铢的小钱，以50个五铢钱（共重250铢）兑换一个重12铢的大钱。社会上久已惯于使用五铢钱，且大钱与小钱的比值极不合理，因此民间仍然私用五铢钱进行交易。

第三次改革是在始建国二年（10）。王莽以钱币讫不行，"于是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钱货六品，金货一品，银货二品，龟货四品，贝货五品，布货十品）"㉑。这些复杂的货币，只有更使"百姓愦乱"，而且连古代的原始货币龟、贝也拿来应用，尤为荒谬。由于"其货不行"，"乃但行小钱值一与大钱五十，二品并行"㉒，龟、贝、布属停止使用。

最后一次改革是在天凤元年（14）㉓。由于大钱、小钱不能通行，遂予废止，改行"货布"与"货泉"两种。一个货布重25铢，一个货泉重5铢，但却规定一个货布的价值等于25个货泉。又下令一个12铢重的大钱兑换一个5铢重的货泉，比例还是不对。

王莽屡易货币，"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㉔。而且种类复杂，单位太多，换算亦不容易，所以人民仍私用五铢钱，盗铸钱者不可胜禁。王莽对于私铸钱币者，原定处以死刑，后来因为犯者愈来愈多，杀不胜杀，于是改为犯者及妻子没为官奴婢，由郡国用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主管铸钱的官），因此"愁苦死者什六七"㉕。虽然如此，新币仍不能通行。

在政治制度方面，王莽也大事更张。他一味的"矫讬天

命，伪作符书”来实施改革。他把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和行政区划，大加改变，屡易其名；甚至连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有“新家”、“新室”、“新成”、“黄室”等，名目虽多，但毫无意义。

王莽实行的这些改制，有些措施触及到当时社会的突出矛盾。但是王莽是封建权贵的代表，他的改制实质上是从维护贵族的利益出发的。他之所以打击一部分豪强和工商业主，不过是为了强制大地主、大商人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使封建经济得到适当的调整，藉以缓和当时已经激化了的社会矛盾。更明白地说，就是企图牺牲个别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来重新稳定濒于崩溃的封建权贵的统治。这如果能够实现，在客观上对农民还是有利的。正因如此，所以遭到豪强富贾的顽强反抗；加上王莽胡乱推行一些反经济规律的措施，给本来即已混乱的社会经济生活更增加了混乱。许多官僚也趁火打劫，渔肉百姓，无限制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以致“农商失业”，“百姓困乏”，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破坏，社会矛盾更加尖锐。

王莽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为了挽回自己的威信，拯救自己的统治，又肆意挑起了和周边各族的战争，以转移人民的视线。王莽执政后，为了显示自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族颁发新室印绶，收回汉朝的印绶；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侯，引起周边各族的反抗。在东方，高句丽人反对王莽，王莽派严尤征服了高句丽，并把高句丽改称“下句丽”，但高句丽并没有停止战斗。在西方，西域各国纷纷反抗，断绝同王莽的往来。在西南，句町（今云南蒙自地区）王起兵反抗，王莽于天凤元年（14）派冯茂等发巴蜀兵击句町，前后三年，“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㉕，始终未能征服句町。

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是对匈奴的战争。匈奴从宣帝时起和汉朝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王莽称帝后，派专使收回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接着，王莽又下令分匈奴全国为十五单于，并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子，封为单于。始建国三年（11），王莽一面下令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对匈奴表示侮慢；一面又大发北方各郡国及乌桓、鲜卑十二部兵，分十路向匈奴进攻，引起匈奴人的强烈反抗。结果“损失惨重”，“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㉒。

王莽发动的这些战争，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

王莽改制没有挽救社会危机，相反，使广大人民在政策的摇摆中遭受祸殃。残酷的刑法，沉重的赋役征发，加之匈奴入寇，旱灾虫蝗频仍，使得百姓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于是天下萧萧然，农民暴动风起云涌。

注 释

①②③④⑤《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⑥《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五年。

⑦⑧《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⑨《资治通鉴》汉平帝元始五年。

⑩⑪⑫⑬⑭《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⑮⑯⑰《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⑱⑲《汉书》卷二四《食货志》下。

⑳《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㉑㉒《资治通鉴》王莽始建国二年。

㉓改行货布、货泉年代，《王莽传》置于地皇元年（20），此据《汉

书·食货志》。

㉔《资治通鉴》王莽天凤元年。

㉕《汉书·食货志》下。

㉖《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㉗《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秦汉

绿林赤眉起义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批农民被排挤出生产领域，成为辗转沟壑的流民，甚至沦为奴婢。成帝时，因饥馑而死于道路者数以百万计。哀帝即位后，大司马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等为此拟订了方案，都因遭到权贵的反对而作罢。农民的处境日益恶化，谏大夫鲍宣上书说，由于租赋苛重，官吏贪残，豪强蚕食，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加上水旱自然灾害，民“有七亡（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①。因此，“部落鼓鸣”，“盗贼横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王莽应运而出，实行托古改制，但是事与愿违，他的改制不但未能挽救社会危机，结果却转化为引发大规模人民反抗斗争的导火索。

始建国三年（11），边塞上首先爆发了反对王莽的农民“叛乱”。这一年是连年自然灾害后的一年，王莽全然不顾百姓死活，在连岁自然灾害之后又发动不义战争。不少农民被征为戍卒，屯田五原北假（今内蒙古河套以北、阴山以南地区，当时属五原郡），“以助军粮”；海岱江淮之民，则转输兵谷于边

塞；而并州一带农民，既承担更多兵谷，又受到莽军吏士的骚扰，受害更深。因之，并州农民最先举起了反莽的旗帜。天凤二年（15），随着王莽征戍压迫的加剧，反莽斗争愈加发展。按汉制戍卒服役为期一年，而王莽调发三年仍不更换，“边兵二十余万人仰衣食，县官愁苦。五原、代郡尤被其毒，起为盗贼，数千人为辈，转入旁郡”②。接着，在长江下游也爆发了“叛乱”。天凤四年（17），“……临淮（郡名，治今江苏泗洪东南）瓜田仪等为盗贼，依阻会稽（郡名，治今苏州）长州（苑名，在今苏州西南）”③。同年，在今山东也爆发了“叛乱”，琅邪女子吕母起于海曲（今山东日照西）。吕母富有家产，有子为县游徼，因小罪为县宰判处死刑。吕母怨宰，散尽家财，招聚饥民数千人，为子报仇。吕母自称将军，亲率农民攻陷海曲城，杀死县宰，以宰之头祭其子墓。然后回到海上，继续反莽斗争④。

以上所述均为大规模农民起事的前驱，从天凤四年起，大规模的农民叛乱随之爆发。就地域分布来看，当时的农民“叛乱”，可以分为三大区域。在东方是青、徐（今山东）一带；在南方是荆州、南阳（湖北西部和河南南部）一带；在北方是河北地区。其中主要的、后来成为大的军事集团的是东方和南方的两大支，起事后都曾先后攻到长安，这就是“绿林”和“赤眉”两支农民军。

天凤四年（17），荆州一带连年大旱，发生饥荒，农民相率在野泽中采掘凫茈（音符子，野荸荠）为食。新市（今湖北京山东北）人王匡、王凤兄弟为人排难解忧，受到饥民拥护，被推举为首领。他们聚集饥民，不时攻击附近乡聚。一时诸亡命如马武、王常、成丹之徒，都率众参加。他们以今湖北当阳

境内的绿林山为根据地，揭起反叛的旗帜，数月间众达七八千人。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绿林军”。绿林山的“叛逆”，一天天成为荆州的威胁。地皇二年（21），新莽荆州牧发兵两万人进攻绿林军。绿林军击败莽军，攻拔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转攻云杜（今湖北京山）、安陆（今湖北安陆东南）等地，部众增至五万人。次年，大疫降临鄂西，绿林山的叛民，死亡一半。为了求生，他们相率离开了绿林山，分道转移：一路由王常、成丹率领，西入南郡（治今江陵），称下江兵；一路由王匡、王凤、马武、朱鲔、张卬（昂）率领，北入南阳，称新市兵。当新市兵进攻随县时，平林（今随县东北）人陈牧、廖湛也聚合了数千农民响应，称“平林兵”。由于新市兵与平林兵的结合，鄂北、豫南一带已完全为叛乱的农民所控制。

绿林军起事爆发后，一些与新莽政权有矛盾的西汉宗室和地方豪强也纷纷起兵。宗室刘玄投奔平林军，为安集掾。南阳的刘縯、刘秀兄弟也是西汉宗室子弟。他们兄弟既富资财，又广结豪侠，王莽即位后，遭到迫害，遂在农民军兴起后，抱着“复高祖之业”⑤的目的在舂陵（今湖北枣阳南）起事。刘氏兄弟纠集族人、宾客七八千人，称舂陵军，与新市军、平林军联合反莽。

绿林军起义的第二年（天凤五年），在今山东、苏北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当时青、徐大饥，民变蜂起。在吕母起事地区莒县的饥民，共推琅邪人樊崇为首领，尊之曰“三老”。樊崇的同乡逄安、东海人徐宣、谢禄、杨音率众会合，部众发展到几万人。吕母死后，她的一部分部众也并入樊崇集团，于是樊崇遂成为山东农民“叛乱”的总领袖，而泰山也就成为当时农民“叛乱”的中心。“初，崇等以困穷为寇，

无攻城徇地之计。众既寖盛，乃相与为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以言辞为约束，无文书、旌旗、部曲、号令。其中最尊者号三老，次从事，次卒史，汎相称曰巨人”⑥。不仅樊崇的集团如此，其他“叛乱”集团，无不如此。

关于上述农民叛乱情况，曾有许多“盗匪地区”逃出来的官吏，上书向王莽报告。王莽将这些官员“下狱以为诬罔”，他认为，“结谋连党以千百数，是逆乱之大者”。所以他下令要各地守令，务予殄灭，以后“有不同心并力，疾恶黜贼，而妄曰饥寒所为，辄捕系，请其罪”⑦。自是以后，臣下多不敢向王莽报告“盗贼”真实情况。当时有一个名叫田况的高级军官，曾因与“盗贼”交手，一度取得小胜，被王莽任命为兼领青、徐二州州牧。他大胆地向王莽建议，不要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王莽不听，派太师王匡、更始将军廉丹率领十万大军进击青、徐“盗贼”。当莽军前来进攻时，樊崇“恐其众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以相识别，由是号曰赤眉”⑧。王莽官军“所过放纵”，东方为之语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⑨地皇三年（22）冬，莽军攻下无盐（今山东东平东），屠杀起事人民一万多人。赤眉军以逸待劳，勇敢杀敌，在成昌（今山东东平西）会战中，大破莽军，击杀万余人，并乘胜追至无盐。在成昌会战中，廉丹丧命，太师王匡落荒逃走。赤眉军占领了东自莒城，西到陈留，南达汝南东海，北到濮阳青州的广大地区，基本上结束了王莽在东方的统治。战后，赤眉军在黄河南北纵横驰骋，队伍扩充到数十万人。

继樊崇之后，大河以北地区的居民也四方蜂起，各推首领，攻掠郡县。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称：“别号诸贼：铜马、大肜、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

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各领部曲，众合数百万人。”当时，“诸贼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⑪，各部叛民，均有渠帅，如铜马贼帅东山荒秃，上淮况，大肜渠帅樊重……，富平贼帅徐少，获索贼帅古师郎等。其余“贼”，亦各有其渠帅。可见当时“叛乱”者声势之浩大与分支之繁多。

在赤眉军成昌大捷之后，绿林军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地皇四年（23）正月，绿林军在沘（音比）水（今河南泌阳）大败莽军，歼灭二万余人，杀死主将甄阜和梁丘赐。接着，又转兵向西，在淯阳（今河南南阳西南）击溃王莽的纳言将军严尤和秩宗将军陈茂，获得大批装备，部众扩展到十多万人，随即进围宛城（今河南南阳市）。由于战局的胜利发展，需要建立政权来统一指挥。绿林军将领认为人民支持反对王莽就是“人心归汉”，因此，在这年二月，他们在淯阳拥戴刘玄做了皇帝，建元“更始”，正式建立了汉政府。从此，绿林军被统一称为“汉军”。汉政府建立后，一面发布复兴刘氏的政治号召，一面派刘縯、刘秀等出师北伐。

王莽听到刘玄建立汉政权的消息后，非常恐慌。但他为了对外伪装镇静，故意染黑了须发，宣召从全国各地征选的一百二十名淑女进宫，王莽日与方士涿郡人昭君等在后宫考究房中术。四月，绿林军将领王常、刘秀等攻下昆阳（今河南叶县北）、郾（河南今县）和定陵（今河南舞阳）；同时，刘縯以别军占领了宛。这时刘玄的政府已奄有今日豫西大部分地方。王莽闻之更加恐慌，因大发兵讨伐中原“群盗”，“遣大司空王邑驰传之洛阳，与司徒王寻发众郡兵百万，号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东……邑至洛阳，州郡各选精兵，牧守自将，定会（按

照规定期限会合）者四十二万人，余在道不绝，车甲士马之盛，自古出师未尝有也”⑪。此外，王莽还征集到各地明兵法者六十三家，随军担任后备军官，并且选用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巨人巨毋霸作为垒尉，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军威。

这年五月，王邑、王寻率领着号称百万的大军，南出颍川，会同严尤、陈茂，直逼昆阳。新军将领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为歼灭汉军于昆阳城下，不过弹指间之事耳。当时，驻守昆阳的汉军只有八九千人。汉军诸将见新、汉两军众寡悬殊，皆惶怖，欲放弃昆阳，散归荆州各地。刘秀反对上述主张，他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即拔，一日之间，诸部亦灭矣。今不同心胆，共举功名，反欲守妻子财物邪！"⑫汉军正在议论间，莽军的前锋部队已逼近昆阳城北，后续部队也在源源开来。这时，军情十分紧急。诸将彼此观望，但又苦无良策。刘秀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又是一员偏将，在以前的战斗中，也未立过赫赫战功，因此平时并不为诸将所重。当此紧急关头，他表现得如此坚定沉着，又能提出一整套御敌方案，诸将始另眼相看，请他参与谋画。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按照刘秀的主张，由王凤与王常留守昆阳，派刘秀与五威将军李轶（音义）等十三骑，从城南门突围，到定陵、郾城去调集援兵，夹击新军。

王邑、王寻率领新军围攻昆阳，一开始就遭到汉军的顽强抵抗。屡经败阵的严尤，吸取以往教训，向王邑献计说："昆阳城小而坚，今假号者（指更始）在宛，急进大兵，彼必奔走；宛败，昆阳自服。"⑬王邑骄傲地回答说："吾昔围翟义，

坐不生得，以见责让，今将百万之众，遇城而不能下，非所以示威也。当先屠此城，蹀血而进，前歌后舞，顾不快邪！”⑭围城的莽军，在昆阳城外列营百数，围之数十重，金鼓喧天，远闻数十里。围兵“或为地道、冲辒（辒音崩，冲辒，楼车也）撞城，积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负户（背着门板）而汲”⑮。汉军守将王凤在莽军的重压下，曾一度请降，莽军不许。王邑、王寻意气洋洋，以为攻占昆阳，建立大功，就在漏刻之间！昆阳汉军，在无路可退的情况下，坚守危城，顽强抵抗，昆阳城为之屹立不动。严尤见屡攻昆阳不下，再次向王邑、王寻建议说：“《兵法》：‘围城为之阙’宜使得逸出以怖宛下。”⑯王邑仍不纳。六月初，刘秀从郾城、定陵调来了全部汉军，救援昆阳。刘秀亲自率领步骑兵千余人，开到距新军主力四五里处，布下阵势。王邑、王寻狂妄自大，根本未把刘秀放在眼里，轻率地决定只派数千人前去迎战。经过几次小的接触，汉军均获胜利。其时，宛城已为汉军主力攻克三日，战报尚未传来。刘秀乃使人向昆阳城中伪传捷报：“宛下兵到。”又故意将捷报失落。王邑、王寻得到战报，暗自吃惊。汉军闻讯，“胆气益壮，无不一当百”。

刘秀见决战时机已经成熟，便亲率敢死者三千人，迂回到昆阳城西，从水上向新军大本营发动猛烈袭击。王邑、王寻见汉军兵力不多，仍然认为不堪一击，亲自带领一万余人巡行军阵，下令诸营“皆按部毋得动”。汉军由于接连胜利，胆气更壮；而新军士兵大都是临时胁迫来的农民，他们痛恨王莽，都不愿意作战；诸将又藉口“皆按部毋得动”的命令，乐得按兵不动。因此，汉军冲入新军阵中，如入无人之境。王邑、王寻部队经不住汉军猛冲，阵势紊乱。汉军乘锐破阵，杀死王寻。

守城汉军亦鼓噪而出，内外夹击，呼声震天。失去指挥的莽军为之大乱，继之以溃散逃亡，奔逃者互相冲撞践踏，死伤不计其数。会大风雷，屋瓦皆飞，雨下如注，城北滍（音志）川暴涨，虎豹吓得战慄不止，莽军士卒淹死于水中者以万数。王邑、严尤、陈茂率轻骑踏着溺者尸体逃命而去。被迫征发来的农民，在汉军的攻击下，以溃散方式反对王莽，各还本郡，王邑只得率领数千残兵败将逃回洛阳。

昆阳大捷之后，刘玄遣王匡率兵直攻洛阳；申屠建、李松叩武关。汉军的强大攻势，不仅三辅为之震动，海内豪杰亦“翕然响应，皆杀其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诏命，旬月之间，徧于天下”⑰。析（今河南西峡）人邓晔、于匡于南乡（属析县）聚兵百余人，响应汉军，降析县宰和武关都尉，攻杀莽军右队（弘农郡的改称）大夫宋纲。王莽更加忧惧，技穷不知所出。当时有一臣下崔发告诉王莽说，《周礼》及《春秋左氏》皆谓国有大灾，则哭以厌（压胜）之。王莽乃率群臣至南郊，叩头号哭，乞求皇天保佑，又作告天策千余言，自陈功劳。太学生和居民哭得最悲哀者和能诵策文者，均“除以为郎”，计有五千多人。这幕丑剧刚刚收场，邓晔即战败王莽的援军，迎接申屠建等率领的汉军进入武关。汉军势如破竹，郡县望风而降，九月间攻入长安。城中少年朱弟、张鱼集众响应，火烧作室门（未央宫的便门），延及宫室，大呼：“反虏王莽，何不出降?”王莽避火宣室（未央宫殿名）前殿，宫人妇女啼哭曰：“当奈何!”王莽青服端坐，自我安慰说：“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天明，群臣扶王莽至渐台（在未央宫中），欲阻池以拒“贼”。汉军攻上渐台，商人杜吴杀死王莽⑱，取其玺绶，校尉公宾就斩王莽头。莽首传送至宛，悬于

市上，"百姓共提击之，或切食其舌"⑲。经过六年血战，王莽政权终于被绿林军所推翻。

当西入武关之军，攻陷长安时，刘玄的北伐军也攻陷了洛阳。公元23年十月，刘玄政府由宛县北迁洛阳。当时赤眉军散布于汝南、颍川一带，饥饿无以为食。樊崇亲率渠帅二十余人赴洛阳，诣谒刘玄，接受封号，表示归附，但并不为刘玄所重视。樊崇等人乃亡归其营，率兵入颍川，击杀河南太守。但当时的河南，"赤地千里，城无所夺，野无可掠，赤眉部众皆日夜愁泣，思欲东归"⑳。樊崇等知东归则群众必散，乃决计西攻长安。

更始二年（24），刘玄移都长安。当时长安"唯未央宫被焚而已，其余宫馆一无所毁。宫女数千，备列后庭，自鍾鼓、帷帐、舆辇、器服、太仓、武库、官府、市里，不改于旧"㉑。更始居长乐宫，完全恢复了封建帝王一套腐化堕落的生活。刘玄委政事于宠臣赵萌等，"日夜与妇人饮宴后庭，群臣欲言事，辄醉不能见"㉒。又大封宗室、功臣，"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绔、襜褕（音参于，围裙）、诸于（妇女的外衣），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炊烹之意），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㉓像这样的政权，当然要使天下大失所望。

是年冬，赤眉军分两路向长安进发：一路由樊崇率领进武关；一路由徐宣率领进陆浑关（今河南嵩县东北）。更始三年（25）正月，两军俱至弘农（今河南灵宝东北），与刘玄诸将连战皆捷，众遂大集。进至华阴，有士人方阳者，劝说樊崇立刘氏宗室，以为号令。樊崇以为然，乃于军中求得西汉宗室后裔、一个年仅十五岁的牛吏刘盆子，立为皇帝。樊崇本来应做

丞相，然不知数术，便推举做过县狱吏能通《易经》的徐宣为丞相，自己做了御史大夫。

赤眉军继续西进，到达高陵（今属陕西省），刘玄将张卬叛降赤眉，遂联兵共攻长安城东都门。城破，刘玄来降，上玺绶于刘盆子，先被封为长沙王，后为赤眉军将领谢禄所缢杀。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由于关中地区豪强地主坚壁清野，聚众反抗，长安城中粮尽，于是西走陇阪，逢大雪，坑谷皆满，士多冻死。于是又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建武三年（27）春，在宜阳（今河南洛宁东北），遭到刘秀大军截击。赤眉军突围未成，十余万众被迫降附了刘秀。同年夏，樊崇准备再次起兵，但事泄为刘秀所杀，赤眉起义遂告彻底失败。

注　释

①《汉书》卷七二《鲍宣传》。

②《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中。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④吕母"叛乱"事，《后汉书·刘盆子传》置于天凤元年。此据《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⑤《后汉书》卷一四《齐武王刘縯传》。

⑥《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⑦《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⑧《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⑨《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⑩《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李贤注。

⑪《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⑫⑬⑭《资治通鉴》卷三九淮阳王更始元年。

⑮《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上。

⑯《资治通鉴》卷三九淮阳王更始元年。

⑰《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⑱据《汉书·王莽传》。《汉书补注》引《三辅故事》谓杀死王莽者系“屠儿杜虞”。

⑲《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下。

⑳《后汉书》卷一一《刘盆子传》。

㉑㉒㉓《后汉书》卷一一《刘玄传》。

秦汉

刘秀统一全国

昆阳大捷后，新市、平林诸将以刘縯、刘秀兄弟威名益盛，阴劝刘玄杀掉刘縯。刘縯部将刘稷勇冠三军，对刘玄立为皇帝，心中不服。刘玄封刘稷为抗威将军，刘稷不肯接受，刘玄乃与诸将陈兵数千人收捕刘稷，将要斩首，刘縯固争，因与刘稷一并被诛杀。刘秀闻讯，心自不安，立即含悲忍泪，从城父（今河南宝应县东）赶到宛城，向新市、平林诸将谢罪。刘秀迫于形势，不敢为刘縯服丧，饮食言笑如平时，以此取得刘玄的信任，被封为破虏大将军。虽然如此，从刘縯被杀之日起，刘秀无日不在策划脱离农民军的队伍，独树一帜。更始元年（23）十月，刘玄北都洛阳后，以刘秀行大司马事，持节北渡河，镇抚诸郡。

当刘秀北徇河北时，河北地区形势异常复杂。这里既有以铜马为首的几百万农民军，也有同起义军为敌和观望自守的地主武装，另外还有拥有实力、据守城邑、无所归依的王莽所置官吏。刘秀知道，要平定河北，必须剿灭农民军；要剿灭农民军，必须要获得城市以为军事据点。因此，他一渡黄河，便打

起大司马的旗号，所到之处，“辄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从而取得吏民的支持，“争持牛酒迎劳”①。正当刘秀兴高采烈之时，突然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卜者王郎在当地土豪的支持下，称帝于邯郸。这个割据势力由于谎称为赤眉拥立和诈称成帝子子舆，发展极为迅速，以至“赵国以北、辽东以西，皆从风而靡”②。王郎移檄通缉刘秀，刘秀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蓟（今北京市）。更始二年（24）初，刘秀为了逃避王郎的拘捕，狼狈地逃出蓟县，在风雪交加中，驰驱于饶阳、下曲阳和下博途中。在饶阳传舍，为取得一餐，还冒充过王郎的使臣，险些被捕。

当时河北郡国皆已降王郎，惟独信都（今河北衡水东）太守任光，和戎（王莽分信阳为和戎，居下曲阳）太守邳彤（音容）不肯从。刘秀走信都，任光、邳彤来会。刘秀拜任光、邳彤为大将军。刘秀以信都为根据地，移檄边郡，共击邯郸，郡县还复响应。豪族刘植、巨鹿大姓耿纯各率宗族宾客数千人归附刘秀，合兵攻陷下曲阳（今河北曲阳县），于是有兵数万人，连陷新市、真定、元氏、防子等地，进而与王郎的大将李育在柏人（今河北隆尧西）发生了遭遇战。正当此时，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耿况、渔阳（郡治今北京密云西南）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率领大队骑兵来会。上谷、渔阳是西汉边郡要塞，天下精兵荟萃之地，特别是骑兵中的乌桓骑士，最能冲锋陷阵，素有“突骑”之称。两郡的归附，大大增强了刘秀的军事力量。接着，更始帝也派遣尚书仆射谢躬带兵来讨伐王郎。于是刘秀乃大飨士卒，连兵进攻王郎，五月，攻破邯郸，王郎乘夜逃走，刘秀使王霸追斩之。

刘秀击斩王郎，声势大震于河北。刘秀势力的不断发展，

引起更始帝的不安。为了安抚刘秀，刘玄特派人封他为萧王，令其罢兵回长安。刘秀辞以河北未平，不肯就征。从此刘秀与更始分道扬镳，在河北独立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并进行一系列建立地主政权的活动。更始二年（24）秋，刘秀亲统大军击铜马于鄡（音敲，今河北束鹿东）。又命吴汉率"突骑"来会清阳（今河北清河东南），企图一举歼灭河北的农民军。铜马军顽强地抗击了刘秀的进攻，迫使刘秀大军只能"坚营自守"，采取封锁政策。后来铜马军由于粮道断绝，饥不得食，不得不撤退，在逃遁途中，被刘秀军追至馆陶（今属河北）击破。铜马军余部和高湖、重连两部会合，与刘秀大战于蒲阳（即蒲阳山，在今河北完县西北）。结果因为高湖、重连等农民军领袖背叛了群众，大部分饥民被改编为刘秀的创业之军。刘秀将这支大军分隶诸将统领，形成一支几十万人的队伍，大大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当时"关西号光武为铜马帝"③。所谓"铜马帝"，即"贼帅"的别称。而刘秀正是凭借这支农民军争衡天下的。明年，刘秀又于元氏、右北平、安次、渔阳诸地，连续击破了尤来、大枪、五幡等支农民军。这些军事活动，使刘秀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占据河北广大地区。

正当此时，更始政权已呈现了分崩离析的局面，强大的赤眉军已开始向长安进军。刘秀估计到赤眉军必然能够攻克关中，占领长安，因而采取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策略。他派邓禹率六裨将，引兵西向，以乘更始、赤眉之乱；同时遣大将冯异扼守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以拒洛阳。为了巩固河北北部的占领，刘秀又自徇燕赵。此外，为了保守根据地及粮饷的来源，又命寇恂留守河内（郡治在今河南武陟西南）。经过这样一番部署，可谓攻守咸宜，进退自如，刘秀实现自己政治野

心的时机已经到来。当时，河北诸将议为刘秀上尊号，刘秀谦辞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④耿纯进曰："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绝望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⑤刘秀谦让后说："吾将思之。"行至鄗（hào浩，今河北高邑东南），刘秀以前的同舍生强华，自关中带来《赤伏符》（捏造的谶记）。符文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⑥到了这时，刘秀只得"恭承天命"，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即皇帝位，改元建武，改鄗为高邑，是为汉光武帝，时在25年六月。同年十月，刘秀派岑彭劝说坚守洛阳的绿林军将领朱鲔（wěi委）投降。岑彭向朱鲔陈说利害，朱鲔说："大司徒（指刘縯）被害时，鲔与其谋，又谏更始无遣萧王北伐，诚自知罪深，不敢降。"岑彭回报刘秀，刘秀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⑦朱鲔乃降。刘秀随即占领洛阳，并在其地建都。这就是历史上的东汉政权，又称为后汉。

当赤眉军与更始激战之际，邓禹自汾阴（今山西万荣西南）渡过黄河，占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从此，赤眉军和刘秀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建武二年（26）春，长安粮尽，赤眉军引兵而西，至安定（今甘肃泾川西北）、北地（今甘肃中宁），邓禹乘机进入长安。九月，赤眉军在陇地转攻城邑，受到陇西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大雪的袭击，士兵冻死不少，只好折返长安，引众东归。当时邓禹派兵在郁夷（今陕西宝鸡

东）袭击义军，结果被义军击败，赤眉军再度占领长安。

冬十一月，光武帝遣冯异入关代邓禹，临行，敕冯异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诸将非不健斗，然为虏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饬，无为郡县所苦！"③冯异受命西行，因征召邓禹还京师。十二月，关中发生饥荒，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赤眉军引兵东归，尚有众二十余万人。在义军回归途中，刘秀已经作好截击部署。他派侯进屯新安（今河南渑池东），耿弇屯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分为二道，以截其归路。冯异与赤眉遇于华阴（今属陕西），相拒六十余日，战数十合，降其将卒五千余人。明年正月，冯异与赤眉约期会战，使壮士着赤眉服，伏于道旁。两军交战，伏兵突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遂惊溃。冯异大破赤眉于崤底（崤山，在今河南渑池、洛宁两县之间），降男女八万人。赤眉余众东奔宜阳，刘秀亲统六军，严阵以待，赤眉惊震，刘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皆降，献上所得传国玺绶。刘秀赐樊崇等洛阳田宅，以盆子为赵王（光武叔父）郎中。同年四月，冯异击败延岑等，平定关中，刘秀大军遂占领长安。

刘秀虽然扫平了铜马、绿林、赤眉等农民军，但群雄割据的局面依然存在。为了统一天下，刘秀又展开了削平群雄的战争。当时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梁王刘永称帝于睢阳；隗嚣占据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公孙述称王巴蜀；李宪自立为淮南王；秦丰自号楚黎王；张步起琅邪，董宪起东海，延岑起汉中，田戎起夷陵，并置将帅，侵掠郡县。另外，北部还有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勾结匈奴，立为汉帝。

自建武二年（26）开始，光武帝采取攻伐与招降相结合的

方针，首先对盘踞睢阳（今河南商丘）的刘永发起攻势。刘永为西汉梁孝王八世孙，从宗族谱系上说，比刘秀更为正统。因此，刘秀视刘永为最大威胁。当时刘永雄据今日豫东、皖北，与山东的张步、庐江的李宪、苏北的董宪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同盟。四月，光武帝派虎牙大将军盖延率四将军讨伐刘永，围攻睢阳。八月，盖延攻陷睢阳，刘永与部将苏茂等逃至湖陵（今山东金乡南）。睢阳人反城迎刘永，盖延率诸将围之，吴汉亦率兵前来助战。城中食尽，刘永出走，为其部下庆吾所杀。刘永部将苏茂、周建等共立永子刘纡为梁王。建武五年（29）八月，吴汉拔郯（今山东郯城北），刘纡不知所归，为其军士高扈斩杀以降。其后不到半年，张步、李宪、董宪等亦先后为刘秀所击灭，刘永的势力，至此完全被肃清，"山东悉平"。

在讨伐刘永集团的同时，光武帝又遣建义大将军朱祐南征秦丰于黎丘（今湖北襄樊南），围城半载，秦丰穷困出降，用槛车押送至洛阳诛死。遣右将军邓禹西击延岑于武当（今湖北均县西北）；征南大将军岑彭击田戎于津乡（今湖北江陵东）。"延岑、田戎为汉兵所败，皆亡入蜀"⑨。盘踞河北、自立为燕王的叛将彭宠亦于建武五年初为苍头所杀。于是北自幽燕，南至荆襄，皆已平定。

关东虽平，但陇蜀尚为野心家隗嚣、公孙述所割据。光武下一步战略目标就是消灭隗嚣和公孙述。当时隗嚣据有安定、陇西、金城、武都、张掖、武威、酒泉、敦煌等郡，几乎占有今日甘肃省之全境。他南连公孙述，北结卢芳，西通诸羌、匈奴，粮草充足，士马强壮，进可窥伺关陕，退可据隘自守。且隗嚣"素谦恭爱士，倾身引接为布衣交"，以是"名震西州，

闻于山东”⑩。光武帝闻其风声，报以殊礼，欲同他结好，要求他出兵攻打巴蜀的公孙述。可是隗嚣持观望态度，上书推说“三辅单弱，刘文伯（卢芳）在边，未宜谋蜀”⑪。隗嚣部下王元、王捷也劝他保守边陲，以观天下之变。光武见诱降不成，决定用武力解决，于是派建威大将军耿弇等七将军进攻隗嚣。隗嚣使王元据陇坻（一名陇阪，在今陕西陇县、宝鸡县与甘肃清水县、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之间，为关中平原西部屏障），伐木塞道。诸将与战，败退。王元进攻三辅，为征西大将军冯异、征虏将军祭遵击破。隗嚣因遣使向公孙述称臣。

建武八年（32）春，光武帝率诸将西征，分数道上陇。隗嚣大将十三人，属县十六，众十余万，皆降汉。隗嚣携妻子奔西城（即西县城，在今陕西安康西北）。光武遣吴汉、岑彭围西城月余，王元率蜀兵五千人来救，迎嚣归冀（今甘肃甘谷东）。明年春，隗嚣病死，王元等立嚣子隗纯为王。建武十年（34），光武帝命来歙等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收买窦融，命其以河西五郡之兵，与汉兵夹击隗纯，攻破落门（聚名，在今甘肃武山县西），隗纯降，王元奔蜀，陇右平。

建武八年（32）秋，颍川农民群起，河东守兵亦叛，京师为之骚动。光武认为形势紧急，亲自辰夜东驰，临行前，赐书岑彭等将领说：“两城（西城、上邽）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指公孙述）。人苦不知足，既平陇（隗嚣所都），复望蜀（公孙述所都），每一发兵，头须为白。”⑫公孙述当时据有益州之地，包括今四川、贵州和云南大部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势险阻，兵力精强。他北联隗嚣，并趁光武有事于山东之际，联结关中割据势力，吕鲔、延岑、田戎、王歆等多往归依，公孙述皆拜为将军，因聚兵数十万人，积粮汉中，筑宫

南郑。于刘秀称帝的同年，即建武元年（25）四月，公孙述自立为天子，即位于成都，号成家，建元龙兴。他也和刘秀一样，好为符命鬼神异应之事，借图谶以欺弄民众。他妄引谶记，言孔子作《春秋》，断十二公，象征汉之十二帝（包括吕后），说明汉数已尽。又引《录运法》和《括地象》（皆谶纬之书）中“公孙当立”的预言，说明他是天帝派来接替汉朝的真命天子。公孙述还常将上述宣传品送到中原，藉以迷惑百姓。刘秀为此颇为担忧，他致书公孙述，说公孙述歪曲谶语，谶记所言“公孙”，乃指宣帝；并且劝他不要仿效王莽那样以铁契、石龟、文圭、玄印等作为符瑞，自欺欺人；天下神器，不可力争，不如早日归降，还可保全宗族。然而公孙述并无降意，因此没有复书光武帝。

建武十一年（35）七月，光武帝亲自将兵征讨公孙述，驻军长安。八月，汉将岑彭大破公孙述将侯丹于黄石（今四川涪陵东）。于是汉军不分昼夜倍道兼行二千余里，一直攻下武阳（今四川彭山东），出动精骑驰击距成都仅数十里的广都，势若风雨，汉军所至之处，蜀军无不奔散。公孙述听说岑彭绕过延岑军后，攻下武阳，惊惶地以杖击地说：“是何神也！”他在气恨之余，心生毒计，暗派刺客诈为亡奴，投降汉军，乘夜刺死岑彭。十二月，汉大司马吴汉率领舟师三万人自夷陵（今湖北宜昌东）溯江而上，征讨公孙述。明年春正月，吴汉攻克广都，遣轻骑烧成都市桥，公孙述将帅恐惧，日夜离叛。当胜利在望之时，光武嘱咐吴汉说：“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但坚据广都，待其来攻，勿与争锋。若不敢来，公转营迫之，须其力疲，乃可击也。”⑬其后吴汉与公孙述战于广都、成都之间，八战八克。十一月，吴汉、臧宫又与公孙述战于成都郊

外，大破之，公孙述被创而死。延岑以成都降。吴汉杀述妻子，尽灭公孙氏，并族延岑，巴蜀之地予以平定。

最后还剩下一个盘踞北部的卢芳。当时卢芳据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五郡，包括今日之陕北、山西和内蒙古一带地方。卢芳勾引匈奴和乌桓作为外援，经常侵扰北部边境。光武帝屡遣吴汉、杜茂往击，均未成功。建武十二年(36)，刘秀已剿灭公孙述，卢芳与其部将贾览共攻云中，久攻不下，其留守九原的部将随昱欲胁迫其归降光武。卢芳自知不能相敌，遂弃辎重，率十余骑逃入匈奴。建武十六年（40），匈奴闻汉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遣卢芳还降。卢芳至汉，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汉立卢芳为代王。不久又逃入匈奴，后死于匈奴。

经过十余年的征战，刘秀次第翦灭四方割据势力，结束了纷乱局面，全国重归统一。

注　释

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后汉书》卷一二《王昌传》。

③④⑤《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⑥《后汉书·光武帝纪》注：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即四七之际也。汉火德，故火为主也。

⑦《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元年。

⑧《后汉书》卷一七《冯异传》。

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

⑩⑪《后汉书》卷一三《隗嚣传》。

⑫《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⑬《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光武中兴

刘秀平定各地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以后，为了进一步巩固东汉政权，首先做的一件事，便是削夺功臣之兵权。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光武“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皇太子尝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建武十三年夏四月，“大司马吴汉自蜀还京师，于是大飨将士，班劳策勋。功臣增邑更封，凡三百六十五人……罢左右将军官。”①耿弇、邓禹、贾复等皆相继交出兵权，以特进奉朝请。不仅如此，刘秀还不使功臣参与朝政，而以优厚的封土食邑，使功臣们“以列侯就第”，“阖门养威重”②。当时，只有极少数列侯，如高密侯邓禹、固始侯李通、胶东侯贾复，特许“与公卿参议国家大事，恩遇甚厚”③。

与此同时，为了把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在行政体制上，刘秀把中央政府的事权，由“三公”府转移到尚书台。《后汉书·仲长统传》云：“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尚书的官职创于秦代，原是少府属吏，其任

务仅仅是在殿中传达诏令。西汉武帝时，成为侍从近臣，职权渐重，因以宦官充任，故又名为中书。成帝时，又复尚书旧名。尚书职名虽然由来已久，但直至西汉之末，在中央政府中，地位并不十分重要。东汉建立后，刘秀为了便于自己独揽国家大权，那些侍从其左右的尚书，就成为他最好的助手，尚书的职权，日益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④。尚书台已成为皇帝专制独裁的御用工具。

随着尚书台地位的变化，其机构也得到了发展和加强。据《后汉书·百官志》等书记载，东汉尚书台的组织为：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据应劭《汉官仪》称：“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纪纲，无所不统，秩千石。若公为之，朝会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光武帝特诏尚书令、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于朝会时均专席独坐，京师谓之“三独坐”。这表明尚书台已成为国家的法定机关，其最高长官尚书令的地位也随之而升格。尚书令下设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尚书台设六曹：一曰三公曹，主岁尽考课诸州郡事；二曰吏部曹，主选举祠祀事；三曰民曹，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等；四曰客曹，主护驾、边疆少数民族朝贺事；五曰二千石曹，主司法词讼事务；六曰中都官曹，主水、火、盗贼、治安事。每曹各置尚书一人，侍郎六人，令史三人。六曹即后来六部的起源。由上可以窥见尚书台组织之庞大和职掌之广泛，实为中央政府之缩影。

光武帝除以尚书台为政治司令塔发号施令外，对于地方行政的控制，也很严格。汉代的地方行政机构，实行郡县（国）两级制。汉武帝设十三州刺史监郡，属于临时派遣的监察官吏，他的任务是周行郡国，刺探政情，原无固定治所。东汉承

袭西汉制度，分全国为十三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其首都所属之州，亦设司隶校尉，督察中央直辖区。东汉州刺史的权力，远比西汉时为大，除监察二千石官吏之外，还有选拔官吏，直接向皇帝劾奏之权，甚至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管理，而且已有一定的治所和自己的衙门。这就形成内有尚书总揽朝政，外有刺史控制地方的高度集权的局面。

不仅如此，为了防止发生叛乱，光武帝在完成解除开国功臣的兵权后，又进一步削夺地方的军权。建武六年（30），"省诸郡都尉，并职太守"⑤，同时废除每年八月各郡国集兵演武的都试制度。按郡尉主郡兵，太守主郡政，为西汉旧制，东汉裁撤各郡国的都尉，而以太守典郡兵，是使太守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因此，东汉的太守，亦称"郡将"。翌年三月，又下诏解散地方兵，"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军中临时服役官员），令还复民伍"⑥。在削弱地方武装的同时，又扩大禁卫军的编制，原来的正卒和戍卒，都改为由中央召募而来的职业军人担任。东汉兵制的改革，大大加强了中央职业军队的地位，也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的权威。

为了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光武帝即位之初，即注意减轻刑罚和整顿吏治。建武二年（26），光武下诏书说："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法。"⑦五年又下诏说："久旱伤麦，秋种未下，朕甚忧之。将残吏未胜，狱多冤结，元元愁恨，感动天气乎？其令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罪非犯殊死一切勿案，见徒免为庶人。务进柔良，退贪酷，各正厥事焉。"⑧刘秀在位的三十多年里，曾多次颁诏大赦天下，举冤狱，出系囚。

光武即帝位后，在任用官吏方面，亦能做到选贤任能和奖廉斥暴。如擢王莽时密（今河南密县东南）令卓茂为太傅，名儒伏湛为大司徒。任用杜诗为南阳太守，诗“性节俭而政治清平，以诛暴立威，善于计略，省爱民役……视事七年，政化大行”⑨。卫飒为桂阳太守，“役省劳息，奸吏杜绝”⑩。任延为武威太守，到官之后，查明将兵长史田绀纵容子弟，横暴乡里，任延拘捕田绀，诛杀其父子宾客五六人，自此“威行境内，吏民累息（因恐惧而呼吸急促）”⑪。光武帝还重用不畏强权的董宣为洛阳令。时刘秀姊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董宣在公主出行时，于路上驻车叩马，以刀画地，数落公主过失，命令公主家奴下车，处以死刑。公主向光武帝告状，董宣据理力辩，刘秀不但未加罪责，反而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美名，并赐钱三十万。因而史称光武时期“政在抑强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于成、哀之间什八，可谓清矣”⑫。

光武帝吸取西汉末年王莽篡夺政权的教训，对于诸侯王和外戚的权势，也多方加以限制。如建武二十四年（48），刘秀特诏有司申明旧制“阿附蕃王法”，即继续实行西汉武帝时制定的左官律、阿党法及附益法等。规定诸侯王不得治民，王国设置的傅相，由中央直接委派，诸侯王仅保留食邑特权而已。对于外戚也特别注意控制。比如阴皇后的兄弟阴识、阴兴虽有功劳才德，也不曾委以机密要职。因此当时宗室诸王和外家亲属都比较遵奉法纪，无结党营私或对抗中央之事。

王莽时期，法令滋章，赋役繁重，刑法苛深，以致“父子流亡，夫妇离散，庐落丘墟，田畴荒秽”⑬。刘秀登基后，面对的是经济残破、户口大减的情况，并且震慑于农民大起义的

威力，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首先，奴婢问题曾经是西汉末年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解放这部分生产力，从建武二年到十四年，光武帝曾先后九次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的诏令。如建武二年（26），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论如罪”⑭。四年之后，又针对王莽时期不合西汉旧法而将吏人没入为奴婢的情况，下诏一律免为庶人。建武七年（31），当时东汉王朝已经平定东部地区，又“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掠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⑮。此后在平定陇蜀过程中，又于建武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三次诏令释放益、凉二州奴婢，规定自建武八年以来被掠为奴婢“自讼”在官者，一切免为庶人。此外，光武帝还在建武十一年（35）一连三次下令，规定“其杀害奴婢，不得减罪”，“敢炙灼奴婢，论如律”，“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⑯。以上一系列诏令的实行，使大量奴婢摆脱了豪族地主的奴役，重新回到土地上来，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农民，这对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封建经济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

东汉初年，因统一战争还在继续进行，军费开支很大，国家用度不足，曾实行什一之税。后因实行军士屯田，军粮问题得到解决，为迅速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光武帝于建武六年（30），特颁诏书减轻农民负担，“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⑰，即和西汉文景时期的租率相等。同年六月，他还下令各州县吏员减损到十置其一。光武帝统治后期，史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这多少反映东汉初期的封建赋役负担，比西汉后期和战争期间有所减轻。

刘秀生长于民间，青年时期，颠沛流离于各地，颇知稼穑

艰难，百姓疾苦，因而在即帝位后，能够以身作则，提倡节俭。史书上说他日常生活：身不穿重綵之衣，耳不听妖冶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建武十三年（37），他将异国贡献的千里马送去驾鼓车，将价值百金的宝剑赐给骑士。他不建造专为皇家游乐的苑林，不从事浪费人力物力的狩猎。他一向提倡薄葬，将作大匠窦融向他请示园陵广袤，光武帝说："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茅草）马……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才令流水而已。"⑱中元二年（57）二月，光武临死前，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⑲上行下效，在光武帝的带动和影响下，后宫妃嫔和东汉初期的一些臣僚，也多能做到生活俭朴，清廉自守。如在东汉建国初期，做过御史中丞和司隶校尉的宣秉，"性节约，常服布被，蔬食瓦器"⑳，家中的粮食储存不超过一担。比宣秉稍后，代宣秉为大司徒司直的王良，也是"在位恭俭……布被瓦器"㉑，他的妻子还亲自到田间去曳柴，其清贫自守，可以概见。光武时期，著名的地方官会稽太守第五伦，虽身为二千石，然"躬自斩刍养马，妻执炊爨。受俸才留一月粮，余皆贱贸与民之贫羸者"㉒。东汉初期的政治，由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因而是比较清明的。

另外，光武帝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团结士人方面，也很有策略。建武二年（26），寇恂拜颍川太守，当时大将贾复任执金吾，驻在汝南。贾复的部将因杀人被寇恂逮捕，戮之于市。贾复引以为耻，心怀不忿，对左右说："吾与寇恂并列将帅，而今为其所陷，大丈夫岂有怀侵怨而不决之者乎？今见恂，必手剑之。"㉓自是寇恂常避让贾复。光武闻知，乃召见寇恂，时贾复亦在座。光武对二人说："天下未定，两虎安得

私斗，今日朕分（解也）之。”㉔在光武帝的调解下，两人又“并坐极欢，遂共车同出，结友而去”㉕。

王莽代汉之时，不少士人“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㉖，其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去之者，盖不可胜数”㉗。东汉建立后，光武帝为巩固新建立的政权，他礼贤下士，对士大夫表示非常敬重，史称其“侧席幽人（即侧席而坐以待隐居之人），求之若不及”㉘。例如他对王莽时代的逸民北海逢萌、太原周党，皆曾多次聘请来朝。逢萌托以老耄，迷路东西，不肯就征。光武引见周党，党自陈愿守所志，伏而不谒。光武不但不怪，反赐他帛四十匹。东海王良，在王莽篡汉时，寝病不仕，教授诸生千余人。建武三年（27），征拜谏议大夫，后迁沛郡太守、太中大夫，官至大司徒司直。还有一个与光武少年同游学的会稽严光（字子陵），少有高名，刘秀称帝后，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光武帝备车遣使聘请，一连去了三次，严光才来到洛阳。光武帝亲自到他的住处相见，请他出山相助，严光谦辞。光武帝再次请他入宫，与他同床共卧，论道旧故，并任命他为谏议大夫，严光仍不肯。建武十七年，又特征召，严光又不至，年八十，终老于家。光武帝非常痛惜，下诏郡县赐给严光家属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对待士人的礼敬政策，受到当时人的欢迎，许多原来宣布不与王莽合作的士人，都先后来奔，为东汉王朝效力。

光武在即帝位后的三十四年中，实行了一系列旨在缓和社会矛盾和恢复生产的措施，以重建汉朝对全国的统治。赤眉、绿林起义的严重教训，豪强地主势力的严重威胁，使他在建立东汉王朝后，首先改变中央权力结构，以加强皇权；注意整顿吏治，精兵简政，释放奴婢，减轻赋税，礼贤下士，崇尚节

俭。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虽身济大业，兢兢如不及”㉙。自光武中期以后于明帝之末，其间四十余年，既未发生过内战，亦无封建割据，社会出现了基本安定的局面。《汉书·刑法志》称：“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间同”。建武初年，全国户籍遗存的人口只有十分之二，致田野荒芜；到建武五年，情况已有所好转，土地逐渐得到垦辟。光武末年，载于户籍的人口已达到二千一百多万。光武以后的若干年内，出现了“天下安平”的时代，这与光武皇帝的开创之功是不可分的。因此，光武帝统治时期，史称“中兴”。南宋诗人陈亮说：“自古中兴之盛，无过于光武”㉚，可谓允论。

注 释

①《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②③《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

④马端临：《文献通考·职官》。

⑤《后汉书》卷第二八《百官》五。

⑥⑦⑧《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⑨《后汉书》卷三一《杜诗传》。

⑩⑪《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

⑫《汉书》卷二三《刑法志》。

⑬《后汉书》卷二八《冯衍列传》。

⑭⑮⑯⑰⑱⑲《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⑳㉑《后汉书》卷二七《宣秉、王良传》。

㉒《后汉书》卷四一《第五伦传》。

㉓㉔㉕《后汉书》卷一六《邓寇列传》。

㉖㉗㉘《后汉书》卷八三《逸民列传》。

㉙《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㉚宋陈亮《龙川文集》卷五《酌古论一》。

定谶纬为国宪

东汉王朝建立后，刘秀及其后继者为了巩固新政权，大力提倡谶（音衬）纬之学，并定为官方统治思想。

所谓谶纬，即指谶记和纬书。“谶”是方士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常附有图，所以也称“图谶”、“图书”。“纬”则是相对于“经”而言，《四库全书》说：“纬者，经之支流”，是假托神意来解释儒学经典的书，也称纬书。实际上，谶纬都是汉代人假托天帝或孔子的名义，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编造的著作，其总的思想属于阴阳五行体系。它的内容很庞杂，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天文、历数、地理、文字，也有讲典章制度的，更多的则是宣扬神灵怪异的。这些内容，除包含一部分有用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古史传说以外，绝大部分都是荒诞不经的迷信妄语，颇便于人们穿凿附会地作出任意的解释。

预言而以谶之名出现于中国史籍，始于秦穆公一梦。据史书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曾于梦中会见天帝，天帝告以“晋国将大乱，五世不安；其后将霸，未老而死”；秦大夫公孙

文书而藏之，“秦谶于是出矣”①。秦始皇时，燕人卢生入海求神仙，奏上“图书”，上写“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以为匈奴（胡人）将威胁秦王朝，因此派蒙恬发兵北伐匈奴，夺取河套之地。类似这样的谶语还有不少，如“今年祖龙死”，“始皇帝死而地分”……这些都是当时人民假天神之名发出的预言。到了西汉末年，由于社会危机深重，图谶随之更加流行。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利用谶书，诈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②。刘向奏忠可假借鬼神罔上惑众，汉成帝把忠可下狱治罪，最后死于狱中。谶语的制造，到西汉末年达到全盛时代。王莽辅政之后，各地纷纷呈报祥瑞，仅平帝在位的五年间就出现了七百多件。接着，武功（今陕西眉县东）县长孟通浚井得到一块上圆下方的白石，石上丹书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竟因此做了假皇帝。但王莽并不以此为满足，后来又利用梓潼（今四川广汉）人哀章所作“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指刘邦）传予黄帝（指王莽）金策书”，言“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如天命”③的符命，终于登上真皇帝的宝座，定国号为“新”，改正朔，服色配德尚黄。王莽建立新朝后，将上述这些谶文编录为“符命”四十二篇，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巡行天下宣传解说，证明王莽代汉完全是上天的意旨。

到了新朝末年，刘秀又利用图谶起兵造反。当时，南阳一带饥荒严重，民不聊生，宛人李通乃以“刘氏复起，李氏为辅”的图谶，劝说刘秀起兵。当刘秀在河北立稳脚跟，并向中原推进时，他早年在长安的同学强华送来“河图赤伏符”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④刘

秀的部属大造舆论，说这是"受命之符"，应了火德之运，劝刘秀称帝。其后于建武元年（25），刘秀终于利用谶记在鄗做了皇帝。此外，还有和刘秀同时割据四川的公孙述，也找寻许多天帝允许他应当做皇帝的谶语，准备在成都称帝。

当时，谶语虽然极其盛行，但直至古文经出现之前，还未形成有系统的文献。古文经出现以后，才有人把这些天帝的言语编辑起来，而命之曰纬书。谶语只是构成纬书资料的一部分，除此之外，还有浩如烟海的传说与神话。编辑纬书的目的，主要地是要从侧面宣扬孔子的儒家学说，以达到吹捧利用儒家学说的汉朝统治者的目的。因此，光武帝在即位后，酷好纬书，虽头昏目眩，仍不忍释手。当时他的臣下，有人竟因谶纬的偶合，被提升官职。例如有一个做野王（今河南沁阳）令的王梁，因为《赤伏符》上有一句"王梁主卫作玄武"，刘秀认为玄武是北方水神，司空是水土之官，于是擢升王梁为大司空，居于三公的高位⑤。也有人妄改纬书，希图幸进，例如建武二年（26），光武帝命尹敏校对纬书，并指示他把那些吹捧王莽的图谶全都删除。尹敏对刘秀说："谶书非圣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词，恐疑误后生。"光武帝没有同意他的意见。尹敏见有机可乘，便利用谶书阙文添上一句"君无口，为汉辅"，即是说尹敏（"君"字去掉口为"尹"字）应为汉王朝的辅弼之臣。光武帝觉得奇异，便召尹敏查问，尹敏回答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⑥光武帝虽不悦，但并未治尹敏之罪，只是终身未加升迁而已。

光武帝把谶纬作为一种重要的统治工具，甚至决断政事，发诏颁命，施政用人，也要引用谶纬，谶纬实际上超过了经书的地位。一次，光武下诏群臣会商修建灵台（天象台）处所，

欲用图谶决断，他问桓谭有何意见？桓谭沉默良久，回答说："臣不读谶"，并极言图谶不合经义。光武帝大怒，斥责桓谭"非圣无法"，即要将他问斩。桓谭在光武帝的淫威下，被迫叩头流血，直至刘秀气消，这场风波才算过去。然而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竟因此被贬外任，死在途中。桓谭"博学多通，徧习五经"⑦，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扬雄辩析疑异。建武初年，经大司空宋弘推荐，拜议郎给事中，因上疏陈时政所宜。是时，光武帝正在迷信图谶，每以谶记决定嫌疑，桓谭上疏批评谶记之虚妄曰："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诖误人主，焉可不抑远之哉!"他建议光武帝："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⑧光武帝对于桓谭的议论，本已感到不快，这次桓谭在建灵台的廷议中又直言不讳地"极言谶之非经"，更加激怒光武帝，以致必要加之以死罪。桓谭的遭遇表明，在光武看来，非谶即非法，谶纬神学已成为东汉初年官方的统治思想。

还有一次，光武帝问太中大夫郑兴郊祀之事，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郑兴回答说："臣不为谶。"光武大怒，反问之曰："卿不为谶，非之邪?"⑨显然把不学谶与反谶联系在一起，给郑兴加上一个非圣非法的罪名。郑兴惶恐万状，当即谦辞解释说："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⑩表示自己对于谶书有所未学，而不敢反对，这才幸免于难。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王莽当政时，曾携门人从刘歆讲正左氏大义，与当时另一名儒贾逵并称"郑贾之学"。郑兴每言政事，则依经守义，文章温雅，然而因为他"不善谶"，始终未能得到重用。在当时，图谶已成为仕途显达的决定因素。

光武帝不仅用谶纬决定政事，当时的一些礼仪制度和礼仪盛典，也无不以谶记纬书为根据。光武帝晚年，大司空张纯、博士桓荣等人，曾根据《七经谶》、《明堂图》等纬书，请立辟雍（古太学及祭祀之所）及明堂（古代天子宣明政教之所），光武帝准奏施行。张纯又请封禅泰山，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禅，以告成功。"⑪中元元年（56），光武帝东巡岱宗，登泰山举行祭天大典；之后又禅于梁父，祭祀地神于梁阴，命张纯以视（比也）御史大夫随从。是年十一月，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⑫，正式以法律形式确立谶纬神学的统治地位，从此谶纬迷信风行全国。章帝时，举行汉宫白虎观会议，使诸儒讲论《五经》异同，在皇帝的亲临主持下，最后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亦称《白虎议奏》）——一部集儒学与谶纬于一体的神学化国典。自此以后，儒家学说，遂蒙上一层神学的云雾。

注 释

①《史记》卷一三《赵世家》。

②《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③《汉书》卷九九《王莽传》上。

④《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⑤《后汉书》卷二二《王梁传》。

⑥《后汉书》卷七九《尹敏传》上。

⑦⑧《后汉书》卷二八《桓谭传》上。

⑨⑩《后汉书》卷三六《郑兴传》。

⑪《后汉书》卷三五《张纯传》。

⑫《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秦汉

班超经略西域

继西汉张骞开通西域之后，东汉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大探险家班超。

班超（32——102），字仲升，东汉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其父班彪、兄班固，都是东汉著名史学家，其妹班昭，是一位有才华的女作家。班超生长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颇受其父兄影响，史称其“为人有大志，不修细节。然内孝谨，居家常执勤苦，不耻劳辱”①，而且博览群书，很有口辩。班彪死后，班氏家境中衰，生活十分清苦。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迁为郎，典校秘书，班超与老母随至洛阳。因为家境贫困，班超不得不受雇官府，抄书取酬，供养老母。这与班超志在四方的报国大志很不协调。一日，班超辍业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②同事们都笑他说大话。班超感慨地说：“平庸的人怎能了解壮士的抱负呢？”

永平十六年（73），东汉政府为了恢复丝路交通，命窦固领兵出击匈奴，窦固以班超为假司马（代理司马，较低级武

官）。在攻打伊吾庐（今新疆哈密西），大战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的战斗中，班超机智勇敢，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深为窦固所器重。为了联络西域各国，孤立匈奴，重建汉朝与西域各国的政治关系，窦固决定派班超出使西域。这对班超来说，正是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

班超率领从事（辅佐文官）郭恂等三十六人首先来到鄯善。鄯善原名楼兰，在塔里木盆地的东端，西域南北两道的必经之路。西汉昭帝元凤四年（前77），傅介子曾出使楼兰，用计智杀倒向匈奴的楼兰王安归，改名鄯善，恢复了一度中断了的丝路交通。此次班超肩负着与当年傅介子同样的使命，来到鄯善。当时鄯善王广由于汉朝大军新破匈奴，失去依靠，所以对待汉使"礼敬甚备"。但数日后，匈奴的使节来到，鄯善有了匈奴做靠山，所以对班超的礼敬忽然疏懈。班超察知其情，乃悉召其吏士三十六人，饮酒高会，从而激励之曰："卿曹与我俱在绝域，欲立大功，以求富贵。今虏（指匈奴）使才到数日，而王广礼敬即废；如今鄯善收吾属送匈奴，骸骨长为豺狼食矣。为之奈何？"吏士异口同声答道："今在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当机立断，朗声地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当今之计，独有因夜以火攻虏，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尽也。灭此虏，则鄯善破胆，功成事立矣。"③入夜，班超带领吏士奔向匈奴使者驻地，适值大风骤起。班超命十名吏士携鼓隐藏在匈奴营舍之后，并约定，以火为号，看见火光，立即鸣鼓大呼。其余吏士皆持兵器，埋伏在匈奴营门两侧。部署完毕，班超乃顺风纵火，喊杀之声大起。匈奴人惊慌不知所措，到处乱窜，班超亲手杀死三人，吏士斩杀匈奴使者及随从三十多人，其余的一百余人全部被烧死。明日，班超约见鄯善

王广，向他出示匈奴使者首级，鄯善举国震怖。班超好言抚慰，宣传汉德，鄯善王表示愿意与匈奴断绝关系，归附汉朝，并遣其子入汉为质。

窦固将班超的功绩上报朝廷，并请求朝廷复选干员出使西域。明帝对班超的才能十分赞赏，立即诏令窦固曰："吏如班超，何故不遣而更选乎？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遂前功。"④班超遂复任使臣。行前，窦固打算给他多派些人马，班超辞谢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如有不虞（意外），多益为累。"⑤窦固同意了他的请求。

班超此次出使，首先来到于阗（今新疆和阗县）。其时，于阗王广德新破莎车（今新疆莎车），雄据南道，势力方盛，而北匈奴又派有使臣监护其国。因此，广德对于班超等人的态度很是简慢。于阗人还有迷信巫人的习俗。巫师闻汉使至，竟对于阗王说："神已发怒，责问何故欲向汉？汉使有匹騧马（guā 瓜，黑咀的黄马），赶快取来祭祀我。"广德不敢有违，乃派使者至班超处求取騧马。班超对此情况早已侦知，当即佯允，但要求巫师亲自前来取马。巫人不知是计，有顷，欣然而至，班超当即斩杀巫首送给广德，从而质责广德对汉使不敬、对汉廷不诚之罪。广德早已闻知班超在鄯善诛灭匈奴使团的壮举，今见班超发怒，大为惶恐，立即派人攻杀匈奴监护使者，诚心附汉。班超重赏广德及其所属官员，并加安抚，由此班超威镇于阗。

永平十七年（74）春，班超来到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先时龟兹（qiū cí 丘慈，今新疆库车）王建为匈奴所立，他依仗匈奴势力，控制北道，攻破疏勒，杀死其王，另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故当时的疏勒，直接为龟兹王的属国，而间接受

制于匈奴。班超在到达疏勒前，在距兜题所居槃橐城九十里处暂驻，派从官田虑先去招降。行前，班超指示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种，国人必不用命。若不即降，便可执之。"⑥田虑到后，兜题见其人少力弱，毫无归降之意。田虑乘其无备，突然劫持兜题，左右惊慌奔走。田虑将情况派人飞报班超，班超立即赶到槃橐城，悉召疏勒将吏，当众揭露龟兹王倒行逆施的种种暴行，并求得疏勒故王兄子榆勒，更名为忠，立为疏勒新王。疏勒举国欢腾。榆勒及其官属皆请处死兜题。班超为树立汉朝声威，释兜题遣归龟兹。疏勒由是与龟兹结怨。

西域自与汉断绝六十五载之后，至是复通。于是汉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汉以陈睦为都护，耿恭为戊校尉，屯田车师后部金蒲城（今新疆奇台县西北）；关宠为己校尉，屯田车师前部柳中城（今新疆鄯善县西南）。屯田士兵各数百人。

永平十八年（75）春，北匈奴单于派左鹿蠡王率领两万名骑兵，反攻车师后部。七月，又围耿恭于疏勒城⑦。八月，明帝死，皇太子嗣位，是谓肃宗章皇帝。冬，焉耆、龟兹乘机围关宠于柳中城。车师复叛汉廷，伙同匈奴共攻耿恭于疏勒城。耿恭食尽穷困，乃煮铠弩，食其筋革，最后仅剩数十人，仍厉众坚守。汉遣征西将军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调发张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共七千余人，星夜驰援。终因道路遥远，未能遽至。龟兹、姑墨（今新疆温宿、阿克苏一带）也趁机屡发兵攻疏勒。当时班超拒守槃橐城，势孤力单，只能与疏勒王忠相呼应，拒守一年有余。章帝以陈睦新没，班超力单不能自立，乃悉罢西域都护校尉官，同时下诏征召班超回国。

东汉的势力从塔里木盆地撤退，给西域南道诸国，造成很大的恐怖和压力。因为东汉军队一旦撤退，匈奴必然卷土重

来，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报复。班超将要启程，疏勒举国忧恐，其都尉黎弇曰："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⑧说罢，竟引刀自刭。班超自疏勒还至于阗，于阗王侯以下皆号泣，抱住班超马脚，曰："依汉使为父母，诚不可去!"班超见此情景，知道于阗将不肯放其东归，自己也因壮志未酬，决定暂不回国，与所率三十六人又折返疏勒。在此期间，疏勒有两城复降龟兹，并与尉头（约在今新疆阿合奇县一带）连兵，企图颠覆班超所建立的疏勒政府。班超回到疏勒后，采取果断措施，勒兵击杀疏勒的反叛者，又击破尉头，诛杀六百余人，使疏勒的局势重新安定下来。

建初三年（78），班超率疏勒、康居（在今巴尔克什湖和咸海之间）、于阗、拘弥（在今新疆于田县克里雅河东）等国士兵一万人攻破姑墨石城，斩首七万级。班超欲乘胜平定西域诸国，遂上疏章帝，大意说：西域诸国大多数倾向汉朝，只有焉耆、龟兹未服，若能集中各国兵力攻破龟兹，派数百名骑兵护送龟兹侍子向霸回国为王，便可稳定西域，断匈奴右臂，"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⑨。章帝览奏，知其功可成，遂于建初五年（80）以徐干为假司马，率领驰刑（缓刑）及义从（志愿兵）一千人往助班超。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再复出，遂降附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复叛汉。恰巧徐干率兵及时赶到，班超遂与徐干共破番辰，斩首千余级，俘虏甚众。班超既破番辰，又欲连络天山以北之乌孙，进攻龟兹，以牵制匈奴。他上书章帝曰："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⑩章帝采纳其建议，遣使与乌孙通好。建初八年（83），章帝派班超为将兵长史（大将军置长

史、司马；其不置将军而长史特将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臣归国。李邑到达于阗，正值龟兹进攻疏勒，惧不敢前，反而上书陈奏西域难平，并极力诋毁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章帝深知班超忠心，乃切责李邑："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⑪因令其到班超处接受节度，同时诏令班超说，如果李邑到达班超处报到，便留与从事。班超不但没有留难他，反而派李邑监护乌孙侍子回到京师。徐干很不理解，问班超为何这样处理？班超回答说："内省不疚，何恤人言！"为了国家，班超心底竟是如此之宽广！

元和元年（84），东汉政府再派假司马和恭等四人统兵八百增援班超。至此，班超所属汉军前后共有一千八百人，于是他以这些人马为基本力量，同时凭借西域诸国之兵，信心百倍地展开经略西域的英雄事业。班超首先发疏勒、于阗两国的军队，从东西两面夹攻莎车。莎车自知不敌，乃一面以珍宝贿赂王忠，要其从内部反叛，西保乌即城；一面求援于龟兹。当班超出兵以后，疏勒果然叛汉而从莎车。班超于是改立疏勒府丞成大为疏勒王，悉数征发疏勒的亲汉吏民，全力攻忠。由于康居出兵援忠，半年未能攻下。班超又施展外交攻势，联合与康居结姻的月氏，厚赠锦帛，令其晓示康居王罢兵，并执忠以归其国。乌即城遂降于班超。

章和元年（87），班超征发于阗等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复击莎车。龟兹王遣左将军发温宿、姑墨、尉头兵共五万人前往救援。班超召集将校及于阗王商议决定："今兵少不敌，其计莫若各散去。于阗从是而东，长史（时班超为将兵长史）亦于此西归，可须（等待）夜鼓声而发。"⑫然后故意放松对所获

俘虏的监视，令其得便逃走，还报军情。龟兹王闻讯大喜，亲率一万名骑兵驰至西界，阻遏班超。温宿王率八千骑兵于东界，邀截于阗兵。班超得悉二虏已出，遂密召诸部部置兵马，于鸡鸣时赶至莎车营。胡虏毫无准备，惊乱奔走，班超乘势追杀，斩五千余级，大获其马畜财物，莎车遂降。龟兹、温宿等亦各退散。班超由此威震西域，远近慑服。西域南道从此畅通。

正当东汉政府在西域进行活动时，月氏族亦欲染指塔里木盆地。永元二年（90）五月，大月氏遣其副王谢统兵七万，向班超进攻。当时班超兵力甚少，部属都感到惶恐不安，班超胸有成竹，镇定自若，他晓喻军士们说："月氏兵虽多，然数千里逾葱岭来，非有运输（言运输粮草困难），何足忧邪！但当收兵坚守，彼饥穷自降，不过数十日决矣！"⑬事态的发展果如班超所料。月氏副王谢驱兵进攻班超，不胜，纵兵抄掠，又一无所得。班超估计敌军军粮将尽，必定派人向龟兹求援，于是派兵数百于东界邀截。谢果然派出骑兵携带金银珠玉往赂龟兹。班超伏兵截击，将其尽行消灭。班超派人持月氏使者首级以示谢，谢大惊恐，因即遣使向班超请罪，乞求生还。班超释其西归。月氏由是大震，向东汉岁奉贡献，以示臣服。

永元三年（91），在班超的威名震慑下，龟兹、姑墨、温宿诸国皆降。是年底，东汉政府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校尉官。以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拜白霸为龟兹王，遣司马姚光护送其回国。班超与姚光共同胁迫龟兹，废其王尤利多而立白霸，同时派姚光将尤利多送至洛阳。班超驻龟兹它乾城，徐干屯疏勒。其时西域只有焉耆、危须（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尉犁（今新疆库尔勒）尚怀二心，其余悉定。

永元六年（94）秋七月，班超调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共七万余人，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伐焉耆。大军到达尉犁界，班超派使者晓喻焉耆、尉犁、危须说："都护来者，欲镇抚三国。即欲改过向善，宜遣大人（谓其首领）来迎，当赏赐王侯以下，事毕即还。今赐王綵五百匹。"⑭焉耆王广遣其左将北鞬支携带牛酒来迎班超。班超质问鞬支说："汝虽匈奴侍子，而今秉国之权。都护自来，王不以时迎，皆汝罪也。"⑮班超部下有人建议班超杀掉北鞬支。班超以为不可，说："此人权重于王，今未入其国而杀之，遂令自疑，设备守险，岂得到其城下哉！"⑯于是依例赏赐鞬支，遣其归去。焉耆王广遂与其酋豪带上珍宝至尉犁来迎接班超。

焉耆国有苇桥之险。广因戒惧，不欲令汉军进入其国，乃拆除苇桥，断绝交通。班超指挥部队从别路涉深水而渡。七月末，班超进入焉耆，在距城二十里的大泽之中扎下营寨。广得到报告，大为惊恐，准备将其部众尽数驱入山中以自保。焉耆左侯元孟以前曾入质洛阳，与汉有旧，因派人将此事密告班超。班超当即斩杀来人，示不信用。然后与诸国王约定会期，扬言要对与会者重加赏赐。焉耆王广、尉犁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十人如期到会。焉耆国相腹久等十七人惧诛，皆逃至海上，危须王也未到会。广等坐定，班超怒斥广说："危须王何故不到？腹久等所缘（为什么）逃亡？"⑰说罢，即下令吏士捉拿广、汎等斩首于陈睦故城。然后纵兵钞掠，斩首五千余级，俘虏一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宣布改立元孟为焉耆王。班超本人留驻焉耆城内半岁，对焉耆百姓善加抚慰。于是西域大小五十余国全部摆脱匈奴控制，纳质归附，再度隶属于东汉统治之下。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为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和帝下诏表彰其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

班超征服了西域，使通往西亚各国的“丝绸之路”重新畅通无阻。永元九年（97），班超派遣其副使甘英出使大秦国（今罗马）。甘英一行曾经到达条支（今伊拉克）的西海（波斯湾）岸。本想渡海赴罗马，据说为安息（今伊朗）西界船人所阻，由波斯湾头折回。甘英是我国有史以来出现于波斯湾的第一人。

班超“壮年竭忠孝于沙漠”，到了晚年，思念故土的感情与日俱增。永元十二年（100），他上奏和帝，请求准许他还归故土。疏中有“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之语，情词恳切，感人肺腑。朝廷接到班超奏疏，不知何故，很长时间未能回报。班超胞妹班昭（即曹大家，因嫁扶风曹寿，博学高才，和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以师事之，号曰大家）亦上书和帝，代兄复请，大意谓：班超在沙漠至今三十年，骨肉分离，不复相识。班超年近七十，衰老多病，旦暮入地；发有猝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故敢触死为超求哀，匄超余年。情真意切，委婉动人。和帝览奏，很受感动，下诏征班超回汉。班超奉诏于永元十四年（102）八月回到洛阳，拜为射声校尉。班超素有胸胁疾，回洛阳后病情加重，医治无效，同年九月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一岁。

班超为了开通西域南北道，远在绝域艰苦奋斗了三十年，使西域诸国摆脱了匈奴的奴役，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经济文化联系。从此，著名的“丝绸之路”，再度畅通。班超为我国历史的发展和统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为后人所追思。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⑦按此疏勒城在今喀什噶尔，不是塔斯马干沙漠西端的疏勒。

⑧《资治通鉴》卷四六，东汉章帝建初元年。

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

两匈奴叛服

王莽天凤五年（18），匈奴乌累单于咸死后，其弟左贤王舆继立，是谓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由于王莽的倒行逆施，破坏了汉匈的友好关系，也促成了其自身的灭亡。更始政权建立，刘玄遣中郎将归德侯刘飒、大司马护军陈遵出使匈奴，授单于汉旧制玺绶，要求恢复传统的友好往来。单于舆骄傲语使者："匈奴本与汉为兄弟，匈奴中乱，孝宣皇帝辅立呼韩邪单于，故称臣以尊汉。今汉亦大乱，为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击莽，空其边境，令天下骚动思汉，莽卒以败而汉复兴，亦我力也，当复尊我！"①态度极其强硬。从此匈奴内部反汉的敌对势力抬头，汉匈关系再趋紧张。

东汉建立初年，匈奴利用中原战乱之机，扶植割据势力，分裂汉朝。建武元年（25），据有安定三水（今宁夏同心县东）的卢芳，自立为上将军、西平王，派使者与西羌、匈奴相勾结，匈奴单于舆乃使句林王率数千骑兵迎接卢芳兄弟入匈奴，并且立卢芳为"汉帝"，以芳弟卢程为中郎将，率领匈奴骑兵回到安定，以为声援。不仅如此，匈奴单于还派使者与起兵边

郡的五原人李兴、随昱、朔方人田飒、代郡人石鲔、闵堪等和亲，笼络他们支持卢芳回内地称帝，企图通过这位“汉帝”，变中原为匈奴的属地。建武五年（29）十二月，李兴等人引兵至单于庭迎接卢芳入塞，并在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建立傀儡政权，占有五原、朔方、云中、定襄、雁门等五郡，分置守、令。卢芳与匈奴连兵攻掠东汉北部边郡，人民不堪其苦。

当时东汉政府初建，力量比较薄弱，而且刘秀正忙于进行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北部边事，对匈奴的侵扰，只能加强边塞，采取防御政策。建武六年（30），刘秀始先后派刘飒、韩统出使匈奴，并馈赠大量金币，企图重修旧好。然而单于态度倨傲，对汉使词语狂悖，对汉边境侵掠如故。建武九年（33），刘秀遣大司马吴汉指挥王常等四将军共五万余人出击卢芳。匈奴出兵救援，连战经年，汉军无功而还，匈奴气焰更加嚣张，侵掠有加无已。东汉政府只得采取守势，以朱祐屯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王常屯涿郡（今河北涿县），侯进屯渔阳（今北京密云西南），王霸为上谷太守，以防匈奴的进扰。建武十五年（39），匈奴攻掠日甚，州郡无法抵御。刘秀遣吴汉率马成、马武等北击匈奴，徙雁门（今山西朔县东南）、代郡（今山西阳高西北）、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吏民六万余口于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匈奴的杀掠。同时，在边地大筑亭候，修烽火，增沿边兵每郡数千人，以加强防守。

匈奴单于闻汉朝悬赏购求卢芳，贪得财帛，故意遣卢芳还降。卢芳派使请降，刘秀为使卢芳和辑匈奴，立其为代王。卢芳亦以自归为功，不称匈奴所遣，单于怕暴露阴谋，也未敢明言真象，因而东汉政府未予赏赐。匈奴单于恼羞成怒，更加怨

恨，侵掠更加深入。建武二十年（44），匈奴两次攻掠上党（今山西长子）、扶风（今陕西兴平）、天水（今甘肃通渭西）一带。明年春，又与乌桓、鲜卑连兵攻掠北边，代郡以东受害尤深，"五郡民庶，家受其辜，至于郡县损坏，百姓流亡，边陲萧条，无复人迹"②。是年冬，匈奴又侵扰上谷、中山（今河北定县）等地，"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③。

建武二十二年（46），匈奴单于舆死，其弟左贤王蒲奴立为单于。匈奴内部因继立问题发生矛盾；加以匈奴国内连年蝗旱，赤地千里，人畜饥疫，死耗过半，力量大为削弱，不得不暂停军事攻掠，并遣使至渔阳请求和亲，以缓和汉匈之间的紧张关系。呼韩邪单于之孙、匈奴南边诸部首领日逐王比以不得立，心怀愤恨，乃密遣汉人郭衡携带匈奴地图，于建武二十三年面见东汉西河郡（治离石，今属山西）太守，请求归附。匈奴八部大人共议立比为单于，仍袭用呼韩邪名号，表示继承西汉末年汉匈的传统关系。明年，日逐王比率领南边所属八部兵四五万人降汉。光武帝采纳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接受比的归降，令其"东扞鲜卑，北拒匈奴，率厉四夷，完复边郡"④，并承认他为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从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汉匈关系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建武二十六年（50），东汉政府派中郎将段郴等出使南匈奴，立单于庭于五原（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西部，设置"使匈奴中郎将"，率兵保护并指导督察，南单于遣子入侍。汉王朝赏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官员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及粮食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缯絮万匹，絮万斤。其年冬，南单于因与北匈奴交战失利，东汉政府决定将单于庭南迁至西河美稷（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命

"使匈奴中郎将"及西河长史派兵保护单于，并恢复沿边郡县，南单于亦列置诸部王，率领部众协助戍守，侦察北匈奴动静。

南单于归附汉朝，北匈奴单于蒲奴甚为惶恐。先是归还以前所掠汉民以示善意；建武二十七年（51）又假意遣使至武威请求与汉和亲。东汉政府召集公卿廷议，众臣议论纷纭，未能作出决断。刘秀认为北匈奴的军事力量尚强，彻底消灭，还非其时，不如息民待时，以观其变。明年，北匈奴再次遣使进贡马匹及裘皮，乞求和亲，并请赐与音乐。光武帝交三公府商议酬答良策，司徒掾班彪建议用西汉宣帝时呼韩邪、郅支两单于的历史教育北单于蒲奴，指明"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殊俗百蛮，义无亲疏，服顺者褒赏，叛逆者诛罚，善恶之效，呼韩、郅支是也"⑤。意思是，蒲奴单于必须真心归降，表里如一，如有二意，必将落得和郅支单于同样的下场。同时赐给布帛、弓矢、利剑等物作为酬答，但不派使者回访。所请乐器，因单于国尚未安，方厉武节，以战功为务，暂不赐予。光武帝采纳了班彪的意见。其后，北匈奴侵掠行径稍有收敛。

到了明帝时期，北匈奴的力量逐渐强盛，他们控制西域，经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了避免匈奴的侵扰，答允与北匈奴"合市"。南匈奴一些叛者因汉与北匈奴交使，内怀嫌怨，秘密同北匈奴贵族勾结，准备共同反对东汉王朝。东汉政府于永平八年设置度辽营，以中郎将吴棠行度辽将军事，屯五原曼柏（今内蒙古东胜东北），以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北匈奴虽遣使入贡，而仍多次在河西边郡大肆攻掠，"焚烧城邑，杀略甚众，河西城门昼闭"⑥，边郡再度受到威胁。东汉王朝为确保河西四郡的安全，并相机恢

复同西域的交通，决定改变以防御为主的策略，采取主动出击的方针。永平十六年（73），明帝派窦固等率领汉军和南匈奴、羌胡等族士兵共四、五万人分四路出击匈奴。窦固、耿忠一路，出酒泉塞至天山（今新疆吐鲁番北），击败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领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置宜禾都尉，留吏士屯守。其余三路，因匈奴闻风北逃，皆无功而还。次年，耿秉、窦固等率军一万四千骑，征服车师（今新疆奇台、吐鲁番等地），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

章帝继位后，北匈奴因饥乱，降南部者岁数千人，仅章和元年（87），即有屈兰储等五十八部，二十八万口来降。南匈奴和鲜卑、丁零等在汉王朝支持下，进袭北匈奴，也常有虏获。北匈奴的力量日益削弱。章和二年（88），章帝死，和帝继位年幼，窦太后临朝听政。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上书窦太后称：据北匈奴新降渠帅报告，北单于兄弟争立，部众离散，“宜及北虏分争，出兵讨伐，破北成南，并为一国，令汉家长无北念”⑦。和帝永元元年（89），东汉政府以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领骑兵八千，与度辽营及南单于骑兵共三万人，从朔方出兵，分三路，出击匈奴，与北单于大战于稽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西南），北匈奴败逃。汉军追击，斩名王以下一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百余万头，北匈奴官兵陆续归降者，前后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耿秉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杭爱山），命中护军著名史学家班固撰写一篇铭文，刻石纪功，宣称这次远征是上为高祖、文帝报仇雪耻，宣扬祖宗神灵，下为安国保嗣，开拓疆土，发展大汉声威。

第二年，南匈奴单于屯屠何再次上书请求消灭北匈奴，于是派左谷蠡王师子等率领骑兵八千人，在汉军军官将护下，远征北匈奴，乘夜围攻。北单于受创伤后率数十名轻骑兵逃脱，其阏氏及家属五人均被俘获，斩北匈奴官兵八千人，俘虏数千口而还。

永元三年（91），窦宪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大破北匈奴于金微山（今阿尔泰山），俘获北单于母阏氏，斩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北单于逃走，不知所在”⑧。汉军出塞五千余里而还，是北征匈奴行程最远的一次。经过这次打击，北单于率余众退出漠北，西走康居（在前苏联乌兹别克一带），其后又入欧洲，汉朝边郡不再受匈奴的骚扰。

注 释

①《汉书》卷九四《匈奴传》下。

②《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五郡：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郡。

③《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④《资治通鉴》汉光武帝二十三年。

⑤《资治通鉴》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

⑥⑦《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

⑧《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诸羌叛服

王莽末年，羌人大量入居塞内，散布在金城（治允吾，在今甘肃永靖县西北）等郡，与汉人杂处。汉羌人民习俗既异，言语亦互不相通，羌人“数为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①,因而时常聚众反抗。东汉初年，光武帝为安抚羌人，采纳司徒掾班彪建议，恢复设立护羌校尉，以牛邯主领其事，持节监护，理其怨结，但羌人犯塞并未停止。建武十年至十二年，先零羌豪曾与诸种联合，再度进犯金城、陇西、临洮一带，光武帝先后派中郎将来歙、陇西太守马援率兵击破。马援将归服的羌人，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分散治理，陇右保持相对平静。明帝继位后，对羌人采取软硬兼施策略，攻战稍稍缓和。从章帝建初二年（78）至和帝永元十三年（101），这二十多年时间，汉羌战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对烧当羌迷吾、迷唐父子的征伐，连年动众，干戈不息，耗费甚巨。羌首迷吾虽为汉陇西太守张纡定计毒杀，然汉朝郡守代领护羌校尉者或被杀，或征战无功，以致不得不频频易人。章帝时，张掖太守代护羌校尉邓训由于实施威抚并用、以赏赂离间诸种的策略，

甚得其效，以致迷唐叔父号吾亦率其种人来降，使迷唐被迫远徙，部属离散。经过长期战争，众多羌人因战败而降服，但遭到地方官吏豪右所奴役，因而积怨为仇。东汉中期以后，羌人的反抗比以前更加激烈。

羌人第一次大规模反汉始于安帝永初元年（107）。是年六月，东汉政府派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接应西域都护段禧及屯田吏卒东归，期限紧迫，官吏苛暴。群羌担心远屯不还，行至酒泉即纷纷逃散。诸郡各发兵邀截，官兵乘机骚扰，甚至毁坏羌人村落。羌人奋起反抗，先零别种滇零与钟羌诸种，阻断陇道，大肆钞掠。他们没有兵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或执铜镜以象兵（可能是利用铜镜的闪光来吓唬敌人）”②，郡县官兵畏懦，在羌人进攻面前，竟然束手无策。永初二年（115）春，东汉王朝诏令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率领中央及诸郡兵五万人前去征讨。邓骘进至汉阳（今甘肃甘谷），诸郡兵尚未到达，就被钟羌数千人击败，死亡千余人。是年冬，任尚率诸郡兵与滇零等数万人战于平襄（今甘肃通渭西），又被打得大败，死亡八千余人。羌人气势大盛，朝廷无可奈何。滇零于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自称天子，并联合武都、上郡、西河诸种羌人，“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掠三辅，断陇道。湟中诸县粟石万钱，百姓死亡不可胜数”③。在此情况下，东汉王朝不得不召邓骘还师，留任尚屯汉阳，节度诸军。

东汉军队既临阵忘战，缺乏战斗力，而地方二千石、令、长又多为内郡籍，他们无心战守，纷纷要求朝廷迁徙郡县以避战祸，邓骘也主张放弃凉州。永初五年（111），东汉政府正式

下令将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太守治所迁徙至内地。然而，百姓眷恋故土，不愿离开家园，东汉官府于是派兵抢割庄稼，拆毁民屋，夷平营垒，破坏积聚，强迫驱赶边民上路。当时正值连年旱蝗饥荒，百姓转徙离散，老弱弃置道旁，沿途死亡及幸存沦为奴婢者，已超过半数。东汉政府的残暴和无能迫使汉、羌人民联合起来进行反抗。

同年秋，汉阳人杜琦及弟季贡、同郡王信等与羌人通谋，共同起兵反对东汉政府。他们占领上邽（今甘肃天水）城，杜琦自称“安汉将军”。东汉军队无法取胜，不惜以高官厚禄悬赏购求杜琦首级，汉阳太守赵博收买刺客暗杀杜琦，其后王信兵败被杀。杜季贡被羌族首领推为将军，继续联合战斗。元初二年（115），汉阳太守庞参率羌胡兵七千余人，北击零昌，行至天水郡，为杜季贡所败，庞参因而被免职。朝廷派任尚为中郎将，率羽林、缇骑、五营子弟（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所属部队）三千五百人，屯驻三辅，讨伐杜季贡。任尚采纳属下虞诩建议，罢诸郡兵，各令出钱数千，二十人共市一马，组成轻骑部队，抄击杜季贡于丁奚城（属北地郡，在今宁夏灵武东南），斩杀四百余人，获牛马羊数千头。元初四年（117），任尚先后收买羌人刺杀杜季贡和零昌。其后，任尚又率诸郡兵与骑都尉马贤共击北地郡羌人狼莫。马贤为狼莫所败，任尚率军赶到，合兵俱进，狼莫等引退，汉军追至北地，双方相持六十余日，后在富平河上一战，汉军大败羌人，斩首五千级，狼莫逃走。明年冬十月，度辽将军邓遵收买羌人刺杀狼莫。零昌、狼莫死后，诸羌瓦解，三辅、益州一带“羌患”得到肃清。然而，东汉政府在同羌人十余年的战争中，“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

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④。东汉王朝的统治也因此日益衰落，以致最后走向崩溃。

羌人第二次大规模反抗始于顺帝永和五年（140）。永和四年（139），东汉政府任命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由于二人天性刻虐，对百姓残暴骚扰，五年夏，湟水地区且冻、傅难种羌起而反抗。他们围攻金城，与杂种羌胡进攻三辅，杀害地方长吏。东汉政府慌忙调集大军，进行征讨。顺帝任命马贤为征西将军，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诸州郡兵十万人驻屯汉阳，并于关陇地区修建坞壁（防御工事）三百所，屯兵防守。马贤到任后，并未乘羌人未集发动进攻，反而处处留滞，贻误战机，结果在北地郡射姑山被羌人打得大败，马贤及其二子皆战死，东西部羌人遂大会师，进攻陇西、三辅，焚烧陵园，杀掠吏民。顺帝诏武都太守赵冲督河西四郡兵马为节度，抵御羌人进犯。数年间，赵冲与羌人交战，多所斩获，羌人力量由是衰耗。然而赵冲在追击叛逃降胡中，为羌伏兵所乘，在战斗中牺牲。

冲帝永嘉元年（145），左冯翊梁并改变策略，以恩信招诱羌人，于是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皆来归降，陇右局势才得重新平静。自永和年间至此，西羌叛乱积年，东汉政府消耗军费八十余亿，然而由于将吏“上下放纵，不恤军事”，虽然花费大量费用，而“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⑤。

桓帝时，又爆发了西羌第三次大规模反抗斗争。延熹四年（161），零吾羌与先零及上郡沈氏、牢姐诸种进犯并、凉及三辅。代护羌校尉胡闳不晓军事，对羌人进攻束手无策，使羌人更加嚣张，转相招结，进攻诸郡，历年不能平息。泰山太守皇甫规上疏请命，愿去三辅平定羌祸，朝中三公亦交相举荐，于

是桓帝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督关西兵讨伐零吾等羌。皇甫规素悉羌事，他在赴任前曾上疏桓帝，指出羌人所以反叛，皆由郡守不遵法度，对羌人不知绥抚所致。因此，他到任后，首先向皇帝条奏那些贪污狼籍的地方长官和多杀降羌的军官凡百余人，或免或诛。羌人仰慕皇甫规的威信，闻讯后相劝降者十余万人。

皇甫规平服羌患，理应得到朝廷封赏，然而由于他“多所举奏，又恶绝宦官，不与交通”⑥，于是他们内外串通，反诬皇甫规收买群羌，使其文降（以文簿虚降）。桓帝听信谗言，连下玺书相责。皇甫规上疏申辩说：“若臣以私财，则家无担石；如物出于官，则文簿易考。”⑦然而，在当时朝政腐败、宦官当权情况下，又有何是非可言？皇甫规不但未能得到封赏，反而以“余寇不绝”的罪名，被投入狱中。幸而得到一部分正直官员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多人为他诣阙申冤，才被赦免回家。此后羌人反抗活动仍不断发生。

延熹六年（163），皇甫规被朝廷起用为度辽将军。到营数月后，他上书荐中郎将张奂以自代，认为张奂才略兼优，宜为元帅，自己甘愿作张奂的副手。张奂于桓帝永寿元年（155）任安定属国都尉，曾以二百余人，招诱东羌，击破南匈奴的进犯，使地方得到安宁。羌豪感谢他的恩德，赠予二十匹马，先零羌酋豪还赠其金鐻（金器）八件。张奂召主簿在诸羌面前，当众宣布：“使马如羊（即使马匹像羊那样多），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怀，”⑧然后将马及金鐻全部退还给羌人。在张奂以前有八任都尉俱是贪财好货之辈，羌人深受其害，因而对张奂的廉洁清正，非常敬佩。后来张奂又在武威太守任上，实施平均徭赋，革除陋俗，百姓生为立祠。于是，朝廷在皇甫

规的建议下，改任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在他们任职期间，由于措施得当，边境比较平静。但是由于朝政腐败，羌人反抗活动仍然时伏时起。

延熹六年（163），滇那等诸种羌五六千人又大举进犯武威、张掖、酒泉等郡，“凉州几亡”。东汉政府任命段颎（音炯）为护羌校尉，前去征讨。段颎性情轻狂刚猛，他反对皇甫规、张奂恩威并用的策略，主张采用军事手段，镇压羌人的反抗。数年之间，他攻打西羌，共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马牛羊八百万头，降者万余落，西羌于以弭定。

西羌虽平，而东羌先零等种既降复叛。桓帝向段颎征询对策。段颎回答说：“臣以为（东羌）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耳。”⑨他提出：“今若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辆，三冬二夏，足以破定。”⑩他的这一斩尽杀绝的主张，竟为桓帝所采纳。从建宁元年（168）春至建宁二年（169）的两年间，段颎先后与羌人作战一百八十次，斩杀羌人三万八千六百余人，获牛马羊骡驴骆驼四十二万七千五百余头，用去军费四十四亿，汉军官兵死者四百余人。经过这一残酷镇压，东羌暂时被压平。但十多年后黄巾起义爆发，羌人又群起响应，加入汉族人民起义的洪流，终于促使东汉王朝走向灭亡。

从安帝永初元年（107）至灵帝建宁二年（169）六十余年间，东汉在西北边郡经常屯驻军队达二十万人，军饷耗费四百万万。在征战中，东汉政府调发大批州郡农民充军，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害。在羌人的反抗斗争中，羌人贵族分子和东汉军队同样烧杀掠抢，他们不但摧残了羌人，同时也使边郡汉人死徙流亡，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⑥⑦《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

⑧《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

⑨⑩《后汉书》卷六五《段颎传》。

秦汉

王充撰《论衡》

正当经学昌盛、谶纬迷信流行之时，东汉初期一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逆风而出，公开地向儒家哲学和谶纬迷信展开了挑战。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生于建武三年（27），死于和帝永元（89－105）年间。他出身“细族孤门”，自幼生长在一个政治、经济上并无地位的寒庶之家。从曾祖父起，他家因打抱不平，与豪门之家结下怨仇，被迫多次易地而居。这些对王充的思想性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充六岁时开始读书，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中有学童百余人，皆因有过失或书写不佳，受过师长责罚，王充却是一个唯一的例外。他的学习一天天进步，据说他从老师学《论语》、《尚书》，一天就能背诵千余字。稍长，至京师洛阳太学受业，师事当时大儒班彪。王充“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因家境贫寒，无力购书，常到洛阳书肆中去阅览出售之书，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家乡，先后做过短期县、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出身寒微，思想见解又与当时统治者相左，被迫去职。王充感到他与仕途

无缘，就一面居家教授，一面专力著述。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在“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的情况下完成的。他先后著有《大儒》、《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书，大多是针对当时思想界的问题而发。现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

《论衡》是一部富有战斗精神的哲学巨著，历来著录为八十五篇，今传世各本，《招致》一篇，均有目无文，实存仅八十四篇。据《后汉书》王充本传记载：“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王充在《论衡·自纪篇》中针对有人批评其书“文重”时亦云：“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是《论衡》原书，当在百篇以上，今所存者，可能已非全书。书名《论衡》，王充解释说：“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①即是说，要实事求是地衡量言论之得失与真伪，绝非调弄笔墨，以示殊异。

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据其自称：“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②他所谓虚妄之言，当然是指古文经中的伪书和所有的谶纬之书。董仲舒散布的神学谶纬认为，万物相争的胜负都是由五行相生相克决定的。王充举出很多明显事例，指出神学谶纬的荒谬虚妄，并说明万物相争的胜负存亡是由其自身条件所决定。他说：“夫物之相生，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③谶纬中说孔子是黑龙之子，刘邦是赤龙之子，圣人、皇帝之所以为圣人、皇帝，即因他们不是人种而是龙种。王充非之曰：“若夫

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④

东汉初期，天命之说高唱入云。王充依据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儒家“天人感应”说是虚妄的。因为“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⑤。在《自然篇》中，王充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⑥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天真能用灾异谴告人君，天也必然能任命圣君，选择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委以王事；又何必“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⑦。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⑧揭露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目的。

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王充反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鬼神迷信活动，提出了系统的无神论。王充首先论证了人死不为鬼。他指出精神依存于形体，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⑨据此道理，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说：“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绝，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灭而成灰土，何用为鬼?”⑩王充还从物质灭化的不可逆性，论定人死不能为鬼。他用火灭不能复燃来证明这一点。他说：“人之死，犹火之灭也。火灭而耀不照，人死而智不惠，二者宜同一实。”⑪他还用元气自然论论证人死不为鬼。他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归元气。”⑫“人之所以聪明智惠者，以含五常之气也；五常之气所以在人者，以五藏（脏）在形中也。五藏不伤，则人智惠；五藏有病，则人荒忽……形须气而

成，气须形而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智之精？”⑬古代鬼神迷信的要害是主张形亡可以神存，王充批判说：“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⑭王充认为，“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在忧惧，忧惧见鬼出”⑮。他指出鬼神乃人精神之幻觉，并非真有其物。

从无鬼论出发，王充反对厚葬，提倡薄葬。他说：“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商代大臣，善占卜），良如扁鹊（春秋名医），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⑯！此外，王充还反对神学迷信的种种表现，如灾祥、祸福、星变、卜筮、宅术等等。

王充在批判神学谶纬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认为人认识事物，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同事物相接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⑰。他还指出，人才虽有高下，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⑱。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在《论衡·实知篇》中说：“事有征验，以效实然”。他举出有关周公、晏婴、孔子、颜渊、孟子等古圣事迹的十六个历史例证，说明圣人不能先知，也必待学问而后知也。因此，他反对盲目迷信圣人，指责“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⑲。王充认为这种把儒家哲学当作圣经的学习方法，不能弄清道理，提高认识。他还说：“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

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⑳他认为做学问的根本方法在于大胆提出疑问，同老师辩论是非，以“核道实义，证定是非”。“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㉑。为了证实他的见解，王充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举出许多例子，指出圣贤之言自相矛盾之处。在《论衡》的其他部分，还分别对墨子（《命义篇》）、韩非（《韩非篇》）、邹衍（《谈天篇》）等人进行了批判。在这些批判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王充还对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说：“俗好褒远称古，讲瑞则上世为美，论治则古王为贤，睹奇于今，终不信然”㉒。他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他以汉朝与圣王辈出的周朝相比，认为周不如汉。他说：“汉之高祖、光武，周之文、武也。文帝、武帝、宣帝、孝明、今上，过周之成、康、宣王。”㉓他强调汉王朝版图远比商、周辽阔，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古代戎狄已进化为汉之齐民，生活文化显著提高。他总结说：“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㉔王充指出：“汉有实事，儒者不称”，这是由于“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㉕。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当时，能够如此立说，确是振聋发聩之论。

王充从唯物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的生存，社会的秩序，都依存于物质而不依存于符瑞。他说：“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传曰：‘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

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㉖世俗每称五帝之时，凤凰来集，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王充则认为不尽如此，这可能是人们有意渲染夸大。他认为，果真如此，"方今圣世，尧舜之主，流布道化，仁圣之物，何为不生"㉗？对神学唯心主义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不过，王充由于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有时把自己引为论据的一些自然现象理解错误，他无法透彻阐明唯物主义思想并将其应用到社会历史分析中去，更无法理解国家治乱安危、人们富贵贫贱的真实原因，只得归之于天命，因而陷入了宿命论的历史观。如他说："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㉘"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教，无能损益"㉙。这与上述世乱的论断，是大相径庭的。他还用骨相来解释个人的贵贱寿夭。他说："贵贱贫富，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㉚何以才能知命？用之骨体，"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㉛。说明王充的唯物论，还有很大缺陷。

王充所著《论衡》，在儒家学说和谶纬玄学盛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禁止流行，直到东汉末年，才由著名学者蔡邕发现，带入中原，秘密藏于书库。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论衡》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至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刻书业的兴起，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论衡》才得以刻印，比较广泛地

流传开来。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洪适校刊《论衡》于会稽，《论衡》一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直到今天，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一直闪烁着光芒，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注 释

①②《论衡·对作篇》。

③《论衡·物势篇》。

④《论衡·奇怪篇》。

⑤⑥《论衡·谴告篇》。

⑦⑧《论衡·自然篇》。

⑨⑩⑪⑫⑬⑭《论衡·论死篇》。

⑮《论衡·订鬼篇》。

⑯《论衡·薄葬篇》。

⑰⑱《论衡·实知篇》。

⑲⑳㉑《论衡·问孔篇》。

㉒㉓㉔《论衡·宣汉篇》。

㉕《论衡·齐世篇》。

㉖《论衡·治期篇》。

㉗《论衡·讲瑞篇》。

㉘㉙《论衡·治期篇》。

㉚㉛《论衡·骨相篇》。

班固修《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汉书》是继西汉《史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史学名著。

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郡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汉书·本传》称其“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固之父班彪，是东汉初年著名的史学家，他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想续写武帝之后，于是收集史料，写成《史记后传》65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班彪死后，二十三岁的班固回到家乡，看到父亲所写史书，认为还不够详备，决定继承父志，完成父亲未竟之业。不久有人告发他私改国史，因而下狱，后其弟班超上书力辩，得释。

汉明帝永平五年（62），班固被任命为兰台令史（兰台，是汉朝宫内贮藏图书之处），不久迁升为郎，奉命续写《汉书》。直到章帝建初七年（82），“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完成《汉书》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和帝永元元年（89），班固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任中护军，参与谋议。在

追击匈奴时曾登上燕然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杭爱山），刻石颂功，《封燕然山铭》，即为班固所撰。后窦宪以失势自杀，班固也因此受到牵连，先是免官，后为仇家洛阳令种兢逮捕入狱，死于永元四年（92），年六十一岁。以后和帝又命班固之妹班昭补写八《表》，同郡马续补写《天文志》，终于最后完成了《汉书》的编撰。

《汉书》分为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始于汉高祖刘邦元年（前206），终于刘玄更始二年（24），共记载二百三十年的历史。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对汉武帝太初年间以前的西汉历史，在史料来源上，多采自《史记》，但亦有所增补。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增加了《贤良策》、《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公孙弘传》增补了《贤良策》等文章。在韩信、楚元王、肖何、卫青、石庆及公孙弘等传中增加了一些史实。此外，还在《史记》材料的基础上，新立了一些篇目，如《惠帝纪》及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

武帝以后的史料则以班彪的六十五篇《后传》作为基础，并参考其它有关著述，作了大量订正，增强了史料的可靠性。班固还利用官府藏书，收集许多遗闻轶事，经过取舍剪裁，熔铸于书中，使《史记》缺漏的重要文献在《汉书》中得到补充。《后汉书》作者范晔肯定班固的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①，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汉书》的体例也大体根据《史记》而小有改变，如改“书”

为“志”，废“世家”，将“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精华在“志”。其十篇“志”，比《史记》的八篇“书”，内容详备，规模宏大。其中《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均为班固新创。《五行》与《刑法》分别记载古代自然变异和立法设刑的情况。《地理》则叙述从传说的“九州”到西汉的地理沿革，以及各地的山川、户口、风土和物产，还记载了亚洲一些国家的地理情况，是我国古代地理学的重要著作。《艺文》是综述各学科和学派的源流，记载西汉皇家藏书情况，是论述中国古代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其它六志，如《食货志》补充《史记》的《平准书》，系统地记述了西周以至王莽时期的经济制度，是研究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资料。《沟洫志》续补《史记·河渠书》，详记黄河变迁与治河对策，所载西汉哀帝时贾让《治河三策》是极珍贵的古代历史文献。《律历志》记录了大量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礼乐志》是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机器和典章制度的重要史料。十志在八书的基础上确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志书规模，后来“正史”的志，大体依十志稍作增减。唐宋时期，志书体得到大发展，出现了《通典》、《通志》、《通考》等典章文献专著。《汉书》十志的创始功绩不可泯灭。

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任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吏的变迁情况，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为后世《百官志》、《宰辅表》开辟了道路。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自此以后，用纪传体编纂的断代史连续不断，遂形成了所谓“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这是因为“中国自汉以来政尚专制，忌讳滋多，本朝之人不敢指斥本朝，以速罪戾。班氏史体最合著述家之心理，盖记前朝之事，危疑较少。讥谈政事，臧否人物，均视在当代为自由，《汉书》家独盛于后世，即此故也”（范文澜《正史考略》）。而且除了“正史”外，还有一些编年体的断代史，如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就是将《汉书》的内容删略为编年体的史书。我国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的史料，都能相当丰富而没有间断地保存至今，是与历代都有断代史的编纂分不开的。班固开创了断代为史的方法，是对我国历史学的一大贡献。当然断代史也存在着割断历史联系的缺点，这一点，过去的史学家唐朝的刘知几和宋朝的郑樵都曾指出过。

《汉书》的另一特点是在传中多载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此《汉书》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如《贾谊传》载《治安策》，《晁错传》载《贤良策》，司马相如、杨雄等的文章皆入本传。在古代书籍流传不易，不集中在大著述中是不易保存的，多载文章，亦有必要，后人以此相讥，不得谓之公允。

又《汉书》喜用古字古词，比较难读。东汉人已有很多地方读不通。这就提出了为《汉书》作注的要求。东汉末年已有服虔、应劭所作之注。到唐代，颜师古汇集了前人二十三家的注释，纠缪补缺，完成了对《汉书》的新注。清朝人王先谦又作了《汉书补注》，征引繁博，成为《汉书》旧注的代表作。

《汉书》亦有不足之处，那就是班固生活在儒家伦常完全定型的东汉时期，历史观受到儒家尊君思想的严密束缚，虽

然，《汉书》较之《史记》，有“文赡而事详”的长处，但是，就班固的历史观来看，却远不及《史记》进步。《汉书》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指责《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②，认为《史记》把汉史“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③，是降低了汉朝的历史地位。在高帝赞中又牵强为刘邦编造的从尧开始的世系，企图证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班固在《五行志》里还用大量自然变异现象附会政事，于积极参加东汉的谶纬迷信，神化皇权活动。他还对农民起义领袖，对出身社会下层，对敢于反抗强暴的人物，力加贬斥，如《史记》中的《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在《汉书》里都改为列传。故晋朝傅玄在批评《汉书》时说“论国体则饰朝阙而折忠臣，叙事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④。《汉书》在思想方面比起司马迁的《史记》来，确是中庸、保守得多。

注　释

①《后汉书·班固传论》。

②《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③《汉书》卷一〇〇《叙传》下。

④《史通·书事》。

蔡伦改进造纸术

关于造纸术的起源，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是以三国时文学家张揖及南朝史学家范晔为代表，认为东汉时，宦官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纸。第二种意见是以唐代书画鉴赏家张怀瓘（音欢）及宋代一些著作家为代表，他们认为西汉初年即已有纸代简，至东汉蔡伦时所造之纸精工于前世，故蔡伦不是纸的发明者，而是改良者。近代考古发掘实践证明上述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1933年考古学家黄文弼在新疆罗布淖尔（即罗布泊）汉烽燧遗址掘出一块麻纸，其年代为汉宣帝黄龙元年（前49）。他根据这一考古发现，认为在蔡伦之前一百五十多年已有纸。解放后，新中国的考古工作逐步发展，1957年5月，陕西西安东郊灞桥古墓遗址出土一批文物，清理文物时发现青铜镜下有麻布，布下有纸，均带铜锈绿斑。

考古学家根据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判断其下葬期不晚于西汉武帝时代（前140－前87），专家鉴定该纸为早期麻纸。以后1973年，1978年，1979年，1990年，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在内蒙、陕西、甘肃等地区发现西汉不同时期制造的蔡伦前

古纸，这些古纸的存在，补充了《史记》、《汉书》漏记西汉纸之不足，也纠正了《后汉书》关于造纸起源于东汉的误记，把中国的造纸术起源提前了二百年。

那末，这是否意味抹杀蔡伦的作用和贡献呢？否。蔡伦的作用在于：（一）他总结了前代和同时代造麻纸的技术和经验，组织生产一批优质麻纸。他是麻纸技术的革新者和推广者。（二）他倡导并主持研制楮皮纸，完成以木本韧皮纤维造纸的技术突破，扩大了造纸原料。蔡伦虽非纸的发明者，但确是承前启后的造纸技术革新者。

蔡伦（？－121），字敬仲，东汉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东汉明帝永平（58－75）末年，他开始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太监，章帝建初中，为小黄门。“及和帝即位，转中常侍，豫参帷幄”①。蔡伦是一个有才学、为人诚实的人，他做了中常侍后，尽心王事，十分勤恳。他也敢于直言进谏，“匡弼得失”，因而深得和帝信任。后来，他又被加任尚方令。尚方是皇宫内的手工业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器物。史书记载，蔡伦做尚方令后，经他鉴制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②。正是在他负责尚方工作时，对于造纸技术做出了重大的改进。

纸的发明，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适应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古代人自从发明了文字以后，客观上就要求有记录文字的工具。较普遍的有泥板、树皮、羊皮、纸草、龟甲、牛骨、竹、木、缣帛等。在商周时代，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和牛骨上，或者刻在青铜器上，也有刻在石头上的。随着文化的发展，又将文字刻写在木简或者竹简上，后来又有把字写在缣帛上的。文字刻写在竹简或木简上，然后用绳子一

片片地串起来，叫做“策”（或叫“册”）；缣帛上写的文字，最后卷起来，成为一“卷”。这就是现在所说的“册”和“卷”的来历。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在缣帛上写字，比在龟甲、兽骨上刻字方便一些，但是，竹简和木简仍很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西汉时，齐人东方朔有一次向汉武帝上奏章，共用简三千片左右，要两个人抬进宫去。而且简携带起来也不方便，《庄子》中记载，战国时学者惠施出门，喜欢带上书，这些用简编成的书，足足装了五车。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从春秋战国开始，又用帛来写字，叫“帛书”。帛是一种丝织品，最大的优点是轻便。但是帛受生产的限制，不可多得，而且价格昂贵，无法在民间推广。因此，人们就想到要寻找一种能为大多数人利用的书写材料。于是，纸就应运而生了。

我们现在所说的纸，一般是指用植物纤维（麻、木材、竹、草等）做原料制成的。最初的造纸法是摹仿漂絮法而产生的。东汉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一书中谈到“纸”字的字源时说“纸”从系旁，这说明早期的纸与丝有关。公元前12年，汉成帝后宫有一个名叫曹伟能的女官生了一个男孩，引起了皇后妹妹赵昭仪（“昭仪”为妃子的一种称号）的嫉妒，把她投入监狱，并派人用“赫蹏”（xì tí 夕蹄）包裹着毒药，上面写着迫她自杀的字。“赫蹏”就是丝质的絮纸。

西汉时期，我国蚕丝业已很发达，妇女们把蚕茧煮了以后，再放到浸于水中的席子上捶打，成为丝绵。把丝绵起下之后，在席子上留有一层薄薄的纤维，把它剥下晒干，就成为一张丝绵纸。但是用蚕丝的纤维造纸，原料来源少，产量低，成本也高，还是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人们很需要一种既轻便又

便宜的纸张来作为书写材料。这样，经过摸索、试验，最后终于成功地发明了植物纤维纸。1957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灞桥一座西汉古墓中，发现了一批文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叠纸，共八十八片，因此，被称作“灞桥纸”。经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前140－前87）。其后，1986年甘肃考古学家又在甘肃天水市郊放马滩西汉墓中发现一张麻纸，发掘报告认为“此墓的时代在西汉文、景时期”③。这应当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但是，西汉早期的植物纤维纸，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初级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由于社会经济文化日益发展，造纸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其后，在1942年和1959年，又先后在内蒙古额纳河和新疆民丰县各发现一张东汉纸；到了1974年，又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的质量比西汉纸有着明显的提高，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钞，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及在民间了。可以说，东汉已经是造纸技术比较成熟的时期了。事实证明，这些进步都是和蔡伦在造纸工艺上的“造意”分不开的。

蔡伦在主持各种御器的制造时，经常和工匠在一起，这样就使他有机会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同时，蔡伦善于诗、书，深知世间缺纸的困难。这些为他研究和总结造纸术提供了

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蔡伦首先想到，“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于是“乃造意（立意，发明创造），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④。从今天发现的东汉纸来检验，其工艺流程大体是：浸湿原料、切碎原料、灰水浸泡、蒸煮、舂捣、洗涤、打槽、抄纸、晒干、揭纸。蔡伦造出的纸，体轻质薄，价廉耐用，为人们所欢迎。元兴元年（105），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汉和帝，受到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由于蔡伦曾被封侯，后来人们就把他造的纸称为“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促进了造纸业的发展。

蔡伦改良了造纸术之后，东汉末年又出现了一位造纸能手名叫左伯。其所造麻纸，均匀细密，洁白光辉，色泽鲜明。赵歧《三辅决录》引韦诞奏言：“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指韦诞）墨，皆古法，”可见其纸质之优良。

安帝元初四年（117），“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竭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伦监典其事”⑤。蔡伦奉旨后，每日亲至东观（洛阳宫中殿名，为修史之所），主持校勘事宜。由于他对于经史多所通晓，加上他做事认真负责，经过一段时间紧张工作，全部经史校雠完毕，受到安帝的褒奖。

蔡伦自永平末年入宫侍卫，历经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等五代皇帝，由于他有才学，又能忠于职守，因此得到历代皇帝的信任，从小黄门升到长乐太仆，被封为龙亭侯，可谓官运亨通，一帆风顺。然而在章帝时，由于他在窦后的威势下，被迫参预了宫廷斗争，而造成安帝祖母宋贵人的自杀身

亡。安帝亲政后，下令廷尉审理此事，要求蔡伦到廷尉受审，蔡伦在内疚的心情下，“耻受辱，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而死”⑥。这样一个对人民做出过贡献的人，竟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实为悲剧！然而他改进造纸术的功绩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后人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在他故乡建立了“蔡侯墓”，墓的前院还有“蔡侯祠”，墓前的牌坊额题“蔡伦之墓”四个大字，是郭沫若的手书。

造纸术做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羊皮和纸草进行书写，在书写材料上还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魏晋时期，我国的造纸术首先传到朝鲜，公元七世纪，又从朝鲜传到日本。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向西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人传到了欧洲。公元 1150 年西班牙有了造纸工场，比我国已经晚了一千多年。十六世纪后，我国的造纸术由欧洲传到北美洲。此后，逐渐传遍了全世界。

注 释

①②《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③何双全：《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见《文物》1989 年第二期。

④⑤⑥《后汉书》卷七八《蔡伦传》。

秦汉

张衡研制两“仪”

张衡（78－139），字平子，河南南阳郡西鄂县石桥镇人（今河南省南阳县城北五十里）。石桥镇西南有个鄂城寺，鄂城寺东边相传就是张衡的旧宅所在地，现在叫做“平子读书台”。

张衡的祖先为南阳望族，《后汉书》中有他祖父张堪的传，张堪是个品学兼优的人，年轻时，曾“让先父余财数百万与兄子”。由于品德美好，十六岁被荐举到京城长安学习，他勤奋好学，被京城学者誉为“圣童”。刘秀起兵，张堪率全家相随，为东汉政权的建立立下功劳。东汉建立后，官至蜀郡太守和渔阳（今北京密云县西南）太守。为官清廉，死后没有留下什么家财，张家家境急剧衰落。张衡的父亲未见史书记载，可能是从未入仕，壮年故去。

张衡年幼时，家境清苦，经历许多磨练，激发了他奋发学习的精神。张衡“天资睿哲，敏而好学”①，聪慧过人。少年时就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十七岁时游学三辅，随后又东入京城洛阳，就教于太学，拜经学大师贾逵为师，“遂通五经，贯六艺”②，儒家经世济时的思想成了他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但

这时政归外戚，权任宦官，朝政日趋腐败。因此“举孝廉不行，连辟公府不就”③。正好此时鲍德出任南阳太守，鲍德“修志节，有名称”④，又颇重儒术，所以当鲍德邀请张衡出任主簿时，他欣然应承。由于两人志趣相投，合作多欢，一任九年，直至鲍德被诏拜大司农才离去。

张衡早年的兴趣在文学方面。他从二十三岁开始，以自己出外游学的见闻为素材，模仿班固的《两都赋》，花了十年时间，创作出著名的《二京赋》。“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⑤，张衡做《二京赋》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讽谏”。在赋中，他谴责和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穷奢极欲的腐朽统治，对人民表示了某种程度的同情。过去的大赋虽然也讲讽谏，但往往是劝百讽一，欲讽反谀。《二京赋》的讽谏是切直无掩的，如赋中写道：“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媮乐，忘民怨之为仇也；好殚物以穷宠，忽下叛而生忧也。夫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用以警告统治者不要穷奢极欲，残害百姓，否则将要激起百姓的反抗，表现出张衡具有进步意义的政治主张。由于《二京赋》文辞华丽，感情充沛，被前人评论为集汉赋之大成，是“汉赋之极轨”。当然奠定张衡在文学史上地位的还有那篇开抒情小赋先河的《归田赋》，以及被誉为七言之祖的《思玄赋》后的系辞。

张衡最大的科学贡献，是在天文学方面。安帝永初五年(111)，三十四岁的张衡又一次被地方官推荐，来到京城洛阳，被任命为郎中。这期间，他精读杨雄的《太玄经》，并写下了《太玄经注解》，绘制了《太玄图》。《太玄经》既是一本哲学著作，也涉及天文、历数的知识，张衡通过深入研究，逐步将兴趣与研究转到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方面。元初元年

(115)，张衡升任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主要是掌管政府的档案、文书，并主管“天时、星、历”，为朝廷的祭祀盛典等选择“良辰吉日”和记录各地发生的灾异、祥瑞等工作。张衡本“善机巧，尤致思于天文、阴阳、历算”⑥，因此，对这项工作很感兴趣。他担任太史令，先后长达十四年之久。在这一工作上，张衡更加深入、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和历算，对于科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张衡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之一是他撰写了世界天文学史上的不朽理论名著《灵宪》，从哲学概括的理论高度，阐述了天地的生成、结构、日月星辰的本质和运动。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⑦，说明月亮发光是太阳照射的结果，月亮对照太阳则成满月，背着太阳则月亮就隐而不见。张衡还第一次解释了月食形成的原因，认为月食是由于月球进入地影而未能受到日光反照形成的。他还记述了恒星的数字，“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为星二千五百”⑧，并绘制有关星体位置的《灵宪图》。这是我国最早一张星体分布图。张衡所作《灵宪》进一步发展了我国古代天文学理论。

关于宇宙天体结构，据蔡邕说东汉时曾有三个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天说。盖天说是从古代“天圆地方”说发展而来的。此说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地为天所覆盖。天体在地面以上运动，日月星辰附着于天盖之上，随天转动。“浑天说”认为，天地是浑为一体的，天像一个蛋壳，地像蛋黄，居于其中，日月星辰都在蛋壳上不断地转动。“宣天说”则认为，天没有一定的形状，日月星辰悬浮于天空之中。张衡通过观察天象，认为浑天说比较符合实际。他认为“天体圆如弹

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⑨。元初四年（117），张衡根据浑天说，并参考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耿寿昌等人创造的浑天仪，用精铜制成演示天象用的浑天仪。

据记载，“浑天仪”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空心球体。球体内有根铁轴贯穿球心，球体可以绕铁轴转动。铁轴和球面的两个交点，代表北极和南极。球面刻有二十八宿及其它星辰。球外套有几个圆圈，为地平圈、子午圈、黄道圈和赤道圈。黄道和赤道的交角为二十四度，上刻有二十四节气，从冬至点起，分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同时，又利用滴漏推动仪器转动，使天文现象在仪器上表现出来。浑天仪制成后，张衡写了《浑天仪图注》和《漏水转浑天仪注》，说明它的原理和使用。

《晋书·天文志》对张衡的浑天仪的演示效果曾有生动的说明：“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倡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之观天者，曰：‘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已没。’皆如合符也。”这就是说，由于这些天文现象的出没，与天体运转的情况十分相似，因此，人们只要在屋中观察“浑天仪”的转动，便能对天体运动一目了然。

张衡研制的“浑天仪”后来失落了，但是由于他留有《浑天仪图注》一书，因此，后来科学工作者根据书中叙述的原理，把这个“浑天仪”复制出来。复制的“浑天仪”现存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安帝建光元年（121），张衡转为公车司马令，这是卫尉的属官，地位要比太史令为高。但仕途多变，顺帝永建元年（126），又转为太史令。这当然是官运不亨，所以当时人都认为这“非进取之势”，乃失志的表现。张衡对此抱着“得之不

休（美也），不获不吝（耻也）”⑩的态度，仿照东方朔《答客难》作《应间》表示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他在文中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⑪，他表示“天爵高悬，得之在命，……求之无益”，在命运不达的情况下不能自暴自沉，而要“奉顺敦笃，守以忠信……不见是而不惛，居下位而不忧”⑫。他依然和以前一样，在太史令的岗位上，继续进行他的科学研究。

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从和帝永元四年（92）到安帝延光四年（125）这三十年间，我国连年发生地震，收集各地的地震情况，是太史令的职责之一。尤以元初六年（119）洛阳一带连续两次大地震，为害最大，房屋倒塌，人畜死亡，波及数十个郡县。有人把地震这一自然灾害说成是天意，妄图为谶纬迷信制造根据。为了掌握自然规律和破除迷信，张衡对此精心研究，于阳嘉元年（132）设计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能记录地震、掌握地震情报的“地动仪”。这年张衡五十五岁。

《后汉书·张衡传》有地动仪形状、构造的记述：“以精铜铸成，圆径八尺，合盖隆起，形似酒樽（音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

阳嘉二年（133）四月，阳嘉四年（135）十二月，永和二年（137）四月，永和三年（138）二月，京都连续发生地震，地动仪均准确无误测到。永和三年的一天，朝西北方向的龙吐出铜球，可是在洛阳，谁也没感到“地动”。人们纷纷议论地

动仪失灵。没几天该地派人到洛阳报告：陇西（今甘肃东南）几天前发生了地震。经查对时间，正是地动仪上西北方的龙头吐球的那个时辰。于是人们“皆服其妙”⑬。今日文物考古、科学史专家曾对张衡地动仪作过复原和研究，认为它与现代地震仪器设计原理基本相同，但却比欧洲早了一千七百多年！可见张衡的奇思巧技是何等的伟大！

阳嘉二年（133），张衡被提升为侍中。侍中为九卿之一少府的高级属员，俸禄二千石，“帝引在帷幄，讽议左右”⑭，可以直接接触皇帝。此职使张衡不悦，因为他一生经历过章帝、和帝、殇帝、安帝、少帝、顺帝。从和帝开始，这些皇帝均是幼年继位，朝政由外戚、宦官反复倾轧把持，张衡不满这种腐败政局，曾多次上《论贡举疏》、《陈事疏》、《请禁绝图谶疏》、《京师地震对策》等，要求顺帝改革政局，不仅毫无结果，反招致大臣嫉恨。阳嘉二年，他上书顺帝，要求辞官到学术机关——东观专事著述，但始终未获准。永和元年（136），他调出京城，任河间相（相当于河间太守）。他针对“国王骄奢”，“又多豪右，共为不轨”的情况，下车伊始，即“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上下肃然，称为政理”⑮。任职三年就得到百姓称颂。永和四年（139），他又被调到京城任尚书，当年，这位六十二岁的大科学家在洛阳与世长辞。

张衡的至交崔瑗为他的墓碑写了长篇铭辞，对张衡一生成就作了高度评价：称赞他在研究学问方面的勤奋刻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赞扬他的科学成就为“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可谓恰如其分，并不过誉。张衡不仅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科学家，而且在世界科学史上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在

文学、天文学、地震学、机械制造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无古人的重大成就。解放后，郭沫若同志在他的墓碑上题词："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为了纪念张衡在科技方面的卓越贡献，国际天文学界把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

注 释

①崔瑗为张衡墓碑所写的墓志铭。

②③④《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⑤《后汉书》卷二九《鲍永传》。

⑥《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⑦⑧《续汉书·天文志》注引《灵宪》。

⑨张衡《浑天仪图注》。

⑩⑪⑫⑬⑭⑮《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

秦汉

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

有人把汉代比做中医史上的罗马时期，主要由于产生了两个“医圣”、三大医典。北方青、徐（今山东、江苏）一带的神医华佗，以外科术著称。在南方荆襄（今湖北）一带活动，能与之颉颃的人物就是张仲景，其所著《伤寒杂病论》是内科学的重要著作，也是三大医典之一（另两部是《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宋代名医许叔微曾说：“不读仲景书，犹如儒不知有孔子六经也。”①医学之有张仲景，犹如儒学之有孔仲尼，所以人称“医圣”。遗憾的是，他虽有著作传世，也像大多数古代科技人物一样，史书中并没有为他立传，因而他的事迹大都泯灭无闻。仅就所能见到的零星史料及流传下来的《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作一概介。

张仲景（147或150－219），名机，以字行世。东汉时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市）人。他家庭富裕，从小勤奋好学。当他从史书中看到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时，对扁鹊望气色便知疾病的技能，很是感动，因而对医学发生了兴趣，认为这是利人利己的事业，决心研习医术。还是童年时，他就拜家乡名医

张伯祖为师。张伯祖见他对医学专心致志，就将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全部传授给他。在学习过程中张仲景已显示出在医道方面的卓越才能。《太平御览》引《何颙别传》说，何颙善识人才，以此天下闻名。何颙一见少年张仲景，便断言他“用思精密”，将来必为良医。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言和《太平广记》都曾记述他神话般的高超医术说：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十七岁见到张仲景，张仲景就说王粲有病，应服“五石汤”，不然，病势浸成，三十岁眉毛就会脱落（今称麻疯病，此病潜伏期很长）。张仲景能识之于初，说明他对地方病很有研究。只是王粲少年成名，正是才气横溢，精力旺盛，不以张仲景的话为然。谁知三十岁时，眉毛果然脱落，有人不信此记载。因为《魏书》只说他四十一岁因病（未言何病）死于征吴道上。这种壮年而死，正是由于长期患慢性病，加上征途劳累，病情急剧恶化所致。

张仲景生活的时代是东汉末年，宦官、外戚专权，政治极其腐败，军阀割据，战乱连绵，加以瘟疫流行，灾难深重，人民幸免于兵祸的，又被瘟疫夺去生命。曹植对瘟疫流行的惨状有诗描写“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者”，而瘟疫中的主要一种就是伤寒病。张仲景家族二百余口，自建安以来十年内，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人民疾苦与自身遭遇，促使他决意研究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奔波于患者之间，以行医为终生事业。有的文献说他曾举过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但从《后汉书》和《三国志》等正史查考，建安以来在长沙为太守者，并无张机其人。

张仲景不但医术高明，而且医风高尚，他把“疗君亲之

疾"，"救贫贱之厄"做为行医目标，痛恨那些玩忽职守，视人命如儿戏的庸医。东汉末，寸关尺诊脉法已经流行。为了慎重，他主张不单诊寸、关、尺脉。西汉以前，有《素问》的三部九候诊脉法：把人体分为上、中、下"三部"；每部取天、地、人三个部位，共九个部位，名为"九候"；"九候"又分左右，合为十八诊，必诊遍这些部位才得确诊。比起寸关尺法麻烦许多，却易把握病情。自东汉产生寸、关、尺法后，三部九候诊断渐已不行，张仲景认为那种"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伤寒论》自序），就胡乱开方是难以治好病症的。故他独能不殚其烦，主张参行三部九候法。

张仲景在一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许多医学理论和治疗方法，《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就是这种研究和实践的产物。他看到《内经·素问》中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他根据自己实践发展了这个理论，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但发病在不同季节，有不同的名称。冬天因受寒而发病的叫伤寒；春天受寒发病的叫温病；夏天受寒发病的叫暑病。书中对病理、诊断、治疗以至用药，都有细致的论述，是一部较完整的中医学著作。其中在理论上叙述的有二十二篇，治疗原则三百九十七法，记治传染病三十种，共列出一百三十三个药方。按明朝徐镕的说法，晋太医王叔和始加阐明、扩充，并编次成两书。一名《伤寒论》，一名《金匮玉函要略经》。前者是专论述外感疾病的专书，后者论述内科、杂病，兼及外科、妇科的病症。今传《伤寒论》是宋朝林亿、孙奇等人校定本，分十卷，二十二篇，除去重复计有一百一十三方。《金匮玉函要略经》亦简称《金匮要略》曾一度失传，

宋人王洙从馆阁蠹简中发现了残本，抄行于世。书分三卷：前论伤寒，中论杂病，末载医方，兼论妇科病。宋神宗熙宁间，祕阁校理林亿等奉敕校定医书，因上卷过于简略，但取杂病以下，又将末卷医方散附各病名下，以便拣用，共得二百六十二方，合二十五篇。内容有研究病因、病机、疾病分类和诊断等部分；治疗所用剂型有汤、丸、散、酒、洗、熏、坐等。

张仲景的医学成就从以上二部著作中考察，有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医疗方法（即诊断），二是关于中药处方（即治疗）。

上古医病主要用针灸法，从战国时起，药物疗法的经验逐渐积累下来，后来出现了《山海经》和《神农本草》等中药学书籍。但它们对医疗方法没有涉及。张仲景在长期的从医实践中，总结出要分析疾病的阴阳、表里、寒热、虚实等不同症候，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方法。《伤寒论》从疾病所在部位和性质，区分为“表里上下，虚实寒热”，后世称之为“辨证八纲”。根据“八纲”诊断病症，他又提出：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虚者补之，实者攻之的温、清、补、和、汗、吐、下、消的治疗方法，后世称之为中医“八法”。张仲景认为，这些治疗方法，都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去运用，要使用得当，才能奏效。他还认为，有的病症可以“寒用热治”，“热用寒治”，既可以“先表后里”，也可以“先里后表”。但这种治疗方法的常例和变例，必须靠医生根据病人实际情况去认真掌握和灵活运用。

其次，张仲景的贡献还在于：他的著作中保留了大量的中医成方，如以发汗排毒的麻黄汤、桂枝汤；治乙型脑炎的白虎汤；治细菌性痢疾的白头翁汤；治急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汤、薏苡附子败酱散等等，至今中医里有许多方剂，都是从张仲景

的方剂变化而来的。不仅丰富了中药方剂这个医学宝库，并且在中药的炮制和方剂的配伍等方面也都有所总结和创造。

在方剂的配伍方面，张仲景是有所发明的。中药方从单方逐渐发展为复方，由于复方是由多味药组成，配制时讲究君臣佐使的原则。即一方之中，必以某药为主（君），某药为辅(臣或佐使)。《神农本草》单纯按照药物的性质分类；《素问》规定一方之中，君臣剂量，各有固定比例。《伤寒论》则是完全按照病势，酌情增减。比起《本草》和《素问》的配制方法更为科学。后世中医有“因病立方”，而不“立方待病”的原则，就是在《伤寒论》的影响下确立的。

张仲景既重视治疗方法的研究，也十分重视对疾病的预防。他提出了“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当”的保健方法，还提倡练气功、按摩等锻炼身体的方法。他给病人治病时，不仅注意用医方治病，还注重针灸等理疗。他常给人用灌肠法导便和用人工呼吸法去抢救昏厥的病人。

张仲景的著作很多，除了《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要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等，可惜都没保存下来。

张仲景生活的汉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毕竟还不高，这使他的医学研究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在病理方面，还不能彻底肃清五行说的影响。他的医学理论，还不完全符合科学实际。他的医学著作，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缺点。所以，后代的中医评论他的《伤寒杂病论》说：有治大人病的方剂，没有治小孩病的；有治北方病的，没有治南方病的。

但张仲景一生的研究与实践，对祖国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伤寒论》、《金匮要略》与《黄帝内经》、《难经》等

并奉为医学经典著作，在中医学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自唐宋以来，张仲景的著作影响及于海外，至今日本不少医生专门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不但采用原法原方治病，而且把其中一些方剂制成成药，经过科学研究扩大了应用范围。可见，这位“医圣”在世界医学史上的地位是相当崇高的。

注　释

①《伤寒发微论》。

秦汉

华佗发明新医术

一千七百多年前，我国有一位医学大家，他不仅善于诊断和治疗各种疾病，还精通方药，擅长针灸，其中以外科手术最为有名，被人们称为外科医生的鼻祖。他就是东汉末年鼎鼎大名的医学家华佗。

华佗（？—208），一名华旉（古敷字），字元化，东汉末年杰出医学家。他出生于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精通儒学与医术，拒不为官，以医为业。他通晓养生之道，“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①。华佗经历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和公元184年的全国性黄巾大起义以及其后持续多年的军阀混战。华佗目睹战乱灾祸，不求仕进，立志“以医济民”。他重视前人经验，汲取民间偏方，发明创造。经过多年的实践，他在针灸术、诊断学、药物学、儿科、妇科、驱虫等医疗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外科尤为擅长。行医足迹，遍及安徽、山东、河南、江苏等地，声名颇著，时人称为“神医”，在中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华佗给患者治病，所以疗效显著，关键的一点是他明于诊

断，能根据病情看出病理，判断准确无误，然后对症下药。如一郡守，病情险恶，华佗察看病情，按脉后，诊断为瘀血积存腹内，长期不能吐泄出来所致。若设法使他暴怒，吐出瘀血，病即可愈。郡守之子一切照办，果然使郡守吐出黑瘀血，足有一升多，病症从此痊愈。

华佗在诊断术上的高明之处，还表现在善于区分病状相同，而病理不同的患者。当时有两个府吏，一名倪寻，一名李延。他们都是头疼发烧，感觉相同，华佗察看两人病情后，认为两人病理不同，处方也应当有别。倪寻是外实（感冒），应当吃泻药；李延是内实（伤食），应当发汗。这两人服了不同的药，第二天，二人均病愈。

又如一妇人，在妊娠六个月时，突然剧烈腹痛，经华佗按脉，诊断为胎儿已死，并让她家人摸妇人腹部，告诉他如果胎儿在腹部左侧是男孩，若在右侧为女孩，家人摸了摸说在左侧，华佗给妇人开了药，服后果然坠下男死胎。在封建社会，由于受封建礼教的束缚，“男女授受不亲”，这就使华佗的妇科医术，受到很大限制。

华佗还善于诊断小儿科常见的疾病，东阳县陈叔山的两岁幼子，常腹泻和啼哭，孩子日益消瘦。华佗治疗时分别察看了母子二人，说“其母怀躯（母亲把孩子抱在怀中），阳气内养，乳中虚冷，儿得母寒，故令不时愈”②。华佗让孩子母亲服“四物女宛丸”，十天后，孩子一切恢复正常。

华佗在诊断时，善于察形观色，从病状到病理，由表及里，因此，在诊断学上，有着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晋代医学家王叔和编撰了《脉经》一书，其中的卷五，记载了《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共有76条。所说“扁鹊华

佗"，或指二人的要诀，或单指华佗继承并发扬了扁鹊的医术，由华佗本人总结的经验。《要诀》根据病人的面色、五官、肤色、病状和举止行动等，可以判定患者的生死寿夭。例如："病人及健人面忽如马肝色，望之如青，近之如黑者死"；"病人妄语、错乱及不能语者，不治；热病者可治"；再如："目色赤者病在心，白在肺，黑在肾，黄在脾，青在肝，黄色不可名者病胸中"。由于华佗经验丰富，观察入微，他的诊断相当精确。有一个做过督邮官的顿子献，曾患病，治疗后自觉良好。一日华佗为他按脉说："尚虚，未得复，勿为劳事，御内（夫妻同床）即死。"③恰巧顿子献妻听说丈夫病愈，不远百里，前来看望，夫妻同房团聚，时隔三天，果然病发而死。

华佗治病，常使用针灸法。他继承和发扬了春秋以来的针灸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用针灸，根据病情，分别使用灸法和针刺法。"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不过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瘥愈）"④。最著名的一例，是华佗为当时的汉丞相曹操治疗头风眩症，每当发作，经华佗针灸，即立刻奏效。

华佗的针灸疗法，还能医治一些妇科病。一位李将军的妻子怀孕不慎流产，请华佗检查。华佗按脉后判断：根据脉象，胎儿还未下来。李将军说亲见胎儿坠下，对华佗的诊断不以为然，华佗只得告辞离去。百日后将军妻子又腹痛不止，只好再次请来华佗。华佗告诉将军夫妇："此脉故事有胎。前当生两儿，一儿先出，血出甚多，后儿不及生……胎死，血脉不复归，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⑤华佗针、药并用，妇人有欲产而不能的腹痛。华佗说："此死胎久枯，不能自出，宜使

人探之。”⑥照此实行，果然是一个手足完具、全身变黑的死胎男孩。这时，将军悔恨自己的固执，对华佗的医术赞叹不已。

华佗针灸的高明之处，不仅针灸准确，效果显著，而且还能诊断出别人针灸的失误。当时有一位督邮官徐毅得病，华佗前去看视，徐毅对华佗说："昨使医曹吏刘租针胃管讫，便苦咳嗽，欲卧不安。"华佗察看了扎针的部位，询问了扎针的深度，然后对徐毅说："刺不得胃管，误中肝也，食当日减，五日不救。"⑦五天之后，徐毅果然死去。

华佗除在内科诊断和治疗方面有很大成就外，在医学上最大的贡献是在外科手术方面。据《三国志·魏书·华佗传》记载："若病结积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则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麻沸散"的药物成分和配制方法，今已失传，后人一般认为华佗是用麻蕡（音坟）、羊踯躅、当归、菖蒲等中草药，研制成散剂，每次手术前，用酒服下，即可全身麻醉。这种麻醉方法比西医用乙醚施行全身麻醉术至少要早一千六百多年。有文献记载，华佗给患者施行麻醉后进行过两次腹腔手术，一次骨科手术，一次放血术的病例。这从当时的医药水平来看，也是可行的。

华佗作为名医，努力尽职，即使一些不治之症，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也尽量满足患者的要求，施行手术治疗。有位士大夫，身体极不适，求华佗医治。华佗在认真做了检查后对他说："君病深，当破腹取。然君寿亦不过十年，病不能杀君，忍病十年，寿俱当尽。"⑧患者感到难以忍受，坚持要求

手术。华佗为了减轻患者一时的痛苦，就照患者之意为其施了手术，当时见轻，十年后果然死去。

由于华佗的外科手术高超，时人称他为“神医”，他为患者进行外科手术的事迹在民间广为传颂，在这些故事中，有的是把别人做的事，也附会在他身上了。《襄阳府志》曾记载了华佗为蜀国名将关羽“刮骨疗毒”一事，《三国志·关羽传》也记载了这件事：“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漓，盈于盘器，而羽割炙饮酒，言笑自若”。但并未说医生是华佗。按关羽镇守襄阳时，华佗已死，“刮骨疗毒”一事似不可能。但是，在动手术前，使用华佗的“麻沸散”，进行局部麻醉，还是大有可能的。这也说明，华佗在外科医术上的成就是卓越的，也是一件了不起的革新创造。这对于那种克服疾病完全抱消极态度，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迂腐见解，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蚍虫⑨是当时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病害之一。华佗在治虫除害中，吸取民间良方妙药，再配合自己经验，总结提高，有效地降伏体内各种寄生虫及其他虫害，以解除人们的痛苦。

一次，华佗外出行医，道上遇见一妇人病痛呼叫，即上前问病，得知病人自感咽喉有堵塞物，无法吞咽。华佗告诉病人：买三升又酸又辣的蒜齑（音积 jī，即蒜泥）大酢（zuò 作，即醋）喝下，病即好。病人按他的指点服了药，很快就吐出一条蚍来，病痛立时减轻。

华佗还擅长用水疗法医治虫病。“彭城夫人夜之厕，虿（chāi 拆）螫其手，呻吟无赖”⑩，华佗让她把螫伤的手浸泡在热水中，“卒可得寐”。华佗又让她每过一个时辰换一次水，以保持水温，第二天，螫伤的手就恢复了正常。

华佗治疗虫病的方法很多。其中用汤药治虵是他的得意之作。建安五年（200），“广陵太守陈登忽患胸中烦懑，面赤，不食”⑪。华佗按脉后说：“府君（指陈登）胃中有虫，欲成内疽（jū居），腥物所为也。”⑫华佗让人给他煎煮了二升汤药，先喝了一升，稍停片刻，又喝完另一升。片刻“吐出三升许虫，头赤而动，半身犹是生鱼脍”⑬。陈登顿时觉得轻松。临别时，华佗告诉陈登说：“此病后三期（三年）当发，遇良医可救”。⑭果然不出华佗所料，时过三年，陈登病情复作。由于华佗不在，又没遇到良医，陈登终于死去。

华佗为了使自己的医术后继有人，为子孙后代造福，他把自己的医术和秘方，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弟子。其中广陵吴普、彭城樊阿是最有代表性的两名医学家。

华佗在教授中，曾谆谆告诫吴普说：“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犹户枢，终不朽也。”⑮他还说：古代的长寿者，都做“导引之事”，仿照熊、鸱的动作，伸展躯体，活动关节，以求健康长寿。“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⑯。可以除病和强健身体。当人身体感到不舒畅时，可起作一禽之戏，稍稍汗出，身体自感轻便，增加腹中食欲。吴普按照华佗的“五禽戏”，经常进行锻炼，“年九十余，耳目聪明，齿牙完坚”⑰。

樊阿向华佗学习针灸之术，很有成绩。一般医生认为“背及胸脏之间不可妄针，针之不可过四分”⑱。而樊阿却敢于打破常规，在背部扎针，深度可达一二寸；在胸部扎针，竟可达五六寸。由于技术精湛，疗效十分显著。另外，华佗还将精心研制的漆叶青黏散，传授给樊阿。漆叶青黏散的药物成分是由

漆叶屑一升，青黏屑十四两配制而成。据华佗说：经常服用此散，可以"去三虫，利五脏，轻体，使人头不白"⑲。樊阿遵照老师的教导，长期服用，活到一百多岁。

华佗在方药方面没有留下著作，但李时珍认为，华佗的学生所著《吴普本草》中载有他的用药经验。南朝陶弘景怀疑《神农本草经》是华佗、张仲景所记，虽不免武断，但作过增修工作还是有可能的。关于华佗著作，《隋书·经籍志》所载的几部均已佚失。唯一流传至今的是晋代王叔和撰《脉经》一书，其中卷五有《扁鹊华佗察声色要诀》一篇。世传的《华氏中藏经》，据考为六朝人所撰，但其中部分内容则为华佗的学术思想。华佗创作的《五禽戏》则是对养生学的一大贡献。

曹操得了一种头风病，"每发，心乱目眩"⑳，多次治疗都不见效，听说华佗医术超群，便派人把他请来。经"佗针，随手而差（愈也）"㉑。但仍不能除根。曹操为了让华佗随时为自己治病，要华佗做他的侍医。华佗离家年久，思归探视，乃以"求还取方"之名告假回家。其间曹操曾屡次作书召还，并敕令郡县发遣，华佗托词妻病，不肯上路。曹操大怒，派人前去调查，并指示使者："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㉒。使者至谯，见华妻安然无恙，便拘捕了华佗，传送到许昌狱中。曹操的高级谋士荀彧（音玉）为华佗向曹操请求说："佗术实工（善也），人命所悬，宜含宥之。"㉓曹操说："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耶?"㉔竟下令赐死。华佗临死前，将其所著书一卷交给狱吏说："此可活人。"㉕怎奈狱吏在曹操的淫威下不敢接受。华佗悲愤之极，不再勉强，遂用火焚化。

华佗死后，曹操的头风症并未根除，当发作时，愤然叹息

说："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㉖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的爱子仓舒（即曹冲）病重，找不到良医救治。曹操喟然长叹说："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㉗

华佗被害后，引起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吴普在广陵修建了华佗的神庙，以表达其对恩师的哀思和悼念！在徐州，人们建造了华佗墓，来纪念这位伟大的医学家。

由于当时科学水平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华佗的医学成就也有其局限性，但他对我国医药学特别是外科手术、麻醉剂和医疗体育及养生学方面所作的贡献，确是很大的。千百年来一直为我国广大人民所景仰，也为世界学者所称颂。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⑨虵，古蛇字，这里所说的虵虫，泛指寄食于人体的蛔虫及其他虫害。

⑩《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⑳《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㉑《后汉书》卷八二《华佗传》下。

㉒㉓㉔㉕㉖㉗《三国志·魏书·华佗传》。

外戚专政

东汉时期，皇室往往与世家豪族联姻，帝后多出自功臣勋贵之门，这些功臣勋贵一旦与皇室通婚即成为外戚。东汉初年，刘秀为了加强皇权，在政治上对外戚防范很严。中期以来，随着豪族势力的发展，他们每以外戚身份，拥立幼弱君主，以取代皇帝专政，夺取最高统治权。

永元元年（89），汉章帝死，年仅十岁的和帝继位，由其母窦太后临朝听政，窦后兄窦宪执掌朝政，开始了外戚专政的局面。早在窦宪之妹立为章帝皇后时，窦宪一家就兄弟亲幸，宠贵日甚，掠夺土地财物，肆无忌惮，连皇室成员也不放在眼里。窦宪依恃宫掖声势，曾以贱价强夺明帝女儿沁水公主园田，而公主竟不敢与之计较。后被章帝发觉，召宪切责说："深思前过，夺主田园时，何用愈赵高指鹿为马？久念使人惊怖。……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哉！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①其妹窦后为此毁服向皇帝谢罪，良久章帝怒气始消，命窦宪将侵夺的园田归还公主，窦宪虽未判罪，然亦不授以重任。和帝即位后，窦宪遂以侍中，内主机密，出宣诰命。其诸

弟窦笃、窦景等并侍宫省，处亲要之地。永元三年（91），窦宪大破匈奴于金微山（今独联体西伯利亚境内），北单于逃走，不知去向。窦宪因此威名大震，朝臣震慑，望风承旨。窦氏父子兄弟并居列位，充满朝廷，大批窦氏党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明年，窦宪等潜图弑逆，和帝阴知其谋，乃与宦官郑众定计，乘窦宪班师凯旋京师之际，一面派大臣持节郊迎慰问，一面诏执金吾、五校尉勒兵屯卫南北宫，关闭城门，一举收捕窦宪党羽，下狱诛死。遣谒者仆射收回窦宪大将军印绶，更封为冠军侯，与弟笃、景、瑰皆遣就国。窦宪及其弟窦笃、窦景到国后皆迫令自杀；只有窦瑰因为平时尚知节约自修，河南尹张酺上疏求免，得以不死。窦氏宗族、宾客因宪得官者，皆免归本郡。和帝重新夺回了政权。

元兴元年（105），和帝死，少子隆出生方百余日，立为皇太子，是夜，即皇帝位，是为殇帝，尊邓后为皇太后，临朝称制。数月后，殇帝又死，太后与其兄邓骘定策迎立清河王子刘祜嗣位，是为安帝，安帝时年仅十三，仍由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邓氏吸取窦氏覆灭的教训，比较恭谨守法，邓骘在位，颇能推进贤士，与宦官郑众、蔡伦等也能合作共事。建光元年（121），邓太后死，安帝亲政，邓氏一门仍遭贬黜，邓骘兄弟子侄七人皆被迫自杀。阎皇后兄弟阎显等人，并居卿、校之位，掌握大权。数年后，安帝死，阎后与其兄阎显定策禁中，迎立年纪幼小的北乡侯刘懿嗣位，是为少帝。尊阎后为皇太后，以阎显为车骑将军，执掌朝政，阎氏诸兄弟并处权要。但不久，少帝又病死，中常侍孙程等拥立十一岁的济阴王刘保继位，是为顺帝。孙程等皆封列侯，宦官权势从此日盛。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而且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

戚势力，使外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顺帝阳嘉四年（135），以皇后父梁商为大将军执政，梁氏的权势不断扩大。永和六年（141），梁商死，其子梁冀继任大将军，执掌朝政。梁冀原是一个逸游自恣、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历任执金吾、河南尹等官职，一贯横行不法，顽嚣凶暴。建康元年（144），顺帝死，两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梁冀"侈暴滋甚"，四个月后，冲帝又死，梁太后与梁冀共谋迎立质帝，年仅八岁，梁氏继续以外戚身份掌权。质帝年少聪慧，他对梁冀的骄横侈暴，很是不满。一次在朝会时，目指梁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梁冀听后又恨又怕。一日他阴使左右置毒于煮饼中，进奉质帝，质帝食后而死。在短短的两年中，汉家国祚三绝，比较正直的公卿李固、杜乔等甚感忧虑，他们都主张应当拥立年长而贤明的清河王刘蒜为帝，而梁冀与宦官曹腾则坚持立五岁的蠡吾侯刘志为帝，因而否决了公卿们的主张，刘志即汉桓帝。桓帝即位后，娶梁冀另一女弟为皇后，梁太后临朝，梁氏权势更加显赫。

梁冀以大将军专擅朝政，事无巨细，皆由其决断。和平元年（150），梁太后死，梁冀更加肆无忌惮。他指派心腹担任宫卫近侍，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当时四方调发和贡献给皇帝的珍异贡品，其中上等的皆先选送梁府，其次才献给皇帝。内外百官升迁，皆须先到梁府谢恩，然后才敢去尚书台报到。当时的官吏只能唯命是从，如有异辞，必然遭到祸殃。太尉李固、杜乔由于不肯附和梁冀，皆被梁冀诬杀，陈尸街市。吴树出任宛县县令，拒绝了梁冀的嘱托，到任后，诛杀残害百姓的梁冀门客数十人。后来他升任荆州刺史，赴任前到梁府辞行，梁冀竟以毒酒款待，刚一出门，即死于车上。侯猛拜辽东太守，上

任前未去梁府辞行，梁冀借故将其腰斩。

桓帝为了褒奖梁冀迎立之功，命中朝二千石以上的大臣商议给梁冀以特殊礼遇。有司奏请：梁冀上朝谒见皇帝时的礼仪，可以比照西汉第一功臣肖何；扩大其封邑为四县，比照东汉第一功臣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照西汉中兴功臣霍光；群臣朝会，为他特设专席，凌驾于三公之上。以示殊勋。并把以上规定，向全国公布，定为永制。对于这样优厚的待遇，梁冀犹嫌太薄，表示不悦。

梁冀在政治上如此专横跋扈，在生活上更是骄奢淫逸，糜烂不堪。梁冀在洛阳城里，大肆修建豪华府第，而其妻孙寿亦对街为宅，殚极土木，互相竞夸。在这两座富丽堂皇的第宅里面，各有藏室，在藏室中，堆满了“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又广开园圃，采土筑山，十里九阪，以象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②。每当春秋暇日，“冀、寿共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骋娱恣”③。又起兔苑于河南城西，周围绵延数十里，征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才完成。于是通知各地交纳生兔，刻其毛以为标识，如有人敢于伤害，罪至刑死。曾有一个西域来的客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被牵连处死的达十余人。“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④。

梁冀听信孙寿的建议，斥夺梁氏外戚之在位者，外表上佯为谦让，而实际上是抬高妻族孙氏的地位。孙氏宗亲，冒名为侍中、卿、校、郡守、长吏者十余人，皆贪污残暴。此辈各派遣家奴逮捕其属县富人，下狱拷掠，勒索钱财，出钱少者，则诬以他罪，致之于死，或流放外地。扶风人士孙奋家中富有而

性吝啬，梁冀先赠给他四匹马，然后向他贷钱五千万。士孙奋不甘心，只给了三千万。梁冀大怒，乃命令地方官员，指控士孙奋的母亲原为梁家管库婢女，因偷盗“白珠十斛，紫金千斤”而逃亡。于是拘捕士孙奋及其兄弟，进行拷问，两人皆死于狱中，没收其全部家财一亿七千余万。梁冀还派遣家奴周游四方，远至塞外，广泛搜求珍奇异物；这些奴客乘机横暴地方，掠夺妇女，殴打吏卒，百姓对之切齿痛恨。当时任侍御史的梁冀故吏朱穆，从为梁冀的禄位出发，多次上书劝谏梁冀“宜时易宰守非其人者，减省第宅园池之费，拒绝郡国诸所奉送，内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挟奸之吏无所依托，司察之臣得尽耳目”⑤。梁冀始终不悟，报书朱穆云：“如此，仆亦无一可邪?”其贪婪凶顽竟至于此。

梁氏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为帝后；六人为贵人；两人官至大将军；夫人、女食邑封君（相当于侯）者七人；娶公主为妻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等官职者五十七人。梁冀秉政将近三十年，拥立了三个皇帝，威行内外，百僚侧目，经东汉之世，外戚如此煊赫显贵，是很少有的。

外戚势力高涨，宦官威风相形见绌，因而形成外戚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延熹二年（159），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策划翦除梁冀。他们借梁冀派其亲信宦官张恽入宫宿卫（实际上是监视皇帝行动）之机，以“辄从外入，欲图不轨”的罪名，将张恽逮捕。桓帝命尚书令尹勋召集尚书台官吏武装起来守卫中枢机构，派宦官首领具瑗统领皇宫侍卫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同包围梁冀府第，同时派光禄勋袁盱持节收缴梁冀大将军印绶，以解除其兵权。梁冀及其妻孙寿见情势不妙，皆于当日畏罪自杀。于是收捕梁氏、孙氏中外宗亲送诏狱，无长少

皆弃市，其他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处死者数十人，梁冀故吏、宾客被黜免者三百余人。朝廷的重要官员几乎被罢黜一空。由于事情突然从宫中发生，公卿张惶失措，官府市里鼎沸，数日乃定，天下百姓无不额手称庆。抄没梁冀的家财，由政府拍卖，合三十余亿，以充王府经费，减天下租税之半。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因诛灭梁氏有功，同日被封为列侯，即所称“五侯”。此后至灵帝末年的三十年间，东汉的朝政一直为宦官所把持。

注 释

①《后汉书》卷二三《窦宪传》。

②③④《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⑤《后汉书》卷四三《朱穆传》。

宦官弄权

东汉和帝时，外戚窦宪兄弟专权，图谋不轨。和帝预知其谋，当时朝臣上下莫不附宪，唯独中常侍钩盾令（钩盾令属少府，宦官）郑众，不事豪党，遂与郑众定计诛窦宪。永元四年（92）六月，窦宪伏诛，郑众以功升迁大长秋（皇后近侍）。和帝每次策勋班赏，郑众往往辞多受少，和帝因此对之很是器重，时常同他议论国家大事，并封郑众为侯，东汉宦官用权自此开始。

安帝时，邓太后临朝，邓骘任大将军，掌握朝政。建光元年（121），邓太后病死，安帝亲政。他的乳母王圣、宦官李闰、江京等人，合谋告发太后兄邓悝有废帝之意。邓氏一族或废为庶人，或先后被迫自杀。安帝重用宦官李闰、江京与皇后阎氏兄弟阎显、阎景、阎耀等，共同执掌朝政，开启了外戚与宦官联合专政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安帝死。阎皇后及其兄弟，还有宦官江京、樊丰等人，阴谋定策另立章帝孙北乡侯刘懿为帝。刘懿年少即位，是为少帝。阎太后临朝，阎显以车骑将军执掌大权，

并处死宦官樊丰、周广等人。不到一年，刘懿又病死。以孙程为首的另一伙宦官共十九人，乘机起事，拥立废太子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闫显被杀，闫氏倒台。孙程等以立帝有功，十九人均封列侯，宦官再度把持朝政，权势日盛。

桓帝时，梁冀专权跋扈，天子拱手，桓帝心虽不平，但又口不敢言。延熹二年（159），梁太后死，桓帝与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唐衡、左悺等五人密谋诛除梁冀。梁氏灭门后，单超等五人皆因诛梁有功，同日被封列侯，连小黄门刘普、赵忠等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此外，以言诛梁冀之功而封侯者，尚有侯览。宦官掌权之后，骄横跋扈，"手握王爵，口含天宪"①，狐假虎威，无恶不做。他们还兼作朝官，娶姬妾，蓄养子，并得以养子传爵袭封。他们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搜括）百姓，与盗贼无异"②。单超弟安官为河东太守，弟子匡为济阴太守，徐璜弟盛为河内太守，左悺弟敏为陈留太守，具瑗兄恭为沛相，无不贪污残暴，毒害地方。单超之丧，皇帝除追封他为车骑将军，又赐东周秘器、棺中玉具，赠侯将军印绶，并赐国葬。葬后，又派五营骑士、将军、侍御史护丧③。其威风无可伦比。单超死后，四侯更加骄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可，意为办事无准则，可恣意胡为）。"④徐璜兄子宣为下邳令，暴虐尤甚。他因向前汝南太守李暠家求婚未遂，及到任，竟发吏卒捕女至县衙，戏射杀之。东海相黄浮根据举报，经过核实，将徐宣斩首示众。徐璜向桓帝诉怨，昏愦的桓帝反将黄浮髡钳（即剃发束颈），输作左校（遣送左校劳作）。中常侍侯览之兄侯参任益州刺史，对辖区内富豪，竟诬为大逆之罪，捕杀后霸占全部家财，前后累计以亿计。其后被太尉杨秉弹劾，

押送来京途中，畏罪自杀。京兆尹于旅舍检查其行装，居然还有三百多车，全是金银锦帛珍玩，多得不可胜数。侯览本人更是“倚势贪放，受纳货遗以巨万计”⑤。他“前后请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八十一顷”⑥。新建府第十有六区，都是亭台楼阁，画栋雕梁。他还掠夺良家妇女，以为姬妾奴婢。督邮张俭举奏侯览罪行，反被诛杀。是非颠倒，以至于此，民不堪命，只有“起为盗贼”。

桓帝延熹八年（165）冬，立窦武长女为皇后，拜窦武为特进，城门校尉。窦武为人清身疾恶，生活俭仆，多辟名士入朝为官，对于子侄亦能严加约束，使其遵纪守法。当时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不少正直大臣遭到逮捕及罢黜。窦武上疏桓帝，请求贬黜宦官，信任忠良，桓帝被迫赦免前司隶校尉李膺、太仆杜密等。

永康元年（167）十二月，桓帝死，无嗣。窦太后与其父窦武商议，迎立十二岁的解渎亭侯刘宏于建宁元年（168）正月继位，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称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太傅陈蕃与窦武谋划诛翦宦官。窦武引用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窦武兄子窦绍为步兵校尉，监羽林左骑，控制政府中枢和部分近卫部队。又征召天下名士前司隶校尉李膺、宗正刘猛、太仆杜密、庐江太守朱寓等，列于朝堂，共定计策。会五月发生日食，陈蕃谓窦武曰：“蕃以八十之年，欲为将军除害，今可且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⑦窦武向太后建议：宦官但当供职宫中，主管生活服务琐事，不宜干预政务，尤其不能使其子弟担任要职。目前天下议论纷纷，正因此故。应当悉数诛除宦官，以清朝廷。太后以为任用宦官，本朝早有先例，不能尽废，但当诛杀其有罪者。窦武只好

先杀掉专制宫内的中常侍管霸、苏康等，然后又屡奏太后诛杀用事宦官曹节等，太后犹豫不决，故事久未发。八月，侍中刘瑜上奏太后称：太白出西方，奸人在主傍，宜急防之。同时上书窦武和陈蕃，以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窦武、陈蕃得书将发，于是又安排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以控制首都及周边地方政府机构。

正当窦武、陈蕃积极布置准备尽诛宦官时，宦官曹节、王甫、朱瑀等却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窦太后，占据皇宫，并假传圣旨，收捕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驰入步兵营，与窦绍共同射杀使者，召集禁军五校尉兵数千人屯洛阳都亭，准备抵抗。陈蕃闻难，亲自率领属官及诸生八十余人，拔刃突入尚书门，与宦官王甫相遇，陈蕃拔剑叱甫叛逆，王甫命宫廷警卫执蕃下狱，当日遇害。王甫矫诏命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与新从边区征还京师，不知缘由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统五营士兵进攻窦武。深夜，王甫率宫中警卫虎贲、羽林、剑戟士等千余人，出屯北宫门，与张奂会合。明辰，两军在宫门外对阵。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谋反，营府禁军素来畏惧宦官，窦武部下逐渐散走归降，窦武、窦绍退走，王甫挥军追围，武、绍皆被迫自杀，窦武宗亲、宾客、姻属，悉被诛戮；窦太后被软禁于南宫云台。自公卿以下，凡为陈蕃、窦武举奏者及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曹节、王甫等诛杀窦武、陈蕃后，曹节升为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升为中常侍，并任黄门令如故；其余十多名宦官皆封列侯。宦官完全控制了朝政，灵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朱雀门阙上书写“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

禄，无有忠言者”⑧。于是宦官矫诏命司隶校尉刘猛急捕书写人，刘猛以诽书言直，不肯急捕，结果被贬官。中常侍王甫因向渤海王刘悝（桓帝弟）勒索五千万钱未遂，乃与曹节等诬奏刘悝谋反，迫令自杀。刘悝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狱中，傅、相以下官属皆被杀。王甫等十二人自相封赏，“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⑨

曹节、王甫一伙宦官当道后，贪污残暴，胡作非为，公卿大臣杜口吞声，莫敢有言。王甫养子王吉为沛国（治相县，今安徽睢溪县西北）相，尤为残暴。凡判处死刑的人，皆陈尸车上，标明罪状，巡行所属各县示众。遇到夏季尸体腐坏，则以绳索串连尸骨，遍游国中乃止，见者无不惊怒万状。他任沛相五年，总共杀死一万多人。当时任尚书令的阳球激愤说：“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⑩光和二年（179），阳球果然迁为司隶校尉。他借上朝谢恩之机，参奏王甫父子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等罪恶。灵帝命阳球亲临考问王甫等人，五刑俱备，王甫父子皆死于杖下。于是磔王甫尸体于洛阳夏城门，于尸旁立牌大书曰：“贼臣王甫。”抄没其全部家产，妻子皆流徙外地。其后，阳球与司徒刘郃计议收审曹节、张让等，却被曹节等先发，向灵帝诬奏阳球与刘郃、少府陈球等“交通书疏，谋议不轨”⑪。灵帝昏庸，竟相信宦者诬告，阳球、刘郃、陈球等皆下狱诛死。曹节兼任尚书令，直接掌握政府中枢机构，宦官权势复盛。

光和四年（181），曹节死，张让、赵忠等十二人并为中常侍（宦官最高品级），封侯贵宠，父兄子弟布列州郡，贪污纳贿，残害百姓，被称为“十常侍”。黄巾军起，郎中张钧上书乞斩“十常侍”，以谢百姓，反为张让等诬为与张角交通，被

收掠死于狱中。张让、赵忠教唆灵帝聚敛天下，每亩增税十钱用来大修宫室。由于宦官从中贪污作弊，宫室连年不成，刺史、太守不得不加增私调，百姓苦不堪言。贪残的灵帝还大开西邸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县令县长，当面议价，富者交现金，贫者到任以后，加倍缴纳。又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灵帝把他在各种名义下搜刮来的钱财，一部分命人带到他原来的封邑河间去买田宅，起第观；一部分则寄藏在小黄门、常侍家中。灵帝甚至宣称："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⑫昏愦无耻，竟至于此！宦官得到如此空前的宠遇，更加有恃无恐，为所欲为。东汉政府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寿终正寝之日，已为时不远矣。

注　释

①②《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

③④《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⑤⑥《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侯览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窦武传》。

⑧⑨《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曹节传》。

⑩《后汉书》卷七七《阳球传》。

⑪《后汉书》卷五六《陈球传》。

⑫《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张让传》。

党锢之祸

东汉桓、灵之际，主荒政缪，宦官独揽朝政，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一些正直的官僚和士人深感忧虑。为了自身的前途，也为了拯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他们联合起来，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在官僚和士人中，反对宦官集团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报复，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宦官诬称官僚与太学生的联合抗争为朋党）进行大规模的残酷迫害，禁锢终身，不许为官。历史上称这两次事件为“党锢之祸”。

在外戚与宦官轮流专政之初，官僚中的有识之士为了稳定东汉政权，曾提出抑制外戚、打击宦官、权归皇帝的主张，并进行了一些活动。如顺帝时，李固在回答皇帝的策问时就提出：“使权去外戚，政归国家，”并针对宦官权势过重，封赏太厚，而且“子弟禄仕，曾无限极”的现实，建议“罢退宦官，去其权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黄门五人，才智闲雅者，给事殿中”①。后来朝廷派周举等八使案察天下，所劾奏者多是宦官亲属，在朝宦官为之奔走，顺帝下令不再追究。李固与廷尉上疏，以为八使所纠，宜急诛罚，顺帝

乃下令罢免八使劾奏的刺史、二千石，因此与宦官结下仇怨。宦官与外戚、大权臣梁冀相勾结，共同诬陷李固“离间近戚，自隆支党……作威作福，莫固之甚”②，请求诛杀李固。梁太后知李固忠直，没有采纳，李固幸免于罪。后来，梁冀竟借立嗣事，诬蔑李固与刘文等共为妖言，固被杀害。李固死后，随着宦官势力的日盛，朝廷内外官僚和士人深为不满，于是出现以李膺、陈蕃为首，并有京师太学生和郡国学校生徒参加的反宦官斗争。

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以封建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攻击。他们攻击宦官所采取的手段之一是上书苦谏，指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桓帝时“五侯”专权，在朝的许多官僚都上书参奏。官僚集团中的首领如杨秉、陈蕃、李膺等曾多次引用“高祖之约”和汉家“旧典”苦谏，希望桓帝“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③，罢斥“权倾海内，贵宠无极”的宦官集团。但是，当时桓帝已为宦官所控制，官僚的上书苦谏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招来杀身之祸。白马令李云上书桓帝谓：“今官位错乱，小人谄进，财货公行，政化日损，尺一（指诏策）拜用不经御省。是帝欲不谛（审谛之意）乎?”④桓帝大怒，李云因获罪死于狱中。陈蕃、杨秉上疏申救，也被免归田里。当权官僚还运用手中职权纠举、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党羽。延熹八年（165），太尉杨秉揭发益州刺史侯参的贪残罪行，侯参于押赴来京途中畏罪自杀。杨秉进而弹劾其兄大宦官侯览，请免官送归本郡，桓帝被迫免去侯览中常侍的职务。同年，司隶校尉韩演参奏大宦官左悺、左称“请托州郡，聚敛为奸，宾客放纵，侵犯吏民”⑤的罪行，左悺、左称皆畏

罪自杀。在打击宦官中态度最坚决的要数李膺。延熹二年，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大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为野王（今河南沁阳）令，平素贪污暴虐，残害百姓，甚至杀孕妇以取乐。他闻听李膺到任，畏罪逃还京师，隐匿其兄张让家中。李膺侦知情况，亲率吏卒至张让家中将其搜捕，依法处死。此事震惊朝野，从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休假）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⑥

此外，官僚和儒生也对宦官展开舆论抨击和请愿运动。东汉末年，在官僚中品评人物的"清议"之风盛行，反宦官的官僚和太学生皆以气节之士自命，互相标榜，激扬名声。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多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品覈（hé 核）公卿，裁量国政"，纵论时局，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官僚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太学生非常推崇正直的官僚李膺、陈蕃、王畅等人，于是发出评论说："天下楷模李元礼（李膺字），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字），天下俊秀王叔茂（王畅字），"⑦以颂扬他们的节操。

桓帝末年，太学生曾经发动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请愿。第一次是在永兴元年（153）七月，这一次是为了朱穆的案件。朱穆出任冀州刺史，下属县官闻知朱穆上任，解印绶逃走者四十余人。朱穆到职后，仍奏劾各郡贪官污吏，不少人畏罪自杀或关死狱中。时黄河泛滥，漂害人庶数十万户。而宦官赵忠丧父归葬，竟僭用玉器，朱穆下令检查，吏发墓剖棺出之。桓帝闻讯大怒，征穆诣廷尉，输作左校。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到宫门前上书指出：当今中官近臣，窃持国柄，掌握赏罚大权；朱穆

不顾个人安危，严格执行国家法纪，说明他是忠心忧国深谋远虑的贤臣。太学生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⑧。桓帝被迫赦免了朱穆。第二次是在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求索贿赂未遂，因而诬陷以侵没军饷之罪，坐系廷尉，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与正直官僚共同到宫廷前上书，为他辩解，适逢大赦，皇甫规始得被释归家。

当时东汉的一些中下级官吏，也对宦官政治表示不满。当他们看到处士横议和学生抗愤的现实，也敢于挺身而出，站在自己的岗位，行使自己的职权。如刘祐为河东太守，其属县令长多系宦官子弟，百姓深受其苦。刘祐到任，罢黜其罪恶昭彰者，为百姓平理冤狱。延熹四年（161），刘祐任大司农，当时宦官苏康、管霸专权宫中，侵夺全国各地大量良田美业、山林湖泽，使得百姓穷困，州郡萧条。刘祐移书各州郡，依照国家律令予以没收。宦官向桓帝谮诉，桓帝竟将刘祐论输左校。魏朗为彭城令，宦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魏朗屡次上奏弹劾。南阳太守成瑨与其功曹岑晊，决心褒善纠违，肃清郡府。当时南阳有一富贾张汎，平时与宦官相勾结，横行不法。成瑨与岑晊将其捕杀，并收审其宗族宾客，杀死其有罪恶者二百余人。大宦官侯览唆使张汎之妻上书讼冤。桓帝竟下令逮捕成瑨，死于狱中。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

官僚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政治浪潮日益高涨，当权的宦官集团的反攻也一天天凶猛。于是以张成事件为导火线的“党锢事件”发生了。

第一次“党锢”事件，发生在延熹九年（166）。当时，宦官党羽张成，善于占卜之术。他预卜将有大赦，遂教子杀人。

李膺为河南尹，派人收捕张成之子。不久果然政府下令大赦，眼看罪犯即将逢宥获免。李膺更加愤恨，不顾赦令，坚持将张成之子处死。于是，宦官侯览等指使张成弟子牢修上书，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惑乱也）风俗"⑨。在宦官的蛊惑下，桓帝大怒，诏令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于是逮捕李膺等，牵连陈寔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同时，还派使者四出追捕在逃的"党人"，皆悬赏购募。一时之间，"使者四出，相望于道"。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未捕一人。使者责问说："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⑩史弼说："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史弼自称）有死而已，所不能也。"⑪使者大怒，向皇帝举奏史弼，恰值党禁中解，史弼以俸金赎罪得免，以此全活平原"党人"千余人。

这样大案，要经过三府（三公府）考实，太尉陈蕃不肯连署，他说："今所考案，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也，岂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⑫同时上疏桓帝极谏，疏中有云："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⑬桓帝忌其言词切直，假托陈蕃辟召非人，将其策免。李膺等人在狱中交待党人时，故意牵引一些宦官子弟，宦官惧受牵连，亦不敢再坚持；加以外戚窦武及尚书霍谞均上疏为"党人"讼冤。于是遂于次年（永康元年）大赦天下，李膺及"党人"二百余人，皆免归乡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不得为官。

宦官集团的残酷迫害，并没有吓倒正直的官僚和儒生。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史称："海内希风（仰慕风尚）之流，遂共相标榜（称扬），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⑭他们把敢于同宦官斗争的知名人物，分别冠以各种美称，加以表彰。如陈蕃、窦武、刘淑（桓帝时任侍中，主张罢除宦官）三人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宗也）。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宗仰者也）。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他们互相激励，清议的浪潮更加高涨。范滂出狱归家，家乡汝南和南阳士大夫前来迎接的车子多至数千辆。度辽将军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杰，以未能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为耻，乃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朝廷虽未降罪，但当时人们都赞扬他的风节。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灵帝建宁二年（169），一直延续了十多年，规模之大，株连之广，都超过了前一次。公元167年桓帝死，灵帝即位，年仅十二，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尉陈蕃共同辅政，重新起用被废黜的李膺、杜密等"党人"首脑人物入朝为官，并上疏太后谋诛宦官。不料事机不密，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太后交出玺绶，矫诏发北军五营士攻窦武，窦武众溃自杀，陈蕃等亦遇害。从此宦官气焰更加嚣张，对党人的镇压变本加厉。先是山阳郡（治昌邑，今山东巨野南）东部督邮（郡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教令，兼司狱讼捕亡等事。）张俭以宦官侯览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两次上书举奏侯览家族罪恶，请诛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但是，上报奏疏却被侯览扣压，他对张俭十分怨

恨。建宁二年（169），侯览指使乡人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二十四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借题发挥，示意有司奏："诸钩党（钩，谓相牵引也）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⑮当时，汉灵帝年方十四，他问曹节等人："何以为钩党？"对曰："钩党者，即党人也。"灵帝又问："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灵帝问："不轨欲如何？"对曰："欲图社稷。"⑯无知的灵帝因而批准了宦官的请求，于是，李膺等百余人，俱被逮捕，死于狱中。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皆被宦官指为"党人"，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得到很多人的掩护和资助，最后被迫逃往塞外才得幸免。官府搜查张俭所经之处，因受牵连而死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⑰。

熹平元年（172），窦太后死，有人在宫门上张贴反宦官标语，揭露宦官统治的黑暗。于是宦官再次矫诏收捕"党人"，又有"党人"及太学生一千多人被捕。熹平五年（176），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曹鸾上书为"党人"讼冤，书中说："夫党人者，或耆年渊德，或衣冠英贤，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锢，辱在涂泥（困境）。谋反大逆尚蒙赦宥，党人何罪，独不开恕乎！所以灾异屡见，水旱荐臻，皆由于斯。"⑱桓帝览奏大怒，除将曹鸾掠死于狱外，又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一律免官禁锢，并连及五服以内的亲属。经过这场浩劫，天下有气节的儒生，几乎被一网打尽。

东汉末年的"党锢"事件，是东汉士大夫和儒生反对宦官专权的斗争，它反映东汉的政治危机日益加深，接着而来的是

公元184年的黄巾大暴动。东汉政府为了挽救危局，不得不宣布大赦“党人”，但是为时已晚，等待它的只是这个王朝的最后覆灭。

注　释

①②《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

③《后汉书》卷五四《杨秉传》。

④《后汉书》卷五七《李云传》

⑤《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单超传》。

⑥《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⑦《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⑧《资治通鉴》汉桓帝永兴元年。

⑨《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⑩⑪《后汉书》卷六四《史弼传》。

⑫《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李膺传》。

⑬《后汉书》卷六六《陈蕃传》。

⑭《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序》。

⑮⑯《资治通鉴》汉灵帝建宁二年。

⑰《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张俭传》。

⑱《资治通鉴》汉灵帝熹平五年。

秦汉

道教的兴起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它产生于东汉中叶，形成于东汉末年。东汉王朝从和帝开始，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夺利争权，使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给下层民众带来深重的苦难。当广大人民在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就常常幻想有一种神灵的力量来拯救自己，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宗教身上。而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之时，感到儒学已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借以稳定其统治。于是佛教转盛，道家复起，道教也趁机而兴，企图用一套宗教救世之方，改良政治，变易风俗，慰藉人心。

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首先表现在它的主要来源是古代宗教迷信。巫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者，能降神、解梦、预言、祈雨、医病、占星。民间巫术用符水治病，借卜筮占吉凶。先民以为疾病是有鬼附体，需用巫术加以祛除，由此有符咒驱鬼的法术。殷人尚鬼，故也重巫，如以巫咸、巫贤为相。春秋战国时期荆楚重巫，《楚辞》中即有很多巫觋降神的描述。

楚文化的这种祈祷、降神、禁咒之风，当是道教的一个源头。战国以后，神仙方士宣传仙药可以长生不死，迎合上层贵族要求永享富贵的欲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和秦始皇都醉心方术，派人入海觅仙求药。汉武帝宠信齐人少翁、栾大、公孙卿等方士，终日梦想如黄帝一样飞升成仙。这些神仙学说和方术思想逐渐衍化为道教的修炼方法。其次，表现在它与道家哲学，主要是《老子》和《庄子》的关系上。先秦与秦汉道家是一个学术派别，不是宗教教派；《老》、《庄》等书是学术著作，不是宗教典籍。关于《老子》之被神学化以及老子何以被奉为道教教主，现在还无法做出准确说明。从时间上推断，应在东汉时期，首先出现在宫廷和上层贵族阶层。光武帝儿子楚王刘英"晚节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诏书也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①。桓帝"好神，数祀浮屠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后遂转盛"②。这里所说老子被道教奉为神，与先秦的哲学家老子无关，而是以教主的形象出现的。

一种宗教要形成一股社会力量，必须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拥有众多的信徒。由民间巫术发展起来的原始道教的主要宗教活动是以符水治病，祈祷禳除，又提倡互助救困，能解穷民燃眉之急，因此对社会下层人民有较大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生困苦，为符箓派道教组织在民间的建立，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于是有太平道和五斗米道的兴起。

太平道是张角于东汉灵帝时（167－189）所创立。据《后汉书·皇甫嵩传》："巨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十余年间，发展徒众至数十万，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三

国志·张鲁传》裴注引《典略》亦云：“太平道者，坚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其或不愈，则为不信道。”太平道主要在下层群众之间流行，受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中部分反映劳动群众愿望和要求的思想影响。它的特点是人多地广，规模巨大，而领导集团有武装起事的预谋，传道的目的在于借用宗教外衣为起事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他们打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宗教和谶语色彩的口号，向封建朝廷实行造反，军队著黄巾，张角自称黄天，表现出黄老崇拜的特色。太平道于中平元年（184）发动了反叛朝廷的起事，一时“八郡同时俱发”，“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③。后被东汉政府动员大军镇压下去，太平道从此传授不明。

五斗米道也是中国原始的道教。它的开山祖师是沛国丰人张陵。关于张陵的事迹，史书记载极其简略。惟《三国志·魏志·张鲁传》中记云：“鲁……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这是历史上关于三张传道世系的最早记载。另据《典略》谓：“汉中有张修，”“修为五斗米道。”张修死后，“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修业，遂增饰之”④。又《后汉书·灵帝纪》云：中平元年春二月黄巾起事，“秋七月，巴郡妖巫张修反，寇郡县”，裴注引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是历史上确有张修其人。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

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根据以上几条记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得教权。以上两说均有所本，并志于此。

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思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遭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

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⑤。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玡宫崇“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⑥。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谶，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太平经》提出“太平”的社会理想，是该书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美好概念。书中解释“太平”为“太者大也，平者正也”（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48页）。太平世界是和谐公正安定的世界，“凡事皆能得其宜，帝王优游，盗贼无有，百姓无

怨，颂声不绝”（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92页）。这种向往和平，反对战乱的思想，引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共鸣，对于汉末民间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易参同契》是稍晚于《太平经》的道教丹鼎派理论著作。它的中心思想，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经。书中主要讲述炼丹的用药、火候及服用效应等。该书文字古奥，语言含混，千余年来，学者反复研味，多方诠释，仍不能得其真意，甚至像朱熹那样的理学家也慨叹说“无下手处，不敢轻议”⑦。然而，无论如何，《参同契》却推演出许多新的丹鼎学说，奠定了道教外丹学说的基本理论，被称为丹经之祖。

注　释

①《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

②《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

③《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④《三国志·魏志·张鲁传》裴注。

⑤《汉书》卷七五《李寻传》。

⑥《后汉书》卷三〇下《襄楷传》。

⑦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

黄巾大暴动

东汉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宦官、外戚竞相专权，豪强地主肆意兼并土地，安帝以后，水旱蝗灾连年不断，广大农民纷纷破产流亡。桓帝末年，司隶及豫州（今河南省）一带，“饥死者什四五，至有灭户者”①。尽管如此，豪族地主和封建国家压榨搜刮仍有增无减。官吏贪婪无厌，众多农民死于箠楚之下。因此，从安帝以来，农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接连不断，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历史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不下百次，至于各地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②，更是不可胜数。当时，农民中流传一首歌谣说：“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③反映了农民敢于反抗的英雄气概。分散的农民暴动，虽然被东汉政府镇压下去，但是继起的暴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加扩大，终于形成了以张角为首的全国性黄巾大暴动。

张角，冀州巨鹿（今河北平乡县）人，太平道的首领，自称“大贤良师”。灵帝时，疠疫流行。张角画符诵咒，以治病为名创立和传播太平道教，利用宗教，在农民中秘密进行起义

的组织活动。张角派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传道，受到农民的信任。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天下襁负（背着小孩）归之"④，信徒发展到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今长江中下游以北直到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

张角的活动，引起了东汉统治集团的注意。东汉王朝屡下"赦令"，企图以此瓦解流民群。但是流民群在张角的领导下，仍然日益壮大。东汉王朝的阴谋失败，又准备命州郡使用武力"捕讨"。司徒杨赐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张角的势力正在"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⑤，因此，他建议皇帝命令州郡地方官"简别流人，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首领）"⑥，这样"可不劳而定"⑦。其后，侍御史刘陶等人也上疏灵帝，请求"宜下明诏，重募角等，赏以国土，有敢回避，与之同罪"⑧，企图用收买手段，消弭起义。但是东汉统治者的上述对策，并没有得到实行。

在此有利形势下，张角加快了起义准备。他把道徒以"方"为单位组织起来，分为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一渠帅。组织工作就绪后，张角等人"窃入京师，觇视朝政"⑨，深入了解东汉王朝的内部情况，最后决定于甲子年（中平元年，184）三月五日各地同时起义。张角向道徒们发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⑩的口号，向人民宣告东汉王朝崩溃在即，新的朝代将要代起。太平道徒广为散布"黄天泰平"的口号，并派人在洛阳的寺庙及州郡官府门上，用白土涂写"甲子"二字，作为起义的信号和攻打的目标。

中平元年（184）春，张角派大方马元义调荆、扬二州数万信徒到邺城（今河北临漳县）集中，配合京城及各地的起义。马元义多次到洛阳，联系宦官封谞、徐奉等人作内应，约定于三月五日内外俱起。但是，当此紧要关头，起义军中的叛徒唐周，向东汉政府告密，泄露了起义的全部计划。东汉政府下令搜捕，马元义在洛阳被捕牺牲，太平道的徒众一千多人遭到杀害；同时，又下令冀州官府逮捕张角等人。张角得知计划泄露，当机立断，他派人星夜驰向各方，通知信徒，立即举行起义。中平元年（184）二月，以黄巾为标志的农民起义军，在七州二十八郡同时俱起，中国历史上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黄巾军由张角统一指挥，向着东汉封建统治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黄巾军在起义后迅速形成三个中心。一支是由张角三兄弟领导的冀州黄巾军，张角自称“天公将军”，其弟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一支是由波才领导的颍州黄巾军；另一支是由张曼成领导的南阳黄巾军。起义军声势浩大，“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⑪。

黄巾大暴动后，东汉朝廷十分惊慌，急忙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屯驻都亭（洛阳附近），并分遣八都尉屯兵函谷、大谷、广成、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等八个险要关隘；又遣中郎将皇甫嵩、朱儁、卢植、董卓等率兵分头镇压起义。为了纠集豪族地主武装镇压起义，灵帝采纳中常侍吕强建议，宣布取消党禁，赦免党人。于是各地豪族地主纷纷起兵，与黄巾军为敌。当时朝廷中有一个头脑比较清醒的郎中张钧大胆向灵帝提出诛杀宦官，以谢人民

的主张。他说："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搜括）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可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悬头南郊，以谢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⑫昏庸的灵帝不但不采纳，反而替宦官辩护，结果张钧被宦官所诬杀。

起义前期，各个战场上的黄巾军均给予官军以沉重打击。张角领导的冀州黄巾军活捉安平王刘续、甘陵王刘忠，斩杀幽州刺史郭勋、太守刘卫，攻占了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并先后打败卢植和董卓率领的官军。当年三月，南阳黄巾军张曼成攻克宛城，杀死太守褚贡。四月，颍川、汝南黄巾军在波才、彭脱指挥下，打败朱儁，并把皇甫嵩的主力包围在长社（今河南长葛东北）。一时之间，农民军声势浩大，官军被打得狼狈不堪。

本来形势的发展对黄巾军很有利，但由于农民军缺乏作战经验，波才的颍川军包围长社后，失去警惕，"依草结营"，给皇甫嵩以可乘之机。皇甫嵩乘风放火，对起义军发起突然袭击。皇甫嵩令军士皆手持一束燃苇登城，使锐士乘间突围，纵火大呼，城上举燎相应，嵩从城中鼓噪出击，恰在此时骑都尉曹操率领援军赶到，合攻黄巾军，义军因之大败，几万人遭到血腥屠杀。接着，波才军余部于阳翟，彭脱义军在西华，相继失败。之后，皇甫嵩调军向东进攻，击败了汝南、陈国黄巾。皇甫嵩又北上东郡，东郡黄巾军领袖卜巳不幸被俘。朱儁一军则继续南下进扑南阳一带义军。

在南阳战场上，张曼成斩杀南阳太守褚贡后，在宛下屯驻百余日，军事上没有新的进展。同年六月，东汉政府派秦颉率

兵向起义军反扑，张曼成不幸牺牲。黄巾军推赵弘为帅，队伍扩充到十多万人，将新任的南阳太守秦颉赶跑，再据宛城。朱㑺会同荆州刺史徐璆、南阳太守秦颉等地方军，合力围攻宛城。从六月至八月，义军粉碎官军多次进攻，坚守住了宛城，朱㑺几乎被撤职。但黄巾军错过主动出击时机，坐使官军重新积聚力量扭转局面。赵弘在战斗中牺牲后，义军又推韩忠为帅；韩忠被杀，再推孙夏为帅，继续战斗。由于官军不断增兵，义军毫无后援。十一月，宛城陷落，孙夏率义军向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境内的精山转移。朱㑺乘机追击黄巾军，孙夏战死，黄巾军又有一万多人牺牲，南阳的黄巾军主力，遭到了巨大的挫折。

在冀州地区，起义爆发之后，张角首先率领义军攻占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诸城邑。东汉政府派北中郎将卢植前往镇压。卢植开始虽然取得小胜，斩获黄巾军万余人，但他虽倾尽全力“筑围凿堑，造作云梯”⑬，一直未能攻下广宗。东汉政府无奈，只好又改派东中郎将董卓代替卢植去镇压，董卓在下曲阳与义军较量，又被张角一举击破。他围攻广宗三个月，广宗屹然不动。八月底，东汉政府调左中郎将皇甫嵩代替董卓，投入广宗战场。这时张角已病死，由其弟张梁统率广宗义军。“梁众精勇，嵩不能克”⑭，皇甫嵩只得“闭营休士，以观其变”⑮。可是，在十月间的一场战斗中，由于义军疏忽大意，皇甫嵩“潜夜勒兵”⑯，鸡鸣时进扑义军阵地。义军仓促接战，张梁阵前牺牲。与张梁一道战死的有三万多人，其余不甘屈服，投河而死者五万余人。同年十一月，皇甫嵩军又攻破下曲阳，张宝等十多万义军被杀害。残暴的东汉统治者对农民展开了血腥的报复，因张角已先病死，竟

棺戮尸，传首京师”⑰，并在下曲阳城南积尸封土，筑为“京观”。这种野蛮的行径，并没能改变东汉统治者覆灭的命运。

黄巾军的主力虽然被镇压，但是农民的反抗斗争并未停止。中平二年（185），黄巾余众和各地饥民，又举起各种各样的旗帜，活动在黄河以北的原野上。据《后汉书·朱儁传》云：“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蝤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中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黑山军首领张燕（即张飞燕，原姓褚，张牛角战死，改姓张）联络太行山东西各郡农民军，发展成为百万人的队伍，号黑山军，势力最为强大。他们长期坚持抗击官军和袁绍割据势力的斗争。继黄巾军而起的暴动集团人数众多，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组织，各个集团分散行动，互不相属，因而不能集中力量，整齐步伍，向着共同的敌人进军。张燕虽与诸山谷“寇贼”更相交通，但他并不能把各集团领导起来，而且他的反抗意识并不坚定，起事后不久，即“遣使至京师，奏书乞降”⑱，被东汉政府任命为平难中郎将，使领河北诸山谷事。

中平五年（188），当时分散在青州、徐州、兖州、豫州、并州的黄巾军余部，再次发动起义。如郭太起于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活动于太原、河东诸郡，抗击董卓的军队。同年十月，青、徐一带黄巾复起，声势巨大。徐州黄巾军为陶谦阻击后，攻破北海。北海太守孔融慑于起义威势，出屯都昌（今山东临朐境），复被起义军管亥所部包围，直到刘备兵到才解围。青州黄巾再起后，先后进攻泰山、兖州、东平等地，杀

死任城相郑遂，兖州刺史刘岱，发展至百万人。曹操倾全力阻击这支义军，在寿张东与义军“昼夜会战”，被义军击败，济北相鲍信被杀。义军人数虽多，但妇女老幼等非战斗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军需供应全靠“钞略”补给，这就为其流动作战带来极大困难。初平三年（192）这支义军被曹操所收降，曹操简其部分精锐，组成“青州兵”，成为他后来统一北方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而黑山军在被东汉政府招抚后，后又“渐寇河内，逼近京师”，直至建安十年（205年）夏四月，才由张燕率领其众十余万人归降曹操。黄巾大暴动，至此宣告结束，但东汉政权，也被割据势力所瓜分，历史进入豪族混战的局面，东汉王朝名存实亡。

注 释

①《后汉书》卷七《桓帝纪》。

②《齐民要术》卷三引崔寔《四民月令》。

③《全后汉文》卷四六。

④⑤⑥⑦《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附杨赐传》。

⑧⑨《后汉书》卷五七《刘陶传》。

⑩⑪《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⑫《后汉书》卷七八《宦官列传·张让传》。

⑬《后汉书》卷六四《卢植传》。

⑭⑮⑯⑰《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

⑱《后汉书》卷七一《朱儁传》。

秦汉

张鲁雄据巴汉

与黄巾大暴动同时，在蜀郡，张修、张鲁也造作五斗米道，煽起“叛乱”。

五斗米道是东汉时期流行于巴蜀、汉中原始道教的一个流派，其创始人是沛国人张陵。东汉末年，五斗米道主要分为两支：一支是以张陵之孙总道主张鲁为首领，主要活动于四川西部，完全按照其乃祖乃父（张衡）所贯彻的宗旨行事，将五斗米道作为一种纯粹的宗教迷信在传播；另一支是以巴郡教区张修为首领，活跃于巴郡（今重庆市区）、汉中一带，他们在东方太平道的思想影响下，以五斗米道为工具，于中平元年（184）黄巾大暴动之后，也随之发动“叛乱”，攻占了巴郡、汉中相当大的一块地区。

汉末熹平、光和中，到处发生农民暴动，为了加强对各地“叛民”的镇压，汉灵帝把一些重要州的刺史改称州牧，选派有名望的宗室、列卿充任，以总揽一州的军政大权。中平五年（188），宗正兼太常刘焉被任命为益州牧，来到四川，在绵竹（治今四川德阳县北）建立起益州最高行政机关。刘焉和东汉

朝廷中许多公卿大臣一样，冀图乘东汉“政治衰缺，王室多故”①之机，离开京师，到外面去占据一块地盘，成为割据一方的军政首领。因此，他一到绵竹，即迫不及待地实行“抚纳离叛，务行宽惠”②的政策，阴谋实现其割据一方的野心。

刘焉认为，四川的五斗米道势力和汉中的东汉政权是他“阴图异计”的两个重要障碍。于是刘焉首先对张鲁进行笼络，而张鲁面对当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的局面，也想寻觅一个政治靠山，以确保其既得权益，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为政治上的合作伙伴。加之张鲁母“有姿色，兼挟鬼道，往来（刘）焉家”③，刘焉利用这种关系，于初平二年（191）派张鲁为督义司马，并利用张鲁和张修之间的五斗米道关系，给张修以别部司马的名义，令其合兵进攻汉中。

张鲁在取得张修的合作后，军事进展相当顺利。张鲁在武都入汉中的孔道上，“因即峭岭”，修了一个“周围五里，东临濬谷，杳然百寻，西北两面连峰接崖，莫究其极，以南为盘道，登陟二里有余”④的强固城堡，即后世所谓的“张鲁城”。在张鲁城不远处还有“张鲁治”、“张天师堂”等建筑。张鲁以此为活动中心，大肆传道，扩大自己的影响。在汉中人民的支持下，张修和张鲁掩杀了东汉汉中太守苏固，消灭其武装力量。汉中部分地方豪强势力如赵嵩、陈调和顽抗的陈固等亦也消灭。从此刘焉便以“米贼断道”为借口，与东汉统治者断绝联系，利用农民武装力量割据巴蜀。

张鲁既是五斗米道世家、道主，又是广拥部曲的豪强。攻下汉中以后，他认为割据汉中的时机已到。初平二年（191），张鲁袭杀了张修，并收编了他的队伍。于是，他把自己的活动中心由“张鲁城”迁到南郑。兴平元年（194），绵竹大火，燔

烧城府辎重，延及民家，馆邑无余。刘焉徙居成都，疽发背死，其三子刘璋领益州牧。刘璋为人闇弱，张鲁骄恣，不肯承顺，刘璋杀张鲁之母及弟，因此，张鲁与之公开决裂，在汉中建立起以自己为首的割据政权。建安六年（201），张鲁派兵攻下巴郡，从此，他便成为一个占有巴、汉广大地区的统治者。刘璋屡次派兵攻打张鲁，皆为所败。赤壁战后，刘璋采纳别驾张松建议，遣法正请刘备入川。刘璋“以米二十万斛，骑千匹，车千乘，缯絮锦帛，以资送刘备”⑤，使讨张鲁。

张鲁在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张鲁控制下的汉中地区居民，都得加入五斗米道，即使“流移寄在其地者”⑥亦“不敢不奉”⑦。初入道者皆称“鬼卒”；入道既久而又笃信不疑者称做“祭酒”，“各领部众”。祭酒本是当时社会上对某些有地位人的尊敬称号，因而“各领部众”的祭酒乃是五斗米道中的上层分子；领有部众特多、在五斗米道中特权更大者，则称做“治头大祭酒”。张鲁的统治办法是政教合一，“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⑧，即除在郡一级设太守府及其僚佐以外，郡以下的县，以及县以下的乡、亭等皆不设相应的官吏，而是“以祭酒为治”，使各级祭酒行使原基层官吏“治民”、“理民”的职能。祭酒既是宗教统治者，又是行政统治者，这样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要比单纯的行政统治更为牢固和有效。

张鲁的汉中政权，按照《太平经》的设想在政治经济方面采取了以下一些改良措施。

首先，初入道和治病者都得缴纳五斗米，作为祈祷费。此后鬼卒们要常年缴纳，“其供道限五斗米”⑨，使原来道徒的一种宗教性负担，扩展成为普遍实施的通供赋税。另据李膺

《益州记》记载："受道者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彩。后生邪浊，增立米民。"这样种类繁多的实物贡赋，对广大人民来说，无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米民"，则是把一部分贫苦农民控制起来，从事专门的粮食加工生产，以供养张鲁政权的粮谷需要。在此基础上，张鲁命"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⑩。义舍中置有米肉，据说是供"行路者量腹取足"⑪之用，如果取得过多，"鬼道辄病之"⑫。既然汉中居民都得信奉道教，张鲁又以道教组织体系作为其政权形式，这种义舍显然是为张鲁传布政教命令而设置的一种机构。义舍和义米、义肉，并不包含什么"共同生活"的意义。

其次，张鲁对传统的刑法亦有所改变。据《三国志·张鲁传》记载："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这说明对触犯法纪的人，还是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只是在三次原谅之后，仍然坚持不改者，才使用刑罚。对于那些"有小过者"，则令其"治道百步"⑬，可以免除其罪。这比旧的科条要减轻了许多。张鲁所以采取比较宽简的刑律，主要是为了安定巴汉地区的人心，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因为他是了解东汉政府汉中政权怎样被当地农民推翻的。

再次，张鲁政权"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⑭，推行"其市肆贾平"⑮的政策，以发展农业生产和工商业经济。在汉末天下大乱，全国经济凋敝，城乡一片残破的情况下，即使要巩固局部地区政权，也必须做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否则都难免遭到覆灭的下场。曹操所以能够战胜群雄，统一北方，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他认识到了这一问题，而且能够认真去解决。他首先在许县实行屯田，当年得谷百万斛，以后又逐步推广到其所占领地区，积累了较充足的军粮，最终才得以

战胜袁绍，统一北方广大地区。张鲁吸取了曹操的成功经验，非常注意经济问题，加之汉中、巴郡地区战争较少，关西之民来奔者数万家，使这个政权有了一定的实力，即使拥有益州大部的刘璋对之也无可如何。张鲁实施的“保境安民”⑯政策，史称“民夷便乐之”⑰，这是他能够“雄据巴、汉垂三十年”⑱的主要原因。当时的东汉政府，已无力约束张鲁，只好给以镇民中郎将，领汉宁（即汉中）太守的官位，承认了张鲁的割据。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率领十万大军从散关出武都进攻汉中，至阳平关，张鲁遣五官掾接洽投降，其弟张卫不肯，率领部众数万人拒关坚守，曹军不得进。曹军军粮尽，曹操准备退兵，部下郭谌以为不可。他说：“鲁已降，留使既未反，卫虽不同，偏携（偏师）可攻。悬军深入，以进必克，退必不免。”⑲曹操犹疑不定。是夜天色昏黑，曹军迷惑，误入卫营，张卫以为被曹操大军包围，遂降。张鲁闻说阳平关已被攻破，将要“稽颡归降”，部下阎圃认为：“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依杜濩赴朴胡相拒，然后委质（归顺），功必多，”⑳劝张鲁南入巴中，投奔巴酋杜濩，然后与曹操谈判投降，可以获得更多利益。在张鲁逃奔巴中前，左右欲悉烧宝货仓库，张鲁止之曰：“本欲归命国家，而意未达。今之走，避锐锋，非有恶意。宝货仓库，国家之有。”㉑命人封藏完毕之后，才离去。曹操进入南郑，见宝货仓库保存完好，对张鲁很是嘉奖，遣人对之进行慰喻。张鲁本有降意，至此遂率领部众向曹操投降。曹操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及阎圃皆赐封列侯。曹操还特为其子彭祖聘娶张鲁之女为妻，进行联姻，以示宠信。张鲁建立的巴汉政权，至此告终。

注 释

①②《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③《后汉书》卷七五《刘焉传》。

④《水经注·沔水篇》。

⑤《三国志·蜀书·刘璋传》。

⑥⑦《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⑧《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⑨《华阳国志·汉中志》。

⑩⑪⑫《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⑬《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典略》。

⑭⑮⑯⑰⑱《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⑲《三国志·魏书·张鲁传》注引《世语》。

⑳《三国志·魏书·张鲁传》。

㉑《三国志》卷八《张鲁传》。

董卓之乱

黄巾起义失败后，东汉政府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再度激化。一方面地方割据势力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又趋剧烈。

黄巾起义之后，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加强镇压力量，中平五年（188），汉灵帝接受刘焉的建议，先后将一些重要地区的州刺史改为州牧，选择有名望的官僚充任，于是州的长官从只具有行政权，一变而为兼有领兵治民之权。这就给一些将帅和地方长吏以扩充军事实力的权力，出现州郡牧守擅兵局面，加速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

与此同时，灵帝为了加强防护京师的力量，在首都设置西园八校尉，扩建八支近卫部队，袁绍、曹操等七人被任命为校尉，各统一军。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兼为元帅，统帅其他七校尉，连大将军何进也要归他统管，宦官同外戚、官僚士大夫的矛盾又尖锐起来。中平六年（189）四月，灵帝死去，蹇硕欲杀死何进，拥立王贵人之子刘协为帝，独揽大权。为何进察觉，乃急引兵回营，蹇硕之谋未能得逞。于是何皇后之子刘辩

得以继位，是为少帝，何太后临朝，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何进素知宦官专权乱政，为天下人所痛恨，便与世家大族的代表人物袁绍等谋议铲除宦官。蹇硕疑不自安，作书与中常侍赵忠等说："大将军兄弟秉国专朝，今与天下党人谋诛先帝左右（指宦官），扫灭我曹。但以硕典重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闭上阁，急捕诛之。"①何进同乡中常侍郭胜素亲何氏，他与赵忠商议后向何进告密。何进先发制人，命黄门令逮捕蹇硕处死，并接管蹇硕率领的禁兵，成为独掌军权的实力人物。

何进独揽大权之后，袁绍以窦武失败的教训劝他抓紧时机消灭宦官："今将军既有元舅之重，而兄弟并领劲兵，部曲将吏皆英俊名士，乐尽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赞之时也。将军宜一为天下除患，名垂后世。"②并告诫他不可轻易进宫。何进与袁绍定策，欲尽罢除诸宦官，并以其计报告太后。何太后因凭借宦官势力登上皇后宝座，她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她不同意何进的建议，他说宦官统领宫中事务，汉王朝自开国以来，历来如此，怎可废除？何进无法改变太后成见，袁绍提醒何进，"中官亲近至尊，出入号令，今不悉废，后必为患"③。何进犹豫不决。于是袁绍又建议何进多招四方猛将及各地豪杰，使其各自领兵入京以胁迫太后。何进表示赞同。主簿陈琳认为"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只为乱阶"④。尚书卢植亦言不宜召卓入京。何进皆不听，遂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武猛都尉丁原等进屯洛阳附近，向朝廷提出消灭宦官的建议。太后犹不从，何进之弟何苗亦劝进深思，何进意更狐疑。袁绍担心何进变计，乃威胁说："今交搆已成，形势已露，将军何为不早决之？事留变生，后机祸至。"⑤何进于是以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以控制首都洛阳及河南

地区军政大权。袁绍接受任命后，一面命洛阳方略武吏司察宦官，一面催促董卓等人迅速上路。直至此时，何太后才感到事机不妙，被迫罢免了张让等当权宦官，诸常侍、小黄门皆面见何进谢罪，听候处置。袁绍建议何进趁机一网打尽，何进不许。何进劝他们各回封国去享清福，宦官们不肯自动下台，秘密策划反扑。

董卓，陇西临洮（今甘肃岷县）人。临洮在西汉时为一防御羌人边陲重镇，地理形势甚是险要。当地人民长于骑射，习性勇武剽悍。董卓自幼生长在一个武官家庭，力大体壮，粗猛有谋。史称他"膂力过人，双带两鞬，左右驰射，为羌胡所畏"⑥。青年时尝游羌中，尽与羌豪相结，精通羌胡事，以健侠知名羌胡。东汉桓帝末年，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随中郎将张奂共击汉阳叛羌，屡立战功，连升官阶，一直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黄巾起义后，董卓拜东中郎将，接替卢植率兵攻打张角于下曲阳，军败抵罪。不久，又被任命为中郎将、破虏将军，随同车骑将军张温进攻金城叛将边章、韩遂。中平四年（187），韩遂与马腾联合向三辅进攻。董卓被朝廷任命为前将军，与左将军皇甫嵩共同将韩遂、马腾击败。由于董卓在对西羌和韩遂、马腾作战中，壮大了凉州兵的势力，他的政治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以致两次拒绝朝廷的征召：一是中平六年（189），东汉政府征他到朝廷担任少府（九卿之一），董卓以所部羌胡兵不听命令为借口，不去洛阳就职；一是当灵帝将死时，玺书拜他为并州牧，命他将兵权交与皇甫嵩，他再次抗命不遵，并带领部队驻守河东，以观时变。这次当他得到何进的召唤，他认为是篡权的好机会，立即引兵向洛阳进发，并上书请求惩办宦官张让等，"以清奸秽"。

董卓还未到达洛阳，宦官张让、段珪等假传太后旨意，召何进入宫议政，事先使党羽数十人埋伏在宫门外，当何进出宫时，发动突然袭击，将何进杀死。张让、段珪等作诏书，任命樊陵为司隶校尉，许相为河南尹。尚书得诏板，疑不肯信，曰："请大将军出共议。"中黄门以何进首级掷地曰："何进谋反，已伏诛矣。"⑦何进部将和袁术等听说何进被害，领兵焚烧宫门，张让、段珪等见势不妙，慌忙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刘协及宫内官属数十人逃走。当他们逃至小平津（黄河重要渡口，在今河南孟津东北）时，张让被逼走投无路，投河自杀。与此同时，袁绍等引兵将北宫门关闭，勒兵搜捕宦官，不问老少，一概斩首，共诛杀二千余人，有些无胡须的人也被当做宦官杀死。

当洛阳大杀宦官之时，董卓已率兵接近京城，远见火起，知朝中有变，乃引兵急进，天尚未明，到达城西，听说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少帝见到董卓带兵卒然来到，恐怖涕泣。群臣见此情景，对董卓说："有诏却兵。"董卓早怀异心，怎肯听从，乃对群臣说："公诸人为国大臣，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国家播荡，何却兵之有？"⑧遂与少帝和陈留王，一起回到洛阳。

董卓领兵进入洛阳，恰好骑都尉鲍信自泰山募兵来到，他劝袁绍说："董卓拥强兵，将有异志，今不早图，必为所制。"⑨但袁绍畏惧董卓，不敢发难。不久，何进及其弟何苗的一些部曲投归董卓，董卓又收买丁原的部属吕布，杀死执金吾丁原，兼并了他统领的部队，再加上他从凉州带来的三千人马，军事力量大大增强，董卓的野心也随之日益膨胀。他先后自封为司空、太尉、相国。为了削弱何氏外戚集团的势力，他准备废掉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他同袁绍商议，袁绍持异

议，董卓按剑怒叱道："竖子敢然！天下之事，岂不在我？我欲为之，谁敢不从！"⑩袁绍勃然大怒道："天下健者，岂惟董公！"⑪说罢引佩刀长揖而去，座上公卿，见此情景，皆大惊愕。董卓新到洛阳，又因袁绍为世家，亦未敢加害。袁绍惧怕董卓报复，当晚奔冀州。董卓采纳部下周珌、伍琼建议，授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之弟袁术和曹操，不愿屈从董卓，也先后逃离洛阳，别图发展。

董卓掌权后，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他欺世盗名，假惺惺地外示宽柔，起用党人名士做朝官，外放大臣为牧伯太守，平反陈蕃、窦武及诸党人冤狱，"以从人望"⑫。他起用周珌、伍琼、郑泰、荀爽等，处以要职；其染党锢者如陈纪、韩融之徒，皆任为列卿。知名大儒蔡邕以前在宦官打击下，逃亡在外，董卓召他进京，三日之间迁升三次，位至侍中。对其他方面有影响的人物，董卓也尽力笼络，如任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对名将朱儁表面亲近而内心忌惮，董卓自为太尉，以朱儁为副，但不令其真正掌握兵权。

董卓废少帝为弘农王，另立刘协为帝后，以为天下安定，可以为所欲为，对人民一味掠夺残杀。董卓生性残忍，经常放纵士兵抢劫财物，掳掠妇女，使洛阳一带陷于一片恐怖之中。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遣兵至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当时正值百姓社祭，董卓士兵杀死全部男子，掳夺妇女、财物，将人头系在车辕上，诡称"攻贼大获"，高呼"万岁"。回到洛阳城内，将男子首级焚烧，将妇女赏给士兵为婢妾。董卓的种种暴行，激起人民的强烈怨恨。关东地区拥有武装力量的州郡长官，也乘机以讨伐董卓为名，借以扩大自己的势力。

初平元年（190）初，渤海太守袁绍、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内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以及典军校尉曹操等联合起兵，讨伐董卓，共推袁绍为盟主。是时，黄巾余党郭太等率十余万众，再次起事于西河白波谷，转攻太原、河东等地，与关东军对洛阳形成夹击之势。董卓恐惧，乃鸩杀弘农王，准备迁都长安，召集公卿会议。太尉黄琬、司徒杨彪不同意迁都长安，在朝廷上争论没有结果，伍琼、周珌又力谏不可。董卓大怒，下令将伍、周二人斩首，黄琬、杨彪降为光禄大夫，决定挟持汉献帝西迁。在临行前，董卓下令将洛阳宫殿、官府全部烧毁，二百里内民居洗劫一空，荡然无存。他强迫洛阳附近数百万人口西迁，一路上老百姓在军队的践踏和抢掠之下，死伤很多，由于粮食缺乏，因饥饿而死者也为数不少。董卓还命人挖掘皇帝及公卿陵墓，盗取珍宝。董卓的倒行逆施，不仅使洛阳地区经济受到严重破坏，而且也使文化遗产遭到空前洗劫，大批书籍及文物损毁殆尽。

迁都长安后，董卓授意天子拜他为太师，位在诸侯王之上。他将从洛阳等地搜括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积藏在郿坞，城墙高厚皆七丈，号曰“万岁坞”。董卓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⑬他大封亲戚为官，“宗族内外，并居列位”。与此同时，董卓大肆诛杀异己，“法令苛酷，爱憎淫刑，更相被诬，冤死者千数”⑭，弄得“百姓嗷嗷，道路以目”⑮。一次，董卓去郿坞巡行，命公卿百官在长安西门外设宴送行，董卓于坐中杀死数百降人助宴。被杀的人，先断其舌，次斩手足，然后挖去眼睛，最后投入滚烫的开水锅中活

活煮死，与会公卿大臣有人被吓得遗失匕箸，董卓饮食自若。其凶残野蛮，以至于此！天下之人对董卓及其凉州兵恨之入骨，多有诛灭之心。

初平三年（192），司徒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仆射士孙瑞、中郎将吕布等，密谋诛董卓。吕布自从杀死丁原之后，成了董卓的亲信侍从，二人誓为父子。后来吕布因小事失卓意，险些被董卓用手戟刺死，吕布由此阴怨董卓；加以吕布私通宫中婢妾，心中益不自安，遂参与王允密谋，许为内应。四月，献帝有疾新愈，大会群臣于未央殿。王允等乘机派亲信骑都尉李肃带士兵十余人伪装卫士，守住宫门，等待董卓到来。董卓入门之后，李肃一戟刺去，董卓伤臂，堕落车下。他大声呼唤："吕布何在？"吕布应声喝道："有诏讨贼臣！"举矛将董卓刺死，接着又杀死几名董卓的亲信。吕布取出怀中诏版向吏士们高声宣布："诏讨卓耳，余皆不问。"⑯吏士皆正立不动，"大称万岁"⑰！长安城中百姓听到董卓被杀消息，纷纷"歌舞于道"⑱，不少士女卖掉珠玉衣装，沽酒买肉，以相庆贺。

董卓死后，以王允录尚书事，吕布为奋威将军，封温侯，共掌朝政。王允刚愎自用，不讲策略，许多过去被迫依附于董卓的公卿大臣皆被处死。著名学者蔡邕，听到董卓被杀消息，表示惊叹，也下狱身死。董卓部下皆怀恐惧之心，王允也未能妥善处置，致使董卓部将李傕（音决）、郭汜等相与结盟，集兵十余万，进攻长安，打败吕布，杀死王允。不久，董卓部将间为了争夺最高权力，又展开了两年多的火拼，使长安及其附近的关中地区，成为厮杀的战场，居民逃散，行旅断绝，出现了诗人描写的"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悲惨景象。汉献帝徒具虚名，东汉王朝实际上已名存实亡，接着而来的则是关

东军阀的更大混战，逐步形成了长时间的分裂局面。

注 释

①②③④《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⑤《三国志·魏书·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

⑥《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⑦《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

⑧《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注引《典略》。

⑨⑩⑪《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传》。

⑫⑬《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⑭⑮《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⑯⑰⑱《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附录：秦汉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前 221 年	秦始皇二十六年	秦灭齐，统一六国。秦王政称始皇帝，置郡县，统一诸项制度。
前 220 年	秦始皇二十七年	修筑驰道，东通燕齐，南通吴、楚。
前 219 年	秦始皇二十八年	秦始皇东巡郡县，封禅泰山。监禄开凿灵渠。求神仙及不死药。张良谋刺秦始皇。
前 216 年	秦始皇三十一年	令黔首自实田。
前 215 年	秦始皇三十二年	秦北伐匈奴，取河南之地。始皇东巡碣石，使方士卢生卜海求仙。
前 214 年	秦始皇三十三年	攻取南越，置桂林、海南、象郡，谪徙五十万人守五岭，与越人杂居。修筑长城，西起临洮，东到辽东。
前 213 年	秦始皇三十四年	下令焚书。
前 212 年	秦始皇三十五年	修筑直道；营建宫殿和骊山墓。坑杀儒生。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211年	秦始皇三十六年	焚石问卜
前210年	秦始皇三十七年	秦始皇病于平原，沙丘之变。蒙恬、蒙毅死。胡亥继位，为二世皇帝。
前209年	秦二世元年	二世东巡；二世杀诸公子、公主；复作阿房宫。大泽乡起义。陈胜自立为王，国号“张楚”；周文兵败；武臣自立为赵王。刘邦起兵于沛；项梁、项籍起兵于吴。韩广等自立为王。
前208年	秦二世二年	周文败死，田臧杀吴广；陈胜被害。张耳、陈余立赵歇为赵王；秦嘉立景驹为楚王；项梁杀景驹，立楚怀王孙心，定都盱眙。项梁败死；李斯之死。楚遣宋义救赵；楚遣沛公伐秦。
前207年	秦二世三年	项羽于巨鹿击败秦主力；刘邦向武关进军。章邯降楚。赵高逼二世自杀；子婴杀赵高。刘邦破武关。
前206年	汉王元年	刘邦进军霸上，约法三章，秦亡，乃西入咸阳。项羽坑秦降卒，鸿门宴，项羽屠咸阳，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封诸侯王。刘邦为汉王，以萧何为丞相，拜韩信为大将。刘邦烧绝栈道，还定“三秦”。
前205年	汉王二年	项羽杀义帝（怀王），大掠齐地。张良归汉。刘邦为义帝发丧。陈余发兵助汉。刘、项彭城之战。萧何说降英布；汉取敖仓粟；刘邦重陈平；萧何守关中；韩信平定魏地。
前204年	汉王三年	韩信破赵之战，李左车说韩信。英布归汉。范增死。刘邦夺韩信军。郦生说齐。蒯彻说韩信击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203年	汉王四年	汜水之战，刘邦数羽十罪。韩信平定齐地。蒯彻说韩信三分天下。楚汉言和，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
前202年	汉高帝五年	刘邦固陵之败。周殷叛楚。楚、汉垓下大战，项羽自刎，汉葬项羽。刘邦即皇帝位，都洛阳。兵皆罢归家。刘邦论取天下。田横自刎。刘邦赦季布斩丁公。娄敬请都关中。
前201年	汉高帝六年	刘邦伪游云梦；黜韩信为淮阴侯；封功臣；封同姓王；封雍齿为什方侯；诏定元功次位。冒顿自立为单于；韩王信叛降匈奴。
前200年	汉高帝七年	刘邦率军击匈奴，被围于白登。汉迁都长安。
前199年	汉高帝八年	刘敬献和亲策。
前198年	汉高帝九年	汉与匈奴和亲。徙齐、楚大族豪杰于关中。
前197年	汉高帝十年	周昌为赵王相。代相国陈豨反，刘邦自将兵讨之。
前196年	汉高帝十一年	陈豨军败。吕后杀韩信。刘邦赦蒯彻，杀彭越、释栾布。淮南王英布反。立赵佗为南越王。
前195年	汉高帝十二年	英布败死。刘邦作《大风歌》。刘邦病死，葬于长陵。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汉惠帝。
前194年	汉孝惠帝元年	吕后杀赵王如意及戚夫人。
前193年	汉惠帝二年	萧何死。曹参代何为相。
前192年	汉惠帝三年	与匈奴和亲。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188 年	汉惠帝七年	惠帝死，太子嗣位（惠帝无子，吕后取后宫子以为帝子立之），吕后临朝称制。
前 187 年	汉高后元年	封诸吕为王。
前 183 年	高皇后五年	初令戍卒岁更。
前 181 年	高皇后七年	刘章作《耕田歌》。陆贾说陈平。
前 180 年	高皇后八年	吕后死。周勃、陈平除诸吕。代王恒立。
前 179 年	汉文帝前元年	陈平、周勃为左右相。除收孥相坐律令。赵佗复归附汉朝，仍为南越王称臣奉贡。
前 178 年	汉文帝前二年	止辇受言。贾谊论积贮。
前 177 年	汉文帝前三年	刘长杀审食其。以张释之为廷尉。
前 176 年	汉文帝前四年	以贾谊为长沙王太傅。
前 175 年	汉文帝前五年	更造四铢钱；除盗铸钱令，使民得自铸。
前 174 年	汉文帝前六年	贾谊上治安策。淮南王刘长谋反，徙处蜀郡。
前 169 年	汉文帝前十一年	晁错言边事。
前 168 年	汉文帝前十二年	河决酸枣。晁错论贵粟。贾谊死。
前 167 年	汉文帝前十三年	除秘祝。除肉刑。
前 162 年	汉文帝后二年	复与匈奴和亲。申屠嘉责邓通。
前 158 年	汉文帝后六年	周亚夫屯军细柳。
前 157 年	汉文帝后七年	文帝政绩。文帝死，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景帝。
前 156 年	汉景帝元年	减笞法。
前 154 年	汉景帝三年	七国之乱，亚夫平吴楚。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147 年	汉景帝中三年	周亚夫谢病免。
前 145 年	汉景帝中五年	司马迁诞生。
前 144 年	汉景帝中六年	再减笞法，定箠法。李广巧计退敌。
前 143 年	汉景帝后元年	周亚夫下狱死。
前 141 年	汉景帝后三年	景帝死，皇太子刘彻继位，是为武帝。
前 140 年	汉武帝建元元年	始建年号为“建元”，从此我国开始用年号纪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前 139 年	汉武帝建元二年	窦太后贬抑儒臣。以卫青为太中大夫。
前 138 年	汉武帝建元三年	武帝重文学。张骞初使西域。武帝微行。东方朔谏治上林。
前 135 年	汉武帝建元六年	汲黯为主爵都尉。武帝许匈奴和亲。
前 134 年	汉武帝元光元年	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前 133 年	汉武帝元光二年	汉军伏兵马邑，诱击匈奴，与匈奴绝和亲。
前 130 年	汉武帝元光五年	汉通西南夷。作见知法。以公孙弘为博士。
前 129 年	汉武帝元光六年	开漕渠。卫青击匈奴。
前 128 年	汉武帝元朔元年	定二千石不举孝廉罪法。匈奴侵李广。
前 127 年	汉武帝元朔二年	颁“推恩令”。卫青、李息击匈奴，取河南地，置朔方郡。
前 126 年	汉武帝元朔三年	公孙弘为布被。汲黯质责张汤。
前 124 年	汉武帝元朔五年	公孙弘为相。卫青为大将军。
前 123 年	汉武帝元朔六年	卫青击匈奴。诏民得买爵赎罪。
前 122 年	汉武帝元狩元年	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谋反自杀，所连引死者数万人。汉使通滇国，使者还，复通西南夷。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121 年	汉武帝元狩二年	霍去病击匈奴。匈奴浑邪王降汉。
前 120 年	汉武帝元狩三年	作昆明池。始立乐府。汲黯谏诛贤才。
前 119 年	汉武帝元狩四年	造新钱币；莞盐铁，算缗钱。漠北之战，李广自杀。张骞再使西域。
前 118 年	汉武帝元狩五年	平牡马价。铸五铢钱。
前 117 年	汉武帝元狩六年	遣使循行郡国。霍去病死。行腹诽法。
前 115 年	汉武帝元鼎二年	置均输，铸三官钱。张骞出使乌孙，西域始通；置酒泉、武威郡；求汗血马。
前 114 年	汉武帝元鼎三年	扬可主持告缗。
前 113 年	汉武帝元鼎四年	禁止郡国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造。
前 112 年	汉武帝元鼎五年	在甘泉立"泰一"祠坛，塑造汉家至尊的上帝神，汉武帝始拜泰一神。吕嘉反。击南越。削夺一百零六人列侯爵。
前 111 年	汉武帝元鼎六年	征西羌；平南越，置九郡；平西南夷，置五郡；击东越；置张掖、敦煌郡。穿六辅渠。
前 110 年	汉武帝元封元年	武帝勒兵巡边；武帝求神人；武帝下诏改元，登泰山，行封禅典礼。赐桑弘羊爵左庶长，置均输、平準官。
前 109 年	汉武帝元封二年	填决河。征朝鲜。滇王归附汉朝，以其地为益州郡。
前 108 年	汉武帝元封三年	汉军击破楼兰、车师。朝鲜降汉。
前 106 年	汉武帝元封五年	初置十三部刺史，巡视郡国。
前 105 年	汉武帝元封六年	击昆明。汉与乌孙和亲。
前 104 年	汉武帝太初元年	造《太初历》。李广利伐大宛。司马迁始著《史记》。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 103 年	汉武帝太初二年	公孙贺拜相。李广利攻宛失利。赵破奴军败。
前 102 年	汉武帝太初三年	任文击走匈奴。汉大举攻宛。
前 101 年	汉武帝太初四年	任文捕楼兰王。汉在轮台、渠犁屯田。匈奴使来献。
前 100 年	汉武帝天汉元年	苏武出使匈奴。
前 99 年	汉武帝天汉二年	李陵降匈奴，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宫刑。作“沉命法”。
前 97 年	汉武帝天汉四年	李广利等出击匈奴不利。族诛李陵家。
前 95 年	汉武帝太始二年	白渠建成。
前 92 年	汉武帝征和元年	巫蛊始起。
前 91 年	汉武帝征和二年	公孙贺族诛。巫蛊之祸，太子刘据兵败自杀。
前 90 年	汉武帝征和三年	李广利等出击匈奴。田千秋讼太子冤。
前 89 年	汉武帝征和四年	罢方士求神仙事。武帝悔征伐。赵过教民为代田。卫律害贰师。
前 88 年	汉武帝后元元年	金日磾捕马何罗。
前 87 年	汉武帝后元二年	武帝托孤、皇太子刘弗陵继位，是为汉昭帝。葬武帝於茂陵。
前 83 年	汉昭帝始元四年	田广明伐姑缯、叶榆。
前 82 年	汉昭帝始元五年	诈称卫太子案
前 81 年	汉昭帝始元六年	盐铁议起。苏武归汉。
前 78 年	汉昭帝元凤三年	匈奴犯张掖；汉击乌桓。
前 77 年	汉昭帝元凤四年	丞相田千秋死。傅介子诱杀楼兰王。
前 74 年	汉昭帝元平元年	昭帝死。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而复废，霍光又另立病已为帝，即汉宣帝。
前 73 年	汉宣帝本始元年	以黄霸为廷尉正。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72年	汉宣帝本始二年	汉与乌孙共击匈奴。
前71年	汉宣帝本始三年	匈奴军远遁。常惠击龟兹。匈奴大衰。
前69年	汉宣帝地节元年	于定国为廷尉。
前68年	汉宣帝地节二年	废副封制度。
前67年	汉宣帝地节三年	置廷尉平。屯田车师。
前66年	汉宣帝地节四年	霍禹等谋反被族诛。龚遂治勃海。
前65年	汉宣帝元康元年	赵广汉死。击莎车。
前64年	汉宣帝元康二年	诏郑吉还屯渠犁。
前61年	汉宣帝神爵元年	赵充国率兵击西羌。赵充国上屯田奏。
前60年	汉宣帝神爵二年	始置都护府于乌垒城。
前58年	汉宣帝神爵四年	匈奴诸王争位。
前57年	汉宣帝五凤元年	萧望之谏伐匈奴。
前54年	汉宣帝五凤四年	匈奴单于称臣。令边郡设常平仓。
前53年	汉宣帝甘露元年	冯夫人锦车持节。
前52年	汉宣帝甘露二年	匈奴呼韩邪单于叩五原塞请朝。
前51年	汉宣帝甘露三年	遣呼韩邪单于归国。画功臣于麒麟阁。解忧公主归汉。王政君入宫。
前48年	汉元帝初元元年	关东十一郡国大水。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车师故地。
前47年	汉元帝初元二年	中书令弘恭，仆射石显擅权，前将军萧望之被迫自杀。弘恭病死，石显为中书令，威权日盛。
前46年	汉元帝初元三年	珠崖诸县反，元帝以“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下诏罢珠崖郡。
前42年	汉元帝永光二年	冯奉世等率兵击破西羌。
前37年	汉元帝建昭二年	京房奏考功课吏法。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36年	汉元帝建昭三年	匈奴郅支单于一千五百余人败死；俘、降者共千余人。
前33年	汉元帝竟宁元年	元帝以宫女王嫱（字昭君）赐呼韩邪单于；昭君出塞。从此边境安宁、改元为竟宁。元帝死，太子刘骜继位，是为汉成帝。
前32年	汉成帝建始元年	成帝以元舅王凤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石显被徙归故郡，不食死于途中。其党羽及所结交为官者，皆废罢，从此外戚王氏专擅朝政。
前30年	汉成帝建始三年	终南山傰宗率众数百人起义。
前27年	汉成帝河平二年	“王氏五侯”专权自此始。汉派陈立平西夷。
前26年	汉成帝河平三年	光禄大夫刘向著《洪范五行传论》。
前25年	汉成帝河平四年	罽（jì计）宾（西域国名）遣使来献。
前22年	汉成帝阳朔三年	颍川铁官徒起义。
前18年	汉成帝鸿嘉三年	广汉郑躬起义。
前17年	汉成帝鸿嘉四年	郑躬起义失败。
前16年	汉成帝永始元年	封王莽为新都侯。刘向著《新序》、《说苑》、《列女传》。营建昌陵五年未成，天下虚耗，故罢作昌陵。
前14年	汉成帝永始三年	尉氏人樊并起义；山阳铁官徒苏令等起义。
前11年	汉成帝元延二年	乌孙内讧。
前8年	汉成帝绥和元年	置三公官。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与大司马、丞相为三公。王莽为大司马。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前7年	汉成帝绥和二年	成帝死，前定陶王皇太子刘欣继位，即哀帝。刘歆继承父业，典领五经，歆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师丹请限民名田；待诏贾让上《治河三策》。
前3年	汉哀帝建平四年	关东民讹言行筹。鲍宣上书痛陈时政阙失。
前2年	汉哀帝元寿元年	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王使臣伊存口受《浮屠经》。此为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最早的记录。
前1年	汉哀帝元寿二年	正三公官分职。改丞相为大司徒。哀帝死，庶中山王箕子继位，是为平帝。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以王莽为大司马秉政。
1年	汉平帝元始元年	王莽号“安汉公”。
2年	汉平帝元始二年	王莽颁四条与单于。
3年	汉平帝元始三年	王莽诛除异己。
5年	汉平帝元始五年	王莽加九锡；王莽害平帝；王莽居摄践祚（假皇帝）。
7年	孺子婴居摄二年	更造货币。东郡太守翟义起兵反莽；槐里人赵明、霍鸿在关中起义响应，众十余万。
8年	孺子婴居摄三年	王莽称帝，建立“新”朝。
9年	王莽始建国元年	王莽复古：封拜四辅、三公、四将；更作小钱；改制。
10年	王莽始建国二年	行“五均、赊贷、六筦”之法；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作宝货。
11年	王莽始建国三年	严尤谏王莽；击匈奴百姓流亡。
12年	王莽始建国四年	王莽令：民得卖田。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 年	王莽天凤四年	临淮瓜田仪在会稽长州起义；琅邪吕母聚众起义；新市人王匡、王凤领导的绿林起义。
18 年	王莽天凤五年	琅邪人樊崇、东海人刁子都起义。
21 年	王莽地皇二年	绿林大败官军。
22 年	王莽地皇三年	崇恐其军与莽兵乱，乃皆朱其眉，由是号曰“赤眉军”；王常、成丹的“下江兵”及马武等支党北入南阳号“新市兵”；陈牧的“平林兵”。赤眉军与廉丹大战成昌。刘縯、刘秀起兵；汉军取莽辎重。
23 年	王莽地皇四年	刘縯围宛。绿林军立刘玄为帝，改元更始。王寻、王邑受莽令围昆阳；刘秀突围；岑彭降汉；昆阳大战；刘玄杀刘縯。隗嚣起兵；公孙述起兵；刘望起兵；王莽死；王匡攻拔洛阳；刘望败死；刘玄都洛阳；新朝亡。刘秀徇河北。邯郸卜者王郎起义，称帝于邯郸。
24 年	汉更始二年	更始委政赵萌。刘秀击王郎；王郎败灭；大树将军冯异；刘秀受爵不就征。赤眉军西击长安。
25 年	汉更始三年	公孙述称帝；刘秀称帝；光武帝击降刘茂；赤眉军入长安；光武帝定都洛阳，是为建武元年。匈奴立卢芳为汉帝。
26 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年	吴汉击檀乡。邓禹入长安。光武破五校。刘嘉降汉。光武敕冯异。冯异阻击赤眉。刘秀下令释放奴婢。
27 年	汉光武帝建武三年	被赤眉军立为帝的刘盆子降汉。冯异平定关中；吴汉破苏茂；岑彭破秦丰。
28 年	汉光武帝建武四年	马援见刘秀。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9 年	汉光武帝建武五年	岑彭破田戎；窦融降汉；光武破庞萌；张步降汉。初建太学于洛阳。
30 年	汉光武帝建武六年	全国并省四百余县。恢复三十税一之制。
31 年	汉光武帝建武七年	杜诗兴利南阳。
32 年	汉光武帝建武八年	光武征隗嚣。得陇望蜀。
34 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年	吴汉败匈奴兵。陇右平。来歙破先零羌。
35 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一年	汉兵入江关；公孙述盗杀来歙；岑彭等大破蜀兵；岑彭被刺。
36 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	光武帝谕公孙述；吴汉败公孙述；蜀地平。
37 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	光武不用功臣为政。十年的统一战争结束，全国统一。
39 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五年	令州郡检核垦田户口。考核二千石。
40 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	征侧征贰起事自立为王。度田事件。卢芳降汉。复行五铢钱。
43 年	汉光武帝建武十九年	马援定岭南。更立皇太子。董宣强项不屈。
45 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年	西域十八国请置都护。
46 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	匈奴求和亲。
48 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分为南北两部，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率部众归附汉朝。
49 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	复制乌桓校尉。
50 年	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	令云中等八郡民归本土。诏南单于徙居西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54 年	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	班彪死。
56 年	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	宣布图谶于天下。
57 年	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	倭奴国遣使奉献朝贺。光武帝死，太子刘庄继位，即汉明帝。
60 年	汉明帝永平三年	图中兴功臣。
64 年	汉明帝永平七年	明帝遣使求佛。
65 年	汉明帝永平八年	置度辽将军。
66 年	汉明帝永平九年	立学于南宫。
69 年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	王景、王吴奉命修汴渠。
73 年	汉明帝永平十六年	班超立功西域。
75 年	汉明帝永平十八年	明帝死。太子刘炟继位，即汉章帝。
77 年	汉章帝建初二年	马防等大破羌兵。
79 年	汉章帝建初四年	章帝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
80 年	汉章帝建初五年	班超经营西域。
83 年	汉章帝建初八年	章帝抑窦宪。
84 年	汉章帝建初九年	诏议贡举法。
85 年	汉章帝元和二年	诏还匈奴生口。
86 年	汉章帝元和三年	班超打通西域南道。翌年，又击败莎车。
88 年	汉章帝章和二年	章帝死。太子刘肇继位。即汉和帝。窦太后临朝，外戚窦氏执掌朝政。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汉廷如故。
89 年	汉和帝永元元年	窦宪破匈奴于稽落山。
90 年	汉和帝永元二年	班超击降月氏。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1 年	汉和帝永元三年	窦宪破匈奴于金微山。以班超为西域都护。
92 年	汉和帝永元四年	窦宪伏诛。班固死。
94 年	汉和帝永元六年	匈奴立师子为单于。西域五十余国内属。
97 年	汉和帝永元九年	鲜卑攻辽西肥如。此后对北部诸郡攻掠不断。班超遣甘英出使大秦。王充死。
101 年	汉和帝永元十三年	著名经学家贾逵死。
102 年	汉和帝永元十四年	班超死。
105 年	汉和帝永元十七年	和帝死。太子刘隆继位，即殇帝。邓太后临朝称制。蔡伦改进造纸术，制成“蔡侯纸”。
106 年	汉殇帝延平元年	减宫廷用度。殇帝死。邓太后定策迎立清河王子刘祜为帝，是为安帝。
107 年	汉安帝永初元年	罢西域都护及屯田士。羌人大规模起义。倭国王遣使献生口。
108 年	汉安帝永初二年	先零羌起事。
109 年	汉安帝永初三年	三公奏卖官。
110 年	汉安帝永初四年	东观校书。
115 年	汉安帝元初二年	虞诩破羌于赤亭。
119 年	汉安帝元初六年	封离降。
120 年	汉安帝元初七年	置西域副校尉。
121 年	汉安帝永宁二年	邓太后死，安帝亲政。《说文解字》书成。
124 年	汉安帝延光三年	班勇击北匈奴。
125 年	汉安帝延光四年	安帝死，立北乡侯刘懿为帝，即少帝。数月之后，宦官孙程等拥立废太子济阴王刘保，是为顺帝。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7 年	汉顺帝永建二年	耿晔击鲜卑。
131 年	汉顺帝永建六年	复开伊吾屯田。
132 年	汉顺帝永建七年	张衡创制“地动仪”。行限年察举法。
133 年	汉顺帝阳嘉二年	诏举敦朴之士。
142 年	汉顺帝汉安元年	张纲埋轮。
144 年	汉顺帝汉安三年	九江范容、周生、徐凤、马勉相继起义。顺帝死，太子刘炳继位，即冲帝。皇太后梁氏临朝称制。
145 年	汉冲帝永嘉元年	冲帝死。立渤海王鸿之子刘缵为帝，是为孝质皇帝。历阳人华孟起义。
146 年	汉质帝本初元年	梁冀鸩杀质帝。
147 年	汉桓帝建和元年	梁冀杀李固、杜乔。
151 年	汉桓帝元嘉元年	张陵劾梁冀。崔寔作《政论》。
153 年	汉桓帝元嘉三年	朱穆为冀州刺史。
155 年	汉桓帝永寿元年	张奂破匈奴。
156 年	汉桓帝永寿二年	李膺为度辽将军。
159 年	汉桓帝延熹二年	梁冀伏诛。黄琼举奏汙吏。
162 年	汉桓帝延熹五年	沈氐羌降。长沙、零陵民起义。冯绲大破武陵蛮。
163 年	汉桓帝延熹六年	杨秉奏免贪残牧守。
165 年	汉桓帝延熹八年	朱盖、胡兰起义。
166 年	汉桓帝延熹九年	大捕“党人”。
167 年	汉桓帝延熹十年	禁锢“党人”。桓帝死，立解渎亭侯刘宏为帝，即灵帝。
168 年	汉灵帝建宁元年	宦官曹节矫诏杀太傅陈蕃、大将军窦武。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169 年	汉灵帝建宁二年	东羌平。钩党狱起。
170 年	汉灵帝建宁三年	崔寔死。
172 年	汉灵帝建宁五年	段颎收系太学诸生。
175 年	汉灵帝熹平四年	立石经。蔡邕请除三互法。
177 年	汉灵帝熹平六年	三道击鲜卑。
178 年	汉灵帝熹平七年	灵帝卖官。
181 年	汉灵帝光和四年	作列肆于后宫。
184 年	汉灵帝光和七年	黄巾起义。东汉政府进攻黄巾军。皇甫嵩败波才。张梁战死。张宝战死。朱儁破黄巾于宛。贾琮抚定交趾。东汉政府大赦“党人”。
185 年	汉灵帝中平二年	各地农民纷纷起义。以崔烈为司徒。
187 年	汉灵帝中平四年	韩遂攻三辅。
188 年	汉灵帝中平五年	改刺史为州牧。初置西园八校尉。
189 年	汉灵帝中平六年	袁绍诛宦官。灵帝死，皇子辩嗣位，是为少帝。太后临朝，改元光熹。董卓废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献帝，改元永汉。此后，军阀混战开始。
190 年	汉献帝初平元年	董卓迁都长安。公孙度为辽东守。
191 年	汉献帝初平二年	张鲁杀张修，割据汉中。
192 年	汉献帝初平三年	王允诛董卓。蔡邕被杀。曹操收降青州黄巾。

三国两晋南北朝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

三国中的曹魏政权，是曹操集团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扫灭群雄，统一北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曹操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政治地位，则是他发展势力，统一北方，最终建立政权的重要条件。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祖父曹腾是东汉宦官，桓帝时任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父亲曹嵩是曹腾的养子，袭爵，曾任司隶校尉、大司农等职。灵帝卖官时，又“货赂中官，及输西园钱一亿万，故位至太尉”①。曹操少年时机警，有谋略，而任侠放荡，不重操行，故未引起时人的重视，只有太尉桥玄等深为赞誉。名士许劭则认为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②。

曹操二十岁举孝廉，出任洛阳北部尉。造五色棒，悬挂门左右各十余根，“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迹，莫敢犯者”③。迁顿丘（今河南清丰西南）令。后征拜议郎，又上书为被宦官杀害的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讼冤。

中平元年（184）春，黄巾起义爆发，旬月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曹操被任命为骑都尉，随皇甫嵩、朱儁镇压颍川（治所在今河南禹县）黄巾军，因功迁任济南（治所在今山东历城东）相。济南所属十余县，县官多阿附贵戚，仗势贪赃枉法，胡作非为。曹操上任后，奏免了八个县官。济南地方淫祀极盛，多至六百余祠。曹操到任后，毁祠屋，禁绝吏民祠祀。于是"奸宄逃窜，郡界肃然"④。后来，朝廷将他征还，任为东郡（治所在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守。当时权臣专政，贵戚横恣，曹操不愿违心迎合他们，得罪他们又恐连累家族，于是托病不就任，回归乡里。他筑室于谯县城外，春夏读书，秋冬打猎以自娱乐，等待机会，施展才能。

中平五年（188），汉灵帝自黄巾起义后，留心军事，为加强京师禁军力量，组建西园新军，设置西园八校尉以统领。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等。各校尉皆受上军校尉蹇硕统辖。曹操因此成为东汉皇室核心武装的将领之一。

中平六年（189），灵帝死，少帝继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等欲尽诛宦官，何太后不同意，何进等召并州牧董卓领兵进京以胁迫何太后。董卓未至，而何进被宦官杀死，袁绍等尽诛宦官。董卓进京后，把持朝政，废少帝刘辩，立刘协为帝，是为献帝。曹操和袁绍都拒绝与董卓合作，相继逃离洛阳。曹操改易姓名，潜行到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招兵买马。同时得到当地孝廉卫兹的资助，招募了五千士卒，组成一支队伍。十二月，起兵讨伐董卓。

袁绍逃离洛阳后，奔冀州，任勃海（治所在今河北南皮东北）太守。初平元年（190）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伐董卓，

包括后将军袁术、豫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刺史孔伷、冀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牧韩馥、兖州（治所在今山东金乡西北）刺史刘岱、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武陟西南）太守王匡、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治所在今山东金乡西北）太守袁遗、济北（治所在今山东平阴北）相鲍信等。他们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并授给诸将官号。曹操也加入讨伐董卓联军行列，被授以行奋武将军。诸将各自拥兵分屯各地，各有各的打算，都想保存实力抢占地盘，因此谁都不愿意率先出击董卓。

董卓为避关东联军兵锋，迁汉献帝于长安（今陕西西安），焚烧洛阳宫殿。曹操对诸将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今董卓"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⑤。诸将不听，于是曹操径自引兵西进，到荥阳（今属河南），被董卓将领徐荣打败，为流矢所中，士卒死伤甚多，退回驻地酸枣（今河南延津西南）。诸将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责备他们，又为他们进攻董卓提出部署的设想，指出："今兵以义动，持疑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⑥诸将还是不听。曹操兵少，又兼新败之后，不可能再单独采取行动，便与夏侯惇等去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寿县）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杨（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太守周昕给他四千兵卒。回到龙亢（今安徽怀远西北），这些兵大部分叛逃。后在膪县（今安徽宿县西南）等地收编流民千余人，以他堂弟曹洪所统领的家兵千余人为骨干，重新组建了一支队伍，进屯河内。不久，关东联军解体，开始互相兼并、厮杀。袁绍从韩馥手中夺取了冀州。

鲍信对曹操说，袁绍为盟主，因权专利，将自生乱，将成

为又一个董卓。要打垮他，我们的力量还不够，可先进取黄河以南，以待其变。初平二年（191）七月，黄巾军余部黑山军十余万进攻魏郡（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东郡。东郡太守王肱不能抵御，曹操于是进军东郡，击败黑山军。袁绍因此表奏曹操为东郡太守。

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军百万进入兖州，攻陷任城（今山东济宁），杀死任城相郑遂，接着又转战东平（今属山东），杀死兖州刺史刘岱。这时候，曹操部将陈宫对曹操说，现在兖州无主，可以取之为争夺天下的基地。于是他前去劝说兖州刺史刘岱的属官迎曹操为兖州牧，说：曹操"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⑦。此前曾劝曹操进取黄河以南的鲍信，也极表赞成，便与兖州的官员到东郡迎曹操领兖州牧。曹操遂进军兖州，攻打黄巾军于寿张（今山东东平西南）东，被黄巾军打败，鲍信战死。后经设奇伏，昼夜会战，终于迫使黄巾军投降，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选其中精锐组成战斗力很强的队伍，号"青州兵"。曹操的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并取得兖州作为发展势力的基地。

曹操任兖州牧以后，选拔毛玠为治中从事。毛玠认为在当前天下分崩离析，皇帝流亡，百姓饥馑的情况下，"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⑧。这就是说，要成就霸业，除了恢复生产积蓄军粮外，还要把皇帝控制在手里，用皇帝的号令去讨伐对立势力。曹操采纳他的意见，派使者前往长安，向汉献帝上奏表，表忠诚。

这时候，董卓已被司徒王允和吕布杀死，汉献帝又被董卓的部将李傕、郭汜控制。曹操的使者中途被河内太守张杨阻

挡，后经董昭说服张杨，才得以通过，到达长安。李傕、郭汜打算扣留曹操的使者，经过钟繇的劝说，他们才让使者上达曹操的奏表，并对曹操厚加报答。曹操和朝廷建立了联系，表明了自己"乃心王室"，对汉献帝的"真诚"。

初平四年（193），曹操的父亲曹嵩避难琅邪（治所在今山东临沂北）、辎重百余辆，途中被徐州牧陶谦部下劫杀。其后曹操两次东征，讨伐陶谦，攻陷十余城，坑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河水因此断流。所经过地方多杀戮，"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⑨。陈留太守张邈等趁曹操东征，叛迎吕布为兖州牧，下属州郡县多响应。曹操回军后，经过艰苦作战，才把吕布、张邈等打败，巩固兖州基地。

兴平二年（195）二月，李傕、郭汜等在长安发生火并。李傕杀死樊稠，随后又与郭汜在城内外混战数月。李傕包围王宫，将献帝劫持到自己营中，放火烧光宫殿、官府、民居。郭汜则扣留公卿以为人质。李傕部将杨奉谋杀李傕未遂，叛变。李傕势力削弱。在另一名凉州兵将领张济调解下，双方才同意和解，放出汉献帝和公卿。

长安已焚毁，献帝和多数将领都想回到旧都洛阳去，郭汜等不同意。后来他们只同意暂驻附近县城，因此献帝车驾于八月进驻新丰（今陕西临潼北）。郭汜谋胁迫献帝都郿，杨奉打败郭汜等，与董承等护驾东行。十二月，献帝到达弘农（今河南灵宝北），郭汜、李傕联合追截车驾，把董承、杨奉等打败。杨奉等联络白波军首领韩暹等相助，才将李傕、郭汜等打败，继续东行。在李傕等整兵继续追击，杨奉等又被打败后，献帝及随从慌忙北渡黄河，得渡者才数十人。献帝乘牛车到达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河内太守张杨派数千人负米供应，河东

（治所在安邑）太守王邑奉献衣物，献帝一行才得以平安过冬。

建安元年（196）二月，张杨派董承先修缮洛阳宫殿。董承又派人劝说荆州牧刘表派兵到洛阳助修宫室，并运送各种物资。七月，献帝在杨奉、韩暹等护送下，回到旧都洛阳。张杨回驻野王（今河南沁阳）。杨奉出屯梁县（今河南临汝），以拱守京师。韩暹、董承则留洛阳宿卫。

汉献帝虽然为董卓所立时就是一个傀儡，但在我国封建社会，他毕竟是最高权力的象征。谁控制了他，谁就可以打着他的旗号发号施令，因此几年来他被抢来夺去。他驻安邑时，谋士沮授就曾向袁绍建议说，今冀州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而谋士郭图、淳于琼则持相反意见说，如果迎天子到身边，“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沮授则进一步指出：“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⑩袁绍没有接受沮授的建议。

正如沮授所估计那样，曹操抢先了。献帝回到洛阳之初，曹操便谋迎献帝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谋士荀彧认为这是好机会：“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明矣。……若不时定，四方生心，后虽虑之，无及。”⑪曹操于是派曹洪领兵西迎天子。董承等据险拒守，曹洪受阻。曹操便通过在朝中任议郎的董昭，用自己的名义给驻守梁县的杨奉写信，表示愿意合作共辅王室：“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⑫杨奉收到信后，认为曹操近在许县，有兵有粮，可以依靠，便与诸将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

亭侯。

这时留京师宿卫的董承和韩暹闹矛盾，董承私下召曹操进京以制韩暹。曹操便趁机领兵进入洛阳。韩暹逃出洛阳，奔附杨奉。朝廷以曹操为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掌握朝政。今后当如何进退，曹操问计于董昭。董昭以为，此间将领各怀异心，留在洛阳有诸多不便，应当把皇帝迎到许县。曹操说这正是自己的本意，但担心统精兵驻守梁县的杨奉作梗。董昭又为曹操策划说，杨奉为人勇而少虑，可以遣使给他送厚礼，答谢他为自己任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出力，以稳住他；同时对他说因洛阳无粮，让车驾暂移靠近许县的鲁阳（今河南鲁山），以便供给。曹操随即照办。汉献帝旋即被曹操迁往许县。杨奉发现上当，想加以拦截已来不及，后被曹操打败，南奔袁术。

曹操迁献帝到许县后，改兴平三年为建安元年（196），营立汉室宗庙社稷。献帝以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总揽朝政，从此献帝又沦为他手中的傀儡。曹操得势，袁绍始后悔，提出要把献帝迁到离自己较近的鄄城（今属山东），遭到曹操拒绝。曹操还以献帝的名义，下诏责备他"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⑬。袁绍只好上书自责。朝廷于是以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耻于排位在曹操之下，表辞不受。曹操为暂时缓和与势力比自己强大的袁绍之间的矛盾，减少外部压力，把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自任司空，行车骑将军事。

此后，曹操不断加强对汉献帝的控制，严厉诛除支持皇帝、危害自己的势力。车骑将军董承等称受献帝衣带密诏谋诛曹操，曹操即杀董承等，并诛三族。后来皇后伏氏在写给其父伏完的书信中，透露了献帝对曹操诛董承等不满。皇后伏氏因

此被废被杀，其父和兄弟及宗族被杀者数百人。献帝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等数人联合，趁曹操不在许都，欲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他们被曹操镇压后，许多人株连被杀。曹操还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以直接监视献帝。

同时，曹操打着献帝的旗号，以朝廷的名义，讨伐敌对势力，北伐袁绍，南征刘表、孙权，西讨刘备，莫不如此。这比一般的军事威慑力量还要大。公元199年，官渡之战前，袁绍的谋士沮授反对袁绍进攻曹操的理由之一，是“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今举师南向，于义则违”⑭。公元208年，曹操南征刘表，蒯越等劝刘表的儿子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的理由之一，是“逆顺有大体，……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⑮。而张昭等认为孙权应当投降曹操，除了考虑军事实力对比外，也因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以朝廷为辞，今日拒之，事更不顺”⑯。因此，曹操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再加上他个人的政治军事才能，使他由弱转强，逐步消灭大河南北的敌对势力，统一了北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⑰。这确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情况。

曹操总揽朝政，职位也日益提高，由司空而丞相；而魏公，加九锡；而魏王，设天子旌旗、冕有十二旒。他没有来得及登上皇帝宝座，便于公元220年死去，终年六十六岁。但他为儿子曹丕登基铺平了道路。曹操生前，曹丕已任五官中郎将、副丞相，立为王太子。曹操死后，他即嗣位为丞相、魏王，当年即代汉建魏，改元黄初，尊曹操为武帝。曹丕就是历史上的曹魏文帝。东汉王朝名存实亡延续三十多年，至此彻底结束。

注 释

①《后汉书》卷七八《曹腾传》。

②《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异同杂语》。

③《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④⑤⑥《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⑦⑧《资治通鉴》卷六〇，汉献帝初平三年。

⑨《资治通鉴》卷六〇，汉献帝初平四年。

⑩《资治通鉴》卷六一，汉献帝兴平二年。

⑪《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

⑫⑬《资治通鉴》卷六二，汉献帝建安元年。

⑭《资治通鉴》卷六三，汉献帝建安四年。

⑮《资治通鉴》卷六五，汉献帝建安十三年。

⑯《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

⑰《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

三国两晋南北朝

曹操屯田

三国中，曹操实行屯田的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取得成效也最为显著。这主要因为他所据有的黄河南北地区，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主战场，社会经济受到的破坏最严重。恢复经济成了曹操集团生存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中原地区的大中城市，是各家军阀争夺的主要目标，战火往往最为猛烈，遭受破坏也最严重。中平六年（189），董卓进兵都城洛阳后，纵兵烧杀抢掠，第二年，为避山东联军的兵锋，又将汉献帝西迁长安。西迁时，“卓部兵烧洛阳外面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又将诸富室，以罪恶没入其财物；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①。献帝迁至长安时，三辅户口尚数十万。公元192年，董卓被杀后，其部将郭汜、李傕等为董卓报仇，与吕布战于长安，放兵虏掠。其后郭汜、李傕又相互攻战，死尸遍地。献帝东归后，“长安城空四十余日，强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间，关中无复人迹”②。黄河下游地方遭受的破坏也极其严重。公孙瓒部将田楷与袁绍军在青州“连战二年，粮食并尽，士卒疲困，

互掠百姓，野无青草”③。

在军阀的连年混战中，人民群众成千上万直接间接死于兵火。董卓西迁时，将洛阳及其附近数百万人迁往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④。曹操攻打徐州牧陶谦，“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⑤。官渡之战，曹操前后杀袁绍士卒七万余人。此外，中原地区，人民为逃避战乱天灾，大量转移到益州、荆州、江淮地区。

中原地区人口损耗的情况十分严重。当时“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⑥，现存户口只相当于原来的十分之一。这里所说的“天下”，指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直到曹氏代汉十多年后，魏明帝青龙年间陈群上疏还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时，不过一大郡。”⑦“丧乱之后”的情况如此，可见在军阀混战的“丧乱”之中，情况会更糟。曹操在《蒿里》一诗中所说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反映了战乱频繁的地方人烟断绝的惨状。

城乡残破萧条，人烟稀少甚至断绝，生产自然受到极严重的影响。其结果是严重缺粮，粮价飞涨。长安谷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二十万钱；幽州谷一石十万钱。汉献帝从长安返回洛阳时，从官吃枣菜。普通老百姓大批饿死，人相食的惨状屡见于史籍。幽州“岁岁不登，人相食”⑧。其他不少地方也是“民人相食，州里萧条”⑨。这种人相食的情况，甚至在混战军阀的军队中也发生。刘备与吕布争徐州时，“饥饿困踧，吏士相食”⑩。

受到断粮威胁的不仅仅是刘备集团，北方众多的军阀集团都面临同样的威胁。“自遭荒乱，率乏粮谷。诸军并起，无经年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

胜数。袁绍之在河北，军人仰食桑椹。袁术在江淮，取给蒲蠃”⑪。曹操在征战过程中，也多次因缺粮而退兵，也发生过以干桑椹充军粮得以度过难关的事。因此，不解决粮食问题，北方各武装集团就根本不能存在，更谈不上战胜对手谋求发展，也更谈不上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汉献帝到许县（今河南许昌东）后，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盘，便接受枣祗、韩浩等的建议，实行屯田。曹操颁布的《置屯田令》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⑫于是以枣祗为屯田都尉，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于许县地区。实行屯田的当年即见成效，得谷百万斛。随即向辖区的其他地方推广，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广泛实行屯田，需要掌握大量的田地和大批劳动力。由于战乱，大批地主和农民死于战火或逃离家园，人烟稀少，有些地方甚至成为无人区，存在大量的无主荒田，正可用于屯田。此前曹操于兖州地区镇压青州黄巾军，在济北（今山东平阴北）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同时还有各地流民可供招募。这些正是他实行屯田的主要劳动力来源。

如前所述，曹操自称实行屯田是遵循汉武帝西域屯田的先代“良式”。但当年汉武帝在西域屯田，是为了就地供应驻军军粮，省却长途转运，实行的是军屯，即由守边戍卒就地轮流耕种。而曹操的屯田，除在边境和军事要地实行军屯外，还在各郡县大量实行民屯。兵屯由兵士轮番耕种，“且田且守”。民屯则由招募的屯田客耕种。民屯一般以屯为单位，每屯五十人，有较严格的类似军队编制的组织。兵屯以营为单位，每营六十人。

由于曹操屯田的规模大，范围广，需要有专门机构管理。总管全境民屯的，中央设有大农，后改称大司农。郡设置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县设典农都尉，分别管理郡和县的屯田事务。此外还有典农丞、典农司马、典农功曹等，可能都是郡县典农官的属官。郡县典农官与郡守、县令等地方长官不相统属，自成系统，直属中央大司农。管理兵屯的典农官后称司农度支校尉，由各地军事长官管辖，掌管一方兵屯事务。他们也自成系统，与各地的郡守、县令不相统属。

屯兵和屯田客必须向官府交一定数量的粮食。开始时，实行计牛输谷，就是按所领官牛的数目，每年按每头牛向官府上交固定数量的粮食。实施以后，丰年官府不多收，灾年屯兵和屯田客不能少交，官私不便。枣祗坚决反对这种办法，提出实行分田之术，即分成制。经过与曹操反复讨论，终于获得批准。按照这种办法，无论兵屯或民屯，凡持用官牛者，收获的粮食官府得六成，屯者得四成；持用私牛者，官府和屯者各得五成。这种办法比计牛输谷的办法灵活，丰年时官府和屯者都可以多得，荒年时屯兵和屯田客的负担轻些，有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屯兵和屯田客必须把劳动所得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官，他们的负担是很重的。但在当时社会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屯田把大批农民组织固定在土地上，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对恢复生产有利，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特别是由于广泛屯田，使大片无主荒田得以开发利用，带动了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促使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进步，使中原的农业日益恢复和发展起来，残破的北方经济得以逐渐恢复。如曹操任刘馥为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寿县西南）刺史，“广屯田，兴治芍陂

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发展了生产，使官民都有积蓄⑬。

曹操广泛屯田最直接最明显的结果，是他的军队开始摆脱缺粮的威胁，使他有可能壮大自己的力量，战胜对手，统一北方。广行屯田后，“数年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⑭。使曹操“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⑮。枣祗死后，曹操仍念念不忘他在屯田中的功绩，特别是他坚持分成的计征办法。曹操还提到，“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平天下，以隆王室”。他认为枣祗兴屯田之功，理应受封，没有及时封爵，是自己的过失。因此，他给枣祗的儿子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⑯。

曹魏广行屯田，始于曹操。曹操的后继者曹丕和曹叡等仍一如既往，大力推广军屯和民屯，并不断取得很大的成果。“当黄初中，四方郡守垦田又加，以故国用不匮”。“魏明帝世徐邈为凉州，……又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⑰。后来邓艾提出在淮水流域大兴屯田的建议：“陈（今河南淮阳）、蔡（今安徽寿县西北）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于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⑱他的建议受到太傅司马懿的赞赏，并于正始二年（241）付诸实施。“遂北临淮水，自钟离（今安徽凤阳东）而南，横石以西，尽沘水四百余里，五里置一营，营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广淮阳、百尺二渠，……溉田二万顷。淮南、淮北皆相连接。自寿阳到京师，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每东南

有事，大军出征，泛舟而下，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艾所建也”⑲。从中可以看出，邓艾在淮水流域的屯田规模是很大的，成效也是相当可观的。屯田的继续扩大和不断取得成效，对后来曹魏灭蜀、晋灭吴，无疑都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曹操广行屯田，主要是由于北方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军粮无法筹措的特定历史情况下发生的。三国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之后，各国内部局势相对稳定，生产逐渐恢复。随着统治者迫切需要解决的军粮问题逐渐得以解决，屯田也就不如当初那么受重视。一些屯田官往往驱使屯民从事其他劳役或经商牟利，从而破坏了屯田的耕作。随着生产的继续发展，大地主私有制发展，豪强兼并土地，也侵蚀屯田，如何晏等人倚势“共分割洛阳（今属河南）、野王（治所在今河南沁阳）典农部桑田数百顷”以为产业⑳。曹魏还赐给公卿以下数量不等的租牛、客户，他们也往往依势扩大对屯田土地和屯民的占有。这种种情况都使屯田制日趋破坏。于是，曹魏朝廷于咸熙元年（264）下令，“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㉑。从公元196年曹操开始实行的屯田制至此结束。

注　释

①《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续汉书》。

②《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③《后汉书》卷七三《公孙瓒传》。

④《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⑤《后汉书》卷七三《陶谦传》。

⑥《三国志》卷八《张绣传》。

⑦《三国志》卷二二《陈群传》。

⑧《太平广记》卷三五引王粲《英雄记》。

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⑩《资治通鉴》卷六二，献帝建安元年。

⑪⑫《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⑬《三国志》卷一五《刘馥传》。

⑭《三国志》卷一六《任峻传》。

⑮《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

⑯《三国志》卷一六《任峻传》注引《魏武故事》。

⑰《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⑱《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

⑲《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⑳《三国志》卷九《曹爽传》。

㉑《三国志》卷四《陈留王纪》。

三国两晋南北朝

官渡之战

建安五年（200）的官渡之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一战，也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

初平二年（191），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散伙后，各自抢占地盘，相互混战，发展势力。原为联军盟主的袁绍利用冀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牧韩馥和屯兵幽州（治所在北京城西南）的公孙瓒的矛盾，软硬兼施，使韩馥让出冀州，迎请他为冀州牧。他以此为基地，向四周扩大地盘，占据了青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淄北）、幽州、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西南），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以中子袁熙为幽州刺史，以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他自己和幼子袁尚守冀州，控制黄河以北广大地区，成为北方占地最广、兵力最强的割据势力。曹操占据兖州（治所在今山东金乡西北）、豫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于建安元年（196）奉迎汉献帝都于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越政治地位，控制了黄河以南大片地区，成为与袁绍相对抗的重要割据势力。

袁绍没有接受谋士沮授的意见，失去了把汉献帝接到冀州

控制在自己手里的机会，结果曹操却乘机控制汉献帝。袁绍既后悔，又内心不服，想自己做皇帝，又受到部下的反对，时机也不成熟。因此，建安四年（199）他消灭公孙瓒后，自恃兵多地广，于是选精兵十万，骑万匹，南征曹操，以实现皇帝梦。

从当时袁、曹双方力量对比看，明显是袁强曹弱。袁绍占有冀、青、幽、并四州，地广，兵多，粮食比较充足。曹操只有豫、兖二州，地狭，兵少，粮食不足。东有刘备据徐州（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反曹，西有马腾、韩遂威胁。南边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牧刘表虽持观望态度，但不得不防。因此，曹操还有后顾之忧。袁绍的社会影响很大，他的高祖袁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①。曹氏虽世代为官，也颇显赫，但曹操毕竟是宦官养子的儿子，社会地位和影响远不如袁氏。

但从深层次看，优势并不在袁绍方面，而在曹操方面。战前曹操的谋士荀彧就向曹操指出：“今与公争天下者，唯袁绍尔。绍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达不拘，唯才所宜，此度胜也。绍迟重少决，失在后机，公能断大事，应变无方，此谋胜也。绍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众，其实难用，公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寡，皆争致死，此武胜也。绍凭世资，从容饰智，以收名誉，故士之寡能好问者多归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诚心，不为虚美，行己谨俭，而与有功者无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此德胜也。夫以四胜辅天子，扶义征伐，谁敢不从，绍之强其何能为。”②荀彧的分析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曹操善于用兵，利用自己“度胜”、“谋胜”、“武胜”、“德胜”的优势，打败强大的袁绍

是完全可能的。

对这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袁绍部下意见很不一致。谋士沮授、田丰等认为，为讨公孙瓒已连年用兵，百姓负担很重，应注意务农息民，不要急于马上出兵决战。可先将讨平公孙瓒的捷报上报汉献帝，如果不能上达，则揭露曹操阻断我们与朝廷的联系，然后进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用持久战的策略，逐渐吞并曹操控制的黄河以南地区。袁绍手下另外两位谋士郭图、审配则拥护袁绍的决策，认为因袁绍之神武，用四州之强兵，讨平曹操易如反掌，用不着持久战。袁绍采纳后者的意见，惩处持不同意见的沮授，将其所统兵力削减三分之二。

为迎击袁绍的进攻，曹操作了全面的军事部署，八月，他派臧霸等进入青州，从东路牵制袁军，派于禁驻守黄河南岸；九月，分兵守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他又派卫觊镇守关中，稳定西路。

建安五年（200）正月，车骑将军董承暗杀曹操的阴谋泄露，被杀。刘备曾参与其谋，此前被曹操派往徐州堵截袁术北上，便趁机据徐州反曹。曹操拟亲自领兵东讨刘备。诸将认为，袁绍将会趁机抄曹军后路，不能冒这个险。曹操的谋士郭嘉则以为，“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备新起，众心未附，急击之必败。此存亡之机，不可失也”③。果然，袁绍以儿子有病为辞，拒绝谋士田丰提出趁虚袭击曹操后路的建议。田丰因此痛心疾首，以手杖击地，说：“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④结果，曹操东征击败刘备，俘其妻子及关羽，还军官渡。这时候，袁绍才决定出兵进攻许昌。田丰又提出，曹操已打败刘备，则许昌不复空虚，且他善用兵，兵虽少，不可轻敌；决成败于一战，如不成功，将后悔莫及。因

此他主张持久战。袁绍不但不接受他的意见，还认为他有意涣散军心，将他关进监狱。于是，袁绍向各州郡散发陈琳起草的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其罪恶，并进行人身攻击。

二月，袁绍大军南下，进驻黎阳，并派大将颜良渡过黄河，攻曹操的东郡太守刘延于白马（今河南滑县东）。当时曹军在官渡前线只有三四万人，不能正面交锋。四月，曹操接受谋士荀攸的建议，声东击西，先渡过黄河，进兵延津（今河南延津北），作将袭击袁军后路的态势，吸引袁绍分兵西向，然后率轻兵向东解白马之围。结果，被曹操俘虏的关羽刺颜良于万众之中，围攻白马的袁军溃败。袁绍于是全军渡过黄河向官渡进攻。沮授提出，主力应屯驻延津，分兵渡河进攻官渡，如能攻克，大军再渡河推进；全军渡河，如进攻失利，大军就退不回来了。袁绍不听，率领全军渡河。沮授在渡河时不禁叹息："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济乎。"⑤袁绍渡河后，前锋被曹操打败，大将文丑被斩杀。连损颜良、文丑两员大将，袁军士气大受打击。八月，袁军进军官渡，与曹操对峙。

九月，曹操出兵与袁绍交战，不能取胜，便退回营垒坚守。袁绍在周围筑起高楼，垒土山，居高临下，向曹营放箭。曹营中往来需蒙盾牌而行。曹操于是造霹雳车，抛掷石块击垮袁绍的高楼。袁绍又从营外往曹营内挖地道，曹操又在营内挖长沟以阻挡。这样相持一段时间以后，曹操兵少粮尽，士卒疲乏，百姓因负担过重，多叛变归附袁绍。曹操感到支持不住了，便给荀彧写信，提出要撤回许昌，以诱敌深入。荀彧回信不同意撤军，指出袁绍将全部主力集中在官渡，欲与我方决一胜负。我方以至弱抵挡至强，若不能制胜，必为对方所制，没

有别的结果。我方以弱抗强，已相持半年，双方的情况都已暴露，力量已经用尽，情况将会发生变化，这正是出奇制胜的良机，不能放过。曹操接受他的意见，继续坚守，并安慰鼓励运送给养的士兵，同时派徐晃击败袁绍押运粮食的将领韩猛，焚烧其运往官渡的几千车军粮。

十月，袁绍又派车运送军粮，命淳于琼等领兵万余人护送，储存于袁绍营垒北四十里的乌巢。沮授向袁绍建议，应另派一支军队，驻守在乌巢附近，与淳于琼互相照应，防止曹军抄掠。袁绍不予采纳。

袁绍的谋士许攸又建议说，曹操兵少而全力与我相拒，许昌的守备一定薄弱，若分派轻兵迅速偷袭，可以拿下。拿下许昌，奉迎天子以讨伐曹操，曹操可以擒获。即使拿不下许昌，也可以使曹操来回奔命，一定可以把他打败。袁绍不同意，说我一定要先攻取曹营。这时，许攸家人在许昌犯法被捕，许攸一怒之下，便投奔了曹操。

许攸受到曹操热情欢迎，便向曹操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报。他告诉曹操，袁绍的辎重万余车储备在乌巢一带，屯军守备不严，若派轻兵突袭，焚烧他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不出三天，袁氏自然溃败。曹操得到这一情报十分高兴，便留下曹洪、荀攸守营，自领步骑五千人，打着袁军旗帜，每人抱一束柴草，乘夜从小道进发，直奔乌巢。途中遇到袁军查问，就说是袁公恐曹操抄略后路，派我们去加强防备。查问者信以为真，他们通行无阻。到达乌巢后，包围袁军守军营垒，一齐放火。营中惊乱。天亮后，淳于琼发现曹军兵少，便保营拒守，曹操于是围攻乌巢守军。

袁绍得知曹操进攻乌巢的消息，对他儿子说，即使曹操能

攻下乌巢，而我趁机攻破他的营垒，他便没有归路了。袁绍于是派高览、张郃率大军进攻曹营。张郃提出，曹操以精兵攻乌巢淳于琼，一定能攻破。淳于琼被擒，我们都将成为俘虏。因此，他主张先救乌巢。袁绍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只派轻骑救援乌巢，而以重兵攻曹营。结果，袁军攻曹营不下，而乌巢守军却被曹操全歼。淳于琼被斩杀，储存的军粮和其他物资全部被烧光。这时主张先救乌巢的张郃反而受到诬陷，有人向袁绍说他为袁军的失败而高兴。张郃既气愤又畏惧，便与高览一起向曹营投降。

至此，袁军惊扰，全线崩溃。袁绍和他儿子袁谭与八百骑兵北渡黄河逃跑。曹操追赶不及，尽收其辎重、图籍、珍宝。投降的袁军士卒，全被曹操活埋，共坑杀七万余人。

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查出许昌和军中的人与袁绍暗中联络的书信，一律烧掉，不予查究，说："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况众人乎。"⑥这样便消除了众人的疑虑，安定了人心。

曹操击溃袁绍主力，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关键性胜利，但北方四州仍在袁绍手中，他们仍有相当势力。而曹操却打算南击荆州牧刘表。谋士荀彧认为，袁绍新败，部众离心，应乘胜彻底消灭其势力；如果南征，让他收集残余势力，乘虚抄我后路，我将面临极大危险。曹操接受他的意见，放弃南征打算。建安六年（201）四月，曹操进军河上，在仓亭（今山东阳谷县北）击败袁绍军。第二年正月，曹操进军官渡。五月，袁绍病死。

袁绍有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袁绍和后妻刘氏偏爱幼子袁尚，有让他继承的意向。袁绍死后，他属下逢纪、审

配等便假造袁绍的遗命，让袁尚继位，统领袁绍原来的军队。长子袁谭不得继位，便自称车骑将军，屯兵黎阳。九月，曹操渡过黄河，进攻黎阳。袁谭向袁尚告急，袁尚领兵相助，共同抵抗曹操。建安八年（203）二月，曹操于黎阳击败袁谭、袁尚。他们退守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四月，曹操追至邺城附近，诸将主张乘胜攻城。郭嘉认为，袁谭、袁尚在继位问题上有很深的矛盾，各有派系。我们攻急了，他们就联合，否则就相互争斗。不如南向荆州，待他们内讧，然后可一举歼灭。曹操认为这看法正确，便留兵守黎阳，主力撤回许昌。

曹操南撤后，袁谭、袁尚果然相互攻伐，在邺城燃起战火。八月，袁谭被打败，逃奔平原（今山东平原南），被袁尚围困。袁谭派辛毗向曹操求救。十月，曹操北渡黄河进驻黎阳。第二年二月，曹操乘袁尚再次进攻平原的机会，进围邺城。久攻不下，就在城四周挖长四十里、深宽各二丈的长沟，引漳河水灌满沟中，将城包围。城中断绝接济，饿死者过半。七月，袁尚率兵万余人还救邺城，被曹操击溃，北逃中山（今河北定县）。八月，邺城守将投降。九月，曹操领冀州牧。冀州是袁氏势力的据点，曹操占据冀州，取得了消灭袁氏残余势力的重大胜利。

曹操围攻邺城时，袁尚回兵救邺，平原之围解除，袁谭趁机占领河北一些地方，并打败逃往中山的袁尚。袁尚奔幽州依靠袁熙。建安十年（205）正月，曹操北进讨伐袁谭，攻克南皮（今河北南皮北），杀死袁谭，占据了青州。随后，曹操又北上进攻幽州的袁熙、袁尚。袁熙受到其部将焦触、张南的进攻，与袁尚一起逃奔辽西乌桓，焦触等率诸郡县投降。曹操占据幽州。

十月，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干降而复叛，企图袭击邺城，受到曹操进攻后，退守壶关（今山西长治东南）。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曹操亲自西征高干，进围壶关。三月，壶关守兵投降。高干逃往匈奴求救，后又企图南逃荆州，途中被杀。至此，曹操全据并州。

为了彻底消灭袁氏残余势力，安定边郡，建安十二年（207），曹操率大军北征三郡乌桓。三郡乌桓（又称乌丸），即辽东、辽西、右北平乌桓三部。东汉末，他们趁乱掠汉民十余万户。袁绍曾借助他们的力量打败公孙瓒。辽西乌桓蹋顿尤其强大，被袁绍立为单于。在袁曹争战中，他们支持袁氏。袁熙、袁尚兄弟战败后即逃往蹋顿，企图借助他们的力量恢复故地。曹操进军到易县（今河北雄县西北），郭嘉提出，兵贵神速，现辎重多，推进慢，敌人可以作充分准备，应轻兵突进，攻其不备。但时值雨季，滨海道路积水，曹军不能前进。后得到田畴的帮助，改道从卢龙口（今河北喜峰口），堑山堙谷五百余里，东指柳城（今辽宁朝阳南）。曹军逼近，蹋顿等才发觉。袁熙、袁尚和蹋顿等率数万骑迎战，结果被曹操击溃。蹋顿及名王以下被斩，胡人和汉人投降者二十余万口。袁熙、袁尚逃奔辽东太守公孙康，被公孙康杀死。

至此，袁氏势力被彻底消灭，其所据有的冀、青、并、幽四州全归曹操，曹操基本上统一北方。曹操班师时，已是深秋，滨海道路已通。他曾登临碣石山（今河北秦皇岛附近），放眼浩瀚的大海，留下了《观沧海》一诗，描绘了渤海的宏伟壮丽，抒发了政治家的胸怀。

注　释

①《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②《三国志》卷一〇《荀彧传》。

③《三国志》卷一四《郭嘉传》注引《傅子》。

④《三国志》卷六《袁绍传》。

⑤《资治通鉴》卷六三，献帝建安五年。

⑥《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

三国两晋南北朝

曹操的抑制豪强与"唯才是举"

抑制豪强与"唯才是举"，是曹操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实施的两项重要政策，这对曹操统一北方，稳定地发展曹魏的政治和经济，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曹魏实施的抑制豪强的《抑兼并令》颁发于建安九年(204)九月占领袁氏根据地邺城以后。

官渡之战以后，逃回邺城的袁绍在建安七年(202)五月，因积劳成疾，发病而死。袁绍死后，他的小儿子袁尚在邺城统领军队，袁谭、袁熙(袁绍长子、次子)、高干(袁绍女婿)仍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但由于袁绍的几个儿子原来就不团结，各怀异心，袁绍死后，袁谭与袁尚更为争夺嗣位而互相攻打。是年九月，曹操利用袁尚、袁谭之间的矛盾，派兵攻打屯兵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南)的袁谭。袁谭屡战屡败，被逼向袁尚求救。建安八年(203)三月，袁尚军也不敌曹军，退回邺城，曹操占领了黎阳。黎阳是冀州的重要门户，正当曹操准备一举直捣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时候，谋士郭嘉建议说：

“袁绍爱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图、逢纪为之谋臣，必交斗其间，还相离也。急之则相持；缓之而后争心生。不如南向荆州若征刘表者，以待其变。变成而后击之，可一举定也。”①

曹操接受了郭嘉的意见，留贾信守黎阳，曹军回师南下，进攻占据荆州的刘表。当南下的军队刚到西平（今河南西平西）时，袁谭与袁尚果真又互相攻伐，袁谭遣辛毗前来求救。曹操同僚属们商量对策，这时荀攸向曹操进计说：

“天下方有事，而刘表坐保江汉之间，其无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据四州之地，带甲十万，绍以宽厚得众，借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业，则天下之难未息也。今兄弟遘恶，若有所并则力专，力专则难图也。及其乱而取之，天下定矣，此时不可失也。”②

这是对原来郭嘉意见的一个发展，被曹操所采纳。

建安九年（204）二月，曹操军队到达黎阳后乘袁尚进攻袁谭的时机，出兵直捣邺城。邺城被曹军围攻四个月后，因城中粮食紧缺，袁尚被曹军打败后逃往幽州投奔次兄袁熙，六月邺城终于被攻下。此后，曹操一方面在军事上继续扩大战果，进一步击败袁谭，占领了冀、青二州的全部地区；另一方面就在这年的九月，颁布了《抑兼并令》，全文如下：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郡国守相明检察之，无令强民有所隐藏，而弱民兼赋也”。③

曹操的这一条法令主要讲了二层意思，一是历数袁氏在冀州的统治，是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藏匿罪人，为逋逃主”。袁绍是当时北方最大的士族地主，世袭“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他在冀、青、幽、并等州的统治，正如郭嘉所说，“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④。即是说，袁绍的统治是放纵士族豪强的。东汉以来，士族豪强势力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所谓“百夫之豪，州以千计”⑤。“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⑥。袁绍实际上是当时士族豪强势力的代表，因此在他的统治下，豪强擅恣、兼并，小民代出租赋，困苦不堪。令文指出袁绍实行这种宽纵豪强的政策，要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是不可能的。二是令文宣布决心革除袁绍实施的弊政，规定田租每亩收四升，每户出绢二匹，绵二斤，其他不得擅自兴发，不得使豪强有所隐藏，转赋于民，对不法豪强责令地方官严厉打击。需要指出的是，曹操在这里还对东汉以来的赋税制度进行了改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除了地主对佃农进行地租剥削以外，封建国家还对广大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进行赋税剥削（主要是地税和人头税），作为国家的经费，以养活大批官吏和军队。不同时期，赋税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不同的变化。两汉时期的地租（田赋），是根据收获量按比例征收的，如西汉初的三十税一，十五税一等。人头税是按人口的多少和大小征收的，分为算赋（成年人）和口赋（小孩），收的是钱。曹操将地税改为按定额征收，一亩收四升；将人头税改为按户征收，一户交纳绢二匹，绵二斤，收的是实物，称为户调。由于曹操的这一规定并不比汉代重，同时又有不准额外征收以及不准豪强将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等限制（尽管这种限制执行起来并不彻底），因此农民的负担同

袁绍时期相比，确是有所减轻的。

曹操的这一抑制豪强任意兼并土地、减轻农民赋税负担过重的法令，既是针对袁绍放纵士族豪强的统治而作的改革，也是从维护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它有利于新占地区统治秩序的稳定，有利于阶级矛盾的缓和。为了配合这一法令的推行，曹操还针对冀州地区结党营私，造谣诽谤，颠倒黑白的歪风邪气，在建安十年（205），下了一道《整齐风俗令》。令文说："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同时还下令："其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⑦这些都有利于在政治上打击那些"不法"的豪强地主。为了贯彻抑制豪强兼并的法令，曹操注意选派一些得力的官员，到一些地区去推行。如平定高干后，曹操任命梁习为并州刺史，"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⑧。又如满宠，被曹操派往袁绍的老家汝南作太守，袁绍在那里的势力十分强大，"门生宾客，布在诸县，拥兵拒守"。满宠到任后，"募其服从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人，一时皆平，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⑨。再如曹操以杨沛为邺令，"奉宣科法"，严加惩治，豪右曹洪、刘勋等皆为之退避⑩。这些都说明曹操颁布的重豪强兼并之法，在不同程度上是得到贯彻的，它为曹魏统治区域内社会秩序的走向稳定，发挥了作用。

曹操关于"唯才是举"的政策，共颁布了三个法令。现摘录于下：

建安十五年（210）的"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今天下得无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zè 通侧）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11]

建安十九年（214）的“有司取士无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12]

建安二十二年（217）的“举贤无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遂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13]

曹操的这三篇求贤令文，都贯彻着一个基本思想——“唯才是举”，即重视人的才干，而不强调个人的品行，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可以举用。特别是他公开提出了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这是对东汉末年以封建道德、家世出身作为选拔官吏标准的一次有力冲击。

东汉倡儒学崇名节，选人采取察举征辟制度。儒学的德行孝义，成了察举的重要标准。而当时掌握政权和选举权的，又多为世代为官的世家和乡里大族，他们不仅自己以世代儒宗相

标榜，而且其子弟、门生、故吏，为获取仕途，往往不惜以矫情伪饰来博取声誉。因而德行孝义的名誉，往往被他们所独占，从而堵塞了寒门仕进之路，埋没了大批的人才。及至汉末宦官专权，察举制度更沦落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⑭的地步。因而曹操在求贤令文中提出的"要选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是对东汉末年以来，察举制度下名实完全脱节用人方针的有力冲击。

曹操"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史称曹操"知人善察"，"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⑮。如戏志才、杜畿、赵俨、裴潜、辛毗等，均系寒微出身，但他们在曹操的营垒中，尽职效力，作出了各自的贡献。特别是谋士郭嘉，他既出身细微，又有"负俗之讥"，但经荀彧推荐，曹操信之不疑，予以重用。郭嘉心怀感遇之恩，为曹操呕心沥血，最后英年早逝。曹操称赞他"平定天下，谋功为高"⑯。正因为在曹操的周围集聚了这样一大批文臣、武将和智谋之士，才不断地扩充了曹操集团的力量，使之终于击败群雄，成就了北方统一的大业。

应该指出，曹操的"唯才是举"，并不是不要德，不讲政治标准。他是以能否贯彻自己的统治政策，能否维护、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为前提的。对于不利于维护、扩大他统治势力的一些人，即使原来立了大功的，也给予严厉的镇压和打击。对此，清人赵翼有一段评述："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

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倚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⑰尽管如此，曹操实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主张明扬仄陋，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作法，不仅比起其他地主阶级集团来，显然是高出一筹的，就是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里，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注 释

①《三国志》卷一四《魏书·郭嘉传》。

②《三国志》卷一〇《魏书·荀攸传》。

③《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④《三国志》卷一四《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

⑤《文选》卷五九王简栖《头陀寺碑文》注引《昌言》。

⑥《后汉书·仲长统传》载《昌言·理乱篇》。

⑦《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⑧《三国志》卷一五《魏书·梁习传》。

⑨《三国志》卷二六《魏书·满宠传》。

⑩《三国志》卷一五《魏书·贾逵传》注引《魏略》。

⑪⑫《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⑬《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⑭《抱朴子·审举》。

⑮《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⑯《三国志》卷一四《魏书·郭嘉传》。

⑰《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刘备三顾茅庐

三国中的蜀汉政权，是以刘备为首的政治集团建立的。刘备有雄才，以复兴汉室为志愿，但早年辗转依靠北方军阀，势力得不到发展，在中原无法立足。他到达南方后，经过三顾茅庐，获得诸葛亮的支持，事业才有了转机，逐渐建立了与魏、吴鼎足而立的蜀汉政权。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涿州）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刘胜之子刘贞于汉武帝时封涿县陆城亭侯，其子孙即落籍涿县。刘备的祖父曾任县令，父亲刘弘早死，家道中落。刘备小时候与母亲贩履织席为业，十五岁时，与公孙瓒等求学于同郡儒生卢植，不甚乐于读书，好交结豪侠。在东汉末年的社会动荡中，得到中山（今河北定县）大商人的资助，得以组织徒众。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人关羽（字云长）和同郡人张飞（字翼德）加入他的队伍，成为亲密伙伴。刘备参加镇压黄巾起义军，以军功任安喜（今河北安国西北）县尉，后又任高唐（今山东高唐东）县令。后被黄巾军打败，投奔中郎将公孙瓒，任别部司马。在公孙瓒与袁绍的

战争中，奉命与青州（治所在今山东临淄北）刺史田楷抗击冀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西南）牧袁绍的进攻。原在公孙瓒属下的赵云（字子龙）归属刘备。

初平四年（193），曹操东征徐州（治所在今山东郯城）牧陶谦。陶谦向田楷请救。田楷便与刘备前去救援。刘备当时拥兵千余人，陶谦又给他增兵四千，他便脱离田楷，归属陶谦。陶谦表奏刘备任豫州（治所在今安徽亳县）刺史，屯驻小沛。兴平元年（194）冬，陶谦病死，刘备在陶谦下属糜竺、陈登等人的劝说下，领徐州牧。建安元年（196）占据淮南的袁术进攻刘备，争徐州，并勾结吕布打败刘备。吕布自称徐州牧，刘备依附曹操。曹操举刘备为豫州牧，给他增兵，提供粮食，让他东还小沛，收集散兵，进攻吕布。公元198年，刘备又被吕布打败，于是曹操东征，与刘备合兵，俘杀吕布。刘备随曹操到许都（今河南许昌东）。曹操表奏刘备为左将军，并给予优厚的礼遇。

这时，曹操接汉献帝到许都已三年。朝中一些人对曹操专制朝政不满，汉献帝的岳父车骑将军董承等称受献帝密诏谋杀曹操，刘备也参预其谋。一次，曹操在酒席上对刘备说，今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袁绍之流是数不上的。刘备听后非常紧张，手中的筷子都失落地上。当时正好遇上一声响雷，刘备随即说："圣人云'迅雷风烈必变'，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可至于此也。"①将自己的失态机警地掩饰过去。

袁术于公元197年在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后，穷奢极欲，不得人心，士卒散尽，不能自立，公元199年派使者送帝号与堂兄袁绍。袁绍之子袁谭从青州出兵迎接他，拟从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经过。曹操派刘备和朱灵等前往截击。刘

备等到达下邳时，袁术已死。朱灵等返回许都，刘备则趁机杀死曹操所派任的徐州刺史车胄，留关羽守下邳，自己还驻小沛。建安五年（200），董承等欲诛除曹操的图谋暴露，被处死并诛三族。曹操决定亲自东征刘备。当时曹操正与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对峙，他的部将担心他东征后，袁绍会乘虚袭击后路。曹操以为袁绍见事迟，而“刘备，人杰也，今不击，必为后患”②，于是分兵东征，曹操大败刘备，俘虏他的妻子，擒获关羽。刘备逃奔青州袁谭，然后北投袁绍，逐渐收集逃散的士卒。一个多月后，刘备想脱离袁绍，便劝说袁绍南连荆州（治今湖北襄樊）牧刘表。此前袁绍曾派人求助刘表，夹击曹操。但刘表只是口头答应，没有采取行动。因此，袁绍接受刘备的建议，派他率领旧部，南下联络刘表。建安六年（201），刘备到达荆州，受到刘表的热烈欢迎。刘表给他扩充军队，让他屯驻新野（今属河南）。

刘备投靠刘表之后，因刘表一贯坐观成败，不图进取，他不但不能有所作为，还受到刘表的猜忌。他曾因“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有感于“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而悲伤③。这说明刘备对自己的处境不满，要摆脱多年来寄人篱下的状态。除了需要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勇将领兵打仗外，还需要有智谋，有政治才能的人出谋划策，辅佐自己，因此便在荆州广罗人才。当时北方不少有识之士因避战乱流寓荆州，著名的如司马徽、王粲、崔州平、徐庶、诸葛亮等。刘备曾访世事于司马徽。司马徽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他们都是谁，回答说：“诸葛孔明、庞士元也。”④很受刘备器重的徐庶也向他推荐说：“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让

徐庶把他请来。徐庶说："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⑤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临沂）人，汉司隶校尉诸葛丰的后裔。其父诸葛珪曾任泰山郡（治所在今山东泰安东北）丞。诸葛亮幼年丧父，依靠叔父诸葛玄生活。诸葛玄被袁术任为豫州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太守。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跟随叔父到豫州任所。诸葛玄丢官后，带着他们兄弟一起投靠荆州牧刘表。诸葛玄死后，诸葛亮离开刘表，在襄阳城西二十里的隆中山"躬耕陇亩"，博览群书，与名士交游，观察天下形势。他胸怀定国安邦大志，常自比于齐桓公时的贤相管仲、燕昭王时的名将乐毅。当时人不以为然，只有他的好友崔州平、徐庶认可。可见徐庶向刘备极力推荐诸葛亮，是出于对他敬佩和深刻的了解。这样，正在广求贤才的刘备，便决定到隆中山去拜访被誉为卧龙的诸葛亮。

刘备去隆中山前后三次，第三次才见到诸葛亮。他让众人回避之后，才坦率而诚恳地向诸葛亮提出问题，请求指教："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短浅，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诸葛亮回答说："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而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唯天时，抑亦人谋也。"这里，诸葛亮通过在群雄割据混战过程中，弱小的曹操终于战胜强大的袁绍，由弱转强的事实，指出这不仅靠机遇，而且靠主观努力，事在人为。这对屡遭挫折的刘备无疑是极大的鼓舞。

接着，诸葛亮又分析了曹、孙两家的现状："今操已拥百

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这说明，进取曹操已控制的中原、图取孙权已据有的江东，都已经不可能办到。那么，刘备应当抢占哪块地盘，发展势力呢？诸葛亮指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里说明，当时可能进取的只有荆、益二州，这二州无论在地理形势或经济条件方面，都是极其有利于发展势力的地区。诸葛亮还为刘备进一步规划了占据荆、益二州以后，对内对外的基本策略：“将军……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就是说，以荆、益立国，对内修明政治，搞好和西部和南部少数民族的关系，对外联孙抗操，利用时机分东西两路北伐中原，恢复汉室。这就大体上指明了三分鼎立的历史发展趋势。这次对话，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也称为“草庐对”。以后，刘备正是按照诸葛亮所指出的争取鼎足三分的方向去发展势力，建立蜀汉政权的。蜀汉政权建立后，也基本上采取了他所规划的内政、外交策略。

刘备礼贤下士和坦诚，感动了诸葛亮，使他透彻陈述了自己的满腹经纶。刘备的远大抱负，也使诸葛亮看到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他抛弃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处世态度，出山充当刘备的谋士。正如他二十一年后所说

的："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茅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诸葛亮对当时形势的深刻分析，对以后发展方向明确而具体规划，使迷惘困惑中的刘备看到曙光。他于是将诸葛亮依为心腹，两人"情好日密"。这引起了长期患难相随的伙伴关羽、张飞的不满，时有怨言。刘备对他们解释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⑥鱼之有水，便有生机。刘备集团势力的发展，从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注　释

①《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

②《资治通鉴》卷六三，献帝建安五年。

③《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

④《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⑤《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⑥本篇引文未注出处者，均见《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孙吴据江东

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中，孙吴经过两代三人——孙坚、孙策、孙权的努力，最终确立在江东（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统治，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孙坚（157－193），字文台，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早年在本县充当县吏，后曾募兵参与镇压会稽人许昌暴动，因功升任县丞。中平元年（184）黄巾军大暴动，他募兵千人，追随右中郎将朱儁镇压黄巾军，被任命为别部司马。其后又跟随车骑将军张温，讨伐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的边章、韩遂地方割据势力，又曾镇压了长沙区星等人暴动，被任命为长沙（今属湖南）太守，封乌程侯。曾参加关东讨伐董卓的联军，投靠割据淮南的袁术，被袁术表奏为破虏将军。孙坚英勇善战，曾杀死董卓的大将华雄，带兵进入洛阳，因洛阳被董卓撤退时焚掠，残破不堪，只好退还。初平三年（192），孙坚受袁术指派，进攻荆州（治所在今湖北襄阳）刘表，被刘表部将黄祖的士兵射死于襄阳岘山。

孙策（175－200），字伯符，孙坚长子。孙坚讨伐董卓时，

他随同母亲迁居庐江舒城（今安徽舒城南），与当地人周瑜结交。孙坚死后，他投靠舅父丹阳（今属江苏）太守吴景。孙策募兵数百人，又向袁术索回父亲原来的部曲千多人，以此作为发展自己势力的基本队伍。兴平元年（194）大败扬州刺史刘繇，进据曲阿（今江苏丹阳），收编刘繇的兵士二万余人，马千余匹，威震江东，形势转盛。随后向东南进军，攻占会稽（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自任会稽太守，并据有豫章郡（治所在今江西南昌）。袁术称帝，孙策和他断绝关系，曹操表奏孙策为讨逆将军、吴侯。袁术死后，其部曲归于庐江（今属安徽）太守刘勋。公元199年，孙策赶走刘勋，尽得袁术的部众。至此，孙策据有江东六郡之地，即会稽、丹阳、豫章、庐陵（治所在今江西泰和西北）、吴郡（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庐江等，奠定了孙吴政权的基础。建安五年（200），曹操与袁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相对峙时，孙策想趁机袭击曹操的基地许都（今河南许昌东），整军待发时，遇刺重创身死，终年二十六岁。

孙策临终时，给孙权佩带印绶，让他继承自己的事业，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①同时命谋士张昭等辅助孙权。

孙权（182－252），字仲谋，孙坚次子，孙策之弟。曾任阳羡（今江苏吴兴）长、奉义校尉等职，并曾随孙策征战。孙策死后，孙权继立，这时候虽然拥有江东六郡地盘，但面临内部动摇不安的困难局面。一方面，境内深险山区的山越人并未完全从命，他们的骚动给孙吴政权造成很大的威胁；另一方面，原来孙策属下，心存观望，"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

之间”②。庐江太守李术甚至公开抗命，并且招纳孙权的亡叛，拒不送还，以致孙权不得不发兵将他消灭。但在张昭、周瑜等人的辅助下，终于稳定内部，并逐步发展势力。

张昭，彭城人，汉末名士，避乱江东后任孙策长史，充当谋士。孙策死后，他对孙权的倾心支持，对吸引和安定北来人士起了很大的作用。诸葛瑾、鲁肃等都归附孙权。周瑜有谋略，孙策渡江攻打刘繇时留守丹阳，后被孙策任命为建威中郎将，领江夏（治所在今湖北云梦）太守。孙策打败刘表部将黄祖后，他留守巴邱（今湖南岳阳），闻孙策死，带兵赴丧。孙权任命他为中护军，与张昭共掌事权。周瑜全力支持孙权，对于团结过去追随孙策的将领如程普、朱治、董袭等人，共同维护孙氏政权，也起了很大作用。

孙权稳定内部之后，建安八年（203），对山越人的反抗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军事镇压。他派吕范平鄱阳（今属江西）、会稽境内山越；程普讨伐乐安（鄱阳属县）境内山越；任命黄盖、韩当、周泰、吕蒙等充任山越人反抗剧烈的各县令长，分别就地讨伐。这是较大规模的一次。这以后仍然不断对山越用兵。对山越的镇压，不仅巩固了孙吴的后方，而且获取人力物力资源，增强孙吴的国力。对山越用兵也加强了内地和山越地区的联系、接触，对江南落后地区的开发，客观上起了促进作用。

只有占据荆州才可以屏藩江东，巩固孙吴政权。因此向西发展势力，就成为孙权的战略目标。鲁肃就曾经向孙权建议趁北方混战时，“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③。建安八年（203），孙权在大规模镇压山越的同一年，先行攻打刘表的江

夏太守黄祖，破其水军，将他包围在夏口（今湖北汉口），但未能攻下，因山越“复动”，只好撤还。建安十三年（208）春，孙权接受甘宁的建议，打算抢在曹操之前夺取荆州，又大举进攻黄祖，大败黄祖军，并追斩了黄祖，俘获男女数万口。

攻灭黄祖，是攻取荆州的前奏，但孙权还没有来得及继续进军夺取荆州时，曹操就在这年秋天率大军南下。刘表病死，他儿子刘琮举荆州投降曹操。于是孙权与刘备联合，在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之战中大败曹军，曹操北撤。孙权占据荆州的江陵（今属湖北）及其以东的地区，以周瑜为南郡（治所在今湖北江陵）太守，程普为江夏太守，吕范为彭泽（治所在今江西湖口）太守。南郡后来“借”给刘备。刘备占据了荆州南部的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均在今湖南境）。这样，赤壁战后，孙权与刘备瓜分了荆州。此后孙权重点是向岭南发展势力。在东汉末年北方军阀混战之际，岭南地区逐渐为士燮所控制。建安十五年（210），士燮以岭南七郡归附孙权，孙吴的势力扩展到交州（治所在今广州）地区。第二年，孙权将都城从京口（今江苏镇江）迁至秣陵（今江苏南京），后改名建业。

孙权和刘备瓜分荆州，刘备占领其中的大部分，孙权只占领其中的小部分。孙权接受这样的结果，甚至支持刘备任荆州牧，还将妹妹嫁给他，这只是加强联盟、联合抗曹的需要。这种妥协只是暂时的，孙权并不甘心放弃占有荆州，全据长江以巩固江东的战略目标。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占据益州（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第二年，孙权便向刘备索还荆州。最后双方达成重新瓜分荆州的妥协，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归刘备；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孙权在荆州的势

力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大举进攻曹操占据下的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孙权趁机派吕蒙领兵溯长江西上，偷袭关羽的后路，占据江陵，最后将关羽杀死。从此，孙权便从刘备手中夺取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占据荆州全部，据有三峡以东、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为了巩固江南的地盘，向江北发展势力，孙权在赤壁战后还同曹操在淮南地区进行反复的争夺。赤壁之战的当年冬天，孙权曾亲率十万大军围攻合肥（今属安徽），久攻不下，第二年春天撤还。曹操平定关中后，建安十八年（213）亲率号称四十万的大军南下进攻濡须口（今安徽无为东北），孙权率军七万迎战。相持一个多月，双方都没有取得多少进展。曹操看到孙权的水军精锐，队伍整肃，进退自如，发出"生子当如孙仲谋"的赞叹④，然后撤军北还。曹操为防止孙权对滨江郡县的掳掠，强迫这一带的居民北迁，结果事与愿违，江北十多万户渡江归附孙权，造成江北空虚，增加了孙权的人力。

公元214年，孙权领兵攻下淮南重镇皖城（今安徽潜山），第二年又领兵十万进攻合肥，受到曹操部将张辽的奋力抵抗。孙权败退时，在逍遥津（今合肥东北）遭张辽追击，险些丧命。公元217年，曹操进军居巢（今安徽巢县北），曾在濡须打败孙权军队，接着孙权求和，曹军北还，双方仍处于相持状态。其后，双方争夺仍不时进行。公元220年曹操病死，他的儿子曹丕代汉称帝后，曾于公元224年，亲率大军南征孙权，到达广陵（今江苏扬州）。孙权在沿江数百里间，"植木衣苇，为疑城假楼"⑤，又安排大批舟舰在江巡游。当时江水盛涨，曹丕面对滔滔江水，感叹说："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⑥只好临江而还。

曹丕的感叹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曹魏所长是“武骑”。长江对他们说来，自然是不可逾越的天堑。孙吴所长是水军，他们可以越过天堑，但离舟登岸，则弃其所长，用其所短，面对曹魏的“武骑”，自然不可能在江北淮南有所作为。因此，双方反复争夺的结果仍然基本上是划江而治。

公元 229 年，孙权称帝，改元黄龙，以建业为都城。同年，孙吴与蜀汉建立盟约，中分天下，双方约定：戮力一心，同讨曹魏，“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⑦。孙刘抗魏联盟得到进一步巩固，孙吴全据长江中下游，形势稳定。这有利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首先是农业的发展。由于汉末中原军阀混战，大批人口南移，这不仅给江南增加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带来了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孙权对农业生产也颇重视，像曹操在北方一样，实行屯田，也分军屯和民屯，设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管理。牛耕得到进一步推广。水利建设也有所发展，孙权曾组织人力开通从句容（今属江苏）到西城（今江苏丹阳境）的破岗渎运河，使都城建业和三吴（吴郡、会稽、丹阳）一气相联。钱塘江和太湖流域成为经济发达的富庶地区，永兴（今浙江萧山）有的稻田一亩可产米三斛。

其次，手工业也有相当的发展。纺织业中的丝织业虽不如蜀，但葛布、麻布的生产，却是当时全国最发达的，会稽的越布最有名。瓷器制造，也有重大进步，青瓷的造型和制造工艺都相当精美。“煮海为盐”，盐业发达，设有司盐校尉管理，海盐（今浙江平湖东南）是著名产地。大将朱桓死时，孙权赐盐五千斛，作为丧事费用，可见盐的产量之丰富。酿酒、制茶业

也有所发展。孙皓每次宴会群臣，规定每人饮酒七升，也反映了酒的产量相当可观。

应当特别提出的，是孙吴造船和航海业的发展。建安郡的侯官（今福建闽侯）是造船业的中心，有很大的造船工场。造船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大海船长达二十余丈，可载六、七百人，或载物万斛（五百吨以上）。随着造船业的进步，航海业也发达起来，扩大了与海外的联系。黄龙二年（230），孙权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人，乘船从章安（今浙江临海东南）出海，经福州、泉州（均属今福建），然后东渡海峡，到达夷洲（今台湾），“得夷洲数千人还”⑧。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此后两岸联系日益密切。在派卫温等去夷洲前，公元226年孙权曾派朱应和康泰出使南海诸国。朱应回国后还根据自己的见闻写成《扶南异物志》，康泰也撰写了《外国传》。此外，孙吴和印度、大秦（东罗马帝国）、高丽等国也有海上往来。

农业、手工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都城建业就是繁荣的商业都会。孙吴除了海外贸易外，与曹魏、蜀汉的互市也颇发达。孙吴供应魏、蜀的主要是葛布、麻布，以及大贝、明珠、翡翠、象牙、犀角、孔雀等珍奇之物，而从魏、蜀获得的是丝织品和马匹。

这样，孙吴据有江东，对东南地区的开发，就为东晋南朝时江南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注 释

①《三国志》卷四六《孙策传》。

②《资治通鉴》卷六三，献帝建安五年。

③《三国志》卷五四《鲁肃传》。

④《资治通鉴》卷六六，汉献帝建安十八年。

⑤⑥《资治通鉴》卷七O，魏文帝黄初五年。

⑦⑧《三国志》卷四七《孙权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赤 壁 之 战

曹操消灭袁氏势力，降服乌丸，基本统一北方后，建安十三年（208）七月，亲率大军南征荆州牧刘表，准备消灭南方割据势力，实现全国统一。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幼子刘琮。刘表及其亲信蔡瑁、张允等偏爱幼子刘琮。长子刘琦受排挤，为避祸出任江夏（治所在今湖北云梦）太守。曹操大军南下后，八月，刘表病死。蔡瑁、张允等便以刘琮继任荆州牧。九月，曹操进军到新野（今属河南），刘琮接受属下蒯越等的建议，派人到曹操军前投降。于是曹军继续南下。

当时，刘备屯兵樊城（今湖北襄樊）。刘琮投降时不敢告知刘备。待到刘备得知他们投降的消息时，曹操大军已到达宛县（今河南南阳）。刘备大为震惊，急忙与部下共议对策。有人劝他在曹军到达前进攻刘琮，占有荆州。刘备认为这有负刘表临终嘱托，是背信自济，没有同意，便领部队向南撤退。路过襄阳（荆州治所）时，刘琮的属官和荆州人多追随刘备。到达当阳（今属湖北），跟随刘备的有十几万人，辎重数千辆，

每天只能走十余里。刘备只好另派关羽率领水军乘船数百艘，从水路去江陵（今属湖北）等待会合。有人劝刘备轻装前进，迅速进据江陵，但他不愿抛弃随行的人群，说："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①"

曹操因江陵储有大量军用物资，唯恐为刘备所据有，便留下辎重，轻装前进。到襄阳（今湖北襄樊），得知刘备已过襄阳南下，曹操便率精锐骑兵五千急追，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刘备撤退到当阳长阪（今湖北当阳东北），被曹操骑兵追上。刘备被曹军打败，人众辎重大多落入曹操手中，连家属也被冲散，只带领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逃走。幸有张飞率二十骑断后，喝退追兵，刘备等才得以逃脱。由于赵云英勇作战，才救出甘夫人和刘备的儿子刘禅。刘备与关羽、刘琦的军队会合后，渡过汉水，继续向夏口（今湖北武汉）撤退。曹操进据江陵，荆州所属郡县先后归属曹操。

当初刘表病死的时候，鲁肃曾向孙权建议说，荆州与我们相邻，那里江山险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据而有之，可建立帝王的基业。现刘表刚死，两个儿子不睦，军中将领也因此而各有彼此。刘备是天下英雄，与曹操有仇隙，但刘表忌妒他而不用他。现在"若备与彼协心，上下齐同，则宜抚安，与结盟好；如有离违，宜别图之，以济大事"。因此，鲁肃请求去荆州吊丧，并劝说刘备安抚刘表部众，同心一意，共同抵抗曹操。鲁肃还指出："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②孙权接受他的建议，即派他去荆州探虚实。

鲁肃到达夏口，得知曹操已向荆州进军，于是日夜兼程，想赶在曹操之前到达荆州。他到达南郡（治所在江陵），才知道刘琮已举荆州向曹操投降，刘备已向南撤走，便径直往北迎

刘备。他在当阳长阪迎上刘备，转达孙权的问候，谈论天下形势，并询问刘备的去向。刘备说准备投奔苍梧（治所在今广西梧州）太守吴巨。鲁肃不以为然，指出，孙权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英雄豪杰都归附他，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成就大事。“今为君计，莫若遣腹心自结于东，以共济世业”③。刘备接受鲁肃的意见，进驻鄂县樊口（今湖北鄂城境内）。

曹操占据荆州后，将自江陵沿江东下，刘备和孙权都面临极大的威胁。联孙抗曹本来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方针。在这紧要关头，诸葛亮请求与鲁肃一起去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会见孙权。他会见时针对孙权犹豫观望的态度，指出：“今将军外托服从之名，而内怀犹豫之计，事急而不断，祸至无日矣。”孙权于是决心抗曹，说：“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④但对刘备新败之后，抗曹能否取胜信心不足，诸葛亮又对他分析说，刘备虽败于长阪，“今战士还者及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刘琦合江夏战士亦不下万人。曹操之众，远来疲弊……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又荆州之民附曹者，逼兵势耳，非心服也”。今将军如能任命猛将统兵数万，与刘备协规同力，必定能打败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形成矣。成败之机，在于今日”⑤。孙权很赞成他的意见，便和属下讨论，以便采取行动。

这时候，曹操占据江陵后，获取丰富的军用物资，收编了荆州水军，气势更盛，未免趾高气昂，仿佛江东指日可下。他给孙权写信说：“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⑥孙权属下不少人被曹操的虚张声势吓倒，在讨论中主张向曹操投降。张昭等认为，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以朝廷为辞，今日抗拒他，事更不顺；

他既占据荆州，收编刘表强大的水军，沿江水陆俱下，我方倚为屏障的长江天险已失去作用；而兵势强弱悬殊，不可相提并论。鲁肃不同意他们的主张，私下对孙权说，投降是没有出路的，不要理这些人的议论，要及早下抗曹的决心。他还建议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抗曹大计。

周瑜回来后，坚决反对投降。他首先揭穿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的幌子，说："操虽托名汉相，其实汉贼也。"然后又进一步分析了江东的长处和曹操的弱点：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足用，英雄乐业"，而"北土既未平安，加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且水战非其所长；"又今盛寒，马无藁草"；北方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几点都是行军作战所忌讳的，而曹操都冒犯了。"瑜请得精兵三万人，进住夏口，保为将军破之"⑦。孙权于是拔刀砍面前奏案说："诸将吏敢复有言迎操者，与此案同"⑧。决心抗曹，不再讨论。

当晚，周瑜又向孙权进一步指出，许多人只看见曹操来信说有水军步兵八十万，就纷纷被吓倒，而不分析其虚实，便主张投降，很没有道理。现据所了解的实际情况，曹操领军"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怀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不足畏"⑨。可见周瑜和诸葛亮一样，没有被曹操的表面上的强大所迷惑，能看到他存在致命的弱点；不因为自己表面上的弱小而丧失信心，能看到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他们比同时的一些人见识更深远一些。他们的胜利信心是建立在坚实的客观基础上的。

于是，孙权选精兵三万，办足兵船、粮秣和战具，以周瑜和程普为左右督，以鲁肃为赞军校尉，帮助策划方略，率兵与

驻军樊口的刘备会合，并力迎击曹军。孙刘联军沿江西进，与曹军遭遇于赤壁（今湖北嘉鱼东北）。正如周瑜所估计那样，这时曹军已发生流行病，初遭遇，即战败。曹操便退泊北岸，与南岸赤壁的孙刘联军对峙。曹军不适应大江风浪冲击，为减少船舰因风浪振荡，将船舰连锁，首尾相接，结果各船移动困难。周瑜的部将黄盖认为这是火烧曹军战船的好机会，便向周瑜建议采用火攻。他同时提出，因敌众我寡，难与持久，火攻应抓紧进行。周瑜接受他的建议。

黄盖当即给曹操写了一封诈降的信。信中利用曹操人多势众，踌躇满志的心态，说江东根本不是曹操百万大军的对手，这是众所共知的。江东将吏不论智愚，都知道不可与您交战，只有周瑜、鲁肃不明大义。我诚心归顺曹公，决心利用担任前锋之便，交战中将相机行事，报效曹公。曹操接信后，根据自己对形势的分析，认为黄盖的投降是可信的。

为了以诈降掩盖火攻，黄盖准备了十艘大战船，装载干芦苇、枯柴，灌上油，用帷幕裹好，上树旌旗以伪装。同时准备轻便快捷的小船，系在大船尾部，以便点火后人员撤离。十艘大战船航行在前面，其余船只依次跟进。当时东南风正急，船至江心拉起风帆，速度更快。曹操军士都出营观望，指言黄盖来降。黄盖的十艘大战船离曹军二里余，同时发火。点火的士兵跳上船尾的小船离开。火烈风猛，十艘火船如箭冲近曹军战船，一起燃烧，并延及岸上营落，一片火海，烟焰冲天。孙刘联军随后擂鼓冲杀。曹军人马很多被烧死、溺死。曹军全线崩溃。曹操领军取陆路从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道向江陵方面退走。途中遇泥泞，道路不通，又刮大风，命令疲弱的士卒背草铺路，战马才能通过。疲弱的士卒被人马挤踏，陷入泥中，

死亡惨重。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曹操至南郡。曹军战死、饿死、病死大半。曹操留曹仁、徐晃守江陵，乐进守襄阳，然后北还。

周瑜、程普率兵乘胜进攻江陵，经过一年多的战斗，曹军死伤甚多，曹仁放弃江陵北撤，退守襄阳。孙权占据荆州沿江地区，以周瑜领南郡太守，屯据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吕范领彭泽（治所在今江西湖口东）太守；吕蒙领寻阳（今湖北黄梅西南）令。刘备乘胜进攻荆州江南地区，武陵（治所在今湖南常德西）太守金旋、长沙（今属湖南）太守韩玄、桂阳（治所在今湖南郴州）太守赵范、零陵（今属湖南）太守刘度先后投降。刘备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以赵云领桂阳太守。刘备表奏刘琦领荆州牧。不久刘琦病死，刘备领荆州牧，驻公安（今属湖北）。

赤壁之战终于以曹操惨败，孙刘联军胜利而结束。曹操的失败和孙刘联盟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对此，战前诸葛亮和周瑜都先后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事实说明，他们的分析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他们不愧为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当然，孙刘联军的胜利，也包含着客观机遇和主观努力，诸如灭亡的威胁所激起的抗战的决心和士气，曹军连锁战船和火攻的献策，以及东南风的相助等等。

赤壁之战，是三国历史上的关键一战，也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其结果，曹操统一南方的努力落空了，退回北方后，致力于安定内部，进一步恢复经济，向西北发展势力。北方此后在相当长时间内尚不具备统一南方的力量。通过这次战争，孙刘建立了联盟关系。刘备结束了长期颠沛流离的境况，取得了半个荆州的地盘，并以此为发展势力的基础，进

而取得益州。孙权取得了荆州沿江地区，内部更加稳定，并进一步向东南沿海和华南地区发展势力。孙刘联盟在相当长时间内，足以和北方抗衡。因此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实际上已经形成。

注 释

①《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

②《三国志》卷五四《鲁肃传》。

③《三国志》卷三二《先主传》注引《江表传》。

④⑤《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⑥《资治通鉴》卷六五，献帝建安十三年。

⑦《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

⑧《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注引《江表传》。

⑨《三国志》卷五四《周瑜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

"九品中正制"，也称"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是在曹魏黄初元年（220）曹丕即魏王位后（是年十月，曹丕称帝，改元黄初），由大士族出身的尚书陈群建议实行的。《三国志·陈群传》载：（曹丕）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资治通鉴》卷六九也载："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胡三省注："九品中正自此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论述"九品中正"时也说："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实，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后付尚书选用。"①由上引史料，可以看出，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各州郡设大小中正官，使掌搜荐，帮助吏部铨选人士。各州郡中正官依据州郡内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

等，称为“九品”。中正官在评定人物品级时，主要考虑祖上做过什么官，有几代人做过官，称为“家世”，也称“品”；然后再看本人的才德，谓之“状”。中正要注明各人的“品状”如何，划分品第，然后向当时主管选择官吏的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的报告，依品授官。中正的品第并不等于所授的官品，但也决不是虚名，而是与官职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品第越高，所授官职就越大。已授官的，每三年由“中正”负责向吏部推荐升降，“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②。这种以“中正”为中心，论品定级，选拔和升降官吏的制度，就叫“九品中正制”。

在秦汉统一时代，封建官僚的来源，主要是“察举”和“征辟”二途。“察举”就是由皇帝下诏规定需要选拔人材的性质，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武猛堪将帅”之类，要各地方州郡发现、搜荐上去。“征辟”就是中央封建王朝、各地方政府自己直接从“布衣”或现有官吏中征聘人才。采用察举、征辟来选用官吏，目的在于强化中央集权。但是，东汉末年以来，在农民起义的猛烈扫荡下，士人流散各地，基层政权的乡、亭、里组织遭到破坏，致使秦汉以来以“乡举里选”为主要根据的“察举征辟制度”，事实上已无法实行。《晋书·卫瓘传》云：“魏氏承颠复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移，考详无地，故立九品之制，粗具一时选举之本耳。”③就是这一情况的说明。

但当时，曹操在统一北方中原的过程中，为了维护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让更多的人为自己的事业服务，他不受东汉时期选拔官吏标准的限制，曾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方针，并加以贯彻实施，这对成就曹操统一北方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自东汉末年以来，士族豪强势力的发展，他们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成武装割据的地方实力派。曹操虽然打击过不肯依附自己的世家大族，但也广泛搜罗了一大批名门大族为己所用。当时著名的豪强地主、士人名流，如李典、许褚、荀彧、陈群、司马朗、司马懿之流，都是曹魏政权依靠的基本力量。曹丕继位为魏王后，为了代汉自立，进一步向世家大族妥协，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于是"九品中正制"便适应这种政治需要而确立起来了。因此，综合起来说，九品中正制的产生，一方面是东汉末年以来，乡、亭、里的基层政权遭到破坏，士人流散，因而使以乡举里选为基础的察举、征辟制度无法实行；另一面，是东汉末年以来士族豪强政治经济势力的发展。二者的结合，便导致了九品中正制的产生。

实行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长期操纵政权，提供了机会。在曹魏时期，中正官在品评人物时，还能家世与人才优劣兼顾。所谓"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④。晋卫瓘也说："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褒贬所加，足为劝励，犹有乡论余风。"⑤如陈寿遭父丧有疾，令婢丸药，客见之，乡党以为贬议，由是沈滞累年，张华申理之，始举孝廉。阎乂亦西州名士，被清议，与寿皆废弃。卞粹因弟裒有门内之私，粹遂以不训见讥被废。当时"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议升黜者"。如长史韩预，强聘杨欣女为妻，时欣有姊丧未经旬，张辅为中正，遂贬预以清风俗。陈寿因张华奏已官治书侍御史，以葬母洛阳，不归葬于蜀，又被贬议，由此遂废。又温峤已为丹阳尹，平苏峻有大功，司徒长史以峤母亡，遭乱不葬，乃下其品。说明"是已入仕者，尚须时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又

石虎诏云："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立之，亦人伦之明镜也。先帝黄纸（中正品第，用黄纸书写，藏于司徒府）再定，以为选举。今又阅三年，主者更铨论之。是魏以来，尚有三年更定之例，初非一经品定，即终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尝不详慎也。"⑥但由于中正一职，位居权要，一般都由官居高位的"著姓大族"来担任，因此他们控制了评定人物的大权，当然不会真正按才能来选官，而只会单纯以家世声名的高低来决定取舍。因此，九品中正制发展到晋时，便进一步变成为世家大族垄断上等官品的重要工具。

首先，主持选拔和评定官品的中正官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不列二品，就不能担任中正官⑦。因而担任中正官的世家大族实际操纵了西晋朝廷选任官职之权。史称"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⑧。如刘卞初入太学，试经当为四品，台吏（助中正访问之人）访问，欲令写黄纸一鹿车，卞不肯，访问怒言于中正，乃退为尚书令史⑨。何劭初亡，袁粲来吊，其子岐辞以疾，粲独哭而出曰：今年决下婢子品。王诠曰：岐前多罪时，尔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岐品，人谓畏强易弱也⑩。可见当此之时，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本人的意旨为轻重。正如刘毅所说："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⑪。

其次，这时家世、门第成为评定官品的唯一标准。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时，中正官还能按照士人的德行来评定品级。所谓"其始造也，乡邑清议，不拘爵位"。至曹魏末期和西晋时，中正官就完全按家世、门第高低作为评定士人品级的标准，吏部也按中正所定品级来定官吏品秩，这种方法称为"门选"。

史称“中间渐染，遂计资定品”⑫。而门选的结果，就形成“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⑬的现象。

其三，上品的界限提高，有权势的势家大族垄断上品官位。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时，一般是把九品中的第一、二、三品定为上品，定上品人做高官，定下品的人做低官。到西晋时，中正官则只把第一、二品定为上品，三品以下则定为下品了。如沈约在《宋书·恩倖传序》中云：“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又如《晋书·温峤传》峤奏军国要务六条，其中第六条云：“使命尤远，益宜得才，宣扬王化，延誉四方，人情不乐，遂取卑品之人，亏辱国命，生长患害，故宜重其选，不可减二千石见居二品者。”证明只有二品才是上品，三品以下便是卑品了⑭。特别是中正官并不“中正”，在评定九品时，往往循私舞弊，只根据家世的兴衰，贿赂的多少，个人的爱憎来定品位。所谓“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⑮。这样，家世高、权势大、贿赂多的世家大族子弟都为二品以上大官，而家境寒素、无权无势而又无钱贿赂的士人则被列为三品以下的下品，只能作小官、卑官。因而造成“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⑯的局面。九品中正制发展到晋，完全成了维护世家大族权益的有力工具。豪族地主正是利用这一特权，世代垄断了做官的权力。曹魏时期的许多家族，直到两晋南北朝始终衣冠不绝。如曹魏的司空崔林、卢毓、将作大匠郑浑、司空王昶等人的家族，后来与进入中原的鲜卑贵族合流，

成为北朝可以左右政局的富宗强室。曹魏的太傅王祥、典农中郎将谢瓒的后人，即后来有名的王导和谢安，在东晋时位居丞相、太傅，王、谢两大家族东晋以后，仍活跃于南朝，多次参与政局的演变，扮演着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

"九品中正制"的实行，从法制上正式肯定了东汉以来士族垄断官位的事实，对东汉以来逐渐发展起来士族门阀制度起了巩固作用。东晋司马氏政权，在实行九品中正的同时，还在法律上规定官僚士族按品位占田、占佃客和荫庇亲属等特权。这些措施，不仅为九品中正制提供了物质保证，也使东晋的士族门阀制度发展至顶峰。南北朝时，由于全凭世资取官的"九品中正制"，从政治上堵塞了庶族地主（指不是世代为官的一般地主）做官的道路，而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庶族地主在经济上的力量得到增强，他们希望在政治制度上有某种有利于他们的改变，士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突出，它们的对立进一步凝固化了。此时防止士庶混淆的最好办法是辨别姓族，"士族进身已不必关心中正给他的品第，问题只在于自己的血统"，门阀制度发展到这一阶段，"九品中正之制已不是士族专政必需的工具"⑰。到了隋朝，罢除了"九品中正之法"，创立进士科，开始实行科举制，这为庶族地主的参政打开了入仕之门。唐承隋制，全面推行科举取仕办法，正式完成了从"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的转变。在中国历史上推行几个世纪的"九品中正制"，随着士族地主的完全衰落，而寿终正寝。

注 释

①《廿二史劄记》卷八。

②《文献通考·选举考》。

③《晋书》卷三六。

④《宋书》卷九四《恩倖传序》。

⑤《晋书》卷三六《卫瓘传》。

⑥《廿二史劄记》卷八。

⑦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⑧《晋书》卷四八《段灼传》。

⑨《晋书》卷三六《刘卞传》。

⑩《晋书》卷三三《何劭传》。

⑪《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⑫《晋书》卷三六《卫瓘传》。

⑬《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⑭参见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⑮《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⑯《晋书》卷四八《段灼传》。

⑰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刘备据蜀

赤壁之战后，周瑜乘胜攻打曹操留守江陵（南郡郡治，今属湖北）的曹仁。经过一年多的激战，曹军伤亡颇重，放弃江陵北撤，孙权因此取得南郡及其以东沿江大片土地。刘备也乘胜向南攻占了原已投降曹操的武陵（治所在今湖南常德西）、长沙（今属湖南）、桂阳（治所在今湖南郴州）、零陵（今属湖南）四郡，表奏刘表的长子刘琦为荆州刺史。不久，刘琦病死，刘备任荆州牧，领兵驻公安（今属湖北），以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集其赋税，以充军用；以赵云领桂阳太守。

为了联合抵抗曹操，孙刘联盟进一步发展。孙权为笼络控制刘备，将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刘备则想离开不利于发展的公安这个小地方，从孙权手中取得江陵。这里利于北指襄、樊，西取巴、蜀。孙权接受鲁肃的建议，同意把江陵借给刘备，共拒曹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借荆州”。刘备获得有利发展的地盘并加强与孙权联盟，对曹操很不利，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写字，竟吃惊得落笔于地。刘备取得江陵后，

便以此作为荆州治所，有了比较稳定有利的据点。但刘备只据有荆州南部，北部的南阳（今属河南）、襄阳（今属湖北）仍为曹操据有，很难摆脱北面曹操和东面孙权的威胁。而且荆州经过赤壁之战，也受到很大破坏，不利于进一步发展势力。因此，庞统劝刘备赶快进取益州，指出："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孙吴，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于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他还特别指出：迟迟不动手，别人将抢先："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①这的确是事实。赤壁战后，刘备借荆州前，孙权曾接受周瑜的建议，决定趁曹操新败，无力南顾时，进兵取益州，并袭取汉中。后因周瑜在返回江陵准备进军的途中病死，刘备又极力反对，孙权才没有出兵取蜀。西取益州，本来就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的重大战略决策，现在更需要马上付诸实施。就在刘备急需取得益州的时候，正好遇上益州牧刘璋派法正前来请援，刘备便趁机领兵入蜀。

刘璋何以要向刘备请援？这是由于刘璋在益州统治不稳，矛盾重重造成的。刘璋是继其父刘焉为益州牧的。刘焉，字君郎，汉朝宗室，曾任洛阳令、冀州刺史、宗正、太常等职。黄巾起义削弱了东汉的统治。为了加强地方统治力量，刘焉向朝廷建议将一些重要地方的州刺史改为州牧，委以清重大臣，给以领兵治民之权。中平五年（188），朝廷接受刘焉的建议。刘焉自己也因此当了益州牧，和其他州牧一样，成为掌握一州军政大权的土皇帝。刘焉到益州上任之前，蜀地暴发了以马相、赵祗为首的农民起义，攻下绵竹（今四川绵竹东），杀死县令，攻破雒县（今四川广汉东），杀死益州刺史郤俭，占领蜀郡（治所在今四川成都）和犍为郡（治所在今四川彭山东）。巴郡

(治所在今四川重庆)的“板楯蛮”也先后起义。益州治中从事贾龙率领地主武装镇压了这几股起义力量，地方势力也因此大为发展。刘焉入蜀后，以他为代表的外来势力与本地地方势力的矛盾很尖锐。当时，今河南、陕西一带人流寓蜀中的有数万家，刘焉将他们收编为军队，号称“东州兵”，作为镇压当地地方势力的工具；又枉杀当地大姓巴郡太守王咸、李权等十余人，妄图以此树立威慑力量。结果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犍为太守任岐等的武装反抗。刘焉死后，当地大吏赵韪等因刘璋懦弱无能，拥立为益州牧，以便于操纵。但刘璋放任“东州兵”侵害当地百姓，引起人们不满。赵韪利用百姓怨恨，联合地方势力起兵进攻刘璋，得到蜀郡、广汉、犍为等郡的响应。刘璋依靠“东州兵”，作殊死战，才打败赵韪。这表明，刘璋集团与本地地方势力的矛盾更加尖锐。此外，刘璋集团与占据汉中、信奉五斗米道的张鲁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刘璋曾杀死张鲁的母亲和弟弟，并曾派兵镇压张鲁，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在矛盾斗争和社会动荡不安中，益州本地的和外来的有识之士，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维持本州稳定的局面，正如诸葛亮在“隆中对”所分析的：“智能之士，思得明君。”法正和张松就是他们的代表。他们二人密谋迎接刘备入蜀作为一州之主。

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击败马超、韩遂。刘璋听说曹操要派钟繇进攻汉中张鲁，恐怕曹军趁机攻蜀，十分紧张。张松便趁机向刘璋指出，如果曹操取得汉中，再南下攻蜀，就无法抵挡。荆州的刘备和将军同是宗室，他是曹操的仇敌，善于用兵，若请他讨伐张鲁，一定能取胜。消灭了张鲁的势力，益州

便强大了，曹操再来攻打，也无能为力。张松还进一步指明利害说，现在州中诸将如庞羲、李异等都恃功骄横，有背叛之意。如果不请刘备来，则敌攻其外，民攻其内，益州难保。刘璋认为他说得有道理，便派法正领兵四千，去荆州迎接刘备入蜀讨伐张鲁。他对属下黄权等的反对意见，一无所纳。

法正到了荆州，便请刘备趁此机会袭取益州，并向他献计说："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凭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②刘备便率数万军队入蜀，让庞统随行，留诸葛亮、关羽等守荆州。

刘璋命令沿途各地保证供给，提供方便，使得刘备入境如归，顺利到达巴郡，然后北上至涪县（今四川绵阳东）。刘璋从成都率步骑三万来会，欢宴百余日。张松让法正告诉刘备，利用这个机会袭杀刘璋。庞统也认为："今因此会，便可执之，则将军无用兵之劳而坐定一州也。"刘备则以为："初入他国，恩信未立，此不可也。"③没有接受。刘璋给刘备增加兵员，并厚加资给，使北讨张鲁，又让他督领白水关（今四川广元东北）驻军。刘备向北到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便停止前进，在当地厚树恩德以争取人心。

建安十七年（212）冬，庞统向刘备提出袭取益州的上、中、下三策。选精兵，昼夜兼程，乘刘璋不备，一举拿下成都。此为上策。刘璋的名将杨怀、高沛以强兵驻守白水关，曾多次向刘璋建议将刘备等遣回荆州。现在告诉他们，荆州有紧急情况，需回军救援，他们一定来送行。乘机将他们逮捕，兼并他们的军队，然后向成都进兵。这是中策。下策是退军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和荆州联络，然后再图进攻成都。庞

统还认为，必须马上决定采取行动，再迟疑不决，将误大事。刘备认为上策太急，下策太缓，决定采取比较稳妥的中策。

这时候，恰巧曹操向孙权进攻，孙权要求刘备自救。刘备便给刘璋写信说，我与孙权本为唇齿相依的关系，而关羽兵弱，不前往救援，则曹操必定攻取荆州，转侵益州，这比张鲁更危险，张鲁不过是自守之贼，不必忧虑。因此，他向刘璋要求增兵一万和资粮，以便回救荆州。刘璋只给兵四千，资粮等也只给一半。刘备于是激怒其部众，回军杀死刘璋白水关守将杨怀、高沛，收编他们的军队，进据涪城。刘璋先后派吴懿、李严、费观等领兵抗击刘备，但他们都先后向刘备投降。刘备军威更盛，分遣诸将平定下属各县，并围攻雒城。建安十九年(214)，诸葛亮按刘备的命令，留关羽守荆州，带领张飞、赵云等沿江西上，占领巴东（治所在今四川奉节东），破江州，俘太守严颜。然后赵云分兵向南，张飞分兵向北，攻占今四川东部郡县。这年四月，刘备攻陷雒城，进围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引兵会合。马超被曹操打败后，一度投靠张鲁，这时也来投刘备。刘备让他屯兵城北，共围成都。刘璋等闻马超归刘备，更加恐慌。当时城中尚有精兵三万人，谷帛足以支持一年，吏民主张作殊死抵抗。刘璋认为，自己父子两代在益州二十多年，无恩德以加百姓，现在百姓为了我已历三年征战之苦，再战于心不安，于是出城投降。刘备将刘璋迁徙于公安。

刘备进入成都，取城中金银分赐将士。当时有人主张，以城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赵云反驳说："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④刘备采纳他的意见。刘备取得益州后，自领益州牧，以军师中郎将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益州太守。刘备除了任用原

来手下人如关羽、张飞、赵云、黄忠等人之外，为缓和刘焉、刘璋父子时期主客矛盾，对原来刘璋手下的官员，无论本地的外来的，都给予重用。如刘璋所重用的董和、黄权、李严、许靖等，刘璋的姻亲吴懿、费观等，受刘璋处分的彭羕，与刘备有宿怨的刘巴，刘备都把他们安排在显要位置，以发挥他们的才能。于是有志之士，争相效力，原来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刘备在益州的统治渐趋稳定。

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占领成都的第二年，曹操率军讨张鲁，攻陷阳平关，张鲁奔巴中（今嘉陵江上游地区），不久投降曹操。曹操进入汉中郡治所南郑（今属陕西），占据汉中。当时司马懿与刘晔都向曹操建议说，刘备立足未稳，应趁胜攻蜀。曹操因力量不足，且孙权正率众十万大军进攻淮南，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决定回军东向。曹操撤走后，留下夏侯渊督率张郃、徐晃等守汉中。汉中是益州北面门户，在曹操手中对益州是个威胁。刘备要北伐中原，也需要这个据点。建安二十二年（217），法正建议刘备抓紧时机夺取汉中，他认为夏侯渊、张郃的才略，不如蜀之将帅，举众往讨，一定可以攻克。攻占汉中之后，可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以倾覆寇敌，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⑤。刘备接受法正的意见，率诸将进兵汉中，留诸葛亮守成都，负责物资供应。建安二十三年（218），刘备推进到阳平关，与魏将夏侯渊等对峙一年多，不能克敌。建安二十四年（219）春，刘备南渡沔水，驻屯定军山（今陕西勉县西南）。夏侯渊引兵来战，被黄忠打败，斩杀。张郃统领曹军还守阳平关。曹操自长安举众南征，出斜谷，亲临汉中。刘备聚众据险自守，不与曹操交战。曹操与刘备相持月余，求战不得，粮运

不继，士兵多逃亡。五月，曹操全军从汉中撤回长安，刘备进据汉中。

刘备占据汉中后，又派刘封、孟达等攻占房陵（今湖北房县）、上庸（今湖北竹山西南）等地。

同年秋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于沔阳（今陕西勉县东），任魏延为镇远将军，领汉中太守，镇守汉中。刘备返回成都。

第二年（220）正月，曹操病死。冬十月，曹丕代汉称帝，改元黄初。

公元221年，蜀中传言汉献帝已遇害。四月，刘备便在成都即皇帝位，改元章武。以诸葛亮为丞相，录尚书事；以许靖为司徒；置百官，立宗庙；立刘禅为皇太子。因刘备以复兴汉室为己任，故国号仍称汉。因其辖境主要为蜀地，所以历史上又称蜀汉。

注 释

①《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注引《九州春秋》。

②《三国志》卷三七《法正传》。

③《三国志》卷三七《庞统传》。

④《三国志》卷三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⑤《三国志》卷三七《法正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夷陵之战

刘备占据巴蜀、汉中之后，势力发展到鼎盛时期，基本上具备了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二州，然后分兵两路北伐中原的地域条件。但情况很快发生变化，蜀吴双方为争夺荆州，引发了夷陵之战。结果，刘备惨败，不但失掉荆州，而且国力大伤。

当初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是在强敌曹操的威胁面前，联刘抗曹的暂时措施。赤壁战后，曹操战败，退出荆州，但仍占据荆州北部的南阳郡（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和南郡北部襄樊一带。孙权占据南郡南部的江陵及沿江一带。刘备占据荆州南部四郡。所谓“借荆州”，实际上是孙权将所占据的南郡南部，特别是重镇江陵借给刘备。刘备以江陵为荆州治所，从公安（今属湖北）移驻江陵。荆州对曹、孙、刘三家的战略意义都十分重要。孙权失去荆州，江东就失去上游屏障；曹操获得荆州，顺流而下，对孙权是最大的威胁；刘备据益州后，如果失去荆州，就失去下游屏障和分兵北伐中原的东路据点。所以，这里是三家必争之地。早在孙氏据江东之初，孙吴的一些有识

之士就认为，必须占据上游，才能保住江东，发展势力。孙权继承父兄遗业的当年（200），鲁肃就向他提出：趁北方纷争，“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①。后来孙权不能全据荆州，是赤壁战后的形势造成的，但他并不安于现状，要抓紧一切机会去实现对荆州的占领。

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取得益州。第二年，孙权便派使者向刘备索还荆州。刘备以取得凉州（治所在今甘肃张家川）后再归还荆州为辞，加以拒绝。孙权十分恼火，便派吕蒙率兵袭夺了刘备手中的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均在今湖南境内）。刘备亲自东下至公安，督关羽领兵争夺三郡。孙权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西南），为诸军节度，使鲁肃率军抵抗关羽。就在荆州争夺战一触即发的时候，刘备得知曹操进攻汉中张鲁，恐益州有失，便主动向孙权求和。孙权也准备集中力量进攻淮南，同意和谈。结果双方协议重新瓜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权；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三郡属刘备。双方求得暂时妥协，保持联盟关系。

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众向曹军占据的襄樊发动进攻。曹操先后派徐晃和于禁率军援救驻守襄樊的曹仁。时值夏季连日暴雨，樊城被洪水包围，在关羽水军的猛攻下，于禁率众投降。关羽军分别围困樊城和襄阳，曹操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芳都投降了关羽。许都以南地区百姓也起而响应关羽。于是关羽“威震华夏”，曹操曾讨论迁都以避其兵锋。

关羽得势，孙权不安。曹操手下的司马懿等也看出，孙刘两家外亲内疏，孙权不愿意关羽得志。他们建议曹操劝孙权抄关羽的后路，答应以江南封给孙权。曹操采纳他们的建议，孙权也写信给曹操，以讨关羽作为报效。于是孙权亲自率军沿江

而上，派吕蒙为前部，直趋江陵。为了不让关羽沿江守军发觉，吕蒙将战船伪装成商船，精兵藏于船中，摇橹的士兵也装扮成商人，以突然袭击的办法逮捕了关羽的沿江岗哨。吕蒙军在敌人毫不觉察的情况下，突然兵临城下，关羽留守公安的士仁和留守江陵的糜芳先后开城投降。吕蒙夺取江陵后，安抚全城百姓和关羽将士的家属，关羽前方将士的斗志瓦解。关羽得知江陵失守，即向南撤退，同时派人到上庸要求刘封和孟达派兵增援。他们以上庸新定为借口，拒绝派兵。对于撤退中的关羽，曹操不加追击，以免孙权方面由于曹军袭击关羽转而防曹，留下关羽与孙权相斗，对自己更为有利。关羽自知势孤，乃西保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孙权使人诱降，关羽以伪降作掩护出逃，兵卒都走散，只剩下随从十余骑。孙权先已派潘璋等断绝其逃路。十二月，关羽被潘璋部下马忠俘获，被斩首。曹操表奏孙权为票骑将军，领荆州牧，封南昌侯。从此，孙权便袭取了原来刘备所占据荆州的部分地区，控制了三峡以下长江沿线。

刘备失去荆州，既失去下游的屏障，又失去分兵北伐中原的东路据点，更失去关羽这员虎将，打击实在太大了。蜀章武元年（221）四月，刘备称帝，七月即亲率五六万大军进攻孙权。对于刘备的这一行动，蜀汉内部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翊军将军赵云指出，“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操身虽毙，子丕篡盗，当因众心，早图关中，……以讨凶逆”，“不应置魏，先与吴战”②。对这样正确的意见，刘备根本听不进去，甚至还处罚一些敢于提不同意见的官员。这时候，孙权派遣使节向刘备求和。孙权的南郡太守诸葛瑾也给刘备写信，[illegible]关羽与汉献帝相比较（当时传言献帝被曹氏所

害)，看究竟谁更亲，将荆州与全国相比较，看究竟哪个大哪个小，劝他不要因小失大。对于孙权的求和，刘备加以拒绝；对诸葛瑾的善意相劝，刘备根本听不进去。他下决心一定要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

孙权向刘备求和不成，为避免两面受敌，便派遣使节向曹魏称臣，并将投降关羽的魏将于禁护送归魏。于是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并赐九锡。孙权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朱然、潘璋、韩当、孙桓等将领及士卒五万人，西向拒敌。

刘备领兵出发前，让车骑将军张飞自阆中（今属四川）率兵万人到江州（今四川重庆）与大军会合。张飞临出发时，被帐下将张达等杀死。刘备还未开战，就丧失一员大将。

刘备的先头部队在将军吴班、冯习率领下，首先在巫县(今四川巫山县北）打败吴将李异、刘阿等，然后推进到秭归(今属湖北)。刘备从秭归继续进发时，治中从事黄权劝阻说："吴人悍战，而水军沿流，进易退难，臣请为先驱以当寇，陛下宜为后镇。"③刘备不听，以黄权为镇北将军，使督江北诸军前进，以防魏军，而自率主力自南岸缘山东进，驻扎于猇亭(今湖北宜都北)。刘备又派马良到今湖南沅水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招纳五溪蛮夷北上配合。当时吴军诸将要求迎击刘备，陆逊没有同意。他认为刘备举军东下，现在锐气正盛，且乘高守险，进攻难获全胜。但蜀军缘山行军，兵势难以施展，反而会疲于木石之间。因此他采取诱敌深入，等待战机，后发制人的策略。刘备在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东西一线树栅连营七百余里，分设数十营寨，以冯习为大都，张南为前部督，自公元222年正月与吴军相对峙，到六月还得不到决战机会。他曾让吴班领数千人在平地立营，同时在山谷中设伏兵八千，想诱使

吴军出战，然后伏兵出击。但陆逊识破刘备的图谋，没有上当。这时正值盛夏，天气炎势，刘备的士气越来越低落，供应也发生困难。他改变原来水陆俱进的部署，让水军离船上岸，在山林中安营扎寨。

陆逊认为，这时候刘备的军队已疲惫不堪，锐气尽失，已施展不出更多的作战谋略，打垮他们的时机已到。于是，他先试探性进攻刘备一个营寨，结果没有取得成功。他从失败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决定采取火攻的办法。他命战士各持一把茅草，到蜀营放火，火势形成后全线出击。结果连破四十余营，刘备军全线崩溃。蜀将冯习、张南和少数民族首领沙摩柯等战死，杜路、刘宁等投降。刘备登上夷陵西北面的马鞍山，"陈兵自绕"，依山自守。陆逊督诸将四面围攻，蜀军土崩瓦解，死伤甚众。刘备乘夜突围，带领少数人马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蜀军的舟船、器械、水、步军军用物资损失殆尽，尸骸沿江飘流而下。督江北诸军的黄权，因道路被截断，不能返回，投降了曹魏。

当时吴军有的将领主张乘胜追击，俘虏刘备。这时曹丕已大规模集结军队。陆逊认为曹魏表面上要帮助我们讨伐刘备，内心里另有图谋。因此，他没有穷追刘备，而立即东撤以防魏。当年九月，曹丕果然以孙权不送儿子入质为辞，向吴发动全线进攻，命征东大将军曹休、前将军张辽等向洞口（今安徽和县境）；大将军曹仁向濡须（今安徽无为东南）；上军大将军曹真等围南郡。曹丕也从许昌南征，十一月抵宛（今河南南阳）。孙权迫于曹魏兵势，在临江拒守的同时，派遣使节向蜀汉通报求和。惨败后的刘备既无力再战，也担心魏灭吴后，蜀汉更不能存在，只好同意孙权的请求，派使节回报。这样，双

方因战争中断的关系得以恢复，这场战争彻底结束。

但这场战争的失败，对刘备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不但夺回荆州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相当大部分的兵力和财力都付诸东流，使蜀汉元气大伤。战后，刘备便一病不起，蜀章武三年（223）四月死于白帝城，终年六十三岁。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六三，献帝建安五年。

②《三国志》卷三六《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③《资治通鉴》卷六九，文帝黄初三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诸葛亮治蜀

蜀章武二年（222）秋，夷陵之战惨败后，刘备归驻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不久便病倒了。第二年（223）二月，诸葛亮应命从成都来到白帝城。四月，刘备病死。刘备临终命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以尚书令李严为副。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感激涕泣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又遗诏敕太子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①诸葛亮送刘备灵柩回成都，办理丧事，以李严为中都护，扼守白帝城。五月，十七岁的太子刘禅即皇帝位，史称后主，改元建兴。封丞相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论大小，全由诸葛亮决断。从此，诸葛亮便担负起治理蜀汉的重任，成为实际上的蜀汉最高统治者。

诸葛亮治蜀，基本上是按照当年他在"隆中对"中所提出的方针进行的。当时，诸葛亮面临的困难是相当大的。夷陵之战惨败，蜀汉元气大伤，新丧元首，境内动荡不安。早在刘备病重时，汉嘉（治所在今四川名山北）太守黄元乘诸葛亮不在

成都的机会，举郡反叛，烧临邛城（今四川邛崃），顺流而下，准备投降孙吴，结果在南安（今四川乐山）被捕杀。刘备死后，南中（今四川南部、云南、贵州）一时俱反。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大姓雍闿杀太守正昂，又执太守张裔送往孙吴，获得支持，被孙吴任为永昌（治所在今云南保山东北）太守。他还让孟获诱煽南中各少数民族反叛。牂柯（治所在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越嶲（今四川西昌）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同时俱反，响应雍闿。诸葛亮因新遭大丧，对他们都抚而不讨，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诸葛亮执政之初，即着手修复和巩固与孙吴的联盟关系。早在夷陵之战后，刘备死去前，蜀吴间虽恢复通好，但战争造成的裂痕依然存在。孙吴与曹魏并未断绝关系，还支持蜀汉南中地区的叛乱。诸葛亮在执政的当年（223）冬天，即派邓芝使吴，重申盟约。但孙权态度犹豫，耽心蜀主年幼，国力弱小，在曹魏威胁下，不能保全。邓芝向他指出，吴蜀共有四州之地，您和诸葛亮都是现时的英杰，而且，“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长，共为唇齿，进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②。邓芝还进一步指出，若吴归顺于魏，大则要您入朝，小则要您太子为人质，如不从命，则奉辞讨伐，蜀亦将乘机顺流而下，江南之地将非东吴所有。孙权沉思良久，经过权衡利害，终于决定与魏断绝关系，与蜀恢复联盟。从此，双方使节常相往来，互致方物，在抗魏中互相声援。但联盟关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汉内部一些人认为孙权已“僭逆”，应断绝联盟关系。诸葛亮则从现实出发，考虑长远利益，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与孙吴断交，就需要两面作战，灭吴以后才有可能北伐中原，这

在目前是办不到的；即使在东边屯兵相守，也不利于北伐，而使曹魏得计。如保持联盟关系，我大军伐魏时，孙权为占领魏地，示武于内，也会向魏出兵，而不会坐视；就算他坐视不动，我也可无东顾之忧，曹魏在黄河以南的兵力，为防吴不能移向西线，对我北伐也是极为有利的。因此，他不但不谴责孙权“僭逆”，而且还派陈震为使者，对孙权称帝表示祝贺。孙权与陈震登坛歃血为盟，约定中分天下各州：“以徐、豫、幽、青属吴，并、凉、冀、兖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③这些州都在曹魏手中，这种瓜分天下，自然是象征性的，但它标志着蜀吴联盟关系的继续存在和巩固。

蜀吴联盟关系的修复和巩固，就使得诸葛亮消除东顾之忧，致力于南征和北伐，集中力量治理蜀汉内部。

诸葛亮执政后，即“约官职，修法制”④。他要求朝廷的官员们集思广益，为蜀汉政权尽忠尽力，并给自己予支持。他要求他们像当年徐庶那样，不计较个人得失，对问题反复讨论，以求得比较满意的结论；像董和那样，对不恰当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十次提出自己的看法。诸葛亮认为，属下能够这样做，他自己就可以少出现过失。他希望与属下共事过程中，能像当年结交崔州平那样“屡闻得失”，像结交徐庶那样“勤见启诲”，像与董和共事那样“每言则尽”，像与胡济相处那样“数有谏止”⑤。一个掌握最高权力的丞相，对下属能够如此坦诚，是难能可贵的。史书记载表明，诸葛亮不但这样说，也力求这样做，他实行的确实是较开明的“纳言之政”。

诸葛亮在治蜀过程中，很重视维护和发展农业生产。蜀地的农业生产原来就比较发达，农田水利搞得比较好。都江堰是成都平原农业的命脉，能“使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

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诸葛亮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堰农本，国之所资"⑥，因此，特征调一千二百人经常维护，并设堰官管理。为保证军粮供应，他还在一些军事要地如汉中等处，实行屯田，设督农官管理。这有利于减轻农民征粮、运粮负担，发展农业生产。

诸葛亮还利用蜀地丰富的盐铁资源，发展制盐和铁器制造业，设司盐校尉和司金中郎将，实行官营。王连任司盐校尉时，"校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⑦。可见盐铁生产的规模和效益都相当可观。盐铁生产部门还是人才集中的地方，其中吕乂、杜祺、刘干等后来都成为蜀汉的高级官员。这说明盐铁生产是很受重视的部门。丝织业也很发达，成都的蜀锦更是驰名全国的名产。它是蜀汉朝廷大量赏赐大臣的珍贵物品，也是与孙吴交往的主要礼品，更是与吴、魏交易的主要货物。诸葛亮曾说过，"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⑧。可见织锦业在蜀汉财政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农业、盐铁和丝织业的发达，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从左思的《蜀都赋》中，我们可以窥见成都商业的盛况："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诸葛亮措置得当，蜀地经济情况较好，是蜀汉在与强敌对峙中，以一州之地坚持半个世纪的重要原因之一。

诸葛亮治蜀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严明法令，赏罚必信。他很重视法制建设，曾与法正、刘巴、李严、伊籍共同制订《蜀科》，作为执法的根据。为清除刘焉父子统治益州时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⑨的积弊，他强调必须严格执法。无论罚有罪还是奖有功，他都注意严明公允，对蜀土人士和随刘备入蜀的人士，对高级官吏

和一般官吏，都一视同仁。马谡才器过人，深受诸葛亮赞赏，建兴六年（228）第一次北伐时，让他率先头部队。在街亭（今甘肃庄浪南）之战中，他违反诸葛亮的部署，被魏军击溃，造成这次北伐的失败。诸葛亮为严肃军纪，惩前毖后，挥泪将他处死。丞相长史向朗对马谡逃亡知情不举，被免官。老将赵云在这次北伐中，因箕谷失利，也被贬官。李严原是刘璋手下的重要官员，和诸葛亮同受刘备遗命辅佐刘禅，地位仅次于诸葛亮。建兴九年（231），他负责北伐军的军粮供应，因雨运粮困难，竟假传后主刘禅的旨意，命诸葛亮撤军。撤军后，他又说军粮已足，对撤军佯作惊异。同时他又对刘禅说，撤军是为了诱敌深入，企图掩盖自己的过错。诸葛亮查清全部事实后，将李严削职为民，徙居边郡。廖立被诸葛亮视为与庞统不相上下的楚地良才，后因诽谤刘备，疵毁众臣，也被削职为民，徙居边郡。

诸葛亮执法严，但并不滥施刑罚，在史书记载中，蜀国的死刑并不多见。街亭之败后，被处死的除马谡外，还有将军张休、李盛。此外如彭羕因图谋煽动马超共同反叛、刘琰因诋毁后主刘禅被处死。在封建社会中，他们这样的过失是严重的，被处死也不足为怪。同时期的孙吴和曹魏，滥杀甚至族诛不断。在诸葛亮统治下的蜀国，族诛却极少见。

诸葛亮执法严明公允，还表现在对有才能有实绩的官员的提拔任用上。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时，命令诸葛亮火速从成都发兵增援。诸葛亮征求当过郡守属官的杨洪的意见。杨洪认为汉中是益州的咽喉，无汉中则无蜀，应毫不迟疑地发兵增援。诸葛亮认为他很有见识，便让他代理蜀郡太守；他办事很得力，便又加以正式任命。王平行伍出身，识字不多，是马谡的

属官。他在街亭之战前，对马谡的错误措置敢于提出意见。街亭之败后，部众溃散，他却能保全所领千人，并收合各营散卒，率将士而还。诸葛亮将马谡等人处死的同时，却提升王平为将军，封亭侯，充当自己身边的战将。北伐期间，蒋琬任丞相府的留府长史，工作很有成效，常足食足兵供应前线。诸葛亮于是密表后主："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10]推荐他为自己的接班人。诸葛亮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事例很多，所以蜀土人士赞扬他能尽时人之器用。把有才有识之士组织在统治集团中，既增强统治力量，又有利于政权的稳定。

诸葛亮不但执法严明、公允，而且一贯严于律己。他因授任无方，用人不当，造成街亭之败，奏请自贬三等，以右将军代行丞相职权，同时向境内公布自己的过失。他要求子侄"淡泊以明志"，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李严曾劝他受"九锡"，进爵为王。这通常是封建社会的权臣谋取帝位的道路，同时代的曹氏和司马氏就是这样做的。但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诸葛亮却拒绝走这条路。他答复李严说，自己本是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刘备，一心考虑的是报答知己，复兴汉室，不能坐自贵大。诸葛亮早年无子，其兄诸葛瑾之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很有才学，颇有名气。但诸葛亮没有像同时代的曹氏和司马氏那样，让子弟充当自己的副手，为他们日后掌权甚至夺取帝位铺设台阶，诸葛乔只不过是一名没有实权的附马都尉。在北伐中，诸葛亮还让他和诸将子弟一起在汉中督运物资，以使他同诸将子弟同荣辱。除成都的薄田十五顷、桑树八百株外，诸葛亮没有另外经营产业，实现了自己提出的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11]的保证。他一生兢兢业业，身为丞相，事必亲恭，甚至"自校簿书，流汗竟日"[12]，实现了他在《后出师

表》中所立下的"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誓言。可以说，诸葛亮在我国封建统治者中，是一位能以很高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的楷模。

正因为诸葛亮执法严明、公允，严于律己，所以他能"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⑬。受他处分的人也口服心服，听到他的死讯，廖立垂泣，李严发病死去。被他提拔重用的人，在他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的影响下，一般也比较勤勉廉洁。蒋琬办事稳健，能听得进下属抨击自己的意见。费祎精明干练，办事效率之高异乎常人，且"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⑭。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乐学不倦，清素节约"⑮。当时蜀地受战乱破坏较小，仍很富庶，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⑯。在这样奢侈的社会风气下，蜀汉统治集团能做到比较勤勉廉洁，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因此，与同时期的吴、魏相比，蜀汉统治集团比较稳定团结，没有因争权夺利而相互残杀。在刘禅是个昏庸之君的情况下，要维持这种局面也是很不容易的。总体说来，蜀汉政权在三国中比较清明，社会矛盾也比较缓和，没有发生大的动荡。这也是它以区区一州之地，能与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曹魏抗衡，存在近半个世纪之久的重要原因。

历史上对诸葛亮治蜀一贯给予很高的评价。他的属官张裔称赞他"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也评论说："诸葛亮之为国相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

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⑱。《袁子》的作者也指出："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⑲这些评论难免有溢美之词，但论者或是诸葛亮同时代的人，或时代相去不远，他们的评论，应当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实际情况。当时蜀汉境内的各族人民也用行动对诸葛亮治蜀作出评价。诸葛亮死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祭"。这种情况并非出于一时的热情，肯定是持续不断的，所以三十年后的景耀六年（263），蜀汉朝廷为了顺应民心，才不得不同意在沔阳（今陕西勉县）诸葛亮墓地附近立庙，"断其私祭，以崇正礼"⑳。

注　释

①《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②《三国志》卷四五《邓芝传》。

③《三国志》卷三九《陈震传》。

④⑤《资治通鉴》卷七0，文帝黄初四年。

⑥《水经注·江水》。

⑦《三国志》卷四一《王连传》。

⑧《诸葛亮集》卷二。

⑨《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蜀记》。

⑩《三国志》卷四四《蒋琬传》。

⑪⑫《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⑬《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⑭《三国志》卷四四《费祎传》注引《祎别传》。

⑮《三国志》卷四四《姜维传》。

⑯《三国志》卷三九《董和传》。

⑰《三国志》卷四一《张裔传》。

⑱《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

⑳《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三国两晋南北朝

诸葛亮南征和北伐

蜀汉的南中地区，包括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设越
嶲、益州、永昌、牂柯四郡。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汉代统称
为“西南夷”。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南抚夷越”，指
的就是要安抚好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

刘备据蜀后，设庲降都督驻平夷（今贵州毕节），负责治
理南中地区，先派将军邓方为庲降都督。邓方死后由李恢继
任。他们对当地少数民族不轻易用武力征服，对其上层人物加
以一定的约束。邓方在当地各族人民中还有相当高的威信。这
说明蜀汉政权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是比较得力的。

蜀建兴元年（223），刘备在夷陵惨败后病死，国力大伤，
后主刘禅新立。于是，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大姓雍
闿、牂柯郡（治所在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越嶲郡（治
所在今四川西昌）少数民族首领高定（又称高定元）一时俱
反。诸葛亮因值大丧之后，内部不稳，皆抚而不讨。

蜀建兴三年（225），经过几年“闭关息民”，稳定内部，
特别是与吴修复和巩固联盟关系，消除了东顾之忧后，诸葛亮

便亲率大军南征。

诸葛亮领军出发时，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诸葛亮就这次军事行动的策略征求他的意见。他认为在以后倾全力北伐时，南中地区趁国力内虚，反叛是很容易的。全部消灭他们以除后患，不符合仁者之情，也不容易办到。因此他提出“攻心”的策略，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①他的建议和诸葛亮“南抚夷越”的精神是一致的。自然被诸葛亮采纳。

诸葛亮分兵三路。他自率西路军向越嶲，攻击高定叛军。东路军由马忠率领，由焚道（今四川宜宾）向东南攻打牂柯的朱褒叛军。中路军由庲降都督李恢率领，从其驻地平夷出发，向南攻打益州郡的雍闿叛军。

诸葛亮的西路军进展顺利，歼灭了高定叛军，杀死高定，占领了越嶲郡。东路的马忠军也打败了朱褒，攻占了牂柯郡。只有中路李恢军遭受挫折。同年五月，诸葛亮率军渡过泸水（金沙江），穿越人烟稀少的山区，追近益州郡。这时雍闿已被高定的部下杀死，孟获取代了他的地位，收集余众抵抗。孟获是少数民族首领，在南中地区很有影响。诸葛亮对他采取攻心战术，俘获以后，他不服。诸葛亮对他不杀不辱，把他释放了，让他再战。经七擒七纵，最后他心服口服，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②终于投降。诸葛亮与马忠、李恢等会合于滇池（今云南晋宁东）。于是，南中叛乱全部平定。

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对地方的行政建置作了调整，将原来的四个郡分为六个郡。郡太守这一级官员，由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或当地人担任，如李恢、吕凯就是当地人。县和县以下的各级官吏，基本由当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担任。诸葛亮认为，若

委派外地人，则当留兵，就需要运送粮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相安故耳”③。一些在当地有威望、愿意合作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还被请到成都任官，如孟获官至御史中丞，爨习官至领军将军，孟琰官至辅汉将军。这些措施实际上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继续。

蜀汉政权在南中地区不但不留兵不运粮，而且还从当地调发人力当兵，并“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④。

诸葛亮的南征，虽然是一种武力征服，但使这一边远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从此加强，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化进程加快。牛耕、煮盐、冶铁、织锦等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入和推广，有利于当地经济进一步发展。当地后世还留传着不少有关诸葛亮的故事，把许多与诸葛亮无关的事物，都说成是他南征带去的，或是由他传授的，有的还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这些都表明当地百姓对诸葛亮一些措施的肯定，当地各族人民对他的好感。

由于诸葛亮的措置比较适当，自后南中地区没有发生大的动荡，比吴、魏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相对平静。这样，诸葛亮的南征消除了后顾之忧，其后可以安心于北伐中原。

蜀建兴五年（227）春，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作出师北伐的准备。北伐中原，兴复汉室，是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确定的战略目标。但时间已过去二十年，时过境迁，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荆州失守后，分兵两路北伐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只剩西边一路。北方的曹魏已日趋稳定，经济也从战乱的严重破坏中逐渐恢复，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比蜀强大。两相对比，蜀灭魏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那么，诸葛亮为什么

还要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连年用兵呢？这里有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苦衷。刘备和诸葛亮都以兴复汉室为己任，作为蜀汉立国的根本。诸葛亮在出屯汉中前所上的《前出师表》中，强调说明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⑤。两年后，公元229年孙权称帝，蜀汉一些大臣所以反对与其保持联盟关系，就是认为与僭逆者联盟，不符合兴复汉室的基本国策。诸葛亮用以说服这些人的唯一理由，也是暂时利用联盟，有利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这说明蜀汉既以兴复汉室为职责，如不北伐曹魏，对内对外都失去建立政权的根据和号召力，要继续存在就更困难了。此外，北伐曹魏，也是诸葛亮以攻为守的策略。曹魏要以武力统一全国是既定方针，问题只是灭蜀灭吴谁先谁后和等待时机。蜀汉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以战求存。关于这一点，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说得很清楚：“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⑥因此，诸葛亮只能尽最大的主观努力，为争取达到既定的战略目标，“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公元228年春，诸葛亮从汉中开始了第一次北伐进军。出发前留守汉中的魏延建议，由他领精兵五千和负粮兵士五千，出褒中（今陕西褒城）沿秦岭而东，由子午谷（今陕西西安南）袭取长安（今陕西西安）。同时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今陕西眉县南）。在魏军调集前，两军在长安会合，这样可以一举定咸阳（今属陕西）以西地区。诸葛亮认为这样太冒险，不如先取陇右再取关中稳妥。于是扬言由斜谷进攻郿城（今陕西眉县北），以赵云、邓芝军为疑兵，据箕谷（今陕西褒城北），以吸引魏将曹真都督关右诸军进屯郿城防堵。诸葛亮则率主力向西北出祁山（今甘肃和县北）。曹魏因蜀汉自刘备死后，几

年来寂然无闻，对其北伐没有防备，突然得知诸葛亮出兵，朝野恐惧。陇右的天水（治所在今甘肃甘谷东南）、南安（治所在今陇西渭水东岸）、安定（治所在今甘肃镇原东南）三郡叛魏响应蜀军，曹魏天水参军姜维也投奔诸葛亮。魏明帝曹叡西镇长安，派张郃督步骑五万西拒诸葛亮。

在有利的形势下，蜀军的前锋马谡推进到街亭（今甘肃秦安东北），违反诸葛亮部署，拒不接受下属王平的正确意见，不据城，舍水上山。张郃切断其汲水通道，大举进攻。马谡等溃败，士卒离散，街亭失守。这使诸葛亮失去进攻的据点，同时，东线的赵云、邓芝军也遭失败。诸葛亮只好撤回汉中，第一次出兵祁山以失败告终。

街亭之败后，诸葛亮上疏自请贬官三等，以右将军代行丞相职权。赵云因兵败箕谷，被贬职。马谡等因失街亭，被处死。诸葛亮“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民忘其败矣”⑦。

同年冬，曹魏宗室曹休在淮南被吴将陆逊打败，魏军东下。诸葛亮趁关中虚弱，又率军北上，出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包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出军前，为释朝中群臣之疑，他上了《后出师表》。陈仓的魏军已有准备，魏将郝昭据险固守。诸葛亮想尽各种办法，猛攻二十多日，不能得手。魏援军将到，诸葛亮粮尽，只好撤回汉中，退军途中杀死前来追击的魏将王双。

蜀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派部将陈式攻打武都（治所在今甘肃成县）、阴平（治所在今甘肃文县西北）二郡。魏将郭淮领兵前来救援，被击退，蜀军占领二郡。后主刘禅恢复诸葛亮丞相职位。

蜀建兴八年（230）六月，魏大司马曹真率大军由斜谷、司马懿由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北）、张郃由子午谷三路进攻汉中。诸葛亮闻讯，即进驻成固（今陕西南郑东）防堵，并调李严率军二万来汉中增援。遇大雨三十余日，斜谷等处道路不通，魏明帝在众大臣的劝谏下，下令曹真等撤军。对于诸葛亮来说，这是一次防御战。

蜀建兴九年（231）春，诸葛亮率诸军围祁山。鉴于历次北伐主要是因为军粮运输困难，难以为继而退军，诸葛亮这次特别设计了一种独轮小推车作为运粮工具，当时称为“木牛”。这时魏将司马懿代替曹真西屯长安，督将军张郃等抗击蜀军。司马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今甘肃天水），让其余军队西救祁山。诸葛亮分兵继续围攻祁山，亲自领兵进攻司马懿，沿途打败郭淮等部的截击，与司马懿遭遇于上邽以东。司马懿依险坚守，拒不出战。在众将的请求和讥讽下，司马懿只得派张郃出战，结果大败，又退守营寨。这时因军粮困难，李严又假传后主刘禅撤军的谕旨，诸葛亮又一次撤回汉中。退军中，司马懿派张郃领军追击，被诸葛亮的伏兵乱箭射死。

诸葛亮退军后，将贻误军机的李严削职为民，徙居边郡。同时休整士卒，设计称为“流马”的运输工具。用“木牛”、“流马”运粮，储存于斜谷，准备再次北伐。

经过二年休整、准备，蜀建兴十二年（234）春，诸葛亮率十万大军出斜谷，开始了第五次北伐，同时约孙权在东边向魏进攻以声援。四月，诸葛亮到达郿县，在渭水之南的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立营。司马懿渡过渭水，背水筑垒相拒。诸葛亮鉴于过去常因粮尽退军，使北伐不得志，为长期战争作准备，乃分兵屯田。屯田兵与百姓交错于渭水之滨。由于军纪

严明，百姓安居乐业。

司马懿针对蜀军悬军深入，供应困难，利于速战，难以持久的弱点，一直固守不战。双方相持百余日。诸葛亮派人给司马懿送去妇人服饰，想激怒他出战，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诸葛亮的使者到司马懿军中，司马懿向使者询问诸葛亮的睡眠和饮食以及事务繁简情况，不问军事。使者回答说："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至数升。"司马懿因此对人说："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⑧

情况正如司马懿所估计的那样，诸葛亮在军中病倒了。他病重时，后主刘禅派人前来探望，并询问他百年之后谁可继任，他推荐蒋琬；蒋琬之后，他推荐费祎。再问其次，他不予回答。事情久远，固难于逆料，而蜀地人才匮乏，也令智者犯难。

八月，诸葛亮病死于五丈原军中，终年五十四岁。杨仪等按诸葛亮临终部署，率蜀军撤退。司马懿追赶，疑有诈，不敢逼近。于是杨仪结阵而还，进入斜谷然后发丧。司马懿考察诸葛亮营垒处所，赞叹说："天下奇才也。"⑨

至此，诸葛亮晚年竭尽全力的北伐战争以失败告终。唐朝著名诗人杜甫曾在《蜀相》一诗中感叹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表现了对这种结局的痛惜。其实，这种结局并不意外。蜀魏力量对比既然日益悬殊，而司马懿又紧紧抓住诸葛亮悬军深入、给养困难这一致命弱点，以逸待劳，坚守不战。诸葛亮尽管有卓越的军事才能，也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诸葛亮办不到的事，蜀汉政权的后来统治者就更办不到了。

注 释

①《三国志》卷三九《马谡传》注引《襄阳记》。

②③《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④《华阳国志·南中志》。

⑤《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⑥⑦《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

⑧《资治通鉴》卷七二，明帝青龙二年。

⑨《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曹魏灭蜀

三分鼎立的局面最终形成之后，大混战的局面基本结束，三国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北方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经济逐渐得以恢复，曹魏的国力日渐加强，南北抗衡的基础逐渐消失，北方统一南方的条件已经成熟。司马昭镇压了淮南诸葛诞军事叛乱后，杀死魏帝曹髦，立曹奂为帝，没有引起社会波动。这说明司马氏已将异己势力诛除殆尽，代魏已成定局，只是时机问题。稳操军政大权的司马昭为积累更多的政治资本，便开始筹划统一全国的战事。

魏景元三年（262），司马昭准备着先大举伐蜀。他在申述自己的见解时，认为伐吴要"作战船，通水道，当用千余万功，此十万人百数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湿，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①。

这时候，蜀汉已经没有昔日诸葛亮辅政时期的实力，已不足以与魏继续抗衡。诸葛亮时期对内励精图治，法令严明，发展生产，对外联吴抗魏，以攻为守，社会比较安定。诸葛亮死

后，根据他生前的推荐，蒋琬和费祎先后执政。他们对内大体上遵循诸葛亮的政策，政治比较廉明，注意保持内部的安定；对外继续与吴联盟，没有大规模用兵。蒋琬曾出屯汉中，准备伐魏。鉴于诸葛亮几次北伐均因斜谷等运道艰险，军粮不继而退军，他曾打算改道，循汉沔水路攻魏，但未付诸实施而病死。费祎执政时期，最大的军事行动是公元244年打退魏军的进攻。这一年，魏大将军曹爽和夏侯玄等率步骑十多万进攻汉中。蜀将王平兵不足三万，据险固守，费祎从成都率军来援。曹爽等退走，遭费祎截击，亡失惨重。这是一次防御性的作战，此外，费祎没有大的军事行动。但卫将军、与费祎共录尚书事的姜维，自以为才武过人，又熟悉陇西风俗民情，常想大举北伐。费祎对他这种不自量力的打算常予限制，给他的军队不过万人，而且还告诫他说："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侥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②"

费祎遇刺身亡后，姜维进位大将军，得以肆行其志，连年出兵北伐，劳民伤财。公元256年，姜维又率众出祁山（今甘肃礼县东），与镇西大将军胡济约定于上邽（今甘肃天水）会合。胡济失期不至，姜维与魏将邓艾战于上邽南段谷（今甘肃天水东南），大败，士卒星散，伤亡惨重，引起人们极大不满，陇西亦骚动不安。姜维上疏请求自贬，以卫将军行大将军事。但他并未吸取教训，第二年冬又率兵数万北伐，魏将邓艾等坚守不战，再次无功而还。

这时候的蜀汉政治也日趋腐败，诸葛亮、蒋琬、费祎掌政时较为清明的景象已不复存在。宦官黄皓得到后主刘禅的宠

信。当时先后任尚书令掌握政令者为陈祗、董厥、樊建、诸葛瞻等。黄皓与陈祗相勾结。陈祗死后，董厥等不能制裁黄皓，士大夫多阿附他，使他得以操纵朝政。后主刘禅的兄弟刘永对黄皓擅权不满，黄皓因此对后主进谗言，竟使刘永十年不得朝见后主。姜维曾对后主说，黄皓将败坏国家，请处死他。后主不以为然，还让黄皓向姜维致歉。姜维意识到自己失言，害怕被害，因此请求出守沓中（今青海东南）种麦，远离成都以避祸。

不自量力的连年征战，国力虚耗，政治腐败，百姓不满，表现出蜀汉政权行将崩溃。这种征兆，蜀中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预见到了，中散大夫谯周作《仇国论》以古讽今，指出："如遂极武黩征，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③这种征兆，就连蜀汉的盟国孙吴的有识之士也觉察出来。吴主派五官中郎将薛珝通聘于蜀，回来后，问他关于蜀汉的政事得失。薛珝回答说："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他认为，他们只不过苟且偷安，"怡然不知祸之将及"而已④。

蜀汉将不能抵御魏兵的进攻而灭亡，司马昭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他于公元262年作出先伐蜀后灭吴的战略决策，以钟会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姜维因此曾上书后主，指出钟会治兵关中，是图谋攻蜀，建议派兵驻守阳平关和阴平桥头（今甘肃文县北），以事防备。黄皓相信巫鬼之说，认为魏军不会进攻。后主听信他的鬼话，将姜维的建议搁置，使群臣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朝廷对魏军也不加防备。第二年秋天，司马昭便在洛阳誓师，兵分三路，大举伐蜀。西路由征西将军邓艾率兵三万多人，自狄道（今甘肃临洮）向驻守沓中的姜维进攻，并牵

制他，使他不能东顾。中路由雍州刺史诸葛绪率兵三万，由祁山向阴平桥头进攻，以截断姜维的归路。东路由镇西将军钟会率兵十多万，分别由斜谷、子午谷南进，直取汉中。

蜀后主得知魏兵大举南下的消息，才急忙派廖化率兵向沓中增援姜维，派张翼等率兵增援阳平关，但为时已晚。援兵还在途中，阳平关守将在魏军进攻下，蒋舒投降，傅佥战死。魏军突破阳平关后，很快战领了汉中。邓艾军也迅速推进到沓中，进攻姜维驻地。由于汉中已失守，姜维便向南撤退。以图阻止魏军继续南进。他在阴平桥头摆脱诸葛绪军的堵截，继续南撤，与廖化、张翼等北上的援军会合，拒守剑阁天险，阻止钟会军南下。邓艾由沓中进至阴平与诸葛绪军会合后，提出由阴平经剑阁西南的江油（今属四川）直取成都，诸葛绪不同意，于是东下与钟会军会合。这时候，钟会想专擅伐蜀的军权，向曹魏朝廷密告诸葛绪畏懦不敢前进，并用囚车将他押送回洛阳治罪，他的军队全归钟会指挥。钟会进攻剑阁，遇到姜维据险抵抗，久攻不下，再加上军需运道既远又险，军中缺粮，打算撤军。邓艾认为敌人正受到沉重打击，应乘胜前进。他提出分兵由阴平小道南进，绕开剑阁，经江油，出其不意进攻剑阁南边的涪县（今四川绵阳东）。这时候，剑阁守敌必兵援涪，我主力可克剑阁向南推进；如剑阁守敌不动，则涪守军薄弱，必被我军攻克，然后我军可直取成都。于是邓艾率军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山高谷深，极其艰险，粮食运输几乎中断，频临绝境。邓艾以毡自裹，从山上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沿崖，鱼贯而进。先头部队抵达江油，蜀守将马邈投降。诸葛瞻督诸军北上抗击邓艾军，到涪县后即停止不前。他拒不接受尚书郎黄崇一再提出迅速占据险要地点，阻止敌人进入平

地的意见。邓艾得以长驱而前，击溃诸葛瞻的前锋部队。诸葛瞻退守绵竹。邓艾派使者给他送信说，如果投降，当上奏封他为琅邪王（诸葛瞻是诸葛亮的儿子，祖籍琅邪）。诸葛瞻大怒，斩来使，列阵抵抗，曾打败邓艾军的左右夹击，但终于为邓艾军击溃。诸葛瞻及黄崇被斩杀。诸葛瞻的儿子诸葛尚长叹："父子荷国重恩，不早斩黄皓，以致倾败，用生何为。"⑤于是策马入阵战死。

蜀汉没有料到魏兵来得这么迅速，成都周围没有布置防守。听说邓艾军已进入平川，百姓惊恐，"皆进山野，不可禁制"⑥。后主刘禅召开群臣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投奔盟国孙吴，有人主张迁往南中，据险拒守。而谯周认为这两种意见均不可行，奔吴，得称臣；将来魏一定能灭吴，到时候还得又向魏称臣。因此，"再辱之耻，何与一辱"⑦。还不如现在就向魏投降。奔南中也非善策，因那里的少数民族过去迫于军威，才不得不臣服，"今若至南，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广张，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其叛必矣"⑧。后主接受谯周的意见，决定派侍中张绍捧着皇帝的印玺去雒县（今四川广汉北）向邓艾请降。刘禅的儿子刘谌坚决反对投降，说："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⑨刘禅不听。刘谌于是哭于先帝刘备之庙，先杀死妻子儿女，然后自杀。刘禅又派人传令前线的姜维、廖化、张翼等向钟会投降，各郡县也奉命先后投降魏军。

邓艾进军到成都城北，后主刘禅率太子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反绑双手，让人抬着棺材，到邓艾军前投降。邓艾给他松了绑，焚烧了棺材，以示接受。第二年，公元 264 年，刘禅举家迁往洛阳，被曹魏封为安乐公，子孙及群臣封侯者五十余

人。司马昭与刘禅宴会时，特别安排了蜀地的乐舞，旁人都因此而感到亡国的悲伤，而刘禅却喜笑自若。司马昭对贾充说："人之无情，乃可至于是乎！虽使诸葛亮在，不能辅之久全，而况姜维邪！"他日，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答："此间乐，不思蜀。"⑩

蜀汉从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建国，到公元263年刘禅向魏投降亡国，历二帝共四十二年。

注 释

①《晋书》卷二《文帝纪》。

②《三国志》卷四四《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

③《资治通鉴》卷七七，高贵乡公甘露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七七，元帝景元二年。

⑤《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⑥⑦⑧《三国志》卷四二《谯周传》。

⑨《三国志》卷三三《后主传》注引《汉晋春秋》。

⑩《三国志》卷三三《后主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司马氏代魏

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建立晋王朝，是经过司马懿和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两代人在曹魏政权内部诛除异己，发展势力，最后由他的孙子司马炎完成的。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出身于河内郡温县（今属河南）大族，是秦汉之际将领司马卬的后代。其父司马防，东汉末年曾任京兆尹。其兄司马朗，曾在曹操手下任职。司马懿"少有奇节，聪朗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汉末大乱，常慨然有忧天下心"①。曹操任司空时，闻其名而准备召用他。他不愿意与曹操合作，托病拒不应召。曹操任丞相，又提拔司马懿为文学掾，并命令前去传达召命的人说，如不应召，即加逮捕。司马懿惧而应命。历任黄门侍郎、议郎、丞相主簿等职。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为魏王，曹丕为王太子，司马懿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称帝后，司马懿历任侍中、尚书、右仆射、给事中、录尚书事等职。曹丕两次征讨孙权，司马懿均奉命留守许昌，内镇百姓，外供军资。公元226年，曹丕临终

时，遗命司马懿与曹真等共同辅佐魏明帝曹叡，后出屯宛城（今河南南阳），都督荆、豫二州诸军事。蜀将孟达降魏后，被任为新城（治所在今湖北房县）太守，后又外联吴蜀反魏。司马懿迅速出兵，八日即兵临城下，击斩孟达。太和四年（230）迁大将军，与曹真伐蜀，因雨退军。第二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围祁山（今甘肃礼县东）。曹真病死，魏明帝对司马懿说："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②于是以司马懿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接替曹真西屯长安，统领车骑将军张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抗击诸葛亮北伐军，成为诸葛亮的劲敌。在挫败诸葛亮北伐军过程中，表现出他过人的谋略和才能，成为曹魏的政治军事支柱。

诸葛亮死后，蜀汉对曹魏已不能构成威胁。公元237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自立为燕王，勾结鲜卑反魏。魏明帝从长安召回司马懿，以讨伐公孙渊，说："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③第二年六月，司马懿领步骑四万进入辽东后，绕过公孙渊在辽河的重兵堵截，进围辽东首府襄平（今辽宁辽阳）。陷襄平，斩公孙渊父子，诛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余人，辽东等四郡皆平。年底班师至汲县（今属河南），先后收到内容不同的诏书，开始命令他归镇长安，后来又急召他回京师。他疑京师有变，于是乘追锋车昼夜兼行，疾驱入朝。原来是魏明帝病重，在由谁辅佐新皇帝的问题上，朝中意见不一。司马懿终于在明帝死前的关键时刻赶回到洛阳。

景初三年（239）正月，魏明帝曹叡遗命司马懿与宗室曹爽共同辅佐八岁的齐王曹芳为帝。曹爽是已故大将军曹真的儿子，威望和能力均在司马懿之下，但以宗室受魏明帝爱重，任他为大将军。曹芳即位后，曹爽和司马懿都加侍中、都督中外

诸军、录尚书事，共执朝政。曹爽为了削弱司马懿的权势，专擅朝政，引擢一批亲信为心腹，以邓飏、丁谧为尚书，何晏专掌选举，毕轨为司隶校尉，李胜为河南尹。曹爽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另一个弟弟曹训为武卫将军，共同掌管禁军。丁谧等为曹爽画策，让皇帝转任司马懿为太傅，名位虽尊，但政事不经过他。从此，军政实权逐渐落入曹爽手中。

司马懿为了寻找机会消灭曹爽势力，东山再起，采取了韬晦策略。他装病在家，不预政事。曹爽的亲信河南尹李胜出任荆州刺史，借向司马懿辞行的机会刺探情况。司马懿伪装病重，让两婢扶持相见；衣服拿不住，由手中滑落；喝粥不能持杯，粥流出洒满前胸。李胜说将出任荆州，他又故作听不清，一再说成并州。他又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李胜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李胜回来告诉曹爽："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④曹爽信以为真，对司马懿便不加提防。司马懿便暗中与其子中护军司马师、散骑常侍司马昭策划诛除曹爽。

嘉平元年（249）正月，皇帝曹芳出洛阳城南谒明帝高平陵，曹爽兄弟都随从出城。司马懿趁机发动军事政变。此前司马师暗中养死士三千人，散在民间，这时一召而集。司马懿以皇太后令，关闭城门，派兵占据武库，亲自领兵出迎天子，屯兵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行大将军事，接管曹爽军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接管曹羲军营；向皇帝上奏曹爽罪状，撤爽兄弟职务，以侯归第，不得稽留皇帝车驾，否则军法从事。他还派侍中许允劝说曹爽应当及早认罪；又派曹爽亲信者告诉曹爽，仅免官而已，并指洛水为誓。大司农桓范逃出城去见曹爽，极陈利害，劝他奉皇帝至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发四方

兵以自辅，令天下讨伐司马懿。曹爽默然不从，最后投刀于地说："司马公正当欲夺吾权耳。吾得以侯归第，不失为富家翁。"⑤于是交出事权，以侯归第。司马懿发洛阳吏卒包围他们兄弟的住宅，四角作高楼，派人监视他们的行动。随后，司马懿以曹爽及其亲信阴谋反逆罪，逮捕处死曹爽兄弟，以及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并诛三族。这是一次关系到司马氏代魏的关键斗争，曹氏势力遭到惨重打击，从此军政实权落入司马氏之手。此后曹氏宗室中，再也没有能与司马氏抗衡的人物，忠于曹氏的军队将领，成为司马氏诛除的主要对象。

嘉平三年（251），太尉王凌于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寿县）起兵，反对司马懿。此前王凌曾与其甥兖州（治所在今山东金乡西北）刺史令狐愚，谋废被司马氏控制的魏帝曹芳，立曹操的儿子楚王曹彪为帝，迎都许昌。司马懿领兵东征，王凌自杀。司马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皆诛三族，赐楚王曹彪死，将曹氏诸王禁闭于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派人监视，不得与人交往。司马懿封邑增至五万户，子弟封侯者十九人，进一步控制了朝政。不久，司马懿病死，其长子司马师升任大将军、侍中、都督中外诸军，接替他掌握军政大权。

司马师（208－255），字子元，曾任散骑常侍，累迁中护军。他掌政后，正元元年（254），以中书令李丰、皇后父亲张缉等，图谋用夏侯玄取代自己辅政的罪名，杀李丰、张缉、夏侯玄等，并诛三族。同年，皇帝命司马昭西讨蜀汉姜维。于是，司马昭从许昌引兵入洛阳。司马师便以皇太后令召开群臣会议，废魏帝曹芳为齐王，追皇太后交出皇帝印玺，立文帝曹丕之孙、东海王曹霖之子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公元

255年，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假传太后诏命，起兵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东），向各州郡发布讨伐司马师檄文。他们率众六万，渡过淮水向西进至项城（今河南沈丘）。当时司马师新割目瘤，乃忍痛率中外诸军东征，以其弟司马昭兼中领军，留守洛阳。毌丘俭兵败被杀，传首京师，并诛三族。文钦逃奔孙吴。司马师班师至许昌病死，临终命其弟司马昭总统诸军。

司马昭（211－265），字子上，曾任典农中郎将、散骑常侍等职，曾随曹爽伐蜀，后西镇长安，节制诸军抗击蜀汉姜维北伐。司马师在许昌病死，司马昭拜卫将军，奉命留守许昌。但他用钟会等的计策，领军返回京师。回到洛阳后，司马昭进位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掌握军政大权。第二年，加号大都督，进封高都公。甘露二年（257），继毌丘俭任镇东大将军的诸葛诞，准备起兵反对司马昭，拿出全部帑藏赈济百姓，赦免所有罪犯，以收拢人心。收养扬州轻侠数千人为敢死队，又请求以十万人守寿春以备孙吴。司马昭派贾充去刺探诸葛诞的意图，对他说都中诸贤都愿皇帝以帝位禅让司马氏。诸葛诞大加反对，厉声说，世受魏恩，岂可以社稷输人！司马昭因此得知诸葛诞反意，便用贾充的计策，任他为司空，召回京师。诸葛诞知道自己的意图暴露，便杀扬州刺使乐綝，起兵反对司马昭。他向孙吴称臣，送儿子为人质请求救援。司马昭奉魏帝及皇太后率军二十多万东征。孙吴应诸葛诞之请，派将军全怿、全端等率兵三万与降将文钦前来救援。司马昭军将全怿、文钦等和诸葛诞围困于寿春城中。孙吴派朱异领兵解围没有成功。城中缺粮。全怿、全端等受司马昭离间，弃诸葛诞出城投降。文钦、诸葛诞突围失败，死伤惨重。在内部矛盾

斗争中，文钦被诸葛诞杀死。文钦的两个儿子进攻诸葛诞失败后，越城出降，受到司马昭优待，授任将军、赐爵关内侯，城中斗志瓦解。第二年初，寿春被攻陷，诸葛诞被杀，并诛三族。从此，司马昭权威更盛，军政大权，进退百官，都在其掌握之中。

魏帝曹髦眼见威权日去，帝位将被篡夺，不胜愤慨，景元元年（260），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⑥。王沈、王业等是司马昭的心腹，随即向司马昭报信。司马昭召中护军贾充作防备。曹髦不听王经劝阻，率宫中宿卫、奴仆等鼓噪而出，讨伐司马昭。司马昭的心腹中护军贾充率众与曹髦战于南阙下。兵众与皇帝作战大概有些怯阵，欲退却。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该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⑦于是成济挥戈将魏帝曹髦刺死。事后，司马昭杀成济并诛其三族，以掩人耳目。同年，司马昭立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十五岁的常道公曹奂为帝。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钟会、邓艾、诸葛绪等率兵伐蜀。伐蜀诸将捷报频传，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并加九锡。同年冬，刘禅投降，蜀亡。司马昭消灭了一个长期对峙的敌国，随后又镇压了钟会勾结蜀降将姜维在成都发动的叛乱，获得更多的政治资本，便于咸熙元年（264）春进爵为晋王，增封十郡。司马昭封王后，即命司空荀颛等负责制定礼仪，中护军贾充负责修订法律，尚书仆射、裴秀负责议定官制，由太保郑冲总其成。第二年，又建天子旌旗，使用和皇帝一样规格的仪仗和乐舞。泰始元年（265）进晋王妃为王后，司马炎由

世子进为太子。这一切说明，司马昭准备做皇帝了，但就在他即将登上皇帝宝座的最后一级台阶时，这年秋天病死。太子司马炎嗣位相国，袭爵晋王。

司马炎（236－290），字安世，司马昭长子。泰始元年（265）冬，接受魏帝禅让，即皇帝位，历史上称晋武帝。他建立的晋王朝建都洛阳，历史上称西晋。司马炎称帝后，奉魏帝曹奂为陈留王，曹氏诸王皆降为侯；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黄初元年（220）曹丕代汉建立的魏王朝，经历五帝共四十五年，至此结束。

注　释

①②③④⑤《晋书》卷一《宣帝纪》。

⑥《三国志》卷四《高贵乡公纪》注引《汉晋春秋》。

⑦《资治通鉴》卷七七，元帝景元元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西晋灭吴

司马昭作出先伐蜀后灭吴的战略决策时，原打算灭蜀三年之后，由蜀地顺流而下，水陆并进，消灭孙吴，最后统一全国。司马昭于公元263年灭蜀后，来不及灭吴，便于公元265年死去。他的儿子司马炎接替他执掌曹魏军政大权，旋即于当年称帝，建立西晋王朝。统一全国的工作只能由晋武帝司马炎去完成了。但他因王朝初建，还需致力于安定内部，巩固政权，没有按照司马昭的时间安排立即进行灭吴的战争。

晋泰始五年（269），晋武帝司马炎才开始着手作灭吴的准备工作，把一些重要将领安排在沿江要地，经略平吴大计。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今湖北襄樊）；镇东大将军东莞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其后，司马炎与羊祜谋划伐吴之计时，羊祜以为伐吴宜借长江上游之势，推荐王濬为益州刺史，监益、梁诸军事，训练水军，大造战船、军器。王濬造作大舰，长一百二十步，能载二千人，其上以木为城，立瞭望台，开四门，舰上可以驰马往来。

在司马炎加紧准备灭吴的时候，孙吴的统治已江河日下，国力日弱，逐渐失去与北方抗衡的能力。孙吴统治走下坡路的形势，早在孙权称帝后就开始了。孙权称帝前，继承父兄遗业，能团结重用张昭、周瑜、鲁肃、吕蒙等一大批人才，联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打败曹操。尔后他又打败刘备，夺取荆州，巩固了与北方抗衡的鼎足之势，孙吴的国力达到了顶峰。曹操曾赞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公元221年，孙权接受魏文帝曹丕封号称吴王，派中大夫赵咨向曹丕致谢。曹丕问赵咨："吴主何等主也？"对曰："聪明、仁智、雄略之主也。"他还举例说："纳鲁肃于凡品，是其聪也；拔吕蒙于行陈，是其明也；获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据三州虎视于天下，是其雄也……。"①这些话出自孙权使臣之口，虽难免有溢美之词，但基本上概括了孙权称帝前的谋略、器量和成就。

公元229年，孙权称帝，改元黄龙。此后他对自己的亲近大臣开始疏远，不加信任。他刚愎自用，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公元233年，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派使者向孙权称臣。孙权十分高兴，宣布大赦，派太常张弥、执金吾许宴等领兵万人，带着金宝珍货，由海上赴辽东，封公孙渊为燕王，并赐九锡。举朝大臣自丞相顾雍以下，都认为公孙渊不可信，极力劝阻，孙权根本听不进去。老臣张昭劝止的言词恳切，态度坚决。孙权认为张昭有意让他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因而按剑怒斥张昭，声言要把张昭杀掉。结果公孙渊果如张昭等所料，出尔反尔，没收孙吴的珍宝，杀死张弥、许宴等，并将他们的脑袋送往曹魏请赏。曹魏拜他为大司马，封他为乐浪公。孙权对自己的失误，不但不吸取教训，反而意气用事，要亲征辽东，砍下公孙

渊的脑袋扔到海里，否则无颜复临万国。在陆逊等一批重臣的苦苦规劝下，他才放弃这次远征。

孙权对文武大臣都心存戒备。守边武将要留下妻子儿女作人质。他还委任一批称为校事、察战的官吏，专门监视文武官员。这些人仗势横行，滥行纠举，造成许多冤假错案。孙权派中书郎吕壹检查各官府及州郡的文书。吕壹因此恃势渐作威福，深文周纳，诬陷无辜，毁短大臣，甚至连丞相顾雍都是他毁谤的对象。孙权对他的话竟深信不疑，对顾雍加以诘责。孙权对吕壹的宠信，引起大臣们的不满，太子孙登一再进谏，不被接受，群臣不敢复言。后来孙权不得不处死吕壹，派中书郎袁礼向诸大将致歉，并征求他们对朝政的意见。但诸葛瑾、步骘、朱然、吕岱等各自以不掌民事为由，不肯陈述己见，而推让陆逊和潘濬。陆、潘二公也心怀危惧，心不自安。孙权只知道埋怨他们不能像当年管仲对齐桓公那样敢于进忠言，而不知道吸取教训，校事、察战之官，仍然设置不废。

孙权在太子废立问题上固执己见，也激化了统治集团的矛盾，并种下了互相攻杀的祸根。孙权称帝后立孙登为太子。孙登死后，立孙和为太子，又封儿子孙霸为鲁王。孙权对孙霸特加宠爱，待遇与太子无异。许多大臣一再进谏，认为这将造成祸端，孙权听不进去。孙霸想夺取太子的地位，朝中大臣也分成支持太子和拥护孙霸两派。孙权支持拥护孙霸的一派，打击拥护太子的一派。丞相陆逊就因拥护太子受孙权的打击，愤恚而死。后来孙权又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废太子孙和，赐鲁王孙霸死，立宠爱的少子孙亮为太子。公元 251 年，孙权病重，因太子孙亮只有九岁，便以大将军诸葛恪领太子太傅，除生杀大事外，朝中诸事全由诸葛恪统管。公元 252 年，孙权临终，

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吕据、孙峻等嘱以后事。孙权死后，尚未发丧，顾命大臣间即开始互相攻杀。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和，便秘不发丧，想假传孙权的诏命杀死他。诸葛恪得知后，便借议事的机会杀死孙弘，然后发丧。十岁的太子孙亮即皇帝位，以诸葛恪为太傅，掌朝政。诸葛恪于是下令废除典校官制，取消对官吏的监视，减轻百姓的税赋，取消关税，得到官吏和百姓的拥护。

诸葛恪很有才能，但也很刚愎自用。孙权死去的当年冬天，魏分兵三路攻吴。诸葛恪率兵援救，取得胜利，第二年进封阳都侯，加荆州、扬州牧，都督中外诸军事。他便欲借战胜之威，率大军攻魏。举朝大臣几乎一致反对，同声劝阻。但诸葛恪认为他们都是“不见计算，怀居苟安”②的人，于是固执己见，发州郡二十万众大举攻魏，包围合肥新城。吴军攻城数月不下，夏天大暑，病者大半，死伤涂地，不得不撤军。从此朝野失望，怨恨大起。这年冬天，宗室孙峻与皇帝密谋，借请诸葛恪进宫赴宴的机会，将他杀死，并诛三族。孙峻任太尉，掌握朝政。孙峻骄矜淫暴，国人侧目，临终又由其堂弟孙綝掌政。骠骑将军吕据闻孙綝代孙峻掌政，便与诸督将联名表荐滕胤为丞相，并从淮南回军，与滕胤联合起兵以废掉孙綝。结果因未能按期汇合，滕胤兵败被杀，并诛三族，吕据自杀。孙綝显贵倨傲，多行无礼。公元 257 年，皇帝孙亮亲政，对孙綝不大信任，并谋诛除孙綝。第二年，孙綝派兵包围皇宫，废皇帝孙亮为会稽王，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孙休即位不久，即杀死孙綝，并诛三族。公元 264 年，孙休病死。丞相濮阳兴和张布等迎立孙权的孙子、废太子孙和的儿子孙皓为帝。

孙皓即位之初，还实行过一些优恤士民的措施，但不久即

暴露出十足暴君的本色。他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朝野失望。濮阳兴和张布私下后悔迎立他为帝，他得知后，就在即位的当年冬天，趁入朝时将他们逮捕处死，并诛三族。他经常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杀死他不满意的大臣。散骑常侍王蕃，为人正直，对孙皓不百依百顺。孙皓对他不满，在大会群臣中，见他沉醉顿伏，怀疑他是装醉，便在殿下斩首。然后他又出宫登上来山，让随从把王蕃的脑袋抛掷到虎群中，使群虎相争，把它咬碎。中书令贺邵中风不能说话，离职数月，孙皓怀疑他是假装的，经严刑拷打，他还是说不出一句话。孙皓还不相信，竟让人烧锯锯断他的脑袋。他还经常对臣下用剥面皮、凿眼睛的酷刑。孙皓的残暴、嗜杀，使得上下离心，人人自危。

公元265年，孙皓从建业（今南京）迁都武昌（今湖北鄂城），扬州各地百姓供应其穷奢极欲，物资运输，要逆流而上，负担更为繁重，童谣“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表现了百姓的愤恨。第二年，还都建业，又派人遍行州郡搜取将吏女子，没有被选中的才许出嫁。后宫宫女已以千数，还采择不已。又建造昭明宫，让二千石以下官员都入山督促百姓伐木；大开园囿，穷极伎巧，工役之费以亿万计。

孙皓昏庸透顶，迷信谶言。公元271年春，吴人刁玄假传谶文说，黄旗紫盖见于东南，荆、扬之君，终有天下。孙皓便想一举灭晋，入主中原，于是大举伐晋，随军车载太后、皇后及后宫数千人出发。途中遇大雪，道路泥泞，兵士被甲执仗，百人才能牵动一辆车，疲惫不堪，冻死不少，都说如果遇到敌人一定倒戈。孙皓怕当俘虏，才不得不撤回。

孙皓的残暴、穷奢极欲和倒行逆施的结果，使得“国无一

年之蓄，民有离散之怨”③。原来就不安定的孙吴政局更加动荡。统治集团上层分崩离析，宗室、前将军孙秀和驻守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京下督孙楷先后降晋。昭武将军西陵督步阐也据城降晋。下层群众也纷纷起而反抗，吴宝鼎三年（266），施但趁百姓劳苦怨恨，聚众数千人，劫持孙皓庶弟永安侯孙谦起事。他们推进到建业附近才被打败。吴天纪三年（279），下级军官郭马等趁广州民心不安，发动群众起事，杀死广州督虞授和南海太守，驱逐广州刺史。孙皓派兵从东西夹攻，才镇压下去。

这种局势表明，孙皓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晋灭吴的时机已经成熟。晋咸宁二年（276），镇守荆州的羊祜上疏晋武帝司马炎，请求伐吴。他指出：“凡以险阻得全者，谓其势均力敌耳。若轻重不齐，强弱异势，虽有险阻，不可保也。”“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④。因此，他认为伐吴一定可以成功，对几路大军如何一起推进，还作了规划。司马炎同意他的意见，但朝议中多数大臣不同意，尤其是贾充、荀勖、冯紞等人，只有度支尚书杜预、中书令张华和司马炎意见一致。因为意见不一，没有采取行动。公元278年，羊祜因病入朝，再次提出，孙皓暴虐已甚，现在可以不战而克；如果孙皓死去，吴人更立贤明的君主，将成为后患。这年冬天，这位司马炎最重要的灭吴谋臣，没有来得及实现灭吴的宿愿便病死了。他临终推举同意伐吴的杜预接替自己，都督荆州诸军事。

晋咸宁五年（279），益州刺史王濬上疏，要求晋武帝司马炎抓紧有利时机，立即灭吴，还说我造船已经七年，有的船已经腐烂；我已经七十岁，说不定哪天就死了。接替羊祜镇守荆

州的杜预也上疏，催促司马炎快下灭吴的决心。于是，司马炎乃决意大举伐吴。他大体按照三年前羊祜所提的进军部署，以二十万大军，分兵六路，在东西千里的江防线上同时出击。他派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由江北向孙吴首都建业；安东将军王浑向牛渚（今安徽当涂）；建威将军王戎向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向夏口；镇南将军杜预向江陵；龙骧将军王濬和唐彬率巴、蜀军沿江东下；太尉贾充为大都督，节制各军。

正如羊祜生前所分析的，由于国力相差悬殊，在晋军的强力攻击下，长期以来孙吴赖以屏障的长江天险完全失去作用，此前吴军在长江要害处曾以铁锁横江，又作长丈余的铁锥暗置江中，企图阻止晋军舟舰。王濬作大筏数十，令水性好的人使筏先行，使铁锥著筏而去；又作长十余丈、大数围的大火炬，灌以麻油，烧断拦江铁锁。晋军所向披靡，第二年（280）年初，王濬、胡奋、王戎等军很快攻陷沿江重镇夏口、武昌。

孙皓闻王浑军南下，派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等领军三万，渡江抵抗。吴军渡江后，很快被击溃，张悌战死。王濬军顺流直趋建业。孙皓还想作最后挣扎，派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抵抗，结果张象望风而降。这时王濬兵甲满江，旌旗映天，威势极盛，吴人丧胆。孙皓又合众两万，准备乘大船抗击晋军，结果未及出发，前一天晚上便全部逃散。

王浑、王濬、司马伷几路大军都逼近建业，孙皓派使者分别向他们呈降书。随后王濬戎卒八万，方舟百里，首先鼓噪开入石头城。孙皓反绑双手，让人抬着棺材，到王濬军前投降。王濬派人给他松绑，焚烧棺材，表示接受。正如后来唐朝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诗中所描述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孙皓投降后，晋武帝司马炎封他为归命侯。同年五月，孙皓及其宗族被送抵晋都洛阳。司马炎大会文武官员及四方使者，引见孙皓及吴投降者。

司马炎给孙皓让座，说："朕设此座以待卿久矣。"孙皓回答："臣于南方，亦设此座以待陛下。"⑤看来，他对亡国并不十分甘心，与刘禅"乐不思蜀"不同。从孙权于公元229年称帝，到公元280年孙皓降晋，孙吴传四帝，历时五十一年而亡。如从公元221年孙权称吴王算起，或从公元195年孙策取江东算起，则历时五十九年或八十五年。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六九，文帝黄初二年。

②《资治通鉴》卷七六，邵陵厉公嘉平五年。

③《资治通鉴》卷七九，武帝泰始二年。

④《资治通鉴》卷八O，武帝咸宁二年。

⑤《资治通鉴》卷八一，武帝太康元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西晋的占田、课田制

占田、课田制，是西晋时期一项重要的土地和赋税制度，它是晋武帝司马炎在废除曹魏屯田制后实行的。

曹魏陈留王咸熙元年（264），“罢屯田官以均政役，诸典农皆为太守，都尉皆为令长”①。晋武帝泰始二年（266）十二月，再次“罢农官为郡县”②。至此，曹魏时实行的屯田制度彻底废弛了，诸典农官成为郡太守和县令长、屯田客成为国家控制的州郡领民，与其他自耕小农一样，负担田租、户调、力役等封建义务。又过了十六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统一全国以后，又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户调之式”——即土地和赋税法令。这一法令的内容包括三大部分，即一、民户的户调制；二、自耕农的占田、课田制，三、品官的占田荫客制。

一、民户的户调制

户调式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③，户一匹，远者或一丈。”④

所谓“户调”，就是政府以户为单位向农民征收的赋税。它起源于汉代，到曹魏时，加以固定化和普遍化，而取消了算赋和口钱（汉代的人头税）⑤。曹魏时，对自耕农“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⑥。西晋颁布的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这比曹魏时的户调来，增加了三分之一。

但上述征收的户调数，只是一个平均数，是交给地方官统计户口的征收标准，在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民户的资财多少来定，这叫“计赀定课”。一般分贫富为“九品”，即九等，按等收税，称为“九品相通”⑦。这样又造成了一个漏洞，使有财有势的豪门大族得以勾结官府，在评估赀产和等第时，可以上下其手、降低等次，“从富督贫，避强侵弱”⑧，把大部分负担转嫁到贫苦农民身上。

二、自耕农的占田、课田制

> 户调式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小，不事。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⑨

所谓“占田”，就是“以名占田”，即法律允许向政府申报登记户口的农民，丁男一人可占有田地七十亩，丁女一人可占有田地三十亩，合计一夫一妇可以占田百亩。但这是政府规定农民可以占有土地的一个假定指标，并不是政府按这个指标分配土地给农民，实际上能否占有这个数量的土地，政府是不管的。所谓“课田，就是征课田赋，即规定每个丁男必须每年向政府

交纳五十亩的田租，丁女交纳田租二十亩，次丁男交纳二十五亩的田租，因此课田是政府规定的交纳田租的法定指标，不论占足土地与否，政府就按这个指标向农民征收田租。因而，占田数只是一个限额，而课田数却是固定的。除田租外，法令还规定了正丁、次丁、老小的年龄，正丁和次丁，都要负担一定的徭役，只有老小可以“不事”，即免除服役。

但课田的剥削量究竟是多少？《晋书·食货志》没有载明。据《初学记》卷27宝器部引《晋故事》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按此数折合，则平均每亩交租八升。西晋课田制下农民交纳的田租较曹魏时每亩交纳的四升田租来，剥削率则增加了一倍。

三、品官占田、荫客制

户调式又规定：“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贵贱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顷，第二品四十五顷，第三品四十顷，第四品三十五顷，第五品三十顷，第六品二十五顷，第七品二十顷，第八品十五顷，第九品十顷。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荫其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而又得荫人以为衣食客，品第六以上得衣食客及佃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举辇、迹禽、前驱、由基、强弩、司马、羽林郎、殿中冗从武贲、殿中武贲、持椎斧武骑武贲、持級冗从武贲、命中武贲武骑一人。其应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⑩，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⑪。

由上述品官占田、荫客制中可以看出：(1) 西晋各级官吏的占田数额，远远高于普通农民的占田。规定官吏第一品可以

占田五十顷，以下每低一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小官，尚可占田十顷，是普通农民占田数的十四倍多。而且这种官吏占田的亩数，并不是世家豪族可以占有土地的限额，而是政府按官品重新加给他们的亩数。

（2）规定各级官吏可以占有户数不等的佃客，还可以荫庇亲属，多的可到九族，少的可到三世。根据东晋时各级官吏占有的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客皆注家籍”、“其佃谷，皆与大家量分”⑫的规定来看，西晋时的情况也应该是这样。这就是说，这些被各级官吏占有的佃客、荫庇的亲属等人户，他们是不在官府立户籍的，免除了对于官府的徭役和租赋，他们是官僚地主的依附民，入了官僚地主的“家籍”，他们与官僚豪族地主间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到他们残酷的奴役和剥削。这种荫客制度是世家豪族地主的一项重要特权。

（3）品官占田荫客制的颁布，一方面表明西晋政府承认汉代以来世家豪族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的既成事实，并且通过法制的形势把它进一步巩固起来，从而保障世族门阀的经济特权；另一方面，它对于世家豪族占田、荫客的法定限额作了规定，表示对于土地和劳动力占有的适当限制。这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在争夺土地和劳动人手上又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由上述户调之式的三部分内容，可以看出：西晋的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是承袭曹魏的制度稍加变化而来。占田、课田制是在屯田制破坏以后发展起来的。屯田制破坏以后的屯田户，变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原来耕种的官田，现在变成了私田。户调制也是从曹魏的租调制演变而来。品官占田荫客制，则是对曹魏末期公卿以下官僚实行的“给客制”、赐“租牛客

户”和世家豪族凭借权势侵占官田及招募逃亡等情况的认可并加以法制化。

西晋政权是在得到世家豪族地主的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西晋的土地和赋税制度从根本上说，是反映世家豪族地主利益的制度。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世家豪族地主的占田数，远远超出劳动人民可以占有的田亩数。而且实际上，对于官僚地主来说，他们的占田是没有限额的。占田令公布后不久，太中大夫恬和建议限制王公以下私有奴隶的数额，尚书郎李重就反对说："人之田室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⑬说明世家豪族私有土地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强弩将军庞宗因犯法被没收的田地达二百多顷⑭。广阳王司马睦在所封的中山国内，"受逋逃、私占及变易姓名，诈冒复除者七百余户"⑮。金城（今甘肃兰州市）的麴氏、游氏，世为豪族，"西州为之语曰：'麴与游，牛羊不数头，南开朱门，北望青楼'。"⑯大官僚豪族王戎，"园田水碓，周偏天下"⑰。富豪石崇被杀后，"有司簿阅崇水碓三十余区，苍头（即奴隶）八百余人，他珍宝货贿田室称是"⑱。西晋的豪族地主就在他们广占土地和劳动人手而建立起来的庞大田庄里过着骄奢淫佚的生活。

而且，同样是占田，性质却截然不同。各级品官的占田，是封建国家承认他们的特权，为他们提供扩大剥削的手段；而劳动人民的占田，实际上是政府为了更好地控制劳动人手，保证封建国家赋税、徭役的剥削。据记载，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的人口数字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人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⑲。而太康三年（282），"晋户有三百七十七万"⑳。二年之内，户口增加一百三十余万户，

显然，这绝大部分不可能是自然的增殖，而是西晋政府“驱民归农”，加强户口统计造成的结果。劳动力与土地的结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太康年间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干宝《晋纪总论》云：“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虽不免有所溢美，但毕竟呈现出一派小康景象。但西晋政权的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加紧对人民的剥削，拚命强逼农民扩大“课田”数，农民不堪这种沉重的剥削，不得不又抛弃土地，逃亡他乡，或投身于豪强地主门下，成为他们的佃客和荫户，因而颁布户调式不久，便出现了“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⑳的状况。阶级矛盾的尖锐，与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导致了短促的西晋王朝的迅速覆灭。

注 释

①《三国志》卷四《魏书·陈留王纪》。

②《晋书》卷三《武帝纪》。

③古代巴人称赋为“賨”。秦汉政府向“南蛮”征收赋税，成人每年纳布一匹、小孩二丈称为賨布。故“賨布”一词就成为西南夷赋税之名。

④《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⑤参见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⑥《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⑦参见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⑧《魏书》卷四〇《世祖纪》上。

⑨《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⑩《晋书·食货志》载：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无过五十户。有人根

据东晋时品官荫佃客户数普遍高于西晋的记载，认为一、二品佃客无过“五十户”是“十五户”之误。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⑪《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⑫《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⑬《晋书》卷四六《李重传》。

⑭《晋书》卷六O《张辅传》。

⑮《晋书》卷三六《高阳王睦传》。

⑯《晋书》卷八九《麴允传》。

⑰《晋书》卷四三《王戎传》。

⑱《晋书》卷三三《石苞附子崇传》。

⑲《晋书》卷一四《地理志》上。

⑳《三国志·魏书·陈群传》注引《晋太康三年地记》。

㉑《晋书》卷五一《束皙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八王之乱”

在西晋的第二个皇帝晋惠帝司马衷统治时期（元康元年至永兴三年，290－306），封建王朝中的后党与后党之间，后党与司马氏宗室之间，以及司马氏宗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斗争，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发生了许多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和战争祸乱。先后参与或发动这些战乱的司马氏宗室有八个诸侯王，他们是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音义）、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音庸）、东海王司马越，史称“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爆发于晋惠帝时，但祸根却在晋武帝司马炎时就埋下了。晋朝建立以后，司马炎认为，曹魏政权所以被司马氏篡夺，是因为曹氏不分封同姓诸侯王，皇室缺乏屏藩的缘故。于是司马炎一登上皇帝宝座，就在泰始元年（265），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王，这些诸侯王都有封地，拥有武装，王国除国相以外的文武官吏也由诸侯王自己选任①，不少诸侯王还兼领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②，他们“或出拥旄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③，形成为晋朝内部的强大割据

势力。这是造成或加剧“八王之乱”的深层原因。

而酿发“八王之乱”的直接根源则是晋武帝立白痴儿子司马衷为太子，宠信杨氏、贾氏后党，让司马氏诸王和后党共同辅政。晋武帝的次子司马衷，是一个“昏愚”“愚劣”的白痴皇帝④。九岁时被立为皇太子，当时不少朝臣认为将来由这个白痴太子当皇帝是不行的，曾婉言劝说晋武帝应废掉他。如侍中和峤一次侍坐时对晋武帝说：“皇太子有淳古之风，而季世多伪，恐不了陛下家事。”晋武帝默然不答⑤。太子少傅卫瓘也认为太子“不能亲政事”，想劝晋武帝废太子。由于不敢明说，只能装酒醉，用手抚摸晋武帝的御床说：“此座可惜！”晋武帝对他说：“公真大醉耶?”卫瓘于是不敢再言⑥。实际上，晋武帝自己也知道，“太子不堪奉大统”，因而一次他对皇后杨艳道出了实情。但杨艳对他说：“立嫡以长不以贤，岂可动乎?”⑦由于晋武帝宠信杨氏后党，始终不愿废去痴太子。晋武帝皇后杨艳出身于弘农郡杨氏大姓，其祖上“四世为三公”⑧。杨艳生惠帝。她临死时，又推荐从妹杨芷嫁给武帝为皇后。杨芷的父亲杨骏也因此被超升为车骑将军。晋武帝司马炎自太康平吴以后，认为天下无事，殆于政术，不复留心万机，惟耽酒色，宠幸后党，因此杨骏及其弟珧、济“势倾天下，时人有‘三杨’之号”⑨。

晋武帝司马炎还宠幸贾氏后党。晋武帝除了同意立司马衷为皇太子外，还同意为皇太子娶贾充的女儿贾南风为太子妃。贾充是平阳襄陵的世家大族，为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篡夺魏帝位立过汗马功劳。司马炎被立为晋王太子，后作晋帝，也与贾充在司马昭面前盛赞他“宽仁，且又居长，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⑩这样的赞誉有密切关系。司马炎称帝后，贾充被升

为侍中、尚书令、车骑将军，深受武帝的宠信。贾南风成为司马衷的妃子后，贾氏家族更广树党羽，扩充权势。以后贾氏后党就成为与杨氏后党争权的主要敌手。

太熙元年（290）四月，晋武帝死，惠帝司马衷继位。武帝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与外戚杨骏共同辅政。杨骏和女儿杨皇后（杨芷）伪造诏书，“口宣帝旨作诏，以骏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⑪，由杨骏独揽了政权。

贾后是个凶狠、贪暴的女人。惠帝即位后，贾后也想独揽大权，因此杨太后与杨骏就成了她揽权的最大障碍。元康元年（291）三月，贾后利用杨骏为政“严碎专愎，中外多恶之”⑫的状况，与宫中侍从官董猛、孟观、李肇等阴谋策划，诬陷杨骏谋反，陷害杨太后与杨骏“同逆”，密召楚王司马玮（司马炎第五子）带兵进京讨伐杨骏。贾后以惠帝名义下诏废掉杨骏，司马玮则率领东安公司马繇帅四百殿中兵攻打杨骏府第，杨骏逃入马厩后被杀死，杨太后也被贾后废黜，后饿死宫中。杨骏及杨氏后党“皆夷三族，死者数千人”⑬。

杨氏后党被消灭以后，惠帝下诏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太保卫瓘皆录尚书事，辅政。楚王司马玮因协助贾后政变有功，也以卫将军、领北军中侯，在中央握有兵权。“贾后族兄车骑司马（贾）模，从舅右卫将军郭彰、女弟之子贾谧与楚王玮、东安王繇并预国政”⑭。因而在掌握朝廷实权的司马亮和司马玮之间又产生了矛盾。而贾后则认为司马亮、司马玮二人都妨害了她的专权。于是便在这年六月，贾后使惠帝作手诏赐玮，令其督军杀死辅政的汝南王司马亮、卫瓘，然后又以“矫诏”的罪名，杀掉楚王司马玮。“于是贾后专朝，委任亲党，

以贾模为散骑常侍，加侍中”[15]，开始了她的“女主专政”。

贾后的专断朝政达八、九年之久。贾后及其党羽贾谧（原为贾后甥，嗣贾充）为保持其“女主专政”，采取各种阴险毒辣的手段诬陷、坑害愍怀太子司马遹，因而又爆发了贾后与太子司马遹的矛盾。司马遹是惠帝谢妃所生，幼小时聪明伶俐，晋武帝很爱他，曾对人说：“此儿当兴我家。”[16]他不愿废掉司马衷，也是想让司马遹将来继司马衷当皇帝。贾后自己无子，遂取妹夫韩寿子慰祖养之，託谅闇所生[17]，与贾谧密谋废太子遹。元康九年（299）贾后诈称惠帝不豫，召太子入宫，把他灌醉后令其写：“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当入了之。中宫（指贾后）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当手了之。”然后呈惠帝，使惠帝下诏：“遹书如此，今赐死。”[18]由于中书监张华等大臣的反对，贾后才废太子遹为庶人，幽禁于许昌宫。

太子遹的无罪被废，引起一部分拥护太子朝臣的不满。永康元年（300），他们与当时握有军权的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密谋废贾后，复太子。赵王伦答应参与行动。但赵王伦及其嬖人孙秀考虑到平素与贾后亲密，害怕太子复立会对自己不利，于是一面行使反间计，挑动贾后用毒药害死太子遹；一面在是年四月，借口为太子报仇，领兵入宫，废贾后，贾氏党羽贾谧、贾午等也被一网打尽。并借机除掉与其有宿怨的朝臣张华、裴頠等，“自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相国、侍中，一依宣（司马懿）、文（司马昭）辅魏故事”[19]，独掌了朝廷大权。永宁元年（301）正月，司马伦又索性废掉傀儡皇帝惠帝，自己作起皇帝来。

司马伦作皇帝后，嬖人孙秀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将军、仪同三司，“专执朝政，伦所出诏令，秀辄改更与夺，自书青

纸为诏，或朝行夕改”。又滥封爵号，“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会，貂蝉（诸武官冠之，冠的前部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盈座，时人为之谚曰：‘貂不足，狗尾续’。”⑳他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其他宗室诸王的反对。被赵王伦排挤到许昌的齐王司马冏（司马炎弟齐王司马攸子），联合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十六子）和镇守长安的河间王司马颙（司马懿弟司马孚之孙）等起兵讨伐赵王伦，赵王伦也调兵遣将迎战，“三王”之兵与司马伦军队在洛阳附近酣战两个多月，“战斗死者近十万人”。结果，赵王伦兵败被杀。“凡百官为伦所用者皆斥免，台省府卫仅有存者”㉑。晋惠帝复位，齐王司马冏入朝辅政。

司马冏得志后，也骄奢擅权，耽于宴乐，选用不均，嬖宠用事，中外失望。太安元年（302）十二月，河间王司马颙联合在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司马炎第六子），对司马冏发动进攻，冏、乂双方的军队在京城洛阳展开激战。是时，“城内大战，飞矢雨集，火光属天”㉒。连战三日，冏兵败被杀，“同党皆夷三族，死者二千余人”㉓。长沙王司马乂掌握了政权。

但不久，太安二年（303）八月，司马颙又联合成都王司马颖以“乂论功不平”㉔起兵讨司马乂。颙以部将张方为都督，将精兵七万，自函谷东趋洛阳；司马颖以陆机为前将军、前锋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将军牵秀、中护军石超等军二十余万，南向洛阳。司马乂奉惠帝与颙、颖军战，颖进兵逼京师，张方决千金堨，水碓皆涸，洛阳成为一座孤城，“公私穷踧，米石万钱。诏命所行，一城而已”㉕。永兴元年（304）正月，在京城的东海王司马越（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孙）与部分禁军将领把司马乂拘禁起来，向司马颙、司马颖求和，司马乂

被张方“炙而杀之”㉖。司马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并立为太弟（皇帝的接班人），“乘舆服御皆迁于邺，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㉗；司马颙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二人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但司马颖掌权不久便“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众望”㉘。七月，司空东海王司马越与右卫将军陈眕及长沙王植故将上官巳等奉晋惠帝北讨司马颖，“越檄召四方兵，赴者云集，比至安阳，众十余万，邺中震恐”㉙。然因麻痹大意，不甚设备，反被司马颖派出的将军石超败于荡阴（今河南河阴县西南）。晋惠帝被俘送邺城。司马越逃奔下邳，徐州都督、东平王司马楙（司马懿弟司马孚之孙）不纳，司马越径回东海封国。陈眕、上官巳等奉太子司马覃守洛阳。时河间王司马颙命部将张方乘机率兵击败上官巳等，占领了洛阳。八月，安北将军幽州刺史王浚、宁北将军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司马越弟）联兵南攻邺城，司马颖兵败挟晋惠帝南奔。十月，惠帝还洛阳，“张方拥兵专制朝政，太弟颖不得复预事”㉚。十一月，张方又挟惠帝和司马颖迁往长安。十二月，这时掌握西晋朝廷实权的司马颙又废黜司马颖，更立豫章王司马炽（司马炎第二十五子）为皇太弟。诏以司空司马越为太傅，司马越辞太傅不受。太宰司马颙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张方为中领军，录尚书事、领京兆太守。

永兴二年（305）七月，东海王司马越在山东集兵讨司马颙，唱义奉迎大驾，回复旧都。他率甲士三万西征。司马颙先派司马颖、张方等迎战，兵败以后，又杀死张方，向司马越求和。光熙元年（306）四月，司马越乘胜打进关中，司马颙逃奔太白山中。六月，司马越奉惠帝回洛阳。就在这一年，司马

颖、司马颙先后被司马越所杀，惠帝也被毒死。皇太弟司马炽被立为帝，是为晋怀帝。司马越从此“专擅威权”⑤，八王之乱至此结束。

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是西晋世族恶性发展的产物，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凶恶、险毒、残忍、腐朽本性的一次集中暴露。八王之乱中，曾经在太康年间一度恢复的西晋社会经济又遭到了新的破坏，人民又重新陷入了苦难的深渊，被迫举行起义，以反抗和推翻司马氏的腐朽统治；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的官僚贵族，也趁时而起，建立割据政权。西晋王朝在统治阶级的互相残杀中走向灭亡，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混乱时期。

注 释

①《晋书》卷三八，《琅琊王伷传》："武帝践祚，封东莞郡王，……始置二卿，特诏诸王自选令长。伷表让，不许。"又同卷《齐王攸传》："诏议藩王令自选国内长史。"攸上表辞让，"书比之上，辄极不许"。又《晋书》卷四六《刘颂传》：太康末年（289）上疏："官人用才，自非内史、国相命于天子，其余众职……悉得专之。"

②参见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

③《晋书》卷五九《汝南王亮等传序》。

④《晋书·惠帝纪》称："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及天下荒乱，百姓饿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昏蔽皆此类也。"

⑤《晋书》卷四五《和峤传》。

⑥《晋书》卷三六《卫瓘传》。

⑦《晋书》卷三一《武元杨皇后》。

⑧《晋书》卷九三《外戚·杨文宗》。

⑨《晋书》卷四O《杨骏传》。

⑩《晋书》卷四O《贾充传》。

⑪⑫《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永熙元年。

⑬《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元年。

⑭《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二西晋之乱。

⑮《资治通鉴》卷八二，晋惠帝元康元年。

⑯《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

⑰《晋书》卷三一《后妃贾后传》。

⑱《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二。

⑲《资治通鉴》卷八三，晋惠帝永康元年。

⑳㉑《资治通鉴》卷八四，晋惠帝永宁元年。

㉒㉓《资治通鉴》卷八四，晋惠帝太安元年。

㉔㉕㉖㉗《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二西晋之乱。

㉘《资治通鉴》卷八五，晋惠帝元兴元年。

㉙㉚《通鉴纪事本末》卷一二西晋之乱。

㉛《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永嘉之乱”

永兴三年（306），晋惠帝司马衷被独掌朝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毒死，第二年（307），太弟司马炽继立为帝，是为晋怀帝，改年号为“永嘉”。从永嘉元年开始，西晋政权更加衰落。长江流域的荆、湘地区，继巴蜀的李特、荆、扬的张昌、石冰流民起义以后，又爆发了王如、杜弢等流民起义；而北方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也风起云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此时，匈奴贵族刘渊已建立汉国，怀帝永嘉六年（312），刘渊的儿子刘聪攻下西晋都城洛阳。建兴元年（313），司马邺在长安继立为帝，建兴四年（316），汉国刘聪又派刘曜攻陷长安，愍帝出降。历史上把司马炽登位，至晋愍帝出降，西晋政权最后在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中被匈奴贵族所推翻，从而出现“五胡乱华”的局面，称之为“永嘉之乱”。

晋怀帝司马炽即位，实际徒具虚名，执掌朝廷军政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在朝中滥施淫威，诛杀异己。如司马炽为太弟时，与中庶子缪播亲善，即位后，以缪播为中书监，缪胤（播从弟）为太仆卿，委以心膂，司马炽舅、散骑常侍王延，尚书

何绥，太史令高堂冲等并参机密，越疑朝臣贰于己，乃诬播等欲为乱，“遣平东将军王秉，帅甲士三千入宫，执播等十余人于帝侧，付廷尉，杀之。帝叹息流涕而已”①。司马越专擅朝政，图谋建立自己的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②。怀帝司马炽完全成了他控制、利用的傀儡。这时西晋各地官将也对晋室离心离德，有的边疆镇将“为自安之计，结好夷狄”③；有的“虽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而思自全之计”④。西晋政权只是一具虚有其表的躯壳。

另一方面，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统治阶级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相互残杀和战争，使社会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而阶级矛盾尖锐，于是南方的流民起义发生了。而魏晋以来就开始内迁生活的边疆各族人民，他们的生活原来就陷于悲惨的境地，他们大部分为汉族地主充当边疆田客，有的甚至被汉族统治者掠卖为奴隶。八王之乱又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痛苦。晋惠帝太安中(303)，当山西大饥荒时，并州刺史司马腾甚至用武力捕捉大批匈奴、氐等胡人，“两胡一枷”，“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⑤。他们的痛苦生活，使他们对汉族的统治阶级蕴蓄着强烈的阶级仇恨，“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⑥。他们所受的压迫，是阶级的与民族的双重压迫。早在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八月，当支持司马越的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宣帝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孙）和安北将军王浚调动乌丸、鲜卑及汉人兵力十余万，南伐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时，迁居于并州的五部匈奴左贤王，此时为司马颖属下的冠军将军刘渊，打着调动五部匈奴以消灭司马腾、王浚为名，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县东北）

公开打出了反晋的旗帜，是年十一月，刘渊称汉王。怀帝永嘉二年（308），又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成了北方反晋斗争的最强势力。

当时聚众青、徐的王弥、曹嶷⑦，起兵赵魏的汲桑、石勒⑧等拥众归渊，以汉为共主。渊以王弥为青、徐二州牧。王弥转战青、徐、兖、豫四州，攻破他所经过的许多郡县，一度攻入西晋的重镇许昌，其兵锋进抵西晋首都洛阳城下。石勒也率众三万，转战魏郡（治邺）、汲郡（治及，今河南汲县西南二十五里）、顿丘（郡治顿丘，今河南清丰县西南）一带，陷五十余壁，“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⑨。永嘉三年（309）夏，石勒又“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众至十余万”⑩。同年，晋左积弩将军朱诞奔汉，具陈晋都洛阳孤弱，劝刘渊遣军攻之。渊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以灭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将兵攻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克之；又败晋将王堪于延津（今河南延津县北），沉男女三万余口于黄河。是年八月，汉主渊命楚王聪等进攻洛阳，西晋以平北将军曹武等拒之，皆为聪所败。聪率军长驱至宜阳（今河南宜阳西），“自恃骤胜，怠不设备”⑪。九月，晋弘农（今河南灵宝北）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刘聪大败而还。十月，汉主刘渊复遣楚王聪、王弥、始安王曜、汝阴王景帅精骑五万进攻洛阳，大司空雁门刚穆公呼延翼帅步卒继之。经宜阳后，刘聪率军屯洛阳西明门（洛城西面南头第二门），晋将北宫纯等夜帅勇士千余人出攻汉壁，斩其征虏将军呼延颢。刘聪因首战失利，便南屯洛水，大将呼延翼为其下所杀，其众自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溃归。刘渊敕刘聪等还师；聪表称“晋兵微弱，不可以翼、颢死故还师，固请留攻洛阳”⑫，渊许之。守备洛阳的晋太傅司马越婴

城自守。刘聪亲自去嵩山祈祷，以平晋将军刘厉、冠军将军呼延朗督摄留军。司马越的参军孙询说越出击呼延朗，斩之。刘厉也穷蹙赴水而死。王弥对刘聪说："今军既失利，洛阳守备犹固，运车在陕，粮食不支数日，殿下不如与龙骧（渊族子刘曜）还平阳，裹粮发卒，更为后举。"刘聪自以请留，未敢还。刘渊平阳的太史令宣于修之也言于渊曰："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⑬渊乃召刘聪等还师平阳。

永嘉四年（310）七月，刘渊死，太子刘和立，渊第四子聪杀和自立。十月，刘聪遣其子汉河内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弥帅众四万进攻晋都洛阳，石勒帅骑二万会粲于大阳，粲率军周旋于梁、陈、汝、颍之间，攻下堡壁百余处，在战略上达到孤立西晋首都洛阳的目的。洛阳在汉军包围下饥困日甚，太傅司马越遣使以羽檄征天下兵，使入援京师。"（怀）帝谓使者曰：'为我语诸征、镇，今日尚可救，后则无及矣！'既而卒无至者。"⑭司马越因擅杀朝臣王延等，既失众望；又以胡骑益盛，内不自安，请求怀帝让其外讨石勒，镇集兖、豫。怀帝对他说："今胡虏侵逼郊畿，人无固志，朝廷社稷，倚赖于公，岂可远出以孤根本！"但司马越认为其外出，"幸而破贼，则国威可振，犹愈于坐待困穷也"⑮。十一月，司马越率甲士四万向许昌，用太尉王衍为军司，留其子司马毗及龙骧将军李恽、右卫将军何伦守卫京师。永嘉五年（311），司马越因与征东将军、青州刺史苟晞有矛盾，苟晞乃移檄诸州，自称功伐，陈越罪状。晋怀帝"亦恶越专权，多违诏命；所留将士何伦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因而密赐苟晞手诏，使晞讨越。三月，越行军至项（今河南项城县东北），忧愤发病而死。其军归由襄阳王司马范和王衍率领，奉越丧还葬东海（今属江苏）。四

月，折至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鹿邑县），为石勒军追及，“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均被石勒俘获，石勒使人夜排墙加以坑杀，并剖越棺柩，焚越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⑯西晋的主力军至此全部消灭。与此同时，汉主刘聪使前将军呼延晏将兵二万七千进攻洛阳，“皆及河南，晋兵前后十二败，死者三万余人。始安王曜、王弥、石勒皆引兵会之”⑰。六月，洛阳被攻陷，晋怀帝司马炽被掳至平阳，后杀之。刘聪军破洛阳时，纵兵烧掠，“士民死者三万余人”，并发掘诸陵，“焚宫庙、官府皆尽”⑱。东汉末董卓焚洛阳后，经魏、晋经营近百年的洛阳城，再次化为灰烬。

刘聪在攻下洛阳以后，又遣刘曜攻破潼关，进掠长安。时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⑲。晋冯翊（今陕西大荔）太守索綝与安夷护军麹允、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太守贾匹谋兴复晋室，共推贾匹为平西将军，率众五万向长安。雍州刺史麹特、扶风（今陕西泾阳西北）太守梁综等也帅众十万会之。时豫州刺史阎鼎与司空荀藩正同谋奉秦王司马邺（司马炎子司马晏之子，出继伯父秦献王司马柬，袭封秦王）入关，据长安以号令四方。司马邺在永嘉五年洛阳倾覆时，避难于荥阳密县（河南密县），与舅荀藩、荀组相遇，自密南趋许、颍。后豫州刺史阎鼎与荀藩等挟司马邺自宛（今河南南阳）趣武关。十二月，贾匹迎秦王司马邺入于雍城（今陕西凤翔南）。永嘉六年（312）四月，贾匹等围长安数月，汉中山王刘曜“连战皆败，驱掠士女八万余口奔于平阳”⑳。秦王司马邺自雍入于长安。十二月，贾匹为汉凉州刺史彭天护帅群

胡攻杀。阎鼎也在与京兆太守梁综争权中，被麹允、索綝、冯翊太守梁肃合兵攻击中被杀。第二年（313）二月，晋怀帝在平阳被刘聪杀害。四月，司马邺在长安即皇帝位，是为愍帝，改元建兴。以卫将军梁芬为司徒，雍州刺史麹允为尚书左仆射，录尚书事，以京兆太守索綝为卫将军，领太尉，"军国之事，悉以委之"。是时长安城中，"户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车四乘，百官无章服、印绶，唯桑版署号而已"㉑。五月，晋愍帝遥封这时已立足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的琅琊王司马睿为左丞相、大都督，督陕东诸军事；以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督陕西诸军事。并令幽（晋幽州刺史王浚），并（晋并州刺史刘琨）两州勒卒三十万直造平阳，令司马保帅秦、凉、梁、雍之师三十万诣长安，令司马睿领精兵二十万径造洛阳，同时发动向汉的进攻，以期复国，并迎回晋怀帝梓宫。但晋愍帝的这个诏令，完全成为一纸空文。幽州刺史王浚"名为晋臣，实欲废晋自立"㉒，与刘琨为争夺冀州而相互攻打，不久（建兴二年，314）即为石勒攻杀。刘琨在永嘉元年，出任并州刺史，领匈奴中郎将。永嘉之乱中，他在并州一带，曾联合鲜卑拓跋猗卢及其子六脩等抗击过刘曜对晋阳（并州治所，今山西太原市）的进攻。建兴二年（315），晋愍帝进刘琨为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希望他担当起抗敌卫晋的重任。刘琨虽抗敌的决心坚强，但他的兵力十分薄弱。在刘聪、石勒两大强敌的夹攻下，他只能依靠猗卢的鲜卑兵力据守晋阳、阳曲（今太原市北阳曲镇）一带，并逐渐陷入"进退维谷，首尾狼狈"㉓的困境。立足江南的琅琊王司马睿则"以方平江南，未暇北伐"㉔为辞，拒绝出兵。南阳王司马保为司马模之子，模后被刘聪子粲杀死，时保在上邽（今甘肃天水市）。

其后贾匹又死，“保全有秦州之地，自号大司马，承制置百官。陇右氐羌并从之”㉕。愍帝即位后，以其为右丞相，加侍中，都督陕西诸军事。寻又进位相国。刘曜派兵进攻关中，愍帝多次征兵于司马保，保左右曰：“蝮虵螫手，壮士断腕，今胡寇方盛，且宜断陇道以观其变。”㉖采取的是保存力量和观望的态度。

愍帝为了取得当时关中武装地主的支持，曾滥授爵位以悦人。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青将军之号（加将军号而假以银印、青绶）”㉗。可是对兵民的生活，却全然没有注意改善。长安临时政府的局面支持了四年。在此期间，关中的农业生产不仅没有能够得到恢复，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内部不断火并的结果，生产进一步受到破坏，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建兴四年（316）七月，汉大司马刘曜围北地（今陕西耀县、富平一带）太守麴昌，大都督麴允将步骑三万救之，为刘曜所败，北地为汉军所夺。曜进至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渭北诸城悉溃”㉘。八月，刘曜率军进逼长安。晋将焦嵩、竺恢、宋哲引兵救长安，“皆畏汉兵强，不敢进”。相国司马保遣胡崧将兵入援，击破刘曜军于灵台（长安西40里），“崧恐国威复振则麴（允）、索（綝）势盛，乃帅城西诸郡兵屯渭北不进”。于是刘曜攻陷长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内外断绝，城中饥甚，米斗直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㉙。十一月，愍帝泣谓麴允曰：“今穷厄如此，外无救援，当忍耻出降，以活士民。”使侍中宗敞送降牋于刘曜，愍帝“乘羊车，肉袒、衔璧、舆榇出东门降”㉚。后被送往平阳。至此，历时三十六年（280－316）的统一的西晋王朝

正式灭亡，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个短促的王朝。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三年。

②《晋书》卷五九《东海王越传》。

③《晋书》卷三九《王沈附子浚传》。

④《晋书》卷四三《王衍传》。

⑤《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

⑥《晋书》卷五六《江统传》。

⑦王弥，东莱（今山东掖县）人，家世二千石。惠帝末，刘伯根起义于东莱之弦（音坚）县（今属山东），弥率家僮从之。柏根死，聚徒海渚，为晋将苟纯所败，入长广山，青土号为“飞豹”。曹嶷，王弥部将。

⑧汲桑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马牧主。石勒，上党（今山西潞城东北）武乡羯人。晋太安中，并州饥乱，晋并州刺史、东嬴公司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两胡一枷，石勒也在其中，被卖于山东茌平人师懽为奴。晋惠帝被张方逼迁于长安后，成都王司马颖也被掌握实权的司马颙废黜。时颖故将公师藩起兵赵魏，汲桑、石勒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赴之。后公师藩被晋将苟晞讨斩之，桑乃自号大将军，与勒一起，称为成都王颖诛东海王越、东嬴公腾而起兵。

⑨⑩《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上。

⑪⑫⑬《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三年。

⑭⑮《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四年。

⑯⑰⑱《资治通鉴》卷八七，晋怀帝永嘉五年。

⑲《晋书》卷六〇《贾匹传》。

⑳《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怀帝永嘉六年。

㉑㉒《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

㉓《晋书》卷六二《刘琨传》。

㉔《资治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

㉕《晋书》卷三七《宗室、司马模附保传》。

㉖《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三年。

㉗㉘㉙㉚《资治通鉴》卷八九，晋愍帝建兴四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偏安江左

西晋末年，北方连年混战，经济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大批死亡。北方士族和百姓纷纷渡江南下避乱。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王朝，偏安江左，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

司马睿（276－322），字景文，司马懿的曾孙。他祖父司马伷，晋武帝时封琅邪王，他父亲司马觐袭封。父亲死后，司马睿十五岁袭爵为琅邪王。八王之乱中，随东海王司马越拥惠帝讨伐成都王司马颖，兵败荡阴（今河南汤阴西南），逃归封国琅邪（今山东临沂北）。其后，司马越命其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永嘉元年（307），被晋怀帝封为安东将军，移镇建康。晋怀帝被刘聪杀死，晋愍帝即位，封其为左丞相，督陕东诸军，后任为丞相。公元316年，刘曜陷长安（今陕西西安），晋愍帝投降。第二年，司马睿称晋王。公元318年，愍帝被杀的消息传到建业，司马睿称皇帝，史称晋元帝，改元大兴。

司马睿的东晋王朝，是在王导、王敦等北方士族的支持下

建立和巩固起来的。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王敦（266－324），字处仲，王导的堂兄。琅邪王氏是当时最著名的士族，王导、王敦则是士族的首领。王导青年时期就很有才识，一些名士曾赞赏他是“将相之器”。西晋末，宗室自相残杀，中原大乱，王导有振兴国家的大志，便倾心推奉琅邪王司马睿，司马睿也很器重他，两人因此成为亲密的朋友。八王之乱中，王导曾劝司马睿离开洛阳，返回封国琅邪，以保存自己，发展势力。司马睿出镇建业后，便以王导为谋主，“推心亲信，每事咨焉”①。

王导首先为司马睿政权争取了江南士族的支持。司马睿出镇建业之初，“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②。江南士族对司马睿如此傲慢，并非偶然。他们从三国时期以来，已形成一股强大的地方势力。司马睿出镇建业前后，周玘曾三定江南。张昌起事后，派石冰攻取徐、扬二州。周玘起兵讨石冰，会同陈敏的官军，大败石冰于建业，石冰北走徐州被杀。这是一定江南。陈敏打败石冰后，割据江东，为政残暴。永嘉元年（307）周玘等擒斩陈敏于建康。这是二定江南。永嘉四年（310），吴兴（今属浙江）人钱璯起兵反晋，司马睿派郭逸等率兵讨钱，但因兵少畏缩不前。周玘又一次率“乡里义众”，会同郭逸等斩璯。传首建康。这是三定江南。周玘三定江南，表明江南士族的势力在江左是举足轻重的。晋灭吴后，北方士族在政治上居于垄断地位，江南士族受排挤，他们同司马氏朝廷及北方士族本来就存在相当尖锐的矛盾，而司马睿在晋王室中既是远支疏属，又兼“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③，威望不高。因此，在江南士族看来，他和他的追随者只不过是

一批“亡官失守之士”，自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但是，没有江南士族的支持，司马睿要在江左站住脚是不可能的。于是王导和堂兄王敦商定，利用他们在士族中的影响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他们趁人们到水边进行祈福消灾活动时，组织郊游，让司马睿乘肩舆，带着威武整齐的仪仗，王导、王敦等士族名流骑着马，浩浩荡荡跟随在后。王导等士族名流对司马睿的拥戴，惊动了江南士族，司马睿的形象在他们的心目中顿时高大起来。他们的头面人物纪瞻、顾荣等“乃相率拜于道左”④。王导还向司马睿建议，请顾荣、贺循出来做官，以结人心，如果这两人愿意合作，许多江南人士就会仿效他们。司马睿接受他的建议，派他登门邀请顾荣和贺循，二人均应命而至。贺循被任为吴国内史，顾荣被任为军司马，“凡军府政事，皆与之谋议”⑤。通过他们的推荐和带动，许多江南士族果然先后到司马睿手下任官，支持司马睿政权。纪瞻任军祭酒。周玘过去不谈功赏，拒绝东海王司马越的任命，现在不但出任吴兴太守，接受乌程县侯的爵位，而且很卖力气，在吴兴颇有治绩。

王导还为司马睿政权争取到北方士族的拥护，这也是司马睿政权建立和巩固的重要条件。当时北方士族“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如琅邪王氏、太原王氏、陈国（河南淮阳）谢氏、谯国（安徽亳县）桓氏等诸著名士族都先后南渡。王导建议司马睿“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⑥。司马睿便从他们之中选取了百余人为属官，其中不少人如周顗、祖逖、刘隗、庾亮、桓彝、温峤等，都先后成为东晋的重臣。而王导、王敦对司马睿政权的直接支持，则起着关键的作用。王导从安东司马到丞相，执掌朝政，除了出谋划策外，还以其才识和在士族中的影

响，对北方士族起着吸引和安定人心的作用。桓彝初过江，看到司马睿政权微弱，曾对周顗说，“我以中州多故，来此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将何以济！”深感前途没有指望。他会见了王导并共论国家大事后，由失望一变而为充满信心高兴地对周顗说，“向见管夷吾，无复忧矣”⑦。温峤初渡江，看到东晋政权草创，纲维未举，深为忧虑，和王导畅谈后，也欢欣鼓舞，说“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复何忧”⑧。管夷吾即春秋时齐国的贤相管仲。北方士族把王导视为当代管仲，从他的才识和谋略中获得了信心和力量。王敦则是司马睿建立和巩固政权的军事支柱，从任扬州刺史到大将军，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东晋全境）诸军事。永嘉五年（311），王敦曾讨斩不服从司马睿教令的江州刺史华轶；从公元313年起，与反晋的杜弢军队前后数十战，两年后将他们镇压下去，为东晋的建立扫清道路。正因为王导、王敦是拥立司马睿政权的主力，是东晋王朝的实际建立者，所以司马睿即帝位时，一再请王导和他坐在一起，接受百官朝贺，王导没有同意。当时流行的“王与马共天下”⑨，也生动地表明王氏与司马睿政权的关系。

为了取得南北士族的支持，东晋朝廷还对他们采取宽纵政策。侨置州郡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即在南方设置已非东晋控制的北方州郡政府，也就是流亡地方政府。如侨置南兖州、南徐州于京口（今江苏镇江），侨置南豫州于芜湖（今属安徽）。此外，还先后侨置司、青、冀、幽、并等州，侨置的郡县就更多了。侨置众多的各级地方政府机构，一方面可以为“亡官失守”的北方士族开辟广阔的仕途，以便他们居高官，领厚禄；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这些地方广占田地，发展封建庄园经济，奴役南渡的北方百姓。如王、谢等著名士族，在会稽（今

浙江绍兴）一带就占有广大的庄园。侨置州郡的地方一般还未充分开发，江南士族势力相对薄弱，北方士族在这些地方求田问舍，和他们的利害冲突相对少些，可以缓和彼此的矛盾。执掌朝政的王导对地方官吏和豪强的不法行为，也是一贯宽容的。

为了维护和巩固政权，东晋朝廷还采取其他一些措施。王导鉴于西晋时“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以至丧乱的教训，提倡节俭，并身体力行，家中“仓无储谷，衣不重帛”⑩；在帑藏空虚的情况下，他带头穿起练布（粗丝织品）单衣，士人竞相仿效。司马睿初过江时，常因酗酒误事，王导还劝他戒了酒。这比西晋时石崇与王恺斗富，竟相挥金如土，或何曾一餐花一万钱，何劭一餐花两万钱等穷奢极欲的情况，自然要好得多。考虑到战乱对文化教育和典章制度的破坏，王导等“为使文武之道，坠而复兴”⑪，还建议设立学校，设置史官和制定典章制度。农业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司马睿曾下令在徐、扬二州推广冬小麦的种植；还要求地方官府和军队实行屯田，规定以收入粮食多少，作为考核二千石官吏的等级标准。

在建立东晋政权的时候，王导等人似乎并不满足于江南一隅的偏安局面，而欲有所作为。一天，一些南渡的士族名流聚会在江边宴饮，周顗因流落江南，而有“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慨叹，引起其他人也因此触景伤情，相视痛哭流涕。王导当场严肃地批评说：“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⑫大家这才收泪承认错误。王导所说的“戮力王室，克服神州”，就是要求大家一致尽力支持东晋政权，兴师北伐，收复中原，重新统一全国。这是一个宏伟的抱负，

是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深受人民欢迎的，但一直未能实现。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则是最主要的原因。

江南士族虽然支持和参加东晋政权，但他们与北方士族的矛盾还是很尖锐的，斗争还不时表面化。东晋政权以北方士族为主体，他们“多居显位，驾御吴人，吴人颇怨”⑬。宗族强盛的周玘，就因受司马睿的猜忌和北方士族刁协的轻侮，曾谋起兵诛除执政的北方士族，代之以江南士族，终因谋泄失败，忧愤而死。他临死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北方人杀死的，你能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两年后，建兴三年（315），周勰果然秘密勾结徐馥，以讨王导、刁协为名起兵。孙吴的末代皇帝孙皓的族人孙弼，也起兵响应。这次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了，但南北士族间的矛盾和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北方士族之间以及他们与司马氏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斗争也常常表面化。王导、王敦权位日重，王敦更欲专制朝廷，有夺取帝位的野心。司马睿于是重用刘隗、刁协等，以抑制王氏势力。

永昌元年（322）王敦以诛刘隗为名，从武昌（今湖北鄂城）起兵，顺流而下，进攻建康。周玘的弟弟周札驻守建康石头城，趁机开城门接应王敦。这实际上是南方士族假手王敦打击北方士族。王敦入据建康后，自为丞相。刘隗北投石勒。刁协北逃途中被杀。周顗、戴渊也被王敦杀死。随后王敦虽然退回武昌，但遥控朝政。太宁二年（324），王敦急于夺取帝位，再次起兵向建康进攻，因遭到王导和其他士族的反对，以及王敦病死而失败。王敦被戮尸，他的主要党羽被处死。后来，在平定王敦之乱中立了功的苏峻、祖约，势力日益扩展，对未能执掌朝政不满。咸和二年（327），他们以讨伐执掌朝政的庾亮

为名，联合起兵进攻建康，第二年入据京师，将宫室、官署付诸一炬，控制了朝政。在陶侃、温峤、庾亮等的讨伐下，苏峻战死，祖约北投石勒，乱事始告平息。

这一系列争权夺利斗争，大大削弱了东晋的国力。多次北伐进军，就是因为得不到士族的支持，或受他们矛盾斗争的制约而中止、而失败，徒劳而无功。祖逖是誓死收复中原的志士，也曾收复黄河以南地方。在他准备推锋越河，扫清河北的时候，就是因为受朝廷的牵制，看到王敦、刘隗等争权夺利，痛感壮志难酬，忧愤而死，前功尽弃。庾亮、庾翼和殷浩的北伐也无功而返。后来桓温北伐虽然收复洛阳，推进到长安附近，但他觊觎司马氏的帝位，既失去士族的支持，也缺乏锐意进取精神，只能半途而废。刘裕北伐的成绩可谓最大，曾收复洛阳和长安，但也因忙于夺取司马氏帝位，步步后撤，北伐的成果得而复失。其后南朝政权更迭频繁，更不可能采取有效的收复中原的行动，北方也未形成足以统一南方的强大势力，偏安江左的局面一直延续了二百七十多年，直到开皇九年(589)，隋文帝渡江灭陈，统一全国，才结束偏安江左的局面。

但是，王导等人拥立司马睿，建立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还是有历史功绩的。江南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可以抵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抗拒北方战乱向南方蔓延，保持南方相对安定的政治局面。这一方面可以保护已经得到一定开发的南方经济和文化，另一方面使带着比较先进生产技术的北方百姓，渡江南下后，有可能和南方百姓一起，对南方进一步开发，促使江南经济文化更大的发展，并超过北方。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八六，怀帝永嘉元年。

②《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③《晋书》卷六《元帝纪》。

④《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⑤《资治通鉴》卷八六，怀帝永嘉元年。

⑥⑦《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⑧《晋书》卷六七《温峤传》。

⑨《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⑩⑪《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⑫《世说新语·言语篇》。

⑬《晋书》卷五八《周处传附周𫖮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祖逖北伐

司马氏偏安江左，建立东晋政权前后，广大中原地区为匈奴、羯等少数民族的统治者所控制。在民族压迫下的北方百姓希望东晋北伐，解除他们的痛苦。东晋统治集团的一些人士也曾有过多次北伐的军事行动。他们各人的动机不尽相同，取得的成效也不一样，都由于错综复杂的矛盾而失败。祖逖是北伐第一人，慨然以恢复中原为己任，取得的成就也较大。

祖逖（266－321），字士稚，范阳郡遒县（今河北涞水北）人，范阳地方大姓。祖上历任二千石官吏。其父祖武，曾任上谷郡（治所在今河北怀来东南）太守。祖逖性格豁达无拘束，十四五岁还未读书，但轻财好侠，常散谷帛周济贫乏，为邻里宗族所看重。后博览群书，涉猎古今，当时人认为他有辅佐当世的才能和本领。青年时期与后来任司空的刘琨同任司州（治所在今河南洛阳）主簿。两人关系极好，共被同寝。半夜闻鸡鸣，祖逖即蹬醒刘琨说，这不是不好的声音，于是起而舞剑习武。这就是传颂千古，催人奋进的"闻鸡起舞"的故事。两人都有英锐气质，常讨论世事，激动时或中夜起坐，说："若四

海鼎沸，豪杰并起，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①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后，匈奴等少数民族首领进入中原地区，北方大乱。豪族大姓纷纷避乱江南，祖逖也率领乡党宗族数百家迁徙淮泗地区（今江苏北部），用所乘的车马载一同南迁的老弱病人，而自己徒步行走，药物、衣服、粮食与大家共用，又富有应变的谋略，因此受到男女老少的拥戴，被推为行主。到达泗口（今江苏清江西南）时，祖逖被镇守建康的琅邪王司马睿任命为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刺史，旋即征召为军咨祭酒。祖逖于是定居于丹徒之京口（今江苏镇江）。

祖逖有感于社稷倾覆，常怀振兴恢复之志。他招募暴桀勇士为宾客义徒，待之如子弟，备加保护，因此受到人们非议，而他若无其事。当时琅邪王司马睿渡江不久，尚未在江南站稳脚跟，来不及也没有力量北伐。祖逖便向司马睿提北伐的建议说，晋朝发生的动乱，并不是上边无道而造成下边怨叛，是由于诸王争权，自相残杀，使得戎狄乘机流毒中原。现在北方百姓被残害，“人有奋击之志。大王诚能发威命将，使若逖等为之统主，则郡国豪杰必因风向赴，沈溺之士欣于来苏，庶几国耻可雪，愿大王图之”②。司马睿因此于建兴元年（313）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他一千人的粮饷、三千匹布，不给兵器，由他自己招募士兵。

祖逖于是从随自己南渡的亲党部曲中选百余家北渡长江。船到江心，他敲击着船桨，当众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③辞色壮烈，部下都深受感动而慨叹。

祖逖渡江后，屯于淮阴（今淮阴西南），一面打造兵器，一面招募训练兵士。招募训练成一支二千多人的队伍，然后向北进发。

当时黄河下游地区主要为羯族首领石勒的势力所控制。石勒表面上受匈奴族首领刘渊、刘聪的号令，实际上他以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为中心，发展自己的势力，谋求建立自己的政权，占据着今山东、河南、河北大片地方。

在石勒控制黄河下游过程中，晋朝在这一带的势力逐步被消灭或退出。留在当地的汉人为了抗敌自保，结成许多大小不等的武装集团，大的上千家甚至数千家，小的数百家。他们筑堡而居，称“坞堡”，或称“壁”、“垒”。坞堡主多是大地主或武装集团的首领。坞堡各据一方，一般不相统属，有的还互相吞并，发生战斗。他们与晋和石勒的关系情况也比较复杂。祖逖北伐进入这一地区后，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

流人张平、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谯（今安徽亳县）为坞堡主。晋北中郎将刘演在北方与石勒斗争时，曾署张平为豫州刺史、樊雅为谯郡太守。司马睿南渡任丞相后，曾派桓宣前去劝说，他们都归附晋。到祖逖北伐时，他们杀死祖逖派去的使者，勒兵固守。祖逖进攻他们，一年多攻不克，后诱使其部属谢浮杀死张平，进驻太丘（今河南永城西北）。樊雅据谯城与祖逖相拒，祖逖久攻不下，南中郎将王含派参军桓宣率兵五百帮助祖逖。后樊雅经桓宣劝说，投降祖逖。祖逖于是进驻谯城。石勒派石虎领兵围谯城，王含再派桓宣增援祖逖，石虎退走。

蓬陂（今河南开封境内）坞堡主陈川自称陈留（治所在今河南开封东北）太守，本来支持祖逖北伐，曾派其部将李头帮助祖逖进攻樊雅。后因其部将率众归附祖逖，而反对北伐。他大掠豫州诸郡，被祖逖打败后，举浚仪（今河南开封西北）叛

降石勒。祖逖率众讨伐陈川，石勒领兵五万援救，被祖逖打败。石勒于是收兵掠豫州，并将陈川部众五千户迁往襄国，留桃豹等守浚仪城，据守城的西半部。祖逖派遣部将韩潜等占据城的东半部。两军同处一大城，对方从南门出入放牧，晋军开东门，相守四十日。祖逖军已缺粮，但用许多布袋装满土，然后派千余人连续运进城中；又派几个人担米，伪装极端疲劳而休息道旁。桃豹军来追夺时，他们弃担而走。敌人抢得粮食，便以为祖逖军队运入城中的都是粮食，粮食充足；而他们自己缺粮已久，因而心里害怕，士气低落。石勒派人以千头驴运粮接济桃豹，又被祖逖派韩潜等截获。桃豹于是被迫乘夜撤走，退据东燕城（今河南延津东北）。祖逖派韩潜屯封丘（今属河南）以进逼桃豹，自己则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祖逖其后曾多次邀击石勒军，石勒又派精骑数万袭击晋军，又被祖逖打败。他镇戍的据点因此归附祖逖的很多，控制的地区不断缩小。

对于那些心存晋室的坞堡主，祖逖则做争取团结的工作。如赵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依附者众多，都有相当势力，但互相攻战。经祖逖派人调解，说明利害祸福，他们彼此和解，都愿意接受祖逖指挥。一些坞堡主原先归附石勒，并送了人质，现在倾向于晋，但不便公开归附。祖逖体谅他们的难处，听随他们私下保持“两属”关系，还不时派兵伪装抄掠他们，造成他们未归属晋的假象，以掩护他们的“两属”关系。这些坞堡主对祖逖十分感戴，石勒方面有什么举动，他们即秘密报告。正是由于利用这些情报，祖逖先后打了许多胜仗。

祖逖的北伐取得很大成果，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地方，“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④。祖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

恩礼遇之”。“其有微功，赏不逾日。躬自俭约，劝督农桑，克己务施，不畜资产，子弟耕耘，负担樵薪，又收葬枯骨，为之祭醊，百姓感悦。尝置酒大会，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且歌舞。’其得人心如此”⑤。东晋朝廷为祖逖进位镇西将军。

石勒因祖逖日益强大，“不敢窥兵河南”，还命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部）修缮祖逖的祖父和父亲的墓地，又给祖逖写信，要求互通使者和开展贸易。祖逖不予回信，而听任双方互市。结果收利十倍，公私丰赡，兵马日益发展壮大。

正当祖逖准备乘势渡过黄河，扫清河北的时候，晋元帝司马睿派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戴渊为都督兖、豫等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出镇合肥（今属安徽），祖逖也归他指挥。祖逖认为他是吴人，虽有才学和声望，但无宏图远见；且自己披荆斩棘，收复河南地方，而戴渊毫不费力却大摇大摆来管辖，心里不平。他又得知王敦与刘隗、戴渊等争权夺利，内难即将爆发，统一的大业难以成就，于是愤激得病，但仍图进取不辍。他将妻子儿女等安置在汝南大木山下（今属河南）。当时中原地区人士都认为他应当进据武牢（今河南荥阳境内），而反将家人安置于险要之地，有人曾加劝阻。祖逖没有采纳，以此表明继续北进的决心。他还营缮武牢城。该城北临黄河，西接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四望甚远。又恐其南无坚垒，必为敌人所攻袭，派其侄汝南太守祖济率众筑垒。垒未筑成，晋大兴四年（321）祖逖病死于雍丘，时年五十六岁。豫州百姓如丧父母，十分悲痛，纷纷立祠纪念他。东晋朝廷追赠他为车骑将军。

随后，东晋以祖逖的弟弟祖约为平西将军、豫州刺史，率领祖逖的部众。祖约没有安抚指挥的才能，得不到士卒拥护。祖逖原来的部众有的开始离去，如范阳人李产因北方动乱，希望保全宗族，远来依附祖逖。后来通过观察祖约的所作所为，失去信心，便率领子弟十余人返回乡里。石勒因祖逖死去，也无所顾忌，一再侵袭黄河以南地区，第二年冬，攻陷襄城（今属河南）、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包围谯城。祖约不能抵御，退屯寿春，石勒攻取陈留。许多原来归附祖逖的坞堡主归附了石勒。祖逖收复经营的黄河以南大片地方，又为石勒所据，当地百姓又陷于民族压迫的苦难之中。

注 释

①②③④⑤《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五胡十六国兴亡（上）

西晋灭亡以后，当西晋宗室琅邪王司马睿在长江以南建立东晋政权的时候，在北部中国，从西晋末至北魏统一北方的一百三、四十年间，入居中原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在中原和巴蜀地区建立了十六个国家（实际上是二十多个国家，其中也有汉人建立的政权），使北方长期陷入分裂割据的局面，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

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形势。各族统治者之间相互攻伐，社会动荡不安，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颠沛流离、生活极端艰苦。但是，各族人民通过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共同斗争，也增进了相互的了解和联系，从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过程。

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383）爆发的淝水之战以前，少数民族在当时中原地区建立的国家，主要有：汉（匈奴）、前赵（匈奴）、后赵（羯）、前燕（鲜卑）和前秦（氐）。

晋愍帝建兴四年（316），刘聪灭掉西晋以后，匈奴贵族刘

渊始建的汉国成为控制黄河中游大片地区的强大割据势力。为了加强控制，充实汉国都城平阳（今山西临汾市），刘聪把被征服的汉人和胡人源源不断迁入并州地区，他采用胡、汉分治的办法，设左右司隶和内史等官职，统治四十多万户汉民；置单于左右辅和都尉等官职，统治二十余万落包括匈奴在内的所有胡人。①

后来，随着汉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掌握汉国军权的上层分子逐渐成为新的割据势力。刘聪的族弟刘曜以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坐镇长安，盘据关中一带；晋永嘉五年（311），石勒杀王弥后，以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的身份，驻扎襄国（今河北邢台），割据河北；王弥的部将曹嶷攻拔齐、鲁之间郡县垒壁四十余所，势力发展至十余万，也有"雄据全齐之志"②，成为占有整个青州的割据势力。因此，刘聪实际所能统治的地区，只局限于山西（部分尚在刘琨敌后政权手中）和由刘曜坐镇的关中部分地区。史称其地"东不逾太行，南不越嵩、洛，西不逾陇坻，北不出汾、晋"③。

汉主刘聪是一个极端荒淫的统治者。他继位不久，即纳太保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又纳刘殷孙女四人为贵人，位次贵嫔，"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聪稀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贵嫔决之"④。不久，又立中护军靳准二女月光、月华为皇后，完全沉湎于声色之中，把政事推给任相国、大单于的儿子刘粲，自己则尽情享乐。刘粲同样骄奢淫逸，胡作非为。刘聪以其为相国、总揽政事以后，他更是作威作福，排斥忠良，昵近小人，严酷刑法，一意孤行。在他们的暴虐统治下，汉国人民饥困流离，死亡相继。汉人二十多万户投奔冀州的石勒，三万多人逃向东晋游击区豫州；氐、羌等少数民族反叛者也达十

余万落。⑤

东晋元帝太兴元年（318），刘聪病死，子刘粲继位，以外戚靳准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军国之事一决于准”⑥。靳准为了夺取权力，将刘聪的子孙全部杀死，“刘氏男女老少长皆斩于东市”⑦。自号大将军、汉大王。这时，刘聪的族弟、镇守关中的刘曜遣兵至平阳，族灭靳氏，移都长安，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第二年，汉国镇东大将军、羯人石勒也在河北称王，建立割据政权，史称后赵。

刘曜建立前赵后，对关中、陇西一带的氐、羌族多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和掠夺，把被征服的胡人迁入长安。氐族首领苻洪和羌族首领姚弋仲、仇池氐羌杨难敌等都被迫归降。在政治上，他仍采用胡汉分治的办法。不过刘曜自己以皇帝的身份统治汉人；而立其子刘胤为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以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⑧。刘曜还在长安设立学校，“简百姓年二十五以下十三以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⑨；并颁布封建租赋制度。比起汉国来，显出了更多的封建化倾向。

前赵与关东的后赵政权也进行过频繁的战争。东晋成帝咸和三年（328），石勒遣石虎率众四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南）西入伐刘曜，“河东应之者五十余里”⑩，进至蒲坂（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刘曜率前赵军主力分水陆进攻，大败石虎军，“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⑪。继攻后赵将石生于金墉（今洛阳城西北隅），石勒驰救，刘曜骄傲轻敌，又临阵酗酒，为石勒所擒获。次年，刘曜子刘熙，南阳王刘胤等在上邽（今甘肃天水市）为石虎所执杀，前赵的文武官员、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被徙往襄国，前赵灭亡。

匈奴族建立的汉、前赵，自刘渊于晋惠帝永兴元年称汉王起，至东晋成帝咸和四年，前赵为石勒所灭，共三世，立国凡二十六年（304—329）。

建立后赵的石勒，系上党武乡羯人（今山西沁州武乡县），为匈奴之别部。

永嘉五年（311），石勒与刘曜攻陷洛阳。后来石勒便进据襄国（今河北邢台），山东（指太行山以东）郡县，多被其攻陷。当时在北方的西晋残余势力中，力量比较大的有幽州刺史王浚和并州刺史刘琨。王浚不仅为政苛暴，赋役繁重；而且为着争夺冀州的地盘，还与刘琨互相残杀。愍帝建兴二年（314），为石勒所袭杀。刘琨出身于名门世族。永嘉元年（307），他出任并州刺史来到晋阳时，百姓“负楯以耕，属鞬而耨”，到处是一片“荆棘成林，豺狼满道”的荒凉景象。后来经过他一番整顿之后，重又出现了“鸡犬之音复相接矣”[12]的局面，许多流亡的百姓也纷纷归附。然而刘琨骄奢淫逸的本质也由此逐渐暴露，人民对此又表示不满，因此，“一日之中，虽归者数千，去者亦以相继”[13]。而且刘琨南面以汉国为敌，东面受制于王浚。永嘉六年（312），刘聪乘刘琨北击乌桓，乘虚袭击晋阳，刘琨依靠鲜卑拓跋猗卢的力量，才把汉国的军队打退。愍帝建兴四年（316），刘琨又为石勒所败，并州为石勒占领，刘琨投奔鲜卑段部，后为段部首领所杀。

东晋元帝建武二年（318），汉国外戚靳准作乱，杀死刘粲，石勒与刘曜派兵加以讨灭。大兴四年（321），石勒又攻灭辽东鲜卑段氏。同年乘东晋祖逖之死，进据河南、皖北。明帝太宁初（323），又进兵广固（今山东益都西北），破青州牧曹嶷，夺取青州。咸和四年（329），石勒攻灭前赵，并有关陇。

这样，广袤的中原地区，除占有辽东一隅的鲜卑慕容氏和河西张氏前凉政权外，均为石勒所统一。太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咸和五年（330），石勒又称赵天王，都襄国，旋即称皇帝。咸和八年（333），石勒病死，他的养子石虎废杀石勒子石弘，继承皇位，迁都于邺（今河南安阳市北）。后赵强盛之时，其地“南逾淮海，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⑭。成为与东晋南北对峙的大国。

石勒在统治期间，为了巩固他所建立的政权，在政治上竭力提高羯人的地位，称他们为“国人”，严禁称“胡”。他把羯人和其他胡人编成强大的禁卫军，由石虎以单于元辅的身份统率，作为他的基本力量；同时，他也搜罗和重用汉族士大夫。当他转战于并州、冀州时，曾把当地的衣冠人物集中为“君子营”，并重用汉族士大夫张宾，引为谋主，这对成就石勒的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后，他在政治上又恢复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典定士族，设立学校，制定律令，大力提倡佛教；在经济上，他下令州郡阅实户口，劝课农桑，采用魏晋的租调制度，规定“户赀二匹，租二斛”⑮。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后赵政权出现了明显的汉化趋势。与汉、前赵政权相比，后赵的统治比较稳定，民族矛盾较为缓和。

继石勒为帝的石虎，是一个残忍、荒淫、暴虐的统治者。还在随石勒征战之时，他就到处进行灭绝人性的屠杀，“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鲜有遗类”⑯。即位后，为了满足其穷奢极欲的需要，他在邺城、洛阳、长安大兴宫室，征调民工四十余万人。他大量掠夺民间妇女，后宫竟至十万人。为了扩充地盘，他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发动了频繁的战争，“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

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万人”⑰。加上各级官吏“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⑱。石虎的暴虐统治，激起了后赵境内汉族和其他被压迫各族人民的反抗。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晋穆帝永和四年（348）梁犊为首的东宫高力发动的起义。石虎的太子石宣为巩固其皇位继承权，暗杀其弟石韬；事泄，石宣妻儿被杀，东宫卫士十余万人谪戍凉州。其中高力（卫士兵种名称，以胡汉身强者充任）一万多人谪迁雍城后，在梁犊领导下起兵东还，至长安时，因得到胡汉各族人民的支持，发展至十多万人。他们击溃镇守长安的石苞后，东出潼关，进击洛阳、荥阳等地，石虎最后依靠羌人姚弋仲，氐族苻洪率领的精骑，才把他镇压下去。

永和五年（349），石虎死，诸子争权，互相残杀，石虎少子石世只立三十三天，就为兄石遵所杀。石遵立一百八十三天，为弟石鉴所杀。石鉴在位一百零三天，又为石虎养孙冉闵与大司农李农合作所杀。

冉闵字永曾，小字棘奴。冉闵文瞻，魏郡内黄（今河南内黄县）人，祖先为汉黎阳骑都督。西晋末，石勒破乞活帅陈午⑲，俘获了冉瞻，时年十二，石勒命石虎收养为子。冉瞻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位左积射将军、西华侯。冉闵幼而果锐，石虎抚养为孙。长大后，善谋策，勇力绝人，拜建节将军，历位北中郎将，游击将军。在石遵起兵废杀石世和石鉴废杀石遵的斗争中，冉闵都是积极参加者和中坚分子。东晋穆帝永和六年（350），冉闵杀死石鉴后，便自己即皇帝位，改赵为魏。后赵自大兴二年石勒称赵王至此而亡，立国三十一年（319—349）。

冉闵利用汉人对石虎暴虐统治的不满，扩大民族纠纷，令

邺城内“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结果百里内的汉人都入城，胡羯少数族则纷纷出城。冉闵知胡羯少数族终不为自己所用，便下令滥杀，“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后赵境内“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⑳。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胡汉民族间的矛盾。冉闵的这一做法是违反历史发展潮流的，因而其统治根本无法巩固。永和八年（352），冉魏政权就被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所消灭，只历时三年。

鲜卑慕容部为东胡之后裔。鲜卑族的“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㉑，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慕容部的祖先就是从鲜卑山分衍出来的。曾祖莫护跋在曹魏时，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司马懿讨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大棘城之北。莫护跋二传至涉归时，又迁居于辽东之北。晋武帝太康五年（284），涉归死，子慕容廆继立，侵灭扶余国。时鲜卑宇文、段氏二部势力渐强，与慕容部时有冲突。太康十年（289），慕容廆遣使降晋；同时又因辽东僻远，便由辽东北部南下，回居于徒河之青山（今辽宁义县境内）。元康四年（294），又移居大棘城（今辽宁锦州市附近），结束了飘忽不定的游牧生活。慕容部的真正倾向汉化，当从这时开始。永嘉初，慕容廆自称鲜卑大单于，晋愍帝遣使拜他为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国公。当时洛阳、长安相继失陷，中原汉族士人，除大部分南迁，一部分西投凉州张氏政权外，也有一部分山东、河北的世族地主，北徙幽州，投奔晋幽州刺史王浚。后来王浚政治腐败，石勒想要吞并王浚的形势又很明显，于是投靠王浚的世族地主，又转奔辽东，投靠平州刺史崔毖。慕容氏据有辽东之后，流亡到慕容部来的也不少，“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余”㉒。慕容廆“虚怀引纳”，重用汉族士人。以河东裴

嶷、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逄羡、广平游邃、渤海封抽、西河宋奭等为股肱，并设立郡以统流人，仿照汉族建立起一套政治制度，被东晋遥封为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辽东郡公。成帝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子慕容皝继立。成帝咸康三年（337），慕容皝称燕王。咸康七年（341），慕容皝迁都龙城（今辽宁朝阳县）后，南摧强赵，东破扶余及高句丽，攻灭鲜卑宇文部，"开境三千，户增十万"㉓。他在龙城地区集中了十万户汉族流民和其他族被征服的人民，耕种荒地，无牛的贷给耕牛，采用魏晋时分成制剥削方式：持官牛耕公田者官六民四；用私牛耕官田者对半分成。这一经济措施的实施，不仅开发了经济落后的龙城地区，而且也促进了鲜卑慕容部的封建化。

晋穆帝永和四年（348），慕容皝死，子慕容儁继位。他趁石赵政权之衰，席卷幽州，迁都于蓟（今北京市）。接着他进掠冀州，击灭冉闵。永和八年（352），慕容儁称帝，建立前燕，以邺（今河南安阳市北）为都城。前燕在镇压中原人民的反抗，削平连跨并州数郡，"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㉔的豪强张平的势力后，统治逐渐巩固起来。前燕强盛之时，其疆域"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yáo 摇）、黾（měng 猛），北守云中㉕，与关中的苻秦政权平分了黄河流域。

但慕容儁仍不以中原地区为满足，他企图进攻东晋，经略关西，下令州郡检查现丁，"率户留一丁，余悉发之，欲使步卒率满一百五十万"㉖。结果计划没有实现，慕容儁却病死了。升平四年（360），年仅十一岁的慕容暐继位。慕容暐统治时期，对外与东晋、苻秦兵革不息；对内因慕容暐母可足浑氏乱政，辅佐大臣慕容评等贪冒，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政治十分

黑暗。鲜卑慕容部贵族随着前燕政权的建立，都成了中原的封建大地主。他们在邺城附近强占土地，建立田园，占有数量很大的荫户。慕容暐接受其尚书左仆射悦绾检括荫户的建议，一次就“出户二十余万”㉗，朝野为之震惊。东晋废帝太和五年(370)，前燕为前秦苻坚所灭，慕容暐及王公以下并鲜卑四万余户迁于长安。

前燕自慕容皝称燕王，至慕容暐为苻坚所灭，历三世三十四年（337—370)。自慕容儁杀冉闵（352)，据有中原，至慕容暐失国，凡十九年。

建立前秦的苻氏，为略阳临渭氐族（今甘肃秦安县东南)，其祖先世为西戎酋长。西晋永嘉乱时，少数族上层分子纷纷起兵反晋，氐族首领苻洪也为本族人推为盟主，后归附于前赵和后赵。石虎徙关中豪强及氐、羌族于关东，苻洪被任为龙骧将军，流人都督，率户二万居于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之淇门渡)。石虎死，冉闵杀胡羯，“秦、雍流民相帅西归，路由枋头、共推蒲洪为主，众至十余万”㉘，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但不久，蒲洪为石虎旧将麻秋毒死。子苻健代领其众，由枋头鼓行而西，击败占据关中的割据势力杜洪，进入长安，占有关陇。穆帝永和七年（351)，苻健自称天王，建国为秦，次年改称帝。由于关中经过梁犊起义，继石赵而建立的苻秦政权采取了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苻健“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㉙；并于丰阳县（今陕西山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㉚。使关中地区的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国家的财政得到改善。永和十一年（355)，苻健死，子苻生继位。苻生是一个极端荒淫暴虐的统治者，被苻健

的侄子苻坚杀死。苻坚统治期间，前秦的国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苻坚为苻健弟苻雄之子。他继位后，重用汉族寒士王猛，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首先，他大力整顿吏治，打击氐族贵族势力。氐豪樊世，有大勋于苻氏，因而居功自傲，当众辱骂王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被苻坚杀死。苻健妻弟强德，也因酗酒横暴，为害百姓而被王猛捕杀。苻坚任王猛为京兆尹（管京城长安的行政长官），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㉛；其次，苻坚还恢复魏晋士族特权，广修学官。他从精通儒学经义的生徒中选拔官僚，建立起完善的封建统治秩序。其三，实行开发水利，劝课农桑的经济政策。当时关中水旱不断，苻坚"发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㉜。同时还整齐交通。在首都长安至各州的交通干线两旁，"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老百姓歌唱道："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㉝在苻坚、王猛的治理下，关陇地区出现了"田畴修辟，帑藏充盈"，"百姓丰乐"㉞的可喜景象。

在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的基础上，苻坚开始了统一北方的活动。晋废帝太和五年（370），苻坚派王猛率军长驱入邺，攻灭前燕，"迁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㉟，简文帝咸安元年（371），又攻取仇池氐杨氏，接着又进攻汉中，取东晋益州。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又进兵姑臧，攻灭前凉，前凉主张天锡投降㊱，"凉州郡县悉降于秦"

㊲，占有了整个河西地区。与此同时，又攻灭了鲜卑拓跋部在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附近）建立的代。太和七年（382），苻坚又命氐族贵族吕光进攻西域。这样，北部中国便全部统一于前秦政权之下，它的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苞襄阳，北尽沙漠”㊳，成为五胡十六国中国力量最强大的国家。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孝武帝太元八年（383），苻坚一意孤行地发动了对东晋的淝水之战，结果大败而回。从此，苻秦由强转弱，开始走上了衰亡的道路。

注 释

①②《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

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④⑤⑥⑦《晋书》卷一〇二《刘聪载记》。

⑧⑨⑩《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

⑪《资治通鉴》卷九四，晋成帝咸和三年。

⑫⑬《晋书》卷六二《刘琨传》。

⑭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⑮《晋书》卷一〇四《石勒载记》。

⑯⑰⑱《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

⑲乞活军是跟随司马腾撤出并州的武装流民集团。见周一良《乞活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⑳《晋书》卷一〇七《石季龙载记附冉闵传》。

㉑《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

㉒㉓《晋书》卷一〇九《慕容皝载记》。

㉔㉕《晋书》卷一一〇《慕容儁载记》。

㉖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㉗《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

㉘《资治通鉴》卷九八，晋穆帝永和五年。

㉙㉚《晋书》卷一一二《苻健载记》。

㉛㉜㉝㉞《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㉟《资治通鉴》卷一〇二，晋海西公太和五年。

㊱河西前凉政权：晋惠帝永康二年（301），晋散骑常侍张轨出任凉州刺史，芟夷"盗贼"，讨破鲜卑，威著西土。再传至茂（轨卒，子寔嗣，为其部下所杀，弟茂代为凉州刺史），规取陇西，南安地，与刘曜相持。张骏（寔之子）时，为刘曜所败。刘曜败，复收回河南地（指河套以南地），并遣将伐龟兹、鄯善、西域诸国。子重华继位，始称凉王。再传至元靓（重华子），复称凉州牧。后重华弟天锡杀元靓自立。孝元元年（376）为苻秦所灭，历九世，七十六年。见《晋书》卷八六。

㊲《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三年。

㊳《高僧传·晋长安五级寺释道安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五胡十六国兴亡（下）

苻坚在淝水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了北方的再分裂。原来在前秦控制下的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趁机起来摆脱其统治，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在关东地区，鲜卑慕容贵族先后建立了后燕、西燕、北燕和南燕；在关中地区，有羌族贵族姚苌建立的后秦和匈奴铁弗部建立的夏；在陇西地区，先后出现了氐族吕氏建立的后凉、鲜卑秃发氏建立的南凉、卢水胡沮渠氏建立的北凉、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和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

东晋孝武帝太元九年（384），即淝水之战的第二年，鲜卑贵族慕容垂首先起兵称燕王，建立后燕。

慕容垂字道明，为前燕慕容皝第五子。慕容儁称帝建立前燕时，慕容垂被封为吴王，镇信都（今河北冀县），又为征南将军、荆兖二州牧，威镇梁、楚之南。慕容暐统治时期，他曾大败晋将桓温于枋头，后因受到辅政的太傅慕容评等人的疑忌，怕遭杀戮而投奔苻坚。历位京兆尹，进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①。淝水战争中，苻坚遭到失败，只有慕容垂所部三万人却保全了实力。他乘机回到河北，收罗慕容旧

部，联合河北丁零翟斌②、乌桓张骧、屠各毕聪等部，集众二十余万③，建立后燕。太元十年（385），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太元十一年（386），慕容垂改称帝。他派兵攻占苻坚子苻丕据守的邺城，打退了当时东晋声援苻丕的军队，"关东六州郡县多送任请降于燕"④，逐渐恢复了前燕的版图。

在后燕建立的同年，慕容泓与慕永冲（均为慕容儁子）率领另一支鲜卑慕容部在关东起兵，进攻关中。太元十年（385），慕容冲即帝位于阿房（今陕西咸阳），建立西燕。但由于慕容部在关中没有基础，且西燕军队较暴虐，关中壁垒纷纷结盟与之抗拒；再加上新兴的后秦政权与它对抗，慕容部不得不退出关中。西燕宗室慕容永（慕容廆弟慕容运之孙。慕容冲畏后燕慕容垂之强，不乐东归，西燕将韩延因鲜卑众心之怨杀慕容冲，立冲将段随为燕王，尚书慕容永又袭杀段随）率鲜卑男女四十余万口，进入山西，击败这时在晋阳（今山西太原）称帝的苻丕，建都于长子（今山西长子），进而控制了并州八郡。太元十九年（394），为后燕慕容垂所灭。

这时，活动于代北的鲜卑拓跋部在拓跋珪领导下，于登国元年（386）重建国家，史称北魏。晋孝武帝太元二十年（395），后燕主慕容垂遣其太子慕容宝及慕容农、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结果在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北）一战，拓跋珪歼灭了后燕骑兵主力八万人。第二年，慕容垂亲自率军伐魏，虽然一度占领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但并未遭遇魏军主力，而慕容垂却在回军途中死去。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北魏军占领并州后，大举向河北进军，终于占领后燕都城中山。镇守邺城的燕宗室慕容德（慕容皝少子，慕容垂建立后燕时，封范阳王）于隆安二年（398）率户四万南迁滑台（今河南滑县），

建立南燕。第二年，滑台又被北魏军攻下，慕容德再迁于广固（今山东益都），据有山东地区。后慕容德死，兄子慕容超继位。慕容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⑤。义熙六年（410），为东晋将领刘裕所灭。

慕容德自东晋安帝隆安二年建立南燕，至慕容超二世，晋安帝义熙二年灭，凡十三年（398—410）。

北魏军占领中山后，后燕主慕容宝（慕容垂第四子）率部奔辽西龙城。义熙三年（407），中卫将军、鲜卑化汉人冯跋乘后燕主慕容熙（慕容垂少子。慕容宝在位三年，公元399年被部下杀死，子慕容盛继位，402年又被部下杀死，慕容熙继立为主）荒淫暴虐，人民骚动不安的机会，杀死慕容熙。推慕容宝养子、高句丽人高云（即慕容云）为天王。义熙五年（409），高云为左右所杀，冯跋取代后燕，自称天王，建立北燕。

慕容垂以太元九年称燕王，建立后燕，至慕容熙四世，加上高云为天王二年，共二十六年（384—409）。

建立北燕的冯跋，小字乞直伐，长乐信都人（今河北衡水县西南），其祖先为毕万之后，因食邑冯乡而改姓冯。冯跋虽为汉人，但与鲜卑慕容部关系密切。永嘉之乱时，冯跋祖父冯和避地上党（今山西潞城东北）。父冯安，慕容永时为将军，西燕灭亡后，东徙和龙。冯跋为慕容宝中卫将军。他在义熙五年（409）取代后燕建立北燕。北燕据有辽东、辽西，维持了二十八年的偏安局面。宋元嘉十三年（436），继立的跋弟冯弘时为北魏所灭。

关东地区的四个燕国政权，都是由前燕皇室贵族，或与皇室贵族关系密切的鲜卑化汉人所建立。建立西燕的慕容冲、慕

容永，建立后燕的慕容垂和建立南燕的慕容德属于前者；建立北燕的冯跋属于后者。他们在起兵争城夺地，建立割据政权过程中，互相攻打杀戮，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如西燕主慕容冲进攻长安，前燕主慕容暐图谋联络长安城内的鲜卑人予以响应，被察觉后，苻坚杀慕容暐及其宗属，"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⑥。慕容冲入居长安后，也"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⑦。慕容垂久攻苻丕据守的邺城不下，竟决漳水堤防，引漳水灌城。当时战争最为频繁的河北地区，人民遭受的灾难更为深重。只有在战争较少、社会比较稳定的地区，才出现过相对安定的局面。如慕容德率军袭占战争较少的青、齐地区后，约束军队，不得私掠；建立学官，"简公卿以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⑧；又大兴山泽之利，"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⑨。他还企图改变魏晋以来豪强大族隐匿户口，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的状况，大力清查户口，以尚书韩绰"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⑩。当时辽东地区战争也较少，建立北燕的冯跋能注意勤心政事，政治比较清明。他下令革除前朝苛政；每次派遣地方官，都亲自接见，询问为政要领，鼓励直言；同时又励意农桑，"下书省徭薄赋，堕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⑪。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⑫，使辽东地区的蚕桑业得到发展。在北燕统治的二十多年中，辽东地区社会比较安定。

在关中地区首先起来建立政权的是羌族贵族姚苌。苌父姚弋仲在晋末永嘉之乱时，从南安赤亭（今甘肃陇西县渭水东岸）东徙榆眉，"戎夏缀负随之者数万"⑬，自称护西羌校尉、雍州刺史。刘曜、石勒时分别归附过前赵、后赵。石虎徙秦、

雍豪杰于关东，姚弋仲率部众数万迁于清河（今山东临清东）。后赵末，梁犊起兵，姚弋仲镇压有功，进封西平郡公。后弋仲病死，子姚襄继位，有户六万。姚襄归附东晋，受晋将殷浩节制，殷浩北伐，以姚襄为前锋，襄中途倒戈，击殷浩，大败晋军。姚襄入关时，为苻坚战败而死。姚襄弟姚苌率部降于苻秦。淝水战后，慕容垂、慕容泓在关东起兵反秦。姚苌也率众奔渭北马牧，西州羌豪尹详、赵曜等率五万余家，推姚苌为盟主。太元九年（384），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公开打出了反对苻秦的旗帜。

当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姚苌进屯北地（今陕西耀县），"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余万户"⑭。太元十年（385），苻坚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将山（今陕西岐山附近），姚苌派遣骁骑将军吴忠率骑围坚，俘虏了他。太元十一年（386），苻坚族孙苻登在氐族残余势力支持下，据陇东（今甘肃平凉市）称帝。太元十九年（395），苻登与姚苌子姚兴战，兵败被杀。苻登子苻崇奔湟中（今青海西宁市），为乞伏乾归所杀。

前秦自苻健于东晋穆帝永和七年立，至苻登五世，凡四十四年（351—394）。

太元十一年（386），姚苌进攻长安，即帝位，建国号为秦，史称后秦。由于关中羌人与汉人融合较深，故姚苌建立的后秦政权是一个汉化程度较高的政权，继姚苌即位的姚兴也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统治者。在他统治时期，不仅在军事上击灭了前秦的残余势力苻登，击降了西秦王乞伏乾归、后凉王吕隆，河、陇地区的秃发傉檀、沮渠蒙逊、李暠也都臣服于后秦。其版图"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⑮，包括了前秦时期的整个关中与河陇地区。而且在政治上，

他抑制羌、汉豪强、杀死羌豪弥姐高地、杜成等，又徙“河西豪右万余户于长安”⑯；他下令放免由于荒乱而沦为奴婢的人；删除繁苛不便的刑政，立律学于长安，集中官吏进行学习，“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⑰；为了巩固统治，他还提倡儒学与佛教，招致名儒天水姜龛、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在长安讲学，生徒一万数千人。凉州名儒胡辩，在洛阳讲学，关中人士多前往听讲，他下令沿途关卡要为士人往返提供方便。在他的提倡下，后秦儒风极盛。同时，他还招致龟兹名僧鸠摩罗什演说佛经，并翻译佛经三百余卷。

但是，后秦北有北魏，南有东晋，在南北两大势力的夹击下，长期存在和发展都很困难，而且战争连续不断，一度臣属的赫连勃勃、乞伏乾归等纷纷反叛，后秦国力日蹙。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姚兴死，子姚泓继位。在姚泓统治时期，“内外离叛”⑱。内有宗室南阳公姚愔、齐公姚恢、并州牧姚懿等的叛乱；外有大夏赫连勃勃、东晋的进逼；境内羌、氐等少数族也时有反抗和叛变。义熙十三年（417），终为东晋刘裕所灭。后秦自姚苌于东晋孝武帝九年立，至姚泓凡三世，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灭，共立十四年（384—417）。

在后秦的西北方有匈奴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赫连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⑲，与刘渊同族。勃勃曾祖武，刘聪时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后为鲜卑拓跋猗卢所败，奔于塞外。祖豹子时，又招集种落，复为诸部之雄，石虎遣使拜为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父刘卫辰时，又入居塞内，苻坚封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⑳。前秦统治瓦解时，据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后刘

卫辰被魏军击杀，赫连勃勃奔于后秦姚兴高平公没奕于，姚兴以勃勃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虏二万余落，镇朔方”㉑。东晋安帝义熙三年（407），赫连勃勃以其众之万余人袭杀没奕于而併其众，自称天王、大单于，建国大夏。义熙九年（413），定都统万（今陕西横山）。由于铁弗部匈奴长期游牧于陕北长城内外，接受汉化影响较少，当时还处在奴隶制社会的早期阶段，因此和后秦相反，大夏的统治方式表现为野蛮的掠夺、残杀和破坏。他们依靠出没奔驰的骑兵，经常四出剽掠，残杀民众，驱掠牲口。赫连勃勃在打败南凉秃发傉檀时，杀伤万计，把人头堆在一起，以为京观，号“髑髅台”。攻姚兴时，“坑将士四千余人，以女弱为军尝”㉒。建筑国都统万城时，征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㉓。又征集工匠打造兵器，器成之后，“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即斩铠匠”㉔。义熙十四年（418），赫连勃勃乘刘裕灭姚泓后东归，关中守军寡弱之机，夺取长安，改称皇帝。然而，赫连勃勃的凶狠残暴统治，使“夷夏嚣然，人无生赖”㉕，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大夏的北方强敌北魏先后攻下统万和长安。元嘉八年（431），大夏的残余部分被北魏属国吐谷浑击灭。

赫连勃勃建立的大夏政权，历二十五载而亡（407—431）

在陇右、河西地区，淝水战后，曾建立五个短期的割据政权：即陇西鲜卑乞伏部乞伏国仁于太元十年（385）建立的西秦，都苑川（今甘肃榆中），它历时四十七年，宋文帝元嘉八年（431），被大夏赫连定（赫连勃勃子）所灭。氐人吕光于太元十年（385）建立的后凉，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它历时十九年，晋安帝元兴二年（403），被后秦姚兴所灭。与拓跋部同

源的河西鲜卑秃发部秃发乌孤在东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建立的南凉，都廉川堡（今青海乐都），义熙十年（414），亡于西秦，历时十八年，卢水胡[26]沮渠蒙逊于东晋安帝隆安五年（401）建立的北凉，都张掖（今甘肃张掖），宋元嘉十六年（439）为北魏所灭，历时三十九年。汉人李暠于东晋安帝隆安四年（400）建立的西凉，都敦煌（今属甘肃），宋武帝永初二年（421）为北凉所灭，历时二十二年。

在这五个割据政权中，除汉人李暠建立的西凉政权外，氐人吕光建立的后凉、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汉化程度较深。晋末河西地区自张轨建立前凉政权以来，社会比较安定，“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27]。张轨及其子孙，在政治上除遥戴晋室，作为维系人心以外，还能举贤纳谏，立法行令。因此，前凉政权不仅深得河西地区汉族人民的拥护；而且吸引了中原汉族士人的归附，使河西地区的儒学颇为兴盛。前凉被苻坚所灭以后，在西凉、北凉统治时期，根据吐鲁番出土十六国文书所见的官职名称等情况来看，河西地区仍然基本上沿用内地的一套行政制度[28]，同时也一直保持着尊礼儒学的传统。

西凉的开国君主李暠，“世为西州右姓”，是一个“通涉经史，尤善文义”[29]的儒生。他建立西凉后，“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30]，对儒学的提倡不遗余力。当时河西的名儒刘昞、宋繇等都被他所重用。1975年新疆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出土的《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有力地证明了西凉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

北凉主沮渠蒙逊，虽系卢水胡人，但汉化程度较高。在前凉、西凉儒风影响下，对儒生和儒学经典都很重视。沮渠蒙逊自幼好学，“博涉群史，颇晓天文”[31]。他灭西凉后，名儒刘

昞和宋繇均受其重用。在北凉统治时期，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搜辑的新出十六国时期高昌地区的官私文书来看，北凉实行过“按赀配生马”的制度，即按赀产的多寡配养生马。户赀不满一斛的，二户合赀配生马，也就是二户合养，所养马匹大都供军队骑乘。如果没有养好马，马死后又不立即补上，就是犯了“阅马逋罪”，就要被谪往白䒾（读棘，今鄯善东南之辟展，北凉的一个军事要塞）去戍守。又根据新疆阿斯塔那墓地六十二号墓1966年出土的两件“翟疆辞为共治葡萄园事”和另外出土的“西凉建初十四年（418）严福愿赁蚕桑券”、“北凉玄始十二年（423）翟定辞为雇人耕䵚（即穈，粟的一种）事”等几件文书来看，十六国时期的西凉和北凉，已经存在着租佃土地的封建契约关系。文书中反映的雇人耕䵚以绢酬值，则反映了这一时期绢帛与钱币相辅而行，局部地起着交换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以上出土的吐鲁番文书说明西凉、北凉推行的封建制度既渊源于中原地区，又具有河西的地方特色。北凉的沮渠蒙逊父子在文化方面，对古籍的保存和传播也相当重视，曾先后派遣使者向东晋和后来的刘宋求《周易》及子集诸书，并将永嘉后在凉州地区保存的《周髀》、《三国总略》等书及本地撰述的《凉书》、《敦煌实录》、《十三州志》以及敦煌赵𢾺所撰《甲寅元历》赠给刘宋王朝。此外，北凉还大兴佛教，鼓励道教。西域僧人昙无谶和河西沙门惠嵩、道朗等合作，在姑臧译出《大般涅槃经》、《方等大集经》等十几部大乘经典㉜，对佛学作出了贡献。

与此相反，建立西秦与南凉的鲜卑乞伏部和秃发部，它们当时尚处于以游牧经济为主或正在向农耕经济转化的半游牧经济阶段，接受汉化程度较浅。如秃发统治者认为仓府粟帛是引

起民族间争夺、战争的根源，只有保持“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的游牧经济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㉝。在他们的统治下，汉人原有的农业生产一般都遭到很大的破坏，并且由于战争的频繁，统治区人民的生活都十分艰苦。

总之，当时的陇右、河西地区，由于原有的经济水平较中原为低，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淝水战后，这里割据政权林立，没有一个国家能把这一地区统一起来。有的只是彼此征战吞併，因而使混乱持续很久，生产遭受破坏很大。如北凉沮渠蒙逊伐后凉吕隆时（吕光弟宝之子），后凉国都姑臧“谷价踊贵，斗直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万余口。城门昼闭，樵採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吕隆怕动摇民心，把要求出城的人全部活埋，于是老百姓只能等死，而“积尸盈于衢路”㉞。像这类情况，在当时并不是个别的。

北方十六国时期，南方正值东晋与之对峙。淝水战后北方重新出现的分裂，本来是东晋进行北伐，统一中原的绝好机会。但是，由于东晋统治集团中的大多数人，他们已经在富庶的南方重新建立了新的家园，只图苟安江表，没有收复北方的决心，这就为塞外鲜卑拓跋部的力量得以迅速发展，最终统一北方提供了条件和机遇。

鲜卑拓跋部早先是个游牧部落，在拓跋猗卢之前，还处于氏族社会时期。拓跋猗卢之世，正值西晋末年，晋并州刺史刘琨因为要依靠猗卢在军事上的支持，对抗刘聪和石勒，曾割陉岭以北（今山西原平县勾注山以北）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地给拓跋部，猗卢被晋愍帝封为代王。在猗卢统治时期，鲜卑拓跋部制订了刑法，开始向阶级社会过渡。但猗卢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被其儿子六脩所杀，部落离散。经过二十

余年，至什翼犍统治拓跋部时，“始置百官，分掌众职”㉟，逐渐从氏族制过渡到国家。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什翼犍重新建立的代国被苻坚攻灭，什翼犍也被其子寔君所杀。淝水战后，前秦统治瓦解。太元十一年（魏登国元年，386），什翼犍孙拓跋珪又纠合旧部，重建了代国，并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在拓跋珪统治时期，不仅抑制了国内的分裂势力，打败了北方的一些游牧部落；而且把农业生产由国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推广到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和稒阳塞外（今内蒙包头市北），使拓跋部力量迅速强大起来。太元二十年（魏登国九年，395），魏军大败后燕军于参合陂。第二年，魏军大举攻燕，夺取并州。又东出井陉，陆续占领河北地区的信都、中山、邺等重镇，基本上平定了关东地区。安帝隆安二年（魏天兴元年，398），拓跋珪称帝（道武帝），定都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宋武帝永初三年（魏泰常七年，422），魏明元帝拓跋嗣（拓跋珪长子）取得黄河以南刘宋的青、兖二州。宋文帝元嘉八年（魏神䴥四年，431），魏太武帝拓跋焘（拓跋嗣长子）攻灭匈奴铁弗部建立的夏。元嘉十三年（魏太延二年，436），又攻灭北燕。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439），拓跋焘又攻灭北凉，从而结束了长达一百二十年之久的五胡十六国的纷扰时期，最终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附十六国简表

政权称号	民族	创立者	建立年代	都城	灭于何国
汉	匈奴	刘渊	304—317	平阳(山西临汾)	
前赵	匈奴	刘聪	318—329	长安(陕西西安)	后赵
后赵	羯	石勒	319—349	1、襄国(河北邢台) 2、邺(河北临漳)	冉魏
△冉魏	汉	冉闵	350—352	邺(河北临漳)	前燕
前凉	汉	张轨	301—376	姑臧(甘肃武威)	前秦
成(成汉)	巴氐	李雄	304—347	成都	东晋
前燕	鲜卑	慕容皝	337—370	1、龙城(辽宁朝阳) 2、邺(河北临漳)	前秦
前秦	氐	苻健	351—394	1、长安 2、陇东(甘肃平凉)	后秦
后秦	羌	姚苌	384—417	长安	东晋
西秦	鲜卑	乞伏国仁	385—431	苑川(甘肃榆中)	夏
后燕	鲜卑	慕容垂	384—409	1、中山(河北定县) 2、龙城(辽宁朝阳)	北燕
南燕	鲜卑	慕容德	398—410	1、滑台(河南滑县) 2、广固(山东益都)	东晋
北燕	汉	冯跋	409—436	龙城(辽宁朝阳)	北魏
△西燕	鲜卑	慕容冲	385—394	长子(山西长治)	后燕

政权称号	民族	创立者	建立年代	都城	灭于何国
夏	匈奴(铁弗)	赫连勃勃	407—431	统万(陕西横山)	北魏
后凉	氐	吕光	385—403	姑臧(甘肃武威)	后秦
南凉	鲜卑	秃发乌孤	397—414	1、金城(甘肃皋兰) 2、廉川堡(青海乐都)	西秦
北凉	卢水胡	沮渠蒙逊	401—439	张掖	北魏
西凉	汉	李暠	400—421	敦煌	北凉
△翟魏	丁零	翟辽	388—392	滑台(河南滑县)	后燕
△代	鲜卑	1、拓跋猗卢 2、什翼犍	310—316 338—376	盛乐(内蒙和林格尔)	前秦
△北魏	鲜卑	拓跋珪	386	398年迁都平城(山西大同)	

注：有"△"者不在十六国之内。成、成汉与汉、前赵均以一国计。

注 释

①《晋书》卷一二三《慕容垂载记》。

②丁零翟氏，世居康居，后渐东迁。冉闵杀石氏，丁零酋帅翟鼠率其所部降于前燕慕容儁，封归义王。前燕灭，苻坚徙丁零翟斌于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渑池(今河南洛宁县西)之间。淝水战后，翟斌起义抗秦，推慕容垂为盟主。见《魏书》纪传。

③④《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⑤《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

⑥《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孝武帝太元九年。

⑦《资治通鉴》卷一〇六，晋孝武帝太元十年。

⑧⑨⑩《晋书》卷一二七《慕容德载记》。

⑪⑫《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

⑬《晋书》卷一一六《姚弋仲载记》。

⑭《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

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

⑯⑰《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

⑱《晋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

⑲⑳㉑㉒㉓㉔㉕《晋书》卷一三O《赫连勃勃载记》。

㉖北凉主沮渠氏的族源问题，史学界主要有二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匈奴族，马长寿、林干等持此说；一种认为卢水胡族源应为小月氏，唐长孺、周一良等持此说。

㉗《晋书》卷八六《张轨传》。

㉘见《文物》1983年1期。

㉙、㉚《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

㉛《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㉜见《出三藏记集》。

㉝《晋书》卷一二六《秃发利鹿孤载记》。

㉞《晋书》卷一二二《吕隆载记》。

㉟《北史》卷一《魏本纪》。

苻坚统一北方

西晋衰亡，北方先后出现众多的割据政权，其中多数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经过几十年的混战，到公元四世纪七十年代，北方才基本上为前秦苻坚所统一。

苻坚（338—385），一名文玉，字永固，略阳临渭（今甘肃秦安东南）人，氐族。他祖父苻洪世代为氐族小帅，在西晋末年的战乱中，先后投靠前赵刘曜、后赵石虎和东晋，被拜将封侯，后来自称三秦王。苻洪死后，其子苻健（苻坚的伯父）继位，据有关中，称皇帝，建都长安（今陕西西安）。苻坚从少年时期起就受汉族文化薰陶，成年后博学多才艺，有经国大志，结交有才能的志士，以图经世之宜。他的才志很受先辈的赞赏，苻健曾筑坛举行隆重的仪式，任命他为龙骧将军，还深情地告诫他说，这是他祖父发迹时的职衔，要求他不辜负先辈的期望。

苻健死后，其子苻生继位。苻生是个暴君，“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在位两年，“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①。永兴元年（257），苻坚率众入宫杀死

苻生，废去帝号，自称大秦天王，结束了苻生的残暴统治。

苻坚即位后，一方面诛除苻生的佞臣董龙、赵韶等二十余人，为被苻生残杀的高级官员恢复名誉，以礼改葬，对他们的子孙随才授职；另一方面重用王猛等人，在政治经济领域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出身贫寒，少有大志，好读兵书。公元254年，东晋桓温北伐，进军至灞上（长安附近）。王猛曾去拜见桓温，畅谈天下大势，旁若无人，深受桓温赏识。但他看出桓温没有恢复中原的决心，拒绝随其南下。苻坚慕其名，派人邀来相见，谈论国家兴废大事，非常投机，就像当年刘备会见诸葛亮一样。苻坚即位后，即任命王猛为中书侍郎，掌机密，此后官越做越大，甚至一年中五次升官，最后任丞相，"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②。王猛在苻坚的支持下，对豪强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措施。如氐族豪强樊世，自恃有大功于苻氏，负气倨傲，当众侮辱王猛。苻坚对此十分恼火，说"必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③。后来樊世在朝中与王猛发生争执，激怒苻坚，终于被处死。又如特进强德，自恃是苻健的内弟，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王猛捕而杀之，并陈尸于市。数旬之间，贵戚豪强被处死者二十多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风化大行，中央政权得以进一步加强。苻坚对此十分赞赏，说"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④。

前秦还颇重视农业生产，鉴于关中地区常发生水旱灾害，曾组织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兴灌溉之利。在干旱地区还推广"区种法"（一种抗旱的耕作方法）。苻坚还在宫中和民间严禁奢侈。前秦还重视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

事业，广兴学校。苻坚经常亲临太学视察，考查学生经义优劣，褒奖才学优异的人士。

在王猛的治理下，前秦的政治，在北方各分立政权中是较为清明的。史书称“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⑤。自西晋末年以来遭到严重破坏的关中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社会由动荡渐趋稳定，这就为苻坚统一北方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比较安定的后方和物质条件。

攻灭前燕，是苻坚统一北方过程中最重大的胜利。前燕是鲜卑慕容氏建立的政权，据有今河南、山东、河北、辽宁广大地区。它和据有关中的前秦、偏安江左的东晋，是当时中国鼎足而立的三个最强大的政权。公元360年，前燕皇帝慕容儁死去，由其弟慕容恪辅佐十一岁的太子慕容暐继位。慕容恪是比较有才能有威望的政治家，在他主持下，前燕的政局还比较稳定。公元367年，慕容恪死，由慕容评辅政。从此“暐母乱政，评等贪冒，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⑥。再加上最高统治集团争权夺利，互相倾轧，前燕政局发展到崩溃的边缘。

公元369年，东晋桓温北伐，屡败燕军，推进到枋头（今河南浚县西南）。慕容暐极为恐慌，打算放弃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北逃和龙（今辽宁朝阳）。慕容垂（慕容恪之弟）反对逃跑，并自请领兵抗晋。于是慕容暐一面命令慕容垂率众五万抵抗桓温，一面派人向苻坚求援，答应割让虎牢（今河南荥阳境内）以西土地，作为派救兵的报酬。是否派救兵，前秦内部有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些人主张拒绝派兵，因为上次桓温北伐打到秦都长安附近，前燕并未救秦。王猛则持异

议，主张派兵救燕。他私下对苻坚说，慕容评不是桓温的对手，一旦桓温灭了燕，秦更不能与晋抗衡；不如援燕退晋，晋兵退，燕亦疲敝，我们可乘其敝而取之。于是，苻坚与王猛定下乘机取燕的计策后，便派步骑两万援燕抗晋。

桓温终因军粮不继撤军。晋军撤退中遭慕容垂的追兵伏击，死三万余人；随后又遭援燕的援军截击，死一万人。桓温北伐再次以失败告终。抗晋的胜利，前燕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慕容垂素有威望，在最高统治集团中一贯受排挤，抗晋胜利后他的威望更高，更为慕容暐、慕容评等所忌恨。他们由排挤他进而决计杀害他。慕容垂为避祸，谋北逃和龙不成，只得西奔苻坚。苻坚早在慕容恪死去时，就打算灭燕，但怵于慕容垂的威名，未敢动手。现在慕容垂弃燕并投奔自己门下，他便可以无所顾忌地开始灭燕的行动，自然喜出望外，给慕容垂以隆重的欢迎。前燕失去了慕容垂这一支柱，等待着它的只能是覆灭的命运。

桓温撤退后，慕容暐悔约，拒绝割虎牢以西的土地给前秦，说答应割地是使者"失辞"，说走了嘴。苻坚便以此为理由，于建元五年（369）冬，派王猛等率步骑三万，以慕容垂为向导，讨伐前燕。秦军越过边界后，直逼洛阳。慕容暐派精兵来救，被秦军败于荥阳。洛阳守将得不到救援，于公元370年初降秦。这年四月，苻坚又派王猛、杨安等率步骑六万继续伐燕。王猛攻克壶关（今山西长治东南），杨安攻陷晋阳（今山西太原），沿途郡县纷纷降秦，燕人大震。慕容暐派慕容评率精兵四十万抵抗秦军。燕军人数比秦军多几倍，但慕容评怵于王猛军威，不敢西进，屯于潞川，与秦军相持。他认为王猛孤军深入，利在速战，因此准备以持久战制胜。但慕容评贪婪

成性，为了向自己的部队高价出卖柴草和水，竟垄断山林和水源，每用水两石，收绢一匹，大发国难财。因此将士人人怨愤，毫无斗志。王猛抓住时机，派出锐卒五千，乘夜绕到慕容评营后，纵火焚烧其辎重，火光映入前燕首都邺城。慕容暐十分恐慌，派人批评慕容评贪鄙，命令他速战。批评未必有效，速战可谓失策。王猛见燕军求战，便于阵前誓师，鼓励将士为国立功，结果“众皆奋勇，破釜弃粮，大呼竞进”⑦。燕兵一战即溃，被俘和被杀五万多人；在秦军追击下，投降和被杀的又十多万人。慕容评单骑逃归邺城。王猛挥师东进，将邺城包围。这时苻坚率众十万，从长安赶来会师。在秦军围攻下，邺城燕军开门投降，慕容暐等在北逃和龙途中被俘。前燕诸州牧守及六夷渠师尽降于秦。苻坚以王猛为冀州牧，镇邺城；以郭庆为幽州刺史，镇蓟（今北京城西南）；将慕容暐及其王公以下及鲜卑四万余户迁往长安。前燕终于为苻坚所灭。

苻坚攻灭前燕的第二年（371），又派苻雅、杨安等率步骑七万西伐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仇池是氐人杨难敌在西晋末年建立的政权，后来世代相传，称仇池公，先后称臣于后赵石虎和东晋。杨世在位时，投降苻坚，接受前秦封号。其子杨纂袭位后，又归附东晋，与前秦绝交，苻坚因此兴师讨伐。杨纂率众五万与东晋援兵千余人会合抵抗前秦军，战于仇池北。杨纂兵败，逃归仇池。前秦军乘胜进围仇池，杨纂出降。苻坚以王统为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镇仇池，杨氏割据政权至此结束。公元373年，苻坚又向南攻取了东晋的梁、益二州，占据了陕南、四川等地。

建元十二年（376），苻坚开始了消灭前凉的军事行动。前凉是汉人张氏建立的政权。自张轨于西晋末任凉州刺史以来，

世代相承，据有河西（今甘肃、宁夏西部和新疆东部）地区，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张玄靓在位时，曾向前秦称臣。后来在最高统治集团的相互倾轧中，张天赐杀玄靓自立。张天赐荒于酒色，人情怨愤，内部矛盾十分尖锐。苻坚便以张天赐“臣道未纯”为由，一面派使者到姑臧征张天赐入朝，一面派苟苌、梁熙等率步骑十三万进驻秦凉边境，若天赐“有违王命，即进师扑讨”⑧。

在前秦大军压境的威逼下，前凉应当采取什么对策，内部意见不一。主张抵抗者认为，凉有河西天险，“若悉境内精兵，左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⑨，完全可以取胜。张天赐接受他们的意见，杀死前秦使者，决计抵抗。前秦军得到使者被杀的消息，便越过边境大举向前凉进攻，屡败前凉军，步步进逼。张天赐一面派军三万守洪池（今甘肃武威南），一面亲自领军五万守金昌（今甘肃古浪）。前秦军击败驻守洪池的前凉军后，又大败前凉军于赤岸（今甘肃武威南），逼近姑臧。张天赐从金昌城出战，城内叛变，只带领数千骑逃回姑臧。在前秦军围攻下。张天赐出降，被送往长安。前凉郡县全部投降前秦。苻坚以梁熙为凉州刺史，镇姑臧，迁前凉豪右七千余户于关中。历时七十多年的河西张氏割据政权至此结束。

在前秦的北方，有一个鲜卑拓拔部建立的代国，据有今山西北部、内蒙中部地区。公元376年冬，先前已降附苻坚的匈奴刘卫辰部为代国所逼，向前秦求援。苻坚便以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伐代王什翼犍。又遣俱难、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今陕西榆林北），与苻洛军会合。代王什翼犍派鲜卑白部、独孤部向南抵御前秦军，被打败；派南部大人刘库仁率十万骑兵与前秦军战于首都

盛乐（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之南，又失利。什翼犍正患重病，不能带兵作战，只得率诸部逃奔阴山之北，因受当地高车人攻掠，不得放牧，又返回盛乐。这时前秦军尚未撤离，什翼犍被其子民翼圭缚送前秦军请降（一说被其子实君杀死），被送往长安。苻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⑩。又分代国为两部：河以东属刘库仁，河以西属刘卫辰，又授以官爵，使统其众。苻坚攻灭代国后，又向南于公元376年攻占东晋上游重镇襄阳（今属湖北），俘其守将朱序送往长安；又占据东晋淮北重镇彭城（江苏徐州）。

至此，中国北方基本上为苻坚所统一。但这种统一的局面并不巩固，为期也很短。自公元375年王猛死后，前秦法制日趋废弛，苻坚的宫廷生活也逐渐奢侈。连年征战，兵疲于外，民困于内，内部矛盾日益尖锐。被攻灭的各国统治者都几乎被保留在前秦政权中，他们念念不忘复国。这种种矛盾，促使在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中前秦一触即溃，北方的统一局面顷刻瓦解，又陷入群雄割据，连年混战的局面。

注 释

①《晋书》卷一一二《苻生载记》。

②③④⑤《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⑥《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

⑦《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⑧⑨《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元年。

⑩《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三国两晋南北朝

淝水之战

前秦苻坚统一北方后，开始进攻东晋，准备统一全国。晋太元三年（378），他分东西两路进攻东晋，揭开了淝水之战的序幕。

西路，苻坚于二月派征南将军苻丕等率步骑七万进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同时派征虏将军石越率精骑一万、京兆尹慕容垂等率众五万、领军将军苟池等率众四万从几面围攻。晋襄阳守将朱序因前秦军无舟船，不作防备，被前秦军围困。第二年二月，襄阳陷落，朱序被俘。朱序解送长安后，被苻坚任命为度支尚书。

东路，苻坚于同年七月派彭超攻彭城（今江苏徐州），同时派后将军俱难等率步骑七万攻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盱眙（今属江苏）。第二年二月，陷彭城、淮阴。五月，陷盱眙。秦兵六万进围三阿（今江苏高邮西北），距广陵（今江苏扬州）百里。东晋朝廷大震，急忙在沿江一带布防。东晋兖州刺史谢玄率北府兵自广陵解三阿之围，并攻复盱眙、淮阴，把秦军赶到淮水以北，打退了他们的东路进攻。

晋太元七年（382）十月，苻坚大会群臣于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太极殿，提出：自从即位至今近三十年，几经征讨，"四方略定，唯东南一隅，未宾王化，……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仗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①，征求群臣意见。

对于苻坚准备大举南征东晋，朝中支持者占少数。他们提不出什么支持的充分理由，无非是阿谀奉承之词，有的人还有个人的动机。苻坚对这些人的言论大加赞赏，还将他们引为同道。

秘书监朱肜说："陛下恭行天罚，必有征无战，晋主不衔璧军门，则走死江海。"陛下送南来士民返回家园，"然后回舆东巡，告成于泰山，此千载一时也"。苻坚听了十分高兴，说"是吾志也"②。

冠军将军、京兆尹慕容垂对苻坚说："弱并于强，小并于大，此理势自然，非难知也。以陛下神武应期，威加海外，虎旅百万，韩（信）、白（起）满朝，而蕞尔江南，独违王命，岂可复留之以遗子孙哉！"他还说，这件事陛下圣心决断足矣，何必广求众臣意见，当年晋武帝平孙吴，所依靠的只有张华、杜预二三大臣而已，"若从朝众之言，岂有混一之功！"苻坚对他大加赞赏，说："与吾共定天下者，独卿而已。"③为此苻坚还赐绢五百匹，表示鼓励。其实，慕容垂鼓动苻坚南征，怀有个人目的。慕容垂，字道明，是鲜卑族首领，前燕宗室，封吴王。曾打败东晋桓温北伐军，威名大震，被皇帝慕容暐等所忌，惧而投奔苻坚。苻坚灭前燕后，他念念不忘恢复鲜卑慕容氏政权。当苻坚正式出兵南征时，他便和自己的亲属私下盘算了。他的侄子慕容楷等对他说，苻坚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

之业，在此行也！”他回答说：“然。非汝，谁与成之！”④事实证明，后来他确实是这样做的。赞成苻坚行动的姚苌，是羌族首领，也是慕容垂一类人物，也怀着类似的个人目的。

朝中多数人对苻坚南征的决策持反对态度。他们反对的理由除“天道”之类的迷信说法外，都比较充分。苻坚一概加以简单的否定，所使用的往往是空泛自大的言词。

尚书左仆射权翼认为：“今晋虽微弱，未有大恶；谢安、桓冲皆江表伟人，君臣辑睦，内外同心，以臣观之，未可图也。”太子左卫率石越指出，晋“据长江之险，民为之用，殆未可伐也”。苻坚则反驳说：“今以吾之众，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又何险之足恃乎！”⑤

但群臣仍各言利害，提出不同意见，就连苻坚所宠信的张夫人和太子苻宏、幼子苻诜都提出异议。苻坚一概听不进去，对张夫人的劝谏，他说：“军旅之事，非妇人所当预也！”⑥对苻诜的劝谏，他则说：“天下大事，孺子安知！”⑦

苻坚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便认为自古帝王都是与一两位大臣决定大事，现在众说纷纭，只能让人乱了方寸。于是他单独找主管军政大事的阳平公苻融商量。不料苻融也反对，说：“今伐晋有三难：天道不顺，一也；晋国无衅，二也；我数战兵疲，民有畏敌之心，三也。”他还特别指出，持反对意见的人都是忠臣，应该采纳他们的意见。苻坚听了很生气，说连你也这样，我还有什么指望！“我强兵百万，资仗如山，……乘累捷之势，击垂亡之国，何患不克，岂可复留此残寇，使长为国家之忧哉！”苻融对苻坚固执己见，十分痛心，他哭泣着说：晋未可灭，昭然甚明。我所担忧的还不是南征无功而还，而是“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满畿甸，太子独与弱卒数万留守

京师，臣惧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掖，不可悔也”。他还想借助于曾为苻坚所信重、辅佐苻坚成就统一北方大业的王猛（字景略）来说服苻坚，说“王景略一时英杰，陛下常比之诸葛武侯，独不记其临没之言乎！”⑧原来王猛在公元375年临终时曾嘱咐苻坚：“晋虽僻处江南，然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⑨苻融把王猛抬出来，也没有起作用，苻坚根本听不进去。

面对众人的反对、劝谏，苻坚大惑不解，说：“以吾击晋，校其强弱之势，犹疾风之扫秋叶，而朝廷内外皆言不可，诚吾所不解也！”⑩这说明他只看到自己表面上的强大、东晋表面上的弱小；看不到东晋潜在的力量、自己潜在的众多矛盾和潜在敌人 。而几年前王猛看到了，现在苻融等也看到了。苻坚和多数人的反差是如此强烈。他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骄傲自大，一意孤行，其结局自然是淝水之战惨败的历史悲剧。

晋太元八年（383）七月，苻坚下诏大举攻晋，百姓每十丁出一兵，良家子年龄二十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聚集三万多人。当时朝臣多数仍坚持反对南征，只有慕容垂、姚苌及良家子赞成。苻融还想作最后努力，对苻坚说：鲜卑和羌人，都是我们仇人，“常思风尘之变以逞其志，所陈策画，何可从也！良家少年皆富饶子弟，不闲军旅，苟为谄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今陛下信而用之，轻举大事，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后患，悔无及也！”⑪这时候苻坚南征的诏令已发，他更听不进去了。在他看来，灭晋易如反掌。他在统一北方过程中，对所征服国家的头面人物，不管是投降的还是被俘的，一般都封官拜爵。这时他按自己的惯例，先任东晋孝武帝司马

曜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侍中。并预先为他们在长安建造府第。

但东晋并非苻坚想象那么不堪一击。这时司马氏偏安江左已有半个多世纪，政权已相当稳定，心怀篡夺的桓温已死去几年，由谢安执掌朝政。谢安（320—385），字安石，祖籍阳夏（今河南太康）。“其为政，务举大纲，不为小察”⑫，威望较高，时人把他和东晋初年的名相王导相提并论。面临前秦威胁，统治集团矛盾比较缓和。桓温的弟弟桓冲都督江、荆、梁、益等州诸军事，镇守上游。谢安侄谢玄监江北诸军事，镇守广陵。谢玄在广陵召募了一批劲勇之士如刘牢之、何谦、诸葛侃等，号称“北府兵”，每战必胜，前此在解三阿之围，粉碎前秦的东路进攻中，已表现出很强的战斗力。

八月，苻坚派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等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苻坚自长安出发，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旗鼓相望，前后千里。九月，苻坚到达项城（今属河南）时，凉州之兵始达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蜀、汉之兵方顺流而下，幽、冀之兵到达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苻融等率领的先锋部队已到达颍口（今安徽颍上境内）。苻坚这次进军的规模和声势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东晋面对苻坚的大举进攻，以尚书仆射谢石为征虏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率众八万，抗击秦军；另派龙骧将军胡彬以水军五千增援寿阳（今安徽寿县）。

以八万多兵力与秦兵相抗，兵力相差悬殊，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上下震恐。为了安定人心，掌政的谢安表现十

分镇静。谢玄等问计于谢安，他不予回答，带着他们和亲朋好友一起游山间别墅，下围棋。谢玄平常棋艺高于谢安，这时因为心情紧张，却不能胜他。他们又登山涉水，入夜才返回。桓冲深以都城安危为忧，派三千精兵入卫。谢安坚决拒绝，说朝廷安排已定，兵力不缺，这些精兵应留作上游防卫。桓冲对谢安的用意并不理解，叹息说："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⑬

十月，苻融等攻陷寿阳，俘虏东晋平虏将军徐元喜等。慕容垂攻拔郧城（今湖北京山境内）。胡彬率水军救援寿阳，未到而寿阳已陷，便退守保硖石（今安徽寿县西北）。前秦将领梁成等率先头部队五万，屯于洛涧（今安徽寿县西南），在淮水中设障以阻止晋军。谢石、谢玄等到达距洛涧二十五里处不敢前进。胡彬在硖石遭苻融围攻，粮尽，派使者向谢石求援。使者被敌人俘虏，苻融得知晋军困急的信息，便飞速报告苻坚，说："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⑭苻坚于是留大军于项城，亲率轻骑八千，急速赶到寿阳。

苻坚派此前于襄阳俘虏的东晋将领朱序到谢石军中劝降，朱序却趁机对谢石等说，若等前秦的百万大军全到前线，确实难与为敌，现在应乘其诸军未集，迅速攻击，若打败他的前锋，就可以先声夺人，取得胜利。谢石、谢玄等根据朱序提供的情报，决定采取进攻行动。

十一月，谢玄派刘牢之率"北府兵"⑮五千进攻洛涧，大败秦军，斩秦将梁成等，又分兵堵截其归路。前秦步骑崩溃，争渡淮水，士卒死者万五千人。刘牢之等俘虏前秦扬州刺史王显等，尽收其器械和其他军用物资，取得初战胜利。于是谢石

等水陆继进，至淝水东岸与西岸的秦军隔水对峙。苻坚和苻融登上寿阳城，看见晋兵部阵严整，士气旺盛，心中惊恐，看见寿阳城北八公山的草木，也都以为是东晋士兵。他回头对苻融说，这分明是劲敌，怎么能说是弱旅！“草木皆兵”的典故，即出于此。

两军隔淝水对峙，晋军不能渡过淝水，无法交战。相持下去，秦军集结日多，对晋军十分不利。因此，谢玄派使者对苻融说，你悬军深入，而临水置阵，这是持久之计，不是想速战，“若移阵少却，使晋兵得渡，以决胜负，不亦善乎！”⑯前秦诸将都不主张将阵地后移，而苻坚则主张将阵稍后移，待晋兵半渡时，用铁骑冲击，一定可以歼敌。苻融也认为这是好办法，于是指挥部队后退。不料秦兵一退而不可复止，再加上朱序等在阵后大呼：“秦兵败了！秦兵败了！”便成溃退之势。谢玄、谢琰、桓伊等迅速渡过淝水进击。苻融驰马想整顿阵形，阻止溃退，马被冲倒，他被晋兵杀死。秦兵失去主将，更成溃败之势，自相践踏而死者满山遍野。晋兵趁势追击。往回逃命的秦兵，闻风声鹤唳，都以为是晋兵追至，慌不择路，夜宿原野，再加上受冻挨饿，死亡十之八九。此前被俘的朱序等也趁机返回东晋。苻坚乘的云母车也被晋兵缴获。东晋遂克复寿阳，俘前秦的淮南太守郭褒。

苻坚中流矢，单骑败走淮北，前秦诸军多崩溃，只有慕容垂所三万人得以保全。于是苻坚收集千余骑投奔慕容垂军。慕容垂的儿子慕容宝等主张立即杀死苻坚，恢复鲜卑慕容氏政权。慕容垂不同意当时就采取这样的行动。苻坚得以一路收集散兵，返回到洛阳（今属河南），才有军队十多万，百官、仪仗、军容粗备。

谢安在建康收到前线胜利的捷报，正与客人下围棋，随手将报告放在一边，脸上毫无喜色，照常下棋。客人问报告的内容，他平静地回答："孩子们已打败了敌人。"待到下完棋，他返回内室时，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过门槛时撞断鞋底的木齿也没有发觉。

淝水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前秦的失败和东晋的胜利都不是偶然的。苻坚统一北方的基础十分薄弱，尖锐的民族矛盾，不但表现为统治集团对这次战争的意见分歧，而且表现为来自各民族的百万士兵的士气低落，一触即溃。东晋在前秦的威胁面前，统治集团比较团结，又有比较有谋略的谢安这样的核心人物。兵力虽少，但精悍，士气旺盛，不为秦兵的声势和数量所屈服。东晋的胜利，遏制了前秦势力向南方发展，保护南方的经济发展和继续开发，应当肯定。

淝水之战溃败后，前秦的统一顷刻瓦解。慕容垂随苻坚回到洛阳后，以回邺城扫墓为名，随即起兵反对苻坚，第二年(384)即建立后燕。鲜卑族的其他首领以及匈奴、羌族等少数民族首领，也纷纷先后建立政权，北方再次陷入分裂混战之中。

前秦的威胁消除后，东晋统治集团的矛盾又逐渐激化。淝水战后第二年，谢安奏请乘苻坚倾败，开拓中原，派谢玄等伐秦。谢玄等曾攻克彭城，平兖州、青州，进攻冀州，最后只得置戍而还，退镇淮阴。谢安受司马氏排挤，自求北征，出屯广陵，公元385年死去，东晋的统治从此江河日下。

注　释

①《晋书·苻坚载记下》。

②③《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⑤⑥⑦⑧《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

⑨《晋书》卷一一四《苻坚载记下》。

⑩《资治通鉴》卷一〇四，晋孝武帝太元七年。

⑪⑫⑬⑭《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⑮谢玄以京口、广陵的侨人及其子弟组建起来的军队，因为京口在东晋京都建康之北，所以当时人称京口为北府，把谢玄训练的这支军队叫作“北府兵”。

⑯《资治通鉴》卷一〇五，晋孝武帝太元八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孙恩、卢循起义

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爆发于江南三吴八郡（吴、会稽、吴兴、义兴、临海、永嘉、东阳、新安）地区的孙恩、卢循起义，是东汉末年以来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安帝统治时期，以太傅摄政的皇叔司马道子及其子司马元显进一步专权，引用主张消弱方镇的王国宝（太原王氏、世族地主）、王绪（国宝从祖弟）为腹心，让他们在中央掌握大权，引起了统治集团内部以王恭（安帝舅，为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军事、兖、青二州刺史、镇京口）、殷仲堪（陈郡世族地主、荆州刺史）、桓玄（东晋权臣桓温子，任广州、江州刺史）等方镇力量的不满。隆安元年（397）、二年（398），王恭、桓玄称兵跋扈，起兵反抗中央后，长江中游地区为拥有荆州军的桓玄割据；下游的京口和长江以北地区，为北府兵将领刘牢之所控制。东晋朝廷所能控制的地区，实际上只剩下江南一隅，赋税、徭役、兵役的沉重负担，全部落到江南三吴八郡农民身上，使这一地区成为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的地区。

当时在朝廷执政的司马元显考虑到上游荆州军的威胁和北

府兵的难于控制，想建立一支由他亲自掌握的新军，便下令征调江南诸郡免奴为客者，号为“乐属”，移置京师建康，以充兵役，使本来已经尖锐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安帝隆安三年(399)十一月，孙恩利用“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①的形势，首先在浙东地区发动起义。

孙恩字灵秀，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人，世奉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原是东汉时期民间道教的一个派别，它的创始人为张陵。根据《三国志·张鲁传》等有关史料的记载，张陵原籍沛国丰人（今江苏丰县），后客居四川，学道于鹄鸣山，依据《太平经》造作道书，创立了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假借鬼神符箓以聚徒惑众，以符水为人治病，这与以炼丹求长生为目的的丹鼎派道教不同，是属于符箓派的道教。由于后来的道教徒尊称创始人张陵为天师，因此五斗米道又称为天师道。它本来只在民间流行，进入魏晋以后，五斗米道开始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在封建士大夫中传播；另一部分仍在民间从事秘密活动。

西晋末年，琅琊孙氏南渡以后，孙恩叔父孙泰师事浙江钱塘五斗米道教主杜子恭。杜子恭死，孙泰就成为教主。他凭借宗教的形式去组织和发动农民，百姓“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②。但因之也引起了东晋政权对他的怀疑，孙泰被流放至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以孙泰为郁林太守。孙泰在两广一带继续传教。东晋政府对其放心不下，并由于他深知五斗米道纵欲享乐的养性之方，东晋政府又把他召回，任为徐州主簿，稍迁辅国将军、新安太守（今浙江淳安西）。王恭起兵时，孙泰私合义兵数千人讨王恭。他见当时天下纷纷起兵，认为东晋王朝已岌岌可危，便进一步“煽动百姓，私集徒众”③,迅速地在三吴地区发展着自己的势力。东晋政府下令

杀死孙泰及其六子，孙泰兄子孙恩逃入海岛。

隆安三年（399），东晋政府下令“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激起浙东农民的普遍骚动，孙恩利用这一形势，于是年十月由海岛帅其党徒百余人攻上虞，杀县令，袭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市），部众发展到数万人。当时会稽谢琼、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市）陆瓌、吴兴（治今浙江湖州市南）丘尪、义兴（今属江苏）许允之、临海（治章安，今浙江临海县东南）周胄、永嘉（郡治永宁，今浙江永嘉县）张永及东阳（郡治长山，今浙江金华）、新安等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④，建康附近的畿内诸县，也“处处蜂起”，来势十分猛烈。会稽内史王凝之、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均被义众杀死。吴国内史桓谦、义兴太守魏傿、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等弃城出奔。孙恩占领会稽，自号征东将军，称其党曰“长生人”。时“吴、会承平日久，人不习战，又无器械，故所在多被破亡”⑤。东晋急忙派卫将军谢琰、镇北将军刘牢之等率北府兵，前往镇压。为避免损失，孙恩率义军男女二十余万口暂时退入海岛。

隆安四年（400）五月，孙恩第二次从浃口登陆，入余姚、破上虞，进攻刑浦，至会稽，杀死晋会稽太守、北府名将谢琰。东晋朝廷大惊，急忙派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进击，孙恩仍退回海上。东晋增派北府兵另一名将刘牢之继谢琰为都督会稽五郡诸军事，屯上虞。刘牢之令参军刘裕戍守句章，吴国内史袁山松也在沪渎（今上海一带）筑垒，在沿海地区作防御孙恩攻击的严备。第二年二月，

孙恩又出浃口，攻句章，未攻下，遭刘牢之进攻，又退回海岛。三月，孙恩北趣海盐（今浙江境），与刘裕相拒十分激烈。孙恩知海盐难以攻拔，便转攻沪渎。五月，沪渎被攻克，义军杀死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义军乘胜浮海，进逼京口，"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建康震骇"⑥，统治者十分惶恐，内外戒严，匆忙布防。冠军将军高素等守石头，辅国将军刘袭栅断淮口，丹阳尹司马恢之戍秦淮河南岸、冠军将军桓谦等备白石，并征豫州刺史、谯王司马尚之入卫京师。刘牢之由山阴引兵击孙恩，未至而义军已过，乃使刘裕自海盐入援。裕兵不满千人，倍道兼行，与孙恩所率义军同时到达丹徒。丹徒守军无斗志，孙恩帅众攻击，登蒜山，遭刘裕军奔击，义军复整兵径向京师建康，后将军司马元显帅兵拒战，频不利，"会稽王道子无他谋略，唯日祷蒋侯庙"⑦。由于义军楼船高大，泝风不得疾行，数日乃至白石。孙恩本以晋诸军分散，欲击其不备。既知司马尚之在建康，又闻刘牢之已回，至新洲不敢进而去，浮海北走郁洲（今江苏连云港市），并派一支义军攻陷广陵。八月，东晋以刘裕为下邳太守，率军追讨孙恩于郁洲，累战破之，义军由此转弱，复缘海南走。十一月，刘裕追孙恩至沪渎、海盐，又破之，义军损失惨重，孙恩再次撤回海岛。

元兴元年（402）三月，孙恩再度登陆进攻临海，被临海太守辛景击败，"恩所虏三吴男女，死亡殆尽"⑧，孙恩投水自杀，义军余众数千人继推孙恩妹夫卢循为领袖。

卢循字于先，范阳涿人（今河北涿县东北），出身世族，是晋司空刘琨从事中郎卢谌的曾孙。卢循娶孙恩妹，孙恩起义时，他与孙恩共同计谋，因此，孙恩窘迫投水自杀后，被余众推为领袖。这时割据江、荆二州的桓玄已经攻进建康而掌握了

东晋的军政大权。桓玄为了抚安东土，便以卢循为永嘉太守。卢循表面上答应受命，而实际上仍领导着起义。元兴二年（403）正月，卢循使司马徐道复（卢循姊夫）进攻东阳，为刘裕击败。八月，刘裕又破卢循于永嘉、晋安（今福建福州市西）。元兴三年（404）九月，卢循浮海南走，进攻番禺（今广州市），执广州刺史吴隐之，自称平南将军，摄广州事，又使徐道复攻始兴（今广东韶关市西），执始兴相阮典之。

这时在义军打击下，动荡不定的东晋政局，更加分崩离析。掌握东晋朝政大权的桓玄已废晋安帝而自立为帝。接着，北府兵将领刘裕、刘毅、何无忌等从广陵、京口举兵，赶走桓玄。继桓玄掌握东晋实权的刘裕正忙于巩固自己的权力，没有精力对付起义军。安帝义熙元年（405），东晋任命卢循为广州刺史，徐道复为始兴相。卢循、徐道复为积蓄力量，表面上也接受了所授官职，暗中却派人到南康山（今江西赣州一带）伐木，贱价于本郡出售，藏船木于民，准备待机再起。

义熙五年（409），刘裕率兵北伐南燕，建康兵力空虚。六年（410），卢循、徐道复乘机从广州起兵。一路由卢循率领，自始兴攻长沙，直指江陵（今属湖北省）；一路由徐道复率领，下南康（今江西赣州市）、卢陵（郡治石阳，今江西吉水县东北）、豫章（郡治江西南昌），由江西直指建康。卢循、徐道复率领的起义军有的是“三吴旧‘贼’，百战余勇”；有的是“始兴溪子，拳捷善斗”⑨，战斗力很强。徐道复在豫章大败晋军，杀死晋镇南将军何无忌。时刘裕北伐南燕未归，东晋政府急忙派豫州刺史、北府兵名将刘毅率兵至寻阳（今江西九江市）堵截。卢循一路在长沙击败晋荆州刺史刘道规后，进至巴陵。由于徐道复军事进展迅速，卢循采纳了徐道复暂不攻取江

陵，集中兵力攻下建康的建议。卢循从江陵浮江东下，与徐道复会师，“戎卒十万，舳舻千计”⑩，声势极其雄壮。是年五月，桑洛洲（今九江市东北）一仗，卢循大败晋卫将军刘毅，起义军直逼建康附近的江宁（今南京市江宁县）。

这时刘裕灭南燕后虽已匆忙南归，然将士多病，建康兵力不过数千。而卢循率领的起义军，“战士十余万，舟车百里不绝，楼船高十二丈，败还者争言其强盛”⑪，强弱之势十分悬殊。当时与刘裕同举义兵击灭桓玄的孟昶、诸葛长民等认为刘裕无法与卢循相抗，主张拥晋安帝北走，放弃建康。孟昶因刘裕不采纳他的意见，又不愿看到东晋政权被义军倾覆，惶恐而服药自杀。徐道复主张乘刘裕军疲惫，援军未集之机，“于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数道攻裕”⑫，决一死战。卢循多疑少决，“欲以万全之计”⑬，迁延时日，错失良机。当义军进攻石头城小受挫折，又下令退守浔阳，想力取荆州，与东晋政府长期对抗。

十月，徐道复率义军三万攻江陵，不利，损失万余人，退回湓口（今九江市西）。十二月，卢循、徐道复又率义军数万，连舰而下，与刘裕率领的晋军先后战于大雷（今安徽望江县）、左里（今江西鄱阳湖口），义军又损失数万人。卢循收集散卒，得数千人，徐道复退保始兴。义熙七年（411）二月，晋将孟怀玉克始兴，斩徐道复。三月，卢循率义军余部至番禺，围城二十余日，遭晋将孙处、沈田子合击，又损失万余人。沈田子更追卢循于苍梧、郁林、宁浦（均在今广西省境内），卢循突袭合浦（今属广西），径向交州（州治龙编，今越南福安省多福府），在与交州刺史杜慧度的战斗中，杜慧度“掷雉尾炬焚其舰，以步兵夹岸射之，循众舰俱燃，兵众大溃”⑭。卢循战

败后投水自杀，孙恩、卢循起义至此彻底失败。由于孙恩、卢循起义发生于江南三吴八郡地区，这里是南北士族势力集中的地区，起义杀戮了一批同义军对抗的士族人物，有的还使他们灭了门，绝了嗣。特别是浙东以王、谢为代表的士族势力，经此打击后日益衰落，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统治权，为我国南朝时期新兴的寒门地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注 释

①《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

②③④⑤《晋书》卷一〇〇《孙恩传》。

⑥《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纪。

⑦《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隆安五年。汉末，秣陵尉蒋子文讨贼，战死蒋山下，吴孙权为立庙，江东朝野祷之，多有灵验。

⑧《资治通鉴》卷一一二，晋安帝元兴元年。

⑨《资治通鉴》卷一一五，安帝义熙元年。

⑩《晋书》卷一〇〇《卢循传》。

⑪⑫《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

⑬《晋书》卷一〇〇《卢循传》。

⑭《资治通鉴》卷一一六，晋安帝义熙七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刘裕北伐

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刘裕联络刘毅、何无忌等一批北府兵将领，在京口、广陵起兵，击灭了篡夺东晋政权的桓玄势力，以都督诸军事领南徐、南青二州刺史，出镇东晋的京畿重地京口，北府兵军权掌握在刘裕一人手中。义熙四年（408），刘裕又被东晋任命为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实际上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刘裕进行的北伐工作，也就从这时开始。

这时，南燕主慕容超，乘东晋政权衰乱之际，不断派兵侵扰东晋边境。义熙五年（409）二月，南燕兵又大掠淮北，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赵元，驱掠千余家。为了打击南燕鲜卑慕容氏势力，保障东晋东北边境地区的安宁，这年四月，刘裕率领的北伐部队从建康出发，“泝淮入泗”，由淮河进入泗水，五月至下邳，留船舰辎重，率步军进抵琅琊（今山东临沂），越过大岘（今山东沂水县北），六月至东莞（今山东沂水）。临朐（今属山东）一仗，“斩其大将段晖等十余人，其余斩获千计”①，击溃了南燕军队的主力，进围南燕都城广固

(今山东益都)。慕容超陷入困境，派遣尚书郎张纲、尚书令韩范去后秦求救。结果张纲被晋军俘获，反为东晋造攻城的战具；韩范要来的一万救兵，又为大夏赫连勃勃军队所阻，韩范也投降了东晋。慕容超"求救不获"，转忧惧，"乃请称藩，求割大岘为界，献马千匹"，刘裕不听，围之转急，"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②。时后秦主姚兴遣使谓刘裕曰："慕容氏相与邻好，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刘裕毫不退缩，对秦使者说："语汝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③实际上，姚兴的一番话，不过是想吓唬一下刘裕而已。后秦当时北有强敌北魏，西北为匈奴族赫连氏建立的大夏所牵制，因此是决不敢贸然大举出兵的。

南燕外无救兵，内部又意见不一，众叛亲离。慕容超即位以来，猜虐日甚，政出权倖。时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其兄归为冠军、常山令，叔父颓为武卫、兴乐公，"五楼宗亲皆夹辅左右，王公内外无不惮之"④。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公孙五楼，先迁尚书郎，后出为济南太守，再迁入为尚书左丞，因而时人为之语曰："欲得侯，事五楼。"⑤慕容超自己"不恤政事，畋游是好"⑥，早就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广固城被东晋军队包围以后，"城中男女病脚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继"⑦。义熙六年（410）二月，南燕尚书悦寿开城门纳晋师，慕容超与左右数十骑踰城突围出走，被晋军追获，南燕被晋所灭。刘裕忿广固久攻不下，欲尽阬之，以妻女赏将士。韩范谏曰："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须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伐而尽阬之，使安所归乎！窃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

矣。"⑧刘裕接受了他的意见，没有尽阬广固士民，然犹斩王公以下三千人，没入家口万余，慕容超被送往建康斩首。

义熙八年（412）十二月，刘裕在江陵（今属湖北省）攻灭他的重要政敌刘毅后，以将军朱龄石为统帅，消灭了先前叛晋称王的益州割据势力谯纵⑨，把益州重新置于东晋的控制之下，这为刘裕北伐后秦解除了后顾之忧。

当时的关中地区，由羌族贵族建立的后秦政权，是东晋政权的更大威胁。它不仅直接骚扰东晋的西北方，而且先后支持过南燕的慕容氏政权和益州的谯纵割据势力，不断骚扰东晋的边境。东晋内部的分裂割据势力，如被刘裕击败的世代盘据荆、楚的桓氏势力、反对刘裕的东晋宗室司马休之和雍州刺史鲁宗之等，也无不得到后秦的支持与资助。因此，刘裕在消灭南燕的慕容超和割据益州的谯纵势力后，北伐后秦，势在必行。

义熙十二年（416）二月，后秦主姚兴死，子姚泓初继父位，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尖锐起来，政权显出不稳。跨有并、冀的北魏拓跋氏和虎踞朔方的大夏赫连氏，也威胁着后秦政权的北方，牵制着后秦的一部分兵力，刘裕对后秦的北伐，就在这年的八月进行。

八月，刘裕从建康出发，为总统帅。他遣龙骧将军王镇恶、冠军将军檀道济将步军自淮、淝向许、洛，新野太守朱超石、宁朔将军胡藩趋阳城，振武将军沈田子、建威将军傅弘之趋武关，建武将军沈林子、彭城内史刘遵考将水军出石门，自汴入河，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锋诸军自钜野入河。九月，刘裕至彭城，集中兵力后，分二路向后秦进兵。一路由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率水师由黄河向前推进；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任

前锋，率步兵由淮、淝，进取许昌、洛阳（今属河南省）。王镇恶、檀道济入秦境后，所向皆捷，“诸屯守皆望风款附”⑩，接连攻下项城、许昌、成皋（今河南荥阳县上街镇），十月，姚秦洛阳守将，姚泓弟、平南将军姚洸出降，晋军占领洛阳，前锋进抵潼关。

王仲德这一路，率水师入黄河后，威胁到北魏在黄河南岸的唯一桥头堡——滑台（今河南滑县），魏守将尉建弃城逃跑。北魏主拓跋嗣遣使责问刘裕，裕逊辞谢之曰：“洛阳，晋之旧都，而羌据之；晋欲收复山陵久矣。诸桓宗族，司马休之、国璠兄弟，鲁宗之父子，皆晋之蠹也，而羌收之以为晋患。今晋将伐之，欲假道于魏，非敢为不利也。”⑪魏河内镇将于栗磾，好使黑矟（音朔，长矛），以勇敢著称，在黄河北岸筑壁垒以防晋军侵犯，刘裕写信给他，称之为“黑矟公麾下”，力图与北魏保持友好关系，以减少进兵后秦的阻力。

义熙十三年（417）正月，刘裕亲统后继部队从彭城出发。时前锋王镇恶、沈林子等攻下洛阳后，未等后继部队到达即迅速向前推进。二月，王镇恶抵达潼关；檀道济、沈林子自陕北渡过黄河，进抵蒲阪。结果为秦兵所阻，军粮给养发生问题。王镇恶等遣使驰告刘裕，要求支援军粮。刘裕呼使者，令开舫北户，指河上魏军以示曰：“我语令勿进，今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军！”王镇恶亲至弘农（今河南灵宝南），说谕百姓，“百姓竞送义租，军食复振”⑫。当时北魏以司徒长孙嵩统帅十万大军，屯于黄河北岸，防备东晋北犯。刘裕沿黄河向西进军时，北魏经常以数千骑兵沿河跟随东晋军队。东晋在黄河南岸用以拉纤的士兵，因风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魏军所杀略。刘裕依靠勇敢的北府兵，上岸奋击北魏军队，才

保证了后继部队的向西推进。

刘裕到达洛阳后，重新作了部署，分两路进攻关中。一路由沈林子、傅弘之进军武关（今陕西商县东），包抄长安后路；一路由王镇恶、檀道济等由潼关直取长安。对潼关的一路，刘裕又命王镇恶率水军溯渭水西上，直趋长安。七月，王镇恶所率水军乘“蒙冲小舰”，行船者皆在船内，秦人见舰进而无行船者，都惊以为神。镇恶船舰至渭桥（今陕西西安市西北），令军士食毕，皆持仗登岸。由于渭水迅急，舰皆随流漂去，倏忽间不知所在。当时姚泓用于屯守的军队尚有数万人，王镇恶勉励士卒说：“吾属并家在江南，此为长安北门，去家万里，舟楫、衣粮皆已随流。今进战而胜，则功名俱显；不胜，则骸骨不返，无他歧矣，卿等勉之。”⑬王镇恶身先士卒，众军士皆腾踊争进，大败后秦军队于渭桥，终于攻下了长安城，姚泓窘迫出降，后秦宣告灭亡。九月，刘裕至长安，送姚泓至建康，斩首于市。

刘裕北伐南燕和后秦，都取得了成功，这是东晋政权偏安江南以来取得成就最大的一次。其原因，一是刘裕当时掌握东晋的军政大权，处于“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显赫地位，已没有任何实力派和大士族能和他抗衡；二是刘裕通过清除内部的分裂势力，如消灭反对他的政敌刘毅、诸葛长民和击败起兵反抗的晋宗室司马休之等，不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保证了北伐事业的顺利进行；三是更重要的得到了当时中原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刘裕北伐南燕广固城时，“北方之民执兵负粮归裕者，日以千数”⑭。伐后秦时，前锋王镇恶克洛阳后在潼关为秦兵所阻，给养发生困难，王镇恶亲自到弘农，说谕百姓，“百姓竞送义租，军食复振”，又是当时的北方人民，帮助解决了粮

食给养的困难，有力地支援了刘裕的北伐。义熙十三年（417）十一月，由于刘裕的谋臣刘穆之在建康病死，政权有旁落到他人手中的可能，因此刘裕在长安只留住了二个月，便要匆忙南归。三秦父老得知这一情况后，至刘裕军门外哭诉说："残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⑮可见北方中原人民是热切地盼望和支持刘裕的北伐事业的。

由于刘裕匆忙撤离长安，只留下他的次子、十二岁的桂阳公刘义真以及由镇将王镇恶、沈田子、王脩等统领的一万余名军队驻守长安，兵力十分空虚，加上留守的镇将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大夏的赫连勃勃乘机进攻长安。这样，关中地区收复后不到一年零五个月，又为匈奴族赫连勃勃所夺去。尽管如此，刘裕北伐和争取统一的功绩仍不可抹煞。自潼关以东至青州（今河南、山东境内）终于成为东晋和南朝刘宋王朝的疆土，淮河南北成为南北朝进行战争的缓冲地带，使长江流域得到比较长期的安定，有利于江南经济、文化的发展。

注　释

①②《宋书》卷一《武帝纪上》。

③《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

④⑤⑥《晋书》卷一二八《慕容超载记》。

⑦⑧《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六年。

⑨谯纵，巴西南充人，原为晋安西府参军。义熙元年（405），晋益州刺史毛璩遣谯纵及侯晖等领梁、益州诸县氐民进兵东下，以图配合刘裕击灭败退中的桓玄势力。侯晖利用梁州人石乐东下，逼谯纵为主，袭杀益州刺史毛璩，称成都王。

⑩⑪《资治通鉴》卷一一七，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⑫⑬《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

⑭《资治通鉴》卷一一五，晋安帝义熙五年。

⑮《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南朝政权更替

从宋永初元年（420）到隋开皇九年（589），是中国历史上的南朝时期。南朝是指宋（420—479）、齐（479—502）、梁（502—557）、陈（557—589）四个连续更替的封建政权。由于它们都建都于建康，统治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江淮以南地区，故史称南朝。

建立刘宋王朝的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字寄奴，祖籍彭城（今江苏徐州），后流寓晋陵郡丹徒县（今属镇江市）。他出身寒微，曾伐荻新洲，又负京口大族刁逵社钱三万，“经时无以还，被逵执”①，遭受凌辱。孙恩起义，他投军北府。因勇悍善战，屡立战功，升为参军，成为北府兵的重要将领。后加彭城内史。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二月，刘裕与刘毅、何无忌、刘道规、孟昶等纠合徒众百余人同在京口、广陵举兵反对篡晋建楚的大士族桓玄。义熙元年（405），因击败桓玄，迎安帝复位，被任为扬州刺史，加录尚书事，开始执掌东晋的军政大权。此后，他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义熙六年（410），攻灭南燕，收复青州（今山东西北部）。翌年击败卢

循，收复广州。义熙八年（412），攻破江陵，打败政敌刘毅。第二年灭成都王谯纵，收复成都。义熙十一年（415），又攻克襄阳，逐走反对他的晋宗室司马休之，全部扫清了境内的分裂割据势力。义熙十二年（416），他率军攻破长安，灭掉后秦。至此，他威信大增、声望日隆。安帝先后以刘裕为相国、进爵宋公，再封为宋王。元熙二年（420），他正式废东晋恭帝司马德文，建立刘宋王朝。

刘裕称帝三年病死，长子义符继位，大臣傅亮、徐羡之、谢晦等辅政。由于他信任群小，游晏无度，兴造千计，疲极兆民，人神怨怒。傅亮等废他为营阳王，幽于吴郡，随即杀害，另立刘裕第三子刘义隆为帝，是为宋文帝。

宋文帝刘义隆统治的三十年间，是刘宋王朝统治比较清明，经济向上发展，统治疆域最大的强盛时期，史称"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恒科，爵无汜品。故能内清外晏，四海谧如也"②，被史家称为"元嘉之治"。但此时北方的鲜卑拓跋部于公元439年（元嘉十六年）统一了北部中国，南北关系渐趋紧张，宋与北魏发生了几次规模较大的战争。刘裕统治的永初三年（422），魏军进攻刘宋的青、兖二州，在虎牢遭到毛德祖的顽强抵抗，因众寡不敌而失滑台（今河南滑县东）、洛阳及虎牢三军事重镇。元嘉七年（430），宋遣右将军到彦之统军北伐，一度收复司、兖、豫诸地，但终因战略失误导致败北。元嘉二十七年（450）秋，宋大举伐魏，宁朔将军王玄谟率水军由东路攻许昌、洛阳，参军柳元景自西路出弘农攻潼关，曾大败魏师于陕（今陕西陕县），进据潼关；但因东路王玄谟贪愎好杀，众心失望，遭魏军追击，"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略尽，委弃军资器械山积"③，遭致失败；西路也被迫撤还。魏

主拓跋焘乘胜驱兵南下，直至瓜步（今南京市六合县），伐苇为筏，准备渡江。建康危急，宋命将军刘遵考等将兵分守津要，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舳舻相接，严阵以待。魏军见此，才于翌年（451）正月班师退兵，“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所过郡县，赤地无余，“自是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矣”④。

文帝以后，刘宋统治集团内部展开了骨肉相残的斗争。文帝晚年为太子刘劭所害。刘劭杀父自立为帝，激起了宗室诸王的不满，其弟刘骏在沈庆之等人帮助下，发兵攻劭，斩劭于台城，自立为帝，是为宋孝武帝。他性多猜疑，是个暴君。为了强化皇权，他派自己的亲信，出任“典签”，对出任方镇的诸王及功臣严加监督；在朝廷中，又重用寒人为中书舍人，排挤门阀大族，激化了权贵之间的利害冲突。孝武之世，先有南郡王义宣起兵，此后，竟陵王诞、海陵王休茂又相继叛乱。大明八年（464），孝武帝刘骏病死，子刘子业十六岁继位，嗜杀虐行，超过其父，尤恶诸王，常拘至殿内殴捶陵曳，且狂暴淫乱，无复人道。在位不到一年，被朝臣杀死（是谓前废帝）。立湘东王彧（文帝庶子，子业之叔），是为明帝。庶子继位，更引起兄弟叔侄间权力之争，孝武帝的十几个儿子全被诛杀。之后，后废帝刘昱（即苍梧王）、顺帝刘准在位期间，又有桂阳王休范、建平王景素之乱。这些叛乱都遭到镇压，而每次镇压又都有大批宗室被杀。刘宋统治的六十年中，争权夺利的骨肉相残，愈演愈烈，宋武帝九子、文帝十九子、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十二子，“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⑤。在刘宋内外交困、骨肉相残的情势下，掌握禁卫军的萧道成乘机控制了政权。顺帝升明三年（479），萧道成废顺帝为汝阴王，自立为

帝，建国为齐，取代了刘宋王朝。刘宋共历八帝，统治六十年。

建立萧齐政权的萧道成（427—482），字绍伯，小字斗将，原籍东海兰陵（今山东峄县），高祖时南迁，居晋陵武进县之东城里，更为南兰陵人。他以军功起家，因废立之功，进位相国，总百揆而取代刘宋政权。称帝后吸取刘宋亡国的教训，提倡节俭，“身不御精细之物”、“后宫器物栏槛，以铜为饰者，皆改用铁”⑥，以身率下，移风易俗。他大力厘革宋末弊政，整顿东晋、刘宋以来日益混乱的户籍，然而在检籍工作中由于官吏的贪赃枉法，徇私舞弊，造成“应却而不却，不须却而却”⑦的状况，不但户籍越发混乱，而且被却者“悉充远戍”⑧，引起人民新的恐慌，齐武帝永明三年（485），便爆发了以唐寓之为首的反检籍斗争。永明八年（490），萧齐被迫停止检籍，宣布“自宋升明（宋顺帝）以前，皆听复注。其有谪役边疆，各许还本”⑨。萧齐政权对却籍户的让步，反映了寒人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及大族传统地位的动摇。

萧道成死后，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萧赜在位时，对外执行与北魏通好的政策，边境比较安定，对内为政较宽舒，善抚宗室，经济得到一定发展，史称“职贡有恒，府藏内充，人鲜劳役”⑩。但萧赜晚年因太子早死，由太孙昭业继立，内部斗争便激烈起来。其堂叔萧鸾用阴谋夺取了帝位（齐明帝），就大杀齐高帝和齐武帝子孙，重演了刘宋“骨肉相残”的丑剧。前人论萧鸾之“残忍惨毒，无复人理，真禽兽之不若矣”⑪。萧鸾在位五年而殁，太子萧宝卷继立，在齐宗室的互相残杀中，萧道成的族弟、雍州刺史萧衍在襄阳起兵，攻进建康，废萧宝卷为东昏侯，另立萧宝融为帝（齐和帝）。不久，

萧衍废和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萧齐共历七主，统治二十二年，是南朝历史上一个短促的王朝。

建立梁朝的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其父萧顺之是萧齐的大臣，与齐皇室同宗，同为侨居南兰陵之素族。萧衍长于文学，博学多通，有文武才干，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他与沈约、谢朓、任昉等著名文士“并游焉，号曰‘八友’”⑫。后来以军功起家，乘萧齐内乱，从雍州起兵，夺取政权，建立萧梁。梁武帝萧衍在位共四十八年。当时北魏自孝文帝元宏死后，政治日趋腐败。经过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打击，北魏政权已名存实亡，梁武帝本可以利用时间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积蓄力量，恢复中原，但他只满足于其国家的相安和皇位的巩固，并不求有所发展和开拓。他为了赢得地主阶级的广泛支持，既重用素族寒人典掌机要，又恢复百家士族的权利，力图用调和士庶的矛盾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维持梁朝的久安。相反，对人民，他除用严刑峻法外，还大力提倡佛教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他既尊儒又崇佛，宣布佛教为国教，在国内大兴佛寺，并三次舍身同泰寺，群臣每次都用亿万之钱为他赎身。在他的提倡下，寺院经济极度膨胀，僧侣成为封建特殊阶层。梁武帝崇佛，使封建统治阶级更加挥霍和奢侈，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加深了已经尖锐的社会矛盾。太清元年（547）梁武帝为贪得土地，接受东魏大将侯景的叛降。侯景是个反复无常的野心家，太清二年（548）八月起兵反梁，次年（549）三月，攻破建康台城，梁武帝被囚禁，不久被饿死。侯景立太子萧纲为帝（简文帝），自为相国、汉王、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七月，侯景杀萧纲，另立豫章王萧栋为帝。十一月，再废萧栋自立为汉帝。侯景叛乱及其举措，激起了梁宗室

诸王及地方豪绅的不满，相继起兵平叛，并进行割据。大宝三年（552），梁武帝的第七子萧绎在江陵称帝（梁元帝）。承圣三年（554），萧绎的侄儿萧詧得西魏兵之助进攻江陵，第二年，萧绎被杀。萧詧在西魏的卵翼下建立了后梁。与此同时，在平定侯景之乱中建有功勋，这时镇守建康的大臣王僧辩和在京口的陈霸先，把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接到建康，立为帝。而北齐闻讯，又送回梁武帝的侄儿萧渊明，得到王僧辩的支持，又在建康拥立为帝。陈霸先乘机起兵，杀王僧辩，击败了控制萧渊明的北齐军事力量，再拥戴萧方智为帝（梁敬帝）。太平二年（557），陈霸先废萧方智，自立为帝，建国为陈。梁共历四帝，凡五十五年而亡。

建立陈朝的陈霸先字兴国，吴兴郡长城县（今属浙江湖州市）下若里人，出身寒微，其祖上陈达，“永嘉中南迁，为丞相掾、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⑬。东晋成帝咸和中土断，就定籍为长城县。陈霸先初仕乡为里司，后至建邺为油库吏，后任小职军官。因镇压交、广地区溪族反抗，官位渐显。梁太清元年（547）官至西江督护、高要（今广东高要县）太守。在平息侯景之乱中战功卓著，被封为长城侯。承圣四年（555），他起兵袭杀拥立萧渊明的王僧辩，拥立梁敬帝萧方智，击败北齐兵，削平叛乱。太平二年（557）十月，受封陈王，随之废萧方智自立为帝，建立陈朝。

陈霸先建国之初，萧詧占有江陵，萧勃据有岭南，一些新起的土豪还各据一方，不受节制，所谓“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⑭。如豫章（今江西南昌）有熊昙朗，临川（今江西抚州）有周迪，巴山（今江西崇仁）有黄法氍、东阳（今浙江金华）有留异，新安（今浙

江淳安）有程灵洗，晋安（今福建福州）有陈宝应，临兴（今广东韶关西）有侯安都，长沙（今属湖南）有欧阳颜等，特别当时盘据湘、郢二州的王琳对陈朝威胁最大。永定二年（558），王琳引兵十万，下至湓城（今江西九江），在北齐的支持下，奉梁元帝之孙萧庄为帝。第二年，陈霸先病死，王琳军在北齐的声援下直趋建康。陈文帝（陈霸先侄儿陈蒨）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交兵时，王琳兵放火燧以掷陈战舰，时刮西南风，反为陈军所用，"琳船舰溃乱，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余皆弃船上岸，为陈军所杀殆尽"⑮。王琳逃入北齐。以后陈文帝又用笼络、征剿兼施的办法，相继消灭了熊昙朗、留异、陈宝应等反对势力，使陈政局初步得到安定。

陈文帝面对梁末大破坏之后造成的"编户凋亡，万不遗一，中原氓庶，盖云无几"和"府藏虚竭，杼轴岁空"⑯的衰竭局面，采取了一些缓和社会矛盾和务急农桑的发展生产的措施，同时还大力革除梁朝奢靡之风，"恭俭以御身，勤劳以济物"⑰。天嘉七年（566）二月，文帝死，子伯宗继位，政事大小皆决于安成王陈顼（音须）。光大二年（568）陈顼废伯宗自立，是为宣帝。他继续实行文帝轻徭薄赋，发展生产的政策，使遭受破坏的江南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其时北方周、齐相峙，冲突不断。为夹击北齐，周、陈通使结好。太建五年（573），陈宣帝以吴明彻为征讨大都督，统军十万大举攻北齐，连战皆捷，"大败齐师于吕梁，又攻杀王琳于寿阳，于是淮、泗之地俱复"⑱。太建九年（577），北周攻灭北齐，随即与陈军发生正面冲突。太建十年（578）双方在彭城吕梁展开激战，陈军为周师所败，吴明彻被擒，周将韦孝宽复取寿阳（今安徽寿阳），梁士彦复拔广陵（今江苏扬州），"陈乃划江为界，江

北之地，尽入于周”⑲。陈的力量更加衰竭，成为南朝历史上疆域最小的王朝。

太建十四年（582），宣帝病死，子叔宝继位。这就是陈后主。此时，北方出现了统一的北周，太建十三年（581），外戚、大丞相杨坚废年仅八岁的周静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他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社会经济，并在军事上积极准备灭陈。而陈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并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而盛修宫室，无时休止。税江税市，征取百端。刑罚酷滥，牢狱常满”⑳。陈祯明元年（隋开皇七年、587），隋出兵攻灭江陵的后梁，扫除了向江南进军的最后障碍。祯明二年（588），杨坚下诏伐陈，“暴后主二十恶。又散写诏书，书三十万纸，遍喻江外”㉑，并以晋王杨广为元帅，督八十总管，率军五十余万，“自巴、蜀、沔、汉下流至广陵，数十道俱入”㉒。隋开皇九年（589）正月，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陷京口，韩擒虎自横江（安徽和县）克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拔姑孰（今安徽当涂），隋军南北两道并进，直趋建康宫城，陈文武百官逃散，后主匿于景阳楼井中，被隋军搜获，陈朝至此灭亡。隋灭陈，结束了自东晋十六国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从此，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发展时期——隋唐。

注 释

①《南史》卷一○《宋高祖武帝》。

②《宋书》卷五《文帝纪》。

③《资治通鉴》卷一二五，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④《资治通鉴》卷一二六，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⑤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一一。

⑥《南史》卷四《齐本纪》。

⑦《通典·食货》。

⑧《南史》卷七七《恩倖吕文度传》。

⑨《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

⑩《南史》卷四《萧赜纪》。

⑪《廿二史劄记》卷一二，齐明杀高武子孙。

⑫《梁书》卷一《武帝纪》。

⑬《南史》卷九《陈本纪》。

⑭《陈书》卷三五传论。

⑮《南史》卷六四《王琳传》。

⑯⑰《陈书》卷三《世祖纪》。

⑱⑲《廿二史劄记》卷一二。

⑳㉑《南史》卷一〇《陈后主纪》。

㉒《陈书》卷六《后主纪》。

三国两晋南北朝

土断人户

土断制，或称土断人户，是东晋、南朝时实施的一项重要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与西晋“永嘉之乱”爆发后，中原人民的大量南迁，南方大量侨州郡县的设置密切相关。

永嘉乱后，北方人民的迁徙南下，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在东晋、南朝时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大体上可以分做七次。

永嘉元年（307），北方变乱开始，司马睿移镇江东，北方流民相率过江，《宋书·州郡志》序曰：“自夷狄乱华，司、冀、雍、凉、青、并、兖、豫、幽、平诸州，一时沦没，遗民南渡，并侨置牧司，非旧土也。”这是第一个时期。

东晋成帝初年，苏峻、祖约叛乱于江淮，羯族石勒乘机南侵，淮南人及北方人侨居于淮南者，进一步南迁过江。这是第二个时期。

康帝、穆帝以后，“胡亡氐乱”，石赵政权崩溃，中原兵燹连年；东晋桓温出兵关中，秦、雍之民多南出樊沔，或至汉中。这是第三个时期。

孝武帝太元八年（383），淝水之战爆发，苻坚在谢玄率北

府兵迎击下败亡，北方黄河流域再次分裂，中原流民又相率渡江。这是第四个时期。

晋安帝时，刘裕北伐，收复河南、关中、山东等地，继而复失关中。刘裕死，又失河南，流民南徙过江者转多。这是第五个时期。

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北魏南侵至瓜步（今江苏南京市六合县），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六个时期。

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流民南渡江淮。这是第七个时期①。

中原人民的迁徙南下，在寓居地域上，主要集中于长江流域的荆、扬、梁、益诸州，总数约在七十万人以上，尚有二十万未到达长江流域，聚居于今山东境内。谭其骧教授把《宋书·州郡志》中所记侨州郡县之户口数作为南渡人口（政府领民）之约数，则自永嘉至刘宋之季，南渡人口九十万，占当时政府领民五百四十万的六分之一，占西晋太康之时北方诸州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②。在北方南下的侨寓人口中，从地域来说，以寓居今江苏省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山东省次之，约二十一万；安徽省再次之，约十七万；再后，寓居四川省者约十万；寓居湖北省者约六万；陕西省者约五万；河南省者约三万，寓居江西、湖南省者各一万余人。迁徙的大势是：中国北方的东部人，迁徙到中国南方的东部；中国北方的西部人，迁徙到中国南方的西部。在寓居江苏省的二十六万人口中，南徐州（治丹徒，今江苏镇江）一州领有的侨寓人口即达二十二万，几占寓居江苏全省人口的十分之九，侨寓人口超过原有人口二万余人。

东晋政府为了安置如此巨大数量、汹涌南下的北方人民，

创置了侨州郡县。“元帝寓江左，百姓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置郡县”③。晋元帝大兴三年（320），首先侨立怀德县于建康。成帝咸康元年（335），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侨立南琅琊郡。其后，随着北方流民的大批南下，侨州郡县的设置就越来越多。由于从兖州、青州及徐州北部南下的侨民较多，就在建康附近的京口界内侨立南徐州和南兖州（南兖州州治后迁往广陵）；广陵界内侨立南青州；芜湖界内侨立南豫州。而其他如幽州、冀州迁徙南下的侨民较少，就不建立州的流亡政府，只在大江南北建立郡级或县级的流亡政府，并把它们拨给南徐、南兖、南青州等管辖。因此，以南徐州一州而言，就“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④。而江南的常州等地，则设有十五、六个侨郡和六十多个侨县。这种随便分合地区，随便侨置郡县的结果，势必把地方行政系统搞得十分混乱。史称“魏晋以来，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混淆，职方所不能记”⑤。

更严重的还有大批流民不入户籍，他们“客寓流离，民籍不立”⑥，过着到处浮浪的生活。而南北豪强地主则乘机大量招收劳动力。所谓“南北权豪，竞招游食”⑦和“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⑧，就是流民大量投入私门情况的反映。这样，国家的租税收入和赋役势必受到严重的影响，出现了“国弊家丰”的局面。由于上述这些原因，土断的措施便提出来了。

所谓土断，或称土断人户，就是把散居侨人或浮浪人断入所在籍贯，由政府加以控制；有的是并省没有实土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更主要的是整顿不统一的户籍，即把原来侨寓户享

有不向封建国家纳税和服役优复权的白籍（以白纸为籍）改成与土著户一样的黄籍（以黄纸为籍），便于政府对土著户和侨寓户征收统一的赋税和徭役。由于当时的侨寓户很多隐庇于豪族地主门下，因此实行土断，也是封建国家向豪族地主争夺控制对象。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东晋、南朝一共进行了大约九次土断。

第一次土断，在东晋成帝咸和二年（327）。此次土断，《晋书》中无明确记载。但据《陈书·高祖纪》记载："（其先）世居颍川。……达，永嘉南迁，……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达生康，复为丞相掾，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⑨。又据《南史·王僧孺传》记载："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难，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两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⑩。说明《陈书》的咸和中土断，即为咸和二年土断。土断后整理出来的户籍，称为晋籍，也就是黄籍，它相当精详，成了政府征收赋税和征发徭役的依据，因而从咸和二年一直沿用到刘宋元嘉二十七年，长达一百二十余年。

第二次土断，在东晋成帝咸康七年（341），"实编户，王公以下皆正土断白籍"⑪。这是在东晋第一次土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检查户口，以充实编户，并令王公以下至百姓的侨寓户，一律以土为断，把侨寓户的白籍厘正为黄籍。

第三次土断在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三月初一庚戌那天进行的，故称"庚戌制"。"三月庚戌朔，大阅户人，严法禁，称为庚戌制"⑫。主持这次土断的是当时掌握东晋军政大

权的权臣桓温，他推行土断大刀阔斧，对一些隐匿户口的皇亲国戚和大士族打击比较严厉。如彭城王司马玄"会庚戌制，不得藏户，玄匿五户，桓温表玄犯禁，收付廷尉"⑬。又王彪之当时为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内史，土断后，"亡户归者三万余口"⑭。可见庚戌土断比较彻底，故史称"于时财阜国丰，实由于此"⑮。

第四次土断为东晋安帝义熙九年（413），主持此次土断的，是当时已掌握东晋军队大权的刘裕，他在上给晋安帝的奏疏中说：自桓温庚戌土断以来，"自茳迄今，弥历年载，画一之制，渐用颓弛。杂居流寓，闾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纯，民瘼所以犹在"。他要求"请准庚戌土断之科"进行土断。得到了安帝的同意。刘裕在这次依界推行的土断中，"唯徐、兖、青三州居晋陵者，不在断例"，其余"诸流寓郡县，多被并省"⑯。刘裕主持的这次义熙土断，也能雷厉风行，会稽四大士族之一的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杀死，包庇虞亮的会稽内史司马休之也被撤职免官，史称"豪强肃然，远近知禁"⑰。

由于在东晋、南朝，设置侨州郡和实行土断基本上是两个并行不悖的措施，因此进入南朝后，一方面有侨州郡的不断设置；一方面又不断进行土断。故继东晋四次土断之后，南朝仍进行了五次土断。即：宋孝武大明元年（457）七月"土断雍州诸侨郡县"⑱；宋废帝元徽元年（473），再"申土断之制"⑲；齐高帝萧道成建元三年（481），土断江北侨郡县⑳；梁武帝天监元年（502），"土断南徐州诸侨郡县"㉑；陈文帝天嘉元年（560），进行了南朝历史上最后一次土断："自顷丧乱，编户播迁，言念余黎，良可哀惕。其亡乡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内随其适乐，来岁不问侨旧，悉令著籍，同土断之例。"

②上述南朝进行的五次土断，有的是局部地区把侨人编入黄籍的土断；有的则“不问侨旧”，主要是针对“逐食流移”的流民，因而与东晋时实行的四次土断略有区别。但其实质都是一样，即通过土断，把侨人和流民都纳入到封建国家剥削和奴役的对象中去，增加了国家控制的编户齐民。

注　释

①以上均参见《宋书》卷三五至三八《州郡志》。

②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燕京学报》十五期。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⑤《宋书》卷一一诸志《序》。

⑥《世说新语》政事篇引《续晋阳秋》。

⑦《晋书》卷八八《颜含传》。

⑧《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南兖州》。

⑨《陈书》卷一《高祖纪》。

⑩《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

⑪《晋书》卷七《成帝纪》。

⑫《晋书》卷八《哀帝纪》。

⑬《晋书》卷三七《彭城穆王权附玄传》。

⑭《晋书》卷七六《王廙附侄彪之传》。

⑮⑯⑰《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⑱《宋书》卷六《孝武帝纪》。

⑲《宋书》卷九《后废帝纪》。

⑳《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

㉑《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㉒《陈书》卷三《世祖纪》。

三国两晋南北朝

寒人掌机要

从魏晋以来，在社会政治上，有两种势力在互相激荡。一种是世家大族的势力，他们依据一定的门第和仕途，把持中央与方镇的政治权与军事领导权，享有种种特权。另一种是寒门庶族的势力，他们社会地位低微，只能靠军勋起家，或由寒吏入仕。入仕官职也不是世家大族把持的那些职闲禄重的清流美职，而只能是职低禄轻的浊流浊职。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①，就是高门士族与庶族寒门之间在政治、社会地位上存在着巨大差别的真实反映。

东晋是门阀士族社会，王、谢、庾、桓四大士族的权势实际凌驾于皇族司马氏之上。晋投奔后秦的韦华就对姚兴说：“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②但是经过东晋末年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东晋的门阀士族势力开始走向衰落；而随着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庶族寒门的势力却在不断上升。南朝四个王朝的建立者，都是“崛起寒微”，建立军功的贵族。他们的当政，又为这个变化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南朝时期的高门士族，他们虽然在政治上丧失了统治权，但是在社会上仍享有很高的地位。多数高门士族以政治超脱为高，以勤劳国务为羞，他们依靠门户和父祖余荫，“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③。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以门第相矜，以风流相尚，以奢侈相高。他们“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④。其中有许多世族子弟，他们既无经国之才，又不学无术，但却“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⑤。完全堕落为社会的寄生虫。正如清人赵翼评论所说：“高门大族者，不过雍容令仆，裙屐相高。求如王导、谢安柱石国家者，不一、二数也。次则如王宏、王昙首、褚渊、王俭等，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市朝革易，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族，迥异于庶姓而已。”⑥

出身素族寒门的南朝君主，为了抵消世族的政治影响，加强王权，必然要寻找自己政治上的同盟者、支持者，正是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寒人势力便由此悄然兴起。

南朝寒人对政治的积极参与和重要作用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典掌中书舍人、制局监、典签等机要职务而实现的。这些职务，品位不高，但机要性很强。尤其是中书舍人一职，在南朝时实际夺了中书省的权力，起着中书监、中书令的作用。

关于中书舍人一职的设置和衍变，《南齐书·倖臣传序》曰：“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

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元帝用琅琊刘超，以谨慎居职。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及明帝世，胡母颢、阮田夫之徒，专为佞幸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付其省，万机严秘，有如尚书外省。"可见中书舍人原为九品小官，晋以前诏诰机要之权在中书省，宋齐以后，诏命不关中书，专出舍人之手了。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中，担任中书通事舍人的秋当、周赳均出自寒人，并管要务。戴法兴，会稽山阴人，其父"贩纻为业"，法兴则"少卖葛于山阴市"。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孝武帝刘骏之世，戴法兴、巢尚之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凡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上皆与法兴、尚之参怀"。世祖崩，前废帝即位。时太宰江夏王义恭录尚书事，任同总已，而法兴、尚之"执权日久，威行内外，义恭积相畏服，至是慑惮尤甚"。时废帝未亲万机，"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而当时的尚书左仆射颜师伯、录尚书事刘义恭"守空名而已"。因此民间传言"谓法兴为真天子，帝为赝天子"⑦。明帝刘彧时代，会稽阮佃夫，出身为"台小吏"、吴兴王道隆、宣城杨运长并执权，"亚于人主"。连孝武帝时代的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戴法兴也无法与之相比。明帝晏驾，后废帝即位，三人并兼中书通事舍人，"权任转重"。连阮佃夫的捉车人也官至武贲中郎将、傍马者官至员外郎⑧，可见其权

势的煊赫。

在萧齐时代，居中书舍人而擅权势者有纪僧珍、刘系宗、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毋珍之等，他们均门户低贱，出身寒人小吏，“既总重权，势倾天下”。齐武帝萧赜尝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⑨并称誉吕文度：“公卿中有忧国如文度者，复何忧天下不宁?”⑩可见君主对他们委寄之深。这时的中书舍人，已从中书省中独立出来，形成中书舍人省，“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谓之四户”⑪。由于中书通事舍人地在枢要，和皇帝关系密切，所以人地虽寒，官品虽卑，而权任极重。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常谓人曰：“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⑫

到梁、陈时代，中书舍人的权力进一步强化。《隋书·百官志》载：梁陈时代，“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事十人，书吏二百人。书吏不足，并取助书。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权”。中书舍人的地位，已不单纯是皇帝的机要秘书、地位卑小的官吏，而是指挥尚书，参预行政的要员。故萧梁时，梁武帝用寒人朱异典掌机要三十余年，威振内外，因而当时的世家大族“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⑬。入陈之后，毛喜以素族，施文庆以吏门，沈客卿以寒流，先后任中书通事舍人。毛喜在仕宦中能“勤心纳忠，多所匡益，数有谏诤”，因之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⑭。而陈后主重用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则“唯以刻削百姓为事”⑮。甚至隋军临江，犹曰“此常事，边臣足以当之，不复警备，以致亡国”⑯。由此可见，中书舍人之职，其

职权之重实系安危于国。

除中书舍人外，寒人在中央政权里占据的重要职位还有制局监、外监。《南史·恩倖传序》曰：“领武官有制局监、外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寒人担任制局监、外监的职务，是参与军事指挥权的重要途径。南齐建立后，齐武帝任用寒人吕文度，“文度为外监，专制兵权，领军将军守虚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将星占文度吉凶”[17]。齐东昏侯时，寒人茹法珍、梅虫儿二人“并为制局监，俱见爱幸”[18]。另一寒人徐世标，自殿内主帅为直阁骁骑将军，操纵着兵权。陈显达起兵，齐政府用护军崔慧景为都督赴讨，“而兵权实在世标，当时权倾法珍、虫儿”。永元二年（500），徐世标以谋大逆罪伏诛，“自是法珍、虫儿并为外监，口称诏敕，中书舍人王咺之与相唇齿，专掌文翰。其余二十余人，皆有势力”[19]。

萧梁时，亦用寒人为制局监，梁武帝时的寒人周石珍“建康之厮隶也，世以贩绢为业”，“颇娴应对，后遂至制局监，带开阳令。历位直阁将军。太清三年，封南丰县侯，犹领制局”[20]。他在侯景包围台城时，就射书与侯景相勾结，“景纂位，制度羽仪皆石珍自出”[21]。

寒人对地方政治的参与，主要是寒人在州镇里充任典签。南朝君主，为加强皇权，在宫廷内省则重用寒人，参掌机要；在地方上则由诸王出任刺史。但自宋中叶以降，出任方镇的诸王，年龄都比较幼少，而州府上佐，则多由世族子弟充任，他们往往不留心吏事，而寄情物外。因此君主便指派寒人出身的亲近左右来充任诸王典签，代替诸王批阅公事，甚至照管诸王的饮食起居。故典签之职职位虽低，而实权极重。《南史·恩倖传》叙述典签制度的起源说：“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

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为七职。宋氏晚运，多以幼小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纳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典签对州刺史、行事（以行府州事身份主持州务（宗王亲信，一般为士族出身的人担任）施以监督，经常往来于京师、方镇之间，“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闲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㉒。萧齐时，典签之权更重，如武陵王奕，在江州忤典签赵渥，赵渥启其得失，即召还京。宜都王铿举动，每为签帅所判，立意多不得行。南海王子罕，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不得，与囚何异？邵陵王子贞求熊白，厨人答以无典签命，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侍读鲍僎，典签吴修之不许乃止。甚至诸王欲取一挺藕，一杯浆，典签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只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如有不甘受制而擅杀典签者，则必治以专辄之罪。如长沙王晃，为典签所裁，晃杀之，高帝大怒，手诏赐杖。鱼复侯子响杀典签吴修之等，后以抗拒台兵被诛。故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竟陵王萧子良尝向范云曰：士大夫何故诣签帅？云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十倍之利，不诣何为？在宋、齐两代宗室的相互杀戮中，典签大多执行君主的命令，成为杀戮诸王的具体执行者。如齐明帝杀高武子孙时，无一不就典签杀之。萧鸾开始辅政时，令萧谌密召诸王典签，令其约束诸王，不令交通外人。其害巴陵王萧子伦时，惧其有兵能拒命，以问典签裴伯茂，伯茂曰：若遣兵，恐不可即得。委伯茂，则小吏力耳。果以酖逼之死。又遣裴叔业害南平王萧锐，防汉周伯玉欲斩叔业，举兵

匡社稷，典签叱左右斩之，锐遂见害㉓。典签威权之重，不难想见。

寒人参政，寒人对国家权力中心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南朝时期出现的一种打破世族统治的社会现象。而出身寒门的南朝皇帝，和高门大族之间，由于政治上的利害不尽相同，他们往往和寒人结合，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存在于南朝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普遍现象。

注 释

①《晋书》卷四五《刘毅传》。

②《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

③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

④颜之推《颜氏家训·涉务》。

⑤《颜氏家训·勉学》。

⑥《廿二史劄记》卷一二。

⑦《宋书》卷九四《恩倖戴法兴传》。

⑧《南史》卷七七《阮佃夫传》。

⑨《南齐书》卷五六《倖臣茹法亮传》。

⑩《南史》卷七七《恩倖茹法亮传》。

⑪《南史》卷七七《恩倖吕文显传》。

⑫《南史》卷七七《恩倖茹法亮传》。

⑬《颜氏家训·涉务篇》。

⑭《陈书》卷二九《毛喜传》。

⑮《南史》卷七七《倖臣沈客卿传》。

⑯《廿二史劄记》卷八。

⑰《南史》卷七七《恩倖茹法亮传》。

⑱⑲《南史》卷七七《恩倖茹法珍传》。

⑳㉑《南史》卷七七《恩倖周石珍传》。

㉒《南史》卷七七《恩倖吕文显传》。

㉓可参见《廿二史劄记》卷一二，齐制典签之权太重。

三国两晋南北朝

江南的开发

西晋灭亡以后，我国北方黄河流域长期存在混乱局面，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晋元帝司马睿于建武元年（317）在建康建立东晋政权，经过了一百零四年，宋武帝刘裕于永初元年（420）称帝建宋。此后，在东晋统治的江南地区，相继出现了总称之谓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封建王朝，直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南北方重新统一。在此近三百年期间（317—589），我国南方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政治秩序相对安定，江南的开发步伐加快，社会经济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经济得到开发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史称“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①。北方人民南迁的时间从西晋末年一直到刘宋时期，南迁的北方人口约有九十万之巨，占当时北方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

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不仅使地广人稀的南方增加了大量的劳动人手，而且也带来了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其次，是这一时期南方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同化和融合，其中尤以山越族和蛮族最为突出。山越族分布于长江下游的南部山岭地区（今皖南、苏南、浙、赣等地）；蛮族分布于长江中游的江、汉、荆、湘地区。山越族在三国时就熟悉了农耕和冶铁技术，它们和荆、湘蛮族到南朝的齐、梁时，都先后实现了同汉族的融合。这不仅增加了开发南方的劳动力，而且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也意味着扩大了南方的开发地区。经过南北两支劳动大军的共同辛勤劳动，江南地区迅速地改变着过去“火耕水耨”、“渔猎山伐”的落后面貌，社会经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

这个时期农业的发展特别显著，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水利事业的兴修和荒芜土地的垦辟上。三国以后，中原地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南方开始得到推广。吴时，南方已普遍应用耦耕。东晋时，区田法已传入南方。如河内轵人郭文“洛阳陷，乃步担入吴兴余杭大辟山中穷谷无人之地，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区种菽麦，采竹叶木实，贸盐以自供”②。并已使用粪肥。宋武帝刘裕的功臣广陵人到彦之寒微时曾以挑粪为业，说明粪已用作肥料。水稻栽培技术有了提高，岭南地区出现了“各种春熟、春种夏熟、秋种冬熟”的三熟稻③。麦的种植也得到了推广，东晋和刘宋都曾以政府命令推广种麦，如晋元帝大兴元年（318）诏：“徐、扬二州，土宜三麦，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种，至夏而熟，继新故之交，于以周济，所益甚大。”④宋元嘉二十一年（444）、大明七年（463）又令“扬州、浙江西属郡，自今悉督种麦，以助阙乏”

[5]。麦类逐渐成为南方人民的重要粮食。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水利事业，在东晋、南朝时也有很大发展。如西晋末、东晋初陈敏所立练塘（即原江苏省丹阳县练湖），周围四十里，溉田数百顷；会稽勾章（浙江余姚东南）所复汉旧渠，溉田二百余顷；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县）新筑荻塘，溉田千顷；丹阳曲阿（今江苏丹阳市）新丰塘溉田八百余顷；芍陂（今安徽寿县南）有“良田万顷，堤堰久坏”，宋、齐、梁三代累加修葺[6]；雍州襄阳有六门堰（今河南省双县西），汉时溉田三万顷，“堰久决坏”，宋元嘉时，加以修复，“雍部由是大丰”[7]；宋末在乌程筑吴兴塘，“溉田二千余顷”[8]；在荆州筑获湖，“堰湖开渎，通引江水，田多收获”[9]；齐时筑赤山塘（今江苏句容县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淮，有石门以为水启闭之节[10]；梁时在豫州（治寿春，今安徽寿县）之“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11]；在临海乐安县（今浙江仙居县）“堰谷为六陂以溉田”[12]。由于南方有比较丰富的自然水系，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们对江湖川泽进一步加以利用，便在湖边低洼地方，筑堤排水，围以为田，这就是当时江南出现的“湖田”。湖田土质肥沃，又接近水源，便于灌溉，特别适宜于水稻的种植。

劳动人口的增加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南方土地的开垦。在东晋、南朝时期，南方已形成若干经济区。其中以三吴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三角洲，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成为与下游扬州有同等地位的重要开发区；以寿春为中心的淮海地区在当时南北经济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包括鄱阳湖流域的豫章地区，岭南的交、广地区、福建的闽江流域，都成为当时新的重要开发区。位于这些经济区内

的云梦、洞庭、鄱阳、太湖等三湖流域渐次成为鱼米之乡。宋、齐时人沈约记述荆、扬地区经济发展的情况说："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郛有全吴之沃"，这里"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⑬。梁、陈时，建康所在的江南地区更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⑭，说明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面貌，与《史记》所描述的江南一带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状况相比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手工业方面，首先是江南地区的冶铁技术有了显著提高。除普遍使用水力鼓风炉以外，还能把生铁与熟铁熔合在一起，反复加热捶打，炼成质量较纯的钢铁，既可打造刀剑，也可打制镰刀等农具，对发展生产起很大的作用。当时以造钢坯著名的上虞人谢平，和另一擅造刀剑的炼钢师黄文庆，并称为"中国绝手"。丹阳郡的永世县（今江苏溧阳）的铁岘山，剡县（shàn 善，今浙江嵊县）的三口山和江夏（今湖北武昌）的冶唐山都出产丰富的铁矿，也是冶铸兵器、农具的重要场所。梁武帝曾用建康东、西冶冶铸的铁堵塞浮山堰的缺口，可见南朝铁的总产量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是纺织业。南方原来有基础的是麻葛织业，左思《吴都赋》中关于纺织品的描写大都指麻葛织品。东晋以后南方纺织业的发展，一方面表现为麻葛织品品种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不仅有所谓越布、香葛、细葛、南布、花练等不同品种，而且高级织品织造极为精巧，以至刘裕曾憎其"精丽劳人"而下令禁织。南朝末年还出现了"夜浣纱而旦成布"的"鸡鸣布"⑮。另一方面是丝织业的大发展。刘裕灭后秦姚兴时，曾

把关中锦工迁往江南，于建康设立锦署，为日后金陵织造业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与丝织业密切相关的蚕桑养植业在江南得到了普遍推广。优良的桑种，在鲜卑族慕容廆通使于东晋时，还被移植至辽东⑯。当时南方的豫章、永嘉、闽中等地，都出现"四熟"、"五熟"和"八熟"之蚕。江南逐渐成为除齐、蜀之外一个新的纺织业中心。

东晋、南朝时期，是我国青瓷器发展的重要阶段。青瓷无论在胎质、釉色、纹饰和烧制技术等方面，都有了显著提高。这一时期的南方大部分墓葬都有青瓷出土，尤其以浙江、江苏为多。所产青瓷，釉质厚润，器物种类繁多，造型优美。青瓷制造的长足进步，为隋唐青瓷的全盛时期打下了基础。

造纸业方面，两汉时期发明的造纸术，至东晋、南朝时，在利用南方当地资源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并增加了纸的品种。藤皮纸即是利用当时南方所产的桑皮、藤皮作原料的，剡县和余杭都是这种纸的产地。除了白纸，还能制造青、赤、缥(音飘，淡青色)、绿、桃花等各色纸。技术的改进和原料来源的扩大，提高了纸的产量。王羲之曾一次赠谢安九万张纸⑰，可见纸的消费量已随着生产量的增多而增加。纸的大量生产导致桓玄明令废除竹简，"皆以黄纸代之"⑱。竹简的废除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事，它反映了南方经济的发展对文化所起的促进作用。南朝的建康城中有"银纸官署，齐高帝造纸之所也，尝造银光纸赠王僧虔，一云凝光"⑲。梁简文帝为太子时，与人笺，有"特送四色纸三万枚"之语；梁文帝为湘东王时，出为荆州刺史，曾"上武帝纸万福，又奉简文红笺五千番"。又云"特送五色三万枚"⑳。这里所谓四色、五色，是指纸张的花色增多，说明在南朝时，纸的制造技术又在不断提高。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当时商业和贸易的发达。江南地区众多的河流与湖泊，为商品的流转，航运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晋、南朝的造船业在孙吴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刘裕攻灭后秦时，王镇恶率水师溯渭水而上，乘坐的蒙冲小舰，行船者都在舰内，秦人只见舰进而不见行船者，都"惊以为神"。卢循起义军也曾"作八槽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㉑。侯景乱梁时，江南有军舰千艘，称"鸼船"，"两边悉八十棹"，"去来趣袭，捷过风电"㉒。以此推知，民间运载的船只，也一定不会太差。颜之推说："昔在江南，不信有千人毡帐；及来河北，不信有二万斛船"㉓。比之东吴的万斛大船，船只的载重量又增加了一倍。横贯东西的长江是当时江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处于这条大动脉上的建康不仅是当时南方的政治中心，又是一个繁荣的商业都会，它"贡使商旅，方舟万计"㉔。梁时"城中二十八万户，东西南北各四十里"㉕。如以一户五口计，则建康已拥有一百四十万以上的人口，"市廛列肆，埒（等）于二京"㉖。与长江中游的江陵（今属湖北省）、夏口（今湖北汉口）、下游的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广陵（今江苏扬州市）等一起，则是长江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货物的重要集散地。处于大动脉附近的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则是三吴经济中心；寿春（今安徽寿县）为南北贸易中心；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是长江中下游新兴商业城市；地处交、广的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则是南方经济中心和国际贸易口岸。

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使原先落后的江南经济逐渐赶上黄河流域，南贫北富的局面开始扭转，我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移。以后，隋灭南朝的陈，统一南北以后，开凿贯通南北的大

运河，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联系起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起两汉更为强大、繁荣的隋、唐帝国。

注　释

①《宋书》卷三五《州郡志》。

②《晋书》卷九四《郭文传》。

③徐坚《初学记》卷八引《广志》。

④《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⑤《宋书》卷五《文帝纪》。

⑥见《宋书》卷五一《长沙王道怜传子义欣附传》、《南齐书》卷25《恒崇祖传》。

⑦《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

⑧《元和郡县图志》湖州乌程县。

⑨《太平寰宇记》卷一四六。

⑩《梁书》卷五三《良吏沈瑀传》。

⑪《梁书》卷二八《夏侯亶附弟夔传》。

⑫《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七。

⑬《宋书》卷五四史臣曰。

⑭《陈书》卷五《宣帝纪》。

⑮《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⑯据《晋书·慕容宝载记》："先是辽川无桑，及廆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川桑系由吴来。"

⑰《太平御览》卷六O五引《语林》。

⑱《太平御览》卷六O五引《桓玄伪事》。

⑲《太平御览》卷六O五引《丹阳记》。

⑳元鲜于枢《笺纸谱》引。

㉑《北堂书抄》卷一三六引《义熙起居注》。

㉒《梁书》卷四五《王僧辩传》。

㉓《颜氏家训·归心篇》。

㉔《宋书》卷三三《五行志》。

㉕《太平寰宇记》卷九〇引《金陵记》。

㉖《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

三国两晋南北朝

梁武帝的统治

梁武帝萧衍自天监元年（502）废齐和帝建梁朝起，至太清三年（549），被东魏叛降的大将侯景攻破建康台城，被囚禁，不久饿死，前后作皇帝四十八年，这是南朝历代封建皇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在南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梁武帝统治的五十年也可以说达到了较高的发展。南朝的历史学家李延寿论曰："自江左以来，年踰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并非完全溢美之词。而萧衍之死，则又实际上标志着梁朝的灭亡。李延寿评论说："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①梁朝灭亡的原因，正是萧衍自己酿成的。

梁武帝统治的特点之一是他竭力调和统治阶级内部世族与寒门之间的矛盾。高门大族虽然在东晋末年经受了很大打击，但是他们在社会上仍拥有很高的地位。因而笼络高门是梁武帝的一贯政策。为此，他下诏："凡诸郡国旧族，帮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括，使郡有一人。"②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东晋以来淹没不显的旧族，使他们有参加政权的机

会，作为萧梁政权的支持力量。如谢朏在萧齐时为士族首领，齐高帝萧道成方图禅代，他不愿做“假玺授齐王”之事，险些送了性命，最后被免官禁锢五年。萧衍做了皇帝，请谢朏出来做官，谢朏“轻舟出，诣阙自陈。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诏以为侍中、司徒、尚书令”③。谢朏在梁朝虽然担当台枢之任，但却无所建树，“以此颇失众望”。可梁武帝对他却非常礼遇。他有脚疾，行走不便，萧衍令他“乘小舆升殿”。他死时，萧衍还“车驾出临哭”④。又如齐、梁之际的袁昂，出身于东汉以来陈郡的世家大族。他在齐末任吴兴太守，“永元末，义师至京师，州牧郡守皆望风降款，昂独拒境不守命”。后来建康城平，袁昂还举哀恸哭。萧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抚东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门，世有忠节，天下须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吴兴宣旨，“昂亦不请降，开门撤备而已。及至，帝亦不问其过”。天监二年（503）萧衍任袁昂为临川王参军事，进一步打消袁昂的疑虑：“朕遗射钩，卿无自外。”⑤萧衍的优容终于换得了袁昂对萧梁政权的合作，先后在梁任侍中、吏部尚书，再迁尚书左仆射、尚书令、司空等职，他在临死遗疏戒子书中说：“往忝吴兴，属在昏明之际，既闇于前觉，无诚于圣朝，不识天命，甘贻显戮，幸遇殊恩，得全门户。……今日瞑目，毕恨泉壤，圣朝遵古，如吾名品，或有追远之恩，脱有赠官，慎勿祗奉。”⑥这里所谓“圣朝遵古”及“如吾名品”，就是指萧衍尊重高门士族，了解袁氏的社会地位和对高门大族的优容态度。其他的高门大族，如王亮官至中书监，王莹官至尚书令和丹阳尹，王瞻、王峻、王份官至侍中，王志官至中书令，王暕官至侍中左仆射，王泰、谢览官至吏部尚书。这些高门大族虽然官位并不低，但只停留在虚

名上，并不真正掌握实权。而且士族发展至梁时，已日薄西山，日渐腐朽了。故熟悉当时士族情况的颜之推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簷车，跟高齿屐，坐僕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三月三日上巳，九月九日重阳）公讌，则假手赋诗。"⑦显然，梁武帝要完全依靠这帮腐朽透顶的高门大族来支撑萧梁政权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萧衍优容他们，只是要利用士族这块招牌，他要的是士族的拥护。

萧梁时在政治上实际掌握实权的还是那些出身于士族中、下层的寒门或寒士。如范云、沈约、徐勉、朱异等均为寒门或寒士⑧，他们在梁武帝统治时期均执掌实权。据《通鉴》载：天监二年（503）"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云卒。云尽心事上，知无不为。临繁处剧，精力过人。及卒，众谓沈约宜当枢管。上以约轻易，不如尚书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卫将军周舍同参国政。舍雅量不及勉，而清简过之 。……常留省内，罕得休下。勉或时还宅，群犬惊吠。每有表奏，辄焚其稿，舍豫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掌之"⑨。《梁书·朱异传》也说："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朝仪国典，诏诰勅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异属词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梁武帝重视门阀士族的中下层，还从培养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上采取了措施。天监四年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主一馆，馆有数百学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隋书·百官志上》记载："旧国子

学生限于贵贱，〔武〕帝欲招来后进，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天监八年又下诏，“其有能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指吏部〕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⑩。这样寒门子弟在入学和试吏以进入仕途方面，都得到特别关注。因此，协调士族之间高门与寒门之间的关系，使之共同支持萧梁政权，就成为梁武帝巩固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

梁武帝统治的特点之二是十分优容皇族子弟和官吏，他们犯法，全不受法律制裁。如梁武帝侄萧正德和大臣子弟夏侯洪等“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⑪。梁武帝第六弟临川王萧宏“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关锁甚为严密，有人报告梁武帝，说库房里可能都是武器，他大吃一惊，认为萧宏要夺取皇位。过一天，他带了昔日旧友射声校尉丘佗卿前往萧宏处饮酒，半醉后对萧宏说：“我今欲履行汝后房。”没有得到萧宏的答复，便起身径往后房走去，萧宏恐怕他哥哥见其搜刮那么多钱货，会不高兴，非常恐惧。梁武帝见此更加怀疑库房里藏的是武器，间间库房，都亲自检查一遍，但见“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梁武帝与丘佗卿屈指一算，“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纻、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萧宏认为这一下糟了，哪知萧衍查知库房内藏的不是武器，知道弟弟没有夺取皇位的野心，非常高兴地对萧宏说：“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情方更敦睦⑫。由此可见，对萧衍来说，只要不危害其皇权，贪污聚敛是允许的。萧宏如此，其他王公贵人

莫不尽然，故王伟为侯景草檄告建康城中市民曰："梁自近岁以来，权倖用事，割剥齐民，以供嗜欲。如曰不然，公等试观：今日国家池苑，王公第宅，僧尼寺塔；及在位庶僚，姬姜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不夺百姓，从何得之。"⑬可见当时官僚的奢侈腐化，肆情搜刮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梁武帝对皇室子弟和官僚这样优容，甚至"有犯罪者，皆讽群下，屈法申之"。可是对老百姓，刑罚却特别苛刻。"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逃亡，则举家质作"⑭。萧梁政府领民不超过五百万口，而百姓每年因犯法而被判处二年以上徒刑的，就有五千人之多。以致一次梁武帝去南郊祭天，有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⑮当然，梁武帝是不可能反过来的。

梁武帝统治的特点之三是利用宗教，特别是佛教作为欺骗、麻痹、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梁武帝是一位博学多通的人，他对儒学、道学、佛学乃至史学、文学等都有过研究，他从维护封建统治入手，认为儒、道、佛三教各有妙用而不能偏废：儒学教导人们恪守礼法伦常；道教讲羽化成仙，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佛教讲六色皆空，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它们的共同点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不去反抗斗争。因而在他看来，三教是同源的，它们在理论上可以融会贯通，在实践中可以互相补充。但在三教中，他认为佛学理论和佛教的修行方法，对人民大众更具吸引力，更具欺骗性，因而梁武帝把佛教奉为国教，特别在他的晚年，佞佛到了十分荒唐的地步。他不仅大事营造寺院佛塔，京都"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

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⑯。而且施舍僧尼，大力扶植寺院经济。一次布施，往往即值千万以上。萧子显《御讲〈摩诃般若经〉序》说：“皇帝（梁武帝）舍财，遍施钱、绢、银、锡杖等物二百一种，直一千九十六万。”由于梁武帝的大力提倡和资助，寺院拥有的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寺院还以当铺、钱庄的形式来聚敛钱财和剥削人民。尤其荒唐的是不仅梁武帝亲自行幸佛寺讲经、诵经，而且分别在大通元年（527）、中大通元年（529）、太清元年（547）三次舍身同泰寺院为奴，然后由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⑰。从而获得了“皇帝菩萨”的称号。梁武帝在佞佛上大肆挥霍钱财，但他在平时生活上却“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后宫职司贵妃以下，“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乐，显得十分简朴。他可以一个多月在寺中当和尚，不上朝理政，但他平时却要装出勤于政务、孜孜不怠的模样，“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⑱。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在梁武帝统治48年的全过程中，他尽管笃信佛教，但对道教和儒教并未采取排斥、打击的态度。任何宗教，对广大被压迫人民而言，都是麻痹、欺骗群众的精神鸦片，梁武帝对各种宗教采取宽容态度，兼容并包，更易争取民心，有利于维护其封建统治。

在军事方面，梁与北魏战事不断，双方力量不相上下，梁武帝有成功，也有失败。天监五年（506），与魏军在淮水以南对峙，主帅临川王萧宏“以帝弟将兵，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之有”⑲。只是由于萧宏懦弱无能，部署乖方，才大败而回。次年，梁军曹景宗，韦叡等在钟离（今安徽凤阳县东北）大败魏军，“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者十余

万，斩首亦如之"，"缘淮百余里，尸相枕藉，生擒五万人，收其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20]。魏军主帅元英、萧宝夤免死除名为民。这次战役，梁武帝指示曹景宗等采用"火攻之计"，起了决定作用。后来梁武帝想阻止魏军南下，听信魏降人王足之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于是从天监十三年（514）起，动员二十万民夫，筑浮山堰（在今安徽凤阳县），费时二年筑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21]。后开湫东注。北魏也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并成泽国。不久，淮水暴涨，"堰坏，其声如雷，闻三百里，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22]。普通七年（526），北魏北受六镇起义的威胁，南境又有葛荣领导的声势浩大的起义，局势极不稳定。是时梁武帝派夏侯亶等率军进入魏境，所向皆下，据寿阳，"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七万五千口"[23]。大通元年（527），梁将陈庆之军在涡阳（今安徽蒙城）与魏军相持，"自春至冬，数十百战"，最后大破魏军，"俘斩略尽，尸咽涡水，所降城中男女三万余口"[24]。到中大通元年（529），陈庆之率军送魏北海王元颢进洛阳。此时北魏在南北六镇、河北、关陇两大起义打击之后，又有尔朱荣入洛和河阴之役，内部混乱，给梁军造成有利机会，陈庆之"以数千之众，自发铚县至洛阳，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皆克"[25]。此次梁军攻进洛阳，为南朝百余年未有之事。但陈庆之兵力寡少，孤军深入，没有后援，加以元颢背离梁朝，陈庆之终于"军士死散略尽，乃削须发为沙门，间行出汝阴，还建康"[26]。以此为转折点，梁朝的军事力量便急剧下降了。

魏分东西以后，大同二年（536），东魏主动与梁议和，以便牵制西魏，形势对梁十分有利。但梁武帝没有利用北方东西分裂的局面，巩固内部，刷新局面，图谋进取。太清元年（547），梁武帝为贪得土地，反而接纳了东魏叛将侯景，破坏了与东魏的关系。接纳以后，又反复无常，准备出卖侯景给东魏。侯景发觉，终于起兵南攻。在应付侯景过程中，梁武帝又举棋不定，优柔寡断，终于被困台城而饿死，梁武帝四十八年的统治至此结束，真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梁武帝死后，萧梁政权实际也就垮台。

注 释

①《南史》卷七史论。

②《梁书》卷二《武帝纪中》。

③④《南史》卷二〇《谢弘微附朏传》。

⑤⑥《南史》卷二六《袁湛附昂传》。

⑦《颜氏家训集介》卷三《勉学》。

⑧参见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载《中华学术论文集》。

⑨《资治通鉴》卷一四五，梁武帝天监二年。

⑩《梁书·本纪》及卷四八《儒林传》。

⑪《南史》卷五一《梁宗室》上。

⑫《南史》卷五一《梁宗室萧宏传》。

⑬《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武帝太清二年。

⑭⑮《隋书》卷二五《刑法志》。

⑯《南史》卷七〇《郭祖深传》。

⑰《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⑱《南史》卷七《梁武帝本纪》。

⑲⑳《资治通鉴》卷一四六，梁武帝天监五年。

㉑《南史》卷五五《康絢传》。

㉒《资治通鉴》卷一四八，梁武帝天监十五年。

㉓《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普通七年。

㉔《资治通鉴》卷一五一，梁武帝大通元年。

㉕㉖《资治通鉴》卷一五三，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侯景之乱

侯景之乱发生于梁武帝太清二年（548）八月。这是一次重要的历史事件，它实际导致梁朝统治的垮台。

侯景字万景，为北魏怀朔镇戍兵，是一个鲜卑化的羯族人。早年他曾参加过六镇起义，后即叛降北魏尔朱荣，充当先锋，镇压葛荣起义，并因功升迁定州刺史。高欢灭尔朱荣后，侯景又投靠高欢，在东魏历官尚书左仆射、吏部尚书、司空、司徒、河南道大行台（河南道的军政最高长官），将兵十万，专制河南，达十四年之久（534—547）。高欢死，欢子高澄想把侯景调回，夺其兵权，景举兵不受代，以河南十三州之地，降于西魏。西魏丞相宇文泰知侯景机诈多变，乃采取“受降如临敌”的谨慎态度，分派大军，络绎接收侯景占有的土地七州十三镇，并示意要他把指挥的军队交出，并入朝长安。同时，高澄也已在侯景叛变之后，命慕容绍宗率大军向侯景进逼。侯景在东西两面夹击不利的形势下，乃派使至江南向梁武帝接洽投降，并请求萧梁出师救援。

已经做了四十六年皇帝的梁武帝萧衍，听到侯景来投降，

认为统一中原的机会到了。于是一面任命侯景为大将军、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诸军事、大行台，接受了他的投降；一面派他的侄儿萧渊明率南朝主力军队五万人进攻彭城，牵制东魏，支援侯景。由于南朝兵农身份低落，“萧衍发召兵士，皆须锁械；不尔，便即逃散”①，因而毫无战斗力。加以军官的腐化，师到之处，劫掠居民，毫无纪律，统帅萧渊明怯懦和缺乏战斗经验，因而梁军在彭城外十八里寒山堰一战，为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所败，贞阳侯萧渊明及胡贵孙、赵伯超等“皆为东魏所虏，失亡士卒数万人”②。梁朝的主力军，几乎全被歼灭。东魏军在大捷之后，又回师进击侯景。时景有众四万，退保涡阳（今安徽蒙城县），曾连败东魏军。慕容绍宗坚壁不与交战，相持连月，待侯景军食尽，然后进击，“景军溃散，丧甲士四万人，马匹千匹，辎重万余两”③。侯景乃与腹心数骑自硖石济淮，稍收散卒，得马步八百人，仓促逃奔南朝的寿阳（今安徽寿县）。梁武帝萧衍听到萧渊明寒山堰大败，梁军主力被消灭，萧渊明被东魏俘获的消息，紧张得几乎从御床上跌下来。后来又听到侯景失败后投奔寿阳的消息，乃发表侯景为南豫州刺史，就令他镇守寿阳，并赐给他青布万段，兵仗若干，史称“景自涡阳败后，多所征求，朝廷含弘，未尝拒绝”④。

东魏在寒山堰取得军事胜利以后，又对萧梁采取了外交攻势，叫俘去的萧渊明写信给梁武帝：只要消灭侯景，就可释放萧渊明和寒山的战俘。想藉此来离间侯景和梁朝的关系，促使侯景迅速叛变，达到他们希望的两者相争，北朝坐收渔利的目的。但梁武帝不加深虑，复信东魏说：“贞阳旦至，侯景夕返。”⑤侯景本来就认为萧梁腐朽，早有染指野心。他曾向高欢请兵三万，“要须济江缚取萧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⑥。

因此，当他得知梁武帝与东魏的议和情况后，即对左右说："我固知吴老公薄心肠。"于是始为反计，"属城居民悉召募为军士"⑦，并在太清二年（548）八月初十，公开在寿阳起兵叛梁。

是年十月，侯景扬声趣合肥，而实突袭谯州（今安徽滁州市），并降历阳（今安徽和县），引兵直趋长江。梁武帝闻讯，急忙派他的侄子、临贺王萧正德为平北将军、都督京师诸军事，由他布防长江，保卫建康。梁武帝先前无子，过继其弟萧宏之子萧正德为皇储，后来生了萧统，又将萧正德送还萧宏。萧正德失去继承皇位的机会，一直耿耿于怀。他"阴养死士，储米积货，幸国家有变"⑧。侯景借机煽惑萧正德，以推翻萧衍，用拥戴他作皇帝为诱饵，约为内应。因此当侯景兵马至江边时，萧正德"遣大船数十艘，诈称载荻，密以济景"，于是在十月二十二日，侯景便从横江渡江至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采石矶），当时侯景只有"马数百匹，兵几千人"⑨。二十三日，侯景军至板桥（今江苏南京市板桥镇），二十四日至秦淮河南岸，与秦淮河北岸的梁军隔朱雀桁而军，萧正德党与沈子睦复闭桁（大桥）渡侯景军，萧正德即率众与侯景军合，景乘胜直抵台城（建康有三城，西，石头城，禁军驰屯之所；东，东府城，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所居；中，台城，皇帝所居），并作长围围台城以隔绝内外，又西陷石头城，东取东府城，百道俱攻，昼夜不息。又引玄武湖水灌台城，门前御街尽为洪波所淹没。台城自太清二年十月廿四日被围，至太清三年（549）三月十二日被攻破，前后被围一百三十多天之久。时梁武帝已老耄，城中防务由太子萧纲主持，防军在名将羊侃的指挥下尽力抵抗。城初被围时，城内有男女十余万人，甲士

三万余人，米四十万斛。被围既久，死者十之七、八，登城而能作战的士兵，不满四千人了。城破之时，生存的只有二、三千人。台城里，“横尸满路”，“烂汁满沟洫”⑩。台城外的居民，在侯景的暴力驱迫下，于城东西起土山，“不限贵贱，乱加殴捶，疲羸者因杀以填山”⑪。侯景军中乏食，又纵“士卒掠夺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后米一升直七、八万钱，人相食，饿死者什五六”⑫。军人乏粮，“屠马于殿省间鬻之，杂以人肉”⑬。至于一般平民百姓，由于建康城被围，“道路继绝，数月之间，人至相食，犹不免饿死，存者百无一二”⑭。昔日繁华的建康城⑮，经此劫难，遭到了彻底的破坏。

当台城被围的时候，城外援军在邵陵王萧纶、东扬州刺史萧大连（皇太子萧纲之子）、南兖州刺史萧会理（梁武帝第四子萧绩之子）、司州刺史柳仲礼、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衡州刺史韦粲、高州刺史李迁仕等率领下，集结于建康周围的援军有二、三十万之多，共推柳仲礼为大都督，指挥全局。但柳仲礼“唯聚妓妾，置酒作乐，诸将日往请战，仲礼不许”。其他将师帅，除韦粲一人忠勇战死外，大都相互仇怨，顿兵不进，纵兵暴掠。梁武帝见此情景，曾问策于身在台城之内的太子詹事、柳仲礼之父柳津。柳津对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礼，不忠不孝，贼何由平！”⑯台城破后，侯景强迫梁武帝命令援军全归侯景指挥。援军或归或降，陆续散去。

侯景未入建康时，曾立萧正德为帝（大清二年十一月初一），既入建康，废正德，以后又缢杀正德，侯景自加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南朝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他一人手中。梁武帝也被侯景软禁起来，在台城陷落后二月老病饿死，年八十六。其长子萧统先死，三子萧纲时为太子，侯景立纲为帝，是

为简文帝。简文帝当了将近二年的傀儡皇帝，侯景自为相国，自封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大宝二年（551）八月，景又废简文帝，立萧统长子萧欢之子萧栋为帝。这一年的十月中，侯景命人用土囊压杀简文帝萧纲，并杀其十余子。十一月中，又强迫萧栋禅位于己，国号汉。

侯景在攻下建康台城后，又进军三吴地区。东扬州（治山阴，今浙江绍兴市）刺史萧大连有“胜兵数万，粮仗山积”⑰。东土人民恶侯景暴虐，都愿起兵讨景，但萧大连“朝夕酣饮，不恤军事”；司马留异“凶狡残暴，为众所患”。他们在侯景军的进攻下，弃城逃跑，于是“三吴尽没于景，公侯在会稽者，俱南度岭”⑱。当时荆楚尚称全盛，侯景在占领扬、越后，即用兵取得江州（今江西南昌）、郢州（今湖北武汉），并乘胜西上，其水军“号二十万，联旗千里，江左以来，水军之盛未有也”⑲。进达巴陵（今湖南岳阳县），将攻江陵，梁荆州刺史萧绎（梁武帝第七子）命大将王僧辩率兵击退景军，于大宝二年（551）七月，收复郢州和江州。承圣元年（552）三月，王僧辩又大捷于姑熟（今安徽当涂县），乘胜进抵建康。侯景战败东奔，与腹心数十人乘船于沪渎（今上海市）入海，景党或死或降，或走投北齐。梁将羊侃子羊鹍随景东走，语舵师驶回京口（今江苏镇江市），至胡豆洲（今江苏镇江市北），景觉，大惊，欲投水，鹍刺杀之，送景尸于王僧辩，侯景之乱平。

侯景发动的叛乱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年光景，但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建康台城被叛军攻下后，昔日繁华的建康都城，被化作一片废墟，接着叛军又分兵攻掠吴郡、会稽、广陵等地，又一路杀烧破坏，把富庶的三

吴地区，破坏得残败不堪。史称“自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及侯景之乱，掠金帛既尽，乃掠人而食之，或卖于北境，遗民殆尽矣”⑳。由于侯景军队对东土的破坏，造成简文帝大宝元年江南的大饥荒。“时江南大饥，江、扬弥甚，旱蝗相系，年谷不登，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兄弟相要俱缘东岳。芰实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叶，为之凋残。虽假命须臾，亦终死山泽。其绝粒久者，鸟面鹄形，俯伏床帷，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罗绮，怀金玉，交相枕藉，待命听终。于是千里绝烟，人迹罕见，白骨成聚如丘陇焉”㉑。加之侯景性极残酷，他于建康石头（城）立大碓，“有犯法者捣杀之”。他平时常对诸将说：“破栅平城，当净杀之，使天下知吾威名。”因之，诸将每战胜，“专以焚掠为事，斩刈人如草芥，以资戏笑”。又“禁人偶语，犯者刑及外族”㉒。侯景的残暴统治，使江南人民对之恨之入骨，“由是百姓虽死，终不附之”㉓。这正是侯景之乱迅速被平定的根本原因。

注　释

①《魏书》卷九八《岛夷萧衍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六O，梁武帝太清元年。

③④《南史》卷八O《侯景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梁武帝太清二年。

⑥《南史》卷八O《侯景传》。

⑦⑧⑨《资治通鉴》卷一六一，梁武帝太清二年。

⑩《南史》卷八O《侯景传》。

⑪⑫见《通鉴纪事本末》卷二三。

⑬《南史》卷八O《侯景传》。

⑭《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

⑮《资治通鉴》引《金陵记》称："梁都之时，户二十八万。"（卷一六二）如以一户五口计，则当时建康有人口140万左右。

⑯⑰⑱《资治通鉴》卷一六二，梁武帝太清三年。

⑲《南史》卷八〇《侯景传》。

⑳《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

㉑《南史》卷八〇《侯景传》。

㉒㉓《资治通鉴》卷一六三，梁简文帝大宝元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拓跋氏建国

拓跋氏是鲜卑族的一支，关于它的原始居住地，历史资料记载说："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又说："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①说明其原始居住地，应在大鲜卑山附近。而在《魏书·乌洛侯国传》中又有如下一段记载："世祖真君四年（443）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民多祈请。世祖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李敞的祝文保存在《魏书·礼志》中。近代学者根据这一历史线索，曾努力探寻鲜卑石室的地理位置，长期无公认结果。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从 1979 年开始，经过几年的反复调查，1980 年 7 月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内找到了太平真君四年的石刻祝文，从而证实了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嘎仙洞即拓跋鲜卑先世的旧墟石室②。说明东北嫩江流域的大兴安岭是拓跋鲜卑的原始发源地。

鲜卑拓跋部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得很久远，但是比较具

体的历史记载，是从一个叫力微的大酋长开始的。力微的父亲为诘汾。时东汉击走匈奴，他率领拓跋部走出高山深谷，经过“九难八阻”，迁到了匈奴的故地，在云中（现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游牧。诘汾在部落中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他的儿子，就是后来拓跋部公认的始祖神元皇帝力微。

拓跋力微开始时，也只附属在没鹿迴部大人纥豆陵氏之下，其后兼并了没鹿迴部，“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余万”③。魏曹髦甘露三年（258），力微迁居定襄之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并在是年四月，举行“祭天”大典，“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至，征而戮之，远近肃然”④。在这次大会中，拓跋部取得了部落联盟的领导权，拓跋力微也巩固了世袭大酋长的地位。部内有诉讼之事，由大酋长和四部大人（由部落联盟选举产生）商议判决，但还没有法律和监狱，拓跋部还没有形成正式的国家。

拓跋力微在外交上，采取结好南夏的邦交方略，遣其长子沙漠汗留质洛阳，领略中原先进的文化风情。力微年事高后，沙漠汗准备回代北接班。由于拓跋部的当政大人都是保守派，他们又接受晋大臣卫瓘的贿赂，诸部大人在阴馆迎接沙漠汗的酒会上，看到沙漠汗本领高强，用弹弓打飞鸟，应手而落，相谓曰：“太子被服同南夏，兼奇术绝人，若继国统，变易旧俗，吾等必不得志。”⑤于是驰返向力微进谗言，将沙漠汗杀害于塞南途中。在迈向文明与保守落后的旧势力斗争中，沙漠汗成为第一个牺牲者。力微年老丧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就在晋武帝咸宁三年（227）病死。

力微死后，诸部离叛，国内纷扰，至力微少子禄官统部，拓跋部仿匈奴旧制，分国人为中、东、西三部。禄官自为大

酋，居上谷北，濡源西（今河北张家口市南），为东部；力微长子沙漠汗子猗㐌，居代郡参合陂北（今山西大同市北），为中部；猗㐌弟猗卢居定襄之盛乐故城，为西部。其后猗㐌、禄官先后病死，晋怀帝永嘉二年（308），猗卢总摄三部，“控弦骑士四十余万”，并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拓跋部成为塞上一支强大的力量。当时正值西晋末年，中原大乱，西晋并州刺史刘琨要依靠拓跋部的帮助来与刘聪、石勒对抗，永嘉四年（310），请求晋怀帝封猗卢为代公。愍帝建兴三年（315），又进封为代王，并割陉岭以北（今山西原平县勾注山以北）马邑、阴馆、楼烦、繁畤、崞五县之地与猗卢，于是“东接代郡，西连西河、朔方数百里”⑥，猗卢又得很多晋人的归附，拓跋部势力至此更盛。猗卢最后一年（即晋建兴四年，316），内部发生变乱，长子六脩居新平城（于南都平城之南百里灅水黄瓜堆新筑，六脩镇之以统南部）不应猗卢之召，猗卢领众前讨失利，微服民间，被六脩追寻杀死。桓帝猗㐌子普根闻难来赴，攻杀六脩，代为首领，国中大乱，“新旧猜嫌，迭相诛戮”⑦。时代国分为旧人与新人两派，旧人指拓跋鲜卑人，新人指新降附的汉人、乌桓族人。新人派领袖卫雄、姬澹以众寡不敌，与刘琨质子刘遵率领汉户和乌桓共三万家，牲畜十万头，南入并州归附刘琨，拓跋鲜卑的实力于是削弱。普根立月余死去。普根子始生，桓帝后立之，到冬天，这个小婴儿又死去。此时，西晋王朝，在刘曜的攻击下，愍帝出降而灭亡了。就在东晋建立的那一年（317），拓跋鲜卑平文帝郁律继位。时匈奴汉国发生分裂，东晋元帝建武二年（318），刘曜建立前赵，都长安；大兴二年（319），羯人石勒建立后赵，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后都于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郁

律雄壮有威略，在位五年，破走朔方铁弗刘虎，“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⑧，雄居北方草原。但此时，拓跋鲜卑力量仍不足以在中原插足。又数传至昭成帝什翼犍。什翼犍为郁律次子，曾为质子于石赵历十年之久，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东晋成帝咸康四年（338），他即代王位，“始置百官，分掌众职”⑨。并用汉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始制法律，规定反叛、杀人、奸、盗等罪的刑罚。代国至此正式具有国家规模。什翼犍于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定都盛乐，并于次年于盛乐故城南八里筑盛乐新城，代国开始有了定居的政治中心。同时在盛乐附近出现了汉人所种的穄（高粱）田，代国已有了农业生产。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前秦苻坚为统一北方黄河流域，遣其大司马苻洛帅众二十万击代，什翼犍大败，“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抄，不得刍牧”⑩。最后什翼犍为其子寔君所杀，秦遂灭代。什翼犍时正在成型中的国家，在外力的打击下夭折了。

代灭后，代国众离散，苻坚使鲜卑化的匈奴铁弗部刘库仁、刘卫辰分摄代国事，年幼的什翼犍之孙拓跋珪，先后流寓到独孤部与贺兰部。淝水之战后，苻秦政权倾覆，慕容垂称帝于中山（今河北定县），建立后燕。拓跋珪也于是年纠合旧部，在牛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召开部落大会，即代王位，同年又改国号曰魏。新生的北魏政权，当时面对着两股强大的势力，即刘显和刘卫辰势力。代国灭亡以后，苻坚分代国为二，以刘库仁统辖河以东，刘卫辰统辖河以西，刘库仁和刘卫辰就成为继代国之后的两大势力。刘库仁死后，弟刘眷继统其众。刘眷引苻坚并州刺史张蚝击败内部叛乱的白部大人騀佛，又在善无击破贺兰部，在意亲山（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击

破柔然别帅肺渥，势力大增。然而在刘眷徙牧于牛川时，被刘库仁子刘显所杀，刘显继统其众，“地广兵强，雄于北方”⑪，成为当时一个很强大的割据势力。刘卫辰是匈奴铁弗首领刘虎的嫡孙。什翼犍时与代通好，但又暗自结好苻坚，被苻坚封为左贤王。什翼犍晚年，刘卫辰引苻坚军大败什翼犍，灭代国。苻坚分代国为二，便以刘卫辰统辖河西地区，柔然等游牧部族也附于刘卫辰，势力颇为强盛。后来苻坚又封其为西单于，督统河西诸杂部，屯驻代来城（又称悦跋城，在今内蒙伊金霍洛旗西北）。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下的各族纷纷复国，其中慕容永、姚苌为壮大声势也都拉拢刘卫辰，于是刘卫辰依仗部众势强，便不断侵扰原代国离散部众，成为拓跋珪建国后的一个强敌。

拓跋珪是慕容垂的外甥，因此拓跋珪在消灭刘显和刘卫辰两大势力过程中，很策略地争取了慕容垂的军事支持。如魏登国元年（386）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拓跋珪叔父窟咄（为苻坚质于长安，淝水战后随慕容永为新兴太守）以兵逼魏国南境，魏国内诸部骚动，人心顾望。拓跋珪“虑内难，乃北踰阴山，幸贺兰部”，同时遣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⑫。慕容垂遣其子慕容驎率军来援，拓跋珪会慕容驎于高柳，大破窟咄，窟咄奔卫辰后被杀。登国二年（387）六月，拓跋珪又出兵与慕容驎一起在弥泽（今山西朔州市南）再次进击刘显，大破之，刘显南奔慕容永，拓跋珪尽收其部落。拓跋珪与刘卫辰势力的斗争，也得到了慕容垂军事力量的支持。登国五年（390），拓跋珪西征，袭高车袁纥部，慕容垂遣慕容驎率众来会。四月，拓跋珪又与慕容驎联合讨贺兰、纥突隣、纥奚诸部落。时刘卫辰遣子直力鞮进攻贺兰部，贺兰部帅贺讷困急，

请降于魏。拓跋珪引兵救援，将直力鞮击退。登国六年（391）十一月，刘卫辰遣其子直力鞮率众八、九万寇掠魏国南部，拓跋珪率军大破直力鞮军于铁岐山（今内蒙固阳县西北）南，“获其器械辎重，牛羊二十余万”，并从五原金津（今内蒙包头市西南）南渡黄河，直捣卫辰老巢悦跋城，刘卫辰被击毙，其子直力鞮被擒拿，“自河以南，诸部悉平”，拓跋珪获“名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⑬。这样，刘显、刘卫辰部被消灭之后，其他一些部族也都逐渐归附了拓跋魏国，拓跋氏便成为塞外的唯一强国。

慕容垂见拓跋珪的势力日益强盛，将威胁其国家的安全；同时慕容垂又想掠取拓跋珪的马匹、牲畜来充实他的军队配备，于是便在登国十年（395）七月，命太子慕容宝率兵八万进攻拓跋珪。时拓跋珪还过着“逐水草”，“无城郭”的游牧生活，因而慕容宝军来攻，拓跋珪就远徙河南（今内蒙古河套内）。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余家，收穄田百万余斛”⑭，进军临黄河，造船为济具。到了这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慕容宝的远征军出师已达四月，因达不到与拓跋珪的主力军决战，塞外严寒，只得撤兵。而拓跋珪却集中二十万骑追蹑于后。十一月九日，拓跋珪亲率精锐二万余骑追击，渡过已结冰的黄河追击慕容宝军，到达参合陂（今山西大同市东），十日晨合战，慕容宝军大败，“人马相腾躡，压溺死者以万数”，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文武将吏数千人，“兵甲粮货以巨万计”，均落于拓跋珪军之手⑮。拓跋珪把俘获的后燕军四、五万人全部屠杀，燕军的主力至此几乎全部被消灭。登国十一年（396）三月，慕容垂亲率从龙城（今辽宁朝阳县）调来的大军，直扑云中，时拓

跋珪已退守善无（今山西左云县西北）。慕容垂攻破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乘胜北上，行至参合陂时，“见（燕军）积骸如山，为之设祭，军士皆恸哭，声震山谷”⑯。慕容垂以年迈之身，惭愤呕血，旧病复发，在平城顿兵十日，病情进一步加重。四月，退兵至上谷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南）病死。这次慕容垂伐魏，最后仍以失败告终。此后，拓跋珪乘慕容垂新死之机，大举进兵中原，攻取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中山、邺等名都重镇，占有今山西、河北二省之地。天兴元年（398），拓跋珪定都平城，即魏皇帝位，是为道武帝。

拓跋珪定都平城以后，将平城改称代都，在平城设置司州、代尹和平城县等各级行政机构，并进行大规模的营建。天兴元年正月，又“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鲜卑慕容族）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技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⑰。手工、商业也开始发展起来。平城逐渐成为北魏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拓跋珪在军事上的胜利，不仅使他完成了建国的大业，而且也使拓跋部在封建化的道路上大大跨进了一步。据《魏书·官氏志》载：“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部落的解散，部落大人、酋长和部落人员都成为国家的编户，拓跋部原有的氏族彻底地消灭了。与此同时，拓跋珪在掠取广大土地的基础上，还在代北推行“息众课农”、“计口授田”的政策。攻破后燕后，“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授田”⑱。又划平城周围为畿内，“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师（帅）以监之”⑲。这种方、维帅不同于原有的部落大人，是朝廷派遣的地方官。在方、维内居住的部落，被解散为普通民户；被迁来的新民在这里计口授田定居，不准随便迁徙。方、维帅的职责主要是劝课农耕。此外，拓跋珪还积极采用汉族官制，吸收汉族士大夫到政权中

来，制定了较为完备的律令等等。这一切，都说明，到拓跋珪时，拓跋氏的建国任务已经完成了。

注　释

①《北史》卷一《魏本纪序纪》。

②见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③④⑤⑥《北史》卷一《魏本纪序纪》。

⑦《魏书》卷二三《卫操传》。

⑧⑨⑩《魏书》卷一《序纪》。

⑪《资治通鉴》卷一〇七，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

⑫⑬《魏书》卷二《太祖纪》。

⑭⑮《资治通鉴》卷一〇八，孝武帝太元二十年。

⑯《资治通鉴》卷一〇八，晋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

⑰《北史》卷二《魏道武帝纪》。

⑱《魏书》卷二《太祖纪》。

⑲《资治通鉴》卷一一〇，晋安帝隆安二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北魏统一北方

拓跋珪没有完成北方的统一，天赐六年（409）十月，被其子清河王绍杀死。但是，他在促进鲜卑社会封建化和为统一北方奠定基础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拓跋珪死后，当时避难在外的拓跋珪的长子拓跋嗣，于同年十月，回到京城平城，杀死了其弟拓跋绍，登上了皇位，他就是魏明元帝。当时，北魏周边的形势是：柔然雄居大漠南北，南方先后为东晋、刘宋。在中原地区，与北魏并存的，尚有辽东地区的北燕、山东地区的南燕、关中地区的后秦、夏国，秦陇地区的西秦，河西地区的南凉、北凉和西凉。明元帝统治时期，他在内外政策上，实行的是“隆基固本，内和外辑”①的方针，为北魏政权的巩固，国家实力的增强做出了贡献。在统一中原方面，比较突出的是他对刘宋用兵，攻占了黄河流域的青、兖、豫三州。泰常七年（422）五月，宋武帝刘裕死，拓跋嗣欲乘其子刘义符新立，“大臣不附，国内离阻”②之机，夺取刘宋黄河以南的滑台、虎牢、洛阳（今河南省境内）等地。是年十月，拓跋嗣以司空奚斤为统帅，大将公孙表

为先锋，率步骑二万南渡黄河，直攻滑台；同时命大将叔孙建率六万大军，自平原渡河，东略刘宋青、兖诸郡。叔孙建统帅的东路军，以略地为主，又得原东晋降将刁雍、司马爱之、司马季之等的协助，因而魏军所到之处，"所向城邑皆溃"③。叔孙建从泰常七年十二月奉命出兵，至次年四月，主动撤军，为时五个月，先后攻占了刘宋青、兖所属的泰山、高平、金乡、济南、临淄（均今山东境内）等地。奚斤统帅的西路军，以攻城为主，虽然最后攻占了滑台、洛阳和虎牢等地，但战斗进行得很艰苦，魏军损失也十分沉重。如魏军攻虎牢，"被围二百日，无日不战，劲兵战死殆尽"。魏军攻下虎牢外城后，宋守将毛德祖"于其内更筑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毁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昼夜相拒，将士眼皆生创"，最后在城中"人马渴乏，被创者不复出血，重以饥疫"④的情况下，魏军俘获了毛德祖，攻占了虎牢城。但"魏士卒疫死者亦什二三"⑤。魏军攻占了刘宋的滑台、虎牢、洛阳三镇和青、兖、豫三州所属的一些郡县，使北魏的疆域扩展到了黄河以南。泰常八年(423)，拓跋嗣病死，他的十六岁儿子拓跋焘继承了帝位，他就是为北魏统一北方建立赫赫武功的太武帝。

拓跋焘，一名佛狸（佛，读弼音），明元帝拓跋嗣长子，泰常八年（423）十一月，即皇帝位，在位三十年。他一生的主要功绩，就是通过武力，重创柔然，消灭了北方各割据势力，使长期分裂的黄河流域重归统一，形成与南朝对峙的北朝。

太武帝继位后，与北魏毗邻的柔然、刘宋、北燕、夏国等并立，其中对北魏威胁最大的是柔然和夏国。太武帝要统一中原，首先必须解除柔然对魏国的威胁这一后顾之忧。他对柔然

采取主动进攻的方针。从始光元年（424），到太平真君十年（449），太武帝先后八次亲率大军，深入漠北，讨伐柔然。

柔然为"东胡之苗裔"⑥。从柔然汗始祖木骨闾"秃头"和柔然人"辫发"的风俗，和其诸多部落后来都加入到拓跋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之内来看，柔然和拓跋族可能是鲜卑族中的近支⑦。从拓跋部酋长猗卢统治时代，柔然汗始祖木骨闾开始挣脱拓跋氏的羁縻。至其子郁久闾车鹿会继立，柔然便形成为一个部落结合体。到车鹿会的五世孙社仑时，为了避免北魏拓跋氏对它的侵袭，开始从漠南推向漠北，社仑自称"豆伐可汗"（义谓驾驭、开张之王），建庭于弱洛水（今土拉河西支的喀尔喀河）畔，成为东起大兴安岭，西踰阿尔泰山，南自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的一个强盛的游牧国家。他们"冬则徙度漠南，夏则还居漠北"⑧。用"马畜、貂豽皮"⑨和拓跋部进行贸易。社仑再传至大檀时，柔然汗国达到极盛，成为北魏的强敌。北魏为了要抵御柔然人的进攻，在平城周围设立了六个军事重镇，以便拱卫首都。当时柔然的骑兵几乎每年都要侵扰北魏的边境。拓跋焘始光元年（424），柔然汗大檀曾亲率大军南下，围拓跋焘于云中，"杀掠人吏，攻陷盛乐"⑩。后来因柔然内部闹矛盾，才解围北去。魏太武帝拓跋焘为了雪云中被围之耻，依靠其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于神麕二年（429）率军亲征柔然，度戈壁，至栗水（今蒙古国克鲁伦河），大檀知北魏军势甚盛，"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⑪。其年六月，拓跋焘从栗水西行，至菟园水（今土拉河），然后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⑫。高东诸部也乘机摆脱柔然族

的统治，“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虏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八月，魏太武帝又派遣别军往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一带降东部高车数十万落，把他们劫往漠南的北魏控制地区。柔然的强盛，本来靠高车部落的依附，高车一挣脱它的统治，柔然汗国的统治，就骤然削弱下来，于是“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⑬。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次对柔然的征战，虽未灭柔然，但柔然遭此重创，势力大衰，已再无力南下威胁北魏了。

在北魏毗邻的各政权中，除了柔然，就要数夏国的实力强，对北魏的威胁大了，因此太武帝拓跋焘也把夏国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夏国是匈奴族铁弗部建立的政权。夏的建立者赫连勃勃，是刘卫辰的少子。登国六年（391），拓跋珪击败匈奴部帅铁弗刘卫辰，杀卫辰及其子弟宗党5000人，卫辰少子勃勃辗转逃亡于后秦。天赐四年（407），勃勃脱离后秦独立，称大夏王，以大夏为国号，以统万（今陕西横山县境）为都城。勃勃“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⑭。赫连氏建国后，依靠其劲悍的骑兵，攻占了后秦岭北的大部分郡县，并不断四出攻掠，成为危害后秦、西秦、北魏的强大势力。泰常三年（418），赫连勃勃又赶走刘裕留驻长安的军队，占有关中，自称皇帝。魏太武帝接位的第二年（425），赫连勃勃死，其子为争夺帝位，互相残杀，为魏伐夏提供了机会。始光三年（426），太武帝“闻屈孑死，诸子相攻，关中大乱，于是西伐”⑮。是年九月，魏太武帝分二路攻取。一路由司空奚斤率领，攻长安；一路由拓跋焘亲自统帅，进攻夏都统万。奚斤率领的军队，所向披靡，先后攻占弘农、蒲坂和长安（均在今陕西境内），“秦、雍、氐羌皆叛昌（时勃勃三子赫连昌为夏皇）诣斤降。武都氐王杨玄及沮

渠蒙逊皆遣使内附”⑯。拓跋焘统帅的军队，从君子津（今内蒙古清水河西）渡河直逼夏都统万。十一月，掠获“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⑰。始光四年（427）初，赫连昌遣其弟赫连定率众二万南下，与奚斤争夺长安。五月，拓跋焘调集十万大军，再次进攻统万。从君子津渡河后，太武帝舍辎重，率轻骑三万，倍道兼行，直趋统万城。六月，赫连昌率步骑三万出城迎战。太武帝引兵伪退，引而疲之。赫连昌乘势鼓噪追击。时值风雨交加，沙尘飞扬，太武帝返军冲击夏军。“魏主马蹶而坠，几为夏兵所获；拓跋齐以身捍蔽，决死力战，夏兵乃退。魏主腾马得上，刺夏尚书斛黎文，杀之，又杀骑兵十余人，……奋击不辍，夏众大溃”⑱。赫连昌不及入城，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市），拓跋焘入统万城，“获夏王、公、卿、将、校及诸母、后妃、姊妹、宫人以万数，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⑲。这座统万城是赫连勃勃时修建的，“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高五仞，其坚可以厉刀斧。台榭壮大，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穷极文采”。拓跋焘入城后对其左右军将说：“蕞尔国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拓跋焘攻下统万以后四年多，即到神䴥四年（431），夏的残余势力才最后完全被消灭。

出兵和龙，攻灭北燕　皇始初，北魏道武帝拓跋焘相继攻占后燕的并、冀等腹心地区。后燕遭北魏军的沉重打击，元气大伤，加之其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王权的斗争激烈，至皇始三年（398），后燕分裂为二：镇守邺城的燕宗室慕容德（慕容皝少子，慕容垂建立后燕时，封范阳王）率户四万南迁滑台（今河南滑县），建立南燕。第二年，滑台又被北魏军攻下，慕容德再迁于广固（今山东益都），据有今山东地区。其余的鲜卑慕

容部，则在北魏军占领中山（后燕都城，今河北省定县）后，由后燕主慕容宝（慕容垂子）率领奔辽西龙城（今辽宁朝阳市），占据幽、燕之地，此为后燕之余绪。在慕容熙（慕容垂子。慕容宝在位三年，公元399年被部下杀死，子慕容盛继位，402年又被部下杀死，慕容熙继位为主）统治时期，国内“赋役繁数，民不堪民”⑳。天赐四年（407），中卫将军、鲜卑化汉人冯跋乘慕容熙荒淫暴虐、人民骚动不安的机会，杀死慕容熙，推慕容宝养子、高句丽人高云为天王。北魏明元帝永兴元年（409），高云为其左右宠臣杀死，冯跋取代后燕，自称天王，史称北燕。北燕地小势弱，面临强魏的威胁，冯跋内修政治，外睦邻国。他“抚纳契丹等诸落，颇来附之”㉑，并以其女乐浪公主妻柔然可汗，与强大的柔然结好。这当然为北魏所不容。北魏明元帝泰常三年（418），遣征东将军长孙道生、奚观等率精骑2万讨伐北燕，拉开了魏燕战争的序幕。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在解除了柔然与夏国南北两大威胁之后，为统一中原，从延和元年（432）至太延二年（436），连续五次派军讨伐北燕。其时，冯跋已死，其少弟冯弘（字文通）乘冯跋诸子为争夺王位而内讧，乘机夺取王位。延和元年六月至九月，太武帝亲率大军第一次伐燕，夺取北燕的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等六郡，并徙其三万余户于幽州。延和二年（433）六月，太武帝遣永昌王拓跋健、尚书左仆射安原等第二次伐燕。北燕大将封羽以凡城降，永昌王健等徙其民3000家而还。接着，延和三年六月，太延元年（435）六至七月，太延二年三至五月，北魏又派军三次伐燕。在北魏大军连年攻伐下，北燕“日就蹙削，上下危惧”㉒。冯文通多次向刘宋求援，毫无回应。之后，他又不听群臣劝告，遣使向高丽求

援。太延二年五月，高丽王遣大将军葛卢率数万大军赴援。葛卢入和龙城后，“命军士脱敝褐，取燕武库精仗以给之，大掠城中”㉓。冯文通在高丽军保护下逃离和龙”，“帅龙城见户东徙，焚宫殿，火一旬不灭”㉔。和龙城遭到彻底破灭，北燕灭亡了，北魏取得了消灭北燕的胜利。

消灭北凉，完成统一大业 北凉的建立者沮渠蒙逊，张掖临松胡人㉕。他的祖先做过匈奴左沮渠之官，遂以官名为氏。沮渠氏世代为诸部豪酋，沮渠蒙逊又“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杰有英略”㉖，为诸胡所推服。先前，沮渠蒙逊及其伯父罗仇、麹粥、从兄男成都在后凉做官。魏道武帝皇始二年(397)，后凉王吕光以其弟吕延与西秦作战时兵败身死，归罪于罗仇，杀罗仇及其弟麹粥。蒙逊为替二位伯父报仇，与从兄男成起兵反对后凉，共推吕光建康太守段业为凉州牧、建康公，改元神玺。段业以蒙逊为张掖太守，男成为辅国将军，委以军国之任。后来，段业“惮蒙逊雄武，微欲远之”㉗，蒙逊也内不自安。魏道武帝天兴四年（401）四月，段业出蒙逊为安西太守，蒙逊以段业“愚闇，非济乱之才，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㉘，五月，蒙逊聚众杀段业，攻占张掖，自称凉州牧、张掖公。此后，他屡败西凉李暠，又多次打败南凉秃发傉檀。魏明元帝永兴三年（411），蒙逊攻占姑臧，次年，迁居之。改年玄始，自称河西王，置百官，史称北凉。明元帝泰常五年（420）七月，蒙逊攻灭西凉，夺取酒泉、敦煌。北凉全盛时，拥有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西海、金城、西平、乐都诸郡，“西域诸国皆诣蒙逊，称臣朝贡”㉙。北凉成为占据整个河西走廊并影响着西域许多国家的强大势力。蒙逊虽系胡人，但汉化程度较高。在前凉、西凉儒风影响下，他对儒学和

儒学经典都很重视。在对外关系上，蒙逊、牧犍父子采取远交近攻政策。他们与毗邻的西凉、南凉、西秦、夏国互相杀掠，战争频仍；但对相距较远、实力较弱的北魏、柔然、刘宋等政权则采取通好政策。太武帝继位后，蒙逊、牧犍父子，仍“贡使相望”，并遣世子入侍。但太武帝志在统一北方。神䴥四年（431）灭夏后，他在把军事进攻的目标对准北燕的同时，便选派尚书李顺出使凉州。至太延五年（439）北凉被灭，八年间，李顺出使凉州达12次之多。这一方面是为了宣扬国威，使北凉俯首称臣；另一方面则是直接了解北凉内情，为灭北凉作准备。太延五年（439）六月，魏太武帝率大军从平城出发，西进灭北凉。八月，永昌王拓跋健攻获河西畜产20余万；平西将军源贺招抚姑臧周围的鲜卑部3万余落。太武帝得以专攻姑臧。九月，在魏军的强力攻击下，孤城姑臧被攻破，“牧犍帅其文武五千人面缚请降”，魏收其城内“户口二十余万，仓库珍宝不可胜计”，安远将军源贺又“分徇诸郡，杀胡降者又数十万”㉚。北凉终于灭亡。

太武帝攻灭北凉，至此，他完成了统一黄河流域的大业，结束了历时一百三十余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的局面，这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 释

①《魏书》卷三《太宗纪》。

②《魏书》卷二九《奚斤传》。

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晋阳王景平元年。

⑥《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

⑦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⑧⑨《北史》卷九八《蠕蠕传》。

⑩《北史》卷二《魏太武帝纪》。

⑪⑫⑬《北史》卷九八《蠕蠕传》。

⑭《魏书》卷九五《屈孑传》。

⑮《魏书》卷九五《赫连昌传》。

⑯《魏书》卷四《世祖纪》。

⑰《魏书》卷九五《赫连昌传》。

⑱⑲《资治通鉴》卷一二〇，宋文帝元嘉四年。

⑳《资治通鉴》卷一一四，晋安帝义熙二年。

㉑《魏书》卷九七《冯跋传》。

㉒《魏书》卷九七《冯文通传》。

㉓㉔《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三年。

㉕对卢水胡沮渠氏的族源问题，史学界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匈奴族，马长寿、林干等持此说（见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林干《匈奴史》）；另一说以唐长孺、周一良、姚薇元先生为代表，认为卢水胡族源应为小月氏。（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姚薇元《北朝胡姓考》）。

㉖㉗㉘《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㉙《资治通鉴》卷一一九，宋武帝永初二年。

㉚《资治通鉴》卷一二三，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坞屯壁聚

北魏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它除了在军事上次第消灭建立在各地的地方性割据政权，把其统治地域纳入北魏版图之内以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当时在北方地区广泛存在的坞屯壁聚。这种坞屯壁聚，乃是在战乱分裂时期以宗乡集团为主体的自保避乱的武装的社会集团，有称之为“坞”、“壁”、“垒”者，也有称之为“坞堡”、“坞壁”、“壁垒”者，习惯上通常称之为“坞壁”。坞壁里聚集的人，多则四、五千家，少则千家、五百家，平时在坞壁外耕地种田，敌人来了，就坚壁自守。坞壁主多半是当地的宗族主和地主（包括世族地主和豪强地主），也有一部分坞堡主，是在战斗中表现了才能，为大家所佩服而推选出来的。

坞壁产生的社会条件，一方面固然与战乱、分裂的社会环境直接相关；另一方面与自给自足的封建地主庄园经济、宗族乡里地方大族势力的发展也不无关系。因此早在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中原地区就出现了众多的坞壁，这是坞壁的发生阶段。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社会分裂，战乱频繁，民族矛盾尖

锐、复杂，生民涂炭。为了防暴避乱，人们只能结成社会集团屯聚本地，或易居附近和远徙深险地区，筑坞自保，且耕且战，因此五胡十六国时期就成为我国历史上坞堡势力的大发展时期①。

十六国时期的坞壁不仅数量多，规模大，小坞壁依附于大坞壁，大小坞壁有时结成坞壁群，连州跨郡，听命于一个高门大族出身的坞壁主帅，而且具有很浓的民族斗争色彩。刘渊、刘聪、石勒、石虎等胡族上层分子的残酷杀掠，迫使北方汉民纷纷结坞自保，张平割据的晋中地区有“垒壁”三百余处，冀州郡县有“堡壁”百余个，前秦时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建立后赵的石勒曾想一举挥戈渡河，直捣江东，故河南地区争夺激烈，坞壁尤为星罗棋布。如流民坞主张平、樊雅分别以豫州刺史和谯郡太守的名义屯于谯（今安徽亳县）；蓬陂坞主陈川自号宁朔将军、陈留太守（今河南开封市东北）；平阳人李矩为乡人推为坞主，以荥阳太守的名义，屯新郡（今河南新郑县）；东郡魏浚与流民数百家，屯于洛北石梁坞（今河南洛阳市东）。浚死，族子该继领其众，以河东太守名义屯宜阳一泉坞（今河南宜阳县界）。郭默率遗民自为坞，以河内太守的名义与李矩、魏该相犄角；乞活帅②陈午，以五千余人据浚仪（今河南开封市西北）与石勒相持；魏郡邵续先后以乐陵太守、冀州刺史的名义屯厌次（今山东无棣县西南、旧阳信县治东），与石勒、曹嶷（王弥部将，石勒火并王弥后据有青州）相拒。续女婿、广平刘遐以坞主、平原内史壁于河、济之间③。这些星罗棋布的坞堡组织，有的心向东晋皇室；有的慑伏于石勒的兵威；也有的则割地自守。无论后赵或东晋，如何争取和对待这些坞堡，成为当时南北争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东晋名将祖

逖就是根据这些坞堡主的不同政治态度，制定了不同的斗争策略，才为东晋收复了大片失土，前锋到达黄河沿岸，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④。

当北方的战乱使生产变得萎缩或中断时，坞壁也是维持生产的社会组织，这是坞壁的另一种职能。坞壁中的居民，最多的是佃客、部曲和奴婢。部曲是坞壁主、豪族地主的私兵，平时生产，战时打仗。佃客则主要用于生产。佃客、部曲的身份和农奴相似。北魏初期，有一些坞壁主、帅率"乡部"向鲜卑统治者表示归顺，如河东汾阳薛氏，前秦时，薛强"遂总宗室强兵，威振河辅，破慕容永于陈川"。强卒，子薛辩"复袭统其营"。仕姚兴，历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辩知姚氏运衰，遂弃归家保乡邑"。刘裕平姚泓，又署为相国掾，除平阳太守，委以北道镇捍。"及长安失守，辩遂归魏"，被北魏任命为东雍州刺史，赐爵汾阴侯，"辩既还任，务农教战，恒以数千之众，摧抗赫连氏"⑤。也有的宗豪坞壁主帅率部与北魏军队进行了对抗，如范阳大族卢玄从祖兄卢溥，"慕容宝之末，统摄乡部屯海滨，……称征北大将军、幽州刺史，攻掠郡县，天兴（道武帝拓跋珪年号）中，讨禽之"⑥。又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摽亲往讨之，大为波败，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⑦。在这些坞堡主统率的宗族或"乡部"中，既包括有属于坞堡主、帅私产的佃客、部曲和奴婢，也包括了为他们所控制的地主和农民。处于剥削地位的地主和主、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封建义务；处于被剥削地位的农民，往往是由于战乱，或者是负担不了封建国家的赋役，而投到这些坞壁主门下的，他们要把收获物的一部或大部交给他们，替他们服役当兵，变成了他们的"荫户"。这些荫户，他们依附于

宗主，具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没有独立的户籍，“客皆注家籍”⑧，即在政府户籍本上已没有了名字，却登上了坞壁主的家籍，为坞壁主提供财源和兵源。

当西晋的统一国家瓦解之后，各族统治者在北方建立的政权，几乎都无例外地和这些坞壁主、帅发生又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前述石勒与东晋在争取黄河南北坞壁势力的支持时是这样；苻坚攻灭前燕，任用王猛治理东方（前燕的统治区，即今河北、山东地区）时也是这样。史称苻坚“以关东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授讫，言台除正”⑨。这里所谓的“英俊”，实际上很多就是据坞独立自保的坞主，王猛任用坞壁主作当地的郡守和县令，给了他们合法的统治权，稳定了前燕地域内的政局。

拓跋部入主中原后，北魏在处理和坞壁主的关系方面，有过一些曲折。开始时，道武帝拓跋珪打算调虎离山，把这些人迁到平城。如天兴元年（398），拓跋珪攻下后燕邺城后，“徙山东六州人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署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充京师”⑩。这里所谓的“六州人吏”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分布于冀州各地的大小坞主。结果遭到一些坞壁主的反抗，卢溥、傅世、仇儒便首先起来发难。魏明元帝拓跋嗣永兴五年（413）也曾下诏，令“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奔赴京师，“当随才叙用，以赞庶政”⑪。但是豪门强族或坞壁主，“人多恋本，而长吏逼遣之，于是轻薄少年，因相煽动，所在聚结。西河、建兴盗贼并起，守宰讨之不能禁”⑫。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议，准备用大赦来缓和紧张的局面。鲜卑勋贵元城侯元屈以为不如先诛首恶，赦其同类；崔宏以为“王者临天下，以安人为本，何顾小曲直也”。建议全部赦免，“若赦而不改，诛之不

晚”⑬。明元帝接受了崔宏的意见，颁布了大赦令，同时出动大军，继续镇压反抗的坞堡主。

明元帝以后，迁徙豪强的政策停止执行了。汉族居住地区坞壁主的权利，得到了北魏政府的承认，坞壁主也就是宗主，政府承认他们对本乡的统治权力，即委托他们管理宗族和当地自耕农，为政府收取租调，征发徭役，这种制度就叫宗主督护制。最著名的一些宗主，过去和鲜卑统治者为仇的，现在联合起来了，卢溥的从弟卢玄在太武帝拓跋焘神䴥四年（431），“辟召天下儒儁，以玄为首。授中书博士，迁侍郎，本州大中正”⑭。成为北魏“文治”上的助手。魏文成帝拓跋濬（太武帝孙子，太武帝死后继位）时，陆馛（原姓步六孤，为鲜卑贵族）为相州刺史，十分注意与当地士大夫和豪强的合作，史称其“为政清平，抑强扶弱。州中有德宿老名望素重者，以友礼待之，询之政事，责以方略，如此者十人，号曰十善。又简取诸县强门百余人以为假子，诱接殷勤，赐以衣服，令各归家为耳目，于是发奸擿伏，事无不验”⑮。在宗主督护制下，坞壁主和北魏统治者的联合，取得了一时的相安。

但是，在宗主督护制下，豪强地主又利用职权，不断扩大依附农数量，隐瞒户口，侵吞租调，史称“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徵敛，倍于公赋”⑯。《魏书·李冲传》也说：“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家、三十家方为一户。”这势必与北魏逐渐强化的中央集权制产生矛盾。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十月，随着均田制的实施，与重定户调田租的同时，孝文帝又采纳了李冲的建议，强化了县级以下的地方行政组织，确立三长制度，废除了宗主督护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

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⑰三长制颁布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校比户口，造户籍⑱，也就是有组织地向豪强大族搜括荫户，来扩大政府的剥削对象，因此三长制的实行，对豪强大族来说，是不利的，所谓“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⑲。所以反对此法最力者，就是中原的世族大地主的冠冕人物中书令荥阳郑羲和秘书令渤海商祐⑳。但是“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㉑历史表明，随着北魏的统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孝文帝推行封建化措施，宗主督护制的废止和三长制的推行都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在整个北魏，坞屯壁聚的现象并没有完全解决，北方宗主聚族而居仍很盛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云：“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㉒北魏末年，随着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又爆发了六镇起义和河北、关陇人民起义，各地豪强势力，坞屯壁聚又有所恢复和发展，赵郡大族李灵的孙子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㉓。河东薛氏宗族直至隋初还很隆盛。隋统一南北，结束了历史长达近四个世纪的分裂局面，铲除了坞屯壁聚产生的政治基础，才使坞壁转入衰落。但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仍然是酝酿坞壁产生的经济基础，若出现战乱分裂的政治气候，坞屯壁聚的现象仍会死灰复燃。坞屯壁聚这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和再现，是封建自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孽生物。

注 释

①参见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壁》，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②乞活军是跟随司马滕撤出并州的武装流民集团，他们在西晋政权颠覆之后，与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进行过艰苦的斗争。见周一良《乞活考》，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③参见《晋书》卷六二《刘演、祖逖传》；卷六三《邵续、李矩、魏浚、郭默》等传。

④《晋书》卷六二《祖逖传》。

⑤《北史》卷三六《薛辩传》。

⑥《北史》卷三O《卢玄附卢溥传》。

⑦《北史》卷三三《李孝伯附子安世传》。

⑧《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⑨《资治通鉴》卷一O三，晋简文帝咸安元年。

⑩《北史》卷一《道武帝纪》。

⑪《魏书》卷三《太宗纪》。

⑫⑬《北史》卷二一《崔宏传》。

⑭《北史》卷三O《卢玄传》

⑮《北史》卷二八《陆俟传》。

⑯⑰《魏书》卷一一O《食货志》。

⑱《魏书·外戚·闾毗传》："子豆，后赐名庄，太和中，初立三长，以庄为户籍大使，甚有时誉。"又《魏书·晓暄传》："太和中，……始立三长，暄为东道十三州使，更比户籍。"

⑲《魏书》卷一一O《食货志》。

⑳㉑《魏书》卷五三《李冲传》。

㉒《通典》卷三引。

㉓《北史》卷三三《李灵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太武帝灭佛

太武帝拓跋焘在位期间，不仅用武力统一了北方黄河流域，结束了十六国以来北方的分裂割据局面；而且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大规模的灭佛行动，以表明胡、汉一统，在政治上谋求和汉族士大夫的合作，以便巩固业已开始建立的胡汉统治。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创始人为乔达摩·悉达多。相传这位古印度迦毗罗王城（今属尼泊尔）净梵王的太子，在出生后七天，其母即去世。十七岁时，他娶表妹耶输陀罗公主为妻，十九岁时生子罗喉罗。他痛感人世间生、老、病、死之苦，在生子当天夜晚即弃家出走，经过五年的探求和六年的修行，他终于在三十一岁时于菩提树下端坐成"佛"。后世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即为觉行圆满入寂成佛之意。

事实上，释迦牟尼并不是神的化身，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中的人。他出身于名门贵族，又曾受过婆罗门著名学者的教育培养，但他对当时古印度流行的种姓制度极不满意，认为四个种姓，即婆罗门（僧侣集团）、刹帝利（武士集团）、吠舍

（手工业者和农民）、首陀罗（奴隶）之间的不平等和冲突，正是现实社会中一切苦难的根源。为了寻求真理，探索出一种解救人世苦难的学说，他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出家云游，大约在他三十五岁时，终于创立起一门新的宗教——佛教。此后，他广收信徒，传布学说，足迹遍及印度恒河流域等地，直到八十岁左右才死去。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其教义概括起来有如下三点：

（一）宣扬"众生平等"，反对婆罗门集团的特权。这种主张虽然只是一种教义，并没有实际的内容，但它以感人的号召，成为人民大众借以从精神上解脱苦难的一副药剂。

（二）认为现实世界是苦难的世界，强调寄希望于来世。在释迦牟尼看来，现实世界充满了灾难，但他不承认人剥削人的制度是造成这种灾难的根源，却把苦难世界形成的原因，归结为有了生命。因此他反对人民大众的反压迫斗争，认为只要消灭人类自身的肉体，使精神进入到一个完全寂灭的状态，就可以摆脱这种痛苦。这种反对使用暴力的说教，成为统治阶级用以麻痹人民和压迫人民的有力工具。

（三）强调"六根清净"，主张通过修行去达到涅槃境界。释迦牟尼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真的、无常的，人们认识上的错误在于"无明"而自寻烦恼。并认为人有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从而产生各种情欲和烦恼痛苦。因此人们要排除这些烦恼和痛苦，只有保持"六根清净"，挣脱贪欲、情爱、瞋恚、断灭"无明"；而要断灭"无明"必须通过"戒"、"定"、"慧"等修正方法，才能达到最后进入涅槃（即寂灭、无为、圆寂之意）境界。这种用逃避现实去超脱苦难的消极办法，瓦解了人

民群众的反抗意志，对统治阶级是十分有利的①。

释迦牟尼之后，印度佛教有了进一步发展。公元二至三世纪时，中天竺有马鸣著《大乘起信论》、《大庄严经论》，创导大乘，称旧派为小乘。其后，又有龙树及其弟子提婆，更把大乘学说发扬光大。龙树著有《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等，提婆著有《百论》。在大乘学说中，改造后的佛教教义更完整了，它的欺骗性也更大了。大约到五世纪时，从大乘佛教中又产生了新的教派，即瑜伽宗。它的创始者是出生于北天竺犍驮罗国国都富楼沙城（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的无著、世亲两兄弟。这一教派的特色是以小乘教派（即原始佛教派）的哲理为基础，在它的上面建立起大乘学说。它的基本教理是"万法唯识"，把"唯识"的心理学和五天竺古代的因明学（古代逻辑学）结合起来，因此瑜伽宗又称唯识宗。

印度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说法不一。大抵在西汉末期，佛教已在当时的西域诸国（今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等地）流行。张骞通西域时，已知"身毒天竺国，有浮图之教"②。又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鱼豢《魏略》称："汉哀帝元寿元年（2），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是汉人和佛教接触的开始，它是通过大月氏贵霜王朝的使臣为媒介而接触的。后汉时，佛教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如光武帝子楚王刘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给他的诏书中有"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③之语。可见当时崇信佛教，已大有人在。桓帝在宫中，也是黄、老、浮屠并祠，说明直到东汉末年，黄、老、浮屠并祠的状况并没有什么改变。牟融所著《理惑论》中，虽把佛说成是能"恍惚变化，分身散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

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④的神人，但仍然用庄老玄理去解释佛说。《理惑论》同时还说到当时“世人学士多讥毁”佛教：“俊士之所规、儒林之所论，未闻修佛教以为贵，自损容以为上。”这些都说明，佛教虽在两汉时传入我国，但直至东汉之末，它并未能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

随着佛教开始在我国传播，佛教寺院也开始创建，河南洛阳东郊的白马寺，就是在我国建造的最早的一所佛教寺院。据传在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中天竺僧人摄摩腾（迦叶摩腾）、竺法兰，随同赴天竺求佛法的蔡愔、秦景等人来到洛阳，次年便建寺，因摄、竺二僧来华时以白马负经，故名为白马寺⑤。随着印度、西域僧人进入中原内地，翻译佛经的工作也已开始。桓、灵二帝时，僧人安息国（今伊朗）太子安世高译出《修行地道经》、《阿含经》等三十余部，西域大月支国（今属新疆）名僧支谶也在洛阳译出《般若道行品经》、《首楞严经》等十四部二十七卷。安世高所译多为小乘，支谶所译则多为大乘。据史料记载，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至献帝延康元年（220）的一百五十四年间，主要译经者十二人，译出佛经二九二部，计三九五卷⑥。

东汉末年爆发的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使东汉政权名存实亡。接着，军阀割据，豪族争权，战争不断，劳动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在斗争失败之余只能祈求法术无边的佛陀能把他们拯救出人间苦海；同时封建统治阶级面对东汉统一王朝的崩溃，原来用作欺骗和麻痹人民的经学，已失去了它的昔日光彩和作用，他们也迫切需要寻找维护统治的有效工具。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土壤条件下，具有极大欺骗性的佛教，便得到了很快的传播。据《三国志·

吴志·刘繇传》载："笮融者，丹阳人，初聚众数百，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彭城运漕，遂……断三郡委输以自入。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户。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说明佛教从东汉末年开始，便在人民群众中逐渐传播开来了。三国时，佛教的传播中心有北方的洛阳和南方的建康。曹魏齐王芳嘉平和高贵乡公正元时均有天竺僧人昙摩迦罗、康僧铠和安息僧人昙无谛来洛阳集众僧受戒和翻译佛经。西晋时，佛教发展更盛，不仅民间信佛者日多，而且公卿名士，甚至连皇帝也推崇佛教。据《洛阳伽蓝记》载，西晋时有佛寺四十二处，其中洛阳就有十处。西晋倾覆以后，玄学思想的统治地位动摇了，佛教便趁此空隙在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里，很快地得到传播。如后赵时，龟兹僧人佛图澄，甚为石勒、石虎所信任，勒"有事必谘而后行，号大和尚"。虎"朝会之日，和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奉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坐皆起。……于是中州胡晋，略皆奉佛"⑦。史载佛图澄"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⑧。建立北魏的拓跋部，其先活动于漠北，"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屠之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⑨。至拓跋力微及其子沙漠汗时，开始与曹魏、西晋交往，逐渐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待至什翼犍南学于襄国（今河北邢台），受教于后赵之石勒，才"备究南夏佛法之事"。道武帝拓跋珪继位以后，不断经略燕、赵之地，对中原文化和西来佛教有了进一步接触。史载"太祖平中山，经郡国，见沙门

皆致敬，禁军旅无有所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帝致书以缯素汫毯钵锡为礼，今犹号朗公谷焉”⑩。天兴元年(398)，拓跋珪下诏推弘佛法有“济益之功”，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岁“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别构讲堂禅房及沙门座，莫不严具焉”⑪。说明随着北魏政权的建立，作为统治人民的佛教尤为统治者所重视。明元帝拓跋嗣在位期间，佛教势力又有所发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赵郡沙门法果，太祖拓跋珪诏征以为沙门统，“绾摄僧徒，言多允惬，供施甚厚，太宗崇敬弥加于前”⑫。太武帝拓跋焘即位以后，“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当僧徒们抬着佛像行于广衢时，“帝亲御门楼，临观散华，以致礼敬”⑬。于是佛事日隆，名僧辈出。如号为白脚师的惠始，颇有法术，当他被夏主赫连屈丐追杀时，“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屈丐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惠始后主平城，“多所训导，人莫测其迹，世祖重之，每加礼敬”⑭。又如昙无谶，原为中印度高僧，备受北凉主沮渠蒙逊崇敬。拓跋焘听说他译出《涅槃》等十多部经典，又晓术数、禁咒，多所中验，便遣使至北凉要求将他送至平城，蒙逊非但不给，反而将他杀害。后来，太武帝终于灭了北凉。再如释玄高，他精于禅法，有弟子一百多人。当太武帝灭北凉时，玄高随其舅阳平王杜超回平城。太武帝令太子晃拜玄高为师。凡此都说明，太武帝即位之后，对佛教也是信事的，对佛僧是尊崇的。

但与此同时，太武帝拓跋焘又笃信中国本土之道教：“世祖雅好庄老，讽味晨夕，而富于春秋，锐志武功，虽归宗佛法，敬重沙门，而未览经教，深求缘报之志，及得寇谦之道，

以清静无为，有仙化之证，遂信行其术。司徒崔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每与帝言，数加诽毁，谓虚诞为世费。帝以其辨博，颇信之。”⑮这里说明，拓跋焘虽敬宗佛法，但对佛教教理并未深入；另一方面，他又雅好老、庄，道教大师寇谦之又常在其左右，对道教主张清静无为，并有仙化之术却甚为笃信；再加上司徒崔浩又奉谦之之道，他不信外来的佛教，常在拓跋焘面前对佛教加以诽毁。于是拓跋焘对佛教便产生了反感。太延五年（439），太武帝诣道坛受符箓而信奉道教，并于次年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太武帝尊崇道教，这是他下令灭佛的前奏。

事实上，在此前一年，即太延四年（438），太武帝曾“以沙门众多”为由，下诏“罢沙门年五十以下”⑯。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太武帝又发布诏令：“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孽。非所以壹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有私养沙门、师巫及金银工巧之人在其家者，皆遣诣官曹，不得容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师巫、沙门身死，主人门诛。明相宣告，咸使闻知。”⑰这一诏令，对佛教来说，是个沉重打击。同年九月，佛僧玄高、慧宗被杀，玄畅出逃。其他僧徒或杀或逃者当不在少数。太平真君七年（446），卢水胡盖吴在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起义，关中骚动，太武帝西伐至长安。在长安一佛寺，从官见寺内有弓、矢、矛、盾等兵器。太武帝疑佛僧与盖吴通谋，下令将该寺僧徒全部杀死。在查抄该寺财产时，不但查出州郡官吏和富人寄存于寺院的大批财物和酿酒用具，还发现僧侣“与贵室女私行淫乱”的窟室。太武帝忿恨沙门无法，在崇奉道教

的宰相崔浩的建议下，下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勅留台下，四方一依长安行事”。又下诏“自王公以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者诛一门”⑱。这就是太武帝的灭佛事件。

太武帝采取灭佛的举措，不能简单归结为佛、道两教的斗争，更主要的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太武帝锐志武功，要统一中原；但鲜卑族是少数族，被称为是胡族或戎族。太武帝为了坐镇天下，统治人数众多和具有高度文化的汉族，当然要以推崇儒学和信奉道教去标榜自己，而不能以信奉被称为“胡神”的佛教来影响自己在汉族士大夫中的声望。而且，太武帝发出灭佛之令，是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背景下进行的。盖吴聚众反于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不仅西掠新平、汧城、临晋一带，使关中大震；而且与河东蜀族领袖薛永宗等遥相呼应，并派使者去江南，呼吁刘宋出兵。他署置百官，与太武帝分庭抗礼。太武帝出自安定西北地区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复疑长安佛僧与盖吴通谋，故在道教徒司徒崔浩的劝说下，发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灭佛的命令。

但是实际上，由于当时崇拜佛教的太子拓跋晃频频上表请求减缓施行，“犹缓宣诏书，远近预知，各得为计，京邑四方沙门，多士匿而免者。其金银宝像经论，大得秘藏”⑲。但众多的寺院佛塔，则几乎全遭焚毁厄运。太武帝诏令灭佛后四年，杀崔浩，对禁佛已有所松弛。正平元年（451），年届二十四岁、崇奉佛事的太子晃死。次年，太武帝拓跋焘被宦官宗爱所杀，长孙文成帝拓跋濬继位，下诏恢复佛教。于是，一度失势的佛教在北朝又广泛流传开来。

注 释

①以上可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②《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③《后汉书》卷四二《楚王英传》。

④《弘明集》卷一引牟子《理惑论》。

⑤见《洛阳伽蓝记》卷四。

⑥罗宏曾《魏晋南北朝文化史》。

⑦⑧《高僧传》

⑨《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⑩⑪⑫⑬《广弘明集》卷二《魏书·释老志》。

⑭均参见《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⑮《广弘明集》卷二《魏书·释老志》。

⑯⑰《魏书》卷四《世祖纪》。

⑱⑲《广弘明集》卷二《魏书·释老志》。

三国两晋南北朝

孝文帝改制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统一北方后，经过文成、献文帝，传到了孝文帝拓跋宏。孝文帝是北魏历史上著名的皇帝。他五岁登上皇帝的宝座（皇兴五年，471），共做了二十八年皇帝，三十三岁时死去（太和二十三年，499）。当他继位之时，北魏社会上各方面的矛盾都日趋尖锐。延兴元年（471，孝文登位后改元），有青州（今山东益都）高阳民封辩起义，自号齐王，聚党千余人。次年，又有光州（今山东掖县）民孙晏等聚党千余人起义。延兴五年（475），洛州人（今河南洛阳市东）贾伯奴、豫州（今河南汝南西）人田智度聚党千余人反，伯奴称恒农王，智度称上洛王。承明元年（476），冀州（今河北冀县）武邑民宋伏龙聚众起义，自称南平王。太和元年（477），更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东）略阳民王元寿聚众五千余家起义反抗，自号冲天王①。这些接连不断的起义反抗，冲击着北魏的封建统治。为了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巩固封建统治，孝文帝先是在其祖母冯太后的协助下，接着又在太和十四年亲政后，先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归纳起来，有如

下几个方面。

一、颁行俸禄，惩治贪污。在孝文帝改制以前，北魏官吏没有统一的俸禄。他们在自己的管辖区域内，只要向上级交纳一定的租调，就可以放肆地剥夺人民的脂膏。史称“爵而无禄，故吏多贪墨；刑法峻急，故人相残贼；不贵礼义，故士风无节；货赂大行，故俗尚倾夺”②。曾镇压上党丁零人的公孙轨是贪暴的一个典型。太武帝将北征，发驴以运粮，使轨押运雍州。轨令驴主皆加绢一匹，才接受驴。百姓语曰：“驴无强弱，辅脊（背着绢）自壮（就算壮的）。”大家一起嘲笑。轨死，太武帝对崔浩说：“吾过上党，父老皆曰：公孙轨为将，受货纵贼，使至今余奸不除，轨之罪也。其初来，单马执鞭；及去，从车百两，载物而南”③。官吏这样贪赃不法，不能不加重人民的痛苦，激起人民的反抗。太和八年（484）六月，孝文帝正式颁行俸禄制：“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④同时规定赃满一匹者死。每季班禄，从此内外百官，按级别受俸禄。十年（486），又“议定州郡县官依户给俸”⑤。这是规定以领民户多少为给俸之等差⑥。俸禄制的实行，虽然增加了些人民的负担，但比以前放任官吏贪污、掠夺来说，对人民是有利的。班禄以后，先后犯赃被处死的官吏达四十余人，使北魏的吏治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二、推行均田制，鲜卑拓跋族原来虽然是一个社会经济比较落后的民族，但是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由于受到汉族先进的封建社会的影响，因此在北魏统一北方前，在其控制的代北地区，封建的农业经济已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道武帝在“离散诸部，分土定居”⑦后，一般的部落成员已同中原迁来的“新民”成为被北魏直接束缚于土地上的农民。道武、明元

帝又实行“计口授田”⑧制，这实际上就是均田制的雏型，均田制则是代北实行的“计口授田制”的扩大和推广。

均田制的实行，也与北魏统一北方后阶级矛盾的发展有关。北魏统一北方后，贵族地主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不仅中原汉族豪强地主建立起坞、屯、堡、壁的军事性地主庄园，而且鲜卑贵族对土地的占有欲望也日益强烈。贵族地主占有制的发展，必然兼并大量土地，从而使自耕农趋向破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的逃亡、反抗，使国家编户数量锐减，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加深了政治危机。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状况，于是一种新的土地政策——均田制便应运而生。

太和九年（485）十月，孝文帝正式颁布均田制，在全国推行。均田制规定：男子15岁以上，受（给）露田40亩，妇人20亩；奴婢与平民一样授田。丁牛一头，受田30亩，限四牛。所授的露田，如休耕一年，多授40亩；休耕二年，再多授40亩。露田不准买卖，身死或年老不能耕种时，必须归还政府。男子还授给桑田20亩，种桑五十株、枣五株、榆三株，皆为世业，身死不还。地方官吏各随在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15顷、太守10顷、治中、别驾各8顷，县令、县丞各6顷。新旧任相交接，不得出卖。田地不足的地区，人民可“听逐空荒”，可迁往他郡⑨。

与均田制相适应，根据李冲的建议，又制定新的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每年出帛1匹，粟2石。15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租调都分别相当于一夫一妇数量。新租调制的颁布，废除了过去征收赋税中的九品混通制，减轻了自耕农的赋税负担。

均田制名曰“均田”，实际上是基本保持原有封建土地占

有的不均状况，它是在肯定原有的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对原耕土地占有的基础上，以国家控制的荒地分配给无地或缺地农民，因而具有国有和私有双重性质。属于还授范围的土地，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官吏所受公田，也只有占有权，这都属于国有性质。不还授、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买卖的桑、麻田，属于私有性质。尽管如此，均田制的实行，程度不同地限制了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兼并，对自耕农占有原耕土地的肯定，以荒地分给无地和缺地的农民，都提高了农民对生产的积极性，因而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促进作用。

三、建立三长制。孝文帝在颁布均田令的第二年，即太和十年（486），采纳李冲的建议，又建立了三长制，以代替原来存在的宗主督护制。

从西晋末年到北魏初年，北方由于长期战乱，原本发达的黄河流域，出现了经济萧条，地旷人稀的现象，劳动力极度不足。北魏从道武帝以来，虽竭力注意劳动人手的招纳，如收容降户，强制徙民，掠夺生口等，但这些人口中的一部分是作为奴隶赏赐给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的。由于人口的减少，沉重的赋役负担又使大批国家编户逃亡或荫庇于大族及寺院门下，致使国家编户日益减少，户籍十分混乱。所谓"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⑩。"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⑪。当时北魏实行的宗主督护制正是适应了这种状况。晋末、五胡十六国以来，一些没有南迁的大族，聚集宗族，构筑坞壁，隐庇大量人口，形成一个个独立的王国。北魏建国后，利用这些坞壁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坞主（即豪强地主）为宗主督护，行使地方职权，通过他们向农民征调租税力役，维护社会秩序。在此

制度下，人户无准确数字，中央政府无法按户征租。随着均田令的颁行，整理户籍，清理民多荫附的局面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三长制便应运而生。所谓三长制，就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⑫。三长负责清查户口，征收租税，征发徭役和兵役。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加强了政府对人民的控制；同时也通过清查户籍，与豪强地主争夺劳动力，争夺人口，使向政府纳税的户口大为增加，相对减轻了每户农民的负担。史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⑬。其积极作用是很明显的。

四、迁都洛阳和推行汉化措施

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接受汉族先进文化，消除鲜卑族和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士大夫，巩固北魏的统治，孝文帝决定把都城从僻处塞上的平城，迁到中原华夏文化的中心地洛阳。

但是，迁都问题在朝廷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以鲜卑族元老穆泰、元丕、陆叡等为代表的保守派和官吏反对迁都。于是孝文帝便宣布要大举南伐，不意又遭到以任城王拓跋澄为首的贵族、百官反对。孝文帝在退朝后，单独留下拓跋澄，对他说：“国家兴自北土，徙居平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任城意以为何如？”⑭他的一番话，取得了任城王拓跋澄的支持。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发兵二十万，号称三十万，开始“南伐”。大军到达洛阳后，适逢阴雨连绵，孝文帝不顾阴雨，仍然“戎服执鞭，御马而出”，表示要继续前进。群臣都跪在马前叩头，请求他不要再南进了。孝文帝乘机说：

"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⑮并且下令，愿意迁都的站在左边，不欲者右，"时旧人虽不愿内徙，而惮于南伐，无敢言者，遂定迁都之计"⑯。洛阳是当时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迁都洛阳对北魏和鲜卑拓跋部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孝文帝在迁都以后，还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措施。

1、改革鲜卑服装，改穿汉服。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下令革服装之制，令鲜卑人不再穿本族衣服而仿照汉人着汉服。第二年，孝文帝还亲自在光极堂引见群臣，"颁赐冠服"，即汉族官员的衣冠服饰。此后"朝臣皆变衣冠，朱衣满座"⑰。他看见街上鲜卑妇女仍有穿"夹领小袖"的鲜卑胡服的，大为发怒，把群臣责备了一番。以后汉服便逐渐推广开来。

2、禁止说胡语，改说汉话。迁都后，鲜卑族大批迁居中原，鲜卑语已无法反映民族融合的新变化。于是太和十九年（495）六月，孝文帝正式下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⑱，废除了鲜卑语的官方地位。并规定凡年在三十岁以上久习鲜卑语的人，允许有一个改正期，三十岁以下并在朝中任职的人要立即改正过来，不允许继续使用鲜卑语，如不遵从，降爵黜官。

3、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鼓励鲜卑人和汉人结婚。

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诏，以为"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⑲。从此，北魏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其余鲜卑人也更改了姓氏。其中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达溪氏改为奚氏，乙旃氏改

为叔孙氏，纥骨氏改为胡氏，东焜氏改为车氏等。与此同时，孝武帝还采用了汉族的门第制度，制定姓族。除帝室元氏及长孙、叔孙、奚氏以外，鲜卑以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为首；汉世族地主中，山东以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赵郡李氏为首，关中和河东以韦、裴、柳、薛、杨、杜为首。郡姓中又按门第官位分为四等："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领军）、护（护军）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⑳规定鲜卑的八个大姓与汉人头等士族崔、卢、李、郑四姓相当。孝文帝亲自娶汉族大姓女为后宫，又给他的弟弟们娶汉族大姓女为妻室，以示提倡。经过孝文帝的这一改革，北朝"以贵承贵，以贱袭贱"㉑的门阀制度，也就确立起来了。

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不断遭到鲜卑族内保守势力的阻挠与反对，他们策动太子拓跋恂阴谋发动叛乱。结果，孝文帝将太子囚禁，废为平民，不久用药酒毒死。他们还在平城多次阴谋起兵，自立一国，也都被孝文帝严厉镇压下去。这样，才保证了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

孝文帝的改革，促进了我国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的相互融合，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因而孝文帝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出身于少数民族的一位杰出的封建皇帝。

注　释

①以上均参见《魏书》卷七《高祖纪》。

②见《魏书》《目录叙》。

③《北史》卷二七《公孙表传》。

④⑤《魏书》卷七《高祖纪》。

⑥《资治通鉴》卷一三六，齐武帝永明四年胡三省注。

⑦《北史》卷八O《贺讷传》。

⑧《魏书》卷二《太祖纪》、卷三《太宗纪》。

⑨以上可参见《魏书·食货志》、《通典·食货典》及《册府元龟·田制门》。

⑩《魏书》卷五三《李冲传》。

⑪⑫《魏书》卷一一O《食货志》。

⑬《魏书》卷五三《李冲传》。

⑭《北史》卷一八《景穆十二王》下。

⑮⑯见《通鉴纪事本末》卷二O。

⑰见《资治通鉴》卷一四一，齐明帝建武四年。

⑱《魏书》卷七《高祖纪》。

⑲《资治通鉴》卷一四O，齐明帝建武三年。

⑳《新唐书·儒学柳冲传》。

㉑《魏书》卷五七《韩麒麟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六镇风暴与河北、关陇起义

北魏孝文帝的改革，给北魏社会带来了一些兴旺景象，但是从宣武帝（元恪，孝文帝子，孝文帝死后即位）开始，剥削加重，徭役频繁，统治阶级生活腐化，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到孝明帝（元诩，宣武帝子，宣武帝死后继位）时，就爆发了六镇和河北、关陇起义。

北魏迁都洛阳以来，不断向南朝发动战争。宣武帝即位后，战争规模益趋扩大。所谓“荆、扬二州，屯戍不息，钟离（今安徽凤阳东）、义阳（今河南信阳市南），师旅相继”。人民的徭役和兵役负担便随之加重，“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①。这些服兵役的人民，在军队中又受尽将帅的剥削，“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战利品），夺为己富。其羸弱老少之辈，微介金铁之功，少闲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绵冬历夏，加之疾苦，死于沟渎者，常十七八焉”②。赋税租调也越来越重。当时的户调绢，按规定

是一匹长四丈，但在政府征收时，却要每匹“皆长七、八十尺”③，无形中增加了一倍。租米也是如此。北魏的斗秤本来比以前已经大了一倍。而当时又用“大斗、重秤”，三斗才合一大斗，三两才为一大两，农民的负担无形中又增加了二倍。在苛重的赋役和租调负担下，农民被迫离开家乡，逃亡外地，他们“或诡名托养，散没人间；或亡命山薮，渔猎为命；或投仗豪强，寄命衣食”④。有的则“绝户而为沙门”，投入寺庙为僧尼，“假慕沙门，实避调役”⑤。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正是北魏统治危机加深的重要标志。

农民的痛苦贫困日趋严重，而北魏统治阶级的骄奢腐化却达到了极点。孝文帝死后，子宣武帝即位，他实行对宗室贵族和汉族士族的宽纵政策，政治趋于腐败。宣武帝死，孝明帝即位，年仅七岁，母胡太后临朝。神龟三年（520），太后妹夫、宗室元叉（道武帝玄孙）与宦官刘腾，共幽禁胡太后于北宫，叉、腾共执朝政，北魏政治至此大坏。是时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⑥。如咸阳王元禧，“姬妾数十”、“奴婢千数”；高阳王元雍“僮仆六千，妓女五百”；河间王元琛，“妓女三百人”。为了满足他们生活上享乐腐化的需要，他们除了“田业盐铁，遍于远近，臣吏僮仆，相继经营”⑦，“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⑧之外，还在政治上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如元晖为吏部尚书，“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其余官职各有差，天下号曰市曹”⑨，称吏部卖官为白昼行劫⑩。如此腐败的政治，导致阶级矛盾更趋尖锐。正是在这样深刻的社会危机

下，爆发了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起义。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有关陇人民起义，河北、青州起义等。

北魏初年，为了拱卫首都平城，防御柔然的南下，太武帝拓跋焘曾在北面沿边建立了一些军事据点，称作镇。由西向东，分别为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北）、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南）、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抚冥镇（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镇（今内蒙古兴和北）、怀荒镇（今河北张北县北）等六镇。由于这里是防御柔然入侵的军事重镇，因而原先镇将都由鲜卑宗室贵族充任，镇兵也都是高门或强宗子弟。所谓“昔皇始（道武帝年号）以移防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⑪。“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征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⑫。都说明了充任六镇镇将非宗室亲贵莫属，是十分荣耀的事。六镇镇兵也都视为国之肺腑，他们日后不但可以做大官，而且免除了一切赋税徭役，成为人们羡慕、追求的美职。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六镇原来拱卫京都的军事地位丧失，镇兵的身份急剧降低，他们的仕途受到阻遏，所谓“征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本家兄弟），留居（洛）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甚至许多犯罪的人被配到北边为兵，“役同厮养”。边镇军民还受到镇将的剥削、压迫，“主将、参僚，专擅腴美，瘠土荒畴，以给百姓，因此困敝，日月滋甚”⑬。因而不满、反抗情绪在六镇中日益高涨。孝明帝正光四年（523），柔然主阿那瓌率众三十万入塞，孝明帝忙抽调关内15万人前往阻击。阿那瓌驱迫边民、马牛羊，烧杀抢掠而去，北征大军无功而

还。不久，柔然又发兵进犯北镇。其时，北边诸镇已非常空虚。当时担任怀荒镇将的是武卫将军于景。他是因图谋废杀元叉而被贬到怀荒镇的。柔然进攻柔玄、怀荒二镇时，怀荒镇民要求开仓赈济，于景不给，于是镇民囚杀于景。

正光五年（524）正月⑭，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⑮因与该镇辖下的高阙戍主“率下失和”，遂杀戍主，改元真王，举兵起义。起义军迅速攻克沃野镇，接着挥兵北进，围攻武川、怀朔二镇。三月，魏以临淮王元彧为征讨大都督，带兵进讨。四月，高平镇酋长胡琛，自称高平王，起兵响应破六韩拔陵。接着破六韩拔陵攻陷怀朔、武川二镇。拔陵军连败政府军于五原白道（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六镇至此尽为起义军占领。东西部敕勒（高车族）也加入了起义集团，起义军声势浩大。北魏政权束手无策，不惜出卖土地和人民，请柔然人来消灭六镇义军势力。孝昌元年（525）春，柔然主阿那瓌率领大军十万，进攻武川镇，西向沃野镇，义军频战不利。这时，北魏元琛所率军队也自平城出发，开至怀朔。六月，拔陵渡黄河南移，余众尚二十余万，不幸又受到北魏广阳王元琛率领的政府军的夹击。六镇兵民二十余万人被元琛截获。这时六镇经过柔然人的袭击，生产组织破坏无余，“六镇荡然，无复蕃捍”⑯。北魏政权乃派黄门侍郎杨昱把这些六镇降户分散于定（今河北省定县）、冀（今河北冀县）、瀛（今河北河间县）三州就食，六镇起义经过一年零五个月，至此失败。

六镇起义失败后，北魏政府把平城以及六镇兵民二十多万人遣往河北地区就食，他们在路上饥饿困苦，固不待言。到了河北之后，又正值河北频遭水旱之灾，“饥馑积年，户口逃散”⑰，无处就食，生活无着。孝昌元年（525）八月，以柔玄镇

兵杜洛周为首的“六镇降户”在上谷（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起义，“攻没郡县，南围燕州”⑬。高欢、蔡隽、尉景、段荣、彭乐等皆从之。孝昌二年（526）正月，魏安州（今河北丰宁县境）石离、穴城、斛盐三戍守将也都叛应杜洛周。十一月，杜洛周率义军攻下幽州（治涿，今河北涿县）。武泰元年（528）正月，杜洛周兵锋南转，又攻下了定州和瀛州，并击败了柔然主阿那瓌的一万援兵；在杜洛周上谷起义后四个月，即孝昌二年（526）正月，以怀朔镇兵鲜于修礼为首的“六镇降户”，起义于定州之左人城（今河北省唐县），义众一下发展到十余万人。八月，鲜于修礼为义军别帅元洪业所杀，并请降于魏，修礼部将葛荣杀元洪业，继续领导义军与政府军作战。九月，博野白牛逻（今河北蠡县南）一役，葛荣击溃了北魏政府军，在阵上击杀了北魏政府军的统帅章武王元融；不久，又在定州附近俘斩了北魏政府军的最高统帅广阳王元琛，锐不可当，葛荣自称天子，国号齐。孝昌三年（527），葛荣义军又攻下了殷州（今河北内丘县东北）、冀州，杀殷州刺史博陵崔楷，俘冀州刺史，北魏宗室元老元孚。武泰元年（528）正月，葛荣又攻下了河北大镇定州。二月，葛荣击杜洛周，杀之，并其众，攻占了冀、定、沧、瀛、殷五州之地。义军人数，这时已发展到数十万之众，号称百万，将向京师洛阳。八月，围攻相州（今河北磁县东南），前锋已过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这时北魏政权已落入契胡族酋长尔朱荣手里。九月，尔朱荣自帅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东出滏口（今河北邯郸市西），以侯景为前驱。葛荣麻痹轻敌，“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尔朱荣“潜军山谷，为奇兵，分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处有数百骑，令所在扬尘鼓譟，使贼不测多

少”，又以人马近战，刀不如棒，“勒军士赍袖棒一枚置于马侧，至战时虑废腾逐，不听斩级，以棒棒之而已”⑲。他命壮士所向冲突，而身自陷阵，出于义军之后，表里合击，葛荣军大败，“于阵擒葛荣，余众悉降”⑳，冀、定、沧、瀛、殷五州皆平，轰轰烈烈的葛荣起义军失败了。义军“数十万众，一朝散尽”㉑。但就在这年的十二月，义军的余部在韩楼、郝长领导下，继续起义，还占领过幽州（今北京市西南），人数也发展到数万人。永安二年（529）九月，尔朱荣又派大都督侯渊前往镇压，韩楼败于幽州。至此，历时四年零一个月的河北起义终于失败。

在六镇起义的同时，关陇地区也爆发了人民起义。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元月，羌人莫折大提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发动了起义。当时的秦州刺史李彦（陇西李氏，李冲兄子）刑政酷虐，州民薛珍、刘庆、杜超等杀彦聚众起义，共推莫折大提为帅，大提自称秦王。南秦州（治洛谷城，今甘肃西和县南）城民张长命、韩祖香等杀刺史崔游举兵响应莫折大提。不久，大提病死，其子莫折念生继统义军，称天子，国号秦。十一月，起义军东进岐州（今陕西凤翔县南），擒斩魏将元老及岐州刺史裴芬之。与此同时，莫折念生的另一支部队也攻占了魏泾州（今甘肃泾川县）、凉州等地。魏改派齐王萧宝夤继任西道行台、大都督率征西将军崔延伯前来进讨。

孝昌元年（525）正月，萧宝夤亲率五万军队与莫折念生战于马嵬（今陕西兴平县西），念生战败，义军被俘斩十余万，受重创，退屯小陇（今陕西陇西东南），义军吕伯度举所部降魏；萧宝夤又联合吐谷浑贵族进袭凉州义军。这时，南秦州义军首领韩祖香，也被北魏东益州刺史魏子建击败，韩祖香被

杀，张长命也率部降魏，关陇起义军一度进入低潮。

孝昌三年（527）正月，莫折念生开始反攻，大败北魏政府军于泾州，再度攻占陇东的东秦、岐、豳（今甘肃宁县）、北华（州治杏城，今陕西黄陵县西南）诸州，并曾越长安东据潼关，声震洛阳。三月，孝明帝下诏"中外戒严"，并声称要御驾亲征。北魏一方面派重兵堵截义军，收复潼关，解除了对洛阳的威胁，一方面又派间谍收买义军将领，分化义军内部。九月，莫折念生为部将常山王杜粲杀害，杜粲投降了萧宝夤。莫折念生死后，其部众团结在另一义军领袖万俟丑奴周围，继续战斗。

万俟丑奴（鲜卑族）原是高平镇敕勒族酋长胡琛的部将。正光五年（524）三月，破六韩拔陵在六镇首义时，高平镇胡琛举兵响应。孝昌元年（525），当莫折念生一度为政府军击败，损失很大，胡琛就命万俟丑奴和宿勤明达等率义军进攻泾洲。北魏行台萧宝夤率岐州刺史崔延伯等"甲卒十二万，铁马八千"㉒前来镇压，丑奴奋击，大败政府军，崔延伯中流矢死，士卒死伤三万余人，成为关陇义军起义以来的空前大捷。胡琛死后，丑奴继胡琛为领袖；莫折念生为杜粲所杀，关陇义军都受丑奴指挥，接连攻下东秦州和豳州。永安元年（528）七月，丑奴自称天子，署置百官。永安二年（529），又进围岐州。这时，北魏政权已落入尔朱荣手中，尔朱荣在消灭了河北起义军的葛荣之后，就把新收编的六镇军团中的武川军团由贺拔岳率领，由尔朱天光节制，开往关陇进行镇压。建明元年（530）四月，义军溃败，丑奴被擒，被送往洛阳斩首。丑奴既败，"自泾、豳以西至灵州，贼党皆降于魏"㉓。唯万俟道洛率领一支六千人的义军，退至略阳（今甘肃清水西南），与氐

人王庆云会合，据守水洛城（今甘肃静宁县东南），又被尔朱天光击败，义军一万七千人被坑杀，其家口被瓜分。义军的另一支在宿勤明达的率领下，先是退至夏州（今陕西榆林县西南），最后又退至东夏州（今内蒙古乌审旗境内），在普泰元年（531）四月，宿勤明达被擒，也送往洛阳斩首。至此，关陇起义持续了六年零十个月，最终也失败了。

北魏末年，由六镇风暴为先导，引发了河北人民起义和关陇起义，总称为北魏末年的各族人民起义，它不仅沉重打击了北魏的胡、汉统治者，使北魏政权分崩离析；而且也教训了以后北齐和北周的统治者，促使他们进一步推进汉化政策，缓和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通过起义和斗争，促进了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和融合，从而对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注　释

①《魏书》卷四七《卢玄传孙昶附传》。

②《魏书》卷六九《袁翻传》。

③《北史》卷三〇《卢同传》。

④《北史》卷四六《孙绍传》。

⑤《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

⑥见《洛阳伽蓝记》。

⑦《魏书》卷二一《咸阳王禧传》。

⑧《魏书》卷九四《阉官刘腾传》。

⑨《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

⑩《北史》卷一七《汝阴王天赐传》。

⑪《北史》卷一六《广阳王建附孙深传》。

⑫《北史》卷五六《魏兰根传》。

⑬《魏书》卷四一《源贺附子怀传》。

⑭破六韩拔陵起义时间有正光五年、四年两说。此据《魏书》肃宗纪和天象志。

⑮为匈奴人，《北齐书·破六韩常传》云："匈右谷蠡王潘六溪没于魏，其子孙以潘六溪为氏，后人讹误，以为破六韩。"

⑯《魏书》卷一四《高凉王孤附六世孙天穆传》。

⑰《北史》卷一五《常山王遵附五世孙晖传》。

⑱《魏书》卷九《肃宗纪》。

⑲⑳均见《通鉴纪事本末》卷二二《六镇之叛》。

㉑《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㉒《资治通鉴》卷一五O，梁武帝普通六年。

㉓《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河阴之变”

正当关陇、河北人民起义势如破竹地迅速发展之时，北魏晋西北地区的军事贵族尔朱荣凭借其军事力量，镇压了起义军，并由此进一步壮大其军事势力，趁机进军洛阳，发动了“河阴之变”，攫取了对北魏政权的实际控制权。

尔朱氏为东胡的一支，世为酋帅，“其先居尔朱川，因为氏焉”①。尔朱荣的高祖尔朱羽健时，正值北魏拓跋珪进取中原，羽健率所部契胡武士从平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定中山（今河北定县），拜散骑常侍，以其所居秀容川附近三百里地为其封地，世代相袭。到尔朱荣祖父尔朱代勤时，其外甥女又做了太武帝拓跋焘的皇后，尔朱家族的地位更加显赫。代勤位肆州（今山西忻县西北）刺史，封梁郡公。到其父尔朱新兴时，其家族已非常荣耀富有，“牛羊驼马，日觉滋盛，色别为群，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讨之事，尔朱家族都“辄献私马，兼备资粮，助裨军用”②。孝文帝迁洛以后，特听尔朱新兴“冬朝京师，夏归部落”，位至平北将军，秀容第一领民酋长③。孝明帝时，他上表请求传爵于尔朱荣。尔朱荣“幼而神机

明决，及长，好射猎，每设围誓众，便为军阵之法”④。明帝正光中，正值北魏四方兵起，国内大乱之时，尔朱荣遂趁机招合义勇，散财结士，积蓄力量。不久，他奉命平定了并州一带诸胡的叛乱，接着又赶走了肆州刺史尉庆宾，署其从叔尔朱羽生为肆州刺史。朝廷慑于其军事实力，不仅未予罪责，反而进官为镇北将军。

孝昌二年（526）十一月，杜洛周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攻克幽州；另一支由葛荣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也于孝昌三年（527）攻下了殷州（今河北隆兴县东）、冀州（今河北冀县），河北大震。尔朱荣乘机上表朝廷，要求出兵进讨，北魏又进尔朱荣为征东将军、右卫将军、车骑将军、并、肆、汾、广、恒、云六州都督，前往镇压起义。武泰元年（528）二月，杜洛周起义军攻下定、瀛二州后，河北两支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兼并，葛荣杀杜洛周火并其众，杜洛周的部属高欢、段荣、尉景等逃奔尔朱荣。至此，尔朱荣如虎添翼，迅速成了北魏动乱政局中一支不可动摇的力量。

当时北魏朝廷中，胡太后再次临朝，“嬖佞用事，政事纵弛，威恩不立，盗贼蠭起，封疆日蹙”⑤。而且随着孝明帝的年岁日长，胡太后与孝明帝之间的矛盾便逐渐突出，“太后自以所为不谨，恐左右闻之于帝，凡帝所爱信者，太后辄以事去之，务为壅蔽，不使帝知外事”⑥。因此，胡太后与孝明帝母子之间，“嫌隙日深”。面对动乱的政局和昏庸的朝政，尔朱荣曾问计于高欢，高欢对他说：“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畜此竟何用也?”尔朱荣说：“但言尔意。”高欢进一步献计说：“今天子闇弱，太后淫乱，嬖孽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机奋起，讨郑俨、徐纥（胡太后的倖臣）之罪，以清帝侧，

霸业可举鞭而成，此贺六浑（高欢字）之意也。”⑦尔朱荣听后，很是高兴，从此高欢成了尔朱荣的得力助手和谋主。尔朱荣图谋举兵向洛，“内诛嬖倖，外清群盗”的计谋，也得到了并州刺史元天穆、尔朱荣帐下都督贺拔岳的支持。于是尔朱荣上书朝廷准其率兵东下相州（今河北临漳县西南），胡太后怕尔朱荣出兵有变，不许。尔朱荣以防山东（太行山以东，实即河北）“盗贼”西逸为借口，遣兵固守滏口（今河北邯郸市西南鼓山），于是“北捍马邑，东塞井陉”⑧。

正在尔朱荣雄踞一方，威震中原的时候，北魏朝廷内部胡太后与孝明帝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胡太后的肆意干政使孝明帝大为不满，欲借尔朱荣的兵力迫使胡太后退出朝政，因而密诏尔朱荣率兵进京。尔朱荣即以高欢为前锋，行至上党，孝明帝又改变了主意，“复以私诏止之”。武泰元年（528）二月，胡太后害死了元诩，立皇女为帝，几天后又宣称新立皇帝为女，下诏改立三岁的元钊为帝。闻讯后，尔朱荣与并州刺史元天穆密议，并立即举兵南下。这时胡太后也恐尔朱荣出兵，忙派尔朱荣从弟直阁尔朱世隆北上慰谕尔朱荣罢兵。尔朱荣欲留尔朱世隆参与计议，尔朱世隆对尔朱荣说：“朝廷疑兄，故遣世隆来，今留世隆，使朝廷得预为之备，非计也。”⑨尔朱荣乃遣尔朱世隆返洛阳。接着尔朱荣与元天穆密谋立长乐王元子攸为帝，并派其从子尔朱天光及其亲信奚毅暗赴洛阳，通过尔朱世隆向元子攸传达其旨意，元子攸表示同意。于是尔朱荣便抗表起兵晋阳，不久尔朱世隆也从洛阳逃出与尔朱荣会于上党。胡太后闻讯后，以黄门侍郎李神轨为大都督，帅众拒之，别将郑季明、郑先护将兵屯河桥（今河南省孟津县）、武卫将军费穆屯小平津（孟津县北），拒阻尔朱荣大军入京。尔朱荣所部迅

速开至河内，复遣王相密至洛，迎长乐王元子攸。这年四月，元子攸与其兄彭城王元劭、弟霸城公元子正从京城暗渡高渚，与尔朱荣会于河阳（今河南省孟县西南），尔朱荣在河阳立元子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庄帝以元劭为无上王，元子正为始平王。以尔朱荣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太原王。

尔朱荣南下大军继续向洛阳挺进，镇守河桥的郑先护与庄帝交好，开城纳尔朱荣入城，小平津守将费穆率先降于尔朱荣，城内徐纥、郑俨见大势已去，各自外逃。胡太后"尽召肃宗（明帝）后宫皆令出家，太后亦自落发"。城内百官迎庄帝入河桥，尔朱荣遣骑执太后及幼主，送至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沈太后及幼主于河"⑩。尔朱荣欲向洛阳，恐群情不服。乃于次日引百官于行宫西北，云欲祭天，"百官既集，列胡骑围之，责以天下丧乱，肃宗暴崩，皆由朝臣贪虐，不能匡弼，因纵兵杀之"⑪，自丞相高阳王雍、司空元钦、仪同三司义阳王略以下死者二千余人。是为"河阴之变"。接着，尔朱荣又派数十人冲入庄帝行宫，杀死无上王元劭，始平王元子正，迁庄帝于河桥，置于尔朱荣帐下。"河阴之变"是以尔朱荣为首的武人贵族集团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它一举歼灭了北魏朝廷重臣，并使北魏朝廷解体。

尔朱荣所部胡骑杀朝士既多，不敢入洛城，谋迁都晋阳，尔朱荣狐疑不定，武卫将军汎礼固谏，尔朱荣才决定奉帝入城。他先下诏大赦，诏令"从太原王将士普加五阶，在京文官二阶，武官三阶。百姓复租役三年"⑫。当时洛阳京城"百官荡尽，存者皆窜匿不出"，洛中"士民草草，人怀异虑"⑬。有的说尔朱荣要纵兵大掠；有的说尔朱荣欲迁都晋阳，人心惶

惶，“富者弃宅，贫者襁负，率皆逃窜，什不存一二⑭，秩序十分混乱。尔朱荣只得上书孝庄帝，要求追赠无上王元劭为无上皇帝，其余死于河阴之变者诸王赠三司；三品赠令、仆，五品赠刺史，七品以下及白民赠郡、镇，死者无后听继，即授封爵⑮。又大封百官，以江阳王元继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北海王元颢为太傅、平东将军，“又遣使者循城劳问”⑯。这些措施，使京城的混乱局面得到初步安定。为了控制庄帝，尔朱荣又提出以其女原肃宗嫔妃，立为庄帝后，庄帝犹豫不决，后经黄门侍郎祖莹劝谏，方才应允。接着庄帝加封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兼录尚书事，尔朱荣遂返晋阳。荣令元天穆入洛阳，加天穆侍中、录尚书事、京畿大都督兼领军将军，以行台郎中桑乾朱瑞为黄门侍郎兼中书舍人，“朝廷要官，悉用其腹心为之”⑰。尔朱荣坐镇晋阳，遥控北魏朝廷。

接着，尔朱荣打败了河北、关陇和山东起义军。永安二年(529)，又击败了投奔梁朝的北魏宗室元颢和陈庆之率领攻进洛阳的萧梁军队，再次进军洛阳，以功受封为天柱大将军。但不久又帅军重返晋阳。尔朱荣自立孝庄帝以来，“身虽居外，恒遥制朝廷，广布亲戚，列为左右，伺察动静，大小必知”⑱。朝内军政大事，一决于己，朝中官员无不仰其鼻息，惧其威势。孝庄帝虽受制权臣，但勤于政事，孜孜不已，并对尔朱荣的霸道行径无法容忍。尔朱荣启奏北人为河南诸州太守，欲为犄角势，庄帝不许。尔朱荣大为光火，曰：“天子由谁得立？今乃不用我语！”又庄帝尔朱皇后也常干预朝政，公然对庄帝说：“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即自作，今亦复决？”⑲庄帝外逼于尔朱荣，内迫皇后，“恒怏怏不以万乘为乐”⑳，始有图荣之意。永安三年（530）九月，庄帝与城阳

王元徽、侍中李彧等假借尔朱皇后提前产皇子为由，趁尔朱荣、元天穆等前来庆贺之际，伏兵于宫中明光殿，杀死了尔朱荣，元天穆与尔朱荣之子尔朱菩提、尔朱阳靓等三十余人全部被杀。

尔朱荣被杀后，坐镇汾州的尔朱兆（荣从子）迅速起兵占据晋阳，不久与从洛阳北撤的尔朱世隆（荣从弟）所部会合于长子（今山西省长子县），共推太原太守长广王元晔即帝位，改元建元。元晔以尔朱兆为大将军，尔朱世隆为尚书令，尔朱度律为太尉，尔朱彦伯为侍中，原徐州刺史尔朱仲远为东骑大将军、三徐州大行台（徐州治彭城、北徐州治琅邪，东徐州治下邳）。尔朱仲远从徐州起兵进攻洛阳。永安三年（530）十二月，尔朱兆率军由太行南下，先攻丹谷（今山西晋城县东南），都督崔伯凤战死，史仵龙开城降。尔朱兆率轻骑倍道兼行，从河桥西侧渡黄河，是日，“暴风，黄尘涨天，兆骑叩宫门，宿卫乃觉，弯弓欲射，矢不得发，一时散走”㉑。庄帝步出云龙门外，被尔朱兆骑兵所执，锁于永宁寺楼上。尔朱兆扑杀皇子，污辱嫔御妃主，纵兵大掠，临淮王元彧、范阳王元海、青州刺史李延寔等均被杀。

由于河西纥豆陵步蕃曾受庄帝诏率部进逼尔朱氏根据地晋阳，因而尔朱兆攻破洛阳后不敢久留，命尔朱世隆、尔朱度律、尔朱彦伯镇守洛阳，自己便回师北上抗击步蕃，庄帝也被押往晋阳，缢杀于晋阳三级佛寺。尔朱兆在晋阳屡为步蕃所败，后得到高欢的援助，“欢与兆进兵合击，大破之，斩步蕃于石鼓山”㉒。

建明元年（531），镇守洛阳的尔朱世隆与尔朱天光等以长广王元晔“疏远，又无人望，欲更立近亲”㉓，因而废元晔，

改立广陵王元恭为帝，改元普泰，是为前废帝（即节闵帝）。尔朱兆以不预废立之谋而大怒，欲举兵进攻洛阳，于是尔朱氏之间产生裂痕，高欢便趁机背叛尔朱氏，最终导致东、西魏的分裂。

注 释

①②③④《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

⑤⑥《资治通鉴》卷一五二，梁武帝大通二年。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二二《元魏之乱》。

⑧《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

⑨⑩⑪⑫⑬⑭《资治通鉴》卷一五二，梁武帝大通二年。

⑮《魏书》卷一〇《孝庄纪》。

⑯⑰《资治通鉴》卷一五二，梁武帝大通二年。

⑱《魏书》卷七四《尔朱荣传》。

⑲《北史》卷四八《尔朱荣传》。

⑳㉑㉒《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㉓《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魏分东西

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十二月，尔朱荣从子尔朱兆从晋阳起兵为尔朱荣复仇，攻陷洛阳，杀魏孝庄帝。建明元年（531）二月，尔朱世隆等在洛阳立广陵王元恭（献文帝弟广陵王羽之子）为帝，是为节闵帝。这时的北魏王朝，实际上是尔朱氏的天下。是时，尔朱兆据有并（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州治西河郡兹氏城，今山西汾阳县）；尔朱天光专制关中；尔朱仲远（荣从弟）擅命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兖（州治瑕丘，今山东兖州），他们“分裂天下，各据一方”①。而尔朱彦伯，尔朱世隆（仲远兄弟）兄弟在朝秉政。史称尔朱氏“割剥四海，极其暴虐”②。那时六镇兵民自河北起义失败后，被迫迁徙到今山西一带，人数尚有二十余万，深受尔朱氏凌虐，生活非常困苦。其时又值山西连年霜旱，迁到山西的六镇兵民，个个饿得“面无谷色”，至“掘田鼠而食之”，曾举行过大小二十六次的武装反抗③。这部分六镇兵民，除了武川一部分兵户，前已由贺拔岳率领随尔朱天光西征，镇压关陇起义军，往后成为宇文泰的主要军事力量以外，留在并

州的一、二十万人还时时举行武装反抗，尽管“诛夷者半，犹谋乱不止”④。对此，尔朱兆深患之，问计于高欢。高欢对他说：“六镇反贼，不可尽杀，宜选王腹心使统之，有犯者罪其帅，则所罪者寡矣。”⑤尔朱兆接受了高欢的意见，就叫高欢去统领迁徙到山西的恒、燕、云三州的六镇兵民。于是高欢将他们加以部勒，“乃建牙阳曲川，陈部分”⑥，组成了军队。接着高欢又请求尔朱兆让他们去山东（太行山以东地区）就食，“待温饱更受处分”。尔朱兆同意了高欢的意见。当时尔朱兆长史慕容绍宗谏曰：“不可。方今四海纷扰，人怀异望，高公雄才盖世，复使握大兵于外，比如借蛟龙以云雨，将不可制矣。”⑦但尔朱兆以与高欢结兄弟为由，未接受慕容绍宗的意见，让高欢[illegible]三州六镇兵民去山东就食。高欢就依靠掌握的三州六镇兵民，最后倒戈消灭了尔朱氏。

高欢，鲜卑名贺六浑，自称渤海修人（今河北景县东），六世祖隐，为晋玄菟（今朝鲜咸镜道咸兴）太守。十六国时期，鲜卑慕容氏占据辽东一带，高隐及其子高庆、孙高湖三代都在慕容氏政权下作官。后燕慕容宝败，高湖率众归魏，为右将军。高湖的第三子高谧，仕魏至侍御史，后因犯法徙居怀朔镇。到高欢之父树生时，居于怀朔镇道南，高氏家境已经败落。高欢出生，其母韩氏殂，高欢被寄养在其姊夫，即当时为镇狱队的尉景家。由于高欢出生于六镇兵户之家，“累世北边，故习其俗，遂同鲜卑”⑧。他虽然长得深沉有大度，且“轻财重士，为豪侠所宗”⑨，但由于家贫，与家境富有的匹娄氏（鲜卑族）结婚后，才有一匹马，镇将提拔他任“队主”，又转为“函使”，即负责把怀朔镇的公文送往洛阳的小军官。为函使六年，由于往来洛阳与六镇之间，因而对当时洛阳的腐败政

治，了解得比较清楚。特别是在这一期间，他亲眼目睹了京城羽林军焚毁领军将军张彝住宅的情景。事发后，朝廷怕出乱子，对此竟不敢问津。高欢曾对人说："为政若此，事可知也。"⑩从此他萌发了澄清天下的志向。

孝昌元年（525），遣散至河北就食的六镇兵民在杜洛周领导下起义于上谷，高欢就同刘贵、段荣等一帮人投奔了杜洛周，因与杜洛周不合，准备与尉景、段荣、蔡俊等谋杀杜洛周。又因计谋泄露，便投奔葛荣。不久又弃葛荣而亡归尔朱荣，尔朱荣以高欢为亲信都督（卫队长）。尔朱荣举兵入洛阳后把持北魏朝政，出兵镇压河北起义军，利用高欢过去在河北起义军中的关系，"令神武喻下贼别称王者七人"⑪，又和元天穆一起击破以邢杲为首的山东起义军，以功累迁第三镇民酋长、晋州（治白马城，今山西临汾县）刺史，成为尔朱荣部下的得力将领。

尔朱荣被魏孝庄帝杀死后，尔朱兆从晋阳起兵赴洛，邀高欢一同南下，高欢藉故晋州有汾胡、绛蜀，恐其反叛而不出兵。尔朱兆攻陷洛阳后，高欢曾私下派人会见孝庄帝，谋劫孝庄帝以讨伐尔朱兆。由于纥豆陵步藩进逼晋阳，尔朱兆押庄帝返回晋阳并杀之，立元晔为帝。步藩屡破尔朱兆兵，兵势日盛，高欢怕步藩势力日后难制，便与尔朱兆联手对付步藩，悉力破之。这个举动赢得了尔朱兆的信任。不久，尔朱兆便把六镇降众交给高欢统领。高欢又借口并、肆缺粮，求率六镇兵众就食山东。得到了尔朱兆的同意。高欢遂从晋阳起程赴山东。途中正逢尔朱荣妻北乡长公主由洛阳北返晋阳，有马 300 匹，被高欢尽数夺去。

普泰元年（531）二月，高欢趁尔朱世隆在洛阳废立之机，

进军河北。那时河北的情况复杂。河北的第一重镇相州（治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掌握在尔朱氏的亲信、契胡族刘诞手里；殷州（治广阿，今河北隆尧县东）掌握在尔朱族人尔朱羽生手里；幽州（治蓟，今北京市西南）刺史刘灵助已举兵反对尔朱氏，自称燕王；尔朱氏特地任命其亲信侯渊为定州（治卢奴，今河北定县）刺史，来对付刘灵助。只有控制了冀州（治信都，今河北冀县）的赵、魏大族封隆之、高乾、高昂兄弟，是倾向高欢的。高欢一到滏口（今河北磁县西北石鼓山），高乾与封隆之子子绘就去滏口面见高欢，说欢曰："尔朱酷逆，痛结人神，凡曰有知，莫不思奋。明公威德素著，天下倾心，若兵以义立，则屈强之徒不足为明公敌矣。"表示冀州"户口不减十万，谷秸之税，足济军资，愿公熟思其计"。⑫赵郡李元忠也赶到滏口，向高欢进策曰："殷州小，无粮仗，不足以济大事。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为明公主人，殷州便以赐委。冀、殷既合，沧、瀛、幽、定自然弭服。"⑬高欢接受了他们的意见，率三州六镇兵民进驻信都。北魏的洛阳政权为了安抚高欢，封他为渤海王，任命他为东道大行台、冀州刺史。

建明二年（531）六月，高欢准备起兵和尔朱氏决裂，乃诈为书，称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又为并州符，"征兵讨步落稽（即稽胡）"，将发一万多人前往。高欢部下的孙腾和尉景佯作替镇兵宽限五日，如此几次，延误了征期。然后高欢亲自到郊外送行，涕泪执别，镇兵号恸，声震原野，高欢便对他们说："与尔俱为失乡客，义同一家，不意在上征发乃尔！今直西向，已当死，后军期，又当死，配国人，又当死，奈何?"镇兵曰："唯有反耳!"高欢说："反乃急计，然当推一人为主，谁可者?"众共推高欢。高欢便对镇兵说："尔乡

里难制，不见葛荣乎！虽有百万之众，曾无法度，终自败灭。今以吾为主，当与前异，毋得凌汉人，犯军令，生死任吾则可；不然，不能为天下笑。”众皆顿颡曰：“死生唯命”！⑭于是高欢椎牛飨士，起兵于信都（今河北冀县）。但此时高欢仍未敢显言背叛尔朱氏。不久赵郡大族李元忠举兵进逼殷州，进攻尔朱羽生，高欢以援救殷州为名，派高乾诱杀尔朱羽生，欢反意始决，乃以李元忠为殷州刺史，并抗表罪状尔朱氏。七月，尔朱兆将步骑二万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县），击败李元忠，复取殷州。十月，高欢在信都立渤海太守元朗为帝，改元中兴，是为后废帝。后废帝以高欢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书事、大行台，高乾为侍中、司空，高敖曹（昂字）为骠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孙腾、魏兰根为左、右仆射。

尔朱兆收复殷州以后，约尔朱仲远、尔朱度律与骠骑大将军斛斯椿、车骑大将军贺拔胜等共讨高欢，屯于阳平（今山东莘县），尔朱兆出井陉，军于广阿（今河北隆光县），众号十万。高欢利用尔朱氏内部矛盾，纵反间计，使仲远等不战而还，高欢遂与尔朱兆在广阿合战，俘获尔朱兆军卒五千余人。次年（永熙元年，532）正月，高欢又攻下邺城，生擒相州刺史刘诞。三月，尔朱世隆卑辞慰喻尔朱兆，并请前废帝纳兆女为后，尔朱氏之间的矛盾得以缓和。闰三月，尔朱天光自长安，尔朱兆自晋阳，尔朱度律自洛阳，尔朱仲远自东郡，“皆会于邺，众号二十万，夹洹水而军”⑮。时高欢战马不满二千，步兵不满三万，众寡不敌。但三州六镇鲜卑深恨契胡贵族，士气非常旺盛。高昂所将汉兵三千余人，也都操习已久，前后格斗，不减鲜卑。两军于邺城西南的韩陵山（今河南安阳市东北）会战，高欢“连系牛驴以塞归道，于是将士皆有死

志”⑯，尔朱兆大败，贺拔胜与徐州刺史杜德于阵降欢，尔朱兆逃还晋阳，尔朱仲远逃还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尔朱天光逃往洛阳。当时洛阳的政局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都督斛斯椿从前线败回后，率部背叛尔朱氏，杀尔朱世隆、尔朱彦伯及其同党，并将尔朱天光、度律等执送高欢，尔朱仲远在徐、兖也无法立足，急忙投奔南朝。关中尔朱氏的残余势力尔朱显寿（天光弟），也被倒向高欢的尔朱天光部将贺拔岳、侯莫陈悦所擒。四月，高欢入洛阳，废杀节闵帝元恭（尔朱氏所立）、后废帝元朗（元魏宗室疏属），另立孝文帝孙子、广平王元怀之子平阳王元脩为帝，是为孝武帝。以高欢为大丞相、天柱大将军，其子高澄为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凡尔朱氏所除官爵例皆剥夺”⑰。北魏的政权，从尔朱氏转到高欢手中。

七月，高欢发两路大军进讨尔朱兆，一路由高欢亲自统领入滏口，一路由大都督库狄干统领入井陉，孝武帝又派骠骑大将军高隆之帅步骑十万会高欢于太原。十二月，尔朱兆退保秀容。永熙二年（533）正月，高欢军前锋窦泰追尔朱兆至赤洪岭，尔朱兆窘促自缢而死，尔朱兆手下大将慕容绍宗“携尔朱荣妻子及兆余众诣欢降”⑱。至此，尔朱氏消灭殆尽。高欢取得晋阳后，在晋阳建大丞相府，同时将六镇鲜卑侨置迁徙于并、汾等州，恢复恒、燕、云三州建置；又把六镇改置为朔、显、蔚三州，也侨置于并、汾等州内。于是三州六镇鲜卑，就改称为六州鲜卑。这是高欢以及东魏、北齐政权的主要力量。原为尔朱氏控制的晋阳也就变成高欢霸业的政治、军事基地。

高欢与尔朱氏一样，坐镇晋阳，遥控洛阳朝政。魏帝元脩不甘心充当傀儡，高欢和元脩之间的矛盾不久就突出起来。永熙二年（533）三月，元修杀司空高乾，又密敕东徐州刺史潘

绍业谋杀高乾弟高敖曹，敖曹离讯伏兵执潘绍业北奔晋阳，敖曹兄光州刺史高慎也被魏帝革职后奔晋阳，晋阳与洛阳的矛盾公开化。当时在朝将领中与高欢实力相当能与之抗衡的是关西大行台贺拔岳。高欢在韩陵山大捷不久，贺拔岳趁尔朱天光东下之际，联合侯莫陈悦打败了留镇长安的尔朱显寿（天光弟），占据长安。高欢入洛后征贺拔岳为冀州刺史，岳畏欢，欲单马入朝，行台右丞薛孝通对贺拔岳说："今关中豪俊皆属心于公，愿效其智力。公以华山为城，黄河为堑，进可以兼山东，退可以封函谷，奈何欲束手受制于人乎！"⑲贺拔岳乃逊辞为启而不就征。高欢同孝武帝发生冲突以后，贺拔岳派府司马宇文泰使晋阳，以观高欢之为人。宇文泰回长安后对贺拔岳说："高欢所以未篡者，正惮公兄弟耳；侯莫陈悦之徒，非所忌也。公但潜为之备，图欢不难。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三千余人，灵州刺史曹泥、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各拥部众，未知所属。公若引军近陇，扼其要害，震之以威，怀之以惠，可收其士马以资吾军。西辑氐、羌，北抚沙塞，还军长安，匡辅魏室，此桓、文之举也。"⑳贺拔岳听后大悦，又派宇文泰入洛面陈魏帝。永熙二年（533）八月，孝武帝以贺拔岳为都督雍、华等二十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以与高欢抗衡。高欢惧贺拔岳和侯莫陈悦势力之强，施离间计，永熙三年（534）二月，侯莫陈悦诱杀贺拔岳。岳军中奉宇文泰为主，魏主元修遂又以宇文泰为大都督代统岳军。四月，宇文泰在上邽击败侯莫陈悦，使其自缢而死。秦、陇之地尽为宇文泰所据。

宇文泰字黑獭，是宇文肱的小儿子。宇文氏原是东胡的一支，东汉时加入鲜卑檀石槐部落联盟，"总十二部落，世为大

人”㉑。后燕慕容宝败，归魏。魏天兴初，其祖先徙居代郡武川镇。正光末，破六韩拔陵起兵沃野镇，其部下卫可孤次下武川镇，宇文肱纠合武川镇贺拔胜等中下级军官杀卫可孤。以后随六镇兵民徙居河北。河北起义爆发后，宇文泰随宇文肱参加了鲜于修礼的起义队伍，在与北魏定州军的战斗中，宇文肱战死。葛荣杀鲜于修礼后，十八岁的宇文泰便转随葛荣。尔朱荣打败葛荣后，宇文泰随葛荣部下被迁至并、肆一带。元颢之乱发生后，尔朱荣派贺拔岳（贺拔胜弟）讨元颢，宇文泰以别将随贺拔岳从征。以后，尔朱荣又以尔朱天光为主帅，贺拔岳、侯莫陈悦为副帅，带兵镇压关陇的万俟丑奴起义军，宇文泰便随贺拔岳入关。

永熙三年（534）五月，魏主元修下诏发河南诸州兵，声言欲亲率大军伐梁，实际上是企图袭击高欢占据的晋阳。高欢早已洞察魏主的图谋，他先发制人，调集了二十万大军，分道南下，以讨伐南方的梁和关中、荆州（贺拔岳兄贺拔胜为刺史）等地方势力。高欢的军队一渡过黄河，元修知道大势已去；七月，他放弃洛阳，率轻骑入关，投奔宇文泰。荆州刺史贺拔胜兵败后投奔梁朝。十月，高欢至洛阳，拥立年仅十一岁的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统治权完全操在高欢手里。高欢以洛阳“西逼西魏，南近梁境”，决定迁都邺城，令下三日即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㉒。高欢留后，事毕回晋阳。迁都邺城后的魏朝，史称东魏。

元修至长安后，宇文泰进位丞相，也要把元修当作傀儡皇帝，因而主相之间的矛盾又公开化起来。十二月，宇文泰鸩杀孝武帝，改立南阳王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至此，北魏灭亡，形成东、西魏分裂、对峙的局势。

注 释

①《魏书》卷七五《尔朱天光传》。

②《魏书》卷七五《尔朱彦伯弟世隆附传》。

③④⑤《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⑥《北史》卷六《齐神武本纪》。

⑦《资治通鉴》卷一五四、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⑧⑨⑩⑪《北史》卷六《齐神武本纪》。

⑫⑬《通鉴纪事本末》卷二七《元魏之乱》。

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三年。

⑮⑯⑰《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⑱《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梁武帝中大通五年。

⑲《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武帝中大通四年。

⑳《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梁武帝中大通五年。

㉑《北史》卷九《宇文泰纪》。

㉒《资治通鉴》卷一五六，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

宇文泰实行府兵制

府兵制创立于西魏文帝大统年间（535—551），废止于唐玄宗天宝（742—755）之际，前后存在约二百年。其发展变化，可分为前后二期，隋以前的西魏、北周为前期，隋唐为后期。

府兵制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一种特殊的兵制，它的产生，是和魏晋以来军府领兵制度以及鲜卑拓跋部族兵制的演变密切有关。府兵的特点之一是军属于府，军民分治，所谓府兵即是属于军府的兵。魏晋以来，地方上都以刺史治民，都督领兵。都督的军衙称军府，军府所属的兵就称为府兵①。这是府兵制度产生的一个历史渊源。

府兵制产生的另一个历史渊源是鲜卑拓跋氏的部族兵制。鲜卑拓跋族兴起之时，尚处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阶段。《魏书·官氏志》载："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所谓三十六国，九十九姓，就是指加入这个部落联盟的氏族或部落。这些氏族或部落的成员当时都有当兵的权利和义务。拓跋氏入主中原时，在北部边缘地区设镇，以防遏柔然等部族的入侵。

进入中原后，也在西、南边境上设镇。这些镇府的兵士，主要是鲜卑拓跋氏各部落的成员。后来随着拓跋氏社会的阶级分化和封建化，“散之部落，同为编户”，拓跋氏贵族就发展成为封建贵族，大部分部落成员则成为普通民户，而在镇府当兵的，则成为府户或兵户。宇文泰实行府兵制初期，“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②。这就是在形式上摹拟鲜卑拓跋氏当时的部族兵制。

府兵制作为一种军事兵制的建立，在西魏大统十六年(550)。据《周书》卷一六传末的记载：

“初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拜荣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后，此官遂废。大统三年（537），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始命为主。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职，自大统十六年以前任者凡有八人。太祖位总百揆，督中外军，魏广陵王欣元氏懿戚，从容禁闱而已。此外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分掌禁旅，当爪牙御侮之寄。当时荣盛莫与为比，故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云。”

《玉海》卷一三七引《后魏书》也云：“大统十六年，以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资治通鉴》也把宇文泰“始籍民之有材力者为府兵”，“合为百府”，系在梁简文帝大宝元年，即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

宇文泰在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建立的府兵制，是以贺拔岳的武川军团、侯莫陈悦旧部李弼军团和北魏孝武帝带进关中的禁卫军团为基干，并招募关陇豪右、接纳乡兵参加六柱国系统而形成。宇文泰接收的贺拔岳的武川军团，其总人数不过数千人；侯莫陈悦被宇文泰击溃后，其部属李弼拥众万人来归宇文泰；北魏宿卫禁旅，即所谓“六坊之众”，随孝武帝元修入关

的，也“不能万人”③。这三者合起来的总人数，大约在三万人左右。魏孝武入关之前，宇文泰已分其军为十二④。故西魏的三万兵力，宇文泰命十二个将军分别率领。大统三年（537），东、西魏沙苑（今陕西省高陵县）会战，高欢以二十万众进犯西魏，宇文泰迎击的军队，不满万人；大胜高欢军后，不断补充，人数增多。大统八年（542）三月，宇文泰成立六军。大统九年（543），西魏军队发展至十万人左右。此年与高欢在邙山会战失利，宇文泰的西魏军被东魏歼灭的达六万人之多。经过这次惨败，西魏实力大丧，兵员的补充更为困难，由于关陇地区六州鲜卑人数本来就不多，因而宇文泰不得不从汉族方面来补充军队。《周书·文帝纪》称：“邙山失律，于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这些新编的军队，都是由政府选择关陇地区有名望的人物来加以统领。如太原阳曲人郭彦，“其先从官关右，遂居冯翊。……大统十二年，初选当州首望，领乡兵，除帅都督”⑤。武功人苏椿，是苏绰的兄弟，“（大统）十四年，置当州乡帅，自非乡望，允当众心，不得预焉。乃令驿追椿领乡兵”⑥。敦煌人令狐整，“世为西土冠冕。……常愿举宗效力，遂率乡亲二千余人入朝，随军征讨”⑦。由于“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把分散的乡兵吸收到西魏的军队中来，因此西魏的兵力得到了充实。同时，宇文泰对其军队的统帅部，也略作改组，形式上采取鲜卑旧日的八部之制，设立八个柱国大将军，除宇文泰自己已在大统三年（537），由西魏文帝任命为柱国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为西魏的实际最高统帅外，又在大统十四年（548），任命西魏宗室、广陵王元欣为柱国大将军，但元欣也只挂虚职，并不实际统军。却用赵贵、李虎、李弼、于谨、独孤信、侯莫崇等六人为柱国大将

军来实际统帅六军。在六个实际统军的柱国大将军下又各督二大将军，是为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又督二开府，共二十四开府，是为二十四军。每个开府下，又有仪同二人，共四十八个仪同。仪同为军团级，再下是团、旅、队，分置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这就形成了整个府兵的组织系统。整个府兵约五万人⑧，构成了西魏的主要武力。

府兵制在西魏、北周时为兵农分离制，府兵自立军籍，不编户贯，免于赋役的征发。据《玉海》引《邺侯家传》记载："初置府兵，皆于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者，选材力一人，免其身租庸调"，"兵仗衣驮牛驴及糗粮六家共备"，说明府兵制初期，宇文泰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又于九等户中的上、中等富室中籍其材力者为兵，并笼络"首望"、"义首"的乡兵纳入皇朝六柱国统领系统，使地主武装逐步中央化。宇文泰完成了地主阶级武装力量的统一，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但当时，这种统一还不完全，六个柱国大将军对其部属还有特殊的封建权利，他们可以"自相督率"，同时军资、衣粮仍保有军将自筹的旧习，以后才逐步走向"并资官给"。

府兵是以禁旅的姿态出现的中央禁卫军，府兵轮番在京城宿卫，所谓"十五日上，则门栏陛戟，警昼巡夜；十五日下，则教旗习战，无他赋役"⑨，战时则出征打仗，社会地位较世兵为高。府兵虽然是以"禁旅"的性质出现，但由于当时的实际执政者为宇文泰，西魏文帝元宝炬不过是傀儡，因而府兵的指挥权，实际属于任大丞相、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宇文泰相府。宇文泰卒后，北周宇文护专权，府兵的指挥权仍属于任大冢宰、都督中外诸军事的宇文护相府。《周书·晋荡公护传》称："自太祖（宇文泰）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

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建德二年（572）杀宇文护，命其弟齐王宇文宪往宇文护相府，“收兵符及诸簿书等”⑩，这支府兵才真正辖于君主。建德三年（573），武帝宇文邕又对府兵制进行改革，下令“改军士为侍官”，使府兵名符其实地成为直辖于皇帝的禁卫军；同时又扩大府兵兵源，“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是后，夏人半为兵矣”⑪。这就突破了关陇豪右和“六户中等以上家”的范围，兵源大大扩大，使府兵制开始和均田制结合起来。被征为兵的均田农民，除免除本人的租调、杂徭外，他们的家庭也可给复三年。这样，原来为地主大族控制的农民，现在直接为北周朝廷所控制，这是我国自东汉末年以来出现的一个大的变化，中央集权得到了加强。但是，周武帝时，府兵的军籍与民籍还是分开的，兵农还未合一，这要到全国统一，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颁布军人编入户籍的诏令：“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同编户。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⑫府兵制才由原来的兵农分离制变为兵农合一制。

注 释

①参见唐长孺《魏周府兵制度辨疑》，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②《北史》卷九《文帝纪》。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周书》卷一一《宇文护传》。

⑤⑥⑦分别见《周书》《郭彦传》、《苏绰附弟椿传》、《令狐整传》。

⑧《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载：“六柱国共有众不满五万。”

⑨《北史》卷六〇《李弼等传》后叙。

⑩《北史》卷五八《周室诸王》。

⑪《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⑫《北史》卷一一《隋高祖本纪》。

三国两晋南北朝

周灭北齐

东、西魏分裂以后，经过近二十年的相互对峙和战争，东魏武定八年（550）五月，高欢子高洋废掉东魏孝静帝，建立齐朝（为北齐文宣帝），史称北齐。西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宇文泰子宇文觉禅代西魏，建立北周（为北周闵帝）。原来东、西魏的对峙变成了北周、北齐的对峙。北周建德六年（577），北周武帝灭掉北齐，结束了周、齐对峙的局面，重新统一了祖国的北方。

北周主要占据关中、陇东地区，僻处西北一隅，经济凋敝，民穷兵弱，力量远不及控制着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广大地区的北齐强大。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北周却逐渐强大，并终于灭掉北齐，统一北方，这不是偶然的。

北齐在历史上存在了二十七年，皇位换了六次，是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个短命王朝。北齐的统治区域占有今黄河中、下游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以及苏北、皖北等广大平原地区，农业、盐铁业、制瓷业都相当发达，是当时中国境内鼎立的齐、周、南朝的梁、陈三个国家中经济最富庶的一个国家。

惟其地主经济比较发展，因此在北魏孝文帝时开始实行的均田制，在北齐境内破坏得就比较严重。史称“东魏以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赋不均。（孝静帝武定二年，544）冬十月丁巳，以太保孙腾、大司徒高隆之为括户大使，分行诸州，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侨居者皆勒还本属”①。北齐武成帝高湛，在河清三年（564）重新颁布过均田令，对鲜卑勋贵和汉世家大族拥有奴婢的人数、耕牛的头数和受田数，都比北魏孝文帝时有了详细的规定。鲜卑勋贵和汉世家大族在奴婢、耕牛受田的名义下，可以占有上百顷的土地，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云：“又河渚山泽，有司耕垦，肥饶之处，悉是豪势，或借或请，编户之人，不得一垄”，“其时强弱相凌，恃势侵夺，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②。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离迁徙，有的依托豪家，有的为寺院所占。据统计，北齐后期，那些“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的丁壮发展到二百余万人之多，约占北齐二千万六千八百八十人总数的十分之一，造成“户口租调，十亡六七”③。因此北齐境内的阶级矛盾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而北齐统治集团内部又腐败贪婪、互相残杀、分崩离析。如北齐建国之君高洋肆行淫暴，臣下比之“有甚于桀纣”，在邺城曹魏所建三台宫殿的基础上，又“发丁匠三十余万人”大起宫室及游豫园④。后主高纬营建晋的宫殿“壮丽逾于邺下”。凿晋阳西山大佛像，“一夜燃油万盆”，工程“穷极工巧，运石填泉，劳费亿计”；宫中饲养鸡马鹰犬，不仅吃肉和细粮，而且“乃有仪同、郡君之号”⑤。北齐政权又是以鲜卑贵族为主体的统治政权，胡汉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高洋统治时，在杨愔等中原世族地主的辅佐下，推行汉化政策，对封建政权的巩固，还起了一定作用。高洋死，子高殷继位。

不久，洋弟高演、高湛在鲜卑勋贵高归彦、贺拔仁、斛律光的拥护下，杀汉族大臣杨愔、宋钦道等，废高殷，先后拥立高洋弟高演、高湛为帝，湛死，子高纬继位。统治集团内部一次次争斗，鲜卑勋贵的势力越发增大。这样，北齐境内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鲜卑贵族和汉族士族之间的矛盾都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它被北周所灭亡也就成为不可避免。

而建立北周的宇文觉在禅代西魏之前，其父宇文泰在西魏时已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重用汉人苏绰，颁布了总结汉族统治阶级统治经验的“六条诏书”，制定了计帐（以乡为单位计算户口、土地和赋役的办法）、户籍等制度，并对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和租调制也作了一些必要的改进。规定“有室者（一夫一妇）田百四十亩，丁者（尚未娶妻）田百亩”；一夫一妇每年纳“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半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三分之一），皆以时征纳”。均田农民服力役，“半年不过三旬，中年则二旬，下年则一旬”⑥。此外宇文泰在军事上还创立了府兵制，全军由六柱国分领，下设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每个开府领一军，共二十四军，军士都由固定的将领统帅，另立军籍，不再负担其他赋役。实行这种制度，提高了士兵身份，改善了兵将之间的关系，战斗力大为增强。这些改革，使宇文泰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得到巩固和加强，为后来北周武帝的进一步改革和最终灭齐，准备了条件。

北周正式取代西魏的第三年，即孝明帝武成二年（560），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即位，是为北周武帝。他进一步摆脱鲜卑旧俗的束缚，继续推行多方面的改革。他几次下诏把从江陵俘虏来的奴婢全部释放为民，把他们投入生产。他还注重增辟农

田，兴修水利，“于蒲州开河渠，同州开龙首渠，以广溉灌”⑦。为了集权中央，周武帝于建德元年（572）杀死了实际操纵北周军政大权的大冢宰宇文护，并对府兵制进行了改革，把府兵的指挥权从相府转归皇帝，并扩大府兵兵源，使均田农民“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选材力一人”⑧来充当府兵，加强了北周的军力；周武帝还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下诏灭佛，把关、陇、梁、益、荆、襄地区几百年来僧侣地主的寺宇、土地、铜像、资产全部没收，把近百万僧侣和僧祇户（依附于寺院的佃客）、佛图户（寺院奴隶）编为均田户，把合龄的壮丁编为军队，所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⑨。这些措施大大增加了北周的财政收入和兵役来源，也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周武帝的一系列改革，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向，调整了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通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北周的国力得到显著增强。加上周武帝还善于运用外交策略，北与突厥和亲，娶突厥可汗女为皇后，和突厥连兵伐齐；南与陈朝通好，约定中分中国，使陈进兵淮南，牵制北齐。正是在做好这一系列工作的基础上，周武帝正式出兵灭齐。

北周建德四年（北齐武平六年，575），周武帝调集十八万大军进攻北齐。武帝亲率六军攻拔了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大城；齐王宇文宪率领的前锋也攻拔了洛口东、西二城（今河南巩县东北）。武帝麾军进围洛阳城，不克。北周的主力在攻下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南）南城之后，“围中潬，二旬不下（河阳有三城，即南城、北城、中潬。中潬在黄河中）”⑩。时北齐派右丞相高阿那肱从晋阳统率大军救援河阳，北周武帝又得了疾病，只得退兵。

第二年，即北周建德五年（576）十月，周武帝再度出兵伐齐。这次出兵的路线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出兵前，周武帝曾对群臣曰："前出河外（指去年河阴之役），直为拊背，未扼其喉。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镇摄要重，今往攻之，彼必来援；吾严军以待，击之必克。然后乘破竹之势，鼓行而东，足以穷其巢穴，混同文轨。"⑪采取的是"进兵汾潞，直掩晋阳"⑫的路线。十月下旬，北周军主力进抵平阳城（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下，北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开门降，周军进入平阳，这为周军进军晋阳打开了大门。武帝命齐王宇文宪率精兵一万沿汾水河谷向北推进。时北齐后主高纬正在晋阳，他带了冯淑妃在天池（今山西宁武县西南管涔山上）打猎，晋州告急的文书，"自旦至午，驿马三至"，右丞相高阿那肱不奏，至暮，驿使更至，云平阳已陷落，乃奏之。齐王将还，"淑妃请更杀一围，齐主从之"⑬。后北齐在晋阳集合齐军主力十万以上，出发救援平阳。时平阳已被北周攻下，北周武帝听说北齐大军南下，任命梁士彦为晋州刺史，留精兵一万守平阳城，自率六军退到玉壁（今山西稷山县南）。北齐军到达平阳后，包围平阳城，昼夜猛攻，北周平阳守将梁士彦苦守待援。北齐大军顿兵平阳城下，历一月之久，士气逐渐衰颓。此时周武帝再率军主平阳，"诸军总集，凡八万人，稍进，逼城置阵，东西二十余里"⑭。北齐军在决战前，在平阳城南掘有壕沟，北齐军队列于壕沟北面，周军在壕沟南面，两军相持不决。北齐后主左右的一批倖臣对后主说："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何为守堑示弱！"于是北齐军填堑南引，与周军接战。北齐主与冯淑妃并骑观战，齐军东翼稍却，冯淑妃惊恐地说："军败矣！"录尚书事城阳王穆提婆也说："大家（指后主）去！大家

去!”北齐后主即与淑妃奔高梁桥（今山西临汾县东北）。北齐后主一动，军心大溃。于是齐师大败，“死者万余人，军资器械，数百里间，委弃山积”⑮。平阳城下一战，北齐主力实际已被打垮。不久，晋阳城被北周军攻下，北齐后主逃往邺城。后主知大势已去，急忙把皇位让给八岁的儿子高恒（史称幼主），自称太上皇帝。周太建九年（577）正月，周军乘胜攻破鄴城，北齐终于被周武帝所灭。

周武帝灭齐后，把改革措施推广到整个北方，继续推行放免奴婢的政策，“诏自伪武平（北齐后主年号）三年以来，河南诸州人，伪齐破掠为奴婢者，不问公私，并放免之”⑯。接着，又下令东、西魏分立以来，“东土人被钞在化内为奴婢者”并免同人伍。同时释放僧祇户、佛图户，在齐境推行大举禁佛等措施。同时还颁布统一的权衡制度和《刑书要制》，规定劫盗财物，“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隐地三顷以上，皆至死”⑰。这些都促进了北方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以后隋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统一北方之后，因武帝还打算“平突厥，定江南”，造成全国统一的局面。太建十年（578）五月，周武帝出兵攻打突厥，在途中得病。六月，回长安后即病死，终年三十六岁。周武帝未竟的统一事业，遂由隋文帝杨坚来完成。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一五八，梁武帝大同十年。

②《通典·食货典·田制》引。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北史》卷七《显祖文宣纪》。

⑤《北史》卷八《后主高纬纪》。

⑥《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⑦《北史》卷一〇《周武帝纪》。

⑧⑨《广弘明集》卷二七周释昙积《谏周高祖沙汰僧表》。

⑩《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宣帝太建七年。

⑪《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宣帝太建八年。

⑫《隋书》卷六六《鲍宏传》。

⑬⑭⑮《资治通鉴》卷一七二，陈宣帝太建八年。

⑯⑰《北史》卷一〇《周武帝纪》。

三国两晋南北朝

民族大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最主要的是指十六国至北朝时期北方民族的融合，也就是从西晋永嘉丧乱至隋的统一，时间长达二百七十余年（307—581）。这么长时间民族大融合的浪潮，大体上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五胡十六国时期。西晋永嘉丧乱以后，统一的西晋政权很快就瓦解了，已经内迁的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入主中原，建立割据政权。由于这些少数民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因此他们在中原建国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多重用汉族士大夫，采用汉、魏、晋的封建统治制度，提倡儒学，振兴教育。这在当时成为一种趋势，五胡各族虽然在接受汉化上程度有所不同，但最终走向汉化的趋势则是一致的。其中尤以慕容鲜卑与氐族为突出。

鲜卑慕容廆在大棘城（今辽宁义县）建立政权后，"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②。在这些"流亡士庶"中，有不少是汉族世家的才智之士。永嘉丧乱以后，中原

人士大部分避难江东，另外一部分入河西依靠张氏，而山东、河北的一部分士族则流入辽东，投靠慕容氏，如河东裴嶷、渤海封奕、西河宋奭、河东裴开、平原刘赞、鲁国孔纂等都为慕容氏君主所任用，他们在帮助慕容鲜卑迅速汉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慕容氏的前燕很注重儒学教育，任命"儒学该通"的刘赞为东庠祭酒，慕容廆世子慕容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慕容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③。继慕容廆为君的慕容皝、慕容儁都是"雅好文籍"、"尚经学"，喜欢讲论义理，可见鲜卑慕容氏汉化之深。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氐族苻氏。前秦主苻坚生长于内地，八岁就请师受学，即位后，重用汉族政治家王猛，在政治、文化方面力求汉化，严厉制裁氐族重臣樊世等反王猛、反汉化的反动势力。苻坚的行政措施，如"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④。这完全是仿汉魏以来的施政方针。苻坚还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者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对于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清修廉直，孝悌力田者都加以表扬。于是前秦境内，"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⑤。苻坚本人亲临大学，考学生经义优劣，问难五经，他对博士王寔说："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⑥在这里，苻坚俨然以继承、维护周公、孔子以来的汉魏文化传统自居。正因为苻坚善于接受汉族文化，并付诸实施，故在纷扰的五胡十六国中，苻坚的前秦政绩最佳。史称："关陇清晏、百姓丰乐，……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

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楼。英彦云集，诲我萌黎。”⑦这虽然有所溢美，但在纷乱的十六国有如此兴旺景象，与苻坚、王猛大力推行汉化，才能取得这样的政绩，则确实无疑。可以说，苻坚与北魏孝文帝一样，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中，虚怀远见，勇于接受汉文化，对促进民族融合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物。

十六国中建立后赵的羯族，汉化程度较差。石勒少时曾被掠卖为奴，未尝读书识字。他建立政权后，采用胡汉分治的办法，称羯族为国人，歧视、压制汉人。但石勒还是重用一些汉族士人，如裴宪、傅畅、杜嘏、张宾等，酌量采用魏晋的政治制度，也立太学及郡国学官。其太子石弘“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⑧，逐渐汉化了。然而旋即继位的石虎是个非常残忍的君主，他反对汉化，激化了民族矛盾，酿成胡、汉残杀的惨局。十六国中，汉化较差的还有匈奴赫连氏建立的夏国，勃勃“性凶暴好杀，无顺守之规”，因而其国内“夷夏嚣然，人无生赖”⑨。最后为北魏所灭。

而在河西建立北凉国的卢水胡沮渠氏，其国虽小，但在保存汉魏晋以来的文化方面却很有成绩。西晋永嘉丧乱之际，张轨保据河西，后张氏建立前凉政权，中原士大夫多有来此避难者，在前凉政权七十余年的安定环境中，保存了汉、魏、晋以来的文化。沮渠氏长期与汉人杂居，接受汉化，故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⑩。进据河西后，仍然保存了前凉以来的汉文化传统，学术空气浓厚，与南朝刘宋常有文化交往，互赠书籍⑪。后北魏灭北凉，还将当地很多学者如刘昞、阚骃、阴兴、宗钦、段承根及寓居河西的程骏、常爽等迁往平城，对发展北魏前期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总之，入主中原的五胡各族，他们建立的各个政权，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汉化措施，在历史舞台上经历了一番表演之后，最终都汇合到民族同化和融合的洪流中去。

第二个阶段是北魏前期和中期，即从道武帝拓跋珪建北魏的登国元年（386），至魏孝文帝在位时（太和二十三年，499）改革的全部完成，历时110余年。鲜卑拓跋部原是塞外经济、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一支部落，僻居东北遐荒（今黑龙江省嫩江流域），后经迁徙，南下大漠，定居代北近塞。但从拓跋珪至拓跋宏，北魏总的都在推行汉化措施。

拓跋珪建国后，为了君临中原，巩固统治，不得不接受远比拓跋部先进的汉族文化，包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政治制度方面，天兴元年（398），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经术，毙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⑫。并使邓渊“典官制，立爵品，定律令，协音乐”；董谧“撰郊庙、社稷、朝觐、飨宴之仪”；王德“定律令，申科禁”；晁崇“造浑仪，考天象”；最后由吏部尚书崔宏“总裁之”⑬。在经济制度上，他“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⑭。并给内徙新户“耕牛，计口授田”。使鲜卑拓跋族由游牧经济转化为汉族定居的农耕经济。

太武帝拓跋焘通过武力征服，不仅实现了北方的统一，显示了其赫赫武功；而且在文治方面继续推行汉化措施，成绩卓著。他在灭夏、后燕、北凉等国后，大量录用其国内的汉族士大夫。神䴥四年（431），又下诏征范阳卢玄、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勃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汉族士人、州邦冠冕，“敕州郡以礼发遣”，州郡所遣至者“数百人，

皆差次叙用”⑮。太武帝又尊重儒学，重视教育。始光三年(426)，“起太学于城东，祀孔子，以颜回配”。太平真君五年(444)，“诏自三公以下至于卿士，其子息皆诣太学”⑯。

道武帝、太武帝虽推行汉化，但由于当时保守势力的强大，因而也有曲折。道武帝时，大臣贺狄干通使后秦，归国后，道武帝见其“言语、衣服类中国，以为慕而习之，故忿焉，既而杀之”⑰。而太武帝末年，也发生了汉族大士族崔浩的被杀事件。崔浩所以被杀，表面上是因为修“国书”，勒石公布，引起鲜卑拓跋部人的不满，实际上是由于他“大欲齐整人伦，分明姓族”⑱。也就是要抬高汉族世族在政治上的地位，扩大汉文化的影响。而在当时，这还不能为拓跋贵族所接受，因而崔浩被杀了，被牵连的崔、卢、郭、柳诸汉族世家大族也大量被杀，拓跋鲜卑的汉化趋势受到了又一次曲折。

但是拓跋鲜卑的汉化趋势是阻遏不了的。到孝文帝元宏时，鲜卑族的汉化便进入到了高潮。孝文帝祖母冯太后是汉人，孝文帝初即位，年幼，冯太后执政，即推行汉化，改定礼仪。孝文帝是高度汉化者，史称其“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在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自太和十年以后，诏册皆帝文也”⑲。可见其汉化之深。他执政后，迁都洛阳，进一步推行汉化措施。孝文帝实施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他运用政权的力量促使拓跋鲜卑彻底汉化，特别是从平城迁到洛阳的鲜卑人是彻底地汉化了。如通过三长制和均田制的实行，使少数族从部落贵族的统治下，变成了国家的编户；汉族人民也从宗主督护制下摆脱出

来，统一在三长制下，胡汉人民在政治上取得了一致。均田制的实行，又使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一致。改姓氏，易胡服，行汉语，定门第，把汉族的士族门阀制度推行到以鲜卑贵族为主体的各少数民族贵族之中，使胡汉之间的民族界限逐渐消失，大大促进了民族的同化和融合⑳。因此孝文帝是推动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杰出的历史人物。

第三个阶段是北魏末年的六镇起兵、各族人民起义及东、西魏、北齐、北周的对峙直到隋的统一，时间大约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是北朝汉化趋势中的一个大挫折。对此，陈寅恪先生论述说："北魏晚年六镇之乱，乃塞上鲜卑对于魏孝文帝所代表拓跋氏历代汉化政治之一大反动，……高欢、宇文泰俱承此反对汉化保存鲜卑化之大潮流而兴起之枭杰也。"㉑六镇起兵固然与镇兵反对镇将压迫、剥削的阶级矛盾有关，但也确有塞上未汉化之鲜卑反对洛阳汉化政府之性质。武泰元年（528），契胡族酋长尔朱荣进兵洛阳发生的"河阴之变"，"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㉒。北魏政权瓦解后建立的东、西魏及此后的北齐、北周，高欢和宇文泰依靠和利用的主要是六镇鲜卑的力量。

在东魏、北齐政权中，六镇鲜卑的势力很大，高欢本人是汉人之鲜卑化者，其妻娄氏是鲜卑人，其亲贵大人亦多为鲜卑人或其他族之鲜卑化者。故高欢"申令三军，常鲜卑语"㉓。挑斥、轻视汉人。北齐高洋曾问杜弼："治国当用何人？"杜弼对曰："鲜卑车马客，会须用中国人。"高洋以为讥笑他㉔。因此在北齐政权中是鲜卑人得势，反对汉人和汉化。但是东魏、北齐政权中，汉人士族的势力也是相当大的，因为这个政权是从洛阳迁到邺城的，承继的是洛阳的汉化政府。因而在

东魏、北齐，汉人与鲜卑人是有斗争的，但斗争的结果却是鲜卑人得势，它的反汉化倾向比较重，因而最后为北周所灭。

而在西魏、北周政权中，宇文氏所依靠的是武川镇的鲜卑，但它的人数和力量比东魏、北齐的鲜卑力量少得多；宇文氏虽然也有一种反汉化、维护鲜卑旧俗的逆流，如宇文泰、宇文邕都习惯说鲜卑语、恢复鲜卑复姓等，但同时，他们也推行汉化。宇文泰为了巩固政权，与强大的高齐、萧梁抗衡，他需要强大的兵力，为此他创建了府兵制，后来还扩大了兵源，使均田上的“六户中等以上，家有三丁，选材力一人”㉕来充当府兵，后来并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关陇统治集团。同时宇文泰还利用关中是西周旧壤的地理条件，任用汉人士族苏绰、卢辩等模仿《周礼》，改定官制，置六卿官，以继承西周传统文化自居。宇文泰及其继承者宇文邕推行的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使西魏、北周国力大为增强，最后终于灭掉北齐。由于此时宇文泰带进关中的六镇鲜卑与汉人之间的民族界限已经消失，故汉人杨坚以外戚代周后建立了隋朝。此时南朝的陈正处于十分腐败的时期，而北方的隋国力强大，境内的汉族与进入内地的六镇鲜卑已完全融合，因此，由隋来统一全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了。

由上述十六国至北朝经历三个阶段民族融合的情况来看，历史的发展反复证明了一个真理：“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㉖历史逃脱不了本身的发展。十六国至北朝的各族统治者采用和实施的汉化措施，加速了由较低生产方式向较高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各族人民在反

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共同斗争中，又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联系，从而使这一时期出现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其中出现的一些反汉化的曲折，不过是这个潮流中的一些回流而已，它最终是阻挡不住奔腾向前的历史潮流的。

注 释

①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有的论者认为有三次高潮，即春秋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有的论者认为有四次高潮，即除上述三次外，还有一次是清代。

②③《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

④⑤⑥⑦《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

⑧《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

⑨《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

⑩《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⑪见《宋书》卷九八《大沮渠蒙逊传》。

⑫⑬《北史》卷一《道武帝纪》。

⑭《魏书》卷八三《外戚贺讷传》。

⑮⑯《北史》卷二《太武帝本纪》。

⑰《北史》卷二〇《贺狄干传》。

⑱《魏书》卷四七《卢玄传》。

⑲《北史》卷三《孝文帝纪》。

⑳根据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民族同化与民族融合是有区别的。民族同化指一个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而融合到另一个民族中去；民族融合是指所有民族都消失掉各自的特征而溶铸为统一的新体。我们这里讲的广义的民族融合，也应包括历史上的民族同化。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

㉑《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六《兵制》。

㉒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㉓《北史》卷三一《高允传附》、《北齐书·高昂传》同。

㉔《北史》卷五五《杜弼传》。

㉕《玉海》卷一三八引《邺侯家传》。

㉖恩格斯《反杜林论》，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O卷199页。

三国两晋南北朝

范缜坚持《神灭论》

在魏晋南北朝的南朝时期，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上，涌现出了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家——范缜，他坚持的《神灭论》思想，在我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闪耀着绚丽的光彩。

范缜，字子真，约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450），卒于梁武帝天监十四年（515），原籍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北）。六世祖汪，东晋初渡江，官至安北将军，遂寓居江南。祖父璩之，官至宋中书郎。父濛，早卒。范缜少孤贫，勤奋好学，二十岁前，师从当时名儒沛国刘瓛。当时刘瓛门下多士族贵族子弟，而范缜“在瓛门下积年，去来归家，恒芒屩布衣，徒行于路”①，毫无愧色。及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②，表现出不随波逐流和不畏权威的战斗精神。

范缜仕齐为尚书殿中郎。时齐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盛招宾客，当时名士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八人为西邸上客，称为“八

友"。范缜也在子良的延揽之中。萧子良是个佞佛的信徒，范缜却不相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于是引起了争论：

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贱贫?"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坠，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③。

范缜在这一段对答里，明白地说出了人的富贵贫贱，只是偶然的际遇，与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无关。为了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范缜开始著《神灭论》。

《神灭论》初稿写成以后，立刻遭到以萧子良为首的一批佞佛信徒的围攻和嘲笑。史称"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④。当时有一个佛教信徒、太原世族地主王琰著论讥笑范缜："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因范缜主张神灭，藉此攻击他数典忘祖。范缜立即反击说："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驳得王琰无言以对。萧子良又派王融对范缜说："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可便毁弃之。"范缜听后大笑说："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⑤范缜这种不妥协、不屈服、不趋炎附势、坚持真理的精神，充分表现出唯物主义者的坚强性格。

齐建武中（494—497)，范缜由尚书殿中郎转为领军长史。不久，又出为宜都（郡治夷道，今湖北宜都县西北）太守。范缜不信佛，当然也就不相信鬼神。当时夷陵有很多神庙，范缜便下令禁断，不许奉祠。后以母忧去职，居于南州（今湖北江陵)。后梁武帝称帝，因为范缜原是西邸之友，故梁武帝任范

缜为晋安（今福建福州市）太守，“在郡清约，资公禄而已”⑥。不久，梁朝内调范缜为尚书左丞。由于他返京后在经济上资助失官在家的齐尚书令王亮（原与范缜同为尚书殿中郎，旧相友爱），因而在天监四年（505）坐徙广州。天监六年以后，又追还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大约到天监十四年（515），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与世长辞了。

范缜生活的南朝齐、梁时代，政治上动荡不定，社会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统治阶级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追求虚幻的福荫，拼命提倡佛教。佛教宣扬的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的思想又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迷惑力，它有利于封建统治者维护统治，消弥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因而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奴役劳动人民有力的精神武器。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因此在南朝的齐、梁时代，佛教在我国南方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梁朝的郭祖深说：当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僧侣）又有白徒（未出家而为僧院服役的男丁），尼则皆蓄养女（未出家而为尼寺服役的女子），皆不贯人（民）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⑦。统治阶级的崇佛、佞佛，达到了举国若狂的地步，其流毒所至，则“使兵挫于行间，吏空于官府，粟罄于惰游，货殚于泥木”⑧。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范缜继承了前人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挺身而出，公开宣传无神论思想，批判佛教的神不灭等谬论。

继萧齐建立梁朝的梁武帝萧衍，是南朝历史上最为佞佛的皇帝，他在做皇帝以后的第三年，即天监三年（504）下了一条诏令：

“大经中说道有九十六种，唯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

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外，以事正内。诸佛如来，若有公卿能入此誓者，各可发菩提心。……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入正。”⑨

这道诏令，实际宣布佛教为国教，梁朝佞佛的气氛，弥漫着全国。而范缜却在这时把他写成的《神灭论》书稿修订定稿，并在亲友中流传开来。佞佛与反佛之间展开了更加白热化的一场战斗。

当时梁朝的大僧正（最高僧官，总管全国僧侣）法云上书梁武帝说：“中书郎范轸（缜）著《神灭论》，群僚未详其理，先以奏闻。”⑩提醒梁武帝利用皇帝的威势来压服范缜。梁武帝为了加强思想统治，巩固其建立不久的政权，便组织了一场对范缜的围攻。梁武帝在《敕答臣下神灭论》的诏勅中，给范缜的《神灭论》定下了“违经背亲，言语可恶，神灭之论，朕所未详”⑪的结论。在大僧正法云的组织和提议下，当时王公朝贵六十二人都起来责骂范缜，攻击《神灭论》思想。特别是东宫舍人曹思文写了《难神灭论》和《重难神灭论》两篇诘难文章，通过诡辩给范缜加上“欺天罔帝”、“伤化败俗”⑫的罪名，妄图把神灭论学说压下去。但范缜毫不畏惧，毫不退缩，坚强地和这些御用学者论战，“辩摧众口，日服千人”⑬。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无神论者大无畏的战斗精神。

范缜的《神灭论》著作，采用问答体裁，对有神论者的种种谬论，特别是佛教的“神不灭论”，逐条地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全文一开头，就对物质第一还是精神第一这个哲学的根本问题，作了唯物主义的回答。针对佛教徒鼓吹的人有生死而灵魂永在的谎言，范缜断然宣称：“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认为人的形（肉体）和神

(精神）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肉体死了，精神也就随之消灭。他把人的肉体同精神的关系，用刀口同锋利作了极为形象的比喻。“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故“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指出人的精神对于肉体的关系好比锋利和刀口的关系一样，离开了刀口就无所谓锋利，怎么能说精神能够离开肉体而存在呢？范缜还把人的精神现象分为二部分，一是能感觉痛痒的“知”，一是能判断是非的“虑”。知即知觉，虑即思维。他认为二者有程度上的差别，“浅则为知，深则为虑”。但它们又都是精神现象的组成部分，“知即是虑”。他还认为，每一种精神作用，都是一定的生理器官所产生的。“痛痒之知”以手足为基础；“是非之虑，以器所主”。因为“五藏各有所司，无有能虑者，是以知心为虑本”⑭。在这里，尽管由于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范缜没有能够摆脱心脏主管思维的误解，但是他却正确地阐明了感觉、思维从属于人体的唯物主义观点。这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各种宗教和唯心主义派别猖獗的时候，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范缜的神灭论思想，继承了王充的唯物主义传统，是汉、晋以来无神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对于形神关系问题的论述，超过了他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所能达到的水平。他驳斥了神不灭的说法，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宗教神学的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所谓“浮屠害政，桑门蠹俗”。他主张禁断佛教，讲求“匡国”、“霸君”之术⑮。因而也有积极的实践意义。范缜不愧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伟大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

当然，和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一涉及到社会现象

时，范缜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如他认为人的富贵贫贱，完全是偶然的因素，从而陷入了宿命论，他又把所谓“圣人”与“凡人”的区别，说成是由于形体和器官上的差异。他对儒家经典中关于神道说教的一套说法也采取了保留态度等等。这些都表现出他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是其阶级和时代局限性的表现。但尽管如此，范缜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他所阐述的《神灭论》的精辟思想，在我国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永放光辉的。

注 释

①②③《梁书》卷四八《儒林范缜传》。

④⑤⑥《南史》卷五七《范云附缜传》。

⑦《南史》卷七〇《循吏郭祖深传》。

⑧《梁书》卷四八载范缜《神灭论》。

⑨《广弘明集》卷四《归正篇》。

⑩《续高僧传》卷六《梁杨都光宅寺沙门释法云传》。

⑪《弘明集》卷一〇。

⑫《弘明集》卷九。

⑬《弘明集》卷九萧琛《难神灭论序》。

⑭以上引文均为范缜《神灭论》，见《梁书》卷四八。

⑮见《神灭论》。

三国两晋南北朝

陈寿著《三国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的分裂、割据、对峙，又使封建官府保留的资料极易散失，许多学者、官吏便致力于汉史、三国史以及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的研究和编修，藉以发扬民族精神，故私家治史蔚为风气，史学名家辈出，史学著作十分丰富。其中完整地保存至今，且与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同称史学名著的，当推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南）人，他生于蜀后主建兴十一年，即魏明帝青龙元年（233），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297），终年六十五岁。他少年时，受学于蜀汉学者谯周，攻治经史，锐精《史记》、《汉书》，富有文史才能。蜀汉时，曾任观阁令史。时宦官黄皓专弄威权，“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①。入晋后，历任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治书侍御史等职。他一生研究历史，编著的史书有《蜀相诸葛亮集》、《益都耆旧传》、《古国志》和《三国志》等。其中《三国志》是他三十多岁时的成名之作，也是他的代表

作。

《三国志》，也称《魏蜀吴三国志》，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也称《魏书》）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它比较完整地、如实地记载了魏、蜀、吴三国鼎立和封建统治的史实，是继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出现的第三部史学名著。西晋的著名学者，中书令张华等人看到《三国志》以后，深为赞美，把陈寿比作司马迁、班固。其他社会人士也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②。当时以“有盛才”著称的夏侯湛正在著述《魏书》，当他见到陈寿著述的《三国志》以后，自愧不如，“便坏己书而罢”③。张华则对陈寿说：“当以《晋书》相付耳”④。陈寿卒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在上晋惠帝表中还称赞陈寿的《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晋惠帝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⑤，作为“良史”行世。晋代以后的学者，也一致认为陈寿《三国志》是和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同等重要的史学名著。南朝刘宋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谓：“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原来在陈寿撰《三国志》之前或同时，当时有关三国史的著作，有十余家之多⑥。有的写得激昂慷慨难于证实；有的写得空疏迂阔而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三国志》写得文辞质朴而辨事洽当，成为三国史的集大成者。故《三国志》出，而众史皆废。刘勰认为晋荀勖、张华把陈寿比作司马迁、班固那样的良史，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赞誉。可见南朝时人对《三国志》的评价，就很高了。唐代学者房玄龄等人也认为魏晋人可

以像左丘明、司马迁、班固那样“继明先典”的，惟有“陈寿得之”⑦。

陈寿的《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如曹操为《武帝纪》，刘备为《先主传》，孙权为《吴主传》。因之，《三国志》是以曹魏为正统的。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以晋接汉，以刘备为正统。司马光作《通鉴》以魏纪年。朱熹作《通鉴纲目》又以蜀汉纪年。宋人萧常作《续后汉书》，元人郝经也作《后汉书》，都为刘备争正统。这些书实际是为各自成书时的政治服务。习凿齿是东晋人，朱熹、萧常是南宋人。东晋、南宋形势和蜀相似，尊蜀即是为本朝争地位。陈寿用魏作正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的。因晋受魏禅让，如不承认魏，即是间接不承认晋。陈寿身为晋人，写史不为晋朝政治服务是不可能的。但陈寿把三国分开写，表明三国鼎立，不相统摄，这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实际上，蜀、吴诸王传中，仍按编年记述，只是名义上不称本纪而已。故刘知几《史通·列传》篇言：“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

陈寿《三国志》的一个重要特色是叙事审正，文辞朴实，故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⑧。但本传又说：“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又谓“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王隐《晋书》，言陈寿撰《蜀志》，以“爱憎为评”，所指也只是《诸葛亮传》。自《晋书》有陈寿索米之说后，历代学者，如北周柳虬、唐刘

知几，清朱彝尊、杭世骏、王鸣盛、钱大昕等有言其有，有言其无。潘眉《三国志考证》言“丁仪、丁廙，官不过右刺奸掾及黄门侍郎，外无摧锋接刃之功，内无升堂庙胜之效，党于陈思王，冀摇冢嗣，启衅骨肉，事既不成，刑戮随之，斯实魏朝罪人，不得立传明矣。《晋史》谓索米不得不为立传，此最无识之言。同时如徐干、陈琳、阮瑀、应瑒、应璩、刘桢、吴质、邯郸淳、繁钦、路粹、杨修皆无传，益足证《晋史》之诬”。陈寿在晋朝屡为人所排挤，且同时人修史也有许多难如人意之处，故《晋书》这段记载明显与上文称陈寿为良史，自相矛盾，显系诬蔑之词，不足征信⑨。至于陈寿写诸葛亮传，谓亮“将略非长”，是否因寿父被髡，故以“爱憎为评”呢？清代学者也早有公论。王鸣盛在《陈寿史皆实录》一目中说：“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为张郃所破，初未尝以私隙咎亮。至谓亮将略非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之私言也。”又言“亮六出祁山，终无一胜，则可见为节制之师，于进取稍钝，自是实录”⑩。赵翼在《陈寿论诸葛亮》一目中也说：“观寿校定诸葛亮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又《诸葛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因而赵翼认为“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⑪。因此陈寿《三国志》叙事之审正、可信，实为一大特色，陈寿真乃良史之才。

陈寿所著《三国志》，不仅叙事审正、简要，议论也有见地。他在纪传后面不用论赞，而称“评曰”。如评曹操“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

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⑫。评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⑬。评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猜疑，果于杀戮”⑭。评诸葛亮“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评关羽、张飞“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⑮。这些论断，明有褒贬，实属公允。

《三国志》在编撰上比前史也较精密，全书前后贯串，事不重复。见于《魏志》，则《吴志》、《蜀志》不重出；见于《吴志》、《蜀志》的也是一样，前后矛盾较少。因此之故，《三国志》出，其余三国史便都废而不用。

陈寿所著《三国志》，虽铨叙可观，“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因此到南朝宋文帝时，中书侍郎裴松之为之作注。“上使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为不朽矣’”⑯。裴注上于元嘉六年（429），先范晔《后汉书》而成。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提出注书四例。其一曰：“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约184至280年间事），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采取，以补其阙。”其二曰：“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其三曰：“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四曰：“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⑰。裴松之所上注书四例，概括起来就是（一）条其异同；（二）正其谬误；（三）疏其详略；

（四）补其阙漏⑱。在裴注中，引用的书籍，多至二百一十种，注文总数超过《三国志》正文三倍，差不多有关三国的重要史料，全部在注中保存下来。特别是裴松之征引的书籍，今天绝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依靠裴注，我们还能了解这些书的梗概。因而裴注的史料价值，并不弱于《三国志》。像裴松之这样注《三国志》的方法，与其说是注史，毋宁说是补史。

这样，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加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成为历代学者研究三国史事的基本典籍。

注　释

①②③④⑤《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⑥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下册。

⑦《晋书》卷八二史臣曰。

⑧《晋书》卷八二《陈寿传》。

⑨参见柴德赓《史籍举要》。

⑩《十七史商榷》卷三九。

⑪《廿二史劄记》卷六。

⑫《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

⑬《三国志》卷三二《蜀书·先主传》。

⑭《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权传》。

⑮《三国志》卷三六《蜀书·关羽·张飞传》。

⑯《宋书》卷六四《裴松之传》。

⑰卢弼《三国志集解》载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

⑱详见柴德赓《史籍举要》。

三国两晋南北朝

曹氏父子的诗歌成就

三国时期，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都获得重大发展。尤其在建安年间（196—220），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诗人，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①的现实主义精神，在文学史上开创了被后人称为“建安风骨”的一代文风。

“建安风格”，是指建安时期的诗歌，以情辞慷慨，格调刚健为共同的风格特征。关于建安风骨，始见于刘勰《文心雕龙·风骨》。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又说：“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他说建安时期的诗歌，“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说明建安诗歌是以它深厚的社会历史内容（“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和遒劲浑成的风格（“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形成了自己的刚健“风格”。建安文学，实际上并不限于建安年间，大致还应包括曹魏黄初、太和（220—232）这一段时间，总体上大约有37年（196—232）时间。

建安文学是我国中古文学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期，它是在曹氏父子的提倡、带动下发展起来的。他们开始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不再把文学当作阐发经义的工具，而是用来反映现实生活和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使文学出现了新的面貌。它以五言诗领先，突破了两汉以来辞赋居于主导地位的局面。以它浓厚的社会内容和遒劲浑成的风格铸就了自己刚健的“风骨”。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形容当时五言诗的盛况：“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趋。”说明建安诗歌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曹操父子、王粲、陈琳、蔡琰等人。

曹操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有很高的才能；在文化上，也有卓越的贡献。他酷爱汉代乐府民歌，努力学习汉乐府的优良传统。曹操的诗歌，留传到现在的有二十二首，几乎全部都是乐府。这些诗歌刚健、质朴，情调十分悲凉，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为《蒿里行》：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指董卓等）。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

淮南弟称号（指袁术），刻玺于北方（指袁绍亦欲称帝）。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这首诗以生动形象的语言，控诉了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

苦难。诗的风格十分朴素、刚健。他所以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是因为他对人民的疾苦有着深切的同情，他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目击者，像这样的好诗，还有《薤露行》、《苦寒行》等。

曹操在一些诗中，也常常写出自己建功立业的理想。他在《对酒》、《度关山》等诗中写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说："天地间，人为贵"。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他的《龟虽寿》一诗，表现了他的雄心壮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种老当益壮的英雄气概，对人们起着鼓舞的作用。他的《短歌行》，虽然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感叹人生短促的消极面，但结尾的"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是以周公自比，反映了他要收揽全国人才，统一全中国的雄心壮志。

曹操在取得冀州以后，为了抗击三郡乌桓的侵扰，率军途经碣石山（今河北昌黎县），写了一首《碣石篇》的乐府，其中的《观沧海》写出了大海的汹涌、壮伟的景色："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通过写大海的宽广，以及波涛的起伏，显出一种奇丽之状，反映出作者宽阔、雄壮的情怀。这是我国写景诗中最早的名作。

曹丕字子桓，曹操次子，继承了曹操的魏王位，代汉称帝，史称魏文帝。他爱好文学，在文学上的成就，诗和文学论都极著名。他的诗和曹操一样也是多数脱胎于乐府的。但在风格方面则有显著区别。曹操的诗内容多属叙事，诗风质朴、悲凉；曹丕的诗则偏于抒情，风格较为华美，更多感伤的情调。他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七言诗《燕歌行》。通过主人公的

动作和当时的自然环境来刻划人的心理，写得十分细致。如收尾部分，写那个妇女见到："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生动地渲染了人物的内心活动，使人感到富有情趣。曹丕作品的主要缺点是反映的生活面窄，这是和他久于宫廷生活分不开的。他的《上留田行》一诗，把"富人食稻与粱"、与"贫子食糟与糠"的社会现实，归因于"禄命悬在苍天"。这是充分表现出他思想中的落后成分，比起曹操和曹植来，显然要逊色得多。

曹植，字子建，曹丕的同母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学教养，"年十余岁，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②。他在兄弟中表现得最有才能，曹操曾考虑立他为太子。后来因听信谗言，认为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饬，饮酒不节"③，动摇了对他的信任。此议终未能实现，却因此引起曹丕对他的猜疑。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即位以后，便不断对曹植加以监视和迫害。于是曹植的处境便由一个贵族公子一变而为名是藩王，实则囚徒的处境 。他在曹丕和曹睿（魏明帝）的统治下，悲惨地生活了十二个年头，于四十一岁时郁郁地死去。

曹植在诗歌创作上，比曹操、曹丕更注意乐府民歌语言的加工和提炼，因而他的诗在描写上更为细致饱满，形象更为具体生动，抒情气氛更加浓厚。他的作品，根据他平生的经历，大致可分前后两期，分界线就是曹魏黄初元年（220）曹操之死，曹丕即位。在前一时期中，曹植的生活是优裕的，情调比较乐观开朗，诗作主要以表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见长。代表作有《名都篇》和《白马篇》。前者对整天斗鸡走马、虚度光阴的京洛少年作了有力的讽刺。后者则写立功沙场的"幽并游侠儿"们武艺高强，勇于报国立功。他的《送应氏》诗，对洛阳

残破的景况流露出深深的悲悯："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表明他因为"生于乱，长于军"之故，对人民遭受的灾难有所同情。

曹植后半期的作品，由于地位的变化，生活经验更丰富了，对人民的疾苦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因此作品的题材更广泛，概括的生活更丰富，风格上出呈现出沉郁的气象，艺术成就更高了。有代表性的如《呈白马王彪》。这首诗是写自己所遭受的迫害，抒发了他和白马王曹彪分别时的骨肉之情。其中有悲愤的疾呼，有凄惋的倾诉，也有生动的景物描写，感情真挚而亲切。《泰山梁甫行》写海滨人民的痛苦生活：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者边海民，寄身于草野。
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流露出诗人对海滨人民深切的同情。他的《野田黄雀行》，借黄雀比喻自己深陷罗网的处境，情调非常愤怨。曹丕为了剪除曹植，以曹操死后曹植不来奔丧为借口，派人把他抓到洛阳来问罪。并以"兄弟"为题，限他在殿上走七步做成一诗，否则要立即斩首。曹植却随口成章：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诗中以萁豆相煎，比喻骨肉相残，表露了他对曹丕的不满。曹植在辞赋方面的成就也很高，《洛神赋》是他的代表作。他采用神话传说中的洛水女神宓妃的故事作素材，塑造了一个"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神女形象，写得十分细致和生动，比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更完整、更形象。

除三曹外，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还有“建安七子”，他们是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应玚（yáng 羊）。其中王粲的《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

王粲《七哀诗》的第一首，描写其随汉献帝迁都长安，董卓死后，汉献帝初平三年（192）避李傕、郭汜之乱，从长安南下荆襄途中的见闻和感受：

西京（长安）乱无象，豺虎方遘患。
复弃中国去，远身适荆蛮。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
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
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长安。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

作者在这里控诉了造成“白骨蔽平原”惨象的封建统治者的罪恶，表现了对人民的深厚同情。

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全诗用对话的方式，从筑城卒与妻室的书信对答中，揭示出筑城苦役带给人民的灾难。筑城卒对妻子的嘱语：“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公婆），时时念我故夫子。”充分表现了役卒无生还的希望及作为一个男子的不幸。诗中还告以长城下死人之众的惨象：“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诗的最后以其妻子表示不能独活而结束：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该诗既是一篇对封建徭役制度沉痛的控诉书，又是一篇对劳动人民坚贞爱情的颂歌。

建安时期还有一位著名女诗人蔡琰。蔡琰字文姬，陈留圉（音宇 yǔ）县（今河南杞县）人，是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她的一生遭遇非常不幸。年轻时嫁给河东卫仲道，因夫死无子，回父家寡居。汉末大乱，为董卓部下的胡骑掳去，居南匈奴十二年，嫁给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建安十二年（207），曹操把她赎回，改嫁给同郡人，屯田都尉董祀。蔡琰的代表作是五言《悲愤诗》。这首诗叙述了作者悲惨的经历，把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起来。长诗从蔡琰被凉州军的乱兵所掳写起：“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揭露凉州军的残酷和被掳者的悲惨、非人生活。接着又写她在匈奴地区的思乡之情。当写到曹操赎她回汉，母子惜别的情景时，长诗用“儿前抱我颈，问母何所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把与亲生骨肉别离时的痛苦心情、矛盾心理深刻、细致地刻画出来，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在文学方面的另一项成就，是文学批评的发展。曹丕是文学批评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著。该文强调了文学作品的政治作用和社会价值，认为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他分析了诗赋、奏书、铭诔等文体各自的特点：“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质，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由于体裁不同，写作技巧就不能一律。一个作家往

往只能擅长一种或几种文体，所谓“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他还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也就是说，作家的创作各有其个性和风格，不可强求一律。他们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他历数了当时“建安七子”的长处和短处，指出“文人相轻”的作风是有害的。曹丕的这些论述，对提高作家的地位，扫除文人相轻的恶劣风气，促进文学创作的自由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对后世的文学批评著作，如晋代陆机的《文赋》、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也都有深刻的影响。

注　释

①乐府民歌：乐府是汉武帝时开始设立的专门掌管音乐的机构，负责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和收集民歌。乐府民歌是指乐府收集和保留的民歌。

②③《三国志》卷一九《魏志·陈思王植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南北朝乐府民歌

从晋室南渡到隋代统一二百五十余年（317—589）时间内，南北呈现着对峙的局面。在这长时间内，北方的汉人大量南移，边疆的少数民族入居内地，造成了民族间的长期斗争。中国固有的文化，开始遭受重大的摧残，但久而久之，南北则渐趋同化，然而由于经济基础的悬殊，政治环境的差异，以及地理、风俗等各方面的不同，在文学上便形成南北不同的色彩和风格，在这一时期的乐府民歌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南方的民歌，形成以短小为主，内容以抒情见长。或写相恋的喜悦，或写失恋的悲伤，或写送别的心情，或写相思的痛苦。它主要分《吴声歌》和《西曲歌》两大部分。《吴声歌》是长江下游，即建康、扬州一带的民歌。所谓"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康，吴声歌曲起于是也"①。《西曲歌》是长江中游的的民歌，它"出于荆、襄、樊、邓之间"②。这些作品，原来大都流传在人民口头，后来由专管音乐、民歌的乐府收集起来，被之管弦。北朝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隋平陈后，"因于太常置清商署

以管之”③，故南朝的民歌，也被称为《清商曲辞》。

《吴声歌》保留在《乐府诗集》里的共有三百多首，曲调有《子夜歌》、《读曲歌》、《春歌》、《秋歌》等，内容则几乎全是情歌。其中有描写爱情欢乐的，如：

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子夜歌》

春倾桑叶尽，夏开蚕务毕。昼夜理机丝，知欲早成匹。——《夏歌》

有写相思之苦或对恋爱不自由进行控诉、抨击的，如：

自从别欢来，何日不相思。常恐秋叶零，无复莲条时。——《秋歌》

未敢便相许。夜闻侬家论，不持侬与汝（不肯把我嫁给你）。啼著曙（哭到天亮），泪落枕将浮，身沉被流去。相送劳劳渚，长江不应满，是侬泪成许（如许，这样）。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用）？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华山畿》

《吴声歌》不仅感情细腻，缠绵婉丽，而且在表现方法上，常常喜欢用双关隐语。如以“莲”喻“怜”，以“丝”喻“思”以“匹”喻“匹配”，以“藕”喻“偶”，以黄连之“苦”，喻相思之“苦”，以“芙蓉”喻“夫容”等等。如

遣信欢不来，自往复不出。金铜作芙蓉，
莲子何能实。——《子夜歌》

登店卖三葛，郎来买丈余。合匹与郎去，
谁介断粗疏。——《读曲歌》

同时，南朝的民歌，又往往采取问答的形式，男女一唱一

答，所谓"郎歌妙意曲，侬亦吐芳词"（《子夜歌》）。双关语的运用，既丰富了想象思维，又增加了委婉含蓄。这是《吴声歌》的一大特色。

流行于荆楚地区的《西曲歌》，目前保留在《乐府诗集》里的有一百四十多首，曲调有《石城乐》、《乌夜啼》、《襄阳乐》、《三洲乐》、《采桑度》、《作蚕丝》等，其内容也大都是描写男女之间的恋情，但更多的是描写水上船边的离愁别绪。如

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

缠绵自有时。——《作蚕丝》

吴中细布，阔幅长度。我有一端，与郎作裤——《安东平》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

交郎到头还。——《那呵滩》

《西曲歌》在男女情感的表现手法上，较《吴声歌》要勇敢热烈，没有吴歌中那种特有的娇羞细腻的情态。语言则较朴素大方。这正是《西曲歌》的主要特色。《西曲歌》中描写商人重利、思妇离情的一些诗作，也反映着当时商业经济的发展。

北朝民歌，则与南朝民歌不同。一是北朝民歌偏重于反映社会生活，如战争与尚武精神、社会、婚姻、农牧生活等，题材远比南朝民歌宽广；二是北朝民歌的特色是粗犷豪放，激昂慷慨，不像南朝民歌那样委婉、细腻，即使写男女之间的情爱，也是直率的、热烈的，语言刚健。北方民族的风尚与气质，北方苍茫辽阔的自然环境和连年不断的战争，都促成了北

方民歌风格的悲凉、豪放。三是北朝民歌中，有少不本身就是鲜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歌曲。在《乐府诗集》中，北朝民歌计约70首。按其同容来说，可分如下几类。

（一）反映民族迁徙和流动的：

陇头流水，流离西下。念我一身，飘然旷野。
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
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指关中），
心肝断绝。——《陇头流水歌辞》
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
何当还故处。——《紫骝马歌辞》
朔马心何悲，念旧心中劳。燕雀何徘徊，
意欲还故巢。《朔马谣》④

（二）有歌颂尚武精神的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
剧于十五女。《琅琊王歌辞》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地，
群雀向两波。《企喻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蓬。左射
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
《李波小妹歌》⑤

（三）战歌方面的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跋黄尘下，
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辞》
放马大泽中，草好马著膘。牌子铁裲裆，
铉矛鹦尾条。——《企喻歌辞》
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

肝。骣騘父马铁瑕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骣騘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陇上歌》⑥

（四）反映男女相恋的

侧侧力力（叹息声），念君无极。枕郎左臂，

随郎转侧。《地驱歌乐辞》

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

蹀坐郎膝边。《折杨柳歌辞》

（五）反映农牧生活的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敕勒歌》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牧歌，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过去人们一向认为，这首歌是北齐斛律金所作，或认为它是敕勒族的民歌（关于斛律金其人，可见《北齐书》本传。关于敕勒族，可见《魏书·高车传》）。但据《乐府广题》载："北齐神武攻周玉壁，……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由此可见，这首歌实际上并不是斛律金所作，也可能不是敕勒族（今新疆维吾尔族）的民歌，而是鲜卑族民歌，由斛律金介绍译为汉语。至于歌名《敕勒歌》，那是由于这首歌描述的是敕勒川的景致的缘故。《敕勒歌》只有短短 27 个字，寥寥数语却把苍茫辽阔、牛羊繁盛的大草原景象真实地勾勒出来，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具有无比的魅力，是北方民歌中的名篇。

北朝乐府民歌最杰出的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木兰诗》，

它与建安时期的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同为南北民间叙事诗的两大代表作。《木兰诗》全文三百多字，内容是写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木兰为了捍卫国家，女扮男装，代父出征，转战疆场十年之久，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战争结束后，她不慕官爵，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并恢复了自己的女儿装，情愿过原来的劳动生活。《木兰诗》的全文如下：

>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回故乡。”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出门看伙伴，伙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两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关于这首《木兰诗》的著作年代，古人早有讨论，如《后村诗话》、《艺苑卮言》俱有成于唐代之说，近人也有主张成于唐代说，该说的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

（一）《乐府诗集》有唐人韦元甫拟作《木兰辞》一篇。并且解题中说："按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也。"后人因疑《木兰辞》原作，亦出自唐人韦元甫之手。

（二）歌中的"策勋十二转"为唐代官制。唐制勋官"凡十有二等，十二转为上柱国，十一转为柱国"⑦。歌中的"明驼"为唐代驿制。

（三）"万里赴戎机"以下四句，似唐人诗格。但是，这些理由均不能推翻《木兰诗》是北朝时代的作品。我们拿《木兰诗》的前六句，同《折杨柳枝歌》中"敕敕何力力"六句比较：

> 敕敕何力力，女子临窗织。不闻机杼声，只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可以看出，两者差不多完全相同，这是《木兰诗》出于民间的一个证据。《木兰诗》原歌与韦元甫的拟作，显然有不同的色彩。原歌的民间风格、质朴俚俗的语调、天真活泼的描写，都与拟作的雕饰，做作迥然不同。至于唐代的制度与诗格的混入，那是民间歌谣被后人删改、润色的证明，并不能说明原作出于唐代。因此，《木兰诗》的原作应该说是成于北朝，但后来加入了隋唐人的修饰。

《木兰诗》在中国古典诗歌里，初次塑造出一个典型的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她生命的充沛与情感的活跃，加上北方伟大的自然背景，组成了一组雄健刚强的交响乐。全诗的艺术特色是故事性强，布局严谨，描写生动，富有音乐的美感，发扬了民歌的独特风格。如不少排比句的运用，回环重迭，像"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等四句，"旦辞爷娘去"，"旦辞黄河去"八句，"爷娘闻女来"六句等都是民歌风格，把木兰出征

前后的心情刻画得非常细腻、突出。“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只用了六句 30 个字，就概括了长期紧张、艰辛的沙场生活，刻画了木兰的英雄气概。结尾部分，木兰脱去男装，恢复女装，雄兔、雌兔四句的比喻，十分新奇，形象鲜明，也有民歌色彩。因此，《木兰诗》是我国古典民歌艺术的杰作，它歌颂了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英勇杀敌和功成不居，成为千百年来人民颂扬和美好理想的化身。

注　释

①③郭茂倩《乐府诗集》四四。

②《乐府诗集》四七。

④见《晋书》卷一二二《吕光载记》。

⑤《北史》卷三三《李孝伯附子安世传》。

⑥《晋书》卷一〇三《刘曜载记》。

⑦《唐六典》卷二。

三国两晋南北朝

北朝的石窟艺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不仅寺宇林立，僧侣众多；而且还在今新疆、甘肃、陕西、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开山凿窟和雕塑佛像，因而使这些地区至今仍保存着许多石窟和数以千万计的佛像。这些宗教艺术作品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其中的北朝雕刻艺术，就是我国古代艺术宝库中的明珠，而云岗和龙门石窟造像，就代表了北朝雕刻艺术的最高成就。

云岗石窟位于今山西大同市西郊 15 公里的云岗堡武州山南麓，石窟东西绵延约一公里。大同原名平城，是北魏初期的都城。平城附近的云岗，有长约一公里的天然石窟（北崖），因此，从笃信佛教的魏文成帝兴安二年（453）开始开凿，相继在云岗崖上开凿了大小洞窟五十三个，其中大型石窟二十一个，中小型洞窟三十二个，计有大小造像十万尊（现存五万多尊），以及其他雕刻艺术品，成为我国最大的石窟群之一。

在云岗石窟中，最负盛名的是“昙曜五窟”和方塔洞第六窟。

昙曜五窟因昙曜主持开凿而得名。昙曜是文成帝拓跋浚时的沙门统（亦称僧统，掌全国僧尼事务），他所主持开凿的五个洞窟现编号为16—20，这些洞窟中的主像既是大佛，在造型上又具备当时帝王的形象特征，分别象征文成帝拓跋浚、景穆帝拓跋晃，大武帝拓跋焘、明文帝拓跋嗣、道武帝拓跋珪。《魏书·释老志》载：每窟“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万代”。这些佛像形象多广额高鼻，长眉丰颐，很似北魏鲜卑族的体征。体态衣纹多劲直，形像严肃，特别是大像更显得雄伟健壮，显示北方民族骠悍、粗犷、豪放的气质。服装则仍是印度的偏袒右肩的袈裟，衣褶多紧密贴体，且有犍陀罗式的造型风格。刀法多尚平直，棱角锋利，既新颖又原始。五窟大佛中，最高的为16.8米。这是云岗石窟中最大的一尊。

方塔洞第六窟，是魏孝文帝为其亲母文明太后冯氏祈福而开凿的。该窟建造庄严华美，洞口有一座四层的大楼阁，洞内从地面到顶高二十米，中间矗立一个大方塔柱。塔柱的主要部分都刻了佛像，以及各处不同的图案装饰，诸如手执乐器而凌空遨翔的飞天，头顶重物而神情欢洽的侏儒，色彩鲜艳而错落有致的莲花等等，使整个洞窟显得富丽堂皇。这一窟佛像的长裳下部翻转飘扬，与“昙曜五窟”中佛像的服装紧贴躯体有明显不同，显示出宽缓的形象。窟内十七幅表现佛经故事的浮雕，人物动态也显示出汉族传统艺术的风格。这些都是鲜卑人进一步汉化的反映。

云岗石窟的雕刻，构建了一幅封建统治的和谐图。大佛像高大雄伟，象征着皇帝的至高无上。其他佛像各按品级错落有致，环绕着大佛；自然界的山和水，动物和植物，人世的苦乐

悲欢，也都被理想化了。担负沉重苦役的侏儒（短小、壮健的一种造像），也显得神情欢洽，统治者在这里借助宗教艺术，引诱人们忘记现实的苦难，顺从皇帝的意旨，起着“潜移默化”的麻醉作用。

云岗石窟的雕刻艺术，继承了秦汉以来的艺术传统，吸取和融合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精华，形成其特有的艺术风格，对后来隋唐雕刻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北朝的佛教中心随着南迁，石窟的建造也从云岗的武周山移到了洛阳的伊阙。

伊阙石窟又称龙门石窟，在今河南省洛阳市南二十五里的伊水入口处两岸。东山称香山，西山称龙门山，伊水自南而北穿流其间。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迁洛后第三年(498)，中经东魏、北齐、北周、隋、唐诸朝，连续营造历四百年之久。石窟分布在两山的崖壁上，计西山有 28 处，东山有 7 处。计大小窟龛 2137 个（窟 1352，龛 785），佛像 10 万多尊，文字题记和碑刻 3600 多品。最大的佛像（奉先寺卢舍那大佛）高达 17.14 米，最小的佛像仅 2 厘米，另有 40 余座佛塔。在这些石窟石龛中，北朝的窟龛占百分之三十，唐代的窟龛占百分之六十，其他各时代的占百分之十。北朝开凿的窟龛都在伊水西岸的龙门山，最著名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

古阳洞开凿于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洞北壁上留下了一幅北魏贵族穆亮在这一年写刻的铭记。到太和二十二年（498）比丘慧成正式营建古阳洞石窟，造了一尊石佛。在洞壁的四周，刻有许多浮雕和小龛。在古阳洞内，还保存了许多著名的碑刻书法作品……造像记，占了“龙门二十品”中的十九品，

其中如"长乐王丘穆陵亮夫人尉迟氏碑"，便是这一时期书法艺术的珍品。古阳洞石窟不仅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石窟，而且还有着突出的特点，即石窟中多中小佛龛和题有雕刻年月的铭记，雕刻工艺精致工整、华美无比。

宾阳洞是龙门石窟中最堂皇的佛洞之一。位于龙门西山北部，可分为中、南、北三洞。宾阳洞一般是指中洞而言。据《魏书·释老志》载："景明初（500），世宗（宣武帝）诏大长秋卿白整准照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孝文帝）、文昭皇太后（高氏）营石窟二所。……永平中（508—511），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500）至正光四年（523）六月以前，用工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后洞则为孝明帝元诩所营建。前后历时凡23年，用工八十余万，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宾阳洞计深12米，宽10.9米，高9.3米。洞口两侧，各有一粗手大脚的力士。洞内共有11尊大佛，后壁中央是本尊释迦牟尼的坐像，坐高4.8米。本尊的面相略长而清秀，高髻长鼻，大耳垂肩，双眉作弧形而略扬，两目如下弦之月，嘴唇稍厚而嘴角向上，表情温和而隐作微笑。在本尊的两侧，还有右侍阿难和左侍迦叶。

在洞内的南北两壁上，另有三尊释迦牟尼立像、两罗汉立像和两菩萨立像。这些造像的胸部平直，面部严肃。在圆穹形的洞顶上，有精美的藻井图案。它的正中是一大朵莲花，莲房裸露，莲子饱满，周边为宝石、钱币花纹组成的流苏，构成莲花宝盖，旁边更有小莲花，以及八个伎乐天和两个供养天人。

洞口两壁，原有两幅大型浮雕《帝后礼佛图》、《太后礼佛图》，分别刻着以北魏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冯氏为中心的几十

个人物组成的礼佛行列场面。浮雕人物形象逼真，十分精美，艺术价值很高。但是，这两幅艺术珍品以及龛壁洞顶的飞天等，早在1934年就被美国人普爱伦盗走，现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这是帝国主义掠夺中国宝贵文化遗产罪行的铁证。

此外，在龙门石窟中，还有北魏太和二十三年（498）开始凿刻的老龙洞，孝昌三年（527）前后开凿的莲花洞，正光四年（523）开始凿刻的“魏字塔”，以及药方洞（北魏至唐时开凿）里凿刻的北齐时的140多个古药方①。

龙门石窟初创阶段的造像，还带有明显的云岗早期犍陀罗艺术的风格，而至北魏迁都洛阳之后的太和末年及宣武、孝明时期，其造像风格、题材内容及艺术表现手法，均受到激烈变革中的北魏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一时期所有佛、菩萨的衣饰，多表现为“褒衣博带”的名士风度，这说明孝文帝汉化政策在雕塑艺术上的影响②。

总之，龙门石窟雕刻在中国佛教雕刻史上，是由古拙走向精美，由摹拟走向现实的重要时代的产物。它与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有了显著的变化，属中原文化体系。其造型手法和制作手法，已与云岗有了显著的区别③。

注　释

①见《洛阳市文物志》。

②参见宫大中《北魏汉化新窟——宾阳洞》，载《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4期。

③参见王子云《中国雕塑艺术史》。

三国两晋南北朝

郦道元注《水经》

我国地理学的发展，历史悠久。战国秦汉以来，由于生产的发展，政治上的逐渐统一，交通和各地区经济联系的加强，使人们的地理知识大大扩展，于是产生了像《山海经》、《尚书·禹贡》、《史记·河渠书》、《汉书·地理志》这样一些重要的地理著作。它们或以名山大川作为自然区划来描述祖国的地理概貌，或以政区疆域为纲来述说各地的地理状况。

大约在三国时候，我国又出现了一部以全国水道为纲的地理著作——《水经》。关于《水经》的作者，唐、宋时代的著作，都说是汉代桑钦所作。但据清代学者的考证，认为这部书不是西汉桑钦所作（桑钦所撰《水经》早已失传），大概是三国时人所撰写。至于这部《水经》为何人所撰，由于原书没有留下作者姓氏，而郦道元为之作注时所写的《水经注序》中，也未曾提及，所以已经无法查考了①。《水经》这部书共记述了河道一百三十七条，并简明地叙述了河道经过的郡县、都会的名称。自晋朝以来，为《水经》作注的有两家：一是晋朝人郭璞注三卷，他所注的《水经》，大概就是桑钦所著的《水

经》，现已失传。另一部就是北魏郦道元为三国时人所撰的《水经》作的《水经注》四十卷②。

郦道元（472？—527）③，字善长，涿州人（今河北省涿县），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地理学家。其曾祖父郦绍，仕后燕慕容宝，为濮阳太守，以郡降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出任兖州监军。祖父郦嵩为北魏天水太守。父亲郦范太武帝拓跋焘时，给事东宫，文成帝拓跋濬时，封为男爵、子爵，为征南大将军慕容白曜司马，因定三齐有功，出任青州刺史，并进爵为侯，入朝为尚书右丞。孝文帝拓跋宏时出任平东将军、青州刺史，假范阳公④。郦道元为郦范长子。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跟随父亲游历山东。太和十八年（494），他出任尚书郎。父亲郦范死后，他袭封为永宁侯，又按例降为永宁伯。先在皇宫担任书侍御史。景明中（宣武帝年号），为冀州（今河北冀县）镇东府长史，“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后为鲁阳郡（今河南鲁山县）太守，“表立黉序，崇劝学教”。延昌中（宣武帝年号）为东荆州（今河南唐河县）刺史及河南尹（今河南洛阳）等职。重返朝廷后，历仕黄门侍郎、侍中、摄行台尚书，又除御史中尉。道元“素有严猛之称”⑤，在御史中尉任上，他敢于弹劾皇叔、汝南王元悦，并将元悦的嬖近小人丘念处死。因此之故，郦道元被元悦、城阳王元徽等排挤出朝廷，出任当时已露反状的雍州刺史萧宝夤所在地的关右大使。结果，郦道元在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附近）被萧宝夤的叛军所包围，由于“水尽力屈”，叛军逾墙而入，郦道元与其弟、二子均被害⑥。郦道元被害的这一年是孝明帝孝昌三年（527）。

郦道元的《水经注》一书成于何时，《魏书》、《北史》郦道元本传均未作说明，但书中所出现的最后一个年代是延昌四

年（515），而郦道元的被害在孝昌三年（527），因此《水经注》的成书，也必定在延昌至孝昌这十余年的时间之内。这一段时期，宣武帝元恪死，孝明帝元诩继位，胡太后临朝，北魏朝政江河日下，昔日孝文帝元宏欲统一中国的遗愿已无法实现。郦道元痛感朝政的腐败，利用他多年积累的资料，来著述《水经注》这部巨著，将他的爱国主义情感，倾注在这一著作之中，以表达他对祖国的无比热爱和满腔希望。

郦道元为什么要为《水经》作注？他在《水经注》的序言中说："昔《大禹记》著山海，周而不备；《地理志》其所录，简而不周；《尚书》、《本纪》、与《职方》俱略；都赋所述，裁不宣意；《水经》虽粗缀津绪，又阙旁通。所谓各言其志，而罕能备其宣导者矣。"这说明由于过去的一些地理书籍记载过于简单，不能全面详尽地把祖国的地理历史情况、风土人情都记载下来。因此，他选择了《水经》作为底本，采用作注的形式，写了一部独具风格的综合性的地理巨著，藉以寄托他的爱国之情。

郦道元的《水经注》全书约30万字，超过《水经》原书20余倍。全书包括沿革地理、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的各个方面，是一部以水道为纲，综合全面，内容完备的地理名著。它不仅全面记载了我国辽阔疆域内的山川河流的源流与变迁，而且还记述了各地的地形矿藏、农田水利设施，考订了有关郡县、城邑的沿革盛衰，记录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古迹、民间传说等，为后世研究有关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根据和线索，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价值。例如在自然地理方面，《水经注》详细记载了我国境内主要河流水文地质方面的情况，它记载的河流达1252条⑦，比《水经》所记137条几乎多10

倍。而且大都记载了它们的发源、流程和归宿，揭示出这些河流的自然地理特点。如发源于太行山南麓或西麓的清水（今卫河）、沁水（今沁河）、淇水（今淇河），《水经注》指出清水是"上承诸陂散泉，积以成川"；而沁水则源出"名远县羊山头世靡谷，三源奇注，迳泻一隍，又南会三水"而成；淇水之水源则由沮洳山的瀑布争流形成⑧。《水经注》中还记载了大量淡水和咸水湖泊的变迁、河流湖泊分布地区动、植物的分布与变迁等，在研究自然地理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经济地理方面，《水经注》详细记载了古代劳动人民修造的堰渠分布和溉田亩数以及各地的特产。如卷一六《沮水注》中的郑渠"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皆亩一钟，关中沃野，无复凶年"。卷三三《江水注》中的都安大堰（又称湔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也。"《水经注》最早记录了陕西高奴（今陕西延安市东）、酒泉延寿县（今甘肃立门市南）的河水中有"肥"可燃，或称"石漆"⑨。这是历史上对延长河玉门油矿的最早记录。又关于石炭的记载，《水经·浊漳水注》云："（邺城）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石墨可书，又燃之难尽，亦谓之石炭。"又《㶟水注》载："火山水……发火山东溪，东北流出山。山有石炭，火之，热同樵炭也。"这些记载对于研究水利农田史和经济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在沿革地理方面，《水经注》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全书记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二千八百余座，古都一百八十座。如卷一九《渭水注》中记秦汉古都长安，举凡城门、城郭、街衢、宫殿、园苑等无不一一详记。卷十六《谷水注》中记载的

洛阳，是郦道元目击的北魏当代首都，他花了七千多字详细记载了这个都城。卷一三《㶟水注》中记载北魏旧都平城，卷一○《浊漳水注》中记载的所谓“五都”（洛阳、谯、许昌、长安、邺），卷三三《江水注》中记载的所谓“三都”（新都、成都、广都）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城市历史地理资料。不仅如此，《水经注》还记载了部分国外城市，如卷一《河水注》中记载了今印度河流域的古代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卷三一《温水注》中记载了古代中南半岛林邑国的军事重镇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成为研究古代这些城邑发展的重要资料。

其次，《水经注》记述范围广阔，征引资料十分广博，这也是它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色。正如上述，《水经注》所述范围不仅限于国内，还扩及境外。东至朝鲜汊水（今朝鲜大同江），南达扶南（今越南、柬埔寨一带），西至安西（今伊朗）、西海（今咸海），北至流沙（今蒙古大沙漠），全书记载水、山、湖泊、城邑等各类地名2万左右，这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地理记载的内容，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也为研究中西关系、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水经注》征引的资料十分广博，据统计，引用古籍文献多达437种，提到的碑铭302块。特别宝贵的是，其中大部分的古籍、碑铭后世都佚失无传了，如戴延之的《述征记》、刘澄之的《永初记》以及《燕书》、皇甫谧的《帝王世纪》等，我们依靠《水经注》，才得以窥见这些书的部分原貌。它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李善的《文选注》被称为我国古代典籍中的三大名注。

其三，《水经注》文字优美，它不仅是历史地理学名著，也是优秀的山水文学。郦道元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加上他亲自

涉历过很多地方，有的还亲自跋山涉水，注重实地调查，因此他在描述祖国的壮丽河山时，能将记事与抒情很好地结合起来，善于运用散文、骈体文等不同的文学形式，使整个著作语言丰富，生动活泼，使人读来如身临其境，趣味盎然，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和模仿。如以黄河孟门瀑布为例。孟门即龙门峡口的上口，这是北魏旧都平城与新都洛阳之间的必经之地，从太和十八年起，郦道元曾多次往返于平城和洛阳之间，对这个瀑布他是多次亲自考察的，因而写得十分真实、生动。如：

孟门，即龙门之上口也，实为河之巨阨，兼孟门津之名矣。此石经始禹凿，河中漱广，夹岸崇深，倾崖返捍，巨石临危，若坠复倚。古人有言，水非石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冲，素气云浮，往来遥观者，常若雾露沾人，窥深悸魄，其水尚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濬波颓叠，迄于下口。方知慎子下龙门流浮竹，非驷马之追也⑬。

这一段描写，有声有色，十分逼真，实为千古名文。又如对长江三峡的描写：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⑪。

这真是描写山水文字的杰作典范，读来琅琅上口。此外，

一些短小的状景文学也十分清新可喜，如状卢氏鹈鹕山之险："山有二峰，峻极于天，高崖云举，亢石无阶，猿徒丧其捷巧，鼯族谢其轻工。及其长霄冒岭，层霞冠峰，方乃就辨优劣耳，故有大小鹈鹕之名矣。"⑫

当然，《水经注》也有一些错误疏漏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经指出。主要是那些郦道元足迹未到的地方，难免"附会乖错"、"传闻失实"。如滦河的正源、三藏水的次序、甚至以浙江妄合姚江等，都是十分明显的错误。《水经注》中记载的不少神鬼故事和迷信传说，也削弱了这部伟大著作的科学价值。

但瑕不掩瑜，《水经注》是我国古代的地理学名著，它具有的百科全书性的学术地位是无可动摇的。明清以来，人们对郦道元及其《水经注》的研究已蔚然成风，开创了一门专门的科学——"郦学"。随着"郦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郦道元及其《水经注》的评述将会更加公允和恰当。

注　释

①②参见陈桥驿著《郦道元与〈水经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出版。

③郦道元生于何年，《魏书》、《北史》均无记载。此据陈桥驿推算。见上书。

④以上均见《北史》卷二七《郦范传》。

⑤⑥《北史》卷二七《郦范附子道元传》。

⑦此据《唐六典》所计。赵永复认为是 2596 条（见《〈水经注〉究竟记述多少条水》，载《历史地理》第二辑；《中国水利史稿》认为是 5000 多条。

⑧《水经注》卷九。

⑨《水经注》卷一三《河水》。

⑩《水经注》卷四《河水注》。

⑪《水经注》卷三四《江水注》。

⑫《水经注》卷一五《洛水》。

三国两晋南北朝

祖冲之的科学贡献

南朝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人物，祖冲之就是当时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他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祖冲之字文远，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源县）人。他生于宋文帝元嘉六年（429），卒于齐东昏侯永元二年（500），终年七十二岁。祖家从范阳南迁，大概在西晋末年，他的曾祖祖台之，为晋侍中，祖父祖昌，宋时为大匠卿，是负责营造设计的一名官员。父亲祖朔之，宋奉朝请。祖冲之年轻时就很博学，并善于思考问题，宋孝武帝时就在专门研究学术的官署华林学省工作。后来又历仕南徐州从事、司徒府的公府参军、娄县令①等小官职。以后又长期在中央做谒者仆射，掌管朝廷礼仪。又转长水校尉，掌管联系少数民族工作。由于祖冲之从小就好"稽古，有机思"②，又在国家的研究机构——华林学省工作过，因而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出仕以后，又坚持钻研学术，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经过长期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位大科学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方面作出了重大

的贡献。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是他求得了比较精确的圆周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通过生产实践，已经摸索出圆周与直径的比例，大体上是三比一，即《周髀算经》所说的“周三径一”。但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后来经过历代数学家的推算，越来越接近于实际数值。如西汉刘歆计算出的圆周率为3.1547；东汉时，张衡著《灵宪》，计算出的圆周率为3.1466；曹魏时的刘徽求得的圆周率的近似分数值为3.1416；刘宋时的何承天求得了3.1428等。祖冲之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别在刘徽研究的基础上，把圆周率的计算继续向前推进，即“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过剩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nü不足近似值）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③。他精确地推算出的圆周率是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他还求得两个分数值的圆周率，一个是$\pi=355/113$（约等于3.1415927），这一个数比较精密，称为“密率”；另一个是$\pi=22/7$（约等于3.14），这一个数比较粗疏，称为“约率”。

祖冲之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的准确数值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字的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九百年以后，十五世纪时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求得的结果才超过了他的成就。而他提出的密率，即$\pi=355/113$，更是数学史上的伟大贡献。在欧洲直到公元1573年，德国的奥托和荷兰的安托尼兹才求得355/113这个分数。为此，西方数学家把它称作“安托尼兹率”。其实，这比祖冲之已晚了一千多年。一位日本数学家曾

建议把“安托尼兹率”改称“祖率”，把荣誉还给中国这位伟大的数学家。

此外，祖冲之还注释过《九章算经》，编著了《缀术》一书。《缀术》有六卷，由数十篇论文组成，这是祖冲之研究数学的代表作。在唐代时，这部书被列为算学的主要课本，学习年限规定为四年，政府举行数学考试时多从《缀术》中出题，其重要性可以想见。可惜的是到了北宋中期，这部很有学术价值的数学著作却失传了。

祖冲之在天文历法方面的贡献也很大。南朝初期，普遍使用的是何承天编订的《元嘉历》。这比以往各种历法有很大进步，“比古十一家为密”。但祖冲之经过实测和研究，发现《元嘉历》仍有很多不足之处，“冲之以为尚疏，乃更造新法”④。祖冲之编制的新历，称为《大明历》。

《大明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第一次将当时最新的科学成就——东晋虞喜发现的“岁差”理论，运用到历法的计算中去。所谓“岁差”，是指太阳从上一年冬至日运行到下一年冬至日，在天空上的位置移动距离。过去一直认为太阳在冬至日的位置是永远不变的。东晋的天文学家虞喜，首先发现了“岁差”现象，并算出每五十年西移一度。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果。但由于《元嘉历》等一直未把这一发现引入历法，影响计算太阳运行的位置，造成推算日、月蚀日期的误差。祖冲之经过自己的实测，证实了虞喜的发现，并把它引用到他编制的《大明历》中去，且经过了从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到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二十三年间四次月蚀的检验，证实了《大明历》的推算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祖冲之还测定了“回归年”，即两年冬至点之间的时间，是 365.24281481 日。

这与现代天文科学测得的结果比较，只差46秒，一年的相对误差仅有六十万分之一，说明已达到了十分缜密的程度。

《大明历》的另一个重要改进，是改革了闰法。我国古代长期沿用十九年安排七次闰月的方法。因为日行一年，即地球绕日一周，约365天多一点，而月圆十二次，即月球绕地球十二圈，约355天，二者相差十天左右。如果只以月圆十二次计年，二十四个节令的时间每年实际上都要差十天，会造成很大麻烦。因此采用十九年七闰的办法来加以解决，这应该说是个创造，但还不够准确"经二百年辄差一日"⑤。祖冲之经过测算研究，提出了新闰法，每三百九十一年，安排一百四十四个闰月，大大提高了《大明历》的精确性。

祖冲之的《大明历》在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编成，他在上宋孝武帝书中谈到《大明历》的编制过程："臣博访前坟，远稽昔典……探异今古，观要华戎"；而且"加以亲量圭尺，躬察仪漏，目尽毫氂，心穷筹策，考课推异，又曲备其详矣"⑥。说明《大明历》的编成，不仅总结、吸收了前人的成果，而且也是他实地观测、计算的结果。在上书中，他还充分阐述了《大明历》比《元嘉历》和其他旧历更精确之所在，要求孝武帝颁布推行。"孝武帝令朝士善历者难之，不能屈"⑦。但由于孝武帝卒，实行《大明历》一事受阻。直到梁天监九年(510)，经过他儿子祖暅之的多次上书，《大明历》才被梁朝采用。陈朝继续沿用，到隋开皇九年（589）陈亡为止，前后共施行了八十年。

祖冲之在机械制造方面，也有很多发明创造，他造出的千里船，"于新亭江试之，日行百余里"⑧，比一般船快得多。又设计制造一种利用水力推动的"水碓磨"，能同时舂米和磨

面。又比照诸葛亮的木牛流马，造一运输工具，“不因风水，施机自运，不劳人力”⑨。宋顺帝昇明中（478），祖冲之还“追修古法”，改造了一辆从后秦姚兴那里缴获来的“指南车”。由于改用铜质齿轮和机件，提高了灵敏度，使之“圆转不穷，而司方如一”，史称“马钧以来未之有也”⑩。当时有一位从北朝来的工匠叫索驭蓌，也说能造指南车，辅政的萧道成叫他与祖冲之各造一辆，拿到皇家的乐游苑比试。结果“颇有差僻”，祖冲之所造，则运转自如，高明得多。

祖冲之的儿子祖暅之，“少传家业，究极精微，亦有巧思”⑪。也是一位有名的科学家。他在世界上第一次求出了球体体积的正确公式。据唐李淳风《九章算术》注引“祖暅之开立圆术”条载，祖暅之应用“缘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指“等高处横截面积相等的两个立体，它们的体积也必定相等”）的原理，求出了球体体积的公式是“球体体积 $=\frac{\pi}{6}D^2$（D为球体直径）。祖暅之所确定的球体原理，比意大利人卡瓦列里的公理要早1000年。因而有人提出要把卡瓦列里公理改称为“祖暅公理”，把荣誉还给中国的这位科学家。

祖冲之的孙子祖皓也是“少传家业，善算历”⑫。在侯景之乱中，祖皓被侯景的乱军所杀。这样，祖冲之家族自祖父祖昌以来父子相传的科学技术世家，在侯景之乱中被覆灭了。

注　释

①②《南史》卷七二《祖冲之传》。

③《隋书》卷一六《律历志》上。

④《南史》卷七二《祖冲之传》。

⑤⑥⑦《南齐书》卷五二《祖冲之传》。

⑧⑨⑩均见《南史》卷七二《祖冲之传》。

⑪⑫《南史》卷七二《祖冲之附暅之传》。

三国两晋南北朝

贾思勰著《齐民要术》

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书。贾思勰是北魏后期至东魏初期山东益都（今属山东）人，具体生卒时间已不可考。他曾做过高阳（今山东临淄西北）太守。《齐民要术》这部书写成于北魏出帝永熙三年（534）至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544）之间①。

《齐民要术》全书共十卷，九十二篇，包括正文和注共十一万多字。它主要记载了自西周以来，特别是贾思勰所生活的时代，我国黄河中下游一带的农业生产经验。其中包括谷物、蔬菜、瓜果、林木的栽培（1—5 卷）；家畜、家禽、鱼类的饲养（6 卷）；酿酒（7 卷）；制酱、制醋、腌腊（8 卷）；主食品制造、副食品烹调（9 卷）；黄河流域以外的北方、南方各地，以及国外各处传入中原的各种作物品种介绍（10 卷）等，内容十分丰富，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起自耕农、终于醯（xī 希，即醋）醢（hǎi 海，用肉、鱼等制成的酱），资生之道，靡不毕书。"②实际上是一部反映当时农业和人民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贾思勰给这部书起名为《齐民要术》，就是指它是以

传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要方法的一本书，具有深刻的含意。

贾思勰著《齐民要术》这部书，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采捃经传，爰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③。所谓“采捃经传”，就是继承、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齐民要术》整理、引用了一百五、六十种古书里的农业生产知识。有些书现已失传，如西汉时氾胜之所写的一本农书——《氾胜之书》，是总结西汉农业生产的重要农书，现已失传，幸而《齐民要术》对它作了较多的引录，使书中的部分内容得以保留下来。又如东汉崔寔的《四民月令》，虽然是地主经营田庄的经历，但也记载了很多农业生产经验。也久散佚，幸而《齐民要术》的引用，而保存了部分内容。《齐民要术》中，搜集和记录了不少民歌和农谚，对当时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加以总结。如“湿耕泽锄，不如归去（回家）”，说地太湿就去翻耕，会使土地板结变硬，不如不翻的好。又如“耕而不劳，不如作暴”，是说耕了地面不把它平整好，那就等于瞎胡闹。又如“锄头三寸泽”，谓多锄一次地，犹如多下一次雨，利于作物保墒。再如“穄（音祭，糜子）青喉，黍折头”，是说穄在穗与秆相接的地方还没有变黄时就得收割，而黍子则要等完全成熟，穗子弯下头时才能收割等等。《齐民要术》中收录的三十多条农业民谚，都是十分宝贵的。

《齐民要术》总结和收集的生产经验是多方面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现概述于下：

（一）关于天时、地利与农作物的关系

贾思勰在书中认为：天时有春、夏、秋、冬的变化，土壤有肥、瘠、温、寒之别，因此，“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

而成功多。任情（凭主观）反道（违反客观规律），劳而不获”（《种谷第三》）。《齐民要术》要人们因时因地之宜去合理经营生产的原则，是对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生产经验的总结，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关于农作物的选种与播种

《齐民要术》非常重视农物的选种工作，认为种籽必须纯净。它说：“种杂者，禾则早晚不均，舂复减而难熟，粜卖以杂糅见疵，炊爨失生熟之节，所以特宜存意，不可徒然。”（《收种篇》）具体选种的方法：“粟、黍、穄、粱、秫，常岁岁别收，选好穗纯色者，劁刈高悬之。”这是穗选法。在播种以前，还要将种籽放到水里，剔去秕粒后，将纯种捞出晾干。这是水选法。种子播入留种田后，还要经常锄治，使它不生稗子，生长得更好。对于播种的时令，要注意作物种类的差异。如种黍穄，“三月上旬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五月上旬为下时”（《黍穄篇》）；种小豆，“夏至后十日种者为上时，初伏断手为中时，中伏断手为下时，中伏以后则晚矣”（《小豆篇》）；种麻，“夏至前十日为上时，（夏）至日为中时，（夏）至后十日为下时”（《种麻篇》）。《齐民要术》认为播种必须结合雨泽，但雨后播种，也要根据雨水量的多少而灵活处理。如种谷，“雨后为佳。遇小雨，宜接湿种；遇大雨，待薉生”。自注云：“小雨不接湿，无以生禾苗；大雨不待白背，湿辗，则令苗瘦。薉若盛者，先锄一遍，然后纳种，乃佳也。”（《种谷篇》）这是说小雨之后，可以趁地湿时下种；大雨以后，杂草萌生，索性等干燥后，再锄一遍，然后下种。《齐民要术》强调播种要疏密得宜。如种麻，“良田一亩，用子三升，薄田二升。”自注云：“穊（密）则细而不长，稀则粗而皮恶。”（《种

麻篇》）种子出苗后，再采用间苗法或补苗法，使种苗疏密得宜，利于作物生长。

（三）关于耕耘与除草

《齐民要术》非常重视田地的耕作，把它放在首篇，并根据北方的特点，指出"秋耕欲深，春耕欲浅"，耕作时"必须燥湿得所"，若水旱不调，"宁燥不湿"，如果"湿耕泽锄，不如归去"。意思是说燥耕时虽土壤成块，但一经得雨，便能松散。而湿耕则不然，土壤干燥后结成硬块，无益有损，不如扛起锄头回家去。《齐民要术》对中耕除草工作极为重视，它说："苗出垄则深锄，锄不厌数，周而复始，勿以无草而暂停。"自注云："锄者，非止除草，乃地熟而实多，糠薄米息。"（《种谷篇》）说明中耕除草不仅可以保证农作物的养分，增加土地的肥力，而且也可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质量。

（四）关于轮种与套种

为了保存和恢复地力，我国在秦汉以前主要采用休耕法。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多次提到轮栽和套种，这比以前的休耕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新的农业经验总结，在世界农业发展史上也是最早的记载。如说"谷田必须岁易"（《种谷篇》）；"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水稻篇》）；"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田欲岁易"（《种麻篇》）。关于套种，它说："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耕田篇》）"凡谷田，绿豆、小豆底为上，麻、黍、胡麻次之，芜菁、大豆为下"（《种谷篇》）；"凡黍穄地，新开荒为上，大豆底为次，谷底为下"（《黍穄篇》）；"小豆大率用麦底，然恐小晚，有地者常须留去岁谷下以拟之"（《小豆篇》）。这些轮栽和套种的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土地的复种指数，还可以使不同植物所需的

养分得到合理的调整和补充，有利于保持和提高土地的肥力，减少因连栽同一作物带来的病虫害。贾思勰在这里提出的“以地养地”的方法，不仅对我国农业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也是对世界农业发展所作的贡献。

（五）关于保墒与施肥

《齐民要术》很重视作物的保墒工作。认为北方气候比较干燥，对雨雪的保存很重要。在《耕田篇》和《大小麦篇》里都引用了《氾胜之书》中保墒的办法。如说：“冬雨雪止，以物辄藺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寒多实。”对于瓜地，“冬月大雪时，速并力堆雪于坑上，为大堆。至春草生，瓜亦生茎叶，肥茂异于常者，且常有润泽，旱亦无害”（《种瓜篇》)。《齐民要术》十分重视施肥工作。他把肥料分作人粪、厩肥、蚕矢、绿肥等，又强调要用熟粪而不用生粪。熟粪就是让肥料发酵或密闭起来，可以通过沓粪、压青和堆积等法取得。

（六）关于曝根与防冻

《齐民要术》讲到栽培水稻时说：“稻苗渐长，复须薅(hāo 读蒿，即拔草)。薅讫，决去水，曝根令坚。量时水旱而溉之。将熟，又去水。”(《水稻篇》)《水稻篇》所载稻作技术，反映的当是已包括在北魏版图内的江淮地区的情况。上述稻作技术，反映的是烤田的具体内容。即在第二次薅草后，放去稻田里的水，让太阳照晒，这是烤田，其目的达到“曝根令坚”，即通过烤晒，增高土温，加强养份分解，促使根须向纵深发展，萌发新根，控制茎叶生长和无效分蘖的发生。这样复水后稻秆茎生长健壮，不易倒伏，促进穗大籽粒饱满。这一技术过程，贾思勰把它概括为“曝根令坚”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对于

防霜冻，《齐民要术》介绍了熏烟防冻法：“天雨新晴，北风寒切，是夜必霜。此时放火作煴，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栽树篇》）这种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就已应用的熏烟防冻法，至今仍为人们所广泛应用。

（七）关于林木的栽培

《齐民要术》中也总结了不少劳动人民关于林木栽培的经验。如有些树木的栽培，要用苗圃育苗法，像榆、白杨“初生即移者喜曲，故须丛林长之，三年乃移种”（《种榆白杨篇》）。而槐树楮树种子应和麻子一起下种，这样，可以“胁槐令长”和“为楮作暖”，有利于它们“亭亭条直，千百若一”。对于果树的栽植，《齐民要术》根据果树的不同特性，总结出不同的培育方法。如种栗树是“栗种而不栽”（《种栗篇》）；种桃树，是桃子熟时，“合肉全埋粪地中。至春既生，移栽实地”（《种桃李篇》）。又有扦插（即埋枝）法和嫁接法。如李树，采用埋枝法，“三岁便结子”，否则“五岁始子”。对杨、柳树，也主张用扦插法来蕃殖。对于果树的嫁接，《齐民要术》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如插接时要选择向阳的枝条，要互相对准植物不同部位的接合，做砧木的树干要高大等。《插梨篇》说：将梨树枝嫁接于棠树上，其果实大而多，若嫁接于枣树或石榴树上，则果实味道好。这种生物学方面无性繁殖的方法，是我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能繁育出优良的果树，在园林农艺史上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八）关于家禽、家畜饲养及其他

在家禽、畜牧饲养方面，《齐民要术》也有详细的记载。如选择种鸡，要选择形体小，脚细短的；选种羊时，要选腊月或正月生的；对于牲畜的喂料喂水，要适合牲畜的特性等

等。对于肉用家畜，提供阉割法使之长得肥大。这种方法，至今我们还在使用。为了治疗家畜、家禽的各种疾病，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整理、介绍了近50种兽医药方。对于其他家庭副业，诸如酿酒、制醋、腌肉、泡菜、制酥酪、肉酱、制毡等，书中亦多分别作了记述。其中用乳类加工制成酥酪，用羊毛制成毡毯的技术等，显然是对塞外鲜卑等民族或部族生产经验的总结。

由上所述，可知《齐民要术》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论述农业科学的专门著作，它内容十分丰富。贾思勰在这一部书中，不仅吸取和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还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和实践，总结了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我国北方各族人民生产斗争的丰富经验。对前人的经验，也能在运用和实践中加以鉴别。如《氾胜之书》说黍子下种宜稀。而贾思勰从实践中了解到，稀植的黍子谷粒不饱满，米色较黄，而密植的黍虽棵小些，但谷粒匀称饱满，米色较白。因此，他改正了《氾胜之书》的说法，在《齐民要术》中作出了黍子密植为好的正确结论。这样，贾思勰在农学方面的成就超越了他的前人。《齐民要术》这一本农学著作，不仅对当代起着指导作用，而且对后代的农业生产也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历代农学家总结生产经验、编写的农书，如元朝的《农桑辑要》、王祯的《农书》、明朝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和清朝的《授时通考》等，无不注意吸取《齐民要术》的精华。直到今天，《齐民要术》仍是我们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的宝贵资料，具有很高的地位。

注　释

①《齐民要术·种谷篇》自注称："西兖州刺史刘仁之，老成懿德，

谓予言曰‘昔在洛阳，于宅田，以七十步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刘仁之据《魏书》本传载：出帝初（532—534）为著作郎，兼中书令；出除卫将军西兖州刺史，在州有当时之誉，武定二年（544）卒。因而贾思勰撰成此书，当在公元534—544年之间。

②③《齐民要术·序》。

附录：三国两晋南北朝大事年表

（这段时期政权纷立，年号多而变幻频繁。本表限于篇幅，只选列三国、两晋和南朝年号，供参考。）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4年	汉灵帝中平元年	黄巾大起义。
188年	中平五年	东汉改州刺史为州牧，任以清名重臣。刘焉为益州牧。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宦官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皆统于蹇硕。
189年	中平六年	宦官杀外戚何进。袁绍尽诛宦官。董卓带兵进入洛阳，立刘协为帝（献帝），专制朝政。袁绍、曹操逃离洛阳。
190年	汉献帝初平元年	关东州郡起兵讨董卓，推袁绍为盟主。董卓迁汉献帝于长安，焚毁洛阳。
191年	初平二年	袁绍领冀州牧。曹操为东郡太守。刘备为平原相。
192年	初平三年	王允、吕布杀董卓。曹操领兖州牧，收降青州黄巾百余万口，收其精锐，号“青州兵”。
193年	初平四年	曹操征徐州牧陶谦，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94 年	汉献帝兴平元年	益州牧刘焉死，其子刘璋嗣任。徐州牧陶谦死，刘备领徐州牧。孙策据江东，领会稽太守。
195 年	兴平二年	汉献帝离长安东归，杨奉、董承等随从，为李傕、郭汜所败，渡黄河，驻安邑。
196 年	汉献帝建安元年	汉献帝还洛阳。曹操进兵洛阳，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旋迁献帝都许，任司空，行车骑将军，总朝政。曹操开始屯田。
197 年	建安二年	袁术称帝于寿春。曹操攻袁术。术走淮南，后病死。
198 年	建安三年	曹操俘杀吕布，占徐州。曹操表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
199 年	建安四年	袁绍杀公孙瓒，占幽州。袁绍谋攻许，曹操分兵守官渡。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据徐州。
200 年	建安五年	曹操东征刘备，俘其妻子及关羽。刘备奔袁绍。孙策被刺死，其弟孙权领其众。曹操大败袁绍于官渡。曹操定租调制。
201 年	建安六年	刘备奔荆州牧刘表，屯新野。
202 年	建安七年	袁绍死，其子袁谭、袁尚争立。
203 年	建安八年	曹操败袁谭、袁尚于黎阳。
204 年	建安九年	曹操攻陷邺城，占冀州，兼领冀州牧。袁尚败逃中山，后奔幽州，依袁熙。
205 年	建安十年	曹操杀袁谭，占据青州。袁熙、袁尚逃奔辽西乌桓（一作乌丸）。黑山军张燕率众十余万投降曹操。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06 年	建安十一年	曹操击杀高干，占据并州。曹操将征乌桓，开平虏渠、泉州渠以通粮道。
207 年	建安十二年	曹操北征乌桓，杀蹋顿。袁熙、袁尚奔辽东，为辽东太守公孙康所杀。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作"隆中对"。
208 年	建安十三年	曹操南征荆州牧刘表。刘表病死，子刘琮嗣，投降曹操。刘备与孙权联盟，大败曹军于赤壁。曹操北还，周瑜围曹仁于江陵。刘备占据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
209 年	建安十四年	刘备领荆州牧，驻公安。周瑜败曹仁，占据江陵。
210 年	建安十五年	孙权以江陵借刘备（借荆州）。刘备移驻江陵。
211 年	建安十六年	曹操大败韩遂、马超于渭南，占据关中。曹操派钟繇等进攻汉中张鲁。刘璋派法正迎刘备入川。诸葛亮、关羽等留守荆州。
212 年	建安十七年	刘备欲袭成都，自葭萌回军据涪城。
213 年	建安十八年	曹操东征孙权，相持于濡须口，见孙权军伍整肃，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后撤还。曹操进位魏公，加九锡。刘备进围雒城。
214 年	建安十九年	刘备陷雒城，进围成都。诸葛亮引军来会。马超投奔刘备。刘璋出降。刘备据成都，领益州牧，以诸葛亮为军师将军。曹操平扰右。曹操杀伏皇后及二皇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15年	建安二十年	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双方协议重新瓜分荆州，以湘水为界，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长沙、江夏、桂阳属孙权。张鲁投降曹操。曹操据汉中。
216年	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进爵魏王。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使居并州。
217年	建安二十二年	刘备进军汉中。
218年	建安二十三年	少府耿纪等起兵反曹操失败，被诛三族。曹操领兵进汉中击刘备。
219年	建安二十四年	曹操在汉中与刘备相持积月，退回长安。刘备占据汉中，称汉中王。关羽北攻樊城，魏将于禁投降。孙权派吕蒙袭取江陵，关羽败走麦城，后被杀。孙权据荆州，向曹操称臣。
220年	魏黄初元年	曹操死，子曹丕袭爵，旋代汉称帝，是为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东汉亡。魏推行九品中正制。
221年	魏黄初二年 蜀章武元年	刘备称帝于成都，建立蜀汉政权，以诸葛亮为丞相。刘备率大军攻吴，孙权派陆逊率军五万相拒。孙权向魏称臣，被封为吴王，加九锡。
222年	魏黄初三年 蜀章武二年 吴黄武元年	陆逊大败刘备于夷陵。魏文帝曹丕以孙权不送任子为辞，发兵攻吴。孙权临江拒守，派使者向蜀求和。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23 年	魏黄初四年 蜀建兴元年 吴黄武二年	刘备病死于白帝城，临终托诸葛亮辅佐太子刘禅。刘禅即帝位于成都，是为后主。诸葛亮封武乡侯，领益州牧，政事无大小皆专决之。蜀南中地区反叛。诸葛亮派邓芝使吴。吴与魏绝，与蜀修好。
224 年	魏黄初五年 蜀建兴二年 吴黄武三年	孙权派张温使蜀通好，此后两国信使往来不绝。曹丕攻吴，至广陵，时江水盛涨，临江而还。
225 年	魏黄初六年 蜀建兴三年 吴黄武四年	诸葛亮率军南征，七擒孟获，平定南中。曹丕攻吴，再次临江而还。
226 年	魏黄初七年 蜀建兴四年 吴黄武五年	魏文帝曹丕死。太子曹叡继位，是为明帝。曹真、司马懿等辅政。
227 年	魏太和元年 蜀建兴五年 吴黄武六年	诸葛亮上《出师表》，出屯汉中，准备北伐。
228 年	魏太和二年 蜀建兴六年 吴黄武七年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魏派曹真督师迎战。马谡失街亭。诸葛亮进无所据，退回汉中，斩马谡，自贬三等。魏天水参军姜维归降诸葛亮。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散关，围陈仓，粮尽退军。
229 年	魏太和三年 蜀建兴七年 吴黄龙元年	诸葛亮第三次北伐，陷武都、阴平二郡。孙权称帝，国号吴，迁都建业。诸葛亮遣使祝贺，吴、蜀约中分天下。
230 年	魏太和四年 蜀建兴八年 吴黄龙二年	吴遣使者到达夷洲（台湾）。魏派曹真、司马懿等分道攻蜀。遇大雨，栈道断绝，退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31 年	魏太和五年 蜀建兴九年 吴黄龙三年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围祁山，以木牛运。曹真死，魏派司马懿率军抵御。诸葛亮粮尽退军，击毙魏将张郃。蜀李平因运粮失职，被削职为民。
232 年	魏太和六年 蜀建兴十年 吴嘉禾元年	诸葛亮劝农讲武，积粮于斜谷口，准备再次北伐。
233 年	魏青龙元年 蜀建兴十一年 吴嘉禾二年	吴封辽东太守公孙渊为燕王。公孙渊杀吴使者。
234 年	魏青龙二年 蜀建兴十二年 吴嘉禾三年	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据渭南五丈原，与司马懿相拒百余日。诸葛亮病死军中。蜀蒋琬任尚书令，总国事。
235 年	魏青龙三年 蜀建兴十三年 吴嘉禾四年	魏以司马懿为太尉。蜀以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费祎为尚书令。
237 年	魏景初元年 蜀建兴十五年 吴嘉禾六年	公孙渊自称燕王。
238 年	魏景初二年 蜀延熙元年 吴赤乌元年	司马懿讨公孙渊，斩其父子，平辽东。魏以曹爽为大将军。
239 年	魏景初三年 蜀延熙二年 吴赤乌二年	魏明帝曹叡死，太子曹芳继位。曹爽、司马懿辅政。
241 年	魏正始二年 蜀延熙四年 吴赤乌四年	魏邓艾于淮水南北大规模屯田。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43 年	魏正始四年 蜀延熙六年 吴赤乌六年	蒋琬病重，蜀以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244 年	魏正始五年 蜀延熙七年 吴赤乌七年	曹爽攻蜀，败归。
246 年	魏正始七年 蜀延熙九年 吴赤乌九年	蒋琬死，费祎辅政。
247 年	魏正始八年 蜀延熙十年 吴赤乌十年	曹爽专擅政，多树亲党。司马懿称疾，不预政事。
249 年	魏嘉平元年 蜀延熙十二年 吴赤乌十二年	司马懿发动军事政变，诛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何晏等，并夷三族，掌握朝政。
251 年	魏嘉平三年 蜀延熙十四年 吴赤乌十四年	魏太尉王凌在扬州起兵反对司马懿。司马懿南征，王凌自杀，相关连者皆夷三族，处死楚王彪，禁闭曹氏诸王。司马懿死，其子司马师主政。
252 年	魏嘉平四年 蜀延熙十五年 吴建兴元年	孙权死，太子孙亮即位，诸葛恪辅政。
253 年	魏嘉平五年 蜀延熙十六年 吴建兴二年	蜀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刺杀。吴诸葛恪大举攻魏失败。孙峻等杀诸葛恪，并诛三族。
254 年	魏正元元年 蜀延熙十七年 吴五凤元年	司马师废魏帝曹芳为齐王，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55年	魏正元二年 蜀延熙十八年 吴五凤二年	魏扬州刺史文钦、镇东将军毌丘俭起兵讨司马师。司马师南征。毌丘俭兵败被杀，文钦投孙吴。司马师死，其弟司马昭为大将军，录尚书事。
256年	魏甘露元年 蜀延熙十九年 吴太平元年	蜀姜维进位大将军。姜维率众出祁山。与邓艾战于段谷，死者甚众，蜀人由是怨维。吴孙峻死，孙綝为大将军。
257年	魏甘露二年 蜀延熙二十年 吴太平二年	魏镇东大将军诸葛诞起兵于寿春，讨司马昭，向吴称臣请援。司马昭奉魏帝及皇太后南征诸葛诞。
258年	魏甘露三年 蜀景耀元年 吴永安元年	司马昭陷寿春。诸葛诞被杀。孙綝废吴帝孙亮，立孙休为帝。孙休杀孙綝。蜀宦官黄皓控制朝政。
260年	魏景元元年 蜀景耀三年 吴永安三年	魏帝曹髦讨伐司马昭，被杀。司马昭立曹奂为帝。
263年	魏景元四年 蜀景耀六年 吴永安六年	魏派邓艾、钟会、诸葛绪分三路大举伐蜀。后主刘禅降魏，蜀亡。
264年	魏景元五年 吴元兴元年	邓艾、钟会被杀。司马昭进爵晋王。吴帝孙休死，孙皓继位。魏废屯田。
265年	晋泰始元年 吴甘露元年	孙皓迁都武昌。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袭爵，旋称帝，是为武帝，国号晋。史称西晋，魏亡。晋武帝大封宗室二十七人为王。
266年	晋泰始二年 吴宝鼎元年	吴还都建业。晋罢农官为郡县。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67 年	晋泰始三年 吴宝鼎二年	晋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
269 年	晋泰始五年 吴建衡元年	晋武帝有灭吴之志，以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镇襄阳；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镇临淄；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镇下邳。
270 年	晋泰始六年 吴建衡二年	吴以陆抗都督上游诸军以备晋。孙皓从弟夏口督孙秀降晋。
272 年	晋泰始八年 吴凤凰元年	晋太子司马衷纳贾充女贾南风为妃。王濬为益州刺史，大造舟舰，以备攻吴之用。吴西陵督步阐降晋，被陆抗镇压。
273 年	晋泰始九年 吴凤凰二年	晋武帝诏选公卿以下女备六宫，挑选未完，禁止婚嫁。
274 年	晋泰始十年 吴凤凰三年	晋武帝诏取良家及小将吏女五千入宫。会稽谣言章安侯孙奋当为天子，孙皓即杀孙奋及其五子。吴陆抗死。
276 年	晋咸宁二年 吴天玺元年	吴京下督孙楷降晋。晋以羊祜为征南大将军。羊祜上表请伐吴，唯杜预、张华赞同。
277 年	晋咸宁三年 吴天纪元年	晋武帝诏诸王以户邑多少分大、次、小国，依次置军五千、三千、一千一百人。
278 年	晋咸宁四年 吴天纪二年	晋羊祜死。杜预为征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
279 年	晋咸宁五年 吴天纪三年	匈奴左部帅刘豹死，晋以其子刘渊继立。王濬、杜预分别上表请求伐吴。晋遣兵二十余万分六路进军伐吴。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280 年	晋太康元年 吴天纪四年	晋军所向克捷。王濬军顺流直趋建业，孙皓出降。吴亡。晋下诏悉去州郡兵，颁占田、课田、户调法。
281 年	晋太康二年	晋武帝专注游宴，怠于政事，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
282 年	晋太康三年	吴故将莞恭等举兵于建业，反晋失败。王恺、石崇斗富。
284 年	晋太康五年	尚书左仆射刘毅上书指出九品中正制有八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要求废止，未被采纳。
289 年	晋太康十年	遣诸王都督诸州军事，以强帝室。晋武帝封子孙六人为王。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
290 年	晋永熙元年	晋武帝司马炎死。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立贾充之女贾南风为皇后。太后之父杨骏为太尉，总揽朝政。以刘渊为建威将军、匈奴五部大都督。
291 年	晋元康元年	贾后杀杨骏等，废杨太后为庶人。命汝南王亮辅政。贾后又使楚王玮，杀汝南王亮，旋又杀楚王玮。贾后专政。"八王之乱"开始。
292 年	晋元康二年	贾后杀杨太后。
296 年	晋元康六年	关中氐、羌等起义，立氐帅齐万年为皇帝。
298 年	晋元康八年	秦、雍六郡流民数万家流入汉中，巴氐李特兄弟率流民就食蜀中。
299 年	晋元康九年	晋俘齐万年。贾后废太子遹为庶人。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300 年	晋永康元年	贾后杀废太子。赵王伦杀贾后及其党羽，自为相国，专朝政。淮南王允举兵讨赵王伦，败死，益州刺史赵廞据成都反晋。
301 年	晋永宁元年	赵王伦逼惠帝禅位，自立为帝。齐王冏起兵讨赵王伦，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等响应。赵王伦及其党羽孙秀等被杀。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张轨建立前凉。氐人李特等在蜀起义，据广汉。
302 年	晋太安元年	李特称大将军、益州牧。河间王颙、成都王颖、长沙王乂等起兵讨齐王冏。齐王冏兵败被杀。长沙王乂执政。
303 年	晋太安二年	张昌、石冰率流民起义，后为陶侃所败。河间王颙、成都王颖起兵讨长沙王乂。河间王颙部将张方率兵大掠洛阳。李特败死，其弟李流继立；李流死，其弟李雄继立，攻陷成都。
304 年	晋永兴元年	长沙王乂被东海王越囚执，后被张方炙杀。成都王颖为皇太弟，居邺，遥控朝政，表请以匈奴刘渊为冠军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东海王越奉惠帝讨成都王颖，败于荡阴，惠帝被俘入邺。幽州刺史王浚联合东嬴公腾讨成都王颖，颖挟惠帝逃回洛阳，张方拥兵专朝政。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自号大单于，后称汉王，国号汉，攻略并州诸郡县。张方挟惠帝迁长安，废成都王颖皇太弟称号，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305 年	晋永兴二年	东海王越檄州郡兵西迎惠帝，被推为盟主。成都王颖部将公师藩因颖被废，聚众起兵，汲桑、石勒响应。
306 年	晋光熙元年	东海王越部将祁弘等攻入长安。河间王颙，成都王颖败逃，后被杀。惠帝还洛阳，东海王越为太傅，录尚书事。李雄称帝，国号大成。惠帝司马衷死，皇太弟司马炽继位，是为怀帝。“八王之乱”结束。刘伯根、王弥起义于青州。
307 年	晋永嘉元年	汲桑、石勒起义，攻陷邺城。晋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假节，镇建业。
308 年	晋永嘉二年	石勒略赵、魏。刘渊称帝。石勒归附刘渊。
309 年	晋永嘉三年	刘渊迁都平阳。石勒攻陷冀州郡县。
310 年	晋永嘉四年	刘渊死，子刘和继立。刘和弟刘聪杀和自立。王如领导宛城流民起义。东海王越率众出驻许昌。
311 年	晋永嘉五年	东海王越死，太尉王衍等奉其灵柩还葬封地东海，被石勒追及，杀死王公以下十余万人。刘聪派刘曜、石勒等攻陷洛阳，俘怀帝至平阳。司空荀藩等拥秦王司马邺奔许昌。刘曜攻陷长安。
312 年	晋永嘉六年	安定太守贾疋等率众围攻长安，逐刘曜，迎司马邺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313年	晋建兴元年	刘聪杀晋怀帝司马炽。皇太子司马邺在长安即帝位，是为愍帝。以琅邪王司马睿为左丞相，督陕东诸军。司马睿以祖逖为豫州刺史，渡江北伐。改建业为建康。
315年	晋建兴三年	以鲜卑拓跋猗卢为代王，建立代国。以司马睿为丞相、大都督。
316年	晋建兴四年	刘曜围攻长安，晋愍帝出降。西晋亡。
317年	晋建兴五年	司马睿在建康称晋王。祖逖北伐进入谯城。刘聪杀晋愍帝于平阳。
318年	晋太兴元年	司马睿在建康即帝位，是为东晋元帝。刘聪死，刘曜称帝，国号赵，史称前赵。
319年	晋太兴二年	石勒称王建赵，史称后赵。
321年	晋太兴四年	石勒据幽、冀、并三州。祖逖死于雍丘。
322年	晋永昌元年	王敦起兵于武昌，攻陷建康，杀周顗、戴渊等，还驻武昌。晋元帝司马睿死，太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王导辅政。
324年	晋太宁二年	王敦派其兄王含等再攻建康，兵败。王敦死，乱平。
325年	晋太宁三年	晋明帝司马绍死，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太后临朝，王导等辅政。
326年	晋咸和元年	后赵石聪攻寿阳，苏峻击走之。
327年	晋咸和二年	苏峻、祖约起兵反朝廷，陷姑孰。
328年	晋咸和三年	苏峻等陷建康，专朝政。庾亮、陶侃等平乱。苏峻败死。石勒擒刘曜。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329 年	晋咸和四年	祖约败逃石勒。石勒灭前赵。
330 年	晋咸和五年	后赵石勒即皇帝位。
332 年	晋咸和七年	石勒部将陷襄阳。陶侃派桓宣等克服之。
333 年	晋咸和八年	石勒死，子弘嗣，石虎为丞相。
334 年	晋咸和九年	成汉李雄死，兄子李班嗣。李雄子李期杀班自立。后赵石虎杀石弘，自立为天王。
337 年	晋咸康三年	鲜卑慕容皝自立为燕王，建立前燕。
338 年	晋咸康四年	成汉李寿废李期，自称皇帝，改国号汉。鲜卑什翼犍继为代王，始置百官。
339 年	晋咸康五年	晋丞相王导死。
340 年	晋咸康六年	代王什翼犍始都云中之盛乐宫。
341 年	晋咸康七年	晋封慕容皝为燕王。晋实行土断，废侨置郡县。
342 年	晋咸康八年	晋成帝司马衍死，其弟司马岳继位，是为康帝。
343 年	晋建元元年	晋庾翼北伐至夏口。汉主李寿死，太子李势继位。
344 年	晋建元二年	晋康帝司马岳死，太子司马聃继位，是为穆帝。太后褚氏临朝。
345 年	晋永和元年	晋桓温为安西将军。张骏自称凉王。
346 年	晋永和二年	前凉王张骏死，子重华继位。
347 年	晋永和三年	晋桓温灭成汉。
348 年	晋永和四年	前燕王慕容皝死，其子慕容儁继位。
349 年	晋永和五年	后赵石虎死，其兄石鉴自立。晋褚裒北伐，败退京口。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350 年	晋永和六年	冉闵灭石氏自立为帝，建魏，史称冉魏。后赵亡。氐人蒲洪称三秦王，改姓苻氏，后被杀。其子苻健入据关中。
351 年	晋永和七年	苻健称天王于长安，国号大秦，史称前秦。
352 年	晋永和八年	前秦苻健称皇帝。前燕慕容儁灭冉魏，称帝。
353 年	晋永和九年	晋殷浩北伐，退保谯城。前凉张重华死，其兄张祚自为凉州牧。
354 年	晋永和十年	前凉张祚称凉王。晋桓温北伐，于蓝田大败秦兵，进至灞上，败于白鹿原，撤还。
355 年	晋永和十一年	前秦苻健死，太子苻生继位。前凉内乱，张祚被杀，立张玄靓。
356 年	晋永和十二年	桓温自江陵北伐，入洛阳，置戍而还。
357 年	晋升平元年	前秦苻坚杀皇帝苻生，称大秦王，王猛掌机要。
358 年	晋升平二年	前燕略定并州。
359 年	晋升平三年	前燕攻占颍州、谯、沛诸城。
360 年	晋升平四年	前燕王慕容儁死，太子慕容暐继位。仇池公杨俊死。其子杨世嗣立。匈奴刘卫辰投降前秦。
361 年	晋升平五年	晋穆帝司马聃死，司马丕继位，是为哀帝。
363 年	晋兴宁元年	张天锡杀凉州刺史张玄靓自立。桓温北伐，克许昌。
364 年	晋兴宁二年	晋所在土断，称“庚戌制”。
365 年	晋兴宁三年	晋哀帝司马丕死，其弟司马奕继位。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368年	晋太和三年	晋加桓温殊礼，位在诸侯王上。
369年	晋太和四年	晋桓温北伐，至枋头，粮运不继，退军。
370年	晋太和五年	前秦灭前燕，迁慕容暐等于长安。
371年	晋咸安元年	仇池公杨纂降于前秦。桓温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帝。
372年	晋咸安二年	晋简文帝司马昱死，太子司马昌明继位，是为孝武帝。
373年	晋宁康元年	桓温死，以其弟桓冲领其众。前秦取梁、益二州。
374年	晋宁康二年	晋谢安总中书。
375年	晋宁康三年	前秦丞相王猛死。
376年	晋太元元年	前秦灭前凉，灭代国，统一北方。
377年	晋太元二年	晋以谢玄为兖州刺史，招募、训练“北府兵”。
379年	晋太元四年	前秦陷襄阳，执晋梁州刺史朱序。前秦攻盱眙，围三阿，谢玄击走之。
382年	晋太元七年	前秦苻坚朝议大举攻晋，朝臣多持异议。
383年	晋太元八年	苻坚发百余万大军攻晋。晋以谢石、谢玄等率军八万拒之。两军战于淝水，前秦军溃败。
384年	晋太元九年	慕容垂举兵反秦建燕，史称后燕。慕容泓建西燕。羌人姚苌建后秦。谢玄等乘胜北伐，连克河南诸县。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385 年	晋太元十年	晋谢安死，司马道子掌政。苻坚被杀，苻丕继位。鲜卑乞伏国仁建立西秦。仇池杨定自称陇西王。
386 年	晋太元十一年	后燕慕容垂称帝。后秦姚苌称帝。西燕内乱，立慕容永。拓跋珪复代国，称魏王，史称北魏或后魏。氐人吕光建立后凉。
394 年	晋太元十九年	苻登为后秦姚兴所杀，前秦亡。后燕慕容垂杀慕容永，西燕亡。
396 年	晋太元二十一年	后燕慕容垂死，其子慕容宝立。晋孝武帝司马昌明死，太子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司马道子专政。
397 年	晋隆安元年	鲜卑秃发乌孤自称大单于，建立南凉。卢水胡拥立段业建立北凉。
398 年	晋隆安二年	慕容德称燕王，史称南燕。北魏拓跋珪称帝。
399 年	晋隆安三年	孙恩、徐道覆在浙东起义。法显往西域、印度求法。
400 年	晋隆安四年	孙恩再次登陆攻会稽，为刘牢之堵击，败走入海。南燕慕容德称帝。
401 年	晋隆安五年	孙恩登陆，迫建康，为刘裕所败，走入海。
402 年	晋元兴元年	晋帝下诏讨桓玄。桓玄沿江东下，攻入建康，杀司马道子等。孙恩败死，众推卢循为主，后为刘裕所败，浮海南走。
403 年	晋元兴二年	后凉亡于后秦。桓玄称帝，废晋安帝司马德宗为平固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404年	晋元兴三年	刘裕等讨桓玄，攻入建康。桓玄挟司马德宗走江陵，后兵败被杀。卢循袭取广州。
405年	晋义熙元年	晋安帝司马德宗回建康，复位。刘裕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出镇京口。
407年	晋义熙三年	匈奴赫连勃勃建夏国。冯跋灭后燕，建北燕。
408年	晋义熙四年	刘裕为侍中，录尚书事。
409年	晋义熙五年	刘裕北伐南燕，围广固。
410年	晋义熙六年	刘裕俘慕容超，南燕亡。卢循从广州北进，迫建康，后为刘裕所败，退回番禺。
411年	晋义熙七年	卢循败死。
412年	晋义熙八年	刘裕讨刘毅，毅自杀。
413年	晋义熙九年	刘裕杀诸葛长民。刘裕请行“庚戌”土断之制，杀抗拒土断的世族虞亮。晋军占领成都，平谯纵。
414年	晋义熙十年	西秦灭南凉。
415年	晋义熙十一年	刘裕讨司马休之，休之投降后秦。
417年	晋义熙十三年	刘裕率北伐军进入洛阳、长安，后秦亡。刘裕留其子刘义真等守长安。
418年	晋义熙十四年	刘义真逃归。刘裕任相国，封宋公，加九锡。刘裕杀晋安帝司马德宗，立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恭帝。
419年	晋元熙元年	刘裕进爵宋王。
420年	宋永初元年	刘裕迫晋恭帝司马德文让位，自即帝位，国号宋，史称南朝宋，或刘宋。刘裕即宋武帝。东晋亡。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421年	宋永初二年	北凉灭西凉。
422年	宋永初三年	宋武帝刘裕死，太子刘义符继位，是为少帝。
423年	宋景平元年	北魏破虎牢，占有司、豫、兖州诸郡县。北魏明元帝拓跋嗣死，子拓跋焘继位，是为太武帝。
424年	宋元嘉元年	徐羡之、檀道济等杀宋少帝刘义符，迎立刘义隆，是为文帝。
426年	宋元嘉三年	宋文帝杀徐羡之等。
427年	宋元嘉四年	北魏攻夏，陷统万城。
429年	宋元嘉六年	北魏大破柔然、高车，徙其民于漠南。
430年	宋元嘉七年	宋到彦之等攻北魏，洛阳、虎牢等地得而复失。
431年	宋元嘉八年	夏灭西秦。魏属国吐谷浑灭夏。
432年	宋元嘉九年	北魏攻下北燕郡县，徙乐浪等六郡民三万家至幽州。
434年	宋元嘉十一年	宋收复汉中。
435年	宋元嘉十二年	北魏制定三等九品制。
436年	宋元嘉十三年	北魏灭北燕。
437年	宋元嘉十四年	北魏通西域。
439年	宋元嘉十六年	北魏灭北凉，统一北方。
442年	宋元嘉十九年	宋据仇池。氐王杨难当奔北魏，仇池平。
445年	宋元嘉二十二年	北魏卢水胡盖吴起义。
446年	宋元嘉二十三年	北魏禁佛教，毁诸经、佛像。盖吴败死。
448年	宋元嘉二十五年	北魏平西域。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450年	宋元嘉二十七年	宋分道攻北魏，王玄谟兵败滑台。薛安都等攻陷陕城。北魏军南下趋瓜步。宋魏议和。
451年	宋元嘉二十八年	北魏北撤，围盱眙，不克，大掠徐、兖、豫、青、冀等州，所过郡县，赤地无余。
452年	宋元嘉二十九年	宗爱杀魏帝拓跋焘，立拓跋濬，是为文成帝。
453年	宋元嘉三十年	宋太子刘劭杀宋文帝刘义隆自立。刘骏杀刘劭，即帝位，是为孝武帝。北魏文成帝开凿云岗石窟。
457年	宋大明元年	宋实行土断。
462年	宋大明六年	祖冲之制定《大明历》，计算出七位圆周率值。
464年	宋大明八年	宋孝武帝刘骏死，子刘子业即位，是为前废帝。
465年	宋永光元年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死，子拓跋弘继位，是为献文帝。冯太后临朝。宋湘东王刘彧杀刘子业，即帝位，是为明帝。
466年	宋泰始二年	宋晋安王刘子勋起兵，称帝于寻阳，后被杀。宋明帝尽杀孝武帝二十八子。
467年	宋泰始三年	北魏攻占淮北青、徐、冀、兖四州及豫州大部。
469年	宋泰始五年	北魏废除三等九品制。北魏始置僧祇户、佛图户。
470年	宋泰始六年	北魏大破柔然。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471年	宋泰始七年	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传位太子拓跋宏，是为孝文帝。
472年	宋泰豫元年	宋明帝刘彧死，太子刘昱继位，是为后废帝。
473年	宋元徽元年	北魏劝课农事，检括户口。
474年	宋元徽二年	宋萧道成平桂阳王刘休范之乱，任中领军，参决朝政。北魏罢门房同诛之律。
475年	宋元徽三年	北魏禁屠杀牛马。
476年	宋元徽四年	北魏太后毒杀献文帝，临朝称制。
477年	宋升明元年	萧道成使人杀宋帝刘昱，立安成王刘准为帝，是为顺帝。萧道成录尚书事。
478年	宋升明二年	宋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讨萧道成，兵败自杀。
479年	齐建元元年	萧道成废宋顺帝刘准为汝阴王（不久被杀），自立为帝，是为高帝，国号齐，史称南齐。宋亡。
482年	齐建元四年	齐高帝萧道成死，太子萧赜继位，是为武帝。
484年	齐永明二年	北魏实行班禄，禁官吏贪赃。
485年	齐永明三年	北魏实行均田制。齐唐寓之起义于富阳。
486年	齐永明四年	唐寓之称帝，后被擒杀。北魏立三长法及租调制。
490年	齐永明八年	北魏冯太后死。
493年	齐永明十一年	齐武帝萧赜死，其孙萧昭业继位。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494 年	齐建武元年	齐萧鸾大杀诸王，称帝，是为明帝。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
495 年	齐建武二年	北魏禁朝廷中用鲜卑语；代人迁洛阳者皆为洛阳人；依《汉志》改用长尺、大斗；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于洛阳；始铸太和五铢钱。北魏于洛阳开凿龙门石窟，于嵩山建少林寺。
496 年	齐建武三年	北魏定族姓，如改拓跋氏为元氏等。
498 年	齐永泰元年	齐明帝萧鸾死，子萧宝卷继位。
499 年	齐永元元年	北魏孝文帝元宏死，子元恪继位，是为宣武帝。
500 年	齐永元二年	齐雍州刺史萧衍起兵于襄阳。
501 年	齐中兴元年	萧衍使人杀齐帝萧宝卷，进兵建康，掌朝政。
502 年	梁天监元年	萧衍称帝，是为武帝，国号梁。齐亡。
506 年	梁天监五年	北魏在洛口大败梁军。
507 年	梁天监六年	梁在钟离大败北魏军。范缜著《神灭论》。
509 年	梁天监八年	北魏佛教大盛。
510 年	梁天监九年	梁颁行祖冲之《大明历》。
511 年	梁天监十年	梁大败北魏兵，攻取朐山。
514 年	梁天监十三年	梁欲以淮水灌北魏寿阳，发二十万人作浮山堰。
515 年	梁天监十四年	北魏宣武帝元恪死，太子元诩继位，是为孝明帝。梁再次筑浮山堰，以铁器数千万斤填之，又填以巨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516 年	梁天监十五年	浮山堰成而后毁，淮水两岸十余万人漂流入海。北魏造永宁寺，规模极大。
518 年	梁天监十七年	北魏遣人去西域求佛经。
519 年	梁天监十八年	北魏行《停年格》，选举只凭年资。
523 年	梁普通四年	北魏沃野镇民破六韩拔陵起义。诸边镇响应，六镇起义开始。
524 年	梁普通五年	北魏高平镇民推高车酋长胡琛为高王，响应破六韩拔陵。破六韩拔陵大败北魏兵。莫折大提起义。西北、关中各地起义响应破六韩拔陵。
525 年	梁普通六年	破六韩拔陵起义失败，二十万人被俘。北魏柔玄镇民杜洛周起义。今陕西、河南诸蛮起义。
526 年	梁普通七年	北魏五原降户鲜于修礼起义。鲜于修礼为叛徒所杀，葛荣得其部众，据瀛州，称天子。北魏预征六年租调。
527 年	梁大通元年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
528 年	梁大通二年	葛荣杀杜洛周，领其众。北魏尔朱荣拥立元攸为帝。是为孝庄帝。尔朱荣执胡太后及幼主元钊送至河阴，沉于河，并杀王公百官二千余人，史称“河阴之变”。胡琛部将万俟丑奴称天子。葛荣被尔朱荣俘杀。
529 年	梁中大通元年	梁武帝再次舍身同泰寺，群臣以一亿万钱赎回。
530 年	梁中大通二年	北魏尔朱天光俘万俟丑奴，平定三秦。尔朱荣被杀。尔朱兆进入洛阳，杀孝庄帝元攸。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531 年	梁中大通三年	尔朱世隆立元恭为帝，是为节闵帝。高欢起兵，立元朗为帝。
532 年	梁中大通四年	高欢进入洛阳，大杀尔朱氏党羽，废元朗及节闵帝元恭，立元修为帝，是为孝武帝。
533 年	梁中大通五年	尔朱兆为高欢所败，自杀。
534 年	梁中大通六年	高欢回师洛阳，大杀群臣，孝武帝逃往长安，为宇文泰所控制。高欢立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迁都于邺，史称东魏。
535 年	梁大同元年	元宝炬即帝位于长安，是为文帝，史称西魏，宇文泰掌政。从此东西魏互相征讨。
537 年	梁大同三年	西魏宇文泰于沙苑大败东魏高欢。
538 年	梁大同四年	东魏改《停年格》，以选拔贤才。
543 年	梁大同九年	西魏宇文泰与东魏高欢大战于洛阳邙山，高欢大败。
544 年	梁大同十年	西魏苏绰立六条诏书：先治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547 年	梁太清元年	东魏丞相高欢死，高澄主政。侯景叛东魏，附西魏，旋又降梁。梁武帝又一次舍身同泰寺，群臣又以一亿万钱赎回。东魏孝静帝被高澄幽禁。
548 年	梁太清二年	侯景以萧正德为内应，起兵于寿阳，攻入建康，围台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549 年	梁太清三年	侯景陷台城，幽禁梁武帝。梁武帝忧愤死，侯景立萧纲为帝，是为简文帝。陈霸先起兵于南海，讨侯景。东魏高澄被部下杀死，其弟高洋掌政。
550 年	梁大宝元年	高洋废杀东魏孝静帝，自立为帝，国号齐，史称北齐。东魏亡。西魏实行府兵制，设八柱国大将军。
551 年	梁大宝二年	西魏文帝元宝炬死，其子元钦继位。侯景杀梁简文帝萧纲及太子、诸王二十余人，自立为帝，国号汉。
552 年	梁承圣元年	陈霸先、王僧辩等击败侯景。侯景为部下所杀。萧绎称帝，是为梁元帝。
554 年	梁承圣三年	宇文泰废西魏帝元钦，立元廓为帝，是为恭帝，复姓拓跋氏。梁元帝萧绎投降西魏。
555 年	梁绍泰元年	西魏在江陵建立萧詧傀儡政权后梁。萧方智在建康即梁王位。王僧辩迎萧渊明至建康，即帝位，和北齐称藩。陈霸先在京口起兵，袭杀王僧辩，废萧渊明，立萧方智为帝，仍向北齐称藩。陈霸先与北齐签订和约。
556 年	梁太平元年	北齐毁约，陈霸先大败北齐兵于建康。西魏宇文泰死，子宇文觉嗣爵，宇文护主政。
557 年	梁太平二年	宇文觉称帝，是为孝闵帝，国号周，史称北周。西魏亡。宇文护废杀孝闵帝宇文觉，立宇文毓，是为明帝。陈霸先称帝，是为武帝，国号陈。梁亡。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559年	陈永定三年	陈武帝陈霸先死，其侄陈蒨继位，是为文帝。北齐尽诛拓跋氏，前后死者七百多人。北齐文宣帝高洋死，子高殷继位。
560年	陈天嘉元年	宇文护杀北周明帝宇文毓，立其弟宇文邕，是为武帝。北齐高演自立为帝，是为孝昭帝。
561年	陈天嘉二年	北齐孝昭帝高演死，其弟高湛继位，是为武成帝。
562年	陈天嘉三年	后梁主萧詧死，其子萧岿继位。
564年	陈天嘉五年	北齐颁均田令。
565年	陈天嘉六年	北齐武成帝传位于太子高纬，是为后主。
566年	陈天康元年	陈文帝陈蒨死，太子陈伯宗继位。
568年	陈光大二年	北周隋桓公杨忠死，子杨坚袭爵。
569年	陈太建元年	陈顼废陈伯宗，称帝，是为陈宣帝。
574年	陈太建六年	北周武帝禁断佛、道二教，改革府兵制。
575年	陈太建七年	北齐后主荒淫无道。北周武帝攻北齐，因病退军。
576年	陈太建八年	北周武帝发兵攻北齐。
577年	陈太建九年	北周灭北齐。北周武帝宣布灭佛。
578年	陈太建十年	北周武帝宇文邕死，太子宇文赟继位，是为宣帝。
579年	陈太建十一年	北周宣帝传位于太子宇文阐，是为静帝。
580年	陈太建十二年	北周宣帝死，静帝年幼，杨坚总理朝政，进爵隋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581 年	陈太建十三年	杨坚废北周静帝，自立为帝，是为文帝，国号隋。北周亡。
587 年	陈祯明元年	隋灭后梁。
588 年	陈祯明二年	隋文帝发兵攻陈。第二年灭陈，统一南北。

隋唐五代

隋的建立和统一

自黄巾起义瓦解东汉政权，封建军阀乘机拥兵割据以来，分裂局面延续长达四百年。其间虽有西晋的统一，但为时不过二十年，复又陷于分裂混战。扰攘纷纭，社会横遭阻滞，百姓苦于兵革。及至南北朝后期，随着南北经济的发展，和北方各民族的融合，重新统一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起于北方的隋朝，出而完成这一统一事业。

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宇文赟死，子静帝宇文阐年仅八岁，宣帝皇后父杨坚受遗诏辅政。杨坚（541－604，弘农华阴人）远祖杨元寿曾任北魏武川镇（今内蒙古武川西南）司马，世代为武川镇军人，父杨忠随魏孝武帝入关中，帮助宇文泰建立西魏政权，为北周开国功臣。宇文泰于西魏大统十六年（550）建立府兵制，以六柱国督十二大将军，下统二十四开府，每开府领一军，共二十四军。杨忠为十二大将军之一，赐姓普六茹氏，后升柱国，封随国公。杨坚袭父爵，历任上柱国、大司马、大后丞、大前疑等要职。杨坚妻为鲜卑大贵族柱国独孤信之女，独孤信另外一女为周明帝皇后，

杨坚女又为宣帝皇后，于是杨坚就集周明帝之联襟、周宣帝之岳父、周静帝之外祖父于一身。他不仅出自士族高门，而且成为关陇集团强有力的军事统帅，又加是如此显赫的皇亲国戚，这使他不仅为北周政权中鲜卑贵族集团所亲信，也为北周政权中汉族地主集团所支持。周宣帝死，汉族官僚刘昉、郑译（540－591，隋荥阳开封人，字正义）等矫诏由杨坚辅政，称大丞相、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揽军政大权。杨坚得"入宫辅政"，刘昉、郑译之力最大，故"时人为之语曰：刘昉牵前，郑译推后"①。杨坚恐北周宗室在外，诸王不服，藉口赵王宇文招女千金公主将嫁突厥佗钵可汗，召赵、陈、越、代、滕五王回长安，以便控制。

杨坚为收天下人心，"革宣帝苛酷之政，更为宽大，……躬履节俭，中外悦之"②。一面又引用时才，扩充实力，引高颎（？－607，隋渤海蓨人）入丞相府为相府司录，高颎欣然曰："纵令公事不成，颎亦不辞灭族。"杨坚夺取帝位取代北周的意图，高颎已深为了解。杨坚夜召太史中大夫庾季才，问代周称帝事，答曰："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颍之事乎！"③独孤夫人亦曰："大事已然，骑虎之势，必不得下。"

六月，相州（治所在邺县，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④总管尉迟迥，闻知丞相杨坚将夺取北周帝位，起兵讨杨，自称大总管，自行署置官员，拥戴赵王招少子以资号令。他管辖的相、卫、黎、洺、贝、赵、冀、瀛、沧等州皆跟随起兵。尉迟迥之弟青州（治今山东益都）总管尉迟勤起兵响应，他统辖的青、齐、胶、光、莒等州亦跟随起兵。兄弟联兵达数十万，关东各地纷起响应。杨坚发关中兵，以上柱国韦孝宽为行军元

帅，宇文述、崔弘度、杨素（？－606，弘农华阴人，字处道）等为行军总管，讨伐尉迟迥。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亦起兵响应尉迟迥，杨坚以柱国王谊为行军元帅讨伐司马消难。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亦起兵攻始州，杨坚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伐王谦。一时三方并起，力图挽救北周政权。长安周室诸王伺机谋杀杨坚，未得手。

八月，杨坚遣高颎监东线诸军，时韦孝宽与尉迟迥两军相持于沁水（在今山西南部）。高颎至，于沁水架桥，尉迟迥挥军稍退，欲引韦孝宽军半渡时进行反击。韦孝宽乘机鸣鼓齐进，大军过桥，高颎下令焚桥，断绝士卒后退之望，故皆奋勇直前，尉迟迥军大败，韦孝宽乘胜追击。尉迟迥与二子统兵十四万于邺城南布阵，其弟尉迟勤率兵五万自青州赴援。尉迟迥又败，走保邺城，韦孝宽纵兵围城，城破，尉迟迥自杀，其二子及弟尉迟勤被俘，失败距起兵仅六十八日。韦孝宽分兵讨关东叛军余部，相继削平。杨坚焚毁邺城，徙相州于安阳。王谊率四总管兵至郧州，司马消难拥众以鲁山、甑山镇投降陈朝。十月，梁睿将步骑二十万讨王谦，屡败王谦兵，进逼成都。王谦亲帅精兵五万，背城一战，大败被杀，剑南平定。与此同时，毕王贤、赵王招、越王盛、陈王纯、代王达、滕王逌（yóu）及诸王子相继以谋反罪名被杨坚诛杀，北周残余势力消灭殆尽。十二月，杨坚进爵为随王。次年北周大定元年（581）二月，周静帝下诏，逊居别宫，奉册书及皇帝玉玺，禅位于隋。杨坚受册玺即皇帝位，改国号为隋，改元开皇，是为隋文帝。杨坚因袭父爵成为随国公，又进爵为随王，故即位后改国号为随，又嫌随字带“走”，恐如北齐北周一样匆匆逝去，故将“隨”字去“走”改作“隋”。

隋文帝即位后，以高颎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纳言，虞庆则为内史监，李德林为内史令⑤。立独孤氏为皇后，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封其余诸子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杨谅为汉王。女杨后改封乐平公主。封周静帝为介公，周室诸王皆降爵为公。虞庆则劝隋文帝尽灭宇文氏，高颎模棱两可，于是谯公宇文乾恽等十三公皆死。五月又暗害周静帝，葬于恭陵。

杨坚自受遗诏辅政，不出一年，即取代北周，建立隋朝。

杨坚代周之后，隋朝尽有江北，国力日益强大；陈朝只保有江陵（今属湖北）至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南的狭小地区，统治腐朽，国力日益削弱。文帝欲并吞江南，问高颎将帅人选，高颎推荐贺若弼（544－607，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与韩擒虎（538－592，原名豹，字子通，河南东垣人）。开皇元年（581）三月，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广陵（今江苏扬州）；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庐江（今安徽合肥），东西呼应，威胁陈朝都城建康，准备灭陈。

开皇二年，陈朝后主陈叔宝即皇帝位。陈后主昏暴荒淫，大兴土木，造临春、结绮、望仙三阁，各高数十丈，连延数十间，门窗栏槛皆用沉香和檀香木制成，并饰以金、玉、珍珠、翡翠，外挂珠帘，内置宝床宝帐。微风一过，香闻数里。阁下布置假山池水，异草奇花。陈后主自住临春阁，张贵妃（张丽华）住结绮阁，孔贵嫔、龚贵嫔住望仙阁。陈后主与诸妃嫔、女学士日日游宴其中，仆射江总、都官尚书孔范、散骑尚侍王瑳等文士十余人侍宴，谓之狎客，饮酒赋诗，选特别艳丽者谱成新声，选宫女千余人奏乐歌唱，有《玉树后庭花》、《临春乐》等曲。君臣酣饮，通宵达旦。张贵妃与陈后主共决国政。

卖官鬻狱，贿赂公行，大臣争相谄附。由于穷奢极侈，府库空虚，委任施文庆、沈客卿、阳惠朗、暨慧景等人重赋厚敛，赋税超过平常数十倍。是时陈朝局势正如傅縡狱中上书所说："小人在侧，宦竖弄权，恶忠直若仇雠，视生民如草芥。后宫曳绮绣，厩马余菽粟，百姓流离，殭尸蔽野，货贿公行，帑藏损耗，神怒民怨，众叛亲离。"⑥

开皇七年（587），隋文帝废江陵傀儡政权后梁，扫清进军江南的道路。后梁宗室萧岩、萧瓛降陈，隋文帝怒陈朝接纳叛臣，谓高颎曰："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⑦问高颎灭陈之策，高颎对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彼必屯兵守御，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为常；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以储蓄皆非地窖。若密遣行人因风纵火，……不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⑧隋文帝采用这一策略，使陈朝陷入更加疲困的境地。又用崔仲方关于军事部署的建议，于武昌以东长江下游诸州，各驻精兵，准备渡江；于武昌以西长江上游诸州，大造战船，多张声势。如陈朝以上游为兵家必争之地，令精兵援上游，则下游诸军即可乘虚渡江；如陈朝在下游拥兵自卫，则上游隋军即可顺流东下。在军事上隋居显著优势。上游造战船，有人请秘密进行，文帝说何密之有，命将造船木屑投入长江，说："若彼惧而能改，吾复何求。"杨素在永安（今四川奉节）造"五牙"战船，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左右前后置六拍竿，皆高五十尺，用以拍击敌船。开皇八年（588）三月，隋文帝下诏宣布陈后主罪状二十条，中有："陈叔宝据手掌之地，恣

溪壑之欲，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逼内外，劳役弗已；穷奢极侈，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自克昏乱，罕或能比。”⑨声言将出师讨伐，“永清吴越”，并在江南散发诏书三十万张，以为舆论准备。

开皇八年十月，隋设淮南行省于寿春（今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统帅灭陈大军。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及杨素皆为行军元帅，以高颎为晋王元帅长史。杨广出兵六合（今属江苏），杨俊出兵襄阳（今属湖北），杨素出兵永安，韩擒虎出兵庐江，贺若弼出兵广陵，共计九十总管，大军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杨广节度。一时长江上下，八道出师，水陆并进，西起巴蜀，东至海滨，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陈军不过十万，“分之则势悬而力弱，聚之则守此而失彼”⑩，无法抗拒席卷而来的隋军。杨俊督隋军水陆十余万屯汉口（汉水入江之口），攻长江上游，陈水军都督周罗睺驻守江夏（今湖北武昌）抗拒隋军。杨素率水军下三峡，夜袭狼尾滩，俘陈水军数千人，蔽江东下，旌甲曜日，陈人谓杨素为江神。东线隋军进攻长江下游，陈将樊毅以为京口（今江苏镇江东南）、采石（今安徽当涂北）地处冲要，应各驻精兵五千，另调战船二百艘，沿江巡防。这一正确建议遭施文庆、沈客卿等阻挠，久议不决。隋军逼近长江，陈守将飞书告急，陈后主则对侍臣说：“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也！”孔范也说：“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邪！”君臣依然纵酒奏乐，赋诗赠答如故。

开皇九年（589）正月初一日，贺若弼自广陵渡江，陈军并未发觉，继而攻克京口，控建康下游门户；同日，韩擒虎自横江夜渡，陈军皆醉，遂克采石，扼建康上游咽喉；杨广率大

军屯六合镇桃叶山⑪。陈后主以萧摩诃、樊毅、鲁广达为都督，司马消难、施文庆为大监军，对抗隋军。贺若弼、韩擒虎东西两路逼近建康，沿江陈军纷纷溃散。贺军进据锺山（在今南京市内），韩军屯兵新林（在今南京西南二十里）。时建康尚拥兵十余万，陈后主唯日夜啼泣。当贺军攻京口时，萧摩诃请率兵迎战，陈后主不许。至贺军据锺山，萧摩诃以敌悬军深入，营垒未固，请出兵偷袭，陈后主又不许。至隋军合围之势已成，陈后主轻率决战，命鲁广达、任忠、樊毅、孔范、萧摩诃于锺山附近布阵，南北二十里，首尾进退互不知晓。贺若弼率隋军与鲁广达激战，再攻孔范兵，孔范兵一触即溃，陈军败逃不可复止。隋军擒萧摩诃，鲁广达苦战后亦被擒。韩擒虎自新林进军，任忠迎降，引韩军直入朱雀门。陈后主仓皇从十余宫人出景阳殿，自投于枯井中，"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⑫。陈后主投降。高颎首先进入建康，见陈叔宝床下京口前线告急密奏尚未启封。攻破建康之前，杨广令高颎保留张贵妃，至是高颎违令斩张贵妃，杨广闻报变色曰："我必有以报高公矣。"由是痛恨高颎。杨广入建康，斩施文庆、沈客卿等五人。时陈水军都督周罗睺督上游陈军力战，杨广命陈叔宝手书招降上游诸将，周罗睺解散陈军，投降杨俊。陈亡。自隋大举出兵，前后不过四个月，结束四百年长期分裂局面，重新实现统一。

二月，隋军讨平继续抗拒的陈吴州（治今江苏苏州）刺史萧瓛及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刺史陈叔慎，俘萧瓛斩于长安，擒陈叔慎斩于汉口。南朝梁高凉（治今广东阳江西）太守冯宝寡妻冼（xiǎn险）夫人，为岭南（五岭以南）越人（古族名，

后部分与汉人融合，部分发展成为壮、黎等族）首领，有部落十余万家，曾助陈朝统一岭南，并献犀杖于陈。陈亡，岭南数郡共拥冼夫人为主，号圣母，保境拒守。隋遣韦洸出兵岭南，为陈残兵所阻。杨广命陈叔宝致书冼夫人，并以犀杖及兵符为凭，晓谕冼夫人：陈朝已亡，令其归顺隋朝。冼夫人见犀杖，验知陈亡，乃迎韦洸入广州，岭南诸州皆定。于是陈境皆平。隋灭陈共得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户五十万，口二百万。诏令建康城邑宫室俱平为耕地。

三月，杨广班师回朝，俘陈叔宝及陈朝王公百官数百人至长安，献俘于太庙。论功行赏，封杨素为越公，以其子杨玄感为仪同三司；封贺若弼为宋公，加位上柱国；高颎为齐公，加位上柱国；韩擒虎进位上柱国。以陈朝将相江总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袁宪、萧摩诃、任忠为开府仪同三司，周罗睺为上仪同三司。陈旧境免徭役十年，其余各州免当年租赋。

江南世族豪门自东晋以来，素享特权，世居高位，凌驾寒门。平陈之后，隋官限制其政治、经济特权，苏威⑬又作“五教”（守则之类，内容不详）使民诵读，激起不满。豪民制造谣言，谓隋将徙江南士民入关，于是远近惊骇。开皇十年（590）十一月，婺州（今浙江金华）、越州（今浙江绍兴）、苏州（今属江苏）、饶州（今江西波阳）、温州（今属浙江）、泉州（今福建福州）、杭州（今属浙江）等地豪民纷纷起兵，自称天子或大都督，署置百官，攻陷州县。陈朝旧境，大抵皆反，大者数万人，小者数千人，抓住隋官抽肠割肉而食之，说：“更能使侬诵《五教》耶！”文帝遣杨素为行军总管，率师进讨，屡经激战，叛乱终于平息，统一获得巩固。番禺三仲宣起兵反隋，岭南首领多起响应，围广州（今属广东），隋将韦

冼中流矢死，文帝遣裴矩巡抚岭南，高凉冼夫人出兵救广州，与裴矩合力击溃仲宣军，广州解围。冼夫人披甲乘马从裴矩巡抚二十余州，岭南遂定。隋追赠冯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封冼夫人谯国夫人，皇后赐夫人首饰及宴服一套。

隋朝的统一，不仅使大陆南北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得以结束，并且使大陆与台湾自古以来的紧密联系更加密切。台湾即汉代的东鳀、三国时代的夷州、隋唐时代的流求。远在新石器时代，大陆东南地区印纹陶文化即已流传台湾；高山族是这里的最早居民，汉朝时候常来大陆进献方物，进行贸易。三国时，孙权遣卫温、诸葛直率万人船队抵达夷州，自此与大陆联系更为密切，大陆来台湾的移民与日俱增。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海师何蛮奏称：每当春秋二季，天清风静之时，东望大海中，模糊似有烟雾之气。大业三年，炀帝据何蛮奏报，遣羽骑尉朱宽与何蛮入海求访异俗。至流求国，因语言不通，掠一人而返。大业四年（608），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王不从，朱宽取其布甲（流求人编苎麻布为甲）而归。大业六年炀帝遣武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今浙江金华）兵万余人，自义安（今广东潮安）出海，月余至流求。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是商旅，多来军中贸易。流求王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为陈稜所败。陈稜等乘胜攻破其都邑，斩渴刺兜，俘万七千人而还。隋代遣官兵三至台湾，巩固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注　释

①《隋书》卷三八《刘昉传》。

②《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箕、颍之事指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逃亡于箕山，洗耳于颍水事。

④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23页，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中册130页，相州治所皆作河南安阳市。查是年八月尉迟迥起兵失败后，杨坚始“徙相州于安阳，毁邺城及邑居”（《资治通鉴》卷一七四，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尉迟迥起兵时，相州治所仍在邺县。

⑤尚书令、尚书仆射、门下纳言、内史监、内史令皆为宰相。

⑥《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长城公至德三年。

⑦《南史》卷一O《陈本纪》下。

⑧《资治通鉴》一七六，陈长城公祯明元年。

⑨⑩《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长城公祯明二年。

⑪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23页。地图出版社出版，1982年10月第一版。

⑫《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九年。

⑬苏威（534－621），隋大臣。字无畏，京兆武功（今属陕西）人，隋文帝时历任纳言、民部尚书、尚书右仆射。隋亡后先后在宇文化及、李密、越王侗及王世充等政权中任职。

隋唐五代

隋文帝励精图治

隋文帝杨坚，自开皇元年（581）至仁寿四年（604）在位二十四年。在位期间，取代北周建立隋朝，攻灭陈朝统一全国，改革政治制度，加强中央集权，采取经济措施，发展社会经济。他所确立的各项制度，为其后历朝所遵循。“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①，隋代粟帛储积之多，历来为封建史家所称道。隋文帝虽在其统治后期，刑罚日益严酷，剥削不断加强，但仍不失为一个有作为的封建帝王。

唐太宗曾问房玄龄、萧瑀：“隋文帝何等主?”对曰：“勤劳思政，每一坐朝，或至日昃（日西斜）。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之人，传飧（音孙，熟食）而食。虽非性体仁明，亦励精之主也。”②虽然唐太宗以其“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作为帝王，并不可取。但如隋文帝每晨坐朝，直至太阳西斜，与朝臣议论政事，侍卫无暇离去坐下用餐，只有传递熟食“立驻传餐而食”，可谓勤于政事。《本纪》言其“乘舆四出，路逢上表者，则驻马亲自临问。或潜遣行人，采听风俗。吏治得失，人间疾苦，无不留意。尝遇关中

饥，遣左右视百姓所食。有得豆屑杂糠而奏之者，上（文帝）流涕，以示群臣，深自咎责，为之撤膳，不御酒肉者，殆将一祺（音基，一周年或一整月）”。在封建帝王中，隋文帝向以节俭著称，“六宫咸服澣濯之衣。乘舆供御有故敝者，随令补用，皆不改作”③。隋文帝配止痢药，需胡粉（傅面用的铅粉）一两，宫中竟未找到。他告诫太子杨勇说：自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长久的，当太子首先应崇尚节俭。开皇初明令禁止地方官进献犬马器玩口味；悉放太常寺所管散乐人员为百姓，禁止杂乐百戏。开皇十五年（595）相州刺史豆卢通进献绫纹布，命在朝堂焚毁。由于文帝倡导，贵族官吏衣著一般也“无金玉之饰，常服率多布帛，装带不过以铜铁骨角而已”。隋文帝之勤于政事，躬行节俭，在封建帝王中确属罕见。

隋文帝统一全国，综合前代各项制度，有沿有革，制定隋制，大体为唐宋至明清各代所沿袭。

中央官制：开皇元年（581），采纳大臣崔仲方的建议，废北周仿《周礼》所置六官，即天官大冢宰、地官大司徒、春官大宗伯、夏官大司马、秋官大司寇、冬官大司空。恢复汉魏旧制，置三师、三公，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不主事，不置府僚。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参议国家大事，无其人则阙，寻亦不置府僚，仅为优礼大臣之虚号。置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五省，除去秘书省掌图书著作，内侍省掌宦官外，辅佐皇帝处理全国军政机要的主要是三省。尚书省管理政务，“事无不总”（负责执行），置尚书令一人，左右仆射各一人，下设吏部、礼部、兵部、都官（后改刑部）、度支（后改民部）、工部六曹，分管各项政事。每部设尚书，掌部务。六尚书分统三十六侍郎。左仆射判吏、礼、兵三部事，右仆射

判民、刑、工三部事。门下、内史二省掌典机要，门下省掌封驳（审议），置纳言（南北朝时为侍中，为避杨忠讳改为纳言）二人，内史省（南北朝时为中书省，隋改为内史省）掌出纳王命（拟旨），置内史令二人。三省长官：尚书令、左右仆射、纳言、内史令并为宰相。三省互为配合，互为牵制，共分宰相职权，以防止外戚大臣专权篡位。五省以外有御史（掌监察官吏）、都水（掌水利）二台；有太常（掌礼乐等事）、光禄（掌皇室膳食）、卫尉（掌殿廷帷幕等事）、宗正（掌皇族事务）、太仆（掌舆马）、大理（掌刑法）、鸿胪（掌接待四方宾客及礼仪之赞导）、司农（掌仓储）、太府（掌金谷之保管出纳）、国子（掌教育）、将作（掌营造）等十一寺；有左右卫（掌禁卫兵）、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十二府。又置上柱国、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开府仪同三司、上仪同三司、仪同三司、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十一等勋官，及特进、左右光禄大夫、金紫光禄大夫、银青光禄大夫、朝散大夫七等散官作为荣誉名号，分别授予有勋劳或有德声的文武官员。

地方官制：隋以前极为紊乱，南北两朝滥立州郡县，南朝更有侨州郡县，正如杨尚希上表所说："……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备位充数之官）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干良才，百分无二，动须万数，如何可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应改弦更张，变更办法），瑟无胶柱之理（不应胶柱鼓瑟，拘泥不知变通）。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隋文帝采纳他的建议，开皇三年，罢天下诸郡，只存州县两级，又加以并省，裁

汰冗官，消除紊乱现象。汉代以来，州郡长官自辟僚佐，极易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九品中正制下，州郡僚佐的辟置又为世家大族所左右，极不利于封建国家实行中央集权。隋文帝废除州郡长官自辟僚佐旧制，凡九品以上地方官，均由中央任命，吏部考核。并规定县佐回避本郡，任期三年，不得连任。

兵制：隋初沿袭北周府兵制，军人仍独立军户，携带家室，住于军坊，不归州县管理。开皇十年（590）诏令："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战，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包桑多根，军户不能安居，植桑难至根多），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④按此规定，军人除军籍外，并同家室列入州县户籍，与民户同样依照均田法令请占土地。其军役范围内之任务、职责，指挥调度，仍循北周之制，归军府管辖。军人平时耕作，按规定轮番宿卫，战时出征。军人免租调役，出征时自备资粮。于是，府兵家室可以安居，不再随府兵调动而成"流寓之人"，州县掌握府兵及其家属之户籍，亦可堵塞军人包庇本家，隐匿户口，逃避赋役之漏厄。且取消军户之后，府兵即可自一般民户中简选，兵源因而得以扩大。

科举制：魏晋以后，选官用九品中正制，诸州皆置大中正，以甄别流品。开皇初避杨忠讳改大中正为州都。但自西魏北周以来，选官已不全凭家世门资，九品中正制逐渐失其作用。"九品及中正，开皇中方罢"⑤。开皇三年（583）正月，"诏举贤良"。开皇七年隋文帝定制，每州每岁贡士三人，应秀才、明经等科考选。保荐标准为文章华美，其中文章尤美者可应秀才科。开皇十八年（598）命"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其秀

才、明经等科为常设科目，“贤良”、“志行修谨”、“清平干济”等科为临时特科。至“炀帝始建进士科”⑥，正式形成科举制。

刑律：开皇元年（581）隋文帝令高颎、杨素、常明等修订刑律，采魏、晋、齐、梁旧律，沿革轻重，务取平允。废除前代枭首（斩后悬首于木上）、轘裂（车裂）、宫刑、鞭刑等酷法。除谋叛以上罪，一概不用灭族刑。刑名分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笞刑五种。死刑分绞、斩二等；流刑分一千里、一千五百里、二千里三等，刑期最多不超五年；徒刑分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五等；杖刑分六十、七十、八十、九十、一百五等；笞刑分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五等。并废前代审囚酷法，敲打数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亦有定式。发展《北齐律》的“重罪十条”，制定“十恶之条”，即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凡犯“十恶”之罪及故意杀人者，虽遇大赦亦不得赦免。《魏律》、《晋律》有“八议”条文，即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若亲贵犯罪，大者必议，小者必赦”⑦。隋律继承“八议”条文，凡在“八议”之科的皇亲贵戚、勋臣和七品以上官员，犯罪皆减一等治罪；九品以上官员犯罪，可以铜赎罪。开皇三年，刑部断狱仍多达万件，隋文帝认为“律尚严密”。复令苏威、牛弘等修订，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千余条，只定留五百条，分为名例、卫禁、职制、户婚、厩库、擅兴、贼盗、斗讼、诈伪、杂律、捕亡、断狱等凡十二卷，是为《开皇律》。开皇六年，废孥戮相坐之法，开皇十二年，隋文帝以用律者每多乖错，同罪异判，令诸州死罪不得专决，悉移大理寺覆按。

开皇十六年规定死罪囚须经三次奏请，然后行刑。自此刑律简要，基本上为唐、宋至清各代所沿袭。但隋文帝常律外施刑，后期刑罚日益严酷。

继续均田：开皇二年（582），隋颁新令继续均田。规定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为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六十为老。丁男中男依北齐之制受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受露田四十亩，露田必须还受，永业田可传于子孙，得买卖有余或不足部分。园宅地三口给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丁牛（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四牛。自诸王以下至都督，按品级给永业田一百顷至三十顷（《隋书》卷二四《食货志》作四十亩）。京官一品至九品皆给职分田，一品官给五倾，以下每品递减五十亩，至九品为一顷，以充俸禄。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奴婢依良人受露田，不受永业田⑧，奴婢受田人数自诸王至庶人限制在三百人至六十人之间。开皇十四年（594）罢各级官府所置公廨钱，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收租以充办公经费。永业田世代享有，可以买卖，职分田、公廨田则更代相付，不准买卖。上述丁男、中男及妇女受田额乃最高限额，实际并不能按规定亩数受田。开皇初年，太常卿苏威以户口日增，民田不足，建议“减功臣之地以给民”。遭王谊等反对而未果。开皇十二年（592），因关内、河东、河南、河北等地区“地少人众，衣食不给”，隋文帝遣使四出均田，狭乡每丁只能受田二十亩，老少受田更少。功臣不仅占有大量土地，又能获得赏赐田宅，隋文帝两次赏赐杨素田一百三十顷。官僚地主常依势劫夺民地，杨素即“贪冒财货，营求产业，……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硙、并利田宅，以千百数”⑨。然民田虽少，聊胜于无，均田制对豪强兼并土地亦稍有限

制作用，如李圆通即曾“判宇文述田以还民”[10]。

减轻赋役：开皇元年（581），度支尚书苏威奏请减轻赋役，得隋文帝允许，乃改定北朝租调力役制度。规定：丁受田，纳赋服役，六十免赋役。丁男夫妇为一床，纳租粟三石，桑土调绢一匹（四丈），绵三两，麻土调布一端（五丈），麻三斤。单丁及仆（部曲）隶（奴婢）租、调各纳一半。未受田者免租调。有品爵的贵族、官吏及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免除赋役。力役“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匠则六番”[11]。即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工匠两个月。开皇三年隋文帝迁入长安新城，下令把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改为二十一岁，丁男服役日期由每年一个月改为二十日，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十年（590）“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12]，“民年五十，免役收庸”[13]。庸即免役人按服役日期每日纳绢数尺，唐制每日三尺，当是沿袭隋制。免二十日役，纳绢不过数丈。赋役的减轻，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整顿户籍：隋初，户口隐漏情况严重。由于南北朝后期赋重役勤，民不堪命，多依附士族豪强，为其佃客，形成“百室合户，千丁共籍”。或诈老诈小，逃避赋役。北齐时“阳翟（今河南禹县）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隋初，山东一带，“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对此，隋文帝首先整顿人户编制，因革北魏以来的三长制，畿内五家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正。畿外五保为里，设里正；四里为党，设党长，以相检查。继续均田，减轻赋役，以利于与地方豪强争夺浮客。开皇五年，隋文帝“命州县大索貌阅（检括户口，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户口不实者，里正、党长远配（流放远方）；大功（堂兄弟）以下，皆令析籍（各立户头），

以防容隐”⑭。又奖励民户互相检举。于是“计帐”⑮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口”⑯。为检括户，防止官吏豪强营私舞弊，隋文帝采纳高颎建议，实行输籍法，即政府按民户资财和人丁多少划分户等，根据户等高低，从轻定出赋税定额，称为“输籍定样”，颁发各州县。每年正月五日，县令派人到各地，各随近便，以五党或三党为一团，依照“定样”，逐户确定户等，编成定簿，使赋税负担有固定标准，百姓不能逃税，官吏并不能任情舞弊，而所定税额较豪强取之“浮客”者稍轻，有利于诱使“浮客”脱离豪强的荫庇成为政府的“编户”。使国家掌管的户口大为增加。

统一钱币、度量衡：南北朝时期，钱币极其混乱，“周齐所铸钱凡四等，及民间私钱，名品甚众，轻重不等”⑰。北齐铸常平五铢，制造甚精，民间往往私铸，或以生铁和铜。北周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后废布泉，又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千，与五铢并用。开皇元年（581），隋文帝新铸五铢钱，“背、面、肉、好（铜钱铸有文字的一面为“面”，背面为“背”，钱体为“肉”，钱孔为“好”），皆有周郭（铜钱外圆周之以规，内方周之以矩，谓之“周郭”，即都有外框），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开皇三年，“诏四面诸关，各付百钱为样，从关外来，勘样相似，然后得过；样不同者，即坏以为铜，入官”。开皇五年，“又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⑱。隋文帝统一度量衡，以古度量衡（指王莽所定度量衡）为标准，由小变大：以古尺一尺二寸为一尺（合今29.51厘米），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合今594.4毫升），以古秤三斤为一斤（合今668.19克）。“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⑲，

唐以后历朝沿用隋制，变动不大。

户口与储积：北周建德六年(577)灭北齐时，北齐户数在三百万以上⑳，当时北周旧境户数当在一百四十万以上㉑，隋朝建立了初户数当在四百五十万左右。由于大索貌阅和析籍以及减轻赋役和输籍法的实施，隋境户口激增，开皇九年(589)，原北周、北齐和陈江北旧境户数达六百余万㉒。灭陈得户五十万，总户数达到七百万左右。大业二年(606)户数达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数达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㉓。公元589－606年十七年中户数约增百分之二十九，增长速度超过唐代前期。另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开皇初有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零四户，开皇九年灭陈得五十万户，总计当时全国户数约四百一十万。材料依据为《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炀帝大业二年，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极盛也。(原注：后周静帝末授隋禅，有户三百五十九万九千六百四。至开皇九年平陈，得户五十万，及是才二十六七年，直增四百八十万七千九百三十二)。"开皇初户数如为三百五十九万，去掉北齐旧境的三百零三万，北周旧境只余五十六万。如北齐旧境以三百三十万计，则北周旧境只余二十九万，显然北周禅隋时户数决不止三百五十九万㉔。故不取此说。

随着全国的统一，赋役的减轻，农业人口的激增，社会经济也呈现出繁荣景象，反映之一是隋代朝廷的富饶，储积的惊人。"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今山西永济）达于京师，相属（zhǔ）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㉕。开皇十二年（592），"有司上言：储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于是更辟左藏院以受之"㉖。库藏之富，前所未有。《通典》卷

七《食货典》《丁中》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㉗，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今山西太原）库布帛各数千万。"唐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㉘贞观十一年（637），侍御史马周上疏："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以畜积多少，在于百姓苦乐。且以近事验之。隋贮洛口仓而李密因之，东都积布帛而世充资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至今未尽。"㉙唐朝立国二十年后，隋朝所留库藏仍未用尽，其数量之大可以想见。

注 释

①《文献通考·国用考》。

②《旧唐书》卷三《太宗纪》下。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十年。

⑤《通典·选举典》。

⑥《通典》卷一四《选举典》《历代制》中。另一说开皇年间已设进士科，参阅韩国磐《隋唐五代史论集》294页《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三联书店1979年第一版。

⑦《太平御览》卷六五二引《傅子》。

⑧参阅《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及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242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26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二版。

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⑩《隋书》卷六四《李圆通传》。

⑪《隋书》卷二四《食货志》。十二番即分服役人为十二组，每一组服役一个月后轮换，每人十二个月中服役一个月。六番即分服役人为六组，每一组服役一个月后轮换，每人六个月内服役一个月。如此轮流更代。

⑫《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⑬《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文帝开皇十年。

⑭《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长城公至德三年。

⑮各州县每年造一次计帐，向尚书省报告户口及来年要征的课役，再据计帐造成户籍。

⑯《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⑰《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⑱《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⑲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一《权量》。

⑳《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北齐为周师所灭，有户3032528，口20006880。《周书》卷六《武帝纪》：关东平，合州55，郡162，县385，户3302528，口20006686。

㉑参阅汪篯《隋唐史论稿》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隋大业中北周旧境户二百五十四万余，北齐旧境户五百三十九万余，北周灭北齐时北齐户三百万，增长率约为百分之七十八。按这一增长率推算，当时北周旧境的户数当在一百四十万以上。

㉒《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参阅汪篯《隋唐史论稿》33页。

㉓《通典》卷七《食货·历代盛衰户口》。

㉔参阅汪篯《隋唐史论稿》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㉕《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㉖《资治通鉴》卷一七八，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㉗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差等，储之闾巷，以备凶年。开皇十二年规定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

㉘吴兢《贞观政要》卷八《论贡赋》。

㉙《资治通鉴》卷一九五，唐太宗贞观十一年。

隋唐五代

突厥附隋

突厥是匈奴的别支，有十姓，首领出于阿史那氏。突厥族原游牧于中亚叶尼塞河上游，后迁徙于高昌之北山（高昌国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北山即今博格多山），以从事锻铁著称。五世纪中臣属于柔然，迁居金山（阿尔泰山）南麓，世为柔然铁工。金山形似兜鍪（古武士头盔），其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突厥”为族名。

西魏时突厥逐渐强大，到西魏边塞通贸易。西魏文帝大统十一年（545），遣使到突厥报聘通好，大统十二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遣使到西魏献方物，这是西魏与突厥往来的开始。这一年，高车进攻柔然，土门率所部大破高车，降其众五万余落。土门恃其强盛，向柔然可汗阿那瓌求婚，阿那瓌遣人辱骂土门：“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土门大怒，杀柔然使者，转而向西魏求婚。大统十七年（551），西魏以长乐公主嫁土门。次年，土门在怀荒镇（故址在今河北张北）大破柔然，迫阿那瓌自杀。土门自立为伊利可汗，号其妻为“可贺敦”（意为皇后），子弟为“特勤”，将领为“设”，以今鄂尔浑河上

游为中心建突厥汗国。公元553年土门死，子科罗立，号乙息记可汗，曾遣使至西魏献马五万匹。不久科罗死，其弟木杆可汗（553－572）立。木杆可汗统治时期，突厥势力极盛。木杆勇而多谋，善于用兵，率兵灭柔然余部，又西灭嚈哒（yà dā，建都拔底延城，在今阿富汗北部），东击契丹（在今辽河上游一带），北并契骨（在今叶尼赛河上游一带，即结骨，唐称黠戛斯），于是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自辽海（今辽河下游及辽东湾）以西，西以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戈壁沙漠）以北，北至北海（贝加尔湖）五六千里"①，成为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强大汗国，牙帐建在于都斤山。

突厥人民以畜牧为生，逐水草而居，穹庐毡帐，披发左衽，食肉饮酪，贵壮贱老。风俗与匈奴、柔然略同，行收继婚制，父、兄、伯叔死，子弟及侄得妻其后母、嫂、伯叔母，但父兄伯叔不能以儿媳、弟媳及侄媳为妻。人死，"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②。是谓剺（lí）面。然后择日焚尸取灰而葬，墓地建屋，"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生前战场上杀一人则立石一块，有立至千百块者。人皆以战死为荣，以病终为耻。牲畜为私有，数量很多，与北朝往来，动即献马数万匹。突厥"工于铁作"，武器有弓、矢、鸣镝、甲、矟、刀剑等，铁工具的制造颇为发达，与周、齐以及中亚商业交换日趋频繁。可汗之下有叶护（相当于宰相）、设、特勤、俟利发、吐屯发等大小官共二十八级，皆为世袭。征兵、征税及刑法制度大致如下："其征发兵马，科税杂畜，辄刻木为数，并一金镞箭，蜡封印之，以为信契。其刑法，反叛、杀人及奸人妇、盗马绊者皆死；奸人女者重责财物，即以其女妻之；斗伤人者

随轻重输物；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突厥已有拼音文字，这是蒙古草原上第一个有自己文字的民族。突厥汗国是一个奴隶制国家，可汗、官吏和各部落中的“伯克”（唐时汉译作“匐”，牧主）组成奴隶主阶级，他们占有多少不等的牧地、奴隶和牲畜。主要生产者是牧民和奴隶，牧民是氏族平民，向可汗提供牲畜、劳役和兵役；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有汉人、高车人、柔然人及其他各族人，奴隶向奴隶主纳贡，服无偿劳役。奴隶主的残酷压榨使突厥“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fǔ）心，衔悲积恨”③。意即部落之下，没有一个一心为可汗服务的人民，各族各类的人同奴隶主成为敌对双方成为仇敌，他们泣血捶胸，满怀悲愤，矛盾非常尖锐。

北周天和三年（568），周武帝纳木杆可汗女为皇后。木杆可汗死，其弟佗钵可汗继位。时突厥兵马强盛，控弦之士数十万。北周既与突厥和亲，岁给缯絮锦綵十万段，突厥人在长安者优礼相待，衣锦食肉，常以千数。北齐恐突厥与北周联兵，亦倾府库遣使向突厥求婚。正如隋文帝诏书中所说：“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遂安危。”④佗钵可汗利用这一形势，和双方榨取大量财物，每对其部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也！”⑤周武帝宣政元年（578），突厥扰国幽州，武帝率军击突厥，因病班师，六月死，佗钵可汗请和，宣帝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嫁佗钵。

隋开皇元年（581），佗钵可汗死，其子庵逻立。庵逻又以国让乙息记可汗子摄图，摄图号沙钵略可汗，居都斤山。庵逻降居都洛水，称第二可汗。（参看后附突厥可汗世系表）沙钵

略可汗又以木杆可汗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木杆可汗时曾遣土门可汗弟室点密率十大首领经略西域，攻灭哌哒，室点密自立为西面可汗，其子玷厥继位为达头可汗。诸可汗各统所部，形成割据势力，沙钵略可汗为大可汗最高统治者。杨坚代周建立隋朝以后，待突厥甚薄，沙钵略怨怒，其妻周千金公主又请为周室复仇，于是沙钵略与原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攻陷临渝镇（今山海关），开皇二年（582）更发诸可汗兵四十万入长城，纵兵袭武威（今属甘肃）、安定（今甘肃泾川北）、天水（今属甘肃）、金城（今甘肃兰州）、上郡（今陕西富县）弘化（今甘肃庆阳）、延安（今陕西延安东北）等地，以至“六畜咸尽”。对突厥的攻掠，隋文帝采取两项措施，一是采用长孙晟的离间策略。长孙晟因在北周时为送千金公主出使突厥，颇知突厥虚实，上书分析摄图与玷厥、阿波、处罗侯之间互相猜忌疑惧不安的情况，提出：“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霫，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⑥的离间突厥的策略。隋文帝采纳这一建议，遣使联络玷厥、处罗侯及奚、霫、契丹。另一措施即以河间王杨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行军元帅，分道击突厥。沙钵略欲继续南下，达头不从，引兵而去。开皇三年（583），隋军与沙钵略战于白道（阴山南北重要通道之一，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隋精骑五千掩击，大破突厥兵，沙钵略弃所服金甲，潜伏草中而得逃脱。窦荣定率步骑三万出凉州（今甘肃武威），屡败阿波于高越原（在今甘肃武威北长城外）。时长孙晟在窦荣定军中为偏将，乘势劝阿波依附隋朝，结连达头，免遭摄图

归罪戮辱。阿波甚以为然，遣使随长孙晟入朝。沙钵略素忌阿波骁悍，白道战败后又闻阿波与随连和，因率兵先归，袭击阿波牙帐，杀阿波之母。阿波无处可归，西奔达头，达头闻之大怒，遣阿波率兵东进，其部落归之者近十万骑，攻沙钵略，屡破之，复得故地。达头与阿波联合，一起与沙钵略抗衡，连兵不已，东西突厥的分裂从此形成。

开皇四年（584）二月，达头可汗请降于隋。九月，沙钵略可汗儿次败于隋军之后亦请和亲，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隋文帝女。隋遣使赴突厥，改封千金公主为大义公主。沙钵略致书隋文帝："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隋文帝覆书说："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开皇五年（585），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请将部落迁居漠南，得隋朝允许。隋并赐以衣食、车服、鼓吹。沙钵略因而西击阿波，擒之置于山谷间，上表给隋文帝，表示"永为藩附"。隋文帝下诏书说："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是一体。"⑦沙钵略自是贡献不绝。开皇七年（587）沙钵略死，其弟处罗侯立，是为莫何可汗。次年莫何可汗死，国人立沙钵略子雍虞闾为都蓝可汗。隋灭陈，以所获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周千金公主改封）。公主对周室之亡心仍不平，题诗于屏风上以寄怀，隋文帝闻之不悦，待之渐薄。公主乃煽惑都蓝屡为边患。开皇十三年（593）隋遣使入突厥，废大义公主，并劝说都蓝把她杀死。时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于北方，遣使求婚，隋以宗女安义公主嫁突利可汗，劝说他率众南迁，故予厚礼，以离间都蓝。都蓝求婚，隋不允。由是怨怒，常扰边境，突利侦知动静，即遣使报告，使隋边境每常有备。开皇十九年

(599)，突利奏言都蓝欲攻大同城，隋遣高颎、杨素、燕荣等三道出兵以击都蓝。都蓝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袭击突利，大战于长城下，突利大败，兄弟子侄皆被杀。突利投奔隋朝，至长安，隋文帝给予优厚待遇。高颎军大败突厥，追过白道（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越过秦山（在白道北）七百余里而还。杨素军遇达头骑兵十余万，乘其战阵未整，周罗睺率精骑迎战，杨素以大军继之，突厥大败，达头受重创逃遁。隋封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汉语意为"意智健"）。突厥男女万人归启民可汗，隋文帝命长孙晟在朔州（治今山西朔县）筑大利城，使启民可汗率部居住其中。时安义公主已死，隋又以义成公主嫁启民可汗。是年十二月都蓝为部下所杀，其国大乱，余部多附启民可汗。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开皇二十年(600)，步迦可汗犯边，诏令晋王杨广与杨素出灵武道（今宁夏灵武南），长孙晟率降人归晋王指挥；汉王杨谅与史万岁出马邑道（今山西朔县），分道击突厥。长孙晟以突厥饮泉水，于是在流投涸毒药，突厥人畜饮后多死亡，于是大惊曰："天雨恶水，其亡我乎！"连夜逃遁。长孙晟率部追击，斩首千余级。史万岁出塞至大斤山（即秦山，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遇步迦，大破步迦兵，斩首数千级，追入沙漠数百里而还。仁寿元年（601）正月，步迦再度犯边，打败隋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总管韩弘。五月，突厥男女九万口降隋。十一月，隋以杨素为行军元帅，长孙晟为受降使者，携启民可汗北击步迦。教启民分遣使者招怀铁勒等部。次年，步迦可汗部思力俟斤等南渡黄河，掠启民可汗部下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杨素率诸军追击，大破突厥兵，追获全部人畜归启民可汗。自是突厥远遁漠北，漠南始得安居。

仁寿三年（603），西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乱，铁勒之仆骨等十余部皆摆脱步迦可汗降于启民可汗。步迦部众溃散，西奔吐谷浑，不知所终，余部尽归启民可汗。先是开皇五年（585），西突厥阿波可汗为沙钵略所擒，国人立鞅素特勤之子为泥利可汗。仁寿元年（601），泥利可汗被铁勒击败而死，其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泥撅处罗可汗统治失道，国人多叛。大业元年（605）泥撅处罗引兵击铁勒诸部，于是铁勒诸部皆叛，屡败泥撅处罗。泥撅处罗母向氏，本汉人，时居住在京师，泥撅处罗思念母亲，大业四年（608），隋遣招怀他，泥撅处罗只遣使贡汗血马而不入朝。大业七年，泥撅处罗属下酋长射匮遣使求婚，炀帝令射匮发兵诛处罗，然后始许婚，并可立其为大可汗。射匮举兵大败泥撅处罗，迫使他率数千骑东走高昌，炀帝遣裴矩与泥撅处罗母向氏前往晓谕，泥撅处罗降隋入朝。分其部众为三部，一部居会宁（今甘肃靖远），一部居楼烦（今山西静乐），泥撅处罗自将五百骑常从炀帝巡游，赐号曷娑那可汗，赏赐甚厚，并以宗室女为信义公主嫁给他。其后射匮死，弟继位称统叶护可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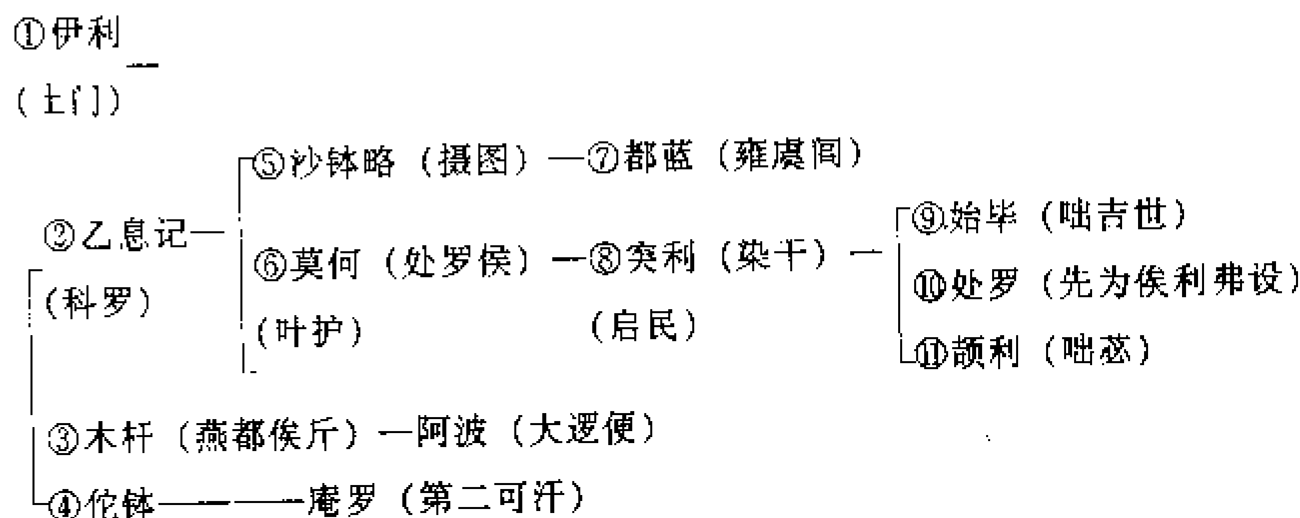
隋与启民可汗联系更为紧密，大业三年（607）启民入朝，炀帝为之搜求天下乐工、杂技皆为乐户，使四方散乐大集东京，以夸示富乐。同年炀帝北巡，沿途启民不断遣子侄朝见。车驾驻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启民可汗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为炀帝北巡，突厥举国就役，自榆林北境，至启民牙帐，东达于蓟（今北京市）开御道三千里，宽百步。启民上表说："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愿率部落变更衣服，一如华夏。"⑧炀帝至启民可汗牙帐，皇后到义成公主帐，赐启民及公主金瓮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

等。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死，炀帝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为始毕可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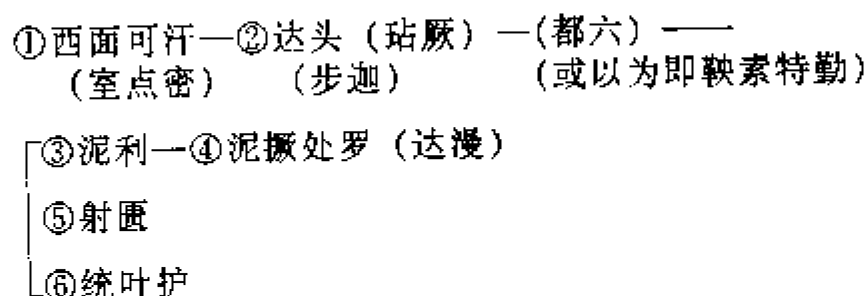
自齐、周以来，崛起于北方的突厥，至此归附隋朝。但隋所恃者主要为离间手段，故只能收效一时，不能维持久远，隋末复起而为边患。

附：突厥可汗世系表

突厥及东突前汗国可汗世系表



西突厥前期可汗世系表



阿波（木杆可汗子）

贪汗（世系失考）

（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五代史》383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8

（参看《中国大百科全书·隋唐五代史》38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注　释

①《周书》卷五O《突厥传》。

②③④《隋书》卷八四《突厥传》。

⑤《周书》卷五O《突厥传》。

⑥《隋书》卷五一《长孙晟传》。

⑦《资治通鉴》卷一七六，陈长城公至德三年。

⑧《资治通鉴》卷一八O，隋炀帝大业三年。

隋唐五代

隋炀帝之暴政

隋炀帝杨广是靠阴谋夺取帝位的。隋文帝有五子，代周后以长子杨勇为皇太子，封次子杨广为晋王，杨俊为秦王，杨秀为越王，杨谅为汉王。隋文帝曾对群臣说：前代天子，多宠嫔妃，众子“嫡庶分争，遂有废立，或至亡国。朕旁无姬侍，五子同母，可谓真兄弟也，岂有此忧邪?”①但不久即有废立太子之事。杨广十三岁封晋王，曾任并州总管，淮南道行台尚书令等职，二十岁被任为灭陈隋军统帅，深受皇后独孤氏宠爱。太子杨勇行事放任，无所拘束，无所掩饰，恩宠遂衰，文帝渐生猜忌。杨广闻知，更加矫饰，以获帝后欢心。文帝与独孤后至杨广第宅，他藏匿宫女，断乐器之弦，不令拭去灰尘。文帝以为他不好声色，大喜。实则当隋军攻克建康时，杨广首先想到的是派人赶至建康令高颎留下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高颎以为不可，斩张丽华，杨广闻而变色说：“我必有以报高公矣。”因此恨高颎。文帝看到的全是伪装假相。独孤后劝文帝废立太子，杨广勾结杨素，使素于文帝前屡进谗言，又收买东宫近臣，诬告杨勇图谋不轨。文帝有废立之意，言于高颎，高颎反

对废立，高颎子娶太子女，高颎与太子已成为儿女亲家，事关一家命运，自然不能同意。文帝于开皇十九年（599）免高颎上柱国、左仆射，继而除名为民。开皇二十年（600）废太子杨勇及其子女为庶人，穷治东宫党与。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囚杨勇于东宫，交给太子杨广监管。杨勇屡求见隋文帝申冤，为杨广所阻，不得见，于是升树高呼，声闻帝所，冀得引见。杨素说杨勇神志昏乱，文帝信以为真，终不得见。废杨勇立杨广为太子，蜀王杨秀意甚不平，杨广恐其终为后患，令杨素进谗言，仁寿二年（602）废杨秀为庶人，囚之于内侍省，不得与妻子相见。宇文化及之乱杨秀及诸子皆遇害。杨素专事逢迎，贪冒财货，及废太子杨勇及蜀王杨秀，更得文帝宠信，威权愈盛。仁寿四年（604），文帝病危于仁寿宫（避暑行宫，在今陕西凤翔北），杨素、柳述、元岩皆入宫侍疾，召太子杨广入居大宝殿。太子与杨素预谋后事，杨素致太子密报，宫人误送文帝处，文帝览而大怒，又加杨广无礼后宫，始知其奸谋，后悔杨勇之废说："独孤误我"，"枉废我儿"！乃呼柳述、元岩，令召杨勇进宫，欲行废立。杨素闻之立报太子，矫诏逮捕柳述、元岩下大理狱，控制宫廷宿卫，尽遣后宫退出寝殿，令张衡进入寝殿拦杀文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②。文帝死，杨广即皇帝位，是为隋炀帝。使人入长安，矫称文帝遗诏，缢杀杨勇。杨勇所生十子皆被杀。又遣使持文帝玺书召汉王杨谅，文帝曾与杨谅密约："若玺书召汝，敕字旁别加一点。"及见敕字旁无点，杨谅知有变，于是以讨杨素为名起兵，直指京师，为杨素所败。杨谅请降，除名为民，幽禁而死。只秦王俊因病于开皇十七年召还京师，又以奢侈免官，数岁而卒。

隋炀帝继位后，立即决定迁都洛阳，征发丁男数十万掘长堑以环卫洛阳。长堑起自龙门（今山西河津）东接长平（今山西高平）、汲郡（今河南汲县）抵临清关（在今河南新乡东），渡河至浚仪（今河南开封）南下至襄城（今属河南），西达于上洛（今陕西商县），沿堑设置关防，使堑内地区与关中相联结，以防民众反抗。并下诏于伊、洛营建东京（洛阳）诏书说：汉王谅起兵，山东州县，一度沦陷，“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况复南服（陈朝故地）遐远，东夏（北齐故地）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③。营建东京在政治上可以加强对关东与江南地区的控制。且洛阳“水陆通，贡赋等”，交通方便，地位适中，各地贡赋运输，路程均等，在经济上物资供应比长安便利。于是凭借隋文帝积累起来的巨量财富，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

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命尚书令杨素为营建大监，纳言杨达与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于洛阳旧城西十八里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历时十月，于大业二年初建成。宇文恺迎合炀帝意图，规模力求宏大，城跨洛水两岸，总体布局是方形，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宫城也称禁城，位于外郭城之西北隅，皇城之北，“东西五里二百步南北七里”④是皇帝寝宫和议事殿阁所在。宫城内殿堂林立，乾阳殿“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其柱大二十四围（一围即两手之间合拱的粗细）”⑤。皇城位于外郭城之西北隅，围绕在宫城的东、西、南三面，是百官府署，皇子、皇孙及公主府第所在。外郭城也称罗城是百官府第和百姓住宅所在，东墙长 7312 米、南墙长 7290 米、北墙长 6138 米、西墙纡曲长 6776 米，周长合 55.032 里。外部城有一百零三坊

（居住区），在洛河南岸有二市：东为丰都市（唐名南市）；西为大同市（唐名西市）；洛河北有通远市（唐名北市）。东京建成后，为充实其人口和经济力量，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⑥。大业二年（606）五月，又命“江南诸州，科上户分房入东都住，名为部京户，六千余家”，大业三年十月又命“河北诸郡送工艺户陪东都，三千余家”。时洛阳有二十万二千二百三十户，人口达百万以上。宫殿木料皆采自豫章（今江西一带），大木运输极为困难，据隋末唐初张玄素所见：“二千人曳一柱，以木为轮则戛（jiá 夹，摩擦声）摩火出，乃铸铁为毂（gǔ 谷，车轮中心贯车轴者），行一二里，铁毂辄破，别使数百人赍（jī 基，持）铁毂随而易之，尽日不过行二三十里，计一柱之费，已用数十万功，则其余可知矣。”⑦工程浩大，时间紧迫，官吏督役严急，服役丁壮被劳累折磨致死者十之四五。载尸车东至成皋（今河南荥阳）北至河阳（今河南孟津）相望于道。

与营建东京同时，命宇文恺、封德彝等于洛阳西南营建显仁宫（在今河南宜阳）。南接皇涧，北邻洛阳，周围十余里。征发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运抵洛阳；又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充实各园苑。

大业元年五月，在洛阳西面筑西苑，周围二百里，苑内引涧水掘池为海（名积翠池）周围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形势非常相宜。海北有龙鳞渠，曲折流来，注入海内。沿渠立十六院，院门临渠，每院住四品夫人主院事。堂殿楼观，穷极华丽，宫树秋冬凋落，剪彩绫为花叶，缀满枝条，色褪则更换新制，使常如阳春。池中亦剪彩绫，为荷、芰、菱、芡，炀帝一

到，则去冰布于水面。十六院想尽方法招引炀帝到来。炀帝好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马上奏《清夜游曲》。

营建东京同时，发丁百余万开通济渠。自长安至江都，置离宫四十余所，江都宫尤为壮丽。又在江南造龙舟及杂船数万艘，大业元年八月，炀帝率领一二十万人出游江都（今江苏扬州），自显仁宫出发，所乘龙舟长二百尺，宽五十尺，高四十五尺，上下四层，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二层有房间一百二十，全用金玉装饰；下层为内侍住所。皇后乘翔螭舟，制度较小，装饰相同。还有称为浮景的水殿九艘，高三层，另有漾彩、朱鸟、苍螭、白虎等名号的大船数千艘，妃侍、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番客按品位分别乘坐，一部分船载帝后及出游人使用的物品。挽船壮丁多达八万余人，其中挽漾彩以上船的有九千余人，皆着锦彩袍，谓之殿脚。其中龙舟用纤夫一千零八十人，皇后的翔螭舟用纤夫九百人，妃嫔所乘浮景舟共九艘每艘用纤夫二百人，贵人、美人所乘漾彩舟共三十六艘，每艘纤夫一百人。又有平乘、青龙等名号的船数千艘，皆由十二卫兵乘坐，并载兵器帐幕，由兵士自挽，不给夫役。船只首尾相接前后长达二百余里，骑兵夹岸护送，旌旗蔽野。所过州县，五百里内皆令献食，多者一州献至一百车，尽皆山珍海味中的精品，后宫无法吃尽，出发时尽皆埋弃。许多州县官为献食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租调，众多民户为此倾家荡产。

大业二年（606）二月，炀帝在江都令何稠等大造车舆仪仗，何稠智思精巧，务求华盛，以称炀帝之意。课州县送羽毛，以装饰仪仗，于是到处求捕，网罗遍水陆，禽兽羽毛能用者，捕杀殆尽。“乌程有高树逾百尺，旁无附枝，上有鹤巢，

地，时人或称以为瑞，曰：'天子造羽仪，鸟兽自献羽毛'"⑧。搞得鸟兽不宁。造仪仗役使工匠十余万人，用金银钱帛不计其数。每次出游，仪仗填街溢路，长二十余里。四月，回洛阳，仪仗队千乘万骑入京城，大逞其帝王之威风。

大业三年（607），突厥启民可汗入朝，炀帝欲夸示富乐，召集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编为乐户，又六品官以下以至庶人，有擅音乐百戏者皆至太常寺当差。于是四方散乐（又称百戏即杂技）大集东京。炀帝检阅散乐于西苑积翠池畔。有舍利兽跳跃激水，化成鲸鱼，喷雾障日，忽而化成黄龙，长七八丈。又二人左右并行，头上各顶长竿，竿上皆有人舞动，忽然竿上两人同时跳到对方竿上，互换位置，一闪而过轻捷自如。乐舞人员皆衣锦绣缯彩，两京绵彩几乎用尽。启民见隋朝各种文物，羡慕异常。同年炀帝巡游北境，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开通往并州（今山西太原西南）的大路。沿途郡县官献食精美者赏，不满意者罚，于是争相献美食，边郡贫苦，仅此一项不知使多少人丧失生计。为行军安全，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起榆林（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东至紫河（今内蒙古南部、山西西北部长城外的浑河，蒙语为乌兰穆伦河）限期二十天筑成，丁役死者十之五六。至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启民率所属奚、霫（xi 习）契丹等部落酋长数十人及突厥酋长到帐下朝见，炀帝盛宴之并作散乐，各酋长争献牛羊驼马，炀帝赐启民帛二十万段，其余酋长按等级受重礼。高颎、贺若弼、宇文㢸（古弼字）私下议论炀帝大征散乐、修筑长城、侈宴启民事，被告发，皆以诽谤朝政罪处死。高颎为隋开国元勋，当朝执政将近二十年，先后推荐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皆位至将相。高颎声望很

苏威、杨素、贺若弼、韩擒虎等人，皆位至将相。高颎声望很高，无罪被杀，时人多表怜惜。炀帝率大军五十万，马十万匹，出榆林游行突厥牧地，旌旗辎重千里不绝。令宇文恺作观风行殿，上容侍卫数百人，下装轮轴，可以推移。又作行城，周围二千步，以木板作城墙、望楼，以布罩之，涂以丹青，突厥惊以为神。驾临突厥启民牙帐后，大军转入楼烦关（在今山西宁武东北）经太原回洛阳。在太原下令营建晋阳宫。

大业四年（608）炀帝再度北巡，出塞巡视去年所筑长城，又发丁二十余万筑榆林以西一段长城。西京及江都宫殿苑囿虽多，日久生厌认为无可意者，于是令于汾州（今山西汾阳）之北营建汾阳宫。

大业五年（609）正月改东京为东都。炀帝西巡，自东都至西京，四月渡黄河，到浩亹川（浩亹 gé mén，今大通河，在青海乐都县东），吐谷浑可汗伏允率众抗隋，炀帝遣将击败吐谷浑。至张掖（今属甘肃），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设（意为突厥所置守伊吾官）等因得隋厚利，与西域二十七国使者于路旁谒见。吐屯设献西域地数千里，隋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等郡，时全国共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余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为隋朝极盛时期。炀帝于观风行殿盛宴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二十余国使者。自张掖东还，行经大斗拔谷（今甘肃民乐东南甘、青两省交界处扁都口隘路），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遇大风雪，士卒冻死过半，马驴死十之八九，十一月始回东都。

西域诸国商人，一向至张掖交易，裴矩驻张掖掌管通商事务，他就西域商人访问诸国山川风俗，状貌服饰，撰《西域图

记》三卷，炀帝一见大悦，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令裴矩以厚利劝令西域诸国入朝。大业六年（610）正月，西域诸国使者商人齐集洛阳。炀帝于正月十五日夜，在皇城端门外大街设百戏场，为西域人大演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各种乐器进行演奏的达一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通宵达旦，灯火照耀同白昼，直到月底方罢。费至万万。自是岁以为常，今人元宵行乐，盖始盛于此。西域人入丰都市交易，炀帝先命商人“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⑨，商人服装华美，卖菜者亦用龙须席铺地。西域人过酒食店，店主邀请入座，醉饱而散，不取分文，诈称隋朝富饶，酒食照例不收钱。西域人见市上树皆用缯帛缠饰，问道：“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⑩市上人无言以对。三月炀帝再游江都。

大业十一年（615）炀帝第三次北巡，突厥始毕可汗率骑兵数十万谋袭隋军，义成公主遣使告变。炀帝逃回雁门（治今山西代县西北），突厥围雁门，城中兵民十五万，尽力死守，粮食仅可支持二十天，雁门郡四十一城，被突厥攻破三十九城，又急攻雁门，流矢可见；炀帝大惧，抱幼子日夜哭泣。苏威、肖瑀等劝炀帝下诏不再出兵高丽，高悬赏格重赏战守及来援将士。于是郡守县令竞率援军赴难。李世民亦应募从军。始毕见援兵已至，义成公主又遣使告以：“北边有急。”始解围出塞。炀帝回洛阳，对守雁门有功将士，大降赏格，失信于民，又议出兵高丽，将士无不愤慨。杨玄盛之役，龙舟水殿皆被焚毁，令江都再造新船数千，比原来更大更美。

大业十二年（616）江都新龙舟造成，炀帝慑于农民起义的风暴，决心离开洛阳去东都，以求苟安于一时。右候卫大将

军赵才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⑪炀帝大怒，将其下狱。出发时，崔民象在建国门上表谏阻，被杀，行至汜水（在今河南）王爱仁上表请还西京，又被杀。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南），有人拦路上书说："陛下若遂幸江都，天下非陛下之有。"⑫杀上书者。时隋炀帝已成为"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极端孤立的独夫民贼。

注 释

①②《资治通鉴》隋文帝仁寿四年。

③《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④⑤《大业杂记》卷六O。

⑥《隋书》卷三《炀帝纪》上。

⑦《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⑧《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二年。

⑨⑩《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六年。

⑪⑫《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十二年。

隋唐五代

隋炀帝三攻高丽

中国与朝鲜有悠久的历史关系，早在殷周时期已有往来。战国时齐燕等国与朝鲜商业贸易联系密切，燕之铁器、货币都曾输入朝鲜。燕齐两地人民为反抗封建压迫，成批迁往朝鲜，带去先进生产工具和技术。西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去朝鲜后被立为朝鲜国王，都王险城（今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半部。卫氏朝鲜与西汉保持友好关系，为汉“藩属”国。汉武帝时，因卫满孙右渠“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雍阏不通”①，于元封二年（前100）派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水旱两路进攻朝鲜。围王险城，久攻不下。后因朝鲜内部变乱，臣属杀国王卫右渠，投降汉朝。汉武帝在卫氏朝鲜统治区设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西汉政府对朝鲜人民进行统治和压迫，朝鲜人民不断进行反抗。但两国人民经济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发展。中国手工业品大量传入朝鲜。平壤出土的漆耳杯、漆盘等皆西汉官营工业之精制品。汉文化对朝鲜有明显影响。东汉末年，朝鲜半岛北部先后兴起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半岛南部有三韩，即马韩、辰

韩、弁韩。东汉政府同其中的许多政权有政治和经济的联系。朝鲜的苏马谌（shì 音是）等人与东汉贸易，受到刘秀的欢迎。朝鲜人用班鱼、“果下马”（能在果树下行走的矮马）、文豹等产品交换东汉的物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朝鲜半岛分为三国，高句丽居北，百济居西，新罗居东。三国同中国南北政权都保持经常往来。梁武帝大同七年（541），百济遣使求《涅槃》等佛经经义，并请派讲解三《礼》、《毛诗》的博士和工匠、画师。梁武帝派学者陆诩和工匠、画师前往，中国的五经、三史、《三国志》等书以及医药、历法等也陆续传入朝鲜。朝鲜语吸收不少汉语词汇，很多人能用汉文写作。朝鲜的乐曲《箜篌引》和伽倻琴传入中国。北周曾将高句丽、百济乐列入乐部。

三国中高句丽最为强大，都城平壤亦名长安城。高句丽与南朝联系从未间断，与北朝亦有使节往来，北魏时朝贡通商颇为频繁，曾“岁致黄金二百斤，白银四百斤”，北魏亦给予“衣冠服物车骑之饰”②。北齐封高句丽统治者高汤为高丽王，始去“勾”字称高丽。北周武帝封高汤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文帝即位仍封为高丽王。开皇初不断遣使入朝，及隋灭陈之后，高汤大惧，遂“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③。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致书高汤，责其闻陈亡而叹恨，并问：“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高汤将奉表谢罪，恰逢病卒，子高元嗣位，隋仍封其为高丽王。开皇十八年二月，高丽王高元率靺鞨万余骑扰辽西，隋文帝大怒，以汉王谅为行军元帅，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口长史，周罗睺为水军总管，率水陆三十万攻高丽。杨谅兵出临渝关（今河北山海

关)，适值水潦，运输困难，军中缺粮，又遇疾疫；周罗睺率水军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泛海趋平壤，遭风船多沉没。九月班师，死者十之八九，高元亦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罢兵，待之如初。

大业三年（607）隋炀帝至启民可汗牙帐时，高丽使者正在启民处，炀帝用裴矩策，令高丽使者还告高丽王早日入朝觐见，如若不朝，将率突厥攻之。高元拒命。大业六年（610）令天下富人买军马，一匹贵至十万钱，检阅兵器，务求精新，准备攻高丽。大业七年炀帝自江都乘龙舟直达涿郡（今北京西南郊）。下诏攻高丽，命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工严急，匠役昼夜立水中，不得休息，腰以下溃烂生蛆，死去十之三四。征调全国士兵，不论近远，皆集中涿郡，又征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岭南排镩（小稍）三万人，充当水军。令河南、淮南、江南造军用车五万辆送高阳（今属河北），供军士挽载衣甲帐幕。发河南、河北民夫运送军需。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只运黎阳、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船只首尾相接连绵千余里，满载军粮、兵甲及攻城器具，往还于道路的民夫常有数十万人。日夜不息，大量死亡，尸体枕藉、臭秽盈路。山东郡县负担尤为沉重，“增置军府，扫地为兵”④。又发民夫运米，屯处于泸河（今辽宁义县境）、怀远（今辽宁辽阳西）⑤二镇，车牛一去不返，民夫死亡过半，“耕稼失时，田畴多荒。加之饥馑，谷价踊贵，东北边尤甚，斗米值数百钱”⑥。牛车征尽，又征鹿车（人力小车言其小只容一鹿）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一车，载米三石，路途遥远，未达粮台，米已吃尽，只好逃亡。

大业八年（612）正月，四方应征士兵皆集涿郡，全军凡

一百一十三万八千人，号称二百万，运输粮饷的民夫加倍于士兵。炀帝下诏誓师，祭告天地，令左右两翼各十二军分二十四路，按指定所出之道向平壤进发。每军设大将、亚将各一人，统帅骑兵四十队，每队一百人，十队为一团，共四团；步兵八十队，二十队为一团，共四团⑦；又有辎重、散兵等四团，由步兵夹路护送。每团设偏将一人。每军特置受降使者一人，直接听皇帝指使，不受大将节制。是月第一军出发，以后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四十里，连营渐进，经四十日，出发始毕。各军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连贯九百六十里。御营分六军，最后出发，又长八十里。“近古出师之威，未之有也”⑧。水军自东莱海口出发，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水军，船队前后相衔数百里不绝，直指平壤，以接应诸军。

三月，陆军至辽水（即辽河）高丽兵凭河拒守，宇文恺、何稠等造浮桥三道，隋军渡河，大战于东岸，高丽兵大败，死者万计。诸军乘胜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炀帝早戒诸将，凡军进止，皆须奏闻待命，不得专擅。又令诸将如高丽请降，必须抚慰，不得纵兵进攻。

辽东城每将陷落，守军就声请投降，隋军不得不停止进攻，驰奏请旨，俟旨意到来，守军补充完备，又坚守拒战，如此再三，炀帝终不醒悟。直到六月，辽东城仍久攻不下。水军进入腹水（即大同江），跟平壤六十里处大破高丽兵，来护儿选精兵四万乘胜直抵平壤城下，高丽兵出战伪败，来护儿追入城中，纵兵俘掠，中伏兵，隋军大败，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来护儿引兵还屯海滨，不敢复留平壤附近接应诸军。于文述、于仲文等九军凡三十万五千人渡鸭绿水（即鸭绿江），行军中自泸河、怀远二镇，人马皆给百日粮，复加兵器衣资，过重难

以远负，虽“下令军中：‘士卒有遗弃米粟者斩’!”⑨但士卒仍于幕下掘坑埋之，故行及中途，粮已将尽。高丽兵诱敌深入，一战即走，于文述一月中七战七捷，遂渡萨水（即清川江）去平壤三十里扎营，高丽遣使诈降，于文述见士卒疲弊不能再战，平壤险固，短期又难以攻克，遂引兵还。高丽兵四面掩袭，隋军且战且行，七月渡萨水，半渡中遭高丽兵袭击，诸军俱溃，将士奔还，一昼夜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除卫文升一军保全，其余溃军逃回辽东城下的只有二千七百人，军需器仗，损失殆尽。炀帝大怒，锁拿宇文述等，率残军回洛阳。此次出兵，不过攻取辽水西岸高丽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已。

大业九年（613）正月，炀帝下诏，征发全国兵集中涿郡，由于兵力不足，开始募民为兵，称为骁果，应募者，免除其家赋役。修辽东古城以储军粮，复宇文述官爵。四月炀帝率大军渡辽河，命宇文述、杨义臣进军平壤，命诸将攻辽东城，许以便宜从事，不必事事奏请。来护儿仍统水军自东莱海口出发。隋军以飞楼（即楼车，攻城用战具）、橦（chōng冲锋车）、云梯、地道昼夜猛攻辽东城，二十余日不能克，双方伤亡甚众。隋军制布囊百余万，装土欲堆成宽三十步高与城齐的大道，使战士登而攻城，夹道作八轮楼车，高出城墙，以俯射城内，正当指定日期将行强攻，城内守军十分危急之际，六月，杨玄感起兵黎阳，进攻东都，消息传来形势为之一变。

礼部尚书杨玄感，为杨素之子，因累世贵显，交游广阔。杨素以助炀帝夺取帝位，恃功傲慢，引致炀帝不满，杨素病死后，炀帝“谓近臣曰：‘使素不死，终当夷族’”⑩。杨玄感闻知，暗与诸弟策划作乱。第二次进攻高丽时，杨玄感受命在黎

阳仓（在今河南浚县大伾山北麓）督运军粮。见“百姓苦役，天下思乱”⑪，遂乘机起兵。六月入黎阳城选运粮民夫五千余人，江南船夫三千余人，聚众誓师说：“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死辽东者以万计。今与君等起兵以救兆民之弊，何如？”⑫众踊跃从命。李密向杨玄感献上、中、下三策，上策袭据涿郡，扼守临渝关，断征辽隋军归路，前阻险关，后迫追兵，资粮断绝，其众不降即溃；中策率众西行，直取长安，安抚士民，据险而守，杨帝即使返回洛阳，然已失其根本，可与之对抗，徐徐图之；下策迅速攻占东都，借以号令四方。但若百日不能克，四方援军一至，前途实难设想。杨玄感采用下策，引兵直指洛阳，沿途民众踊跃从军。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遣精兵分路拒战，但隋军不战自溃，弃甲仗给杨军，有的全部投归杨军。杨玄感一直打到洛阳城下，告兵民说：“我身为上柱国，家里钜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耳。”⑬父老争献牛酒，到军门投效者每日上千人。时杨玄感已拥兵十万，长安留守代王杨侑遣卫文升率兵四万救东都，杨玄感屡破之，前后十二战，卫文升军死伤过半。达官子弟如韩擒虎子韩世谔、来护儿子来渊、周罗睺子周仲等四十余人皆降杨玄感。

炀帝正督大军猛攻辽东城，得洛阳告急文书，大惧，深夜密召诸将，下令班师，军资、器械、攻具堆积如山，营垒、帐幕原封不动，皆弃之而去。高丽乘势追击，后军伤亡颇重。命宇文述、屈突通、来护儿分路攻杨玄感。杨玄感围攻东都月余不克，隋援军继至，杨军屡战不利，遂于七月解东都之围，西趋潼关欲入关中，攻取长安，宇文述等军追踪于后。杨玄感不听李密劝告，攻弘农宫（今河南灵宝）三日不克，为隋军追

及，战败自杀。炀帝对大臣说："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无以惩后。"⑲以治杨党为名，杀三万余人，流放六千余人。凡杨玄感开仓赈济时领取米粮者皆遭坑杀。

大业十年（614）二月，令百官议伐高丽事，一连数日无敢发言者。于是又征发全国兵，百道俱进，发动第三次进攻。三月炀帝至涿郡，时国内已乱，诸郡多留兵不发，路上士卒亦相继逃亡。炀帝列军容祭黄帝，斩逃亡士卒以血涂鼓，逃亡仍不止。七月炀帝驻辽西怀远镇，来护儿率水军自东莱先至毕奢城（即卑沙城，今旅大市东），败高丽兵，继指平壤，高丽王高元惧，遣使乞降。炀帝大悦，遣使召来护儿回师，来护儿不肯奉诏，表示此番回师不可再来，欲继续进兵，围平壤俘高元胜利回朝，即使因此获罪亦所不惜。长史高君肃力争，始奉诏还师。八月炀帝自怀远镇班师，十月至洛阳。仍征高丽王高元入朝，高元竟不至，令诸将严整行装，准备第四次出师。大业十一年（615）炀帝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雁门，不得已以不再征辽为条件悬赏募救兵。解围回洛阳，又议伐高丽，但末日已临，再也无力出师了。大业十二年（616）炀帝三游江都，留别宫人诗说："我梦江都好，征辽亦偶然。"后果如此严重之大事，竟出于偶然，兴之所至！《隋书》论炀帝侵高丽事说："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闻之也。"

注　释

①《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

②《北史》卷九四《高丽传》。

③《隋书》卷八一《高勾丽传》。

④《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⑤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20页，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版。一说为辽宁朝阳附近。

⑥《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七年。

⑦步兵、辎重等每队人数史文不详，从二十四军加御营六军共三十军，全军总人数为一百一十三万估算，每队应为二百人。《续通志》卷二〇一《窦建德传》："募兵伐辽东，建德补队长。"《旧唐书》五四《窦建德传》中作"二百人长"可为佐证。

⑧⑨《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八年。

⑩《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九年。

⑪《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

⑫⑬⑭《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九年。

隋唐五代

修造大运河与赵州桥

营建大兴城。

隋文帝即位，继北周之后仍以长安为都城，但长安城为汉代旧都，文帝嫌其制度狭小，苏威、高颎，庾季才等皆劝帝迁都，庾季才说："汉营此城，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都之计。"①开皇二年（582）六月，诏高颎等于城东南二十一里龙首原南麓营迁新都，以宇文恺"有巧思"，任为营新都副监。于开皇三年（583）三月毕工，命名为大兴城，隋迁都于新城。

《隋书·地理志》记载大兴城南北长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东西长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据考古实测城东西长 9721 米，比历史记载长 26.35 米（18 步弱），这可能是《隋书》未计入城墙厚度。城南北长 8651.25 米，比历史记载长 456.45 米（310 步强），但历史记载各局部南北长度的总合与实测数相近，证明历史记载南北长度有误，应为十六里一百二十五步。城墙高一丈八尺全城总面积约八十四平方公里，约为今西安旧城的七倍半。

大兴城东西略长，南北略窄呈一长方形，由宫城、皇城、外郭城组成。宫城是皇帝及皇室（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地方），位于全城最北部，正中央。据记载，“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其崇三丈五尺（崇即高）”②。皇城为百官衙署所在地，紧附于宫城之南。北面无城墙以宽441米的横街与宫城相隔，“皇城东西五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三里一百四十步，周十七里一百五十步”③。皇城内南北有七条街，东西有五条街，台省寺卫并列其间。构成封建王朝的行政中心。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拱卫宫城与皇城，由南北大街十一条和东西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坊”，作为居民住区，包括寺、观、官吏府第和一般民户。各坊四周有墙，皇城以南三十六坊仅有东西街道，只开东西两门，不开南北街和南北门是为了避免冲城阙，避免“泄气”，破坏“风水”。其余各坊均有东西、南北十字街，四面各开一门。坊门昼启夜闭，管理严密，每夜街鼓鸣后，街上即荡无行人，“六街鼓绝尘埃息”即指此而言。坊呈长方形，布局整齐，皇城东西两侧，南北向排列各三行，每行皆为十三坊，像一年十二月加闰月。因南城墙在距城东南角1360米处垂直北折510米，再垂直东折1360米，把曲江池隔在墙外，故靠东城墙的一行实为十一坊。皇城以南，南北向排列共四行，像一年四季，每行皆为九坊，像《周礼》“王城九逵”。皇城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各有一市，东为“都会市”，西为“利人市”。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市内各有两条东西大街，两条南北大街，构成“井”字形，每面各开二门。井字形街道分市场为九方，每方四面皆临街，设店铺，中间一方置二署即治市的官府。外郭城四面各开三门，北面有宫城和禁苑，三门皆开在北墙西段。南

墙三门向中间紧缩。东西两墙城门均靠北面，是为了交通上的便利，因为城市的核心在北部中央。街道均作南北、东西排列，笔直端正，似一棋盘。凡是通向东西城门和南北城门的街道所谓“六街”都宽，最宽的朱雀大街宽一百五十五米，最窄的东西顺城街仅二十至二十五米，反映了交通上的特点。自西汉以后，帝王宫阙衙署之间杂置民宅，隋文帝以为不便，大兴城中宫城、皇城与市坊隔离，是设计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宋人吕大防曾说：“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yōng 垣墙），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宫寺、民居、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大兴城发展北魏洛阳城和东魏，北齐邺都南城的优点，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改变周官“面朝背市”之旧传统，本孔子南面而治及众星拱辰的思想，把宫城置于北部，使宫城及百官衙署占据高地。考虑商业的需要置两市于民居之间，根据交通的需要决定城门的位置及街道的宽窄。并从城南开永安渠引洨水、开清明渠引潏水入城，从城东南开龙首渠引浐水入城供给城市用水。它是古代世界中罕见的巨大都城，不仅在隋代而且在后来唐代统治的近三百年间，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它的设计为东亚创作，日本古代京城的规划思想和布置受大兴城的影响很大。

建造安济桥（又称赵州桥）。

隋开皇大业年间，杰出工匠李春、李通等设计建成安济桥。安济桥横跨赵州（今河北赵县）附近的洨水（即洨河）两岸。亦称赵州桥，桥身长五二点八二米，全用巨石砌成，故又称大石桥。

关于安济桥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桥成一百多年后，唐中书令张嘉贞的《石桥铭序》，其中写道："赵州洨河石桥，隋匠李春之踪也。制造奇特，人不知其所以为。"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孙人学的《重修大石桥记》说赵州桥是"隋大业间石工李春所造"。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张居敬的《重修大石桥记》中说："赵城南距五里，在洨河，河上有桥名安济，一名大石，乃隋匠李春所造云。"清光绪年间所修《赵州志》说："安济桥在州南五里洨水上，一名大石桥，乃隋匠李春所造。"另外在赵州桥下曾发现题名石一块，上刻"开皇十□年"和"唐山石工李通"字样。上引文字资料记述了桥的名称、位置、设计督造者和建造时间。

赵州桥建成后，深受人们赞扬，并出现关于它的优美传说，最早见于文献纪录的赵州桥传说，是《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二所载："赵州城南有石桥一座，乃鲁般（即鲁班）所造，极紧固，意谓古今无第二手矣。忽其州有神姓张，骑驴而过桥。张神笑曰：'此桥石坚而柱壮，如我过，能无震动呼！'于是登桥，而桥摇动若倾状。鲁般在下以两手托定而坚壮如故。至今桥上则有张神所乘驴之头尾及四足痕，桥下则有鲁般两手痕。此古老相传，他文未载，故及之。"《湖海新闻夷坚续志》，据缪荃孙《艺风藏书记》的考证，编集于元代初年（约当十三世纪八十年代），口头传说当更早于此。至于桥身上那些迹痕，据现代桥梁专家罗英工程师按照工程原理推测，桥面上的所谓仙迹都在东侧三分之一部位，是一种行车指标，指明行车勿靠边侧，应走中间，免招外倾危险。桥下的手掌印是一种工程指标，表示万一石桥出现裂痕，可在手印处暂加支柱，以免立即坍圮，而可从容修理。

由于洨河夏季洪流汹涌，赵州桥采用单孔大跨度，一孔跨度长达37.45米，便于洪流通过，它是当时世界跨度最大的石拱桥。为便于交通运输，赵州桥采用低矢跨比率，如此大跨度的拱圈，其拱顶比拱脚只高出7.23米（矢），矢跨比率约为1:5，桥面坡度平缓，便利车马行人。为增加泄洪量和使桥身坚固，在大拱的两肩上各辟两个小拱，形成大拱圈与路面之间的四个洞。当洪水泛滥时，大小拱同时泄水，增加泄水量16.5%，也减轻了洪水对桥身的冲击，正如张嘉贞《石桥铭序》所说："两涯嵌四穴，盖以杀怒水之荡突，虽怀山（洪水）而固护焉。非夫深智远虑，莫能创是。"④而由于四小拱的开辟，节约石料二百多立方米，减轻桥身重量约五百余吨，使桥基负担减轻，增加了桥的安全系数。这种"敞肩拱"，七百多年后才出现于欧洲。在施工技术上拱石砌置采"纵向并列式"，组成全桥的二十八道拱圈都能独立负担桥上载重量，如遇拱石破损或桥基石均匀沉陷时，不致影响全桥，修补方便。建桥时也可节约十倍以上的架木。并采用"护拱石"、"勾石"、"铁拉杆"、"腰铁"和"收分"等办法⑤补救纵向并列缺乏横向联系的缺点，使大桥更加坚固。拱石琢磨精细，"干砌"紧凑无间，不用灰浆连接，免其受水膨胀，致使拱圈变形，由于结构设计科学，施工技术巧妙，赵州桥经历一千三百多年的风雨怒涛和震中很近的1966年邢台大地震，桥身仍安然无恙。

赵州桥的艺术造型也极为优美，桥型雄伟刚劲，秀逸轻盈，宋代杜德源诗中说它："架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蛰背磨空。"明代祝万祉诗中说它似："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桥面两侧栏杆的石雕，是隋代石雕的精华，龙狮栩栩如生，唐代张嘉贞描写它："蟠绕拿踞……若飞若动。"

开凿大运河。

运河在唐以前称沟、渠、漕渠、漕河、运渠，宋代始有运河之称，元明以来渐成通称。隋代以前，著名的运河有春秋末吴国开凿的邗沟，战国初魏国开凿的鸿沟，汉武帝时开凿的漕渠和白渠，东汉末曹操所开的白沟，以及六朝时开凿的江南河。其中除白渠外皆与隋代运河有关，隋代运河除利用自然河流外就是在这些古运河的基础上或循其故道开凿的。

广通渠（略循漕渠故道）。漕渠为西汉元光六年（前129），大司农郑当时主持，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督率开凿。渠傍秦岭下自长安东至黄河，长三百余里；三年而成，漕运大便。东汉时尚可通航，北魏时已干涸。开皇四年（584）隋文帝下诏说："……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⑥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定，漕运困难，命宇文恺率水工，自大兴城西北，凿渠引渭水，东绝灞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东至潼关，达于黄河，全长三百余里。因渠道经过渭口广通仓下，故名广通渠。广通渠凿成后转运便利，关内赖之。因渠下人民颇受其惠，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又改名永通渠。

山阳渎与邗沟。邗沟为春秋时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在江淮间开凿。故道自今江苏扬州南引江水北过高邮县西，东北折入射阳湖，再西北至淮安县北入淮。东汉建安初，改凿新道，自今高邮径直往北直达淮安。但魏晋时，淮安以南一段仍须绕道射阳湖。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为准备伐陈，沟通江淮漕运，下令疏浚邗沟。因其北起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境，得名山阳渎，仍绕道流经射阳湖。大业元年（605）隋炀帝发

淮南民十余万重开邗沟，略循建安故道进行拓宽取直，自今扬州市南扬子（今江苏仪征）引江水，直达淮安三百余里，不再东向绕道。

通济渠（略循阳渠、鸿沟故道）。阳渠，东汉初自今洛阳市附近引谷、洛二水东流，经古雒阳城东至偃师东南入雒水（今洛河），以便漕运。其自古雒阳城以东的一段，亦名阳渠。北魏后废。鸿沟，战国初魏国开凿。故道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流经今中牟、开封北，折而南下，经通许东、太康西，至淮阳东南入颍水，联结济、汴、睢、颍诸水，形成黄淮平原上的水道交通网。汉以后改称莨荡渠。魏晋以后，自开封以下改称蔡水，开封以上改称汴水。隋炀帝即位后，为进一步控制江南地区，并便于转运南方的粟米布帛，同时也为怀恋江都的繁华，准备巡游享乐，着手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业元年（605）三月"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⑦。分东西二段：西段起自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西宛，引谷水、洛水贯洛阳城，东出循阳渠故道至偃师入洛水，由洛水入黄河；东段起自板渚（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水东行汴水（鸿沟开封以上段）故道，至今开封别汴水折而东南流，经今杞县、宁陵至商丘东南行蕲水故道，又经永城、安徽泗县会泗水，经江苏泗洪至盱眙对岸注入淮河。八月完工，渠长千余里，宽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植柳树护岸。因为炀帝巡游所用，俗称御河，唐改名广济渠。《大业杂记》描述通济渠邗沟情况说："水面阔四十步，通龙舟；两岸为大道，种榆柳，自东都至江都，二千余里，树荫相交。每两驿置一宫，为停顿之所，自京师至江都，离宫四十余所。"

永济渠。大业三年（607）八月，炀帝至突厥启民可汗帐，

宣旨高丽使者："朕……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宜早来朝，勿自疑惧，……苟或不朝，将率启民往巡彼土。"大业四年正月，炀帝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主要利用自然河道，疏浚沁水下游自今河南武陟至沁水入黄河口一段，作为南接黄河北通涿郡（今北京）的起点；自武陟沁水东岸至今河南汲县一段，用沁水直流及今孟姜女河；自汲县至天津一段，用清水下接淇水、屯氏河、清河，略同今卫河北进（自内黄至武城在卫河西，自武城至德州在卫河东），至天津入海；自天津至涿郡一段，用沽水上接桑干水，即今武清以下的白河与武清以上的永定河故道。全长两千余里，直通龙舟。江南河。大业六年（610）十二月，令开江南河。在六朝开凿的运河河道基础上，重浚加宽。自京口（今江苏镇江）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八百余里，宽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准备东巡会稽（治今浙江绍兴）。

至此，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南达余杭，贯通南北，全长五千里⑧的大运河全部通航，河中"商旅往还，船乘不绝"⑨。由于大运河纵贯河北、河南、安徽、江苏、浙江五省，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故对统一局面的巩固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过巨大的作用。每当汛期，黄河洪水部分自永济渠和通济渠泄出，减少了黄河本身的压力。故大运河开通后，数百年间黄河未发生大泛滥。

如此举世闻名的伟大工程，在短短六年中完成，人民劳役繁重，官吏督工严急，"导洛至河及淮（通济渠），又引沁水达河，北通涿郡（永济渠），筑长城东西千余里，皆征百万余人。丁男不充，以妇人兼役，而死者大半"⑩。凿运河督工将军名麻祜，残暴异常，使人闻而生畏。沿河人民常以"麻祜来了"

一语吓吓小儿。大运河实亦为隋末劳役繁重之历史见证。

注　释

①《资治通鉴》陈宣帝太建十四年。

②《长安图志》卷上。

③《唐两京城坊考》卷一。

④《全唐文》卷二九九。

⑤护拱石，二十八道拱背上铺大块护拱石，即保护拱石，又借压力与摩擦力拉联。勾石在桥两侧用曲尺形勾石，勾住外侧的拱石。铁拉杆，用五根大铁杆把二十八道拱圈拉联起来，腰铁，是用银锭形铁榫，嵌入两块拱石之间拉联。收分，从桥两头向中间逐渐收缩宽度，使外侧拱圈略向内倾。故赵州桥中间宽九米，两头向平地倾斜部分宽九点六米。

⑥《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⑦《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元年。

⑧相当于俄罗斯伏尔加和顿河运河的26倍。

⑨《旧唐书》卷六七《李随传》。

⑩《通典》卷七《食货七》。

隋唐五代

隋末农民战争

隋炀帝在位十四年中，挖掘长堑、营建东京、修筑长城、开凿运河、大营宫室、连年巡游、三攻高丽，致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①，有人为求免于死亡，甚至自断手足，称为福手福足。故杨玄感起兵后给民部尚书樊子盖的信中说当时：“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②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到处是一片荒凉悲惨的景象。大业七年（611）山东河南大水漂没三十余郡。大业八年大旱，瘟疫流行，人多死，山东尤甚。天灾伴随人祸，使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停顿，灾民“剥树皮以食之，渐及于叶，皮叶皆尽，乃煮土或捣藁为末而食之。其后人乃相食”③。在这种情况下，“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迫，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起义军）”④。

大业七年（611）隋炀帝在全国范围内征发兵士和民夫，准备第一次进攻高丽。山东地区接近辽东，作为进军基地受祸尤重，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首先在山东地区爆发。

齐郡邹平（今山东邹平北）人王薄因兵役繁重，领导农民

起义。以长白山（在今山东邹平南）为根据地，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号召。避兵役者多往归附。

平原（治今山东平原西南）农民起义，推豪强刘霸道为首，以滨海临河之豆子䴚（在今山东惠民县境）为根据地，有众十余万，号“阿舅军”。

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孙安祖，家为大水漂淹，妻子饿死，县令又逼他服兵役，于是刺杀县令，亡匿窦建德家。因追捕甚急，建德助其聚众入高鸡泊（在今河北故城西南）自号将军。

清子䴚县（今山东夏津）人张金称率众起义，以河曲（夏津县北大清河曲处）为根据地，众至数万。

信都蓨县（今河北景县）人高士达率众于清河（今属河北）起义，以高鸡泊为根据地，继而与窦建德部会合，自称东海公，以窦建德为司兵。

清河漳南人窦建德，胆力过人，时募人攻高丽，建德以勇敢被选为二百人长，因助孙安祖起义，家属被隋官屠杀，遂率部起义，投高士达任司兵。张金称杀孙安祖，孙安祖部属归窦建德，众至万余人。窦建德招收才能，与士卒同甘苦，远近人多来归附。

东郡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人翟让，骁勇有胆略，初任东郡法曹，坐事当斩，为狱吏救脱，于瓦岗（今河南滑县南）起义，与单雄信、徐世勣等据瓦岗，采用徐世勣的建议，入荥阳、梁郡二郡县，夺取运河来往船只货物，众至万人，多为善使长枪之渔猎手。

除上所述，还有王当仁、王伯当、李公逸、周文举以及不知名号者不可胜数。

大业八年（612）隋第一次攻高丽大败而回，大业九年（613）复又征发兵役，发动第二次进攻高丽的战争，民众厌战，起义运动更加扩大。

大业九年（613）正月，平原人杜彦冰、王润等攻破郡城，取财物后弃城他去；李德逸聚众数万，亦称阿舅军。同月灵武（今属宁夏）人白瑜安起义，夺取官马，北连突厥，众至数万，因白出身奴隶，被诬为“奴贼”。

二月济北（今山东茌平）韩进洛聚众数万起义。

三月济阴（治今山东曹县西北）孟海公起义，据周桥，进占曹戴两州，众至三万，见人称引书史，辄杀之。齐郡（治今山东济南）孟让起义，一度与王薄联合。北海（治今山东益都）郭方预起义，自号卢公，众至三万。平原郝孝德聚众数万起义，与王薄、孙宣雅等部十余万结为联军。厌次（今山东无棣南）人格谦起义，以豆子航为根据地，称燕王，众至十余万。渤海（治今山东阳信）人孙宣雅起义于豆子航，众至十万，称齐王。曾联王薄、郝孝德、张金称、高士达等部，屡败隋军。

五月济北（今山东茌平）甄宝车聚众万余起义。这一时期农民起义，主要集中在山东地区，队伍比较分散，主要活动于农村，对于一些郡县城，只能“观其无备，攻而陷之”，随即放弃，隋朝统治尚未感受巨大威胁，隋炀帝正全力进攻高丽，只下令都尉、鹰扬与郡县官镇压起义。郡县官每遇起义军皆望风溃败，唯齐郡丞张须陀勇敢善战，率郡兵在泰山下击败王薄起义军。王薄收余兵渡河，北连孙宣雅、郝孝德等十余万攻章丘，张须陀率步骑二万再败起义军。郭方预等合军攻陷北海，亦大败于张须陀，死数万人。至大业九年（613）六月杨玄感

起兵反隋，为全国范围内农民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隋末农民大起义进入第二阶段。

大业九年（613）七月，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刘元进起义，响应杨玄感，炀帝再征江浙一带兵征高丽，逃兵役而亡命者纷纷归附刘元进，旬月间，众至数万。八月吴郡（治今江苏苏州）朱僪、晋陵（治今江苏常州）管崇起义，苦于徭役的民众纷纷参加，管崇打败炀帝派遣屯守扬子（今江苏仪征）的虎牙郎将赵六儿，缴获大量器械军资，队伍发展至十万。十月刘元进率部渡江与朱燮、管崇汇合，据吴郡，刘元进自称天子，朱燮、管崇俱为尚书仆射，署置百官。炀帝派左屯卫大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率兵镇压。起义军转战丹阳、毗陵、黄山，连战皆败，损失巨大，管崇牺牲。但“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败而复聚，其势益盛”⑤。鲁俱罗因而被处死，吐万绪被罢官。炀帝改派江都丞王世充率淮南兵数万渡江镇压，刘元进、朱燮先后牺牲于吴郡，起义农民被骗降坑杀三万余人，余党聚而复战，官军不能讨，直至隋亡。是岁，梁郡（今河南商丘）韩相国起兵响应杨玄感，聚众至十余万，曾被杨玄感任为河南道元帅，后败散被杀。章丘（今属山东）杜伏威临济（今山东章丘西北）辅公祏率众起义，杜伏威时年十六，每作战“出则居前，入则殿后”⑥，深得众心。时隋军主力调至山东，这支起义军，转入淮南，杜伏威自称将军，会苗海潮、赵破陈等部大破江都隋军，声势大盛，进逼江都。各地反隋起义还有：信安（今广东高要）陈瑱起义，众三万，破郡城；东海（今江苏海州镇）彭孝才；济阴（今山东曹县）吴海流；苍梧（今广西梧州）梁慧尚；东阳（今浙江金华）李三儿向但子；东郡（今河南滑县）吕明星；唐县（今属河北）宋子贤；扶风

(今陕西凤翔)沙门向海明等。

大业十年(614)隋炀帝第三次进攻高丽,激起士兵农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扶风人唐弼立李弘芝为皇帝,自称唐王,有众十万。延安(今属陕西)人刘迦论结稽胡起兵,自称皇王,建元大世,有众十万。诏以左骁卫大将军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发兵镇压,刘迦论及将卒万余人牺牲。齐郡(今山东济南)左孝友拥众十万,据蹲狗山,为张须陀所败。张须陀以功升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涿郡卢明月率众十万攻占祝阿(今山东长清东北),为张须陀、罗士信、秦叔宝等所败。此外还有汲郡(今河南淇县)王德仁,彭城(今江苏徐州)张大虎,琅邪(今山东胶南)宋世谟,建安(今福建建瓯)郑文雅、林宝护,邯郸(今属河北)杨公卿,长平(今属山西)司马长安,离石(今属山西)胡人刘苗五等起义。

大业十一年(615)炀帝以全国起义,户户逃亡,"诏民悉城居,田随近给。郡县驿亭村坞皆筑城"⑦。但农民起义继续向前发展。上谷(今河北易县)人王须拔有众十余万,自称"漫天王",国号燕;魏刀儿有众十余万,自称历山飞,转战于今河北、山西一带,后王须拔攻幽州,中流矢死,所部亦归魏刀儿。是岁起义者还有北平(今河北卢龙)杨仲绪、淮南(今安徽寿县)张起绪、彭城(今江苏徐州)魏骐驎、东海李子通、城义(今安徽亳县)朱粲、绛郡(今山西新绛)敬盘陀、柴保昌等。炀帝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承制黜陟选补郡县文武官。

大业十二年(616)正月朝会,由于农民起义已席卷全国"朝集使不至者二十余郡"⑧。隋炀帝分遣使者十二道发兵围剿起义军。农民起义仍如火如荼。雁门人翟松昍起兵于灵丘

（今属山西），东海卢公暹率众据苍山（今山东临沂东），魏刀儿部将甄翟儿率众十万攻太原，斩隋将潘长文，冯翊（今陕西大荔）人孙华，高凉（今广东阳江）通守冼瑶，恒山（今河北正定）赵万海，安定（今甘肃泾川）荔非世雄纷纷起兵。是年夏大业殿西院大火，炀帝以为起义军至，惊走匿西苑草丛中，火熄始还。自大业八年以后，“炀帝每夜眠常惊悸，云有贼，令数妇人摇抚，乃得眠”⑨。

这一时期农民起义从局部地区迅速席卷全国。起义军由分散作战到联合行动，不仅攻陷城邑，杀伤官吏，而且称王称帝，对隋朝统治构成致命威胁。炀帝连派讨捕大使、抚慰大使，并因镇压不力而诛杀数将。东京已非安全之地，当年七月炀帝逃离东都，第三次去江都，命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标志隋朝统治已开始土崩瓦解，隋末农民起义进入第三阶段。

从大业十二年（616）七月炀帝逃离东都至隋朝灭亡，是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逐渐汇合成三支主力农民军，它们建立起短暂的农民政权，成为摧毁隋朝黑暗统治的中心力量。

在河南地区，有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自炀帝南下江都以后，东都空虚，有利于这一带农民军的发展。大业十二年（616）李密投奔瓦岗军。李密（582－618）出身于贵族之家，少有才略，曾为炀帝侍卫，因不得炀帝信任，称病自免。尝乘黄牛读《汉书》，得杨素赏识，结识杨玄感。杨玄感起兵迎李密作谋主，失败后李密被捕，在押送途中逃脱，辗转来到瓦岗军。李密献策于翟让，剖析形势，定灭隋取天下的战略目标，并前往说服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部并入瓦岗军。瓦岗军扩大后粮食问题急需解决，李密建议翟让引兵攻克

金隄关（在今河南荥阳东北）及荥阳诸县，以足军粮。炀帝急命悍将张须陀为荥阳通守，率兵二万进攻瓦岗军。瓦岗军用李密策，由李密分兵千余在荥阳大海寺北丛林设伏，王伯当、徐世勣伏兵于大海寺两翼。由翟让出战不利，引张须陀追逐十余里，伏兵齐发，张须陀大败。李密、翟让及徐世勣、王伯当合军围攻，阵斩张须陀，"河南郡县为之丧气"⑩。隋残兵五千余人逃脱，炀帝以裴仁基为河南讨捕大使，代领其众。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李密向翟让建议："今东都士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在今河南巩县)，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⑪遂与翟让率精兵七千，一举攻克兴洛仓；开仓任饥民取食，老弱妇乳，道路不绝，前来就食者近百万。东都留守越王杨侗遣刘长恭等率步骑二万五千，进攻起义军，大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刘长恭只身逃回东都，瓦岗军声威大振。翟让以李密对瓦岗军的贡献和才能，推李密为主，号魏公建元永平。在兴洛仓附近筑洛口城，方四十里，作为魏国都城。继陷河南大部郡县，江淮以北及河南各部起义军孟让、郝孝德等多附之，众至数十万，成为全国最大的一支主力农民军。李密一跃而为中原群雄的盟主。四月李密以孟让为总管，率步骑二千攻入东都外郭，烧丰都市。隋将河南讨捕大使裴仁基以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降李密，李密得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等皆重用之。遣裴仁基、孟让攻克洛仓，李密据回洛仓，大修营堑围逼东都，败隋兵七万。瓦岗军发布檄文，数炀帝十罪，说他是："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并说起义军"犹泻沧海而灌残荧，举昆仑而压小卵"⑫，隋之灭亡，可指日而待。九月李密

遣徐世勣、郝孝德等攻克黎阳仓（在今河南浚县西南），开仓任民就食，旬日间得胜兵二十余万。瓦岗军盛极一时，炀帝派王世充统帅会集东都的十余万大军镇压起义军，几经激战，隋军坚壁不敢出。

李密在瓦岗军中权力日大，引起瓦岗旧将不满，劝翟让自为大冢宰，以夺李密权。翟让不从。李密在房彦藻等策动下，竟于大业十三年（617）十一月置酒宴请翟让，令左右尽出就餐，出良弓与翟让习射。翟让方引满，李密遣壮士自后斩之，并杀翟弘及王儒信等。自此瓦岗旧将心怀疑惧。时炀帝在江都，荒淫益甚，然见天下危乱，亦不自安。常深夜饮酒，对肖后说："外间大有人图侬（我），然侬不失为长城公（陈后主降隋后封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陈后主妻），且共乐欢耳！"尝引镜自照，对肖后说："好头颈，谁当斫（zhuó 斩）之！"肖后惊问，则答以"贵贱苦乐更迭为之，亦复何伤！"炀帝无心北返，准备迁都丹阳（今南京）。随从的骁果卫士，多关中人，他们久客思乡，加以江都粮尽，纷纷逃亡。郎将赵竹枢、司马德戡等乘机于大业十四年（618）三月拥宇文化及为主，引兵入宫，缢杀炀帝。宇文化及立秦王杨浩为帝，拥兵十万北上，声言欲返关中，又说要取东都。东都留守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元皇泰。

宇文化及攻黎阳仓，李密率精兵二万拒战，深恐东都兵攻其后路；王世充等亦畏宇文化及打败李密后进攻东都，遣使招降李密，令先平宇文化及然后入朝执掌文武大权，以期两败俱伤。李密上表于隋皇秦帝，乞降；东都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七月，李密集精兵攻宇文化及，大战于童山（在今河南淇县境）下。李密中流矢堕

马，左右奔散，秦叔宝收兵力战，宇文化及乃退。其部下王轨、许敬宗、苏威、陈智略等率众投降李密，宇文化及逃往魏县，杀秦王浩后为窦建德、王薄等擒杀。

李密虽破宇文化及，但“其劲卒良马多死，士卒疲病”⑬，将入朝辅政。适王世充杀诸留守官，独掌大权，乘机选精兵二万人，出师击李密。魏征主张深沟高垒，以逸待劳，俟王世充粮尽自退，追而击之。单雄信等欲战者占十之八九，李密惑于众议，又有轻王世充之心，不设壁垒，一战大败，王世充收李密将卒十余万还东都。李密率二万人入关降唐，后谋重整兵马，叛唐为唐将所杀。瓦岗军失败。

隋末三支主力农民军中的另一支是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河北地区比较著名的起义军有张金称、高士达等部，屡败隋军。大业十二年（616）冬，炀帝派太仆卿杨义臣讨张金称，杨义臣深沟高垒，月余不出战，造成张金称的麻痹轻敌，然后率精骑夜袭张金称营。张金称大败被俘。隋“吏立木于市，悬其头，张其手足，令仇家割食之，未死间，歌讴不辍”⑭，慷慨就义。隋将郭绚率万余人攻高士达，高士达以窦建德为军司马，悉以兵授之，建德大败隋军，斩郭绚，杀虏数千人。张金称余众皆归窦建德。杨义臣乘胜进攻起义军，高士达不听窦建德暂避其锋的建议，率兵还击，获小胜即纵酒高宴，结果大败阵亡。窦建德收兵得三千余人，自称将军。炀帝以为河北农民军主力已破，恐杨义臣在外久握重兵，权重难制，将其召回，所部遣散，为起义军发展造成有利时机。窦建德集结队伍，继续战斗。先是起义军“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独建德善遇之”⑮，由是隋官常以城降，起义军众至十余万人。大业十三年（617）正月，窦建德据乐寿（今河北献县）称长乐王，

置署百官，建元丁丑。七月炀帝派涿郡留守薛世雄率精兵三万南下进攻瓦岗军，命王世充等诸将皆受其指挥，沿途“盗贼”顺便剿除。薛世雄行至河间（今属河北）七里井，适天大雾，咫尺不辨来人，窦建德率敢死士千人乘雾夜袭隋营，隋军大乱，自相践踏，死者无数，薛世雄与数十骑遁归涿郡。歼河北地区隋军主力，支援了瓦岗军。

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窦建德改国号为夏，改元五凤。后迁都洺州（今河北永年）。夏国“劝课农桑，境内无盗，商旅野宿”⑯。窦建德“每战胜克城，所得资财，悉以分将士，身无所取”⑰，“又不啖（dàn，吃）肉，常食唯有菜蔬脱粟之饭，其妻曹氏，不衣纨绮”，不失劳动人民朴素本色。建德虽出身农民，但封建思想影响颇深，对隋官及士族子弟，皆优礼相待，予以重用，甚至“参决军议”。宇文化及杀隋炀帝及秦王浩称帝，建德认为是大逆不道，表示对宇文化及有弑君之仇，唐武德二年（619）出兵击杀宇文化及于聊城（今属山东）。建德入聊城，首先谒见肖皇后，自称臣。出嫁突厥的隋义成公主遣使迎肖皇后，建德遣千余骑送之，并以宇文化及之头献义成公主。又遣使朝见东都隋皇秦帝，直到唐武德二年（619）四月，王世充废隋皇秦帝，建德始敢称帝。武德三年（620）唐兵进攻洛阳王世充，王世充求援于窦建德。窦建德恐唐兵削平洛阳，威胁河北，武德四年（621）亲率大军十余万救援洛阳，为唐军李世民、尉迟敬德阻于武牢（即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其部下凌敬建议：出兵敌后，袭取河东，震撼关中，以解洛阳之围。建德未予采纳，拟俟唐军粮草用尽，牧马河北时，攻武牢。李世民故意以马千余匹牧于河北，建德全军出动，列阵二十里，李世民按兵不动，自早晨至中午，士

卒饥倦，唐军突袭，起义军大败，建德受伤被俘牺牲，士卒溃散，被俘五万人。

窦建德失败后，其旧部不堪唐官吏的压迫，在刘黑闼领导下，武德四年（621）七月，在漳南（今山东恩县）起义。起义军连败唐淮安王李神通和黎州总管李世勣，半年中尽复夏国故地，武德六年（623）再遭唐军镇压失败。

隋末农民起义另一支重要力量是杜伏威、辅公祏领导的江淮起义军。大业十三年（617），炀帝派大将陈棱率精兵进剿江淮起义军，杜伏威率部迎战。陈棱知杜伏威勇猛善战，故坚守壁垒，持重不出。伏威赠以妇人服，称之为"陈姥（mǔ 母，老年妇女），陈棱被激怒出战，杜伏威前额中箭，仍奋勇杀敌。隋军大败。陈棱仅以身免。伏威乘胜进据历阳（今安徽和县），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合并江淮间各部起义军，占有江淮广大地区。武德三年（620）杜伏威遣辅公祏渡江攻克丹阳（今江苏南京），起义军移据丹阳后，东征西讨，"尽有江东、淮南之地，南接于岭，东至于海"。境内薄赋敛，除殉葬法，其犯奸盗及官人贪浊者，无轻重皆杀之⑬。但杜伏威于武德元年（618）上表于隋皇秦帝，拜东道大总管、封楚王。武德二年（619）又降于唐，拜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江淮以南安抚大使，进封吴王，赐姓李氏。武德五年（622）唐征召杜伏威去长安，杜伏威入朝，拜太子太保，仍兼行台尚书令，留长安，位在齐王元吉之上。杜伏威入朝后，辅公祏在丹阳称帝，建国号为宋，起兵反唐。唐派大军镇压，辅公祏失败被捕牺牲。杜伏威则被唐朝毒死。

注 释

①《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②《隋书》卷七〇《杨玄感传》。

③《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④《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七年。

⑤《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九年。

⑥《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

⑦《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十一年。

⑧⑨⑩《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十二年。

⑪《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

⑫《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檄文为起义军中文学家祖君彦起草。

⑬《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⑭⑮《资治通鉴》隋炀帝大业十二年。

⑯《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⑰《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⑱《旧唐书》卷五六《杜伏威传》。

隋唐五代

李渊父子晋阳起兵

大业九年（613）正月，隋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集中涿郡（今北京），准备再攻高丽。卫尉少卿李渊督运于怀远镇（今辽宁朝阳附近），路过涿郡，与宇文士及深夜密论时事，始有起兵反隋夺取天下之志。与此同时，特向隋炀帝进献"鹰犬"，以为"自安之计"。杨玄感起兵后，李渊被任为弘化郡（治今甘肃庆阳）留守，关右十三郡兵马皆受其征发。炀帝以李渊貌相奇异，又名应"李姓当为天子"之图谶（古代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宣扬迷信的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征兆），颇忌之。未几，召见，李渊因病未至，炀帝问渊甥后宫王氏："汝舅来何迟?"王氏以病对，帝曰："可得死否?"渊闻之颇疑惧，因而纵酒纳赂以自韬晦，收敛锋芒，隐藏踪迹，以待时变。妻兄窦抗以图谶既谓"李氏当为天子"，劝李渊乘势起兵。李渊曰：勿为祸首，继续等待时机。

大业十一年（615）春，方士劝炀帝尽诛海内凡李姓者，右骁卫大将军李浑（字金才），门族强盛，炀帝忌之。乃杀浑及其宗族三十二人，于是人怀疑惧。未几，李渊受命为山西、

河东抚慰大使，前往镇压起事农民。挚友副帅夏侯端谓渊曰："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但主上晓察，情多猜忍，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①渊"深然其言"，反隋之志愈坚。

大业十二年（616），李渊迁右骁卫将军，奉诏为太原留守（太原郡诏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以王威、高君雅为之副。太原乃军事重镇，兵源充足，粮饷丰沛，可"食支十年"。渊"私喜此行，以为天授"，谓第二子世民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渊袭封唐国公，传说中远古部落陶唐氏居于平阳，即今山西临汾一带）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②乃留长子建成于河东，命其"潜结英俊"；携次子世民至太原，命其"密招豪友"，二人皆能"倾财赈施，卑身下士……故得士庶之心"③。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避辽东之役，亡命晋阳（今山西太原西），世民善待之。晋阳宫监裴寂与晋阳令刘文静、夜见烽火，密论"世事可知，何忧贫贱！"世民深与结纳。文静曾语世民曰："……当此之际……取天下如反掌耳。……乘虚入关，号令天下，不过半年，帝业可成。"④阴与部署宾客。是岁末，突厥扰马邑（今山西朔县），诏渊与马邑太守王仁恭击之，战不利。炀帝遣使者将执渊与仁恭，送江都治罪。对此，李渊自比文王，将为商纣囚于祇（音攸）里，要建成、世民效法武王，会师盟津以讨伐隋炀。世民说渊曰："今主上无道，百姓穷困，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渊以为然，秘密部署，准备起兵。随之，炀帝又遣使者赦渊及仁恭。当时农民武装震撼全国，隋室土崩瓦解之势已成。晋阳宫监裴寂、晋阳令刘文

静、鹰扬府司马许世绪、行军司铠武士彟及唐宪、唐俭兄弟等纷纷劝李渊尽速起兵。唐俭说渊曰："明公北招戎狄，南收豪杰，以取天下，此汤、武之举也。"渊曰："汤、武非所敢拟，在私则图存，在公则拯乱，卿姑自重，吾将思之。"⑤

大业十三年（617）初，渊使刘文静伪造敕书，发太原、西河、雁门、马邑数郡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为兵，年终集涿郡，云将攻高丽。于是群情汹汹，人心思乱。二月，马邑鹰扬府校尉刘武周起兵，杀太守王仁恭。三月，武周引突厥袭破楼烦郡（今山西静乐），占据汾阳宫。世民复说渊曰："大人为留守，而盗贼窃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今至矣！"渊乃集将佐问计，谓之曰："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族灭，若之何？"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等皆惧。渊继曰："朝廷用兵，动止皆禀节度，未有外将敢得专之。今贼在数百里内，江都在三千里外，加以道路险要，复有他贼据之，闻奏往来，还期莫测，若拘泥奏报，不予变通，势难挡贼，进退维谷，何为而可？"⑥高君雅乃炀帝旧部，与王威同为炀帝遣使监视李渊者，至此，迫于非常形势，皆曰："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渊乃命世民与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募集新兵，远近应募，旬日间近万人。并遣密使往河东召建成、元吉，往长安召柴绍急赴晋阳。王威、高君雅见募兵云集，疑李渊有异志，欲借晋祠祈雨之机诛之。晋阳乡长刘世龙，与君雅相善，得知此事，密告李渊。五月癸亥夜，世民伏兵于晋阳宫城外。次晨，渊与王威、高君雅同坐晋阳宫视事，刘文静引开阳府司马刘政会至庭中，称有密状，渊示意王威等取状，政会曰："所告乃副留守事，唯唐公得视之。"渊视其状云："王威、高君雅潜引突厥入寇。"君雅大呼："此乃反者欲杀我耳。"⑦刘文静、刘弘基、

长孙顺德等共执王、高系狱。适突厥数万扰晋阳，众以为确由王、高所引致。李渊于是斩王威、高君雅，宣示群众，铲除障碍，公开起兵。六月，建成、元吉等始至晋阳。

起兵后，刘文静劝李渊北结突厥，以解后顾之忧，并“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渊亲笔致书突厥，卑辞厚礼，遣使驰送始毕可汗。表示：将大举义兵，远迎炀帝，与突厥恢复和亲。如突厥能助兵马，联兵南下，愿勿侵扰百姓；若只待和亲，坐受宝货，一听可汗选择。始毕复书表示“苟唐公自为天子，我当不避盛暑，以兵马助之”。将佐皆请依突厥所言，联兵南下，渊以时机未到，不可。裴寂等乃请尊炀帝为太上皇，立隋京城留守代王侑为帝，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隋旗尚赤，改用红白狼头旗，表示臣服突厥），渊许之。

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拒不听命，且为南下必经之地，渊命建成、世民率众取之。建成、世民治军严整，路旁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窃之者辄求其主偿之”，遇战则身先士卒，与之同甘苦。军士虽募集未久，但一战而下西河，执斩郡丞高德儒，其余不杀一人。首战告捷，往返仅只九日。渊喜曰：“以此行军，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策。于是建大将军府，李渊自为大将军，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唐俭、温大雅为记室，武士彟为铠曹，刘政会及崔善为、张道源为户曹，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为左右统军，其余文武，量才擢用。时募兵已得数万，建立三军，分为左右。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领左三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领右三统军。

七月，李渊以李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自与建成、世民率领三万大军誓师南下。誓词指斥炀帝“饰非好佞，

拒谏信谗"，"巡幸无度，穷兵极武"，"辽水屡征，歼丁壮于亿兆"，致使"十分天下，九为盗贼"。表示以"废昏立明"为己任，"兴甲晋阳，奉尊代邸（即代王侑），扫定咸雒"⑧。并以誓词檄喻各郡县。代王侑遣虎牙郎将宋老生以精兵二万屯霍邑（今山西霍县），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以骁果数万屯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阻击李渊。劲敌守险，又久雨不停，渊军不得进，粮运不继，复传突厥欲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渊召将佐商议，裴寂等以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短期难克，刘武周勾结突厥，威胁太原，且军士家属俱在其地，"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建成、世民则以为"今禾菽被野，何忧乏粮？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武周与突厥外虽相附，内实相猜"，并未严重威胁晋阳，自应"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令天下。"渊不听，下令左军发还太原。世民复谏曰："今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矣。"⑨渊乃悟，令世民与建成分道连夜追回左军。

八月雨霁，太原粮运亦至。渊率军沿傍山小路趋霍邑，亲与数百骑至霍邑城东数里以待步兵，使建成、世民率数十骑至城下挑战。老生怒，引兵三万分道出东门、南门。渊后军亦至，拟使军士先食而后战，世民曰："时不可失。"渊乃与建成布阵城东，世民布阵城南，渊军战稍退，世民与段志玄引兵冲入老生背后，"世民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渊军复振，锋刃相交，响若山崩，城楼皆震。渊军传呼"已斩宋老生"，老生兵闻之大乱，弃戈而走，争奔东门、南门欲入城，建成、世民率军先已屯守门外，老生不得入，为刘弘基部下军头卢君谔所斩。渊军奋击，血流遍地，日暮下令登城，军士无攻具，肉搏而上，遂克霍邑。赏功时有人提出奴

应募者应有别于良人，渊曰："矢石之间不辨贵贱，论勋之际何有等差？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勋授。"渊军继进，势如破竹，连下临汾、绛郡（今山西新绛），至龙门（今山西河津禹门口），刘文静与突厥柱国康鞘利引突厥兵五百及马二千匹来援。

九月，进围河东，屈突通凭城拒守，攻之不克。时关中豪杰日有前来归附者，渊欲引兵渡河入关中，进攻长安，正犹豫未决。裴寂曰："屈突通拥大众，凭坚城，吾舍之而去，若进攻长安不克，则腹背受敌，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东，然后西上。"李世民曰："不然，兵贵神速"，"宜乘机早渡，以骇其心。我若迟留，彼则生计。且关中群盗，所在屯结，未有定主，易可招怀，贼附兵强，何城不克？屈突通自守贼耳，不足为虞。若失入关之机，则事未可知矣"⑬。渊"两从之"，留诸将继续围攻河东，自引大军渡河西进，主力渡河后遣建成、刘文静等率军数万屯永丰仓，守潼关，以备东面敌兵；世民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部数万人攻取渭北。渊女平阳公主于柴绍赴太原后，归鄠县别墅，散家财聚众起兵，与起兵于鄠县山中之李神通及聚众于司竹园之西域商胡何潘仁联兵攻克鄠县，众至七万。及渊渡河西进，平阳公主、李神通等各遣使迎接。世民军至渭北，平阳公主率精兵万余前与会师，营中号曰："娘子军。"世民引兵趋司竹，李仲文、何潘仁、向善志等皆帅众归附，胜兵十三万，军令严整，秋毫不犯。隰城尉房玄龄谒世民于军门，世民一见如故，任为记室参军，引为谋主。大军所至皆下，吏民及各地武装"归之如流"。世民遣使请李渊会师长安战场，渊命建成选精兵趋灞上（今陕西西安东），世民率新附诸军北屯长安故城。十月，李渊至长安附近，诸军皆集，

合二十余万。渊命建成攻东、南两面，世民攻西、北两面。十一月，建成部下军头雷永吉利用云梯首先登上城墙，诸军继之，遂克长安。

李渊进入长安，与民众约法十二条，悉除隋朝苛暴，迎代王侑继皇帝位，是为隋恭帝，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恭帝以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进封唐王。“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义宁二年（618）四月，炀帝凶讯至长安，五月，隋恭帝禅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于太极殿，国号唐，是为唐高祖，改元武德，仍都长安。罢郡置州，改太守为刺史。六月以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以隋民部尚书萧瑀为内史令，屈突通为兵部尚书。立建成为皇太子，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奉隋帝为酅（xī 希）国公。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表曰：“隋以恶闻其过亡天下。陛下龙飞晋阳（617 年五月晋阳起兵），远近响应，未期年而登帝位（618 年五月隋恭帝禅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不难也。臣谓宜易其覆辙，务尽下情，凡人君言动，不可不慎。”⑪渊览表大悦，擢为治书侍御史，赐帛三百匹，并颁示远近。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2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③《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4 页。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 2372 页，中华书局 1964。

⑤《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 2373－2374 页，中华书局 1964。

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 2375 页，中华书局 1964。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 2375－2376 页，中华书局 1964。

⑧《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二 19－20 页。

⑨《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 2380 页，中华书局 1964。

⑩《旧唐书》五七《裴寂传》。

⑪《通鉴纪事本末》卷二六 2391 页，中华书局 1964。

隋唐五代

唐统一全国

当起义浪潮席卷全国，隋朝统治行将灭亡之际，一些地主官僚乘机打出反隋旗号，纷纷组织地主武装，形成割据势力。唐朝建立后，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

俘杀薛仁杲 薛举原为隋金城府（今甘肃兰州）校尉，家资钜万，交结豪猾，雄于西边。大业十三年（617）陇右（泛指今陇山以西地区）农民起义，四月，金城令郝瑗募兵数千，令薛举率领镇压。薛举及其子薛仁杲等乘郝缓置酒飨士之机，劫郝缓，举兵反隋，囚郡县官吏，开仓赈施饥民。薛举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招集群“盗”，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岷山羌族首领鍾利俗率众二万归附，兵势大振。于是以薛仁杲为齐王，领东道行军元帅。宗罗睺为兴王，为仁杲之副。分兵略地，攻克西平（治今青海乐都）、浇河（治今青海贵德）二郡，未几尽有陇西（治今甘肃陇西），众至十三万。七月薛举自称秦帝，立其子仁杲为皇太子。遣仁杲攻克天水（今属甘肃），自金城迁都天水。十二月薛举遣薛仁杲攻扶风（今陕西凤翔），唐弼率领的义军十万拒之。在薛举的招降下，唐弼杀

其所立天子李弘芝，请降于薛举。薛仁杲乘其无备，袭破之，兼并其众十万，因而"举势益张，军号三十万，将图京师"①。

时李渊父子攻克长安不过一个月，立足未稳；薛仁杲率十万大军围攻扶风，意图争夺关中，对李渊构成严重威胁。李渊遣李世民率军西进应战，大破薛仁杲，"斩首数千级，追奔至陇坻（陇山东面侧坡，在今陕西陇州以西南北一线）而还"。薛举深恐李世民越过陇山穷追不舍，因问左右："古来天子有降事否？"黄门侍郎褚亮说："蜀汉后主刘禅降魏侍晋，被封为安乐公，转祸为福，自古有之。"卫尉卿郝瑗说，汉高祖屡经奔败，卒成大业，"陛下奈何以一战不利，遽为亡国之计乎！"薛举自知失言，随声自解说："聊发此问，试君等耳。"②扶风大捷沉重地打击了薛举，有力地巩固了长安的李氏政权。

扶风之役后，薛举东进之心不死，企图勾结突厥，再度谋取京师。

李渊父子面对东都王世充、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朔方（今内蒙杭锦旗北）梁师都、武威（今属甘肃）李轨等几支武装力量群雄逐鹿的复杂形势，制定了先固根本，再取关东的战略方针。首先翦除西北方面的强敌，建立巩固的后方，然后再东面而争天下。故武德元年（618）四月，李渊派李建成、李世民东进中原，兵至东都城下。城中多欲为内应，李世民则说："吾新定关中，根本未固，悬军远来，虽得东都，不能守也。"③遂引兵还长安。集中力量消灭直接威胁长安之薛举、薛仁杲父子。

武德元年（618）五月李渊称帝，六月薛举入侵泾州（今甘肃泾川北），进逼高桀（今陕西长武县北），游兵掠岐州（治

今陕西凤翔）、豳州（治今甘肃宁县）。唐以秦王李世民为元帅，与长史刘文静、司马殷开山等率八总管兵以拒之，七月双方对垒于高墌。时唐拥有关中、巴蜀和山西的广大地区，掌握着储备丰盛的长安府库和永丰粮仓，赤岸泽（在今陕西大荔县西南）牧监又供给了不少战马，关中、河东一带又是隋代府兵集中的地方。所以唐军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远超秦军。而且李渊进入长安后，与民约法十二条，尽除隋朝苛禁，唐统治区阶级矛盾初步得到缓和，唐军有比较巩固的后方。秦军的情况是：薛举父子据有的陇右地区是隋的牧监所在，又是隋防御突厥和吐谷浑的要地，民习战备，人务骑射，故秦军多精骑骁将，薛举父子即颇能征善战，因而秦军军锋锐盛。但陇右一带，民户寡少，经济落后，天水、陇西、金城等郡，隋盛时合计户数亦不过七万。新占地区，虽户口稍多，但地处前线，尚难严加控制。所以秦军人力、物力、财力皆感不足，难于持久作战。李世民知薛举军粮不足，意在速战，故下令军中“深沟坚壁，以老其师”④。时世民患疾卧病军营，委军事于刘文静与殷开山，并告诫他们：“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⑤刘文静、殷开山恐不出战为敌人所轻，竟陈兵于高墌西南，恃众轻敌而不设备。薛举以精锐轻骑从背后包抄掩袭，战于浅水原，唐军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等被俘，薛举攻下高墌城，积唐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李世民引兵回长安，京师骚动，刘文静、殷开山皆被除名。

武德元年八月，薛举乘唐军新败，将帅并擒，京师骚动，拟进军直取长安。大军出发前，薛举突然病死。薛仁杲继位为秦帝后居于折墌城（今甘肃泾川东北）。唐再以秦王世民为元

帅，出击薛仁杲。九月，唐军进临高墌，薛仁杲使宗罗睺屡次挑战，李世民深沟高垒，坚壁不出。诸将请战，他说："我士卒新败，锐气犹少；贼以胜自骄，必轻敌好斗，故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策也。"乃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⑥双方相持六十余日，十一月，薛仁杲粮尽，部将梁胡郎等率部投降。李世民知秦军已将士离心，令行军总管梁实率部札营浅水原诱敌。秦将宗罗睺，一直求战不得，见唐军出浅水原，大喜，全力进攻。梁实守险不出，人马断水数日，仍顽强抵抗。宗罗睺急攻不下，士卒疲乏。李世民捕捉战机，复令右武侯大将军庞玉结阵于浅水原南，威胁敌阵右翼。宗罗睺并军酣战，庞玉几不能支，李世民亲率大军突然出现于浅水原北，出其不意，宗罗睺忙引兵迎战，但阵势已乱。李世民率骁骑数十冲入敌阵，唐军表里奋击，呼声动地，秦军大溃，斩首数千级。李世民率轻骑二千，驰追溃敌，有人说薛仁杲犹据坚城，不可轻进，他说破竹之势，绝不可失，否则溃兵入折墌城，薛仁杲抚而用之，就难于攻克了。遂追抵折墌城下。日暮，唐大军继至，四面合围。夜半守城秦军纷纷下城降唐。薛仁杲计穷出降。唐军俘获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李世民凯旋长安，薛仁杲被斩于市。是役为唐统一战争中第一个大战役。历时近一年，它的胜利，解除了唐王朝来自西北的威胁，消灭了争夺关中的对手。

败逐刘武周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今山西朔县）鹰扬府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开仓赈济饥民，驰檄降服境内属城，收兵得万余人，武周自称太守，遣使附于突厥。三月，袭破楼烦郡（治今山西静乐）占据汾阳宫，以隋宫人賄突厥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报以战马，兵势益振，又攻陷定

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突厥立刘武周为定杨可汗⑦，赐以狼头纛（dào道又读dú毒，古军队大旗）⑧。刘武周即皇帝位，改元天兴。继而围克雁门（今山西代县）。宋金刚原为易州（今河北易县）一支农民军首领，有众万余，与魏刀儿相结。武德元年（618）窦建德打败魏刀儿，宋金刚率部救援，战败，率众四千投奔刘武周。得武周重用，委以军务，并纳武周之妹为妻，宋金刚建议刘武周"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⑨。武德二年（619）四月，刘武周引突厥兵南下，兵锋甚盛，占领榆次（今属山西），包围并州（治所晋阳，隋改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为齐王李元吉击退。五月刘武周攻陷平遥（今属山西），六月，宋金刚率兵二万攻并州、刘武周攻陷介州（隋末以平遥、介休置介休郡，武德元年改介州，治介休今属山西）。唐遣左武卫大将军姜宝谊、行军总管李仲文击刘武周，中伏兵，大败于雀鼠谷（在介休西南），姜宝谊、李仲文皆被俘，既而逃归。九月右仆射裴寂率兵攻宋金刚，大败于介休东南度索原，唐兵失亡略尽，裴寂逃回晋州（今山西临汾）。刘武周进逼并州，留镇太原的齐王李元吉身为并州总管，连夜携妻妾逃回长安，太原失守。李渊惊呼："晋阳强兵数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一旦弃之。"⑩宋金刚又拔晋州，陷龙门（今山西河津），逼绛州（今山西新绛），十月打下浍州（今山西翼城），军势锐盛，关中大震。裴寂无将帅之才，唯知驱赶民众入城堡焚去积蓄，民众惊扰，夏县（今属山西）民吕崇茂聚众响应刘武周。河东大部城镇，均落刘武周之手，唐仅保有晋西南一隅之地，李渊忙颁手敕："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世民上表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

恨。愿假精兵三万，必能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发关中兵增益世民所部，使击刘武周，李渊亲自为之送行。

武德二年（619）十一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乘坚冰东渡黄河，进驻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屯驻浍州的宋金刚军主力对垒相持。时河东州县，为宋金刚掳掠一空，民情慌乱，无从征敛，军粮不足。世民一反裴寂所为，晓喻民众，安抚人心，号召复业，民众莫不归附，然后收其余粮，以充军食。

当时形势是刘武周军起于代北边防要地，“人性劲悍、习于戎马”①，战斗力强，又乘战胜余威，士气旺盛。加之得突厥支持，军锋锐盛。晋阳府库充实，刘武周占据晋阳掌握着充足的仓粮库绢。但刘武周、宋金刚勾结突厥，难得人民拥护，深入河东，就地筹粮异常困难，大部军粮皆远自晋阳输运，山重峰险粮道极不安全。唐军在屡败之余，士气低沉。但唐王朝除拥有关中、巴蜀，又得陇右、河西，后方更为巩固。人力、物力、财力优于刘武周，而柏壁距关中不过百里之遥，粮运极其安全，特别是李渊晋阳起兵后，在河东比较注意军纪，此番交战在河东就地征粮比较容易。

十二月唐将李孝基、于筠、独孤怀恩和唐俭攻夏县，宋金刚遣尉迟敬德合吕崇茂大破唐军，李孝基等四将俱没。尉迟敬德将还浍州，李世民遣殷开山、秦叔宝邀击于美良川（在今山西夏县北），大破之斩首二千余。尉迟敬德复引骑兵援据守蒲坂（今山西永济北）的旧隋将王行本，李世民自将步骑三千夜趋安邑（今属山西），敬德仅以身免，世民复归柏壁。诸将皆请同宋金刚决战，世民说：“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刘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蔽。金刚强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

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⑫坚持"坚壁挫锐"之计。

所谓汾、隰，"汾"即汾州、浩州，隋之西河郡，治所在隰城今山西汾阳；"隰"即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刘武周大军南下后，晋州以北城镇只浩州仍在唐军之手，而浩州控晋阳至晋西南交通要冲，对刘武周军运粮线威胁极大。李世民遣刘弘基、张纶进逼西河，牵制进攻浩州的敌军。武德三年（620）三月，刘武周攻浩州，被李仲文击败，俘斩数千人，张纶又败刘武周于浩州俘斩千余人。宋金刚部深入晋西南，僵持五月余，始终不得与唐军主力决战，士气逐渐下落。浩州唐军又渡过汾水，消灭刘武周的护运部队，占领平遥、介休之间的张难堡（今张兰镇），汾水东侧的运粮线又被切断。四月宋金刚被迫北撤。

李世民见敌军北撤，战机已至，立即率军尾追不舍。至吕州（即霍邑今山西霍县），大破敌军寻相部，乘胜逐北，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战斗数十回合。至高壁岭，士卒饥疲，部将谏请驻兵以待军粮与后继部队，然后继进。李世民说："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必乘此势取之。"⑬遂策马而进，将士虽一昼夜未得进食，但亦不复言饥，继续前进。至雀鼠谷，追及宋金刚，"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军中只有一羊，世民与将士分而食之"⑭。继引兵追至介休，宋金刚尚有兵两万，在城西布阵，南北亘七里，欲背城决死一战。李世民命李世勣、程咬金、秦叔宝攻其北翼，翟长孙、秦武通攻其南翼。两翼唐军出战不利，李世民自率精骑三千冲其阵后，大败宋金刚，斩首三千余，追之数十里，至张难堡，与浩州唐守军

会师。尉迟敬德以介休降唐，李世民大喜重用之为右一府统军。刘武周闻宋金刚全军溃败，大惧，弃并州率五百骑北奔突厥，宋金刚收其余众拟再战，但已众莫肯从，指挥失灵，亦率百余骑进入突厥。李世民入晋阳，刘武周所占唐河东州县，全部收复，并进据代北一带。时“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相与为《秦王破阵乐》之风”⑮，以颂扬秦王功业，后此曲编入唐乐府。时李世民年仅二十四。刘武周之剪灭，为唐挺进中原统一全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为统一战争中之重大事件。未几刘武周、宋金刚分别欲逃回其起兵处马邑与上谷，皆为突厥所杀。

迫降王世充　王世充原为隋江都郡丞，因镇压起义有功，颇得炀帝宠任，升为江都通守。大业十三年（617），受命率江淮劲旅与各路兵马同赴东都共讨李密。炀帝诏诸将皆受涿郡留守薛世雄节度。九月诸军会于东都，薛世雄已为窦建德击溃，炀帝诏诸军皆受世充节度。东都守军屡遭瓦岗军重创，不敢复出。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五月，炀帝凶讯至东都，留守官奉越王杨侗即皇帝位，改元皇泰。以段达、王世充为纳言、元文都、卢楚为内史令与皇甫无逸等七人，共掌朝政，时人号为“七贵”。王世充受封为郑国公。宇文化及拥兵北上，六月，李密向东都乞降，皇泰帝令李密先平化及，然后入朝辅政。王世充不满以朝廷官爵与李密，由是与元文都、卢楚有隙，七月李密大败宇文化及，东都皆喜，独王世充激其部下反对李密，元文都与卢楚等谋诛之。王世充勒兵攻入宫城，杀元文都、卢楚等，被任命为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掌握东都政权。李密将入朝，闻元文都等已死，乃止。九月，王世充乘李密与宇文化及大战后劲卒良马多死，出兵击败李密，得李密

将卒十余万。皇泰帝以世充为太尉、尚书令、总督内外诸军事。世充专总朝政，事无大小，皆入太尉府，台省监署，莫不寂然。武德二年（619）三月，又受命为相国，假黄钺、总百揆，进爵郑王，加九锡⑯。四月王世充逼皇泰帝禅位于郑，入宫即皇帝位，国号郑，改元开明。

李密降唐后，唐以淮南王李神通为山东道安抚大使，率部出关招抚李密旧部。时徐世勣据李密旧境，在魏征劝说下应命归唐，开仓运粮供李神通军。唐以徐世勣为黎州总管，赐姓李氏。唐在关东声势渐振。武德二年（619）十月窦建德攻克黎阳，俘李神通、魏征，徐世勣亦降。王世充乘机夺取了唐在河南的一部份土地。唐军主力正与刘武周决战，无力东援，关东之地全部丧失。

武德三年（620）五月，李世民平刘武周后回到长安。七月，李渊命李世民统诸军东击王世充。时黄河流域形成唐、郑（王世充）、夏（窦建德）三方鼎峙之局面。唐欲统一全国，必先统一北方，郑、夏是其必须解决的两大势力。王世充据守坚城，洛阳防卫严密，一时难以攻破。但他原为炀帝亲信，镇压农民起义起家，郑政权直接继承隋政权，因而其统治集团不得人心，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郑政权统治内部，矛盾颇深，一部分关陇军事贵族一直倾向于唐。投降过来的李密旧将，如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等先后降唐。郑政权控制的州县亦不巩固，一旦看到唐朝占有优势，大部会倒向唐方。王世充的主力由江淮排穳手组成，善于防守，不善于进攻，而东郡距新安（今属河南）前线，不过百里之遥，全部暴露在唐军面前。唐朝方面在消灭薛仁杲和刘武周之后，关中更加巩固，后方地区扩大，后顾无忧，可大力翦除关东群雄，军事上完全转入主动

的局面。武德三年（620）七月，又在关中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初置十二军，分关内诸府以隶焉。……每军将副各一人，取威名素重者为之，督以耕战之务。"⑰把军事和生产结合起来，有利于前方兵员的补充和粮秣的供应。而唐在屡胜之后，士气较高。唐、郑相较，唐军居于优势地位。

七月，李世民至新安，王世充选所属诸州镇骁勇，集中洛阳，分遣其兄弟子侄防守洛阳五城⑱，及洛阳外围的襄阳（治今河南叶县南）、虎牢（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怀州（今河南沁阳）等要地，自己统率步骑三万，以抗唐军。李世民亲率大军进行攻坚战。唐军围慈涧（今河南新安东），王世充率兵三万救之。李世民率轻骑与之猝遇被围，苦战退敌，世民还营，尘埃覆面，军不复识。次日唐军五万攻克慈涧，王世充逃回洛阳。李世民部署兵力围攻洛阳，自率大军屯驻洛阳以北北邙山，连营以逼洛阳；遣史万宝自宜阳（今河南宜阳西）南据龙门（在洛阳南），遣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怀州今河南沁阳），遣王君廓自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有洛口仓）切断王世充粮道，遣黄君汉自河阴（今河南孟津东北）攻回洛城（洛阳故城北七里）。八月在洛阳西宛青城宫隔水对话中，王世充对李世民说："唐帝关中，郑帝河南"，"相与息兵讲好，不亦善乎！"世民使宇文士及答曰："奉诏取东部，不令讲好也。"⑲八九两月中黄君汉克回洛城，降其堡聚二十余；刘德威攻入怀州外郭，下其堡聚；史万宝进军甘棠宫（即显仁宫在今河南宜阳附近）；王君廓徇地东至管城（今河南郑州），郑属河南郡县相继降唐。至武德四年（621）二月，唐军已据管城；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告成镇）亦降唐；王世充太子王玄应率兵数千自虎牢运粮入洛阳，被唐军消灭，玄应仅

以身免，既而唐军攻克虎牢；王世充侄王秦弃河阳（今河南孟县南）遁走，部将以城降；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保据洛口的单雄信亦遁去，洛阳外围据点多入唐军之手。于是李世民移军洛阳西宛之青城宫，壁垒未立，王世充率大军两万出战。李世民先令屈突通率步兵五千渡水击之，然后自行骑兵南下，与步兵配合力战。为探明敌阵厚薄，李世民率精骑数十冲入敌阵，直穿其背，所向披靡，杀伤甚众，其战马中流矢倒毙，从者以己之坐骑授之，终于冲出敌阵。激战自晨至午，郑军始退，世民纵兵追抵城下，俘斩七千人，遂围洛阳宫城。王世充虽婴城自守，不敢复出，但洛阳城守御极严，“大砲飞石重五十斤，掷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车辐，镞如巨斧，射五百步”⑳。李世民昼夜围攻，旬余不克。唐将士疲弊请求班师，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唯洛阳孤城，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于是下令军中：“洛阳未破，师必不还，敢言班师者斩！”㉑三月，洛阳于久围之后，城中缺粮，绢一匹只换粟三斤，布十匹换盐一升，百姓吃草根树叶皆尽，竞相澄取浮泥拌米屑作饼食之，人人皆病，死者相枕于道。瓦岗军攻入东都外郭时，居民迁入宫城三万家，至是减至三千家，攻克洛阳已指日可待。正当此关键时刻，窦建德军十余万，西救洛阳陷管州、荥阳（今属河南），水陆并进，泛舟运粮，沿河西上，抵达成皋（今河南汜水）之东原。形成对围城唐军阵后的严重威胁。

初郑夏二国交恶，不通信使，至唐军逼洛阳，王世充遣使求救于窦建德。夏中书侍郎刘彬建议说：“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今唐兵临郑，自秋涉冬，唐兵日增，郑地日蹙，唐强郑弱，势必不支，郑亡，则夏不能独立

矣。不如解仇除忿，发兵救之，夏击其外，郑攻其内，破唐必矣。唐师即退，徐观其变，若郑可取则取之，并二国之兵，乘唐师之老，天下可取也。”㉒窦建德采纳其建议，致书李世民请退军潼关，返还郑国土地，复修前好。世民不答，至是见洛阳危急，乃出兵。世民集将佐议对策，萧瑀、屈突通、封德彝等认为：唐兵已疲弊，王世充据守坚城，难于立克，窦建德乘胜而来，不易抵挡，与其腹背受敌，不如退保新安，再图后举。郭孝恪、薛收等认为：王世充据东都府库，拥江淮精兵，唯缺粮草，故困守待毙。如坐视郑夏合兵，运河北之粟供应洛阳，必将使战争延续统一无期。宜继续围困洛阳，分兵东据成皋，以拒窦建德，夏兵一破，洛阳可不攻自下。李世民当机立断，采纳郭孝恪等人的主张，命齐王李元吉领兵围守东都，自率精兵三千五百人，驰赴虎牢关，扼止窦建德西进。

时双方形势：窦建德政治清明，深得河北人民爱戴，后方巩固，粮运亦较便利。但河北、山东农民不习鞍马，骑兵不及唐军精锐。唐军有洛阳的后顾之忧，对夏作战，利于速决，不利于持久。李世民抵虎牢次日，即率精骑五百，出虎牢东二十余里，侦察敌营，沿途布留伏兵，最后只余四骑，直抵距夏军营三里处，引夏军五六千骑追入伏中，伏兵奋击，重创夏军，俘其骁将殷秋、石瓒等，斩首三百余。双方相持一月，建德数战不利，唐军又抄其粮运，俘其大将军张青特。其部下凌敬建议：大军渡河攻取怀州、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越过太行山，乘虚入上党（今山西长治），取汾（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晋（晋州治今山西临汾），趋蒲津（在今山西永洛蒲州境）。既可避实击虚拓河东之地，又可震骇关中，解洛阳之围。窦建德以郑亡在旦夕，舍之而去是畏敌弃信，一心与唐决战。李世民侦

知"建德伺唐军刍尽，牧马于河北，将袭武牢"㉓。五月一日李世民北渡黄河，察看形势，留马千余匹，诱建德主动出战。次晨建德果全军出动，陈兵汜水，南北二十里，鼓行而进。李世民见夏军喧嚣而来，无严格纪律，逼城而阵，有轻敌之心，乃按兵不出，待其"勇气自衰，阵久卒饥，势将自退，追而击之"㉔。夏军布阵，自清晨至中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迟疑欲退。时唐军牧于河北的群马已调回，李世民乃下令出击，自率轻骑当先，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逼夏阵。建德群臣正进行朝谒，唐骑突然出现，建德急召骑兵拒之。骑兵阻于朝臣不得过，建德令朝臣退去，进退之间，唐兵已至。世民率骑兵所向披靡，诸军大战，尘埃涨天。世民帅程知节、秦叔宝等，卷旗突入敌阵，出其阵后，张出旗帜，建德将士见阵后唐旗飘扬慌乱大溃。追奔三十里，阵亡三千余，建德坠马被俘，壮士皆溃去，所俘五万人，世民即日遣散使还乡里。

虎牢战后，世民回师攻洛阳，囚窦建德等至城下。王世充见大势已去，召诸将议突围，南走襄阳，诸将以为所恃者唯有夏王，夏王一败，虽突出重围终必无成。王世充遂率其太子群臣二千余人以洛阳降。

是役自武德三年（620）七月开始至武德四年（621）五月结束，历时十月，是唐统一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唐军一举镇压窦建德，削平王世充，为全国统一奠定基础。

俘斩刘黑闼　刘黑闼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少时与窦建德为友，隋末参加起义，从郝孝德加入瓦岗军。瓦岗军失败，他为王世充所俘，世充任为骑将，使其守新乡（今属河南）。李世勣攻新乡，俘黑闼献于窦建德，建德署为将军，赐爵汉东公。

武德四年（621）五月窦建德失败被俘，建德妻曹氏与左仆射齐善行率数百骑退至洺州（今河北永年），余众欲立建德养子为主，征兵继续抗唐。独齐善行以为不可，他说以夏王之英武，士马之精强，一朝被擒，易如反掌，今丧败如此，不若请降于唐，欲得缯帛者，当散府库之物，不得扰民。于是运府库存帛数十万段，散发给将卒。凡三昼夜始尽。然后与右仆射裴矩率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玺并所得珍宝降于唐，建德之地悉平。七月，李世民至长安，斩窦建德于市。唐官吏严厉惩处建德旧部，"以法绳之，或加捶挞，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25]。适逢李渊下令征建德故将范愿、董康买、曹湛及高雅贤等赴长安，"范愿等相与谋曰：'王世充以洛阳降，其下骁将公卿单雄信之徒皆被夷灭，我辈若至长安，必无保全之理。且夏王往时擒获淮安王，全其性命，遣送还之。唐家今得夏王，即加杀害，我辈残命，若不起兵报仇，实亦耻见天下人物。'于是相率复谋反叛"[26]。为此同赴漳南见建德故将刘雅，欲推他为首，刘雅说："天下适安定，吾将老于耕桑，不愿复起兵！"[27]时刘黑闼隐居漳南，以种菜为业，范愿等往告其谋，推之为主。黑闼杀耕牛同饮定计，聚众得百余人，七月起兵袭据漳南县城。

唐置山东行台于洺州，以淮安王李神通为行台右仆射，统兵镇压刘黑闼。九月李神通率兵五万与刘黑闼战于饶阳（今属河北）城南，唐军大败，士马军资失之三分之二，黑闼兵势大振。十一月刘黑闼陷定州（今河北定县），俘定州总管李玄通，黑闼爱其才，欲用为大将，玄通引刀自刺，破腹而死。十二月，黑闼率兵数万，进逼宗城（今河北威县西），黎州总管李世勣弃城走保洺州（今河北永年东南），黑闼追击，杀步卒五

千人，世勣仅以身免，黑闼入洺州。另外先后杀屯卫将军王行敏，魏州总管潘道毅，败右武卫将军张士贵、左武卫将军秦武通。先后陷鄃县、历亭、瀛州、观州、冀州、相州、黎州、卫州、邢州、赵州。建德将卒争杀唐官吏以应之，半岁之间尽复建德旧境。武德五年春正月，刘黑闼自称汉东王，定都洺州，改元天造。以范愿为左仆射，董康买为兵部尚书，高雅贤为右领军，窦建德时文武百官悉复本位。其设法行政悉仍建德之旧，而攻战勇决则过之。又遣使北连突厥，屡败唐军。刘黑闼起兵后，已归附唐朝的徐圆朗亦据兖州（今属山东）起兵响应，黑闼以圆朗为大行台元帅，兖、郓等八州皆应之。河北、中原形势为之突变。

武德四年（621）十二月，唐高祖命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率大军东击刘黑闼。武德五年春正月李世民复取相州（今河南安阳），进军肥乡（今属河北）列营于洺水（即洺河，在今河北南部）之上，唐幽州总管李艺率兵数万南下配合，在鼓城（今河北晋县）大败黑闼兵，俘斩八千人。洺水（城在今河北曲周南）降唐，李艺取定、栾、廉、赵四州与李世民会合。二月刘黑闼陷洺水城，唐名将罗士信战死，李世民再拔洺水城。三月李世民、李艺屯兵洺水南北与刘黑闼兵对峙，黑闼屡挑战，世民坚壁不应，别遣奇兵断其粮道。时黑闼自冀、贝、沧、瀛等州水陆运粮，舟车俱进，遭唐将程名振邀击，“尽毁其舟车”㉘。双方相持于洺水一带凡六十余日，世民估计黑闼粮食用尽，必来决战，于是使人筑堰挡水于洺水上流，嘱以待下流战起即决堰放水。黑闼果率步骑二万南渡洺水，逼唐营布阵。世民自率数骑击败其骑兵，乘胜践踏其步兵，黑闼率众进行殊死战，自中午至黄昏，势渐不支，遂与范愿等二百骑奔突

厥。余众不知，仍在拚死格斗，时上流决堰，洺水猛涨，深丈余，黑闼兵大败，斩首万余级，溺死数千人，河北悉平。世民引兵攻徐圆朗，下十余城。七月，班师，使淮安王李神通等继攻徐圆朗。

刘黑闼奔突厥后于当年六月引突厥寇山东。七月至定州。其故将曹湛、董康买等聚兵响应。以淮阳王李道玄为河北道行率总管以讨之。九月，黑闼陷瀛州（今河北河间）。十月诏齐王李元吉讨刘黑闼于山东。淮阳王李道玄率兵三万攻刘黑闼于下博（今河北深县南），大败，为黑闼所杀，李世民为之流涕。李道玄之败，山东震骇，洺州总管庐江王李援弃城西走，州县皆叛附于刘黑闼，旬日间黑闼尽复故地，进据洺州。李元吉畏避黑闼，不敢进军。

十一月诏太子李建成率军讨刘黑闼，魏征对太子李建成说："前破黑闼，其将帅皆悬名处死，妻子系虏；故齐王之来，虽有诏书赦其党与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谕遣之，则可坐视离散矣！"㉓建成采纳其建议，实行安抚政策，争取人心，安定社会。农民在近二十年战争之后，希望恢复生产，过安定生活。黑闼失去群众支持，军中食尽，众多逃亡，在与唐军交战中大败，与数万骑亡去，武德六年（623）正月被俘，牺牲。山东悉平。二月徐圆朗山穷水尽，与数骑弃兖州出走，为野人所杀，其地悉平。

注 释

①②《旧唐书》五五《薛举传》。

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④《旧唐书》五五《薛举传》。

⑤《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⑥《旧唐书》五五《薛举传附薛仁杲传》。

⑦据赵翼《陔余丛考》卷一五载："'定杨'、'平杨'，皆取平定杨氏（隋帝）之义。"

⑧旧史称突厥本狼种，牙门建狼头纛以示不忘本。

⑨《旧唐书》五五《刘武周传》。

⑩《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⑪《隋书》卷三O《地理志中》。

⑫《册府元龟》四五《帝王部·谋略》。

⑬⑭《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⑮〔唐〕刘悚《隋唐嘉话》18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一版。

⑯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以九种礼物，即车、马、衣服、乐器、朱户（门上加朱漆）、纳陛（一说纳，内也，谓凿殿基为陛，不使露也，一说纳陛者致于殿两阶之间，便其上殿）、虎贲百人、铁钺（同斧钺）、弓矢、秬鬯（jù chòng古代用黑黍和香草酿造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参阅《资治通鉴》1148页。王莽篡汉之前先加九锡，嗣后禅位者多效为之。

⑰《唐会要》卷七二《京城诸军》。

⑱宝城（即皇城）、南城（在皇城之南）、东城（在皇城之东）、含嘉城（即含嘉仓城，在皇城东北）、曜仪城（在皇城与宫城北）。参阅《资治通鉴》5886页。余扶危、贺官保：《隋唐东都含嘉仓》11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

⑲《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⑳㉑《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㉒《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㉓㉔㉕《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㉖《旧唐书》卷五五《刘黑闼传》。

㉗《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㉘《旧唐书》八三《程名振传》。

㉙《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隋唐五代

唐灭东突厥

隋文帝曾击败东突厥，使突厥归附隋朝，隋与启民可汗关系极为密切。大业五年（609）启民可汗死，炀帝立其子咄吉为始毕可汗。隋末东突厥再度强大起来，成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夏的强大军事力量。裴矩诱杀始毕可汗宠臣史蜀胡悉，始毕由是不朝。大业十一年（615）八月，始毕率骑兵数十万围炀帝于雁门。自是屡寇北边。时隋朝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封建割据势力乘机各霸一方，始毕支持北方各分裂割据势力，扩大内地分裂局面，借以坐收渔利。正如《通典》所说："隋末乱离，……（突厥）又更强盛，……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大唐起义太原，刘文静聘其国，引以为援。"①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南下，为解除后顾之忧，并取得突厥兵马的资助，也一度称臣于突厥。李渊卑辞厚礼致书始毕可汗，并遣刘文静出使突厥借兵。双方约定："若入长安，民众

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②大业十三年（617）八月，刘文静、康鞘利以突厥兵五百、马二千匹来助李渊。唐高祖即位后，“以初起资其兵马，前后饷遗，不可胜纪。突厥恃功骄倨，每遣使者至长安，多暴横，帝优容之”③。武德二年（619）始毕可汗卒，因其子什钵苾年幼，立其弟俟利弗设为处罗可汗。突厥遣使告丧，高祖为始毕举哀废朝三日，诏百官就馆吊其使者，并遣使吊处罗可汗，送丧礼帛三万段。处罗可汗遣二千骑助李世民攻刘武周，刘武周既败，武德三年（620）六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④。处罗迎隋炀帝萧后及炀帝孙杨政道，立政道为隋王，并欲取并州（治所在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以居之。将出师，是年十一月处罗死。隋义成公主以其子丑弱，废之，更立启民可汗第三子莫贺咄设，号颉利可汗，又纳义成公主为妻。以始毕可汗之子什钵苾为突利可汗（按始毕父启民可汗染干本号突利可汗，什钵苾又称突利可汗，盖袭其祖先号）。颉利遣使告丧，高祖为之罢朝一日，遣百官就馆吊其使者。

颉利可汗承父兄之业，兵马强盛，气陵唐室，妻隋义成公主，请为隋室复仇，以报隋文帝厚遇启民之德。颉利颇以为然。虽唐高祖以中原初定，国力不足，待突厥甚厚，而颉利求请无厌，言辞骄慢，继而就不断攻扰。自武德四年（621）至武德九年（626）几年中，突厥贵族发兵侵扰中原地区不下五十次。如武德四年四月，颉利扰雁门（故址在今山西雁门山上），为李大恩击退。八月扰代州（治今山西代县），总管王孝基拒之，全军覆没，总管李大恩据城自守，月余始退。武德五年四月颉利遣数万骑与刘黑闼共围代州总管李大恩于新城（今

山西朔县西南)，大恩粮尽突围，部众溃散而死。八月，颉利十五万骑入雁门，扰并州（治所在晋阳，隋改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又遣兵扰原州（治今宁夏固原)，命太子李建成率兵出豳州（治今陕西彬县）道，秦王李世民率兵出泰州（时治龙门今山西河津）道以御之。唐高祖与群臣议对突厥和与战孰利，有主张言和者，有主张战而后和，方可恩威兼著者，唐高祖取后者。是月破突厥于汾州（治今山西汾阳)，斩首五千级，又遣使见颉利说："唐与突厥风俗不同，突厥虽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虏掠所得皆入国人，于可汗何有？不如旋师，复修和亲，可无跋涉之劳，坐受金币，又皆入可汗府库，孰与弃昆弟积年之欢，而结子孙无穷之怨乎?" 颉利引兵还。武德六年七月，以突厥屡扰边，遣太子建成率兵屯北边，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备突厥。初，并州大总管府长史窦静以突厥屡为边患，请于太原置屯田以充军粮，岁收谷数千斛。十一月，秦王世民于并州境增置屯田。是岁，唐统一战争结束，颉利不欲中原地区出现统一强大的唐王朝，武德七年侵扰更为频繁。或劝高祖说："突厥所以屡寇关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长安故也。若焚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息矣。" ⑤高祖、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以为然，遣宇文士及赴樊（今湖北襄阳北)、邓（今河南邓县）一带寻找建都之地。肖瑀等虽知其不可而不敢谏。李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 ⑥迁都之议乃止。

武德七年（624）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侵，连营南下，京师戒严，秦王世民引兵拒之，屯兵于豳州（治今陕西

彬县）⑦。颉利率万余骑突至城西，居高布阵，将士震骇。世民率百骑，驰奔敌阵，指责颉利背约入扰说："国家与可汗誓不相负，何以背约，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来一决胜负。可汗若自来，我当与可汗两个独战。若欲兵马总来，我惟百骑相御耳。"⑧颉利恐秦王以百骑挑战，而伏大军合围以击之，不敢应战。世民又遣骑告突利说："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⑨也！"⑩颉利狐疑，闻香火之言"阴猜突利"与秦王有约，叔侄离心。世民一面遣使见突利晓以利害，继纵反间之计；一面乘积雨不晴，突厥弓矢"筋胶俱解"，雨夜出师。突厥大惊，颉利欲战，突利以为不可，乃请和亲，引兵退去。突利请与世民结为兄弟，盟誓而去。

武德八年（625）议大举击突厥，先是唐高祖与突厥书用敌国礼，七月起改用诏敕。八月颉利可汗率兵十余万大掠朔州（今山西朔县），并州道行军总管张瑾战败，全军覆没，行军长史温彦博为突厥所执，囚于阴山。

武德九年（626）八月，颉利乘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与突利合兵十余万骑扰泾州（今甘肃泾州县北），进至武功（今属陕西），京城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败突厥于泾阳（今属陕西），斩首千余级，俘其俟斤阿史德乌没啜，得突厥主力仍进至长安附近渭水便桥之北。颉利一面列阵渭水北岸，一面遣使入长安以观虚实，声称二可汗率兵百万抵达渭水北岸。唐太宗一面囚押突厥使臣，一面与高士廉、房玄龄等六骑直达渭水南岸，隔水责颉利负约。突厥大惊，皆下马列队而拜。继而诸军皆至，旗甲蔽野，太宗挥诸军布阵，独留与颉利对话。太宗深知突厥君臣志在金帛，若厚加赐与，理当自退，待其志满意骄，不复设备，再一举而灭之。

颉利在唐太宗"啖以金帛"⑪的情况下，又见使臣一去不返，唐太宗轻骑独出，成竹在胸，唐军军容严整，意在必战，而自己悬军深入，归路难以确保，于是请和。隔日，太宗至城西，斩白马，与颉利盟于渭水便桥之上。突厥始退。

突厥退兵后，唐太宗日率诸卫将卒数百人在显德殿庭教习射术，射术优良者赏赐弓、刀、帛以加强军事训练。同时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增强国力，做好与突厥最后决战的准备。贞观元年（627）颉利政令烦苛，国人不悦，又信任诸胡，疏远突厥，适遇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人民陷于冻馁之中。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阴山以北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十余部皆叛。贞观二年（628）突利分管之奚、霫等数十部，因征税无度，多叛突厥归附唐朝。颉利责突利失众，遣其北征薛延陀，又战败丧师，颉利怒，拘之十余日并加责挞，突利愤怒。颉利征兵于突利，突利拒之，表请归附唐朝。同年，唐太宗遣使间道册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使入贡。至此突厥势力大衰，上层分崩离析，下层民饥畜瘦，内有心腹之患，外受腹背之敌。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转变。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都督张公谨上言突厥六可取："颉利纵欲肆凶，……此主昏于上，可取一也。别部同罗、仆骨、回纥、延陀之属，皆自立君长，……此众叛于下，可取二也。突利被疑，……欲谷丧师（欲谷设为薛延陀、回纥等击败），无托足之地，此兵挫将败，可取三也。北方霜旱，廪粮乏绝，可取四也。颉利疏突厥，亲诸胡，……可取五也。华人在北，……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可取六也。"⑫反攻东突厥的条件成熟了。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唐太宗命并州都督李世勣为通

漠道⑬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与李道宗（大同道）、卫孝节（恒安道）等分道大举出击东突厥，计六总管兵力十余万皆受李靖⑭节度。一时捷报频传，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突利可汗入朝，突厥郁射设率部降唐。贞观四年（630）正月，李靖率三千精骑由马邑（今山西朔县）突抵恶阳岭（在定襄南）。驻扎定襄（今内蒙古清水河县）的颉利可汗不意唐军猝至，大惊曰："唐不倾国而来，靖何敢孤军至此！"军心惶恐，一日数惊。李靖乘机夜袭定襄，大破突厥，夺取定襄，俘获隋炀帝萧后及炀帝孙杨政道。颉利狼狈逃循。捷报传来，太宗大喜，称赞李靖"以骑三千，蹀血虏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辈，足澡吾渭水之耻矣！"⑮颉利撤军往碛口，途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李世勣军出云中（今山西大同），于白道设伏，大败突厥，其酋长率部落五万投降。颉利逃于铁山（在阴山北），余众尚数万，遣使谢罪请和，愿举国内附，身自入朝。颉利卑辞求和，实乃缓兵之计，欲俟草青马肥，逃往漠北，伺机反扑。唐太宗遣唐俭等前往慰抚。二月李靖、李世勣已会师白道，皆以为如颉利逃往漠北，则鞭长莫及，必为后患，乘双方言和颉利放松戒备，攻其不备，可不战而擒。于是李靖选精骑一万，携二十日粮，自白道出发，李世勣继其后。军至阴山俘突厥千余帐，李靖督兵疾进。颉利见唐使，大喜，果放松戒备。李靖使苏定方率二百骑为先锋，乘雾进至去牙帐七里，突厥始发觉，颉利惊遁，部众溃败。李靖大获全胜，斩首万余级，俘男女十余万，获杂畜数十万，杀颉利可汗妻隋义成公主。颉利率万余人欲退往漠北，李世勣早已屯兵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切断退路，

其大酋长等率众降，世勣俘五万余口而还。自阴山至大漠尽为唐有。三月，颉利西逃，往依沙钵罗设，将奔吐谷浑。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突至沙钵罗营，俘颉利送京师，沙钵罗设举众降唐，漠南之地遂空。东突厥既亡，唐朝声威远播，薛延陀、回纥、仆固等"西北诸蕃，咸请上尊号为天可汗"，自是太宗赐西北君长玺书，皆称天可汗，唐朝皇帝成了这一带部落民族之最高首领。

东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余众约十万口降附唐朝。如何安置，群臣意见分歧，方案有三，其一主张把突厥降众全部迁徙于黄河以南兖州（今属山东）、豫州（治今河南汝南）一带，"分其种落，散居州县，教之耕织，可以化胡虏为农民，永空塞北之地"⑯。其二以魏征为代表，主张对突厥降众"宜纵之使还故土"不可徙之中原，因其"弱则请服，强则叛乱"，降众近十万，数年之后蕃衍生息，必成心腹之患。晋初诸胡杂居中原渐成乱阶可为明鉴。纵还故土以后，各部册立君长，互不臣属，"假之王侯之号，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权弱势分，易为羁制，可使常为藩臣，永保边塞"⑰。其三以温彦博为代表，主张"准（按照）汉建武（光武帝年号 25－26）时，置降匈奴于五原（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北）塞下，全其部落，得为捍蔽，又不离其土俗，因而抚之，一则实空虚之地，二则示无猜之心"⑱。唐太宗用温彦博策，将突厥降众按其原来部落分别安置于塞内，置于唐王朝直接管辖之下。在东起幽州（治今北京城西南）西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的广大地区，分突利原统辖区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原统辖区置北开、丰、北宁、北抚、北安等六州，分为左右二部，左置定襄都督府，

右置云中都督府，五月以突利为顺州都督，使率部落还蕃。并以阿史那思摩为北开州都督，使统颉利旧众。并陆续任命史大奈、阿史那苏尼失、史善应、康苏等分别为丰、北宁、北抚、北安等州都督。“酋豪首领至者皆拜将军，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⑲。“其入居京师者近万家”。

东突厥前汗国后期可汗世系表

①启民可汗（染干）
妻隋安义、义成公主

- ②始毕可汗（咄吉世）——突利可汗（体钵苾）
  仍妻隋义成公主
- ③处罗可汗（先为俟利弗设）——阿那社尔
- ④颉利可汗（咄苾）
  仍妻隋义成公主
- 苏尼失————阿史那忠

⑤思摩

岑仲勉《隋唐史》：贞观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之子弟阴结部落四十人，夜袭御营。帝乃决定还其部落于河北，立颉利族人阿史那思摩为可汗，使率众渡河。

注　释

①《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②《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

③《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④《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⑤⑥《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⑦有的书上谓豳州治所在今甘肃宁县，实则治今甘肃宁县的豳州唐初已改为宁州。这里的豳州为西魏废帝三年改南豳州置。治所在白土(今陕西彬县西南，隋初移今彬县)，隋大业二年并入宁州。唐武德元年复置。

⑧《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⑨指焚香盟誓，结为兄弟的情谊。

⑩《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⑪《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⑫《新唐书·张公谨传》。

⑬《旧唐书》《突厥传》及两《唐书》《李勣传》，均作“通漠道”，而《通典》及《资治通鉴》误作“通汉道”，今从前者。

⑭李靖（571－649），唐初军事家。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精熟兵法，为其舅隋朝大将韩擒虎所称道。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常抚之曰：“可与言将帅之略者，独此子耳！”隋末任马邑郡丞，后归唐属秦王麾下，屡立战功。高祖时任行军总管率军从李孝恭平萧铣、取得岭南地区，任岭南道抚慰大使，参与镇压辅公祏起义军。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著有《李卫公兵法》。

⑮《新唐书·李靖传》。

⑯⑰《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⑱《贞观政要》卷九《安边》。

⑲《通典》卷一九七《边防典》《突厥》上。

隋唐五代

唐灭薛延陀

隋末唐初，北方强大民族除突厥外，当推铁勒。突厥盛时，铁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散居漠北，诸部中以薛延陀为最强。故薛延陀为“铁勒之别部”①，其可汗姓壹利咄氏②。西突厥方强，薛延陀和铁勒诸部皆臣属之，回纥等六部东属始毕可汗。西突厥势衰，薛延陀酋长夷男率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等相继叛之，大破其欲谷设率领的十万骑兵。贞观二年（628），突厥北边诸姓多叛颉利可汗归薛延陀，共推夷男为可汗。唐太宗采远交近攻之策，联络薛延陀孤立东突厥，遣使间道持册书，拜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并赐以鼓纛。夷男遣使入贡，建牙于郁督军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的东支，或作于都斤山、乌德鞬山）下，疆域“东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碛，北至俱伦水，回纥、拔野古、阿跌、同罗、仆骨、霫诸部皆属焉”③。贞观四年（630）东突厥灭亡，薛延陀乘“朔塞空虚”，尽据“古匈奴之故地，

胜兵二十万”④，取代突厥，成为唐朝北方最强大的势力。唐在北方改为利用突厥降众以抵御薛延陀的策略。

唐太宗恐薛延陀强盛难制，利用夷男立其二子拔酌、颉利苾分主南北二部的机会，于贞观十二年（638）遣使册其二子皆为小可汗各赐鼓纛，外示优崇，实分其势。

贞观十三年(639)诏以右武侯大将军、北开州都督⑤、怀化郡王李思摩(即统颉利旧众的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使其率安置诸州之突厥北渡黄河，还其旧部，以便世作藩屏，长保边塞。事虽与突利弟结社率阴结旧部夜犯行宫有关，但主要原因是为让突厥北迁以抵御薛延陀的进扰。突厥畏薛延陀，不肯出塞，太宗遣使薛延陀玺书说：“尔在碛北，突厥在碛南，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其逾分故相抄掠，我则发兵各问其罪。”⑥突厥始渡黄河，建牙于河北，有户三万，胜兵四万，马九万匹。夷男对此深感不悦，唐朝同薛延陀开始不和。

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巡幸洛阳，准备东封泰山。薛延陀真珠可汗估计天子封泰山，士马从行，边境必将空虚，命其子大度设发同罗、仆骨、回纥、靺鞨、霫诸部兵二十万，南渡大漠进攻突厥，屯兵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突厥俟利苾可汗率部落入长城保朔州（今山西朔县），遣使告急。十一月唐太宗命李世勣、张俭、李大亮、张世贵、李袭誉等发兵十余万，东起营州（治今辽宁朝阳）西至凉州（治今甘肃武威）五道出兵反击薛延陀。薛延陀越过大漠，行军数千里，人马疲困，突厥又烧割秋草，致使马啃林木枝皮略尽。十二月，大度设率三万骑逼长城，李世勣引唐兵至，尘埃涨天，大度设惧而北走。李世勣选部下骑兵及突厥精骑六千，追过白道川，至诺真水，双方展开激战。薛延陀万矢齐发，唐战马多

死，世勣命士卒下马冲敌阵，薛延陀兵溃，唐兵纵击，斩首三千余级，俘虏五万余人。大度设率残部奔漠北，正值大雪，薛延陀人畜冻死者十之八九。

贞观十六年（642），薛延陀真珠可汗遣使谢罪、请婚、献马，唐太宗以为，遂其请求，结以婚姻，足可安静三十年，表示："朕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爱一女。"许以新兴公主妻之。贞观十七年，真珠可汗遣使纳币（缔婚之后男家送聘礼给女家），献马五万匹，牛、橐驼万头，羊十万口。太宗征真珠可汗至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亲迎，并将亲赴灵州与其相会。发使三道接受其所献杂畜。薛延陀素无库厩，真珠可汗税诸部羊马以为聘财，往返万里，途经沙漠，死亡将半，失期不至。太宗乘机与其绝婚，停赴灵州，追还三使。褚遂良等群臣力谏不可失信其戎狄，致屯边患。太宗则认为：今我强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击胡骑数万，薛延陀所以献马请婚，实欲假朝廷之声威，以镇服同罗、仆骨等十余部。诸部不敢反抗，亦因其为朝廷所立，今若以女妻之，彼将自恃大国之婿，诸部谁敢不服，助其强大，反而易成边患。今绝其婚，诸部知我弃之，必将起而攻之⑦。

贞观十八年（644），薛延陀数攻突厥，俟利苾不善抚御其众，突厥人皆弃俟利苾南渡黄河，请求安置于胜州（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十二连城）、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之间，太宗许之。俟利苾既失群众，遂轻骑入朝，太宗以之为右武卫将军。

真珠可汗曾请求以其庶长子曳莽为突利失可汗居东方，统铁勒其他诸部；以嫡子拔灼为肆叶护可汗，居西方，统薛延陀本部。太宗许之以分其势。贞观十九年（645），真珠可汗死，

二子不和，拔灼杀曳莽，自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多弥可汗乘太宗亲征高丽，引兵十万攻河南，唐军诱其深入，至夏州境，大破之，追奔六百余里而还。多弥复发兵攻夏州，贞观二十年（646）正月，唐军再败薛延陀“虏其众数万”⑧，多弥可汗轻骑遁走，部内骚然，国中震恐。多弥对部下猜忌无恩，国人不附；多所诛杀，人不自安。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共击之，多弥大败。六月，太宗命李道宗、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契苾何力、薛万彻及张俭等率部分道并进，大举进攻薛延陀。薛延陀诸部大乱，多弥引数千骑遁走，为回纥所杀。诸酋长互相攻击，争遣使降唐。薛延陀余众犹存七万余口，西归故地，共立真珠可汗兄子咄摩支为伊特勿失可汗。未几去可汗号，遣使奉表于唐，请居郁督军山之北。太宗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前往安集，又恐其终为漠北之患，又遣李世勣与铁勒诸部共图之。李世勣至郁都军山，纵兵追击，前后斩五千余级，虏男女三万余人。咄摩支降唐，至京师，拜右武卫大将军，薛延陀至此宣告最后灭亡。

李道宗、薛万彻分别遣使招谕铁勒诸部，太宗亦亲往灵州，行抵泾阳（今甘肃平凉西北），铁勒十一部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等各遣使入贡，并请于各部置官以统辖之。九月，太宗至灵州，铁勒各部俟斤遣使至灵州者数千人，皆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太宗诗序其事曰：“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⑨并勒石于灵州。至是“北荒悉平”⑩。

贞观二十一年（647）正月，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龟灵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

州，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是为六府七州，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诸酋长奏称：“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⑩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⑪太宗皆许之。至此北方各族同唐朝的关系大为缓和，经济文化交流更为密切。四月置燕然都护府，统瀚海等六府、皋兰等七州。接着下令访求隋末以来，为戎狄所虏掠的边民，遣使赎还本籍。室韦、乌罗护、靺鞨三部人为薛延陀所掠者，亦令赎还。高宗龙朔三年（663）二月，徙燕然都护府于回纥，更名瀚海都护；徙高宗永徽元年（650）所置瀚海都护于云中古城（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更名云中都护。以大漠为界，漠北州府皆隶于瀚海都护府，漠南皆隶云中都护府。高宗总章二年（669）八月，改瀚海都护府为安北都护府。

注　释

①《通典》一九九《边防典十五·薛延陀》。

②《册府元龟》九五六《外臣部·种族》。

③《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④《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

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考异曰：“《旧传》云为化州都督，按化州为突利故地，安得云统颉利部落也。”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三年。

⑦《通典》一九九《边防典十五·薛延陀》。

⑧《旧唐书》一九九下《铁勒传》。《通典》作“二千余人”。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年。

⑩《旧唐书》三《太宗纪》。

⑪《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隋唐五代

吐谷浑附唐

吐谷浑为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徒河之寿山（在今辽宁义县东北），西晋末（公元四世纪初），其首领吐谷浑率所部西迁至今甘肃青海间。至其孙叶延，始以吐谷浑为姓氏。南北朝时先后属宋、齐、北魏；北周时其王慕容夸吕始称可汗，建都于伏俟城（故址在今青海省青海湖西岸布哈河河口附近），“有地方数千里”①。隋文帝时，吐谷浑可汗世伏遣使奉表称藩，文帝以光化公主妻之。隋炀帝将通西域，因吐谷浑阻遏商路，出兵大破之。其可汗伏允率数千骑投奔党项，吐谷浑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末，伏允乘隋朝举国混乱，尽复其故地。

唐初，高祖遣李安远“使于吐谷浑，与敦和好，于是吐谷浑主伏允请与中国互市”②。伏允子慕容顺曾为质于隋，高祖应伏允之请遣其归国。东突厥灭亡后，吐谷浑渐趋强大，成唐朝西南境一大势力。时伏允年迈，由天柱王用事，“数入塞侵盗”，多次侵入河西走廊，威胁唐与西域的交通，并成为唐进攻西突厥的主要障碍。贞观八年（634），伏允扣押唐使赵德

楷，太宗频繁遣使宣谕，不下十余次，仍无所动，六月，遣段志玄、樊兴等为行军总管，率边兵及契苾、党项兵击吐谷浑。十月间大破之。追奔八百余里，直抵去青海湖三十余里处，吐谷浑仓皇驱青海牧马而遁。接着，唐亚将李君羡败吐谷浑军于青海湖南悬水镇，虏羊马二万头而还。同年十二月，以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李道彦、高甑生诸军及突厥、契苾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九年（635）闰四月，李道宗败吐谷浑精骑于库山，伏允轻兵逃入沙漠以避唐军，为阻追兵，沿途悉烧野草。诸将以为途无野草，马已疲瘦，不可深入，不如撤军鄯州（治今青海乐都），待马肥再图进取。侯君集说：吐谷浑于库山"一败之后，鼠逃鸟散，斥候（侦察、候望）亦绝，君臣携离，父子相失，取之易于拾芥，此而不乘，后必悔之"③。李靖从其议。军分两道，分进合击，李靖与薛万均、李大亮由北道，侯君集与李道宗由南道。

侯君集南路军于无人之境行军二千余里，气候恶劣，盛夏降霜。经破逻真谷，其地无水，人咬冰，马吃雪④，艰苦备尝。五月追及伏允于乌海，一战破其主力，俘其名王。继越星宿川至柏海后始与李靖军合。

李靖北路军，先败吐谷浑于曼头山，斩其名王，获大批杂畜，用作军食；再败之于牛心堆；三败之于赤水源。五月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是役薛万均、薛万彻又败天柱王于赤海，是役薛万均、薛万彻轻骑先进，被困重围，兄弟皆中枪，失马步战，从骑死者十之六七。左领军将命契苾何力率数百骑救援，竭力奋击，反败为胜，敌披靡遁去。李大亮败吐谷浑于蜀浑山，俘其名王二十人。李靖督率诸军经积石山河源，至且末，直抵吐谷浑西境。伏允西走突伦川，将奔于阗。

契苾何力选精骑千余，直趋突伦川，薛万均引兵从之，果敢追袭，沙漠无水，将士刺马血而饮。终于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伏允逃遁，俘其妻子。伏允率千余骑逃沙漠中，十余日，众叛亲离，为左右所杀。其嫡子慕容顺本隋朝之甥，为质于隋，久不得归，伏允立别子为太子。及慕容顺为唐高祖遣送归国，意不平而郁郁不乐，至李靖灭伏允，其国人皆怨天柱王；慕容顺顺应众心，斩天柱王，举国降唐，国人立顺为可汗。李靖奏吐谷浑已平，太宗诏复其国，立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又虑其不能悉服众心稳定局势，乃命李大亮率精兵数千为其声援。由于慕容顺曾久质于隋，国人不附，为其部下所杀。幼子诺曷钵立，大臣争权，国中大乱，十二月侯君集等率兵援之。贞观十年（636），以诺曷钵为河源郡王、乌地也拔勤豆可汗。贞观十三年（639）诺曷钵来朝，以宗女为弘化公主妻之。

注　释

①《通典》一九〇《边防典六·吐谷浑》。

②《旧唐书·李安远传》。

③④《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九年。

隋唐五代

唐灭西突厥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西突厥处罗可汗降隋入朝，国人立其叔父（达头可汗之孙）号射匮可汗。射匮开拓疆土，东至金山（今阿尔泰山），西至西海（今里海）。射匮卒，其弟统叶护可汗立。统叶护勇而有谋，"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①。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入贡。武德八年（625），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高祖许之，因颉利可汗作梗，未果。贞观二年（628），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伯父自立为莫贺咄侯屈利俟毗可汗。国人立统叶护之子为乙毗钵罗肆叶护可汗，两可汗相攻不已，皆遣使来唐求援，太宗拒绝他们的请求，劝各守分地，勿再动兵。西域诸国及铁勒皆叛之。肆叶护战胜莫贺咄，被推为大可汗，西突厥暂时统一。贞观六年（632），肆叶护诛杀有功酋长，诸部起而攻之，肆叶护逃康居而死。国人立咄陆可汗为主，咄陆遣使要求内附，愿去

可汗名号。太宗遣使立咄陆为奚利邲咄陆可汗，赐给旗鼓，以示支援。贞观八年（634）咄陆可汗死，弟沙钵罗咥（dié）利失可汗继位，咥利失分西突厥为十部，每部有酋长一人，号为十设，每设赐箭一枝，又号为十箭。再分十箭为左右厢，每厢管五箭。左厢号五咄陆部，置五大啜，居碎叶川（今楚河）以东；右厢号五弩失毕部，置五大俟斤，居碎叶川以西。左右两厢，合称为十姓。咥利失失众心，为其部下击败，西部另立乙毗咄陆可汗。乙毗咄陆与咥利庆大战，杀伤甚众，自是西突厥分裂，伊列水（今伊犁河）以西属乙毗咄陆，以东属咥利失。咥利失死，乙毗沙钵罗叶护可汗继位，龟兹、鄯善、且末、吐火罗、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国皆附之。厥越失、拔悉弥、驳马、结骨、火藝、触木昆等皆附于乙毗咄陆。沙钵罗叶护可汗数遣使入贡，太宗立之为西突厥可汗，并赐旗鼓，未几，为乙毗咄陆擒杀，部众亦为其所并。贞观十六年（624），乙毗咄陆自恃强大，拘留唐使，侵暴西域，攻扰伊州（治今新疆哈密），为郭孝恪所败，又败其处月、处密二部。弩失毕诸部遣使来唐，请废乙毗咄陆，更立可汗，太宗遣使立莫贺咄之子为乙毗射匮可汗。乙毗射匮礼遣过去拘留之唐使，贞观二十年（646）遣使入贡并请婚。太宗许之，使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多聘礼，事未果。乙毗咄陆西奔吐火罗，遭乙毗射匮追击，部落亡散，其所立叶护阿史那贺鲁于贞观二十二年（648）率其余众数千帐降唐，安置于庭州（治金满，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北）莫贺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东）。拜左骁卫将军，立为泥伏沙钵罗叶护，赐以旗鼓，使招讨西突厥之未服者，并置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府，以阿史那贺鲁为瑶池都督。

高宗永徽二年（651），贺鲁羽翼渐丰，闻唐太宗死，拥众西走，击破乙毗射匮可汗合并其部众，建牙于双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布），自号沙钵罗可汗，五咄陆部、五弩失毕部皆归之，胜兵数十万，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入寇庭州，杀略数千人。高宗命大将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发府兵三万及回纥骑兵五万击退沙钵罗军。永徽四年（653），乙毗咄陆可汗死，其子真珠叶护与沙钵罗不和，与五弩失毕共击沙钵罗，斩首千余级。显庆元年（656）以程知节为葱山道行军大总管击西突厥，先败歌逻禄、处月二部，斩首千余级。副总管周智度拔突骑施、处木昆等部斩首三万级。十二月，程知节军至鹰娑川，遇西突厥骑兵二万，鼠尼施等部二万余骑继至，前军总管苏定方率五百骑击之，西突厥大败，追击二十里，杀获千五百，获马及器械不可胜计。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其功，矫称得诏旨，因程知节恃勇轻敌，委王文度为之节制，收军不许深入。苏定方请囚王文度，飞表奏闻，程知节不从，遂班师。王文度以矫诏罪除名，程知节追敌不力免官。显庆二年（657）高宗发大军攻沙钵罗，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等兵自金山进军为北路，以降唐的西突厥酋长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进军，从南路招集旧众，约定两军在双河会师。北路军至金山北，先击破处木昆部，降其万余帐。泥孰部曾为贺鲁所破，至是从唐军共击贺鲁。至曳咥河西，沙钵罗率兵十万拒战。苏定方以万余人击之，大败沙钵罗，追奔三十里，斩获数万人，五弩失毕部悉众来降，沙钵罗率百骑西走。时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陆部闻沙钵罗败，皆降步真。苏定方率部追击沙钵罗，适大雪平地二尺，诸将皆请俟雪晴继进，他说：“虏恃雪

深，谓我不能进，必休息士马，亟追之可及，若缓之，彼遁逃浸远，不可复追。”②于是踏雪昼夜兼行。至双河与南路军会师，距沙钵罗驻地二百里，长驱直入，直至其牙帐。沙钵罗方将出猎，苏定方攻其不备，纵兵击之，斩获数万人。沙钵罗渡伊丽河西逃石国（故地在前苏联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一带），被石国人擒获，交给唐追兵，西突厥亡。阿史那贺鲁被擒，对唐将萧嗣业说：“先帝（指太宗）遇我厚而我负之，今日之败天所怒也。吾闻中国刑人必于市，愿刑我于昭陵（太宗墓）之前，以谢先帝。”③高宗怜之，令免其死。未几贺鲁死，葬于颉利墓侧。

唐分西突厥地置昆陵、濛池二都护府。昆陵都护府居碎叶川东，任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统率五咄陆部。濛池都护府居碎叶川西，任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统率五弩失毕部。各部落酋长，按其部落大小，资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其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西突厥领土全部归唐所有。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分安西都护府置北庭都护府，治所在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率昆陵、濛池两都护府，与安西都护府分掌天山南、北两路。北庭都护府辖境东起今阿尔泰山西达今咸海（一说今里海）。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

②《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二年。

③《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二年。

隋唐五代

唐控西域

唐初西域处于西突厥控制之下，唐朝要战胜西突厥，解除西北边区的威胁，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必须取得西域，即所谓“断匈奴右臂”。贞观二年（62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为其伯父所杀，引起内乱，西域震动。

贞观四年（630）西突厥属地伊吾城（今新疆哈密）主举所属七城内附，并亲自入朝长安。唐太宗于其地置西伊州，作为经营西域的第一个据点。

第二步是灭高昌。隋唐之际，西域主要有高昌、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五个王国，天山以北是西突厥人生活地区。高昌国（今新疆鄯善、吐鲁番两县地）是中原王朝通向天山南北路的出口，古代中西交通的孔道。国王麴氏原为兰州汉人，北魏景明元年（500）被推为王，故高昌在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模仿和学习中原王朝，经济、文化水平较高。“厥（其）土良沃，谷麦岁再熟，有葡萄酒，宜五果，有草名白叠（棉花），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有文字，知书计”①。人口三万七千余，有兵一万余人。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贡，贞观四年（630）高昌王麴文泰入朝长安，太宗对他赠赐甚厚。高昌除贡献拂菻狗、玄狐裘等方物外，“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双方关系协洽。时西域通内地之碛路已于隋末闭塞，西域商贾皆道经高昌，贞观六年（632）焉耆王突骑支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太宗许之。高昌王麴文泰闻之大怒，遣兵大掠焉耆，与西突厥乙毗陆可汗结盟，共同“遏绝西域商贾”，阻隔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对途经高昌的西域入唐贡使，任意拘留，抢夺贡品。并侵扰唐的伊州，扣留逃出西突厥取道高昌南返的汉人，傲慢唐使，挑拨薛延陀与唐的关系。

贞观十三年（639），太宗征麴文泰入朝，文泰称疾不至，于是决定出兵平定高昌。“时公卿近臣，皆以行经沙碛，万里用兵，恐难得志，又界居绝域，纵得之，不可以守，竞以为谏”②。太宗力排众议，十二月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薛万均及契苾何力部步骑数万以击高昌。贞观十四年（640）麴文泰闻唐出兵，谓其国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碛居其二千里，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安能致大军乎！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得有隋之比。今来伐我，发兵多则粮运不给；三万以下吾力能制之。当以逸待劳，坐收其弊。若顿兵城下，不过二十日，食尽必走，然后从而虏之。何足忧也！”但出其意料，唐军很快兵临碛口，麴文泰忧惧不知所为，随即惊吓发病而死，子麴智盛继位。时高昌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③八月唐军至田城（即田地城，今新疆鄯善西南鲁克沁），晓谕不下，攻半日而克，虏男女七千余口。大军直趋其都城高昌城（今新疆吐鲁番东哈拉和卓堡西南），击败

高昌军，直抵其城下。麴智盛力图固守，侯君集命填堑攻城，以撞车毁其城堞，炮车（《旧唐书·西戎传》作抛车，四轮，可抛石）抛石，飞石如雨，又作巢车，高十丈，可俯瞰城中。城中大惧。初，麴文泰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相约，有急相助，如唐兵至，“共为表里”。侯君集出兵，乙毗咄陆遣其叶护屯兵可汗浮图城（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北），声援高昌。及唐军至，可汗畏惧，西走千余里，叶护以城降唐。麴智盛援绝计穷，开门出降。侯君集分兵略地，全部收回三州五县二十二城，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户八千四十六，口三万七千七百。

平定高昌以后，唐太宗欲将其地置为州县。魏征等认为若置为州县，则常需千人镇守，遣兵远戍，轮番更代，往来奔走，徒耗钱财，不能从中得“撮粟尺帛”之利。应援东突厥之例，抚其百姓，存其社稷，立其子孙，长为藩翰。太宗不从，以其地置西州（治所在高昌城），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在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留兵镇守，以可汗浮图城置庭州（治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侯君集虏高昌王及其群臣而还。“于是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④。

第三步是灭焉耆。焉耆国（国都在今新疆焉耆西南四十里城市附近）“东接高昌，西邻龟兹，……其王姓龙氏，名突骑支，胜兵二千余人，常役属于西突厥。其地良沃，多葡萄，颇有鱼盐之利”⑤。有户四千余，从事农牧，贞观初年焉耆王突骑支曾遣使于唐，贡献方物，并获准开通大碛商路，因而遭高昌袭掠。侯君集进攻高昌时，焉耆请为声援，高昌灭后，唐太宗诏以高昌所掠焉耆七百人还焉耆王。高昌既灭，西突厥笼络焉耆，其大臣屈利啜为其弟娶焉耆王突骑支女，与焉耆结为姻

亲，互为唇齿，抗拒唐朝。贞观十八年（644）唐以安西都护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击焉耆。焉耆城四周环水，恃险而不设备，唐军倍道兼行，夜至城下，将士浮水而渡，至晓登城，俘其王突骑支，留王弟栗婆准摄国事而还。不久于其地置焉耆都督府。郭孝恪锁突骑支至洛阳，赦其罪，后太宗葬昭陵，刻突骑支石像列于陵前。

第四步是灭龟兹。龟兹国（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在焉耆之西，"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学胡书及婆罗门书、算计之事，尤重佛法"，"有良马、封牛（一种高背的大牛），饶葡萄酒"。矿产丰富，是我国最早用煤冶铁的地区之一。

唐高祖即位，龟兹遣使来朝，贞观四年（630）又遣使献马，太宗赠赐甚厚，自此每岁朝贡不绝。后臣服于西突厥，唐灭焉耆时，龟兹曾遣兵援焉耆王突骑支，至诃黎布失毕即位，断绝朝贡侵扰邻国，在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控制下，与唐为敌。贞观二十一年（647）十二月以阿史那社尔为昆丘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副总管，与安西都护郭孝恪等率唐兵及铁勒、突厥等兵合十余万击龟兹。贞观二十二年（648）九月，阿史那社尔率军先破西突厥处月、处密二部，十月，引兵自焉耆之西趋龟兹北境，五道进军。龟兹大震，守将多弃城逃走。龟兹王诃利布失毕与其相那利率兵五万拒战，大败，逐北八十里。布失毕走保都城，阿史那社尔攻克之，由安西都护郭孝恪驻守。布失毕轻骑西走，保拨换城（故址即今新疆阿克苏），社尔攻四十日，拔拨换城，擒布失毕。其相那利逃走，引西突厥兵反扑袭都城，郭孝恪守备不严，于激战中阵亡，唐军力战，那利兵败被俘。阿史那社尔乘胜连下五大城，遣使前往各城晓示祸福，"降者七十余城，宣谕威信，莫不欢服"⑥。唐

灭龟兹，西域大震，各族首领纷纷摆脱西突厥的统治，服属于唐，贡使往还，通商不绝。于阗（在今新疆和田一带）王伏阇信闻阿史那社尔灭龟兹，遣使送骆驼三百峰以劳军。西突厥慑于唐军威力，亦“争馈驼马军粮”。阿史那社尔立龟兹王布失比之弟叶护为龟兹王，勒石记功而还。

唐政府为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设置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个军镇，统属于安西都护府，称为“安西四镇”。高宗显庆三年（658）正月，龟兹大将羯猎颠，抗拒唐朝，遣杨胄率兵大破之，擒羯猎颠及其党与，尽诛之。以其地为龟兹都督府，立布失毕之子素稽为龟兹王兼都督。五月，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⑦。

高宗咸亨元年（670）四月，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陷龟兹拨换城，高宗下令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⑧。

高宗调露元年（679），西突厥连合吐蕃侵逼安西，吏部侍郎裴行俭乘送波斯质子归国之便，途经西州，“召四镇诸胡酋长”⑨以畋猎为名倍道西进，猝至西突厥部落，擒其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别帅李遮匐而归，留副使王方翼于安西，使筑碎叶城（故址在前苏联吉尔吉斯北部托克马克附近），“乃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元龟九六七）。此为四镇再置之颠末。与前异者用碎叶代焉耆”⑩。至此，碎叶始为四镇之一。高宗永隆元年（680）七月，吐蕃陷龟兹、疏勒等四镇，“会东突厥离唐独立，北方多难，无暇西顾，武后垂拱二年（686）又弃安西（全唐文一六五员半千文）⑪。武后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命王孝杰、阿史那忠节率兵击吐番，大败之复取四镇，置安西

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⑫。是为四镇之三置。是时四镇仍有碎叶而无焉耆。武后圣历二年（699），西突厥突骑施（突骑施为西突厥十箭之一）首领乌质勒移衙碎叶，其子娑葛继立，攻陷安西，四镇路绝。唐赦其罪，册为十四姓可汗，赐名守忠。守忠死，部将苏禄为酋长。玄宗开元七年（719），册拜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忠顺可汗“请居碎叶，因改以焉耆备四镇（新书二二一上），此为四镇最末次之改制”⑬，已有焉耆而无碎叶。玄宗天宝元年（742）时，“羁縻之州八百，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安西节度抚宁西域，统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治龟兹城，兵二万四千”⑭，显然其时四镇仍有焉耆而无碎叶。

唐德宗贞元六年（790）时，安西北庭为吐蕃所隔，皆假道回鹘始能入奏长安。五月，吐蕃急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鹘需索无厌，与西突厥别部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皆降于吐蕃，节度使杨袭古率二千人奔西州，为回鹘所杀。北庭既陷，安西路绝，莫知存亡，四镇遂废。

注　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传》。

③《册府元龟》卷一〇〇〇《外臣部》《灭亡》。

④《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四年。

⑤《旧唐书》卷一九八《焉耆国传》。

⑥《新唐书·阿史那社尔传》。《资治通鉴》作七百余城，今从《新唐书》。

⑦《资治通鉴》唐高宗显庆三年。

⑧《资治通鉴》唐高宗咸亨元年。

⑨《资治通鉴》唐高宗调露元年原注：四镇：龟兹、毗沙、焉耆、

疏勒四都督府也。

⑩⑪岑仲勉《隋唐史》上册254页，中华书局1982年新1版。

⑫《资治通鉴》唐则天后长寿元年。

⑬岑仲勉《隋唐史》上册259页。

⑭《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元年。

隋唐五代

唐复辽东

唐初，朝鲜半岛仍为高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北部为高丽，南部东为新罗，西为百济。三国皆遣使与唐往来，武德五年（622）唐高祖赐书高丽王高建武，使其遣还隋末战士流亡于高丽者；亦令各州县索流亡之高丽人，遣其归国。高丽遣还中国流亡人口近万人。武德七年（624），唐遣使册高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以百济王扶余璋为带方郡王，新罗王金真平为乐浪郡王。三国互相攻击，唐遣使谕止。时唐朝正巩固内部，无暇他顾，唐高祖无意用兵朝鲜半岛，故说："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①贞观五年（631），唐太宗遣使去高丽，毁高丽用隋战亡士卒尸骸所筑的京观，收葬战亡骸骨并致祭奠。高丽惧，自扶余城（故址在今吉林四平）西南行至海修筑长城一千余里，以资防御。贞观十六年（642）高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②杀高丽大臣百余人，又杀国王高建武，立建武弟之子高藏为王，自任莫离支（犹唐之兵部尚书兼中书令），专擅国政。唐遣使册高丽王高藏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贞观十七年（643）百济攻取新罗四十余城，又与高丽连兵，谋断绝新

罗入朝之路。新罗遣使求援，唐太宗遣相里玄奖出使高丽，谕以各自收兵，勿攻新罗，否则唐将出兵攻讨。泉盖苏文却说："高丽、新罗，怨隙已久。往者隋室相侵，新罗乘衅夺高丽五百里之地，城邑新罗皆据有之。自非反地还城，此兵恐未能已。"③玄奖说："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辽东，战国燕置郡，辖境相当今辽宁大凌河以东，汉魏皆为郡县，十六国后燕末地入高勾丽，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④泉盖苏文不听，唐太宗闻之曰："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⑤时唐已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等亦相继内属，西突厥在西域势力也已大为衰落，西北边疆渐趋稳定，国内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唐太宗开始着手解决辽东问题，转而东向进攻高丽。泉盖苏文违命与新罗求援，使其获得出兵的时机与借口。贞观十八年（644），决定亲征高丽。群臣多上书劝阻，褚遂良建议派二、三猛将率兵四、五万，即可成事，不必亲征。太宗不听，并对侍臣说："辽东本中国之地，隋氏四出师而不能得。朕今东征，欲为中国报子弟之仇，高丽雪君父之耻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余力以取之。"⑥是年七月遣将作大匠阎立德等往洪州（治今江西南昌）、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造船四百艘，以供运输军粮。以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转运粮饷，自河北诸州皆受其节度。命太仆少卿肖锐运河南诸州粮入海，作进攻辽东的准备。前宜州刺史郑元璹，已年老致仕，太宗以其曾从隋炀帝攻高丽，特召而问之。对曰："辽东道远，粮运艰阻，东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简短数语，道出双方的长短和战争的前途。惜太宗对此未作认真考虑，只

说是今非昔比，仍然大举出兵。十一月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江淮等地劲旅四万，长安、洛阳募士三千，战舰五百艘自莱州（今山东掖县）渡海趋平壤；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六万及部分西北胡兵趋辽东，水陆两军并进合击。又令新罗、百济、奚、契丹配合唐军分路击高丽。贞观十九年（645）二月，太宗亲率诸军自洛阳出发至前线督战。四月李世勣军渡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自守。李世勣、李道宗攻克盖牟城（在辽东城，即今辽宁辽阳东北）⑦俘获两万余人，粮十余万石。以其地为盖州。五月，张亮率舟师拔卑沙城（在今辽宁金县东大黑山），获男女八千口，兵抵鸭绿水。唐水陆两军皆获战果。李世勣军至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下，高丽步骑四万救辽东，李世勣、李道宗引兵大败之，斩首千余级。时太宗率兵渡辽水，撤桥以示决心。李世勣攻辽东城，昼夜不息，太宗引精兵与其会师城下，围城数百重，喊声震天地。唐军因风纵火。焚其城楼，火延城中。将士登城，守军力战不敌，辽东遂下。杀万余人，得胜兵万余人，男女四万口，以其城为辽州。继而进军白岩城（在今辽宁辽阳东北），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弩矢，太宗亲为吮血，将军契苾何力中槊，裹伤力战大破高丽兵。六月，白岩城降，得男女万余口，以其城为岩州。

六月，太宗自辽东出发，进军攻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高丽北部耨（nòu）萨（类都督）高延寿、高惠真率高丽、靺鞨兵十五万救安市。直抵城东南八里，依山布阵长四十里。李道宗建议：高丽倾国来战，平壤守备必弱，愿率精兵五千，取平壤覆其根本，余众可不战而降。太宗未用其策，亲自指挥李世勣、长孙无忌等诸军鼓噪并进，奋击安市救兵。适雷

电交作，薛仁贵著奇服，大呼陷阵，所向无敌。大军猛攻，高丽兵大溃，斩首二万余级。高延寿、高惠真率余众三万六千八百人请降。太宗对二人说："东夷少年，跳梁海曲，至于摧坚决胜，故当不及老人，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⑧是役获马五万匹，牛五万头，铁甲一万领，高丽举国震动。薛仁贵以功拜游击将军。太宗写信给太子和留守大臣高士廉等说："朕为将如此，何如？"⑨

太宗以安市城险兵精，守将善战能守，谓李世勣曰："建安（在今辽宁营口东南）兵弱而粮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则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谓'城有所不攻'者也。"⑩李世勣以为军粮皆在辽东，若越安市南攻建安，恐被截断粮道，遂先攻安市。七月，太宗徙营于安市城东岭，八月徙营于安市城南。高丽凭城坚守，人自为战，唐军久攻不下。九月，高延寿、高惠真献计先取乌骨城（在今辽宁丹东西北），其他小城必望风奔溃。然后收其资粮，直取平壤。群臣亦皆赞同，独长孙无忌以为天子亲征，必取万全之策，建安、新城高丽军犹有十万之众，若先攻乌骨，易致腹背受敌，不如先破安市，再取建安，然后长驱直入，始为万全之策。诸军继续猛攻安市，李道宗督众于城东南筑土山，高出城墙数丈，俯视城中。高丽兵出城夺据土山，唐军攻之不能下，李道宗伤足。太宗以辽东气候早寒，草枯水冻，且粮食将尽，大军难于久留，九月下诏班师，渡辽水。十月太宗入临渝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市东山海关），十一月至幽州。是役计拔玄菟、盖牟、辽东、白岩、卑沙等十城，徙辽、盖、岩三州户口七万人入内地，斩首四万级，战士死者近两千人，战马死者十七八。太宗深悔之，叹曰："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并对薛仁贵说："朕诸将皆老，思得新进骁勇者将之，无如卿者，朕不喜得辽东，喜得卿也。"

贞观二十年（646）三月，太宗始还长安。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泉盖苏文虽遣使谢罪，但仍侵攻新罗不止。贞观二十一年（647）太宗将再攻高丽，朝臣建议：高丽善守城，短期难于攻破，不如派遣偏师，轮番攻扰，使其民不得耕种，数年之间，千里萧条人心不固，鸭绿江以北可不战而得。太宗用其议，三月以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万余人，泛海攻高丽。以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三千人与营州都督兵自陆路攻扰。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见高丽困弊，准备明年发大军三十万一举灭高丽。有人以为大军东征，须备经岁之粮，陆路难于运载，必由水运。剑南道（治所在今四川成都）百姓富庶，应令其造舟舰。于是太宗派人于剑南道伐木造舟舰，大者长百尺，宽五十尺。剑南道所属雅、邛、眉三州獠人苦于造船之役，群起反抗，遣张士贵、梁建方率兵二万前往镇压。蜀人苦于造舰之役请纳船庸（一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雇潭州人造船。"州县督迫严急，民至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谷价踊贵，剑外骚然"⑪。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死，战事暂时停止。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高丽与百济、靺鞨连兵，侵新罗北境，攻取三十三城。新罗王遣使求援，高宗遣程名振、苏定方等发兵攻高丽，杀获千余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还。显庆五年（660）百济得高丽支援屡侵新罗，新罗王金春秋上表求救。三月，以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水陆军十万渡海攻百济；以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新罗兵配合作战。八月苏定方破百济兵于熊津江口，杀数千人，余皆溃

走，唐军水陆并进，直指其都城。百济倾国来战，又大败，死万余人，百济王扶余义慈及太子扶余隆逃至北部边境。苏定方围其都城，国王次子扶余泰自立为王，率众固守。太子隆之子逾城投降，百姓皆从之，扶余泰不能禁，唐军登城，扶余泰开城请降，国王、太子及诸城主皆降。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分统其原有五部，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万户，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留刘仁愿等驻守百济，苏定方等转攻高丽。龙朔元年（661）百济人起兵抗唐，立故王子扶余丰为王，收复大部国土，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龙朔二年（662）苏定方久围平壤不下，解围班师，高宗以“平壤军回，一城不可独固”⑫，令刘仁愿、刘仁轨撤往新罗。刘仁轨以为欲灭高丽，必先诛百济以牵制敌军。今平壤既解围班师，熊津又守兵尽撤，百济余烬复燃，高丽何时可灭？刘仁愿、刘仁轨守熊津城不走。龙朔三年（663）高宗遣孙仁师率兵渡海助之。百济王扶余丰引倭国救兵以拒唐军，孙仁师与刘仁愿、刘仁轨合军，遇倭兵于白江口，四战四捷，焚倭船四百艘，烟焰冲天，海水皆赤。百济王丰逃奔高丽，王子等率众降。唐军占领百济全境。联合新罗威胁高丽南方，高丽处于腹背受敌之困境。

乾封元年（666）五月，高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代为莫离之，其弟泉男建、泉男产起而争权。男建自为莫离之，发兵讨男生，男生遣其子献诚到唐求救。六月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庞同善、高侃为行军总管，率兵攻高丽，使泉献诚为响导。泉男生率众与庞同善会合。十二月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水陆诸军总管统归李勣指挥，河北诸州租赋悉送辽

东供军用。乾封二年（667）九月，李勣军攻克新城，泉男建遣兵袭唐营，左武卫将军薛仁贵击破之。高侃进军金山，接战失利，高丽乘胜追击，薛仁贵引兵大破之，斩首五万余级，连克南苏、木底、苍岩三城⑬与泉男生会师。总章元年（668）二月，薛仁贵率三千人攻扶余城，大破之，杀获万余人，遂克扶余城。扶余川中四十余城皆望风降服。九月李勣会诸道军进至鸭绿江，大破高丽守军追奔二百余里，沿途诸城相继逃遁或投降。契苾何力引兵先至平壤城下，李勣大军继至，围平壤月余。高丽王高藏遣泉男产率诸首领九十八人降。泉男建继续抗拒，出战屡败，唐军登城，泉男建自刺不死被擒，高丽全境皆平。计五部，八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余户。置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都护府于平壤以统之，以其有功酋帅为都督、刺史、县令。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⑭，统兵二万驻守。

总章二年（669），高丽民众起兵反唐，令迁高丽民三万八千二百户于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诸州空旷地，留贫弱者使守安东。咸亨元年（670），高丽酋长剑牟岑立高藏外孙安舜为主起兵反唐。以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发兵讨之，安舜奔新罗，此后高侃、李谨行不断用兵高丽。新罗王法敏既纳高丽逃亡民众，又占据百济故地，领导朝鲜半岛人民反抗唐朝。上元元年（674）以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李谨行副之，发兵攻新罗，新罗乃遣使入贡。仪凤元年（676）迁安东都护府于辽东故城，迁熊津都督府于建安故城。仪凤二年（677）以高藏为辽东州都督，封朝鲜王，遣归辽东安辑高丽余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封带方王，遣归安辑百济余众。皆由安东都护府统率。高藏谋叛召还，扶余隆不敢归故地，高丽、百济遂亡，

新罗逐步统一朝鲜半岛。开元二十三年（735）新罗遣使于唐，唐赐以高丽浿水（今大同江）以南地。唐末五代初，朝鲜半岛再分裂为新罗、高丽、后百济，五代后唐时，高丽并新罗灭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②姓泉名盖苏文，旧传作“西部大人”。今从《实录》。

③《旧唐书》卷一九九上《高丽传》。

④⑤《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八年。

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⑦据《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胡注及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1页。另一说：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350页作今辽宁盖平县，《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244页作今辽宁盖县，并注明辖境相当今辽宁盖县、庄河县、岫岩县及营口市部分地区。这样盖牟城不仅跑到了辽东城西南，而且也跑到了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南营城子）西南，已达渤海沿岸。李世隆军于645年四月戊戌自通定镇（在今沈阳西北辽河西岸）渡辽水，副大总管李道宗兵逼新城（今沈阳东北），他们活动于辽东城东北。四月壬子李世勣、李道宗攻盖牟城。在渡辽水后十三天，即越过辽东城、安市城南下至今营口一带去攻盖牟城，无可能也无必要，后说当误。

⑧⑨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

⑪《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

⑫《资治通鉴》唐高宗龙朔二年。

⑬诸城位置参阅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50、51页。

⑭唐代“职官未实授之时，则上冠‘试’、‘摄’、‘权’、‘判’或‘检校’等字样以示别，……中唐后，‘检校’犹之虚衔，用法与初唐不同。”（岑仲勉《隋唐史》下册557页）例如《资治通鉴》6323－6338页

载：661年三月“诏起刘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因功于663年9月“加仁轨六阶正除带方州刺史”。

隋唐五代

实施均田制与租庸调法

均田制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北齐、北周沿袭采用，隋更将其推广至江南地区，经历各朝的发展变化，集中表现于唐朝。

隋文帝开皇二年（582），颁布新令，继续均田①。“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查焉。男女三岁以下为黄，十岁以下小，十七以下为中，十八以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四十亩（《通典》作三十顷）。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即一夫受露田八十亩，一妇受四十亩，奴婢受田数与良人同。奴婢受田者亲王限三百人，逐品递减，八品以下至庶人限六十人。丁牛即壮牛一头受田六十亩，牛数不得多于四头。又每丁受永业田二十亩种桑或麻。齐制奴婢不受永业田），并课树以桑榆及枣。其园宅三口给一亩，奴婢则五口给一亩。……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五品，则为田三顷，六品二顷五十

亩，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又给公廨田，以供公用”②。

农民受田，一夫一妇合计为一百四十亩。其中露田，计口分配以种植谷物，必须还受，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永业田，分给男子以种植桑麻树木，作为世业可传于子孙，不在还受之限，相当于北魏的桑田、北齐的桑田或麻田。按北魏桑田得买卖有余或不足部分，永业田在一定限度内可以买卖。当然，法令规定的农民受田数额，只是受田的最高数额，实际受田都不足。

官吏受田除永业田及其所拥有的奴婢受田外，另有职分田也称“职田”，以其田租收入作为官吏俸禄的一部分。还有公廨田，始于开皇十四年（594），时“台、省、府、寺及诸州皆置公廨钱，收息取给”③。工部尚书苏孝慈以为官民争利，非兴化之道，上表请罢之。“诏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④。拟以公廨田所收地租充作官署办公经费以代替公廨钱的放债扰民。职分田、公廨田只充作在职时的俸禄和办公经费，要更代相付，不准买卖。

按上述规定隋代官吏受田最多的如亲王，计永业田一百顷，职分田五顷，奴婢三百人假定男女各半可受田一百八十顷，合计二百八十五顷，相当于一对普通农民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的二百倍。此外，皇帝还常将大量田宅赐予官僚贵族，官僚贵族并进而掠夺农民的耕地。如隋文帝因杨素平陈有功，“拜（杨）素子玄奖为仪同，赐黄金四十斤……公田百顷，宅一区。……（开皇末年），并赐（杨素）田三十顷，绢万段……素（贪）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碾，并利田宅，以千

百数”⑤。正因官僚地主占地过多并继续掠夺农民的耕地，而封建政府的屯田和营田又占去大量土地，并不是把所有的官田荒地都用以均田进行还受分配，故农民受田不足的情况愈来愈严重，开皇十二年（592），因天下户口日增，关内、河东、河南、河北地区地少人多，衣食不给，“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少又少焉”⑥。均田制施行得很不彻底，但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地兼并和豪族势力的发展。如大贵族宇文述掠夺民田，李圆通“判宇文述田以还民”⑦。杨素的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不法，华州长史荣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⑧。对农民按口受田，狭乡分田虽少，但亦聊胜于无。隋文帝时经济繁荣，均田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诏天下均田，均田情形史籍无载，诏书恐是一纸空文。

唐朝建立之初，承隋末大乱之后，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灾荒遍地，农业凋残。贞观六年（632）魏征谏阻太宗东封泰山时说：“……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⑨就是到高宗显庆二年（657），许州（今河南许昌）、汝州（今河南临汝）一带，还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⑩。为安辑流亡，重新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以巩固封建统治，武德七年（624）四月，沿袭魏、齐、周、隋的均田制，加以修改，颁行了均田令。开元时，再次修改均田令，重予颁行。唐代均田制主要内容如下：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每一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县以籍成于州，

州成于省，户部总而领焉”。（造户籍时，里正责成户主呈送“手实”，报告本户人口、年龄和土地亩数，并保证没有隐漏。计账是依据户籍等编造的，向尚书省报告州县户口及来年要征的课役；征税数目，皆需“书于县门、村坊、与众知之”。——引者注）

“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原注：中男年十八以上者，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凡田分二等，一曰永业，一曰口分。丁之田二为永业，八为口分。凡道士给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凡官户（据《唐六典》六都官郎中员外郎条：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又称官户，再定为杂户，三免为良人。——引者注）受田，减百姓口分之半。凡天下百姓给园宅地者，良口三人以上给一亩，三口加一亩，贱口五人给一亩，五口加一亩，其口分、永业不与焉（原注：若京城及州县郭下园宅，不在此例）。凡应收授之田，皆起十月，毕十二月。凡授田先课后不课，先贫后富，先无后少。凡州县界内所部受田悉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

“凡官人受永业田。亲王一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二品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十一顷（《通典》作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一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原注：其地并于

宽乡请授，亦任隔越请射莅帅，皆许传之子孙，不在此〔?收〕授之限。若未请授而身亡者，子孙不合追请。若袭爵者，祖、父未请地，其子孙减初受封者之半。按《通典》尚有‘其六品以下永业，即听本乡取还公田充，愿于宽乡取者亦听’，则六品以下官，悉有永业田）”⑪。另外，中央和地方官吏还有职分田，以其地租作为俸禄的补充，一品官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各级官府还有公廨田，以其地租作为办公费用。中央官署最高二十六顷，最低二顷；地方官署最高四十顷，最低一顷⑫。

“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所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诸以工商为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半给之，在狭乡者并不给”。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即子孙犯除名者，所承之地亦不追。每亩课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三年种毕。乡土不宜者，任以所宜树充”。

“诸庶人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者，听卖永业田，即流移者亦如之；乐迁就宽乡者，并听卖口分田（原注云：卖充住宅、邸店、碾硙者，虽非乐迁，亦听私卖。）。诸买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依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⑬。

“其赐田欲卖者，亦不在禁限。其五品以上，若勋官永业田，亦并听卖”⑭。

唐代均田办法与前代相比，重要变化如下：

一、受田对象不同。寡妻妾以外的一般妇人、官户以外的

一般奴婢和牛不再受田，而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等新的受田对象。这些变化是由于隋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妇人服役的苛法，唐初妇人既不服役，因而亦不受田。通过隋末农民战争，大量奴婢挣脱原来身份，官僚地主在新办法施行后，既可以受到大量土地，遂取消通过奴婢和牛来受田的办法。又由于寺院经济的发展和商贾占地日多，故增加了僧、尼、道士、女冠和工商业者受田的规定。

二、土地买卖限制放宽。北魏时土地买卖只限于桑田，以后及于麻田的有余或不足部分；北齐时虽有买卖露田者，但在法律上是不允许的；至唐法律允许在几种情况下，口分田亦可买卖。

三、官吏受田办法完备。保证大官僚必为大地主，唐代勋官授与极滥，勋官受田的规定，为中小地主和富裕农民通过获取勋品而合法广占土地开辟了道路，从而促进了大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唐代均田制实施的情况，由于唐政府的屯田、营田、牧地以及赏赐贵族勋臣，占用了大量土地，地主阶级拥有的土地为数亦多，因此，用于均田的土地是有限的。法令规定的农民受田数额，实即占田的最高限额，而实际受田普遍不足。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幸灵口（在今陕西临潼），村落逼侧（狭仄），问其受田，丁三十亩。……诏雍州（长安）录尤少田者，移之于宽乡"⑮。唐代均田制实施的情况，不仅见之于文献记载，而且有出土的唐代文书可以印证。从已发现的唐代敦煌县户籍残卷中，可看到每户均载明户主、男女人口、并注明丁、中、小、黄、丁妻或寡妻妾；还载明应受田、已受田，其中口分、永业、园宅各若干；并注明课户、不课户。这些与法

令规定都是一致的，是唐代曾行均田的确证。而这些户籍残卷中，一般受田都不足额。据对记载完整的五十五户的统计，其中两户老男不课户，完全没有受田；两户有官勋，勋田不计，受田都超过限额；一户因有买田，受田足额；除这些特殊情况外，其余五十户受田皆不足额，平均每丁为三十二亩一分。各户已受田数与应受田数相差甚大。农民受田不足，是均田制下普遍存在的现象。虽如此，唐代前期均田令的实施仍有一定成效。在隋末农民战争中，很多地主死亡逃散，他们遗留的田地，一部分转入农民手中，一部分成为国家控制的荒田。唐代均田令承认农民占有这些田地的合法性。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可以依令向国家请受荒田，开垦耕种，均田令中包含了鼓励垦荒的规定，它的推行使不少荒地得到开垦，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唐政府通过均田，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承担赋役，以保证和增加封建国家的收入，巩固了帝国的统治基础。唐前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全国户口的持续上升，以及唐王朝国力的日益强盛，与均田制的推行不无关系。

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初定租庸调法，武德七年（624）随均田令的颁行再度申明。唐代租庸调法是从均田制实施后租调力役制发展完备而来，它是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制度。隋代租调力役制规定："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调以绢絁，麻土以布。绢絁以疋（四丈），加绵三两。布以端（五丈），加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各半之。本受地者，皆不课。""仍依周制，役丁为十二番（每岁一月），近则六番(每岁二月)"。"开皇三年（583）正月，帝入新宫，初令军人以二十一成丁，减十二番为每岁二十日役，减调绢一匹为二

丈"。开皇十年（590）"以宇内无事，益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防"⑯。以上是隋炀帝横征暴敛破坏课役法之前，隋代租调力役制的主要内容。

唐初承袭隋的租调力役制，发展成租庸调法。《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说："凡赋役之制有四：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课户每丁租粟二石。其调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据《唐律疏议》二及《陆宣公集》二二为岁输绫或绢或絁二丈），布加五分之一（据《唐律疏议》引赋役令及《陆宣公集》二二作布加四分之一，应从后者⑰），输绫绢絁者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皆书印焉。凡丁岁役二旬（原注：有闰之年加二日），无事则收其庸，每日三尺（原注：布加五分之一。按《通典》卷六说："布则三尺七寸五分。"折算亦应为布加四分之一）。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原注：通正役并不得过五十日）。"

"凡水旱虫霜为灾害，则有分数。十分损四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若桑麻损尽者各免调，若已役已输者听免其来年。凡丁新附于籍账者，春附则课役并征，夏附则免课从役，秋附则课役俱免"。"凡丁户皆有优复蠲免之制（原注：诸皇宗籍属宗正者，及诸亲王五品以上父祖兄弟子孙及诸色杂有职掌人），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老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

唐代上述赋役办法，唐人陆贽说它是："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⑱故称为租庸调法。第四项杂徭亦称色役，名目很多，如守陵墓人、营墓夫、类似近世胥役的防阁、白直等，不是唐代赋役的重要部分。四项之外还有杂征，如按户等高下所征收的户税。武德年间按资产多少，分户为三

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后不断加税，大历四年(769)上上户四千，以下每等减五百，至下下户为五百。另外还有按亩征税的地税。贞观初戴胄建议按隋义仓办法，王公以下每亩交税二升，贮备凶年，不得杂用，后以国用不继，挪借他用了。

“租庸调之制，以人丁为本”⑲，即以丁为征收单位。从均田制的每丁给田一顷出发，只问丁身，不问财产，规定每丁应纳田租、户调和役庸。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受田后，纳租调并服役，成丁后服兵役。

隋朝的“免役收庸”或“输庸停防”只限于五十岁至六十岁之间，唐朝把“输庸代役”制度化，适用于一般力役。如纳绢六丈或布七丈五尺，即可代替全年二十天的力役，加上服役往返时间，用来从事自己耕地的经营，必然会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徭役征调局部转向实物征敛，避免劳动力与土地脱离，对农业劳动力的相对稳定，对生产力的发展，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注 释

①《册府元龟》卷四八七《赋税》：“(开皇）二年，颁新令。”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作“公元581年（开皇元年)”，今取前者。

②《隋书》卷二四《食货志》。

③《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四年。

④《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⑤《隋书》卷四八《杨素传》。

⑥《资治通鉴》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⑦《隋书》卷六四《李圆通传》。

⑧《隋书》卷六六《荣毗传》。

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⑩《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⑪《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关于六品以下官员永业田，汪篯《隋唐史论稿》50页、55页有如下论述可参阅："至于六品以下的官员，则从唐田令和唐律疏议来看，他们的应受田是和一般人同样的"。"唐制六品以下的职事、散官，虽无官人永业田，却可以通过叙勋或赐勋得受勋田。""《新唐书》五五《食货志》有'六品、七品二顷五十亩，八品、九品二顷'的记录，与《唐律疏议》、《唐六典》、《通典》等较为原始的资料俱不合，不知其所据。今不取"。

⑫《通典》卷三五《职官职田公廨田》。

⑬《通典》卷二《食货典》《田制》下。

⑭《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

⑮《册府元龟》卷一O五《惠民》。

⑯《隋书》卷二四《食货志》。《隋书》卷二《高祖纪》下作"人年五十，免役收庸"。

⑰隋制丁男一床，桑土调绢絁一匹（四丈）或麻土布一端（五丈）。开皇三年（583）正月减调绢一匹为二丈，正好减半；布一端亦当减为二丈五尺，虽史文漏载，但以理推之，布一端不应减为二丈四尺，《唐律疏议》作"布加四分之一"为是。

⑱陆贽《陆宣公集》卷二二《均节赋税恤百姓》。

⑲《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

隋唐五代

恢复府兵制度

隋唐沿袭西魏北周的府兵制，屡加改革，至唐而益形完备。

西魏北周的府兵，另立军籍，家属随营转移，编为军户，住于军坊，不属州县管辖。隋文帝开皇十年（590）颁发诏书说："隋末丧乱，宇县（犹天下）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完整房间），地罕包桑（根深柢固的桑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账，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①按照这一规定，军人除另有军籍，其军役范围内的任务和职责，仍归军府管辖外，还同自己的家属列入州县户籍，与民户一样依照均田法令请占土地。军人平时耕作，每年有一定时间轮番宿卫，战时出征。军人皆免租调役，从征时自备资粮，。其家属仍纳租税。这是府兵制的重大改革，一变过去兵民分治而为兵民合治，完成了"兵农合一"的工作，使府兵制和均田制紧密结合，成为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军事制度。取消军户后，府兵可从一般民户中简

选，不局限于过去的世袭军户和部分编户，扩大了兵源，减少了财政负担，对封建统治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府兵的统率，隋沿袭魏、周十二大将军之遗制，设立十二卫，即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十二卫各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十二大将军为府县最高将领，总隶于皇帝。各卫下统军府，为府兵基本组织单位，文帝时称骠骑府，每府置骠骑、车骑二将军。炀帝时改骠骑府为鹰扬府，改骠骑将军为鹰扬郎将，车骑将军为鹰扬副郎将。集中军事统率权于封建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初沿袭隋的府兵制。武德初，始置军府，由骠骑、车骑两将军府统领。分关中为万年、长安、富平等十二道，每道皆置军府。武德二年（619），初置十二军，如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等，分统关内诸府。每军将、副各一人，“督以耕战之务。由是士马精强，所向无敌”②。武德六年（623），以天下既定，废十二军，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武德八年（625），因突厥入扰复置十二军，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坊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③。唐府兵制一开始即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贞观十年（636）唐太宗改定府兵制，改府兵基本组织单位名折冲府，改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分别任折冲府长官、副长官。所统府兵名卫士。折冲府下为团，团有校尉，统卫士二百人；团下为旅，有旅帅，统卫士一百人；旅下为队，有队正，统卫士五十人；队下为火，有火长，统卫士十人。折冲府分三等，上府六团，卫士一千二百人；中府五团，卫士一千人；下府四团，卫士八百人。《新唐书》卷五O《兵志》载：“凡天下

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总兵力六十八万人。唐代军府数旧史记载颇不一致，盖因军府有废置，诸书各据一时言之，故有异同。从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十道折冲府数比较表，可看出折冲府分布情况。

道名	关内	河东	河南	河北	陇右	山南	剑南	淮南	岭南	江南	总计
军府数	288	164	74	46	37	14	13	10	6	5	657
占总数百分比	43.9	24.9	11.2	7	5.6	2.13	1.98	1.52	0.91	0.76	100

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置府二百六十一，拥兵二十六万，约占全国军府与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使唐政府能随时调集重兵，保持强大的国防与镇压力量，形成“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④的“居重驭轻”的形势。

全国各地折冲府主要分统于中央十二卫，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另加不统府兵的左右监门卫、左右千牛卫是为十六卫）。其中左右卫各统六十府，其余诸卫各统五十府或四十府。少量军府归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各五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各五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各三府。十二卫各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卫大将军是府兵最高军官，直接隶于皇帝。凡征发府兵十人十马以上，皆由兵部奉皇帝敕令颁发铜鱼符或木契，下至州、府，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对勘相合，始得发兵。若全府征发，折冲都尉以下皆行，若部分征发，则由果毅都尉领队；再少则由别将领队。调兵大权握于中央，地方长官、折冲都尉无权征调，卫大将军、兵部尚书亦不得专决。“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⑤。贞观年间，边将连续领兵，一般亦“三年一易，收

其兵权”⑥。以防大将拥兵擅权。

府兵的来源是从军府所在地均田制下的农民中征点，每三年征点一次。递补缺额。服兵役的年龄是“二十一入幕，六十出军”⑦。征点的标准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⑧折冲府平时主要任务是训练士兵，“居常则皆习射”⑨，每年冬季集中校阅。府兵任务有二：一为轮流到京城宿卫，称为“番上”。“番上”的办法是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以内为五番，五百里以外至一千里为七番，一千里以外至一千五百里为八番，一千五百里以外至二千里为十番，二千里以外为十二番，皆一月上（一次宿卫一个月）。五番即将一府应参加宿卫的卫士分为五组，每组宿卫一月后轮换，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两次多。十二番即分为十二组轮流，一年之内每组轮到一次。（上据《新唐书·兵志》。《唐六典》则谓五百里内五番，五百里外七番，一千里外八番，各一月上。二千里外九番，倍其月上。两说不尽一致，但离京师愈近，轮到宿卫的次数愈多，距离愈远，次数愈少则是一致的）府兵另一任务是戍防出征，戍防是边防重镇需较大兵力，本地兵力不足，从各府抽调卫士到边境戍守。府兵战时出征，与地方兵或边防兵结合，常成为中坚力量，如贞观四年（630）二月李靖破突厥于阴山之役，即以匡道折冲府苏定方的二百骑兵为前锋，直到距牙帐七里，颉利才发觉。贞观十五年（641）在唐同吐谷浑的战争中，“果毅都尉席君买帅精骑百二十袭击吐谷浑丞相宣王，破之，斩其兄弟三人”⑩。

府兵除执行番上宿卫和戍防出征任务外，平时在家乡进行农业生产，农闲时受军事训练，亦即三时农耕，一时教战，进一步做到“兵农合一”。府兵服役期间免本身租调，但“其家

不免征徭”⑪。府兵除战马、甲、弩、矛等物以外，要自备资粮。自备物品包括：“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䦆（大锄）、凿、碓（舂具）、筐、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载矢器）、横刀、砺石、大觿（xí解结锥）、毡帽、毡装、行縢（téng裹腿）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装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⑫可见府兵负担极为沉重，所免租调远远不能抵偿。唐初，府兵立功勋可以获得勋品、勋田，可以升官，战争中还可分得俘虏、财物，因此“富室强丁，尽从戎旅”，府兵征点原则上是取六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地主、富裕农民，他们一般都积极从军，借以升官致富，并不回避点兵。后来由于战争频繁，府兵超期服役，高宗显庆五年（660）以后，府兵优厚待遇取消，战死无人过问，更无“敕使吊祭，追赠官爵”的荣宠。正如高宗麟德元年（664）检校熊津都督刘仁轨上书所说：“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其壮而富者，行钱参逐（行贿于官吏的随从人员），皆亡匿得免；贫者身虽老弱，被发即行。”兵役负担全落于贫苦农民身上。

1968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村一座唐墓中，发现唐代《西州营名籍》。它是开元三年（715）的西州（治所在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府兵花名册，上写“西州营”四十名“火长”和随从他们的“火内人”（士兵）的姓名。每行写火长某某下注火内人某某，下边有三条横短线，是本人的“节记”（手指节纹的标记），等于签字划押。有的火长名下不注“火内人”只注“自身”。名籍上写着他们共牵押二百四十驮马。名

籍一式三份，其中一份注明为给陇西县的文牒。这是由西州所辖折冲府征调兵马组成的一支运输部队，调发目的地是甘肃陇西县。《西州营名籍》的出土，说明唐代西北地区也实行过府兵制。

由于府兵制实行“兵农合一”，兵士自备资粮，这就保证了兵源。减少了封建国家的开支，巩固了封建国家的武装力量。军权集中于中央，军府集中于关内，加强了中央的力量，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精神。分番抽兵法，对生产的影响不大，民众服兵役的劳苦也比较均平，故在贞观时期，府兵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兵制。唐初军事力量强大，战争连续获胜，府兵制是其原因之一。

随着均田制的逐渐破坏，农民受田不足的现象愈益严重，府兵制失去了存在的物质基础，陷于贫困地位的农民，无力承受兵役的沉重负担，番上宿卫和戍边出征的府兵，不仅“番役更代，多不以时”⑬，而且备受歧视虐待，“府兵入宿卫者，谓之侍官，言其为天子侍卫也。其后本卫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隶；……其戍边者，又多为边将苦使，利其死而没其财⑭。军府州的农民为避兵役，纷纷迁移至未设军府的州县，甚至“有翦手足以避府兵者”，致使府兵兵源枯竭。玄宗天宝八年(749)，折冲府已无兵可交，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停止对府兵的征发，废除府兵制，以募兵制代之。

注 释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③《新唐书》卷五○《兵志》。

④《唐会要》卷七二《府名》。

⑤《新唐书》卷五O《兵志》。

⑥《困学纪闻》卷一四引《家学要录》。

⑦《新唐书》卷五O《兵志》。

⑧《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

⑨《旧唐书》卷四三《职官志》。

⑩《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⑪《唐会要》卷七二《府兵》。

⑫《新唐书》卷五O《兵志》。

⑬《新唐书》卷五O《兵制》。

⑭《资治通鉴》唐玄宗天宝八年。

隋唐五代

"贞观之治"

唐高祖李渊的太穆皇后窦氏，生四子，即建成、世民、玄霸、元吉。按照皇位继承嫡长制，应由建成继承皇位。世民继位为皇帝，是经过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激烈斗争和"蹀血禁门"的宫廷政变而实现的。

李渊对建成、世民、元吉（玄霸早年夭折）的安排，完全按照封建伦理原则，以先兄后弟为序：617年太原起兵后，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率左三军；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率右三军；李元吉为姑臧公、太原太守，留守晋阳宫。至攻克长安，李渊进封唐王，以建成为唐国世子，世民为秦公，元吉为齐公。618年李渊称帝以后，根据嫡长子继承制，立建成为皇太子，封世民为秦王，元吉为齐王。时建成与世民战功略同，唐帝国又面临统一战争的急迫形势，薛举已进攻泾州，世民为元帅，领兵出征，建成留居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军国大事，统治集团内部尚属团结。

随着统一战争的节节胜利，李世民立下赫赫战功。武德元年（618）十一月，一战而降薛仁杲，"得其精兵万余人，男女

五万口”①。李渊派李密迎世民于豳州，这个“自恃智略功名，见上（李渊）犹有傲色”的李密，“及见世民，不觉惊服，私谓殷开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祸乱乎！’”②第一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李世民的威望。这对太子建成的地位不能不构成一种威胁。武德二年九月，“太子……疾秦王世民功高，颇相猜忌……信谗慝，疏骨肉”，李渊任命的辅导建成的太子詹事李纲，屡谏不听，“郁郁不得志，是岁，固称老病辞职”③。因妒忌开始了勾心斗角的活动。

时刘武周进逼并州，留守晋阳宫的齐王元吉弃“强兵十万，食支十年，兴王之基”④的晋阳城逃回长安。刘武周据并州。继续进攻，关中大震。李世民再次领兵出征。武德三年李世民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余里，二日不食，三日不解甲，一日八战，大破刘武周部将宋金刚，俘斩数万人。刘武周闻讯，弃并州走突厥，所占州县全部收复。这一战役更加提高了李世民的声望。

平定刘武周三个月后，李世民又奉诏督师讨伐王世充，指挥历时十个月的唐统一过程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洛阳王世充据守坚城，河北窦建德拥有巩固的后方，发兵十余万西救洛阳。面对王、窦联兵，部将意见分歧，李世民当机立断，分兵围洛阳，扼虎牢，俘窦建德，降王世充，消灭了两大势力，而他们是“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势”⑤的重要势力。至此，唐初统一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随着战功的显赫和自己力量的壮大，李世民逐渐产生了夺取皇位继承权的政治野心。李渊起兵时，著名道士王远知用密传符命的方法投靠李渊，说李渊将承天受命做皇帝。武德四年李世民在削平王世充、窦建德回师长安时，曾与秦府记室房玄

龄“微服”拜访王远知，远知迎接说：“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世民以实对，远知又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俨然又是一个李渊。世民对此一直牢记在心，“眷言风范，无忘寤寐”⑥。说明至少在这个时候世民已产生夺取皇太子地位的野心。也颇有人拥护他为皇太子，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中，以王远知为首的道教徒就是拥护他的。

武德四年七月，李世民凯旋长安，世民被黄金甲、齐王元吉、李世勣等二十五将从其后，铁骑万匹，甲士三万人⑦，前后军乐齐奏，献俘于太庙，真是荣耀已极。当年十月，李渊以秦王建立殊勋，“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以世民为天策上将……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⑧。世民又开“文学馆”引进四方文士，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计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颜相时、苏勖、于志宁、苏世长、薛收、李守素、陆德明、孔颖达、盖文达、许敬宗等十八人，号称十八学士。这时的秦王是威震四海，人心所向，秦王府谋臣猛将济济一堂。夺取皇位继承权的图谋更加强烈，条件也更为具备了。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有辅佐帝王创业治国的才能）。若大王守藩端拱（安分守己做藩王严肃不苟地朝见天子），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夺取皇位），非此人莫可。”⑨“世民惊曰：‘微公言，几失之。’即奏为府属”⑩。从这一段谈话可以看出秦王府的政治动向。所以支持太子的大臣封德彝指出：“秦王恃有大勋，不服居太子之下。”⑪

上述情况严重威胁着太子建成的地位，所以“建成内不自安，乃与元吉协谋，共倾世民，各引树党友”⑫。东宫与齐王

府的联合，虽然加强了东宫的力量，使秦王府处于不利地位，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形势。这一点东宫的谋士们看得很清楚。当武德五年十一月，刘黑闼第二次起兵时，太子中允⑬王珪、洗马⑭魏征建议太子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殿下但以年长位居东宫，无大功以镇服海内。今刘黑闼散亡之余，众不满万，资粮匮乏，以大军临之，势如拉朽，殿下宜自击之以取功名，因结山东豪杰，庶可自安。"⑮这一分析是切中要害的，所以建成立即采纳这一建议，请兵出征。李渊也立即予以批准，一反过去历次重大战役皆令李世民挂帅的惯例，显然是为了加强东宫在斗争中的地位，抑制秦王府声势的发展。

建成长期留居长安，出入后宫，收买高祖妃嫔，以获得她们的支持，并通过她们对李渊施加影响。世民妻长孙氏虽在宫廷"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⑯，努力从高祖妃嫔中争取支持者。但建成凭借太子的有利地位和"无所不至"的活动，获得大多数妃嫔的支持。"诸妃嫔争誉建成、元吉而短世民"⑰。世民攻克洛阳以后，妃嫔数人到洛阳，私自向世民索取珍宝，并为她们的亲属求官，都被拒绝，"由是益怨"。淮南王李神通有功，世民给田数十顷。张捷妤求李渊把这块地赐给她父亲，李渊"手敕赐之"，李神通不给，张捷妤告诉李渊说："敕赐妾父田，秦王夺之以与神通。"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手敕不如汝教也？"后谓裴寂曰："此儿久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复昔日子也。"⑱尹德妃父纵家童殴打秦王府属杜如晦，折一指。德妃反奏"秦王左右陵暴妾家"。李渊大怒，责世民说："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⑲诸妃嫔密奏李渊说：秦王"憎疾妾等，陛下万岁后，妾母子

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又说：“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zhǔ 托附）之，必能保全。”[20]在后宫，李建成显然占居有利地位。

武德六年以后，随着唐初统一战争的胜利结束，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唐太宗回忆说：“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21]齐王元吉劝太子建成除掉秦王世民，并说：“当为兄手刃之。”世民随李渊至齐王府，元吉令刺客潜伏内堂，欲刺杀世民，建成宽简仁厚，制止了这场暗杀。元吉抱怨说：“为兄计耳，于我何有?”[22]

建成、世民等在长安各自拥兵，树立自己的势力。建成的东宫兵、世民的秦王府兵、元吉的齐王府兵都是公开的。另外都私养一批勇士作为自己的死党。武德七年六月李渊去仁智宫避暑，留建成居守京师，命世民、元吉随行。建成使元吉俟机除掉世民说：“安危之计，决在今岁。”[23]建成又使庆州都督杨文干私募勇士送长安，并遣尔朱焕、桥公山送盔甲给杨文干。二人中途畏罪，告太子使杨文干起兵以便里应外合。李渊怒，召建成至仁智宫，并遣使召杨文干，文干遂起兵。李渊召世民说：“文干事连建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征讨），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24]世民出发后，内有元吉与妃嫔为建成说情，外有封德彝为建成营解，李渊改变废立皇太子的主意，仍遣建成回京师居守。

武德七年七月，世民谏止因避突厥而欲迁都的计划，建成和妃嫔乘机向李渊进谗言说：“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即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耳!”[25]李渊命三子比武驰射，建成以肥壮而喜仆倒的胡马授世民，世民乘

马驰射，胡马仆倒，世民一跃站于数步之外。一连三次，世民语左右曰："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令妃嫔进谗言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岂有浪死。"李渊大怒责世民说："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一何急也！"㉖适突厥入寇的奏报到达，矛盾才缓和下来。李渊"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㉗。

武德九年，世民遣温大雅、张亮等经营洛阳，结纳山东豪杰，在地方树立势力。元吉告张亮谋反，查无实据，复令其还洛阳。"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李渊一面敕建成："秦王素不能饮，自今无得复夜饮。"㉘一面见兄弟不相容，为避免骨肉相残，拟遣世民"居洛阳，自陕以东皆主之"㉙。将行，建成、元吉恐世民一至洛阳，拥有土地甲兵，必成后患，多方阻挠而止。元吉、尹德妃、张捷妤日夜向李渊进谗言，李渊相信将治世民罪。陈叔达力谏："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刚烈，若有挫抑，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疾，陛下悔之何及！"㉚此事才得缓解。元吉密请杀秦王，李渊也以为秦王有定天下之功，罪状不显著，无以为辞。

形势紧急，秦王府僚属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劝世民效周公诛管、蔡故事，杀建成、元吉，以求得家国的安宁。

建成、元吉加紧收买、斥逐秦府僚属。将金银器一车密赠尉迟敬德，致书招请，被拒绝。于是元吉使刺客夜刺敬德，敬德获悉，重门大开，安卧不动，刺客不敢入。又挑拨李渊将敬德下诏狱，由于世民力请，始得免死。又以金帛诱段志玄，也被拒绝。程知节、房玄龄、杜如晦等皆遭斥逐。世民收买东宫官属率更丞㉛王晊却获得成功，并把常何也拉到自己一边，安

置他屯守宫城北门玄武门。常何先从世民消灭王世充，后从建成平定刘黑闼，这种经历可以减少建成的疑虑。世民还收买了屯守玄武门的其他将领敬君弘、吕世衡等。

武德九年夏，突厥数万骑入塞侵扰，建成向李渊推荐元吉率诸军北征，以免世民掌握兵权。元吉要求秦府骁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及秦叔宝等同行，并挑选秦王帐下精锐充实自己的军队。意图将秦王骁将精兵转移到自己手里，然后谋杀世民。率更丞王晊向世民告密说："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吾当使人进说，令授吾国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㉜形势危急异常，秦府僚属皆主先发制人，世民私养勇士八百余人也已入寓，世民于是定计准备动手，密召斥逐在外的房玄龄、杜如晦回秦府共同谋划。

六月三日，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并说他无负于兄弟，而建成、元吉都要杀害他，似是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他若被杀，魂归地下，也耻见诸贼。李渊闻之愕然，决定第二天鞫问。

六月四日，李渊召裴寂、萧瑀、陈叔达等欲审察其事。张捷妤探知世民密奏内容，飞报建成。面对这一情况，元吉主张"勒宫府兵，托疾不朝，以观形势"。建成说："兵备已严，当与弟入参（朝参），自问消息。"㉝于是照常入朝。其时世民已在常何协助下，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伏兵于玄武门。建成、元吉行至临湖殿，发觉情况异常，立即回马欲归东宫与齐府。世民跃马而出随后大呼，元吉引弓射世

民，由于仓皇失措，控弦不开，再三不达有效射程。世民一箭射杀建成。尉迟敬德率七十骑继至，左右箭射元吉坠马。世民马奔入丛林，被树枝拌住，坠马不能起，元吉突至，夺弓将扼世民，敬德大声喝叱，跃马而来，元吉逃向武德殿，被敬德射杀。东宫将领冯立、薛万彻、齐府将领谢叔方率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攻玄武门，与守门兵激战多时不得入。薛万彻等鼓噪欲攻秦府，形势紧急，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头出示对方，宫府兵溃散，薛万彻、冯立等逃匿。

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宫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李渊处。李渊大惊，谓裴寂等曰："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太子），委之国事，无复事矣!"㉞李渊表示这是他素常的心愿。其时双方战斗仍未结束，敬德请李渊"令诸军并受秦王处分"㉟，这一手敕宣读后，战斗才停下来。建成之子五人，元吉之子五人皆被杀。

六月七日立世民为皇太子，又诏："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㊱

六月十六日李渊给裴寂等人的手诏中说："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㊲表示有传位于太子之意。世民做皇太子两个月后，武德九年八月，唐高祖李渊传位于太子，唐太宗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次年（627）改元贞观。

贞观元年（627）至贞观二十三年（649），是唐太宗统治的贞观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唐朝政治上相对清平稳定，经济上较快恢复发展，国防上日益强大，文化上初步昌盛，出现了封建社会中罕见的"太平盛世"，史称"贞观之治"。

早在唐太宗即位之初，武德九年十月，在朝廷中就进行过一次如何统治农民以实现“天下大治”的辩论。封德彝等认为：“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㊳。意思是夏、商、周以后人心不古，逐渐浇薄，所以秦朝专用刑法律令，汉朝也杂以暴力刑罚治天下。因而他们主张：欲实现天下大治，必须严刑峻法，对农民实行严厉镇压。魏征坚决反对这种主张，他说：“若谓古人淳朴，渐至浇讹，则至于今日，当悉化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㊴“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㊵。魏征主张行王道，以“仁义”治理国家；如孟子所说：“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㊶上下同心，不必太久，即可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意见，确立了贞观时期施政的总方针。行之数年，“国内康宁，突厥破灭。因对群臣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行王道）’”㊷。“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㊸。“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㊹。可见这一施政总方针的确立，对贞观之治影响颇为深远。

同年十一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之策，有的主张“重法以禁之”，唐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也！”这就确立了贞观时期在经济上实行的“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㊺的政策。

唐太宗政治思想的形成和统治政策的确立，深受隋朝覆亡的影响，他注意勤行始终不渝的是“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

龟”[46]。（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引申为借鉴之意）故经常与群臣讨论历代王朝的盛衰成败和治国的方针政策，从中吸取历史经验。对隋朝覆亡的教训尤为重视，他们看到既富且强的隋朝，曾“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力殊俗”。他之所以一旦土崩瓦解，归于覆亡，皆由于隋炀帝“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万物而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苑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戈不戢”。以致“民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47]，这个教训是深使封建统治者震惊的。唐太宗就曾说：“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骄且逸，一朝而败，吾亦何得自骄也？言念于此，不觉惕焉震惧！”[48]“亡隋之辙，殷鉴不远”[49]。贞观君臣常“思隋氏灭亡之事”[50]，以为前车之鉴。他们从前代兴亡历史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唐太宗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51]《荀子·王制篇》的一句名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被反复引用来警励自己，教戒子孙。他总结出一条重要的统治经验，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52]皇帝如果暴虐无道，横征暴敛，弄得民不聊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53]。唐太宗的统治政策，就是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制定的。

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与经济思想中，有明确的民为邦本，农为政本，静为农本的思想内容。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

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及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54]又说：“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志廉耻。”[55]又说：“育物济人，必资于食；家给人足，本藉于农。纵使瓦砾尽作隋珠，沙石皆为和璧，珍宝满目，何解饥寒？”[56]这些话明确指出，要治国安邦，必须“先存百姓”，使百姓能生存下去；要使百姓“家给人足”，必须重视农业；要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必须“人君简静”，不“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做到不夺农时。

贞观时期从各方面推行重农政策。贞观二年，京师一带蝗虫大起，唐太宗入禁苑察看庄稼，见蝗虫，拾取数只，诅咒说：“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将蝗虫吞下，左右进谏说：“恶物恐成疾。”太宗说：“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57]遂将数只蝗虫吞下去。贞观三年正月，恢复废弃已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唐太宗“亲祭先农，躬御耒耜，藉于千亩之甸。……观者莫不骇跃”[58]。在春耕前由天子亲执耒耜，在藉田上施行三推或一拨的藉礼，通过这一仪式，倡导举国上下尽力农耕。“观者莫不骇跃”，说明这一举动取得了某种程度的预期效果。

唐太宗经常遣使赴各地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同诸州考使说“国以人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谷不登，恐由朕不躬亲所致也”。接着说他自己亲自种了几亩地，有时锄草不及半亩，已感疲乏。“以此思之，劳可知矣。农夫实甚辛苦”。所以要求诸州考使到各地，要“遣官人就田垅间劝励，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还，多废农业，若此劝农，不如不去”[59]。

为政简静，与民休息，不夺农时在贞观初期是比较突出的。唐太宗即位之初，突厥颉利可汗引兵深入到渭水便桥北，

太宗与颉利盟于便桥之上，突厥退兵后，太宗对侍臣说："所以不战者，吾即位日浅，国家未平，百姓未富，且当静以抚之。"⑩贞观君臣深知"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⑪。贞观五年春，礼部上书说，皇太子将举行冠礼，用二月为吉，请征府兵以备仪仗。太宗说："今东作方兴，恐妨农事，令改用十月。"肖瑀奏称：据阴阳书，不如二月。太宗说："农时甚要，不可暂失。"⑫贞观元年，太宗对侍臣说："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朕今欲造一殿，材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⑬在大臣劝谏下停止土木兴建、封禅等事的记载也屡见史册。不夺农时，与民休息的政策，还得到法律的保证。《唐律》《非法兴造》条文中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疏议》解释说："非法兴造，谓法令无文。虽则有文，非时兴造亦是。若作池亭宾馆之属及杂徭役，谓非时科唤丁夫，驱使十庸以上，坐赃论。"⑭就是擅兴土木，妨夺农时，被视为"非法"，要以贪赃论处。在太宗的倡导命令下，"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⑮。

此外唐太宗在推行均田，奖励垦荒，增殖人口，兴修水利等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隋末农民战争部分调整了当时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改善了社会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广大农民安居下来，以辛勤劳动推动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隋末动乱造成唐初社会经济的一片衰蔽凋残，直至贞观初期，仍是"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⑯。全国人口锐减，政府掌握的户口只有二百多万户，不到隋盛时八百九十多

万户的三分之一。加之贞观元年关中欠收，斗米值绢一匹，贞观二年蝗灾，贞观三年大水，克服天灾人祸造成的困难，实非易事。由于广大农民勤于“耕稼”，迅速改变了农村的凋残景象。贞观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⑰。

唐代史学家杜佑说：“自贞观以后，太宗励精为理。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两钱。”⑱《贞观政要》记述当时情况说：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⑲这里虽不无溢美之词，但基本上反映了贞观时期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据《唐会要》、《通典》等书的记载，永徽三年（652，唐太宗死后三年）户口增至三百八十万户，比武德末年的二百万户，增长一百八十万户，贞观时期每年平均增长近七万户，是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反映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唐太宗的“知人善任”，是“贞观之治”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唐太宗深知用人的重要性，他在《帝范》、《求贤》篇中说：“任使得人，天下自治。”贞观十三年，他又对侍臣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⑳他把“官不得其才”，比作“画地作饼，不可食也”㉑。正因为如此，他在“贞观之初，求贤如渴”㉒。载入《全唐文》的太宗所下求贤举人诏达五次之多。贞观二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公等所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

哉？[73]又对封德彝说："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卿既不言，朕将安寄？"对曰："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74]太宗除督促大臣"求访贤哲"外，自己也处处留心，多方物色。贞观三年太宗命百官上书指陈朝政得失。常何一介武夫，不通文墨，家客马周代草奏疏奏事二十余条，事事皆合太宗旨意。太宗怪而问之，常何以实对，"太宗即日召之（指马周），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历迁中书令"[75]。又如褚亮原为薛仁杲父子的太常博士，世民平薛仁杲后，因素闻其名，"乃于众中访之，深加礼接"，并云"寡人受委专征，喜于克敌得俊"[76]，发现网罗贤俊早在即位之前已在进行。而他的网罗贤俊，不分士族庶族，不分为官为民，不分故旧新进"昔仇"，不分汉族夷族，"用人但问堪否"，"惟有才行是任"，"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77]即位后健全科举制度，为选拔录用人才开拓了一条重要途径。

唐太宗明于知人在于他知人能兼明善恶，兼知优劣长短。贞观十八年太宗面举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八大臣的优点和缺点，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求之古人，亦当无比；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接着对唐俭、杨师道、岑文本、刘洎、马周、褚遂良等逐一品评，无不全面、中肯。

唐太宗的善于用人，在于他用人能舍短取长。他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之行能，不能兼备"。用人必"弃其所短，取其所长"[78]。"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79]。对房玄

龄、杜如晦的任用可为范例。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有王佐之才，但不善于理狱及处理杂物琐事，太宗任之为左右仆射，并"敕尚书省，细碎务皆付左右丞，惟冤滞大事合闻奏者，关于仆射"⑧⓪。于是房玄龄"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良相焉"。杜如晦则"军国多事，剖断如流"，"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⑧①。贞观六年，太宗对魏征说："为官择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魏征对曰："天下未定，则专取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可用也。"⑧②太宗用人坚持"才行兼备"这一标准，许敬宗虽"文字宏奥"，马周、刘洎皆"无以过之"。但马周、刘洎皆被任为宰相，而许敬宗终贞观一代一直未被重用。"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阳（即许敬宗）才优而行薄故也"⑧③。官吏选授之后，唐太宗很重视对他们的考核，制定考核制度，由吏部或遣专使进行，他也亲自加以监督。他曾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⑧④"由是官吏多自清谨"⑧⑤。由于唐太宗的"知人善任"，贞观时期人才济济。这些猛将谋臣为李唐王朝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与"贞观之治"的成功是密切相关的。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群臣的犯颜直谏，形成贞观时期良好的政治风气，为封建社会所罕见。唐太宗深知纳谏的重要性。贞观二年他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⑧⑥对此他深表赞同。贞观四年他对肖瑀说："以天下之

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87]他深知一个人的耳目有限，思虑难周，必须从谏如流，集思广益，才能求得天下大治。

唐太宗在“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88]。玄武门之变后，他刚被立为太子处理军国庶事时，就“令百官各上封事”[89]，陈述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正式即位后又号召百官“上封事”，对这些上书他非常重视，“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90]。他对大臣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91]为了导之使谏，不仅晓以利害，而且给以奖赏，“赐（魏）征金瓮一”[92]、“赐征绢五万匹”[93]、“赐（张）玄素彩二百匹”[94]等记载时见史册，由于他的积极倡导，极言直谏，蔚然成风。

唐太宗屈己纳谏，从谏如流。对确属自己的过失或可以不做的事，常能采纳臣下的谏诤。如武德九年十二月，遣使点兵，下令中男身形壮大者亦点。魏征反对，不肯签署敕令。太宗怒责其固执，魏征说：“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太宗悦服说：“我不寻思，过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错失，若为致理？”[95]遂撤消点中男入军的敕令。不仅如此，对一些他认为必须做的事，有时也因臣下的极言直谏而暂缓施行。如贞观四年他下令修洛阳宫，认为洛阳地位适中，转运财物比较便利，此举实属必要。张玄素上书规谏说：“且以陛下今日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残之后，役疮痍之人，费亿万之功，袭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

甚于炀帝远矣。”太宗说：“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说：“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96]太宗遂停此役。贞观五年又要修洛阳宫，又因戴胄规谏而止，许久以后才命将作大匠窦琎修建洛阳宫。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在封建帝王中无一可与之媲美，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起了很好的作用。首先是避免了许多错误，他说自己“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97]唐宪宗也说：“朕览国书，见文皇帝（太宗）行事少有过差，谏臣论诤，往复数四。”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是避免了上下阻隔，了解下情，使国家政策的制定符合客观实际，比较切实可行。复次这种开明作风，形成贞观时期比较融洽的君臣关系。如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卒，葬于昭陵，太宗思念不已，在御苑筑层观以望昭陵。曾引魏征同登，一起远望昭陵，魏征说他老眼昏花不能见，太宗“指示之，征曰：‘臣以为陛下望献陵（唐高祖与太穆皇后陵），若昭陵则臣固见之矣。’上泣，为之毁观”[98]。这种纯属家庭生活个人感情的小事，魏征竟亦直言无隐，君臣关系可见一斑。又如太宗对功臣深怀厚爱，杜如晦死后，“上每得佳物，辄思如晦，遣使赐其家。久之，语及如晦，必流涕”[99]。即使对卷入太子谋反事件的侯君集也表现出君臣之情，侯君集被收后，太宗对他说：“朕不欲令刀笔吏辱公，故自鞫公耳。”至反形已具，又对侍臣说：“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群臣以为不可，于是对侯君集说：“与公长诀矣!”并“泣下”[100]。开明的作风、融洽的君臣关系是贞观时期政治上比较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贞观十五年，李世勣镇守晋阳已十六年，唐太宗曾说：

“隋炀帝劳百姓筑长城以备突厥，卒无所益。朕唯置李世勣于晋阳而边尘不惊，其为长城，岂不壮哉!”⑩这虽是太宗对李世勣的充分肯定，也是贞观时期边境上“烽烟不举”的恰当写照。

此外唐太宗在文化上的兼容并蓄，吸取并融合边疆各族与亚洲各国的文化，为唐代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虽然贞观后期，唐太宗在为政简静、与民休息、居安思危、从谏如流等方面“渐不克终”⑩，但“贞观之治”仍然是封建社会中有名的“盛世”，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

注　释

①②《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

③④《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二年。

⑤《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三年。

⑥《旧唐书·王远知传》。

⑦⑧《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⑨《贞观政要》卷二《任贤》。

⑩《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

⑪《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四年。

⑫《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⑬唐制东宫官属掌侍从、赞相礼仪、驳正启奏。

⑭唐制东宫官属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

⑮《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⑯《旧唐书·后妃传》。

⑰⑱⑲⑳《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五年。

㉑《贞观政要》卷五《忠义》。

㉒㉓㉔㉕㉖㉗《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七年。

㉘㉙㉚《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㉛掌宗族次序、礼乐、刑罚及漏刻政令。

㉜㉝㉞㉟㊱㊲《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㊳《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㊴《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㊵《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㊶《孟子·梁惠王上》。

㊷《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㊸《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㊹《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㊺《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㊻《贞观政要》卷六《杜谗邪》篇。

㊼《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篇。

㊽《贞观政要》卷十《灾祥》篇。

㊾《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㊿51《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52《贞观政要》卷一《君道》篇。

53《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54《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55《帝范》四《务农》。

56《册府元龟》一五七《帝王部·诫励二》。

57《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58《旧唐书·礼仪志》。

59《贞观政要》佚篇（罗振玉校录），转引自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

60《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61《贞观政要》卷八《刑法》篇。

62《贞观政要》卷八《务农》篇。

⑥③《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篇。

⑥④《唐律疏议》卷一六《擅兴律》。

⑥⑤《贞观政要》卷六《俭约》篇。

⑥⑥《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⑥⑦《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⑥⑧《通典》卷七。

⑥⑨《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⑦⓪⑦①《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⑦②《贞观政要》卷一O《慎终》篇。

⑦③⑦④《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⑦⑤《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

⑦⑥《册府元龟》卷九七《帝王部·礼贤》。

⑦⑦《贞观政要》卷五《公平》篇。

⑦⑧《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

⑦⑨《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

⑧⓪《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篇。

⑧①《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篇。

⑧②《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六年。

⑧③《旧唐书·许敬宗传》《史臣曰》。

⑧④《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⑧⑤《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⑧⑥《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

⑧⑦《贞观政要》卷一《政体》篇。

⑧⑧《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⑧⑨《旧唐书·太宗本纪》。

⑨⓪《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九年。

⑨①《贞观政要》卷二《求谏》篇。

⑨②《资治通鉴》6027页。

(93)《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元年。

(94)《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95)(96)《贞观政要》卷二《纳谏》篇。

(97)《贞观政要》卷四《教戒太子诸王》篇。

(98)《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年。

(99)《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四年。

(100)《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

(101)《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102)《全唐文》卷一四O《十渐疏》。

隋唐五代

武则天代唐称帝

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太宗因长孙皇后死，深感寂寞，闻故荆州都督武士彟女“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①，赐号武媚，时年十四。

武氏名曌（载初元年即689年“自以曌字为名，遂改诏书为制书”②以避其名。），尊号则天（神龙元年即705年，中宗“上太后尊号曰则天大圣皇帝”③，当年死，遗制“去帝，称则天大圣皇后”。谥曰：“则天大圣皇后。”④），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人。父武士彟，以经营木材致大富，隋末为府兵低级军官鹰扬府队正，颇好交结。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顾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义旗起，以士彟为大将军府铠曹，从平京城⑤。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武氏入宫数年后，高宗被立为太子，“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⑥。及太宗死，武氏与地位较低的嫔御皆寄身感业寺为尼。太宗忌日，高宗入感业寺烧香，见武氏，两人皆感伤落泪。王皇后闻之，阴令武氏蓄发，劝高宗纳武氏入后宫。

因王皇后无子，肖淑妃有宠，王皇后疾之，欲以此夺肖淑妃之宠，于是武氏第二次入宫。武氏性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王皇后，后爱之，屡称誉于高宗，未久大受宠幸，拜为昭仪，王皇后、肖淑妃皆失宠。皇后舅中书令柳奭请辞，罢为吏部尚书。

武氏虽得宠幸，但高宗无意废掉王皇后。“会昭仪生女，后怜而弄之，后出，昭仪潜扼杀之，覆之以被。上至，昭仪阳欢笑，发被视之，女已死矣，即惊啼。问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适来此’。上大怒曰：‘后杀吾女！’昭仪因泣数其罪。后无以自明，上由是有废立之志”⑦。为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高宗与武昭仪亲至长孙无忌家，拜无忌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赐无忌金宝缯锦十车，以期得无忌拥护，无忌接受赐与，仍然反对废后。昭仪母杨氏至无忌家屡次请求，无忌终不许。

高宗永徽六年（655）六月武昭仪诬王皇后与其母柳氏为厌（yā）胜（求女巫行法术祈求鬼神加祸于敌对的人）敕令皇后母柳氏不得进宫，贬皇后舅吏尚书柳奭为遂州刺史。中书舍人李义府，为长孙无忌所恶，将贬为壁州司马，知高宗欲立武昭仪为后，正犹豫未决，乃上表请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以满足万民心愿。高宗悦，“召见与语，赐珠一斗，留居旧职。昭仪又密遣使劳勉之，寻超拜中书侍郎”⑧。大臣中不属于关中军事贵族的许敬宗、王德俭、袁公瑜、崔义玄、李勣等因受长孙派的排斥，皆拥护废立以投靠武氏。

九月，高宗召长孙无忌、李勣、于志宁、褚遂良入内殿，李勣称疾不入。高宗曰：“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⑨褚遂良对曰：“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

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明日又提此事，褚遂良力谏：“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武氏在帘中大骂：“何不扑杀此獠（lǎo 古骂人词语)!”⑩长孙派的韩瑗、来济纷纷上表极谏，中有“妲己倾覆殷王”⑪，褒姒灭亡周室，吴王拒谏，麋鹿逝于姑苏，废王立武荆棘将生于庭阙。语极痛切，高宗不听。他日，高宗谓李勣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李勣对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乃下决心。许敬宗更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⑫褚遂良被贬为潭州都督。

十月，高宗下诏称：“王皇后、肖淑妃谋行鸩毒，废为庶人。”说武氏出于功勋门第，以才行卓越选入后宫，誉满宫闱。说自己做太子时侍从太宗朝夕不离左右，在宫内端正自身言行，宫廷女官之间未曾反目而视，对此太宗每加赞赏，“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⑬可立为皇后”⑭。十一月，武后“遣人杖王氏（故皇后)、萧氏（故淑妃）各一百，断手足，投酒瓮中，曰：‘令二妪骨醉’，数日而死，又斩之”⑮。

高宗显庆元年（656）废皇太子忠为梁王，立武后子代王弘为皇太子。继而以拥护或反对废立为标准，大事贬诛长孙无忌、褚遂良等，重用李义府、许敬宗等。显庆二年三月，以李义府兼中书令，虽义府枉法释大理狱女囚，并擅杀六品大理寺丞，高宗亦不加罪。八月再贬褚遂良为爱州刺史，贬侍中韩瑗为振州刺史，贬中书令来济为台州刺史，终身不听朝觐。显庆三年十一月以许敬宗为中书令。是岁褚遂良卒于贬所。武后以

长孙无忌受重赐而反对废立，深怨之。对废立问题于志宁中立不言，武后亦不悦，因令许敬宗伺隙陷害之。许敬宗使人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闻之泣下，对母舅不忍加诛。许敬宗反复诬奏，并谓无忌与太宗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如振臂一呼，群恶云集，必成大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如再犹豫，恐变生肘腋悔之晚矣。显庆四年（659）四月，下诏削长孙无忌太尉及封邑，流放黔州（今四川彭水）。七月遣人至黔州逼无忌自缢。受此案株连，褚遂良已死追削官爵，柳奭、韩瑗除名，继又遣人追锁来京师，继诏所至斩决。于志宁免官，长孙氏、柳氏、韩氏三家财产没收，近亲皆流岭南、褚遂良子被杀。八月，长孙氏、柳氏贬降者十三人，于志宁贬荣州刺史，于氏贬降者九人，至此政敌尽除，大权归于武后。

是年六月，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许敬宗以太宗时所修《氏族志》不叙武氏门族，奏请改之，武后为提高武氏一族及宠臣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氏族及李唐皇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按仕唐官品高下，共分九等。于是以军功致位五品者皆入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显庆五年七月废梁王忠为庶人，徙囚黔州。是年十月，高宗患风眩头重，目不能视，难于操持政务。百官奏事，高宗或使武后决之，颇为称旨，始委以政事，武后遂专国柄，威势日重。高宗大权旁落，动为武后所制。高宗怒欲废之，麟德元年（664）十二月，命宰相上官仪草废武后诏。左右奔告武后，武后闻之遽至高宗处自诉，诏草犹在，高宗懦弱不忍，乃曰：“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武后乃使许敬宗诬奏上官仪与

废太子忠谋反，上官仪下狱被杀，赐废太子忠死，株连流贬者甚众。自是高宗每临朝视事，武后则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⑯。

武后以将行封禅礼⑰于泰山，表请参与奠献⑱。诏社首山（在今山东泰安西南）祭地神以皇后为亚献。乾封元年（666）正月祭地于社首山，高宗初献，武后亚献。标志其非同皇后的政治地位。

乾封二年（667）高宗因久疾，命太子弘监国。上元元年（674）秋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名为避先帝、先后之称，实欲自尊。十二月武后上表建议十二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免除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徭役）。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政府手工工场）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下）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丧服）三年（过去是一年）。十，上元（年号）前勋官已给告身（委任状）者，无追覈。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增加薪水）。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提级）申滞。"⑲高宗诏皆施行之。武则天能够重视农业生产，规定各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升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必加惩罚⑳。所编《兆人本业》农书，颁行天下，影响很大。上元二年三月，武后在宫廷中召集大批文人学士，大量修书，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且密令参决朝廷奏议及百官表疏，以分宰相之

权，时人谓之北门学士㉑，时高宗风眩更甚，拟使武后摄政，宰相郝处俊谏曰："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㉒事乃止。太子弘深为高宗钟爱，高宗欲禅位于太子。武后方图临朝，不满于太子弘，适太子弘见肖淑妃之女义阳、宣城二公主因母得罪幽禁宫中，年逾三十而未嫁，奏请出降，高宗许之。武后怒，继而太子死于合壁宫，时人以为武后所毒杀。五月，高宗下诏："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德命，加以尊名，可谥为孝敬皇帝。"㉓

六月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调露元年（679），高宗命太子贤监国，太子处事贤明审慎，时人称之。贤又招集当时学者注范晔《后汉书》，在士人中颇著声望。永隆元年（680）正议大夫明崇俨以厌胜之术为武后所信使，密称："太子不堪承继，英王貌类太宗。"武后曾命北门学士撰《少阳正范》及《孝子传》以赐太子，又几次作书谴责之，太子愈不自安。适明崇俨为盗所杀，武后疑是太子所为，遣人搜查东宫，于马坊中搜出皂甲数百领，以为谋反物证，遂废太子贤为庶人，送京师幽禁。立英王哲（原名显）为太子。

高宗永淳二年（683）高宗病危，召裴炎入受遗诏辅政。高宗去世，遗诏太子柩前即位，军事大事取决武后。太子显（曾更名哲）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武后临朝称制，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中宗欲以韦后父韦玄贞为侍中，裴炎固争不听，告于武后；乃命裴炎、程务挺等带兵入宫，废中宗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武后继续临朝称制，睿宗居别殿，不得有所干预。

武后取代李唐之势日益明显，武后光宅元年（684）遣人逼废太子贤自杀，以武承嗣为太常卿、同中书门下三品，参预

国政。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九月徐敬业、骆宾王等以挽救庐陵王为名，起兵扬州。敬业自号匡复府上将、领扬州大都督，开府库，赦囚徒，旬日间得胜兵十余万。发布檄文，历数武后“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等罪，肆意诋毁。中有“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观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语。武后见檄文，问作者为谁，告以“骆宾王”，武后曰：人有如此之才华，未能招致朝廷，皆宰相之过也！同时遣李孝逸等发兵三十万讨徐敬业。武后问计于裴炎，炎对以如太后归政于皇帝，则徐敬业可不讨自平。武承嗣使人言裴炎有异图，下狱斩于洛阳。徐敬业未能一鼓作气率兵直指洛阳，而先取润州（今江苏镇江），欲借金陵王气称霸江南。结果大败于李孝逸，敬业为其部下所杀。裴炎下狱后，单于道安抚大使程务挺曾为之申理，遂诬程务挺与裴炎、徐敬业同谋，即军中斩之。则天后垂拱元年（685），下令九品以上官及百姓，都可“自举”，申达自己的才能以求升官或当官。

自徐敬业起兵，武后疑天下人多反对她，知唐宗室大臣心皆不服，欲大施诛杀以镇慑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过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至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如所言称旨，则破例授官，不实者亦不问罪，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武后任用酷吏推问告密案，索元礼讯一囚必令引数十百人；周兴、来俊臣募无赖数百人，欲陷害一人，则使数处告密，事状如一。来俊臣与司刑评事万国俊共撰《罗织经》一卷，专讲如何告密，网罗无辜，织成罪状，并竞为酷刑，使人但求速死，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

武后垂拱四年（688），武后独与北门学士议明堂制度，不问诸儒。使僧怀义役数万人，毁乾元殿，于其地作明堂，近一

年落成，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号曰万象神宫。明堂既成，又命僧怀义作夹纻大像，大像小指中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层以藏之。“月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㉔。天堂落成，上至三层即可俯视明堂。是年武承嗣使人凿白石为文曰：“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称得于洛水，献于武后，武后大喜，命其石曰“宝图”。武后加尊号为圣母神皇。

武后谋夺李氏社稷，剪除唐宗室，诸王不自安，欲起兵匡复，议未定而博州刺史琅邪王冲先发，是年八月举兵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北）。豫州刺史越王贞起兵豫州（治今河南汝南）以应之。武后分遣丘神勣、麴崇裕击之。琅邪王冲起兵七日败死；九月，越王贞兵败自杀。武后欲悉诛诸王，使周兴等审讯之，迫韩王元嘉、鲁王灵夔、黄国公譔、东莞郡公融、常乐公主等自杀，亲党皆诛。穷治越王贞、琅邪王冲党与。

武后当政期间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共录取进士205人，高宗武后统治期间共录取一千余人。平均每年录取人数比贞观时增加一倍以上㉕。武后载初元年（690）武后在洛城殿对贡士亲发策问，是为殿试之始。是年遣存抚使十人巡抚诸道，推、举人材，一年后各存抚使举荐一百余人，武后引见不问贤愚，悉加擢用，或为试凤阁（中书省）舍人、给事中，或为试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试官制度自此始，时人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语。武后虽滥以禄位收人心，然不称职者亦予罢黜，或加刑诛。明察善断，故时人亦竞为之用。为奖励告密，武后对告密者破例授官，以卖饼为生的侯思止，素无赖，因诬告舒王元名与恒州刺史裴贞谋

反，被擢为游击将军、侍御史。元名流和州，其子被杀，裴贞灭族。王弘义，素无行，见闾里耆老作邑斋，遂告以谋反，杀二百余人。擢授游击将军、殿中侍御史。是年杀安南王颍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之宗室至是杀戮殆尽，其幼弱幸存者亦流岭南，又诛其亲党数百家。

是年七月，僧法明等撰大云经四卷，谓武后乃弥勒佛下世，当代唐为天下主，武后下令颁行天下。命两京诸州各置大云寺一所，藏大云经，使僧人讲解并升释教于道教之上。是年九月侍御史傅游艺率关中百姓九百人上表，请改国号为周，赐皇帝姓武氏。于是百官及帝室宗戚、百姓、四夷酋长、沙门、道士共六万余人，亦上表请改国号。武后准所请，改唐为周，改元天授。武后称圣神皇帝，以睿宗为皇嗣，赐姓武氏，以皇太子为皇孙。立武氏七庙于神都，追尊周文王曰：始祖文皇帝。立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其余武氏多人为王及长公主。

武周天授二年，左金吾大将军丘神勣获罪被诛，或告酷吏周兴与丘神勣同谋，武后命来俊臣审讯之。俊臣问周兴何法可使囚认罪，周兴曰：取大瓮，以炭火四周炙之，令囚入瓮中，何罪不认？俊臣如法布置毕，谓周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周兴伏罪流岭南，中途为仇家所杀。酷吏周兴、索元礼、来俊臣等竞为残暴，周兴、索元礼各杀数千人，来俊臣所破千余家。索元礼尤为残酷，武后亦杀之以慰人望。武后自徐敬业起兵以来，任用酷吏，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时告密之风仍胜，武后亦厌其烦，命监察御史严善思按问之，告密不实而伏罪者 850 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近臣亦上疏言告密罗织严刑酷吏之害，武

后亦颇采纳，随武周政权之建立，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安西四镇于武后垂拱二年（686）由于唐军败于吐蕃而再次失守，武周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以王孝杰知吐蕃虚实，命为武威军总管与阿史那忠节等率兵击吐蕃，大破之。收复四镇，吸取安西四镇几度失陷的教训，唐政府为巩固西部边防，遣军二万四千人常驻四镇，自此安西四镇始得稳定。

周长寿三年（694）武三思率四夷首领请以铜铁铸天枢，立于端门外，以颂武后功德。武后亲题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天枢铸造历时八月而成，其形制若柱，高一百零五尺，直径十二尺，八面，面各五尺，下为铁山，周一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环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直径三丈，盘上四龙直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首领之名于其上。用铜铁二百万斤，"请胡聚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㉕。

周神功元年（697）武后使武懿宗审讯刘思礼谋反事，武懿宗令刘思礼广引朝士，许免其死，于是刘思礼诬引宰相李元素、孙元亨等三十六家"海内名士"，致使皆遭灭族，亲旧连坐流窜者千余人。时人以为武懿宗之残暴仅亚于周兴、来俊臣。

是年，来俊臣欲罗告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中宗之妹，武则天唯一的亲生女儿），又欲诬皇嗣（睿宗）及庐陵王（中宗）与南北衙共同谋反，拟一网打尽以盗国权。武氏诸王与太平公主恐惧，共同揭发其罪行，下狱处以极刑。仇家争啖其肉，须臾而尽。来俊臣凶狡贪暴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杀人不可胜

计。“赃贿如山，冤魂塞路”[27]，武后亦知天下愤怨，下制数罪恶并没收其家财。

周圣历元年（698）武承嗣、武三思谋求当太子，几次使人对武后说：“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武后犹豫未决，狄仁杰从容对武后说：“姑侄之与母子孰亲？”（武承嗣、武三思皆武后之侄，中宗、睿宗则武后之子）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祭祀于太庙；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祭姑于太庙者。又劝武后召还庐陵王（中宗）。武后由是无立武承嗣、武三思之意。乃召庐陵王还东都，皇嗣（睿宗）请逊位于庐陵王，武后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命为元帅，狄仁杰为副元帅率兵击突厥。武后信重仁杰，常谓之“国老”而不呼其名。仁杰好诤谏，武后每屈意从之。仁杰卒，武后泣曰：“朝堂空矣！”常叹：“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

周长安二年（702）初设武举，以箭法、枪法、材貌、言语、举重等项选人。是年置北庭都护府于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年少美姿容，入侍武后，皆得幸。二人常傅朱粉、衣锦绣。武承嗣、武三思等皆等候门庭，争为执鞭牵马。武后每于内殿小宴，辄引诸武及张易之、张昌宗欢饮戏谑，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晋后身[28]，武后命昌宗以鸟羽为衣，吹笙，乘木鹤于庭中，文士皆赋诗赞美。武后年迈，政事多委张易之兄弟，二张势倾朝野。昌宗弟昌仪为洛阳令，有候选官员姓薛者，以金五十两赂之求官，并呈一状。昌仪受金，以状授天官侍郎张锡，命即授官。继而张锡失其状，再见昌仪问求官者姓名，昌仪曰：“我亦不记，但姓薛者即与之。”于是候选官员中姓薛者六十余人悉授官。

邵王重润（中宗长子，出生后高宗大悦，为之改元永淳，满月后立为皇太孙，开府置官属。中宗第二次为太子时封为邵王）与其妹永泰郡主及郡主婿武延基窃议张易之兄弟何得任意入宫，易之诉于武后，武后皆逼令自杀。

宰相魏元忠于武后前斥二张为小人，被诬谋反，遭贬逐。

周长安四年（704）武后卧病于长生院，宰相累月不得见，惟张易之、张昌宗侍侧。二张恐武后一死大祸将临，结党密为准备。有人屡以匿名书告二张谋反，武后皆不问。

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武后病重，张易之、张昌宗居中用事，宰相张柬之、崔玄暐与敬晖、桓彦范、袁恕己等谋诛之，密陈其策于太子（中宗），太子许之。张柬之等乃率羽林兵（禁卫军）五百余人拥太子入宫，斩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后传位于太子。中宗复位。徙武后于上阳宫，上尊号为则天大圣皇帝。恢复唐国号、百官、旗帜、服色、文字等皆复旧制，复以神都为东都。是岁武后卒于上阳宫，年八十二。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在武则天当政的五十年间，由于沉重地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从贞观末永徽初的380万户猛增到615万户。商业交通出现了贞观时期未有的繁荣，唐朝从此进入鼎盛时期。

注 释

①②《旧唐书》六《则天皇后纪》。

③《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④《旧唐书》六《则天皇后纪》。

⑤《旧唐书》五九《屈突通等传》。

⑥⑦《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五年。

⑧⑨⑩⑪⑫《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六年。

⑬王政君事见《资治通鉴》890页，汉元帝为太子时，宣帝"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汉代宫人之称）可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壹幸，有身，是岁生成帝"。政君之入太子宫，亦媵侍耳，以子贵，遂为正妃。

⑭⑮《资治通鉴》唐高宗永徽六年。

⑯《资治通鉴》高宗麟德元年。

⑰封禅：帝王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南梁父山上辟基祭地曰"禅"。

⑱奠献：古代祭祀时献酒三次：第一次为初献爵，第二次为亚献爵，第三次为终献爵，合称三献。

⑲《新唐书》卷七六《后妃·则天皇后武氏传》。

⑳《唐大诏令集》卷一一O《诫励风俗勅》。

㉑唐代各官署都设在皇城内，位居宫城之南故称南衙，这批文人学士出入不经南门，而经北门，故谓之北门学士。

㉒㉓《资治通鉴》高宗上元二年。

㉔《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天册万岁元年。

㉕据徐松《登科记考》。

㉖《资治通鉴》则天后延载元年。

㉗《资治通鉴》则天后神功元年。

㉘《列仙传》载：王子晋，周灵王太子，好吹笙，为道士引上嵩山，修炼二十年得道成仙，乘白鹤飞去。

隋唐五代

韦后之乱

唐中宗皇后韦氏（？－710），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

高宗永隆元年（680），武则天废太子贤为庶人，送京师幽禁。立李显为皇太子。继而纳韦氏为太子妃。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裴炎受遗诏辅政，太子显柩前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武后临朝称制。次年正月初一改元嗣圣，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晋升皇后父普州参军韦玄贞为豫州刺史。中宗又欲以韦玄贞为侍中，（门下省长官，时裴炎为中书令）授乳母之子为五品官。裴炎力争，以为不可，中宗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而惜侍中也！"裴炎惧，奏明武后，密谋废立。二月初六，武后在乾元殿召集百官，裴炎与羽林将军程务挺率禁兵入宫，宣武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扶下殿堂，中宗问："我何罪？"武后曰："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乃幽禁于宫中别所。韦后同遭贬黜，中宗即位至此尚不足两个月，即遭如此骤变。同年四月庐陵王被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房州流放期间，武则天多次遣使

探视。中宗惧不自安，每闻制使至，常惶恐欲自杀。韦后常劝解说：祸福无常，岂可失之于一死。何至如此。中宗之悲愁惶惧得以排解。二人一同幽禁，备尝艰危，情爱甚笃。中宗常与韦后私誓："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

十四年后周圣历元年（698），在狄仁杰等朝廷重臣的劝谏下，武则天终于下决心在皇位承继问题上传子而不传侄，乃召庐陵王还东都。托言庐陵王有疾，遣徐彦伯召庐陵王及其妃与诸子至东都疗疾。三月初九，庐陵王至东都。皇嗣（睿宗）请逊位于庐陵王。当年九月武则天立庐陵王为皇太子，复立韦氏为太子妃。封皇嗣为相王。继命太子为河北道行军元帅，狄仁杰为行军副元帅，出兵击突厥。先是募兵月余，应募者不满千人，及闻太子为元帅，应募者云集，未几数满五万。加之徐敬业扬州起兵，博州刺史琅邪王李冲、豫州刺史越王李贞起兵皆曾以"匡复庐陵王"、"迎还中宗"为政治口号，足见恢复李唐为时望所归。武则天虽确定传子，但并不想因此伤害武氏集团的利益，惟恐身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乃"命太子、相王（睿宗）、太平公主与武攸暨（武则天侄，太平公主初嫁薛绍后嫁武攸暨）为誓文，告天地于明堂，铭之铁券，藏于史馆"①。

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被迫传位于太子，中宗即位，恢复唐国号。二月立太子妃韦氏为皇后，追赠皇后父韦玄贞为上洛王。大臣上疏以为异姓不封王是自古以来之通制。先朝赠皇后父为太原王（指高宗封武后父武士彟为王）应引为鉴戒，中宗不听。

韦氏再立为皇后，即倚仗中宗"惟卿所欲，不相禁制"之私誓开始干预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桓彦范上表云："陛下每临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预闻政事。臣窃观自古帝

王，未有与妇人共政而不破国亡身者也。”②中宗不听。

张柬之等五大臣在拥中宗复位的政变中，诛杀了二张及其党羽，时已有人指出，不除武三思终必成为大患，张柬之等以为大事已定，不欲广事诛杀，故未采纳此议。故武则天退位，武氏集团权势并无衰减。五大臣立功后执掌国政，武三思恐其不利于己，密谋自安之计。韦后幼女安乐公主，备受中宗宠爱。安乐公主适武三思子武崇训，使武三思地位更加巩固。上官婉儿③曾为武则天掌文书，中宗复位后，益加信任，使主持撰述诏令，拜为昭容，居中用事，私通武三思故党于武氏，又荐三思于韦后，引入宫中，三思复与韦后私通，中宗遂与三思谋议政事，并数微服幸武三思第，武氏集团声势复振。张柬之等数劝中宗诛诸武，中宗不听。柬之等长叹曰：“吾所以不诛诸武者，欲使上自诛之以张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势已去，知复奈何！”④未久，中宗命武三思为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武三思得以身居相位，掌握朝政大权。

是年五月中宗以张柬之等及武三思、武攸暨等十六人皆为立功之人，赐以铁券，自非反逆，各恕十死。敬晖等率百官上表请降诸武王爵，以安内外。中宗不许。武三思与韦后在中宗前日夜进谗言，谓张柬之、敬晖等“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之权”。中宗信以为然，乃封张柬之、敬晖等五人为王，皆罢政事，赐金帛鞍马。武三思令百官重修则天之政，斥逐不附武氏者，起复为五王所逐者，大权尽归武三思。

上官婉儿劝韦后袭则天故事，上表请改百姓年二十一成丁，六十免役为二十三成丁，五十九免役，又请天下士庶为被父所离弃的生母服丧三年。改易制度以收人心。韦后效法武则天，

谋求自居帝位，为此培植私人势力，重用自己亲属，形成韦氏集团。

神龙二年（706）闰正月，太平、长宁、安乐、宜城、新都、定安、金城等七公主皆成立府署，设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则天女，长宁以下皆中宗女）安乐公主恃宠骄横，势倾朝野，又自草诏敕，掩住正文，令中宗签署，中宗竟不看诏文笑而署之。又请中宗废皇太子，立她为皇太女，中宗虽不从亦不加谴责。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倚势弄权，卖官鬻爵，用钱三十万，就别降墨敕除官（不按程序，而由皇帝直接颁敕书，不经宰相审议，不由中书盖印，即拜官授职），斜封交中书省执行。时人称之为“斜封官”。当时以员外（员数外别置）、同正（同正员资格）、试（试某官）、摄（摄某官）、检校（检校某官）、判（判某官事）、知（知某官事）等名义授官的达几千人。安乐公主穷极豪奢，府第拟于宫掖而精巧过之。请中宗赐昆明池，不许，乃夺民田作定昆池，方圆数里，累石像华山，引水像天河，欲以胜昆明。故名曰：定昆。安乐公主有一织成裙，值钱百万，花卉鸟兽，皆如粟粒，正视旁视，日中影中，各为一色。中宗、韦后及公主等又多营佛寺，“竭人之力，费人之财，夺人之家，爱数子而取三怨”⑤。

是时朝中形成以韦后为首的武韦专政集团，武三思忌五王在京师，先出之为外州刺史，继诬之与反武三思、韦后者通谋，皆贬为远州司马。武三思秘密使人书韦后秽行，张贴于天津桥（今河南洛阳西），请加废黜。中宗大怒，武三思诬五王使人所为，名为废后，实谋篡逆，请夷其三族。又使安乐公主及其党羽，内外进谗言，中宗以曾赐五王铁券，许以不死，于是流五王于恶地，子弟十六以上皆流岭南。武三思遣使矫制杀

之。比至，张柬之，崔玄暐已死，余三人遭惨杀。武三思既杀五王，势倾朝野，常言："我不知代（世）间何者为善人，何者为恶人。但于我善者则为善人，于我恶者则为恶人耳。"御史中丞周利用、侍御史冉祖雍、太仆丞李俊、光禄卿宋之逊、监察御史姚绍之皆为三思耳目，时人谓之五狗。

中宗对揭发武韦丑行者处以极刑，益增其声势。

韦后、安乐公主、武三思等专权弄政，骄横胡为，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景龙元年（707）太子李重俊起兵。李重俊非韦后所生，为韦后所恶；武三思尤忌惮太子；安乐公主与驸马武崇训经常侮辱太子，呼之为奴，武崇训唆使安乐公主请中宗废太子，立她为皇太女；上官婉儿因武三思之故，每起草制敕推尊武氏。重俊积久难平，于七月初六日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沙吒忠义等，矫制发羽林兵三百余人，突入武家宅邸，杀武三思、武崇训及其亲党十余人。使成王千里及天水王禧分兵把守宫城诸门，太子与李多祚引兵入宫城，求索上官婉儿，上官婉儿曰："观其意欲先索婉儿，次索皇后，次及大家（宫中称皇帝为大家）。"中宗与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登玄武门楼以避兵锋，使右羽林大将军与兵部尚书宗楚客等拥兵二千余人屯于玄武门楼下及太极殿前，李多祚与太子至玄武门楼下，按兵不战，中宗凭槛谓多祚所率禁兵曰："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禁兵斩多祚、李承况等，余众溃散。成王千里、天水王禧攻右延明门不克而死。太子以百骑走终南山为左右所杀，政变失败。

韦后和安乐公主拟利用政变打击相王和太平公主，以铲除韦后实现称帝野心的主要障碍。安乐公主及兵部尚书宗楚客日夜谋进谗言，使御史冉祖雍诬奏相王及太平公主与太子重俊同

谋，中宗使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肖至忠查办此案。肖至忠痛切陈词："陛下富有四海，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罗织害之乎？相王昔为皇嗣，固请于则天，以天下让陛下，……奈何以祖雍一言而疑之！"⑥在吴兢等大臣一致劝阻下，其事乃止。

景龙三年（709）祭天地于南郊，在韦后为亚献，重演高宗禅社首以武则天为亚献的故事。李唐王室再度面临来自后族的威胁。

韦党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不满，不断有人予以检举揭发。监察御史崔琬检举宗楚客等潜通戎狄，受其贿赂，致生边患。中宗命崔琬与宗楚客结为兄弟以和解之。时人谓之"和事天子"。定州人郎岌上书，言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韦后先白中宗杖杀之。

景龙四年（710）五月，许州司兵参军燕钦融上书，言韦后淫乱，干预国政，安乐公主、宗楚客等图危害宗社。中宗召见诘问，钦融顿首直言，神色不变，中宗默然无语。宗楚客矫制令禁兵扑杀之，投于殿庭石上，折颈而死。中宗郁郁不乐，韦后及其党羽始感忧惧。

韦后早欲效法婆母武则天，梦寐以求女皇帝；安乐公主希望韦后临朝自为皇太女；散骑常侍马秦客以懂医术，光禄少卿杨均以善烹调皆出入后宫，得幸于韦后，恐事泄被诛，乃合谋于饼中放毒。六月初二中宗卒于神龙殿，时年 55 岁。

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起草中宗遗制，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想以"相王旦参谋政事"来限制韦后的大权独揽。韦后秘不发丧，调诸府兵五万屯驻京城，由韦捷、韦灌、韦璿、韦錡、韦播等分别统率，用以控制京师。以中书舍人韦元巡察六街。召诸宰

相入禁中议修改中宗遗制，宗楚客率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罢相王政事，遂删改遗制，削相王辅政而后宣行。

六月初四日始集百官发丧，韦后临朝摄政，初七日皇太子即位，史称少帝，由韦温总知内外守捉兵马事，南北卫军及台阁要司皆由韦氏子弟及亲信控制。宗楚客、武延秀（武崇训被杀，安乐公主再嫁武延秀）等及诸韦共劝韦后效法武则天，革唐命而称帝。宗楚客与韦温、安乐公主密谋除相王及太平公主，消灭反韦势力，为韦后称帝扫清道路，斗争日益激烈。

相王子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阴聚才勇之士，厚结禁军豪杰，积蓄力量，进行捍卫李唐社稷、反对韦后篡权的斗争，并获太平公主支持。素附韦后集团的兵部侍郎崔日用，知宗楚客等密谋，观察宫廷斗争形势，恐祸及自己，乃遣僧人普善密告隆基，劝其速发，“出其不意，若少迟延，或恐生变”⑦。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公主子薛崇暕、禁宛总监钟绍京等密谋先发制人。六月二十日傍晚，隆基微服入禁宛以总监钟绍京官署为政变指挥部。入夜，禁军豪杰葛福顺、李仙凫奉隆基之命直入宿卫玄武门的羽林营，斩统领羽林军的韦璿、韦播、高嵩，向将士宣布：“韦后酖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⑧羽林军早愤韦播等的横行，至是欣然听命。玄武门及羽林军入于掌握之中。葛福顺、李仙凫分兵二路攻玄德门、白兽门，杀守门将，三鼓，两军会师凌烟阁前。隆基帅总监及羽林兵亦入，在太极殿宿卫梓宫的诸卫兵，皆披甲响应。韦后仓惶逃入飞骑营，有飞骑斩其首献给隆基。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被斩。武延秀被斩于肃章门外。上官婉儿持烛率宫人迎接隆基，出示中宗遗制草稿，上有“相王旦参谋政事”，证

明她是早已支持相王的。隆基不为所动，下令斩之于旗下。但令收婉儿诗词撰成文集二十卷传世。继捕诸韦及韦后亲信皆斩之。拂晓内外皆定。隆基出见相王谢不先报告之罪。相王抱隆基而泣曰：“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宫，辅佐少帝。继而紧闭城门分遣禁军，搜捕诸韦亲党。韦温、宗楚客等皆被捕杀。

六月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命，让位于相王。二十四日，相王即位，是为睿宗。复以少帝为温王。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唐则天后圣历二年。

②《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③上官婉儿，上官仪的孙女，上官仪因为高宗草拟废武后诏而被杀后，婉儿随母没入掖庭，及长，有文词，明习吏事，因忤旨当诛，武则天惜其才不杀，只黥其面，圣历以后为武则天掌文书。

④《资治通鉴》唐中宗神龙元年。

⑤《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二年。

⑥《资治通鉴》唐中宗景龙元年。

⑦《新唐书》《崔日用传》。

⑧《资治通鉴》唐睿宗景云元年（710）。

隋唐五代

"开元之治"

唐玄宗明皇帝李隆基开元（713－741）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是唐朝极盛时期，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鼎盛时期之一，史称"开元之治"。

中宗景龙四年（710）六月，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共谋起兵讨韦后，杀韦后、安乐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儿及诸韦亲党，武氏宗属亦诛死流窜殆尽。睿宗即位，立隆基为皇太子，任用姚元之、宋璟两宰相，但政局并未因之而获得稳定，原因来自太平公主。

太平公主（武后女），深沉聪慧多权略，武后时特承恩宠，军国大事每预谋议，贵盛无比。神龙元年预谋诛张易之有功，进号镇国太平公主。在诛灭韦党拥立睿宗之政变中又立大功，加实封五千户通前满万户。睿宗常与谋议大政，权倾人主，"军国大政，事必参决，如不朝谒，则宰相就第议其可否"①。"公主所欲，上无不听，自宰相以下，进退系其一言，其余荐士骤历清显者不可胜数"②。

太平公主深忌太子隆基英明干练，欲改立懦弱者以巩固其

权势，乃集结党羽，散布流言，说“太子非长不当立”。睿宗景云二年（711），太平公主邀宰相于光范门，提议改易太子，众皆失色，提议遭拒绝，太平公主与太子的矛盾已公开化。宰相姚元之、宋璟、张说为维护太子的地位，密奏睿宗并获准：命太子监国，安置太平公主于蒲州，宋王、豳王皆出为刺史。太平公主闻之大怒，指责太子，太子恐惧，上奏姚元之、宋璟离间姑侄、兄弟关系，请处以极刑。睿宗为应付太平公主，贬姚、宋为远州刺史，继而宰相韦安石等五人皆罢政事，以刘幽求、魏知古、崔湜、陆象先为相，任免皆按太平公主之意。太极元年（712）七月，慧星出西方，太平公主使术士言于睿宗曰：“慧所以除旧布新，……皇太子当为天子。”其原意本拟借此挑拨睿宗猜疑防范太子，但睿宗却决计传位太子。太平公主力谏，以为不可。睿宗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太子固辞，睿宗曰：“汝为孝子，何要待柩前然后即位也！”诏传位于太子。八月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李隆基虽登皇位，太平公主的权势仍在发展，宰相七人中四人依附太平，满朝文武，“太半附之”。双方矛盾日趋尖锐。先天二年（713），太平公主与宰相窦怀贞、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密谋于七月初四率羽林兵入宫，废掉玄宗。宰相魏知古闻讯立报玄宗，玄宗与宰相、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等先发制人，引兵入宫斩常元楷，控制羽林军。大事捕杀太平党羽，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方出，赐死于家。

自神龙元年（705）正月武则天退位到诛杀太平党羽，为时八年半，政局动荡不安，七度政变，四易皇帝，至铲除太平公主才结束这一混乱局面。玄宗初年迫切需要稳定政局，为此

玄宗采取如下几项措施：一是加深同胞兄弟的手足之情，以免离心离德。同时对诸王严加限制，不授实职，不给实权，禁朝官与诸王往来以削弱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玄宗"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同寝，……退则相从宴饮斗鸡击球，或猎于近郊，游赏别墅，……然专以声色畜养娱乐之，不任以职事。……以宋王成器兼岐州刺史……令到官但领大纲，自余州务，皆委上佐主之"③。开元元年（713）宰相张说密见岐王范，事为姚崇揭露。张说被贬为相州刺史，逐出京城。二是贬斥恃功邀求权位的功臣。他们多参加诛韦后，诛太平公主两役，因立功身居要职，居功自傲，贪求无厌，动辄心怀不满。玄宗对之亦不姑息迁就。开元元年（713）十一月命中书侍郎王琚兼御史大夫，按行北面诸军，将其派出京城。十二月宰相张说和刘幽求同时被免职，张说左迁相州刺史，刘幽求罢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年（714）贬刘幽求罢为陆州刺史，钟绍京为梁州刺史，王琚为泽州刺史。开元五年（717）太常卿姜皎解职，放归田园。开元十九年（731）开府仪同三司、内外闲厩监牧都使霍国公王毛仲，求为兵部尚书不得郁郁不乐，形于词色。宦官高力士乘机进谗言。王毛仲贬瀼州别驾，中途赐死。三是任用名相。玄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卅年未曾不四更即起"④，忧勤国政，谏无不从。决心起用姚崇为相，政绩显著，屡建战功。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借渭川打猎之机，召见姚崇，要他出任宰相，因其才兼文武，"吏道敏捷"，在武周和睿宗时期两度出任宰相。姚崇上献"十事"，包括稳定政局、防止国亲外戚宦官干预朝政；结束酷吏政治施行仁政；整顿吏治，国亲不任台省官，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严格执法赏罚分明；不求边功，停建寺观，除租庸赋税外杜绝额外

贡献等方面，玄宗一一允诺陆续施行。“十事”实亦为姚崇出任宰相后的施政纲领。姚崇拜相后开元三年四年，山东诸州连续蝗灾。蝗虫食苗，“声如风雨，”民或于田旁设祭而不敢捕杀。姚崇奏遣御史督州县捕埋治蝗。朝野内外多人反对，另一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蝗太多，恐伤和气，玄宗颇为犹豫。姚崇坚主治蝗，并谓“若使杀蝗有祸，崇请当之”⑤。玄宗始下决心，派御史至诸道督州县组织捕蝗。“获蝗一十四万石，投之汴水，流下者不可胜数”⑥。故连岁蝗灾尚未出现大饥荒，这对稳定政局，发展经济颇为有利。姚崇因两子及亲信受贿，数请避相位，荐宋璟以自代。开元四年（716）末姚崇罢相，宋璟继为宰相。“姚宋相继为相，……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⑦。由于上述措施，稳定了政局，奠立了开元之治的基础。姚宋之后任宰相的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暹、韩休、张九龄等，“皆得贤才”，这也是太平盛世的基础。

在姚崇等辅佐下，玄宗注意整顿吏治。首先废除酷吏，开元二年（714）诏周利贞、裴谈等十三人“皆酷吏，宜终身勿齿（永不录用）”⑧。继而罢免冗官，五月下令全部罢免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规定此三项官今后非有战功及别敕特行录用外，吏部和兵部不得给授。严格控制官吏选授，开元四年，有人反映县令选授，不得其才，及新选县令入宫辞谢，玄宗召入宣政殿，试以安人策，只鄄城令韦济文理第一，升为醴泉令，余二百人不及格，且令上任，另四十五人回家读书。定内外官互换制，开元二年下令“选京官有才识者除都督、刺史，都督、刺史有政绩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为恒式”⑨。改变重京官轻外官的风气。同时并加强对官吏的监察，上述措施

有利于澄清吏治。

于整顿吏治的同时，着手改善“府库空虚，人力凋弊，造作不息”的财政匮乏状况。措施之一是禁抑奢靡。开元二年七月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宜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并规定百官服带、酒器、马衔、镫，三品以上以玉为饰，四品以金，五品以银，以下皆禁止使用。开元二年九月颁布《禁厚葬制》，指出厚葬之为害，令所司据品位高低明加节制。“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⑩。措施之二是沙汰僧尼。中宗以来，贵戚争建佛寺，私度僧尼，建寺规模壮丽，所费巨万。“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⑪。且因僧尼免缴赋税免服劳役。於是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达官贵人倚势建佛寺度僧尼，隐占人丁户口，增加私产收入。造寺不止国家开支日增，度人无数，国家收入日减，府库自然空虚。开元二年（714）正月，玄宗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因伪度而令其还俗的一万二千余人。二月下令自今严禁创建新寺，旧寺维修亦需经有司检视允准。七月下令禁百官家与僧尼道士往还，禁人间铸佛写经。这一措施有利于改善财政匮乏的状况。措施之三是改革食封制度。唐初实封家不过二三十家，中宗时增至一百四十余家，庸调绢流入实封家每年达一百二十余万匹，政府收入多则不过百万匹，少则七八十万匹，是所谓“国家租赋，太半私门”⑫。玄宗即位后虽在几次政变中一些实封家被诛杀，封家对国家赋税收入的分割有所减少，但问题并未完全解决。开元初年公主食实封由几千户甚至上万户改为五百户。诸王及长公主亦皆减少；并规定封户“通以三丁为限”⑬，封家占有封丁数受到限制。封家的实封户数和丁数的

削减使封建国家收入增加。与此同时封物的征收办法亦由封家直接向封户征收，改为政府向封户征收租调，封家向官府领取。食封制度的改革，有利于改善国家财政状况，也有利于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由于政局稳定，吏治较为澄清，国家财政状况获得改善，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开元年间生产发展经济繁荣。是时土地垦阔，“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估计在八百万顷至八百五十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⑭。耕地面积扩大，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⑮。“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州（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⑯。反映出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兴旺，道路畅通，行旅安全的繁荣景象。开元天宝年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迅速上升。开元二十年（732）全国户7861236，口45431265，比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天宝十四年（755），全国户增至8914709，口52919309，是为唐代最高人口统计数。如连逃户计算在内，杜佑估计唐天宝年间全国人口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户，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当时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人。

经济的繁荣推动了文化的昌盛，唐诗是唐代灿烂文化的结

晶，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顶峰。而开元天宝时期即所谓盛唐时期的诗尤为光彩夺目。著名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王昌龄、高适、岑参、孟浩然等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李白、杜甫都曾受玄宗赏识、唐朝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亦培育于这个时代。其他绘画雕塑等艺术以及科技医药等方面无不成就显著，僧一行主要活动于开元时期。

国力强盛，国威远扬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高宗以后，吐蕃强大，后突厥复兴，契丹崛起。不少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又脱离唐朝的控制。玄宗加强多事地区的驻军。开立屯田，充实防务，设立节度使，统一指挥战守。收复失陷州县；防止吐蕃势力北上；与后突厥化干戈为友好往来；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与中亚西亚交通顺畅。唐帝国声威远达西亚，事迹将在另题叙述。

《通典》卷六《食货典》《赋税》下所载天宝时总的收支情况，岁入五千七百余万端屯匹贯石，发出五千四百余万，所余三百万左右。故天宝年间虽军费增加五六倍，宫中用度日奢，对臣下赏赐无节，而政府仓库存粮和库府钱帛仍不断增加。天宝八载（749）官仓存粮共九千六百余万石⑰，相当于国家四年的粮食收入。

开元时期繁荣强盛的同时，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农民大量逃亡，均田制、府兵制及租庸调制濒临崩溃，节度使拥兵太盛，而内地军备废弛，内轻外重，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八三《太平公主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〇九，唐睿宗景云元年。

③《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二年。

④终南山楼观台《老子显见碑》。

⑤《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三年。

⑥《唐会要》卷四四《螟蜮》。

⑦《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二七玄宗开元四年。

⑧《新唐书》卷二〇九《酷吏传》。

⑨《资治通鉴》唐玄宗开元二年。

⑩《旧唐书》卷八《玄宗上》。

⑪《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

⑫《旧唐书》卷八八《韦嗣立传》。

⑬《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

⑭汪篯：《隋唐史论稿·唐代实际耕地面积》。

⑮《元次山集》卷七《问进士第三》。

⑯《通典》卷七《历代盛衰户口》。

⑰《通典》卷一二《食货·轻重》按其下分别记载各种仓库存粮数总和则为一亿二千三百七十余万石。

隋唐五代

唐蕃和战

吐蕃是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中叶藏族在青藏高原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

约两千多年前，西北地区部分羌族陆续迁徙，逐渐与青藏高原土著居民融合，成为藏族的祖先。他们分为许多部落，散处于青藏高原广大地区。公元六世纪时西藏地区各部族开始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畜牧业仍是重要生产部门，饲养牦牛、马、骡、狗、羊、猪等。部分居民已过定居农业生活，使用两牛牵引一犁耕地，种植青稞麦、小麦、荞麦和豌豆等，并兴建高地筑池蓄水，低地泄水入河的排灌工程，手工业已能采炼金属矿物，制造精良的金、银、铜、铁等生活用品和武器。

约在隋时，居住在今西藏山南地区西雅隆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其君称赞普（雄强丈夫之意），相称大论、小论。其人民喜用赭色涂面以避风寒。“无文字，刻木结绳为约……军令严肃，每战前队皆死后队方进。重兵死，恶病修，累代战没以为甲门；临阵败北者悬狐尾于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俗耻之”①。其武器精良，铠甲坚利，战士全身披甲，

唯开两眼，可挡劲弓利刃。以五行（金、木、水、火、土）和十二属相纪年，以麦熟时为岁首。其时雅隆部落成为西藏地区最强大的部族，其首领朗日论赞的统治已为吐蕃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统一西藏地区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朗日论赞在奴隶主集团互相争夺中被毒死，其子尺松赞②继赞普位，因其对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密切藏汉两族关系有重大功绩，死后藏族人民追谥他为“干布”（大德之意），故藏文史料都称他为“松赞干布”（即庄严大德王）。松赞干布即位时年仅十三，当时国内混乱，父王诸官和母后诸族举兵公开叛乱，与羊同、苏毗诸部内外呼应。松赞干布“骁武多英略”“少年奋发”，在叔父论科耳和宰相尚囊等帮助下，查出阴谋进毒为首诸人，将其满门抄斩，消灭了宫廷内部的敌对力量。又团结支持王朝的力量，用二三年时间组织训练了一支精锐军队，随即出兵平叛，攻取叛乱者所据地区。平定内乱后，决定迁都逻些（今西藏拉萨）③，因其形势险要，原野秀美，布达拉山居高临下，雄峙原中，就布达拉山修筑王宫，即碉堡式的布达拉宫。迁都后据有了西藏高原的心脏地区，接着征服了强大的苏毗、羊同等部，统一西藏高原，更巩固了奴隶制政权。松赞干布在位期间，创立文字即今藏文，厘定法律、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参考唐历制定藏历，采取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措施。继而向境外用兵，击败已臣属于唐朝的吐谷浑和党项。

贞观八年（634）十一月松赞干布遣第一批吐蕃使臣访问长安，乃请婚。太宗遣使者冯德遐到吐蕃回访慰抚。吐蕃闻突厥、吐谷浑皆与唐通婚，复遣使随德遐入朝，以重礼奉表求婚，太宗未允。吐蕃疑吐谷浑从中作梗，遂发兵击吐谷浑，吐

谷浑战败遁于青海之北，民畜多被吐蕃掠取。吐蕃继破党项，白兰诸羌，屯兵二十余万于花州（今四川松潘）西境，遣使贡金帛欲迎公主。继而进取松州，打败唐军。唐以侯君集为行军大总管，领步骑五万击之，贞观十二年（638）九月败之于松州城下，吐蕃退兵遣使谢罪复请婚。太宗许之。贞观十四年（640）松赞干布命大相（宰相）禄东赞献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妻之。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送文成公主入吐蕃，带去大批丝织品、手工艺品，还有史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医方一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还有芜菁（通称大头菜）种子和其他谷种。还带着通晓所带书籍的文士和制造各种物品的工匠以及乳娘、宫女、乐队等。一行人显示了唐朝国力的充沛和中原文化的繁荣，成为一支传播中原先进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队伍。

松赞干布到吐蕃东部边境柏海（今青海扎陵湖）迎接公主，以婿礼见道宗。日后，唐封他为附马都尉西海郡王。公主到逻些时，吐蕃人民着节日盛装迎接联络汉藏民族友谊的赞蒙（藏语王后）。松赞干布谓所亲曰："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示后代。"④以尊重汉族的风俗习惯，在逻些为公主修筑了唐式宫室。松赞干布也改服唐人服装，派遣贵族子弟到长安入太学学习诗书，聘唐朝文士掌管与唐往来文书。留长安学习的吐蕃人多有成就，唐高宗时吐蕃使臣仲琮，唐中宗时使臣明悉列，皆为著名汉学者。文成公主信仰佛教，在逻些修建小昭寺，协助泥婆罗（今尼泊尔）尺尊公主（亦松赞干布妻）修建大昭寺。她所带释迦牟尼像仍保存在大昭寺。松赞干布向唐请求给予蚕

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随文成公主入藏的工匠把中原地区的农具制造、农业技术、纺织、缫丝、建筑、造纸、酿酒、制陶、碾硙、冶金等生产技术传入西藏。唐人陈陶《陇西行》诗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说明她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影响很大。文成公主于高宗调露二年（680）去世，在吐蕃生活近四十年，对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促进作用。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结婚的故事以及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的形式在汉藏民族间广泛流传。拉萨市的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内还供奉着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塑像；布达拉宫里还保存着他俩结婚的洞房遗迹。两人的陵墓也巍然尚存。汉藏人民自此结成亲如一家的亲戚关系。

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使臣王玄策出使天竺，东、西、南、北四天竺皆遣使入贡，适中天竺王死，大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攻玄策，尽掠诸国贡物，松赞干布为王玄策发精兵一千二百人攻打中天竺，俘阿罗那顺。高宗初即位，松赞干布致书于长孙无忌等：“天子初即位，臣下有不忠者，当勒兵赴国讨除之。”⑤唐朝和吐蕃王朝建立起密切的政治关系。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吐蕃与唐发生多次战争。

高宗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卒，其孙继位，赞普年幼，大相禄东赞专掌国政，此后五十年间，吐蕃军政大权一直为其家族控制。为了夺取新的土地、奴隶和财富，高宗显庆五年（660）禄东赞遣其子起政率兵击吐谷浑，三年后禄东赞自率兵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为吐蕃所败，率数千帐弃国奔凉州，请徙居内地。唐命苏定方节度诸军援吐谷浑。禄东赞屯兵青海，遣使请和亲。高宗不许，遣使责备吐蕃。咸亨

元年（670），吐蕃陷西域白州等一十八州，又与于阗合众陷龟兹拨换城。唐罢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以右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左卫将军郭待封为其副率军十余万击吐蕃，并援送吐谷浑还故地。郭待封先与薛仁贵并列，及征吐蕃耻居其下，遇事多违其意。军至大非川（今青海共和县西南切吉旷原），将攻乌海（在青海），薛仁贵命留辎重于大非岭，率精锐部队轻装速进，倍道兼行，攻其不备。仁贵率所部大破吐蕃兵，进屯乌海，以俟待封。待封不用仁贵策，与辎重徐行，未至乌海，遇吐蕃兵二十余万，交战大败，尽弃辎重，逃回，仁贵退屯大非川。吐蕃相论钦陵率兵四十万猛攻，唐军大败，死伤略尽，与吐蕃约和而还。吐谷浑故地皆入于吐蕃。四镇土地亦大部为吐蕃所有。

周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唐休璟请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武则天以王孝杰知吐蕃虚实，命为武威军总管，与阿史那忠节等率军击吐蕃，大破吐蕃军，复取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屯兵镇守。其后唐与吐蕃于西域青海两地多次争战，胜败略等。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吐蕃大相论钦陵遣使请罢四镇戍兵，并求分西突厥十姓土地。武则天采郭元振议，答以若吐蕃归还吐谷浑诸部及青海故地，则以五弩失毕部归吐蕃，对其要求缓拒之。周圣历二年（699）吐蕃内讧，大相论钦陵兵溃自杀，大将论赞婆帅所部千余人来降，论钦陵子论弓仁亦率吐谷浑七千帐降唐，武则天封论赞婆为郡王，论弓仁为郡公，使率众为唐守边境。

至弃隶缩赞赞普时，吐蕃对唐政策有大改变。由于王室内部争权激烈，整个吐蕃地区统治不稳，急于与唐通好，以加强赞普的统治。中宗景龙元年（707），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金

城公主妻弃隶缩赞赞普。景龙三年（709）赞普遣其大臣尚赞咄等千余人迎金城公主。景云元年（710）一月，金城公主往吐蕃，命左骁卫大将军杨矩送之。中宗自送公主至始平（今陕西兴平，距长安约五十里），隆重的迎送表示双方对此十分重视。金城公主喜爱文艺，带去锦缯各数万匹，大批杂技百工、龟兹乐队，及《毛诗》、《左传》、《礼记》、《文选》等汉籍。进一步发展了汉藏两族的亲密关系。公主至吐蕃，赞普为公主别筑城以居之。是年十二月，吐蕃赂鄯州都督（今青海乐都）杨矩，请与河西九曲之地以为公主汤沐邑（帝、后、公主收取赋税的私邑，谓以其赋税供沐浴之用），矩奏与之。其地肥饶，水甘草美，颇宜畜牧。吐蕃就之畜牧，更便于攻扰唐陇右地区。杨矩悔惧自杀。唐不得不大力加强河西、陇右两节度所辖地区的设防。开元十八年（730）吐蕃数败请和，玄宗命皇甫惟明与内侍张元方使于吐蕃，弃隶缩赞赞普大喜，遣其大臣论名悉猎随惟明入贡，在上唐玄宗表文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⑥金城公主也多次为吐蕃请盟。开元二十一年（733），许金城公主之请，唐蕃和盟于赤岭（今青海湟源西日月山）立碑以分唐与吐蕃边境。由于两方守边将领贪图私利、邀功请赏，和盟后仍不时有战争发生。长期的战争导致唐蕃两王朝统治的削弱。

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唐陇西、河西及四镇兵力东调平乱，吐蕃乘虚据有陇右、河西，唐安西（今新疆库车）北庭地区初被隔绝，后亦沦陷。时在唐西南方的南诏因与唐失和亦降服吐蕃。此时吐蕃控制的区域，西达中亚，北至今新疆南部，东至今四川西部及甘肃陇山以西。幅圆之广阔，为

汉魏以来西方诸族所不及。鼎盛时期的吐蕃，在西方扼止占据波斯的大食向东发展。在南方与天竺泥婆罗为邻，有非常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东方不时与唐冲突，曾于代宗广德元年（763）攻入长安。是年十月，吐蕃率吐谷浑、党项、氐、羌二十余万众，经过泾州、邠州进至奉天、武功，京师震骇。代宗令以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兵度便桥，代宗仓猝奔陕州，六军逃散。吐蕃入长安，纵兵焚掠，长安萧然一空。吐蕃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郭子仪至商州，收散兵合武关防兵共四千人，乃泣谕将上共雪国耻，收复长安。渭北、鄜坊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合势进击。百姓骗吐蕃曰："郭令公自商州将大军不知其数至矣！"子仪又遣将入城，密结少年数百，深夜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率众遁去。其后仍不断攻袭唐关内道、夏等州。

德宗贞元五年（789）至贞元六年（790），吐蕃与回鹘为争夺北庭而激战。此后，回鹘与唐联合抵御吐蕃。贞元九年（793）南诏亦脱离吐蕃控制，遣使上表归唐。吐蕃处境孤立，势力削弱。穆宗长庆元年（821）吐蕃可黎可足赞普遣专使礼部尚书论纳罗来求盟，穆宗以大理卿刘元鼎为吐蕃会盟使。隆重的会盟仪式先后在唐朝国都长安西郊（821）和吐蕃国都逻些东郊（822）举行，盟文曰："……自今而后，屏去兵革。宿忿旧恶，廓焉消除，追崇舅甥，曩昔结援，边堠撤警，戍烽韬烟，患难相恤，暴掠不作……"⑦双方预盟官员宰相以下各于盟文后自书名。长庆三年（823）建立《唐蕃会盟碑》。碑文汉文部分写道："……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封境……"⑧藏文部分写道：

“甥舅和协，扫彼旧怨，泯其嫌隙，喜兵革之不作，惟亲好之是崇……”⑨此碑至今仍屹立于拉萨大昭寺门前，成为汉藏两族人民历史情谊的见证。这次会盟结束了唐蕃之间的长期战争，体现了汉藏人民亲谊的进一步发展。

武宗会昌二年（842）吐蕃达磨赞普卒。无子，佞相立其妃兄子乞离胡为赞普，只三岁。佞相与妃专权，杀首相结都那。国人愤怒。大将论恐热举兵自称国相。吐蕃大乱。宣宗大中三年（849），吐蕃三州七关降唐。大中五年（851）沙州汉人张义潮乘吐蕃大乱，率众起义，赶走吐蕃统治者，奉表归唐，略定十州后以之为归义军节度使。河湟之地陷吐蕃百余年，至是尽入于唐。懿宗咸通七年（866），鄯州守将拓跋怀光，擒斩论恐热，其部众溃散，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

自松赞干布至达磨，吐蕃赞普共九人，历时218年，吐蕃王朝瓦解后，宋、元及明初，史籍仍泛称青藏高原及当地人民为吐蕃或西蕃。

吐蕃和唐朝统治者之间虽然进行过多次战争，但双方关系的主流还是友好的。自文成公主入藏后吐蕃即尊唐主为舅而以外甥自居，双方使节往还频繁。据统计自贞观八年（634）第一批吐蕃使臣访问长安，至会昌六年（846）吐蕃王朝瓦解的213年间，双方遣使达191次，平均一年零一月即有一次⑩。人数多者五十余人至百余人，少者也有十余人。吐蕃使臣多长期居留长安，有时达十余年乃至数十年之久。使节的往还商旅的交易促进了汉藏两族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

注释

①《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②或称弃宗弄赞、弃农赞，皆为唐代汉文史籍异译。松赞是其本名。

③赞普原居琼巴达则，汉文史籍称匹播城或跋布川，在今西藏穷结县。

④《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⑤《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三年。

⑥⑦《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

⑧《唐蕃会盟碑》汉文部分拓片。

⑨《唐蕃会盟碑》藏文部分译文。

⑩王忠：《唐代汉藏两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65年第五期54页。

隋唐五代

南诏归唐

南诏是唐代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在今云南地区建立的奴隶制边疆民族政权。乌蛮与今彝族有亲缘关系。白蛮与今白族有亲缘关系。

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多，难以胜计。汉族进入云南，设置若干居住点，开始传播先进文化。战国时楚威王派将军庄蹻率兵略地到滇池，因归路断绝就以滇池为中心建立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汉武帝遣将军郭昌灭滇国，置益州郡。东汉增置永昌郡（治不韦，今云南保山县北）。诸葛亮平定南方后又增置兴古（今云南马龙县）、云南（今云南祥云）二郡。

战国以后许多汉人陆续移居云南，和土著居民长期杂居通婚，形成了白蛮族。白蛮的文字、语言、风俗大致与汉族相同①。白蛮过农耕生活，在洱海和滇池周围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经济。唐初，洱海周围有成百个被称为“河蛮”的白蛮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诸部以赵、李、杨、董等姓为首领，各据一地，互不统属。在离洱海较远的四周，则散居着乌蛮部落。乌蛮受汉族影响较小，有些乌蛮部落，语言需三

译四译才能与汉族相通。唐初乌蛮仍以畜牧为业，不知耕织，多牛羊，无布帛，用牛羊皮制衣服。乌蛮妇人著黑色衣服，衣长曳地，白蛮妇人著白色衣服，长不过膝。

七世纪初叶至中叶，乌蛮部落不断向洱海地区迁移，他们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建立了六个诏。乌蛮称王为诏，六诏即六个王国、六诏的名称和居地如下：

一、蒙巂诏——居地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

二、越析诏——居地在今宾川县。

三、浪穹诏——居地在今洱源县。

四、邆赕（音藤闪）诏——居地在今邓川县。

五、施浪诏——居地在今洱源县东。

六、蒙舍诏——居住在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西北境。因地居五诏之南，故又称南诏。

蒙舍诏首领姓蒙，始祖名蒙舍龙。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舍龙孙独罗（又名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遣使入贡，臣属于唐。武则天时，细奴逻子逻盛亲自入朝。七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吐蕃势力进入洱海地区北部。唐朝为削弱牵制吐蕃，对“六诏”采取扶植、联合策略。“天子每有恩赏，各颁一诏”②。五诏受吐蕃威胁，常弃唐归附吐蕃。南诏距离吐蕃最远，受威胁较小，故仍依附于唐朝。六诏之间虽有婚姻关系，但常彼此争夺。唐玄宗为了抵御吐蕃，极力支持南诏进行统一战争。从开元初至开元末，经过二十余年战争逻盛之孙皮逻阁相继兼并其他各诏，基本上统一了洱海地区，建立了统一的南诏国。开元二十六年（738）唐朝册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赐名蒙归义。开元二十七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故址在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

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了据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东居民以乌蛮为主，西居民以白蛮为主，西居地在滇池周围），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扩大了疆域。南诏最盛时大致占有今云南及四川、贵州的一部，“回环万里”，成为西南少数民族所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

南诏政权建立后，同唐朝基本上保持友好关系。十三代南诏王中，有十个接受过唐朝的委任和册封，有的还与唐朝皇帝建立了“兄弟若舅甥”的亲密关系③。但自南诏向外扩张，占据了爨地之后，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亦向云南地区发展势力，双方在争夺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上也存在矛盾。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而唐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即姚州）太守张虔陀等狡狯无谋，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天宝九载（750）因南诏王携妻子进见都督，路过云南，云南太守张虔陀竟侮辱同来妇女，对南诏又多所征求，南诏王阁罗凤忿怨，发兵攻陷姚州，杀张虔陀，取夷州（西南夷归附后所设之羁縻州）三十二。次年，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八万攻南诏，南诏王阁罗凤谢罪请和，并谓：“今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我，我将归命吐蕃，云南非唐有也。”④仲通不许，进军至西洱河，与阁罗凤交战，唐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杨国忠掩其败绩叙其战功。阁罗凤遂背唐而北附吐蕃。吐蕃封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以金印，号称“东帝”，自建国号大蒙。阁罗凤在太和城刻立《南诏德化碑》，说明他不得已而叛唐，并说：“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非本心也。”⑤时杨国忠升任宰相，继续征

调天下兵以攻南诏。天宝十三载（754），命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击南诏，阁罗凤诱之深入，至太和城，坚守不战，唐军粮尽，又罹瘴疫，退兵遭追击，全军覆没，李宓被擒。杨国忠假报战功，继续发兵征讨，前后死者达二十万人。白居易《新丰折臂翁》充分暴露攻打南诏的覆败和人民因此而受到残酷奴役的情形。

安史之乱起，阁罗凤会同吐蕃乘乱于肃宗至德元年（756年）陷嶲州（唐治所在越嶲，今四川西昌），获唐西泸县令郑回，阁罗凤爱重其学识，子凤迦异，孙异牟寻，曾孙寻梦凑皆拜郑回为师，“每授学，回得挞之”。时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于大历十四年（799）与吐蕃合兵十万攻袭剑南西川，为唐所破，吐蕃南诏兵饥寒交加，坠落崖谷而死者八九万人。吐蕃以南诏为属国，不断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进驻其险要地带，南诏王异牟寻不堪骚扰，时郑回已被任为清平官（相当唐的宰相）专决国事，因劝异牟寻复归于唐，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亦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贞元五年（789），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向南诏征兵万人，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吐蕃以为少，乃增至五千，引起南诏不满。贞元十年（794）唐使崔佐时至南诏，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已到达。崔佐时密见郑回，尽知内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与封号，献其所给金印，恢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并率其子寻梦凑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异牟寻按与吐蕃前约，遣五千人前行，自率万人随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大

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继而遣使献地图及吐蕃所给金印，请恢复南诏旧名。唐以袁滋为册南诏使，赐金印，文为“贞元册南诏印”。此后四十年间，双方一直保持着和好联系。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南诏统治者为了掠夺奴隶和财富，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太和三年（829）出兵攻入成都，“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⑥，自是南诏工巧等于蜀中。

九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亦极衰弱，南诏既无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南诏统治者“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这些掠夺战争给汉族劳动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也使南诏劳动人民受到很大损害。在汉族人民坚决抗击和南诏人民不断反抗下，南诏统治者不得不停止对唐的战争。双方又恢复和好关系。僖宗时，南诏统治者向唐求婚，中和三年（883）唐以宗室女为安化长公主，妻南诏王。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中央官制——清平官六人，决国事轻重，职位等于唐朝宰相。又有大军将十二人，随清平官每日见国王议事。清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代国王判押处置文书。外算官二人，或清平官或大军将兼任。外算官领六曹。六曹相当于唐朝六部，初期为兵曹、户曹（掌户籍）、官曹、法曹、士曹（掌营造工程）、仓曹（掌财政）。后期改六曹为三托、九爽。三托是：气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地方官制——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分为十睑（音简，相当唐朝的州），其中六睑为南诏国家直接统治地

区。其余四睑，为拱卫中心地区的重镇，由国王的子弟镇守。平民实行军事编制，“百家有总佐一，千家有治人官一，万家有都督一”⑦。各地方一万家设都督一人，南诏共设两都督。另设六节度使分兵驻外围要害地方，统治六诏以外诸部落。对外剑川、丽水两节度使防吐蕃；拓东、弄栋两节度使防唐剑南。

南诏采用唐均田制和府兵制，王室贵族、高级官吏和军将等所谓“上官”，授田四十双（每双合汉亩五亩，共二顷）。“上户”授田三十双，“中户”和“下户”依次减授，大约分别为二十双和十双。乌蛮和白蛮的统治者均属“上官”或“上户”，是奴隶主阶级，他们使用奴隶耕田和服役。“中户”和“下户”是自由民，他们除每年每户向国家纳税米二斗外，还要服兵役，并自备武器，马匹及军粮。每年十一、十二两月，农事完毕，兵曹长行文至城邑村谷，集合队伍，操练武艺，检查器械。出兵征战，每兵自带粮米一斗五升，鱼干若干，此外别无给养。因带粮不多，急求决战。作战时南诏王派高级官吏监视，军法规定，兵士前面受伤，允许治疗，背部受伤，即行杀戮。行军出国境后，不禁止抢掠。邻国的人口、粮食、牛羊都成掠夺对象。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天宝四年（745）南诏王皮逻阁曾派其孙凤迦异入朝到长安，唐玄宗任其为鸿胪少卿，将一宗室女子嫁给他，回去时并送给他许多文物和胡部、龟兹两个乐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唐朝后期五十年中学成回国的人“殆以千数”。在成都就学的南诏子弟张志诚，得王羲之、王献之书法字帖，带回后广为传播，多人学习。南诏把晋右军将军王羲之视为圣人，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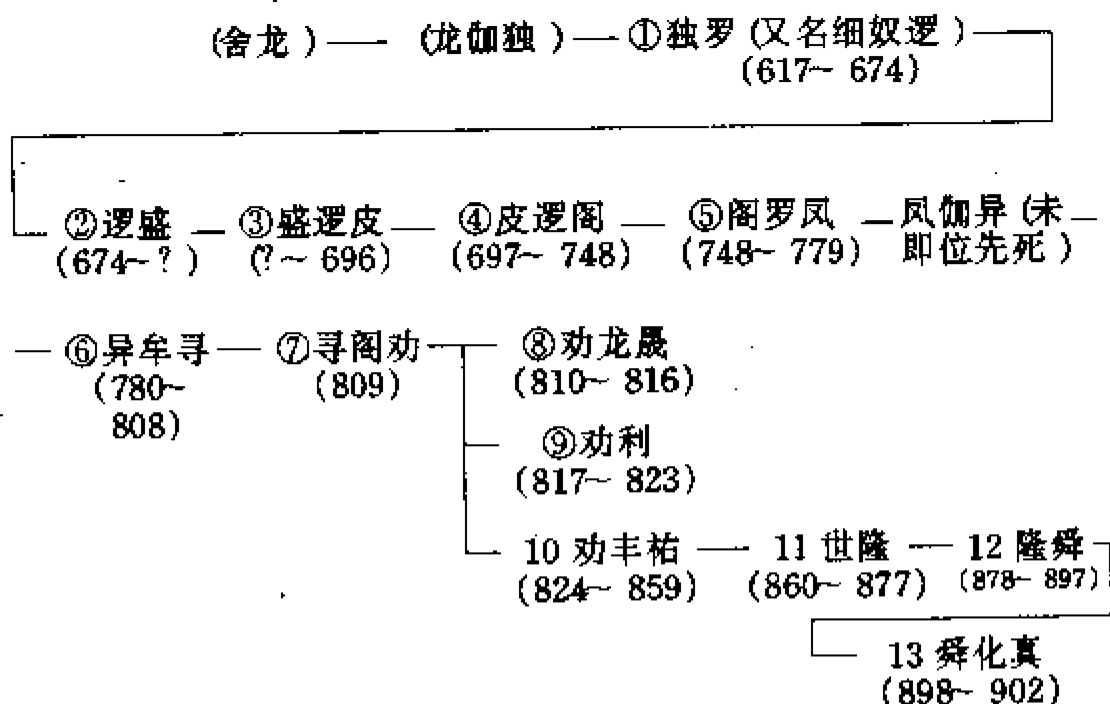
建右军将军祠。郑回没入南诏后，大力传播儒学，大量输入唐文化，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出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中。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了很多工农业生产技术。如天宝十五载（756）南诏攻陷唐巂州，"子女玉帛，百里塞途"⑧，大批汉族劳动者进入南诏，自然传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前述被俘的成都工匠入南诏也起了这样的作用。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汉族工匠恭韬、徽义设计建成的云南大理崇圣寺三塔即出现于南诏时期，至今仍矗立于苍山、洱海之间。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矛盾激化，唐昭宗乾宁四年（897），沉湎酒猎不理国事的南诏王隆舜为其臣下杨登所杀。唐昭宗天复二年（902）南诏执政大臣郑买嗣（郑回七代孙）乘政治混乱民怨沸腾，杀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灭蒙氏王朝，另建大长和国，南诏亡。

自贞观二十三年（649）独罗（又名细奴逻）称王，至此共254年，传十三主。南诏边疆民族政权的建立，促进了云南地区的开发，促进了云南各族的融合，密切了云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对我国历史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附：

南诏世系表



注　释

①《通典》卷一八七《边防》谓白蛮“有文字”，字形与汉文相近；知历法，以十二月为岁首。据考古和民族调查，八世纪南诏时期有“百文”，形近汉字，其创用当在此之前，可证《通典》的记载。

②《全唐文》卷七四四卢求《成都纪序》。

③《新唐书》卷二二二中《南诏传》。

④⑤《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唐纪三二，玄宗天宝十载。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纪六十，文宗太和三年。

⑦《新唐书》卷二二二上《南诏传》。

⑧《全唐文》卷九九九《南诏德化碑》。

隋唐五代

回 纥 内 附

回纥，唐代漠北操突厥语的民族之一；后亦为以回纥族为核心建立于漠北的游牧汗国名。

回纥为古代丁零人的后裔，丁零活动于北海（贝加尔湖）以南独洛水（土剌河）以北一带地方。西汉时丁零居匈奴北，匈奴曾北服丁零。丁零俗多乘高车，南北朝时也称为高车部。高车部有敕勒，铁勒等名称，与丁零皆同一名词的音译。隋唐时称铁勒。回纥在北魏时为高车或铁勒诸部之一，作袁纥，隋代作韦纥及乌护，唐初名回纥，又作乌纥，是团结、联合、协助的意思。袁纥、韦纥、乌纥、回纥当时 Uirur 的对音，今译维吾尔。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自请改汉字译音为“回鹘”，取俊健如鹘之意。

回纥是铁勒诸部之一，铁勒有回纥、仆固、浑、拔也古、同罗、思结、契苾、阿布思和骨仑屋骨九个部落，历史上称为铁勒九姓。这九个部落形成部落联盟，其中回纥势力最强又统称为回纥，回纥部落自身由九个氏族组成，即药罗葛、胡咄葛、啒罗勿、貊歌息讫、阿勿嘀、葛萨、斛嗢素、药勿葛、奚

耶勿。这九个氏族有时被称为内九姓，以与铁勒九部相区别。九个氏族以药罗葛为首，后来回纥的可汗大多产生于这个氏族。

回纥传说中的祖先为卜可汗。高车初期六姓之一的袁纥、颇为强盛，与其他部落一起南迁漠南，有数万或数十万众，畜牧蕃息，渐知农耕。北魏统治者不仅在征服过程中屠杀高车人民，掠夺大批牲畜，而且在强迫高车南迁后，又经常征发他们服兵役，征收很重赋税。高车人民不堪压迫，不断举行反抗，太和十九年（495）孝文帝征发高车南征，高车人民推袁纥部树者为首领，相率北逃，孝文帝派大军追击，被打得大败而归。后来改为招抚，树者才率众投降。隋代到唐初，回纥的住地在娑陵水（今色楞格河）侧，位于铁勒另一部薛延陀之北。当时回纥与薛延陀、仆骨、同罗、契苾等铁勒诸部同役属于突厥，时服时叛。大业元年（605）西突厥处罗可汗残酷搜括铁勒诸部，“厚敛其物”，为镇压铁勒，又诱集各部首领百人，一起坑死。回纥联合仆固、同罗、拔也古等部起来反抗，各部首领都自号为俟斤，不再要突厥的承认。在反压迫的斗争中，回纥逐渐壮大，有“众十万，胜兵半之”①。

隋末，回纥部众推时健俟斤为君长，时健死，子菩萨被推为继位人。酋长世袭制开始出现，是回纥史上划时代的大事，菩萨智勇善战，贞观元年（627），铁勒诸部联兵反抗东突厥的统治，颉利可汗遣将率十万骑进击，菩萨率五千骑破突厥十万之众，回纥由是大振。贞观四年（630），唐擒东突厥颉利可汗，东突厥前汗国亡，漠北唯回纥与薛延陀两部最强。回纥曾服属于薛延陀，薛延陀多弥可汗暴虐，诸部离心。贞观二十年（646）多弥可汗攻唐，被唐击败，国内大乱。回纥酋长吐迷度

与铁勒其它部落共同助唐破灭薛延陀，并其部落，奄有其地，成为漠北唯一强部，回纥这一名称逐渐代替铁勒而成为东铁勒诸部的总称。

唐太宗灭薛延陀汗国后，回纥等部酋长皆请归附。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在漠北设羁縻府州，给回纥、仆骨等六部以府的名称，酋长称都督；又给浑、斛薛等七部以州的名称，酋长称刺史。漠北凡六府七州，隶属于燕然都护府（治故单于台，鄂尔浑河南流处）。唐任命都护统治诸部。唐太宗接受诸部酋长所上"天可汗"的尊号，并允在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条大驿道，分设六十八驿，各驿有马及酒肉，供往来贡使，称为"参天可汗道"。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酋长吐迷度接受唐所给怀化大将军兼瀚海都督名号，承认自己是唐朝的官员，属唐之燕然都护府管辖。吐迷度之后六代君长皆受唐都督称号。吐迷度在部落联盟内部却称可汗，建立起汗国来。在唐朝与西突厥的战争中，回纥积极出兵助唐，起了很大作用。武后时，东突厥后汗国兴起，回纥诸部再次受突厥贵族的奴役，回纥君长承宗与契苾、浑、思结等部迁往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之间，在河西居住四十余年，受中原文化影响不小；原留漠北的回纥余众这时则为后突厥役属。开元十五年（727），唐河西节度使王君㚟（音辍）虐待甘凉间回纥等四部，并诬告四部谋叛，玄宗将瀚海大都督回纥承宗、浑大德、贺兰都督契苾承明、卢山都督思结归国四人长流岭南。回纥诸部起兵袭杀王君㚟，逃入突厥，承宗子骨力裴罗即位。天宝元年（742），回纥、葛逻禄、拔悉密三部合兵攻杀突厥可汗骨咄叶护。推拔悉密酋长为颉跌伊施可汗，骨力裴罗和葛逻禄酋长为左右叶护。突厥余众之乌苏米施可汗。玄宗天宝三载（744），

拔悉密击斩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突厥余众立其弟为白眉可汗。于是突厥大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出兵破其左厢十一部。未几，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密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来告，玄宗册骨力裴罗为怀仁可汗。唐放弃瀚海都督名号，承认其可汗地位，说明回纥已是漠北唯一强国，唐不可能再保持燕然都护的权力。怀仁可汗南据东突厥汗国故地徙牙于乌德鞬山（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东支）与嗢（音蛙去）昆河（今蒙古鄂尔浑河）之间，其地当即哈剌巴剌哈孙废址。天宝四载（745），击杀突厥白眉可汗，回纥领土东接室韦，西到金山，南跨大漠尽有突厥故地。唐与回纥边境平静无事，呈现出一种历史上罕见的和好关系。

骨力裴罗自立为可汗后十年间，为汗国草创时期，巩固汗国，完备制度。最高统治者为可汗，次为可汗的子弟称特勤，别部领兵者称设（或译作杀），大臣有叶护、屈律啜、阿波、俟利发、达干、吐屯等共二十八等，如突厥旧制；可汗之下还置内宰相三人，外宰相六人，并有都督、将军、司马等官，这表明回纥汗国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既沿袭突厥游牧汗国的传统，又深受唐朝影响而具有二重性。

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欲借兵外夷以张军势。至德元载（756）遣敦煌王承寀（采的异体字）与仆固怀恩出使回纥，以请援兵。回纥可汗以女妻承寀，并遣贵臣同来，肃宗赐回纥女号毗伽公主。至德二载（757）回纥葛勒可汗遣子叶护率精兵四千入援，天下兵马元帅广平王俶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众十五万攻长安，与占据长安之十万叛军展开激战，大败之，斩首六万级。叛军弃城夜遁，大军入西京。初，肃宗欲速

得京师，曾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②城破后，叶护欲践约，广平王俶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回纥兵过城南东去。肃宗闻之喜曰："朕不及也。"西京收复后，安庆绪调集叛军十五万抗拒官军，郭子仪等与叛军战于新店，不利，回纥袭其后路，叛军惊呼："回纥至矣"！遂溃。官军与回纥夹击叛军，大败之。安庆绪仓皇弃东京走邺郡（今河南陕县）。广平王俶入东京，回纥纵兵大掠，意犹未足。洛阳父老敛集罗锦万匹送回纥，俘掠乃止。肃宗封叶护为忠义王，岁给回纥绢二万匹。乾元元年（758）册封葛勒可汗为英武威远毗伽阙可汗，肃宗以亲女宁国公主嫁葛勒可汗。帝送宁国公主至咸阳，公主辞别说："国家事重，死且无恨。"肃宗流涕而还。回纥立公主为可敦（可汗正室名号）。未及一年，葛勒可汗死，回纥欲宁国公主殉葬，公主曰："回纥慕中国之俗，故娶中国女为妇，若欲从其本俗，何必结婚万里之外邪！"宁国公主因无子，于是年八月回京师。

肃宗宝应元年（762）唐遣使于回纥，借兵助讨史朝义，登里可汗为史朝义所诱。有轻唐之意，唐令仆固怀恩往见可汗（怀恩女为登里可敦），始举兵入援，唐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节度使及回纥兵于陕州（治今河南陕县），进讨史朝义。雍王适至陕州，与僚属四人从数十骑往见回纥可汗，可汗责其不行督侄礼，雍王僚属与回纥将军车鼻力争久之，车鼻引雍王僚属四人各鞭一百，二人致死，以雍王适年少无知遣归营。诸军发陕州，三路会于洛阳，败叛军数万。史朝义悉其精兵十万救洛阳，官军骤击，叛军大败，斩首六万级，俘获二万人，副元帅仆固怀恩进克洛阳，史朝义率数百骑东走。回纥入

境，所过虏掠，三月方止，房屋殆尽，士民皆以纸为衣。次年登里可汗归国，带走全部掠获赃物。唐代宗为酬报回纥助战之功，册登里为颉咄登密施合俱录英义建功毗伽可汗，并规定唐买回纥马，年最高额为十万匹，马一匹换绢四十匹。唐虽连年内战需要补充军马，但回纥互市马病弱不堪军用，唐忍受损失照马数付价，以求边境平安。

自安史之乱以来，回纥与唐交往密切，受唐文化影响也比较明显，“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室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③。说明在唐的影响下，八世纪中叶后，回纥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建立城市、宫室，由游牧走向半定居生活。考古发掘证明：漠北有若干城郭，是回纥汗国时期建造的，其中哈剌巴剌合孙是回纥汗国的都城，城址占地二十五平方公里，中心部分有特殊的墙垣围绕着，面积有一平方公里。宫庭建筑装饰物是唐朝的风格。周围为人烟较稀的定居区。城堡不仅面积很大，残存的城垣还高达十公尺。这里不仅是回纥汗国的政治中心、商业中心，也是手工业的集中地区，在一所住宅的遗址中，找到松香、铜片和铜块，断定这是工匠的住宅。虽然回纥基本群众仍是游牧民，但贵族既习惯于城市生活，这就为后来在西域定居奠定了基础。回纥采用了开元历，直到西迁后仍继续使用。在昭武九姓胡的影响下，回纥日益重视商业活动，与唐进行大规模绢马互市，得马价绢，并购买茶叶及各种手工业品，除贵族自用外，势必向西域开辟交换市场。回纥商贾居长安者常有千人，九姓胡冒回纥之名杂居长安的还要加一倍，其他大城市也有不少。回纥人原信萨满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入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

教，登里可汗率兵击史朝义，攻入洛阳，接触摩尼教僧，并带四人归国，摩尼教传入回纥，并成为回纥的国教。

自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至唐文宗开成五年（840）的六十年间，回纥可汗共历十二代，其中四代在暴力夺位中被杀，六代通过暴力夺得汗位，政权极不稳定。从德宗贞元五年（789）起，回鹘与吐蕃争夺北庭，斗争极为激烈。自安史乱后，安西北庭两都护府孤悬塞外，当时吐蕃强盛，回纥扶助两府，共同抵御吐蕃。对双方都有利。但回纥统治者把两府看作附庸，征收苛重赋税，北庭受害更甚。原属北庭管辖的沙陀别部和原属回纥的三姓葛逻禄部和白服突厥部痕恨回纥的苛征暴敛，转附吐蕃。德宗贞元五年（789），吐蕃结葛逻禄、白服突厥攻北庭，回鹘大相颉干迦斯率兵救之，结果大败，北庭为吐蕃所有。次年秋颉干迦斯率全国兵数万进取北庭，又被吐蕃击败，士卒死亡大半。葛逻禄乘胜取回鹘的浮图川（在乌德鞬山西北）。回鹘震恐，悉迁其西北部落于乌德鞬山以南以避之。正因回鹘内外多事，这一时期虽自天亲可汗（名顿莫贺达干）起四代回鹘可汗先后与德宗女咸安公主成婚，但与唐朝往来明显减少。

贞元十一年（795）奉诚可汗死，原出跌（音协）跌氏的宰相跌跌骨咄禄立为可汗，唐封为怀信可汗，回鹘可汗位由药罗葛氏转入跌跌氏。怀信可汗两传到保义可汗时，大破吐蕃，取凉州，占领北庭和龟兹，击败葛逻禄，向西经略，势力远达真珠河（原苏联锡尔河上游纳伦河）及拔汗那（原苏联乌兹别克费尔干纳）一带。当时吐蕃衰弱，后吐蕃又击败回鹘收回失去的土地。

穆宗长庆元年（821）崇德可汗即位，唐以宪宗女太和公

主妻之。回纥与唐交往再度活跃，互市兴旺。文宗太和六年（832），回鹘内乱又起，又发生饥荒和疫病，大雪成灾，羊马多死。文宗开成五年（840）回鹘别将句录莫贺引黠戛斯兵十万骑攻破都城，杀𫩪馺（音咳飒）可汗及宰相掘罗勿，焚毁牙帐，掳去全部财物，回鹘汗国亡。

回鹘汗国崩溃后，诸部离散。一支为居于可汗牙帐附近的十三部共立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南下边塞降唐，未几发生内哄，乌介可汗被杀，遏捻特勤被立为可汗。后转依室韦和奚，逐渐消失。一支奔吐蕃占领下的河西地区，定居在甘州（今甘肃张掖）一带，与当地人民融合，即今天甘肃省裕固族的祖先。一支西迁天山北路由回鹘宰相馺（音飒）职拥庞特勤（回鹘可汗的外甥）等人率十五部西奔葛逻禄地区，庞特勤被推为可汗。后曾攻克西州、北庭、轮台等城，势力发展，掌握了唐通天山南北路的枢纽。一支西迁天山南路，可汗居西州，称西州回鹘，征服了天山南路各城居的农业国。可汗沿唐制，对内地朝廷称舅，自称为甥。西迁天山南北路的回鹘诸部，与当地居民长期相处，逐渐发展形成为维吾尔族。

回纥（鹘）可汗表

	君长名	唐封可汗名号	在位时间
漠北立国前	卜可汗（牟羽可汗）		传说中的祖先
	1. 时（特）健俟斤		隋末唐初
	2. 菩萨		627～?
	3. 吐迷度		? ～648
	4. 婆闰		648～661
	5. 比粟毒		661～680
	6. 独解支		680～695 或 715
	7. 伏帝匐		695 或 715～719
	8. 承宗		719～727
	9. 伏帝难		727
漠北回鹘汗国时期	10. 骨力裴罗	怀仁	727 之后～747
	11. 磨延啜	英武威远	747～759
	12. 移地健牟羽	英义建功	759～779
	13. 顿莫贺达干	武义成功长寿天亲	779～789
	14. 多逻斯	忠贞	789～790
	15. 多逻斯之弟		790
	16. 阿啜	奉诚	790～795
	17. 骨咄禄	怀信	795～805
	18. 俱录毗伽		805～808
	19.	保义	808～821
	20.	崇德	821～824
	21. 曷萨特勤	昭礼	824～832
	22. 胡特勤	彰信	832～839
	23. 廅馺特勤		839～840
	24. 乌介特勤		841～844、847 之间
	25. 遏捻特勤		? ～848
	26. 庞特勤	怀建	? ～?

注 释

①《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

②《资治通鉴》卷二二O，唐纪三六肃宗至德二载。

③《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唐纪四十二德宗建中元年。

隋唐五代

靺鞨内附

靺鞨是我国东北的一个古老民族，居住在白山（长白山或称不咸山、徒太山、大白山）黑水（黑龙江）之间。周秦时称肃慎，曾来贡中原，臣服于周。两汉至魏晋时称挹娄，曾长期役属于扶余。曹魏初年摆脱扶余的统治，向魏贡纳貂皮等物。北魏时称勿吉，势力更为强盛，逐步打败扶余，入据今松花江流域，仍臣属于中原政权。隋唐时称靺鞨，已拥有粟末、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拂涅、黑水等七大部落，其中以黑水部粟末部最为强大。靺鞨人依山傍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人们群聚而居，夏日出逐水草，冬天入居穴中。除以狩猎为生外，有农业，用耦耕法耕田，种植粟、麦、穄等耐旱作物。以米酿酒，饮之亦能醉人。善养猪，“富人至数百口，食其肉而衣其皮”①。

粟末靺鞨以居住在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而得名，居于各部之南，较先进，有战士数千。隋炀帝大业元年（605）粟末靺鞨败于高丽，首领突地稽②率八部大众千余家自扶余城（今吉林四平）西北内附于隋，被安置于柳城（今辽宁朝阳）

一带，渐与当地人融合。唐初，突地稽遣使朝贡，唐以其部落置燕州，以突地稽为燕州总管。突地稽因立战功做到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其子李谨行，为唐高宗时守边名将，做到右卫大将军，封燕国公。他与高宗同年死，陪葬乾陵。乾陵只十七个陪葬墓，已发掘的五墓中，除李谨行墓外，余皆太子、公主、中书令墓，其与唐关系之密切可以想见。

留在故地的粟末靺鞨与白山、伯咄、安车骨、号室诸部靺鞨人先后沦为高丽的附庸。唐总章元年（668），唐灭高丽，该部粟末人与高丽遗民数万人被西迁至营州（今辽宁朝阳）一带。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营州契丹人李尽忠等起事，攻陷州城据营州叛唐，造成大乱，粟末部首领乞乞仲象带领当地靺鞨人和高丽人东走，其子大祚荣以靺鞨高丽之众击败唐军，东渡辽河，回到靺鞨故地。大祚荣在奥娄河（今牡丹江上游）畔的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修筑城堡（敖东城）并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建立了震国。初，震国为防备唐朝的讨伐，曾依附于突厥。唐中宗神龙三年（707），唐遣侍御史张行岌招抚大祚荣，双方和解。开元元年（713），唐鸿胪卿崔忻奉使宣劳靺鞨，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自此始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旅大市至今还保留着鸿胪卿崔忻完成册封使命后于开元二年五月在旅顺的凿井刻石。开元七年大祚荣死，子大武艺立，是为武王。武艺时向周围发展势力，曾一度与唐发生军事冲突。唐宝应元年（762），第三世王大钦茂被封为“国王”后，与唐廷关系更为亲密。此后，历世诸王皆经唐廷册立，终唐之世遣使朝唐一百数十次，对唐始终和好。唐亡后，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保持着臣属于中原王朝的关系。

渤海的疆域，初仅靺鞨故地，“方二千里”。经大祚荣、大武艺两代的扩充，领土不断扩大。被称为渤海中兴之主的第十代宣王大仁秀，更广开土宇，南定新罗，北略诸部，疆域至“方五千里”，南至朝鲜半岛北部，以泥河（今朝鲜咸镜南道龙兴江）为界与新罗相接，东至日本海，东北至乌苏里江下游与黑水靺鞨为邻，北隔那河（今松花江）与室韦为界，西抵扶余川（今吉林伊通河）流域与契丹接壤，西南达辽河流域与唐交界，全境包括今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前苏联滨日本海的部份地区。境内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首都初在“旧国”（今吉林敦化一带），唐天宝末迁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省宁安县西南东京城）。此后除唐贞元（785～805）时一度迁东京龙原府（今吉林珲春西）外，一直定都于上京。居民以靺鞨人最多，靺鞨中又以粟末靺鞨为主，另外还有高丽遗民、汉人及少量突厥、契丹、室韦人。

渤海在与唐朝发生密切联系之后，在中原文明强有力影响下迅速完成封建化进程，其行政组织、兵制等皆仿唐制：中央设三省（中台、宣诏、政堂，等于唐的门下、中书和尚书省），政堂省有六部（忠、仁、义、礼、智、信，相当于唐的吏、户、礼、兵、刑、工），还有七寺（殿中、宗属、大常、司宾、大农、司藏、司膳）及中正台、文籍院、胄子监、巷伯局等机构；地方有诸京、府、州、县等行政区划的建制，有节度使、州刺史、县丞等地方官；军事上仿唐十六卫制，置左右猛贲、熊卫、罴卫、南左右卫、北左右卫等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左右三军等编制，兵员最多时达数十万。另外也有法律、监狱等。

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影响下，渤海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和进步，五京周围及南部、西南部地区得到迅速的开

发。农业成为最主要的生产部门，大量使用铁农具，大面积种植水稻，并培育出卢城稻这一著名品种；柞蚕与桑蚕的饲养也较普遍。畜牧业也有较大发展，猪、马、兔等皆培育出优良品种。手工业生产达到了较高水平，专业冶工达数千人以上，所产之铁、熟铜、金银佛和绸、布、绵以及玛瑙柜、紫瓷盆等工艺品远近驰名。随着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兴城市，至其末年已达一百余座，其中上京城建筑宏伟壮丽，形制模仿长安，周长三十二里，为当时东北最大城市，交通相当发达，从鸭绿江入海，经旅顺至登州（今山东蓬莱），是渤海通往唐朝的水路要道，另有营州道、契丹道、新罗道、日本道及黑水靺鞨道等水陆干线，分别通往邻近地区及新罗、日本等国。渤海所产的马、铜等物，源源不绝地输往唐朝，对内地的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渤海的貂鼠皮、海豹皮、鹰（海东青）、麝香、人参等都常输入内地，与内地的“就市交易”及互市岁岁不绝。开元时渤海曾一次贡唐貂鼠皮一千张，唐朝也经常赠渤海锦、绢、缯、帛和金银器皿，如开元十五年（727）赐渤海彩练一百匹，其间赐以紫袍金带、绯袍银带、以及绢、帛百匹或数十匹者，仅玄宗时即有数十次③。

七十年代在吉林省和龙县唐代渤海古墓中发现的不少金器，和内地唐墓中发现的金器形制相同，是为唐与渤海亲密关系的确证。由于朝贡、互市的频繁，自代宗宝应二年（763）起，唐政府在青州（治今山东益都）设置渤海馆，以接待渤海使臣，管理同渤海贸易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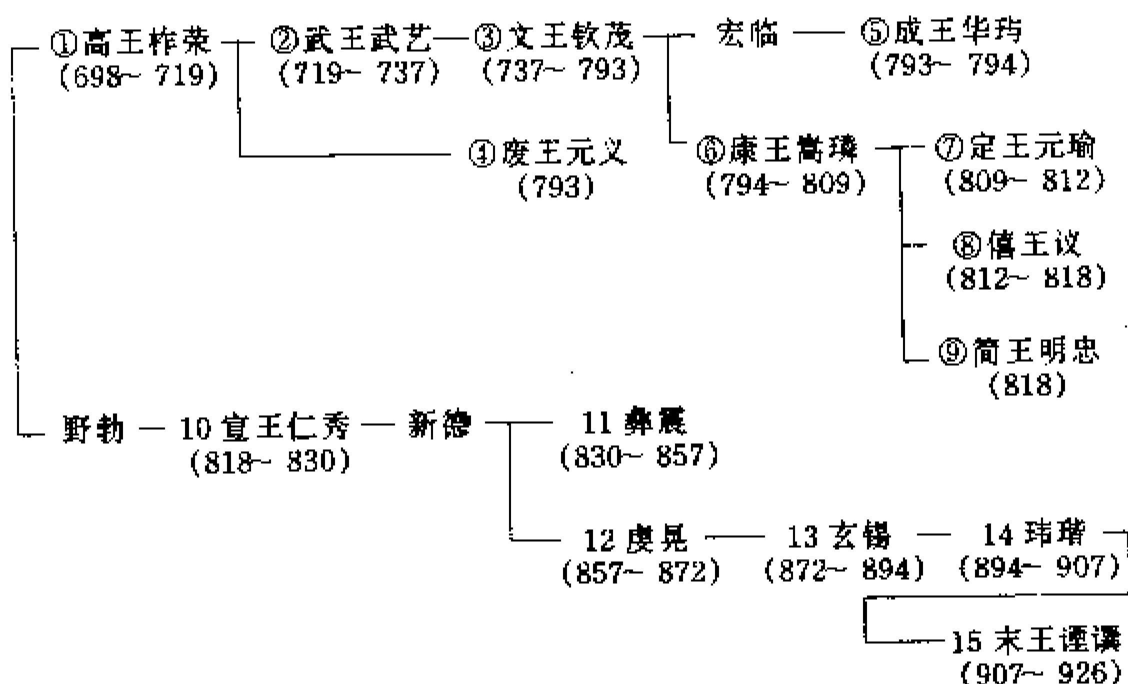
汉族的传统文化对渤海影响很大。渤海王“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④。不少学生在唐朝参加科举考试，如高元固、乌炤（照的异体字）度、乌光赞等就在唐朝进

士及第，从而带回更多的内地制度和文化。渤海不时遣使写各种典籍，如开元二十六年（738）遣使求写《唐礼》、《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等书。渤海使用汉字，许多汉文典籍得到流传。在五京周围等发达地区，按中原教育模式，建立了较系统的教育体制。在儒学、宗教、文学、音乐、歌舞、绘画、雕塑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文学家、艺术家、航海家等。其中大诗人裴颋（音挺）曾被日本同辈尊称为诗坛“领袖”；渤海王子大某则以“佳句在中华”而博得晚唐著名诗人温庭筠等人的称颂。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的统治思想，佛教在其境内各地也得到广泛流传。在生活习俗方面从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体育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向一致。故温庭筠送渤海王子诗有“疆理虽重海，车书本一家”句。考古工作者在吉林敦化县近郊即渤海旧都敖东城南发掘了渤海贞惠公主墓，墓道里一对石狮具有浓厚的唐代雕刻风格，《贞惠公主墓碑》从碑制形式到碑文文体完全和内地相同。由于渤海大量吸取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和政治文化制度，经济、文化都很发达，在当时有“海东盛国”之誉。海东文化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华民族的开发史上占有重要一页。渤海政权的建立，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以及东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都有推动作用。

黑水靺鞨因居住黑水（黑龙江）而得名，居于最北方，发展较慢，分十六部，黑水靺鞨和唐朝也有密切联系，遣使来朝，每岁不绝。开元十年（722）黑水靺鞨酋长倪属利稽入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勃利州刺史，勃力即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伯力（前苏联称之为哈巴罗夫斯克）。开元十三年

(725) 唐在黑水靺鞨地置黑水军，次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其余各部为都督府下属的州，以其首领为刺史，唐派长史以监领之。开元十六年（728）唐玄宗赐黑水都督府都督姓李名献诚，并授云麾将军兼黑水经略使。黑水都督府的设置使唐代中国封建王朝在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同内地的联系。黑水都督府连同室韦都督府的设置，使唐朝的疆域，东北至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一带，包括库页岛在内。

渤海世系表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

②《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传》将突地稽放在总介绍和黑水靺鞨中叙述，《新唐书》卷二一九《靺鞨传》所谓唐初内附的黑水靺鞨渠长阿固郎实亦指突地稽。

③参阅《册府元龟》卷九七五、九七六《褒异》。

④《新唐书》卷二一九《渤海传》。

隋唐五代

唐日交往与鉴真东渡

继隋代日本推古天皇朝四次遣使于隋，隋也派使臣赴日之后，唐和日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日本社会正处于奴隶制瓦解、封建制确立和巩固阶段，对唐朝的昌盛极为赞赏之外，更加要求学习反映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唐朝的典章制度来进一步巩固社会秩序，吸收唐朝文化来丰富发展自己国家，因此它向唐朝派遣的使者、留学生和学问僧数量之多，仅次于新罗。

早在日本大化改新之前的推古天皇三十一年（623），自唐归国的日本留学僧惠齐等上书朝廷说，在唐留学生均已学业成就，应予召回，并说："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①朝廷接受这一建议，积极准备，于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派出第一次遣唐使。此后到开成三年（公元838年、日本承和五年）的二百零八年间，正式的遣唐使计有十二次。乾宁元年（公元894年、日本宽平六年）又准备派遣唐使，出使的主要官员已经任命，而已被任命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上书建议中止派遣，从此遂正式停止遣唐使。从

630年至894年，二百六十四年间，除上述正式遣唐使十二次外，任命而未成行的三次，抵达长安的日本使臣，两次是送唐使臣回国的“送客唐使”，一次是迎遣唐使归日本的“迎入唐使”，故总计为十八次②。

遣唐使团组织完备，使团官员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正式外交官员）。使团成员除约占半数的舵师、水手之外，还有知乘船事（船长）、造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卜部（掌确定航行方位、测定风力者）、阴阳师、医师、画师、乐师、史生（文书）、船师（航海长）、杂使（杂役）以及船匠、木工、铸工、锻工、玉工等各行工匠，其职务类别将近三十种。随行人员有长期在唐居留的留学生、留学僧和短期入唐将随同一使团回国的还学生、还学僧。还有从事保卫的射手。唐初，日本派出的遣唐使团一般是二百多人，乘船二艘，从八世纪初开始，人数倍增，一般为四艘船，五六百人。717年派出的遣唐使为557人，733年派出的为594人，838年派出的为651人。其中有的船中途遇难，入唐的也只有少数的主要成员被允许进入长安。

遣唐使的航线从七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四十年间，采取北路，即由难波（今日本大阪）登舟，通过濑户内海，从博多（今日本福冈）出发，沿朝鲜半岛西岸北行，再沿辽东半岛南岸西行，跨过渤海在山东半岛登陆，再由陆路西赴洛阳、长安。这条航线大部分是沿海岸航行，比较安全，船只遇难情况较少。以后因新罗灭百济、高句丽，统一朝鲜半岛，与日本关系一度紧张，于是遣唐使船在七世纪七十年代到八世纪六十年代这一百年间，航线改取南岛路，即由九州南下，沿南方的种子岛、屋久岛、奄美诸岛，向西北横跨中国东海，在长江口

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这条航线主要航行于渺茫无际的东海上，靠岸困难，危险较大。北路和南岛路航行时间都需三十天左右，甚至更长时间。遣唐使后期，航线改取南路，即由九州西边的五岛列岛迳向西南，横渡东海，在长江口的苏州、明州一带登陆，再由运河北上。航行时间较短，一般十天左右，甚至只需三天，但风涛之险与南岛路基本相同。

遣唐使的目的在于学习、吸取唐朝文化，因而对使团人员的选任，特别是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使团四官的选任是非常谨慎的。例如正使除具外交才能外，还须有堂皇的仪表，优雅的风度，及关于中国的知识和礼仪方面的较深修养。如第三次遣唐押使高向玄理曾在隋留学三十五年，后来成了大化改新的最高政治顾问国博士。第十次遣唐副使吉备真备曾留唐十七年。此外任过正使的多治比广成好文学、诗歌；藤原常嗣游大学，能"史""汉"，谙《文选》；未成行的副使小野篁文章无双，草隶兼精；录事山上忆良是著名的万叶歌人。有两家父子先后被任命为使臣，也是由于具有教养和经验，利于向唐朝学习。总之，参加遣唐使团的或博于经史，或长于文章，或精于书法，尽皆风度翩翩的饱学之士。就是下层的医师、工匠、乐师、水手等也都是本行业的佼佼者。

遣唐使在完成外交使命的同时，还担负着进行文化和贸易活动的任务，他们既是文化使者，又是国家商人。在文化上他们要进行考察、学习和引进，唐帝国则热情提供方便。如唐玄宗命朝衡陪同遣唐使参观府库藏书，又应遣唐使的要求，令四门助教赵玄默去鸿胪寺为其讲课"授经"。他们大量采购图书，吉士长丹等因从唐朝带回很多书籍和宝物而得到天皇赏赐③。使团中技术和艺术人才，在唐期间也努力学习，准判官藤原贞

敏善弹琵琶，入唐后拜琵琶名手刘二郎为师深造，并与刘二郎之女成亲，回日本后，贞敏出任雅乐助和扫部头，成为日皇宫廷音乐的负责人。遣唐医师菅原梶成，在唐期间就教于名医，回国后任针博士，后来做了御医。其他木工、锻工、铸工等都是入唐参观学习该行业最新技艺的。至于正使、副使、判官、录事等，不少人后来在朝廷中任重要职务，由于他们能不同程度地接近朝廷政治中枢，便能将在唐朝期间学得的知识变通融会于日本各项制度和政治施策中去。总之，遣唐使在学习和引入唐文化方面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遣唐使同时也是贸易代表团，它把日本的大批“国信物”（对唐的赠品）船载以来，又把唐朝的大批“回赐”（对日本的答礼）船载以归，实质上承担了唐日之间产品交换的任务，遣唐使带来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1970 年在西安发现的日本“和同开珎”银币很可能就是遣唐使带来的。唐政府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等。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保存的唐代珍贵文物中，有一部分就是遣唐史带回去的。这样的赠品和答礼，实际是两国之间互通有无的贸易。

为吸收中国文化成果，日本选派了不少留学生来唐学习，这些留学生若以学习方式和年限为准，可区分为一般留学生、请益生和还学生。请益生类似今之进修生或访问学者，在国内已有所长，入唐求教和深造。还学生亦如此，不过他们是与遣唐使同去同还。他们在史籍上留下姓名的计二十六人，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他们被分配到长安国子监，大部进太学学习。一般留学生学习年限较长，动辄十年二十年，与中国诗人、学者结下深厚友谊；有的参加唐朝科举考试“及第”而步入仕途。留学生在学习之余，还搜购中国典籍、书画、乐器、

工艺品、文具、衣服甚至武器等，以便归国时带回。唐昭宗大顺二年（891），据藤原佐世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日本保存的汉籍计分易、诗、乐…．共四十家，一千五百七十九部一万六千七百九十卷。这些汉籍大部分是遣唐使和留学生带回的。留学生回国后，由日本朝廷安排在教育、医药、刑律、艺术等不同部门工作，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学术和技术特长，在日本社会的进步和文化发展上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和日本人民群众一起，为这个原本落后的岛国的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也为加强中日友好作出了历史贡献。著名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十七岁入唐，进国子监的太学学习，成绩优秀，通过唐朝的科举考试，踏上仕途，长期居留中国，擅长诗文，在唐历任左拾遗、左补阙、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卫尉卿兼秘书监、左散骑常侍、安南都护等职。天宝十一年（752）藤原清河出使长安，朝衡再一次提出回日申请（第一次提出在开元二十二年，未获许可），终于得到玄宗允许。他留恋自己生活多年的中国和中国友人，写下了“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的诗句。王维写了《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并序》：

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
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
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
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
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
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

在诗序中盛赞唐日友好并期待朝衡重返中国。但他乘的船只途中遇风暴，漂流到安南，人皆以为该船已失事，李白写了《哭晁卿衡》的动人诗句：“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沈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④但经历千难万险，朝衡又回到长安，终老于唐。在他逝世一千二百多年后，中日两国人民分别在西安和奈良为他树立纪念碑，表彰他为中日友好所做的历史贡献。吉备真备二十二岁入唐，在中国留学十七年，研习经史、历算、阴阳、天文等学科，并携回大量中国书籍和器物。一行和尚所造的大衍历，在吉备真备带回不久即为日本所采用。他由留学生而任日本遣唐使节归国后官至左大臣，极力推广唐代文化，是早期中日交往中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遣唐留学僧见于文献的达九十人。他们和留学生一样也分为一般留学僧、请益僧和还学僧。他们在中国巡礼名山，求师问法，带回大量佛经、佛像、佛具等，同时传入了与佛教相关联的绘画、雕刻等，对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作用。最澄、空海分别创立了日本的天台宗和真言宗，并且仿效唐朝，开创了日本佛教在山岳建寺的风气。空海回国时带回一百八十多部佛经。他除研究佛经外，广泛吸收中国文化，是成绩卓著的文学家、书法家和教育家。由其弟子编成的《性灵集》（十卷），收录了他的诗赋、表文、碑铭等文学作品，他给最澄的亲笔信被称为《风信帖》被定为日本国宝。他对中国的文学和文字有深刻的研究，在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篆隶万象名义》和圆仁留唐十年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中国和日本的文艺批评、文字学和历史的重要文献。

如同阿倍仲麻吕等日本人在唐作官、从事文化和宗教活动一样，也有不少唐人在日本作官和从事文化、宗教活动。遣唐使回日，唐朝有时派遣“送使”同去，前后共八次，每次常常数十人。使者完成使命后即应回国，但由于航行艰险，也有不少人居留下来，归化日本。如沈维岳、袁晋卿等，见于日本史书的有十八人。沈维岳被授从五位下，作了美作权椽，袁晋卿叙从五位上，作大学音博士，历任大学头、安房守等官职。这些唐人在介绍唐文化和促进日本文化的发展方面都有所贡献。

唐朝僧人也有随遣唐使赴日本的，在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中作出最杰出贡献的是唐高僧鉴真。

鉴真（688－763）日本常称为“过海大师”、“唐大和尚”，俗姓淳于，扬州江阳县（今江苏扬州）人。其父以经商为生，笃信佛教，曾就扬州大云寺智满禅师受戒学禅。家庭对鉴真影响极深，十四岁（一说十六岁）时随父入大云寺朝圣，见佛像而动心，请求出家，父奇其志而允许，遂就智满禅师剃发出家为沙弥（初出家的童僧），配住大云寺，鉴真是其法号。从此开始佛学研究生涯。十八岁受菩萨戒（表明已具备作为僧侣的基本条件），此后青年时期的鉴真曾巡游东都、长安，遍投名师，潜心钻研佛教经典。同时对佛教艺术、建筑、医学等都苦心钻研，极富素养。二十一岁在长安受具足戒（受戒仪式完成即具备僧籍）。在两京六年切磋，使鉴真成为知识渊博的僧侣。开元元年（713），二十六岁的鉴真自两京回扬州，定居扬州大明寺（今扬州法静寺）。其后四十余年间，在江淮一带宣讲律藏，为俗人剃度传授戒律先后达四万余人，其中著名僧侣有二百三十余人，江淮间尊鉴真为授戒大师。同时他主持修崇福寺、奉法寺等大殿，主持建筑寺院八十多处，并指导塑造、绘

制大量佛像和壁画，抄写上千卷佛经，鉴真成为德高望重名扬四海的高僧。

当时，佛教在日本受到封建朝廷的推崇，颇为兴盛。但日本佛教戒律不完备，僧人不能按照受戒仪式受戒，一般都只受过菩萨戒或自誓戒，没有“三师七证”由十位僧侣证明一位僧侣僧籍的具足戒。很多人不经一定手续就“自度”、“私度”作了僧尼，不少农民逃入寺院，剃发为僧以求免税免租，使封建朝廷失掉纳租人；上层僧侣凭借朝廷威势，为所欲为，腐化堕落。因此建立严格的受戒制度，控制僧侣人数的盲目增多，使僧侣遵行应守的清规戒律，抑制违法行为，提高佛学修养，成为整顿日本僧侣制度的急务。

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日本天平五年），日僧荣睿、普照随遣唐使入唐，学习戒律，拜谒名僧，代表日本圣武天皇邀请高僧去日本传授戒律，天宝元年（742）冬，荣睿、普照至扬州大明寺，顶礼（五体投地用头去顶尊者的脚，以示尊敬）鉴真足下，具述来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愿和上东游兴化。”⑤众弟子以日本太远，沧海茫茫，狂风巨浪，百无一至，咸表沉默。鉴真表示为兴佛法“何惜身命”？毅然应请，决心东渡，时年五十五岁。弟子祥彦、道杭、思讬等二十一人愿同心随去。

鉴真、荣睿、普照、道杭等加紧准备远航用具、食品等，道杭曾是唐朝宰相李林甫之兄李林宗的家僧，因请李林宗代办从扬州出发经海路至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朝圣证件，以便出海后直航日本。因唐代未经政府批准私人不能出国。至于航船，李林宗也写信给侄子扬州“仓曹”李凑，命其协助。筹备工作正顺利进行之时，天宝二年（743）四月突生意外。因道杭说：

此去日本，为传戒法，需德高望重者，高丽僧如海少学，不宜同行！如海怒，至官府诬告道杭勾结海贼，正造船备粮，致使道杭、荣睿、普照等被捕，船只、干粮被没收。后虽获释但第一次东渡失败。

荣睿、普照获释后至大明寺准备再次东渡。鉴真以全部积蓄买军舟一只，雇水手十八名，备办海粮、佛经、袈裟，并招聘工匠八十五名。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荣睿、普照、思讬等一百余人，同驾一舟，举帆东下。由扬州出发，出大运河口入长江，至狼沟浦（今江苏太仓浏河口附近的狼港），遇风暴，浪击舟破，离船登上浅滩，潮水逆涌，水过腰深。时值隆冬，寒风刺骨，冷水浸身，艰辛备至。第二次东渡，未曾远航，即遭失败。

鉴真亲自组织指挥抢修船只，修复后，一行人重新登船，开始第三次东渡，出长江口直指日本，不幸到舟山海面船触暗礁，人虽上岸，但船沉海底，粮水俱尽。一百余人在荒凉小岛上在饥渴寒冷中度过三昼夜，后获救安置在明州（今浙江宁波）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又遭失败。

第三次东渡失败后，鉴真等暂居明州阿育王寺，巡游附近诸州讲律授戒。越州僧知鉴真欲东渡，告州官曰："日本僧荣睿诱大和上欲往日本国。"荣睿被捕入狱，病重始获释。鉴真以荣睿、普照为求佛法，历尽艰辛而终不退悔。钦佩其志向，故东渡弘法决心益坚。天宝三年（744）又准备第四次东渡，遣法进等到福州办粮买船，拟从福州登船，以避江淮一带官府耳目。鉴真率门徒祥彦、荣睿、普照、思讬等三十余人，辞别阿育王寺，开始巡礼佛迹。进入天台山，朝圣佛迹后，去福建途中，又生意外。鉴真在扬州的弟子灵祐向各寺僧侣说："我

大师和上，发愿向日本国，登山涉海，数年艰苦，沧溟万里，死生莫测，可共告官，遮令留住。”⑥出于对大师的爱护，众僧共同署名，向官府呈递阻止鉴真东渡请求书。江东道采访使下令追踪，到黄岩县禅林寺扣留鉴真一行。派兵防卫，送回扬州崇福寺。第四次东渡失败。鉴真呵责灵祐，灵祐日日忏悔，每夜一立至五更谢罪，连立六十天方得鉴真谅解。

天宝七载（748）春，荣睿、普照从同安郡（今安徽安庆）再来扬州崇福寺，鉴真虽已六十一高龄，但东渡壮志不减，决定即行造船备办百物，一如天宝二年所备。僧祥彦、荣睿、普照、思讬等一十四人同行，水手十八人，及其他相随者共35人。当年六月廿七日自崇福寺出发，出长江口，扬帆出海，开始第五次东渡。为等候顺风，在越州界三塔山（今定海海中的小洋山）停住一月。得好风，发至暑风山（当指舟山岛附近）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风起出发，突见东南海面出现一座岛山，至日中，岛山骤然消失，继而天色昏暗，阴云密布狂风突起，巨浪滔天。岛山实为积聚之蜃气，预兆飓风将临。鉴真一行，不识气象，继续航行，至风暴来临，已远离暑风山，无法返航。时风急浪峻，水黑如墨，船飘怒涛间，忽而被涌上高山，忽而被摔入深谷，人皆晕醉，船在大海上漂流，三日过蛇海，蛇长一丈余，小者五尺余，色暗有白斑，满泛海上。一日过飞鱼海，白色飞鱼，长一尺许，遮蔽海空。一日经飞鸟海，鸟大如人，飞集船上，船重欲沉，以手推之，鸟即衔手。船上淡水用尽，每餐由普照发每人生米少许，嚼米，喉干咽不下，吐不出，饮海水，即腹胀。众人干渴欲死。次日，西南空中云来覆船上，落雨，人皆以碗盛水，饮之甘美，始解危难。次日又降雨，人皆饱足。如此海上漂流十四天，始在南海中一岛登

陆，其地虽当冬十一月，仍鲜花竞艳，树实竹笋。经四经纪人引道，经三日到振州（今海南岛南端崖县）。此后在地方官迎接护送下，鉴真从海南经雷州半岛，绕广西、广东、江西而北返。天宝十载（751）返回扬州。第五次东渡又归失败。先后有三十六名中日人员牺牲。荣睿几经囚牢，又遇险漂流，积劳成疾，在端州（今广东高要）病逝。鉴真哀恸悲切，送丧而去⑦。北返途中，普照见鉴真长年颠簸，体质日衰，不忍师父晚年再遭苦难，决定忍痛分离，去阿育王寺等待归国便船。鉴真执普照手，悲泣说："为传戒律，发愿过海，不到日本国，壮志不息！"师生分手，无比感念。跟随鉴真多年的祥彦也不幸逝世。鉴真悲恸万分，抚遗体连呼"彦！彦！"由于长期艰辛熬煎，又频经炎热，鉴真视力日减，虽经治疗，不见成效，终于双目失明。

经过十二年的努力，鉴真终于在天宝十二载（753）冬，以六十六岁的高龄率弟子二十多人搭乘日本遣唐使团的船东渡，同行弟子中包括尼三人和胡人安如宝、昆仑人军法力、占婆人善所。鉴真所乘船于次年一月十七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到达萨摩国川边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县川边郡秋目浦），一个多月后在盛大隆重的欢迎下进入首都奈良。留居著名的东大寺。当年鉴真在奈良东大寺设立戒坛，为日本圣武上皇、皇太后和孝谦天皇授戒。日本僧人在称为"三师七证"的十位和尚参加下出家受戒，此为日本正规授戒之始。天皇任命鉴真为大僧都，成为日本律宗始祖。在他的亲自设计和领导下，奈良修建了唐招提寺。寺中金堂采用三层斗拱，房脊两端鸱尾高挺，整个建筑简朴优美，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物，反映了当时唐朝建筑技术的最新成就，是研究

唐代建筑最珍贵的“标本”建筑物之一。唐招提寺的佛像雕塑也是在鉴真主持指导下由他的弟子和日本匠师完成的。传播了唐朝雕塑艺术干漆夹纻法，鉴真的弟子塑造的鉴真干漆夹纻座像是十分杰出的艺术珍品。鉴真携带佛经八十四部共三百余卷，大批佛像、佛具，并凭他的精深学识对日本经疏的错误一一订正。鉴真虽双目失明，但凭手摸、鼻嗅、口尝鉴定了正仓院所藏草药。唐肃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鉴真圆寂，安葬于奈良唐招提寺，他被称为“日本文化的恩人”。他的干漆夹纻像一直安放于该寺，被定为日本“国宝”，一千二百余年来始终受到日本人民的景仰。1980年，日本送这座塑像短期来华，回故乡扬州探亲，又到北京巡展，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史上的佳话。

通过以上交往，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发展到空前广泛深入的新阶段。先进的唐文化给日本文化以积极、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政治方面，贞观十九年（645），日本进行大化改新，长期留学中国的高向玄理和僧旻被任命为国博士，参议国家大事。他们参照隋唐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施行了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仿照隋唐的官制，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参考隋唐律令，制订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

二、教育方面，不少是照搬唐制，天智天皇时期在京都设立大学寮，以后学制逐渐完备，设明经、纪传、明法、书、算等科，各科均设博士、助教进行讲授、教科书为中国儒家经典。由于日本的门阀政治，高官必出权门，因而并未原封不动地接受唐的科举制度。

三、语言文字方面，日本古代无文字，八世纪前使用汉字

作为表达记述的工具，留学生吉备真备和学问僧空海和尚在日本人民利用汉字标音的基础上，创造了两套“假名”（即字母），吉备真备采用汉字楷体偏旁造成“片假名”（“片”即“偏”），空海采用汉字草体全字造成“平假名”（“平”即“全”）。这些新体文字的发展，大大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同时汉文仍被尊重，日文的词汇和文法也受到汉语的影响。

四、文学方面，唐代丰富多彩的文学被移植到日本并获得蓬勃发展，尤以唐诗影响最大，上至天皇下至一般贵族，皆以欣赏和写作汉诗为时尚。白居易诗尤为日人所喜爱。留学生晁衡、吉备真备、小野篁、橘逸势等对中国诗文都有很深的造诣。用汉文写成的《怀风藻》、《凌云集》、《经国集》等文学著作不断出现。

五、艺术方面，唐朝的音乐、绘画、雕塑、书法、工艺美术等也纷纷传入日本。日本吸取唐朝的乐制，并派留学生入唐学习唐乐。日本宫廷请唐乐师教授音乐，唐的乐书、乐器陆续传入日本。唐朝绘画给日本绘画影响极大，日画家摹绘唐人绘画的作品称为“唐绘”，日本高松塚古墓侍女群壁画与唐章怀太子墓和懿德太子墓侍女壁画十分相似。鉴真将王羲之父子真迹带到日本，引起日本学习书法的热潮，出现了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等所谓“能书三笔”。由于学习了唐工艺的先进技术和设计，日本许多手工艺品（家具、食器、文具、乐器等）甚至无法确定是唐制还是日制。

六、科学技术方面，唐朝的先进生产技术、天文历法、医学、数学、建筑、雕版印刷陆续传到日本。

七、生活习惯方面，唐人打马毬、角抵、围棋等体育活动，先后传入日本。茶叶传入日本，兴起喝茶之风。唐服传入

日本，为日本人所喜爱，端午节，七月十五盂兰盆会，九月九日重阳节亦由唐朝传入日本，中日关系之密切，于此可见一斑。

注 释

①《日本书纪》推古天皇三十一年条。

②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写作十九次，是把667年日本派伊吉博德等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也算作一次。实际上这次仅为送客而且只到百济，并未入唐，以不计为宜。

③《日本书纪》白雉五年七月条。

④苍梧山亦名九疑山，在湖南省宁远县东南，虞舜南巡，崩于苍梧之野，即此。

⑤〔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40页。

⑥〔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60页。

⑦〔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73页。

隋唐五代

中 朝 交 往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中国封建时代实属空前，在当时世界上亦为仅有。唐文化辉煌灿烂，蔚为中国封建文化的高峰，亦为当时世界文化中的高峰。因此唐朝受到各国尊重，享有极高声望。从这一时期起，唐朝成为中国的象征，各国开始把中国人称为唐人，这一称呼至今仍在一些国家中沿用。

唐朝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对各国具有强大吸引力。伊斯兰教创始人、阿拉伯帝国建立者穆罕默德（573－632）以《古兰经》鼓励其门徒："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而强盛稳定的唐朝，在政治上奉行其"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之方针，在文化上施行其并蓄兼行，群花同放之政策。鼓励外国商人来中国贸易，对国际交往不加限制。再加对外交通发达，对扩大国际交往提供有利条件。如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东经河北、辽东达朝鲜半岛；西经河西走廊，出敦煌、阳关、玉门关，分三路穿新疆，一经于阗，一经龟兹、疏勒，一经碎叶、然后越葱岭，通印度、波斯、阿拉伯，此即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交通自山东、江苏出海达朝鲜、日本。从广州出海经越南

海岸，过马六甲海峡，分别达爪哇、斯里兰卡、印度，直至波斯湾沿岸。并初步开辟至埃及与东非的海上交通。唐代中国航海大船长20丈，体积与抗风能力均超过大食海舶，可载六七百人，经常往来于广州与波斯湾之间。见于史书记载的外国船只有"南海舶"、"昆仑舶"、"师子国舶"、"婆罗门舶"、"西域舶"及"婆斯舶"等数十种。代宗时每年来广州的各国船只达4000余艘。可见唐代国际交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使当时和中国通商往来的国家发展到70多个。唐朝首都长安成为世界都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数十国家的使节汇于长安，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商人集合于西市，大批各国留学生入长安国子监学习，外国僧人来中国研习佛法，中亚诸国艺术家在长安也异常活跃。高度繁荣的唐文化依据本身发展的需要，对外来新成份，选择取舍，汲取发扬，使自身愈益丰富多彩。唐文化远播东西各国，各国依据自身文化传统，斟酌吸取，使本国文化获得助益，加速发展。唐朝经济文化对许多国家发生巨大影响。在与唐通商往来的70余国中，以朝鲜、日本、印度等国与我国的联系最为密切。

唐朝时期中国同朝鲜交往十分密切。唐初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和新罗三国鼎立时期，三国皆遣使与唐朝往来，并相继选派贵族子弟到长安读书。房玄龄等所撰《晋书》完成后，唐太宗特将一部赠给新罗。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罗王金法敏统一朝鲜半岛后，直至唐末，始终和唐朝保持友好关系。中朝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进一步发展。

双方互遣使节，频繁往来于陆、海两路。据不完全统计，自高宗永徽元年（650）至武宗会昌元年（841）约190年中，仅新罗遣唐使者即达21次。其使命或为"贺正"（祝贺春节），

或为赠礼，或为国丧致哀，或贺新君即位。唐朝也不断遣使赴新罗。当时海路常冒覆舟之险，代宗大历初归崇敬充新罗册立使，在海上“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①，他毫不畏惧，坚持航行，胜利完成出使新罗的使命。钱起《送陆珽侍御使新罗》诗有“受命辞云陛，倾城送使臣”句②，表明中国人民对出使新罗的重视。新罗使者带来珍贵礼物，如开元间新罗使者带来牛黄、人参、朝霞绸（绸的异体字）、鱼牙锦、纳绸、镂鹰铃、海豹皮、金、银等，唐朝也给新罗以名贵答赠，如开元时曾一次即赐予新罗使者精美丝织品300段（唐制，凡赐杂彩十段，通常包括丝布二匹，绸二匹，绫二匹，缦四匹）。

唐朝同朝鲜贸易往来繁盛，很多新罗商人来唐贸易。他们主要活动于北起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南达楚州（今江苏淮安）、扬州（今属江苏）一带。唐朝在楚州等地设“新罗馆”，以接待新罗商旅。在我国东部沿海尤其是山东牟平、海阴、文登、荣成，江苏江都、淮安、东海等地有许多朝鲜侨民聚居，他们聚居的街巷叫“新罗坊”，坊中有总管、翻译。唐朝地方政府，设“勾当新罗所”管理其事务。他们主要从事商业贸易，是中国和朝鲜交往的中间人。山东文登县有新罗人所建佛寺，当地新罗人经常按新罗风俗举行法会，用新罗语讲经。唐文宗开成五年（840），日本和尚圆仁来唐时，在文登县参加过正月十四、十五两天的讲经，每天都有新罗男女200余人听讲。唐朝与朝鲜的商船经常行驶在中、朝、日之间的航线上，常多达数十艘。从朝鲜输往唐朝的物品有牛、马、苎麻布、纸、折扇、人参等，从唐朝输往朝鲜的有丝绸、茶叶、瓷器、药材、书籍等。新罗“所输物产，为诸蕃之最”③。在唐朝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新罗居各国首位。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派遣更多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中新罗人最多。文宗开成二年（837）旅唐新罗学生多达216人。文宗开成五年（840）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批就有105人。不少新罗留学生参加唐朝进士科举考试，从穆宗长庆元年（821）至唐末，共58人考中进士，时称“宾贡进士”（意为外籍进士）。他们“登唐科第语唐晋”④，有的担任了唐朝的官职，归国后使汉文学在朝鲜获得广泛传播。其中如崔志远，12岁入唐，18岁中进士，曾任溧水县尉、侍御使、内供奉等职，29岁返新罗，他的书法和诗文在新罗发生很大影响。他用汉文写的《桂苑笔耕集》二十卷，保存了不少有关当时中国的珍贵史料，至今仍为研究唐朝历史的重要资料。它被著录于《新唐书·艺文志》，在当时已受重视，它不仅在我国流传至今，亦为朝鲜现存一部有价值的文集。新罗留学生回国时，带回许多我国的文化典籍，在吸收传播唐文化上起了很大作用。

唐朝文化对新罗影响巨大。高宗上元二年（675）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唐以前，朝鲜已利用汉字作为表达思想和记事的工具。七世纪末，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作为音符标记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夹在汉文中间，帮助阅读汉文，更加丰富了朝鲜语汇，推动了文化普及和文学艺术的发展。从贞观十三年（639）至天宝八载（749）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和漏刻博士，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和历法，并传授生徒。如新罗医学博士即用《本草经》等中国医书教授学生。中国的典籍如诸子书、《文选》、诗文等大量传入新罗。白居易的诗歌和张鷟的文章等深受朝鲜人喜爱。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对新罗影响很大。八世纪中期，新罗仿效唐朝政

治制度改进其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朝尚书省，下设三府三部，相当于唐的六部。地方设州、郡、县、乡，亦与唐朝相似。德宗贞元四年（788），新罗设“读书出身科”采用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要考试科目。新罗都城平壤是模仿隋唐的长安、洛阳建成的，也分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文宗太和二年（828）新罗使臣从唐朝带茶种回国，自此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时期，雕版印刷技术传到朝鲜。由于新罗大量吸取唐朝的制度和文化，学习汉人的诗赋辞章，他们的作品有的不下于中国作家。新罗文物昌盛，当时被称为“君子之国”。唐朝常选饱学之士出使新罗。开元二十五年（737）新罗王逝世，唐玄宗特选经学家邢璹（shú赎）前往吊祭，并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以卿学术，善与讲论，故选使充此。”⑤可见在唐文化影响下新罗文化之发达。在长期友好交往中，朝鲜文化对唐朝亦产生一定影响。朝鲜的音乐舞蹈艺术在南北朝初期已传入中国。隋朝时作为宫廷乐舞，隋文帝选定“七部乐”和隋炀帝选定“九部乐”中都有“高丽乐”。唐初，唐太宗选定“十部乐”，“高丽乐”仍为其中之一。直至武则天代唐称帝时，高丽乐仍保存25套曲谱，其后逐渐散佚。中朝经济、文化交往，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由于唐朝与新罗关系密切，双方多次互相救助。一次，登州商人马行余由江苏去浙江，在海上遇暴风，船飘至新罗，新罗王闻中国商人遇险而来，即以贵宾之礼相待。并助其回归中国⑥。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冬，新罗王子金士信来唐朝，船被恶风刮至楚州盐城县，当地官府妥善安置，并及时报告唐朝廷。是年，新罗发生饥荒，“其众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东”

⑦，唐朝亦予周到接待。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四九《归崇敬传》。

②《全唐诗》卷二三七。

③《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④《全唐诗》卷五〇六，章孝标《送金可纪归新罗》。

⑤《旧唐书》卷一九九上《新罗传》。

⑥范摅《云溪友议》卷上。

⑦《唐会要》卷九五《新罗》。

隋唐五代

玄奘取经

玄奘（602－664），俗姓陈，名祎（huī），洛阳缑（gōu 勾）氏人（今河南偃师缑氏镇），十三岁出家，玄奘是其法名，后人称他三藏法师（三藏是对佛教经典的三个部分——佛经、戒律、论述与注解的总称，通晓三藏的僧人被称为三藏法师）。唐初，他在四川、长安等地研究佛教理论，感到佛教分成许多宗派，佛经译文多误，自己无所适从，想亲自到天竺学佛经，研究解决关于佛教教义的一些疑难问题，在长安结伴准备出国西游，由于唐朝初建，突厥贵族扰边。暂时禁止私人出境。同伴退缩。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杂于返西域的客商中，偷越玉门关，然后独自西行，于628年夏末，到达天竺西北部。然后沿一条由西向东的路线访问参谒了古代无忧王为释迦牟尼佛建造的三百多尺高的“窣（音素）堵波”（宝塔）以及佛诞生处、逝世处、说法的讲堂等胜迹，还在至那仆底国（今印度旁遮普省）调查了有关中国的桃、梨传进印度的传说。这样度过了四年，贞观四年（630）他到达摩揭陀国（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来到那烂陀寺。

那烂陀寺是天竺佛教的最高学府。该寺主持（当家和尚）戒贤是当时印度的佛学权威。玄奘到达时受到热烈欢迎，一千多人捧香、花沿路迎接，时戒贤已一百多岁，本已不再讲学，但为表示对中国的友好情谊，特意收玄奘为弟子，用十五个月的时间给他讲了最难懂的佛经——《瑜珈论》。他用了整整五年时间精研佛学理论，并研究了波罗门教经典、印度方言，取得优异成绩。全寺除戒贤通晓全部理论外，能通晓 20 部的有一千人，通晓 30 部的有五百人，通晓 50 部的只有十人即十大法师，玄奘即其中之一。他并未以此满足，636 年辞戒贤外出游学，一路之上多次参加各地的辩论会，战胜许多学者，声誉满天竺。

贞观十四年（640）返回那烂陀。戒贤叫他主持寺内讲座，有一位戒贤的弟子，对经论不能贯通，玄奘用梵文（古印度文）写了一篇论文，阐发义理，指明其谬误，得戒贤与僧众同声赞誉。那时曷利沙帝国已统一了天竺北部，国君戒日王崇信佛教，本人又是诗人剧作家，经他提倡各宗教学派论辩争鸣十分活跃。有一个反对那烂陀派的人写了一篇论文呈给戒日王，声称无人能驳倒一个字。戒日王把论文转给戒贤，并决定在国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脑季）举行学术大会公开辩论。戒日王非常高兴地会见玄奘，玄奘介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情况，引起戒日王很大兴趣，表示要亲自到中国访问。贞观十二年（642）十二月辩论大会开始，与会者有天竺十八国的国王，佛教徒三千多人，波罗门等教徒两千多人，那烂陀寺来了一千多人。玄奘担任大会的论主（主讲人）。他用梵文写了一篇《制恶见论》，作为辩论的主题在会上宣读。同时誊写一份悬挂在会场门口，并依照惯例声明："如有人能据理驳

倒一个字，就斩下论主的头以谢罪。”可是五天过去了，仍没有人来辩论。大会连续举行十八天，大家都被玄奘的精辟议论所折服。结束那天，戒日王送给他金钱一万、银钱二万，僧衣一百领。十八国王也各以厚礼相赠，他全部谢绝了。最后戒日王恳请玄奘乘坐一头用精美华幢（音床）装饰的大象游行一周，又特邀他参加七十五天的无遮大会（五年一次的天竺佛教盛会），表示对这位中国大师的尊敬。

公元643年，深切怀念祖国的玄奘表示将要回国，戒日王一再挽留他，一个国王甚至表示只要玄奘肯留下，愿为他建造一百所寺院，但他归志已定，戒日王只好答应。朋友们争相赠礼，玄奘一一谢绝，只接受了鸠摩罗国王送的一件鹿毛披肩，以备途中防雨。动身那天，戒日王、鸠摩罗王等以及当地人民送他几十里路才洒泪而别。

645年正月二十四日，玄奘带着657部佛经，经西域回到长安。唐太宗在洛阳行宫接见他，极有兴趣地听他介绍西域及天竺见闻，并劝他还俗到朝廷任职，他婉言谢绝。三月初一玄奘回长安，随即开始佛经翻译工作。先后在弘福寺和慈恩寺主持译场，译场有负责翻译的，有检查译意的，有整理译文的，有推敲字句的，各任专职，分工细密。玄奘不懈地工作了十九年，共译出佛经七十五部1335卷，由于他有较高的汉文化素养又精通梵文，所以他的译文流畅优美，而且忠于原意。有些专用名词如“印度”一词，表示时间的“刹那”一词就是经他确定的。唐太宗亲自为玄奘的译经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借以宣扬佛教。

玄奘还回忆旅途见闻，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亲历的110国、传闻的28国的情况。涉及地域包括今新疆以

及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等国家和地区。他把当时各国的方位、道里、疆域、城市、人口、风俗人情、名胜古迹、历史人物、传说故事等一一写下来，内容丰富生动，准确可靠，是研究这些地区历史的重要材料。现在《大唐西域记》已译成数国文字。成为一部世界名著。玄奘当时可能认为他留给后世的主要贡献是取回的佛经和他的译经。我们今天看来，他那些宣扬佛教的经书的总和也未必抵得上这一部《大唐西域记》的价值。玄奘也向天竺介绍了中国的文化，据说他曾经把中国道教哲学著作《老子》译成梵文，传入印度。这应是第一部中国典籍的外文译本。但现已散佚。

天竺朋友十分怀念他，高宗永徽三年（652）天竺和尚法长来中国，玄奘老友那烂陀寺的智光和慧天特意托他给玄奘捎来书信、著作和礼物，表示亲切的问候。信中说："送去白布两匹，表示我们并没有忘记你，路程太远，希望你不要怪带去的东西太少，还是接受下来吧。如果你需要什么书，我们会抄出来送去的。"玄奘请法长捎去回信，回赠了礼物，并捎去一份他在回国途中丢失需要补抄的书单。在回信中玄奘感谢朋友们的深情厚谊，对戒贤老师逝世表示深切悼念。还报告了自己的译经工作进展情况。这种动人的友谊，是中印人民友谊史上的佳话。

玄奘是中印人民友谊的使者，是唐初佛教高僧，是世界著名的伟大旅行家和杰出的古代翻译家。他所以能在交通条件还极其落后的时代，用了十八年时间跋涉五万余里，征服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完成了自己的艰巨使命，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具有极其顽强的性格，目标既经确定，就决不动摇，就要以百

折不挠的毅力去实现它。这种性格是十分可贵的。他的顽强精神和动人事迹，将永远留在中印两国人民的记忆中。

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玄奘圆寂于长安附近的玉华寺，葬于长安兴教寺。生平事迹由其弟子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唐中叶已有关于玄奘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隋唐五代

李林甫专权

李林甫，高祖从弟长平王叔良之曾孙，善音律，曾任御史中丞、历刑、吏二侍郎，多与宦官结交。时武惠妃爱倾后宫，二子寿王、盛王也因母而得帝宠异。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通过宦官告知武惠妃“愿保护寿王”。武惠妃德之，阴为内助，得拜为黄门侍郎。开元二十三年（735），以张九龄为中书令、李林甫为礼部尚书。李林甫面柔而有狡计，又厚交宦官、嫔妃，能伺上动静，出言相奏，甚合主意。

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均以母失宠而有怨语，驸马都尉杨洄告之武惠妃。妃泣诉于上，玄宗大怒，谋于宰臣，欲罪之。张九龄曰：“陛下三个成人儿不可得。太子国本，长在宫中，受陛下义方，人未见过，陛下奈何以喜怒间忍欲废之？臣不敢奉诏。”①玄宗不悦，林甫初无语，待退下后对得宠之宦官说：“此主上家事，何必向外人。”②自此，日毁誉九龄于帝前，终致代九龄为中书、集贤殿大学士、修国史，贬九龄为荆州长史。不久，玄宗又用林甫言，废太子瑛，贬鄂王、光王为庶人。封李林甫为晋国公。

开元二十五年（737），废太子瑛和武惠妃均死，储位虚空，李林甫对上曰："寿王年已成长，储位攸宜。"玄宗曰："忠王仁孝，年又居长，当守器东宫。"③欲立忠王玙，又犹豫不决。高力士乘间问其故："得非以郎君未定耶？"上曰："然。"对曰："大家（指玄宗）何必如此虚劳圣心，但推长而立，谁敢复争。"④上遂立玙为太子。林甫以立太子非己意，遂有戒心，欲阴查事端以倾太子。

韦坚以皇太子妃兄，在朝中身居要职，李林甫密令御史中丞杨慎矜监视韦坚的行动。正月十五，皇太子出游，与韦坚见面相谈，慎矜知之，奏上。玄宗大怒，以为不轨，罢免韦坚，后又寻故赐坚自尽。杨慎矜权势渐大，李林甫又忌之，遂推荐王鉷为御史中丞，以为心腹。王鉷诬奏杨慎矜左道不法，族灭其全家。天宝六载（747），李林甫又唆使洛阳别驾魏林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说他曾云与忠王同养宫中，情深意好，想拥兵佐助太子。玄宗不信，曰："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⑤

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凡以为上所厚者，必设法结交，然位势相逼时，辄以计去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

天宝三载（744）唐玄宗纳原寿王妃杨太真于宫中，三千宠爱在一身，从此君王不早朝。玄宗对高力士说："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说："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无事，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⑥玄宗不悦，高力士自此不敢深言天下事。

林甫更加有恃无恐。天宝四载（745）李适之任左相，林甫为右相，二人争权，林甫深恶之。林甫对李适之说："华山

有金矿，采之可以富国，主上未之知也。”改日，适之奏于圣上。玄宗问李林甫此事，林甫却曰：“臣父知之，但华山陛下本命，王气所在，凿之非宜，故不敢言。”⑦圣上听之，认为林甫爱己，适之则虑事不周，遂疏远之。

开元、天宝年间，常有边关大将入朝为相者，李林甫志欲专权，杜绝出将入相之源，对玄宗说：“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⑧于是哥舒翰、安禄山得为节度使，终导致安史之乱。

杨国忠以椒房之守入朝，位至中司，权倾朝列，引起李林甫妒忌。时南诏犯边境，李林甫奏请国忠赴镇，临行，玄宗安慰说：“卿暂到蜀郡处置军事，朕屈指待卿，还当入朝。”⑨李林甫十分不悦。不久，林甫病危，玄宗召国忠还京。国忠谒林甫，林甫流涕曰：“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⑩遂卒。

后，杨国忠诬奏林甫与蕃将阿布思同构逆谋，上信之，诏夺林甫官爵，废为庶人。子孙、亲信、朋党亦遭流贬。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②《通鉴纪事本末》卷三〇《李林甫专政》。

③《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李林甫专政》。

⑤《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⑥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李林甫专政》。

⑧⑨《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

⑩《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李林甫专政》。

隋唐五代

安 史 之 乱

唐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治所幽州，今北京城西南）起兵反叛。

安禄山本是营州（今辽宁朝阳）杂种胡人，初名轧荦山。其部落破散后，外逃，冒姓安，取名禄山，因懂蕃语，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贸易中充当经纪人。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用他为捉生将。安禄山用诈诱捉契丹人，每次带数人外出，总能捉几十名契丹人回来，屡建“战功”，逐步提升，终为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

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安禄山征讨奚、契丹叛军时，因轻敌冒进，大败。张守珪奏请斩之，宰相张九龄为严肃军纪，判处安禄山死刑。唐玄宗听说安禄山精明强干，下令释放。张九龄力争：安禄山违反军令，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据我观察，他非良善之辈，不杀必留后患。玄宗不听劝谏，赦免了他。

开元二十九年(741)，安禄山厚赂玄宗亲信，得授营州都督，平卢军使、两蕃(指奚、契丹)、勃海、黑水四府经略使。第二年，

又被授予平卢节度使。唐天宝三载(744),以安禄山兼范阳节度使。过三年,又兼任御史大夫。他每岁必以奇禽异兽、珍玩贡献朝廷,又竭力迎合玄宗所好,百般逗趣,以博其欢心。安禄山体胖,腹垂过膝。一次,玄宗指其腹问:“这肚子里是什么东西,怎么这样大?”他马上回答:“无有他物,只有一颗对圣上的忠心。”又一次,入宫,见玄宗与杨贵妃并坐,便先拜见贵妃,后拜玄宗。玄宗问何故,对曰:“胡人先母而后父。”帝、妃皆喜。于是,安禄山认贵妃为母。

当时,常有以有功之边将入仕宰相者。中书令李林甫欲谋相位,设法杜绝边帅入相之路。他一边排挤颇有战功的朔方等四镇节度使王忠嗣,一边在玄宗面前竭力推荐安禄山,认为胡将无文化,不大可能入京为相。玄宗正担心边将谋反,于是听信李林甫,命安禄山兼任河东节度使,并赐与铁券①。玄宗又为安禄山在京师造宅第,不限财力,穷极富丽,并以金银为篣(音旁,竹笼)、筐、笊篱等。

安禄山在范阳北修建雄武城,对外说是为御敌,实则内贮兵器,广积谷物。又养同罗、奚、契丹降兵降将八千人,号“曳落河”(壮士);有家僮百余人,一以当百;畜养战马数万匹,多聚兵器,阴谋叛乱。天宝十载(751),安禄山率三镇六万兵马进攻契丹,大败,全军覆没,玄宗却仍宠信有加。

第二年,李林甫死,杨国忠为相,安禄山蔑视之,二人矛盾极大。杨国忠屡次对玄宗说安禄山要谋反,玄宗不以为然。天宝十三载(754)春,杨国忠又对玄宗说安禄山必反,又云“召必不至”。玄宗派人召之而至,在华清池见驾,对玄宗哭诉:“臣蕃人,不识字,陛下擢臣不次,彼杨国忠欲得杀臣。”②玄宗安慰他,并更加信任。从此,人人皆知安禄山必反,却

无人再敢在玄宗面前提及此事。

天宝十四载春二月，安禄山派人入奏，请以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宰相韦见素对杨国忠说："禄山久有异志，今又有此请，其反明矣。明日见素当极言；上未允，公其继之。"③二人力谏，上不听。

安禄山与孔目官太仆丞庄严、掌书记屯田员外郎高尚、将军阿史那承庆密谋，秣马厉兵，伺机反叛。十一月，安禄山诈为敕书，召诸将矫称："有密旨，令禄山将兵入朝讨杨国忠，诸君宜即从军。"④遂发所部兵及同罗、契丹、奚等兵十五万，号称二十万大军，在范阳发动叛乱。

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反叛，才仓促布署防御：封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派他去东京（今洛阳）召募兵士，十天得六万人。拆断河阳桥（今河南孟津县北），以防止叛军由此渡黄河。调任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为户部尚书，以朔方右厢兵马使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新设立河南节度使，管辖陈留（治浚仪，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个郡，任命张介然为节度使。从内府拿出钱币，在京师募兵十天，得十一万人，号"天武军"，都是市井子弟。任命皇子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丽人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军东征。十二月初，高仙芝率兵五万，出关屯守陕郡，以宦官边金诚为监军。

安禄山从灵昌渡黄河，兵临陈留城下，此时张介然到陈留才数日。安禄山叛军攻城，陈留太守开门投降，张介然和近万名将士遭杀害。安禄山引兵攻荥阳，守城士兵闻号角声，惊得纷纷堕城，陷荥阳，杀太守崔无波，气焰益加嚣张，以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向东京进发。封常清所率皆为新募士卒，未受过训练，在武牢与安禄山对抗，兵败。安禄山陷

东京。封常清率余众至陕郡，与高仙芝合兵一处，退守潼关。叛军追至潼关，攻城不下，退屯陕郡，宦官边金诚向玄宗进谗言："封常清以贼摇众，而仙芝弃陆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⑤玄宗遂令就地将封、高斩首，高仙芝临刑大叫："我遇敌而退，死则宜矣。今上戴天、下履地，谓我盗减粮赐则诬也。"⑥

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当时染病居家，唐玄宗任命他为兵马副元帅，命他率兵八万讨伐安禄山。这八万人多是新兵，加上一部分河西、陇右的镇兵、西北边境上十三个部落的蕃兵，以及潼关高仙芝旧部，计十几万人，号称二十万。玄宗让这支由病将统率、临时拼凑起来的杂牌军去攻取东京。

安禄山攻潼关不下而归，于天宝十五载正月在洛阳称帝，国号燕，年号圣武。

河北常山（今河北正定县）太守颜杲卿、平原（今山东平原北）太守颜真卿起兵讨伐安禄山。河北十七郡起而响应，归顺朝廷，安禄山仅剩下范阳、卢龙、密云、渔阳（今河北北部）、汲、邺（均在今河南南部）等六郡。

安禄山派大将史思明、蔡希德各带一万人马分两路攻打常山。颜杲卿顽守四天，昼夜拒战，终因粮尽矢绝，兵败城破。叛军杀害了一万多军民，抓获了颜杲卿，押送洛阳；颜杲卿大义凛然，痛斥安禄山，惨遭杀害。颜真卿募勇士万人抗敌，邻近诸郡纷纷响应，杀死安禄山所派守将，共推颜真卿为盟主，派兵收复魏郡（今河北大名县西）。二月，河东节度使、原朔方军将领李光弼率朔方军万余人、太原郡弩手三千出井陉（今河北井陉北井陉山上），攻克常山，收复其九县中的七个县。安禄山守将史思明仅据九门、藁城两县与李光弼对峙。四月，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出井陉，在常山与李光弼会合，集汉、蕃兵十余万，与史思明大战。史思明败逃，唐军追拔赵县（治今赵县）。史思明奔博陵，收集散兵数万人，旋即又败于郭子仪、李光弼。安禄山在东京分出骑兵两万人，又从范阳派出郡兵一万人，与史思明残部会合，约五万人，其中同罗、曳落河兵占五分之一。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在嘉山（今河北曲阳）大破史思明，斩首四万，捕获千余人。史思明坠马，徒步奔回博陵。李光弼追至，围城，军威大震。范阳和洛阳之间联络被隔断。

哥舒翰带兵守潼关，玄宗和杨国忠疑其按兵不动，别有他图，于是召募万余人屯于灞上，以备哥舒翰有变。玄宗令哥舒翰进攻陕洛。哥舒翰奏称叛军利在速战，官军利在坚守；郭子仪也奏请引兵攻范阳，而认为潼关大军不可轻率出征。杨国忠又怀疑哥舒翰图谋自己，向玄宗进谗言，派出一个个宦官催促哥舒翰出关。哥舒翰无奈，拍胸恸哭，只好引兵出关，在灵宝县西遇埋伏，大败。哥舒翰为一反叛蕃将诱捕，解送洛阳。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叛军入潼关。玄宗、杨国忠带领杨贵妃姊妹，诸皇子及一些随从朝官、宦官、卫兵逃出西京（长安）往蜀地避难。郭子仪、李光弼闻潼关失守，遂放弃河北，退入井陉，李光弼守太原，郭子仪去灵武，河北诸郡皆陷史思明之手。安禄山进入西京后，叛将们沉迷于酒色，争权夺利，士气大衰。

玄宗一行逃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西），将士又累又饿，皆怒气冲天，以杨国忠勾结胡虏谋反为借口，追杀之；并杀了他的妹妹韩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军士围驿，玄宗闻声问何故，左右答曰杨国忠谋反。玄宗出驿门慰军，令收队，军士不从。

玄宗使高力士问之，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回奏："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⑦玄宗无法，乃命高力士引贵妃至佛堂，缢杀之。留太子李亨讨伐安禄山，玄宗入蜀，至成都。七月，李亨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尊玄宗为太上皇。

肃宗即位时，身边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想平定叛乱无从着手，于是请来好友李泌，任命为元帅府行军长史，共议国事。不久，郭子仪率精兵五万到达灵武。李泌为肃宗献计说："贼之骁将，不过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等数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思明、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守忠、乾真不敢离长安，是以两军絷四将也，从禄山者，独承庆耳。愿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征之兵军于扶风，与子仪、光弼互出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往来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来春复命建宁为范阳节度大使，并塞北出，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阳，覆其巢穴。贼退则无所归，留则不获安，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⑧肃宗甚以为然。

唐至德二载（757）春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即帝位，派遣尹子奇率兵十三万人攻睢阳（今河南商丘南）。真源令张巡与睢阳太守许远合兵六千八百人，日夜苦战，杀敌两万余。三月，再败尹子奇。五月，尹子奇再围睢阳，张巡等率五十骑突入敌营，射中尹子奇左目，败走。七月，尹子奇复征兵数万，再攻睢阳，城中粮尽，以茶纸、树皮为食。八月，城内死伤之余，仅剩六百人。张巡令南霁云突围至临淮

(泗州，在今江苏盱眙北水下)，向河南节度使贺兰进明求援。进明不肯发兵，尹子奇知睢阳援绝，围之益急。城陷，张巡、许远、南霁云先后遇害。张巡守睢阳，大小四百余战，杀叛军十二万人。

时史思明围太原月余不下，安庆绪命他退守范阳。二月，肃宗到凤翔。李泌主张先取范阳，以求彻底消灭叛军，肃宗不听，决定先取两京。从河东召回郭子仪，任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兵攻打长安。五月，郭子仪为安守忠所败，退保武功。郭子仪劝唐肃宗派人至回纥部求援。九月，回纥怀仁可汗使儿子业护率精兵四千余至凤翔。广平王李俶与郭子仪率朔方镇兵及回纥、西域兵计十五万，大破叛军，收复了西京。叛将安守忠、田乾真率败兵逃出潼关。

失西京后，叛军军心动摇。郭子仪乘胜率大军攻东京洛阳，安庆绪率残部奔河北，占据邺郡（今河南安阳）。他招兵买马，很快拥兵六万。十二月，唐玄宗回到长安。叛将史思明请降，封归义王、范阳节度使。

乾元元年（758）六月，史思明再叛。九月，肃宗命郭子仪、李光弼等九个节度使率兵二十万攻打安庆绪。大军不立元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十月，围邺郡。从十月至第二年二月，邺郡城中人相食，斗米值七万钱。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称大圣燕王。二月，引兵救邺。三月，郭子仪等九节度使战败，遂解围南行，以朔方军切断河阳桥，以保东京洛阳。史思明至邺郡，杀安庆绪，留下儿子史朝义，自回范阳。四月，史思明称大燕皇帝，年号顺天。

邺城下九节度使溃败，鱼朝恩将罪责推给郭子仪。肃宗召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副元帅，重赏朔方

节度副使仆固怀恩，为抑退李光弼做准备。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南下，渡河，攻取汴州。李光弼只好放弃洛阳，退守河阳。不久，史思明在河阳败于李光弼，逃回东京。上元二年（761），鱼朝恩、仆固怀恩怂恿肃宗命李光弼出兵攻打洛阳，李光弼被迫出战，在邙山（今河南偃师北）大败，因此失去兵权。

史思明欲乘胜攻击西京，朝廷大惧。正当此时，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即帝位，改元显圣。

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宦官李辅国、程元振杀肃宗皇后，惊死肃宗。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十月，代宗任命其长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仆固怀恩为副元帅；又派出宦官向回纥请兵，会合唐军，攻打史朝义。连战连胜，收复东京、郑、汴等州。十一月，仆固怀恩率朔方等军渡河北进，追赶史朝义，围史朝义于莫州（治在今任丘北）。

唐宝应二年（763）正月，叛将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怀仙以范阳降，史朝义在逃亡中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注 释

①帝王赐给功臣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契。

②《旧唐书》卷二OO上《安禄山传》。

③④⑤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一《安史之乱》。

⑦《资治通鉴》卷二一八，唐肃宗至德元载。

⑧《资治通鉴》卷二一九，唐肃宗至德元载。

隋唐五代

刘晏理财

唐代名臣、理财家刘晏是曹州南华（旧址在今河南东明县东南、金代时被黄河淹废）人，从小聪明好学，才华出众，年幼时即被带往京师，授予正字（校对）之职。曾历任夏县、温县县令，四十岁调任侍御史。安史之乱后，肃宗任用为户部度支郎中（主管财政的收支），主管江淮租赋之事。

宝应元年（762）唐代宗即位，任刘晏为长安京兆尹、户部侍郎兼任判度支、铸钱、盐铁使及转运使。第二年，刘晏迁吏部尚书、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广德元年(763)、刘晏升“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诸使如故，因主管财经，被称为“计相”。后以功升“户部尚书”，管理财政经济十余年，功勋卓著。德宗继位后，户部度支仍由刘晏兼管。杨炎做宰相后，为替劣迹昭著的前宰相元载报仇，排挤、构陷刘晏，引起德宗疑虑，先将之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后又“赐死”。

刘晏受命于安史之乱后的危难之秋，理财十多年，使唐王朝渡过严重的财政难关，得以延续下去。刘晏理财，主要抓了

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恢复，改进江淮漕运，解决向京师运粮之事。关中地区虽产粮，却难以满足供应京师百姓和大批禁军之需，每年需从江淮调运百万石粮食。水路运输，路长水远，过水势湍急的三门峡，常常船翻粮沉；走陆路则山道崎岖，牲畜拉驮，劳民伤财。安史之乱时，漕运更加艰难，京师严重缺粮，米价涨到每斗一千至一千五百钱，官府厨中都无多余粮食，京畿农民捋下田中青穗，供给缺粮的禁军。广德二年（764），刘晏率随从南下江淮，沿途察视河道：看三门峡的栈道和石渠；到河阴（今河南河阴县东）、洛口（今河南巩县）观察汴水、洛水入河口，计谋对策，组织伕丁，疏浚汴水。在扬子县（今江苏仪征县）建立十个船场，令人打造装粮千石的大船二千艘，雇用船工水手，以十只船编成一队，由军官督运，改私运为官运，保证了运粮的安全。又改"直运"为"分段接运"。以往江南船只二月在扬州集中，四月入淮渡汴，六七月才到黄河口，需历时半年始能往京师运。这样耗费巨大，粮食受损严重。分段接运是将全程分为四段，各段船工熟悉本段的水情，损耗小；又可以运一段，在岸上存贮一下，减少损失。三门峡一带，则采用部分人撑篙，部分人拉纤的办法，一步步将船拖过陕峡逆流，避免了船翻粮沉。

从此，汴、黄漕运通畅，粮食源源不断运到京师。人们称赞刘晏"见一水不通，愿荷锸而先往；见一粒不运，愿负米而先趋"①。每年运粮四十万石，有时多达百万石，而且大大节省了运费，从过去"斗钱运斗米，到每石粮运费只需三百四十文钱。京师米价跌降，朝廷收入增加。刘晏刚办漕运时，朝廷年收入四百万缗，大历末年增加至一千二百多万缗。

久经战乱，朝廷财政亏空，刘晏决定从食盐专卖上获利。从唐乾元元年（758）起，朝廷实行食盐专卖，每斗一百十文。上元二年（761），元载为户部尚书，任盐铁使。他广设盐官，选派豪吏督收盐利，卖不掉便强行摊派，常常“一吏到门，百家供奉”，百姓受害非浅。

刘晏接管盐务后，首先精减管盐机构——监院，裁减冗员，清除贪官豪吏。在主要产盐区，保留十个盐监、四个盐场。盐监是管理食盐生产和收购的机关，盐场是中转的栈场。此外，在主要城市设立十三个巡院，负责管理食盐市场、缉查盐贩走私活动等。刘晏还着手改革食盐专卖制度，由官运官销改为“就场专卖制”。即由盐官统一收购，集中到盐场后再转卖给盐商，食盐流通税包含在盐价中。商人缴纳盐款后，可自由运销，即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在边远地区，刘晏令存贮部分食盐，称“常平盐”，以防止盐价上涨，稳定市场。此外，还采取一些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设立盐仓，可就近调拨运销；请求朝廷严禁地方乱收费，以减少运盐成本；鼓励以绢代钱购盐，以解决将士的衣着，等等。

刘晏管理盐务后，朝廷收入大增，原江淮盐利每年约四十万缗，大历末年增到六百多万缗，占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在征税方面，刘晏也一反元载的做法，废除额外的横征暴敛，派人任“知院官”，掌管各地农事，上报朝廷以决定减免或调整租税。还设立“常平仓”，注意调节粮价。在粮食上市时，商人压价，各地官府则以高于市场的价钱收籴粮食，避免“谷贱伤农”，在青黄不接或欠收年头，官府以低于市场价格供应缺粮农户，避免“谷贵伤民”。并以重价召募“疾足”（跑得快的信使）了解四方物价情况，三五日内京师就可知晓。刘晏

掌握情况后，及时平抑物价。这样，既稳定了民心，又保证了官府的财税收入，“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

刘晏理财的另一做法即“均输”，朝廷将赋税收入折成钱，以低价从产地收购各种土特产品，转运到京师和高价地区出售，这样，既调节了供求，朝廷也增加了收入，对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到大历末年，刘晏所辖各事总收入每年一千二百万缗，其中盐务占百分之七十，比初任事时增加十倍。

当时，朝廷因铜料不足，钱币短缺，物价转跌。刘晏以铸钱使身份，精工足料，铸造足值的货币。他还在征收或换购的物资中，把一部分零星不值钱、供应京师都不足以抵偿运费的东西运到盛产铜砂的淮楚地区，以换回铜砂铸币，一年可达十余万贯，保证了京师等地市场流通的需要。

对于刘晏的功绩，《新唐书·刘晏传》这样评价：“因平准法，斡山海，排商贾，制万物低昂，常操天下赢资，以佐军兴，虽拿兵数十年，敛不及民之用度足”，“富其国而不劳于民，俭于家而利于众”②。

注 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二三《刘晏传》。

隋唐五代

推行两税法

唐初，对农民实行“租、庸、调”赋税制，除田赋、丁调、劳役外，还以亩计征“地税”，按户计征“户税”，每亩附加“青苗钱”，此即朝廷财政的主要来源。

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严重，丧失土地的农民四处流浪，均田制遭到破坏，户籍亦十分混乱。“不为版籍，人户寖溢，堤防不禁。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①。失去土地的人因有户籍在，仍需负担沉重的赋税，富人增加了土地，因享有特权而免税。“凡富人多丁者，率为官为僧，以色役免，贫人无所入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下”，“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日送无休息”②。

安史之乱以后，赋税混乱状况加剧，以致于“王赋所入无几”。大历初年，京畿废除租、庸、调制。唐德宗年间，由于税制混乱，官吏层层中饱私囊，朝廷收入无法维持正常开支，税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建中元年（780）正月，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正

式颁令实行新税法："计算百姓及客户，纳丁产，定等第，均率作年支两税。"③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一、提出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即先计算国家每年各项支出的总额，再计算国家各项收入的总额，以这两方面的数额为依据，根据财政支出所需费用的总额，确定向百姓征税的数额，把这个数额摊到各州县，各州县再按亩数和户等向百姓征收。并将量出制入落实到大历十四年的旧征额数，以防止统治阶级上层由于奢侈无度而导致横征暴敛。二，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贫富为差"，即不分主客户，按现居住地户籍，不分丁男中男，均以贫富定等级；三，不定居的行商人，于所在州县按三十分之一纳税，使其与定居者一样负担租税；四，将以往征收的租庸调、户税、地税及其他杂税等全部并入两税，统一征收。分夏秋两季征收，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五，将征收实物赋税改为征收货币；六，明文规定两税之外，辄率一钱以枉法论。简言之，两税征收对象，一为户，二为地，户按资产定等，地按亩数征收，为确保税收，"贞元四年诏天下，两税审等第，三年定户"④。

同时，杨炎提出将政府岁入由皇帝私藏改归政府。唐代本规定国家公赋与皇帝私人经费分头管理，安史之乱中，因财政入不敷出，无法应付，就将国家公赋收入和皇室经费合到一起，成为"天下公赋为人君私藏"。杨炎主张公赋仍归政府，每年提出一定数额为皇帝私用。

两税法推行的初期，对平民小户有利。以往朝廷用钱，则随意加税，名目繁多，富户或做官人家，设法逃税，而一般百姓家口多，只能按丁纳税，苦不堪言。新税法按资产而不按丁口征收，也不区分主客户，这样，一些有田产的富户、富商就

得多负担税额，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可以少纳税或不纳税，负担有所减轻。

推行两税法，暂时统一了税制，扩大了征税对象，约束了官吏的贪赃枉法行为，“两税之兴，其首要之务，实为去无名之暴赋”⑤。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据记载，建中元年，两税所得税款一千零八十九万八千余缗，谷二百一十五万七千斛。

两税法的实施，是封建社会赋税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初实行曾起过较好的作用，但不久即嶎端丛生。建中二年（781）以后连年征战，军费成倍增加，朝廷借口“量出制入”，税上加税。如，建中三年（782），淮南节度使陈少游上表请求在本道两税钱中每千文加二百，唐德宗马上批准，而且通知各道均加税二百文。诸如此类，各道不时要求暂加税收，当然，各地加税后，也进奉一部分给朝廷。

两税法规定，不分主客户，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不分丁男中男，按贫富定等第。贞元四年（788），唐德宗敕令天下每三年定一次户籍，按户口增加。税钱增长考核地方官吏政绩。于是，地方官吏迫使老百姓分户，诱骗邻境居民逃入本境，这样税额又全部摊派给土著户，且限期完税，贫苦人家只好借债卖儿缴纳。按贫富定等级，可是有人资产贵重却易于藏匿，田产物产堆在场院、谷仓，虽不值钱，却被认为富有，造成“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⑥。

规定，商人纳税三十分之一，以商人盈利，三十而税一，实际比农民负担轻得多，定居者分夏秋两季纳税，这般促急，造成“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⑦。而且

旱涝灾年，照旧收税。此外，两税均以钱计算，“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⑧。如，农民生产粮棉，官府则将粮棉折钱收税，初行两税，定三匹绢为一万钱，到后来六匹绢才抵一万钱。到唐穆宗年间，钱愈重，物愈轻，八匹绢才抵一万钱，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增加三倍。

两税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依据，保留丁额，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虽然十室九空，仍依照丁额下摊。《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税取于居者，一室空而四邻亦尽。”由于强行摊派，逃亡之人愈来愈多。唐宪宗年间，原有四百户的渭南县（今陕西渭河平原南部）长源乡只剩下百余户。

至于租庸调及其他一切科目全部废除，但各种苛杂税比正税还多，且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两税法推行中的这些弊端，宰相陆贽、翰林学士白居易均有奏议，要求朝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也有人提出恢复租庸调法或实行均田法。但两税法终究没有废除，直到明代后期才由一条鞭法取而代之。

注　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一八《杨炎传》。

③《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

④《新唐书·食货志》。

⑤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175页，中华书局版。

⑥《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3页，中华书局版。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5页，中华书局版。

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二第2994页，中华书局版。

隋唐五代

吐蕃犯唐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统一西藏后，与唐建立密切关系，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藏和亲。唐中宗时，又将美女金城公主入嫁吐蕃（710）。此期间，虽吐蕃时有侵扰，但唐蕃关系基本上是良好的。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发动叛乱。安史之乱，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边关精锐者皆征发入援，所留边兵单弱，吐蕃乘机不断入侵，虏掠杀伤，数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的数十州均落入吐蕃之手。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上半年，吐蕃犯唐，陷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兰、岷（治今岷县）、廓（治今青海化隆西）、临（治今甘肃临洮）、原（治今宁夏固原）等州。七月，入大震关（今甘肃陇县西）。九月，吐蕃陷泾州。十月，又寇邠州，陷奉天县，京师震骇。

代宗诏雍王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抵御吐蕃。吐蕃率党项、吐谷浑、氐、羌 20 余万人抵长安，京师失守，代宗仓猝出逃陕州。郭子仪退保商州。吐蕃入京师，剽掠府库

市里，纵火焚掠。又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置百官。郭子仪在商州收散兵四千，欲夺回长安，以节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难，吐蕃闻之甚惧。百姓欺骗吐蕃说："郭令公自商州领众却收长安，大军不知其数。"①又遣将入城，阴结少年数百人，夜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惶骇，悉众遁去，遂收复京师。年底，代宗还京。

广德二年（764）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反叛。八月，引吐蕃、回纥兵十万入寇，京师震惊，诏郭子仪出奉天以御之。十月，吐蕃两万人逼邠州，节度使白孝德闭门拒守，先锋郭晞在邠州西斩俘吐蕃兵数百人。吐蕃兵进逼奉天，京城戒严。郭子仪屯奉天，众人请战，子仪曰："客深入，利速战。彼下素德我，吾缓之，当自携式。"②因下令："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吐蕃不战自溃。剑南节度使严武破吐蕃七万众，拔当狗城。

代宗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等三十万人，分三道入扰，吐蕃以十万军赴奉天，京师震恐，命郭子仪等屯泾阳等地。代宗又下诏亲征。吐蕃攻醴泉，大掠男女财物而去。吐蕃退至永寿北（今陕西郴县），遇回纥，又合兵一处，来攻奉天。郭子仪知回纥与吐蕃不睦，遂与数骑飞驰回纥营，说服回纥与官军联合对付吐蕃，在灵台（今甘肃泾川东九十里）斩吐蕃五万，掠牛羊无数。

大历二年（767）九月，吐蕃又以数万人围灵州（今宁夏中卫、中宁以北），诏郭子仪镇泾阳，京师戒严。十月，朔方节度使破吐蕃二万余众，生擒五百人，获马一千五百匹，吐蕃败走。

大历三年（768），吐蕃又以十万人侵灵武，大将尚悉摩率

两万人马寇邠州。邠宁节度使马璘破敌两万，关内副元帅郭子仪于灵州又破吐蕃六万余众，剑南西川亦破吐蕃万余众。

吐蕃连年劫掠、滋扰，至大历八年（773）吐蕃六万人又扰灵武，践踏禾稼而去。十月，吐蕃以十万人寇泾、邠等州，郭子仪派遣朔方兵马使浑瑊拒之，初败于宜禄（在邠州西），后与马璘合力，杀数千人，吐蕃败走，夺还被掠居民、牛马。

大历十一年（776）正月，剑南节度使崔宁大破吐蕃、突厥、氐、吐谷浑、羌、党项等二十余万众，斩首万余级。十月，又攻下吐蕃望汉城。十二月，西川兵破吐蕃十余万众，斩首八千级。

德宗建中元年（780），唐派遣韦伦送归吐蕃俘虏。吐蕃人极言唐天子盛德，其赞普（首领）大悦，修道路迎韦伦，并遣使随韦伦入唐朝贡，唐蕃关系转机。建中二年（781）赞普请改敕书称贡献及赐，并请以贺兰山为界，皆许之。建元三年（782），吐蕃放归设蕃将领、僧尼等八百人。双方协议会盟之事。时朱泚反，吐蕃出兵助唐收复京城。

到贞元三年（786）五月，以侍中浑瑊为吐蕃平凉会盟使，率军两万至盟所。将盟，吐蕃伏兵数万齐发，唐将卒被劫千余人，浑瑊侥幸逃归。不久，吐蕃又遣使请和，拒之。于是又大掠汧阳、吴山等地，继而围陇州、陷华亭、连云堡，扰长武城，屯原州。

贞元四年（788）盛夏，吐蕃以三万骑扰泾、邠、宁、庆、鄜等州，掠人畜约二、三万而归。十月，吐蕃又发兵十万联合云南兵滋扰西川（今四川西部）。节度使韦皋说服云南王引兵回去，而在清溪关（四川汉源西南）外大破吐蕃兵。第二年，韦皋又遣将破吐蕃兵于嶲州（治今四川西昌）台登谷，斩首二

千级，投崖赴水者不可胜数。

德宗贞元八年（792）吐蕃扰灵州，毁营田。六月，又扰泾州、掳屯田士卒千余人而去。八月，韦皋攻吐蕃于维州（治今四川理县），虏其大将论赞热。第二年五月，又遣董勔、张芬分出西山、灵关，破吐蕃，拔堡寨五十余所。

至贞元十七年（801），吐蕃又大举进攻，寇盐州、陷麟州、杀刺史、毁城池，大掠居民。韦皋遣将率兵两万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并进，从八月到十二月，转战千余里，累破敌十六万众，拔七城，五军镇，受降三千余户，生擒六千余人，斩首万余，遂围维州，擒吐蕃大首领论莽热。吐蕃元气大丧。韦皋治蜀二十一年，数次出师，破吐蕃凡四十八万，擒杀城主、笼官千五百，斩首五万余，获牛羊二十五万，收机械六百三十万。

唐宪宗元和六年（806），吐蕃遣使入唐请盟，唐亦遣使入蕃，自此遣使朝贡不绝，并开互市。到长庆元年（821），吐蕃会盟使论纳罗入唐，据吐蕃宰相钵阐布提的盟文，穆宗命宰相及大臣共十七人与吐蕃盟使会盟于长安西郊。次年，唐会盟使刘元鼎入吐蕃，与钵阐布会盟于逻些（今拉萨）东哲堆园，建"长庆会盟碑"。规定："蕃汉两邦，各守见管本界，彼此不得征，不得讨，不得相为寇雠，不得侵谋境土。"③基本上结束了唐蕃之间长期的战争。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上》。

②《新唐书》卷一三七《郭子仪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下》。

隋唐五代

藩 镇 割 据

安史之乱后，朝廷多以安史残部降将为节度使，形成了地方割据势力。

唐宝应元年（762）十一月，以叛将张忠志为成德军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赐姓李，名宝臣。第二年正月，以降将薛嵩为相、卫等六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等五州都防御使，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六月，改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形成成德、魏博、幽州三个藩镇。这些节度使表面上服从朝廷，实际上蓄意发展自己的势力。河北三镇节度使与镇守淄青（治所青州，今山东益都）的高丽人将领李正己（怀玉）互为表里，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设文武将吏。朝廷对这些藩镇一味姑息，忍辱退让。

李宝臣、李正己和田承嗣议定，在藩镇确立世袭制。唐大历十四年（779），田承嗣死，侄田悦接替他，李宝臣奏请朝廷承认田悦的继承权，正式任命其为魏博留后。建中二年（781），成德镇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也要求继承其父之位，田悦屡次为李惟岳奏请继袭。唐德宗坚决不允，于是田悦、李

正己、李惟岳联合起来，为争取继承权而对朝廷出兵。田悦派大将康愔以八千人围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并亲率数万人围临洺（今河北永年县西）。唐德宗调各路兵马讨伐叛军。又封靺鞨人、原郭子仪部将李怀光为朔方节度使。秋，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军将李晟在临洺大破田悦军。田悦引兵夜逃，求救于李纳（时李正己死），和李惟岳。李纳派兵万余，李惟岳派兵三千，与田悦散兵合到一处，计两万余人，屯于洹水（今河南安阳以北）。淄青军在东面，成德军在西面，首尾呼应。八月，范阳节度使朱滔奉命讨李惟岳，游说易州（今河北易县）守将张孝忠归降朝廷。朝廷任命张孝忠为成德节度使。十一月，宣武节度使刘洽、朔方大将唐朝臣等率兵破淄青、魏博兵于徐州。

唐建中三年（782）正月，马燧、李抱真等军在洹水破田悦军，斩首两万余级，捕虏三千余人。田悦收集残兵败将千余人，逃回魏州。朱滔、张孝忠与李惟岳战于束鹿（今河北束鹿东北），李惟岳大败，逃往恒州。李惟岳部将、契丹人王武俊因遭到李惟岳猜忌，杀李惟岳，归顺朝廷。二月，唐德宗以张孝忠为易、定、沧三州节度使，王武俊为恒、冀二州都团练观察使，另一降将康日知为深、赵二州都团练观察使，命朱滔管辖德、棣二州。朱滔拒绝交出深州，朝廷不允，因此甚为怨恨。王武俊自以为有功而不被朝廷重用，亦甚不悦。田悦得知，派人游说朱滔、王武俊，要求三镇连兵。此时，朝廷又下诏要王武俊、朱滔讨伐田悦，朱滔却率步骑兵两万五千人南下救助田悦，将士们鼓噪反对，杀了二百余人，复率兵南行，无人敢再反对。朱滔反叛，连累其兄朱泚（原镇守凤翔），被夺兵权。朱滔、王武俊南救魏州，田悦杀牛备酒相迎，大吹前来

征讨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

田悦感激朱滔援救，与王武俊议立朱滔为王。朱滔认为不可，遂商议共称王而不改年号。十一月，朱滔称翼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朱滔为盟主，称孤；王武俊等三人称寡。四人又向怀西节度使（驻蔡州，河南汝南县）李希烈劝进。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

建中四年（783）正月，李希烈攻陷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又派出部将四方骚扰，取尉氏（今河南尉氏）、围郑州，另有少数兵马逼近洛阳，东都震惊。战火从河北蔓延到河南。奸相卢杞怂恿唐德宗派三朝元老颜真卿为淮西宣慰使，前去说降李希烈。颜真卿利用一切机会，多次劝说李希烈。李希烈有野心，不听劝告，并将颜真卿送到蔡州拘留起来，于公元784年将他杀死。

秋八月，李希烈将兵三万围襄城，朝廷派淮西招讨使李勉救襄城。九月，又派泾原等诸道兵马救援襄城。冬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师，降雨天寒，士兵只有粗食劣菜，怨声载道，于是张旗鼓躁，哗变攻入京城。唐德宗率少数宫室人员仓皇出走，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过了几天，郭子仪手下大将浑瑊来到奉天，统率各路到京的援兵。叛军拥朱泚为王，因朱泚曾担任泾原节度使，于是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与河北三镇遥相呼应。

唐德宗派人去魏县行营告急，李怀光率朔方兵驰援奉天，神策军将领李晟也沿途收拾兵将来奉天。马燧等各守本镇，李抱真仍留在河北。朱泚从东西南三面合力攻城，浑瑊苦战却敌。朱泚围城月余，城内粮尽，唐德宗也只以糙米、芜青根充

饥，将士们更是困饿不堪，但士气尚可。李怀光引兵五万至长安附近，其余援兵陆续到达。朱泚闻讯退去。

李怀光生性粗鲁，自山东来救援，解奉天之围，自付皇帝必以礼相待，厚赏重赐。不料德宗听信卢杞谗言，诏令李怀光不必入朝，可直接攻取长安。李怀光愤恨不已，说："我遭奸臣排斥，前途可知！"屯兵不进，连连上表，揭发奸相卢杞。朝中大臣议论纷纷，归罪于卢杞。德宗无奈，于十二月贬卢杞为新州司马。接着，李怀光又逼德宗杀了宦官翟文秀。

兴元元年（784），唐德宗改元，下诏罪己，宣布除朱泚外，赦免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等人之罪。李纳、田悦等见赦令，皆去掉王号，上表谢罪，归顺朝廷。德宗任命王武俊为恒、冀、深、赵节度使；李纳为平卢节度使；田悦本是节度使，加检校左仆射官号。只有李希烈自恃兵强马壮，遂称帝，国号大楚，改元武成。朱泚改国号汉，自称汉元天皇。

李怀光胁迫朝廷赶走卢杞等后，内心十分不安，遂有反叛之意。他屯兵咸阳，以士兵疲乏为由，不进攻长安。李晟屡奏其反状，德宗不信，派使臣前往加封，赐铁券。李怀光大怒，投铁券于地说："凡人臣反，则赐铁券，今授怀光，是使反也。"①李怀光遂与朱泚通谋，声称："吾今与朱泚连和，车驾当须引避。"②唐德宗仓皇逃往梁州（今陕西汉中）。

李晟率孤军驻长安东北边的东渭桥，夹在李怀光和朱泚之间，两面受敌，处境十分困迫。此时，驻邠宁、奉天、昭应（陕西临潼县）、蓝田的官军，纷纷接受李晟指挥，军威大振。李怀光一怕部下生变，二怕李晟袭击，急忙烧营房东逃，中途掠夺泾阳等十二县。四月，朝廷加封李晟为鄜坊、京畿、渭

北、商华副元帅，任浑瑊为朔方节度使，引兵屯奉天，与李晟东西呼应，进逼长安。朱滔攻贝州百余日，不下。泽潞节度使李抱真与王武俊驰援贝州。李抱真、王武俊距贝州三十里驻军。朱滔引三万人出战，抱真、武俊合兵奋击，朱滔军死者万余。当夜，朱滔焚营，趁雾逃往德州。李晟率军收复京师长安，军纪良好，秋毫无犯。是日，浑瑊等亦收复咸阳。朱泚想出奔吐蕃，为部将所杀。唐德宗论功行赏，封李晟为司徒、中书令，浑瑊为侍中。

唐德宗回长安后，以李晟兼凤翔、陇右节度使及四镇、北庭、泾原行营副统帅；进爵西平王。加封浑瑊为河中绛州节度使；马燧为奉诚军、晋慈隰节度使。六月，朱滔病死，将士们拥涿州刺史刘怦为主。朝廷任命刘怦为幽州、卢龙节度使。李怀光困守长春宫，马燧、浑瑊奉命讨伐李怀光，先劝降了李怀光的部将，使之孤立无援、李怀光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

唐贞元二年（786），李希烈接连派人攻襄州、郑州，均失败。四月，李希烈病，部将陈仙奇买通医生将其毒死，然后率众投降。朝廷任命陈仙奇为淮西节度使，不久，吴少诚杀死陈仙奇，朝廷只好任命他为淮西留后。

唐德宗回长安后，对宿将握兵多者渐生猜忌，如李晟、马燧、浑瑊等；加之回纥、吐蕃连续内侵，使朝廷与割据势力的矛盾暂退第二位，但藩镇割据并没有结束。

公元805年，唐宪宗即位。宪宗意在统一全国，因而对藩镇斗争较有决心。田承绪、田悦、田绪相继为魏博节度使时，曾选拔一万精兵充作卫兵，称牙军。后来，牙军势力越来越大。元和七年（812）秋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立子田怀谏为副大使。牙将田兴知书达理，有勇有谋，任步射都知兵

马使。时宪宗与宰相李绛商议讨魏博之事。李绛反对出兵征讨，劝宪宗坐待魏博自归。田怀谏年仅十一岁，无法控制魏博局势，很快发生内讧。牙军废除田氏继承人，拥田兴为留后。十月，朝廷闻讯，采纳李绛建议，用田兴为魏博节度使。十一月，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犒赏魏博将士。军士受赐，欢声雷动。其间，诸藩镇，如李师道、吴少阳、王承宗先后派人到魏博游说，田兴不为所动。田兴安葬了田季安，又将田怀谏送到京师。元和八年（813）正月，宪宗赐田兴名弘正。田氏割据魏博四十九年，田弘正归朝，割据告一段落。

元和四年（809），成德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宪宗想割除河北藩镇世袭之弊，打算由朝廷遣官去成德，如不服即出兵征讨。时淮西节度使吴少城死，其部将吴少阳杀吴少诚之子元庆而代之，自为留后。元和五年（810）七月，朝廷讨伐王承宗，失利，只好赦王承宗，任为成德节度使。元和九年（814）淮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为帅。他派兵四处滋扰，屠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焚业县（今业县西南），掠鲁山、襄城（均属河南）。朝廷派宣武节度使韩弘等进军淮西，讨伐吴元济。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成德王承宗请赦吴元济，不允。李师道又派人烧毁河阳军粮，遣刺客入京刺死宰相武元衡，并想焚掠东都洛阳。宪宗任用裴度为宰相，坚持讨伐淮西，但数年讨伐，久战无功。

元和十二年（817），宪宗用李愬为唐（今河南唐河）、随（今湖北随县）、邓（今河南邓县）节度使，要他进剿吴元济盘据的蔡州（今河南汝南）。李愬，字元直，甘肃临潭人，名将李晟之后，为人有谋略，武艺过人，尤擅长骑射。李愬到任后，见军士厌战，为安定军心，同时为麻痹淮西，绝口不提蔡

州事。故意对迎接他的人说："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③二月，李愬部下在巡逻中捉到吴元济的捉生虞候丁士良，李愬义释丁士良，在他的帮助下攻取了淮西的据点文城栅和兴桥栅，收复敌将李祐和李忠义。不久，裴度以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身份亲临郾城，统一指挥淮西军事。冬十月，李愬接受李祐建议，雪夜飞奔蔡州，出其不意一举攻占，进入吴元济外宅。吴元济还以为是洄曲（淮西精兵所在地）将士来讨寒衣！李愬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镇。消息传出，各藩镇多震动。于是，平卢李师道献沂、密、海三州；成德王承宗献德、棣二州；幽州刘总也要求归顺朝廷。随后，李师道反悔，不肯献地。朝廷令宣武韩弘、魏博田弘正、义成李光颜、武宁（今徐州）李愬、横海（今沧州）乌重胤共同讨伐李师道，屡战屡胜。元和十四年（819）平卢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归顺朝廷。宪宗收复了淄青十二州。淄青镇自李正己从公元765年割据以来，长达四十五年。

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幽州、成德两镇反叛。第二年，魏博牙将、奚人史宪诚亦反叛，节度使田布自杀。三镇联合起来，又恢复了割据。太和三年（829），魏博军哗变，杀史宪诚，拥立牙将何进滔为节度使。此后，动乱不止，先后拥立韩君雄、乐彦祯、罗弘信，直到公元912年。魏博镇自田承嗣到罗弘信，共割据一百五十年。

成德镇以田弘正为节度使。长庆元年（821），都知兵马使回鹘人王庭凑鼓动牙将杀死田弘正，自称留后。朝廷不得已，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直到公元921年，部将张文礼杀王氏继承人。从李宝臣到王氏灭亡，成德镇割据计一百六十年。

幽州镇朱滔死后，将士拥立刘怦为节度使。后来，其子刘

济接任节度使。长庆元年（821），唐穆宗任张弘靖为幽州节度使，代替刘氏后人刘总。后内部不断残杀，互相代立，直到公元913年，李存勖杀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幽州镇自李怀仙至刘守光割据达一百五十一年。

注　释

①②《旧唐书》卷一二一《李怀光传》。

③《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

宪宗削藩

唐后期，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各方节度使实力大增，各霸一方，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各藩镇不仅节度使官职父子相传，不接受朝廷指派，而且有时还联兵攻打朝廷，故削藩、裁抑藩镇是当务之急。唐宪宗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不仅致力于改革内政，而且在平藩方面多有建树。

唐永贞元年（805），西川节度使韦皋死，支度副使刘辟自为留后，上表请求朝廷封任，不许。以袁滋为西川节度使，以刘辟为给事中，刘辟不受，阻兵自守，袁滋不敢强进，被贬为吉州刺史。十二月，任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

刘辟益骄横，宪宗元和元年（806）仍求兼领三川（西川、东川、山南西道），不得，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攻陷梓州（今四川三台，治所东川）。

宪宗召集群臣商议讨伐平蜀之计，众皆以为蜀地艰困难取。宰相杜黄裳却说："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专以军事委之，勿置监军，辟必可擒。"①遂拜为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充右神策行营节度使，兼统左右神策、奉

天、麟游诸镇兵讨伐刘辟。时朝中大将不少，人人自谓可当选，待诏令出，皆大惊。

高崇文屯兵长武县，练精兵五千。三月取梓州。四月，以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五月，刘辟在成都北一百五十里鹿头山（扼西川之要）筑城，连八栅，强犄角之势，屯兵万余，以拒高崇文。不久，崇文破贼于鹿头城下。刘辟将栅移至关东万胜堆，崇文派勇将高霞寓攻之，夺其堆，烧其栅，前后八战皆胜，刘辟军军心动摇。八月，河东将阿跌光颜深入到鹿头西大河之口，以断刘辟军粮道。城中忧惧，于是锦江栅守将李文悦以三千军归顺。鹿头守将仇良辅以城降崇文，俘获刘辟之子、婿。崇文军长驱直指成都，所向崩溃。攻成都，刘辟大惧，率守军数十骑西走吐蕃。崇文派高霞寓等将急追，刘辟走投无路，遂自投岷江，被擒，押至京师，强诛。崇文军入成都，军令严肃，秋毫无犯。至此，一境皆平。授高崇文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进封南平郡王。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原田季安手下牙内兵马使田兴有勇有谋、知书达理，经常规谏田季安的不轨行为，田季安欲杀之，先出为临清镇将，田兴佯得风痺，才得免。田季安死后，夫人谋诸将，立其子怀谏为副大使。怀谏年仅十一岁，军政大事决于家僮蒋士则，不断以个人爱憎移易诸将，引起军中不安。

宪宗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出兵讨伐，李绛则认为不必用兵，当可待其自归："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以断，军政大权，必有所归……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②

一日，田兴早上入府，数千士卒围住田兴，拜请他为留

后。田兴惊倒在地，众人仍不散，田兴只好说："你们肯听我的话吗?"众应："诺。"田兴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政籍请吏，勿犯副大使，可乎?"③众曰："诺。"遂杀蒋士则十数人，移怀谏于外，后送往京师，宪宗封其为右监门卫将军。

朝廷闻魏博事变，李绛力劝宪宗"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宪宗从之，加田兴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沂国公等，并赐名弘正。田兴感恩流涕，士卒莫不欢欣。

李绛又对宪宗说："魏博五十余年不沾皇化，一旦举六州之地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不有重赏过其所望，则无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邻劝慕，请发内库钱百五十万缗以赐之。"宦官反对，宪宗曰："朕所以恶衣菲食，蓄聚货财，正为欲平定四方，不然，待贮之府库何为!"④十一月，派中书舍人裴度到魏博宣谕，赐魏博三军赏钱一百五十万缗，六州百姓给复一年。军士受赐，欢声雷动，田兴请裴度遍至所部州界，宣布朝令，魏人郊迎感悦。

自弘正归朝，幽、恒、郓、蔡各州屡遣说客，多方诱阻，而弘正始终不听。弘正于府舍起书楼，集书万卷，政事之余，与宾客讲古论今，后有《沂公史例》十卷留世，为弘正宾客所著。宪宗平蜀，魏博归朝后，大大鼓舞了宪宗削藩的信心和决心。开始讨伐吴元济。

唐德宗年间，淮西将陈仙奇毒杀节度使李希烈，夺其位；后兵马使吴少诚又杀陈仙奇，自为留后，贞元五年（789）进拜节度使。

贞元十五年（799），吴少诚兵袭唐州，杀监军，掠百姓；又进围徐州，再掠西华。德宗诏削吴少诚官爵，令诸道进军讨之。因统帅无勇无谋，宦官监军专进退，致使官军节节败退。

十月，吴少诚引兵回蔡州（今河南汝南），上表谢罪。德宗召大臣议论，宰相贾耽曰："五楼军退，而少诚卷甲不追，有自新路。"⑤遂下诏罢兵、赦吴少诚，官复原职。顺宗即位后，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司空，徙封濮阳郡王。

宪宗元和四年（809），吴少诚死，部将吴少阳杀少诚子元庆，自为留后。朝廷因河朔用兵无力讨伐吴少阳，只好任之为淮西留后，元和六年（811）以为节度使。吴少阳阴聚兵马，时常外出劫掠，不肯朝顺宗，然而却屡献牧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及死，其子吴元济匿表不报，自为留后，并四处焚掠：屠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焚叶县（今叶县西北），掠鲁山、襄城（今均属河南）。十月，朝廷任用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招讨吴元济。

元和十年（815）正月，吴元济纵兵侵掠，逼东都。诏令宣武韩弘等十六道进军讨之，胜负互见。三月，吴元济遣使求救于平卢、承德。平卢李师道、成德王承宗数次上表，请赦吴元济，宪宗不许。李师道发兵二千，声言助官军，实助元济。有亡命少年为李师道献计说："河阴者，江、淮委输，河南、帝都，请烘河阴敌库，募洛壮士劫宫阙，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也。"⑥李师道遂遣人烧河阴转运院钱三十余万缗、谷三万余斛、仓百余区。六月，又使人刺杀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受伤。京师戒严，怀疑王承宗所为，诏数其罪恶，绝其贡赋。宪宗以裴度为宰相，坚持讨伐淮西。因严绶讨吴元济无功，改以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十月，以右羽林大将军高霞寓为唐、随、邓节度使，专攻吴元济；以户部侍郎李逊为襄、复、郢、均、房节度使，调五地赋税充为讨吴军饷。高霞寓讨吴，在文城栅（今河南遂平西南）大败，朝臣多主张罢兵，宪

宗曰："胜负兵家之常，……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⑦遂贬高霞寓及李逊，以河南尹刘权为山南东道节度使。不久，李光颜等攻吴元济，拔陵云栅等六栅。

年底，以太子詹事李愬为唐、随、邓节度使，以对付吴元济。

元和十二年（817），李愬到唐州，见士兵多畏战，遂说："天子知愬柔懦，能忍耻，故使来拊循尔曹。至于战攻进取，非吾事也。"⑧众人安心。李愬关心士卒，伤病者多恤之。淮西闻之，遂渐轻敌，不为备也。二月，李愬谋取蔡州，诏以昭义、河中、鄜坊步骑两千充用。李愬派十将（军中小校）马少良率十余骑外出巡逻，恰遇吴元济捉走虞侯丁士良，擒之。丁士良常来滋扰，众皆欲刳其心，而士良毫无惧色，李愬佩服，遂释其缚，丁士良表示愿效死命。丁士良对李愬说："吴秀琳以数千兵不可破者，陈光洽为之谋也。我能为公取之。"⑨不久，丁士良果擒陈光洽。于是吴秀琳以文城栅降。

时淮西兵缺粮，百姓更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为活命，相率投奔官兵者达五千余户。宪宗置行县管制。

李愬与吴秀琳计议讨蔡州事，秀琳说："必破贼，非李祐无与成功者。"⑩李愬设下埋伏，果然擒获李祐，待之以礼。又重用秀琳部将李宪，更名李忠义，常与二人商议至夜半。军中多谏此二人不可近，愬待以益厚。将吏一致要求杀李祐，李愬只好将之械送朝中，上表极言李祐对取蔡州的重要作用。宪宗诏释李祐，李愬乃用为六院兵马使，统率三千随、唐牙兵（卫队）。

时，李光颜数战皆胜，吴元济将兵力集中于洄曲对抗光颜，李祐建议乘隙突袭蔡州。李愬请示前来淮西督师的宰相裴

度，裴度亦认为这是出奇制胜之道，可行。李愬命李祐、李忠义以三千死士为前驱，自与监军将三千人为中军，再令三千人殿后，军队东行六十里，袭张柴村，留后镇守，以绝吴元济后路。天降大雪，天昏地暗，冷风扯裂旌旗，人马冻死道上十之一二，李愬又命令东行，众将问去何处，李愬曰："入蔡州取吴元济！"皆大惊失色，监军使者泣曰："果落祐计。"⑪夜半，行七十里，至蔡州城下，近城有鹅鸭池，李愬令人击之，声四起，以掩盖行军声。四鼓，李愬军至城下，无一人知晓。李祐、李忠义砍城墙为坎登城，尽杀守门卒而留击柝者（打更人），依旧打更。黎明，雪止，李愬军已进到吴元济外宅。有人报告："城陷矣！"吴元济不相信，说："是洄曲子弟来索褚衣尔。"⑫李愬遂擒吴元济，械送京师问斩。余众二万余人相继投降。淮西平。

收复淮蔡后，又陆续收复了幽州镇、成德镇、淄青十二州等，藩镇割据局面基本结束，暂时实现了全国统一。

注　释

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宪宗平蜀》。

②《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魏博归朝》。

③《旧唐书》卷一四一《田弘正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魏博归朝》。

⑤《新唐书》卷二一四《藩镇宣武彰义泽潞》。

⑥《新唐书》卷二一三《藩镇淄青横海》。

⑦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宪宗平淮蔡》。

⑨⑩⑪⑫《新唐书》卷一五四《李晟传》。

隋唐五代

宦官专权

唐初，太宗定制，内侍省不置三品官。唐玄宗时，宦官势力逐渐扩大。安史之乱后，宦官形成左右朝政的势力，发展到“法度隳驰，内臣戎帅”，肃宗、代宗均使用宦官执掌禁军。德宗时，改用朝官白志贞统帅神策军。建中四年（783）泾原兵东征，路过京师，因无犒赏而哗变，禁军竟无人救驾，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原泾原节度使朱泚称大秦皇帝。第二年，朱泚叛乱被平定后，德宗回到长安，由此“忌诸将”，以宦官窦文场、王希迁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自此宦官统领神策军遂成定制。神策军势大人多，控制着京畿地区，将士出征，派宦官为监军使，从此“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①。

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崩，太子诵即位，是为顺宗。原东宫侍读王伾善书，王叔文善棋，俱有宠。顺宗患风疾，口不能言，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依前翰林待诏；以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他们又将柳宗元、刘禹锡、韩泰等八人推荐给顺宗，一道商议革除时弊，夺取宦官集团的权力。时宦官

借“宫市”（采购宫中用品）为名，四处敲诈勒索，成为京师一大祸害，顺宗下旨罢“宫市”，又除去以捕鸟养狗为名进行勒索的五坊小儿（在鹏、鹘、鹞、鹰、狗五坊供役者），恩免了百姓积年所欠赋税，废除了地方官吏和盐铁使的月进钱等。不久，王叔文兼任户部侍郎、度支和诸道盐铁转运副使，掌握朝廷财政大权。

“二王”改革的关键是夺宦官执掌的兵权。五月，朝廷调宿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遭到大宦官俱文珍等强烈反对，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又与剑南、荆南、河东等藩镇勾结，发动宫廷政变，迫顺宗立李纯为太子，是为宪宗。贬王伾开州司马。王叔文渝州司户。不久，王伾病死，王叔文赐死。柳宗元等八人均被贬到边远地区做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宪宗宠信宦官吐突承璀，任为左神策中尉，掌管禁军。后又任为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等，负责讨伐藩镇，大败。宪宗想恢复朝廷的统一。起用李绛等朝臣。元和六年（811），改任吐突承璀为淮南监军，由李绛任宰相，辖京西、京北神策军，朝官势长。元和九年（814），李绛因病罢相，又召回吐突承璀为左神策中尉，宦官占上风。

在皇位继承上，宦官分为两派。吐突承璀谋立沣王李恽，王守澄等则拥护太子李恒。元和十五年（820）宦官陈弘志杀宪宗，梁守谦、王守澄等立太子恒，是为穆宗，自此，宦官掌握皇帝的生死、废立大权。

唐穆宗、唐敬宗是听任宦官摆布的两个皇帝。敬宗因打骂宦官，于宝历二年（826）被宦官刘克明等杀死。刘克明欲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刘克明、李悟，迎立江王李

涵，是为唐文宗。宦官在朝中地位愈加巩固。

文宗时，王守澄为骠骑大将军、光右军中尉，横行无忌。文宗深知两朝之弊，想改变宦官专权局面。大和二年（828），文宗考试举人，进士刘蕡写了一篇痛斥宦官的策文："……谋不足以翦除奸凶，而诈足以抑扬威福；勇不足以镇卫社稷，而暴足以侵害闾里。羁绁藩臣、干陵宰辅，隳裂王度，汩乱朝经。张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法出多门，人无所措，由兵农势异，而中外法殊也"。②对宦官的倒行逆施，朝官不敢过问，百姓更是怨声载道，他要求"揭国权以归其相，持兵柄以归其将"③，剥夺宦官窃取的军政大权。考官叹服，而不敢取用。

唐文宗的宦官强盛，王守澄尤其跋扈，"招权纳贿，上不能制"。大和五年（831），文宗与翰林学士宋申锡商议翦除宦官，为王守澄的亲信郑注察知，遂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漳王"，上信之，贬为开州（辖境相当于今四川开县）司马。唐文宗本想用宋申锡诛灭宦官，反替宦官除去了宋申锡。唐文宗转而收买王守澄的党羽李训、关注。大和九年（835），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又指使人酖杀王守澄，并罢免路隋、李德裕、李宗闵三宰相，任命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当年十一月，李训指使亲信谎报禁卫军厅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准备在左右中尉鱼弘志、仇士良率众宦官前来观看时一网打尽。途中，仇士良发现有异，急挟文宗入宫，随即率兵五百出来，逢人便杀，李训、郑注均被杀。史称"甘露事变"，从此权归仇士良、鱼弘志。由是"宦官气益盛，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④。

唐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颍王李瀍为皇帝，是为唐武

宗。唐武宗不甚信任宦官，而以朝官李德裕为相，宦官势力有所削弱。唐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宦官立痴人、唐宪宗之子李忱为帝，即唐宣宗。

唐宣宗的痴是装出来的，他立志为父亲报仇，诛杀了谋害宪宗的宦官陈弘志和勾结宦官的郭太后。大中八年（854），宣宗又与宰相令狐绹商议杀尽宦官。令狐绹密奏："宦官有罪必罚，有阙不补，自可消除。"

唐大中十三年（859），宣宗死，宦官王宗实等立其长子李漼，即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懿宗死，宦官杀其年长诸子，立年十二岁的李儇为帝，为唐僖宗。僖宗专务嬉戏，政事全交给中尉、宦官田令孜，并呼田为"阿父"。田令孜出主意，让僖宗派人去市上劫夺商人财物，敢反对者，一律交京兆尹杖杀。光启四年（888），宦官杨复恭立皇弟寿王杰，为唐昭宗。杨复恭仿照田令孜办法，养勇士多人为义子，使之分掌兵权；又养宦官六百名为义子，分做诸道监军。唐昭宗憎恨杨复恭专权，数次发动朝官翦灭宦官，均事败。唐昭宗恨极，于大顺二年（891）发兵攻打杨复恭私宅。杨复恭只身逃往汉中，起兵反抗朝廷。景福二年（893），昭宗发兵攻打不听朝廷号令的原山南道招讨使李茂贞。李茂贞打败禁军，进逼京都，昭宗杀了西门君遂等三个大宦官，才平息这场风波。光化三年（900），宦官刘季述与人合谋废昭宗，率兵入思政殿，逢人便杀，昭宗惊倒床下，刘季述指责他"某日某事尔不从我，罪一也……"，数几十项犹未完，立逼帝传位太子监国，将帝后囚之于少阳院。凡帝之亲信皆杀之，出尸十数车。帝于囚所无衣穿，公主嫔妃无被盖，哭声传入外廷。刘季述想杀尽百官，再弑帝，挟太子以令天下。宰相崔胤以离间计，串通部将孙德昭、董从

实、周承海等，杀刘季述，夷其三族，迎接昭宗复位。

崔胤与唐昭宗密谋杀死所有宦官，被宦官中尉韩全诲探知，他勾结驻京凤翔兵统率李继筠，拒绝接受一切命令，并禁止唐昭宗单独接见朝官。后又与李茂贞一道将昭宗劫持到凤翔，为他配备百官，皇帝完全成了傀儡。903年，李茂贞败降，送回唐昭宗。昭宗派人杀了韩全诲等宦官十六人。崔胤等入凤翔城，又捕杀宦官七十余人。唐昭宗回长安后，顺从崔胤等要求，杀死全部宦官。几年后，昭宗终为黄巢起义军降将朱温所杀，唐朝灭亡。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八四《窦文场传》。

②《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③《旧唐书》卷一九〇《刘蕡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

隋唐五代

永贞革新

安史之乱后，唐朝政治腐败，宦官专政，战事连年。公元779年，唐代宗死，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德宗。

德宗是个性情急躁，刚愎自用的皇帝。即位不久，即听信谗言，免去名将郭子仪的一切职务，任用臭名昭著的卢杞为宰相，朝政更加昏暗。大臣陆贽为人正直，敢于谏诤，却遭免职、贬逐出京。德宗猜忌文武官员，却信用宦官。兴元元年(784)，任用大宦官窦文场、霍仙鸣监左、右神策军；后又升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十五万禁军统率权归于宦官。

德宗于“奉天之难”中吃了苦头，流亡十个月后回到长安，遂巧立名目，收刮民财。他令宦官当宫市使，手下有白望数百人，专到市场上抢劫民间货物，以供宫廷日用。各地节度使也以“进奉”迎合皇上的贪欲，名目为“内外方园”、“用度羡余”，即将他们掠夺的额外财物送给皇帝十分之一二，每月或每日送来，称做“月进”或“日进”。阶级矛盾空前尖锐。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顺宗。顺宗信用王伾、王叔文，二人均为顺宗做太子时的

侍读，王伾善书，王叔文善棋。叔文有心计，侍读时常对太子讲民间疾苦。一次，太子与众侍读论及危害民间的弊政，太子曰："寡人方欲极言之。"众皆称赞，叔文无言。太子独留叔文问故，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视膳问安无与也。且陛下在位久，如有小人间之，谓陛下收厌群情，则安解乎？"太子曰："非先生不闻此言。"①心中感激，遂大爱幸，与王伾相依附。

顺宗即位后，以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王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宫中之事，依以裁决。时顺宗病不能言，由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由帷中可其奏。二王内结李忠言、牛昭容，外引荐吏部尚书韦执谊为相。又结交了陈谏、凌准、程异、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等有识之士，共谋革除时弊，打击宦官势力。

首先贬逐了京兆尹李实。李实为官贪暴，不体恤百姓。贞元二十年（804）关中大旱，德宗召李实问民间疾苦，李实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②强征租税，聚敛进奉，以固主恩。百姓只好拆房卖瓦、卖青苗以供赋税。第二年，有诏免畿内租赋，李实违诏征之，官吏多遭笞罚，顺宗即位一个月内，李实即打杀数十人于府。百姓对他恨之入骨。二王通过顺宗，贬之为通州（今四川达县）长史，百姓欢呼，皆持瓦石于道旁，欲击其首，因避道而出，方免。

二月，罢百姓深恶痛绝的进奉、宫市、五坊小儿。贞元末年，宦官及其爪牙在长安购买民间货物，或付价极少，或不付价，称做"宫市"，甚为扰民。亦设五坊小儿——在宫中雕、鹘、鹞、鹰、狗五坊供役之人。他们横行闾里，或张网于门，不许人出入；或张网于井上，不许人汲水。如有违碍，则痛殴之，曰："汝惊供奉鸟雀！"敲诈钱财，或留一袋蛇给卖主，嘱

不许使之饥渴，吓得卖者连声哀求，才带走。这些时弊，顺宗做太子时已深知，故支持二王罢除进奉、宫市，五坊小儿。又免除民间欠税和一切杂税及盐铁使每月所进的“羡余”。

叔文每言：“钱谷者，国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③谋整理财政，冀得国赋在手以固权，又恐人心不服，故加杜佑度支及诸道转运使，自为副使，实际专总，控制了财政大权。

王叔文改革的关键是夺取宦官的兵权。五月，任用宿将、右金吾卫大将军范希朝为右神策统军，充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节度使，以韩泰为其行军司马，欲使神策军脱离宦官掌握。遭到俱文珍等大宦官的反对，曰：“从其谋，吾属必死其手！”④密令诸将不得交出兵权。范希朝赴任奉天（今陕西乾县），诸将无一来见，数月后，只好返京。

俱文珍恶王叔文弄权，借王叔文加任户部侍郎之职，削去其翰林学士，叔文大骇：“若不带此职，无由入内。”⑤王伾为之力争，仍不许保留学士之职，只允许“三五日一入翰林”。先是，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转相结构，事下翰林，由叔文定可否，宣于中书，韦执谊承奏于外。韦执谊升迁后，遂逐渐摆脱叔文，曰：“非敢负约，欲共济国家事尔。”⑥数事与叔文作梗，叔文诟怒，遂成仇。

第四项重要的改革就是裁抑藩镇。永贞年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派支度副使刘辟到长安，对王叔文云：“太尉使辟致微诚于公，若与某三川（剑南东川、西川及山南西道为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与，亦当有心相酬。”⑦叔文怒，欲斩之，逃去。

第五，罢盐铁使月进钱。唐后期实行盐铁专卖，设盐铁使经营。后巧立名目，除正课捐税外，每月要向皇帝送羡余钱，

供其私用。这项弊政加重了百姓负担，影响国库收入，永贞时罢除。

第六，释放宫女和女乐。唐代宫廷奢侈，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先帝侍女八千人”之诗，可见后宫宫女儿千人，过着与外界隔绝的凄惨日子，永贞年间，放出宫女、女乐九百人，使之与家人团聚。

第七，宫中禁征乳母，唐德宗时，往往要寺观选送婢女入宫，充当乳母，往往不能当选，只好卖掉产业从民间买有姿色的女子送上。这是当时一害，王叔文改革时下诏废除。

在唐顺宗支持下的永新改革，其目的是推翻宦官专政和消灭封建割据势力，革除弊政，因而遭到宦官和藩镇势力的强烈反对。刘辟为韦皋求为三川节度使不成，韦皋就勾结宦官，上表攻击王叔文紊乱朝政；又联合荆南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相继上表反对王叔文，要将他赶出朝廷。大宦官俱文珍等策划立广陵王李纯为太子，又屡请让太子监国，以取代顺宗。同时，俱文珍伪造敕书，撤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调任吏部尚书。四月，王叔文以母丧去位。七月，王伾请宦官和杜佑建议王叔文为相，且总领北军，不获；又请以为威远军使、平章事，又不得。当夜，王伾盛怒中风。

此时，俱文珍等又请太子监国，顺宗许之，令皇太子李纯主管军国大事。八月，顺宗亦自称太上皇，太子即位，是为宪宗。第二天，大宦官俱文珍便对革新派下毒手。贬王叔文渝州司户，王伾开州司马。王伾病死在贬所，第二年赐王叔文死。二王之党亦遭贬斥：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人称“八

司马”；永贞革新亦称“二王八司马事件”。公元806年，顺宗亦被宦官毒死。

注 释

①《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②《旧唐书》卷一三五《李实传》。
③《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④《通鉴纪事本末》卷三四《伾文用事》。
⑤《旧唐书》卷一三五《王叔文传》。
⑥《新唐书》卷一六八《王叔文传》。
⑦《通鉴纪事本末》卷第三四《伾文用事》。

隋唐五代

甘 露 之 变

安史之乱后，宦官李辅国劝太子李亨在灵武（宁夏青铜峡县东北）即位，以收揽人心，是为肃宗。李亨由宦官拥立，则收权力付于宦官：以大宦官鱼朝恩为天下观军容使，节制九个节度使；使李辅国内掌玉玺、外管禁军。李辅国专横跋扈，终致逼死肃宗，杀死张皇后和越王，挟太子临朝听政，立为代宗。自命为定策功臣，对代宗说："大家第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①唐代宗处处受李辅国挟制，于是利用另一宦官程元振杀了他，而程元振又替代李辅国仍独揽大权。

到唐德宗时，经过"奉天之难"，更加信任宦官，以大宦官霍仙鸣、窦文場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掌管十多万禁军，使宦官得以挟兵操纵皇帝废立大权。德宗之后，顺宗、宪宗、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

公元826年，宦官王守澄拥立唐文宗后，日益骄横，招权纳贿，文宗深患之。王守澄通过襄阳节度使李愬结识了郑注。郑注多艺，诡谲阴狡。王守澄入总枢密，郑注随任京师，日夜为王守澄计议，"出入禁军、卖官贩权"。大和四年（830），文

宗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翌年，宋申锡引吏部尚书右丞王璠为京兆尹，告之以谋宦官之事。王璠泄密，郑注知之，又告诉王守澄。二人设计反诬宋申锡欲谋立文宗之弟漳王湊。

王守澄、郑注唆使神策军都虞侯豆卢著先行揭发，再由王守澄密报文宗。漳王湊素多众望，文宗本有猜忌，于是命王守澄侦察此事。王守澄欲派二百人去杀宋申锡，遭到宦官、飞龙厩使马存亮的反对，说宋申锡罪状未明，如乱杀无辜，会引起众怒，最好先召集宰相们核实一下情况。牛僧孺、李宗闵等来到延英殿，宋申锡被挡在门外，宦官言“所召无宋申锡”。宰相们亦认为此事当慎重。牛僧孺说，宰相是人臣最高的职位了，宋申锡已当了宰相，他怎么会反对陛下呢？文宗以为然，于是贬漳王湊为巢县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后卒于开州。

大和八年（834），文宗中风。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竟大有成效，遂宠信。前宰相李逢吉遣侄李训以金币珍宝数百万厚结郑注，郑注又引之谒见王守澄，王守澄以其善疏易经而荐于文宗。由是郑注、李训并有宠，言无不从。郑注为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李训为四门助教、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翌年秋，进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法，行宰相事。李训既秉权衡，即谋诛内竖。先以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

仇士良与王守澄有隙，想置之于死地，遂与李训合谋，追查当年杀害宪宗的凶手。宫廷内外均以为宪宗为王守澄与陈弘志所害。这时，陈弘志在襄阳做监军，李训奏请文宗将之召回，遣使者途中杖杀之。李训为相后，改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为六军十二卫观军容使，夺其实权，又寻故赐酖杀之。

唐文宗以功封李训、舒元舆、王涯为宰相。他们策划一举消灭宦官。大和九年（835），任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布署他们招兵买马，以壮大自己的势力。

李训因郑注得进，然二人得势后，互相争功、势不两立，遂以内应外援谋，出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待诛灭宦官后再杀郑注。又擢选相厚者分掌兵权，以京兆尹罗立言权知大尹事，太府卿韩约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刑部郎中兼御史知杂李孝本权御史中丞。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御紫宸殿，百官朝拜完毕，韩约上奏："金吾左仗院石榴树，夜来有甘露，臣已进状讫。"②群臣称贺。李训奏曰："甘露降祥，俯在宫禁，陛下宜亲幸左仗观之。"③文宗许之，即乘辇出紫宸门，升含元殿，召宰相，侍臣、文武两班随之。又诏宰相率群臣往观之，李训回来奏曰："臣等恐非真甘露。不敢轻言，言出，四方必称贺也。"文宗曰："韩约妄耶？"令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等内臣验之。此时，王璠、郭行余部下皆执兵列于丹凤门外，李训传呼："两镇军人受诏旨！"④只有王璠从兵入，邠宁兵不至。王璠惧怕不敢靠前，只有郭行余拜于殿下。仇士良等至仗所，见韩约气慑汗流，不敢抬头。仇士良怪之，曰："将军何为尔？"恰风动幕布，仇士良见幕后有许多仗兵之人，大惊，急走。门者欲闭大门，遭宦者叱止。李训急呼："金吾卫士上殿来，护乘舆者，人赏百千！"⑤仇士良跑回含元殿，让宦官急推辇迎帝："事急矣，请陛下入内。"扶辇下殿疾趋，李训抓住辇车曰："陛下不可去！"仇士良叫："李训反！"文宗曰："训不反！"金吾卫士数十人随李训入。

罗立言率府中从人自东来，李孝本率台中从人自西来，共计四百余人，上殿来与金吾卫士斗杀，内官死伤数十人。

李训推辇愈急，至宣政门，内官郄志荣奋拳击李训胸部。李训倒地，宦官将辇推入东上阁门，门随闭，宫中呼“万岁”。⑥很快，仇士良遣神策副使刘泰伦、陈君奕等率禁军五百人，持刀出阁门，逢人便杀。诸司从吏死者六七百人，捕李训余党千余人，斩之，血流成河。宰相王涯、贾悚、舒元舆均闻难出走。

李训中拳仆地，后出走终南山，投寺僧宗密，本欲剃发藏之。后又趋凤翔，欲依郑注。出山，被捉获，械送京师。李训恐受宦官侮辱，对押送的士兵说：“所在有兵，得我者即富贵，不如持我首行，免被夺取。”⑦乃斩之，以其首上报。宰相王涯、舒元舆及王璠、郭行余、韩约等，均遭捕杀，亲属亦无一幸免。

郑注本与李训谋为外援，自凤翔率亲兵五百余人赴京。中途闻事败，欲还。时监军使张仲清已接密诏，将之诱入监军府议事，伏兵突起，斩之。

以上史称“甘露之变”。自是，宦官之权愈大，天下之事皆决于宦寺。

注　释

①《新唐书》卷二〇八《宦者下》。

②③《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九《李训传》。

④以上事见《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

⑤⑥⑦《旧唐书》卷一六九《李训传》。

隋唐五代

牛 李 党 争

唐朝后期，朝官内部的朋党之争日趋激烈，其中突出地表现为牛李党争。李宗闵、牛僧孺是牛党首领，笼络一批进士科出身的人结成朋党；李德裕、郑覃是李党首领，其成员大多出身世家大族，靠门荫入朝做官。

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牛党对割据的藩镇一惯持姑息养奸态度，李党则坚决主张平叛。元和二年（807），李吉甫做宰相，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反叛，李吉甫为唐宪宗出谋划策，平定刘辟叛乱。

在朝中，李党主张政治改革，牛党主张维持现状。李吉甫看到朝廷人浮于事，就建议裁汰冗员、省并州县。宪宗采纳他的建议，于元和六年（813）精简京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外官八百零八人。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执政时，又精简冗员一千余人。精简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牛李党争开始于宪宗朝，持续到宣宗。元和三年（808）四月，李宗闵、牛僧孺以贤良方正对策，策文指斥李吉甫“炽于武功”。李吉甫泣诉于宪宗。宪宗贬逐了考官杨於陵、郑敬

等人，李宗闵、牛僧孺也长期不得升迁。

穆宗长庆元年（821）用牛僧孺为户部侍郎。初，韩弘入朝，人多流言，其子右骁卫将军公武以钱财贿交朝中权贵。公元823年，韩弘父子俱卒，孤孙弱小，不能主事。穆宗遣使至其家，取其帐簿自视，朝中权贵多纳弘贿，至牛僧孺名下，牛句细字注其左："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讫。"①帝大喜，谓左右："吾不谬知人。"遂以牛僧孺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时李德裕与牛僧孺均有入相之望，而德裕出为浙西观察使，从此"八年不调"，以为是李逢吉排己而引僧孺为相。于是牛李之怨愈深。

第二年，穆宗服长生药致死，敬宗即位。李逢吉为相，勾结内官王守澄，排挤守正的朝官。牛僧孺看到朝政败坏，早晚会发生变乱，于是上表辞相，出任武昌节度使、同平章事。由于部分朝官竭力推荐，公元826年，裴度出任宰相，李逢吉遭贬，出任节度使。公元827年，宦官刘克明等弑杀唐敬宗，拥立绛王李悟。枢密使王守澄等杀李悟，发禁军迎立江王李涵为帝，是为唐文宗。文宗深患宦官势倾朝野，欲借助朝官力量与宦官对抗。太和三年（829），召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入朝，任兵部尚书。朝夕且为相。李宗闵得宦官帮助，先入仕为相，排挤李德裕出任文成节度使。太和四年春，李宗闵又引牛僧孺为相。李、牛二人合力排斥拥戴李德裕的朝臣，并将李德裕调至远离朝廷的西川为节度使。"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②不久，文宗又用翰林学士宋申锡为相，谋除专权之宦官。大和五年（831），宋申锡推荐王璠为京兆尹，且告之除宦官之谋。王璠泄密，郑注知之，使王守澄诬宋申锡谋立皇弟李凑。文宗大怒，命王守澄捕李凑及宋申锡的亲信严加审讯。

宰相牛僧孺说："人臣不过宰相，今申锡已为宰相，假使如所谋，复与何求？申锡殆不至此！"③郑注恐诈谋被侦知，乃不追究。文宗贬李凑为巢县公，宋申锡为开州（今四川开县）司马。时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向南诏索还被虏蜀人四千，接受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之降，收复维州。文宗使群臣大议，牛僧孺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无害其疆。今修好使者尚未至，遽反其言。且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彼来责曰：'何故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若东袭陇坂，以骑缀回中，不三日抵咸阳桥，则京师戒严，虽得百维州何益？"④文宗以为然，诏李德裕以城归吐蕃，执悉怛谋送还，吐蕃诛之于境上。牛李结怨益深。

大和六年（832），有人对文宗说："缚送悉怛谋以快虏心，绝后来降者，非计也。"文宗亦后悔，牛僧孺因此罢相，出为淮南节度使；召李德裕还朝，为兵部尚书。第二年，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李德裕入谢，文宗问："而知朝廷有朋党乎？"德裕答："今中朝半为党人，虽后来者，趋利而靡，往往陷之。陛下能用中立无私者，党与破矣。"⑤不久，李宗闵亦罢相，李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大学士。

大和八年（834）底，文宗中风。第二年，王守澄荐郑注为文宗治病，颇见效，遂有宠；又荐"善《易》"的李训入宫，文宗欲用为谏官，李德裕奏曰："李训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顷年恶积，天下皆知，无故用之，必骇视听。"⑥文宗不听，授为四门助教。由是王守澄、李训、郑注皆憎恨李德裕，怂恿文宗召回李宗闵为宰相，排挤李德裕出京。李宗闵得势后，排斥李德裕朋党，官吏调动频繁。唐文宗无策，只好叹息："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⑦他原想去除朋党，却加强了李宗闵

朋党，而李宗闵又依附于宦官王守澄。

唐文宗想除掉宦官，将心事告诉郑注、李训。二人为文宗策划，擢用宦官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郑注又在文宗前诋毁李宗闵，将之贬为明州刺史、再贬为处州长史、潮州司马。大批朝官被指为李宗闵、李德裕的同党，贬斥到外地，重要官位均安置上二人心腹。朝廷上下议论纷纷，人心不稳。李训、郑注二人劝文宗下诏曰："应与德裕、宗闵亲旧及门生、故吏，今日以前贬黜之外，余皆不问。"⑧人心稍定。唐文宗任用李训为宰相，郑注为凤翔节度使，谋内外合势以除宦官。

大和九年（835）11月，李训等毒杀了大宦官王守澄，又策划"甘露事件"谋杀仇士良，不料事败，反被宦官所杀。

开成五年（840），仇士良立李瀍为唐武宗，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为相。德裕入谢，对武宗大言朋党之弊："致理之要，在于辨群臣之邪正。""臣以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萝，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竞为朋党"⑨。自以为没有朋党之嫌，岂不知已卷入朋党。时牛僧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恰襄州（今河北襄阳）大水，李德裕将此地遭灾的罪责全推到牛僧孺身上，撤销他的职务，调为太子太师。不久，又将牛僧孺藉故废去，又贬李宗闵为湖州刺史，激起牛党仇恨。

牛僧孺、李宗闵被贬，李德裕犹不甘心，于会昌四年（844）借机揭发牛、李与昭义镇叛乱分子勾结。唐武宗大怒，贬牛僧孺为太子少副、李宗闵为漳州（今福建漳浦）刺史。几天后，又贬牛僧孺为汀州（今福建长汀）长史，把李宗闵流为漳州长史。一个月后，再贬牛僧孺为循州（今广东惠州东）长

史，把李宗闵流放封州。在不到两个月内，连贬三次，实属罕见。

会昌六年（846），武宗服金丹致死，李忱继位，是为宣宗，用牛党骨干白敏中为宰相，贬斥了李德裕，又起用遭李德裕贬斥的人，牛党得势。此后，李德裕、牛僧孺相继去世，朋党之争渐熄。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七二《牛僧孺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朋党之祸》。

②《新唐书》卷一八О《李德裕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四四，唐文宗太和五年。

④《新唐书》卷一七四《牛僧孺传》。

⑤《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

⑥《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

⑦《新唐书》卷一七四《李宗闵传》。

⑧《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五《朋党之祸》。

⑨《资治通鉴》卷二四六，唐文宗开成五年。

隋唐五代

唐末农民战争

唐朝末期，政治日趋腐败，战祸连结，地方割据势力连年争战；朝廷中宦官和官僚、官僚与官僚、宦官与宦官之间各树私党、相互倾轧。自唐懿宗以来，官僚日趋奢侈，官府为维持庞大开支，横征暴敛；加之关东连年灾害，百姓实无生计，遂相聚起事。此伏彼起。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浙江东部农民在裘甫领导下起义，攻陷象山，屡败官军。第二年，陷剡县（今浙江嵊县）、余姚、慈溪、奉化、宁海，很快发展到三万多人。咸通九年（868）桂林戍兵起义北返，攻入徐州。在粮科判官庞勋领导下，很快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活动于山东南部、安徽、江苏北部广大地区。

咸通十四年（873），关东大旱，颗粒无收，众多百姓死于饥荒。曹州流传着这样的民谣：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

乾符元年（874），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旧城）人王仙芝聚集数千人起事，发展迅速。第二年正月初三，王仙芝在濮阳（今山东濮阳西南）发表檄文，痛斥朝廷吏贪赋重，自称天补

平均大将军。夏六月，攻陷濮州、曹州，发展到数万人。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

黄巢与王仙芝均为私盐贩子。黄巢善骑射，曾读书、屡试不第，做诗以述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起事后横行山东，百姓争相投奔，数月间发展到几万人。河南、淮南一带农民亦纷纷起义，多者千余人，少者数百人。淮南、忠武、宣武、义成、太平五军节度使辖区亦多起义农民。

乾符三年（876）7月，王仙芝攻打沂州（今山东临沂）。唐僖宗任命平卢节度使宋威为诸道行营招讨草贼使。与王仙芝遭遇，王仙芝转向河南、淮南一带活动。一时盛传王仙芝已被打死。八月，王仙芝攻陷阳翟（今河南禹城）、郏城（今河南郏县），进逼汝州（今河南临汝）。九月，攻克汝州，执刺史王镣，东都洛阳震惊。冬十月，王仙芝南攻唐、邓二州（治所在今泌阳、邓县）。十一月，攻陷郢、复二州（今湖北京山、沔阳）。十二月，王仙芝从湖北一直打到安徽，攻下五六个县，又从安徽南部打到湖北蕲州。

朝廷围剿不利，企图用招抚的办法瓦解起义军，派人到蕲州诱降王仙芝，授予他"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王仙芝准备接受招安，遭到黄巢的反对。黄巢说："始者共立大誓，横行天下，今独取官赴左军，使此五千余众安所归乎！"①遂殴打王仙芝。众怒难犯，王仙芝不敢接受任命，遂与黄巢分头带领义军活动：黄巢率一部分人打到山东，王仙芝则留在湖北。乾符四年（877）二月，王仙芝攻克鄂州（今湖北武昌），八月，攻陷安州（今湖北安陆）、随州（今湖北随县），执随州刺史崔休征，兵锋直指襄州。

唐王朝惊慌不安，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农民。提升诸道行营招讨副史曾元裕为招讨使，颍川刺史张自勉为招讨副使。曾元裕率军追击王仙芝。第二年，王仙芝率众攻入江陵城，再转战申州（今河南信阳县），被曾元裕一直追到黄梅岭（今湖北黄梅）。二月，黄梅一战，五万起义农民战死，王仙芝亦被杀。

王仙芝死时，黄巢正在攻打亳州（今安徽亳县）。王仙芝部将尚让率余众投奔黄巢，起义农民增加到十数万人，声势大振。黄巢被推为统帅，称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三月，黄巢攻破沂州、濮州，遭到曹元裕的拦阻，又转而攻打河南襄邑（今河南睢县西）、雍丘（今河南杞县），再次受到唐军阻击，转而西击叶县（今河南叶县）、阳翟，再次威胁洛阳。

唐僖宗急调驻守荆门、襄州的曾元裕军队回洛阳正面防务；并调集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宣武、昭义兵两千余人守卫皇宫；又调义成军三千人守轘辕（今河南偃师东南）、伊阙（今河南龙门）、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等军事据点。黄巢见形势严峻，决定转战江南。此时，王仙芝余部王重隐、曹师雄等已攻占洪州（今江西南昌），在湖南、安徽、苏北一带活动。四月，黄巢率军渡淮河、长江，进入江西境内，攻下虔州（今江西赣州）、吉州（今江西吉安）、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等地。朝廷调荆南节度使高骈为镇海节度使，来对付黄巢。黄巢率军转入浙东，攻下首府越州，至衢州，无法从海路进入福建，遂开山路七百里，经仙霞岭到达建州（今福建建瓯）。十二月，攻克福州。

乾符六年（879），黄巢率军从福州南下泉州。四月，至东莞（今属广东）。朝廷以宰相王铎为荆南节度使，南面行营招讨都统，又以李晟曾孙李系为副都统，以精兵五万屯潭州，以

塞岭北之路，阻拒黄巢。五月，黄巢给浙东节度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写信，要求转告朝廷授予他太平节度使官职。二人为之转奏，朝廷不允。又自己上表要求广州节度使，仍不允。六月，朝廷授予黄巢率府率（皇太子属官，正四品上）。黄巢闻之大怒，遂急攻广州。十月，城破，抓住李迢，杀之；又掠岭南一些州县。

这年，岭南发生瘟疫，部将劝黄巢离开岭南北还，以图大事。黄巢军先攻取桂州，编大木筏子数千个，乘筏沿湘江攻取衡州、永州；又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尚让率军一支，号称五十万，乘胜进逼江陵。王铎慌忙逃往襄阳。十一月，黄巢、尚让合兵一处向襄阳进军，在荆门中了官军埋伏，战败，损失惨重。黄巢渡江向东进击，攻下鄂州，转攻饶、信、池、宣、歙、杭等十五州，起义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朝廷任命淮南节度使高骈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募兵七万，准备率军入江西进攻起义军。黄巢此时正屯兵信州（治上饶，今江西上饶市），遇瘟疫，将士多死亡。听到官军进攻的消息，派人送信给高骈，表示要投降。高骈立即以代请官职相引诱，以便一举歼灭。为了独占功劳，还奏请朝廷令各镇援兵退回淮河以北。黄巢乃假降，见诸道兵退去，遂与高骈大战，败淮南兵，声势大振。六月，黄巢连续破睦州（治建德，今浙江建德县）、婺州（今浙江金华市）、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号称六十万人马。七月，黄巢率部从采石（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距高骈驻守的扬州城不满五十里。高骈畏惧，不敢迎战，谎称“中风”。朝廷任命淄州刺史曹全晸为天平节度使兼东面副都统，率军阻挡黄巢渡淮河。九月，黄巢率十五万大军突破曹全晸防线，渡过

淮河，攻破申州，分路进攻河南诸州。十一月，黄巢以天补大将军名义通告各节度使："各守本营，不得犯我兵锋。我东进洛阳，再攻长安，向朝廷问罪，与众位无关。"②黄巢向洛阳顺利进军。十一月十七日，洛阳守将投降。唐将齐克让率一万军马退守潼关。十二月，黄巢攻克潼关。十二月初五，唐僖宗带领嫔妃、亲王等逃离长安，奔成都。当天，黄巢率军进入长安。十二月十三日，黄巢即位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朝中三品以上官员停职，四品以下官员留任。尚让通告百姓："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③

公元881年四月，朝廷任命凤翔节度使郑畋为诸道行营都统，各道节度使分别屯兵沙苑（今陕西大荔南）、渭桥（今长安西北）、武功（今陕西武功）、盩厔（今陕西盩厔）等长安外围据点。在副都统程宗楚和行军司马唐弘夫指挥下，从长安西、北两面夹攻，黄巢弃长安东撤，官军入长安，大肆劫掠。黄巢侦知官军所为，又率众杀回长安。官军死伤十之七八。

中和二年（882）正月，朝廷又任命王铎为中书令兼诸道行营都统，以王处存、李存昌、拓跋思慕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二月，黄巢的同州刺史朱温攻取同州，击败了河中节度使（今山西永济）王重荣。四月，各道节度使的军队集结在渭北、兴平、渭桥、武功等长安外围重镇，形成包围之势。在官军重重包围中，长安城内粮价猛涨，斗米值三十千，黄巢人马无粮，处境困难。五月，黄巢将领尚让打败了邠宁、凤翔军，收复了兴平。九月，朱温为抵御王重荣的河中军，屡次向黄巢求援。黄巢不予理会，朱温遂投降王重荣。十月，朝廷任命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

为对付起义农民，朝廷起用西北境内游牧部落沙陀族贵族李克用，十二月任命他为雁门节度使（今山西大同）。李克用率四万沙陀兵从晋北出发到河中。第二年自夏阳渡黄河，进驻同州。

唐中和三年（883）正月，李克用在沙苑大败黄巢之弟黄揆。王铎用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李克用进攻沙苑西南的乾阬，会合王重荣、王处存和宦官杨复光所率三路官军，与屯住在梁田陂的尚让十五万军队激战。尚让大败，死伤数万人。

二月，黄巢袭取华州，李克用随之围住华州，尚让将兵来救，战败。起义农民撤出华州，以三万兵力扼守长安东南的蓝田（今陕西蓝田），控制了从商州（今陕西商县）出武关（今陕西武关）的道路。四月，李克用与黄巢战于渭南（今陕西渭南），一日三战，大败农民军。黄巢率军退守长安。黄巢力战不敌，遂焚宫室退出长安，自蓝田入商山。五月，黄巢部将孟楷率军一万攻下蔡州（今河南汝南）。接着，孟楷又攻打陈州（今河南淮阳），兵败，被杀。黄巢闻讯大怒，在陈州北面建房，设置办事机构，围困陈州达三百多天。第二年，河南大旱，围陈州之起义军严重缺粮。

是年，朝廷任命朱温（全忠）为宣武节度使，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朱温与忠武节度使周岌、武宁（今江苏徐州）节度使时溥三路军马兵临陈州。但尚不敢轻举妄动，又求救于李克用。

中和四年（884）三月，李克用率兵五万，从太原出发，会合许州、汴州、徐州、兖州等路官军，赶赴陈州。五月，黄巢义军失利，退到陈州北面故阳里。六月初，大雨倾盆，黄巢军营帐皆被淹没，只好北移，引军攻汴州、尉氏（今河南尉

氏)，并准备渡过汴水，向河北转移。渡河时，又遭到唐军袭击，损失惨重。尚让投降了时溥，其他将领投降了朱温。

渡过汴水的黄巢军同李克用军在封丘（今河南封丘）激战，损失惨重，只剩下一千多人向山东兖州撤退。七月，黄巢军在山东莱芜以北的瑕丘，同武宁节度使时溥打了最后一仗，大多数人战死，黄巢在莱芜东南的狼虎谷自杀身亡。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以失败告终。

黄巢起义失败后，唐王朝已名存实亡，全然不能管领藩镇，政令不出长安。公元907年，朱温废掉唐昭宗李晔，自立为帝，国号梁，唐朝灭亡。

注 释

①《通鉴纪事本末》卷三七。

②③《旧唐书》卷二OO《黄巢传》。

隋唐五代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中国印刷术的发展，经历了由印章、拓石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几个阶段。

我国很早就出现的印章和拓石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近几十年来，周秦印章不断出土。战国墓出土的铜印，成为《史记》所载战国时苏秦佩带六国相印的有力证据。汉朝时印章已很流行。印章通常只刻有三四个字，两晋时我国古代著名炼丹家葛洪（281？—341）的著述中，记有刻着120个字的大木印。拓石是用浸湿的薄纸敷在石碑上，轻轻拍打，有字处微微下陷，然后在纸上刷墨，再把纸从碑上揭下来，就成了墨地白字的拓本。东汉灵帝时，蔡邕把重要的儒家经典刻石立于洛阳太学门外，作为标准读本。许多人对照校正、抄写、拓印，街道为之堵塞。后来人们又把字刻在木板上，较刻石省力。印章和拓石相结合，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供了技术条件。

雕版印刷一般是在尺寸相等的纹质细密坚实如枣木、梨木等木板上涂胶或浆糊，把写好的文字的薄而透明的绵纸正面贴在木板上，使字成反体，再用刻刀把文字和插图刻在木板上，

即成雕版。然后在雕版上涂墨，把纸覆盖上，用刷子均匀刷拭，揭下来，文字和插图就转印在纸上并成为正字。

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尚未确知，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一书中引《弘简录》说在贞观时（627—649），曾令“梓行”长孙皇后写的《女则》。说明七世纪前半叶即唐初已有雕版印刷。因为这里只是说“梓行”（即刻印传布），并未说开始“梓行”，故一说此前已有雕版印刷。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引陆琛《河汾燕闲录》说：“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敕废像遗经，悉令雕版，此印书之始……雕版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如是则公元六世纪末即隋时已经发明了雕版印刷。但此说尚有争论，因“雕板”二字或作“雕撰”，“雕”指雕刻佛像，“撰”是撰写佛经，而非雕版印刷。又近年英国发表了斯坦因盗自我国新疆吐峪沟的古物残纸一片，上印“延昌卅四年（公元594年，开皇十四年），甲寅……家有恶狗，行人慎之……”，外国人曾鉴定这是中国现存最古的印刷品。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手迹而非印刷。学术界一般将雕版印刷的开始定于七世纪上半叶。

早期雕版印刷主要在民间进行，多用于印刷佛像、经咒、发愿文以及历书等。唐冯贽《云仙散录》卷五引《僧园逸录》说，玄奘用回锋纸印普仙像，发给四众（僧、尼、善男、善女），每年五驮无余。说明唐初印刷技术已达较高水平。长庆四年（824），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自注云：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也）。”① “模勒”即模刻，说明在元和、长庆时市上已刻板印书出卖或以之换取酒茶。则唐中叶以来，雕板印刷使用渐广。

到文宗大和年间（827—835），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每岁“以板印历日”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布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②。大和九年（835）文宗下令“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板”③。唐末柳玭（音 pín，频）说，他在中和三年（883）在成都书铺看到许多雕版印书，有阴阳杂记、占梦、相宅、字书、小学等。说明唐后期雕版印刷已相当发达。

五代时期，不仅民间雕版印书盛行，政府亦大规模刻印儒家书籍，自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至后周广顺三年（953）22 年间刻印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 2 部，130 册。至宋代，雕版印刷更为发达，技术臻于完善，尤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刻印质量更高。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张徒信在成都雕刊全部《大藏经》，费时 22 年，计 1076 部，5048 卷，雕版达 13 万块，成为早期印刷史上份量最大的一部书。南宋时，偏远的海南岛也刻印了医书。北方的辽、金和西夏也先后采用雕版印刷。宋朝雕印的书籍，现知就有 700 多种，字体优美，纸墨精良。后世把宋版书作为古代书籍中的珍品保存。

雕版印刷术不断发展又出现彩色套印。北宋初年在四川流行的“交子”，就是用朱墨二色套印的纸币。14 世纪时元代中兴路（今湖北江陵）用朱墨两色刊印的《金刚经注》，是现存最早的套色印本。到 16 世纪末，套色印刷广泛流行，明代万历年间的闵齐伋、闵昭明、凌汝享、凌濛初、凌瀛初都是套色印刷的名家。这种套色技术与版画技术结合，便产生出光辉灿烂的套色版画。明末《十竹斋书画谱》、《十竹斋笺谱》皆为古版画的艺术珍品。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它为书籍从

手抄进步到印刷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发展。雕版印刷术逐步传播到国外，成为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唐朝时朝鲜和日本来我国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其中包括印刷术。十二世纪雕版印刷术传到埃及。欧洲直到 14 世纪末，才开始有雕版印刷，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国的相同，说明欧洲的印刷术也是由中国传去的。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20 世纪初英帝国主义派遣斯坦因从敦煌莫高窟盗走的唐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这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此件由 7 张纸粘成一卷，全长 488 厘米，每张纸高 76.3 厘米，阔 30.5 厘米，第一张雕印佛的故事图，图为释迦牟尼对弟子说法的故事，四周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是一张优美的版画艺术。后 6 张刻有《金刚经》全部经文。这卷雕版印刷品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浓厚均匀，清晰鲜明，刊刻技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此外，现存的唐代印刷品还有僖宗乾符四年（877）和僖宗中和二年（882）的日历残本和唐末印的一张《陀罗尼经》等。可惜这些珍品绝大部分被斯坦因、伯希和等盗往国外，目前国内尚存的只有那张《陀罗尼经》，它发现于 1944 年成都望江楼五代墓，居中部分的正文是梵文，上面还印有佛像，纸边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纸马铺发售”的字样。1966 年在南朝鲜发现雕版陀罗尼经，刻印于 704—751 年之间，为目前所知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在日本至今留存着雕印本的《陀罗尼经》，据说印于日本宝龟元年（770），印数相当多。刻工和技术颇似初学。日本学者认为这个经书的印刷，是由中国传去的。

注　释

①《元氏长庆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

②《册府元龟》卷一六O。

③《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

隋唐五代

僧一行制定《大衍历》

僧一行本名张遂（683—727），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襄州都督郯（tán）国公张公谨的曾孙。张遂自幼聪敏，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道士尹崇，博学多藏古书，张遂往借《扬雄太玄经》，归家读数日而还其书，尹崇说，此书深奥，我探求积年，尚未通晓，你可进一步研求，不必速还。张遂说已弄清其要旨，因而拿出他撰写的《大衍玄图及义决》一卷给尹崇看，尹崇大惊，“谓人曰此后生颜子也”①。张遂由是远近知名。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名请与结交，张遂逃匿以避之，旋即出家为僧，隐于嵩山，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名一行。他跋涉千里，访师求学，先后到郯州天台山，荆州当阳山学习佛教经律和天文数学。开元五年（717）唐玄宗礼迎一行至长安，安置于光太殿向他征求治国安邦之道。一行切直谏诤，玄宗皆予采纳。开元八年（720），天竺僧金刚智至长安传授密宗。一行从金刚智灌顶②受法，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开元九年（721）因据当时行用的麟德历所推算的日蚀多

误，玄宗诏一行研究前代诸家历法，制定新历。

测定日、月、五星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和掌握它们的运行情况，对提高历法的精密程度至关重要。而以前的天文仪器基本上都是赤道装置。赤道是赤道面和天球的交线，它垂直于地球自转轴。这样的仪器所测得的天体位置，都是用赤道坐标表示的，还须经过坐标换算，才能确定天体在自己轨道上的位置，这就需要应用球面三角法。但那时的学者们还没有掌握这个方法，都是用近似的经验公式来计算，误差较大。一行知道这个缺点，他希望有一架能够直接测量日、月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的仪器，这样可以减少一道换算手续，并避免由此产生的误差。一行对梁令瓒等与工人设计的黄道游仪木模进行鉴定，支持梁令瓒用铜铁制造成器，黄道是太阳在天球中视运动③的路线，即从地球上看太阳，感觉到太阳在宇宙空间一年当中运动的轨道。用黄道游仪来观测天象，可以直接测量出日月星辰在轨道上的坐标位置，从而减省换算手续，避免误差。开元十二年（724），黄道游仪正式制造成功。惜史书缺详细记载和图样，其具体结构和形状已无法了解。大致是由几个金属圆环交织在一个“中旋枢轴”的周围，很像一个大球。“枢轴”与地球自转轴平行，指向南北两极。仪器由四个高四尺七寸雕成龙形的柱子支持着，坐落在水平槽上。在金属圆环间装有“玉衡望筒”用来观察天体，类似后来的天文望远镜。金属圆环中的黄道环，白道环（白道是月亮在天球中视运动的路线）和赤道环的交点不固定，能够开合，观测者可以从黄道环上读出所需要的数字来。一行用黄道游仪测量150余颗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并同汉代观测结果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有很大差异。从而在世界上最早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在

世界天文史上是一个创举，比英国人哈雷 1712 年发现恒星自行大约早了一千年。

开元十三年（725），一行与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水力运转的浑象（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这是一个球形物体，有铁轴贯穿球心轴的方向就是地球的旋转方向。球和轴有两个交点，作为球的南极和北极。球面上刻着二十八宿和其他星辰。球的外围套有两个圆圈，一为地平圈，一为子午圈。交叉环套。天球半露在地平圈上，半隐在地平圈下。天轴支架在子午圈上边。另外，在球体上还有黄道和赤道，互成 24 度交角。在赤道和黄道上各刻有 24 节气，并且从冬至开始，刻分成 365 1/4 度，每度分为四格，太阳每天辐射在黄道上移动一度。如是天体现象皆可在球上表现出来。为使浑象能自己转动，利用我国古代计时漏壶滴水的原理，在仪器上安装齿轮，用漏壶滴水的力量发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每天转动一周。用大柜做地平，使天球一半在地下，地平上有两个木人，面前置钟鼓，每刻击鼓，每个时辰（两小时）撞钟，皆由柜中齿轮操纵。这架演示天体现象并能自动报时的仪器被称为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

从开元十二年起，一行组织了全国十多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这是世界科学史上的创举。测量任务主要是在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的正午各点的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测量日影的长度是把一根长八尺长的标杆（古代叫做“表”）直立于地面，至时量其影长。北极高度，即观测点和北极的联线同通过观测点的子午圈的切线所成的角度。这需要比较复杂的仪器才能解决。为了测量北极高度，一行设计了一种测量工具——复矩，并且绘制《复矩图》24 幅（可能是配合复矩的天文图）。

“矩”是我国古代一种制图工具，很像木匠使用的“曲”尺。“复矩”就是把“矩”倒过来放置。在“矩”的直角上安装一个由0度到91.31度的分度器（这里的度指古代的一种计量单位，是圆周的365.25分之一），顶点系一铅锤，这就是一件完整的工具了（见图一），用法也很简单，只要把复矩临近91.31度的直角边直指北极，使北极、观察者的眼睛和直角边的两端正好在一直线上，另一直角边“向下倾复”，这时铅锤线在分度器上就能指出观测点的北极高度来。北极高度实际上就是当地的地理纬度。复矩不仅构造简单，灵巧，容易作用，而且合乎科学原理。在当时的天文测量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观测点的北极高度都是利用它测得的。这是一行在天文测量上的一项贡献。

在这次测量中，以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四个点的测量工作最重要。这四个点是白马（今河南省滑县东北）、浚仪（今河南开封）、扶沟（今河南扶沟县）、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四个观测点处于一条子午线上。他们测量了各点的北极高度、夏至日正午八尺标竿的影子长度，还测量了各点之间的距离。

这次测量彻底推翻了《周髀算经》中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错误说法。派往龙编（治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一带的测量队测得夏至日影在表南三寸三分，阳城（今河南商水西南）夏至日影为表北一尺四寸九分，两地如以直线步量不到5000里，结果合277里左右影差一寸。南宫说等测得从白马到上蔡，距离526里270步（唐尺），夏至日表影长度差二寸有零，合263里左右影差一寸。这就证明了南北地隔千里影差不是一寸，而随着地点的不同，影差和南北距离的比率是不固定的。也证明了隋朝的刘焯和唐初李淳风的看法是正确的，从

而使一行等完全放弃了地隔千里影差一寸的概念。

这次测量最重要的成就，是一行根据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同一平原地区内同一子午线上四个点观测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南北距离就相差351里80步（唐代尺度。合129.22公里）的结论。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这与现代测量北纬34.5°地方子午线一度的弧长111.2公里仅差18.02公里。它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开创了通过实测认识地球的道路，把地理纬度测量和距离结合起来，既为制定新历法创造了条件，又给后来的天文大地测量奠定了基础。这是我国科学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一再著文论述，认为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经过几年的观测研究，开元十三年（725）一行着手编订新历，开元十五年（727）新历法草稿完成，名为《大衍历》，一行也于这年逝世。后经张说、陈玄景等将新历草稿整编成册。其中包括：《开元大衍历经》1卷7篇，《七政长历》3卷，《历议》10卷，《历立成》12卷，《古今历书》24卷，《略例奏章》1卷，《天竺九执历》1卷。其中《历经》全文被录入新、旧《唐书·历志》，《历议》，《略例奏章》被摘要录入《新唐书·历志》因得存留至今，从开元十六年起，每年颁发根据《大衍历》推算的次年的历书。经过检验证明，《大衍历》比以前所有历法都更为精密。其结构严谨，演算步骤合乎逻辑，为后世历法所师从。《大衍历》最突出的成就是比较正确的掌握了太阳周年视运动中速度变化的规律（实际应当是地球绕太阳运动时速度变化的规律）。指出冬至前后日行最快，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短；夏至前后日行最慢，所以两个节气之间的时间最长。又测知从冬至到春分之间共为88.99日。从春分到夏

至之间共91.73日。秋分前后的情况与此相同。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大衍历》在日食计算中首次考虑了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也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科学。在当时《大衍历》是最先进的历法，故宋代科学家沈括说："开元《大衍历》最为精密，历代用其朔法。"从唐朝中叶到明朝末年，使用了800余年。开元二十一年《大衍历》传入日本，在日本广泛流传使用，影响甚大。

一行在数学上也很有贡献。他在《大衍历》中提出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吸收印度传入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提出了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

一行叔祖父张大素撰《后魏书》，未完成其《天文志》，一行续成为2卷。后人将此2卷补入魏收所撰《魏书》，成为《天象志》的第三、四两分卷。一行并助金刚智译《陀罗尼经》；助印度善无畏译《大日经》7卷（存），并自撰《大日经疏》20卷（存）；奉敕撰《释氏系录》1卷；著《摄调伏藏》10卷，《梵天火罗九曜》1卷（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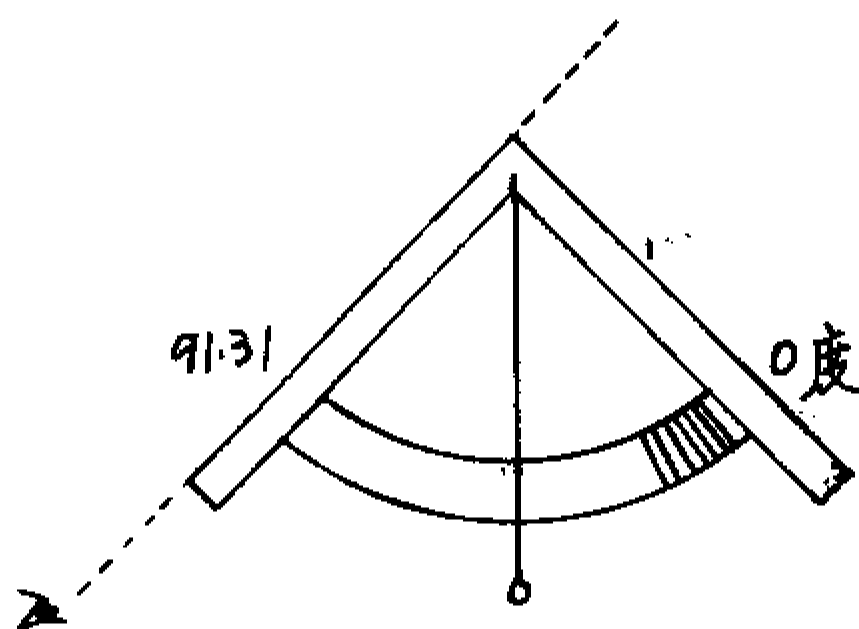
1955年8月25日，我国邮电部发行古代科学家纪念邮票中，有僧一行一种，肯定了他的创造性成就和古代科学家的地位。

注 释

①《旧唐书》卷一九一《一行传》。颜子，孔子高徒颜回，敏而好学，问一知十。

②灌顶，天竺国王即位时，以四大海之水灌于顶上以表祝意，佛教密宗效此法，于堪为众僧规范之高僧嗣阿阇黎位时，设坛而行灌顶之仪式。

③视运动是直观看到的表面现象，而不是真实运动。如太阳每天东升西落是视运动，真实运动是地球自西向东自转，并绕太阳公转。



隋唐五代

史学的发展

唐代史学，有比较重大的发展，一为官修史书制度的确立，二为史学著作中出现新的创作。

中国早在奴隶社会即已设立史官，以后帝王敕令修史的事也屡见不鲜，但史官职守甚杂，到隋唐时所保存的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只是经政府审定认可而已。隋文帝开皇十三年(593)，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zōng pǐ）人物者，皆令禁绝。"①明令禁止私人撰写国史，评论人物，表明中央集权的政府日益看重历史著作的作用，要将国史的编纂工作集中在封建政府手中，以便从中吸取统治理论和经验，树立统一的历史文化观点，以加强和巩固思想统治。这一禁令成为封建政府即将实行官修史书的信号，为唐朝官修史书创造了条件。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别置史馆于禁中，专修国史，而由宰相监修，自此，南北朝以来掌修国史的著作郎罢史职。史馆由宰相监修国史，下设史馆修撰、直馆，从事编述。这一措施是中国中世纪史书编纂工作中一个重要变化，从此所谓纪传体的正史都由封建政府掌修，私家著述越来越少。宰相监修国史也

成为以后各封建王朝的定制。唐初在专设史馆，多人合修，由宰相监修的情况下，修成了二十四史中的八部纪传体史书，即唐太宗御撰房玄龄监修的《晋书》（实为史官多人共同撰写，唐太宗只为宣、武二帝的纪和陆机、王羲之二人的传写了论）、姚思廉所修《梁书》、《陈书》、李百药等所修《北齐书》、令狐德棻等所修《周书》、魏征监修《隋书》、长孙无忌等监修《五代史志》（后并入《隋书》）、李延寿等所修《南史》和《北史》。

除官修纪传体史书外，唐朝出现了两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一为刘知几的《史通》，一为杜佑的《通典》。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史学家。他祖父是史官，父曾任侍御史，他幼年即对史学产生浓厚兴趣。“年十二，父藏器为授古文尚书，业不进，父怒楚督之。及闻为诸兄讲春秋左氏，冒往听，退则辨析所疑，叹曰：‘书如是，儿何怠。’父奇其意。许授左氏，逾年遂通览群史”②。十七岁时读完唐以前的主要史书，二十岁中进士。他用毕生精力研究历史。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长安三年与朱敬则等撰《唐书》80卷，神龙（705—707）时与徐坚等撰《武后实录》。玄宗先天元年（712），与谱学家柳冲等改修《氏族志》，至开元二年（714）撰成《氏族系录》200卷，四年与吴兢撰成《睿宗实录》20卷，重修《则天实录》30卷、《中宗实录》20卷。

刘知几不满于当时史馆制度的混乱和监修贵臣对修史工作的横加干涉，如知几修《武后实录》，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听，乃于景龙二年（708）辞去史职，“退而私撰《史通》以

见其志"。景龙四年（710）写成《史通》二十卷。

《史通》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史学评论著作，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如《六家》篇总结唐初以前史书著作的类别，六家指《尚书》家（纪言）、《春秋》家（纪事）、《左传》家（编年）、《国语》家（国别）、《史记》家（通史纪传）、《汉书》家（断代纪传），申述各家的源流兴废和优劣所在。《二体》篇总结了唐初以前编年体史书和纪传体史书在编纂上的特点和得失，认为这两种体裁是不可偏废的，而在此基础上的断代为史则是今后史书编纂的主要形式。《史通》对纪传体史书的各部分体例，如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题目等，作了全面而详尽的分析，不仅评论古人，也正是抒其所见。《史通》对编写史书的方法和技巧也多有论述，这些在中国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指出修史必须广搜史料，明辨真伪，直言不讳，截去浮词。它认为"征求异论，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主张对各种"杂史"应分别其短长而有所选择，对以往各种记载中的"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关于作史原则，其《直书》、《曲笔》两篇，鲜明地提出坚持直书，反对曲笔，在认识上把中国史学的直笔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发展了。外篇的《史官建置》篇，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是一篇简要的史官制度史；《古今正史》篇叙述历朝正史（指官修的编年和纪传体史书）的源流和写作过程，间也有些评论；《疑古》、《惑经》等篇继承了王充《论衡》的《问孔》、《刺孟》的批判精神，对古代史事提出一些疑问，对

儒家六经和整理六经的孔丘，进行大胆的怀疑和批判，批判手定六经的孔丘，隐瞒歪曲事实，爱憎由己，提出对《尚书》的十条疑问，批判《春秋》“真伪莫分，是非相乱”③；《杂说》等篇涉及以往史家、史书的得失，有些地方也反映出作者在哲学思想上的见解和倾向。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在《辨职》篇中，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级：一是敢于奋笔直书，不避强御，彰善贬恶，如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鲁之左丘明，汉之司马迁，此其次也；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礼部上书郑惟忠尝问刘知几：“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操金，不能货殖；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pián南方大木）柟（楠的异体字）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无可加者。”④在中国史学史上，刘知几第一次提出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尤为重要。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刘知几这一论点在当时被认为是确当的评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代以前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进而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史通》成书时，同时人徐坚见而叹曰：“为史者宜置于座右也。”唐末柳璨于光化三年（900）著《史通析微》10卷，说明《史通》在唐代已经流传。明清

以来流传渐广，为之作注、释、评、续者颇不乏人，现代史学家亦有不少研究《史通》的论著。《史通》是八世纪初中国史坛和世界史坛上的一部重要的史学评论著作。《史通》的缺点在于它对史书体裁的评论，仅仅局限于对过往的总结，未能提出新的设想；它所说史书编纂超不出编年、纪传二途也不够全面。它过分强调史书体例的整齐划一，以至要求以生动的历史去适应体例的模式，因而对已往史书“讥评过当”，批评往往失于偏颇。

《史通》之宋刻本已不可见，现存最早刻本为明刻宋本，如万历五年（1577）的张之象刻本。万历三十年（1602）的张鼎思刻本（源于1535年的陆深刻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李维桢以张鼎思刻本为基础进行评论，乃有《史通评释》刻本，此后续有郭孔延《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清朝黄淑琳《史通训诂补》等，浦起龙将明清各种版本疏而汇之，予以互正，撰《史通通释》，刻于乾隆十七年（1752），此即求放心斋刻本，流传较广。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的《史通通释》校点本，即为目前之通行本。

刘知几在《史通》中批判了史书中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强调人事在历史上的作用。他指出：“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历史属于“人事”的范围，不能用命定或命运来解释。如果用“命”来解释历史的事理，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他主张写史书应清除神学迷信思想，对《汉书》等史籍专列五行、符瑞等《志》，把灾异、图谶、神怪作为天命的征兆，穿凿附会，斥之为“言无准的，事涉虚妄”，主张废除。刘知几的这种历史观显然是进步的。但他在重视人事的同时，往往把某些统治人物的性格、道德、

智能、神武看成起决定作用因素，这就不能不陷于以伦理和心理来曲解历史，又回到唯心主义的范畴。刘知儿在《史通》中反对复古主义的历史观，宣扬历史进化论。他认为把三皇五帝时代美化成理想时代，是春秋以来的传统说教，实际是没有根据的。在刘知几看来，远古生活简陋，不是今不如古，而是古不如今。刘知几把历史看作是发展的，变化的。他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治异"，决不能按古人的标准要求今人。应当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去评判人物和事件。在1200年前刘知几在《史通》中表达的一系列有进步意义的卓越见识，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另一部私家著述的重要史学著作，为杜佑编纂的《通典》。杜佑（735—812），唐中叶宰相，著名史学家。他以门资入仕，历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经略使、水陆转运使、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等，又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后任岭南、淮南节度使，在淮南期间，曾开雷陂以利灌溉，辟海滨荒地为良田，积米至50万斛。后入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宰相兼度支使、盐铁使。由于他历任财政大吏及地方和中央的行政要职，对经济、政治等典章制度较为熟悉。又好学不倦，掌握了丰富的史料。刘知几之子刘秩仿《周礼》六官的职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分门别类，写成《政典》35卷，宰相房琯称其才过刘向。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以36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通典》200卷。《通典》成而《政典》废。

《通典》是记述唐天宝（742—756）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的专书。内分9门，子目1500余条，

约 190 万字。每一制度，必条贯古今，上自黄帝，下迄天宝，都作了系统的原原本本的叙述和考证。《通典》取材广泛，上自《史记》八书、《汉书》十志、下至晋、宋、齐、魏、隋书诸志，皆所取资，并参照了《隋官序录》、《隋朝仪礼》、《大唐仪礼》、《开元礼》、《太宗政要》、《唐六典》等典制政书。《通典》的编撰目的既然是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揭举先代“致治之大方”，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借鉴。按照“经邦济世，治国安民”的原则，他认为治理国家，经济条件最重要，所以列食货典（12 卷）为九门之首，下面依次为选举典（6 卷）、职官典（22 卷）、礼典（100 卷）、乐典（7 卷）、兵典（15 卷）、刑典（8 卷）、州郡典（14 卷）、边防典（16 卷）。《通典》自序说明各门编次的理由说：“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这里着重说明首列食货的道理，当时杜佑已知经济史的重要，杜佑以前，没有一个史家这样重视过食货，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卓见。

《通典》源于纪传体史书的志书，发展而为经济政治礼乐等典章制度的专史，确立了中国史籍中与纪传体、编年体并列的典制体，为史书著述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影响下，宋代史学家郑樵、马端临分别撰成《通志》和《文献通考》，习称“三通”，再进而有“九通”、“十通”，为研究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大量引用古代文献资料，

其中许多今已亡佚，赖《通典》得以部分保存，因而《通典》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书中四分之一以上的内容是关于唐代的，多取自当时的官方文书、籍帐、大事记以及私人著述，如诏诰文书、臣僚奏议、行政法规、天宝计帐等，皆为第一手材料，为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

注　释

①《隋书》卷二《高祖纪》下。

②《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③《史通》外篇《惑经》。

④《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

隋唐五代

唐诗的成就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唐诗在丰富多彩的唐文学中最放异彩，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许多杰出的诗人，创作出大量的优秀诗篇。根据清代康熙时所编的《全唐诗》统计，诗人有二千二百余家，作品有四万八千九百余首，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遗产。

唐朝诗歌发达的原因，除封建经济的繁荣给它提供了物质基础；阶级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给它提供了动力而外，还有以下几点：一、从高宗开始，科举考试考诗赋，这是诗歌发达的反映，反过来又给它以很大的推动。二、南北统一，南方文风与北方文风互相融合，原来南朝宫体诗，追求词藻华丽，缺乏思想内容，北朝诗，质朴刚健，却少文彩。融合后发展成既有词彩又有内容的唐诗。三、民族大融合，使诗歌题材中加入了少数民族和边疆的风光，扩大了描写面，丰富了诗歌的内容。四、大量民间口语和民歌，被吸收到诗中来，使诗歌增加了新血液，加强了诗歌的生命力。

唐诗题材广泛，大地、山河、战场、边塞、农村、城市和

阶级对立、政治风云、人民生活、妇女遭遇等等，无不加以描写，反映了唐朝历史发展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唐诗，一般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初唐诗人犹沿南朝宫体诗气息，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艺术形式上，自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杰”至沈佺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及至初唐最杰出的诗人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可说是一扫六朝粉黛。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他的诗刚健朴素，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时期，唐诗发展至繁荣的顶峰，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盛况。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一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的边塞诗派，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701—762），字太白，自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出生在客居碎叶的汉族商人李客家中（碎叶当时辖于安西都护府，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旁）。五岁时候，随父入川，移居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今四川江油），在蜀中度过了少年时代。李白“十岁通诗书”，年轻时尚义任侠，向往着不受束缚的自由生活。常以张良、诸葛亮自比，政治上有一番抱负。这时他已是一个“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的青年作家，以诗文见赏于世。李白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浪游四方当中度过的。少年时候，游览过蜀中的许多地方。二十五

岁，开始远游，由四川到湖北停留十余年，主要往来于襄阳、江陵一带；中间也曾游过洞庭，到过金陵。三十七八岁以后，他到过山西，东游山东，在任城住了几年，并在那里安了家。又南至江苏、安徽、浙江等地。在这一过程中，祖国河山的自然景象深深地感召了他，他也接触到社会各个方面，一些游侠、道士对他影响很大。玄宗天宝元年（742）他四十二岁时，因道士吴筠的推荐，被召至京城长安。他很兴奋，以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来到了。他在《别内赴征》诗里说："归时倘佩黄金印，莫见苏秦不下机。"在《南陵别儿童入京》诗里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到长安，往见贺知章，贺知章看了他的《蜀道难》，"叹曰，子，谪仙人也"。声名大振。玄宗召见，大加赏识，任为翰林院供奉，掌管机密诏命的起草。一日，玄宗和杨贵妃在宫中沉香亭饮酒看牡丹，召李白作乐词，白正醉卧酒肆，召入后左右以水洒面，援笔成《清平调》词三首：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支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
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玄宗爱其才华，几次宴见，李白在殿上沉醉，引足令高力

士脱靴，高力士深以为耻，以其《清平调》词激杨贵妃，因诗中直指杨贵妃即西汉的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因李白诗名太高，得免指斥杨贵妃的罪责。唐玄宗召请他，只不过是希望他做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诗人，并没有想得到宰相之才，没有使他得到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他的浪漫的性格和正义的主张，使他遭到权臣贵族们的排挤。在当时只有用牺牲正义和自由作为代价，他的政治活动才能够成功，但他不肯付出这样的代价。对杨贵妃、高力士之流，他不但没有奉承拉拢，反而毫不掩饰地予以鄙视，终于遭受他们的排挤。他在长安仅仅三年，就被变相地放逐出宫（赐金放还）。此后他漫游四方。并一度到达幽州，目睹了安禄山势力坐大。安史之乱期间，他五十六岁时，被当时镇守南方的永王李璘召为王府幕僚。就在那一年，永王李璘起兵，与他哥哥唐肃宗争夺帝位，次年，永王兵败，李白被捕，囚在浔阳。五十八岁时，被判处流放夜郎，途中遇赦。762 年，六十二岁的李白在穷困飘泊中病死当涂（今属安徽）。后世有李白是醉后入水捉月淹死之说，不足为信。

李白的性格是非常浪漫和豪放的，感情是炽烈的，他热爱祖国，热心于政治。这些是建筑在对于正义和自由的迫切要求上的。而这是和当时统治集团有矛盾的。所以，他一生中真正的政治生活，只有短短的两次，时间总共不过五年，并且都以失败告终。他虽已享有极大的诗名，但仍在四方浪游中度过一生。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封建经济空前繁荣，李白出身于富商之家，生活优裕，得以漫游全国名山胜地。他对自己对社会都抱着积极乐观的态度，在作品中表现出蓬勃向上的精神。他以大量的诗篇歌颂祖国的壮丽河山。写长江："故人西辞黄鹤

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这些诗是李白对祖国江河千古绝唱的赞歌。写庐山瀑布：“日照香庐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写西北高原的塞外风光：“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关山月》）。写峨眉山的月色：“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即青衣江，在峨眉山东北）水流。”“月出峨眉照沧海，与人万里长相随”（《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这些诗表现了诗人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也表现了他对自由和光明的渴望。人们读了这些再现大自然的雄伟形象的诗篇，自然激起对祖国山河的热爱。

李白一生的后期，正是唐朝由强盛的顶峰走向衰落的时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诗人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他所处的时代的特点。他离开长安之后，由于政治理想破灭并和最高统治集团有过直接接触，陆续写出了一系列政治抒情诗，对宫廷腐败进行大胆揭露，并预言唐帝国大难将临。在当时只有李白的作品具有这种政治敏感。如《行路难》、《鸣皋歌送岑征君》、《玉壶吟》、《雪谗诗赠友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书情赠蔡舍人雄》、《梁甫吟》、《远别离》等。诗人既不愿同流合污，亦不愿独善一身的矛盾，使他怀才不遇的抒情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这一特色也表现在一些以饮酒、游仙、吟咏山水为题材的诗篇中，如《将进酒》、《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

天姥吟留别》、《庐山谣》、《蜀道难》、《横江词》等。安史之乱爆发后，写出描绘九土横溃和生民涂炭的悲惨景象并愤怒谴责唐统治者的昏庸与无能的名篇，如《猛虎行》、《永王东巡歌》、《万愤词》、《赠张相镐》、《流夜郎闻酺不预》、《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闻李太尉大举秦兵出征东南》等。李白还有政治色彩淡薄，多以吟咏山水，抒发羁旅别情或反映与下层社会的接触为内容的作品，风格清新隽永，显示了诗人天真恳挚的性格，富于生活情趣。如《静夜思》、《春夜洛城闻笛》、《望庐山瀑布》、《秋浦歌》、《赠汪伦》、《哭宣城善酿纪叟》、《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这类诗作同样是李白诗歌中的重要部分。

总之，李白的诗篇，介绍给我们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有惊奇绝险的名山大川，有和平淡远的田园村舍，有穷边绝塞的苍茫，有曲涧清溪的幽静，有风雪怒吼，有花月争辉，有江南水乡的白鹭，有沉香亭畔的牡丹，有侠客的剑光，有美人的舞袖，有章台走马的五陵少年，有山林高卧的幽人隐士，有百战沙场的老将，有秋作夜舂的农民，有为君谈笑静胡沙的东山谢安石，有笑隔荷花共人语的若耶溪旁采莲女……。这个世界是这样丰富多彩，无论那一个角落，都流贯着一股长江大河似的奔腾洗荡的气势，都在读者心中引起一种生气勃勃的青春奋发的情感。诗歌中的这个世界，就是当时现实世界在诗人心灵中的投影。而人民是创造历史和创造文化的动力，也就在这里得到一个极其雄辩的证明。诗人李白的伟大意义正在于此。

在现存的李白的作品中，直接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政治情况的并不很多，但是，人民对于光明和自由的热望，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的决心，却通过诗人自己的同样性质的感情的抒写，而得到鲜明的反映。它们原是人民群众现实生活中广泛存

在的东西，被诗人吸收和集中起来，予以艺术的提高，于是随着诗篇的流传和感染，重又灌注进人们的心灵，成为一种力量，鼓舞人们去争取美好的生活。这就是李白诗篇的巨大的积极意义之所在。

李白是屈原之后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种傲视权贵和敢于反抗的性格深受历代读者喜爱。

在诗歌的艺术成就方面，李白全面地、富于创造性地继承了汉魏以来乐府民歌的丰富遗产，同时也总结了这一时期诗人们向乐府民歌学习的经验。因此他就拥有雄厚的艺术力量，来反映他的时代中的高涨着的人民力量，把唐诗推向一个高峰。他融会汲取口语、民歌，写出许多感情真挚、语句自然的极其动人的诗篇，如《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又如《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李白的诗作感情奔放，想象丰富，语言夸张，并惯于采用历史典故和神话传说表达感情。他最擅长乐府歌行，近体则以七绝和五律著称。现存李白诗共1000余首，有的被翻译到朝鲜和日本。

杜甫（712—770），字子美，因曾一度在成都做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也称他杜工部，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故后世多称少陵。他出生在河南巩县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诗人。他自幼好学，知识渊博，自称少年时“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并非自夸，时即以诗赋受长者称许。二十岁以后，漫游吴、越、齐、赵，开始诗歌创作。登泰山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初步显示了诗人的才

华。25 岁考进士不第。天宝三载（744）三十三岁时，在洛阳遇李白，结下深厚的友谊，杜甫诗中说他和李白“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李白诗中怀念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后来虽未再见，但彼此总是互相深情地怀念着。

天宝五载（746），杜甫来到了当时的政治中心长安。本想凭着自己的学问能够为皇上所用，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次年应举，再次落第。当时朝政黑暗，他找不到出路，只得陪贵族做诗喝酒，维持生活。“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困居长安将近十年，在失意和贫困之中，长安的一切，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人民群众的深重苦难，不得不使诗人对现实有所认识。诗人的思想感情逐渐靠近了人民，他的笔触从个人的忧愤感伤伸向广阔的现实世界。这个时期，杜甫写了不少深刻反映社会矛盾的诗歌，如《兵车行》，揭露由于兵役苛重，破坏了农业生产，造成“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户生荆杞”。对朝廷贪边功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动的不义战争，持明显的反对态度。又如《丽人行》，斥责杨贵妃姊妹和杨国忠等的奢侈荒淫。从两个极端反映了天宝年间的社会真实。还有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写 755 年冬，他从长安到奉先探望妻子，路过骊山时，知唐玄宗正和杨贵妃在华清宫避寒，肆意挥霍，尽情欢乐。而长安街头和各地不知有多少人受冻受饿，诗人不禁感慨系之。他刚进家门，就听到一片号哭，原来是他的小儿子饿死了。他由一家的贫困想到天下的贫困，又想到统治阶级的荒淫腐朽，愤慨地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深刻反映阶级对立因而流传千古的名句。既是叛军攻陷长安前的一幅社会缩影，也包含诗人自己的切身哀痛；个人的穷通和人民

的命运相沟通，杜诗成为一代诗史即始于此。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带着全家，饱尝逃亡的苦辛，受尽了穷困的折磨。一度被叛兵捉住，送往已被攻陷的长安。长安经过战乱洗劫，到处呈现着国破家亡的景象。757年春，他潜行曲江，见宫殿紧闭，满目萧条，《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集中表现了他当时忧愤心情。他逃出长安，到凤翔见肃宗，先后做了两年小官，因曾拜左拾遗，故称杜拾遗。不久就放弃官职，决心作野老，继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期间诗人接触现实日多，亲眼看到国家的灾难，人民的痛苦，促使诗人写出很多不朽的诗篇。如《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北征》、《羌村》等。759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年，也是他的创作空前丰收的一年。传诵千秋的“三吏”、“三别”（《新安吏》、《石濠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就都是在这一年完成的。杜甫在这些诗里深刻地写出了生活在战乱和阶级压迫下的人民的惨痛遭遇，对那些残害人民的封建统治者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揭露了他们不顾人民死活，把结婚才一天的新郎，没有成年的中男，以至老太婆都一齐抓去服役。在《新安吏》中，杜甫还问了新安吏一些话：“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新安吏答以“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杜甫更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杜甫还劝送儿子的母亲不要哭：“暮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杜甫在这里是说了许多话的。而在《石濠吏》里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把问题已经看得更明白了。一开始就是“莫投石濠村，有吏夜捉人!”这个吏已经是强盗了，杜甫不同他讲话了。接着是：“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听妇前致词：‘三男

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杜甫代表人民呼喊出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深沉的哀痛，同时也表示了自己对国家危难深刻忧虑的心情，诗中劝那些防关武将不要在敌人面前临阵脱逃，还劝那些新婚青年暂时抛弃个人幸福，为了国家的安危赶快穿上军装，"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对战争的性质认识的比较清醒，尤其难能可贵。这些诗，真实地反映了唐代由兴盛走向衰落这一历史转折过程中的社会面貌，充满了现实主义精神，把唐代诗歌在思想上的成就发展到了顶点。不仅是诗人的代表作品，而且也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光辉遗产。

760年，杜甫来到成都，靠友人资助，在浣花溪畔修了一座草屋，暂时得到了栖身之处。除一度因兵乱又流亡一年多，在成都草堂实际只住了三年多。其间一度任剑南节度使严武参谋，武保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765年又离开成都草堂，由四川而湖北、湖南到处漂泊。以舟为家，居无常所。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冬天，贫病交加，在湘水上一艘客船里，诗人永远停止了歌唱。卒年59岁。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以大量的诗歌揭露了唐朝封建社会的种种矛盾。诗人必须有高尚的抱负，才能产生高尚的意境，才能产生高尚的作品。杜甫早年的政治抱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现实的不满还较含糊。在政治上受挫折，生活上遭流离之后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目击战乱酿成的灾难，切盼早日结束战争，说出"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洗兵马》）。他自身生计艰

难，推己及人，说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针对现实中的种种弊端，写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由于这样的抱负，才产生了高尚的意境：“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安史乱后，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解决的办法，只能依靠农民起义。但杜甫对社会现实深刻地现实主义的描写，却把社会疮痍更强烈更集中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有可能进一步感受它，有所警觉，引起不满。杜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当然，阶级的局限使他能感人的描写人民的疾苦，却写不出人民的反抗斗争；能揭露某些封建统治的罪恶，却往往为皇帝开脱辩解；能反映社会矛盾，却指不出现实的出路。但杜甫能超越一般封建文人，达到了他所隶属的阶级在当时可能达到的较高水平。这正是他的伟大处。

杜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种乐观主义精神，使醮满血泪写出的沉郁悲哀的诗篇，并不使读者情绪低沉，读之反倒常常精神振奋，意气高昂。例如，759年是杜甫一生中最困苦的一年，在同谷县时，穷困到每天在山谷里拾橡栗充饥。《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把残酷的现实和丰富的想象结合起来，竟唱出“溪壑为我回春姿”的开阔壮丽的诗句。《登岳阳楼》写诗人的处境“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可是在这四句之前，他写出“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浩瀚的景象。同样情形，当他感慨“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时，前面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当他叹息“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时，他的面前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当他想到"野哭千家闻战伐"时，他听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这是诗人面前的风景，同时也是诗人的心境，有了广阔的胸襟，才能用这样壮丽的景色来衬托他所写的时代的艰辛和个人的不幸。所以他的诗尽管悲哀沉痛，可是读者在深受感动的同时，并不意气消沉，而是兴起昂扬振奋之感。

杜诗在艺术上被公认为唐诗集大成者，律诗成就尤为显著，特别是后期七律，最能体现杜诗沉郁顿挫的典型风格，属对精切而毫无斧凿痕，高度凝炼却又挥洒自如，代表着唐代近体诗的最高成就。

杜甫一生写下几千首诗，留下来的还有一千四百多首。他的诗歌广阔地、鲜明地反映了一个复杂动荡的历史时代，被人们称为"诗史"。杜甫的诗感情真挚、气势雄浑，语言锤练、自然、朴实、绚丽含蓄，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给后世的诗歌创作带来极为深远的影响，历代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诗人，都把他奉为学习的典范，尊称他为"诗圣"。

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屋，后人修为祠宇。解放后重建为"杜甫草堂"。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白居易和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贡献。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晚年寓居洛阳的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出生在小官僚家庭，十一二岁时，为逃避藩镇战乱，同百姓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这就使他接触人民，了解一些人民的疾苦。他年轻时苦节

读书，不遑寝息，以至“口舌成疮，手肘成胝”。从少年时代就喜欢写诗赋，十五六岁时他写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受到当时有名诗人顾况的赏识。27岁时考取进士，由校书郎、县尉历任翰林学士、左拾遗等。因反对宦官和顽固的大官僚贵族专权，四十四岁时（815）被贬为江州司马。在牛李党争中，白妻杨氏是牛党重要人物杨颖士的妹妹，被算作牛党，李德裕执政，排斥白居易，甚至不敢读白诗，怕改变对他的成见，白居易采取不争名位的方法来对待朋党之争。在作地方官时曾做过一些好事，如任杭州刺史期间，主持兴修湖堤，利用湖水灌田一千多顷。晚年退居洛阳，滋长了消极思想，这是他局限性的一面。

白居易是杜甫之后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提出一套进步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意思是文学必须反映时代，不能脱离政治，要达到教育的目的，有助于现实的斗争。并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把诗比作一棵果树，感情是根，语言是枝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就像无根的果树，无法成活。没有意义的诗就像不结果的果树，徒有枝叶毫无价值。他认为一首好诗，应是有感情有思想，而语言声韵也好，思想感情尤其重要。他的进步文学理论，对当时诗坛和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对我国文学的健康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最能代表白居易文学主张的，是他的讽谕诗。他在唐宪宗初年，身任左拾遗谏官，每日论事，对朝政和诏令小有遗阙，他都密陈所见，甚至当着皇帝的面说：“陛下错。”有些不便明言直说的，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意见，希望皇帝听了有所改悔。这一类诗有些题为新乐府，通称为讽谕诗，是白诗中最有人民

性的部分，也是白诗精华所在。以《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为代表。

《新乐府》中的《杜陵叟》指斥封建政府的苛敛说："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卖炭翁》则斥责当时的宫市宦官掠夺人民，"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这简直是把"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卖炭老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白白抢去了。这首诗很快传播到西域一带，新疆婼羌县发现了回鹘诗人坎曼尔抄写的这首诗，足见其在当时影响之大。《新丰折臂翁》写杨国忠征兵攻南诏时一个"偷将大石槌折臂"以避兵役的人，白居易看见他时，已有八十八岁了，尽管每逢风雨阴寒，还要"直到天明痛不眠"，却仍以得保全残生为大幸。诗人愤怒地谴责了不义战争。《秦中吟》中的《重赋》直斥官吏"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逼得人民"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买花》的"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揭露了严重的贫富对立。

白居易的讽谕诗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现实，据他与友人书中说：他的诗使权贵闻之变色，执政柄者闻之扼腕，握军要者闻之切齿；而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其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往往有咏其诗者。这正是这些诗的人民性之所在。也与他的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分不开的。

除了讽谕诗外，白居易还写了《长恨歌》、《琵琶行》等优美和谐的叙事诗。显示了诗人的巨大艺术才能。后世不少剧作家，把它改编成戏剧，搬上舞台，其感人之深，据此可见。他

的作品广泛为国内外读者所传诵、所仿作。

白居易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留下诗歌三千多首。

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李商隐诗隐晦朦胧，文字清丽；杜牧在艺术上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隋唐五代

唐代古文运动

唐代文学的另一成就是古文运动的兴起。

南北朝时代，帝王、贵族左右文坛，为了用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饰空虚贫乏的内容，于是特别注意形式美的骈文，发展繁荣起来。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排偶、用典，形式四、六对仗（用四字和六字的句子组成，互相对称），看起来华丽整齐，内容却空洞无物。文风萎靡，形式僵化，拘束于对偶，拘于平仄，无法自由表达思想感情和政治见解，无法反映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隋文帝时李谔上书反对骈文，说它“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云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①。（他反对骈文的上书却通篇是骈体）隋文帝也深恶文章浮艳，下令：“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就因文表华艳而得罪。但隋炀帝擅长骈文，自以为与士大夫比文章也可以高出众人，也当选他做皇帝。隋文帝的诏令自然不再有效。唐朝上起诏敕，下至判辞书牍，无不用骈文。北宋有人说：“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淫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唐文士不能作骈

文，即无仕进的可能，骈文的盛况可以想见。武周时陈子昂效法西汉古体文作政论，对当时的文风发生了很大影响。唐玄宗开元、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摈斥文坛浮艳之风，主张以三代两汉古体文为法，以儒家经典为依据，创作上亦力变排偶为散体，成为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把自己的奇句单行，继承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对立。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这种复古的主张在当时得到广泛的响应，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安史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藩镇割据，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以巩固唐帝国。它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韩愈主张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骈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反对骈文，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提倡古文。古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思想，而且它本来就是载儒家之道的，因而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排斥佛、老。韩愈说，我所以致力于古文，不只是好其文辞，而且好其道。又说：“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这就是说学古道必须学古文，学古文是为

了学古道。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基本观点，也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在文体改革方面韩愈主张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和创造，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强调博学群书又不蹈袭前人，“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做到推陈出新。他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韩愈在文道合一和文体改革方面提出了比前人更为明确具体的主张，而且还将自己的主张贯彻于实践，写了许多优秀作品，大大提高了古文的水平。

韩愈的古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传奇，皆所擅长，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其论说文立论鲜明，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富于说服力，名著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均以发扬儒道为根本，虽有封建说教，但能针砭时弊，其中有些见解，至今仍可借鉴。其记叙文爱憎分明，抒情性强，有的人物性格，跃然纸上，有的绘声绘色，可泣可歌，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或叙或议，笔锋均带感情，对所写人物满腔同情，对社会黑暗亦多有揭露，充满愤世嫉俗的批判精神。总之韩愈的古文雄奇奔放，流畅明快，如长江大河，浩瀚千里。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善于锤炼词句，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他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保存在

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如"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杂乱无章"、"落井下石"等。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公认的领袖。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地位仅次于韩愈。他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反对片面追求词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造的首要条件，写出的作品在社会上应起"褒贬"和"讽喻"的作用，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他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写出大量的名篇，在这方面取得了与韩愈相当的成就。他的理论和实践同样是古文运动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柳文说理透辟，雄深雅健，寓意幽微，山水游记尤为出色。他的山水游记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所写山水景物生动逼真，细致精彩，呈现出如他自己所说的"清莹秀澈"、"锵鸣金石"之美，代表作有《永州八记》。他的寓言讽刺小品如《三戒》、《蝜蝂传》等简洁警策，含意深远，鞭笞世态人情，深刻辛辣，耐人寻味。他的传记散文多取材于社会下层，往往通过下层人物的描写，反映中唐时代人民的悲惨生活，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名篇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及《捕蛇者说》等。

在唐德宗贞元时期（785—805），由于韩愈的努力倡导，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众多。而李翱、皇甫湜等皆为著名的韩愈的追随者、拥护者。至唐宪宗元和时期（806—820），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写作蔚然极盛，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提出的"文以载道"对后世影响深远，这个

观点，实质是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这里所说的“道”，固然是指儒家之道，但通过韩、柳的创作表明，他们主张的“传道”、“明道”并不排斥对社会现实的评议、批判和揭露。正因为如此，“文以载道”的主张为后世文人普遍接受。古文运动提倡的散体文同样影响深远。它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恢复了古代散文的历史地位，并扩大了它的实用范围，从著书立说扩大到抒情、写景、纪游等。北宋以欧阳修为首的文学改革运动，按其主张实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并涌现出更多的优秀古文作家，形成了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新的古文传统。它具有题材更广、与现实生活联系更密切、文学性更强等特点。新的古文传统形成后，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才被语体文所代替。

注 释

①《隋书》卷六六《李谔传》。

隋唐五代

传奇小说的影响

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

唐人小说之称为“传奇”，是由于晚唐时期出现大批小说专集，如牛僧儒《玄怪录》、薛用弱《集异记》、裴鉶《传奇》等，宋以后人遂以“传奇”概称唐人小说。

传奇小说的盛行，主要是三方面的因素促成的，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首都长安，人口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扬州、成都、洛阳、广州也是闻名全国的大城市。城市聚集着贵族官僚、商人、手工业者和各行各业的市民，知识分子也在城市谋取官职。人们社会生活的范围扩大了，社会生活的内容也更复杂了。封建文人的见闻也丰富了，他们不满足只用散文诗歌去表现自己的思想生活，希望扩大题材，创造出反映更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的文学体裁，这就促进了小说的创作。其次，唐代的

古文运动，结束了骈文的长期统治，提高了散文技巧，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较强的新散文体，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再次唐代士人应科举考试，求进上第，带着自己诗赋的选本，写成一卷投献达官贵人称为行卷，过几天再投献新卷，称为温卷，提醒达官贵人，免被遗忘。如果得到达官贵人赏识，替士人向主试官宣扬推荐，及第的可能性就增大，第二次投卷，为引起达官贵人的兴趣，往往取材新奇篇幅不大使达官贵人容易看完，这就是短篇小说。如牛僧儒喜看志怪小说，士人迎合其所好，投献行卷多取鬼怪事，编起来成《玄怪录》一书。因为小说"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随着中晚唐投卷风气的盛行，也促进了传奇的发展。

唐代传奇小说现存数量不少，其中流传较广的有几十篇。按其历史发展情况，可分三个时期：

一、初盛唐时期：是传奇小说初步发展时期。作品数量很少，内容未全脱六朝志怪小说的窠臼，艺术上也不够成熟，但已注意到形象的描绘与结构的完整。作品有《古镜记》、《补江白猿传》、《游仙窟》等。

二、中唐时期：是传奇小说的黄金时代。作品空前增多，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占据了主要地位，即使谈神说怪，也往往具有社会现实内容，艺术技巧方面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流传较广的作品有《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莺莺传》、《高力士传》、《安禄山事迹》、《长恨歌传》、《李娃传》、《东城老父传》等。

谈神说怪的如《枕中记》、《南柯太守传》。《枕中记》写卢生在邯郸逆旅中，借道士吕翁的青瓷枕入睡，梦中经历了他热

烈追求的飞黄腾达"出将入相"的一生，醒来时主人在他入睡前正煮的黄粱饭还没有煮熟，于是他大彻大悟，万念俱息。《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醉后入梦，被槐安国招为驸马，出任南柯太守，深受百姓爱戴。后因与檀罗国交战失败，公主又随之谢世；于是遭到排挤，终被国王遣送出郭。淳于棼醒后寻踪发掘，始知所谓槐安、檀罗两国，原来是两个蚁穴。他深感人生虚幻，乃栖心道门，不问世事。两篇都曲折地反映了封建士子热衷功名富贵的思想，也揭露了封建官场互相倾轧的丑态，但宣扬了人生如梦的主题。《南柯》一篇穿插颇多而结构严整，情节丰富而脉络清晰。结尾尤为成功。

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如《任氏传》、《柳毅传》、《霍小玉传》、《李娃传》、《莺莺传》等，在唐代传奇小说中成就最高。它们大都歌颂坚贞不渝的爱情，谴责封建婚姻和门阀制度对妇女的迫害，创造了一系列优美的妇女形象。它们以"郎才女貌"对抗"门当户对"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如《李娃传》写妓女李娃与荥阳公之子某生的爱情故事。李娃感情真挚，当某生资财用尽，她虽顺从鸨母的意旨，被迫抛弃某生；但当她看到某生被其父打得半死，在风雪中饥寒交迫的惨状时，就与鸨母斗争，挽救了某生。当某生高第得官，李娃有感于封建门阀的压力，为不影响某生仕途，忍痛割爱，悄然欲去；而荥阳公却立刻认儿认媳，前倨后恭。一个流落风尘的女子品格高尚；一个道貌岸然的"老爷"虚伪狠毒。通过某生与李娃的结合，告诉人们，门当户对的门阀婚姻原则是可以突破的，它具有强烈的反对门阀制度的意义。而妓女可以封为"汧国夫人"的设想，也相当大胆。这篇小说艺术表现很有特色，人物有血有肉，情节波澜起伏，文笔清丽圆转，描写淋漓尽致。

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传》、《安禄山事迹》、《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等，成就不是很高。

三、晚唐时期：如前所述出现了大批传奇专集，这些专集虽有可喜之作，但总观之倾向于搜奇猎异，言神志怪，六朝遗风复炽，现实主义内容受到削弱。当时藩镇割据，互相斗争，往往蓄养刺客，于是描写剑侠这类新题材的作品便应运而生。晚唐传奇作品虽为数不少，但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成就，都远逊于中唐时期那些名著。

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是我国古典小说史上一大飞跃。它把小说从记述神怪的狭小天地，引向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矛盾，歌颂伟大理想的广阔道路。它揭开了我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序幕，反映了城市社会生活的繁荣复杂，把反对封建门阀制度和礼教压迫当作自己的基本主题。唐代传奇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大多结构严整，体制简短而有长篇小说的规模；语言简洁、准确、丰富、优美；情节惊奇，想象大胆；人物塑造比较全面地采用了史传文学的手法，把一个人前后完整的一段生活，甚至一生的经历都描绘下来，形象地揭露社会矛盾，表现出人物的微妙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特征。这些都说明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逐渐趋于成熟。从此，小说正式形成了自己的规模和特点，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唐代传奇小说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它不仅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开创了道路，并为后世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霍小玉、李娃、红拂等的生动形象，和她们反封建势力的压制，坚持爱情自由理想的反抗精神，则成为后世小说戏曲中反复歌颂的主题。在宋元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秀秀和“三言”中的杜

十娘、花魁娘子等人物的背后可以看到李娃、霍小玉的影子。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大量描写人神鬼狐间的爱情故事，在思想内容和题材手法上显系受《任氏传》、《柳毅传》的影响。唐代传奇小说，成为后世小说戏曲取材的重要来源。元朝王实甫的《西厢记》，渊源于元稹的《莺莺传》，高文秀的《郑元和风雪打瓦罐》和明朝的《绣襦记》，都取材于《李娃传》。清朝洪升的《长生殿》取材于唐人的《长恨歌传》。

当然唐传奇中没有深刻反映民间疾苦和阶级斗争的作品，也没有一个劳动人民的形象。赶不上唐诗和后来的小说。

隋唐五代

敦煌艺术的形成

甘肃省敦煌县东南鸣沙山的断崖上，有很多石窟。这是从两晋南北朝经隋、唐、五代、宋、元前后一千多年中陆续凿成的。这就是莫高窟，共有一千多个洞窟，也叫千佛洞。现在还保存了 492 个，其中 60% 以上是隋唐时候开凿的。隋窟 95 个，唐窟 213 个，足见唐代是敦煌艺术的极盛时期。

敦煌艺术的产生，一是由于自汉代以来敦煌成了东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热闹的国际都市。西汉末年，印度的佛教就是通过这里传入中国内地的。二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用以麻醉和欺骗人民。战争带来的灾祸，也给佛教的传播准备了条件，当时人们希望从宗教里得到一些安慰。因而佛教得以广泛传播，凿石窟、雕佛像、绘壁画等佛教活动盛行起来。于是产生了敦煌艺术。这不但是中国艺术史上也是世界艺术史上的大事。

关于莫高窟开凿的年代，有人说自西晋开始，比较多的人认为是在前秦。根据唐《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莫高窟记》和 156 窟的题壁载，大致是：符秦建元二年（366），乐僔和尚西

游至敦煌城东南的三危山下，时近黄昏，忽见三危山放射出万道金光，仿佛有千佛之状。他认为这是圣地，就募人在三危山对面鸣沙山上开凿石窟。其实乐僔看到的金光，只是落日的余辉照到山顶红色岩石上的返射。从乐僔开始，陆续开凿，到隋唐时期达到高潮。

莫高窟凿窟的崖壁，是冲积岩，质地松软，虽可凿窟，却不能用来雕刻。所以，在莫高窟看不到像云岗、龙门那样的大石雕刻。这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使敦煌艺术向泥塑和壁画发展，这就给我们留下这一份丰富多彩的艺术宝藏。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素朴的浮雕、圆雕，不会这样绚丽多彩了。

莫高窟的塑像据初步统计有 2415 身，其中唐塑就有 670 身，另外还有数以万计的小千佛（多用影塑或浮雕）。这些塑像，有的秀骨清风，有的肌肉丰满，有的体态玲珑，有的气魄雄伟，有的色彩朴素，有的色彩华丽，显示出各个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是一个大雕塑馆，一部生动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唐窟出现了前代不见的高大塑像。如武则天延载二年（695）的北大像高 33 米，玄宗开元年间（713—714）的南大像高 26 米，代宗大历十一年（776）的涅槃像长 17 米。唐塑有很大进步，头和身子的比例适当，菩萨像有高高的发髻，圆圆的面庞，风度优美，薄薄的贴身的衣服起着微波似的衣褶，在沉思，在微笑，眼睛和嘴角是那样的传神，俨然是唐代美丽的中年妇女的形象。艺术家们不是在颂扬神，而是在歌颂人类女性的善良、美丽、智慧和尊严。天王像更表现了男性的健美。或是全身盔甲，或是半露上身，用肌肉的紧张和暴露的青筋表示出勇猛、坚毅的性格，显示出唐代武士跃马横戈的神情。“人们的愿望是怎样的，他们的神像便是怎样的”，由于对

人的尊敬，对生命的歌颂，才创造出这样动人心弦的卓绝作品。

莫高窟四壁45000多平方米光彩夺目的壁画，各个时期有着不同的风格。北魏的色彩沉着，用笔豪放。隋代的线条流利，用色柔和。唐代的构图宏伟，色彩富丽。内容主要是描绘佛教故事，如：经变，就是佛经的变相，也就是佛经的图画；本生故事，本生指释迦的前生，印度佛教徒相信轮回，认为释迦在降生前就经历了许多世，便把许多民间的寓言和传说穿凿附会编成本生经，其中好的主角就是佛的前身。另外有供养人像，就是那些出钱修窟的人，把自己的像画在壁上，表示这窟内的佛菩萨是他们所供养的。他们是现实世界的人，穿着当时的服饰。这些供养人像，是一个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阶层和不同民族的服饰展览会，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珍贵的历史资料。即使是佛教故事，因为艺术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人们无法离开自己的生活方式、经验等等，去设想天堂和地狱，所以它还是复杂而曲折的反映了现实生活。我们可以从壁画中看到，有统治阶级残酷镇压人民，把他们剜去两眼的血淋淋的场面，有农民辛勤劳动耕种、收割、打场的场面，有泥瓦匠正在修建楼阁亭台的劳动场面，有画师们在洞窟里借着微弱灯光，一笔一笔地绘制壁画的场面，有贵族官僚观看精彩的歌舞伎乐的场面。敦煌艺术所以永远保有清新的力量，主要是在于它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给我们用图画留下这一千多年的社会生活面貌，敞开了无数扇历史的窗子。也看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卓越才能。

莫高窟里还保存有大量古书、古画、户籍、契约、小说、词曲以及丝织品等珍贵文物，写本就有两万件以上，刊印本约

占百分之一二。这些文物大约是在北宋中叶西夏占据敦煌前，和尚们逃难时藏进一个洞窟的复室里的。外面用泥壁封好，并绘上壁画，直到1900年才被人发现。后来英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骗走24箱写本和五箱绘画、织绣品。法帝国主义分子伯希和盗购经过精选的文书经卷6000余卷，还有不少画卷。美帝国主义分子华尔纳，更以特制的化学胶布揭走无比精美的唐代壁画26方，搬走几尊最优美的唐代塑像。由于人民的反抗，才使莫高窟的雕塑壁画和部分藏经保存下来。

解放后莫高窟回到人民的怀抱，洞窟得到修缮，文物和艺术品的研究工作开展起来，这个艺术宝库才得以大放光彩。

隋唐五代

佛教的发展与禁佛毁寺

隋唐时期，佛教有了更大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由于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佛教影响扩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维护封建制度、麻痹人民反抗意志的得力工具。

玄奘说："正法隆替，随君上所抑扬。"①说明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财政援助。佛教宣扬灵魂不灭、生死轮回、因果报应、布施得福等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做奴隶。净土宗说："富贵贫穷由宿造。"穷人贫贱受苦，是前世不肯为善的报应；富人锦衣玉食，乃是过去"慈孝"、"修善"、"积德"的结果。以此来解释阶级的不平等和贫富悬殊的原因，麻痹劳动人民的反抗意志。同时又编造十八层地狱的极苦吓唬人，说地狱黑壁千重，铁城四面，刀山剑树，烈焰冲天；下地狱者，死去活来，惨痛难言。并宣传西方净土的安乐，说那里"地是黄金山是玉"，是解除人生一切苦难，享受永世极乐的地方。每个人只要诚意信佛，不厌其烦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能"罪病消除，福命长远"，临死时，阿弥陀佛就会在香花和仙乐中将其迎往"净土"。这些说

教的目的都是为了掩饰社会上尖锐的阶级矛盾，诱骗劳动人民甘当统治者的顺民，把人生的希望寄托在佛的恩赐上。当时一个深懂佛教作用的官吏，在为唐宣宗重兴佛教大造舆论时说，有些人反佛，是只看到它雕饰彩绘的小费，却不明白其扶世助化的大益。他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②他说出了佛教的本质和隋唐统治者扶植它的居心。佛教又说布施可消除全部宿债，可得福报，成佛。犯过滔天大罪的人，如果"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使统治阶级感到，从剥削所得，拿出一点来修功德，不仅今后可以恣意作恶，还可保证来世的荣华富贵。正因为如此，佛教得到隋唐统治者的大力扶植而进入鼎盛时期。

北周武帝毁佛时期，佛教严重受挫。隋朝建立后，隋文帝为巩固统治，积极实行崇佛政策，以振兴佛教为己任。为了神化自己的权力，他利用曾抚养过他的尼智仙编造出所谓"儿当大贵，从东国来，佛法当灭，由儿兴之"的预言，宣称他当皇帝是"蒙三宝福祐"。他三次下令修建舍利塔，征召北周毁佛时潜藏的僧徒，准许修复废毁的寺庙，重新雕撰废像遗经，明令"境内之民，任听出家"③。隋政府赞助翻译新的佛经，恢复佛教义学的研究。隋炀帝继续奉行崇佛政策，以国家的力量支持僧徒续修旧经，翻译新经，立寺度僧，行道造像。佛教势力迅速增长。在隋代三十多年间，全国度僧236200名，建寺3985所，造像20余万躯，建塔100余座，译经82部，当时"民间佛经多于（儒家）六经数十百倍"④。为佛教在唐代的极盛奠定了基础。

唐朝统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尊道、崇儒、礼佛的政策，利用

其矛盾，调和其纠葛，倡导所谓三教归一，即要他们都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只是出于各时期不同政治斗争的需要，有时更多尊道，有时更多崇佛。唐朝建立时，李渊曾舍宅建寺，写经造像，并按佛教说法，每年规定一定时间禁止行刑屠钓。全国统一后，为恢复经济，招抚流亡，曾一度下令限制佛教，但未认真执行。唐太宗在尊道的同时，也更多地利用佛教。他在战争中杀死许多人，亲手斩杀的就有一千左右，于是在过去作战的战场上，大修寺刹、伽蓝，说是给死者超度，使他们走向菩提之道。在打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在镇压窦建德的汜水立等慈寺，在镇压刘黑闼的洺州立昭福寺，表示愿死者脱离苦海，得到甘露，借以收揽人心。他支持建寺度僧、译写佛经。贞观十九年（645）玄奘回国后，唐太宗不仅资助他译经，还为他撰写《大唐三藏圣教序》，经常召他入宫谈论，优礼备至。这都促进了佛教的发展。李渊父子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规定在朝觐的排班次序中道士在僧尼之前。他们还是尊道抑佛先道后佛的。武德七年（624），太史令傅奕上疏主张明令禁佛，他认为佛教僧徒"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并指出："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而愚僧矫诈，皆云由佛。"⑤佛徒法琳作破邪论、辩证论狂骂傅奕。唐太宗敕法琳说，你著辩正论在信毁交报篇里说，有念观音者，刀不能伤。现在给你七天去念观音，到期试刀，看是否不伤。七日期满，问他刑期已到，你念观音有灵否？法琳苦思救命之计，答道，七日以来，我不念观音，只念陛下。问何故？说陛下功德巍巍，照佛经说，陛下就是观音，所以只念陛下，法琳以谄谀奉迎免死，流放远州僧寺，病死途中。唐太宗一面压制反对先

道后佛的僧徒，一面又向僧徒私下表白说：佛老尊卑，不以谁暂时在上为胜，我修佛寺比立道观早，你们应该理解我的用心。这充分表明当时统治者对佛教的态度。

唐代第一个崇佛高潮出现在武则天时期，武后载初元年（690）七月，僧法明等进献所撰《大云经》四卷，中有太后乃是西天弥勒佛下世，应取代唐朝为天下主，这正迎合了武则天图谋称帝的欲望，她即命长安、洛阳及诸州立大云寺，各藏《大云经》一部，置高座宣讲。据考古资料，远在帕米尔的碎叶镇和海南岛，当时也设置了大云寺。武则天耗巨资在洛阳龙门雕大佛像高十多米，用以崇佛。出于巩固武周政权的政治需要，武则天于证圣元年（695），从于阗请来名僧实叉难陀，重译《华严经》，并亲自过问译务，撰写序文，强调自己当女皇符合天意，向朝臣宣讲。僧徒法藏奉命在佛授记寺讲解新译《华严经》。为反李唐皇室和鼓励为她效劳的僧徒，武则天诏令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徒处道徒之前。“铸浮屠，立庙塔，役无虚岁”。在武则天的尊崇下，影响深远的禅宗，道门兴旺。因法藏得到武则天的宠幸，华严宗形成一大宗派。在武则天的资助下，曾赴天竺求法的义净，从事译经，弘扬佛法。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佛教臻于鼎盛，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

唐代第二个崇佛高潮出现在肃宗、代宗时期，那时正值安史之乱，躲在灵武的唐肃宗祈求佛保佑朝廷，请密宗僧人不空率百名和尚住进宫中，晨昏念经，为朝廷祈福。郭子仪等力战并请回纥援兵收复长安，肃宗却归功于不空诵经。代宗时一遇朝廷同回纥、吐蕃有战事，代宗就请僧众在宫里诵经。战争结束，即认为僧众退敌有功，益加宠信。安史之乱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加深，统治者既需佛教寄托自己空虚的灵魂，更需佛教

帮助消除蓬勃发展的人民反抗斗争。他们广建佛寺，大度僧尼，把大量财物馈赠寺庙，将许多官爵封赠僧徒，以政府的力量维持寺产，支持佛教的各种活动。元和十四年（819），宪宗遣中使率僧众自凤翔法门寺迎佛骨至京师，“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然香臂顶供养者”⑥。掀起了崇佛狂热，充分表现了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

在统治者的大力推崇扶植下，隋唐时期佛教获得巨大的发展。一批又一批虔诚的僧徒，为了解决佛学上悬而未决的重大课题，不顾艰难险阻，从陆、海两路前往天竺，仅唐初半个多世纪里，就有数十人。他们携回大批梵本佛经、佛像和舍利，撰写了《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等著作，对中西文化的沟通起了很大作用。同时涌现出玄奘、义净、实叉难陀、菩提流志、金刚智、不空和般若等著名翻译家，有了完备的译场制度，译经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越了前代。佛学家们开始用儒家注经的方式，撰述了浩如烟海的解释佛经的疏论，编纂了工具书，开创了翻译和研究佛经的新纪元。

南北朝的佛教理论研究者已发现佛教许多流派的思想分歧，有些讲经法师只讲自己熟悉的经典，对于和自己学派不同观点的其他经典，一般是存而不论。他们讲经的寺院并不固定，不注意传法世系的继承关系。隋唐时代佛教适应封建政治经济关系进一步演变，有些学派不仅有自己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规范制度，而且在寺院经济中有自己的寺产所有权和宗内继承权，他们摹仿世俗封建地主阶级的封建宗法制度，建立了世代相传的僧侣世袭制度。每宗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传法世系，开始形成中国佛教宗派。天台宗成立于陈、隋之际，创始

人智颛（531—597），以在浙江天台山建基地而得名，因崇奉《法华经》，故又称法华宗。这一派着重宣传一切“皆由心生”，世界本体是空无的，故又被称为空宗。流行于今浙江及湖北一带。法相唯识宗创立于唐太宗、高宗时期，创始人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窥基（631—682）。以它的学说的内容为宗派名称。这种学说以论证“万法（事物）唯识（心识，精神本体）”、“心外无法”为宗旨，认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但那不过是由“识”幻现出的影相。教义烦琐，不易被一般人接受。流行于长安、洛阳一带，只在唐初兴盛了几十年便消沉下去。华严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法藏（643—712），因以《华严经》为主要经典，故名。主要是论证所谓“尘是心缘（辅助条件），心为尘因（主要条件）。因缘和合，幻相方生”。认为客观物质世界由主观精神（心）产生，是“幻相”。又提出“理事无碍”说，即“事”（物质）是“理”（精神）的体现，而“理”又体现在“事”中，两者互相融通，互不妨碍，但“理”却是第一性的。流行于长安及今山西五台山一带。禅宗创立于武则天统治时期，实际创始人是慧能（638—713），以它独特的修养方法、思想方法而得名。“禅”是梵语音译“禅那”的简写，意为静虑。静坐沉思，称为“坐禅”或“禅定”，是佛教修养的重要途径之一。相传“禅宗”是由南印度僧人达摩在北魏时创立的。五祖弘忍有两大弟子，一为神秀，一为慧能，神秀创立北宗，慧能创立南宗。南北二宗各有四句偈归纳它们的主张。神秀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意即通过长期苦修，排除杂念，然后才能成佛。这是渐悟。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慧能反

对神秀的渐悟说，认为佛在心内，不在心外，只要净心自悟，不必苦修，不必背诵大批经卷即可成佛。这是顿悟。渐悟是客观唯心论，顿悟是主观唯心论。慧能这种简单速成的方法，对陷于水深火热中而看不到出路的劳动人民深具欺骗性；这种廉价进入天堂的方法，既可使地主官僚们的空虚灵魂得到寄托，又可帮他们消除人民的斗志，自然也受到他们的欢迎。因此南宗终于战胜了北宗，得到广泛流传。禅宗开始流行于今广东、两湖一带，唐末、五代时期遍及全国，几乎取代了佛教各宗派，垄断了佛坛。

佛教的流行，造成寺院经济和僧侣地位的恶性膨胀。隋唐时期几乎历代皇帝都赐予著名僧徒和寺院许多土地、寺户和各种财物。如隋文帝曾给少林寺地 100 顷，封民户五十供宣州妙显寺“洒扫”。唐王朝给长安西明寺“田园百顷，净人百房，车五十辆，绢布二千疋”⑦。各寺院根据均田令和赋役令，可请授土地和蠲免赋役。当时达官贵人，舍宅为寺，长安的近百所壮丽寺庙，许多就是他们捐赠的邸宅。寺院还兼并土地，强夺民产，到代宗时，京畿地区的丰田美利，私宅公田多归僧徒所有。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一样进行封建剥削。寺院土地由奴婢耕种，或租给农民，灵隐山一寺，岁收租谷竟达万斛。唐末土地兼并加剧，赋役繁苛，人民相继流亡，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为寺户佃户，以避征役，许多寺院占有大批土地、劳力，剥夺了官府控制的纳税人口和财政收入，引起了世俗地主和僧侣地主在政治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正如辛替否尖锐指出的：“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

食之矣!”⑧自开元以来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限制，但朝廷的禁令不绝于上，佛教势力发展于下。武宗即位后，曾愤然指出：“穷吾天下，佛也。”佛教与唐王朝在经济利益上的尖锐冲突，终于引发了唐武宗大规模禁佛毁寺事件。在宰相李德裕和道士赵归贞的劝助下，会昌五年（845）七月颁发诏令，先毁中小寺院，敕上都（长安）、东都（洛阳）左右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留僧30人；诸州各留一寺，上寺留僧20人，中寺10人，下寺5人；其余寺庙，全部限期拆毁，僧尼一律还俗；田产没收，铜像钟磬熔铸钱币，铁像熔铸农器。分遣御史巡行天下监督禁佛毁寺法令的执行。僧徒平日作威作福，贫苦百姓十分憎恨，闻朝廷下令毁佛，纷纷涌入寺庙，御史未出潼关，各地寺庙已拆毁一光。八月宣告中外，凡毁大寺院4600余所，中小寺院4万所，勒令260500僧尼还俗，150000奴婢改充两税户，没收良田数千万亩。继又颁布诏令东都只留僧20人，诸州留20人者减其半，留10人者减3人，留5人者改不留，史称“会昌废佛”。这次禁佛，给佛教势力以沉重打击。但也遇到阻力，藩镇割据的河北地区，朝廷政令久已不行，对毁佛公然抗拒。尤其是武宗死后，宣宗一登皇位，立即复兴佛教，佛教势力逐渐复苏过来。

注　释

①《大正藏》卷五二《集古今佛道论衡》。

②《全唐文》卷七八八，李节《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

③《资治通鉴》卷一七五，陈宣帝太建十三年。

④《隋书》卷三五《经籍志》。

⑤《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

⑥《资治通鉴》卷二四O，唐宪宗元和十四年。

⑦《文苑英华》卷八五五苏颋《唐长安西明寺塔》。

⑧《旧唐书》卷一O一《辛替否传》。

隋唐五代

花间派和李煜的词

唐人歌唱多用五七言绝句，唱时加上和声。唐歌曲中的和声，有和于句中与句尾者，如《竹枝》即以“竹枝”两字和于句中，以“女儿”两字和于句尾。由于音乐的发展和需要，整齐的五、七言诗谱入曲调中已经不合要求，于是根据和声辞的长短，就长短声填长短句，使合曲拍，这就自然形成一种可以配合曲调歌唱的新诗体，这就是词。

词产生于初盛唐，它本来自民间。根据敦煌发现的文卷编成的《敦煌曲子词》说明早在唐中叶以前已经出现的民间词，歌咏的内容比较丰富，有涉及农民起义的，有歌咏反抗少数民族统治者压迫的斗争的，有感伤边塞征战之苦的，有专咏疾病医疗的，有感慨赴考落第的，有自慨贫病不能还乡的，有咏夫妇离别的，也有不少谈情说爱的。其中有不少好词。有一首已失词调残缺不全的词：

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

写幼年新兵初上战场时的心情，写得很动人。《敦煌曲子词》文字通俗，情意真切，显然是民间流行的唱辞，说明在文士作词以前，民间已有大量好词在歌唱。

中唐前后，由于民间词的广泛流传，一部分比较接近人民的诗人开始了词的创作。张志和是较早的作家，他的《渔歌子》：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描绘水乡风光，在理想化的渔人生活中，寄托了爱自然爱自由的情趣。白居易、刘禹锡是中唐时期写词较多的作家。白居易的《忆江南》：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通过自然景物的烘托，袒露了诗人的襟怀，已经离开了民间歌词的情调。

晚唐温庭筠写词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长期出入歌楼妓馆，由于他精通音律，熟悉词调，在词创作的艺术成就上在晚唐其他词人之上。温词现传60多首，多数是描写妇女的容貌、服饰和情态的。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

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也有描写闺情的，如《望江南》：

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苹洲。

前一首写妇女服饰之华贵，容貌之艳丽，体态之娇弱，适于宫妓歌唱以点缀没落王朝醉生梦死的生活（相传是温庭筠代宰相令狐绹写给唐宣宗的）。后一首表现妇女的离愁别恨相当动人，曾赢得一些不幸妇女和怀才不遇的文人的爱好。温庭筠善于选择富有特征的景物构成艺术境界，表现人物的情思。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不仅衬托出人物的如花美貌，也暗示她的如花薄命。又如“斜晖脉脉水悠悠”，也暗示行人的悠悠不返与闺中人的脉脉多情。他在词艺术方面的探索，有助于词的艺术特征的形成，推动了词的发展。但温词题材偏于闺情，表现伤于柔弱，词句过于雕琢，也带来消极影响。它上承南朝宫体的诗风，下奠花间词派的基础，花间词派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形成的。

唐末战乱，士人多逃往成都，投靠王建。西蜀依恃山川的险固，受战祸较小，割据军阀、官僚地主，弦歌宴饮，昼夜不休。这些文士继续做词寻乐，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词人。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十卷，选录了温庭筠等十八家的词500首。其中主要作者有韦庄、皇甫松、薛昭蕴、牛峤、毛文锡、朱希济、欧阳炯、顾夐、鹿虔扆、和凝、孙光宪等。其中除温庭

筠、皇甫松、孙光宪外，都是集中在西蜀的文人。他们在词风上大体一致，后世因称为花间词人。花间词人奉温庭筠为鼻祖，绝大多数作品堆砌华艳的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体态，题材比温词更狭窄，内容更空虚。在艺术上缺乏意境的创造，只是片面发展温词雕琢字句的一面。所以陆游《花间集跋》说："斯时天下岌岌，士大夫乃流宕至此。"一针见血地批评了他们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

花间词人中与温庭筠齐名的韦庄，作品稍有内容，风格也较温词清新明朗。如《思帝乡》：

> 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写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追逐爱情幸福，比其他花间词中的妇女形象生动得多。又如《女冠子》二首：

>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不知魂已断，空有梦相随。除却天边月，没人知。
>
>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

前词写闺中人陈诉离别之情，后词写行人叙述梦中相见，在构思布局上别具匠心。且语言生动，与专事雕琢词句者不同。韦词上承白居易、刘禹锡，下启冯延巳、李煜，可说是花间词中

的别调。另外，牛希济《生查子》中的：

春山烟欲收，天澹星低小。残月脸边明，别泪临清晓。

语已多，情未了，回首犹重道——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

颇有南朝乐府民歌情味；李珣《南乡子》中的：

乘彩舫，过莲塘，棹歌惊起睡鸳鸯。带香游女偎伴笑；争窈窕，竞折团荷遮晚照。

把南国水乡风光和劳动妇女的形象带到词里来，颇为清新开朗。然而他们的成就在后来崇拜花间派的词家中反未得到继承。

五代时期另一个词的中心产地是南唐国。几个跟花间词人同时而稍晚的词家，集中在南唐的首都金陵。金陵、扬州原为长江下游最繁盛的都市，这时经济又继续有所发展，中原人士不少到此避乱，南唐国君又爱好文学，于是出现了南唐词。南唐词的生活基础与花间词并无两样，然而南唐中主李璟后期就面临周、宋威胁，面临亡国危机，这些没落小王朝的君臣，即使还强欢作乐，也不能不流露他们绝望的心情，这就决定了南唐词的感伤基调，在这一点上与西蜀词稍有不同。

南唐词重要作家有冯延巳、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冯延巳曾官至中主朝宰相，留词一百多首。最能代表他的成就的有《鹊踏枝》十几首，如：

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

这些词逐渐摆脱了描绘妇女的容貌服饰，而着力抒写人物内心的哀愁。在缠绵悱恻的“闲情”、“春愁”中，流露出对南唐没落王朝的关心和忧伤。语言也比较清新流转。冯词把温庭筠以来的婉约词风推进了一步。

南唐中主李璟，前期还能扩展国土，使南唐成为南方大国，后期只能对周奉表称臣。留词四首，如《摊破浣溪沙》：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

内容虽还是离愁别恨，但境界更阔大，感慨也更深沉了。李璟曾问冯延巳：“‘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冯词《谒金门》的开头两句）’，干卿底事？”冯回答说：“未若陛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即引此词。

李煜，世称李后主，他工书，善画，洞晓音律，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能。他即位时，宋已建立，南唐形势岌岌可危。他对宋委曲求全，过了十几年苟且偷安的生活，纵情声色，侈陈游宴。公元 975 年宋兵破金陵，他出降，被俘到汴京，度过两年囚徒生活，于 978 年被宋太宗派人毒杀。

李煜前期有些词写他对宫廷豪华生活的迷恋，当南唐王朝进一步走向没落时，他还得意洋洋地写他的酣歌狂舞生活，这是十足的亡国之音。如《浣溪沙》：

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红锦地衣随步绉。佳人舞点金钗溜，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

随着南唐内外危机的深化，李煜逐渐感觉到他无法摆脱的没落命运，因而在部分词里流露出沉重的哀愁。如《清平乐》：

别来春半，触目柔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虽属描写离愁别恨的传统题材，但从“拂了一身还满”的落花和“更行更远还生”的春草里，反映出他心情的沉重。

南唐的亡国，他由小皇帝降为囚徒的巨大变化，使他后期的词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也获得了一些新的成就。面对亡国之君的残酷现实，在词里倾泻他“日夕以眼泪洗面”的深哀巨痛，读起来哀婉感人。如：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许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词里的“故国”、“江山”、“往事”实际只是小皇帝的生活，这种生活的必然没落，他本身又不可能看到更好的前途，就只能沉没在一江春水似的长愁中。这些词曾经感动过不少失去自己美好生活的人们，但不能给人看到自己的前途而为之奋斗的力量，这是以感伤为基调的诗词与格调悲壮诗词的明显区别。

李煜在我国词史上的地位，更多地决定于他的艺术成就。他改变了晚唐五代以来词人通过一个妇女的不幸遭遇，流露或曲折表达自己心情的手法，而直接倾泻自己的深哀剧痛，使词成为诗人们可以多方面言怀述志的新诗体，在艺术手法上给后来豪放派词家以影响。另外他善于用白描的手法抒写生活感受，如“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构成了画笔达不到的意境。他还善于用贴切的比喻如“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将抽象的感情形象化。语言明净、优美，摆脱了花间词人雕琢字句的作风。

隋唐五代

伊、祆、摩、景教的传入

隋唐时期，由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发达，许多西方宗教在这时传入中国。

伊斯兰教是阿拉伯麦加人穆罕默德于7世纪初创立的。伊斯兰（Islān），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以犹太教、基督教之一神为基础，以祈祷、清洁、斋戒、布施等为功德，尊奉安拉为唯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服从安拉的意志。《古兰经》就是安拉对穆罕默德的默示。传教三年，得信徒四十人。深为富商权贵所忌，有遭捕杀的危险，乃于公元622年逃到麦加东北的麦地那，穆斯林（伊斯兰教信徒）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历纪元的开始。穆罕默德在麦地那传教，信徒日益众多，当地人民更委以行政立法权，于是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宗教公社。630年穆罕默德占领麦加，632年完成了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历史使命。他的继承人哈里发用武力向外推行伊斯兰教，并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伊斯兰阿拉伯大帝国。它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君主政体。唐永徽二年八月四日（公元651年8

月25日）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噉密莫末腻”）派使者来到长安，朝见唐高宗。这是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第一次正式交往。但民间来往可能较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食商人，居唐奉伊斯兰教，他们来华主要从事贸易，不是传教，因而伊斯兰教不在中国居民中传布。故唐代中国的伊斯兰教只存在于大食商人聚居地区，如长安、广州、扬州等地。他们集中居住的“蕃坊”内建立清真寺，作为礼拜之处，伊斯兰教就这样传入中国。7世纪中叶，大食占领了波斯，到8世纪中叶，进而控制了原来服属唐朝的康国、石国。唐天宝十载（751）唐朝将领高仙芝与大食军战于怛逻斯（前苏联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大败，伊斯兰教势力的前锋达到中国的西域。唐军中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于是中国的丝织、画法、金银制作等技术特别是造纸法由此而传入欧洲。这次被俘后才回国的杜环撰《经行记》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的对伊斯兰教情况的记载。安史之乱时唐朝也用大食兵以收复两都，这些伊斯兰教士兵，不少就落籍中国。大食商人陆路来华因吐蕃西进而被阻，唐后期多改循海路来华，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是主要口岸，因而这些地方伊斯兰教徒也最多，黄巢起义军入广州，遇害的大食人和波斯人数以万计。

祆教原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是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在公元前六世纪创立的。教义备载于《波斯古经》（Avesta），谓世界上有光明与黑暗两神互相斗争着，二者为善与恶之源，人宜弃恶从善，应崇拜光明。故敬拜火光及日月星辰。中国古代以其拜火及天，而关中谓天为祆，故称之为火祆，简称为祆教，俗称拜火教。三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此教为国教，遂盛于中亚。中国南朝梁时及北朝元魏时始知其教。《魏书·西域传》：

“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神龟（魏孝明帝年号 518—519）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云。”《梁书·诸夷传》亦谓滑国（都拔底延，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事天神、火神。滑国邻接波斯，故渐染其俗。祆教东传，先经今新疆南部，由波斯商贾传来。《北史·西域传》谓焉耆、高昌都俗事天神。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都有祀胡天的记载。如《魏书·灵太后传》说，灵太后“……后幸嵩高山……从者数百人，升于顶中，废诸淫祀，而胡天神不在其列”。《隋书·礼仪志》说：“后齐……后主末年，祭非其鬼，至于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邺中遂多淫祀，兹风至今不绝。”又说：“后周欲招徕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亲焉。其仪并从夷俗，淫僻不可记也。”胡天即指祆教的崇拜天神。看来北魏时传入中国的祆教，有了某些变化，如产生了对神像祈祷等现象。祆教的祭司名为萨甫、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的官名。典客署是掌管接待外国使臣及客商的机构，设这样的官职，反映当时来华胡商中有不少祆教徒。唐朝时，中亚一带康国、石国、安国、曹国、米国、史国都是祆教的信奉者，祆教也进一步传入今新疆境内的于阗、焉耆、疏勒、高昌。西域各族人来华经商的极多，祆教随之在长安、洛阳日益流行。唐代前期及中期，对各种宗教都很尊崇。高祖武德时，在长安布政坊西南隅建胡祆祠，太宗贞观时在崇化坊立祆祠。据韦述《两京新记》及宋敏求《长安志》：长安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也有祆祠。另据宋敏求《河南志》及张鷟《朝野佥载》：洛阳会节坊、立德坊、南市西坊亦有祆祠，供每岁胡商祈福。地方上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州，也有祆祠。只称祠而不称寺，因祆教主要是在华胡人信奉，唐朝禁民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政府置萨宝府，设萨宝（正

五品)、萨宝府祆正（从七品）等官以掌其祭，皆以胡人充之。祆教一度极盛，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禁毁佛寺，祆祠亦加禁毁，祆僧勒命还俗，从此一蹶不能再起。会昌以后弛禁，到宋代还有残存祆祠，南宋以后，中国典籍就不见记载了。

摩尼教是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创立的。其教义是揉合波斯原有的琐罗亚斯德教（即祆教)、印度传入的佛教和由东罗马传入的基督教而成。主要是“二宗三际论”。“二宗”意为两个本原，指光明和黑暗，即善和恶，声称摩尼为光明之代表。“三际”意为三个时期，指初际、中际和后际，即过去、现在和未来。摩尼认为，光明和黑暗原来是互相对峙着，互不侵犯，两者断然分开，这是初际的情景。但到初际末期，黑暗群魔闯进光明王国，结束了和平的初际阶段，进入激烈斗争的中际时期，自有人类直到现在，都属于中际时期。这个时期一直到世界被大火毁灭为止，这就标志进入后际时期，那时恢复到初际时的情景，光明和黑暗断然分开，黑暗将永远被囚禁。摩尼教与波斯国教（祆教）相对立，公元277年摩尼被波斯王处死，教徒多逃往中亚及印度，摩尼教却传播颇为迅速，三至六世纪已遍及中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武后延载元年（694）波斯人拂多诞持《二宗经》来朝，摩尼教传入中国①。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来献一解天文的摩尼教师（慕阇)。大抵此时摩尼教已在长安、洛阳等地传播。它传入中国后，受到佛教的排斥，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诏：“末摩尼本是邪见，妄称佛教，诳惑黎元，宜严加禁断。”只准许胡人信奉。安史之乱，回鹘兵入洛阳，毗伽可汗在洛阳遇摩尼教师传法，携睿息等四教师回国，摩尼教自唐传入回鹘，受到可汗尊崇，可汗并

自称“摩尼化身”。回鹘人以助唐有功入居中原的很多，摩尼教依仗回鹘的势力，更加推行于唐地。大历三年（768）唐朝准许回鹘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长安、洛阳而外，摩尼教也已在南方各商埠流行，大江南北都有它的寺院。清末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记载了在回鹘可汗支持下摩尼教传布的情况。此碑又称摩尼教为“明教”，后来这个称号代替了摩尼教的原名。唐武宗时回鹘破亡，会昌废佛，摩尼教也被禁止，此后多在民间秘密传布，成为农民起义领袖用以组织群众的工具。如五代后梁陈州毋乙、董乙的起义和宋代的方腊起义都利用了摩尼教。元末韩林儿、刘福通的起义，用以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就是摩尼教与佛弥勒派的结合。

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唐时传入中国后称为景教。五世纪时叙利亚人聂斯脱利（Nestorius）是东罗马君士坦丁堡主教，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在东罗马被视为异端，受到迫害。一部分追随者逃至波斯，得到波斯国王的保护，成立独立教会，成为基督教的一个支派，与摩尼教、祆教共同形成波斯当时的三大宗教，流行于中亚。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波斯景教僧侣阿罗本来长安，将此教传入中国，贞观十二年唐太宗诏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②许其传教。高宗时也加以保护，准于诸州各置景寺。初期景教寺因阿罗本从波斯来，我国人称其为波斯寺。唐天宝四载（745）玄宗下令将两京和各地的波斯寺一律改称大秦寺。可见景教寺院不仅建于长安、洛

阳，地方府州也有，肃宗时，在西北地区亦建立寺院，信奉者不仅是来华西域人，也有中国居民，并有翻译的经典。唐建中二年（781）吐火罗人伊斯出资，大秦寺僧波斯人景净撰文于长安义宁坊大秦寺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石明代出土，现存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内有“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的话，以“景”名教，可能是取其与“基督”谐音，又取其光明辉煌之义。唐武宗会昌废佛，景教同被禁，唐末至两宋，不再见于中国。元代再度传入，被称为“也里可温”。元亡后再次衰落。

注 释

①20世纪70年代以来，学界趋向于认为在拂多诞得到官方承认以前，摩尼教已在中国民间流传多时。

②《唐会要》卷四九。

隋唐五代

五代更替和十国兴亡

五代是指唐朝灭亡之后，相继占据中原地区的五个王朝，十国是指围绕在五代周围割据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个小国，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虽言五代，称帝的却有八姓，虽仅历时54年却更换了十四个皇帝（后唐三姓，后周二姓，余各一姓）。首尾两代的君主是汉族人，中间3代的君主是沙陀族人。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和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时期和其他三代皆都开封。疆土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十国中九国割据南方，仅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十国与五代并存，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之前，灭亡于五代结束之后。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更替。

后　梁

黄巢起义失败后的唐朝，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知名的割据势力不下 20 支，他们都力图扩大实力。经过不断地互相兼并，逐渐形成了几支较大的势力。在北方，主要是以汴州为据点的朱温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

朱温是黄巢起义军的叛徒，叛降唐朝并帮助唐朝镇压了起义军之后，受封为宣武节度使，据汴州。在藩镇相互兼并的战争中，他逐渐扫除了割据于今华北一带的许多武装势力。天复三年（903）又战败称霸秦陇、挟持唐昭宗的李茂贞，消灭了长期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中唐以来的强藩魏博、成德也被迫归附。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称帝，国号梁，史称后梁，是为后梁太祖，改元开平。五代时期自此开始。后梁建国后，除山西大部和河北北部外，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但与宿敌河东李克用连兵不已，境内方镇跋扈依旧，加上朱温私人生活又极为荒淫。乾化二年（912）被次子朱友珪所杀。朱友珪称帝八个月，被其弟梁末帝朱友贞起兵杀死。梁末帝与李克用之子李存勖的战争更为激烈。因连年用兵，暴征于民，激起陈州人毋乙、董乙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虽被镇压，义军首领 80 余人壮烈牺牲，但后梁统治也难以继续。同光元年（923），被后唐李存勖所灭。后梁共经三帝，历时 17 年。

后　唐

李存勖是沙陀人，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之子。李克用的父亲李国昌，本名朱邪赤心，世统沙陀部落。因助唐镇压庞勋起义，赐名李国昌。李克用又率部助唐屠杀黄巢起义军，封为河东节度使，进爵晋王，控制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朱温灭唐后，他以拥护唐朝为名，与后梁交战不休。李存勖继承晋王

位，继统河东后，攻取河北，累败后梁军，彻底消灭了中唐以来长期跋扈的河北三镇。龙德三年（923）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位，国号唐，史称后唐，是为后唐庄宗，改元同光。同年，他派兵攻占开封，灭后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不久后唐迁都洛阳，统一华北地区后，又派兵攻灭前蜀。但李存勖大修宫室，宠任伶官、宦官，朝政不修，又任用租庸使孔谦残酷掠夺人民，以至“四方饥馑，军士匮乏，有卖儿贴妇者，道路怨咨”①。于是魏州骄兵发动叛乱，在一片混乱中李存勖为部下所杀。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原名邈佶烈，此系赐姓名）继位，是为明宗。他诛杀孔谦，废除苛敛，均减田税，允许民间自铸农器。他在位八年中，战事稍息，农业生产凋敝的局面有所改观，是五代少有的小康之世。明宗死，子李从厚继位，明宗养子王从珂起兵夺取了帝位，国内陷于混乱。天福元年（936）明宗女婿石敬瑭攻入洛阳，灭掉后唐。后唐共经四帝，三姓，历时14年。

后　晋

石敬瑭沙陀人，随后唐明宗打仗，积战功屡任大镇节帅，后为太原节度使。他以太原为根据地，以最卑鄙无耻的手段勾引契丹为助，来抢夺帝位。清泰三年（936）夏，他向契丹上表称臣，并认比他小11岁的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割幽蓟十六州，愿岁输帛30万匹，换取契丹援助，开始夺取后唐政权。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于太原，国号晋，史称后晋，是为后晋高祖。继而攻入洛阳，灭后唐，迁都开封。石敬瑭死后，其侄石重贵继位，是为出帝，或称少帝。他在主战派景延广等的影响下，对契丹不再恭顺。耶律德光在降将赵延寿等协助下，进攻后晋，开运三年（946），契丹军攻下开

封，俘出帝石重贵，将其北迁，后晋灭亡。后晋共二帝，历时11年。次年耶律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辽帝占领中原以后，不给骑兵粮草，纵使四出掠取，称为“打草谷”，中原群众群起反抗，辽帝被迫引众北还。

后　汉

刘知远沙陀人，原为石敬瑭部将，后任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当后晋与契丹交战时，他广募士卒，有步骑5万，声言防备契丹，但却按兵不动。待契丹进入开封，将出帝迁往北方后，他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称帝，自言不忍改晋国号，又恶开运年号，乃用出帝原天福年号，以争取后晋旧臣归附。当辽兵北退后，他统兵南下，是年六月进入开封，诸镇多降，他改国号为汉，史称为后汉，是为后汉高祖。时中原一带，因契丹掳掠而残破不堪，公私困竭。刘知远死后，其侄隐帝刘承佑继位。隐帝不甘受制于将相，杨邠、史弘肇、王章等权臣同日被杀。隐帝又密令杀邺都留守郭威未成，郭威举兵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后汉亡。时乾祐三年（950）。后汉历二帝前后约四年。

后　周

郭威灭后汉，于广顺元年（951）正月在开封继帝位，国号周，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后周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改变中国北方的残破局面。周太祖死。养子郭荣（原姓柴太祖内侄）继位，是为周世宗。世宗在太祖改革的基础上，继续革新政治训练军队，开始进行统一战争。显德六年（959）柴荣病死，子宗训即位，是为恭帝。次年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后周共经三帝，二姓，历时十年。

十国兴亡

前蜀和后蜀　王建在唐末据西川和东川，天复三年(903)受唐封为蜀王，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蜀土富饶，但自后主王衍继位后，朝政浊乱，盛行卖官，赋敛苛重，土荒民怨。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兵攻灭前蜀。前蜀凡二主，共割据35年。庄宗任命孟知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杀董璋，取东川。长兴四年(933)后唐封他为蜀王、东西川节度使。次年孟知祥称帝，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成都。其子孟昶继位后，于契丹灭后晋之际，又得秦、成、阶、凤诸州，拥有前蜀故地。后以君臣奢纵无度，朝政腐败，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后蜀凡历二主，共割据四十年。

吴和南唐　杨行密在唐末据淮南28州，景福元年（892）唐封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他一面招合遗散，恢复地主经济，一面选练军队，战必争先。乾宁四年（897）杨行密打败朱温南下的军队，使南方各地的割据政权暂时稳定不卷入中原混战的漩涡。天复二年（902）他受唐封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扬州）。杨行密死后，诸子皆政治庸人，大权旁落于部下徐温及其养子徐知诰之手。徐知诰访求贤才，采纳规谏，清除奸猾，杜绝请托，减免赋敛，休兵息民，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顺义七年（927）杨行密子吴王杨溥称帝，加徐知诰都督中外诸军事。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吴帝杨溥，吴亡，共历四主，割据46年。徐知诰废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升元。次年改姓名李昪，改国号为唐（徐知诰本姓李，为徐温养子，冒姓徐氏。至此复姓李氏改名

昇。自言为唐室后代，故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是为南唐烈祖（前主）。李昪对外结好邻邦，对内整饬朝政，遣使巡视民田，以肥瘠为等定税和调兵派役，史称江淮之地，"频年丰稔"。升元七年（943）李昪死，其子李璟继位，是为中主。派兵攻灭闽国，占领汀、漳、建、泉等州，加新置秦、筠、剑等州，共辖35州，成为南方大国。因李璟日益骄侈，朝政浊乱，任用非人，赋役繁重，南唐国力迅速衰败。交泰元年（953）李璟献江北淮南14州，去年号，称臣于后周。李璟死，子李煜即位，是为后主（即李后主）。开宝八年（975），宋兵渡江，攻破金陵，后主李煜被俘，南唐亡。凡历三主，共39年。

吴　越　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又吞并浙东，占有两浙、苏南十三州之地。唐昭宗任他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开平元年（907）后梁封他为吴越王，都于杭州。吴越国土狭小，北邻大国吴及后来的南唐，钱镠戒约子孙，世代结交中原朝廷，以牵制吴及南唐的侵扰。吴越在十国中最为安定，战争很少，生产发达，经济繁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入朝，降于北宋，吴越亡，历五主，共经86年。

闽　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全境，唐昭宗任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王潮死，王审知继为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统治近30年，他力行节俭，轻徭薄赋，奖励农业，促进生产，开辟海港，发展商业，建立学校，发展文化，境内富实安定。王审知死后，国内常有乱事，政局不稳。继承者都崇信道教巫术，大兴土木，费用不足，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保大三年（945）闽为南唐所灭，凡七主，共经53年。

楚　马殷在唐末割据湖南，被任湖南节度使，后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楚王，在长沙建造宫殿，专制一方。马殷死后，诸子争立，政局混乱，租赋沉重，农民逃亡。保大九年（951）南唐发兵灭楚，楚历六主，共经56年。

南汉　刘隐在唐末任岭南东道节度使，逐步平定那里的一些割据势力，扩大了势力范围，以后，据有西自邕州（今广西南宁南）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地区。后梁贞明三年（917），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次年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南汉君主都极其奢侈，而且刑法惨酷，所以南汉统治下阶级矛盾尖锐，境内曾爆发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凡历五主，共经67年。

南平（荆南）　高季兴于开平元年（907）被后梁封为荆南节度使，驻守江陵，阻兵自固。同光二年（924）被后唐封为南平王。故荆南又称南平。南平只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在十国中占地最小，势力最弱，靠征收商税和掠夺过境使者的财物维持财政开支。其统治者向四周称帝各国一概上表称臣，求得赐予。建隆四年（963）南平为宋所灭，凡历五主，共经57年。

北汉　刘崇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任后汉的太原留守，郭威灭后汉称帝时，刘崇也在太原称帝，占据河东12州，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北汉占地不大，土瘠民贫，勾引契丹为援，以反对后周、北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兵攻克太原，北汉亡，凡历四主，共经29年。

注　释

①《旧五代史》卷三五《唐明宗纪》一。

隋唐五代

契丹的强盛和南扰

契丹族出自东胡，西汉时东胡为匈奴所破退保鲜卑山，北魏时始见契丹族名，开始有历史记载。原分八部居潢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之南，黄龙（今辽宁朝阳）之北。从北魏时开始，和中原王朝以“朝贡”的形式，进行经济交往，以名马和毛皮换取中原地区的粮食和纺织品等。当时他们进行交换，是各个部落独立进行，没有联合起来，没有出现共同的领袖。六世纪中叶以后，契丹受突厥控制，为反抗突厥的统治，各部落渐趋联合。隋唐之际，构成契丹主体部分的八个部落形成了契丹族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部落联盟，即大贺氏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首长为大贺氏这一氏族所独占）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和唐关系相当密切。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诸部皆请内属，唐廷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南），以其部落联盟长窟哥为松漠都督，封无极县男，赐姓李氏。又置羁縻州十，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承认这些州刺史隶属于松漠都督府，受窟哥统辖。唐和突厥是契丹的两个强邻，随着他们力量的消长，契丹依违于两者之间。武周万岁通天元年

(696) 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孙万荣并为唐营州（治今辽宁朝阳）都督赵文翙所侵侮，遂举兵杀文翙，据营州反，领导了一次和唐朝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以孙万荣为前锋，兵至数万。武后遣曹仁师等二十八将击之。契丹故纵唐俘，告以"吾辈家属，饥寒不能自存，唯俟官军至即降耳"。唐俘至幽州、具言其状，诸军闻之，争欲先入。契丹设伏兵拦腰横击，擒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等，将卒死者填山谷，唐军大败，全军几尽。李尽忠死，孙万荣代领其众。突厥默啜乘机攻契丹，虏李尽忠、孙万荣眷属，武后封默啜为立功报国可汗。突厥再攻契丹新城，尽俘以归，孙万荣军心震动，唐军夹击，契丹溃败，孙万荣为部下所杀，余众降于突厥。这样大规模的战争，说明当时契丹族的力量已经相当强大。这一次战争之后，契丹转而依附突厥。开元三年(715)，在突厥渐趋衰败的情况下，契丹大贺氏部落联盟长李失活再度投靠唐朝，唐廷复置松漠都督府），以李失活为松漠都督，封松漠郡王，玄宗又以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妻之，通过和婚达到密切政治联系的目的。开元十八年（730）契丹将可突干杀部落联盟长李邵固投靠突厥，持续了100年的大贺氏部落联盟结束。经过内部纷争，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前后，契丹将涅里推举遥辇氏阻午可汗为部落联盟首长，契丹族从此进入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直至五代开始阿保机自立为可汗为止，共延续170年。唐为防御契丹，加强东北边防兵力，建立范阳、平卢两节度使，重用胡人安禄山，以致酿成安史之乱。遥辇氏部落联盟时期的契丹，先依附于突厥，突厥衰亡后，契丹又被置于回纥的控制之下。从唐朝玄宗天宝年间至九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内，契丹虽受回鹘控制，和唐朝交往并未中断，如

代宗大历年间，十四年中，契丹“朝献”竟达十三次。九世纪中叶，回鹘破亡，契丹新立屈戍可汗重新归附于唐，唐赐以“奉国契丹之印”。九世纪中叶以后遥辇氏部落联盟迅速发展壮大，契丹族正在加速它向奴隶制过渡的过程。农业和手工业有所发展，对外战争从掠夺财富和杀戮战俘演变为主要是掠夺人口。据《新唐书》记载，咸通年间（860—873）遥辇氏鲜质可汗对奚族的战争，俘奚人 700 户。到了阿保机的父亲撒剌的时候曾俘虏 7000 户奚人，由此可见，契丹族已出现了阶级分化，向奴隶制社会发展。天复元年（901）耶律阿保机任契丹部落联盟军事首长，继任总知军国事的重要职位，总揽了部落联盟的军政大权。后梁开平元年（907），唐朝覆灭的一年，阿保机经“国人推戴”，在遥辇氏部落联盟首长痕德堇死后，取得了契丹部落联盟首长的地位，从而结束了遥辇氏部落联盟 170 年的历史。

阿保机连年四出征讨，不但掠夺了邻近的女真、室韦、奚等族大量人口为奴隶，而且还南下河东（今山西）、河北，俘虏了大批处于封建生产关系下的汉人。契丹族的奴隶制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掠夺人口而迅速发展，基于这种奴隶占有制的政权也在迅速发展。阿保机这个部落联盟首长，实质上已经是奴隶制政权的君主。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阿保机即皇帝位，建元“神册”，立长子信为皇太子，建都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国号契丹。至此，契丹奴隶主政权正式建成。它不仅统一了契丹八部，征服了邻近的奚、霫、室韦等部，并且灭掉了东北的渤海，已是北方的一个强大的政权了。

在阿保机建立政权日益强大时，就时常南扰唐、五代北边。不过当唐卢龙节度使刘仁恭统治幽州时，还能抵挡住契丹

统治者的南扰，他选将练兵，乘秋深入，逾摘星岭以讨契丹。当霜降秋深，则焚塞下野草以困之，契丹马多饥死。这样一面扼守榆关（故址即今河北秦皇岛东山海关）险要，一面焚烧契丹马草的办法，收到一定效果，契丹统治者不能大举进扰。后梁末年，晋王李存勖攻克幽州，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命周德威镇幽州，周德威恃勇不修边备，遂失榆关之险，契丹进而占据营、平二州，并曾进攻幽州，为害渐大。不过当后唐庄宗时，定州节度使王都勾结契丹，反抗后唐，契丹派兵助王都，皆为后唐大将王晏球打败。溃逃的契丹军队投奔村落，村民到处以锄头木棒打死进扰的契丹军。说明在中原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五代的封建政权如能坚决打击进扰者，则契丹是不可能进行大规模南扰的。

至石敬瑭为乞求契丹耶律德光支持他夺取帝位，不惜称臣、称儿、割幽云十六州另加岁贡帛 30 万匹。当时连刘知远也进谏："称臣可以，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石敬瑭不听，后唐废帝清泰三年（936），耶律德光自将五万骑援石敬瑭，大败唐兵，唐兵死者近万人，被围士卒五万人投降。耶律德光册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之后，石敬瑭割幽州（今北京）、蓟州（今河北蓟县）、檀州（今河北密云）、顺州（今河北顺义）、新州（今河北涿鹿）、瀛州（今河北河间）、莫州（今河北任邱）、涿州（今河北涿县）、妫州（今河北怀来）、儒州（今河北延庆）、武州（今河北宣化）、云州（今山西大同）、应州（今山西应县）、寰州（今山西朔县马邑镇）、朔州（今山西朔县）、蔚州（今河北蔚县）十六州与契丹。从此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河东也仅存雁门关一处险要。契丹既得幽云十六州成为南扰中原

的根据地，进扰之祸日甚一日。如单从地理角度谈，契丹和以后的女真、蒙古统治者相继取得南攻的胜利，先占十六州是有重大作用的，石敬瑭割地卖国流毒四百余年。

晋出帝石重贵天福八年（943），因出帝向契丹主称孙不称臣，契丹发兵十余万攻晋，爆发晋、契丹第一次战争，因军民力战，击退南扰军，双方死伤很重。契丹军回国，沿途烧杀掳掠，方圆1000里内，人民和财产几乎绝灭。

两年后（945）契丹又大举南侵，所到之处杀掠殆尽。出帝征诸道兵，下诏亲征，诸将各率所部奋击契丹军，契丹大败，势如山崩。契丹主弃车，骑一只骆驼逃走，晋、契丹第二次战争，以契丹大败告终。

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契丹仍不断进扰，晋遣天雄节度使杜威、天平节度使李守贞等大发兵攻契丹。下诏宣告：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取幽燕，荡平塞北。杜威早存卖国奸心，要求禁军都随大军出发，使开封守卫空虚，只等杜威的出卖。契丹也大举攻晋，两军夹滹沱河对阵，杜威不敢渡滹沱河与恒州（今河北正定）军合势，结果为契丹切断粮道及归路，杜威李守贞等密谋投降，派密使入契丹营要求重赏，契丹允其称帝，乃降于契丹，军士皆痛哭，声振林野。耶律德光引兵南下打入开封，晋出帝降，晋亡。晋百官藩镇皆降。

耶律德光服汉衣冠，登正殿，受百官朝贺，改国号为辽，改元大同。契丹兵入开封，大肆抢掠。胡兵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数千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开封洛阳一带数百里间财畜殆尽。又遣使赴诸州括借钱帛，民不聊生，争起抗拒。于是山东、河南等地，农民纷起，“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①。竞起抗击契丹。保义都头王晏和

壮士们杀契丹所派保义节度副使和监军。滏阳民帅梁晖袭相州，杀契丹数百人，赶走契丹守将。晋州百姓杀契丹刮钱帛使赵熙。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南）王琼起义，围契丹澶州节度使数日，契丹救兵至，王琼失败牺牲。耶律德光谓左右曰："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由是无久留之意。

公元947年三月耶律德光被迫北撤，带着晋降官数千人，宫女、宦官数百人以及晋府库所有财物离开封北归。沿途屠相州，悉杀城中男子，驱妇女北去，掷婴儿于空中，举刃接之以为乐，城中仅存七百余人，凡死十余万人，辽主被迫退出中原，杀人泄忿。他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说："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诸道括钱，一失也；令上国（契丹自谓其国为上国）人打草谷，二失也；不早遣诸节度使（晋降将）还镇（镇压民众）三失也。"北撤途中耶律德光死于杀胡林。

此后，契丹统治者还不断南扰，后周时又助北汉攻周，沿边受其劫掠，耕作俱废，周世宗不得不进行收复幽云抗击契丹进扰的自卫战。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

隋唐五代

周世宗的改革和南征北伐

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华北地区的混乱残破局面，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郭威（周太祖）出身贫家，知道民间疾苦。他即位后，进行了一些政治经济改革：任用贤能，虚心纳谏；保持节俭生活，停止州县贡献珍贵食物及土特产；免除正税以外的一些苛敛，如斗余（概量之外，又取其余）、称耗（计斤之外，又多取之，以备耗折）等；废除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梁太祖击淮南，掠耕牛千万计，给东南诸州农民，使岁输租，自是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并将民间牛皮一律输官，禁止买卖的办法，改为计田十顷，税取一皮，余听民自用及买卖；停废营田（前世屯田皆在边地，使戍兵耕种。唐末中原驻兵所在皆置营田，募民为佃户，不隶州县，由户部置官总领。强迫编户为营田户，使封建国家纳税户减少，营田收入多被管理营田的官吏侵吞封建国家的营田收入不多），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使封建国家增加了三万多户的纳税户，农民得到土地后，生产积极性提高，收成

超过往年。

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他继续推进改革。在政治方面如整顿科举，再开制科，注意选拔搜罗人才，破格用人；澄清吏治，严惩贪官污吏；修订刑法，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又有新颁敕条，汇编附益，有的已难解释，有的矛盾重复，世宗令大臣整理、注释、删简，汇编为《大周刑统》21卷，想做到刑法不滥；下诏求谏，令臣下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特别是整军工作和严肃军纪对加强军队战斗力起了很大作用，在后周抗击北汉和契丹联军的高平之战中，大将樊爱能、何徽临阵奔溃，世宗处决了樊爱能、何徽及中级将校70余人，使骄将惰卒无不知惧。高平之战前，世宗已令诸道招募包括山林亡命之徒的骁勇者来充当禁军，高平战后，世宗命令检阅诸军，淘汰老弱，留用精锐，选拔特别优异者为殿前诸班。从此朝廷拥有一支勇猛强壮的禁军，“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①，为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周世宗在经济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下列诸项：

一为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供纳租税。规定如田主三周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房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都相对放宽，如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二。十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二分之一。十五周年内回归的交还三分之一。招人承佃逃户庄田，和招还逃户回乡，使土地和劳动力结合起来，有利恢复农业生产。

二为均定田租，显德五年（958）周世宗制成《均田图》，颁发州县，下诏均定田租，这是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而采取的措施。元稹在同州时，见到不少民户逃亡，田地荒废，有些近河田地，被河水冲刷，变为沙碛，但农民还要按原来田亩数分摊两税。一些豪富之家，广占田地，“十分地才税二三”。于是元稹建议，除去逃户荒田和被河沙侵吞的土地，把两税税额按现有耕地分摊到田亩中。这样既可免农民分担逃户荒田和河水冲坏田地的租税，也使富豪难于逃避两税，这多少具有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周世宗认为此法妥善，按元稹《均田表》所说均平田租的办法，制成《均田图》颁给诸道节度使、刺史各一面，作均田准备。不久派遣使臣34人，分行诸州，均定黄河以南60州田租，连受历朝优待免纳租税的曲阜孔家，也照平民例交纳。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两税。因均定田租，具有抑制地方豪强势力，有利于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作用，故宋太祖赵匡胤继续采用它。

三为打击寺院经济势力：唐武宗禁佛毁寺，给寺院经济势力很大打击，但宣宗继位，恢复崇佛，故寺院经济继续发展。五代时各地寺院林立，大量隐匿编户，故郭威曾废开封僧尼寺院58所。世宗继位后，于显德二年（955）令天下寺院非敕额（朝廷特许）者一律废除。禁私度僧尼，只许两京（开封、洛阳）、大名府（即魏州）、京兆府（即长安）、青州五处设戒坛，度人为僧尼，禁止私度。申请剃度出家者，必须是男年15、女年13以上，得到祖父母、父母或伯叔兄的允许，并能背诵或读过一定数量的佛经，否则不许受戒出家。这一年，天下寺院存留2694所，废除寺院30336所，批准僧系籍者42444，尼18756。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继又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用

以铸钱。世宗对侍臣们说：你们不要疑虑，佛教讲利众生，愿意舍自己的生命布施给别人，为什么舍不得铜像。如果施舍我的身体可以利民，我也不会吝惜。据《佛祖统记》载镇州有一尊观音像，极有灵应，毁像诏下，无人敢动此像。世宗亲自到寺，用斧斫破铜像面胸，用以制止反对派的反对阻挠。废除寺院，勒令僧尼还俗并限制剃度出家，使封建政府控制较多劳动人手，不致任意流入寺院，毁像铸钱，初步解决了钱币缺乏问题。

四为兴修水利整顿漕渠。唐末五代以来，黄河屡为灾害，幅员千里，户口漂荡，农桑废弛。显德元年（954）派宰相李谷到澶、郓、齐等州巡视黄河堤防，发丁夫6万人用30天修固河堤。其后河决于原武（今河南原阳），又遣吴延祚督丁夫二万塞黄河决口，修筑河堤。几次筑堤，多少减轻了黄河的水灾。显德五年，浚汴口，引河水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东京。显德六年令王朴到河阴（今河南荥阳北）巡查河堤，在汴口立斗门，控制黄河水势。又发民夫数万浚汴水。自开封城东引汴水入蔡水，通陈、颍等州漕运。先已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是年再浚五丈河经曹、济、梁山泊，通青、郓等州漕运。这样就恢复了以开封为中心的水路交通网。

其他如继续严惩贪官污吏，右屯卫将军薛训与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皆因贪污和向农民税外加征，被贬逐和处死，以重刑整顿纪纲。又如当时存在历朝相沿的不等民间收获纺织完毕，就征收谷帛的弊端。显德三年世宗下诏自是年起夏税自六月一日起征，秋税自十月一日起征，民间称便。

周世宗的经济、政治改革为后周开始统一事业和抗击契丹奠定了物质基础，创造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有利条件。周世宗

一即位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军事行动。

显德元年，北汉主刘崇乘郭威刚死、世宗初即位的时机，请契丹万余骑并自将兵三万大举攻周，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世宗拒绝冯道的劝阻，率领大军亲征，与契丹北汉联军战于高平（今山西晋城东北）。刘崇见周军较少，后悔召请契丹，令骁将张元徽攻周右军。周将樊爱能、何徽临阵率骑兵奔溃，步兵千余投降北汉，军势危急。世宗自率亲兵督战。宿卫将领赵匡胤身先士卒，勇犯敌锋，士卒死战，无不以一当百，杀北汉骁将张元徽，北汉兵大败，刘崇率百余骑逃归晋阳。樊爱能等闻周兵大捷，与士卒复回，世宗为严肃军纪，斩樊爱能、何徽等70余人，又杀投降北汉的右军步兵。赏有功将士数十人，以赵匡胤为殿前都虞侯，赏罚分明，军威大振。

显德二年，王朴献《开边策》，主要内容是说，要用兵首先要改善政治，“民心既归，天意必从”。用兵之道，先取其易，宜先取南唐的江北诸州，既得江北，再取江南。得江南岭南，巴蜀自然来降。南方既定，幽云十六州必望风内附，如辽兵据守，出师不难攻取。北汉与周世仇，决不肯降，留待最后消灭之。这一建议基本上成为后周以及北宋统一全国的指导方针。就在这一年，周世宗遣将攻后蜀，擒后蜀威武节度使以下将士5000人，收回秦、凤、成、阶4州。

显德三年周世宗下诏亲征淮南。斩南唐将刘彦贞，斩首万余级，伏尸三十里。克滁州（今安徽滁县）。取扬州，南唐主李璟奉表称臣，献金器千两，银器五千两，缯锦二千匹，请和，不许。周军捷报频传，南唐江北诸州已半为周有，南唐又遣使献金千两，银十万两，罗绮二千匹，愿割濒淮六州，岁输金帛百万，以求罢兵；周欲尽得江北之地，不许。周军继克寿

州、泗州、濠州、泰州，世宗临江督战，屡破南唐兵。苦战三年，南唐力竭，请献江北地，岁输贡物数十万。周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在攻南唐战争中，赵匡胤立战功，升为殿前都指挥使。

显德六年，世宗以幽、云未复，乘辽内部纷争，下诏亲征，统率水陆大军北伐。遣将自沧州（今河北沧县东）治水道入契丹境，遂通瀛莫二州。世宗乘龙舟，沿流北进，舳舻相连数十里。连下益津关（故址在今河北霸县）、瓦桥关（故址在今河北雄县）、淤口关（故址在今河北霸县信安镇），攻取瀛、莫、易3州17县，契丹守将皆举城降，不到两个月，兵不血刃而取燕南之地。正当周军向幽州胜利推进时，世宗突患重病，被迫回师。不久世宗死，子柴宗训七岁继位，被赵匡胤取代，建立宋朝。

注 释

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太祖显德元年。

附录：隋唐五代大事年表

说　明

一、本表起于隋文帝开皇九年（589）隋灭陈，止于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北宋建立后周亡，前后计 372 年，内容大体上依据本书正文。

二、本表以中国纪年系事，年末按公元纪年换算已进入公元下一年的事件仍置本年，如后汉隐帝乾佑三年（950）十一月郭威举兵反，攻入开封，隐帝刘承佑被杀，时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推算公元纪年，应为 951 年 1 月 1 日，本表仍置“950 乾佑三年”栏。十二月郭威自立，亦置“950 乾佑三年”栏。

三、中国纪年只列隋、唐、五代年号，前后元互盖问题，不强求统一。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589	隋开皇九年	正月，隋军克建康，俘陈叔宝，陈上游诸将皆降，陈朝亡。二月，冼夫人迎隋军入广州，岭南诸州皆定，陈境尽平。是岁，废行台，置并、扬、益、荆四大总管府。
590	开皇十年	五月，改革府兵制，诏府兵入州县户籍。六月，诏民年五十免役收庸。是冬，陈旧境反隋武装蜂起，隋遣杨素、裴矩领兵镇压，江南岭南皆定。
591	开皇十一年	吐谷浑可汗夸吕卒，子世伏继立，遣使奉表称藩，并献方物。
592	开皇十二年	官吏奏称："府藏皆满，无所容，积于廊庑。"时各地户口岁增，关内等地地少人多，衣食不给，遣使均田，狭乡每丁只二十亩。
593	开皇十三年	禁私修国史。
594	开皇十四年	诏废公廨钱制，省、府、州、县皆给公廨田以供公用。
597	开皇十七年	以宗女安义公主妻突厥突利可汗。
598	开皇十八年	高丽王高元与靺鞨之众万余攻辽西，隋遣汉王谅统军 30 万进击，高元遣使谢罪，罢兵。
599	开皇十九年	东突厥突利可汗为都蓝可汗、达头可汗所败，投奔隋朝，隋以其为启民可汗，筑大利城于朔州（今山西朔县）处其部落。东突厥都蓝可汗为部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
600	开皇二十年	废太子杨勇为庶人，改立晋王杨广为太子。日本使者小野妹子抵隋。
601	仁寿元年	废太学及州县学，只留国子学生七十人。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03	仁寿三年	东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乱，步迦可汗西奔吐谷浑，其部尽归启民可汗。
604	仁寿四年	七月，文帝去世，太子杨广即位为炀帝。八月，汉王谅以讨杨素为名起兵并州，九月为杨素讨平。十月，诏除妇人及奴婢部曲之课。
605	大业元年	营建东都，修筑西苑，每月役使丁夫二百万。开通济渠。疏浚邗沟。炀帝游江都。
606	大业二年	迁都洛阳。"始建进士科"。置洛口仓、回洛仓。
607	大业三年	突厥启民可汗入朝。遣羽骑尉朱宽、海师何蛮使流求。颁《大业律》。炀帝北巡至榆林，启民可汗来朝行宫。
608	大业四年	开永济渠。倭王遣使入贡。
609	大业五年	遣兵击吐谷浑。炀帝至张掖，高昌王麹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相率朝见。吐屯设献地数千里，因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大索貌阅"增丁二十四万余，口六十四万余。是岁，全国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余，口四千六百余万。
610	大业六年	东都大陈百戏，征四方奇伎异艺，陈于端门街，终月乃罢。洛阳弥勒佛徒起义。隋遣陈稜、张镇州率军泛海击流求。雁门尉文通起义。朱崖王万昌起义。隋凿江南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11	大业七年	炀帝将攻高丽，集百万大军于涿郡，又强征百万民夫运粮械。邹平民王薄起义于长白山。刘霸道、孙安祖、窦建德、张金称、高士达、翟让等相继起义，隋末农民起义爆发。
612	大业八年	正月，下诏誓师水陆击高丽。三月炀帝渡辽水一征高丽。辽东城久攻不下，七月因水、陆军大败，撤兵。
613	大业九年	三月，炀帝二征高丽，围辽东城不下。六月，杨玄感起兵反炀帝于黎阳，围逼东都，炀帝被迫撤兵。八月，杨玄感兵败被杀。是岁，杜彦冰、王润、李德逸、白瑜娑、孟海公、孟让、郭方预、郝孝德、格谦、孙宣雅、刘元进、韩相国、杜伏威、辅公祏等起兵。
614	大业十年	炀帝三征高丽。农民起义遍于全国；高丽遣使请和，炀帝撤兵。
615	大业十一年	二月炀帝以全国起义，诏民悉城居。八月，炀帝北巡，为东突厥始毕可汗围困于雁门，九月解围，还东都。
616	大业十二年	七月，炀帝幸江都宫，命越王侗留守东都。十月，李密加入瓦岗军后，瓦岗军连续获胜，又大败隋将张须陀于荥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17	大业十三年	正月，窦建德据乐寿称长乐王。杜伏威据历阳，自称总管。二月，瓦岗军取兴洛仓。翟让推李密为魏公，据洛口。四月，瓦岗军陷回洛仓进逼东都，与王世充相持。五月，李渊起兵晋阳，七月进军关中，十一月攻占长安，立代王侑为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李密火并翟让。
618	唐武德元年	三月，江都兵变，拥宇文化及为主，杀炀帝，立秦王浩为帝，引兵北上。五月，李渊废隋恭帝侑，称帝，国号唐，改元武德，是为高祖。隋朝亡。东都群臣立越王侗，改元皇泰，史称皇泰主。九月，李密败于王世充，降唐。宇文化及杀杨浩，称帝于魏县，国号许。十一月，窦建德定都乐寿，国号夏。十二月，李密叛唐，被杀。
619	唐武德二年	二月，初定租庸调法。闰二月，窦建德诛宇文化及，许亡。四月，王世充废皇泰主，称帝，国号郑。五月，唐杀李轨，得河西。八月，窦建德迁都洺州。九月，杜伏威降唐。刘武周据并州。十月，李世民击刘武周。
620	武德三年	四月，李世民大破刘武周、宋金刚与突厥之联军，收复并州。十一月突厥颉利可汗立。
621	武德四年	五月，窦建德援洛阳，兵败于虎牢，为李世民所俘，夏亡。王世充以洛阳降唐。郑亡。七月，窦建德被杀于长安，部将刘黑闼复起义于河北，尽复建德旧境。是岁，萧铣降，唐得江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22	武德五年	正月，刘黑闼称汉东王，定都洺州，三月，为李世民所败，亡入突厥，六月，复起，又几尽复故地。十一月，李建成请击刘黑闼。
623	武德六年	正月，刘黑闼为李建成执杀，起义失败。三月，唐诏分天下户为上中下三等以征户税（后改为九等）。八月，辅公祏率杜伏威余部起义，称帝，国号宋，都丹阳。
624	武德七年	二月，置州、县、乡学。杜伏威被杀于长安。三月，辅公祏被执杀，宋亡。四月，唐颁行新律（即《武德律》），定均田、租庸调法。八月，李世民退突厥于豳州。
625	武德八年	八月，突厥俘温彦博。
626	武德九年	四月，傅奕请废佛法。六月李世民伏兵玄武门，杀太子建成及齐王元吉。八月，李世民即位，是为太宗。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是岁，东突厥深入，逼近长安，唐太宗亲临渭水，与颉利可汗结便桥之盟，突厥退兵。唐废诸道行台。
627.	贞观元年	裁并州县，因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
628	贞观二年	诏各地置义仓。平梁师都，得夏州，全国统一。为削弱颉利，太宗遣使册封薛延陀首领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建汗庭于漠北。
629	贞观三年	李靖等率兵十余万，分道击突厥。松赞干布即吐蕃赞普位。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30	贞观四年	李靖俘颉利可汗，东突厥亡，降唐者十万口，采“全其部落”“以实空虚之地”的政策安置降众。日本遣唐使首抵唐。“天下大稔”。
631	贞观五年	赎没于突厥之男女八万口。
632	贞观六年	铁勒契苾部帅契苾何力率众附唐，为授左领军将军。
635	贞观九年	诏天下户分为九等。李靖大破吐谷浑，其主慕容伏允及其子先后为左右所杀，唐立其孙诺曷钵为可汗。景教僧侣阿罗本将景教传入唐。东突厥阿史那社尔附唐。
636	贞观十年	改定府兵制，府兵军府改名折冲府，以折冲都尉为长，果毅都尉为副。全国共置六百三十四府。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纪传撰成。
637	贞观十一年	颁贞观律令格式。武氏入宫。
638	贞观十二年	颁行高士廉等所撰《氏族志》。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兵号飞骑。
640	贞观十四年	八月，侯君集克高昌，唐以其地置西州。西突厥屯兵可汗浮图城，以城降，置庭州于可汗浮图城。九月，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
641	贞观十五年	文成公主入吐蕃，与松赞干布和亲。天竺摩揭陀国王尸骨迭多遣使入唐。
642	贞观十六年	魏王李泰等撰《括地志》成。禁自伤肢体。郭孝恪败西突厥。
643	贞观十七年	二月，图画功臣长孙无忌等二十四人像于凌烟阁。四月，废太子承乾，立晋王治为太子，贬魏王泰。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44	贞观十八年	平焉耆王龙突骑支之乱。十一月，下诏征高丽。
645	贞观十九年	玄奘取经还，抵长安。太宗征高丽，无功而还。
646	贞观二十年	西突厥乙毗射匮可汗请和亲，许之，命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铁勒九姓大首领率众降唐。唐平薛延陀。《大唐西域记》成书。
647	贞观二十一年	于铁勒诸部置羁縻州府。以回纥部为瀚海都督府，以其首领吐迷度为都督，赐姓李。置燕然都督府于薛延陀故地。
648	贞观二十二年	结骨（唐时又名黠戛斯）内附，唐置坚昆都督府，以其首领阿栈为都督，隶燕然都护府。唐出使天竺使者王玄策俘摩揭陀国王阿罗那顺而归。契丹内附，唐置松漠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赐姓李。奚内附，唐置饶乐都督府。阿史那社尔平龟兹，唐始置安西四镇。
649	贞观二十三年	五月，太宗去世。六月，高宗李治即位。是岁，吐蕃松赞干布去世。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遣使入贡于唐。
650	永徽元年	诏罢安西四镇。
651	永徽二年	瑶池都督阿史那贺鲁叛唐，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于千泉，统西突厥十姓之地，有兵数十万。大食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唐与大食的官方联系始此。唐颁行《永徽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53	永徽四年	长孙无忌等撰修《律疏》成。睦州女子陈硕真起义，自称文佳皇帝，不久失败牺牲。日本僧人道昭入唐求法。
655	永徽六年	征高丽，无功而还。高宗拒谏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
656	显庆元年	《五代史志》（即《隋书志》）修成。唐大将程知节、苏定方破西突厥鼠施等部于鹰莎川。
657	显庆二年	苏定方擒阿史那贺鲁，西突厥亡。唐以其地分置昆陵都护府统五咄陆部；濛池都护府统五努失毕部，并隶安西都护。
658	显庆三年	龟兹内部纷争，唐遣将大破之，置龟兹都督府，立素稽为龟兹王兼龟兹都督。安西都护府迁龟兹，四镇随之恢复。唐征高丽，无功。
659	显庆四年	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苏定方平思结、疏勒之叛，葱岭以西悉平。颁《新修本草》，是为世界上第一部官修药典。
660	显庆五年	苏定方破百济，其王及太子降。高宗委政于武后。
661	龙朔元年	再征高丽，围平壤，不克而还。以吐火罗（今阿富汗）、波斯（今伊朗）等十六国置八都督府，七十六州，一百一十县、一百二十六军府，皆隶属于安西都护府。以萨珊波斯王子卑路斯为波斯都督府都督。
662	龙朔二年	立波斯都督卑路斯为波斯王。改百官名。改左右屯营为羽林军。西突厥附于吐蕃。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63	龙朔三年	划瀚海、云中辖地，碛北州府属瀚海，碛南属云中。吐谷浑为吐蕃所破，其可汗曷钵与弘化公主率众内附，居于凉州。击平百济。
664	麟德元年	改云中都护府为单于大都护府。武后垂帘听政。玄奘卒。
668	总章元年	高丽内乱，遣使求救，唐遣李勣、薛仁贵等击灭之，俘其王高藏，以其地置安东都府，以薛仁贵检校安东都护。
670	咸亨元年	吐蕃陷龟兹拨换城，唐罢安西四镇。复百官旧名。
671	咸亨二年	义净自广州浮海赴天竺学佛学。高侃破高丽起事余众。
674	上元元年	八月，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时称二圣。
675	上元二年	武后用北门学士参决百官疏奏，以分宰相之权。太子弘死。
679	调露元年	吐蕃赞普死，文成公主遣使告丧，高宗遣使赴吐蕃会葬。裴行俭平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重建安西四镇，以碎叶代焉耆。
680	永隆元年	废太子贤为庶人，立英王哲（李显）为皇太子。文成公主卒，高宗遣使吊祭。
681	开耀元年	裴行俭回师后，突厥阿史那伏念与阿史德温傅连兵犯塞，裴行俭再击之，多行反间，俘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
682	永淳元年	王方翼平西突厥，擒其首领三百余人。后突厥骨咄禄崛起，回纥受其压迫，西徙甘、凉二州之间。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683	弘道元年	高宗去世，子中宗李显即位，武后执政。
684	嗣圣元年	二月，废中宗为庐陵王，立豫王旦为皇帝，是为睿宗，武后执政。武后改元光宅，立武氏七庙。九月，徐敬业于扬州起兵反武后，三个月后兵败被杀。
686	垂拱二年	唐军为吐蕃所败，安西四镇再度失守。武后盛开告密之门，任用酷吏。
687	垂拱三年	后突厥骨咄禄等扰朔州，唐大将黑齿常之败之于黄花堆。
688	垂拱四年	琅邪王李冲、越王李贞先后起兵反武后，均不足月即败死。
689	载初元年	十一月，始用周正（周以十一月为正），改本月为载初元年正月。宗秦客改字，改“照”为“曌”，武后自名“曌”。
690	天授元年	武后策贡士于洛城殿，为后世进士殿试之始。杀南安王颖等宗室十二人，又鞭杀故太子贤二子，唐宗室至是杀戮殆尽。武后废睿宗，称帝，改国号为周。
692	长寿元年	武后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夺回安西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
694	延载元年	铸天枢。摩尼教由波斯人佛多诞传入唐。
695	证圣元年	武后遣使封后突厥默啜可汗为迁善可汗。义净回到洛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696	万岁通天元年	营州契丹李尽忠、孙万荣等起兵叛唐，陷州城，杀都督，攻略河北诸州。唐诏山东近边诸州置武骑团兵，以击契丹。
697	神功元年	王孝杰败于契丹，孝杰坠崖死，十七万将士死亡殆尽。默啜求降户、谷种、缯帛、农器与铁，以契丹未平，乃驱还降户数千帐，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件，铁四万斤。
698	圣历元年	置武骑团兵于河南、河北，以抗突厥。复立李显为太子。靺鞨首领大祚荣建震国于东牟山、奥娄河。
699	圣历二年	西突厥别支突骑施首领乌质勒遣子来朝，遣使安抚乌质勒及十姓部落。
700	久视元年	复用夏正（复以周正正月为十一月）。
702	长安二年	始置武举。分安西都护府天山以北之地为北庭都护府，治庭州，辖西突厥十姓部落。
703	长安三年	遣使括户。
705	神龙元年	正月，张柬之、崔玄暐等发动政变，率羽林兵拥太子入宫，杀张易之、张昌宗，逼武后传位太子，中宗复位，尊武后为则天大圣皇帝。二月，复国号唐。十一月，武后去世，遗制去帝号，称则天大圣皇后。
706	神龙二年	置十道巡察使，二年一代。武三思贬杀张柬之等参与政变的五王，独揽大权。安乐公主势倾朝野。唐与吐蕃首次会盟。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707	神龙三年	四月，中宗以所养雍王守礼女金城公主妻吐蕃赞普。七月，太子李重俊起兵杀武三思入宫城索上官婕妤，失败被杀。
708	景龙二年	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张仁愿筑三受降城于黄河北，首尾相连，绝突厥南下之路。唐先后封突骑施首领乌质勒为西河郡王；其子娑葛为金河郡王。册娑葛为十四姓可汗。
709	景龙三年	吐蕃赞普弃隶蹜赞遣大臣等千余人来迎金城公主。
710	景龙四年	六月，韦后毒杀中宗，临朝摄政，皇太子即位，是为少帝。睿宗子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韦后及安乐公主，逼少帝逊位，拥立睿宗。立隆基为皇太子。是岁，刘知几撰成《史通》。
711	景云二年	太平公主结党欲废太子，睿宗命太子监国。置十道按察使。
712	先天元年	太平公主离间睿宗与太子，睿宗传位于太子，八月，李隆基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
713	先天二年	以河北诸州刺史统领团结兵。封靺鞨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令祚荣兼都督，自此始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玄宗杀太平公主及其党与，政局始稳定。纳刘彤建议，令姜师度、强循等检校全国盐铁之课。
714	开元二年	诏沙汰僧尼，还俗者万二千余人，禁营佛寺。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715	开元三年	山东蝗灾，宰相姚崇遣御史督州县捕埋。突骑施酋长苏禄遣使来朝，授金方道经略大使。
716	开元四年	是岁奚首领李大酺附唐，受封饶乐郡王，妻固安公主。契丹首领李失活附唐，受封松漠郡王，妻永乐公主。日僧玄昉入唐学法。
717	开元五年	唐重置营州都督府，收复辽西十二州。日本吉备真备来唐留学。
719	开元七年	康国等因大食攻逼，遣使求救于唐。唐封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唐允许西突厥十姓可汗移居碎叶城，复以焉耆代碎叶为安西四镇之一。
721	开元九年	令监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户。命僧一行造新历。
722	开元十年	吐蕃夺小勃律九城，小勃律首领没谨忙联合唐军大破吐蕃，受唐封为小勃律王。
723	开元十一年	先是纳张说建议，募兵充宿卫，是岁选府兵及白丁一十二万谓之“长从宿卫”。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置五房于其后，分掌庶政。
724	开元十二年	僧一行发起天文测量。据以得出地球子午线一度的弧长。僧一行制成铜黄道游仪。
725	开元十三年	长从宿卫改称彍骑。僧一行与梁令瓒制成铜铸水运浑天仪。
726	开元十四年	与契丹、奚和亲。黑水靺鞨遣使入朝，以其地置黑水州。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727	开元十五年	许奚厥于西受降城互市。新罗僧慧超赴天竺巡礼返回，抵安西。吐火罗因大食攻逼，求援于唐。
730	开元十八年	吐蕃遣使入贡，自是复内附。契丹遥辇氏取代大贺氏为八部盟主。
731	开元十九年	赐吐蕃《毛诗》、《春秋》、《礼记》。许互市。
733	开元二十一年	金城公主请立唐蕃界碑于赤岭，许之。改全国十道为十五道，各置采访处置使。僧一行《大衍历》传入日本。
734	开元二十二年	以裴耀卿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于运河沿线置仓，分段转运江淮仓米。
736	开元二十四年	以礼部侍郎代吏部员外郎主持科举。
737	开元二十五年	募诸色征人及客户为“长征健儿”。定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共二十七篇，三十卷，是为《开元二十五年令》。
738	开元二十六年	封南诏皮罗阁为云南王，赐姓名为蒙归义。分左右羽林军之万骑置左右龙武军。《唐六典》成书。
740	开元二十八年	金城公主去世，吐蕃来告丧，请和，不许。
741	开元二十九年	重用安禄山，任之为营州都督，充平卢军使，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742	天宝元年	置十节度、经略使。全国兵数为五十七万四千，边兵占四十九万。
743	天宝二年	广运潭修成，以聚江淮运船。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744	天宝三载	拔悉蜜攻斩突厥乌苏可汗，突厥大乱。回纥、葛逻禄攻杀拔悉蜜颉跌伊施可汗回纥骨力裴罗自立为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来告，册为怀仁可汗，于是回纥南据突厥故地。唐诏男子二十三岁成丁，十八岁为中男。
745	天宝四载	后突厥为回纥所灭，回纥拓地愈广，尽有突厥故地。册杨太真为贵妃。玄宗敕改波斯（景教）寺为大秦寺。
746	天宝五载	李林甫拜相后数兴大狱倾陷异己。
747	天宝六载	以安禄山兼御史大夫。安西副都护高仙芝破小勃律，继而以高仙芝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749	天宝八载	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度。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攻拔吐蕃石堡城。
750	天宝九载	安西节度使高仙芝袭破石国。南诏起兵反唐，附于吐蕃。
751	天宝十载	以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兼河东节度使，安禄山既兼领三镇，遂谋作乱。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击南诏，大败于西洱河。
752	天宝十一载	杨国忠拜相，势倾朝野。
753	天宝十二载	安禄山、杨国忠交恶。十二月，鉴真抵日本。
754	天宝十三载	剑南留后李宓率兵七万攻南诏，大败于太和城，全军皆没，李宓被擒，杨国忠隐其败，再征全国兵讨之。前后死二十万。是岁全国户九百零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为唐之极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755	天宝十四载	二月，安禄山请以蕃将代汉将，凡三十二人。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以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赴东京募兵守御。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诏军事要冲处置防御使。命高仙芝统诸军东征。十二月叛军陷洛阳。唐监军边令诚奉诏杀高仙芝、封常清。是岁，吐蕃赞普弃松德赞即位。
756	天宝十五载	正月，安禄山称帝于洛阳，国号燕。六月，哥舒翰灵宝大败，叛军陷潼关。玄宗奔蜀，马嵬驿军士哗变，杀杨国忠、杨贵妃。太子李亨走灵武。叛军陷长安。七月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奉玄宗为太上皇。郭子仪、李光弼并为宰相。唐借兵于回纥。十月，史思明陷河北诸郡。
757	至德二载	正月，安禄山为其子安庆绪所杀。李光弼败史思明于太原。二月，郭子仪平河东。九月，唐军与回纥兵克长安。十月，官军克洛阳，安庆绪逃往邺郡。十二月，史思明降唐。是岁，置左右神武军，与左右羽林，左右龙武统称北衙六军。
758	乾元元年	史思明复叛。唐以鱼朝恩为观军容使，总监郭子仪等九节度使数十万大军围安庆绪于相州。肃宗以亲女宁国公主嫁回纥葛勒可汗。置度支、盐铁、都团练使；废采访使，更置观察使。
759	乾元二年	三月，史思明增援安庆绪，九节度使兵溃相州。史思明杀安庆绪，还范阳，四月，自称大燕皇帝，九月，攻占洛阳。
761	上元二年	三月，史思明为其子史朝义所杀。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762	宝应元年	四月，玄宗、肃宗相继去世，张皇后召越王系选宦官以诛李辅国，李辅国、程元振幽张皇后，杀越王系，拥立太子李豫，是为代宗。八月，浙东袁晁起义。十月，唐军与回纥兵收复洛阳。是岁李白卒。
763	宝应二年	正月，史朝义自缢，余党皆降，安史之乱平。三月，袁晁被俘，起义失败。因边兵入援平乱，吐蕃进扰，十月攻占长安十余日，代宗奔陕州。十二月代宗返长安。是岁，鉴真在日本卒。
764	广德二年	始税青苗地头钱以给官俸。是岁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史言丧乱之后，户口减于承平什七八)
765	永泰元年	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等入扰，郭子仪单骑说回纥，合兵破吐蕃。
766	大历元年	吐蕃取甘州、肃州，唐河西节度使徙治凉州。南诏王阁罗凤立《南诏德化碑》于其都城太和城。
770	大历五年	杜甫卒。晁衡（阿倍仲麻吕）卒于长安。
773	大历八年	唐苦与回纥互市，回纥一马易四十缣，动至数万匹，马皆瘦弱，朝廷苦之。
774	大历九年	藩镇强横，自署将吏，不供贡赋，皇室结亲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欲固结其心，而承嗣益骄慢。
775	大历十年	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反，命诸道讨之。
776	大历十一年	田承嗣遣使表请入朝，诏赦其罪，复其官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777	大历十二年	是岁，蕃镇割据，据地拥兵，相互勾结，不用朝廷法令，官爵、甲兵、租赋等皆自专之。
779	大历十四年	五月，代宗去世，德宗李适即位。德宗励精求治，纵训象，出宫女，山陵制度从俭，禁宦官出使求贿，收禁兵权。是岁，阁罗凤卒，孙异牟寻立，迁都羊苴咩城。
780	建中元年	正月，废租庸调制，诏行杨炎两税法。杀前宰相刘晏。时全国土户一百八十万；客户一百三十万。
781	建中二年	五月，成德李惟岳、淄青李正己、魏博田悦三镇叛唐。六月，山南东道梁崇义亦叛。七月李正己卒，子李纳自领军务。八月李纳叛，梁崇义兵败自杀。是岁，安西、北庭表奏达长安，唐以安西四镇留后郭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加北庭节度使李元忠为北庭大都户。
782	建中三年	闰正月，成德军将王武俊杀李惟岳，自称节度使。二月，王武俊与卢龙节度使朱滔反。十一月，河北三镇相约称王：朱滔为盟主，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又邀淄青李纳称齐王。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建兴王，联合四镇反。
783	建中四年	正月，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盟于清水。七月，唐蕃二使至自青海，言疆场已定。以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诏诸将相与吐蕃使臣盟于城西。十月，长安发生泾卒哗变，拥前泾原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出奔奉天。是岁，初行税间架、除陌钱法。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784	兴元元年	正月，德宗下诏罪己，大赦除朱泚以外各叛镇，王武俊等去王号，上表归顺，朱泚更号汉帝，李希烈称楚帝于汴州。二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德宗奔梁州。五月，唐大将李晟克长安，朱泚率部西走，将奔吐蕃，为其部下所杀。
785	贞元元年	六月，卢龙节度使朱滔病死。八月，李怀光兵败自杀。
786	贞元二年	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四王二帝之乱”平。
787	贞元三年	正月，南诏因吐蕃赋敛繁重，遣人求内附。闰五月，唐蕃会盟于平凉，吐蕃劫盟。
788	贞元四年	诏定户等，规定三年一定，以为常式。回纥改称回鹘。
790	贞元六年	吐蕃攻占北庭。
791	贞元七年	吐蕃攻占西州。
793	贞元九年	始征茶税，估其值，什税一，岁收四十万缗。南诏遣使上表归唐，德宗赐诏书，遣使慰抚之。
794	贞元十年	异牟寻斩吐蕃使，与唐使盟于点苍山，联合唐军败吐蕃。唐册之为南诏王，赐金印。
796	贞元十二年	六月，置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以宦官为之。自是窦文场、霍仙鸣势倾中外。
797	贞元十三年	张建封奏宫市之弊，然宫市不改。
801	贞元十七年	贾耽绘《海内华夷图》，撰《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成。杜佑撰《通典》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02	贞元十八年	骠国王子舒难陀率乐队及舞蹈家抵长安。
804	贞元二十年	日本学问僧空海抵长安留学。
805	贞元二十一年，	正月，德宗去世，子顺宗李诵继位。王叔文、王伾谋改革时政，引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进行革新。八月，宦官俱文珍、节度使韦皋等逼顺宗让位于太子李纯，改元永贞，是为宪宗，史称“永贞内禅”。“二王八司马”被贬，革新失败。
806	元和元年	正月，宰相杜黄裳请制裁藩镇。三月，平定夏绥节度留后杨惠林之叛。九月，平定剑南节度使刘辟之叛。
807	元和二年	平定镇海节度使李锜之叛。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成，总计全国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一千四百五十三，每岁国家财赋倚办止于东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兵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率以两户资一兵。
808	元和三年	牛僧孺、李宗闵等应直言极谏科，指陈时政试官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恶之，贬试官，抑牛僧孺等人，启“牛李党争”之端。沙陀朱邪尽忠背吐蕃附唐，中途被杀，子执宜率余众到灵州，唐置其盐州，以执宜为阴山都督府兵马使。
811	元和六年	用李吉甫议，省并内外官及诸司流外官。是岁大稔，米斗有值二钱者。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12	元和七年	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卒，其子田怀谏年十一，代领军务。军中拥立部将田兴，田兴归命于朝。
813	元和八年	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成。
814	元和九年	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子元济匿丧自领军务，唐发诸道兵讨之。
815	元和十年	平卢、成德暗助吴元济，并暗杀宰相武元衡，宪宗改任裴度为相，继续讨伐淮西。
817	元和十二年	八月，裴度督师淮西。十月，唐邓随节度使李愬雪夜袭蔡州，擒吴元济，淮西平。
818	元和十三年	发五道兵讨淄、青李师道。废支度使。
819	元和十四年	韩愈谏迎佛骨。李师道为其部将刘悟所杀，淄、青等十二州皆平。成德、卢龙二镇节度使自请入朝，藩镇割据局面暂时平定。诏诸道节度使、都团练使、都防御使及经略使下属之支郡兵马归刺史统领，以分方镇兵权。
820	元和十五年	正月，宪宗为宦官陈弘志等所杀，宦官梁守谦等共立太子恒，是为穆宗，宦官废立皇帝自此始。是岁，新罗僧人道义回国，将南派禅宗传入新罗。
821	长庆元年	李德裕恶李宗闵曾对策讥其父李吉甫，借贡举不公事倾宗闵，宗闵等贬远州刺史，各分朋党，倾轧垂四十年。卢龙、成德二镇复叛。唐蕃会盟于长安。以宪宗女太和公主和亲回鹘崇德可汗。
822	长庆二年	魏博镇叛，河北三镇恢复独立。唐蕃复盟于逻些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23	长庆三年	牛僧孺拜相，牛、李之怨愈深。唐蕃会盟碑立。
824	长庆四年	正月，穆宗去世，子敬宗李湛即位。
825	宝历元年	盐铁使王播进羡余。王播诛求严急，正入不充而羡余相继。
826	宝历二年	十一月，敬宗为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宦官王守澄杀刘克明拥皇弟文宗李昂立。
829	太和三年	南诏攻陷成都外郭，掠男女工匠数万而去，自是南诏工巧等于蜀中。
831	太和五年	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吐蕃守将悉怛谋以维州降唐；德裕遣兵据其城，奏称欲乘机攻吐蕃，宰相牛僧孺反对，德裕被迫将悉怛谋送归吐蕃，弃维州，由是益怨僧孺。
832	太和六年	牛僧孺力主送归悉怛谋事，帝亦怨其失策，乃罢相。以李德裕为兵部尚书。
833	太和七年	李德裕拜相。排斥其所恶者，宰相李宗闵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
834	太和八年	李宗闵复相，李德裕罢相，文宗每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
835	太和九年	十一月文宗与李训、郑注等谋杀宦官，失败，宦官大杀朝臣，史称"甘露之变"。
837	开成二年	十月，国子监《石经》刻成，共百一十四石。是岁，新罗在唐留学生达二百余人。
838	开成三年	日僧圆仁来唐求法。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40	开成五年	正月，文宗去世，弟武宗李炎立。是岁，回鹘为黠戛斯所灭。回鹘诸部逃散：一支西迁葛逻禄，与邻近部落建哈剌汗国；一支西南迁西州、龟兹，称西州或高昌回鹘（今维吾尔族祖先）；一支西迁甘州，称甘州回鹘（今裕固族祖先）；亦有南迁附唐及迁入吐蕃者。
844	会昌四年	平定泽潞刘稹之叛，史称"会昌伐叛"。
845	会昌五年	武宗下令废佛，同时罢萨宝府（掌管祆教事务，设萨宝、萨宝府祆正等官以掌其祭，皆以胡人充之），禁毁祆教、景教、摩尼教祠寺，僧徒并令还俗。佛教徒称此为"会昌法难"。
846	会昌六年	三月，武宗去世，皇叔宣宗李忱立。是岁，李德裕罢相，出为荆南节度使，牛李党争结束。白居易卒。
847	大中元年	闰三月，敕复废寺，令会昌五年所废寺，听僧尼修复，于是僧尼之弊皆复其旧。是岁，日僧圆仁回国。
848	大中二年	沙州人张义潮率沙州人民起义，逐吐蕃守将，自摄州事，遣使奉表归唐。
849	大中三年	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在原州界）人民摆脱吐蕃统治，归唐。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诸道出兵应接。诸道兵分取三州七关。
850	大中四年	张义潮收复伊州。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51	大中五年	正月，张义潮所遣告捷使者方抵长安。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十月，张义潮发兵略定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义泽入献十一州图籍。陷吐蕃百余年的河湟之地尽入于唐。十一月，置归义军于沙州，以义潮为节度使。
852	大中六年	严禁私度僧尼。
857	大中十一年	吐蕃将领尚延心以河、渭二州归唐，以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859	大中十三年	八月，宣宗去世，宦官王宗实下诏立宣宗子李漼，是为懿宗。十二月，浙东民裘甫起义，陷象山。
860	咸通元年	二月，裘甫败浙东兵攻占剡县，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改元罗平，铸印曰天平。发数道兵击裘甫，八月，起义失败，裘甫被杀。
861	咸通二年	张义潮收复凉州。南诏陷邕州，据二十余日，始去。
863	咸通四年	南诏陷交趾，都护蔡袭重伤溺海死。
865	咸通六年	南诏陷嶲州。
866	咸通七年	北庭回鹘仆固俊破吐蕃，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安南都护高骈大破南诏兵，进围交趾城，攻克之，南诏遁去，安南始平。
867	咸通八年	张义潮入朝长安，命其族子惟深守归义。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68	咸通九年	七月，徐州募卒戍桂林六年不代，推庞勋为首起义于桂州，卷旗北归，十月攻占徐州，屡破官军，众至二十万。是岁，王玠刻印《金刚经》，是现存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
869	咸通十年	四月，庞勋称天册将军，诸道兵七万余人以沙陀骑兵为前锋数败庞勋军，起义军克地相继失守。官军破徐州，悉斩桂州戍兵亲族。九月庞勋战败牺牲，起义失败。
872	咸通十三年	归义节度使张义潮去世，以长史曹义金为节度使。是后中原多故，回鹘陷甘州，声问遂绝。
873	咸通十四年	七月，懿宗去世，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立帝少子僖宗李儇，时年十二。
874	乾符元年	岁末（875年年初）王仙芝与尚让等起义于长垣，仙芝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唐末农民战争爆发。
875	乾符二年	六月，王仙芝打下濮州、曹州，众至数万。黄巢聚众数千起义于冤句以应仙芝。
876	乾符三年	起义军克汝州，俘刺史王镣，东都大震。攻蕲州，刺史裴偓诱降，仙芝动摇，因黄巢反对降敌未成。王、黄分兵作战。
877	乾符四年	南诏遣使请和，许之，诸道兵戍邕州者十减其七。唐招讨副使杨复光诱降，王仙芝动摇，遣尚君长接洽，中途为唐将宋威劫杀，仙芝降敌未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78	乾符五年	二月，王仙芝战死黄梅，尚让引仙芝余众与黄巢汇合，推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是岁，义军受阻，遂挥师南下，攻浙东，开山路七百里，趋建州克福州。
879	乾符六年	六月，黄巢攻占广州。自称“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州观察处置等使”，露表宣告将入关中，数朝廷诸弊，皆中时弊。十月，义军大举北伐，众号五十万。陷潭州，逼江陵。
880	广明元年	是春，黄巢东入江南，七月渡长江，九月渡淮河，十一月克东都，十二月破潼关，僖宗与宦官田令孜等奔蜀，义军入长安，黄巢称帝，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881	中和元年	义军与唐凤翔节度使郑畋战于龙尾陂，败绩。官军云集长安附近，黄巢帅兵东出，空长安以诱之，官军入城抢掠，黄巢引兵还袭，大败官兵。唐赦李国昌、李克用罪，用以镇压义军，僖宗至成都，田令孜专制朝政。
882	中和二年	正月，黄巢以朱温为同州防御使。四月，官军四集，义军处势日蹙，号令不出同、华二州，长安城中斗米三十缗。九月，朱温叛降唐，僖宗赐其名为全忠。
883	中和三年	二月，李克用败尚让于梁田陂。四月，黄巢放弃长安东撤。五月，孟楷下蔡州，攻陈州牺牲。六月，黄巢围攻陈州，不克。是岁，李克用任河东节度使，自此据太原。朱温任宣武节度使，自此据汴州。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84	中和四年	四月，李克用会诸道兵于陈州，黄巢解陈州围。义军接连失利。五月，尚让降唐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六月，黄巢牺牲于狼虎谷，起义失败。是岁，秦宗权称帝于蔡州，遣军四出攻略。
885	光启元年	僖宗还京师。冬，李克用、王重荣合兵攻逼长安，田令孜挟僖宗奔凤翔。
886	光启二年	李克用等请诛田令孜。
887	光启三年	流田令孜于端州，令孜依陈敬瑄，拒命不行。
888	文德元年	二月，僖宗至长安，大赦，改元文德。三月，僖宗去世，宦官杨复恭立皇弟昭宗李晔。昭宗以朝廷日卑，有恢复之志，即位之始，中外欣然。
889	龙纪元年	秦宗权为部将执送朱温，斩于长安。
891	大顺二年	王建攻占成都，据西川。
892	景福元年	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行密招抚流散，轻徭薄敛，未数年，公私富庶。
893	景福二年	唐以钱镠为镇海军节度使。王潮攻占闽五州之地。
894	乾宁元年	日本终止遣唐使。
895	乾宁二年	义胜节度使董昌自称大越罗平国皇帝，钱镠发兵讨之。唐封李克用为晋王。唐以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
896	乾宁三年	唐以马殷为湖南节度使。李茂贞攻长安，昭宗奔华州，依韩建。钱镠灭董昌，据有两浙。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897	乾宁四年	九月，削新西川节度使李茂贞官爵，复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十月，王建克东川，占有全蜀。十二月，王潮卒，弟王审知继位。
898	光化元年	八月，昭宗还长安，改元光化。
900	光化三年	六月，宰相崔胤与昭宗谋去宦官，宦官枢密使宋道弼、景务修皆赐自尽。十一月，拟尽诛宦官，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等废昭宗，立其子李裕。
901	天复元年	正月，左神策指挥使孙德昭杀刘季述、王仲先，迎昭宗复位。闰六月，崔胤密召朱全忠入关助除宦官，十一月，宦官韩全海等劫昭宗走凤翔，依李茂贞。朱全忠兵围凤翔。
902	天复二年	封杨行密为吴王。封钱镠为越王。王建攻占山南西道。南诏权臣郑买嗣杀其王舜化真，建大长和国，蒙氏所建的南诏亡。
903	天复三年	先是凤翔被围久，城中食尽，李茂贞谋诛宦官以自赎，求和于朱全忠，至是诛宦官韩全海等七十余人送昭宗出凤翔。朱全忠拥帝还长安，杀内侍省宦官数百人，挟昭宗诏诸道除监军。废神策军中尉，以朝臣为枢密使。朱全忠进爵梁王。西川节度使王建进爵蜀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04	天复四年	正月，朱全忠杀宰相崔胤，迫昭宗迁都洛阳，并驱徙士民，毁长安宫室民舍成丘墟。四月，更封钱镠为吴王。八月，朱全忠使人杀昭宗，立其子李柷，是为哀帝。十一月，朱全忠攻杨行密，大掠淮南以困之。得牛给诸州民，使岁输租，曰租牛课，此后历数十年牛死而租不除。十二月，以刘隐为清海节度使。
905	天祐二年	朱全忠逐杀朝士，集朝贬官者三十余人于白马驿，一夕尽杀之，投尸于黄河，史称“白马驿之祸”。杨行密卒，子杨渥立，军政大权旁落大将徐温、张颢之手。
906	天祐三年	朱全忠应天雄节度使罗绍威之请，发兵屠魏博骄横牙兵八千家，魏兵自是衰弱。
907	天祐四年	四月，朱全忠逼哀帝禅位，自即帝位，是为太祖，更名晃，改国号为梁，史称后梁，都开封。唐朝亡。是岁，后梁封马殷为楚王；钱镠为吴越王。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改枢密院为崇政院，以朝臣为使，职司不变。王建称帝，国号蜀，史称前蜀。契丹耶律阿保机统一八部。
908	后梁开平二年	晋王李克用卒，子李存勖继位，大破梁军。徐温、张颢杀吴王杨渥，立其子杨隆演。温韬聚众嵯峨山，掠雍州唐帝诸陵发之殆遍。
909	开平三年	后梁迁都洛阳。封刘隐为南平王，王审知为闽王；封刘守光为燕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10	开平四年	吴越王钱镠筑捍海石塘，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
911	开平五年	南平王刘隐卒，弟岩袭位。燕王刘守光称帝，国号大燕，建元应天，据幽州。奚五部臣服于耶律阿保机。
912	乾化二年	六月，梁帝朱晃次子友珪杀朱晃自立。
913	乾化三年	二月，朱晃第三子友贞结禁军杀梁帝友珪，即帝位于开封，是为梁末帝。复都开封。八月，梁封荆南节度使高季昌为渤海王。十一月，晋王李存勖下幽州擒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杀之，燕灭。
914	乾化四年	荆南高季昌以水军攻蜀。大败。
915	乾化五年	魏博军乱，叛后梁，降于李存勖。王建攻岐，取其秦、阶、成、凤四州，拓境至大散关。
916	贞明二年	契丹主耶律阿保机称皇帝，是为太祖，晋王欲结契丹，事阿保机为叔父。
917	贞明三年	南平王刘岩称帝于番禺，国号越。王建改国号为汉。次年复号为蜀。
918	贞明四年	六月，王建卒，子王衍即位。是岁，刘岩改国号为汉，史称南汉。
919	贞明五年	蜀政浊乱。吴王杨隆演自称吴国王。
920	贞明六年	吴国王杨隆演卒，弟杨溥继立，徐温养子徐知诰专国政。后梁陈州人毋乙、董乙以明教组织起义，数月后失败。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23	后唐同光元年	晋王李存勖称帝于魏州，是为庄宗，国号唐，史称后唐。十月，梁大举攻后唐，致使大梁无兵，庄宗攻入开封，末帝自杀，后梁亡。后唐迁都洛阳。楚王马殷遣使入贡于唐。渤海王高季昌入朝，更名季兴。吴遣使于唐。
924	同光二年	后唐封荆南节度使高季兴为南平王。
925	同光三年	后唐灭前蜀，以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闽王王审知卒，子延翰立。
926	同光四年	正月，孟知祥入成都。三月，李克用养子李嗣源因魏州赵在礼兵变，夺取汴州。四月，乱兵杀庄宗于洛阳，李嗣源入洛阳称帝，是为明宗。十月，王延翰称王，建闽国，仍称臣于后唐。十二月延钧杀延翰自立。是岁，渤海为契丹所灭。
927	天成二年	后唐封马殷为楚国王。以后唐明宗婿保义节度使石敬瑭为宣武节度使，兼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928	天成三年	以温韬发唐诸陵，赐死。南平王高季兴卒，子从诲继立。
930	长兴元年	后唐并盐铁、户部、度支三使为三司使（位亚执政，专制国计，号称计相，为最高财政长官），三司使之名始此。楚王马殷卒，子希声继立。
932	长兴三年	后唐令国子监依西京石经本校定九经，雕印卖之。官府大规模刻书自此始。吴越王钱镠卒，子元瓘继立。孟知祥攻取东川。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33	长兴四年	闽王王延钧称帝，国号闽。后唐封孟知祥为蜀王。后唐明宗病，子从荣欲率兵入宫侍疾，事败被杀。明宗卒，子李从厚继位，是为闵帝。
934	应顺元年	四月，明宗养子李从珂杀闵帝自立，是为末帝。是岁春，孟知祥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都成都。夏，孟知祥卒，子孟昶继立。
935	清泰二年	河东节度使、北面总管石敬瑭广储军粮。贿曹太后，宫中事无巨细皆知之。
936	清泰三年	五月，石敬瑭叛后唐，七月，上表于契丹，称臣于耶律德光，且请以父礼事之，以幽蓟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援助。九月，契丹军南下，大败后唐军。十一月契丹主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建元天福，是为后晋高祖。后晋割幽蓟十六州，并岁输帛三十万匹。契丹主与石敬瑭引兵南下，后唐军大溃，闰十一月，石敬瑭攻入洛阳，末帝从珂自杀，后唐亡。
937	后晋天福二年	后晋迁都开封。吴帝杨溥禅位于齐王徐知诰。徐知诰称帝，国号唐，史称南唐，都金陵，是为南唐烈祖（前主），徐知诰复姓李，改名昪。
938	天福三年	石敬瑭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契丹主止晋主称臣，令称“儿皇帝”。
941	天福六年	后晋诏撰《唐书》，以宰相赵莹监修。吴越王钱元瓘卒，子弘佐继立。吐谷浑降后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42	天福七年	南汉刘岩卒，子刘玢继立。后晋高祖石敬瑭卒，侄石重贵继位，史称出帝或少帝。遣使致书于契丹，称孙不称臣，契丹大怒。南汉博罗人张遇贤起义于循州，自称“中天八国王”，年号永乐。
943	天福八年	南唐前主李昪卒，子李璟嗣，是为中主。闽王延羲弟王延政称帝于建州，是为天德帝，国号殷。南汉刘晟杀其兄刘玢自立。张遇贤义军北上，攻南唐虔州，战败牺牲。
945	开运二年	王延政改国号曰闽，仍居建州。八月，南唐兵破建州，王延政降；九月，汀、泉、漳三州皆降于南唐，闽亡。是岁，后唐宰相刘昫等撰《唐书》（即《旧唐书》）成。
946	开运三年	十月，后晋遣杜威、李守贞等大发兵攻契丹。意欲“先取瀛、莫，安定关南；次复幽燕，荡平塞北”。战败。十一月，契丹大举攻晋，十二月，契丹攻下开封，俘出帝石重贵北迁，后晋亡。
947	开运四年	正月，耶律德光入开封，纵胡骑四出“打草谷”。二月，耶律德光称帝于开封，改国号为辽。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称帝于太原，自言不忍改晋国号，称天福十二年。三月，辽帝因中原人民反抗，被迫引众北归。六月，刘知远复都开封，国号汉，史称后汉，是为后汉高祖。吴越王钱弘佐卒，弟弘倧继立，旋被废，弟弘俶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48	后汉乾祐元年	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卒，子承佑继位，是为隐帝。三月，河中、永兴、凤翔三镇叛后汉。是岁，楚内乱，南汉攻取楚贺州、昭州。
949	乾祐二年	郭威平三镇之叛。南唐以留从效、陈洪进为清源军节度使及副使，自是，从效据泉、漳二州。
950	乾祐三年	四月，后汉以郭威为邺都留守以备契丹。十一月，隐帝杀权臣杨邠、史弘肇、王章，又谋诛郭威，事泄，郭威自邺城起兵，攻入开封，隐帝被杀，后汉亡。
951	后周广顺元年	郭威称帝于开封，国号周，史称后周，建元广顺是为后周太祖。刘知远弟刘崇称帝于太原，国号汉，史称北汉，是为北汉世祖。是岁，南唐灭楚。
952	广顺二年	楚旧将周行逢、王逵等拥刘言为朗州节度使，发兵攻占长沙，逐走南唐兵，尽复马氏岭北故地，表附后周。
953	广顺三年	后周革旧弊，令罢营田务除租牛课。后唐时始刻之九经，雕版历二十一年，至是版成，后世称“五代监本”。
954	显德元年	正月，后周太祖郭威卒，养子柴荣继位，是为世宗。三月，世宗败北汉、辽联军于高平，斩临阵溃退之将领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人，以整肃军纪。继赏高平之功，将校迁拜者有赵匡胤等数十人。十月，世宗简选诸军，置殿前军。是岁，北汉主刘崇卒，子承钧嗣，上表于契丹称男，契丹主称主为“儿皇帝”。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955	显德二年	世宗下令拆废佛寺，废三万余所，存两千余所。僧尼括为编户，销铜佛像铸为钱币。后周败后蜀，取秦、阶、成、凤四州。
956	显德三年	以殿前都虞侯赵匡胤为定国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
957	显德四年	世宗令大臣汇编律令为《大周刑统》。
958	显德五年	南唐中主李璟献江北淮南十四州于后周，称臣。去帝号，去年号。南汉主刘晟卒，子刘鋹立。
959	显德六年	世宗趁辽内乱，下诏亲征，取瀛、莫、易三州，瓦桥、益津、淤口三关。世宗因病班师，旋卒，子宗训继位，是为恭帝。时年七岁，主少国疑。
960	显德七年	正月，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拥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为天子，是为太祖，国号宋，改元建隆，废恭帝，后周亡。

第二卷　后记

隋唐五代55件大事中：前段28事（《玄奘取经》以前）和后段13事（《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以后）由刘占武编写。中段12事（《李林甫专政》至《唐末农民战争》）由任雪芳编写。

编　者

1994年5月

两宋

陈桥兵变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世宗柴荣（又称郭荣）亲统大军北伐契丹，欲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料身染重病，回师京城后不久病逝，其子柴宗训继立为帝，是为恭帝，年仅7岁。世宗统一北方大业未尽，“主少国疑”①，文武群臣忧虑重重，朝廷内外惶恐不安。职掌禁军大权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因此而成为朝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赵匡胤（公元927—976），涿郡（治今河北涿州）人。其父赵弘殷，行伍出身，历任五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禁军高级将领，家住洛阳（今属河南），赵匡胤即出生于洛阳夹马营。因受家庭和当时社会尚武风气的影响，他自小喜欢武艺。青年时，他曾赋《咏日》诗，以言己志：“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须臾走向天上来，赶却残星赶却月。”表达了自己远大的抱负与豪情壮志。后汉时，赵匡胤应募从军，投奔在枢密使郭威帐下。乾祐四年（951），郭威于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发动兵变，随即统领所部闯入开封（今属河南），后汉隐帝为乱兵所杀，郭威遂取代后汉，建立后周。此

次政变，赵匡胤积极参与并拥戴郭威为帝（是为周太祖），功绩卓著。故事成之后即被授予东西班行首，典掌禁军。郭威养子柴荣（原为周太祖皇后柴氏之侄）任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府尹后，又改授赵匡胤为开封府马直军使。郭威病故，柴荣继位，不久擢升赵匡胤为归德军节度使，成为禁军高级将领。显德六年，柴荣病危之际，为防范皇族内部争权夺利而导致政变的发生，下诏，将郭威的女婿，殿前都点检张永德免除军职，而以赵匡胤接替，使之掌握禁军大权，以辅佐柴宗训。

显德七年正月元旦，赵匡胤以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二州名义，谎称契丹与北汉相勾结，大举南下，入侵后周边境，因而请求朝廷急速派兵阻击、增援。宰相范质、王溥等人不辨真伪虚实，立即令赵匡胤率大军北上。待赵匡胤领兵出城之际，开封城内却到处传说“策点检为天子”②之谣。一时间，“士民恐怖，争为逃匿之计”③。然后周朝廷对此却一无所知。初三清晨，赵匡胤率军离开京城，日暮，驻军于距开封城东北 40 里处的陈桥驿（位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他将军中诸事悉交由其弟赵匡义和亲信、谋士赵普代为处置，自己则入帐内饮酒，全然不问军中之事，直至醉卧榻上。

不多时，军营之中有都押衙李处耘、殿前都虞候李汉超、内殿都虞候马仁瑀、散员指挥使王彦升等禁军主要将领鼓噪而起，与赵匡义、赵普等人商议，要拥立赵匡胤为帝。赵普对众人说：“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④众人莫不赞同。

第二天清晨，赵匡胤尚未起身，诸将领即蜂拥至其寝帐之外，赵匡义入帐中请出其兄。赵匡胤出帐，众人纷纷拔刀抽剑，排列于庭院之中，齐声说道：“诸军无主，愿策太尉（时赵匡胤尚有检校太尉之衔）为天子。”⑤不等赵匡胤答话，众人便拿出事先已准备好的用于皇帝登极时穿着的黄袍，披戴在他的身上。赵匡胤无可奈何，便对诸将领说道：“汝等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众人异口同声道：“唯命是听。”⑥赵匡胤又说：“太后（指符后）、主上（指周恭帝），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戮汝。”⑦众将领纷纷拜伏于地，表示遵从圣命。

赵匡胤立即派人赴开封，先与守卫京城的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联络。之后，他便自陈桥驿回师开封。进入城中，将士们遵从赵匡胤之令，秋毫无犯。守城的后周军将，不敢轻举妄动，唯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闻讯，骑马径自皇宫内廷疾驰而出，欲集结部众负隅顽抗。当其行至街上，被王彦升察觉，遂紧随其后，直追至其家中，将其家人全部杀死。赵匡胤入城，登上明德门，命令兵士各返回所属军营驻地，自己也回到原来的官署。

不多时，诸将领簇拥着范质等后周朝廷要员来到赵匡胤官署。赵匡胤一见他们，顿时痛哭流涕，呜咽道：“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范质等人还未及对答，军校罗彦环却手按利剑，厉声说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⑧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无计可施，只好屈身退至阶下，列队朝拜。随即，赵匡胤于官署堂上召集文武百官，依据每人功劳高下确定入朝列班次序。翰林承旨陶穀自袖中取出事先写好的禅位制书，当众宣

读，称柴宗训退位，由赵匡胤即皇帝位。随后，宣徽使引导赵匡胤下堂，来到庭院中，面向北方行拜礼。又引他出官署入宫中，进崇元殿，更换朝服，头戴衮冕，正式登极称帝，是为宋太祖。另又将柴宗训及符后等人迁至西宫，去其帝号改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后周历史至此结束。

次年正月，赵匡胤下令大赦天下，改元建隆，仍定都于开封。因他曾于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出任过归德军节度使，故以"宋"为国号，史称北宋，其后，赵匡胤对有功官吏将士，分别封官授爵，给予赏赐。以石守信为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王审琦为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其余禁军诸将领亦分授官职，并兼领节度使。朝廷各重要官署机构均重新任命长官，从而建立起宋朝的统治秩序。与此同时，他又遣使向各地郡县、藩镇通报称帝换朝之事，希望他们改弦易辙，归顺宋朝。

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很快激起原后周一些藩镇首领的反抗，其中主要有占据上党（今属山西）的李筠，盘据淮南的李重进。

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经营上党长达8年之久。他在自己的统辖区域内，擅自征收赋税，召集亡命之徒，颇具一定实力，以至于后周朝廷亦曾感到李筠"倔强难制"⑨。得知赵匡胤称帝代周，他遂积极准备举兵反宋。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四月，李筠勾结北汉，发动叛乱。消息传入宫中，赵匡胤果断决定速战速决，以"服天下之心"⑩，巩固刚刚建立的宋朝统治。为此，他一方面令石守信领兵前去上党征讨叛军，一方面又令昭化军节度使慕容延钊、彰德军节度使王全斌率军出东路，以策应石守信。李筠自以为宋军将士多与自己是旧友

故交，必会念旧情而临阵倒戈，因此掉以轻心，未作认真设防。宋军与叛军一交锋，即发起猛攻，全然无旧友故交之情。首战于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大败叛军。随后，宋军几路并进，步步紧逼。赵匡胤亲临前线指挥各路人马围歼叛军。石守信会同江宁军节度使高怀德于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境内），再大破李筠军主力，擒获叛军大将范守图，杀戮北汉降兵数千。李筠率残部逃入泽州城中。宋军团团围困城池，连续攻城数十日，终于破城。李筠知大势已去，投火自尽。其子李守节献上党降宋，李筠的反宋叛乱被平定，北方的局势得到控制。

后周淮南节度使李重进为周太祖郭威的外甥，权势显赫。周世宗柴荣在位时，曾一度与赵匡胤分掌朝廷内外兵权。后领命出镇淮南，坐镇扬州（今属江苏）。陈桥兵变后，赵匡胤即令韩令坤接任其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之职，并令其移镇青州（治今山东益都）。李重进十分清楚赵匡胤此举旨在削夺自己的权势，故而拒不从命，反而派遣亲信翟守珣北上，准备与李筠结盟，南北夹击刚刚建立的宋朝。然而翟守珣非但未与李筠联合，反入开封向赵匡胤陈述此事。返回扬州后，他又劝说李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11]，致使李重进未敢贸然起兵反宋。李筠兵败身亡后，李重进自感大祸临头，决意孤注一掷。九月，他于扬州发动叛乱，并派人入南唐求援。不料，南唐主李璟恐引火烧身，不肯派兵相助，李重进陷入“内乏资储，外无救援”[12]的窘困境地之中。赵匡胤先遣石守信统军南下征讨。十月，又率兵亲征。宋军浩浩荡荡沿汴河南下，直抵淮河北岸。李重进不甘心束手待毙，严令兵士作殊死抵抗，妄图阻止宋军渡河南下。石守信指挥宋军强渡淮河，发起猛攻，叛军溃败而逃。宋军迅速包围扬州。十一月，扬州城破，李重进举

家自焚而亡。宋军入城，尽杀叛军，淮南地区随之得以平定。

在李筠、李重进被平定前后，原后周地方藩镇政权，虽亦不满赵匡胤以兵变取代后周，可又惧怕宋朝的兵威，自感无力与之抗衡，只得听命归顺。赵匡胤对此采取恩威并重的策略，一方面仍名义上保留其藩镇，允许留驻原地，但同时又派监军入其藩镇，行使职权。原后周成德军节度使郭崇时常为后周的覆灭而悲哀流涕，但当监军陈思海到任，他也只好强忍悲痛，表示拥戴宋廷。原后周保义军节度使袁彦得知赵匡胤代周后，日夜整修军械，操练兵士，欲对抗宋廷。然而宋廷派潘美前去监军，并令他入朝时，袁彦也不得不俯首贴耳，单骑赴京城。周太祖郭威妃杨氏之弟、原后周建雄军节度使杨庭璋曾与李筠关系密切，时有往来，当赵匡胤调其改任定难军节度使，令他入居开封时，亦丝毫不敢拒命。

至此，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的宋朝政权，得到了极大的巩固，中原地区的局势得以安定。

注　释

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简称《长编》)卷一。

②③④⑥《长编》卷一。

⑤⑦⑧《宋史》卷一《太祖纪》。

⑨《宋史》卷二五九《张美传》。

⑩王偁《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⑪《东都事略》卷二二《李重进传》。

⑫《东都事略》卷二六《赵普传》。

两宋

杯酒释兵权

自唐末以后，各地藩镇割据林立，天下分崩离析，战火蔓延，连绵不断。及赵匡胤称帝建宋，欲结束分裂动荡的局面，一则要削平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宏图；二则要铲除割据的根源，防止和避免重蹈分裂的覆辙。为此，他苦思冥想，夜不能寐。宋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镇压了原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的叛乱之后，更感到消除分裂的隐患已迫在眉睫。

一日，赵匡胤召见亲信、谋臣赵普入朝，向他询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回答道："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天下自安矣。"赵普的话还未讲完，赵匡胤就迫不及待地说："卿勿复言，吾已喻矣。"①

欲彻底改变"君弱臣强"的弊政，其首当其冲的便是收缴

臣僚及地方兵权，集中控制于中央朝廷。对此，通过“陈桥兵变”称帝建国的宋太祖赵匡胤十分清楚兵权的重要和“节镇太重”的隐患及其严重后果。为此，他即位后，即废去“殿前都点检”一职，由自己直接掌握和控制禁军。然而禁军高级将领多是昔日与赵匡胤出生入死的“义社”兄弟，是为自己“黄袍加身”的有功之臣，如何体面地收缴他们手中的兵权，而不致发生流血之争，更使赵匡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甚至一度陷入优柔寡断之中，不忍心冷遇旧友故交。

一次，赵匡胤欲令久负盛名的大将符彦卿典掌禁军。赵普闻讯，数次上奏劝谏，激烈反对委任符彦卿职掌禁军重权，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重柄”。赵匡胤拒不采纳。不料宣敕下达，却被赵普扣留。他将敕书藏入怀中，入朝请求面见赵匡胤。赵匡胤得知赵普求见，即迎上前，问道：“岂非以符彦卿事耶?”赵普担心先提及此事恐宋帝难以接受，便答道：“非也。”待到其他事情陈奏完毕，他才从怀中取出敕书。赵匡胤一见，十分惊奇。赵普忙解释说：“臣托以处分之语未备，复留之。惟陛下深思利害，勿为后患。”赵匡胤道：“卿苦疑彦卿何也？朕等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也?”赵普反问道：“陛下何经负周世宗?”②赵匡胤无言以对，遂撤回对符彦卿授官的敕书。由此，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收缴兵权。

一日晚上，朝会散后，赵匡胤传令召集几位与自己关系甚为亲近密切的禁军高级将领入宫，且专为他们设摆酒筵。其中包括归德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人。君臣欢坐一堂，开怀畅饮。至酒兴正浓之时，赵匡胤摒退随从和卫士，对石守信他们叹息道：“吾非尔曹之

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又未尝敢安枕而卧也。”石守信等将领忙询问何故？赵匡胤继续说道：“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众人一听此言，顿时惊慌失色，匆忙跪拜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赵匡胤答道：“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众人惊恐万状，不知所措，一时痛哭流涕，叩头不止，连声说道：“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

赵匡胤于是一面宽慰众人，一面劝导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我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众人听到此处，再次拜谢说：“陛下念臣及此，所谓生死而骨肉也。”③酒筵到此，众人哪有心思饮酒，纷纷告辞而去。

第二天，参加酒宴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均声称自己患病，未来上朝，并请求罢免自己所担任的军中要职。赵匡胤随即另授予虚衔：石守信改授为天平军节度使，高怀德改授为归德军节度使，王审琦改授为忠正军节度使，原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武信军节度使张令铎改授为镇守军节度使。从此，这些禁军主帅“皆罢军职”④，就连禁军“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亦无职掌，实为武官高级虚衔，秩从二品，但厚其待遇。“皆以散官（为有官称而无固定职守之官）就第，所以慰抚赐之者甚厚。与结婚姻，更度易制，使主亲军”⑤。

宋开宝二年（969），赵匡胤再次设摆酒筵，盛情款待前来入朝的藩镇节度使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军将统领。席间，赵匡胤语调和缓地对众人说："卿等皆国家旧臣，久临剧镇，王事鞅掌（指事务繁忙），非朕所以优贤之意。"王彦超立刻听出赵匡胤的弦外之音，即上前奏道："臣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愿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唯有武行德等人却执迷不悟，竭力陈述自己"夙昔战功及履历艰苦"。赵匡胤淡淡地说道："此异代事，何足论！"⑥第二天，赵匡胤便下令，罢免王彦超、武行德等一批藩镇节度使，削夺其权，亦另授高级虚衔。至此，赵匡胤又一次以赎买的方式，收缴了地方藩镇的兵权，有效地防止和避免地方割据局面的再度形成，使藩镇听命于朝廷。

赵匡胤两次"杯酒释兵权"，极其平静地达到"收其精兵"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调整军队统帅机构，于禁军设置殿前司和侍卫司，分置长官为殿前都指挥使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合称为"三帅"，均受赵匡胤节制。又另设枢密院，"凡天下兵籍武官选授及军师卒戍之政令，悉归枢密院"⑦。旨在分离三帅统兵之权与枢密院调兵之权，使三帅有统兵而无调兵之权，枢密院虽调兵却不得统兵，以相互牵制。此外，赵匡胤亦大力整顿军队，裁汰老弱病残，补充精壮。甚至亲自制定"兵样"，作为选兵的标准，派遣使臣赴各地依照"兵样"精选兵卒。此举又将原地方藩镇军中骁勇善战者大部选入京城，入补禁军。赵匡胤经常亲临校场训练禁军兵士，严肃军纪。他曾说："朕今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若犯吾法，惟有剑耳。"⑧由此极大地加强了禁军的实力。他积极奉行"守内虚外"⑨的基本国策，而将22万禁

军，分一半驻扎于京师及京畿地区，另一半则分戍地方要冲之地，并称之为“内外相制”⑩。赵匡胤的此番举措，有其重要的原因，“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⑪。基于此因，他一则选授资历较浅，易于驾驭者充任禁军将领，且频繁调任。二则实行更戍法，即间隔数年便更换禁军屯驻地点，使将帅经常调换，将兵间无法相结为死党，有效地防止兵变的发生。

赵匡胤通过“杯酒释兵权”，极大地集中了全国的兵权，又加强禁军，形成威慑地方的格局，从根本上消除了分裂割据的隐患，巩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然而，将兵分离又导致作战不相协调，战斗力削弱的后果，致使与辽、西夏交战屡遭失利。

注 释

①②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③④《长编》卷二。

⑤《涑水纪闻》卷一。

⑥《宋史》卷二五五《王彦超传》。

⑦《宋会要辑稿·职官》。

⑧《长编》卷一二。

⑨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一O《屯田》。

⑩朱弁《曲洧旧闻》卷九。

⑪《长编》卷三二。

两宋

削平南方割据

北宋建立后，即面临统一分裂割据局面的首要问题。时北方有兵势正盛的辽朝和依附辽朝的北汉政权，南方则有各据一方的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小朝廷。宋太祖赵匡胤欲一统天下，却对如何削平割据而大伤脑筋，举棋不定。

起初，赵匡胤有意先出兵翦灭北汉，平定北方后再举兵南下，逐一除灭大江南北诸政权，为此他曾询问宰相魏仁浦："朕欲征太原（今属山西），如何?"魏仁浦认为此举会"欲速不达"①。他又征询武胜军节度使张永德"下并（治今山西太原）、汾（治今山西汾阳）之策"。张永德亦认为"彼兵虽少而悍，加之北虏（指契丹）之援，未可遽也。姑以间谍离虏心，设游兵以扰其稼事，待其困弊，乃可图耳"②。诸大臣反对赵匡胤先攻北汉之策，是考虑北汉虽距宋朝很近，威胁很大，然其背后有契丹相助，灭此政权并非易事，况且宋朝初建，国势不强，力不从心。宋太祖见众臣反对，遂与心腹谋士赵普商议。

赵普（922——992），字则平，幽州蓟县（今属天津）人，

后迁居洛阳（今属河南）。后周时，他曾于赵匡胤帐下供职，初为军事判官。赵匡胤出任同州节度使，他改任推官。其后赵匡胤移镇宋州（治今河南商丘南），他又任掌书记，一直充任赵匡胤的高级幕僚和重要谋士。他积极参与、策划了陈桥兵变，为赵匡胤黄袍加身，而被授予右谏议大夫、枢密直学士。宋建隆元年（960），他力劝赵匡胤立即发兵平定李筠之乱，并自请随御驾扈从，因功得迁至兵部侍郎、枢密副使。同年，他再请赵匡胤速出兵平定李重进之乱，从而巩固了宋朝的统治。三年，被擢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乾德二年（964），又替代范质任宰相，充门下侍郎、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其间，他为扭转唐末以来节度藩镇飞扬跋扈，君弱臣强的局面，而建议赵匡胤收缴地方权利，深得赏识。正因如此，赵匡胤也常征询他对朝廷大政方针及治国之术的见解。

赵匡胤常爱微服私访大臣，故赵普每次退朝回到家中，不敢更换衣冠，依然身着朝服，以备皇帝突然来访，不致失礼。一天深夜，漫天大雪纷飞，寒气袭人。赵普以为赵匡胤必不会雪夜私访，不料忽听敲门之声，他连忙开门，却见赵匡胤正立于风雪之中。赵普忙行礼，将皇帝迎入屋中。赵匡胤告之赵普："我已约晋王光义来你家中。"不多时，赵光义到。赵普侍奉他们坐定，便烧炭煮肉，又让妻子为二人斟酒，赵匡胤亲热地以嫂相称③，君臣饮酒谈笑。

席间，赵普试探地问道："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

赵匡胤道："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

赵普又故意问道："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

赵匡胤答道："吾欲收太原。"

赵普沉思了许久，说："非臣所知也。"

赵匡胤忙问其缘由，赵普慷慨陈辞道："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边患我独挡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

赵匡胤听罢，笑着对赵普说："吾意正尔，姑试卿尔。"④

赵匡胤雪夜访赵普，最终奠定"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决定先用兵江南诸小政权，待统一南方后，再北上灭北汉，夺回辽占据的蓟（治今天津蓟县）、幽（治今北京西南）、云（治今山西大同东）等16州之地。此后，宋廷密切注视江南诸政权的动向，设法寻找出兵的借口，捕捉战机。并积极储备粮草，招募精壮，修缮兵甲，操练兵士，随时准备兵进江南。早在建隆三年九月，占据湖南的武平节度使周行逢病危，临终前，嘱咐其子周保权，一旦发生变故，迫不得已时，可"自归朝廷"⑤，即投降宋朝。周行逢死后，盘据衡州（治今湖南衡阳）的张文表起兵，袭取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又欲攻占击保权所在的朗州（治今湖南常德），企图取而代之，独霸湘湖地区。周保权一面派杨师璠率兵抵抗，一面派人北上向宋廷求援。

赵匡胤即命山南东道节度使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调集各路人马，会师于襄阳（今属湖北），以讨伐张文表为名，出兵湖南。

宋军进兵湖南，须途经荆南节度使、南平王高继冲控制下的南平政权。此前宋朝使臣卢怀忠已侦知南平虚实，认为"高继冲甲兵虽整，而控弦（即军队）不过三万；年谷虽登，而民困于暴敛。南通长沙（今属湖南），东距建康（今江苏南京），

西迫巴蜀（今四川），北奉朝廷（指宋朝），观其形势，盖日不暇给，取之易耳”⑥。于是，赵匡胤又派使臣入南平，向高继冲提出宋军“假道”的要求。南平政权内部为此而争论不休，高继冲更是犹豫不决，束手无策，结果宋军未及南平同意，已兵临江陵（今属湖北）。高继冲见宋军压境，只得出城迎接。宋军不等他反应过来，其前锋已冲入城中，“分据冲要，布列街巷”⑦。就这样，宋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平定荆南，得3州、17县、143500户。

宋军继续南下，进逼朗州。此时杨师璠已击败张文表，平息了叛乱，因此周保权拒绝宋军入城。慕容延钊毫不理睬，依旧指挥大军攻入城中，生擒周保权。又镇压各处的反抗，迅速占领湖南，得14州、1监、66县、97388户。

宋占有荆湘，为统一南方开创了有利的局面，也直接威胁到盘据四川的后蜀政权。

后蜀皇帝孟昶对宋军南下，一举灭亡南平、楚政权十分恐惧。乾德二年（964），他派使臣北上勾结北汉，请求发兵渡黄河南下，自己则出兵自四川北上，占据潼关（今属陕西）以西地区，“使中原表里受敌”，牵制宋军，解除对后蜀的直接威胁。孟昶此举，恰成为宋廷出兵的借口，赵匡胤笑道：“吾西讨有名矣。”⑧

十一月，赵匡胤派6万人马，分两路伐蜀：一路由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统领，自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南下，进攻剑门（今四川剑阁北）；一路由刘光义、曹彬等统领，自归州（治今湖北秭归）逆长江西上，直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东）。孟昶即以其子孟元哲为元帅，与知枢密院王昭远指挥后蜀军队抵抗宋军进攻。不料，剑门一战，蜀军一触即溃，王

昭远被俘。王全斌攻破蜀军防线，挥师进逼成都。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献城投降。不久，刘光义亦率兵抵达成都。至此，宋军前后仅用 66 天，即灭后蜀，而得州 45、县 158、户 534039。

宋军平定巴蜀后，却大肆抢掠，屠杀后蜀降兵，激起四川百姓的反抗。三年，四川地区先后爆发上官进、全师进领导的蜀兵和百姓的反宋斗争。历时 3 年，方被宋军镇压平息。为安抚四川军民，赵匡胤下诏，将王全斌等将帅降职处罚，并肃正军纪，逐步稳定四川局势。

后蜀灭亡前后，占据岭南的南汉政权，正因刑罚严酷，滥杀无辜，加之赋役繁重，民不聊生，统治岌岌可危。大臣邵廷琄认为宋军大举南下，南平、楚及后蜀诸国相继覆灭，宋朝“必将尽有海内，其势非一天下不能已”⑨，建议后主刘鋹与宋通好。刘鋹非但不采纳，反而以谋反罪将其处死。其后，赵匡胤也设法通过后唐劝说刘鋹归顺宋朝，亦遭拒绝。宋开宝三年（970）九月，赵匡胤令潘美统行营前军，尹崇珂为副帅，领大军讨伐南汉。宋军自郴州（治今广东韶关），敲开南汉北边的大门。四年正月，宋军再克英州（治今广东英德），逼近广州。

面对接踵而至的失利，刘鋹竟孤注一掷，调集全国军队救援广州，又于城外编竹木为栅栏，以阻挡宋军的进攻。潘美施以火攻。他下令征调数千民夫，每人手持两只火炬，待天黑以后，悄悄接近南汉军营。一声令下，万火齐发，刹那间，火光冲天，火借风势，广州城外一片火海，南汉后主抱头鼠窜。宋军趁势猛攻，杀死南汉兵士数万人，随即破城而入。刘鋹下令焚烧府库，正欲出逃海岛，适逢宋军追赶而至，束手就擒。宋军一鼓作气，继续攻占岭南各州县重镇，很快平定了岭南，得

州60、县214、户170263。

南方诸割据政权中当属南唐最为强盛。然而五代末期，后周世宗三次亲征南唐，夺得江北、淮南14州、60县之地，与其划江为界，为此南唐君臣惊恐万状。自赵匡胤称帝后，南唐后主李煜便百般讨好宋朝，企图以此维持自己的割据小政权。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宋军在统一南方之初，也未与之宣战，但却与地处南唐东南的吴越政权结成军事同盟，以此钳制南唐，构成对它的包围形势。

灭亡南汉后，宋军进行休整。宋开宝七年（974），赵匡胤命曹彬、潘美为大将，统兵10万，自荆南乘战舰顺长江而下，开始了统一南唐的战争。

李煜自以为与宋结好而苟且偷安，军不设防，当宋军进入南唐辖境，沿江屯驻南唐兵士还以牛酒犒赏宋兵。及至发觉宋军翦灭南唐的意图，为时已晚。南唐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守将戈彦弃城而逃，兵卒不知所措。宋军沿江推进，只遇到一些小抵抗，便顺利到达位于金陵（今江苏南京）西南的重要渡口——采石矶（位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使大军渡江作战，宋军采纳江南人樊若冰（一作水）的建议，将大船串联排列，于江上搭建一座浮桥，使江北的宋军得以跨越天堑，进入江南。还在宋军搭建浮桥时，就有消息传入金陵，可南唐君臣却以为长江自古无桥，宋军此举不过是儿戏罢了，丝毫不予理会。待得知浮桥架成，宋军已顺利渡江时，国都金陵已陷入包围之中。此时，宋廷又约吴越出兵夹击。吴越派兵攻克常州（今属江苏），于润州（治今江苏镇江）与宋军会师，合兵围攻金陵。

南唐后主李煜虽身处重兵围困之中，仍梦想保全自己的地位，便委派大臣徐铉前往开封（今属河南），恳求赵匡胤缓兵。

赵匡胤按剑厉声呵斥道："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⑩徐铉吓得魂不附体，仓皇退下。李煜见乞求不成，又欲殊死相拼，下令调集十几万军队急速救援，分别驻扎于金陵城内外。又令江西派兵增援，企图切断采石浮桥，阻截宋军后援，但均未奏效。

八年十一月，金陵被围已达一年，李煜再次派遣徐铉入见宋帝，恳请退兵，又遭赵匡胤断然拒绝。宋军在击败南唐援军及地方武装，并于金陵城下多次大败南唐兵后，终于攻陷城池。还在出兵南唐之前，赵匡胤曾专门召见曹彬、潘美等将帅，告诫道："城陷之日，慎无杀戮。设若困斗，则李煜一门，不可加害。"⑪因而宋军入城，秋毫无犯。后主李煜无计可施，只得投降。曹彬等令其写文书致南唐诸州县长官，命他们投降宋朝。诸州县多遵命而行，唯有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军校胡则杀刺史，据城固守，拒不从命。5个月后，被宋将曹翰攻破城防，死者数万人。宋朝彻底平定了南唐，得州19、军3、县180、户655060。

吴越王钱俶因出兵助宋进攻南唐，也曾得到宋帝的赞赏，得以"守太师，尚书令，益食邑"⑫。及南唐灭亡，钱俶于开宝九年（976）偕子钱惟濬等入朝开封，觐见赵匡胤，并进献银绢、乳香、吴绫等物，其值数以亿万计，旨在恳请宋廷允许保留自己的一席之地。朝中自宰相以下官员均向赵匡胤奏请扣留钱俶父子，乘机出兵夺取吴越之地。赵匡胤未作应允，依旧允许他们返回吴越。待钱俶父子等辞行之时，赵匡胤"取群臣留己章疏数十轴，封识遣俶，戒以途中密观。俶届途启视，皆留己不遣之章也"⑬。钱俶读毕奏章，悲喜交加，既对宋帝感恩不尽，又对宋臣的上疏恐惧无比。此后，他时时处处小心谨

镇，倾心竭力亲近宋廷，百般殷勤顺从。

与吴越相毗邻还有一处割据政权，即占据漳州（今属福建）、泉州（今属福建）一带的陈洪进。在江南诸政权中，以陈洪进的势力最为弱小。为保全自己，不为其他政权所兼并，陈洪进积极与宋朝交往、靠近，并请求加封，而被赵匡胤任命为节度使。其后，他一直向宋廷称臣纳贡，保持着和睦友好的关系。正因如此，宋廷像对待吴越一样，未派兵进剿陈洪进。不过，陈洪进还是从宋廷对待吴越王钱俶的态度上，觉察到其中的用心和意图。因此，当赵匡胤去世，赵光义（是为宋太宗）即位后，陈洪进惶恐不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亲自入开封朝贡，并主动向赵光义献出漳、泉二州及所辖14县、151978户和兵士18727。赵光义授予陈洪进为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

陈洪进的"纳土"，亦使先期到达开封城朝贡的吴越王钱俶坐卧不宁。在这种形势逼迫下，钱俶只好向赵光义请求罢免自己的吴越国王称号，解除天下兵马大元帅等官衔，并乞求允许自己返回吴越。但这一请求又遭到宋帝的拒绝。钱俶的谋臣崔仁冀告诉他："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纳土，祸且至。"⑭钱俶亦感到，仅去王号，免除官衔，而保留原有地位，绝非宋廷所能应允，况且此刻身处宋都，距吴越千里之遥，自己已被握于宋人手中，插翅难逃。他权衡再三，最终决定效仿陈洪进，向赵光义献出吴越所辖13州、1军、86县、户550686和115036兵士。赵光义欣然接纳了钱俶的献地，亦给予优厚的待遇，封他为淮海国王，其子钱惟濬为淮南军节度使、钱惟治为镇国军节度使。

至"陈洪进纳土"、"吴越归土"，最终结束了自唐末以来，

江南诸政权并立的分裂割据局面，北宋亦完成其统一南方的战略，版图迅速扩大，国势日渐强盛。

注　释

①王偁《东都事略》卷一八《魏仁浦传》。

②《东都事略》卷二一《张永德传》。

③《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九。

⑤《长编》卷三。

⑥⑦《长编》卷四。

⑧《长编》卷五。

⑨《新五代史》卷六五《南汉世家》。

⑩《东都事略》卷二三《李煜传》。

⑪⑫⑬《宋史》卷三《太祖纪三》。

⑭《长编》卷一九。

两宋

征伐北汉

宋朝建立后，其西北边尚有割据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的北汉政权。它以太原为中心，尽管是“地狭产薄”①，国势并不强盛，然而由于依附于契丹族，得到了辽朝的扶植和保护，声势壮大，竟得以于五代后期的动荡局面中维持住自身的统治。宋廷在制定消除分裂割据，实现一统天下的战略时，不得不考虑到“太原（指北汉）当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则我独当之”②，而采取“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战略，姑且先搁置北汉，而集中兵力翦除南方诸割据政权，以统一南方，完成第一步战略后，再北上灭亡北汉。

不过，由于北汉毗邻宋朝，威胁很大，因而赵匡胤曾一度设想先用兵太原。即使是统一的战略制定后，其主观愿望仍想寻找战机，一举消灭之。北汉自建立后，始终是“土瘠民贫，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繁役重，民不聊生”③，国内统治极不稳定。宋开宝元年（968），北汉主刘承钧病亡，由其养子刘继恩继位为帝，此举立刻招致北汉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遂部署出兵征伐，令昭义军节度使李继

勋等将领率兵北上。九月，宋军一路征战，屡败北汉军，直逼太原城下。北汉更陷入混乱，权臣郭无为谋杀了刚即位的刘继恩④，拥立其弟刘继元为北汉主。且火速派人向契丹求援，以解救太原之危难。辽穆宗迅速派兵入援，宋军腹背受敌，无功而还。

宋与北汉的初次交锋虽未达预期目的，但赵匡胤仍不肯罢休，依旧寻机出兵灭亡北汉。二年二月，他再次决定发兵，又作了周密的部署：令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侍卫步军指挥使党进为前军副都部署，宣徽南院使曹彬为都监，棣州防御使何继筠为石岭关部署，建雄军节度使赵赞为汾州路部署，统兵正面进攻北汉。又令彰德军节度使韩仲赟为北面都部署，彰义军节度使郭延义为副都部署，领兵北上防御辽军南下救援。各路人马由赵匡胤亲自统帅，自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北上。首战，李继勋于太原城下大败北汉军。赵匡胤随后亲临城下，仔细察看城池地形，认为可以引汾河水灌淹太原城，遂下令沿汾河修筑长堤。又于太原城外四周构筑营寨，部署兵力，以李继勋驻军城南，赵赞驻军城西，曹彬驻军城北，党进驻军城东。宋军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后，随即北引汾河水灌城。

太原告急，求助辽帝，辽廷遂再次出兵入北汉救援。何继筠指挥宋军奋力截击，于阳曲（今山西太原北）击败辽军，斩首数千级，暂时阻止住辽军的南下。赵匡胤令兵士将所获辽军首级、铠甲陈列于太原城下，以示北汉君臣尽早投降。然而，辽军此次救援北汉，分兵二路：一路入援太原，一路则入侵宋境，以此分散、牵制宋军，达到救援的目的。韩仲赟虽于定州（今属河北）北与辽军交战获胜，但形势依然十分危急。赵匡胤令兵士连续猛攻太原，守城北汉兵拼死抵抗，宋军伤亡惨

重，“诸军欲登城以死攻，上愍之，不允”⑤。赵匡胤见太原久攻不下，遂下令决堤，水淹太原城。辽军亦加紧攻势，宋朝边境频频告急。尽管太原城下已激战数十日，终未能攻陷，宋军疲惫不堪，且形势日趋严峻，无奈，赵匡胤只得下令撤军。临撤退时，他又下令将北汉境内数万百姓迁往山东，以削弱北汉实力。宋军撤离太原后，又分兵赴镇州（治今河北正定）、潞州镇守，并于河北广筑城池据点，以防御辽军南下。

此次战役的失利，表明宋朝尚不具备彻底消灭北汉的实力，因而，赵匡胤只得暂时放弃这一意图，按照既定的“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统一战略，调兵遣将，集中兵力先统一南方。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经过10余年的征战，宋朝消灭了南方诸割据政权，统一南方的大业已告结束。宋太宗赵光义便继续赵匡胤未竟事业，决定再度征伐北汉，实现统一天下的夙愿。四年，他派遣官员分赴国内各地，征调粮草、军械，陆续运往太原行营，以备战争之用。随后又任命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德节度使李汉琼、彰信节度使刘遇、桂州观察使曹翰各配以卫府将帅，领兵四面进讨。又以侍卫马军都虞候米信、侍卫步军都虞候田重进并为行营指挥使，率领所辖马军、步军为后续；西上閤门使郭守文、顺州团练使梁迥负责监护。鉴于太祖征伐北汉，失利于辽军救援的教训，赵光义特任命云州观察使郭进为太原石岭关都部署，专事阻击燕州（治今北京西南）、蓟州（治今天津蓟县）入援北汉的辽军。经过一番精心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二月，赵光义离开京城，指挥各路人马，浩浩荡荡进兵北汉。

三月，战争全面展开。首战，郭进率先攻克西龙门砦，俘

获北汉将兵甚众。随后又于石岭关南大败辽军援兵。宋左飞龙使史业亦大败北汉鹰扬军。党项族拓跋部首领、夏州节度使李继筠也率部东进，助宋进攻北汉，并分兵阻击辽军。北汉军队不敌宋军的猛烈进攻，连失重镇，节节败退。于宋军捷报频传之际，为防止辽军趁宋朝后方空虚入侵骚扰，以尽快消灭北汉，赵光义又以孟玄喆、刘廷翰为兵马都钤辖，崔翰为总领马步军，一同驻守镇州，以增强御辽兵力。

四月，赵光义亲临前线，指挥宋军全线出击，对北汉发起强大攻势，先攻占岢岚军（今山西岢岚），俘获军使折令图；又克隆州，俘虏北汉招讨使李询等将；再克岚州（治今山西岚县北），斩杀北汉宪州刺史郭翊，擒获嫢州节度使马延忠。很快，宋军便推进到太原城下。赵光义下诏，令北汉主刘继元献城投降，刘继元借城防拒守，不肯束手就擒。赵光义随即下令，命诸将领指挥兵士发射机石攻城，并于太原城外遍筑营寨，相连为城，将太原城团团围困，层层封锁。

五月，宋军首先进攻太原城西南，经过浴血奋战，攻陷羊马城，生擒北汉宣徽使范超。进而，又于城西北发起猛攻。在宋军的猛烈攻势下，北汉政权孤立无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太原城危在旦夕。北汉指挥使郭万超见大势已去，遂出城投降。宋帝诏令太原城守军投降，然而诏书传入城中，却未见有何动静。宋军便再度攻城，将士人人奋勇当先，攀援城墙，拼死杀敌，北汉兵士已难以抵挡，攻克太原城指日可待。刘继元深感覆灭将临，已无计可施，连夜派遣使臣出城，面见赵光义，表示愿意归顺宋朝。第二天，刘继元率北汉文武大臣，出城投降。至此北汉灭亡。

北宋削平北汉，又得 10 州、1 军、40 县、户 35220，亦

基本实现削平割据，一统天下的战略，更由此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社会局面和历史。此后，赵光义又命祠部郎中刘宝勋知太原府，调整更定原北汉所辖州县。并对投降的原北汉将校官吏给予优厚的赏赐和待遇，原北汉主刘继元授封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为庆贺平定北汉大捷，赵光义特作《平晋诗》，令随从大臣和韵。遂又将自己于太原的行营更名为“平晋寺”，令匠人将己所作《平晋诗》刻石立于寺中，以示自己克复天下的志向和豪情，故而史称之“帝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⑥。

注　释

①《长编》卷四。

②《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

③《资治通鉴》卷二九O。

④《宋史·太祖纪》则称，“北汉供奉官侯霸荣弑其主继恩”。

⑤《宋史》卷二《太祖纪》。

⑥《宋史》卷五《太宗纪》。

两宋

高梁河之役

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亦称契丹国），因援助后唐节度使石敬塘称帝建立后晋，遂得以割占“幽云十六州（又称燕云十六州）”之地，为其染指中原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赵、魏之北，燕、蓟之南，千里之间，地如平坻，步骑之便，较然可知”①，从而对中原构成极大威胁。

后周世宗柴荣（即郭荣）励精图治，亲统大军攻辽，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中的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莫州（治今河北任丘）、易州（治今河北易县）3州和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益津关（位今河北霸县境）、淤口关（位今霸县东）等“三关”之地，威震契丹国。然而正当其实现统一北方的宏图战略时，不幸染病去世，十六州失地未能尽收。

北宋建立之初，辽朝正值国势强盛之时，且又与北汉结好，雄踞于北方。宋太祖赵匡胤与臣僚商讨削平南北方割据政权，统一天下的战略时，亦想统一幽云，然而又对辽朝存有重重忧虑，深感自身实力难与之相对抗，曾设想用赎买的办法，即用金帛与辽交换这一地区。为此，赵匡胤于宫内专门设置了

一个封桩库，贮藏金帛财物。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讲："石晋（指后晋皇帝石敬塘）苟利于己，割幽蓟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直。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②此后，宋军出兵南方，翦灭割据政权时，赵匡胤十分留心聚敛财富，以充储封桩库，一则以此赎回幽云之地，二则用作武力收复时的军饷。然而此事后来未有结果，但赵匡胤却始终惦念着夺回北方这片土地。宋开宝九年（976），灭亡南唐，统一南方已成定局。捷报传入京城开封，群臣激昂，以为可喜可贺，奉表请加赵匡胤尊号为"一统太平"。赵匡胤婉言谢绝，认为："燕晋未复，遽可谓一统太平乎？"③不过，他终未及实现"一统天下"的夙愿，便在一天深夜，与其弟赵光义密谈时，于"烛影斧声"中突然逝去。

赵光义（后更名为炅，是为宋太宗）继位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出兵灭北汉。宋军曾一举击败由辽南院宰相耶律沙率领的援军。夺取太原（今属山西）之后，赵光义以为一统天下已万事俱备，错误地低估了辽军的实力，以一役的胜利而过于相信自己的军事力量，便决定趁灭北汉之大捷，一举收复幽云之地。他不顾群臣的劝谏和反对，在未及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坚持出兵进攻燕京（今北京西南）。六月，赵光义开始部署北伐幽蓟，他先设置北面行营，作为攻辽的据点，"遣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赴北面行营"④。并决定自己亲统各路人马，任命将帅分兵指挥。宋军自太原出发，一路无阻，顺利抵达北边重镇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因不熟北上路线，乃从当地百姓中募得百名向导。宋军的大举北伐，是辽未预料的，因而北上几乎未遇辽兵阻击。宋军进兵东易州（治今河北易县），

辽刺史刘宇献城投降。赵光义留下千余名兵士守卫城池，又继续指挥宋军东进。后抵涿州（今属河北）城下，辽涿州判官刘厚德亦开城请降。宋军直至幽州（治今北京西南）城郊，方与辽军正式遭遇。宋军驻扎于城南，辽军则屯兵于城北，两军对峙，剑拔弩张。赵光义见辽军孤立无援，遂亲自率兵出击，经过一番激战，辽军不敌，大败而逃。

幽州城郊失利，燕京辽军随即积极备战，并向辽廷求援。宋辽争夺燕京的大战在即，赵光义亲临阵前部署，令定国节度使宋偓、河阳节度使崔彦进、彰信节度使刘遇、定武节度使孟玄哲分兵从四面进攻燕京城，又以潘美知幽州，职掌府事。部署完毕，赵光义又将自己的行营移到城北，便于直接指挥各路兵马攻城。

在宋军强大的攻势下，燕京周围的诸多辽军据点及重镇纷纷倒戈，辽地方官吏相继率部投降。幽蓟之地本是汉人聚居地区，百姓亦不满契丹人的统治和欺凌，宋军的到来，使当地的汉人百姓欣喜若狂，纷纷“以牛酒犒师”⑤，支援宋军攻城。宋军将士受此激励，斗志愈发高昂，拼死杀敌，欲攻陷城池。七月，统领顺州（治今北京顺义）的辽建雄军节度使、知顺州刘廷素叛辽降宋。随后，辽知蓟州刘守恩亦开城降宋。至此，燕京城处于宋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一座孤城。城内辽军官兵人人自危，惶恐不安，已无心固守城池，而城中汉人百姓更是“民怀二心”⑥，急切盼望宋军入城。在此有利形势下，赵光义更感胜利在望，他不顾一切，亲自乘坐于战车之上，每天都要到近城之处督军，指挥攻城。

宋军的大举北伐及燕京地区的危急局势，使辽廷大为震惊，辽景宗耶律贤立刻派大将耶律休哥火速赶往燕京救援。耶

律休哥领命，率军直奔燕京，给宋军以措手不及。燕京城下，赵光义正全力指挥宋军攻城不止，不想辽军援兵突然来临，只好于阵前调兵遣将，仓促应敌。两军遂于城外高梁河（位今北京东南）展开激战。初战，宋军阵容齐整，将士顽强杀敌，令辽军兵将望而生畏，勉强抵挡住进攻。再战，耶律休哥于阵前观察到宋帝亦在宋军阵中指挥作战，随即命令辽军主力径直冲入宋军，直扑赵光义的卫队。这一突如其来的冲杀，立刻打乱了宋军的阵脚，赵光义也一时忙于应敌，顿时乱作一团。辽军趁势猛攻，宋军无力抵抗，顷刻溃不成军。辽兵于宋军阵中横冲直撞，刀劈斧砍，万余宋军兵将被杀，伤者无计其数。赵光义在众将士的护卫下，左突右冲，经过一番殊死拼杀，才得以突围脱险，撤退到涿州，"窃乘驴车逃去"⑦。宋军犹惊弓之鸟，沿途丢盔弃甲，损失军械物资"不可胜计"⑧。

宋军全线败退，辽军则乘胜追击，形势急转直下，不仅已占据的蓟、顺等重镇相继失守陷落，宋朝北边更是形势严峻。赵光义唯恐辽军尾随其后，长驱直入，特令孟玄喆屯兵驻守定州（今属河北）、崔彦进领兵屯守关南（指瓦桥关南）、潘美带兵屯驻河东三交口。对于北伐燕京中失职的将领一律贬职，原西京留守石守信贬为崇信军节度使，刘遇贬为宿州观察使。经此番举措方才得以稳定军心，缓解了紧张的形势。

不久，宋镇州都钤辖刘廷翰于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大败南下追击的辽军。忻州（今属山西）、关南的宋军亦先后击退辽军的进犯，杀死辽兵数万。五年，宋宣徽南院使潘美又于雁门（位今山西代县北）再败辽军，并于阵前斩杀辽驸马、侍中萧咄李，俘获辽都指挥使李重海，从而遏制了辽军南下的势头，稳定了北部边防。

此后，赵光义又对北疆的防御作了周密的安排，派出众多军队分别屯驻于关南、镇州、定州；征调自京城开封至雄州（治今河北雄县）一线附近民夫，修筑直达北疆的驿道，以作为传递军情及调兵之用；又令禁军统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米信负责定州屯兵之事。这一系列安排旨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北部边防，其后边境局势确实相对安稳。

赵光义既稳定北疆防御，有效阻止辽军的南侵，但仍不忘前师之耻，依旧寻机北上征伐契丹。十一月，赵光义再度指挥宋军北伐。宋辽首战于关南，宋军大破辽军，赵光义遂任命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关南都部署，继续领兵征讨。再战，两军交锋于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宋军虽竭尽全力拼杀，终未获胜。二次北伐再度失利，使赵光义感到宋、辽两国势均力敌，夺取幽云之地绝非易事，不敢再贸然用兵，而改变策略，一面继续加强北部边防，委以保静军节度使刘遇、威塞军节度使曹翰为幽州东、西路部署，米信为定州都部署等；一面则“诏渤海琰府王助讨契丹”⑨，欲夹击辽朝。宋军自此基本处于守势中，除局部地区与辽发生战事，取得一些战绩外，再未有大规模的战争。

注　释

①《旧五代史》卷八九《桑维翰传》。

②《长编》卷一九。

③《长编》卷一七。

④⑤《宋史》卷四《太宗纪》。

⑥《辽史》卷八三《耶律学古传》。

⑦⑧《辽史》卷九《景宗纪》。

⑨《宋史》卷四《太宗纪》。

两宋

雍熙北伐

辽乾亨四年（982），辽景宗耶律贤病故，由其子耶律隆绪继位，是为辽圣宗，时年12岁，改元统和。因耶律隆绪年幼，故耶律贤临终前遗诏由皇后、耶律隆绪生母萧燕燕（汉名绰）摄政。其后上尊号为承天皇太后。

萧燕燕本为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耶律贤即位后，册封其为皇后。史称她“习知军政”①。耶律隆绪初立，承天皇太后临朝称制，辽廷内部极不稳定，军政大权多握于宗室贵戚手中。且国主年幼，朝臣多怀观望的态度。南邻的宋朝不断窥视幽云之地，随时可能再度出兵北进，形势十分紧张。承天皇太后毅然启用守卫南京幽都府（今北京西南）有功的南院枢密使韩德让（后受赐姓名耶律德昌）总领宿卫事，后又兼政事令；任命于燕京（今北京西南）、瓦桥关（位今河北雄县西南）二度大败宋军的北院大王耶律休哥为南京留守，兼南面行营总管，总领南面军务，许便宜从事；提升南院大王耶律斜轸为枢密副使，继而进为北院枢密使、都统。几位受宠重臣同心戮力，共同辅佐辽帝、太后，使辽朝政局很快得到控

制，并迅速趋于稳定，国内各种矛盾亦得缓和。

然而，辽朝易主的消息传入宋朝，群臣却以为是北伐幽云的极好战机。知雄州贺令图等人上奏称："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请乘其衅，以取幽蓟。"②一心想收复幽云诸州的宋太宗赵炅（即赵光义），遂调兵遣将，决定再次发动对辽的大规模征战。宋雍熙三年（986）正月，部署宋军兵分三路北上。东路，以天平军节度使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河阳三城节度使崔彦进为副将，又以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彰化军节度使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沙州观察使杜彦圭为副，统兵10万，出雄州（治今河北雄县），直进燕京；中路，以侍卫步军都指挥、静难军节度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统兵自定州（今属河北）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县北），直取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路，以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都部署，是为本路主将，以云州观察使杨业为副将，统兵出雁门关（今山西代县北），进攻山后诸州。待中、西两路宋军攻克各自的既定目标后，再与东路军会师，合围燕京。临发兵前，赵炅叮嘱曹彬："潘美之师但先趣云（治今山西大同）、应（治今山西应县），卿等以十万众声言取幽州（治今北京西南），且持重缓行，不得贪利。彼闻大兵至，必悉众救范阳（今北京西南），不暇援山后矣。"③即要他统兵牵制辽军主力，掩护西路军进攻，待中、西路军得手后，集中兵力进攻燕幽。

三月，三路大军相继发兵，与辽军交战。战争伊始，宋军势如破竹，捷报频传。东路，曹彬率军与辽军首战于固安（今属河北）南，一举攻占城池，继而，兵进涿州（今属河北），再战又克，且于涿州城南大败辽军援兵，斩杀奚人宰相贺斯。

中路，田重进率兵与辽军首战于飞狐北，大败辽军。再战，采用定州路行营马步军都监袁继忠计，伏兵于飞狐南口，大获全胜，生擒辽骁将、西南面招安使大鹏翼，监军、康州刺史马頵（一作赟），副将、马军指挥使何万通及渤海军3000余人，斩首数千级，俘虏辽军兵士万余。田重进指挥宋军追击辽逃兵，长驱直入40里，迅速发兵攻飞狐，辽守将吕行德、张继从、刘知进等献城投降，宋廷遂改飞狐县为飞狐军。随后，田重进又挥师进围灵丘。西路，潘美、杨业率大军自西陉进兵辽境后，即与辽军相遇激战，辽军溃败而逃，宋军紧追至寰州（治今山西朔县东），刺史赵彦辛出城投降。而后，西路军继续北进，包围朔州（治今山西朔县）。杨业之子、杨业军先锋将杨延昭（原名杨延朗）率兵攻战于朔州城下，激战中他臂中流矢，依然顽强厮杀，战斗不止，辽守将、节度副使赵希赞开城请降。宋军占据朔州，又进兵应州，宋将、节度副使艾正、观察判官宋雄慑于宋军兵威，亦献城请降。

四月，潘美、杨业率领西路军继续推进，再攻陷云州。田重进率中路军于飞狐北，两度重创辽军，斩杀两员辽将。进而挥师蔚州，辽守军牙校李存璋、许彦钦诛杀大将萧啜理，擒获监城使、同州节度使耿绍忠，率城中吏民降宋。西、中二路宋军节节胜利，连克辽山后重镇，尽收要害之地，兵势大振。曹彬率东路军亦连下辽境州县，然而因其进兵过速，粮草不济，至涿州10日后，竟无粮供食，只得退兵雄州等待粮草。赵炅闻讯，十分恼怒道："岂有敌人在前，后退军以援刍粟，失策之甚也。"④立刻派遣使臣前往军中，令曹彬速率兵沿白沟河与米信会师，而后按兵不动，养精蓄锐，以声援西路宋军，等潘美、杨业全部占据山后重镇，与田重进合师东进，三路会合

共取幽州。命令虽已下达，然曹彬帐下诸将得知潘美、田重进两路军已累建战功，而自己尽管兵力精壮，却未能有所攻取，战绩平平，遂谋议蜂起，纷纷请求出战。曹彬见众将争功请战，不得已，乃下令携带有限的粮草再度进兵涿州。

时辽援军未至，耶律休哥力寡势单，不敢贸然出战，只于夜间派轻骑深入曹、米两军之间，斩杀流动于营外的零散体弱的宋军兵士，以恐吓宋兵；白天则布列精锐，虚张声势，使宋军忙于防御，疲惫不堪。时值五月，天气炎暑，宋军人马困乏，军中粮草又将告罄。耶律休哥又派兵设伏于林莽之中，截断宋军粮运。曹彬等宋将见粮草不济，令兵将移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北）驻守。一月之后，曹彬指挥宋军再度北进涿州。耶律休哥仍不断派遣轻骑沿途骚扰，抢夺宋军食粮，袭击离队落伍者，边战边退。宋军常顾此失彼，自顾不暇，只得收缩阵容，集结方阵而行。酷暑当头，沿途缺井少河，将兵干渴难忍，多就沼泽泥潭饮水，行进迟缓，四日方抵涿州。此时萧太后已亲统援军赶赴城下，兵势倍增。曹彬料难以制胜，便率兵冒雨后撤。萧太后指挥精锐紧追不舍。米信独自率领麾下 300 龙卫卒断后，被辽军重重包围，宋兵奋力拼杀，辽兵放箭，矢下如雨。米信殊死搏斗，射死辽兵多人，终因寡不敌众，龙卫卒多阵亡。宋军不敌辽军的进攻，便环列于粮草之外，边反击边撤退，等行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时，终被耶律休哥所领辽军团团围困。日近黄昏，米信手执大刀，率随从骑士呼喊着冲向辽军，杀死数十人，辽军稍稍后退。米信随即带领百余骑冲出重围，曹彬亦在众将士护卫下，突围而去，其余兵将皆溃败而逃，死伤无计。突出重围后，曹彬、米信收拢散兵，连夜渡过拒马河，退守易州（治今河北易县）。辽军紧随其后，

亦追击至易州东。耶律休哥侦知宋军于沙河边集结有数万之众，急令辽军前往攻击。宋军竟然望尘而逃，未及交战已溃不成军，以至为夺路逃生而相互挤撞坠落岸下或自相践踏而亡者过半，致使沙河水流阻断。

东路宋军的失利，使宋廷北伐战略难以实现，赵炅下令各路人马撤军，并召曹彬、崔彦进、米信等将返朝，令田重进屯守定州，潘美退守代州。进而又令潘美、杨业所部护卫，将云、应、朔、寰 4 州之民及吐浑部族分别迁入内地河东、京西地区。此时，辽萧太后与大臣耶律斜轸、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率领 10 余万大军，已攻陷寰州，形势危急。杨业认为，辽军兵势正盛，不可与战。朝廷亦只令迁徙 4 州之民，可先派人密告云、朔州守将，待我军出代州之日，各州民众即出城南下；我军行至应州，辽兵必定会来阻截，再令朔州民出城，直入石碣谷。再派千名强弩手布阵于谷口，派骑兵于中途接应，那么 4 州之民可安然撤退。不料此议却遭到监军、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的嘲讽，认为杨业领有数万精兵却如此怯懦，而当大张声势，直趋雁门关北。监军、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亦赞成此议。杨业坚持已见，不同意进兵。王侁竟讥讽道："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无奈，说道："业非避死，盖时有未利，徒令杀伤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责业以不死，当为诸公先。"他负气出征，临行前，哭泣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上不杀，宠以连帅，授之兵柄。非纵敌不击，盖伺其便，以立尺寸功以报国恩，今诸君责业避敌，业当先死于死！"⑤他又指着陈家谷口，约潘美在此设伏，待自己引辽兵至此，即发步兵左右夹击。

杨业领兵出击。耶律斜轸闻业且至，即令辽军佯败而退，杨业指挥宋军紧追其后，遂误入伏击。等辽军伏兵出击，耶律斜轸与萧挞凛联兵夹攻，杨业难以抵挡，乃败退后撤，辽军穷追不舍。自杨业领兵出发后，潘美与王侁等先是率杨部兵士于陈家谷口布阵设伏。自寅时至巳时，始终未见杨业踪影，王侁命人登山颠托罗台瞭望，亦不见动静，竟以为辽军败走，他又欲借机争功，立即带兵离开谷口，追击辽兵。潘美见此情景，亦不能制，只得随同大队人马沿灰河进发。行进约 20 余里，忽然传闻杨业遇敌战败，宋军顿时紧张异常，潘美与王侁等人不顾与杨业有约在先，竟率部迅速后撤。杨业孤军力战，自午时直杀至傍晚，边杀边退，终抵达陈家谷口。杨业于马上眺望谷口，指望得到接应，然而竟未见宋军一兵一卒，不禁捶胸失声大哭。他深知已无路可退，随即调转马头，率领帐下将士，再次冲向辽军。经过一番苦战拼杀，终因寡不敌众，人疲马乏，杨业帐下将士相继阵亡，其子杨延玉亦不幸身殁，他自己身上伤痕累累，只身一人陷入辽兵的团团围困之中。杨业于马上挺刀，依旧奋力杀敌不止，百余名辽兵死于其刀下，直至其马受创倒地，他才为辽军擒获。杨业被押禁于辽军营帐中，他叹息道："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至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⑥遂绝食，3 日而逝。

宋军北伐全线受挫，辽军乘胜大举进犯宋边，夺回为宋军攻占的缘边州县城池。赵炅无可奈何，只有对北伐失职的将领给予处罚：贬曹彬为右骁卫上将军；崔彦进为右武卫上将军，米信为右屯卫上将军；潘美则降官 3 级，改授检校太保；监军王侁、刘文裕革除名籍，分别发配至金州（治今陕西安康）、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对北伐之中阵亡的将士则给予赈抚，

并赐其家眷3月口粮；特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眷布帛千匹，粟千石。同时，赵炅重新调整、部署北边戍守兵将，以阻止辽军南下。定州驻泊兵马都部署田重进率兵入辽境，攻下岐沟关（今河北涿县西南），杀死辽兵千余，缴获一批牛马辎重，暂时稳定了北疆局势。

是冬，萧太后再度统兵南下，以耶律休哥为先锋，首战大败宋军于望都。宋瀛州兵马都部署刘廷让率兵迎敌，于君子馆与辽军交战，他分出精兵交予沧州都部署李继隆为殿后，缓急为援。时值严冬，天寒地冻，宋军弓弩手不能拉满弓弩，无法射杀辽兵，刘廷让所部遂为辽军重重包围。李继隆见状，非但不救援，反而引兵退守乐寿（今河北献县）。刘廷让孤立无援，虽奋力杀突围，终未成功，其先锋将贺令图被俘，高阳关部署杨重进阵亡，全军数万将士战死，刘廷让仅率数骑冒死杀出重围，得以生还。此战失利，致使河朔地区宋军戍兵毫无斗志。辽军因此长驱直入，先后攻陷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祁州（治今河北无极，后移至安国）、德州（治今山东陵县）等州，杀戮宋朝官吏，掳获百姓，抢夺金帛财富，留下几座空城和一片焦土，遂满载而归。

此后，赵炅再不敢用兵北伐，宋廷对辽由攻势转为守势。

注 释

①《辽史》卷七一《景宗睿智皇后萧氏传》。

②③④《宋史》卷二五六《曹彬传》。

⑤⑥《宋史》卷二七二《杨业传》。

两宋

青城起义

北宋建立后，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对“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①的土地兼并现象，不加任何限制，致使社会贫富不均，差距悬殊，“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椎之地”②。尽管如此，北宋政权仍将因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而造成的巨额支出转嫁到百姓头上，不断加重赋税的盘剥。故自宋初之后，农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其中尤以四川地区最为突出。

四川物产丰饶，自唐朝中叶以来，中原地区屡经战乱，官僚富豪纷纷逃亡入川。他们疯狂搜刮掠夺，侵占田地，甚至将自己承担的赋税和徭役转交佃户承担。宋灭后蜀，又纵兵掳掠，并将后蜀府库贮存的金、银、铜、币、珠宝等“重货”和绢帛布匹等“轻货”运往京城，为此，强行征调大量民夫，水陆并运，直延续10余年才运完，此举更加重了四川地区百姓的负担。宋廷又于四川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贸易，禁止农民和商贩私下交易，豪强地主趁机“释贱贩贵”③，投机倒把，从中渔利，而使更多的农民丧失田地，商贩破产。不仅如

此，宋廷还在四川推行茶叶专卖，严禁茶贩贩茶，而由官府以极低的价格从茶农手中收购，使茶农、茶贩无以为生，整个四川地区的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四川大旱，百姓更是雪上加霜。而官府依旧“赋敛急迫”④，在天灾人祸的沉重压力下，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南）地区最终爆发了武装起义。

二月，因“贩茶失职”⑤的青城茶农王小波率百余众揭竿而起，他鲜明地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⑥、“均贫富”的主张，深得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和响应，“贫民多来附者”⑦，仅10天之内，起义队伍便发展到万人。

起义军在王小波的带领下，一举攻占青城县。义军又乘胜转战于邛州（治今四川邛崃）、蜀州（治今四川崇庆）、眉州（治今四川眉山）等地，并攻占眉州彭山县，生擒县令齐元振。齐元振曾被宋廷标榜为“清白强干”，受宋帝亲诏嘉奖，然而他勾结豪强，贪婪残暴，勒索无厌，民愤极大。起义军处死齐元振，将他搜刮聚敛之财全部分发给贫苦百姓。这一举动在农民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附近各县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队伍不断扩大。十二月，王小波率领义军自彭山北上，攻打成都东南战略重镇江原县（今四川崇庆东南）。四川都巡检使张玘正驻守于此，乃亲自督阵，令驻扎江原的西川宋军主力拼死抵挡，两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王小波与义军奋勇杀敌，交战中其额部不幸中箭，仍带箭继续指挥战斗。义军将士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终于攻克江原，打死张玘，夺取川西大战的胜利。然而不久，王小波因箭创甚重而牺牲。

王小波牺牲后，起义军遂推举其妻弟李顺继任义军首领。李顺原亦为青城县茶农，也是起义军中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

此后，他继续执行“均贫富”的纲领，利用江原大捷的有利形势，率领义军扩大战果。他下令召集乡里富人大姓，责令他们开具各自家中所藏钱财粟帛清单，呈报义军，“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⑧。与此同时，他于义军内部建立严格纪律，“录用材能，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⑨。李顺的这些举措，深得百姓称颂，起义军因此声势大振，队伍迅速发展到数万人。

江原大捷后，成都周围各州县如临大敌，惊恐万状，轻易不敢与起义军交战。四年四月，李顺再率义军主力攻克蜀州，杀死宋军监军王亮等十余名官僚。随后又攻占邛州，处死知州桑保仲、通判王从式等一批贪官污吏。之后，义军再向成都门户新津（今四川成都西南）江口挺进。据守于此的宋巡检使郭允能率宋军向义军发起猛烈进攻，双方激烈交战。在义军强大的攻势下，宋军惨败而逃，郭允能被击毙，同巡检使毛俨徒步脱逃。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先后攻占永康军（今四川都江堰市）、双流、新津、温江、郫县等重镇；一路则由李顺统领直逼成都。于成都城西郭门交战中，义军欲焚烧城门，失利，遂转而攻陷汉州（治今四川广汉）、彭州（治今四川彭州市）。起义军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的反抗斗志，纷纷加入义军，队伍很快壮大到数十万人。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惊了宋朝的统治者。东上阁门使、知成都府吴元载滥用刑罚，民众积怨，且未能镇压王小波起义而遭革职。宋太宗改任东上阁门使郭载知成都。镇守成都的西川转运使樊知古与都巡检使郭延濬等将领更加强了成都府的防御，以抵挡农民起义军的进攻。

李顺率领起义军迅速攻占汉、彭二州之后，又突然回师成都。淳化五年正月，义军再度对成都发起猛攻，守城宋军难以招架。十六日，义军攻陷城池，郭载与樊知古带着万余残兵败将拼死突围，逃往梓州（治今四川三台）。起义军进驻成都后，建立大蜀政权，李顺称“大蜀王”，建年号“应运”，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地方官署设刺史、知州等职。义军脸上刺有“应运雄军”四字。大蜀政权还铸造“应运元宝”铜钱和“应运通玉”铁钱，供辖区内流通。政权建立后，大蜀军派兵四出，“所向州县，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⑩，很快控制了北至剑门（今四川剑阁东北），南至巫峡的川峡大部分地区。其影响更超出了这个范围，秦陇地区由赵包率领的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和峡路数千名漕卒均闻讯准备响应。

宋太宗得知农民起义军向剑南（今四川剑阁以南）诸州进兵，遂命昭宣使、河州团练使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兵自剑门入川，且委以“便宜决遣”⑪，镇压起义军。二月初，太宗又闻成都失守，大为震惊，执意再增兵入川，又命少府少监雷有终、监察御史裴庄同为峡路随军转运使，工部郎中刘锡、职方员外郎周谓为陕府西至西川随军转运使，另以马步军都军头、勤州刺史王杲领兵趋剑门，崇仪使、带御器械尹元统兵由峡路入川，一切部署及行动均受王继恩节制。与此同时，太宗还多次下诏招抚，却又责令宋军严厉镇压，“尽加杀戮，不得存留”⑫。

李顺于成都建立政权后，分遣数千人，由杨广率领北攻剑门，以夺取川北门户。驻守剑门的都监、西京作坊副使上官正指挥兵士出击御敌。正在这时，从成都败逃的监军、供奉官宿

输率部下投奔剑门，两支军队合击大蜀军。杨广所领部众人少力单，非但未能攻陷剑门，反而遭致惨败，伤亡几尽，仅300余人退回成都。李顺恐消息走露，惊扰军心，下令将逃回的将卒全部斩杀于东门外。剑门争夺战失利，使宋军一直担忧的入川栈道被打通，从而长驱直入。北攻剑门的同时，李顺又派遣相里贵率20万主力军前去围攻梓州。梓州战略地位远不及剑门重要，右谏议大夫，知梓州张雍仍做守城准备，训练城中3000余兵，又招募千余强勇，贮藏金帛，熔铜钟铸箭镞，伐木为竿，绞布为绳。都巡检、内殿崇班卢斌援救成都，未果退还，被张雍委以监护之任。大蜀军行至梓州城下，派老弱兵士佯攻，诱宋军出城。卢斌率兵突出城外，与大蜀军击战50余回合，大蜀军不敌，稍稍后退。不久，大蜀军又设云梯、冲东、火车连夜攻城，梓州城中兵民惊恐万状。张雍召集百余名敢死之士，自城上悄悄吊出城外，放火烧毁大蜀军攻城器械。尽管如此，大蜀军攻势更加猛烈，连续攻城长达80余日，城中守军人心涣散。正当梓州告危之时，王继恩派内殿崇班石知颙率数千人前来救援，大蜀军处于前后夹击的不利形势下，被迫撤兵，退回成都。梓州一役，大蜀政权不仅损失了数万兵士，更因战略进攻的失利，致使由攻势转为守势。

四月，王继恩率宋军自小剑门路入研口寨（位今四川剑阁北），大蜀守军战败。宋军遂翻越青强岭，攻陷剑州（治今四川剑阁），控制入川要塞。随即，宋军连克广安军（今四川广安北）、绵州（治今四川绵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巴州（治今四川巴中）、蓬州（治今四川仪陇南）等地，疯狂屠杀大蜀军民，并形成对成都的包围。五月，宋军尾随自梓州撤退的大蜀军，追至成都城下。

成都城中十几万大蜀军在李顺等人的指挥下，沉着应战，战斗异常激烈。但终因寡不敌众，六日，宋军自坍塌城墙上突入城中，大蜀将士死者3万余人，城池陷落。大蜀政权的重要首领李顺、卫进、计词、吴文赏、李俊、徐师中、吴利涉等人被俘⑬，后被宋军押往开封（今属河南）途中，于凤翔（今属陕西）遭杀害。

成都陷落后，大蜀军民继续在四川各地顽强抗击宋朝官兵。宋将尹元统兵自峡路入川，“捕斩收集，久未得进”。即使是王继恩占据成都后，“郭门十里外犹为贼党所据”⑭。在分布于各地的大蜀军中，有两支队伍声势较大：一支由中书令吴蕴率领，有十余万众，曾一度攻打眉州（治今四川眉山）长达百余日。得知成都失陷后，吴蕴遂放弃围城，仍活动在眉州一带，到处打击宋军，处置官僚富豪。另一支为张余率领，有万余人，活动于川东地区，连续攻陷嘉州（治今四川乐山）、戎州（治今四川宜宾）、泸州（今属四川）、渝州（治今四川重庆）、涪州（治今四川涪陵）、忠州（治今四川忠县）、万州（治今四川万县）、开州（治今四川开县）8州，声势大震，队伍很快发展到数万人。此后，张余乘胜率部进攻夔州（治今四川奉节白帝城），又分兵进攻施州（治今湖北恩施）。五月下旬，张余在围攻夔州中，受到如京使白继斌与巡检使解守颙所率宋军的两面夹击，损失惨重，不得不撤离，退回嘉州。

大蜀军民的反抗斗争，再度引起宋廷的不安。十一月，宋军对农民武装开始了更大规模的镇压和围剿。王继恩派遣宿翰、都头梁继明统兵围攻吴蕴一部，大蜀军战败，吴蕴阵亡。眉、陵（治今四川仁寿）、简（治今四川简阳东）等州农民武装先后遭镇压。十二月，宿翰等又领兵自眉州直扑嘉州。大蜀

政权知嘉州王文操献城投降，张余被俘，余部退往邛州（治今四川邛崃），不久亦为宋军所败。至道元年（995）二月，张余于嘉州遇害。此后，散布于各地的农民武装多转入崇山峻岭之中，继续坚持反抗斗争，虽宋朝官府镇压、招抚并举，未能翦除。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率部众活动于邛蜀山区，且自称“邛南王”，兵进邛、蜀（治今四川崇庆）二州，未几亦遭镇压。其余地区的农民武装也坚持斗争长达数年之久，才陆续被宋军剿灭。

注　释

①《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

③⑤曾巩《隆平集》卷二O《王小波·李顺》。

④王偁《东都事略》卷四二《石普传》。

⑥⑦《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⑧⑨⑩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

⑪《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⑫《东都事略》卷一七《削平僭伪》。

⑬关于李顺下落，史载不一，或称城破时遇害，或称撤出成都，30年后于广州遇害。

⑭《续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三《李顺之变》。

两宋

澶渊之盟

北宋自高梁河之役和雍熙北伐两度失利后，宋廷内部恐辽情绪日渐滋生。继而党项拓跋部首领继迁叛宋臣辽，国内又爆发青州地区王小波、李顺的起义，外忧内患，令宋廷不得不重新调整内外策略。端拱二年（989），左拾遗田锡在回答宋帝赵炅（宋太宗）询问边备之策时，即提出："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①未几，赵炅亦认为："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②至此，宋廷"守内虚外"的内外策略已是基本定局。至后代，更有"夷狄者，皮肤之患，尚可治；盗贼者，腹心之疾，深可忧"③之说，明确提出预防"内患"乃为关系社稷安危之首要大事，"守内虚外"遂成为宋朝的基本国策。

在此策略下，宋廷一改对辽朝的攻势，而代之以守势。辽帝耶律隆绪（辽圣宗）自大挫宋军攻势后，亦对宋朝采取攻势，先后攻占宋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束城、文安等沿边重镇。同时，辽廷又利用继迁的叛宋归附，对他大加册封，授

予“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④，并应继迁之请，将契丹宗室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嫁之，结成联姻，而使党项拓跋势力与辽朝合成对宋朝的钳形攻势，首尾相应，夹困宋朝。面对此种形势，宋廷却一味消极防御，令宋军西起保州（治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姑海口，沿宋辽边境，利用河渠塘泊，筑堤蓄水，蜿蜒长达 900 余里，以为屏障。于沿边设置 26 寨、125 军铺，布置兵士 3000 余人，使“部舟百艘，往来巡警”⑤，企图以此阻止辽军的长驱直入。但对于入侵宋境的辽军，宋廷竟然规定，“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⑥。宋廷旨在息事宁人，与辽和解。然而辽廷已从中清楚地看到宋朝的虚弱，遂进一步加紧入侵和挑衅，不断派兵深入宋境，掳掠人畜财物，屠杀百姓，毁坏民宅庄稼，宋霸州（治今河北霸县）、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冀州（治今河北冀县）、邢州（治今河北邢台）、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等 10 余州军百姓惨遭涂炭。

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帝耶律隆绪及其母萧太后亲统辽军，以收复瓦桥关（位今雄县旧南关）南 10 县为名，大举南下，采取避实就虚战术，绕开有宋军重兵把守的城池，一路挺进，迅速围攻定州（今属河北）。辽军的迅猛进攻，使宋军措手不及，北方州县纷纷告急，公文一夕数次频传开封（今属河南），宋廷上下为之大震。此时在位的宋帝赵恒（宋真宗）虽曾表示要亲自统兵抵御辽军入侵，但事到临头，又心虚胆怯，犹豫不决。臣僚意见纷纷，参知政事王钦若劝说赵恒迁都升州（治今江苏南京）以避战乱，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则主

张迁都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惟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主张赵恒亲征北上。经过朝廷中主战派的力争，将王钦若调离，出镇天雄军府兼都部署，赵恒被迫同意北上。

临亲征北上前，宋廷又作了周密的部署，除倚重抗辽前线屡立战功，“勇于战斗，以名称相上下”⑦的杨延朗（杨业子，后更名延昭）、杨嗣外，又以天雄军都部署周莹为驾前贝冀路都部署，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为驾前邢洺路都部署。又令兵部尚书张齐贤兼青、淄、潍安抚使，权三司使丁渭兼郓、齐、濮安抚使。诏令定州路驻泊行营都部署王超等将领率兵赴宋帝临时驻扎之地，大将魏能、张凝、田敏统兵屯驻定州。还以山南东道节度、同平章事李继隆为驾前东面排阵使，武宁军节度、同平章事石保吉为驾前西面排阵使。为了防止党项拓跋部趁势侵扰宋疆，宋廷又委任西凉府六谷吐蕃部落首领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灵州西面巡检、西凉府六谷大首领，以牵扯党项。在完成了一系列的部署和安排后，赵恒才终于踏上北巡的征程。

南侵辽军号称20万，在耶律隆绪和萧太后的统领下，继续南下，又先后攻陷宋德清军（今河南清丰）、通利军（今河南浚县西北）等重镇，直抵黄河北岸的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城北。但辽军此番南侵，目的在于掠夺物资财富，并向宋廷炫耀武力，施加压力，因而在用兵进攻的同时，又不断向宋廷表示和谈的意图，以为试探。辽帝通过降将，原宋定州副都部署王继忠向宋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守将石普送去一封书信，表示须由宋廷首先提出议和。此信转到赵恒手中，赵恒亲笔手书，答应王继忠所提条件，并委派阁门祗侯曹利用前往辽军给予明确答复。

辽军兵临重镇澶州城下，对宋都开封构成极大的威胁。宋军守城官兵坚守城池，以阻止辽军的继续南下。澶州前军西线宋军设伏弩射杀辽兵，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一作挞凛）率游骑攻城，中伏弩身亡，辽军士气受挫。宋帝赵恒自开封北上，一路顾望不前，进军迟缓，在寇准的一再催促下，才于十一月到达澶州南城。时澶州城跨黄河而建，故分为南、北二城，河上用船并联架设成一座浮桥，成为联系二城的通道。赵恒抵达南城后，即表示不愿过河，寇准又与禁军将领高琼再三劝说，高琼甚至用鞭子抽赶为宋帝抬轿的兵士，方才将赵恒请到北城。当赵恒登上北城城楼，召见抚慰诸将领时，宋军一片欢腾，“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⑧，士气为之大振。与此同时，宋军已有数十万人马集结于澶州一带，与辽军形成两军对峙的局面。辽军深感孤军深入，难以相持长久，急于和谈。而赵恒北上的真实目的并非武力驱逐辽军，而是指望通过和谈，不惜用金帛换取辽军的北撤，稍后到达澶州的宰相毕士安也力赞赵恒以重金厚赂辽军，以求双方议和。尽管此时澶州前线局势对宋军十分有利，但在宋帝及宋廷主和派的积极倡导下，一味忍辱议和，再度派遣曹利用作为使臣，向辽乞和。

曹利用受命出使，临行前向赵恒询问议和所许银绢之数，赵恒告诉他，如实在不得已，只要能议和，以百万银绢作为交换的条件也是可以的。寇准闻讯则叮嘱曹利用说：“虽有敕旨，汝往，所许毋得过三十万，过则勿见准，准将斩汝。”⑨曹利用到辽军果真以 30 万银绢达成和议，待他返回澶州行宫入见宋帝时，赵恒正在进食。得知曹利用自辽军归来，赵恒迫不急待地想知道具体情况，便先让内侍询问应允辽帝多少银绢？曹利用推辞道：“此机事，当面奏。”后见推辞不成，他以“三指

加颊”为示。内侍入内禀告：“三指加颊，岂非三百万乎？”赵恒听罢，失声说道：“太多。”既而又道：“姑了事，亦可耳。”曹利用正站于门外，先闻宋帝抱怨太多，顿时惊慌失措。之后再听宋帝之语，他又转忧为喜。待他入见赵恒，又故作姿态，再三称罪，直至最后才说明与辽议和是以 30 万银绢成交。赵恒听罢，竟喜出望外，给予曹利用极丰厚的赏赐⑩。

十二月，宋辽经过几次交涉，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终于订立盟约。双方约定：宋辽维持原定疆界，两国约为兄弟之国，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且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给辽朝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称为“岁币”；双方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双方相互遣送对方的逃亡入境者，沿边城市只能依旧修葺城池，不得新增修筑城堡、开挖或改移河道；辽军北撤时，宋军不得在沿途邀击。澶州又称澶渊，故此盟约又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订立之后，宋廷委任何成矩、李允则、杨延朗等强帅勇将分驻北疆沿边重镇，谨守边境。又“改威虏军曰广信、静戎曰安肃、破虏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宁边曰永定、定远曰永静、定羌曰保德、平虏城曰肃宁”⑪，以示对辽的友好。此后，宋、辽之间长期并立，双方再未爆发大的战事，边境相对安宁，经济文化交流频繁，使臣往来不断，“二方既定，中外略安”⑫。

注 释

①《长编》卷三〇。

②《长编》卷三二。

③《长编》卷一六三。

④《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⑤《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
⑥《长编》卷一五三。
⑦《长编》卷四八。
⑧《长编》卷五八。
⑨《涑水记闻》卷六。
⑩⑪《长编》卷五八。
⑫《宋史》卷二八一《毕士安传》。

两宋

庆历新政

宋乾兴元年（1022），宋帝赵恒卒，庙号真宗，其子赵祯即位，是为宋仁宗。时朝柄大权操纵于真宗刘皇后手中，她先后任用王曾、王钦若、张知白、张士逊、吕夷简等人为宰相，朝政率循旧章，依旧执行"守内虚外"的国策，致使内外矛盾不断发展，官僚冗滥，办事效率低下；军队将兵冗员，作战能力低弱；朝廷费用入不敷出。为解决"积贫积弱"的问题，宋廷靠增加赋税以充实府库，导致百姓生活贫困，怨声载道，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而辽又与西夏相呼应，严重威胁着宋朝北部与西北部的边疆。北宋再度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

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卒，赵祯才实际控制朝政。此时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士兵暴动与农民起义相互交织，宋南京（今河南商丘）、京东、郑州（今属河南）、许州（治今河南许昌）、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解州（治今山西运城西南）、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清平军（今山东章丘）、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建昌军（今江西南城）、桂阳监（今湖南桂阳）及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峡州（治今湖北宜昌）等地，先后爆

发了各种形式的起义斗争，规模大小不等。其中有影响的反抗斗争包括庆历三年(1043)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王伦率众哗变，杀巡检使朱进，"转斗千余里"，"如履无人之境"①。同年，京西、陕西两路有张海、郭貌山领导的农民起义，于黄河至汉水流域间杀戮贪官污吏，"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②。又有荆湖南路瑶、汉百姓的起义，"平人惊惧，尽起为盗"③。此后，还有河北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王则领导的起义，等等。这一系列的反抗斗争极大地震动了北宋朝廷，不禁惊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④宋廷官僚多已看到社会潜伏的诸多危机，不断提出革新的倡议。

此前，地方官僚中的一些有识之士着手进行局部的改革。大理寺丞郭谘与秘书丞孙琳于洺州肥乡县（今属河北）试行"千步方田法"，基本改变了当地"田赋不均，岁久莫能治"⑤的局面。而更多的官吏则指盼宋帝赵祯能革除积弊，消除危机，扭转局面。庆历三年，赵祯令枢密使吕夷简罢议军国大事，旋即擢升范仲淹为参知政事，韩琦为枢密使，富弼为枢密副使，三人同以宰相执政，又以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同为谏官。为"兴致太平"，赵祯期望他们能尽快提出更张朝政的革新方案。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属江苏）人。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登进士第，始入仕途。他对宋廷的种种弊端耳濡目染，身感不安。天圣三年（1025），他以文林郎充大理寺丞，即向赵祯上疏，提出恩荫冗滥之弊。五年，再奏《上执政书》，抨击朝廷粉饰太平，兵久不用，武备不坚，内外奢侈，国用不充，贤才乏匮等诸多弊政，希望能"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⑥。

八年，他改判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再度上疏请求裁并州县，减轻差役，以宽民力。但范仲淹的多次上疏，未引起朝廷的重视，依然因循守旧。不过他的主张与见解，越来越多地得到朝野有识之士的称赞，“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⑦。欧阳修、富弼、余靖等一批有志青年官僚，纷纷支持范仲淹的革新倡议，不满吕夷简等人的墨守陈规。景祐二年（1035），他升任权知开封府，又一次向宋帝极言更张之措，因反对吕夷简的擅权，而遭谪贬，出知饶州（治今江西波阳）、润州（治今江西镇江）、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次年，他与尹洙、欧阳修等人又被吕夷简等权臣斥为“朋党”，宋廷上下官僚因此而咋舌，不敢言事。直至庆历初年，因内外交困，宰相吕夷简难以应付，在日益高涨的更张呼声中，宋帝赵祯乃重用范仲淹为宰相。

是年九月，赵祯诏辅臣于天章阁应对，范仲淹与富弼联名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又称《上十事疏》），提出一套革新的基本方案：一曰明黜陟，提倡依官吏政绩决定升迁罢黜。二曰抑侥幸，限制官僚子弟依据恩荫充官。三曰精贡举，变更学校传习之业及科举取士之法，应“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四曰择长官，重视对地方官吏的择选，而使政令下达，杜绝扰民。五曰均公田，均定官所占职田的收入。六曰厚农桑，主张重视农业生产，修复水利，以利财政收入。七曰修武备，建议招募强壮之丁，以充京畿卫士，令其三时务农，一时教战，既可省兵费，又益京师防卫。八曰减徭役，提出合并州县，以利减轻户少之州县百姓的赋役负担。九曰覃恩信，要求朝廷及地方政府官员恪守职责，严格执行宋帝及朝廷所颁大赦等恩惠，以取信于民。十曰重命令，即慎重订立条法，一经颁

行，各级官吏必须照章遵守执行。此 10 项革新主张，大多在庆历三年五月至四年五月间，由赵祯下诏书颁行全国，时称“新政”。其间，富弼还上疏陈当世之务 10 余条和安边 13 策，韩琦亦前后上疏陈述 15 事，是为对“新政”的完善与补充。

范仲淹、富弼等人更张的核心是通过整顿吏治，以达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从三年十月起，宋廷即着手进行吏治的整顿，先是赵恒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长官共同择选各路转运使。范仲淹在选定转运使人选时，十分慎重，凡属庸碌无能之辈，一律免去，最后确定张昷之赴河北，王素赴淮南，沈邈赴京东，施昌言赴河东，李绚赴京西，实地考察地方官吏的治绩。对此富弼尚存疑虑，担心免除庸才之职，会生悲泣之感。范仲淹则坚持认为，如若任其贪赃枉法，则本路百姓将受其盘剥。未几，赵恒又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共同选定各路转运使与提刑按察使。重新恢复设置各路转运使司判官。不久，再诏令中书省与枢密院商议并颁行“新定磨勘式”，以作为考核官员及官吏升迁的条法依据。十一月，宋廷更定“荫补法”，且下令限制职田数额。

庆历年间，以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首的“新政”派，主要从整顿吏治入手，却因此触及了官僚地主的特权及利益，多数官僚恐仅此已更张过甚，不便于推行。部分守旧派官僚更是横加指责，百般刁难，暗地里甚至公开表示强烈的反对。集贤殿大学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章得象对“新政”极为不满，他支持部分御史台谏官，攻击和诽谤范仲淹等革新派及其新政，诬陷他们结为“朋党”，“欺罔擅权”，“怀奸不忠”。枢密使夏竦则令其女仆伪造石介为富弼撰写废立皇帝草诏，诬蔑富弼要废赵祯，另立他帝。守旧势力的破坏与诋毁，令范仲

淹等人难以安身，新政更难以推行。四年六月，范仲淹借“秋防”之名，离开朝廷，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亦宣抚河北。范、富二人出朝后，守旧派更是肆无忌惮，又编织各种罪名，将支持新政的官僚刘巽、王益柔、苏舜钦等10余人贬出朝廷。宋帝赵祯迫于压力，也向守旧派妥协，十一月，他下诏“戒朋党相讦，及按察恣为苛刻、文人肆言行怪者”⑧。五年正月，范仲淹、富弼被罢相。二月，诏罢“京朝官用保任叙迁法”，又罢“荫补限年法”。三月，韩琦亦遭罢相。五月，欧阳修等人相继被贬出朝，又罢各路转运使司判官。至于各路转运按察使，多以“苛刻”之罪名，或罢或贬，曾惩治贪官污吏卓有成效的江南东路转运使杨纮及其判官王绰、提点刑狱王鼎等人，竟被诬为“江东三虎”⑨，遭到贬斥。

在守旧势力的陷害和打击下，新政官僚人人自危，“皆惧谗畏祸，不敢挺然当国家之事”⑩。守旧派官僚控制朝政后，基本废止了新政所实施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依旧推行“守内虚外”的国策。为解决朝廷庞大的开支，满足统治者的挥霍浪费，拼命盘剥搜刮，全然不顾百姓死活。结果朝廷府库仍旧亏空，社会矛盾继续激化。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逝。此后不久，原参与新政的官僚又多被重新启用，至和二年（1055），富弼受任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嘉祐元年（1056），韩琦任枢密使。三年，富弼改授昭文馆大学士，韩琦改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三年，富弼改授昭文殿大学士。五年，欧阳修升任枢密副使。尽管他们再度复官，却失去昔日新政时革新的锐气，并陷入守旧与保守之中，不再有“妄非”之举。不过“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可主张“更张”的思想却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注 释

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二。

②《长编》卷一四三。

③《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九。

④《欧阳文忠公文集·奏议》卷四。

⑤《长编》卷一四四。

⑥《范文正公集》卷八。

⑦《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O。

⑧《宋史》卷十一《仁宗纪三》。

⑨《宋史》卷三O五《杨纮传》。

⑩包拯《包孝肃奏议》卷一。

两宋

庆历兵变

北宋建立后，采取“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收缴藩镇节度兵权于中央，“强干弱枝”，极大地加强禁军。又实行“养兵”政策，凡遇饥荒之年，即由官府派人赴灾区，招募大批强壮饥民充军入伍，以此防止饥民作乱。因此宋朝军队庞大，军费支出巨大。然而统治集团的腐败，加之官吏、军将肆意克扣军饷，随意役使兵士，亦引起下层军校和士兵的极度不满，时有反抗，进而发展为士兵暴动。宋真宗在位期间（998——1022），即发生了四川王均的兵变和宜州（治今广西宜山）陈进领导的士兵暴动。这些兵变虽遭到镇压，但将士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到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兵变愈演愈烈，且与农民起义交织一起，他们“陵侮朝廷”，“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招募徒众”，甚至“称王称朕，与朝廷抗礼”①，给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

宋庆历三年（1043），京东安抚使陈执中，大肆搜括民财，强令农民修筑青州（治今山东益都）城，百姓怨声载道。五月，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虎翼军卒王伦趁势纠集四、五十名

兵士发动兵变，杀巡检使朱进，直入青州境。陈执中遂遣巡检使傅永吉率官军抗击，王伦乃率众转攻淮南地区，先后活动于沂、密（治今山东诸城）、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泗（治今江苏盱眙北）、真（治今江苏仪征）、扬（今属江苏）诸州，转战千余里，所到之处如入无人之境。行至高邮军（今江苏高邮）时，已有部众二三百人，皆为贫苦百姓，他们于脸上刺"天降圣捷指挥"六字，以示必胜。

自宋初以来，淮南地区多年无警报，州县防卫怠懈，及闻王伦来攻，竟不知所措。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泰州（今属江苏）守臣不敢迎战。知高邮军晁仲约欲保全自家性命，张榜令富民向王伦所部赠送"金帛牛酒，使人迎劳"②。然而王伦率众转辗迁移，虽四出攻击官军，却未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致使势单力薄。

宋廷对王伦率众转战于淮南十分不安，唯恐其阻断汴河漕运，遂令傅永吉率官军追击王伦，于扬州山光寺南击败之。七月，王伦率残部转至和州（治今安徽和县），渡江南下，至江南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东北），为官军所俘，未几即遭杀害。

庆历七年（1047），宋宣毅军小校王则又于恩州（治今河北清河西）兵变。王则，涿州（今属河北）人。其家境贫困，后因饥荒逃难至恩州，给人牧羊。之后参加宣毅军，升为小校。恩州、冀州（治今河北冀县）一带多信奉弥勒佛，王则便以宗教的形式，组织当地百姓，以《五龙经》、《滴泪经》及图谶诸书作宣传，声称"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③，以此号召民众反抗宋朝统治。随后，他以州吏张峦、卜吉为谋主，派人赴德州（治今山东陵县）、齐州（治今山东济南）等地发展信徒，约定庆历八年正月初一起兵，阻断澶州（治今河南濮

阳）浮桥，于河北地区活动。但因其信徒潘方净向北京留守贾昌朝告密，王则不能再等待，遂仓促于庆历七年冬至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提前兵变。

当日，知州张得一正率官僚祭拜天庆观，王则乘虚率众冲入府库。张得一闻变，逃入骁捷营，欲借军营保全其性命。王则夺得兵器、财物后，即领众人直扑骁捷营，放火焚烧营门，杀入营中，生擒张得一。兵马都监、内殿承制田斌率所部与王则军激烈巷战，战败出逃。王则攻入城中，令兵士关上城门。提点刑狱田京、任黄裳丢弃家眷，持府印自城上吊出城关。王则军杀通判董元亨，打开军资库，又得大批物资。随后，王则又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司理参军王奖、节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齐开、主簿王湙。且打开囚牢，释放囚徒，深得城中百姓的支持。

王则首战告捷，遂以“东平郡王”为号，建国号“安阳”，年号“得圣”。又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立政权。称其居所为“中京”，居室等皆立名号。城中则以一楼为一州，上书州名，任命知州。而于城上依四个方向各置一总管。又改历法，以十二月为正月。凡年龄 12 岁以上，70 岁以下的男子，皆刺面曰“义军破赵得胜”。而旗帜号令，皆以“佛”为称。

宋廷急令澶、孟（治今河南孟县南）、定（治今河北定县）诸州及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官军严加防守。又调集禁军 10 万，前往镇压。不久，赵祯以知开封府明镐为河北体量安抚使，督统诸军，进围恩州。恩州城民汪文庆、郭斌等人，自城上以箭系书信，射入明镐军营帐中，约为内应，且定以夜晚自城上垂下绳索，以接应官军入城。官军如约乘黑夜攀绳登城，

数百人占据城墙，即焚烧城楼。王则等发现官军已入城，遂率众反击。官军先登城者，急欲争功，故砍断绳索，不令后继者入城。及战，官军无后继援兵，寡不敌众，只得与汪文庆等内应缒城而逃。

恩州地处南北交通要道，辽人入宋常经于此。王则得知辽朝派入宋使臣将途经附近，遂决定出兵劫持，以示抗辽。然而消息走露，明镐派殿侍安素于恩州西门外设伏。深夜，王则派数百人出城袭击辽使，中伏，全部被官军俘虏。

恩州城池坚固，城墙高峻，官军屡攻不破。明镐令兵士于城南暗挖地道，而每天指挥官军佯攻北城，以分散其注意力。不久宋廷见恩州城久攻不下，又以参知政事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使，继续攻城。文彦博至恩州城下时，地道已挖至城内。文彦博与明镐便自官军中挑选了一批精壮兵士，连夜由地道入城，向恩州发起猛攻。

官军入城后，遂占据城墙，王则率部众与官军激烈交战，且在牛身上绑草泼油，点燃后令火牛冲击官军。官军以枪刺牛鼻，迫使火牛掉头，又直冲王则军。王则军顿时大乱，官军趁势猛攻，王则军不敌，开东城门出逃。

閤门祗候张绚于城外凭借城壕，迎击逃出城外的王则军，但未能奏效，自己亦被斩杀。王则军陷入官军重围之中，经一番殊死搏斗，王则军又败退，王则为总管王信所俘。其残部又退守城郊村舍。官军随即又团团围困村舍，王则残部依旧顽强抵抗，宁死不屈。官军依仗人多势众，猛烈进攻，放火焚烧村舍。大火熊熊，王则残部仍无人投降，终于全部被烧死。

王则起兵前，曾派人赴河北、京东地区，联络10余州县信徒，起兵反宋。然王则提前起兵后，与10余州县中断联系，

而未能得到及时响应。齐州禁军兵士马达、张青、张握等人得知王则起兵后，亦欲率众起事占据州城，以策应王则，然因部众泄密而遭镇压。

宋廷于王则兵变遭镇压后，即令各州“大索妖党”④，残酷镇压百姓，以至于“被系者不可胜数”⑤。

王则兵变自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庆历八年闰五月失败，历时66天。其后，王则、张峦、卜吉等兵变首领被押解至开封遭杀害。

注　释

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弭盗门》。

②《范文正公集》卷一《年谱》。

③《宋史》卷二九二《明镐传附王则传》。

④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一。

两宋

广西战事

北宋时，广南西路多聚居溪峒蛮，其中尤以侬氏、黄氏、周氏、韦氏四大姓氏人多势众，各雄据一方，而广源州（今越南高平广渊）及西原州的蛮族势力最为强大。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宋承唐制，于其地多设置羁縻州，以其首领为长官。

侬氏世代居住于广源州。广源州地处邕州（治今广西南宁南）之西南，位于宋朝与交趾王朝之间，隶属邕州管辖，但因其距邕州较远，宋廷鞭长莫及。宋初以后，交趾（今越南）日渐强盛，因广源州地产黄金、丹砂，便不断向北蚕食，欲吞并此地。交趾派兵进击广源，俘虏其首领侬全福，且每年于此掠走大批金货，"赋敛无厌，州人愁苦"①。侬全福被俘后，其妻另嫁，生子名智高。及侬智高长大成人，仍被部众推举为首领，遂率领部众反抗交趾的盘剥与奴役，曾一度于傥犹州建立政权，号"大历"。交趾对侬智高此举十分恼怒，便出兵北上，攻陷傥犹州，俘虏了侬智高。然交趾又欲笼络、收买侬智高，以为北上扩张之策，便释其罪，且委他为知广源州。但与交趾

有深仇的侬智高，却不为之所动，依然与交趾时有抗争。及后，交趾又胁迫他归顺，又遭其断然拒绝，积怨日重。

宋皇祐元年（1049）九月，侬智高率部众攻陷安德州，于此建“南天国”，改元景瑞。他亦不满隶属宋邕州的地位，欲建割据政权，便率部众侵扰宋境，又向北攻击邕州横山寨。对侬智高的割据活动，首先感到不安的仍是交趾，故未过许久即发兵攻打侬智高。迫于交趾咄咄逼人的进攻与压力，侬智高不得已乃向宋廷请求内属。然而宋廷恐滋生边事，竟然拒绝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既不得内属宋廷，又与交趾为仇，便凭藉着广源地区川泽之土利，招募亡命之徒。又与广州进黄玮、黄师宓等人日夜谋划，入攻宋境。一日黄昏，侬智高令人焚毁所藏积储，而对部众声称：“生计穷，当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否则必死。”②遂率部众入侵宋境。

宋皇祐四年（1052）五月，侬智高率部众5000人，沿郁江东下，破横山寨，进而攻陷广南西路重镇邕州，杀知州陈珙及广西都监张立，于此建“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改元启历。自黄师宓以下官吏，皆授官，称宋廷官称。随后，侬智高率兵连克横州（治今广西横县）、贵州（治今广西贵县）、藤州（治今广西藤县）、梧州（今属广西）、封州（治今广东封开）、康州（治今广东德庆）、端州（治今广东肇庆）。其时，广南州县皆无防备，州县官吏畏懦，一旦仓促应战，竟不知所为，守将多弃城而遁，而宋军则一战即溃，死伤甚众。侬智高得以长驱直入，进围广州。

侬智高对广南地区的大举进犯，引起宋廷极大震动。宋帝赵祯下诏，令钤辖陈曙发兵征讨。侬智高率兵围攻广州，长达五六十日，城未能克，他却于城外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此后

侬智高又率兵进击贺州（治今广西贺县），又不克；乃转攻昭州（治今广西平乐西南），遂破城而入。昭州数千百姓逃入山谷间避难，侬智高令士卒放火，百姓全部遇难。宋廷又以孙沔为广南安抚使，令他平息侬智高叛乱。然而侬智高丝毫不受节制，继续进兵侵扰，宋帝赵祯深感忧虑。侬智高请求充任邕、桂节度使，赵祯甚至准备接受。参知政事梁适以为不可，若依侬智高之请，则岭南之地不属宋廷所有。适逢枢密副使狄青上表，请求征讨侬智高，赵祯委以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率兵进击侬智高。谏官韩绛认为狄青为武将，不宜专任其一人。赵祯为此征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庞籍，庞籍极力荐举狄青，且言："号令不专，不如不派。"赵祯方消除疑虑，又下诏，将岭南诸军皆隶属狄青统领。

十月，侬智高兵进宾州（治今广西宾阳），知州弃城而逃。侬智高陷宾州城，又复入邕州。侬智高于广南的叛乱，使交趾感到有机可乘，竟向宋廷请求出兵，协助宋军平定侬智高之乱。宋帝赵祯急欲息事，遂应允交趾之请。经制广南西路、知桂州余靖亦认为交趾可信，乃于邕州、钦州（治今广西灵山西）屯积万人粮草，以备交趾所需。赵祯亦下诏，以缗钱3万赐交趾，作为军费，还许平叛之后再加以厚赏。狄青到达广南后，即传檄余靖不许借助交趾军队，随即又上奏朝廷："且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以一（侬）智高而横蹂二广，力不能讨，乃假兵蛮夷，蛮夷贪得忘义，因而启乱，何以御之？请罢交趾助兵。"③赵祯罢交趾派兵助攻。狄青知侬智高叛军擅攀高履险，宋兵不习山地作战，故交战必败，遂召当地少数族兵随从作战。

宋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合孙沔、余靖所部自桂州

进驻宾州（治今广西宾阳）。此前，军将蒋偕、张忠皆轻敌，结果与侬智高交战，皆兵败战死，军队士气受挫。狄青则严明军纪，统一号令，告诫诸将不得擅自与叛军接战，听候命令。广西钤辖陈曙趁狄青未至，率步卒8000进攻侬智高所部，果于昆仑关（今广西南宁东北）溃败。狄青闻讯，认为："令之不齐，兵所以败。"④清晨，狄青于堂上召集诸将，将陈曙、殿直袁用等30名将领斩首。孙沔、余靖相顾惊愕，诸将皆两腿颤抖不已。

随后，狄青便按兵不动，且令将士休整10日，众人不知意图何在。侬智高派人侦探，回报称宋军不会马上用兵，侬智高遂怠懈。次日，狄青即集合军队，自己亲统前军，孙沔率军随后，余靖领兵殿后，发兵进击邕州。行至黄昏，即抵达昆仑关下。时值上元节（正月十五日），狄青于军中大设酒宴，款待将士。侬智高探报侦知，叛军亦不为备。是夜，大风雪。次日凌晨，宋军营帐竖大将旗，诸将环列于狄青营帐前，候命进击昆仑关。有军校来报，狄青已连夜率前军攻入昆仑关，令诸将速领所部过关集结。众得方知主帅已破关进击叛军。

狄青既入昆仑关，又率兵出归仁铺（今广西南宁东北），且于此部署军阵。侬智高指挥所部，倾巢出击，迎战宋军。宋军前锋将领孙节与叛军激战于山下，不幸阵亡，叛军由是气焰嚣张，孙沔等将领见叛军猖獗，不禁惊恐失色。狄青则沉着自若，手执白旗指挥蕃部骑兵，自左右两翼夹击叛军。叛军大败而逃。狄青率军追杀50里外，又斩首数千级，俘获500余，侬智高幕僚黄师宓、侬建中、侬智中等57名官属被斩。叛军严重受挫，侬智高连夜焚烧邕州城池出逃，自合江口逃入大理国。

次日凌晨，狄青统军进入邕州城，缴获金帛巨万，各种牲畜数千，下令释放被侬智高胁迫、掳掠的百姓。又收敛叛军尸体，堆积于城北，内有一尸着金龙衣，众人皆以为是侬智高，欲上奏朝廷邀功。狄青则反对此举，告之众人："安知非诈邪？宁失（侬）智高，不敢诬朝廷以贪功也。"⑤二年后，侬智高死于大理国，在宋朝遣使追索之下，大理国函其首送交宋知邕州萧注。

交趾欲借侬智高叛事侵蚀宋边的企图未能得逞，侬智高被镇压后，交趾便又寻机向宋境扩张，进行武装入侵，劫掠财富。宋嘉祐四年（1059），交趾兵扰钦州。次年，交趾与甲峒蛮合兵侵扰邕州。赵祯为此下诏，令广南西路诸州发兵征讨。此后，交趾对宋境的侵扰与劫掠始终不断，边境不得安宁。

宋熙宁九年（1075）九月，交趾再次发兵侵入宋广西古万寨（今广西扶绥）。十月，交趾则发兵6万，号称8万，分水陆两路，大举入攻宋广南西路。水军自海上（今北部湾）直进，攻占廉州（治今广西合浦）、钦州；步卒则进兵邕州。宋邕州知州苏缄闻讯，立即调集军队，共2800人，部署防务，以迎击来犯的交趾军队。

交趾为掩饰其扩张，兵进之处，遍布榜文，"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济"⑥。宋廷君臣对此愤慨已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亲自起草文告《讨交趾榜》，给予驳斥，且调兵赴桂州（治今广西桂林）、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以援应广南西路宋军。

宋熙宁九年（1076）正月，交趾王李乾德率兵围攻邕州。知州苏缄率军队奋力抵抗，城破，苏缄令家人自尽，遂放火自焚，全城军民5800余人亦拒不投降，悉为交趾兵屠杀。

二月，宋廷任命宣徽使郭逵为安南行营经略招讨使，兼荆湖、广南宣抚使；以天章阁待制赵卨为招讨副使，统兵号称10万，南下讨伐交趾军队。宋帝赵顼同时下诏，令占城（今越南南部）、占腊（真腊，今柬埔寨）出兵合击交趾。宋廷又支钱5万缗予广南东路转运司，令修筑州军城濠，以防范交趾军入侵。

郭逵、赵卨统兵南征至长沙（今属湖南），先遣军将领兵收复邕州、廉州。随后大军入广西，进兵广源州，交趾守将刘应纪献城投降。至九月，宋军收复广南西路全部失地。十一月，宋帝赵顼再次下诏，令宋军继续反击交趾军。在宋军打击下，交趾军节节败退，逃回交趾国。十二月，郭逵、赵卨率军进入交趾境内。李乾德于决里隘屯聚重兵，以阻截宋军进攻。宋军攻隘，交趾军以象军迎击，宋兵以强弩射象，以刀砍象鼻，击退象军的进攻，遂乘胜反击，大败交趾军，攻占决里隘。

决里隘失守，李乾德又令交趾兵于夹口隘设伏。宋军绕过夹口隘，越兜顶岭向南推进，相继攻陷桃榔、门州等重镇，直抵富良江（今红河）北岸，距交趾国都城交州（治今越南河内）仅90里。然因无船渡河，欲战不得，而与交趾军隔河相峙。郭逵设伏兵于北岸，仅以少量将兵隔河邀战。交趾兵见宋军兵微将寡，发兵数万过江来战。郭逵指挥宋军发起猛烈攻势，伏兵出击，与交趾军激烈交战。此战，交趾军死伤无计，其王子李洪直亦为宋兵所杀，大将阮合被生擒，李乾德损兵折将，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廷奉表乞降。

其时，宋军随军兵夫30万人，负责运送军粮给养。时值酷暑，交趾又多瘴地，兵夫多染病，死者过半。郭逵因此被迫

撤兵，而交趾国亦不敢窥测宋境，只得恢复每年入朝贡献方物。广南西路遂得安宁。

注　释

①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三。

②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三O。

⑤③④《宋史》卷二九O《狄青传》。

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一。

两宋

熙河之役

宋治平四年（西夏拱化五年，1067）正月，宋帝赵曙病故，谥号英宗，太子赵顼（xù 旭）继位，是为宋神宗。其时，宋廷内忧外患，辽与西夏交相侵扰，赵顼急欲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朝廷有识之士亦希望富国强兵，革除朝政之弊逐渐成为潮流。

宋熙宁元年（1068），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入朝，上《平戎策》3 篇。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州德安（今属江西）人。早年因试制科未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故对宋夏关系及西夏扰边侵疆颇为熟知。他在《平戎策》中指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治今甘肃临夏东北）、湟（治今青海乐都），则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因而建议先招谕吐蕃唃氏贵族，使率其部族居于河西，"为汉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无所连结"①。赵顼对其所言颇感惊奇，令召其入宫，详细询问治边方略，随即委他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

蕃部首领俞龙珂的部众于青唐羌（吐蕃族的一支）诸部中势力最为强大，渭源羌（吐蕃族的一支）与西夏都竭力拉拢

他，欲使之隶属于自己。宋秦凤路经略司诸将力主发兵先征讨俞龙珂部，王韶正巡视边境，遂亲率数骑入吐蕃境，直抵俞龙珂帐下，向他申明成败大义，招谕其归顺宋廷。直交谈到深夜，索性留宿其帐中。次日凌晨，王韶将返回，俞龙珂等即遣其首领随王韶赴宋境。以后，俞龙珂又率其部众12万人内附。

宋熙宁二年（1069）十月，王韶主张修筑渭州（治今甘肃平凉）、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上下两城，以屯驻军队，安抚、招纳居住于洮州（治今甘肃临潭）、河州的吐蕃各部落。此议交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再议，李师中则以为不可，认为："今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及令蕃部纳土，招弓箭手，恐西蕃及洮、河、武胜军部族生疑。"因而他主张："今不若先招抚青唐（今青海西宁）、武胜及洮、河诸族，则西蕃族必乞修城寨，因其所欲，量发兵筑城堡，以示断绝夏人抄略之患，部人必归心。"②李师中之议遭宋帝反对，遂下诏，罢免其经略使职。

王韶又主张："渭源至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良田不耕者万顷，愿置市易司，颇笼商贾之利，取其赢以治田"③，请求官府贷钱为本。赵顼从其所请，下诏令秦风路经略司将益州（治今四川成都）交子务钱交予王韶，且令他提举市易司。李师中又上奏以为不可。宋同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则力主王韶之议，遂削李师中职，贬为知舒州。另以窦舜卿接替，且派李若愚核实王韶募人耕种缘边土地情况。李若愚到边境，向王韶询问耕田所在，王韶无言以对。窦舜卿又查寻文簿，仅得垦田1顷，然而该地主人对此有诉讼，只得将地归还本人。为此，李若愚上奏朝廷，称王韶欺诈。王安石又将窦舜卿罢免，再改任韩缜。韩缜则附会此事，谎报耕田。于是王韶又升任太子中

允、秘阁校理。其后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统帅郭逵亦上奏，称王韶贪污秦凤经略司所贷市易钱。王安石认为是无稽之谈，而将郭逵改任为镇泾原。正是在宰相王安石的全力支持下，王韶方得以排除众议，悉心经略河、湟，扭转了西部的战局。

赵顼决意收复河州、陇州（治今陕西陇县），下令筑古渭城为通远军，委王韶为知军事。宋熙宁四年（1071）八月，宋廷置洮河安抚司，令王韶为长官，开始经营河湟地区。熙宁五年（1072）七月，王韶率军进击河、湟地区吐蕃部，筑城渭源堡及乞神平。吐蕃蒙罗角、抹耳水巴等吐蕃部据守险要，以迎击宋军。宋军诸将欲于平坦之地布阵，与吐蕃军交战。王韶则认为："贼不舍险来斗，则我师必徙归。今已入险地，当使险为吾有。"④乃指挥宋兵直趋抹邦山，居高临下，压敌军而阵。王韶告诫众将士："敢言退者斩！"未几，吐蕃部兵向宋军阵营发起猛攻，宋军虽奋力抵抗，仍稍有后退。王韶见状，亲自挽弓，披挂上阵，指挥帐下卫兵迎击敌兵。吐蕃部兵大溃而逃，遂焚毁其庐帐。宋军大捷，洮西地区为之大震。

吐蕃瞎征部闻宋军来攻，即起兵援应蒙罗角、抹耳水巴部。方渡洮水，即遇溃败之兵，瞎征遂聚集溃兵，欲迎击宋军。王韶令其别将大张旗鼓，自竹牛岭进军，而自己则率兵悄悄越过武胜（今甘肃临洮）。王韶领兵进击，与瞎征首领瞎药所部遭遇，宋兵勇猛冲击，再大败之。随后，王韶令兵士于此筑武胜城，建成镇洮军。城成，瞎征集部兵来攻，宋军再击败之，且收降其部众2万，余众溃逃而去。王韶此次出击，屡败吐蕃部兵，拓地1200余里，收降吐蕃部众30余万口。宋廷论王韶之功，进为右正言、集贤殿修撰。不久，赵顼令镇洮军更

名为熙州（治今甘肃临洮），且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四州以及通远军（今甘肃陇西）合为一路，置熙河路，治所设于熙州，王韶则以龙图阁待制知熙州，又进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然而其时河、洮、岷三州犹未收复。

宋熙宁六年（1073）二月，王韶统兵进击河州。于击败吐蕃兵后，占领河州。不久，宋军收降的吐蕃部众复又反叛，王韶立刻率兵返熙州平息叛乱。瞎征乘宋军大部撤离之机，重新占据河州。王韶闻讯，又领兵回击，攻克诃诺木藏城，穿越露骨山，南入洮州境。宋军进兵所经之地，山地崎岖，道路狭窄，马不能行。王韶遂令兵士下马步行，因此进军缓慢。瞎征认为有机可乘，遂留下部分兵士戍守河州，自己率兵尾随宋军，寻机进攻。王韶令宋军与之激战，终击退追兵，瞎征再度败逃，宋军又乘胜收复河州。九月，王韶率军又连续攻占岷州、宕州（治今甘肃岷县西南）二州，洮州、迭州（治今青海西宁）的吐蕃首领相继献城降宋。此次王韶出兵连续行军54天，长途跋涉1800里，尽据河、岷、宕、洮、迭五州之地，斩首数千级，缴获牛、羊、马匹以万计。先后“招抚大小蕃族30余万帐”⑤，其所经营的河湟地区，幅员已达2000余里。宋廷为王韶所取得的胜利大为振奋，百官入朝向宋帝祝贺，赵顼甚至解下自己所佩玉带，赠予王安石，同时升任王韶为左谏议大夫、端明端学士。次年，又召王韶入朝，加资政殿学士，且赐第崇仁坊。

宋熙宁七年（1074）二月，宋知河州景思立与吐蕃部将青宜结鬼章战于踏白城，宋军不敌，战败，景思立亦为吐蕃兵所杀。青宜结鬼章遂率兵进围河州。一时间，吐蕃气焰复炽，吐蕃部将木征亦率兵围攻岷州。宋军处境极为危急，宋朝臣甚至

主张放弃熙河路，赵顼也感到左右为难，而下诏告诫王韶坚守城池，持重勿出。

王韶返回熙河，行至兴平年（今属陕西），即闻景思立兵败，河州遭围攻，遂日夜兼程，急驰至熙州。熙州守将方部署城防，欲守城御敌。王韶入城，下令撤除城防，乃选精兵2万，与诸将商议进兵去向。诸将认为当进兵河州，夺回城池。王韶向众将分析道：“贼所以围城者，恃有外援也。今知救至，必设伏待我，且新胜气锐，未可与争。当出其不意，以攻其所恃。”⑥遂领兵直奔定羌城，拔之。又击败吐蕃结河部，切断吐蕃与西夏国的通道。继而又兵进宁河，分兵令偏将统领出南山，彻底扫除吐蕃设于河州外围的援兵。瞎征正围攻河州，见援军相继为宋军击败，料河州难以破城，只得拔寨而去。围攻岷州的木征部，亦为宋将高遵裕击败，撤围而走。宋廷得知王韶击退吐蕃军，熙河路安然无羌，极为欣喜。

王韶还师熙州，随即派兵沿西山，绕至踏白城后，袭击集结于此处的瞎征部众，焚毁其8000余帐。瞎征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只得向宋军乞降，宋兵俘获瞎征，熙河路自此稍得安宁。

熙河之役为北宋建国以来，对外用兵的一次重大胜利，使北宋重新据有河湟之地。王韶亦因此再擢升为观文殿学士、礼部侍郎。未几，复召为枢密副使。然而，其后因与宰相王安石及赵顼有隙，遂罢职遭贬。

注 释

①《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②《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

③④《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四七。

⑥《宋史》卷三二八《王韶传》。

两宋

熙宁新法

宋帝赵祯庆历年间的“新政”失败后，守旧势力再度控制朝政，在“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下，宋朝统治集团依旧将“内忧”置于首要的地位，致使自宋初以来百年间的种种弊政不断加剧，尤其是“三冗三费”问题日趋严重。宋廷官僚机构在赵祯在位时已是极为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军功、进纳、胥吏出职等多种途径均可入仕。宋真宗时，文武百官约为9700员，至赵祯皇祐年间（1049——1054），已增至17000余员，其中尚不包括未被差遣的京官、使臣及选人等。其后竟高达24000余员。宋初，全国总兵力约40余万，分为禁军、厢军、乡军、蕃军，之后为守卫京师之需，不断加强禁军，又以募兵养兵之制，防范饥民的骚乱，于是军队数量巨增，赵祯时，仅禁军即达80万人，总兵力高达140余万。冗官、冗兵，加之挥霍浪费，开支无度，又导致宋廷年度支出逐年猛增。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朝廷岁入2224余万余缗，当年尚有大半节余。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岁入15085余万缗，岁支出12677余万缗，尚余2407万缗。赵祯皇祐元年（1049），岁

入 12625 余万缗，“而所出无余”①。到英宗赵曙治平二年（1065）时，岁入 11613 余万缗，岁支出 12034 余万缗，又有非常支出 1152 余万缗，当年即亏 1573 余万缗。朝廷收入逐年减少，而支出却有增无已，亏空数额逐年扩大，“累世所藏，几乎扫地”②。

为解决朝廷府库入不敷出的窘困境地，宋廷便采取搜刮盘剥百姓财富的办法，不断增加赋税徭役。赋税中除保留前代的“二税（田税）”外，又有“加耗”、义仓税、身丁税、杂变税、支移折变等诸多名目。徭役之外，尚有差役（职役），城市中则有“科配”。如此繁重的赋役已使社会中下层百姓难以应付，而宋廷又“不抑兼并”。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缓急盗贼窃发、边境扰动，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③。宋初以后，土地兼并亦不断加剧，“地各有主，户或无田产，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④。这不仅使下层百姓丧失土地而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剧，又影响到朝廷赋税收入的增加，更使已十分尖锐的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地农民抗税、杀贪官污吏及豪强地主等反抗斗争连绵不断。宋朝统治危机四伏。

边境局势亦风波不止。虽有“澶渊之盟”，宋辽之间再未发生大的战争，但西夏倚契丹为援，侵边不止，辽亦借西夏之势邀索不已。辽、夏两国自北、西北二方构成“犄角之势”，夹困宋朝，亦加重了宋朝统治者的“外忧”之感。

“外忧内患”与入不敷出更清楚地显现出宋朝的“积贫积弱”国势。为扭转这一局面，继“庆历新政”之后，又有一些官僚对原有的制度进行了某些变更。庆历八年（1048），陕西

转运使李参为解决当地驻军粮草不足的困难，于百姓春荒之时，“令自度谷麦之入，予贷以官钱，谷麦熟则偿，谓之‘青苗钱’”⑤，即由官府借贷帮助生产。到皇祐五年（1053），当地军粮已自给有余。两浙转运使李复圭等曾改差役为募役，个别地区亦实行过令民户代官府养马，以解决军马之需。这些措施的实行，都收到一定的成效。

嘉祐八年（1063）三月，赵祯病逝，庙号仁宗，其继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皇帝的更替，给“庆历新政”后受沉闷保守的政治气氛压抑的改革派势力带来希望。面对仁宗遗留下的弊政，赵曙也提出“积弊甚众，何以裁救”⑥的看法，流露出“更张”的意图。但仁宗的曹皇后此时以太后身分垂帘听政，她认为“祖宗法度不易轻改”。对赵曙的言行极为不满，处处加以提防，甚至“权同处分军国事”。曹太后的党羽秉承其意图，亦与赵曙处处为难。一度太后与赵曙间矛盾重重，赵曙为之气恼，口出“太后待我无恩”⑦之语。后经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的劝解，母子间的关系稍有缓和，曹太后遂还政于赵曙。但在此过程中，枢密使富弼未介入，恐赵曙执政于己不利，又对韩琦耿耿于怀，竟辞官而去。刚刚执政的赵曙原本身体多病，又见辅臣间如此勾心斗角，不禁忧虑重重，终未及有所作为，即于治平四年（1067）正月病故。其子年仅20岁的赵顼即位，是为神宗。

赵顼“性气越紧，尤欲更新之”⑧，即位前，即常与侍臣议论天下大事，对真宗、仁宗之时的朝政弊端深感其危害，有意革除。及即位后，更欲有所作为，想效仿唐太宗，也希望自己的身边能有像魏征那样直言敢谏的辅臣，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顼选中了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自幼随其父赴任而辗转南北，且百家诸子之书，无所不读。中进士第后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七年，任鄞县（今浙江宁波）知事。此后历任舒州（治今安徽潜山）通判、开封（今属河南）群牧司判官。嘉祐二年（1057），调任常州（今属江苏）知州。次年，调任江南东路提点刑狱。未几，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多年在地方任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接触和了解社会，尤其是对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深感忧虑，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宋朝的统治“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据此，王安石向宋帝赵祯呈《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万言书》）⑨，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改革，以彻底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在《万言书》中，王安石明确指出宋朝统治的时弊及改革之策。首先是吏治败坏，官吏多为“不才苟简贪鄙之人”、“奸悍无赖”之徒。学校传授仅“讲说章句而已”，实属“无补之学”。科举选士、恩荫任子而步入仕途者，不懂治世之道，“无用于世”，故需革除其弊端，从地方上选拔治世人才。其次，官吏侵渔百姓，尤其是下层官吏俸禄微薄，“委法受赂，侵牟百姓，往往而是”，故需发展生产增加财税收入，“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因此改弦更张迫在眉睫。王安石以历史为鉴，指出“盖汉之张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国莫能发其谋；唐之黄巢，横行天下，而所至将吏无敢与之抗者。汉唐之所以亡，祸自此始”。他疾呼道：“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王安石的此番改革主张，并未受到赵祯及在朝宰执的重视，奏书上呈，竟石沉大海。六年，王安石充任知制诰，仅负责为宋帝起草文

书、诰令。虽然他的改革主张未被采用，却因此受到要求改革的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敬重，引起社会的重视，王安石的声望日渐提高，企盼改革的士大夫将厚望寄托于他的身上，期待他登台执行，推行改革。

赵曙在位时，王安石感到变法尚未成熟，故借母亲病故，居丧金陵（今江苏南京），屡召不起，而于家中收徒讲学，宣传自己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为其后的变法实际培养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此时尚未即位的太子赵顼却很赞赏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极想与他当面交谈，商议治国之道。及赵顼即位之初，即于熙宁元年（1068），起用王安石充知江宁府，不久，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便同年轻的宋帝赵顼一道议论治国之道，悉述自己改弦更张的主张，深得赵顼赏识，要求他"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⑩。与此同时，官僚集团中及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独负天下盛名的王安石已成为众望所归的人物。不过，赵顼起初仍不敢重用他，而仍想得到富弼等一批旧僚老臣的支持。但当赵顼即位后召见富弼，商议治世之道时，得到的却是消极悲观的回答，不禁大失所望，遂于熙宁二年（1069），令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为使改革得以推行，宋廷专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吕惠卿主其事，章惇为编修三司条例官，曾布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三年，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其"变风俗，立法度"思想的指导下，终于形成了宋帝赵顼熙宁年间的变法高潮。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旨在"修吾政刑，使将吏称职，财谷富，兵强而已"⑪，即富国强兵，以此扭转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其为富国而推行的新法是以发展生产，充实朝廷府库为

先，自理财入手，“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方面，陆续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输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免行法、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新法。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等新法，以提高兵将的素质和军队的战斗力，改变对辽、西夏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为推进改革，培养人才，王安石对科举制度、中央及州县学校也进行了必要的改革，颁行贡举新制，以经义取士；令太学实行“三舍法”，“取学行卓然尤异者”，“取旨除官”⑫。王安石认为“古之取士，皆本于学校，故道德一于上，习俗成于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于世”⑬。为统一思想，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以及《诗义》、《书义》，合称《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1075）颁行学校，作为教材，并以此为科举考试的依据和选官的参考。其间，又重置武学，新建律学，改建太医局，以适应各种专门人才的培养和社会所需。

王安石及其改革派官僚所实行的变法虽是维护和加强宋朝的统治，但所行“新法”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因此，新法一提出，便遭致以两宫太后、皇亲国戚、老臣旧僚等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他们串通一气，共同指责、抨击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新法，甚至向宋帝赵顼施加压力，迫使废止新法，因而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自始至终都极为激烈。翰林学士司马光为首的一批朝廷内外官僚，更是不择手段诋毁改革派，造谣生事。判大名府韩琦为反对实行青苗法，上奏宋帝称此法是“官放息钱”⑭，并谎称百姓亦不愿请贷青苗钱。赵顼看后，却认为“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

审”[15]。王安石虽据理力争，仍无法解除赵顼的疑虑。且赵顼的动摇，已严重影响到改革的进行，王安石无奈，只好称病，请求辞职。赵顼虽对变法左右摇摆，但最终还是希望能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故只得挽留王安石继续执政。不过与改革之初的态度相比，赵顼对王安石的信任与支持已显然减弱，变法面临着更大的阻力与危险。六年，免行法颁行后，皇亲国戚及宦官因其恣意勒索受到限制，再度掀起反对变法的高潮，赵顼也因此更摇摆不定，甚至亲自出面阻止免行法的实行。在此形势下，改革派官僚中也有人畏缩不前，附和守旧势力，抵制变法，排挤王安石。七年初，天下干旱，反对派利用天灾攻击变法，向赵顼上《流民图》，诬蔑“王安石变乱天下”，赵顼因此“流涕退，命安石议裁损之”[16]。王安石感到新法难行，自己已无法继续执政，遂恳请辞官。四月，王安石被罢去宰相职，出任江宁府。

王安石辞相后，曾推举韩绛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但吕惠卿却未继续推行变法，而是标新立异，结果“民不胜其困”[17]。更为甚者，他唯恐王安石复相，威胁自己的宰执地位，便于朝中处处争权，从不将韩绛放在眼里。吕惠卿的倒行逆施，引起朝野人士的极大不满，一时间，“天下之人，复思荆公（王安石）”[18]。韩绛借机向赵顼请求召王安石返朝，恢复宰相之职，以继续推行变法。八年（1075）二月，赵顼采纳韩绛的建议，重新起用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接到诏令，立即赴开封就职。

王安石复相后，重又恢复新法，以期尽快富国强兵。可此时变法更是困难重重，改革派内部的分裂愈演愈烈，吕惠卿非但不支持和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寻机打击、诽谤。六

月，王安石因患疾，赵顼为使其养病，特许他少预政事。然而吕惠卿却上奏称他“屡称病不治事，积事以委臣”⑲，公开与王安石对抗。虽然十月间，吕惠卿遭御史以不法之名弹劾，出知陈州，权三司使章惇也因受牵连遭贬，出知湖州。改革派内部的分裂已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变法已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王安石对此深感忧虑，尤其是昔日的变法同僚竟釜底抽薪，更使他忧心忡忡，自认“智不足以知人，而险被常出于交游之事”⑳。不仅如此，赵顼亦不再重视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经常不采纳他的建议，变法实际上已无法推行。九年初，王安石屡次上疏，请求辞官。六月，其爱子王雱病故，使王安石受到精神上的沉重打击，“尤悲伤不堪，力请解机务”㉑。十月，赵顼接受请求，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出任江宁府。但他并未上任履职。十年六月，王安石又辞去江宁府一职，从此闲居。赵煦元祐元年（1086），以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执政，废除此前推行的新法。王安石闻讯悲愤不已，四月，郁然病逝。

注 释

①《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上二》。

②《长编》卷一九八。

③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一。

④《长编》卷二七。

⑤《长编》卷一七四。

⑥《长编》卷二〇一。

⑦《宋史》卷二四二《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⑧《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⑨《临川先生文集》卷三九。

⑩《宋史》卷三二七《王安石传》。

⑪《长编》卷二二O。

⑫《长编》卷二二七。

⑬《长编》卷二二O。

⑭《宋会要辑稿·食货》。

⑮《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八。

⑯《长编》卷二五二。

⑰《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

⑱《长编》卷二六O。

⑲《长编》卷二六五。

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三。

㉑《长编》卷二七八。

两宋

元丰改制

赵顼熙宁年间（1068——1077）颁行的由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所倡导的新法，虽经历了与守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以及王安石的最终遭罢相，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未完全废止。王安石罢相出朝后，在赵顼的主持下，新法仍在一定的程度上得到推行。元丰元年（1078），赵顼曾以王安石为尚左仆射、舒国公、集禧观使，仍有延续变法之意。直到元丰八年（1085），赵顼去世前，熙宁新法的主要措施仍在执行，部分内容又作了变更，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官制的改革。

自宋初以来，为加强君主专制统治，采取分割相权的办法，军、财、民三权分立，使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权，又置副职与长官相互制约，以此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使皇帝得以独断专行。但因此造成官僚机构重叠，官署职掌纷繁，又相互交插。而机构既无定员，又无专职，出现众多徒有虚名却无职事的冗闲官署及官员。加之官、职、差遣分离的官僚体制，又造成莅其官位而不履其职的现象，官称与实际职掌往往相悖，互相推诿，办事效率低下。熙宁年间，王安石虽对一些闲散机

构进行了调整，并新设一些机构，以利新法的推行，但未彻底改变官职分离、混乱的局面。且王安石主持变法，重在发展生产，提高军队战斗力，对官僚机构的弊端也未过多涉及，仅认为各机构能复其职掌即可，故官制固有的问题依旧十分严重。赵顼对此深感不便，遂执意对官制进行改革。

熙宁十年（1077），赵顼诏令校勘《唐六典》，以此作为官制改革的参考和依据。元丰三年（1080），又诏令中书省详定官制。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珪、参知政事蔡确等人的协助下，赵顼着手改革官制。

宋初于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是为中枢最高官署，亦为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又称为政事堂，简称中书，又称中书门下内省。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大权，号称“二府”。中书门下长官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为分散其事权，又置参知政事为副宰相。赵顼改制，罢中书门下，其职掌分归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但三省不设中书令；侍中、尚书令，而以尚书左、右仆射为正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为左相；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为右相。恢复唐朝“中书取旨，门下复奏，尚书施行”之制，实际权归中书，为右相所握。改参知政事为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为副宰相。原宰相处理政务之所遂移至尚书省，改称都堂。

枢密院仍为最高军事机构，但废枢密使、副使，长官改为知枢密院事，副长官为同知枢密院事，同为执政。与三省长官合称为宰执，是为宋廷的最高宰辅官僚。

同年八月，赵顼下诏，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而使各机构有固定的职掌，有定编、定员，因而许多机

构被裁减或合并。宋初置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合称“三司”，是为宋廷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长官为三司使，号称“计相”。赵顼撤销三司，将其大部职权归入户部与工部，又将审官院并入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在此基础上，充实和加强了六部的职权。

赵顼改革官制的重要内容是“正名责实”，即改定“寄禄官”制度。宋初虽沿袭唐代三省六部制，然其官名仅为官阶之用，是为虚衔，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及序迁，因此称为“阶官”，亦称“寄禄官”。元丰改制，将原有的文官散阶由29阶改为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24阶，作为新的寄禄官阶，定为《元丰寄禄格》，此后官员升迁、领取俸禄，一律依照新定寄禄“以阶易官”。而原寄禄官阶中的三省六部官名，则恢复其实际的职掌，使官、职相符相称。

赵顼对官制所进行的改革，确实裁减、撤并了一些冗闲官员和冗散机构，这使得宋廷每年可节省2万缗的开支，赵顼因此而感到满意。但改革仅对机构设置作了某些调整，官职、差遣，相权分离，相互牵制的基本政策并未得到彻底的改变，官僚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局面依然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又使赵顼有些后悔。

在官制改革的同时，赵顼又从强兵入手，以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亦对原有的兵制进行了局部的改革。为加强京城开封地区和西北边疆地的防御和战斗力，元丰二年（1073）十一月，先于开封府界试行“集教法”，即将开封府所属各县2800多名大保长集中于11处教场，每10人组成一个单位，由一名禁军教头负责操练，传习武艺。次年，待大保长们武艺学成后，宋廷又推行“团教法”，即将每一都保的保丁分为五团，

每团分别由一名大保长担任教头，训练保丁，教授武艺。此举对维持地方治安，防范盗贼，协助地方官府捕盗，亦有积极作用。

四年，宋廷又改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东路、永兴路、秦凤路等5路的义勇兵为保甲，随即将“集教法”与“团教法”推行于上述地区，经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使多达69万余保丁掌握了一定的武艺。

熙宁年间推行的保马法，在元丰年间也作了一些变更。宋廷规定，城镇坊郭户家产及3000缗，乡村户家产及5000缗者，须养马一匹。如家产超过所定标准一倍者，则须增加养马一匹，但最多可养马3匹。这不同于由官府发给监马或给钱令养马户自行购养的保马法，而是将马交由拥有一定家产的物力户承养，故称物力户养马法，简称户马法。此法主要推行于开封府界、京东路、京西路、河北路、河东路、陕西路等地区，收到一定的成效。元丰七年，宋廷又于京东和京西两地推行另一种养马法，规定每一都保须养马50匹，称为都保养马法。这两种养马法，与熙宁变法中的保马法相比，虽具体的做法有所区别，但基本内容都是交由民间养马，旨在扩大养马的范围，为军队提供更多的马匹。

与此同时，赵顼对宋朝军队的主力军——禁军的数量也作了调整，扩充了这支正规军队的编制，使总人数由熙宁间的56万余人，增加到61万余人。

不过，元丰年间所行新法中也有与熙宁新法相悖之处。为了增加朝廷收入，宋廷又借推行新法之机，随意敲诈勒索，原行免役法中规定，州县官府出钱募人充役，所需募役费用按户资产多募，划等级征收，内又分免役钱和助役钱。元丰年间再

行募役法，则采取扩大免役钱、助役钱的征收范围的办法。两浙路即不按原法规定，以降低承担役钱的标准多收役钱。原定“坊郭户”家产不足二百千者，可以不交纳助役钱，此时则将征收助役钱的家产最低征收限额降至五十千，仅此一策，即使众多家资微薄的民户承担纳募役钱的义务，所以尽管“雇役不加多，而岁入比前增广”①。到元丰七年，所征收的募役钱，竟比熙宁年间多收入三分之一。募役法当为便民之法，然而此时所行则又为扰民之举。

赵顼继王安石之后主持的元丰年间的改制与变法，目的仍是为了富国强兵。但他对改革的态度远不及王安石坚决，尤其是不敢触及权贵及大地主的利益。每遇守旧势力的反对，他即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甚至放弃改革，这使得新法无法贯彻始终，所以收效甚微。赵顼既避免触犯权势的利益，只能千方百计从百姓身上攫取财富。赵顼在位年间，宋廷每年征收二税、青苗、免役、市易等赋税达 6000 余万贯，比英宗嘉祐年间的 3680 余万贯增加了 2300 余万贯。赵顼还于宫中特设元丰库，储存岁入积剩钱物，仅元丰五年，元丰库即收进坊场各剩钱 500 万贯，常平钱 800 万贯。经过熙宁到元丰年间的变法与改革，朝廷收入确有很大的增加，基本扭转了英宗时入不敷出的亏空局面。不过，同时百姓所遭受的盘剥也更加严重了。

注　释

①《宋史》卷一七七《食货志》。

两宋

元祐更化

王安石主持变法时，由元老重臣和一些士大夫组成的守旧派因反对变法而多被逐出朝廷。赵顼即帝位之初，曾尊其母高氏为皇太后，其祖母曹氏为太皇太后，曹氏为宋开国元勋曹彬的后代，高氏则为太宗时名将高琼的后代，两家均为高门贵族，她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也强烈反对“改弦更张”。为了限制皇亲国戚的某些特权，王安石变法时曾制定了一些政策。熙宁二年（1069），颁定《裁宗室授官法》，规定“唯宣祖、太祖、太宗之子孙，择其后各封国公，世世不绝，其余元孙之子，将军以下听出外官；祖免之子，更不赐名授官，许令应举”。三年，“再裁定后、妃、公主及臣僚荫补恩泽”①。这一举措对世代享受特权的皇亲国戚及其子弟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于是“宗子相率马首陈状，诉云：‘均是宗庙子孙，且告相公，看祖宗面’。荆公（即王安石）厉声曰：‘祖宗亲尽，亦须祧迁，何况贤辈！”②太皇太后曹氏与皇太后高氏更是痛哭流涕地劝说赵顼：“祖宗法度，不宜轻改。民间甚苦青苗、助役，宜悉罢之。王安石变乱天下，怨之者甚众，不若暂

出之于外。”③在王安石的一再解释和坚持下，赵顼才未采纳守旧派的意见，新法得以继续推行。

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逝，庙号神宗，皇太子赵煦即位，是为哲宗，逾年改元“元祐”。是年赵煦尚不满10岁，赵顼时的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分临朝称制。她一主持朝政，立即起用反对熙宁新法的守旧势力，任命了一批守旧派的核心人物，以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两人同为宰相。又以元老重臣文彦博为平章军国重事。在宣仁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又任用刘挚、范纯仁、范祖禹、吕大防等人，结成一个势力强大的守旧派官僚集团。在宣仁太后“以恢复祖宗法度为先务”的旨意下，司马光打着“以母（宣仁太后）改子（宋神宗）”的旗号，攻击熙宁新法。司马光首先将矛头对准王安石，诬蔑“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④。继而否定新法，指责变法是“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⑤。为了堵塞言路，进一步排挤和迫害变法派官僚，司马光令刘挚、王岩叟等人充任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要职，从而控制了专事监察纠劾百官的重要机构——御史台，让他们对变法派提出弹劾。由此掀起反对和废止变法的狂潮。

司马光首先废除免役法，而恢复旧有的差役法。元祐元年（1086）正月，他两次上奏阐述自己的主张，然而在对比二法利弊时，却又举不出免役法的弊端，或称免役法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⑥，或云“彼免役钱虽于下户困苦，而上户优便”⑦，自相矛盾，漏洞百出。实在无法，司马光又说：“凡法久则难变。此法行之已十五年，下户虽愁苦，上户颇优

便，常情议论已是非不一，若不于此时决志改之，恐异日遂为万世膏肓之疾，公家不得民力，贫民常苦，富民优矣。”为达此目的，他竟不惜哀求臣僚赞同此举，“光观欲作一文字奏闻，若降至三省，望诸公同心协力与赞成。如此行之，可以降久弊，苏疲民”⑧。司马光的行径，激起了朝中变法派官僚的不满和抵制。知枢密院事章惇说他“旬日之间，两入札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审因何违戾乃尔！”司马光称：“民间疾苦，所降出者约数千章，无有不言免役之害者，足知其为天下之公患无疑。”⑨章惇则上疏奏说：“臣着详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间言免役之法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马光以其所言异己，不为签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为害，事理分明。”⑩造谣不成，司成光又称免役法实行后，“驱迫贫民，剥肤椎髓；家产既尽，流移无归，弱者转死沟壑，强者聚为盗贼”⑪。章惇指出：“自行法以来十五余年，未闻民间因纳免役钱有如此事。⑫”尽管司马光竭尽造谣中伤之能势，可却被章惇“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⑬，这就招致守旧派的憎恨与报复，他们利用控制的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直至将他罢官，贬出朝廷，出任知汝州，最后赋闲家居方才罢休。

在司马光等人的独断专横下，免役法终被废止，重行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秉承司马光旨意，令下仅 5 日，即在辖境内全面恢复差役法，其扰民之害远远胜于熙宁之前。此后，司马光又提出其他新法均应废罢，这一论调不仅变法派官僚反对，就连守旧派官员也难以接受，苏轼、苏辙兄弟等人就曾公开表示不赞成司马光的这一作法，其他许多官员也都先后上疏，表示对废止新法的异议。至于民间百姓更是不愿恢复旧法，“天下皆思雇役（即免役）而厌差役”⑭。但这一切丝毫没有改变

司马光的作法，继元丰八年明令废罢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甲法等新法后，元祐元年又继续罢止青苗法、免役法等。

在废止新法的同时，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变本加厉地迫害变法派及支持变法的官僚。除章惇外，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及一批官员先后遭排挤和打击，或贬或逐。守旧派罗织罪名，企图将他们置于死地。元祐四年（1089），守旧派将蔡确所作《东盖亭诗》引申评论，认为是讥讪宣仁太后，在此罪名之下，蔡确终被贬死于新州（治今广东新兴）。不仅如此，守旧派还将近百名变法派官员的名字分列于王安石、吕惠卿、蔡确的名下，冠以“亲党”之称，“榜之朝堂”，使他们永远不许重返仕途。这一系列的打击和迫害，令变法派官僚人心惶惶，被贬至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的吕惠卿在谪籍 9 年之中，竟连一口冷水都不敢喝，唯恐因此患病，而受守旧诬蔑，指责自己悲戚愁叹。

守旧派对待新法和变法派可谓痛恨之极，但面对西夏的讹诈却又俯首贴耳。宋神宗时，宋廷大举发兵，两度征伐西夏，虽战场上失利，但战后，宋廷于宋夏边境要冲之地，建起塞门、安疆、葭芦、浮图、米脂等寨堡，从而加强了对西夏的防御工事，遏制西夏军队的进犯，也对西夏构成一定的威胁。神宗之后，西夏认为有机可乘，遂于元祐元年派使臣入宋，提出归还失地的要求。司马光和文彦博却不顾群臣反对，“只欲卑弱请和”⑮，硬将安疆、葭芦、浮图、米脂 4 寨拱手送与西夏，以此换取一时的苟安。

元祐元年正月，司马光病重时，新法尚有部分未予废罢，为此他叹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⑯他一面将废除新法的重任托付给吕公著，一面则抱病上奏，以求尽快悉废新

法，“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⑰。守旧派的倒行逆施，一意孤行，引起朝野人士的普遍不满，希望司马光等人能以社稷为重，悉心辅佐宋帝赵煦，但这均无济于事。司马光虽为相一年后即病逝，但执政的宣仁太后依旧推行废止新法，恢复旧法的举措。直至元祐八年（1093）九月病逝，在整整的8年之中，司马光及其后继者全部废除了熙宁年间颁行的新法，史称“元祐更化”。这些守旧派官僚除依附于宣仁太后，有恃无恐外，几乎无视小皇帝赵煦，引起他极大的不满。待宣仁太后病故，赵煦亲政，遂再度起用变法派，严厉打击守旧派官僚，“元祐更化”终遭罢止。

注　释

①《皇宋编年备要》卷一八。

②陆游《老学庵笔记》。

③《长编》卷二五二。

④《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七。

⑤《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

⑥《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⑦《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〇。

⑧参见《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

⑨⑪《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

⑩⑫《长编》卷三六七。

⑬《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⑭苏辙《栾城集》卷四三。

⑮《朱子语类》卷一三〇。

⑯《长编》卷三五五。

⑰《长编》卷三九四。

两宋

洛蜀朔党争

宋元丰八年（1085）三月，赵顼病故，年仅10岁的幼子赵煦继位，是为哲宗。英宗的皇后、神宗赵顼的母亲宣仁太后高氏又以太皇太后的身分垂帘听政，处理军国大事。她早就对熙宁新法不满，临朝称制后，立刻纠集和起用反对新法的守旧派官僚，在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公著、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等元老重臣的主持下，不仅废罢了熙宁新法，又对变法派官员进行打击和迫害，或贬官出朝，或罢官免职，一时间保守势力气焰嚣张，变法派人人自危。然而，司马光等人的倒行逆施，不仅引起朝野变法派的反对，也激起守旧派内部一些官僚的不满，尤其是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①的一概否定新法的作法，曾招致守旧派官僚的反对。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在熙宁年间因反对并拒不执行新法，而被贬出朝，被司马光重新起用后，却不同意不加区别而一概废罢新法，建议“去其太甚者可矣”②。他认为推行青苗法“利国利民”，当继续实行。对于免役法，他更认为：“此法熟议缓行则不扰，急

行则疏略而扰，委非其人，其扰滋甚”③。为此曾劝说司马光谨慎行事。但这一切非但未能引起司马光等人的重视，反而招惹不满。中书舍人苏轼也曾是一位新法激烈的反对者，复出后，亦不满司马光悉废新法，主张渐改，尤其反对废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甚至提出用积存的3000万贯免役宽剩钱买田，实施给田募人充役之法，这与变法派的“给田募役”是一致的。在廷议役法时，他更是明确地表示支持免役法，当面告诉司马光“罢募役而复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盖未易也”④。尽管已惹怒了司马光，但苏轼依然抗争不已，“上疏极言衙前可雇不可差，先帝此法可守不可变”⑤。就连吕公著也提出新法不宜全废，对其中的弊端应予以矫正而后复行。其他又如中书舍人范百禄、兵部尚书王存、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等一批为司马光所重用的守旧派官僚也都不同程度地反对司马光的做法，或主张推行部分新法，甚至上疏陈述复行旧法的种种弊端。

不仅在废罢新法问题上，守旧派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对待变法派官僚的态度上也绝非统一。范纯仁曾不满于对变法派的残酷打击与迫害，认为这样的做法会使“吾辈将不免矣”⑥。

尽管如此，以司马光为首的最顽固的守旧派势力却对此置若罔闻，一意孤行。他们把持着朝廷大权，继续废罢新法，复行旧法，排斥打击变法派官僚。为减少废罢新法的阻力，他们甚至不放过持不同政见的守旧派官僚，秘书省正字刘安世就曾数次上疏，弹劾范纯仁、王存、李常、盛陶等人。事实上，守旧派官僚中只有御史中丞刘挚、御史王岩叟及刘安世等人完全赞同并支持司马光的主张。守旧派内部的分歧随着新法的废罢

而愈演愈烈，终于酿成一场朋党之争。

元祐元年（1086）九月，宰相司马光病逝，80余岁的文彦博以“班宰相之上”⑦揽政。又擢升尚书左丞吕大防为中书侍郎，刘挚为尚书左丞，守旧派中的顽固势力继续执政。但此时由于政见的不同及学术主张的分歧，已导致相互间的倾轧，开始分化为几个小集团，形成以崇政殿说书、河南（今河南洛阳）人程颐及其门徒、左司谏朱光庭，殿中侍御史贾易等人为首的“洛党”；以中书舍人、知制诰、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殿中侍御史吕陶等人为首的“蜀党”；以永静东光（今河北东光）人刘挚，右谏议大夫梁焘、起居舍人兼左司谏刘安世，监察御史王岩叟为首的“朔党”。其中以把持朝政的“朔党”势力最为强大，三党之间明争暗斗，一场混战。

“洛党”首领程颐于元祐元年以“布衣之士”为司马光、吕公著引荐入朝，后以崇政殿说书之职充任幼帝赵煦的老师，他以“师道”自居，向赵煦传授儒家正统思想，且又以“正色”训诫，主张一切复行“古礼”。司马光病故，他甚至反对朝臣于朝贺大赦之时，去吊唁司马光。他的此番言论惹起朝臣的不满，斥之为迂腐之论。苏轼更以他不近人情，所行非孔夫子之礼而屡加讥讽。朱光庭、贾易等人借口苏轼在策问中提出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偷惰不振，效法“神考之励精”而使官吏们流于苛刻，而攻击苏轼讥讽宋仁宗赵祯不如汉文帝刘恒，宋神宗赵顼不如汉宣帝刘询，认为朝廷应以此追其罪责。苏轼同党吕陶、监察御史上官均遂反唇相讥，上疏论列朱光庭为程颐宣泄私忿，“议者皆谓轼尝戏薄程颐，光庭乃其门人，故为报怨。夫欲加轼罪，何所不可，必指其策问以为讥谤”⑧。程颐与苏轼自此势不两立，两党间积怨日深。对此，

无所偏倚的范纯仁也觉得朱光庭的上疏言辞过于偏激。但身为朔党的王岩叟却公开偏袒程颐，这更激化了两党间的矛盾。

洛党与蜀党的争斗，其结果两败俱伤。元祐四年（1089），苏轼辞官出朝，改任知杭州，程颐也被免去崇政殿说书一职，改充权同管勾西京国子监，而刘挚的朔党却"渔翁得利"从此独揽朝政。

是年，受谪贬而居住于安州（治今湖北安陆）的前任宰相蔡确作《东盖亭诗》十章，梁焘、刘安世将诗滥加引申评论，竟指责其讥讪宣仁太后高后，更诬陷道："方今忠于确（蔡确）者，多于忠朝廷之士；敢为奸言者，多于敢正论之人。以此见确之气焰凶赫，根株牵连，贼化害政，为患滋大。"⑨高太后遂将蔡确自殿文殿学士贬为光禄卿，不久再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治今广东新兴）。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也因未纠察蔡确而被改官。范纯仁为此而劝谏高太后："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诛窜大臣。今举动宜与将来为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且以重刑除恶，如以猛药治病，其过也，不能无损也。"⑩继而又与尚书左丞王存一同劝谏赵煦，退出后再度上疏，力陈不应治罪蔡确之由。然而范纯仁的力谏终未奏效，相反司谏吴安诗、正言刘安世却交章攻击他为蔡确之党，范纯仁遂力请免官辞职。次年，即罢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出任知颍昌府。

六年，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与尚书右仆射刘挚同为宰相，然二人因争权多有不合。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依附于吕大防，交相上奏，以刘挚有"第往以俟休复"之语，意指"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又奏劾他与蔡确、章惇、梁焘等人交结，"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祸"。高太后闻讯，对刘挚

多有不满。刘挚上章自辩，其党人官僚也多为他辩解，高太后却认为："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⑪刘挚因此而被罢相，出知郓州。郑雍、杨畏并未就此罢休，继续对他进行打击，于是刘挚又改任知大名府，改迁知青州。在刘挚为吕大防党人所弹劾时，王岩叟连续上奏为他辩护，结果被指责为刘挚同党，被罢官，出任知郑州，次年又受排挤，出任河阳府知府，不久，便死于任上。另一位同党，给事中朱光庭驳斥郑雍、杨畏的捕风捉影之论，"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⑫，也因此被免官，出朝任知亳州。

起止于元祐年间的蜀洛朔党争，实际是守旧派官僚内部的一场争斗，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和意义，相反而造成了政局更大的混乱。

注　释

①《长编》卷三九四。

②③《范忠宣公集》卷一九。

④ 苏轼《东坡七集奏议》卷三。

⑤《宋会要辑稿·食货》。

⑥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一。

⑦《宋史》卷一七《哲宗纪一》。

⑧《宋史》卷三四六《吕陶传》。

⑨《宋史》卷三四二《梁焘传》。

⑩《宋史》卷三一四《范纯仁传》。

⑪⑫《宋史》卷三四〇《刘挚传》。

两宋

绍圣绍述

赵顼母高氏以太皇太后（宣仁太后）的身分辅佐朝政。她重新起用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废罢熙宁新法，恢复旧法，残酷打击、迫害变法派。司马光死后，吕大防、刘挚等守旧派官僚继续执政，他们依附于以太皇太后为代表的皇亲国戚，更有恃无恐，根本无视幼帝赵煦，“每大臣奏事，但取决于宣仁后，哲宗有言，或无对者”①。以至于臣僚每有奏事，均面对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而幼帝“只见臀背”②而已。赵煦虽极为不满，但亦无可奈何。

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氏病故，赵煦开始亲政。他有志继述宋神宗赵顼在位时颁行的新法。而在守旧派执掌朝政时，不仅是受排挤的变法派官僚，就连守旧派内部的许多官僚都对刘挚等人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心怀恢复新政的强烈要求，然而多是敢怒而不敢言。他们更视皇帝亲政为扭转政局的契机，这与赵煦的意图完全一致，在共同的愿望下，君臣之间形成了一股“绍述先帝遗业”的潮流。赵煦一亲政，立即着手恢复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合称“熙丰新政”），并于次年四月

下诏，改元“绍圣”。宋廷政局自此再度发生急遽的变化，故史称“绍圣绍述”。

赵煦下令依照《唐六典》重新修订官制。随即又相继罢免原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等守旧派，即所谓“旧党”官僚的官职，门下侍郎苏辙劝说赵煦不可轻易变更元祐之政，不能复用变法派执政，赵煦大怒。罢免其官职。随后再贬吕大防为秘书监，刘挚为光禄卿、苏辙为少府监，对先期已罢贬的苏轼也不放过，又落职知英州，再谪贬惠州（治今广东惠阳东）。数月后，吕大防又“以监修史事贬秩，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安州（治今湖北安陆）居住”③。对于在元祐年间（1086——1093）追随守旧派，肆意诬蔑诽谤变法派及持不同政见官僚的礼部侍郎范祖禹、枢密都承旨刘安世等人也陆续罢官，贬逐出朝。与此同时，对于元祐更化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变法派官僚则给予极高的褒崇礼遇，以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对蔡确追复右正议大夫，进而又特追复观文殿大学士，赠太师，赐谥号“忠怀”。重新起用原变法派的主要人物，委以资政殿学士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翰林学士承旨曾布为同知枢密院事，原吏部尚书许将为尚书左丞，翰林学士蔡卞为尚书右丞。后又以曾布为知枢密院事，许将为中书侍郎，蔡卞为尚书左丞，吏部尚书黄履为尚书右丞，翰林学士林希为同知枢密院事。经过一系列的任免，基本清除了守旧派势力，组成了以宰相章惇为首的所谓“新党”的官僚集团，为“绍圣绍述”扫清了障碍。

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掌握政权后，继续严厉打击守旧派，甚至连中间派也不放过。绍圣四年（1097），赵煦下诏，追贬吕公著为建武军节度副使，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王岩叟

为雷州别驾，又夺原同知枢密院事赵瞻、中书侍郎傅尧俞所赠谥号，降文彦博为太子少保。变法派仍感不足，继而又追贬吕大防为舒州团练副使，刘挚为鼎州团练副使，苏辙为化州别驾，梁焘为雷州别驾，范纯仁为武安军节度副使，统统流放岭南，分别安置于循州（治今广东龙川）、新州（治今广东新兴）、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化州（治今广东化州东北）、永州（今属湖南）等5州。原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亦被追贬为光禄少卿，以太子少傅致仕的韩维不仅被追夺官爵，还与其他30余人同遭贬官。为使打击守旧派的这场斗争成为世人之鉴，赵煦下诏："大臣朋党，司马光以下各轻重议罚，布告天下。余悉不问，议者亦勿复言。"④负责为起草贬黜元祐群臣的中书舍人林希不仅用词"极其丑诋，"甚至"以'老奸擅国'之语阴斥宣仁"⑤，欲以守旧派与太皇太后相互勾结，谋废宋帝的罪名，追废宣仁太后，诛杀守旧派官僚。此举因引起朝臣们的愤慨，加之赵煦的反对，才未扩大株连。

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宰相章惇等变法派逐步恢复新法。赵煦于改元"绍圣"的当月，即下诏令各路恢复元丰年间的免役法，随后又复行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法，恢复设置提举常平官，以及义仓等。到元符元年（1098），又将常平、免役、农田水利、保甲等法分门别类，编为一书，名为《常平免役敕令》，作为推行新法的依据。在此期间，还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国史》、《神宗帝纪》等记录神宗一朝政事和变法情况的史书，并将王安石所著《日录》载入《神宗实录》，又于宫中建成显谟阁，用以专门收藏《神宗御集》。以此为神宗赵顼及其熙宁新法正名。针对元祐年间守旧派修改的科举和学校制度，亦进行更改。首先废罢进士科考习试诗赋，令只专习

二经。赵煦还下诏令京师及地方学校官员，凡未经制科、进士和学校上舍生而入仕为官者，一律罢免。并且解除元祐年间不许进士科考时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又令蔡卞议定国子监三学及各州州学学制。对于官吏的选拔升迁与贬黜，亦注重对其政绩的考核，赵煦亲政不久，即令监司每年督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治绩，将其中有突出成绩者上报朝廷。绍圣三年，又令按照元丰改制所订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确定俸禄与官级。

历绍圣、元符年间，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基本遵照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的内容推行新法，其间亦针对新法过去实施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改革和调整，因此“绍圣绍述”仅仅是依章行事，几乎无所创新。

在废罢旧法，恢复新法之时，章惇、曾布等宰执一反守旧派屈服妥协的对外政策，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浇攻挠耕”之策迫使西夏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无法集结进犯宋疆。绍圣二年八月，宋廷终止与西夏关于订立两国疆界的谈判，采取进筑寨堡，拓土扩疆的战略，在泾原路、鄜延路、环庆路等西北沿边地区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先后建成寨堡50余处，使千里之地成为阻止西夏军队入侵的防线，元符元年十月，宋夏间爆发平夏城之役，宋军一举击败30万夏军，并且占据河东路西北、陕西路横山至天都山一线的战略要地。这一系列的战绩，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宋廷对西夏所处的消极被动的局面，也迫使西夏于次年“叩关”⑥求和。二年，变法派控制的朝廷再度发兵攻占吐蕃族占据下的青唐（今青海西宁），改青唐为鄯州，邈川（今青海乐都）为湟州。不久，吐蕃族大举反抗，宋将种朴阵亡，宋廷被迫放弃青唐撤退。

然而绍圣、元符年间的变法并未像王安石变法时那样，为

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政局而认真贯彻执行。在赵煦亲政的六年中，变法派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打击守旧派及消除影响的斗争中，因此绍述最突出的一点是巩固了变法派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内讧和分裂。握有枢密院大权的曾布虽以变法派自居，但在王安石变法后期，曾上疏反对推行市易法，而与吕惠卿分裂。绍圣初年，他更千方百计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其后又攻击章惇引用小人，专恣弄权，甚至借对守旧派官僚的罢贬，指责他是“报私怨”。还别有用心地指责章惇和蔡卞于朝中培植党羽。而原来政见一致的章惇与蔡京、蔡卞兄弟，也因权势之争渐生积怨。变法派内部的相互倾轧，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严重影响了新法的深入推行。

元符三年（1100）正月，赵煦病逝，庙号哲宗。皇太后向氏为皇亲国戚中的守旧派势力，当权后即再度起用守旧派官僚，任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等一批变法派官僚则相继被贬出朝。以继承神宗新法为宗旨的“绍圣绍述”遂告废止。

注　释

①《宋史》卷三四〇《苏颂传》。

②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一。

③④《宋史》卷一八《哲宗纪二》。

⑤《宋史》卷三四三《林希传》。

⑥《宋大诏令集》卷六三。

两宋

崇宁绍述

年仅25岁的赵煦病逝后因无子，在选立帝位继承者的问题上，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的分歧。哲宗母向太后提议立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异母之弟、端王赵佶为帝。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则主张立哲宗异母长弟、申王赵佖为帝，或立哲宗同母弟、简王赵似为帝，反对立赵佶为帝，认为他“轻佻，不可以君天下”①。支持向太后的知枢密院事曾布、尚书左丞蔡卞等人竟于朝廷上呵斥章惇：“听太后处分。”②向太后遂决策，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自己则“权同处分军国事”。

赵佶即位之初，朝廷大权实际掌握在向太后手中。她早在当宋神宗赵顼皇后时，就曾公开反对王安石变法。及其当权，即起用守旧派官僚，首先任用神宗时的著名守旧派代表人物韩琦之子、吏部尚书韩忠彦为门下侍郎，又以资政殿大学士黄履为尚书右丞。四月，又擢升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礼部尚书李清臣为门下侍郎，翰林学士蒋之奇为同知枢密院事。十月，又以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其后，再以观文殿学士安焘为知枢密院事，礼部尚书范纯礼为尚书右丞。

曾布也因投靠向太后亦被重用，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凡遭变法派罢贬的守旧派官僚，向太后都给予极高的礼遇。她下令对范纯仁等人“复官宫观”，将贬到岭南管制的苏轼等人徙往内地居住，又追复文彦博、王珪、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33人的官爵。

向太后对变法派则采取严厉打击、排斥的政策，罢免章惇的宰相之职，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后又贬为雷州司户参军。蔡京被贬为知永兴军，蔡卞被罢官。

守旧派官僚借向太后的势力得以重操朝政，但这位年事已高的太后，与赵佶“同听政”仅半年多，即力不从心，还政赵佶。赵佶亲政后，面对朝廷中的守旧派势力和残存的变法派势力，遂打出调和对立两派的招牌，“时议以元祐、绍圣均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释朋党”，下令次年改元为“建中靖国”，以示“邪正杂用”。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向太后病故，守旧派失去后台，极善投机钻营的曾布随即见风使舵，不断窥试赵佶的意向，且“渐进‘绍述’之说”③，又改以变法派自居。韩忠彦虽与曾布同为宰相，但韩忠彦处理政务优柔寡断，故事务多由曾布决断，赵佶亦多召其问事。在曾布的劝说下，赵佶决意恢复新法，遂下令又改次年年号为“崇宁”，以示遵崇宋神宗熙宁新法之意，再行新法。

崇宁元年（1102）二月，赵佶依绍圣故事，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五月，罢免韩忠彦左相之职，又降复太子太保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太师文彦博为太子太保，对其余守旧派官僚亦分别给予罢贬。赵佶甚至下诏，称“元祐诸臣各已削秩，自今无所复询，言者亦勿辄言”④。其后，又仿《唐六典》修定神宗所定官制。为了标榜“崇法熙宁”，赵佶特将供奉哲宗神位的

景灵西宫宝庆殿更名为重光殿。在曾布为相期间，守旧派官僚或罢或贬，势力大为削弱。

元符三年曾被向太后罢贬的蔡京，后数次为台谏官以与宦官交相弹劾，直贬为提举洞霄宫，闲居杭州（今属浙江）。在杭州，他结交了在此访求珍奇书画的明金局供奉官、宫中大宦官童贯。此后一连数月，不分白天黑夜，蔡京始终陪伴童贯尽兴游玩，关系甚为密切。蔡京所画屏障、书画等物，均经童贯之手送入宫中，童贯还常附上吹棒蔡京之言论交给宋帝赵佶。赵佶酷爱书画，见蔡京所绘及童贯所奏，不禁好感于蔡京。崇宁元年，遂徙蔡京为知大名府。适逢宰相韩忠彦与曾布积怨日甚，韩忠彦欲借助蔡京之力，壮大自己权势，以排挤曾布，遂引荐蔡京入朝，复用为翰林学士承旨。赵佶为崇法熙宁新法，有意修订神宗熙宁、元丰年间的政事。蔡京党徒、起居舍人邓询武早就向赵佶建议，“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得知赵佶意图后，他又进言：“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无助者。”于是作《爱莫助之图》，进献赵佶。其图如《史记》年表，旁列七行，分为左右，左曰元丰，右曰元祐，自宰相、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各为一行。左侧所列为能助绍述者，执政中唯列尚书右丞温益一人，其余官员姓名也不过三四人而已。右侧则列举在朝的辅相、公卿、各职事官，无一遗漏，多达百余人。此图意在显示朝中虽有百官，而能辅佐宋帝继述熙宁新法者却寥寥无几。赵佶将此图交付曾布，却揭去图中左侧所列的一个姓名。曾布见图，向赵佶询问所揭何人？赵佶答道：“蔡京也。询武谓非相比人不可，以与卿不同，故去之。”⑤曾布深知赵佶的用意，尽力迴避，推辞道：“询武既与臣所见异，臣安敢豫议？”⑥推辞不敢接受。以国朝次日，赵

佶又将《爱莫助之图》交给温益，温益欣然接受，遂借图发挥，以国朝宰相非蔡京不可，而对不赞成者，则指责为异论，并请求记录异论者。尽管温益的言行为世人所厌恶，然而早有此意的赵佶仍执意重用蔡京，使之辅佐帝业，复行新法。是年五月，经过一番明争暗斗，韩忠彦最终被曾布排挤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任知大名府。蔡京随即被擢升为尚书左丞，邓洵武改充中书舍人。

重返朝廷后，蔡京并不满足于获得的官位，又欲登居宰相之位。他与独居相位的曾布在政见上多相左，遂寻机将他排挤出朝。曾布为巩固和确保自己的相位，发展个人势力，拟定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曾布之婿陈迪为陈佑甫之子，故二人是为亲家。蔡京以为时机到手，此议方提出，他立即上奏宋帝，冠以徇私之罪，且称："爵禄者，陛下之爵禄，奈何使宰相私其亲?"⑦曾布当廷与蔡京争辩。两人争吵不休，曾布恼羞成怒，嗓音不觉提高了许多。在一旁的蔡京党徒温益见状，顿时呵叱道："曾布，上前安得失礼!"⑧赵佶对曾布亦大为不悦，即废罢了他提出以陈佑甫充任户部侍郎的请求。随后，御史台谏官又对曾布于朝廷上目无君主的无礼举止群起而攻之，以其任用亲信，培植党羽相弹劾。在蔡京及其党徒的攻击和排挤之下，曾布终被罢免宰相之职，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大学士之衔知润州。一月之后，蔡京即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次年，又改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蔡京凭藉手中权柄，大力任用和培植党羽。为其入相出力的邓询武官至吏部尚书，温益改授中书侍郎。他仿熙宁新法时所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于都省（尚书省）设置讲议司，自己任提举讲议司，主持所谓变法之事。又以其党徒吴居厚、王汉之

等10余人为僚属，凡属重大的政务，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一项设置3人主管，负责本项政务的政策制定及实施等事务。同以前的新旧党人一样，蔡京之流亦不放过对守旧派官僚及政敌的制裁。蔡京入相逾月，赵佶下诏，严令禁止司马光等21人的子弟入京师作官。随后又下诏，令中书省将元符三年向太后执政时，主张维持新法和废罢新法的官僚姓名及各人的奏章，分作正、邪两大类，每类又各分正上、正中、正下和邪上、邪中、邪下三等，分别记录在案。其中只有41人为正等，悉加旌擢，另有500余人为邪等，则降责有差。又定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余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总计120人为元祐奸党，由赵佶亲笔抄录姓名，刻石端礼门。为防止奸党串通作乱，规定受责降者不得同一州居住。此后又重定元祐及元符末奸党，与上书邪等者合为一籍，总计达309人，以司马光为首，再刻石文德殿门。蔡京又亲自抄录，令各州郡镌刻成碑，称为"元祐党籍碑"。奸党名籍中，亦包括因反对拥立赵佶为帝，而被指责为"为臣不忠"的章惇，以及门下侍郎李清臣、尚书右丞张商英，尚书左丞陆佃等10名与蔡京政见相左的变法派。凡被列入党籍者，重者被编管、责降到边远地区，轻者则谪贬或闲居，非经特许，不得内徙。经过此番清党，"元祐群臣贬窜死徙略尽"，可是蔡京"犹未惬意"，又"锢其子孙，不得官京师及近甸"⑨。赵佶也为此下诏："党人子弟毋得擅到阙下。"⑩甚至对已进士及第者，凡为元祐上书属正等者，升入甲等；属邪等者，则一律取消进士出身。

为了彻底打击守旧派及政见不一者，清除他们的影响，赵佶下诏毁掉放置于景灵西宫中的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范

纯仁、刘挚、范百禄、梁焘、王岩叟的画像。诏令各地官府收缴并焚毁已刊行的苏轼、苏辙、苏过等人的文集。凡元符末年曾向朝廷上书的进士，虽未入奸党名籍，但所书内容有诋毁、诽谤新法者，由地方州郡将其遣送至州学，依据太学的三舍生规定，让他们自己学习。一年后，能"革心自新"者，准许将来参加科举考试，如仍坚持旧有立场及观点者，则流放到边远地区编管。赵佶还令皇亲宗子不许与元祐奸党成员的子孙结为婚姻。

为了自我标榜，蔡京之流打着变法派"新党"的旗号，为两位推行新法的先帝更改谥号，改神宗谥号为"体元显道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改哲宗谥号为"宪元继道显德定功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追封王安石、蔡确为王，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在推行所谓的新法上，他们一面参照熙宁、元丰新政，一面肆意滥改，借机安插亲信党羽。更定官制时，蔡京改尚书左仆射为太宰，尚书右仆射为少宰，而他自称"公相"，总治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罢开封权知府，置府牧、府尹、府少尹之职。改定六部，以士、户、仪、兵、刑、工为称，并增加各部定员数额。又仿《唐六典》变更胥吏官称。令各路知州、通判官名中加入"主管学事"4个字。与此同时，其子蔡攸、蔡鯈等子孙10人相继入朝，窃据高官要职。他还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杨戬、朱勔、李彦、高俅等人相勾结，结成死党，左右朝政。宋初，凡皇帝下达诏令，均须交中书门下审议，而后命翰林学士撰书。至神宗熙宁年间，出现了诏令不交中书门下共议之事，其间即有权臣从中营私舞弊。蔡京执政后，唯恐群臣非议自己。遂在"绍述"的名义下，"故作御笔密进，而丐徽宗亲书以降，谓之御笔手诏，违者以违制

坐之。事无巨细，皆托而行，至有不类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⑪。又罢科举选士之法，令州县学校均仿太学设置三舍考选之制。于城南另建辟雍外学，广招四方之士。令各地推行方田之法。对江、淮7路实行榷茶，而官自为市。彻底更定盐钞法，规定凡旧钞一律不准使用，商人须向榷货务出钱买盐钞，再凭盐钞去产盐地换盐，只许到指定的地点贩卖。

蔡京之流的所谓“新法”，“名为遵用熙丰之典”，真正的目的已绝非富国强兵，而是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势，满足穷奢极欲的需求，故“未有一事合熙丰者”⑫。这一违背熙宁新法宗旨的“变法”，也遭到了部分官僚的反对和抵制，但在蔡京之流的迫害和打击下，很快即被压制下去。更定盐钞法后，“富商巨贾尝持数十万缗，一旦化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缢死”。提点淮东刑狱章绛对此情景哀悯不已，遂上奏，称“改法误民”。蔡京见奏章勃然大怒，下令将他革职罢官。但仍余怒未消，又令人铸造“当十”大钱，以此“尽陷（章）绛诸弟”⑬。

宋帝赵佶重用蔡京等人，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并以此为满足，统治愈发黑暗、腐朽。在“崇宁绍述”的幌子下，赵佶与蔡京之流完全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社会矛盾再度激化，统治进一步陷入危机之中。

注 释

①《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②《宋史》卷四七一《章惇传》。

③《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④《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⑤⑥《宋史》卷三二九《邓洵武传》。

⑦⑧《宋史》卷四七一《曾布传》。

⑨《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⑩《宋史》卷一九《徽宗纪一》。

⑪《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⑫ 徐梦梓《三朝北盟会编》卷四九。

⑬《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两宋

六贼当道

北宋末年，蔡京身居高位，操纵并控制朝政。这位所谓的变法派，却是一位极善投机钻营，惯用权术的奸佞之臣。他于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步入仕途。元丰八年（1085），他投靠当时的变法派、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蔡确。宋神宗赵顼病故后，守旧派上台，蔡京随即又倒向宰相司马光，为废罢新法，复行旧法而卖力。时任知开封府的蔡京秉承司马光的旨意，仅在5天的期限内，便将畿县已行的募役法改为差役法，司马光称赞道："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哲宗亲政，废止"元祐更化"，蔡京因"挟邪坏法"，遭台谏官弹劾，屡屡罢贬。然而他又很快摇身一变又成了变法派。绍圣元年（1094），蔡京重返朝廷。适逢哲宗"绍述"熙宁新法，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惇欲废役法，复行募役，为此他专门设置机构评议两法，但久议未决，蔡京则对章惇建议道："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蔡京乃以变法自居。蔡京反复无常，完全是为了谋取私欲，"十年间(蔡)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①。在绍圣年间，蔡京俨如一位坚定的变法派，对刘挚、梁

焘、王岩叟等守旧派一再论诛弹贬，其目的是觊觎执政。但因与曾布有隙而未能如愿。哲宗去逝，向太后垂帘听政，再废新法，尽逐变法派官僚，蔡京于是再度受贬夺职。直至被赵佶再次起用，登上宰相之位。蔡京最后的上台，"起于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为，而京阴托'绍述'之柄，箝制天子"②。他极力发展和培植自己的势力，朝中遍布党羽。他不仅将自己的儿子蔡攸、蔡儵、蔡翛、孙蔡行先后拉入朝中，官至大学士，等同执政，也对联姻亲家宋乔年、胡师文等人委以握兵之重，更与童贯、王黼、梁师成、朱勔、李彦等人相互勾结，牢固地控制并操纵朝廷军政大事，排斥异己，无恶不作，时人称为"六贼"。

赵佶重用"六贼"，六贼则竭力迎合赵佶骄奢淫逸的需求，倡"丰亨豫大"之说，大肆挥霍，甚至进言："人主当以四海为家，太平为娱，岁月能几何，岂可徒自劳苦。"③一时间，君臣穷奢极侈，视财富如粪土，累朝所储一扫而光。为了粉饰太平，又制订礼乐，铸造九鼎，建造明堂，修筑方泽，广立道观，于城中大兴土木。赵佶、蔡京一伙以皇宫窄狭，又于城北新建延福宫。此后，又于城东北营建"艮岳"，方圆10余里，堆土成山，高达90尺，峰峦起伏，殿台亭阁遍布其间，山下散布池沼洲渚。赵佶终日于此纵情取乐。蔡京及其子蔡攸府宅不仅宏敞，园内林木参天，装饰精巧华丽。蔡京家中妻妾成群，每逢生日，各地官吏都要向他进献珍奇特产，称之为"生辰纲"。曾出任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后迁武康军节度使的童贯，每得军需，皆充私藏，以至家中宝玉金币堆积如山。防御使朱勔在应奉局供职时，"指取内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数十百万计"④，他在苏州有众多甲第、名园、田产，

跨连郡邑，每年仅租税收入多达10万多石。官至宰相的王黼"凡四方水土珍异之物，悉苛取于民，进帝所者不能什一，余皆入其家。"⑤他于家中多蓄子女玉帛供其享乐，侍妾中有官封者即有18人之多。蔡京贪得无厌，已受仆射俸禄，又提出增加所谓的"司空寄禄钱"。甚至公然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时人称："三百贯，直通判；五百贯，直秘阁。"一时间，蔡京等人第宅门庭若市，"输货僮仆以得美官者，不可胜数"⑥。

崇宁元年（1102），宋廷于杭州设置造作局，交由童贯主持，每天役使数千工匠，为皇室制造珠宝金玉之物，以供赏玩，而所用物料，悉由民间征敛。稍后，又于苏州（今属江苏）设应奉局和造作局，由朱勔主管。赵佶酷爱奇花异石，蔡京便令朱勔密取江浙一带的珍异花石进奉。朱勔初进黄杨3株，颇受赵佶喜爱。以后，进奉花石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增加。为了装点延福宫和艮岳，朱勔"豪夺渔取于民"。凡百姓家中一石一木稍有奇异之处，即率健卒闯入其家，用黄帕封弥，以为标志。一时拿不走的，就令该户人家看护，稍有不慎，就加以"大不恭"之罪，敲诈勒索。待搬运之时，则拆屋扒墙以运出，致使人户顷刻间倾家荡产。时人若有一物稍有特殊，则认为是不祥之兆，唯恐灾难降临。如于陡峻山颠、悬崖峭壁上有奇木异石，应奉局官员则必定督课役夫登攀取摘，不管死活。百姓被征为役夫者，非死即伤，中等人家因此破产，或卖儿女以供其所需。一次朱勔得到一块太湖石，高4丈，装载在一艘大船上，竟动用数千夫装运、拉纤。在运往开封的途中，所经州县为使船只顺利通过，有的只好拆毁水门、桥梁，甚至凿开城墙。待这块太湖石运到开封后，赵佶亲自赐名为"神运昭功石"。运送奇花异石的船只，每10艘编为一纲，称为"花石

纲"。经常用数10艘船运送，以至运河中的花石纲船"舳舻相衔"⑦。

花石纲船不足装运时，应奉局官只就截取各路运粮的船和商船。运送花石的船只竟多得堵塞运河河道，于是又"取道于海，每遇风涛，则人船皆没，枉死无算"⑧。一块石头的运费可达30万贯，一竿竹子所费有高在50万贯者。

置局汝州（治今河南临汝）的宦官李彦"发物供奉，大抵类朱勔"。几根竹子便往往动用一部大车和数十头牛驴拉运。这些都责督百姓负责运送，一年四季，竟无空闲之时，致使"农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垦，殚财靡刍，力竭饿死，或自缢辕轭间"⑨。

花石纲及搜刮到的花石竹木，除装点皇家苑囿外，更被蔡京之流用来装饰自家的庭院园林，垒石为山，疏泉为湖，穷极华侈。造作局、应奉局及地方州县官吏也借机巧取豪夺，侵吞百姓财富，中饱私囊，凡"尺寸之地，入口之味，莫不贡献"。

朝廷开支日益加大。宋神宗元丰年间左藏库月支约36万贯，这时已高达120万贯，府库空虚，财政危机自然转嫁到百姓头上。崇宁元年（1102），恢复榷茶法，于茶叶产地设官场专卖，禁止私相贸易。四年，罢官场后，允许商贩向园户买茶贩卖，但须第官府"抽盘"，发给茶引。仅茶税一项收入十分可观，政和元年（1111）以后，年茶税额400余万贯，其中每年抽100万贯作为"私奉"，供皇帝使用。蔡京说还更改盐钞法，规定盐商须向榷货务以钱易盐钞，凭盐钞去产地换盐，再到指定的州县贩卖。但钞法多变，商人以钱易钞后，未及换盐，钞法又变，又须贴钱领新钞，以至于数十万贯一夕废弃。宋廷还以卖盐多寡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依据，州县官员因此便强

迫百姓按户等买盐。宣和元年（1119）前后，仅淮南、两浙地区的盐利就达2200万贯左右，成为宋廷一笔重要的财政收入。

除此之处，他们又巧立名目增加赋税剥削。政和六年（1116），令宦官杨戬于京西路设置公田所称“西城所”，制定法律，追查百姓田契，往往辗转复查，直到田契所出无证可凭时，便以此为由增加赋税额。此法自汝州地区开始实行，渐及京东、京西、淮西、淮北等地，凡“废堤、弃堰、荒山、退滩及大河淤流之处”，一律括为“公田”，收归官府所有。而后强制租给百姓耕种，且确定租税额，即使田地被冲毁或淹没，租税却不准减少。横跨济（治今山东巨野）、郓（治今山东东平）数州，方圆数百里的筑山泺，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捕鱼人户定立租税，按船纳值。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加租钱10余万贯，遇水旱灾害，常赋可减免，而租钱绝不可少。杨戬死后，继任的另一位宦官李彦更有过之，“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皆指为‘天荒’，虽执印券皆不省”⑪。更有甚者，李彦竟将鲁山（今属河南）全县括为公田，括田时令官吏焚毁百姓手中的田契，而后令田主承佃自己原来的土地，向官府纳租税。有胆敢上诉者，则施以重刑，因此致死者多达千万，而强占的所谓“公田”共有3．4万余顷，大批农民因此被夺去田产，流离失所。

赵佶、蔡京一伙为保障自己的巨额消费，不惜将地方仓贮钱谷搜罗一空，对各路每年向朝廷上缴的钱谷数额重新制定，较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又增加十几倍。不仅如此，宋廷还借“支移折变”敲诈勒索百姓。宋初因对辽、西夏用兵或有其他变故，官府常以此为由强迫百姓将应交本地官府的赋税送交到他地，是为支移。交纳赋税原有固定之物，官府以种种借口，

令百姓折成其他钱物上缴，以代原定赋税，是为折变。这二项正赋以外的附加税十分扰民，支移，路途遥远，往返耽误农时，不支移则交“地里脚钱”。折变，则加重农民负担，利于官吏、商贾从中牟利。故“支移、折变，贫弱者尤以为患”⑪。至赵佶时，又令一向不征收“支移”的地区，加征地里脚钱，1斗粮竟加收56文，相当于元丰年间的正税额。西蜀地区原定税钱300文，折变绢一匹，几经折变后，竟增至23贯，增加七八十倍之多。此外，更巧立名目进行盘剥，如绢帛即有私买、预买、泛买、常平司和买、应副燕山和买等项，米谷又有和籴、均籴、补发上供私籴等名目。名为预买，却不付钱，名为私籴，低价购买。

朝廷如此敲诈勒索，胥吏更是敲骨吸髓，在这种黑暗、腐朽的统治下，社会生产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众多的百姓倾家荡产，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人们疾呼：“打破筒（童贯），泼了菜（蔡京），便是人间好世界。”⑫对赵佶及蔡京等“六贼”深恶痛绝，迫切盼望改变自身悲惨的境地。

注 释

①②《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③ 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政通鉴》卷一六。

④《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⑤《宋史》卷四七〇《王黼传》。

⑥ 王偁《东都事略》卷一〇一。

⑦《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⑧ 方勺《青溪寇轨·容斋逸史》。

⑨《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附《李彦传》。

⑩《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⑪《宋史》卷一七四《食货志·赋税》。

⑫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二。

两宋

方腊起义

赵佶（宋徽宗）在位期间，重用蔡京等“六贼”，统治陷入极度的腐朽和黑暗之中。百姓破家荡产，无以为生，他们对把持朝政的“六贼”“恨之如骨，欲食其肉”①。一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终于爆发。

两浙路一直是北宋社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每年提供数额巨大的财赋。赵佶即位后，先后于杭州（今属浙江）、苏州（今属江苏）设置造作局、应奉局，交由童贯、朱勔等人主管，在他们大肆的搜刮、掠夺下，百姓的处境更加危难。宣和二年（1120年），睦州青溪县（今浙江淳安西北）农民在方腊的领导下揭竿而起。

方腊（方十三）为青溪万年乡帮源洞地主、里正（保正）方有常家的佣工（一说他有漆园，是为漆园主）。十月初九，他假托“得天符牒”，准备举兵。不料消息走露，被方有常发觉，派人报告官府。方腊得知后，立即率领农民冲入方有常家，杀死其家人40余口。他以帮源洞为据点，聚集附近的贫苦农民，号召举义旗，反抗宋朝的统治。随后，方腊召集百余

人于漆园誓师，酒至数巡，他起身历数宋朝统治的罪恶，指出“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糜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他告诉众人：“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②在方腊的号召下，远近农民纷纷响应，加入起义队伍，义军很快发展为上万人。

十一月初一，义军尊方腊为“圣公”，建元永乐，设置机构及官员，以方腊为相，将帅分为六等，以头扎红巾及其他各色头巾作为标志，建立起农民政权。

起义爆发后，两浙路提点刑狱张苑急报朝廷，而宰相王黼不以为然，反而严厉斥责张苑“张皇生事”。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两浙路制置使张建派兵马都监蔡遵、颜坦统精兵5000进剿青溪。方腊据险坚守，诱敌深入，二十二日，于息坑（今浙江淳安西）斩杀蔡遵、颜坦。青溪县知县陈光弃城而逃，义军猛攻县城，俘虏县尉翁开。占领青溪后，方腊率2万义军转攻睦州（治今浙江建德东）。睦州城防空虚，知州张徽言连夜逃遁。十二月初，方腊相继攻占睦州及所辖寿昌（今浙江建德西南）、分水（今浙江桐庐境内）、桐庐（今属浙江）、遂安（今浙江淳安境内）等县。“起义军以诛朱勔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③，所到之处，杀富济贫，深受百姓拥护。

不久，方腊率义军西进歙州（治今安徽歙县），全歼宋东南第三将、“病关索”郭师中所部，杀郭师中，占领歙州及所辖诸县。歙州战役后，方腊兵分三路：一路北上攻宁国（今安徽宁国西南）、宣城（今属安徽）、广德（今属安徽），一路南

下攻衢州（治今浙江衢县）、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一路由方腊率领义军主力，直趋杭州。

杭州为两浙路首府，亦为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朱勔的造作局即设置于此，更聚集着大批官吏、富商、地主及其财富，因此也屯驻有重兵。赵佶见义军攻势迅猛，声势浩大，欲招安方腊，乃下诏称："如能束身自归，或告言动息，捕致贼党，并特予免罪，一切不问。内稍有功绩，即优与推赏。"④义军不为所动，兵临杭州城下。攻城开始后，义军将领身先士卒，妇女和儿童也上阵助威。知杭州府赵霆弃城而逃。经过5天激战，十二月二十九日，攻陷杭州城，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于城内捕捉官吏，发掘蔡京父坟墓，暴其骸骨。

义军连克重镇，诛杀贪官污吏，深得人心，也得到更多民众的响应。苏州石生，湖州归安县（今浙江吴兴）陆行儿，婺州兰溪县灵山峒（今浙江兰溪西南）朱言、吴邦，温州永嘉俞道安，永康县方岩山（今浙江永康东）陈十四等人，纷纷率领当地农民参加起义。台州仙居县吕师囊，越州剡县（今浙江嵊县西）裘日新（仇道人），衢州郑魔王等人领导当地摩尼教徒起兵响应，湖州（治今浙江吴兴）、常州（今属江苏）、秀州（治今浙江嘉兴）等地农民也聚集众人，准备攻打州县。一时间，反抗宋廷黑暗统治的浪潮迅猛高涨。

面对骤然壮大的农民起义军，赵佶一面下诏"罪己"，令撤销苏、杭造作局，停运花石纲，罢免朱勔父子兄弟官职。一面令童贯任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谭稹为两浙路制置使，调集京畿禁军和驻淮东、荆湖北路的军队，以及陕西六路汉、蕃精兵，约20余万，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军。宣和三年正月，童贯、谭稹统兵出发。临行前，赵佶亲自为童贯饯行，嘱

咐道："东面事尽付太傅，必有紧急，不得已，可径作御笔行下。"⑤童贯到达江南后，依赵佶事先的部置，派兵进驻金陵（今江苏南京）和镇江（今属江苏）两大重镇，扼守江防。而后分兵两路：东路由谭稹、王禀等统领，欲经苏州、秀州，进攻杭州；一路由刘延庆、刘镇等统领，自宣州（治今安徽宣城）直进歙州。两路宋军约定合师于睦州。赵佶随后又派郭仲荀、姚仲平另统一军南下浙东，以为接应后援。

方腊占据杭州后，未采纳太学生吕将的建议，先进兵江宁（今江苏南京），抢占长江天险，阻止宋军过江增援，而是将主力调集到南面，进攻婺州、衢州。这一战略上的失误，给宋军的大举进剿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有利时机，而义军自举兵以来在战场上的主动权亦由此而丧失。正值童贯统兵南下之时，方腊也正分兵南征北伐。北伐义军兵分两路：东路由方七佛领8万义军，一举攻克崇德县，进围秀州，又派一支队伍进入湖州境内。秀州统军王子武据城顽抗，义军攻城不下。正在激战之时，王禀所率东路军亦进到秀州城下。方七佛腹背受敌，他仍指挥义军于秀州旷野上与数倍于己的宋军拼死厮杀，方七佛身负重伤，所部9000余人阵亡，最后突围退守杭州城。西路由八大王率领，由歙州向江宁进发。二月初，连克宣州宁国县（今安徽宁国西南）、旌德县，进围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宋西路军总指挥刘延庆令刘镇移军广德救援，令杨可世率兵进驻宣州，以阻止义军北上。八天王率义军阻击杨可世所部，终因寡不敌众，3000义军阵亡，旌德县复为宋军占据。随后义军又遭刘镇所部围击，战败，宁国县城亦为宋军占据。宋军随即缩小对杭州的包围圈。

在此之前，方腊率领义军主力南征，相继攻陷婺州（治今

浙江金华）及开化、江山、常山等县。郑魔王统领一支义军进攻衢州，守城将领韩起弃城出逃，知州彭汝方被斩，衢州为义军占领。另一支义军队伍由洪载率领，亦攻占处州（治今浙江丽水西）。正当起义军节节胜利之时，方腊得知宋军大举进攻杭州，急令义军回师救援。义军将领吕将认为南线兵力分散，大部主力未及撤回，建议暂时放弃杭州城，而发兵直进宋军后方的金陵，再寻机攻取杭州。方腊仍未采纳建议，却与方七佛等率领义军坚守城池。

二月，宋军在完成对杭州城的包围和进攻的布置之后，开始发起猛攻。初七日，义军首先于城北的清河堰阻击宋军的进攻。宋军轮番攻击，双方激战六天六夜，义军伤亡惨重。城中粮尽，难以固守，义军只得突围转移。方七佛领2万义军留于城中掩护方腊及其他义军出城，他与宋军直杀至深夜，又下令焚烧城中的官府、道观、寺庙、学宫等，最后突围出城时，仅存千余人。宋军实际得到的仅是一座空城。

起义军撤出杭州后，仍坚持在杭州以南地区抗击宋军。三月初，义军试图扭转局面，突然回师攻打杭州，但在宋军的反扑下，再度失利，方腊见久战未捷，遂转移睦州。三月中旬，宋军将领杨可世、刘镇各统所部合击由八大王统领的西路义军，义军不敌，被迫放弃歙州。随后，八大王又于歙州潘村指挥万余义军迎击宋军，又派万余义军绕到宋军后方出击，以夹击两支敌军。战斗异常激烈，至半夜，义军力不能支，后撤，1500余名将士阵亡。次日，义军又偷袭宁国县城，再次失利。至此，义军的西路军已无力抗击宋军，步步退守。宋军紧追不舍。

王禀占领杭州后，于三月初十自杭州向西进剿，连续攻占

富阳、桐庐、睦州。是月底，宋廷再派刘光世率鄜延兵、张思正率河东兵、姚平仲率泾原兵增援。四月初一，刘光世部进攻衢州，郑魔王统万余义军与宋军激战，2300多名义军将士阵亡，郑魔王被俘，衢州城陷落。初七日，刘光世再领兵东进婺州。自衢州退出的义军乘城中宋军主力东进之机，发动反攻。守城将领叶处厚落水身亡，义军攻入城中。刘光世急速回师，衢州城重新落入宋军手中。十七日，宋军攻陷婺州。十九日，王禀指挥宋军攻占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青溪县。方腊被迫退守帮源洞。

宋东路军紧随义军之后，追至帮源。四月下旬，童贯又调集西路军，层层包围帮源洞山区，总兵力达20余万。此时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有20多万人，他们凭借险要的地势，四下设置陷阱和埋伏，准备殊死抵抗。宋军曾向门岭发起过攻击，但未能奏效。刘镇又领精锐自小路偷袭门岭。门岭失守，帮源洞被打开了一个门户。二十四日晨，宋军以“纵火为号”，分别由刘镇、王禀率部从两个方向进攻帮源洞。义军顽强抵抗，从清晨一直激战到深夜，有万余名义军战死，方腊退守到一个石洞中。二十六日，在原里正方有常之子方庚等人的带领下，宋军校韩世忠率一支人马猛攻义军据守的石洞。八大王指挥义军与宋兵殊死搏斗，7万多将士先后牺牲，方腊及其妻邵氏，子方亳（二太子），丞相方肥，以及八大王等首领先后被俘，被解往杭州，又押解到都城开封。八月二十四日，方腊父子遭杀害。帮源洞攻破后，宋军对俘虏的义军将士及家属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死者无计。

“方腊虽就擒，而友党散走浙东，‘贼’势尚炽”。⑥起义军余部转移浙东后，与在这里坚持抗宋斗争的义军首领吕师

囊、裘日新、霍成富等各支义军共同战斗。童贯派遣郭仲荀、刘光世、姚平仲等将领率部分兵进攻义军。郭仲荀进兵三界镇，裘日新组织义军迎击失利。姚平仲兵进义乌（今属浙江）等县，攻占裘日新的石洞，裘日新战死。刘光世一部进剿婺、衢等地的义军余部，致使浙东义军遭受巨大的损失。

闰五月初，宋廷以方腊义军已遭镇压，北方与辽战事正紧，下令将大部分宋军调往北方，仅留2.5万军队继续剿灭剩余的义军。下旬，方腊起义军余部在方五相公，方七佛率领下仍坚持斗争。宋军在姚平仲的统领下攻陷台州仙居境义军据点招贤等40余洞。六月，吕师囊率义军转移黄岩（今属浙江），宋将折可存追击至山区受阻。义军扼守断头山，凭借山势抵抗，宋军死伤甚众，多日不得前进。宋将杨震指挥兵士自山后包抄，义军战败，吕师囊等30余位首领遇害。七月，义军首领俞道安率义军，号称10万人，自永嘉（今属浙江）转战乐清（今属浙江）等地，并于乐清重创宋军，随即又攻打温州（今属浙江），攻城30多天未破，遂转入处州境内永康山谷中。十月，宋军进山围剿，俞道安战败牺牲。

尽管各支起义军相继被宋军镇压，但余众仍于两浙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杀官吏，捕官军，直至宣和四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

注　释

① 曾敏行《独醒杂志》。

② 《青溪寇轨》附《容斋逸史》。

③ 方勺《泊宅编》卷五。

④ 《宋会要辑稿·兵十》。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五。

⑥《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一。

两宋

黄淮义事

政和元年（1111），赵佶任用宦官杨戬设置“西城括田所（西城所）”，京东地区百姓倍受其害，或赋税额巨增，或田产被括为公田，不服上诉则惨遭酷刑，冤死者数以千万计。方圆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西城所括占，对湖上渔户依保甲法进行编制，并于渔船上刻立标志，禁止其他船只进入梁山泊。凡渔民入泊捕鱼、采摘莲藕等，一律定立赋税，按船只大小交纳税收。更有甚者，杨戬还令州县于常赋之外，再增租钱 10 余万贯，遇天灾常赋可减免，而租钱不减。百姓无以谋生，“相聚为盗”，奋起反抗宋廷的残酷剥削和压榨。

重和元年（1118 年）、河北、京东地区遭受严重水灾，贫苦农民流离失所，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宣和元年（1119），以宋江等 36 人为首的农民于京东起义。他们活动于青州（治今山东临淄）、齐州（治今山东济南）、单州（治今山东单县）、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之间，间或出入于京城开封附近。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打击贪官污吏和追剿的宋军，使州县官府一筹莫展。宋廷对宋江义军恨之入骨，称其为“京东贼”、“河北剧

贼”。二年十一月，宋廷调歙州知州曾孝蕴为青州知州，令其专事镇压宋江的义军。但因此时两浙路方腊起义迅猛发展，曾孝蕴又改任睦州知州，参与镇压两浙地区农民起义。由于宋廷将大量的兵力投入江南，给宋江在河北、京东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他率领义军，“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①。赵佶见武力镇压宋江义军未能奏效，遂改用诱降、招安之策。中书侍郎侯蒙认为宋江“才必过人”，上书赵佶称：“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②随即受任为东平府（郓州）知府，负责招降宋江。他未及赴任，即病亡。

宋廷的武力镇压和招安诱降都未能使宋江就范，相反义军声势愈发壮大，“啸聚亡命，剽掠山东，一路州县大震，吏多避匿”③。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及梁山泊地区成为宋江起义军的重要根据地。不久，宋江率领义军南下，途经沂州（治今山东临沂）时，向知州蒋圆借道。蒋圆施以缓兵之计，义军过于轻信，未加提防。待蒋圆指挥宋军发起突然袭击时，起义军措手不及，伤亡惨重，只得退回郓州等地。宋江重新集结力量，三年初，他再次统领义军南下，攻陷沂州、淮阳军（今江苏邳县东）。宋廷急令调兵遣将，讨伐宋江。宋江继续挥师南下，进入淮南路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地区，给予当地官府及官吏、富商、地主沉重打击，而被诬为“淮南贼”。宋江义军在夺得大船10余艘后，转而向东北方向进军，驾船渡海，途经沭阳时，遭县尉王师心引兵邀战，义军迎战失利。二月，宋江义军又泛舟至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附近。海州知州张叔夜派奸细混入义军，侦得宋江义军动向，遂招募千余名亡命之徒，设伏于城郊。同时复令混入义军队伍的宋军士卒寻机焚烧

义军船只，且又以少量宋军前去挑战。宋江等弃船登岸追杀，不幸中伏，宋江副将被俘，大部分义军接受张叔夜的招安，投降了宋廷。余部则撤退回京东地区。四年，武功大夫折可存在镇压方腊起义后，班师回朝，赵佶随即又令他“捕草寇宋江”。在宋军的追剿之下，起义军最终被镇压，宋江等36名义军首领接受朝廷招安，而被封官拜爵④。

宋江起义虽然失败了，京东地区，特别是梁山泊一带农、渔民的反抗斗争依然继续。直至宣和六年（1124），梁山泊起义的渔民受东平府知府蔡居厚诱骗而惨遭杀害，反抗斗争才稍得平息。

正值宋江起义失败之时，宋廷与金朝开始联合攻辽。灭辽后，赵佶及权臣蔡京一伙将原输辽的“岁币”再每年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转输给金朝，以此从金朝手中赎回燕京（今北京西南）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等6州之地。宋朝得到燕京等地后，设官府，置官僚，同时派遣军队驻防，其中所需给养就近摊派到河北、山东、河东等地区百姓的头上，且令交纳时一律“支移”运送到燕京交予官府。这一规定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带来极大的灾难，一石粮食从产地运至燕京，沿途盘费所需高达十几至二十几石，且往返路途遥远，费时费力，百姓为此怨声载道。此后，宰相王黼又将灭辽用兵时征发民夫充役的办法，改为征收免夫钱，并推行到全国。一次即搜括免夫钱6200余万贯，竟相当于宋朝中期一年的税赋收入。宋廷规定，凡抗拒不交纳免夫钱者，一律依军法治罪，甚至连违期交纳者也将处以斩刑。为如数如期交纳免夫钱，州县官府及官吏对百

姓逼督甚急，直至渴泽而渔，百姓被逼卖子鬻女，家破人亡。而宣和初年又遇连年灾荒，一时间饿殍遍野，死者相藉，黄淮地区百姓陷入更严酷的水深火热之中。

宣和五年（1123），河北、京东等路农民相继起义，反抗宋朝统治的斗争再度掀起高潮。这些起义，少则数百、数千人，多则数万，乃至数十万人，“白昼横行”所到之处攻打州县，杀官吏，除地主，杀富济贫，或于崇山峻岭之中建立据点，聚众自保，寻机出击，致使“巡、尉不敢抗，县、镇不敢守”⑤。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密州（治今山东诸城）徐靖、沂州临沂武胡、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杨天王、郓州李太（李太子）、何子威、沂州徐进、水鼓山刘大郎、莒县（今属山东）徐大郎等领导当地农民的起义。而规模较大的又有河北路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张迪领导的起义，队伍发展多达数十万众，攻陷了一些州县城池，曾围攻濬州（治今河北浚县）长达5日之久，之后又攻打滑州，声势大震。京东路青州张仙（张先、张万仙）领导的起义军号“敢炽”，称10万人。河北高托山于望仙山组织当地农民举行起义，号称30万人，转战于河北和京东路的青（治今山东益都）、徐（今属江苏）、密、沂等州一带。

宣和六年，赵佶以宦官梁方平为河北、京东制置使，督率王渊、刘光世、杨惟忠、辛兴宗、韩世忠、张俊等将领，统兵镇压起义军。与此同时，宋廷又以诱降、招安之策，分化瓦解农民起义军。赵佶下诏，称起义军如能自首，“一切不问”，对于首领自首，还“当议优与补受官资”。次年正月，赵佶又下诏“罪己”：“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⑥同时下令，免去部分赋役。以此缓和与农民起义军之

间尖锐的矛盾和冲突。

在宋廷武力镇压和诱降之下，部分农民起义军投降。张仙起义军于礌鼓山与宋军作战，战败后，张仙接受招安。贾进起义军曾拒绝宋廷多次劝降，并杀死每一次前来劝降的官吏，宋军将领辛昌宗带兵进剿，被义军打得全军覆没，但不久，也投靠宋廷。不过，更多的起义军坚持斗争。高托山领导的义军先后遭到杨惟忠、辛兴宗、王渊、韩世忠等所领宋军的追击，屡遭挫折，甚至高托山一度接受招安，但义军将士始终未放弃斗争，直到建炎二年（1128），这支义军仍活动在河北、京东地区，转而抗击金军。

注 释

①②王偁《东都事略》卷一〇三《侯蒙传》。

③ 张守《毘陵集》卷一三《蒋圆墓志铭》。

④ 关于宋江投降的时间，一说为宣和三年，受张叔夜招安而降；一说为宣和四年，受折可存招安而降。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七。

⑥《宋会要辑稿·兵一二》。

两宋

海上之盟

北宋末年，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迅速崛起，日渐强盛。宋政和五年（1115），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完颜旻）正式称帝，建立大金国。长期处于辽朝残暴统治下的女真族，在阿骨打的统领下，奋起反抗。金收国元年（1115），金军在大败前来镇压的辽军后，即向辽朝发起进攻。辽军节节败退，北方局势发生巨大的变化。

金朝的建立和强大，使宋朝统治者感到一线希望，可以借机收回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朝的北方之地，以此转移和缓和国内的各种矛盾。

在此之前，宋政和元年（1111），赵佶曾派童贯出使辽朝，以了解辽的国内局势。路经卢沟（今永定河）时，深夜有燕人马植求见。童贯与他交谈后，十分惊喜，便于出使归来时，亦将他带回，并改其姓名为李良嗣。回到京城开封后，童贯即将他荐举入朝。朝上，李良嗣献策称："女真恨辽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治今山东蓬莱）、莱（治今山东掖县）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相约攻辽，其国可图也。"待

赵佶召见时，他又提出："万一女真得志，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事不侔矣。"①赵佶十分欣赏他的建议，赐其国姓赵氏。并委以秘书丞。从此宋廷开始策划谋取燕京。

重和元年（1118）二月，宋派遣武义大夫、登州防御使马政等人取海路首次出使金朝，商议夹攻辽朝之事，并提出"若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地。"②第二年正月，金遣渤海人李善庆、熟女真人小散多（散覩）、生女真人渤达，持国书随马政至宋朝，书中称："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③待金朝3位使臣返回时，马政及其子马宏（马扩）再度受命出使金朝，再议夹攻辽朝，求归还辽占汉地，应允岁币等事。但小散多因使宋时受宋廷所赠团练使之官，阿骨打对此大为恼怒，下令杖击且夺其官职。故马政返回时，金廷改派李董辞列、曷鲁等人为使臣，赴宋再议夹攻辽朝事宜。

经过宋、金间互派使臣，反复商议，终于取得一致。宋宣和二年（1120），宋再派赵良嗣为正使、王晖（王环）为副使，仍由登州乘船浮海入金境，与金朝最后商定：宋、辽相约攻辽，金取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宋取辽燕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灭辽以后，宋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此即为"海上之盟"。

"海上之盟"订立后，赵佶下令于河北地区集结军队，准备攻辽。然而此时，方腊率领起义军在两浙地区给予宋朝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为了尽快镇压方腊起义军，赵佶遂下令，命童贯统领已集结的军队南下征讨。宋、金订立"海上之盟"的消息也传入辽朝，赵佶担心辽朝会因此用兵以报复自己，不禁"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④。宋朝攻辽举棋不定，使金朝十分不满。宣和三年，金朝派出使者，催促宋朝按原定盟约如期

发兵，赵佶仍犹豫不定，一拖再拖，半年后，才让金朝使臣返回。是年年底，金帝完颜旻以忽鲁勃极烈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以昊勃极烈完颜昱、移赉勃极烈完颜宗翰，以宗斡、宗望、宗磐等人为副都统，亲征辽朝。宣和四年正月，金军克陷辽中京大定府，辽帝耶律延禧西逃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军紧追其后，三月再度战败辽军。辽军屡战屡败，节节退缩，留守燕京的辽宗室耶律淳在宰相李处温与皇族耶律大石的拥立下称帝，辽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宋廷君臣由此感到进攻燕京的时机已到，加之金朝再一次派遣使臣入宋催促出兵，赵佶唯恐坐失战机，燕京会被金军攻占，这才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蔡攸为宣抚副使，屯兵于北部边境，准备北进。但同时又令招谕驻守于幽（治今北京）、燕等地的辽军，妄图以大兵压境辅之以招降之策，即可使燕京辽军拱手献城。甚至提出如遇辽军抵抗，则“按兵巡边，全师而还”⑤。

五月，童贯统领大军到达雄州（治今河北雄县），命令都统制种师道等分路进兵。童贯、种师道等人虽握有重兵，仍无心与辽作战，幻想辽军会自己投降，因此亦下令，宋兵“如敢杀一人一骑，并从军法”⑥。宋军自雄州几路进发，前军统制杨可世于兰沟甸与辽军遭遇，战败。继而又于白沟与辽将萧幹交战，又战败。另一路宋军在统制辛兴宗率领下，与辽军战于范村，亦败绩。六月，宋军各路人马均惨遭失败，种师道只得领兵退守雄州，很快，辽军又追击到城下。赵佶得知前线兵败，惊恐万状，立刻下诏，令各路人马撤回。

宣和四年（1122）四月，金军攻占辽西京大同府，继续西征追击辽帝。六月，金帝完颜旻自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出发，亲征辽帝。辽帝耶律延禧兵败，率残部退入沙

漠之地。于燕京自立为帝的耶律淳病故。这些形势的变化，又一次使宋廷君臣感到有机可乘，宰相王黼以耶律淳病故为由，又命童贯、蔡攸再度集结兵力，以河阳三城节度使刘延庆为都统制，打算对辽燕京守军宣战。但与此同时，宋廷君臣仍对用兵燕京抱有幻想，甚至惧怕。朝散郎宋昭上书劝谏朝廷出兵北伐，竟招致王黼恼羞成怒，赵佶下诏，对宋昭“除名、勒停，广南编管”⑦。不久，金朝使臣徒孤且乌歇等入宋又一次商议宋军出兵日期。赵佶、王黼与群臣议而不决，只得再派赵良嗣赴金朝暂时应付。正在这时，辽、宋前线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辽涿州守将郭药师投降宋朝，并献涿、易二州，燕京周围的防御因此受到极大的削弱。而郭药师所部战斗力很强，其降宋后亦壮大了宋军的声势。这一变化又使宋廷君臣感到兵取燕京大有希望，十月，兵马未动，宋廷先改燕京为燕山府，对涿、易等八州也同时赐名改称。而后，刘延庆、郭药师等将领才统兵出雄州，北上驻扎于涿州。

郭药师见刘延庆所部行军毫无纪律，散不成军，遂劝说刘延庆应于军中设防，否则辽军设伏出击，宋军首尾不应会溃败于一旦。刘延庆却置若罔闻。宋军行至良乡（今北京西南），遇辽将萧幹率兵阻击，刘延庆指挥宋兵与之交战，战败，遂闭垒不敢出战。郭药师向刘延庆请战，认为萧幹兵力不过万人，如今倾巢出动迎击宋军，燕京城防必然空虚。请求拨给 5000 名精骑兵卒，偷袭燕京，即可攻取城池。同时希望刘延庆派其子刘光世率兵作为后援接应。刘延庆应允，派大将高世宣与郭药师领兵 6000 袭击燕京。郭药师统兵绕道而行。待天亮时，部将甄五臣率领 5000 骑兵夺取迎春门，攻入燕京城中。随即，高世宣、郭药师也率部入城作战，宋军与辽军于城中展开激烈

的巷战。辽萧后闻讯，密令萧幹迅速撤回救援。郭药师攻入燕京城后，力战辽军。然刘光世所率援兵却失约未至。大将高世宣阵亡，郭药师亦坠落于马下，险些被擒，只得退出燕京。刘延庆见偷袭燕京不成，遂下令于卢沟（今永定河）安营。萧幹见宋军驻防，便分兵袭扰，阻断粮运，擒获宋护粮将王渊和2名兵士。萧幹令将宋兵留于帐中，深夜他谎称辽军3倍于宋军，将以精兵冲击宋营，另分左右翼为策应。随即将一名宋兵释放。被俘宋兵入归宋营，报告给刘延庆。次日清晨，刘延庆果见北岸火起，真以为辽军前来攻击，慌忙烧毁营帐，狼狈逃窜。慌乱撤退之中，宋军兵士相互践踏，死者抛弃于百余里的道路之上，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以来储存的军械装备损失殆尽。

宋军两度北上进攻燕京均未得手，反而损兵折将，宋廷君臣只好请求金朝出兵，与宋军夹攻燕京。

金天辅六年（1122）十一月，完颜旻下诏，告诫燕京官吏，金军所到之处，凡投降者一律赦免其罪，官职依旧。十二月，完颜旻亲自统兵讨伐燕京，以宗望率7000兵士为先锋，命迪古乃（完颜忠）率部出得胜口（今北京北），银术哥（银术可）领兵出居庸关（今北京西北），又以娄室所部为左翼，婆卢火所部为右翼，取居庸关。金军大举进攻，使辽军闻风丧胆，辽统军都监高六等投降。完颜旻自南门进入燕京城，令银术哥、娄室于城上列阵。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加政事康公弼等奉表请降，金军占据燕京城，唯辽萧后与少数官吏逃遁。金朝占有燕京后，于次年派遣李靖入宋，以“海上之盟”有约为由，提出将燕京地区每年的赋役归金朝所有，金则归还燕京及六州之地。宋廷君臣先

是以为不可，后经双方多次使臣往来，反复商议，方达成协议：宋廷除将原输辽“岁币”转输给金外，每年再增加100万贯钱，作为“燕京代税钱”，一并交予金朝。金朝则将燕京，以及顺（治今北京顺义）、檀（治今北京密云）、涿（今属河北）、易（治今河北易县）、蓟（治今天津蓟县）、景（治今河北遵化）6州之地归还宋朝。

然而，金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交还燕京及其属州之议尚存分歧。辽降臣们亦不愿让宋廷接管燕京，认为既然是金军占领，则不应划归宋朝。作为金军统帅的完颜宗翰亦有同感，随即向完颜旻提出废止已订协议，只将先期由郭药师率部投降宋朝时所献易、涿二州划归宋，而燕京及其他州县，则归金朝所有。完颜旻力排众议，坚持如约履行交割事宜，才得使燕京及所辖州县得以归还宋朝。但金军在撤离燕京之时，尽掠城中金帛财富及官吏、富商、百姓，待童贯、蔡攸等领兵进入燕京城，已是“城市邱墟，狐狸穴处”⑧，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

宋、金“海上之盟”中也涉及到辽西京大同府及所辖武（治今山西神池东北）、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县）、蔚（治今河北蔚县）等州的归属问题。及燕京及所属州县以“代税钱”赎回后，宋廷君臣又提用“加币”的办法再赎买大同府及州县。这一请求遭到金廷百官的反对，只有金帝完颜旻表示为与宋朝“永远交好，特许西京地土并民户”⑨，且只要求宋廷向金朝支付犒军费。但西京未及交割，完颜旻即于金天辅七年（1123）八月病逝，其弟吴乞买（完颜晟）继位。金天会二年（1124），宋遣使依协议入金，索取西京大同府及所属州县，金西南、西北两路都统宗翰、宗望请求完颜晟不要割大同府等地给宋朝，完颜晟认为这样做“是违先帝之命也，其

速与之”⑩。不过宗翰等人并未遵照金帝的旨意，反而变本加厉地阻挠交割大同府。不久，他又提出宋廷“招纳叛亡”，且辽帝西逃尚未擒获，如依约将西京大同府等地划归宋朝，金军则将失去“屯居之所”。完颜晟同意这一建议，决定废止原协议，不再归还西京等地。

注　释

①《宋史》卷四七二《赵良嗣传》。

②③《金史》卷二《太祖纪》。

④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五。

⑥《三朝北盟会编》卷七。

⑦《宋史》卷二二《徽宗纪四》。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

⑩《金史》卷三《太宗纪》。

两宋

开封保卫战

金天辅七年（1123）正月，辽平州节度使时立爱投降金朝，金廷遂升平州（治今河北卢龙）为南京，以辽降臣张觉为留守。不久，张觉等辽旧臣错误地认为已被金军追赶得逃入沙漠的辽帝耶律延禧兵势复振，便积极准备“勤王倡义，奉迎天祚，以图兴复”①。五月，张觉等人打出辽的旗号，反叛金朝。消息传入宋廷，赵佶视此为千载难逢的良机，以为用招降张觉之策，即可得到平州地区，遂以高官厚禄招诱张觉降宋。五月，金太傅、中书令左企弓，枢密使、侍中虞仲文，枢密副使曹勇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枢密副使权知院事、签中书省康公弼同赴置于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的枢密院，途经平州宿于栗林下。张觉派人将他们全部杀害，遂以金南京投降宋朝，宋廷欣然接纳。张觉的背叛行径及宋廷的招降引起金廷极大的忿慨，尤其是张觉拥兵5万屯驻于润州近郊，威胁到迁、来、润、隰4州，更是不能容忍。金廷立刻派南路军帅阇母统兵征讨，几次交战，阇母军取胜，然再战于兔耳山，阇母军大败，张觉遂向宋廷报捷。宋廷改平州为泰宁军，以张觉为节度

使，并赠银绢数万作为犒赏之费。

金帝完颜旻病逝，其弟吴乞买（完颜晟）继位为帝（金太宗），再令宗望统领阇母所部讨伐张觉。张觉于南京城东与宗望军大战，惨败而逃奔宋朝，进入燕京城。宗望随即以招纳叛逆为由，责问宋河北、河东、燕山府路宣抚司，并索要张觉。起初，三路宣抚使王安中将张觉藏匿于甲仗库，而谎称未见张觉。宗望依旧索要，王安中便斩杀一位貌似张觉者，交予金军，但被金人识破。无奈，王安中只得令张觉出来，历数其罪，张觉破口大骂。王安中下令将他斩首，将首级送交宗望。原燕京辽降将及辽常胜军闻讯皆涕泣，人人自危。

金天会三年（1125）二月，金军统帅娄室率所部歼灭辽残余军队，俘获辽帝耶律延禧，辽朝灭亡。金臣阇母、斡鲁相继上奏，陈述宋廷违背“海上之盟”誓约之事，宗翰、宗望则请求朝廷发兵，征伐宋朝。十月，金帝完颜晟下诏，以谙班勃极烈完颜杲兼领都元帅，以赉勃极烈宗翰（粘罕）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元帅右都监，统兵自西京南下太原（今属山西）；以六部路军帅挞懒为六部路都统，斜也为副都统，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为副都统，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南下燕山府（今北京西南）。不久，又以阇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为副都统，宗望为阇母、刘彦宗两军监战。东、西两路金军相约会师于宋都城开封。

十二月，金军两路南侵。在此之前，宋廷侦知金军集结，遂派童贯赴太原，宣抚河北、燕山。童贯立刻派马扩、辛兴宗出使金朝，以缓和局势，宗翰则指责宋廷纳降张觉，且遣使告之以武力征伐，又劝说童贯速割让河东、河北两地给金朝，以

示谢罪。童贯不知所措，却打算一逃了之。太原留守张孝纯责备说："金人渝盟，王当令天下兵悉力枝梧，今委纵而去，是弃河东与敌也。河东入敌手，奈河北乎?"童贯反而怒叱道："贯受命宣抚，非守土也。"张孝纯叹息道："平生童太师作几许威望，及临事乃蓄缩畏慑，奉头鼠窜，何面目复见天子乎?"②童贯全然不顾张孝纯等人的反对，逃回开封。与此同时，宗望也派使臣赴开封，要挟宋廷。大臣李邦彦等人竟面无人色，鄙言探询求和之法，金使厉声答道："不过割地称臣尔。"宋廷君臣随即遣使入金求和。

东路金军侵入宋境后，连克檀、蓟二州，进围燕山府。宋守将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于白河迎击金军，不敌战败。郭药师遂献城投降，燕山府及所辖州县悉为金军占据。宗望继而指挥金军继续南下，于真定（今河北正定）击溃阻击的宋兵，再克信德府。西路金军则相继攻占朔、武、忻（今属山西）、代（治今山西代县）等州。进而围攻太原。耶律余睹于汾河北击败宋河东、陕西的援军。宋太原守将王禀率领全城军民奋力抵抗金军的进攻，从而牵制了西路金军的继续南下。东路金军在收降郭药师后，又委以他作为先锋，随大军直奔开封，

金军两路南侵的消息传入开封，宋廷君臣慌作一团。赵佶急忙下诏"罪己"，令朝廷内外直言极谏，评论朝政得失。同时下令罢除浙江诸路"花石纲"、"西城所"和内外制造局，停止营建延福宫，撤销册封道官及大晟府、行幸局。归还"西城所"所括土地给原来拥有者。又令各地官民起兵"勤王"。赵佶的一系列举动实际是为遮掩自已躲避战争威胁的目的。为了利于随时撤离开封，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赵佶委以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欲令其"监国"，而派户部尚书李棁先行出

守金陵。权直学士院兼侍讲吴敏认为："朝廷便为弃京师计，何理也？此命果行，须死不奉诏。"③太常少卿李纲甚至刺臂沾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④在其他臣僚的坚持下，赵佶终于同意内禅，让赵桓继位为帝。此时东路金军长驱直入，进至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时，守将詹度指挥军民顽强抗击，斩杀金军大将蒲察、绳果，使金军于城下一再受挫。金军见一时难以破城，遂绕城南下，距开封尚有10天左右的路程。吴敏再次请求赵佶于3日之内传位赵桓，否则时间紧迫，赵桓继位已来不及组织军民抗金。赵佶为了尽快脱身，同意立刻传位。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二十三日，他装作患病，跌倒在地，昏迷不醒。大臣们见状，慌忙灌药。须臾，赵佶假装苏醒，伸臂示意取纸笔，颤抖着用左手写道："皇太子可即皇帝位。"赵桓随即继位，是为宋钦宗，赵佶则以"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之名，退居内宫。

宋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征已接近黄河。宋廷急速派兵北渡黄河增援滑州（治今河南浚县），可是兵士多年不训练，毫无作战力，而军将只饮酒作乐，风闻金兵临近，竟不战自溃，滑州随即陷落。驻守黄河南岸的宋兵亦慌乱烧毁黄河上的桥梁，夺道而逃，致使黄河防卫顷刻空无一人。金军到达黄河北岸，起初只搜索到十余艘小舟，每舟乘六七人渡河，后来又找到几艘稍大的船，故连渡数日方使金军南渡完毕。然而渡河未遭受宋军的丝毫抵抗，竟使金军将领也感到难以置信。正月初三，金军渡黄河南下的消息传入朝廷，原打算第二天赴

亳州（治今安徽亳县）的太上皇赵佶当即决定逃离开封。深夜，他与大臣蔡攸仅偕几位内侍慌忙出通津门东逃。一路上，他嫌船行太慢，改乘小轿，又改乘运砖船，赶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再改乘骏骡，到符离（今属安徽）才乘上官船，一路折腾，直到泗上方敢稍事休息。稍后，童贯、高俅率“胜捷兵”赶到，赵佶方有扈从侍卫。他随即继续南逃到扬州（今属江苏），竟顾不得太上皇后，自己先逃过长江到达京口（今江苏镇江）。而未能跟上的皇子、皇女们，则只好暂时栖居于沿途州县。赵佶的南逃，亦引起朝廷内极大的恐慌，许多臣僚也悄悄紧随其后，逃离京城，寻找安全之地。

刚刚即位的赵桓对劝说赵佶“内禅”的吴敏、李纲等人给予重用，以吴敏为门下侍郎，李纲为兵部侍郎。此时朝野人士对蔡京等人的祸国殃民罪行已是深恶痛绝，太学生陈东等人上书，历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之罪，谓之“六贼”，请求将其诛杀。赵桓出于无奈，只好将“六贼”或贬官流放或赐死，以平息民忿。

面对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宋廷君臣人心惶惶，众说纷纭，出现抗击与逃避两种截然相左的意见。李纲主张赵桓应像当年宋真宗那样，亲自统兵北上征讨，在其他主战派官僚的要求下，赵桓被迫下诏“亲征”。其时，金兵已逼近开封。口称“亲征”的赵桓心里却想着出逃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及邓州（治今河南邓县），遂委以李纲为东京留守，统帅开封城军民抗击金军，便于自己脱身，故当给事中王寓直谏“亲征”之事，竟给予罢官。李纲得知宋帝的真实意图后，立刻劝谏他不要退却，并明确告之臣僚：“上意已定，敢有异议者斩！”⑤于是最终制止了宋帝的出逃。李纲随即被任命为尚书右丞。第二天，

又改任他为亲征行营使，以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曹曚为副使，负责开封城的防卫之事。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李纲立即组织军民积极备战，修城楼，挂毡幕，安炮坐，架弩床，运砖石，施燎炬，垂檑木，备火油，守战之具无不齐备。又于开封城四面，每面配备正兵1200余人，另有厢军及保甲兵协助作战。同时组织马步军4万人，分作前、后、左、右、中五军，每军8000人，每日操练习武。以前军驻守通津门（东水门外），保卫内储粮40万石的延丰仓；后军驻军于朝阳门（宋门）外，防守城濠；其余三军为总接应。心虚胆怯的赵桓对此仍不放心，一面遣使赴各路，督催地方官府尽快发兵救援开封，一面又派尚书驾部员外郎郑望之，亲卫大夫、康州防御使高世则出使金军，进行谈判。

李纲积极备战才数日，金军已到达开封城下，驻扎于城西北郊牟驼岗。是夜，金军分乘几十艘船，沿汴河而下进攻宣泽门（西水门）。李纲派出2000名敢死队布列于城下，待敌船临近，即用长钩钩住，拖至岸边，投掷石块砸烂船只。又于水中钉入木桩，阻挡敌船。另搬运蔡京宅第内的山石堵住宣泽门。经过一夜的激战，金军在损失百余兵士的情况下，于清晨被迫撤兵。李纲来不及休息，赶入朝中禀报战况。有军士入报，金兵复又进攻酸枣门、封丘门，李纲急忙率一千名射手，赶赴酸刺门、封丘门，指挥抗敌。他们刚到达，金兵已渡过城濠，搭云梯攻城。正当危急之时，李纲急令兵士射杀金兵，并率官员登城督战。又派壮士数百人，缒城而下，放火烧毁数十座云梯。城上守军用檑木，弓箭进行还击，多次击退金军的攻城。金军随即又转攻通津门、景阳门等处，李纲仍亲自前往督战，

从卯时（今5至7时）直战至酉时（今17至19时），杀死金兵数千人。金军多处强攻均遭挫败，死伤颇多，只得再次退兵。李纲率领城中军民终于胜利地保卫了京城。

金军未能攻入城中，统帅宗望遂改以议和，以迫使宋廷让步，他要求宋帝委派大臣前来金军营帐商议。李纲请求派自己前往，但赵桓既希望李纲领兵抗击金军的围攻，又唯恐他过于刚直强硬，于议和不利，而另派同知枢密院事李悦为谈判使臣。李纲劝阻赵桓说："安危在此一举，臣恐李悦怯懦而误国事也。"⑥赵桓不听，反而授权李悦可以增"岁币"三五百两、犒军费三五百两，另赠宗望黄金一万两及酒果之物。不料宗望却提出以宋纳金犒军费黄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杂色缎100万匹、绢帛100万匹、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今属河北）3镇；尊金帝为伯父；以宋皇室亲王、宰相作为人质，护送金军北渡黄河，才许议和。李悦不置可否，还回城中禀报。李纲坚决反对以增币、割地、遣亲王为质的做法，主张派遣能言善辩之士与宗望论议所提条件，拖延数日，待宋军增援集结于开封，金军孤军深入，即使得不到犒军费，也会急速撤兵。然而赵桓与大臣却同意宗望的议和条件，李纲抗争不成，遂提出辞职。赵桓不许，令他出宫巡视城防。可待他一出去，赵桓却将应允议和的誓书交予金军，又将康王赵构与宰相张邦昌作为人质派往金军。李纲返回宫中，知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诏书发出，即令扣留不发。

宋廷发出誓书后，便每天向金军输送币帛，金军邀索不已，并于开封城郊肆意屠杀掳掠。而宋"勤王"援兵纷纷赶到，达20多万兵力。李纲希望由自己统领各路援军，但群臣

却主张另置宣抚使臣，以河东、河北路制置使种师道为宣抚使，总领“勤王”援兵及驻于开封城外的亲征行营使司所辖前、后军。李纲又提出切断金军粮道，夹困金军，索回誓书，逼迫其退兵。可都统制姚平仲却提出夜袭金营，生擒宗望，劫回赵构。赵桓同意姚平仲的主张，并订于二月初一实施夜袭行动。姚平仲急于邀功，先期率步骑万人出发，不料消息已泄露，金军早有提防，姚平仲偷袭大败，惧怕治罪竟弃军而逃。半夜，李纲接到赵桓谕旨，称姚平仲已率兵出发，令他急速增援。李纲火速领兵出击，但刚出封丘门（永太门），即与金军遭遇。李纲指挥兵士射杀，才击败金军的进攻。太宰兼门下侍郎李邦彦将夜袭金营失利的责任推给李纲和种师道，赵桓遂罢免李纲，以示向金军谢罪，又废亲征行营使司，先后派驸马都尉曹晟和资政殿大学士宇文虚中、知东上阁门事王球携割让三镇的诏书、地图赴金营议和。

宋廷的投降举措，于朝廷内外激起极大的忿慨。二月初五，太学生陈东等率诸生数百人到宣德门上书请愿，要求复用李纲、种师道，罢免李邦彦。京城数万民众赶来声援，正遇李邦彦入朝，众人历数其罪行，投掷砖瓦，李邦彦慌忙骑马夺路出逃。众人砸烂登闻鼓，呼声惊天动地，并打死宦官数十人。赵桓不得已，只好宣旨重新起用李纲为尚书右丞、京城四壁防御使。李纲复出，开封军民为之振奋，次日，再次挫败金军进攻。开封城外20万“勤王”援军亦准备出击，李纲下令重赏杀敌者，将士无不为之奋跃，抗金形势再度好转。但执意议和的宋帝赵桓仍旧派遣使臣前去金营，答应金军提出的支付犒军费和割让3镇等项条件，又以肃王赵枢替代康王赵构，又改少宰兼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太宰兼门下侍郎，完全满足了金军所提

出的各项苛求。金军统帅宗望眼见开封城外陆续集结了 20 多万宋朝援兵，开封城又固若金汤，自己所统 6 万金兵是孤军深入，难以长久对峙，况且所提议和条件均已得到满足，所以不等宋廷凑足金银，遂于二月初十下令撤军。开封之围随即解除。

注 释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七。

②《宋史》卷四六七《童贯传》。

③《宋史》卷三五二《吴敏传》。

④《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⑤ 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一。

⑥《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降战之争

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军兵分东、西两路，大举南侵，一心想逃离京城开封的赵佶（宋徽宗）下诏内禅，让位给长子赵桓。赵桓即位，是为钦宗，次年改元“靖康”。

当金军逼近开封之际，赵佶与蔡京子蔡攸竟连夜出城南逃。蔡京、童贯等人也相继携家眷、财富，慌忙逃跑。童贯竟然拒绝接受赵桓委以其东京留守之职，而与高俅等率“胜捷兵”紧随赵佶之后，妄图下两浙路，再拥戴他为帝。赵佶一伙于大敌当前出逃，引起宋廷的极大恐慌，臣僚纷纷逃离京城，激起朝野有志之士的忿慨，指责“六贼”祸国殃民，卖国求和。太学生陈东先后3次上书，揭露“六贼”的罪行，“误我国家，离我民心，天下困敝”。恳切希望赵桓“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旨四方，以谢天下”①。当初赵佶内禅，赵桓推让之际，王黼等人曾引郓王赵楷上殿，企图拥立他为帝。而此刻，这一伙人相继逃到东南以后，又以“太上皇帝圣旨”之名，截留了这一地区上缴朝廷的物资，甚至扣留“勤王”援兵，实际把持了东南地区的行政、经济、军事大权。“控制大

江之险，奄有沃壤之饶，东南千百郡县，必非朝廷有”②。甚至准备在镇江（今属江苏）请赵佶重新登极。这对刚即位的赵桓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赵桓对童贯一伙的行径大为不满，为了维护自己的帝位，他重申了赵佶于退位时所表示“除教门（指道教）事外，余并不管”③的诺言，以此下诏剥夺赵佶、童贯等一伙的权力。继而又将未随赵佶南逃的梁师成、王黼、李彦等人“赐死”。二月初，赵桓准备派知开封府聂昌挂淮浙荆湖制置发运使之职，赴东南秘密处置蔡攸、童贯、朱勔等人。尚书右丞李纲恐处置不当节外生枝，建议将他们贬官，并请赵佶返回京城。不过，赵桓与其父赵佶只是在权力的分配上暂时出现了矛盾，而在对待金军入侵的问题上，父子都是主张议和的投降派。赵桓不顾李纲率领开封军民奋力抗击金军和20万“勤王”援兵集结于开封近郊的有利形势，依旧满足了金军统帅宗望提出的赔款、割地等议和的条件，换取到金军的撤退。二月十七日，他听说金军已渡黄河北返，第二天便下诏，贬蔡京、蔡攸、童贯官职。蔡京病死贬所，长子蔡攸、次子蔡脩被诛。赵桓又派御史于南雄州（治今广西南雄）杀死童贯，朱勔亦被赐死。赵桓的做法使赵佶感到不妙，极力为自己开脱、辩解，又给赵桓写密信，表示要“甘心守道，乐处闲寂”④，无意再当皇帝。

金军虽然北撤，但威胁尚存，赵桓还想依靠李纲等主战派保卫自己的安全，便委任他为知枢密院事，主持军事。此时，金军统帅宗翰率西路金军继续南下，宋廷再度惊慌失措。赵桓一面任命中太乙宫使种师道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保静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姚古为二路制置使，分别领兵入河北、河东。一面又派使臣前往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向金军述说订

立和议之事，请求宗翰退兵。种师道、姚古统兵分赴两地，枢密院令他们进攻金军，宰相府却令他们让金兵出境，竟使他们不知如何行事。宗翰知道宋、金已有和议，遂班师返回太原等待宋使前来交割。

为了表现议和的诚意，以换取一时的太平，投降派官僚竭力讨好金人，赵桓向被割让的三镇之地派出割地专使，与金军办理交割事宜。但投降派丧权辱国的求和行径，遭到力主抗击金军的主战派官僚的坚决反对和抵制。自西路金军南下时就已受围攻的太原城军民，拒绝出城接受宋帝的割地诏书，继续反击金军的进攻。宗翰见太原城一时难以克陷，便让银术可率部分金军继续围攻太原城，自己则统军退回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宗望率东路军自开封北撤到达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府（今河北河间）两镇时，守城的军民拼死固守，拒不投降。宗望令随军的宋朝人质、肃王赵枢，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和割地专使到城下劝说守城军民献城投降，但得到的回答是城上射出的利箭和投掷的石块。

金军北撤，宋廷曾令种师中与姚古等统兵将金军“逐出境”。姚古所部遂乘宗翰北上之机，一举收复隆德府和威胜军等失地。种师中统兵尾随北撤的宗望金军之后，到达真定（今河北正定）时，即接宋廷命令，进援太原，与姚古部互为犄角，以解救太原之围。种师中随即挥师西进，出井陉关（今河北井陉北），相继收复寿阳（今属山西）、榆次（今属山西）。五月初，前锋部队进抵距太原城仅20里的石桥。种师中一路西进，几乎未遇金军的抵抗，只有零散放牧的金兵。探报以为金军大部已北撤，知枢密院许翰亦信以为真，几次派人到军中督令种师中出兵攻击。种师中也以为金军无主力在此，未作认

真布置。金将斡论活女率主力金军前来攻击，宋军仍认为是小股金军。种师中遂令后军出击收捉。于寿阳石坑，宋军遭到金军袭击，宋军仓促应战，五战三胜，又返回榆次。种师中在出击前，曾与姚古、张灏两军约定共同发兵，且均不带辎重。然而种师中孤军进发，姚古、张灏却失期未至。待种师中进至杀熊岭时，因粮草断绝，兵士饥饿难忍。金军侦知，遂集中兵力猛攻，宋军右翼和前军先后溃败。种师中率领部将与金军死战，自卯时（今5—7时）直激战到巳时（今9——11时），宋军用神臂弓多次击退金军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种师中身中数枪，力战阵亡，余部退守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姚古率部增援，被金军阻地盘陀，遂退至隆德府。张灏所部亦遭金军攻击，失利后撤。宋军出战失利，终未能解救被金军围攻的太原城。

宋军战场上的失利，再度引起朝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的争论。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力主割让3镇以求和，李纲等人则坚决反对。为了排挤李纲，耿南仲借太原之围未解之机，向赵桓提出：“欲援太原，非纲不可。”⑤赵桓令李纲接替因病归朝的种师道，出任河北、河东路宣抚使。李纲清楚赵桓、耿南仲等人的用意，便以自己是书生，并不懂得用兵，恐会殆误国家大事为由，请求辞去此任，又以身患疾病，请求辞官，都被宋帝拒绝。陈过庭、陈公辅等臣僚也认为这样做是陷害李纲，他不能离开朝廷。不料，赵桓竟为此大怒，下令罢免陈公辅等的官职，依然坚持令李纲出朝任宣抚使。

河北、河东路宣抚使司仅有兵士1200人，且马匹甚少，因此李纲受命后提出要在京城“括马”。赵桓先是应允，继而又出榜称：“宣抚司括马，事属骚扰，可更不施行。”⑥李纲请

求拨给银绢钱各百万，以解决军需，却只得到 20 万。李纲考虑出任宣抚使还有许多事尚待办理，请求延缓出发的日期，赵桓指责他是“迁延拒命”。李纲上疏陈述不能如期出发的理由，仍未获准。临行之时，他又告诉赵桓，朝廷若重用奸臣，必将误国。

李纲出任宣抚使后，先处置了谎报军情、搅乱军心的将领，以严肃军纪。又宣布对不服从军令、抢劫百姓财产者给予正法，以扭转宋军腐败涣散的状况。进驻河阳后，李纲利用 10 余天的时间训练兵士，修整军械装备，为进击金军，解救太原之围做准备。继而又进驻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准备汇集“防秋之兵”再进兵太原。可就在这时，赵桓下诏，罢减各地调集的防备金军秋季入侵的军队。李纲为此上奏抗论，指出：“太原之围未解，河东之势甚危，秋高马肥，敌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对朝廷朝令夕改的作法，他认为已于抗金极为不利，故自己“不足以任此”⑦。赵桓对李纲的上疏毫不理会。反而批复令他马上起兵赴太原解围。李纲无奈，只好于隆德府召集诸将领，定于七月二十七日各自统领所部进兵太原。然而各路主将均接受朝廷的直接指挥，凡事皆需禀报朝廷，或执行朝廷的指令，李纲的宣抚使司徒有指挥的虚名。为此，李纲再次上疏，力陈宣抚使司无实权的弊端，可仍未见赵桓答复。

约定出兵的日期已到，唯有威胜军一路宋兵开拔，而平定军、汾州（治今山西隰县）、辽州（治今山西左权）三路宋军“皆逗留不前”。威胜军行至南北关，与金军遭遇，两军转战 4 日，互有胜负，伤亡相当。金军增援部队赶到，合力进击，威胜军却无援应，力战不胜，遂败退。李纲准备将各路宋军聚

拢，缩短战线，避免为金军各个击破，而后由他亲自统领，赴太原与金军交战。此时，宋廷中投降派与主战派臣僚间的抗争亦愈演愈烈，赵桓为首的投降派已将原定割让3镇的议和条件，改为用代税钱替代，并积极与金朝协商洽谈。投降派已于朝廷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主战派官僚随之相继遭排斥，被赶出朝廷。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被罢官，贬为知东平；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被罢知扬州；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官，贬为知亳州。而投降派官僚则被擢升，以中书侍郎唐恪为少宰兼中书侍郎，以尚书右丞何㮚为中书侍郎，礼部尚书陈过庭为尚书右丞，开封府尹聂山为同知枢密院事，御史中丞李回为签书枢密院事。李纲闻讯，叹息道："事无可为者矣！"八月，赵桓又命种师道重新出任，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使司，而召李纲返回京城，不久便被免职，出任知扬州。九月初，他未及到任，又以他"专主战议，丧师费财"之罪名被贬官。

投降派控制朝政，给抗击金军的斗争带来极大的消极影响，除部分主战派军将领兵与金交战外，朝廷再未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甚至不再过问被围困的太原城。而局部的抗金斗争，也因孤军作战，无一取胜。河东察访使张灏与金军战于文水县（今属山西），战败。都统制张思正又夜袭文水县金兵，失利。次日再战，又溃败，阵亡数万人。张思正逃至汾州。都统制折可求于子夏山与金军交战，亦遭惨败。宋军在战场上的失利与宋廷的投降求和，更使河东一带的百姓对抗击金军入侵失去信心。威胜军、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汾州、晋州（治今西临汾）、泽州、绛州（治今山西新绛）等百姓恐金军侵掳，纷纷渡过黄河南逃，以至"州县皆空"。

注　释

①《长编纪事本末》卷一四八。

②《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二。

③《靖康要录》卷一。

④《靖康要录》卷四。

⑤《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

⑥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三。

⑦《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

两宋

靖康之难

开封保卫战之后，金军北撤，宋廷内的投降派势力再度甚嚣尘上，在赵桓的支持下，先后将主张以武力抗击金军的太宰兼门下侍郎徐处仁、少宰兼中书侍郎吴敏、同知枢密院事许翰罢贬出朝，李纲也被责以“专主战议，丧师费财”，遭贬去职。而以原中书侍郎唐恪、尚书右丞何㮚、礼部尚书陈过庭、开封府尹聂昌、御史中丞李回为代表的一批力主议和的官僚相继被擢升，执掌朝廷要政。

这时，另一位投降派的重要人物、太上皇帝赵佶也自江南返回开封，宋廷随之又恢复了“文恬武嬉”的局面。赵桓一伙极力粉饰太平，对“防边御寇之策，反置而不问”①。他们既不积极组织兵力防范金军的入侵，反而下令命各路赴开封的“勤王”援军撤回原驻地，而使防务更加空虚。对遭金军连续数月围攻的太原城（今属山西），亦不作认真的救援部署，只是将率领全城军民拼死抗击金军围攻的主将王禀由侍卫亲军马军副都指挥使、镇西军承宣使，改授为建武军节度使，以“录坚守太原之功”②。宋廷的腐败使朝野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百

姓亦对抗金失去信心，“威胜、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③。

宋廷的虚弱无能，更助长了金廷的嚣张气焰。宋靖康元年（1126）八月，完颜晟（金太宗）下诏，仍以宗翰、宗望分统西、东路军，自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南下，目标仍是开封。

太原城自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被金军围攻以来，在王禀的率领下，城中军民已击退金军无数次的进攻，在外无援兵，内乏粮食军械的情况下，仍抗拒赵桓停止抵抗，献城交割的诏书，坚守城池。金统帅宗翰到达太原城郊后，又指挥金兵加紧围攻，展开更为猛烈的攻势。他令金军于城外修筑保垒，环围城池，彻底阻断太原城内外的联系与交通。城中军民存粮已尽，则以弓弩之筋弦、皮甲、树皮及草根充饥。在数月的激烈战斗中，城中军民伤亡及饥饿身亡者甚众，尚存者亦体力难支。九月初三日，坚守长达近 9 个月的太原城终被金军攻破。王禀又率领太原军民与金军巷战，身中数十枪，投水自尽，全城军民大多壮烈牺牲。

东路金军在宗望的统领下，再次经中山府（今河北定县），直扑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真定府于金军第一次南侵时，全城军民在守将刘韐的率领下奋起抗击，未能使金军破城。金军北撤后，城中大部分兵力随刘韐前去救援太原，故金军再次围攻时，城中守军尚不足 2000 人。真定知府李邈、守将刘翊（靖、竑）依然率领全城军民顽强抵抗，并上书宋廷求援，但先后 30 多次的奏请竟被朝廷搁置不理。在坚守了 40 余天后，真定府陷落。刘翊又率军民与金兵展开巷战，力竭自尽。李邈被俘，押往金燕京府（今北京西南），不屈被害。

太原、真定相继失守，金军东、西两路遂长驱直入。正抱病出任宋同知枢密院事的种师道立即檄召方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令南道都总管和西道都总管府所属陕西制置使，急速率“勤王”兵赴开封。又上奏赵桓指出金兵必会大举再侵，请朝廷及早作好御敌的准备。赵桓见到奏疏，却认为种师道是大惊小怪，遂以议事为名，又将他召回开封。种师道扶病赶回京城，不久病故。

此时，西路金军又克陷汾州（治今山西汾阳），知州张克戬、兵马都监贾亶阵亡，又攻占平定军（今山西平定）。宋廷仍欲以三镇代税钱向金朝求和，令王云出使金军。王云返回，称金军坚持要割让太原、中山、河间府（今河北河间）3镇，才接受议和。赵桓召集百官，在尚书省商议，少宰兼中书侍郎唐恪、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坚决请求割让3镇，以求与金军议和。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伏地痛哭恳请。赵桓派尚书左丞王寓随从康王赵构前往宗望军中谈判，王寓随即提出辞官，赵桓即将他贬官，又以知枢密院事冯澥替代。而金军继续南攻，西路金军又相继攻陷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威胜军（今山西沁县南）、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东路金军也已推进到黄河北岸，宋宣抚副使折彦质率领12万兵前去阻击，被金军击溃，知河阳燕瑛、西京留守王襄竟弃城而逃。康王赵构与冯澥未至金军便返回开封，赵桓很生气，将冯澥罢官，再令刑部尚书王云随同赵构出使宗望军中，同意割让3镇，向金帝进献衮冕、车辂，并尊金帝为皇叔，上尊号。金军又渡过黄河，折彦质与提刑按察使许高再相继兵败。金军遣使入开封，要求宋廷尽割让河北之地。赵桓又派资政殿学士冯澥和李若水为割地请和使，赴宗翰军中求和。

十一月中旬，宋东路割地请和使赵构和王云一行到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知磁州兼河北义兵都总管宗泽率领兵民方击败金军的进攻。城中军民告之赵构，金军已从邻县渡黄河南下，请求他们不要北上求和，而应起兵进援京城。有人发现王云行囊中夹有“番巾”，指责其为奸细，人们气愤已极，将他打死。赵构无人随同，只得暂留磁州。相州知州汪泊彦闻讯，邀请他前来本州，赵构便又退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赵桓为了满足金军不断升级的苛求，尽快议和，以求得金军后撤，在第一批割地请和使分赴东、西路金军之后，又派耿南仲出使宗望军中，聂昌出使宗翰军中，同意与金朝划黄河为界，河北之地悉归金所有。然而宋廷一系列的求和活动，丝毫没有阻止金军向开封的推进。十一月底，东、西两路金军先后到达开封城下。

金军兵临城下。赵桓一伙一面任命京兆府路安抚使范致虚为陕西五路宣抚使，令他督催“勤王”兵入援开封。又派人秘密出关召兵，约康王赵构和河北地方守将领兵赶赴开封。一面又害怕大量的宋军聚集城下，会激怒金人，影响割地求和的谈判，竟下令命已率兵奔赴开封的南道都总管张叔夜和陕西制置使钱盖不得妄动，一律返回原驻地。对金军提出的划黄河为界，赵桓表示：“一一专听从命，不敢依前有违。”④并且派朝廷重臣与金使一同前往河北各地，办理交割事宜。

宋廷投降行径，再度激起河北、河东地区军民的反对和抵制。聂昌与金使在绛州（治今山西新绛）交割时，一齐被当地百姓打死。耿南仲与金使在卫州（治今河北汲县）交割时，也险遭“乡兵”的处置，金使仓皇出逃，耿南仲也连夜逃入相州，且不敢再提割地之事。开封城内军民对投降派也恨之入

骨，宰相唐恪于巡视城防途中，险遭百姓的痛击，赵桓只得将他免职，以平民愤，又以主张抗金的门下侍郎何㮚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并派人持蜡书到相州，委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并令尽发河北兵入援开封，又诏诸路“勤王”兵火速赶往京城。但赵桓于金军兵临城下之际才采取的这些措施，都已为时太晚。

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军开始对开封城进攻，通津门、善利门、宣化门先后遭到金军猛烈的攻击，守将范琼、姚仲友等率兵士顽强击退金军的进攻，范琼反击出城，焚烧金军营寨，守城将士甚至“缒城”杀敌，焚毁敌炮架、鹅车等军械。宋军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统制官高师旦等众多将士阵亡。赵桓雨雪中披甲登城，以御膳赐士卒，自己则食兵士之食。但进入闰十一月，天气骤寒，雨雪纷纷，滴水成冰，兵士握不住兵器，甚至有冻死者。可“勤王”之师迟迟不到，城中兵力可用者只有 3 万，亦已失去十之五六。金人攻城愈急范琼率千余兵士出城迎战，渡河时因冰层破裂，淹死 500 余人，士气大挫。赵桓又听信成忠郎郭京的妖言，令其率“神兵”出击，二十五日，郭京打开宣化门，“神兵”出城，随即大败。郭京又声言下城作法，却领余兵开城逃跑，金军乘机攻上城墙。

金军虽攻占城墙，城中军民抗金斗争并未停止，他们杀死前来“议和”的金使，并自发地组织起来抗击金军，仅到官府请求领取甲胄和武器的民众就多达 30 万人。金军下令纵火屠城，何㮚率领百姓与之巷战，金军急忙于城上修筑对内的防御工事，不敢下城。尽管开封城内军民仍在顽强地与金军战斗，可赵桓已吓得魂不附体，当金军又一次提出议和的要求时，他

立刻表示接受。金军要求太上皇赵佶前往金军营帐议降，赵桓以太上皇“惊忧而疾”为由，提出自己亲往。他从金军返回城中不久，又上降表，并派遣聂昌、耿南仲、陈过庭随金朝官员分赴河东、河北两地交割土地。两河地区的百姓坚决反对宋廷的投降割地求和，除石州（治今山西离石）一地降金外，其他地区的民众与军队均坚守城池，拒不执行诏令献城投降。赵桓只得再次下诏，令两河百姓“开门出降”，但收效依然甚微。

宗望、宗翰进一步提出，要求宋廷收缴民间百姓手中的武器，又向宋朝邀索犒师之费：绢1000万匹、金100万锭、银1000万锭，缎1000万匹。宋廷竭尽全力于城中收罗搜刮，可除绢凑够要求的数额外，其他物品“十分未及所须之一”。宗望、宗翰等人对此很不满意，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再次要求赵桓赴金军营地，随即被扣押，声言待交纳足数，方可放还。宋廷于是在全城拼命搜刮金银，凡钗钏在铢两以上皆被强行收走，一时间满城悲戚愁叹，民不聊生。百姓请求官府发放武器，却遭到拒绝，于是铤而走险，私自打造兵器，乘黑夜捕杀下城剽掠的金兵。宋廷对金兵“为百姓掩杀甚多”，感到十分惊恐，下令严禁“以防护为名，于炉头打造兵器”⑤，还将违反禁令的百姓斩首示众，以此阻止城中百姓的抗金斗争。

二月初六日，宗望、宗翰令宋廷臣僚推举异姓为帝，并废赵佶、赵桓二帝。初七日，金军又要求太上皇赵佶入金营，且根据内侍邓述提供的赵氏宗室名单，将诸王及其子孙尽收入金营。十一日，宗望、宗翰又强迫赵佶召皇后和皇太子赴金营，同时迫令张邦昌为傀儡。他们见提出的搜括金银数量仍未凑足，认为宋廷官员搜刮不力，竟然杀死户部尚书梅执礼、户部侍郎陈知质、刑部侍郎程振、给事中安扶。三月初七日，金人

扶植下的张邦昌正式称帝，建立伪楚政权。不久，金军按照名单入城收取赵氏宗室成员，以便全部带到金营之中。开封府尹徐秉哲竟下令，要求百姓相互结保，不得藏匿宗室成员及子弟。三月底，金军带着赵佶先行北上，返回金朝。

四月初一日，宗望、宗翰又带着赵桓及皇后、皇太子，以及赵氏宗室、大臣3000余人，和掠夺的金银财宝，“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车辂、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秘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娼优”⑥等，满载北归。宋廷府库的积储，遂为之一空。北宋亦随之灭亡。

南宋绍兴五年（1135），赵佶死于金朝，三十一年（1161），赵桓亦死于金朝。

注 释

① 李纲《靖康传信录》卷三。

②《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③《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

④《大金吊伐录》卷上。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

⑥《宋史》卷二三《钦宗纪》。

两宋

赵构重建宗室

宋靖康元年（1126），金东、西两路军长驱直入，进逼宋朝都城开封府（今属河南）。宋廷中投降派把持朝政，不断派遣使臣赴金军谈判。十月，宋帝赵桓令其弟康王赵构与知枢密院事冯澥前往金军议和。十一月，赵桓再令赵构与刑部尚书王云为割地请和使，赴金东路军统帅宗望军营，且进奉衮冕、车辂，尊金帝为皇叔，上18字尊号。赵构一行自开封经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濬州（治今河南浚县），到达磁州（治今河北磁县）。此前，金军于磁州遭宋守将宗泽的抵抗，未能破城而径直渡河南下。宗泽因此劝阻赵构，认为肃王赵枢与太宰兼门下侍郎张邦昌作为人质已随第一次金军北撤，至今未归。而此刻金军又再度南侵，还要去北方有什么用？遂请他留居磁州。磁州军民发现王云的行囊中夹有“番巾”，认定他是金朝的奸细，准备挟持赵构去金朝，愤怒的百姓群起将他打死。赵构因此暂时留下，可随从却认为磁州不安全，不可久留。相州知州汪伯彦闻讯，派人持蜡书来请赵构，于是他便又退回相州（治今河南安阳）。

其时，金军在开封城下发起进攻。闰十一月，天气骤冷，开封守城宋军冻饿而亡者甚众，伤亡亦十分惨重，而“勤王”兵却迟迟不至，开封城危在旦夕。赵桓又命赵构为天下（一说河北）兵马大元帅，并写“蜡诏”（密诏），令阁门祗候秦存前往相州，面交赵构。又令知中山府陈亨伯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秦存见赵构，自头发中取出蜡诏，赵构宣读诏令，在场的军民无不悲泣。不久，尚书左丞耿南仲急速赶到相州，向赵构面授赵桓旨意，令他召集河北地区的宋军入卫京城。赵构遂与耿南仲一起招募兵士，准备“勤王”。十二月初一日，赵构于相州建立大元帅府，有兵士5万，分为五军，令武显大夫陈淬为都统制军马。大元帅府方置，阁门祗候侯章又持“蜡诏”自开封赶来，急令大元帅赵构速发河北军队，由州县守将各自统领所部，入援京城。赵构随即命令各州县长官与将领，迅速领兵南渡黄河。初四日，赵构率军离开相州，自冰上穿过黄河，到达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宗泽率领2000兵士先期抵达这里，随后知信德府梁扬祖也领3000兵到达，其中有张俊、苗傅、杨沂中、田师中等数位将领，赵构的兵力因此得到加强，继续开赴京城。

正在这时，签书枢密院事曹辅又持“蜡诏”赶来，称金军已占据开封城墙，宋廷与金军刚刚议和，令赵构领兵屯驻于邻近开封地区，不可轻举妄动，以免惹怒金人，议和不成。汪伯彦等人都相信宋廷能与金军和议，只有宗泽不信，建议马上领兵直趋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再步步为营，推进开封，以解金军之围，“万一敌有异谋，则吾兵已在城下”①。宗泽的建议遭到汪伯彦等人的非难，他们授意赵构派遣宗泽率所部先行，而请赵构移军至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宗泽领万人进屯

澶渊，并扬言康王在此军中。汪伯彦等人此举的用意是排挤力主抗金的宗泽，此后宗泽再也不能参预大元帅府的谋议和决策。待宗泽统兵离开大元帅府，赵构随即离开大名府，进驻东平府，于是河北地区的军务要政，全由大元帅府决策。

靖康二年（1127）正月，宗泽领兵进至开德，与金军13次交战，大获全胜。他上书赵构，请他发布檄文，召集各路兵马会合京城。同时他又移书北道都总管赵野，河东、河北路宣抚使范讷，知兴仁府曾楙，请他们合兵入援开封。然而他们竟认为宗泽狂妄，未予理睬。宗泽孤军奋进，都统陈淬称前方金军兵力太强，认为不可贸然用兵。宗泽听后极为气愤，准备将他处死，诸将领纷纷乞请，让他戴罪杀敌立功，宗泽便令陈淬领兵进军。陈淬指挥兵士奋勇杀敌，击败金军的阻击。此后，宗泽又派部将孔彦威于开德府大败金军的进攻，于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等地多次打败金军，随即兵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南。宗泽考虑到自己将孤兵寡，不深入敌军则不可能取胜，遂挥师再进。正行之际，先锋军报告前方有金军营帐，宗泽指挥将士直扑金营，迅速歼灭金兵，又移师东进。金军召集大部兵力围歼宗泽部，部将王孝忠阵亡，宋兵陷入金军前后堵截的困境。宗泽告诫兵士："今日进退等死，不可不从死中求生。"②宋兵无不以一当百，拼死杀敌。金军被斩首数千级，大败，后退数十里。宗泽看到金军十倍于己，如今一战就败退，必会卷土重来，如果出动铁骑夜袭宋军，自己将处境危难。他立刻下令乘天黑转移。入夜，金军果然出兵袭击，见到一座空营，吃惊不已。从此，金军害怕与宗泽交战，也不敢再出兵追击。

赵构移大元帅府于东平府后，河北地区的宋军纷纷投奔府

下，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总管杨惟忠率数千兵士到东平。赵构令黄潜善领兵进驻兴仁，留杨惟忠为元帅府都统制。二月，赵构应汪伯彦等人之请，自东平移到济州（治今山东巨野南），大元帅府拥有官军和前来投奔的义兵已号称百万，分兵驻守于济州、濮州等诸州府，可是各路准备入援开封的"勤王"兵却被安置于此，不得发兵。而此时太上皇赵佶、宋帝赵桓均已被金军掳入营中。三月，金军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消息传来，赵构失声痛哭。大元帅府官僚中，有人主张赵构南移至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再南下江浙，但未成行。依据宋朝官制，赵构以宗泽为徽猷阁待制，又以汪伯彦为显谟阁待制、充元帅，黄潜善为徽猷阁待制、充副元帅。

不久，完颜宗望挟赵佶北撤。四月初，完颜宗翰又挟持遭废黜的赵桓北归。宗泽闻讯，立刻起兵直趋滑州，经黎阳关（今河南浚县东），到大名府准备径直渡河，直插金军北撤必经之路，劫回二帝。可"勤王"兵却按兵不动，没人响应。听说张邦昌僭位称帝，宗泽又准备先出兵诛讨张邦昌。但却得到大元帅府的令书，让他将所部带往靠近开封的地方，按兵不动。宗泽致书赵构："自古奸臣皆外为恭顺而中藏祸心，未有窃据实位、改元肆赦、恶状昭著若邦昌者。"③希望能出兵征讨张邦昌。与此同时，在大元帅府内，耿南仲正率幕僚劝说赵构称帝即位，赵构推辞不肯接受。汪伯彦等人又借天命、人心再请他登极，甚至还说"靖康"纪元年号，即蕴含有"十二月立康"的预兆，赵构提出仍需考虑后再说。正在这时，张邦昌派遣阁门宣赞舍人蒋师愈等人持文书前来拜见赵构，自称将归还大宋印玺，退让皇帝之位。赵构见张邦昌有"避位"之意，随即向诸将领下令，不许领兵前往开封，已到开封也不许入城。

并且派人告谕宗泽等人，称“受伪命之人义当诛讨”，然而出于权宜的考虑，不要轻易出兵。

不久，门下侍郎吕好问派人送来“蜡书”，称赵构若不自立为帝，恐怕就会有不该称帝而自立为帝者。伪楚大臣谢克家也送“大宋受命之宝”到济州，赵构跪受印玺，且命谢克家返回开封，备办各种仪物。济州的百姓纷纷来到军营门前，请求赵构在此即位称帝。恰在这时，宗泽赶到，认为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为当年太祖赵匡胤封王之地，且应天府地处国家中心，漕运极为便利。赵构于是决定再迁至应天府。这天晚上，张邦昌于开封亲笔手书，为已被宋哲宗罢废的皇后孟氏上尊号为元祐皇后，派尚书左丞冯澥为奉迎使，迎孟氏入居皇宫。孟氏随即派其侄、卫尉少卿孟忠厚持手书赴济州，面呈赵构，请他即皇帝位，自己则垂帘听政。在以吕好问为首的部分原宋廷臣僚的反对下，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改任尚书左仆射。为了缓解宫廷内外对他的非议，他率领在京城的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孟氏又以手书告之朝廷内外，宣布由赵构承袭帝位。

在大元帅府官员和原宋旧臣的再三请求下，赵构终于同意称帝。他派宗泽统兵分驻于长垣（今属河南)、韦城等县，以应付意外。不久，东道副都总管朱胜非、宣抚司统制官韩世忠、鄜延路副总管刘光世、西道都总管王襄分别统领所部相继投奔赵构，赵构遂以刘光世为五军都提举，这才从济州动身，到达南京应天府。两天后，张邦昌也自开封来到应天府，见到赵构便伏地痛哭，请求一死了之，赵构却极力安抚宽慰他。随后赵构又以汪伯彦为显谟阁直学士，黄潜善为徽猷阁直学士。很快，权吏部尚书王时雍等人给赵构送来车舆、服饰等仪物。

官府也于应天府门东侧修筑天地坛，供登极祭祀之用。

五月初一日，赵构登坛受命，即位于应天府官署，下令改元建炎。随后便任命臣僚，以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同知枢密院事，河东、河北宣抚使范讷为京城留守，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兼门下侍郎。又以黄潜善兼御营使，汪伯彦为副使，真定府路副都总管王渊为都统制，鄜延路副都总管刘光世提举一行事务。以资政殿学士路允迪为京城抚谕使，龙图阁学士耿延禧为副使。以保静军节度使姚古为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知府，以宗泽为龙图阁学士、知襄阳府。对于靖康年间“主和误国”的臣僚李邦彦、吴敏等人一概贬官，发配地方管制。但对张邦昌，赵构却认为“知几达变，勋在社稷”④，仍留于朝中，特许他每月两次赴尚书省议事，不久又进封为太傅。御史中丞颜岐甚至提出：“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体。”⑤由于新任臣僚威望不高，赵构遂委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令他赶来应天府。可朝廷中的主和派势力却反对和阻挠李纲任右相，颜岐先后五次上疏，认为：“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直到赵构出面干涉，指出“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才不再声张。但颜岐仍不罢休，竟又派人将他的奏章面交正行于途中的李纲，企图阻止他入朝。赵构因朝廷刚立，且金军北撤后威胁仍在，感到“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任用李纲不可，故拒绝了李纲辞去宰相职务的请求，而将范宗尹、颜岐等贬出朝廷。

李纲入朝后，立即向赵构上书，提出“国是、巡幸、赦令、僭逆、伪命、战、守、本政、责成、修德”等“十议”之事，指出应罢和议，积极备战，严明军纪，改革朝政弊端，并

请求严厉惩处以张邦昌为首的降金官员。第二天，赵构令臣僚商议李纲所奏之事，但却留下僭逆、伪命二事，不交廷议。李纲仍力主处置张邦昌，黄潜善极力主张留用，吕好问则推托交由赵构裁决。在李纲一再坚持下，赵构只好下诏，将张邦昌等一批降金官僚贬谪，又以李纲兼御营使。

注　释

①②③《宋史》卷三六〇《宗泽传》。

④《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⑤《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两宋

宋室南逃

宋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称帝，是为宋高宗，史称南宋。

此时的宋廷中，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和以门下侍郎兼权中书侍郎黄潜善为首的主和派并存。由于宋廷重建，百废待兴，且金军威胁依然存在，为“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①，赵构在李纲的力主下，采取了一些积极防御的措施，令河北、陕西、京师等地州、军、县、镇募人修筑城防；以神卫四厢都指挥使马忠为河北经制使，负责招募设置民兵；各县增置弓手，设武尉统领；置沿黄河、沿淮河、沿长江帅府19处，要郡39处，次要郡38处，由帅守兼都总管，郡守兼钤辖、都监，总兵力达967500人，另置水军77将。又诏陕西、河北、京东、京西诸路募兵10万人，更番入卫应天府，还命京东、京西两路大造战车。经李纲的荐举，赵构又起用原北宋时的监察御史、“声震河北”的张所，提任河北西路招抚使，以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经过主战派官僚的苦心经营，宋朝兵势复振，形势稍得好转，河北、河东两路百姓心系

宋廷，不断有抗金杀敌的捷报传入应天府。围攻河北、河东诸州县的金兵，亦纷纷撤兵离去。而自发组织的抗金义兵应招抚司、经制司之招募者甚众，赵构因而召集河北等5路兵马前来应天府，以保卫宋廷。

北宋都城自被金军攻陷，太上皇赵佶、皇帝赵桓被金军北掳后，开封府长官一直空缺，李纲认为要恢复旧都，非老将宗泽不可。在他的极力荐举下，时年69岁的宗泽被委以知开封府。宗泽到开封时，金军的骑兵还屯驻于黄河边，金鼓之声，朝夕相闻。而京城的城墙门楼尽遭毁坏，城内外兵民杂居，盗贼横行霸道，人心惶恐不安。宗泽因此下令，“为盗者，赃无轻重，并从军法”，并处置了几名盗贼，又收降了河东巨寇王善，及往来于京西、淮南、河北、河南等地的强寇杨进、王再兴等人，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他积极修筑城池，加强城防，开封形势得以好转。

赵构虽重用李纲、宗泽等主战派官僚，积极整饬军备，扩充军队，修筑城池，但他却害怕金军，想远离河北。建炎元年(1127)五月，赵构下诏令成都（今属四川)、京兆（今陕西西安)、襄阳（今湖北襄樊)、荆南（今湖北江陵)、江宁（今江苏南京）诸府和邓（治今河南邓县)、扬（治今江苏扬州）二州，储备粮草，修筑城堡，以备巡视。宗纲上疏赵构，认为开封经过整治，形势已恢复到承平之时，而且将士、农民、商旅、官吏人心所向，均盼望宗帝返归京城，故请赵构马上回京师主持朝政。赵构对此却无动于衷，除去擢升宗泽为延康殿学士、京城留守兼开封府尹外，依然留居南京应天府。

这时金朝派人以出使“大楚”朝为名，来到开封府。宗泽立刻拘捕来使，上书朝廷请求处置。赵构则下诏，要求将金使

安置于馆驿。宗泽上疏抗旨，认为金人借出使之名觇窥虚实，“令迁置别馆，优加待遇，臣愚不敢奉诏，以彰国弱”②。赵构又亲笔写札致宗泽，令他放金使回国。黄潜善以此指责宗泽拘留金使，尚书左丞许景衡抗疏力辩，认为宗泽任开封尹，成绩卓然，无人能比。此事方得以平息。

金朝在真定府（今河北正定）、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之间屯集了大量的军队，秘密修治军械兵器，准备再度入侵宋境。朝廷将相不以为虑，不部置任何防御措施。宗泽忧心忡忡，亲自北渡黄河，召集各州守军将领商议战备之事，准备收复河北失地。同时又于京城四周分别派使统领招募汇集的抗金义军。他为了加强和巩固开封城的防卫，又根据地势地貌，在城外修筑了24处坚固的壁垒，沿黄河依序排列而相接为“连珠寨”，从而连接了河东、河北山水寨的忠义民兵。这一系列的举措影响颇大，陕西、京东、京西诸路人马都表示愿意听宗泽指挥，抗金形势极为有利。

在这样的形势下，主和派官僚依旧畏金如虎，黄潜善、汪伯彦劝说赵构逃往江南，李纲等人则极论不可，且指出赵构曾“降诏许留中原，人心悦服，奈何诏墨未干，遽失大信于天下?”③在李纲等主战派的坚持下，赵构只得先将孟太后等送过江南，并表示：“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聚兵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战。”④又迁李纲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而黄潜善则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主战派与主和派分操左、右相。在主和派的牵制与破坏下，李纲等人的抗金举措举步艰难。黄潜善、汪伯彦见南逃的企图被李纲等人所阻，便蓄意诋毁和破坏抗金斗争。张所请求于宋北京燕山府（今北京西南）设置招抚使司，待一切准备就绪，即发兵渡

黄河北上。然而黄潜善的党羽、北京留守张益谦却诬陷河北招抚使司扰民，甚至声称自从建立招抚使司后，河北地区的盗贼日益猖獗。李纲反问道："张所尚在京城，招抚使司还未建立，如何知道扰民之事？河北百姓流离失所，相聚为盗，难道是设置招抚使司后才有盗贼吗？"黄潜善一伙仍不甘心，又下令，由宗泽"节制"傅亮立刻渡河北上，傅亮认为，准备尚未就绪就急令渡河，恐要误大事。李纲更是向赵构一针见血地指出，黄潜善、汪伯彦此举的目的是针对自己的抗金主张。然而赵构却以黄潜善等人所称"傅亮兵少，不可渡河"为由，下令撤销河东经制司。李纲知自己处处被排挤，抗金已难以进行，便多次提出辞职请求。赵构遂以"买马招军"之罪，将任宰相仅75天的李纲罢官。太学生陈东、进士欧阳澈上书，认为黄潜善、汪伯彦不可任用，李纲不能罢官，因此而遭杀害。

李纲被罢官后，张所亦被贬，傅亮则以母病为由，辞职归乡。不久，河北招抚使司也被撤销，李纲已制定和实施的抗金措施，全部遭废止。在打击和排挤主战派官僚的同时，赵构与黄潜善一伙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南逃的准备。赵构亲笔书诏，称"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⑤。先是决定去南阳（今属河南），不久又退到淮甸，同时诏令荆襄、关陕、江淮地区官府，准备迎接"巡幸"，并派徽猷阁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庙列祖列宗的神位到扬州。赵构南逃的意图为世人所知，宗泽多次上疏，恳请他返归开封，不要"巡幸"东南，但始终得不到赵构的重视。为此，宗泽抗疏疾呼："京师二百年积累之基业，陛下奈何轻弃以遗敌国？"⑥他指责黄潜善、汪伯彦力主南下为误国之举。宗泽一次又一次的上疏，经过三省、枢密院后，便落入黄潜善等人的手中。他们每见宗泽的奏疏，都讥笑他颠狂。

金军自攻陷开封北撤后，一直整修军械，寻找机会再度南侵。自傀儡皇帝张邦昌被废黜，伪楚政权夭折，金朝即以此为借口，准备发兵征讨南宋。宋、金局势日益紧张，主战派再次力主抗金，原河北招抚使司都统制王彦率7000兵士渡过黄河，北上攻击金军，一举收复新乡县（今属河南)。河东、河北大部分未被金军占据的州县，也积极备战，随时准备迎击来犯的金军。可是以赵构、黄潜善、汪伯彦为首的主和派却加紧了南逃的步伐。九月初，赵构听说金兵入侵河阳，未经证实就已坐卧不安。为了彻底扫清南逃的障碍，排除各种非议，赵构竟下诏："有敢妄议惑众沮巡幸者，许告而罪之，不告者斩。"⑦十月底，赵构到达扬州。宋室的南逃，招致金军再度发兵南下。金军此次出兵南下，旨在攻战河东、河北地区尚在宋军控制之下的州县重镇，以巩固其在两河地区的统治。面对金军的进攻，各地百姓与宋军将士奋起反抗金军的残暴掳掠，尤以抗金义军最为活跃。泽州（治今山西晋城)、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一带的义军与金军多次交战，曾进攻金军大营。几乎俘获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声势浩大。王彦收复新乡后，遭数万金军围攻，战败后，王彦与所部官兵突围，转移到共城县（今河南辉县）西面的太行山区抗击金军。他们于面部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8字，以示决心，而被称为"八字军"。忠义民兵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10余万义军投奔到王彦帐下。王彦"缮甲治兵"，多次击败金军，并一度准备北上收复太原（今属山西)。河北庆源府（今河北赵县）五马山（位今河北赞皇）上有宋武翼大夫赵邦杰与原保州路廉访使马扩领导的抗金义军，他们拥立自称信王赵榛的人作为号召，队伍一度发展到10多万人，四出打击金军。

河东、河北地区官军与义军的抗金斗争，给南侵的金军造成很大的威胁，客观上掩护了刚刚重建的南宋政权。但赵构与其父赵佶、其兄赵桓一样，并非真心抗金。赵构下诏“一人一骑不得渡河”⑧，致使黄河以北的抗金义军得不到援应，长期孤军作战，遭受极大的损失，五马山寨等义兵据点相继落入金军手中。河北重镇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军民自靖康元年（1126）十月，被金军围攻以来，在知府陈遘的率领下，顽强抗击金军的进攻。陈遘殉职后，城中军民依然拒不献城投降，直到建炎二年（1128）三月，由于城中早已断炊，军民伤亡及饿死者大半，城池终为金军占据。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自建炎元年五月间被金军围攻，守将王麟畏敌投降，城中军民坚决反对而将他杀死，另推举韩一领导抗金。之后，皇族赵士晤自金军逃出，于磁州（治今河北磁县）召集义兵数万人，半夜袭击围攻铭州的金军，乘势进入城中，而使洺州城防得到极大的加强。他们包围金军，俘虏金军将领，迫使金军撤退。不久金军又纠集兵力再次围攻洺州，守城军民浴血奋战270余天，大小57次战斗，给金军以很大的损伤。但也因城中粮尽，军民被迫突围，转移到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洺州遂被金军占据。

守卫开封的宗泽为让赵构重返京城，派人联络河北、河东的抗金义军，南下云集于开封城周围，总兵力达百万，迫使金军不敢贸然进犯。他多次上书，恳请赵构来开封，“陛下及此时还京，则众心翕然，何敌国之足忧乎？”⑨他前后上书20余次，但都被黄潜善等人扣留，宗泽忧愤成疾，于七月病故。临终前一天，他长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又嘱托部将继续抗金。翌日，宗泽依旧不提及家事，临终前连呼

三声“过河”。便与世长辞。宗泽死后，赵构又派北京留守杜充改任开封尹，东京留守。杜充上任，一改宗泽的抗金举措，原宗泽招抚的抗金义军，对此极为不满而纷纷离去。

赵构的南逃和消极投降的行动，又一次为金朝所蔑视，南侵宋朝的气焰日趋嚣张。建炎二年七月，金廷再次发兵，大举进攻步步退缩的宋朝，宋廷又陷入大敌压境的困境。

注　释

①《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②《宋史》卷三六〇《宗泽传》。

③《宋史》卷三五八《李纲传上》。

④《宋史》《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一。

⑤《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⑥《宋史》卷三六〇《宗泽传》。

⑦《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⑧《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五。

⑨《宋史》卷三六〇《宗泽传》。

苗刘兵变

赵构建立南宋后依然承袭北宋对金朝屈辱投降的政策，不敢还朝开封，自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退避到扬州（今属江苏）。南宋政权的腐败无能，助长了金廷力主用兵宋朝的气焰。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十二月，金廷又一次举兵，分3路大规模南征。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统东路军自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渡黄河，进攻淄州（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青州（治今山东益都）等山东地区；以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统中路军自河阳渡黄河，进攻河南地区；以完颜娄室统西路军进攻陕西地区。

建炎二年（金天会六年，1128）正月，3路金军连克南宋重镇，青州、潍州（治今山东潍坊）、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邓州（治今河南邓县）、襄阳（今湖北襄樊）、均州（治今湖北丹江西北）、房州（治今湖北房县）等相继落入金军手中。金军原以为赵构仍在应天府，兵渡黄河后才得知他已逃到扬州。金军并未作出长驱直入的准备，难以继续向南推进，完颜宗辅便留驻大军于黄河南北屯

田，自己则返回北方。完颜宗翰在攻占洛阳（今属河南）、唐州（治今河南唐河）、蔡州（治今河南汝阳）、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颍昌府（今河南许昌）、郑州（今属河南）等地之后，将当地的百姓强行迁徙到河北各地，也留下一部分军队屯田于黄河南北，自己率余部返回山西。完颜娄室统兵入攻陕西，连克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今陕西凤翔）等地，但在西进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后，遭宋军伏击战败，被迫撤兵。

金军此次南征，主要是为了攻占河北地区尚未被宋军驻守及控制的州县重镇，以彻底清除宋朝在北方的势力。不过，出兵虽然遭到一些抵抗和抗金义军的攻击，但宋朝的虚弱本质已暴露在金军的面前。于是，七月，金帝完颜晟又诏令金军讨伐南宋，穷追宋帝赵构，以灭亡南宋王朝。以完颜宗辅与完颜宗翰各统一路人马，分别自河北、河东南下，合击宋朝。同时仍以完颜娄室统所部人马进攻陕西，以牵制四川、陕西的宋军，不得入援中原。完颜宗辅与完颜宗翰出兵后，一路顺利，十月，两军会师于濮州（治今山东鄄城北），随即围攻城池。濮州守将姚端、杨粹中率军民顽强抵抗，且领兵出其不意，夜袭金营，直攻金军中军。完颜宗翰慌忙逃命，竟连鞋袜都未穿上。不久，完颜宗辅部主将完颜宗弼（兀术）进攻开德府（今河南濮阳），遭宋御营统制韩世忠、权同主管侍卫步军司公事范琼，以及元帅府马步军都总管马扩所率援军的反击，亦退至濮州。濮州城外金军增兵，攻城更紧。城内军民坚守，击退金军连续不断的进攻，但终因得不到援应，遭围攻一月之后陷落。姚端率军突围而出，杨粹中不幸被俘。

宋帝赵构一面派兵救援遭金军进攻的重镇，一面又将隆祐

太后陈氏送往杭州（今属浙江），为自己的继续过江南逃做准备。在宋廷的退却战略下，抗金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和影响。进入十一月后，宋于河南、陕西的州县重镇，如延安府（今陕西延安）、开德府、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德州（今属山东）、淄州等相继落入金军手中。面对金军强大的攻势，赵构连忙派魏行可充任金国军前通问使，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向金军求和。而东京留守、开封尹杜充竟然决黄河堤，使之自泗水入淮河，企图以此阻止金军继续南下。但这些消极的措施都未能阻止金军的南侵，十二月，金军转攻东平府（今山东东平），京东西路制置使范延世弃城而逃。金军再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知府刘豫献城投降。又攻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转运判官裴亿出城投降，提点刑狱郭永被俘后，不屈而死。随后，金军连克袭庆府、虢州（治今河南灵宝）等，步步逼近扬州。

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正月，金军统帅完颜宗辅、完颜宗翰派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拔离速与大将马五等率5000骑兵，奔袭扬州。三十日，金军进至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金军的快速推进，使宋帝束手无策，二月初一，“始听士民从便避兵”，又令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率部兵护送皇子和六宫后妃去杭州。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率兵在淮河阻击金军，然而还未等到金军临近，宋军却先溃散而去。金军随即攻占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知州朱琳投降，之后又攻陷天长军，距离扬州仅百余里地。初三日，消息传到扬州，赵构竟连宰相黄潜善、汪伯彦都不告诉，即与杭州制置盗贼使王渊等数人身着甲胄，骑马狼狈出逃，于瓜洲乘小舟渡江至镇江（今属江苏）。马五所率5000金军骑兵一路急驰，当天傍晚时分赶到

扬州，又闻讯赵构已过江南逃，便立即追到瓜洲渡口。宋太常少卿季陵正带宋军护送太庙列祖列宗牌位准备过江，金军得知马上派兵拦截，季陵夺路而逃，竟丢失了宋太祖赵匡胤的牌位。拔离速部奔袭扬州，未能俘获宋帝，孤军突进，却激起江淮地区百姓及官兵的奋起反抗，宝应县（今属江苏）在李在的组织下，以五马山寨义军和红巾军的旗号召集百姓抗金，对远离金军主力的拔离速部构成很大的威胁，迫使这支金军不敢于扬州久留，而迅速北撤。

赵构逃到镇江，在王渊的建议下，又决定再逃杭州。他命令中书侍郎朱胜非留下，镇守镇江；以吏部尚书吕颐浩为资政殿大学士，江淮制置使；都巡检使刘光世为殿前都指挥使，充行在五军制置使，驻守镇江，扼守京口；主管马军司杨惟忠节制江东军马，驻守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但随着他的东南逃却，又对东南地区的防务不断进行调整，除加强沿江的驻防外，又增置“沿海托防”官，募海船守卫海湾江口。为了掩饰自己的怯懦与退怯，赵构下诏罪己，又对犯死罪以下的囚犯一律赦免，对已遭罢贬流放的官吏允许返回家乡。可对李纲却不赦免，也不许离开流放地，仍想用治罪李纲讨好金朝。

黄潜善、汪伯彦一伙的屈膝投降，激起朝野极大的忿慨。赵构迫于舆论，采纳了御史中丞张澂的建议，下令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的官职。三月初，赵构以朱胜非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而以御营都统制王渊为同签书枢密院事。王渊原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同伙，因主张护送赵构南逃镇江、杭州而倍受恩宠，得以擢升，扈从统制苗傅对此十分妒嫉，忿忿不平。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也因自己曾镇压淮西丁进等大盗而赏赐甚微，大为不满。二人遂合谋，借官僚对王渊普遍存在的不

满情绪，和对仗势欺人、专横跋扈的宦官康履等人的愤恨，趁刘光世、张俊、杨沂中、韩世忠等大将分守江防要塞之机，于杭州发动政变。三月初五日，苗傅、刘正彦等设伏兵于城北桥下，等王渊退朝行至桥上，伏兵出击，刘正彦指责他勾结宦官阴谋反叛，亲手将他杀死。又包围康履宅第，狂捕滥杀，凡无胡须者全遭杀戮。随后，苗傅、刘正彦提着王渊的首级，拥兵闯入行宫，扬言"苗傅不负国，止为天下除害"①。

杭州知府康允之、殿帅王元得知兵变，立即保护赵构登上阁楼。赵构凭栏询问起兵缘由，苗傅厉声呵道："陛下信任中官，军士有功者不赏，私内侍者即得美官。"赵构只得宣布授予苗傅为庆远军承宣使、御营使司都统制，刘正彦为渭州观察使、副都统制，并请他们退兵回营。但苗、刘仍不退兵，赵构问左右如何使之退兵，浙西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时希孟、军器监叶宗谔建议除掉康履方可平息兵变。赵构无奈，只好令中军统制吴湛捕捉康履。吴湛于宫中清漏阁的灰尘中抓到躲藏于此的康履，苗傅即于楼下当众将他斩杀。不料，苗傅、刘正彦除掉康履后，仍拥兵不退，却又提出让赵构退位。赵构请朱胜非缒楼，与苗傅、刘正彦等人谈判。苗傅又提出请隆祐太后孟氏一同听政，且派遣使臣与金朝议和。赵构当即应允，下诏请太后垂帘听政。诏下，苗傅竟不拜，进一步提出让赵构3岁的儿子即皇帝位。一时间，阁楼上臣僚各持己见，或赞同或反对，争论不休，赵构遂表示自己退位，随即下令，请隆祐太后临朝，自己则起身站立于楹柱之侧。

须臾，隆祐太后乘轿来到楼下，苗傅、刘正彦请她临朝称制，并声称立皇子为帝。孟太后则表示："今强敌在外，使吾一妇人帘前抱三岁儿，何以令天下？"刘正彦见孟太后不应允，

便以自杀相要挟，苗傅则在一旁催促她答应垂帘听政。直至赵构派人奏告孟太后，自己已决定退位，孟太后仍未应允而返回宫中。朱胜非哭泣着请求赵构下诏治罪苗傅、刘正彦二凶。赵构摒退左右，告诉他："当为后图，事不成，死未晚。"②当天晚上，赵构便搬出行宫，进住显宁寺中。第二天，孟太后垂帘听政，尊赵构为睿圣仁孝皇帝，改显宁寺为睿圣宫，其身边仅留内侍15人。

初八日，赵构退位，孟太后临朝的赦令传到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侍御史张浚拒不拜受。初九日，赦令传至江宁府，江淮制置使吕颐浩致书张浚，陈述兵变原委，张浚随即举兵勤王。初十日，御营前军统制张俊到平江府，张浚劝说他起兵救援赵构，张俊欣然领命。此时杭州城内，朱胜非等人则设计麻痹和稳住苗傅、刘正彦等人，孟太后也百般"劳勉"，使之深信不疑。张浚还致书苗傅、刘正彦，褒奖其"忠义"，以示"慰安"。苗、刘自以为得势，又提出改元和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孟太后恐全部拒绝，将引起其疑心，遂应允改元。十一日，改元"明受"。次日，百官始朝睿圣宫，赵构命苗傅为武当军节度使，刘正彦为武成军节度使。在稳住苗傅、刘正彦后，张浚便派进士冯幡入杭州，请赵构复帝位，总揽朝政。又致书苗、刘党徒马柔吉、王钧甫，要他们及早反正。随后，他传檄诸路统帅，约吕颐浩和殿前都指挥使、行在五军制置使刘光世领兵会合于平江府，准备入杭州讨伐叛逆。

正在这时，苗傅以堂帖让张俊赴秦州（治今甘肃天水），而令两浙提点刑狱赵哲统领张俊所部，赵哲不从。改令陈思恭领兵，亦不从。苗傅又以其党羽、御营中军统制吴湛主管步军司，而以武功大夫王彦为御营司统制时，王彦则佯装颠狂，当

日即致仕而去。一时间，南宋政局极度动荡不安。为了防止金军乘虚而入，张浚一面准备平定兵变，一面令节制司参议官辛道宗以防备海寇为名，征集海船以便应急之用。十六日，苗傅、刘正彦又操纵宋廷，将内侍蓝珪、曾择等6人贬谪至岭南诸州安置。苗傅对此仍不罢休，竟追杀曾择。又提出以所部替换禁卫军守护赵构所在的睿圣宫，并请赵构离开杭州，前往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或越州（治今浙江绍兴）。御史中丞张澂和朱胜非婉言劝阻，赵构才未被赶出杭州。进士冯轓受张浚之命，劝说苗、刘二人反正，苗傅勃然大怒，按剑怒视冯轓，刘正彦则提出，只要张浚亲自前来劝说，即可反正。随后他们派朝官赵休与冯轓同赴张浚营中，招其反叛。

苗傅、刘正彦的反叛，特别是他们兵变后非但不号召抗金，反而认为逼迫赵构，就可以向金朝讨好求和，激起了朝廷内外诸多的抵制和反抗。吕颐浩与张浚、张俊、韩世忠相继发兵"勤王"。苗傅、刘正彦闻讯，又利用朝廷下令，以韩世忠为定国军节度使，张俊为武宁军节度使、知凤翔府，张浚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发配郴州（今属湖南），企图以此解除他们的兵权，但韩世忠等将领对此不屑一顾，吕颐浩兵至丹阳（今属江苏），刘光世率所部赶来与之会师。张浚见韩世忠兵少，便自张俊军中分2000兵力给他。苗傅、刘正彦见朝廷命令竟成一纸空文，便立即调兵遣将，派苗瑀、马柔吉率"赤心队"及王渊旧部进驻临平，以阻止各路"勤王"之师进入杭州。

吕颐浩等各路"勤王"兵马相继到达平江府。张浚于进兵途中得到罢贬自己官职的命令，恐部将兵士因此人心浮动，而谎称是朝廷的召见之令，从而稳定了队伍。经各路统帅的合谋，由吕颐浩、张浚传檄四方，号召起兵讨伐叛逆之贼。不

久，吕颐浩等率兵到达吴江（今属江苏），上奏朝廷请赵构复位。苗傅、刘正彦听说"勤王"之师大会师，惊恐不已，立即请朱胜非、冯𬬻至尚书省商议赵构复位之事。朱胜非随即率百官三次上表，请赵构还朝。

四月初一，孟太后下诏还政赵构。赵构遂重返行宫，尊孟太后为隆祐皇太后，以苗傅为淮西制置使，刘正彦为副使。初三日，下诏，恢复建炎年号。同日，吕颐浩、张浚率军到达临平，苗翊、马柔吉派兵于河上阻截。韩世忠亲自率领先锋兵发起冲锋，张俊、刘光世领兵策应，苗翊不敌，败逃，"勤王"之师遂进入北关。苗傅、刘正彦见大势已去，便去尚书省取出孟太后赐予的铁券，带领2000精兵，连夜打开涌金门逃走。初四日，吕颐浩、张浚统兵入杭州，孟太后撤帘，停止听政。苗傅、刘正彦发动的兵变遂告破产。

苗傅、刘正彦出逃后，又率叛军进犯富阳（今属浙江）、新城（今浙江富阳西南）二县，遭统制官王德、乔仲福的追击。此后，他们继续负隅顽抗，屡犯两浙州县重镇。四月十八日，赵构以韩世忠为江、浙制置使，与御营副使刘光世合兵追讨叛军。二十二日又下诏，除苗傅、刘正彦、苗瑀、苗翊等首犯不赦外，余党免罪。在官军的追剿下，叛军到处被动挨打。五月初三日，叛军统领官张翼斩杀马柔吉、王钧甫投降朝廷。十二日，韩世忠于浦城县（今属福建）俘获刘正彦。苗傅弃军而逃，改换姓名连夜逃入建阳县（今属福建），被当地土豪詹标认出，将他抓获送入韩世忠军中。韩世忠讨平叛军后，返回建康，苗傅、刘正彦等叛军头领遂被处置。

注　释

①②《宋史》卷四七五《苗傅传》。

两宋

洞庭风云

早在北宋末年，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即以行医为名，利用巫教作掩护，建立互助团体——乡社。他宣扬“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深得广大民众的拥护。环洞庭湖周围数百里内的贫苦农民，自备钱粮，纷纷投奔钟相，以至络绎不绝，昼夜不息。宋廷闻讯，屡次下令禁止，皆“不能尽法绳之”①。经过20余年的宣传与组织，加入“乡社”者已遍布于以洞庭湖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其后，钟相以抵御盗匪、保卫乡里为名，于武陵县唐封乡水连村的山岗上建立栅寨，组织“乡社”民兵，操练习武，培养出一支训练有素的农民武装。

宋靖康二年（金天会五年，1127），金军再度南下，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钟相招募300民兵，交其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然而一心投降求和的宋廷，唯恐“勤王”之师会惹怒金军，求和不成，竟下令就地遣散“勤王”武装，令其“归原来去处，各著生业”②。钟子昂率300名民兵返回鼎州（治今湖南常德）。钟相对宋廷的屈辱投降极为愤慨，执

意不遣散民兵，而于天子岗筑垒浚濠，制作旗帜器甲。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初，完颜宗弼（兀术）所部破江西后，移师湖南，围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宋将、直龙图阁向子湮与宗室赵聿之率军民守城御敌。8天后，潭州城失守，金军屠城而去，洞庭湖一带亦遭洗劫。不久，一支溃兵土匪武装由匪首孔彦舟所领，窜扰洞庭湖地区。二月，孔彦舟率所部自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南窜，直犯潭州、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澧州（治今湖南澧县）等地。又在鼎州大肆抢劫财物，强迫百姓当兵，更激起这一带百姓的强烈反抗。钟相于二月十七日，发动农民武装起义。鼎州、澧州、荆南等地民众群起响应，杨么、杨广、夏诚等人亦相继于当地率众起义。二月二十一日，钟相以武陵为中心，建立政权，被推举为楚王，并以钟仪为太子，建国号“楚”，改元“天载”，又对其他义军将领分授太尉以下官职，各领其责。

随后，钟相派兵进击桃源县（今属湖南），入城斩杀知县钱景诗。又派兵攻克澧州，捕杀澧阳县丞及澧州守臣黄琮等。很快鼎州、澧州、荆南、潭州、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岳州（治今湖南岳阳）、辰州（治今湖南沅陵）等州境内19县，除部分城镇外，悉为义军占领。义军声势日益壮大，号40万。义军所到之处，“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为劫财为均平”。正因如此，“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③。义军更于占领之地，“无税赋差科，无官司法令”④。大楚政权“均贫富，等贵贱”的政策，使更多的百姓摆脱宋廷苛捐杂税的侵扰。

大楚政权的建立，亦令宋廷大为不安，视之为“腹心之

害”、“咽喉之疾”。遂委以匪首孔彦舟为荆湖南、北路捉杀使，领兵镇压义军。又令驻守鄂州（治今湖北武昌）的宣抚访察使李允文派兵进击义军。李允文令步卒进攻益阳、水军进击澧口、战舰游袭洞庭湖，以围击大楚。钟相将义军分作左、右翼迎击。孔彦舟于澧州城遭义军攻击，“弃甲而走，仅以身免”⑤，蜷缩于鼎州城不敢出战。他佯称与义军休战，欲引军东向，同时派手下人以“入法”混入大楚内部，作为内应。钟相麻痹轻敌，三月二十六日，孔彦舟趁义军不备，里应外合，袭击钟相营帐。钟相及太子钟长昂奋力突围，于山谷中被俘。孔彦舟令将钟相父子押往京城，途经湖南攸县时，将他们杀害。

钟相父子遇害后，义军在杨么率领下，继续与官军作战。杨么原称杨太，因楚地方言称排行最小者为“么（yāo 腰）”，故亦称杨么。杨么利用洞庭湖区河湖港汊密布，山地丘陵起伏的地形，令义军“农兵相兼”、“陆耕水战”，很快扭转被动局面，于洞庭湖区建立起 70 余处山水寨。“大段紧密，水泄不通。日逐离寨二十里，陆路使人巡逻，遇夜伏路；水路日夜使船巡绰，寨门外令群刀手把定，便大虫（老虎）、豹子也则入去不得”⑥。寨内则“茅竹为舍，密比如栉”⑦，且养牛、育蚕，饲养猪、羊、鸡、鸭，“田蚕兴旺，生理丰富”⑧。

六月，宋廷以程昌寓为鼎、澧路镇抚使兼知鼎州。程昌寓自荆南出发赴任，令水军、步兵直趋鼎州。官军一路抢劫，搜刮军费，行至龙阳县鼎口，遭到义军截击，官军船队亦被包围。义军奋勇杀敌，程昌寓只身逃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南），又改由陆路到鼎州。他要报“鼎口之辱”，对俘虏的义军兵士施以酷刑，直至斩杀。到达鼎州后，程昌寓募得 1000 余名弓弩手，以充实步军。又募匠人打造车船，加强水军。欲水陆并

进，夹击义军。他密谋募人潜入水寨，刺杀杨么，因无人应募而罢。

宋绍兴元年（1131）春，程昌寓合水陆两军，进攻大楚重要据点夏诚寨。夏诚寨扼守沚江，设防坚固。义军大开寨门，诱官军车船驶入沚江口。沚江狭窄，车船无法调转，义军发起攻击，大败官军，缴获全部车船。程昌寓再次狼狈而逃。

官军进剿连遭败仗，宋廷又于绍兴二年十月，令湖北安抚使刘洪道与程昌寓合兵招捕义军。十一月，又令湖广宣抚使李纲、荆南镇抚使解潜与刘洪道、程昌寓4路合兵，以李纲为主帅，总领各路官军，围剿义军。不久，李纲遭罢免，又改派湖南安抚使折彦质为主帅。然各路官军既不协调，又无心作战，进抵鼎州附近，即为义军杀伤甚众，遂以粮草不济，纷纷撤兵。此次围剿义军再度受挫。

在击败官军多次进剿之后，大楚政权声势大振，义军“据湖山，扼当路，阻吴蜀之通流”⑨。绍兴三年（1133）四月，杨么自号“大圣天王”，且以此纪年，又拥立钟相少子钟仪为太子，使政权进一步得到巩固。

义军的壮大与发展，使宋廷惊恐不安。六月，赵构以神武前军统制兼淮南宣抚司都统制王玂为荆南、潭、鼎、澧、鄂制置使，率6万大军镇压大楚政权。十月，王玂率水军方抵鼎口，即被义军车船截住。刚一交战，官军水军便被击败，王玂亦中流矢，急令撤退。他与程昌寓于十一月，再度对义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他将水军主力交由统制官崔增、吴金统领，据守下游湘江口、洞庭湖口一带。自己则领步军自德山（今湖南常德南）直攻龙阳（今湖南汉寿）的义军大寨。企图自上游发起攻势，迫使义军向下游败退，再用下游水军拦击。此次官军进

攻异常猛烈，自月初至十三日，战斗激烈。义军被迫放弃龙阳的部分水寨。王𤫉为剿灭义军，奔波于上下游官军之间。下游官军得知义军丢失水寨，以为胜利在握。义军识破官军意图，遂自上游放下几艘车船到下游引诱官军。船上不竖旗枪，兵士则藏于船舱中。崔增、吴金领水军于下游停泊日久，终不见动静，便派小船逆流而上，前去打探。小船正行驶间，忽见有空船顺水漂泊而至，探报误以为义军已败，急报崔增、吴金，官军水军随即驾舟船迎车船而上。官军舟船将靠近时，义军车船突然擂鼓发炮，义军踏车回旋，于官军船队中横冲直撞。顷刻间，官军大小数百艘船只悉被击沉。留于沙滩上的官军亦被义军掩杀抄截，全部歼灭。一日之间，万余官军被消灭，器甲兵械全为义军所缴获，崔增、吴全被击毙。义军于下游全歼官军水军主力后，立即挥师上游。

王𤫉、程昌寓尚不知下游官军已全军覆灭，直至百余义军携缴获的百余枚官告、印章、器甲牌等物，前来嬉戏取笑，方知败局已定。是夜，月明如昼。义军发车船 8 艘，相衔而进。船上悉载精锐铁甲之士，各持雁翎长刀，直扑官军船队。官军舟船不敢应战，拼命逃离。义军随即又发大小车船无数，紧追不舍，又重创官军，迫使官军不敢再派水军进剿。王𤫉连败两仗，损失两员大将，无心再与义军交战。十一月底，王𤫉置程昌寓的再三劝阻于不顾，甚至未经朝廷允许，即率残兵败将退回鄂州。不久，宋廷乃以其“官由货授，政以贿成，军心坐离”⑩等罪名，将王𤫉连贬三官。

宋军屡战屡败，宋廷乃改以“恩威并济”之策，令官军“且招且捕”。绍兴四年（1134）二月，赵构命王𤫉与折彦质，共同措置招安。可义军“未有降意”⑪。

在宋廷武装镇压和招抚诱降均未奏效之时，由金廷扶植的刘豫伪齐政权亦欲拉拢义军，借以攻宋。十月，伪齐太尉李成奉金帝及刘豫之命，派间谍进入义军水寨，以金帛文书约义军与李成伪齐军水陆并进，进攻宋廷。且许愿“得州者做知州，得县者做知县”⑫，事成之后，许杨么“裂地而王”⑬。但义军拒绝了伪齐的协约。一个月后，李成又派出35人的使团，携官诰、金束带、锦战袍及羊羓（bā巴，干肉）等物，入义军大寨，相约联兵攻宋。义军将士于夜晚将来使用酒灌醉，全部杀戮，沉尸江中。伪齐自此不敢再有此议。

宋廷见招安不成，复行武力征讨。绍兴四年（1134）八月，赵构以岳飞为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将他自淮西抗金前线调往洞庭湖区，取代王𤫉。五年三月，张浚赴湖南部署、指挥官军进剿义军。张浚调集大军沿洞庭湖区布防，同时又采取诱降政策，以分化瓦解义军。官军到处张贴诱降黄榜，甚至释放被俘在押的义军兵士，发给文书，以此动摇义军军心。岳飞统军到达洞庭湖区后，即派人不断潜入义军恐吓、利诱，“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⑭。不久，义军重要首领之一黄佐叛降，岳飞令他返回湖中伺机行事。四月，黄佐偷袭义军首领周伦大寨，义军损失惨重。继而义军另一首领杨钦亦叛降，向岳飞密报义军于湖区的据点，及设防部署。且向岳飞献计，派人打开义军所修堰闸，泄湖水入大江，使义军大车船不得行驶；又建议将水草捆绑投入港汊之中，以缠绕车船水轮，使之转动不得。

五月，岳飞所部进驻鼎州城外。他令叛降者加紧招降活动，又派兵佯攻，引义军出寨迎战。适逢大楚军马太尉杨钦率3000余兵士，400余艘战船投降，严重削弱了大楚政权的军事

实力。杨钦又串通全琮、刘诜等一批首领叛降，且献计诱使杨么统兵误入官军设伏之地，而使义军数次蒙受重大损失。鉴于杨钦所统寨堡中，尚有不降者，岳飞将杨钦放还，使其前往劝降，以为内应。杨钦返回义军后，对凡抗拒不降者悉尽杀戮。官军的进攻与招降，义军内部的叛降，使大楚政权处境日趋艰难，局势极为严峻，而以杨么为首的义军首领，仍欠警觉，未及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黄佐、杨钦等人叛降后，竟能屡次出入义军水寨，进行诱降，甚至带出人马和船只，而给官军造成可乘之隙。

张浚和岳飞在作完周密的军事进剿部署之后，又自义军叛降首领口中探知各水寨的设防虚实，遂于绍兴五年（1135）六月，向义军据守的各个水寨发起全面攻击，此时率领义军坚决抗击官军的尚有楚王杨么与夏诚。岳飞令兵士以木枝、杂草拥塞河道，迫使义军车船行驶不得。在官军猛烈攻击下，义军水寨相继失守，战船被夺，众多兵士被杀。杨么所部陷入官军包围之中，杨么仍率军奋力抵抗。正激烈交战时，部将陈琩突然临阵叛逃，且劫走太子钟仪所乘大船。杨么立即保护钟仪拼死突围，但随即被岳飞水军团团包围。杨么见突围不成，便先将钟仪推入湖中，自己亦跳入水中，不幸被官军俘获。杨么于被害前，仍连声高喊“老爷（义军对钟相的称呼）”，以示不屈。在克陷大部义军水寨之后，岳飞指挥官军围攻最后的一处义军据点——夏诚据守的大寨。经过极其紧张、激烈的厮杀，官军攻入寨中，夏诚被杀。

张浚、岳飞镇压了洞庭湖区的大楚政权后，即将起义军的五六万强壮农民收编为官军，而将10余万老弱者解散归农。

注 释

①《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② 岳珂《金佗续编》卷二五。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④ 李纲《梁溪全集》卷七三。

⑤ 熊克《中兴小纪》卷八。

⑥《杨么事迹》卷下。

⑦《金佗续编》卷二七。

⑧《杨么事迹》卷上。

⑨《金佗续编》卷二五。

⑩ 胡寅《斐然集》卷一二。

⑪《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

⑫《杨么事迹》卷下。

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一。

⑭《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六。

两宋

宋金江淮之战

苗、刘兵变被镇压，宋帝赵构复位后，以吕颐浩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张浚为知枢密院事，刘光世为太尉、御营副使，韩世忠为武胜军节度使、御前左军都统制，张俊为镇西军节度使、御前右军都统制。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四月，赵构又自杭州（今属浙江）返回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并更名为建康。此时，江淮局势刚刚得以稳定，为求苟安享乐，五月，赵构派朝散郎洪皓为大金通问使，赴金朝表示“愿去尊号”，“比于藩臣”①，再次献媚求和。六月，赵构又放弃开封，召东京留守、开封府尹杜充领兵赴建康，先任户部尚书兼侍读，随即又改授兼宣抚处置副使，节制淮南、京东西路。为了掩人耳目，赵构诏谕天下，表示“朕与辅臣宿将备御寇敌，应接中原”②，然而中原地区的防备已是极大地削弱了。

七月，正值秋高马肥之时，金帝完颜晟又令金军分四路侵宋，以六部路都统、元帅左监军挞懒领兵进攻山东、淮北地区；完颜宗弼（兀术）进兵归德（今河南商丘南），再南下渡江，取建康，追击宋帝；管勾太原府路兵马事拔离速与大将马

五统兵入河南，再南进过江；完颜娄室继续率军进攻陕西。挞懒一路进犯山东后，连下潍州（治今山东潍坊）、莱州（治今山东掖县）。金军又一次威胁到赵构在江南暂时获得的安定，他感到建康临江，极不安全，遂改杭州为临安府，以为退路。同时，又派崔纵出使金军求和。八月，赵构再派杜时亮、宋汝为前往金军，并于所携求和书中乞求金军统帅、左副元帅完颜翰（粘罕）不要进兵。但宋朝请和使臣未及与金军谈判，南下金军已进入淮北。

面临金军南侵的威胁，赵构连忙调兵遣将，沿长江布防：以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充兼江、淮宣抚使，守卫建康；御营使司都统制韩世忠为浙西制置使，戍守镇江（今属江苏）；御营副使刘光世为江东宣抚使，镇守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池州（治今安徽贵池）。韩世忠、刘光世同受杜充节制，而且赵构下诏，只允许戍江将领在用兵上可随宜行事，其他均受节制。知枢密院事张浚则赴襄阳（今湖北襄樊）招募官军、义兵，分别屯驻于襄阳、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邓州（治今湖南邓县），且交程子秋、李允文指挥。尽管宋军江防已部署停当，赵构依旧放心不下，闰八月，他在先行安排隆祐皇太后孟氏离建康南下洪州（治今江西南昌）后，自己也在二十六日，撤离建康，经镇江，于九月初六日，到达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此时，完颜宗弼部已连克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兴仁府、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迅速向南推进。临时住在平江府的赵构又急忙调整和加强这里的防务，同时又派张邵等人为金国军前通问使，再赴金营求和，可金军毫不理会，依然大举进兵，再克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赵构自感平江府临近长江，仍不安全，便再次撤往

临安府。十月初八日，赵构到达临安，十五日，又渡过钱塘江东逃，十七日，到达越州（治今浙江绍兴）。

金拔离速部得知孟太后在洪州，遂径直南下，先克寿春府（今安徽寿县），再陷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北）。二十六日，金军乘木筏和小舟渡江，宋将刘光世率兵逃去，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知州韩梠也弃城而逃。拔离速过江后，指挥金军自大冶县（今属湖北）直扑洪州。十一月初一日，完颜宗弼率兵进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李会献城投降。再进兵和州（治今安徽和县），知州李俦出城降金。又兵进无为军（今安徽无为），守将李知几弃城而逃，金军随即渡江。孟太后得知金兵直进洪州，立即退往虔州（治今江西赣州），而江西制置使王子献竟轻易丢弃洪州，仓皇撤退。拔离速率军攻占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又陷洪州，而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袁州（治今江西宜春）二州知州也先后降金。

完颜宗弼所部于十一月中旬渡过长江后，下旬即入建康城。赵构闻讯，很快便由越州逃往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完颜宗弼率金军经溧水直逼临安府。赵构胆战心惊，又认为明州不安全，决定“航海避兵”③。十二月十一日，完颜宗弼进攻临安，知府康允之弃城出逃，钱塘县令朱跸遭杀害，临安陷落。赵构闻讯立刻率大臣登楼船驶离明州。十五日，驶抵定海县（今浙江镇海）。赵构一行在登船出海躲避之时，仍不忘留下参知政事范宗尹与司勋员外郎赵鼎，在明州专程迎候金朝使臣，以便面商求和退兵之事。十九日，赵构一行驶抵昌国县（今浙江定海）。完颜宗弼占据临安后，派大将阿里、蒲卢浑领兵4000追击宋帝。二十四日，兵进越州，安抚使李邺献城投降，殿前都指挥使、两浙宣抚副使郭仲荀竟丢弃所统军队，只

顾自己逃往温州（今属浙江）。二十六日，赵构的船队南下到达温州、台州（治今浙江临海）沿海，并漂泊于海上，不敢贸然靠岸。

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金军进攻明州，右军都统制兼浙东制置使张俊与知明州刘洪道先是击退了金军的进攻，但当金军于初七再度进攻时，张俊却领兵撤退，随后浙东副总管张思政及刘洪道也临阵逃脱。10天后，明州陷落。是夜，金军乘胜攻破定海，又乘海船经昌国县追袭宋帝的船队，途中遇狂风暴雨，宋枢密院提领海船张公裕指挥大海船迎击金军船队，交战中，宋船将金军船只冲散，阻止了金军的追赶。金军只得乘船返回明州，阿里派人赴临安府向完颜宗弼报告，称“搜山检海已毕”④，遂放弃追击宋帝。赵构知金军已被击退，方敢令海船停泊于温州港口。

二月初三日，金军自明州撤回临安府。十三日，完颜宗弼率金军自临安北撤，宋帝赵构命刘光世率兵追击。但金军沿途抢掠，宋军却不敢与之交战。十八日，金军攻陷秀州（治今浙江嘉兴）。二十三日，当金军游骑出现在平江府附近时，宋同知枢密院事兼两浙宣抚使周望竟放弃守城，逃入太湖，知府汤东野也随其后逃走。二十六日，金军进入平江府，纵兵焚掠。三月初十日，金军北撤到达常州（今属江苏），知州周杞亦弃城而去。当初完颜宗弼统金军南侵时，韩世忠率兵自镇江退守江阴（今属江苏）、华亭、秀州一带。得知金军北撤，韩世忠即领所部8000余人，募得海船百余艘，重返镇江戍守，以阻断金军退路。待金军到达镇江时，韩世忠已屯守焦山寺，封锁住通道。完颜宗弼见金兵不得进，遂派使入韩世忠军中，约定双方交战日期。

三月十五日，宋、金两军各派精锐水师，于长江之上展开激战。韩世忠亲自统兵，于江上“乘风使篷，往来如飞”⑤，如战马驰骋。力战数十回合，不分胜负。韩世忠妻梁红玉亦披挂上阵，亲自擂鼓以助宋军之威。宋军兵士奋力杀敌，金军难以招架，只得败退而未能渡江北去。完颜宗弼知难以突破宋军防线，便向韩世忠请求，以江南所掠财富及人口为条件，求他让路放金军渡江，韩世忠断然拒绝。完颜宗弼又提出以进献良马借道，同样遭到拒绝。在潍州（治今山东潍坊）的金将挞览得知金军受阻于江南，即派李董太一率兵火速赶往淮东以作援应。完颜宗弼见镇江渡江不成，又指挥船队溯江西上。韩世忠随即也令宋军船队沿长江北岸与金军并行，且战且行，从而将金军船队围进黄天荡。黄天荡距建康东北 70 里，系一处死水港。韩世忠令宋军以船只堵住出口，金军多次突围均遭失败，受困于黄天荡达 20 余天。后有奸细奏报沿老鹳河故道可抵秦淮河，完颜宗弼随即下令，于一日深夜金军倾巢出动，开挖老鹳河故道 30 余里。金军方于四月十三日逃出黄天荡，进抵建康府。第二天清晨，宋军发现金军逃遁，旋即起锚追赶，于建康以北的江面上，再次堵住金军退路。

此时江北有太一所领金军援兵，江南则为完颜宗弼所统南侵金军主力，韩世忠的船队则横亘于中间江面上。韩世忠将铁链穿以大钩，交付骁健军卒，以钩曳敌船。次日凌晨，金军船队鼓噪而进，企图突破宋军防线，渡江北撤。韩世忠令宋军船队分左右，自金军船队后面发起进攻，宋军用索钩勾住一艘艘金船，随即将其曳沉。金军船沉人亡，始终不得北渡，只得再返回南岸。完颜宗弼走投无路，再次乞求韩世忠放行。韩世忠义正严辞，提出：“还我两宫（指为金军北掳的宋太皇帝赵佶

与宋帝赵桓），复我疆土，则可以相全。”⑥完颜宗弼对此无言以对。几天后，完颜宗弼又请求与韩世忠会面，因其出言不逊，韩世忠引弓欲射之，完颜宗弼见状，慌忙令兵士驾回船仓皇逃去。

金军北渡屡遭挫败，完颜宗弼便募求破宋军海舟之策。有闽人王某，进献舟中载士之法，教金军兵士于舟船上铺以平板，又于两侧船板凿洞，插入船桨。此法既使船行平稳，又加快船行速度。王某建议此舟有风勿驶，无风则出，缘因宋军海舟无风则停驶之故。四月二十五日，适逢江上无风，完颜宗弼令小舟出击。金军小舟靠近宋军海舟，遂射火箭以焚烧宋船，矢下如雨，而宋船却动弹不得，遂大乱，只得顺水而退。金军驾驶小舟紧追不舍，攻击不止，直追击数十里外。长芦（今河北沧州）崇福院僧人普伦等与百姓千余人驻于杨家洲上，得知韩世忠兵败，船队又为金军小舟所追击，便驾无数小船，头裹红巾，船插赤旗，迎头抵挡金兵。金军小舟不敌，随即退回建康。此役，完颜宗弼统兵号称 10 万，而韩世忠仅有 8000 兵士，却将金军堵截于长江南岸近 50 天。宋军败退，长江防线旋即瓦解，五月十一日，完颜宗弼所领金军在纵火焚毁建康城后，携所俘宋户部尚书李棁、知府陈邦光渡江北归。淮南宣抚司统制岳飞于静安镇袭击北撤的金军，继而收复建康府。

拔离速、马五所统一路金军，继攻占洪州后，又连克吉州（治今江西吉安）、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等重镇，进击至万安军（今广东万宁），终未能追赶上南逃的隆祐皇太后孟氏。随即转攻潭州（治今湖南长沙），于建炎四年二月末，渡江北撤。四月二十五日，自荆门军北归的金军行至宝丰（今属河南）境，于宋村遭留守司同统制牛皋所领民兵的攻击。金军大败，

狼狈而逃，大将马五则被民兵生擒。

挞揽一路金军南下久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不下，知州赵立率领城中军民殊死抵抗，坚守长达 10 月之久，后因城中粮尽，赵立不幸中炮阵亡，军民部分夺门突围，城中则展开激烈巷战。金军虽最终得以占据城池，然伤亡甚众，且被拖于此城，南进不得。之后，挞攋统军南侵，又于鼍湖（今江苏淮安境）、樊梁湖（今江苏高邮境）一带，遭到梁山泊渔民张荣所领义军的截击。挞攋令金军进攻张荣设于缩头湖（今江苏兴化东）的义军水寨，时值水退，金军舰船不得靠岸，义军则乘机奋力杀敌，杀死及俘虏金军数千人，仅有 2000 余残兵逃奔回楚州，缩头湖因此而更名得胜湖。挞攋见南下屡遭挫败，遂下令金军经宿迁、东平北撤。

金军的大举南侵，既未能擒获宋帝赵构，消灭南宋政权，且又遭到南宋军民的抵抗，故无力建立对江淮地区的统治。南宋政权更无意北进，只贪一时安宁，故金军北撤后，江淮地区的局势重新恢复平静。

注 释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

②③《宋史》卷二五《高宗纪二》。

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

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

⑥《宋史》卷三六四《韩世忠传》。

两宋

川陕御金

南宋建立，金帝完颜晟决定再度发兵南下征宋。宋建炎元年（金天会五年，1127）十二月，金军从东、中两路进攻山东、河南，另以金军统帅完颜宗翰所派完颜娄室统领西路军进攻陕西。

完颜娄室兵入陕西，即败宋将范致虚所部，随后相继攻克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俘虏宋河东经制副使傅亮，河东经略使唐重、副总管杨宗闵、提举军马陈迪、转运副使桑景询等众多官吏死于战火之中，川陕军民为之大震。宋军多闻风弃城而逃，致使丹州（治今陕西宜川）、延安府（今陕西延安）、绥德军（今陕西绥德）等16处重要城寨为金军占据。宋陕西安抚使、知府州折可求于金军入攻之时，竟以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丰（治今陕西府谷西北）三州及9处堡寨，降于完颜娄室。唯有晋宁军在守将徐徽言的率领下，奋起反抗，使金军久攻不下。然而晋宁军城中无井，军民每日需取河水饮用，完颜娄室遂令兵士于河东开挖水渠，引

河水东泄，城中乏水，处境极其艰难。数日后，李位、石乙等宋将开城郭门投降，金将随即统兵入城。徐徽言率领城中军民退守子城，激战3日，终因寡不敌众，徐徽言为金军所俘，与统制孙昂一同被害。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完颜娄室再度进兵陕西。十一月，宋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奉命出行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部署陕西地区防务。十二月，完颜娄室领兵围攻陕州（治今陕西陕县），知州兼安抚使李彦仙请求张浚派兵援应，又提出自陕州撤军，以避实击虚。张浚不许放弃陕州，而命其死守。金军分作10队，以鹅车、天桥、火车、冲车等军械，轮番攻城。城中军民在李彦仙率领下，顽强抗敌，击退金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使金军伤亡甚众。城中受金军围攻，储粮告罄，将士分粮而食，李彦仙亦只饮豆汁。四年正月，经历大小200余战后，陕州城终遭陷落，李彦仙身负重伤殉难。城中百姓仍旧以巷战抗击金军，妇人则登上屋顶，以瓦块砸击金兵。四月，金军又攻克鄜（治今陕西富县）、坊（治今陕西黄陵东南）及三原（今属陕西）、乾（治今陕西乾县）、邠（治今陕西彬县）等州县重镇，且驻军于长安（今陕西西安）。此时，南侵各路金军已陆续北撤，陕西地区则因受战火摧残，生产凋敝，百姓存者无几，且已被金军占据的州县重镇又纷纷叛金。张浚也在积极组织力量反击金军的进攻，陕西局势极不安定，完颜娄室见此情景，只得退兵河东。

完颜宗弼撤回江北后，屯驻于六合（今属江苏）。江淮地区的局势依然严峻。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夏，宋廷恐金军秋后再度南侵，即令张浚于陕西向金军展开攻势，以分散和牵制金军主力。张浚领命后，进行精心部置，下令诸路

宋军分道进兵关中。宣抚处置司都统制、鄜延经略使、知延安府曲端认为此时用兵仓促，主张应充分备战而后与金军交战。张浚不允，即将他罢官。

完颜宗弼（兀术）得知张浚于陕西起兵，原为金军占据的州县相继叛金归宋，且完颜娄室所统兵力不足抵挡宋军的进攻，已向金廷求援，故于是年七月，奉金帝完颜晟之命，率2万精兵自六合直趋陕西救援，又以右副元帅完颜宗辅（讹里朵）总领陕西军事。张浚令于陕西部署基本完毕后，即指挥宋军夺回被金军所占失地。八月，张浚令统制吴玠领兵一举收复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遂以他为权永兴军经略使。随后又用兵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收复所辖诸州县重镇。九月，张浚调集骑兵六七万，步兵十二三万，号称40万大军，浩浩荡荡向东挺进。张浚亲临邠州督战，指挥大军进兵富平（今属陕西）。宋军大规模的用兵，令金廷紧张万分，完颜宗辅与完颜宗弼、完颜娄室合兵西进，亦至富平。张浚令都统制刘锡统五路兵马与金军大战，宋、金交战后，泾原路军将刘錡亲自率领将士杀入金军阵中，斩杀俘获金兵甚众。完颜宗弼等人陷入宋军重围之中，金将韩常亦被宋军流矢射中眼睛。金军经过拼死厮杀，方突破宋军包围，完颜宗弼得以幸免于难。

正当宋、金两军激烈交战之时，宋环庆路军将赵哲竟擅离所部，适逢完颜娄室领兵来攻，赵哲所部无主帅，将校见前方尘土飞扬，惊慌失措，赵哲临阵弃军自逃，所部也随后奔逃。宋军御敌部置全被打乱，金军趁势猛攻，宋军全线溃败。张浚领兵屯守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宋军的溃败，使金军得以长驱直入，陕西地区再度失陷，诸多州县官吏投降金军，宋军士气大受挫折。张浚于阵前召来赵哲，当众处斩，以平定士气，

又令诸将领各领所部回归本路防守。同时派刘子羽赴秦州招集溃散的宋军，一时间前来会合的宋兵已达10余万人。宋军兵势稍得恢复。金军攻势愈发猛烈，张浚随即命吴玠聚兵扼守凤翔府境内大散关、和尚原（位今陕西宝鸡南），以堵截金军的来路，又令关师古等将领统领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宋军，驻守岷州（治今甘肃岷县）大潭；以孙渥、贾世方等将领统领泾原路（治今甘肃平凉）、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宋军屯守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治今甘肃成县）、凤（治今陕西凤县）3州，以加强入川之道的防卫。张浚则率兵退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复命陕西节制使、知京兆府王庶为知兴元府、利夔两路制置使，节制陕西诸军。王庶随即招集到2万余溃散的宋军及抗金民兵。张浚入川后，募集新兵，操演训练，精心治军，苦心经营，尤注意用人之长。他以刘子羽"慷慨有才略"奉为"上宾"，以赵开善理财而使为都转运使，以吴玠每战皆胜使为大将，从而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故"西北遗民，归附日众"①。而吴玠亦于大散关东的和尚原建立起山寨，在此训练兵士、屯蓄粮草，作为死守之计。

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五月，金将没立自凤翔出兵，别将乌鲁折合自阶州、成州出散关，约定合兵于和尚原。乌鲁折合先期到达，布阵于北山，且向宋军挑战。吴玠令诸将领坚守阵地，以逸代劳，轮番作战。山谷路狭多石，马不能行，金兵舍马步战，吴玠指挥宋军据险反击，金军大败而逃。没立所部攻打箭筈关，也遭吴玠派兵击退。十月，完颜宗弼会集各路金军10余万人，亲自统领，架浮桥跨过渭水；直扑和尚原。他令金兵自宝鸡向南建"连珠营"，垒石为城，相互衔接，便于援应，且夹山涧与宋军对阵。吴玠与其弟吴璘率

领宋军英勇反击，令诸将选劲弓强弩，轮番射杀金兵，号称“驻队矢”，连发不绝，箭如雨注，金兵死伤无计。金军阵势稍退，吴玠即派兵侧击，又派兵断其粮道。激战3日，杀俘金兵万余人。吴玠料敌必将撤兵，又出奇兵设伏于神坌。未几，金兵果然退兵途经于此。宋军突然攻击，金军顿时大乱。入夜，吴玠再纵兵袭击金营，金军大败，完颜宗弼亦身中2箭，竟剃去髯须，方未被宋兵识出，得以逃脱。他惊魂未定，即自河东返回燕山府（今北京西南），复以撒离喝为陕西经略使，屯驻于凤翔，与吴玠对阵。战后，张浚以吴玠为镇西军节度使，吴璘为泾原路马步军副总管。

二年，张浚又以吴玠兼宣抚处置使司都统制，节制兴、文（治今甘肃文县西）、龙（治今四川平武东南）3州。时金军窥视四川已久，只因吴璘驻兵于和尚原，扼守得逞要冲，金军难以得逞，遂欲出奇制胜。撒离喝用宋叛将李彦琪驻守秦州，以牵制吴玠；令游骑出熙河，以牵制关师古；自己则率兵避开和尚原，迂回自商州（治今陕西商县）直插上津。三年正月，撒离喝率军攻洵阳（今属陕西），击败王彦部宋军后，即沿汉水西进。占据金州（治今陕西安康）。二月，金军长驱直入，进逼洋（治今陕西洋县）、汉（治今陕西汉阴）等地。宋兴元府（今陕西汉中）知府刘子羽急令宋将田晟统兵扼守饶风关，且以驿书招吴玠入援。吴玠于河池接到求援驿书，立即率数千兵将日夜兼程，急驰300里赶到饶风关。他令人送黄柑给金军，称“大军远来，聊用止渴”。撒离喝为之大惊，用杖击地，说道：“尔来何速耶！”宋、金两军随即大战于饶风关。金兵身披重铠甲，登山仰攻，一人在先，二人拥后，前者伤亡，后者继续进攻。吴玠令兵士弓弩齐射，滚石砸砍，经过6天6夜的激

战，金军死者堆积如山，但仍进攻不止。吴玠又招募敢死兵，每人千银，得敢死兵 5000 人，准备夹击金军。正在此时，吴玠军中有一小校叛逃，引导金军绕到饶风关后，居高临下攻击据守关口的宋军。宋军不备，且腹背受敌，终于不敌而溃败。吴玠退往仙人关，王彦退守达州（治今四川达县），刘子羽退保三泉，筑潭毒山寨堡固守。未几，金军因伤亡严重，亦退兵北撤。四月，金军自兴元府北归，吴玠闻讯，立刻派兵于武休关掩杀其后军，金兵仓皇应战，坠涧身亡者多达千人，丢弃辎重狼狈逃回凤翔府。

饶风关战后，吴玠因和尚原距四川甚远，粮运不便，遂令吴璘放弃据守，另于仙人关右侧修筑堡垒，号“杀金平”，调和尚原守军驻扎于此，准备迎击金军的再次进攻。而金廷亦令完颜宗弼重返陕西，指挥并策划金军入川。十一月，金军占据和尚原。

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二月，完颜宗弼统领金将撒离喝所部和伪齐刘夔所部共 10 万人马南侵，自铁山凿崖开道，绕山岭东下，进抵仙人关下。吴玠派出 1 万宋军抵抗，吴璘率轻兵由七方关驰援，经与金军转战 7 昼夜，才得以和吴玠合兵。金军首攻吴玠所部，遭反击败退。随后金军又用云梯进攻堡垒，宋守将杨政指挥兵士用撞竿撞碎云梯，以长矛刺杀金兵。吴璘拔刀画地，对诸将士说：“死则死此，退者斩！”②宋军将士人人奋勇杀敌，击退金军进攻。完颜宗弼又将金军分为两部，自己领一部布阵于东，令大将韩常领一部布阵于西。吴璘则亲自率领一队精兵穿梭往来于东、西两部金军之间，寻找战机，左右攻击金兵。交战已久，吴璘所部兵将已疲惫不堪，迅速退守第二隘。初，吴璘见“杀金平”所处地势

开阔，且距仙人关远，不易固守。若前阵失利，须后阵阻击，故于“杀金平”之上又急修第二隘。吴璘方率兵退至第二隘，金军主力即接踵而至。金兵身着重甲，以铁钩相联系，鱼贯而上。吴璘令以“驻队矢”交替射杀金兵，顿时矢下如雨，金兵中箭而亡者层层迭积。然而金军又踏着死尸，强攻不止，金将撒离喝甚至勒马四望道：“吾得之矣。”

翌日，完颜宗弼令金军进攻第二隘西北楼，宋将姚仲领兵登楼与之酣战。激战之中，楼忽然倾斜，姚仲立刻以帛为绳，将楼挽正。金兵攻楼不下，又改以火攻，姚仲率守楼将士用酒坛砸灭烈火。形势极度危难之时，吴玠急遣统制田晟率兵挥舞长刀、大斧冲入金军阵中，左突右击，一时间，火炬照亮四周山岭，喊杀声震天动地。第二天，吴玠指挥宋军全面反击，令统制王喜、王武率领精锐兵士分作2队，各以紫、白旗为前导，冲入金营，金军阵营顿时大乱。宋军奋力厮杀，交战中又射中金将韩常的左目，金军不敌，连夜溃逃。吴玠又令统制官张彦于横山寨拦劫金军，王俊伏兵于河池扼守金军退路，再次大败金军。

金军败退后，吴玠又统兵出击，四月，先后收复秦、凤、陇（治今甘肃陇县）等地，金军自此不敢轻举妄动。

注 释

①《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②《宋史》卷三六六《吴玠传》。

两宋

岳飞抗金

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农家出身。少年家境贫寒，仍刻苦学习《左氏春秋》、孙子和吴起兵法，习练武艺。未及成年，即能挽300斤弓及8石力弩。

宋宣和四年（1122），真定宣抚刘韐招募勇士，岳飞应募，投军抗辽，曾仅率百骑一举歼灭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境内巨盗。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大举南侵，宋帝赵桓令康王赵构置天下兵马大元帅府。赵构至相州，岳飞前往投奔，且受命招降抗金义军，而补承信郎。后赴开封府（今河南开封）解围，于滑州（治今河南滑县东）与金军对峙。岳飞率百骑于黄河岸边与金军遭遇，独自闯入敌军阵中，大败金军，而迁秉义郎，后改随东京留守宗泽。宗泽极赏识其才干，亲自授予战阵之法。宋建炎元年（1127），北宋灭亡，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称帝。岳飞上书力请赵构还都开封，亲征金军收复失地，却被宋廷以越职为由，削夺军职。此后，岳飞又投河北招讨使张所麾下，任中军统领，受命从都统制王彦北

渡黄河收复新乡（今属河南）。后因与王彦有隙，复归宗泽，为留守司统制，屡立战功。宗泽逝世后，宋廷以杜充为东京留守，岳飞仍以统制隶其麾下。

宋建炎三年（1129），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举军南侵，杜充弃开封南逃建康（今江苏南京）。岳飞力谏不可，亦随之南下，充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未几，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率兵直插江南，杜充竟紧闭城门不行御敌之事。直至金军自马家渡渡江，兵抵建康城下时，杜充方令诸将出击，独岳飞顽强抗击，而他将皆溃败而逃。建康陷落，杜充逃奔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叛宋降金。所隶部将多溃散劫掠，唯岳飞军秋毫无犯。完颜宗弼兵进杭州，岳飞领兵攻击金军，接连获捷。又招集散兵游勇，整饬所部，转战于广德军（今安徽广德）等地。建炎四年，岳飞率军屯驻宜兴（今属江苏）。完颜宗弼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越州（治今浙江绍兴）、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等地"搜山检海"之后，率军北撤，再攻常州（今属江苏）。岳飞与金军四战皆胜，又尾袭金军于镇江（今属江苏）之东；又战于清水亭，再报捷，使金军横尸15里。此后，岳飞再数次击败金军，克复建康，遂受任通、泰镇抚使兼知泰州，屯兵驻扎于江北泰州（今属江苏）。不久，金军进攻楚州（治今江苏淮安），宋帝赵构令御营前军统制张俊领兵救援，张俊推辞，又改令岳飞出兵，另以殿前都指挥使刘光世领兵援应。岳飞率所部赴援至承州（治今江苏高邮），与金军三战三捷，俘虏金军将校70余人。然而刘光世等却畏敌不敢进兵，致使岳飞所部孤军奋战，与金军鏖战数日后，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兵江南，楚州失守。宋帝又令岳飞回师驻守通州（治今江苏南通）、泰州，且称能守则守，不可则掩护该

地百姓渡江。岳飞认为泰州无险可守，便放弃拒守，率领军民渡江。然而宋廷却以泰州失守，令岳飞停职待罪。

宋绍兴元年（1131），岳飞所部隶属于张俊部下，转战于洪州（治今江西南昌）、筠州（治今江西高安），击破盗匪李成军，收降张用。绍兴二年，以岳飞为权知潭州，兼权荆湖东路安抚都总管，且交于金字牌、黄旗，令招降盗匪曹成军。岳飞又转战于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西路，彻底击溃盗匪，曹成被迫投降。绍兴三年，奉命镇压吉州（治今江西吉安）、虔州（治今江西赣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宋帝赵构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制成旌旗赐之，授镇南军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

绍兴四年，岳飞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是时，伪齐军与金军联兵南侵，岳飞受命统兵北上，连破敌军，克复郢州（治今湖北钟祥）、随州（治今湖北随县）、襄阳府（今湖北襄樊）、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唐州（治今河南唐河）、信阳军（今河南信阳），遂授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是年冬，完颜宗弼与伪齐帝刘豫合兵围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宋帝亲笔书札令岳飞前往解围。岳飞领兵直趋庐州，于城下击溃伪齐、金联军，解救庐州围困。绍兴五年，岳飞晋升为镇宁、崇信军节度使，又授荆湖南、北两路、襄阳路制置使，神武后军都统制。受命赴洞庭湖诱降，镇压了钟相、杨么的起义军，又升任荆湖南、北两路、襄阳路招讨使。

绍兴六年，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都督诸路军马张浚至长江会诸大帅，独称岳飞与韩世忠可倚大事，令岳飞屯守襄阳府。岳飞移军京西路。又迁宣抚副

使，遂于襄阳置宣抚使司。随即再次出师北上，攻占伪齐镇汝军、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商州（治今河南商县）、伊阳（今河南嵩县）、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七月，伪齐刘豫派其子刘麟、侄刘猊打着金军的旗号，分路入侵淮西地区。宋军将领刘光世、张俊畏敌，欲放弃各自驻守的庐州和盱眙（今属江苏），宋廷再令岳飞率兵自襄阳东下，迎击伪齐军。岳飞不顾目疾严重，得诏书当日即发兵，一直进至蔡州（治今湖南汝南）。但是宋廷不许，而未攻下蔡州。

绍兴七年，岳飞赴临安府入见宋帝，拜太尉，授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岳飞多次与宋帝谈论克复北方失地，力主出兵北上进攻伪齐，收复河北、京畿、陕西失地。宋帝十分赞赏其主张，表示“中兴之事，一以委卿”①。岳飞领命正欲筹划举兵，枢密使秦桧却竭力与金廷求和，破坏抗金部署。岳飞又与张浚商议遣将之事，因遭猜忌而自除兵权，还乡为其母服丧。直至宋帝数次下诏，令岳飞还职，方入朝待罪。仍以出兵北上，收复失地劝谏宋帝，且建议屯兵于淮甸，以伺机进兵。宋帝不许，而令其驻兵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以即时援应两淮及两浙地区。八年，岳飞所部回驻鄂州（治今湖北武昌）。但因上言请无子嗣的赵构建储，因而再遭宋帝的猜忌。在复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的倡导下，宋廷又欲与金求和，以换回建炎元年（1127）被金军俘虏北去的太上皇帝赵佶的梓宫，岳飞的北伐计划及部置因此而遭废止。绍兴九年，金帝完颜亶归还宋廷河南、陕西之地。岳飞认为金人不可信，上表不赞同赵构与秦桧等人的投降乞和行径，提出“唾手燕云，复仇报国”的豪言壮语，甚至一度曾拒绝宋帝所赐开府仪同三司之官爵，指出：“今日之事，或危而不可安，

可忧而不可贺"②，仍主张整饬军队，训练兵士，积极备战。但这一切都被秦桧所阻止。

宋绍兴十年（金天眷三年，1140），金廷毁约，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统领大军，分四路攻宋。相继攻陷宋东京开封府、拱州（治今河南睢县）、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重镇，河南、陕西之地复为金军所据。宋帝急令岳飞出兵救援，岳飞接令，派遣张宪、姚政、王贵、牛皋、董先、杨再兴等部将，分别经略一方，又令梁兴北渡黄河，纠集河北各地的抗金忠义民兵，攻取河东、河北州县。另派兵东援淮西制置使刘锜，西援知永兴军兼节制陕西诸路军马郭浩。岳飞则亲统大军长驱中原。宋帝又授予他为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不久，岳飞所遣各路将领相继告捷。宋军大举北伐，主力屯聚于颍昌府（今河南许昌），诸将所部分路出击，岳飞亲自率领一支轻骑，驻扎于郾城（今属河南）。数万岳家军屡败金军，又先后自金军手中夺回淮阳府（今河南淮阳）、郑州（今属河南）、西京河南府等河南大片失地。

面对岳家军的大举北伐，完颜宗弼极度恐慌，忙召集部将商议对策。认为岳家军诸将尚可对付，唯有岳飞不可挡，遂议定孤注一掷，合兵与之决战。完颜宗弼侦知岳家军诸将分路进击，兵力分散，而岳飞仅带少量军队驻于郾城，决定亲统精锐骑兵15000人，直扑郾城，企图一举歼灭之。宋廷闻讯，大为担忧，宋帝下诏，要岳飞"审处自固"③。岳飞不以为然，依旧每日出城挑战，于金军营前骂阵。完颜宗弼大怒，遂与金龙虎大王、盖天大王及韩常等将领合兵，进兵郾城。七月初八日，金军于郾城北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云领轻骑直冲敌阵，并告诫："不胜，先斩汝！"岳云领命，即率军闯入金军

阵中，往来冲杀，鏖战数十回合，金军死尸遍野。完颜宗弼令其精锐重甲骑兵“铁浮图”作正向攻击，另以骑兵为左右翼，侧面进攻，号称“拐子马”。岳飞则遣背嵬亲军与游奕军马军迎战金军，又派步兵手持麻扎刀、大斧等兵器，冲入金骑兵军中，上砍敌兵，下砍马足。金军战马纷纷倒地，岳飞指挥余部掩杀坠马金兵，勇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欲生擒完颜宗弼，斩杀金兵数百人。完颜宗弼见“铁浮图”遭如此惨败，伤心已极，随即又命金军增援。岳飞部将王刚正领50名骑兵侦察敌军，忽遇金军援兵，即奋力拼杀，斩杀其将。岳飞亲临前线视察战地，望见远方黄尘蔽天，料金军前来救援，遂率领40骑突入金援军，击败之。完颜宗弼与岳飞两军自下午直激战至天黑，金军大败。

十日，完颜宗弼再度派兵进攻偃城。岳飞率军于城北五里店与之交战，于阵前斩杀金前锋主将李朵孛堇，追杀20余里。完颜宗弼见偃城再度失利，遂调集12万重兵，屯驻于临颍（今属河南），又一次进攻偃城。十三日，岳飞部将杨再兴率300骑兵巡逻至偃城北小商桥时，突然与金军遭遇。杨再兴与300骑兵当即冲入敌阵，杀死2000余金兵及万户撒八孛堇等100多名金将。终因力寡，被金军团团包围，杨再兴和所部将士全部殉难。岳家军将张宪闻讯，即率兵赴小商桥，次日晨，于临颍城南与金军交战，大败金兵，又径直追杀，将金军逐出临颍县界30余里。金军残部向尉氏（今属河南）溃逃。岳飞料金军攻偃城屡败，必将转攻颍昌府，随即令岳云速援颍昌守将王贵。十四日晨，完颜宗弼果然亲自统领金军主力3万骑，直抵颍昌城西门外。驻守颍昌的岳家军主力倾城出战，迎击金军，血战数十回合，直战至午后，胜负难分。岳家军部将董

先、胡清率精兵突入敌阵，打乱金军布阵，扭转战局。岳云率援兵赶至颍昌，王贵率游奕军、岳云率背嵬亲军与金军再战于城西。岳云指挥800骑兵与金军决战，又派步军自左右翼继后掩杀。双方激战，岳家军再次大破金军主力，斩杀完颜宗弼女婿、金将夏金吾、副统军粘罕索孛堇，完颜宗弼率残部逃离。

岳飞统兵北伐，数挫金军精锐主力，令金兵闻风丧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中原及河北民众亦盼望宋军克复失地，恢复宋朝江山。河北抗金义军首领赵俊、乔握坚等，趁金军南下，后方空虚之机，克陷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岳飞部将梁兴、董荣两军赴河北敌后，抗金义兵及百姓纷纷归附。完颜宗弼深感局势严峻，下令“老小渡河”，先以8000人渡河北撤，准备随后再全线撤兵。岳飞因此上奏朝廷，提出要诸路兵马“火速并进”，继续北上进击金军。并激励部下：“直抵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与诸君痛饮耳！”④然而以宋帝赵构、宰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当初令岳飞北进，并非想光复宋朝江山，只是指望击退金军南侵，保住半壁江山即可，也想以此作为与金廷议和的条件。因此得到岳飞的奏疏后，宋帝下诏，令他“措置班师”。为了阻止岳飞继续北进，秦桧甚至提出划淮河为界，以北地区全部放弃。他深知岳飞志坚且倔犟，竟先私自命令张俊自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宿州（治今安徽宿县）退兵至淮南。又令各路大军停止前进，撤回原驻地屯守。而后以岳飞所部孤军深入，请赵构令其撤兵。宋帝为使岳飞尽快退兵，竟一日连下12道金牌，且令东京副留守刘錡放弃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岳飞见朝廷如此举措，愤然泪下。尽管此时其所部一支已兵进朱仙镇，距开封（今属河南）仅四五十里，岳飞迫于宋帝的命令，只得奉诏班师。他愤慨万分，说道：“所得

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⑤

为了防止金军乘岳家军退兵时再度南侵，岳飞于临班师前，扬言将进兵开封。金军闻讯，不敢出战。中原百姓得知岳飞撤兵，众人拦住岳飞的马，失声恸哭。岳飞也悲泣落泪，只得以宋帝的诏书出示众人，一时间，哭声震野。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岳飞下令所部驻留 5 日。背井离乡的百姓纷纷南下，道路拥塞，人流如潮，岳飞又急奏朝廷，请求于汉水沿岸六郡安置中原南徙百姓。

七月十九日，岳飞下令，岳家军自偃城退兵。此时，陈州（治今河南淮阳）又遭金军围攻，岳飞立即分兵前去解围，之后所部诸将领兵退至鄂州。岳飞则取道顺昌，南渡淮河直往临安府。岳飞北伐征金，收复河南大片失地，且于偃城之战中，以少胜多，令金军闻风丧胆。加之梁兴等将领于河北敌后的抗金活动，岳家军北上克复旧疆故土，形势极为有利。然而宋廷投降派的破坏，致使北伐的胜利成果，顷刻间被断送。岳家军数十日浴血奋战夺回的失地，在岳飞撤兵后，复为金军占据。此后，岳飞虽多次主张北上进击金军，但都遭到赵构与秦桧等人的拒绝，而只令他防守，最终解除其兵权，制造冤狱，以求与金廷议和。

注　释

①②③④《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

⑤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

两宋

伪齐覆灭

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金廷分兵四路南下侵宋，完颜宗弼率军渡江追击赵构，迫使他乘楼船漂泊于海上，终得以逃脱。在南宋军民的英勇抗击下，金军北撤。为确保金廷于黄淮地区的统治势力，避免中原百姓与金朝的直接对抗，四年九月，金廷扶植南宋降臣刘豫建立伪齐政权。

刘豫，景州（治今河北东光）阜城人。少年时，曾偷窃同窗好友的白金盂、纱衣等物。宋神宗元符年间（1098——1100），登进士第。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拜殿中侍御史，即遭到朝廷官员的讥讽。不久，刘豫屡次上奏，评议礼制局，又遭徽宗训斥，贬为两浙察访使。宣和六年（1124）改判国子监，除河北提刑。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侵，刘豫弃官逃到仪真（今江苏仪征）躲避战乱。建炎二年（1128），刘豫通过巴结中书侍郎张悫，被荐举为知济南府。此时山东地区强盗肆行，刘豫不愿前往赴任，请求朝廷改任东南地区一州之长，遭拒绝后愤然北上。是年冬季，金军进攻济南府（今山东济南），刘豫派其子刘麟出城迎战，被金兵包围，州副官张柬带兵前来

援助，方得以解围。刘豫仍念不得改任他州之忿，遂阴谋策划叛宋。他杀死抗金将领关胜后，欲献城降金，但百姓反对投降，刘豫只好缒城投奔金军。三年三月，完颜宗弼得知赵构已渡江南逃，江淮地区宋军实力减弱，便徙刘豫为知东平府，充京东、京西、淮南等路安抚使，节制大名、开德府、濮、滨、博、棣、德、沧等州。又以刘麟充任知济南府。原黄河以南的宋地，均归他统治。

建炎四年（1130），刘豫派刘麟持名贵珍宝贿赂金左监军完颜昌（挞懒），请求册封自己为帝。完颜昌应允，派人赴刘豫所部征询民意，众人尚未及答复，即有刘豫同乡张浃先行请求册立刘豫。完颜昌随即奏请金廷，金帝完颜晟下诏："今立豫为子皇帝，既为邻国之君，又为大朝之子。"①九月，刘豫在金廷扶植下，正式即皇帝位，国号大齐（史称伪齐），建都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仍称北京。委任原宋安抚使张孝纯为丞相，李孝扬为左丞，张柬为右丞，李俦为监察御史，郑亿年为工部侍郎，王琼为汴京留守，其子刘麟为太中大夫、提领诸路兵马兼知济南府，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

刘豫为建傀儡政权，千方百计拉拢宋朝地方官员。他多次派人劝降宋东京副留守上官悟，又贿赂其僚佐共同劝说上官悟降金，上官悟不从，将来人及僚佐一并斩杀。又招降知楚州赵立，亦遭断然拒绝。相反，刘豫的倒行逆施更招致众叛亲离，诸多僚属纷纷离去，或逃入山谷间。然而宋廷主和派却十分害怕伪齐政权，于国书中称刘豫为大齐皇帝。伪齐官僚张孝纯、郑亿年、李邺等人家眷均在南宋，宋廷对他们倍加抚慰。金廷虽册立刘豫为帝，亦只视为傀儡，处处加以防范。宋绍兴元年（金天会九年，1131），金廷与伪齐以黄河故道为界，但又恐河

东、河北金朝占领地区百姓逃入伪齐，金廷遂下令检括户口，或将百姓转卖他国，或强行押送云中（今山西大同）地区，以此防备刘豫。此后，完颜宗弼（兀术）等出兵陕西，宋军退守四川，金廷又划陕西给伪齐。

五月，宋朝叛将李成遭江淮招讨使张俊进击，大败，遂率数万人马自淮西投奔伪齐势力，伪齐势力渐强。十月，刘豫派伪齐军入侵宋境，令其将王世冲率蕃、汉兵进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知州王亨设计斩杀王世冲，大败伪齐军。十一月，伪齐秦凤军帅郭振入寇宋境，遭宋均、金、房州安抚使王彦和关师古领兵反击，大败而还。宋河南镇抚使翟兴屯守伊阳山，刘豫深感其威胁之大，绍兴二年三月，刘豫派人招降翟兴，且许以王爵。翟兴焚烧伪诏，处死来使。刘豫见招降不成，又暗地收买翟兴部将杨伟以除心腹之患。杨伟杀害翟兴，投降伪齐。四月，刘豫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时金军占据黄河、淮河及陕西、山东地区，刘豫的伪齐政权凭借的军事力量只有由 10 余万乡兵组成的皇子府 13 军。不仅如此，中原地区自北宋末年以来，屡遭战火摧残，农田荒芜，经济凋敝。刘豫为解决财政收入，分别设置河南、汴京淘沙官，专事搜刮民间财富，两京地区的坟墓都盗掘一空。伪齐统治区域内，赋税征敛烦苛，民不聊生，纷纷奋起反抗。伊阳（今属河南）人翟进兄弟筑山寨对抗伪齐，在伪齐军与金军的联合围攻下，依然坚持斗争。

五月，宋襄阳镇抚使桑仲遇害，刘豫立刻派人前往襄阳（今湖北襄樊）招降桑仲部将，又派人赴随州（今属湖北）、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分别招降守将李道、李横，均遭拒绝，所遣使臣皆被杀戮。桑仲死后，宋廷遂委李横为襄阳镇抚使。

十二月，李横于扬石大败伪齐军，遂进兵汝州（治今河南临汝），守将彭玘出城投降。绍兴三年正月，李横军又攻破颍顺军，守将兰和投降。又败伪齐军于长葛（今属河南），随即率军进攻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伪齐安抚使赵弼据城固守。宋军发起猛攻，赵弼弃城而逃。二月，宋河南镇抚司统制官李吉也于伊阳台击败伪齐军将梁进所部，且斩杀梁进。南宋对伪齐的攻击，尤其是颍昌府的失守，令刘豫焦虑不安，只得求助于金廷。金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粘罕）令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统兵赴援。刘豫亦遣部将李成率2万伪齐军会合金军，于颍昌府西北牟驼冈与宋军大战。李横不敌，败退，颍昌府陷落。四月，金与伪齐联军再克虢州（治今河南灵宝），宋镇抚司统制官谢皋剖腹自杀，以示拒降。不久，金元帅府派使臣萧庆至汴京，与刘豫商议联兵征伐南宋。刘豫建议以轻兵直趋长江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渡江攻宋。正议而未决之时，宋阁门宣赞舍人、明州守将徐文率所部海舟60余艘、官军600余人自海上驶抵盐城（今属江苏），投降伪齐。徐文告之刘豫，南宋沿海无备，可自海上进兵，袭取昌国（今浙江定海），劫取宋廷屯积于此的粮船，再进抵明州（治今浙江宁波），登陆攻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刘豫将徐文所言上书金元帅府，完颜宗弼与完颜宗翰对用兵南宋意见相左，完颜宗弼因有前次受困于黄天荡之鉴，便以“江南卑湿，今士马困惫，粮储未丰足”②为由，不愿南下，故金廷仅遣元帅左监军完颜昌（挞懒）率兵南行，然而兵至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即北归。

刘豫见金廷无意自海上南侵，遂派其子刘麟、侄刘猊及宋叛将李成、孔彦舟等率伪齐军与金军联兵攻宋。十月，相继攻陷邓州、襄阳、随州、郢州（治今湖北钟祥）。伪齐将领王彦

也自亳州（治今安徽亳县）统兵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欲窥视江南。时宋江东淮西宣抚使刘光世驻军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扼守马家渡，又令部将郦琼率兵进驻无为军（今安徽无为）。王彦见势，不敢贸然南侵，只得北撤。十二月，金廷派使臣李永寿、王翊入宋，为伪齐要挟宋廷，要求宋廷送还所俘伪齐兵士及逃入宋境的西北地区民众，且提出以长江为界，划江北地区给刘豫。宋廷主战派官僚力主不从金议，赵构派使臣章谊赴云中（今山西大同），与金元帅府再议此事。完颜宗翰提出宋军不得驻军淮南，章谊拒不屈从，返回时，刘豫欲扣留之，章谊巧妙脱身，返回宋境。

宋绍兴四年（金天会十二年，1134）正月，宋熙河路马步军总管关师古于左要岭与伪齐军大战，战败后投降，刘豫遂占有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岷州（治今甘肃岷县）等地区。五月，宋舒、蕲等州制置使岳飞率兵北上征伐伪齐，大败李成所部，相继收复襄阳、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随州、邓州等地。刘豫向金廷乞求增援。同时令伪齐军掠夺民船500艘，装载战具，以徐文为前军，扬言进攻定海（今属浙江）。九月，刘豫派刘麟入寇宋境，又诱说金统帅完颜宗辅、完颜宗弼、完颜昌分兵南侵，步军自楚（治今江苏淮安）等地出兵，骑兵自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直插滁州（今属安徽）。而后又派遣伪齐知枢密院卢纬赴金廷请求出兵。金帝完颜晟召集诸将廷议，完颜宗翰与完颜希尹认为不可，唯完颜宗辅力主出兵，金帝从其议，委任完颜宗辅权左副元帅，完颜昌权右副元帅，调集渤海军、汉军5万余人马援应伪齐。又以完颜宗弼熟知江南地形，遂命其统领前军。刘豫闻金廷派兵援应，即以刘麟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率兵与金军分道南渡淮河。守知楚州樊序弃城而

逃，淮东宣抚使韩世忠亦自承州退守镇江（今属江苏）。

面对伪齐与金军的联兵进攻，赵构在主战派臣僚劝说之下，决意迎敌。十月，赵构令江淮招讨使张俊率军援助韩世忠，淮西宣抚使刘光世移军建康。韩世忠随即率兵渡江进驻扬州（今属江苏），不久便于大仪（今江苏仪征北）大败敌军。十一月，赵构下诏讨伐伪齐。宋军士气大振，准备渡江决战。淮西军将王师晟、张琦合兵攻陷南寿春府，俘虏伪齐知州王靖。十二月，岳飞派牛皋、徐庆于庐州击败金军。在宋军的反击下，金军退兵，刘麟亦慌忙丢弃辎重，连夜北逃。

宋绍兴六年（金天会十四年，1136）正月，刘豫于淮阳（今江苏邳县东）集结伪齐军，准备反攻，韩世忠得知后，迅速出军包围。完颜宗弼与刘猊合兵火速救援，均为韩世忠军击败。刘豫见宋军大举反攻，且闻宋帝将亲征伪齐，忙告急于即位不久的金帝完颜亶。金领三省事完颜宗磐认为刘豫无能，不当派兵援应，完颜亶因此告之刘豫，许之自行处置，且派完颜宗弼领金军驻扎于黎阳（今河南浚县东），以观察事态变化，实不欲与伪齐联兵南侵。刘豫无奈，又以刘麟复领东南道行台尚书令，李邺为行台右丞，冯长宁为行台户部，许清臣为兵马大总管，李成、孔彦舟、关师古为大将，征调30万民兵，分三路南侵：刘麟总领中路兵，自寿春（今安徽寿县）进攻庐州；刘猊率东路兵，取紫荆山出涡口，进攻定远；孔彦舟统西路兵，进兵光州（治今河南潢川）攻六安（今属安徽）。十月，韩世忠所部受刘猊阻击，退回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麟统伪齐中路军自淮西（今河南汝南）架三座浮桥南渡淮河，10万伪齐军屯驻于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与寿州之间。江东、淮西安抚使张俊前往迎击。宋帝又诏令神武中军统制兼权殿前

司杨沂中赴泗州与张俊合兵。正当宋军北上御敌，行至濠州，刘光世却放弃庐州（今安徽合肥）南退。张浚闻讯，派人连夜急驰至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拦住刘光世，且告之："敢渡江南下者斩！"刘光世只好统兵返回庐州，与杨沂中相呼应。宋统制王德、郦琼自安丰（今安徽寿县）出兵。与伪齐军遭遇，宋军一举击败敌人。刘猊率数万兵过定远，欲进兵宣化，再进兵建康。杨沂中所部于越家坊与之遭遇，伪齐军战败后移军，又于藕塘再遇杨沂中部，又大败。刘猊遂撤军北退，刘麟亦拔寨而逃。伪齐攻宋以失败告终。

金廷得知刘豫南侵失利，始有废黜之意，刘豫亦有所觉察，便请求立刘麟为太子，以试探金廷意向。金廷答以派人咨访河南百姓，而后决定。伪齐攻宋失败，刘豫极为沮丧，中原百姓则日夜盼望宋军北上。三月，宋统制郦琼率3万兵马投降伪齐，令刘豫喜出望外，亲自于文德殿召见他，且授之以静难军节度使，知拱州。郦琼劝说刘豫出兵攻宋，刘豫又以此乞请金军援应，而且声称郦琼将亲自效力。金廷害怕刘豫兵众难制，正欲设计除掉他，便谎称郦琼投降恐怕有诈，命令遣散其兵。

不久，金帝先令完颜昌、完颜宗弼假称南侵，兵至汴京，将刘麟骗出城，派骑兵自两翼夹击，将他生擒，随即金军急驰入城。完颜宗弼仅领3骑突然闯入东华门，下马拉住刘豫手，一起行至宣德门，强令他骑在一匹瘦弱的马背上，两旁金军骑士以刀刃将他夹在中间，驶离宫城。次日，完颜昌、完颜宗弼召集伪齐百官，宣读金帝诏书，废黜刘豫。又以铁骑数千包围宫门，派小校巡逻于街巷之中，以稳定局势。又于汴京置行台尚书省，以张孝纯权行台左丞相。李成、孔彦舟、郦琼、关师

古等各领一州。另以女真人胡沙虎为汴京留守，李俦为副留守。原伪齐诸军悉令解甲归田。宫人任其出嫁。被囚禁于汴京金明池的刘豫苦苦哀求，完颜昌则以当年宋帝赵桓赴金营时，汴京百姓哭泣挽留时的情景相比较，告之刘豫："今汝废，无一人怜汝者，何不自责也。"③刘豫无言以对，遂请求迁居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原韩琦宅第，得以应允。十一月，金废刘豫为蜀王，伪齐政权被废止。其后刘豫与其子刘麟又被迫迁居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改封曹王。

注　释

①②③《金史》卷七七《刘豫传》。

两宋

顺昌川陕保卫战

宋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把持金廷朝政的尚书令完颜宗磐、东京留守完颜宗隽、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等人，力主与宋和议，将陕西、河南之地交还南宋，以诱使宋对金称臣。次年，金帝完颜亶在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国论左勃极烈完颜宗幹（斡本）、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希尹的支持下，先后除掉完颜宗磐、完颜宗隽、完颜昌等人，完颜宗弼升任都元帅，掌握军政大权，遂废止与宋和议，再度出兵南下，欲夺回割让之地。

绍兴十年（1140），宋帝委以梁州团练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主管侍卫马军司刘錡为东京副留守，节制军马。然而其所部仅有原王彦"八字军"37000人，刘錡率此部及随军家眷沿水路北上，准备军驻汴京（今河南开封），把家眷安置在顺昌府（今安徽阜阳）。刘錡率军日夜兼程，五月，得悉金军重据汴京。当兵进至顺昌府时，金军又举兵来侵。刘錡决定据守顺昌城。为了表示固守御敌的决心，刘錡下令将所乘舟船凿沉，以示退路断绝。又将自己的家眷安置寺庙中，于寺门堆积

大量柴草，万一失守时，则引火自焚，以示必死决心。刘錡所部士气高涨，男子备战守，妇人磨刀剑，争相高呼：“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①顺昌城防薄弱，无险可据，刘錡令兵士将伪齐所造癡车搬上城墙，将轮辕埋入土中，又拆下民户门板，围在车的四周。且在城外靠近城墙之处，修筑一道羊马垣，于垣上挖洞为门。并将数千户百姓迁入城中，而后焚烧其庐舍。经过6天紧张的准备，城防粗具规模，金军游骑亦已渡过颍河来到顺昌城下。

赵构下诏抗金，且派三京招抚处置使刘光世，熙河兰廓路副总管、行营左护军都统制王德率军进援顺昌。五月，金军围攻顺昌。刘錡于城下设伏，生擒金千户阿黑等将。得知距城30里有金营，便于深夜派千余兵士袭击，杀俘甚众。不久，金三路都统王彀率3万兵，与金龙虎大王合兵，亦进至城下。刘錡与部将许清隐蔽于羊马垣后，金兵射箭，或射于垣上，或自垣上方飞过，未能伤宋兵一人，而刘錡则令兵士用破敌弓，两翼用神臂弓或强弩，自城上和垣门射杀金兵，箭无虚发，金军稍稍退后。刘錡即令步兵出击。金兵大乱，坠入河中溺死者不可胜计，金军数千铁骑溃败。金军继续增兵围困顺昌，且于距城20里的东村安营扎寨。刘錡派骁将阎充招募500壮士，夜袭金营。当天夜里，大雨将降，电闪雷鸣，宋兵于闪电中，见有发辫者即用刀斧砍之，又迫使金军后退15里。随即，刘錡又令100名兵士连夜再袭金营，每人口衔一哨，闪电时奋力厮杀，闪电熄灭则藏匿不动，金营顿时大乱。宋兵闻哨声则聚拢，神出鬼没，金兵无法辨认，竟自相残杀一夜，至天明时分，已是积尸盈野，只好退兵至老婆湾。

完颜宗弼于汴京得知金军围攻顺昌遭惨败，立刻穿靴上

马，与宋叛将孔彦舟、郦琼、赵荣等统领10余万金兵赶赴顺昌。途中仅于淮宁停留一宿，准备战具和粮草。不到7日，金军进抵顺昌城下。刘锜得知完颜宗弼亲统大军来攻城，遂召集诸将于城上商议对策。有将领认为如今应乘屡胜之势，准备舟船，领军南撤。刘锜认为不可，乃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刘锜向金军下战书，完颜宗弼不以为然，认为“顺昌城壁如此，可以靴尖踢倒，来日府衙会食”②。刘锜部将见他如此嚣张，又告之非但要与金军约战，且谓太子不敢渡河，特献浮桥5座，供金军渡河交战。天亮时，5座浮桥果然架设于颍河之上，金军即自桥上渡河。

刘锜派人于颍河上游及丛草之中投毒，且告诫兵士，即使渴死，亦不准饮用颍河水，有敢饮者，杀无赦。其时正值六月，天气炎热，金军长途跋涉，人疲马惫，夜不敢卸甲，而宋兵轮番休息进食于羊马垣下。金军人马饥渴，但一饮水食草即中毒。至清晨清爽凉快时，尽管金军叫骂，刘锜始终按兵不动。待至未（今13——15时）、申（今15——17时）时之间，金兵已精疲力尽之时，刘锜突然派数百人出西门与金军交战。随后又派数千兵士出南门，悄悄接近金军。此时完颜宗弼身着白袍，骑佩甲战马，率领3000牙兵于阵后督战。牙兵皆着重铠甲，戴铁兜鍪，号称“铁浮图”。宋兵冲入金军阵中，即用枪挑去金兵头上的兜鍪，用大斧砍断其臂，碎其头颅。金军号称“拐子马”的左右翼铁骑，是为“长胜军”，专用以攻坚，自南侵以来，所向披靡，无坚不克，是役亦为刘锜兵士砍断马足，斩杀兵卒。双方激战至申时，金军不敌。刘锜随即令兵士于城外设置拒马木作为阻挡金军骑兵的障碍，而令所部将士稍事休息。顺昌城上鼓声不绝，宋军将士从容进餐，与平常之时

无异，可金军却不敢进兵。待用餐完毕，刘锜再派人拆除拒马木，令兵士冲入敌阵厮杀。金军再次大败，弃尸死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堆积如山。完颜宗弼所依仗的主力军，竟十损八九。退至陈州（治今河南淮南）后，完颜宗弼历数诸将之罪，鞭打大将韩常以下诸将领，以泄心头之恨。

顺昌保卫战，刘锜投入的兵力不足2万，而实际出战进击金军的兵士仅5000人。金军则投入数十万兵，仅营帐长达15里。刘锜以逸待劳，以少胜多，使“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③。宋廷主战派臣僚主张乘胜分兵北上追讨，生擒完颜宗弼，收复汴京。然而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却令宋军撤退，再次放弃有利的战机。

在完颜宗弼率兵南侵河南的同时，金陕西经略使撒离喝亦自同州（治今陕西大荔）西渡黄河，入侵陕西。数日间，即占据长安（今陕西西安），直扑凤翔府（今陕西凤翔），而将驻守川陕的宋军拦腰截断，大部宋军被阻于渭水之北，川陕地区人心震恐。其时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杨政驻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宋枢密院都统制、节制陕西军马郭浩驻鄜延（今陕西延安），只有吴璘随同四川制置使兼宣抚司事胡世将驻河池（今陕西凤县东）。胡世将急召诸将来河池商议御敌之策，唯有泾原守将田晟与杨政赴会。参谋官孙渥认为河池不可守，欲退守仙人原（今陕西宝鸡南），吴璘厉声反驳，请求胡世将派百人即可破敌。胡世将也指着自己居住的营帐，表示将战死于此，众将因此斗志激昂。胡世将遂令田晟领兵3000迎击金军。吴璘则派部将姚仲戍守凤翔石壁寨。五月，金军前锋进至石壁寨，姚仲领兵抗击，金军败退至武功（今陕西武功西）。

六月，吴璘、杨政致书撒离喝，约定交战日期。会战之

日，撒离喝派大将鹘眼郎君率骑兵 3000，直冲吴璘军。吴璘指挥部将李师颜领骁骑迎击，双方激战一团，金军终溃败。鹘眼郎君退入扶风（今陕西兴平西北），李师颜又率军追击，夺回扶风，俘虏金军 3 将及女真兵士百余人。撒离喝亲自统兵至百通坊（今陕西扶风西南），欲与宋军决战。金军列阵长达 20 里，气势汹汹。吴璘又派姚仲奋击金军，撒离喝亦败。渭北郭浩所部击退金军对耀州（治今陕西耀县）的包围，且派部将郑建充调集渭北各地宋军，合兵攻下醴州，与吴璘相呼应，夹攻金军。

撒离喝屡遭失利，再派部将胡盏、习不祝合兵 5 万进攻吴璘所部，交战于剡家湾。吴璘以“叠阵法”迎击金军：以长枪居前，兵士持枪坐地；之后为强弓、强弩，射手跪膝而发；最后为神臂弓，射手站立而射。敌军攻至百步内，神臂弓先射杀；进至 70 步，则强弓弩齐射。凡布阵侧重于阻击金军骑兵，于阵前布置相连的铁钩。先以两翼骑兵遮蔽于阵前，待战阵布置完毕骑兵撤去，即谓之“叠阵”。胡盏与习不祝精通兵法，率军据险固守，所扎营盘前临雄峰峻岭，后控腊家城，认为宋军不敢轻易进攻。吴璘领兵欲与之交战，召集诸部将商议攻击之策。姚仲认为战于山上则胜，战于山下则败。吴璘欣然采纳，便派人入金营请战，胡盏与习不祝见战书，讥笑吴璘不懂兵法。半夜，吴璘派姚仲、王彦二将领兵自山崖攀登上山，令兵士人人口中衔枚，约定待二将登上山岭后，发火为号。姚仲、王彦率兵士上得山岭，金军毫无觉察，宋军于山岭上集结已毕，遂点燃火炬。刹那间，万炬通明，金军顿时惊愕不已，乱作一团。习不祝、胡盏二人主张相左，金兵无所适从。吴璘随即派兵至金营前挑战，胡盏果然出兵迎战。吴璘指挥宋兵以

“叠阵法”迎击，自己着轻裘衣，亲临前线驻马督战。宋兵轮番射杀，轮流下阵休息，金兵于宋军阵前中箭倒仆者无计，终于大败，有万余金兵投降。胡盏下令退守腊家城。吴璘指挥宋军又围攻腊家城，宋兵奋勇进击，强攻不已，克城指日可待。正在这时，赵构、秦桧为与金廷议和，派人诏吴璘“班师”。眼看到手的胜利又白白丧失，胡世將不禁仰天长叹不已。

在胡盏、习不祝进击吴璘所部同时，撒离喝又尽起凤翔金军，北攻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宋将田晟领兵迎击，大败金军。撒离喝在正面与宋军激战之时，另遣一部绕到田晟军后出击。宋军措手不及，有部分兵将惊溃而逃。然而田晟所部主力“右护军”万余将兵临阵不乱，奋力拼杀，金军死伤甚众，撒离喝被迫退守凤翔，不敢再出战。

泾州一战，陕西金军主力遭受重大损失，渭北宋军遂得以全师回到四川。但宋军亦因粮尽而退守仙人原，未能再进击金军残部。宋、金双方军队遂于川陕地区处于对峙之中。然而绍兴十一年（金皇统元年，1141），在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策划下，宋廷与金廷订立和议，割让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又一次葬送川陕抗金的胜利成果。

注 释

①《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

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一。

③《宋史》卷三六六《刘锜传》。

绍兴和议

金完颜亶即位（即金熙宗）后，太宗子、尚书令、宋国王完颜宗磐（蒲鲁虎）晋封太师、领三省事。宋绍兴七年（金天会十五年，1137）十一月，金废伪齐。宋派王伦为迎奉梓宫使，入金面见金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乞归还陕西、河南之地。绍兴八年（金天眷元年，1138）八月，金同意将陕西、河南之地归还宋廷，且派左司侍郎张通古为诏谕江南使，赴江南与南宋朝廷议和。在此之前，完颜昌已通过宋使王伦，向宋帝赵构通报金廷欲以归还二地换取宋廷称藩的意图。赵构欣然同意，且擢升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专主与金求和事宜。秦桧深知议和不得人心，必遭朝臣非议，故在其一再坚持之下，赵构决意仅委托他一人全权操办求和之事，不许其他臣僚插手干预。

尽管如此，朝臣闻讯，依旧纷纷上疏，切谏议和。吏部侍郎魏矼拒绝出任馆伴使，秦桧婉言相劝："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魏矼反唇相讥："第恐敌不以诚待相公尔。"①秦桧只得另选他人。枢密副使王庶，先后7次上疏，抨击主和派的

屈膝投降。枢密院编修官胡铨对秦桧一伙的卖国行径深恶痛绝，表示要斩杀秦桧、王伦"以谢天下"②。一时间，朝廷内外哗然。司勋员外郎朱松、馆职胡珵等6人联名上疏，指出："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以覆我王室，以弛我边备，以竭我国力，以懈缓我不共戴天之仇，以绝望我中国讴吟思汉之赤子。以诏谕江南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礼。自公卿大夫到六军万姓，莫不扼腕愤怒，岂肯听陛下北面为仇敌之臣哉！天下将有仗大义，问相公之罪者。"③面对朝廷中臣僚的激烈反对，秦桧竭力稳定住赵构，诬陷道："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④同时又擢升亲信死党，诸如勾龙如渊之流，充任御史中丞等御史台官，弹劾、排挤，直到迫害主战派官僚，使"中朝贤士，以议论不合，相继而去"⑤。

不久，金遣使臣张通古、萧哲等人入宋，仍以诏谕江南为名。秦桧清楚此名称难以为宋廷臣僚所接受，亦恐因此再遭主战派的攻击，遂与金使商议，乞请更改"诏谕"为"国信"，改"江南"为"宋"。金使傲慢的态度及嚣张的气焰，更激起宋廷臣僚的不满和愤慨。京淮宣抚处置使韩世忠连续数次上疏，请拒绝与金议和，表示愿捐躯报国，与金军决一死战。然而赵构唯恐惹恼金军，而断然拒绝。金使入宋，接伴使范同秉承秦桧之意，奴颜卑辞，军民见者，往往流涕。金使要求宋帝依照藩属之礼，跪受金帝诏书，接受金帝册封。秦桧欲使赵构向金使"行屈己之礼"。赵构左右为难，认为"朕嗣守太祖、太宗基业，岂可受金人册封"⑥。在众多臣僚的激烈反对下，秦桧表示代表宋帝跪受金帝诏书与封册。金使提出受诏书须百官备礼，秦桧恐百官不从，遂令省吏着朝服，导从充数。又恐诏书外露，引起朝臣的攻击，待诏书到手，随即藏于禁中。秦

桧代宋帝接受金帝诏书，实际全面接受金廷的议和条件，从而将南宋朝廷变成金朝的藩属，宋帝向金帝称臣。金廷将陕西、河南两地归还，宋廷则每年向金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对于如此屈辱苛刻的议和条件，以赵构为首的宋廷臣僚竟表示庆贺，极力粉饰太平。

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金正式向宋归还陕西、河南之地。宋令王伦为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同时又派遣其他官员前往接管两地。但赵构仍抱定“守内虚外”的国策，对新得两地无意固守，只欲保全一隅之地，甚至不准动用朝廷财赋。他告诫宰执：“河南新复，宜命守臣专抚遗民，劝农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南之财，虚内以事外。”⑦朝廷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于上奏贺表之中多有讽喻，认为“祸福倚伏，情伪多端”。然而群臣的忠告，却遭到秦桧的黜责。

七月，金廷政变，右副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杀完颜宗磐、完颜昌（挞懒），且于中山府（今河北定州）拘禁王伦。此前，王伦已先知金廷有变，曾密报宋廷，秦桧却毫不理会，令王伦继续前去交割。韩世忠请求趁金廷内乱，出兵攻金。赵构、秦桧则以“《春秋》不伐丧”为由，不许韩世忠发兵。

十年五月，金廷败盟，由都元帅完颜宗弼统领金军，分4路入攻宋境。刚交割不久的河南诸州县相继失陷。赵构竟不知所措，只知下诏历数完颜宗弼罪状。而秦桧则力排众议，以和议自任。金毁约入侵，再度激起南宋军民的愤慨，在韩世忠、王俊、岳飞等将领的组织和指挥下，宋军英勇反击，全线告捷，岳飞一路进至距开封（今属河南）仅数十里处。完颜宗弼连遭战败，已做好撤逃河北的准备。死抱议和的秦桧却于此时

力主班师收兵，宋帝见反击已确保了半壁江山，遂令岳飞“措置班师”，“不许深入”。抗金斗争再度受挫，“所得诸郡，一旦都休，社稷江山，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⑧。

赵构、秦桧等主和派既已葬送了宋军将士抗金斗争的胜利成果，仍不罢休。赵构担心主战派抗金，将迫使金廷求和，进而放还赵佶（宋徽宗）、赵桓（宋钦宗）父子，会与自己发生皇位的争夺。秦桧亦唯恐岳飞等将领的抗金斗争会惹怒金廷，于议和不利，更害怕岳飞等功迹卓著，于己不利。因而他们又千方百计地破坏抗金斗争，直至迫害抗金将领。十一年四月，赵构与秦桧以犒赏拓皋之捷为借口，召韩世忠、张俊、岳飞3大将，论功行赏。授韩世忠、张俊并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又以宣抚司军隶属枢密院，实则解除了他们的兵权。七月，又解除抗金名将、淮北宣抚司判官刘锜兵权，改授知荆南府。八月，再罢夺岳飞的官职。与此同时，赵构、秦桧更加快了议和的进程。完颜宗弼放还宋使莫将、韩恕后，秦桧又派刘光远、曹勋出使金朝，另以魏良臣为通问使，进一步向金乞和。不久，魏良臣偕金使萧毅等入宋，提出以淮河划定宋、金疆界，且要求宋廷割让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二州。秦桧满口应允。

九月，秦桧与投靠自己的张俊收买岳飞部将、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及王贵，诬告岳家军名将、副都统制张宪谋据襄阳（今湖北襄樊）策划兵变，进而据此诬陷岳飞谋反。十月，完颜宗弼再度侵宋，以胁迫宋廷尽快接受且订立和议。金军攻陷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楚州（治今江苏淮安）。秦桧见金军来势汹汹，唯恐议和不成，竟然不许宋军渡江抗击，同时加紧投降求和的进程。他大兴岳飞之狱，将岳飞投入狱中关押，

令其党徒、谏官万俟卨（mòqíxiè 莫齐谢）断狱论罪。岳飞及其子岳云被送大理寺后，秦桧又令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理通讯。何铸指出岳飞无辜蒙冤，秦桧遂恼羞成怒，又换万俟卨治理岳飞之狱。在迫害岳飞之时，秦桧对金廷则百般卑屈。由于宋廷不加抵抗，金军如入无人之境，直渡淮河，进至六合（今属江苏）。金军进兵如此顺利，竟始料不及，以至粮运不济，金军人心惶惶，无心渡江南侵。金军统帅完颜宗弼竭力稳定军心，继续于江北虚张兵威，以施加压力，逼迫宋朝投降求和。赵构、秦桧哀求宗弼"先敛兵，许敝邑拜表阙下"⑨。十一月，宋派魏良臣出使金军，他拜见完颜宗弼时再三叩头，哀求甚切。完颜宗弼遂许以淮水为界作为和议条件，且遣审议使萧毅、邢具瞻与魏良臣入宋订立和议。最终达成和约如下：一、宋向金称臣，"世世子孙，谨守臣节"，金册赵构为宋帝。二、双方划定疆界，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为界，以南属宋境，以北归金境。宋将唐、邓 2 州及商（治今陕西商县）、秦（治今陕西天水）2 州之大半割让给金。三、宋每年向金纳贡银 25 万两、绢 25 万匹。自绍兴十二年始，每年春季运送到泗州交纳。

除正式订立的"绍兴和议"外，完颜宗弼还提出以杀害岳飞作为议和的条件之一。秦桧便将岳飞惨害于大理寺中，将岳云、张宪斩杀于市，其家属流放广南。对支持岳飞抗金，为岳飞鸣冤的文武官员，则以诋毁和议之罪，滥施弹劾，给予贬斥。在赵构、秦桧的指使下，坚持抗金，反对投降的主战派遭到严酷的打击，或罢或贬，从而使投降求和的政策得以无阻碍地推行。

绍兴十二年（金皇统二年，1142），赵构以"臣构"的名

义向金帝完颜亶上誓表，正式承认了和议中的条款。三月，金帝遣左宣徽使刘筈入宋，对赵构行册封礼。经赵构再三的请求，金廷方送归其母后韦氏及宋徽宗赵佶的灵柩。

绍兴和议的订立，使宋与金处于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两国间也自此结束了长达 10 余年的战争，最终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满足于半壁江山的赵构、秦桧又将每年向金廷的纳贡负担全部转嫁到百姓头上，致使“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⑧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

⑨《金史》卷七七《完颜宗弼（兀术）传》。

秦桧祸国

秦桧（1090－1155）字会之，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宋政和五年（1155），登进士第，补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教授，历太学学正。靖康元年（1126），金军围攻汴京（今河南开封），遣使入城向宋帝提割让太原（今属山西）、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属河北）三镇。秦桧上书，言军机四事，反对宋廷割地求和，主张抗击金军入侵。又改任职方员外郎，不久命隶属少宰兼中书侍郎张邦昌，为干当公事。秦桧认为此职“是行专为割地”①，与自己的主张相悖，遂辞官不从。后为御史中丞李回、翰林承旨吴幵荐举，拜殿中侍御史，迁司谏。未几，金军再度南侵，二次进逼汴京。十一月，宋帝赵桓召集百官于延和殿商议割地求和之事，范宗尹等70名臣僚力主割地，秦桧等36人坚决反对。不久，秦桧升任御史中丞。闰十一月，汴京失守，金军命赵佶、赵桓入金营。二年二月，完颜宗翰命宋廷臣僚推举异性者为帝。东京留守王时雍等随即召集百官军民共议拥立张邦昌为帝，众人皆失色不敢答话。监察御史马伸主张应仍立赵氏为帝。秦桧亦认为理当如此，上书状反

对建立张邦昌的伪楚政权，遂被金兵掳入金营。不久，即随赵佶、赵桓及文武百官同被金军北掳至燕山府（今北京西南），后又迁徙至韩州（治今辽宁昌图北），旋即降金。

不久，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即位。金帝完颜晟得知后，致书完颜宗翰，与南宋和议，且交秦桧润色文字。秦桧随即又以重财贿赂完颜宗翰，后完颜晟（吴乞买）将秦桧赐给其弟完颜昌（挞懒）任用。宋建炎四年（金天会八年，1130），完颜昌领兵进攻宋山阳（今江苏淮安）。十月，秦桧与其妻王氏，以及奴婢、仆人取道海上南下，到达杭州（今属浙江）。随即入见赵构，次日便任命为礼部尚书，且赐予银帛等物。

秦桧自金朝归来，宋廷议论纷纷。秦桧自称是杀死监视自己的金兵，才逃出归来的。而大臣们多认为“靖康之难”，独秦桧逃回，且燕山府（今北京西南）距北地甚遥，需跨河越海，秦桧如何能杀死监兵，千里迢迢南奔？又如何能携妻一家返还？尽管朝臣多有怀疑，但尚书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与秦桧相好，百般为他开脱、辩解，极力荐之其忠。宋帝赵构也认为：“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盖闻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②秦桧入宋后，便提出：“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③而且又上奏自己起草的与完颜昌的求和书。自此，宋廷开始改变且守且和的对金策略，专与金廷解仇议和。因秦桧被掳至金朝后，曾力主议和，故实为完颜昌有意放他返回宋朝，以促成南宋的投降求和。

绍兴元年（1131）二月，秦桧任参知政事。不久，排挤掉宰相范宗尹，八月，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

枢密院事。九月，秦桧又将一同执掌朝政的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吕颐浩排挤出朝，令他于镇江（今属江苏）建都督府，专理军队事务。秦桧独揽朝政，于朝中培植党羽、亲信，排挤异己，一时间，求和论调甚嚣尘上。二年，吕颐浩自长江江防返回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不满秦桧的独断专行，赵构亦对其"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主张深感不安。秦桧不久即遭罢免，且榜示朝廷，不再复用。

绍兴五年（金天会十三年，1135），完颜晟死，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完颜昌等人力主与宋廷议和。宋廷中的投降势力视此为求和的极好时机而加紧活动，秦桧也因此得以再度起用。七年，金廷在罢废刘豫的伪齐政权后，金帝完颜亶在左副元帅完颜昌，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左丞相太保、领三省事完颜隽等权臣的一再坚持下，将原属伪齐统治下的陕西、河北地区划归宋廷，以换取宋朝向金朝称臣。时任枢密使的秦桧唯恐岳飞等将领的抗金会使议和不成，极力破坏抗金斗争。他与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张浚劝说赵构收回由岳飞并统淮西军的成命，致使岳飞气愤已极，一度弃军还家，更导致淮西军大将郦琼率几万兵马哗变投降伪齐。张浚因此引咎辞职，荐举赵鼎为宰相。秦桧随即又离间张浚与赵鼎的关系，以图从中谋利。十二月，宋请和使王伦自金朝返回，带回完颜昌的口信，"和议自此平达"。宋帝与秦桧喜出望外，加快求和的步伐。

绍兴八年（1138）三月，秦桧官复原职，重登右相之位。十月，秦桧借宰相、执政官入见宋帝之机，单独留下，向赵构进言："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专）与臣议，勿许群臣预。"赵构当即表示："朕独委卿。"④秦桧仍担心宋帝议和决心不

坚；或为群臣所阻，议和难成，便有意拖延了几天。直到摸透宋帝议和之意坚定不移，方向赵构呈递与金求和的文书，且明令禁止群臣干预议和之事。不久，秦桧再借赵构建储之议，排挤赵鼎与参知政事刘大中，二人随即罢官谪贬。从而秦桧得以独揽朝政，专主议和。为实现与金的求和，秦桧变本加厉迫害和排挤朝中的主战派官僚。枢密副使王庶、枢密院编修官胡铨、赵雍、校书郎许忻、礼部侍郎尹焞等一大批官僚均因上疏反对议和，指责秦桧的屈膝卖国的行径，相继被贬逐出朝。秦桧的所作所为激起朝廷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与切齿痛恨。胡铨在其上书中即明确表示："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秦桧、宋请和使王伦、孙近）头，竿之藁街。"⑤临安府民众得知胡铨上书后，纷纷传抄，全城"喧腾数日不定"。殿中侍御史陈刚中在胡铨遭贬后，为他送行，称赞他："身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⑥更有人将胡铨的奏疏刻版刊行，广为传布，深得民众的同情。

十二月，金廷使臣张通古、萧哲以诏谕江南为名，入境南宋。秦桧自感此称谓将招致朝廷群臣非议，遂与萧哲商议，乞求改"江南"之称为"宋"，改"诏谕"之名为"国信"。金使南下，再次激起抗金军民的反对。宋京东、淮东宣抚处置使，兼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韩世忠先后五次上疏力谏，希望能废止议和，与金军决一死战。但宋廷始终不许。金使入朝，声言金廷册封赵构为帝。秦桧甚至要求赵构"引屈己之礼"，接受金廷的册封。赵构对此难以接受，而朝廷内外更难以容忍。淮西制置使扬沂中、权主马步军司解潜及殿帅韩世良相继告之秦桧，如若军民群起攻之，将如何办？且告秦桧党羽，领兵在外的岳飞、韩世忠等将领若责问此事，又将如何作答？秦桧见此

情景，不免心虚，更恐怕宋帝难以接受金廷的要求而改变初衷，便以辞职作为试探。赵构虽不愿屈己受金廷之封，但求和之意甚为急迫，见秦桧欲辞职，竟声色俱厉，依旧要他主持议和之事。秦桧知宋帝仍坚持求和，遂又与御史中丞勾龙如渊、右谏议大夫李谊、给事中楼炤等人商定，由秦桧摄冢宰接受国书，而后将金廷国书藏于禁中。宋帝赵构同意此议，下令由秦桧赴驿馆面见金使。金使又提出，让宋廷文武百官备礼参拜，秦桧无奈，只好令三省属吏着朝服导从，自己则代表宋帝正式跪拜，接受金帝诏书。根据金帝诏书称，南宋作为金朝的属国，向金称臣，每年贡金银25万，绢25万匹。而交换的条件为，金廷将河南、陕西之地划归宋朝，且允许归还太上皇帝赵佶的梓宫，以及放还原宋宗室成员。此屈辱和议一定，宋廷竟视为喜事，大加庆贺。而张浚、岳飞、徐俯等将领强烈反对投降求和的行径，于上表中讥讽秦桧的投降卖国，表示要誓死抗金，使“秦桧读之大怒”⑦。

宋绍兴九年（金天眷二年，1139），金廷履约归还宋廷陕西、河南之地。宋帝赵构与秦桧立刻派王伦以签书枢密院事，充迎奉梓宫、奉还两宫、交割地界使的身分与副使蓝公佐等人赴金廷办理议和、交割事宜。七月，金帝完颜亶以谋反罪处死操纵朝政的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左副元帅完颜昌（挞懒）及完颜隽等人，而以完颜宗幹为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弼（兀术）为都元帅。完颜宗弼等人反对议和，遂拘留王伦等人，且决定再次南侵。十年五月，完颜宗弼等撕毁盟约，率领金军南下攻宋，河南诸州县重镇相继失守，宋帝为之大惊。宋军官兵奋起抗击，淮西宣抚使张俊领兵攻克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军将王胜占据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湖北、京西宣抚

使岳飞攻占郾城（今属河南）。尽管各路捷报频传，执意与金议和的秦桧却怂恿宋帝下诏，令各路宋军“班师”。九月，北上抗金的宋军被迫放弃收复的州县重镇，退回原驻守地。秦桧的投降政策，招致金军更大规模的进攻。十一年正月，完颜宗弼自两淮南侵，攻占寿春（今安徽寿县），金将韩常所部突入庐州（治今安徽合肥）。赵构急令东京副留守刘錡率军渡江往援淮西；又令淮北宣抚副使杨沂中统兵3万，自临安赶赴前线；再令岳飞军东进江州（治今江西九江），以为策应。刘錡与王德、杨沂中等军合兵，于庐州东南柘皋镇大破金军，局势转危为安。岳飞等主战派官僚再次上奏，请求北伐，收复失地，重建一统江山。可是秦桧等投降派通过宋帝连续下诏，令岳飞停止进兵，火速救援淮西。秦桧命令杨沂中及张俊先行撤兵，致使抗金斗争在关键时候再度受挫。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宋廷未能出兵抗金。

为了扫清与金求和道路上的障碍，秦桧又阴谋尽收诸将兵权。四月，他与宋帝赵构以赏赐柘皋之捷为由，密召韩世忠、张俊、岳飞赴临安府，论功行赏，授予韩世忠、张俊同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实际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而其中的张俊早已秉承宋帝、秦桧的旨意，自请解除兵权，枢密使因此控制在投降派手中。六月，秦桧升任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他朝柄在握，不顾岳飞的一再反对，解除抗金将领刘錡的兵权。又派刘光远、曹勋出使金朝，再派魏良臣为通问使，亦赴金朝，以尽早促成议和。不久，魏良臣偕金朝使臣萧毅等人返宋，带来金廷的议和条件：以淮河为宋、金疆界，宋须割让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二州予金。秦桧立刻派御史中丞何铸入金，表示接受所提议和条件。八

月，宋帝罢免岳飞。九月，秦桧伙同张俊收买岳飞部将、鄂州前军副统制王俊及部将王贵，诬告岳飞及其勇将张宪阴谋窃据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反叛。十月，金完颜宗弼又发兵南侵，攻占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楚州（今江苏淮安）等地，以胁迫宋廷尽快议和。秦桧、张俊等人唯恐惹怒金廷，不敢派兵北上，任凭金军于江北肆虐。相反，却于朝中大兴岳飞之狱，派与岳飞有隙的监察御史万俟卨（mò qí xiè 莫其谢）及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等亲信党羽审讯论罪。岳飞入狱后，历尽严刑拷打，毫不屈服。完颜宗弼提出杀害岳飞的苛求，秦桧立刻指使其党羽罗织罪名，百般诬陷。十二月，抗金名将岳飞终被秦桧一伙害死于狱中，时年仅 39 岁。其子岳云及部将张宪亦遭杀害。亦遭罢官的韩世忠得知岳飞被害，责问秦桧。秦桧搪塞道："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斥责道："'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乎!"③随后，秦桧一伙又将支持岳飞坚持抗金的官员以破坏议和之罪名，陆续罢贬，凡先前之异己者，亦未能幸免。赵鼎、王庶、胡铨等人更是一贬再贬，且"皆遇赦永不检举"。就连曾与秦桧狼狈为奸，迫害岳飞，鼓吹议和的张俊，之后亦受秦桧的排挤而被罢官。

赵构与秦桧等不惜出卖抗金的战果，以称臣纳币换取与金朝的议和，从而使宋廷偏安东南一隅，厮守半壁江山。"绍兴和议"签订后，秦桧被加太师，进封魏国公，不久再进封秦、魏两国公，成为继北宋奸臣蔡京、童贯之后，又一位受封两国公者，权势益发炽盛。他大肆宣扬祥瑞，粉饰太平，宋帝亦因此苟安杭州（今属浙江），自此不再赴长江巡幸。秦桧自执掌朝政后，一面继续打击、排斥异己，一面竭力培植亲信、党羽。一时间，秦桧党徒遍布朝廷，他们为博得主子欢心，以求

加官晋爵，吹捧秦桧为“圣相”、“元圣”，百般歌功颂德。秦桧为牢固控制朝政，命擢升其子秦熺自秘书少监领国史，历翰林学士兼侍读，直至知枢密院事；又竭力堵塞言路，凡臣僚所上奏章中有指责自己者，或由秦熺以职务之便，加以篡改，或烧毁丢弃。甚至连文人著述中有涉及此类之处，皆予禁绝。不仅如此，秦桧又下令禁止私人作史，凡有私作野史者，许人告发。更为甚者，秦桧官居相位，一手遮天，隐瞒、扣留奏章，擅自行事，连宋帝都深感不满。秦桧的倒行逆施，激起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绍兴二十年（1150）正月，殿前司后军小校施全于秦桧上朝途中行刺，未成被捕，临刑前，他怒斥秦桧道：“举国与金为仇，尔独欲事金，我所以欲杀尔也！”⑨慷慨就义。此后，秦桧每逢处出，必带50名兵士保卫。

绍兴二十五年（1155），已病入膏肓的秦桧再次大兴文字狱，翦除异己。他甚至于一德格天阁书写赵鼎、李光、胡铨的姓名，“必欲杀之而后已”⑩。他始终忌恨张浚，时张浚贬至永州（治今湖南零陵），秦桧便派死党张柄出任知潭州，与郡丞汪召锡共同监视张浚。又使人诬陷张浚等人谋大逆，株连贤士53人。十月，秦桧病死。

秦桧先后两度为相，长达19年，倡和误国，谋害忠良。“附己者立与擢用，自其独相，至死之日，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晚年残忍尤甚，数兴大狱，而又喜谀佞，不避形迹”。不惜屈膝投降，拱手相让半壁江山，与金求和。他“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⑪。南宋统治陷入极度的黑暗之中。秦桧死后，“其党祖述余说，力持和议，以窃据相位者尚数人”⑫。继秦桧之后，万俟卨又升宰相，依旧遵行投降求和的路线。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

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五。

⑧《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三。

⑨《续资治通鉴》卷一二八。

⑩⑪⑫《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两宋

采石之战

宋绍兴十九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刺杀金帝完颜亶（熙宗），自立为帝。二十三年（金天德四年，1152），完颜亮迁都燕京府（今北京西南），下令准备发动侵宋战争。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1159）正月，金朝关闭除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外，所有与宋交易的榷场，宋金间边境贸易被中止。二月，完颜亮又下令建造战船，征调诸路猛安谋克军，凡是年25岁至50岁者，全部编入军籍。且遣使赴诸总管府督造兵器，以备战争所需。为了便于和指挥南侵的金军，完颜亮令加紧修建开封（今属河南）宫殿，以尽早迁都至此。三十年（金正隆五年，1160），完颜亮下诏签发诸路汉军，以扩充南侵的金军兵力。三十一年春，完颜亮南下开封，六月，金都南迁至此，更加紧了进攻南宋的准备。九月，完颜亮亲统32总管兵马征伐南宋，以太保、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为副贰；以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乌延蒲卢浑为副贰；御史大夫徒单贞为左监军，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左宣徽使许霖为左都

监，河南尹蒲察斡论为右都监，皆随从完颜亮出征。金军兵分四路南下：西路，以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为副都统制，统兵自凤翔府（今陕西凤翔）进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而后驻兵待命，以进取四川；中路，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为副都制，自蔡州（治今河南汝阳）进攻荆襄；东路，为金军主力，由完颜亮亲统，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南侵；水路，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完颜郑家为副都统制，率领水军自海上直趋南宋都城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南侵金军以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另又令徒单贞领军2万人驻淮阴（今属江苏）。金军的如此部署，旨在一举消灭南宋王朝。

金军南侵的准备，宋廷有所风闻，金朝派遣的贺宋正旦使施宜生也向宋廷透露这一消息。宋帝赵构一面告诫宰臣要“自治”，以为安边息民之计；一面又册立宋太祖赵匡胤七世孙、普安郡王赵瑗（原名伯琮）为皇子，更名玮，且进封建王，以便于形势不利之时，退位内禅，一走了之。绍兴三十年（1160）二月，赵构派同知枢密事叶义问为金国报谢使，赴金朝探听动静。其后又遣权同知枢密院事贺允中再度出使金朝。两位使臣皆带回金廷必叛盟约、金军即将南侵的情报。不久，淮东总管许世安上奏朝廷，称完颜亮已南下汴京（今河南开封），统领50余万重兵，屯驻于宿州（治今安徽宿县）、泗州。宋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康伯与兵部尚书杨椿随即调兵遣将，部署两淮地区的防务，以便对付金军的大举入侵。以抗金老将刘錡为镇淮都统制，以荆南右军统制李道为都统制。面对金军即将入侵的严峻局势，宋廷中的主战派官僚纷纷

指责和攻击主和派的投降退让行径，深感不安的宋帝赵构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不得不罢免秦桧的党徒、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汤思退官职。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二年，1161）三月，宋廷调整御敌部署，且重用主战派官僚。以破敌军统制陈敏统所部屯宋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以利州西路御前诸军都统制吴拱为知襄阳府，率兵3000人戍卫。又以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杨椿为参知政事。五月完颜亮到开封后，即遣使借贺天申节入宋，又提出要求宋割让淮河、汉水两地。陈康伯、杨椿等宰执立即召集禁军主帅等人商议举兵退敌事宜。赵构亦下诏，令将金帝的无理要求告谕诸路统制、帅守、监司，令其随机应变，毋失机会。随后又以吴璘为四川宣抚使，制置使王刚中同处置军事，另命主管马军司成闵率兵3万戍守鄂州（今湖北武昌）。命两浙、江、湖、福建诸州征发禁军弓弩手，分部送往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以及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太平州等地和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军前。六月，在刘锜的请求下，赵构同意他渡江进兵，令骑兵屯驻于扬州（今属江苏）。又委刘锜为淮南、江东西、浙西制置使，且遣步军司都统制戚方提总江上诸军策应军马，听刘锜节制。又诫谕吴拱严加守备襄阳，视军情急缓，与鄂州都统制田师中和成闵合兵救援。同时允许淮南诸州迁移治所，坚壁清野。下诏令诸路帅臣教习、检阅士兵、弓手等地方武装，以保卫家园。为了阻击和防备金军水师自海上入侵宋境，宋廷任命早年曾跟随岳飞抗金的将领，带御器械李宝为浙西副总管，负责提督海船，驻扎平江。又命两浙、江东地区临海诸州积极防备，随时准备迎击金军水师。正当宋廷

主战派臣僚积极备战之时，主和派势力亦加紧投降活动，甚至主张放弃临安南逃。左相陈康伯怒斥退却之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①方制止了主和派逃却的企图。

八月，淮北忠义兵魏胜领兵收复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李宝闻讯，依宋制援魏胜为海州知事，又自请率领120艘战船，3000名弓弩手，乘船北上。不料船队自江阴（今属江苏）出发后，遇大风浪。李宝船队退回，停泊于明州关澳避风，稍事休整后，重新鼓帆北上。刘锜不顾自己年迈，统兵沿江驻守于扬州，且派统制王刚领兵5000，驻守于宝应（今属江苏）。宋廷又以吴拱为鄂州诸军都统制；成闵为湖北、京西制置使，节制两路军马。

九月，西路金军首先南侵大散关，驻于青野原的吴璘立刻派大将高松等领兵救援，迎击金军。同时又派部将彭青率军奔赴宝鸡（今属陕西）渭河，连夜袭击金军桥头寨，大败金军。随后，又派部将刘海收复秦州（治今甘肃天水），金守将萧济投降。吴璘部将曹淋一举收复洮州（治今甘肃临潭），彭青再收复陇州（治今陕西千阳西北）。从而遏制了西路金军的进攻势头。中路金军南下攻入宋通化军，守将张超率所部英勇抗击，杀退金军，夺回城池。金帝完颜亮所统金军主力，亦向两淮进兵。他以尚书右丞李通为大都督，令于淮河上架设浮桥，指挥金军渡淮南下，号称百万大军。

抱病进驻扬州的刘锜很快派兵北上，除宝应外，又于盱眙（今属江苏）、淮阴驻扎军队，以加强了淮东的防务。然而负责淮西防务的建康府都统王权却始终呆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迟迟不进兵江北。经刘锜再三督催，王权方无可奈何地与妻妾凄凄惨惨地挥泪告别，领兵进驻江北的和州（治今安徽和县），

却又按兵不动。刘锜再次下令催促，王权才到达庐州（治今安徽合肥），但又不作任何设防，淮西地区的防务依旧十分空虚。十月，刘锜统兵赶赴淮阴，此时金军亦到达淮河北岸，双方立刻剑拔弩张。因刘锜已精心部署，东路金军遂受阻于淮河，不得南进。可中路金军却因王权失职，从容渡淮，推进淮西，犹入无人之境。王权得知金军渡淮，慌忙自庐州南逃和州，随后又自和州逃回建康。金军一路无阻，迅速进兵至滁县（今安徽滁州），兵临长江。由于淮西失陷，宋廷急令刘锜退兵，回守江防。正于前线指挥抗金作战的刘锜，接到朝廷“金字牌”后，知金军已入淮西，王权临阵南逃，江南防务空虚，只得领兵退回扬州。

金军渡淮南下，王权弃庐州，刘锜回防江南的消息，使宋廷内外大为震惊与恐慌。宋帝赵构甚至准备登船逃往海上避难，陈康伯坚决反对退却，力主宋帝亲征。朝廷文武官员纷纷送家眷离开临安，四下躲避，唯有陈康伯与国子司业黄中的家眷未撤离。赵构见状，被迫表示“亲征”，遂任命知枢密院事叶义问督视江淮军马，中书舍人虞允文为参谋军事。时金军已南下攻占真州（治今江苏六合）、扬州，刘锜退守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为表示抗金的决心，稳定军心，刘锜特将妻、子从镇江（今属江苏）接到瓜洲。然刘锜毕竟年迈且病重，而宋帝令他专守长江，故只得率军退守镇江。自此淮西、淮南相继陷落。

正值金帝完颜亮长驱直入，直逼江南之时，金征南万户完颜富寿、完颜谋衍等将领统所部还师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发动政变，拥立东京留守完颜雍为帝，是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改元大定，下诏废黜海陵王完颜亮，很快黄河以

北地区相继归附于完颜雍。完颜亮陷于困境，气急败坏，孤注一掷要与宋军决一死战。

十一月，完颜亮统兵直进抵长江北岸，日夜打造战船，准备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渡江。宋廷因王权失职，将他解职罢官，召回临安，另派将领李显忠接替。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虞允文奉命前往芜湖（今属安徽）督促李显忠赴任，且代表宋廷到采石劳军。随王权南逃的所部18000人方退至采石，因主帅已应召而去，新帅尚未到任，军中无帅，士气低落。虞允文抵达采石时，军士三五成群，散布江岸边，解鞍宽甲坐于道旁，毫无斗志。虞允文以为坐等李显忠到任必将贻误军机，遂召集诸将，激励斗志。众人道："今既有主，请死战。"亦有人认为："公受命犒师，不受命督战，他人坏之，公任其咎乎？"虞允文斥责道："危及社稷，吾将安避？"②

虞允文来到江边，遥见江北已筑高台，台上对插2面绛色旗、2面绣旗，中间建有黄屋，完颜亮正踞坐其下。有谍者告之，前一日，金军已宰杀白马、黑马祭天，与众将盟誓，约定今日渡江，先登岸者赏黄金1两。时江北金军达40万，战马80万匹，与宋军兵力悬殊甚大。虞允文乃命诸将布列大阵，不得擅动。又将兵船分作5队，2队沿东西江岸而行，1队停泊于江中，余下2队隐蔽于小港之中，以备援应。布置将毕，江北已鼓噪大作，完颜亮手挥小红旗，指挥数百艘战船绝江而来。瞬间，金军70艘船已驶抵南岸，金兵弃船登岸，直扑宋军，宋兵军阵稍稍后退。虞允文见状，立刻冲入军中，手抚军将时俊之背，说道："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③时俊听罢，立即挥舞双刀冲入金军阵中，宋军兵士亦争相冲杀，与敌军殊死战斗。停泊于江中的宋军水军于江中阻截金军

船只，用霹雳炮向敌船射击，一时间江面上弥漫着烟雾和石灰，金军水军无力抵挡。虞允文又令当涂（今属安徽）民兵驾车船攻击金军船队，船行如飞，船上踏车民兵精神振奋，喊声震天。在车船的撞击和拍竿的拍砸下，金军船只多沉入江中。渡江金军在宋军的顽强抗击下，伤亡过半，但余下者依旧与宋兵厮杀，直杀至日暮时分仍不退兵。适逢有自光州败退的一支宋军途经采石，虞允文令人将溃军截住，授之以旗鼓，令他们绕至山后出击。金军见后方有宋兵来攻，以为宋军援兵赶至，不敢再战，遂全线退却。虞允文令弓弩手以劲弓尾击追射，大败金军，杀死金兵 4000 余人，且斩杀金军首领、万户 2 人，俘虏千户 5 人，以及金人 500 余。宋军首战告捷，虞允文激励、犒赏将士，又告之："敌军今日战败，明日必定再来。"深夜，虞允文派军将分乘海舟，逆流而上，停泊于上游江中。又令宋军水军另出一支船队，直逼江北杨林渡口，以拦击金军。

金军渡江大败而还，完颜亮恼羞成怒，处死生还的金兵。次日，完颜亮令金军再次渡江进攻。虞允文指挥江上、岸上宋军全线出兵，夹击金军。由宋将盛新率领的船队直攻杨林渡口，焚毁金军战船 300 余艘，金军再受重创，退回江北。不久，完颜亮派使臣携诏书渡江，企图施以离间之计，虞允文识破金人的诡计，遂复一书，表示誓与金军决一死战。完颜亮得此书大怒，知难以于采石渡江，便烧毁龙凤车，又斩杀汉人向导及造船工匠，匆匆撤离北岸，直奔瓜洲，企图另择渡江地点。

采石之战，击败金军主力，南宋化险为夷，此时，李显忠亦自芜湖赶至采石。虞允文告之："敌入扬州，必与瓜洲兵合，京口无备，我当往，公能分兵相助乎？"④李显忠遂分兵 6000

交予虞允文。虞允文赶至京口时，金军已于滁河屯驻重兵，且堵塞了瓜洲渡口。为阻止金军南渡，叶义问亦调集20万宋军据守京口（今江苏镇江东北）。然而宋军水军战船不足，虞允文令兵士砍伐木材，锻造铁件，改修民船为战舰。又令军将张深戍守滁河入口，扼守长江要冲，以军将苗定驻扎于下蜀，以援应张深。未几，完颜亮亦进驻瓜洲。虞允文闻讯，令兵士踏车船于江中试船，且绕金山3周。金军以为宋军来攻，持弓待命，见宋军战船行驶如飞，惊愕不已。完颜亮却不以为然。一军将跪奏：宋军有备，不可轻敌，请求回驻扬州，再寻机进取。完颜亮不从。

此前，苏保衡所统金军水军于密州胶西县陈家岛驻屯，准备按完颜亮部署，于十月十八日驶抵钱塘江，直攻临安城。但因风向不对，正候风待发。宋将李宝率战船北上，先解海州之围，与魏胜会师后，继续北上，驶至陈家岛南。借南风，宋军水军向金军船队发起猛攻，一时间，火箭齐发，600余艘金军战船被焚毁。数十艘幸免于难的金军战船企图顽抗，李宝指挥宋船靠近敌船，宋军将士借机跳上敌船甲板，奋勇杀敌。金军水军在宋军的打击下，全军覆没，除水军都统制苏保衡逃脱外，副统制完颜家奴以下及全部船只，均被歼灭。李宝于陈家岛全歼金军水军后，得知完颜亮率军南下，遂统水军退回江南。

完颜亮知水军覆灭，且完颜雍已称帝即位，自己无路可退，遂拼死欲占据江南地区。他召集诸将，命令3日内金军全部渡江南进，否则将全部处死。完颜亮此令引起军将不满，遂发动兵变，杀死完颜亮，向北撤兵。宋军乘势收复两淮失地。

注　释

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〇。

②③④《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隆兴和议

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大定元年，1161），正当金帝完颜亮南下攻宋之际，金廷发生政变，拥立东京留守完颜雍为帝。完颜亮南侵失败，又为部将所弑。宋军乘势收复淮东、淮西失地。

自绍兴七年（1137）遭罢免的宰相、著名的抗金将领张浚，于谪居20余年后，直至完颜亮兵临江北之时，方被重新起用，接替因临阵逃脱而被解职的王权，受命出任判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张浚自潭州（治今湖南长沙）出发，日夜兼程，至岳阳（今属湖南）买小舟冒风雪而行。途中遇东来行人，方知金军正犯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路人请他慎行勿轻进。张浚不顾，径直驶入长江。时金军已占据两淮，江北金军骑兵出没无常，长江上无一舟敢行北岸。张浚却乘小舟依旧顺江而下。待他赶至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时，金军已因完颜亮被杀，相继撤回淮北。张浚复出，为众望所归，“卫士见浚，无不以手加额”，军民皆倚以为重。就连赵构也认为：“卿在此，朕无北顾忧矣。”①随后又委他兼节制建康、镇江府、江州、

池州、江阴军军马。张浚受任后悉心经营，招集忠义民兵，招募淮楚地区壮勇之士，任命陈敏为统制。考虑到金军长于骑兵，宋军长于步兵，故须扬长避短，令兵士制弩造车。

完颜雍即位之初，为巩固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于宋绍兴三十二年（金大定二年，1162）正月，向宋朝派遣使臣，要求恢复和维持宋、金间原有的关系。宋帝赵构虽于金军大举南侵之时，迫于形势而重用主战派将领，而当威胁解除之后，却依旧苟且偷安，企盼与金求和。主战派臣僚希望朝廷能重用张浚，主持军务，但赵构却任命主和派杨存中为江、淮、荆、襄路宣抚使，全面负责军务，又以虞允文为副使。给事中金安节、中书舍人刘珙上奏指出："若圣上以为虞允文不能独自担当此重任，宜别择重臣。"赵构为之大怒，认为是指未任用张浚，遂改命杨存中负责淮东、淮西地区防务，虞允文改任兵部尚书、川陕宣谕使，负责招军买马及与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招讨使吴璘议事，而拒不任命张浚。此前，抗金名将刘錡因病重免官，故张浚已成为朝野上下企望的主战派首领。

三月，金使臣入宋，到达临安（今浙江杭州）。尽管赵构一再表示仍将奉行对金廷纳贡称臣之策，宋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陈康伯等人却更定金使入境接伴、馆伴旧仪，强制要求金使以对等的态度与南宋君臣相见，遏制了金使以往傲慢无礼的态度。同时，两淮、川陕地区宋军继续与金军作战，捷报频传，又相继收复一些失地，抗金形势再度好转，对南宋王朝极为有利。这使得宋帝难于再硬性推行投降求和政策，不得不重用张浚。五月，赵构命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节制江淮东西、沿江州郡军马，又命他招募淮南之民，设置御前万弩营。但并未因此而最终改变宋廷的对金政策。在此之前，宋曾

遣洪迈等使臣入金，贺完颜雍即位，准备再次与金议和。是战是和，令赵构左右为难。五月底，他册立养子赵玮为太子，更名眘（shèn 慎）。六月，以自己"倦勤"休养为由，传位太子，自称太上皇帝。实际是将悬而未决的战和之议推卸给继承者，不过他在退位之前，下令撤销为抗金而专设的招讨司，为宋廷与金廷的议和铺平道路。

同年六月，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赵眘入宫为赵构养子时，即主张抗金，及即位，便召张浚入见，说："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唯公。"②且授其为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进封魏国公。再次表示："朕倚魏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③金见宋迟迟不议和，遂派兵10万屯驻河南，声言将用兵淮东、淮西，又移文向宋索取海（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泗（治今江苏泗洪东南）、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商（治今陕西商县）诸州之地及岁币。张浚向宋帝进言，称金廷诡诈，不当因此而动摇，遂以大兵驻守于盱眙（今属江苏）、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北）、庐州（治今安徽合肥），迫使金军未敢进犯。

宋隆兴元年（金大定三年，1163）正月，赵眘进张浚为枢密使，都督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军马。在重用张浚的同时，赵眘又追复岳飞的官爵，起用主战派胡铨，并下令将秦桧党人逐出朝。

但是太上皇帝赵构安插于赵眘身边的翰林学士史浩，却是主和派臣僚，及他升任参知政事兼权知枢密院事后，极力散布求和言论，阻挠张浚的抗金部署。在史浩的建议下，抱有无须动武而能求得与金平等地位幻想的赵眘，竟不顾张浚等人的反

对，派遣使臣入金通报即位之事。由于金廷坚持要求宋廷履行“绍兴和议”，宋使被迫退回。宋四川宣抚使兼陕西、河东路宣抚、招讨使吴璘自绍兴三十一年（1161）迎击金军对川陕地区的进攻之后，乘胜收复秦凤路（治今甘肃天水）、熙河路（治今甘肃临洮）、永兴军路（治今陕西西安）等大片失地。然而赵眘却下诏，要吴璘“审度措置，保全川蜀”④。随后又诏令四川宣抚司退兵，吴璘只得放弃已攻占的德顺军（今甘肃靖宁东北），于撤退途中遭金军邀击，伤亡惨重，3 万兵士仅有 7000 余人侥幸生还，川陕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夺回的失地得而复失。

赵眘对战和之议举棋不定。隆兴元年（1165），他在任命张浚为枢密使时，亦擢升史浩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是为右相，位高于张浚。又起用曾因反对投降求和而遭贬逐的御史中丞辛次膺为同知枢密院事。时金将蒲察徒穆及金知泗州大周仁率军屯驻于虹县，都统萧琦领兵屯驻于灵璧（今属安徽），忙于积储粮草，修缮城池，以作为南侵的准备。张浚欲于金军尚未备战完毕之前，先发制人，进兵北伐，收复中原之地。适逢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邵宏渊亦提议发兵，先捣毁虹县、灵璧二城。张浚遂合议上奏赵眘，力陈北伐中原之策。不久，张浚应召赴临安（今浙江杭州），入见赵眘。在张浚的请求下，赵眘终于同意出兵渡淮河，北伐中原，且可以不预先与三省、枢密院通报。

张浚命李显忠统兵出濠州，直进灵璧；邵宏渊率军出泗州，直逼虹县，自己则亲临前线指挥。李显忠所部兵进灵璧，大败萧琦；邵宏渊所部亦于虹县击败金军，收降蒲察徒穆、大周仁。宋军乘胜攻占宿州（治今安徽宿县），金朝统治下的中

原地区为之大震。捷报传入临安（今浙江杭州），赵昚亲笔手书慰劳前线将士："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⑤

虽然捷报频传，鼓舞人心，但北伐金军实际已因史浩等人的阻挠及赵昚的犹豫，贻误了极为有利的战机。此前，金帝完颜雍已平息内部叛乱，巩固了统治。金大定二年（宋绍兴三十二年，1162）十月至十一月间，完颜雍已部署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所部进驻睢阳（今河南商丘）。又令尚书右丞相仆散忠义前往南京（今河南开封），指挥金军南侵。因而宋军的北伐是在金军有备的情况下进行的。李显忠占领宿州后不久，纥石烈志宁即率兵赶到。宋、金两军激烈交战，宋军击退纥石烈志宁所部。随后又击败金军援兵。正值金军源源不断赴援，李显忠所部奋力抗击之时，邵宏渊却按兵不动，甚至散布流言，动摇军心，致使李显忠所部孤立无援，终不敌而败。而邵宏渊所部中军统制周宏及邵宏渊之子邵世雄、殿前司统制官左士渊竟于大敌当前之际，率军逃遁。李显忠召集余将与金军再战，又反败为胜。但邵宏渊与李显忠的不和，已引起军中的混乱。殿前司统制官张训通等 7 人及 12 名统领官借机亦逃遁。宋军内部的不和，最终使宋军于符离县（今安徽宿县）被金军击溃。

宋军北伐失利，张浚立刻遭到主和派的攻击。他一面上疏请罪，一面紧急部署：以魏胜戍守海州，陈敏戍守泗州，戚方戍守濠州，郭振戍守六合（今属江苏）。整修高邮（今属江苏），巢县（今安徽巢湖）两城，作为重要的军事据点，又修筑滁州（治今安徽滁县）关山寨，以扼守金军南下要冲。同时于淮阴（今属江苏）集中水军，于寿春（今安徽寿县）集中马军。以此防备和阻止金军南侵。对张浚的上疏请罪，赵昚起初

颇能宽容，他赐书张浚："今日边事倚卿为重，卿不可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任之，今日亦须与卿终之。"而当张浚再次请求致仕时，赵昚又表示："朕待魏公有加，不为浮议所惑。"⑥甚至在称谓上从不呼其名，只称"魏公"。还常遣使了解张浚的饮食和身体状况。之后在主和派官僚接二连三的攻击下，赵昚只好将张浚降职，改授枢密使、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对李显忠、邵宏渊亦降职。此后，赵昚又任用主和派官僚汤思退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废止江、淮宣抚司"便宜行事"的权力。

隆兴元年八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遣使持书入宋，索求宋廷割让海、泗、唐、邓四州之地及岁币，不然则于秋季发兵入攻。张浚认为金人强则来，弱则止，根本不在于议和与不议和。身为右相的汤思退原为秦桧党人，仍急于与金求和，他借退居于德寿宫的太上皇帝赵构的暗中支持，迫使赵昚应允议和。张浚、虞允文、胡铨等一批主战派臣僚纷纷上疏，坚决反对议和。汤思退却指责他们"大言误国，以邀美名"⑦。在主和派的压力下，赵昚只得遣淮西安抚司干办公事卢仲贤等人持书赴金元帅府，但告诫他不许应允归还四州之地，岁币也当差减。十一月，卢仲贤自宿州返回，带来金都元帅仆散忠义致宋三省、枢密院的文书。由于卢仲贤于出使金元帅府时，擅自应允归还四州之地，而被夺官，交大理寺治罪。宋廷遂改任王之望、龙大渊为金国通问正、副使。张浚等人再度力争，反对派使议和。张浚借应召入见之机，向赵昚力陈和议之失。赵昚终于同意不向金廷递交和议誓书，令王之望、龙大渊留驻待命，另派通书官胡昉、杨由义前往金元帅府，通报金廷四州之地不可割让。如金廷非求四州之地，则召回使臣，停止和议。十二

月，左相陈康伯因病罢相，赵昚以汤思退继任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以张浚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仍都督江、淮东西路军马。

胡昉等使臣至宿州后，金人对他们威逼利诱，以胁迫他们应允割地之议。胡昉等毫不屈服。隆兴二年（1164），在主战派的一再请求之下，宋帝赵昚准备自临安府移至建康府（今江苏南京），同时下诏，召回通问使王之望等人，中止与金和议。左相汤思退闻讯，大为惊恐，表面乞求辞职，而暗地却与其党羽密谋，设计陷害张浚。不久，奉赵昚之诏，张浚巡视江、淮。为加强江淮地区的防务，张浚招募山东、淮北地区的忠义民兵，充实建康、镇江两军，人数多达12000余人。又召集淮南壮士及江西地区的起义军万余人，组成万弩营，交陈敏统辖，戍守泗州。凡属要害之地，皆筑城堡，低洼之地则蓄水为阻。还增置江、淮上的战船，使诸军备齐弓矢器械。淮北、山东之民亦纷纷归属投奔张浚，或表示受他节制。汤思退遂令王之望极力诋毁张浚的守备之策，以为张浚的部署不足以抵挡金军的进攻。令其他党羽肆意诽谤、攻击。一时间，主和派气焰甚嚣尘上，张浚见此情景，先请求罢免江、淮都督府，继而请求致仕。四月，张浚被罢相，从此主和派在朝廷更加不可一世。六月，赵昚令湖北、京西制置使虞允文放弃唐、邓二州，虞允文拒不从命，亦被撤职。八月，张浚于"不能恢复中原，雪祖宗之耻"的遗憾之中病故。朝廷完全为汤思退、王之望之流所控制，很快便废除了张浚生前精心部署的江、淮防务。十月，金左副元帅纥石烈志宁以宋朝国书未按原定格式书写，拒绝接受，提出对商州、秦州两地的割让要求，明确表示岁币为20万。之后不久，金军便大举渡过淮河南侵，宋军节节败退，

连失楚州（治今江苏淮安）、濠州、滁州。金军的再度入侵，宋廷主和派毫无作为，赵昚因此罢免汤思退、王之望等人。十一月，太学生张观等 72 人上书，请求处死汤思退、王之望等人，贬逐其党羽，起用陈康伯、胡铨等主战派。赵昚一面派国信所大通事王抃赴金元帅府商议和议条款，一面任命陈康伯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虞允文为同签书枢密院事，希望能阻止金军的南侵。陈康伯领命，即扶病兼程赶至临安，部署抗金。步军司统制崔皋及胡铨等分别击退进犯的金军，但王之望等人却千方百计破坏抗金，拒不执行命令。虽赵昚亦给予撤职贬斥，却又不得不顾忌太上皇帝赵构的求和意图，致使抗金斗争软弱无力，最终只得再遣使臣与金议和。其内容主要为：改宋、金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两国疆界同“绍兴和议”；改“岁贡”为“岁币”，减每年银、绢各 25 万两、匹为各 20 万两、匹；宋割让商、秦二州予金；金国入逃宋境人员不再追回。史称此和议为“隆兴和议”。

“隆兴和议”是于宋帝赵昚主张抗金，却为以太上皇帝赵构为首的主和派阻挠与破坏的背景下订立的屈辱条约，多少改变了宋、金间原有的不平等的关系。

注　释

①②③⑤⑥《宋史》卷三六一《张浚传》。

④《宋史》卷三三《孝宗传一》。

⑦《宋史》卷三八三《虞允文传》。

两宋

宫闱之乱

宋乾道三年（1167）六月，皇后夏氏去世。七月，刚册立2年的皇太子赵愭去世，谥号“庄文”。庄文太子死后，赵昚在选定新太子时，未按排行顺序，由次子庆王赵恺继太子位。而是因三子恭王赵惇“英武类已”①有意册立为太子。遂于七年（1171）二月，正式册封赵惇为皇太子。为避免诸子间的权力之争，赵惇主张：“朕既立太子，即令亲王出镇外藩。”②他进封赵恺为雄武、保宁军节度使，魏王，判宁国府（治今安徽宣城），使之离开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

赵昚既宠爱赵惇，便欲使之掌握治国本领，四月，命他判临安府，不久又改领尹事。赵昚到任后，“究心民政，周知情伪”③。赵昚得知，更为欣喜。

宋淳熙十四年（1187）十月，太上皇赵构病重。赵昚竟罢朝，侍奉太上皇。不久，赵构病故，赵昚悲恸不已，两日未进食，提出要为太上皇服丧三年。文武百官多次上表，请求赵昚还朝听政，却遭拒绝。十一月，赵昚亲笔下诏：“皇太子可令参决庶务，以内东门司为议事堂。”④十五年二月，赵惇开始

赴议事堂，与辅臣相见，商议朝廷大事。左谕德尤袤告诉赵惇："大权所在，天下之所争趋，甚可惧也。愿殿下事无大小，一取上旨而后行，情无薄厚，一付众议而后定。"又认为，太子之位，只在侍奉圣上用膳、问安，不与外事交往。因此请赵惇待圣上祭奠完太上皇之后，恳请辞去参预决策的重任。但赵昚自太上皇赵构去世后，即欲效赵构故事，传位给太子赵惇。为此当丞相周必大请求辞官时，赵昚便极力挽留，"朕比年病倦，欲传位太子，卿须少留"⑤。赵昚认为，礼仪最重者，莫过于侍奉宗庙，而其中首要的享祭却因自己患病，不能常去亲自主持。孝敬最重者，莫过于为亲人服丧，而自己则未能每日去德寿宫。因此准备退位休养。

十二月，赵昚将赵构当年传位的手札秘密交给周必大，让他以自己"倦勤"、侍奉太后等原由，事先起草退位诏书，执意内禅。

十六年二月，赵昚身着素服，正式行内禅礼，退位，居住于重华宫。赵惇继位，是为光宗，遂尊赵昚为至尊寿皇圣帝，皇后为寿成皇后。未几，至尊寿皇又下诏，册立赵昚元妃李氏为皇后。

皇后李氏，安阳（今属河南）人，为庆远军节度使、追赠太尉李道之女。高宗赵构时，召她为恭王赵昚妃。宋乾道四年(1168)，李妃生子赵扩，是为嘉王。七年，李氏被册立为皇太子妃。

李氏生性好妒嫉、凶悍。曾向赵构、赵昚诬告太子东宫官僚之过。赵构对此极不高兴，认为她是一位操纵权柄者。赵昚亦因此而多次训导她："宜以皇太后为法，不然，行当废汝。"⑥赵昚的规劝反而招致李氏的忌恨，她疑心此话出于太后吴氏

之口，遂对吴太后心怀不满。及皇太子赵惇继立为帝，李氏亦册立为皇后，便伺机报复。

宋绍熙二年（1191）十一月，赵惇欲因故诛杀宦官，近侍随从因此惊恐万状，便设计离间寿皇圣帝、赵惇与李后三者的关系。赵惇对他们的举动深感怀疑，却又不便澄清事实。不久，赵惇患心疾，寿皇圣帝赵昚得知后，便买到良药，欲待赵惇入重华宫时，亲自送给他。宦官随即将此事告诉李皇后，且谎称："太上（指寿圣帝）合药一大丸，俟宫车过即投药。万一有不虞，其奈宗社何?"⑦李皇后亲自赴重华宫窥测，确实见寿皇圣帝手中有药，遂相信宦官之语，对寿皇圣帝赵昚更加愤恨。

继而，赵昚于重华宫设宴，李皇后于席间向赵昚请求册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赵昚不许，李皇后随即责问道："妾'六礼'（指婚礼的六种礼仪）所聘，嘉王，妾亲生也，何为不可?"⑧赵昚勃然大怒，李皇后只好退下。随后她又领着赵扩向赵惇哭诉，称寿皇圣帝有废赵惇，另立他子为帝之意。赵惇对此十分困惑，便不再入重华宫朝见寿皇圣帝。

李皇后挑拨了赵昚、赵惇父子间的关系，又欲进一步控制赵惇。一日，赵惇于宫中洗手，见侍奉的宫女手很白净，十分喜爱。此事为李皇后所知，几天后，李皇后派人送来一副盛饭的盒子，赵惇打开饭盒，里面上盛放着那位宫女的双手。他惊悸成疾。赵惇极宠爱黄贵妃，李皇后万为妒嫉。她趁赵惇郊祭，住宿于斋宫之时，竟将黄贵妃杀害，谎称暴病而亡。当天夜里，风雨大作，堆筑的黄土祭坛被冲毁，蜡烛全部浇灭，无法再行祭祀之礼。赵惇既遭风雨惊吓，又闻黄贵妃暴死，病情加剧，以至于不能上朝听政，朝廷大政多由李皇后决断。

李皇后亲操权柄，益发骄奢蛮横，无所顾忌。她凭藉手中之权，封李氏三代为王。又重修家庙，其规模超过宋代典章的规定，且派卫兵守卫，其数量远远多于太庙的卫兵。李氏家庙修成，李皇后借返乡拜谒家庙之机，推恩亲属 26 人，使臣 172 人。甚至连李氏的门客，亦奏请补官。李氏家族因此而鸡犬升天，不可一世。寿皇圣帝得知赵惇病情加剧，便亲自入宫探视，当面责怪李皇后。李皇后对赵惇的怨恨益发刻骨。赵昚见赵惇精神恍惚，不能视朝，故凡遇自己生日、寒暑之季，以及节日之时，皆传旨免去赵惇入重华宫拜见、问候的礼节，令他好生休养。

绍熙三年（1192）三月，赵惇病情好转。消息传出，文武百官，下至平民百姓皆请求他拜谒寿皇圣帝，甚至有撩衣叩头，号啕大哭劝谏者。赵惇亦有所醒悟，准备赴重华宫，然而尚未出发，即改变主意。临安城官民对李皇后的干预深表忧虑。同知枢密院事陈骙上书，陈述 30 余事，其中说：若后妃不能严守本分，则权力会转移；暗地告状之风不加以制止，则无法明断是非；策划台院谏官堵塞言路，则私党膨胀；与近臣商议将帅的任选，则会使贿赂盛行；不求正直之言，则过失必会暴露；不慎重对待旧的章法，则取舍定有失误；馈赠赏赐不加限制，则财用匮乏。陈骙所言，皆切中时弊，却不为赵惇所重视。

十一月，兵部尚书罗点、给事中尤袤等人上书，再次恳请赵惇拜谒寿皇圣帝，赵惇依旧不同意，吏部尚书赵汝愚入宫对策，又反复规劝，赵惇方回心转意。赵汝愚又叮嘱秀王伯圭精心调护赵惇，调解和缓和他与寿皇圣帝的关系。在群臣的努力下，赵惇终于入重华宫，拜见其父。李皇后见此情景，无可奈

何亦随后入宫，与赵眘相见。然而李皇后仍不甘罢休，事后依旧如故，阻止赵眘、赵惇关系的恢复。

绍熙四年（1993）六月，知枢密院事胡晋臣去世。自赵惇染病，不能视朝，胡晋臣即与左丞相留正悉心协力辅佐朝政，使朝廷内外无不顺从，秩序安定。他数次向赵惇陈述子女孝敬父母之理，劝说当亲君子，远小人，抑制侥幸得志者，及消除宗派，广开言路等。但在李皇后的阻挠下，胡晋臣的劝谏全被搁置一侧，赵惇亦再未入重华宫。九月，正值重阳节来临，群臣相继上疏，请求赵惇与赵眘共度节日。赵惇照例不从。中书舍人陈傅良上书，恳切劝说，给事中谢深甫亦进言，认为寿皇圣帝宠爱陛下，如同陛下疼爱嘉王一样。如今寿皇圣帝年事已高，一旦故去，陛下又将如何见天下臣民？赵惇下诏，令随从即刻起驾，前往重华宫，向赵眘问安，又令文武百官列班迎候。百官闻讯，即列班于朝廷，迎候赵惇出宫。赵惇方步出御屏，却被李皇后阻留，硬将他拉回内宫。百官、侍卫面面相觑，无人敢言，唯有陈傅良疾步上前，扯住宋帝衣裾，恳请他不要回宫，亦随之来到御屏之后。李皇后便厉声呵斥道："此何地，尔秀才欲斫头邪?"⑨陈傅良只得退下，失声痛哭。李皇后大发雷霆，派人责问，陈傅良有何理号泣？陈傅良答道："子谏父不听，则号泣而随之。"⑩李皇后益发怒不可遏。赵惇令人传旨，罢止拜谒寿皇圣帝，退回宫中。陈傅良见此事已无法挽回，遂径直出宫。赵惇随即下诏，改任他为秘阁修撰，陈傅良拒不受命，著作郎沈有开、秘书郎彭龟年等人亦相继上书，恳请赵惇拜谒寿皇圣帝，均遭拒绝。

十月，工部尚书赵彦逾等人上书重华宫，请求寿皇圣帝赵眘不要传旨撤销会庆节（赵眘生日）朝会。不料到会庆节时，

宋帝赵惇却声称身体有病，停止朝会。于是自丞相以下文武百官皆上书自责，请求罢黜官职。嘉王府翊善大夫黄裳上疏，请求诛杀内侍，彭龟年上疏请求驱逐内侍押班，以向天下臣民请罪。太学生汪安仁等118人，联名上书，请光宗赴重华宫。但这些请求，均遭拒绝。只是在赵彦逾等人的再三劝说下，赵惇才于是年十一月，开始恢复视朝。

绍熙五年（1194）正月，赵昚染病。此后，群臣纷纷上书，请求赵惇前往重华宫探视、慰问。赵惇非但拒绝，反而与李皇后前往玉津园游玩。兵部尚书罗点劝说宋帝先去重华宫，且认为，如陛下深居简出，长久不履行做儿子的义务，待众人抱怨、诽谤之时，即生祸患，切不可掉以轻心。而赵昚仍犹豫不决。罗点又偕侍读、侍讲等官，再向赵昚进言。赵昚敷衍表示：朕心中何尝不思念父皇？罗点直方指出：陛下虽有此心，却久居宫中，将作何解释？

起居舍人彭龟年连续三次上书，欲求与宋帝面谈，均未获许。待赵惇上朝听政时，彭龟年于列班之内，伏地叩头不止，鲜血染红阶石。赵惇询问原由，彭龟年遂上奏说：如今再没有比探望寿皇圣帝更重要的事情了！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亦诚恳地表示：自己额头叩于陛下台阶上，是何等忠诚恳切。臣下已做到这一步，难道还不够吗？但赵惇虽表示明白臣下之意，却仍不赴重华宫。一时间，群臣接二连三地为此事上书，而赵惇仍无转变之意，臣僚遂又纷纷请求辞官罢职，竟多达500余人。赵惇既不从群臣之请，又拒绝辞官之求。群臣无计可施，遂谋他议。起居郎兼中书舍人陈傅良建议自亲王及宰执中择一人充重华宫使，代赵惇向赵昚问候、探视。御史台、谏院亦上奏表章，以离间陛下与寿皇圣帝之罪，弹劾内侍官员。此议亦

不获准。

五月，赵昚病情加剧。陈傅良以宋帝不去重华宫探问而呈交告敕，出临安城待罪。左丞相留正等进宫劝谏，赵惇拂衣而起。留正忙拉住其衣襟，哭泣着好言相劝。罗点亦以寿皇圣帝危在旦夕，如今日不见，恐后悔莫及相劝。赵惇听得极不耐烦，起身而去。群臣又尾随其后，待赵惇入福宁殿寝宫，内侍宦官竟将殿门关闭，群臣被阻于殿门之外。众人实出无奈，悲泣着离开内宫。

次日，赵惇召罗点入宫。罗点引三国时，辛毗扯曹丕衣襟之典，以喻众人之意。彭龟年见劝谏赵惇无效，便改而请求让嘉王赵扩赴重华宫，向寿皇圣帝慰问、请安。赵惇应允，令赵扩前往探视。卧于病榻的赵昚见孙子前来问候，不禁感慨万分。

六月，68 岁的赵昚病逝，追谥孝宗。其子赵惇不肯出来主持丧礼。留正等人只好率文武百官前往重华宫发丧。将行丧礼之仪时，仍不见赵惇到来，留正遂与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商议，派少傅吴琚请赵昚之母、寿圣皇太后暂且垂帘，主持丧葬之事，方使赵昚丧礼得以进行。

七月，留王以赵惇患病，礼当册立皇太子，协助治理朝政，而后再请赵惇退位，太子即可以亲政。赵汝愚却主张请求太皇太后降旨，令赵惇退位，由太子直接继位。留正以皇太子尚未册立，令他即位，恐日后会有人因此发难，认为此议不妥。他遂率宰执入宫上奏，以为皇子、嘉王赵扩已具备仁义忠孝之德，当尽早册立为太子，以安定人心。赵惇毫不理睬群臣的上奏。六天后，留正等人再次请求此事，赵惇竟下书称“历事岁久，念欲退闲”⑪。留正得书，惊恐跌倒，随即托病不辞

而别。

留正突然出宫而去，朝廷上下顿时人心惶惶。恰于此时，赵惇又突然于上朝之时，倒仆于地。赵汝愚唯恐宋廷因此而生变故，遂决意令赵惇退位内禅。乃令工部尚书赵彦逾联合殿帅郭杲，又与左选郎官叶适、左司郎中商议，请太皇太后降旨内禅。随即遣知阁门事韩侂胄设法告诉太皇太后。韩侂胄通过内侍省宦官，终得太皇太后应允。此时已近日暮，赵汝愚即部署内禅，急令郭杲等将领连夜派兵守卫南北宫城。

次日，群臣入重华宫祭奠孝宗，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赵汝愚率群臣向太皇太后请立嘉王赵扩为太子，且言赵惇有御笔"历事岁久，念欲退闲"。太皇太后随即应允，赵汝愚自袖中取出已草拟好的太后谕旨，以"皇帝有疾，至今未能执丧，曾有御笔，欲自退闲"，而册立嘉王赵扩为帝，尊赵惇为太上皇帝，李氏为太上皇后。太皇太后以为谕旨甚妥，令赵汝愚依谕旨向朝廷内外宣布：皇子赵扩继皇帝位。

嘉王随即于寿皇圣帝帷帐中即位称帝，是为宁宗。

注 释

①《宋史》卷三六《理宗记》。

②③④⑤《宋史》卷三六《光宗纪》。

⑥《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⑦⑧《宋史》卷二四三《光宗慈懿李皇后》。

⑨⑩《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下》。

⑪《宋史》卷三六《光宗纪》。

两宋

庆元党禁

宋绍熙五年（1194）七月，太上皇帝赵昚（宋孝宗）病逝。其养子、宋帝赵惇（宋光宗）狂悖忤逆，不能亲自视朝。在宗室、知枢密院事赵汝愚和外戚、知阁门事韩侂胄（tuō zhòu 托皱）等人的策划下，迫使赵惇退位，而拥立赵惇第二子，皇太子赵扩即位为帝，是为宋宁宗，而尊赵惇为太上皇帝。

赵汝愚既出身皇族，又有策划赵扩登极之功，故擢升兼参知政事。对其他有功之臣亦分别给予升迁：参知政事陈骙为知枢密院事，兵部尚书罗点为签书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余端礼为参知政事。不久，赵扩又擢升赵汝愚为右丞相，赵汝愚推辞不受，乃改授枢密使。

韩侂胄为北宋名臣韩琦的曾孙。其父韩诚娶宋高宗赵构皇后之妹，韩侂胄以恩荫入仕。其侄女韩氏于赵扩封嘉王时，选作王妃，赵扩即位后，她册立为后。韩侂胄未得升迁，欲求推恩。赵汝愚直言告之："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唯爪牙之臣，则当推赏。"①遂加封殿前都指挥使郭杲为武康军节度使，而韩侂胄仅得以提升为宜州观察使兼枢密都承旨。

他大为失望，忌恨赵汝愚。他借传递诏令旨意之机，逐渐得到宠幸。又凭借皇亲国戚的身份，时常炫耀威福。焕章阁待制兼侍讲朱熹告之赵汝愚：对韩侂胄"当用厚赏，酬其劳，而疏远之"。知临安府徐谊建议说：韩侂胄将来定为国家之患，此刻应尽量满足其要求，而将他派往边远地区。对此，赵汝愚自认为大权在握，不以为然。

韩侂胄极欲参与朝政，常赴朝臣议政处——中书门下（都堂）。左丞相留正遣中书门下省官员告诉他：此处非随便出入之地。韩侂胄十分无趣，气愤地离开都堂，寻机报复留正。适逢寿皇（赵惇）陵寝选址，留正与赵汝愚意见分歧，韩侂胄乘机于赵扩面前挑拨离间。赵扩轻信谗言，下诏罢免留正相位，出任知建康府，再择赵汝愚为右丞相。赵汝愚与留正于朝中共主朝政时，相处融洽，及留正免官出朝，赵汝愚怨韩侂胄未向自己说明原委。因此当韩侂胄请求面见他时，竟拒之门外。韩侂胄遂与赵汝愚积怨日深。

九月，韩侂胄党羽、刑部尚书京镗升任签书枢密院事。韩侂胄视此为契机，设法排挤赵汝愚。刘弼（同弼）与韩侂胄同为知阁门事，因未能参预赵扩即位之事，心中愤愤不平。他告诉韩侂胄："赵相（赵汝愚）欲专大功，君岂唯不得节度，将恐不免岭海（今广东）之行矣。"韩侂胄忙询问有何计策，刘弼认为："惟有用台谏尔。"韩侂胄仍不解其意，又请教："若何而可？"刘弼直言道："御笔批出是也。"②韩侂胄立刻醒悟，便设法通过内宫，授予亲信、给事中谢深甫为御史中丞。不久，赵扩令臣僚荐举监察御史，韩侂胄与谢深甫又用同样的办法让党羽刘德秀窃得此位。另安插杨大法为殿中侍御史，刘三杰为监察御史。韩侂胄的亲信、党羽相继钻入御史台，由此而

控制言路，排斥正直官员。

右正言黄度欲弹劾韩侂胄，不料事泄。韩侂胄遂借御笔批他免职，改授知平江府。黄度言："蔡京擅权，天下所由以乱。今侂胄假御笔逐谏臣，使俯首去，不得效一言，非为国之利也。"③因而拒不受命，返乡闲居。朱熹是位名儒，为时人推崇，自应召入朝，授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后，为赵扩讲书。黄度免官，朱熹直言上疏，陈述韩侂胄奸伪，请赵扩整治作乱者。韩侂胄为之大怒，令艺人头戴高帽，身着阔袖衣，于赵扩面前尽显大儒士各种丑态，百般戏弄、侮辱朱熹。并向赵扩说朱熹迂腐不可用。赵扩因此下诏，以朱熹年迈，不宜站立讲经为由，将其罢免，改授宫观之职。赵汝愚为此入宫劝谏，特将御笔藏入衣袖之中，示意赵扩有奸臣借御批徇私，然而赵扩毫无觉察。朱熹气愤已极，辞官而去。中书舍人陈傅良将罢免朱熹的诏敕密封退回宫中，起居郎刘光祖、起居舍人邓驲（rì 日）、御史吴猎、吏部侍郎孙逢吉、登闻鼓院游仲鸿等人亦向赵扩上奏，请求挽留朱熹，均未获准，陈傅良、刘光祖等人反而相继被罢官。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上疏，再请求朝廷留任朱熹，且逐条陈奏韩侂胄的奸诈，称他假托声势，窃据威福，乞请将他罢黜。之后他又提出，宋帝废罢朱熹极突然，希望也以此方法驱赶此小人，不要让天下议论陛下逐君子易，逐小人难。奏疏上呈，彭龟年、韩侂胄均请求辞官，赵扩欲将 2 人一并罢免。陈骙进言："以阁门（指韩侂胄）去除经筵（指朱熹），如何告之天下?"不久，宫内批复，彭龟年免官，出任地方官，而韩侂胄却官升一级，进授保宁军承宣使，提举佑神观。给事中林大中、中书舍人楼钥上奏，以为此举不妥，赵扩却置之不理。自此韩侂胄尤为飞扬跋扈，无所顾忌。

为了在朝廷中孤立赵汝愚，亦使赵扩无所信赖与依靠，韩侂胄又使京镗升任参知政事，郑侨为同知枢密院事。十二月，工部尚书赵彦逾出任四川制置使。赵彦逾亦参预赵扩即位之谋，曾企盼赵汝愚能提拔自己，不料却令出任四川，不禁大为恼怒，遂投靠韩侂胄。待他上殿辞行时，竟上书陈述朝臣姓名，统统指为赵汝愚党徒。且对赵扩表示，老奴将辞行，方敢向陛下讲明此事。赵扩因此而疑心赵汝愚。

为了尽早将赵汝愚排挤出朝，韩侂胄找来京镗商议。京镗认为，赵汝愚为赵氏宗族成员，只须诬陷他阴谋危害国家，即可以达此目的。不久，韩侂胄即有意荐举秘书监李沐为右正言。李沐曾请求赵汝愚擢升自己，但遭拒绝而怀恨在心。他一上任，即按韩侂胄的旨意，上奏称赵汝愚以宗室同姓位居宰相，恐不利于国家。宋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扩下诏，罢免赵汝愚右丞相，改授观文殿大学士，出任知福州。谢深甫等人对此又论说，乞请将赵汝愚彻底免官、治罪。终使赵扩再改授赵汝愚为提举洞霄宫。

韩侂胄将赵汝愚排挤出朝后，仍不罢休，又进一步打击迫害支持与同情赵汝愚的官僚。一日，赵扩于讲堂听讲经时，向侍奉的官员征询："谏官中有人议论赵汝愚，如何？"堂上官员多不置可否。兵部侍郎章颖上奏，请求宋帝宣谕赵汝愚，不使他辞官而去。国子祭酒李祥亦认 赵汝愚甘冒被诛之险，使赵扩登极为帝，如今却蒙冤免官，令后世议论。知临安府徐谊与国子博士杨简上书，恳请留任赵汝愚。结果均为李沐所弹劾，指责他们同为赵汝愚党羽。不久，均遭贬斥。四月，太府寺丞吕祖俭上书，陈述赵汝愚精忠之心，认为罢免朱熹、彭龟年不当。因此得罪韩侂胄，被贬，流放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太

学生杨宏中、周端明、张衙、林仲麟、蒋傅、徐范6人入宫上书，亦请求朝廷留任赵汝愚、章颖、李祥、杨简，罢免李沐。但赵扩却下诏，以造谣惑众，动摇朝廷之罪，将6人分送距京城500里外安置。中书舍人邓驲上奏，请求宽容6名太学生。韩侂胄对此置之不理。一时间，朝中数十名官僚因此而被免官或降职。

在对赵汝愚及其支持、同情者进行打击迫害的同时，韩侂胄极力于朝中培植和发展自己的势力，将诸多亲信和党徒安插在显要之位。郑侨升任参知政事，京镗为知枢密院事，谢深甫为签书枢密院事。韩侂胄之流惧怕自己的倒行逆施为世人所不容，凡与己意见不合者，皆斥责为"道学"之人。后又斥"道学"为"伪学"，以此为罪名，网括赵汝愚、朱熹门下知名之士，企图一网打尽，为此而不择手段。韩侂胄授意御史中丞何澹，诬陷赵汝愚为"伪学罪首"。另一党羽、监察御史胡纮亦上言，称赵汝愚率领奸伪之徒，图谋不轨，且诬陷他有"十不逊"。赵扩轻信谗言，下诏降赵汝愚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于永州（今属湖南）安置。赵汝愚临行之前，告诉儿子们："观侂胄之意，必欲杀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④韩侂胄唯恐赵汝愚日后有被重新起用之时，遂密令知衡州事钱鍪，设法处死他。宋庆元二年（1196）正月，赵汝愚行至衡州（治今湖南衡阳），染病在身。钱鍪对他百般羞辱、刁难，致使赵汝愚病情恶化去世。世人皆知其冤。赵扩下旨追复赵汝愚官职，准回葬家乡。但此诏令却被中书舍人吴宗旦扣押，退回宫中。

此后，在韩侂胄的策划下，京镗又升任右丞相，谢深甫为参知政事，郑侨为知枢密院事，何澹为同知枢密院事。吏部尚书叶翥（zhù铸）竭力迎合韩侂胄之意，上奏称："伪学魁首，

以一人窃据君主权柄，蛊惑天下。”乞请将朱熹语录悉尽除去。宋廷遂令科举考试中，凡有涉及义理者，悉归另册，不予录取。又定《六经》、《论语》、《孟子》、《中庸、》《大学》诸书为禁书，不准传习。叶翥又让吏部侍郎倪思上书论说“伪学”，倪思不从。韩侂胄因此荐举叶翥为签书枢密院事，而罢免倪思官职。

左丞相余端礼对韩侂胄之流尽斥正直之士，于朝中为所欲为，极为不满，终日闷闷不乐，便借口有病，辞官而去。韩侂胄继而又荐举何澹为参知政事，更牢固地把持了朝政。

尽管如此，韩侂胄仍自感后患无穷，变本加厉清除赵汝愚、朱熹等人的影响，彻底翦除正直之士。八月，太常少卿胡纮上书称：“近年来，伪学猖獗，图谋不轨，诋毁、败坏圣德，险酿大祸。仰仗二三位大臣、台谏官悉力排斥，方使首恶者丧命，余众收敛恶迹。”建议让伪学徒退归乡里，反省自责。赵扩随即下令，伪学党徒交由宰执负责。由此对道学的禁令日趋严厉。不久，又有人议论伪学祸患，要求杜绝伪学根源。于是赵扩再下诏，令各监司、帅守荐举任命或改授官员时，须于奏牒前奏明此人非伪学之徒。乡试时，各转运司须先向举人索取家状，上须书“系不是伪学”五字。唯有抚州（今属江西）推官柴中行向转运司申报时，却书：“吾自幼习《易》，读程氏《易传》，不知是否‘伪学’？如是伪学，则不愿应试。”士人皆以为其胆大。

台谏官为讨好韩侂胄，皆以攻击“伪学”为己任，却无一人敢先行发难，又惧怕触犯“清议”，未敢公开贬斥朱熹。为此韩侂胄大为不悦，便以陈贾曾攻击朱熹，擢升他为兵部侍郎。三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入朝拜见赵扩，声言前日

"伪党"，今日已变为"逆党"。韩侂胄听罢，欣喜异常，当日即授刘三杰为右正言。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书，请赵扩令尚书省门部造簿，辑录"伪学党人"及受其荐举提升官员姓名，选择时机发落。赵扩应允，尚书省及六部遂将获罪的"伪学逆党"之人登记在册，内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四名首犯，以及朱熹、徐谊、彭龟年等，共五十九人。凡列入"逆党"名籍者，皆予处罚。凡与他们有关系者，则一律不准为官或参加科举考试。韩侂胄之流对异己者的打击和迫害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五年正月，韩侂胄令蔡琏诬告赵汝愚等人有异谋之心，且陈述其宾客所言多达七十纸。蔡琏曾获罪，被赵汝愚擒获后黥面，故怀恨在心，投靠韩侂胄。赵扩下诏，再削夺前起居舍人彭龟年、曾三聘等人所任官职，而提拔蔡琏，授进义副尉。韩侂胄仍不满足，企图将彭龟年、曾三聘、徐谊、沈有开四人投入大理寺治罪。范仲艺极力抗争，韩侂胄方罢休。是年，赵扩为韩侂胄加爵少师，封平原郡王。

六年闰二月，京镗、谢深甫升任左、右丞相，何澹为知枢密院事。不久，京镗卒。何澹则因与韩侂胄意图相悖，遭罢免。

伪学之祸，虽出于韩侂胄排除异己，以达个人私欲之目的，然却是京镗首谋。及京镗死，何澹等人相继被罢免，韩侂胄亦感此事稍有不妥，欲加更改，以平息朝廷内外议论。张孝仁认为，不弛"伪学"之禁，恐日后有报复之祸。莆田令陈景思亦劝说韩侂胄不应太过分。韩侂胄以为此议有理，遂同意弛"伪学"之禁。宋嘉泰二年（1202）二月，下令追复赵汝愚为资政殿学士，朱熹为待制。周必大复少傅，留正复少保，皆返

回朝廷。其他官员，如徐谊、刘光祖、陈傅良等人，亦先后恢复官职。又删除科举及荐举官员奏文中“不系伪学”一节。“伪党”之禁遂告解除。

注　释

①②《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

③《宋史》卷三九三《黄度传》。

④《宋史》卷三九二《赵汝愚传》。

开禧北伐

宋嘉泰三年（金泰和三年，1203），宋廷遣邓友龙使金，得知漠北蒙古不堪金朝压迫，举兵反金。金廷派兵镇压，屡为所败。次年，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入朝，向赵扩上言，称金国必亡，请求朝廷对金备战。而此前，金使入宋，肆意侮辱南宋君臣，甚至不肯依原定礼仪与宋帝相见。赵扩恼羞成怒，返身退回宫中，不愿屈辱接受金朝国书。后虽金使不得不让步，仍按原定礼仪向宋帝进书，但赵扩已对金朝的盛气凌人及南宋所处的屈辱地位深有所感，希望能摆脱这一窘境。

时韩侂胄控制朝政。他欲为己立“盖世功名”，遂以抗金相号召。因此而得到主战派辛弃疾、叶适、陆游等人的赞赏与支持，赵扩亦支持韩侂胄的抗金政策。一时间，宋廷内外抗金呼声甚高，在舆论推动下，韩侂胄开始了北伐前的备战。七月，下令殿前司督造战舰。十月，又令两淮地区诸州于冬季农闲之时，教阅民兵弓弩手。宋廷备战的举动，立即引起金廷的不安，担心宋廷乘蒙古于北边作乱之机，发兵入攻，遂于金宋边境屯聚粮草，增加戍边兵士，且关闭襄阳（今湖北襄樊）榷

场。宋、金边境局势再度紧张。

四年四月，宋廷于镇江府（今江苏镇江）为韩世忠建庙。五月，追封岳飞为鄂王。武学生华岳上书，劝谏朝廷不宜对金用兵，恐因此引起边境争端。韩侂胄将他流放至建宁府（今福建建瓯）编管。宋开禧元年（金泰和五年，1205）五月，金遣使入宋，责问宋边民侵入金境及宋边增兵戍卫之事。十二月，金再遣赵之杰出使宋朝，贺次年正旦节。然而进见宋帝赵扩时，态度极为蛮横。赵扩气愤之极，韩侂胄遂请赵扩先退入内宫。又令金使改期至正旦日朝见宋帝。为此著作郎朱质上书，请求斩杀金使。赵扩未应允，而是以金使态度傲慢无礼，将馆伴使、副使以下官员分别给予处罚。赵扩虽未处置金使，然而宋、金间积怨日深。

七月，宋帝下诏，以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位于左、右丞相之上，总揽军政大权。不久，又授予他国用使之职，总领朝廷财政大权。二年四月，赵扩与韩侂胄部署抗金北伐，以薛叔似为兵部尚书、湖北京西宣抚使，邓友龙为御史中丞、两淮宣抚使，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郭倪为镇江都统兼知扬州、兼山东、京东路招抚使，鄂州都统赵淳兼京西、北路招抚使，皇甫斌兼京西、北路招抚副使。与此同时，为使北伐顺利进行，赵扩亦对朝廷内外的主和派给予打击，下令追论主和派重要人物秦桧投降误国之罪，追夺其王爵，命礼官改定其谥号为“谬丑”。此外，宋廷再调拨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之兵，支援淮东，以增加淮东地区的兵力。

郭倪受命后，即遣部将毕再遇、镇江都统制陈孝庆领兵进攻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泗州城分东、西二城，毕再遇

欲取东城而佯攻西城，随即攻占东城，西城亦投降。郭倪因而授毕再遇刺史衔。毕再遇坚决推辞说："国家河南八十有一州，今下泗两城即得一刺史，继此何以赏之?"随后江州统制许进收复新息县，光州忠义军首领孙成攻占褒信县（今河南新蔡南）。五月，陈孝庆又入据虹县（今安徽泗县）。但江州都统王大节统兵进攻蔡州（治今河南汝阳），遇守城金军顽强抵抗，宋军溃败而还。宋军首战即获局部之利。宋廷视此为北伐的有利时机，韩侂胄遂请宋帝赵扩下诏伐金。宋军全线出击，对金军展开猛烈攻势。

然而宋军北伐缺乏认真的准备及训练，韩侂胄志大才疏，所委任将领中大多无抗金斗志，有些竟是主和投降派。而金廷对宋军的北伐却有所提防，宋军用兵之初，金军采守势，伺机反攻。宋朝北伐战争全面展开后，金军即全线反击，宋军相继溃败。皇甫斌领兵进攻唐州（治今河南唐河），为金军所败。兴元都统秦世辅出兵至城固县，未及交战即军中大乱。郭倪派池州副都统郭倬、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合兵进攻宿州（治今安徽宿县），亦为金军所败。毕再遇奉命率480名骑兵为先锋，攻取徐州（今属江苏），途中遇自宿州溃败的宋军，仍督军进兵。行至灵壁，又见陈孝庆亦准备退兵，毕再遇慷慨而言："宿州虽不捷，然兵家胜负不常，岂宜遽自挫！吾奉招抚命取徐州，假道于此，宁死灵璧北门外，不死南门外也。"①毅然继续进兵。逢招抚使郭倪下令退兵，毕再遇又担当断后，击退5000余骑金军追击，使郭倪所部得以全军退回泗州。韩侂胄因宋军出师不利，免去邓友龙两淮宣抚使之职，而以江南东路安抚使丘崈为刑部尚书、两淮宣抚使。丘崈曾主张抗金雪耻，然对韩侂胄北伐却不支持，他奉命进驻扬州（今属江苏），

部署诸将驻防，只令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驻扎于长江沿线的军队，分别驻守于长江、淮河地区要塞之处，以为防御之计，而无进击之意。

八月，金廷于汴京（今河南开封）部署反攻完毕，以平章事仆散揆为统帅，领兵分9路南下攻宋。随后，金廷又征集河南壮丁17万入淮南，10万入荆襄，以补充金军兵力。十月，金军全线出击：仆散揆亲统行省兵3万出颍（治今安徽阜阳）、寿（治今安徽凤台）；元帅完颜匡率军25000人出唐、邓（治今河南邓县）；河南路统军使纥石烈子仁领兵3万出涡口（今安徽怀远）；左监军纥石烈胡沙虎带兵2万出清河口（今江苏淮安北）；左监军完颜充将关中兵1万出陈仓（今陕西太白西北）；右都监富察贞领岐（治今陕西岐山）、陇（治今陕西千阳）兵1万出成纪（今甘肃天水）；蜀汉路安抚使完颜纲率汉、蕃步骑1万出临潭（今甘肃临洮南）；临洮路兵马都总管石抹仲温统陇右步骑5000出盐川（今陕西陇西西）；陇州防御使完颜璘带兵5000出来远（今甘肃武山西南）。纥石烈胡沙虎所部自清河口渡淮，进围楚州（治今江苏淮安）。不久，纥石烈子仁攻占滁州（今属安徽），富察贵攻破西和州（治今甘肃西和）。金军大举南侵，连克京西地区诸州县，宋军节节败退，招抚使赵淳竟下令焚樊城（今湖北襄樊），弃城而逃。而宋廷又委丘崈为签书枢密院事，负责督视江淮军马。

金帅仆散揆统兵至淮河，派人秘密测得八叠滩水浅，可涉水而渡。随即令部将奥屯骧领兵进击下蔡（今安徽凤台）佯称渡淮。宋守将何汝励、姚公佐误以为真，调集重兵戍守，以备金军渡河。仆散揆见宋军中计，遂派部将赛不等领兵秘密自八叠滩涉水过河，驻扎于淮河南岸，何汝励等未料金军已改由他

路南渡，不及提防，故一战即溃。金军遂攻陷宋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又进兵驻扎于瓦梁河（今江苏六合西），以控制真州（治今江苏仪征）、扬州诸路之要冲。

十二月，金帅纥石烈子仁率兵进攻真州。真州守军达数万人，金兵分散渡河，绕至宋军背后，突然进攻。宋军不备，2万士兵战死，宋将刘挺、常敬思、萧从德等被俘。真州陷落，百姓渡江逃生者多达10余万众。金军再进攻六合（今属江苏）。郭倪急令前军统制郭僎领兵前往救援，郭僎率军于胥浦桥与金军遭遇，不敌而败。郭倪闻讯，即弃扬州而逃。

当宋军全线溃败之时，唯有毕再遇统所部抗金屡立战功。金将纥石烈胡沙虎进围楚州，时任镇江副都统制的毕再遇奉命急赴楚州解围，他令统制官许俊领一支人马，疾驰淮阴（今属江苏），焚毁金军粮草，3000金兵惊扰奔逃。金军兵临江北后，毕再遇即率军急赴六合救援。他入六合城后，偃旗息鼓，伏兵南门，置弓弩手于城上。金军攻城，城上弓弩齐射，旗帜招展，战鼓大作，伏兵出击。金军不料于此遭遇宋军劲旅，大败而逃。金将完颜蒲辣都集10余万兵自成家桥、马鞍山进围六合。毕再遇指挥六合守军顽强抵抗，不久宋军箭矢射尽，无法射杀金兵。毕再遇急中生智，令兵士张执青盖于城上往来奔走。金兵见状，以为宋军统兵官巡城至此，遂相继向青盖射箭，宋军因此而得箭20余万支。围城金军营帐长达30余里，声势浩大。毕再遇令宋兵于城上奏乐，以示闲暇，同时令宋军分股不时袭击金营，致使金军昼夜不得安宁，被迫撤兵。宋军趁机追击，于滁州大败金兵。缴获金军马匹及物资无计。后遇大雨雪，宋军停止追击，返回驻地。

不久，宋廷以毕再遇为镇江都统制，兼山东、京东路招抚

司公事。时楚州被围已3月之久，城中军民坚守城池，奋勇抗击，而城外金军营寨环列，长达60里。毕再遇遂派部将领兵分道出击，金军见毕再遇所部前来解围，不免怯战，撤围而去。

开禧三年（金泰和七年，1207）二月，宋廷以知建康府叶适兼沿江制置使。此时金军已重兵进逼长江北岸，宋军前线告急文书纷沓而至。然叶适仍治事如平时，一面募兵过江，袭击金兵，一面安置流民，筹办军需。凡军队所需，皆从官府支付，而不侵扰百姓，且部署军队驻防井井有条，十分缜密。因而民心安定，抗金斗志高昂。

宋廷此次北伐及抗击金军南侵的战争，虽一度因宋军多数将领怯敌，望风溃逃，导致形势危难，然而东线在毕再遇所部的顽强抗击下，金军主力一再受挫，损失惨重，金军勇将抹然史挖搭亦于和州（治今安徽和县）为宋军所击毙。中路金军六围襄阳（今湖北襄樊），皆为守城宋军所击退，而金军兵士患病甚多，被迫退兵北撤。而西线虽发生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路招抚使吴曦的叛变降金，然而在众多爱国将领的反对下，终于平定叛乱。金军因此亦未在西线得逞。故宋、金双方于战场上势均力敌。

韩侂胄在主战派官僚的支持下，兴兵北伐，然当北伐失利，金军大举反攻，兵临江北之际，宋廷中的主和派随之蠢蠢欲动。早在部署北伐用兵之时，江淮宣抚使丘崈即表示反对与金宣战，甚至提出将由何人承担首先用兵的罪责。及至金军南侵未能得逞，金廷有议和之意时，丘崈复上书，请求朝廷致书金帅仆散揆，以求议和。且声称金人指责韩侂胄为此次兴师征伐的罪魁祸首，建议暂时将他免职，以满足金廷的要求。韩侂

胄因此将丘崈罢官。不久金军统帅仆散揆病故，宋廷主和派视此为议和契机，再举求和之议。韩侂胄因北伐受挫，迫于形势压力，亦决定与金议和，遂选定萧山县丞方信孺为奉使金国通谢国信所参议官，持文书前往金军。

方信孺行至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东），被金将纥石烈子仁投入狱中，断其粮、水，威逼他应允金廷所提割让两淮；增加岁币；归还叛逃宋境人口；犒赏金军银两；杀韩侂胄，献其首级谢罪的五项议和条件。方信孺毫不屈服，纥石烈子仁将他送至汴京（今河南开封）。金左丞相完颜宗浩坚持五项条件，方信孺据理力争。完颜宗浩遂让他返回宋朝再议。此后方信孺再度出使金朝，仍未能使金廷的议和条件如愿。但韩侂胄却因金提出割首级谢罪之事，恼羞成怒，竟罢免方信孺官职。

韩侂胄遂中止与金议和，又欲兴兵征战。朝廷上下为此忧心忡忡，皇后杨氏与韩侂胄有宿怨，因使皇子、荣王赵曮上疏，称再启兵端，将不利于社稷。又请求让其兄杨次山择群臣中可信任者，谋划革除韩侂胄。礼部侍郎史弥远亦入见宋帝赵扩，力陈形势紧迫，请处死韩侂胄，以使国家安定。赵扩遂应允。史弥远得密旨，告之参知政事钱象祖、李壁，且说明赵扩旨意："韩侂胄久任国柄，轻启兵端，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可罢平章军国事。"②又令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领兵300，以为防卫。次日，韩侂胄入朝，行至途中即被夏震呵住。夏震令兵士簇拥着韩侂胄，行至玉津园侧便将其杀害。赵扩下诏，将韩侂胄之罪告示朝廷内外。随后史弥远升任礼部尚书，再擢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再迁参知政事，直至右丞相；钱象祖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再迁左丞相；夏震为福州观察使、主管殿前司公事。

以史弥远为首的主和派竭力排挤、迫害韩侂胄一派。安远军节度使领阁门事苏师旦为韩侂胄军事幕僚，遭罢贬后又被杀害。叶适等一批抗金将领亦相继逐出朝外，流放岭南（今广东）。为了讨好金朝，又恢复秦桧生前的爵位及赠谥。

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1208）正月，右司郎中王柟出使金朝求和，金帝完颜璟要求宋廷送交韩侂胄首级，可赎回淮南之地。王柟返回宋朝，禀告金帝之意，赵扩遂令文武百官议论此事。吏部尚书楼钥认为：一个奸诈、违法作乱的死人头颅，有何可惜。赵扩下诏，令临安府刨棺，割取韩侂胄及苏师旦头颅，且于两淮地区悬挂示众。

不久，王柟即携韩、苏两人首级送给金军，以易为金军所侵淮、陕之地。又与金订立和议："依建康故事，改金、宋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岁币由绢、银各20万匹两，增至各30万匹、两；宋另付犒军银300万两；宋、金仍维持原定边界。史称"嘉定和议"。此后，金帝完颜璟即令完颜匡等将领撤兵，派使臣入宋，归还宋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及濠州。

嘉定和议签订后，以史弥远为首的主和派极力对金朝妥协投降，南宋统治陷入了更黑暗、更腐朽的境地。

注　释

①《宋史》卷四〇二《毕再遇传》。

②《宋史》卷四七四《韩侂胄传》。

两宋

吴曦之叛

吴曦（1162——1207），宋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著名抗金将领、信王吴璘之孙。以祖荫补右承奉郎。宋淳熙五年（1178），改授武翼郎。累迁高州刺史。绍熙四年（1193），任濠州团练使。庆元元年（1195）冬，由建康军马都统制升任知兴州，兼利西路安抚使。四年，再迁武宁军承宣使。自绍熙年间，宋廷以吴曦祖孙三代于四川为将，恐结成地方势力而将他调离四川后，吴曦则以为自家世代戍守西蜀，而成为国家西部的屏障，如今自己却于四川之外任官，极不得志。遂依附韩侂胄，贿赂大臣，希望能重返四川，镇守蜀地。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何澹觉察到吴曦心怀异志，以为不可让其回川任官韩侂胄竟将何澹免官。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陈自强收受吴曦贿赂极多，遂极力向韩侂胄荐举吴曦，可令他还官西蜀。不久，宋廷便委吴曦为兴州都统制，兼知兴州，吴曦终于如愿以偿。从政郎朱不弃致书韩侂胄，称吴曦不可统领川蜀之师。韩侂胄毫不理会。

吴曦赴任所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后，即诬陷副都统制王

大节，将其罢免。此后，吴曦始终空闲副都统制一职，兵权悉归入吴曦一人之手。宋开禧二年（1206），赵扩下诏伐金，委程松为四川宣抚使，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仍知兴州，允许他“便宜行事”。自宋高宗赵构绍兴末年以来，多由朝廷下达川蜀地区赋税征收总额，且下文书通告宣抚司，负责收敛后上缴朝廷。而韩侂胄以兴师北伐为由，将赋税征收总额交由宣抚司制订，宣抚副使有权节制督察。因此财赋之权又归吴曦掌握。不久，吴曦又兼任陕西、河东招抚使。

时程松将官衙迁移至兴元（今陕西汉中），统领川蜀东军3万．吴曦则进驻河池（今陕西凤县东北），统领川蜀西军6万，且仍控制地方财赋，督察转运司，遂益发专权，即使程松亦不得干预。程松欲以执政的礼节与吴曦会面，便令他前来公堂参拜。吴曦刚行至程松驻地，得知程松意图，竟掉头返回。程松自川蜀东、西军中为自己精心挑选了1500名兵士，作为卫兵。吴曦闻讯，即从中抽走一大批兵士，程松对此毫无觉察。

吴曦既已得志，便与其族弟吴晛（音现），以及亲信徐景望、赵富、米修之、董镇等人一道阴谋反叛。且秘密派遣心腹姚淮源赴金，表示愿献出阶（治今甘肃武都东南）、成（治今甘肃徽成西北）、和（治今甘肃和县西）、凤（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关外四州之地，以求金廷封其为蜀王。此时，宋军北伐在即，韩侂胄企盼吴曦能迅速进兵陕西。梁州（治今陕西凤县）、洋州（治今陕西洋县）抗金义军已袭击且攻占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兴州正将李好义亦率兵于七方关击败金军。然而吴曦非但不出兵，反而与金军相勾结，破坏抗金。

金军进犯西和州（治今甘肃和县），部将王喜、鲁翼率兵

阻击。交战正激烈时，吴曦忽然传令退守黑谷，顿时军中大乱，宋军遂溃败。吴曦又下令焚毁河池城，退守青野原。既而再退守鱼关，于此招集忠义军，给予优厚赏赐，以收买众心。此时他已秘密将心腹派入金军，告之宋军动向。而宋军将士全然不知，待与金军遭遇，殊死相拼，却终为金军所歼。兴元都统制毋思率重兵戍守大散关，使金军进兵不得。吴曦下令将戍守蓦关之兵撤回，金军遂由版闸谷绕至毋思所部背后，前后夹击，毋思不敌，弃关退兵。金军随即占据大散关，吴曦复退驻于罝（音举）口（今陕西略阳西）。吴曦一味退守的反常举动，亦引起人们的猜疑。举人陈国饰投书朝廷，指出吴曦将叛宋降金，却未引起韩侂胄等人的重视。

十二月，金将完颜纲秉承完颜璟旨意，派张存于罝口见吴曦。吴曦声称愿意归附金廷。张存向吴曦索取宋廷命官的凭信，以报之金廷。吴曦遂将全部官告悉交张存，且献出阶州。不久，完颜纲奉金帝之令，遣马良显持诏书、金印至罝口，册封吴曦为蜀王。吴曦秘密接受金帝册命，随即回到兴州。次日，吴曦于营中召集幕僚属官议事，谎称东南已失守，赵扩已逃至四明（今浙江宁波），扬言如今当权宜处事。众人无不惊恐失色。部将王翼、杨骙之强烈反对此举，认为："如此，则相公八十年忠孝门户，一朝扫地矣。"①吴曦对此表示自己主意已定。随后即派任辛持表章入金，进献四川地图及吴氏家谱，以示归附。

出营帐后，吴曦径直来到甲仗库，又召集兵士将官，告之降金之事。部将禄禧、褚青、王喜、王大中等皆称贺听命。吴曦随即面北受印，自称蜀王。且令徐景望为四川都转运使、褚青为左右军统制，率军直趋益州（今四川成都），夺取总领所

仓库。四川宣抚使程松得知吴曦叛变，竟丢弃兴元而逃。

宋开禧三年（1207）正月，吴曦派部将利吉引金兵入凤州，将阶、成、和、凤四州之地正式割让给金廷，且与金朝划定，双方以铁山为界。随后他于兴州正式称王登位，改治所为行宫。吴曦派人将自己叛宋称王之事告伯母赵氏，赵氏气愤之极，不再与之来往。其叔母闻讯，昼夜号哭，骂不绝口。其族子吴僎为兴元统制，见吴曦所颁檄文，心中亦愤愤不平。

其族弟吴晛为吴曦出谋划策，当任用川蜀地区名士以收买民心。吴曦遂竭力招揽官吏名流，然多有不从。随军转运使安丙被委以丞相长史，权行都省事。安丙无计摆脱，遂表面接受官职而暗中伺机倒戈。大安军杨震仲誓死不从，饮药而亡。部将陈咸自削已发，史次秦自瞎己目，王翊、家拱辰等拒不接受任命，杨修年、詹久中、李道传、邓性善等人索性弃官而去，薛九龄等则暗中积极谋划举义兵反击吴曦。

吴曦既称蜀王，遣董镇赴成都为自己营建宫殿，准备自兴州迁入其中。自程松逃遁，其所统3万军队为吴曦兼并。加之吴曦所统7万人马，共拥兵10万。吴曦将10万军队分别隶属10统帅统领。令禄祁、房大勋戍守万州（治今四川万县），且驾战船下嘉陵江，扬言将与金军夹击襄阳（今湖北襄樊）。禄祁旋即领兵至夔州（治今四川奉节），派兵扼守筑于巫山的得胜、罗护等寨，以阻止宋军入川。

吴曦反叛，宋廷束手无策，有人建议因势亦封吴为蜀王，以招纳之。知镇江府宇文绍节以为：吴曦伪官僚佐中，安丙绝非依附叛逆者，定能伺机讨伐叛贼。韩侂胄即密信告安丙：若能为国平定吴曦之叛，即赏赐授官。

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积极策划讨伐叛逆。他秘密与吴曦部

将张林、朱邦宁及忠义之士朱福等人共议此事。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徐梦锡得知后，遂告之随军转运使安丙。时安丙称病在家闲居，他委托程梦锡致书杨巨源，请他来自己卧室面议。杨巨源应邀赴约，对安丙直言道："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适逢兴州中军正将李好义与其兄李好古结交军士李贵、进士杨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数十人，商议翦除吴曦。李好义亦欲请安丙为主谋，且派李坤辰约请杨巨源与之共举义兵。杨巨源前往李好义帐中，相约举兵之事，又回复安丙。安丙大喜，出面主持此事，令杨君玉等人起草密诏，以便事成之后宣读。

二月一日深夜，李好义率70名勇士，以利斧破门，闯入吴曦蜀王宫中。杨巨源随其后，手捧密诏，骑马入宫，且自称奉命入宫。吴曦欲夺门逃，李贵迅速冲入室中，砍下头颅，随即骑马飞报安丙。杨巨源宣读诏书，城中军民齐拜，欢声震天。之后，杨巨源等手执吴曦头颅，于城中安抚百姓。安丙分遣将士搜捕吴曦亲信死党，将其二子及叔父吴柄、弟吴晫、族弟吴晛、贼党姚淮源、李珪、郭仲、米修之、郭澄等皆斩杀。不在城内的党徒，亦派人前往诛杀，从而将吴曦党徒全部处死。

韩侂胄致安丙的密信尚未送达，吴曦已被诛。赵扩令将吴曦首级送临安（今浙江杭州），且令处死吴曦妻、子，追夺吴曦之父吴挺官爵，其亲属为官者，一律除名。又将吴曦之祖吴璘的子孙，全部迁出四川，仅保留吴璘庙。

吴曦反叛平息后，杨巨源、李好义等将领趁势进兵抗金。李好义率众攻城，亲自冒着矢石指挥，人人乐死，以少击众，一举收复西和州，守将完颜钦弃城逃窜。张林、李简攻克成

州，刘昌国夺回凤州，孙忠锐攻占大散关。吴曦割让给金廷的四州一关，复为宋军所据。然而杨巨源、李好义虽力倡平叛，终因其官职低，而无法控制四川局势，只得将四川的军政大权拱手交给安丙。安丙上奏朝廷，言平叛吴曦之事，却未及杨巨源、李好义之功。不久，宋廷委以安丙为四川宣抚副使。时李好义欲乘胜攻取秦陇，安丙却令他们谨守故疆，不得侵越。

李好义领兵攻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与金将术虎高琪交战，战败撤军，返回驻地。吴曦旧将王喜遣其党羽刘昌国至西和州，听李好义节制。一日，两人欢饮达旦，李好义突然心腹暴痛而亡。刘昌国逃遁。入敛时，见李好义口鼻手指均呈青黑色，系毒药所致。百姓闻讯，无不悲痛。宋廷虑王喜叛变，竟授之节度使衔，改任荆鄂都统制。

不久，宋廷奖谕诏书至沔州（治今陕西略阳），安抚司参议官仅授通判职，而王喜却授节度使。杨巨源心中不平，安丙却告杨巨源正欲谋反。又令王喜将杨巨源亲信全部治罪。此时，杨巨源率兵于凤州长桥与金军激战，不敌而败。安丙派兴元都统制彭辂拘捕杨巨源，武装押解至阆州（治今四川阆中）监狱。行至大安（今陕西宁强北）龙屋滩，安丙使樊世显将杨巨源杀害。

注 释

①《宋史》卷四七五《吴曦传》。

两宋

史弥远“更化”

宋开禧三年（1207）十一月，平章军国重事韩侂胄举兵北伐失利，金军全线反攻，大兵进逼长江北岸之际，宋廷中主和派复出，秉承金廷旨意，以诛杀韩侂胄作为议和的重要条件。

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史弥远的投降求和行径，曾激起宋廷内外广大军民的愤慨与反对。抗金名将，镇江都统，权山东、京东路招抚司公事毕再遇不满朝廷葬送抗金成果，随即请求解甲归田，以示抗议。军校罗日愿刺杀史弥远，未成而惨遭杀害。尽管主和派为世人所痛恨，然而方失去韩侂胄等人支持的宋帝赵扩又不得不依靠刚控制了朝政的主和派，遂以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又兼参知政事。在主和派的把持和控制下，主战派再度受排挤。南宋政局愈发黑暗、腐朽。

史弥远执政后，为蒙蔽世人，打出“更化”的旗号。太学博士真德秀曾上言：“抑善谋国者不观敌情，观吾政事，今号为‘更化’，而无以使敌情之畏服，正恐彼资吾岁赂以厚其力，乘吾不备以长其谋，一旦挑争端而吾无以应，此有识所为寒

心。”因而建议:“今日改弦更张,正当褒崇名节,明示好尚。”①史弥远正利用“褒崇名节,明示好尚”的舆论,竭力笼络人心,掩人耳目,以实现自己独揽朝政的野心。

首先,宋廷追复曾被韩侂胄排挤、迫害致死的原左丞相赵汝愚的官爵,仍为观文殿大学士,且追谥忠定。又令史官改写绍熙年间(1190——1194)韩侂胄主持朝政时的事迹。三月,又恢复秦桧的王爵和谥号。此后,又陆续召回及任用曾遭韩侂胄罢贬,放逐的官员及名流,给朱熹追赠谥号“文”,且封赠官爵。又封赠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官爵及谥号,重新恢复及提高了理学的地位。一时间,伪学党人彭龟年、杨万里、吕祖俭等人虽已故去,仍或追赠爵位、谥号,或录用其子孙后代。

史弥远凭借翦除韩侂胄之流的功绩,仰仗杨皇后与皇子赵询等人的势力,于朝廷上日益骄横无忌,为所欲为。赵询被册封为太子后,史弥远随即出任兼太子詹事,后改任兼太子宾客,进封伯爵。不久又迁知枢密院事,进奉化郡侯兼参知政事,继而再擢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兼太子少傅,进封开国公,直至兼太子少师。史弥远于朝中拉拢亲信,培植党羽,“馈赂公行,薰染成风,恬不知怪”②,致使南宋政局腐败成风,奸佞(nìn)当道。

宋嘉定十三年(1220)八月,皇太子赵询病故。史弥远积极寻找皇位继承人,以为凭藉。因赵扩无嗣,他借立沂王赵柄后代的名义,暗中选择宋朝宗室中可立为童子者,作为备用人选。适逢其府中的童子先生余天锡欲回乡参加科举考试,史弥远极器重他,便嘱托他在居住于越州(治今浙江宁波)的宋朝宗室中,挑选贤良忠厚者,开具名单报给自己。余天锡乘舟抵

越州西门，遇大雨，暂栖全保长家避雨。全保长设酒食款待，席间有二位小童侍立于侧。余天锡询问两童何人，全保长告之，为自己的外孙、燕懿王赵德昭后代、荣王赵希瓐之子赵与莒、赵与芮。待余天锡返回临安（今浙江杭州），告诉史弥远。史弥远即令将二童带来京城，见面后，史弥远十分满意，又恐此事泄露，便让二童先回家暂住。

嘉定十四年（1221）六月，宋帝赵扩认为太子尚未册立，便依高宗故事，令选择太祖赵匡胤十世孙、年龄15岁以上者，入宫教养。史弥远见时机已到，又派余天锡赴越州，秘密告之全保长，速将二童送交其父荣王赵希瓐家中抚养。余天锡便将赵与莒、赵与芮带入临安城。不久，赵扩册立沂王赵柄之子赵贵和为皇子，更名竑。而以赵与莒为秉义郎，更名为赵贵诚。

赵贵诚稳重寡言，循规蹈矩，深得史弥远钟爱。而赵竑对史弥远胡作非为则深恶痛绝，史弥远知他难以驾驭，遂于其身边安插亲信爪牙。赵竑好鼓琴，史弥远便将一位擅长鼓琴的美人送给他。美人聪明狡黠，很快博得赵竑的宠爱，然而其举动悉为史弥远所知。时杨皇后与史弥远控制朝政，朝中权臣要员尽为其徒。赵竑对此愤愤不平，常于几案上书写杨皇后、史弥远的劣迹，称："史弥远当发配至8000里外。"又曾手指绘于宫中墙上舆地图中的琼（治今海南琼山南）、崖（治今海南三亚）州，声称："吾他日得志，置史弥远于此。"③且呼史弥远为"新恩"，意指今后非将史弥远流放至新州（治今广东新兴）或恩州（治今广东阳江）不可。史弥远得知，恐惧万分。

史弥远于赵扩面前百般诬陷、诽谤赵竑，企图促使赵扩废除他，而另立自己所扶植的赵贵诚。史弥远又与国子学录郑清之相勾结，令他兼任王府教授，直接训导和扶助赵贵诚。

嘉定十七年（1224）八月，史弥远乘赵扩病危之际，矫诏册立赵贵诚为皇子，赐名为昀。闰八月，赵扩病逝，谥号宁宗。史弥远使外戚杨谷、杨石等人，向杨皇后请求罢废赵竑，册封赵昀为帝。杨皇后以为不可。杨谷等人一夜七次出入后宫，反复游说，杨皇后始终不允。杨谷、杨石跪地哭泣道："朝廷内外皆有改立赵昀之心，若不应允，恐将生祸患，杨氏家族即无生存之望。"在他们的胁迫下，杨皇后被迫答应罢废赵竑，以赵昀继位。史弥远闻讯，火速派人召赵昀入宫，领他至赵扩灵柩前即位。随后，才召赵竑入宫。史弥远再次矫诏称："以赵竑为开府仪同三司，封济阳郡王，出宫居住湖州（治今浙江吴兴）；尊杨皇后为皇太后，垂帘听政。"

赵昀即位，是为宋理宗。史弥远擅自废立，于朝廷内外极不得人心。他一面极力以官爵、俸禄收买天下之士，劝说赵昀褒表老年儒士。赵昀遂下诏，以傅伯成为显谟阁学士，杨简为宝谟阁学士，两人均辞谢不受。一面则排斥异己，堵塞言路，任用亲信、党徒，作为帮凶，以牢固控制朝政。

宋宝庆元年（1225）正月，湖州人潘壬及其弟潘丙、族兄潘甫，组织太湖渔民和巡尉兵卒，夜闯湖州城，强行黄袍加身，拥立赵竑为帝，潘壬等人又打开府库，尽散金帛、会子犒军。知湖州谢周卿亦率官吏前来祝贺。潘壬于城门张贴榜文，历数史弥远罪行。济王赵竑知此事难成，派人报告朝廷，同时率州兵讨伐潘壬。潘壬兵败出逃，潘丙、潘甫被杀。史弥远得知湖州作乱，即遣殿前司军将彭壬领兵前往镇压。彭壬赶到湖州，乱已平息。然史弥远却因此事更加忌恨赵竑，便于宫中谎称赵竑有病，令余天锡召医生赴湖州为他诊治。余天锡到湖州，即传旨逼迫赵竑于州衙悬梁自尽。之后，余天锡却上报朝

廷，称赵竑因病身亡。不久，赵昀下诏，追贬赵竑为巴陵郡公。

赵竑之死，引起朝野愤慨。起居郎魏了翁、金部考功员外郎洪咨夔相继上书，认为赵竑之死甚冤。礼部侍郎真德秀入宫对策时，更为赵竑鸣冤，且恳切希望宋帝能以此自责。大理寺评事胡梦昱上书，言济王赵竑不当废去，且引晋国太子申生、汉戾太子及宋秦王赵廷美为证，语辞恳切、直率。史弥远令监察御史李知孝弹劾胡梦昱，将他除官，流放象州（治今广西象县），不久即去世。面对朝廷中越来越多的议论，史弥远不禁又气又恼，寻机报复。

适逢梁成大因知县任期已满，欲求史弥远提拔。遂自告奋勇，声称自己若能进入御史台，定能办成此事。史弥远擢升他为监察御史。自此梁成大与李知孝、莫泽同为史弥远鹰犬，凡有忤主子者，三人必定攻之。他们对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等交相弹劾，致使朝中名人贤士几乎尽遭贬斥。世人视他们为“三凶”，称梁成大为“成犬”。史弥远见朝中名士尽逐，恐为世人所诅，便又召有时望者入朝，然应召者寥寥无几，或居家称病，或有意拖延，甚者有屡召不至者。以至李知孝上奏称，当计算路程，规定时间，令受召者限期入朝。即使如此，依然无人理睬。

梁成大、李知孝等一伙鹰犬、走狗，不遗余力地为史弥远排除异己，因此而得以加官晋爵。在以史弥远为首的官僚集团统治下，宋廷对金廷一味屈服妥协，而对百姓疯狂掠夺。史弥远以权纳贿，货赂公行。曾大量印行新会子，不以金、银、铜钱兑换，只许以旧会子兑换新会子，且令旧会子折价一半，致使会子充斥，币值跌落，物价腾踊，民不聊生。而梁成大、李

知孝之流更是贪污受贿，巧取豪夺，“侵欲敛积，不知纪极”，甚至将“四方赂遗，列寘堂庑，宾 至则导之使观”④，毫无廉耻之心。

宋帝赵昀深知自己登极，是史弥远一手操纵而成，故即位后，对他极为感激。对他于朝廷上的所作所为，亦十分清楚，但又十分惧怕。赵昀在位已 10 年，仍甘当傀儡，拱手将朝廷大政交史弥远。宋绍兴六年（1233）十月，史弥远病重，乞请退出政界，赵昀仍下诏给予优厚礼遇，特授保宁、昭信军节度使，充醴泉观使，进封会稽郡王。八天后，史弥远病故。赵昀悲痛不已，为他辍朝三日，特赠他“中书令”，追封卫王，赠谥号“忠献”。且令户部支赙赠银绢数千两、匹，用于祭奠。史弥远自宋宁宗赵扩在位时，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独相长达十七年。谋立赵昀为帝，又独相九年。二十六年间，史弥远“擅权用事，专任憸壬”⑤，却受恩宠终身。

史弥远死后，赵昀方始“亲政”。为更改史弥远执政时不得人心的所作所为，赵昀下诏，明年改元“端平”，以示更化。这一举动，立刻引起史弥远亲信、党徒的极度恐慌。“三凶”之一、给事中莫泽急于开脱罪责，遂攻击梁成大“暴狠贪婪，苟贱无耻”。赵昀下诏，夺其官俸。然而不久，御史台臣即弹劾莫泽“贪淫忮害”，因而被罢官。史弥远走狗爪牙间的相互攻击、拆台，暴露了其间相互利用，尔虞我诈的实质。诸多早已对史弥远之流不满的官僚，遂群起而抨击。昔日依仗史弥远，肆无忌惮的亲信、党徒，或因“仇视善类，谄附弥远，险忮倾危”，或因“纳赂弥远，怙势肆奸”⑥，皆相继被罢官。其中“三凶”等罪大恶极者，更是一贬再贬。

与此同时，赵昀下诏，对遭史弥远之流陷害而身亡的名士

及官僚赐谥赠官，且录用其子孙。又召回、重用大批名流贤士，其中真德秀、魏了翁等人相继应召回朝。朝廷内外盼望能迅速扭转腐败黑暗的政局，而对他们寄予厚望。然而以真德秀为首的名流贤士，虽名望甚高，却乏治国之术。真德秀“正当世道安危升降之机”，竟然“略无一语及之”⑦，终未能改变政局。

注　释

①②《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③《宋史》卷二四六《镇王竑传》。

④《宋史》卷四二二《李知孝传》、《梁成大传》。

⑤《宋史》卷四一四《史弥远传》。

⑥《宋史》卷四一《理宗纪》。

⑦《宋元学案》卷八一《西山真氏学案》。

贾似道专权

宋绍定六年（1233），为相26年的史弥远病死，赵昀方得以亲政。其时，北方蒙古正大举南下攻金，金廷危在旦夕。宋以右丞相郑清之为首的主战派，建议乘此时机，发兵北上收复河南之地，据守黄河。而以史弥远侄、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史嵩之为首的主和派，却极力反对出兵。其后，蒙古军灭亡金朝，进而继续南下攻宋。宋廷中战和之争依旧议而不决，其间，赵昀相继任用主战、主和派官僚为宰相，却终无大作为。

宋宝祐三年（1255），赵昀任用参知政事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董槐早年曾习孙武、曹操兵法，且以收复中原为己任。他建议宋廷当像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样，重振宋朝国威。为此而向赵昀进言："外有敌国，则其计先自强。自强者人畏我，我不畏人。"①他为相后，欲扭转宋廷腐败政局，在进言中认为，危害朝政有三种情况，其中首要的即为皇亲国戚、达官显臣不奉法，故应重法令，以制裁不法者。董槐的主张遭到权贵们的强烈反对，赵昀虽任董槐为相，自己却独揽朝政，对朝中正直之士竟认为无中意者，反而喜欢奸佞之人，他更为宠

幸的是阎贵妃及其党羽丁大全、马天骥等人。侍御史丁大全凭仗宋帝恩宠，于朝廷上“窃弄威权”，他遣门客欲私下结交董槐，遭拒绝后，便怀恨在心。董槐入见宋帝，极言丁大全之奸，却为赵昀所包庇，丁大全于是对董槐更加忌恨。

宝祐四年，丁大全弹劾董槐。罢免董槐的诏书还未下，丁大全竟于半夜调集百余名兵士包围董槐府第。以御史台牒迫令董槐离家，且用车载他到大理寺，欲以治罪恐吓他。直至将董槐拉至北关外，弃于郊外。董槐走回城中，罢相之令刚下达。丁大全于是气焰更为嚣张。不久，丁大全升任右谏议大夫，改授签书枢密院事，进升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自此控制朝政，而宰相则形同虚设。宝祐六年（1258），丁大全先是升任参知政事，不久又擢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宋开庆元年（1259），终因藏匿蒙古攻宋军情而遭弹劾罢相。后被流放至海岛。宋景定四年（1263），丁大全乘舟前往贬所，行至藤州（治今广西藤县西）时，被押送的将官毕迁推入水中，溺死。

丁大全罢相后，赵昀又以贾似道为右相。此时，两淮宣抚大使贾似道正统兵驻扎于汉阳（今湖北武汉），以援应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宋军抗击蒙古军的进攻，因而于军中升任右丞相。

贾似道（1213——1275），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其父贾涉官至制置使，以荫补嘉兴司仓。其姐入宫为赵昀宠爱，立为贵妃。贾似道因此屡受擢迁，自太常丞、军器监，至知澧州。贾自小游手好闲，及得恩荫，更“恃宠不检，日纵游诸妓家，至夜即燕游湖上不反”②。自淳祐元年（1241）始，贾又改授湖广总领，加户部侍郎，以宝章阁直学士出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再迁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加

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又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此时贾似道年方30岁。宝祐二年（1254），又升任同知枢密院事，再迁参知政事，历知枢密院事，改任两淮宣抚大使。贾似道青云直上，“威权日盛”，即使是丞相董槐亦惮其威。

宋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蒙哥汗分兵大举攻宋，自己亲统大军入攻川蜀，令皇弟忽必烈攻鄂州，鄂州告危，赵昀急令贾似道入援。时已为右丞相的贾似道于蒙古军攻城愈急之时，竟秘密派遣使臣宋京诣忽必烈军中请和，且许以称臣，划江为界，岁奉银、绢各20万两、匹。适逢蒙哥于围攻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时，死于城下，忽必烈急于北返争夺汗位。贾似道闻讯，再遣宋京赴蒙古军中请和，忽必烈方应允，达成和议。

蒙古撤兵后，贾似道隐瞒求和之事，而谎称大捷，上奏朝廷。赵昀信以为真，以其“有再造功”③，遂以少傅、右丞相兼枢密使召入朝，从此专制朝政近17年。

宋景定元年（蒙古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登极称帝，是为元世祖。随即遣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等人持国书入宋，准备依此前所订和约，要求宋廷履行承诺。此时，贾似道正令人撰写《福华编》，为虚构的鄂州大捷歌功颂德，而朝廷内外皆不知有议和之事。贾似道恐事情败露，遂密令淮东制置司将郝经等使者拘禁于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忠勇军营之中，不使之赴临安（今浙江杭州）。

此时的南宋政局已是“如江河之决，日趋日下而不可挽”④。宋景定四年（1263），贾似道推行公田法，将浙西官民户逾限田产，抽三分之一回买，以充公田。且规定每亩回买官价为160贯至200贯，但实际却低压田价，价值1000贯一亩的良

田，只支付40贯，而且其中一半以官诰、度牒充值，另一半则以“会子”充数。贾似道为达聚敛之目的，甚至将数户少地的民户，并为一户，使之逾限，再强令回买。而官吏们则以多买“公田”为功，强行搜括，凡不肯回买者，即施以酷刑。致使浙西民户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公田法之行，仅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江阴军（今江苏江阴）、安吉州（治今浙江吴兴）、嘉兴（今属浙江）、常州（今属江苏）、镇江（今属江苏）六郡，共回买公田350余万亩。

公田法推行后，物价暴涨，民间怨声载道，御史台、谏院官员及太学生纷纷上书，言公田不便。贾似道则上书反驳，且以“罢政”要挟宋帝。又令京兆尹刘良贵治罪太学生，将他们黥面发配。而赵昀反而宽慰贾似道：“今公私兼裕，一岁军饷，皆仰于此。使因人言而罢之，虽足以快一时之议，如国计何？”⑤在宋帝的支持怂恿之下，贾似道更是有恃无恐。

宋景定五年（1264）十月，赵昀病故，太子赵禥（qí其）继位，是为度宗。贾似道以有定策功，更加专横跋扈。他每有朝拜，赵禥必要回拜，且称之为“师臣”，而不呼其名。文武百官则皆称其为“周公”。贾似道权欲熏心，对此仍不满足。待宋理宗入葬后，他竟弃官而去，又令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向朝廷报称蒙古军进攻下沱。宋廷大惊，急召贾似道回朝。贾似道回到朝廷，欲以端明殿学士充太师衔。依宋朝典故，太师衔须有节度使之称，宋帝因此授之镇东军节度使，贾似道为之大怒，说：“节度使粗人之极致尔。”⑥宋咸淳三年（1267），贾似道见仍未授权独掌朝柄，便提出致仕，还乡休养。赵禥及朝臣为此慌了手脚，“大臣、侍从传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赐赍者日十数至”，甚至夜晚“即交卧第外以守之”⑦。最

后只好授他太师，特授平章军国重事，且于西湖边葛岭为他建造府第。贾于葛岭大起楼台亭榭，作“半闲堂”，建“多宝阁”，终日淫乐其中。

贾似道既操权柄，却不赴中书堂治事，每天让吏员抱文书到其府第，而大小朝政，一切悉交予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处理。宰执们更无权过问，只能于文书末尾署名而已。贾似道虽身居府第，朝廷上台谏弹劾、诸司举荐官员，以及京城、京畿地区的财政收支等一切事务，凡事先不请示他，则无人敢执行。朝臣中稍有违其旨意者，则严加训斥；重者则罢官免职，终身不予录用。一时间，朝中正直之士被贾似道贬逐殆尽。他收受贿赂，贪婪无度。官吏争相纳贿以求美职。由是贪风大行。贾似道为巩固自己的权位，更以赏赐官爵收买和拉拢官吏，赵禥亦对他奈何不得，下令，许贾似道入朝不拜。而退朝时，赵禥要起身避席，目送贾似道出朝后，方能坐下。

宋咸淳四年（1268），蒙古帝忽必烈派兵再度南下攻宋，且选择襄阳（今湖北襄樊）为突破口。蒙古兵进击襄阳，襄阳随即被围困，战事危急。贾似道依然不闻不问，凡有告急文书送抵，皆秘而不闻，朝臣中有言边事者，辄加贬斥。襄阳久遭围困，已隐瞒不得，为掩人耳目，贾似道一面向宋帝上书，请求率兵前去救援，一面指使御史台、谏院中的党羽上书阻留。监察御史陈坚等人为给贾似道解脱，甚至荒谬地提出，让太师领兵出征，“顾襄未必能及淮，顾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运天下为得”⑧。由于贾似道一伙的阻挠与破坏，襄阳被围五年，宋廷始终未认真组织救援，宋咸淳九年（1273），襄阳、樊城陷落。贾似道则又为自己推卸责任，“臣始屡请行边，先帝皆不之许，向使早听臣出，当不至此尔”⑨。

襄、樊失守，朝廷内外为之大震。群臣纷纷上书，陈述救亡之策，其中亦指责朝廷失策不当之处。太府寺丞兼权侍右郎官陈仲微上书言：当今“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唯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为也。转败为成，在君相一念间耳”⑩。贾似道为之恼怒，遂将他贬出朝，任江东提点刑狱。京湖安抚制置使汪立信于襄阳被围之时，曾上疏提出，“今天下之势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为虞”。并上挽救危亡三策，一为强兵御敌，二为以议和为缓兵之计，如二策皆不采用，则下策为投降丧国。贾似道得书大怒，摔于地上，大骂道：“瞎贼狂言敢尔!”⑪后又将汪立信罢官。

咸淳十年（1274）七月，赵禥病故，贾似道遂拥立赵昀子，时年仅四岁的赵㬎（xiǎn 显）为帝，是为恭帝。是时，元军已攻陷鄂州，宋廷急令各地起兵“勤王”。贾似道为舆论所迫，不得已方于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抽调诸道精兵13万，出师应战。然而他的出兵是“金帛辎重之舟，舳舻相衔百余里”⑫。行至芜湖（今属安徽），贾似道下令，释放所俘元军将领曾安抚，请他携带荔枝、黄柑返回元军，送交元军统帅，左丞相伯颜，且告之，待宋廷使臣宋京前往元军，仍依开庆年间所约，以称臣、岁输币为议和条件，但遭到伯颜的拒绝。贾似道见求和不成，只得将所部七万兵士交步军指挥使孙虎臣统领，驻扎于池州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夏贵以战船2500艘横亘于长江之中，贾似道自将后军屯驻于鲁港。

二月，宋军先锋姜子才领兵攻元军，不料主将孙虎臣却弃军而逃，宋军于是溃败。贾似道仓皇自帐中跑出，惊呼道：“虎臣败矣!”急忙召来夏贵商议计策。不久，孙虎臣逃入贾似道营帐中，哭诉道：“吾兵无一人用命也。”夏贵却在一旁微

笑，贾似道忙讨教计策，夏贵认为，如今诸军已是丧魂落魄，又如何与元军作战？因而建议贾似道退守扬州（今属江苏），招募溃散兵卒，再迎宋帝泛舟于海上。夏贵随即解舟而去。贾似道与孙虎臣随后亦乘单舸逃奔扬州。次日，宋军溃败兵士沿江而下，竟将长江江面遮蔽严实。贾似道忙派人登上江岸，挥舞旗帜，以招揽散兵，却无一人登岸，只有恶语谩骂。贾似道又令诸州长官登舟泛海上迎候宋帝，又上书赵㬎，请迁移都城，在贾似道退却投降策略之下，各州县长官纷纷弃官而逃，朝野一片混乱。

贾似道祸国殃民的行径，激起朝廷内外的愤慨。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陈宜中、侍御史陈过、监察御史潘文卿、季可等朝臣，相继上奏，请求罢免，乃至治罪贾似道。宋帝赵㬎及太后谢氏仍以“似道勤劳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礼”⑬为由，不肯从重发落贾似道，而将其幕僚、党羽翁应龙处死，廖莹中、王庭等人罢官。后在朝臣再三请求下，才将贾似道罢免，贬至婺州（治今浙江金华）安置。婺州百姓知贾似道将至，聚集一起张贴榜文，以示驱逐。监察御史孙嵘叟等人皆以为处罚太轻，上言不止。遂改徙贾似道至建宁府（今福建建瓯），又为朝臣所反对。直至最后，贬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循州（治今广东龙川）安置。

福王赵与芮素恨贾似道，遂招募能杀贾似道者，派他负责押送贾似道至贬所。县尉郑虎臣欣然请行。待出发时，随从贾似道的侍从妾女尚有数十人，郑虎臣将他们全部逐走。且夺其宝玉，撤去轿盖，使贾似道暴露于秋日之下。又命轿夫吟唱杭州（今属浙江）歌，嘲讽贾似道。并直呼其名，百般羞辱之。八月，郑虎臣押解贾似道行至漳州（今属福建）木绵庵，欲逼

其自杀。贾似道不肯就此结束自己性命，辩解道："太皇许我不死，有诏即死。"郑虎臣说："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⑭遂将贾似道杀掉。

注　释

①《宋史》卷四一四《董槐传》。

②③《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④《宋史》卷四二〇《王伯大传》。

⑤⑥⑦⑧⑨《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⑩《宋史》卷四二二《陈仲微传》。

⑪《宋史》卷四一六《汪立信传》。

⑫⑬⑭《宋史》卷四七四《贾似道传》。

两宋

宋蒙江淮之争

宋绍定五年（金开兴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1232），蒙古军大举南下攻金，金军屡遭挫败，河南大部州县旋为蒙古军所占。十二月，金帝完颜守绪离汴京（今河南开封），逃至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南）。窝阔台汗派使臣王檝（jí及）入南宋，提议联合出兵灭金。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奉宋帝赵昀之命，复遣邹伸之赴蒙古，与蒙古达成协议，双方联合用兵金朝，灭金之后，蒙古将河南之地归还宋朝。

宋绍定六年（金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蒙古军入据汴京，继而兵进归德府，金帝完颜守绪逃入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应蒙古之约，宋遣进勇副尉孟珙与江海率军二万赴蔡州。十二月，宋、蒙两军合攻蔡州。逾年，正月，宋军破南门，宋、蒙军遂入城，金帝完颜守绪自缢身亡，新帝完颜承麟为乱军所杀，金亡。

是年十月，史弥远病故，赵昀亲政。灭金后，蒙古背约，未归还河南之地，而许以蔡州与陈州（治今河南淮阳）为界。宋廷无奈，只得应允。未几，蒙古退兵北还。宋廷臣僚多欲趁

此机会，出兵进取开封（今属河南）、洛阳（今属河南），以占据河南之地，而后迫使蒙古承认既成事实。

宋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六月，淮东制置使兼知扬州赵葵，沿江制置副使兼淮西制置副使赵范相继主张收复三京（指原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西京洛阳府〈今河南洛阳〉），戍守黄河，据守关隘。右丞相郑清之力主北征之说，未作任何准备，即轻率派兵北上。他先令知庐州全子才集淮西军万余人进击开封。时汴京守将崔立常欺侮部下，深为都尉李伯渊、李琦等将所忌恨。闻全子才领宋军将至，遂设计杀崔立，献城降宋。随后，宋将赵葵亦率五万淮西军自滁州（治今安徽滁县）攻取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北），继而北上进兵汴京。七月，宋军占据汴京，另遣钤辖范用吉领13000兵西攻洛阳，以淮西制置司机宜文字徐敏子充任监军，以杨谊率15000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强弩手为后援，各发给五天口粮。徐敏子于宋军出发后，又令和州宁淮军将张迪率200士兵先趋洛阳。此前，蒙古守军已退兵，张迪抵达洛阳城下，城中民众300余户登城投降。张迪与随后赶到的徐敏子、杨谊等统兵入城。宋军仓促北进，粮草不济，徐敏子等到达洛阳第二天，军粮已所剩无几，杂以野菜充饥，等待后援。

宋军用兵河南，引起蒙古的关注。窝阔台汗立即召集臣下商议，旋派塔思率军南下反击。杨谊所领援军于距洛阳30里处，遭蒙古军截击，溃败而逃。蒙古军随即兵进洛阳城下，搭建营寨。徐敏子率宋军与蒙古军交战，各有胜负。然因宋军乏粮，以屠宰战马充饥，难以继续坚守城池，徐敏子遂下令自洛阳撤兵。赵葵、全子才入据汴京后，亦不得后援粮草，而宋军

所收复州县多为空城，无粮可食，乃只得下令撤兵。南宋朝廷大举出兵，欲收复中原的企图遂告破产。

南宋用兵河南恰为蒙古帝国所利用，成为出兵攻宋的借口。十二月，窝阔台汗遣使臣王檝入宋，责问宋廷出兵败盟之事。赵昀等即派邹伸之等为通好使，入蒙古求和。宋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正月，宋廷再以宁淮军统制程芾为通好使，浙西路兵马钤辖王全为副使，入蒙古议和。但这丝毫不起作用，六月，窝阔台汗令蒙古军分三路南侵，以其子阔端率西路蒙古军自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入攻四川；以其子曲出率中路蒙古军南攻襄阳（今湖北襄樊）、郢州（治今湖北钟祥）；以将领口温不花率所部，自东路进攻江淮地区。蒙、宋由此爆发全面战争。

中路蒙古军于七月入攻唐州（治今河南唐河），守将全子才弃师而逃。十月，蒙古军将塔思率军攻陷枣阳（今属湖北）。库春统兵入攻襄阳、邓州（治今河南邓县）。随后塔思又领军进攻郢州。郢州城临汉水，且城池十分坚固，蒙古军遂大量建造木筏，用以攻城。宋蒙两军激烈交战，宋郢州守将、江陵统制李复明力战阵亡，郢州军民继续顽强抗击蒙古军进攻。蒙古军久攻不下，便于城郊掳掠百姓及牛、马数万，撤兵而去。

宋端平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1236），窝阔台汗派兵增援曲出，继续南侵。三月，襄阳宋军内讧。其中北军主将王旻、刘伯渊尽焚城郭仓库，降于蒙古。城中尚存 47000 余官民、30 万财粟及兵器、金银盐钞，悉为蒙古军所得。不久，蒙古军又入侵均州（治今湖北郧县西南）、房州（治今湖北房县）等州县。四月，蒙古军再攻陷随州（治今湖北随县）、郢州 2 州和荆门军（今湖北荆门）。十月，蒙古军进兵江陵（今

湖北荆州)，宋守将李复光战死。宋廷遣建康府都统制，主管侍卫马军行司公事孟珙领兵前往救援。此时中路蒙古军分兵两路：一部进攻复州（治今湖北沔阳），一部于枝江、监利县编造木筏，以渡江南侵。孟珙先遣部将张顺渡江，自己率主力随其后。孟珙令兵士变换旗帜和服装颜色，循环往来。夜晚则令兵士手持火炬，以至于江面通明，长达数十里。待接近蒙古军时，孟珙则派部将赵武等与之交战，自己亲自指挥，连破蒙古军 24 寨，夺回被掳掠的 2 万人，使中路蒙古军遭受了自进兵以来的重大挫折。

东路蒙古军于宋端平二年十月进兵淮西，攻占固始，继而围攻光州（治今河南潢川），且分兵西取信阳（今河南信阳南），东进安丰（今安徽寿县）、合肥（今属安徽）、滁州（治今安徽滁县）。未几，主帅口温不花应召回朝，东路蒙古军由察罕继任统领，又进兵真州（治今江苏仪征）。真州知州丘岳治军严明，率城中军民早已作好迎敌准备。蒙古军屡攻城均遭顽强抵抗，败阵退下。宋军乘胜出击，于胥浦桥又击溃蒙古军。丘岳指挥守城兵士于城西设伏，且备有大量炮石。蒙古军再攻城，伏兵突然出击，一时间炮声大作，炮石横飞，蒙古军顿时大败。丘岳连夜偷袭蒙古军营帐，蒙古军被迫撤兵。东路蒙古军的南下自是被遏制。

西路蒙古军于端平二年冬，自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东北）入攻西川，陷沔州（治今陕西略阳），知州事高稼遇害。宋制置使赵彦呐得知沔州失陷，乃率兵进驻青野原。阔端指挥蒙古军围攻青野原，宋将曹友闻率兵救援，半夜猛攻蒙古军。阔端战败后，又令先锋汪世显转攻大安（今陕西宁强北），曹友闻再率军前往援救，大败蒙古军。蒙古军只得退兵，曹友闻随即

率领所部屯守于仙人关（今陕西略阳北）。

宋端平三年九月，蒙古军统帅阔端率军再次入攻四川，令军将穆直领所部出阴平，自己率主力出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约定会师成都（今属四川）。阔端所部攻占武休关后，克陷兴元（今陕西汉中），欲进攻大安军（今陕西汉中西）。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竟令曹友闻放弃据守沔阳（今属四川）、仙人关，前往大安军抗击蒙古军。曹友闻抗争不得，遂率军与蒙古军激战，战败，曹友闻阵亡，阔端所部长驱直入，进兵四川。

穆直所统蒙古军相继攻占宕州（治今甘肃宕昌）、阶州（治今甘肃武都）后，兵进文州（治今甘肃文县）。知州刘锐、通判赵汝曏率城中军民7000余人，奋力抗击，与蒙古军昼夜激战，坚守一个多月，却未得宋廷援兵。蒙古军久攻不克，有告密者称城中无井，穆直遂令兵士断入城水道，于是城中断水。刘锐知城池难以据守，自己必死无疑，便令家人饮毒而亡。未几，城池失守，刘锐及其二子自刎，赵汝曏惨遭杀害，城中数万军民亦被杀戮。穆直随即率军入川，与阔端合兵，攻陷成都。适逢蒙古军中路主帅阔出死于军中，消息传来，阔端遂率西路蒙古军放弃成都，撤军北还。成都又为宋军所据。

宋嘉熙元年（蒙古窝阔台汗九年，1237）十月，窝阔台汗再令口温不花、察罕等将领统兵南侵。蒙古军相继克陷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复州（治今湖北天门），击败南宋水军。又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克蕲州（治今湖北蕲春）、随州（治今湖北随县），进攻黄州（治今湖北黄冈）。宋军迎战失利，宋将孟珙领援兵赶至，冲入城中。孟珙亲临城楼指挥，终击退敌军。口温不花遂令蒙古军移师转攻安丰军（今安徽寿县）。宋安丰军守将、知军事杜杲早已修缮城池，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蒙古军以火攻烧城，杜杲令兵士冒着炮火及时加以修补。口温不花见城防固若金汤，便于死罪囚徒充军者中招募敢死之士，许以凡攻城勇猛者可赎罪免刑。令他们砍伐木材，以架梯攻城。杜杲遂召集军中善射兵士，令以小箭专射蒙古兵双目。蒙古兵多中箭，旋败退。口温不花又令兵士填城濠，筑成27坝。杜杲指挥宋军死守濠坝，击退进攻。蒙古军乘风势放火，宋兵冒风火奋力冲杀，战斗异常激烈。正在此时，宋池州都统制吕文德率援军突破蒙古军重围，冲入城中，与杜杲合兵抗击蒙古军的围攻。口温不花见蒙古军久攻不下，屡遭挫败，只得退兵而去。此后，蒙古军又多次用兵南侵，前锋曾直抵长江北岸，但在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下，均未能继续推进。

宋嘉熙二年，蒙古窝阔台汗复遣王楫为使臣，入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向赵昀提出贡纳岁币银20万两、绢20万匹的议和条件。宋参知政事，督视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军马史嵩之力主和议。签书枢密院事李宗勉上言反对议和。宋廷对此议而不决。

九月，蒙古主将察罕复统兵，号称80万，南下围攻庐州（治今安徽合肥），欲于巢湖造船，进逼江南。察罕令兵士于庐州城濠外筑土城60里，穿越两重濠沟，所使用的攻城器械亦较之安丰战役时多了数倍。守卫庐州城正是指挥安丰保卫战的杜杲，他率领军民拼死抵抗。蒙古军筑坝高于庐州城，以居高临下，便于攻城。杜杲即令兵士向草束浇油，扔至坝下燃烧，将坝烧得滚烫。又于串楼内竖起7层雁翅，架炮轰击坝上。蒙古兵顿时惊诧不已，杜杲立即指挥宋军出击，蒙古军仓皇逃走，杜杲率宋军追击至数十里之外。战后，杜杲又积极训练水军，扼守淮河，且令其子杜庶部署吕文德、聂斌等将领于要害

之处，以精锐之兵设伏。察罕见此情景，知难以进兵，遂领兵北撤。宋帝赵昀因此下诏，令杜杲为淮西制置使。

不久，宋廷任命孟珙为京西、淮北路制置使，且令其收复襄阳（今湖北襄樊）。孟珙认为“必得郢然后可以通馈饷，得荆门然后可以出奇兵”①，因此指授方略，发兵深入，传檄江陵节制司发兵进击。不久，军将张俊收复郢州，贺顺克复荆门军。十二月，宋将刘全先后出击冢头、樊城（今湖北襄樊北）、郎神山，战胜蒙古军。宋嘉熙四年（1239）三月，孟珙指挥宋兵出击，与蒙古军三战皆胜。军将曹文镛领军收复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刘全收复樊城，遂进而收复襄阳。不久，刘全又遣谭深领兵攻占光化军（今湖北均县东南），息州（治今河南息县）、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守将相继投降宋军。从而取得自宋、蒙战争爆发以来的最大的胜利。

襄阳、樊城收复后，孟珙认为收复此城不难，据守则很难。他上奏指出：“襄樊为朝廷根本，今百战而得之，当加经理，如护元气，非甲兵 10 万，不足分守。与其抽兵于敌来之后，孰若保此全胜？上兵伐谋，此不争之争也。”②因此，孟珙积极扩充军队，训练士卒，将蔡、息二州投降的兵士整编为忠卫军，又将襄、郢等州收降的兵士整编成先锋军。江、淮地区战事暂时得以平息。

注　释

①②《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两宋

四川战事

宋端平二年（蒙古窝阔台汗七年，1235），蒙古攻占成都（今属四川）。后因南攻江淮地区的中路蒙古军主帅阔出死于军中，西路蒙古军主将阔端遂放弃成都，率军北撤。

宋嘉熙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一年，1239）十一月，蒙古统帅塔海率军再度入攻四川。袭破成都后，又相继占领汉州（治今四川广汉）、邛州（治今四川邛崃）、简州（治今四川简阳西北）、眉州（治今四川眉山）、阆州（治今四川阆中）、蓬州（治今四川蓬安）、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以及遂宁府（今四川遂宁）、重庆府（今四川重庆）等大片土地，且继续向东推进。

宋枢密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鄂州孟珙认为蒙古军此举是欲经施州（治今湖北恩施）、黔州（治今四川彭水），进兵湖湘（今湖北、湖南）地区，因而在其驻守的长江中游地区作了充分的准备。他积储了10万石军粮，又派兵驻防峡州（治今湖北宜昌）、归州（治今湖北秭归）、施州等地，“增置营寨，分布战舰，遣张举提兵间道抵均州（治今湖北丹

江西北）防遏”①。

不久，传报蒙古军渡万州（治今四川万县）湖滩，形势极为危急。孟珙兄、湖北安抚副使、知峡州孟璟急致书孟珙，孟珙遂亲自统兵西上迎敌。孟璟亦率军于归州大垭寨迎击蒙古军，终于击退来敌。孟珙则遣部将刘义于巴东县（今四川奉节）清平村击败蒙古军。宋军随即收复川东重镇夔州。蒙古军被迫退兵，湖湘地区转危为安。

击退蒙古军的进犯后，孟珙上书宋廷，陈述长江上游备御之策，建议于长江上游部署“藩篱三层：乞创制副司及移关外都统一军于夔，任涪（治今四川涪陵）南以下江面之责，为第一层；备鼎（治今湖南常德）、澧（治今湖北澧县）为第二层；备辰（治今湖南沅陵）、沅（治今湖南芷江）、靖（治今湖南靖县）、桂（治今湖南桂阳）为第三层”②。且于峡州、松滋等地各屯守万余兵士，以水军隶属之。归州屯驻3000人，鼎、澧等州各屯兵5000。孟珙以此策防患于未然，然未及部署，即有探报蒙古军欲南犯襄阳，并于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境内积储木材，以备造船渡江之用。孟珙决定先发制人，先遣张汉英领兵出随州，任义领兵出信阳军（今河南信阳南），焦进领兵出襄阳（今湖北襄樊），分路扰其后方。又派王坚领兵潜入顺阳，放火焚毁蒙古军堆积的木材。孟珙估计蒙古军必于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屯积粮草，以备南侵之用，遂再遣张德、刘整分兵前往，又焚烧其军粮。孟珙此次出击，打乱了蒙古军南侵的战略部署，阻止了蒙古军的又一次南下。

宋嘉熙四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二年，1240）正月，窝阔台汗令张柔统兵，分数路入侵宋境。二月，蒙古军将领按竺儿率所部进击万州。宋水军乘数百艘战船，溯江迎战。蒙古军乘巨

筏顺流而下，且浮草舟于其间。两军交战，蒙古兵以弓弩发矢如雨，宋军于夔门（今四川奉节）战败，局势再度严峻。正值此时，宋廷授予孟珙为宁武军节度使，委以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不久又进封为汉东郡侯兼京湖安抚制置使，职掌长江中游及川东地区防务。孟珙赴任后，即招集淮西地区流散的原戍边、征战兵士359人，组成“宁武军”，交其弟孟璋指挥。又将收降的回鹘爱里八都鲁所部组成“飞鹘军”，且改爱里名为“艾忠孝”，令八都鲁任总辖，又请求朝廷授官予他。时，四川制置使陈隆之与副使彭大雅不协，相互上奏朝廷攻击对方。孟珙十分生气，认为：“国事如此，合智并谋，犹惧弗克，而两司方勇于私门，岂不愧廉、蔺之风乎？”③随即手书派人驰送两人。陈隆之、彭大雅得孟珙之书，遂丢弃前嫌，悉力治事。

孟珙积极革除四川政局之弊端，他将差除计属、功赏不明、减尅军粮、官吏贪黩、上下欺罔等弊政，逐条陈述，下颁诸州县，以示鳌革。不久，孟珙又兼任夔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当时，军中几无存粮，孟珙因此大兴屯田，征调民夫修筑围堰，再招募民夫耕种田地，发给粮种。自秭归（今属湖北）至汉口（今湖北武汉），共建有20屯，170庄，有田188280顷。为安定秩序，孟珙又创建南阳、竹林两书院，将流落到襄、汉地区的读书人安置其中就读。此后，孟珙派李庭芝权知施州建始县（今属湖北）。李庭芝于任所训练农民，教习战事，择其强壮者编入军中习武。一年后，境内民众皆知战守之法，善骑射。平时，置兵器于田头，耕田犁作；遇敌，则联兵出击。孟珙得知后，令诸州县效仿之。

宋淳祐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十三年，1241）十一月，蒙古塔海部将汪世显等率军又入攻四川，进围成都。宋四川制置使

陈隆之坚守城池10余天，发誓与城共存亡。但其部将田世显却暗中致书汪世显，欲叛宋降蒙。入夜，田世显打开成都城北门，迎蒙古兵入城，陈隆之一家数百口皆遭杀害。蒙古兵用囚车押解陈隆之至汉州城下，令其劝说汉州守将王夔献城投降。陈隆之高喊："大丈夫宁死勿降!"旋惨遭杀害。汉州宋军3000人出城迎战蒙古军，不敌，城被攻陷。王夔乘黑夜驱赶火牛，突围出奔，城中军民悉被杀戮。

蒙古一面以武力征伐，一面又施加政治压力，多次派遣使臣入宋"议和"。十二月，再遣月里麻思出使宋朝，商议罢兵和议，从行者70余人。行至淮上，宋守将以兵相威胁，扬言"若能降，官爵可立致"。月里麻思拒不从命，守将乃囚其于长河飞虎寨，蒙古的议和要挟未能得逞。

宋淳祐二年（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元年，1242），五月，蒙古军攻陷遂宁、泸州。七月，蒙古万户张柔自五河口渡淮，南攻扬（今属江苏）、滁、和（治今安徽和县）、巢等州。宋淮东忠勇军统领王温率领宋兵与蒙古军激战于天长县（今属江苏）东，24人阵亡。淮东告急，宋廷令孟珙援应。孟珙遣部将李得领精兵4000赴援，以其子孟之经监军。有探报侦知蒙古知京兆府也可那延和将领耶律朱哥率骑兵3000经商州（治今陕西商县），直取鹘岭关，出房州（治今湖北房县）竹山，进击三川（指四川山南、剑南、剑东南三路）。孟珙当即决定派部将王令领兵江陵（今属湖北），继而再进驻郢州。部将刘全领兵屯守沙市（今属湖北）。部将焦进领兵一千自江陵、荆门出襄阳。

不久，蒙古兵进入三川，战局异常紧张。孟珙下令各州县戍守长官，不得丢弃一寸土地。适逢权知开州梁栋因粮草匮

乏，请求撤兵返回。孟珙认为他是弃城。待梁栋到达夔州，孟珙派人斩其首示众。自此，诸将领严守命令，未敢有丝毫怠懈。蒙古兵至泸州，孟珙令重庆分司发兵援助，且遣部将张祥屯守涪州。十月，蒙古军连续进攻叙州（治今四川宜宾），宋帐前都统杨大全御敌阵亡。

四川战局再度紧张，宋廷为加强四川地区抗击蒙古军的力量，又委孟珙为四川安抚使兼知夔州，以淮东制置副使余玠为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宋帝赵昀且下诏：余玠任责全蜀，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从事。余玠在临安时，曾入朝进言："一或即戎，则指之为粗人。"甚至斥责为"哙伍"，因此希望赵昀改变重文轻武的风气，对文武之士一视同仁。及余玠赴任，孟珙知重庆军粮积储少，便自屯田粮中拨调10万石支援他。又遣部将晋德率6000兵士援应四川，以其子孟之经为策应司都统制，以配合余玠入川，抗击蒙古军的进犯。

其时，四川屡遭战火摧残，生产凋敝，社会秩序混乱，民不聊生。各路转运使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及驻军将帅各自发布号令，擅自提拔，委任官吏，全然不守朝廷法度，四川政局日益衰败。余玠到任，即着手大革弊政，慎重选拔官吏，于官署建招贤馆，广招人才。凡有文人至此，余玠皆倾心相接，量才任用。他又令兵士于利州（治今四川广元）、阆州大获山（今四川苍溪东南）上建造城堡，驻军戍守入川蜀之门户；于蓬州（治今四川仪陇东南）筑营山城（今四川营山）；于渠州（治今四川渠县）筑大良坪城（今四川渠县东）；重修嘉定府（今四川乐山）旧城；于泸州神臂山（今四川泸州东）建造城堡。同时又令各地依山营建城堡营垒，使之星罗棋布，

相互联系、策应，以发挥山地特长，使蒙古骑兵的优势受到遏制。尤其是余玠听取播州（治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建议，于合州（治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建城，而使宋军有据守入川之口的理想之地。宋军遂于新筑城堡中屯兵积粮，又移合州治所至钓鱼城内；移金州（治今陕西安康）治所于大获城，以扼守蜀口；移沔州治所于青居城；移利州治所于云顶城。且驻重兵于青居、钓鱼、云顶城，以控制嘉陵江、长江。

不久，宋廷又以余玠为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他委都统张宝治理军务，安抚使王惟忠治理财赋，监簿朱文炳接待四方宾客，皆井然有序。又"修学养士，轻徭以宽民力，薄征以通商贾"④。经过悉心经营，四川地区生产恢复、财赋充盈，社会秩序安定，军民人心稳定。

孟珙坐镇夔州，与余玠遥相呼应，有力地抗击了蒙古军的进犯，保障了京湖与四川间长江通道的畅行，使战局化险为夷。然而宋淳祐四年（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三年，1244），宋廷又以孟珙兼知江陵府。孟珙对此深为忧虑，认为："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缀我，上下流急，将若之何？珙往，则彼捣吾虚，不往，则谁实捍之？"⑤无奈，他只得移师江陵。

孟珙方至江陵，赵昀即下诏，调兵5000戍守安丰军（今安徽寿县），以援应寿春（今安徽凤台），孟珙遂派部将刘全领兵前往。继而，宋廷又令他分兵3000防范驻守于齐安的蒙古军进犯。孟珙认为无须派兵，当集中兵力，但宋廷不听。孟珙见江陵无险可守，下令于城近处修复11处关卡，远离城处修复10处关卡。于沮水、漳水中筑坝，令其绕城北入汉水，而于城外形成一片汪洋，使江陵城防得以加强。不久，宋廷又调

其所部5000人援应两淮宋军，再调5000人赴广西，孟珙兵力接连被削弱。蒙古军大将大纳遣杨全于荆门设伏兵，欲邀击宋军。孟珙侦知，告之于枢密院，且传檄两淮宋军防备，然无人重视。宋淳熙六年（1246），蒙古军将范用吉秘密通报孟珙，欲降宋，孟珙告之于朝廷，却又遭拒绝。为此，他叹息道："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⑥他一腔报国之心不得重视，遂忧郁而病，不久逝去。

余玠经略四川，使抗击蒙古军的实力大为增强，亦扭转了被动防御的局面。多次与蒙古军交战获胜。宋淳祐十年（蒙古海迷失皇后称制二年，1250）十月，余玠率领诸将巡视边防，出兵直捣蒙古军占据的兴元（今陕西汉中），与蒙古军将汪德臣、郑鼎所部遭遇，双方激烈交战，宋军无功而还。淳祐十二年（蒙古蒙哥汗二年，1252）十月，汪德臣率领蒙古军掳掠成都，进攻嘉定府。四川地区为之大震。余玠率领诸将乘夜黑之时，开关迎敌，蒙古兵不敌而退。宋宝祐元年（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军又屯兵于汉江，且侵扰万州，入攻西柳关。宋京湖都统高达调遣将士扼守河关，又统兵上山与蒙古军大战，直战至鳖坑、石碑港方撤兵。

四川地区形势好转，"自宝庆以来，蜀阃未有能及之者"⑦。余玠因此亦有自满骄傲之意。戎州（治今四川宜宾）军队欲推举统制姚世安为统领，而余玠正欲革除军队自举将领之弊，遂领3000骑兵至云顶山下，另派金某前去云顶城中接替姚世安。不料姚世安紧闭城门，拒绝交权。姚世安暗地通过关系向左丞相兼枢密使谢方叔求援。谢方叔遂于朝中声称余玠已失军心。又秘密告之姚世安，寻找可攻击余玠的借口，陈述给宋帝。宋帝赵昀由是疑惑。有谢方叔的支持，姚世安更有恃无恐，公然

恐，公然与余玠相对抗，余玠因此闷闷不乐。

余玠长期治理川蜀，凡上奏疏，言辞多有不严谨之处，宋帝对此常有不满。参知政事徐清叟乘机挑唆，宋帝乃下诏，以资政殿学士召余玠还朝。

七月，余玠接到诏书，心中极其不安，于一天夜里突然逝去，有人说是饮毒而亡。四川军民得知此讯，莫不悲哀至极。

余玠遭免官后，宋廷又以知鄂州余晦为四川制置使。然余晦入川后，与蒙古军屡战屡败，致使四川局势再度恶化。

注　释

①②③《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④《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

⑤⑥《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

⑦《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

两宋

合州保卫战

宋嘉熙四年（蒙古窩阔台汗十二年，1240），蒙古汗窩阔台发兵南攻宋境。蒙古军将按竺儿率所部进击万州（治今四川万县），于夔门（今四川奉节）大败宋水师。

二月，宋廷令枢密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兼知鄂州孟珙改任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京湖安抚制置使，负责长江中游及川东地区的防务。孟珙赴任后，积极治理、经营，部署抗击蒙古军的进犯。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为扼守入蜀通道，派部将甘闰于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城东10里的钓鱼山上筑寨堡，以抗击蒙古军的入侵。

宋淳祐二年（蒙古乃马真皇后称制元年，1242）十月，蒙古军再次大规模出兵攻宋。宋廷欲加强川东防务，遂以孟珙为四川安抚使兼知夔州，又以淮东制置副使余玠为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宋帝赵昀下诏：余玠任责全蜀，一应军行调度，权许便宜从事。宋播州（治今贵州遵义）人冉琎、冉璞兄弟，有文武之才，长期隐居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先后有诸多将帅征召他们，皆辞谢不受。及闻余玠为人忠贤，

即前往府上拜谒，余玠待之如上宾。两人经深思熟虑，向余玠上“西蜀之计”：“蜀口形胜之地莫若钓鱼山，请徙诸此，若任得其人，积粟以守之，贤于十万师远矣，巴蜀不足守也。”①余玠闻之大喜，随即将两人的计谋密报朝廷，且请求破格授官。赵昀遂下诏，以冉琎为承事郎、权发遣合州；冉璞为承务郎、权通判州事。迁徙合州城之事，悉委托兄弟2人操办。命令一下，官署哗然，众官吏皆以为不可行。余玠大怒：“城成则蜀赖以安，不成，玠独坐之，诸君无预也。”②不久，钓鱼城建成，余玠遂迁合州治所于城中，屯兵积粮，以控扼嘉陵江要冲。

宋淳祐十一年（蒙古海迷失皇后称制三年，蒙哥汗元年，1251）六月，蒙哥即汗位，是为宪宗。次年，蒙哥汗遣其弟忽必烈统领兀良合台等部蒙古军，南侵大理国。逾年，即灭大理。数年内，蒙古军占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形成对南宋王朝的包围，四川地区局势尤为严峻。

宋宝祐二年（蒙古蒙哥汗四年，1254）正月，蒙古军采取攻守相兼的策略，以经营四川，遂于利州（治今四川广元）、阆州（治今四川阆中）建造城堡，以此作为继续进攻宋境的据点及基地。

不久，宋廷以王坚任合州守将。王坚赴任所后，即组织军民大规模修城设防，而使钓鱼城防更为坚固。受蒙古军侵扰的陕南、川北百姓，为躲避战争及蒙古兵的残害，纷纷南逃，其中众多难民迁入合州城，钓鱼城遂成为拥有十余万人口的军事重镇。因其扼守入川之口，战略地位尤为重要。二月，蒙古军即进扰合州，王坚与守将曹世雄等率领守城宋军与之交战，将其击败。

宋宝祐四年（蒙古蒙哥汗六年，1256）六月，蒙古诸王亦孙哥、驸马也速儿等人向蒙哥汗上言，请求出兵伐宋。蒙哥汗请诸王大臣商议征伐之事。七月，蒙古军进扰叙州（治今四川宜宾），宋知叙州史俊调集水军与蒙古军激战，击退进犯之敌。不久，蒙古军将兀良合台率军经吐蕃（今西藏），征伐白蛮。其子阿珠生擒白蛮骁将，献俘于朝廷。蒙哥汗下诏：应便取道与四川帅府合攻宋军。兀良合台遂出乌蛮，渡泸江，于马湖江大败宋兵，夺宋水军战船200艘。于是打通嘉定府（今四川乐山）至重庆府（今四川重庆）的通道。随后，兀良合台率所部进抵合州，与另一支蒙古军汪德臣部会师。次年，蒙哥汗以宋人囚禁蒙古使臣月里麻思为借口，再次伐宋。

宋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二月，蒙古大举攻宋。蒙哥汗亲统大军入攻四川。另派忽必烈率张柔等部进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再东进临安（今浙江杭州）。又令兀良合台率蒙古军自云南北攻，与忽必烈会师于鄂州。蒙哥汗率兵4万，号称10万，分三道入蜀：军将莫哥率所部由洋州（治今陕西洋县）入米仓关；军将李里义率所部由鱼关入沔州（治今陕西略阳）；蒙哥汗则率主力自陇州（治今陕西陇县）入大散关。

二月，蒙古军前锋进至成都。宋四川制置使蒲择之遣安抚使刘整等将领据守遂宁府（今四川遂宁）江箭滩渡口，以截断东路蒙古军的入侵。东路蒙古军主将纽璘率兵至渡口，两军自清晨直战至黄昏，宋军战败，蒙古军遂长驱直入。于是成都、彭州（治今四川彭州市）、汉州（治今四川广汉）、怀安（治今四川成都东）、绵州（治今四川绵阳）等四川州县相继投降蒙古军。十月，蒙哥汗率主力进攻利州（治今四川广元）苦竹

隘，宋将杨立率军民顽强抗击蒙古军的轮番进攻。蒙哥汗亲自上阵督战，仍久攻不下。蒙古军又架设天桥进攻，亦被宋军击退。后因叛徒赵仲偷开东南城门降蒙，蒙古军方得突入城中。杨立率领军民与之巷战，不幸阵亡，苦竹隘遂为蒙古军所占据。其后，蒙哥汗率兵继续进攻，相继攻占筑于长宁山上的鹅顶堡、大获城（阆州治所）、云山城（蓬州治所）、青居城（顺庆府治所）等重要军事据点。而钓鱼城依旧坚守于宋军手中，成为阻击蒙古军进犯的坚固堡垒。不久，蒙哥汗率兵又攻克隆州（治今四川仁寿）、雅州（治今四川雅安），宋军守将投降，随后，蒙古军即派使臣赴合州钓鱼城招降，遭到守将王坚的断然拒绝。使臣见招降不成，便欲返回，王坚使人将他追回，于城内阅武场将其斩首，以示誓死不降的决心。

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正月，蒙古军于四川境内，全线进击，陷忠州（治今四川忠县）等地后，逐渐推进至夔州境内。宋廷命四川主帅蒲择之、马光祖等将领，战守调遣，可便宜行事，以使四川战局得以扭转。然在蒙古军的凌厉攻势下，又有诸多州县或陷或降。

二月，蒙哥汗以招降使臣被杀，亲统大军自鸡爪滩渡江，进驻石子山，直至钓鱼城下，亲自督阵攻城，俘获男女万余人。合州军民在王坚率领下，奋力抗击，击败蒙古军的猛烈进攻，蒙哥汗命纽璘所部于涪州（治今四川涪陵）江上建造浮桥，截断自荆湖西上的南宋援军，且指挥蒙古军将钓鱼城团团围困，以迫使守军投降。自二月至五月，蒙古军先后猛攻一字城及镇西、东新、奇胜、护国等城门及外城，皆为宋军所击退。宋帝赵昀闻讯，以王坚忠节，坚守合州功绩甚伟，可为诸城守将之楷模，下令对他优加奖赏。

此时，驻守重庆（今属四川）的四川制置使蒲择之与蒙古军屡战屡败，四川大部失陷，重庆亦面临蒙古军的进击。且川鄂间的通道已被蒙古军所阻断，入援四川的宋军均被阻击于川蜀之外，形势极为危难。为扭转战局，宋廷以吕文德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以取代蒲择之指挥川蜀宋军抗击蒙古军。六月，吕文德统领水军，乘战舰千余艘入援四川。宋军沿长江西上，乘风势进攻涪州浮桥，经奋力冲杀，终冲破蒙古军设置的封锁线，进入重庆府。随后，吕文德率10余艘战船，自嘉陵江北上，进援合州城。蒙古军将史天泽将所部分作两翼，顺流而下。吕文德所部与之交战，不敌而败。史天泽率军紧追不舍，直至重庆乃还。

合州钓鱼城久围断援，守军在王坚率领下依旧坚守抗敌。蒙古军在蒙哥汗的督阵下，则拼死攻城，然而屡攻屡败，损兵折将。前锋军将汪德臣曾趁黑夜攻上钓鱼城外城，王坚与军将张珏等率领宋军英勇反击，直激战至天明，将汪德臣及蒙古军逐出城外。汪德臣仍不死心，一面喊话劝降，一面再指挥蒙古士兵架云梯攻城。王坚令守城宋军发炮石还击，蒙古兵攻城云梯折断，纷纷跌落城下，后续蒙古军则为炮石所击，不得近前援救，汪德臣亦为飞石击中，受重伤。时天降大雨，蒙哥汗见进兵不得，只得令残兵败将退下。汪德臣因伤势过重，未几即身亡。随后，蒙哥汗再度亲自督阵，指挥蒙古军猛烈攻城，企图一举破之。合州城军民仍以炮石还击，再重创蒙古军。蒙哥汗亦为炮石所击伤，不得不承认围攻合州钓鱼城失利。七月，他决定留3000兵士，继续围攻钓鱼城，自己则欲率主力转攻重庆府。然而未待启程，蒙哥汗即死于钓鱼山下营寨之中。史天泽等将领与群臣遂奉丧北归，进击合州、重庆等地的蒙古军

亦相继北撤，钓鱼城之围遂解。

蒙哥汗于钓鱼城下身亡之事很快传遍各路蒙古军。九月，率东路蒙古军进至江边的忽必烈得亲王穆哥密报，令其速北归夺取大汗之位。忽必烈初欲进击江南，再取汗位，遂举兵自阳逻堡（今湖北黄冈南）渡江，进围鄂州。宋廷为之大震，宋帝赵昀在内侍董宋臣劝说下，甚至欲迁都逃遁。只因节度判官文天祥等主战派臣僚的强烈反对，未能成行。宋帝随即下诏，罢免隐匿蒙古军南侵四川、京湖军情的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宋鄂州守城军民在守将高达率领下，奋勇抗击蒙古军的围攻，虽伤亡甚众，仍坚守城池。

此时，蒙古国内大汗位之争愈演愈烈，诸王大臣阿兰答儿、浑都海、脱大思、脱里赤等人于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谋立阿里不哥为大汗。忽必烈妃弘吉剌遣使驰至忽必烈军前密报，令速北还。忽必烈遂自鄂州拔寨北撤，却扬言将进兵临安。右丞相兼枢密使，兼京湖、四川宣抚大使的贾似道闻讯惊慌失措，即派使臣赴鄂州，向忽必烈求和。表示愿割让长江以北地区给蒙古，称臣，纳贡岁银 20 万两、绢 20 万匹，以换取蒙古军的北撤。和议尚未谈妥，忽必烈即领兵北撤。

王坚率军民坚守合州钓鱼城长达 5 月之久，迫使入侵四川的蒙古军北撤，缓解了四川危难的局势。而由于蒙哥汗之死，又引起蒙古国内权力之争，迫使忽必烈放弃南侵，从而亦解除襄阳、鄂州一带的危机。

忽必烈领兵北上后，诸王大臣合丹、木哥、塔察儿等会集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拥立忽必烈即大汗位，是为元世祖。此后，忽必烈忙于用兵阿里不哥，未暇南顾。

钓鱼城大捷后，宋廷曾以军将马千更换王坚为合州守将。

宋景定四年（蒙古中统四年，1263），宋廷又以张珏代替马千，戍守钓鱼城。是年，蒙古国遣王德素为国信使，刘公谅为副使，入宋诘问宋帝赵昀四年前为贾似道拘禁于真州（治今江苏仪征）的蒙古使臣郝经之故。春天，蒙古都元帅汪良臣即率兵进击四川，于重庆击败宋将朱祀所部。此后，合州再度遭蒙古军攻击，被张珏率军民坚守城池，屡败敌军。但宋军救援合州却受蒙古军阻击。宋咸淳元年（蒙古至元二年，1265），蒙古军元帅按东与宋军大战于钓鱼山（今四川合川东），大败宋军，缴获兵船146艘。次年，蒙古国改四川行枢密院为行中书省，以赛典赤、也速带儿等兼领行中书省事，负责四川地区攻宋等事宜。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二月，忽必烈招谕宋人，凡钓鱼城及嘉定府、重庆府、泸州、夔州、涪州、万州等处官吏军民，能率众来降者，优加赏擢。七月，蒙古军征调巩昌府（今甘肃陇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京兆府（今陕西西安）等地1000未占籍户，修治四川境内山路、桥梁、栈道，以利于用兵及运送给养。在蒙古军恩威并济的政策下，四川地区的抗战形势急剧恶化。

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1270）三月，因钓鱼城屡为蒙古军所攻，年久失修。宋四川制置司遂遣将兵赴合州，以整修城池，加固城防。蒙古军随即令武胜军拦截宋军，总帅汪惟正临嘉陵江造水栅，扼守水道。且夜悬灯于水栅间。又编竹为笼，中置火炬，令兵士持之，顺地势转走，能照百步之外，以防宋军偷袭。宋军进至，见蒙古军已严加防范，不敢近前，钓鱼城因此未得整修。不久，宋四川制置司又遣都统牛宣与蒙古军将领、签陕西省也速带儿及严忠范等先后战于嘉定、重庆、钓鱼山及马湖江，数战皆败，牛宣被蒙古军生擒，宋军伤亡损

失无计。此后，蒙古军对南宋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首当其冲，川、鄂通道又被阻断，从此四川宋军几乎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此期间，已任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的张珏，依旧积极练士卒，精器械，饬军纪，明赏罚，以兵护耕，垦田积粟，使合州城防务不断得到加强。其在任12年中，屡次拒绝蒙古军招降，固守钓鱼城，亦曾主动出击，收复大良平（今四川广安东北）等城。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宋四川安抚使昝万寿献嘉定府等地降元，四川境内尚坚守于宋军手中的城池已寥寥无几。宋廷遂以张珏为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且征其兵入卫京师，然而道路为元军所阻，不得成行。时元军围攻重庆，且遣人招降，张珏坚决不从，遂派兵解救重庆之围。张珏又与泸州百姓内外相应，俘杀降元叛将梅应春，一举收复泸州。张珏改任后，宋廷又以部将王立为合州安抚使，负责钓鱼城防务。

宋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十二月，张珏率所部进入重庆府，任四川制置使。此后，他率军屡次击败元军的进攻，使重庆府安然无恙。又曾一度出兵收复涪州，解大宁城之围，支援泸州。次年，元军又进围重庆，再次遣人招降，张珏仍奋力率军拒敌。宋景元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正月，元军继续围攻重庆府，守城军民坚守城池，顽强抗击。部将赵安却开城降元，元军入城，张珏仍率兵与之巷战，终因寡不敌众，遂返家中自杀未果，又乘小舟东下，至涪州被元兵俘获。

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合州安抚使王立见大势已去，合州城久受围困，孤立无援，遂献城投降元军，坚守长达30余年的合州钓鱼城终于失陷。

注　释

①②《宋史》卷四一六《余玠传》。

两宋

文天祥抗元

宋理宗宝祐六年（蒙古蒙哥汗八年，1258），蒙古大汗蒙哥分路大举南下攻宋，自统主力入蜀；使忽必烈领兵进击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与兀良合台会师，东进宋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令益都行省李璮率兵攻宋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涟水军。面对蒙古军大举入侵，南宋军民奋力抗击，而宋廷却未作认真部署，组织有效的抵抗。

宋开庆元年（蒙古蒙哥汗九年，1259），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西南）、瑞州（治今江西高安）相继失陷，鄂州遭围攻。宋右丞相兼枢密使丁大全竟对蒙古军进犯，宋军败退的军情匿而不报。直至鄂州告急，宋廷为之大震，内侍董宋臣竟劝说宋帝赵昀逃离临安府，迁都至四明（今浙江宁波），朝中无人反对；唯有宁海军节度判官文天祥上书“乞斩宋臣，以一人心”①，但不为宋帝采纳。稍后，文天祥迁为刑部郎官，董宋臣复入为都知，文天祥再上书极言其罪，亦无人理睬。文天祥的极言极谏，使当权官僚极为不满，在御史台官僚的攻击下，他屡官屡罢，先后出任瑞州知州，改任江西提刑，迁尚书右司郎

官，除军器监兼权直学士院。

宋景定五年（蒙古忽必烈汗至元元年，1264）十月，赵昀死，皇太子赵禥继立为帝，是为度宗。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似道依仗拥立赵禥、辅佐朝政之功，骄横无忌，甚至以谎报军情，称病、辞官等手段，要挟宋帝。文天祥对此极为不满，多次讽喻之，而招致贾似道的忌恨。贾似道随即令御史台弹劾，将其免官。文天祥屡遭罢贬，遂愤然乞请辞官致仕。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文天祥被重新起用，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不久，元帝忽必烈以宋权臣贾似道背盟违约，扣留元朝使臣郝经为由，令史天泽、伯颜总领各路兵马，与阿术、阿里海涯、吕文焕的荆湖行中书省，博罗欢、阿答海、刘整、塔出、董文炳的淮西行枢密院，合兵20万南下。

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正月，文天祥于赣州（今属江西）得知元军渡江南侵，不久又接到谢太后令各地起兵"勤王"的诏书。随即征调组织万余人的"勤王军"。宋廷闻讯，即委他为江西提刑安抚使，令其率兵入卫京城。其友以元军大兵压境，劝其止兵。文天祥坚定回答："吾亦知其然也。第国家养育臣庶三百余年，一旦有急，征天下兵，无一人一骑入关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义士将有闻风而起者。义胜者谋立，人众者功济，如此则社稷犹可保也。"②他变卖全部家产以充军费，八月，率所部抵达临安，改授知平江府。时宋廷已执意投降元朝，文天祥为此上书，陈述救国御敌之策，主张："今宜分天下为四镇，建都督统御于其中。"③ 此议群臣以为"阔远"，未得朝廷应允。

其时进抵临安城的"勤王军"仅有三四万人，文天祥与总

领都督府诸军张世杰商议，以淮东地区至今仍为宋军据守，闽、广地区亦为宋廷控制，故应与元军决战。如能获胜，则命令淮东将帅出击，阻断元军退路，国事尚可有为。可是右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却积极向元军投降求和，根本不采纳文天祥的救国之策，反而请太皇太后下诏，令军队谨慎从事。文天祥与张世杰大失所望。陈宜中先遣工部侍郎柳岳持文书赴元军，乞请退兵，重结友好。又遣宗正少卿陆秀夫与吕师孟等人赴元军，向元军统帅伯颜乞求称侄、纳贡，不行则改称侄孙，以换取元朝息兵停战。之后，又遣使向元朝乞求册封宋朝为藩属小国，直至称臣。但宋廷的屈辱投降丝毫未使元军停止进军。

十月，文天祥赴任入平江府（今江苏苏州），此时，元军已自金陵（今江苏南京）进兵常州（今属江苏）。文天祥立即遣其部将朱华、尹玉、麻士龙与张全率兵救援常州。行至虞桥，与元军遭遇，麻士龙战死。朱华战于五牧，败绩。尹玉亦战败，其兵士争相渡河逃命，于河中攀援张全所部船缘，张全兵士竟断其指，致使尹玉所部兵士皆溺死，尹玉领500名残兵复与元军夜战，战至清晨，全军覆灭。唯有张全未发一箭即逃走。元军随即攻陷常州，知州事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先后遇害。随后又攻入独松关，宋廷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宰相陈宜中、留梦炎令文天祥放弃平江府，驻守余杭（今属浙江）。十二月，宋廷任命文天祥为签书枢密院事。

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太皇太后诏令文天祥任知临安府。而元军游骑已进抵临安城北关，文天祥与张世杰请太皇太后，皇太后、宋帝乘船逃亡海上，他们则率临安军民与元军背城一战，又为陈宜中等人反对而未果行。不久，太皇太后谢氏与陈宜中遣使持宋帝御玺向元军投降，元军

统帅伯颜要求与宋廷执政大臣面谈投降之事。然而此时宰相陈宜中已逃离临安，张世杰、刘师勇等军将领则以宋廷不战而降，各率所部乘船入海。太皇太后谢氏遂任文天祥为枢密使，不久又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偕左丞相兼枢密使吴坚同赴元军请和。他于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元营中，与伯颜抗论，欲保全宋廷，又怒斥叛臣。伯颜知其心怀宋室，遂托辞等待元廷诏令，将他扣留于军中，未几，文天祥便与吴坚、右丞相兼枢密使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一道，被元军押解北上。

行至镇江（今属江苏），文天祥与其门客趁黑夜逃至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宋真州守将苗再成闻讯，迎出城外，悲喜交集，向文天祥陈述抗元之策。文天祥大为赞赏，遂分别致书淮东、淮西制置使，又遣使分赴宋军所据州县，与之相约进攻元军。然而此时有人声称元军秘密派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两淮制置使李庭芝信以为真，以为文天祥即是劝降者，便命苗再成立刻将其处死。苗再成不忍心杀害文天祥，遂谎称令他出巡城堡，且出示制置司文书，而将他放出城外。之后，李庭芝又派两路人马窥探文天祥，若真为说降者，立即处死。两路人马分别与文天祥交谈，见其忠义，亦不忍杀害他。随后文天祥派20人赴扬州，四更时分抵达城下，听守门士兵谈论制置司下令防范文天祥甚为严急。众人面面相觑，吃惊地吐出舌头。文天祥只得东去，欲以海道南下。途中历经艰辛，屡遭磨难，数次遇敌，险遭不测，直至通州（治今江苏南通）登船入海，漂泊至温州（今属浙江）。

此时，元军已占据临安府，且押解宋帝赵㬎、皇太后全氏及皇亲、臣僚等北上，临安宋廷已不复存在。而在伯颜未率元

军进入临安府前，宋驸马都尉杨镇等即护送益王赵昰（shì是）、广王赵昺（bǐng丙）及杨淑妃、秀王赵与择赴婺州（治今浙江金华）躲避。其后伯颜遣将领范文虎率兵追赶他们，只俘虏到杨镇，益王、广王又逃至温州，随即于闽、广地区招集军队，欲进攻江西。元军统帅伯颜得到元江西都元帅宋都解所报，派塔出移师，会合李恒、吕师夔、阿剌罕、董文炳所部，继续南攻宋军所据州县，追击赵昰、赵昺。

陆秀夫、苏刘义等人得知赵昰、赵昺逃到温州，遂匆匆追赶，又派人赴温州清澳，召逃避于此的原右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入温州，拜见益王、广王。再派人入定海（今浙江舟山），召张世杰领所部入援温州。随后，陈宜中等人拥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都元帅，又以秀王赵与择为福建察访使，先入闽中，抚慰百姓，招集忠义之士，捍卫王室。随后，陈宜中等护送二王入闽，于福州设置元帅府。

四月底，文天祥抵达台州（治今浙江临海）。得知益王赵昰尚未称帝，乃上表劝进。赵昰遂委以其为观文殿学士、侍读，召其来福州。五月初一，在陈宜中、张世杰等拥立下，益王赵昰于福州继立为帝，是为宋端宗。五月底，文天祥入福州，被宋帝赵昰任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文天祥提议宋帝返回温州，组织水军，自海道收复两浙州县，却为陈宜中所阻。因与陈宜中议论多不协，七月，文天祥遂出朝，以同都督诸路军马之职，于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设置都督府，组织军队，继续抗元。九月，元军分兵入攻闽、广地区，抗元斗争更为艰难。十月，文天祥在招集兵马之后，率军移镇汀州（治今福建长汀）。随即遣参谋赵时赏、谘议赵孟溁率兵直进赣州（今属江西），攻取宁都；又遣参赞吴浚领兵进取雩都（今属江

西)。文天祥于江西的抗元斗争，引起积极反应，刘洙、萧明哲、陈子敬皆自江西起兵，与文天祥会师，一时声势大振。然而元军大兵压境，起兵多遭镇压。邹沨以招谕副使聚兵宁都(今属江西)，武冈教授罗开礼起兵收复永丰县，皆为元军所败，惨遭杀害。

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元军攻入汀州，文天祥遂移屯漳州（今属福建)。不久，赵时赏、赵孟濼自江西赶至漳州，而吴浚则投降元军，且受命入漳州劝降，文天祥立即将他处死。四月，文天祥领兵入梅州（治今广东梅县)。时有都统王福、钱汉英跋扈不羁，文天祥将其斩首，以明军纪，士气稍振。五月，文天祥统兵回击江西，入会昌。六月，入兴国。七月，文天祥组织反攻。遣参谋张汴、监军赵时赏、赵孟濼等率重兵进击赣州；邹沨率赣州诸县兵士进攻永丰；其副将黎贵达领吉州（治今江西吉安）各县兵士进攻泰和。未几，吉州所辖8县，为文天祥所部收复一半，唯有赣州尚未攻胳。一时间，临洪诸县，纷纷向宋军投降。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等地，纷纷起兵响应抗元，先后收复新化、安化、益阳、宁乡、湘潭、萍乡等地。

然而文天祥所招集兵士，多为乡间百姓、豪杰、忠义之士，未及认真习武操练，不善作战。元江西宣慰使李恒派兵增援赣州，以解其围，自己则领兵直趋兴国，攻击文天祥。文天祥未料元军会突然来攻，遂被击溃，率所部后撤。李恒击败邹沨所部，又紧追文天祥至方石岭。文天祥部将巩信阻击元军，中箭身亡。撤至方坑，文天祥所部溃散，其妻妾子女皆为元兵所俘。部将赵时赏冒充文天祥，迷惑元兵，掩护文天祥安全脱险，而赵时赏为元兵所俘。其他部将或战死，或自尽，或被

执，文天祥所部损失惨重。赵时赏被俘后，怒骂不止，毫不屈服，且为其他被俘将领开脱、掩护，由是得脱者甚众。最后大义凛然，不屈而死。

文天祥收拾残兵败将退至循州（治今广东惠阳东北），进驻南岭（今广东永安东南）。其妻妾子女被李恒所部押解赴燕京（今北京），二子死于途中。文天祥到南岭后，其部将黎贵达暗地与元军通报，欲投降元军，文天祥察觉后，立即将其斩首。此后，文天祥率所部转移至海丰（今属广东）、于潮州（今属广东）、惠州（治今广东惠阳东）等地继续抗击元军。

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三月，文天祥移师丽江浦。四月，赵昰病故，卫王赵昺继立。文天祥上表自劾，且乞请入朝，未获准。八月，宋廷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其间，军中发生瘟疫，兵士数百人染病身亡。十一月，文天祥率兵进驻潮阳，讨伐陈懿、赵兴叛军，俘虏且处死赵兴，陈懿兵败而逃。十二月。文天祥返南岭，旧部邹沨、刘子俊自江西领兵来会，遂合兵再击陈懿叛军。不料陈懿引导元军元帅张弘范率兵袭击文天祥。文天祥被迫撤出潮阳，转移海丰，欲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北五坡岭，正进食时，张弘范率兵突然追至，众将士来不及应战，即为元兵俘虏，多被杀害。文天祥仓皇出逃，被元军千户王惟义执获。

元兵将文天祥押至潮阳见张弘范。左右命他行拜礼，文天祥拒不从命。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张弘范将文天祥押上海船，自潮阳驶往厓山（今广东新会南），以劝降蜷缩于此的宋廷。途经珠江口零丁洋时，文天祥赋《过零丁洋》诗，其末尾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绝唱。至厓山，张弘范命文天祥手书招降张世杰。文

天祥写道："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④因张弘范逼迫不已，遂录此诗作答。不久，元军攻入崖山，宋宰相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背负年仅9岁的宋帝赵昺跳海自尽，宋朝至此灭亡。

元军崖山大捷后，于军中设宴欢庆。张弘范遂劝说文天祥："国亡，丞相忠孝尽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将不失为宰相也。"文天祥说道："国亡不能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况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⑤张弘范见劝降不成，便派兵押解文天祥北上元大都（今北京）。

十月初一，文天祥入大都，先被安置于馆驿，馆中铺设华丽，他直坐到天明。元廷遂将他移交兵马司，派兵士专事看守。原宋廷宰相留梦炎、遭贬而封为瀛国公的原宋帝赵㬎等，先后奉元帝忽必烈之命前来劝降，均被拒绝。当时，忽必烈欲广求江南人才，对文天祥颇为赏识，权臣阿合马亦亲至其住地问话，但文天祥毫不为之动心。丞相孛罗等于枢密院召见文天祥，欲使之行拜见之礼，而他只以长揖为礼，且慷慨陈辞，毫不屈服。文天祥自关押于兵马司狱中，对狱中阴暗潮湿、冬冷夏热的艰苦环境，皆甘之如饴。其夫人欧阳氏及两个女儿亦囚禁于大都，文天祥叮嘱家人"归之天命"，以示不降之意。文天祥在燕京度过三年的囚徒生活，忽必烈知道无法使他屈服，曾与宰相大臣们商议，将他释放。后因有臣僚以文天祥于江西起兵抗元之事上言，而未能实现。

文天祥身陷狱中，然其诗句墨迹却传遍京城，被视之为珍宝。狱中看守的元军官兵亦常请他讲史。京城百姓多为其爱国忠君之心所感动。

元至元十九年（1282），河北中山府（今河北定县）有人

自称“宋主”，聚兵千人，欲进击大都，营救文天祥。而京城中亦有匿名信，称将焚毁护城的苇草，率两翼兵作乱。适逢元左丞相阿合马遭人暗杀。忽必烈遂下令，撤去护城苇草，又将瀛国公赵㬎及宋朝宗室迁往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十二月八日，忽必烈召文天祥入宫，亲自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言：“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⑥次日，文天祥于柴市（今北京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一说于今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慷慨就义，时年47岁。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

两宋

襄樊之战

宋景定二年（蒙古中统二年，1261），蒙古南征主帅忽必烈于蒙古汗蒙哥死后，即自鄂州（治今湖北武汉）率军北返，夺得大汗位。遭围困多日的鄂州随即解围。南宋权臣贾似道忌守将之功，于诸路推行“打算法”，欲以军事时期支取官物为罪，排斥有功之将。为此遣官会计诸路边费。于是大将赵葵、史岩之、杜庶皆以侵用官款，罢官征偿。高达、曹世雄因不附和贾似道，亦遭忌恨，贾似道令京湖安抚制置使吕文德搜集其罪证，逼死曹世雄，罢免高达。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为此恐惧万分，便秘密与蒙古军联系，愿以泸州（治今四川西昌）十五郡，以及30万户归降蒙古。蒙古成都经略使刘黑马遣其子刘元振前往泸州接受刘整归降。未几，蒙古即以刘整为夔路行省兼安抚使。三年，吕文德率军收复泸州，刘整战败后领兵北上。

宋咸淳三年（蒙古至元四年，1267）十一月，已擢升为蒙古南京宣慰使的刘整向忽必烈上攻宋方略，建议南征当先攻取襄阳（今湖北襄樊），然后再乘船自汉水入长江，沿江而下，则可一举灭宋。忽必烈从其计，下诏征调各路兵马，命宿卫将

军、征南都元帅阿术与刘整积极策划，准备集大兵攻取襄阳。

此前，刘整即向忽必烈献策，先于襄阳周围设置据点，以为攻取襄阳之依托。忽必烈遂遣使以玉带贿赂吕文德，请求于襄阳城外设置榷场，以互市贸易。吕文德欣然同意。蒙古军便于城外鹿门山筑土墙，外通互市，内筑壁垒，以遏守南北之援。吕文德对此起初并未觉察其意图，及发觉则悔恨莫及。

宋咸淳四年（蒙古至元五年，1268），忽必烈令陕西五路、四川行省打造战舰 500 艘，交刘整用于攻取襄阳。阿术认为蒙古军多为骑兵，若遇山水、寨栅，则不能驰骋作战，故兵进襄阳非汉军不可。因而建议再让丞相史天泽率领汉军南下，协同作战。忽必烈随即应允。令史天泽领汉军与阿术一同进击襄阳。阿术兵至襄阳，即驻兵于虎头山（今湖北襄樊南），又置营帐于汉水东侧的白河口。他巡视周围地形，认为若于此修筑堡垒，以断宋军粮运，则襄阳城即可夺得。

不久，蒙古设东、西二川统军司，以刘整为都元帅，令赴襄阳与阿术同议军事。刘整与阿术谋议于白河口修筑堡垒。遂指挥兵士筑成新堡。宋知襄阳府兼京西安抚副使吕文焕闻讯，极为震惊，立即派人携密信告其兄吕文德。吕文德见密信大怒，骂道：汝等竟敢虚报军情，以求功赏。即使白河口有城，亦不过为蒙古人搞的假城，况且襄阳、樊城城池坚固，而城中积储足够 10 年之用，因此才让吕文焕坚守城中。如刘整真敢轻举妄动，待入春后再去收拾他，恐怕届时他早已逃之夭夭了。闻此言者无不窃笑吕文德。

不久，阿术又指挥蒙古兵于汉水之中建造高台，于其上架设弩炮，使之与夹江堡相呼应，以此遏制汉水通道，断绝襄阳与外界的联系。自是宋军入援襄阳的衣装、器甲军械及粮食等

物悉被阻断。

刘整与阿术部署蒙古军队将襄阳、樊城围困后，又以攻取襄阳非水战不可，而以蒙古军不习水战为由，下令操练水军，而得7万余精于水战之士。不久，史天泽亦至，又令蒙古兵士于襄阳城郊筑起长围，自万山（今湖北襄樊西）始，止于百丈山（今湖北襄樊南），从而截断南北联系。随后又修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与诸堡垒相联系，以为长久驻守，必取襄阳之计。

宋咸淳五年（蒙古至元六年，1269）三月，蒙古军自白河发兵围攻樊城（今湖北襄樊），又筑堡于鹿门山。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领兵拒敌，双方大战于赤滩浦（今湖北襄樊东南），宋军大败。自襄阳被围困后，襄阳宋军屡次出城攻击蒙古军沿山诸寨。阿术将蒙古军分驻于诸寨御敌，斩杀、俘虏宋军兵士甚众，立功将士多达1300余人。忽必烈（元世祖）亦下诏，凡立战功，生擒敌军者，各赏银50两。七月，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又率领兵船3000，袭击驻于新城（今湖北襄樊南）的阿术所部。然行至鹿门山，即为蒙古万户解汝楫、李庭所领水军击败，宋军2000余士卒被俘杀，50余艘战船被掳。宋将范文虎率水军救援夏贵，行至灌子滩，遇蒙古水军，及战，亦败。

宋咸淳六年（蒙古至元七年，1270），宋左丞相兼枢密使江万里知襄阳、樊城，遭蒙古军所围困，战事日趋严峻，屡次请求宋帝赵禥派兵前去增援，却始终为贾似道所阻。江万里因而坚决请求辞职，遂被免职，出任知福州（今属福建）。不久，宋廷任命主管两淮制置司事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领兵救援襄阳、樊城。贾似道之婿范文虎得知李庭芝将赴援襄阳，立即

致书贾似道，称："吾将兵数万入襄阳，一战可平，但无使听命于京阃（指李庭芝），事成则功归恩相矣。"①贾似道得书遂委范文虎为福州观察使，殿前副都指挥使，总领禁军援应襄阳，但不受李庭芝节制，而受贾似道之命制约李庭芝。范文虎虽领命，却于军中携美妾，走马击毬，以为乐趣。李庭芝屡次与之商议进兵之事，范文虎却每以未奉旨为辞而拒绝出兵。

尽管襄阳、樊城战事趋紧，告急文书不断入报朝廷，却皆为贾似道所匿。贾似道依旧终日与美妾、馆客淫乐于葛岭。凡朝臣有议论边事者多遭贬斥。一日，宋帝赵禥询问道："襄阳被围已有三年，如何解救？"贾似道却反问道："蒙古兵已退去，陛下从何处知晓？"赵禥告之为一女嫔所讲。贾似道立即追问此人，终使赵禥将她赐死。自此，朝中无人再敢言边事。

宋咸淳七年（蒙古至元八年，1271），襄阳、樊城久受蒙古军围攻，然守城将士凭借城防，英勇抗击。其间亦多次派兵及战船出城攻击蒙古军堡垒，但因蒙古军设围严密，多未能获胜。五月，忽必烈因襄阳、樊城久攻不下，一面令围城蒙古军继续猛攻，一面则另派赛典赤、郑鼎统兵，水陆并进，攻打嘉定府（治今四川乐山）诸州。以汪良臣、彭天祥所部出重庆府（今四川重庆），札剌不花所部出泸州（今属四川），曲立吉思所部出汝州（治今河南汝阳），入侵宋境，以牵制宋军兵力，以使襄阳更孤立无援。

六月，在李庭芝再三请求及催促下，范文虎不得已领兵救援襄阳、樊城，但尚未行至鹿门山，竟怯敌逃回。李庭芝再数次请求朝廷许他接替范文虎，领兵赴援，宋廷仍不许。

十一月，蒙古汗忽必烈听从太保刘秉忠请求，取《易经》"乾元"之意，改国号为"大元"。且下诏称："诞膺景命，奄

四海为宅尊；必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②以示一统天下。此后，元帝忽必烈令元军加紧围攻襄阳、樊城，以求打通入宋要塞。元军将领张弘范提议于万山筑城，以断宋军西路粮运。城筑成，且徙张弘范所部至此驻防。自此，襄阳、樊城道路断绝，粮援不继。

宋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1272）五月，襄阳被围已长达五年，却始 终未得到朝廷救援。吕文焕与守城将士拼死抵抗，城虽未被攻破，城中储粮尚可维持所需，然盐、木柴及布帛均已告罄，至此，宋帝赵禥方诏令李庭芝移兵，屯驻于郢州（治今湖北钟祥），以进兵救援襄阳、樊城。李庭芝得知襄阳西北有一清泥河，便令工匠于此造轻舟百艘，每三艘联为一舫，中间一船装载衣、甲等物，左右二舟则空载以作掩护。造舟完毕，李庭芝即出重赏招募敢死之士 3000 人。又于抗元民兵中招募将领，义军首领张顺、张贵随即应召，被委以都统。二人皆智勇双全，素为义军诸将领所敬服。待出发之时，李庭芝告诫将士：“此行有死而已，汝辈或非本心，宜亟去，毋败吾事。”③众将士人人激奋，无一人退却，适逢汉水上涨，李庭芝令百船出发，伏于襄阳西北团山之下。二日后，又进至高头港外，于此结船成方阵。又于各船上配置火枪、火炮、点燃的木炭、巨斧、劲弩等物。半夜，宋船起锚出江，皆以红灯为标志。张贵于首船，张顺于尾船殿后，一路乘风破浪，径直冲入元军所设重围之中。元军于江上密布船舰，无隙可入。宋军将士奋力冲击，用利斧砍断元军捆绑舟船的铁索，解散聚拢在一起的数百艘木筏、船只，与元军转战 120 余里。元兵惊恐万状，纷纷逃避，不敢与宋军交战。至黎明时分，张贵终率船队抵达襄阳城下。城中守军已许久未见援军，得知张贵率兵救

援，顿时士气倍增。待援军入城清点人数时，唯独不见张顺。几日后，有一具尸体浮于江面，溯水而上，身着铠甲，手持弓矢，直冲至浮桥旁。宋兵察看，正是张顺，只见其身上中4枪6箭，然其面貌一如生前。诸军士对他十分崇敬，将他收敛埋葬，立庙祭奠。

张贵进入襄阳，吕文焕坚决请他留下，一同防守城池。但张贵凭借自己的骁勇，仍欲返回郢州。为此，他于军中招募到2位能伏于水中、数日不食的勇士，令其持蜡书赴郢州求援。此时，襄阳周围元军又得到增援，防守更加严密，且水路上连锁船只长达数十里。又于江中布满桩木，连鱼虾亦难通过。2位勇士入水中，遇桩即锯断之，竟冲破重围，平安抵达郢州。不久，2人又返回襄阳，告诉张贵，范文虎已许发兵5000，驻扎于龙尾洲，以协助夹击元军。

待约定时刻既至，张贵乃与吕文焕辞别，欲率军东下，然当清点所部登舟之时，忽察觉一位曾受鞭挞处置的亲兵不知去向。张贵不由得大吃一惊，道："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④他知不能再偃旗息鼓，秘密出击，便鸣炮鼓噪而进。宋军乘黑夜，顺流而下，接连砍断元军联船的铁索，突破重重包围，冒险进击。元兵见宋军如此奋勇，皆躲避之。经奋力拼杀，张贵率船队冲出险要地段。此时正值夜半天黑之时，宋军船队驶至小新城，又遭元军围攻，张贵遂指挥兵士拼死杀敌，终突出重围，继续东进。元军水陆并进，紧追不舍，两岸火炬布列，火光照耀江面如同白昼。宋军船队驶至勾林滩，渐渐靠近龙尾洲。张贵于船首遥望，见龙尾洲战船密布，战旗纷扬，以为郢州援军在此会师，不禁欣喜跳跃，立刻举流星火示意对方，且令船队驰向龙尾洲。对面船只见火光遂驶来。待两方船

队驶近，即将靠拢时，张贵方察觉来船为元军战船。

此前，范文虎遣5000兵马入驻龙尾洲，而宋兵却惊疑此地风水不祥，已于2日前，后退30里屯守。而元军得到潜逃宋兵报告，入据龙尾洲，以逸待劳，等候迎击自襄阳突围而至的张贵所部。张贵遂指挥兵士仓猝应战。然因宋军早已困乏不堪，虽奋力拼杀，终不敌。张贵所部死伤殆尽，自己亦身中数十枪，为元兵所俘。元兵将他押至柜门关，面见阿术。阿术欲令他投降，张贵誓死不屈，被杀害。又令4名降元兵士抬张贵尸体至襄阳城下。守城兵士见张贵尸体，无不为之落泪。吕文焕下令将4名降卒处死，又令将张贵葬于张顺墓旁，建双庙祭奠之。此后，襄阳、樊城再度与外界隔绝，处境更加艰难。

襄阳与樊城隔汉水而建，襄阳于汉水之南，樊城位汉水之北。自元军围困两城之时，吕文焕即令兵士于汉水中插木，又用铁链栓连木桩，再于其上架设浮桥，便于军队来往于两城，以使两城互相呼应、依托。樊城正凭藉此桥得以坚守。元将张弘范遂向阿术进言，襄阳、樊阳相互依托，致使元军一直无法攻陷樊城。如能将两城间的联系阻断，则可阻止襄阳宋军救援樊城。届时再水陆夹攻，樊城即可破，襄阳亦可得。阿术采纳此议，令元兵砍断木桩，砍断铁链，烧毁浮桥。随后，他指挥元军兵船布列汉水，阻断两城间的联系，又令精锐直扑樊城。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元月，元军猛攻樊城，守将、荆湖都统范天顺与牛富等将率全城军民殊死抵抗，顽强击退元军无数次进攻。牛富多次射箭将书信送入襄阳城中，请吕文焕与樊城宋军互为唇齿，共同抗击元军。不久，元军将领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献新炮，遂运至樊城，用以攻城，终炸毁樊城外城，樊城危在旦夕。

樊城无襄阳援应，城墙亦被轰塌，虽城中军民浴血奋战，终不敌元军猛烈进攻，城池失守。范天顺见元军破城，仰天长叹："生为宋臣，死当为宋鬼。"⑤遂自缢身亡。元兵入城后，侍卫马军司统制牛富率领百名敢死之士与元兵展开激烈巷战，元兵死伤无计其数。待他们转移，经过一片已遭焚毁的街道时，牛富身负重伤，他自知已无法杀敌，遂以头撞击石柱，后赴火而死。其部将王福见牛富自尽，叹息道："将军死国事，吾岂宜独生。"⑥亦投火而死。

二月，樊城陷落，襄阳危在旦夕。吕文焕每上城巡视，皆面南遥望，盼望援兵赶至，然始终未见宋军援兵踪影，不免伤心哭泣。襄阳受围危难之况，虽屡次报之朝廷，却未见回复。不久，阿里海涯又率总管唆都等将，将轰击樊城的火炮等军械移至襄阳城下。一时间，襄阳城中人心惶惶，诸将领多有出城投降元军者。阿里海涯携元帝忽必烈诏书，至襄阳城下诏谕吕文焕，以襄阳守军"势单力薄，孤立无援，数万百姓何以生存"为由，劝他投降，且许以对全城军民赦免，对他升迁官职。吕文焕见襄阳守军已是军心涣散，无力再抗击元军，遂出城投降。继而又陈述攻取郢州的计策，且请求由自己担任先锋。

阿术率元军进入襄阳城，阿里海涯则偕吕文焕同赴燕京(今北京)，入见忽必烈。忽必烈授吕文焕为襄汉大都督。

吕文焕献襄阳，投降元朝之事传入宋廷，朝廷上下为之震惊。贾似道极力为自己推卸罪责。给事中陈宜中上言，认为襄阳、樊城失守，皆为范文虎怯懦退逃之故，请求将他斩首。贾似道百般包庇，只降职了事。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汪立信亦上言，认为襄阳、樊城之失祸根在于范文虎与俞兴父子，请求从

重处置。宋帝赵禥因此下诏，免去俞兴之子俞大忠官籍，移交循州（治今广东龙川）管制。

襄阳、樊城失守，使南宋失去一重要屏障，自是元军得以长驱直入，步步进逼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南宋统治陷入危机之中。

注 释

①《宋史》卷四二一《李庭芝传》。

②《元史》卷七《世祖纪》。

③《宋史》卷四五〇《张顺传》。

④《宋史》卷四五〇《张顺传附张贵传》。

⑤《宋史》卷四五〇《范天顺传》。

⑥《宋史》卷四五〇《张顺传附牛富传》。

两宋

临安之难

宋咸淳九年（元至元十年，1273），南宋军事重镇襄阳、樊城（今湖北襄樊）相继被元军攻陷。十年七月，宋帝赵禥病故，谥号度宗。贾似道拥立年仅 4 岁的赵㬎为帝，是为宋恭宗。其时，南宋局势极其严峻，元军占据襄阳，打开入宋门户，江南已无险可守。九月，以左丞相伯颜为统帅的元军主力自襄阳继续南下攻宋，随即进围宋郢州（治今湖北钟祥）。守将张世杰率郢州军民英勇抗击，他令兵士以铁链锁城，于其中设炮、弩。凡要害之处皆设置木桩和防御的器械。伯颜率元军强攻不下，被阻击于郢州城下。伯颜遣人招降，遭张世杰拒绝，无奈，他只得令元军绕过郢州，继续南下，抵达位于长江边的阳罗堡。阳罗堡守将王达率军民顽强抵抗，元军强攻数日终无法攻克。伯颜遂留部分元军继续攻城，另分兵自上游 40 里处的青山矶，强渡长江。不久，阳罗堡失守，守将王达、刘成及 8000 将士战死。元军渡江后，宋汉阳军（今湖北武汉汉阳）、鄂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向元军投降。伯颜率元军主力沿长江东进，直奔临安，所过宋之州县纷纷投降。

元军势如破竹，进逼南宋都城，南宋朝廷惊恐万状。宋廷一面诏令各地起兵“勤王”，入援京师；一面责成贾似道出兵抗元。贾似道被迫于宋德祐元年（元至元十二年，1275）率军西进。然兵至芜湖（今属安徽）即派人赴元军议和，许以称臣纳贡，但为伯颜所拒。随后，贾似道部署宋军迎击元军，部将却弃阵而逃，宋军遂溃败，贾似道亦乘船逃遁。宋帝将贾似道罢官，贬斥出朝。贾似道出师失利，更加剧宋朝的危机，地方守将及官吏或降或逃。宋太平州（治今安徽当涂）、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镇江（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等重镇，先后被元军占领。南宋朝廷中的官僚亦自保性命，纷纷出逃。

“勤王”之诏下达各地之后，各路军将大多按兵不动，唯有京湖都统制张世杰率所部自荆湖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且于途中收复饶州（治今江西鄱阳）。宋帝赵㬎遂委张世杰为和州防御使，后又加官至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兵。不久，赣州知州文天祥集州内豪杰之士及溪峒山区少数民族，共万余入卫京师。湖南提刑李芾（fèi 费）性格刚直，因有忤于贾似道，而遭贬斥，久居家中。及闻“勤王”诏令，即派遣3000名精壮兵士，命将统领入援。

张世杰受命于危难之时，临危不乱，派遣其部将阎顺、李仔进军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谢洪永进军平江，李山进军常州。不久，进取浙西诸州县的宋军捷报频传，陆续从元军手中收复平江府、安吉（今属浙江）、广德军、溧阳（今属江苏）等重镇。宋将刘师勇亦率军收复常州，而制置两淮李庭芝则率军民坚守扬州（今属江苏），屡败进犯元军。张世杰等宋将的奋力进击，使南宋危难的局势稍得好转，浙西诸多降元的州县

及守将官吏又纷纷反正归宋，纷乱的民心略为安定。

七月，张世杰与刘师勇、孙虎臣等将领，出动水军万余艘战舰，进驻焦山（今江苏镇江北）。张世杰下令，将每10艘战舰编为一个方队，下锚停泊于江心。无号令，绝不许可起锚移泊，以示将与元军决一死战。元军统帅阿术登石公山眺望，决定以火攻破宋舟师。他选择千名健射兵士，乘巨舰，从左右两翼夹攻宋军船队，阿术则乘船居中路，指挥进击。元军船队齐头前进，向宋军发动猛攻。交战不久，阿术即令元兵以火矢射之。顿时，宋船篷帆、桅杆纷纷点燃，烈焰冲天而起，浓烟遮蔽江面。宋军大乱，因无命令，宋兵不敢起锚，只得跳江逃生，万余人淹死江中。元将张弘范、董文炳又率精兵驾船，于江上横冲直撞，使张世杰无法再集结军队，进行反击。宋军大败，张世杰逃奔圌山（今江苏镇江东北），随后他又上奏朝廷，请求派兵增援，未获许。

不久，宋廷委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十月，宋廷以张世杰为沿江招讨使，又改授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阴军。赵衎又诏张世杰与刘师勇总领京城戍卫之兵。

李芾领兵即赴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此时元军先锋已入湘阴（今属湖南）、益阳（今属湖南）等地，而潭州守兵尚不足3000人。李芾遂与少数民族联系，以为援应。而后他率领城中军民整修军械，修治城防，积储军粮，于江中筑木栅。待元军进至潭州城下，李芾指挥部将分守城墙，城中百姓不分老弱，皆登城参战。元军连续攻城，战斗异常激烈，守城军民死伤无数，依旧顽强抵抗。凡有前来劝降者，皆被处死示众。元军始终未能破城。

元左丞相阿术领兵围攻扬州，亦遭到李庭芝率全城军民的

奋力抵抗。元军久攻不下，遂于扬州城外筑围栏，欲困死守军。扬州与外界断绝联系，城中无粮，死者布满街道，但毫不退却。伯颜见一时难以攻克扬州，遂与阿术南渡长江，分兵三路，深入宋腹地，会师于临安。

十一月，伯颜统兵到达常州。其时，常州遭元军围攻已长达二月之久，其间知平江府文天祥曾派兵救援，与元军血战后失利。在孤立无援下，知州事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及刘师勇等人率领全城军民拼死抗击。伯颜派人前去劝降，宋军不为所动。伯颜所率元军主力被阻滞于常州城下，强迫常州城外百姓运土筑垒，且将他们杀死后一同筑入垒中，企图以筑垒，阻止宋军出城反击。元军昼夜攻城不止，常州城愈加危难。最后被攻破，姚訔阵亡。陈炤、王安节与元军展开殊死的巷战。有人告陈炤：城东北门尚未关闭，可由此出逃。陈炤厉声呵道："去此一步，非死所矣。"①战至中午时分，元兵援军赶至，宋兵虽奋力拼杀，终寡不敌众，陈炤亦战死。王安节挥舞双刀，率领兵士与元兵搏斗，不幸臂伤被俘。元兵将他押至元军营帐前，询问其姓名。王安节呼道："我王坚子安节也！"②元军欲劝其投降，王安节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唯有刘师勇率8名骑兵，拼死突围，逃至平江。守城兵士数千奋战而死，余下军民悉遭屠杀。

元军于围攻常州之时，亦自镇江发兵，分三路直扑临安：伯颜统中路军攻常州；阿剌罕率右军出广协军，攻独松关；董文炳率左军水师出长江入海，直奔澉浦（今浙江海盐西南）。宋廷闻讯，令文天祥率军自平江府赶赴独松关救援。然而未及赶至，元军已攻入独松关，守将张濡逃跑。文天祥率部退往临安。文天祥调往独松关之时，宋廷以张世杰知平江府，然而常

州失守后，平江府守臣随即向元军献城投降。张世杰尚未到达，伯颜已入平江府。张世杰只得率兵退往临安。

独松关失守，邻近州县官吏、守将皆闻风而逃。宋廷陷入混乱之中。其时抵达临安的“勤王军”仅有三四万众，文天祥因此与张世杰商议，认为淮东州县至今仍据守于宋军手中，而闽、广地区还为宋廷所控制，故应与元军决战，若获胜，则令淮东将帅出击，截断元军退路，国事尚可有为。张世杰闻之大喜。但右丞相兼枢密使陈宜中却积极向元军投降求和，请太皇太后下诏，令军队谨慎从事。文天祥与张世杰大失所望。

投降派求和不得，主战派抗元不成，宋廷束手无策。宋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留梦炎竟弃官而逃。十二月，宰相陈宜中遣工部侍郎柳岳持文书赴元军，乞求退兵，重结友好。柳岳又于无锡（今属江苏）见伯颜，哭诉之：“我朝皇帝年龄尚幼，又正为其父服丧。自古以来，礼不伐丧。事到如今，皆系奸臣贾似道背盟所致。”伯颜反驳道：“汝朝为小人得天下而立，亦败亡于小人之手。”随即令囊加歹偕柳岳一道返回宋朝，以进逼宋廷。

陈宜中得知伯颜所提要求，又遣宗正少卿陆秀夫及吕师孟等人，偕元使囊加歹出使元军，向伯颜乞求以称侄、纳币为条件，换取元军息兵。如不允，则改称侄孙。陆秀夫等于平江府向伯颜提出宋廷请求，但再遭拒绝。陈宜中又向太皇太后建议，奉表向元朝请求册封宋朝为藩属小国，得到太皇太后应允。陈宜中即令直学士院高应松起草表章，他不肯，只得另寻他人起草。表章写成，陈宜中又令柳岳出使元朝，请求册封。柳岳等人行至高邮（今属江苏）嵇家庄时，为村民所杀。

宋潭州自九月被元军围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李芾率领

全城军民顽强抗击，至十二月，城中弹尽粮绝，死伤无计。元右丞阿里海涯指挥元军发起更为猛烈的攻击，城中难以坚守。诸将领哭泣请求李芾为城中百姓考虑，李芾骂道："国家平时所以厚养汝者，为今日也。汝等死守，有后言者吾先戮汝。"③除夕日，元兵蜂拥着登上城墙，李芾亲临城上指挥。元兵稍退，继而又强攻登城。居住于城中的宋衡州（治今湖南衡阳）知州君谷知败局已定，遂与家人自焚。是夜，李芾手书"尽忠"二字，以为军中口令。次日凌晨，李芾强令部将沈忠将自己及家人杀死。城中百姓得知，多仿效李芾，举家自尽。以至于城中无空井，自缢于树木者比比皆是。

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初一，宋潭州守将吴继明、刘孝忠献城投降。湖南各州县随后亦相继开城投降，元军遂长驱直入。

同日，宋廷于临安宫城举行元日朝会，赵㬎于慈元殿会见朝臣，而其中参加朝会的文职官员只有6人。

元军继续逼近临安城。宋嘉兴府（今属浙江）知府刘汉杰开城降元。元军围攻安吉州（治今浙江湖州），知州赵良淳与提刑徐道隆领兵守城，拒绝劝降。城破，赵良淳自缢身亡，徐道隆被俘，后投水死。

陆秀夫出使元朝归来，回报伯颜不接受宋廷以伯侄相称的求和条件。太皇太后遂令改为君臣之称，又派监察御史刘岊奉表向元朝称臣，且向元帝忽必烈上尊号，每年纳贡银、绢各25万两、匹，以此乞求元朝保留宋朝的藩国疆域。又约伯颜至长安镇（今浙江杭州东北），以洽谈议和之事。元军统帅伯颜如期赴约，而陈宜中却违约不至。伯颜遂令元军进驻打皋亭山（今浙江杭州东北），随后元将阿刺罕、董文炳率军与伯颜

会师。临安府尹文天祥与张世杰请太后、皇帝转移海上，自己统兵据守临安，与元军背城一战。然而陈宜中却反对此举，又派监察御史杨应奎持宋帝御玺向元军请降。伯颜接受请降，遣使臣入临安府召陈宜中出城面议投降事宜，同时令囊加歹持御玺和宋廷请降表章，赴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北）面告元帝，然而陈宜中却早已逃出临安府，躲避于温州（今属浙江）清澳。

张世杰、刘师勇及苏刘义等将领认为朝廷不战而降，便各领所部乘船入海。张世杰驻泊定海（今浙江舟山），元将石国英遣都统卞彪劝降，张世杰大怒，割其舌，分其尸。刘师勇率所部漂泊于海上，见宋朝国运将终，忧愤不已，终日饮酒身亡。

杨应奎自元军返回，报告伯颜欲与执政大臣面议请降之事。太皇太后遂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令其与左丞相兼枢密使吴坚一同赴元军面商请降。文天祥奉命至元军，遂被伯颜扣押，吴坚则被释放返回临安府。

二月，伯颜于临安城设置两浙大都督府，令忙兀台、范文虎入城，治理都督府事。又令取太皇太后手诏及三省、枢密院文书，命宋廷执政大臣于其上署名，以通告宋州县守将开城投降，唯有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拒不从命。伯颜又命令查封宋廷府库，收缴史馆、礼部图籍，以及各官署的符、印、告敕等，撤销宋廷所设官府，解散侍卫军队。

三月，伯颜统军自湖州（治今浙江吴兴）进入临安，下令迁皇室及百官北上。宋帝赵㬎及皇太后全氏被迫乘轿离开宫城，与随行的福王赵与芮，沂王赵乃猷，宋度宗赵禥之母、隆国夫人黄氏，及朝臣，太学、国子学、宗学生员一道被押往元

大都（今北京）。太皇太后谢氏因病暂居宫中，后亦被押解至大都。临安宋廷遂告覆灭。

注　释

①《宋史》卷四五〇《姚訔传》。

②《宋史》卷四五〇《王安节传》。

③《宋史》卷四五〇《李芾传》。

两宋

厓山蒙难

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 年），力主抗元的将领、总都督府诸军张世杰和刘师勇、苏刘义得知临安宋廷不战而降，遂各领所部乘船入海。驸马都尉杨镇等护送年幼的益王赵昰（shì 是）、广王赵昺（bǐng 丙）及杨淑妃、秀王赵与檡等逃往婺州（治今浙江金华）。一时间，宋廷一片混乱，官僚纷纷弃官而逃。

元军入临安府（今浙江杭州）。伯颜知益王、广王已出逃婺州，遂令部将范文虎领兵追击。然只俘获杨镇，而二王已继续南逃至温州（今属浙江），范文虎追赶不及，只得返回临安。

宋礼部侍郎陆秀夫、军将苏刘义等得知益王、广王逃至温州，即匆匆登程，追赶二王。又派人赴温州清澳找来躲避于此的宰相陈宜中，且派人赴定海（今浙江舟山）召来张世杰。温州江心寺，为当年宋高宗赵构南逃时暂居之处，寺内保留高宗御座。众人见此，不禁泪涌而下。随即于此拥立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赵昺为副都元帅，并于福州（今属福建）设元帅府。又以秀王赵与檡为福建察访使，先入闽中，抚慰百

姓，颁布文告，招募各地忠义之士。不久，太皇太后谢氏遣两名宦官率8名兵士至温州，召益王、广王回临安。陈宜中将他们全部沉杀于江中，遂偕二王及官僚南下进入福建。

福建转运使黄万石已降元，又欲占据福建，以邀己功。汀州（治今福建长汀）、建州（治今福建建瓯）等州县守将亦欲随他降元。及闻二王入闽，又纷纷闭城，拒绝黄万石入城纳降。南剑州（治今福建南平）知州林起鳌派兵进击黄万石，黄万石逃遁，其部将兵士多有倒戈者。二王的军事力量遂稍得加强，基本控制了福建地区。

宋帝赵㬎一行被元军押解北上，行经瓜洲（今江苏扬州西南）。宋两淮制置使、知枢密院事李庭芝及部将姜才流泪发誓，欲劫持宋帝脱险。李庭芝以金帛犒赏将士，发兵4万夜捣瓜洲。宋军与元军激战三个时辰，元兵团团围护宋帝，且将他藏匿起来。姜才未能劫出宋帝，紧追元军不舍。元军将领阿术派人招降，姜才一口拒绝。真州（治今江苏仪征）守臣苗再成亦谋划救宋帝，也未获成功。元廷担忧宋廷余部于两淮、闽、广地区卷土重来，遂令临安府元军强行将卧病的太皇太后谢氏，连同卧榻一同抬出宫外，派70名兵士押解至燕京。

宋德祐二年（元至元十三年，1276）五月初一，在陈宜中、张世杰等拥立下，年仅9岁的益王赵昰于福州继位为帝，是为宋端宗，改元景炎。且为身在异地的赵㬎上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升福州为福安府，改大都督府为垂拱殿，府中的便殿改称为延和殿。以王刚中知福安府，尊度宗赵禥的杨淑妃为皇太妃，与赵昰一同临朝听政。随后又进封广王赵昺为卫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以陈文龙、刘黼为参知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苏刘

义为主管殿前司。然而不久，陆秀夫因与陈宜中议论不协，陈宜中使台谏官员弹劾陆秀夫，而将其罢免，放逐潮州（今属广东）。张世杰对此极为不满，告之陈宜中："此何如时，动以台谏论人。"①陈宜中方遣人召回陆秀夫。

赵昰继立，宋廷复建。不久，宋帝下诏任命赵溍为江西制置使，进兵邵武（今属福建）；谢枋为江东制置使，进兵饶州（汉今江西波阳）；李世逵、方兴等将，进兵浙东；另以吴浚为江西招谕使、邹沨为副使。又令军将傅卓、李珏、翟国秀等兵分数路，出击元军。不久，文天祥归来，赵昰授予其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文天祥遣吕武赴江淮招募豪杰，杜浒于温州招募兵士。

九月，元军将领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统水军自明州（治今浙江宁波东）南下；塔出、吕师夔、李恒等率骑兵自江西发兵，分路入攻闽、广。十月，元将吕师夔等统兵越梅岭（今大庾岭）。宋将赵溍令新令（今属广东）县令曾逢龙与部将熊飞于南雄（今属广东）阻击元军，不敌而败，曾逢龙战死，熊飞退守韶州（治今广东韶关）。元军遂将韶州团团围困，守将刘自立献城投降。元军入城，熊飞率军民与元兵激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战败。熊飞誓不投降，投水身亡。

十一月，元参政阿剌罕、军将董文炳领兵进攻处州（治今浙江丽水东南），守将李珏献城投降。宋秀王赵与檡率兵于瑞安府（今浙江温州）迫击元军，宋军大败，观察使李世达阵亡，赵与檡及其弟赵与虑、子赵孟备、监军赵由噶、察访使林温等皆被俘遭杀害。元军遂长驱直入福建，相继占据建宁府（今福建建瓯）、邵武军（今福建邵武）。

元军步步进逼，福州局势日趋紧张。陈宜中、张世杰遂备

好海船，迎宋帝赵昰、卫王赵昺、杨太妃等登船，驶入大海。不料与元水军船队不期而遇，幸而海上浓雾弥漫，元军未能识出宋船，宋帝赵昰一行方得化险为夷。宋帝出城不久，元军便进抵福安府（今福建福州）城下，知府王刚中随即出城投降。

赵昰一行自海上漂至泉州（今属福建），提举泉州市舶司蒲寿庚登船拜谒宋帝，请求留驻于泉州，张世杰不许。继而因泛海船只不足，乃抢掠市舶司舟船，且查抄其资产。蒲寿庚勃然大怒，起兵作乱，将居住于泉州的诸宗室弟子及士大夫，以及驻守的淮兵，一并杀戮。赵昰出逃，驶往潮州。蒲寿庚随即献泉州，投降元朝。

十二月，原知福安府王朝中降元后，又派人赴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劝降知军事陈文龙。陈文龙将劝降者斩首，率军民坚守城池，且遣部将林华至敌前侦探。不料林华降元，引元军进击兴化。通判曹澄孙见元军兵临城下，遂开城放入元军。陈文龙被俘，拒不投降，绝食而亡。

元将阿里海涯统兵入攻广西，相继攻陷境内州县。逃避至潮州的宋廷已陷入元军包围之中。因此，宋帝赵昰再逃惠州（治今广东惠阳东）后，即遣使臣赴元军请降。

宋景炎二年（元至元十四年，1277）二月，元军攻入广州（今属广东），随即又攻占广东诸州。正值此时，元朝北方动乱，万户只儿斡带于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境）举兵，元帝忽必烈遂召南征诸将北返，随同伯颜北上征伐，另任命官员负责管理元军占领地区的政务及军事。趁元军北撤之机，宋廷将领大举反攻，夺回失地。文天祥相继收复梅州（治今广东梅县），入江西收复会昌县（今属江西）、吉州（治今江西吉安），于雩都（今属江西）击败元军。宋广东制置使张镇孙收复广

东。张世杰则亲自率两淮兵士进攻泉州（今属福建），讨伐叛将蒲寿庚，其时汀州、漳州等地陈吊眼、许夫人亦各率峒军、畲军，赶来与之合兵。蒲寿庚关闭城门，顽强抵抗。张世杰在围攻泉州的同时，又分兵收复邵武军（今福建邵武）。

八月，元将李恒出兵增援赣州，自己则率兵于兴国（今属江西）击败文天祥所部。文天祥不及准备，损失惨重，其妻妾子女被元兵俘获，自己则因部将赵时赏掩护，方得脱险。九月，元帝忽必烈下诏，令塔出与李恒、吕师夔等将领率步军入大庾岭（今江西大庾南）；忙兀台、唆都、蒲寿庚等领水军下海，两路兵马合围宋帝赵昰。

元军再度来攻，宋廷遂转移至潮州浅湾（今广东潮州南）。其时宋廷于海岸边漂泊不定，朝廷礼仪几尽忽略，甚至杨太妃垂帘听政，与群臣交谈仍自称奴家。每逢朝会，陆秀夫仍仪表庄重，如临安朝廷一样。有时列班朝上，看到朝廷凄凉残破的景象，不免凄然泪下，陆秀夫即用朝服拭泪，以至衣服浸湿，左右无不悲痛伤心。

十月，元将唆都率所部进攻兴化军（今福建莆田）。守将陈瓒紧闭城门，奋力抗击。唆都亲临城下劝降，遭到城上宋兵密集箭、石的攻击。元兵打造云梯、炮石，猛烈攻城，经一日激战，守城宋兵伤亡甚重，方得入城。元军俘虏陈瓒，残害致死。又屠城，致使城中血流成河。

十一月，塔出会合其他几路元军，经过一番激战，攻陷广州。元将刘深率兵入攻浅湾，张世杰领兵迎战，大败，只得保护着宋帝赵昰登海船逃往秀山（今广东东莞西南），又至井澳（今广东中山南）。而宰相陈宜中则索性逃往占城（位今越南中南部），丢下朝廷，一去不返。宋帝刚到达井澳，正遇飓风，

海船毁坏，赵昰掉入海中，险些溺死。赵昰自此染病在身。飓风过后十数天，随从宋廷的兵士才集合在一起，然而死者已十之四五。元将刘深紧追，又袭击井澳。赵昰带病逃奔谢女峡，又离开海岛，漂泊至七里洋。

宋景炎三年（元至元十五年，1278），赵昰自海上移至硐洲（今广东雷州湾外）。宋将曾渊子起兵占据雷州（治今广东海康）。元军劝降不成，遂进兵猛攻。曾渊子于城破之时，逃往硐洲，被委以参知政事，广西宣谕使。不久，赵昰病情加剧。四月，11岁的赵昰病故。朝臣见如此情景，皆欲散去。唯有陆秀夫认为："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将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成中兴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数万，天若未欲绝宋，此岂不可为国耶？"②他与群臣共同拥立年仅8岁的卫王赵昺继立为帝，又下令改元祥兴。杨太妃仍与大臣一同议政。时陈宜中在占城，因与张世杰意见不合，屡召不至。宋廷遂以陆秀夫为左丞相，与张世杰共同秉政。其后，宋廷又迁往厓山（今广东新会南），张世杰率兵驻守厓山，陆秀夫则"外筹军旅，内调工役，凡有所述作，又尽出其手"③。

厓山位于新会（今属广东）南80里处的大海之中，与奇石山相对。张世杰视此为天险，易守难攻，便于此大兴土木，令兵士伐木营建皇帝行宫，且起名为慈元殿，迁杨太妃居住其中。当时随同宋帝转移至此的官吏、兵士及百姓多达20余万，多居住于船上，所需粮食多取自广右道4州及海外4州。

六月，元帝忽必烈任命张弘范为都元帅，李恒为副帅，统兵入闽、广地区，追剿宋廷残余势力。十一月，击败文天祥所部，俘文天祥。宋廷陆上势力几尽歼灭，厓山宋廷更孤立无援。

宋祥兴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正月，张弘范率元军自潮阳乘船入海，搜寻宋帝。驶至甲子门（今广东陆丰东南），俘宋军巡逻兵士，得知宋帝赵昺所在，便指挥船队驶向厓山。

元军兵进厓山，有将士建议宋军宜先占据海口，则可进可退，否则为元军所据，则无进退之路，张世杰担心久航海上恐生离心，拒绝此议，认为："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④随即下令焚毁行朝草市，又将千余艘大海船连接一起，排成"一"字阵，船头向外，船尾向内，停泊于海中。又用大绳贯穿，于四周的船上搭建楼棚，建成一水寨。宋帝赵昺被安置在寨中，作死守之计。

张弘范船队抵达厓山，随即占据海口，又派步、骑兵自陆上切断宋军砍伐樵木，汲取淡水之途。张弘范指挥元军进攻水寨，然而船阵极为坚固，张世杰率苏刘义、方兴等将领组织兵士顽强抵抗，元军无法攻克。张弘范令兵士以船载柴草，上浇油脂，乘风火攻船阵。张世杰早已于船外涂抹泥土，火攻未果。张世杰有一甥于元军之中，张弘范遂委以官号，令他先后三次赴宋军招降张世杰。张世杰向其甥历数古代忠臣，告之道："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⑤张弘范又令文天祥致书张世杰，劝其归降。文天祥断然拒绝："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张弘范强迫他写信，文天祥遂录《过零丁洋》一诗，诗末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⑥张弘范亦无可奈何。

宋军因断绝淡水，已连续十几日就咸涩海水吞咽干粮，随即呕泻，兵士体力严重不支。不久，元军副帅李恒亦率军自广州赶来参战，张弘范令他驻守厓山北面。

二月，张弘范周密部署，将元军分作 4 部，自 4 个方向进

攻宋军船阵。李恒率先自北面进击，战至中午，元军中乐声大作。张世杰以为元军欲休整，而未加防备。不料元军突然又自南面进攻，宋军南北受敌。张世杰指挥兵士迎击，无奈兵士连续作战多日，且体力不支，难以抵挡元军的猛烈进攻。张世杰见元兵攻上外围战船，立即抽调精壮兵士入中军，保卫宋帝。宋军顿时溃乱，张弘范指挥元军，直逼宋中军。

时近黄昏，风雨交加，浓雾笼罩，虽近在咫尺，仍看不清楚。张世杰和苏刘义砍断系船绳索，率 10 余艘船冲出重围，驶入大海。陆秀夫来到赵昺船上，欲带船突围，然因船只太大，且与邻船紧紧栓牢，无法行驶。陆秀夫知突围不成，便先以杖剑驱赶妻、子跳入海中，随后他背负宋帝赵昺亦投海身亡。后宫妃嫔及诸臣亦纷纷跳海自尽。7 天后，有 10 余万尸体飘浮于海面上。南宋传位 9 帝，历时 152 年，至此灭亡。

张世杰后返回厓山，收拢溃散宋兵，于途中遇杨太妃，欲求赵氏后代而立之。杨太妃得知宋帝赵昺已死，顿时抱肘痛哭道："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耳，今无望矣！"⑦遂投海而亡。张世杰将其葬于海滨。随后，张世杰欲赴占城，而随行豪绅们却力求返回广东，遂于南恩州（治今广东阳江）海陵山靠岸。正值飓风大作，将士们劝他上岸暂避，张世杰不愿离船登岸。巨浪铺天盖地而来，张世杰不慎坠入海中，溺水而亡。

注 释

①②③《宋史》卷四五一《陆秀夫传》。

④⑤《宋史》卷四五一《张世杰传》。

⑥《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

⑦《宋史》卷四七《瀛国公纪》。

两宋

更定科举制度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既以武力削平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又以文治统理天下，遂开科取士，广泛招揽文人学士参政，以稳定天下，巩固统治。

北宋时期的科举，“有进士，有诸科，有武举。常选之外，又有制科，有童子举，而进士得人为盛”①。其科目颇多，其中“诸科”即有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科举诸科中，除武举一科始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外，其余诸科均于宋初设置。

宋初礼部贡举（即科举，为地方向中央推举贡送人才，故有此称）皆于秋季举行地方解试考试，冬季将入选举人贡送礼部，次年春季举行礼部考试，合格及第者，书名张榜公布于尚书省。诸州举行考试时，由判官试进士，录事参军试诸科，如考官不通经义，则另选官考校，而判官监之。试纸上须“长官印署面给之”。考试中格者，按成绩排定甲、乙次序，具其所试经义，用红笔判定“通”、“否”，监官、试官署名其下。而后将进士文卷，诸科义卷、帖由，连同“解牒”一齐报送礼

部。如贡举不合法式，或校试不实者，监官、试官停任。若受贿，则以枉法罪论处。

自宋初重开贡举之后，设科取士尤为严格。凡命士应举，地方先以其名申报，同意后方可参加解试。及解试之际，须有什伍相保，且呈报“家状”。家状及试卷之首，须注明解试年号及举数、场第、乡贯，不得随意变更。考试前，知举官先召什伍联保询问，如与家状及卷首所署相同方准入试。凡就试，唯试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等书。若有换带书籍者，及考场中“口相受授者”，发现后即逐出。凡诸州长吏举送，必先察实其籍贯及其德行。乡里推举，须有10人相保，如其中有人行为不端，则不能推举。为避免知举官徇私舞弊，下令禁止台阁近臣向知举官推荐知己。

宋军平定川蜀、荆湖之后，贡举应试者大增。开宝三年(970)，赵匡胤令“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尝终场者，得一百六人”，皆赐予本科出身，称为“特奏名”②。自此，“特奏名”便成为宋代科举制中的重要内容，为破例之举。

开宝五年（972)，礼部进奏合格进士、诸科共28人，赵匡胤于讲武殿亲自召见他们，之后下诏放榜，而未及引试。次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共录取11人。然而其中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语无伦次，被赵匡胤废黜。不久即有人以武济川为李昉同乡，上诉李昉“用情取舍”。赵匡胤遂令抄录未及第者姓名，共360人，皆令入朝召见。又于其中选择195人，连同已及第者一起，于殿上发给纸笔，当场考诗赋。命殿中侍御史李莹等为考官，结果得进士26人，五经4人，开元礼7人，三礼38人，三传26人，三史3人，学究18人，明法5人，皆赐予及第，又赐钱20万，并设宴款待。

“殿试”遂由此而成为常制。开宝八年（975），赵匡胤亲自策试进士，所排定名次与省试名次不同，自此，殿试与省试名次始有升降之别，而最终皆以殿试名次为准。

自开宝五年始，宋代科举分解试、省试、殿试3级考试。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而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有州试（又称乡试）、转运司试（又称漕试）、国子监试（又称太学试）等数种，于秋季举行。举人经解试合格，由所在州、转运司或国子监等依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于次年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省试合格者再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经殿试合格者，方可“登科”及第。

及宋太宗赵炅即位，又“兴文教，抑武事”③，科举取士甚为兴旺。他十分重视科举，曾对侍臣讲：“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④太平兴国三年（977），赵炅亲自主持进士殿试，得109人。二日后又主持诸科殿试，得200人，并赐及第。后又察阅贡籍，得10举以上至15举进士、诸科180余人，皆赐出身。“九经”科有7人不中格，赵炅悯其老，特赐予同“三传”出身。三年冬季，诸州举人会集京师，适逢赵炅将亲征北汉，遂罢当年科举。自此，科举考试无定期，间隔1年或2年方行贡举。

淳化三年（992），诸路贡士已达17000余人。然而于科举考试时，有击登闻鼓上诉校试不公者，而将作监丞陈彭年上疏，请求于殿试时，“糊名考校，以革其弊”⑤，即将写于卷首的姓名、籍贯等内容粘糊密封，而另编号，使考官不知其姓名，以防舞弊。是年贡举以苏易简知贡举，受诏即赴贡院，采用“糊名考校”之法，此遂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方法之一，科

举考试日趋严密。

宋真宗赵恒即位后，于科举取士中，推恩颇广，是宋代少见的。然他又严格考试，以“糊名考校法”定制，规定凡试卷，先由封印院糊名送知举官考定高下，再令封弥送覆考所，考毕然后参校得失。有不合格者，须至下场考试前再发落。赵恒告诫馆阁、台省官员，如有人托情以求徇私者，必须上报，如隐匿不告者论罪。

景德四年（1007），宋廷详定“考校进士程式”，送礼部贡院，颁行诸州，严格寓居他州应试者的审报程序。每年秋季将行解试前，由县令及僚佐察访应试者之行义，为其担保，并上报州；州长贰官复审查核实，再上本路使者类试。如已担任的应试者有行为不端，则州县长官皆坐罪。如参加省试而文理纰缪，则原考官坐罪。

不久，又定“亲试进士条制”。凡殿试策士，于大殿两侧廊庑，摆设几席，于其上标注姓名。前一日，表其次序，揭榜于宫外。次日凌晨，应试者入宫就席。殿试毕，由内臣收卷，交编排官，去卷首姓名及籍贯，另以字号取代。为防止考官辨认字迹，则再由封弥官将原试卷誊录校勘，用御书院印，交考官审评定等。之后再将考官评定等级糊封，又送复考官再定等。而后由编排官审阅考官与复考官的定等，如不同则再定等。如编排官所定等，仍与已定等均不同，则以相近的等级为准。审评定等毕，方取姓名、籍贯与字号相合，且将姓名，成绩及试卷一并呈交皇帝。其后，临轩唱名，一、二两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五等曰“同出身”。

宋仁宗赵祯即位后，科举制更为完善，其中尤以进士及诸科最为盛行。然而“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其贡礼

部而数诎者，得特奏名"，其结果"因循不学"。赵祯为此深感忧虑，特下诏："自今宜笃进厥学，无习侥幸焉。"⑥

景祐初年（1034），乡学之士甚众，而科举取士犹狭路，难以使众举人皆通行。为此赵祯下诏，令就试进士、诸科，十取其二。凡举人年龄50岁以上，参加进士考试5次，诸科考试6次；或曾参加进士殿试3次，诸科殿试5次；或曾参加真宗时的殿试，虽试文不合格，但不得废黜，一律上奏朝廷，此制由此而成定制。

仁宗时，又将"别头试"推行至诸路解试中。规定应试举人有亲戚于本州任官，或任本路发解官，则令应试举人赴转运司移试，录取十分之三。又令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国子监解试亦行别头试、封弥及誊录法。

此前，贡举承唐制，亦由举人作文，于解试或省试前先呈交考官，称"预投公卷"。然公卷多假他人文字，或雇人抄写。景德年间，对此曾令举人于试纸前亲笔书写家状，如与公卷及试卷中所书笔迹不同，则不准考试。如有假手文字，经辨查核实，即斥去，且永不得赴举。及封弥、誊录法逐步推行至地方，预报公卷遂自此废止。

嘉祐二年（1057），宋帝赵祯亲自考试举人，凡参加殿试者自此不再被黜落，仁宗之朝共行殿试13次，得进士4570人，其中三甲，即状元、榜眼、探花共39人。

宋英宗赵曙即位后，有朝臣认为隔年贡士法多有不便，赵曙乃令礼部改为3年一贡举。录取时，明经及诸科合格者，不得超过进士之数。

考试内容视科目而定。英宗以前，进士科诗、赋、论各一道，时务策5道，贴《论语》十道，答《春秋》或《礼记》墨

义10条。宋神宗赵顼时，又改科举考试之法。罢诗赋、帖经、墨义，举人各学《周易》、《诗经》、《书经》、《周礼》、《礼记》一经，兼学《论语》、《孟子》。每次考试分4场，初场试“大经”；二场试“兼经”，大义10道，后改《论语义》、《孟子义》各3道；三场试“论”一首；4场试“策”3道，若礼部试则增2道。又设置明法新科，试律令、《刑统》，大义及断案。后赵顼下诏，自进士第3人以下试法。熙宁三年（1070），宋帝赵顼亲试进士，始专考时务策，且限定答卷字数为千字。旧制，特奏名者只试论一道，自此亦改为试时务策。同时制定回避之法：诸州举送官、发解官、考试官、监试官，凡其亲属及门客不准于本官所在州应试，而以应试者之名报转运司，另外出题考试。

宋哲宗赵煦即位之初，每次贡举，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者约八九百。而其中特奏名者竟占一半以上。为此知贡举苏轼、孔文仲上言称：“前后恩科命官，几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奋厉，有闻于时？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以此知其无益有损。议者不过谓宜广恩泽，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禄无用之人，而所至州县，举罹其害。”⑦赵煦因此下诏，定特奏名考取数，进士入4等以上，诸科入3等以上，不准录取超过总数的一半以上。

元祐四年（1089），宋廷又设经义、诗赋两科，罢试律义。凡诗赋进士，于《周易》、《诗经》、《书经》、《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选习一经。初试本经义2道，《论语义》、《孟子义》各1道；二试赋及律诗各1首；三试论一首；四试子、史、时务策2道。凡专经进士，须习两经，以《诗经》、《礼记》、《周礼》、《左氏春秋》为大经，《书经》、《周易》、《公羊

传》、《谷梁传》、《仪礼》为中经。习《左氏春秋》得兼习《公羊传》、《谷梁传》、《书经》；习《周礼》得兼习《仪礼》或《周易》；习《礼记》、《诗经》者并兼习《书经》。如愿习两大经者，可得允许，然不得只习两中经。考试时，初试本经义3道，《论语义》1道；二试本经义3道，《孟子义》1道；三试论1首；四试子、史、时务策2道。两科录取并以4场考试成绩通定高下，专经者以经义定取舍，兼诗赋者以诗赋为去留，其名次高下，则参考时务策及论的成绩。

既而又立明经行修科，令在朝文臣各推举一人，只于礼部应试。元祐六年（1091），恢复通礼科。且改定考官设置，凡礼部试，设知举官4员，罢差参详官，而置点检官20人，分属4位知举官，协力通考。诸州所设点检官专纠违纪，亦参预考试。

崇宁三年（1104），赵佶下诏："天下取士，悉由学校升贡，其州郡发解及试礼部法并罢。"⑧自此，每年只试上舍生，其法同原礼部试，亦差知举官。科举不行，而州县通行"三舍法"，得免试入学者，多当官子弟，他们在校不务学业，常屡试方得应格。而家境贫困又年老者甚为不满，赵佶又定以原省试三年，参照科举制取士一次。

宣和三年（1121），罢州县学"三舍法"，只于太学实行。且恢复科举取士。次年，举行礼部试，报考进士者多达15000人。考毕，正奏名赐第者800余人。且宫内宦官亦得应试赐第，官吏若"上书献颂"，亦可登第，科举遂滥。

南宋建立之初，国内局势极不稳定，宋、金战争不已。虽宋帝赵构曾下诏令诸道提刑按察司派官主持地方漕试，又于绍兴二年（1128），定以诗赋、经义取士，然因战火所隔，川、

陕、河北、京东地区举人多未应试。是年秋，赵构于扬州（今属江苏）集英殿召集四方之士举行策试，以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学究出身、同出身共取进士 451 人。直至绍兴元年（1131）之后，科举制方逐渐得以恢复正常。然川、陕地区因战火所隔，举人仍不能赴京城应试，只得于宣抚司应试。绍兴十二年（1142），定正月省试，三月殿试，遂以此为定制。

宋孝宗赵昚即位后，于乾道四年（1168）又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诗书，遂命朝臣讨论"殿最之法"。淳熙二年（1175），于殿试唱名后二日，令殿试进士射艺。进士遂易戎服，各给六支箭，弓不限斗力，结果多命中靶的。

旧制，殿试若至傍晚时分，允许赐烛照明。淳熙十一年（1184），规定廷试不许见烛，其中最后交卷者将予降黜。凡省试、国子监试及两浙转运司试，均不得见烛。

宋宁宗赵扩于开禧元年（1205），下诏："礼部考试，以三场俱优为上，二场优次之，一场优又次之，俱劣为下。毋以片言只字取人。编排既定，从知举审定高下，永为通考之法。"⑨

宋代科举制行至宋理宗赵昀时，已是"奸弊愈滋"。所取之士既不精，"时谓之缪种流传"，"不学之流，往往中第"⑩。宝庆二年（1226 年），赵昀采纳左谏议大夫朱端常之议，命精择考官，严格查处营私舞弊及怀挟、传题、传稿、替代等行为。此后屡禁屡犯，终不得止，科举日渐衰敝。

注　释

①②《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

④《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O。

⑥⑦⑧《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

⑨⑩《宋史》卷一五六《选举志二》。

两宋

词坛兴衰

词，亦称词曲或曲子词，源于民间小调，后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多与音乐相配合。因词最初是自五言、七言诗演变而成，其句式长短不一，故又称长短句，亦称诗余。以词配乐，形成诸多词调，又称词牌。以调和词，相得益彰，遂逐渐形成句式、韵律固定的词。

北宋统一之后，城市经济日趋发展，市民生活日益丰富，词作由此而兴盛。宋初沿袭五代南唐词风，以南唐主李煜为代表，多为短章纤巧之词，称作小令。李煜自入朝开封，成为阶下囚，思想感情变化很大，虽南唐词坛遗风犹存，然词意多为故国之念，怀旧之情，感情真挚。但宋初词坛除此之外，仍无其他建树，亦无著名词人。

至宋仁宗在位时（1023—1063），宋代词坛进入勃兴时期，涌现出以晏殊、欧阳修、柳永等人为代表的词家。晏殊与欧阳修等人出生于江南，受南唐词风影响较大，以风流自命，多属短章小令，轻丽之词。晏殊于庆历年间（1041—1048）曾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上层社会接触较多。因此其词多以统治集

团的生活为题材，描述达官贵人的“雍荣华贵”及其奢华的生活。虽其间仍有“艳词”之遗风，然又即景抒情，笔调细腻，辞语含蓄，风格清新。

与晏殊同期的词人柳永是一位于宋代词坛上颇具造诣的名家。他怀才不遇，仕途屡遭磨难，因失意无聊，而流连坊曲，与乐工、歌妓交往颇密。其笔下创造出大量易于上口歌唱的新乐府，称作慢词。慢词与小令相比，属繁音缛节的长调，易于表述及抒发情感。因柳永生活在社会中下层，接近市民阶层，较深地了解市民的社会生活，故其词作范围能够突破士大夫小庭深院的范畴，引向都市和街闻，从而极大地开拓了词作的题材范围，亦为宋词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途。柳永词作追求词语的通俗、浅显及口语化，故为社会广泛接受及欢迎。由此而使词的歌唱日渐普及，成为雅俗共赏的文化娱乐形式，以至于“天下咏之”，柳永之词广为传唱，“凡有井水之处即能歌‘柳词’”①。柳永的词作，仅传世的《乐章集》即收录 200 余首，其中慢词长调即有 100 余首。其长调《望海潮》(东南形胜)、《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即描绘了都市生活和送别的场面。柳永词多为歌妓而作，抒发个人的得意与失意，仍未摆脱“词为艳科”的束缚，而以相思、离别、宴饮、欢会、伤春、悲秋等为主要题材，词风宛转柔美，而被称之为“婉约派”。同期的晏殊、欧阳修等人均属这一派。这对后来的著名词人李清照、周邦彦等人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宋代词坛注入清新之风的是苏轼。他在柳永开创的慢词长调的基础上，更“以诗入词”，一扫宋初以来词作消沉、做作的风格，突破传统的词作题材，使词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从而扩大词作的意境，提高其品位，使词的表现内容更为广

泛，山川景致、乡间风光、怀古感旧等题材均可入词。其代表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尽抒作者豪放之情，故为后人称为“豪放派”，为宋代词坛开创了一个新的天地。

苏轼作词，以写意为主，寓情于景，常不受词律所限，故后代多对此颇有微词，以为他未恪守传统词法，尽管如此，其所创雄浑豪放之风，毕竟使宋代词坛更为繁荣。但这一词风在苏轼之后并未得到继承，其门人、著名词家秦观即摒弃豪放词风，而承袭柳永遗风，然而词品更高。其传世有《淮海诗》，代表作《踏莎行》（雾失楼台）、《鹊桥仙》（纤云弄巧）等，皆声情并茂，语词精细优美。其后，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亦继承柳永“婉约派”的风格，而被认为是自秦观之后的正宗“婉约派”。李清照早年生活平静悠闲，其词讲究音韵、格律，以抒情为主。传世之作如《醉花阴》（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等，描写女子深居闺中的寂寞和惜春的心情。宋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侵，宋廷一味投降求和。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先后逃往江南。赵明诚死后，李清照只身飘泊流离，生活凄凉悲苦。她通过《声声慢》（寻寻觅觅）等词作，反映当时沉重的民族灾难，对丧权误国的昏君奸臣给予鞭笞。以传统词风，抒发爱国情怀，使“婉约派”诗作有了较高的意境。然而李清照词仍以反映个人孤苦凄凉的处境为主，有浓厚的伤感之情，这便是“婉约派”诗风的显著标志和重要特征。

北宋末年，以宋徽宗、宋钦宗为首的统治集团置国家危难于不顾，奢靡淫逸，竭力粉饰太平，“丰亨豫大”，醉生梦死。这一风气亦影响到一代词风，周邦彦即是著名的代表人物。周

邦彦曾任大晟令，职掌音律，故精通词律，自度词曲。他最突出的成绩是对格律的完善，及对音律和章法的贡献，是宋词“格律派”的代表人物。但其词作内容多取材于宫廷，属艳词之风，且感情贫乏，缺乏激情。

南宋初年，面临着金军咄咄逼人的攻势，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社会动荡不安。爱国将士及百姓于朝野上下，形成一股强烈的抗金浪潮，爱国激情亦猛烈冲击词坛，故涌现出一批具有浓厚爱国主义情感的词人和词作。其中尤以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为代表，其悲壮豪迈的风格，对宋代词坛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自此，宋词的思想性益发突出。

陆游亦是南宋著名的主战派代表人物，虽以作诗见长，但亦于词坛颇具造诣。词作奔放激昂，感情强烈。其代表作《诉衷情》词：“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尽抒自己对抗金爱国的不屈壮志，谴责了投降派卖国乞和的卑劣行径，亦为千古绝唱。

继陆游之后，宋代词坛的又一位名星，则是南宋时期著名的主战派官僚，杰出的爱国词人辛弃疾。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其出生时，京东地区已为金军占据。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1161），完颜亮大举进击南宋，河南、京东等地民众纷纷起兵抗金。时年22岁的辛弃疾率众2000人，加入耿京忠义军。后劝说耿京归宋，然而当他渡江接洽归附事宜，返回北方时，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杀害，义军溃散。辛弃疾随即率50余人赴济州（治今山东巨野），俘金知济州张安国，且率反正兵士万余人渡江投奔南宋。初任江阴军签判，宋

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后历任滁州（治今安徽滁县）知州，江西提刑。宋淳熙四年（1177），改任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兼荆湖北路安抚使。其后历任江西、湖南安抚使。于淳熙八年（1181）罢职，退居于江西上饶郊外“带湖”畔的“稼轩”。于此居住10余年后，宋绍熙三年（1192），复出任福建提刑、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等职。后又被罢官，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宋嘉泰三年（1203），任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未几，奉诏入朝。宋嘉泰四年（1204），出知镇江府。次年再遭罢免，退居铅山，不久病故。辛弃疾一生处于南宋动荡的政局之中，内忧外患。他任官期间，力主抗金，与主和派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此番经历，对辛弃疾的词作影响深远。

辛弃疾有《稼轩长短句》620余首。著名的有《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木兰花慢·席上送张仲固帅兴元》、《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一批词作。词中饱含抗战、爱国之情，以奋发激昂的热情，抒发报国之心，“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同时也蕴含壮志未酬、报国无门的悲愤。“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为陈同父赋壮词以寄之》）辛弃疾的词继承了苏轼豪放之风，慷慨豪迈，激情满怀。且进一步将“以诗为词”发展为“以文为词”，使宋词的思想性、艺术性均达到一个顶峰。辛弃疾因此而成为宋代词坛的巨匠。

南宋末期，政治衰败，宋代词坛亦江河日下，反映于词作中，即出现逃避现实、雕琢词藻的风气，与苏轼、辛弃疾的迥

然不同。姜夔即是代表之一。姜夔屡试不第，乃游历于鄂、赣、皖、苏、闽间，出入仕宦家，交游诗人词客。其上承周邦彦，使宋代词坛中的“格律派”得以发展与完善，其词作清妙秀远，追求高雅，然又消极伤感，具有“婉约派”的柔美清丽之风，如其代表作《扬州慢》即属此类。其所著《白石道人歌曲》六卷，多自度曲，其中有旁注音谱，是仅存完整的宋代词曲谱。

与姜夔同期或稍后的词人还有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等。他们远绍周邦彦，近承姜夔，以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为权舆，缺乏思想内容。吴文英曾交游于权相贾似道、吴潜之门，其词作刻意追求形式，堆砌词藻，华而不实，这与南宋晚期大敌当前，或贪生怕死，或醉生梦死的腐朽政治有内在的联系，宋代词坛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渐衰败。

注　释

①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两宋

史学之盛

宋代是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当代史的修撰，既有官修，又有私撰；断代史的编修，则有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欧阳修修撰的《新五代史》，宋祁、欧阳修等人编纂的《新唐书》。然而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通史的编写，其中尤以编年体史书最为重要。

宋治平三年（1066），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编撰《通志》8卷进呈朝廷，颇得英宗赵曙赏识，遂再令司马光依时间顺序编辑历代名臣事迹，以为一书。且命司马光自选官属，于崇文院设置书局，允许借用龙图阁、天章阁、三馆（指昭文馆、集贤院、史馆）、秘阁书籍，以供参阅。

司马光领命，遂遴选秘书丞刘恕、国子监直讲刘攽（音班）、进士范祖禹参与、协助编修。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于商定编次用力颇大。遇史事纷杂难治者，多请他解决，对魏晋以后事，考证尤为精辟。刘攽专汉史，范祖禹精唐史，皆有较高的造诣。他们协助司马光编史，既分工又合作，均作出重要的贡献。

为编撰这部编年体史书，司马光与馆僚们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司马光于书成后所撰《进〈资治通鉴〉表》中，提到编撰此书，“通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①。司马光等利用宫廷藏书的便利条件，除翻阅正史外，还有大量的杂史诸书。其所参阅的书籍，计有正史、编年、别史、杂史等10类，共300余种。其中绝大多数的文献资料，经历后代的沧桑，已佚失殆尽，今赖司马光此书，方得存其梗概。对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司马光与馆僚们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鉴别。他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于文献资料的取舍标准，不囿于积习，不依传统观念行事，对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从而使编史的史料征引，既准确又翔实。如其“叙王世充、李密事用《河洛记》，魏郑公谏诤用《谏录》，李绛议奏用《李司空论事》，睢阳事用《张中丞传》，淮西事用《凉公平蔡录》，李泌事用《邺侯家传》，李德裕太原泽潞回鹘事用《两朝献替记》，大中吐蕃尚婢之事用林恩《后史补》，韩偓凤翔谋画用《金銮密记》，平庞勋用《彭门纪乱》，讨裘甫用《平剡录》，记毕铎、吕用之事用《广陵妖乱志》”②。

司马光自领命入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之后，便悉心投入编史工作，为此，他与馆僚们付出了极大的精力，耗费了巨大的心血。他们收集到两晋，南朝宋、齐、梁、陈，以及隋等六朝以来的奏御，而以唐代的文献最为丰富。遂由范祖禹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因所录资料颇丰，他们便将抄录史事文字的纸卷，每4丈截为1卷。而后司马光亲自逐卷审定，每三天审定1卷，依据文献资料所述史事的详略、真伪，随时进行删减增补。范祖禹等馆僚初步编次的“唐纪”、“草

卷”即有八九百卷之多，司马光先粗审成编，然后又细删，直至删存至数十卷。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于其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进书表中，提到“臣窃闻司马光之作《资治通鉴》也，先使其寮采摭异闻，以年月日为丛目。丛目既成，乃修长编。唐三百年，范祖禹实掌之。光谓祖禹，长编宁失于繁，无失于略。今《唐记》取祖禹之六百卷，删为八十卷是也”。

为使编撰顺利进行，司马光每日夜分始眠，五鼓即起，工作虽繁重艰巨，却不失细致认真。其书修成后，有部分“草卷”积存于洛阳崇德寺修书局，竟堆满两屋。如此浩繁的史事辑录，于抄录时，竟无一潦草之迹，足见司马光等人严谨的治学态度。

司马光编修此书，是欲为宋帝治理朝政提供历史鉴戒，故尽可能真实详尽地反映史事。其对历代统治者的昏庸残暴、骄奢淫逸亦有所揭露，对因统治者的腐败统治，而造成“百姓疲弊”、“饥寒穷愁”，导致百姓反抗、起义之事，亦不回避。

此书的编撰大致分作三步：第一步为编写“丛目”，即由馆僚等协修者将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依时间先后加以排列。第二步为编辑“长编”，即对“丛目”中的史料加以考正辨析，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此亦由馆僚及协修者完成，由书吏抄录。第三步则由司马光据“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凡是非曲委定夺，皆出自其手，而终成定稿。书中往往一事参照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实有歧异之处，均加考订，皆注明斟酌取舍之由，以为《考异》。叙事虽依时间编次，然多用追叙和终言之法，说明其前因后果，明晰而系统。所叙事以政治、军事为主，展示历代君臣成败、治事、安危之迹，以为借鉴。而较少记载历代经济、文化

史事。

宋治平四年（1067），宋帝赵曙死，其子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赵顼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的变法，遭贬出朝，任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今属河南），历任闲职，遂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直至元丰七年（1084）完成此书，历时19年。

《资治通鉴》因司马光精心润色，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亦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而被后世与《史记》并列誉为中国古代史家之绝笔。

《资治通鉴》全书294卷，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此书自《周纪》起，至《五代纪》止，记载自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的历史。其馆僚刘恕又撰《通鉴外纪》10卷，自传说中的庖牺氏迄周威烈王二十年前，以与《资治通鉴》相衔接。

《资治通鉴》成书之后，宋元丰八年（1085）又令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对此书重新加以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遂送往杭州雕版，于元祐七年（1092）刊印行世。

《资治通鉴》虽不失为史学巨著，却因其叙事浩博，难以寻究史事终始。遂有南宋严州（治今浙江建德东北）教授袁枢（1131－1205），为此而编纂成《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袁枢依据《资治通鉴》原文，区别门目，以类纂辑。每事起讫详尽，自为标题。每篇各依年月，自为首尾。全书起自《三家分晋》，止于《周世宗征淮南》，将1362年的史事，概括为239篇。另

有66事附于各篇之后，总计305题。袁枢编纂此书时，对《资治通鉴》旧文取舍剪裁，颇为精密。宋代以前，史家著书仅有编年、纪传两体。编年体以年月为经，“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而纪传体以人物为主，“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袁枢则不拘于这两种传统的著史体例，而独创“纪事本末”的新体例。其体例因事命篇，始终完整，是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又一重要成就。此书成于宋淳熙元年（1174），三年，初刻于严州郡学，遂刊行各地。

司马光所撰《资治通鉴》，迄于五代后周，其后南宋史学家李焘仿《资治通鉴》体例，私家编著成当朝断代编年体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他花费近40年的时间，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广征博采家录、野记，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依据充分。李焘亦本“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宗旨，凡各书记述相异者，则两存其说，且以注文标出，与《资治通鉴》的《考异》类似。李焘为编纂此书，特制作10个木橱，用以收集材料。“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决第之，井然有条。”《续资治通鉴长编》原本980卷，今存520卷，记载了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总计168年的北宋史事。此书曾于宋孝宗赵昚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朝廷。淳熙十年（1183），李焘又将此书重新编订，而成980卷。另上《举要》68卷，《修换事总目》10卷，《总目》5卷，全书总计1063卷。

《续资治通鉴长编》成书后，又有南宋史学家杨仲良继袁枢首创“纪事本末”体后，编撰而成《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

末》一书。他将《续资治通鉴长编》旧文所记史事，分门别类，以北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炅、真宗赵恒、仁宗赵祯、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9朝，各为事目，其中亦或再分子目。叙事取自李焘原文，依年月顺序，首尾相连，采缀成篇，亦间有删节。

南宋时，私人修史极盛。宋孝宗赵昚在位时（1163－1189），又有史家王偁编纂成北宋史书《东都事略》130卷。起自宋太祖，止于宋钦宗，计帝纪12卷，世家5卷，列传105卷，附录8卷。

另有史家徐梦莘修撰成《三朝北盟会编》250卷，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赵构三朝史实，尤以宋、金和战为主。徐梦莘辑录时人所记，又广泛收搜三朝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状、碑志、文集、杂著等，凡"事涉北盟者"，皆予兼收并蓄，故叙事细致。其后，徐梦莘又编《北盟集补》50卷，今已佚。

宋宁宗赵扩在位时（1195－1224），史学家李心传（1167－1240）又编撰成《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与《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名著。前书分甲、乙两集，各20卷。其甲集完成于嘉泰二年（1202），他于序言中称："每念渡江以来，记载未备，使明君、良臣、名儒、猛将之行事，犹郁而未彰。至于七十年间兵戎、财赋之源流，礼乐制度之因革，有司之传，往往失坠，甚可惜也。乃辑建炎至今朝野所闻之事，凡有涉一时之利害与诸人之得失者，专门著录，起丁未（建炎元年，1227），迄壬戌（嘉泰二年），以类相从，凡六百有五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辑录南宋初年以来的朝野事迹，分门别类，分作上德、郊庙、典礼、制作、朝事、时事、杂事、故事、官

制、取士、财赋、兵马、边防13门。此书乙集完成于嘉泰九年（1216），亦依甲集分门别类，续记朝野诸事，是为甲集的补缺。其中亦收集辑录嘉泰二年后的史事，唯少郊庙1门。其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亦记载了自建炎元年（1127）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计36年的史事，而与《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一书互为经纬、补充。李心传编写《系年要录》时，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修史书为依据，又以其他官修史书，以及百余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为参考，对史事进行细致考订。此书编纂多仿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体例，然与之“宁失于繁，无失于略”有所不同，而是摘要而记。故后世多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继续。

宋代自立国至亡国的320年间，史学始终兴盛不衰，史学家及其著述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填写了辉煌的一页。

注　释

①《司马文正公家传集》卷一七。

② 洪迈《容斋随笔》。

两宋

学校之设

宋朝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宋初百业待兴，主要忙于兴师用兵，尚无暇顾及兴学之事。故自宋太祖赵匡胤至宋仁宗赵祯时，学校设置多沿袭前代旧制，官学发展比较缓慢，学校规模亦不大。

宋初承袭后周之制，于京城汴梁（是为东京，今河南开封）设置国子监（一度曾改称为国子学），以为最高学府和中央教育管理机构。以七品以上京官、朝官应荫子孙隶学受业。然而初无定制，国子生亦无定员。开宝八年（975），国子监上言："生徒旧数七十人，奉诏分习《五经》，然系籍者或久不至，而在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肄业，请以补监生之缺。"①国子监生徒遂有增加，而以200人为定额。

凡京师所设其它学校皆隶属国子监。然而宋初京师学校多废置无常，其中宗学是以宗室子弟为生徒。凡诸王位尊者，立小学于其王宫中，其子孙8至14岁者，皆令入学，每日诵20字。凡学成者一律以特恩授其环卫官或得召试迁转官，而非经礼部常试。其他学校亦无定制章法。

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宋廷允许文武官员升为朝官时，其嫡系亲属可随同赴京城，“附国学取解”。而久居京师，远离家乡者，如其“文艺可称”，又有原籍官员担保，经监官审验，亦可入国学作为贡举生员。国子监生徒遂得以增加。

宋代学校的发展，当始于宋仁宗在位期间。其时，国子监下隶广文馆、太学、律学三校。以广文馆接待四方入京城应试者，以太学收八品以下官子弟及庶人子弟为生徒。每逢国子监举行入学考试，则许品官子弟向保荐官员投送家状，“量试艺业”。而后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人数多达千余。然而考试结束，则生徒散归，讲官无须授业，学校竟成为“游寓之所”。而能经常听讲者，不过一二十人。为此宋廷规定，必须在校学满500天者，或原为地方贡举入学者须学满100天者，由各学学官查证核实，再经京朝官保任，方可以参加各学的秋试。但规定每10人只能选送3人应试。凡一旦入学学习，每月初必须由其本人亲自签到。如遇私事或患病、奔丧等事，皆给假。但超出准予的假期或一个月不来就学者，则开除其学籍。后因谏官余靖极言非便，遂废止听讲日期的限制。

仁宗时，设立四门学，以八品以下官子弟及庶人子弟充生徒，每年一试补。届时派学官封锁学校，弥封试卷，择其优异者书名上奏，而后颁发文书。学业欠优异者，仍允许继续留学就读，若3年中仍未合格，则令其退学。四门学设置不久，即废。

为整顿太学治学宽简之弊端，赵祯采用保宁节度推官、湖州（治今浙江吴兴）教授胡瑗治学之法，召其为国子监直讲，后又进天章阁侍讲，兼学正。从而使太学学风得以改观。

庆历四年（1044）三月，令州县皆设学校，由当地选属官为教授。于是，州县皆奉诏兴学，地方学校，遂逐渐兴起。

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十分推崇儒学，自京师至州县，均建有学校，而尤以太学为重。

太学于庆历年间（1041－1054），置生员 200 人。熙宁初（1068）增至 300 人，不久，赵顼下诏，令增至 900 人。熙宁四年（1071），于锡庆院及朝集院西廊庑建 4 所讲堂，至此太学始具规模。太学内，除主判官外，增置直讲为 10 员，每 2 员负责讲授 1 经。十月，立太学三舍法。初入太学者为外舍，定额为 700 人；外舍升内舍，定额 200 人；内舍升上舍，定额 100 人。生员各执 1 经，从负责该经的讲官受学。每月考试，择其优者以次升舍。至上舍，则可充任学正、学录、学谕等学官，每 1 经由 2 人担任讲授。上舍生中学行卓异者，由主判、直讲推荐至中书省，即可免发解及礼部试，召试赐第。

与此同时，赵顼令各州设置学官，以管理本州地方学校，给各州学田 10 顷，用以抚养生徒。又初置小学教授。熙宁八年（1075），赵顼再向中央及地方学官颁发王安石所撰《书义》、《诗义》、《周礼义》，即《三经新义》，作为学校教材。

元丰三年（1079），赵顼颁布“学令”：太学设置 80 斋，每斋房 5 间，容 30 人。外舍生徒 2000 人，每月一私试，每年一公试，公试成绩位第一、第二等者，升补内舍。内舍生徒 300 人，隔年一舍试，成绩为优、平二等者，升补上舍。上舍生徒 100 人，分作 3 等。凡以次升舍之试，皆取贡举考试所行弥封、誊录等法，而上舍试，则不许学官参与考校。此外凡以次升舍之生徒，还须参考学官对其所书德行、才艺状况，优异者方可升舍。太学学正增为 5 人，学录增为 10 人，学录可参

选生徒担任。宋廷每年赐2万5千缗线，又取州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且将开封府（今河南开封）的解试名额悉归太学。国子监生徒所需的解试名额，则由太学分出一定的数额，但不得超过40人。

宋仁宗时，还相继设置了武学，生员以百人为额；律学，设教授4员，凡命官、举人均得入学。

宋哲宗赵煦即位后，始置在京小学，设置“就傅”、“初篮”两斋。绍圣元年（1094），赵煦下诏，规定“太学生悉用元丰制推恩，上等即注官者，岁毋过二人；免礼部试者，每举五人而止；免解试者，二十人而止”②。元符元年（1098），又下诏许命官补国子生，但无过40人。凡太学考试，令择优录取学习“二礼”者，允许占全额之半，余下一半授予学习其他诸经者。

元符二年（1099），赵煦又令诸州推行“三舍法”，凡州学考选、升补，悉如太学。许各州补上舍1人，补内舍2人，每年贡举之。其上舍附太学外舍，若试中则补内舍生，如3试均未通过升舍，则将其遣还回原州。补内舍生则免试。至太学一律补为外舍生。又令各路选监司官1人提举学校，以副贰官同掌其职。遇补试上舍、内舍生，则选有出身官1人，与教授共同考选，仍须弥封、誊录。元符三年（1100年），太学试补外舍，改为四季考试，由学官自己命题，试卷亦不再誊录，但仍加试一场“论”。

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各地州县皆置学校。州学置教授2名，县亦置小学。县学生经选考升入所在州的州学，州学生则每三年推荐至太学。到太学后，对这些选送来的州学生再进行附试，分作3等：上等补太学上舍，中等补下等上舍，下

等补内舍，余皆入外舍。

崇宁三年（1104），又始定诸路增加供养县学学生的数额，大县50人，中县40人，小县30人。凡州县学生曾参加太学公、私试，现又重返太学，入内舍者，可免其家户役，入上舍者，则依“官户法”享受免赋役的特权。

不久，宋帝赵佶令将作少监李诫，于汴梁城南门外寻地营建外学，是为辟雍，为屋1872楹。自是，太学专处上舍、内舍生，而外学则处外舍生。上舍遂增至200人，内舍增至600人，外舍则增至3000人。外舍为4讲堂、100斋，每斋容30人。地方州学推举入太学者，皆先入外学，经试补入上舍、内舍，始得进入太学。而原太学的外舍生，亦令其出居外学。外学的规章制度一律采用太学的内容。以国子祭酒总理治学之事，外学官属设司业、丞各1人，酌减太学博士、学正、学录，归属外学。仍增博士为10员，学正、学录各为5员，学生充学谕者10人，直学2人。

赵佶又令置诸王宫大学、小学教授，立考选法。且停废解试、省试，悉由学校“升贡”，故中央和地方州学倍受重视，州县学校遂发展至宋代极盛时期。

同年，又于京师置算学，以210人为额，许命官及庶人为之；书学，习篆、隶、草3体；画学，内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数门。至此，国子监先后曾属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宗学、武学、律学、算学、书学、医学、画学等10所学校。其中四门学未几即罢，武学废置无常。其后，大观四年（1110），又将算学生归之太史局，书学生并入翰林书艺局，画学生入翰林图画局，医学生入太医局。

崇宁五年（1106），正式颁行学校法令，规定：“凡县学生

隶学已及三月，不犯上二等罚，听次年试补州学外舍，是名‘岁升’”。“每岁正月，州以公试上舍及岁升员”。“凡州学上舍生升舍，以其秋即贡入辟雍”。太学试上舍生，为岁试，每至春季，太学、辟雍生悉公试，同院混取，共取374人。以47人为上等，“即推恩释褐”；140人为中等，“遇亲策士许入试”；187人为下等，补内舍生。如贡士入辟雍外舍，“三经试不与升补，两经试不入等，仍犯上三等罚者，削籍再赴本州岁升试，是名‘退送’”。对太学内舍生，若已降舍，而又一试不与及太学外舍生已被“考察”，亦一试不与，则悉“退送”。且定“考察式格”，改优、平2等为上、中、下3等。

学校法令的颁行，更促进了中央和地方学校的发展。且宋廷又以兴学作为奖励地方官员的条件，更推动学校的大力兴办。建州浦城县学生徒在籍者逾千人，为一路之最，县丞徐秉哲因此而特迁一官。政和四年（1114），京师小学已近千人，分作10斋就读。自8岁至12岁，“以诵经书字多少差次补内舍。若能文，从博士试本经、小经义各一道，稍通补内舍，优补上舍”③。

北宋末年，金军南侵，战火弥漫，中央和地方学校亦随之衰落。南宋建立后，建炎初年，宋帝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置国子监，立博士2员，以随同其南行之士36人为监生。其后，宋、金战事不已，虽有建学之议，终未得实施。绍兴八年（1138），战事稍得缓和，遂重建太学。置祭酒、司业各1员，博士3员，学正、学录各一员，共有太学生700人：其中上舍生30员，内舍生100员，外舍生570员。“凡诸道住本州学满一年，三试中选，不犯第三等以上罚，或不住学，而曾两预释奠及齿于乡饮酒者，听充弟子员”④。初定每

年春秋两季试之，随即又改为一年一试补，后又改为三年一试，遂生徒增至千人，“中选者皆经绫纸赞词以宠之”⑤。绍兴二十七年（1157），定太学试制，春季试补，如遇省试之年，则改孟夏进行。

自高宗赵构始，南宋亦陆续恢复算学、律、武学等京师学校，规模则不及北宋。地方州县学校亦得恢复，然远不及北宋末年州县学之兴盛。但南宋时期教育的普及程度却超过北宋，即使是民间乡村，亦办有“冬学”之类的临时性学校，且有《百家姓》、《千字文》之类的启蒙教材及读物，著名理学家朱熹亦曾编写过识字启蒙读本，而更为重要的是私人办学的兴盛。

自北宋初年，海内太平，文风日起，一些学者、儒生于城市、乡野或山林之中设立“精舍”、“书院”，招收生徒，传授学艺。北宋初，著名的书院有白鹿洞书院（今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今湖南善化岳麓山）、应天书院（今河南商丘）、嵩阳书院（今河南登封太室山南）、石鼓书院（今湖南衡阳石鼓山）、茅山书院（今江苏南京三茅山）等。这些书院规模不等，多则数百人，少则数十人。大多得到宋廷或官府的奖励与资助，多有赐额、赐书、赐学田等殊荣待遇。北宋中期以后，书院渐衰。

及南宋建立后，书院再度勃兴，且较北宋更为发达。淳熙六年（1179），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于次年竣工后，又置学田，延聘主讲，且亲自制定规约，即《白鹿洞规》，还时常亲自授课。绍熙五年（1194），朱熹恢复并扩建岳麓书院，生徒多达千余人。为传播自己的观点，各派理学家纷纷创造自己的书院，陆九渊建象山书院，吕祖谦建丽泽书院等，至理宗赵昀

时（1225－1264），苏州（今属江苏）、丹阳（今属江苏）、徽州（治今安徽歙县）、建阳（今属福建）、绍兴（今属浙江）、道州（治今湖南道县）、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合州（治今四川合川东）等地均建有书院。而南宋一朝，各地先后兴建的书院多达300余所。这些书院得到官府支持，广招生徒，而使文化得以广泛的传播，亦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注 释

①②③④⑤《宋史》卷一五七《选举志三》。

两宋

诗文革新运动

诗与散文自唐代兴盛，经历五代，至北宋初年出现“秉笔艳冶”，“镂刻骈偶”的情形，即刻意追求格律，雕琢词句，而内容空乏，浮艳卑靡。这一文风对宋初文坛影响颇大，也因此而引起宋初文人的不同反响，形成两种不同的倾向。

北宋之初，文学家柳开力倡恢复唐代韩愈、柳宗元的古文之风，然其承袭的乃为唐代古文运动中奇涩古奥之遗风，故文辞涩言苦，意涵深奥。同期的文学家王禹偁亦反对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主张文从韩、柳，诗从李（白）、杜（甫）。他的诗作多反映民间疾苦；古文创作则以“句易通，义易晓”为宗旨。其诗《感流亡》、《畲田词》等，皆以社会现实为题材。其古文《待漏院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唐河店妪传》，以议论、抒情、记事等手法，抒发个人的内心情怀，虽于散体文中仍沿袭骈体句式，然已是上口易读，流畅达意。王禹偁尽管对诗文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正确的见解，然而缺少师友的支持，未能引起文坛的反响，更未能于文坛中形成一股健康发展的势力。相反，追求雕章丽句，袭用典故的“西崑体”却日

渐盛行，浮艳之风逐渐占据文坛的主导地位，左右宋代文坛长达二三十年。

“西崑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他们均为大官僚，供职于馆阁。他们曾与同僚、馆僚等相互唱和，共著录五言和七言诗247首，汇编成《西崑酬唱集》一书。这些诗刻意模仿晚唐诗人李商隐的风格，却又摒弃了李商隐寓情于诗的手法，无真挚情感可言，仅保留其雕词炼句的诗风。其结果，西崑酬唱之作多为无情自吟，苍白无力。内容又多为达官贵人骄奢淫逸的生活，且玩弄华丽词藻及典故。在这些官僚墨客倡行之下，西崑体不仅于诗坛，亦于散文中居于主导地位，风靡一时，对后世影响颇大。

宋仁宗时期（1022－1063），政坛上掀起一股改革、新政之风，一些有识之士强烈要求革除弊政，这亦猛烈冲击了沉闷浮艳的文坛。随之，宋代文坛上亦兴起一场诗文革新运动。

于政坛上力倡改革的欧阳修，亦于文坛上力主继承古文传统，他与尹洙、苏舜卿等人成为北宋诗文改革的中坚。他们将诗文改革与政治斗争紧密关联，针对“西崑体”只追求“藻饰”的形式和“缀风月，弄花草”的内容，而提出“尊韩”、“复古”的主张，提倡“明道”、“致用”、“尚朴”、“重散”，即诗文当“著礼乐仁义之实，以合于大道”，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应具有“救时行道”的作用。而且诗文“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①。欧阳修等人“文与道俱”的观点，使诗文改革直接为政治改革服务。这一时期，欧阳修的《送朱职方提举运盐》、《与高司谏书》、《五代史伶官传论》、《醉翁亭记》、《朋党论》等，均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其古文中，将四六文的骈偶形式变通为散中有骈，骈、散结合的方

式，使古文平易流畅。与此同时，欧阳修等人亦反对杨亿、刘筠等人只求偶切，不问内容的诗风，主张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古体诗。欧阳修的《食糟民》，揭露官府的腐败。苏舜卿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则揭露宋廷的积贫积弱。这些诗作的问世，使朝野诗风大为改观，出现了融议论于诗的发展趋势，诗散文化的特点逐渐突出，诗文并举，成为这一时期文坛改革的主流，从而使诗与古文的创作更贴近于社会现实，成为政坛改革的有力的舆论阵地。

宋神宗即位后，政治改革已成一股社会潮流，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亦随之进入一个高潮时期。经过欧阳修、尹洙、苏舜卿等人的积极倡导力行，诗与古文之作已偏重于实用，平易晓畅的文风已占据文坛。而"西崑体"的近体诗与时文，在诗文革新运动的冲击下，已走向衰败，一蹶不振。

在此之前，欧阳修于宋嘉祐二年（1057）主持礼部考试，对文风的彻底改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年取士，一扫浮艳华靡文风，而得苏轼、曾巩、苏辙等进士，加之出自其门的王安石及苏洵等人，文坛集结了一批倡导革新的人才，从而最终奠定了古文在文坛中的主导地位，骈文被取代后，遂不再复出。

继欧阳修之后，又一位政治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成为宋代文坛的领袖。较之欧阳修，王安石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更强，对时弊的分析更切中要害，因而其诗文的题材更为广泛，所涉及的问题更为尖锐。他力主诗文创作"务为有补于世"②，在其诗文作品中，不乏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如诗作《兼并》、《感事》、《收盐》、《秃山》、《郊行》、《发禀》、《白沟行》等，直接从政治、经济等诸方面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败。

作上，王安石锐意创新，充分发挥“长于议论”的宋诗特点，他所作《明妃曲》、《乌江亭》等诗，即于传统题材中，创出新的意境。其古文之作，更是道理透彻，论说得体，结构严谨，语言简朴，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司马谏议书》、《读孟尝君传》、《游褒禅山记》等篇，皆为后世典范之名篇。王安石的诗文多为其变法服务，故思想性较强，这亦正是诗文革新运动倡导务实的杰出代表。

王安石死后，宋代文坛的主要代表为苏轼。自王安石变法之前，苏轼与他即于政治见解与主张上存在不同的观点，他们的诗文作品亦多带有个人的政治倾向，苏轼的诗文中即有攻击新法的内容。但相左的政见，并没有妨碍苏轼在宋代诗文革新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其古文代表作，如《石钟山记》、《赤壁赋》等，皆为后世所推崇。其诗作则继承和发扬“以文为诗”的风格，超迈豪纵，触处生辉，极富创新精神。不过苏轼诗文中，反映社会现实，敢于正视社会矛盾的作品，如《荔枝叹》、《吴中田妇叹》等则较少，亦有少数如《题西林壁》等极富哲理的诗作。但与王安石相比，诗文中缺乏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

自欧阳修，经王安石，到苏轼，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高潮时期，崇尚“有补于世”的宗旨已成为革新的基本特点。但苏轼之后，这一局面有所改变。著名诗人黄庭坚提倡“以故为新”，仍有革新之意。然其继承者在模仿前人诗作时，却走上只求文字技巧、声韵格律的形式主义道路，形成于北、南宋之际颇具影响的江西诗派。直至陈与义从效仿杜甫诗作声律转向注重杜甫忧国忧民精神，才于诗作中再次反映出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

南宋建立后，社会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成为社会各阶层关注的热点。南宋初年，抗击金军南侵，收复北方失地亦成为文坛的创作主题，其中尤以爱国诗的成就最为著名。这些诗作直接地反映了社会的现实，特别是因南宋统治者的屈辱投降政策，导致北方百姓或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或呻吟于金朝残酷的压榨之下，迫切盼望南宋军队北伐的客观现实，为文坛提供了创作的题材。以陆游为杰出代表的南宋初年文坛，摆脱江西诗派的束缚，更多地触及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陆游诸多的千古传诵的名篇，如《关山月》、《金错刀行》、《书愤》、《大将出师歌》、《军中杂歌》、《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秋夜将晓，望篱门迎凉有感》、《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不仅表达了自己抗金的决心，亦揭露了统治者投降求和的丑恶面目，更反映了社会民众的普遍心声，诗中无不饱含爱国教育。又如《农家叹》、《收获歌》、《三月十五日夜达旦不能寐》等篇，则深刻揭露了统治者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描述了农民艰辛困苦的处境，流露出对农民的同情之心。陆游一生，始终坚持抗金，却屡遭主和派排挤与打击，虽壮志未酬，然作为其诗魂的爱国主义激情却丝毫不减。直至临终前，他仍不忘恢复中原，吟《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今存陆游诗作约 9300 首，对各种诗体，无不精熟，或议论，或抒情，或绘景，或叙事。诗风或雄浑奔放，或清隽流畅。以其为代表，是为南宋时期诗坛的辉煌时期。

与陆游同期的著名诗人杨万里、范成大亦以各自典型的风格，于宋代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他们以抗金、爱国为主题，反映社会及农民的现状，且诗风质朴，语言趋于通俗化、口语化

和自然化，这为诗歌的普及和大众化，奠定了基础。

南宋后期，政治衰败，南宋王朝已是日暮途穷，这亦影响到文坛。这一时期文坛上先后出现了以徐照（字灵晖）、徐玑（字灵渊）、翁卷（号灵舒）、赵师秀（字灵秀）为代表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又重蹈宋初沿袭晚唐诗风的旧辙，专以较量平仄，锻炼字句为能事，无大建树。反映出此时文坛已萎靡不振。

南宋灭亡前后，又出现以文天祥为代表的一批诗文作家。他们于国破家亡之时，饱含悲愤之情，写了一批诗作。特别是文天祥的《正气歌》、《过平原作》、《过零丁洋》等名篇，更是千古传诵的佳作。这些诗人及其诗作，对已十分衰败的宋代文坛无疑是注入了清新的空气，但随着南宋的灭亡，文坛上的诗文革新运动亦告结束，然而其所创造的文风却一直影响着后世。

注　释

①《苏东坡全集·前集》卷二四《居士集叙》。

②《王文公文集》卷三《上人书》。

两宋

理学兴盛

理学，是宋代最重要的儒家学派。其主要以“理”或“道”作为哲学的基本范畴，阐述“义理”，兼及“性命”，故称“理学”，亦称“道学”。理学兴起于北宋，盛行于南宋，至宋理宗赵昀时，遂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哲学。

自唐代中叶以后，政局剧烈动荡，思想领域中，儒、道、佛三家于长期的斗争中，又相互渗透，传统的儒学已难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与发展。唐代孔颖达修《五经正义》，融合魏晋以来南、北经学，又对传统经学进行总结。故此，旧儒学已走入末路。北宋建立后，结束了五代十国纷争、割据的局面，政治、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思想领域中对传统儒学经典多持怀疑，一些学者文人突破经学旧注疏的束缚，不再拘泥于训诂古说，而凭自己的见解，自由说经，从而形成儒学研究的新风。宋初，胡瑗、孙复、石介等曾试图自由阐述经义，且吸收道家的学说，故为后世称为“理学三先生”。但他们于后代创建的理学体系，相异甚大。

自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真宗赵恒的60余年中，宋廷极力为

倡导建立以儒学为主体，糅合佛、道的新思想体系。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的逐渐繁盛，学术气氛亦日渐浓厚。不少学者依据儒学经典，开始探讨有关宇宙形成及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起源与构成的原理，他们各抒己见，由此学派纷立，理学亦形成于其中。

理学的创办人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道州（治今湖南道县）濂溪人。他吸收道家学说，糅合《周易》、《中庸》，首创探讨宇宙本原、万物演化及人性、封建伦理的综合理论学说。其代表作《太极图说》、《通书》集中反映其思想体系，为后代理学家奉为经典文献。他对《周易》所阐“太极”说加以发挥，于其《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其中“无极”乃道家之说，“太极”及儒家之说，周敦颐将两说合为一体，从而建立起一套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与周敦颐同期的邵雍（1011－1077），字尧夫，祖籍河北范阳（今河北涿州）。他上承汉代以来的象数学，阐发《周易》经义，且亦与道学结合，构建成数的图式，形成新的象数学。其主要著作《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等，集中体现其“天地运化”、“道在物先”的自然观与宇宙论。邵雍亦以“太极”为宇宙本原，“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而后万物生。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①。此外，他还认为“心为太极”，“道为太极”②，而陷入主观唯心主义，“身生天地后，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余何足言?”③邵雍关于“先天象数”的理论，亦为其他理学家所推崇。

与周敦颐、邵雍的唯心主义自然观不同的是另一位著名的理学家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著有《正蒙》、《经学理窟》等，后人集为《张子全书》14卷。在自然观、宇宙观上，他认为宇宙的本原当为物质性的“气”，即所谓“凡可状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气也”。“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④。在此，张载明确地提出因“气”的聚散变化而生成各种事物现象，及世上绝无虚空之“无”的观点，认为“知太虚即气，则无‘无’”⑤。张载的“气”不灭的唯物论观点与周敦颐、程颐等人相悖，因此亦遭到其后的理学家程颢、程颐等人的攻击。但同时，他融合自己对《周易》、《中庸》、《周礼》等儒家经典的解释，提出的关于人性、义理及封建伦常等理论，则含有极浓厚的唯心主义成分。他将人的认识分作“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种。“见闻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⑥。而于人性论上，他又划分为“气质之理”与“天地之性”两种，“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⑦。因此而劝谕人们要后天学习“纲常名教”之类，而依此行事，即可改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这一观点深得理学家们的赞赏。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即盛赞道：“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⑧

经过宋初60余年的探讨，至宋仁宗赵祯（1023－1063）、

宋英宗赵曙（1064－1067）、宋神宗赵顼（1068－1085）时期，逐步形成了理学的思想体系。这一时期重要的理学家为程颢、程颐兄弟。程颢（1032－1085），字伯纯，号明道；程颐（1033－1107），字正叔，号伊川，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世称“二程”，其十五六岁时，从师于周敦颐。于宋神宗时，形成自己的理学体系。二程一生著述颇丰，后人辑为《二程全集》，包括《河南程氏遗书》、《河南程氏外书》、《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经说》、《周易传》等。他们将“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于理气说、有对论、人性论、格物致知说等诸方面提出相对系统的理论体系。在“理”（或称“天理”）的观点上，二程提出“理”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体，且不受主观和客观的限制，“有理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⑨。二程又以此用于人类社会“父子君臣，天下之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⑩，从而使封建伦理纲常具有哲学基础。关于“理”与“气”的关系，二程认为“有理则有气”⑪，而理在气先，即由精神派生物质，“理”是先于万物的“天理”。因此提出伦理纲常为天理所定，遵循之即合于天理，否则将逆天理。在人性论上，二程继承孟子的“性善”之说，提出“性即是理”的观点。对于人性中的善与恶，他们提出“气禀”之论，“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⑫。“有自幼为善，有自幼为恶，是气禀有然也”⑬。造成伤害天理之因，在于“人欲”，因此他们力倡“明天理”、“去人欲”。“人欲”与“天理”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要“存天理”，需先“明天理”。要“明天理”，则需即物穷理，逐日认识事物之理。久之则能豁然贯通。于认识论上，二程发展了《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说，“格犹穷也，物犹理也，犹曰穷其

理而已也”⑭。而在“致知”上，则沿袭了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之说，而提出穷君臣父子之理，致德性之知，由此而提出“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之法，“但存此涵养，久之自然天理明”⑮，在此基础上，二程竭力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甚至反对妇女改嫁，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正是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出发，建立起一整套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奠定了宋代理学的基础。故后世将二程与朱熹相提并论，称之为程朱理学。

与程颢、程颐同期的王安石（1021－1086），于自然观、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提出与二程相左的观点。他认为宇宙的本原为“道”，是万物生成之本，“道”之本则为物质性的“元气”。他认为人是可以认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可视而知，可听而思，自然之义也”⑯，且强调“思”的重要性。于人性论上，他提出“精（精神）生于性，性生于诚，诚生于心，心生于气，气生于形（形体）。形者，有生之本”⑰。王安石的朴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认识论，是直接服务于其变法的，为此而招收门生，且于其变法期间被立为官学。

然而王门远不及程门之盛。二程门生弟子极众。宋钦宗赵桓在位时（1126－1127），下诏禁用老庄及《字说》，废止了王学的官学地位。宋高宗赵构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下诏，追赠程颐为直龙图阁，更推崇理学。二程弟子更于社会上广泛传播理学，理学的社会地位日趋重要。

到宋孝宗赵眘（1163－1189）时，宋代理学发展到一个极重要的时期，出现了朱熹这位集大成的理学家。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祖籍歙州婺源（今属江西），曾寓居建州崇安（今属福建）、建阳（今属福

建)。其早年研习儒学，兼学佛教禅学、道经、文学、兵法等，后从师理学家李侗，遂为程颢、程颐之四传弟子，专心攻求义理之学。他于继承和发展二程学说的同时，又糅和周敦颐、张载等理学家及禅学的部分学说，集北宋以来各派理学的大成，最终建立起系统而完整的理学体系。朱熹仍以“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主题，明确提出“理”先于“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⑱。即谓“理”是先天永存的，是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封建伦理纲常皆为“理的体现”，故“理”“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⑲。在此基础上，朱熹又将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和通俗化，力倡将三纲五常作为最高的社会道德标准。朱熹针对周敦颐“无极而太极”的命题中“无极”与“太极”的模糊观点，指出“周子所谓‘无极而太极’，非谓‘太极’之上别有‘无极’也，但言‘太极’非有物也”⑳，鲜明地提出“太极”是无形、无状、无象的“理”。进而，他又用“理”阐述“太极”，“总天地万物之理，便是太极”。“太极之义，正谓理之极致耳”。并且将一切封建道德规范皆归入“太极”，是人人固有的，“人人有一太极”㉑。从而继承、发展并完善了周敦颐的理论，且与封建伦理道德紧密结合，使“太极”说得以充实。

对于“理”与“气”的关系，朱熹依旧坚持“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之说，“有是‘理’，后生是‘气’”㉒。即“理”是第一位的，“气”则是由“理”派生的。

在人性论上，朱熹较前人有了更大的发展。他将人性与“理”、“太极”结合起来，“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是太极混然之体”㉓。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朱熹继承张载的

"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之说，"论天地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㉔。理当然是至善的，故"天地之性"亦是至善的。而气有清、浊之分，故导致"气质之性"的善恶之别。"理"既先于"气"，故"天之生此人，无不与之以仁、义、礼、智之理，亦何尝有不善"㉕。至于人性的善与恶，则是后天各人禀受的"气"有所差别，所以"气质之理"有善恶、智愚的区别。为此，朱熹反复强调"天理"与"人欲"的对立关系，"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而"圣人之教"正是为了"革尽人欲，复尽天理"㉖。即要求人们接受封建道德观念，恪守封建道德标准。

在认识论上，朱熹亦提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居敬"等一系列的理论。他提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㉗ 朱熹的"格物致知"，实际是"格""天理"。即所谓的"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是"父子、君臣、夫妇、朋友，合是如何区处"㉘。实现"格物致知"，朱熹提出的途径是"内省"与"践履"。所谓"内省"，即使心有所主，不含丝毫杂念，亦即二程所倡"诚敬"。"践履"即"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㉙，即要求人们完全遵循封建伦理纲常。

朱熹的理论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确立封建道德标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一生于仕途坎坷磨难，但却致力于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死后，弟子门徒将其著述编辑成《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书。其著述颇得宋理宗赵昀的推崇，自此将朱熹的学说奉为理学正统，理学亦随之成为官方哲学。朱熹因此而被后代统治者奉为"大贤"。

理学家陆九渊（1139－1192），字子静，号象山，抚州金陵（今属江西）人。他与朱熹同期，却与之相对立。陆九渊糅合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和“良知”、“良能”说及佛教禅宗“心生”、“心灭”之说，独自创建所谓“心学”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他提出“心即理”的观点，“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㉚。“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当归一，精义无二，此心此理，实不容有二”㉛。他甚至明确指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宇宙观和认识论。即认为天理、人理、物理皆于“吾心”之中，而心是客观世界的本原、唯一的实际存在。他不赞成朱熹将人心分作“天理”与“物欲”两部分的观点，而认为“至当归一”。人心被物欲所障而致天理不明，因此人们应该首先“明得此理”，使内心有所主宰，之后方能克制物欲而“存心”。他提倡“致知”“不假外求”，只须“明本心”，“先立乎其大者”即可。主张“切己自反”，格除物欲，注重“践履”的学习方法。陆九渊亦宣扬封建伦理纲常，认为“皇极之建，彝伦之叙，反是则非，终古不易。是极是彝，根乎人心而塞乎无地”㉜。即纲常、封建等物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因此劝谕人们恪守之。

陆九渊的“心学”创立后，一度成为与朱熹并立的有影响的理学学派。然而两派之间因学术观点不同，而发生争辩。朱熹认为“无极而太极”，“理”在“气”之先；而陆九渊则认为“心即理”。朱熹认为封建伦理纲常是“天理”；陆九渊则认为这是人人固有的“本心”。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陆九渊则宣扬“明本心”。为此，理学金华学派创始人吕祖谦于宋淳熙二年（1175）邀集朱熹与陆九渊等赴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学术辩论，以调和两派激烈的争执。辩论的

中心仍是“无极而太极”与“心即理”，以及教人与治学之法等问题。双方各持己见，且发展到相互攻击。朱熹讥讽陆九渊的“禅学”，陆九渊则讥讽朱熹为“支离”，又赋诗相互责难。两人皆自诩己学为正统，终未得调和。后又于淳熙十四(1187)至十六年(1189)间再度进行学术辩论，亦未有结果。两次学术辩论，实质只是理学中，以朱熹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两派间的争执，丝毫未妨碍理学的发展。

宋宁宗赵扩在位时(1195-1224)，权相韩侂胄为独揽朝柄，尽斥异己，亦反理学，理学人物悉遭排斥、打击，朱熹亦未能幸免，甚至一度定理学为伪学。然而并未能阻止理学的传播。后随党禁松弛，理学得以再度发展。韩侂胄被诛后，史弥远专权，又极力尊崇朱熹，于嘉定二年(1209)，加朱熹谥号为“文”，称“朱文公”。次年，又追赠朱熹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嘉定五年(1212)，将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列入官学读本。嘉定十三年(1220)，又追谥周敦颐曰“元”，程颢曰“纯”，程颐曰“正”。嘉定十六年(1223)，又追谥张载曰“献”。至理宗赵昀时(1225-1264)，更极力褒颂程朱。宝庆三年(1227)，赵昀下诏追赠朱熹为太师，封信国公。嘉熙元年(1237)，又下诏，令国子监刊印朱熹的《通览纲目》，以为学校读本。淳祐元年(1241)，赵昀亲临太学，下诏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配享(附祭)孔子，且亲书朱熹《白鹿洞学规》，颁赐太学。至此，程朱理学遂取得官学的地位。理学的其他学派或附会于程朱学说，或一改原有观点，其影响日趋削弱。程朱理学遂被奉为理学正统，统治思想领域长达700年之久。

注 释

①《皇极经世·附编·观物外篇上》。

②《皇极经世·附编·观物外篇下》。

③《伊川击壤集》卷一九《自余吟》。

④⑤《张子全书》卷二《正蒙·太和》。

⑥《张子全书》卷二《正蒙·大心》。

⑦《张子全书》卷二《正蒙·诚明》。

⑧《朱子语类》卷四。

⑨《伊川文集》卷五《答张闳中》。

⑩《二程遗书》第五。

⑪《二程粹言》卷下《天地篇》。

⑫《二程遗书》第一八。

⑬《二程遗书》第一。

⑭《二程遗书》第二五。

⑮《二程遗书》第一五。

⑯《王文公文集》卷二O《进字说表》。

⑰《王文公文集》卷二九《礼乐论》。

⑱《朱子语类》卷一。

⑲《朱子大全》卷四九《答王子合》。

⑳㉑《朱子语类》卷九四。

㉒《朱子语类》卷一。

㉓《朱子大全》卷五八。

㉔《朱子大全》卷五六。

㉕《朱子大全》卷七四。

㉖《朱子大全》卷一三。

㉗《大学章句》。

㉘《朱子语类》卷一八。

㉙《朱子语类》卷一三。

㉚《象山全集》卷一一《与李宰二》。

㉛《象山全集》卷一《与曾宅之》。。

㉜《象山全集》卷二二《杂说》。

阿保机立国

西晋时，东部鲜卑族的慕容部、宇文部与段部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和土河（今老哈河）一带鼎足而居，彼此攻战不已。其中慕容部所居之地临近汉地，社会较发展，实力较强，与宇文部、段部的征战中常占据优势。至4世纪中叶，宇文部被慕容部首领慕容皝率所部击败，其首领北走大漠。北魏拓跋珪登国三年（388），宇文部又为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所败，此后分为库莫奚和契丹两部分。

其时的契丹人已形成若干部落，仍主要活动在潢河及土河一带的广阔草原上。悉万丹、阿大何、具伏弗、郁羽陵、日连、匹黎尔、叱六于、羽真侯八个部落各自分散进行狩猎和畜牧活动，互不统摄。各以车马为家。逐水草迁徙。其后，八部落“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①，并于和龙（今辽宁朝阳）与密云（今属北京）与北魏互市交易。为了抵御柔然、高丽、突厥的进击，八部落常常联合作战，随之而结成军事联盟，史称“古八部联盟”。联盟的结合十分松散，仅是为了共同的自卫目的，相互之间仍缺乏统一号令，因此在柔然、

高丽、突厥，以及北齐政权的攻击下，诸部或迁徙，或投附（有的被俘虏后遭强制归附）。古八部联盟存在的80年后，到6世纪中叶，终于瓦解。入隋以后，各部又相继迁返故地，依旧活动于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隋炀帝大业元年（605），隋韦云起曾发大兵与突厥首领启民可汗联兵，攻打契丹。是役，契丹大败。丧失大批的人口和牲畜。

受外部强敌不断的侵攻、欺凌，又促使契丹各部再度联合，共国御敌。时每部兵多者3000人，少者千余。遇征伐则由酋帅聚议，凡兴兵则合符契。唐朝初年，契丹八部开始组成新的部落联盟。联盟首领由大贺氏选充，有兵4万，史称“大贺氏联盟”。部落联盟所辖八部各有自己的首领，负责组织本部生产及管理内部事务。各部首领同为部落联盟议事会成员，有权选举或罢免联盟首领，参与决策部落联盟内部和对外的重大事宜。大贺氏的首领必须自大贺氏家族内部产生，称为“世选”，联盟首领负责处理联盟内部的公共事务，亦代表联盟对外联系，以及组织对外战争。在与唐朝的交往中，亦由联盟首领，或由其选派使臣负责一切交涉事宜。

此后，契丹别部孙氏（审密）又与大贺氏联盟通婚，联盟实力有所扩充。然亦有一些契丹部落受唐朝统辖，未能加入大贺氏联盟，但仍有联系。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大贺氏联盟首领摩会率所辖各部依附于唐朝，与唐朝建立隶属关系。贞观三年（629），唐帝李世民赐旗鼓给摩会，以示对其首领权力的许可。贞观二十二年（648），唐于大贺氏联盟居地设置松漠都督府，加号大贺氏联盟长窟哥为松漠都督，且赐姓李氏。又以各部首领为刺史，于各部居地分置州。唐廷则以营州都督控制松漠。

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因唐营州都督赵文翙（huì秽）欺压契丹、室韦、奚等部族，激起各部族的不满与反抗。契丹大贺氏联盟长、松漠都督李尽中乃与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起兵反唐，杀赵文翙，占据营州（治今辽宁朝阳）。武则天遣 28 名大将统兵进攻契丹，李尽忠兵败身亡。孙万荣率领部众南下，遭武则天派大兵追击，战败后又攻掠唐幽州（治今北京）。武则天再次派兵出击，且联络奚人夹击契丹，孙万荣力战，不敌身亡。契丹大贺氏联盟遭此沉重打击，势力渐衰。其时，北方突厥日渐强盛，对契丹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大贺氏联盟又背叛唐朝，转而依附于突厥。

唐玄宗开元初年（713），突厥势力日渐衰落，大贺氏联盟首领李失活再度归附唐朝，且与之和亲。唐仍对其加号松漠都督，又号静析军大使，而对大贺氏联盟中统领兵马的军事首领加号为静析军副大使。联盟军事首领因此权势日盛。开元十八年（730），联盟军事首领、静析军副大使可突于操纵联盟首领的选举，杀害大贺氏联盟首领邵固，取消大贺氏家族的“世选”特权，复背唐依附突厥。大贺氏联盟遂瓦解。

开元二十二年（734），唐朝联合契丹原大贺氏联盟以外的乙室活部首领郁捷，出兵进攻且斩杀可突于。随后，唐又封郁捷为松漠都督。二十三年（735）契丹贵族雅里（涅里、泥札）杀郁捷，招集契丹部众，击败突厥。又背唐自立，重建契丹部落联盟。部落联盟的领首自契丹贵族遥辇氏家族中推举产生，号称可汗，仍为“世选”。另置夷离堇，为掌管兵马大权的军事首领，亦为“世选”，雅里即任首位夷离堇。部落联盟以乙室活部为基础，而分为乙室和迭剌二部。又招集曾于战乱中流散的其他部落及氏族，编成六部，因而联盟仍由八部落组成，

史称遥辇氏联盟。遥辇氏联盟实际是以乙室和迭剌两个兄弟部落为主，其后部落联盟夷离堇即于迭剌部中“世选”。

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回纥可汗击败突厥，建立回纥汗国。在此后约100年间，契丹又处于回纥汗国的统治之下。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回纥汗国灭亡。此时的唐朝亦自安史之乱以后国势日渐衰落。契丹因此受外部的欺压大为减轻，其发展加快，势力逐渐强大。

唐懿宗咸通（860—873）以后，在位的遥辇氏联盟首领鲜质可汗率领契丹部落不断向外扩张。先征服邻族奚人，后又北征于厥（乌古）、室韦等族，南下汉人聚居的燕（治今北京）、蓟（治今天津蓟县）诸州。契丹所到之处，掳掠居民，充作奴隶。联盟首领及其契丹贵族则从征伐中攫获大量的牲畜、人口等战利品，而成为显贵。在变俘虏为奴隶的同时，他们亦更多地奴役契丹部民，于是契丹内部矛盾日渐尖锐。为此，遥辇氏联盟又始设决狱官，专事稽察、审决，乃至镇压内部的敌对势力。

至痕德堇继任可汗后，唐昭宗光化四年（901），迭剌部贵族耶律阿保机当选为联盟夷离堇，控制兵马大权，专事征讨。唐昭宗天复二年（902）七月，耶律阿保机率兵40万攻掠唐河东代北九郡，俘获牲口95000余，驼、马、牛、羊不可胜计。九月，于潢河之南建城龙化州。天复三年（903）春，征伐女真人，又俘获300户。九月，复攻下唐河东怀远等军。此后，他将降俘的7000户奚人，迁至饶乐（今内蒙古宁城西）的清水地区，设奚迭剌部，分为13县。耶律阿保机东征西讨，战绩著卓，而被联盟推举为“于越”，开始集军事、行政大权于一身。次年，耶律阿保机征讨室韦。唐卢龙军节度使刘仁恭发

兵数万，遣其养子赵霸统领，迎击契丹。耶律阿保机设伏，诱唐兵入伏，乃擒赵霸，歼灭其所部，又乘胜大败室韦。唐昭宗天祐二年（905），耶律阿保机与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结盟，合兵进击刘仁恭，连拔数州，劫掠其民，强令迁徙至契丹领地。唐哀帝天祐四年（907），痕德堇可汗死，耶律阿保机遂被部众推举，取代遥辇氏，充任部落联盟首领、可汗。第二年，耶律阿保机于联盟内部设惕隐一职，专事耶律家族事务，且负责维护耶律家族在契丹族的统治权力和地位。惕隐官直接由他选定，无须再经部落联盟选举。

为了加强对契丹各部的统治，耶律阿保机又设置南、北二府。后梁太祖开平四年（910），耶律阿保机以其妻兄萧敌鲁为北府宰相，另从耶律家族中选任南府宰相。北府以迭剌部为核心，包括品、乌隗、涅剌等部；南府以乙室部为核心，包括楮特、突举等部。通过南、北二府宰相，耶律阿保机有效地控制了契丹诸部民众。与此同时，他又从各部选拔豪健之士 2000 人，组成宿卫军，交其亲信统领，为契丹最精锐之师。

耶律阿保机废除联盟旧有的选举制，确立自己及其耶律家族的统治地位和权力等一系列的举措，激起契丹部分贵族和一些部众的不满。自后梁太祖乾化元年（911）起，契丹内部先后 3 次发生反抗活动，均被耶律阿保机所镇压。后梁末帝贞明二年（916）正月，耶律阿保机（耶律亿）称帝，建元神册，国号契丹，从而建立了契丹政权。此后，又立长子耶律倍为太子，废除部落联盟的选举制，确立了皇位世袭制。

契丹神册三年（918）耶律阿保机，于潢河北建造皇都（位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由汉人康默记、贾去疑监工营造。皇都建成后，遂成为契丹国的统治中心，后更名为上京临潢

府。

神册五年（920），耶律阿保机从侄耶律鲁不谷和耶律突吕不仿照汉字偏旁部首，创制成契丹文字，史称契丹大字。其后，耶律阿保机弟耶律迭制又参考回鹘的造字法，而创制成另一种契丹文字，史称契丹小字。

契丹国家建立后，耶律阿保机随即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活动，继续深入南面汉地大肆掳掠。又大举征伐西北和东北地区的诸部族，北至鄂尔浑流域，西至甘州（治今甘肃张掖）的区域内生活的突厥、吐谷浑、党项、沙陀等部族，均遭受契丹军的攻掠。又出兵乌古部，迫使乌古举部降附。契丹天赞三年（924），耶律阿保机第二次亲征漠北，深入乌孤山（今蒙古肯特山），径趋古单于国（汉时匈奴王庭）、古回鹘城（唐时回鹘王庭），且遣兵逾流沙（今新疆准噶尔盆地），拔浮国城（今新疆奇台西北），尽取包括吐谷浑、党项、阻卜（鞑靼）等部在内的“西鄙诸部”②。天赞四年（925），甘州回鹘可汗遣使入契丹国，贡献方物。是年冬天，耶律阿保机又向东攻打渤海国。次年，契丹军攻占扶余，进围渤海国都城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南）。渤海国王大諲譔献城投降。灭亡渤海国后，耶律阿保机遂于其故地建立东丹国，封其长子耶律倍为东丹王，统治渤海地区。另以其弟耶律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

契丹天显元年（926）七月，耶律阿保机自忽汗城班师皇都，途经扶余（今吉林农安境）染病身亡，庙号太祖。

耶律阿保机去逝后，皇后述律氏临朝称制，权决军国事。东丹王、太子耶律倍闻其父死讯，随即赶赴扶余，与述律后一同护送梓宫回皇都。然自契丹兴国，南侵汉地及渤海国，受汉

文化的影响日深，于契丹内部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长子耶律倍仰慕及倡导习用汉地文明，次子耶律德光则主张沿用契丹旧法。两种主张相左，未能协调一致。耶律阿保机死后，述律皇后支持耶律德光的主张，而被立为皇帝（是为契丹太宗）。耶律倍遭到排斥，逃奔后唐。

注　释

①《魏书·契丹传》。

②《辽史》卷二《太祖纪下》。

辽

辽太宗南略

耶律德光即位之后，即领兵南下俘掠。天显年（928）三月，后唐义武军节度使王都遣人入契丹，献定州（今属河北），归附契丹。后唐帝李亶出兵征讨王都，耶律德光乃命奚人突里铁剌率兵救援。四月，铁剌于定州击败后唐王晏球所部。李亶急调集军队增援，铁剌亦请求契丹朝廷派兵增援。耶律德光遂令惕隐涅里衮、都统查剌领兵赴援。契丹军与后唐军再度激战，契丹军战败，铁剌阵亡，涅里衮、查剌等数十人被后唐抓获。

契丹军失利，耶律德光以“出师不时”，后悔不已。十一月，他亲自统兵讨伐后唐。后唐闻讯，数遣使入契丹。契丹朝臣皆认为“唐数遣使来，实畏威也。未可轻举，观衅而动可也”①。耶律德光，行至半途乃令返军。

耶律德光未称帝前，其兄、东丹王耶律倍曾被太祖耶律阿保机册立为太子。耶律德光即位后，处处排斥耶律倍，甚至乘他在皇都之时，遣将耶律羽之迁东丹百姓赴东平郡（今山东东平），以削弱耶律倍的实力。致使东丹（原渤海国）百姓多逃

入新罗（今朝鲜）或女真族居地。不仅如此，耶律德光更严密监视耶律倍，时常出入其府第，且设宴款待其僚属。耶律倍于契丹国内处处受排挤，乃于天显五年（930）十一月，率其部众40人自海上逃奔后唐。后唐欣然接纳，赐耶律倍姓东丹，名慕华，授怀化军节度使，后又赐姓名李赞华。

耶律德光以耶律倍入逃后唐，后唐帝接纳为由，下令"命将校以兵南略"。且遣人以诏赐后唐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为契丹军南侵让开门户。契丹军随即南下遍掠卢龙（今北京西南）诸州。一时间，幽州城外，契丹骑兵纵横驰骋。卢龙军节度使赵德钧乃筑良乡（今属北京）、潞县（今北京通县）、三河（今属河北）三城，以抵御契丹军南侵。契丹军南下因此受阻，遂转而西掠云州（治今山西大同）等地。

后唐因契丹入扰云州，遂议河东（今山西）帅人选。帝李亶乃以石敬瑭为北京（今山西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兼大同（今属山西）、振武（朔州，治今山西朔县）、彰国（应州，治今山西应县）、威塞（新州，治今河北涿鹿）等军蕃汉兵马总管。石敬瑭至晋阳（今山西太原），又以其部将刘知远为心腹，委以军事。

契丹天显九年（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二月，后唐凤翔节度使、潞王李从珂起兵反叛，废闵帝李从厚，而继立为帝（后唐废帝）。契丹帝耶律德光趁后唐内乱，乃亲自统兵南攻云州、武州（治今河北宣化）等地。后唐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统军防御，耶律德光进兵受阻，乃班师回朝。

石敬瑭以防备契丹为名，广储军粮，且尽收河东粮储，托言以助军费。朝廷觉察其有异志，乃于契丹天显十一年（后唐废帝清泰三年，936）五月，徙石敬瑭为天平军节度使，移镇

郓州（治今山东东平）。石敬瑭抗命不从，被削夺官爵，而以张敬达为太原四面兵马都部署，杨光远为副部署，将兵讨伐石敬瑭。六月，又改张敬达、杨光远为太原四面招讨使、副使。

后唐军大兵压境，石敬瑭乃遣赵莹向契丹西南路招讨卢不姑求援，又上表向契丹帝耶律德光称臣，且请以父礼事之。耶律德光大喜，许以仲秋倾国赴援。八月，后唐遣张敬达领兵进击石敬瑭。张敬达屯驻于晋安乡（今山西太原南），筑长围以攻晋阳。晋阳城中粮储日渐匮乏。

九月，耶律德光亲自统领5万骑赴援石敬瑭，于晋阳城外大败后唐军，死者近万人，石敬瑭遂与耶律德光合兵，将张敬达所部5万余兵，马万匹围攻于晋安寨（今山西太原西南）。张敬达遣使向后唐朝廷求援，然因受围困，消息不通，终不得救援。耶律德光令夷离堇的鲁率兵进攻，与后唐军激战，战败阵亡。耶律德光又以的鲁子徒离骨继任夷离堇，而对临阵怯退的南院宰相鹘离底、奚临军寅你已、将军陪阿给予处罚。十月，耶律德光封石敬瑭为晋王，亲临其府第。石敬瑭与其妻李氏率亲属捧觞上寿。

契丹军与石敬瑭所部继续围攻晋安寨，分遣精兵戍守要冲，以阻断援兵之路。后唐帝李从珂派赵延寿领兵2万屯驻于团栢谷，范延光领兵2万屯驻于辽州（治今山西左权），幽州赵德钧率所部万余由上党（今山西长治）直趋赵延寿所部驻地，合兵进击晋阳。但后唐诸将知契丹军有备，皆逗留不进。李从珂又亲统3万精骑赴援，驻扎于河阳，以督诸军。“然知其不救，但日酣饮悲歌而已”。

耶律德光偕石敬瑭赴自己的营帐，赐坐，从容语之：“吾三千里举兵而来，一战而胜，殆天意也。观汝雄伟弘大，宜受兹

南土，世为我藩辅。”②遂于晋阳设坛，备礼册命。十一月，耶律德光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且解衣冠授之。石敬瑭称帝建立晋国，史称后晋。他割幽、蓟（治今天津蓟县）、檀（治今北京密云）、顺（治今天北京顺义）、瀛（治今河北河间）、莫（治今河北任丘）、新（治今河北涿鹿）、妫（治今河北怀来）、儒（治今北京延庆）、武（治今河北宣化）、云（治今山西大同）、应（治今山西应县）、朔（治今山西朔县）、蔚（治今河北蔚县）、涿（今属河北）、寰（治今山西朔县东）十六州之地与契丹，仍岁输帛 30 万匹，且向耶律德光献媚，愿竭国中之财，以奉契丹。

张敬达及所部于晋安寨受围困 80 余日，内外隔绝，军储殆尽。以至于“濯马粪、屑木以饲马，马饥至自相啖其鬃尾，死则以充食”③。部将杨光达等劝说张敬达出寨投降，张敬达断然拒绝，称：“吾有死而已。尔欲降，宁斩吾首以降”。闰十一月，杨光达、安审琦杀害招讨使张敬达，投降契丹。耶律德光将所降后唐军士及马 5000 匹，悉赐予石敬瑭。

晋安寨失陷，赵德钧等后唐诸援军欲撤兵退还。耶律德光连夜发兵追击。赵德钧等军皆投戈弃甲，自相蹂践，拥挤于川谷之中。耶律德光又令皇太子率轻骑据守险要，追及后唐步兵万余人，皆弃甲投降。既而，又追赶上赵德钧父子，赵德钧及率所部投降。至此，契丹入援石敬瑭大获全胜，耶律德光召集诸将议事，诸将皆请求班师。耶律德光乃命南院宰相解领、鹘离底、奚监军寅你已、将军陪阿率所部先还。契丹军将还，石敬瑭亦向耶律德光告辞，欲赴京城阳（今属河南）。耶律德光遂与之宴饮，至酒酣之时，二人执手约为父子。耶律德光及赠以白貂裘 1、厩马 20 匹、战马 1200 匹，又命军将迪离毕领兵

5000骑，护送其入洛阳，临别之时，耶律德光又交待道："朕留此，候乱定乃还耳。"④

在迪离毕领契丹兵的护送下，石敬瑭率所部直趋洛阳，后唐将校迎降。后唐帝李从珂走投无路，先召耶律倍同死，耶律倍不从，李从珂便派人将其杀害。之后，携传国玺登宣武楼自焚，后唐灭亡。未几，石敬瑭入洛阳，正式定都于此。得知石敬瑭已定都洛阳，耶律德光一面遣郎君解里德抚问，一面班师北返。待行至应州时，原后唐大同、彰国、振武三节度前来迎见契丹帝，均被留之不遣。

契丹天显十二年（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正月，耶律德光率军北还，途经云州。原后唐大同军节度判官吴峦闭城拒命。契丹军乃围攻云州，半年不克。吴峦遣使奉表入洛阳，向后晋求援。石敬瑭遂致书耶律德光，请求退兵解围，且召吴峦南归。原后唐应州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亦耻于称臣契丹，挺身南归。

契丹会同元年（938）七月，石敬瑭以冯道为契丹太后册礼使，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赴契丹行礼拜谒。石敬瑭事契丹必奉表称臣，称契丹帝为"父皇帝"。耶律德光令石敬瑭罢称臣，但称"儿皇帝"。不久，契丹帝遣中台省右相耶律述兰迭烈哥出使后晋国，以临海军节度使赵思温副之，册封后晋帝为英武明义皇帝。十一月，耶律德光命南北院宰相及夷离堇等赴驿馆赐冯道等晋使宴。继而，耶律德光于开皇殿，召见冯道等后晋使臣。后晋使臣乃奉石敬瑭命，为契丹皇太后上尊曰广德至仁昭烈崇简名应天皇太后，为契丹帝上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未几，石敬瑭复遣赵莹奉表入契丹朝贺，且献幽、蓟、瀛、莫、涿、檀、顺、妫、

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于是契丹帝下诏，以皇都为上京，称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升幽州为南京，以南京为东京。改新州为奉圣州，武州为归化州。又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离堇为王，以主簿为令，令为刺史，刺史为节度使。契丹官制日渐完备。

会同四年（941）六月，契丹振武军节度副使赵崇逐其节度使耶律画里，据朔州叛，归附后晋。耶律德光命宣徽使褭古只赴朔州，指挥契丹兵围攻朔州。守城将士备力抵抗。原后唐成德节度使安重荣执杀契丹使者，又出兵攻掠幽州南境，上表斥责石敬瑭父事契丹，及竭国中之财献媚于无厌之虏。后晋乃出兵讨伐安重荣，且告之于契丹。不久，后晋出南节度使安从进亦反叛。耶律德光得知后晋国内屡有背叛之事，下诏"以便宜讨之"。不久，后晋击败安重荣，契丹军亦攻入朔州城，然契丹褭古只战死于城下。

会同五年（942）正月，后晋兵攻入镇州（治今河北正定），执安重荣斩之，石敬瑭命漆其首函送契丹。未几，石敬瑭死，其子石重贵嗣位，是为后晋出帝。乃遣使告哀于契丹帝，契丹帝为此辍朝7月，且遣使入后晋吊唁。七月，石重贵遣金吾卫大将军梁言、判四方馆事朱崇节入谢契丹，进国书只称"孙"，不称"臣"。耶律德光遂遣客省使乔荣前去责问，且以未先承禀，即继帝位为由。然而晋答复道："先帝则圣朝所立，今主则我国自册。为邻为孙则可，奉表称臣则不可。"⑤乔荣回报，耶律德光遂始有南征之意。

会同六年（后晋出帝天福八年，943）九月，后晋囚禁契丹回图使，尽捕杀入后晋境内贸易的契丹人。耶律德光遂决意南征，且下令拘留入契丹的后晋使臣。十二月，后晋单卢节度

使杨光远派人密告契丹，称后晋帝负德违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耶律德光遂至南京（今北京西南），召集诸将商议南攻之事。乃调集幽、云数州兵5万余人，命原后唐忠武节度使赵延寿及赵延昭、安端、解由等统领，由沧州（今属河北）、恒州（治今河北正定）、易州（治今易县）、定州（今属河北）分道而进，契丹大兵随后继至。临行时，耶律德光对赵延寿许愿，如能得后晋都城开封（今属河南），则立其为帝。后晋乃于沿边修筑城堡，征调邻近诸道兵马，以防备契丹入攻。

会同七年（后晋出帝天福九年，944）正月，赵延寿、赵延昭率前锋军抵达任丘（今属河北）；安端领兵入雁门关（今属山西），进围后晋忻州（今属山西）、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不久，赵延寿所统东路军围攻后晋贝州（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军校邵珂开贝州南门纳契丹兵入城。贝州太守吴峦投井身亡，万余后晋兵被杀。继而兵进黎阳（今河南浚县东），西路契丹军则围攻太原（今属山西）。后晋帝石重贵遣使携书至契丹，乞修旧好，且诏割河北诸州，另遣桑维翰、景延广入契丹议和。耶律德光不许，仍令大军进击。后晋帝乃命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右武卫上将军张彦泽等将兵御之。

二月，契丹军进攻博州（治今山东聊城东），刺史周儒献城投降。后晋平卢军节度使杨光远密通契丹，契丹军乃自马家口渡黄河，以策应。后晋将领景延广命部将分守要津，待契丹军进击郓州（今山东东平）时，后晋军将李守贞、皇甫遇等领兵万人，沿黄河水陆并进攻击契丹军，后晋帝亦亲自统军增援。契丹军不敌，只得退兵。后晋军追击至马家口，大败契丹军，溺死、斩杀及俘获各数千人。由是契丹军不敢东渡，杨光

远遂断绝援应。

三月，赵延寿向契丹帝进言，称："晋诸军沿河置栅，皆畏怯不敢战。若率大兵直抵澶渊（今河南濮阳南），据其桥梁，晋必可取。"契丹帝耶律德光遂亲统10万兵马进攻后晋澶州（即澶渊）。两军激战，至黄昏时分，双方死伤不可胜数。耶律德光只得留赵延昭守贝州，令诸军分道北归，沿途纵兵焚掠。

契丹虽退兵北还，仍寻机南侵。五月，契丹将耶律拔里得攻陷后晋德州（治今山东陵县）擒刺史尹居璠及将吏27人。后晋亦遣步骑2万进攻青州（治今山东益都），讨伐叛将杨光远。契丹派兵救援，被击败。杨光远被围困于青州长达数月，契丹援兵不至，城中饿死者大半。其子乃劫持杨光远开城投降。后晋军收复青州，处死杨光远。

会同八年（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正月，耶律德光复遣兵分路进攻后晋邢（治今河北邢台）、洺（治今河北永年东南）、磁（治今河北磁县）三州，一路杀掠殆尽，直入邺都（今河南安阳）境。后晋帝遣皇甫遇与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将兵千骑御敌，后晋军与数万契丹军遭遇，且战且退，至榆林店。契丹大军相继赶至，皇甫遇与慕容彦超与契丹军力战百余合，皇甫遇坐骑被契丹兵击毙，他又率兵步战。后晋援兵涉水进击，契丹军乃退。

二月，后晋帝石重贵征调诸道兵马，下诏亲征。次月，诸军会于定州（今属河北），大举进攻契丹，连克泰州、满城（今属河北）、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契丹帝耶律德光自古北口（今北京西北）拥兵南下，后晋军退至阳城（今河北定县东南），反击，失利退军。后晋军结阵南下，陷入契丹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后晋将杜重威、李守贞等率军备击，激战20余合，

复搏战10余里，呼声震天动地，大败契丹军。耶律德光乘奚车退逃10余里，后晋军紧追不舍，他又改乘骆驼方得脱险。后晋军获胜，诸军退保定州。耶律德光逃回南京，对作战不力的将领各杖数百。

六月，后晋因连年攻战，国力渐衰，乃遣孟守中入契丹，奉表请和，且卑词谢过。契丹亦因连年攻伐，伤亡损失甚众，本自厌兵的述律太后亦力和议，乃以后晋割让镇、定两州之地为条件。后晋帝不允，议和未果。

会同九年（后晋出帝开运三年，946）六月，契丹军乘定州盗起，出兵进击。后晋天平军节度使李守贞率兵击退契丹军。九月，契丹军复扰后晋河东、定州等地，皆为后晋军所败，斩首近万级。十一月，石重贵遣天雄军节度使杜重威，天平军节度使李守贞等统大军北攻契丹，欲先取瀛、莫等州，安定关南，再收复幽、燕等地，荡平塞北。然出师遇雨，连日不止，军行及粮运甚为艰苦。契丹遣精兵断绝河桥，南院大王迪辇、将军高模翰分兵由瀛州间道以进。杜重威遣贝州节度使梁汉璋率众来拒，两军激战，契丹军大败后晋军，杀梁汉璋。杜重威、张彦泽等据守中渡桥。契丹将赵延寿以步卒前击，高彦温则以骑马进击，后晋军溃败而逃，死者数万，其将王清被斩，宋彦筠坠水身亡。契丹军随即发起猛攻，大举入攻后晋。

十二月，契丹军与后晋军夹滹沱河相对阵。契丹军夜则列骑环守，昼则出兵抄掠。杜重威不敢渡滹沱河与恒州（治今河北正定）后晋守军合兵，结果被耶律德光率骑兵连夜南渡滹沱河，切断其粮道及归路。后晋军于是内外隔绝，食尽势穷，将领杜重威、李守贞、张彦泽等率所部20余万众，降于契丹。未几，恒州亦降。耶律德光乃授杜重威守太傅、邺都留守，李

守贞天平军节度使，余将各领旧职。且分降卒一半给杜重威，一半归属赵延寿。又命御史大夫解里、监军傅住儿及降将张彦泽等持诏书入汴梁（今河南开封），自己率大军随后而进。解里等人至汴梁，石重贵素服拜命，又以车载其母李氏奉表请罪。张彦泽乃迁石重贵及其母、妻于开封府署，令控鹤指挥使李荣督兵护卫。后晋灭亡。

会同十年（947）正月，耶律德光入汴梁，于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乃以枢密副使刘敏权知开封府。又以张彦泽擅自迁徙石重贵于开封府署，擅杀后晋朝臣桑维翰，纵兵大掠，而斩于市。随后废后晋帝石重贵，降为光禄大夫、检校太尉，封负义侯。且废东京，降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为汴州。以后晋降臣张砺为平章事，李崧为枢密使，冯道为太傅，和凝为翰林学士，赵莹为太子太保，刘昫守太保，冯玉为太子少保。随后，耶律德光遣赵莹、冯玉等领300骑护送负义侯石重贵及其母李氏、太妃安氏、妻冯氏、弟石重睿、子石延煦、石延宝等，赴黄龙府安置，仍以其宫女50人、内侍宦官3人、东西班50人、医官1人、控鹤4人、庖丁7人、茶酒司3人、仪鸾3人、健卒10人随从。

后晋灭亡，百官藩镇纷纷投降，独有彰义军节度使史匡威据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拒降；雄武军节度使何重建斩契丹使者，以秦（治今甘肃秦安北）、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三州降蜀；河东节度使刘知远虽上表称贺于契丹，却虚与应付，以观形势。

二月，契丹帝耶律德光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升镇州为中京，以赵延寿为大丞相兼政事令、枢密使、中京留守。不久，原后晋节度使、北平王刘知远自立为帝，建国号

汉。辽帝耶律德光乃诏以耿崇美为照义军节度使，高唐英为昭德军节度使，崔廷勋为河阳军节度使，分别据守要地。然契丹纵骑四出，以牧马为名，分番剽掠，谓之“打草谷”，汴梁、洛孙（今属河南）一带，数百里财畜殆尽。又遣使向诸州括借钱帛，致民不聊生，奋起抗拒。保义（河南陕西）军将赵晖等杀契丹将吏；滏阳（今河北磁县）民帅梁晖袭相州（今河南安阳），杀契丹兵数百；晋州（治今山西临汾东北）人杀契丹括钱帛使；昭义（今山西长治）留守王守恩杀契丹使者；澶州人王琼围攻契丹将。一时间，各地百姓群起抗击契丹，多者数万，少者百千，且连陷宋（治今河南商丘南）、亳（治今安徽亳县）、密（治今山东诸城）三州。令契丹军防不胜防，耶律德光遂无留中原之意。

三月，辽帝下令，将原后晋诸司僚吏、嫔御、宦寺、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悬、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临潢府。

四月，耶律德光自汴州出发，尽载府库珍北去，后晋百官从者数千人。令改汴州为宣武军，命萧翰为节度使，镇守之。途经相州，令屠城，悉杀城中男子，驱其妇女北行，城中存者仅 700 余人。军将武行德扣留契丹铠仗。杀契丹临军，入据河阳（今河南孟县南）。耶律德光闻讯，叹曰：“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⑥待行至高邑，耶律德光染病，不久死于杀胡林（今河北藁城西南），年 46 岁，庙号太宗。

耶律德光死后，南逃后唐的原契丹东丹王耶律倍之子、永康王耶律阮（耶律兀欲）于契丹贵族耶律安抟等的策划下，即皇帝位，是为辽世宗。辽述律皇太后于上京另立辽太祖耶律阿

保机第三子耶律李胡为帝，且令耶律李胡率兵阻击耶律阮北返。耶律阮击败耶律李胡军。六月，至南京，因禁其祖母述律太后。九月，耶律阮自称天授皇帝，改元天禄，述律太后及耶律李胡被迫降服。

辽天禄五年（后周太祖广顺元年，北汉世祖乾祐四年，951），后汉枢密使郭威于澶州兵变，废后汉帝刘贇，自立为帝，建国号周，史称后周，是为后周太祖。此后，便发兵进攻北汉。北汉帝刘崇遣使入辽，称侄乞援。辽帝耶律阮即征调各部兵马，亲自统领救援北汉，南攻后周。于进兵途中，辽宗室、泰宁王耶律察割作乱，诛杀耶律阮。随军南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之子耶律述律（耶律璟）杀耶律察割，继任帝位，是为辽穆宗。

注 释

①②③④《辽史》卷三《太宗纪上》。

⑤⑥《辽史》卷四《太宗纪下》。

承天太后摄政

辽穆宗耶律璟终日沉湎宴饮游猎，时人称之为“睡王”。其为人残暴，杀戮任情，不断激化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辽应历十九年（969）二月，近侍小哥、盥人花哥、庖人辛石古等杀耶律璟于行宫。侍中萧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等拥立辽世宗耶律阮第二子耶律贤（耶律明扆）继立为帝，是为辽景宗。

耶律贤即位后，赴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以定策动，进萧思温为北院枢密使，旋兼北府宰相；南院枢密使高勋进封秦王。五月，立贵妃萧氏为皇后。时承穆宗失德之后，中外翕然望治。耶律贤数召翰林学士写室昉，访古今治乱得失，奏对每称旨。萧思温举荐耶律储轸，谓有经国之才。耶律贤乃召问以时政，而指陈恳切，深得器重，旋命节制西南面诸军，援应河东。耶律贤鉴于穆亲耶律璟为政暴虐，故务行宽政。

辽保宁二年（970）四月，统领契丹兵马的北院枢密使萧思温为国舅萧海只及海里杀害，统领汉军的南院枢密使高勋亦因参与此事而被除名、处死。此后，耶律贤便以右皮室详稳耶

律贤适为北面枢密使，而以蓟州玉田人、南京幽都府（今北京）留守韩匡嗣代领。其后，宋帝赵炅北上灭北汉，继而进兵幽燕，韩匡嗣子韩德让代父戍守南京，与辽将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等击败宋军，以功升任南院枢密使，自此权势日盛。

景宗任人不疑，信赏必罚，似可有为，然因患风疾，多不视朝，政事多由其皇后萧氏与诸臣集议之后裁决。萧皇后，名燕燕，汉名绰，为辽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以其“早慧”，而深得其父赞赏。耶律贤即位，即以贵妃选入宫中，寻册为皇后。

辽乾亨四年（982），耶律贤病重，临终遗诏，由其长子耶律隆绪嗣皇位，“军国大事听皇后命”①。不久，耶律贤病逝，庙号景宗。耶律隆绪即皇位，是为辽圣宗，时年12岁。萧绰以皇太后身份，奉遗诏摄政。面对主幼国疑的局面，萧太后十分忧虑，哭泣道：“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耶律斜轸、韩德让进言：“信任臣等，何虑之有!”②于是她与耶律斜轸、韩德让参决大政，而委北院大王、于越耶律休哥为南面行军都统，以领南面事。

萧太后摄政，整顿吏治，选贤任能。史称其“明达治道，闻善必从”，“赏罚信明，将士用命”③。她重用汉人，与契丹朝臣共掌国政。完善科举取士之制，吸收大批汉儒参政。要求契丹和汉官清正廉洁，为此而下诏谕三京左右相、左右平章事、副留守判官、诸道节度使判官、诸军事判官、录事参军等，“当执公方，毋得阿顺。诸县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征求，毋或畏徇。恒加采听，以为殿最”。④惩治贪暴残民者，荐拔清勤自持者，在耶律休哥、耶律斜轸和韩德让、王继忠、张俭等契丹、汉人臣僚的悉心辅佐下，辽廷政治日趋清明，吏

治好转。

其次，萧太后注意减轻赋役，发展生产，多次下令减免租赋、徭役。又遣使赴诸道巡视禾稼，劝课农桑，鼓励百姓开垦荒地；严令禁止官兵畋猎、放牧时，践踏农田，毁坏庄稼。令各地设置义仓，赈济灾贫。且设立榷场，以利于货物流通。

再则，放免奴婢，编户为民。先下令放免穆宗应历（951—969）以后被胁从为奴者，使隶籍于所在州县。对因天灾人祸而典质为奴者，按日计庸值，待其庸值抵偿典质价额后，即令放免归家。又将为皇室贵族捕捉飞禽的稍瓦石烈户编为稍瓦部，为官府冶铁的曷术石烈户编为曷术部，各设节度使治理。

此外，萧太后与辽帝耶律隆绪还审理滞狱，修定法律。多次亲自审断狱讼，昭雪冤案。又派朝官和地方官审理多年的积案，平反冤狱。以至于到开泰五年（1016）时，辽国各道监狱皆空。对辽朝法律亦除繁苛，尚宽简。此前，契丹与汉人于法律上处罚不同，及萧太后与耶律隆绪修定后，则“一等科之”⑤。官僚子弟犯法，与同平民。由于萧太后一以汉法论，缓和了契丹与汉人间的隔阂与对立。

辽统和元年（983）六月，辽帝耶律隆绪率群臣上萧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且更国号曰大契丹。自承天太后称制，委以耶律休哥总南面事之后，耶律休哥即均戍兵，立更休法，又劝课农桑，大修武备。不久，得知宋廷有用兵北征燕云之意，乃多设间谍，使入宋境，佯称辽国内空虚。而枢密使耶律斜轸等征伐女真族获生口10余万，马20余万匹，分别放牧于水草肥美之地，由是数年繁殖所增，竟不可胜算，军马供应充盈。

契丹统和四年（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宋帝赵炅出兵北

伐，欲收复燕云之地。以曹彬为幽州道行营前军马步水陆都部署，崔彦进副之；米信为西北道都部署，杜彦圭副之，率所部出雄州（治今河北雄县）；田重进为定州路都部署，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北）。三月，田重进于飞狐北大破契丹兵，曹彬攻占涿州（今属河北），潘美兵取寰州（治今山西朔县东）、朔州（治今山西朔县）、应州（治今山西应县）。四月，潘美再以所部攻取云州（治今山西大同），田重进攻占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宋军几路进击，其势汹汹。

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以兵少而不出战，夜则令轻骑俘掠零散宋兵，昼则以精锐虚张声势。又设伏于林莽之间，断绝宋军粮道。曹彬占据涿州后，仅留驻 10 余日，便因粮尽而退兵雄州。以待粮运援至。

宋军大举入攻，承天太后乃与契丹帝耶律隆绪一同赶赴南京（今北京）督战。行至涿州东 50 里处，遇宋将曹彬将兵进击涿州，乃今耶律休哥等以轻骑追近宋军。曹彬领兵且战且行，凡四日，始得至涿州。然亦因粮运不继，复弃之。宋军退兵，无复行伍，耶律休哥指挥所部紧追其后，至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追及宋军，两军进行激战。宋军大败，急涉巨马河，人畜相蹂践，死者无计。余众逃奔高阳（今河北高阳东），契丹军再追及，猛冲宋军残部，杀死宋兵数万人。宋军沿途丢盔弃甲，尸首堆积如山。耶律休哥收集宋兵尸体，于南京城陈列，成为一景观。

西线，契丹大将耶律斜轸领兵反击宋军进攻，收复蔚州，于飞狐败潘美所部，遂乘胜入寰州。宋监军王侁强令宋将杨业出兵与契丹军战，耶律斜轸闻杨业将至，乃设伏兵于路。待杨业将兵临近时，耶律斜轸拥众为战势，一交战即佯败，引杨业

入伏。契丹兵与杨业所部奋战，杨业寡不敌众，大败而退。耶律斜轸率兵直追，又于陈家谷口再败杨业，且生擒之。从而彻底击败宋军的北伐。

辽帝耶律隆绪即位后，契丹东北部的女真族不断作乱，反抗契丹的统治。承天太后乃与耶律隆绪多次发兵征伐，镇压女真人的反抗，使东北地区得以相对稳定。

契丹统和六年（988）承天太后与耶律隆绪再度决定南征宋朝。承天太后亲临韩德让军帐中，厚加赏赐，且令从臣与之畅饮，以激励将士。九月，契丹军进击涿州，射帛书谕城中投降，遭守城宋军拒绝。十月，承天太后与契丹帝纵兵四面攻城，破城而入。十一月，又令诸军备攻县，欲亲自统兵进攻长城口。契丹军四面进击，契丹帝与韩德让邀击宋军，杀获殆尽。随即攻满城，下祁州（治今河北固安）纵兵大掠，又拔新乐（今河北新乐北）。宋军千余人出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契丹国舅郎君桃委、详稳十哥率兵击退之。契丹军进至唐河北，遭宋都部署李继隆反击，败退至曹河。随后，契丹诸军趋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宋军自满城出兵救援，为契丹铁林军所败，契丹破易州，又击溃自易州败退的宋军。七月，契丹侦知宋威虏军粮馈不继，欲窥取之。适逢宋定州路都部署李继隆发镇、定大军护军粮数千乘，耶律休哥乃率精骑数万迎击。宋北面沿边都巡检尹继伦潜蹑契丹军后，出其不意，急击之，契丹兵惊乱。耶律休哥为短兵中臂而走，契丹大军遂溃，自相蹂践，死者无数。

契丹与北宋自统和四年交战，，宋军大败之后，宋廷即采取守势，“不敢北向”⑥，于河北沿边长达900余里的平原上，以河渠塘泊筑堤储水，以为屏障。又置寨26座，军铺125处，

布兵3000余人，“部舟百艘，往来巡警”⑦。而对契丹军的入侵，宋帝“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即不得已出兵，只许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⑧。面对宋廷“守内虚外”的国策，契丹对宋朝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不断派兵入侵宋境，深入宋霸（治今河北霸县）、雄、贝（治今河北南宫东南）、冀（治今河北冀县）、邢州（治今河北邢台）、洺（治今河北永年东南）、深（治今河北深县）、滨（治今山东滨县）、博（治今山东聊城）、濮（治今山东鄄城北）、青（治今山东益都）、淄（治今山东淄博西南）、齐（治今山东济南）、潍（治今山东潍坊）及天雄、乾宁等十几个州军之地，掳掠人畜财物，给宋廷北部边境地区造成严重的边患。

契丹统和二十年（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契丹大举发兵，南下攻宋。以统军使萧挞凛、奚六部大王观音奴为先锋，分兵攻掠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随后与契丹帝、承天太后合兵，进攻定州（今属河北）。宋将王超等列阵于唐河，按兵不战。契丹军气势益炽，直抵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城下，集兵猛攻。承天太后亲自擂鼓助威，众将士奋力攻城，城墙上布满了射中的箭，如同刺猬一般，死者3万余人。然城池终不得攻陷，契丹军只得解围而去。由萧挞凛率领的契丹兵则一举攻克祁州（治今河北安国）。

十一月，契丹马军都指挥使耶律课里领兵于洺州与宋军遭遇，大战，击败之。契丹军的大举入侵，使宋廷陷入极大的恐慌之中，主战派与主和派各主己见。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与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相左，宋帝赵恒虽在寇准坚持之下，亲征北上，然却准备与契丹议和，乃秘密遣王继忠入契丹境，乞请议和，宋廷的软弱更助长了契丹的气焰，承天太后一面应允

与宋廷议和，一面继续以武力相威胁，出兵攻克宋德清军，进抵澶州，围三面城。宋将李继隆等分伏强弩，控制要害。萧挞凛自恃骁勇，率少量轻骑按视地形。宋威虎军头张瓌暗发床子弩，击中萧挞凛额头，萧挞凛当即死于阵前，契丹军因此士气受挫。承天太后与契丹帝耶律隆绪始有议和之意。

十二月，在寇准的一再坚持和催促下，宋帝赵恒自卫南（今河北长垣北）进入澶州城。随即遣崇仪副使曹利用入契丹军中请和，不久，契丹遣飞龙使韩杞回书报聘。之后，曹利用再来请和，承天太后与契丹帝以宋廷无归所侵占疆土之意，复遣监门卫大将军姚柬之持书往报。不久，宋帝又遣李继昌前来请和，以承天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承天太后应允，亦遣阁门使丁振持书往聘，和议乃正式订立，此即历史上的“澶渊之盟”。且约定契丹军北归，宋沿边诸军不得出兵袭击。

和议之后，宋帝赵恒自澶州返回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承天太后与契丹帝耶律隆绪亦自澶州城下撤兵北还，一路掳掠而去。至此，契丹与北宋各守疆界，双方之间再未发生大规模的征战。

自完颜隆绪即位之后，由于承天太后的悉心辅政，致使契丹国势达到全盛，契丹统治进入一个鼎盛时期。

统和二十七年（1009）十二月，承天皇太后萧氏病逝。耶律隆绪开始亲政，直至景福元年（1031）病死，庙号圣宗。其子耶律宗真即位。辽清宁元年（1055）耶律宗真死，其子耶律洪基继位，是为辽道宗。此期间，辽朝国内局势动荡，统治日趋腐败，国势江河日下，辽朝进入衰乱时期。

注 释

①《辽史》卷九《景宗纪下》。

②③《辽史》卷七一《后妃传》。

④《辽史》卷一〇《圣宗纪一》。

⑤《辽史》卷六一《刑法志上》。

⑥《辽史》卷八三《耶律休哥传》。

⑦《宋史》卷二七三《何承矩传》。

⑧《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三。

辽

道宗内乱

契丹太平十一年（契丹景福元年，1031），被誉为“辽代盛主”的耶律隆绪病逝。其长子、判北南院枢密使事耶律宗真即位为帝，是为契丹兴宗，时年 16 岁。

耶律宗真为圣宗元妃萧耨斤所生，一出生，即为圣宗齐天皇后收养。耶律宗真即位后，元妃萧氏即谋取政权，依己为耶律宗真生母，而自立为皇太后。随后便赐驸马萧钮不里和国舅详稳、驸马都尉、兰陵郡王萧匹敌死，围场都太师、女真人著骨里，右祗候、郎君详稳萧廷留等 7 人弃市，皆籍其家。又迁齐天皇后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萧太后翦除掉自己的政敌后，乃于景福元年十一月，开始听政。而耶律宗真则“不亲庶务，群臣表请，不从”①。

契丹重熙元年（1032）正月，皇太后萧氏御正殿，代替契丹帝接受文武百官朝贺，其权势不可一世。不久，她又诬罪齐天皇后，且遣人赴上京行弑。齐天皇后请求“具浴以就死”②，未几即被逼自杀。

重熙三年（1034）五月，萧太后摄政日久，担心耶律宗真

年长难制，乃与枢密使萧孝先密谋，欲立少子耶律重元为帝。耶律重元将其所谋告之耶律宗真。契丹帝遂采纳内侍赵安仁之策，勒卫兵出宫，召萧孝先入宫，谕以皇太后萧氏当废之状。萧孝先知谋废之事败露。耶律宗真乃下令收回萧太后符玺，迁其至庆州（今辽宁林西境）。耶律宗真开始亲政。进封其弟耶律重元为皇太弟。其后历任北院枢密使、南京留守等职。

重熙二十四年（1055）八月，耶律宗真病故。其长子，天下兵马大元帅、燕赵国王耶律洪基继立为帝，是为契丹道宗。耶律洪基即位，哀恸不听政。文武百官上表固请，契丹帝下诏称："朕以菲德，讬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识有不及，群下有未信；赋敛妄兴，赏罚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达上。凡尔士庶，直言无讳。可则择用，否则不以为愆。卿等其休朕意。"③及其始呼政，即以耶律重元为皇太叔。契丹清宁二年（1056）十一月，又以耶律重元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其子、楚国王耶律涅鲁古为武定军节度使。耶律重元父子由是权势日重，尊宠无比，遂渐萌逆志。

契丹清宁九年（1063），耶律洪基猎于滦河太子山。耶律重元和耶律涅鲁古乃纠集陈国王陈六、同知北院枢密使事萧胡覩、卫王耶律贴不、统军使萧迭里得等，凡 400 人，诱胁弩千军进犯契丹帝行宫。南院枢密使、许王耶律仁先与知北枢密院事、赵王耶律乙辛等率宿卫士卒数千人抵御耶律重元父子的进击。耶律涅鲁古跃马突出，将与宿卫军交战，被渤海近侍详稳阿厮、护卫耶律苏射杀于马下。耶律重元众稍退，耶律仁先乃食耶律乙辛等分领宿卫士卒及援军，奋击叛军。耶律重元众大溃而逃，耶律仁先等率部追杀 20 余里。于是，"族逆党家"④，耶律重元逃入大漠。

"重元之乱"被平息后，有功之臣皆得擢升：以耶律仁先为北院枢密使，进封宋王，加尚父；耶律乙辛为南院枢密使；萧韩家奴为殿前都点检，封荆王，诸护卫用士卒、庖夫、弩手、伞子等300余人，分别授予官职。耶律良因密告耶律重元父子谋反，令籍横帐夷离堇房，为汉人行宫部署。

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平叛有功，深得契丹帝重任，权势日益膨胀。乃于朝中培植党羽、亲信，排斥异己，擅权专恣，恃宠不法。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对此不满，时常抑之，耶律乙辛不得不有所收敛。

耶律洪基子耶律濬好学知书，明于道理，受其父钟爱，而被封为梁王。契丹咸雍元年（1065）正月，又册封耶律濬为皇太子。他作为皇位的继承人，深受群臣的拥戴。对此耶律乙辛心中极为不悦。辽（咸雍二年正月，契丹改国号为辽）咸雍五年（1069），耶律乙辛为北院枢密使，自此权势日重。咸雍八年（1072）五月，西北路招讨使、晋王耶律仁先病故，耶律乙辛乃自恃无人敢抑之，更加肆无忌惮，于朝中横行霸道，毫不掩饰，臣僚对此多不敢言。十二月，辽帝耶律洪基又以参知政事、同知枢密院事张孝杰为北府宰相。张孝杰汉人，辽帝称其"勤干"，对他十分重用，数问以事，这于辽廷诸汉人官员中，再无有如此受尊宠者。耶律乙辛乃与张孝杰相勾结，以控制和把持朝政。一时间，其党羽、亲信遍布辽廷。

皇太子耶律濬已逐渐长大成人，日趋成熟，其潜心留意，通于治道。因而辽帝耶律洪基对之益发器重，决意委以重任，令其参与治理军国大事。辽大康元年（1075）六月，耶律洪基下诏，以皇太子耶律濬兼北、南枢密院事，始令总领朝政。

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因受皇太子耶律濬节制，更怨恨在

心，欲寻机翦除之。十一月，他串通北府宰相张孝杰，一同诬陷皇后萧观音与伶人私通，以为釜底抽薪，动摇耶律濬的皇太子地位。耶律洪基轻信谗言，下令赐死皇后萧观音，诛杀伶人赵惟一、高长命，并籍其家属。张孝杰因此还得辽帝赐国姓耶律氏。耶律乙辛更是倍受殊荣。辽大康三年（1077）二月，耶律洪基下诏，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同母兄耶律大奴、同母弟耶律阿思“世预北、南院枢密之选”⑤，对其异母诸弟则“世预夷离堇之选”⑥。

耶律乙辛陷害萧皇后轻易得逞，且获殊荣，益发有恃无恐。其党徒亦因废后皆由其谋，欢跃相庆。于朝中为所欲为，以至于忠良之士，斥逐殆尽。五月，耶律乙辛上奏辽帝，称右护卫太保查剌等告知北院枢密使事萧速撒等八人，谋立皇太子。辽帝耶律洪基亲生自按问，却未发觉此阴谋，乃出萧速撒等三人补朝外官，对护卫撒拨等人各处以鞭打百余之罚，令其迁徙至边境。

耶律乙辛见诬陷萧速撒未果，便直接转向皇太子耶律濬。六月，耶律乙辛令牌印郎君萧讹都斡诬告萧速撒谋反，且另有首谋即为皇太子耶律濬，并籍其姓名以告。此前，辽帝耶律洪基有诏，“告谋逆事者，重加官赏”⑦。及耶律乙辛再度诬陷，耶律洪基依旧信而不疑，即命耶律乙辛及南院枢密使耶律仲禧、北府宰相萧余里也、北府宰相耶律孝杰、知南院枢密使事杨遵勗、左夷离毕耶律燕哥，以及抄只、萧十三等人审理此案。然不知其皆为耶律乙辛之党。耶律乙辛乃严刑拷问，杖皇太子耶律濬并将其囚禁于宫中。不久，耶律洪基便废耶律濬皇太子为庶人，令囚之于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

耶律濬被废，耶律乙辛一伙更肆无忌惮穷治皇太子之党，

恣意诛杀大臣，因牵连被杀者甚众。宿直官敌里剌、宣徽使耶律挞不也、始平军节度使撒剌、右护卫太保萧挞不也及其弟耶律阵留等人相继被杀。又遣人赴上京，杀上京留守速撒及其诸子，已被迁徙至此的护卫撒拨等六人亦未幸免于难。东京留守同知耶律回里不等稍后亦被杀害。不仅如此，耶律乙辛之党更借此兴起大狱，遣使按察五京诸道，诛杀官员，尽逐异已。而其党羽却以镇压皇太子耶律濬及其同属谋反之罪，自诩为功臣，得以加官晋爵。护卫太保查刺加镇国大将军，预突吕不部节度使之选；室韦查刺及萧宝神奴、谋鲁古并加左卫大将军；牌印郎君萧讹都斡娶皇女赵国公主。授驸马都尉、始平军节度使。其后，此案的主谋、北府宰相、辽西郡王萧余里也亦充任知北院枢密使事，左夷离毕耶律燕哥为契丹行宫都部署。

尽管耶律乙辛之党罗织罪名，广为诛连，尽诛皇太子同属，然耶律乙辛仍放心不下，唯恐其东山再起。十一月，他又遣心腹赴上京，将耶律濬杀害。

大康五年（1079）正月，辽帝耶律洪基赐北府宰相耶律孝杰名仁杰，旋再加侍中。三月，以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乙辛知南院大王事，加于越。五月，以契丹行宫都部署耶律燕为南府宰相。六月，以北府宰相、辽西郡王萧余里为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乙辛之党因此更为所欲为。权势益重。

大康六年（1080），耶律仁杰自恃辽帝耶律洪基恩宠，且久居相位，贪婪无厌。耶律洪基渐悟其奸，乃命之出任武定军节度使。之后，耶律洪基终察觉到耶律乙辛陷害皇后萧观音、皇太子耶律濬之奸谋，于次年十二月，将武定军节度使耶律仁杰以罪削爵为民，知兴中府事耶律乙辛以罪削夺官爵，囚于来州。大康九年（1083）十二月，耶律乙辛欲逃亡入北京，事觉

伏诛。

辽帝耶律洪基在位期间，由于陷入长期的攻讦倾轧之中，故政治腐败，国势严重削弱。

注　释

①②《辽史》卷一八《兴宗纪一》。

③④《辽史》卷二一《道宗纪一》。

⑤⑥⑦《辽史》卷二三《道宗纪三》。

辽

渤海、靺鞨反辽

耶律隆绪（契丹圣宗）在位的后期，契丹统治下的各族百姓不堪忍受沉重的剥削和压迫，纷纷起兵反抗。

契丹天赞五年（926），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契丹太祖）发兵东攻渤海国，占领扶余（今吉林农安境），进围渤海国都城忽汗城（今黑龙江宁安南）。渤海国王大諲譔出降，渤海国灭亡。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后，令将渤海的势家大族和王室成员迁往内地，以便严加控制。而将渤海之地封予皇太子耶律倍，册封其为人皇王，治理其地。因地处契丹国之东，故名东丹国，耶律倍即为东丹王。东丹国始建都于天福城（即渤海国忽汗城）。耶律阿保机又以其弟耶律迭剌为左大相，原渤海老相为右大相，原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东丹国可自行除授百官，国内推行汉法，每年向契丹国贡纳细布5万匹，粗布10万匹、马1000匹。然而半年后，耶律阿保机病故，耶律倍赴皇都（后改为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奔丧。

契丹天显三年（928）十二月，契丹帝耶律德光（契丹太

宗）乘耶律倍居皇都之机，诏令东丹右次相耶律羽之迁东丹百姓前往辽阳（今属辽宁），以充实东平郡（治今辽宁辽阳北）人户，且升东平郡为东京。原渤海民户不乐内徙，多叛逃奔入新罗（今朝鲜）或女真居地。耶律德光为此下诏，凡因困难、贫穷等原因不能迁徙者，“许上国富民给赡而录属之”①。然耶律德光与耶律倍政治主张各异，意见相左，耶律德光又置卫士监视耶律倍。耶律倍处处受排挤，乃于天显五年（930）十一月，率部众40余人，自海上出逃，投奔后唐，东丹国名存实亡。次年，契丹帝耶律德光依渤海国旧例，于南京置中台省。

耶律阮继皇帝位（辽世宗）后，于辽天禄元年（947）十二月，复建东丹国，封耶律安端为明王，主东丹国事。辽穆宗应历二年（952）十二月，明王耶律安端死，东丹国不复存在。东丹国中原渤海人成为辽朝民户，直接受契丹的统治与剥削。

契丹帝耶律隆绪（契丹圣宗）太平年间（1021—1031），户部使韩绍勋将汉地的赋税制度推行于渤海地区，加重了渤海百姓的负担，而引起反抗。太平九年（1029），契丹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南）地区严重饥荒。户部副使王嘉乃献计造船，令渤海民中擅长海上行舟者，驾船自海上运东京地区粮至南京，以赈济饥荒。然水路艰险，船只多覆没。官府非但不加体恤，反而“鞭楚搒掠，民怨思乱”②。八月，东京舍利军详稳、渤海人大延琳利用渤海民众的不满情绪，起兵反辽。囚禁契丹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孝先及南阳公主，杀户部使韩绍勋、户部副使王嘉、四捷军都指挥使萧颇得，自立为帝，建国号兴辽，建年号天庆。大延琳起兵之前，曾与东京副留守王道平谋议起兵反辽之事，不料王道平惧怕牵连自己，连夜弃家踰

城而走，与大延琳所遣召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境）兵马都部署黄翩的使者，一同告之于朝廷。契丹帝耶律隆绪即令诸道征调军队，发兵前往渤海，征讨大延琳的反叛。

大延琳称帝建兴辽政权后，即遣人四处联络，南、北女真人纷起响应，高丽亦中止向辽朝的纳贡。

耶律隆绪派统帅耶律蒲古领兵征讨。其时契丹国舅详稳萧匹敌治所邻近东京，乃率本管及家兵据守要害，以“绝其西渡之计”③。渤海太保夏行美依旧主兵，戍守保州（治今河北保定），大延琳遂遣人持密书，急驰至保州，让他进击统帅耶律蒲古。夏行美如实告之耶律蒲古。耶律蒲古得大延琳密信，遂杀渤海兵 800 人，断大延琳东路。大延琳见黄龙府、保州皆不肯归附自己，乃分兵西取沈州（治今辽宁沈阳）。此时，沈州节度使萧王六初到，副使张杰见沈州无备，恐有危险，乃诈称愿降。以待援兵。兴辽军信此言，而未急于攻城。然待察觉其中有诈，举兵攻城时，沈州城防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大延琳指挥兴辽军猛攻，却未能破城，只处暂且退兵。不久，契丹诸道兵马陆续开赴渤海，大延琳率部众退守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

十月，耶律隆绪以南京留守、燕王萧孝穆为都统，国舅详稳萧匹敌为副都统，奚六部大王萧蒲奴为都监，率诸道兵进讨大延琳，镇压反叛。萧孝穆统兵至东京辽阳府，于府城四面，距城各 5 里处筑城堡，使城内外不相通，以此围困之。大延琳不敢出城迎击，城中形势日趋严峻。

太平十年（1030）八月，大延琳部将杨详世秘密投降契丹军，趁黑夜开辽阳城南门纳契丹军入城。大延琳被擒，渤海抗击契丹的武装斗争遂遭镇压。十一月，萧孝穆统领东征将士凯

旋而归，受到契丹帝隆重宴劳。旋以萧孝穆为东平王、东京留守，驸马都尉萧匹敌封兰陵郡王，萧蒲奴加侍中。又诏“渤海旧族有勋劳材力者叙用”④。其余者则分居来、隰（治今山西隰县）、迁、润等州。

尽管大延琳领导的渤海民众抗击契丹的斗争遭镇压，百姓遭遣散，分居异地他处，然而反辽斗争始终未止。其后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统治时期，反辽斗争再度高涨。辽天庆五年(1115）二月，饶州（治今内蒙古巴林右旗）渤海人古欲率移居至此的渤海民起兵抗辽，拥兵3万余众。至六月被辽军镇压，古欲被擒。

大延琳抗辽失败后，北方诸族相继兴起，其西北有鞑靼、东北有女真，亦先后起兵反辽，对辽朝构成严重的威胁。

鞑靼（汉译亦称达靼、达打、塔坦等。《辽史》则作或阻卜或术不姑）为蒙古高原上的一支强大的游牧部族，约兴起于8世纪。自回纥西迁后，始据蒙古草原西北，曾与据其东南的契丹族长期争雄。有九姓鞑靼、三十姓鞑靼之分，其后九姓鞑靼迁徙入据杭爱山东段及迤南一带，部众曾随李克用进兵中原。契丹建国后，契丹太祖耶律阿保机、太宗耶律德光相继经略鞑靼，尽收诸部为契丹属部。其时，鞑靼多分布于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辽境的广阔地区，散居，无所统一。契丹朝廷于鞑靼居地设置卜国大王府、西北阻卜国大王府及术不姑国大王府，且派官员充诸分部节度使统领诸部民众。又筑置镇（治今蒙古鄂尔浑上游哈达桑东北）、防（治今蒙古哈达桑东南）、维（治今蒙古哈达桑）三州，以为镇戍援应。

鞑靼部为契丹统治后，诸部需岁贡马1700匹，骆驼440匹，貂鼠皮1万张，青鼠皮2500张，后增至马、骆驼2万匹。

沉重的岁贡，加之节度使的贪婪、残暴，使鞑靼人不堪忍受，而叛服不常。契丹圣宗耶律隆绪开泰初（1012），鞑靼举兵围攻镇州。太平六年（1026）五月，契丹帝耶律隆绪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统兵西进，征伐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回鹘。萧惠乃征兵诸路，约期会师，独鞑靼部首领直刺失期未至，萧惠乃立斩以徇。及萧惠领兵至甘州，回鹘部众据城坚守，契丹军攻城三日，未克，乃班师退兵。鞑靼诸部趁契丹军西征失利之机，相继叛反，直刺之子聚兵追袭契丹军。契丹军乃与鞑靼诸部兵战，皆为所败。契丹都监涅里姑、国舅账太保曷不吕等领兵3000前来救援，与鞑靼兵遇于可敦城（今蒙古乌兰巴托南）西南，不敌，为鞑靼兵所败。涅里姑、曷不吕战死，士卒溃散。耶律隆绪诒遣惕隐耶律洪古、林牙化哥等将兵征讨。次年六月，又诒令萧惠再发兵讨伐鞑靼。在契丹大军的追剿下，鞑靼诸部相继战败，部落首领胡懒、春古等纷纷向契丹请降。此后，鞑靼诸部多遣使入朝契丹，以修好关系。

然契丹对鞑靼的勒索无厌，仍时常激起鞑靼人的反抗。辽道宗咸雍五年（1069）正月，鞑靼再度反辽。辽帝耶律洪基令晋王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领禁军进击。七月，西征鞑靼告捷。辽大安八年（1092）十月，鞑靼部落联盟首领（诸部长）磨古斯举兵反辽，杀辽金吾官吐古斯。辽帝耶律洪基遣奚六部秃里耶律郭三发诸番部进兵征讨。次年二月，吐古斯率领鞑靼兵入攻契丹境。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阿鲁扫古统兵追击鞑靼兵，未果而还，辽都监萧张九领兵则与鞑靼兵遭遇，交战失利，败退。辽二室韦、拽剌、北王府、特满群牧、宫分等军多为鞑靼击溃。

辽军出兵失利，辽帝耶律洪基乃令增兵进讨。十月，磨古

斯向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挞不也诈降。耶律挞不也信以为真，而防备稍懈。既而，磨古斯即领兵乘虚袭击辽军。辽军仓促应战，失利，耶律挞不也阵亡。磨古斯起兵反辽。鞑靼诸部相继举兵响应，首领乌古札、达里底、拔思母合所部兵马，入攻倒塌岭。辽廷为反击鞑靼的进攻，旋即遣使赴各地，籍诸路兵。又以南院大王耶律特末同知南京留守事，而令郑家奴率兵增援倒塌岭。复以左夷离毕耶律秃朵、围场都管撒八并为西北路行军都监，率兵进击。

面对辽军大举进讨，鞑靼诸部顽强抵抗。鞑靼首领辖底率部众攻掠辽西路群牧司。辽廷乃联合蒙古高原的乌古部族，赐马 3000 匹，以使之出兵攻击鞑靼。不久乌古敌烈统军使萧朽哥领部从击败鞑靼兵。

辽大安十年（1094）正月，鞑靼首领乌古札率部众入攻倒塌岭失利，遂投降辽军。首领达里底、拔思母则率所部继续入攻辽境。辽四捷军都监特抹将兵迎击，战败而亡。随即，辽西南面招讨司发兵进讨，战败拔思母所部。达里底率所部依旧入辽境攻掠。三月，辽廷遣山北路副部署阿鲁带将兵出击，击溃达里底所部。在辽军的镇压下，鞑靼诸部力渐不支，只得纷纷投降，排雅、仆里、同葛、虎骨、仆果、惕德萌得斯、老古得等各率所部入辽，请降归附。辽帝诏令各复旧地。

四月，辽军继续进击鞑靼反叛诸部，乌古部节度使耶律陈家奴征讨鞑靼首领茶札剌所部，大败其兵。辽帝耶律洪基又以知北院枢密使事耶律斡特剌为都统，夷离毕耶律秃朵为副都统，龙虎卫上将军耶律胡吕为都监，统领大兵征讨磨古斯，另遣积庆宫使监战。大兵未发，鞑靼首领颇里八部领所部入攻辽境，辽将朽哥带兵击破之。由于鞑靼反辽和辽军出兵镇压，辽

西北路战事不断，百姓流离失所，边境地区极不安定。为了安抚民心，稳定边境，辽廷赐西北路贫民钱。不久，鞑靼达里底、拔思母二部向辽廷请降。

五月，与辽军联兵进击鞑靼的乌古敌烈等部出兵进攻辽西北路。辽统军司出兵与之交战，败北。西北路招讨司再派兵进击，方将其击溃，然辽敦睦宫太师耶律爱奴及其子战殁。辽廷遂又以知国舅详稳事萧阿烈同领西北路行军事。以乌古敌烈统军使朽哥反叛有罪，除其名。

七月，鞑靼再入攻倒塌岭，尽掠辽西路群牧司放养马匹而去。辽东北路统军使耶律石柳率兵紧追不舍，夺回所掠马匹。至此，辽廷再作部署，九月，辽将斡特剌战败磨古斯。此后辽西北路统军司击败鞑靼部落，俘获部落长拍撒葛、蒲鲁、的烈等首领投降。辽廷随即奖赏有功将士，激励辽军翦灭鞑靼反辽势力。山北路副部署萧阿鲁带以讨达里底功，加左金卫上将军。十二月，辽帝耶律洪基下诏，令录西北路有功将士及战殁者，赠官。在辽廷的激励下，辽军奋力追杀。是月，西北路统军司再败磨古斯所部。

鞑靼部族在反辽屡遭挫败之下，依旧顽强抗击辽军的进攻。达里底及拔思母于投归辽廷后不久，复叛，再率部众入攻辽境，又被辽山北路副部署萧阿鲁带击败。辽寿昌元年（1095）正月，拔思母复攻辽西南面招讨司辖区，萧阿鲁带等领兵再败入。七月，磨古斯亦被斡特剌击败。此时，辽军已于战场上占据主动地位，以磨古斯为代表的反辽鞑靼部落陷入困境之中。辽帝耶律洪基诏令西京炮人、弩人教授训练西北路汉军掌握使用炮、弩，以便以更大的武器优势取得最终的胜利。同时，再次令录讨伐鞑靼有功将士，又赈济西北边军，以都统

斡特剌为西北路招讨使，封漆水郡王。且由官府买牛分发给乌古、敌烈、隈乌古部贫民，救济达麻里别古部，以此分化瓦解鞑靼的反辽势力。寿昌二年（1096）九月，徙乌古敌烈部至乌纳水，令其扼守北部边境之要冲。寿昌三年（1097）闰二月，应鞑靼部落长猛撒葛等人之请，辽帝允许其返回故地，向辽廷贡献方物，以示抚慰之意。

五月，辽帝耶律洪基以西北路招讨使斡特剌为讨伐鞑靼叛军主帅，领兵向鞑靼磨古斯统领的反叛部众发起猛攻，再败鞑靼兵。旋即又败梅里急所部。十月，辽廷以西北路招讨使斡特剌为南府宰相。十一月，梅里急所部再次战败。鞑靼诸部落于辽军的大举进剿下，节节败退，内部分化严重。

寿昌五年（1099）正月，辽帝耶律洪基遣使入西夏，请求西帝李乾顺发兵，配合辽西北路招讨司、统军司，讨伐鞑靼拔思母等部，以尽快平定西北边境。

在辽军的追击下，鞑靼部兵已溃不成军，寿昌六年（1100）正月，南府宰相兼西北路招讨使、禁军都统斡特剌率军于大败鞑靼军之后，生擒部落联盟首领磨古斯，并押解至都城。二月，磨古斯被斩于市。磨古斯领导的鞑靼诸部反辽斗争最终失败。

辽廷动用大军，历时近8年才平定了磨古斯的反叛，极大地消耗了辽朝的财力、物力，给予契丹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加速了辽朝统治的危机。磨古斯虽然被斩，但鞑靼人的反辽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直至辽帝耶律延禧（辽天祚帝）即位后，仍不时有鞑靼部落聚兵反辽，仍令辽廷深感不安。

注 释

①《辽史》卷三《太宗纪上》。

②③④《辽史》卷一七《圣宗纪八》。

辽

天祚亡国

辽寿昌七年（1101）正月，辽帝耶律洪基病逝，是为辽道宗。遗诏由辽燕国王，总北南院枢密使事，尚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耶律延禧（耶律延宁）继位，尊号曰“天祚皇帝”。

耶律延禧为道宗之孙。道宗后期，已是“谤讪之令既行，告讦之赏日重，群邪并兴，谗巧竞进。贼及骨肉，皇基寝危。众正沦胥，诸部反侧。甲兵之用无宁岁矣。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祝，削也，发三千。徒勤小惠，蔑计大本”①。政治腐败，政局动荡，统治岌岌可危。天祚即位后，依旧“荒于游畋，不恤政事。好佞人，远忠直。淫刑吝赏，政烦赋重”②。在他的统治下，辽朝国事益非，民怨沸腾。

长期受辽及契丹贵族欺凌压迫的女真族此时已日渐强大。天祚帝每岁遣使市名鹰海上，往返陆上皆途经望女真居地，辽朝使者贪纵，征索无厌，女真人对此极为不满。遂在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的率领下，于辽天庆四年（1114）七月起兵反辽。辽发浑河北诸军，以扩充和加强东北路统军司，又命统军萧挞不也调集诸军赴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完颜阿骨打（完颜

旻）与弟完颜粘罕、完颜胡舍等谋，以银术割、移烈、娄室、阇母为帅，集女真诸部兵马 800 人，擒辽障鹰官。九月，举兵攻辽，进击宁江州。及战，女真兵猛攻，辽军大溃而逃，相蹂践而死者十七八。女真兵至宁江州，填堑攻城，十月，宁江州陷落。

完颜阿骨打的起兵及辽宁江州的失守，使辽廷震惊，朝臣或以为当发诸道兵马以讨伐之。然辽天祚帝仅发契丹、奚军 3000 人，中京禁兵及土豪 2000 人，再选各路武勇 2000 余人，以守司空萧嗣先为东北路都统，静江军节度使萧挞不也为副都统。又以虞候崔公义为都押官，控鹤指挥邢颖为副都押官，领兵屯驻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与女真军对垒，萧嗣先等率步骑诸军会于鸭子河，完颜阿骨打领兵 3700 人迎战，潜渡混同江，掩击辽军。萧嗣先所部先溃，都押官崔公义、副都押邢颖及部将耶律佛留、萧葛十等战死。完颜阿骨打收降辽兵编入女真军，遂发展至万人。

辽军失败的消息传入辽廷，枢密使萧奉先恐其弟萧嗣先因此获罪，“辄奏东征溃军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为患”③。辽天祚帝从之，于是萧嗣先仅仅被罢免官职。诸军将士为此相谓道：“战则有死而无功，退则有生而无罪。”④是故辽兵毫无斗志，皆望风奔溃。十一月，都统萧敌里等率军扎营于斡邻泺东，又遭女真军所袭，士兵死者甚众，然萧敌里亦只坐免官。

十二月，辽宾（治今吉林农安北）、咸（治今辽宁铁岭北）、祥（治今吉林农安北）三州及铁骊、兀惹等部皆叛辽，降于女真。辽廷遣乙薛统兵赴援宾州，南军诸将实娄、特烈等赴援咸州，然皆为女真军所败。

天庆五年（1115）正月，耶律延禧下诏亲征。先遣僧家奴

持书入女真地约和。完颜阿骨打亦遣赛剌持复书入辽地，称若归还叛入辽境者阿疎。且迁黄龙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而后再议之。议和未成，辽都统耶律斡里朵等统兵与女真兵战于达鲁古城，不敌败退。

是月，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号曰大金，是为金太祖。建年号收国，且更名曰旻。随即亲自将兵进攻辽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进临益州，掳民而归。

辽廷闻讯，即遣骑兵20万，步卒70万戍边。天祚帝率兵趋达鲁古城，至宁江州西，下诏亲征。金兵进逼达鲁古城，辽军大败。正值辽、金间战火不断之时，辽饶州（治今巴林右旗）渤海人古欲等聚众起兵反辽，自称大王，拥步骑3万余。辽即遣萧谢佛留领兵进剿，为古欲所部击败。其后又遣南院副都部署萧陶苏斡为都统，再领兵进击，复败。萧陶苏斡乃改以招降，诱古欲部众归降，分化瓦解了古欲的反辽武装。六月，萧陶苏斡率军猛攻，大败古欲所部，生擒古欲，方得以平息反辽叛乱。然是时辽边汉人亦纷纷起兵抗辽，民心摇动。

九月，金帝完颜旻率军向辽发起进攻，一举攻占黄龙府。金完颜宗翰（粘罕）及其弟完颜宗弼（兀术）致书辽天祚帝，“阳为卑哀之辞，实欲求战”⑤。辽帝大怒，下诏亲征。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御营副都统，领蕃汉兵10万，号称70万，发数月粮，期必灭女真。不料辽军将渡混同江，耶律章奴反，逃奔辽上京临潢府，谋迎立魏国王耶律淳。辽天祚帝入攻金国战略遂为打乱，乃遣驸马萧昱领兵至广平淀护卫后妃，行宫小底乙信则奉命持书驰报魏国王耶律淳。耶律章奴先遣魏国王妃亲弟萧谛里将自己所谋告之耶律淳，且劝说之。耶律淳不听，以为“此非细事，主上自有诸王当立，北、南面

大臣不来，而汝言及此，何也?”⑥乃密令左右拘之，复斩萧谛里等。耶律章奴知魏国王耶律淳不从己谋，便率麾下尽掠上京府库，又掠庆（治今辽宁林西北）、饶、怀、祖（治今辽宁林东西南）等州，又结渤海反辽起事者，众至数万，径直进犯广平淀天祚帝行宫，直至辽顺国。女真阿鹘产以300骑仅一战即大败之，擒其贵族200余人，皆斩首，余逃脱者则投奔金国。耶律章奴兵败，诈为使者，亦欲奔金国，于途中被逻者所获，押解至行营，腰斩于市。耶律章奴的叛乱虽被平定，然辽军人心动摇，已无心再与金军交战。天祚帝下令立即退兵。金军尾追不舍。

十二月，金军于护步答冈（今吉林农安西）追及辽军。其时金兵仅有2万，金完颜旻告诫诸将士："彼众我寡，兵不可分。视其中军最坚，辽主必在焉。败其中军，可以得志。"⑦乃先使金军右翼出战，几经交锋，复令左翼合而攻之。辽军大溃。死者相连，遍布百余里内。金军获辽舆辇、帝幄、兵械、军资及其他宝物、马、牛不可胜计。

辽国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中军都监耶律张家奴反，锦州刺史耶律术者随即叛应。辽廷即命北面林牙耶律马哥率兵征讨。然征讨未果，辽宁天庆六年（1116）正月，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又作乱。有"恶少年"十余人，乘酒醉持刀，于夜晚翻墙入东京留守府，杀留守萧保先。辽东京户部使大公鼎闻乱，即摄留守事，与副留守清明召集奚、汉兵千人，尽捕恶少年，斩之，方得以控制局势。但裨将渤海人高永昌又复叛，自立为帝，建年号隆基（《契丹国志》载为应顺）。天祚帝遣萧乙薛、高兴顺招之，不从。乃遣萧韩家奴、张琳领兵讨伐。而辽贵德州（治今辽宁抚顺北）守将耶律余睹以广州渤海

叛附高永昌。接踵而至的叛乱，更加剧了辽朝统治的危机。

二月，辽天祚帝命侍御司徒挞不也等讨伐耶律张家奴，战于祖州，失利。继而再遣汉人行宫都部署萧特末率诸将征讨。耶律张家奴则诱饶州渤海人及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贼侯槩等万余人，攻占高州。辽军屡剿不胜，天祚帝乃于四月，亲自统军进击。虽此后辽军生擒侯槩，荡平饶州渤海，然萧韩家奴、张琳等所部仍为耶律张家奴余部击溃。五月，金军攻下沈州（治今辽宁沈阳），复陷东京，擒高永昌。这场叛乱方暂得平息。但此时辽境内已是众叛亲离，渤海等部族纷纷归附金国，北方鞑靼等部则攻掠不已，令辽廷疲于奔命。六月，天祚帝命籍诸路兵，凡有杂畜10头以上者皆充军，以此解决兵源不足之危机。

金军攻辽日剧，天祚帝乃进封魏国王耶律淳为秦晋国王、都元帅，上京留守萧挞不也为契丹行宫都部署兼副元帅，招募辽东饥民2万，进攻沈州。遭金军反击，而不能下。次年，耶律淳率军于蒺藜山与金军再战，复败退回。

辽军屡遭败绩，将领怯懦，军士离心，而金军大举入攻辽境，连连拔城。天祚帝束手无策，只得向金乞和。辽天庆八年（金天辅二年，1118）正月，天祚帝遣耶律奴哥等出使金国议和。金帝完颜旻复书辽天祚帝，称“能以兄事朕，岁贡方物，归我上、中京、兴中府（今辽宁朝阳）三路州县，以亲王、公主、驸马、大臣子孙为质；还我行人及元给信符，并宋、夏、高丽往复书诏，表牒，则可以如约”⑧。其后，辽使耶律奴哥、金使胡突衮穿梭往来，经反复交涉与协商。六月，辽天祚帝遣耶律奴哥等持宋、西夏、高丽书诏，表牒至金。七月，金帝复遣胡突衮入辽，告之“免取质子及上京、兴中府所属州

郡，裁减岁币之数”，且声称“如能以兄事朕，册用汉仪，可以如约”⑨。因金帝即位之初，采纳杨朴之策，“自古英雄开国或受禅，必先求大国封册”⑩，故其以议和求封。八月，辽使耶律奴哥等入金，议册礼。然而直至十二月，才议定册礼。天庆九年（1119）三月，辽天祚帝遣知右夷离毕事萧习泥烈等赴金国，册封金主完颜旻为东怀国皇帝。然而完颜旻既已受封册，对辽更为轻蔑。七月，遣乌林答赞谟入辽，责斥辽帝册文中无“兄事”之语，不称“大金”而云“东怀”，“乃小邦怀其德之义；及册文有‘渠材’二字，语涉轻侮；若‘遥芬多戬’等语，皆非善意，殊乖体式。如依前书所定，然后可从。”⑪天祚帝无奈，只得照此办理，再遣萧习泥烈、杨立忠持册藁使金。金帝完颜旻对辽廷更改后的册文依旧不满意，复遣乌林答赞谟持书及册文副本入辽交涉，天庆十年（1120）三月，天祚帝因金帝完颜旻所定册文中有“大圣”二字，与契丹先世称号同，又遣萧习泥烈往议。金帝完颜旻大怒，遂绝和议。

完颜旻以天祚帝不从己意，再举兵。五月，亲自统兵攻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克陷上京城外部。上京留守挞不也率众出降。辽又以北府宰相萧乙薛为上京留守，知盐铁内省两司，东北统军司事。

是年八月，北宋遣赵良嗣出使金国，与金议约夹攻辽，宋将贡辽岁币如数贡金，金则于灭辽之后，归还燕云等地于宋。且约定金军自平地松林趋古北口（今北京东北），宋军自雄州（治今河北雄县）趋白沟夹攻。如宋军不如约，即不可得燕地。

辽南北受敌，处境危难。然大敌当前，其内部却争斗不已。辽保大元年（1121）正月，辽廷再度内讧。天祚帝有四子：长子赵王耶律习泥烈，母昭容；次子晋王耶律敖鲁斡，母

文妃；三子秦王耶律定、四子许王耶律宁，皆为元妃所生。国人皆知晋王耶律敖鲁斡“喜扬人善，劝其不能，中外称其长者”⑫。而元妃之兄、枢密使萧奉先恐秦王耶律定不能立，阴谋图立之。晋王耶律敖鲁斡母文妃为姊妹三人：长者嫁耶律挞曷里，次者文妃，小者嫁耶律余覩。一日，文妃姊妹俱会于军前，萧奉先使人诬陷驸马萧昱及耶律余覩等人谋立晋王耶律敖鲁斡。天祚帝信以为真，萧昱、耶律挞曷里等伏诛，文妃亦赐死，唯独对晋王耶律敖鲁斡未忍加罪。耶律余覩正领兵在军中，得此噩耗不由大惧，即率千余骑叛辽，投奔金朝。天祚帝即遣知奚王府事萧遐买、北府宰相萧德恭、大常衮耶律谛里姑、归州观察使萧和尚奴、四军太师萧斡将所部兵追之。追至闾山县，诸将乃勒马商议道：“主上信萧奉先言，奉先视吾军蔑如也。余覩乃宗室豪杰，常不肯为奉先下。若擒余覩，他日吾党皆余覩也！不若纵之。”⑬乃还，声称追赶不及。萧奉先既见耶律余覩叛逃入金，恐日后诸将亦仿效背叛，“遂劝骤加爵赏，以结众心”⑭。以萧遐买为奚王，萧德恭试中书门下平章事兼判上京留守事，耶律谛里姑为龙虎卫上将军，萧和尚奴为金吾卫上将军，萧斡为镇国大将军。

萧奉先既诛耶律挞曷里，逼走耶律余覩，然晋王耶律敖鲁斡仍在，执意除之。保大二年（1122）正月，金帝完颜旻以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完颜昱、完颜宗翰等副之，统大军渡辽河西进，且以耶律余覩为先锋，先克辽中京（今辽宁宁城西），再下泽州。辽天祚帝出居庸关（今北京西北），至鸳鸯泺（今河北张北西北）。耶律余覩引金兵直逼辽帝行宫。萧奉先见耶律余覩领金兵来攻，竟不顾大敌当前之危，却进言道：“余覩乃王子班之苗裔，此来欲立甥晋王耳。若为社稷计，不惜一

子，明其罪诛之，可不战而余覩自回矣。”⑮天祚帝遂赐晋王死，耶律撒八等人亦遭牵连伏诛。晋王素得人心，诸军知其遇害，无不流涕，由是人心解体。不久，耶律余覩领金兵逼近行宫，辽帝率卫兵5000余骑逃奔云中府（今山西大同），途中将传国玺失落于桑乾河中。

二月，金副帅完颜宗翰率偏师直趋辽北安州（治今河北承德西）。辽奚王萧遐买（萧遐末）伪降，随即出兵围之。金兵去马与之殊死交战，败奚王所部，追杀至黄昏，遂克北安州。完颜宗翰驻兵于此，遣部将完颜希尹领兵攻掠临近之地，俘获辽将，知辽军众心离散，辽西北、西南两路兵马皆老弱不可战。完颜宗翰乃报之完颜杲（斜也）。完颜杲率兵与完颜宗翰会师于羊城泺（今河北沽源北），金将完颜宗望与完颜宗弼率百骑先进。

三月，天祚帝闻金师将出岭西，遂趋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北）。完颜宗翰、完颜宗幹以精兵6000袭之，一日三败辽军。天祚帝复逃至漠北，闻金兵将近，计不知所出。萧奉先请其逃往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天祚帝遂尽弃辎重，乘轻骑入夹山。及至夹山，方悟萧奉先之不忠，心头大怒道：“汝父子误我至此，今欲诛汝，何益于事？恐军心忿怒，尔曹避敌苟安，祸必及我，请勿从行。”⑯萧奉先下马哭拜而去。未行数里，左右执其父子，交给金兵。金人斩杀其长子萧昂，押解萧奉先及其次子萧昱送往金帝完颜旻处。途遇辽军，夺回萧奉先父子，天祚帝遂下诏赐死。

天祚帝自燕京（今北京）出逃时，诏留宰相张琳、李处温与秦晋国王耶律淳戍守燕京。李处温得知辽帝逃入夹山，即与其弟李处能、子李奭，外假怨军（辽军名），内结都统萧幹，

谋立耶律淳为帝。遂与耶律大石、左企弓、虞仲文、曹勇义、康公弼等诸大臣召集蕃汉百官、诸军及父老数万人，前往秦晋国王府，请耶律淳即皇帝位。耶律淳方出，李奭持赭袍披其身，令百官参拜山呼。耶律淳惊骇已极，再三推辞不得，只好从命。乃以李处温守太尉，左企弓守司徒，曹勇义知枢密院事，虞仲文参知政事，驸马都尉萧旦知枢密院事。改怨军为常胜军，耶律淳遂自称天赐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皇帝为湘阴王。乃据有燕、云（治今山西大同）、平（治今河北卢龙）及上京、辽西六路。凡军旅之事，悉委耶律大石。而辽天祚帝所有，仅为沙漠以北，西南、西北路两都招讨府及诸蕃部族而已。

六月，耶律淳得知天祚帝传檄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云内州（治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东南）、朔州（治今山西朔县）、武州（治今山西神池东北）、应州（治今山西应县）、蔚州（治今河北蔚县）等地，调集诸蕃精兵5万余骑，约定八月入燕京，并遣人赴燕京问劳，索要衣裘、茶、药等物。耶律淳对此十分惊恐，急命南、北面大臣议事。李处温、萧幹等主张“迎秦（指秦晋国王耶律淳）拒湘（指湘阴王耶律延禧）”，乃令蕃汉百官再议。凡从李处温、萧幹之说者，东立。唯有南面行营都部署耶律宁西立。李处温等人询问其故，耶律宁以为：“天祚果能以诸蕃兵大举夺燕，则是天数未尽，岂能拒之？否则，秦、湘，父子也，拒则皆拒。自古安有迎子而拒其父者？”李处温等人相顾而笑，欲杀之。耶律淳依枕长叹：“彼忠臣也，焉可杀？天祚果来，吾有死耳，复何面目相见耶。”⑰未几，耶律淳病故。众人乃议立其妻萧氏为皇太后，主军国事。奉耶律淳遗命，百官迎立天祚帝次子、秦王耶律定

为帝，萧太后遂称制，改元德兴。李处温父子惧祸，南通宋廷权臣童贯，欲挟萧太后纳土于宋；北通于金，欲为内应。萧太后得知，骂道："误秦晋国王者，皆汝父子！"⑱乃历数其数十条罪过，赐死李处温父子，又籍其家，得钱7万缗及大量金玉宝器，皆为宰相数月间所得。

八月，天祚帝遭遇金军，交战于石辇驿，辽军败逃，都统萧特末及其侄撒古被执。之后，天祚帝又被金军紧追不舍，弃辎重方得逃脱。

十一月，金军进至奉圣州（治今河北涿鹿）天祚帝率卫兵屯守落昆髓。而秦晋王耶律淳妻萧德妃先后五次上表金廷，请求册立秦王耶律定，金帝不许，萧德妃乃以劲兵据守居庸关。及金兵临近关口，崖石突然自落，戍卒多压死，不战而溃，萧德妃出古北口，趋天德军。金帝完颜旻领兵入燕京，自是辽五京皆为金军所据。天祚帝闻金军占据燕京，遂出居四部族详稳之家。

辽保大三年（1123年）正月，辽知北院枢密使事、奚王萧幹自立为奚国皇帝，改元天复。天祚帝命知北院枢密使事并都统马哥讨伐之。二月，萧德妃至四部族见天祚帝，为天祚帝所杀。四月，金遣人招天祚帝归附，天祚帝答书请和。金军于青塚包围辽廷辎重，辽秦王、许王、诸妃、公主、随从诸臣皆陷没。金军押送族属辎重东行。天祚帝乃遣兵于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截击金军，为金兵所败，辽赵王耶律习泥烈、萧道宁被俘。天祚帝遣牌印郎君谋卢瓦送兔纽金印向金军伪降，才得以幸免，西逃云内。

天祚帝为金军追赶，落荒而逃。五月，西夏帝李乾顺遣使赴云内，请其入西夏。天祚帝从之，渡黄河，驻金肃军北，且

册封李乾顺为夏国皇帝。金将完颜宗望闻西夏迎辽帝入其境，乃遣使入夏执索天祚帝，许以割地。

辽保大四年（1124）七月，时天祚帝在夹山。不久，完颜宗翰还上京，天祚帝率军出夹山，复取天德、东胜（治今内蒙古托克托旗）、宁边、云内等州。再南下武州，遇金军，战于奄遏下水，辽军大溃，天祚帝再逃阴山。

辽保大五年（1125）正月，党项小斛禄遣人迎请天祚帝。天祚帝遂趋天德，过沙漠时突遇金军。天祚帝徒步出逃，又改乘马至天德州。此时，天祚帝一行既无衣御寒，又无粮充饥，终日奔逃。入夜，宿于民户家，居数日，天祚帝嘉其忠，遥授以节度使。及至党项，遂以小斛禄为西南面招讨使，总知军事。

二月，天祚帝耶律延禧行至应州新城东60里处，为金将完颜娄室所俘。辽亡。

注 释

①《辽史》卷二六《道宗纪六》。

②耶律余睹《降金上书》。

③④《辽史》卷二七《天祚皇帝纪一》。

⑤⑥《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

⑦《金史》卷二《太祖纪二》。

⑧⑨⑩⑪《辽史》卷二八《天祚皇帝纪二》。

⑫《辽史》卷六四《皇子表》。

⑬⑭⑮⑯⑰⑱《辽史》卷二九《天祚皇帝纪三》。

西辽始末

西辽为耶律大石于辽将亡时在中亚地区建立的，以巴拉沙衮（亦称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东南）为中心的国家，立国近百年之久。

耶律大石，字重德，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耶律亿）八世孙，通契丹、汉文，善骑射。辽天庆五年（1115）登进士第，擢翰林应奉，寻升翰林承旨。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故亦名“大石林牙”；历泰、祥二州刺史，辽末任兴军节度使。

天祚帝耶律延禧在位时，北方女真人于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率领下，起兵反辽，屡败辽军，入攻辽境。辽保大二年（1122），天祚帝自鸳鸯泺（今河北张北西北）败逃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留其子秦晋国王耶律淳与宰相张琳、李处温共守燕京（今北京）。耶律大石乃与李处温等拥立耶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三个月后，耶律淳病故，其妻萧德妃权主朝政，耶律大石等又立其为太后。不久，金帝完颜旻领兵攻陷辽南京（今北京），萧德妃西逃天德军（今同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谒天祚帝，天祚帝怒诛萧德妃，而责问耶律大石：“我在，

汝何敢立淳?”耶律大石答称:“陛下以金国之势,不能拒敌,弃国远遁,使黎民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于他人耶?”①天祚帝无言以对,乃赦其罪。

天祚帝虽赦其罪,然耶律大石心不自安,保大四年(1124)七月,天祚帝自类山率军东伐,欲谋恢复故业。耶律大石劝谏不从,乃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连夜率200铁骑西逃。过黑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联合旗艾不盖河),白达达部(汪古部)详稳床古儿献马400匹、骆驼20头、羊若干只,以示资助。其后,耶律大石至可敦城(今蒙古土拉河上游西),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等十八部首领及部众,谕之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②于是得精兵万余。耶律大石设官置吏,建立新政权,策划复兴辽朝,拟出兵东进,联合西夏与南宋,共抗金朝。其时,金朝国势正盛,且对其防范甚严,耶律大石审时度势,放弃东征,改而西进。

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行,越金山,驻叶密立(今新疆额敏),招抚当地突厥诸部,势力渐强。稍事休整后,继续向西,且先致书西州回鹘王毕勒哥,称将假道其国,西去大食(今阿拉伯)。毕勒哥设宴迎接耶律大石,临行又馈送驼、马、牛、羊、财物,直送至境外。所过之处,敌者胜之。降者安之。兵行万里,归者数国,获资无计,军势日盛,锐气日增。

又西行至塔什干(今属乌兹别克),西域诸国举兵10万,

前来拒战，两军相望二里许。耶律大石乃遣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招讨副使耶律松山等将兵 2500 人攻其右翼；以枢密副使萧剌阿不、招讨使耶律术薛等将兵 2500 人攻其左翼；自己率主力攻其中路。三军俱进，诸国兵大败。耶律大石又于塔什干驻军 90 日，回回国王来降，贡献方物。

1132 年，耶律大石在文武百官的拥立下，称帝即位，号葛儿汗，又依汉制上帝号曰天祐皇帝，是为西辽德宗。改元延庆，仍用大辽国号，史称西辽，又称哈喇契丹（黑契丹）。西辽延庆三年（1134），耶律大石班师东归，行 20 余日，于楚河南岸八剌沙衮建都，号虎思斡耳朵。旋改年号为康国元年，由是西辽定都于此。

三月，西辽帝耶律大石以六院司大王萧斡里剌为兵马都元帅，敌剌部前同知枢密院事萧查剌阿不为副帅，茶赤剌部秃鲁耶律燕山为都部署，护卫耶律铁哥为都监，率骑兵 7 万东征。临行前，耶律大石树旗誓于众将士：“我大辽自太祖、太宗艰难而成帝业，其后嗣君耽乐无厌，不恤国政，盗贼蜂起，天下土崩。朕率尔众，远至朔漠，期复大业，以光中兴。此非朕与尔世居之地。”又叮嘱元帅萧斡里剌：“今汝其往，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③7 万大军东进万余里，一无所得，而牛马多死，乃勒兵而还。其后，金帝完颜亶亦遣军西征耶律大石，大败而还。

西辽建国后，先降服西州高昌回鹘，置少监监其国。是时，高昌回鹘以西有喀喇汗王朝，其边境住有 16000 余帐自辽朝西迁的突厥—契丹人，获知耶律大石军东来，乃举帐投奔西辽。东喀喇汗王朝阿儿斯兰汗伊卜拉欣，因不堪忍受葛逻禄和康里人的欺凌与侵扰，亦于西辽康国元年（1134）初遣使赴西

辽。表示愿意归附之意，耶律大石乃封其为“伊利克—伊·土库曼”，即土库曼王。

康国四年（1137），西辽继续向外扩张，五月，西辽军始攻寻思干（今撒马尔罕）、算端（苏丹）马哈木汗，于忽毡（今塔吉克列宁纳巴德）大败西喀喇汗军。马哈木汗退回寻思干。康国八年（1141年），西喀喇汗王朝与葛逻禄矛盾加剧。马哈木汗求援于其舅父忽儿珊的塞尔柱王朝算端桑贾尔。葛逻禄人则向西辽耶律大石求助。未几，桑贾尔举兵10万，渡阿姆河东攻。耶律大石率契丹、突厥和汉军，迎战于寻思干迤北的喀忒汪。桑贾尔所率塞尔柱军大败，溃退到梯尔哈木山谷。西辽军旋进击，塞尔柱军全军覆没，桑贾尔与马哈木汗仅以身免。耶律大石遂率军进入萨末犍，封马哈木汗弟伊卜拉欣为桃花石汗，且留下西辽少监监临其国。

西辽军大败西喀喇汗王朝后，乘胜北攻不哈剌，又遣其大将额儿布思领兵进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国慑于西辽兵威，其主沙阿提西兹向西辽降服，愿为藩属，每年纳贡3万金狄纳尔及畜产等物。双方缔结条约后，西辽退兵。

至此，西辽拥有辽阔的疆域，其辖地以虎思斡耳朵为中心，北达叶尼塞河上游，南至锡尔河上游，西至塔拉斯河，东至伊塞克湖以东。辖有东西喀喇汗王朝、高昌回鹘、花剌子模等属国及粘拔恩部、康里部、葛逻禄部等属族，成为中亚地区强大的帝国。

西辽帝国制度多沿袭辽制。设南、北面官制。对附属国则保留其原有制度。多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改地税为户赋，每户只收一个狄纳尔。因此西辽经济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尤以百谷、棉花、园艺、桑蚕等业为主。畜牧业十分发达，畜产中的

牛、羊和伊犁马素负盛名。渔猎业主要分布于境内河流流域地区。其手工业主要有玻璃制造业、制陶业、五金业、采矿冶炼业等。境内及对外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内地中原生产的丝绸和工艺品，中亚、西亚所产珠宝、香料多成为交易的主要商品，西辽遂成为联系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枢纽和商品集散地。

康国十年（1143），耶律大石病逝，庙号德宗。因其子夷列年幼，耶律大石临终前，令皇后塔不烟权国。塔不烟后号感天皇后，及称制后，改元咸清。在位7年，于1150年，子夷列即位为西辽第二代皇帝，改元绍兴。夷列在位期间，下令检括户口，籍民18岁以上者，得84500户。又派东喀喇汗国出兵支援西喀喇汗国恰克雷汗，与花剌子模军作战。夷列在位13年，病逝，庙号仁宗。

夷列逝世时，其子亦年幼，以其妹普速完权国。普速完称制，改元崇福，号承天太后。她在位期间，命西喀喇汗国派兵，强行将居住于蒲华、萨末犍两地的葛逻禄人迁往喀什噶尔，引起葛逻禄人的反抗。1170年，又下令出兵花剌子模。承天太后生活糜烂，与其夫、驸马萧朵鲁不弟萧朴古只沙里私通。后索性将萧朵鲁不出轰出宫中，出任东平王。1178年，承天太后罗织罪名，将其夫萧朵鲁不处死。此事引起萧朵鲁木父、西辽元帅萧斡里剌的不满与怨恨，遂发兵包围皇宫，射杀承天太后萧普速完和萧朴古只沙里。承天太后在位14年。

承天太后死后，西辽仁宗耶律夷列次子耶律直鲁古即位，改元天禧。其时，花剌子模国日益强大，国主沙摩诃末汗力图摆脱西辽附属国的地位，出兵征服河中地区，与西喀喇汗朝结成同盟，起兵反西辽。西辽遣兵与花剌子模军交战70余次，皆战败。西辽势力因此退出河中地区。连年的征战，极大地消

耗了西辽国内的实力，财力日渐匮乏，统治危机日益加剧。其后，西辽所辖附属国及部族纷纷叛离而去。

西辽天禧二十七年（1204），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积极向外扩张，出兵征讨乃蛮部。乃蛮部首领太阳汗战败身亡，其子屈出律西逃。不久，屈出律逃奔至西辽。西辽帝耶律直鲁古将女儿嫁给他。此后，屈出律复离西辽，东去收集乃蛮残部，乃为乃蛮王。他与花剌子模相约，夹攻西辽。天禧三十四年（1211）秋，耶律直鲁古外出狩猎，乃蛮王屈出律以8000兵设伏，生擒之。耶律直鲁古被迫退位，屈出律窃据西辽帝位，遂袭辽朝衣冠，尊耶律直鲁古为太上皇。皇后为皇太后，“朝夕问起居，以侍终焉”④。两年后，耶律直鲁古死，庙号仁宗。

1218年，蒙古国成吉思汗西征，灭西辽，屈出律被擒处死，西辽遂亡。

注 释

①②③④《辽史》卷三〇《天祚皇帝纪四》。

西夏

党项崛起

西夏是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

党项羌为古代西羌族中的一支，大约兴起于公元6世纪后期的南北朝末期。最初活动于今青海东南部。历隋代，至唐初，其活动范围逐渐扩展至“东距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西叶护（今新疆），南春桑、迷桑等羌（今青海果洛境内），北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甘肃南部）”①。他们依氏族分化而成的家族结成部落，各自分主，不相统一。较重要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又作野律、野辞）、米擒氏（亦作来擒）、拓跋氏等八大部族，其中尤以拓跋氏最为强盛。

开皇元年（581），杨坚（隋文帝）代周，逐渐结束南北朝纷争割据的局面，实现天下的统一。开皇四年（584），数千余户党项羌民内附隋朝。次年，拓跋部首领拓跋宁丛率所部迁徙至旭州（治今甘肃临潭），请求于此定居，隋授拓跋宁丛大将军号。开皇十六年（596），党项羌入攻会州（治今甘肃靖远）。隋令陇西兵进讨，大败其众。随后，党项羌纷纷请降，且遣子弟入朝谢罪。杨坚告之：“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

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②此后，党项羌始得与内地汉人和睦相处。

唐贞观三年（629），唐南会州都督郑元琦遣使招谕党项羌人，其首领细封步赖率领部众归附唐朝。唐帝李世民遂降玺书慰抚之。细封步赖入朝，受到唐廷极其优厚的礼遇与赏赐。唐于其部所在地设置轨州（今四川松潘境），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细封步赖乃请求率领所部讨伐吐谷浑。其后，党项羌诸部首领相继率领部众入附唐朝，请求成为唐朝臣民。李世民对他们厚加抚慰，且于其居住之地设置崌（山居）州、奉州、岩州、远州等羁縻州，各授其首领为刺史。另一党项羌大首领拓跋赤辞，起初与吐谷浑结好，又与吐谷浑主伏允通婚，贞观初年，党项羌诸部首领率众内附之时，唯有拓跋赤辞拒不附唐。贞观八年（634），唐遣大将李靖等领兵进讨吐谷浑，拓跋赤辞率部众屯守狼道坡抗击唐军。唐廓州刺史久且洛生遣使，以祸福劝谕拓跋赤辞。遭拒绝后，久且洛生遂率轻骑袭击拓跋赤辞部，于肃远山击败之，斩首数百级，掳其牲畜6000头。李世民又令岷州都督李道彦再次劝降拓跋部，拓跋赤辞从子拓跋思头向唐使秘密递送降表，另一首领拓跋细豆亦率所部归降唐朝。拓跋赤辞见众叛亲离，始有归化之意。适逢岷州都督刘师立再度遣人前来招诱，拓跋赤辞遂与拓跋思头一同率众内附。唐授其为西戎州都督，且赐姓李氏。此后，拓跋部职贡不绝。

其后吐蕃日渐强盛，不断向外扩张，拓跋部受其威胁愈来愈大，遂向唐请求内迁，开始迁徙其部众至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唐于庆州界内又置安定、安化等州，以安置拓跋部众。

唐天授三年（692），位于西北边境的20余万党项羌人内附，唐廷又分其地而设朝、吴、浮、归等10个羁縻州，仍散

居于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等界内。唐至德（756—758）之后，受吐蕃的诱惑，时常入侵叛唐朝。宝应元年（762），党项羌首领入朝，请求协助唐廷供应灵州军粮，因此倍受唐帝李豫的褒奖。

居位于泾州（治今甘肃泾川西北）、陇州（治今陕西陇县）的党项羌10余万众，于唐上元元年（760），在其首领率领之下，向凤翔节度使崔光远请降。宝应元年十二月，其归顺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朝凤州部落，一同向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判史臧希让请求赐予州印。臧希让遂报告朝廷，得到唐帝李豫的应允。

唐都统朔方、邠宁、鄜坊节度事以党项羌、吐谷浑部落散处于盐州（治今陕西定边）、庆州等地，其地与吐蕃临近，易相互勾结，给唐朝边境造成威胁，而迁静边州都督府、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治今陕西米脂西北）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则迁至夏州之西，且阻断其相互间的联系。唐帝李豫又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位刺史入朝，给予极丰厚的赏赐，使其返回各自部落，以安抚部众。既而郭子仪又以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置行庆州。且置静边、芳池、相兴三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等七州都督府。于是党项羌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乐思州刺史拓跋乞梅等皆入朝，而宜定州刺史折磨布落、芳池州野利部同迁徙至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其时，居住于庆州地区的党项羌部落称为东山部落，居住于夏州地区的党项羌部落称为平夏部落。后建立西夏王朝的拓跋氏即为平夏部落中的显赫大族。

元和年间（806——820），唐廷于西北复置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东南），以保护党项诸部落。然而至大和年间（827——835），党项羌人不断侵扰唐边，劫掠财富。但又苦于兵器落后，遂以良马与汉人交换铠甲，以羊只交换弓矢。鄜延道军粮使李石闻讯，下令商人不得携旗帜、甲胄、兵器等进入党项羌部落贸易。尽管如此，至开成末年（841），党项羌部落仍愈发繁盛，豪商富贾纷纷以缯宝与之交换羊、马。藩镇则见利可图，遂强行以低价购买党项羌羊、马，致使诸部众纷纷反抗，一时间内地赴灵州、盐州通途被阻断。

大中四年（850），党项羌人内掠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唐帝李忱绍令凤翔节度使李业、河东节度使李械合兵讨伐，以宰相白敏中为都统。不到一月，唐军大破党项部众，余部窜逃南山。

平夏部曾于天宝末年（756），协助唐廷进击安史叛军，立有战功。其首领拓跋守寂被擢升为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迁灵州都督。其孙拓跋乾晖后出任银州刺史。拓跋氏遂割据一方。

咸通末年（874），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自称刺史。未几，黄巢率农民军攻入长安（今陕西西安）。拓跋思恭闻讯，与鄜州节度使李孝昌结盟，共同发兵进击黄巢。唐帝李儇授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使。拓跋思恭于广明二年（881），率蕃、汉兵进击，然至王桥即为黄巢军所败。拓跋思恭又改与郑畋等四节度使结盟，合兵屯驻于渭桥。中和二年（882）唐帝李儇又下诏，以拓跋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随后又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平定黄巢起义后，又以其兼太子傅，封夏国公，赐姓

李。自此夏州拓跋氏改称李氏，夏州又称“定难军”，下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夏州李氏因此而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

拓跋思恭死后，唐廷又以其弟拓跋思谏代为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孝为保大节度使，鄜、坊、丹、翟等州观察使，二人同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有叛乱起，唐廷令党项羌拓跋部出兵平叛，遂又以拓跋思孝为北面招讨使，拓跋思谏为东北面招讨使。拓跋思孝乘乱兵取鄜州（治今陕西富县），遂为节度使，且累兼侍中。后因年老，而荐举其弟拓跋思敬为保大军兵马留后，未几擢升为保大军节度使。

五代十国时期，僻居西北的夏州拓跋氏仍以藩镇自居，与中原地区相继建立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诸政权，以及占据河东地区（今山西）的北汉政权，保持着“臣属”的关系，避免卷入中原战火之中。

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谏死后，由拓跋思恭孙拓跋彝昌继立为定难军节度使。后梁开平四年（910），拓跋彝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其族父、蕃部指挥使拓跋仁福为将吏推举，而继任为定难军节度使。遂受后梁封为朔方王。李存勖灭后梁建立后唐，夏州拓跋部又归附后唐。

后唐明宗李亶在位（926——933年）时，曾下诏于沿边设置榷场，购买马匹，周边部族遂入市中原，其中尤以回鹘、党项羌所产马匹为交易之最。李亶对远来各部族十分优待，不论马匹强弱皆予收买，且出价极高，又“往来馆给，道路倍费”。党项羌人至京师，李亶常于宫中大殿召见，“劳以酒食，既醉，连袂歌呼，道其土风以为乐，去又厚以赐赉，岁耗百万计”③。后经朝臣劝阻，李亶方禁止周边部族入市京城，而令宫吏只于边境榷场买马。然而党项羌人“利其所得”，不理会

禁令，依旧进入京师。且灵州、庆州之间的党项羌人更时常入侵后唐疆域，抢劫财物。河西回鹘使臣入贡后唐，途经党项羌部落时，多遭劫掠，其使臣被劫持，所携入贡财宝则被卖之于他族，以换取牛、马，给后唐造成严重的边患。

后唐长兴四年（933），拓跋仁福卒，其子拓跋彝超继为留后。后唐帝李亶欲趁机兼并夏州，遂令拓跋彝超与彰武军节度使安从进调换治所，又遣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统兵5万。前往接管夏州。拓跋彝超知后唐用意，遂组织部众守卫夏州，又集诸胡骑兵万余，抗击后唐军队。后唐军队进围夏州，百余日仍不得克。拓跋彝超兄弟登城求和道："夏州贫瘠，非有珍宝蓄积，可以充朝廷贡赋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蕞（zuì最）尔孤城，胜之不武，何足烦国家劳费如此？幸为表闻。若许其自新，或使之征战，愿为众先。"后唐兵久攻不克，亦无斗志，加之粮运艰阻，只得撤围而去。此后，后唐不敢再用兵于夏州，拓跋氏于党项羌诸部落中的威望益发提高。

拓跋彝超死后，其兄拓跋彝殷继任定难军节度使，掌握夏州政权。后晋天福九年（944），拓跋彝殷率兵自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渡黄河，助后晋军进攻契丹。后汉乾祐二年（949），后汉朝廷又将静州（治今陕西米脂北）隶属定难军，夏州拓跋氏遂辖有夏、银、绥、宥、静五州之地，其势力进一步得到壮大，遂成为西北地区较强大的一支割据力量。

其时，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内地政权无暇西顾，多以加官晋爵拉拢拓跋首领，以求稳定边境。拓跋彝殷因此不断以武力相要挟，迫使内地政权给予更多的利益。后周初年，后周帝郭威给拓跋彝殷加中书令。显德初，封其为西平王。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给拓跋彝殷加太保。后周恭帝柴宗训即位，再加太

傅。

后周显德七年（960），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废幼帝柴宗训，称帝建立宋朝，又给拓跋彝殷加太尉，继续保留夏州拓跋氏的藩镇地位。未几，北汉主刘钧勾结代州（治今山西代县）以北诸部族入侵麟州。拓跋彝殷派部将李彝玉会集诸镇党项羌兵抗击而驱赶之。此后，夏州拓跋部与宋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建隆初年，向宋朝贡献良马300匹。宋帝赵匡胤以玉带回赐，乾德三年（965），拓跋彝殷卒，赵匡胤为此废朝3日，又追赠其太师，追封夏王。

其子拓跋光睿（后因避宋帝赵光义讳，而改称克睿）遂自立为权知州事。宋又授其为检校太尉，定难军节度使。宋开宝九年（976），拓跋光睿率兵攻陷北汉吴堡寨，斩首700级，俘获寨主侯遇进献宋廷。后累加检校太尉。宋太平兴国三年（978），拓跋克睿卒，宋帝赵炅（即赵光义）为此亦废朝2日，追赠其为侍中。

拓跋克睿之子拓跋继筠继立。拓跋继筠初为衙内都指挥使、检校工部尚书，继立后亦自权知州事。宋廷授其为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宋帝亲征北汉，拓跋继筠遂遣银州刺史李光远、绥州刺史李光宪率蕃、汉兵列阵渡河，进逼北汉都城太原（今属山西）地区，以助涨宋军声势。太平兴国五年（980），拓跋继筠卒，其弟，衙内指挥使拓跋继捧继立为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

党项羌自内迁后，其社会发展逐渐加快，虽各部族仍散居于诸州，不相统摄，然拓跋部于其中的显赫地位日趋明显。自唐历五代十国。至宋初，拓跋始终与内地政权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不断接受内地政权的册封。遂得以借助内地政权之威，提

高自己的声势与名望，据五州之地，成为割据一方的藩镇。

注 释

①《新唐书》卷二二一《党项传》。

②《隋书》卷八三《党项传》。

③《新五代史》卷七四《四夷附录》。

西夏

继迁叛宋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党项羌拓跋部首领，宋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观察留后拓跋继筠卒，其子年幼，由其弟、衙内指挥使拓跋继捧嗣为留后。因失礼于诸部落首领，宗族多有不协。太平兴国六年（981）八月，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其弟李克顺等率兵袭击定难军治所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欲除拓跋继捧。拓跋继捧侦知，先设伏兵以待。李克远等率兵入伏，战败而亡。十一月，拓跋继捧即以银州（治今陕西米脂西北）兵变上奏宋廷。宋太宗赵炅诏令抚绥属族，勿使之滋乱。太平兴国七年（982）五月，拓跋继捧从父、绥州刺史、西京作坊使李克文上表，称拓跋继捧不当承袭留后。且请求宋帝遣使与己同赴夏州，召谕拓跋继捧，令其入朝。

宋太宗正欲收缴地方割据势力之权，然于夏州拓跋氏始终不得下手，见李克文上表，遂以李克文权知夏州，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拓跋继捧见此情景，即率族人入朝宋帝，且献所辖银、夏、绥（治今陕西绥德）、宥（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四州八县①之地。宋太宗对其入朝，甚为嘉奖，赐予白金

千两、帛千匹、钱百万。赵炅祖母独孤氏亦赏予玉盘、金盘。拓跋继捧向宋帝陈奏其诸父、昆弟多相怨仇，而希望留居京师。宋太宗乃遣使赴夏州发送拓跋族人入京师。且授拓跋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又分别授予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李克信等 12 人官职。

拓跋继捧族弟、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拓跋继迁不乐内附。拓跋继迁时居于银州，年 20 岁。他与其弟拓跋继冲、亲信张浦等人谋曰："吾祖宗服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唐朝曾赐拓跋氏李姓）将不血食矣，奈何?"拓跋继冲认为："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以为应乘夏州不备，杀诏谕使，占据绥州、银州，即可得志。而张浦认为："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②遂诈称拓跋继迁乳母病故，需出葬郊外。而以兵器铠甲置于棺中，与其部众亲信数十人，出银州城，直奔距夏州城东北 300 余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于此招聚部众，集合武装，不断侵扰宋境，致使宋边患不已。

太平兴国八年（983），拓跋继迁多次进击河西地区，银、夏诸州无安宁之日。宋帝赵炅令银、夏、绥、宥都巡检使田钦祚与西上閤门副使袁继忠率兵巡护。拓跋继迁自葭柞岭出兵狙击，与宋军战于葭芦川，战败，弃甲而逃。田钦祚与袁继忠遂屯兵驻守于三岔口，以扼守夏州要冲。拓跋继迁率兵偷袭宋军，战败后退入狐貉谷。田钦祚等统兵追击，拓跋继迁指挥部众自后面围攻宋雄武军。袁继忠令龙卫指挥荆嗣前往救援。荆

嗣令兵士列阵，与之格斗，拓跋继迁不敌，败退，损失人马700余。田钦祚告捷返师，依山为营，拓跋继迁亦于其下建寨。田钦祚与荆嗣于军中招募劲卒50人，趁黑夜纵火击之。拓跋继迁营栅悉为焚毁，兵士死者千余人。

拓跋继迁屡战屡败，又见绥、银、夏等州官吏招诱被党项羌掳至界外之民归业，部下人心浮动，便与张浦谋议。张浦认为宋军遍驻于银、夏等州，势难与争。而宥州富庶，又依横山为界，可招诱党项羌诸部，合力攻取之，即可扼险观变。拓跋继迁因此召集2万余众，进攻宥州。宋巡检使李询率所部蕃、汉兵卒奋力抗击，击退党项羌兵。

太平兴国九年（984）九月，知夏州尹宪侦知继迁踪迹，遂与银、夏、绥、麟、府、丰、宥州都巡检使曹光实自军中选择精骑，发兵夜袭地斤泽。大败拓跋继迁所部，斩首500级，焚毁400余帐，俘虏拓跋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近万计。仅拓跋继迁与其弟拓跋继冲得以逃脱。

拓跋继迁至夏州北黄羊平招揽蕃众，兵势复振。于是，党项羌野利等显族首领纷纷与之联姻。宋雍熙二年（985），拓跋继迁连娶豪族，又转徙无常，逐渐强大。而党项羌人以拓跋氏世著恩德，往往多归之。拓跋继迁乃以其祖拓跋彝殷画像，出示给众人，众人皆拜泣。拓跋继迁因而告之诸部首领："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③众人异口同声表示愿从。拓跋继迁随即与拓跋继冲、破丑重遇贵、张浦、李大信等起兵夏州，以诈降宋军。且派人告之曹光实，请求纳降，又约定日期于葭芦川陈礼投降。曹光实不知其诈，又欲专其功，亦不与人商议，便应允纳降之事，及约定之日，拓跋继迁先于葭芦川设下伏兵，又派10余人赴银州迎接

曹光实。曹光实仅率数百骑前往受降。拓跋继迁亲为前导，引宋军北行，将至纳降地点时，他忽举手挥鞭，顿时伏兵四出，曹光实被斩杀。曹光实从子曹克明时正押辎重于后，得知此讯，恐军中大乱，而秘不发丧。令人假传曹光实令，还军银州。随即与仆人张赉潜入党项羌军中劫回曹光实尸体。

拓跋继迁既杀曹光实，又假其旗帜，袭破银州城，缴获军资器械无计。于是，党项羌诸部归附者日众。部将李大信等人商议推举拓跋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以号令诸部。谋臣张浦以为不可，当先令诸部首领各领州郡，使人自为战。拓跋继迁欣然同意，遂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又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祐、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又预署党项羌诸部首领为刺史，以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遇乜为丰州刺史，其弟拓跋延信为行军司马。

三月，拓跋继迁出兵攻陷会州（治今甘肃靖远），焚毁城郭而去，继而大举用兵河西地区。三族寨将折遇乜杀宋监军使者，与拓跋继迁合兵。宋廷乃遣知秦州田仁郎等领兵讨伐。田仁郎兵至绥州（治今陕西绥德），上奏朝廷请求派兵增援，然过月余方报予朝廷。宋帝赵炅大为不满，遂改以军器库使刘文裕替换田仁郎，而召其返朝。

四月，宋将李继隆、王侁等统兵出击拓跋继迁。王侁率军进击银州北，破悉利诸族，追杀数十里，斩杀3000余级，俘虏蕃、汉老幼千余口，杀折罗遇及其弟埋乞，缴获牛、马、铠仗颇多。宋军又出开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丞族，斩其副首领埋乜以下57人，收降银三族首领折八军等3000余众。继而又破没邵浪、悉讹诸族及浊轮川东、兔头川西诸族。在宋军

的进击下，麟州诸蕃部纷纷请求纳马赎罪，愿改图自效，助讨拓跋继迁。王侁等遂与所部兵入浊轮川，斩首5000级。拓跋继迁与折遇乜败退而逃。随后，宋军又攻破党项羌其他诸多小部族，由是麟、夏、银3州的党项羌人相继背叛拓跋继迁，归附于宋朝有125部族，1600余户。

宋军的进击，使党项羌拓跋氏处境困难。拓跋继迁为摆脱困境，乃率众攻夏州。宋权知麟州韩崇训领兵赴援，大败党项羌兵。拓跋继迁又入宋境抄掠。宋银、夏、绥、府都巡检使石保兴领兵巡防，趋黑水河。党项羌兵侦知，以数千骑据谷中之险，又渡河向宋军挑战。时石保兴所部尚不足2000人，石保兴乃分短兵设伏，待党项兵渡至河中时，宋军迅速出击，斩其首百余级，追击数十里外。

宋雍熙三年（986），拓跋继迁见党项羌诸部被宋军所击，或丧败溃散，或投降归附，便与众将商议，认为“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单力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④。乃遣张浦至契丹，请求归附。契丹帝耶律隆绪对此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认为：“河西为中国（指宋朝）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衡刘汉，致大兵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⑤耶律隆绪遂接纳拓跋继迁的归附。

四月，耶律隆绪欲令党项羌牵制宋朝，乃遣侍中萧里得持诏入党项羌地，授拓跋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银、夏、绥、宥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又授予拓跋继冲为副使。

拓跋继迁以联辽之策，实现其抗宋“克复旧业”的目的，遂于十月朝会于契丹。十二月，又亲自领500兵至契丹边塞，

向契丹帝提出“愿婚大国，永作藩辅”⑥。契丹帝耶律隆绪下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册封为义成公主，下嫁给拓跋继迁，同时赐予他3000匹马。

拓跋继迁依附于契丹，借其声势壮大自己的势力，重树在党项羌诸部中的威望。且假契丹兵威，继续抗宋。

宋雍熙四年（987），拓跋继迁又进攻夏州。宋知夏州安守中率3万余兵马于王亭镇迎击党项羌兵，不敌而退。拓跋继迁统兵追击至夏州城门而返。自此，拓跋继迁数为边患，宋廷有言，拓跋继迁悉知朝廷事，皆为拓跋继捧所泄。宋帝赵炅遂以拓跋继捧为崇信军节度使，李克宪为道州防御使，李克文遣归博州，使之出朝。并另选常参官为通判，以专一州之政，不使其操权。

宋端拱元年（988），宋廷改授拓跋继捧为感德军节度使，他屡次发兵征讨拓跋继迁，始终未获胜。又数以诏谕拓跋继迁及其所属部族，拓跋继迁亦曾派孔目官张浦，向知环州程德元自陈归顺之意，然却始终不肯降宋，反而侵扰宋边愈盛。宰相赵普建议，复委拓跋继捧重返党项羌故地，令其治理。宋帝赵炅随即召拓跋继捧入朝，赐其赵姓，更名保忠，又亲书五色金花笺赐之，且授以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又赐金器千两、银器万两，并五州钱帛、刍粟、田园。赵保忠辞别赴任之日，赵炅于长春殿设宴，为其饯行，再赐袭衣、玉带、银鞍马、绵綵3000匹、银器3000两，又赐锦袍、银带500副、马百匹。且命右卫第二军都虞侯王杲领兵千人护送。

赵保忠返回夏州，拓跋继迁对他极为蔑视。然赵保忠受宋帝之恩，亦希望能笼络他。至夏州数月，见其仍无投降归顺之

意，竟上言称拓跋继迁已悔过归顺，请求宋廷授官。宋帝赵炅乃授拓跋继迁为银州刺史，充洛苑使。对此，继迁毫不理会，相反亦欲拉拢赵保忠，遂向契丹帝耶律隆绪请求，希望能与其通好。耶律隆绪知其非诚，不许。

端拱二年（契丹统和七年，989），契丹以义成公主下嫁拓跋继迁，而与之联姻，以进一步控制他。而拓跋继迁则恃契丹为后援，继续与北宋对抗。西域诸部族多遣使臣入朝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贡奉所产良马。然途经党项羌地，多为拓跋继迁所击，贡物悉遭抢劫。宋军虽多次出击，终不得止。

宋淳化元年（契丹统和八年，990），拓跋继迁自娶契丹义成公主，假契丹国之威，慑服党项羌诸部，诸部于是纷纷向其贡输牲畜。拓跋继迁势力渐壮。八月，赵保忠奉宋帝诏买马，强令诸蕃卖马，遂以武力征服宥州归附拓跋继迁的部族，而与拓跋继迁交战于安庆泽。拓跋继迁中流矢逃遁。十月，拓跋继迁谋取夏州，乃遣破丑重遇贵等至夏州城诈降，声称拓跋继迁伤势严重，已不能统军。赵保忠轻信其言，而不设防。拓跋继迁集结诸部兵马，突攻夏州。赵保忠出兵拒战，破丑重遇贵等人即于军中策应。赵保忠无防，仅以身免。十二月，契丹帝为进一步笼络拓跋继迁，以利用党项羌牵制宋朝，继续与宋朝为敌，乃遣使封拓跋继迁为夏国王。

宋淳化二年（契丹统和九年，991）正月，拓跋继迁再攻夏州，宋帝遣商州团练使翟守素率兵救援。宋并代、夏绥、麟府三镇部署孔守正亦统兵进击，于大横冈大败拓跋继迁所部。复交战于白池，又败之。

拓跋继迁自举兵叛宋，走大漠数年间，倍感艰辛，其役属党项羌诸部怨声不已。夏州之战，虽败赵保忠兵，然其部下指

挥朗吉等将领“潜相携贰”，及闻翟守素领兵前来征讨，甚为恐惧，乃奉表归顺。拓跋继迁见一时难以“克复旧业”，遂奉表向宋帝请降。宋帝赵炅乃授其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氏，更名保吉。拓跋继迁又举荐其弟拓跋继冲，赵炅亦赐其姓，改名赵保宁，授绥州团练使。并授拓跋继迁子拓跋德明为管内蕃落使。

然而拓跋继迁归附宋朝，又引起契丹的不满，即遣西南招讨使韩德威持诏，率兵往谕。拓跋继迁借口西征，不见韩德威。韩德威大为恼怒，率兵至银州大掠而还。自此，拓跋继迁与契丹发生间隙。

宋廷自拓跋继迁奉表归顺，便应其所请，开通陕西互市，又弛青白盐禁。但拓跋继迁对此并不满足，他于此前已攻占绥、银二州，继而又遣使入宋，乞请归还夏、宥等州，宋帝赵炅予以拒绝。拓跋继迁大怒道：“五州故地，先业留遗，拓土展疆，是诚在我。”⑦ 乃以李大信为蕃部都指挥使，率众进犯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八月，又兵进原州（治今甘肃镇原），大肆抢掠。拓跋继迁自此再度兴兵，以拓土展疆，重复拓跋氏旧业。

注 释

① 王偁《东都事略·西夏传》作献五州之地，多静州，然静州废置无常，故为四州可信。

② 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篇》卷二五，戴锡章《西夏纪》卷一。

③《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④《西夏书事》卷四。

⑤《辽史》卷一一《圣宗纪二》。

⑥《西夏书事》卷四。

⑦《西夏书事》卷五。

西夏

西平定都

宋淳化五年（994）正月，继迁令继冲胁迫绥州百姓迁往平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又于宋境沿边攻围堡寨，大肆俘掠，焚毁积储。继而又入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击败守将慕容德丰。宋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尚食使尹继伦为都监，领兵讨伐继迁。

继迁族兄继捧先已归顺宋廷，且授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令其返镇党项羌故地。然其既不能牵制继迁，反与之勾结。及闻李继隆统兵将至，十分惊恐，乃先携其母及妻、子，与卒吏躲避于野外。且上言称与继迁已解仇，愿贡马50匹，乞请朝廷罢兵。宋帝大怒，立即派遣使臣，急令李继隆移兵先进击夏州。三月，宋军大兵压夏州境，继迁却趁机欲兼并其部众。他劫持继捧牙将赵光祚，夜袭继捧营帐。继捧方寝，闻帐外大乱，遂单骑出逃，返回夏州城。及至城中，即被其部将、指挥使赵光嗣所执。赵光嗣开城门，迎李继隆入城。李继隆既入夏州城，令指挥使许均戍守。继迁撤兵而去。

四月，宋帝赵炅下诏，削夺所赐继迁"赵保吉"姓名，又"以夏州深在沙漠，本奸雄窃据之地"①，欲毁夏州故城，迁其民于绥、银等州。宰相吕蒙正力赞其意，遂诏令废毁。夏州原为党项羌故地，继迁闻讯，一面数次出兵进攻夏州，一面派部将入宋境，表示归顺之意，甚至遣其弟延信入宋，奉表待罪。十一月，宋遣内侍张崇贵持诏往谕继迁，复命其为银州观察使。

宋至道元年（995），继迁遣左押衙张浦入宋，贡奉良马、骆驼。六月，继迁又上表宋廷，请求夏州。赵炅知其诈，乃遣阁门副使冯纳、中使贾继隆持诏，授继迁鄜州节度使。继迁以鄜州（治今陕西富县）临近延安（今属陕西），易受宋朝控制，而不奉诏。赵炅知张浦为继迁谋臣，乃授其为郑州团练使，留居京师。

继迁既不受诏命，又邀击清远军（今甘肃环县北），且以厚赂诱契丹韩德威，进攻宋府州（治今陕西府谷），给宋廷施加压力。

至道二年（996）正月，宋帝命洛苑使白守荣等护送40万粮草赴灵州，且令车队前后分作三队，运送粮草的丁夫持弓矢自卫，押运的士卒列方阵护卫。遇敌则战，可以无失。同时又令会州观察使田绍斌率兵应援。然而白守荣却擅自作主，将运粮车并为一队。行至浦河（今宁夏吴忠南），遭继迁邀击。白守荣见车队被围，欲出击迎战。田绍斌劝阻他，建议勿弃辎重与战，当结阵徐行。白守荣不从，田绍斌遂率所部离去四五里。继迁初见田绍斌旌旗，不敢进击。田绍斌离去，白守荣等欲邀功，与之交战。继迁先设伏，以老弱骑兵前去挑战。白守荣麻痹轻敌，中伏战败。丁夫惊恐而逃，践踏而死者甚众。粮

草辎重悉为继迁所夺。

四月，宋廷以李继隆为环、庆等州都部署，殿前都虞侯范廷召为副都部署，讨伐继迁。然而，宋军尚未部署完毕，五月，继迁又领兵围攻灵州。宋帝赵炅欲弃灵州，廷议未决。灵州城上表告急，皆为继迁所得，遂顿兵不去。宋帝即令诸将，分五路进讨继迁，救援灵州。以李继隆出环州（治今甘肃环县），丁罕出庆州，范廷召出延州（治今陕西延安），王超出夏州，张守恩出鄜州。

李继隆自环州出兵后，未按原定路线进击，而径直兵进继迁巢穴。他与丁罕率兵行军十余日，竟未见敌兵，乃撤军退回。而张守恩虽于途中遭遇党项羌兵，却不出击，反而率所部退回原驻地。唯余下二将奋力杀敌，范廷召出延州城，于乌、白池与继迁所部遭遇。党项羌兵结方阵迎击，范廷召与部将石保兴指挥宋兵冲入阵中，与之激战。石保兴乘马中流矢，他易骑奋呼，且行且战。一连三日，激战42回，俘虏米幕军主、吃啰等军将。继迁逃去。王超出夏州，以其子王德用为先锋，率万人与继迁战于铁门关，斩首13级，缴获牲畜万计。随即进兵乌、白池，遇党项羌军主力，王超见敌多势众，不敢进。王德用请战，得精兵5000人，与敌转战三日，党项羌军退却。王德用领兵赶至距夏州五十里处，绝其归路，且下令军中："乱行者斩！"一时间，军中肃然，王超亦赶至坐阵。继迁领兵尾随其后，众部将望王超军阵齐整，不敢靠近。此战，宋军诸将失期，加之粮运不济，终未得重创继迁。而继迁利用宋军各路不协之机，四下出击，令宋军被于应战，贻误战机。

继迁既令宋军无功而还，遂出兵进攻石堡寨，又进围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入侵灵州合河。然皆遭宋军守将反击，屡

战屡败，伤亡颇大。

至道三年（997），宋太帝赵炅卒，其子赵恒即位，是为真宗。继迁遣使求和，“姑务宁静”②的赵恒遂从其请，乃命张崇贵持诏前往，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复、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复赐姓名“赵保吉”。自此，继迁复得夏、银、绥、宥、静（治今陕西米脂北）五州之地，其地东西25驿，南北10余驿，方圆数千里。张浦随即亦被放回。

宋咸平元年（998）正月，继迁遣押牙刘仁谦为使，奉表入宋谢恩。然而继迁对此并不满足，他于恢复“故土”之后，欲扩张其割据势力，遂大举入侵宋境。

咸平二年（999）六月，继迁率骑兵入河西劫掠，杀宋虎翼军指挥使李瑶。八月，继迁会集河西部族兵入攻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击败府州将、洛苑使折惟昌所率援兵，杀同巡检使折海超、供奉官折惟信。九月，又入侵府州。十二月，继迁率万骑进围延安。

咸平三年（1000）二月，继迁令万子、米逋、西鼠等部3000余兵屯驻萧关（今宁夏固原东南），威胁原、渭（治今甘肃平凉）、灵、环等州。九月，宋知灵州李守恩、陕西转运使陈纬自庆州发兵，护送粮草赴灵州，途经瀚海时，遭继迁袭击。李守恩、陈纬阵亡，粮草悉为继迁所夺。契丹帝遂授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军节度使，唆使继迁攻取灵州。

咸平四年（1001）九月，继迁克陷清远军，进围灵州。宋廷以灵州乃兵家必争之地，一旦失守，则沿边诸州县皆不可保，乃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统兵6万抵御继迁入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亦向宋廷表示愿出

兵与宋军协力讨伐继迁。宋授他为盐州防御使兼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潘罗支即遣部下李万山率兵助讨，且致书知镇戎军李继和，约定出兵日期。十一月，宋诏告西蕃诸族，有能生擒继迁者，当授节度使，赐银、綵、茶6万；斩首来献者，授观察使。同时，宋又遣使招谕秦陇以西诸部族，请其发兵助攻。

然而宋廷的措施并未能阻止继迁的拓土展疆，尽管在宋廷恩威并重之下，一些部族或降或附，但继迁依旧用兵于灵州。咸平五年（1002）正月，继迁与灵州副都部署张凝交战，虽战败，仍出兵相继攻占河外五城，遂集结众多党项羌部族兵，大举进攻灵州。且派兵阻断粮运之途，使之孤军绝援。知灵州裴济刺破手指，血书告急奏章，恳请朝廷发兵急援。宋帝即令张煦等领兵救援。方行至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而灵武已为继迁所陷，裴济阵亡。继迁入据灵州后，遂改其为西平府。

六月，继迁复以2万骑围攻麟州。金明巡检李继周率军反击，未能解围。继迁占据水寨，切断麟州水源。麟州处境极其危急，知州卫居实乃出奇兵，自城上缒勇士而出，突击继迁军。一时间，城上鼓噪大作，矢石如注，继迁所部死伤万余人，被迫撤围离去。

继迁虽占灵州，然西凉府六谷部与宋廷结约，左右夹攻，使继迁难以应付，乃设计诱其叛附。继迁用兵买马，必经西凉府境，唯恐为六谷部所阻，遂遣人以铁箭诱六谷诸部叛宋，然所遣之人为潘罗支或杀或俘。

咸平六年（1003），潘罗支派咩逋族首领成逋急驰镇戎军，请求合兵进攻继迁。且集结6万骑兵，乞请会师宋军收复灵州。宋帝因此又授潘罗支为朔方军节度使、灵州西面都巡检使，准予与宋军约期出兵。

当初，继迁居夏州时，曾修复陵寝、宗庙，安抚部族，举族上下，人心安定。及据灵州，喜其山川地形，谋划迁都于此。其弟继瑗以为“今恢复未久，遽尔迁弃，恐扰众心”。而继迁则以为不然，他认为：“自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立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若缮城浚壕，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中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③遂令继瑗与牙将李知白等于西平府（今宁夏灵武西南）督立宗庙，设置官衙。且迁夏州宗族于此，建立为都城。

继迁虽授定难军节度使，然绥州、宥州实际仍为宋军所据。随继迁兵力日盛，宋廷亦感兵事不已，宋帝赵恒乃遣张崇贵、王涉与继迁议和，尽割定难军原辖之地予之，继迁因此占地益广。

此后，继迁屡发兵，欲东进扩疆，然皆为宋军所阻，乃回师西向。他调集诸族会于盐州（治今陕西定边），扬言分兵二路入攻环州（治今甘肃环县），而暗地移兵入攻西凉府。西凉府为吐蕃部族聚居之地，未及防备，城池即被袭破，知府丁惟清被俘杀害。继迁将城中百姓尽徙城外，而占据其府库，且改西凉府为西凉州。

继迁得知宋廷已授吐蕃六谷部首领潘罗支朔方军节度使等职，心中极为不悦，乃率大兵往攻。潘罗支见难以与之抗衡，遂向其诈降。张浦认为用兵当慎重，须审时度势而行。潘罗支未受挫折，却突然提出请降，其中必然有诈。当乘其阴谋未实现之时，将他擒获，这样吐蕃诸部族自会相继降伏。然而继迁不以为然，认为：“我得凉州，彼势已促，力屈而降，何诈之

有？况杀降不祥，尔勿疑，以阻向化之心。”④乃令张浦先返回西平府，自己留下安抚吐蕃诸部族，以消除后患。张浦见劝谏不成，泱泱而回。

潘罗支遂秘密联络、召集六谷蕃部，乘其不备，率万余人突袭继迁，于距灵州仅30里的三十九井处大败党项羌兵，继迁身中流矢，逃回西平府。

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继迁伤势日重，自度性命难保，而嘱咐德明必归附宋朝，且称：“一表不听，则再表，虽累百表，不得请，不止也。”⑤欲令以归附避免宋朝用兵入攻。又叮嘱张浦悉力辅佐德明，“负荷旧业”。嘱毕而卒，年42岁。其子德明继立为定难军留后。

注 释

①《宋史》卷五《太宗纪二》。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二。

③④《西夏书事》卷七。

⑤《宋史》卷二八二《向敏中传》。

西夏

德明归宋

宋景德元年（1004）正月，党项羌拓跋部首领、定难军节度使继迁因箭伤日重而亡，其子德明继立为定难军留后，时年23岁。

其年，宋廷与契丹订立"澶渊之盟"，两国间自征战转入和议。宋朝统治者对党项羌部族采取"姑务羁縻，以缓争战"①之策，对德明招抚。鄜延钤辖张崇贵移书德明，谕以朝廷恩信。但德明仍奉行继迁"联辽抗宋"之策，既遣使告哀于契丹，又遣使入契丹，上继迁遗物，而对宋廷的招抚极其蔑视。他遣使告张崇贵，因继迁未葬，难发表章，要求推延至表期结束再禀命。张崇贵请德明派大臣至边境议事，未有结果。

西凉府吐蕃六谷部首领、宋朔方军节度使、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潘罗支欲乘继迁死、德明初立之机，率部族及回鹘精兵，直抵贺兰山，扫除拓跋势力，遂遣其兄邦逋支入宋，奏请宋廷发大军援助。宋真宗赵恒令其率兵前进，而未对宋沿边军将进行认真的部署，致使此举未成。不久，潘罗支被党项羌部族所弑，吐蕃六谷部族亦散奔山谷之中。随后六谷部诸首领又议立

潘罗支弟厮铎督为头领。赵恒也以党项羌未平，遂授予厮铎督为朔方军节度使、押蕃落等使、西凉府六谷大首领，以藉其腹背夹攻拓跋氏。

景德二年（1005），德明继立已一年，未得册封，党项羌诸部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宁认为："国家疆宇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被害，蕃众惊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②德明遂遣赵保宁入契丹，请求契丹帝耶律隆绪给予册封。而宋帝赵恒亦借德明立足不稳之机，与之实现和议。因此召张崇贵入朝，面授机宜：授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颁赐金、帛、缗钱各4万，茶2万斤；给予与内地节度使等同的俸禄；允许党项羌人入内地自由贸易往来；解除青盐内销的禁令等五事，作为与德明媾和的条件。同时要求德明履行七事：归还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之地；限党项羌居住于平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地区；遣子弟入宋都汴梁（今河南开封）宿卫；归还所俘宋朝官吏；解散蕃、汉军队；释放被掳的宋朝边民；凡边境纠纷，需听从宋廷处置。德明对此表示接受，唯不同意归还灵州及遣子弟入宿京师二事。宋廷遂仍禁止夏地所产青盐入销内地，且不允许党项羌人入内地往来贸易。

六月，宋石隰部署耿全斌率兵入伏洛关招诱党项羌诸部族，内附者达数千人，禁之亦不得止。德明与左押衙张浦谋议，认为"先王遗命，应即表闻，缘降之太易，彼将轻我。今兵复西凉，国威已振"③，此当为请降之时。因而遣牙将王旻奉表入宋，请求归附宋朝。宋帝赵恒因此遣使持诏答复，且给予极其丰厚的赏赐。

因党项羌所处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契丹与宋廷皆欲争

取，以利用其战略地位，胁迫对方。德明因此得以周旋于两国之间，以图拓跋大业。七月，契丹遣北院枢密副使萧承德持节，封德明为西平王，复姓“李”，且赐车、旗、衣、币等物。九月，宋廷以德明媾和未定，命知永兴军府向敏中改任鄜延都部署兼知延州，使经略与党项羌诸事宜。而德明则始遣其都知兵马使白文寿入贡宋廷。十二月，德明又遣其教练使郝贵入贡于宋。其后德明又遣其兵马使贺永珍入宋贡马。欲以此缓和与宋廷的关系，以求其让步。

景德三年（1006），向敏中、张崇贵与德明议立誓约，久而未决。德明虽屡次遣使入贡，然对于宋廷所提媾和七事，却始终未予应允，反而数次上表，乞请宋帝先行册封，再徐议此事。宋帝赵恒急欲与之和议，息事宁人，遂下诏准许德明不归还灵州。继而又颁诏致向敏中等，召谕德明不必遣送子弟赴京师宿卫，只不得攻掠、劫持河西吐蕃、回鹘等诸部族入宋贡奉使臣及财物；如有纠纷，取朝廷决断，而其他诸事，悉去除之。然而仍不准党项羌人入宋境往来经商，亦不解除青盐之禁。

此后，德明与宋反复交涉，宋帝虽知其不肯遣子弟入宿京师，然亦“不阻其归顺之志”④。其时，党项羌诸部族多有投附宋廷者，德明恐人心涣散，遂于九月遣牙校刘仁勖入宋进誓表，表示归降。十月，宋授德明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国，充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封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户，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依内地节度使例颁赐俸禄⑤。又令抄录德明所进誓表，命渭州（治今甘肃平凉）派人持之，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晓谕吐蕃等

部族。

既而，赵恒又遣内侍左右班都知张崇贵、太常博士赵湘等充旌节官告使、副使，入夏州，赐德明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3万贯、茶2万斤。德明受宋封册，亦遣使入贡骆驼、马匹及土物。

宋以德明归附，诏令西边州、军，减少屯戍之兵，而分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鄜州（治今陕西富县），致使边境弛备。邠宁、环庆路都部署孙全照以为边防不可无备，而未量裁戍兵。宋帝竟认为："全照是好勇多言者，德明使已至阙，复何虑焉？"⑥甚至认为，若从孙全照所言，"恐致危疑"，完全沉溺于歌舞升平之中。

景德四年（1007），德明既与宋议和，遂遣使贡物不已。宋帝赵恒一反常例，对德明贡奉使臣倍加优待，甚至应允德明所请，许进奉使臣入宋时，购买所需之物。张崇贵虽为议和使臣，然亦感边备弛懈，而请求于沿边设置安抚使，以制约拓跋氏及党项羌诸部。然真宗不许，认为："西鄙宁静，别无经营，苟德明能守富贵，无虑朝廷失恩信也。增置官属，徒为张皇，不若委卿静制之。"⑦

德明自受宋廷册封，据有更为广阔的疆土，党项羌内部亦人心稳定，拓跋氏的统治得到极大的巩固。四月，德明于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建成二所驿馆，一曰承恩，一曰迎晖，以迎宿宋朝使臣。又将500里内的道路、桥梁修治整饬。凡有宋朝使臣至，德明必遣亲信重臣，出城郊迎。德明依仗与宋媾和，遂进一步向宋廷提出诸多请求。

七月，应德明之请，宋帝禁止保安军（今陕西志丹）修建

驿舍。于是宋境沿边城池除依和约当行修缮者外，其余则移徙寨栅，开复河道，城池寨堡无大小悉禁之。之后，又从德明之请，于保安军设置榷场，许蕃民于此与内地百姓交易。宋“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náo 挠）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师者，纵其为市”⑧。

德明通过与宋结好，不仅在经济上得到极大的利益，更得宋帝不断的加封，而于党项羌诸部中威望愈高。于是，他便进一步向西扩张。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德明遣夏州万子等军主领兵入攻西凉府。因见吐蕃六谷部势强兵盛，未敢与之交战，而直趋回鹘地。回鹘部族设伏于途。待万子兵至，先示弱不与之战，待其过，则奋起击之，党项兵大败，唯万子军主突围而逃，辎重、兵士皆为回鹘焚、杀。

大中祥符二年（1009）四月，德明因万子军主为回鹘所败，遂遣张浦率精骑2万入攻甘肃（治今甘肃张掖）。回鹘可汗夜落纥率部众坚守城池，奋勇抗击10余日。乘张浦不备，夜落纥遣部将瞿符守荣出兵，夜袭党项羌军营帐。张浦大败而还。

大中祥符三年（1010），德明以归附宋朝，换来边境的安宁。数年之中，宋军几无入境征战，德明所辖地区，得以平静。德明因此俨如君主，遂“役民夫数万，于鏊（ào 傲）子山（今陕西延川南）大起宫室，绵亘二十余里，颇极壮丽”⑨。随后，他再次用兵入攻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甘州地区部族，又入侵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劫掠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吐蕃部贡奉使。次年，再攻凉州（治今甘肃武威）。

德明屡次用兵，虽均未获胜，然其扩张之意已十分坚决。

大中祥符六年（1013），德明自夏州赴鏊子山，“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尽管德明欲建割据政权之迹日渐显露，然宋帝依旧加封不已，复加太保、宣德功臣，欲以此笼络之。

大中祥符九年（1016）五月，德明以党项羌5000骑兵入侵庆州（治今甘肃庆阳）。随后又上表，指责宋边将违约，招纳逃亡之众。宋帝赵恒依旧一味迁就，答诏抚慰。德明由是愈加肆无忌惮，称帝之心日盛。“每朝廷使至，则撤宫殿题榜，置于庑下，使輶（yóu 由）始出饯馆，已更赭袍，鸣鞭鞘鼓，吹导还宫，殊无畏避”⑩。

德明攻占凉州后，令部将苏守信戍守，有兵7000，马匹5000。吐蕃、回鹘诸部畏其势强，不敢轻举妄动。而回鹘入贡宋朝通道悉为所阻。及苏守信死，其子啰麻自领府事，部族不服。甘州可汗夜落纥遂派兵攻陷凉州，掳其族帐百余，斩首300级，夺马匹甚众。啰麻弃城而逃。自此，凉州归属回鹘。

宋天禧元年（1017）八月，啰麻逃入沙漠后，秘密派人潜入凉州城，约旧时蕃卒，以为内应，又请德明出兵赴援。回鹘联合吐蕃六谷部拒之，德明所部无功而还。德明见西凉未能攻克，辄与甘州构难。党项羌兵侦知回鹘贡奉使安信等将入朝，乃遣兵于途中劫掠。因安信提前出发，德明未得逞。不久，吐蕃遣使朝贡契丹。契丹帝耶律隆绪以吐蕃入贡道路迂远，而谕以假道夏州。吐蕃遣使来请，德明不许。

宋天禧四年（1020），德明复派兵侵犯延州境。宋鄜延路钤辖周文质请朝廷多发兵马，宋帝却以“边候兴兵，或至生事”⑪，只令周文质沿边侦察、巡逻，不许发兵反击。不久，

契丹帝以吐蕃假道未许，而不复朝贡契丹，归罪于德明，乃亲自统兵50万，直攻凉甸。德明因此率众抗击，败之。

十一月，德明认为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今宁夏灵武西南）为其障蔽，形势便利”。遂遣贺承珍监督役夫，北渡黄河筑城，“构门阙、宫殿及宗社、籍田”⑫，且改怀远为兴州，于此定都。

天禧五年（1021）七月，德明击退契丹军进犯后，积极备战，以防契丹再次来战。契丹帝见其进奉使许久未至，唯恐德明因此侵边，造成边患，遂欲与之讲和。乃遣金吾卫上将军萧孝诚持玉册、金印，授德明为尚书令，晋大夏国王。

宋天圣二年（1024）二月，德明于怀远镇西北百余里的省嵬山西南麓筑城，以控制居住于此的党项羌诸部，亦为兴州北部之屏障。

天圣四年（1026）二月，德明向宋廷请求于并州（治今山西太原）、代州（治今山西代县）设置和市，宋帝赵祯应允。自此，党项羌与北宋间的商人贸易，有河东二处和市，陕西二处榷场。

六月，甘州回鹘阿萨兰部背叛契丹。契丹帝耶律隆绪遣魏国公萧惠征集诸路兵进讨。德明闻讯，欲借此机报甘州回鹘攻陷凉州之仇，随即点集蕃众，派往甘州，与契丹军协同进击。萧惠连攻甘州三日，终不得克，而其部下阻卜等复叛。契丹军中大乱，萧惠急令退兵，德明所部亦随之回师。

天圣五年（1027）二月，德明遣都知兵马使白文美入宋，以蕃部逃入宋境之事告之宋廷。宋帝因此下诏，令鄜延路部署司据数遣还。然而五月，德明又派兵进攻宋金明寨，为守将李士彬所击，败退。

天圣六年（1028），德明在位已久，权势日渐显赫，诸部无不慑服。乃再度举兵，极力扩拓疆土。六月，德明遣其子元昊领兵入攻河西。元昊急引兵奔袭甘州。甘州回鹘仓促应战，城池陷落，可汗夜落隔兵败自焚，其妻、女皆为元昊所俘。元昊置兵戍守，自己率军返回。未几，德明再度出兵，一举攻占西凉府。德明势力因此伸入河西地区。

在兴兵扩疆的同时，德明进一步完善政权建设。他以克陷甘州之功，而立元昊为皇太子，立元昊生母卫慕氏为后。为了继续结好契丹，以牵制宋廷，使自己割据一方的举措得以顺利实施，次年二月，德明遣使为元昊向契丹王朝请婚，得到契丹帝应允。

德明势力的壮大，使河西地区的回鹘等部族深感不安。自德明占据西凉府、甘州之后，河西回鹘入宋之途尽为阻隔，失去与宋廷的联系。天圣八年（1030），瓜州（治今甘肃安西西）回鹘王贤顺率所部千余骑向德明请降。河西地区悉为德明所据。

天圣九年（1031）十月，契丹以兴平公主下嫁元昊，且契丹帝耶律宗真授予元昊为夏国公、驸马都尉。

是年冬，德明病危，临终前，再三叮嘱元昊："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⑬不久病逝，年50岁。德明一生，既臣于契丹，又归附于宋，以此换来境内的安宁，得以扩土展疆，使政权建设初具规模，然未及称帝即去世。其子元昊继立。宋廷闻讯，赵祯辍朝三日，又于宫中为德明举哀，且赠其为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以尚书度支员外郎朱昌符为祭奠使，六宅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冯仁俊为副使，携所赐之物，前往祭奠。

注 释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

②③《西夏书事》卷八。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三。

⑤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四、《宋史·真宗本纪》、《宋史·夏国传上》。

⑥《宋史》卷二五三《孙全照传》。

⑦《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五。

⑧《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⑨《西夏书事》卷九。

⑩田况《儒林公议》卷上。

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五。

⑫《西夏书事》卷一〇。

⑬《宋史》卷四八五《夏国传上》。

西夏

元昊立国

宋天圣九年（1031），党项羌拓跋部首领德明病故，其子元昊袭位。元昊对其父臣宋极为不满，认为："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①

宋明道元年（辽重熙元年，1032）十一月，契丹派遣使臣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宋则遣工部郎中杨告为旌节官告使，礼宾副使朱允中副之，授予元昊为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等州管内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上柱国、西平王，食邑六千户，食实封一千户。仍赐推忠保顺、亮节翊戴功臣。契丹、北宋此举，皆旨在拉拢以元昊为首的拓跋贵族，以便在与对方的抗争中，充分利用拓跋氏的战略地位。然而元昊对此毫不在意，宋朝使臣到来，他竟"迁延遥立"，后经屡次催促，方至使臣面前受诏。而拜受之后，又认为"先王大错，有国如此，而乃臣属于人"②。之后设摆宴席，元昊竟不肯坐于宾位。

其后，他又认为故唐和宋朝所赐李姓、赵姓不足以显示其尊贵，乃自号"嵬名"氏，称"吾祖"，即为可汗之意。于是，

属族悉改称嵬名。

明道二年（1033），元昊袭位后，遂加紧称帝建国的步伐。他招纳亡命，申明号令，以兵法约束诸部。因避其父德明名讳，改宋廷明道年号为显道，颁行于诸部族。之后，元昊又欲革除党项羌旧俗，先自秃己发。三月，下秃发令于诸部，凡三日不从，许众人共杀之。于是部众争相秃发，耳垂重环。

五月，元昊升兴州（治今宁夏银川）为府，更名为“兴庆”。且于此广筑宫城，营造殿宇，其名号悉仿内地朝廷宫殿名称。又始建文武官制，仍依宋制，置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苑、磨勘司、文思院等机构。自中书令、枢密使、宰相、御中大夫、侍中、太尉以下，命蕃、汉人分任。而专授予蕃人之职有宁令、谟宁令、丁卢、丁弩、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皆以蕃号为称。又制定文、武官员及百姓的服式，以示区别。

元昊虽然仍旧贡奉契丹与北宋，但其车服、仪卫，却如同皇帝之制。明年正月，元昊下谕，改显道三年为开运元年。之后，又改为广运元年。是月，元昊发兵攻击府州（治今陕西府谷）。七月，又掳掠环庆路（治今甘肃庆阳）。十月，元昊以宋庆州柔远寨蕃部巡检嵬逋攻破党项羌后桥诸堡为名，称兵报仇，复举兵入攻庆州。于龙马岭击败缘边都巡检杨遵、柔远寨监押卢训所部，又于节义峰再败环庆路都监齐宗矩、走马承受赵德宣、宁州都监王文所率援军，生擒齐宗矩。

元昊权柄日重，亦引起党项羌内部的权力之争。其母族卫慕部人山喜欲谋杀元昊，事泄元昊以毒药杀其母卫慕氏，又将山喜一族沉杀于黄河。又复立额藏渠怀氏为太后。后来，其妃

卫慕氏亦责备元昊弑母后，元昊则尽杀其族及其生子。

元昊广运二年（1035），宋帝赵祯遣内侍省都知冯从顺至兴州，进授元昊中书令。元昊益发骄横。宋朝“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滞留而不迎；或佯为遽而见迫；或负扆而对；或欲专席而居。虽相见之初，暂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后，便具帝者之仪”③。

七月，元昊再次发兵征战，令首领讹遇等率兵入犯环庆路。又遣其令公苏奴儿将兵25000人进击吐蕃唃厮啰部，结果全军覆灭，苏奴儿被擒。元昊闻讯，乃亲自率兵进攻吐蕃猫牛城，围攻一月仍未攻陷。元昊遂假称和议，诱使开城，率众突入城中，杀戮纵掠。既而，又攻吐蕃青唐、安二、宗哥、带星岭诸城，其势不可一世。唃厮啰部将安子罗领兵阻绝党项羌兵归路，元昊与之昼夜激战200余日，方击败安子罗所部，但元昊所部渡宗哥河溺亡及饥饿而亡者过半。待其兵临河湟时，唃厮啰知自已众寡难敌，而坚守鄯州（治今青海乐都）不出。又派人秘密探听元昊虚实。元昊已渡河，便令人于黄河河道上插旗帜以示其浅。唃厮啰得知，便派人暗地将旗帜迁徙至水深之处。及与之大战，元昊溃败而逃，沿旗帜渡河，一时间，遭溺死者十之八九，被吐蕃兵所俘者甚众。

元昊广运三年（1036），元昊于境内颁行新的文字。又改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十二月，元昊再度发兵西攻回鹘，一举占据瓜、沙州（治今甘肃敦煌西）、肃州（治今甘肃酒泉）三州，尽据河西之地。自此，元昊据有夏（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银（治今陕西米脂西北）、绥（治今陕西绥德）、宥（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静（治今陕西米脂北）、灵（治今宁夏灵武西南）、盐（治今陕西定边）、会（治今甘肃靖远南）、

胜（治今内蒙古准格尔旗）、甘（治今甘肃张掖）、凉（治今甘肃武威）、瓜（治今甘肃安西西）、沙、肃等诸州，而又以石堡、洪门诸镇寨升置为洪（治今陕西靖边南）、定（治今宁夏平罗东南）、威（治今宁夏同心）、怀（治今宁夏银川东南）等四州。又以肃州为蕃和郡，甘州为镇夷郡，置宣化府。其疆域东抵黄河，西达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南临萧关（今宁夏固原西南），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

元昊于境内部署军队，依贺兰山为屏障，驻兵设险。以7万兵护卫兴庆府（今宁夏银川），5万兵镇守西平府（今宁夏灵武），5万兵驻守贺兰山。左厢宥州路派驻5万兵，以防备宋鄜（治今陕西富县）、延（治今陕西延安）、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等州。右厢甘州路派驻3万兵，以防备吐蕃、回鹘等部族。自黄河南洪州（治今陕西靖边西南）、盐州（治今陕西定边）至天都、惟精山一线，派驻5万兵，以防备宋环（治今甘肃环县）、庆（治今甘肃庆阳）等州和镇戎军（今宁夏固原）。自黄河北至午腊蒻（ruò若）山，派驻7万兵，以防备契丹。

又制定兵制。年满15岁以上的男子为丁，凡二丁则取一人为正军，另四丁抽二人为随军杂役，称为“抄”。置炮手200人，称为“泼喜”，可立旋风炮于骆驼鞍，纵石如拳。得汉人勇者为前军，号“撞令郎”。境内总兵50余万，另有“擒生军”10万。宫廷禁军称“御围内六班”，有75000兵，分三番宿卫。用兵时多设虚寨，而以伏兵包围进击之。另有铁骑军3000人，乘善马重甲，用钩索串联，虽死马上而不坠落。战则先出突阵，阵乱则冲击之。

又立军名，分境内为左、右厢，立十二监军司：以左厢神

勇监军司驻守天都山，以祥祐监军司驻守石州（治今米脂西北），以嘉宁监军司驻守宥州，以静塞监军司驻守韦州（治今宁夏同心东北），以西寿保泰监军司驻守柔狼山北（今甘肃靖远北），以和南监军司驻守卓罗城（今甘肃永登南），以右厢朝顺监军司驻守克夷门（今宁夏银川西北），以甘肃监军司驻守甘州，以西平监军司驻守瓜州，以黑水镇燕监军司驻守兀剌海城（今甘肃金塔东北），以白马强镇监军司驻守盐州，以黑山威福监军司驻守汉居延故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南）。每一监军司设都统军、副统军、监军使各一员，以贵戚豪右充任。其下设指挥使、教练使、左右侍禁官等数十员，则不分党项羌、汉人，均可充任。

是年，元昊欲南侵，恐吐蕃六谷部首领唃厮啰断其后，乃举兵进攻兰州吐蕃诸部。又以重赂离间唃厮啰二子瞎毡、磨角毡与其父的关系。唃厮啰由是势衰，遂西徙青唐城（今青海西宁）。

大庆二年（1037）七月，元昊更定礼乐：裁九拜之礼为三拜，革五音之乐为一音。十一月，立蕃字院、汉字院。以汉字院习正楷、草书，蕃字院兼习篆书、隶书。两院秩同唐、宋翰林学士院。汉字院掌管与宋朝的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注西夏文。蕃字院则掌管与吐蕃、回鹘及张掖（今属甘肃）、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等地部族的一切往来文书，中书西夏文，旁注各族文字。凡行文，西夏文一律居右，故以蕃字院为重。

大庆三年（1038）十月，元昊召集党项羌诸部族首领，约定发兵入攻宋鄜延路，分兵三路，自德靖、塞门、赤城路同时入攻，凡有劝谏者则杀之。枢密使山遇数谏元昊罢兵，元昊置之不理。山遇恐因此被诛，遂举家赴延州请降，且告之元昊将

建国称帝。宋知延州郭劝不敢收降，入奏朝廷。宋帝赵祯诏令遣还，山遇拒不返回，郭劝即令监押官韩周押解山遇等送交元昊。元昊随即召集骑兵，将他射杀，并戮其族。自是，党项羌人无人再敢归附宋朝。

不久，元昊采纳谋臣杨守素建议，筑坛受册，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又追谥其祖父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其父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

元昊称帝，是为西夏景宗。随后便设官任职，以野利仁荣、嵬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张文显分任中书令、枢密使、侍中等官；以杨守素等人分任官计、受纳诸司长官；以野利旺荣等人主管兵马，分驻于十二监军司。

元昊称帝建国，引起宋廷的震惊。宋帝赵祯随即下诏陕西、河东，关闭所有与西夏交易的互市、榷场。又下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④"且以夏竦为泾原、秦凤安抚使，范雍为鄜延、环庆安抚使，经略夏州。又遣左侍禁鲁经持诏，授唃厮啰河西节度使衔，使之出击元昊。但这一切丝毫未能制约元昊。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宋宝元二年，辽重熙八年，1039）正月，元昊遣使入宋，表请称帝改元。宋知枢密院事王德用等请求领兵讨伐元昊，宋帝不许。

五月，元昊制定朝仪，于正朔朝贺，杂用唐、宋典制。官属入朝，以六日为"常参"，九日为"超居"。又建立蕃学，以野利仁荣主管，用西夏文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著作，于党项羌、汉人官僚子弟中选俊秀者入学。待其学成，出题试问，量授官职。且令诸州、各官署均设置蕃学，

设教授传习西夏文及学业。

六月，宋帝赵祯以元昊“背惠反常，毁忠蔑言，僭举国号，扇惑蕃渠”⑤而下诏削夺所赐其姓、官爵。关闭与西夏所有的沿边互市，且于边境张榜，招募能生擒或斩杀元昊者，事成之后，即授定难军节度使。西夏蕃、汉官员如能率族归顺，“等第推恩”。同时，又于宋夏边境调动、集结军队，进行军事部署。但又唯恐引起契丹王朝的疑虑，而移文至契丹帝，告之元昊叛立之事。

尽管宋廷采取种种制裁措施，元昊依然毫不理会，继续于国内完善政权建设。他以中书令不能统理朝政庶务，而仿宋制，设置尚书令，负责处理百官诸官署的日常事务。又以宋置24司为基础，于朝廷设立16司，负责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曹事务。在逐渐完备官制的同时，元昊又用兵宋边，对宋廷施加压力，以此要挟之。十一月，元昊出兵相继进攻宋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南安承平寨、楚竿城等。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正月，元昊又设计一举攻陷宋边重镇金明寨，随即分兵攻掠延州安远、永平诸寨，从而扫清入攻延州的通道。

元昊正是于东征西战中，建立起以党项羌为主体的西夏政权，并在与北宋的抗争中，得以巩固和发展，从此，夏、宋之间关系紧张，征战不已，亦给宋廷造成严重的边患。

注 释

①《宋史》卷四八五《西夏纪上》。

②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杂志》。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四。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

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

西夏

夏宋战和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举发兵，入攻宋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境。知延州范雍急忙向宋廷请求派兵增援。未几，元昊又遣其牙校贺真向范雍表示愿意改过归顺，范雍不复设防。金明寨为延州重镇，扼守要冲，且守将、都监李士彬有兵近10万，是员勇将，被众人称为“铁壁相公”。元昊执意拔除金明寨，便设计令其民众向李士彬诈降。李士彬遂起疑心，请范雍将来降的西夏民众迁移到陕西南部，范雍非但不同意，反而令这些西夏降众归李士彬统领，又给予降众金帛，以为赏赐。于是，降者终日不绝，纷纷进入诸寨。元昊下令，凡诸将与李士彬相遇，一律不战而逃。又声称“吾士卒闻铁壁相公，胆坠于地”。李士彬由是渐生骄傲，加之其对部下严苛，多有怨愤者，元昊遂秘密用重赂收买之。待元昊举兵来攻，内外策应，俘李士彬，其子李怀宝力战身亡，金明寨失守。随后，元昊又分兵攻掠安远、永平诸寨，再进围延州。

范雍立即召令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与鄜延路副都

部署石元孙合兵救援。两军行至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平素轻敌的刘平令骑兵先行，步兵随后，昼夜兼程。直至入夜，至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陷入西夏军的重围之中，宋军仓促应战。在西夏军的猛烈进攻下，宋军稍稍后退。走在军阵最后的鄜延都监黄德和见状竟率领所部逃去，宋军随即溃败。

刘平忙令军校用军杖、宝剑截留溃逃军卒，仅得千余人，退守西南山下，立栅为营，抵抗西夏兵的进攻。双方又激战数日，元昊派兵于宋营前挑战，又派兵从四面进击，将宋军断为两部，刘平、石元孙兵败被擒。此战，宋军损失惨重，巡检郭遵等将领阵亡。

元昊获三川口大捷后，集兵于延州城下。延州城仅有宋军数百人。及刘平、石元孙兵败被俘，范雍更惊恐万状，欲遣都监李康伯请求元昊缓兵，遭到僚属的反对。守城官兵坚守七日，适逢天降大雪，西夏兵方解围而去。

元昊大举入攻宋境，宋廷再度大震。宋帝赵祯诏令陕西转运使明镐招募强壮男丁充军，以加强边防。又诏吐蕃首领唃厮啰出兵进攻西夏。甚至令潼关（今陕西潼关北）设兵防守。正当宋廷部署防御之时，元昊又挥师攻陷塞门寨，杀宋兵马监押王继元，俘虏寨主、内殿承制高延德，尽获粮草、器甲。又乘胜进围安远寨，攻占后，再分兵攻取栲栳、黑水等寨，焚掠五龙川一带的宋边民户。

宋廷为加强陕西沿边的防御力量，遂调整陕西将帅，以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韩琦、范仲淹为副使。又令韩琦、范仲淹分负措置军事之事，韩琦主泾原路，范仲淹主鄜延路。范仲淹令延州都监周美重修金明寨（今陕西延安西北）。元昊遣数万西夏军再攻此寨，又于延安城北 30 里处布阵。周美率

2000兵奋勇抗击，战至日暮，仍不见宋军援兵赶至，便移军山北，多设疑兵。西夏军疑是援军，随即撤去。不久，西夏再派兵进攻金明寨，复为周美击退。

与此同时，元昊又令西夏军入攻宋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击败守将刘继宗、李纬所率5000名兵士。宋泾原路总管刘谦乘西夏出兵进攻镇戎军之机，率兵深入西夏境内，败党项部族兵。宋将王珪于镇戎军郊野以寡击众，大败西夏军。

七月，宋廷欲出兵征讨西夏，又恐元昊与契丹勾结，夹困宋朝，遂遣使入契丹，告其将发兵入攻西夏。八月，又遣尚书屯田员外郎刘涣，前去诏谕吐蕃首领唃厮啰出兵，助宋军进攻西夏。

范仲淹见延州诸寨相继失守，遂向宋廷请求治理延州。宋帝赵祯诏以范仲淹兼知延州。范仲淹赴任，大阅州兵，得18000人，分为六将，每将3000人。分部进行教练，日夜操训。每遇西夏兵入侵，视其众寡，派兵抵御。西夏兵见范仲淹治兵有术，防备严密，相互告诫："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①

九月，西夏军入攻三川寨，宋都巡检杨保吉战败阵亡。西夏军又进围师子、定川等寨，攻陷干沟、干河、赵福三堡。宋环庆路兵马副都总管任福与北路都巡检使范恪，自华池凤川镇声音巡边，召诸将出兵牵制西夏兵力。任福与范恪入夏境，攻破白豹城，大败西夏军。范仲淹也派殿直狄青等将，领兵于芦子平大破西夏兵。

自安远、塞门等寨陷落，宋边东路无御敌屏障，西夏军入侵宋境益发频繁。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军将种世衡向宋廷建言，请求于延州东北原宽州故城构筑新城。宋帝赵祯遂令种世

衡督工筑城。元昊闻讯，立即派兵与之争夺。种世衡指挥宋兵一面与西夏军交战，一面构建城池，终于筑成。宋帝赐名为“青涧”。狄青部将张王亦筑青涧招安寨。

元昊见宋军筑青涧城，又得知宋都监朱吉驻扎延安寨，防守东路；指挥使王信、张建侯、黄世宁驻扎保安军，扼守中路；巡检使刘政驻扎德靖寨，控制西路；指挥使张宗武等率兵分别屯守诸要害之地，密布兵马，声势日盛。乃于西夏绥州（治今陕西绥德）界外修筑遮鹿、要册两寨，令狗儿厢主驻守。范仲淹遣兵马监押马怀德率所部袭击，狗儿厢主督兵出战，被马怀德射杀，西夏戍兵大败，损失惨重。宋并代州钤辖王凯又入西夏境，转战 40 里，大败西夏军，缴获牛、马无计。宋廷再命范仲淹用金帛招募敢死兵，深入夏境探听军情。

十月，范仲淹探知西夏于夏州（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设置冶铁务，以当地所产铁锻造甲胄，坚滑光莹，非劲弩可以射透。乃欲谋取之，遂遣部署葛怀敏与鄜府都监朱观，率兵分 6 路进攻夏州。朱观等将领兵入西夏境，连破 10 余寨及族帐 20 余处，进抵洪州（治今陕西靖边南）。西夏军结寨顽强抵抗，元昊令横山诸部族，占据险要之处，派兵自宋军背后出击。葛怀敏等力战不胜，只得退兵。此后，宋沿边军将多入西夏边境，进击沿边诸堡寨，西夏军迎击，多战败失利。

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宋庆历元年，辽重熙十年，1041）正月，宋帝赵祯诏令鄜延（治今陕西延安）、泾原（治今甘肃平凉）两路同出兵，入攻西夏。然韩琦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进击；范仲淹则力主先巩固防御，审慎用兵。两人意见相左，宋帝不知所措，宋军出击之事，遂搁置不行。

二月，元昊遣使至延州请和。韩琦知其中有诈，命诸将严

加戒备，自已率兵至高平。不久，元昊果真派兵进攻渭州（治今甘肃平凉）。韩琦立即迅速直趋镇戎军，将全部守军及招募的敢勇之士，约数万人，交大将任福统领迎击西夏军。又以耿傅为参军事，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各领所部，受任福节制。任福率数千轻骑直奔怀远城（今甘肃平凉北）捺龙川，遇见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刘肃，与西夏军战于张家堡南，斩杀西夏兵数百。西夏军丢弃马、羊、骆驼，佯作北逃。武英见状，认为前面必有伏兵，众将不听。桑怿领骑兵紧追西夏兵，任福紧随其后，至傍晚，桑怿、任福合军，屯驻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北）；朱观与武英合兵，驻扎于龙落川，与好水川相距 5 里，约定翌日于川口会兵进击，不使西夏军逃脱一兵一卒。然而却不知此时已中元昊设下的埋伏。且宋军进兵快捷，粮草供给不济，兵士及马匹已有 3 日缺粮断草。

元昊亲自率领 10 万精兵，设伏于好水川口，令兵士将百余只带哨家鸽装入泥盒，放置于路旁。次日凌晨，任福与桑怿率兵沿好水川继续西行，出六盘山下，行至距羊牧隆城（今宁夏隆德西北）5 里之处。先锋桑怿见路旁泥盒，封闭紧密，内有动静，未敢碰动。任福到后，即令兵士开启泥盒，百余家鸽鸣哨而起，盘旋于宋军上方。元昊遂令西夏军循鸽哨声，四面合围宋军。桑怿率领前军奋勇冲杀，自清晨激战至中午。元昊于阵中挥旗指挥西夏兵左右夹击，宋军大败，桑怿、刘肃及任福子任怀亮，皆阵亡。小校刘进劝任福撤退，任福不听，乃率军顽强抗击，力战而亡。

朱观、武英合兵进至能家川，亦与西夏军遭遇，王珪率 4500 人赶来助阵。宋军与西夏军自中午战至下午，西夏援兵

纷纷赶来，宋军渐不能支，偏军步卒先溃败，余部随之败逃，王珪、武英、渭州都监赵津及参军耿傅、队将李简、都监李禹亨、刘钧相继战死。唯有朱观率千余人突出重围。

好水川之战，宋军惨败，数十员大将阵亡，万余兵士战死。宋廷为之大惊，宋帝赵祯甚至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守边防，不得出兵进入西夏境，如遇西夏军入攻，也只准迎击，逐出境外。自此，宋廷对西夏转攻为守，不敢轻易用兵。并因此夺韩琦一官，范仲淹则改任知庆州。

元昊获三川口、好水川两战大捷，愈发侵边不已。七月，再发兵入攻宋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二州，与宋麟府路巡检使张岊于深柏堰遭遇。张岊分兵追击，西夏兵被斩百余人后，败退。既而，元昊又进围麟州，宋都监王凯等坚守，激战长达31日。西夏军屡攻不下，只得暂且撤兵解围。不久，元昊得知王凯与张岊护送粮草前往麟、府，乃令西夏军主力出击，于青眉浪截击宋军。两军交战后，西夏军即将王凯与张岊两部隔断，先分兵夹击王凯所部。王凯指挥兵士奋勇反击，又与张岊合兵一处。张岊率所部拼死杀敌，不幸被流矢穿透双颊，张岊忍痛拔出流矢，继续顽强厮杀。西夏军终难挡宋军的猛烈反击，败退而去。

八月，原已归附宋朝的党项羌乜罗部，在其首领、宋殿侍乜罗的率领下，叛宋附西夏。元昊即以其为向导，转攻府州。府州城既坚固又险要，城东南有水门，为悬崖峭壁，下临黄河。西夏兵沿悬壁小径鱼贯而上，城上宋兵矢石乱下。西夏兵无法登攀，只得退去。一日，西夏军进至府州城西南隅，这里城墙低矮，众兵士正欲登城，被守城宋兵察觉。张岊立刻赶到，大声呼喊宋兵杀敌，西夏兵被迫稍稍后撤，既而又攻城。

张岊被飞石击中右目下，身上亦受伤3处，仍昼夜督战。西夏将兵见这里不能破城，再转攻城北，宋兵奋力抗击，杀死重伤西夏兵甚众。元昊见强攻不下，得知城中无井，悉靠取黄河水饮用，遂令军士断其汲水之道。城中断水，张岊乃与通判张旨乘深夜开城门，率军出击，西夏军仓促应战，稍后撤。张岊令宋军左右迎敌，让城中百姓自中间下河汲水，又命用泥覆盖草垛。元昊望见宋军用水和泥，苫罩草垛，以为城中用水有余，城池难以攻破，只得领兵退去，府州之围得以解除。

麟、府两州未能攻陷，元昊即领兵转攻金明，破宁远寨，斩杀寨主王世亶、兵马都监王显。进而再攻丰州（治今陕西府谷西北），知州王余庆、兵马监押孙吉虽拼死抵抗，终因孤城无援，而被攻陷，二人均死于阵中。元昊据得丰州，遂屯兵扼守要害，以断绝麟、府二州饷道。麟、府州因此再度告危，宋廷朝臣认为二州远在边塞，建议丢弃黄河以外诸州县。宋并代钤辖张亢奉诏前往麟、府州，与张岊合兵，决心保卫二州。张亢遂领兵屡败西夏军，方转危为安。

宋将高继宣率兵渡黄河屯驻于府谷（今属陕西），不断派兵于黑夜骚扰西夏军营。又招募2000余人，组成“清远军”，命偏将王凯统领。王凯领兵行至三松岭，遭数万西夏兵包围，遂指挥“清远军”奋起反击，斩首千余级。西夏兵不能阻止而仓皇败退，以至于相互践踏而亡者不可胜计。

十月，宋廷罢免夏竦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之职，又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4路，各置经略安抚招讨使，以知秦州韩琦、知渭州王沿、知庆州范仲淹、知延州庞籍分别充任本路之职。范仲淹、庞籍各领本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后，一改分地谨守，不敢拒战，而使西夏军往来如履无人之境的局面，复

遍布探马、侦候，一旦有西夏兵入境，立即会合诸部兵，进行迎击。庞籍以金明寨西北浑州川水土肥沃，而位于川尾的桥子谷又为西夏边境的险要关隘，遂令部将狄青于谷旁修筑招安寨。元昊闻讯，立即派兵3万前往争夺，指挥骑兵于寨前挑战。宋六班散直张玉手持铁简迎战，西夏兵不敌，纷纷避退。此后，西夏兴庆符（今宁夏银川）、灵州（治今宁夏灵武）东部边境驻军，不能越境东侵。

元昊自兴兵攻宋以来，虽屡屡获胜，然军中伤亡相半，兵士困于征战，国中财力匮乏。宋廷欲乘机与西夏缓和局势，宋帝赵祯以赦书敕边吏，向西夏通报朝廷之意。知延州庞籍令知保安军刘拯、知渭州王沿、总管葛怀敏派僧人法淳持书，分别招诱元昊心腹，以分化瓦解西夏统治集团。

元昊处境日蹙，遂令兵卒据守建宁寨。建宁寨位于麟、府二州之间，以险要著称，元昊据此，断绝二州饷运。张亢奉命押运朝廷赏饷自府州至麟州，元昊令西夏军抄掠，未能得手，乃集聚数万兵马，屯驻于柏子寨，欲待张亢返回时截击之，张亢仅率3000兵士，见此情景激励众人："若等已陷死地，前斗则生，不然，为贼所屠无遗也。"② 适逢大风骤起，张亢指挥所部顺风势出击，斩杀、俘虏西夏兵无数。既而转战至建宁寨，寨兵弃寨而逃，张亢遂修复寨垒。元昊令兵士争夺，张亢便命张岊伏短兵、强弩手数千于山后，又以虎翼军迎击。西夏兵搏战许久，宋伏兵突然发起猛攻，西夏军当即溃败。元昊见进兵不得，下令撤回诸路入攻宋境兵马。宋麟、府二州饷道自此始通。

宋招诱西贡中书令野利旺荣不得，知环州、环庆路兵马钤辖种世衡遂重用僧人王光信入西夏，离间元昊与野利旺荣，后

因泄密未成。诱降、离间不成，夏、宋边境冲突再次加剧。宋将范恪会集诸道兵，入攻西夏十二盘及咄当迷子寨，攻陷之。范仲淹亦令其子范纯祐与蕃将赵明于庆州（治今甘肃庆阳）西北马铺寨筑大顺城，以扼制西夏边境重镇白豹、金汤等寨。又于环州（治今陕西环县）西、镇戎军东筑细腰、葫芦诸寨，以联系二地。宋军马都监周美与西夏军战于无定河，大胜，又兵至绥州（治今陕西绥德），劫掠而去。

闰九月，元昊声言将入攻镇戎军，泾原路经略安抚使、知渭州王沿命泾原路马步军副都总管葛怀敏统领诸寨兵，前往援应，且告诫他切忌深入夏境，可设伏诱敌。不久，元昊于天都山点集左、右厢兵 10 万，分作东、西两路，一路出刘璠堡（今宁夏海原西南），一路出彭阳城（今宁夏彭阳），合攻镇戎军。

葛怀敏会集诸寨兵马，乃遣瓦亭寨都监许思纯、环庆都监刘贺率 5000 蕃兵为左翼，天圣寨主张贵为殿后。随后兵进五谷口，知镇戎军曹英、泾原路都监赵珣、西路都巡检李良臣、孟渊皆领兵前来会师，葛怀敏遂令沿边都巡检使向进、刘湛为先锋，赵瑜为后援，继续进发。元昊以诱敌深入之计，移兵于界壕之外。葛怀敏全然不顾王沿的告诫，命诸将分四路出界壕，进击西夏军。元昊遂令西夏兵引宋军至定川寨（今宁夏固原东北），随即断其归路，重重包围。又断定川寨上游水泉，以饥渴夹困宋军。葛怀敏率领中军，屯守寨门东侧，曹英等守卫东北隅。西夏军先以精兵猛攻中军，遭击退后，又转攻曹英所部。正在此时，有黑风自东北而起，宋军目不能睁，阵营大乱，西夏兵趁风势攀城而上，曹英面中流矢，跌落城壕之中。葛怀敏所部见西夏兵入城，惊吓得四下奔逃。葛怀敏不能制

止，反被散兵拥挤倒地，遭践踏几死去。其后，他与赵珣等将奋力拼杀，才使西夏军稍稍后退。然此时，宋兵已多无斗志。

黄昏时分，西夏兵持火炬紧围寨城。葛怀敏知中元昊之计，乃于深夜召集诸将商议计策，决定结阵移师镇戎军。凌晨，宋军出发，向东南驰行2里余，至长城壕，发觉路已断，而西夏兵自四面团团围困，猛烈攻击。葛怀敏及曹英等16员大将皆被斩杀，余部9400余人、马600余匹，悉为西夏军所俘获。

定川寨之役大捷之后，西夏军遂乘胜越平凉（今属甘肃），长驱直入，横扫渭州（治今甘肃平凉）境内外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

夏、宋间连年战争，给双方均造成巨大损失。宋廷受辽与西夏的夹困，边患严重，而与西夏的征战，多次受挫。西夏则立国未久，国内局势尚未稳定，国势亦不强盛，且部族多有叛附于宋者，亦难以再连年征战。在此情形下，夏、宋均有议和，以缓征战之意。宋廷放还西夏教练使李文贵，以通达“若诚能悔过从善，称臣归款，以息彼此之民，朝廷所以待汝主者，礼教必优于前”③之意。元昊亦将僧人王嵩放还延州，以回复议和之意。然因元昊坚持称帝，双方往复计议，久而未决。

自定川之役后，宋廷再度治理边防，以扼制西夏军的入攻与侵扰。种世衡又设计，再次离间元昊与野利旺荣，终使元昊诛之，且灭其家。随后，种世衡又诱得西酋苏吃曩，进一步离间元昊与野利旺荣弟、有“天都大王”之称的骁勇之将野利遇乞。元昊中计，遂夺其兵，赐之死。自此，西夏君臣相猜，朝廷内部人心惶恐。十一月，宋帝应范仲淹之请，复置陕西四路

都部署，经略、安抚兼缘边招讨使，命韩琦、范仲淹、庞籍分领之，置司泾州（治今甘肃泾川）。

天授礼法延祚六年（宋庆历三年，契丹重熙十二年，1043）正月，宋改渭州笼竿城为德顺军（今甘肃静宁东北）。韩琦、范仲淹等于鄜延、环庆、泾原诸路，各选精壮兵士，掠取横山，招纳部族，修筑城堡，更番出兵，以侵扰西夏。元昊既杀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方知中计。又国饥民怨，屡为宋军扼制，势难支撑，遂决定向宋廷请和。乃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李文贵至延州议和，且上书自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④ 贺从勖又告之契丹使臣，请契丹代为向宋廷转达议和通好之意。二月，契丹即以元昊罢兵，遣使入宋，请与西夏通好。

四月，宋帝赵祯遣保安军判官邵良佐及张士元、张子奭、王正伦等入西夏，许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岁赐绢 10 万匹，茶 3 万斤。然而，元昊对此极不满足，而提出 11 点议和要求。双方因此使臣频繁往来，反复交涉商议。其间，元昊数遣使臣入宋，以通市青盐、纳盐易茶、增岁币 30 万为条件，以换取称臣议和。宋廷对此议而未决。

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宋庆历四年，契丹重熙十三年，1044），契丹帝耶律宗真因境内党项部等叛逃西夏，而发兵征讨西夏。元昊再度陷入困境，乃遣使入宋上誓表。八月，契丹帝欲亲征西夏，令元昊尤为紧张，再遣使入宋请求册封。十二月，经过一年多的协商，宋廷与元昊终于议和。宋帝乃遣尚书祠部员外郎张子奭为册礼使，东头供奉官、阁门祗候张士元为副使，持使节入西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双方议定：西夏向宋称臣。宋岁赐西夏银 5 万两、绢 13 万匹、茶 2 万斤，是为

“净赐”；另有“回赐”银2万两、银器2000两、绢2万匹、衣1000匹、杂帛2000匹、茶1万斤。西夏与宋议和之后，虽无大规模的征战，然边境争端仍时有发生。

注　释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六。

②《宋史》卷三二四《张亢传》。

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八。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九。

西夏

没藏氏专权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宋庆历七年，1047）三月，西夏元昊任用没藏讹庞为国相，没藏讹庞为权臣野利遇乞妻没藏氏之兄。自野利遇乞与其兄野利旺荣被元昊诛杀后，元昊即与没藏氏私通。野利后虽觉察，却不忍杀害，而令其出家为尼，号“没藏大师”，居于兴州（治今宁夏银川）戒坛寺。没藏氏生一子，名谅祚。没藏讹庞为国相后，即与没藏氏密谋，欲废太子宁令哥，而改立谅祚。

五月，元昊为太子宁令哥娶妻没啰氏，但见其容貌俊美而自纳，称“新皇后”。宪诚皇后野利氏为野利遇乞之从女，对野利旺荣、野利遇乞被害已多不平，及其子宁令哥之妻为元昊所夺，更多有怨恨之语。元昊闻之，乃废其皇后，黜居别宫。此后，元昊终日于贺兰山离宫游宴作乐，朝政悉交予没藏讹庞处置。

没藏讹庞唆使宁令哥作乱。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正月，宁令哥约野利族人浪烈等，趁元昊酒醉，入宫行刺，被戍卫发觉，浪烈等当即被杀。宁令哥于慌乱之中，只削去元昊

的鼻子，仓皇出逃，藏匿于没藏讹庞家中。没藏讹庞恐此事败露，便以弑君之罪，令人执杀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

翌日，元昊因伤致死，时年46岁。谥号武烈皇帝，庙号景宗。临终之前，元昊有遗言，立从弟委格宁令为帝。及元昊去世，众臣欲依其遗言拥立，没藏讹庞不许，认为："委哥宁令非子，且无功，安得有国？"①遂拥立年仅1岁的谅祚为帝，是为西夏毅宗，而尊其母没藏氏为宣穆惠文皇太后。在没藏皇太后的支持下，没藏讹庞仍自任国相，总揽朝廷大权，"至是，权益重，出入仪卫拟于王者"②。

契丹帝耶律宗真曾因境内党项部叛逃西夏，而与元昊构怨，直至发兵进讨。及谅祚继立，契丹更借西夏国主年幼之机，欲发难之。西夏延嗣宁国元年（契丹重熙十八年，1049年），西夏遣使入契丹贺正旦节，契丹留其使臣。六月，再遣使臣入贡，复为契丹所扣留。七月，契丹帝亲征西夏。兵分3路：以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贴不为副都统，渡黄河，直指西夏东境；以耶律敌鲁古为北道行军都统，突入西夏右厢地区，南下进攻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契丹帝自领中军，以天齐王耶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先锋。

八月，契丹南路军渡过黄河，西夏军望风而逃。契丹军遂占据西夏唐隆镇（今陕西神木北），萧惠因而麻痹轻敌。随后，南路军沿黄河推进，战舰、粮船，绵亘数百里。既入夏境，契丹军前哨兵竟离大军很近，而军中兵士铠甲载于车上，亦有骑马，毫无戒备。西夏军见此情景，乃自高坂突然发起猛攻，契丹军猝不及防，死伤甚重。南路军的失利，迫使契丹帝率中路军无功返回。唯有耶律敌鲁古率北路军于十月兵进贺兰山，俘

获元昊妻没啰氏及西夏臣僚家眷数十人。没藏讹庞率3000骑兵迎战，失利而退。

西夏天祐垂圣元年（契丹重熙十九年，1050）二月，没藏讹庞欲报契丹入攻之仇，乃遣大将洼普、猥货、乙灵纪等率兵进攻契丹金肃城。契丹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西南面招讨使耶律仆里笃率军迎击，猥货、乙灵纪相继阵亡，洼普受伤而逃。三月，没藏讹庞又派观察使讹都吪督兵屯驻河南三角川（今内蒙古达拉特旗南），又为契丹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率轻骑击溃，讹都吪被生擒。

没藏讹庞的兴兵入攻契丹，更激起契丹帝的忌恨。契丹随即以西南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宜新、林牙萧撒采得等率军征伐西夏，又以行宫都部署别古得监阵，以同知北院枢密使萧革统兵驻于边境，以为声援。萧蒲奴领兵至西夏境，纵军俘掠。五月，契丹军包围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大肆劫掠。没藏讹庞令诸将闭城坚守，不敢出战。因入攻契丹兵败逃回的洼普，恐为没藏讹庞所诛，率部投降契丹。六月，契丹军再破位于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今内蒙古巴音浩特北），尽获西夏储粮。

契丹军的大举入攻，令没藏太后和没藏讹庞惶恐不安。十月，没藏太后遣使入契丹，乞请依旧称臣纳贡，但遭到契丹帝的拒绝。十二月，没藏太后又令西夏帝谅祚遣使，上表于契丹，仍请求称臣纳贡。天祐垂圣三年（契丹重熙二十一年，1052）五月，慑于契丹的兵威，没藏太后与没藏讹庞拒绝契丹所辖阻卜部族的请降。尽管如此，契丹帝仍以西夏帝幼弱，强臣用事，而于边境常驻重兵，整修边界封堠。这更令没藏氏不安，乃遣近臣吃多已入契丹贡献方物，乞求弛边备。此后，西

夏更是进一步靠拢契丹，不仅贡献方物、马、驼等，更有进降表，且遣使入契丹为谅祚求婚，以此换得契丹的和好。

西夏福圣承道三年（宋至和二年，契丹重熙二十四年，1055）三月，自谅祚继立，朝廷内外大事悉由没藏讹庞主之。没藏讹庞知河西土地肥沃，种植收获颇丰，便令国内百姓耕种，而将其收获尽入己家。且不断向东侵耕，距屈野河（今陕西神木西北）仅20余里，竟作为己田。没藏讹庞所遣游骑径直抵麟州（治今陕西神木北），或过城东，往来无阻，如入无人之境。

七月，宋河东管勾军马贾逵巡边，见没藏讹庞所侵耕之田已过界，乃督责知麟州王亮。宋帝亦下诏令边吏加以约束，不令西夏侵耕，蚕食边境。又遣使与西夏交涉，归还侵占之地，没藏讹庞坚决不允。知并州庞籍亦遣人亟召没藏讹庞，更定夏、宋疆界。没藏讹庞对此依旧不予理睬，反而令将领吕效忠领兵侵宋，宋知德顺军周永清率兵迎击，大败西夏军，生擒吕效忠。

十月，崇信佛教的没藏太后，得宋廷所赐《大藏经》，而役使数万兵民，于兴庆府城西营建大寺，贮经其中，乃赐额“承天”。

福圣承道四年（宋嘉祐元年，1056）三月，没藏讹庞既不肯与宋廷议定屈野河界，又恐宋军抢先占据其地，乃屯兵屈野河西，以诱宋军。庞籍告诫官吏：“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若绝之，彼必自来，毋得过河与战。”乃悬榜于边境，禁绝银星和市。于是西夏国内财用渐乏。

没藏讹庞侵扰屈野河日趋严重。九月，宋帝令殿直张安世、贾恩为都同巡检，负责处置此事。没藏讹庞依然如故，宋

军强行夺耕，即出兵与之交战；一旦缓和，则继续就耕，始终无归还之意。张安世、庞籍等人移牒至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责问，没藏太后见牒，遣宠臣李守贵赴屈野河勘察。返回后，李守贵告之所耕之田皆为宋边之地，没藏太后责令没藏讹庞归还侵耕之地。但因随之而来的内乱，而未有结果。

十月，西夏宫廷内乱。李守贵曾为野利遇乞职掌出纳之事，后与没藏太后私通而为宠幸之臣。另有宝保细吃多已曾于戒坛寺侍奉西夏景宗元昊与没藏氏，因而出入无所顾忌，亦为没藏太后所宠。然没藏太后既与李守贵私通，又与宝保细吃多已相通。李守贵为此愤怒不已，乃杀宝保细吃多已与没藏太后。其后，没藏讹庞诛杀李守贵，为了进一步控制西夏帝谅祚，便将其女嫁予他，时年谅祚方 9 岁。

西夏 䄅都元年（宋嘉祐二年，1057）正月，没藏讹庞派兵屯驻屈野河西，且侵耕河西田不止。宋知并州庞籍令并州通判司马光前往巡视，司马光因此建议于麟州西 20 里左右增置 2 堡。庞籍令建成 2 堡后，废横戎、临寨 2 堡，将其城防设施、戍卫兵士悉徙入新堡，以加强防卫，又设烽燧以通警报。如有紧急兵情，即发麟州和横阳堡兵救援；如西夏军前来侵耕，则出兵驱逐之；如已种植，则践踏之；若西夏大举入攻，则入堡中躲避。三月，没藏讹庞见宋军防范日紧，令屯驻屈野河西的西夏兵暂且撤回。

五月，没藏讹庞再度兴兵，进驻于夏、宋边境上，不久，又增兵至数万人。宋管勾麟府军马公事郭恩及知麟州武戡，走马承受公事，内侍黄道元等以巡边为名，前往边境视察。有探报告之，西夏兵主力屯驻于沙黍浪，郭恩乃欲止不行，黄道元

大怒，以言语相要挟。郭恩等无奈，遂率步骑1400余人，沿屈野河北而行。正行进时，西夏兵于卧牛峰上燃火炬，武戡告之郭恩，西夏军已知宋军到此。黄道元却以动摇军心相威胁。不久，又闻鼓声，黄道元依然不相信西夏军有备。行至谷口，郭恩欲于此扎营休息，待天明后再登山。黄道元竟强令进兵，郭恩只得继续前进。天明时分，到达忽里堆，猛然西夏兵自左右夹击，宋军遂陷入包围之中。郭恩等拼死抗击，终不敌战败，郭恩、黄道元及府州宁府寨兵马都监刘庆皆被俘，宋军伤亡、损失惨重。

八月，宋廷关闭陕西和市。十一月，又禁绝河东私市，严令禁止边民与西夏私相交易，以此来困西夏，迫使没藏讹庞接受划疆之议。然而没藏讹庞自忽里堆大败宋军后，唯恐宋军报复，不断调集军队，派遣万余兵侵扰鄜延境。因主掌军事的宋提点刑狱陈安石，预先有备，西夏军终未得手，无所收获而退兵。

䄄都三年（宋嘉祐四年，1059）五月，没藏讹庞虽不断向东侵耕，然距屈野河尚余20里，为闲置之地。然自击败郭恩所部后，他更肆意狂妄，无所顾忌，又妄指屈野河中央为夏、宋分界，且派兵沿河边屯驻，白昼则驱赶过河的汉人，夜晚则过河剽掠，若遇宋军巡逻兵士，即撤回河西。又于银州（治今陕西米脂西北）以南至神木堡，悉令部民侵耕，或伸至界外五七里，甚至延至10里。

没藏讹庞窃据朝政，又连年侵耕征战，朝廷内外颇有怨声。西夏六宅使高怀正、毛惟昌之妻，曾以己乳哺养西夏帝谅祚，故谅祚对二人赏赐甚厚，时常与他们商议国事，或使之采访民间，以了解朝政利弊得失。没藏讹庞因此内心极其仇恨他

们。不久，高怀正依仗谅祚恩宠，向百姓贷银，而毛惟昌又私下穿起西夏景宗元昊的盘龙服。被人发觉后，没藏讹庞即诛杀高怀正、毛惟昌全家。谅祚闻讯，请没藏讹庞不要将他们处死，却遭到拒绝。

䄄都四年（宋嘉祐五年，1060）七月，自宋廷禁绝河东私市，西夏国内官民不便，怨声载道。没藏讹庞只得遣使至宋麟、府州（治今陕西府谷），与宋廷商议夏、宋边界，且愿退出屈野河西 20 里侵耕之田，归还宋朝。然宋经略使梁适不从。随后，宋帝赵祯又令薛向为转运使，平易河西解州（治今山西运城西南）盐价，以杜绝西夏所产青盐走私入境。于是，青盐无利可图，西夏无盐利可收，朝廷财用日益匮乏。没藏讹庞走投无路，遂于十一月，派遣西夏兵士于鄜延路（治今陕西延安）沿边界的德靖等 10 余寨堡开垦荒地，剽掠人口、牲畜。宋军戍边兵将频频出击，捍卫边境，却始终不能制止西夏的侵扰。

䄄都五年（宋嘉祐六年，1061），西夏帝谅祚渐长，对没藏讹庞的专权日益不满，有收权亲政之意。谅祚乃与没藏讹庞之子妻梁氏私通，为没藏讹庞察觉而忌恨在心。梁氏秘密告诉谅祚，没藏讹庞将反叛作乱。谅祚乃与受没藏讹庞压制、排挤的漫咩军人，举兵诛杀没藏讹庞，灭其家族，杀其妻没藏氏。因梁氏忠于自己，而娶其为妻。自此，谅祚始得亲政。

西夏帝谅祚亲政后，重用叛宋入夏的汉人景询，任为枢密使。又委其弟乞埋为家相。此后，为平息与宋廷的边境争端，派吕宁拽浪撩黎与宋太原府代州钤辖苏安静议定两国疆界。次年正月，谅祚又遣大首领祖儒嵬名聿正、副首领枢铭靳允中入宋，进奉马匹、骆驼。四月，再进奉 50 匹良马，上表求宋帝

御制诗草、隶书石刻本，又求赐《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至正朝贺仪。又上表乞请购买《大藏经》等物。

西夏帝谅祚与宋廷的结好，使没藏讹庞专权以来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改善。从此，夏、宋边境相对安宁，西夏国内亦因此得以安定，减轻百姓征战之苦。

注　释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三。

②吴广成《西夏书事》卷一八。

西夏

梁氏姊弟专权

西夏拱化五年（宋治平四年，辽咸雍三年，1067）十二月，西夏帝谅祚死，追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其长子秉常即位，是为惠宗，时年7岁。其母恭肃章宪皇后梁氏被尊为太后，自此开始了梁氏的专权。

西夏乾道元年（宋熙宁元年，1068）正月，梁太后开始摄政，遂命其弟梁乙埋为国相，将军国要政悉交他办理。梁乙埋又擢升其子弟入朝，并居近臣要职，于是梁氏权势日趋显赫，逐步把持和控制了朝政，形成梁氏外戚专权的局面。

梁氏为汉人，于西夏皇族拓跋氏中难以维持其统治地位，为转移内部的矛盾，梁太后与梁乙埋一面穷兵黩武，大举兴兵，入侵宋朝边境；一面则采取尊崇党项拓跋旧俗等措施，以博得党项诸部族的拥护和支持。

五月，宋帝赵顼因西夏军屡屡侵边，掳掠秦凤路（治今甘肃天水），而遣宰相韩琦知永兴军，经略陕西。韩琦建议筑筚篥古城，与古渭州（治今甘肃平凉）互为犄角，乃令兴州防御使杨文广督兵筑城。七月，筚篥筑成，宋帝赐名为“甘谷”。

梁乙埋见筚篥城正扼守要冲，便派兵袭攻，以拔除之。西夏兵入宋境，与秦凤都监张守约遭遇，遂分兵为两翼夹攻。张守约仅以 500 兵士迎战，自己挺身于阵前，亲自鸣金击鼓，指挥宋兵杀敌。西夏兵不敌，军将被射杀，众人退却。九月，梁乙埋屡争甘谷城不得，又征调诸监军司兵，屯驻于环州（今甘肃环县）折姜会。知原州种古率兵与西夏兵交战，斩杀 2000 余人。

乾道二年（宋熙宁二年，1069）八月，梁氏改变西夏毅宗所定废蕃礼，从汉仪的礼仪制度，而恢复党项旧礼俗，仍改穿党项服饰，行蕃礼。九月，因国内货用缺乏，梁太后令西夏军入攻庆州（治今甘肃庆阳），掠夺宋边民财富。十月，西夏军既入侵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又向宋帝上誓表，请求以侵占的安远、塞门二寨换回被宋军夺走的绥州城（今陕西绥德）。宋派韩缜与西夏商议，同意以绥州交换二寨。鄜延宣抚使郭逵以为不可行，但已有诏令，命他焚毁放弃绥州城。郭逵便匿诏不执行。不久，西夏使臣罔萌讹入宋，却不归还二寨，反而声称要先得绥州。郭逵命机宜文字赵卨入西夏，交还二寨，且与之商定疆界。罔萌讹却以定疆界并非事先约定之事，而不肯商议。赵卨以西夏违背盟约，又修治绥州城，不与西夏交换二寨。未几，更名为绥德城。

梁太后见不肯归还绥州，命出兵入攻宋顺安、绥平、黑水等寨，进围绥德。宋军诸将纷纷请求发兵阻止，判延州郭逵认为西夏军长途跋涉，旨在速战，下令不得轻率出击。待西夏军粮草将尽，郭逵乃命诸将伺机攻敌，西夏军随即退去。

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宋熙宁三年，1070），西夏军未能攻占绥德，梁太后又发兵 2 万，于距绥德城 4 里处修筑 8 座寨堡，各留二三百人戍守之。郭逵派其部将燕达等攻其中二

堡，一日即克。于是其余诸寨堡戍守皆弃堡窜逃。五月，西夏军又于庆州荔原堡北修筑寨堡，名为“闹讹”，置守兵号称20万。因其位于宋境内20里处，宋蕃部巡检李宗谅、知庆州李复圭等率兵进攻，不敌战败，便又遣偏将破金汤、白豹等寨，自此，夏、宋边境战火又起。

八月，梁太后、梁乙埋欲得绥州不成，金汤、白豹又遭宋军掳掠，遂下令大举入攻宋境，且声言将兵进鄜延路，宋钤辖高敏屡次提醒李复圭：“兵家之事，声东击西。环庆尝破白豹、金汤，结衅已深，不可不备。”①不久，西夏30万兵果然分几路进攻环庆路（治今甘肃庆阳）所辖大顺城、柔远寨、荔原堡，淮安镇东谷、西谷二寨、业乐镇等，兵多者号20万，少者亦不下一二万，且大兵屯驻于榆林，距庆州仅40里，游骑直抵庆州城下。连续9日的交战，西夏军先后斩杀宋钤辖郭庆、高敏、魏庆宗、秦勃等将。随后，西夏军又围柔远寨，守将林广预先告诫守城诸将校，不得轻举妄动。西夏兵持攻城器械，气势汹汹，前来攻城。林广披挂齐整，率兵打开侧门，令众兵出城抢夺西夏军战马。西夏兵见状，忙丢下器械，抢争战马。林广遂得以修缮城池，加强戍卫。又募得敢死之士，乘黑夜缒城而下，偷袭西夏军营。西夏军数战失利，撤兵而去。

此后，梁太后与梁乙埋更加穷兵黩武，又于葭芦川与宋将折克行交战，失利而逃。再与宋知渭州蔡挺战于胡卢河，又溃败。复又遣兵于延州（治今陕西延安）怀宁寨相去60里处筑细浮图寨，屯驻重兵戍守。再派3万骑兵进逼怀宁城。宋西路都巡检贾翊与延州巡检燕达率所部500人跃马奋击，所向披靡。西夏军败逃。宋廷以西夏屡屡攻宋，令延州不要接纳西夏使臣。

十一月，梁太后复出兵入攻宋环州，又进攻大顺城。知延州郭逵奉宋帝赵顼之诏，出兵救援。郭逵侦知西夏帝秉常留居于西夏宥州（治今内蒙古鄂托克东南），乃派燕达领兵相继克陷西夏临边诸寨，且扬言将出兵进攻宥州。燕达与西夏军连续交战，均获胜。郭逵又遣部将田守度领兵出德靖寨，待西夏兵退回时，伺机攻击之。梁太后闻宋军将攻宥州，急令撤军救应。西夏军自宋境急赴宥州，途中遭田守度截击。

十二月，西夏轻骑趁黑夜穿过宋边界壕，掳掠宋镇戎军（今宁夏固原）三川寨。宋巡检赵普设伏兵于界壕外，西夏骑兵返回时，遭伏击，战败而走。

为防范西夏侵耕宋边，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司于诸路招募弓箭手，每人给房屋，贷口粮2石，于沿边半耕半战。其中尤以德顺军所募弓箭手最为劲勇。西夏绥州监军吕效忠领兵万骑进犯渭州（治今甘肃天水），进攻德顺军（今甘肃靖宁东北）。宋知德顺军事周永清出兵迎战，吕效忠战败被俘。周永清令兵士连夜急驰百里，捣毁吕效忠的据点，又斩杀西夏兵卒数千人。这年，宋廷又停止给西夏的岁赐，禁止与西夏的和市交易，以此进一步制裁西夏，使之陷入困境。

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宋熙宁四年，1071）正月，梁乙埋得知宋廷制定更戍法，于陕西分置5路24将，准备大举入攻西夏；乃令兵士于抚宁旧城北滴水崖修筑城堡。崖石峭拔，高10余丈，下临无定河。城堡名为罗兀城，以扼守横山要冲。延州左麒麟使折继世与知青涧城种谔谋议兵取之计。种谔又告之宣抚使韩绛，建议自绥德（今属陕西）进兵攻取罗兀城，再建6寨，以通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治今陕西府谷）两州，括地数百里，则可与鄜延路、河东路相呼应，足以制服西

夏。韩绛遂令种谔率所部2万兵出无定河，诸将皆受他节制。种谔命河东兵先进击银州（治今陕西米脂西北），于铁冶沟遭梁乙埋率众兵邀击，溃败。种谔亲率大军直赴罗兀城，西夏都枢密使哆腊闻讯，率钤辖13人，领兵3000，屯守罗兀城北马户川。种谔令前部军将高永能领6000骑兵迎战，哆腊五战皆败，乃率众逃至立赏平，坚守不出。种谔以送妇人衣三袭（古时全套衣裳称为一袭）为掩护，派军将吕真领兵1000悄悄跟随其后。适逢大风骤起，已是惊弓之鸟的哆腊望见，惊呼"汉兵至矣!"溃逃而去。

罗兀城失落，而国内又征集不起兵士，梁太后与梁乙埋无奈，只得于二月，遣使入辽乞请援应。辽帝耶律洪基应允发兵30万，援助抗击宋军，西夏国内士气复振。

不久，种谔又进兵修筑永乐川、赏捕岭二寨，分遣都监赵璞、燕达修筑抚宁故城。然罗兀城无井泉水源，抚宁城则处于平川，均不可守。三月，梁太后与梁乙埋大举出兵，攻顺宁寨，围抚宁城。种谔在绥德节制诸军，闻西夏兵来攻，竟茫然失措，欲写信给燕达，手颤抖不已，无法下笔。于是宋军新筑诸堡相继陷落，罗兀城亦未能幸免，守城将士战死千余人。宋军失利，四月，宋廷遣环庆都钤辖耳贇率军屯驻邠泾、河中等地，以防西夏入侵。

西夏权臣罔萌讹、结明爱屡劝说梁太后、梁乙埋发兵入侵宋边。虽抚宁一战克陷诸堡，但罗兀城外300里，因战火席卷，已误春耕。加之宋廷断绝岁赐，国内财力极度困乏，梁乙埋因与罔萌讹不和，遂遣使至绥德面见知州折克隽，乞请和好。梁太后亦遣使入宋，请宋帝降问罪诏书。

九月，梁太后与梁乙埋虽频频向宋廷表示愿和好如初，却

不过是虚幌，旨在再以安远、塞门二寨交换绥州，仍遭到宋廷的拒绝。十月，宋廷再度严令禁止陕西、河东私市，以彻底阻止与西夏的民间交易。是年，宋帝以王韶主持洮河安抚司事，王韶遂降伏吐蕃青唐部，又欲收复河湟地区，以围困西夏。由是，西夏处境更为困苦。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宋熙宁五年，1072）正月，梁太后与梁乙埋上表宋廷，请求宋军于城北后退 20 里为疆界，以使无定河东膏腴之地为西夏人所耕。遭宋拒绝后，梁太后便屡次出兵，入绥德境劫掠、放牧。宋鄜延经略使以奉旨通和，不敢追击。于是梁太后与梁乙埋以为有机可乘，乃于二月遣使入宋，议定绥德界至。宋廷亦苦于防范西夏军侵边，见西夏频频遣使通和，亦欲平息边事，乃遣盐铁判官张穆之至鄜延，与西夏使臣协商，确定两国疆界。但西夏却无使臣来议。

梁氏一面与宋朝不断挑起边境事端，又以乞和迷惑宋廷，重又换取到宋廷的岁赐；一面则于朝内排斥异己，形成以梁太后为首的外戚统治集团。时西夏朝廷中，梁乙埋手握朝政，居中用事。都罗马尾次之，掌兵权。罔萌讹因与梁太后关系甚密，虽位次都罗马尾之下，仍与梁乙埋同操大政。西夏毅宗谅祚时的权臣嵬名浪遇，是为西夏景宗元昊弟，熟知兵法，通晓边事，而为都统军。及梁氏专权，嵬名浪遇不肯依附，而遭罢官，且连其家属一并贬出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天赐礼盛国庆四年（宋熙宁六年，1073）三月，梁乙埋得知宋熙河路经略安抚使王韶于河州（治今甘肃临夏东北）与吐蕃瞎征部交战，而延州（治今陕西延安）兵力寡弱，便征集军队渡黄河，进驻天都山及芦子川侧，又约马衔山、龛谷等诸部族兵为后援，以攻宋境。正在此时，王韶破河州，消息传来，

梁乙埋不敢贸然对宋用兵。而又唯恐宋军收复河西洮西之地，将从吐蕃故地入攻西夏境，梁太后便令修治凉州城（今甘肃武威）及其附近寨堡，以防御宋军。随后，又遣兵入侵宋麟、府州等地，大肆掳掠人畜。

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宋熙宁七年，1074）四月，王韶破吐蕃结河部族，切断西夏通道。其后，宋廷派遣使臣召谕回鹘，使之发兵深入西夏境内，使西夏腹背受敌。不久，西夏境内大旱，草木枯死，羊马无所食。而宋廷禁断边境交易，西夏国内财用日趋匮乏。梁太后与梁乙埋走投无路，只好向麟州请求开放和市，宋帝由是下令，只许以铜、锡与西夏交易马匹，其他则一概禁止。

西夏大安二年（宋熙宁九年，1076）正月，西夏帝秉常开始亲政，时年16岁。其时夏、宋关系依旧紧张，秉常担心宋军入侵，采纳梁乙埋建议，征集兵马，出入于麟、府二州之间，以示兵威。而梁乙埋又令西夏民侵耕绥德城疆界外生地。又劝说秉常于讲宗岭广聚木材，修筑城堡，以进逼宋环庆路。

秉常亲政后，对外戚梁氏的专权十分不满。西夏大安六年（1080）正月，秉常下令国中，去除蕃仪，复行汉礼。朝中哗然，梁氏死党纷纷反对，梁乙埋与其叔母相继劝说，秉常依旧坚持。梁太后与梁乙埋对此十分不悦。

西夏大安七年（宋元丰四年，1081）四月，西夏将军李清劝说秉常，将黄河以南的不毛之地归还宋朝，以换取与宋的结好，借以削弱梁氏势力。秉常接受此议，欲遣李清为使臣。梁太后、梁乙埋得知后，便诱杀李清，又将秉常囚禁于兴庆府外的木寨之中。梁太后还令梁乙埋与罔萌讹等聚集人马，切断桥梁，阻断音信。但秉常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后，秉的亲党和近臣

纷纷拥兵自固，与梁氏对抗。一时间西夏国内大乱。五月，保泰统军禹泰花麻以秉常失位，移文宋熙州（治今甘肃临洮），请求宋廷发兵征伐，且愿作内应。宋帝赵顼以为战机难得，决定大举出兵入攻西夏。

七月，宋帝令熙河路经略使李宪领兵出熙河，鄜延路总管种谔领兵出鄜延，环庆路经略使高遵裕出环庆，泾原副总管刘昌祚出泾原，签书经略使王中正出河东，5 路近 50 万大军并进，入攻西夏，会师于兴州（治今宁夏银川）、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而以李宪为统帅。梁太后忙分遣诸监军司兵，交大帅梁永能总领抵御。

宋军一路进军，西夏军难以抵挡，或降或逃。梁永能领兵迎击，惨败溃逃。梁乙埋督军再战，又败。宋军连连告捷，军威大振。梁太后束手无策，向群臣问计，拟坚壁清野，放宋军深入，调 12 监军司 10 余万精兵，驻防于兴、灵州各要冲。十一月，刘昌祚率先攻至灵州城下，随后，高遵裕亦领兵赶至，遂重重围攻灵州。西夏军一面坚守城池，一面以轻骑袭击宋军粮运。宋军连攻 18 天不得破城，而粮草不继，兵士饥寒交加，渐不能支。梁太后令决七级渠，水灌宋营，宋兵冻溺而亡者无计，仅有 13000 余人生还。其他 3 路宋军也因粮草接济不上，先后溃退。此次宋军五路征伐西夏，损失惨重，40 余万宋兵阵亡。

西夏大安八年（宋元丰五年，1082），西夏虽击退宋军的五路进攻，然国内因秉常被囚，人心离贰。外戚梁氏之族与仁多族分据东西厢兵马，势均力敌，积怨日深。正月，宋廷再议征伐西夏，以熙河路经制使李宪为泾原、熙河、兰会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知兰州李浩权安抚副使。三月，梁太后点集河内、

西凉府、罗嚨岭及甘、肃、瓜、沙州百姓，每 10 人出 9 人赴兴州，大举侵入宋境。令都统军嵬名妹精嵬、副统军讹勃遇统兵数万入环庆，掠淮安镇。遭宋军守将张守约迎击，两人皆战败身亡。七月，梁太后忌恨淮安之败，又集 12 监军司兵及诸州僧道，会合于铁牟、天都二山及没烟峡、葫芦河等处，令兵士各携口粮，入攻宋镇戎军，大败宋三川寨巡检王贵。又分兵劫掠熨斗平，其气势尤为嚣张。

八月，宋帝遣给事中徐禧、内侍押班李舜举至鄜延，与种谔商议据守横山。然徐禧等方至延州，已定议建永乐城。种谔极言此地依山无水源，不可筑城，宋帝不听，仍从徐禧所议。徐禧遂督工建城，14 日即完工，赐名为“银川寨”（今陕西米脂西）。永乐城距银州、米脂各 50 里，是西夏必争之地。九月，梁太后令统军叶悖麻、哱讹埋领 6 个监军司 30 万兵马进攻永乐城。刚离开永乐城 9 天的徐禧忙率兵救援，与西夏兵战于永乐城下，7 万宋军被击败，徐禧等退守城中。西夏兵将城池团团围困，又据其水寨。宋兵昼夜血战，然城中断水，数日后，渴死者十分之六七，以至于绞马粪汁饮之。半夜，西夏兵发起猛攻，城旋即陷落。徐禧、李舜举、高永能等将战死，士卒役夫死者达 20 万。西夏兵攻陷永乐城后，乘胜进围米脂（今属陕西），耀兵 3 日，而后撤去。

宋军自五路征伐至永乐城之败，损失惨重，兵将死者 60 余万，钱、银、粟、绢耗费数万，宋廷大为震惊，宋帝赵顼甚至临朝痛哭。西夏因而气焰更盛，对宋境掳掠愈发加剧，袭绥德，攻德顺军静边、隆德两寨，侵兰州（今属甘肃），进屯熙河路，夏、宋边境处处刀光剑影，几无宁日，宋廷因此欲以议和宁息边事。

然而自西夏帝秉常被囚禁以来，梁太后与梁乙埋连年与宋军交战，宋廷则断岁赐，禁和市，西夏国内财用极度困乏，一绢之值竟涨至10余千文。而横山一带的百姓因战火连绵不断，不敢耕耘，只得穷守沙漠，衣食并竭，老幼饥饿，不能自存。国中对梁氏的专权越发不满，西夏大安九年（宋元丰六年，1083）四月，梁太后遣使入宋，表示希望与宋廷和好。宋帝应允，于是岁贡赏赐，一切如旧。闰六月，梁太后与梁乙埋等商议，让秉常复位，以缓和国内矛盾。

秉常虽复位，但梁太后与梁乙埋仍不肯让出朝廷大权，秉常有名无实。梁太后一面遣使入宋，表请称臣纳贡，以修好两国的关系；一面又以索取西夏旧有疆土为由，继续对宋境进行侵掠，全然不顾国内的怨声。国内矛盾日趋尖锐，朝野上下对梁氏的专权尤为憎恶，“自梁氏兄弟用事以来，虐用其民，上下怨嗟，皆欲食其肉”。

西夏大安十一年（宋元丰八年，1085）二月，西夏国相梁乙埋卒。因梁太后曾特许梁乙埋世袭，其子梁乞逋（又作梁乙逋）乃自立为国相，继续独揽朝政。十月，梁太后亦卒。自此，梁氏姊弟的专权终告结束。梁乞逋虽入朝掌权，然其所依靠山皆亡，处境岌岌可危。而仁多保忠等朝廷重臣又与之分庭抗礼，致使梁乞逋处处受困，难以支撑局面。

注　释

①《宋史》卷四五二《高敏传》。

金

金朝统治的建立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潢水（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流域，生活着一支游牧民族，史称勿吉。北魏时，勿吉有7部：粟末部、伯咄部、安车骨部、拂涅部、号室部、黑水部、白山部。隋代统称之为靺鞨。入唐，仅见黑水靺鞨与粟末靺鞨。粟末靺鞨始附于高丽国（今朝鲜），唐圣历元年（698），粟末首领大祚荣建国。唐先天二年（713），玄宗李隆基遣使册封大祚荣为左骁卫大将军、渤海郡王，遂以渤海为国名。黑水靺鞨初亦附高丽国，唐开元年间（713—741），入朝唐廷，唐于其地置黑水都督府，以黑水部首领为都督、刺史，另置长史监察。后渤海国强盛，黑水靺鞨乃依附渤海国，与唐朝断绝来往。五代时，黑水靺鞨又有女真之称，又作女贞、虑真、朱理真等，也称为女直。北方契丹族强盛后，尽取渤海国之地，女真遂改附于契丹。

女真各部发展不尽相同。居于南部者发展较快，且隶属于契丹，称之为熟女真，亦称系辽女真或系籍女真。居住于北部的女真发展迟缓，不入契丹籍，而称为生女真。契丹于咸州

（治今辽宁开原）和东京（今辽宁辽阳）设置详稳司，分掌生、熟女真及处置各部军政事务，实施统治。

生活于长白山、混同江（今黑龙江）一带的生女真诸部落逐步出现原始农业，但采集与狩猎仍占重要地位。其所产名马、貂皮、海东青（鹰）、东珠，是生女真奉辽的贡品。辽中期以后，生女真内的完颜部发展较快。完颜部主要活动于按出虎水（今阿什河）一带，这里土地肥沃，宜于耕作，因而其农业发展，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其时，部落首领石鲁刚毅质直，渐立条教，约束部人。契丹遂以他为惕隐，负责治理本部。

11世纪中叶，石鲁子阿古廼继任为完颜部首领。此时，完颜部已成为生女真诸部中最为强大的一部。石鲁联合白山部、耶悔部、统门部、耶懒部、土骨论部和被辽称为"五国部"的蒲聂（蒲奴里）、铁骊、越里笃、奥里米、剖阿里等五部，逐步组成了以完颜部为核心的生女真部落联盟。乌古廼协助辽廷搜索逃亡的铁勒人、乌惹人、讨伐叛辽的部族，而得以依靠辽廷的支持，制服不肯归附的乌林答部。其间，又有斡泯水蒲察部、泰神忒保水完颜部、统门水温迪痕部、神隐水完颜部等相继入联盟，乌古廼因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被辽廷授以节度使称号。辽人称节度使为"太师"，自此，完颜部首领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便有了"都太师"之称。然而乌古廼不愿系契丹籍，力阻辽军进入生女真界内。此后，他又置甲胄，修弓矢，备器械，兵力渐强，而归附者相继而至。于是，他又设置"国相"，负责管理部落联盟内部事务，以完颜雅达充任。

契丹咸雍八年（1072），乌古廼死。其次子劾里钵继任联盟长，袭封生女真部族节度使，而免去雅达的国相之职，以弟

颇剌淑充任。雅达子桓赧、散达等起兵反抗劾里钵，部落联盟中因此而发生激烈的争斗。颇剌淑所部被桓赧、散达所部击败，桓赧、散达又联络其他部落，大举进攻劾里钵。劾里钵亲领兵迎击，且告之族弟辞不失："死生唯在今日，命不足惜。"①面对气势正盛的桓赧、散达所部，劾里钵部兵未战而先惧，皆呆立而面无人色。劾里钵依旧镇定自若，亦无责备之言，只令士卒解甲少憩，以水沃面，调麦食之。而后，又训励士卒，军势复振。随即，劾里钵袒袖，不披挂，持弓提剑，充当全军前锋，突入桓赧、散达军中，部落兵士亦紧随其后。劾里钵与辞不失奋力杀敌，大败桓赧、散达所部，又乘胜追击，斩杀无计，尽获所弃车、甲、马、牛、军资。桓赧、散达等遭此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举兵。后于辽大安七年（1091），举部归降劾里钵。

桓赧、散达举兵反抗劾里钵时，以锻铁擅长的温都部首领乌春亦曾与之联兵进攻劾里钵，后被完颜部欢都击败。劾里钵又与弟盈歌一起发兵战胜活剌浑水的纥石烈部。经过一系列的斗争，直至战争，劾里钵不断发展和加强了完颜家族的势力，扩大和巩固了生女真的部落联盟，使完颜部落在生女真中的名望得以极大的提高。

辽大安八年（1092），劾里钵病故。其弟颇剌淑继任为完颜部首领、生女真部落联盟首领，袭封节度使。颇剌淑于劾里钵在位时，担任国相期间，独当一面，常被委任处理联盟与契丹间的事务。又于桓赧、散达反叛时，奉劾里钵之命，入契丹求援，故精通契丹国事。及继位后，借与契丹的关系，避免与之冲突，而潜心治理部落联盟内部事务。他命劾里钵长子乌雅束、次子阿骨打等领兵讨平纥石烈部，又解除了部落联盟的后

顾之忧。不久，契丹授予阿骨打“详稳”的称号。

辽大安十年（1094），颇剌淑病故。其幼弟盈歌继立为首领、节度使，他以兄子撒改为国相。其时，女真内部再度出现纷争，徒单部另组成有14部落参加的联盟，乌古论部亦结另外14个部落为一联盟，蒲察部则组成7部落联盟。徒单、乌古论、蒲察3个联盟联合攻打以完颜部为首的12部落联盟，双方展开激战。经过一番较量，盈歌、撒改与阿骨打先后击败3联盟，战胜强敌纥石烈部阿疎，而将部落联盟的势力扩大到东南乙离骨岭（今朝鲜摩天岭）至东北五国部的广大地区。此后，盈歌通告联盟各部首领，不得另组联盟，自称“都部长”，禁止自置牌符，擅发号令。规定由部落联盟统一制定、发放牌印。且以完颜部已定的法律约束诸部，从而加强了完颜家族对部落联盟的控制，协调了内部的关系，使之号令趋于统一。此后，盈歌又将女真甲兵发展至1000余人，并以此开始与契丹抗衡。

辽乾统三年（1103），盈歌病故。劾里钵长子乌雅束继立、袭位。乌雅束在位期间，曾与高丽国或战或和，筑9城与之相争。

辽天庆三年（1113），乌雅束病死。其弟阿骨打（完颜旻）继立为部落联盟首领，称“都勃极烈”。次年六月，辽帝耶律延禧授阿骨打节度使称号。

阿骨打继任都勃极烈时，辽国势日衰，国内统治腐败。边备松弛。辽视女真为藩属，邀索无厌，侮辱不已。辽帝游畋无度，除需诸多名马外，更要海东青供他狩猎之用。为此，女真人只得出兵从五国部夺取。辽廷需东珠与宋交易，而强令女真贡献。更有甚者，为“大辽盛时，银牌天使至女真，必欲求荐

枕者。其国旧轮中下户作止宿处，以未出适女侍之。后求海东青使者络绎，恃大国使命，惟择美好妇人，不问其有夫及阀阅高者。女真寖忿，遂叛”②。

阿骨打在继立为联盟首领前，曾入辽朝贡，十分不满辽的腐朽与跋扈。辽天庆二年（1112），辽帝耶律延禧春捺钵活动时，阿骨打代表生女真诸部朝见辽帝。行头鱼宴时，辽帝命各部族首领依序歌舞助兴。阿骨打推辞不从，辽帝大怒，命枢密使萧奉先假借边事，将他处死。萧奉先以为阿骨打为粗人，不识礼仪，恐因此而失远人向化之心，未执行辽帝之命，将阿骨打释放，返归故里。

此后，阿骨打利用女真人的反辽情绪，积极聚兵备战。辽天庆四年（1114）六月，阿骨打召集各部首领，部署修城堡、治兵器，以待命出兵。又派人使辽，侦察辽境边备情况。辽廷觉察到阿骨打的举动有异，乃遣使责问，又令大将萧挞不野领契丹、渤海兵800人，驻守宁江州（治今吉林扶余东）。九月，阿骨打会诸部兵于涞流河（今拉林河），得甲兵2500余人，随即进攻宁江州。十月，攻破宁江州城。首战告捷，女真士气倍增。辽廷急忙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务，同时征发契丹、奚等族兵及禁军、土豪和诸路武勇7000人，屯驻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十一月，阿骨打领兵3700人，抢渡鸭子河（今松花江），与辽军激战于出河店。辽东北路都统萧嗣先率兵迎击，不敌而逃。阿骨打缴获辽军车马、甲兵、珍玩不可胜计。此后，阿骨打率领女真兵连克数城，占领辽朝东北重镇宾州（治今吉林农安东北）、咸州（治今辽宁开原）等地。在一系列的交战中，阿骨打积极收降辽军各族兵士，且将他们编入女真军中，女真军因而迅速发展到10000余人，实力迅速增长。

辽天庆五年（宋政和五年，1115）正月初一，阿骨打依仿汉族制度，即皇帝位，建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且以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为国都，是为金太祖。

阿骨打即位后，废除原女真部落联盟的国相制，设谙版勃极烈等辅佐国政，以完颜晟、完颜撒改、完颜习不失和斜也（完颜杲）充任。仍设猛安、谋克分别统领女真兵。对收编的辽东降军则依辽制，分设都统或军帅辖领。又令完颜希尹仿辽、汉文字，创制女真字，后于金天辅三年（1119）颁行国中，大金政权遂日渐完备。

阿骨打称帝建国后第5天，便亲统大军伐辽。九月，金军一举攻陷辽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十一月，辽帝耶律延禧率领70万大兵进击金军，又令驸马萧特默、林牙萧扎拉领5万骑兵、40万步卒为援应，企图翦除女真之患。正在此时，辽将耶律章奴率所部直趋上京，谋立皇叔、魏国王耶律淳为帝。耶律延禧闻讯，急令辽兵折回，直奔上京平叛。金帝阿骨打立即选精骑紧追辽军之后，2日后追及。金军见辽中军阵容齐整，料辽帝必在其中，便派右翼军先击辽军，交战数回合后，又以左翼军合攻。辽军受左、右夹击，遂溃败，死亡兵士布百余里。金军缴获舆辇、帝幄、兵械、军资、马牛及其他物资无计。萧特默焚毁营帐，才得以逃脱。

金收国二年（1116）闰正月，辽东京渤海人高永昌杀辽东京留守萧保先自立帝。阿骨打随即遣将进攻辽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生擒高永昌。且改元天辅。金天辅元年（1117），阿骨打又领兵相继攻占辽泰（治今黑龙江泰来）、显（治今辽宁北镇）等州。天辅四年（1120）四月，攻占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辽帝逃奔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

同)。五年，辽宗室、都统耶律余睹等赴咸州向阿骨打请降。阿骨打乃命完颜杲、完颜昱、完颜宗斡与完颜宗幹等领兵进攻辽境。十二月，阿骨打下诏："辽政不纲，人神共弃。今欲中外一统，故命汝率大军以行讨伐。尔其慎重兵事，择用善谋，赏罚必行，粮饷必继，勿扰降服，勿纵俘掠，见可而进，无淹师期。事有从权，毋须申禀。"③

天辅六年（1122）正月，金忽鲁勃极烈、内外诸军都统完颜杲（斜也）等以耶律余睹为向导，连克辽高、恩、回纥三城，攻占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已逃至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的辽帝耶律延禧与辽廷朝臣为之震惊不已，辽帝遂再逃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金军紧追不舍。四月，金军占领辽西京大同府，俘获辽枢密使得里底，节度使和尚、雅里斯、余里野等。六月，阿骨打自上京出发，亲统大军征伐，以其弟、谙版勃极烈完颜晟（吴乞买）监国。阿骨打统军追击辽帝，辽帝耶律延禧又自鸳鸯泺逃至大鱼泺，随即又西逃，进入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阿骨打于追击中，又连克辽数州。十一月，依照宋、金"海上之盟"所约，阿骨打准备与宋军夹击辽南京析津府（燕京）。为此，诏谕燕京官民，令其投降。十二月，因宋军两度进攻燕京未果，金军遂大举出兵，进兵燕京。以完颜宗望率7000兵为先锋，以迪古乃率兵出得胜口（今北京北），银术哥率兵出居庸关（今北京西北），又以娄室为左翼，婆卢火为右翼，攻取居庸关。辽统军都监高六等前来向阿骨打投降。随后，阿骨打自南门进入燕京城，且令银术哥、娄室陈兵于城上。辽知枢密院左企弓、虞仲文，枢密使曹勇义，副使张彦忠，参知政事康公弼，佥书刘彦宗等奉表请降。阿骨打乃命左企弓等慰燕京诸州县，以安定民心，稳

定秩序。

天辅七年（1123）正月，宋廷遣使臣入燕京，商议归还燕京等燕云之地事。金军继续追赶辽军，又先后于白水泊（今内蒙古察右前旗）、青冢（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南），大败辽军，俘辽诸王、后妃、公主、驸马多人，且缴获辽帝耶律延禧的传国之玺。辽所属宜（治今辽宁义县东北）、锦（今属辽宁）、乾（治今辽宁北镇西南）等州相继降金。二月，宋廷又遣使臣赵良嗣来议归还燕京之事，请求以增加原输辽岁币，以为燕京代税钱。经金、宋使臣反复交涉，阿骨打终许归还燕京等地。然金军于撤换时，将城池掳掠一空。四月，阿骨打遣完颜斡鲁、完颜宗望继续追击辽帝，于阴山再败辽军。八月，阿骨打于返回上京途中，因患疾身亡。谙版勃极烈吴乞买继位为帝，是为金太宗。

吴乞买（完颜晟）即位后，以国论勃极烈完颜杲为谙版勃极烈，完颜宗幹为国论勃极烈，又以谩都诃为阿舍勃极烈，参议国政。

金天会二年（1124）正月，西夏帝乾顺遣使入金，奉表称臣。金帝吴乞买许以下塞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剌部吐禄泺西之地，划归西夏。

金天会三年（辽保大五年，1125）二月，辽帝耶律延禧屡遭兵败，见大势已去，乃西奔，欲入逃西夏，于余睹谷被娄室率金军追及，生擒，辽朝灭亡。辽宗族耶律大石西迁，后于中亚称帝，建西辽，是为西辽德宗。

十月，金帝吴乞买（完颜晟）下诏，进攻北宋。以谙版勃极烈完颜杲兼领都元帅，移赉勃极烈完颜宗翰兼左副元帅，先锋，经略使完颜希尹为元帅右监军，左金吾上将军耶律余睹为

元帅右都监，自西京南下太原（治今属山西）；以六部路军帅挞懒（完颜昌）为六部路都统，斜也为副都统，完颜宗望为南京路都统，阇母为副都统，知枢密院事刘彦宗兼领汉军都统，自南京入燕山。不久，又改以阇母为南京路都统，埽喝为副都统，完颜宗望为阇母、刘彦宗两军监战。金军两路进击，十二月，完颜宗翰领兵攻陷宋朔州（治今山西朔县）。完颜宗望率军与宋燕京守将郭药师、张企徽、刘舜仁战于白河，大败宋军，郭药师遂献城投降。随后，东、西两路金军长驱直入，先后攻占宋代州（今山西代县）、中山府（今河北定州）、真定（今河北正定）。完颜宗翰进围太原府，遭守将王禀领全城军民的顽强抵抗，而不得进兵。东路军则继续南下。

金天会四年（宋靖康元年，1126）正月，金军南渡黄河，围攻宋都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宋太上皇帝赵佶出逃，守将李纲率军民坚守城池，顽强抗击金军的进攻。宋帝赵桓一面令各州“勤王”之师赶赴开封救援，一面遣李棁入金营谢罪，且请修好。完颜宗望应允与宋议和，提出以宋宗室亲王、宰相作人质；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宋需交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骡各1万头匹、驼1000头、杂色缎100万匹、绢帛100万匹；尊金帝为伯父，金、宋以伯侄相称。宋帝又遣使臣，表示接受金所提条件，且以康王赵构、少宰张邦昌作人质，负责护送金军北渡黄河，后改以肃王赵枢替代赵构。此时，宋各地“勤王兵”援军纷纷赶至开封，完颜宗望见已得太原三镇割让的诏书，又不便于河南长留，恐有不测，只得先撤兵北还。

八月，金帝吴乞买再诏令左副元帅完颜宗翰、右副元帅完颜宗望领兵征伐北宋。九月，完颜宗翰攻克太原府，东、西两

路一齐推进。十一月，两路金军合围开封。宋军出城拒战，遭金军击败。不久，金军攻破城池。宋帝赵桓派宰相何栗赴金营求和，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要求太上皇帝赵佶前来金营商议割让黄河以北之地，划黄河为界之事。不久，宋帝赵桓亦奉命入金营求降，二帝遂为金军所拘。

金天会五年（宋靖康二年，1127）四月，金军于开封府等地大肆搜括宋朝宫廷内外府库及官、民户金银钱帛之后，俘掳宋太上皇帝赵佶（宋徽宗）、宋帝赵桓（宋钦宗）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朝臣官员等，浩浩荡荡北撤。宋廷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亦被搜罗，满载而归。北宋朝廷的统治遂告结束。北宋灭亡。

金朝灭亡北宋，撤军北上后，又扶植北宋降臣张邦昌于开封称帝，建立伪楚傀儡政权。不久，宋宗室、康王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是为宋高宗，重建宋朝统治，史称南宋，张邦昌遂投依赵构。金天会八年（1130）九月，金廷又册立刘豫为子皇帝，建立伪齐傀儡皇帝，且将原宋朝统治下的河南、陕西之地，划归伪齐统辖。

自此，女真族经过东征西讨，南征北战，终于成为与南宋对峙的北方强大的政权。

注　释

①《金史》卷一《世纪》。

② 洪皓《松漠纪闻》。

③《金史》卷二《太祖纪》。

金

金熙宗改制

女真族初无嫡长子继承制，完颜阿骨打（完颜晟）称帝即位（金太祖），建立金朝，以其弟吴乞买（完颜晟）为谙版勃极烈。他死后，吴乞买即继称皇帝，是为金太宗，又以己弟完颜杲（斜也）为谙版勃极烈，是为帝储。然完颜杲先死，在宗室完颜宗翰、完颜宗幹及完颜希尹等人支持下，吴乞买又立太祖孙完颜亶为皇位继承人，加号谙版勃极烈。金天会十三年（1135），吴乞买病故，年仅 13 岁的完颜亶遂即帝位，是为金熙宗。

完颜亶以汉族文人韩昉及宋朝儒生为师，潜心学习汉文化，学习内地政权的礼仪制度及契丹、汉人的治国之术。及其即位后，为适应金朝疆域拓扩后的统治形势，加强和巩固金朝政权的统治，完颜亶在完颜宗翰、完颜宗幹等人的支持下，对原有的制度进行改革，渐改女真旧俗，而仿内地之制。

金天眷元年（1138），完颜亶废止谙版勃极烈等辅政旧制。依宋、辽制设太师、太傅、太保，称为“三师”。于朝中设尚书、中门、门下三省，由领三省事综理政务，其下设左、右丞

相及左、右丞（副相)。又分别于汴京（今河南开封)、燕京（今北京）设置行台尚书省，负责管辖河北、河南地区。此后，又进一步改革官制，全面推行汉族官制。对原女真族官号一律“换官”，即将原女真官职换授为相应的汉称新职。对女真贵族实行封国制，封授一地国王称号，形同勋爵，不任实事。且于尚书省设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位左、右丞之下，以加强尚书省权力。另设御史台掌管刑狱及监察百官，以加强皇帝对百官的控制。

此外，金帝完颜亶又于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仿汉制营建都城和宫殿，建号上京。制定百官朝见的礼仪及其相关的制度，严格君臣名分和禁卫制度。又颁行一种笔画简省的新文字，称为女真小字，推行于全国。

为加强对汉地的控制，完颜亶下令，将女真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地区，从事屯垦、戍守和征战。

完颜亶这一系列的改革，使金政权建设更为完善，统治得到极大的加强，史称“天眷新制”。

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建立金朝以来，完颜宗翰、完颜宗幹、完颜希尹等女真宗室成员既有建国定策之功，又立下灭亡辽、北宋之战功，且于完颜亶改革时，为主要的决策和支持者，因而成为金廷中的实权派代表人物。而金太宗吴乞买长子完颜宗磐因未能继立为帝，对支持拥立完颜亶的完颜宗翰等人极为不满。加之完颜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限制了女真贵族的权限，更使他耿耿于怀。为了安抚完颜宗磐，避免金廷内部的摩擦与矛盾，完颜亶乃任命他为太师，且与完颜宗翰、完颜宗幹并领三省事。然而完颜宗磐对此并不满意，反而利用职权，积极培植党羽，发展自己的势力，伺机打击完

颜宗翰等实权派人物，以实现自己独揽朝政的企图。

金天会十五年（1139），完颜宗磐以贪赃罪，将完颜宗翰的亲信、尚书左丞、辽国降官渤海人高庆裔逮捕，下狱处死。完颜宗磐借机大兴狱讼，完颜宗翰因此抑郁而亡。随后，完颜宗磐又与金太祖子、东京留守完颜宗隽和太祖从弟、左副元帅挞懒结成联盟，主张废刘豫伪齐政权，将河南和陕西之地归还宋朝，以换取宋向金称臣纳币。完颜宗幹与完颜希尹等人坚决反对此议，双方互不相让。金帝完颜亶采纳完颜宗磐之议，遂废伪齐帝刘豫为蜀王，于汴京设置行台尚书省。第二年七月，完颜希尹被罢免左丞相职，在完颜宗磐和挞懒等人的主持下，金廷正式将河南归还南宋，又以右司侍郎张通古等出使江南。且将汴京行台治所移至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再移往祁州(治今河北安国)。十月，东京留守完颜宗隽任尚书左丞相兼侍中，进封陈王。完颜宗磐一派势力暂居上风。

金天眷二年（1139）正月，完颜宗隽再任太保、领三省事，又进封衮国王。然而金帝又将兴中尹完颜希尹复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完颜希尹复相后，即与完颜宗幹、翰林学士韩昉等人积极争取金帝的支持，以反击完颜宗磐一派。不久，完颜希尹与完颜宗幹、完颜宗弼（兀术）等上奏，弹劾完颜宗磐私通宋朝，割让河南之地。适逢郎君吴十（吴矢）谋反，被处死，此事亦牵连完颜宗磐等人。七月，逮捕完颜宗磐和完颜宗隽，以谋反罪将他们处死，诏告朝廷内外。随后，金帝以右副元帅完颜宗弼为都元帅，进封越国王；左副元帅挞懒为行台左丞相。又以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幹为太师，进封梁宋国王。八月，又以挞懒等人谋反，被处死。自此，完颜宗磐一伙势力翦除殆尽。

金天眷四年（1140），完颜亶采纳完颜宗幹、完颜宗弼之议，诏令元帅府出兵，夺回河南、陕西之地。命都元帅完颜宗弼率兵自黎阳（今河南浚县）直趋汴京，右监军撒离合出河中直趋陕西。五月，金军夺回河南。六月，再夺陕西。

完颜宗弼以诛挞懒之功，由都元帅升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总揽汉地军旅、钱谷诸事。九月，他借金帝完颜亶对完颜希尹的不满，而以"燕居而窃议"、"心在无君"①等罪名，诛杀左丞相完颜希尹、尚书右丞萧庆及完颜希尹子、昭武大将军把搭、符室郎漫带。

金廷夺回河南、陕西之地后，又将行台尚书省治所移回汴京，以燕京路直属中央尚书省，撤销燕京行台尚书省的建置。十二年，完颜宗弼上言，称宋将岳飞、张俊、韩世忠率大军北渡长江，进击河南。金帝令完颜宗弼率兵反击，完颜宗弼遂领兵南下至宋淮南境，连克宋守军，大肆掳掠而还。

金帝完颜亶自登极为帝之后，对内地汉文化极为推崇。金皇统元年（1141）二月，完颜亶亲自祭奠孔子庙，面北而拜，且告之侍臣："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大凡为善，不可不勉。"②从此他尤为喜爱阅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经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

不久，完颜宗幹死，金帝诏完颜宗弼与宰相、执政一同入朝奏事。随即又以他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都元帅、领行台如故，进而掌握了金廷军政大权。秋季，完颜宗弼领兵南下攻宋，渡淮河进击。宋廷请求金军罢兵，议和，金、宋遂议定双方以淮水为界，宋向金纳币称臣。皇统二年（宋绍兴十二年，1142）二月，宋廷遣曹勋为请和使，入金正式订立和议，宋帝

赵构以“臣构名义向金帝上誓表，金册封其为宋帝。且宋廷向金纳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划淮水为界；世世子孙，永守誓言”③。

完颜宗弼自掌军政大权后，排斥异己。其身旁形成以蔡松年、许霖、曹望之为首的汉官集团，而非亲信的汉官则遭贬，甚至被杀，宇文虚中、高士谈等人先后被诛杀，而因此受株连被免官及禁锢者竟有30余人，以至于朝堂为之一空。此后，金廷只有完颜宗弼一派及蔡松年为首的汉官集团。

面对朝廷的此番局面，金帝完颜亶动摇于女真贵族与汉官争权夺利的斗争之中，无所适从，而沉溺于酒。“上自去年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宰相入谏，辄饮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饮矣，明日当戒。’因复饮”。甚至于五云楼与群臣宴饮，“皆尽醉而罢”④。一次，完颜亶饮酒而醉，竟杀死户部尚书宗礼。尽管群臣数次劝谏，他仍饮酒不止，朝廷大事几乎无暇顾及。皇统七年（1147），完颜宗弼又升任太师、领三省事，仍为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事。又以平章政事完颜勖为左丞相兼侍中，都点检完颜宗贤为右丞相兼中书令，行台右丞相刘筈、右丞萧仲恭为平章政事，尚书左丞完颜宗宪为行台平章政事，同判大宗正事完颜亮为尚书左丞。

皇统八年（1148），完颜亶又擢升契丹人、平章政事萧仲恭为行台左丞相，左丞完颜亮为平章政事。不久，又以尚书左丞相完颜勖领行台尚书省事，右丞相完颜宗贤为太保，尚书左丞相，行台左丞相萧仲恭为尚书右丞相。完颜亶虽不断调整金廷要职人选，然仍不能控制朝政。尤其是十月，完颜宗弼死后，金廷内部派系斗争越发加剧，更困扰着金帝完颜亶。左丞相完颜宗贤、左丞完颜禀等人进言，认为州郡长吏当并用女真

人。完颜亶则认为："四海之内，皆朕臣子，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谚不云乎：'疑人勿使，使人勿疑。'自今本国及诸色人，量才通用之。"⑤ 因此，他以右丞相萧仲恭为太傅、领三省事，左丞相完颜亮为尚书右丞相，左丞相完颜宗贤为太师，领三省事兼都元帅。皇统九年（1149），又罢免完颜宗贤职，而以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勗为太师、领三省事。不久，又复完颜宗贤职，左丞相完颜亮为太保、领三省事。然而时隔未久，又出完颜亮领行台尚书省事，另以都元帅完颜宗敏为太保、领三省事兼左副元帅。之后，金帝对朝廷要职频繁更迭人选，政局极不稳定，内部斗争日趋尖锐。

完颜亶既受困于朝廷派系斗争，又为皇后裴满氏的干政所牵制，其心中更难平静，遂更加嗜酒多疑，淫刑肆虐，常以疑似滥杀，致使群臣皆不自安。十一月，完颜亶杀裴满后。又杀已故邓王子阿懒、达懒，遣使杀德妃乌古论氏及夹谷氏、张氏。十二月，又于寝殿杀妃裴满氏。一时间，朝廷人心惶惶。

平章政事完颜亮借群臣恐惧和不满的情绪，与其密党刺杀了完颜亶。完颜亶死时年 31 岁。后追谥武灵皇帝，初庙号闵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改庙号为熙宗。

完颜亶被杀后，完颜亮自立为帝，史称海陵王、海陵庶人。金朝统治进入巩固时期。

注 释

①《金史》卷七七《完颜宗弼传》。

②③④⑤《金史》卷四《熙宗纪》。

金

海陵篡立

金帝完颜亶（金熙宗）在位期间，女真社会新旧两派势力矛盾冲突加剧，且女真贵族与汉官间的争权斗争又与之交织在一起。完颜亶受困其中，无所适从。金皇统八年（1148），金太师、领三省事、都元帅、领行台尚书省完颜宗弼（兀术）病故，完颜亶更无力驾驭朝政。契丹人萧仲恭、女真宗室完颜亮、完颜宗贤、完颜宗敏、完颜勗等人先后为相，总军国大事。由于金廷内部派系斗争不止，政局动荡不稳。而皇后裴满氏又勾结朝臣干预朝政，使完颜亶又多受其牵制。帝、后之间与女真贵族之间相互倾轧，更加剧了朝政的日益混乱。

金帝完颜亶陷入动荡与混乱的政局之中，欲为不能，遂酗酒成癖，以至于嗜酒多疑，淫刑肆虐，常以疑似一再诛杀大臣，群臣皆不自安。

已故金太师、领三省事、辽王完颜宗幹次子完颜亮于皇统九年（1149），以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从而进一步控制了朝政。完颜亮，字元功，原名迪古乃，金天眷三年（1140），年18岁的完颜亮即以宗室子弟，初任奉国上将军，赴梁王完颜

宗弼军前任使，以为行军万户，迁骠骑上将军。金皇统四年（1144），加龙虎卫上将军，为中京留守，迁光禄大夫。完颜亮为人残忍，好猜忌。在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时，专横立威，笼络小人。猛安萧裕常与完颜亮议论天下大事，深知其心意，曾劝说他举大事。

皇统七年（1147）五月，金帝召完颜亮入朝，授同判大宗正事，加特进。十一月，又拜尚书左丞。完颜亮遂把持权柄，任用其心腹为尚书省、御史台要职，且引荐萧裕为兵部侍郎。皇统八年（1148），再拜平章政事，年底，升任尚书右丞相。及他兼任都元帅后，权势益大。皇统九年正月，完颜亮生日，金帝完颜亶使寝殿小底大兴国持物赐予，皇后亦附赐礼物。对此金帝不悦，却杖罚大兴国，追回所赐礼物，完颜亮因此感到十分不自在。三月，拜太保、领三省事，其后“益邀求人誉，引用势望子孙，结其骧心”①。

四月，学士张钧因所起草诏书与金帝旨意相忤，被处死。金帝为此询问朝臣，是何人指使？尚书左丞相完颜宗贤认为是完颜亮所为。金帝对此十分不悦，而令他出任领行台尚书省事。然当他行至良乡（今北京西南），又被召还。完颜亮不知所以，惊恐不安。待其返回金都，又复为平章政事。自此，完颜亮深感危险迫近。

十一月，完颜亶杀皇后裴满氏，又杀已故邓王之子阿懒、达懒。不久，他出猎于忽剌浑土温，却遣人入京城，诛杀妃乌古论氏及夹谷氏、张氏。十二月，金帝结束狩猎，返回京城，又于寝殿杀妃裴满氏。完颜亶的滥杀，更招致群臣震恐。完颜亮与其亲党、尚书左丞、驸马唐括辩、寝殿小底大兴国及护卫十人长仆散忽土、徒单阿里出虎等密谋废立之事。

唐括辩、大兴国等人均因事遭廷杖而忌恨金帝。待仆散忽士、徒单阿里出虎于宫中当值时，便令尚书省令史李老僧告之大兴国。深夜二鼓时分，大兴国窃得入宫之符钥，假借皇帝诏令开启宫门，召唤唐括辩等入宫。完颜亮怀藏利刀与同党、尚书右丞相完颜宗德、大理卿乌带及徒单贞、李老僧等人，尾随唐括辩行至宫门。宫门戍卒知唐括辩为驸马，未起疑心，放一行人入宫。完颜亮等进至金帝寝殿门前，被寝殿卫士所察觉。完颜亮随即抽出利刃，卫士见状，不敢声张。仆散忽士、徒单阿里出虎冲入寝殿，完颜亮见此情景，忙起身寻找经常放置于榻上的佩刀，不料佩刀早已被大兴国转移他处放置，故寻刀不得。仆散忽士、徒单阿里出虎进前刺杀金帝，完颜亮亦上前，亲手杀害金帝完颜亶，其鲜血竟溅于完颜亮脸面及衣裳之上。年仅31岁的金帝完颜亶顿时惨死于完颜亮刀下。

完颜亮既诛完颜亶，遂在仆散忽士、完颜秉德等人的拥立下，自立为帝。完颜亮恐自己的篡立遭到女真宗室的反对，乃诈称金帝完颜亶欲议册立皇后事，召诸大臣入朝，遂杀曹国王完颜宗敏、尚书左丞相完颜宗贤。而任命完颜秉德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左副元帅、唐括辩为尚书右丞相中书令，乌带为平章政事，仆散忽士为左副点检，徒单阿里出虎为右副点检，徒单贞为左卫将军，大兴国为广宁尹。同时，对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勖以下20位重臣亦进爵增职，以笼络之。又对参预篡立之事的有功之臣，分别赐钱、绢、马、牛、羊等物。且下令改元天德。

金天德二年（1150），完颜亮“以励官守、务农时、慎刑罚、扬侧陋、恤穷民、节财用、审才实七事诏中外”②，作为其治国之策。同时又下诏求直言，鼓励官民士庶上书言事。为

了掩饰其弑主篡立的行径，巩固自己的统治，完颜亮先以左丞相兼左副元帅完颜秉德出领行台尚书省事，以尚书省右丞相唐括辩为左丞相，平章政事乌带为尚书右丞相。然而时隔月余，完颜亮即杀太傅、领三省事完颜宗本、尚书省左丞相唐括辩、判大宗正府事完颜宗美。又遣使诛杀领行台尚书省事完颜秉德，东京留守完颜宗懿，北京留守完颜卞及金太宗完颜晟子孙70余人，周宋国王完颜宗翰子孙30余人，诸宗室50余人。

此外，完颜亮亦对朝廷要员频频更换，先以其弟完颜兖为司徒兼都元帅，又以他领三省事、封王，仍兼都元帅，继而再以其为太尉、枢密使，而不任宗室。另任用渤海人、平章行台尚书省事、右副元帅大臭为行台尚书右丞相，再为尚书右丞相兼中书令；渤海人、参知政事张浩为尚书右丞，汉人、行台尚书左丞为尚书左丞，奚人同知中京留守萧裕为秘书监，再任尚书左丞，又迁平章政事。这些人进入尚书省执政，削弱了女真皇室贵族的权势，组成了由多民族参与的统治集团，使完颜亮的统治得以加强和巩固。

在进行官僚集团调整之后，完颜亮即着手进行官制方面的改革，以进一步强化皇权。二年十二月，完颜亮下令，废罢行台尚书省，使政令归于朝廷。又改都元帅府为枢密院，受尚书省节制。

金天德三年（1151）正月，完颜亮粗通经史，渐受中原文化的濡染，而对汉文化十分仰慕，始于京城设置国子监，作为教育机构。又加强御史台的监察作用。他曾对御史大夫赵资福说："汝等多徇私情，未闻有所弹劾，朕甚不取。自今百官有不法者，必当举劾，无惮权贵。"③

三月，完颜亮下诏，以上京僻在一隅，令尚书右丞张浩、

燕京留守刘筈等仿北宋汴京宫室制度、城市规模及格局，扩建燕京（今北京）。次年，又下诏，决定迁都燕京。

为杜绝朝臣中为官不做事的弊端，完颜亮下诏，凡朝官中有称病不治事者，尚书省则令监察御史与太医一同前往诊治探视，若属作假者则一律处罚，直至治罪。

金贞元元年（1153），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改燕京为中都，建大兴府；以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南京，以中京为北京。完颜亮迁都至燕京后，又调整朝臣官职，以司徒徒单恭为太保、领三省事，平章政事萧裕为右丞相兼中书令，右丞张浩、左丞张通古为平章政事，参知政事张中孚为左丞，萧玉为右丞，枢密副使完颜昂为枢密使，工部尚书仆散师恭为枢密副使。

迁都燕京，使金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极有利于金帝摆脱守旧势力的束缚和影响，推进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对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与完善，以及金朝社会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金正隆元年（1156）正月，完颜亮颁行新的官制改革，史称“正隆官制”。首先废除附属于尚书省、形同虚设的中书、门下两省，而以尚书省为最高政务机构，专理朝廷政务，尚书令为最高行政长官，直接听命于皇帝。以左、右丞相为辅佐，废除平章政事之职，而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不再直接参与政务。将军事归入枢密院，遂废都元帅及左、右副元帅等职，而由枢密使、枢密副使统领军务。自此，尚书省和枢密院便成为金朝政治、军事的最高机构，完颜亮因此得以控制朝廷军国大事。这一官制，遂成为以后金朝的定制。

随着官制的改革，金帝完颜亮又仿宋朝之制，对中央官僚

机构进行建设和完善。金正隆二年（1157），初定太庙时享牲牢礼仪，改定亲王以下封爵等第。又始置登闻院，诏尚书省：“凡事理不当者，许诣登闻检院投状，院类奏览讫，付御史台理问。”④

在进行官制改革的同时，完颜亮严厉打击异己势力，而任用契丹、渤海、汉、奚等族官僚和支持自己的女真官僚，重新组成一个受他直接控制的上层统治核心势力。他还进一步整顿科举制度，使选官制度统一，以利于培养和选拔科举所需人才。

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完颜亮的统治得到极大的加强和巩固，他随即又开始策划进兵江南，企图消灭南宋政权。正隆四年（1159），完颜亮下令营建汴京宫室，制军器于中都，造战船于通州（治今北京通县），又遣使分赴诸路总管府督造兵器、征兵、括马。调各路猛安谋克军，凡年龄在20岁以上，50岁以下者，一律充军入籍，不许“留侍”。由于督催苛急，四方骚动。太医使祁宰上疏，劝谏伐宋，竟遭杀害。

完颜亮执意伐宋。正隆六年（1161），他令百官先赴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治事，尚书省、枢密院、大宗正府、劝农司、太府、少府皆从行，吏、户、兵、刑部，四方馆，大理寺官各留1员。六月，完颜亮亦至南京，且又以此作为京都，亦作为南侵宋境的基地。他征伐南宋的举措，遭到朝臣的反对。完颜亮则对劝谏征战者，不分何人一律严厉处置。皇太后徒单氏因谏伐南宋而被杀于宁德宫，完颜亮即令于宫中焚尸，将她的尸骨弃于水中，并杀其侍婢等10余人。且又因此杀右卫将军萧秃剌、护卫十人长斡卢保、枢密使仆散师恭、北京留守萧颐、西京留守萧怀忠，杖尚书令张浩、左丞相萧玉等一大

批朝臣。这一行动，更激起朝廷内外、举国上下的不满情绪。九月，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民王九据城反叛，聚众至数万。所到之处，百姓蜂起响应，多者占据城邑，少者入保山泽，或以十数骑张旗而行，金军官兵无人敢靠近，与之交战。然而，完颜亮十分讨厌听起义之事，有敢议论者，则处以刑罚，故朝中无人敢言此事。

不久，完颜亮亲自统领32个总管府之兵分路南下，进攻南宋。以太保、枢密使完颜昂为左领军大都督，尚书右丞李通副之；尚书左丞纥石烈良弼为右领军大都督，判大宗正府事乌延蒲卢浑副之；御史大夫徒单贞为左监军，同判大宗正事徒单永年为右监军；左宣徽使许霖为左都监，河南尹蒲察斡论为右都监，皆随从完颜亮自寿春（今安徽风台）领兵进发。以工部尚书苏保衡为浙东道水军都统制，益都尹郑家副之，经海路直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以太原尹刘萼为汉南道行营兵马都统制，济南尹仆散乌者副之，自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南进。又以河中尹徒单合喜为西蜀道行营兵马都统制，平阳尹张中彦副之，自陕西凤翔（今属陕西）发兵，进攻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于此驻兵待命。另派徒单贞领兵2万进入淮阴。

部署完毕，完颜亮即以武胜、武平、武捷三军为前锋，领兵渡淮，入攻宋淮南路。一时间，南宋淮南、江东地区战火纷飞。金军迅速攻占淮南地区，进抵长江，然其后方极不稳定。山东、河北、河东等路的各族人民纷纷揭竿而起，反抗金朝的残暴统治。正隆三年（1158），山东沂州临沂（今属山东，人赵开山首举义旗，攻克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日照（今属山东）等地。正隆五年（1160），海州东海（今属江苏）又有张

旺、徐元的起义，杀县令，与官军相持数月。同年，西北路爆发契丹人耶律撒八移剌窝领导的反金斗争，一度拥兵5万。后移剌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率军北上攻泰州（治今吉林白城东南），声势大振。正隆六年（1161），南京路单州杜奎率众起义，攻州城。大名府王友直（王九郎）拥众万人反抗金廷的暴政，声震河北。济南府耿京、李铁枪等人联合诸多小股抗金武装，众至数十万。太行山一带的抗金武装在陈俊率领下，严重威胁金朝后方，牵制了金军的南侵。完颜亮一面进行南侵，一面令各地官府严厉镇压反金武装。各地抗金势力相继遭镇压失败，耿京部属王友直、辛弃疾等人于抗金失败后，南逃投奔宋朝。

完颜亮自南京率大军征伐南宋，然“将士自军中亡归者相属于道”⑤，士气十分低落。曷苏馆猛安完颜福寿、东京谋克金住等将刚于大名府接受领兵之命，旋即举部逃归，从者多至万余众。十月，完颜福寿等人返回辽阳府，与东京留守司之兵共同发动政变，拥立东京留守、曹国公完颜雍（乌禄）为帝，是为金世宗。完颜雍即位后，改元大定，大赦天下。下诏历数完颜亮罪过：弑皇太后徒单氏；杀金太宗及完颜宗翰、完颜宗弼子孙，以及完颜宗本诸王；毁上京宫室；杀辽豫王、宋天水郡王、郡公子孙等数十事，为此废黜完颜亮皇帝位。

完颜雍政变的消息传来，完颜亮不顾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矶渡江失利，移师扬州（今属江苏），强令所部再次渡江，欲占据江南与完颜雍抗衡。十一月，完颜亮集结水军于瓜洲渡口（今江苏扬州南），准备第二天渡江南侵。次日，军中叛乱，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等军将反叛，杀完颜亮，时年40岁。金大定二年（1162），完颜雍降封完颜亮为海陵郡王，追谥曰

炀。大定二十年（1180），完颜雍再降完颜亮为海陵庶人，史称海陵王。

注　释

①②③④⑤《金史》卷五《海陵王纪》。

金

世宗章宗治绩

金正隆六年（1161），金帝完颜亮兴兵南下，进攻南宋淮南之地。十月，金曷苏馆猛安（南征万户）完颜福寿、高忠建、卢万家奴等军将不愿随从完颜亮南征，遂于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率所部 2 万余众，脱离大军北上至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投奔东京留守、曹国公完颜雍（乌禄）。婆速路总管完颜谋衍亦领所部 5000 余人投附完颜雍。诸军进入东京城中，即杀东京副留守高仔福等人。不久，在完颜福寿、完颜谋衍等人的拥立下，完颜雍即位为帝，是为金世宗，改元大定。

完颜雍以完颜谋衍为右副元帅，高忠建为元帅左监军，完颜福寿为元帅右监军，卢万家奴为显德军节度使。十一月，完颜亮被其部将、浙西兵马都统制完颜元宜所杀。

完颜亮死后，枢密使完颜昂入朝东京，完颜雍任他为都元帅。太傅、尚书令张浩自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上表贺完颜雍即位，仍继续任尚书令。海陵王在位时的文武官员，大多被继续任用，稳定了金朝内部的局势，避免了混乱与争斗。

不仅如此，完颜雍亦不改变完颜亮在位时制定的合理政策。且采纳参知政事李石的建议，继续以汉地为统治中心。为占据天下腹心，控扼四方，成万世大业，完颜雍决定以中京燕京府（今北京）为京师。其时，北方契丹农牧民的抗金斗争仍在持续，南方宋朝与金朝的关系依旧比较紧张。面对这一形势，即位不久的完颜雍遂调整统治政策，以扭转被动的局面，巩固自己的统治。

契丹人耶律撒八与移剌窝斡领导的农牧民反金斗争，自金正隆五年（1160）以来，虽多次遭受金军的镇压，却始终坚持斗争。后移剌窝斡因耶律撒八谋奔西辽，而将他杀害，继续率领队伍抗金。金大定元年（1161），移剌窝斡自称皇帝，建年号天正，率部转战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一带，攻占泰州（治今吉林白城东南），声势大振。次年，转攻济州（治今陕西农安），活动于懿州（治今辽宁阜新）、川州（治今辽宁北票）等地，屡败金军。完颜雍命右副元帅完颜谋衍领兵进剿，又下诏告谕征契丹部将士："应契丹与大军未战而降者，不得杀伤，仍安抚之。后招诱来降者，除奴婢以已虏为定，其亲属使各还其家，仍官为赎之。①"未几，完颜雍再遣元帅左监军高忠建会集北征将帅共同讨伐移剌窝斡。但右副元帅完颜谋衍、元帅右监军完颜福寿因进军迟缓，坐失战机，而被召回京师，皆罢免官职。

二年六月，完颜雍又以尚书右丞仆散忠义为平章政事兼右副元帅，负责镇压移剌窝斡领导的抗金武装。同时出内府金银给征伐将士之用。又令居庸关（今北京西北）、古北口（今北京密云北）守军对过往行人严加盘查，有捕获契丹奸细者则加官赏。既而又令古北口及石门关严加防范。仆散忠义率兵两度

战胜移剌窝斡，俘虏其弟。八月，金元帅右都监完颜思敬亦奉诏，率所部与大军会合，进讨移剌窝斡。在重兵进击围剿之下，移剌窝斡战败，北走沙陀。九月，完颜思敬获移剌窝斡，抗金斗争遂失败。

在镇压移剌窝斡等反金武装的同时，金廷又出兵攻宋，重新夺回陕西地区。大定三年（宋隆兴元年，1163），金军于宿州符离县（今安徽宿县）大败北上的宋兵，迫使南宋请和。金大定四年（宋隆兴二年，1164），经金、宋互遣使协商，终于达成“隆兴和议”，约定双方各守旧疆；宋对金不再称臣，而改称侄皇帝。“隆兴和议”重新调整了金、宋间的关系，此后两国边境相对安宁，金朝的政局亦得以稳定。

完颜雍对金官制又稍加调整，恢复平章政事官职，且增至2员，与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丞相并为宰相，而以尚书左、右丞和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后又将元帅府改为枢密院，作为金廷管理军政的最高机构。在官吏的任用上，完颜雍亦沿袭完颜亮的作法，在任用众多海陵王朝女真官员的同时，更广泛吸收非皇室的女真人和契丹、渤海、汉人参与执政，甚至对一些政敌亦摒弃前嫌，给予任用，从而改变了金朝以来，唯有宗室子弟和完颜部人参与朝廷机要的状况，亦扭转了海陵王朝排斥宗室和异己的局面。长期以来女真贵族的纷争至此逐渐结束，统治基础得以进一步扩大，又赢得广泛的支持，最终形成以完颜雍为核心的多民族的统治集团。

完颜雍吸取海陵王朝失败的教训，常以海陵王为政苛急，拒谏自专，非礼臣下为戒，究心于历代王朝的统治经验与儒家的仁政王道。要求宰执臣下务远图、习经济、举贤能、劾贪墨，且身体力行，常巡幸地方，体察地方官的政绩。他认为

“县令之职最为亲民”，而“郡守系千里休戚”②，对地方官的选授，尤为重视，以使缓解扰民。他于万机之暇，博览史册。十分推崇汉族典籍，特设译经所。令以女真文字翻译《诗》、《易》、《书》、《论语》、《孟子》、《新唐书》等汉籍，以供女真百官、宗室子弟传习。

完颜雍重视发展生产，采取招集流亡、减轻赋税，放免二税户（原辽朝时的投下户，入金后多被抑为奴）与奴婢之法，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大定四年（1164），完颜雍命泰宁军节度使张弘信等24名官员分检诸路物力。次外，又立诸路通检地土等第税法，既增加了朝廷府库的赋税收入，又使百姓的课税负担相对合理均平，而得以减轻。又取消金银矿税，听民开采。还一度罢免诸关征收商税，恢复并广开与南宋、西夏沿边的榷场。又诏造总计录，使朝廷和晓府库盈余或不足之数，避免官吏侵吞。

完颜雍大定年间（1161——1189），金廷财政充足，仓廪有余，政治局面安定。他在位期间，金、宋间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国内局势稳定，故史称他为“小尧舜”。

这一时期，大量的女真民户已内迁定居于燕山以南、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女真猛安、谋克户散处于汉人村落之间，逐渐接受汉族文化，通用汉族语言。为此，完颜雍一面继续推行学习汉族经史诗文的政策，一面又竭力保持和恢复女真族原有的风俗习惯及其本民族的文化，大力实施民族歧视和压迫的政策。一再搜括汉人田地，分配给女真猛安、谋克户，致使国内民族间的对立和矛盾依旧存在。

大定二十九年（1189）正月，完颜雍病故，时年67岁，庙号世宗。其孙、原王完颜璟（麻达葛）继位，是为金章宗。

完颜璟为宣孝太子完颜允恭之子，11岁时，即封为金源郡王。后从太子侍读、进士完颜匡、徐孝美学习女真语言、女真小字和汉文经籍。金大定二十五年（1185），其父、太子完颜允恭卒，完颜雍乃以其为嫡孙而册立为皇太孙，成为皇位继承人。其间曾出判中都大兴府事，又任尚书右丞相等职，参预朝政。完颜璟曾因精通女真语而得到完颜雍的赏识，他受封为原王时，即用女真语谢恩，使完颜雍大喜。但他即位后，却积极倡导和推行汉文化。即位之初，即命学士院进呈汉、唐便民事和当今急务。他擅长汉字书法，大量收藏历代图书。在完颜璟的倡导下，女真贵族研习汉文化蔚然成风。他还鼓励女真屯田户与汉族通婚，逐渐消除了女真、汉人及其他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矛盾，又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促进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完颜璟采取一系列积极的措施，维持安定的局面，巩固统治。金大定二十九年，他下令减百姓地税十分之一，河东南、北两路百姓减十分之二，下田减十分之三。之后，又下令解放奴婢，劝课农桑，减免赋役，注意发展生产。他多次诫谕官府，罢免不急之役；弛行宫、围场地禁，允许百姓入内耕捕樵采；制定屯田户自种及租佃法。

他亦十分重视清廉吏治，重置登闻鼓院。设提刑司，分按诸路，考察州县官员的治绩。他选择有才干的官吏为诸州刺史，又命五品以上官员上升后，即荐举一名任满后的接任者，而后令提刑司采访考察。还要求五品以上官员每年荐举一名清廉干练官吏，不拘资历，以备任用。还于亲王府设置王傅、府尉官，以限制诸王，"制诸王任外路者，许游猎五日，过此禁之，仍令戒约人从，毋扰民"③。

完颜璟亦重视史事的搜集整理和史书的修撰。令人寻访書

老，收集金太祖完颜旻、太宗完颜晟、熙宗完颜亶、世宗完颜雍四朝皇帝的言论，分类编纂成“圣训”。又续修金世宗、显宗完颜允恭的实录，完善起居注和日历的编写制度，以备编修国史。同时提倡尊崇儒家思想，尊孔读经，大力发展科举制，以招揽人才。金明昌二年（1191），完颜璟召谕有司：“进士程文但合格者即取之，毋限人数。”④且改变“律科举人止知读律，不知教化之原”的弊端，“必使通治《论语》、《孟子》，涵养器度”⑤。要求亲军35岁以下者，亦须学习《孝经》、《论语》等。明昌五年（1194），他下诏搜求《崇文总目》中所阙书籍，以高价向民间购买。如私家不愿出卖，则以书价之半租借，组织人力誊录后，再将原书归还。

完颜璟在位20年间，逐渐完善了金朝的典章制度。明昌元年（1190），设置详定所，审定律、令。编定成《泰和律义》30卷，《新定敕条》3卷，《律令》20卷，《六部格式》30卷，改变了此前条例与制书并用，时有牴牾的缺陷，完善且统一了律、令、格、式，为金朝一代成规定法。明昌六年（1195），又令编撰《大金仪礼》，使金朝的礼仪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完颜璟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使典章文物日臻完备，成为有金一代治规。

完颜璟在位期间，北方蒙古高原诸部族逐渐兴起。蒙古合底斤、山只昆等部一再兴兵，反抗金朝的统治，鞑靼更是不断侵扰金境。为此，完颜璟令右丞相完颜襄连年出兵征伐，大败鞑靼部。为防御北方游牧部族的侵掠，又于北边修筑长达千余里的壕堑，以阻止游牧骑兵南下。

金泰和六年（宋开禧二年，1206）四月，宋帝赵扩在宰相韩侂胄的力主之下，发动对金朝的北伐战争。五月，赵扩下

诏，令各路宋军北进。然而在金军的抗击下，宋军各路相继失败。金军遂乘胜分兵南下，攻占宋京西、淮南部分地区。南宋因兵败求和。泰和八年（宋嘉定元年，1208），金与宋重订和约：改金、宋叔侄之国为伯侄之国，岁币由银、绢各 20 万两、匹，增至各 30 万两、匹，宋朝另付金犒军银 300 万两，即“嘉定和议”。金虽取得战场上的胜利，然其损失亦相当惨重，右副元帅仆散揆、都元帅完颜宗浩等相继死于军中。

在南北战事不断的背景下，金廷又面临国内自然灾害的威胁。自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明昌五年（1194），黄河三次决口，大量土地被淹，众多百姓死于水患，或被迫逃亡。赋税收入急剧减少，但军费支出却有增无已。财政入不敷出，只得大量发行交钞，导致冗滥，又推行通检推排及括田等法，仍不能改观。

完颜璟以皇太孙继位，唯恐诸叔有轻慢之心，故以置王傅、王府尉官钳制诸王。但因此而引起诸王的不满。明昌四年十二月，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完颜永蹈谋废完颜璟自立，事泄赐死，株连甚众。此后，完颜璟对诸王防范甚严。明昌六年（1195）五月，判平阳府事、镐王完颜永中为完颜璟伯父，因倍受遏抑而郁郁不乐，其子常有怨言。于是完颜璟乃遣官责问，杀其二子，赐完颜永中死，且禁锢其全家，以致家中男女不得婚嫁者近 40 年。完颜璟严苛的防范措施及举动，在完颜宗室引起怨恨。

完颜璟晚年，不顾北方边患日趋严重，而娱情声色。朝廷上下纷纷效法，统治极度腐化。官吏弛慢，迁延苟简，循私卖法成风，吏治大坏。“上自省部之重，下逮司县之间，律度弗循，私怀自便”⑥。而军队不修武备，军纪败坏，将帅怯懦。

为了满足统治集团穷奢极侈和军队粮饷所需，只得加紧搜刮百姓财富，致使国内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国势日渐衰落，金朝的统治自完颜璟统治时期开始走向衰败。

金泰和八年（1208）十一月，完颜璟病死，时年41岁，庙号章宗。金世宗完颜雍第7子、卫王完颜永济（兴胜，又名完颜允济）继位，是为卫绍王。

注　释

①《金史》卷六《世宗纪上》。

②《金史》卷七《世宗纪中》。

③《金史》卷九《章宗纪一》。

④⑤《金史》卷九《章宗纪二》。

⑥《金史》卷一二《章宗纪四》。

金

卫绍王遭废

金泰和八年（1208）十一月，完颜璟病故。金世宗完颜雍第7子、卫王完颜永济继位，史称卫绍王。

完颜永济原名兴胜、完颜允济，完颜璟在位时，因避其父、显宗完颜允恭名讳，而更名永济。完颜永济母为世宗元妃李氏。他于金大定十一年（1171），受封薛王，进封滕王。大定十七年（1177），授世袭猛安。大定二十五年（1185），加开府仪同三司。其后任秘书监，转刑部尚书，改殿前都点检。完颜璟即位后，进封他为潞王，判安武军节度使。金明昌二年（1191），进封为韩王。明昌四年（1193），改判兴平军。金承安二年（1197），改封卫王。

完颜璟即位之初，“雅爱诸王，置王傅、府尉官以傅导德义”①。后因定武军节度使、郑王完颜永蹈谋废完颜璟自立，判平阳府事、镐王完颜永中不满受遏制，皆被诛。“由是疏忌宗室，遂以王傅、府尉检制王家，苛问严密，门户出入皆有籍”②。完颜永济虽为完颜永蹈母弟，然他“柔弱鲜智能，故章宗爱之”③。后完颜璟“已感嗽疾”，自已无子嗣，尽管诸

叔兄弟多在，他却执意要立完颜永济。不久，完颜璟病危，元妃李氏、黄门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颜匡定策，完颜永济于完颜璟病逝后，即皇帝位。

此时，北方蒙古草原各部已实现统一。金泰和六年(1206)，蒙古成吉思汗已建立大蒙古国，占据漠北。金大安三年（1211）二月，蒙古军开始南侵金朝。完颜永济一面遣西北路招讨使粘合合打向蒙古帝国乞和，一面遣平章政事独吉千家奴（独吉思忠)、参知政事胡沙行省事备边。独吉千家奴、胡沙领兵抵御，于乌沙堡被蒙古军击退，自抚州（治今内蒙古兴和境）退军，驻守于宣德州宣平县（今河北旧怀安东北)。八月，完颜永济罢免独吉千家奴、胡沙官职。改命参知政事完颜承裕率大军据守野狐岭，抵抗蒙古军入攻，亦兵败退守宣平。成吉思汗领兵追击，于会河堡（今河北怀安东）大败金军，完颜承裕遂逃往归德。蒙古军攻占居庸关（今北京西北)，前军进至金中都大兴府（今北京)。金参知政事梁瑭镇抚京城，严加戒备，禁止城中男子出中都城门，坚守城池。

金都城被围，各地金军纷纷赶来救援。上京留守徒单镒令同知乌古孙兀屯领兵2万入卫中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屯兵于通玄门外。完颜永济亦到诸军巡抚，以鼓舞士气。

不久，蒙古军另一路大兵，自西路攻占金净州（治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又入攻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金守将纥石烈胡沙虎（纥石烈执中）弃西京入逃京师。于是，金德兴府、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东过平州、滦州，南至清州、沧州，由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过辽河，西南至忻州、代州，皆归属大蒙古国。

面对蒙古大军的进攻，完颜永济与金廷慌作一团。以上京

留守徒单镒为右丞相，纥石烈胡沙虎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然而当徒单镒提议迁徙桓州（治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昌州（治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境）、抚州（治今内蒙古兴和境）三州百姓入内地时，完颜永济却以“是自蹙境土也”④，给予断然拒绝。不久，蒙古军占领三州，完颜永济方后悔不已。既而，徒单镒又请求于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设置行台尚书省事，以防备不测。完颜永济却极其不悦，认为“无故遣大臣，动摇人心”⑤。未几，东京失守，完颜永济又一次后悔不及。十二月，金廷签陕西两路汉军5000人赴中都。金崇庆元年（1212）五月，再签陕西勇敢军2万人，射粮军1万人，赴中都。由于中都守军的顽强抗击，蒙古军久攻不下，只得撤军解围而去。

崇庆元年秋季，成吉思汗再次率军大举南侵，掠昌州、桓州、抚州，随即再攻金西京大同府。时蒙古军于獾儿嘴布阵，金兵30万，号称40万，与之对阵。蒙古军将木华黎率敢死之士，策马冲击。成吉思汗指挥诸军并进，大败金军，直追至浍河，伏尸百里。金降将石抹明安领蒙古军抚定云中（今山西大同）东、西两路。既而，蒙古军继续向南进攻，包围金威宁、金防城，守将千户刘伯林献城投降，被成吉思汗委以原职。刘伯林擅长骑射，成吉思汗遂令他挑选士卒，与向导秃怀合兵征讨金军，招降山后诸州。

金军节节败退，国内局势日渐严峻，各种矛盾亦日趋尖锐。先有红袄军首领杨安儿于山东扯旗造反，攻劫州县，杀掠官吏。自益都（今属山东）东进，相继攻克莱州（治今山东掖县）、登州（治今山东蓬莱）等地，开仓济贫，聚众达数十万。既而山东又有刘二祖领导众人抗金。在蒙古帝国兴兵南侵之

时，金廷为防止边境地区出现骚乱及反叛事件，而加强对辽朝遗民的控制，下令契丹民一户，以女真民二户类居防守。金崇庆元年（1212），金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攻金隆安、韩州（治今辽宁昌图北），抢劫其地，屡败金兵，其后附众多至10余万，耶律留哥自为都元帅，率众进击金军，声震辽东。金帝完颜永济遣完颜承裕率军60万，进攻耶律留哥，扬言得耶律留哥骨一两，赏金一两；得耶律留哥肉一两，赏银一两；且封为世袭千户。金军大兵来攻，耶律留哥随即向蒙古求援。获援应后，耶律留哥即与蒙古军合兵，于迪吉脑儿与完颜承裕所率金兵交战，大获全胜。其后，蒙古帝国乃派耶律留哥屯守其地。崇庆二年（1213）春，耶律留哥自立为辽王，改元元统。

金朝动乱不止，境内陕西东路、河东南路、南京路、山东西路及卫州（治今河南汲县）等地又相继发生旱灾，之后，陕西全境亦面临灾害的威胁，以至饿殍遍野。而西夏则乘金朝国内饥荒严重，国势衰落之机，大举发兵进犯金保安州（治今陕西志丹），斩杀刺史等官吏；再进犯庆阳府（今甘肃庆阳）。金帝完颜永济一面对受旱之地赈灾救济，一面抚谕辽东，诏谕咸平路"契丹部人之啸聚者"⑥，企图以此缓和国内各种矛盾。但完颜永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丝毫没有缓解日益加剧的统治危机。

七月，成吉思汗又一次发兵攻金。先攻克金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再兵进德兴府（今河北涿鹿）。蒙古兵猛攻城池，皇子拖雷及附马赤驹先登上城。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南进怀来，乘胜至古北口（今北京东北）。蒙古军再度南侵，完颜永济忙部署中部防务。先遣尚书左丞完颜元奴领兵备边，又重新起用纥

石烈胡沙虎（纥石烈执中）为右副元帅，领武卫军 3000 人屯守中都城防北门（通玄门）外，又令治中福海另外领兵屯驻城北，欲使这两支军队合力抵抗蒙古大兵的进攻，以保卫京城的安全。

居庸关是抵御蒙古军进攻京师的重要关隘。金廷恃居庸关险要，冶铁加固关门，且于关外方圆百余里内，遍布铁蒺藜，以阻止蒙古骑兵的进攻，又派精锐之师戍守关口。成吉思汗见居庸关防守甚为严密，乃采纳扎八儿的献策：沿山间小道穿越黑树丛，一夜之间即可进入关内。蒙古军自日暮时分进入山谷，穿行于崇山野岭之中，至黎明时，诸军皆翻越大山，到达平原。旋即，成吉思汗指挥蒙古军疾驰闯入紫荆口。戍守的金兵尚在睡梦中，闻蒙古兵至，仓猝于五回岭（今河北易县西）迎击。金军大败，血流遍野，成吉思汗遂率军进击并占据涿（治今河北涿州）、易（治今河北易县）二州。不久，契丹人讹鲁不儿等金军守将献北口（今北京八达岭）投降蒙古，居庸关以北亦被蒙古军所据。

金右副元帅纥石烈胡沙虎在蒙古军大兵压境之时，却终日驰骋狩猎，根本不受理军务，因此遭到金帝完颜永济的斥责。纥石烈胡沙虎怨恨在心，乃与其党羽完颜绰诺、蒲察六斤等密谋作乱。于是，纥石烈胡沙虎妄称知大兴府图克坦南平及其子、驸马都尉穆延谋反，自称奉完颜永济诏令入城征讨。首先诱召图克坦南平姻家福海，执而杀之，且兼并其驻守城北的所部。既而率兵自通玄门入城，又诱杀图克坦南平及图克坦穆延于广阳门西。福海子、符宝郎鄯阳和都统石古乃率所部迎击纥石烈胡沙虎，不敌而亡。纥石烈胡沙虎又率兵叩皇宫东华门，遣人呼唤守直亲军百户冬儿、五十户蒲察六斤。见无人应答，

纥石烈胡沙虎便又许以世袭猛安三品官职，仍无人应答。都点检徒单渭河缒宫城而出，护卫斜烈砸毁大锁，开启宫门。纥石烈胡沙虎随即率兵闯入宫中，尽逐宫中卫士，代之以所部兵士。完颜永济逃入后宫。纥石烈胡沙虎自称监国都元帅，居大兴府（今北京）。

次日，纥石烈胡沙虎拥兵逼迫金帝出宫，用素车载之，送往其故邸卫王府，派武卫军兵士 200 人守卫王宫，不准完颜永济随便离开。尚宫左夫人郑氏为内职，掌管宝玺，得知宫中政变，金帝完颜永济被逐出宫处，遭囚禁，乃端坐于保管宝玺之所等待变故。不久，纥石烈胡沙虎遣黄门（宦官）入内索要宝玺。郑氏告之："玺，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将何为?"黄门答道："今天时大变，主上犹且不保，况玺乎，御侍当思自脱计。"郑氏厉声骂道："若辈宫中近侍，恩遇尤隆，君难不以死报之，反为逆竖夺玺耶？我死可必，玺必不与。"⑦说罢遂瞑目不语。黄门无奈，只得退出。纥石烈胡沙虎只好亲自出马，自郑氏手中夺得"宣命之宝"，封其党徒丑奴为德州防御使、乌古论夺剌为顺天军节度使、提控宿直将军徒单金寿永定军节度使，其余数十名党徒皆得迁官。但因不能以异姓监国，纥石烈胡沙虎只得造访尚书右丞相徒单镒，两人议定立金显宗完颜允恭长子、金章宗完颜璟兄、景王完颜从嘉（完颜珣）为帝。于是，纥石烈胡沙虎遣宦官李思中入卫王府中处死完颜永济。又诱使奉御完颜和尚写信急召其父、尚书左丞完颜元奴（完颜匡）入中都议事。完颜元奴不知有诈，乃率兵前来京城，被纥石烈胡沙虎囚禁于悯忠寺。不久便以其失 4 州、又败于缙山（今北京延庆），并其子一道杀害于市口。

此后，纥石烈胡沙虎尽撤沿边戍守诸军至中都，又以平州

（治今河北卢龙）骑兵屯驻于蓟州（治今天津蓟县），以为自保。遣使赴彰德府（今河南安阳）迎昇王完颜从嘉来中都即皇帝位，是为金宣宗，改元贞祐。

金至宁元年（1213）九月，完颜从嘉即位后，复改称完颜珣。以纥石烈胡沙虎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封泽王；尚书右丞相徒单镒进尚书左丞相，封广平郡王。纥石烈胡沙虎议请废前帝完颜永济为庶人，完颜珣便诏文武百官于朝堂商议此事，议者多达200余人。太子少傅奥屯忠孝、侍读学士蒲察思忠请求从废黜之议；户部尚书武都、拾遗田庭芳等30余人，请求降完颜永济为王侯；太子太保张行简请依汉昌邑王、晋海西公故事；侍御史完颜讹出等10人请求降完颜永济，恢复原封王。金帝完颜珣不知如何是好，提出"朕徐思之，以谕卿等"⑧。但纥石烈胡沙虎固执前议，完颜珣不得已，只得降完颜永济为东海郡侯，又昭雪道陵元妃李氏、承御贾氏。

十月，蒙古军5000骑兵由怯台、哈台二将率领，进攻中都。纥石烈胡沙虎令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出城迎战，战败而退。纥石烈胡沙虎欲杀术虎高琪，金帝完颜珣谕免。乃再遣术虎高琪出战，与怯台、哈台军自傍晚战至拂晓。时风沙骤起，再败而退。术虎高琪知入朝必为纥石烈胡沙虎所诛，便自率乱军入中都城后，径直包围纥石烈胡沙虎住所。纥石烈胡沙虎登墙欲逃，坠而伤股，被术虎高琪执杀。完颜珣下诏削夺纥石烈胡沙虎官爵，授术虎高琪为左副元帅。

金贞祐四年（1216），金帝完颜珣追复完颜永济卫王，谥曰"绍"。其时，蒙古军攻金不已，金朝国势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金史》卷一三《卫绍王纪》。

⑧《金史》卷一四《宣宗纪上》。

金

宣宗南迁

金至宁元年（1213）七月，大蒙古帝国主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南攻金朝，继攻克金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之后，又连克金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涿州（今属河北）、易州（治今河北易县），占据居庸关（今北京西北），进逼金中都大兴府（今北京）。

十二月，蒙古帝成吉思汗令怯台、哈台继续领兵攻击金中都城，屯兵中都城北。而后将金降将杨伯遇、刘伯林等汉军46都统及蒙古兵分为3路：以成吉思汗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沿太行山南进，先后攻占金保（治今河北保定）、遂（治今河北徐水西）、中山（今河北满城）、磁（治今河北磁县）、相（治今河南安阳）等州郡，直抵黄河，纵兵掳掠于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今属山西）之间；又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等将领为左军，统兵攻陷滦（治今河北滦县）、蓟（治今河北蓟县）及辽西诸州。成吉思汗则亲与其子拖雷同统中军，攻破雄（治今河北雄县）、莫（治今河北任丘）、沧（今属河北）、河间府（今河北河间）、济南府（今山东济南）等地。

蒙古军三路攻金，驰骋于两河（黄河、淮河）、山东数千里之间，破金90余州郡，杀戮掠夺甚多，凡金、帛、人口，以及羊畜马匹悉席卷而去，屋舍丘墟，所过皆残破不堪。唯有金中都、通（治今北京通县）、顺（治今北京顺义）、真定（今河北正定）、清（治今河北青县）、沃（治今河北赵县）、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德（治今山东陵县）、邳（治今江苏邳县）及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11城未下。三路在大军胜利北还，复屯于大口（今北京西）。未几，成吉思汗令蒙古军兵进中都城下，包围城池。

金贞祐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九年，1214）三月，蒙古兵围中都，成吉思汗驻扎于中都北郊，诸军将纷纷请求攻城，然成吉思汗不许。中都被围困，形势危在旦夕。金帝完颜珣多次遣使乞和，又以银两赏赐、诏谕军士，坚守城池，但形势依然严峻，乃再遣完颜承晖入元军请和。成吉思汗遂遣札八儿入中都城，告之金帝，山东、河北若均归蒙古帝国所有，则可退兵解围。且提出，要求金帝犒师，以消蒙古诸将领之怒。金帝完颜珣与诸臣商议，决定以遣使请和为上策。便再令都元帅完颜承晖至蒙古军中，向成吉思汗表示请和罢兵之意，且以东海郡侯完颜永济（即卫绍王）之女为岐国公主，进献给成吉思汗，并向蒙古军献纳金帛以及童男童女500人、马3000匹。成吉思汗下令退兵。中都随即解围。

中都虽解围，然因蒙古军于两河、山东一带的抢掠，致使财富损失严重，粮道亦遭断绝。为此，完颜珣下令于城中搜刮民粮，中都为之大扰。乃改令知大兴府胥鼎便宜筹划军粮，又允许富户大家纳粟买官。尽管如此，金廷财用依旧匮乏。

五月，完颜珣唯恐蒙古军再来，朝廷难保，加之财用不

足，国蹙民怨，中都亦难以守卫，乃决意离中都南迁，且诏告国内。太学生赵昉等上章极论南迁利弊，以为不当南迁。完颜珣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皆慰谕而遣。又命平章政事、都元帅完颜承晖，尚书左丞抹撚尽忠，与太子完颜守忠留守中都。自己则率皇室、百官，载运宫中珍宝，赴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成吉思汗得知金廷迁都开封，十分气愤，认为既和而迁，是有疑心而不释，乃再图南侵金境。

完颜珣一行，行至良乡（今北京西南），完颜珣命驻守于中都南边的乣（jiū 纠）军扈从护驾，且令原给铠马，尽数交还官府。乣军甚怨，拒不从命，遂作乱，杀其主帅素温，而推斫答、北涉儿、札剌儿三人为帅，金军愤然北还。中都留守完颜承晖闻知乣军叛乱，忙派兵拒守卢沟（今永定河），以阻止乣军北上，斫答率所部奋击，战败完颜承晖所部，乃遣使入蒙古乞降。成吉思汗立即遣石抹明安及三合拔都领兵入援，进军古北口（今北京东北），攻占顺义（今属北京）、蓟县（今属天津）等地。不久，石抹明安与斫答合兵，进逼中都，中都局势再度紧张。

蒙古军的南侵，金廷的南迁，更加剧了金朝国内的危机。山东、河北等地的反金武装斗争之势日盛，杨安儿起兵声势益发壮大，潍州（治今山东潍坊）李全等又率众抗金。其时各路抗金武装均身着红衣，以为标志，故称红袄军。在各路抗金武装中，以李全及其兄李福势力最为强盛，刘庆福、郑衍德等先期起事的抗金义军，均归附于李全。李全与杨安儿互相呼应四出打击金军。金廷遣宣抚使布萨安真至益都府（今山东益都），于城东击败杨安儿。杨安儿乃撤至莱阳府（今山东莱阳），继续反金。后莱州（治今山东掖县）守将徐汝贤以城降于杨安

儿，红袄军势力复强。登州（治今山东蓬莱）刺史耿格亦开登州城门，献纳州印，迎杨安儿入城，且尽出州府库藏慰劳红袄军。杨安儿于此设置官属，建年号天顺。随后，率红袄军攻宁海州（治今山东牟平），再攻潍州。在杨安儿屡战屡捷的形势下，其他反金武装亦频频出击。密州（治今山东诸城）方郭三率部众攻占州城，李全亦率众进攻益都。泰安州（治今山东泰安）刘二祖、霍仪、兖州（今属山东）郝定等亦相继起兵，率众进击州县重镇，打击金军。

山东、河北反金武装风起云涌，令金廷深感忧虑，金宣抚使布萨安真乃遣将征讨，镇压各地的反金斗争，然终不可遏止。而两地的地主豪强亦于蒙古军不断南下侵扰，金军节节败退的局势下，纷纷招兵买马，组织武装，据地自保。

七月，金帝完颜珣到达南京开封府，遂遣使入南宋，告之宋帝，金廷迁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宋起居全人真德秀上疏，请罢纳金岁币，认为女真因蒙古军侵凌不已，而迁都至汴京，“金有必亡之势。亦可为中国忧”①。宋帝赵扩采纳真德秀之议，罢输金岁币。金见宋停输岁币，更感困扰，乃遣使入宋，多次督催岁币，终不得而还。

十一月，兰州（今属甘肃）译人程陈僧反叛，且勾结西夏作为援应。而北方蒙古国频频派兵侵扰，金朝边境及北方终无宁日。为稳定国内局势，完颜珣下令赦免山东反金武装，然杨安儿与耿格不在赦免之列。金军乃继续追剿这两支武装，不久，耿格被杀。金廷又以陕西统军使完颜弼改任知东平府（今山东东平），领兵镇压杨安儿。杨安儿战败，与部将汲政等人乘舟入海，遭袭击坠水身亡，但山东的反金斗争并未中止。

自金崇庆元年（1212）叛金逃奔蒙古的原金北边千户、契

丹人耶律留哥，于辽东韩州（治今辽宁昌图北）自立为辽王后，亦成为金廷北边之患。金因此遣使招诱耶律留哥归降，又许以重禄，耶律留哥坚决不从。金帝完颜珣遂遣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统领40余万大军进攻辽东，耶律留哥率所部迎战于归仁县北河上。两军激战，耶律留哥所部终大败金军。金军战败，辽东金地大震，金安东同知阿林便向耶律留哥乞降归附，于是耶律留哥遂据有辽东诸州郡，乃以咸平府（今辽宁开原东北）建都，号为中京。其后，金廷又遣左副元帅移剌都统兵10万，再度征讨耶律留哥，亦战败而逃。

金贞祐三年（1215）正月，金北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北）叛乱。金北京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杀宣抚使兼北京留守奥屯襄，推举乌古论寅答虎为帅。不久，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献通州（治今北京通县），投降蒙古国。成吉思汗乃以蒲察七斤为元帅。金中都的形势更加危难。二月，金帝完颜珣命御史中丞李英、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领兵护送粮饷赴中都，且“付以空名宣勅，许视功迁叙，逗挠者治以军律”②，以此加强中都的防务。不久，又颁奖谕官吏军民诏书，以赦免招抚北京作乱者。未几，蒙古大将木华黎遣部将史天祥等进攻金北京，乌古论寅达虎拒战，不敌，遂献城投降。木华黎怒其投降迟缓，欲坑杀其众。蒙古军将石抹也先劝谏之，认为北京乃辽西重镇，当抚慰以得人心。木华黎以为可行，便以乌古论寅达虎为北京留守。

金中都大兴府自金帝完颜珣由此迁都至南京开封后，久为蒙古军所包围，处境十分困难。中都留守、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定国公完颜承晖与尚书左丞抹撚尽忠（穆延尽忠）会面商议，希望能一道与社稷同存亡。然抹撚尽忠不从，执意弃城南

逃。五月，完颜承晖写遗表，请尚书省令史师安石代为书录，于遗表中论述国事及术虎高琪奸状，且谢未能保住中都之罪。又尽出家财施散给家人，按跟随自己的时间长短分发财物。其后，完颜承晖便饮药自尽，由家人将其掩埋于庭院之中。是日黄昏，留居于中都城中的妃嫔，得悉抹撚尽忠将离城南下，便皆收拾好行装于通玄门等待与抹撚尽忠一同出发，抹撚尽忠欺骗众人称我当先出，为诸妃启途。随即与其爱妾等人出城，结果一去不返。

不久，蒙古军攻入中都。金户部尚书任天宠、知大兴府高霖等均死于蒙古兵刀下，宫室建筑均被乱兵焚毁。

中都陷落后，师安石携完颜承晖遗表至汴京。金帝完颜珣赠完颜承晖尚书令、广平郡王，追谥忠肃。未几，抹珣尽忠亦携爱妾等入汴京，金帝却不追究其弃城之罪，依旧以他为平章政事。

中都大兴府失守，蒙古大军南侵已无屏障可阻，加之国内反抗武装斗争不断，金廷在内忧外患之下处境依旧危急。

其时，成吉思汗驻守于鱼儿泺，遣大将三哥拔都率1万骑兵自西夏假道进军金京兆府（今陕西西安），乃进攻潼关（今陕西潼关县北）。守关金军顽强抗击，蒙古军遂由留山（今河南南召东）经小路至汝州（治今河南临汝）。途中遇山涧，蒙古兵便将铁枪相锁，连接成桥，得以越涧而行，因而顺利进至汴京。面对蒙古兵的突然降临，金帝惶恐不安，忙派人赴山东，急召花帽军前来京城救援。蒙古兵至杏花营，距京城仅20里，形势极为严峻。幸好花帽军及时赶到，又马不停蹄迎击蒙古军，终将其战败，转危为安。三哥拔都进攻汴京失利，率所部退至陕州（治今河南陕县）。适逢天寒地冻，黄河冰封，

蒙古兵遂北渡而上，河南暂告平安。

蒙古军此番突袭，尽管未能攻占金中都，然金廷的腐朽和虚弱再次暴露无遗。蒙古兵北撤之后，金廷一面向蒙古帝国遣使求和。成吉思汗欲应允和议，然臣僚撒没喝耻于自己未树战功，不同意议和。蒙古乃遣乙只里入金，向完颜珣宣称若欲和，则献出河北、山东两地尚未被蒙古军攻占的城池，并要求金帝去帝号称臣，封金帝为河南王。完颜珣认为蒙古国所提议和条件过于严苛，未从。

与此同时，金廷吸取蒙古军突袭京城的教训，严加防范。先是于陕西置行省。又增编步军万人，戍守京城以西；另增加步军4万人，戍守京城以东。选调陕西骑兵2000人，以增强京畿地区的防卫力量。继而又谕告陕西行省，令选兵置将，坚守延安（今属陕西）、临洮（今属甘肃）、环州（治今甘肃环县）、庆州（治今甘肃庆阳）、兰州（今属甘肃）、会州（治今甘肃靖远南）、保安（今陕西志丹）、绥德（今属陕西）、平凉（今属甘肃）、德顺州（治今甘肃静宁）、镇戎（今宁夏固原）、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原州（治今甘肃镇原）、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坊州（治今陕西黄陵东南）、宁州（治今甘肃宁县）、乾州（治今陕西乾县）、耀州（治今陕西耀县）等地要害之处。且分渭南州郡步兵屯守平凉府，令宣抚使治邠州（治今陕西彬县），副使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之澄城，以统领戍守之兵。另派步骑戍守渭水沿岸各渡口。金廷此番部署，在于严防蒙古军的入攻，但却连西夏的进攻也未能遏制。西夏于秋季乘金朝防范蒙古军入侵之机，出兵进攻金保安、延安等地，一举攻占临洮，生擒陕西宣抚副使完颜胡失剌，再度暴露了金廷的虚弱。

金朝岌岌可危的处境更加剧了国内的危机，继耶律留哥之后，金宣抚使蒲鲜万努亦据辽东，自称天王，建国号天真，改元天泰。而已定都韩州的耶律留哥与其子薛阇以90车载金币入东京，向成吉思汗请降归附。成吉思汗给予优遇，仍封耶律留哥为辽王，赐金虎符。此时耶律留哥有部众60余万，成吉思汗向耶律留哥索要3000人为质，并发蒙古兵300人前往索取。耶律留哥部将耶厮布等反对归附蒙古，而欲拥耶律留哥为帝，见蒙古索要人质，乃假称耶律留哥已死，遂率其部众反叛，杀300蒙古兵，只有3人逃归。

十二月，金廷迁徙朔州（治今山西朔县）百姓分屯于岚州（治今陕西岚县北）、石州（治今山西离石）、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吉州（治今山西吉县）、绛州（治今山西绛县）、解州（治今山西解县）等地，以避免临边民户遭受蒙古兵劫掠。

金贞祐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蒙古加紧对金的侵扰。正月，蒙古军攻占金曹州（治今山东曹县）。二月，蒙古军包围太原府，继而又攻占霍山各关隘，河东、河北暴露于蒙古兵铁蹄之下。金廷忙以河东南路宣抚使胥鼎为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于平阳府（今山西临汾）置行省，以筹划抗蒙古军入侵之事。八月，蒙古军进攻延安。九月，兵攻金坊州。金廷又以签枢密院事完颜永锡为御史大夫，领兵赴陕西，且许其“便宜从事”③。不久，蒙古入攻金代州（治今山西代县），金经略使奥屯丑和尚迎击，失利阵亡。

撒格巴图鲁率蒙古军又自西夏东进，至潼关之下。十月，攻占潼关，金安西节度使尼庞古蒲卢虎战死。撒格巴图鲁率所部越潼关继续东进，先进驻于嵩州（治今河南嵩县）、汝州（治今河南临汝）之间，后又进驻渑池（今属河南）。金右副元

帅蒲察阿里不孙迎击蒙古军，兵败而逃。蒙古军来势汹汹，金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胥鼎担心蒙古军将控制黄河两岸，乃令绛州、解州、隰州、吉州（治今山西吉县）、孟州（治今河南孟县）五经略司合兵，成夹击之势。蒙古军自三门集渡口北渡黄河至平阳府，胥鼎又派兵拒战，大败进犯的蒙古军。蠍格巴图鲁知平阳府不可取，撤兵北归。胥鼎随即出兵，乘胜夺回潼关。

这一年，蒙古军虽多次入攻金境，占据金河东、陕西、河北、山东众多州县城池，然金军亦收复数十座城池，金蒙于战场上的争夺日渐激烈，南京金廷内外交困的处境仍未有改变。

注　释

①《宋史》卷四三七《真德秀传》。

②③《金史》卷十四《宣宗纪上》。

金

金廷衰败

金帝完颜珣将京都自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南迁至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后，蒙古军侵扰金境益发频繁，攻占不已，甚至兵进汴京（今河南开封）城下，令金廷惊恐不堪。金廷的南迁，又严重挫伤河北等地军民的抗蒙斗志，士气低落，在蒙古大军的进攻之下，屡屡败退，河北、山东、河东（今山西）、陕西等地州郡重镇相继失守陷落。而境内反抗金廷残暴统治的武装斗争更是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四出打击金军，攻占州县城池，杀戮官吏，开仓赈穷。尽管金廷多次派重兵前往追剿、镇压，然反金斗争依旧持续高涨。这一切都充分暴露了金朝统治的腐朽和虚弱，亦加剧了统治的危机。金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叛金降蒙，自立为王。前往镇压的金宣抚使蒲鲜万努，亦于战败后，于辽东自立，且投降蒙古。一时间，金军将领，地方官吏多有叛金自立，或献城纳土，归附蒙古。金廷处于内忧外患，内外交困之中，处境十分危难。

面对金朝统治的严峻局势，金廷一面诏谕、安抚地方官民，又遣使入蒙古乞和；一面则于沿边各地部署军队，防范外

敌入攻。但局势仍无多少改观。金贞祐五年（宋嘉定十年，1217）正月，南宋沿淮河地区发生严重饥荒，沿金、宋边境饥民多有入金境抢劫为盗者。为转嫁统治的危机，以尚书右丞相术虎高琪为首的朝廷臣僚，主张南下侵掠宋境，以扩大疆土。对此，金帝完颜珣先是表示反对，以为"但能守祖宗所付足矣，安事外讨?"①然而，此时北边受蒙古军的攻掠，大片境土丢失。金廷军储严重不足，只得以停罢州府学生员廪给的办法筹措军粮。而根据金、宋和议，宋廷应贡岁币却被罢止，完颜珣只得命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庆寿、签枢密院事完颜赛不等经略南边。又采纳王世安取宋盱眙（今属江苏）、楚州（治今江苏淮安）之策，且任王世安为淮南招抚使，终定侵宋之议。

四月，完颜珣命乌古论庆寿、完颜赛不统大军南侵宋境。完颜赛不率所部于信阳（今河南信阳南）首战大败宋军。其后南渡淮河，破宋光州（治今河南潢川）两关，缴获军资分赐军中将士。又攻光州中渡镇，杀榷场官盛允升。乌古论庆寿则分兵攻宋樊城（今湖北襄樊），进围枣阳（今属湖北）、光化军（今湖北均县）。又遣将领完颜阿林领兵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进攻宋西和军（今甘肃西和）、阶州（治今甘肃武都）、成州（治今甘肃成县）。金军大举侵掠宋境，宋帝赵扩遂命京湖制置使赵方、江淮制置使李珏、四川制置使董居谊等领兵反击，积极部署防御。在宋军的顽强抗击下，金军的南侵一再受阻，已任升行枢密院事的乌古论庆寿只得谎报战绩，撤军北还。金帝以其"奏不以实，诏鞫之"②。

金廷挑起金、宋边境争端后，宋廷亦欲乘金朝危难之时，出兵收复河南失地。京湖制置使赵方为此上奏，请宋帝赵扩下诏征伐金朝。六月，宋军北上伐金。而金帝完颜珣则"以宋遣

兵数犯境，及岁币不至，诏谕沿边罪宋”③。自此，金、宋连年交兵，征战不息。

七月，宋军伐金之际，有金定远县（今属安徽）民季先越边境至山阳（今江苏淮安），见宋知楚州应纯之，言山东豪杰均愿归宋。应纯之乃命沈铎为武锋副将，与部将高忠皎各招集忠义民兵进攻金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后因粮运不济，乃退兵至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岛）。应纯之遂密报宋廷，称蒙古大军南侵，日逼金廷，中原可复。然宋尚书右丞相兼枢密使史弥远鉴于前宰相韩侂胄“开禧北伐”之败，不敢明令招纳山东忠义民兵，乃密令应纯之慰接来归之反金武装，号“忠义军”，悉听应纯之节制，由宋官府发给忠义粮。于是东海马良、高林、宋德珍等反金武装首领，集结部众万余人于涟水军（今江苏涟水），配合宋军讨伐金朝。

宋军在忠义军的配合下，大举伐金，围攻金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北），进围灵璧县（今属河南），袭破东海县。金军仓促应战，金海州经略司以其所部与宋军激战于石湫南，又战于涟水县，再战于中土桥，连败宋军，遏制住宋军进攻的势头。海州经略使阿不罕奴失剌、提控李元等相继率兵反击，俘获宋兵、军资甚多。金蔡州（治今河南汝南）帅府侦知宋军将入攻金息州（治今河南息县），乃派少量兵马诱宋兵深入金境，而以精锐于途中设伏袭击，大败宋军，生俘其将领沈俊等，缴获物资甚多。

金军虽击败宋军的进攻，但北边蒙古国势日渐强盛，成吉思汗以木华黎有佐命之功，拜为太师，封鲁国王，按命令行政事，且分弘吉剌等十军及蕃、汉诸军，皆归其指挥，又置行尚书省于燕云。木华黎因此率军南下攻克遂城（今河北徐水西）、

蠡州（治今河北蠡县）等重镇。此后，蒙古军又攻隰州（治今山西隰县）及汾西县，兵进沁州（治今山西沁源），进逼太原城（今山西太原），进攻交城（今属山西）、清源（今属山西）等地。十月，再攻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州）及新乐县，克陷磁州（治今河北磁县），进逼金都汴京，令金廷惶恐不安。而西边则屡受西夏的侵扰，沿边州县频频告急。金廷面临蒙古、西夏、南宋三面的威胁，兵力分散，疲于应战。因此不得不考虑缓兵之计。

时隔未久，金右司谏兼侍御史许古上疏，请先遣使与宋议和。尚书右丞高汝砺则反对议和，认为“和议先发于我，恐自示弱，非便”。但金帝完颜珣依旧命许古起草通报宋廷议和的文牒。待许古起草完，完颜珣便将此告之宰臣，“宰臣以其言有祈哀之意，徒示微弱，无足取者”④。和议之事遂罢，决定对南宋兴兵。十一月，完颜珣令唐州（治今河南唐河）、邓州（治今河南邓县）、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等行元帅府举兵伐宋。十二月，金将完颜赟率兵骑万人，入侵四川。大兵进逼湫池堡（今甘肃西和西），攻陷宋天水军（今甘肃天水）。之后又进逼黄牛堡（今陕西宝鸡西南），金、宋西部战争日趋激烈。

金兴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1218）二月，金军攻陷宋皂郊堡（今甘肃天水西南），宋军阵亡兵士多达5万余众。不久，宋利州（治今四川广元）制统王逸率领所部及忠义民兵，奋力拼杀，复又自金军手中夺回皂郊堡，进而又指挥众将士和忠义民兵进逼秦州（治今甘肃天水）。但因沔州（治今陕西略阳）都统制刘昌祖下令退师，且遣散抗金忠义民兵，招致宋军全线大溃败。兴元府（今西汉中）都统制吴政虽奋勇抗击，终因寡不敌众，战死于黄牛堡。新任沔州

都统制张威于大安军（今陕西宁强大安镇）歼灭金军精锐，迫使金军退却。四川宣抚使安丙又联合西夏夹攻金军。西夏军入攻金巩州（治今甘肃陇西），久攻不下而退兵。随后，安丙再部署宋军分兵北伐，金军英勇抗击，迫使宋军无功而退。

在京湖战场上，宋京湖制置使赵方督率部将扈再兴、孟宗政等，力拒金军。孟宗政戍守枣阳军（今湖北枣阳），筑堤蓄水，修治城堞，检阅兵士，严阵以待。金唐、邓元帅完颜赛不率步骑进围城池，孟宗政与扈再兴合兵抗击金军，历时三月之久，大小 70 余战。孟宗政身先士卒，拼死杀敌。金军屡遭失败，乃于城周围开濠引水，欲围困之。孟宗政遂招募壮士，乘金军不备之时，奋力突击，金军不备，稍稍后撤，随即又重新集结，再次攻城不止。适逢宋随州（治今湖北随县）守将许国率援军至白水（今湖北枣阳东南），孟宗政乘势出击，金军奔溃。

金兴定三年（宋嘉定十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二月，金军再攻宋兴元府，宋权兴元府事赵希訔（shí实）弃城而逃。金军占据兴元府后，又破宋大安军、洋州（治今陕西洋县），前任四川制置使董居谊逃遁。宋都统制张威命部将石宣截击金兵，大获全胜，金军被歼 3000 人，金将巴土鲁安亦被宋兵所俘，金军被迫撤兵。未几，金将完颜讹可再度围攻枣阳军，宋京湖制置使赵方命知随州许国等率军 3 万余人反攻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二州，以解枣阳之围。

闰三月，金左副元帅布萨安贞率兵入攻宋淮南地区，包围安丰军（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县）、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州）三州。宋江淮制置使李珏命池州守将

武师道及忠义军都统制陈孝忠率兵赴援，受金军阻击，而不得进。一时间，宋淮南百姓为战火侵扰，流离失所，纷纷南下，渡江避乱。金军游骑突进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杨林渡，使宋建康府（今江苏南京）为之大震。宋淮东提刑按察使、知楚州贾涉节制两淮抗金忠义民兵，命李全、李福等忠义军首领截断金军归路。李全乃率忠义军赶赴涡口（今安徽怀远），于化湖陂与金军激战，杀金将数人，金军乃解诸州之围而退。李全率所部紧紧追击不舍，又于曹家庄再败金军。金军遭此打击，不敢再兵至淮东。

金军于淮东遭败绩，继而再兵进淮西地区。七月，金将完颜额尔克率步、骑兵再度进攻枣阳军。宋守将孟宗政率全城军民顽强抵抗，以囊盛糠沙加固城防。金军的每次进攻均被击败，完颜额尔克又选精骑 2000，号称弩子手，携云梯及天桥登城进攻。孟宗政先毁城楼，又掘深坑，以防备金军挖地道入城。金军复又攻城，双方于城下血战凡 15 阵，金兵终未得胜。枣阳军遭金军围攻，宋将扈再兴、许国再率兵两路并进，进攻唐、邓二州，焚毁城栅粮储，以迫使金军退兵解围。金兵于枣阳城下屯兵 80 余日，攻城不得，而后方又遭抗金忠义军骚扰、打击，处境危险，士气日渐低落。孟宗政随即领兵反击，完颜额尔克指挥所部与之激战，终不敌败逃，3 万余金兵被宋军斩杀。自此金军不敢再窥视宋襄阳府（今湖北襄樊）及枣阳军。孟宗政给万余中原遗民归宋者以口粮及田地，且登记其勇敢壮丁，组成武装，号“忠顺军”，命出没于唐、邓二州之间，袭扰金军。

金兴定四年（宋嘉定十三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正月，宋将扈再兴发兵入攻邓州，许国入攻唐州，总兵

10余万步骑。金派兵增援，宋军力战失利，连夜焚毁营寨而去。金招抚副使术虎移剌答追击，夺其俘还师，继而兵进樊城，被赵方遣诸将领兵反击，被迫退归。金、宋间征战不已，双方兵力、财物消耗甚大，而金朝受蒙古、西夏攻掠，国力更难以支撑。金户部侍郎张师鲁为此上书，请求于开春之际，派遣数千骑兵，于两淮、四川地区并进，以骚扰宋境，掠夺财物，以充军饷。

尽管如此，金朝国内局势仍日趋严峻。为稳定国内局势，增强国势，金帝完颜亮遂定以设置九公、划地分守之策。诏命以河北、山东之地封沧州（治今河北沧州东南）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今属河北）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真定（今河北正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今北京）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治今山西左权）刺史、行元帅府事郭文振为晋阳公；平阳（今山西临汾）招抚使胡无作为平阳公；昭义（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此九公于北部金、蒙边境地区划地分守，均兼任宣抚使，总管本路兵马，且有权署设置官吏，征收本路赋税，及对官吏、将士给予奖惩，发号施令，以平定本路叛乱之事，治兵修缮，以防范蒙古军入攻。如能用兵收复本路临近失守州县，则归其管辖。

在金廷置九公以加强北边防务之际，西夏与南宋又相约进攻金境。先有西夏以书信达四川，议约南宋夹攻金军。八月，宋四川宣抚使安丙复致书西夏，定议夹击攻金。乃命宋利州统制王仕信率军至熙州（治今甘肃临洮）、秦州、巩州（治今甘肃陇西）、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另委派丁焴节制并招谕陕西五路官吏、军民起兵反金。西夏随即出兵，取金会州（治今甘

肃靖远南)。金陕西行尚书省遣官与西夏议和，以息兵，安宁边境，然九月，西夏枢密院使宁子宁统领20万兵马，围攻金巩州，且致书安丙，催促宋军出兵会攻。安丙遂令宋军自四川及陕西出兵。宋四川宣抚司统制质俊等攻占金来远镇，于定远城（今甘肃兰州东）大败金军。宋利州统制王仕信亦率军攻克金盐川镇（今甘肃陇西西)。随后，王仕信等率宋军与西夏军合兵会攻巩州，虽然奋力进击，终未破城。宋军遂自巩州退兵至秦州，西夏军亦自定远撤兵退回。

正当金、宋攻战不已之时，蒙古成吉思汗正统兵西征，而遣太师、鲁国王木华黎专事攻金。木华黎统兵先攻占金绛州(治今山西绛县)、潞州（治今山西长治)，继攻平阳府，金将郭用战死，行尚书省参政李革继续坚守平阳城，终因兵少绝援，平阳城失守，李革于城破之时自杀。此后，蒙古军攻占金河东诸州。其后，木华黎又派张柔领兵南征，相继攻克金雄(治今河北雄县)、易（治今河北易县)、保（治今河北保定)、安（治今河北保定东）诸州，引兵至满城（今属河北)。金真定经略使武仙调集数万兵马进攻蒙古军。此时张柔正率大部兵马入攻金河北之地，帐下仅留数百人，却以少胜多，大败金兵，且又攻克金定州（今属河北)，再败金军。金军于河北连连败北，令地方官吏闻风丧胆，由是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冀州（治今河北冀县）30余州县，皆归附蒙古。至金兴定四年，蒙古军攻金兖州（今属山东)，金泰定军节度使完颜畏可兵败身亡。六月，金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亦被蒙古军攻陷，开州（治今河南濮阳）及东明（今属山东）等州县相继遭蒙古军围攻。七月，金帝完颜珣派使臣乌库哩仲端入蒙古求和，称成吉思汗为兄，但未得应允。八月，金长清令严实先是

叛金降宋，将受其节制的太行山以东地区的魏（治今河北大名西）、博（治今山东聊城），恩（治今山东德州西南）、德（治今山东陵县）等诸州之地归宋。十一月，木华黎率军入济南府（今山东济南），严实又以其所领二府、六州及所辖 30 万民户降归蒙古。木华黎遂以严实为行尚书省事。

其时，金廷派 20 万大军屯驻于黄陵冈，且遣 2 万步骑于济南袭击木华黎。但为木华黎所部击败，蒙古军随即掩杀，攻占黄陵冈，且进兵围攻东平（今属山东）。

北边战事吃紧，河东、河北、山东及陕西大片境土失守，为蒙古军所据。金廷却于此不顾，依然与南宋征战。金兴定五年（宋嘉定十四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1221）二月，金将布萨安贞率军出息州（治今河南息县），于黄土关击败宋军，遂进军攻占麻城（今属湖北），围攻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汉阳（今湖北武汉）。三月，布萨安贞继续率军攻取蕲州（治今湖北蕲春），宋蕲州知州李诚之兵败自杀，其家人赴水殉难，官属亦多死。金军未敢于蕲州久据，不久便撤军北还。宋将扈再兴出兵邀击，大败金军。

五月，金东平府久为木华黎所统蒙古军包围，粮饷断绝。金将蒙古纲请求移山东行尚书省于河南，金枢密院则令其率军徙行省于邳州（治今江苏邳县西南），监军王庭玉移行元帅府于黄陵冈。蒙古纲方率众南走，蒙古军追至，斩首 7000 余级，蒙古纲仅以数百骑遁去。东平府遂告陷落，木华黎命严实抚慰东平以北恩、博等州。自此金失山东。

十一月，木华黎率蒙古军转攻金陕西北部地区，先兵进延安府（今陕西延安）。金元帅合答与纳买住统兵抵御。木华黎设伏兵，诱金军掩击。金军中伏战败，被追杀 7000 余人。合

答等遂坚守延安。木华黎留军继续围攻延安，自己则率军继续南下进攻鄜州（治今陕西富县）、坊州（治今陕西黄陵）等地。陕西由此再遭蒙古军战火侵扰。

金朝连年的征战，已极大地消耗了财力、物力，国内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弊，国用不支，金廷的统治更加摇摇欲坠。为了挽救垂危的统治，金帝完颜珣下令铸造“兴定宝泉”，每一贯可当“兴定通宝”400贯，币值巨贬，更令国人怨声载道，金朝境内反叛之事时有发生。十一月，金义勇军反叛作乱，占据砀山，且进击永城（今属河南）。金廷遣行军副总领高琬率军反击，又命蒙古纲率所部与之合兵进讨，方得以平息。十二月，金陈（治今河南淮阳）、亳（治今安徽亳县）等州和鹿邑（今属河南）、城父（今安徽亳县东南）诸县民众揭竿而起，金帝完颜珣令枢密院遣将领兵，前往镇压。金兴定六年（1222），金恒州又发生兵变，万户呼延械等10余人于城内肆意杀掠之后，焚城而去。金元光二年（1223）八月，金邳州驻军因蒙古纲督课部下甚严，亦兵变作乱。邳州经略使纳合六哥率众闯入行尚书省中，杀蒙古纲，占据州城。后金行枢密院总帅纥石烈牙吾塔率兵征伐，经一番激战，才得以收复邳州城。

在国内反叛不止，外敌攻战不已的局势下，金朝的统治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几尽衰亡。

注　释

①②③④《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

金

金拒蒙宋夹击

完颜珣（金宣宗）统治的后期，北方遭蒙古军的侵攻，自陕西，经河东（今山西）、河北，至山东，大片境土丧失，山东全境几近陷落于蒙古军手中。西夏亦乘机与南宋相约，合兵夹击金境，屡发兵攻掠金边州县，掳劫财物人口，令金廷疲于调兵防范。而南宋与金则长期征战不已，两淮地区战火不断。金廷因北方受蒙古军的进攻，损失惨重，却急欲用兵南宋，以弥补朝廷亏空，其结果是雪上加霜，财力、物力消耗极大，国用严重匮乏。

金兴定六年（宋嘉定十五年，西夏光定十二年，蒙古成吉思汗十七年，1222）二月，完颜珣因宋断绝纳金岁币，乃遣左监军讹可行元帅府事，节制三路兵马，以签枢密院事时全行枢密院事，为副帅，领兵南侵，金、宋间战火又起。

四月，讹可、时全率军自颍州（治今安徽阜阳）、寿州（治今安徽凤台）渡淮河南进，击败前来截击的宋军，随即击败宋庐州（治今安徽合肥）守将焦思忠所部。然因宋廷调兵增援，金军难以长驱直入。五月，讹可令撤兵北还。诸军行至距

淮河20里处，正欲渡淮北上，时全却矫称密诏，令诸军留驻淮南收获麦子。三日后，讹可等欲趁淮水浅时过渡，时全又加以反对。是夕，突降大雨，淮水暴涨，金军架桥渡淮，遭宋军袭击。金兵大败，夺桥而逃，不料桥突然坍塌，金兵多坠落河中溺死。其后完颜珣以罪杀时全，然金军此次南侵损兵折将，损失极其惨重，军中士气十分低落，金廷无力再与南宋交战。

金南征败北，北边又遭西夏、蒙古的进犯。八月，西夏进攻金德顺府（今甘肃靖宁），旋即又抢掠神林堡（今甘肃靖宁东）。十一月，蒙古太师、鲁国王统领大军南渡黄河，入攻金河东及陕西地区。先进攻同州（治今陕西大荔），既而克陷城池，金定国军节度使李復亨、同知定国军节度使讹可等皆兵败自杀。随后，木华黎又率军攻克蒲城（今属陕西），径趋长安（今陕西西安），金京兆府行尚书省完颜哈达率20万军坚守。蒙古军攻城不克，木华黎乃令蒙古蒲花分兵转攻金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十二月，木华黎自京兆府（今陕西西安）移师进攻凤翔。

金元光二年（宋嘉定十六年，西夏光定十三年、乾定元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1223）正月，凤翔为蒙古军围攻，完颜珣以凤翔守将完颜仲元孤军坚守，又遣平西军节度使赤盏合喜领兵救援。及蒙古军进围甚急，金帝又以同知临洮府郭斌总领军事。郭斌擅计谋，长于应变，指挥金军自冬至春，守城40余日。木华黎指挥蒙古军久围无功，只得撤兵，沿渭水南进，另遣蒙古布哈领兵攻掠金凤州（治今陕西凤县），之后退兵。

十二月，金帝完颜珣死，太子完颜守绪即位，是为金哀宗。

完颜珣临终之际，入夜，近臣皆出寝宫，唯有前朝资明夫人郑氏以其年老而侍奉于病榻之前。完颜珣知其忠实可信，乃诏之曰："速召皇太子主后事。"言毕即身亡。郑夫人恐宫中作乱，遂秘不发丧。完颜珣贵妃庞氏，为人阴狡机慧，常以其子完颜守纯年长而不得立为太子，心中不快。是夜，庞贵妃与皇后询问金帝病情，郑夫人恐庞贵妃有变，故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① 等庞贵妃一入后宫，郑夫人即锁闭宫门，急召大臣，传遗诏立皇太子完颜守绪。待遗诏宣毕，始开锁唤后妃出宫，发丧。完颜守绪得遗诏方入宫，完颜守纯已抢先进得宫中。完颜守绪闻讯，立即分遣枢密院官及东宫亲卫军官移剌蒲阿调集3万余人集结于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宫城东华门街。待部署已就，完颜守绪便令护卫4人将完颜守纯监于近侍局中，自己才入寝宫，于完颜珣柩前即位。

完颜守绪即位之时，面临外部强敌攻掠，国内叛变作乱的局面，局势动荡不安。完颜守绪首先决定停止与南宋的战争，金正大二年（宋嘉定十七年，1224）六月，遣尚书令史李唐英赴滁州（今属安徽），与宋通好。之后，又遣枢密判官移剌蒲阿率兵至宋光州（治今河南潢川），张榜告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之意②。十月，西夏遣吏部尚书李仲谔入金，通问交好，称弟而不称臣，且各用本国年号。完颜守绪亦遣吏部尚书奥敦良弼赴西夏，通报两国和议之事。自此，金与南宋、西夏间长期的征战得以平息。

此时，蒙古成吉思汗已西征归来，遂以西夏曾收纳蒙古仇敌，且又不遣质子入蒙古为由，亲统大军征讨西夏。连克西夏重镇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北）、肃州（治今甘肃酒泉）、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又兵攻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西夏军队

已溃不成军，其统治危在旦夕。

金正大四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1227）正月，蒙古灭亡西夏已指日可待，成吉思汗乃留兵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即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自己则统大军南渡黄河，进攻金积石州（治今青海循化），遂攻占金洮河（治今甘肃临洮）、西宁（今属青海）二州。成吉思汗又遣兵攻克金信都（今河北冀县）。五月，完颜守绪召集群臣，商议与蒙古和议之事，群臣多以为议和为便。完颜守绪乃下诏，命行尚书省斟酌发遣。不久，陕西行尚书省进呈攻守三策："上策自将出战，中策幸陕州（治今河南陕县），下策弃秦（治今甘肃天水）保潼关（今陕西潼关北）。"③然欲和议的金廷对此不予采纳。六月，金帝遣前御史大夫完颜合周为议和使。其时，成吉思汗正领兵于西夏境内大举歼灭西夏军，尽占西夏城邑。西夏国都中兴府被围已久，西夏末主李睍走投无路，力屈乃降。适逢避暑于六盘山的成吉思汗病故，其第四子拖雷监国，而对金朝的乞和置之不理。

十二月，蒙古灭亡西夏后，继续向金朝发起进攻，连破潼关外诸隘，兵取武州（治今山西武寨北）、阶州（治今甘肃武都）、商州（治今陕西商县）。宋四川制置使郑损丢弃沔州（治今陕西略阳），领兵南逃，于是入川的重要门户大散关、仙人关等三关皆无兵据守。金亦尽弃河北、山东关隘，以缩小战线，收缩兵力，戍守潼关，死保河南。金于洛阳（今属河南）、三门（今河南三门峡北）、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迤东，至邳州（治今江苏邳县西南）雀镇，东西千余里之间，设置四个行尚书省，以 20 万精兵守御这一地区。

金正大五年（宋绍定元年，蒙古拖雷监国元年，1228）正

月，金得知成吉思汗死讯，仍欲与蒙古议和，乃遣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和杨居仁赴蒙古吊唁。然与蒙古议和之事，依旧未果。

金正大六年（1229）八月，蒙古耶律楚材宣成吉思汗遗诏，召诸王集会，请立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自成吉思汗起兵反金定西域，窝阔台功绩卓著。于是监国拖雷与诸王奉窝阔台即位于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尔和林）东库铁乌阿剌里之地。九月，金再遣使赴蒙古，归还蒙古太祖成吉思汗之赙（fù附），窝阔台却而不受，遂与诸王商议伐金。十月，窝阔台汗发兵进击金境，屯驻于庆阳府（今甘肃庆阳）境上。金完颜守绪命陕西行尚书省遣使入蒙古军营中，向其将士赠送羊、酒、币、帛，乞求蒙古缓师，以便请和。然蒙古军拒绝金廷的请和。

金正大七年（蒙古窝阔台汗二年，1230）正月，金以枢密副使移剌蒲阿、总帅纥石烈牙吾塔、权签枢密院事完颜讹可领兵解救庆阳之围。移剌蒲阿于大昌原（今陕西宁县西）与蒙古兵遭遇。移剌蒲阿乃以完颜彝（陈和尚）所率由回纥、乃蛮、羌等族人组成的忠孝军为前锋。完颜彝仅以400骑与蒙古军8000兵交战，以少击多，大获全胜，于是庆阳府之围随即解除。金军取得自金蒙交战以来的首捷。之后，金令完颜讹可屯守邠州（治今陕西彬县），移剌蒲阿、纥石烈、牙吾塔还师戍守京兆府。

金军虽有庆阳府之捷，但在蒙古大兵压境的形势下，只能被动挨打。六月，蒙古军再度围攻京兆府，金急令救援。援兵于途中被蒙古所败。京兆府很快为蒙古军所破。七月，窝阔台汗亲自统兵征伐金朝，拖雷及皇侄蒙哥亦率军从征。八月，蒙

古军将先叛金复又叛蒙入逃金朝的原金恒山公武仙包围于卫州（治今河南延津北）。金权参知政事，京兆府行尚书省事、兼统河东两路完颜合达与枢密副使移剌蒲阿引兵救援卫州。蒙古兵退，卫州之围遂解。金帝亲临承天门上犒赏军士，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一同世袭谋克。正在这时，窝阔台汗则遣苏格为使臣入金。以通好为名，实为窥探金朝虚实。苏格入金，告诉金帝完颜守绪如能恭修岁币，通好不绝，则可转祸为福。完颜守绪反唇相讥，如蒙古欲加兵于金朝，金则敢以精锐相战，且告之岁币非所愿闻。苏格使金，绝非通好，乃默识入金道途及金廷虚实，待返回蒙古后，尽告之窝阔台汗，深得其赞赏，自此，蒙古军做好了攻金的一切准备。

不久，拖雷即率大军入攻金陕西，于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同州（治今陕西大荔）、华州（治今陕西华县）之间连破金寨栅 60 余所，进而逼近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完颜守绪命完颜合达及移剌蒲阿于阌乡（今山西风陵渡南）行尚书省事。以固守潼关。不久，拖雷率军进攻潼关。遭守军顽强抵抗，未能破关，十二月，蒙古军攻克金天全寨、天胜寨、又占据韩城（今属陕西）、蒲坂（今山西永济西），进一步包围河南之地。

金正大八年（宋绍定四年，蒙古窝阔台汗三年，1231）正月，蒙古拖雷指挥大兵围攻凤翔府。完颜守绪遣枢密院判官白华、右司郎中夹谷八里门诏谕阌乡行尚书省进兵救援凤翔府，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等却以“未见机会不行”。完颜守绪复遣白华诏谕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领兵出潼关，解凤翔府之围，两位将领仍不肯出兵。四月，凤翔府失守。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遂弃京兆府，迁其民于河南，而留庆山奴戍守。蒙古军继续攻金，速不台率所部于倒回谷遭完颜彝邀击，大败而逃，受窝阔

台汗责备，乃从拖雷南征。

蒙古军于陕西、河东等地连败金军。然金廷缩小战线，收缩兵力后，形势亦有所改变，金军于战场上亦多次击败蒙古军，且潼关不克蒙古兵难以进军河南。时有金朝降民李国昌告之拖雷，金廷迁至中都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已近 20 年，所依仗者为潼关、黄河两道天然屏障。若蒙古军兵出宝鸡（今属陕西），入汉中（今属陕西），即可抵达金唐（治今河南唐河）、邓（治今河南邓县）。拖雷即以此奏闻窝阔台汗。窝阔台汗遂会集诸将，约定于明年正月会合南宋、蒙古南北军，进攻汴京（今河南开封），且命拖雷率兵先期赶至宝鸡。随后又遣速不台为使臣，假道河南入宋，请宋廷发兵，以合击金军。六月，速不台行至沔州（治今陕西略阳）青原野，被金统制张宣所杀。

八月，蒙古以使臣速不台途中被杀为由，拖雷乃分 3 万骑兵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破宋凤州（治今陕西宝鸡西南），进逼华阳（今陕西勉县东），兵围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南宋军民死者甚众。随后，拖雷再分兵两路：西路军入沔州，渡嘉陵江，直趋葭萌（今四川剑阁东），连破城寨 140 余座而还；东路军屯驻于兴元府、洋州（治今陕西洋县）之间，兵趋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

在拖雷领兵入攻秦岭、四川之际，窝阔台汗又兵进金河东南路。金军退守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东），且据河中城之半，以便防守。蒙古军乃于城下筑起松楼，高 200 尺，下视城中，又筑土山，掘地穴，百道并进，昼夜力战，终破河中城。金军将士多死于阵前，唯有 300 余兵夺船而逃，败走阌乡。蒙古兵进至黄河北岸。十二月，拖雷攻破饶风关，自金州（治今陕西安康）东进，直趋汴京。沿途军民皆入保城堡，以避兵乱战

火。拖雷率蒙古军因此一路如入无人之境。

金正大九年（金开兴元年、天兴元年，宋绍定五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1232）正月，拖雷所部游骑已抵汴京城郊，而河东蒙古军亦自河清县白坡渡黄河南进，两路蒙古军直扑金都。蒙古军途经唐州时，金元帅完颜两娄室于襄城汝坟与之接战，不敌败走汴京。金帝完颜守绪派遣知开封府事完颜麻斤出等率民丁万余人，决黄河水，以阻止蒙古军前进。不久又于宫中置尚书省、枢密院，以便随时召问。金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自邓州率步骑15万人赴援汴京，行至钧州（治今河南禹县）沙河，遇拖雷所部。金军且行且战，至黄榆店，距钧州尚有35里地，适逢大雪，天寒地冻。蒙古军随即包围金军，既而又闪开通往钧州之路，放金军突围。而后复又夹击，金军大败。金将武仙逃入密县，樊泽等英勇抗敌，直至身亡。完颜合达、完颜彝、杨沃衍等率数百骑左突右冲，方得退入钧州城中。蒙古军兵进郑州（今属河南），拖雷所部于此与白坡渡河蒙古军合兵，金军难以抵挡。

蒙古军入攻河南，各地金军纷纷入援汴京。金都尉乌林荅胡土率所部自潼关赴援；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京；徐州（今属江苏）行尚书省完颜庆山奴引兵入援。但与此同时，众多金将及地方官吏慑于蒙古兵威，而相继投降归附蒙古。屯军元帅马伯坚献城降；义胜军校侯进、杜正、张兴率所部投降；许州（治今河南许昌）军变，杀元帅古里甲石伦、粘合仝周、苏椿等，以城献蒙古。一时间，河南境内大乱，人心惶惶。

窝阔台汗复派援兵入河南，兵至之处，金军纷纷溃败。未几，蒙古大军围攻钧州，与金军战于三峰山，金军大溃。钧州

城失守，完颜合达被杀。完颜彝不屈而死。移剌蒲阿突围出城，欲走汴京，亦为蒙古兵所追杀。于是金之骁勇健将损失殆尽，兵势不可复振。

二月，蒙古军攻入饶风关，完颜守绪遣将据守潼关。金关、陕行尚书省徒单兀典，总帅纳合合闰，秦、兰总帅完颜重喜等统领关、陕行省两军及秦、兰帅府军 11 万、骑兵 5000 人自秦、兰诸关撤退东进。蒙古军随即赶至，两军遭遇，正值天降大雪，金军不战自溃，徒单兀典、纳合合闰战死，完颜重喜投降，亦被斩于马前。于是潼关守将李平献关投降。徐州行尚书省完颜庆山奴引兵入援汴京途中，于阳驿店与蒙古兵遭遇。两军激战，徐州元帅完颜兀里力战而死。完颜庆山奴被生擒，蒙古兵令其赴金南京招降金廷，完颜庆山奴誓死不从。睢州（治今河南睢县）刺史张文寿弃城随从完颜庆山奴入援，亦战死。蒙古军乃入据商州、睢州、陕州，河南已无险可守，金都南京已暴露于蒙古大军铁蹄之下，金廷危在旦夕。

注　释

①《金史》卷一六《宣宗纪下》。

②③《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

金

哀公迁蔡

金正大九年（金开兴元年、天兴元年，宋绍定五年，蒙古窝阔台汗四年，1232），蒙古窝阔台汗大举入攻金境，陕西、河东（今山西）、河北、山东等几尽为蒙古军占据，金廷已蜷缩于河南之地。正月，蒙古太师、鲁国王拖雷率所部出宝鸡（今属陕西）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入汉中（今属陕西），直趋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进入河南。金权参知政事、京兆府行尚书省事兼统河东两路完颜合达与枢密副使移剌蒲阿、忠孝军总领完颜彝（完颜陈和尚）等自邓州（治今河南邓县）率步骑15万兵赴援汴京（今河南开封），于钧州（治今河南禹县）被蒙古军击败，几位将领皆被杀。未几，窝阔台汗复遣援兵南下，破金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东），南渡黄河，与拖雷所部合兵，遂进击河南诸州县。

三月，蒙古军架设火炮轰击，攻占洛阳（今属河南）。随后蒙古军主将拖雷等北归，而留速不台等领兵继续进兵，围攻金都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且遣使自郑州（今属河南）入开封召谕金廷急速献城投降。使者入金廷，出国书授译史，

译史转授金宰相，宰相呈书跪进，金帝完颜守绪起立受之。蒙古国于国书中索要金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27家，及归顺蒙古的金官吏、将士的家属，移剌蒲阿妻子，以及绣女、弓匠、鹰人等。应蒙古国之请，金帝完颜守绪封荆王子完颜讹可为曹王，由尚书左丞李蹊将其送往蒙古军中为质。另遣谏议大夫裴满阿虎带、太府监国世荣为讲和使。又分军防守汴京四面城墙，以抵抗蒙古军的进攻。

蒙古军复以炮石攻城，其炮石球形，大小约一斤重，可击破大甲。蒙古兵于汴京每一城角处设炮，以石轰城，数日后，石积与城墙平。守城金军亦以大炮还击，其炮名震天雷，以铁罐盛火药，用火点燃，炮声如雷，可射透诸铁甲。金兵还以飞火枪射杀蒙古兵。蒙古军攻城16昼夜，蒙古兵死者上万计。攻城之初，完颜守绪出承天门抚慰西面守城将士。之后又出宫外抚慰东面守城将士，且于南薰门下亲自为受伤将士敷药包扎，赐酒食，又出内府金帛器皿犒赏浴血奋战的将士。兵士李新守城有功，即擢升四方馆使，以此激励将士。

四月，金帝遣户部侍郎杨居仁携金帛赴蒙古军中乞和。速不台见攻城十数日，伤亡甚众，知汴京城不易取，遂应允议和。金复遣杨居仁携珍奇异物出宜秋门，贿赂速不台，又以酒肉犒劳蒙古兵。速不台乃下令退兵，散屯于黄河、洛水之间。南京之围暂时解除，完颜守绪下令改元天兴。又诏告朝廷内外，“官民能完复州郡者，功赏有差”。又“出金帛酒炙，犒饫军士”。且“减御膳，罢冗员，放宫女”。规定“上书不得称圣，改圣旨为制旨”。令汴京解除戒严，“步军始出封丘门采薪蔬”①。然金廷统治的危机依然如故。

六月，戍守汴京城200余飞虎军兵士夺封丘门出逃，完颜

守绪乃令“塞京城四门，以便守御”②。不久，金徐州（今属江苏）埽兵总领王佑、张兴及都统封仙等人据徐州叛乱，火烧草料场，将行尚书省徒单益都驱赶至宿州（治今安徽宿县），众人推举张兴行尚书省事。不久，蒙古将国安用率兵入徐州，杀张兴、王佑等人，而推封仙为元帅，主持徐州事。此后，金宿州镇防千户高腊哥、李宣杀节度使纥石烈阿虎父子，请行省徒单益都主元帅府事。徒单益都不从，乃率其所部将吏出宿州城西走。至谷熟遇蒙古军，战败身亡。

七月，蒙古帝窝阔台汗遣唐庆为使臣，率30余人入金。向金廷传谕，欲通和好，金主需亲自至蒙古商议和好之事。完颜守绪乃称病，于卧榻上会见唐庆等使者。唐庆多有不逊之语。金飞虎军士申福、蔡元等愤其无礼，是夕，闯入驿馆，擅杀唐庆等30余人。金帝处死申福等，但金与蒙古的和议遂告断绝。

金恐蒙古军再至，乃为之备，“以膀召民卖放下年军需钱，上户田租如之”③。又以御史大夫完颜合周、点检徒单百家等主持搜括京城粟。且许卖官及令百姓买进士第。然搜括粮粟甚为严苛，致使死者相继，无论贫者富者均束手待毙，以至于人相食。括粟使者、兵马都总领完颜九住以所括粟中夹有蓬稗，竟杖杀孝妇于尚书省门前。

十月，金泗州（治今江苏盱眙北）守将完颜赛哥叛，杀防御使徒单塔剌。金总帅纳合买住将盱眙（今属江苏）归附南宋，宋廷乃改其地为招信军。

十二月，窝阔台汗为加速灭金战争，遣王楫（ji辑）为使臣，入宋商议夹攻金朝之事。宋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奏呈宋帝赵昀（宋理帝）。赵昀乃命史嵩之转报蒙古使臣，史嵩之又

遣邹伸之赴蒙古，约定事成则归河南地于宋。

是月，完颜守绪以“事势危急”，遣近侍向枢密院判官白华询问计策，白华则对以“纪季以酅入齐之义”④。完颜守绪遂决意离开汴京出行，乃除拜扈从及留守京城官。以尚书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完颜赛不，平章政事、权枢密使兼右副元帅完颜白撒，右副元帅兼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完颜讹出，兵部尚书、权尚书左丞李蹊，元帅左监军、行总帅府事徒单百家等，率诸军随金帝出行扈从。以参知政事兼枢密院副使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习捏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外城东面元帅把撒合，南面元帅术甲咬住，西面元帅崔立，北面元帅孛术鲁买奴等留守京城。又擢升魏璠为翰林修撰，令其赴邓州招武仙领兵入援。除拜既定，金帝乃将京城交付给完颜奴申等官员，又登临端门，散发府库及两府器皿、宫人衣物，赐予将士。其时，朝中官奴、阿里合等人谋立荆王为帝，不成。完颜守绪虽知其事，然因时间紧迫，亦置之不问。部署停当，金帝便与太后、皇后、诸妃告别，众人抱头痛哭。金帝与扈从一行至公主苑时，太后遣中官持米、肉犒慰扈从军士。待出开阳门外，完颜守绪诏谕留守军士：“社稷宗庙在此，汝等壮士也，毋以不预进发之数，便谓无功，若保守无虞，将来功赏顾岂在战士下?”⑤闻者无不流涕。

巩县（今属河南）元帅完颜忽斜虎自金昌赶至，称京西300里内无人烟，不可往，完颜守绪遂决定东行，乃经陈留、杞县（今属河南）、黄城、黄陵冈，准备渡黄河。蒙古军将速不台闻知金帝已出城东行，乃复进兵，围攻汴京城。

金天兴二年（宋绍定六年，蒙古窝阔台汗五年，1233）正月。完颜守绪乘船渡河，突遇大风，后军尚未渡济。蒙古军追

至南岸，金军奋力抵抗，元帅完颜猪儿、贺都喜阵亡，建威都尉完颜兀论出投降蒙古军。完颜守绪于黄河北岸哭祭阵亡将士，复招集兵粮，议取卫州（治今河南汲县）。又以元帅蒲察官奴领忠孝军千人，东面元帅高显、果毅都尉粘哥咬住领兵万人为前锋，至蒲城。不久，平章政事完颜白撒，元帅和速嘉兀底不相继赶至。完颜白撒随即引兵攻卫州，不克，得知蒙古军自河南渡河，已行至卫州西南，遂退师。完颜白撒与蒙古军战于白公庙，败绩，完颜白撒弃军东逃。元帅刘益、上党公张开亦逃走，于途中为民家所杀。

为尽快摆脱蒙古军的追击，完颜守绪采取完颜白撒之谋，趁黑夜弃六军渡河，与副元帅合里合六七人急赴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次日凌晨，诸军始知金帝弃军而去，遂溃散。司农大卿蒲察世达、元帅完颜忽土出归德府西门，迎金帝入城。完颜守绪乃遣奉御术甲塔失不、后弟徒单四喜前往汴京奉迎太后、皇后两宫。又遣使召完颜白撒至归德，数其罪，下之狱，籍其家财以赐将士。另遣归德府知府、行户部尚书蒲察世达、都转运使张俊民赴陈州（治今河南淮阳）、蔡州（治今河南汝南）等地索取食粮，且令元帅李琦、王璧护卫。金帝暂时居归德府。

完颜守绪离汴京出行后，速不台攻城日急。城中形势异常危难，米价一升易银2两，致使民饥骚乱。金安平都尉、京城西面元帅崔立与其党徒韩铎、药安国等举兵叛乱，杀参知政事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完颜斜捻阿不，勒兵入见太后，又召集百官商议所立。乃以太后名义，传令召卫王子完颜从恪，封为梁王，监国。随即崔立又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未几又自称左丞相、都元帅、尚书令、郑王。以其弟崔倚为平章政

事、崔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李术鲁长哥为御史中丞、韩铎为副元帅兼知开封府，折希颜、药安国、张军奴、完颜合荅并为元帅。而原殿前右副点检温敦阿里，左右司员外郎聂天骥，御史大夫裴满阿虎带，谏议大夫、左右司郎中乌古孙奴申，左副点检完颜阿散，奉御忙哥，讲议蒲察琦等人一并遇害身亡。崔立遂送降款于速不台军前。速不台乃遣军将碎不解进兵汴京。

崔立献城投降蒙古后，又将金帝衮冕及皇后服饰赠送速不台。又“阅随驾官属军民子女于省署”⑥，甚至禁止民间嫁娶，搜括汴京城内金银，残酷索取，死者相藉。随后，崔立令太后、皇后、梁王、荆王及诸妃嫔出宫，共载于37辆车上，与宗室男女500余人，以及衍圣公孔元楷和医、卜、工匠、绣女等人送至青城速不台军中。速不台杀梁、荆二王及其族属，而将金太后、皇后、诸妃嫔等遣送至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依蒙古旧制，凡遇抵抗，破城后即要屠城。速不台乃遣使言于窝阔台汗，请求屠汴京城。经耶律楚材再三劝谏，窝阔台汗方令速不台只杀完颜氏一族，他人均免死。其时，汴京城中的民户尚有140万户，乃得保全。

完颜守绪至归德府后，虽尽括城中粮粟，然城中粮草仍不足供食。因而除留元帅蒲察官奴所统忠孝军450人，都尉马用所部280余人于城中就食外，其余诸军悉发往宿、徐、陈三州就粮。三月，金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知归德府事石盏女鲁欢向金帝乞请尽散卫兵出城就食。蔡州元帅乌古论镐送粮400余斛至归德，表请金帝临幸蔡州。完颜守绪乃遣学士乌古论蒲鲜入蔡州，向州人告谕金帝欲临幸蔡州之意。

不久，蒲察官奴以所统忠孝军作乱，攻杀都尉马用，又杀尚书左丞李蹊、参知政事石盏女鲁欢、殿前点检徒单长乐及从

官右丞以下300余人。金帝恐事态扩大，乃取权宜之计，赦免蒲察官奴之罪，而公布石盏女鲁欢罪状，以蒲察官奴为枢密副使、权参知政事，左右司郎中张天纲为户部侍郎、权参知政事。未几，蒲察官奴真授参知政事，兼左副元帅。蒲察官奴窃据要位，又以金帝居住照碧堂，“禁近诸臣无一人敢奏对者。”金帝悲泣不已：“自古无不亡之国、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用人，致为此奴所囚耳。”⑦ 遂与内局令宋珪等人谋议诛除蒲察官奴。

金帝于归德府处境危急，金唐、邓州行尚书省武仙于顺阳（今河南邓县西北）与金唐州（治今河南唐河）守将武天锡、邓州（治今河南邓县）守将移剌瑗合谋，欲迎金帝入蜀，于是发兵入侵宋光化（今湖北襄樊西北），以便打通入蜀之途。宋将孟珙迎击金军，大败武天锡军，遂领宋军进攻顺阳，武仙败走马蹬山。

五月，金参知政事，权左副元帅蒲察官奴奉金帝之命，至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向蒙古军请和。蒲察官奴与蒙古军将忒木解言，欲劫持金帝降蒙古。忒木解信以为真。端午之夜，蒲察官奴率忠孝军450人登舟，径直进攻王家寺忒木解军帐，以火枪射杀蒙古兵。蒙古军大败，溺死军士多达3500余人。

金帝离汴京时，以强伸为金中京（今河南洛阳）留守。其后又以总帅、权参知政事乌林荅胡士代行省事，强伸行总帅府事。六月，城中粮尽，军民稍散。蒙古军旋又来攻，布阵于洛水南岸，强伸则阵于洛水之北。蒙古韩元帅派人招降，强伸以矢射之。韩元帅率数百步卒夺洛水桥，金军顽强抗击，军中一卒，勇杀蒙古兵数人。强伸即以统制银牌佩于其身，于是金军士气颇振。不料，乌林荅胡士却以轻骑携妻子逃奔蔡州，其部

下遂献中京西门，投降蒙古军。蒙古军随即入城，强伸仅率数十人杀出东门。复转战至偃师（今属河南），被蒙古兵俘获，其后不屈而死。

金帝完颜守绪经周密策划，于归德处死蒲察官奴及其党徒阿里合、白进等官。之后，他亲临双门，赦免忠孝军，以安定人心，避免再度发生叛乱之事。遂决策再迁往蔡州（治今河南汝南），诏蔡州、息州（治今河南息县）、陈州（治今河南淮阳）、颍州（治今安徽阜阳）等各派兵前来保驾。随后，完颜守绪离归德出发，留元帅王璧戍守归德城。时久雨，道途泥泞不堪。扈从皆以青枣为食，兵士足胫尽肿。次日，行至亳州，金帝着黄衣，皂笠，从者仅有二三百人，马50匹。待入蔡州时，仪卫甚简。应完颜守绪之召，徐州行尚书省完颜胡沙虎、抹撚兀典等相继赶赴蔡州。完颜守绪乃于蔡州重置官署，以乌古论镐为御史大夫，仍为总帅；张天纲为御史中丞，仍权参知政事；完颜药师为镇南军节度使，兼蔡州管内观察使；左右司郎中乌古论蒲鲜兼息州刺史，权元帅右都临，行帅府事；征行元帅、权总帅完颜娄室签枢密院事；完颜胡沙虎为尚书右丞。完颜胡沙虎有文武之材，他选士兵，括马匹，修治甲兵，且劝谏金帝简汰后宫，留识文义者1人，余听自便。其后，得马千余匹，诸州郡亦选兵入援蔡州，兵势稍振。金帝又以签枢密院事、权参知政事抹撚兀典主持括马之事，以前御史中丞蒲察世达为吏部侍郎，权行六部尚书。金遂于蔡州建起小朝廷。

七月，宋将孟珙自金降将刘仪得知武仙所在，乃出兵围攻马蹬山。武仙于马蹬山中建9寨，宋军6日已破其7寨，遂伏兵于岵山之下。待武仙登山，伏兵四起，武仙仓促应战，金军大败，730余兵士被俘，所弃铠甲堆积如山。武仙仅以五六骑

逃遁，余众7万余将士全部投降宋军。

八月，金帝完颜守绪以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权参知政事，行省事于陕西。又遣人谕以蜡书，约定九月中旬征兵，与金帝会师于饶风关，欲乘宋军不备，攻取宋兴元府。然而，蒙古都元帅塔察儿亦遣使王楫至襄阳，与宋相约进攻蔡州。王楫自南宋返回时，宋廷派军队护送。金青山招抚使卢进捕得宋边巡逻士卒，方得知此事，金帝为之大惧。不久，蒙古即召宋廷出兵，合攻唐州。金元帅右监军乌古论黑汉力战而亡，主师蒲察某为部曲兵所食，唐州城陷落。因民饥乏食，完颜守绪假蔡州都军致仕、内族完颜阿虎带充同佥大睦亲府事，出使南宋，乞求借粮。临行前，完颜守绪告诉他，称："宋人负朕深矣。朕自即位以来，戒饬边将无犯南界。边臣有自请征讨者，未尝不切责之。向得宋一州，随即付与。近淮阴（今江苏邳县东）来归，彼多以金币为赎，朕若受财，是货之也，付之全城，秋毫无犯。清口临阵生获数千人，悉以资粮遣之。今乘我疲敝，据我寿州（治今安徽寿县），诱我邓州，又攻我唐州，彼为谋亦浅矣。大元（蒙古）灭国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连和，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卿其以此晓之。"③完颜阿虎带将此意图转达给宋人，宋廷不许。

九月重阳节日，金帝完颜守绪以重九拜天于节度使厅，群臣陪从。礼毕赐酒食。然酒未饮毕，数百敌兵已突至城下。完颜守绪乃分军防守四面及子城，以总帅孛术鲁娄室领兵防守东面，内族完颜承麟副之；参知政事乌古论镐守南面，总帅元志副之；殿前都点检兀林荅胡土守西面，忠孝军元帅蔡八儿副之；忠孝军元帅、权殿前右副点检王山儿守北面，元帅纥石烈

柏寿副之；遥授西安军节度使兼殿前右卫将军、行元帅府事女奚烈完出守东面，元帅左都监夹谷当哥副之；殿前右卫将军、权左副都点检、内族完颜斜烈守子城，都尉王爱实副之。金帝部署完蔡州城防御不久，蒙古大军即兵临城下，筑长垒围困蔡州。完颜守绪下令，搜括蔡州城内粮粟，严禁公私酿酒。十月，因城中缺粮，完颜守绪令放饥民老幼患病者出城。且给饥民船，允许他们采摘城壕内菱芡水草就食。为防止城中出现骚乱，又以右副都点检阿勒根移失剌为宣差镇抚都弹压，另设弹压官4员副之，同时还负责稽察四隅防守御敌之事。

是月，宋遣其江海、孟珙率2万大军，携粮30万石赶赴蔡州，助蒙古军攻城。蒙古将塔察儿大喜，加紧修治攻城器械，声闻城中，蔡州军民窃议出降，尚书右丞完颜胡沙虎精心经营防御，军民人心方安，始有守意。然城中缺粮日甚。

十二月，于蔡州城中尽藉民丁防守，甚至征妇人壮捷者更换男子衣冠，搬运大石。金帝亦出巡城防，抚慰将士。蒙古与南宋联兵攻城，分决练江、柴潭水入汝水。不久，蔡州外城失守，金宿州副总帅高剌哥阵亡。金帝乃以总帅孛术鲁娄室、殿前都点检兀林荅胡土皆权参政，都尉完颜承麟为东面元帅，权总帅。数日后，蒙古军攻破蔡州西城。金帝告之侍臣："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系，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⑨蒙、宋军攻城愈猛，金都尉王爱实死于阵前。金炮军总帅王锐杀元帅夹谷当哥，率30人降蒙古。蔡州城局势更加恶化。一夜，完颜守绪微服，率兵摸黑出东城，欲逃往他地，然行至蒙古军所置垒栅前，不得通过，经一番激战后，仍退回城中。时城中已无粮可食，完颜守绪遂令杀尚厩署马50匹、官员用马150匹，

聊以充饥。

金天兴三年（宋端平元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1234）正月，宋将孟珙与蒙古将塔察尔率两国军队继续围攻蔡州城。时城中断粮已有三月，人心浮动，欲降者日众。守城将士伤亡甚多，金帝又以近侍分守四城。蒙古兵凿开西城为五门，攻入城中，金军奋力抗击，直战至黄昏时分，才将入城蒙古兵赶出城外。是夕，金帝完颜守绪召集百官，传帝位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完颜承麟推辞不受，完颜守绪乃下诏称："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娇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⑩完颜承麟乃即皇帝位。此时，宋将孟珙率宋军猛攻蔡州城南门，至金字楼，布列云梯，诸将士奋勇击杀，大战于城上。待百官称贺完颜承麟即位，登极礼毕，纷纷出战御敌时，南城已树立宋军旗帜。金兵放弃南门，退守城中。

孟珙招江海、塔察尔统兵入城，一时间四面呼声震天。金将完颜胡沙虎率1000精兵于城中与蒙古、南宋兵展开激烈巷战，终因寡众悬殊，不能抵抗联军的进攻。完颜守绪见大势已去，乃自缢于幽兰轩。完颜承麟率兵退守子城，闻完颜守绪自尽，悲痛不已。完颜胡沙虎率兵顽强抗击，因再无力御敌，遂与所部500余将士投水而亡。完颜承麟哭奠完颜守绪未毕，子城亦被攻陷，乃令火焚其尸，奉御绛山收拾哀宗完颜守绪骨瘗于汝水上。蒙古、南宋大军攻入子城中，完颜承麟为乱兵所杀。历时120年的金朝至此灭亡。

注 释

①《金史》卷一七《哀宗纪上》。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金史》卷一八《哀宗纪下》。

附录：宋辽夏金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60年	宋建隆元年	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于陈桥驿（今河南开封东北）发动兵变，追周恭帝柴宗训让位，称帝（宋太祖），建国号宋。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检校太尉、淮南节度使李重进相继举兵反宋。宋帝统兵亲征，李筠、李重进皆兵败身亡。
961年	宋建隆二年	宋罢殿前都点检，自此不复除授。谋臣赵普建议宋帝削夺藩镇之权。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召石守信、王审琦等饮，诱退其典中央禁兵之权，皆罢军职。
962年	宋建隆三年	宋削夺藩镇节度使之权。
963年	宋建隆四年 乾德元年	宋以山南东道节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统兵平荆南，取湖南。宋以文臣知州事，始置诸州通判。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64年	宋乾德二年 辽应历十四年	宋昭义节度使李继勋等领兵入攻北汉辽州（治今山西左权）。北汉告急于辽。辽帝耶律璟（辽穆宗）遣西南面招讨使耶律挞烈领6万骑赴援，败李继勋所部。后蜀主孟昶约北汉举兵攻宋。宋得其书，乃遣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与刘光义、曹彬等率步骑6万分路进讨后蜀。连克兴州（治今陕西略阳）、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利州（治今四川广元）。
965年	宋乾德三年 辽应历十五年	后蜀主孟昶以太子元喆为元帅，募兵防守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宋军取剑门，入成都（今属四川），孟昶降，后蜀亡。辽黄室韦、乌古部叛。辽帝耶律璟命枢密使雅里斯等合诸部兵征讨，大败乌古部。宋帝诏调发蜀兵赴京师，蜀兵作乱，推旧将全师雄为帅。
966年	宋乾德四年 辽应历十六年	宋军破蜀兵，全师雄兵败身死。辽军入侵宋易州（治今河北易县），为监军任德义击败。
968年	宋乾德六年 辽应历十八年	北汉主刘钧卒，养子继恩嗣，未几，为人所害，其弟刘继元嗣。宋客省使卢怀忠等领兵屯潞州（治今山西长治），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进击北汉，败北汉兵，迫太原（今属山西）城下。辽南院大王挞烈领兵救援，宋军乃退。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69年	宋开宝二年 辽应历十九年 保宁元年	宋帝亲征北汉。以李继勋为河东行营前军都部署，进击太原。北汉将刘继业奔还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遭罢免。宋军围攻太原，决晋祠水灌城。辽发兵入援。宋军多染病，班师。辽帝耶律璟为近侍小哥等诛杀，庙号穆宗。侍中萧思温与南院枢密使高勋等奉耶律贤为帝，是为辽景宗。
971年	宋开宝四年	宋贺州道行营兵马都部署潘美将兵伐南汉。南汉主刘鋹献广州（今属广东）降宋。
974年	宋开宝七年	宋遣知制诰李穆使江南（即南唐），欲召江南主李煜入朝。李煜称病固辞。宋命曹彬等领兵进讨。宋军于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东北）架浮梁渡江，败江南兵。
975年	宋开宝八年	宋军进围金陵（今江苏南京），自春至冬。城破，李煜降。
976年	宋开宝九年 太平兴国元年 辽保宁八年	宋遣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党进与潘美等分五路讨伐北汉，辽帝遣南府宰相耶律沙等救之。宋帝赵匡胤于“烛影斧声”中暴卒，其弟、晋王赵光义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978年	宋太平兴国三年	平海节度使陈洪进向宋廷献所辖漳（今属福建）、泉（今属福建）二州。吴越王钱俶上表献所辖十三州、一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79 年	宋太平兴国四年 辽保宁十一年 乾亨元年	宋帝赵光义以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与崔彦进、曹翰、李汉琼等将兵进击北汉。北汉主刘钧（刘承钧）求援于辽。辽以南府宰相耶律沙、南院大王耶律斜轸赴援，为宋军所阻。宋帝临太原城督战，宋兵冒死登城。刘钧乃遣使奉表纳款，北汉平。宋帝乘胜领兵北征辽，进兵至辽南京析津府（今北京），攻城不已。辽耶律沙、耶律休哥率援兵赶至，于高梁河大败宋军。宋帝乘驴车南遁。辽南京留守、燕王韩匡嗣与耶律沙、耶律休哥统兵攻守，为宋军所败。宋定难军留后、党项拓跋部首领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袭位。
982 年	辽乾亨四年	辽帝耶律贤卒。其子梁王耶律隆绪奉遗诏嗣位，是为辽圣宗，时年 12 岁，皇太后萧氏称制，总决军国事。
983 年	契丹统和元年	辽帝耶律隆绪率群臣上太后尊号曰承天皇太后。更国号曰大契丹。
984 年	宋太平兴国九年 雍熙元年	宋定难军留后李继捧入朝，尽献银（治今陕西米脂西北）、夏（治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绥（治今陕西绥德）、宥（治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南）四州八县之地。宋帝发拓跋氏族人入汴京（今河南开封）。继捧族弟继迁不乐内徙，乃出奔地斤泽。是年，宋知夏州尹宪袭击继迁，继迁仅以身免。
985 年	宋雍熙二年	李继迁设伏诱杀宋都巡检使曹光实，遂袭据银州。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86年	宋雍熙三年 契丹统和四年	宋兵分三路北伐幽燕。西路连克寰州（治今山西朔县东）、朔州（治今山西朔县）、应州（治今山西应县）、云州（治今山西大同）。东路攻涿州（今属河北），因粮运不继，为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所击，乃退。于岐沟关（今河北涿州西南）被契丹军追及，大败。宋诸路退兵。宋将杨业于陈家谷与契丹军战，失利被擒，不屈而死。继迁降于契丹，封定难军节度使。
990年	契丹统和八年	契丹封继迁为夏国王。
991年	宋淳化二年	宋遣商州团练使翟守素赴夏州。继迁惧宋军来讨，乃奉表归顺。宋授其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名保吉。
993年	宋淳化四年 契丹统和十一年	契丹与高丽国议和。宋青城（今四川灌县南）民王小波聚众起义，以"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相号召。西川都巡检使张玘于江源（今四川崇庆东）与王小波战。王小波卒，众推李顺为帅，乃攻占蜀（治今四川崇庆）、邛（治今四川邛崃）等州。
994年	宋淳化五年	李顺占据成都（今属四川），号大蜀王。宋帝以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率军破成都，俘李顺。宋命李继隆为河西兵马都部署，将兵讨继迁，入夏州。
996年	宋至道二年	李继迁率万余众寇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围攻岁余。
997年	契丹统和十五年 宋至道三年	契丹封继迁为西平王。赵光义卒。其子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999年	宋咸平二年 契丹统和十七年	契丹军南侵，宋镇、定行营都部署傅潜拥兵8万，畏懦闭营自守。遂城（今河北徐水西）守将杨延郎集丁壮御契丹兵。
1000年	宋咸平三年 契丹统和十八年	宋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戍卒李延顺等起事，拥神卫军都虞候王均为帝，建大蜀政权。攻汉（治今四川广元）、绵（治今四川绵阳），败知益州、提举川陕两路军马雷有终所部。后官军穴城而入。王均率众突围，战败自缢。宋帝赵恒巡边至大名府（今河北大名东北）。契丹军至瀛州（治今河北河间），败宋定州行营都部署范廷召军，复败高阳关都部署康保裔军，遂渡河掠淄（治今山东淄博南）、齐（治今山东济南）而去。宋知灵州李守恩等运刍粟过瀚海，为李继迁所邀击。李守恩等皆战殁。
1001年	宋咸平四年	李继迁率众攻陷宋清远军（今甘肃环县西北）。宋筑绥州（治今陕西绥州）城。以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领步骑6万援灵州。宋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为灵州西面都巡检使。
1002年	宋咸平五年 契丹统和二十年	李继迁集蕃众围攻灵州。知州裴济求救，援军终不至城遂陷。李继迁以灵州为西平府。复进围麟州（治今陕西神木东北），为知州卫居贤所败。契丹遣北府宰相萧继远等率军南下，败宋军，攻泰州（治今河北保定），未几，引还。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03年	宋咸平六年	西凉府六谷部首领潘罗支集6万骑，请与宋军会师，收复灵州。宋帝以其为朔方节度使、灵州西面都巡检使。李继迁攻西凉府，潘罗支伪降。复集六谷蕃部及者龙部众袭击继迁。继迁不备，大败，中流矢逃回灵州，未几身亡。其子李德明嗣。
1004年	宋景德元年 契丹统和二十二年	契丹遣使封德明为西平王。契丹帝耶律隆绪与承天太后萧氏大举南下，以统军使萧挞凛、奚六部大王观音奴为先锋，合兵进攻宋定州（今属河北）。宋将王超等拒唐河，按兵不战。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寇准请宋帝赵恒亲临澶州（治今河南濮阳）。契丹军进抵澶州城下，萧太后亲自击鼓，契丹兵急攻，死万余人，不克，乃退。寇准与宋帝行至卫南，契丹军再攻澶州。宋将李继隆等分伏强弩，中辽将萧挞凛额。萧挞凛死，契丹军士气大衰。宋帝至澶州，遣殿直曹利用赴契丹议和，乃定议：宋输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史称澶渊之盟。
1006年	宋景德三年	宋以党项拓跋部首领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
1007年	契丹统和二十五年	契丹营建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契丹西北路招讨使萧图玉领兵征伐鞑靼。
1008年	宋大中祥符元年	宋定难军节度使德明截击回鹘贡宋使臣及财物。又遣万子等四军领族兵攻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又转攻回鹘，战败退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09年	契丹统和二十七年	契丹萧太后死。耶律隆绪亲政。
1010年	契丹统和二十八年	契丹帝亲自统军征伐高丽。遣使册西平王德明为夏国王。
1012年	契丹统和三十年	契丹鞑靼诸部起兵反契丹。
1013年	契丹统和三十一年	契丹乌古、敌烈部叛，右皮室详稳延寿率兵讨之。契丹将耶律化哥破鞑靼首领乌八所部。
1020年	宋天禧四年	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德明始筑怀远城而居之，号兴州（治今宁夏银川）。
1022年	宋乾兴元年	宋帝赵恒死，庙号真宗。太子赵祯继位，是为宋仁宗。
1026年	契丹太平六年	鞑靼侵扰契丹。契丹帝耶律隆绪遣西北路招讨使萧惠领兵讨伐甘州（治今甘肃张掖）回鹘。萧惠遂于诸路征兵，唯鞑靼首领直刺迟至。萧惠立斩以徇。至甘州围攻3日，不克乃还。直刺之子聚兵来袭，会西鞑靼诸部皆叛。契丹都监涅鲁等将兵3000救援，败于可敦城（今蒙古乌兰巴托南）西南，涅鲁战死，士卒溃散。
1029年	契丹太平九年	契丹东京舍利军详稳大延琳作乱，囚留守，建国号兴辽。南、北女真皆从之。契丹以南京留守萧孝穆为都统率兵征讨，大延琳固守东京不出。
1030年	契丹太平十年	契丹都统萧孝穆于东京城四周筑城堡，使内外不相通。大延琳部将杨详世秘密投诚，夜开南门，契丹军入，擒大延琳，渤海遂平。
1031年	契丹太平十一年	契丹帝耶律隆绪卒，庙号圣宗。太子耶律宗真嗣位，是为兴宗。皇太后摄政。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32 年	宋天圣十年 明道元年 契丹重熙元年	宋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德明卒。其子元昊继立。乃引兵夺甘州（治今甘肃张掖），拔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宋复以元昊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元昊避其父名讳，改元明道，契丹册元昊为夏国王。
1033 年	宋明道二年 契丹重熙二年	宋皇太后死，宋帝赵祯亲政，遂裁抑侥幸，罢吕夷简、张耆、夏竦、范雍等，出知州府。令右司谏范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廪，赈乏绝。上疏言“销冗兵，削冗吏，禁游惰，减工作”等事。契丹禁元昊使臣沿途私市铁。
1034 年	宋景祐元年 契丹重熙三年	契丹萧太后摄政，虑契丹帝年长难制，乃与枢密使萧孝先谋立少子耶律重元。耶律重元告之耶律宗真。耶律宗真遂废太后，始亲政。元昊始寇府州（治今陕西府谷），扰庆州（治今甘肃庆阳）。于国内制秃发令。改元广运。
1036 年	宋景祐三年 契丹重熙五年	契丹帝耶律宗真始行殿试策士。元昊占据河西，举兵攻回鹘瓜（治今甘肃安西西）、沙（治今甘肃敦煌）、肃（治今甘肃酒泉）三州。
1038 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元年	元昊欲攻宋，其从父山遇数劝之，不听。山遇畏诛，携妻子降宋。宋知延州郭劝不纳，遣返，元昊集骑射而杀之。未几，元昊称帝，是为西夏景宗，建国号大夏。史称西夏。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39年	宋宝元二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	西夏帝元昊遣使抵延州（治今陕西延安），上表于宋。宋帝赵祯下诏，削所赐元昊官爵，除属籍。且揭榜于边，募人擒元昊。宋筑青涧城（今属陕西），以备西夏。
1040年	宋宝元三年 康定元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	元昊攻保安（今陕西志丹）、金明寨（今陕西延安西北），进抵延州城下。宋鄜延、环庆路沿边经略安抚使召鄜延、环庆路副都部署刘平入援。刘平领兵行至三川口（今延安西北）遇西夏军，激战至日暮，宋军溃败，刘平被俘。西夏兵围攻延州7日，遇大雪，引退。复扰三川寨，斩宋镇戎军西路都巡检杨保吉。宋以韩琦为陕西安抚使，范仲淹兼知延州，种世衡知青涧城。
1041年	宋康定二年 庆历元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	宋陕西安抚使韩琦巡边。元昊谋寇宋渭州（治今甘肃平凉）。韩琦乃命环庆副部署任福领兵进击。西夏军伪遁，任福屯军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北）。西夏军以铁骑冲突，任福战死，宋军大败。元昊发兵扰麟（治今陕西神木北）、府等州，陷丰州（治今陕西府谷西北）。契丹闻宋军讨西夏屡败，欲出兵南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42 年	宋庆历二年 契丹重熙十一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	契丹帝遣萧末特、刘六符使宋，谋取瓦桥关南十县之地。宋以富弼为回谢国信使，赴契丹议事，终以增岁币绢10万匹、银10万两，达成"增币之议"。宋以大将葛怀敏率军入攻西夏，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战败，葛怀敏殁。西夏军直抵渭州（治今甘肃平凉），焚庐舍，掠居民而去。元昊连年攻战，国中困疲，渐生和意。
1043 年	宋庆历三年 契丹重熙十二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	契丹遣使谕夏国与宋议和。西夏帝元昊遣贺从勖出使宋朝，请和。宋虎翼军率王伦于沂州（治今山东临沂）起兵。商州（治今陕西商县）民张海、郭邈山起义。宋大理寺丞郭谘、孙琳于洺州（治今河北永年东）肥乡县行千步方田法。
1044 年	宋庆历四年 契丹重熙十三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	契丹所属党项及山西部族叛入西夏，契丹遣兵击之。元昊遣兵援应党项。契丹征诸道兵将伐西夏，并告之于宋。契丹帝亲征西夏，夏兵败退。遇大风骤起，飞沙眯目，夏兵反击，契丹军大溃。西夏帝元昊向宋称臣，复遣使议和。宋应允岁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及回赐银、绢、茶等物。明年，请和于契丹。
1047 年	宋庆历七年	宋宣毅军小校王则于贝州（治今河北清河）兵变。执知州，建国号安阳，自称东平郡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48年	宋庆历八年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	西夏帝元昊为其子宁令所弑，庙号景宗。其幼子谅祚嗣位，是为夏毅宗。其母没藏氏摄政。宋册封谅祚为夏国主。
1049年	宋皇祐元年 契丹重熙十八年 西夏延嗣宁国元年	契丹帝耶律宗真乘夏主年幼即位之机，亲征西夏。以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西夏诱敌深入，再袭击之，契丹军大败。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进至贺兰山，获元昊妻及官僚家属。宋广源州侬智高起兵反宋。
1050年	宋皇祐二年 西夏天祐垂圣元年	西夏军将洼普等领兵攻契丹舍浀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契丹南面林牙耶律高家奴击破之。契丹殿前都点检萧迭里得于三角川败西夏军。契丹遣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率军伐夏，纵军俘掠而还。西夏帝谅祚、没藏太后遣使上表契丹帝，请求依旧称臣。
1052年	宋皇祐四年	侬智高招纳亡命，与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等谋议，破邕州（治今广西南宁），遂建大南国自号仁惠皇帝。其后，入横州（治今广西横县）、贵州（治今广西贵县）等地，进围广州（今属广东），围75日，不克乃去。宋以狄青为荆湖南、北路宣抚使，进击侬智高。
1053年	宋皇祐五年	宋将狄青合孙沔、余靖兵，大败侬智高军，追杀50里。侬智高纵火焚邕州城，逃入大理。宋陕西转运使李参行青苗钱。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55年	契丹重熙二十四年 清宁元年	契丹帝耶律宗真卒。庙号兴宗。其子耶律洪基继位，是为契丹道宗。
1060年	宋嘉祐五年	交趾与甲峒蛮合兵扰邕州。宋帝诏发诸州兵讨之。
1063年	宋嘉祐八年 契丹清宁九年	宋帝赵祯死，庙号仁宗。其子赵曙即位，是为宋英宗。旋病，皇太后曹氏辅政，左右多有谗言，赵曙与曹太后遂有隙。契丹皇太叔耶律重元与其子、楚国王涅鲁古乘契丹帝耶律洪基猎于滦河太子山之机，诱胁弩手军犯行宫。南院枢密使耶律仁先率宿卫兵反击，重元亡入大漠。
1064年	宋治平元年	宋皇太后曹氏出手书付中书，还政。赵曙亲政。
1066年	宋治平三年 辽咸雍二年 西夏拱化四年	宋帝赵曙命龙图阁直学士兼侍讲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名为《通志》。契丹改国号为大辽。西夏人攻宋大顺城。谅祚中流矢，乃遁。
1067年	宋治平四年 西夏拱化五年	宋帝赵曙死，庙号英宗。其子赵顼继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宋青涧城守将种谔收复绥州（治今陕西绥德）。西夏帝谅祚死，庙号毅宗。子秉常即位，是为西夏惠宗，时年7岁，梁太后摄政。
1068年	宋熙宁元年	宋帝赵顼召翰林学士王安石入对。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69年	宋熙宁二年 辽咸雍五年	宋帝以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置制置三司条例司，掌经划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以陈升之、王安石领其事，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等法。 鞑靼反辽。辽帝耶律洪基命耶律仁先为西北路招讨使，率禁军进击。
1070年	宋熙宁三年 西夏天赐礼盛国庆元年	宋廷立保甲法、免役法。王安石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西夏发兵10万入攻宋境，败知庆州李复圭，大举入侵环庆路。
1071年	宋熙宁四年 西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	宋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立太学生三舍法。宋将种谔于啰兀（今陕西米脂西北）筑城。西夏军入攻，种谔弃城。
1072年	宋熙宁五年	宋行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宋秦凤路沿边安抚使王韶引兵渭源堡（今甘肃渭原）、武胜（今甘肃临洮）。宋置熙河路，以王韶为经略安抚使、知熙州。
1073年	宋熙宁六年	王韶收复河州（治今甘肃临夏北）。宋置经义局，修《诗》、《书》、《周礼》三经义，以王安石提举。宋廷置军器监。
1074年	宋熙宁七年	王安石遭罢相，出知江宁府。宋置三司会计司。
1075年	宋熙宁八年	王安石复相。王安石进所撰《三经新义》，颁于学官。
1076年	宋熙宁九年	王安石再罢相，出判江宁府。宋将赵高拔广源州，大败交趾兵，其主李乾德请降。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77年	辽大康三年	辽北院枢密使耶律乙辛等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辽帝耶律洪基轻信谗言，废太子耶律浚。
1080年	宋元丰三年 辽大康六年	宋帝赵顼令中书详定官制。辽宰相耶律仁杰久居相位，贪婪无厌，被出为武定军节度使。
1081年	宋元丰四年 西夏大安七年	西夏帝秉常欲借宋削弱后党梁氏势力，梁太后乃囚禁秉常，秉常党拥兵自重。宋以西夏政变，乃发兵五路攻西夏。以李宪为五路统帅，出熙河路，以种谔出鄜延路，高遵裕出环庆路，刘昌祚出泾原路，王中正出河东路，拟取灵州，直捣兴州。西夏以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之计，致使宋军损失甚重，败回。
1082年	宋元丰五年 西夏大安八年	宋于银、夏、宥三州交界之地筑永乐城。西夏发倾国之兵来攻。城中水源枯绝，援军为西夏军所阻，城遂陷落，伤亡损失惨重。
1083年	宋元丰六年 辽大康九年 西夏大安九年	西夏发兵数十万攻围兰州（今属甘肃），为宋将王文郁击溃。复屡扰河东，皆失利。乃遣使上表，请与宋和。宋帝许之。辽耶律乙辛谋奔宋，杀之。
1084年	宋元丰七年	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书成。
1085年	宋元丰八年	宋帝赵顼卒，庙号神宗。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太皇太后高氏与之同听政。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保守派攻击变法，乃罢之。
1086年	西夏天安礼定元年	西夏帝秉常卒，庙号惠宗。子乾顺嗣位，是为夏崇宗。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087 年	宋元祐二年	宋于泉州（今属福建）置市舶司。宋廷洛、蜀、朔党争。
1092 年	辽大安八年	鞑靼首领叛辽，杀金吾吐古斯。辽帝命奚六部发兵讨之。
1093 年	宋元祐八年	宋太皇太后高氏卒，宋帝赵煦亲政。
1094 年	宋绍圣元年 辽大安十年	宋改元绍圣。以章惇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恢复熙宁新法。辽军进击鞑靼，败磨古斯所部。
1097 年	宋绍圣四年 西夏天祐民安八年	西夏军入扰宋绥德城（今陕西绥德），侵麟州（治今陕西神木东北），至葭芦城（今陕西佳县）。宋军反击，破洪州(治今陕西靖边南)。次年，西夏再入扰宋边，为宋军所败。
1099 年	宋元符二年 西夏永安二年	西夏军屡败，西夏帝乾顺遣使向宋廷谢罪，且进誓表。宋夏遂通好。
1100 年	宋元符三年	宋帝赵煦卒，庙号哲宗，其弟赵佶嗣位，是为宋徽宗。皇太后向氏听政，旋罢。
1101 年	辽寿昌七年	辽帝耶律洪基卒，庙号道宗。其子、燕国王耶律延禧嗣位，上尊号天祚皇帝。
1102 年	宋崇宁元年 辽乾统二年	宋廷立元祐奸党碑。宋于杭（治今浙江杭州）、明（治今浙江宁波）二州置市舶司。辽将萧海里叛，入女真。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执之。
1105 年	宋崇宁四年 西夏贞观五年	宋以童贯经营西边。西夏发兵屡扰宋边，且求援于辽，请求伐宋。宋帝赦元祐党人。宋置应奉局，以朱勔总其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13 年	辽天庆三年	女真完颜阿骨打起兵反辽，袭位为都勃极烈。
1114 年	辽天庆四年	完颜阿骨打发兵攻辽，陷宁江州（治今吉林扶余东南），于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大败辽军。
1115 年	辽天庆五年 金收国元年	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号大金，是为金太祖。改元收国，更名旻。随即亲自将兵攻黄龙府（今吉林农安）。辽天祚帝下诏亲征。金军进击达鲁古城，辽军大败。金军陷黄龙府。辽帝以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副，率 10 万兵攻金。耶律章奴反，奔上京，后为辽军所杀。天祚帝被迫退兵，为金军所败。
1116 年	辽天庆六年 金收国二年	辽东京（今辽宁辽阳）将、渤海人高永昌据辽阳府反辽。为金所败，杀之。金克辽保州（治今辽宁丹东东南）。
1117 年	宋政和七年 辽天庆七年 金天辅元年	金攻陷辽春州（治今吉林长春）、泰州（治今吉林白城）。辽东北面诸军不战自溃。宋令登州（今属山东）王师中以市马为名，浮海入辽东，以观辽金虚实。
1118 年	宋重和元年 辽天庆八年 金天辅二年	辽天祚帝遣耶律奴哥等赴金议和。宋遣马政浮海赴金，与之通好。
1119 年	宋宣和元年 辽天庆九年 金天辅三年	宋廷采纳赵良嗣计，将会金以图燕云之地。辽天祚帝遣使册金帝完颜旻为东怀国皇帝。金帝责辽册文轻侮。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20年	宋宣和二年 辽天庆十年 金天辅四年	宋遣赵良嗣使金约，金夹击辽，许以输辽岁币转输金。宋睦州（治今浙江建德）青溪（今浙江淳安）方腊起义。次年失败。金帝亲自统军分三路攻辽，破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
1121年	宋宣和三年 金天辅五年	宋郓州（治今山东东平）宋江起义，后被宋军击攻，宋江投降。金帝命完颜杲为内外诸军都统，完颜昱、完颜宗翰副之，大举攻辽。
1122年	宋宣和四年 辽保大二年 金天辅六年	金攻陷辽中京（今辽宁宁城西）、北安州（治今河北承德西）。辽帝西逃奚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金陷辽西京（今山西大同）。辽知易州高凤降宋。辽将郭药师以涿州（今属河北）降宋。宋童贯领兵攻辽失利。金军乃入燕京。
1123年	宋宣和五年 辽保大三年 金天辅七年	宋金议定交还燕京条件，宋输金岁币40万，岁输燕京代税钱100万缗。金收掳掠一空的燕京（今北京）涿易等六州归还北宋。辽知北院枢密事、奚王萧干自立为帝，辽出兵讨之。天祚帝与金军战，败逃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北）。西夏帝请辽帝入其国，受金胁迫，未敢接纳。
1124年	辽保大四年 金天会二年	金帝完颜旻卒，庙号太祖。其弟吴乞买（完颜晟）即位，是为金太宗。辽耶律大石率铁骑300夜遁。辽帝率兵出夹山取天德，被金军击败。西夏称藩于金。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25年	宋宣和七年 辽保大五年 金天会三年	辽天祚帝行至应州（治今山西应县）新城东60里，被金兵所执，辽亡。耶律大石自立为王，西行至可敦城（今鄂尔浑上游），会西边七州及十八部王，得精兵5万余，乃置官吏，立排甲，备器仗，整旅而西。兵行万里，归者数国，军势日盛。于塔什干（今属乌兹别克）败西域10万兵。耶律大石称帝，建元延庆，号葛儿汗，史称西辽。后定都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金帝完颜晟下诏侵宋。金军分两路，西路以完颜宗翰（粘罕）为主将，自大同南攻太原；东路以完颜宗望（斡离不）为主帅，自平州（治今河北卢龙）攻燕京（今北京）。欲合兵于宋都开封城（今属河南）下。西路于太原遭宋将王禀率全城军民顽强抵抗，不得南下。东路至燕京，守将郭药师献城降，乃以之为向导，长驱直入。宋帝赵佶传位于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赵佶（宋徽宗）自称太上皇帝。
1126年	宋靖康元年 金天会四年	金军克濬州（治今河南浚县）。渡黄河南进。宋太上皇赵佶出开封城南逃，至泗上渡淮奔扬州（今属江苏），复过长江至京口（今江苏镇江）。宋帝赵桓即皇帝位，亦欲南逃，为兵部侍郎李纲所止，乃以李纲为亲征行营使。李纲主开封防务，率宋军击败攻城金军，保卫开封城。赵桓遣使入金军请和，许犒军费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綵各100万匹、牛马各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宋各路勤王师入援开封。金军乃退。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26 年	宋靖康元年 金天会四年	宋太上皇赵佶回开封。宋军救援太原之兵皆败。王禀率军民于孤立无援境况下，抗击金军，终因城中乏食，城破。再巷战突围走，王禀投汾水而死。宋廷贬李纲。宋真定府（今河北正定）陷落。金军再分兵两路南侵。宋帝以康王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赴河北召集义勇抗金。遂于相州（治今河南安阳）置府，金军围攻开封，军将郭京开宣化门迎敌，溃败，金军遂登城。宋帝赵桓入金营议和，金索 1000 万锭金，2000 万锭银，1000 万匹帛。宋帝令于京城搜括，尽归于金。金帝完颜晟采用汉官制度，始定金朝官制，设尚书省。
1127 年	宋靖康二年 宋建炎元年 金天会五年	宋钦宗自汴京至青城（今河南开封南）金营被扣，徽宗、太后、诸皇子及后宫有位号者均被金送至青城。金废徽、钦二帝为庶人，携二帝及宗室家族四百七十余人北去，并掠走宋珪璋、宝印、图书等，北宋亡。金立张邦昌为帝，国号楚，都金陵。宋徽宗九子赵构即帝位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宋高宗拜大学士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是为宰相。李纲力主抵抗金兵，遭黄潜善、汪伯彦、张浚等和议派排斥，居相位七十五日被罢。宋副元帅宗泽自大名（今河北大名）至开德（今河南濮阳）与金兵十三战皆胜，率兵还守汴京，造决胜战车千二百辆，城外驻兵数万。河北招抚司都统制王彦率裨将岳飞等七千人渡河抗金，收复新乡。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28 年	宋建炎二年 金天会六年	金兵南侵，破均州（今湖北均县西北）、房州（今湖北房县）、长安（今陕西西安）、郑州（今河南郑州）、邓州（今河南邓县）、中山府（今河北定县）、延安府（今陕西延安）、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开德府（今河南濮阳）、相州（今河南安阳）、东平（今山东东平）、济南（今山东济南）、北京（今河北大名）。
1129 年	宋建炎三年 金天会七年	金兵南侵，破徐州（今江苏徐州），直抵淮（今河南泌阳）、泗（今安徽泗县），宋高宗自扬州（今江苏扬州）南退至杭州（今浙江杭州），升杭州为临安府。金兵破扬州、磁州（今河北磁县）、建康（今江苏南京）、临安（今浙江杭州）、越州（今浙江绍兴），宋高宗先后退至明州（今浙江宁波）、定海（今浙江镇海）。
1130 年	宋建炎四年 金天会八年 伪齐阜昌元年	金破明州（今浙江宁波）、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潭州（今湖南长沙）、平江（今江苏苏州）、汴京（今河南开封）、承州（今江苏高邮）、楚州（今江苏淮安）、泰州（今江苏泰州）、通州（今江苏南通）。宋人钟相率湖湘众起义，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十九县响应。起义达二十年之久。韩世忠领宋兵阻击北返金兵，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江中）与金兵相持四十八日。岳飞领兵收复建康。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都北京（今河北大名），年号阜昌。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1131 年	宋绍兴元年 金天会九年 伪齐阜昌二年	金陷熙州（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西北）。李成拥兵数万，据江、淮、湖、湘（今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叛宋，宋令江淮招讨使张俊、通泰镇抚使岳飞征讨，败叛军，李成降于刘豫。金以陕西地给伪齐，刘豫尽得中原。忠州防御使、秦凤经略使吴玠两次大败金兵于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俘获近万人。
1132 年	伪齐阜昌三年	伪齐刘豫迁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沿河、淮及陕西、山东诸路均驻北军。
1133 年	宋绍兴三年 金天会十一年	金破姜子关（今陕西安康西）、取金州（今陕西安康），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取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宋刘子羽、吴玠夹击金兵于兴元，金兵死伤十之五六，自此北撤。
1134 年	宋绍兴四年 金天会十二年 伪齐阜昌五年	金兀术、撒离喝及伪齐刘夔率军十万破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南），攻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宋吴玠及其弟吴璘败金兵于仙人关，收复秦州（今甘肃天水）、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刘豫勾结金兵侵宋，破滁州（今安徽滁县）、承州（今江苏高邮）。岳飞将兵收复郢州（今湖北钟祥）、唐州（今河南唐河）、襄阳（今湖北襄阳）、随州（今湖北随县），又败金兵于庐州（今安徽合肥北）。韩世忠率军于大仪（今江苏扬州西北）、天长（今安徽炳辉）、承州（今江苏高邮）大败金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35年	宋绍兴五年 金天会十三年	宋帝赵构自平江府回临安行宫。川陕宣抚使吴玠遣统制吴璘及同统制杨政出兵牵制，攻克秦州（今甘肃天水），败金将完颜杲所部。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率军自镇江（今江苏）北上，太原、河北忠义民兵抗击金军。宋帝赵佶卒于金国，庙号徽宗。岳飞率兵攻占洞庭水寨，杨幺投水身亡。金帝完颜晟卒，庙号太宗。其兄之孙、谙版勃极烈完颜亶继位，是为金熙宗。金帝完颜亶遣完颜宗磐率军进讨蒙古。
1136年	宋绍兴六年 金天会十四年	宋帝以岳飞为京湖宣抚使，主管军马，乃遣部将牛皋收复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蔡州（今河南汝南）。复于唐州（今河南唐河）败刘豫军。伪齐刘豫命其子刘麟、侄刘猊、将孔彦舟率领乡兵30万，号70万，分三路南侵。韩世忠等领兵迎击。宋统制官杨沂中败刘猊所部，伪齐军乃退。
1137年	宋绍兴七年 金天会十五年	宋罢免临阵退却的淮西宣抚使刘光世，改以王德为都统制。淮西将郦琼不服，叛降金军，宰相张浚因此遭贬。另以赵鼎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金废刘豫为蜀王，宋遣王伦为奉迎梓宫使，赴金。
1138年	宋绍兴八年 金天眷元年	宋定都临安。宋帝以枢密使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专主与金和议。力主抗金的宰相赵鼎被罢贬。金颁行官制，分封诸王，定封国制。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39 年	宋绍兴九年 金天眷二年 西夏大德五年	宋以吴玠为四川宣抚使。未几，吴玠卒于仙人关。金行台左丞相挞懒谋反，被诛。金军北攻蒙古，大败而还。 西夏军攻陷金府州（今陕西府谷）。西夏帝乾顺卒，庙号崇宗。子仁孝即位，是为西夏仁宗。
1140 年	宋绍兴十年 金天眷三年	金帝下诏，令元帅府复取河南及陕西之地。宋军刘锜、韩世忠、岳飞、张宪、张俊等各领兵迎击，相继败金军，攻占亳州（今安徽亳县）、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京（今河南洛阳）、颍昌（今河南许昌）等。岳飞于郾城（今属河南）大败金统帅兀术所部。秦桧先令杨沂中等退兵，又一日 12 道金字牌召岳飞班师。河南之地遂为金军所据。
1141 年	宋绍兴十一年 金皇统元年	金将兀术统兵南侵。宋将张俊、杨沂中率兵至淮西，岳飞进军江州（治今江西九江），韩世忠率兵赴援。宋军于昭关（今安徽含山西北）大败兀术。宋获柘皋之捷。宋帝罢韩世忠、张俊、岳飞兵权。秦桧升任尚书左仆射，遂使右谏议大夫万俟卨弹劾岳飞。鄂州前军副都统制王俊诬陷岳飞部将张宪谋反，乃将其下狱。张俊附会和议。秦桧矫诏，诬陷岳飞，遂下大理寺狱。又罢韩世忠枢密使。宋金和议：以淮水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秦、商等州，岁输金银、绢各 25 万两、匹。岳飞遇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42 年	宋绍兴十二年 金皇统二年	宋于泗州（今江苏盱眙对岸洪泽湖中）、先州枣阳（今湖北枣阳）、安丰（今安徽寿县）置榷场，金于蔡（今河南汝南）、泗（今江苏盱眙）、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秦（今甘肃天水）、巩（今甘肃陇西）、洮（今甘肃临潭）、凤翔（今陕西凤翔）置榷场，宋金互市。宋割和尚原于金。
1143 年	西辽康国十年	西辽帝耶律大石卒，庙号德宗。皇后塔不烟执政。
1149 年	金皇统九年 天德元年	金帝完颜亶日益荒淫，滥杀无辜。先杀其弟、北京留守、胙王完颜元，又以积忿杀皇后费摩，召胙王妃萨摩入宫。金平章政事完颜亮与其党密谋废立，乃与金帝护卫徒单阿里出虎、仆散思恭等人寝殿，杀完颜亶（庙号熙宗），完颜亮即位。
1153 年	金贞元元年	金帝下诏迁都燕京（今北京），以燕京为中都大兴府。另以汴京开封府为南京，中京大定府（今河北平泉西北）为北京。上京会宁府、东京辽阳府、西京大同府仍旧。
1159 年	金正隆四年	金帝令打造战船，籍壮丁，欲南侵。金留泗州榷场，宋留盱眙榷场，余皆废。
1160 年	宋绍兴三十年	宋帝赵构无子，下诏立艺祖七世孙赵瑗为太子，更名玮。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61年	宋绍兴三十一年 金正隆六年	金军大举入攻宋境。宋帝赵构下诏，以金背盟南侵，令宋军布防御敌。宋军于淮河三处设防。四川宣抚使吴璘派兵收复泗州、秦州。金东京留守完颜褒杀副留守高存福自立为帝，是为金世宗，改名雍。完颜亮闻讯，急欲取江南据守，乃率军渡淮，大败宋军，攻占扬州（今属江苏）。宋浙西马步军副总管李宝于密州（今山东诸城）陈家岛败金兵，焚毁舟船数百。宋廷起用判潭州张浚为判建康府兼行营留守。宋参谋军事虞允文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北）大败渡江金军。完颜亮被迫移师扬州，再欲渡江。金军内讧，都统制耶律元宜等率众闯御营，杀金帝完颜亮，自为左领军副大都督。金军乃退。宋军遂收复泗、和（今安徽和县）、楚（今江苏淮安）、汝（今河南临汝）等州。
1162年	宋绍兴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金帝完颜雍降完颜亮为海陵郡王。金军数万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败于宋镇江都统制张子盖军下。宋帝赵构自为太上皇，传位太子赵昚，是为宋孝宗。赵昚下诏，追复岳飞原官。
1163年	宋隆兴元年 金大定三年 西辽绍兴十三年	宋四川宣抚使吴璘奉诏班师，所收之地悉为金军所据。宋廷尽逐秦桧党人。赵昚以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乃定出师渡淮，北攻中原。宋军于符离为金军所败。西辽承天皇后萧氏听政。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164 年	宋隆兴二年 金大定四年	金军南侵，连克楚、濠（今安徽凤阳）、滁（今属安徽）州。宋遣使赴金议和。宋金和议：宋金以侄叔相称，改岁贡为岁币，银、绢各减 5 万匹，疆界如绍兴和议所定。
1170 年	西夏乾祐元年	西夏国相任得敬专权，欲分地为王。西夏帝仁孝诛任得敬。
1183 年	宋淳熙十年	宋廷禁朱熹理学，始定"道学"之称。知遂宁府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书成。
1189 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宋淳熙十六年	金帝完颜雍卒，庙号世宗。皇太孙完颜璟继位，是为金章宗。宋帝赵昚称太上皇，传位太子赵惇，是为宋光宗。
1192 年	宋绍熙三年	宋泸州（今属四川）骑射营卒张信作乱，旋平息。
1193 年	西夏乾祐二十四年 金明昌四年	西夏帝仁孝卒。庙号仁宗。子纯祐继任，是为西夏桓宗。金郑王完颜永蹈谋反，被诛。
1194 年	宋绍熙五年	宋太上皇赵昚卒，庙号孝宗。赵惇被尊为太上皇，传位子嘉王赵扩，是为宋宁宗，立皇后韩氏。
1195 年	宋庆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宋外戚韩侂胄排挤右丞相赵汝愚，贬其出朝。又以"道学"为"伪学"排斥异己。金帝诛其长子、镐王完颜永中。
1197 年	宋庆元三年	宋行伪学党禁，又立伪学籍，共 59 人。
1198 年	金承安三年	鞑靼反金。金枢密使完颜襄领兵进击。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02 年	宋嘉泰二年	宋弛伪学、伪党之禁。韩侂胄结党营私，逐渐把持朝政。
1204 年	宋嘉泰四年	韩侂胄定议北伐。立韩世忠庙于镇江，追封岳飞为鄂王。蒙古铁木真击败乃蛮部。
1205 年	宋开禧元年 西夏天庆十二年	宋以韩侂胄为平章军国事，位丞相之上。蒙古铁木真侵夏，大掠而还。
1206 年	宋开禧二年 金泰和六年 西夏应天元年 蒙古成吉思汗元年	宋帝赵扩下诏，征伐金朝。宋军除武义大夫毕再遇胜金军外，余将皆败。金军分九道南侵，宋军屡战屡败。四川宋将吴曦叛宋投金。西夏镇夷郡王赵安全废帝赵纯祐。赵纯祐卒，庙号桓宗。蒙古诸部长尊铁木真为大汗，上尊号成吉思汗。乃于斡难河即位，是为元太祖。
1207 年	宋开禧三年	吴曦自称蜀王，旋为随军转运使安丙等人所杀。宋礼部侍郎史弥远杀韩侂胄。
1208 年	宋嘉定元年 金泰和八年	宋金和议，约为伯侄之国，增岁币至30万，犒军费 300 万贯。金帝完颜璟卒，庙号章宗。皇叔、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
1209 年	蒙古成吉思汗四年 西夏应天四年	蒙古攻入西夏，于河西、兀剌海城(今甘肃张掖东)、克夷门（今宁夏银川西北)、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连胜夏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11年	蒙古成吉思汗六年 金大安三年 西夏光定元年 西辽天禧三十四年	蒙古成吉思汗率军击金，于野狐岭（今河北张北之南）、西京（今山西大同）、会河堡（今河北怀安）等大败金军。又克居庸关，至金中都（今北京）城下，金军誓死迎击，蒙军撤军北归。西夏帝安全卒，庙号襄宗。族子大都督府主赵遵顼继立，是为西夏神宗。乃蛮屈出律汗废西辽主直鲁古自立，至是西辽亡。
1212年	蒙古成吉思汗七年 金崇庆元年	蒙古攻克云中（今山西大同）、九原（今内蒙五原）、抚州（今河北张北）以及金东京（今辽宁辽阳）。
1213年	蒙古成吉思汗八年 金崇庆二年 至宁元年	蒙古军攻克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经怀来（今河北境）取居庸关北口（今北京八达岭）。复至金中都城下大破金军。金右副元帅纥石烈胡沙虎与其党完颜绰诺、蒲察六斤等谋作乱，杀金主完颜永济于卫王府。迎昇王完颜从嘉（完颜珣）即帝位，是为金宣宗。
1214年	金贞祐二年	金以财用匮乏，不能守中都（今北京），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
1215年	蒙古成吉思汗十年 金贞祐三年	蒙古进攻金北京（今内蒙宁城西），金出降，蒙古遂占北京。复陷中都（今北京），尽焚金宫室。再袭南京（今河南开封），至汴京二十里杏花营被金军击败，遂退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渡河北撤。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16 年	蒙古成吉思汗十一年 金贞祐四年	蒙古军自西夏进兵，取金潼关。北渡至平阳（今山西临汾），遭金兵拒战而败退，金复取潼关。金亦收复数十城。
1217 年	蒙古成吉思汗十二年 金贞祐五年	金军渡淮南侵，攻光州（今河南潢川）、樊城（今湖北襄樊）、枣阳（今湖北境），入大散关（今陕西宝鸡西南）。宋宁宗下诏伐金，自是宋金连年交兵。
1218 年	蒙古成吉思汗十三年	蒙古军攻占金平阳（今山西临汾）及河东诸州。
1219 年	宋嘉定十二年 金兴定三年 蒙古成吉思汗十四年	金军围安丰（今安徽淮南）及滁（今安徽滁县）、濠（今安徽凤阳）、光（今河南潢川）三州，入淮南，游骑至采石（今安徽当涂）。宋淮东提刑知楚州贾涉命李全、李福断金归路，与金军激战于化湖陂，杀金将数人，自是金兵不敢至淮东。李全兵至齐州（今山东济南），金守臣王赟迎降。青州（今山东益都）等山东十二郡归李全。 蒙古成吉思汗亲征西域，攻占讹答剌城，俘其首领哈只儿只兰秃。
1220 年	金兴定四年 宋嘉定十三年 西夏光定十年	金分河北、山东、山西地，封王福、武仙等九公分守，总管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收赋税。宋夏相约攻金，夏以 20 万人围巩州（今甘肃陇西），与宋师会攻，不克而还。
1221 年	金兴定五年 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	金军陷宋麻城（今湖北麻城）、蕲州（今湖北蕲春）。 蒙古军占东平城（今山东东平），建行省。自是金已不能控制山东。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22 年	金兴定六年 宋嘉定十五年	金主以宋绝岁币，国用空乏，复渡淮南侵，破宋庐州（今安徽合肥）。渡淮北归时遭宋军袭击，金军大败。
1223 年	蒙古成吉思汗十八年 金元光二年 西夏光定十三年 乾定元年	成吉思汗至八鲁弯川（今阿富汗喀布尔东北）避暑，分兵攻克邻近诸部，西域渐定，蒙古始置达鲁花赤。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细亚花剌子模及诸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进入南俄草原，打败俄罗斯诸侯，旋退兵。金帝完颜珣卒，庙号宣宗。太子完颜守绪即帝位，是为哀宗。蒙古军攻西夏，夏国主赵遵顼传位于次子赵德旺，自称太上皇。赵德旺是为献宗。
1224 年	西夏乾定二年 金正大元年 宋嘉定十七年	夏金议和：夏对金以弟相称，各用本国年号。宋帝赵扩卒，庙号宁宗。养子赵昀继位，是为理宗。
1226 年	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一年 西夏乾定四年	成吉思汗率军征夏，取夏黑水（今陕西绥德西）、肃州（今甘肃酒泉）、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应理（今宁夏中卫）、灵州（今甘肃青铜峡东）等州县。夏帝赵德旺惊悸而死，庙号献宗。其弟赵睍即位，是为末主。
1227 年	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 西夏宝义二年	蒙古军尽占西夏城邑，夏国主赵睍降。至是，西夏亡。成吉思汗病死，庙号太祖。第四子拖雷监国。
1229 年	蒙古窝阔台汗元年	蒙古推成吉思汗第三子窝阔台为大汗，是为太宗。耶律楚材定册立礼仪。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1230 年	蒙古窝阔台汗二年	窝阔台汗伐金，皇帝拖雷、皇侄蒙哥从征。拖雷率军入陕西。
1231 年	蒙古窝阔台汗三年 金正大八年	蒙古拖雷骑兵 3 万人入大散关，破凤州（今陕西宝鸡西南），趋华阳（今四川成都），围兴元（今陕西汉中），入沔州（今陕西略阳），渡嘉陵江，趋葭萌（今四川剑阁东），破城塞百四十而还；东向蒙古军破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趋汴京（今河南开封）。蒙古侵高丽，取四十余城，高丽降。蒙古始立中书省，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并立地方官，分理军民财赋之制。
1232 年	蒙古窝阔台汗四年 金正大九年 宋绍定五年	蒙古大败金兵于钧州（今河南禹县）。金潼关守将李平降，蒙古兵入陕州（今河南三门峡），攻克洛阳，进围汴京，金哀宗离汴东逃。蒙古约宋攻金，约以事成，归河南地于宋。
1233 年	蒙古窝阔台汗五年 金天兴二年 宋绍定六年	金元帅崔立政变，以汴京降蒙古，金后妃宗室等五百余人送至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金帝入蔡州（今河南汝南）。宋军应蒙古约攻蔡州。
1234 年	蒙古窝阔台汗六年 金天兴三年 宋端平元年	蒙古、宋军合攻蔡州。金帝于蔡州城内传帝位于东面元帅完颜承麟，自缢死。承麟等谥金帝为哀宗。城破，末帝承麟为乱军所杀，金亡。宋诏出师复三京，宋兵入洛阳。蒙古兵至洛城下，宋兵退。蒙古毁约，决黄河水淹宋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35年	蒙古窝阔台汗七年 宋端平二年	窝阔台命皇子阔端、曲出等率军侵四川、江淮，命皇子贵由、皇侄蒙哥伐西域，鲁火出伐高丽。蒙古破宋枣阳(今湖北境)、沔州（今陕西略阳)。蒙古建都和林（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筑城周围五里余。
1236年	蒙古窝阔台汗八年	蒙古军破宋兴元（今陕西汉中)、文州(今甘肃文县)、成都。
1237年	蒙古窝阔台汗九年	蒙古军破宋光州（今河南潢川)、夔州(今四川奉节)。
1239年	宋嘉熙三年	宋孟珙屡败蒙古，收复樊城、襄阳、光化（今湖北均县东南)、息（今河南息县)、蔡（今河南汝南）及夔州（今四川奉节)。
1241年	蒙古窝阔台汗十三年	蒙古窝阔台汗卒，庙号太宗。皇后乃马真自称于和林。
1242年	蒙古乃马真皇后元年	蒙古攻宋通州（今江苏南通)，守臣杜霆以舟载私币渡江逃走。城破，蒙古屠城。
1246年	蒙古乃马真皇后五年	蒙古推窝阔台长子贵由为大汗，是为元定宗。
1247年	蒙古贵由汗二年	蒙古以高丽不纳岁贡，乃遣将征伐。自后8年，克其城十四。
1248年	蒙古贵由汗三年	蒙古贵由汗卒，庙号定宗。皇后海迷失称制，立皇子失烈门，诸王大臣多不服。
1250年	宋淳祐十年	宋严禁私运铜钱及伪造会子。
1251年	蒙古海迷失皇后三年	蒙古诸王大臣共推太宗窝阔台皇侄蒙哥即汗位，是为宪宗。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53 年	蒙古蒙哥汗三年	蒙古忽必烈率军至临洮，南征云南，入大理城（今属云南）。
1256 年	蒙古蒙哥汗六年	忽必烈于桓州（今内蒙正兰旗）东筑城，名开平府，后升为上都。
1257 年	蒙古蒙哥汗七年	蒙古兀良合台征服云南，于云南设置郡县。继又征服安南。
1258 年	蒙古蒙哥汗八年	蒙古军自西蜀大举入侵宋，宋西川州县降于蒙古。
1259 年	蒙古蒙哥汗九年	蒙古蒙哥汗亲统大军围攻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宋守臣王坚力战守城，击毙蒙古军前锋将汪德臣。蒙哥汗死于合州钓鱼山，庙号宪宗。蒙古军将史天泽奉丧北归，合州解围。忽必烈率军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蒙古阿兰答儿等于和林谋立阿里不哥，忽必烈得密报，拔寨北去。贾似道遣使向蒙古请和。
1260 年	宋景定元年 蒙古中统元年	忽必烈于开平（今内蒙古多伦旗）称帝即位，是为元世祖。阿里不哥则于和林（今蒙古哈尔和林）称帝。忽必烈击败阿里不哥，复以八思巴为国师，遣郝经出使宋朝，遭囚禁。
1261 年	蒙古中统二年	忽必烈大败阿里不哥。
1264 年	宋景定五年 蒙古中统五年至元元年	阿里不哥归降忽必烈。忽必烈下诏，改燕京（今北京）为中都。贾似道请于诸路推行经界推排法。
1267 年	宋咸淳三年 蒙古至元四年	蒙古都元帅阿术军于襄樊（今属湖北）大败宋军。蒙古立大理等处行六部。忽必烈采纳南京宣慰使刘整计，令其与阿术经略襄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69 年	宋咸淳五年 蒙古至元六年	阿术率兵围樊城。宋京湖都统制张世杰将兵御敌，战败，宋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 3000 兵船，袭阿术军，亦战败。
1270 年	宋咸淳六年 蒙古至元七年	宋以李庭芝为京湖制置大使，领兵救援襄樊。贾似道令范文虎从中制约。
1271 年	宋咸淳七年 元至元八年	宋军入援襄樊，败退。蒙古帝用刘秉忠所议，改国号为大元。
1272 年	宋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	李庭芝命民兵都辖张顺、张贵溯汉水而上，救援襄阳，张顺阵亡，张贵入襄阳，返回途中力战被俘而死。宋四川安抚使昝万寿遣兵攻元成都（今属四川），毁其大城。元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
1273 年	宋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元军攻陷樊城，又用回回人亦思马因所造巨炮攻襄阳，宋守将吕文焕献城投降。
1274 年	宋咸淳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元帝忽必烈下诏，以伯颜为统帅，大举攻宋。元军出兵襄阳，攻沙洋、新城等，复州、汉阳军、鄂州降元。宋帝赵禥死，庙号度宗。子赵㬎即位，是为宋恭宗，是年 4 岁。
1275 年	宋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元军大举入攻宋境，贾似道至芜湖督师，败溃，逃回临安（今浙江杭州）。郢州守将张世杰、知赣州文天祥等入卫临安。伯颜统军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张世杰率水军于镇江焦山与元军战，元军旋攻占镇江、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等地，进逼临安。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76 年	宋德祐二年 景炎元年 元至元十三年	元军破潭州。宋廷奉表投降。文天祥以右丞相入元军营中谈判，遭扣留，伯颜掳宋全太后、皇帝赵㬎北归，留诸将平定南方。宋臣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于温州（今属浙江）奉益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时年 9 岁；广王赵昺为副元帅，是年 6 岁。旋于福州（今属福建）拥立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文天祥自元军逃脱。元军入福建，赵昰等乘海船南逃。
1277 年	宋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文天祥移军漳州，收复梅州，入江西，于兴国（今属江西）为元军所败。广州降元。张世杰奉宋帝走井澳。元军将领塔出、李恒等越大庾岭南下，忙兀台、唆都等率水军追击宋帝。
1278 年	宋景炎三年 祥兴元年 元至元十五年	宋帝赵昰卒，庙号端宗。陆秀夫等旋拥立卫王赵昺为帝，是年 8 岁，随即迁居厓山（今广东新会南）。元以张弘范为都元帅，率兵南下。元兵于广东海丰五坡岭袭执文天祥。
1279 年	宋祥兴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宋、元水师于厓山决战，元军大胜。陆秀夫负宋帝赵昺投海而死。宋亡。张世杰退至海陵山，遭风浪，溺水亡。文天祥被押至大都。

元

黄金家族的兴起

蒙古黄金家族①自其传说中的始祖起，至公元12世纪末成吉思汗（1162—1227）统一蒙古部、崛起于漠北，经过了大约四五百年的时间。

这个家族出自蒙古部，是唐代室韦的一支。《旧唐书·北狄传》称做蒙兀室韦，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下游东岸的山林地带，后西迁至斡难（今鄂嫩河）、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土兀剌（今土拉河）三河河源的不儿罕山（今肯特山）一带。蒙古部最初只是一个包括乞颜和捏古思两个氏族的小部落，经过若干年的繁衍生息，逐渐强盛，原氏族发展出了很多分支。但是，直至11世纪中叶以前，它依然是一个包括大小十几个氏族的比较弱小、分散的部落。《元朝秘史》②、《圣武亲征录》③和（波斯）拉施特《史集》④等记载了黄金家族祖先的传说及其兴盛发展的历史。

黄金家族传说中的始祖孛儿帖赤那和妻豁埃马阑勒⑤从额尔古捏一昆（今额尔古纳河东山林地带）同渡腾汲思水，西迁至不儿罕山（今蒙古大肯特山）一带居住，生子名巴塔赤罕。

下传11世，至成吉思汗的11世祖朵奔蔑儿干（又做脱奔咩哩犍）。朵奔蔑儿干有兄名都哇锁豁儿，为蒙古部朵儿边氏始祖。传说他额中生一只独眼，能望见三程远处的势物。一日，兄弟二人同登不儿罕山眺望，都哇锁豁儿见一群百姓顺统格黎小河徙来，一辆黑车子前坐着一个美妙的女子。便对其弟说："那女子若尚未嫁人，索与弟为妻。"遂遣弟前去探察。朵奔蔑儿干见女子果然生得俊俏，且未嫁人。于是就娶她做了妻子。此女名阿兰豁阿（又作阿阑果火⑥），是豁里秃马惕首领豁里剌儿台蔑儿干（又作郭哩岱）之女。

阿阑豁阿先生二子，一名不古纳台，一名别勒古纳台。从此二子繁衍出两个蒙古部落。既而夫亡，阿阑豁阿寡居，又生三子。长名不忽合答吉，次名不合秃撒勒只，幼名孛端察儿。孛端察儿即是蒙古孛儿只斤氏⑦的始祖。

孛端察儿稍长，"状貌奇异，沉默寡言，家人谓之痴。其母阿阑豁阿语人曰：'此儿非痴，后世子孙必有大贵者。'"母死后，五兄弟分家产，诸兄以其愚弱，不分与他。孛端察儿见兄长们不以兄弟相待，便说："贫贱富贵，命也，资财何足道。"⑧遂独乘一匹生断梁疮的秃尾青白马，愤然离去，顺斡难河至巴勒谆阿剌（又作八里屯阿懒）之地，结草庵而居。饮食无所得，遇有苍鹰猎兽，遂用马尾作套，捕鹰而养之。鹰即驯，则以鹰捕猎飞禽、野兔为食。居数月，有兀良哈部众数十家自统格黎小河之野逐水草迁至此地。孛端察儿每日到这群百姓处讨马奶喝，夜则归宿草庵。后其兄不忽合勒吉来寻，邀与俱归。途中兄弟相谋以兵征服这些兀良哈人。既而，以孛端察儿为先锋，率壮士往征，果胜。孛端察儿掳一孕妇为妻，生一子，取名札只剌歹。他就是蒙古札答阑氏的始祖。后来曾与铁

木真结为安答⑨的札木合即出自该部。

孛端察儿正妻所生之子，名八林昔黑剌秃合必畜（又作把林失亦赖秃合必赤、合必赤把阿秃儿、不合）。至此，家道稍盛，有了马群、隶民和奴婢。

成吉思汗八世祖名咩撚笃敦（又作蔑年土敦、土敦-蔑年，父即八林昔黑剌秃合必畜。土敦当是突厥、回鹘的部族官吐屯，此人当是有吐屯官职的人）。他的妻子名莫拏伦-塔儿浑。“塔儿浑”是蒙古语“肥胖”之意。她生有七子⑩，而后寡居。她拥有巨额的收入和财富，马和牲畜，多到无法计算。她常常吩咐人把牲畜赶到一起，每当她坐在山头上，看到从山顶直到山麓大河边满是牲畜和遍地蹄印时，便喊道：“牲畜全聚拢来”！莫拏伦性刚急，时有名为押剌伊而（又作札剌亦儿、札剌儿、阻卜札剌部）的蒙古人，遭邻族契丹人的屠掠，身材如鞭子一般高的儿童全被杀光；家具什物和牲畜也被洗劫一空。一部分离契丹稍远的人得以幸免，他们逃了出来，向斡难河、怯绿连河一带迁徙，到了莫拏伦的营地境内。他们掘草根为食，在牧场上掘出了许多坑，破坏了莫拏伦儿子们驯马的地方。莫拏伦勃然大怒，驱车径出，辗伤了掘草的儿童，甚至有的被辗死。押剌伊而人怨愤，他们尽驱莫拏伦的马群以去。莫拏伦诸子不及被甲，便前往追击，为押剌伊而人所败，6子皆死，押剌伊而人乘胜杀莫拏伦，灭其家。唯长孙海都尚幼，被乳母藏于积木中得免。

此前，莫拏伦第七子纳真（又作纳臣把阿秃）按蒙古人的习俗在八剌忽部民家为赘婿，也幸免于难。事后，纳真将海都接往八剌忽之地。海都稍长，纳真与八剌忽怯谷⑪诸民，共立为君。后海都与纳真联合八剌忽部，起兵攻灭押剌伊而，虏其

民为奴隶，由此势力渐强。近旁部落归之者渐众。此后，纳真一支将营地移至斡难河下游。海都先在八剌忽真之地，后又迁回不儿罕山故地。

海都死后，其次子察剌孩领忽（又作察剌合领昆）嗣为首领，他是蒙古泰赤乌氏（又作泰亦赤兀惕）之始祖。泰赤乌部人数众多，拥有无数军队。察剌孩领忽与长子想昆必勒格二人都有辽朝的部族官号⑫。此时，蒙古部在漠北地区已是一支比较强大的势力。察剌孩父子的时代，当是蒙古部强盛的起点。

海都长子伯升豁儿多申（又作伯升豁儿多黑申、拜姓忽儿）生一子名屯必乃薛禅⑬，他是成吉思汗四世祖。伯升豁儿早亡，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察剌孩领忽娶嫂为妻，又生二子。一名坚都一赤那（又作建都一赤那，意为公狼），一名兀鲁克臣一赤那（又作玉烈贞一赤那，意为母狼）。这两个儿子的后代形成了两个部落，他们被称为赤那思部落（赤那思为赤那一词的复数）。屯必乃的后裔形成了另一支强大的势力集团，并一直与泰赤乌部联合。

屯必乃薛禅生二子⑭，长子合不勒罕（又作合不勒合罕、葛不律寒），次子（挦）薛赤列。屯必乃卒，合不勒被推举为首领，“管辖了全蒙古百姓”。他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列祖中第一个称汗的首领⑮。从他繁衍出许多氏族和分支，他的子孙被称为“乞牙惕氏”。在蒙古诸部中，他声名昭著，很受尊敬。合不勒及其儿子们都非常勇敢和能干。辽末金初，蒙古部建立起了强盛的兀鲁思⑯。

公元 1125 年（金天会三年），金灭辽后，北境达到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以北。金朝皇帝闻合不勒汗强盛，欲与通好，遣使邀其来朝。合不勒汗至，金帝待之甚厚。在一次有各种美

味食品和饮料的宴会上，合不勒汗大出风头。他一向认为金朝君臣生性狡猾，不讲信义，下毒害人是出了名的。因此格外小心。他水性很好，据说能在水中呆上吃掉一只羊的时间。席间，他不时到外面去，沉没到水里，仿佛是为了解暑。实则潜入水中，将吃下的东西全部吐掉，以防中毒。然后，回到席间继续照常吃喝。金朝君臣颇为惊异："他怎么老是吃不饱、喝不醉，老不呕吐?"在这次宴席上，合不勒汗很兴奋，他拍手而舞，走到金朝皇帝面前，抓住他的胡须。廷臣和护卫见他举止粗野无礼，便向他扑过去。但金帝非但没有怪罪他，反倒把这当成友好的玩笑和戏闹，宽恕了他，并送他很多金子、宝石和衣服。彬彬有礼地把他送了回去，以免引起双方敌对。但廷臣们认为不应该忽视他的无礼，将他纵还，于是又遣使追他还朝。合不勒汗害怕被金朝扣留，杀死了使臣，逃回了自己的部落。从此，合不勒汗与金朝关系破裂。

合不勒汗的妻子名豁阿-古鲁古。"豁阿"是容貌洁净、美丽的意思。古鲁古是她的名字。她是翁吉剌部人。有一次，她的一个名叫赛音-的斤的弟弟病了，从塔塔儿部请了一个萨满作巫法医治无效，赛音-的斤死了。他的亲属为此杀死了那个萨满。由于合不勒汗与赛音-的斤有亲戚关系，于是他便派兵去攻打塔塔儿部。塔塔儿是金朝的属部，金朝也经常驱使他们攻打合不勒。因此，两部互相敌对，彼此争战不休。

合不勒汗有七子，长名斡勤-巴儿合黑（又作窠斤-八剌哈哈、八剌哈、八儿哈-拔都。"斡勤"，蒙古语"姑娘"之意）。他得到这个名字是因为他的面容美净，他有一张阔大、下颏丰满的圆脸。他年轻时，就被塔塔儿人抓去送到金朝，被钉在"木驴"上处死。他是长支乞颜-主儿气（又作禹儿乞、禹儿

勤、主儿勤）氏的始祖。他的后裔也形成了许多部落。

合不勒汗死后，泰赤乌部首领想昆必勒格的儿子俺巴孩⑰作了蒙古部的汗。后来，俺巴孩汗到塔塔儿部选姑娘为妻，使塔塔儿人感到受了侮辱，将他抓起来送给了金朝。金朝依然将他用“木驴”处死。

俺巴孩汗死后，蒙古部推举合不勒汗第四子忽图剌为汗。忽图剌骁勇无比。蒙古诗人为他创作了许多颂扬的诗篇。据说，他声音宏亮，以致隔开七座山都能听到他喊叫的声音。他的手犹如熊掌，双手抓起一个无比强壮的人，能毫不费力地像折断木杆一样将他折成两段。他攻击之猛烈，可使三河之水翻腾起来。他每餐要吃整整一只三岁羊，喝一大碗酸马奶。忽图剌为了给俺巴孩报仇，统率全部蒙古军队进攻金朝。击溃了金军，缴获了无数战利品。回军途中，忽图剌轻装前进，携鹰打猎，遭到朵儿边部的袭击，军队溃散，他只身逃脱。当他走到一片沼泽时，马陷进了泥潭。他将一只脚踏在马鞍上，纵身一跳，跳到了水洼的边缘。这时，追击的人站在水洼另一边，向他喊道：“一个蒙古人丢掉马，还能有什么作为，不如回来吧！”他向敌人射了几箭，将他们赶跑。敌人退走后，他将马从泥潭里拉出来，他不愿空着手回家，于是又折回去，从朵儿边人的马群中抓了一匹驯良的公马，将母马驱赶在前边。时值春天，他又在草原上拾了一些野鸭蛋，装在靴子里，挂在马鞍上，光着脚骑在公马上悠闲地赶路。亲人们见败兵逃回而不见他的踪影，以为他已经战死，正在哀悼他。他的突然到来，使人们喜出望外。顿时，哀悼变成了欢庆。

忽图剌死后，合不勒的次子把儿坛把阿秃儿（又作八哩丹、八里丹）的第三子、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又做叶速该、

伊苏凯）把阿秃儿被推举为蒙古部首领。也速该英勇过人，威名远扬，曾多次与其他蒙古部落和金朝作战。而其中的多数战争是与当时的强部塔塔儿人进行的。

1162年（金世宗大定二年，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也速该在一次与塔塔儿人的战争中取胜，俘获了他们的部长帖木真-兀格（又作铁木真-斡怯、帖木真-斡怯）和豁里-不花（又作忽鲁-不花）。并洗劫了他们的马群和财产。当也速该凯旋时，适逢其妻诃额伦-兀真⑱在斡难河边迭里温孛勒答黑（亦作跌里温一盘陀山，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肯特省达达勒县境内）地方生下一子。他降生时，右手握着一块如赤石般的凝血，也速该颇感奇异。由于他战胜了敌人，当然认为这奇异现象是吉祥的征兆，遂以俘获的塔塔儿部长的名字为长子命了名，这就是后来令世界为之震惊的成吉思汗铁木真（又作帖木真、忒没真、特穆津）⑲。

诃额伦是也速该的长妻，生有四子，次子名拙赤·合撒儿（又作拂只·合撒儿）。"拙赤"是名字，"合撒儿"意为"猛兽"。由于他十分勇猛，故得到了这一称号。据说他的肩与胸很宽，而腰很细，他侧卧时，能容一条狗从肋下穿过。他力气过人，能用双手抓起一个人，像折一支箭一样将他折成两段。三子合赤温（又作哈赤温），他死得早，他的儿子额勒只带（又作按只吉歹、按只带）威望很高。四子铁木哥-斡惕赤斤⑳，他在蒙古人中间，以长于建筑、好修建"宫院"著名。铁木真诸弟，后来都是黄金家族中威名赫赫的人物。

铁木真九岁时，也速该带他到舅族斡勒忽讷兀惕百姓处选妻，行至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两山之间，遇见翁吉剌部首领特薛禅㉑。特薛禅见铁木真眼睛明亮，面上发光，相貌非凡，便

说："也速该亲家，我昨夜得一梦，梦见一白海青②两爪攫取日月飞落到我手上，这是奇异的。你今日领着儿子前来，正是应了我的梦。你们乞颜人的吉兆来了。"接着又说："我有一美貌的小女，请亲家去看看。"遂领也速该父子至其家。及见其女，果然容貌俊美，面上发光，眼睛明亮，很是中意。女名孛儿帖，长铁木真一岁。翌日，也速该代儿子向特薛禅求婚。特薛禅说：多次求婚才答应，则主贵；少次求婚就答应，则卑贱。虽然这样说，大凡女孩生下来，没有老留在家里的道理，我将女儿许配你的儿子，把他留在我家做女婿。于是，也速该用从马作了聘礼，将铁木真留在了特薛禅家。

在回家途中，行至扯克扯儿地面，也速该饥渴，适逢塔塔儿人在举行宴会，便在宴席前下了马。不意被塔塔儿人认出，他们为报往日之仇，邀他参加宴会，暗地里在食物中下了毒。也速该在回家的路上感到不适，意识到自己是中了毒。勉强回到家中，便死去了。之后，按照他的遗言，人们将铁木真从翁吉剌部接回。

也速该死后，他的儿子年幼，家道开始衰落。同族的泰赤乌部势力强大，他们遗弃了铁木真母子，迁到了别处。铁木真家的属民也相继离开他们投靠了泰赤乌部。近侍脱端-火儿真也准备离开，铁木真亲自挽留。他却说："深池已干，坚石已碎，留复何为?"诃额伦见此情景，遂亲自上马，纛旗将兵，追赶叛离的部众，驱其大半回归。部将察剌合（又作察剌海）在厮杀中受伤，铁木真亲自慰劳。此后，仍不断有部众离他们而去。

被族人遗弃的铁木真母子流落在斡难河畔，过着贫困的生活，家里只剩下一个仆人、九匹马。在艰苦的环境中，坚强的

诃额伦带着幼子们与命运抗争。她束紧固姑冠㉓，严整衣裙，奔波在斡难河边。他们采拾杜梨野果，掘取野葱、野韭和草根为食，铁木真兄弟还在河中捕鱼，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

一次，铁木真因捕获的一尾金色鱼被其异母弟抢走，与之发生争执。母亲教育他们：你们是同父之子，一定要和睦相处。要知道，现在你们是“影子以外无伴当，尾巴以外无鞭子”，如果兄弟间再不和，就无法向泰赤乌人报仇。铁木真不听劝告，竟杀死了异母弟别克帖儿。为此，他遭到母亲的严厉斥责。她训斥说：“败子们，你们如吃胞衣的狗，如冲山崖的猛兽，如难抑其怒的狮子，如吞食活物的蟒蛇，如自冲其影的海青，如噤声吞食的大鱼，如咬其羔儿后腿的风雄驼，如在风雪里奔冲的狼，如赶不动雏儿而食之的猛禽，如护窠的豺狼，如搏食的猛虎，如疯狂的禽兽。你们除影子外无伴当，尾巴外无鞭子。现在正受着泰赤乌人欺凌，谁去报此仇，你们怎么作出如此手足相残之事。”㉔

铁木真稍长，泰赤乌人惧其羽翼丰满而成后患，便前来袭击。诃额伦母子逃入密林，泰赤乌人无法进入，遂将林子包围起来。铁木真躲了几天后，牵着马出来寻找食物，被泰赤乌人抓获。泰赤乌部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令他徇行各处，每营（户）住宿一夜，各户轮流看守。一天，泰赤乌人举行宴会，铁木真用枷将看守他的小孩打昏在地，逃了出来。在泰赤乌人出来搜索时，他仰卧在水沟里，将身体藏入水中，面部露出水面。速勒都思（又作速勒都孙）人锁儿罕失剌发现了他，但没有告发。前几天，铁木真曾被派到锁儿罕失剌家看管，他的两个儿子沉白和赤老温怜悯他，夜间曾给他卸掉枷锁。他认为这家人也许会救他，于是在追捕结束后，铁木真又回到了锁儿罕

失剌家。沉白和赤老温说："雀儿逃避大鹰，逃入草丛里，草丛尚能救他性命，如今有人逃到我们家里，若不能救他，反不如丛草。"遂将铁木真的枷打碎烧掉，让他藏到装羊毛的大车里。几天后，锁儿罕失剌备了一匹甘草黄白口的骒马，煮了一只吃两只羊奶的肥羔羊，装了一皮桶马奶子，给了他一张弓，两支箭，送他上路。铁木真得以同母亲、弟弟会合。不久，全家迁到桑沽儿小河（今克鲁伦河支流臣赫尔河）附近合剌只鲁格的阔阔海子地方住下，以打捕土拨鼠、野鼠为食。一天，铁木真家门前的八匹骟马被人盗走，仅存的一匹黄马又被其弟别勒古台骑着猎土拨鼠去了。他们只好等傍晚别勒古台回来再去追赶盗贼。路上，铁木真幸遇纳忽伯颜（伯颜，意为富人）的儿子孛斡儿出（又作博尔术、孛斡尔出、博郭尔济），在他的帮助下，追回了被盗的八匹骟马。

铁木真自父死回家后，一直没有再见到妻子孛儿帖。生活稍事安定后，他便与别勒古台沿着怯绿连河去寻觅孛儿帖。在扯克彻儿、赤忽儿古两山之间找到了特薛禅家，在特薛禅的主持下与孛儿帖完婚㉕。并由其岳母将他们一直送回家。

铁木真想让孛斡儿出做他的那可儿㉖，遣别勒古台去接他。孛斡儿出没有禀告父亲便随着别勒古台来了，铁木真非常高兴。不久，他们全家迁到了客鲁涟河源头不儿吉之地（今克鲁伦河上游布尔肯小河旁）。

艰难坎坷的历程，使铁木真深感身单势孤，难以成就大业。为应付复杂的环境，反抗泰赤乌贵族的欺压，他需要强大势力的支持、帮助。于是，他与合撒儿、别勒古台来到土兀拉河黑林（今蒙古乌兰巴托南）克烈部首领、他父亲的安答王罕处，将孛儿帖见公婆时的礼物黑貂鼠皮袄送给了王罕，尊称王

罕为父，以求得他的支持和庇护。王罕答应帮助他将离散的部众招集回来。通过王罕，铁木真又取得了他儿时的安答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支持与配合，开始聚集力量。

继孛斡儿出之后，居于不儿罕山附近的兀良哈部人札儿赤兀歹老翁携子者勒麦（又作折里麦）来投铁木真，表示供他驱使，为他“备鞍子，看门户”，即做门户奴隶。

当铁木真家族势力开始慢慢恢复却羽翼未丰之际，又遭到了三姓蔑儿乞人的袭击。他们洗劫了铁木真的营地，虏走了家人豁阿黑臣和别勒古台的母亲，孛儿帖兀真由于没有马骑，坐在一辆牛驾的黑车子里，也被蔑儿乞人抢走，并给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作了妻子。蔑儿乞人来袭时，诃额伦怀抱幼女帖木仑，与铁木真五兄弟、孛斡儿出、者勒蔑等骑马逃入不儿罕山，蔑儿乞三百军马围追，终不能及。于是他们虏走孛儿帖，报了当年也速该夺妻之仇㉗。

不久，铁木真、合撒儿、别勒古台再次前往土兀拉河黑林拜见王罕，将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请求援助。王罕答应起兵2万助击蔑儿乞，救还孛儿帖。同时，要他们再与札木合联系，要求他再出兵2万相助。于是铁木真遣合撒儿去见他的安答札木合㉘。札木合也答应出兵，将作战计划通报铁木真和王罕。至期，王罕与其弟札合敢不各率一万兵马，札木合起兵一万，并统领铁木真的一万兵马。他们在孛脱罕孛斡儿只地方会师后，突袭蔑儿乞人的营盘不兀剌川（今恰克图南布拉河）。蔑儿乞首领脱黑脱阿无备，部众溃散，与兀洼思氏蔑儿乞的答亦儿兀孙只带着少数随从沿着薛凉格河（今色楞格河）逃往巴儿忽真地面（今贝加尔湖以东一带）。铁木真在溃逃的人群中找到了孛儿帖。合阿惕氏蔑儿乞的合阿台答儿马剌被俘，送往

不儿罕山。为报母亲被虏之仇，别勒古台将300蔑儿乞人全部杀死。毁坏了房屋，将美貌女子虏为妻子或奴婢。公元1185年，铁木真在王罕、札木合的帮助下，征服了蔑儿乞部㉙。

这次战争后，铁木真在蒙古诸部中声威大振，致使泰赤乌人闻风逃窜㉚。铁木真的力量逐渐壮大起来，他又迁回了桑沽儿小河驻营。蒙古部众纷纷来附。其中有兀良哈人速不台（又作速不额台）、者勒蔑的弟弟察兀儿罕，巴鲁剌族人忽必来，忙忽族人哲台、多豁勒忽兄弟，阿鲁剌族人孛斡儿出的弟弟斡哥连，巴阿邻族人豁儿赤兀孙老人等大小20余部的首领和部众。这些人多出自弱小的氏族，有不少地位低微的奴隶和属民，他们总是依附于强大的贵族势力。现在，他们投靠了铁木真，拥立他为首领。愿为他"砍断逞气力者的项颈，劈开逞雄勇者的胸膛"，"如老鼠般地把收集的财产储存起来，像黑老鸦般地把所有的东西收拾起来。似盖毡般地作为屏障，把宫屋保护得风雨不透"㉛。他们希望铁木真事业成功，自己的地位也可随之上升；铁木真则想依靠他们壮大自己，于是他用高官、美女对他们加以笼络。这从豁儿赤与铁木真的一次对话中就可以得到反映。豁儿赤对铁木真说："你若作国的主人呵，怎生教我快活？"铁木真回答："我真个做呵，教你作万户。"豁儿赤则说："我告与你许多道理，只与我个万户呵，有什么快活？与了我个万户，再国土里美好的女子，由我捡选三十个为妻。"

这时，一些原来有名望的乞颜氏贵族也重新向铁木真靠拢，他们中有合不勒汗的长支主儿乞氏的莎儿合秃主儿乞及其子撒察别乞、泰出，忽图剌汗之子拙赤汗和阿勒坛，也速该之弟答里台斡赤斤，捏坤太子之子忽察儿别乞等。投靠泰赤乌的原也速该的部属、札木合的族人及其麾下部众也有来归者。那

些部落贵族本来是享有被拥立为汗的权力的，但现在，铁木真的势力发展了，他们已经无力与之对抗，反而希望借助于铁木真掠夺更多的财富和奴隶，于是他们共同拥立铁木真为汗。

1189年（金大定二十九年，宋淳熙十六年），贵族们在古连勒古（又作古列勒古）地面桑沽儿小河地方召开大会，作出保证说："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作前哨，但虏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如厮杀时违了你号令，并无事时坏了你事呵，将我离了妻子家产，废撇在无人烟地面里者。"于是，铁木真被蒙古各部贵族推举为汗，号成吉思[32]。

铁木真即为蒙古部的首领，便开始建立巩固统治地位的制度，分设带弓箭的、带刀的、管饮膳的、掌管放牧羊只的、管修造车辆的、管家内人口的、掌驭马的、管牧养马群的、负责远哨近哨的和守卫宫帐的等10种职务。又任命最早追随他的亲信那可儿孛斡儿出和者勒蔑为那可儿之长。担任上述职务的，除其弟别勒古台、合撒儿外，几乎全是他的那可儿。他们不像蒙古旧贵族那样拥有显贵族望和属民，而是靠铁木真"用人肉养着，用铁索拴着"，随时可以放出去博取猎物的新贵。铁木真通过这套制度，组成了一支以那可儿为核心的精悍队伍，作为自己力量的基础。经过20年的抗争，以成吉思汗为首的黄金家族终于在漠北草原崛起了，此后，成吉思汗便开始了他统一草原各部、创建大蒙古国的历程。

黄金家族的崛起乃是具有世界性历史意义的大事，当成吉思汗所向无敌地扩张势力之后，他和他的家族的后裔，不但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建立了大蒙古国和元朝，并曾在今新疆，中、西亚和东欧地区建立过察合台、窝阔台、钦察和伊利四大

汗国。元朝灭亡后，成吉思汗和黄金家族的后裔，作为蒙古贵族、地方统治者，在大部分蒙古地区统治了数百年，直至 20 世纪初中叶。

注 释

①“黄金家族”一称，见于《蒙古黄金史纲》等文献，参见朱风、贾敬颜等译《汉译蒙古黄金史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年。

《蒙古黄金史纲》一作《阿勒坦·脱卜赤》，俗称《小黄金史》，蒙古编年史。作者佚名，成书于明末。有蒙古文、俄文、日文、英文、汉文等刊行本，有《蒙古编年史——黄金史》、《成吉思汗传》、《圣成吉思汗传》、《黄金史——蒙古年代记》、《蒙古黄金史》、《汉译蒙古黄金史纲》等不同译名。此外，尚有以《喀喇沁本蒙古源流》为名的抄本、译本流传于世。

②蒙古语名《忙豁勒·纽察·脱卜察安》（蒙古秘史），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文献。

原文为畏兀儿体蒙古文，早已散失。作者佚名。书后有写于鼠儿年的记载，故学界有成书于 1228 年戊子、1240 年庚子、1252 年壬子和 1264 年甲子等几种意见。现存的文本是明朝四夷馆的汉文音译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教学蒙古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旁注汉译，并分段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明初刻本分正集 10 卷和续集 2 卷，《永乐大典》收录本为 15 卷。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 282 节，学界一般习惯于按节编序引用。《元朝秘史》自 19 世纪就已流传到国外。至今，此书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德、俄、匈牙利、英、法等文字，在某些国家还出版过拉丁音写原文本。《元朝秘史》从成吉思汗 22 代祖先写起，记载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的起源。成吉思汗先人谱系，他的生平业绩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突出描述了成吉思汗早年的坎坷经历和他在战乱中成长壮大以及建立大蒙古国的过程。书中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可知此书是经过续修的。

在现行的版本中，以 1936 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为最好。本文和以后各篇所引用的《元朝秘史》皆为该版本。

③又名《圣武亲征记》，著于元世祖至元年间。作者佚名。某些学者认为可能是翰林学士王鹗等人所撰。

它是一部记录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历史的重要史籍。现存版本中，以《说郛》本为最早，近人王国维校注本质量较好。近年，又有贾敬颜教授《圣武亲征录校本》油印本问世。本文及以后各篇所引用的即是贾敬颜师《校本》，以下简称《亲征录》。

④一译《蒙古全史》。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阿丁·法兹勒·阿拉赫（1247—1318 年，波斯哈马丹人）奉伊利汗合赞和合儿班答之命主持编纂，以波斯文撰写，历时 10 年完成。全书原分为三部：第一部为《蒙古史》，第二部为《世界史》，第三部为《世界地志》。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前两部和一个残缺不全的附编《阿拉伯、犹太、蒙古、拂郎、中华五民族世系谱》。《蒙古史》包括第一至第三卷，分别记述了乌古思及起源于乌古思亲属、后裔的各部落、民族，即札剌亦儿、塔塔儿等 19 个部落；克烈、乃蛮、汪古、唐兀、畏兀儿、吉利吉思等 9 个大部族；自古以来就称为蒙古的诸部落；成吉思汗列祖纪和成吉思汗编年大事记、成吉思汗训言、军队编制、波斯伊利汗以外的成吉思汗后裔史以及旭烈兀至合赞汗的诸伊利汗史以及同时代的亚洲、非洲各国君主传。是研究 14 世纪以前的蒙古史的最重要的史籍之一。

《世界史》包括第四至第七卷，分别记述了波斯古代诸帝王史，迄萨珊王朝之衰亡以及穆罕默德传；阿布·伯克尔以至穆斯塔辛诸哈里发史，波斯后期伊斯兰教诸王朝史，突厥、中华、犹太、拂郎、印度等民族的历史。本书流传至今的波斯文抄本有 10 余种。其中最古老、最佳的为伊斯坦布尔 1317 年抄本。百余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本书进行了校勘、翻译、注释和研究。本文引用《史集》第一、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3 年出版；第三卷，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6 年出版。以下简称《史集》。

⑤旧译“孛儿帖赤那”作“苍色的狼”，“豁埃马阑勒”作“惨白色的鹿”。关于蒙古人祖先的传说，《元朝秘史》载，“当初元朝的人祖，是天生一个苍色的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同渡过腾吉思名字的水，来到于斡难名字的河源头，不儿罕名字的山前住着，产了一个人名字唤和‘巴塔赤罕’”；《史集》记载说：“大约距今二千年前，古昔即被称为蒙古的部落，与其他突厥部落发生了内讧，终于引起战争。其他部落战胜了蒙古人，并对他们进行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这两家人害怕敌人，逃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个地方叫额儿吉捏—昆。‘昆’的意思是‘山坡’，而‘额儿古捏’意为‘险峻’；这个地方意即‘峻岭’。那两人的名字是：捏古思和乞颜。”又说：“所有蒙古部落都起源于逃进额儿古捏—昆的那两个人的氏族。而孛儿帖赤那则是那两个人后裔中一些部落的首领。……他有许多妻子和孩子。名叫豁埃马阑勒的长妻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巴塔赤合罕。”

关于蒙古人的狼鹿祖先传说，反映了他们先民时代的图腾观念。狼祖传说在北方游牧民族中早已有之。参见韩儒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载《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也有人主张“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乃是蒙古人男女祖先的名字。它与蒙古人出自苍狼、白鹿无关。

⑥《元史·太祖纪》，中华书局点校本，以下简称《太祖纪》。

《史集》称阿阑豁阿为豁罗剌思部人。“豁罗剌思”，多桑《蒙古史》作“火鲁剌思”。

⑦“孛儿只斤”又作“博尔济斤”、“博尔济锦”、“布尔济斤”，意为“蓝眼睛”。据说，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过了一段时期，有一天，在家里睡觉，一线亮光从帐庐（毡帐）的烟孔上射进来，射入她的腹里。这个情况使她感到惊奇，她惊吓得不得了，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这件事。过了一些日子，她知道自己已经怀孕了。当分娩临近时，她的兄弟们和丈夫的族人们聚在一起说道：“一个没有了丈夫的妇人私下勾引男子怀了孕，这怎么行呢？”阿阑豁阿回答道：“我没有了丈夫却有了孩子，不

管实际情况怎样，你们猜测得对，你们的怀疑表面上看来也对。但是毫无疑问，有些怀疑真是罪过，我怎么能作出应受责备的可耻的事呢？的确，我每夜都梦见一个红发蓝眼的人慢慢地向我走近来，然后又悄悄地转了回去。我看得很真！你们对我的任何怀疑都是不对的，我所生的这些儿子，都属于特殊种类。他们长大了要成为万民的君主和汗，到那时，你们和其他合剌出（即不属于成吉思汗氏族的部落或人、部落成员）部落才会明了我这是怎么回事。”自其子孛端察儿时，始称“孛儿只斤氏”。其后裔繁衍形成了许多部落，除了成吉思汗祖辈一支外，皆另有姓氏。至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罕时，复冠以“乞颜”之称。乞颜，《秘史》做“乞牙惕”，为“乞颜”的复数形式。《太祖纪》做“奇渥温”，意为“狂暴湍急的洪流”。传说乞颜为蒙古部始祖之一，其后裔遂以为氏。至成吉思汗 11 世祖朵奔伯颜以后，族支繁衍，各有姓氏，其称号遂湮没无闻。合不勒汗时，复其称。

一说“孛儿只斤”一称，始于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时。由于至也速该把阿秃儿时出现了这个特殊的征象。据蒙古人说，这是阿阑豁阿所说的她的子孙的王权征候，这种红发蓝眼睛相貌便证实了她所说的话的正确以及她所遇到的情况的确凿可靠，无可置疑。

据说，“直到现在（13 世纪初，拉施特撰写《史集》时——引者注），出自也速该把阿秃儿及其诸子与兀鲁黑的后裔，大部分都是蓝眼红发的。”“兀鲁黑”，蒙古语，意为后裔，本氏族的子孙，或与札惕，即外人、外氏族的人相对，作同族人讲。被称做兀鲁黑的不仅限于本氏族成员，凡是有共同祖先的一切有血缘关系的氏族成员都被认作兀鲁黑。汗的氏族被称为阿勒坦—兀鲁黑，即“黄金氏族”。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⑧《太祖纪》。

⑨安答，也作谙达、安达、按答。蒙古语音译，意为朋友、义兄弟。

⑩此据《太祖纪》，《史集》则说她有九个儿子。

⑪八剌忽怯谷又作八儿忽真之隘、巴儿忽真一脱窟木，其地有八儿忽真河。约当今贝加尔湖东巴尔古津河流域一带。

⑫“领忽”或“领昆”即令稳，为辽朝小部族官；“想昆”即“详稳”，是辽朝授与大部族首领的官号。

⑬屯必乃，又作敦必乃、统必乃。“薛禅”，蒙古语，意为贤者。

⑭此据《元朝秘史》。《元史·宗室表》称他有六子。《史集》则说“他有九个聪明、能干、勇敢的儿子，其中每一个都是现今有声望的分支和部落的始祖。在这九个儿子中，五个大儿子是一母所生，另外四个是另一个母亲所生。他们全都是把阿秃儿和受尊敬的人”。“把阿秃儿”亦作拔都、拔都鲁、霸都鲁、巴图尔，蒙古语音译，义为“勇士”。

⑮《史集·成吉思汗列祖纪》中，海都、屯必乃都带有汗（或作“罕”、“合罕”）称号；《太祖纪》亦有海都在八剌忽时曾被“共立为君”的记载；《元史·速不台传》则称屯必乃为“皇帝”。但这大概是成吉思汗后人夸耀祖先的说法。根据《秘史》，真正统一全蒙古部众并开始称汗的当是合不勒。

⑯“兀鲁思”，又作兀鲁昔，蒙古语音译，原意为“百姓”，后引申为“领民”、“领地”和“国家”。

⑰《史集》称俺巴孩为察剌合领昆的儿子速儿合黑都忽—赤那之子。速儿合黑都忽—赤那《秘史》缺载。

⑱诃额伦—兀真，也做诃额伦—额客、月伦—旭真、月伦—额客或月伦太后。“兀真”、“旭真”、“额客”，蒙古语，意为“妻”。

⑲关于成吉思汗的生年，当代国内学者多主1162年（壬午）说。主要依据《元史·太祖纪》、《南村辍耕录》、《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等汉、蒙文史籍。清代学者主此说者有邵远平（《元史类编》）、魏源（《元史新编》）和曾廉（《元书》）等。此外，尚有生于1154年（甲戌）、1155年（乙亥）、1167年（丁亥）等意见。

⑳铁木哥—斡惕赤斤又作“帖木格—斡惕赤斤”，“铁木哥—斡赤斤”。“斡惕赤斤”或“斡赤斤”，意为“灶火”和“禹儿惕之主”，幼子

也称“斡惕赤斤”。后来斡惕赤斤竟成了铁木哥的名字。“禹儿惕”，突厥语，蒙古语音译为“嫩秃黑”，又做“纳秃克”、“农土”。《秘史》释作“营盘”、“屯营”或“住所”。《元史》解作“经界”。蒙古牧民游牧驻营的地区。蒙古各部统一后，分赐诸王勋戚的分地也称“嫩秃黑”。参见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竣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78年。

㉑翁吉剌部又作王纪剌、弘吉剌、广吉剌、光吉剌、翁吉剌、雍吉剌、弘吉烈、弘吉列、雍吉烈、翁吉里等。而《南村辍耕录》和《秘史》所载的翁吉剌歹、翁吉剌惕等为其复数形式。

特薛禅，又做德薛禅、德那颜。本名为“德”或“特”，“那颜”蒙古语意为“官人”。“薛禅”为号或赐名，意为贤者。德从成吉思汗起兵有功，故赐号“薛禅”。

㉒海青即海东青，一种能猎捕天鹅的猛禽。白海青即纯白色的海东青，尤为名贵。

㉓固姑，又作姑姑、顾姑、故故、故姑，元明时期蒙古族已婚妇女所戴的一种头冠。《黑鞑事略》记载：“妇人顶故姑。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直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以我朝（指南宋——引者注）翠花及五色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草木子》载：“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带姑姑，衣大袍。其次即带皮帽。姑姑高圆二尺许，用红色罗盖。唐金步摇冠之遗制也。”

㉔《元朝秘史》第78节。

㉕《蒙古源流》载铁木真与孛儿帖完婚时间是1178年。

㉖那可儿，又作那阔儿，《秘史》释为“伴当”。古代蒙古各部首领与那颜贵族的亲兵和扈从。多出身于自由民或贵族氏族成员，以“誓约”形式与贵族首领结合，接受领主的赡养和保护，平日侍从那颜，战时随主出征。后发展演变为怯薛，即护卫军。

㉗初，也速该在斡难河放鹰，适逢蔑儿乞人也客赤列都从斡勒忽纳

兀惕族娶妻归来。他见那女人生得漂亮，即与其兄捏坤太子和弟答里台斡惕赤斤二人前去追赶赤列都，将新娘诃额伦抢来与也速该成了亲。参见《元朝秘史》第54—56节。

㉘铁木真曾两次与札木合结安答。第一次是铁木真9岁时，札木合送给铁木真一个狍子髀石（髀石，本为击兔用，也是儿童玩具，可在冰上抛掷，视其远近定胜负）；铁木真送给札木合一个铜灌的髀石，两人在斡难河的冰上打髀石游戏，遂结为安答。第二次是在一个春天，两人用小木弓射箭时，札木合将自己的一个用两个小牛角钻眼粘成的髅头（即箭头，响髅头亦即响箭或鸣镝）送给了铁木真；铁木真则将自己的柏木髅头送给了札木合，两人再次结安答。

㉙参见《元朝秘史》。《亲征录》、《史集》、《元史》都没有记载铁木真、王罕、札木合联兵攻打三姓蔑儿乞人的战争。据《史集》载，其时蔑儿乞人与王罕关系尚好，他们抢到孛儿帖后，将她送到了王罕处，王罕待以儿媳之礼。铁木真遣札剌亦儿人撒巴去接，回家的路上孛儿帖生下了术赤。由于路途危险，又没有襁褓，撒巴用面粉（一说用软泥）作了个面团，将婴儿裹在里面，并将他置于自己怀中，因为他是猝然降生的，所以起名术赤。

㉚1186年4月，铁木真与札木合间发生矛盾，铁木真离开札木合。一天夜里，铁木真率部众行经泰赤乌人营地，这些泰赤乌人闻讯惊起，连夜逃奔札木合处。他们慌忙逃走时，将一名叫阔阔出的小孩丢弃在营盘，被铁木真部众送给了诃额伦抚养。

㉛《元朝秘史》第124节。

㉜此据《蒙古源流》记载，参见《元朝秘史》第120—126节。当今学术界多认为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时，始称成吉思汗。

元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

铁木真登上汗位之初，其家族的兀鲁思只控制着怯绿连河上游不大的地域，属众也不多。而蒙古诸部中的泰赤乌、札答兰等部的实力都在他之上。要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蒙古诸强部都承认其权力，他仍然需要强大的克烈部首领王罕的支持。因此，即位后，他立即派遣答孩、速格该二人向王罕报告，并得到了王罕的认可。他的崛起，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泰赤乌部贵族和札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不安、不满与仇视，因为他们既不愿看到、也不能容忍出现一个新的、强大的、足以与他们抗衡的势力。因而，蒙古各部贵族间的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于是，以札木合之弟给察儿①抢劫铁木真马匹被射杀的事件为导火线，引发了铁木真与札木合、泰赤乌部贵族间的一场战争——十三翼之战。

时给察儿居玉律哥泉②。一日，率众至萨里川，将成吉思汗的马群劫走。成吉思汗的伴当拙赤答儿马剌连夜追赶，至马群，暗伏马上，箭射给察儿致死。以此之故，札木合联合泰赤乌部贵族，起兵3万，分十三翼进攻成吉思汗。时成吉思汗驻

营于古连勒古地方，得到札木合部下亦乞列思族人木勒客脱塔黑、孛罗勒歹二人的报告③，立即组织起自己的军队总共3万人编成十三翼，阵于答兰版朱思之野（又作答兰巴勒主惕、答兰巴勒渚思），准备迎击。十三翼即十三个古列延④，其中第一翼为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率领的亲族、部属、侍臣、仆役和属于她个人所有的人们；第二翼成吉思汗自己统领的诸子、那可儿和护卫队；第三翼至第十一翼是乞颜氏各贵族率领的族人和属民；十二、十三两翼由来附的旁支尼鲁温氏族成员组成⑤。这就是成吉思汗的全部武装力量。

经过激战，成吉思汗溃败，退至斡难河的哲列捏狭地⑥。札木合获胜回军，对赤那思族（也称捏古思族，为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的后裔）即成吉思汗的第十三翼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将其部众煮了70大锅，又砍下察合安的头，系在马尾上拖着。由于札木合性情残暴，军纪不严，虽然取得了胜利，而各部首领却纷纷离他而去，归附了成吉思汗。当时，诸部之中"唯泰赤乌地广民众，号为最强"。但其"内无统纪"，各强支之间互争雄长，不能统一；贵族、首领对部众又十分凶残，常攘其车马，夺其饮食，无人君之度。

与他们的残忍骄横态度相反，成吉思汗则采取了笼络人心的作法。有泰赤乌属部照烈部（又作沼兀列惕）与成吉思汗所居营盘邻近。一日，成吉思汗出猎，偶与照烈部猎骑相属，由于他们没带锅和粮食，成吉思汗遂邀他们同宿，凡留者，悉与饮食。翌日再围猎，他又令左右将野兽驱入照烈部的猎场，使其满载而归，部众不胜感激。照烈之长玉律为泰赤乌贵族欺凌，不堪忍受，遂与塔海答鲁率所部来归。他们对成吉思汗说："我们如同无夫之妇，无主之马群，无牧人之畜群。长母

之诸子（指泰赤乌部贵族）正在毁灭我们，为了你的友谊，让我们一起用剑去作战，去歼灭你的敌人！"⑦成吉思汗听后大受启发，因说道："如我熟寐，捽发而悟之；兀坐，掀髯而起之。汝之言，我素心也，汝兵车所至，余悉力而助也。"遂与之结盟。后玉律和塔海答鲁二人食言叛去，其族人忽敦忽儿章⑧怨其反侧，遂杀之。此后，成吉思汗对部属愈加宽仁、关怀和加意笼络。时札木合和泰赤乌贵族的部属多苦其主非法，见成吉思汗仁义，有人君之度，"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以为"安民定国，必此人"。于是兀鲁兀惕、忙忽惕（忙兀）、晃豁坛、速勒都思等族以及主儿扯歹（术赤台）、忽余勒答儿（畏答儿）、蒙力克诸人，纷纷来附。十三翼之战，成吉思汗虽败犹胜，实力反而因此壮大。

接踵而至的又一次机遇，使成吉思汗的威望空前提高。这就是他与王罕联兵配合金朝夹攻塔塔儿部的斡里札河之战⑨。

自金初以来，金朝一直利用塔塔儿部为他们防卫东北路边墙，使之与其他各部互相牵制，在金朝与蒙古各部之间起一种缓冲作用。塔塔儿部是一个人数众多、强大、富有的部落，它长期为金朝属部，在金朝的支持、挑动下，经常攻击蒙古、克烈等部。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和俺巴孩等曾被他们执送金朝，处以"木驴"之刑，也速该又被他们毒死，两部遂成世仇。金章宗明昌六年（1195），蒙古部落山只昆（散只兀）、合答斤（合底斤）联合翁吉剌等部，侵扰金朝边境，金遣夹谷清臣率师北伐，以轻骑8千，令宣徽使移剌敏为都统，左卫将军完颜充、招讨使完颜安国为左、右翼，分领前队，清臣自选精兵1万以当后队。并征召诸纠部族军从征。金军进至合勒河（今哈拉哈河），前队移剌敏等于栲栳泊（今呼伦湖）攻下14

营寨，回迎清臣大军。塔塔儿部（北阻蹼）乘金军回师之机，拦夺其所获羊马以归。清臣则遣人责其赎罚，塔塔儿首领蔑古真薛古勒图（又作蔑儿真速勒图）因此反叛。金章宗责清臣贪小利而失大局，命右丞相完颜襄代之。承安元年（1196），完颜襄（《元朝秘史》作王京）兵分两路北征，东路军进至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为塔塔儿所围，三日不得出。完颜襄率兵往援，鸣鼓夜发，清晨突袭，塔塔儿溃败，部众向斡里札河退却。完颜襄遣安国追击⑩。

成吉思汗得讯，立即报告王罕，邀他出兵共同配合金朝夹击塔塔儿。并以“为父祖复仇”的名义，征集长支主儿乞部撒察别乞、泰出等族人助战。主儿乞氏没有出兵，成吉思汗遂率领自己的一个古列延人马与王罕军会合，引军自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的忽速秃失秃延、纳剌秃失秃延⑪之野，协助金军击溃塔塔儿，攻破两寨，捕杀其首领蔑古真薛兀勒图（又作灭兀真笑里徒、蔑兀真速勒图），“尽虏其车马粮饷”，“又获大珠衾、银绷车各一”。在这次掠夺中，他们还虏获了“银摇车和饰有珠宝的被子”⑫。由于当时这种奢侈品在蒙古人中间很少，因此，这件事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大事。在抢劫塔塔儿人寨子时，还拾到一个带着金圈环子、穿着金纻丝貂皮里兜肚的小孩。给诃额伦做了养子。他就是后来著名的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又作忽都忽、忽都虎、失乞刊忽都忽）。

斡里札河之战的胜利，不仅使成吉思汗有力地打击了劲敌，使世仇塔塔儿部从此一蹶不振，而且在蒙古部中赢得了能“为父祖报仇”的崇高声望。同时，他和王罕也得到了金朝的封赏，金授成吉思汗“札兀惕忽里”（乣军首领）之职。王罕则得到“王”的封号。王罕本名脱斡邻勒（又作脱里）。自被

金朝封为“王”，始在“罕”（汗）号之上加“王”，而有“王罕”之称。

金朝的封赏大大提高了成吉思汗的权力，从此他可以用朝廷命官的身份号令蒙古部众和统辖其他贵族。同时，也缓和了蒙古部和金朝的矛盾，为他统一蒙古各部创造了有利条件。

斡里札河之战前蒙古部贵族内部就已经出现裂痕。合不勒汗长子一支，即乞颜—主儿乞氏依恃长支族望和所继承的精悍部众，小视把儿坛把阿秃儿的子孙。撒察别乞、泰出等长支贵族虽然推举铁木真为汗但并不情愿服从他的管辖，而且一直怀有争夺权位的野心。一次在斡难河边树林中举行的亲族宴会上，撒察别乞的母亲责打了成吉思汗的司厨失乞兀儿（又作失丘儿、失邱儿）；主儿乞氏掌管马匹的不里孛阔砍伤了为成吉思汗管理马匹的别勒古台。两家因此而发生了一场争斗。这两件小事暴露了成吉思汗与长支贵族的矛盾，同时，也使他意识到主儿乞氏是他的危险对手。攻打塔塔儿时，主儿乞氏非但不肯出兵，反而乘成吉思汗率兵出征之机，劫掠了他的奥鲁⑬，违背了当初推举可汗的盟约。于是，成吉思汗以此为理由，于1197年从斡里札河回军后，乘胜征讨主儿乞氏。时主儿乞人的营盘在客鲁连河上游的朵罗安孛勒答兀之地（又作朵栾—盘陀山、朵兰孛—孛勒答黑，今蒙古境内克鲁伦河与臣赫尔河合流点之西的巴颜乌兰山南麓）。成吉思汗军至，主儿乞即溃，撒察别乞、泰出等料不能敌，带少数人逃跑，至帖列秃地方，被成吉思汗捉获处死。以前合不勒汗挑选出来授与长子的“有胆有勇的百姓”，全部被成吉思汗兼并，成为他的“梯己百姓”。札剌亦儿族的古温兀阿（又作孔温窟哇），赤剌温孩亦赤兄弟分别带领二子模合里（木华黎）、不合和统格、合失来投

成吉思汗，为其“永远做奴婢”、“看守金门”。赤列温又将第三子者卜客送与成吉思汗弟合撒儿。者卜客于主儿乞的营盘内拾得一个许兀慎族的小孩，名叫孛罗兀勒（又作博尔忽、博尔浑、博罗欢），也被诃额伦收为养子，成为后来的“四杰”之一。攻灭亲族中最有势力的长支贵族，大大提高和巩固了成吉思汗的权力，这是他迈向成功之路的重要一步。此后，他不断地削弱蒙古部中其他贵族的权力、地位，迫使他们逐渐降为从属于他的一般那可儿。

驻牧于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之东的翁吉剌、合答斤、山只昆等部落，屡扰金朝边塞。承安三年（1198），金朝在击溃塔塔儿人的反叛之后，“乘其春暮马弱”，遣宗浩、襄等率兵进剿三部。先破翁吉剌，后合答斤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等亦降。这些“桀傲不驯”的部落受到重创，力量大大削弱。金朝的统治此时也已由盛转衰，无力继续控制蒙古草原。这一形势为以后成吉思汗东进夺取东部地区（今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一带）显然是有利的。

主儿乞氏被吞并之后，泰赤乌氏贵族即成为与成吉思汗争夺蒙古汗权和部众的主要对手。1200年春，成吉思汗与王罕会于萨里川，共同起兵攻打泰赤乌部。泰赤乌贵族沆忽阿忽出、忽怜、忽都答儿⑭、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塔儿忽台”为名，“乞邻勒秃黑”意为：“嫉妒者”）等则与蔑儿乞贵族联合。此前逃往巴儿忽真隘的蔑儿乞部长脱黑脱阿（又作脱脱、脱黑台别乞）遣其子忽都等统兵助泰赤乌，双方会战于斡难河。泰赤乌部战败，退至月良兀秃剌思（又作月良古惕秃剌思）之野（今俄罗斯赤塔南之鄂良古依河地），整军再战。经过激战，泰赤乌终于被击溃，塔儿忽台、忽都答儿等被擒杀，

沆忽阿忽出与忽都等逃入巴儿忽真隘，忽怜投奔乃蛮部。

主儿乞氏和泰赤乌氏是蒙古贵族中两支强大势力，他们的相继灭亡和溃散，使成吉思汗地位得以巩固，实力进一步壮大。

泰赤乌部被消灭后，成吉思汗的进取目标转向东部。合答斤、山只昆两族，根据蒙古祖先传说，是朵奔蔑儿干死后，阿阑豁阿感天光而生的二子不忽合塔吉和不合秃撒勒只的后裔，与成吉思汗具有同样尊贵的血统。他们本来也是强大的蒙古部落。1198年被金朝击溃，严重受挫，实力已大不如前。先是，成吉思汗曾遣使通好二部，欲与之联合，他们没有接受，对来使也缺乏应有的尊敬，他们从锅里将连同羊血煮在一起的…那样的羊的脏腑取出，泼在他的脸上⑮，辱骂了他，使他受辱而归，由此双方结下了仇怨。其后，他们又依附泰赤乌，参与反对成吉思汗。泰赤乌失败后，他们的首领又与塔塔儿，朵儿边和翁吉剌等部会于阿雷泉（今海拉尔河下游北），斩白马为誓，谋袭成吉思汗与王罕。

成吉思汗得到其岳父特薛禅的密报，即与王罕率军自斡难河附近的虎图泽出发，与合答斤诸部军战于盃亦剌川（今贝尔湖），大败敌军。成吉思汗、王罕大掠其牲畜、部众而去。成吉思汗驻军于金边墙附近的彻彻儿山⑯，继续攻伐这一带的塔塔儿部。

1201年，札木合纠集一批败散的贵族，包括塔塔儿、翁吉剌、合答斤、山只昆、泰赤乌、朵儿边、豁罗剌思、亦乞列思、蔑儿乞、斡亦剌、乃蛮等11部，会于犍河，共立札木合为古儿汗⑰。各部首领为维护各自的贵族地位而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他们在秃律别儿河（今得尔布干河）岸⑱发誓：

"凡我同盟，有洩此谋者，如岸之摧，如林之伐。"誓毕，共举足踏岸，挥刀砍林，驱众驰马往攻成吉思汗。时札木合军中有名为塔海哈者，悉知其谋，他与成吉思汗的部属召烈氏抄兀儿相亲，值抄兀儿前往探视，二人骑马并行，塔海哈以马鞭掇其肋，抄兀儿回顾，塔海哈示之以目，抄兀儿会其意，下马佯为小便，塔海哈遂告以札木合等之谋。抄兀儿当即驰还。途经豁罗剌思（又作火鲁剌思、火鲁剌、火罗剌思、豁里剌儿等）部，首领也速该命其家人火力台与抄兀儿同往报告⑲，成吉思汗闻讯，即刻起兵迎战。在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支流帖尼火罗罕（火罗罕意为"小河"）之地，击溃札木合联军。札木合逃走，翁吉剌部来附，其余诸部首领则作鸟兽散。

打败札木合后，成吉思汗又于1202年（金泰和二年，宋嘉泰二年）出兵征讨答阑捏木儿格思（今蒙古东方省贝尔湖南讷墨尔根地）的按赤塔塔儿、察罕塔塔儿、都塔兀惕塔塔儿、阿鲁孩塔塔儿等部，追击至兀鲁回·失连真河（又作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兰盖郭勒、色也勒钦郭勒）一带，将塔塔儿部尽数消灭，控制了东部地区。

当成吉思汗征讨塔塔儿诸部时，王罕率众追剿蔑儿乞部，至八儿忽真脱窟木之地，将脱黑脱阿长子脱古思别乞杀死，又虏其二女忽秃黑台、察阿仑和二子忽图、赤剌温及其妻子，洗劫了财物、部众。

初，乃蛮太阳罕弟盃禄罕（又作不亦鲁黑罕、不欲鲁罕、卜欲鲁罕）在黑辛八石（今新疆乌伦古湖或布伦托海）一带被成吉思汗和王罕击败，逃往谦谦州地区（在唐麓岭以北，谦河上游流域，叶尼塞河上游一带）。1202年秋，他与蔑儿乞部的脱黑脱阿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等合兵东进，攻打成吉思汗

和王罕。这时，札木合与泰赤乌、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塔塔儿等部残余势力，也与孟禄罕联合起来，一时声势夺人。成吉思汗、王罕军避其锋芒，自兀鲁回·失连真河地区退入兀惕古城墙（金边墙），王罕子亦剌合⑳居侧翼，据高山结营，乃蛮军冲击不能下，遂还。亦剌合也入塞。

战前，成吉思汗移辎重于他处，与王罕依阿兰塞为壁㉑。待孟禄罕联军进至阙亦坛㉒之野，两军会战。成吉思汗和王罕凭据有利地势。而孟禄罕联军由于寒气凛冽，又值大风雪，许多部属手足冻裂，人畜从高处滚下，填沟坠堑，死伤甚多，军乱不能战，被迫引兵退回。札木合等各部起兵来援乃蛮，见势不利，未战即星散离去。王罕追击至额洏古涅河，札木合无力抵抗，举兵投降。泰赤乌部首领阿兀出把阿秃儿等率众渡过斡难河，成吉思汗追至，双方连战数次，胜负未决。在战斗中，成吉思汗颈部中流矢，蒙古军被迫休战，泰赤乌军也连夜离开。成吉思汗被伤，流血不止。那可儿者勒蔑用口为其吮吸淤血。夜半，成吉思汗醒来后口渴，者勒蔑裸身独袴潜入敌营，寻找马奶子不得，拿回一桶酪（酸奶子）。又弄来一些水，与酪调后给他喝。成吉思汗问者勒蔑何以裸身前去，者勒蔑说："我若被擒，就说我本是来投降你们的，但被他们发觉，将我的衣服脱去，欲杀间，遂挣脱逃出来。"成吉思汗伤愈后，立即率军追击泰赤乌。阿兀出把阿秃儿、豁团斡儿昌、忽都兀答儿及其家属皆被执处死。部众全部降服。

原泰赤乌属部别速惕部人者别（又作哲别、哲伯）、巴阿邻部人纳牙阿以及速勒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剌等相继来归。

者别，本名只儿豁阿歹。来附后，成吉思汗问他，阔亦田作战时，自岭上将我白口黄马项骨射断的是谁？者别说："是

我射的。如今可汗教死，只不过溅污手掌般一块地。若教不死，我愿出气力，将深水横断，坚石冲碎。”成吉思汗说：“但凡敌人害了人的事，必隐讳不说。如今你却不隐讳，可以作伴当。”遂“赐名者别，如战马般用着他。者别，军器之名也”㉓。

歼灭泰赤乌部后，成吉思汗回师忽巴合牙之地。泰赤乌部的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逃避在树林中，被其家人失儿古额秃老翁及其二子阿剌黑、纳牙阿捉住欲献给成吉思汗。其人体肥不能骑马，遂载于车中。途中，纳牙阿说：我们若把他送至铁木真处，必说我们卖主求荣，不信任我们，甚至将我们杀了。不如将他放了，然后去见成吉思汗。就说我们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捉拿来，因他是主人，心内不忍，路上把他放回去了。成吉思汗必然宽容我们。于是就在忽都忽勒讷兀地方把塔儿忽台放了。纳牙阿到成吉思汗处，备言其事，成吉思汗果然因为他们保护了自己的主人，而赞赏了纳牙阿。

阙亦坛之战后，成吉思汗实力大增，地位更加巩固。随之，强大的克烈部㉔便成了他下一个所要攻取的目标。

铁木真自幼依靠义父王罕的帮助，渡过重重难关，终使黄金家族崛起。自 1189 年被推举为乞颜氏首领以来，又一直与王罕联盟，东征西讨，凭借王罕的强大势力不断壮大自己。为得到王罕的支持，他恪守君臣之礼，凡有虏获，必先献与“汗父”，“如海东鸷禽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也速该和成吉思汗也曾几次救王罕出危难。但是，为了争霸蒙古草原，他们的联盟终于破裂了。当时，克烈部虽是漠北最强大的部落，但王罕杀戮亲族，残害百姓，克烈部内贵族间的矛盾也一直十分尖锐，部众不断投附成吉思汗。王罕之所以支持成

吉思汗，也是想把他当作可供驱使、利用的附庸。

1199年，王罕与札木合、成吉思汗等进攻乃蛮部盃禄罕，至乞则里八思海（即黑辛八石，今新疆乌伦古湖）后回军至土兀剌河，王罕子亦剌合、弟札阿绀孛来会，为乃蛮骁将曲薛吾撒八剌㉕侦知，乘其不备，袭虏其部众于途中。亦剌合、阿札绀孛仅以身免，奔告王罕。王罕遣使向成吉思汗求援，成吉思汗遂派博尔术（孛斡儿出）、木华黎（木合黎）、博罗浑（博罗忽勒）、赤老温（赤剌温）"四杰"率师往援，大败乃蛮，帮助亦剌合夺回被虏的妻子、部众和牲畜。

在乞则里八思海之战交战前夕，王罕于夜间虚燃篝火于营中，潜移部众于他处。由此，成吉思汗颇疑其有异志，也退师萨里川。是夜，札木合与王罕一起行动，向王罕进谗言离间其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加深了两人间的裂痕。此时，王罕见成吉思汗力量日益强大，而自己年事已高，诸子又平庸无能，深恐日后汗位与部众落入成吉思汗之手，因此与之渐生敌意，并密谋加害。

1200年春，王罕与成吉思汗在萨里川（今克鲁伦河上源之西）聚会，准备征讨泰赤乌时，王罕就曾打算把成吉思汗抓起来。据说，在宴饮时，八邻部人阿速那颜有所觉察，便将刀子插在靴筒内，坐在王罕与成吉思汗中间，吃着肉，边谈边回头看。王罕意识到他的阴谋被发觉，才没敢动手。

1202年阙亦坛之战后，成吉思汗移军出塞，驻营于阿不只合阙忒哥儿山㉖，与王罕营地相近。成吉思汗为长子术赤向亦剌合之女抄儿别吉（又作察儿别乞、抄儿—伯姬，《史集》说她是亦剌合之妹）求婚，遭到无礼拒绝。王罕之孙（亦剌合之子）秃思—不花亦欲娶成吉思汗女火臣别吉，也未成功。因

此，双方裂痕进一步加大。骄横自大的王罕父子小视成吉思汗，而此时的成吉思汗却已羽翼丰满。他已把富足的东部地区和众多百姓牢固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无时不准备进一步扩展势力。

这时，蒙古草原上形成了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以王罕为首的克烈部和以太阳罕为首的乃蛮部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投奔王罕的札木合与因违令受责罚的阿勒坛、忽察儿等人㉗都极力煽动王罕进攻成吉思汗。以图借王罕之手消灭成吉思汗。亦剌合亦再三对其父说："你如今见存，他俺行不当数。若父亲老了呵，将俺祖父辛苦着收集的百姓，如何肯教我管。"于是，1203 年春，王罕父子伪许婚约，邀请成吉思汗前来吃"不兀勒札儿"㉘，企图乘机杀之。成吉思汗信以为真，率 10 骑赴请，但中途受到晃豁坛部人蒙力克老人的劝阻，只遣不合台，乞剌台二人去赴宴，自己则返回。王罕父子发觉事已败露，决定次日晨发兵，以图先发制人。王罕麾下、阿勒坛之弟也客扯连（又作也客察兰、也客察合兰）回家对妻子阿剌黑亦惕言及此事，并说："如果有人去把发生的事告诉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一定给他许多恩典和好处。"此话被他的牧马人乞失里黑（又作乞力失、启昔里）听见，遂与同伴巴歹（又作巴带）连夜驰奔报告。成吉思汗得报，仓猝整兵迎敌，与王罕大战于合兰真沙陀（又作忽剌安不鲁合惕、忽剌安不剌合惕、哈剌真沙陀、哈阑真沙陀、合兰只之野，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北境）之地。

与当时"形势盛强"的王罕相比，成吉思汗依然处于劣势，经过一天苦战，虽稍却王罕军，仍因众寡不敌，队伍溃散。成吉思汗只带少数人从兀鲁回—失连真河退至答兰捏木儿

格思，溯河而上，至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今哈拉哈河中游北），溃军渐集，点视军马，仅4600骑（一说为2600骑），遂分军两岸，沿河而下，驻营于董哥泽（地当今贝尔湖东）。

合兰真沙陀之战是成吉思汗第一次单独与当时蒙古草原上最大的贵族势力进行较量，虽然暂时失败，蒙受了重大损失，但他并未动摇与王罕再战的决心。他一面遣使历数王罕背盟弃约诸事，表示重新和好的愿望㉙，一面收集部众，休养士马。

1203年夏，成吉思汗移营至班朱尼河（又作巴勒渚纳海子，地当今克鲁伦河下游附近），处境艰难，以射野马乃至煮野兽的尸体和察鲁乞（一种软底皮鞋）为食，从污泥中汲浑水以饮。成吉思汗与他的伴当仰天盟誓："使我克定大业，当与诸人共甘苦，苟渝此言，有如河水。"㉚据说，参加此次盟誓的共有札八儿火者、镇海等19人。后来，"同饮班朱尼河水"作为成吉思汗艰苦创业的佳话载入了史册，在蒙古人中广为流传。同年秋，成吉思汗的军事力量既已恢复，遂迁至接近克烈部的斡难河上游驻营，准备与王罕再战。

合兰真沙陀之战后，王罕与投靠他的蒙古贵族发生了分裂。札木合、答里台斡赤斤、阿勒坛、忽察儿等暗地相约叛离并杀害王罕："我们去突袭王罕，自己当君主；既不与王罕合在一起，也不与成吉思汗合在一起。"不料王罕获悉其谋，起兵相攻。答里台和蒙古巴阿邻（又作八邻）、嫩真二部，克烈部的撒合亦惕（又作撒合夷）部归附成吉思汗，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和塔塔儿人忽秃帖木儿等逃奔乃蛮部。至此，王罕势力渐衰。成吉思汗见此形势，与其弟合撒儿商议，决定以他的名义派遣其部下沼列惕人合里兀答儿（又作哈柳答儿）、兀良合人察兀儿罕（又作抄儿寒）去对王罕佯称："我兄太子今

既不知所在，我之妻孥又在王所，纵我欲往，将安所之耶？王傥弃我前愆，念我旧好，即束手来归矣。”王罕信之不疑，遣亦秃儿坚与合里兀答儿等同行，“他在泡胶水用的角上滴了几滴血，让他们送给合撒儿作为誓盟，因为蒙古人有互相沥血立誓盟的习惯”。中途亦秃儿坚见势生疑，欲逃被执，为合撒儿所杀。使臣回报，成吉思汗获悉王罕毫无戒备，正搭起金帐，欢聚宴饮。遂起兵日夜兼程，以偷袭战术，包围了王罕驻营地者折额儿温都儿山（地当今克鲁伦河上游之南），突然发起攻击，激战三昼夜，克烈部主力被击溃。王罕狼狈西逃，在乃蛮边界为其守将所杀。王罕的头被送到乃蛮王太阳汗处，太阳汗不赞成这样做，他说：“为什么将这样伟大的君主杀死呢？应当将他活着带来！”为了显示王罕的伟大、应受尊敬，他命令将王罕的头镶上银子，摆在自己的宝座上。王罕之子亦剌合逃奔西夏，被逐，又辗转逃至曲先城（今新疆库车）彻儿哥思蛮之地，被执杀。

克烈部既灭，蒙古草原出现了蒙古与乃蛮[31]两大部相接和对峙的局面。王罕的覆灭使乃蛮部太阳汗感到十分震惊，一向被他们视为落后的“歹气息，衣服黑暗”的蒙古人，居然把强大的克烈部消灭了。此时，太阳汗已意识到成吉思汗下一步要与他争霸了，“天上只有一个日月，地上如何有两个主人？”于是，自恃强大的太阳汗决定出兵攻打蒙古。

这时蔑儿乞部的脱黑脱阿，克烈部的阿邻太师，斡亦剌部的忽秃合别乞，札答兰部的札木合，以及塔塔儿、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等残部，都会聚在太阳汗处，一时兵势颇盛。号称“国土广大，百姓众多”的乃蛮部太阳汗，自恃其强，十分骄横，夸言要以兵征服蒙古，将“生得好的妇女掳来，他每

（们）的弓箭夺来"。遂于1204年春率兵东进，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的合池儿水（今哈瑞河）驻营，会合诸部残余势力，共同攻打成吉思汗。

太阳汗起兵之前，遣脱儿必塔失与居于漠南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联络，约其"益我右翼"，即以其为右翼，夹攻成吉思汗。汪古部首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审时度势，拒绝了太阳汗的盟约，决定归附成吉思汗，遂遣月忽难报告敌情，并将来使缚送给他。

时成吉思汗正在帖蔑延客额儿（又作帖麦该川，今贝尔湖和克鲁伦河河口处）之地围猎。当他得报后，立即召集"忽里勒台"㉜与众将商讨对策，群臣中多有以方春马瘦，宜待秋高马肥为由，不同意出兵，唯其两弟主张即早发兵攻打乃蛮。斡赤斤言："事所当为，断之在早，何可以马瘦为辞。"别里古台亦言："乃蛮欲夺我弧矢，是小我也，我辈义当同死。彼恃其国大而言夸，苟乘其不备而攻之，功当可成也。"成吉思汗悦，决定起兵迎战。出征前，他把军马集于合勒合河旁的建忒该山，下令进行整顿。其一，将全部兵马按千户、百户、十户的军制统一编组，委派了千夫长，百夫长和什夫长等各级那颜；其二，设立扯儿必官㉝，任命其亲信那可儿6人为扯儿必；其三，成立护卫军，设八十宿卫，七十散班；从千户、百户那颜和白身人的子弟内拣选有技能身材好者做护卫；又命阿儿孩合撒儿选拔一千名勇士，组成先锋队，并由其统领，"如厮杀则教在前，平时则做护卫"。军队的重新编组和护卫军的建立，使成吉思汗的军队成为一支纪律严格、战斗力强和高度集中的武装力量，这不仅加强了汗权，而且使追随他的那可儿们得到了大小官职。从而激励他们更勇猛地去战斗。

军马整顿完毕，1204年4月16日，成吉思汗祭旗纛，以哲别、忽必来为先锋，麾师逆怯禄连河西进，至萨里川与乃蛮军相遇。成吉思汗依朵歹扯儿必计，夜令人各烧火五处为疑兵。太阳汗原以为成吉思汗兵少马瘦，可以轻取，及得到前哨报告蒙古兵"如星般多"，"军马已塞满撒阿里客额儿（萨里川）地面"时，"孕妇更衣处，牛犊吃草处"都不曾到过的太阳汗，又惊疑畏惧，虽勉强自合池儿水起兵，顺塔米儿河渡过斡耳寒河（又作斡儿豁河，今鄂尔浑河），然而军心已乱，失去斗志。札木合等见成吉思汗军马整肃，又率部不战而走。这时成吉思汗军马已逼近，两军激战于纳忽山（在今鄂尔浑河东，土拉河西），成吉思汗的"四狗"哲别、忽必来、者勒篾、速不台如狼入羊群般冲杀。乃蛮军大败，太阳汗负伤被俘，旋即死去。其子屈出律（又作古出鲁克）与脱黑脱阿等率残部逃奔盃禄汗。太阳汗所属的乃蛮部众遂为成吉思汗所征服。是役太阳汗母古儿别速被执，成吉思汗对她说："你说达达（蒙古）歹气息，你却如何来?"遂纳了。乃蛮部掌印官塔塔统阿亦被俘，后效力于成吉思汗，创制了回鹘式蒙古文。

在克烈、乃蛮等部相继败亡之后，札木合辗转逃入倘鲁山（又作唐麓岭，今唐努山）中，被跟随他的五名那可儿执送成吉思汗，按惩处本部贵族的习惯，赐其不流血死。至此，成吉思汗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

1206年（宋开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各部贵族在斡难河畔举行"忽里勒台"，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全蒙古的大汗，建立了"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

成吉思汗建国后，即发兵攻按台山（今阿尔泰山）北的乃蛮盃禄汗，战于莎合水（今科布多河上游索果克河），将其消

灭。依附于盃禄汗的屈出律、脱黑脱阿等逃往也儿的石河及其支流不黑都儿麻河（今额尔齐斯河支流布赫塔尔马河）一带。不久，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向成吉思汗投降。于是，大蒙古国的疆域，东起今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北达贝加尔湖。

成吉思汗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实行领户分封制，将全蒙古部众分为 95 个千户，上置万户，下分百户、十户；扩建护卫军；制订成文法“大札撒”，设置“札鲁忽赤”（断事官）；确立行政制度以及创制蒙古文字等。

蒙古各部的统一和大蒙古国的建立，为蒙古民族的形成和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此据《元朝秘史》。《亲征录》、《太祖纪》同作“札木合部人秃台察儿”，《史集》作“札木合亲属迭兀—答察儿。按《秘史》记为“札木合因迭兀给察儿”，“因”，蒙古语意为“的”；“迭兀”意为“弟”，则“札木合因迭”意即“札木合之弟”，“给察儿”是其名。“秃”即“迭兀”，“秃给察儿”即“迭兀给察儿”的不同音译。答察儿即给察儿。《亲征录》、《史集》、《太祖纪》将“秃”和“秃迭”当作人名组成部分，显系译误；《史集》称答察儿为札木合亲属，不确；《太祖纪》等称其为部人，误。

②《元朝秘史》作“札剌麻山前斡列该—不剌合地面”。《华夷译语》：不剌黑（不剌合）——泉。则斡列该—不剌合即玉律哥泉。

③此据《元朝秘史》。《史集》以木勒客—脱塔黑为二人，属八鲁剌思部。《亲征录》作慕哥、卜栾台。《元史·孛秃传》作磨里秃秃、波栾歹。

④“古列延”，一作“库伦”。蒙古语音译，意为“圈子”或“营”，

也译作“翼”。《史集》称：“所谓古列延是圈子的意思。在古时候，当某部落屯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的中央，这就称作古列延。在现代，当敌军临近时，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与异己无法冲进来。”

⑤“尼鲁温”，又作“尼伦”，蒙古语音译，意为“出身纯洁”，也称“尼鲁温蒙古”。《史集》记载，这一支蒙古人，系指阿兰豁阿三子不忽合塔吉、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后裔形成的合答斤氏、撒勒只兀惕氏、孛儿只斤氏以及后来族支繁衍形成的各部。

第十二翼，《史集》记为“尼伦轻吉牙惕部的答吉把阿秃儿及尼伦雪干部；《亲征录》记为兴吉牙部塔降吉拔都（“降”当为一衍字）统雪干、札剌吾思为一翼。答吉、塔吉，《秘史》作速勒都思部人塔乞。

第十三翼，《史集》记为察剌合（又作察剌孩）领昆的儿子坚都赤那和兀鲁克臣赤那。《亲征录》作建都赤纳、玉列真赤剌二部为一翼。

⑥此据《元朝秘史》。关于十三翼之战的结局，《史集》说：“成吉思汗用这十三个吉列延歼灭了（敌人）三万骑兵。人数众多，实力雄厚、强大可怕的泰亦赤兀惕诸部在这次战争中溃败了。”《亲征录》也称“札木合败走”。

参见韩儒林《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穹庐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亲征录》记载：“我属将有（如）无夫之妇，无牧之马而来，以泰赤乌长母之子讨杀故也。我誓当弃亲从义而招之。”

⑧见《亲征录》。《史集》作忽敦斡儿长，为蔑儿乞人；《秘史》作豁团斡儿昌，为泰赤乌部人。

⑨斡里札河，见《金史·内族襄传》。《秘史》作浯勒札河，《宋会要辑稿·蕃夷·契丹》称“骨力札国（河）”。今蒙古境内乌尔札河，该河流入俄蒙边界的托列伊湖。

⑩《金史·夹谷清臣传》、《内族襄传》，中华书局点校本。

⑪《亲征录》作忽速秃失图、纳刺秃失图。"失秃延"意为"寨"，"忽速秃—失秃延"即"枫树寨"；"纳剌秃—失秃延"即"松树寨"，这两个寨子可能是金朝早期所筑边墙的两座边堡，地当今蒙古乌勒札河上游，此处今尚存边墙遗址。

参见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⑫参见《亲征录》、《元朝秘史》、《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⑬奥鲁，一作"阿兀鲁黑"，蒙古语音译，意为"家小"、"老营"、"老小营"，即蒙古军出征时，留守后方的家眷、辎重。元代，大翼万户下设奥鲁总管府，小翼万户及各千户下设奥鲁官，专掌辎重、后勤诸事。参见《秘史》、《经世大典序录·军制》等。

⑭见《亲征录》。《史集》作安忽—合忽出、忽里勒、忽都答儿；《秘史》作阿兀出把阿秃儿、豁团斡儿昌、忽都兀答儿；沆忽阿忽出，《太祖纪》作沆忽，另二人失载。

⑮《史集》载，他们没有同意，"却从锅中舀出蒙古人用肠子和血熬成的一种沸羹，泼到使者的脸上"，此物是"蒙古人用动物内脏和血熬成的"，这里大概是指恩·姆·普尔热瓦尔斯基所描述的一种蒙古食物：挤出羊肠里的东西后，灌上血煮成的一种灌肠。

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普尔热瓦尔斯基《蒙古地区和唐古特人地区》，莫斯科，1946年。

⑯据近人王国维考证，彻彻儿山即今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北230里的苏克苏尔山。参见《观堂集林·金界壕考》。

⑰犍河，见《太祖纪》、《亲征录》。《元史·沼烈台抄兀儿传》作坚河；《秘史》作刊沐涟，即刊河，今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根河。

古儿罕，又作局儿罕、菊儿罕、葛尔罕、阔儿罕、古儿合等。蒙古初兴时，各部以此称共同的盟主，即"诸汗之汗"或"大汗"之意。《秘史》释为"普皇帝"，《史集》释为"算端和诸国王们的主君"。

⑱关于此次盟誓和推举札木合为"古儿罕"的地点，《太祖纪》、《亲征录》均称在秃律别儿河岸，《元朝秘史》说"至于刊沐涟河洲的地

行，将札木合立作皇帝。"《元史·召烈台抄兀儿传》称在"坚河之滨忽兰也儿吉之地，谋奉札木合为帝"。贾敬颜师在《亲征录》校勘中指出"忽兰应与此秃律别有关连，然何以彼此歧异，不得其故"。

也儿吉，又作额儿吉，《元朝秘史》释为"岸"。忽兰（又作乌兰）也儿吉即"红岸"之意。笔者认为忽兰也儿吉当在秃律别儿河（今得木布干河）南岸、坚河（刊河，今根河）北岸，且在两河流入额尔古纳河入口处附近的一处地方。《亲征录》、《元朝秘史》分别只记录了此"红岸"北、南的一条河流，故而产生了记载的歧异。如此解释，与其地望相合，且可使两书记载看来"彼此歧异"之处得以一致。

⑲关于通报消息之人，《元朝秘史》记为豁罗剌思人豁里歹，《史集》称"有一个名叫火力台的人，听到了他们商议的事和这些话，……他到成吉思汗处报告了那些话后，成吉思汗马上带着他出征"。《太祖纪》则说："塔海哈时在众中，与帝麾下抄兀儿联姻，抄兀儿偶往视之，具知其谋。即还至帝所，悉以其谋告之。"《元史·召烈台抄兀儿传》记"抄兀儿知其谋，驰以告太祖"。

据《亲征录》的记载，笔者认为至成吉思汗处通报札木合之谋者，实则抄兀儿与火力台二人。

⑳亦剌合，又作桑昆、鲜昆、亦剌合鲜昆、你勒合桑昆。亦剌合、你勒合为名；桑昆、鲜昆即详稳，为官职。1196年，他随父王罕配合金朝击败塔塔儿部，被任为本部详稳。

㉑阿兰塞，《史集》作"阿剌勒（意即岛）的边缘"。王国维认为此塞乃金源界壕鹤五河堡子的一段。见《观堂集林·金界壕考》。

㉒又作阙奕坛、阔亦田，蒙古语音译，意为"寒冷"。洪钧认为阔亦田位于今内蒙古苏尼特左旗东北40公里的寒山；王国维以今内蒙古札鲁特旗以南的灰腾岭或灰腾山当之。其地当在今哈拉哈河上源处。

㉓者别，意为箭镞或枪刺。这里成吉思汗掩饰了自己颈部被射伤，而说是自己的马被射伤。

㉔克烈，又作怯烈、客列亦惕、克哩叶特，是当时漠北最大最强的

一部。其分布地域大抵东至怯绿连河上游之南，西至杭海岭（今杭爱山），北至土兀剌河和斡耳塞河（今鄂尔浑河）下游一带，南临大漠。

㉕见《亲征录》。曲薛吾撒八剌，《太祖纪》作曲薛吾、撒八剌二人；《元朝秘史》作可克薛古—撒卜剌黑；《史集》作可克薛兀—撒卜剌黑。

㉖《元朝秘史》作阿不只阿—阔迭格儿、阿卜只合—阔帖格儿；《亲征录》作阿不札阙忒哥儿。其地当在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西北或蒙古苏赫巴托尔省南部。

㉗1202年春，成吉思汗在出兵征伐塔塔儿前，颁布了一道命令（札撒）："若战胜时，不许贪财，既定之后均分。若军马退动至原排阵处，再要翻回力战，若至原排阵处不战回者，斩。"但忽图剌罕的儿子阿勒坛、捏坤太师的儿子忽察儿别乞、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台斡惕赤斤等蒙古贵族居然不遵从法令，战时仍按旧习惯随意抢夺，违反了军令。成吉思汗遂命其那可儿忽必来、者别二人将他们抢来的牲畜、财物全部没收，分配给众军。

㉘不兀勒札儿，《元朝秘史》译作"许婚筵席"。《太祖纪》称"布浑察儿，华言许亲酒也"。"不兀勒札儿"一语，意为吃羊颈喉肉。蒙古青年男女从结婚之日起，连吃三天羊颈喉肉的风俗，直到现在，蒙古地方还存在。羊颈喉的骨头很坚韧，用它祝贺夫妻百年好合。故"吃羊颈喉肉"，意为男女成婚喜宴。参见策·达木丁苏隆编译，谢再善译《蒙古秘史》，中华书局，上海，1956年。

㉙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秘史》、《亲征录》（中）。

㉚《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㉛乃蛮，又作乃满、乃马、奈蛮，即《辽史》中的粘八葛，《金史》中的粘拔恩。其居地以按坦山（今阿尔泰山）为中心，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北抵阿雷和撒剌思河（今鄂毕河上游支流），与吉利吉思接界；东与原克烈部为邻；南隔沙漠与畏兀儿为邻。当时，在漠北各部中，乃蛮人比其他部落先进。他们吸收回鹘文化，较早就建立了国

家机构。亦难赤·必勒格·不古汗死，其长子台不花（一作拜不花）与其次子号盃禄汗的古出古惕（或作古出古敦）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斗争，使乃蛮分裂为南、北两部。台不花占据了南部草原地区，为汗位继承人，号“太阳汗”。因其受金封为“大王”，蒙古语讹为“太阳”（又作“塔阳”、“泰阳”），后遂以“太阳汗”著称于世；盃禄汗则占据了北部山林地区。

㉜又作“忽邻勒塔”、“忽烈尔台”等，蒙古语音译，意为“聚会”或“宗亲大会”，原为氏族部落内部的族众会议，后逐渐演变成诸王、百官等参加的推戴大汗和决定军国大事的贵族会议。

㉝又作彻儿必、扯儿宾、阇里必等，蒙古语音译，意为“侍从官”、“常侍”。当时共设六种扯儿必官，随行左右，分掌各种事务。

元

千户编组与怯薛之制

克烈部灭亡后，蒙古草原地区唯一存在的敌对势力是太阳汗统治的乃蛮部。1204 年，乃蛮部太阳汗联合蔑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斡亦剌部首领忽都合别乞和札木合所率的朵儿边、合答斤、山只昆、泰赤乌等部残众，决定出兵攻打蒙古。为了迎击太阳汗的联军，消灭草原地区的最后一个敌对势力，统一草原游牧部族，铁木真决定对乃蛮用兵。进攻乃蛮部前，铁木真将兵马集中在合勒合河旁，依草原民族的传统，以十进制的编制，对所统兵马进行了整编，进一步统一了号令和指挥。

他将所有的军队按十户、百户、千户统一编组，任命了十户、百户、千户那颜。这是铁木真打破以往军队"按古列延召集和区分"，由各贵族率领所属军队与他联合作战的方式，而将军队"转变为常备军的新组织"，纳入他个人统一指挥的办法和措施，从而使他得以掌握和调动所属的全部蒙古军队，这无疑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

他以统一编组后的军队投入对乃蛮的征服战争，大获全胜，最后完成了对草原游牧部落的统一，为大蒙古国的建立、

蒙古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是蒙古国千户制的前身和雏形。

1206年铁木真做了全蒙古的大汗，又在原有千户的基础上，"把全部蒙古人彻底区分为千户，并任命了那颜——千户长"①。完成了蒙古社会的千户组建过程。千户上设万户，下辖百户。各级那颜都是在统一蒙古诸部的战争和其他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和立有功劳的那可儿和草原贵族。他们各自享有大汗分给的一定数目的属民和游牧地（嫩秃黑），成为本封地的主人，这种权利是被登记入册并从而获得承认和保护的。千户组织既是蒙古国的基层行政单位，也是蒙古军队的一级编制。自百户长至万户长，职务都可世袭。按照大汗的命令，各万户、千户分别被纳入大汗或诸王的兀鲁思封国。如，成吉思汗让大功臣孛斡儿出做了大汗直属的右手万户，木华黎做了左手万户，纳牙阿（纳牙）做了中军万户。同时将忽难赐与术赤，他说："这忽难，夜间做雄狼，白日里做黑老鸦。依着我行，不肯随歹人。……我子拙赤最长，教忽难领着格你格思，就于拙赤下做万户者。"②又说："察阿歹性刚子细，教阔阔搠思早晚根前说话者"③。"蒙古汗及诸王对那颜个人可以完全支配，即剥夺他们的分地或恩赐新的分地"，那颜们"无权任意离职，抛弃颁赐给他的分地或改事另外的宗主君"。某些万户长，有权自选千户长，但需报请成吉思汗同意。如中军万户纳牙阿，"他的军队全部是八邻部人。由于他是大异密④，忠心地服从（成吉思汗），建有功勋，故成吉思汗让他统辖八邻部军队。他自行任命千夫长后，（向成吉思汗）报告"⑤。

千户的组成，有多种方式。"一部分千户是由同族结合而成的。如成吉思汗的姻亲弘吉剌部的按陈驸马，亦乞列思部的

孛秃驸马，汪古部的阿剌兀思惕吉忽里，都仍旧‘统其国族’，按照统一制度分组为若干千户，自任其亲族为千户那颜，但必须向成吉思汗申报批准。后来归附的斡亦剌部忽都合别亦统本部四千户，千户那颜自置。还有一些率部投归成吉思汗的氏族首领，如兀鲁部的术赤台、忙兀部的畏答儿、巴阿邻部的豁儿赤、格尼格思部的忽难等”⑥。他们或因有较强的实力，在成吉思汗的统一事业中一直支持他，建有功勋，因而与黄金家族结成姻亲关系；或因归附后忠心耿耿地为大汗效力，得到成吉思汗的特别恩惠，准予其继续管辖本部百姓，或收集本族散亡者重组并管理千户。与此情况类似的还有左手万户木华黎，“由于他是有威望的异密，建有功勋，成吉思汗将所有的札剌亦儿部军队交给了他。他将札剌亦儿部按千户划分后，报告了成吉思汗，札剌亦儿人总共三千”⑦。

多数千户则是以不同部族的人民混合而成的。“在群雄争战之中，蒙古各部残存的氏族组织进一步瓦解了。原来人数众多的大部，如泰赤乌、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等，在被成吉思汗征服后，其所属人民都被‘分与了众伴当’。成吉思汗的将领们战争中也各自‘收集’了不少百姓。编组千户以分管百姓时，成吉思汗准许他们即以所得百姓组成千户管辖。还有一些忠勤效力，但不曾在前敌捕掳得百姓的亲信那可儿，也许其收集‘无户籍’的百姓组成千户；或命令从各那颜所属百姓中征调一部分合组为千户，授与他们管辖”⑧。如成吉思汗让脱仑与其父、者别、速不台等以“自收集的百姓”为千户；同意厨子汪古儿、战死于班术尼之战的察罕豁阿之子纳邻脱斡邻等的要求，将散在各部落里的巴牙兀惕百姓和捏古思部人收集起来组成自己的千户管理，由其子孙世袭；木匠古出儿所管

百姓数目较少，成吉思汗则命令“於各官下百姓内抽分着，教他与札答剌种的木勒合勒忽一同做千户管着”⑨。这样，蒙古草原的全体游牧民就都被编入了千户组织，被纳入成吉思汗任命的千户那颜管辖之下，作为蒙古国家基本军事单位和地方行政单位的千户，便最终取代了部落、氏族的组织形式。

各万户和千户那颜又直接隶属于大汗或诸王，无论他们地位多高，功劳多大，却无一例外的都是“黄金家族”的臣仆：他们必须效忠于大汗及其子孙。他们所统的千户组织都有被指定的居住和游牧范围，在各自的千户内，他们又是高踞于牧民之上的封建领主，享有世袭权，掌握着本部分配牧场、征收赋税、差派徭役和统领军队的权力。地位高的那颜还可以参与选举大汗、商议国策和掌管国政，通过赏赐和战争掠夺，拥有大量的牲畜、财富和奴隶。所辖百姓不经允许，不得任意变动。成吉思汗的札撒规定：“任何人不得离开其所属的千户、百户或十户而另投别一单位，亦不得避匿他处。如违此令，擅离者于队前处以极刑，接受其人者，亦严厉惩处之。”⑪国家按千户征收赋役和征调军队。隶属于各百户、千户的游牧民，则有义务向领主缴纳贡赋和提供军役。十五至七十岁的男子都需承担兵役，随时根据命令，自备马匹、兵仗、给养，由本部那颜率领出征。

在任命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还特别封赠了一批对其家庭成员有过救命之恩的人为“答剌罕”。“答剌罕”意为自由自在之意。他们享受有种种特权，可以不受游牧范围限制，“自在下营”；可以免纳贡赋，“出征处得的财物，围猎时得的野兽，都自要者”；缺少什么，可以直接向大汗索要；九次犯罪不罚；宴享时享受宗王待遇；封号和特权可以世袭。以巴阿邻长支的

后裔兀孙老人为最重的官“别乞”，可以骑白马，着白衣，座位在众人之上，“教敬重者”。

当第一次组建千户时，成吉思汗就成立了自己的护卫亲军。初期的亲军由八十宿卫、七十散班和一千人的护卫军组成。建国后，为了保卫至高无上的汗权，成吉思汗在分封宗王、千户的同时，也扩充了大汗直接控制的护卫军。

大汗的护卫军由一万人组成，其中包括宿卫一千人、箭筒士一千人、散班八千人。散班由万户、千户、百户、十户和白身人子弟中身体好、有技能的人充当。各部那颜都必须将其子弟送到大汗身边为他效力，不许逃避或以他人代充。千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十人；百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五人；十户那颜的儿子许带弟一人，伴当三人。所需马匹、物品诸项，除取自本人外，允许按规定在所管户内征敛供给。这是各级那颜和白身人向大汗提供的一各特殊兵役，而他们的子孙被征入护卫军，也就具有了“质子”的性质，这无疑有助于大汗“更牢固地联系和控制分布各地的那颜，使他们效忠于自己”⑪。大汗也给予他们种种优待，充当护卫可以免除其他差发和杂役，他们的身份地位居在外的千户之上，他们的家人也居于在外的百户、十户那颜之上。如果他们与在外的千户那颜发生争执，罪在千户那颜。

护卫军的主要职责是保卫大汗的金帐和分管汗廷的各项事务。同时也是大汗亲自统领的作战部队，所以成吉思汗也称他们为“大中军”。

护卫军也称“怯薛”，即番值护卫之意。其中宿卫值夜，箭筒士与散班值日，各分为四队，总称四“怯薛”。四怯薛分别由大汗最亲信的那可儿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四

家世袭统领⑫。怯薛长是大汗的亲信内臣，元朝称其为“大根脚”出身，放外任就是一品官。护卫士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

怯薛职分有火儿赤（又做豁儿臣，佩弓箭环卫者）、云都赤（带刀环卫者）、昔宝赤（掌鹰隼者）、札里赤（书写圣旨者）、必阇赤（书记，主文史者）、博尔赤（又做宝儿赤，亲烹饪而奉上饮食者）、阔端赤（掌从马者）、八剌哈赤（守城门者）、答剌赤（掌酒者）、兀剌赤（典车马者）、速古儿赤（掌内府尚供衣服者）、怯里马赤（传驿者）、帖麦赤（又作铁蔑臣，牧骆驼者）、火你赤（又作豁你臣，牧羊者）、忽剌罕赤（捕盗者）、虎儿赤（奏乐者）等，他们各司其职，共同保卫和侍奉大汗。

成吉思汗也制定了严格、完善的侍卫制度。四怯薛轮番入值，每番三昼夜。日落前，值日的散班和箭筒士将所司职责交与当值宿卫，出外住宿，次日早饭后入值。入夜后，不许任何人在宫帐周围活动，有违此制者，宿卫应将其收捕，次日审问。未经允许闯入者，宿卫有权将其杀死。有急事需入奏者，必须先经宿卫通报，得旨允准方可同宿卫一起入帐奏事。非宿卫人员，不论职位多高，均不得杂入宿卫队伍。宿卫人员不得泄露值班时间，外人也无权过问。宿值者必须按时入值，旷值者，依次处以数量不等的笞刑，旷三次者，流放远方。宿卫人员有罪，需请求大汗给以惩罚，怯薛官无权自行处理。

“怯薛歹作为大汗的侍从近臣，在蒙古国的政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怯薛‘百执事’之官就担任着中央政府的职能。大汗还常常派怯薛歹为使者，出去传达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歹调任外臣，多担任重要职务。因此在元代，充当怯薛歹

成为那颜阶级作官的最便捷途径”⑬。

在分封诸王、千户的同时，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吩咐说：“今初定了百姓，你与我做耳目。但凡你的言语，任谁不许违了。如有盗贼诈伪的事，你惩戒着，可杀的杀，可罚的罚。百姓们分家产的事，你科断着。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上，以后不许诸人更改。”⑭“大断事官的职责主要有两项：一是掌管民户的分配；一是审断刑狱、词讼，掌握司法大权。大断事官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长官，相当于汉族官制的丞相”⑮。直到至元二年（1265）设大宗正府，大断事官专大宗正府，治蒙古公事并兼理刑名，才不再是全国的行政长官了。

建国之际，成吉思汗还命所俘的乃蛮太阳汗掌印官、畏吾儿人塔塔统阿参照畏吾儿字创制了蒙古文字，结束了蒙古人“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⑯的历史。

大蒙古国建立前，蒙古人中存在着被称为“约孙”的习惯法和行为准则。元代通常译为“体例”，有“道理”、“规矩”、“缘故”等含义。在统一草原游牧部落的过程中，成吉思汗也不断发布一些命令，称“札撒”。1203 年，战胜克烈部王罕后，成吉思汗召集大会，“定立完善和严峻的法令”，可能是比较系统地宣布了一系列号令。文字创制后，成吉思汗命令将这些号令、诏敕、训言写成册文。于是，蒙古国开始有了自己的成文法。成吉思汗十四年（1219），在西征前召开的一次忽里勒台上，他“对（自己的）领导规则、律令和古代习惯重新作了规定”。二十年（1225）结束西征返回后，又“颁发了若干英明的诏敕”⑰，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最后编成并予以颁布。“大札撒”是在古代“约孙”的基础上，集成吉思汗的命

令、诏旨、训言等编集而成的，它是蒙古国初期官员们必须遵奉的法律。编成后，宗王们各领一部藏于金匮宝库中。

至此，大蒙古国的统治体制、制度、法令得以逐渐形成并日益完善。随着国家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制定的札撒虽已不能适应统治的需要，但新汗登基、诸王聚会颂读祖训，已经成为必须奉行的一整套仪式和程序。

注 释

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刘荣焌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1978年。

②《元朝秘史》卷九。

③《元明秘史》卷一〇。

④异密，波斯语，相当于蒙古语的那颜，即官人。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部分：《万夫长、千夫长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

⑥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三部分：《万夫长、千夫长与成吉思汗的军队简述》。

⑧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⑨《元朝秘史》卷九。

⑩《世界征服者史》第一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⑪《元朝史》引《元史·兵志》："或取诸侯将校之子弟充军，曰质子军，又曰秃鲁花军。"伯希和《圣武亲征录译注》认为：秃鲁花军即护卫军中由各级那颜和白身人之子组成的"散班"——土儿合兀惕。"土儿兀合惕"为借用的突厥语词汇，意为"哨兵"、"守卫"。"《元史》称为'质子军'，或者是当时征取各那颜之子充护卫，本含有以其子为质的意思。后来降蒙的汉地诸侯亦各遣子入质，为宿卫之士。

⑫博尔忽等四人被称为"四杰"，蒙古语称"朵儿边曲律"。

⑬《元朝史》第一章第四节。

⑭《元朝秘史》卷八。

⑮《元朝史》第一章第四节。

⑯彭大雅、徐霆《蒙鞑备录》，海宁王静安遗书本。

⑰《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元

诸王分封

按照蒙古人的习惯，儿子们可以从他们父母的遗产中分到各自的份额，蒙古语称为“忽必”。成吉思汗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元典章》记载：“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们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根据这一约定和蒙古人的传统习惯，从1207至1214年，成吉思汗把三十余个千户及蒙古国东、西两翼之地分授给诸子诸弟，形成了东、西道诸王兀鲁思①。

享受分封的有成吉思汗的母亲、诸子、公主、诸弟，他们是封地和属民的主人。常被称为“投下”（亦作“头下”）、“头项”、“位下”，蒙古语则称为“爱马”。

受封诸王对封地、属民拥有相当大的支配权，酷似较独立的封国，同时也是草原分封军民集团，这种投下或部，是大蒙古国属下的一层统治机构。

兔儿年（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年，1207），成吉思汗命长子术赤领兵征伐了林木中百姓，征服了斡亦剌、乞儿吉思等部。术赤得胜归来，成吉思汗很高兴，他说：“我儿子中你最长，

今日初出征去，不曾教人马生受，将他林木中百姓都归附了。我赏与你百姓。”②同时，孛罗忽勒、朵儿伯朵黑申又征服了豁里秃马惕。蒙古国将有毡帐的百姓和林木中百姓都纳入了自己的统治范围。

于是，成吉思汗按照当初的约定，在大汗家族内部进行分封。他说：“共立国的是母亲，儿子中最长的是拙赤（术赤），诸弟中最小的是斡惕赤斤。”按照蒙古人的习惯，最小的儿子（蒙古语称“斡惕赤斤”）③是父母财产的主要守护者和继承者。于是成吉思汗分给母亲和幼弟一万百姓，术赤处分得九千，二子察合台分得八千，三子窝阔台和幼子拖雷各分得五千。二弟合撒儿分得四千，三弟合赤温早死，其子按赤台（又作按只台、阿勒赤歹、阿勒吉歹）代表其父分得二千，异母弟别勒古台则分得一千五百。

这次分封，虽是以家族中血缘关系亲疏为标准进行的，同时也有论功行赏的成分。成吉思汗的叔父阿答儿台曾跟从王罕阻挠过蒙古大汗的统一事业，当给亲族分配“忽必”时，成吉思汗本欲处死他，因功臣孛尔术（孛斡尔出）的解劝，看在已故父亲的份上，原谅了他，但不曾依家族成员之例分给他应得的“忽必”。

随着人口的分配，也大体确定了投下的疆界。术赤的封地（也称禹儿惕、嫩秃黑或兀鲁思）从阿勒台山（阿尔泰山）至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地区，同时令其向钦察草原用兵，征服该地区的国家并将其纳入自己的领地，于是术赤及其后人在最初封地的基础上，建立了庞大的钦察汗国。察合台的封地自阿勒台山至质浑河（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阿尔泰山西南叶密立（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诺）、霍博一带。拖雷的封

地在阿勒台东、谦谦州（叶尼塞河上游）和乞儿吉思（叶尼塞河中游）一带。大体上术赤拥有也儿的石河至咸海、里海以北的地区，察合台领有畏兀儿至河中原属西辽的地区，窝阔台分得叶密立以北，额尔齐斯河上游、阿尔泰山一带原属乃蛮的地区。拖雷则据有大斡耳朵西北部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上述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们，他们的封地在成吉思汗大兀鲁思（或称大斡耳朵）的西部，故常被称为西道或右手（右翼）诸王，这些封地分别由成吉思汗诸子及其后裔掌管。

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涅河（又作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海拉尔河）地区，与帖木格·斡惕赤斤的封地相接。合赤温之子按只台的封地在捕鱼儿海子（今古贝尔湖）南、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南端西麓一带，南至胡卢忽儿河与弘吉剌部为邻。帖木格·斡惕赤斤同其母亲的封地在蒙古东北最远处，哈剌温山以西哈拉哈河一带。别勒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今鄂嫩河）和怯渌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一带。南接按赤台，西邻成吉思汗大斡耳朵。这些封地都在大汗斡耳朵的东部，所以他们的领主被称为东道诸王，也称左手（左翼）诸王。拥有和管理这些封地和游牧民的是成吉思汗诸弟及其后裔。

在各自封地内，诸领主有权将其所分得的土地人民向各自的子孙进行再分配，从而形成封国内的又一层封地与封君，即所谓“国中之国”。

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后妃，直接控制了怯渌连河、斡难河上游和土兀拉河（土拉河）、斡尔寒河（鄂尔浑河）流域的蒙古国中心地区。

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也给诸王任命了辅弼千户那颜（蒙古

语，意为官人）。母亲与幼弟斡惕赤斤处委付了蔑儿乞部的古出千户等四人，术赤处委付了轻吉惕部的忽难等三人；察合台处委付了哈剌察儿等三人，窝阔台处委付了亦鲁等二人，拖雷处委付了哲歹等二人，合撒儿和按赤台处也各委派了一人。

这是蒙古国建立之初的首次大规模分封。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分封又在更大的范围内，以不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着。同时，由于各投下主人对大汗效忠程度的不同，甚至有的领主与大汗之间发生了武装对抗，各封地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总的发展趋势是西道诸王逐渐脱离元朝中央的控制，发展成与元廷保持松散隶属关系的独立政权。与此相反的则是元朝中央加强了对东道诸王的控制和限制。就个别宗室成员而言，则是与大汗亲缘关系密切和效忠于大汗者，得到了较多的实际利益；发动武装叛乱者，被平定后，其权力也相应被剥夺。

太宗时期，窝阔台入主中央兀鲁思，在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哈尔和林）建都，使之成为大蒙古国的统治中心，而将自己的封地交给了长子贵由。同时，利用大汗的权力，从拖雷所辖的属民中拨出逊都思、雪你惕等三千户给次子阔端，令其驻牧西凉，全权负责对川、陕、甘、宁、青、藏的攻略征伐，由此，又形成了以西凉府（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的阔端的兀鲁思。

宪宗蒙哥时期，诸王封地再一次发生变化，首先是术赤兀鲁思的扩张。由于地处西陲，又握有自基本领地出发向外扩张的权力，所以术赤兀鲁思最先出现了离心倾向。随着军事征伐的胜利，术赤及其继承人次子拔都逐渐控制了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大片领土。宪宗蒙哥的入继大统多得力于拔都的支持，因此拔都又经大汗特许在兀鲁思内享有更大的权力。于是，术赤

兀鲁思首先成为大蒙古国内扩张最快，领土最大，享有独立权力最多的宗藩之国。

蒙哥即位，遭到窝阔台子孙的抵制最大。蒙哥在处罚武装夺权的窝阔台子孙后，对窝阔台兀鲁思也进行了调整。他将窝阔台第六子合丹安排在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七子蔑里安置于也儿的石河，孙海都（第五子合失之子）居海押立，脱脱（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居叶密立，阔端子蒙哥都的领地也奉命西移。上述窝阔台后王各自分到原兀鲁思的数量不等的军队和属民，原兀鲁思的其余各千户和贵由继承的窝阔台兀鲁思则被剥夺或分割了。只有阔端因与蒙哥、忽必烈关系较好，得以保留其西凉府一带的领地，但随着忽必烈在京兆一带封地的扩大，阔端领地的范围也逐渐缩小了。

世祖忽必烈时期，诸王兀鲁思变化更大。西道诸王相继脱离蒙古国和元朝中央，成为独立的汗国。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因争夺大汗继承权爆发战争，给西道诸王提供了摆脱蒙古大汗控制的机会。世祖至元六年（1269），察合台后王八剌正式脱离元廷，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宗藩之国。

蒙哥弟旭烈兀在宪宗朝曾奉命率军征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并实际上控制了上述地区，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最终支持了前者，从而取得了对阿姆河至密昔尔（埃及）这一广大地区的统治权，成为又一个较独立的藩国。

与此相反的是东道诸王势力的削弱。以帖木格·斡惕赤斤为首的东道诸王，曾经是蒙古汗国东部地区的支配力量，成吉思汗西征期间，他曾为监国。窝阔台死后，他虽因图谋汗位被杀，但其兀鲁思并没因此而被削弱，至其孙塔察儿时，其势力已达到哈剌温山以东的广大地区。由于拥戴忽必烈有功，世祖

时期，塔察儿长期受到特别的尊宠与优待。但是，他们效仿西道诸王向东部的辽阳、高丽一带发展势力却受到了元廷的限制。世祖后期，由藩王与中央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东道诸王的叛乱。叛乱平定后，忽必烈剥夺了部分叛王的军队和部众，并设东路蒙古军万户府长期镇守这一地区。他们受封后扩张所得的土地被朝廷收回，虽能退保原封地，但地位和实力却被大大地削弱了。

除列土分民的“忽必”以外，蒙古大汗对亲族和功臣还有一种称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随着蒙古国统治范围的扩大，成吉思汗时期在蒙古草原地区的分封和赏赐也扩展到了新占领地区。而由于新领土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忽必”和“莎余儿合勒”的形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太宗六年（1234），金亡，河北、河东和河南的部分地区纳入蒙古统治范围。但长期的战争，居民多逃入诸汉人地主武装控制的地区。同时，诸将领也将所俘人口作为私属，寄居州县，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非常有限。为了将无籍和私属人口纳入大汗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大断事官，全面编籍中原户口。

次年，失吉忽秃忽以所籍中原户口上报大汗，共得户一百一十多万。按照蒙古人的观念，所得中原汉地有城子的百姓，也是“黄金家族”的共同财产，也应在亲族中进行“忽必”的分配和向功臣提供名为“莎余儿合勒”的赏赐。于是，太宗八年（1236）下令将中原民户分与宗室和功臣。这次分配范围较广，自太祖叔、太宗叔祖答里台以下，至太祖诸弟、太宗诸兄弟、姐妹、子女或其后裔以及诸功臣、将领等，都分得了数目不等的汉地民户。

但是汉地的分封进行得并不顺利。首先，在与蒙古将领共同攻打金朝时形成的汉人地主武装，已经成为中原地区有一定实力的政治、军事集团，他们控制了河北、河东部分地区的大量民户，分封直接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不可避免地遭到他们的抵制。同时，中原地区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农业区，那里早已采用租佃制经营方式，那里的人民是封建国家直接管理的编户齐民，他们对地主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享有相对的人身自由。分封就意味着他们将被领主所控制，成为领主的私属，身份地位将下降。这是历史的倒退，必然激起中原人民的抵制。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契丹人耶律楚材制定了一个折衷方案。规定：各地只设达鲁花赤④，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税，非奉诏不得征兵赋。按照这一原则制定的具体办法是：封地由地方州县和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管理，在赋税中，按封户每五户出丝一斤的份额，每年向领主颁赐一定数目的丝料。这就剥夺了诸领主对封地的治理权，领主只能得到封地的部分租赋收入，这就是“五户丝制”。它与唐中期诸皇子弟的食邑制颇为相近。

但是，蒙古贵族不肯轻易放弃他们在草原地区享有的权力，他们习惯于像治理草原封地一样治理中原食邑，因而，耶律楚材制定的“五户丝制”自其执行之日起，就被诸封君所破坏。而中原地区的社会背景、汉人官僚的抵制以及中央集权与分封的矛盾，也使这种食邑制不断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发展变化。

按照规定，五户丝食邑允许设置由各投下主委任的监临官达鲁花赤，其余事务则由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负责。实际上，自中原分封之始，各投下就违制私自向封地派遣官员，致使食邑内，除合法的达鲁花赤之外，又不断增设札鲁忽赤⑤，课税

官和其他军民长官。“这种状况使中原食邑基本上被正规或非正规的投下官府所支配，最终造成封君权力的扩大和五户丝食邑制的名存实亡”⑥。

这种状况，无疑侵害了大汗和国家的利益，违背了五户丝制的根本原则。因此，在诸王的中原食邑中一直存在着朝廷与封君争夺治理权的斗争。

同草原爱马的分封一样，中原五户丝食邑的分封也进行了多次。太宗以后，宪宗、世祖、仁宗朝都曾对五户丝食邑进行过分配与整顿。

宪宗即位后，曾两次为其诸兄弟分拨汉地民户。宪宗二年（1252），其母唆鲁禾帖尼死，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拖雷家族的真定食邑。蒙哥则以大汗的权力，也为其余诸兄弟分配了汉地食邑。五年后的宪宗七年（1257），又进行了第二次分拨。其中分得属民最多的是其同母弟忽必烈，他先后分得京兆三万户和怀孟一万一千多户。另一同母弟旭烈兀分得了彰德二万五千余户。其余各庶出兄弟岁哥都、拨绰、末哥等也各分得三千至五千不等的食邑封户。太宗诸子合丹、灭里、合失、阔出等则分得了汴梁路（原金南京直辖州县）民户。

世祖即位后，再次调整和改封中原五户丝食邑。至元二年（1265），将汴梁路封户在窝阔台四子中重新分配，以郑州隶合丹，钧州隶灭里，睢州隶阔出之子孛罗赤，蔡州隶合失之子海都，以广建诸侯的方式削弱太宗系后王在中原的实力。三年，将原属汉人世侯史天泽的卫州五城改赐蒙哥之子玉龙答失，使蒙哥后王在中原也有了食邑封户。

及至灭宋，这种食邑制又被以改变了的方式推行到江南。元人称其为“江南户钞”。至元十八年（1281），将江南民户封

与宗室诸王。受封的宗室包括太祖子弟、太宗诸子、拖雷诸子及其后裔，世祖诸子中则只封嫡不封庶。各封君所得户数比中原分封时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其中拖雷诸子所得户数较中原封户增加近三分之一。户钞即按所封户数，每户五百文的标准从税粮中折纳交钞，再由官府向封君颁赐。同时，也将中原地区的五户丝数额由原来的每五户出丝一斤增加到每五户出丝二斤。到成宗时，户钞数额又由原来的五百文增至二贯。

成宗大德七年（1307），为世祖次子西平王奥鲁赤分拨了江南封户一万三千六百户；八年，为侄海山（元武宗，裕宗真金孙）分拨江南封户六万五千户，此属特殊情况，不属封地调整、分封之限。仁宗朝五户丝食邑有了较大变动。首先是皇庆元年（1312），对世祖的子孙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江南食邑分封。其中世祖子爱牙赤、脱欢、忽哥赤、忽都帖木儿仿成宗朝封西平王奥鲁赤例，一律分与一万三千余户。裕宗真金（忽必烈子，成宗父）之孙也孙铁木儿（元泰定帝，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子）、湘宁王迭里哥儿不花（甘麻剌第三子）、魏王阿木哥（真金第二子答剌麻八剌长子，武宗、仁宗之兄）、武宗子和世㻋等仿成宗封海山例，一律封以六万五千户。延祐六年（1319），重新核查了五户丝户的实际数目，并以这次核查的户数为准，重新造册，作为颁赐五户丝的依据，改变了一些封君封户数目大量减少却依然按原有户数享受五户丝颁赐的状况。

从草原到中原再至江南，诸王分封性质虽无大改变，而方式却各不相同。主要表现在诸封君对封地的控制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同草原封地领主可直接治理相比，中原封地按规定应由国家设置的地方政权机构管理，而由诸封君委任的达鲁花赤监临，达鲁花赤作为领主的代表和食邑的最高长官，从财

赋、行政、司法等方面，对封地事务实行监临。这一规定在执行中虽受到传统观念和传统制度的干扰，但国家也在不断排除各种干扰，力图行使对各封地的治理权。初，诸封君在封地内除按制度规定派任达鲁花赤外，又多违制私设札鲁忽赤、课税官和其他军民长官。世祖时期，罢去了诸王私设的达鲁花赤以外的其他投下官；明确了达鲁花赤的委任办法与程序，即“凡诸王分地与所受汤沐邑，得自举其人，以名闻朝廷，而后授其职”⑦，将投下达鲁花赤纳入朝廷地方官行列。至于江南户钞，则由朝廷由税粮折钞后颁赐，领主封君的干预成分更微乎其微了。

注 释

①兀鲁思，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⑯。

②《元朝秘史》卷一〇。

③斡惕赤斤，蒙古语，义为“火王”、“灶君”、“幼子”；突厥语“特勤”，义为“王子”。

④达鲁花赤，蒙古语，义为“监临官”。

⑤札鲁忽赤，蒙古语，义为“断事官”。

⑥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⑦《元史·选举二》。

元

成吉思汗西征

当成吉思汗崛起于蒙古草原时，中亚地区花剌子模的势力也臻于极盛。花剌子模是中亚古国之一，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北魏建立了联系，《魏书》称其为“呼似密国”（忽思密）；《新唐书》作火寻、货利习弥、过利或火辞弥。天宝十年，曾遣使献黑盐。蒙古人称其为“撒儿塔兀勒，意即“商队”，他们以此称呼穆斯林；汉译为“回回国”。花剌子模位于阿姆河下游，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共和国库尼亚·乌尔根齐），其王号花剌子模沙（波斯语，“沙”意为王）。

八世纪以来，花剌子模相继受阿拉伯帝国、萨曼王朝（874—999，波斯人建，首都撒马尔罕）和哥疾宁王朝（962—1189，突厥人建，首都哥疾宁，又作加兹尼）的统治。十一世纪中期，又被塞尔柱王朝（1037—1300，突厥人建，首都巴格达）征服。1141年，西辽进军河中，花剌子模沙向西辽纳贡称臣。在西辽的帮助下，其王帖怯失（又作帖乞失、特克什）及其子摩诃末（又作马合谋）不断向西、南扩张势力，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先后占领了呼罗珊（阿姆河以南地）的首

都内沙不尔（又译作你沙不尔、乃沙不尔，在今伊朗东北部）及其东部的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之西）、也里（今阿富汗西北部的赫拉特）等许多重要城镇，成为伊斯兰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摩诃末杀死西辽使者，宣布脱离西辽统治，乘喀喇汗王朝内部发生人民起义之机，将军队开进河中，先后占领了河中重镇蒲华（又译作不花剌，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布哈拉）、撒马耳干（今乌兹别克境内撒马尔罕）。

1210年，马合木在塔剌思河（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塔剌思河）打败西辽军队，进一步提高了在穆斯林世界中的声望，于是他又在自己的名字上加上了苏丹桑贾尔的称号，以伊斯兰世界的真正统治者自居①，并于1212年灭亡了西部喀喇汗国。

作为西辽附庸的东部喀喇汗国属部的高昌，其王亦都护巴尔术阿尔忒的斤已于1209年归附了成吉思汗。1211年西辽的又一附庸葛罗禄（亦作哈剌鲁）首领阿尔思兰汗也归附了蒙古。同年，乃蛮太阳汗之子屈出律篡夺了西辽末帝直鲁古的汗位。

当成吉思汗于1215年进占金中都后，摩诃末曾派出一个使团到达中都。成吉思汗在驻营地接待了这个使团，并表示与花剌子模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作出了允许商人自由往来的决定。这期间，一支来自中亚的商队也到达成吉思汗营地，向蒙古人出售他们的织物。其中一个商人"对他最多用十个或二十个的那购进的织品，竟索三个金巴里失"②，激怒了成吉思汗，他下令将这个商人的商品全部没收，并让他们参观了自己金库中的贵重织物。于是另两个商人再也不肯出售他们的货物，却说"我们把这些织品献给汗"。于是成吉思汗按每匹金锦一个金巴里失，二匹布一个银巴里失的价格买下了三个商人

的全部货物，并在纯白色的毡帐里接待了他们③。当商队返回时，成吉思汗也组成了一个回访使团，以花剌子模人马哈木、不花剌人阿里·火者和讹答剌人玉素甫·坎哈为使团首领；同时命令后妃、宗王和官员们每人挑选一二名亲信，组成了一个四百多人的商队，带上金、银，用五百头骆驼驮载着大量中国内地的丝绸和蒙古皮毛等，与使团同时前往花剌子模，换取当地的珍品。成吉思汗通过使团传达他愿与花剌子模建立友好关系和加强联系的愿望，并表示愿与花剌子模共同维持商路的畅通和保护商旅的安全。他让他们告诉花剌子模王："贵国商人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又将他们遣送回来了。此外，我们还派了一些商人跟着他们到贵国来，想将贵国的珍品和当地出产的珍贵织物运到我国来。您的家族的伟大和姓氏的高贵是尽人皆知的！大多数地区的平民、贵族全都知道您的国土的辽阔和您的命令的威力。您是我的爱子和最好的穆斯林。现在，当您消除了敌人，将同我们邻接的地区全部占领和征服后，我们两国就成了邻国，为了在两国沟通协作一致的道路，要求我们拿出高尚明达的态度来，担负起患难相助的义务，将两国之间的道路安全地维护好，避免发生险情，以使因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关系到世界福利的商人们得以安全通过。当我们之间建立起亲睦关系以后，就没有人动坏念头了，也就没有人支持纷争和叛乱了。"④

商队大约在1218年春到达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今哈萨克斯坦境内奇姆肯特西北齐穆耳）和讹迹邗（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乌支根）等城。花剌子模讹答剌长官亦难赤（又作亦纳勒术、亦难勒出黑）贪图商人们的货物，他一面扣留了商队，一面向花剌子模王摩诃末报告了商队和商人的情况。出于与亦难

赤同样的贪欲和对成吉思汗称其为“爱子”的不满，摩诃末下令杀死商人，没收他们的全部货物。商队的成员除一名骆驼夫及时逃脱外，全部被杀。成吉思汗听到这一消息后，极其愤怒，“他独自登上一个山头，脱去帽子，以脸朝地，祈祷了三天三夜，说：‘我非这场灾祸的挑起者；赐我力量去复仇吧。’于是他下山来，策划行动，准备战争”⑤。他派出三名使臣，指责花剌子模王的无理和背信弃义，要求交出凶手亦难赤；并警告他加强武装，准备迎击大军的讨伐。摩诃末不但拒绝了成吉思汗的要求，而且又下令杀死了为首的使臣，剃去了另两个使臣的胡须，将他们驱逐出境。实力蒸蒸日上的成吉思汗当然不能容忍摩诃末的蛮横无理，又没有任何政治力量能居间调停，于是，东西两强间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了。

此前，乃蛮部王子屈出律逃亡并篡夺西辽，就点燃了蒙古出兵中亚的火种，摩诃末对商队的暴行则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然，通过回回商队提供的信息，成吉思汗对花剌子模的实力也有所了解。因此，他对出兵中亚作了充分的准备。在遣使的同时，他派遣大将哲别率军攻打西辽，消灭盘踞那里的屈出律；派遣速不台追袭蔑儿乞部的残余势力，试探花剌子模的虚实，扫除进兵花剌子模的障碍。为大军的征伐作了必要的准备。

屈出律篡夺西辽政权后，将军队派往伊斯兰地区，对穆斯林臣民横征暴敛，残酷镇压。为了维持其残暴的统治，又令士兵强行住进百姓家，进行严密的控制、监视，激起境内人民的普遍不满。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他强迫穆斯林改信基督教或佛教，杀害伊斯兰学者。

哲别利用穆斯林的不满情绪，宣布“人人均可信仰自己的

宗教，遵守自己的教规”⑥。蒙古军队在穆斯林地区除了屈出律之外，什么东西都不要，因而穆斯林将他们视为解放者，他们纷纷杀死住进居民家中的西辽士兵，配合哲别的军队。屈出律在可失哈耳（又作喀什喀尔，今新疆喀什）听到蒙古军到来的消息，不待交锋便匆匆逃走。蒙古军跟踪追至巴达哈伤山中，在当地猎人的帮助、配合下，俘获并处死了他。

与此同时，速不台的军队尾追蔑儿乞残众至钦察草原，在咸海北消灭了他们。摩诃末得知蒙古军队进入钦察草原的消息后，也发兵自毡的（今哈萨克斯坦克齐尔·奥尔达东南，锡尔河北岸）北进，与蒙古军相遇，蒙古军避而不战。他们说："成吉思汗没有让我们同算端花剌子模王交战，我们是为了别的事来的。"⑦但花剌子模军队并没有因此停止进攻，于是蒙古军被迫应战，并打败了花剌子模军，摩诃末在其子札兰丁的援救下才脱离了险境。东西两强业已交兵，且中间已经没有了任何缓冲地带。当速不台报告了与花剌子模军队交战的情况后，成吉思汗便开始部署西征。

他以幼弟斡惕赤斤留守蒙古地区，将与金朝作战的任务交给了左手万户木华黎。率领诸子、诸那颜，调动了大部分蒙古军队和西夏的河西军、新近自金归降的汉军、契丹军等，大约二十万兵力，于1219年开始了对花剌子模的“讨伐”，这就是成吉思汗的西征，也是蒙古军队的首次西征。

太祖十四年（1219）夏，成吉思汗驻扎于也儿的石河。六月，大军祭旗出师，途经海押立时，哈剌鲁阿尔思兰汗和畏兀儿高昌王亦都护也率师加入，前往助战。大军的第一个进攻目标就是讹答剌。当蒙古西征军将讹答剌城团团包围后，成吉思汗开始调兵遣将：他派长子术赤率数万兵将沿忽章河（锡尔

河）进兵毡的；留察合台、窝阔台攻取讹答剌；命阿剌黑那颜率军南下攻取别纳客忒（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塔什干南，锡尔河北岸）、忽毡（今乌兹别克共和国列宁纳巴德）；自己与幼子拖雷率主力渡锡尔河，穿越沙漠，直趋不花剌。

讹答剌城守将亦难赤作了充分的迎战准备，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蒙古军猛烈进攻下，坚守了五个月，外城终被攻破。亦难赤知道自己不会被宽宥，不肯投降。又率残众退守内城，一个月后，终因众寡不敌，守军全部战死。因为成吉思汗命令必须生擒亦难赤，故使他得以战斗到最后被俘。由于城中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也有很大伤亡，城破后，蒙古军大肆杀掠，将城夷为平地。而将刀下余生的庶民和工匠收入军中服役。亦难赤被送到成吉思汗军前，处以死刑。

术赤军在向毡的进军时，首先占领了昔格纳黑（又译作速格纳黑、速黑纳黑，今哈萨克斯坦契伊利东南，锡尔河北岸）。进攻昔格纳黑前，蒙古军先派出了一名前此来归的穆斯林哈散哈只（忽辛·哈只）为使者，要求居民归降。然而居民不肯投降，并杀死了劝降使者。于是蒙古军从早至晚轮番作战，经七昼夜的猛攻，占领了该城。为给哈散哈只复仇，蒙古军对昔格纳黑也进行了屠杀和掠夺，并命哈散哈只的儿子管理该城。

蒙古军自昔格纳黑出发，向讹迹邗和巴耳赤邗（又作八儿真，在昔格纳黑西北）进军，由于当地居民没有组织抵抗，因而也没有遭到屠城的厄运。然后，他们继续向毡的方向进军，攻占了毡的南部城镇额失纳思（也译作阿失纳思，在锡尔河左岸）。锡尔河沿岸城镇相继失守的消息传到毡的，当地守军及其将领弃城逃往花剌子模，居民虽曾自动组织抵抗，但因缺乏作战经验，该城很快又破陷。蒙古军将居民驱赶到城外，掠夺

了城中财物，处死了组织抵抗的人，任命早年归附的穆斯林阿里火者治理该城。接着，他们又遣将西进，攻取养吉干（今哈萨克斯坦诺沃卡札林斯克南，锡尔河左岸，咸海东）。至此，锡尔河下游诸城尽被蒙古军占领。术赤驻营锡尔河以北的哈剌忽木。

阿剌黑那颜率军围攻别纳克忒三昼夜，守军乞降。劫后余生的居民除工匠外，都被编入军籍。之后，蒙古军向忽毡进发，忽毡守将帖木尔灭里在河中岛上修筑坚固的城堡，率领精锐固守在岛上，不断袭击蒙古军。成吉思汗不断从讹答剌、不花剌、撒麻尔干（撒马尔罕）等地派兵增援，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威逼下，帖木尔灭里乘船向锡尔河下游撤退。得知蒙古军已经组织兵力阻截后，他舍舟登陆，边战边退，部众损失殆尽，他只身逃往玉龙杰赤，会见算端。蒙古军攻下忽毡，进而占领费尔干那地区。

成吉思汗和拖雷率领蒙古军主力渡过锡尔河进军河中。他们派遣穆斯林使者先进入沿途城镇、堡寨劝降，对主动归降的城镇，或将其青壮年编入军队从征，或令其依原来的标准向蒙古军缴纳贡赋，而城中居民们的财富，则照例被蒙古军队抄掠一空。1220年3月，成吉思汗抵达不花剌。守将率领部分军队逃走，被蒙古军尾追击败。城中教长、绅士献城投降。成吉思汗入城，在清真寺举行了庆功宴会，蒙古军打开仓库，用谷物喂马，将古兰经从箱子里倒出，用装经书的箱子作马槽，伊斯兰教的首领、学者、博士、贵族在蒙古的监督下为蒙古军将看管马匹。宴会后出城，令百姓聚集在城外，成吉思汗向他们宣布了算端的罪行，称自己是“上帝之鞭”，是上帝以此降罪于该国之人。他们要求城中的富人交出他们埋藏于地下的财

富，而地上的财富则可由军队自取。由于内城仍有军民坚守，蒙古军在掠夺、勒索后，纵火焚烧了居民的房屋，以孤立内城守军，然后又驱赶不花剌人攻打内堡。经过几天激烈的战斗，内城守军再也无力抵抗了，内城被攻破。居民中的丁壮被强征从军，往攻撒马尔罕，老弱妇孺逃往乡下，不花剌这座昔日繁荣的城市遂变为"平坦的原野"。

占领不花剌后，成吉思汗又率军前往河中府撒马尔罕，蒙古军驱赶着从不花剌征集的大军，沿途村落，一经投降，便一无所伤；凡进行抵抗者，则留兵围攻。当蒙古军攻打讹答剌时，花剌子模王摩诃末曾预征三年的赋税拟筑长围保卫河中府。但成吉思汗率军到来的消息传出后，摩诃末留下数万人守城，自己却从该城退走⑧。成吉思汗到达后，遣大将哲别、速不台率军追击摩诃末，自己则用两天的时间"巡视城池，观察墙垣、外垒和城门"⑨。察合台、窝阔台也从讹答剌领兵来会。第三天，成吉思汗下令围城，蒙古军和在当地征集的签军将撒马尔罕团团包围，水泄不通。守军组织突围，被蒙古军击溃。他们又用战象冲击蒙古军阵，双方都有很大伤亡。但蒙古军击退象阵，逃回的大象反而践踏了守城的步兵，城内军民陷于混乱。第五天，守军和城民终于决定投降。蒙古军入城后，拆除了城墙和外垒等防御设施，将居民赶到城外，只有献城的居民代表、法官和宗教首领的家属约五万人受到了保护。藏匿不出者，一旦被发现便遭杀害。这时，内堡的守军也陷入混乱，他们"吓得心胆俱裂，既不敢挺身抵抗，又不能转身逃跑"⑩。有一支千人敢死队拼命冲出内堡，去与算端会合，其余的人只好龟缩在内堡之中。第二天，内堡被攻陷，守军退入大清真寺，用火油筒和方镞箭进行抵抗，蒙古军也用火油筒回

击，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内堡中的人也全部被赶到城外。蒙古军将突厥人的头发剃成蒙古式样，对他们进行了收编，而将约三万名康里将卒全部杀死⑪。居民中有技艺者三万人被分给了成吉思汗诸子和族人，又将同样数目的丁壮收编为签军，令其随军参与征战。其余的人在缴纳一定数目的赎金后，被允许回城。同时任命契丹人耶律阿海为达鲁花赤，镇守该城。

完成对河中地区的征服后，成吉思汗开始作下一阶段的部署，西征战事进入第二阶段。他派察合台、窝阔台率军征讨花剌子模，令术赤自毡的前往与二弟会师。自己则作进军呼罗珊的准备。

成吉思汗命哲别、速不台追袭摩诃末时，指示说："朕命你们去追赶花剌子模沙算端，直到将他们追上为止，如果他带领军队来攻打你们，你们无力抵抗，可马上（向我）报告，如果他力量不大，可（与他）对敌！因为我们不断接到消息说，他怯弱、害怕、心惊胆战，他一定敌不过（你们）。……如果他被你们打垮后，带着几个人躲到陡山、狭洞里，或者像'必里'（伊朗神话中犯罪的天使）般躲过了人眼，你们要像强风似地吹进他的国土上去；归顺者可予奖励，发给（保护）文书，（为他们指派）长官；流露出不屈服和反抗情绪者一律消灭掉。"⑫

当蒙古军围攻撒马尔罕时，花剌子模王摩诃末便放弃了首都玉龙杰赤，逃往阿姆河南的卡利甫一带，准备防守阿姆河一线。但花剌子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无法组织有效的防御。成吉思汗又采纳讹答剌城降人的建议，施用离间之计，加剧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猜忌。哲别、速不台按照成吉思汗的指示紧跟摩诃末之后，穷追不舍。沿途所经之地，凡迎降者，为其

指定长官后，立即率军离开；个别地区虽不曾迎降，也因行军匆忙，不曾停留；个别村镇，居民们的无礼行为触怒了他们，才遭到攻城和屠杀的厄运。

不花剌、撒马尔罕相继陷落后，摩诃末匆忙逃到你沙不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路上还险些被属下的突厥将士杀死。哲别、速不台跟踪渡河追至巴里黑（今阿富汗境内阿姆河南马扎里沙里夫西，卡利甫西南）。消息传入你沙不尔，摩诃末又仓惶逃往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1220 年 6 月，蒙古军又跟踪追到了你沙不尔，并向当地权贵们派出了招降使者，向表示归附的人们发放了成吉思汗诏敕的副本。哲别、速不台分兵追袭。速不台军经徒思（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哈布商（今霍腊散省古昌）、担寒（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至剌夷（今伊朗德黑兰之南）；哲别经志费因（今伊朗霍腊散省札哈台），进入祃桚答尔（今伊朗马赞德兰），经剌夷尾追摩诃末至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摩诃末在哲别军到来之前，离开哈马丹又转匿于可疾云附近诸堡。蒙古军的步步紧追，使他无法在任何一个地方安身。这期间，蒙古军曾与摩诃末军遭遇，由于他们不知道那是摩诃末的队伍，虽射伤了驮载重物的马，却使摩诃末本人得以逃脱。最后，他逃到了宽甸吉思海（里海）中的一个岛上。他在群岛中转来转去，蒙古军没有找到他，却袭击了他的后妃和金库所在的堡寨，夺得了他的金库，俘虏了他的后妃，杀死了他的儿子。1220 年底，摩诃末在悲痛与惶恐中死于海岛。死前，传位于其子札兰丁。

当摩诃末撤离阿姆河防线时，其母秃儿罕哈敦也撤离首都玉龙杰赤逃往祃桚答尔。后来，追击摩诃末的蒙古军围困了她

栖身的堡寨，守兵坚持四个月后，因寨中无水出降，秃儿罕哈敦也作了蒙古军的俘虏⑬。

当秃儿罕哈敦离开玉龙杰赤时，城内尚有守兵九万人。1220年夏，忽毡守将帖木儿蔑力兵败后退入这里。他整顿了城防，并以此为根据地反攻术赤军，一度夺回养吉干。摩诃末死后，新算端札兰丁曾自里海返回故都，但城内的康里军素与札兰丁不和，他们策划发动政变杀死他。于是他又撤离这里开赴呼罗珊，帖木儿灭里率三百骑与他同行。

玉龙杰赤群龙无首，秃儿罕哈敦的族人康里将领忽马儿（又作乌马儿）的斤被拥为算端。1220年秋，西征战事进入第二阶段。成吉思汗派三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进击玉龙杰赤。术赤率本部军自毡的出发，察合台、窝阔台自不花剌进入花剌子模境。蒙古先锋军在城外一程之地设下埋伏，派少数将士进至城下，当守军出城袭击时，他们迅速撤离，将花剌子模军引入伏击圈，杀死守军一千余人后退回宿营地。

玉龙杰赤城横跨阿姆河两岸。蒙古主力到达后，在城周围结下环形营垒，一方面准备攻城的武器和代替石头的木料，一方面照例遣人谕降。准备就绪后，他们用火油筒攻城，城内守军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他们又以三千人夺取连接两城的桥梁，结果三千人全部被守军杀死。此后，守军斗志高昂；而蒙古军却因术赤与察合台的严重不和，导致指挥混乱，号令不一。围攻玉龙杰赤的战斗进行了数月，军事上却毫无进展。消息报告到成吉思汗处，他命令由窝阔台担任全军统帅，指挥攻城。窝阔台调解了两位兄长的矛盾，坚定地执行成吉思汗的命令，使蒙古军齐心协力投入战斗，终于攻占了这座城市。他们照例将居民驱往城外，将其中的十万名工匠送到了蒙古本

部，妇女和儿童全部成了俘虏，其余的人则全部遭到杀害。他们在掠夺和洗劫了这座城市后，又决阿姆河水灌城，使花剌子模的都城变成了一片汪洋。

成吉思汗在撒马尔罕住了一段时间后，就移军那沙黑不（今乌兹别克斯坦哈尔希）附近草原，休养士马，一俟秋高马肥，他与幼子拖雷便开始了向阿姆河南呼罗珊地区进军的行动。大军自那沙黑不经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尔夏勃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南下，抵达阿姆河北岸的忒耳迷（今乌兹别克斯坦克尔梅兹）。忒耳迷军民依靠坚固的城防，充足的装备，坚持抵抗了十一天。经过激烈的战斗，成吉思汗的军队终于攻下了这座城市。居民们因进行了抵抗而悉数被杀。然后，他分兵攻略附近城寨，派拖雷进军呼罗珊，还派出一支军队进入巴达哈伤（喷赤河与兴都库什山之间）地区。

这一年，成吉思汗在阿姆河北驻冬。1221 年春，他领兵渡过阿姆河，抵达河南重镇巴里黑（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西）城下，城中首领送上礼物归降⑭。接着他领兵东向围攻塔里寒寨（在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之北）。塔里寒军民据险固守，蒙古军与守军激战七个月仍未能将其攻下，直至拖雷奉命前来会师，才将堡寨攻克。守堡军民被杀，城堡、房屋被毁。成吉思汗驻军塔里寒。

拖雷奉命出师呼罗珊时，成吉思汗下令从诸军中各抽调十分之一的勇武之士，由他指挥。呼罗珊地区分为四个城区：巴里黑、马鲁（今土库曼斯坦马里）、也里（今阿富汗西北赫拉特）、你沙不尔。拖雷将其军队分为三部分，他自统中军，与左、右两翼向除由成吉思汗征服的巴里黑以外的其余地区发动

了全面进攻。“两三个月内，拖雷征服了许多城镇，其人烟如此稠密，以至每个镇区本身就是一座城池，而且人群汹涌，其每座城镇都是海洋；整个地区变得像掌心，造反的豪杰就被粉碎在毁灭之掌中”⑮。上述地区在哲别、速不台追袭摩诃末时，几乎都曾经历过兵燹，但当时，两将的主要任务是追袭摩诃末，凡不曾抵抗的城池，一律在接受了蒙古军委派的达鲁花赤后，发给了优待文书、诏敕。但是，其中的一些城镇，在蒙古军远离后，相继起兵反抗。拖雷军到达后，凡曾经反叛的城镇，都遭到了又一次洗劫。其中以马鲁、你沙不尔为甚。

当哲别的军队到达时，马鲁城曾接受了蒙古军委派的长官和成吉思汗的木牌子。而后，他们背叛并袭击了一支蒙古军。拖雷军再至，洗劫了这座城市，将居民中的四百工匠和部分童男女掠走，其余的则全部被杀。城市也被夷为平地。蒙古军退去后，一些隐藏在洞穴中或逃亡返回的人又重新聚集，不幸又再次惨遭杀戮。你沙不尔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花剌子模、呼罗珊相继征服后，成吉思汗召诸子大会于塔里寒寨。下一个军事目标就是消灭新算端札兰丁。

札兰丁无论智慧还是勇武，都远在乃父之上。他自玉龙杰赤出走时，参与保卫玉龙杰赤的忽毡长官帖木儿灭里跟随了他，他们途经奈撒（今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东）时，击溃了一支驻守该地的蒙古军，取得抗击蒙古入侵的首次胜利。这一胜利鼓舞了一些地方的首领，于是在他前往自己的封地哥疾宁时，马里都督阿明灭里（灭里可汗）率五万军队，另一大臣赛甫丁也率四万人相继来投。为了镇守哥疾宁、可不里（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带的道路，1222年，成吉思汗派失吉忽秃忽、帖克扯克等前往这一地区进行征伐和警戒。札兰丁击

败了帖克扯克率领的蒙古军先头部队一千多人。4月，又在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大败失吉忽秃忽。八鲁湾之战是蒙古西征中损失最重的一次，也是自抵抗以来花剌子模一方取得的最大胜利。消息传开，被占城镇纷纷起义反抗，杀死蒙古戍将，蒙古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于是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日夜兼程，追赶札兰丁。而得胜后的札兰丁部下，却因分配战利品发生了争执甚至分裂。札兰丁听到成吉思汗前来追袭的消息，放弃了自己的根据地，向辛河（亦作申河，今印度河）方向撤退，准备渡河避难。

蒙古大军抵达哥疾宁时，札兰丁已离开半月之久。成吉思汗视察了八鲁湾战场，指出了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任命牙剌瓦赤为哥疾宁长官，然后火速向辛河方向追击。在辛河岸边，他们追上了札兰丁，为了防止札兰丁渡河逃走，并打算生擒他，成吉思汗命令连夜组织进攻。他下令："不得用箭射伤算端，要设法（将他活）捉到手！"⑯蒙古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阿明灭里总右翼军，战败后向白沙瓦方向逃跑，被蒙古军追及后杀死。左翼军也发生了动摇。只有札兰丁自统的中军左右拼杀，坚持战斗。由于没有发出改变生擒的命令，军士们不能向他射箭，只是把他紧紧地包围起来。当他意识到突围无望后，便换乘生马向蒙古军猛冲过去，迫使他们后退，"接着他疾驰向后，扯紧缰绳，背上披着盾牌，拿住屏伞与徽牌，用鞭子抽打了一下马，像闪电般地过河去了"⑰。蒙古军准备过河追击，被成吉思汗阻止了。札兰丁知道自己无法取胜时，已先将妃嫔、子女和金银珠宝投入河中。及至他逃到对岸，蒙古军将他的士兵全部消灭，然后动手打捞被他遗弃的珍宝。

成吉思汗驻军白沙瓦，命八剌和朵儿拜（朵儿伯）那颜率

领二万蒙古军渡河继续追击札兰丁，同时分兵遣将镇压各地的起义。八剌等进入印度境内，攻占了一些城镇，但始终没有找到札兰丁的下落。天时向暑，蒙古人不耐暑热，遂班师与成吉思汗会合。这一年，成吉思汗在八鲁湾驻夏。并在这里接见了长春真人邱处机，9月，回师撒马尔罕。算端札兰丁则因不为德里算端所容，离开那里回到了波斯。

奉命追击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在1220年秋进入阿哲尔拜占（首府桃里寺，即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当地统治者纳金钱、牲畜请降。1221年，他们又进入谷儿只（今格鲁吉亚共和国），败其守军。因那里林密路险，他们又自桃里寺往攻蔑剌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并镇压了那里人民的反抗斗争。1222年春，他们再入谷儿只，转战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打耳班（今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逾太和岭（高加索山）入阿速人（也作阿兰，在太和岭北麓）、钦察人（里海、黑海以北，东起乌拉尔河西至顿河的辽阔草原）地区。

他们离间和破坏了钦察与阿速人的联盟，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了阿速、钦察，进入钦察草原。钦察部落首领向斡罗斯诸侯求援，由于指挥不一，诸侯各自为战，损失惨重，蒙古军长驱直入，自斡罗斯南部沿黑海北岸进入克里米亚半岛。1223年底东返，经亦的勒河（伏尔加河），攻下不里阿耳。然后沿黑海、里海北岸回师与成吉思汗会合。

这次西征，南至印度，西至伊拉克、阿塞拜疆、黑海北岸，北达斡罗斯的基辅，历时六年。

注 释

①苏丹，亦译作算端。苏丹桑贾尔是塞尔柱王朝统治时间最长的苏丹，摩诃末袭用他的称号，以示自己的强大。

②的那、巴里失，花剌子模货币单位，七十五的那相当于一个巴里失。

③蒙古人尚白，在纯白色毡帐接待商人是对他们友好和尊重的表示。

④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乞台与摩至那诸合罕、哈剌契丹、突厥斯坦与河中的君主，伊朗、苫国、密昔儿、鲁木、马格里布卜等国哈里发、算端、蔑力、阿答毕传》。

⑤⑥《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Ⅵ《征讨算端诸地的原因》。

⑦《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乞台与摩至那诸合罕、哈剌契丹、突厥斯坦及河中的君主，伊朗、苫国、密昔儿、鲁木、马格里卜等国哈里发、算端、蔑力、阿答毕传》。

⑧关于守城兵力，有四万、六万、十一万等不同说法。

⑨⑩《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 XVⅢ《撒麻尔干的征服》。

⑪康里，游牧于乌拉尔河以东至咸海东北的突厥部落。

⑫《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叙述成吉思汗派遣哲别那颜、速别台那颜去追击花剌子模王、马合谋算端，并叙述伊朗地区上诸国的征服》。

⑬哈敦，突厥语，夫人、皇后。

⑭城民归降后的命运，诸史家说法不一，有的记载说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一直在这一带活动，成吉思汗对居民的纳款表示怀疑，城民全部被杀；有的记载说城民获得了宽宥。参见《元朝史》。

⑮《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 XXVI《拖雷征服呼罗珊简述》。

⑯⑰《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二编：《成吉思汗纪·叙述成吉思汗追击札兰丁算端，算端在辛河上战败后渡过了辛河》。

元

真人西游

金朝初年，一部分不愿与女真贵族合作而又不能进行武装抵抗的下层读书人，采取了逃避现实、处身方外的态度，他们将儒家思想、道教教义结合起来，创立了一些道教新学派，全真教就是其中之一。全真教创于金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1），主要传播于山东、河北、陕西、河南等地。它杂糅儒释，主张三教合一。提倡修真养性，除情去欲，克己忍辱，清静无为，并创立出家制度。创始人王喆有著名弟子七人，号七真。金世宗大定（1161—1189）后期，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大定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七真之一玉阳真人王处一先后两次被召见，向金帝进说“惜精全神”，“端拱无为”的修身、治国之道，并为其主持斋醮。金章宗承安三年，长生真人刘处玄又被召见，也向后者讲说了“寡嗜欲则身安，薄赋敛则国泰”的道理。金、元之际，邱处机在河南、河北则享有盛名。

邱处机，字通密。山东登州栖霞人。幼丧父母，十九岁入山学道，次年以全真祖师王喆为师。大定九年（1169），随王喆入关。先后隐居修行于磻溪（今陕西宝鸡芳南）、陇州（今

陕西陇县）龙门山。交结士人，声名渐著。二十八年（1188），应世宗召至中都（今北京），颇受优遇。后复还祖庵。明昌二年（1191）后，隐居栖霞。宋、金分别遣使来召，均不赴。

元太祖十四年，（金宣宗兴定三年，1219）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征前，遣侍臣刘仲禄佩带文为“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的虎头金牌，传旨敦请①。仲禄五月自乃蛮国斡耳朵（兀里朵）②出发，六月到威宁（今内蒙古兴和北），七月至德兴（今河北涿鹿县），八月抵燕（今北京）。经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到益都（今山东青州市），十二月，到东莱（今山东掖县），见邱处机，决定第二年正月十八日启程。

于是，邱处机选弟子十八人，如期出发，经潍阳（山东潍坊）、青社（益都）、长山（今山东淄博市西北）、邹平（长山西），二月初至济阳（今山东济南市东北）。中旬渡滹沱河，二十二日过卢沟河至燕。

得知成吉思汗西征已出师，邱处机因年老，不欲冒风霜西行，恰遇成吉思汗命人选处女同往，遂以不愿与处女同行为辞，欲留居燕地，以待成吉思汗之归。并通过刘仲禄所遣请旨使臣，附书陈情③，盘桓燕地待命，同时从事宗教活动和与士大夫诗文唱和。

四月中旬，自燕京启行，过居庸，五月至德兴，于此渡夏，住龙阳观。八月，至宣德府（今河北宣化），住朝元观。十月，斡辰大王（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此时为蒙古地区留守）使者阿里鲜、刘仲禄派往西域的使臣曷剌先后到达。斡惕赤斤要求邱处机取道他所在的行帐；成吉思汗则坚持要邱处机到西域来见，并命令刘仲禄“毋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

来”④。邱处机与刘仲禄决定，天气寒冷，行人所需御寒衣物未备，暂回德兴，待来春启行。依旧主持斋醮和与燕京、宣德、德兴诸道友唱和。

十六年（1221）二月八日，自德兴启程，经翠屏口、野狐岭（均在今河北张家口西），过抚州（今河北张北），十五日抵盖里泊（今内蒙古太仆寺旗南）。出金界壕，入沙漠。三月初，至鱼儿泊（今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

三月初五日，自达里诺尔向东北方向行进，所见皆“黑车白帐，随水草放牧”之人。

四月初一，至斡惕赤斤驻地。斡惕赤斤问道，约以望日（十五日）授受，至期大雪，斡惕赤斤不敢占乃兄之先，遂约定自西域回时仍途经此地，再向真人问道。十七日，斡惕赤斤以牛马百数，车十乘送行。自此西北行，二十二日至胪朐河（亦作陆局河、驴驹河，今蒙古克鲁伦河）。

循河南岸西行，五月初一，日蚀。又行十六日。胪朐河转向西北流。西南有驿路。蒙古人早已得知消息，并以黍米相赠。邱处机酬以红枣，蒙古人甚喜，说“未尝见此物”。又十日，渐入山，当地人亦牧亦猎，男人结发垂两耳，妇女着“故故冠”⑤，“遇食同享，难则争赴。有命则不辞，有言则不易，有上古之遗风焉”⑥。邱处机有诗记其实：“极目山川无尽头，风烟不断水长流。如何造物开天地，到此令人放马牛。饮血茹毛同上古，峨冠结发异中州。圣贤不得垂文化，历代纵横只自由。”又行四日渡河，河西北山川秀丽，水草丰美，有契丹城址。

六月中下旬，至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即斡耳朵）。其地米面极贵，日以乳及乳制品供应一行人等，金岐国公主、西夏公

主也常以寒具（油炸食品如馓子等）相送。

七月九日，离斡耳朵西南行，抵镇海屯田处。有汉民工匠、金章宗妃嫔和歧国公主的母亲袁氏来迎。镇海来见，邱处机见此地“秋稼已成”，欲于此过冬。刘仲禄请镇海决定，镇海称：“近有敕，诸处官员如遇真人经过，无得稽其程，盖欲速见也。父师若寓于此，则罪在镇海矣。愿亲从行，凡师之所用，敢不备。”邱处机答以：“因缘若此，当卜日行。”于是采纳镇海的意见，以“大山高峻，广泽沮陷”，乃“减车从，轻骑以进”，留宋道安等九人，选地筑观。于是当地之人不召而至，“壮者效其力，匠者效其技，富者施其财”，不到一个月，观成，“榜曰栖霞观”。

八月初八日，以弟子赵九古等十人、车二乘、蒙古驿骑二十余随，镇海、刘仲禄又以百骑同行。

镇海及其从人李家奴皆称前面大山有山精，李家奴曾被山精剪去脑后发，乃蛮国王曾被山精所惑，“食以佳馔”。

秋，抵金山（今阿尔泰山）。少驻后复南行。“其山高大，深谷长坂，车不可行”。于是上山时用绳拴住车轮，令士兵将车拉上山顶；下山时，再一点点放下去。过山后，临河宿营，休养铺牛驿马，并有三绝句记金山秋色⑦。

渡河后将过白骨甸。白骨甸为古战场，地皆黑砂石，约行二百余里方有水草；现前行又有大沙漠百余里，至回纥城（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才有水草。“遇天晴昼行，人马往往困毙”。镇海与邱处机商量，过白骨甸为两天行程。傍晚起程，一夜可走一半，上午可到有水草处；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起程，第三天上午十点左右可至回纥城。但夜间赶路，有魑魅魍魉作祟。蒙古人要将血涂在马头上以制服鬼怪。邱处机说：

“邪精妖鬼，逢正人远避。书传所载，其谁不知。道人家何忧此事！”于是，一行乘夜过白骨甸，不胜负载的牛，便被遗弃。故过白骨甸后，不复用牛。

八月二十八日，抵阴山（天山支脉博格达山），回纥（以巴尔术阿而忒的斤为首领的高昌回鹘）首领效迎，先至一小城。赠送以波斯布制成的哈达，并以葡萄等果品、大饼、浑葱（洋葱、圆葱、葱头）等招待。又西行过二小城，至鳖思马大城（即回纥城，也作别失八里，唐代的北庭都护府所在地）。有王官、士庶、僧、道数百人远迎。回鹘王部族献葡萄酒、异花、杂果、名香，设歌舞、百戏招待，中原人很多。

九月二日起行，四日至轮台，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长老来迎，以诗赠河南安阳书生李伯祥。重九日至昌八剌城（又作昌八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畏午儿（维吾尔）王率部族、僧、道远迎。与其夫人以西瓜、葡萄招待。翌日起程，循山西行约十程，再渡沙漠。七日，抵天池（赛里木湖）。雪峰环绕，山峦峭拔。西征时，察合台劈山开路，架设四十八座桥，道路始通。九月二十七日至阿里马城（又作阿里麻里，阿力麻里，维吾尔语意为苹果，因盛产苹果得名。在今新疆霍城西北）。有穆斯林首领和蒙古达鲁花赤来迎。其地盛产苹果、棉花（当地人称“秃鹿麻”），“农者亦决渠灌田”。

十月初七，刘仲禄先行驰报，独镇海陪同前行。中旬，逢东夏（蒲鲜万奴国号）使者，知成吉思汗于今夏已率军追算端札兰丁至印度。十月底十一月初至大石林牙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这里“平地颇多，以农桑为务，酿葡萄为酒，果实与中国同。惟经夏秋无雨，皆疏河灌溉，百谷用成”。

十一月初，经塔剌思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江布尔）至赛蓝（今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东）。初五，随行弟子赵道坚（九古）死，葬于城东。

西南行六日，渡霍阐没辇（忽章河，今锡尔河）。十八日至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耶律阿海和蒙古、回鹘将帅载酒迎。刘仲禄以前途桥梁被毁，土人叛乱，建议明春朝见，遂于此驻冬。邪米思干为河中重镇，花剌子模统治时期，有城民十余万户。现存者仅有四分之一，城中有田园蔬果，皆引水灌溉。居民中有回鹘、契丹、西夏和汉人，田园多赖汉人、契丹和西夏人耕种，汉人工匠杂处城中，长官则由诸色（各民族、部族）人担任。食品有米面盐油、蔬菜、葡萄酒，异物有大象、孔雀。邱处机一行于此观览风景，谈玄论道，与耶律楚材等中原士人唱和。刘仲禄、镇海遣曷剌领兵前往探路。

年底，侦骑回，桥梁、道路均已修好，反叛也已平息。二太子察合台请邱处机先至自己营中，邱处机以不能适应那里的生活环境为理由推辞。

十七年（1222）三月，宣差阿里鲜回。传达了成吉思汗对邱处机的慰劳和对诸奉使的褒奖，同时命万户播鲁只（博尔术）以甲士千人护送邱处机过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卜兹南九十公里拜松山中的布兹加勒山口）前往行在。

邱处机留弟子尹志平等三人于撒马尔罕，于三月十五日率余人与宣差出发。四日，过碣石城（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卜兹）。博尔术以回鹘军一千人护送，过山时依然由军士挽车，两天通过铁门关，然后顺着一条小河南行。第七天，渡阿姆河。四月初到达成吉思汗的行营塔里寒。五日，入见。席间，成吉思汗问长生之药，邱处机答称“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

药”。并介绍了与马钰（丹阳真人）、刘处玄（长生真人）、谭处端（长真真人）等三人师从重阳真人王喆的情况。成吉思汗命护卫人员称其为“神仙”，约以四月十四日问道。因天气渐热，遂与成吉思汗一同前往雪山避暑。

四月中旬，因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的军队在八鲁湾大败失吉忽秃忽，被征服的地区也相继起兵反抗，成吉思汗又率军追击札兰丁，将问道时间推迟到十月，邱处机请求先回撒马尔罕，得旨允准。

回程途经石峡，雄险更在铁门之上，邱处机有诗称：“水北铁门犹自可，水南石峡太堪惊。”重五日，回抵撒马尔罕。

八月八日，离撒马尔罕，前往成吉思汗雪山行宫。自碣石取别径过山，十五日抵达阿姆河北岸，渡河至巴里黑。二十二日，抵巴鲁湾行宫，即刻入见。二十七日，从成吉思汗北归。

九月十五日，设坛传道，唯耶律阿海、田镇海，宣差刘仲禄、阿里鲜与闻，阿海为蒙古语翻译。此后，十九日、二十三日和十月六日，又多次讲论修身治国之道。成吉思汗“温颜以听”，并“令左右录之，仍敕志以汉字，意示不忘”。

所讲内容大致为，“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从道生”；声、色、情、味皆可散气，“气实则健，气散则否”；“学道之人知修炼之术，去奢屏欲固精守神”。

修炼之道又有“常人之道”和“天子之说”，天子应除残去暴，减声色，省嗜欲，行善讲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恤众保民，使天下怀安；“修身之道，贵乎中和，太怒则伤乎身，太喜则伤乎神，太思虑则伤乎气。此三者于道甚损，宜戒之也”，能修德保身，可致长寿。

“中原天垂经教，治国治身之术为之大备，屡有奇人成道

升天耳。山东、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禾、美蔬、鱼、盐、丝、蚕，以给四方之用，自古得之者为大国”。而今“兵火相继，流散未集，宜差知彼中子细事务者、能干官，规措勾当。与免三年税赋，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一举而两行之，兹亦安民祈福之一端耳”。

同时，他又指出成吉思汗遣刘仲禄在燕京选室女充后宫不合于道；又反复说明应遣“清干官”安辑山东、河北，“苟授以非才，不徒无益，反而有害”，必不得已，可借鉴金朝立刘豫的方式，待熟悉中原情况后便可废去⑧。

十月初一，至撒马尔罕。二十六日启程东行，十二月二十三日过锡尔河。蒙古人惧雷霆，成吉思汗向邱处机问雷震事，他答称：“山野（邱处机自称）闻国人（指蒙古人）夏不浴于河，不浣衣，不造毡。野有菌，则禁其采，畏天威也，此非奉天之道也。尝闻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者，天故以是警之。今闻国俗多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成吉思汗欣然采纳，并命以回鹘字记录下来。邱处机又请“遍谕国人”，也为成吉思汗所接受。并召诸子、诸王、大臣，盛赞邱处机，要求他们将他所说的“各铭诸心”。

十八年（1223）正月十一日，东行。十九日众官为邱处机祝寿（七十五岁）。

二月七日，奏请回归。八日，因成吉思汗狩猎坠马，邱处机又劝其年事已高，宜少出猎。答称：“我蒙古人骑射，少所习，未能遽已。虽然，神仙之教在衷焉。”并对扈从的吉息利（启昔礼）说：“但神仙劝我语，以后都依也。”二十四日，再请辞，成吉思汗以考虑应送何物为礼拖延。三月七日，又辞。赐以牛马等物，皆不受。给圣旨一道，免邱处机门人一切差

发。遣阿里鲜、蒙古带、喝剌八海护从东归。

先至赛蓝，奠祭赵道坚。然后东行过楚河、阿里马城，经天山、天池，过四十八桥，越阿尔泰山，至阿不罕山（阿鲁欢，镇海屯田处），前所留弟子宋道安等来迎。

五月七日，令宋道安等六人先行；十四日，与尹志平等六人继之；命张志素等五人于十八日启行随后。七月九日至云中（今山西大同），十三日，遣弟子尹志平与阿里鲜一起持信谕山东。在宣德、德兴、蔚州从事斋醮，住德兴龙阳观。1224年二月，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会众道徒、道友，讲论道义，作斋醮。

1227年，奉成吉思汗圣旨，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命邱处机掌管全国道教事务。七月七日，邱处机病痢死于长春宫。

注 释

①圣旨称："……访闻邱师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穷理，道冲德著，怀古君子之肃风，抱真上人之雅操……朕心仰怀不已。……选差近侍官刘仲禄备轻骑素车，不远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悠远为念。或以忧民当世之务，或以恤朕保身之术，朕亲侍仙座，钦惟先生将咳唾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②当在额尔齐斯河或阿尔泰山东西两麓，乃蛮旧境中某处。为成吉思汗西征前的行营所在。

③表称："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恻！前者南京（指金朝）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冲霜，图其一见。……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窃恐中途不能到得。加之，皇帝

所重，军国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殊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许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名，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

④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参见王国维《长春真人西游记注》，《王静安先生遗书》本；侯仁之、于希贤审校，纪流注译《成吉思汗封赏长春真人之谜》，中国旅游出版社，1988年。

⑤故故冠，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㉓。

⑥《长春真人西游记》。

⑦其一：八月凉风爽气清，那堪日暮碧天晴。欲吟胜概无才思，空对金山皓月明。

其二：金山南面大河流，河曲盘桓赏素秋。秋水暮天山月上，清吟独啸夜光球。

其三：金山虽大不孤高，四面长拖拽脚牢。横截山中心腹树，干云蔽日竟呼号。

⑧传道内容皆见耶律楚材《玄风庆会录》，《道藏·洞真部谱箓类》，正统本。

六征西夏

西夏，蒙古人称之为“唐兀惕”、“河西”，又讹为“合申”。它北与蒙古克烈、乃蛮部接界，东、南与金朝为邻。铁木真灭掉克烈、乃蛮二部后，西夏便成了蒙古的南邻。西夏桓宗李纯祐天庆十二年（1205），蒙古军首次进攻西夏，攻占并摧毁了边境堡寨力吉里寨，进至经落思城，掠夺了周围地区，俘虏了大量人口、牧畜和战利品①。这是一次掠夺性和试探性的军事行动。

夏襄宗李安全应天元年（1206），铁木真为蒙古各部首领推举为大汗，确立了南下攻掠金朝的战略目标。西夏恰居蒙古之南，金朝之西，世为金朝附庸，又与克烈、乃蛮等部素有往来，它的战略地位和军事动向对成吉思汗的事业至关重要，为了集中军力攻打金朝，防止西夏对蒙古地区的骚扰，保障后方安全，成吉思汗需要将西夏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防范西夏与金朝联合，消除来自蒙古军侧翼的威胁，他也必需隔断金、夏联系，把西夏争取到蒙古一方。有鉴于此，成吉思汗决定再征西夏。

元太祖成吉思汗二年，夏襄宗应天二年（1207），蒙古以西夏不肯称臣纳贡为由，二次出兵西夏。他们攻破西夏边防重镇斡罗孩城（又作兀剌海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境内狼山中一处关口），见西夏兵势尚盛，驻兵数月后，于次年春退回②。

元太祖四年，夏襄宗应天四年（1209），为迫使西夏臣服，成吉思汗又率大军，三征西夏。他们出兵黑水城，自斡罗孩西关口进入夏境。夏襄宗遣世子承祯为主将，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兵五万前往抵御。夏军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四月，攻克斡罗孩城，西夏太傅西壁讹答领兵巷战，兵败被俘，蒙古军乘胜南下。七月，抵达中兴府外围要冲克夷门（贺兰山中一处关口）。克夷门山势险峻，夏军统帅嵬名令公率五万人拒守，蒙古军初战失利。两军相持两月之久，夏军守备渐弛。蒙古军设伏以待，以游兵诱夏军入伏，擒获嵬名令公，攻下克夷门，进围中兴府（西夏都城兴庆府，1205年改名中兴，今宁夏银川市）。城中军民固守，蒙古军攻之不下。适逢天降大雨，河水暴涨，蒙古军引水灌城，淹毙居民无数。夏襄宗遣使求援于金，为金所拒，都城危在旦夕。不久河决外堤，反淹蒙古军营。成吉思汗一面派遣西壁讹答入城招谕使降，一面自行撤围③。夏襄宗被迫纳女请和，称臣纳贡，订立了城下之盟，蒙古军放还嵬名令公。至此，成吉思汗初步达到了拆散金夏联盟，巩固侧翼的目的，并使西夏成为蒙古用兵金朝的同盟。此后，蒙古不时向西夏征兵，令其配合攻战，并常取道西夏，出击金朝。

为报复金朝，西夏也甘愿效力蒙古，袭击金朝边境州县。致使金、夏关系进一步恶化，西夏国势日衰，财用渐匮。耕织

无时，田野荒废。元太祖十一年，夏神宗光定六年（1216），蒙古军取道西夏，进军关陕。西夏出兵配合，攻克潼关。而后随从蒙古军侵掠金朝，岁无宁日，军民困弊，穷于应付。又屡为金人所败，夏军损失惨重。朝野对蒙古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蒙夏关系渐致疏离。

成吉思汗西征前，又遣使命西夏军从征，为金所拒，于是又导致蒙古军的第四次征伐。元太祖十三年，西夏神宗光定七年（1217）冬，蒙古军渡河攻夏。西夏毫无戒备，列城不能御。蒙古军长驱直入，围困兴中府。夏神宗出奔，并遣使请降。因西征在即，蒙古军不能久留，遂撤围回师。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将经略中原的重任委派给左手万户、太师、国王木华黎。木华黎与金军作战时，仍不断征调西夏军队参战。元太祖十八年，夏献宗李德旺乾定元年（1223），木华黎兵围凤翔（今属陕西），西夏遣兵十万助战。官、兵厌战，城不克而擅自撤回。木华黎遣使问罪，夏神宗传位与次子德旺，自为太上皇。

夏献宗李德旺与金朝约和，并遣使联络蒙古漠北诸部，组建抗蒙联盟，欲趁大军西征未回之际，叛蒙自立。其年，木华黎病逝，其子孛鲁承袭为国王，继承其父总领华北诸军，继续经略中原。他到西征军中朝见成吉思汗，并上奏西夏动向，得旨侍机进讨。元太祖十九年，夏献宗乾定二年（1224）七月，自西域回师的一支蒙古军攻沙州（今甘肃敦煌），为西夏守将籍辣思义所败。九月，为配合沙州攻城蒙古军，防止西夏派兵增援，孛鲁率军攻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歼灭夏军数万，生擒守将塔海，虏掠牛、马、驼、羊数十万，留都元帅蒙古不花镇守要害。十一月，夏遣使请降，许送质子为信。此为蒙古

对西夏的第五次征伐。

元太祖二十年，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成吉思汗回军漠北，西夏质子不至。遂遣使西夏，责其不派军从征，不遣质子，收纳蒙古之敌亦腊喝·翔昆，且出言不逊。西夏因已与金朝修好，专意抗蒙，不践前约，使者无功而还。

次年，成吉思汗决定六征西夏，意在必灭。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取西夏西北重镇黑水城（亦集乃城，在今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虏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北境。同时派遣忽都铁木儿与党项（蒙古人称为唐兀）人昔里钤部招谕沙州。沙州守将佯许献城，并设牛酒犒师，暗中却设伏以待，蒙古军险遭暗算。蒙古军组织攻城，夏军溃败，沙州沦入蒙古。

五月，蒙古军进至肃州城下，遭到西夏守军的顽强抵抗，州城久攻不下。但其周围地区已为蒙古军蹂躏，民间窖藏尽失，守军孤立无援，终为蒙古军攻陷。城下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唯昔里钤部曾预先请于成吉思汗，获准于俘虏中求其亲属，得免者仅昔里氏亲族百余户。

肃州既下，大军又进围甘州（今甘肃张掖）。早年投靠蒙古的党项人察罕随军。察罕之父曲也怯律为西夏甘州守将。围城之际，“察罕射书招之，且求见其弟。时弟年十三，命登城于高处见之。且遣使谕城中，使早降。其副将阿绰等三十六人合谋，杀曲也怯律父子，并杀使者，并力拒守。城破，帝欲尽坑之，察罕言百姓无辜，止罪三十六人”④。

七月，兵至西凉府（今甘肃武威），蒙古宿卫官粘合重山执大旗指挥六军，猛烈进攻。西夏守臣斡扎力屈，开门迎降。大军乘势连克搠罗、河罗诸县。

夏献宗面对军事上的失利，忧惧而死。群臣拥立其侄李晛继位。蒙古军继续深入，越过沙陀，进至黄河九渡，攻占应里（今宁夏中卫）等县。十一月，进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灵州为西夏南面重镇，夏人势在必争。李晛遣老将嵬名令公率十万众赴援，双方隔河对阵。蒙古军发起猛烈攻击，阻止夏军从结冰的河面上过河东进。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成吉思汗站在冰上，下令发箭射（敌人的）脚，不让他们从冰上过来，敌人们应弦而倒”⑤，死伤数倍于蒙古军。灵州失守。成吉思汗至盐川州驻冬。蒙古军四出搜虏遗民，百姓至穿凿土石为洞穴以避兵，得免于难者百无一二。

元太祖二十二年，夏李晛宝义二年（1227），蒙古军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经灵州之战的沉重打击，西夏已不能组织有力的抵抗。成吉思汗留阿术鲁率部分军士围城，自己则率军渡河攻打积石州。连破临洮府（今属甘肃）、洮（今甘肃临潭）、河（今甘肃临夏）、西宁（今属青海）等州。五月，成吉思汗避暑于六盘山（在今宁夏固原境内）。至此，中兴府被围已届半年，粮尽援绝，军民困病，再无力抵抗和突围。成吉思汗又遣察罕入城谕降。

不久，夏主李晛请降，同时乞请展限一月，以备贡物和迁民出城，得到允准。六月，成吉思汗继续南下，至秦州清水县患病，七月病逝于军中。遗命秘不发丧，以防敌方得知实情，形势有变。并告诫待李晛出降，立即处死。既而李晛出城至蒙古军营，当即被杀。同时决定尽杀中兴城军民，经察罕力谏乃止。察罕领兵入城，安集遗民。

蒙古军前后六次用兵，历时二十二年，终于灭掉了立国近两个世纪的西夏。

注　释

①②《亲征录》

③《太祖纪》。

④《元史·察罕传》。

⑤《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

太宗之立

元太宗窝阔台，成吉思汗第三子，蒙古国第二代大汗。他在位时，元朝国号尚未确立，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制先世尊谥庙号时，定为太宗英文皇帝。

成吉思汗与其正后孛儿帖兀真（兀真又作“旭真”，即妻子、夫人）所生四子，各有所长，都是当时极有威望和倍受尊敬的人，因而被称为“四曲律”。“曲律”用来指马就是骏马、快马，用来比人则是豪杰、勇士之义。

长子术赤生于成吉思汗创业之初，在蔑尔乞部的一次突然袭击中，孛儿帖被掠，并给了赤列都的弟弟赤勒格作了妻子。以报复当初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抢夺蔑儿乞人新娘月伦的宿怨①。后来，蔑儿乞人在不兀剌川被王罕、札木合和铁木真联军击败，孛儿帖又被夺回，不久术赤降生。因而，术赤的出身就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汗位继承上，它不可避免地被当做一条理由提了出来。

次子察合台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他精通札撒②，熟悉必里克③，但却与长兄术赤一贯不和。

三子窝阔台“以庄严、聪明、能干、善断、谨慎、坚定、老成持重、宽宏大量和公正著称，但爱好娱乐和饮酒”④。

四子拖雷“常在父亲身边。成吉思汗总是就所有的事、各种重大事件和他商议，称他为“那可儿”⑤。成吉思汗的禹儿惕⑥、大帐、财产、家室、异密⑦、那可儿、近卫军和直属军队都在他的统辖之下，因为自古以来，蒙古人和突厥人都有这样一种习俗：还在活着之时，就把自己的年长的儿子们分出去，给予他们财产、牲畜和羊群，其余的东西则归幼子所有，并且他被称为斡惕赤斤，即与火和灶有关系的一个儿子，以表示他是家室的根本⑧。在汗位继承上，他也占有独具的优越地位。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无疑将在此四人中选择。

最先提出继承人问题的是成吉思汗的来自塔塔儿部的皇后也遂（又作也速伦）。西征前，她向成吉思汗说：“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⑨成吉思汗对这一建议非常欣赏，当即召集诸子和有关人员商讨。他让四个儿子分别发表意见。术赤还没有开口，察合台就抢先发言。他说术赤是蔑儿乞种，表示不愿服从他的管辖。兄弟俩在父亲面前争执起来。术赤提出以比赛一次射箭和摔跤一决雌雄，被众人劝止。察合台则提出他与术赤都不做继承人，愿为父亲效力。“斡歌歹（窝阔台）敦厚，可奉教训”⑩。术赤也只好同意。窝阔台则表示“尽力谨慎行将去，只恐后世子孙不才，不能承继”⑪。拖雷也表示愿意尽心辅助兄长，“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醒，差去征战时，即行”⑫。初次讨论总算取得了一致。

此后，在频繁的征战中，成吉思汗也随时注意对四个儿子进行考察，攻打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乌兹别克境内库尼亚·乌尔根奇）时，术赤和察合台各执己见，不能协调一致，

战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军队管理混乱，死伤甚多。成吉思汗很生气，他派窝阔台前去担任军队统帅，协调两位兄长的关系，指挥攻城。窝阔台坚定地执行了成吉思汗的命令，把军中诸事安排得很有条理，并使两位兄长的紧张关系缓和下来，维持了表面上的和睦，于是蒙古军齐心协力投入战斗，很快就攻下了玉龙杰赤。对于窝阔台的任情享乐和纵饮贪杯，成吉思汗也曾多次告诫和给以处分。而做为征服花剌子模的主帅，攻陷玉龙杰赤后，兄弟三人私自分配了俘虏和百姓，没有请示成吉思汗，也没有留下父亲和幼弟的份额，使成吉思汗非常不满。当窝阔台等回军时，成吉思汗曾让他们等了三天而不肯召见。拖雷一直在成吉思汗身边，战功卓著，少有过失，加上蒙古人素有的幼子守产的习惯与规矩，所以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成吉思汗也曾一度陷入矛盾中，在窝阔台与拖雷二人之间举棋不定。但经过反复考虑，他还是选择了窝阔台，而将自己的禹儿惕、家室、财产、库藏和军队，全部交与拖雷掌管。因此，当他在灭亡西夏的战争中突然患病又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便把窝阔台和拖雷招到身边（时术赤已死，察合台留守后方），亲自向他们强调了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并叮嘱他们不要违背他的话，在国内引起纷争。

按照蒙古社会的传统习惯，汗位的继承必须有宗亲、贵族的推举，才算合法。因此，窝阔台的即位典礼，须在忽里勒台（大聚会）之后，取得合法资格，才能举行。在大会召开之前，按传统则由幼子拖雷代行大汗职权，即所谓“监国”。

为了权力的顺利移交，维持国家的稳定，忽里勒台应尽快召开，以便早日推举出合法的大汗。但是，成吉思汗 1227 年病逝和举哀发丧后，忽里勒台却没有立刻举行，汗位虚悬达两

年之久。这是因为蒙古大汗的权力，他所控制的军队，拥有的土地、人民、财富都是颇具吸引力的，是令人垂涎和觊觎的；传统的习惯在社会上仍有根深蒂固的影响；拖雷继承了乃父的大量军队、人民和财产，实力大大超过了其它的兄长及其后裔。在窝阔台和拖雷之间做何选择是一个非常敏感、棘手而又至关重要的问题。人们不能不担心，"一旦发生大事，领袖和君主又未指定，国家的根基就将陷于衰弱和混乱。因此，最好尽快选立大汗⑬。

到了 1229 年，各方面开始互派急使，着手准备忽里勒台，就汗位继承问题进行磋商。八月，诸王百官大会于怯绿连河（今蒙古克鲁伦河）曲雕阿兰之地。术赤的儿子斡尔答、拔都、昔班、别儿歌、别儿歌撤儿、不花帖木儿从钦察赶来；察合台和他的子孙从海押立（遗址在今哈萨克斯坦克塔勒迪—库尔干西南）赶来；窝阔台及其子孙从叶密立（又作也迷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额敏）赶来；成吉思汗的弟弟斡惕赤斤、别勒古台及其子孙，拙赤合撤儿（成吉思汗二弟）的儿子也苦、移相哥（又作也孙格、也松格），合赤温（成吉思汗三弟）的儿子按只吉歹等从他们各自在东部的封地赶来；拖雷则早已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宫帐）所在的曲雕阿兰之地等候了。人们到齐后，首先高高兴兴地宴饮了三天三夜。接着，开始就朝政和大汗人选进行磋商。他们充分尊重成吉思汗的遗命，决定推举窝阔台。窝阔台则再三谦让，他说："成吉思汗的旨意虽则若此，但尚有我的兄长和叔伯，他们比我更能胜任此职；再者，据蒙古的风俗，长室中的幼子应成为其父的继承人，而兀鲁黑那颜⑭是长斡耳朵的幼子，他一直日夜晨昏地侍候成吉思汗，目睹、耳闻和领会他的所有札撒、法令。既然这些人仍都健在，

就在眼前，我怎能继承汗位呢?”⑮宗亲和贵族们就此讨论了四十天，终于作出了最后决定，把大汗的权柄交给了窝阔台，并决定八月二十二日举行即位典礼。这个决定的作出，除窝阔台本人的条件外，成吉思汗的遗命和察合台的支持也起了重要作用。

但拖雷对此尚有保留，对汗位的继承仍存幻想，他寄希望于推迟举行典礼，推翻所作的决定进而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参与筹备、组织典礼活动的契丹人耶律楚材⑯寻求支持。耶律楚材认为“大计若不早定，恐生它变”⑰，劝谏他拥戴窝阔台，并以二十四日为吉日，过此近期再无吉日为理由，促使他早下决心。为了维护大汗的尊严，提高窝阔台在宗亲、贵族中的地位和威望，耶律楚材又借鉴中原王朝的礼仪，为大蒙古国制定了朝仪，其中包括宗族中的长者对大汗行拜礼。他充分利用察合台与窝阔台的亲密关系，说服察合台带领叔父和兄弟们向大汗跪拜。

元太宗窝阔台的即位典礼如期在八月二十四日举行。首先，按照蒙古人举行重要活动和祈祷的仪式，大家摘掉帽子，把腰带搭在肩上。然后，察合台拉着窝阔台的右手，拖雷拉着他的左手，叔父斡惕赤斤抱着他的腰，把他扶上大汗的宝座。“既有老成持重的赞助，又有鼎盛青春的扶持”⑱。拖雷举起酒杯，御帐内外的人们依次向大汗行九次跪拜之礼，祝贺他登了大位。又在斡耳朵外向太阳叩拜三次。窝阔台则命令呈上金库的财物，慷慨地赏赐了所有的人。大典和宴饮结束后，窝阔台又命令按照蒙古习俗，为成吉思汗举行了隆重的祭祀活动。

窝阔台即位后第一件事就是颁布大札撒，接着开始制定各种制度，行使对国家的治理权，他派绰儿马浑（又作绰儿马

罕）至伊朗，继续征服花剌子模；派术赤的儿子斡尔答、拔都、昔班等，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尔、孙子不里，他自己的儿子贵由、合丹，拖雷的儿子蒙哥、拨绰以及大将速不台等往征钦察、斡罗斯等地，这是蒙古军队继成吉思汗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征伐，被称为“长子出征”；他修建了宫殿和哈喇和林城（今蒙古额尔德尼召）；他设置了仓廪，完善了驿站制度；制定了蒙古地区、中原和西域的赋税制度，派西域人牙剌瓦赤主持汉地事务；在牧区缺水处凿井，解决人畜用水的困难。最大的成就则是灭亡了金朝，将统治范围扩大到淮河以北，将统一中国的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然而由于他沉湎酒色和纵情享乐，筑长围为猎场，征民女为妃嫔，也曾招致不少怨言；晚年任用西域商人奥都剌合蛮“扑买”中原课税，加重了人民负担，也破坏了由他早年制定的赋税制度。但瑕不掩瑜，时人仍称他“仁厚有余，言辞极寡。服御俭素，不尚华饰。委任大臣，略无疑二。性颇乐饮，及御下听政，不易常度。当时政归台阁，朝野欢娱，前后十年，号称无事”⑲。《元史·太宗纪》也说：“帝有宽宏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此虽不免过誉，也足证太宗行事确有可称者。

窝阔台在位十三年，于1241年11月因饮酒过度，病逝。

注　释

①月伦，《元朝秘史》作“诃额仑”，斡勒忽讷惕部人，曾许与蔑尔乞部人也客赤列都为妻，迎娶的路上，被也速该所劫，生成吉思汗等四子一女。参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㉗、㉘。

②札撒，蒙古语，意为“法律”、“法令”、“命令”。

③必里克，蒙古语，意为“文书”。

④《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合罕纪》第一部分，余大钧、周建奇汉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那可儿，蒙古语，意为“伴当”。

⑥禹儿惕，突厥语，蒙语为“嫩秃黑”——游牧地段及某一社会经济单位从事游牧的地区。

⑦异密，相当于蒙古语的“那颜”，即“官人”。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传》。

⑨⑩⑪⑫《元朝秘史》续一。

⑬《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纪》。

⑭兀鲁黑那颜即也可那颜，大官人。这里指拖雷。

⑮《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分《世界的皇帝合罕登上汗位和世界帝国的威力》。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⑯耶律楚材早年跟从成吉思汗，掌管汉文文书。与成吉思汗诸子关系密切。

⑰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引李微撰《墓志》。

⑱《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一部分《世界的皇帝合罕登上汗位和世界帝国的威力》。

⑲《元朝名臣事略》卷五《中书耶律文正王》引赵衍撰《行状》及王恽文集。

元

蒙 金 战 争

成吉思汗曾受金朝官职，对其进贡方物，并在边城会见过卫绍王完颜永济。金对蒙古的掠夺、杀伐早已激起了蒙古诸部的强烈不满，蒙古立国前后，又不断有金朝边将来投。故成吉思汗对金朝和西夏的虚实有所了解。金降将俱言章宗杀戮宗室，荒淫日恣，且陈其可伐之状。于是成吉思汗在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就将攻掠的目标指向了金朝。

元太祖三年（金章宗泰和八年，1208）金章宗死，完颜永济即位，遣使持诏书谕蒙古。成吉思汗大不以为然，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儒亦为之也。"①由此更轻视金朝。但金朝毕竟是中原上邦，为蒙古诸部的宗主，立国已近百年，成吉思汗不敢轻举妄动。他首先出兵西夏，解除金夏合兵共抗蒙古的威胁，消除西夏自其西路牵制兵力的后顾之忧。四年（金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成吉思汗以武力迫使夏襄宗李安全纳女奉贡请和，拆散了金夏联盟，将西夏争取到蒙古一方，遂积极准备南下伐金。

六年（金大安三年，1211）秋，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首次

南下袭击金朝。他率军自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出发，进入金境。金平章政事独吉思忠（即千家奴）失于备御，蒙古军先锋哲别攻陷边境堡寨乌沙堡，进取乌月营。思忠以战败解职，卫绍王命参知政事完颜承裕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战，自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先锋，以行省兵为声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兵长驱直入，占领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和抚州。金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部署重兵阻截，号称四十万。蒙古将领木华黎率勇士策马横戈，大呼陷阵，拼死力战，猛冲金兵。诸军同时并力出击，金兵大败，“死者蔽野塞川”。金将石抹明安降，承裕率军南逃。九月，蒙古军跟踪追至会河川，金军再溃，僵尸百里，精锐尽失。蒙古军首战告捷，先锋突入居庸关，进至中都城外，攻城不克，退回。

成吉思汗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率军自西南路突入边墙，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惕吉忽里献关，导蒙古军攻下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子古城）、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朔（今山西朔县）等州，抄掠后退去。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弃西京（今山西大同）逃回中都。

七年（金崇庆元年，1212），蒙古军乘胜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和山后（今太行山北段之西）州县，威宁防城千户刘伯林降。进而围攻西京，歼灭元帅左都监完颜襄率领的援军。成吉思汗亦中流矢，撤围回军。同年，哲别受命率军往攻东京（今辽宁辽阳市），见城守尚严，

乃佯退五百里，待其守备松懈之机，连夜换马驰回，出其不意，攻陷东京，大掠而回。

八年（金至宁元年，1213），成吉思汗复会集诸军，再入野狐岭，连下宣德、德兴，与金行省完颜纲、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所统乣、汉守军激战于怀来（今河北怀来东），又获全胜。蒙古军尾追金军至居庸北口，杀得金军“如烂木般堆着”②。金以重兵守居庸，“布铁蒺藜百余里”③，蒙古军不得入。成吉思汗留部分兵力继续进攻，自率木华黎、哲别等间道西行趋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斩关而入，再溃金军。金涿州守将、副统军王檝降。哲别等驰赴南口，猛攻金军，“金鼓之声若自天下，金人犹睡未知也。比惊起，已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蔽野”④。哲别与北口诸军两面夹击，攻下居庸天险，进逼中都。成吉思汗则率军连取涿（今河北涿州市）、易（今属河北）二州。于是除留兵围攻中都外，其余各军兵分三路，抄掠黄河以北。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西路），循太行山东麓南下，至黄河北岸卫（今河南汲县）、孟（今河南孟县）诸州，再循西麓北上，掠河东泽（今山西晋城），潞（今山西长治），至忻（今山西忻县）、代（今山西代县）、武等州后还；左军（东路）由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和斡惕赤斤等为统帅循海而东，取蓟（今天津市蓟县）、平（今河北卢龙）、滦（今河北滦县）及辽西诸郡而还；成吉思汗本人与其第四子拖雷领中军，掠雄（今河北雄县）、霸（今河北霸州市）、济南、益都（今山东青州市）等河北东路及大名，山东东、西路诸府州而还。别遣木华黎攻陷密州（今山东诸城），屠其城。金朝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诸州县皆遭杀掠。永清地主史秉直、史天倪父子降。

同年八月，金帝完颜永济被权右副元帅、中都 城北守将纥石烈执中所杀，宣宗完颜珣即位，改元贞祐。

九年（金贞祐二年，1214）春，诸军会于中都附近，成吉思汗驻北郊，遣使向金索要贡献。金宣宗以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和童男女五百、马三千奉献，蒙古退军。夏，成吉思汗避暑鱼儿泊（即达里泊）。五月，金宣宗南迁汴京，留太子完颜守忠与丞相完颜承晖（福兴）、尚书左丞抹撚尽忠等守中都。六月，镇守中都南面的乣军哗变，投降蒙古。成吉思汗遣三木合拔都、契丹人石抹明安、汉人王檝等南下，会合乣军围攻中都。金皇太子出城赴汴。

十年（金贞祐三年，1215）正月，通州守将、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州降，完颜承晖向金宣宗告急。金宣宗遣元帅左都监乌古论庆寿率军一万余人，御史中丞李英督粮救援中都。三月，李英被酒，军溃霸州，粮运尽失。庆寿军闻知，溃归，中都援绝。抹撚尽忠弃城走汴，承晖自杀。五月，中都被蒙古军攻占。成吉思汗遣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等清点中都府库，悉数北运，以札八儿火者、石抹明安镇守中都。

成吉思汗自中都撤军后，遂派木华黎统军征辽东。木华黎派早年来归的契丹人石抹也先袭取东京。时值金东京留守易人，也先于中途截杀赴任新留守，持其所受诰命至东京，以新留守身份发号施令，兵不血刃，即下辽东地。又配合木华黎取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北京路（治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大名城）诸州县。木华黎攻取北京，大败金军于花道（今内蒙古赤峰市东南），城中金军杀其守将，推寅答虎为帅，举城降。北京即下，木华黎遣人招降兴中府（今辽宁朝阳），兴中土豪石天应，义州（今辽宁义县）契丹土豪王

珣等相继迎降。十一年（金贞祐四年，1216）他们协助木华黎平定据锦州（今属辽宁省）先降而复叛的张鲸、张致兄弟。取平、滦、懿（今辽宁阜新市东北绕阳河南岸满汉营子一带）、广宁（今辽宁北镇县）等府州。

占领中都后，成吉思汗遣使金朝，要求其献河北、山东未下诸州县，金不从。于是又遣脱栾扯儿必、史天倪等蒙古军和投降的契丹、汉军南征，降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名（今河北大名东北）。至东平（今属山东省），阻水不克，大掠后还军，金人复取之。同时遣三木合拔都由西夏趋关中，出潼关，掠河南而还。此为蒙金战争的第一阶段。

占领中都前，蒙古的军事活动以俘虏人口、财富为其主要目的；占领中都后，逐渐转向攻城略地，进占中原了。

十二年（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秋，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赐誓券、黄金印，使之统帅弘吉剌、亦乞烈思，忙兀、兀鲁等十军和契丹、汉军，专事中原的经略。他说："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其勉之。"⑤又赐大驾所建九斿大旗，谕诸将曰："木华黎建此旗以出号令，如朕亲临也。"⑥不久，成吉思汗率领四子和蒙古军主力，开始西征。蒙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自中都失陷后，河北、河东、山东等路州县不断遭到蒙古军的攻击、抄掠。金朝已无力控制。各地土豪纷纷结寨自保，招募武装力量。他们或接受金朝官职，为之守土抗蒙；或投附蒙古，帮助木华黎攻城略地。

木华黎建行省于燕云，率刘伯林、石抹也先、耶律秃花、史天倪等攻取河北、山东诸州县，下蠡州（今河北蠡县），破大名府，东定益都、淄（今山东淄博市南）、登（今山东蓬

莱)、莱（今山东掖县)、潍（今山东潍坊市)、密诸州。易州武装地主张柔抗蒙兵败后归降，木华黎使其仍居金所授经略使职。张柔率所部连下雄、易、安（河北安新县)、保（今河北保定）诸州，与效忠于金朝的武装地主武仙在河北对抗。木华黎统军自西京由太和岭（太行山）入河东，连下太原、忻、代、泽、潞等州。十三年（金兴定二年，1218)，再下石（今山西离石)、隰（今山西隰县)、岢岚（今属山西)、绛（今山西新绛）等军州。不久，依附于金朝的武装地主郭文振、张开、胡天作等又相继收复太原、平阳（今山西临汾)；在河北，藁城武装地主董俊与张柔合力击败武仙，进据真定。

十五年（金兴定四年，1220)，金封王福、武仙、郭文振、胡天作等九人为公，兼经略使，使之分疆守土，在河北、河东与蒙古军和附蒙的汉人武装势力对抗。武仙为恒山公，知真定府事，在金末九公中实力最强。这一年，木华黎回军河北，自燕南下，至满城（今属河北省)，在董俊、史天倪所统汉军的配合下，击败武仙。仙穷蹙降蒙，与史天倪同守真定，为河北西路兵马副元帅。

蒙古军入山东，前同红袄军一起降宋的武装地主严实以所据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等州三十万户迎降，并助木华黎攻取曹、濮、单等州，大大加强了蒙古对河北、山东地区的控制力量。

十六年（金兴定五年，1221)，木华黎再入山、陕，石天应、史天祥和西夏兵五万从，他们入葭州（今陕西佳县)，取绥德（今属陕西省)，进逼延安，设伏大败金知延安府事完颜合达，徇洛州，克鄜州（今陕西富县)、坊州（今陕西黄陵)，又东渡黄河，再取隰州。

十七年（金元光元年，1222），再下太原、平阳，取河中（今山西永济），皆设官置守。木华黎再次渡河而西，取同州（今陕西大荔），下蒲城，径趋延安。金京兆行省完颜合达拥兵二十万固守，攻之不下，遂分麾下兵屯守。另遣兵断潼关，击凤翔，又不下，乃驻兵于渭水南，徇凤州（今陕西凤县），后渡河东还。十八年（金元光二年，1223）三月，木华黎死于河东闻喜（今属山西），其子孛鲁袭职。十二月，金宣宗死，哀宗完颜守绪即位。

孛鲁于元太祖十九年（金哀宗正大元年，1224）攻克银州（今陕西米脂西北），命蒙古将领驻守要害。当蒙古军主力进攻山、陕之际，河北东、西两路的局势又发生了变化。二十年（金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都元帅史天倪，叛蒙归金；降宋的红袄军首领彭义斌，受宋官任大名路总管，占据了严实控制的大部分地区。四月，围严实于东平。城中食尽，严实被迫与之约和。彭义斌又西向与武仙联兵取真定。史天倪之弟史天泽袭都元帅职，与蒙古军将领肖乃台合兵反攻真定。严实也暗结蒙古孛里海军合击彭义斌。彭义斌被俘，武仙败走，真定复为蒙古势力所据，严实所失州县尽复。至此，金山东、西路，河北东、西路，河东南、北路基本上为蒙古军和降蒙的汉人武装地主所控制。山东东路则为降宋的红袄军首领李全的势力。

二十一年（金正大三年，1226），木华黎弟带孙统蒙古军与严实的汉军围李全于益都，孛鲁也领兵入齐，遣人招降李全。第二年夏，李全城中食尽，出降，山东东路尽入蒙古。

这一时期，木华黎、孛鲁所统蒙古军约二万人，在河北、山东和山、陕三线作战，兵力显然不敷分派。河北东、西路和山东西路主要依靠武装地主史天倪兄弟、严实父子和董俊父子

的兵力。金朝也只在陕西由行省完颜合达的兵力支撑局面，河东、河北诸路则不得不依靠武装地主武仙等九公与蒙古势力抗衡。故这一阶段蒙金战争的特点是投靠金蒙双方的汉人武装地主间的对抗。其间，太原、真定、平阳、东平等重镇虽几经易手，而因蒙古军能往来策应，故其势力始终居于上风。金朝则兵源不足，粮饷匮乏，唯以官爵酬九公而已。宋又授反金起事的红袄军首领以官职，利用他们乘蒙金对抗之机，冀收渔人之利。

成吉思汗于1225年结束西征回到漠北后，便集中兵力大举攻伐西夏。二十二年（金正大四年，1227）秋，成吉思汗病逝，西夏灭亡。这期间，蒙古军下临洮府（今属甘肃），自凤翔徇京兆。金朝也加强了陕西的防御部署。戊子（蒙古拖雷监国，金正大五年，1228），蒙古军八千入大昌原（今甘肃宁县西），金将完颜陈和尚以四百骑取胜，为蒙金交战以来金军的首次大捷，三军士气为之一振。但不久，元太宗窝阔台即位，再议伐金，蒙金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太宗二年（金正大七年，1230）蒙古军攻京兆。秋，窝阔台自将南伐，皇弟拖雷、皇侄蒙哥率师从。下天成等堡，入山西，自平阳南下，渡黄河与陕西兵会。三年（金正大八年，1231）春，围攻凤翔。金遣完颜合达、移剌蒲阿行省阌乡（今河南灵宝），使出关援救。合达、蒲阿见蒙古军势盛，不敢战，托言伺机方可动，不肯出关。金哀宗多次遣使催促，不得已出关，至华阴，与渭北军一交，便匆忙收军入关，放弃京兆。凤翔被蒙古军攻占，潼关以西不复为金有。

夏，窝阔台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大会诸侯王，商讨伐金方略。时金以重兵守潼关、黄河一线。成吉思

汗临死前，曾部署灭金方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⑦及拖雷下凤翔，亦曾有人以此策来献。至是，遂定议兵分三路：中路窝阔台自将，由洛阳进；左路斡陈那颜率领，由济南进；右路拖雷率领，自陕西进，借道于宋，沿汉江下唐、邓，迂回包抄汴京。期以明年正月会师于汴。

秋，窝阔台至云中，率众下河东州县，取河中府，自白波（今河南孟县西）渡河，驻郑州。金卫州节度使完颜斜捻阿不弃城走汴，黄河防线瓦解。拖雷自凤翔趋宝鸡，过大散关，至兴元（今陕西汉中），东下金州（今陕西安康），直趋房（今湖北房县）、均（今湖北均县西），渡汉水北上，进入邓州（今河南邓县）。金遣合达、蒲阿守邓州。合达等据险设伏于邓州西禹山，金军小胜。拖雷避开金军主力，散漫北上，径趋汴京。合达等尾追，双方且战且行，各有伤亡。蒙古军但事骚扰，不与交锋。

四年（金开兴元年，1232）正月，蒙古游骑至汴。拖雷军与金军遇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拖雷集结精兵与金军对阵，"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马践泥淖没胫。军士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⑧。拖雷军与中路军会合，"四面围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⑨。合达战死，蒲阿为蒙古军俘虏，被杀。同时，金潼关守将献关，许州（今河南许昌）兵变，皆降蒙古，金朝大势已去。蒙古军连续攻下卢氏、睢州（今属河南）、

中京（今河南洛阳），遣使入汴招谕，索取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和降蒙诸人家属。金遣曹王讹可出城为人质与蒙古军议和。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等率蒙古军围攻汴京。汴京周围州县皆遭蒙古军杀掠，居民争相入城避难，汴京城人口激增。入夏后，瘟疫流行，五十日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贫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数。七月，蒙古使者唐庆为金军士所杀，和议绝。京城粮尽，括粟于民，骚扰捶楚备至。入冬则人相食。十二月，哀宗出逃，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完颜奴申，枢密副使兼知开封府、权参知政事完颜斜捻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户部尚书完颜珠颗，外城东面元帅把撒合，南面元帅术甲咬住，西面元帅崔立，北面元帅孛术鲁买奴等留守。

五年（金天兴元年，1233）正月，金京城留守官、西面元帅崔立杀参知政事奴申、枢密副使斜捻阿不，以卫绍王子从恪监国，献城降。蒙古军入汴。

金哀宗出城过陈留、杞县，驻黄陵岗。渡黄河攻卫州，不克。又渡河南至归德（今河南商丘）。六月，离归德奔蔡州（今河南汝南）。武仙等谋奉哀宗入蜀。

自汴京被围，蒙古数遣使至宋，约以联兵灭金。八月，和议成。商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于是，蒙宋联合攻唐州，败武仙，断金帝西逃入蜀之途。蒙古将领塔察儿（博尔忽从孙）兵围蔡州。十一月，蒙古兵决蔡州城西练江；宋兵引城南柴潭入汝水，填薪苇铺路，进逼蔡州城。六年（金天兴二年，1234）正月，宋兵攻破南门，引蒙古军自西门入。金哀宗传位于宗室、蔡州东面元帅完颜承麟，自缢死。蒙宋联军攻陷蔡州，承麟死于乱军之中，金亡。

同河北、河东诸路占领与失陷数次反复一样，蒙古对上京、咸平、辽东诸路的征服也颇费时日。早在成吉思汗首次伐金之际，金朝北边千户、契丹人耶律留哥即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八面城）一带反金自立。太祖七年归附蒙古，与蒙古将领按陈结盟，驻守原地。翌年，金朝遣将北伐留哥，被蒙古与留哥的联军击败。此后，留哥自立，建国称王，国号辽，年号元统。进而击败金宣宗所遣的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攻占咸平（今辽宁开原），建为中京。蒲鲜万奴收散兵奔东京。八年，留哥攻破东京，驱逐万奴，朝成吉思汗于行在（当时成吉思汗驻跸桓州）。留哥部属耶厮不等不愿降蒙，趁留哥入朝之际，举众叛去。九年初，自立于澄州（今辽宁海城）。不久，为部下所杀，残部九万余人退入高丽。留哥暂居临潢。辽东为万奴所据。

万奴讨留哥败绩，受到金廷谴责，遂趁金无暇东顾之机，于元太祖十年反金自立，割据东京、咸平，建国大真（史称东夏）。次年，木华黎再入辽东，万奴降蒙，不久叛去，东徙曷懒路（吉林东部和朝鲜北部一带），又攻占上京路诸多州县。金上京行省官太平执元帅承充，夺其军，附万奴。万奴乃成为辽东一大势力。木华黎此时正致力于中原征战，无暇顾及辽东，所下州县放弃后又为金有，对万奴所为也暂取容忍态度，以利用他牵制金军。这年，蒙古将领哈真、扎剌与耶律留哥率军会同万奴入高丽境，追剿逃亡的契丹军残众，由耶律留哥带回临潢。万奴占据辽东东部和上京、速频等路地方达十二年之久。辽东南部则由金行省控制。

元太宗元年，窝阔台遣撒里塔、吾也而、王荣祖等率军征辽东，下盖州（今辽宁盖县）、宣平（今辽宁岫岩）、石城等，

占据辽东南部。五年，由皇子贵由、木华黎孙塔思等东征，万奴平。东京、上京诸路悉入蒙古。

注 释

①《元史·太祖纪》。

②《元朝秘史》续一。

③④《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⑤⑥《元史·木华黎传》。

⑦《元史·太祖纪》。

⑧⑨《金史·移剌蒲阿传》。

定宗之立

太宗窝阔台生前，曾指定三子阔出（又作曲出）为继承人。但1236年，阔出死于征宋军中。阔出长子失烈门年幼聪慧，为窝阔台所钟爱，加之对其父的感情与怀念，窝阔台将失烈门养于宫中，准备让他做大汗的继承人。

1241年十一月，窝阔台死于“欢饮极夜”之际，长子贵由尚在西征返回的途中，皇孙失烈门尚幼，皇后之一的乃马真氏脱列哥那按照蒙古人素有的传统主持了朝政。窝阔台长后无子，且在窝阔台死后不久便离开人世。脱列哥那是他五个年长儿子的生母，又是个权欲极强、惯耍权术的人。一旦大权在握，她就开始改变窝阔台生前的安排，废黜失列门，另立新汗。在诸子中，她属意于长子贵由。因此，她一面向各宗王派遣使者，报告窝阔台的死讯，一面筹备新的忽里勒台，为贵由即位做必要的准备。而在忽里勒台召开之前，她在察合台和一些王公的支持下取得了摄行政事的全权。

窝阔台死后，推举新汗的忽里勒台没有及时召开。原因之一是贵由西征未回，脱列哥那大权在握；其二是西征期间，拔

都与贵由间曾发生纠纷，感情不合①。当脱列哥那遣使商议召开忽里勒台时，拔都已得知宗亲贵族的选汗倾向。他不愿拥戴贵由，故借口有病，拒绝出席大会。作为宗族近属中的长者，拔都的态度是有一定影响的，他的缺席使忽里勒台迟迟无法召开，汗位虚悬达四年之久。这期间，国事皆决于脱列哥那。脱列哥那宠信来自呼罗珊（今伊朗霍腊散省）的女俘虏法迪玛（又作法提玛）和商人奥都剌合蛮，在他们的排斥、打击下，窝阔台时期的老臣镇海、牙剌瓦赤被迫逃到窝阔台次子阔端处，受到后者的保护；契丹人耶律楚材则因国事日非，己志不得行，"愤悒而死"；河中地区的长官马思忽惕伯则投靠了拔都；宗王们也各行其是，趁机向各方签发旨令和牌符，发号施令。

汗位的空缺，局势的混乱，使有势力的宗王再次萌生觊觎之心。成吉思汗的幼弟斡惕赤斤想趁此时机以武力夺取汗位。1243年，斡惕赤斤率军西向，引起了脱列哥那的恐慌，她一面派出急使与斡惕赤斤交涉，一面选将备兵，甚至想西迁以避兵锋。斡惕赤斤听到贵由已回到叶密立（又作也迷里，今新疆额敏）的消息，对自己的行动也很懊悔，遂返回了自己的营地。

斡惕赤斤称兵和林一事，加重了汗位虚悬引起的危机，贵由抵达汗庭后，脱列哥那不待宗王集会，便同她身边的大臣们做出了推举贵由为汗的决定。1246年春，他们向各方派出急使，请诸王和大臣们前来参加忽里勒台。东道和西道诸王以及大臣们相继起程前来。最先到达的是拖雷的长妻唆鲁禾帖尼（又作唆儿忽黑塔尼、唆鲁和帖尼，即庄圣皇后）及其诸子。拔都因对贵由不满，借口身体不好和脚病，没有赴会。代表术

赤系参加大会的是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别儿哥彻儿、唐兀惕和秃花帖木儿；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拜答儿，孙子不里、哈剌旭烈兀、也孙脱花（又作也孙都哇、也孙不花）等也从各自的封地前来。窝阔台的儿子阔端及其诸子、斡惕赤斤及其诸子、按只吉带及其它东道诸王也相继到来。同时还有各地区的长官和贵族。甚至还有来自欧洲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派遣的使者普兰·加尔宾及其使团，他们虽不是与会的成员，却有幸目睹了贵由即位典礼的盛况，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得自旁观者的记录。

虽然脱列哥那运用她的权力和手段，广施馈赠和小恩小惠，拉拢和争取到了一些支持者，但忽里勒台推举大汗的程序还是不能废弃的。经过讨论，宗王们一致同意由窝阔台的一个儿子来接管治理国家的权力。窝阔台次子阔端表示了继承的愿望，理由是他的祖父一度曾提到过他；另有一些人则支持失烈门，认为他成年后会是一个治理国家的适当人选。讨论中，人们认为阔端身体不好，失烈门尚未成年，而贵由是长子，有处理祸福危难的经验，又素以英武、严峻、刚毅和善驭下属知名，是个合适的人选，其母脱列哥那也属意于他，唆鲁禾帖尼及多数大臣也同意这一选择。贵由本人则照例以各种理由和借口推脱一番，然后就正式做出决定。

贵由的即位典礼于1246年8月24日在月儿怯灭土（哈喇和林西）举行。这次大会盛况空前，参加典礼的长官和呈送贡品的使臣就有四千多人。为他们准备的帐幕有二千多座，大帐周围已无可停驻之地，广阔的原野也变得狭窄了，人的食物和饮料供应都很紧张，马匹的饮料更为缺乏。但典礼仍进行得有条不紊。人们照例摘掉帽子，放松腰带，举行萨满教仪式，然

后由斡儿答和也速蒙哥分别拉着贵由的手，把他扶上汗位。接着是敬酒，跪拜大汗和出门拜日。最后就是连续数日的宴饮和庆祝，并把各方呈来的贡品和礼物、府库的金银珠宝等赏赐给诸王和大臣。主持赏赐的是唆鲁禾帖尼，她以自己的才智、持重和无可责难的言行在这次忽里勒台上享有最大的威望。

庆祝活动结束后，开始处理政务。首先是审理斡惕赤斤兵进和林之事。因为它事关重大，不能由异姓审理，贵由把这一案件交给了斡儿答和蒙哥。他们查清问题后，按照札撒处死了斡惕赤斤。

不久，察合台去世。按照成吉思汗的意图和察合台的安排应由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又作抹土干、蔑惕干、木阿秃干）的儿子哈剌旭烈兀接管封地治理权。也速蒙哥也无异议。但做为蒙古大汗，贵由对此进行了干预。因为他与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关系友好亲密，于是便以"有子怎能让孙子当继承人"为理由，剥夺了哈剌旭烈兀的继承权，让也速蒙哥做了察合台封地的最高领主。

窝阔台死后，脱列哥那执政期间，"诸王各自为政，贵人们分别依附他们当中的一个；因此他们在国土上宣写敕令，散发牌子"②。贵由下令对这一违反札撒的行为进行整顿，收回了他们所发出的牌子和旨令，放在他们面前。只有唆鲁禾帖尼和她的儿子们可以感到满意和自豪，因为他们任何人都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反札撒的事。大汗贵由表扬了他们，把他们当做应该学习的榜样。同时他又确认："一如合罕（指窝阔台）即位时维护其父之札撒，不许丝毫改动其律文，因此同样地，己父之札撒和律文也不应任意损益增删。"③并降旨说："凡盖有合罕玺印的诏书，不必向他奏告就可签署通过。"④

脱列哥那的宠臣法迪玛依仗摄政皇后的威势，姿意妄为，陷害大臣，激起了宗王、贵族 、大臣的普遍不满。贵由即位后，重新起用老臣镇海、牙剌瓦赤等，处死了脱列哥那派往汉地的奥都剌合蛮。同时，由于有人告发法迪玛蛊害阔端，致使他病势愈发沉重；阔端也遣使汗庭，要求一旦他遭到不测，请大汗为他报仇。不久，传来了阔端的死讯。在镇海的协助下，贵由决定处死法迪玛。脱列哥那极力保护，贵由的态度也十分坚决。最后，法迪玛被以严酷的刑罚处死。

朝中的事务安排就绪后，他分别向汉地、伊朗、河中（中亚以撒马尔罕为中心的阿姆河、锡尔河中间的地区）等处派出将领和军队，也派出治理汉地的长官。

第二年（1247），贵由借口叶密立气候对他的健康有利，从漠北起程，带领人马浩浩荡荡地西进。人们猜测，这是因为拔都拒绝拥戴他，他心怀不满，西进的目的是讨伐拔都。唆鲁禾帖尼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向拔都处派出急使，提醒他早做准备。于是拔都也整军，东进相迎。1248 年春，贵由行至距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一周之程的横相乙儿之地，病逝。

史载贵由凶悍、残暴，拒听臣下建议；崇奉基督教，压抑穆斯林；而在挥霍和滥赏方面又超过了他的父亲。他虽然处死了脱列哥那的宠臣和妄图夺取汗位的逆臣，却未能从根本上改变脱列哥那执政时期造成的混 乱局面。加之他的即位，引起了阔端、失烈门的不满；擅自改变察合台关于继承人的安排，导致了哈喇旭烈兀与也速蒙哥的矛盾；甚至其它左翼诸王也心生疑忌；西征拔都，使术赤、窝阔台两系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切都加剧了黄金家族内部的矛盾与分裂，也预示着蒙古国汗

位继承将呈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出现更加尖锐激烈的斗争。

注　释

①拔都是长子，西征军的统帅。在西征期间的一次诸王宴会上，他在宴会正式开始之前先饮了几杯酒，引起了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的不满。他们在说了拔都很多坏话后离席而去。事后，拔都遣使将此事告至窝阔台处，窝阔台斥责了贵由，由此二人有隙。

②③《世界征服者史》上册《贵由登上汗位》。

④《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第二部分《记贵由登临汗位》。

元

庄圣教子

成吉思汗幼子拖雷虽不曾为大汗，但他的两个儿子蒙哥和忽必烈却得以先后继承汗位，成为大蒙古国的第四、第五任大汗，忽必烈更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元朝，最后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世祖至元三年（1266），追尊其父为景襄皇帝，母为庄圣皇后。

庄圣皇后怯烈（克烈）氏，名唆鲁和帖尼，是克烈部首领王罕的侄女，其父为王罕之弟札阿绀孛。她是一位聪明能干、明礼守法、倍受尊敬的蒙古贵族女性。1232 年，拖雷死时，长子蒙哥二十四岁，次子忽必烈十七岁，唆鲁和帖尼接管了拖雷封地事务，她并未因拖雷之死表示出任何对大汗窝阔台的不满①，也没有向窝阔台提出过任何非分的要求。相反，她谨守家业，以成吉思汗的札撒和必里克教育诸子，要求他们“懂得德行和礼貌”，不得作出任何违背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事情。要他们的妻子和睦相处，不允许他们之间为任何事发生争吵。她努力维持同各方面的友好关系，她虽然是基督教徒，却十分关心伊斯兰事务，给伊斯兰教上层以大量的施舍和慷慨捐赠。

捐钱修建伊斯兰学校，并向他们提供经费，资助教师和学生。还不时发放一些物品，以救助贫困的穆斯林。她的聪明才智、广施恩惠使她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赞誉，窝阔台对她也十分尊重和格外垂爱。因此，她也才得以像当年的诃额伦一样，保护了拖雷的子孙和他遗留下来并继续由她统领的官员和军队。维护了拖雷家族与孛尔只斤家族各成员的良好关系，为蒙哥的即位作了必要的准备。

拖雷死后，窝阔台曾下诏，遣使令唆鲁和帖尼嫁给他的长子贵由，唆鲁和帖尼客气地拒绝了。她虽认为诏命是不能违背的，但同时也申述了自己的理由，她说："我有一个愿望：要抚养这些孩子，把他们带到成年和自立之时，竭力使他们受到良好的教养，彼此不分开，相互不离弃，从他们的同心同德中得到好处。"②由于她表示了这样的意愿，贵由也没有坚持，于是她得以继续掌握拖雷封地及其属民，与他的儿孙们一起，直至把他的长子蒙哥送上皇帝的宝座。

在汗位继承上，拖雷系与窝阔台系成员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③。作为拖雷兀鲁思的主人，如何处理好与大汗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拖雷死后不久，窝阔台便将原属拖雷的速勒都思部落两个千户拨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此事引起了拖雷兀鲁思诸万户、千户的不满，他们为此要同大汗理论一番。为了不激化矛盾，唆鲁和帖尼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她阻止了手下万户、千户的对抗行为。她说："你们的话是公正的。但是，我们所继承的和自己取得的财产之中并无不足，什么也不缺；军队和我们，同样全都是合罕的，他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要服从他的命令。"④这样，不但避免了与窝阔台的直接冲突，以小的牺牲换取了拖雷兀鲁思及其子孙的安全，而且使拖雷系成员与窝

阔台系的阔端家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减少了日后蒙哥即位的阻力。

在窝阔台和贵由在位期间，唆鲁和帖尼约束属下长官和自己的儿孙们严守法度，使他们的行为达到无可指责的地步。贵由即位后，整顿汗位虚悬期间造成的混乱秩序，惩罚了一些乘机违反法度的宗王、贵族。很多人因擅自发放牌符和令旨受到责难，而拖雷家族成员中却绝无这类事件发生，他们为诸王、贵族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成为执行札撒的模范，受到大汗贵由的赞扬。同样，由于在成吉思汗继承人的人选上，术赤与察合台严重对立，而察合台力主选择窝阔台，形成了察合台系与窝阔台系的亲密关系，造成了术赤系与窝阔台系间的隔阂。贵由与拔都的矛盾又加深了这一裂痕。因此，术赤后王与窝阔台后王严重不和，而同拖雷系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使之成为黄金家族权力斗争的同盟者。也由于他们是严格遵守成吉思汗以来的法度、命令和规矩的典范。因此，尽管拖雷已死，诸子尚无卓著的功绩，但拖雷家族在宗族中仍享有崇高的威望和不容忽视的影响。

贵由即位后，不但没有设法缓和与拔都的矛盾，反而凭借大汗的权势，想以武力征服拔都。元定宗二年（1247），贵由以健康原因为借口，突然西巡。唆鲁和帖尼认为贵由的西巡，“并非别无用意”。⑤她便暗中派遣急使，向拔都通报了贵由的行动，提醒拔都作好准备。这一举动，无疑将进一步加强术赤与拖雷两系的亲密关系，而且加剧了术赤与窝阔台两系的仇恨。

于是，贵由死后，拔都一改当初议立贵由时的态度（当时他以身体不好和脚病为借口，不参加忽里勒台），以宗亲长者

的身份，“接二连三地向各方派出急使，邀请同族和宗亲们，要全体宗王们前来举行忽里勒台‘拥立一个能干的、我们认为合适的人登临大位’”⑥。

以往的隔阂与矛盾使察合台、窝阔台的后裔们对拔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只派出代表前往拔都处。但代表们对拔都作出了不违背他的决定的保证，这就使拔都不但因为年长，同时也因为有宗亲诸王的认可，取得了在大汗位推举问题上超出诸王的权限。唆鲁和帖尼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命令她的长子蒙哥前往拔都处，从而不但维护了拔都的权威，取得了他的好感，而且使他亲眼看到了蒙哥的品德和才干，促使他做出推举蒙哥的决定。从决定做出，到蒙哥即位庆典的召开，拖延达两年之久，这期间向宗王发出邀请，分送礼物，表达亲近友好等一切活动，都有唆鲁和帖尼参与和策划。在拔都和唆鲁和帖尼、蒙哥的共同努力下，1251 年，蒙哥终于作了蒙古国的大汗。拖雷所不曾实现的愿望由唆鲁和帖尼辅佐他们的儿子实现了。

注　释

①《元朝秘史》载，窝阔台驻军龙虎台，忽然得病，昏愦失音。萨满占卜说是“金国山川之神，为军马掳掠人民，毁坏城郭，以此为祟。许以人民财宝等物禳之，卜之不从。其病愈重，惟以亲人代之则可”。窝阔台问：“如今我跟前有谁？”当时只有拖雷在场，拖雷说：“洪福的父亲将咱兄弟内选著，教你做了皇帝，令我在哥哥跟前行，忘了的提说，睡着时唤省。如今若失了皇帝哥哥呵，我谁行提说著，唤省着？多达达百姓教谁管著？且快金人之意。如今我代哥哥，有的罪业，都是我造来，我又生得好，可以事神。”于是，萨满用念过咒语的水给窝阔台洗了病，让拖雷喝了。窝阔台病愈，拖雷死了。《史集》、《元史》也有

类似的记载。

②《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传》。

③按照蒙古人幼子守产的旧俗和拖雷的功绩，他是有资格继承汗位的。但根据成吉思汗生前的安排和当时诸宗王、贵族、大臣忽里勒台的决定，他放弃了争夺汗位的打算。窝阔台即位虽然没有像贵由、蒙哥即位时那样发生激烈的冲突与对立，但两系间的矛盾却已经形成。关于拖雷之死，文献记载虽称是出自拖雷的意愿，但史家并不排除这是窝阔台清除自己的政敌和对手的行动，是黄金家族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

④⑤《史集》第二卷《窝阔台合罕的儿子贵由汗纪》。

⑥《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宪宗之立

1248年春，贵由死于西征途中，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回到贵由的封地叶密立，向各方派出使臣通报贵由的死讯。拔都遂停止东进，驻兵于东距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境内）一周之程的阿剌豁马黑（《元史·宪宗纪》作阿剌脱忽剌）之地。他向斡兀立海迷失派遣使者，一方面安慰她，一方面要求她遵从惯例，与其大臣们共同接管朝政，处理国家庶务。唆鲁和帖尼也派出了劝慰和哀悼的信使，并按习惯做法给她一些衣服和一顶顾姑①。接着，拔都以宗室近支长者的身份向诸王派出急使，请他们到自己的驻地聚会，商讨大汗继承事宜。

围绕着大汗继承权的争夺，成吉思汗的黄金家族中早已出现了尖锐的矛盾和深深的裂痕。而嫡长子继承的制度没有确立，幼子守产的旧俗正在被冲破，选贤任能的原则难以持续长久地推行，先汗的遗命也未被严格遵守。总之，此时的大蒙古国尚没有一项确定无疑的，为宗室贵族、群臣一致认可的统一的选汗标准和原则。这只能意味着围绕汗位继承的斗争将愈演愈烈。

术赤的后裔已驻牧于钦察草原和斡罗斯等地，拔都已顺利地接管了术赤的权力，对其封地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他们的封地距蒙古国统治中心较远，分离倾向较强；加上早已存在的与察合台、窝阔台系的隔阂与怨恨，使他们意识到大汗的宝座同他们的距离已越来越远，因此已无意于争夺汗位。但他们享有推举大汗的权力，他们就不能不利用这一权力在汗位继承上贯彻自己的意图，施加自己的影响。长期以来，拖雷家族与拔都就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唆鲁和帖尼又不断表现出对拔都的关切，术赤家族倾向于拖雷家族就是很自然的了。窝阔台次子阔端同拖雷家族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反，阔端与贵由争夺汗位未能如愿，在他们的后裔中便不能不心生芥蒂，窝阔台家族内部也由此出现了裂痕。

贵由即位后，偏袒察合台之子也速蒙哥，夺去了哈剌旭烈兀对察合台封地的统治权，也造成了察合台家族的分裂。

拖雷的遗孀唆鲁和帖尼却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教子有方，维系了本家族的团结，赢得了各宗王的好感，争取到了属下将领、官员和属民的支持与爱戴。拖雷死后，唆鲁和帖尼掌管拖雷封地的事务和军队，她建立了严格的制度和核算措施，不允许属下有任何违反札撒和传统的行为；她不允许属下官员对属民非法征敛，从不趁汗位虚悬之机发放牌符和旨令，却能依靠继承的封地、财产、军队广施恩惠，收买人心；她信奉基督教，却能优礼和照拂伊斯兰教徒，因而她和她的儿子们能得到比较广泛的支持和同情。当面临又一次汗位争夺时，她的家族就具有了一定的优势。

拔都发出邀请后，唆鲁和帖尼遣长子蒙哥率诸弟阿里不哥、岁哥都（唆亦哥秃）、木哥（末哥、穆哥）等前往。失烈

们和窝阔台的后妃们也从哈剌和林派出了自己的代表。贵由儿子们因驻地距拔都营地较近，便抢在诸王之前去会见拔都，但他们只停留一两天，就借口萨满预言不宜久留，不等人员齐集、大会召开，只留下帖木儿那颜为代表，便返回了自己的封地。1249 年 4 月，蒙哥兄弟和东道诸王塔察儿（斡惕赤斤孙）、术赤系诸王和察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等，大将兀良哈台、速你带、也速不花等相继到达，于是开始就汗位继承问题进行协商。

会上，宗王及宗王代表间就汗位谁属问题争论激烈。拔都等术赤系诸王和拖雷系诸王属意蒙哥；斡兀立海迷失、失烈门和察忽、脑忽的代表们主张从窝阔台的子孙中选择，却不能举出一个一致同意的人选，于是经过几天争吵，达成了一个初步协议：因为拔都是全体宗王们的长者，他的命令是大家务必遵行的，他所赞同的，宗王们无论如何也不违反②。这样就把大汗继承人的提名权交给了拔都。

由于拔都与拖雷家族一直存在着良好的、亲密的关系，也由于蒙哥本人参加过数次征战，并曾在长子西征中取得过活捉钦察部一个首领八赤蛮的辉煌战绩，特别是这次参加忽里勒台，拔都第二次目睹了他的成熟和才干，于是在继续举行的讨论中，拔都首建推举蒙哥之议。这一提议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术赤、拖雷两系宗王的支持，也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窝阔台系诸王、后妃代表的反对。额勒只带（又作宴只吉歹、按只，他可能是失烈门和窝阔台的其它后妃自哈剌和林派去的代表）举出当年与窝阔台立下的誓言来反对拔都，他说：“你们曾全体一致决议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是从窝阔台汗诸子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包上草，牛不会去吃那草，如果将它

涂上油脂，狗不会瞧一眼那油脂，我们仍然要接受他为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宝座。为什么你们另搞一套呢?”③定宗皇后海迷失的使者也说：“昔日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意欲他属，将置之何地也?”④蒙哥之弟木哥和他的随从札剌亦儿部人忙哥撒儿以脱列哥那破坏太宗遗命予以驳斥，木哥说：“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即脱列哥那）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也?”⑤忙哥撒儿则指责八剌说：“汝言诚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时，汝何不言也?八都罕（即拔都）固亦遵先帝遗言也。有异议者，吾请斩之。”⑥兀良哈台也说：“蒙哥聪明睿知，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⑦于是大家宣誓效忠，共立蒙哥为汗，决定明年(1250)举行即位典礼。

唆鲁和帖尼开始向诸王派遣使者，分送礼物，邀请他们参加忽里勒台。窝阔台和贵由家族的一部分宗王、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孙子不里拒绝参加典礼，不接受大会决议，他们多次遣使至拔都处，要求在窝阔台的后裔中推举大汗继承人。拔都认为决议是在宗王们同意的情况下通过的，如果擅自更改，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况且主持一个如此广大的国家，不是孩子们的能力所及的事；而立蒙哥为汗，也是充分考虑了窝阔台子孙的利益的。因此，坚持已经做出的决议。在这样的交涉和争吵中，一年过去了。到了年底，蒙哥等再次向各方派出使者，邀请他们到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地区。他们派失烈门必阇赤至斡兀立海迷失和忽察、脑忽处、派阿兰答儿必阇赤至也速蒙哥处，要求他们同心协力，团结一致，与大家一起共同安排国事。脑忽、也速蒙哥等不得已，只好起程赴会，但他

们有意拖延，以推迟和破坏由拔都、蒙哥主持的这次忽里勒台。

1251年6月，术赤后裔别儿哥、不花帖木儿（《元史·宪宗纪》作脱哈帖木儿），东道诸王拙赤合撒儿的儿子也苦、脱忽、也松格，合赤温的儿子按只吉歹（《元史·宪宗纪》作按只带），斡惕赤斤的孙子塔察儿，成吉思汗的异母弟别勒古台及其诸子，察合台的孙子哈剌旭烈兀等相继到达，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和窝阔台的后裔却迟迟不到。别儿哥请求拔都，拔都派人回答说："你拥立他登上宝位吧，那些背弃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⑧于是，由别儿哥主持，上述诸王、将领和拖雷系诸王一起举行了蒙哥的即位典礼，使他正式取得了大蒙古国第四任大汗的合法身份。

仪式之后，是照例的宴饮庆贺。这时，窝阔台的儿子合丹、灭里，孙子蒙哥都（阔端子）相继赶到，并向蒙哥"行贺礼，执臣节"⑨。由于他们的到来，大会决定继续等候迟到诸王，延期结束。但窝阔台的子孙们却正在策划大蒙古国建立以来的第一次武装夺权活动。

失烈门（阔出子）、脑忽（贵由子），忽秃黑（窝阔台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结盟，以参加庆典为名，赶着无数载满武器的大车，用宴饮的食物做伪装，浩浩荡荡向蒙哥的大帐进发。这时，蒙哥的鹰夫康里人克薛杰丢失了一头骆驼，在寻找骆驼的途中，他遇到了失烈门和脑忽的马群，应一个看车儿童的请求，他帮助修理一辆损坏了的大车，无意中发现了车中装载的武器。他设法了解了实情，并乘人不备，驰向蒙哥大帐，报告了所知的一切。于是蒙哥派遣其弟旭烈兀和老将忙哥撒儿领兵相迎，调查事情的真象，并采取行动制止他们的阴谋。失烈门

等否认有谋逆行为，他们被送到了蒙哥处。蒙哥又派遣不怜吉歹领十万兵驻守哈剌和林至别失八里一线的科布多、杭爱山一带，以防察合台儿子也速蒙哥（《元史·宪宗纪》作也速忙哥）、孙子不里和贵由的儿子忽察。

庆典结束后，蒙哥亲自审问谋逆的宗王，命忙哥撒儿审讯策划和参与这次谋逆活动的大臣。宗王失烈门、也速蒙哥、不里（又作孛里）、忽察（又作火者、和只）、脑忽（又作纳忽）、也孙都哇（又作也孙脱、也孙脱阿）等分别被禁锢和贬谪；贵由后斡兀立海迷失和失烈门母合答失赤被处死，大臣合答曲怜、按只吉歹等七十七人被杀。

当由蒙哥即位引起的黄金家族间的斗争平息后，蒙哥开始处理国事。他派皇弟忽必烈南征大理，委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政事宜；以牙剌瓦赤、布智儿、赛典赤赡思丁等任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委另一弟旭烈兀征西域素丹（又作算端、唆里坛，即苏丹）诸国，这是蒙古的第三次大规模西征。以纳怀、塔剌海、麻速忽等任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以阿儿浑任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事；下令籍汉地、斡罗斯、西藏等地户口；追收贵由死后诸王滥发的牌符、令旨；限制诸王乘驿所用马匹数量和索取超过规定的供应物品；规定了各地税额，并禁止官员、吏员循私偏袒和收受贿赂。宪宗七年（1257），蒙哥以幼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亲率大军征伐南宋。宪宗九年（1259）七月，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山军中，在位九年。

注 释

①顾姑，蒙古已婚妇女的一种头饰（帽子）。参见本卷“黄金家族的兴起”注释㉓。

②《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③《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二编《札剌亦儿部落》。

④⑤《元史·宪宗纪》。

⑥《元史·忙哥撒儿传》。

⑦《元史·宪宗纪》。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

⑨《世界征服者史》下册，第三部分《七大州君主、贤明的皇帝蒙哥可汗登上汗国的宝座，他打开奴失儿汪的地毯，兴复帝室的功业，制定君王的法规》。

元

忽必烈开府金莲川

忽必烈是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的次子，元宪宗蒙哥的同母弟。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一年（1216）生。他同其他蒙古儿童一样，自幼生长于鞍马间。1224年，成吉思汗回军途中，他与弟旭烈兀首次出猎，并分别射死一只兔子和一只山羊，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他按照蒙古人的习惯，亲自为他们拭指①。1232年，其父拖雷死，他与诸兄弟在母亲的培养下长大。拖雷是成吉思汗长后所生的幼子，并且死得蹊跷，而唆鲁和帖尼又能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女，模范地遵守着成吉思汗的札撒，因而他的家族在宗亲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赢得了较多的同情。

太宗窝阔台分封汉地时，拖雷家族得到了真定府，于是这个家族同真定府便建立了密切的联系。1242年（元太宗皇后乃马真氏执政元年），燕京著名的禅学大师海云和尚被召至拖雷兀鲁思，携僧子聪（世祖朝的太保刘秉忠）同行。海云与子聪虽号僧人，实则皆精通儒学。子聪“於书无所不读，尤邃於《易》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无不精通。论天下事如指诸掌”②。忽必烈向海云问

佛法大要，后者对以“宜稽古审得失，举贤措枉，以尊主庇民为务。佛法之要，孰大于此”？这分明是借谈佛法之机，向帝

以汉法治理国家的意图，他对王鹗说："我虽未能尽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耶！"⑦

元定宗贵由二年（1247），冀宁交城人张德辉、顺德沙河人张文谦、通州潞县人李德辉又分别被召。这时，忽必烈的问题就提得更为具体、更为深入和更有针对性了，重点集中在"延访圣贤道德之奥，修身治国之方，古今治乱之由"。他问张德辉："孔子没已久，今其性安在？""或云辽以释亡，金以儒亡，有诸？""祖宗法度具在，而未设施者甚多，将若之何？""农家劳作，何衣食之不赡？""孔子庙食之礼何居？""今之典兵与宰民者为害孰甚？"并询问解决办法。张德辉对答则"详明切直，多所开悟"⑧。于是奉旨兴学，会生徒，行祀礼，重振文风。行前，又陈敦孝友、择人才、察下情、贵兼听、亲君子、信赏罚、节财用等先务七事。

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⑨。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璠、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⑩。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帝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

"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①。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璠。璠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

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断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实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⑫。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戌选女真进士赵良弼⑬于赵州。

壬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⑭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答剌罕向王府申诉⑮，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

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为燕京行省断事官，与不只儿等管理汉地财赋。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⑯。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外所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在西起邓州，东到陈、亳之间，列障戍守。“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严惩贪官，整肃吏治。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入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其年夏，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刘秉忠、姚枢从行，枢以宋太祖时大将曹彬取南唐不妄杀人为谏。第二天，忽必烈对他说：“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第二年，师至大理城，姚枢裂帛为旗，书止杀之令，未曾妄杀一人，由此民得相完保。刘、姚劝谏之功不可没。大理既下，留大将兀良哈台戍守，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白蛮大姓段氏共同安辑。

癸丑（宪宗三年，1253），蒙哥大封同姓，允许忽必烈在河南汴京与陕西京兆间自择其一。他接受姚枢的建议，选择关中⑰。针对诸将在京兆大治府第，以豪华相尚的现象，忽必烈分遣诸将戍守兴元诸州。同时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

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又立京兆宣抚司，先后以李兰、杨惟中、廉希宪为使，“京兆诸郡臂指陇蜀，诸王贵藩环拥周布，户杂羌戎，尤号难治”。他们“摧摘奸强，扶植贫弱”⑱，严惩残暴扰民者，关陇大治。立交钞提举司，印钞以佐军用。又以姚枢为劝农使，督劝农桑，许衡为提学使，兴办教育。

丙辰（宪宗六年，1256），忽必烈将改变在桓、抚间设帐而居的状况，命刘秉忠相地筑城。秉忠选择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与贾居贞等共同经营，三年告成，定名开平。开平介于游牧草地与汉地农业区之间，既便于同蒙古大汗所居的和林联系，也便于控制中原，是沟通、联系南北的理想之地。

开平的兴建，是忽必烈用儒臣治理汉地初见成效和信心增强的结果。儒臣们牛刀小试，就使邢州、河南、陕西的面貌改观，这本是蒙古国加强对汉地统治和治理的大好时机。正当忽必烈准备起用儒臣大展宏图之际，却遭到了来自蒙古贵族内部保守势力的干扰和阻挠。

宪宗蒙哥虽有志于继承和发展父祖的事业，但在靠军事征伐取得东至高丽，西达西亚、东欧的广阔地区后，他没有准确地把握时机，适时地由军事征伐转向政治治理，却一味坚持“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他即位后所发布的命令都是些针对一般性问题采取的治标办法，没有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深入了解各地区现状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而对蒙古贵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及由此引起的各兀鲁思的独立倾向认识不足，没有相应的对策。依然希望以大汗的身份坐镇漠北，控制四方。在用人行政上，他所奉行的依然是窝阔台时期的权宜措施。

忽必烈势力的发展，声望的提高，对蒙哥不无威胁；他依靠儒臣推行的汉法使习惯于任意勒索的蒙古、色目贵族受到了限制，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于是，忽必烈遭到了企图保持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宗亲和掌握汉地财赋大权的官员的反对。他们向大汗告发忽必烈，罪状是“王府得中土心”，“王府诸臣多擅权为奸利事”。

丁巳（宪宗七年，1257），蒙哥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当蒙哥亲征南宋时，令塔察儿（斡惕赤斤之孙）领左翼军，而以有“脚病”为名，不令忽必烈领兵出征。

同时，遣亲信阿兰答儿为行省丞相，刘太平为参知政事，率囊家台、脱因等到陕西、河南检核财赋。他们在关中设钩考局，用一百四十二项条款对河南经略司、陕西宣抚司大小官吏进行考校审查，声称除史天泽、刘黑马⑲外，其余诸人皆可不向大汗报告，不经批准直接由钩考局定罪处治。他们“钩校考索，不遗余力，又取诸路酷吏分领其事，大开告讦，虐焰汹汹”，“恣为威酷，盛暑械人炽日中，顷刻即死”。仅陕西宣抚司死于威刑者就达二十余人㉑。

此次狱讼是蒙古统治集团在治理汉地上两种不同政见矛盾冲突的结果。所谓“王府得中土心”正是以汉法治汉地的结果；而“诸臣为奸利事”则是汉地诸臣选择忽必烈为实现其政治抱负，甘心为其效劳的反映，他们在管理财赋中，为王府谋利侵犯大汗利益的现象是存在的，他们把本属大汗的钱物送入王府，以增强王府的经济实力。阿兰答儿等人广为罗织，目的则是打击忽必烈的政治势力，破坏他的改革计划。如何保存实力，渡过这场危机，是忽必烈面临的最大难题。作为藩王，忽必烈是无力与蒙哥对抗的，汉地儒臣一方面承受着大狱的压

力，一方面设法缓和矛盾，结束危机。

面临残酷的迫害，史天泽、廉希宪、赵璧等挺身而出，身任其咎。以避免更多的牺牲；姚枢则建议忽必烈晋见蒙哥，以解除他的疑虑。他说：“帝，君也，兄也；大王为皇弟，臣也。事难与校，远将受祸。莫若尽王府妃主自归朝廷，为久居谋，疑将自释。”[21]这是个大胆的有风险的办法，忽必烈采纳了。兄弟相见之际，疑团自释，蒙哥下令罢钩考局。此时，正值塔察儿东路军失利返回，于是忽必烈自请率军南征，得到准许。

戊午（宪宗八年，1258）十一月，忽必烈自开平起行，第二年二月，抵邢州。以杨惟忠为江淮荆襄湖南北等路宣抚使，郝经为副从行。五月，于军中征东平宋子贞、李昶，访问得失。子贞对以“本朝威武有余，仁德未洽。所以拒命者，特畏死尔，若投降者不杀，胁从者勿治，则宋之郡邑可传檄而定也”[22]。昶上疏：“论治国，则以用贤、立法、赏罚、君道、务本、清源为对；论用兵，则以伐罪、救民、不嗜杀为对”[23]。忽必烈都表示接受。当忽必烈进至鄂州时，已得到蒙哥死于四川合川的消息。郝经遂上《班师议》，指出：“宋人方惧大敌，自救之师虽则毕集，未暇谋我。第吾国内空虚，塔察国王与李行省（李璮）肱髀相依，在于背胁；西域诸胡窥觇关陇，隔绝旭烈大王；病民诸奸各持两端，观望所立，莫不觊觎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启戎心，先人举事，腹背受敌，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都，按图籍，号令诸道，行皇帝事矣。虽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独不见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决，称受遗诏，便正位号，下诏中原，行赦江上，欲归得乎？”[24]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与南宋缔结密约，于己未（1259）年

底返回。

注 释

①拭指为蒙古人的一种风俗，在小孩第一次出去打猎时，将肉或油脂抹在他们的大拇指上，预示成功。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成吉思汗记》(六)。

②《元史·刘秉忠传》；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中华书局影印元刊本。

③程钜夫《雪楼集》卷六《海云简和尚塔碑》。

④《元史·赵璧传》、《西岩集》卷一九《赵璧神道碑铭》。

⑤⑥《元史·王鹗传》，《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⑦《元史·世祖纪》。

⑧⑨《元朝名臣事略》卷一〇《宣慰使张公》。

⑩《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

⑪《元史·姚枢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⑫《元文类》卷一〇《尚书刘文献公》。

⑬元太宗时，用耶律楚材言，于中原以科举取士，戊戌年(1238)，命刘中等以词赋、经义、论三科取士，得四千多人，称戊戌选。

⑭《元史·姚枢传》，《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⑮两答剌罕即八答(巴歹)和启昔礼(乞失力黑)。答剌罕为勋臣封号，授与对成吉思汗本人及其家人有恩者。享有九次犯罪不罚、免除赋税、自由选择牧地、俘获与猎获物归己以及可随时入见大汗等特权。

⑯《元史·史天泽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公》。

⑰姚枢认为："南京河徙无常，土薄水浅，泻卤生之，不若关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陆海。"

⑱《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⑲史天泽父史秉直、刘黑马父刘伯林皆在太祖时降蒙。天泽、黑马太宗时已为万户，分别参与灭金、西征，握有兵权。

⑳关于钩考陕西、河南钱谷事，并参见《元朝名臣事略》所载《内翰窦文正公》、《平章廉文正公》、《丞相史忠武公》、《左丞姚文献公》、《枢密赵文正公》及《牧庵集》所载《谭澄神道碑》、《姚枢神道碑》等。

㉑《元史·姚枢传》。

㉒《元史·宋子贞传》。

㉓《元史·李昶传》。

㉔郝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元史·郝经传》。

钦察汗国的兴亡

1207年，成吉思汗分封亲族时，把也儿的石河和阿勒台山一带的一切地区和兀鲁思以及四周的冬、夏游牧地都赐给了长子术赤，“并颁赐了一道务必遵命奉行的诏敕，命令术赤汗将钦察草原诸地区以及那边的各国征服并入他的领地”①。当时，术赤所能控制的虽然只有也儿的石河上游和阿尔泰山地区，但是他同时得到了向西发展势力的命令和权力，以钦察草原为中心的地区是成吉思汗为他确定的下一个战略攻取目标。但是，随后成吉思汗发动了对西夏、金和花剌子模的战争，动用了大量兵力，术赤没有向西发展势力的机会。

西征期间，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追袭花剌子模王摩诃末，哲别等一度进军至钦察，这是蒙古军对钦察草原首次用兵。

1220年秋，哲别、速不台自伊朗北部进入阿哲尔拜占(阿塞拜疆)，逼近其首府桃里寺（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其首领月即别自知不能敌，遣人献纳金钱、牲畜请和，蒙古军离去，在里海西岸的木甘草原（也作木干，在今阿塞拜

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南）驻冬。

1221年初，蒙古军进兵谷儿只（格鲁吉亚），败其守军，但因其境内林密路险，难于通行，旋即退兵，再至桃里寺。在镇压哈马丹城的反抗势力后，再入桃里寺。

1222年，自桃里寺北进，再入谷儿只，在边境上击败谷儿只守军。转战设里汪（又做失儿弯），攻破其首府沙马哈（今阿塞拜疆舍马合）；进取打耳班（今达格斯坦自治共和国捷尔本特），自此越过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速人、钦察人地区②。阿速与钦察联兵抗击，双方相持不下。蒙古人设计拆散了阿兰人与钦察人的联盟，将他们各个击破。当时蒙古人通知钦察人道："我们和你们是同一部落的人，出自同一氏族，而阿兰人是我们的异己。让我们缔结互不侵犯的协定吧，你们想要金子、衣服，我们给你们，你们（将阿兰人）给我们留下吧。"他们将许多财物送给钦察人，钦察人便回去了。阿速人失去了同盟，被蒙古人击败。

钦察人相信了缔结的和约，回到了各自的地区，蒙古人却出其不意地突然向他们发起攻击，击溃了钦察人，夺回了送给他们的物品③，占领了钦察草原，钦察人被迫逃散。钦察一部落首领忽滩逃往斡罗斯并向他的丈人斡罗斯加里奇公、大胆的姆斯齐斯拉夫求救，由加里奇公出面，联合基辅等几个南罗斯公国，组成了斡罗斯、钦察联军，共同抵抗蒙古。

蒙古军得知罗斯王公们准备援助钦察后，不想与罗斯开战。他们向罗斯派出议和使者④，但斡罗斯王公们杀死了蒙古使者，向蒙古军展开了进攻。蒙古军队见罗斯联军兵力强大，主动退走，但罗斯联军却尾追不舍。这期间，蒙古人又派出了第二批使者，除谴责他们杀害使者外，仍然要求他们放弃追

击，联军依然没有接受。初次交锋，罗斯军获小胜，加里奇公姆斯齐斯拉夫与沃伦公丹尼尔渡过第聂伯河，又在河东击退了蒙古军前锋。两次小胜使他们产生了轻敌情绪，他们脱离联军，贪功急进，1223年六月在阿里吉河与蒙古主力遭遇，双方展开激战。在“用厉害的武器装备起来、并具有铁的纪律的鞑靼人”（罗斯人对蒙古人的称呼）的强大进攻面前，罗斯联军缺乏统一指挥、统一意志的弱点暴露了。加里奇公与沃伦公迎击蒙古军失利，钦察人向后溃逃，扰乱了后面的罗斯步兵。在阿里吉河旁山上仓猝扎营的基辅公，坐视加里奇亲兵覆灭，不肯派兵应援，结果分别被蒙古军各个击破并被迫投降。罗斯军全部被歼，投降的王公被绞死，只有加里奇公与其残部得以逃脱，这就是有名的阿里吉河之战，它导致了蒙古人对斡罗斯的征伐和奴役。

由于速不台、哲别此行的目的不是与罗斯争战，且对罗斯的情况缺乏了解，又急于回师，所以他们没有进一步深入罗斯内地，而是南下向克里木半岛进军，占领了半岛南岸的速答黑城，并打败了前来援助钦察人的斡罗斯、钦察人联军，然后经由里海、黑海北岸与成吉思汗会师，回到蒙古草原。

在哲别、速不台向谷儿只进军时，术赤也在攻陷玉龙杰赤后回到了自己的兀鲁思。1223年，成吉思汗起程东归时，曾召他来见，术赤推病不赴，成吉思汗大怒，命察合台、窝阔台带兵去抓他，自己也准备亲征，后传来术赤病死的消息，遂派幼弟斡惕赤斤处理术赤丧事，确定术赤次子拔都为兀鲁思继承人。

与罗斯的接触和交锋助长了蒙古贵族的贪欲和扩张野心，拔都接管兀鲁思后，为扩大其统治范围，力主对罗斯用兵。窝

阔台即位后，蒙古再次派兵至伏尔加河，出征钦察、撒克辛（今伏尔加河下游），钦察人向不里阿尔人（居住在以喀山为中心的伏尔加河流域地区）求援，蒙古军打败了不里阿尔人，迫使他们退却。这次出征是一次试探性的军事行动，蒙古人搜集到了必要的情报，并主动撤军。

元太宗六年（1234），先派拔都出征钦察、阿速和斡罗斯等地。七年（1235），窝阔台又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大规模征讨，窝阔台甚至打算亲自领兵出征，经宗王讨论决定，这次远征由各兀鲁思抽调军队，并由各宗王长子统领，因此也被称为“长子出征”。

参加这次远征的宗王有：拖雷的长子蒙哥及其弟拨绰；窝阔台的长子贵由及其弟合丹，孙子海都；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孙子不里；术赤的儿子拔都、斡儿答、昔班、别儿哥和成吉思汗的庶子阔列坚等。远征军统帅由拔都担任，大将速不台为统兵作战的主将，出征将士约十五万人。

在忽里勒台召开之前，拔都已奉窝阔台之命先期进军。根据大会决议，1236年春参加远征的诸王和大将速不台率师出发。秋，进到不里阿耳，与拔都会师。他们在会商后，按照决定分别率领本部兵向各自的目标推进。拔都顺利地征服了不剌儿人（波兰）和巴失乞儿惕人（匈牙利）；速不台则攻陷了不里阿耳城（在伏尔加河与卡玛河会流点南，今喀山南一百一十五公里，其废址在今伏尔加河上的保加尔—乌斯宾斯克耶村附近），迫使其首领降服，平息了他们发动的叛乱。

1236年冬，蒙哥进军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居住在亦的勒河和阿牙黑河（今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人部落有的遣使纳款，有的则据险抵抗，抵抗最力的是斡勒不

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他与阿速人首领合赤儿—兀古列联合，不时袭击蒙古军队，一些逃出的难民也去投靠他。他们凭借亦的勒河下游密林的掩护，经常转移，蒙古军难以发现他的行踪。1237年，蒙哥下令造二百只船，每只船上都载一百名全副武装的蒙古士兵，在亦的勒河中游弋；他本人及其弟拨绰则率军在河两岸大森林中搜索，八赤蛮被迫转移到亦的勒河口附近的宽田吉思海（里海）中的岛上。蒙古军跟踪至海边，乘大风水浅可涉之际，进入该岛，尽歼钦察军，活捉八赤蛮。八赤蛮不肯降服，被杀。

在征服了亦的勒河中下游的钦察人、不里阿耳人地区和对东南欧进行了首次攻击后，1237年秋，拔都召集了一次出征诸王的忽里勒台，决定共同进攻斡罗斯。会后，他们向亦的勒河中游推进，迅速地占领了莫尔多瓦人的国家。冬天，大军逼近梁赞。拔都从南面进抵梁赞国，入境之前，就要求梁赞公缴十一税，“不论大公、平民，缴十分之一的白马、黑马、褐马、火红马和花马”，“还得缴十分之一的甲胄”⑤。双方的和谈失败，梁赞公又不敢在野外与蒙古军会战，于是他们固守城池。蒙古军扫荡了一些小城，使“它们从此永远毁灭，不再见诸历史”⑥，十二月中旬，大军包围了梁赞城（今斯帕斯克城附近的旧城）。守军坚守了六天，第七天，城市陷落。居民部分被杀，部分被烧死”。“梁赞城与梁赞国变了样……，它的光荣付诸流水，一切荡然无存，只剩下烟、焦土与灰烬”。

1238年，蒙古军从梁赞向弗拉基米尔公国进发。途中他们在科洛姆纳击溃了弗拉基米尔公的军队，并攻克了莫斯科、苏兹达尔、罗斯托夫等十余城。二月到达弗拉基米尔城下。

弗拉基米尔大公出城召集军队和联络援军，城中由其子负

责守卫。蒙古军猛攻五日，城破。大公的家属和城中显贵避入教堂，全部被烧死。三月，拔都遣一支军队进攻昔迪河畔的大公军营，弗拉基米尔大公战死。之后，蒙古军自此向诺夫哥罗德进发，但由于江河解冻，道路泥泞，他们被迫退军，转而南下，抄掠了斯摩棱斯克、契尔尼哥夫等地，在科集尔斯克城遭到了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蒙古军遭到很大损失，直到拔都派来援军，才攻破并血洗了该城，因此蒙古人称这座城为“歹城”。

此后远征军继续南下，攻取钦察草原西部地区，钦察部长忽滩战败，率部迁入马札儿（匈牙利）境。1239 年，蒙哥、贵由统兵进入阿速国，攻下其都城蔑怯思，阿速国主杭忽思投降。1240 年，蒙哥、贵由奉窝阔台命东归，仍以杭忽思守其国，而将其子阿塔赤并所部阿速军带回。这支军队从蒙古军攻四川，灭南宋，成为元朝很重要的一支色目军队。

当贵由、蒙哥率军南下时，拔都正统军攻略亦的勒河以东地区，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蒙哥的军队首先到达基辅城下，他派出的劝降使者为基辅人杀死，基辅公则逃到了马札儿。1240 年拔都的军队也到达基辅，诸路军云集，围攻基辅。蒙古军势极盛，“兵车辚辚，骆驼鸣叫，以致人们说话彼此都听不见”⑦。拔都下令在城周架炮，昼夜不息地猛烈攻城，守将德米特尔率领军民顽强地固守，城陷后因负伤被捕，也因其忠勇而获得赦免。接着，蒙古军继续西进，攻下加里奇国，加里奇公也逃到了马札儿。

1241 年，蒙古军兵分两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哈台率领侵入孛烈儿（波兰），一路由拔都兄弟、速不台率领进军马札儿。当时的孛烈儿已分裂为若干小封国，国王博列思老无力

号令各封国，拜答儿等得以顺利渡过维思秃剌河，攻掠其都城可剌可夫，并乘筏渡过奥卡河，败昔烈西亚亨利二世集结的孛烈儿、日耳曼和条顿骑士团三万人，亨利战死。后在斡勒木志城下，为波希米亚将领雅罗思老挫败，遂转向马札儿与拔都军会合。

拔都将其主力分为三路侵入马札儿，利用马札儿内部分裂，诸侯不受国王约束和当地诸侯与逃入的钦察人之间的矛盾，攻下佩斯城，驻军秃纳河（多瑙河）东，一面休养士马，一面四出抄掠。先锋曾到达维也那。但是，长期征战的蒙古军此时也已是强弩之末，无力再进行征伐，不久，传来窝阔台死讯，拔都遂班师东还。此后，他把营帐设在亦的勒河下游，并在那里建立了萨莱城，作为本兀鲁思的都城。他不但统治了亦的勒河下游的钦察人地区，而且将罗斯诸公国也纳入了兀鲁思范围，作为蒙古国的宗王，代表蒙古国对那里行使权力，蒙古国在罗斯诸公国调查户口，罗斯被看作是“政治上自治的、具有自己政权、但依属于诸汗、须向他们纳贡（出巡费）的地区”⑧。

由于拔都同蒙古国第三任大汗贵由矛盾很深，拔都接管的术赤兀鲁思在贵由统治时期就对蒙古国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倾

注 释

①《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术赤汗传》。

②阿速人：又做阿兰人，伊朗语族部落，居住在高加索山北，信仰基督教。

钦察人：俄罗斯著作一般称其为"波罗维赤"，伊斯兰著作称"钦察"，拜占庭史家称其为"库蛮"。突厥语族部落，分布在里海、黑海以北，东起乌拉尔河、西至顿河的广阔草原地区，部分信仰伊斯兰教，部分信仰基督教。

③《史集》第一卷第二编中记载：哲别和速不台来到伊拉克、阿塞拜疆和阿儿兰地区，对那些地区进行了屠杀、洗劫，然后他们取道钦察打耳班回到了蒙古。

④《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载，使者传达蒙古将领的旨意说："我们听说你们听信了波罗维赤人的话要来同我们打仗。可是我们不想侵占你们的国土，既不侵占你们的城市，也不侵占你们的村庄，我们不是到你们这里来，而是奉上帝之命来征服那奴隶和马夫，可恶的波罗维赤人的；你们同我们讲和吧，他们若逃到你们处去时，就将他们杀死，财物都归你们所有；听说他们对你们作恶多端，我们就是为了这个来征讨他们的。"转引〔苏联〕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余大钧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⑤⑥《金帐汗国兴衰史》。

⑦黄巨兴译《蒙古统治时期的俄国史略》，科学出版社，1958年。

⑧《金帐汗国兴衰史》。

旭烈兀西征

成吉思汗征服花剌子模后，在河中地区采纳牙剌瓦赤、马思忽惕的建议，进行恢复治理。西辽人成帖木儿作为术赤的代表镇守河中。阿姆河以南则由成吉思汗诸子各留一部分军队驻守，并受成帖木儿节制。但蒙古军队人少不足以控制局面，呼罗珊地区的秩序一直没有得到恢复，蒙古军不时遭到当地抵抗势力的打击。逃亡印度的札兰丁自那里返回故国，一些故官、故将又聚集在他的麾下，花剌子模的势力很可能死灰复燃。窝阔台即位后，重新安排了被征服地区的统治力量。因为"伊朗地区，骚乱还未平静，算端札兰丁仍然桀骜不驯，（窝阔台）派遣绰儿马浑那颜带着一些异密和三万骑兵去讨伐他"。同时任命成帖木儿为副统帅，"命令诸地区的长官和八思哈亲自出征"①。

逃往印度的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收集起散在当地的残部，得一万人。得知其弟该牙思丁已自立为算端，而故国却依然有很多人支持他之后，便谋划回国以图兴复。1224 年，他回到起儿漫，并先后得到了泄剌失（法儿思）、亦思法杭（今

伊朗亦思法罕)、剌夷(今伊朗德黑兰南)地区,在一些故官、故将的支持、拥护下,征服了一些反对者。1225 年,他进军阿兰和阿哲儿拜占,进入帖必力思(桃里寺),占领谷儿只,到达第比利斯。1228 年,他镇压了其弟该牙思丁(嘉泰丁)和一些藩臣的叛乱,打败了谷儿只人、阿兰人、钦察人和阿布哈兹人等的联军,巩固了在波斯西部的统治,被蒙古人灭亡的花剌子模国出现了复兴的征兆,亦思法杭和帖必力思成为这个新帝国的都城。札兰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又向阿黑剌忒(今土耳其东部凡湖西北阿赫们特)、鲁木(小亚细亚,塞尔柱王朝封国,都城为科尼亚)用兵,残酷的屠杀和掠夺激起了被征服地区人民的普遍愤恨,札兰丁在鲁木、阿黑剌忒联军的打击下,败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额尔赞章。

当札兰丁兵败势衰之际,绰儿马浑的军队也渡过了阿姆河。绰儿马浑得旨出征后,首先到达呼罗珊,对反叛势力进行镇压,但是他没能平息这一地区的叛乱,遂将呼罗珊地区的事务交给术赤的家臣成帖木儿,自己则率军进至剌夷,前去追击札兰丁。

为了抵御蒙古军的征讨,札兰丁向昔日的对手鲁木、叙利亚的算端和哈里发以及各地长官派遣急使,要求联合对抗绰儿马浑,但没有得到后者的积极响应。1230 年冬绰儿马浑抵阿哲儿拜占,札兰丁被迫逃窜,1231 年在土耳其东部的山中被曲儿忒(库尔德)农夫杀死。

绰儿马浑驻营于木甘草原和阿兰一带,不时遣兵攻掠阿哲儿拜占、谷儿只、土耳其东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1233 年,降服了帖必力思,1236 年进至谷儿只,梯弗利思(第比利斯)也归附了他。1239 年,蒙古军进军高加索南部山区,进入阿

美尼亚和鲁木。1240年，阿美尼亚王入朝大汗，窝阔台命其仍治理故地。1241年绰儿马浑死，副统帅别速惕部人拜住那颜接替了他的职务。拜住继续向鲁木、叙利亚、伊拉克等地区用兵。

当绰儿马浑到达波斯时，成帖木儿按照大汗的要求，向他提供了军队，绰儿马浑命他平定呼罗珊地区的叛乱并留镇该地。成帖木儿采取招抚和征伐的办法平定了呼罗珊地区，派遣一些降服者入朝大汗，受到窝阔台的褒奖，并被任命为呼罗珊和祃椤答而地区的长官。他“对呼罗珊的百姓表示仁慈，赦免了活着的人”②，他任用文官治理地方，《世界征服者史》的作者志费尼的父亲就曾被任命为撒希伯底万（财政大臣）。

1235年，成帖木儿死，先后由克烈人诺撒耳和畏吾儿人阔里吉思接管该地事务。斡亦剌部阿尔浑为阔里吉思的八思哈和那可儿。阔里吉思以徒思为驻地，整顿秩序，规定赋税，重建经济，阿姆河以西被纳入大汗的直接控制之下。窝阔台统治后期，阔里吉思遭到成帖木儿的儿子和拔都势力的排挤，被卷入一场案件受审，窝阔台死后，他的支持者镇海也被迫离开汗廷，阔里吉思被窝阔台皇后乃马真氏所杀。阿尔浑接替他掌管了自乌浒水（阿姆河）至法儿思、谷儿只、鲁木和毛夕里（今伊拉克摩苏尔）事务，整顿了由绰儿马浑、拜住的征伐、掠夺导致的混乱。蒙哥即位后，任阿尔浑为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长官，统治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区。

这时，东部伊斯兰世界中尚有祃椤答而的亦思马因派和报答（巴格达）的哈里发两支宗教势力未被征服，蒙哥在处理完大汗家族内部的争权斗争后，决定对上述尚未征服的地区用兵，这是蒙古军的第三次西征。

亦思马因派是伊斯兰教十叶派的一支。创始人是十叶派第一代伊玛目阿里的后裔、第六代教长的长子亦思马因，故称亦思马因派。十一世纪末期，他们从塞尔柱突厥人手中夺取了阿剌模忒堡③，并以此为中心，在里海以南的山隘中建立了上百个城堡④，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宗教国。其他宗教徒称他们为“木剌夷”，即阿拉伯语“迷途者”。

蒙哥即位后，守卫伊朗地区的拜住向他报告了亦思马因派和哈里发的暴行，伊斯兰教法官苫思丁·可疾云尼也向他反映了同样的情况，于是蒙哥决定派遣其有“帝王的气象”和“征服的实践”的弟弟旭烈兀担任了这次西征的统帅。

旭烈兀统率的军队除以前派往伊朗的绰马尔浑、拜住的军队和派往客失迷儿（克什米尔）、印度的军队外，蒙哥又决定从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和诸侄的军队中，每十人抽出两人作为额外人员，随同他出征，各宗王都派遣了自己的代表⑤，还拨给他一支由炮手、弩手和火焰放射手组成的汉军千人队，由著名的攻城能手郭侃率领。由阿姆河行省准备军需，乃蛮人怯的不花（乞忒不花）率一万二千人为先锋。他们封锁了自和林至呼罗珊、鲁木和谷儿只间行军途中的所有草地和牧场，以保证军马通过时有较好的饲草；在河上架桥，以确保道路畅通，为大军出征做了周密的准备。

1252 年八月，先锋怯的不花领兵出发，1253 年三月，渡过阿姆河，着手征伐忽希思丹地区⑥。他们征服了该地区的一部分，在亦思马因派的重要据点之一吉儿迭苦黑堡下遭到顽强的抵抗，蒙古军用了两年的时间才攻下该堡。

1253 年十月，旭烈兀离开自己的斡耳朵，踏上征途。他缓慢地进兵，1254 年到达阿力麻里，1255 年九月到达撒马耳

干，驻营于迦尼一吉里草原，然后经碣石到阿姆河北岸，在那里接见了阿姆河行省和呼罗珊等地的官员，向伊朗各地的统治者发出诏敕，要求他们提供军队、武器和食品，各地算端、长官则从伊拉克、呼罗珊、阿塞拜疆、阿儿兰（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北部）、设里汪（今里海西岸库拉河北部地区）和格鲁吉亚等地前来朝见旭烈兀。次年年初旭烈兀渡河，在河南的苏夫耳罕（今阿富汗北部席巴尔甘）驻冬。三月，他离开冬营地，经哈甫（属你沙不儿地区）和匝维（今伊朗霍腊散省托尔巴特海达里耶）向亦思马因派控制的秃温（今伊朗东部霍腊散省境内）进兵，平息了发生在那里的叛乱。攻下了该城并将它夷为平地。接着他到达徒思（马什哈德北）、哈不珊（哈不伤，今伊朗霍腊散库强），并着手修复蒙古人首次入侵时破坏了的城市。

旭烈兀遣使要求亦思马因派教主鲁坤丁·忽儿沙毁堡投降。忽儿沙遣其弟请降，旭烈兀要求忽儿沙亲自前来，后者则有意拖延，要求缓期一年。谕降不成，1256 年八月，旭烈兀决定全面出征。大军分三路进讨，左翼由怯的不花等率领自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进；右翼由不花·帖木儿等率领自祃桚答而进，旭烈兀自将中军。出发前再次遣使招谕，忽儿沙坚持保留部分堡塞和允许他本人一年后出降，遭到旭烈兀的拒绝。大军相继攻占和捣毁了一些堡寨，十一月，包围了忽儿沙的宫府麦门底司堡，“一支多如蚂蚁的人马像蛇一样把它围了七个圈，并且设法在坚硬的岩石上驻扎。……在白天的时间里，麦门底司的人仅看见人马和旌旗，而在夜里，因为营火遍野，他们以为大地是布满星星的天空，（并且）是刀兵的世界，其中心和边际都看不分明”⑦。双方展开了激战，城内的射石

机射出了一排排猛烈石头，城外的蒙古军则以射程为二千五百步的弩炮攻城。十一月十九日，在蒙古军的猛烈的攻击下，忽儿沙被迫出降。蒙古军屠杀了所有坚持抵抗的人，将府库中所余的财物作为犒赏分给了大臣和士兵，拆毁了这座坚固的堡寨。

投降的忽儿沙被安置在可疾云（今伊朗北部加兹温），旭烈兀还将一个蒙古姑娘赐与他为妻。蒙古军则以他的命令招谕尚在坚守的堡寨，对坚持抵抗的堡寨进行猛攻，拆毁并将它们全部夷为平地。后来，旭烈兀遣忽儿沙至蒙哥处效劳，忽儿沙至和林，蒙哥拒不接见，在返回波斯的途中，他被押送的士兵杀死。至此，亦思马因派宗教国灭亡。

解决了木剌夷的问题后，旭烈兀进驻可疾云。1257 年三月，他又从那里向哈马丹进发作进攻报达的准备。他先遣前来朝见的拜住那颜回鲁木，拜住占领并在鲁木境内进行了杀掠。

报达的统治者是阿拔斯朝（黑衣大食，建立于 750 年）第三十六代哈里发木思塔昔木（穆斯塔希姆）。自十世纪以来，阿拔斯王朝逐渐衰落，当时它只保有报达周围两河流域的一部分土地，哈里发也仅保有伊斯兰教领袖和伊斯兰世界名义上的宗主地位。木思塔昔木“优柔寡断，不明事理”，腐败无能，专事游乐，掌权的将帅大臣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内讧。同时他的统治在当地居民中也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报达哈里发的威势已经到了末日。

1257 年九月，旭烈兀向报达派遣使臣，以自己的胜利和军队战斗力强大相威胁，要求哈里发毁掉防御工事，投降并亲自去朝见他，遭到哈里发的拒绝。于是旭烈兀毅然决定出征报达。他命驻在鲁木的拜住率领其军队为右翼，自毛夕里（今伊

拉克摩苏尔）向底格里斯河推进，在指定的时间到达报达的西面；术赤的孙子不勒合、秃塔儿、忽里等宗王和不花帖木儿等也从祃椤答而进军与拜住的右翼会合；怯的不花等由西模娘进军，为左翼；旭烈兀自统中军由哈马丹向报达进军。在进军途中，旭烈兀依然遣使谕降，而木思塔昔木以蒙古退兵为出降条件。蒙古军继续前进，在1258年初，三路军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哈里发的军队出城迎战，蒙古右翼军决堤放水，淹没了哈里发军后方的草原，击败了他的军队，一万多人被杀，无数人落水和陷入淤泥之中，只有少数人逃归。蒙古军到达报达城下，驻于底格里斯河畔。同时，怯的不花的左翼和旭烈兀的中军也相继赶到。

一月二十九日，双方开始交锋，战斗激烈地进行了六昼夜，旭烈兀一方面指挥攻城，一方面将诏敕射入城内，表明饶恕伊斯兰教法官、学者、司教、阿里后裔、也里可温（基督教徒）和一切不进行抵抗的人。二月初，报达东面城墙被攻破。同时，蒙古军又在河上架桥，在船上安放石炮，狙击那些企图乘船逃跑的人。哈里发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派遣他的儿子和一些官员出城请降，遭到拒绝。十日，哈里发本人率领他的三个儿子、三千圣裔（赛夷）、教长、伊斯兰教法官、达官贵人和大臣们出城请降，旭烈兀命向城里人发布命令，让他们放下武器出城，当人们放下武器走出来时，却全部被杀。

旭烈兀进城，在哈里发的宫殿举行庆祝大会，将哈里发府库中地面上的财宝赏赐给异密们和在场的人，并挖出了他埋藏在宫中水池下面的大量赤金。然后，下令对哈里发的后宫进行统计，应哈里发的请求，将七百名后妃中的一百名近属和亲人留给了他。没收了哈里发的全部财产，使阿拔斯王朝“六百年

间聚集起来的一切东西，像群山般地堆集在汗帐的周围”⑧。哈里发木思塔昔木获准在完成法定的净洗后被处死，阿拔斯家族成员只有哈里发的幼子八剌沙得到赦免，被赐与完者哈敦（旭烈兀的后妃，斡亦剌部脱劣勒赤驸马与成吉思汗的女儿扯扯干所生），并娶一个蒙古女子为妻。其余凡被查出的一个也没有被宽恕。立国五百余年的阿拔斯王朝的历史结束了。旭烈兀指派额里该那颜和合剌不海率领三千蒙古兵进驻报达，恢复秩序和重建市场。

攻占报达后，蒙古军又继续攻取了其周围地区。旭烈兀则选择帖必力思为驻地，将从报达、亦思马因派诸堡、鲁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罗耳人和曲儿忒人处掠夺的珍宝、财物送往阿塞拜疆，在帖必力思建造了一座坚固、壮丽的城堡，以储存这些珍宝，并将其中的一部分送给大汗蒙哥，同时向他报告了得胜的喜讯和下一步进攻叙利亚、密昔儿（埃及）的决定。

由于毛夕里算端巴忒剌丁·鲁鲁恭顺，他得以觐见旭烈兀并受到礼遇，按照后者的要求，他将自己的儿子篾力撒里黑送往旭烈兀处，同蒙古军一起去征服叙利亚，旭烈兀将算端札兰丁的一个女儿赐给他为妻。鲁木算端亦咱丁则因曾与拜住厮杀过而心怀忧虑，在觐见之前，“他吩咐缝制一双漂亮的王靴，在这双靴子上画了他的面貌。在呈献礼物时，他把这双靴子交给了君王（旭烈兀）。当君王的目光落到画像上时，算端叩头说：‘我期望君主的无比幸福的脚抬举奴才的头。’”⑨于是他得到了旭烈兀和脱忽思哈敦的怜悯和饶恕。同时，作为征服者，旭烈兀开始着手恢复被征服地区的秩序，还命火者纳昔剌丁建造了一座天文台。

在旭烈兀进军报达时，哈列卜（今叙利亚阿勒颇）算端就

向他送去礼物，表示了归顺的意图，引起了叙利亚算端纳昔儿的猜疑，于是他逃到旭烈兀处。早已有意进军叙利亚的旭烈兀更加紧了部署。在安排好新近征服地区的政治、军事事务后，旭烈兀开始向叙利亚用兵。他以怯的不花为先锋，失克秃儿、拜住为右翼，孙札黑等为左翼，仍然自率中军，于1259年九月向叙利亚进发。

旭烈兀自帖必力思出发，经阿黑忒剌、迪亚别克儿（今土耳其迪亚巴克儿），一路西进，渡过幼发拉底河，围攻哈列卜，用七天的时间攻破城门，又与城内守军激战四十昼夜，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俘虏了许多工匠，夺得了无数战利品。在任命了政治首脑和军事长官后，他离开了那里。此后，他以招降和军事进攻的方式占领了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并向大马士革进兵。算端纳昔儿弃大马士革逃往密昔儿（埃及）。为避免遭到杀戮，大马士革的"所有达官贵人们便带着各种礼物和城门钥匙去觐见至尊（旭烈兀）表示归顺，交出了城"⑩。蒙古军未经围攻和作战便进了城。城民也得到了宽恕。算端纳昔儿发觉密昔儿算端并不是可靠的庇护者，于是又展转逃往巴勒哈，在遭到怯的不花围攻时，他出堡投降，旭烈兀答应在攻占密昔儿时，让他继续当叙利亚的长官。这时旭烈兀得到了蒙哥的死讯，他将叙利亚的事情交给怯的不花后，自己则踏上归途。

旭烈兀返回时，派遣了一个由数十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前往密昔儿，向他们传旨说："伟大的上帝选择了成吉思汗及其家族，把地上各地区一下子赐给了我们。正如所有人都应知道的，凡是拒绝归顺的人就要连同其妻子、儿女、族人、奴隶和城市一块消灭，而关于我们的无边无际的大军的传闻……传遍四方。因此，如果你归顺我们的至尊，你就纳贡、觐见，请求

（给你）派军事长官，否则就准备作战。”⑪

纳昔儿算端忽都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他手下的士兵多是从算端札兰丁的军队中溃逃出来的，他们从阿黑剌忒逃往叙利亚，当旭烈兀进军叙利亚时，他们又逃到了埃及。此时，他们照例不敢作战，而忽都思却决定抵抗，他同首要异密奔都黑答儿商量，杀死了蒙古使者，突袭了蒙古军的先头部队，将他们赶到了阿昔河岸边。怯的不花前往援助，中了密昔儿军队的埋伏，力战后为忽都思军队所俘，被杀。于是埃及王奔都黑答儿进行了反击，蒙古军退回到鲁木。叙利亚全境又为埃及所有。

这时，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内部矛盾激化，东部爆发了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为争夺汗位而进行的战争，西部也爆发了拔都的继承人别儿哥与旭烈兀为争夺高加索地区进行的战争。

1265年八月，别儿哥以旭烈兀“毁灭了木速蛮（伊斯兰教徒）的所有城市，打倒了所有木速蛮君王家族，不分敌友，未经亲族商议就消灭了哈里发”⑫为由，派遣那海率军三万作为先头部队向旭烈兀所在地进军，旭烈兀则以失烈门为先锋，同撒马合儿那颜、阿八台那颜等前往迎击，那海战败。1264年，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伊利汗，统治阿姆河以西诸地，伊利汗国正式形成。它的疆域东起阿姆河，西至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抵阿剌伯海、波斯湾和北非的部分地区。旭烈兀将都城设在帖必力思，将阿剌答黑和报达分别作为夏冬营地。他把伊拉克、呼罗珊、祃椤答而至阿姆河口的广大地区赐给了长子阿八哈，把阿儿兰、阿塞拜疆地区赐给了第三子玉疏木忒，将迪牙儿剌必至幼发拉底河地区交给了异密、速勒都思部人秃答温，把起儿漫交给了秃儿坚哈敦，任命苫思丁·马合谋·志费尼为全国撒希卜——底万（宰相兼财政大臣）的官职，赐与他权

力，让他全权决定、主宰、安排和掌管国事。1265年，旭烈兀死，长子阿八哈继位。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大汗继承权时，各自都声称得到了旭烈兀的支持，忽必烈抢先一步向旭烈兀和阿鲁忽处（察合台之孙）遣使，宣布“从质浑河岸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⑬。这一决定换取了旭烈兀对忽必烈的支持，旭烈兀也因而得到了对伊朗、伊拉克地区的统治权。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将都城定在燕京，将中原汉地作为统治重点，明显削弱了对西道诸王兀鲁思的控制。因此，伊利汗国自建立之日起，就拥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伊利汗国与元朝关系一直很密切，双方使节往来频繁，贡献、赏赐不断。它的君主由国内的宗王、大臣推举，并以得到元朝大汗的册封为合法。

第六任统治者合赞汗时，伊利汗国进入强盛时期。合赞汗死后，各地长官的叛乱和诸王的争权斗争，使汗国内战不息，陷入封建割据的混乱之中。术赤的后裔金帐汗国的月即别（1312—1342在位）不断与埃及算端纳昔儿结盟，共同进攻伊利汗国。河中的统治者帖木儿（跛帖木儿）也乘机进兵，1388年，占领波斯，伊利汗国灭亡。

注 释

①《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窝阔台合罕纪》（一）。绰儿马浑，又译为绰儿马罕、绰儿马汗，雪你惕部人，曾为成吉思汗的豁儿赤（箭筒士）。

八思哈，波斯-阿拉伯语称“舍黑捏”、“失黑捏”，为“具有警察职能的各城长官”，“对被征服地区的贡赋和居民进行登记的军事长官，汗的代表”。参见《史集》第二卷第二部分《呼罗珊蒙古诸异密传》注③、④。

②《世界征服者史》下册XXVI，《成帖木儿和他对呼罗珊及答而的治理》。

③阿剌模特意为鹰巢，亦思马因派教徒的主要城堡之一，位于伊朗北部可疾云（加兹温）北面的鲁武巴儿，住着亦思马因（阿撒辛）教派的首领。参见《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189页注⑤。

④关于城堡数目，诸文献记载不一，有一百个、一百二十八个和三百六十个等不同记录，参见《元史·郭侃传》、《史集》、刘郁《西使记》。

⑤跟随旭烈兀出征的有其幼弟雪别台（孙台），宗王代表昔班（术赤子）的儿子八剌海，拔都的代表秃斛儿斡兀立、忽里，察合台的代表台古斛儿斡兀立，扯扯干别吉（成吉思汗之女）的代表不花帖木儿和一支斡亦剌部兵以及从四方的驸马、异密和大那颜那里调集的一队将官等。

⑥《史集》第三卷《旭烈兀传》第二部分。忽希思丹，山国，为从你沙不儿地方沿今阿富汗边界向南伸延的地区，其首镇是今伊朗霍腊散省比尔兼德。

⑦《世界征服者史》第三部VII，《世界国王旭烈兀进兵攻取异端的诸堡》。

⑧⑨⑩⑪⑫《史集》第三卷《旭烈兀传》第二部分。

⑬《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第二部分。

元

太宗、宪宗时的蒙宋战争

蒙古人对南宋的了解，初期来自金朝，他们称南宋为“南家思”。成吉思汗在北方崛起后，主要的攻击目标自然是宗主国金朝。当他向金用兵时，曾遣使与南宋通好①。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再遣葛葛不罕“与宋议和”。目的当在于交结南宋，共图金国。初，南宋对蒙古的主动通好态度漠然，但金朝在遭到蒙古的军事压力被迫南迁后，却企图南伐宋朝补偿北方之失，宋金开战。于是有人献策“北通鞑靼”，十六年（宋嘉定十一年，1221），南宋以苟梦玉为使，到西域见成吉思汗，同时又以淮东制置使贾涉的名义，遣赵珙到河北蒙古军前，拜见太师木华黎。十八年（宋嘉定十六年，1223）苟梦玉二次使蒙，双方可能讨论了联军灭金的问题，宋朝联金灭辽故技重演，成吉思汗联宋灭金的策略获得初步成果。

二十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成吉思汗遣一支蒙古军以取金、夏为名，突入南宋利州路，进行武装探察，以了解南宋的军事部署和陇蜀地区的地形险要。宋四川制置使郑损

弃关外五州溃逃，蒙古军遍掠阶、凤、成、和、天水五州后退回，成吉思汗利用宋金世仇，借道南宋灭金的迂回包抄战略形成。

太宗三年（宋绍定四年，1231）正月，拖雷再遣搠不罕使宋，提出借道和需粮两项要求。宋四川安抚制置使桂如渊委曲求全，希望以满足对方条件换取边境安宁，作出弃五州，守三关的决定，令汉中以牛酒犒师，并遣人至凤翔蒙古大营回报。与此同时，东路也遣李邦瑞入宋，欲“假淮南以趣河南”。三月，拖雷经大散关入宋，攻陷凤州、洋州、兴元。五月，宋杀使者搠不罕。十月，蒙古军向宋发起攻势，连下三关。由于这次军事行动的目的是借道伐金，故在十二月于光化军北渡汉水后，蒙古军即离开宋境，这是灭宋战争爆发前蒙宋的第三次交锋。

这三次军事冲突，是蒙宋战争的序幕。此后，蒙宋达成联合灭金协议。金朝灭亡后，蒙古军在“大河两岸，东起曹（今山东荷泽）、濮（今山东鄄城北），西抵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列屯置戍，以备宋人”；大将速不台“增屯设伏于陕府、潼关”，备御尚存于秦、巩（今甘肃陇西）一带的金朝残余势力②。

在联合灭金的协议中，双方“约以陈（今河南睢县）、蔡为界”，灭金后，以“陈、蔡西北地分属蒙古”；南宋在灭金战役中占领的泗（今江苏盱眙）、亳（今安徽亳县）、宿（今属安徽）、蔡、息（今河南息县）、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诸郡归宋。在联合行动中，宋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实惠。蒙古军在连年战争后需要休整和制定新的国策，没有对宋发动攻势，双方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时期。

难得的胜利鼓舞了南宋君臣，在一部分主战派将领的鼓吹下，热衷于恢复的宋理宗悍然决定出师河南，收复三京，以达到据关阻河与蒙古划河而守的目标。

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六月，宋军出师。七月五日入汴。蒙古军得知宋出师河南的情报后，一方面决河放水阻止宋军北上，一方面在三京广布哨马和增屯设伏，同时主动撤出西京洛阳，以空城诱敌。七月，粮饷不继的宋军在知应天府、南京留守兼淮东制置使赵葵的敦促下仓猝入洛。当宋军先头部队入洛后，预先部署在洛阳城南龙门的蒙古军任其入据空城，待其师老粮尽兵疲，令其不攻自破。而以精兵攻打其后续部队。宋军陷入重围，大多溺死洛水或为蒙古军所杀。蒙古军回师攻城，宋军被杀而死者十之八九。蒙古军占领洛阳，宋军不得不放弃汴京班师而归。宋军收复三京之举以彻底失败告终，其直接影响就是首先破坏了蒙宋协议，为将灭宋作为既定方针的蒙古对宋大规模开战提供了口实。"是宋蒙战争爆发的导火线和起始点"③。

秋，蒙古诸王大会讨论伐宋事，已经作了战略部署④。十二月，依惯例，窝阔台遣王檝使宋，要求南宋以事金之礼事蒙古，遭到拒绝，于是便以大军继之。

太宗六年（宋端平元年，1234）至宪 宗元年（宋理宗淳祐十年，1251）为蒙宋战争的第一阶段。战争同时在东、西两线三大战场上进行。

东路由大将阿术鲁负责，以张荣为先锋，出河洛，重点进攻徐（今属江苏）、邳（今江苏睢宽北）。

中路由窝阔台第三子阔出和诸王忽都秃、口温不花和塔思率领，出唐、邓，重点进攻襄、樊（今湖北襄樊市）。

西路由大汗次子阔端率领，重点进攻秦巩、巴蜀。

七年（宋端平二年，1235），阔出率领的蒙古军取道金州（今陕西安康）、光化（今湖北光化西），沿汉水东下；口温不花率军将自唐、邓南下。九月，略地汉上，进入荆汉地区。宋邓州守将赵祥降，蒙古军再下枣阳，集中兵力进攻襄阳。宋军坚守，遂转攻随州（今湖北随县）、郢州（今湖北钟祥）。次年，宋襄阳守将李伯渊降，蒙古军攻下襄阳。江陵北面的均（今湖北均县西）、房（今属湖北）、随、德安（今湖北安陆）、郢等州郡皆为蒙古军攻占。

十一年（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宋军收复襄阳。蒙古军自川蜀增援，为宋将孟珙阻击。由于主帅阔出于1236年去世，襄阳又为宋军收复，中路战场不能取得进展，蒙古军遂在襄、樊、随、信阳一带招集军民屯种。

1235年口温不花率领的蒙古军，在阔出军的掩护下，进入淮西。1236年冬塔思自邓州南下，进攻蕲、黄。张柔屯兵曹武（今湖北京山县东），取九里关（今湖北孝感县东北）。以兵屯驻在曹武北长封岭上，四出经略，为大军进攻淮西扫清了道路，开辟了江淮战场。

1237年，口温不花占领光州（今河南潢川），别略黄州（今湖北黄冈），谋捣长江；史天泽下复州（今湖北天门）；塔思向东南推进；另一军进抵合肥。口温不花连下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与宋军激战于长江，失利后转攻黄州，宋将孟珙坚守，军民殊死战，蒙古军久攻不下，撤军。这是自蒙宋开战以来宋军的首次大捷。接着宋军又在安丰大败口温不花和史天泽，蒙古军损失惨重，班师北归。

1235年8月，阔端军的一支在塔海的率领下自凤州进攻

河池，连下关外阶、成、西成、沔等州。十月，金巩昌便宜总帅汪世显率金残余兵将向阔端投降，阔端令其率兵随从入川。汪世显统郡县数十，胜兵数万，素称秦、巩之豪。他熟悉入蜀道路和四川边备，又结交回回、西夏十八族为内应，他的投降增强了蒙古军对四川进攻的实力。在攻拔了蜀边据点后，阔端于1236年八月以塔海为元帅，汪世显为先锋，率蒙古、西夏、女真、回回、吐蕃、渤海等军，号称五十万，大举攻蜀。入大散关，抵武休关，占领兴元。自金牛道进攻四川内郡⑤。与宋将曹友闻激战于阳平关。曹友闻设伏以待。击溃了南宋增援大安的军队后，汪世显提兵与进攻阳平关的塔海军会合，曹友闻战死，蒙古军打开了入蜀的大门，宋守军溃逃。阔端兵分两路，乘胜直捣成都。一路由拖雷子末哥（又作莫哥）率领，自阴平郡（今甘肃文县西北）绕出剑阁以西，直捣成都；一路由阔端本人率领，出利州、剑门，约日会师成都。

九月，阔端自汉中攻取大安。十月，其先锋吐蕃将领赵阿哥潘入朝天关（今四川广元市北60里），占领利州，分军下阆州、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市）、潼川，月中，各路军会于成都附近。成都承平日久，蒙古军入城之际，官吏晏然，居民纵观。及至发现来者为蒙古军，全城顿时陷入混乱。宋安抚制置副使丁黼拒绝出逃，集合将士，孤注一掷，终因寡不敌众，战死，蒙古军占领成都。末哥军在文州、摩天岭相继受阻，两个多月后，方与阔端会于汉州（今四川广汉县）。

占领成都后，阔端分兵四出，抄掠四川的眉山、青神、嘉定（今乐山）、邛（今邛崃）、蜀（今崇庆）、彭（今彭县）、汉、简池（今简阳县）、永康（今灌县）、潼（今三台县）、遂（今遂宁市）、果（今南充）、合（今合川县）、忠（今忠县）、

万（今万县市）、云安（今云阳县）、梁山（今梁平县）、开（今开县）、达（今达县）等州郡，东到瞿塘，西到黎（今汉源县清溪）、雅（今雅安），经此蹂践后，全蜀残破。

1239年，塔海、汪世显等攻取东川，一度攻破夔州（今四川奉节），恩施（今湖北恩施），向东推进，南宋紧急调兵增援四川，蒙古军撤回。

1240年，宋派孟珙为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四川防务略有转机。安抚制置使陈隆之在成都、汉州修复城垣，布置防守。1241年，塔海等再至成都，陈隆之被俘杀。副使彭大雅经营重庆，在合州钓鱼山筑城设寨，屏蔽重庆。1241年，窝阔台死，此后直至宪宗蒙哥即位，乃马真氏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和进取精神，对宋战争无大进展。

乃马真氏二年（宋淳祐三年，1243），宋以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置元帅府于重庆，率领四川军民修建、扩建各类山城二十余座，因山为垒，屯兵聚粮，加强了四川的防御。

乃马真氏二年和定宗元年（宋淳祐六年，1246），蒙古军进攻嘉定和四路入蜀，均无功。余玠则开始向蒙古军反攻。定宗后海迷失二年（宋淳祐十年，1250），余玠北伐，暂取汉中。余玠取金牛道，向汉中进发，三战三捷。第二年，率各路军，号称十万，进攻汉中。蒙古兴元行省夹谷龙古带以不满五千的蒙、汉军坚守，宋军屡攻不能克，后蒙古援军到，余玠退兵。

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在处理完黄金家族内部的夺权纠纷后，部署了对各地征伐。蒙宋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蒙哥在安排军事征伐时，命察罕、也柳干统两淮等处蒙古、汉军；带答儿统四川等处蒙古、汉军；和里解等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皆仍前征进”⑥。而以皇弟忽必烈主持漠南

蒙古汉地军国庶事。对南宋的征伐，忽必烈广泛听取汉地儒臣和将领的意见，帮助大汗制定了更具进取意义的政策，在部署军事任务的同时，更重视解决粮饷问题，并在沿边建立屯驻基地。在巴蜀战场，巩昌便宜总帅汪德臣重筑沔州城，设官置署，作为深入四川内境的基地；在白龙江一带发展屯田，寓兵于农，把截了宋人北进的大门，为向四川用兵奠定了基础。在荆襄战场，采纳姚枢的建议，“以春去秋来之兵，分屯要地，寇至则战，寇去则耕，积谷高廪。边备既实，俟时大举”⑦。在两淮战场，命张柔移驻亳州，修路筑桥，通商贾之利。同时，河南经略司杨惟忠也在唐、邓、申、裕、嵩、汝、蔡、息、亳、颍等州开展屯田，以解决军队粮饷。经此安排部署，蒙古军在东起陈、亳，中经襄阳，西至唐、邓的沿边一线和川蜀战场，皆置重兵，改以往以虏掠、骚扰为主的战略为屯驻重兵，亦耕亦守，屯田积谷，利则出战的军事进取与恢复经济并举的方针。

以往的对宋战争，巴蜀战场进展较大，两淮与荆襄因淮水与长江的阻隔，进展迟缓。蒙哥改变以往三条战线齐头并进的战略，依然采取当初灭金所用的战略。宪宗二年（宋淳祐十二年，1252），蒙哥命忽必烈远征大理，实行对南宋更大规模的包抄。

同旭烈兀西征一样，仍从东、西道诸王的大军中每十人抽二人，并派一名宗王随从忽必烈远征，以大将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总督军事。同时，还有汉人董文用、董文忠兄弟和郑鼎所率的汉军。在进军之前，也照例遣人入大理先行招抚。三年（宋理宗宝祐元年，1253），忽必烈师至临洮，吐蕃首领、同知临洮府事赵阿哥潘又令其子率军从征。由于赵阿哥潘兄弟的支

持协助，大军顺利通过叠、宕等吐蕃、羌人地区。

师至忒剌（又做塔剌，今甘肃省迭部县与四川若尔盖县接壤的达剌沟）后，兵分三路，“大将兀良哈台率西道兵，由宴当路（今四川阿坝草原）；诸王抄合、也只烈帅东道兵，由白蛮；帝（忽必烈）由中道”⑧。

兀良哈台自忒剌经四川色达、甘孜、新龙、理塘、稻城、得荣一线水草丰美的大草原，进军顺利。秋季，由旦当岭（今云南中甸境）进入云南。

忽必烈经阿坝草原沿大渡河西岸南下，一路招降牧区部落，鱼通（今康定东路）、长河（今泸定县大渡河西）、宁远（今石棉县与九龙县境）等地先后归降。然后渡大渡河，进入宋黎、雅之境。青羌五姓土司之一的杨土司部将高保四率先迎降，并引导大军招降了东岸部落。九月，忽必烈进攻黎州，过飞越岭（今汉源县西北），抵满陀城（即宋盘陀寨，今汉源县西北飞越岭至石城间）。留辎重于满陀城，督军迅速南下，与西路会。十月，中路军于富林渡口再过大渡河，取古清溪道，经安宁河谷，“经行山谷二千余里”，十一月抵金沙江，以革囊及筏渡江。自北胜府汴头（今云南永胜境）渡江，再由丽江石关南进。中路所经为大渡河河谷地带，“山径盘屈”，有时不得不“舍骑徒步”，忽必烈历经艰难险阻，多次不得不由汉将郑鼎背负而行⑨。

东路取川西北通往内郡的古隘道，自忒剌至松（今四川松潘）、茂（今四川茂汶）二州。出岷江故道，经成都，进攻与四川南境相邻的大理白蛮地界。时余玠已死，新任蜀帅无能，四川防务废弛，东路军顺利通过宋军防线，下黎、雅，渡大渡河。

大理国拒绝招抚，加强防备。兀良哈台在降附的摩些部落（在大理北四百余里）的支持帮助下，进入察罕章（今云南丽江），攻下了不受招抚的部落，打乱了大理国的防御部署。十二月十三日，诸军毕集，包围大理城。十五日，城破。大理国主段兴智出奔善阐（今云南昆明市），国相高祥逃至统矢罗（今云南姚安），被追杀。

四年（1254）春，忽必烈班师，留兀良哈台戍守大理，继续征服尚未归附的部落。秋，兀良哈台下善阐。五年（1255），进取赤秃哥（今贵州西部）、罗罗斯（今四川凉山地区）。大理各部均被征服。六年（1256），段兴智以大理地图来献。

“忽必烈通过远征大理之役，为蒙古军迂回包抄，从长江以南进攻宋朝开辟了新的战场”⑩。此后，留戍云南的兀良哈台分别向四川、贵州、广西用兵。

宪宗六年（1256），蒙古诸王大会于欲儿陌哥都（月儿灭怯土），商讨大举伐宋。以灭宋为目标的战争全面展开。蒙古军仍然分为左右两路南下。左翼军由塔察儿统率，包括诸王也松格、察忽剌、忽林赤，驸马纳陈、帖里干，将领不只儿、忙哥忽剌察儿、察罕等，号称大军三十万。右翼由蒙哥亲自统领，包括诸王窝阔台系的合答黑（也可合丹）、秃塔黑，察合台系的忽失海和其宗王阿必失合、纳邻合丹、合答黑薛禅，拖雷系的末哥，蒙哥子阿速带以及火儿赤那颜等军队。此外，尚有诸部军和汉军。

1256年秋，塔察儿率左翼军南下，他们过东平，到汉江，攻襄、樊。因军纪不严，却热衷于掠夺，竟未能攻下一城一地，遭到大汗的谴责。

1257年，塔察儿攻樊城，“霖雨连月，乃班师”。

1258年，蒙哥出师。四月，驻跸六盘山，调集大军四万号称十万，分三路入蜀。蒙哥率主力自陇州入大散关；诸王末哥由洋州入米仓关；万户孛里叉由渔关入沔州。

先令左翼塔察儿佯攻两淮，李璮攻宋东海一线，在江淮战场牵制宋军；留守成都的蒙古将领纽邻抢渡马湖，奔袭重庆，牵制四川境内的宋军。莫哥、孛里叉两路先行为大军继进扫除障碍。后因塔察儿统率左翼师出无功，屡屡受阻，被撤去统帅重任，改用遭谗家居的忽必烈为东道统帅，仍命张柔从忽必烈征鄂，趋杭州。命兀良哈台自云南北上，次年正月与东路军会于长沙。

七月，蒙哥以明安答儿留守京兆，大将浑都海留守六盘山辎重，自己则领兵自陇州出发，经大散关至汉中，取金牛道入蜀，至利州。取剑门关西苦竹隘（今朱家寨），拔长宁山城（今剑阁县东南，苍溪县西北），降大获（在苍溪县东南四十里）、运山（又作云山、燕山隘，在蓬安县东南三十里），青居

蒙哥决意攻取钓鱼城，他命人分兵四出切断钓鱼城与外界的联系，准备了各种攻城武器，包围和攻打钓鱼城。南宋曾派兵攻打成都，以解钓鱼城之围，未能奏效。蒙古军围攻不止，损失惨重，士气低落。虽打退了前来增援的宋将吕文德，攻城之役进行了五个多月，无任何进展，招降也遭拒绝。七月，久旱酷暑，军中大疫，蒙哥病死。随征军士，除留下汪氏和纽邻的军队外，其余都随蒙哥子阿速带北撤。

忽必烈受命南征后，1258年十一月自开平起程，翌年二月至邢州，五月至小濮州，六月至相州。他沿路招见汉臣、儒生和隐士，询问作战方略，进军得失。七月从所俘南宋人处得知蒙哥死于四川军中的消息，未之信，继续南下。九月渡淮，攻破大胜关（今河南罗山县南），进入淮西。至黄陂（今湖北黄陂北），决定由阳逻堡（今湖北新州阳逻镇）渡江，驻军江北。九月，从蒙哥征蜀的末哥送来蒙哥已死的消息，要求忽必烈北还继位。但忽必烈不愿无功而回，于是组织诸军渡江成功，并乘胜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南宋调兵援鄂，忽必烈一面继续围攻，一面遣兵南下湖南，接应自广西入湘的兀良哈台。蒙哥死后，南宋四川方面军事压力减轻，吕文德回师援鄂，东路军压力顿时增加。但南宋权臣、右相、荆湖宣抚策应大使贾似道畏敌不敢战，密遣使至蒙古军前议和。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至军前请其速回，忽必烈与贾似道议和后撤军北还。蒙宋战事暂停，边境局势缓和。

注 释

①《元朝秘史》载："在后成吉思差使臣主卜罕等通好于宋，被金家阻挡了，以此成吉思狗儿年再征金国。"主不罕又译作搠不罕、绰不干、苏巴尔罕。

②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屠寄《蒙兀儿史记·塔察儿传》，《速不台传》。

③《宋元战争史》。

④《元史·木华黎附塔思传》记载："甲午秋七月，……。诸王大会，帝顾塔思曰：'先皇帝肇开大业，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丽、回鹘诸国皆已臣附，惟东南一隅，尚阻声教。朕欲躬行天讨，卿等以为何如?'……塔思对曰：'臣家累世受恩，图报万一，正在今日。臣虽驽钝，愿仗天威，扫清淮、浙，何劳大驾亲临不测之地哉!'"于是命塔思与王子曲出（阔出）总兵南征。

⑤金牛道，又名石牛道，为秦、蜀间重要通道。起自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入四川，经广元趋剑阁。见《宋元战争史》。

⑥《元史·宪宗纪》。

⑦《元文类》卷六〇《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⑧《元史·世祖纪》。

⑨《元史·郑鼎传》，惟鼎传误将"世祖"记为"宪宗"。

⑩⑪《宋元战争史》。

元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会见

八思巴（1235—1280），法名洛卓绛称伯让波（智幢吉祥贤）。藏传佛教萨迦派的第五世祖师，出身于昆氏（款氏）家族，父桑察·索南坚赞，伯父即萨迦四世祖师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从幼年时起，在读写、学法、听经、修习等方面都是一看就懂，众人说：‘他一定是位圣人。’因此将他的名字称为八思巴（意为圣者）”①。元宪宗三年（1253）奉皇弟忽必烈之召，会见忽必烈，与后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忽必烈即位后，八思巴被尊为“国师”、“帝师”。

佛教自七世纪传入吐蕃，九世纪中叶，因遭到吐蕃王朝达玛赞普“禁佛”的打击，一度衰落。吐蕃王朝瓦解后，西藏社会陷入分裂状态，奴隶制也逐渐向封建农奴制转化，十世纪后半期，佛教又开始复兴。十一世纪中叶，随着封建农奴制的发展，各地农奴主的统治地位日益巩固，彼此间的争夺加剧，他们也各自同佛教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藏传佛教也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当时，影响较大的有噶当（“噶”，藏语意为“佛语”；“当”，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

——经律论三藏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该派在藏北当雄西南建热振寺）、噶举（藏语意为"口授传承"，该派支系最多，噶玛噶举、蔡巴噶举、帕竹噶举是其较大的派系，其中噶玛噶举派首创活佛转世制度，有黑帽系和红帽系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和萨迦（藏语意为白土，因其寺建在灰白色土地上得名）等派。

有确切记载的西藏僧俗代表人物与蒙古统治者联系的建立当始自窝阔台的儿子阔端。但中外藏学家中也有人提出这种联系的建立可能开始于成吉思汗时期②。无论如何，萨迦派与蒙古上层的联系确始于阔端而政治关系的确立则完成于忽必烈。

窝阔台即位后，将河西地区赐给了次子阔端。阔端驻于凉州，负有向藏族地区发展势力的任务。阔端招降了金朝巩州便宜总帅汪古人汪世显，承制以来降的临洮吐蕃人赵阿哥潘为叠州安抚使，控制了甘、青、川边界的藏区，为向西藏发展势力打下了基础。元太宗窝阔台十一年（1239），阔端派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藏，军至藏北彭城，四出抄掠，焚毁了热振寺和杰拉康寺，杀死了五百多僧人。征服了西藏地区，使"所有'木门人家'都交纳贡款。东从贡波以上地方，西至尼泊尔，南至扪地区一带，所有王城都被元军征服，收归在元朝国法压制之下，遵从元帝之命，并派遣使臣朝觐元都"③。

继武力征服之后，他又遣使入藏，征聘当地有影响、有威望的人士，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治理和控制西藏。使者入藏后，在广泛地了解情况后，向他作了汇报，他决定首先征聘精通佛教经典的大学者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阔端遣使带着皇帝的诏书前往迎请，萨班在与其周围重要人物商量后，决定前往④。

1243年，萨班与其两个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随使者上路，一路上讲经传法，1246年八月到达凉州。此时，正值大蒙古国选举大汗的忽里勒台召开之际，阔端不在凉州。第二年一月，萨班一行才得以谒见阔端，他为阔端讲经说法，治病禳灾，很受器重。阔端说："汝携带如此幼小之八思巴兄弟及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请而来，他人则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吐蕃教法，可仍着八思巴学习之，着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若吾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岂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实际上，阔端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向萨班劝降。萨班受到的礼遇，使他确信依靠蒙古贵族将有利于萨迦派的发展。因而在这里萨班已经代表西藏各派势力同蒙古贵族进行了谈判，并决定西藏归附蒙古。条件是蒙古国在西藏调查户口，编造清册，征收赋税，任命达鲁花赤；西藏各派僧俗人士，仍可继续任职，从而确定了蒙古贵族依靠萨迦派控制西藏的方针⑤。

1251年，蒙古诸王、大臣的忽里勒台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蒙哥任命其弟忽必烈总漠南军国事。萨班归降蒙古的决定并没有得到全体藏地上层人士的认可，甘、青和川西的一些部落还没有完全归附，西藏的一些教派上层也在进行抵制。蒙哥一方面遣和里䚟统吐蕃等处蒙古、汉军，与两淮、四川等处蒙古、汉军，"皆前征进"。一方面利用萨迦派上层与阔端的关系继续对各派上层进行劝降活动。

十一月，萨班死，八思巴继为萨迦派教主。

宪宗二年（1252），蒙哥下令在汉地、斡罗斯和吐蕃等地清查户口。八思巴以萨迦派教主的身份写信给西藏僧俗上层，

一方面通报萨迦·班智达病逝的消息，一方面通报蒙哥即位和清查户口的有关情况，并遣格西多吉周和松布等与清查使者同往。以便向吐蕃上层解释详情，避免惊惧，保证括户顺利进行。

在清查西藏户口的基础上蒙哥依照在其它征服地区的先例对西藏地区也实行了分封，将止贡划归自己、察巴分给忽必烈、迦萨分给阔端、噶玛分给阿里不哥，旭烈兀则得到了帕竹派地区。

忽必烈受命征云南。夏，驻军六盘山，遣使凉州迎请萨迦·班智达。八思巴与阔端子蒙哥都至六盘山会见忽必烈。忽必烈留下八思巴，与之结成施主和福田关系。这是八思巴与忽必烈的第一次会见，它对八思巴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为萨迦派与元朝统治者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当时，忽必烈的军营中已经有一些本封地的察巴噶举派僧人。但是，他们知名度不高，影响不大。当时，南宋军队在边界上坚壁清野，对忽必烈自临洮进军四川不利，他决定取道甘、青、川藏区，对南宋实行战略包抄。为了顺利地通过藏区，他需要一位威望高、影响大的藏族上层人士的协助。于是他邀请在凉州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和噶玛噶举派教主噶玛拔希到军营中会见。

八思巴大约在该年冬天至忽必烈军营，向忽必烈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宗教情况。在王妃察 必的鼓励下，忽必烈开始接受佛教。

宪宗三年（1253）新年，忽必烈接受了萨迦派的密法灌顶，在察必的支持调停下，与八思巴结成了施主与上师的关系⑥。而噶玛拔希却迟迟未到。

在忽必烈南伐大理时，八思巴在凉州主持了其伯父萨迦·班智达灵塔开光仪式。当忽必烈自云南北返时，他再一次到军营中会见其施主，并追随忽必烈到达汉地。忽必烈对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远道来投十分重视，“颁给八思巴一份称为‘藏文诏书’（扎撒博益玛）的文书，肯定八思巴作为他的宗教上师地位，重申自己皈依佛法、担任佛教的施主”⑦。

宪宗四年（1254）夏，八思巴前往朵甘思（指今西藏那曲专区东部、昌都专区北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北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地区），可能为迎请传戒上师和宣谕藏文诏书。不久，又返回忽必烈营地，并见到了忽必烈自大理带回的佛牙舍利。

宪宗五年（1255）新年，八思巴向忽必烈敬献《新年吉祥祝辞》，称忽必烈为“尊胜人主”，祝愿他“胜于各方”⑧。至此，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特殊的宗教与政治关系正式确立。同年噶玛拔希也曾晋见忽必烈，但他拒绝了忽必烈请他长期留在身边的要求，并转而到漠北投靠蒙哥和阿里不哥。后来，在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之际，他因涉嫌支持阿里不哥受到了忽必烈的惩罚，从而失去了依靠最高统治者发展本派势力的机会，八思巴便成为忽必烈身边唯一重要的西藏宗教和政治势力的代表⑨。

这一年夏天，八思巴到河州（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接受比丘戒，完成了成为一名正式佛教僧侣的全部仪式。然后又返回忽必烈营帐。

宪宗七年（1257），忽必烈与蒙哥兄弟间矛盾公开化，忽必烈被解除了兵权，不能参加对宋战争；阿兰答儿、刘太平等开始检查陕西、河南钱谷出入，忽必烈处境困难。为了趋吉避

凶，忽必烈需要宗教保佑，二月，八思巴为他举行了称为“烧施”的宗教活动，三月，写了《五天女赞》，为忽必烈禳灾祈福⑩。夏季，八思巴朝拜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以一个佛教徒的眼光，写诗赞颂五台，在西藏佛教界影响甚大。冬，忽必烈亲自朝见蒙哥，兄弟释嫌，重归于好，忽必烈处境改善，八思巴的地位也相应提高。

宪宗八年（1258）春夏之交，忽必烈受蒙哥之托，在开平主持释道两教关于《老子化胡经》真伪的辩论大会，除汉地儒生、道士、佛教僧人外，还有吐蕃、河西、大理等地僧人参加，八思巴也参加了这一“汇集了当时大半个中国的释、道、儒三家精英的学术大会”。他以自己广博的知识、雄辩的口才，向道士问难并使之辞穷，从而使佛教理论在这次辩论中战胜了道教，道士十七人依约被罚削发为僧。这场辩论对忽必烈尊崇佛教无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自1254年到1260年，八思巴多数时间在忽必烈军营或王府，从事佛教理论的研习修持，为忽必烈及其诸妃、诸子祈福禳灾。当忽必烈自湖北返回燕京时，他也自开平到达那里。显然，他也是忽必烈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支持者之一。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授以玉印，统释教”。至元六年（1269），八思巴献上所创新字（八思巴蒙古文），七年（1270），忽必烈再次请求八思巴向他传授灌顶时，改西夏王的玉印为帝师印，又封八思巴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梵天佛子，化身佛陀，创制文字，护持国政，五明班智达帝师”⑪。

帝师是皇帝和皇室成员的老师和精神支柱，也是全国佛教僧人的领袖，位在诸王之上。帝师嗣位，要赐封诏玉印，宣谕

天下；新君即位，要对帝师降诏褒奖；颁发给帝师的诏书为专用的“珠诏”⑫，帝师至京师，用皇帝出行仪仗之半为前导，百官郊迎。

帝师代表佛教保佑皇帝，为皇室作各种名目的佛事，如为皇帝和皇室成员祝延圣寿、禳灾祛难、祈祷国泰民安等等。在思想文化方面，就忽必烈个人而言，他即利用汉儒在汉地实行汉法，也利用藏传佛教为巩固其统治服务。忽必烈非常重视八思巴所创的蒙古新文字，新字一经进呈，他立即下诏在全国推行⑬。新字是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的一套拼写符号，采用竖行自左至右的书写方式，“它可以用来拼写蒙古、汉、畏兀、藏等语言，所以实际上是供元朝统治下的各民族共同使用的一套拼音字母。它的创制可以说是在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打算统一各民族文字字形的尝试，也是第一次用一套拼音字母来记写汉语的尝试。对元朝将众多的民族统一为一个大帝国和消除或减少民族间语言文字上的隔阂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⑭。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历史性会见和他们之间宗教、政治关系的确立对元朝的统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都具有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注 释

①《汉藏史集》，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参见（意）杜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室、民族学室，1980年（内部资料）；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载《西藏研究》1992年第三

期。但二者所论仍有不同，杜齐氏认为 1206 年，成吉思汗曾将西藏作为征伐目标，西藏各方共同协议遣使无条件向成吉思汗投降；陈庆英认为："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到过拉达克一带，在藏族地区中，阿里地区可能最早归附蒙古，蒙古在该地设有都元帅。"

③多尔答进军西藏，藏文史籍《青史》、《西藏王臣记》、《汉藏史集》、《新红史》等都有记载。"木门人家"即指藏族。

1253 年，忽必烈奉命征大理。由于察巴是忽必烈的封地，在他的军营中，已有察巴派僧人，但他们都不太知名。

④《西藏王臣记》载，使者为大元长官垛达（多尔答）。他在《请示迎谁为宜的详禀》中说："在边野的藏区，僧伽团体以甘丹派（噶当派——引者注）为大；善顾情面以达隆法王为智；荣誉德望以枳空·敬安大师为尊（枳空即止贡——引者注）；通晓佛法萨迦·班智达为精。"第五世达赖喇嘛著，郭和卿译，民族出版社，1983 年。

《萨迦世系史》载邀请萨班的诏书称：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

晓谕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贝桑布。朕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之喇嘛，在选择之时选中汝萨班，故望汝不辞道路艰难前来。若是汝以年迈（而推辞），那么，往昔佛陀为众生而舍身无数，此又如何？汝是否欲以汝所通晓之教法之誓言相违？吾今已将各地大权在握，如果汝指挥大军（前来），伤害众生，汝岂不惧乎？故今汝体念佛教和众生，尽快前来！吾将令汝管理西方众僧。

赏赐之物有：白银五大升，镶缀有六千三百粒珍珠之珍珠袈裟，硫磺色锦缎长坎肩，靴子、整幅花绸二匹，整幅彩缎二匹，五色锦缎二十匹等。着多尔斯衮和本觉达尔玛二人赍送。

龙年八月三十日写就。"

阿旺贡噶索南著，陈庆英、高禾福、周润年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年。

⑤《萨迦世系史》载萨班给众弟子的信中说："（汗王）又曰：若能

唯命是听，则汝等地方及各部之部众原有之官员俱可委任官职，对于由萨迦之金字使和银字使召来彼等，任命为我之达鲁花赤等官。为举荐官员，汝等可派遣干练使者前来，将该处官员姓名、百姓数目、贡品数量缮写三份，一份送来我处，一份存放萨迦，一份由各自长官收执。另需绘制一幅标明某处已归降及某处未归降之地图，若不区分清楚，恐已降者受未降者之牵累，遭到毁灭。萨迦金字使者应与各地官员商议行事，除利益众生之外，不可擅作威福。地方官员亦不得在不与萨迦金字使商议的情况下擅权作主。不经商议而擅自妄行是目无法度，若获罪谴，我在此亦难求情，惟望汝等众人同心协力。"

此外，尚有"对于金字使者好生迎送，殷勤服侍"、"此间对各地贵人及携贡物而来者俱善礼待之"等等。

⑥《萨迦世系史》载，八思巴要求忽必烈"受灌顶后，上师坐上座"。忽必烈不肯。察必调解说："听法及人少时，上师可以坐上座。当王子、驸马、官员、臣民聚会时，恐不能压服，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听上师之教，不请于上师绝不下诏。其余大小事务因上师心慈，如误为他人求情，恐不能镇国，故上师不得讲论及求情。"

⑦陈庆英《忽必烈继位前的八思巴》，载《思想战线》1988年第五期。

⑧参见陈庆英《八思巴致忽必烈的新年吉祥祝辞探讨》，载《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四期。

⑨《萨迦世系史》载，噶玛拔希为忽必烈身边的诸妃、大臣显示神通，人们觉得"从眼前的神通法力来看，还是这位上师高一些"。王妃察必担心八思巴的地位发生动摇，为了巩固他的地位，察必要求八思巴也显示一下自己的法力。于是八思巴作法，使自己的头部和四肢显现五部佛的形象，压倒了噶玛拔希。

⑩烧施，也译为火祭或护摩，为佛教密宗以焚烧柏枝、酥油、粮食、花果等祭神祈求消灾得福的一种宗教活动。

五天女"即吉祥寿仙女、翠颜仙女、贞惠仙女、冠咏仙女、施仁仙

女，其实是喜马拉雅山的五座高峰，……这五仙女分别为执掌人间福寿、预知、农田、财宝和畜牧之神。”参见陈庆英《忽必烈即位前的八思巴》。

⑪参见《元史·释老传》、《萨迦世系史》、《元史·世祖纪》、《拔思发行状》。《行状》所载帝师封号为“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开教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

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惟诏西番者，以粉书诏文于青绘，而绣以白绒，网以真珠，至御宝处，则用珊瑚”。

⑬《元史·世祖纪三》。

⑭陈庆英《元代帝师制度及其历任帝师》，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一期，该文载忽必烈推行蒙古新字的诏书称：“我国家肇基朔方，俗尚简古，未遑制作，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考诸辽、金及遐方诸国，例各有字，今文治寖兴，而字书有阙，于一代制度，实为未备。故特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顺言达事而已。自今以往，凡有玺书颁降者，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

宪宗七年（1257）蒙哥亲征南宋时，留幼弟阿里不哥守和林。剥夺了忽必烈的兵权，并对他所管的河南、陕西民政、财政进行审查。在与忽必烈的矛盾暂告缓和后，迫于右翼统帅塔察儿军失利，才又命忽必烈统右翼军。九年（1259），蒙哥死于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下，蒙古国再一次出现了汗位空缺。此时，术赤、察合台兀鲁思同大蒙古国的离心倾向逐渐增强，窝阔台后裔的力量严重削弱，未来的一场汗位争夺战将在拖雷诸子间展开。

拖雷正妻唆鲁和帖尼在世的三个儿子以忽必烈为长，时正在征南宋东路军中；旭烈兀为次，在征叙利亚、伊拉克军中；幼子阿里不哥在都城和林。在蒙哥与忽必烈的矛盾冲突中，阿里不哥与蒙哥政见一致，因而蒙哥亲征前，让阿里不哥统率留下的军队和斡耳朵，把兀鲁思交给了他，并把自己的一个儿子玉龙答失留在他那里。于是，在拖雷家族中便形成了以阿里不哥和忽必烈为首的两派政治势力，作为蒙哥在朝中的代表，在汗位的争夺上阿里不哥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此时的忽必烈

已羽翼丰满，特别是他身边聚集了一批具有丰富统治汉地经验的儒臣，并得到了一部分握有兵权的以史天泽为代表的汉人世侯的支持，他们的支持也就意味着他还有以汉地财富为后盾的雄厚的经济实力。儒臣们既已选定忽必烈为其政治代表，就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参与这次最高统治权的争夺，并给这次汗位之争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色彩。

蒙哥死讯传来，漠北的阿里不哥和驻军鄂州（今湖北武昌）的忽必烈都积极进行争夺汗位的活动。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们以居守和林的优越地位，以监国和忽里勒台召集者的身份，向四方遣使，发布敕令，要求诸王、那颜们到斡难、怯绿连之地，为蒙哥举哀发丧并参加忽里勒台；命脱里赤为断事官，行省事于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并括漠南诸道兵；命阿兰答儿乘传调兵，浑都海出兵据关陇，刘太平、霍鲁海（霍鲁怀）办集粮饷，图谋秦蜀，以形成有利形势，钳制忽必烈。

九月，忽必烈自末哥（木哥、穆哥，拖雷第八子）所遣使者处得知蒙哥病逝的消息，坚持挥军渡江，进围鄂州；同时遣大将霸都鲁（拔都突儿，木华黎孙）趋岳州，接应自云南北上的兀良哈台。这时，宋将吕文德自重庆援鄂，宋军城守益坚。十一月，忽必烈妻察必遣使军中，密报阿里不哥所为，要求忽必烈速回。忽必烈立即召集诸将，商讨对策。郝经上《班师议》，建议"断然班师，亟定大计，销祸于未然。先命劲兵把截江面，与宋议和，许割淮南、汉上、梓夔两路，定疆界岁币。置辎重，以轻骑归，渡淮乘驿，直造燕都，则从天而降，彼（指阿里不哥）之奸谋逆志，冰释瓦解。遣一军逆蒙哥罕灵舆，收皇帝玺。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末哥及诸王驸马，会丧和林。差官于汴京、京兆、成都、西凉、东平、西京、北

京，抚慰安辑，召真金太子镇燕都，示以形势。则大宝有归，而社稷安矣”①。忽必烈采纳了郝经的建议。恰值此时，南宋权臣贾似道因不敢与蒙古军交锋而遣幕客宋京前来约和，“愿割江为界，且岁奉银、绢匹两各二十万”②。所提条件大大超出忽必烈的期望，于是忽必烈立即与贾似道约和，以霸都鲁、兀良哈台率部分军队留驻前线，自己与塔察儿、合丹、也松格等各军北归。

至南京（今河南开封），得到了阿里不哥谋取汗位的确切消息，他向阿里不哥派出了急使，要求他将所抽调的军队还给诸将，并准备好交通工具、粮食、武器，结束南征。同时，他又向驻在燕京的阿里不哥代表脱里赤和驻守鄂州的霸都鲁遣使，要求脱里赤遣使前来，向他们表示了同阿里不哥间的误会已经解除；令霸都鲁立即撤军，回到自己身边。以增加自己的军力。这年，忽必烈在燕京驻冬。

1260年夏，阿里不哥遣使要求各宗王前往参加忽里勒台推选大汗，忽必烈身边的宗王塔察儿、也松格（成吉思汗弟拙赤合撒儿的儿子）、纳邻合丹（小合丹，宗王）借故不赴。阿里不哥却在部分宗王的拥戴下即位和林。他们中有哈剌旭烈（察合台孙）的妻子兀鲁忽乃，蒙哥的儿子阿速带、玉龙答失，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之子），塔察儿的儿子乃蛮台、赤因帖木儿（只必帖木儿？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儿子）之弟也速（只必帖木儿之兄也速不花？或只必帖木儿堂兄弟、窝阔台第六子合丹之子也速儿?），合丹（窝阔台第六子）的儿子忽鲁迷失和纳臣、斡儿答（术赤长子）的儿子合剌察儿和别勒古台的一个儿子，旭烈兀的儿子术木忽儿（主木忽儿、玉木忽儿）。那颜和将领中有蒙哥时期的大必阇赤孛鲁合、蒙

哥与阿里不哥的亲信阿兰答儿、脱里赤。驻守六盘山的大将浑都海、驻守成都的部属密里火者（明里火者、密里霍者）和驻守东川的乞台不花等也支持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向各方派出急使，宣称自己已被推举为大汗。

但是，他的即位没有得到忽必烈支持者的认可，他们拦截了使者，并在开平召开了另一次忽里勒台，参加者有东道诸王塔察儿、也松格、忽剌忽儿（哈赤温孙）、爪都（别勒古台孙），西道诸王也可合丹（大合丹，窝阔台第六子）、阿只吉（察合台之孙不里的儿子）等，那颜、将领则有木华黎国王的孙子霸都鲁，速不台的儿子兀良哈台，弘吉剌部驸马按陈，亦乞列思部驸马帖里该和右翼的全体那颜。忽必烈的支持者廉希宪利用塔察儿因兵败遭蒙哥谴责的不满情绪，游说塔察儿，利用塔察儿的影响和威望，提名推举，这次忽里勒台将大汗继承权赋与了忽必烈。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③。

为了南下与其兄争夺天下，阿里不哥“分遣腹心，易置诸将”④，对汉地的军事、行政都重新进行了部署，命刘太平、霍鲁海行省事于关右，收关中诸处钱谷，控制关陇，接应川蜀。将军队指挥权交给亲信阿兰答儿，部署兵分两路进取燕京。令浑都海仍驻六盘并与两川诸将联系；遣阿兰答儿自和林趋凉州，与浑都海配合，意在收集蒙哥旧部，控制河西，占据关陇，东出山、陕，自西路进兵燕京；遣其子玉木忽儿和术赤子合剌察儿率领东路，出和林渡漠进犯开平、燕京。

针对阿里不哥的军事、行政部署，忽必烈也采取了相应措施，他派八春、廉希宪、商挺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粘合南合、张启元为西京等处宣抚使，与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浑都海、霍鲁海、刘太平争夺陕西、四川，并阻止两川支持阿里不哥的

军队东进；派合丹、合必赤、汪良臣等增援八春。派也松格等为东路先锋出兵阻击玉木忽儿。同时，自燕京、西京（今山西大同）、北京（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运米至开平、抚州、净州（内蒙古四子王旗）、鱼儿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以备军储。

廉希宪等晚于刘太平二日入京兆，他一方面“大集官吏，宣示诏旨”，安辑城内，一方面“遣人驰往六盘山，宣谕安抚”⑤。蒙哥死后，其子阿速带扶柩护玺返回漠北，大部分军队由大将哈剌不花率领退屯六盘山与驻守在那里的浑都海会合。留守四川的蒙古军统帅纽邻部下的奥鲁官和副将乞台不花与六盘浑都海联系密切，驻守成都的密里火者也是他的同党。希宪派往六盘的使者被杀，浑都海等已约日进兵。在面对强敌的严峻形势下，希宪遣万户刘黑马逮捕刘太平、霍鲁海，入川杀密里火者于成都，令总帅汪惟正杀乞台不花于青居。征秦巩平凉等处诸军，以所佩虎符银印授汪良臣，使统诸军备六盘，以六盘兵精，戒八春、汪良臣“毋与争锋，但张吾军声”，阻止浑都海兵东进，以待援军。同时宽宥被俘的西川奥鲁官，收其军为己用。

八月，阿兰答儿与浑都海军合，南军诸将首战失利。后合丹、合必赤与八春、汪良臣等合兵再战于平凉，大胜，俘斩阿兰答儿、浑都海。东路也松格也败北军先锋玉木忽儿。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逃往谦谦州（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南），南军占领和林。

为了休养士马，阿里不哥向忽必烈请降，表示在秋高马肥后入觐，得到允准。中统二年（1261）秋，他提兵南下，声称前来投降，却突然袭击了边将也松哥，占领了和林，并派兵南

向骚扰漠南，忽必烈再次亲征。他紧急调动军队，宗王塔察儿、合丹，驸马按陈、帖里该和汉将史天泽等同行。大军与阿里不哥遇于昔木土脑儿，塔察儿与合丹、合必赤等分兵奋击，先败阿里不哥所部的斡亦剌军，杀其将合丹，追北五十余里，阿里不哥败退。由于忽必烈没有穷追溃逃的阿里不哥，使他们误认为南军已经撤退，于是后军统帅蒙哥之子阿速带与阿里不哥商量后率军继进，与忽必烈中军相遇，忽必烈亲自督战，丞相线真将右军，史天泽将左军，合势进逼，左翼史天泽军大败北军右翼；右翼线真军与北军杀伤相当，不分胜负，激战后各自撤军。此后，忽必烈命塔察儿率军北上，而以蒙古、汉军分守居庸、古北诸关口。

在争夺漠南的同时，两兄弟也都力争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忽必烈派察合台曾孙阿必合失（木秃坚孙，不里子）回封地主持兀鲁思事务，他与其兄弟同行，在漠北为阿里不哥逻卒擒获，被杀。阿里不哥另派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子拜答儿的儿子）主持其祖父封地的事务，并要求他提供粮食和武器，守卫质浑河边界，阻止旭烈兀、别儿哥派军增援忽必烈。同时遣使至察合台兀鲁思境内征调军需，使者在短期内征调了大批牲畜、马匹和武器。

受阿里不哥支持夺得了察合台兀鲁思统治权的阿鲁忽，在控制了察合台封地全境后，不愿再听命于阿里不哥。他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牧畜、武器和钱物，宣布拥护忽必烈。旭烈兀也倾向忽必烈，并遣使责备阿里不哥。于是他们对各自控制区的统治权也得到了忽必烈的认可。

阿鲁忽的背叛令阿里不哥极为愤怒，于是他率兵攻打阿鲁忽。阿鲁忽在不剌城击败阿里不哥的先锋军并杀其先锋哈剌不

花后，回到伊犁河，驻在自己的斡耳朵并遣散了军队。阿里不哥后军继至；夺取并洗劫了伊犁河和阿力麻里，阿鲁忽退至忽炭（今新疆和田）和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噶尔）。阿里不哥在伊犁河和阿力麻里地区驻冬，他无节制地宴饮和寻欢作乐，残酷地掠夺和杀害军民，激起了当地人民和属下将领的不满，一些追随者开始脱离他。旭烈兀的儿子玉木忽儿借口有病，首先离开，接着蒙哥之子玉龙答失、阿里不哥的一些千户长也陆续脱离他投降了忽必烈。

在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力衰弱之际，阿鲁忽也出兵攻打他，使他无法在那里立足。忽必烈则乘机北上收复了和林，正当他准备前去追袭阿里不哥时，汉地发生了军阀李璮的叛乱，忽必烈匆忙撤军。此后，南军封锁了通往阿里不哥驻地的交通，由于那里的粮食、物品都依靠汉地供给，阿里不哥处供给发生了困难，物价飞涨，加之连年饥荒，物资极度匮乏，阿里不哥陷入了困境。中统五年（八月改至元，1264）七月，走投无路的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前往开平觐见。

按照惯例，“罪人的肩上要披上大帐的门帘接见，他也就这样地披盖着去觐见（君主）”。忽必烈问阿里不哥：“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阿里不哥回答：“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都流下了眼泪。当时，有旭烈兀的使者在场，他把兄弟两相见的情况报告了旭烈兀，旭烈兀对忽必烈以这样的方式接见本家族的人表示不满，认为这“使宗亲蒙受了耻辱”，忽必烈也承认自己做得没有礼貌。此后，他有整整一年的时间没有让阿里不哥去见他。

第二天，忽必烈命宗王和那颜们审讯阿里不哥的同党。开

始，阿里不哥说："他们无罪，我是这场广泛蔓延的罪行的根源。"但是，没有人理睬他的话。忽必烈问他："谁唆使你起来作乱的？"他供认是孛鲁合、阿兰答儿和脱里赤。忽必烈打算宽宥孛鲁合，因为他曾听到过窝阔台合罕和蒙哥合罕的话；而就这场汗位争夺的有关情况，他还可以在旭烈兀和其他宗王面前作证。但是阿速带反对宽恕孛鲁合，他表示要同孛鲁合对质，并揭发说，孛鲁合曾讲过一个蒙古寓言，大意是说，他们做了事，就不能半途而废，必须勇往直前。情况被报告给忽必烈。孛鲁合被处死。跟随阿里不哥的那颜有十人被处死。窝阔台系诸王被遣送回到他们的封地。

对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的审讯，则需等诸汗国君主旭烈兀、别儿哥和阿鲁忽的到来。只是他们迟迟不到，于是忽必烈与身边的塔察儿等宗王审讯了他们，并向全国各地颁发了圣旨。他向术赤、窝阔台、察合台汗国派出了急使，通知他们说："由于路途遥远，事情繁多，你们未能出席，但若继续拖延（审讯），可能会使（政权）削弱，并使国家边疆事务受到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我们处死了他们的异密并审讯了他们二人。现在我们商议：我们，全体宗亲们，一致决定宽恕阿里不哥，赐他以自由，（并释放阿速带），你们对此以为如何？"这时，诸汗国君主都在忙于自己的事务，对大蒙古国本身问题的兴趣已经逐渐淡漠，钦察汗国君主别儿哥对使者说："合罕、旭烈兀和全体宗亲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一定在牛年（1265）出发，在虎年（1266）走完（全部）路程，在兔年（1267）和旭烈兀一同出席忽里勒台。"使者们报告了全部情况后，阿里不哥和阿速带获准觐见忽必烈。不久，阿里不哥病死，旭烈兀与别儿哥之间爆发了战争，也没能如约赴会。忽必

烈最终取得了对蒙古国的统治权，建号改元，并灭掉南宋统一了全国。其代价则是元朝对钦察、察合台和伊利汗国控制的削弱，它们从此走上了相对独立的道路。

注 释

①郝经《陵川集》卷三二《班师议》。

②《元史·赵璧传》。

③关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自的忽里勒台召开时间《史集》与《元史》记载不同，前者称阿里不哥即位在前，后者反之。此处从《史集》。

④⑤《元朝名臣事略·平章廉文正王》。

元

世祖建元定制

成吉思汗至蒙哥时期，是元朝的前身，它的国号是“也客·忙豁勒·兀鲁思”，即“大蒙古国”。最高统治者的称号是“合罕”，或称“大汗”。“国家肇基朔方，辅相之臣与凡百执事惟上所命，其各官皆因其事而命之。方事征讨，重在军旅之事，故有万户、千户之目。而治政刑则有断事之官，可谓简要者矣”①。随着对外的征伐，大蒙古国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新征服地区的政治背景、经济、文化与蒙古草原不同，统治方式、机构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

蒙古国建立时，在草原地区实行分封制，自大汗至诸王、千户，各有本部的游牧范围。千户是政治、经济、军事三位一体的社会组织，是国家的基层行政单位。其长官千户长既是行政长官，也是本单位的军事首脑。他们平时组织本千户的生产，管理本千户的行政事务，战时，应大汗的征召率领本千户的军士出征。

大汗任命了左、右手和中军三个万户长，他们代表大汗管理东至哈剌温山（今大兴安岭），西至按台山（今阿尔泰山）

的诸千户。

大汗、诸王之外，最重要的长官是大断事官（札鲁忽赤，或译作札鲁火赤、札鲁花赤），为国家最高行政司法长官。成吉思汗时期，以塔塔儿人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主持分封千户。有诉讼纠纷，由他处理，并写在青册上，一经大汗认可，便具有了法律效力，成为以后断案的依据。窝阔台时期，他以大断事官的身份，编籍中原户口，为诸王功臣划分封地，被汉人称为“丞相”。蒙哥时期，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忙哥撒儿曾以酷刑鞫讯反对蒙哥的窝阔台系那颜、将领。

怯薛作为护卫士常常被大汗派遣出使，传达大汗旨意或处理重大事务，怯薛长官作为大汗的内臣可参与军政事务的管理。怯薛百执事实际上承担着大蒙古国初期中央机构的行政职能。西征期间，在被征服地区设置监临官，称达鲁花赤。达鲁花赤，蒙古语，意为镇守者。“征金战争中，成吉思汗曾任命西域人札八儿火者为黄河以北铁门关以南达鲁花赤。蒙哥西征，占领欧亚大片土地，在重要地区和城镇，都设置达鲁花赤”②。“金人来归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帅，则以行省、元帅授之”③。

窝阔台时期，中原的治理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在契丹人耶律楚材主持下，有了汉制中书省的建置，《元史·太宗纪》载：三年八月，“始立中书省，改侍从官名。以耶律楚材为中书令，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但当时的所谓中书令，不过是协助大断事官按只斛处理汉地事务的必阇赤。故陈邦瞻说“丞相谓之大必阇赤”。在地方治理上，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建立了十路征收课税所，以汉人儒士为课税使。尽管蒙古统治者和汉族儒士（包括耶律楚材在内）对中书令、课

税使的职责、地位理解、认识不同，但汉制却开始渗入大蒙古国的体制之中。

蒙哥时期，标榜“遵祖宗之法，不蹈袭他国所为”，国家统治体制没有大的变化。但忽必烈在漠北王府和受命管理漠南军国庶事期间，广泛接触汉地儒臣，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构想已逐渐形成。故世祖时期，在汉族儒臣的协助下，将立纲陈纪，完善统治机构，确立统治制度，作为政权建设的大事，从而确立了有元一代之治规。

忽必烈即位后，首先依中原王朝的成宪，制定年号，定1260年为中统元年。在《建元诏书》中指出：“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之义。”改变了以往蒙古大汗不建年号，仅以十二生肖纪年的状况。至元八年(1271)，又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诏称“绍百王而纪统”，表明忽必烈将大蒙古国看成是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继承，是尧舜禹汤和秦汉隋唐的继续。建号改元是国家的根本大事，忽必烈在依汉法治理天下的路线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即位之初，以开平为京师。而统治重心却在逐渐向燕京转移。早在忽必烈为藩王时，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曾提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④

在建号改元的同时，忽必烈也开始利用汉族儒臣为其制定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的统治制度。忽必烈时期统治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是经过长期酝酿准备的。早在为藩王时，在藩邸诸臣的影响下，忽必烈以儒术治国思想就已经形成。在其即位和

建元诏书中提出的“祖述变通”，即“稽烈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就是他设官定制的原则和纲领。所谓“祖述”、“稽烈圣之治规”，就是继承成吉思汗以来的祖制。“变通”、“讲前代之定制”就是改行中原王朝的汉制仪文。这也是儒臣们对政权建设在忽必烈面前反复陈述的政治见解。郝经在其《立政议》中指出：“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典故，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成一王法。”⑤许衡在其奏疏中提出：“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然可考。使国家而居朔漠，则无事论此也。今日之治，非此奚宜？夫陆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⑥具体地讲，就是要求忽必烈依北魏、辽、金的模式，借鉴前代的经验，建立一套既符合蒙古的社会背景、经济状况和习俗法规，又吸收中原王朝二千年来积累的统治经验和封建统治制度，制定适合于汉地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统治制度。这是忽必烈时期改定官制的原则和指导思想。

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开平后，“立中书省，以王文统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⑦。中书省下吏、户、礼合为一部，称左三部；兵、刑、工合为一部，称右三部。这显然是参考金制和根据当时实际需要确定的。不久，燕京行中书省并入中书。此后定制，以皇太子行中书令，下设右、左丞相各一员，平章政事四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蒙古人尚右，故以右丞相、右丞居上。自中书令至参知政事皆称“宰执”。六部则各设尚书三员，侍郎二员。

管军的机构枢密院是在平定李璮之乱后设置的。鉴于“诸

侯尽专兵民之权的弊害，忽必烈采取断然措施，罢世侯，置牧守，军民分职"，中统三年（1262），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⑧四年（1263）五月，"初立枢密院，以皇子燕王为中书令，兼判枢密院事。"掌天下兵甲机密之务。除四怯薛由皇帝或其亲信节制外，"凡宫禁宿卫，边庭军翼，征讨戍守，简阅差遣，举功转官，节制调度，无不由之"⑨。初置枢密使一员（由太子兼任），副使二员，佥书枢密院事一员。至元七年（1270），在副使之上置同知枢密院事一员，佥书之下置院判一员。二十八年（1291），又置知院一员，增院判一员，并以中书平章商量院事。四怯薛各出代表一员，参与院议。

至元五年（1268），立御史台，"掌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设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史、治书侍御史各二员。御史台直属机构有殿前司、察院，还有内八道肃政廉访司。"凡大朝会，百官班序"由殿前司掌握，"其失仪失列，则纠罚之"；"在京百官到任假告事故，出三日不报者，则纠举之；大臣入内奏事，则随以入，凡不可与闻之人，则纠避之"⑩。肃政廉访司初名提刑按察司，承自金朝的按察司，作为地方监察机构，元初被纳入御史台系统。其巡察地区分为跨地区甚至跨行省的诸道。分别隶属于中央御史台或行御史台。行台是中央御史台的派出机构，元代曾在陕西、云南、江浙等地设置。

元廷对宗室诸王赏赐无度，对外征伐频数，国家用度浩繁，而以理财助国为施政中心，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至大二年至三年（1270—1273、1287—1291、1309—1310）三次设立尚书省综理财用，六部、行省皆隶尚书。在尚书省存在期间，中书形同虚设。

此外，也有大司农司、翰林国史院、集贤院、宣徽院等承自前代的机构。

在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分管政务、军旅和监察之外，在元朝中央，还有与之平行的掌管蒙古、回回和藏地事务的机构。其中包括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掌管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掌管也里可温（基督教和基督教徒）的崇福寺；掌管藏地事务的宣政院等。国初的札鲁忽赤，随着国家统治机构的完备，则转变为专掌皇族政刑的官员，而以大宗正府为其办事机构。与历代大宗正府不同的是“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的蒙古、色目人刑名词讼等事，时而兼治汉人刑名”⑪。大汗后妃所居的斡耳朵官属，则相当于辽朝的宫官。怯薛又是与五卫亲军制并行的大汗禁卫军和直属部队。

地方行政机构是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人认为：“国制，中书总庶政，是为都省。幅员际天，机务日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晋有行台，齐隋所管置外州称行台尚书省，唐以诸道事繁，准齐分置，今行省，其遣制也。”⑫其实，元朝的行中书省乃是承自金末的行尚书省。金朝后期，为抵御蒙古的军事需要，在河北、山东、陕西等地遍置行省，作为尚书省的派出机构，以宰执主持抗蒙事宜，以加重事权。它是一种临时建置。成吉思汗南下时，对降蒙的金朝故官、将领，常以原官授之。同时，也采用了金朝行省的官称。此后，凡有征伐之役、分任军民之事，往往称行省或行台，初无定制，迭为废置。

中统元年，世祖立十路宣抚司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同时，也以中书省官行某处省事的官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设立了一些行省机构。大约在至元二十年左右，以宰执行

某处省事系衔嫌于外重，于是乃改为某处行中书省平章或右丞、左丞、参知政事，而不再以都省官系衔。行省遂从都省的派出机构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因中央尚书省之设，行中书省又曾两度改为行尚书省。

至元二十七年（1290），元廷在全国范围调整行省建制，除中书省直辖的山东、山西、河北等地（腹里）外，在全国设立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个行省。行省"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为表里"⑬。行省设丞相一员，平章二员，右、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二员，于地方"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行省下分设路、府、州、县。

路置总管府，长官为达鲁花赤、总管，又有同知、治中、判官等。至元二十年定制，十万户以上或虽不及十万而地当冲要者为上路，以下者为下路。

府有直隶都省和隶行省或宣慰司的不同，也有统州县与不统的差异。府设达鲁花赤和知府或府尹。

州县也以户口多少为差等。至元二十年，定五万户以上者为上州，三万户以上者为中州，不及万者为下州。上州置从四品达鲁花赤、州尹，六品同知和七品判官；中州置正五品达鲁花赤、知州，从六品同知和从七品判官；下州置从五品达鲁花赤、知州，正七品同知和正八品判官。

三万户以上者为上县，一万户以上者为中县，一万户以下者为下县。上县秩从六品，有达鲁花赤、尹、丞、簿、尉各一员；中县秩正七品，不置丞；下县秩从七品。

此外，在远离行省中心的地区，又置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统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

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其次则只为元帅府”。宣慰司置使、同知、副使、经历、都事等。“其在远服，又有招讨、安抚、宣抚等使，品秩员数，各有等差”⑭。

蒙古统治者最重军事，元朝的军制却最为混乱。时人记载：“本朝最偏重者无若军政，最纷乱者无若军政，”“大无纲纪，细无纪目……分隶频碎，源委隔绝，棼丝沸羹，互相争夺。内立枢府兵部，无簿籍之可寻；外设行省、统军万户府，无一定之行伍。”⑮至于军队的数目，元朝官员中了解者也为数极少。当时，“天下军马总数目，皇帝知道，院官（指枢密院官）里头为头的蒙古官人知道；外处行省里头军马数目，为头的蒙古省官每知道”。“更这边关机密，不合交多人每知道”⑯。

早期，大蒙古国的军队除大汗的怯薛外，有诸王、驸马、功臣、千户的属民所组成的军队。凡有征伐，依大汗的征调出兵。如拔都西征、旭烈兀西征、忽必烈征大理等役，都由东西道诸王派子弟和属下军士参战。而攻坚和镇戍各占领地区，又有探马赤。随着征服范围的扩大，各被占领地区的男丁也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来源，故有汉军、新附军（由南宋降军改编的军队）等名目。

按兵种分则有骑兵、步兵、水军、炮手军等类。

元朝的军事防卫可分为两大系统：保卫皇帝和京畿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

早期，大汗的宿卫由怯薛负责。世祖时，建立侍卫亲军，而怯薛之制不废。中统元年，“谕诸路管军万户，有旧从万户三哥（指史天泽）西征军人，悉遣至京师（开平）充防城军”⑰和“征诸道兵六千五百赴京师宿卫”⑱之事，可能是忽必烈

创建侍卫军之始。二年（1261），任董文炳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三年（1262），命董文炳共领武卫军事。至元元年（1264），武卫军正式改为侍卫亲军，八年，亲军扩充为左、右、中三卫。到至元末，忽必烈共设置过侍卫亲军三十余卫。侍卫亲军设都指挥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侍卫亲军由蒙古、汉军和新附军组成，迁入内地的色目人，如康里、阿速、钦察等后来也有被编入侍卫亲军者。

蒙古、探马赤军的防卫重点，主要是腹里地区，南至河南淮北，北至辽东以及西北、四川等地。淮河以南的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和新附军镇戍。

此外，忽必烈即位后，与西北诸王的军事对抗日益激烈，南方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此起彼伏，为控扼边徼禁喉之地，常遣皇子镇守边境。如北平王那木罕镇守阿力麻里、和林，宁远王阔阔出镇守漠北，安西王忙哥剌镇守京兆和察罕脑儿，西平王奥鲁赤镇守吐蕃，云南王忽哥赤镇守云南等。

诸王、公主和功臣在汉地的分地，是封建制早期的领主制，建立在封建地主制经济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地区的分封制不能不受环境的影响而有所变通。耶律楚材在太宗朝提出的五户丝制的实质就是由地方政权机构州县行使治理权，而由国家将封地内的部分税收颁赐给领主。太宗朝由于种种干扰未能认真贯彻执行，至世祖定制后，封地分别被纳入州县，原则上由地方政权机构管理，领主得自选任达鲁花赤监临。诸王则可由皇帝批准置王府，王傅由朝廷指派。漠北诸王封地则由诸王自治，而统以岭北行省。

注 释

①《元文类》卷四〇《经世大典序录·官制》。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元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

③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

④《元史·木华黎附霸突鲁传》。

⑤《陵川集》。

⑥《元史·许衡传》。

⑦《元史·世祖纪》。

⑧参见《元史·世祖纪二》。

⑨⑩《元史·百官二》。

⑪《元朝史》。

⑫许有壬《圭塘小稿》卷八《河南省左右赞治堂记》。

⑬⑭《元史·百官七》。

⑮胡祗《紫山集》卷二二《军政》。

⑯《永乐大典》卷二六〇八《宪台通纪·照刷枢密院文件》。

⑰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

⑱《元史·世祖纪一》。

元

李璮之乱

李璮小字松寿，是金末红袄军首领李全和杨妙真之子（一说为其养子）。金末红袄军领袖杨安儿、刘二祖和郝定等先后牺牲，余部由杨安儿之妹（一说为其女）杨妙真统领。另一红袄军首领李全与妙真结为夫妇，队伍逐渐恢复壮大。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李全降宋，驻军楚州，受宋封为东京路总管。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宋理宗宝庆二年，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北上，攻占并进驻益都。李全在益都被蒙古军围困一年，兵败后投降，被任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他在蒙宋间朝秦暮楚，降蒙以换取立足之地，依宋以取得粮饷资助。“得专制山东，而岁献金帛”，“外恭顺于宋以就钱粮，往往贸货输大元”①。同时借蒙古军声威南下攻宋，扩展自己的势力。太宗二年（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占领楚州，南攻泰州，突袭扬州，不下。次年在围攻扬州时被宋军袭杀，杨妙真北归，余众降金。

李全死后，其子李璮袭为益都行省，仍专制山东。他完全继承乃父故技，假名攻宋，取得蒙古的粮饷和官爵，却坐镇山

东，发展个人势力，“尽专兵民之权”②。1258年宪宗南征，向他征兵，他却以“益都南北要冲，兵不可撤”为由③，拒不出兵，同时攻取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市东南）、涟水（今属江苏），“大张克捷之功”④，以攫取军赏，借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李璮果然加封江淮大都督。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给他带来了扩张实力的机会，他谎报军情，张大宋军之势以相要挟，乘机骗取粮饷，修缮城堑，自请“节制诸道所集兵马，且请给兵器”，扩大军权。“盖璮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其前后所奏凡数十事，皆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缮益兵计，其谋亦深矣”⑤。

中统二年（126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事进入紧张阶段，大兵集中在北征前线，内地兵力空虚，李璮更加紧锣密鼓策划叛乱。忽必烈对李璮的阴谋虽有所觉察，因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胜负未分，北方形势严峻，对他也只好暂时容忍，寄希望于叛乱能延缓发生。

李璮岳父王文统为忽必烈平章政事，能随时了解朝廷动向；一妻为东道宗王塔察儿之妹，与蒙古贵族联系交往亦深。惟一子彦简，为质子住京师质子营，使其不能不有所顾忌。自京师至益都有李璮所置私驿，中统三年（1262）正月，彦简乘私驿逃归，李璮更无后顾之忧。

二月，璮献涟、海等三城于宋，乘蒙古军无备，起兵叛元，尽杀蒙古戍军，攻占益都，发府库犒军，并迅速占领济南。此时，北方战事转而对忽必烈有利，阿里不哥与察合台汗阿鲁忽发生矛盾，并亲率大军前往讨伐阿鲁忽，正当南军准备追袭阿里不哥时，李璮叛乱的消息传至，忽必烈不得不急撤追袭阿里不哥之兵，发蒙古、汉军，部署平叛。

忽必烈请姚枢分析形势，枢称“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⑥。并断定李璮将出下策。忽必烈在布署平叛时，重点也是防止李璮兵出山东至河北、燕地，阻止其采用上策。他命水军万户解成（解诚）、张荣实、大名万户王文干及万户严忠范会东平，济南万户张宏、归德万户邸浃、武卫军炮手元帅薛军胜等会滨棣。诏济南路军民万户张宏、滨棣路安抚使韩世安，各修城堑，尽发管内民为兵以备。召张柔及其子弘范率兵二千诣京师。阻止叛军自鲁西和海上进军河北。令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以不只爱不干及赵璧行中书省事于山东，宋子贞参议行中书省事。令真定、顺天、河间、平滦、大名、洺州、河南诸路兵皆会济南。待李璮出下策进入济南时，消灭叛军；以中书左丞阔阔、尚书怯烈门、宣抚游显行宣慰司于大名，统领洺、磁、怀孟、彰德、卫辉及河南东西两路军，阻止叛军势穷向河南逃窜，与宋连和。敕元帅阿海分兵戍平滦、海口及东京、广宁、懿州，备御任平州总管的李璮之子，阻止父子连兵或取海路逃入辽东，将他的势力围困在山东一地。同时，放弃息州（今河南息县），迁其民至蔡州，令戍守息州的蒙古将领拔都抹台率戍兵趋济南，加强平叛兵力。令东平万户严忠范留少量兵力戍守宿州（今安徽宿州市）、蕲县，以余兵自随加强东平防卫。及至得王文统参与策划叛乱的实证后，诛王文统及其子荛，以赵璧为平章政事。

不出姚枢所料，李璮果出下策。二月二十七日，李璮抵济南，初获小胜，后为阿术所统蒙古军和史枢所统汉军击败，被歼四千人，遂退保济南。

蒙古军离城三十里开河筑城，凡三河三城，以十七路兵马将济南团团围定。自此，李璮军与外界联系断绝，叛军不得出，犹日夜拒守。李璮“取城中子女赏军士，以悦其心；且分军就食民家，发其盖藏以继，不足，则家赋之盐，令以人为食”⑦。六月，城中食尽，甚至截屋檐草拌盐饲马，即而屋檐草亦尽，将至人自相食。李璮情绪沮丧，终日昏昏沉沉，“军伍不备，将士作乱，以至绝粮，俱不能晓”⑧。七月十三日组织突围，军士已无力战斗，复被蒙古军杀入。于是，“人情溃散，……各什佰相结，缒城以出。”二十日，吩咐众人各自为计寻求生路，自乘小舟入大明湖投水，水浅不死，为官军所获，被丞相史天泽杀死。

李璮之乱的发生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和社会原因。在蒙金战争中，河北、河东的地主武装分成保金和投蒙两大部分。降蒙的武装地主在灭金战争中为蒙古统治者立下了不小的功勋，蒙古贵族一度依靠他们维持了在中原与金朝的相持局面，并取得了对金战争的优势。为了利用他们对抗金朝，蒙古贵族不惜以高官爵位笼络他们。凡对降蒙的金朝将领和地主武装，蒙古统治者一律“因其旧而令官”⑨，授与行省、领省、大元帅等职位，允许他们世袭领有本势力范围内的军民之权，从而形成了专制一方的强大割剧势力。这些乘乱而起的地方割据势力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在社会动荡时期，他们以武装力量为支柱，不论是对金、对宋还是对蒙古的态度，都取决于是否有利于发展个人势力。他们投靠蒙古贵族，也正是基于后者的军事力量较强，能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军事上的支持援助；并且能给他们更多的自主机会。他们同蒙古统治者间只存在互相利用的关系，他们的联合是建立在各自利

益基础之上的，因此他们对蒙古统治者的离心倾向是十分明显的；而在对金、宋的战争中，他们又各自发展了自己的实力，这就为他们拥兵自重甚至发动武装叛乱提供了可能。同时，他们同蒙古贵族间也存在着争夺土地、人口的利害冲突，因此一旦有机可乘，他们就背叛，李璮不过是他们中的典型和代表。这一点从事件的处理上也得到了反映。

祝允明所记李璮赴水未死为人救出被俘后，与严忠范和史天泽的一番对话即反映了当时一些汉人世侯的态度和动向。忠范首先向李璮发问说："此是何等做作?"李璮答称："你每（们）与我相约，却又不来。"严就在李璮肋下刺了一刀；史天泽问："何不投降?"李璮竟不予理睬。又问："忽必烈有甚亏你处?"李璮却说："你有文书约俺起兵，何故背盟?"于是史天泽命人砍去李璮两臂、两足，挖其心而后斩首。史天泽不待奏报而急不可待的杀死李璮，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宜即诛之，以安人心"[10]，其真实目的极有可能是杀人灭口。这就说明当时一些汉人武装地主对蒙古国的统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心倾向，只是在行动上有的谨慎、有的急切而已。

正是由于汉人世侯的这种态度和动向，才使李璮敢于贸然举兵叛乱。他错误地认为只要山东兵起，各路汉人世侯都会群起效法，大事可成而自己因首为天下倡而功必在诸侯上。但是，他没有估计到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战会在短期内发生有利于南军的转折，他更没有估计到汉人世侯中响应者寥寥无几。

由于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使者征调的军需，导致阿里不哥的西征，忽必烈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顿时减轻，他可以调动大量兵力全力平叛，李璮受到了强大的军事压力；汉人地主武

装只有太原总管李毅奴哥、达鲁花赤戴曲薛等响应，势孤力单，也被一举消灭。而史天泽、严忠范等则被派出讨叛，他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当然不会做叛军的应援。李璮所统军队虽然也有一定的战斗力，但人数有限，且脱离人民，内部也存在矛盾，无法与忽必烈的蒙汉联军对抗。叛乱仅维持了五个月就被平定了。

李璮的叛乱虽然时间不长，但给忽必烈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对蒙古国和元朝统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叛乱的筹划者之一王文统，充任中书平章的要职，深得忽必烈的信任，“总内外百司之政”，“委以更张庶务”，当忽必烈亲征阿里不哥时，“凡民间差发、宣课盐铁等事，一委文统裁处”，是掌握中央行政大权的实权人物。地方武装地主则多与李璮有交往，被李璮列为叛乱的联合力量，形势确实十分严峻。忽必烈在依靠汉人治理汉地的方针中最担心的一点——大权旁落的危险确实存在。这就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警惕。以往汉人儒士们在向忽必烈讲授儒家治国思想时，曾力诋回回商人横征暴敛、贪赃枉法之非，回回商人的势力受到了排斥。而今，李璮的叛乱给了他们一次东山再起的机会，于是他们纷纷伏阙上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这一切，都使忽必烈对汉臣、汉将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虽然他没有改变以汉法治理汉地的基本方针，但在用人行政上，对汉官的信任却有了更多的保留，在不得不利用汉官为其办理具体事务时，却在每一机关都分派一名蒙古正员监临，并配置一名权位相同的回回官员为同知进行防范和牵制。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至元二年，忽必烈正式颁布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的决定①。并在

至元五年，果断地罢去了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而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从此，回回人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增加，地位有所提高，中央的实权渐渐落入回回人阿合马手中，引起了后来元朝政局的一系列矛盾和倾轧。

李璮的叛乱增加了忽必烈对来自汉人世侯离心倾向的疑虑，鉴于北方黄金家族内部人心也十分不稳，忽必烈审慎地处理了与李璮事件相涉的人和事，“他总的原则是：在迫使这些地方军阀交出实权（特别是军队），消弭是以产生李璮一类叛乱的基础的前提下，既往不咎，而且根据情况与需要，继续任用以拉拢汉人官僚；同时，利用这一形势，因势利导，进行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⑫。

忽必烈加强中央集权的阻力除来自蒙古贵族的抵制外，也受到汉地割据势力的阻挠，李璮之乱的迅速彻底平定，为忽必烈解除汉人割据势力提供了契机。为了补救自己的失误，维护个人及其家庭的利益，表示对蒙古大汗的忠诚，汉人武装头目、丞相史天泽首先提出：“兵民之权，不可并居一门，行之请自臣家始。”⑬即日，史氏子侄解兵符者十有七人。其余如史氏的姻亲、武卫亲军指挥使李伯佑以及东平严氏（严忠济兄弟）、满城张氏（张柔父子）、济南张氏（张荣父子）等也效法史氏所为，忽必烈则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对前事既往不咎，对他们依然当成汉人地主阶级的代表而予以优容，既解除了他们的兵权，消除了叛乱的隐患，又安定了汉人官僚，稳定了人心，维持了蒙汉统治阶级的联合，并在此基础上，加快了改革的步伐。这次解决汉地地方势力的措施大致可归纳为六点：

（一）消除私家的权力，除本人外，罢其兄弟子侄之为官

者；除真定董氏（董文炳兄弟）外，一度解除了地方军阀的兵权。以后在灭南宋的战争中，史氏、张氏兄弟虽分别被任命将兵，但这时的军队已不再是他们的私人武装力量。

（二）严格执行地方的兵民分治制度。规定：管民官理民事，掌兵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这一点在太宗时耶律楚材早已提出过，但未能贯彻执行。至此，则首先在山东以董文炳领兵，撒吉思治民。其年十二月，作为定制在全国推行。

（三）罢诸侯世袭，行迁转法，消除割据的基础。

（四）易置将帅，使将不能擅兵。

（五）置万户府监战，选宿卫士监汉军。在中央设枢密院，作为总领军事的机关。

（六）取消汉人官僚的封邑。如史天泽原封于卫，自动申请归还朝廷；张柔、严忠济的封户，也于至元二年明命改为民籍。同时，加强中书省的权力，把司法、行政权集中到中央。

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认识到削夺汉人世侯军权的迫切性，并为实行中央集权的改革提供了条件，从而加速了忽必烈实行中央集权的步伐。汉地分离倾向的解决使忽必烈取得了经验，并能组织统一领导的武装力量，平定东、西道蒙古诸王的叛乱，为元朝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经验教训。

注 释

①《元史·李全传》。

②虞集《元帅张献武王庙碑》，见《元文类》卷二一。

③《元史·宪宗纪》。

④⑤《元史·李璮传》。

⑥《元文类》卷八《左丞姚文献公》。

⑦《元史·李璮传》。

⑧祝允明《前闻记》，载《纪录汇编》；参见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四期。

⑨《元典章》卷九《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⑩《元史·李璮传》。

⑪《元史·世祖纪三》。

⑫周良宵《李璮之乱与元初政治》。

⑬《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

元

上都兴废

上都，即忽必烈命刘秉忠所建的开平府。它建于滦河上游岸边。它的遗址已被发现，“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旗政府所在地黄旗大营子东北20公里处，是一座规模宏伟的古城遗址，城郭、街道和部分建筑的轮廓大体可辨”①。这座城市，背依连绵起伏的山冈，面临滦河，东西两面和滦河之南有广阔的草原。夏季，美丽的金莲花盛开，草原一片金黄。因而，在金元时期有金莲川的美名。在金朝，就被金世宗定为避暑的捺钵地。金莲川原名曷里浒川，金世宗大定八年（1268年），以其地盛产金莲，定名为金莲川②。其南是辽朝皇帝夏捺钵炭山，也称凉陉、陉头、王国崖（旺国崖）。大定八年，改名为静宁山。

忽必烈开府漠南时，夏季常驻这里。当时，这里没有城郭屋宇，依旧是设毡帐以居。当忽必烈广招天下耆儒硕德至藩府时，为了适应汉人城居的习惯，于宪宗六年（1256）命刘秉忠相地筑城。刘秉忠选定滦水北岸的龙冈建城，定名开平。

开平城的建造前后用了三年时间，第一年营宫室，第二年

修宫城。董其役者有真定藁城人董文炳，获鹿人贾居贞和丰州丰县人谢仲温。兴建时，首先要排干积水，故在民间留下了世祖向龙借地的神话传说③。

1260年，忽必烈召集他的拥戴者在这里召开了忽里勒台，他被推举为大汗，中央的办事机构也在开平理事，开平实际上已经成为忽必烈的都城。在平定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时，忽必烈除出征和进驻大都外，大部分时间驻跸开平。由于和林地理位置的偏北，物资转输的困难，诸叛王的袭扰，特别是统治重心的南移，决定了忽必烈放弃和林作为都城的地位，开平对他就更为重要了。

中统二年，燕京行中书省也奉命北迁开平，这里进一步成为忽必烈的政治中心和平定叛乱的基地，忽必烈已初步选定其为未来的都城。这一年十二月，"初立宫殿府，秩正四品，专职营缮"④。三年，将兴州（今河北省承德西）、松山州（今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和望云县（今河北赤城县西南）划归开平。并在燕京至开平途中置驿，以方便两地交通。

四年（1263）五月，升为上都⑤。明年（至元元年，1264），改燕京为中都，正式确立了两都制。上都处在蒙古草原南部，南下燕京有驿道沟通，既不嫌辽远，又便于同草原各部联系，对蒙古贵族统治草原地区和汉地都是十分适宜的。上都路东与辽阳行省毗邻，西以今太仆寺旗与兴和路分界，北面是弘吉剌部领主的应昌路和全宁路，南至古北口与大都路分界。辖一府六州十五县。境内居民既有游牧的蒙古部落，也有大量农业人口、工匠、商人和猎户。除历代斡耳朵和诸王投下户外，人口最多时达4万余户，11万余口。

"上都城由宫城、皇城、外城组成，皇城在全城的东南角，

宫城则在皇城的中部偏北。城外有关厢，离城不远有西内”⑥。

宫城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略成长方形。城墙用黄土板筑，四角有角楼，东、南、西各开一门。

宫城外25米处，有宽约1.5米的石砌夹墙，墙基仍在。沿夹墙外有一条环城街道。城外有一平坦的广场。宫城内分布着一些自成体系的建筑群，主要宫殿遗址有30余处。主要街道是通向三门的丁字大街。

宫城中的主要建筑物是大安阁。它是用拆毁宋汴京熙春阁的建筑材料，仿照熙春阁建造的。国家的重大典礼，多在这里举行。此外，见于记载的历代增修的殿阁尚有穆清阁、洪禧阁、水晶殿、香殿、宜文阁、睿思阁、仁春阁、鹿顶殿、歇山殿、崇寿殿、楠木殿、隆德殿、万安阁、清宁殿、统天阁等等。

时人描写宫城的景色称：“绿阑青草玉花骢，驯鹿游眠殿阁东”；“曲曲栏干兔鹿驯，雨肥绿草度青春”；“数树青榆延阁东，云窗霞户绮玲珑，上林文鹿高于马，时引黄麕碧草中”；“宫草葱茸拂槛青，苑中麀鹿自和鸣。云边仙子锵环佩，日暮君王幸穆清”。宫城之内，殿阁之旁，时有骏马、驯鹿、驯兔出没于碧草丛中，增添了宫城的闲逸气氛。并体现了上都行宫草原城市的特点和牧业生产的气息⑦。

上都的外城大体上呈正方形，每边长约2200米。现存遗址高约5米，下宽10米，上宽2米。皇城在外城的东南角，亦呈正方形，每边长约1400米，皇城的东南城是外城东南墙的一部分。墙身残高约6米，下宽12米，上宽2.5米。

皇城四角有高大的角楼台基，南北各开一门，东西各开二

门。外城东城的门就是皇城的东门。外城西开一门，北开二门，南面除皇城南门外，另有一门。皇城与外城的所有城门都筑有瓮城，有的为方形，有的为马蹄形。

皇城内街道宽窄不等，主次分明，相互对称。城内建有很多官署、寺院和手工业作坊。见于记载的有乾元、龙光、华严等寺以及孔子庙和老子宫等。皇城北面是皇家园林。

上都城的东、南、西都有关厢，东关长约 800 米，西关长约 1000 米，南关长约 600 米。宋本《上京杂咏》称："西关轮舆多似雨，东关帐房乱如云。"《元史·河渠志》有"大西关南马市口"的记载，可知西关有马市，或为商业区；东关近皇城，帐房错落，或为前来朝觐诸王安置部众的所在。

传说刘秉忠建城时，曾作法驱龙，并立铁幡竿镇之。上都城遗址西北哈灯台山发现一块长 2.1 米、宽 1.1 米、厚 0.6 米的白石条，石条一面正中并排凿有两个小洞，石条当是一种树竿座，可能是铁幡竿的座基。现在，铁幡竿已成为上都的名胜之一。

上都城外有离宫，称西内。有昔刺斡耳朵，又称棕殿、棕毛殿。昔刺，蒙古语，意为黄；斡耳朵即宫帐、营帐，昔刺斡耳朵即"黄色的营帐"。这里是元举行大宴的地方。此外，上都附近还有专供皇帝巡幸时打猎的场所三不剌和东、西两凉亭。

蒙古王公贵族大聚会时，要举行"诈马宴"，也称"只孙宴"。这是一种规模最大，费用最多，最为隆重的宴会。只孙，蒙古语，意为颜色。诈马，波斯语，意为外衣、衣服。凡有资格参加这种宴会的人，都有皇帝赐与的织金文衣。届时，他们必须按统一规定，穿上皇帝赐与的同种颜色的服装，按尊卑次

序就座。臣僚被赐只孙衣，能与只孙宴也是地位和荣誉的象征。汉官周伯琦对此有详细的记载⑧。

两都制确定后，忽必烈每年春夏至上都，秋冬回大都。上都虽为陪都，却因皇帝有半年时间驻跸于此，而具有实际上的政治地位。忽必烈行汉法后，遭到守旧派诸王的不满与反抗。但时势使然，不得不尔。为了更好地维护黄金家族的团结，进而巩固元朝的统治，忽必烈也必须充分照顾蒙古贵族的习惯和利益，上都是他加强对草原地区的统治和维系与蒙古贵族关系的渠道，这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保留了更多的草原文化特点和蒙古旧俗。

每年二、三月，皇帝驾幸上都，九月前后，返回大都。

在上都的政治活动主要有举行忽里勒台和正常的政事处理。忽里勒台的内容有公推大汗，举行大汗即位仪式，宣读先朝圣训，对诸王、公主和各部首领等进行赏赐，然后是大宴会(只孙宴)。

皇帝巡幸上都，中央机构的主要长官也需随驾，在上都继续辅佐皇帝，议理朝政。一些重要的衙属，在上都均设有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院上都分院等。“天子时巡上京，则宰执大臣下至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⑨。“各行省宣使并差官起解一应钱粮，常典至京又复驰驿上京飞报”⑩。

上都地区农业毕竟不甚发达，皇室、百官所需则仰赖大都转输与和籴，上都建有规模宏大的仓库万盈仓和广积仓，储粮不下三四十万石，足以供应上都官民所需。

为了保障上都与大都间的密切联系，元朝在两地间设有驿道，建有驿站。周伯琦说：“大抵两都相望，不满千里，往来

者有四道焉，曰驿路，曰东路二，曰西路。东路二者，一由黑谷，一由古北口。”“古北口路东道，御史按行处也”；黑谷辇路，“每岁扈从，皆国族大臣及环卫有执事者，若文臣仕至白首或终身不能一至其地也”⑪。

驿路全长约800余里，自大都建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出发，途经昌平县、新店、居庸关、榆林驿（今北京延庆县康庄附近榆林堡）、怀来县（今河北怀来县东，其地已为官厅水库淹没）、统墓店（今怀来县土木堡镇）、洪赞（今怀来县杏林堡南东、西洪赞）、枪杆岭（又称桑干岭，今长安岭）、李老谷—尖帽山（枪杆岭北10余里为李老谷，行经谷中，过谷后即可望见尖帽山）、龙门站—雕窠站（今长城南龙关、雕鹗堡）、赤城（今属河北）、云州（今属河北）、独石口、偏岭—担子洼（独石口西行40里至偏岭，为草原与谷地的分界）、牛群头（今河北沽源县南10余里）、察罕脑儿（意为白海，在今河北沽源县北数里）、李陵台（今正蓝旗西南的黑城子）、桓州、望都铺（或即南坡店，在上都西南约30余里），过滦河即达上都。此驿路又为岭北至大都官道的一段，岭北诸王朝会，使臣、官吏、军队往返，粮食和各类物资的转输，都需经此驿路。而因途中有枪杆岭，以俗传真龙天子不上枪杆，故皇帝决不走此路。

东道长750余里，设18处捺钵。出建德门，经大口（或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北境）、黄堠店、皂角、龙虎台（今昌平县西北辛店）、棒槌店（今居庸关北）、官山（今独山）、车坊（今北京市延庆县东）、黑谷（今名黑峪口）、色泽岭（今名佛爷菌）、程子头、颉家营、沙岭（当在今沽源县境丰元店附近）、失儿八秃（蒙古语，意为有泥淖，即牛群头）、郑谷店

(即察罕脑儿行宫纳钵)、泥河儿（明安驿纳钵)、双庙儿（李陵台驿纳钵)、南坡店（望都铺纳钵)。此为皇帝赴上都路线，寻常人不得由此路行，其两端与驿路相合诸地置有驿站，其余路程则只有纳钵而无需置驿。故官山至沙岭间无驿站。御史按行虽由东道，但与此略有不同，出京走顺州、檀州、古北口、宜兴州（今河北滦平县北兴州小城子)，沿滦河而上至东凉亭，达上都。

西路出京由大口、黄堠店、皂角、龙虎台、妫头、怀来、统墓、阻车（雷家店，今河北怀来西)、丰乐（今新保安附近)、鸡鸣山（在今河北怀来下花园南边)、宣德府（今河北宣化)、沙岭、得胜口（今河北张家口市东北宣平堡北 14 里)、野狐岭（今河北张家口西北膳房堡北)、兴和路（今河北张北县)、忽察秃（意为有山羊处，在张北西 20 里处)、回回柴（蒙古语名为忽鲁秃，意为有水泊，在内蒙古太仆寺旗宝昌境内)、苦水河儿、遮里哈剌（今河北张北安固里淖)、盖里泊（达里诺尔)、郑谷店、泥河儿、六十里店、南坡店，至上都。由于两都间有几条路沟通，联系密切，上都所需不乏。

皇帝巡幸时乘象舆（又称象辇)，即由四只大象驮负的大型木轿。轿上插有旌旗，外包狮子皮，内有金丝垫，每象有驭者一人。行至狭窄处，则独乘一象或乘坐由两象驮负的象辂。

皇帝出大都，择吉日起驾，大都百官送至大口；回銮，再至大口恭迎。

上都将蒙古草地与中原汉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京师大都。因而在元朝统治期间，这里发生了不少惊人心魄的政治事件。

至元四年，战败的阿里不哥在这里晋见其兄；十一年至十

六年，元朝灭宋的方略大都在这里制定；十三年，忽必烈在这里接受南宋少帝与太后的朝见；而在整个平定西北诸王的叛乱中，这里又是元军的大本营和军需供应基地；在这里，汉臣们不只一次弹劾过阿合马、卢世荣，桑哥则被处死于此地；成宗在这里战胜了乃兄甘麻剌登上了皇帝宝座；武宗处死了反对者当了皇帝；英宗在此被杀；文宗在此制定了谋杀其兄的计划。凡此种种，适足以证明其在元朝政治生活中地位之重要。

正因如此，终元之世，这里一直是"富夸塞北"的草原第一大城市。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红巾军北伐，关先生、破头潘、刘二等由大同进兵上都，"焚宫阙，留七日，转略往辽阳，遂至高丽"⑫。使这座积百年之力建起的城市及其殿阁化为灰烬。自此，宫阙残破，大驾不复时巡。顺帝北归后，曾一至上都，而所居却是"行殿"，足见上都建筑已被破坏无余。明、清两代，并未重加修葺，这里又变成了游牧的草场，使繁华一时的上都，空余"禾黍"之叹。

注　释

①陈高华、史为民《元上都》，吉林教育出版社，1988年。

②《金史·地理志上》桓州条下载，曷里浒东川，更名金莲川，世宗曰："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义也"。

③孔齐《至正直记》卷一、《上都避暑》称，相传刘太保迁都时，因地有龙池，不能干涸，乃奏世祖当借地于龙，帝从之。是夜三更雷震，龙已飞上矣。明日以土筑城基。

④《元史·世祖纪一》。

⑤《元史·世祖纪二》；《元史·地理志》载："五年，以阙庭所在，加号上都，岁一幸焉。"与本纪不同，此从本纪。

⑥参见《元上都》；贾州杰《元上都调查报告》，载《文物》1977年

第5期；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编《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2年。

⑦参见《元上都》，胡助《滦京杂泳十首》，杨允孚《滦京杂咏》，周伯琦《扈从上京宫学纪事绝句二十首》，郑彦昭《上京行幸词》等。

⑧周伯琦《近光集》卷一《诈马行》载：国家之制，乘舆北幸上京，岁以六月吉日命宿卫大臣及近侍服所赐济孙翠珠珍宝衣冠腰带，盛饰名马，清晨自城外各持彩杖，列队驰入禁中。于是，上盛服御殿临观，乃大张宴为乐，唯宗王、戚里、宿卫、大臣前列行酒、余各以所职叙坐合欢，诸坊奏大乐，陈百戏，如是者凡三日而罢。其佩服日一易。大官用羊二千，马三千，它费称是，称之曰济孙宴。济孙，华言一色衣也，俗呼曰诈马宴。

⑨黄缙《黄金华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

⑩《析津志辑佚·岁记》。

⑪周伯琦《扈从集·前序》。

⑫《元史·顺帝纪八》。

元

大都兴建

1215年，蒙古军占领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将金朝府库所积，全部运往漠北。城市遭到很大破坏。

蒙古占领之初，燕京的秩序很不稳定，官吏残暴，盗贼充斥，使臣征索百端，燕民甚以为苦。太宗时，虽曾用耶律楚材的建议，一度使秩序有所好转，但并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忽必烈开府漠南时，燕京的地位开始有了变化的转机。潜邸的儒臣们鼓动忽必烈将治理的重点转入中原，甚至一些蒙古贵族将领也支持这一主张。木华黎之孙霸突鲁就主张以燕京为大汗驻跸之所①。忽必烈即位后，郝经正式提出都燕的主张，理由是“燕都东控辽碣，西连三晋，背负关岭，瞰临河朔，南面以莅天下”②。

在与阿里不哥争夺天下的斗争中，燕京起了重要作用。蒙哥死后，阿里不哥及其支持者曾企图将燕京作为他们控制汉地的据点，派遣脱里赤为断事官，行尚书省，据燕京，按图籍，号令诸道。还在燕京周围地区大肆扩兵，准备阻挡忽必烈回军。忽必烈在当年年底赶回燕京，消除了阿里不哥的势力，控

制了这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稳定了汉地的形势。忽必烈在燕京住了几个月，作了必要的布置和准备，1260 年春，前往开平，纠集自己的拥护者举行了忽里勒台，建立了与阿里不哥对峙的大蒙古国政权，兄弟间爆发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依靠汉人臣僚、汉军和部分蒙古贵族将领的支持，以燕地丰富的物质资源为后盾，战胜了阿里不哥，取得了夺权斗争的胜利。为了控制漠北，他不能放弃开平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为了控制汉地，他同样也不能忽视燕京的作用。于是他把中央行政机构设在开平，在燕京设行中书省。中统四年（1263）改开平为上都，而以燕京为陪都。第二年（至元元年，1264），在中书省臣的要求下，改燕京为中都③。

忽必烈即位后，改变了太祖至蒙哥时期以漠北为统治中心的治国方针，开始逐步按汉制制定和完善官制，并大力经营都城。至元四年（1267），在中都东北建立新城。至元八年（1271），大蒙古国正式定国号为“大元”。第二年（1272），命中都新城名为大都，于是大都成为京师，而上都降为陪都。统治中心的南移引起了部分守旧派贵族的不满，他们遣使责问说：“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其故如何?”④忽必烈并未动摇，他遣使向他们解释，大都的建设仍旧按步就班地进行。

同上都一样，大都新城的建设也是逐步进行的。中统元年，“建两京殿宇，始置司以备工役”，所置祗应局，下设油漆局、书局、销金局、裱褙局等。二年，置修内司，“掌修建宫殿及大都造作等事”，下设大、小木局、泥厦局、车局、妆钉局、铜局、竹作局、绳局等；中统四年，色目人亦黑迭儿丁建议修治琼华岛。至元元年，又在修葺故宫建筑的基础上，决定

大规模建设新宫殿。

当时，最先修建的是广寒殿。它是在金朝离宫广寒殿的废墟上建造的。第二年（至元二年），命工匠制作了巨大的酒瓮——渎山大玉海，置于广寒殿。以此为起点，琼华岛上的工程陆续展开。

在重建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工程的同时，忽必烈也着手准备相地另建新城。新城址选定在旧城东北。参与设计、建造的除刘秉忠外，尚有赵秉温、张柔、张宏略、段桢，蒙古人野速不花，渤海人高觽和色目人亦黑迭儿丁。河北曲阳石工杨琼对大都的兴建也作出了贡献。他家世代为石工，他本人从小就学习雕石工艺，“能自出新意，人莫能及”⑤。他奉召参与大都兴建工程，负责管理石匠。城郭宫殿的许多石雕，都出自他手，灵星门内金水河上的三座石桥（周桥），就是由他设计建造的。

至元四年正月丁未（1267 年 2 月 14 日），新城正式破土动工。十三年（1276）完成，历时近 10 年。二十年（1283），城内的修建工程基本完成，元政府将旧城的衙门、商铺和税务机关迁入新城。二十一年（1284），建立了管理大都的机构留守司和大都路总管府。二十二年（1285），制定了旧城居民迁入新城的规定⑥，大规模的搬迁工作开始。

大都城呈南北略长的长方形，周围长约 28600 米。明营建北京城时，北墙南移，因此，大都城的北墙和东西墙的北段，均被废弃，现在，德胜门外尚保留有元代北墙的部分遗址。东、西两城的南段与明清两代北京城东、西墙一致，南墙约在今长安街南侧。城墙用夯土筑成，夯土中用“永定柱”（竖柱）和纴木（横木）加固，基部宽 24 米，城墙的基宽与高和顶宽的比例是 3:2:1⑦。

全城共设十一门，东、西、南各三，而北面有二。东三门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俗称广熙门）、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三门是文明门（今东单南，又称哈达门，“哈达大王府在门内，因名之”⑧。后世把崇文门也称作哈达门，实则崇文门在哈达门址之南）、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南）；西三门是平则门（今阜成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学院路西端，俗称小西门）。十一门象征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三门为三头，东、西六门为六臂，北二门为两足。这可能是设计者刘秉忠的主意。刘秉忠既为僧，也宗道，还精通“天文、地理、律历、三式六壬遁甲之属”⑨，由他作出这种设计安排是很自然的。蒙古贵族对各种学说、各种思想能兼收并蓄，忽必烈对这一设计也是容易接受的。

大都城四角各有角楼，城外有护城河。

大都全城规则整齐，井然有序。它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和厚载门，经万宁桥（又称海子桥，即今地安门桥），直达城市中央的中心阁。中心阁西15步，有一座“方幅一亩”的中心台，台正南有石碑，刻有“中心之台”四字，这就是大都城的中心所在。“在城市设计和建造时，把实测的全城中心作出明确的标志，这在我国城市建设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创举”。

中心阁在今北京城内鼓楼以北。中心阁和中心台之西就是当时的鼓楼，也叫齐政楼。鼓楼上有壶漏、鼓、角。壶漏是计时的仪器，钟鼓为报时的工具。

大都的街道纵横竖直，互相交错。相对的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全城的街道都有统一的标准，大街宽24步，

小街宽12步。贵族、功臣主要住西城。当达官贵人们占据了合适的地方住定之后，才允许普通百姓作室。

元朝中央的统治机构中书省在丽正门内，千步廊东。枢密院在皇城东侧。御史台在文明门内、皇城以东不远的地方。

大都的管理机构大都路总管府和负责大都治安的警巡院，在全城中央，中心阁之东。

全城有50坊，坊各有门，门上署有坊名。全城有两个商业区——市，一个在皇城之北，钟鼓楼周围地区；一个在皇城之西，紧靠海子的斜街。

大都的水道分为两个系统，一条是金水河，为宫苑用水。一条是高粱河、海子、通惠河，为漕运系统。城内还有完整的排水系统，南北主干大街两旁的排水渠，是用石条砌成的阴渠，宽1米，深1.65米，有的地方覆盖有石条。其排水方向则与城市自北向南的地形坡度一致。

大都的皇城在城市的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的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

皇城三面临水，南面有门称灵星，它南与丽正门相对。两门间是宫廷广场。广场两侧有长约700步的千步廊。

将宫廷广场置于皇城南而不是沿袭前此广场在宫城正门之南的布局，在建筑设计上是一大突破，"它加强了从大都城正门到宫门正门之间在建筑上的层次和序列，从而使宫阙的布置更加突出，门禁更加森严"⑩。

皇城北墙东北段和东墙外有通惠河，西墙和北墙西段为金水河。金水河在西墙南端入皇城，在灵星门北数十步，河上有石桥三座，称周桥。桥身雕有龙凤祥云，桥周遍植杨柳。

皇城内围绕着中心太液池有三大建筑群：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此外还有御苑。

宫城在皇城的东部，呈长方形，有南三、东西北各一共六门。南门正中者为崇天，左为星拱，右为云从；东门为东华，西门为西华，北门为厚载。宫城东、西墙与今故宫东、西墙相近。北墙当今北海少年宫前。

宫城内的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北面以延春阁为主。大明殿、延春阁与紧靠延春阁的清宁宫，成一直线，坐落在全城的中轴线上。

大明殿又称长朝殿，建成于至元十年（1273），是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凡皇帝登基、元旦、庆寿等重大活动，都在这里举行。大明殿内，设有“七宝云龙御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座”①。元朝与历代不同的是凡遇大典，帝后同登御榻，接受朝拜。这是蒙古族的传统，元代的皇后可以参与政事的处理。皇帝死后，常常由皇后暂理朝政。

御榻前，陈列着自动报时的七宝灯漏、酒瓮和乐器。在宫殿中陈列酒瓮，也是元朝特有的规矩，除大明殿外，其它宫殿也有，如广寒殿的渎山大玉海。

大明殿后为延春阁，阁下称延春堂，是举行佛、道等宗教仪式和宴会的地方。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延春阁后为清宁宫。宫城后墙的厚载门上也有高阁，其上可表演歌舞。

宫城北为御苑，种植花木，以供观赏；还有用以劝农的“熟地”。

宫城西为玉液池。池中满栽芙蓉，有龙船可供游戏。池中有两小岛，南者为瀛州，即今团城的所在，上有仪天殿，也

称圆殿。北面者为琼华，至元八年改称万岁山。山上有大都城建设最早的广寒殿。

太液池西有两组大的建筑群，南面者为隆福宫，北面者为兴圣宫。隆福宫为皇太子的居处，也称太子宫或东宫。主要建筑是天光殿。后来，因皇太后居此，遂改名隆福。兴圣宫的主要建筑是兴圣殿。殿后有延华阁，东、西鹿殿，畏吾儿殿和其它附属建筑。兴圣宫内有专门收藏图书的奎章阁（后更名为宣文阁）。

“元代宫殿的建筑形式和基本结构是以汉族传统为主的，但同时也吸收了我国各兄弟民族在建筑方面的一些特点，在技术、结构、材料以及建筑装饰方面都有一些创造”⑫。

新城建成后，原来的燕京城就被称为旧城。因为新城在北，故新城也称北城，旧城则称南城。大多数居民迁入新城，旧城逐渐衰落。但南城有许多名胜古迹，是游览的好地方。故大都居民岁时游观，仍以旧城为盛。大都西郊外，有著名的风景区西山。

作为京师，大都的居民包括了多种民族成分。汉族依然占绝大多数，蒙古族也为数不少，此外，还有畏吾儿、回回等色目人。西郊有一个畏吾儿人聚居处，被称为畏吾村，即今天的海定区魏公村。畏吾人阿里海牙就埋葬在高梁河畔。

作为政治中心的大都，同上都一样，也发生过若干政治事件。灭宋后，元朝帝、后以招待宋帝的名义在广寒殿举行了十次规模盛大的庆功筵会。被俘的南宋宰相文天祥被关押在兵马司监狱，终因不屈被杀，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篇。至元十九年，这里发生了千户王著痛杀敛财害民的阿合马的大快人心的事件。泰定皇帝死后，两都间

又发生了居守上都称帝的泰定之子与据守大都的元文宗间的两都之战。元朝末年，顺帝放弃大都逃往草原，这里又成了明燕王的王府所在。明成祖迁都后，它又成了明清两代的都城。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都城，这座古城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

注 释

①参见《元史·霸突鲁传》。

②郝经《便宜新政》，《郝文忠公集》卷三二。

③《元史·地理志》：世祖至元元年，中书省臣言："开平府阙庭所在，加号上都，燕京分立省部，亦乞正名。"遂改中都，其大兴府仍旧。

④《元史·高智耀传》。

⑤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⑥《元史·世祖纪十三》：至元二十二年二月，"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师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

⑦《元大都的勘探与发掘》，《考古》1972年第1期。

⑧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卷四十五引《析津志》。

⑨《元史·刘秉忠传》。

⑩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⑪柯九思《宫词》，《草堂雅集》卷一；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上《谈薮篇》。

⑫陈高华《元大都》，北京出版社，1982年。

海都、都哇之乱

海都是窝阔台第六子合失的儿子，他在成吉思汗的斡耳朵（帐殿）长大，曾在蒙哥汗处效力。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夺中，他站在阿里不哥一边。至元元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后，他回到叶密立。

忽必烈为商讨如何处置阿里不哥，曾向钦察汗别儿哥、察合台汗阿鲁忽、伊利汗旭烈兀和窝阔台后王海都发出邀请，前三汗虽表示将在至元四年前来，但不久却相继去世，海都则以"牧马尚瘦"，借故拖延。这时，忙哥帖木儿、木八剌沙和阿八哈分别继承了钦察、察合台和伊利汗国的统治权。

成吉思汗时期，窝阔台受封别失八里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地区，由于他的子孙阴谋背叛蒙哥，除河西以凉州为中心的阔端封地及其军队外，窝阔台后裔的军队都被剥夺和重新分配了。但海都曾在蒙哥身边效力，并且"是一个聪明、能干而又狡猾的人"，他竟然"设法从各处征集了二三千军队"，把自己重新武装起来①。

海都因支持阿里不哥未遂而对忽必烈心存不满和疑惧，他

一方面抓紧扩充自己的实力，一方面与术赤后王改善关系，乘机占有了窝阔台原来的封地，割据自雄。并秣马厉兵，扩大实力，准备武装反叛。

海都的所作所为无疑会引起蒙古大汗的注意，但刚刚平定了李璮和阿里不哥之乱的忽必烈不愿连续用兵，与本家族成员再开战火，他一方面争取以和平的方式解除海都的威胁，加强国家对西北和中亚地区的控制②，一方面同钦察、察合台汗国建立联系，意在结成共同制约海都的联盟。

首先，他派遣长期在自己身边并能“出色地履行职责”的察合台四世孙八剌（察合台曾孙，木秃坚的儿子哈剌旭烈之子）前往河中，辅助木八剌沙。八剌到达后，废黜了木八剌沙，自己作了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并按照忽必烈的意图，聚集兵力，准备进攻海都。

同时，他选任聪慧辩给、办事果决的任拔都封地平阳地区达鲁花赤的乃蛮人铁连出使钦察、窝阔台汗国，并指示铁连先至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处，与术赤后王结盟后，再至海都处。“铁连既奉命，欲直造海都境，视其虚实，然后议于诸王。副者弗从，曰：‘上命我辈先议于王，今遽造敌境，不可。’铁连曰：‘亲承密旨，汝辈违则当诛。’副者惧而从行。即至，海都日召宗亲宴饮，将伺其隙谋害之。铁连乃厉声斥之曰：‘且食，勿语！望语言脱口，相摭为罪耶！’良久，海都曰：‘直哉！’酒半，铁连求衣为欢，海都嘉其雄辩，将解与之，其妃止之，以皮服二袭付之。因语其属曰：‘为使者当如是矣。’厚赠以行。既至拔都蒙哥铁木王（即拔都孙忙哥帖木儿——引者注）所，具告以故，王曰：‘祖宗有训，叛者人得诛之。如通好不从，举师以行天罚，我即外应掩袭，剿绝不难矣。’铁连还，

悉以事闻，因言于帝曰：'海都兵繁而锐，不宜速战，来则坚垒待之，去则勿追，自守既固，则无虑矣。'帝深然之。"

八剌按照忽必烈的意图，掌握了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铁连的出使又得到了钦察汗配合讨叛的承诺，忽必烈成功地争取到了钦察汗和察合台汗的支持与合作，孤立了海都。同时铁连也掌握了海都的动向，并提出了所以制服海都的措施。忽必烈采纳了铁连的建议，虽然海都反状已明，却没有先事兴兵讨叛。"海都觇伺拔都王（即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引者注）为备已严，意乃帖然"③。

但是，海都仍担心同时也不甘心受到忽必烈的威胁，至元三年（1266），他进入高昌王境内，骚扰并掠夺了亦都护的属民。五年（1268），又击溃并洗劫了他们附近的、依附于（蒙哥合罕之子）玉龙答失的纳邻，再次引兵东向，进入高昌王境。忽必烈自岭北发兵，迎击海都于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破城子），乘胜追至阿力麻里。

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和察合台汗八剌也按照忽必烈的意图，聚集力量进攻海都。腹背受敌的海都兵败后先与忙哥帖木儿讲和，然后集中兵力迎击八剌。在胜负难分的情况下，窝阔台的孙子钦察斡忽勒居中调停，使他们停止互相攻击并结成了安答。此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联合攻打伊利汗阿八哈。在与阿八哈的战争中，八剌溃败并向海都求援。海都又乘机掠夺了八剌的财产并控制了察合台汗国。

至元七年（1270），八剌死，海都主持了八剌的丧事，先后立尼克拜和不花帖木儿掌管察合台汗国事务④。八剌和阿鲁忽诸子不服，举兵攻击海都，察合台与窝阔台后裔间再一次爆发战争。八剌长子伯-帖木儿和阿鲁忽的儿子出伯、合班投奔

了忽必烈，后来，贵由的孙子察八忒也离开了海都，带着一些异密归附了忽必烈。不花帖木儿死后，由海都主持，又将察合台汗国的统治权交给了八剌的儿子都哇（《元史》又作笃哇、都瓦、朵哇）。察合台汗国又成了海都与蒙古大汗对抗的同盟。

鉴于海都势力的扩张，忽必烈一方面遣使令其罢兵，一方面加强了漠北和林和西北别失八里、火州、斡端等地区的防务。他派遣户部尚书、宗正府扎鲁火赤（扎鲁忽赤）畏吾儿人昔班出使海都，"使之罢兵，置驿来朝"。又于至元七年，以永兴府达鲁花赤汉人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撼合纳、谦州、益兰等五部断事官，治益兰。好礼"即于此州修库廪，置传舍"⑤，迁入中原的农民、军人进行屯垦，设工匠局管理迁入的工匠，意在将这一地区建成防御西北诸王的根据地。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派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南木合）驻守阿力麻里。十年（1273），尼克拜与海都相攻，元军又乘机进兵察合台封地。

十一年（1274），元朝在天山南北的别失八里、斡端（又做忽炭，今新疆和田）、鸭儿看（叶儿羌，今新疆莎车）、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处置水陆驿站，加强西北与内地的交通往来，以便及时支援前线。

十二年（1275），叛军至漠北，围皇室祖陵，三日不去。八月，忽必烈再命那木罕率诸王镇守漠北，总领诸军，命木华黎四世孙、丞相安童辅佐，备御海都。随同镇守的还有诸王阔阔出（忽必烈第八子，那木罕弟），蒙哥的儿子昔里吉（又作失列吉、习列吉、失列及、失里吉、昔列吉、昔里吉、昔里给——引者注），阿里不哥的儿子玉木忽儿（又作药木忽儿、约木忽儿、要木忽儿、要不忽儿、要忽儿、要木忽而、要木忽

尔、要术忽尔、药木忽尔、岳木忽、岳木忽而、岳木忽尔、簟木忽尔——引者注）、灭里帖木儿（又作明里帖木儿、明里铁木儿、明理帖木儿、灭里铁木儿、灭里铁木尔），大汗诸弟岁哥都的儿子脱黑帖木儿（又作脱脱木儿、脱帖木儿、脱铁木儿、脱脱木、脱别铁木）、斡鲁忽台（又作兀鲁兀台），以及斡惕赤斤的孙子、忽必烈从弟察剌忽（又作札剌忽）等。但蒙哥和阿里不哥诸子对忽必烈一向不满，他们无意讨叛，却千方百计寻找机会脱离他。

十三年（1276）脱黑帖木儿、昔里吉、玉木忽儿、灭里帖木儿等相约叛乱。元将八鲁浑、粘闾相应，并率所统兵投奔海都。宗王牙忽都率兵追袭，擒八鲁浑。叛乱的主谋脱黑帖木儿以帝位诱惑昔里吉说："帝位将归于你，合罕使我们和我们的父亲们受了多少侮辱啊！""我们把那木罕和安童那颜抓起来交给敌方吧。"于是他们劫持了北平王那木罕、诸王阔阔出、牙忽都和丞相安童，将皇子送往钦察汗忙哥帖木儿处，将安童送给海都，希望借此与海都结成共同反抗忽必烈的联盟。他们遣使说："你们有大德于我们，我们对此不忘，现将企图攻打你们的忽必烈合罕的宗王和异密们送交给你们；咱们不要互相算计，要联合起来打退敌人。"但海都没有同他们结盟，却企图利用他们在漠北牵制元军，以减轻本身受到的压力。他回话说："我们很感谢你们，我们正希望你们这样做，请留驻于原地，因为（你们）那里水草很好。"⑥他们受海都的指使向窝阔台、察合台的斡耳朵进攻，扬言拔都的儿子们、海都和宗王们正带领大军从后面赶来，迫使游牧于那里的蒙古部落迁徙。

秋天，昔里吉等进犯漠北，抄掠诸部，掠祖宗所御大帐，占领吉利吉思，俘虏益兰等州断事官刘好礼。

十四年（1277），叛王分道东进。四月，驻牧应昌（今内蒙古阿巴哈纳尔旗东南）的弘吉剌部首领只儿瓦台（又作只儿瓦歹、只里瓦歹、只里瓦带、只里斡台、只儿瓦台、折儿瓦台）起兵响应，围忽必烈之女囊加真公主于应昌城中。忽必烈急调诸王伯木儿、彻彻都，中书左丞博罗欢等北上，以伯颜统军讨伐昔里吉等。博罗欢等在应昌大败叛军，擒获只儿瓦台。

昔里吉等越过杭海岭（今杭爱山），右丞相伯颜与诸王别吉里迷失、兀鲁兀台与钦察将领土土哈（秃秃哈）、阿速将领伯答儿领兵往讨。先后与叛王战于纳兰不剌、秃兀剌河（今土拉河）和斡欢河（今鄂尔浑河）。斡欢河之战，双方“夹水而阵，相持终日”，被叛王劫持的诸王牙忽都与土土哈暗通消息，以为内应，从叛军内部扰乱其阵，伯颜等乘叛军军乱，“麾军为两队，掩其不备”，大败叛军，土土哈夺回被叛王掠走的祖宗大帐，昔里吉等溃逃。

十五年（1278），土土哈逾金山，击败叛军连结的外剌、宽彻二部，缴获大量羊马辎重。昔里吉败走也儿的石河，脱黑帖木儿等逃往吉利吉思。这年冬天，元以镇国上将军、汉军都元帅、女真人刘国杰领左、中、右三卫兵，戍守和林。元朝政府军又夺回了对漠北地区的控制权⑦。

十六年（1279），脱黑帖木儿领兵南下，袭击杭海岭东。元军主帅别吉里迷失采纳刘国杰的建议，趁其“全军而来，巢穴空虚”，直捣谦河。大军迅速占领谦谦州，追其部众至乌斯。脱黑帖木儿慌忙回军，大败于谦河。元军“俘获生口畜牧万计”。次年春，叛军再次东犯，又被击败。

十八年（1281），叛军内乱。脱黑帖木儿屡被元政府军击败，求援于昔里吉，后者不应。脱黑帖木儿怨恨昔里吉，于是

他又以帝位煽惑蒙哥的孙子撒里蛮（蒙哥子玉龙答失之子），玉木忽儿不从，遭到脱黑帖木儿的征讨。双方交战之际，脱黑帖木儿的军队倒戈投奔玉木忽儿，他本人则被玉木忽儿的军队俘虏，交到昔里吉处，被杀。撒里蛮也不得不投奔昔里吉。昔里吉将他送往术赤后王火你赤处。当他们途经撒里蛮封地时，被撒里蛮的部众劫获，并把护送他的人抓了起来。撒里蛮带着自己的军队拦截了昔里吉的辎重队，并命令将辎重送往大汗处。昔里吉率军前来攻打撒里蛮，他的军队却投奔了撒里蛮，昔里吉被撒里蛮所俘。玉木忽儿得知这一情况后，又调集军队与撒里蛮作战，他的军队也同样倒戈投降，玉木忽儿又作了撒里蛮的俘虏。于是，撒里蛮率领着自己的军队和俘获的叛王前去投奔大汗。途中，玉木忽儿以大量珍宝向斡惕赤斤后王行贿，得以中途逃脱。昔里吉则在撒里蛮之前到达，大汗没有接见他，而是将他流放到一个气候恶劣的海岛，后来，他便死在那里。撒里蛮则受到了礼遇，大汗赐给了他土地和军队，但不久他也死去了。后来，玉木忽儿投奔了术赤后王火你赤，灭里帖木儿投靠了海都⑧。

昔里吉等的叛乱打乱了元朝的平叛部署，破坏了元朝在西北地区的控制、经营。使海都得以乘机休养生息和扩充实力。于是，他打回了阿力麻里，并不时骚扰天山南北。为了遏制海都势力的东进，忽必烈不得不调整部署。至元十五年，他以虎符授八撒察里，命他掌别失八里畏吾城子里军站事，以朵鲁只佩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十六年，四川西道宣慰使、副都元帅刘恩进位都元帅，率蒙古、汉军戍守斡端，置屯田于甘州。十七年，遣阿老瓦丁率兵戍守斡端，命万户綦公直戍守别失八里，置镇北庭都护府；在火州置交钞提举司。十八年綦公直进

驻别失八里，刘恩进兵斡端，元朝在西北的兵力增至十多万。以宗王阿只吉节制。又从阿只吉之请，自太和岭至别失八里置新站三十，以利于军情的传达和物资转运、供应。刘恩在斡端先败海都将领玉论亦撒所率万人，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赴援，刘恩以寡不敌众撤军。

十九年（1282），海都得知元军已平定昔里吉之乱，乃遣那木罕等回，一方面谋求和解，一方面继续进兵斡端等地。

二十二年（1285），都哇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声言："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尔敢以孤城当吾锋乎?"高昌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率众固守。叛军围城半年之久，城中粮将尽，都哇所部也师老兵疲。于是都哇射书入城，要求亦都护纳女讲和。他说："我亦太祖皇帝诸孙，何以不附我？且尔祖尝尚公主矣。尔能以女与我，我则休兵；不然则急攻尔。"亦都护不得已忍痛将爱女送给都哇，叛军解围去。亦都护还镇火州，驻于哈密力之地⑨。

二十三年，海都再次发动攻势，綦公直率军迎击于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追击浸远，援军不继。海都设伏于洪水山（今新疆呼图壁县西南），元军中计，公直与别失八里屯田军总管、怀远大将军李进被俘，公直第五子瑷战死。李进从叛军行至掺八里（即彰八里，今新疆昌吉），遁还。至和州（火州，今新疆吐鲁番东南），收散卒三百人，且战且行，还至京师。海都乘胜再至火州，进攻哈密力，亦都护大战，力尽而死。同年，忽必烈以伯颜代阿只吉总兵，以皇孙铁穆耳抚军，在别失八里置元帅府，遣侍卫新附军屯田戍守⑩。

西北藩王和李璮的叛乱，使忽必烈痛感地方势力的发展对中央政权威胁之甚。于是，他在平叛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东道诸

王的控制。这就又促成了东道诸王的叛乱。

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斡惕赤斤的后裔乃颜首先发动叛乱，并与海都早有往还。海都拟率军前来会合，形势顿趋严峻。忽必烈仍以伯颜驻守和林，割断海都与乃颜的联系，阻止海都东来，自己则率军亲征乃颜。

他遣博罗欢总探马赤军，调集忙兀、兀鲁、扎剌亦儿、弘吉剌、亦乞烈思五投下部众先行。以玉昔帖木儿、李庭分统汉军扈从北征。

海都、都哇利用东道诸王叛乱的有利时机，也加紧了军事进犯。二十五年（1288），海都犯边，元派驸马昌吉，诸王也只列（也只里），察乞、合丹两千户，皆发兵从诸王出伯（术伯）北征。

二十六年（1289），晋王甘麻剌、大将土土哈与海都军战于杭海岭。“敌先据险，诸军失利”，甘麻剌陷入重围。“土土哈以其军直前鏖战，翼晋王以出”⑪。海都乘胜北上，再次占领和林。和林为漠北重镇，屯粮所在，掌钱谷出纳的和林宣慰使怯伯、同知乃蛮带、副使八黑铁儿投叛，元朝政府军有遭到东西叛军联合围攻的危险，形势更加危急，七十四岁的老皇帝忽必烈再次亲征。他调集安童、伯颜、玉昔帖木儿、李庭等各路蒙古、汉军扈从。七月，忽必烈出师，海都闻讯远遁。元军收复和林，仍以伯颜居守。

二十九年（1292）秋，海都指使明理铁木儿犯边，伯颜奉命往讨。两军相遇于阿撒忽秃岭，“矢下如雨，众军莫敢登，伯颜令之曰：‘汝寒君衣之，汝饥君食之，正欲效力于此时尔。于此不勉，将何以报!’麾诸军进，后者斩，伯颜先登陷阵，诸军望风争奋，大破之”⑫。时明理帖木儿败走，伯颜以轻骑

追击，斩首二千余级，俘其众以归。

伯颜久在军旅，历经战阵，知己知彼，恩威并济，有丰富的指挥经验。他对海都等叛军，采取固守防御为主，征进与招抚兼施的策略。战术上以逸待劳，不轻易出击。使叛军在数次出击，长途行军中消耗有生力量，然后一举平定。当时，海都在多次骚扰边境，长途奔袭之后，其势已如强弩之末，力量消耗殆尽，平叛的胜利指日可待。但军中将领不能完全理解他的意图，朝中又有人以“因仍保守”弹劾他，忽必烈本人也急于取得平叛的胜利。于是，至元二十九年，朝廷决定以玉昔帖木儿代伯颜。玉昔帖木儿前来接任之际，恰值海都再次犯边。伯颜欲为朝廷除此大患，遂对玉昔帖木儿说：“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来，未晚也。”伯颜领兵出战，“与海都兵交，且战且退，凡七日，诸将以为怯，愤曰：‘果惧战，何不授军于大夫！’伯颜曰：‘海都悬军涉吾地，邀之则遁，诱其深入，一战可擒也。诸军必欲速战，若失海都，谁任其咎？’诸将曰：‘请任之。’即还军击败之，海都果脱去”⑬。这次失机，又使海都得以自立数年。

玉昔帖木儿代伯颜后，元军展开了大规模攻势。当年秋，土土哈略地金山，获海都属户三千余，迁至和林。又向吉利吉思进兵。次年（至元三十年，1293）“师次谦河，冰行数日，始至其境，尽收其五部之众，屯田守之”⑭。海都派兵来争，又被击败。到忽必烈去世时，海都的势力已被逐出按台山（即金山，今阿尔泰山）之外，实力也已大大削弱，与西北诸叛王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但是，与分裂势力斗争多年的忽必烈还是没有看到平叛斗争的最后胜利。

成宗即位后，仍以大将土土哈率军居守，宁远王阔阔出

(忽必烈子)抚军。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消耗了海都的军力,而且使部众、将领产生了厌战情绪,叛军内部再次发生分化,从海都叛者相继来归。元贞二年(1296),诸王药木忽儿也脱离海都,由土土哈陪同入朝。大德元年(1297),土土哈死,其子床兀儿袭父职继续领兵驻守漠北。床兀儿率军逾金山攻八邻之地,与海都将帖良台战于答鲁忽河,“帖良台阻水而军,伐木栅岸以自庇,士皆下马跪坐,持弓矢以待我军,矢不能及,马不能进。床兀儿命吹铜角,举军大呼,声震林野。其众不知所为,争起就马。于是麾军毕渡,涌水拍岸,木栅漂散,因奋师驰击,追奔五十里,尽得其人马庐帐。”回军,又与海都所遣援军孛伯遇,战于阿雷河。“河上有高山,孛伯阵于山上,马不利下驰。床兀儿麾军渡河蹙之,其马多颠踬,急击败之,追奔三十里,孛伯仅以身免”⑮。二年,床兀儿又败都哇军于火儿哈秃之地。

连续大胜使诸王将领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大德二年秋,诸王将帅商议防边时,都认为“往岁敌无冬至之警,宜各休兵境上。”汪古部驸马、高唐王阔里吉思主张严兵以待,他说:“今秋候骑来者甚寡,所谓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兵备不可弛也。”⑯这年冬天,叛军果然大规模进犯。阔里吉思以所部兵迎击,三战三克,乘胜逐北,深入险境,而后援不至,为叛军所俘,不屈而死。这是一次沉痛的教训,也是自那木罕被劫持后,元军最大的败仗之一。成宗使皇侄海山于军中代阔阔出总兵。四年,海山败海都军于阔别列之地。乃蛮带部落降。五年(1301),博尔忽之子太师月赤察儿奉命督师。海都大举犯边,元军分为五队,分别与海都战于迭怯里古(帖坚古、铁坚古山)、合剌合塔等地。月赤察儿自将一军,“被甲持矛,身先陷

阵，一军随之，五军合击"，叛军大败⑰。海都、都哇负伤退兵，海都死，将窝阔台汗国的事务托付给都哇。在都哇的主持下，海都长子察八儿掌管了窝阔台汗国。察八儿是一个瘦弱多病的人，他的继立，引起了海都诸子女间的不和，窝阔台汗国的势力进一步削弱。

大德七年（1303），都哇、察八儿、明理帖木儿相聚谋曰："昔我太祖艰难以成帝业，奄有天下，我子孙乃弗克靖恭，以安享其成，连年构兵，以相残杀，是自隳祖宗之业也。今抚军镇边者，皆吾世祖之嫡孙，吾与谁争也？……不若遣使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使吾士民老者得以养，少者得以长，伤残疲惫者得以休息，则亦无负太祖所望于我子孙者矣。"

不久，都哇请降，月赤察儿不待奏闻，先遣使许其和，叛乱者逐渐来归。时明里铁木儿屯金山，十年（1306）冬，海山领兵逾金山出击，月赤察儿以诸军继往，压之以威，啖之以利，明里铁木儿降。月赤察儿遣将至其部，尽收其部落。并乘胜掩击察八儿部落，俘两部人口十余万。

武宗至大元年（1308），都哇已死，月赤察儿遣使至朝，奏请安抚都哇子、察合台后王宽彻，以离间察八儿与察合台后王可能再结的联盟，使宽彻倾心朝廷；并请处诸降人于金山之阳，大军屯金山之北，即使降人有足够的牧地，又可解决军粮供给问题，加强讨叛的力量，得旨允准。后来，在元军的强大攻势下，察八儿、秃苦灭等叛王果然投奔宽彻，后者不纳，不得已向朝廷请降。历时四十余年的西北诸王叛乱终于平定。

注 释

①《史集》第二卷第一部分《记窝阔台的子孙》;《元史·地理六》。

②《元史·铁连传》:至元初,宗王海都叛,廷议欲伐之,世祖曰:“朕以宗室之情,惟当怀之以德,其择谨密足任大事者往使焉。”左右以铁连对,遂召见,语及大事,铁连应对称旨。帝嘉其辩慧,曰:“此事非汝不可,然必先诣拔都铁木王所,相与计事而后行。”使二人副之。

③《元史·铁连传》。

④尼克拜又做尼克别、捏古伯,是察合台第四子撒儿班的儿子;不花帖木儿是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合答黑、合答黑赤、合丹)的儿子,他们都是八剌的堂叔。

⑤《元史·地理六》。

⑥《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⑦《元史·土土哈传》。

⑧《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⑨《元史·巴尔术阿尔忒的斤传》。

⑩《元史·李进传》、《綦公直传》。

⑪《元史·土土哈传》。

⑫⑬《元史·伯颜传》。

⑭⑮《元史·土土哈传》。

⑯《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

⑰《元史·博尔忽传》。

元

乃颜、哈丹之乱

宗王乃颜为成吉思汗幼弟斡惕赤斤四世孙。斡惕赤斤之后，他的儿子只不接管封地。只不以后，斡惕赤斤的两个孙子塔察儿和阿术鲁先后接管，阿术鲁之后，其子乃颜继立。

斡惕赤斤的封地在大蒙古国的东北地区，今大兴安岭西麓，即以建忒该山为中心的海拉尔河至哈尔哈河流域的呼伦贝尔草原。他的封地之东再没有蒙古部落，这就使他得以像术赤后王向西扩张一样向东扩展自己的势力。成吉思汗分封时，按照幼子守产的习俗，将其母诃额仑的民户、封地与斡惕赤斤分在一起，他们共有民户八千，是东道诸王中最大的兀鲁思。

成吉思汗西征期间，斡惕赤斤奉命留守，得全权处理国事。这时，他的势力可能又向东扩展至大兴安岭以东的塔兀儿河（今洮儿河）和那兀江（今嫩江）一带。世祖初年，斡惕赤斤后王塔察儿首建拥立之功，在忽里勒台上和商讨大事时，又经常站在合罕一边，故其本人和他的家族都享有很高的威望，被称为“东诸侯之长”。他们控制的地区也已到达松花江流域①。塔察儿甚至擅自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由自己管领，这

就不能不引起诸王与朝廷的矛盾和争夺。

乃颜继立后，朝廷与斡惕赤斤家族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辽东地区有不少宗王营帐，“种人杂处其间，恃势相凌”，“傔从狗马出，蹂民禾，民厌苦之”②。忽必烈吸取汉地军阀李璮和西北宗王叛乱的教训，对乃颜等东道诸王势力的增长不无戒备。乃颜后期，叛乱的倾向日益明显，与朝廷在辽东的争夺也日益激烈。至元二十三年（1286），“廷议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居其间，宣慰司望轻，罢山北、开元等路宣慰司，立东京等处行中书省”③，初治辽阳，不久移至咸平（今辽宁开原）。东京行省设置的目的在于限制东道诸王势力向辽东的扩展，加强朝廷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它必然引起东道诸王的不满与不安。

至元二十四年（1287）二月，与海都早有往还的斡惕赤斤后王乃颜纠合合撒儿后王势都儿（又作失都儿），合赤温后王哈丹（合丹、合丹秃鲁干、哈丹秃鲁干、哈答罕）、胜纳合儿（声剌哈儿、胜纳哈儿、胜剌哈等），阴谋发动叛乱。乃颜遣使征东道兵，忽必烈一方面下令诸王不得发兵，一方面遣右丞相伯颜前往观察其动向。伯颜“乃多载衣裘入其境，辄以与驿人。既至，乃颜为设宴，谋执之，伯颜觉，与其从者趋出，分三道逸去，驿人以得衣裘故，争献健马，遂得脱，驰还白状”④。四月，乃颜起兵叛。

忽必烈决定亲征，并采纳康里侍卫阿沙不花的建议，遣使分化东道诸王。阿沙不花受命游说宗王纳牙。他以乃颜已自归朝廷的假情报通告，纳牙遂不从乃颜反⑤。于是忽必烈部署亲征。

御史大夫、忙兀人博罗欢分析形势说：“昔太祖分封东诸

侯，其地与户，臣皆知之，以二十为率，乃颜得其九，忙兀、兀鲁、扎剌儿、弘吉剌、亦其列思五诸侯得其十一，惟征五诸侯兵，自足当之，何至上烦乘舆哉?”⑥。但忽必烈希望一举解决东道的问题，以便专力对付海都、都哇，遂决意亲征，并调五诸侯兵与汉将李庭所统汉军扈从。

五月，先遣也先传旨谕北京等处宣慰司，凡隶乃颜所部者，禁其往来，毋令乘马持弓矢。继令不鲁合罕总探马赤军三千先行。然后，忽必烈自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出发。六月，与叛军将领黄海、塔不台（塔不歹、塔不带）遭遇。双方战于撒儿都鲁（撒里秃鲁）之地。时“将校多用国人，或其亲昵，立马相向语，辄释杖不战，逡巡退却。帝患之”。浙西道儒学提举叶李筹划说：“兵贵奇，不贵众，临敌当以计取。彼既亲昵，谁肯尽力，徒废陛下粮饷。四方转输甚劳，臣请用汉军列前步战，而联大车断其后，以示死斗。彼尝玩我，必不设备，我以大众蹈之，无不胜矣。”⑦忽必烈乘象舆临阵，“意其望见车驾，必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击象舆，忽必烈不得不下舆乘马。司农卿铁哥献计称：“今彼众我寡，不得地利，当设疑以退之。”⑧于是忽必烈张曲盖，据胡床，铁哥从容进酒。塔不台按兵觇伺，疑有伏，不敢进。李庭认为“其兵虽多，而无纪律，见车驾驻此不战，必疑有大军在后”，推测叛军当夜将遁去，于是“引壮士十人，持火炮，夜入其阵，炮发，果自相杀，溃散”⑨。于是命李庭将汉军。玉昔帖木儿将蒙古军，并进。

玉昔帖木儿等至乃颜地，留蒙古、女直、汉军镇哈剌河（今哈尔哈河）。选精兵扈驾，与玉昔帖木儿军一起至失剌斡耳朵（失剌，蒙古语“黄”，失剌斡耳朵意为“黄帐”，乃颜的营

帐）。随驾的征东行省右丞、高丽人洪茶丘“猝遇乃颜骑兵万余，时茶丘兵不满千，众有惧色。茶丘夜令军中，多裂裳帛为旗帜，断马尾为旄，掩映林木，张设疑兵，乃颜兵大惊，以为官兵大至，遂降”⑩。追击乃颜，获其辎重千余。前卫亲军都指挥使、阿速人玉哇失与叛王哈丹所领万人战，追至不里都伯塔哈之地（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乃颜集结重兵十万，玉哇失陷阵力战，又败之。追至失列门林（绰尔河支流色勒必拉一带），擒乃颜，忽必烈下令将其处死⑪。叛党魁首既已伏诛，忽必烈回銮，留玉昔帖木儿、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乃马带）、平章政事薛彻坚（薛彻干、薛阇干）等追剿余党，御史大夫博罗欢，钦察将领伯帖木儿，弘吉剌部人帖木儿、忽怜，安远大将军、安抚使、高丽军民总管、东征左副都元帅兀爱等从。

时，合丹势盛，薛彻坚等多次与战，不能取胜。忽必烈命忽怜前往增援，值薛彻坚等与敌战于程火失温之地，忽怜以二百人迎敌，败之。哈丹退走猱河（又作恼温江、那兀河、纳兀江、恼木连河等，今嫩江）。御史大夫博罗欢与乃颜将塔不台军战，转战二日，身中三矢，大破敌众，擒其驸马忽伦。与玉昔帖木儿合兵，擒塔不台。玉昔帖木儿麾下钦察将领伯帖木儿、高丽将兀爱等败乃颜兵于忽尔阿剌河，追至海剌尔河，又败之。乃颜将金家奴、别不古率众走山前，元军穷追不舍，再战于札剌马秃河，杀其将二人，追至梦可山（蒙可山），擒金家奴。

七月，乃颜党诸王势都儿（失都儿）犯咸平，辽东宣慰使塔出遣使驰驿以闻。忽必烈命其领兵一万，与皇子爱牙赤同力备御。时女直、水达达（居住在牡丹江和黑龙江中下游一带的

以渔猎为业的部族）官民与乃颜联结，塔出遂与麾下十二骑直抵建州，距咸平一千五百里，与叛将太撒拔都儿合战。当得知叛将帖哥、抄儿赤等将袭击爱牙赤时，又以数十人击退叛军千余，护爱牙赤渡辽水。乃颜军来袭，塔出射杀其将，击退追兵，驻于懿州。

二十五年（1288），皇孙铁穆耳行边，乃颜余党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攻诸郡，诸王小薛与之相应。皇孙铁穆耳率土土哈、诸王乃蛮台（乃麻歹、乃马带）、爱牙哈赤、平章塔出、都万户阔里帖木儿等奉诏抚诸军进讨。钦察大将土土哈等击败叛王火鲁火孙（又作火鲁哈孙）于兀鲁灰，至哈剌温山（大兴安岭），夜渡贵烈河（又做龟剌儿河，今归流河），奔袭哈丹军。玉昔帖木儿率万户、弘吉剌部人帖木儿，洪茶丘子洪万等自贴列可转战至龟剌儿河、恼木连河（又作纳兀河，今嫩江）。伯帖木儿首战却敌，获其党驸马阿剌浑……至霸郎儿，与忽都秃儿干战，杀其裨将五人，生擒曲先儿。九月，往纳兀河东等处，大败敌军，"招集逆党乞答真一千户、达达百姓及女直押儿撒等五百余户"⑫。时已隆冬，声言俟春方进，却出其不意，倍道兼行，过黑龙江，捣其巢穴，杀戮殆尽，哈丹秃鲁干遁去。伯帖木儿追哈丹"至斡麻站、兀剌河等处，连败其党阿秃八剌哈赤军，转战至帖麦哈必儿哈，又败之。进至明安伦城（今黑龙江省龙江南），哈丹迎战，败走，追至忽兰叶儿，又与阿秃一日三战，手杀五人，擒裨将一人。至帖揭里，突袭哈丹，挺身陷阵，身中三十余箭而还。兀爱等败敌将古都秃鲁干于斡秃鲁寒。元军尽得辽左诸部，置东路万户府，哈丹窜入高丽境，侵挠西京，距辽阳二千里皆骚动。

二十六年（1289）正月，哈丹再入辽东，不时整军犯边。

二月，攻胡鲁口（今黑龙江省大安北），开元路治中兀颜雅兀格战数日，败其军。四月，朝命塔海发忽都不花所部军，屯狗站北以御寇。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今洮儿河）。时胜纳合儿响应哈丹，海都又东来欲与东路叛王联兵，渡杭海岭，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再次亲征，海都遁去。伯帖木儿奉命西击海都，行至怯吕连河（克鲁伦河），值拜要叛，移师致讨，擒其党伯颜。薛阇坚与弘吉剌部人忽怜迎击东道叛王，哈丹等退走。东西叛王联兵反叛的危险解除，元军收复和林，以丞相伯颜居守。至此，哈丹的势力被逐出辽东，不得不在高丽境内栖身，并不时窜犯、袭扰辽东，劫夺驿站马匹，扰乱开元、水达达等处蒙、汉、女真人的正常生产、生活。

二十七年（1290）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再犯辽东，进攻海阳（今辽宁绥中南），元廷命高丽发耽罗兵千人讨之。四月，又攻海阳。五月，攻开元。八月，平昌政事阔里铁木儿率师与合丹战于瓦法（今吉林省磐石、海龙一带），大破其军。十二月，诏诸王乃蛮带、辽阳行省平章政事薛阇坚、右丞洪察忽，领蒙古军万人分戍双城及婆娑府诸诚，以防合丹兵，博罗欢俘哈丹二妃。元军在北部和西线都作了部署，哈丹的势力被局限在东南一隅，形势更加被动。

二十八年（1291）正月，元军主动出击，阇里帖木儿、伯帖木儿兵至鸭绿江，与哈丹子老的战，失利。忽必烈又命乃蛮台、薛阇坚等增援，仍以伯帖木儿为先锋。“薛阇坚军先至禅定州，击败哈丹。逾数日乃麻歹兵至，合攻哈丹，又败之。伯帖木儿将百骑追至一大河，虏其妻孥，追奔败北，哈丹尚有八骑，伯帖木儿只余三骑，再战，两骑士皆重伤不能进，伯帖木儿单骑追之，至一大山，日暮，遂失哈丹所在”⑬。

三月，乃颜叛将牙儿马兀等同女直兵五百人追杀内附民，塔海将兵千人平之。十二月，哈丹大势已去，阇里带与玉昔帖木儿议，请继续增兵，一举平定乃颜余党，遂增辽东平叛兵千五百人。

二十九年（1292），在政府军的强大压力下，从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朝议以其分隶诸王、将领，从军自效。东道诸王叛乱彻底平定。

注 释

①参见叶新民《斡惕赤斤家族与蒙元朝廷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2期。

②王恽《秋涧集》卷二九，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二三。

③《元史·世祖纪十一》。

④《元史·伯颜传》。

⑤《元史·阿沙不花传》载：乃颜反，诸王纳牙等皆应之。帝问计将安出，（阿沙不花）对曰："臣愚以为莫若先抚安诸王，乃行天讨，则叛者势自孤也。"帝曰："善，卿试为朕行之。"即北说纳牙曰："大王闻乃颜反耶？"曰："闻之。"曰："大王知乃颜已遣使自归耶？"曰："不知也。"曰："闻大王等皆欲为乃颜外应，今乃颜既自归矣，是独大王与主上抗。幸主上圣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问。然二三大臣不能无惑，大王何不见上自陈，为万全计。"纳牙悦许之。于是诸王之谋皆解。

⑥《元史·博罗欢传》。

⑦《元史·叶李传》。

⑧《元史·铁哥传》。

⑨《元史·李庭传》。

⑩《元史·洪茶丘传》。

⑪关于不里古都伯塔哈与失列门林的地望，参见姚大力《乃颜之乱

杂考》，载《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⑫⑬《元史·伯帖木儿传》。

元

伯颜伐宋

1260 年忽必烈即位后，面临着阿里不哥的挑战，为集中兵力平定阿里不哥，忽必烈遵守与贾似道达成的协议，撤回围鄂的蒙古、汉军，重新部署边境防务。他以史天泽为河南宣抚使，史权为江汉大都督，担任对南宋的防御，拒绝李璮出兵攻宋的建议。并采纳廉希宪“遣信使谕出息兵讲好”的建议①，于 4 月遣郝经为国信使使宋通好。

贾似道惟恐蒙古使臣的到来会使其谎报军功的实情暴露，遂囚郝经于真州（今江苏仪征）。忽必烈致书宋理宗和贾似道，陈述战和利害，并要求令郝经入见或放还本国，宋廷不应。为了专力对付内乱，忽必烈对宋廷的无礼虽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声言“水陆分道并进，以为问罪之举”②，却并未对宋用兵。由于连续发生阿里不哥和李璮之乱，蒙古方面无力再开辟南方战场，不得不采取措施缓和与南宋的矛盾。自中统元年（1260）到至元四年（1267）的 8 年间，蒙宋战场相对平静。

中统初年，李璮曾多次要求出兵，为忽必烈所止。于李璮之乱发生后，宋曾派兵渡淮，夺取了亳、滕（今属山东）、徐、

宿、邳等州。而叛乱平定后，蒙古军立即夺回了所失的 7 州 4 县，并将防线南移。但没有向南宋境内深入。

在川蜀战场，留守的密里火者和乞台不花被廉希宪派去的刘黑马、汪惟正杀死，蒙古军内部的争夺减轻了宋军的防务压力。但南宋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使之错过了收复失地的良机，相反，宋将的争功和妒贤嫉能，却导致了降宋金将刘整的降蒙。刘整以 15 郡 30 万户叛宋降蒙，遭到宋朝的围剿，在蒙古不能大力增援的情况下，退出四川。由于忽必烈改变了先攻川蜀的方针，四川战场遂呈现出相持态势。

在荆襄战场，忽必烈撤军后，兀良哈台也随即撤出，只留河南宣抚使兼江淮诸翼军马经略使史天泽的汉军，依旧屯田戍守，力量薄弱，也不具备主动进攻的条件。

但是，受到汉将和汉族士人支持的忽必烈，不会放弃统一全国的政治、军事目标。当战胜其夺权对象后，他立即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南宋。早在忽必烈即位之初，汉将郭侃在上平宋之策时，就提出了“宋据东南，以吴越为家，其要地，则荆襄而已。今日之计，当先取襄阳”的建议③。及刘整入朝，又以先取襄阳为辞，同时建议“造战舰，习水军”④。万户史权也支持这一建议⑤。忽必烈采纳了上述诸将的建议，改变了以川蜀为重点的战略方针，选择襄樊作为突破口，将进攻的重点从川蜀转移到了荆襄。于是蒙宋战争进入了战略进攻的新阶段。

忽必烈在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采纳汉臣在河南沿边屯田积谷的建议，为南下伐宋创造条件。即位后，又将屯田推广到山东、淮北。为解决军粮供应做了必要的准备。同时，造战船，练水军；开辟兵源，整肃军纪，补充战马，积极部署伐宋。

至元四年（1267）八月，兀良哈台子阿术“观兵襄阳”，入南郡，取仙人、铁城等栅，俘生口5万，马牛5千。军还，被宋军阻截于襄阳西的安阳滩，鏖战后得渡江北归，留5千人于牛心岭，立虚寨，设疑火，再次大败宋军。这次战役暴露了蒙古军不善水战的弱点，于是请求汉军配合⑥，为忽必烈接受。

四年冬，襄樊会战正式开始。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进攻襄阳。五年（1268年）九月，阿术等“筑鹿门、新城等堡，继又筑台汉水中，与夹江堡相应，自是宋兵援襄者不能进”⑦。刘整“率兵五万。钞略沿江诸郡，皆婴城避其锋，俘人民八万”⑧。

六年（1269年），诏史天泽与驸马忽剌前往襄樊前线经划。天泽等见襄阳“城坚池深，必可久守，须断其粮道，使其自困”，乃“相要害，立城堡，以绝其声援”⑨。筑长围起自万山，包百丈山，使南北不相通。又筑岘山、虎头山为一字城联互诸堡，建立了长期围困、待其困敝后进兵攻取的基础。

宋军守将吕文焕觉察出蒙古军的意图，认识到这是对襄樊守御的严重威胁，遣人求援。宋军先后三次遣夏贵、范文虎率师应援，皆为蒙古军所败。七年（1270年）冬，完成了对襄樊的战役包围。

至元九年（宋度宗咸淳八年，1272）春，元军向樊城发动总攻。“破樊城外郛，斩首二千级，生擒将领十六人，增筑重围守之”⑩。七月，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派都管张顺、路钤张贵率敢死士3千，轻舟百艘，盐、布等物资支援襄阳，元军阻截失利，战死者无数。于是张贵约驻守郢州的范文虎以5千人进驻龙尾州，夹攻元军，谋泄。元军先占龙尾州，张贵被

俘，不屈，死。

入秋，元军致书襄樊守将吕文焕，敦促其投降。吕文焕恃襄樊两城联锁互固，不降。元将张弘范、张禧、阿里海牙等献计先下樊城，再图襄阳①。忽必烈批准了切断襄阳援助，先取樊城的作战计划，元军开始了对樊城的总攻。

十年（1273），元军从东北、西南两个方向分5路进攻樊城，命熟悉水性的军士潜入水下，破坏宋军用以护城的木栅、铁锁；回回炮手置炮于城东南助攻；放火烧毁襄阳江岸的宋军战船；然后刘整督战舰至樊城下，五路齐攻，激战十余日，樊城破，元军入城。

宋襄樊守将吕文焕困守孤城五年，多次遣人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始终不把襄樊城守放在心上，而将与妻妾斗蟋蟀当成"军国重事"。及至樊城失守，襄阳陷于内无可守之兵，外无援军的困境。二月，元军一面攻城，一面遣使入城招降，吕文焕投降。

西线川蜀战场由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战争而使宋方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元军再次攻宋时，重点战场又移至襄樊，使宋朝四川守将得以重新构筑防御设施。襄樊会战期间，元军在川蜀战场没有确定的战略目标，只有少量小规模的骚扰和掠夺。当元军完成对襄樊的包围后，忽必烈命赛典赤、郑鼎、汪良臣、曲立吉思等分别向嘉定、重庆、泸州和涪州进兵，以牵制宋四川守军东下援襄樊。这期间，他们征服了建都（建昌，今四川西昌），安定了川西，并袭扰东川，窥视合州。双方在军事上都无大的举措和进展，依然处于相持状态。

江淮战场与荆襄战区关系密切。宋方担任两淮防务的先后是两淮制置安抚大使李庭芝、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黄州夏贵和淮

西安抚副使兼知泸州吕文福等。元朝方面有蒙古将领唆都、昂吉儿、塔出和汉将董文炳等，他们增兵筑城，设方略、谨斥堠，防止宋军北侵。双方在两淮战场上维持着对峙的形势，只有局部战斗发生。

襄樊的失守，打乱了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宋方失去了苟安江南的屏障。这是元军对宋进行全面战略进攻和宋朝全线崩溃直至灭亡的转折点。

襄樊之役后，元朝大举伐宋的时机已经到来。忽必烈就征兵、选将两个问题征询诸将领、大臣的意见。史天泽认为："朝廷若遣重臣如丞相安童、同知枢密院事伯颜者一人，都督诸军，则四海混同，可立待也"⑫。忽必烈采纳了他的意见，命伯颜为帅。

伯颜，蒙古八邻部人，其父晓古台从旭烈兀西征，伯颜在西域长大。至元初，受旭烈兀派遣入朝奏事，忽必烈"见其貌伟，听其言厉"，遂留在自己身边，"与谋国事，恒出廷臣右"。至元七年，为同知枢密院事。

襄樊胜利后，元廷立刻进行全面伐宋的准备。伯颜与史天泽同拜中书左丞相，行省荆湖。阿术为平章政事，阿里海牙为右丞，吕文焕为参知政事。又以合答为左丞相，刘整为左丞，塔出、董文炳为参知政事，行省于淮西。既而又按史天泽的意见，将淮西行中书省改为行枢密院，并受荆湖行省节制。同时，大造兵器；以刘整练水军，选战舰；设河南宣尉司，供应荆湖、淮西军需；并相应调整了两川的军事部署。

十一年（1274），签军10万，大举伐宋。六月，诏谕行省和官兵，申明伐宋之由，要求"将士毋得妄加杀掠。有去逆效顺，别立奇功者，验等第迁赏，其或固拒不从及逆敌者，俘戮

何疑”⑬。

七月二十一日，“伯颜等陛辞，帝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⑭。

为了保证南伐大军在主要战场上的胜利，元军分为两路：右路由伯颜、阿术节度，为进攻主力；左路由博罗欢统领，以博罗欢为中书左丞兼淮东都元帅。一个月内，博罗欢军连下海州、石秋、东海、清河四城。淮西行省参政塔出也率兵进攻安丰、庐、寿等州。在伯颜大军即将渡江之际，忽必烈又命右卫指挥使秃满歹率轻骑2万攻淮安，牵制宋军两淮的军事行动，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军的进攻。

九月，右路诸军会师襄阳，分军三路而进。伯颜、阿术由中道，循汉江趋郢州；博罗欢由东道取扬州；刘整与董文炳驻军正阳镇，筑镇阳两城，夹淮相望。宋淮西制置使夏贵率舟师十万来攻，与董文炳激战。淮东帅李庭芝也为博罗欢所牵制，无力增援郢州。

伯颜、阿术所统的蒙古、汉军，水陆并进，至郢州20里。因郢州城坚粮足，围而不攻，大军绕行郢州下游黄家湾堡抢渡汉江。舍城不攻，顺流而下。十月，与宋郢州守将赵文义、范兴遇，杀赵文义，擒范兴杀之，歼宋兵五百，擒十余人。师次沙洋（郢州南，汉水西岸），招降不成，强攻，破沙洋及其新城。

十一月，进逼复州（今湖北沔阳），宋守将翟贵降，伯颜优礼翟贵，令其招谕江陵。然后大军顺流直下鄂、汉。

伯颜军至复州时，阿术领先头部队已到蔡店（即蔡甸，今湖北汉阳），伯颜军至后，与诸将讨论渡江事宜。十二月，至汉口。以汉口江面宽阔，宋军沿江30里皆布有重兵，遂向其

周围渡口作试探性进攻，仍不得要领。于是一面以兵围汉口，声言在此渡江，吸引夏贵调兵援汉阳；一面遣人至汉阳下游沙武口和阳逻堡，寻找过江渡口。元军下沙武口，围宋军于阳逻堡。同时，阿术领兵西上捣虚，攻占青山矶，阿术、史格、张荣实等力战，获宋军舰只，渡江至南岸。宋军不敌，退至鄂州。十二月十四日，阿速遣人报告过江的消息，伯颜大喜，命步骑数万人急攻阳逻堡，自己也被坚执锐，亲临行阵，指挥诸将，慰问受伤将士。元军无不振奋，一以当十。阳逻堡的宋军却人心瓦解，守将或被俘或战死。夏贵则乘乱逃遁，宋数十万大军，死伤殆尽，元军占领阳逻堡。

阳逻堡又称武矶堡，四面环水，形势险要，为江鄂屏蔽。攻占此堡，直接威胁鄂州的安全。阳逻堡的攻占和渡江的胜利，是元军一次重大的战略性胜利。从此，南宋据以苟安的屏障为元军摧毁，江南完全暴露在元军面前。

阳逻堡之战后，伯颜采纳阿术的意见，先取鄂汉，使师有所依，计出万全。于是伯颜南攻鄂州，阿术北攻汉阳。水陆分道并趋鄂汉。宋权知汉阳军王仪以城降，鄂州失去屏蔽，形势孤危。鄂州自两月前守将罢职后，暂由权守张晏然和都统程鹏飞负责，被称为“金汤重镇”的鄂州，此时防守异常薄弱。伯颜派吕文焕等至城下谕降，张晏然、程鹏飞等以城及守军降。伯颜入鄂州，定新附品级；解散宋降兵，使之分隶元军诸将；放遣边民戍卒陷于宋者；遣使入奏渡江之捷；遣军取寿昌粮40万斛为军饷；留阿里海牙等以4万兵行省于鄂州，窥取荆湖。然后，伯颜与阿术以大军水陆东下，令阿术先据黄州。

当元军主力包围襄樊之际，淮西行枢密院所在的正阳镇遭到宋将夏贵的攻击，董文炳父子力战坚守，行省参政塔出奋力

应援，取得了正阳之战的胜利。两淮战场在保证策应伯颜进取襄樊和顺利渡江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后，它的地位发生了变化，除了继续协同伯颜主力军作战外，还需将战线向长江一线推进，与伯颜沿江而下进取下游诸镇和攻入临安的战役合为一体。

年底，伯颜与阿术领大军水陆东下，时宋方沿江守将，多为吕氏部曲。大军以吕文焕为向导，沿江州郡，多望风降附。

至元十二年（宋恭帝赵㬎德祐元年，1275）初，宋知黄州陈奕降。接着，蕲州、江州（今江西九江）先后降，伯颜留部分蒙古军将与当地守将共守降城，继续东下安庆。在伯颜到达之前，两淮将领董文炳、忽剌出、相威、阿塔海等已先期到达。江州降将范文虎遣使至伯颜营，声称阿塔海等已遣使招降，而他却只愿降于伯颜。于是伯颜令阿术领兵至安庆，他本人则率军到湖口。伯颜承制以范文虎为两浙大都督，以其侄范友信知安庆府。合荆襄行省与行院兵为一，前往池州。池州都统制张林降。

在沿江诸州郡相继归降后，元世祖忽必烈遣人诏谕江、黄、鄂、岳、汉阳、安庆等处归降官吏士民军匠僧道人等，令农者就耒，商者就途，士庶缁黄，各安己业。如或镇守官吏妄有骚扰，诣行中书省陈告。以安定降民之心，稳定对已占领地区的统治。

年初，元将刘整死，宋贾似道大喜，遂上表出师。二月，至芜湖。他出师后，一面遣使求和，一面布署作战。首先遣使至伯颜营求和，“请还已降州郡，约贡岁币”，伯颜要求贾似道亲至军营议。并称“如彼群臣相率纳土归附，即遣使奏闻。若此不从，备尔坚甲利兵，以决胜负”⑮。使者见议和不成，私

自乘船逃走。

贾似道建都府于芜湖，先锋孙虎臣率7万人驻丁家渡，夏贵以战舰两千余艘横亘江中，准备迎击元军。伯颜按阿术和诸将的意见，乘胜迎击宋军，他见宋军势盛，决定计取。扬言积薪刍火烧宋军战船，令宋军日夜严备。待其戒备松懈，则由两岸、江中水陆三面进攻，夏贵军受到冲击，率先逃遁。贾似道仓惶失措，鸣金收兵，宋军大溃。董文炳等追孙虎臣至荻港的朱金沙（今安徽繁昌县西），再败其军。阿术指挥李庭等并舟深入，追杀150里，得战舰、军资器杖无数，宋军杀溺而死者，蔽江而下。夏贵逃回庐州，贾似道、孙虎臣奔扬州，13万大军，一时溃散，南宋有生力量损失惨重。

丁家渡之战时，伯颜以偏师一军入饶州（今江西鄱阳），知饶州唐震不屈而死。元军占领宋江南东路重镇，江东残破。

丁家渡之战，宋军胆落，贾似道传檄诸军海上迎驾，入扬州后，放遣元国信使郝经等。丁家渡之战的胜利，使元军得以控制长江天堑，隔断了南宋都城临安与淮西的联系，阻止淮西宋军入援临安，并为元军攻取长江下游诸重镇创造了条件。元军一路势如破竹，连下芜湖、太平州（今安徽当涂）、采石镇（今安徽马鞍山市南郊）、和州（今安徽和县）、溧阳、镇江。三月初二，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市）。与此同时，留守鄂州的阿里海牙也攻下了寿昌、德安、信阳、岳州（今湖南岳阳）、沙市、江陵、郢州、常德等州郡。忽必烈使廉希宪行省江陵。1275年夏，再下潭州（今湖南长沙）。川蜀战场上也取得了占领嘉定、泸州和东川诸郡的战果。伐宋战争进入了最后冲刺的关键时期。

伯颜驻军建康城龙湾（南京市下关江边），将建康作为南

进基地，派部将唆都入城安抚军民，立行中书省于建康，在这里休整士马，抚慰新降，筹备粮饷，准备再战，并迅速稳定了那里的局势。

四月，派阿术等进兵扬州。阿术遣人劝降，被宋守将李庭芝杀死。阿术占领真州。“造楼橹战具于瓜州，漕粟于真州，树栅以断其粮道”⑮。将瓜州建成了防守淮东的元军的大本营。伯颜又采纳行院阿塔海的建议，命人在扬州外围筑栅，阻截宋军入援扬州，也隔断了驻淮宋军渡江南援的通路，进一步控制了长江天堑。

正当大军部署就绪，灭宋之功指日可待之际，北方与东西道诸王的战事吃紧，伯颜奉命北上平叛。当他向忽必烈陈述江南战况后，忽必烈改变了先平叛后灭宋的计划，提升伯颜为中书右丞，阿术为左丞，同意伯颜南返，命其“率诸将直趋临安”。

伯颜取道益都，行视沂州等军垒，调淮东都元帅博罗欢、副元帅阿里伯，以所部兵溯淮而进。九月，会师于淮安，亲自指挥了淮安之战，意在夺取该城，控制宋军南援。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未下。

当元军控制了长江，临安处境危急之际，宋廷以主战将领张世杰为保康军承宣使，总都督府军。张世杰组织力量，夺取临安外围阵地，小有斩获。淮东制置使李庭芝也出兵攻夺扬子桥，力图打通增援扬州的通道。元军奋战，宋军大溃。宋军的反击虽屡被挫败，但张世杰等并不气馁，1275年七月，张世杰、孙虎臣以舟师万艘驻焦山东，每十船为一舫，联以铁索，以示必死。阿术等登山观察，见“舳舻连接，旌旗蔽天”，认为“可烧而走也”。于是“选强健善射者千人，载以巨舰，分

两翼夹射，……合势进击，继以火矢烧其蓬樯，烟焰涨天。宋兵既碇舟死战，至是欲走不能，前军争赴水死，后军散走”⑰。经此一战，宋人不复成军。

十一月，伯颜分兵三道，以参政阿剌罕为右军，以步骑自建康出四安，趋独松岭；参政董文炳等为左军，以舟师自江阴循海趋澉浦、华亭；伯颜及右丞阿塔海由中道，节制诸军，水陆并进。约日会于临安。

伯颜军至常州，宋军坚守顽抗，元军攻占后屠其城。师至无锡，宋遣使求和。元军下襄阳后，曾两次遣使临安谕降，皆为宋军所杀。至此，灭宋方针已定，伯颜不许其降，他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⑱常州失守后，平江迎降，伯颜驻无锡、平江，准备进取临安。董文炳的左翼军招降江阴和活动于长江口的朱清、张瑄率领的劫富济贫不受宋廷招安的水军。

十二月中旬，三路军均迫近临安。左路以庞大的船队占领了澉浦海口，截断了宋廷的海上逃路。右路军占领了独松关（今浙江安吉南）和武康（今浙江德清西）、德清和安溪（今杭州西北）等地。

十三年（宋端宗景炎元年，1276）正月，元三路大军兵临临安城下。宋廷已处于和、守、战均无望的境地，只有投降一路。于是，他们安排陆秀夫、杨镇等护送赵昰、赵昺出逃，太皇太后谢氏与赵㬎奉传国玺和降表出降。

为妥善处理宋君臣和城内物资，伯颜下令诸军不许入城，遣人入城安抚军民，严禁杀掠，迅速安定了临安城的社会秩序。同时，清点登记宋朝府库和宫中各类物品，将大批财宝、器物、图籍送往大都。

临安失陷后，南宋残余势力有张世杰、陈宜忠等拥立赵氏二王所建立的逃亡政权；李庭芝、姜才在淮东的势力；马（墍）在广西的势力；文天祥在江西的势力和张珏在东川的势力。1276年二月，夏贵以淮西诸郡降。7月，坚守扬州的李庭芝、姜才南下，留朱焕守扬州。庭芝等走后，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庭芝、姜才于泰州，淮东入元。广西静江守将马墍被俘杀，广西入元。1278年，泸州、重庆为元军占领，合州降，巴蜀战事结束。

1277年，文天祥在江西起兵，大江南北诸城邑多乘势杀元守将响应。湖南抗元势力也乘时而起，在潭州、江西、福建三行省的联合进攻下，失利。江西、湖南战事平。1278年，文天祥入广东，与张世杰、陈宜忠合，十二月，文天祥在广东五岭被俘。

宋二王逃出临安后，先后至婺州、温州，1276年五月，陈宜忠、陆秀夫等立赵昰为端宗。十一月，陈宜忠、张世杰奉端宗逃往海上。1277年再逃至官富场（今香港九龙城南）。后辗转至秀山（今广东东莞市虎门）、香山（今广东中山市）。1278年春，移至硇州。帝昰死，昺立。六月，移往崖山。

十月，元军数路并进，意在一举消灭南宋这一残余势力。至元十六年（宋赵昺祥兴二年，1279）正月，元将张弘范自潮阳港下海，围张世杰军。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会弘范于崖山。二月六日，决战开始。张弘范在西、南、北三面包围宋军，李恒围其北、西北，自朝至暮，战未决。傍晚起风，宋军队伍大乱。陆秀夫知大事已去，先沉其妻子，然后抱帝昺入海死，灭宋战争结束。

注　释

①《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

②《元史·世祖纪》。

③《元史·郭侃传》。

④《元史·刘整传》载，至元四年十一月，入朝，进言："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下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之劳，先攻襄阳，撤其捍蔽。"

⑤《元史·史权传》载，至元六年，召至阙下，问以征南之策。对曰："襄阳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阳之外郛，我军若先攻樊城，则襄阳不能支梧，不战自降矣。然后驻兵嘉定，耀武淮、泗，事必有济。"

⑥《元史·世祖纪》至元五年载，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⑦《元史·阿术传》。

⑧《元史·刘整传》。

⑨参见《宋元战争史》、《元史·史天泽传》。

⑩《元史·世祖纪四》。

⑪《元史·张弘范传》载：九年，攻樊城，流矢中其（弘范）肘，裹疮见主帅（阿术）曰："襄、樊相为唇齿，故不可破。若截江道，断其援兵，水陆夹攻，樊必破矣。樊破则襄阳何所恃。"

《元史·张禧传》载：十年，行省集诸将问破襄阳之计策，禧言："襄樊夹汉江而城，敌人横铁锁、置木椒于水中，今断锁毁椒，以绝其援，则樊城必下。樊城下，则襄阳可图矣。"

《元史·阿里海牙传》称：阿里海牙以为襄阳之有樊城，犹齿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则襄阳可不攻而得。

⑫《元史·阿里海牙传》。

⑬⑭《元史·世祖纪五》。

⑮《元文类》卷四一，刘敏中《平宋录》。

⑯⑰《元史·阿术传》。

⑱《元史·伯颜传》。

元

元朝对西藏的治理

以阔端派兵进藏和邀请萨迦·班智达至凉州为开端，蒙古统治者与西藏僧俗上层正式建立了联系，并初步确定了依靠萨迦派实行对西藏统治的方针。蒙哥即位后，一方面派兵征进，一方面对新征服的西藏地区调查户口，实行分封，并改变了阔端时依重萨迦派的方针，改为对各派一律依重、分而治之的方针。噶玛噶举派有依靠西夏政权扩大和发展势力的历史和经验，因此，以噶玛拔希为代表的噶举派对蒙哥和阿里不哥表现出了比对忽必烈更多的热情。年轻的萨迦派教主八思巴却一直追随忽必烈，直至忽必烈取得帝位，被尊为国师、帝师。萨迦派依靠元朝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在藏传佛教各派中占有了明显的优势地位，提高了本派的影响，扩大了本派的实力。在元朝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萨迦派在西藏具有实权地位，他们是元朝在西藏各项政策的执行者。元朝一方面通过对萨迦昆氏家族的控制，以宗教和世俗上层维系其对西藏的控制，一方面在广大藏族地区建立各级政权机构，进行直接统治。

宪宗蒙哥时期，大汗及其同母诸弟和窝阔台子阔端在西藏

都有封地，诸王在封地内设有类似管理中原封地最高长官的达鲁花赤一样的守土官。这时的分封，只限于乌思藏地区，尚未扩展至阿里。到忽必烈即位后，随着中央集权化的加强，在其确立了对包括阿里地区在内的整个西藏的统治后，没有再实行分封，而代之以派遣皇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西藏地区。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以八思巴为国师，掌管佛教事务。至元元年（1264），在元朝中央政府设总制院。掌释教僧徒和西藏事务，以国师八思巴统领院事，桑哥兼总制院使。至元二十五年（1288），“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请，于是，“因唐制吐蕃来朝见于宣政殿之故，更名为宣政院”①。宣政院是专管佛教和西藏地方事务的中央机构。置院使二员、同知二员、副使二员，其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西藏军民事务皆隶属宣政院管辖，小规模的军事活动，由宣政院直接处理，或置分院往镇；有大征伐则由宣政院会同枢密院讨论决定。

总制院设立的同时，国师八思巴返回西藏，协助蒙古贵族建立西藏地区的行政体制。同时，忽必烈又委派总制院使答失蛮前往，沿途清查户口、物产、道路等情况，为建立驿站和更好地治理西藏作必要的准备②。

蒙古在统一西藏的过程中，最早建立的是乌思藏十三万户。“它是蒙古统治者针对当时乌思藏分裂、割据的客观形势，因地制宜地采用的一项颇为策略的政治措施”。其中的伯木古鲁、必里公两万户是蒙哥于1254年左右诏封的。其余诸万户则是在至元五年（1268）及其以前逐渐建立的。万户长都是左右一方的豪族，他们是蒙古统治者按照其原有的势力和功劳宣授的蒙古官职，由大蒙古国大汗颁赐证券和虎符。对万户的封

赏削夺权，掌握在蒙古国大汗手中。

各万户直接代表其所属的百姓接受蒙古国的统治，从而排除了各地方势力成为独立于蒙古国之外的行政实体的可能，使之在承认蒙古国统治的前提下，实行分而治之。蒙古统治者作为这些万户间不可缺少的平衡力量，有效地控制了西藏地区。当萨迦派取得了高出于其余各派的优势后，萨迦本钦（又作本禅，意为大官）作为乌思藏三路军民万户，是当时乌思藏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办事机构为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军民万户府。

“至于各级官职，有十夫长、五十夫长、百户、千户、万户、路达鲁花赤。若管辖三个路，则称为路军民万户，赐给水晶印。在吐蕃，此官职曾封给本钦释迦桑布”③。

十户、百户、千户、万户这种十进制的地方行政组织是蒙古社会的组织形式，五十夫长即五十户的行政长官，五十户组织藏语称“达果”，又称“马头”。这种组织不见于蒙古和西藏社会，当来自汉地的村社。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元朝在汉地普遍建立了村社，作为社会的基层组织单位。随着对西藏统治的确立，内地的这种社会组织也被推行到了西藏，并成为当地征收驿站支应的基本单位。

至元十七年（1280），元朝在前后藏地区设置了乌思藏宣慰司，二十九年（1292）又将乌思藏宣慰司与纳里速都元帅辖区合起来，设置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它的辖区包括除今昌都专区以外的西藏自治区全境和现在国境外的列城等地。

“宣慰司，掌军民之务，分道以总郡县，行省有政令则布于下，郡县有请则达于省。有边陲军旅之事，则兼都元帅府，

其次则止为元帅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与通常在远离行省中心地区设置的宣慰司有所不同的是它并不隶属于行省，而是中央宣政院在西藏的派出机构，负责宣政院与乌思藏纳里速之间下传上达的任务和军民事务，“由于乌思藏各万户、千户与内地州县有很大的不同，又有萨迦本钦总管（十三）万户的事务，所以乌思藏宣慰司直接管理各万户的事务不多，它主要的职责是传宣政令。管理驿站和元朝在西藏的驻军”④。

除在西藏设置宣慰司外，元朝在藏区还设有吐蕃等处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思麻地区）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理朵甘思地区）。

蒙古国和元朝曾经在西藏进行户口调查和征收赋税；为“通达边情，布宣号令”⑤，在内地通往西藏的沿途设置驿站；为控制西藏的局势，维持西藏政局的稳定，在当地驻有军队。

括户工作早在宪宗时已经进行，那时的括户目的是为分封提供依据。元世祖及其后诸帝，也多次在西藏调查户口，从而留下了当时西藏人口数目的确切记录。至元元年（1264），答失蛮赴萨迦，沿途曾清查户口、物产和道路险易。五年(1268)，“即阳土龙年年初，由朝廷派来的金字使臣阿衮与迷林二人，对俗民、土地以及冠以大蒙古之名的根本户数进行了清查，此年之后的二十年，即火猪年（至元二十四年，1287），由大衙署派来的和肃与乌努汗二人，与本钦宣努旺秋一起，按照大清查的规定，统计了户口”⑥。当时统计户籍的办法是：有六根柱子面积的房子，有能下十二蒙古克种子的土地，有夫妇、子女、仆人共计六人，牲畜有乘畜、耕畜、乳畜等三种，山羊、绵羊等，共计二十四头只，这样一户人家称为一个蒙古

户，五十个蒙古户称为一个达果（马头），两个达果称为一个百户，十个百户称为一个千户，十个千户称为一个万户。按照规定建立的万户，都划分出六个千户为教民。这次清查户口是在整个乌思藏纳里速地区进行的，清查的结果是整个西藏地区共有 36453 个蒙古户（帐），其中纳里速和藏地方共计 15690 户，乌思地方共有 20763 户。这是西藏有史以来最早、最确切、最详细的人口统计数字。

至元元年答失蛮进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驿站之例，建立驿站。自此以后，自汉藏交界处至萨迦，总共设立了二十七个大驿站。它们是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七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思藏设立了十一个大站。

由乌思地方（前藏）人支应的大站有索（西藏索县）、夏克（怒江上游源头处）、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此五站地址不详，当分布在藏北草原一线）等七个。

由藏地方（后藏）之人支应的大驿站有达（今西藏日喀则专区南木林县东的达拉）、春堆（今日喀则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宋都思）、达尔垅（今日喀则西南？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答笼站）、仲达（当即《永乐大典》所记的撒思迦站，仲达意为仲曲河谷，当由流经萨迦寺前的仲曲河得名。初设在萨迦西北不远处的仲达地方，后移至萨迦）等四个⑦。吐番地区的驿站同其它各地一样，在重要驿站设有脱脱禾孙（蒙古语，意为“查验者”），负责盘查往来使臣及持驿卷文书由驿站供应饮食乘马者，防止诈伪。藏区驿站的设置，无疑方便了使者的往来和号令的下达。

在西藏设置驿站的同时，就规定了“各个万户支应驿站的

办法”，还委派一名同知院事带着管领吐蕃驿站的诏书，管理当地驿站，“使吐蕃二十七个驿站保持安宁，使上师、本钦、蒙古和吐蕃的金字使者们来往路途平安”。初，各驿站的人畜支应，分别由各相关万户负责。后来，有的驿站则由蒙古驻军负责，而由相应的藏地万户提供牲畜、物资⑧。

为了确保西藏的稳定，维持地方秩序，镇压反叛活动，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在乌思藏宣慰司下设有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他们可能隶属于设在陕西凤翔的蒙古军都万户府。当西藏有重大军事行动时，由枢密院拨给宣慰司指挥，任务完成后再归原建制。至元十六年（1279），总政院使桑哥率领七万蒙古军讨伐贡嘎桑布，大军返回之际，桑哥将其中的一部分留在西藏，担任警卫和哨所驻军，警戒西路蒙古和驻守藏北，保障各寺庙的安全，还拨出部分军队负责驿站事务。

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以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吐蕃。西平王府设在“朵哥思麻地之算木多城（今青海互助县松多）”⑨，奥鲁赤的封地也在这里，他平时驻扎在朵思麻之地，遇有吐蕃发生变故，随时可领兵入藏，以尽其镇戍之责。他和他的儿孙作为镇守一方的宗王，一直负有保卫西藏安全的重任⑩。

元朝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西藏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管理。西藏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版图。

注　释

①《元史·百官三》、《元史·桑哥传》。

②《汉藏史集》称，忽必烈派答失蛮前往萨迦，对他说：“现今吐蕃之地无主，仰仗成吉思汗皇帝之福德，广大土地俱已收归（我朝）统

治。萨迦喇嘛也接受召请，担任我朝的上师。上师八思巴叔侄，其学识在我等之上，如今也在我朝管辖之下。答失蛮，……速往萨迦一次，使我听到人们传颂强悍之吐蕃已入于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达萨迦的消息。"并指示："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

③《汉藏史集》。

④关于西藏地区的军政机构设置，参见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穹庐集》；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载《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⑤《元史·兵志》。

⑥《汉藏史集》。

⑦朵思麻指安多地区，元代的朵思麻路当包括青海黄河以南、黄河河源以东的藏族地区及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部、四川阿坝的北部。朵甘思即通常所说的康区，这里当指今青海玉树、西藏昌都专区北部、那曲专区东部和四川甘孜州北部地区。参见《汉藏史集》和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

又《经世大典》载"乌思藏等……其大站二十八所"，比《汉藏史集》所记多一站。

⑧《汉藏史集》载："藏北的驿站，如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大站，由吐蕃乌思地方各个万户的站户连续驻站支应，十分艰苦费力，乌思地方的人不适应藏北气候条件，故一再逃亡。驿站所在之地奇寒难忍，蒙藏来往使臣、商客，沿途得不到乌拉供应，需得自己照料，按照众人的请求，大臣桑哥命令卫普尔、巴、拉克等军留驻藏北的部队，拨出一部分人负责驿站事务。并规定乌思地方各个万户，以达果为单位，将马匹、驮畜、乳畜、肉羊、供给驿站的青稞、褐布、帐

篷、马鞍、坐垫、绳具、炉子、卧具、医药费以及人员统统交给蒙古人。从此，乌思地方的人，不必在藏北驻站，而是每年派人把应交付给驿站的物资运送到藏北交给蒙古军。”于是驿站常有乌拉供应，而藏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⑨《元史·世祖纪》；仁钦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⑩《汉藏史集》载：薛禅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引者注）的次妃所生之子奥鲁赤，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于汉藏交界之处。亦曾前来乌思藏，多次镇压反叛。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也服事萨迦大寺，做了许多利益教法之事。铁木儿不花之子老的，承袭其父的爵位，未到西藏。铁木儿不花的次妃所生之子搠思班，受封为（镇西武）靖王，前来乌思藏，在江孜的山脚下击溃西蒙古的军队，并将止贡派的“官巴”处以死刑。

元

成宗之立

大蒙古国时期，汗位的继承由贵族大会忽里勒台决定，这是蒙古游牧社会条件下的世选制。这一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它自身不断的发生演变。到成吉思汗帝国时期，只有大汗的直系后代——黄金家族的成员，才享有继承汗位的资格了。另一方面，公选因素的遗留，表现为成吉思汗虽然能自由地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但这位继承人仍不能直接继承汗位，他必须经由全帝国诸王贵族共同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的推举，才能认为是蒙古大汗，获得对大蒙古国的统治权。前汗指定和大会推举的双重程序，表明草原帝国世袭制度发展的不成熟性”①。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维持政权的稳定，在诸汉臣的影响下，在改定官制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最早向忽必烈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任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的汉人张雄飞。至元二年，忽必烈召见他，问以方今所急，他以建储对。他说：“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闾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

储，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他的话深深打动了忽必烈，正卧于榻上的忽必烈“矍然起，称善者久之”②。这时，忽必烈已开始考虑如何以中原王朝立太子为继承人的制度改变忽里勒台制的选汗旧制了。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忽必烈不敢轻率从事。至元五年，卫辉路总管陈祐再上《三本书》，提出“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并为改制制造舆论称：“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事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社之安而已矣。”同时再三强调立储问题的紧迫性，指出“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诚万世一时也。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人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业于圣代，俾入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③。

大蒙古国汗位继承的前车之鉴，儒臣的反复论列，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宗亲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为忽必烈对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继建元、建国号和一系列汉法的实施之后，忽必烈按中原王朝建储的成规，立皇子真金为太子，正式确立了嫡传世袭制。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首次按中原王朝的立储程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至元“十年春，中书右丞伯颜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④。册文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圣武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

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不为显立冢嫡，遂起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远之规，下协昆弟金同之义，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⑤

不久，又发布了《立后建储诏》，称“盖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立后以正家，建储以定国”，“比者朝臣恳奏，册室之礼宜即举行。已于今年三月十三日授皇后以玉册宝章，授皇太子以玉册金宝。从典礼也”⑥。

立后建储的目的、典礼仪式等都从汉制，授册、宝等为太子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为使太子继承和学习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使国家长治久安，又为其置宫师府，聘请耆德硕儒为师。

太子真金，母为忽必烈大皇后昭睿顺圣皇后察必，弘吉剌氏，在世祖即位和至元年间政事处理上对忽必烈多所襄助。真金少从姚枢、窦默学《孝经》。中统三年封燕王，守中书令。先后以汉儒王恂、许衡等为师。立为太子后，世祖为立宫师府，置官属三十八人。他们讲述正道经书，并介绍辽、金帝王行事要略，为之“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⑦。在汉儒的教导和影响下，真金自幼就接受了儒家学说，并主动吸取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经验，立志效法他们修身治国的作为。他优礼儒臣，深得汉儒的倾心。而对阿合马、卢世荣等言利敛财的行为颇为不满。

李璮之乱后，忽必烈对汉官汉将心存芥蒂，用之已不如在

藩邸和即位之初。蒙古大汗对宗亲的赏赐耗费巨大，平定诸王之乱，又使军事费用增加，忽必烈急需理财富国，阿合马、卢世荣等以言利进。儒臣渐被疏远。于是在忽必烈与真金父子身边分别聚集了一批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他们的争斗必然影响皇帝与太子的关系。两派各以皇帝、太子为后盾，展开了激烈争夺。在真金的支持下，儒臣们不断弹劾阿合马、卢世荣等，二人先后被杀。儒臣们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发生的禅位风波却给了阿合马余党一次报复和卷土重来的机会。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台御史尚文上封事，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禅位于太子，太子知道后很紧张，中台秘其章不发。此事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侦知。以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借口，拘封御史台案卷。答即古向忽必烈告发此事，忽必烈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尚文与御史大夫谋议说："是欲上危太子，下陷大臣，流毒天下之民，其谋至奸也。且答即古乃阿合马余党，赃罪狼藉，宜先发以夺其谋。"⑧御史大夫与丞相向忽必烈揭发答即古阿散受贿，与其党皆被处死。皇帝、太子间的一场大案总算被掩盖了，但受这场风波的惊扰，太子真金忧悸而死。这一事件严重地干扰了元朝嫡长子继承制的贯彻执行，并导致了以后元朝在皇位继承上的数次危机。

真金死后，忽必烈数年不立继承人。直到临死的前一年（至元三十年，1293），才接受玉昔帖木儿的意见，选定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为皇太孙⑨。

忽必烈在授太子玉册的诏书中，小心翼翼地避开了封建王朝嫡长子继承制与忽里勒台传统观念的矛盾，没有正面否定忽里勒台选汗制度，而是把预立继承人说成是成吉思汗的遗训和遗制，力图在不触动传统观念的情况下进行改革，这就使嫡长

子继承制的确立缺少稳固的基础和明确的效力。真金死后，忽必烈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有所发展，在立储问题上也就缺少了原有的坚定。因而，当他选立铁穆耳时，只遣领太史院事阿鲁浑萨理前往漠北将皇太子宝授与铁穆耳，并没有像立真金那样发布诏书和授与玉册。甚至皇孙本人和他的母亲事前对此竟也一无所知。这第二次建储如此草率，影响力自然有限；而忽必烈病重期间，竟也没有召皇储回京。以至忽必烈死，铁穆耳还在漠北；忽必烈本人的游疑动摇，再加上蒙古社会传统观念和旧制的影响，给成宗的即位带来了若干不利。忽必烈一度进行了的皇位继承制的改革，又退回到了它的出发点。成宗之立，仍然未能绕开忽里勒台，也仍然未能避免与诸王的争夺。赖有一二大臣以遗诏为依据奋争，才没有酿成以往那样互相残杀的悲剧。

至元三十一年（1294）正月，忽必烈死。时伯颜刚被从大同召回，以其个人的威望，稳住了朝中百官。汉儒徐毅上书请迎皇孙⑩。皇孙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遣福建行省平章政事萨里以书至军中召皇孙，命翰林、集贤、礼官备礼册命，召诸王大臣会议上都。

尽管有忽必烈所授的皇太子宝，忽里勒台推举的形式还是不能废除。而且，忽必烈指定的继承人仍然要面对竞争者的挑战。真金的长子甘麻剌意欲改变忽必烈的遗命，他在诸王中也不乏支持者。二人在帝位问题上发生了争执，铁穆耳并不能因有皇太子宝就可以顺利即位。真金哈敦弘吉剌氏阔阔真倾向于铁穆耳，提出了一个有利于铁穆耳的建议，让二人分别讲述必里克。她说："薛禅合罕（即忽必烈）曾经吩咐，让那精通成吉思汗的必里克的人登位。现在就让你们每人来讲他的必里

克，让在场的达官贵人们看看，谁更为精通必里克。”铁穆耳极有口才，是一个口才极佳的讲述者，他以美妙的声音很好地讲述了必里克。甘麻剌患有轻微的口吃，也没有完善地掌握辞令，无法与之争辩。丞相伯颜与御史大夫玉昔帖木儿也利用自己的影响和威信执行了忽必烈生前的安排。四月，“宗室诸王毕会上都，定策之际，公（玉昔帖木儿）起谓晋王甘麻剌曰：‘宫车远驾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宗祧不可乏主。畴昔储闱符玺既有所归，王为宗盟之长，奚俟而弗言？’王（晋王甘麻剌）遽曰：‘皇帝践祚，愿北面事之。’于是宗亲大臣合辞劝进”⑪。伯颜配合玉昔帖木儿共同推戴成宗，他“按剑陈祖宗宝训，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辞色俱厉，诸王股栗，趋殿下拜”⑫。成宗乃得以即位为帝。

注　释

①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

②《元史·张雄飞传》。

③陈祐《三本书》，《元文类》卷一四。

④《元史·伯颜传》。

⑤⑥参见《元典章》卷一，《元文类》卷九，《元史·裕宗传》。

⑦《元文类》卷三九，虞集《书王贊善家传后》；《元史·王恂传》。

⑧《元史·尚文传》。

⑨《元文类》卷二三，阎复《太师广平贞献王碑》载，“三十年，今上皇帝（指元成宗）以皇孙抚军北边，公为辅行，请授裕考所佩储闱旧玺，从之。”

⑩黄溍《金华集》卷二七《徐毅神道碑》载，徐毅上铁穆耳之母弘吉剌氏的奏折中说：“四海不可一日无君。大行皇帝奄弃天下，已五日

矣。苟非早定大计，万一或起奸觎，变生不测，实可寒心。皇孙抚军朔漠，先帝既授以皇太子宝，圣意可知。伏愿明谕宗藩大臣，协谋推戴，遣使奉迎，归正大统。”它反映出：尽管忽必烈生前已经作了安排，但不经宗藩大臣会议同意，新皇帝依然无法取得合法资格。而对汉臣来讲，忽必烈生前的安排依然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⑪《元史·玉昔帖木儿传》。

⑫《元文类》卷二四，元明善《丞相淮安忠武王》。

元

大都之变

元成宗晚年多病，皇后伯岳吾氏卜鲁罕居中用事。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一向"斥言利之徒，一以节用爱民为务，有大政事，必引儒臣杂议"①，深得汉地儒士心；他本人也颇以安邦治国相许。与皇后间渐生隔阂。

元成宗末年，自知不久于人世，力图安排自己的直系子孙为嗣，遂于大德九年（1305）六月立子德寿为皇太子。十月，成宗病重，德寿年幼，恐不足以威震诸王，在皇后卜鲁罕的筹划下，出其侄爱育黎拔力八达②与其母弘吉剌氏守怀州；前此，爱育黎拔力八达之兄海山已于大德三年奉成宗之命总兵镇守漠北。对太子可能构成威胁的亲王都已远离京城。

十二月，小太子德寿死。

大德十一年（1307）正月，元成宗病重期间，皇后已先遣使召安西王阿难答（忽必烈孙，父为忽必烈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正月初五，阿难答至。初八，成宗死。元朝再次出现帝位危机，也再次爆发帝位争夺战。

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之父、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在世祖

至元二十八年出镇怀州（今河南沁阳），未至而疾作，返还大都，次年病死。海山为其长子。在成宗无子的情况下，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在帝位继承上，海山兄弟是最有竞争力的人选。但此时，兄弟俩皆不在大都，皇后即有出爱育黎母子居藩的行动，自然不想让他们取得最高统治权，于是与其同党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马辛、前中书平章赛典赤伯颜、中正院使怯烈、道兴和诸王明里帖木儿、也只里等密谋，奉皇后称制，而以安西王阿难答辅之。同时阴谋遣人断北道，阻止海山南下。

阿忽台奉皇后的教旨，令诸臣议成宗（祔）庙事，遭到太常太卿田忠良的反对，他说："嗣皇帝（祔）先帝于庙，礼也；皇后教，非制也。"③博士张升则称"制，祔庙必书嗣皇帝名，今将何书?"御史中丞何玮亦持不可。阿忽台以死相胁，他说："制自天降也？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玮曰："死畏不义耳。苟死于义，何畏!"皇后派的安排受到了部分汉臣的坚决抵制。

右丞相哈剌哈孙支持诸汉臣的行动，他更利用其掌管中书大权的有利条件，参与了帝位争夺战。在成宗病重期间，他"入侍医药，出总宿卫，且日理机务，诸藩王欲入侍疾，王（指哈剌哈孙，哈剌哈孙死后追封顺德王——引者注）拒之"④。及成宗死，哈剌哈孙一面派人前往漠北迎请海山，至怀州迎请弘吉剌氏和爱育黎拔力八达；一面封府库，"称疾卧阙下，内旨日数至，不听，文书皆不属"，使卜鲁罕无法与大臣议立新帝事。争取时间等待海山兄弟的到来。

时值怀宁王海山有使至京师议事，哈剌哈孙急命使者还报成宗死讯，并另遣使者迎请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和他们的母亲弘吉剌氏入京共图大事。

哈剌哈孙的使者至怀州，爱育黎拔力八达犹豫不决，未敢上路。王傅李孟献议说："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训也。今宫车宴驾，大太子远在万里，宗庙社稷危疑之秋，殿下当奉大母，急还宫廷，以折奸谋、固人心。不然，国家安危未可保也。"并指出："邪谋得成，以一纸书召还，则殿下母子且不自保，岂暇论宗族乎！"⑤爱育黎拔力八达遣李孟至京师侦视情况。李孟至哈剌哈孙处，恰值皇后所遣至府问宰相疾者在邸，李孟长揖而坐，进前为丞相诊脉，皇后所遣的问疾者以为他是前来诊病的医生，没有发现破绽。李孟却得到安西王即位时间已定的情报。于是，他立即还报，称"事急矣，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不可不早图也"。

左右之人皆不敢决，惟曲出、伯铁木儿劝其行。有人说："皇后深居九重，八玺在手，四卫之士，一呼而应者累万，安西王府中从者如林，殿下侍卫寡弱，不过数十人，兵仗不备，奋赤手而往，事未可济。不如静守，以俟阿合（蒙古语，意为"兄"——引者注）之至，然后图之，未晚也。"李孟反对，他说："群邪违弃祖训，党附中宫，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与。殿下入造内庭，以大义责之，则凡知君臣之义者，无不舍彼为殿下用，何求而弗获！克清宫禁，以迎大兄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既正位号，纵大太子至，彼安肯两手进玺，退就藩国；必将斗于国中，生民涂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亲非孝也，遗祸难于大兄，非悌也；得时弗为，非智也；临机不断，非勇也。仗义而动，事必万全。"李孟的一番说教，坚定了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是他又按蒙古人的习惯，请人占卜吉凶。

有儒服持囊的卜者游于市，遂召之令为卜吉凶。李孟出

迎，语之曰："大事待汝而决，但言其吉。"于是卜者入内，献其卜筮的结果称："是谓乾之睽。乾，刚也；睽，外也；以刚处外，乃定内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飞龙在天，上治也。舆曳牛掣，其人髡且劓，内兑废也。厥宗筮肤，往必济也。大君外至，明相丽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刚运善断，无惑疑也。"李孟乘此进说："筮不违人，是谓大同，时不可以失。"于是，爱育黎拔力八达振袖而起，其意遂决。众人将其扶上马，李孟等人徒步相从。

二月十六日，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至大都，自延春门入。入宫哭临，退居旧邸。哈剌哈孙遂与爱育黎商量，先发制人，他说："怀宁王远，不能卒至，恐变生不测，当先事而发。"⑥三月初一，哈剌哈孙始视事，皇后定于三月三日御殿听政，哈剌哈孙当即签署了案卷，表示同意。后党不知内情，大喜过望。

次日，在哈剌哈孙的安排下，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内，召阿忽台等责以乱祖宗家法，命执之，鞫问辞服"。被送往上都，阿忽台、怯烈、阿难答被杀。皇后称制和阿难答谋继大统的阴谋失败。

爱育黎拔力八达在哈剌哈孙和诸汉臣的支持下，镇压了反对派，取得了在大都夺权斗争的胜利。但他没有立即继位，而是等待其兄海山。这固然是由于海山居长，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海山镇守漠北，掌握着军队的统率权。与爱育黎的优柔寡断相反，海山闻讯后，立刻率军直趋大都。

在大都，爱育黎拔力八达捕杀政敌、控制政局后，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遂合辞劝进，他们说："今罪人斯得，太子实世祖之（曾）孙，宜早正大位。"但爱育黎没有这样做。

海山在得到大都之变的消息后，自按坦山回到和林。时“诸王勋戚毕会，皆曰今阿难答、明里铁木儿等荧惑中宫，潜有异议；诸王也只里昔尝与叛王通，今亦预谋。既辞服伏诛，乃因合辞劝进”。海山则愿待其母、弟等聚会后再议。

其母答己在两个儿子间必须作出选择，她“以两太子星命付阴阳家推算，问所宜立者，曰：‘重光大荒落有难，旃蒙作噩长久。’重光为武宗年干，旃蒙为仁宗年干。于是太后（指海山兄弟之母弘吉剌氏答己——引者注）颇惑其言，遣近臣朵耳谕旨武宗曰：‘汝兄弟二人皆我所出，岂有亲疏？阴阳家所言运祚修短，不容不思。’武宗闻之，默然，进脱脱而言曰：‘我捍卫边陲，勤劳十年，又次序居长，神器所归，灼然何疑。今太后以星命休咎为言，天道茫昧，谁能预知？设使我即位之后，所设施者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则虽一日之短，亦足垂名万年，何可以阴阳之言而乖祖宗之托哉！此盖近日任事之臣，擅权专杀，恐我他日或治其罪，故为是奸谋动摇大本耳’”⑦。遂遣康里脱脱前往大都观察形势，自己则领大军分三路进发。

海山率领大军缓缓行进，大都的形势又趋紧张。答己以爱育黎拔力八达监国，遣使北迎海山。而海山却迟迟不至，“遣使还报太后曰：‘非阿沙不花往不可。’乃遣（阿沙）奉衣帽、尚酝以往，至野马川，见武宗，备道两宫意，及陈安西王谋变始末，且言：‘太子监国所以备他变，以待陛下，臣万死保其无它’”⑧。海山虽知自己继统有望，仍等待康里脱脱的确切消息。

“脱脱驰至大都，入见太后，道武宗所授旨以闻。太后愕然曰：‘修短之说虽出术家，为太子周思远虑乃出我至爱。贪憝已除，宗王大臣议已定，太子不速来何为？’时诸王秃列等

侍，咸曰：'臣下翊戴嗣君，无二心也。'既而太后、仁宗屏左右，留脱脱与语曰：'太子天性孝友，中外属望。今闻汝所致言，殆有谗间。汝归速为我弥缝阙失，使我骨肉无间，相见怡愉，则汝功为不细也。'脱脱顿首谢曰：'太母、太弟不烦过虑，臣侍藩邸历年，颇见信任，今归当即推诚竭忠以开释太子。后日三宫共处，靡有嫌隙，斯为脱脱所报效矣。'"脱脱"行至旺古察，武宗在与轿中望见其来，趣使疾驰，与之共载。脱脱具致太后、仁宗之语，武宗乃大感悟，释然无疑。遂遣阿沙不花还报。仁宗即日命驾奉迎于上都"⑨。海山母子、兄弟间因皇位谁属问题出现的紧张气氛，以海山的母亲、弟弟向武装力量妥协而得到消除。于是双方决定会议上都。

五月，"左右部诸王毕至会议，乃废皇后伯要真氏，出居东安州，赐死。执安西王阿难答、诸王明里铁木儿至上都，亦皆赐死"⑩。武宗即位于上都，受诸王、文武百官朝贺于大安阁。颁布即位诏书。尊母弘吉剌氏为皇太后，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

世祖首立太子，意在使皇位在直系子孙中传承，但蒙古社会的忽里勒台却并未废除，传子与贵族大会推举制并行，使元朝皇位继承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情况。成宗死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汉制的影响力增强。作为中央最高行政机构的中书省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忽里勒台推举已经变成了一种程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大权谁属的问题是在流血的政变和秘密谈判中解决和确定的。忽里勒台"这个草原时代的产物，离开它生长的泥土，移植到中原的土壤上之后，却获得了新的'生命'。然而这种新的'生命'的复活，却始终是和一场皇位危机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哈剌哈孙以中书长官的身份参与继承人的

选择并获得成功，受到了朝廷的褒奖和肯定，这又为行政官僚参与皇位争夺创造了先例。“中枢官僚‘选君’的倾向的发展，有可能与君权旁落的过程相结合，进一步加强统治秩序的混乱”⑪。它给元朝后期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

注　释

①《元史·哈剌哈孙传》。

②爱育黎拔力八达为元世祖重孙，父答剌麻八剌，为真金第二子，成宗兄。

③《元史·田忠良传》。

④《元史·哈剌哈孙传》；《元文类》卷二五《丞相顺德忠宪王碑》。

⑤《元史·李孟传》。

⑥《元史·仁宗纪》。

⑦参见《元史·康里脱脱传》、《元史·后妃二·顺宗昭献元圣皇后答己传》。“重光大荒落”为干支纪年的辛巳年，是海山生年；“旃蒙作噩”是乙酉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生年。

⑧《元史·阿沙不花传》。

⑨《元史·康里脱脱传》。

⑩《元史·武宗纪》。

⑪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对一种旧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蜕变过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七集。

元

英宗亲政与南坡之变

武宗海山享受其母亲与弟弟在大都政变中消灭政敌的政治成果，以手中的军权为后盾取得了皇位。母子、兄弟互相妥协，海山在即位后的第十天就立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授以金宝。至大四年（1311），海山死。爱育黎拔力八达以太子身份即位，为仁宗。

爱育黎拔力八达幼从名儒李孟学，李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由是上下益亲”。及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出居怀州，更以孝悌之道辅导爱育黎，后者也虚心好学。“有暇则就孟讲论古先帝王得失成败，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义。孟特善论事，忠爱恳恻，言之不厌，而治天下之大经大法，深切明白。厥后仁宗入清内难，敬事武皇，笃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功，文物典章，号称极盛。尝与群臣语，握拳示之曰：‘所重乎儒者，谓其握持纲常，如此其固也’”①。

自幼受儒家思想薰陶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天性孝慈，聪明恭俭，通达儒术，妙悟释典”。北上大都时，所过州县，供

帐华侈，则令撤去；过比干墓，以纣内荒于色，毒（痡）四海和比干直谏自警；农叟献粥，则以汉光武备尝艰阻自励。他即位后，力图改变武宗时期造成的财政困窘、政制混乱的局面，悉复至元旧制，整顿朝政，编纂律令，施行科举等。在世祖忽必烈后，是又一位尊崇汉法的皇帝。

他之所以能为帝，一是以李孟为代表的汉臣的支持、鼓动，一是母亲答己的护持，一是皇兄海山尚念兄弟之情和得位之惠。因此，对母亲和兄长他都有一份需要报答的恩惠。

在皇位继承上，他与其兄海山有约，行兄终弟及、叔侄相承之制。但是，受汉地统治方式影响甚深的他，不情愿舍子传侄。于是，在延祐三年（1316），封武宗子和世㻋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置常侍府官署，以遥授中书左丞相秃忽鲁、大司徒斡耳朵、中政史尚家奴、山北辽阳等路蒙古军万户孛罗、翰林侍讲学士教化等并为常侍，中卫亲军都指挥使唐兀、兵部尚书赛罕八都鲁为中尉，仍置谘议、记室各二员，遣就镇”。并令萧拜住及陕西、四川省臣各一员护送②。

十一月，和世㻋等至延安，忽都鲁、尚家奴、孛罗、教化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等合谋反抗，联合陕西行省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等，发关中兵自潼关、河中府入腹里。反抗失败后，和世㻋走金山。

十二月，仁宗立已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将皇位继承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

早在武宗至大三年，云南行省左丞相铁木迭儿擅离职守赴阙，尚书省奏，奉旨诘问，却在皇太后答己的袒护下得免。

至大四（1311）年，武宗死。仁宗即位，欲改变武宗朝政制混乱、财政困窘的状况，杀丞相三宝奴，以完泽、李孟为中

书平章政事，以更张庶务。弘吉剌氏答己则自兴圣宫下旨如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即位后只得承认这一既成事实。皇庆二年（1313），铁木迭儿因病去职。

延祐元年（1314），以丞相哈散奏请，铁木迭儿拜开府仪同三司、监修国史、录军国重事，复拜中书右丞相。奏请“比闻内侍隔越奏旨者众，倘非禁止，致治实难。”“往时富民，往诸蕃商贩，率获厚利，商者益众，中国物轻，蕃货反重。今请以江浙右丞曹立领其事，发舟十纲，给牒以往，归则征税如制；私往者，没其货。”“买山东、河间运使来岁盐引，及各冶铁货，庶可以足今岁之用。”“江南田粮，往岁虽尝经理，多未核实。可始自江浙，以及江东、西，宜先事严限格、信罪赏，令田主手实顷亩状入官，诸王、驸马、学校、寺观亦令如之；仍禁私匿民田，贵戚势家，毋得阻挠。请敕台臣协力以成，则国用足矣”。仁宗从其请。而后，“遣使者分行各省，括田增税，苛急烦扰，江右为甚，致赣民蔡五九作乱宁都，南方骚动，远近惊惧，乃罢其事”③。

二年（1315）七月，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进位太师。

铁木迭儿再入中书，居首相，怙势贪虐，凶秽滋甚。仁宗以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平章政事，对其加以牵制。杨朵儿只以侍御史拜御史中丞，也以纠正其罪为己任。

时上都富人张弼杀人，以家奴行贿铁木迭儿。上都留守贺胜“素恶铁木迭儿贪暴”，遂向御史杨朵儿只告发。杨朵儿只与监察御史玉龙帖木儿、徐元素等共同弹劾铁木迭儿，逮捕其左右，以所犯赃罪事实上报④。“帝震怒，有诏逮问，铁木迭儿逃匿，帝为不御酒数日，以待决狱，尽诛其同恶大奴数人。”铁木迭儿逃入太后宫中，得到太后庇护。杨朵儿只追捕益急。

"徽政近臣以太后旨，召朵儿只至宫门，责以违旨意者，对曰：'待罪御史，奉行祖宗法，必得罪人，非敢违太后旨也'" ⑤。

太后行为不检，铁木迭儿有辟阳之幸。他利用太后的庇护，挠法干政，贪污货赂，营其党而售其奸。仁宗对其所作所为虽切齿痛恨，无奈投鼠忌器，仅能免其相位，而未能治其罪。不久，又以太后旨任为太子太师。

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死。在太子硕德八剌谅阴不视事之际，铁木迭儿交结太后侍臣，在太后的主持下，再次入相。"权势既成，毫发之怨，无不报者"。二月，"乃宣太后旨，召萧拜住、朵儿只至徽政院，与徽政使失列门、御史大夫秃忒哈杂问之，责以前违太后旨之罪。朵儿只曰：'中丞之职，恨不即斩汝，以谢天下。果违太后旨，汝岂有今日耶！'铁木迭儿又引同时为御史者二人，证成其狱。……未几，称旨执送朵儿只载诸国门之外，与萧拜住俱被杀"。五月，又诬贺胜"乘赐车奉诏，不敬，并杀之"。八月，因前御史中丞赵世延曾劾铁木迭儿罪恶十三条，铁木迭儿则将世延自现任四川行省平章政事任上召回治罪。"属其党何至道，诱世延从弟胥益儿哈呼诬告其罪，逮世延置对。世延行至夔路，遇赦。"帖木迭儿（即铁木迭儿——引者注）遣使督追至京师，俾其党煅炼成狱。会有旨，事经赦原，勿复问。帖木迭儿更以它事白帝，系之刑曹，逼令自杀。世延不为动，居囚再岁" ⑥。

三月，太子硕德八剌即位，为英宗。英宗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受汉族封建文化濡染亦深。即位后，极力抑制其祖母答己与奸臣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采取改革措施，起用汉族官僚和儒士，精减机构；节制财用，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加强法治，推行汉法。锐意清除铁木

迭儿余党，惩治贪污，刷新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仁宗和英宗都是以先朝太子的身份即位的，没有经过忽里勒台的推荐。正如仁宗即位诏书所言："先帝奄弃天下，勋戚元老咸谓大宝之承，既有成命，非与前圣宾天而始征集宗亲议所宜立者比，当稽周、汉、晋、唐故事，正位宸极。"⑦这是自元世祖开始的改变皇位继承方式的首次实现。传统的忽里勒台失去了它推举大汗的职能，仅作为即位典礼的仪式被保留下来。但这种改变并没有持之久远，南坡之变使元朝的帝位继承上的改革又退回了原地。

英宗因铁木迭儿陷害先帝旧臣，意欲论治。即位当月即发布诏书，"诏中外毋沮议铁木迭儿"，以拜住为中书左丞相，铁失为御史大夫。铁木迭儿所奏多不听，又罢太皇太后所属的徽政院。

至治二年（1322）八月，铁木迭儿死，不久太皇太后亦死。英宗欲治铁木迭儿余党。十二月，以刘夔献田案杀铁木迭儿之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又作八剌吉思），并籍其家产。与此案有牵连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和主犯刘夔皆伏诛。

前此，浙民吴机以累代失业之田卖于司徒刘夔，夔赂宣政院使八剌吉思买其田交给寺庙，以增加僧人的收入。于是矫诏出国库钱650万贯以酬其田值。铁木迭儿得其值之半。其实，田以久归他人，赃私俱入上述诸人之手。此事被丞相拜住举发，英宗命台察审理，俱得其实。遂将田归还其主，相关诸人论罪处置有差，而特赦铁失。

他的一系列整顿措施引起了守旧派蒙古贵族的不满，至治三年（1323）八月，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约晋王也孙铁木儿（真金长子甘麻剌之子，硕德八剌的堂

叔或堂伯）为援，发动了一场谋杀在位皇帝的事件，史称“南坡之变”。

英宗即位之初，铁失为太医院使。不久令领中都威卫指挥使。至治元年，授御史大夫，仍为太医院使，并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后又命领阿速卫。铁失实为铁木迭儿同党，而英宗未之察，仍委以重任。使他得以用御史大夫的身份，庇护铁木迭儿同党，继续指使他们利用任职台谏的身份陷害清慎官员，屡被英宗指责。至治二年，英宗对台臣说：“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贪，民生疾苦，岂能周知，故用卿等为耳目。曩者，铁木迭儿贪蠹无厌，汝等拱默不言，其人虽死，宜籍其家，以惩后也。”三年（1323），申命铁失振举台纲。铁失却为铁木迭儿余党争取发言权，请英宗降旨广开言路。英宗说：“言路何尝不开，但卿等选人未当尔。朕知向所劾者，率因宿怨，罗织成狱，加之以罪，遂玷其人，终身不得伸，监察御史尝举八思吉思可任大事，未几，以贪墨伏诛。若此者言路选人当乎，否乎？”铁失遭到训斥。英宗以拜住为右丞相，振立纪纲，修举废堕，以进贤退不肖为急务，铁失因系铁木迭儿之党而更不自安⑧。

六月，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欲作佛事。丞相拜住以国用不足谏止。担心被惩治的铁木迭儿余党希望借助于大赦逃避惩罚，遂鼓动僧人坚持大作佛事，他们说：“国当有厄，非作佛事而大赦不足以禳之。”遭到丞相拜住的斥责。群奸闻而愈惧，遂阴谋起事。铁失遣人至漠北联络甘麻剌的儿子晋王也孙帖木儿，“告以逆谋，约事成推王为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变”⑨。

八月二十八日，也孙帖木儿使者尚未到，英宗已自上都南

还，当晚，驻跸南坡。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铁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中书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前治书侍御史锁南、铁失之弟宣徽使锁南、典瑞院使脱火赤、枢密副使阿散、金书枢密院事章台、卫士秃满，及诸王按梯不花、孛罗、月鲁铁木儿、曲律不花、兀鲁思不花等，以铁失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杀右丞相拜住，而铁失直犯禁帷，手弑英宗于卧所。

九月四日，晋王也孙帖木儿即位，铁失及其党皆伏诛。

注 释

① 《元史·李孟传》、《元史·仁宗纪》。

② 《元史·明宗纪》、《元史·仁宗纪》。

③ 《元史·铁木迭儿传》。

④ 《元史·贺胜传》。

⑤ 《元史·杨朵儿只传》。

⑥ 《元史·赵世延传》。

⑦ 《元史·李孟传》、《元史·仁宗纪》。

⑧ 《元史·逆臣·铁失传》。

⑨ 《元史·拜住传》。

两都之战

元朝在皇位继承方面制度的不确定性，使得在这一重大问题上人为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武宗即位后，已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至大三年（1310），此事又被重新提起。时三宝奴为相，武宗身体欠佳。三宝奴欲改变以往的协议，他先与康里脱脱商量，说："皇子浸长，圣体近日倦勤，储副所宜早定。"脱脱因参与了武、仁协议的制定，不愿破坏当初的协议，答称"国家大计不可不慎。曩者太弟躬定大事，功在宗社，位居东宫，已有定命，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者！我辈臣子，於国宪章不能有所匡赞，何可隳其成"。三宝奴称："今日兄已授弟，后日叔当授侄，能保之乎？"脱脱也不敢保其必能，只能说："在我不可渝，彼失其信，天实鉴之。"①后来，武、仁间兄终弟及的协议为海山遵守，叔侄相承的承诺却被爱育黎拔力八达所破坏。

仁宗延祐二年，议立太子，铁木迭儿欲固位取宠，乃请立硕德八剌，并与太后幸臣失列门谮武宗子和世球于两宫，于是仁宗封和世球为周王，命其出镇云南。

和世瓎部属在延安起而抗命，到了金山，得到察合台后王的支持，辗转回到漠北。

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迁武宗第二子图帖睦尔于琼州，至此，武宗的两个儿子都远离京城。

因为有先朝皇帝遗命和答剌麻八剌的妃子昭献元圣皇后以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居中主持，仁宗和英宗成为元朝皇帝中即位较为顺利的两个。

英宗之死事出突然，武宗后裔方面毫无准备，措手不及，也孙铁木儿却有机会插手，于是泰定帝得以继立。泰定元年（1324）正月，图帖睦尔被从琼州召回，居建康。

致和元年（1238，九月，文宗改为天历元年）三月，再徙图帖木儿于江陵。七月，泰定帝死，一场更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在武宗的儿子和泰定帝的儿子之间更为激烈地展开，它不仅发展为一场破坏惨重的行省间公开的内战，而且，配合以骨肉相残的谋杀手段，公开的对抗和隐蔽的阴谋交替使用，使斗争增加了它的激烈程度和残酷性，对元朝统治秩序的进一步崩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武宗长期镇守漠北，与钦察将领土土哈家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仁宗传子而远徙武宗两子，使海山的后人失去了帝位，土土哈的后裔也失去了可靠的依托。他们对政局的这种变化不满是理所当然的。自武宗以来权臣参与皇位争夺的先例又为他们伺机夺回失去的权势提供了榜样，于是，元朝皇位继承的忽里勒台推举制逐渐为权臣择主而立的形式所取代。黄金家族逐渐失去了他们选择自己代理人的权力。两都之战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前景下发生的。

泰定末年，为武宗二子谋夺帝位的活动就已经开始。南坡

之变后弃官闲居的右卫千户、渤海人任速哥与平章政事速速密谋，称“先帝之仇，孤臣朝夕痛心而不能报者，以未有善策也。今吾思之，武宗有子二人，长子周王，正统所属，然远居朔方，难以达意。次子怀王，人望所归，而近在金陵，易于传命。若能同心推戴，以图大计，则先帝之仇可雪也”。速速颇有同感。于是二人结纳手握兵权的佥书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泰定四年冬，泰定帝病重，二人以其谋议往说燕帖木儿。“燕帖木儿初闻之矍然。因徐说之曰：‘天下之事，惟顺逆两途，以顺讨逆，何患不克。况公国家世官，与国同休戚，今国难不恤，他日有先我而谋者，祸必及矣。’于是燕帖木儿许之”②。并与诸王秃满暗中筹划。

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时燕帖木儿总环卫事，居大都。速哥、速速乃与燕帖木儿称奉宗王阿剌忒纳失里之命，“与公主察吉儿、族党阿剌帖木儿及腹心之士孛伦赤、剌剌等议，以八月甲午（初四——引者注，下同）昧爽，率勇士纳只秃鲁等入兴圣宫，会集百官，执中书平章乌伯都剌、伯颜察儿，兵皆露刃，誓众曰：‘祖宗正统属在武皇帝之子，敢有不顺者斩。’”

于是，大肆搜捕上都权臣、丞相倒剌沙的支持者，中书左丞朵朵，参政王士熙，参议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太子詹事丞王桓等，皆被捕下狱。

燕帖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分处腹心于枢密，自东华门夹道重列军士，使人传命往来其中，以防漏泄。即命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剌麻失里乘驿迎文宗（图帖睦尔）于中兴（今湖北江陵），且令密以意谕河南行省平章伯颜选兵备扈从”③。

同时推举前湖广行省左丞相别不花为中书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为平章，前湖广行省右丞速速为中书左丞，前陕西行省参政王不怜吉台为枢密副使，萧忙古仍为通政院使，与中书右丞赵世延、枢密同佥燕帖木儿、通政院使寒食分典机务。贷在京寺观钞，募死士，刁战马，运京仓粟以饷守御士卒，遣使至各行省征发钱帛兵器。

诸卫军无统属者、候选及罢退军官，皆给以牌符，以待调选。众既受命，不知向谁谢恩，乃指使南向拜，众人始知起事者的意向。

时燕帖木儿宿卫禁中，一夜更迁数次，或坐以待旦；其弟撒敦、子唐其势时留上都，乃遣塔失帖木儿密往召之，二人皆弃妻子奔归。

丁酉（八月初七），再遣撒里不花、锁南班往中兴趣图帖木儿大驾早发。并令塔失帖木儿冒充图帖睦儿使者，称："诸王帖木儿不花、宽彻普化，湖广、河南省臣及河南都万户合军扈驾，旦夕且至，民勿疑惧。"以安定大都官民之心。

己亥（八月初九），明里董阿至汴梁，将燕帖木儿等的计划告诉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伯颜叹曰："吾夙荷武皇厚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何敢顾望"④。于是集行省官讲明大都发生的情况。并"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精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赀，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辄止之以给其费。征发民丁，增置驿马，补城橹，浚濠池，修战守之具，严徼逻斥堠，日披坚执锐，与僚佐曹掾筹其便宜。"同时，遣蒙古不花

以其事驰报怀王，以罗里报燕帖木儿：“公尽力京师，河南事我当自效。”又募兵五千前往迎图帖木儿，自已则勒兵以待。

参政脱别台说：“今蒙古军马与宿卫之士皆在上都，而令探马赤军守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我等图保性命，他何计哉！”伯颜不听。其夜，脱别台拟杀伯颜，被伯颜发觉，拔剑将其杀之。夺其所部兵器，收马千二百骑。怀王图帖木儿授伯颜河南行省左丞相。

癸卯（八月十三日），伯颜杀河南行省平章曲烈及右丞别铁木儿。明里董阿至江陵。

甲辰（八月十四日），图帖睦尔自江陵出发，遣使召镇南、威顺、高昌诸王来会。执湖广行省左丞马合谋送京师，以别薛代行其职。

丁未（八月十七日），燕帖木儿命撒敦以兵守居庸关，唐其势屯古北口。

戊申（八月十八日），燕帖木儿又令乃马台充北使，称和世㻋与诸王已整兵南来，中外始安。

庚戌（八月二十日），图帖木儿至河南，伯颜擐甲胄，与百官父老导入，俯伏称万岁，上前叩头劝进。明日，扈从北行。

辛亥（八月二十一日），撒里不花自江陵回京，知图帖木儿已启程，并命燕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

诸王秃满在上都，与阿马剌台、宗正札鲁忽赤阔阔出、平章买闾、集贤学士兀鲁思不花、太常礼仪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谋附大都，事觉，为上都丞相倒剌沙所杀。

壬子（八月二十二日），脱脱木儿率军自上都归大都。即命以军守古北口。

癸丑（八月二十三日），上都诸王以兵分攻大都。

丁巳（八月二十七日），图帖木儿至京师，入居大内。以明里董阿、阔阔台、速速并为平章政事，曹立为右丞，伯颜为御史大夫，赵世延为御史中丞，高昌王铁木儿补化知枢密院事。

己未（八月二十九日），上都梁王王禅及太尉不花、丞相塔失帖木儿、平章买闾、御史大夫纽泽等以兵攻大都，军次榆林。隆镇卫指挥使黑汉谋附上都，被杀。

上都诸王、大臣立泰定帝之子阿剌吉八为帝，即位于上都，年九岁。

九月庚申朔（初一），燕帖木儿督师居庸关，撒都为先锋，至榆林西，乘上都兵未阵攻之，乘胜追至怀来。隆镇卫指挥使斡都蛮袭上都诸王灭里帖木儿、脱木赤于陀罗台，执之归京师。

壬申（十三日），怀王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是为文宗。封燕帖木儿为太平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赐黄金、白金、钞、帛、海东青鹘、豹和官田。

上都兵自古北口、居庸关、紫荆关和辽东数路逼京师。

己卯（九月二十日），燕帖木儿与王禅兵战于榆河，大都兵奋击，追至红桥北。“王禅将枢密副使阿剌帖木儿、指挥忽都帖木儿引兵会战。阿剌帖木儿执戈入刺，燕帖木儿侧身以刀隔其戈就斫之，中左肩。部将和尚驰击忽都帖木儿亦中左肩。二人骁将也，敌为夺气，遂却，因据红桥。两军阻水而阵，命善射者射之，遂退，师于白浮南。命知院也剌答儿、八都儿、亦纳思等分为三队，张两翼以角之，敌军败走”。

辛巳（二十一日），“敌军复合，鏖战于白浮之野，周旋驰突，戈戟戛摩。燕帖木儿手毙七人。会日晡，对垒而宿。夜二鼓，遣阿剌帖木儿、孛伦赤、岳来吉将精锐百骑鼓噪射其营，敌众惊扰，互自相击，至旦始悟，人马死伤无算。明日，天大雾，获敌卒二人，云王禅等挺身窜山谷矣。癸未，天清明，王禅集散卒成列出山，我师驻白浮西，坚壁不动。是夜，又命撒敦潜军绕其后，部曲八都儿压其前，夹营吹铜角以震荡之，敌不悟而乱，自相挝击，三鼓后乃西遁。迟明，追及昌平北，斩首数千级，降者万余人”⑤。王禅单骑亡命，也速答儿等追之，还以三万兵守居庸。

乙酉（二十五日），上都兵入古北口，其知枢密院竹温台掠石槽。燕帖木儿先遣撒敦倍道先行，自领大军继其后，“敌军方炊，掩其不备，直蹂之，大军并进，追击四十里，至牛头山，擒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蒙古答失、牙失帖木儿，院使撒儿讨温等，献俘阙下，戮之。各卫将士降者不可胜纪，余兵奔窜。夜遣撒敦袭之，逐出古北口”⑥。脱脱木儿与辽东兵战于蓟州南，杀获无算。

戊子（九月二十八日），上都诸王忽剌台等兵入紫荆关，大都守关军士溃；陕西行省附上都，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引兵渡河，擒河中府官杀之。河东官吏皆弃城逃走。

十月初，燕帖木儿于通州败辽东军，脱脱木援紫荆关；调浙江兵万余西御潼关；河南兵守虎牢。忽剌台游骑逼近京师南城。“令京城居民户出壮丁一人，持兵仗从军士乘城，仍於诸门列瓮储水以防火”⑦。文宗遣使颁诏书于甘肃、陕西，陕西行省截留使者，撕毁诏书。送使至上都或下于省狱。

辛丑（十月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东路蒙古元帅不

花帖木儿以兵围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宝出降，王禅逃走，小皇帝阿剌吉八不知所终。遂罢免上都所授各路府州县达鲁花赤，上都失败。于是朝廷遣使传檄罢兵。

十一月，遣使至漠北迎皇兄周王。杀上都诸王、将领、大臣倒剌沙、王禅、马某沙、纽泽、撒的迷失、也先铁木儿等。

四川行省平章囊加台自称镇西王，起兵反对文宗，杀行省平章宽彻等，自署行省官，烧毁栈道。

十二月，再遣治书侍御史撒迪等迎周王。周王南还，诸王察阿台、元帅朵列捏等率师护行。旧臣孛罗、尚家奴、哈八儿秃从行。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政事泼皮来迎，武宁王彻彻秃、金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等继至。乃遣孛罗至京师。

文宗先后遣前翰林学士承旨不答失里、太府太监沙班剌、内侍秃教化和中书左丞跃里帖木儿等至周王和世㻋行在所。

天历二年（1329）正月，撒迪等至周王所，以文宗命劝进。周王和世㻋在和林即位，为明宗。扈从诸王、大臣咸入贺。乃命撒迪遣人还报京师。是月，不答失里、沙剌班等也以所挙金银币帛至和林。

二月，宣靖王买奴自京师朝明宗于和林，文宗立奎章阁学士院于京师，遣人以除目来奏。

三月，文宗遣右丞相燕帖木儿向明宗献皇帝宝。明宗南还，准备在上都召集宗王、大臣，召开忽里勒台。

图帖睦尔置行枢密院，以山东都万户也速台儿知行院事，与湖广、河南两省官进兵平四川。

四月，燕帖木儿见明宗於行在。明宗仍以图帖睦尔所授诸官爵授燕帖木儿。

图帖睦尔命跃里铁木儿、王不怜吉台代也速台儿讨四川。

湖广行省参知政事孛罗奉诏至四川，赦囊加台罪，囊加台听诏，蜀地悉定。

八月，明宗驻于上都附近的旺忽察都（王忽察都、晃忽察）。丙戌（初二）文宗以皇太子身份入见。明宗大宴诸王、大臣。庚寅（初六），明宗暴崩。燕帖木儿取皇帝宝归文宗。当月，图帖睦尔以太子身份再次即位。

由于文宗和他的拥护者们取得了两都之战的胜利，又由他们仿照武宗、仁宗的故事，在政治舞台上导演了迎立明宗这场假戏，所以，关于明宗之死的真实情况，已无法找到可资参考的历史资料，它同其它类似事件一样，也成了千古之谜。但种种迹象使人们推断出的结论是文宗以更隐蔽的谋杀方式，避免了发生在兄弟间的武装夺权，却达到了自己取得最高统治权的目的。

同样，明宗也以武宗、仁宗的故事为先例，天真地南下享受其弟的政治、军事果实。但时移事异，与其父不同的是，他手中没有雄厚的军事实力，在皇位争夺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他的悲剧也就不足为奇了。

注 释

①《元史·康里脱脱传》。

②《元史·任速哥传》。

③《元史·燕帖木儿传》。

④《元史·伯颜传》，此伯颜为蔑尔乞氏，与世祖时平宋的伯颜同名。

⑤⑥《元史·燕帖木儿传》。

⑦《元史·文宗纪》。

元

惠宗继统

元惠宗脱欢贴睦尔是元明宗和世㻋的长子。母为哈剌鲁（葛罗禄）首领阿尔思兰汗的女儿迈来迪。

和世㻋是元武宗的长子，元朝皇位继承斗争的牺牲品。武宗以军事力量为后盾，占有了其母亲和弟弟的政治斗争成果，做了皇帝。按照母子、兄弟间的协议，此后的皇位当在兄弟、叔侄间授受。但元仁宗撕毁了协议而立其子英宗。和世㻋则被封为周王，远移云南。不就，流落漠北。

延祐三年，和世㻋以周王身份赴云南。行至延安，得知仁宗欲立其子硕德八剌为太子，遂与侍臣商量对策。常侍教化说："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出镇之事，本非上意，由左右构间致然。请以其故白行省，俾闻之朝廷，庶可杜塞离间，不然，事变叵测"①。于是，他们决定抗旨不赴云南。教化等先至长安，联合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等，陕西发兵来迎，和世㻋等拟自潼关、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入陕西。不料，陕西平章政事塔察儿、脱欢等密报仁宗，并得旨伺机杀害和世㻋。于是，和世㻋

亡命西奔。至金山，得到西北诸王察阿台等的欢迎和支持，遂"与定约束，每岁冬居斡罗斡察山。春夏则命从者耕于野泥，十余年间，边境宁谧"。于是娶哈剌鲁部之女迈来迪，生子妥欢帖睦尔②。

不久，迈来迪死，和世㻋又娶成宗外甥女、寿宁公主的女儿乃马真氏八不沙，生子懿璘质班。

天历二年（1329）明宗和世㻋暴卒于王忽察都，早已在大都登过一次皇帝宝座的文宗图帖睦尔又以明宗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第二次即位为帝。

明宗皇后八不沙亲见明宗死亡的情景，但事出仓卒，母寡子弱，她不得不按照文宗君臣的安排，带着幼子住进宁徽宫。但八不沙母子的存在显然不利于文宗。至顺元年（1330），文宗将宁徽宫的费用从钞万锭、币帛二千匹减至币帛二百匹；同年，文宗后卜答失里与宦者拜住将八不沙推入烧羊火坑中害死。除去了可能揭发他们阴谋的第一见证人。同时，妥欢贴睦尔也被放逐到高丽大青岛，"不与人接"。然后，文宗夫妇立自己的儿子燕王阿剌忒纳答剌为太子。一年后，又发布诏书，称"明宗在朔漠之时，素谓（妥欢贴睦尔）非其己子，移于广西之静江"③。

妥欢贴睦尔住大圆寺，长老秋江曾教其读《论语》、《孝经》和书法，培养其举止、情操。所以，"司官府官至，辄坐长老法座上，正身危坐，一无所言。司官府官出，即下座嬉戏如初"④。比起大青岛的岁月，妥欢贴睦尔在静江期间生活上轻松得多，学习上也有所长进。

文宗三子，幼子早逝，长子阿剌忒纳答剌立为太子仅三十几天也夭折，这对他们夫妇显然是最沉重的打击，为保护唯一

的次子古纳答剌，遂将他送往权臣燕帖木儿家，改名燕帖古思。

至顺三年（1332），文宗病重期间，“召皇后及太子燕帖古思，大臣燕帖木儿曰：‘昔者晃忽察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欢贴睦尔来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

燕帖木儿实为王忽察都事件的主谋之一，自知若立妥欢贴睦尔，自己则难逃罪责。他踌躇数日，决定封锁文宗遗诏，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商量：“阿婆且权守上位，安王室，妥欢贴睦尔居南徼荒瘴之地，未知有无，我与宗戚诸王，徐议之可也。”既而复请立燕帖古思，皇后不从。燕帖木儿不得已，自以为立幼或可侥幸逃避惩罚，乃立明宗幼子懿璘质班，为宁宗。不发诏书，不改年号，尊文宗皇后为太后。

懿璘质班三岁而孤，八不沙死后，文宗尚念骨肉之情，将他留在京师，即位时年仅七岁。宁宗立53日而卒⑤，燕帖木儿仍请立燕帖古思，皇后仍不从。因为二子夭折，已使他们夫妇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文宗年方二十九岁，即位不到五年就病死，更令皇后心神不宁。对长生天的敬畏使她认为丈夫与儿子的早逝都是谋害明宗的报应，于是坚决反对让仅存的儿子继承皇位，她说：“天位至重，吾儿年方幼冲，岂能任耶！明宗有子妥欢贴睦尔，出居广西，今年十三矣，可嗣大统。”⑥乃遣中书右丞阔里吉思迎妥欢贴睦尔于静江。

时燕帖木儿大权在握，国事皆由他决定，再奏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后执行。妥欢贴睦尔至良乡，燕帖木儿前往迎驾，“马

上举鞭指示，告太子以国家多难遣使奉迎之由，太子讫无一言以答之”。燕帖木儿狐疑畏罪，迁延数月，不议妥欢贴睦尔登基事，不久也惊悸成疾而死。

燕帖木儿死后，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与群臣议，于至顺四年（1333）六月初八共立妥欢贴睦尔为帝，即位于上都，改元元统，是为元惠宗，明朝以其“知顺天命，退避而去，特加其号为顺帝”⑦。即位诏书称妥欢贴睦尔为“武宗皇帝之元孙，明宗皇帝之世嫡”，从而肯定了妥欢贴睦尔的皇室血统，为其统治权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元顺帝初继帝位，颇有改革政治，铲除时弊的政治理想，但他孤立无助，处在文宗旧臣的包围之中，不敢也不能有所作为。即位后，伯颜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上柱国、监修国史；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为太傅、左丞相。燕帖木儿的儿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袭其父之封为太平王。以文宗皇后为太皇太后；立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伯颜和撒敦专理国家大事。

伯颜是当初响应燕帖木儿、拥立文宗的功臣之一，伯牙吾事是燕帖木儿之女。顺帝外受权臣左右，内为皇后挟制，依旧处在燕帖木儿的阴影笼罩之下，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他不得不暂时屈从于权臣的威势。至元元年（1335，元朝有世祖和顺帝时两个至元年号，此为后至元），撒敦死，唐其势为中书左丞相。伯颜的权力跃居燕帖木儿家族之上，元朝又出现了权臣间的争夺与较量。

燕帖木儿是拥立文宗的元勋，在文宗朝官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翊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挟震主之威，肆行无

忌”⑧。在他的家族看来，元朝的天下不啻为伯牙吾氏所有。伯颜势力的增长竟然超拔于伯牙吾氏家族之上，伯牙吾氏家族是难以容忍的，唐其势不胜其愤，称“天下本我家天下也，伯颜何人而位居吾上”⑨。于是，遂与其叔答里交结诸王晃火帖木儿，阴谋拥立晃火帖木儿废惠宗。郯王彻彻秃揭发了他们的阴谋。顺帝屡召答里，后者不肯前往。阴谋败露后，唐其势索性以求一逞。六月三十日，他伏兵于上都东郊，率勇士突入宫中，伯颜及完者帖木儿、定住、阔里吉思等已有所准备，唐其势与所率勇士悉数被擒。其余党北奔答里处，答里起兵应唐其势，杀朝廷所遣使者哈儿哈伦、阿鲁灰。顺帝又遣阿弼为使，答里等再杀之。并率其党和尚、剌剌等迎击元军。为元军所败，谋投奔晃火帖木儿，被元军追及，答里被俘，送往上都，被处死。晃火帖木儿自杀。

唐其势被判死刑，攀折殿槛不肯出。其弟塔剌海躲在皇后坐下，皇后以衣服遮蔽其弟。士兵将他从皇后身边拉出杀死，鲜血溅在皇后的衣服上。伯颜奏告皇帝说：“岂有兄弟为逆而皇后党之者!”于是连皇后一起逮捕。皇后向皇帝求救：“陛下救我。”皇帝则说：“汝兄弟为逆，岂能相救也。”于是皇后出宫，被伯颜毒死于上都民舍。

至此，顺帝假手伯颜清除了自己的一大敌对势力，报了杀父之仇，也为自己接管政权创造了条件。

唐其势被杀后，伯颜一人大权独揽，他“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⑩。其位高权重更在燕帖木儿之上。早在元统二年（1334），伯颜曾求为秦王，人们以“秦王大名，恐不宜居”表示反对，伯颜不听，竟争辩说：“我闻淮东有秦邮，我索秦邮为秦王，非西秦也，何不可有?”顺

帝只好以高邮为其食邑，进封他为秦王。杀唐其势为国除奸后，骄纵更甚，以致敢于要求以薛禅为名⑪。

伯颜势倾朝野，“擅爵人，赦死罪，任邪佞，杀无辜，诸卫精兵收为己用，府库钱帛听其出纳”⑫。皇帝赏赐的土地、黄金、白银、币帛不可胜计。他变乱忽必烈以来的典章制度、英宗的新政和文宗文治的成果，实行排斥汉人的民族压迫政策，废除科举以塞汉人入仕之途，甚至提出杀尽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他大肆搜刮聚敛，以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于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日益激化，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

伯颜旧曾为郯王彻彻秃家奴，称彻彻秃为使长。至此，自以为尊崇无比，岂容其上更有使长。于是在至元五年（1339），诬陷郯王彻彻秃，要求皇帝赐王死。帝不准，伯颜则擅自行刑，杀死郯王。又复奏贬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辞色愤厉，不待旨而行。顺帝益愤，积不能平。伯颜却日益立威，“锻炼诸狱延及无辜”。其侄脱脱在老师吴直方的鼓励下，大义灭亲，为国除奸，为家除害。于至元六年，夺其权，伯颜死于被贬途中。

自唐其势、伯颜的势力相继被铲除后，元顺帝以脱脱为相，力图刷新政治，以图中兴，社会面貌一度有所改观，史称“脱脱更化”。但元朝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积重难返，已非个人力量所能挽回，至脱脱遭谗谮去位后，国事日非，元顺帝本人也失去了当初的锐气，并一味沉湎于享乐和女色，纪纲废弛，官吏贪蠹，财政困窘，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风起云涌，元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注　释

①《元史·明宗纪》。

②关于妥欢贴睦尔的出身，民间曾有其非和世㻋子，而为南宋恭帝赵㬎之后的传说。考其传说，仍出自争权斗争的需要。文宗是以皇太子（明宗的合法继承人）的身份继位的，按照当时兄弟相承、叔侄相继的原则，理应立明宗子妥欢贴睦尔为太子。但文宗欲立己子，只好在妥欢贴睦尔的身世上作文章。于是，他们传出消息说，妥欢贴睦尔的乳母的丈夫说，明宗在世时，一直说妥欢贴睦尔不是自己的儿子。因此，令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识将其事写入脱卜赤颜（即蒙文宫廷史册），并令奎章阁学士虞集作书诏告中外。为剥夺妥欢贴睦尔的继承权大造舆论。《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杂史存目》条认为此说“实为荒诞之尤”。今人也屡有文章论证此说之不可信。

参见任崇岳《〈庚申外史〉笺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③《元史·顺帝纪》。

④《〈庚申外史〉笺证》。以下不注资料出处者，皆本于此书。

⑤《元史·燕帖木儿传》称宁宗立四十三日而崩，不确，实为五十三日，参见《〈庚申外史〉笺证》。

⑥《元史·燕帖木儿传》。

⑦《元史·顺帝纪》。

⑧⑨《元史·燕帖木儿传》。

⑩《元史·伯颜传》。

⑪薛禅，蒙古语，意为“贤者”，自从忽必烈的蒙古语谥号称“薛禅皇帝”后，任何人不再以此为名号。自伯颜专权，有人则请赠伯颜以薛禅之名。翰林学士沙剌班等上奏：“万一曲从所请，关系非轻。”于是元顺帝不得不请翰林学士欧阳玄、监丞揭傒斯商量，以“元德上辅”四字代替。

⑫《元史·脱脱传》。

元

脱脱更化

元顺帝初继帝位时，也曾有志于中兴。但当时他处于权臣燕帖木儿和伯颜势力的包围之中，皇位的巩固尚需时日，也就更没有机会和力量实现其振兴纲纪、整顿和刷新政治的意图了。政治上的长期失意和被冷落使他学会了忍耐和等待时机，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并没有采取任何大刀阔斧的锄奸和改革行动，而是静观形势，等待时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

即位的第三年，他改元为至元。至元为元世祖忽必烈曾用的年号，以此为年号意味他有意继承祖宗的事业，实现元朝统治的中兴。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利用燕帖木儿家族与伯颜的矛盾，假手伯颜，除掉了政敌和世仇燕帖木儿家族的势力。而后，他又启用和培植了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僚脱脱。在脱脱的支持、辅佐和配合下，除掉了另一权臣伯颜，又在脱脱的主持下，实行了政治的更新和改革，史称“脱脱更化”。

脱脱是权臣伯颜之侄，少而有志，就学于汉儒吴直方。一日，请于其师曰：“使脱脱终日危坐读书，不若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耳。”①足见其早有立功成名于世的抱负。十五

岁为怯薛官，文宗朝先后任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内宰司丞、府正司丞和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顺帝即位后，兼前职，又同知宣政院事。不久，迁宣政使、同知枢密院事。

至元元年（1335），与伯颜共同挫败了唐其势和答里的谋逆，拜御史中丞，虎贲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在任御史大夫期间，“大振纲纪，中外肃然”。同时，对皇帝也多有匡正。在扈从皇帝自上都还京师时，行至鸡鸣山之浑河，顺帝欲在保安州畋猎，伯颜谏止说：“古者帝王端居九重之上，日与大臣宿儒讲求治道，至于飞鹰走狗，非其事也。”有志振兴的顺帝听取了他的意见。

脱脱并不因伯颜权势之重而骄横，相反，却常常以此为忧，他对父亲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意在由自己家人动手为国除去这一大蠹，以保全家国，得到其父的赞同。然后又去请教自己的老师。直方鼓励他说：“《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但知忠于国家耳，余复何顾焉。”脱脱除奸意已决，但必须得到皇帝的支持和赞同。

当时，皇帝身边多为伯颜同党，脱脱作为伯颜的侄子、亲信，当然是被列入伯颜党的，皇帝对他不能不有所防范。为了同顺帝沟通，他努力接近顺帝的亲信世杰班和阿鲁。顺帝也通过二人探查脱脱的底细。“阿鲁、世杰班日以忠义与之往复论难，益知其无他心，遂闻于帝，帝始无疑”②。于是脱脱开始与世杰班、阿鲁和顺帝潜邸汉臣杨瑀谋划铲除伯颜。

有了脱脱的支持，顺帝态度也开始强硬，敢于否定伯颜的意见了。至元五年（1339），皇帝到上都，伯颜出赴应昌。脱脱等曾计划于上都东门外设兵擒伯颜，恐事不成而止。时伯颜

欲借故罢汉人之为廉访使者，脱脱在吴直方的支持下，先向顺帝通报了伯颜的意图。故伯颜上奏时，顺帝不许。后伯颜知事出脱脱，又在皇帝面前要求惩治脱脱，仍未得逞。而在归大都的途中，伯颜又擅自杀死郯王，贬斥宣让、威顺二王，顺帝已经忍无可忍了。

六年（1340）二月，伯颜带小太子燕帖古思出猎柳林。脱脱、世杰班和阿鲁等谋以所掌兵及宿卫士拒伯颜。于是，顺帝至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出五门听命；收缴诸城门锁钥，将亲信布列于城门下；特令平章沙只班召其馆客范汇，以毡车载入宫中，"谕以伯颜罪状，卸其军权诛之之意"③，令其与杨瑀草拟诏书；夜二鼓，命云都赤月怯察儿至太子燕帖古思营，取燕帖古思还；四鼓，命平章只儿瓦歹持诏赶赴柳林。先解其兵权，传旨诸道随从伯颜者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诏称：

"朕践位以来，命伯颜为太师、秦王、中书大丞相，而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轻视太皇太后及朕弟燕帖古思，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加以极刑，允合舆论。朕念先朝之故，尚存悯恤，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左丞相。所有元领诸卫亲军并怯薛丹人等，诏书到时，即许散还。"

初稿写作"诏书到日"，顺帝说："自早至暮，皆一日也，可改作时。"一字之差，即表明了顺帝对除去伯颜心情之迫切，也可看出顺帝的精明。伯颜请入宫与帝告辞，使者不许。不久，又诏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伯颜行至江西豫章驿，饮药而死。

伯颜被贬，前两都争战和王忽察都事件中的主要人物，文宗朝的权臣都受到了惩罚，于是御史台臣始奏太皇太后非顺帝

母及其曾害死八不沙皇后的事实。

六月，诏撤去文宗庙主，贬太后卜答失里东安州（今河北安次县）安置；放燕帖古思于高丽，遣云都赤（带刀侍卫者）月怯察儿押送。行至沈阳，月怯察儿“拉其腰而死”。前参与王忽察都阴谋而今犹在世的明里董阿伏诛。

伯颜被贬后，顺帝以伯颜弟、脱脱父马札尔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仅半载，于通州置榻房，开酒馆、糟房，日至万石，又使广贩长芦、淮南盐”④，以牟取商利。脱脱对父亲以高官经商营利的作法很不赞成，知其在政治上不会有所作为，于是请参知政事佛喜劝其父解职闲居。不久，顺帝以脱脱为右丞相⑤。

“朝廷更立宰相，庶务多所弛张，而天子图治之心甚切”⑥，百官顿觉中兴有望。于是在脱脱的主持下，开始大刀阔斧地革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

脱脱新政的内容主要是兴文治、整顿吏治和发展经济。

七月，诏封微子为仁靖公，箕子为仁献公，比干加封为仁显忠烈公。命翰林学士承旨腆哈、奎章阁学士巎巎等删修《大元通制》。

十二月，“复科举取士制。国子监积分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一十八名”⑦。这一措施是吴直方向脱脱建议的，他说：“科举之行未必人人食禄，且缘此而家有读书之人，人读书则不敢为非，其有系于治道不小。”⑧“科举一恢复，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引导他们走读书入仕的道路，对于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作用”⑨。在脱脱的倡导下，国子监蒙古、回回、汉生员数目迅速增至三千。

至正元年（1341），顺帝命脱脱领经筵事，改奎章阁为宣文阁，选儒臣进讲。先是，文宗天历二年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采焕然。伯颜擅权，文士四散。顺帝时，宣文阁在经筵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纂史书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了一些减轻人民负担和放松对汉人南人控制的措施，如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等。同时，着手整顿吏治，定守令黜陟之法。

至正二年（1342），为发展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编纂、颁行《农桑辑要》。

至正三年（1343），“诏修辽、金、宋三史，以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⑩。

又请修《至正条格》颁行天下。

在大兴文治的同时，脱脱也辅佐顺帝调整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如为被伯颜杀死的郯王彻彻秃平反昭雪；召还被伯颜贬的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让他们回到各自的封地；使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位等。

至正四年（1344），脱脱以疾辞相，表十七上始获准。继任者先后有阿鲁图（博尔术四世孙）、别儿怯不花、朵儿只（木华黎六世孙）等，脱脱所制定的改革措施基本上仍在贯彻执行。但推行的力度和取得的效果却已大不如前。

七年（1347），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以宿怨谮脱脱父马札儿台，诏徙马札儿台甘肃安置。脱脱请与父俱行，获准。十一月，父死。顺帝召脱脱还京。

八年（1348），为太傅，提调宫傅。九年，复为中书右丞相。顺帝对脱脱寄与莫大希望，为他的再相特行赦天下，诏书称："朕纂成洪业，抚临万邦，夙夜厉精，靡遑暇逸。比缘依注失当，治理乖方，是用图任一相，俾赞万机。爰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统正百官，允厘庶绩，曾未期月，百废具举，中外协望，朕甚嘉焉。尚虑军国之重，民物之繁，政令有未孚，生息有未遂，可赦天下。"⑪

再相时的脱脱，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局势，河患屡屡发生，造成了生产的破坏、财政的困窘和社会的动荡；吏治的败坏，使纲纪废弛的现象日趋严重；生产的破坏，赋役的严重不均，人民负担的日益加重，更激化了元朝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百姓生计无着，流离失所，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发生。

脱脱依然雄心不减，他以乌古孙良桢、龚伯遂、汝中柏、伯帖木儿为僚属，皆委以腹心之寄，小大之事悉与之谋，从当时最为棘手的河患和钞法入手，身任其责，力挽颓局，望有补于万一。

十年（1350），脱脱采纳左司都事武琪的建议，变更钞法。

变更钞法的原因一是纸币的严重贬值。自世祖后期，经成宗大德、武宗至大以来，纸币大量发行，大量动用钞本，造成纸币贬值。仁宗时虽曾加以整顿，却并不能制止纸币贬值的趋势。以致官定的银钞比例仅及中统初的1/20。二是伪钞的泛滥，严重地破坏了钞法的实行。

变更钞法是一件大事，脱脱曾集中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集贤、翰林两院官进行讨论，会上赞同与反对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意见不能统一。最后还是由中书省决定，报请顺帝批准，下诏实行。新钞法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印造至正

交钞，实则以旧日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而至正钞一贯抵至元宝钞二贯。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钱通用，形成钱币并行的局面，而以钱实钞。同金末的交钞一样，没有足够的物质为基础，交钞变更根本无法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变钞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⑫。脱脱的变更钞法以失败告终。

入元以来，黄河水患连年，末年尤甚。河决严重地破坏了生产，造成了大批流民，河水北侵，又破坏了济南、河间盐场，“妨国计甚重”。治河虽花费了大量人力、资财，水患却没能根治。脱脱复相后，“慨然有志于事功，论及河决，即言于帝，请躬任其事，帝嘉纳之”⑬。于是召集群臣会议廷中，而意见分歧很大。都漕运使贾鲁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加固北堤，其用功省；二是疏塞并举，使河东行以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采纳了后一方案。

十一年（1351）四月，下诏中外，命贾鲁以工部尚书为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十五万人，庐州等戍十有八翼军二万人供役，一切从事大小军民，咸禀节度，便宜兴缮。二十二日开工，七月疏凿成，八月决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水土功毕。诸埽诸堤成。河复故道，南汇于淮，又东入于海。

脱脱力排众议，独任贾鲁，治河大功告成，蒙赐号世袭答剌罕。后期所行二事，一败一成。

时，颍上红军起。十二年（1352），芝麻李据徐州，脱脱自请往讨。募盐丁及城邑丁壮二万人，与所统兵俱发。破其外城，芝麻李遁走。十四年（1354），讨张世诚于高邮。顺帝听

信宣政院使哈麻的谗言，以“老师费财”之过削其官爵，安置淮南。十五年（1355），又诏流于云南，行至腾冲。哈麻矫诏遣使鸩杀之。

脱脱死后，顺帝在哈麻引导下，安于淫逸享乐，政事废弛，元朝走向了灭亡。

注 释

①《元史·脱脱传》。

②《元史·伯颜传》。

③④《〈庚申外史〉笺证》。

⑤此据《〈庚申外史〉笺证》所载。《元史》马札儿台和脱脱传则谓以疾辞。

⑥《元史·苏天爵传》。

⑦《元史·顺帝三》。

⑧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四一，《集贤大学士吴公行状》。

⑨邱树森《妥欢贴睦尔传》，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⑩《元史·顺帝四》。

⑪《元史·喃帝五》。

⑫《元史·食货五》。

⑬《元史·河渠三》。

元

方国珍叛降

至正八年（1348）十一月，方国珍起事于台州，聚众海上。

方国珍，江浙行省台州路（治今浙江临海）黄岩人。浮海贩盐为业。家世业农，佃种为生。父亲柔良，每为田主所欺。时"黄岩风俗，贵贱等分甚严。若农家种富室之田，名曰佃户，见田主不敢施揖，伺其过而后行。谷珍（即国珍——引者注，下同）父为佃户，过于恭主。谷珍兄弟四人既长，谷珍谓父曰：'田主亦人尔，何恭如此？'……父卒，兄弟戮力，家道渐裕，酿酒以伺田主之索租。一日，主、仆至其家，盛馔宴主，先以美酝醉死其仆，而主亦醉死焉，皆醢其尸于酒瓮。"日久，事渐露，为主家所告，官府遣人往捕，遂杀捕者，起事①。

浙江参政朵儿只班总兵往讨，一军皆没，朵儿班只被俘，方国珍遂通过朵儿班只遣使向元请降。朝廷剿抚意见分歧，暂从其请，授官庆元定海尉。国珍回故里，而聚兵不解。

方国珍的起事本为报私仇，泄私愤，并无明确的反对元朝统治的意识。他利用自己熟悉海上情况和善用海船的优势，出

没于沿海和海中岛屿，与元军周旋，希冀以造反的方式，扩充实力，邀官请赏。十年（1350），进攻近海州县借粮，俘元帅扈海，进而进攻温州。烧掠沿海州县后，再入海。

十一年（1351），元以孛罗帖木儿为江浙行省左丞，总兵至庆元（今浙江宁波）。泰不花为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进驻温州，讨方国珍。泰不花招募知天文、地理、兵机、战策之士，会两浙各道兵于温州，与庆元约，于六月南北夹击，一举剿灭方国珍势力。至期，孛罗帖木儿先至大闾洋，方国珍夜率劲卒纵火鼓噪，官军不战而溃，赴水死者过半，孛罗帖木儿被俘，方国珍要求他代为向朝廷请降。七月，元遣大司农达识帖睦迩、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浙东廉访使董守悫前往招谕，设巡防千户所，以方国珍兄弟为长、贰，官其徒可任百户者十人，由朝廷发给官、兵粮饷，国珍再降。泰不花只好亲至海滨，遣散招募的兵众，拘收船只、兵器。

时红巾军起，元廷派兵讨徐州芝麻李，命江浙行省以舟师守大江，方国珍疑惧，又叛。泰不花一面发兵守御，一面遣人令其率众归宣慰司。国珍益疑，以舟突袭海门，泰不花乘潮前往迎击，船触沙，不能行，与国珍遇，战死。

十二年（1352），元廷再以左答纳失里为江浙行省左丞，吴世显为浙东同知元帅，与浙东都元帅章保同分府温州，黑的儿为福建同知元帅；与浙东副元帅也忒迷失同分府台州。八月，方国珍攻台州，被也忒迷失、黑的儿击退。又使僧人持书至江浙行省请降。方国珍并不以消灭元军为战斗目标，他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俘虏元朝官、将，为自己请降，乘机要求官赏。元朝也不欲事态扩大，影响漕运；又担心方国珍与红巾军联合，故每欲招降。于是方国珍对元朝便采取屡降屡叛的策

略，元朝所授与的官职也就一次次升高。

十三年（1353）正月，方国珍又降。十月，授国珍徽州路治中，兄国璋广德路治中，弟国瑛信州路治中，令交出船只，遣散兵众，督促赴任。国珍疑惧，不受命。遂拥船千艘，据海道，阻绝粮运。

江浙行省左丞帖里帖木儿和江南行台侍御史左答纳失里以招降不成，获罪。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阿儿温沙升本省右丞，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皆总兵讨方国珍。又设浙江元帅于庆元，以纳麟哈剌为元帅，备御方国珍。纳麟哈剌治铠仗，理舟楫，运粮饷，以给军用。方国珍则不时于海上袭击元朝所运军资粮饷。

至此，方国珍已经三降三反。至正十五年（1355），朝廷拟以海道巡防万户职招降。十六年，方国珍再降，以为海道运粮漕运万户，兼防御海道运粮万户，其兄国璋为衢州路总管，兼防御海道事。

十七年（1357），受江浙行省命率温、台、明三州舟师袭张士诚于太仓。十八年（1358），元授方国珍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海道运粮万户如故。五月，又为江浙行省左丞兼海道运粮万户。国珍既为行省官兼运粮万户，每年自海道运粮至京师，为朝廷所倚重，又与御史大夫拜住哥情好甚密，于是以其侄明善为镇抚驻温州，进而控制了台州和庆元。北上余姚、上虞，控地与张士诚接。

时，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发展势力，十二月，遣人招谕方国珍。方国珍又决定投降朱元璋，与之连兵共图张士诚。于是在 1359 年（元至正十九年，小明王龙凤五年）致书朱元璋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

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惟明公倡义濠梁，东渡江左，据有形胜，以制四方，奋扬威武，以安百姓。国珍向风慕义，欲归命之日久矣，道路雍遏，不能自通。今闻亲下婺州，抚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影从。不弃犷愚，猥加诲谕，开其昏朦，俾见天日，此国珍所素愿也。谨遣使奉书上陈悬款，或有指挥，愿效奔走。首言为定，明神实临。"②于是献黄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织文绮百端。三月，再遣使献温、台、庆元三郡，并以次子方关为质。朱元璋却还其质子，授国珍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国璋右丞，国瑛参知政事，国珉枢密分院佥院。方国珍之降本非出自至诚，遂称疾受印而不任职。"心持两端，觇伺成败"③。十月，又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官，并为元运东南赋粮至京师。时元以达识帖睦迩为江浙行省丞相，张士诚为太尉，国珍为平章，朝廷"虽縻以好爵，资为藩屏，而贡赋不供，剥民以自奉，于是海运之舟不至京师者积年矣"④。方、张互相猜疑，"士诚虑方氏载其粟而不以输于京也，国珍恐张氏掣其舟而因乘虚以袭己也。"朝廷遣兵部尚书伯颜帖木儿、户部尚书齐履亨征海运于江浙，伯颜帖木儿"正辞以责之，巽言以谕之，乃释二家之疑"，于是征平江之粟自杭州转运至京师。

方国珍首鼠两端，既受朱元璋官印，又依旧奉至正年号，运江南粮以助元。而朱元璋西有陈友谅，东有张士诚，无力对浙东用兵，故对方国珍多次遣使责问，以威势暂事羁縻。方国珍依旧运米至大都，并为元朝招降朱元璋效力。同时南与福建陈友定、北与元将扩廓帖木儿通，以成犄角之势，暗中与朱元璋抗衡。朱元璋也利用方国珍侦视元廷动静。自至正十九年至

朱元璋吴元年，方国珍一直在元廷和朱元璋两大势力之间玩弄两面派手法，控制着温、台、庆元地区，元再任为淮南行省左丞相，分省庆元。

至正二十六年（1366），方国珍向朱元璋献白金二万两，朱元璋回报以纱绮、鞍辔。元朝又封他为衢国公，进位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

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吴元年，1367），方国珍一方面与福建陈友定联络，一方面送款于朱元璋，称待朱元璋取杭州，即纳地降吴。

九月，朱元璋以方国珍反复无信，命参政朱亮祖率师讨方国珍。败其弟国瑛，克台州。十月，朱亮祖下温州。朱元璋又派大将汤和讨方国珍于庆元，十一月，汤和攻下庆元。方国珍驱部下乘海舟遁，和率军追袭，方国珍大败后遁入海岛。其部将徐元帅等降，方国珍也遣人至汤和军前请降。明洪武元年，方国珍至建康，明太祖朱元璋赐第京师，授以广西行省参政职。洪武七年（1374）死于南京。

注　释

①黄溥《闲中今古录摘抄》，转引自杨讷等编《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

关于方国珍起义原因，《明史》等载，同里蔡乱头啸聚恶少年行劫海上，有司发兵捕逐其党，多株连平民。国珍为怨家陈氏诬构与寇通，乃杀陈氏，被后者告至官，官兵追捕急，遂亡入海。此说显系国珍自述，或当有所回避。

②《明太祖实录》卷七。

③刘辰《国初事迹》。

④《元史·食货志》。

红巾军大宋政权的抗元斗争

元朝自建立以来，黄金家族内部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除仁宗、英宗两朝的政治路线一脉相承外，随着皇帝的更迭，统治政策也不时发生变化。大都之变开创了权臣选定皇帝的先例，武宗、仁宗、英宗三朝又出现了铁木迭儿依靠太后的庇护专权跋扈的政治局面。两都之战，更将皇位的争夺诉诸武力，进一步造成了皇帝最高统治权的旁落，使权臣专横擅权的状况愈演愈烈。政治路线按照权臣的意志改变，政治风云随着皇位的更迭频繁变化。

仁宗、英宗曾致力于稳定统治秩序，但受制于太后和权臣铁木迭儿；文宗曾有志复兴，而享年不永；顺帝初期在燕帖木儿和伯颜的控制之下，不得施展其抱负，后期又在哈麻等人的诱导下，沉湎于女色和享乐。由于权臣的干扰，蒙古社会习惯势力的影响，元朝的统治制度始终没有彻底完善，统治秩序一直没有最终长期牢固地建立，文治的方针没有自始至终地全面执行。每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造成政策的改变。

自建国以来对宗室、大臣的赏赐和用于宗教活动的支出耗

费了大量财富，皇帝、贵族的生活日益腐化，官吏贪赃枉法的现象愈演愈烈，统治机构迅速腐朽。贷赂公行，官吏的敲诈勒索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其问人讨钱，各有名目：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日曰‘追节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之为何事也”①。

皇室、贵族和权臣对土地的掠夺和兼并，残酷的剥削，繁重的赋役，加上吏治的败坏，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某些权臣、贵族的民族偏见和民族压迫政策，又使民族矛盾加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和互相倾轧更败坏了政治风气。这一切，都使元朝后期的社会经常处于动荡不稳的状态中。

官僚队伍的腐败也侵蚀了军队，灭宋后，太平日久，民不知兵，向以勇敢善战著称的蒙古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元末叶子奇形容当时的军队是“将家之子，累世承袭，骄奢淫佚，自奉而已，至于武事，略之不讲，但以飞觞为飞炮，酒令为军令，肉阵为军阵，讴歌为凯歌，兵政于是不修也久矣”。

世祖、仁宗和顺帝至正前期，虽采取过一些稳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却不断遭到奸臣、权臣的干扰和破坏。而繁重的赋役负担和高利贷剥削，更使贫苦农民破产，甚至卖儿鬻女。

统治集团的骄奢淫佚，官僚队伍的腐化堕落和庞大的军费开支，造成了财政的困窘。元朝统治者解决财政困难的办法就是大量发行纸币，这就造成了后来的交钞贬值。脱脱改变钞

法，不但没有解决元朝财政的困难状况，反而加剧了通货膨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不满，元朝的统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当时流传的一道《醉太平小令》，将元朝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揭露得淋漓尽至，分析得入木三分：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作官，官作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末明初人陶宗仪说，这首《醉太平小令》，因“切中时病”，故当时“自京师至江南，人人能道之”②。在政治腐败和人民贫困的情况下，元顺帝时，天灾也不断发生。元统元年，京畿大雨，饥民达 40 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达 59 万。至元三年，江浙又灾，饥民达 40 万。至正四年，黄河三次决口，饥民遍野。在已往小股农民反抗斗争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早已在民间流传的白莲教组织又在酝酿着大规模的反抗斗争。

人们常常把贾鲁治河说成是导致元末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原因，“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③。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刘福通在颍上首举义旗，头裹红巾为标志，称“红巾军”，又因以白莲教进行组织号召，故也称“香军”。于是长江上下，大河南北，所在蜂起，皆号红巾。“时徐寿辉等起蕲黄，布王三、孟海马等起湘、汉，芝麻李起丰、沛，而郭子兴亦据濠应之”④。

芝麻李，徐州萧县人，名李二。当地发生饥荒，李家惟有芝麻一仓，尽以赈人，遂号为芝麻李。刘福通起义后，民心不

安，李二与邻人赵君用谋起为应，他说："朝廷妄兴土木之功，百姓贫苦无告。吾闻颍上香军起，官军无如之何，当此之时，乃真男子取富贵之秋也。"赵君用为社长⑤，他又联络了"勇悍有胆略的"彭二（彭早住），同邑薛显等八人，歃血为盟。至正十一年八月十日夜，进占徐州。"天明，又树大旗，募人为军，从之者亦百余万。浮桥四出掠地，亦掩有徐州近县，及宿州、五河、虹县、丰沛、灵璧，西并安丰、濠、泗"⑥。

十二年（1352）八月，丞相脱脱自请讨徐州，以淮南宣慰使逯鲁募盐丁和城邑敢勇之士，并令知枢密院事咬咬、中书平章政事搠思监、也可（大）达鲁忽赤福寿等从征。

九月，官军围攻徐州，"以巨石为炮，昼夜攻之不息"。起义军出战不利，城破，"获其黄伞旗鼓，烧其积聚，追擒其伪千户数十人，遂屠其城"⑦。芝麻李遁走。赵君用、彭早住率余众奔濠州，投奔郭子兴。

与此同时，布王三领导的北琐红巾军先后占领了邓州、南阳、唐河、嵩州、汝州、河南府，并进逼滑州、浚州；孟海马领导的南琐红巾军则取襄阳、房州、归州、均州、峡州和荆门等地。

镇压芝麻李的同时，元朝先后遣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知枢密院事老章，卫王宽彻哥，豫王阿剌忒纳失里，中书平章政事蛮子、巩卜班、太不花和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等率军征讨活动在河南、江北的南琐红巾军、北琐红巾军和彭莹玉、徐寿辉领导的天完红巾军。

在与元朝官军的斗争中，各支分散的红巾军逐渐联合，形成南北两支，北方红巾军以刘福通为核心，南方红巾军则在天完政权的领导之下。

刘福通，颍州人。与栾城人韩山童以白莲教组织民众，宣传“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河南、江、淮从之者甚众。时值贾鲁治河之役开始，他们预先在黄河故道埋下一个单眼石人，背上刻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字样，希望动员治河民夫参加起义。正当他们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准备起兵反元之际，为官府发现，遭到镇压，韩山童被捕，其妻杨氏与子韩林儿逃往武安。刘福通也逃出，并于五月初三日率众起义，占领颍州（今安徽阜阳），元末大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正式展开。

元廷命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领阿速军六千并各支汉军前往征讨，与河南行省徐左丞诸军齐进。而“三将但以酒色为务，军士但以剽掠为务，于剿捕之方漫不加省。赫厮军马望见红巾军阵大，扬鞭曰：‘阿卜、阿卜。’阿卜者，言走也。于是所部皆走”⑧。赫厮死于上蔡，徐左丞为朝廷所诛，阿速军不习水战，不服水土，病死者过半。

在镇压红巾军时，元朝军队将领腐化，战斗力低下，纪律松弛的弱点逐渐暴露，同赫厮军的临阵脱逃一样，也先帖木儿所统大军未与红巾军接战，便自相惊扰，也先帖木儿弃军逃跑，损失粮草、车辆、武器无算。

至正十四年（1354），脱脱在镇压了芝麻李之后，统军前往进讨泰州张士诚于高邮，竟因哈麻的中伤，以老师费财被贬，百万大军，一时溃散。

在官军出师屡屡不利的情况下，定居于颍州沈丘的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和信阳罗山人李思齐各自招募丁壮，组织地主武装，与红巾军为敌。元廷授察罕中顺大夫、汝宁府达鲁花赤，李思齐汝宁知府。他们聚兵万人，自成一军，屯于沈丘，屡败

红巾军。后来，成为元朝赖以镇压红巾军的主要力量。

至正十五年（1355）一月，元廷命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洪丑驴守御河南，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述律朵儿只守御潼关，宗王扎牙失里守御兴元，陕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温沙守御商州，通政院使朵来守御山东，将刘福通的势力包围起来，而使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在包围圈内与红巾军作战，企图一举消灭红巾军，但刘福通粉碎了元军的围剿，发展了起义军的力量。二月，他将韩林儿自砀山接回，立为帝，称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建立了北方红巾军政权。宋政权建立了中书省、枢密院，盛文郁、刘福通先后为丞相，又任命了平章、知枢密院等官。随着形势的发展，还建立了行中书省和府、县等地方机构。管军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等，均属枢密院管辖。军职则有百户、千户、万户、总管和统军元帅等⑨。

宋政权建立后，元朝军队更加紧了对它的镇压。六月，答失八都鲁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进军长葛（今河南长葛东北），与刘福通野战，被击败，战士奔溃。答失八都鲁退至中牟，收散卒，准备开展屯种戍守，又被红巾军劫营，尽失辎重。元将刘哈剌不花设伏邀击，红巾军失利，元军夺回所失辎重。

刘福通遣将赵明达北攻嵩、许、邓、洛，自孟津渡河至怀庆，河北大震。察罕帖木儿进战，北上的红巾军战败。十二月，答失八都鲁又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避兵于安丰（今安徽寿县）。

十六年（宋龙凤二年，1356）三月，刘福通进兵亳州，“答失八都鲁父子与刘福通对敌，自巳至酉，大战数合，答失八都鲁坠马，孛罗帖木儿（答失八都鲁之子——引者注）扶令

上马先还，自持弓矢连发以毙追者，夜三更步回营中。十月，移驻陈留”⑩。

九月，为了减轻元军对都城亳州的军事压力，扩大战果，刘福通遣将李武、崔德等进兵陕西，毛贵入山东。李、崔破潼关，元参知政事述律杰战死。

十七年（宋龙凤三年，1357），由于毛贵在山东战果辉煌，刘福通进一步决定大举北伐。宋北伐军兵分三路：以毛贵为主力，由东路进攻大都；关先生、破头潘为中路绕道山西，转攻河北，与东路配合包围大都；派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陕西，增援李武、崔德。旗联大书：“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示了灭亡元朝的决心。

李武、崔德取潼关后，连克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虢州（今河南灵宝），扼崤函，将入陕。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奉调前往追击，李、崔率军至平陆（今山西平陆西南）、安邑（今山西运城东北），被察罕帖木儿击败，队伍溃散。不久，他们又重新聚集，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攻武关，夺七盘，下蓝田，趋长安，前锋直抵霸上，陕西省台告急。察罕帖木儿率众入关，长驱而前，红巾军失利，改走南山，入兴元。十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下兴元，入凤翔。又为察罕帖木儿、李思齐所败，走入四川，李喜喜所部后来投奔了陈友谅。留在陕、甘的李武、崔德于龙凤六年（至正二十年，1360）攻占了宁夏路（今宁夏银川）、灵州（今宁夏灵武南）等地，六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投降李思齐。

毛贵入山东后，下胶州（今山东胶县），杀佥枢密院事脱欢，克莱州（今山东掖县），杀山东宣慰副使释嘉讷。占领益都路，益王买奴逃遁，山东行枢密知院张俊投井死。迅速占领

了山东大部郡邑。三月，下滨州（今山东滨县），进逼济南。朝廷急命湖广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知枢密院事孛兰奚和同佥淮南行枢密院事董抟霄往援，时红巾军大集，“自南山来攻济南，望之两山皆赤”。抟霄等设伏涧上，先以数十骑前往挑战，红巾军中伏失利。泰安红巾军前往支援，也为抟霄所败，遂放弃济南。四月，攻占莒州（今山东莒县）。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军万户田丰响应毛贵，攻克济宁路（今山东巨野）、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冬，棣州的元义军千户余宝也杀知枢密院事宝童，响应红巾军。

龙凤四年（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田丰攻占元朝南北漕运的枢纽——东平路（今山东东平），元朝南北漕运中断。二月，毛贵下清（今河北青县）、沧（今河北沧州市），进据长芦（沧州）。不久，攻占济南路，元守将爱的战死。

毛贵在山东修城池，“立宾兴院，选用故官，以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十止收二分，冬则陆运，夏则水运”⑪。在军事上节节胜利的情况下，重视发展生产，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接着，他挥师北上，由河间趋直沽，犯漷州，至枣林，逼畿甸，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元廷中外骇惧，咸议迁都。独左丞相太平坚持固守。同知枢密院事刘哈剌不花奉命出城拒敌，与红巾军战于柳林，毛贵军失利，退回济南。龙凤五年（元至正十九年，1359），毛贵被部将赵君用杀害，毛贵部下续继祖又杀死赵君用。在内部互相残杀中，山东红巾军势力削弱。至正二十一年，察罕帖木儿向山东反攻，夺回了山东部分州县，招降了田丰、余宝等，山东又被元朝势力所控制。

北伐中路军于龙凤三年（至正十七年，1257）入太行，取

陵川（今属山西），克高平（今属山西），占领潞州（今山西长治），进攻河东重镇冀宁路（今山西太原）。由于受到察罕帖木儿的重兵阻截，退回太行。

四年春，毛贵遣部将王士诚、续继祖自益都出兵进攻怀庆，杀怀庆路总管王得贞；王士诚攻占晋宁路（今山西临汾），杀总管杜赛因不花。中路军势力大增，遂兵分两路，分别自绛州（今山西新绛）、沁州（今山西沁县）出发，进攻晋宁、大同。

围攻大都的东路军撤退后，察罕帖木儿抽调大量兵力西向对付中路。六月，关先生攻克辽州（今山西左权）。九月，东向进攻保定、定州，不克，再入山西，到达晋北。十月，占领大同、兴和。十二月，攻克上都，焚毁了上都宫阙；占领全宁路（今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焚毁鲁王宫府；夺取辽阳路，杀懿州总管吕震，并以此为根据地，向高丽进攻。五年十一月，前锋渡鸭绿江，十二月，攻占义州、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地。七年，因战事不利，退回辽阳，关先生、沙刘二战死，破头潘被俘。余众退回山东后降元。

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北上攻汴梁。先后攻克大名路、卫辉路，形成了对汴梁的包围。元朝遣答失八都鲁、知枢密院事达理麻失里迎战，屡为红巾军所败，龙凤三年，答失八都鲁死，其子孛罗帖木儿袭职，领兵退驻井陉（今河北井陉西）。

龙凤五年，刘福通再攻汴梁，元守将竹贞逃跑，于是，宋以汴梁为都城，迁小明王来居。起义军势力达到鼎盛。由于北伐三路军相继失利，元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汴梁，形势很快便发生逆转。元军包围并攻破汴梁，刘福通冲出重围，带领小明

王逃回安丰，数万红巾军官员、将士及其家属被俘。

逃回安丰后，宋政权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处境十分困难。龙凤九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乘机来攻，刘福通奋力抵抗，战死。朱元璋往援，小明王被救出安置在滁州。龙凤十二年（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派廖永中迎小明王前往应天，在瓜步沉船，小明王溺水死。宋政权灭亡。

注 释

①叶子奇《草木子》。

②陶宗仪《南村辍耕录》。

③《元史·河渠志》。

④《明史·韩林儿传》。

⑤元代农村有村社，以五十家为一社，负责组织生产互助和维护邻里治安。社有长。

⑥《<庚申外史>笺证》。所记从者百万，数字恐有夸大。

⑦《元史·也速传》、《元史·脱脱传》。

⑧《<庚申外史>笺证》。

⑨参见邱树森《元末红巾军的政权建设》，《元史论丛》第一辑。

⑩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元史·答失八都鲁传》。

⑪《元史·顺帝八》。

天完政权的抗元斗争

元顺帝至元四年（1338），白莲教首领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在袁州（今江西宜春）发动反元起义，被官府镇压。周子旺与其母佛母，其子天生、地生被杀，彭莹玉奔淮西，匿民家。

彭莹玉原为袁州慈化寺僧人，常为人医治疾患，享有很高声望。及逃至淮西，又受到当地人民的保护。他与麻城铁工邹普胜等一起，继续以白莲教进行反元起义的准备活动，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

至正十一年八月，在刘福通的影响下，邹普胜与徐寿辉等也用红巾为号，举起义旗。徐寿辉本名徐贞一，以贩布为业，往来蕲、黄间。至此，被邹普胜等推为首领。九月，占领蕲水县（今湖北浠水）和黄州路（路治在今湖北黄冈），杀蕲州总管李孝先。

由于有了长期的酝酿准备，起义军很快就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十月，众推徐寿辉为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定都蕲水。“天完”的含义是“压倒大元”，表现了红巾军推翻元朝统

治的决心。于是设官立制，以邹普胜为太师，乡人有才识者皆授以官爵。天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中书省，称莲台省，下设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地方最高政权机构是行省，先后建立过江南、汴梁、陇蜀、江西等行省。军事机构则有统军元帅府、管军总管府、管军万户府、管军千户府、管军百户府等。

天完政权是元末红巾军建立最早的政权，它一经建立，便分兵四出攻城略地，“其遣将所摧陷，几海内之半”①。

天完治平二年（至正十二年，1352），天完政权遣将分攻河南江北、江西、湖广、江浙等处，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在荆湖战场，天完将领丁普郎、徐明远等下汉阳、兴国（今湖北阳新）。曾法兴下安陆，元知府丑驴（丑闾）战死。邹普胜派千人向湖广行省诈降，进驻武昌，然后以大军继进，内外夹攻，占领武昌，元宗室威顺王宽彻普化、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和尚弃城走。于是连下中兴（今湖北江陵）、沔阳、荆门，与南琐红巾军和北琐红巾军互相呼应，河南江北行省西部的均、房、峡等州尽为红巾军所据。元山南廉访使卜理牙敦被俘，死。沔阳达鲁花赤咬住自溺于柴林河。

二月，红巾军主力南下江西，攻占江州（今江西九江），江州守李黼死。又连下瑞昌、武宁、建昌（今江西永修）、宁州（今江西修水）、饶州（今江西波阳）、信州（今江西上饶）和靖安。围攻南昌不下，进而南下攻占瑞州（今江西高安）、上高、新昌（今江西宜丰）。

三月，下袁州、吉安，四月，进入赣州地区，攻克宁都。在短短的四个月中，红巾军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江西全境。诚然，由于一路前进，所攻下的州县没有力量坚守，有些得而复

失，但影响所及，处处受到群众欢迎，而元朝守土官将则或死或逃，江西大震。

红巾军的迅猛攻势，令宴安日久的元朝官僚、将领猝不及防，不少人被杀、被俘或逃遁。诸州府仓促集兵，粮饷不足，配合不力，州县接连失守。至正十一年底至十二年初，才调兵遣将，收复所失州县。四川行省平章咬住与参知政事答失八都鲁以本部探马赤军三千征讨荆襄。知荆门聂炳也募土兵七万，向红巾军反扑，收回荆门、襄阳、归峡等州和中兴路，杀红巾军将领李太素，俘王权②。

天完刚刚建立，于治平元年冬就东进淮西，十一月，下太湖、宿松、潜山。次年春，克桐城，攻打安庆。进占池州、铜陵、无为。二年，克婺源、休宁、黟县、歙县，并由徽州向杭州挺进。江西的红巾军进入福建，得到当地起义军的响应，下建宁、泰宁，直入邵武。又进取顺昌、将乐、万安，围攻延平（福建南平）、建安（今建瓯）、建阳，近逼浦城、松溪，攻占福安、宁德。红巾军张榜召民入伍，“沿江贩负、深山樵采之徒蜂起”，各为千户、万户、总管③，红巾军在福建的影响迅速扩大。他们有良好的纪律，不杀不淫，只召民入伍和“摧富益贫”。将领王善进攻福宁，俘其知州王伯颜，劝其归降说：“闻公有惠政，此州那可无尹，公为我尹，可乎?”伯颜不从，遂与监州阿撒都剌同被杀。十三年春，王善又连下罗源、连江，擒斩巡检刘浚。福州曾一度被攻占，后因元军援兵至，红巾军撤围走。王善为刘健募人杀害④。

同年，天完部分军队进入衢州路和建德路，占领开化、淳安、建德，攻取常山、江山等县，以孤军无援，不久撤走。主力则往攻杭州。七月，大军抵达杭州，杭州元官相继逃跑。平

章定定、教化逃往嘉兴，郎中脱脱走渡钱塘江，红巾军自北门入城，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樊执敬战死。杭州路总管宝哥自溺于西湖。红巾军进入杭州，“不杀不淫”，只将“府库金帛，悉数辇运以去”⑤。

杭州的失陷使元廷大为震动，立即组织力量围剿红巾军。平章月鲁帖木儿与宣徽使八忒麻失里领兵自淳安入徽州路，切断红巾援军入援之路。浙西廉访使合剌忽纳由绍兴率盐卒过江，会同官军攻杭州。平章教化与济宁路总管董抟霄也从湖州统兵反击。红巾军力不能敌，败退。

自杭州撤出的红巾军在得到接应后，声势再振，入湖州，吴兴，克宜兴、溧阳、溧水、常州、江阴，攻京口（今江苏镇江），逼集庆（今江苏南京）。但元军占领了红巾军的根据地徽州，红巾军失去后援，所得之地不能守，至年底，为元军击败，所得之地尽失。

这年，天完军也曾进入湖南，攻克长沙、岳阳。一度占领常宁、道州、宝庆路（今湖南邵阳）。

治平二年闰三月，元朝调动兵将，全面部署镇压红巾军。下诏令四川行省平章政事咬住以兵东讨荆襄；江西行省左丞相亦怜真班以兵守江东、西关隘；命诸王亦怜真班、爱因班，参知政事也先帖木儿与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月鲁帖木儿讨南阳、襄阳；刑部尚书阿鲁讨海宁；江西行省右（左）丞火你赤与参知政事朵解讨江西；以浙东宣慰使恩宁普代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守芜湖；命江浙行省右丞兀忽失、江浙行省左丞老老与星吉、不颜帖木儿、蛮子海牙同讨饶、信。

天完红巾军是在元朝政治腐败，纲纪松弛，文恬武嬉，因循怠惰，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情况下，经过长期组织准备后突然

向元朝政府军进攻的，故在战争初期，所向克捷。但它的领导力量薄弱，徐寿辉“无他长”，只是以“相貌异众”被推举为帝⑥。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最终的奋斗目标，队伍人员成分庞杂，思想涣散。不懂得在攻下的地区建立政权，巩固战斗成果。因此，在元朝政府军组织反击和地主武装的联合打击下，所下州县，又迅速丧失，反抗活动也很快陷入低潮。

四年（至正十四年，1354），天完政权的核心潜伏于山泽，大规模的军事活动停止，只有个别地区的红巾军余部仍在相机袭击元兵。但天完军队所过之处，人民的反抗情绪高涨，各地不断爆发反元起义，为天完势力的复振准备了条件。同时，刘福通、张士诚两支队伍有了新的发展，分散了元军的力量，也给天完的再兴提供了机会。

五年（至正十五年，1355），天完的首领们走出山泽，再次掀起反元高潮。

正月，天完将领倪文俊复沔阳，以火筏烧蒙古王子报恩奴的船只，报恩奴死，俘其妃妾。陈友谅起于黄蓬。

三月，天完兵再下襄阳路。襄阳世袭万户杨克忠死。

五月，倪文俊自沔阳攻中兴，元帅朵儿只班死。

七月，倪文俊再下武昌、汉阳。

九月，倪文俊围攻岳州。

十一月，天完军占领饶州路、婺源。

十二月，攻祁门、黟县。

六年（至正十六年，1356）正月，倪文俊迎徐寿辉至汉阳，遂以汉阳为都城。天完军再下徽州路。

三月，倪文俊下常德。五月，下澧州。八月，下衡州。九月，攻占兴国。十二月，攻下岳州，俘威顺王子歹帖木儿。

七年（治正十七年，1357）二月，倪文俊破峡州。

当天完军势力再起后，元朝也开始采用剿抚兼施的策略，个别起义军首领在高官的诱惑下产生动摇。丞相倪文俊以王子歹帖木儿为质，求为湖广行省平章⑦。

倪文俊，河南江北行省沔阳人，号蛮子。世以渔业居黄州黄陂。天完政权建立，文俊参加起义。至正十五年天完势力再起后，文俊战功为多。他“善用多桨船，疾如风，昼夜兼行湖江，出人不意，故多克捷”⑧。为实现其降元取高官显爵的愿望，不惜杀害天完政权的领袖，窃夺农民反抗斗争的成果。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未成。自汉阳逃奔黄州，为陈友谅袭杀。友谅自称平章。十年（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称帝，天完政权灭亡。

注 释

①谈迁《国榷》；参见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论述》，《元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82年。

②《元史·哈剌八都鲁传》、《元史·聂炳传》、《元史·顺帝纪五》。

③《万历福宁州志》，参见《元代农民起义资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

④《元史·刘浚传》：浚妻为真定史氏，当红巾军南下之际，尽出奁中物募军，红巾围攻福州，刘浚与之战于中麻，中箭坠马，与其子刘健同被擒。浚不屈被杀，王善特舍其子健，令其收父尸。

刘健尽散家财，结死士百人，诈为工商流丐，入红巾军。发火乱军，使自相屠戮。王善、陈伯祥被擒，磔死于帅府。

⑤《南村辍耕录》。

⑥《草木子》、《明实录·徐寿辉传》。

⑦《元史·成遵传》载，倪文俊质威顺王之子，而遣人请降，求为

湖广行省平章，朝臣欲许者半。参议中书省事成遵反对。并以项羽执太公事为例。

⑧《草木子》。

陈友谅兴败

陈友谅，河南江北行省沔阳渔家子。“少读书，略通文义”①。徐寿辉起兵时，参加起义，为倪文俊簿书掾，后因攻城略地有功，文俊使其领兵，升为元帅。

天完治平五年（至正十五年，1355），倪文俊迎徐寿辉居汉阳后，渐专天完政柄，友谅心不能平。七年，文俊谋杀寿辉，友谅更乘衅袭杀文俊，自称宣慰使，寻自为平章，操纵天完政柄，将这支武装力量当成自己谋富贵、图大事的工具，徐寿辉“徒存空名”而已。

经过两年多的战斗，天完政权控制了长江中游、洞庭湖周围和鄱阳湖北部地区。此外，尚有四川的明玉珍部和袁州的欧普祥部。其中心地区除东北一隅与朱元璋接界外，周围仍处在元朝势力包围之中。陈友谅掌握了天完大权后，打击的目标和发展的方向依然是元朝势力控制的地区。

十月，陈友谅沿江东下，袭击安庆。十一月，屯于山口镇。与安庆守将余阙大战于观音桥。

八年正月，陈友谅与赵普胜、祝宗分别攻其西、东、南三

门。元将余阙分兵守御三门，自当西门。“阙身中三创，被十余枪，力尽，引佩刀自刎死，堕于清水塘”②，攻围两月后，城破。

攻下安庆后，陈友谅顺流而下，进攻江西。五年前，天完红巾军在江西曾横扫诸州县，至此仍有红巾军余部在境内活动，而欧普胜的势力仍占据袁州。经过天完初的打击，元朝虽收复了大部分州县，力量也相应削弱，加之当初配合官军镇压红巾军的地主武装遭到蒙古、色目官僚、将领的排挤和杀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深。这一切，都为陈友谅的顺利进军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月，陈友谅部将王奉国袭击信州，大军号称二十万。

四月，赵普胜自枞阳进军池州，俘元枢密分院院判赵忠，下池州。同月，陈友谅占据龙兴路（今江西南昌）。王奉国占领瑞州。

时江西行省平章政事火尔赤任专权柄，与省臣道童不和，贪忍不得将士心。“陈友谅由九江亲率水兵乘风一夕掩至，官军、义兵势衰不敌，城遂破”③。火尔赤逃遁。道童退至抚州路，“欲集诸县义兵以图克复，而势已不可为”。不久，天完追兵至抚州，道童渡水相拒，死④。

五月，陈友谅遣康泰、赵琮、邓克明等率军前往福建。

友谅自领兵下吉安路。时元江西行省参知政事全普庵萨里、都事吴伯都剌皆总兵分省于吉安，漫不事事。陈友谅以大将熊天瑞往攻吉安，吴伯都剌遣其将塔普援吉，反降于熊，而为向导，全普庵萨里、吴伯都剌皆遁，众大溃，城陷。熊天瑞又占领抚州，俘抚州达鲁花赤完者帖木儿。

陈友谅遣将幸文才围攻赣州路（今江西赣州），江西行省

参知政事全普庵撒里（全普庵萨里）与总管哈海赤斩其劝降使，擐甲登城拒守，力战凡四月。九月，兵少食尽，全普庵撒里自刭死。城陷，哈海赤被俘，不降，被杀。

十一月，陈友谅下汀州路（属江浙行省，今福建长汀）。

天完治平九年（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陈友谅在横扫江西行省后，又入江浙。

三月，略地衢州，同时遣将进攻襄阳。

六月，王奉国、陈友德占领信州路（今江西上饶），守臣江东廉访使伯颜不花的斤战死。

时伯颜不花的斤为江东道廉访副使，自衢州引兵援信州，先在城东败陈友谅将王奉国。伯颜不花的斤入城与镇南王子大圣奴、枢密院判官席闰等分兵自南、北两门出城迎击王奉国，获胜。友谅弟友德急攻东城，并遣使说降，伯颜不花的斤杀使者，誓与城共存亡。信州被围四个月之久，城中食尽，"军民唯食草苗茶纸，既尽，括靴底煮食之，又尽，掘鼠罗雀，及杀老弱以食"⑤。天完军穴地百余所，或鱼贯梯城而上，城中士卒力疲，不能战，席闰出降，大圣奴、参谋海鲁丁皆死，伯颜不花的斤自刎，城陷。

十一月，陈友谅兵突入杉关（今福建邵武西北）。遣邓克明自建昌路（今江西南城）等三路入闽。自此，结束了江西的战事，重点转向对朱元璋的战争。

军事上的顺利进展，提高了陈友谅的声望，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他一方面继续向西北的荆襄地区扩展势力，一方面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加紧了篡夺天完最高领导权的活动。

陈友谅自杀死倪文俊，实际上就掌握了天完政权的领导

权，徐寿辉在远离前线的汉阳，对陈友谅的行动已无力控制。但天完军安庆守将赵普胜是他夺取政权的一大障碍，故陈友谅的夺权活动必自铲除赵普胜始。

赵普胜，别号双刀赵，是天完最早的将领之一。当天完红巾军反元活动陷入低潮之际，结寨巢湖，坚持斗争，曾与朱元璋共事。天完再起，复归。他堪称骁将，却勇而寡谋。在反元和与朱元璋的战争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资历更在陈友谅之上，故素为陈友谅所忌。所守的池州，又是朱元璋向西发展的必争之地。于是，朱元璋利用陈友谅与赵普胜间的嫌隙，遣人入友谅军中行间。普胜不察，“见友谅使者辄诉功，悻悻有德色。友谅衔之，疑其贰于己”⑥。至正十九年九月，朱元璋大将徐达败赵普胜军于潜山，友谅遂以会师为名，亲至安庆。“普胜不虞友谅之图己，闻其至，具烧羊迎之雁汊，登舟见友谅。友谅就执杀之，并其军”⑦。既除普胜，陈友谅即可无所忌惮地篡夺天完政权了。

至正十八年四月陈友谅占领南昌后，寿辉意欲迁都进驻其地，友谅恐对己有所牵制，不从，寿辉不得已而止。十九年十二月，徐寿辉发兵自汉阳前往友谅治所江州。陈友谅则“伏兵郭外，迎寿辉入，即闭城门，悉杀其所部。即以江州为都，奉寿辉以居。而自称汉王。置王府官属。……遣部将阳白事寿辉前，戒壮士挟铁挝击碎其首。寿辉既死，以采石五通庙为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元大义，太师邹普胜以下皆仍旧官”⑧。从此，天完政权被大汉所取代，它反抗元朝统治的宗旨也为陈友谅建立割据一方的封建政权的政治目标所取代。此后，汉政权一方面继续从事反元斗争，一方面与朱元璋争夺长江中下游地区。天完起义军也发生了分裂，进入四川的明玉珍

脱离天完，自称皇帝于四川，占据袁州的欧普祥投降了朱元璋。

天完政权的这种变化早在陈友谅攻陷南昌时就已开始。当时，陈友谅曾召辟元肃政廉访使吴当、江南行台侍御史韩准，礼遇地主阶级士大夫，也博得了部分地主阶级的赞赏。这对他夺取天完统治权产生了一定影响，解开就曾建议他杀徐寿辉降元⑨。

大汉建立后，陈友谅继续遣将出兵福建，他本人则主要从事对朱元璋的战争。

汉大义元年（至正二十年，1360）二月，被派往福建的邓克明下延平。闰五月，康泰攻陷邵武。六月，邓、康合兵围建宁，城中坚守，相持六十五日不下，遂撤围走，城中兵出追击，邓、康大败，人马自相蹂践，死伤过半。

汉大义二年（至正二十一年，1361）三月，邓克明、胡天瑞、康泰陷邵武。五月，再攻延平、建宁。福建行省平章完者帖木儿、左丞帖木烈思和普化帖木儿等共谋退敌，分别部署守城、督战和请援，邓克明等师久无功，于八月大败而回。

同年闰五月，陈友谅约张士诚合兵进攻应天。当时，陈友谅势强，舟师十倍于朱元璋。朱元璋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趁陈、张尚未合兵之际，先克陈友谅，拆散陈张联盟。他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的关系，令康茂才遣人诈降，陈友谅果然中计，兵败龙湾。部将张志雄等降朱元璋。

七月，朱元璋乘胜反击，在安庆遭到抵抗后，决定绕过安庆，直取江州。至江州五里，友谅始知，仓惶逃走，江州又为朱元璋所得。于是部将胡廷瑞、祝宗等相率降，江西又为朱元璋所有。

汉德寿元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四月，陈友谅不甘于丢失江西，乃作大舰围攻南昌（朱元璋改称洪都），“舰高数丈，外饰以丹漆，上下三级，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其中，上下人语不相闻，自为必胜之计，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⑩。朱元璋侄都督朱文正一面坚守，一面向朱元璋求救。七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援南昌，并遣将扼其归路。陈友谅围南昌八十五日，知朱元璋来援，遂解南昌围前往迎击朱元璋。朱元璋兵入鄱阳湖，双方激战于鄱阳湖，朱元璋军乘风以火攻陈友谅战船，“烟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⑪。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平章陈普略等皆焚死，杀其殆尽。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部降，兵力益衰。朱元璋得胜后，退出鄱阳湖，邀汉军归路，控湖口十五日，友谅不得归。日久粮绝，谋出湖奔武昌，又为朱元璋军所遏，友谅中箭，“贯睛及颅而死”。太尉张定边等以小舟载其尸及其子陈理逃回武昌，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

十月，朱元璋率军围武昌，分兵下湖北诸郡。

汉德寿二年（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朱元璋亲往武昌督军攻城，武昌援绝，陈理与太尉张定边等出降，大汉亡。

注　释

①《明史·陈友谅传》。

②《朱一斋先生文集·余廷心后传》，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一分册。

③《万历南昌府志》卷二四《纪事》。

④《元史·道童传》

⑤《元史·伯颜不花的斤传》。

⑥《明史·陈友谅传》。

⑦《明太祖实录》卷七。

⑧《明史·陈友谅传》。

⑨解缙《解学士文集》卷八《鉴湖阡》载：早在占领南昌前，解开就曾致书陈友谅弟，劝其杀徐寿辉降元。友谅不听其归元之议，却谋杀徐寿辉称帝，解开则逃往南昌，南昌下，又拒陈友谅于吉水。

⑩⑪《明太祖实录》卷一二。

大夏兴亡

大夏的建立者明玉珍，随州人，世业农。蕲黄红巾军起义时，与乡里父老谋避兵，召集乡人千余，屯青山，被推为屯长。

天完军势力发展至荆湖州县，遣人来召，称："来则共富贵，不来举兵屠之。"①玉珍引众降，为统兵征虏大元帅，仍领本部，驻守沔阳。与元将哈麻秃战于洞庭湖，流矢中右目，遂眇。

至正十四年（1354），沔阳水灾，民采菜、鱼为食。十五年春，玉珍领兵万余，至夔州府筹粮。十六年，自巫峡还。

时值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与左丞哈麻秃募兵于重庆，阴谋杀害义兵元帅杨汉而夺其部众。杨汉将士顺流而下诉于明玉珍，要求他回军击完者都和哈麻秃，占据重庆。于是玉珍遣粮船之半还沔阳，另一半返回袭取重庆。

时蜀中承平久，遽见兵船，远近骚动。完者都率所部夜遁，哈麻秃被俘。明玉珍禁部众侵掠，所部军秋毫无犯，四处投降者络绎而至。乃遣使向徐寿辉报捷，并将哈麻秃送往汉

阳。

十七年（1357），徐寿辉杀哈麻秃，授明玉珍陇蜀行省右丞。

十八年（1358），完者都与元四川行省平章郎革歹、参知政事赵资率兵屯嘉定（今四川乐山市），谋取重庆。明玉珍遣义弟明三领兵溯流围攻嘉定。相持半年，不能下。

玉珍驻泸州，

于元人之陋习也。更宜洗心从治，慎勿取恶召尤。”③可知，大宋西路北伐军入川后，也曾给元朝在四川的统治以致命的打击。明玉珍入蜀后，并没有与刘福通所遣的北伐军合作。

二十一年（1361），明玉珍以刘桢为王国参谋，朝夕侍讲书史，刘桢、戴寿、张文炳等相继鼓动他建国自立。

至正二十二年（1362），玉珍弟明二在云南与陕西行省参知政事车力帖木儿等战，兵败被俘。

玉珍分兵袭龙州、青州及兴元、巩昌等路。

三月，明玉珍即皇帝位，建都重庆。诏称：“天生斯民，必立司牧，夏、商、周之迭运，汉、唐、宋之继统，其来远矣。……惟我国家肇迹湖湘，志欲除暴救民，……上承天命，下顺民心。谨以壬寅年三月初一日祭告天地祖宗及历代帝王，即皇帝位，国号曰大夏，其以今年为天统元年。呜呼！恭行天罚，革彼左衽之卑污；昭显茂功，成我文明之大治，尚赖远近豪杰勿吝嘉谋，庶几大小臣工协登伟绩”④。于是分蜀地为八道。行周制，设六卿。拜戴寿为冢宰；明三复原姓名万胜，为司马；张文炳为司空；尚大亨、莫仁寿为司寇；吴友仁、周光为司徒；刘桢为宗伯。置翰林院，拜牟图南为丞相，史天章为学士。立子明升为太子。内设国子监，教授公卿子弟；外设提举司、教授所，教养郡县生徒。府置刺史，州置太守，县置令。屏去释、老二教和弥勒堂。以十一之率征赋税，大家无力役之征。立进士科，分五等取士。置雅乐。又置奉天征虏大将军府于汉中，以进取陕右；奉天征蛮大将军府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以进取陈友谅。

秋，廷试进士。

冬，命万胜领兵出汉中，攻剌踏砍，败元平章侯普颜达，

获其人马以归。

二十三年（夏天统二年，1363）春，命万胜领兵十一万，攻云南，由界首入；司寇邹兴由建昌入（今四川西昌市）；指挥芝麻李由宁番入。二月，万胜至云南，屯金马山。梁王孛罗、云南廉访司官逃遁。万胜进占中庆城（今云南昆明市）。遣使四方，告谕招安，来降者众。四月，梁王傅大都领兵攻城，万胜以孤军深入，约兵不至，战士多中伤，遂留逯水元帅府千户聂董等与大都拒于同马，领余兵还。

二十四年（夏天统三年，1364），万胜领兵攻兴元，不克而还；巴州叛，司寇邹兴克之，留兵镇守。

二十五年（夏天统四年，1365），更六卿为中书省、枢密院。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向大亨、张文炳为知枢密院事。邹兴、吴友仁、莫仁寿、邓元帅皆为平章政事，分别镇守成都、保宁（今四川阆中）、夔关、通江（今四川巴中西北）。以江宝英为参知政事，镇守播州（今贵州遵义）。荆玉、商希孟为宣慰，镇守永宁（今四川叙永西南）、黔南。汉参政姜珏来投，令其守夷陵，兴屯种，以备军需。

九月，遣姜珏致意于朱元璋。朱元璋则遣都司孙养浩来使并致书，约以“协力同心，并复中原，事定之日，各守疆宇”。再遣参议江严答聘。

二十六年（夏天统五年，1366），明玉珍死。四月初一，子明升即位，年十岁，尊其母彭氏为皇太后，垂帘同听政。

明玉珍死前谕群臣“同心协力，但可自守，慎勿妄窥中原，亦不可与各邻国构隙”。明玉珍“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赖以小康焉”。庙号太祖文武至圣皇帝。

明升遣使吴及各政权。

玉珍死后，“明升暗弱，群下擅权”，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爆发，丞相万胜因与知院张文炳不和，密遣人杀之。内府舍人明昭等又矫太后诏杀万胜。拜刘桢为右丞相。

丞相戴寿领兵攻乌撒，不克而还。

右丞相万胜，年当壮岁，智勇过人。数岁总兵征讨，士卒乐从，所向克捷，开国之功良多。明昭杀万胜，引起了夏诸大臣的不满。

二十七年（夏开熙元年，1367），保宁镇守、平章吴友仁叛，与陕西李思齐、张良弼通。移文郡县，称：“昔与夏主自沔阳而至重庆，共树奇勋，开邦启土，今日者，矫旨杀戮功臣，我辈宁能自保乎!”幼主明升调兵征讨，皆败还。

二十八年（夏开熙二年，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丞相戴寿总兵力八万征吴友仁。友仁入城自守，对寿称：“不须用兵，可遣参政文彦彬来，即投降。”当日即遣彦彬入城。友仁与彦彬约：“丞相可设策将义子明昭等诛之，不然必为所害。”戴寿回朝后设计擒杀明昭。友仁与彦彬回重庆，请罪谢恩。

朱元璋北伐得胜，元顺帝北逃，明遣使来告。来书以明升比诸窦融、钱俶，暗谕其群臣谏明升以四川降附于明。

明洪武二年（夏开熙三年，1369），明遣使求木植，丞相戴寿不与。

秋，丞相刘桢死。

十月，明遣使谕明升入觐，不从。

明洪武三年（夏开熙四年，1370），以明朝建立，群臣讨论夏之对策。吴友仁主张“外假交好以缓敌，内修武事以备御”。遣使向明献楠木。

明遣使借路攻云南，丞相戴寿不许。

吴友仁攻兴元，明守军数少，守将金兴旺面中流矢，敛兵入城。遣使走宝鸡求援。吴友仁围城。明援军将至，友仁撤围走。夏明和好遂绝。

冬，明以汤和为征西将军，平章廖永忠为副，攻夔关。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设天桥备御。明船至，大木下，船辄被撞碎，明军不能上。屡战不胜，退兵峡外。而都城重庆常虚惊，禁不能止。

洪武四年（夏开熙五年，1371），明大举伐夏。汤和为征西将军，自瞿塘趋重庆；傅友德为征虏前将军，自秦陇趋成都；邓愈驻襄阳，供应粮饷，训练士马。

平章丁世珍拒友德，兵败，夏将双刀王等十八人被擒。友德以木牌数千书克阶、文、绵、汉诸州捷报投诸汉江（西汉水，即嘉陵江），夏重庆守者见之，军心混乱，夔关守军回救成都。明将廖永忠得木牌于巫峡，遂乘虚自夔关入，直抵重庆。六月二十一日，夏丞相刘仁扶幼主明升、太后彭氏诣军门投降，夏亡。立国十年。

七月，成都守将丞相戴寿、知院向大亨犹列象阵拒守，及得明捷报和家书，知重庆已降，乃籍府库仓廪，纳款军门。

明升母子被解送应天，升封归命侯，赐第京师。后徙高丽⑤。

注 释

①《明史·明玉珍传》

②《明氏实录》，见《元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

③李喜喜、白不信、大刀敖入川后称青巾。

④《明氏实录》，见《元朝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编第二分册。

⑤《明史·明玉珍传》

元

张士诚兴败

至正十三年（1353），张士诚起兵。

张士诚，泰州白驹场（今属江苏东台县）人。有弟三人，皆以操舟贩盐为业。“常鬻盐诸富家，富家多凌辱之，或负其值不酬。而弓手邱义尤窘辱士诚甚”①。在红巾军起义的鼓舞带动下，张士诚与弟士义、士德、士信结壮士李伯升等十八人杀邱义与所仇富家，放火焚其庐舍，入旁郡，召集人众。张士诚“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其为主”②。行至丁溪，为大姓刘子仁所拒，张士义中箭死。士诚益愤，与之决战，子仁众溃入海。士诚乘胜攻陷泰州，集众万余人，克兴化，结寨得胜湖（德胜湖）。高邮知府李齐前往招谕，士诚降，行省授以民职，士诚要求从官军征讨红巾军以自效。时赵琏受命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参知政事，移驻泰州，命士诚治戈船，趋淮、泗。士诚疑惧不敢发，又知赵琏无备，复叛。杀赵琏，掠官库民财，走入得胜湖，入据兴化。五月，进占高邮。知府李齐再往招降，被张士诚下于狱。

镇南王府参议军事纳速剌丁守得胜湖，以舟师会诸军往

讨。"阿速卫军及真滁万户府等官，见贼势炽，皆遁走"③，纳速剌丁与其三子皆战死。

六月，亲王完者秃在泰州阵亡。朝廷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达世帖睦迩于淮南、北召募壮丁，并总领汉军、蒙古军守御淮安。以行省平章福寿讨兴化。

十四年（周诚王天祐元年，1354）正月，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④。下令"出狱囚，蠲民逋，凡知名之士取用之"⑤。二月，元以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讨张士诚。枢密院官石普自荐以步兵三万取高邮。受命权山东义兵万户府事，招义军万人以行。普乘夜衔枚进军宝应（今属江苏），"抵县，即登城，贼大惊溃，因抚安其民"。于是，诸将水陆并进，乘胜拔十余城，分三路进逼高邮。"一趋城东，备水战；一为奇兵，虞后；一普自将，攻北门。遇贼与战，贼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蹑之，纵火烧关门，贼惧，谋弃城走。而援军望之，按不进。且忌普成功，总兵者遣蒙古军千骑，突出普军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贼以死扞，蒙古军恇怯，即驰回，普止之不可，遂为贼所蹂践，率坠水中"⑥。于是石普军乱，张士诚军乘机反击，石普血战奋击，至日暮，援绝，负伤堕马，与从者皆死。

三月，张士诚下令务农桑，令称"元氏之乱，多在民穷。夫独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条，志在肥家，不恤民隐。百姓求生无路，引义不能，遂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⑦。要求慎择长吏，以民生兴耗为考察长吏的

标准。

四月，令州县兴学校。令称“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材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夫妇、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义不明。廉耻道丧，王纲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⑧。

六月，进攻扬州。达识帖睦迩兵败，诸军皆溃。朝命江浙行省参知政事佛家闾会达识帖睦迩，再进兵讨伐。

九月，丞相脱脱统大军南征。“黜陟予夺一切庶政，悉听便宜行事；省台院部诸司听选官属从行；禀受节制。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⑨。十一月，至高邮，连战皆捷，高邮城破在旦夕。而宣政院使哈麻却在皇太子、皇后面前谮毁脱脱，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也三次上章弹劾，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心益著”。于是，以师老费财削脱脱官爵，安置淮南；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代将其兵。诏书指责脱脱：“坐视玩冠，日减精锐，虚费国家之钱粮，诓诱朝廷之名爵。”诏书开读后，“脱脱匹马北归，将士溃散，元兵不复振矣”⑩。

十五年（周诚王天祐二年，1355）四月，诏翰林待制乌马儿、集贤待制孙㧑招降张士诚，以宣命、印信、牌面，与淮南王孛罗不花及淮南行省、廉访司等官商议招安。五月，又命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咬住、淮东廉访使王也先迭儿抚谕。士诚囚辱孙㧑，不受招。

十六年（周诚王天祐三年，1356）正月，周军陷常熟州（今江苏常熟）。时松江府印造官号，给吏兵佩带，以防奸伪。“号之制作，画为圆圈，绕圈皆火焰，圈之内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押。民间谣曰：‘满城都是火，官府四散躲，城中无一人，红军府上坐’”⑪，以印讥讽元朝官、将的怯懦。

张士诚以其弟士德自高邮率众渡江，进取平江（今江苏苏州市），元守将遁走，新任平江路总管贡师泰领义兵出战，力不敌，怀印绶弃城走入海滨。平江下，改名隆平府。行省都镇抚、元帅王与敬以松江叛降张士诚。时方国珍已降元，以海舟自太仓水陆并进讨周，为王与敬所阻。

三月，张士诚徙都隆平。命籍户部田赋，皆仍元旧；前所欠税赋悉数免去，又免当年税赋十分之四；赐老年人粮食、布帛和贫民粥食；设学士员，开宏文馆；设礼贤馆，召四方明博之士；筑常熟、吴江城；设郡劝农使、县劝农尉，议修水利。

四月，士诚将赵打虎下湖州（今属江苏）。松江（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无锡等相继为周占领。

六月，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书称：“吾与足下，东西境也，睦邻守国，保境息民，古人所贵，吾甚慕焉。自今以后，通使往来，毋惑于交构之言，以生边衅。”⑫

七月，周军攻镇江，被朱元璋击败。攻杭州，元江浙行省左丞相兼知枢密院事达识帖睦迩弃城走富阳，万户普贤奴尽力抵御，苗军将领杨完者自嘉兴往援，士诚败走。

八月，周以水军数万攻嘉兴，为苗帅杨完者所败。“杨完者以大军四伏，使小舟数十百艘饵之。敌（周军—引者注）樯橹蔽天排川而下，追至杉青，东西岸皆积苇以待。时南风大

作，岸上举火，敌舟焚燎至四十里不止，死者甚众。遂舍舟登陆，进逼城下。战于东瓜堰，大破之，斩首万七千级，俘者数千，张氏统军张士信以伏水遁还。然完者凶肆，掠人货钱。至贵家，命妇、室女见之，则必围宅勒取，淫污信宿，始得纵还。少与相拒，则指以通贼，纵兵屠害。由是部曲骄横，凡屯壁之所，家户无得免焉。民间谣曰：'死不怨泰州张，生不谢宝庆杨'"⑬。

九月，朱元璋攻常州，周军请和。愿岁输粮二十万石、黄金五百两、白金三百两。朱元璋索粮五十万石，和议不成。

十七年（周天祐四年，1357），张士诚西有朱元璋兵相逼，南有降元的方国珍配合元兵征讨。五月，朱元璋军下泰兴。六月，取江阴。时"张士诚据姑苏，跨有淮东、浙右，地大物众，兵食富强，实江南一劲敌"。他"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长兴、江阴二邑，皆其要害。长兴据太湖口，陆走广德诸郡。江阴枕大江，扼姑苏、通州济渡之处。（朱元璋）得长兴则士诚步骑不敢出广德，窥宣、歙；得江阴则士诚舟师不敢溯大江，上金、焦。至是并为我（朱元璋）所有，士诚侵轶路绝"⑭。

七月，朱元璋又遣将攻常熟，俘士诚弟士德。张士德智勇双全，实为士诚的谋主。士德被俘，对士诚是个沉重的打击。士德寄书士诚："可降元朝，以为之助。"遂不食不语，死。于是张士诚准备按士德的意见降元。

八月，张士诚使来投的元江南行台御史蛮子海牙写信向江浙行省左丞相达识帖睦迩请降。后者令参知政事周伯琦至平江抚谕，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德已被俘）。"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⑮。

张士诚降元后，奉元正朔，配合元朝军队攻打红巾军。同朱元璋争夺江阴、常熟、通州（今江苏南通）、杭州、诸暨（今属浙江）、绍兴。并参与了元朝官僚、将领间的倾轧，以兵逼杭州，迫使苗帅杨完者兄弟自杀。同时，每年以江南粮食十几万石输往大都，为朝不保夕的元朝提供物质支援。于是，“方面之权悉归张氏，达识帖睦迩徒存虚名而已”。

二十三年（1363）三月，张士诚将吕珍攻刘福通于安丰，杀刘福通。朱元璋率军援安丰，迁小明王至滁州。

二十四年（1364）九月，张士诚令其部属颂功德，欲求王爵，朝廷不准，遂停止了向元输粮，自称吴王。在平江治宫阙，立官属。逼达识帖睦迩将行省丞相位让与弟士信，移文称：“照得浙江省奠临吴、越，控制江、淮，乃天下之雄藩，实东南之重镇，自非硕德元勋、雄威重望、功盖当世、泽及生民者，畴克居此！吴王张士诚有生英杰，间世雄才；其弟太尉张士信天资英武，志节忠贞。伏念当职，才非辅弼，年已衰残，德不足以服人，力不足以胜任，苟不推贤以自代，必致误国而获愆。今将原授官爵行中书省、行枢密院、行宣政院三台银印各一，便宜行事、赏功罚罪、招降讨逆并金牌等付授施行。”⑮达识帖睦迩被幽拘于嘉兴，行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儿不从，二人先后被迫服毒而死。张士诚对元廷“阳顺而阴背，奉其正朔以饰文移，而凡废置、予夺、生杀、爵禄、悉自己出”。时朱元璋也称吴王，则张士诚为东吴，朱元璋为西吴。

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在打败陈友谅后，决定调集大军，大举进攻东吴。十月，徐达、常遇春等率马步舟师，水陆并进，欲取淮东泰州等处。“时张士诚所据郡县，南至绍兴，与方国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邮、淮安、徐、宿、濠、泗，

又北至于济宁，与山东相拒”。朱元璋部署先取通、泰，剪其羽翼，再取浙西。

张士诚自占领平江进入浙西后，生活日益腐化，政治上也失去了进取心。大造宫殿，追求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大城武林，至起平、松、嘉、湖四路官民以供畚筑。虽海盐一州，发徒一万三千，分为三番，以一月更代，皆裹粮远役。而督事长吏复借之酷敛，鞭扑箠楚，无有停时，死者相望”。同时“大起宅第，饰园池，畜声伎，购图画，唯酒色耽乐是从，民间奇石名木必见豪夺。如国弟士信，后房百余人，习天魔舞队，珠金玉翠，极其丽饰”。人民负担沉重，生活痛苦，对张士诚也越来越不满。军队的战斗力也大不如前。

张士诚外表持重，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军政大事，多借重士德。自士德被俘死，张士诚则委政事于弟士信。士信无能，“惟务花酒”，用王（一做黄）敬夫、蔡德新、叶彦文三人主事，三人无他能，惟事顺从，当时有谚语称：“丞相做事业，专用王、蔡、叶，一朝西风起，乾瘪。”

闰十月，朱元璋军占领泰州。

二十六年（1366）三月，徐达、冯国胜围高邮。前此，冯国胜围高邮，东吴守将俞某开门诈降，国胜轻信，先入城者数百人被杀。受到朱元璋的责罚。至此，国胜督兵四门齐上，一鼓破城，俞某被擒。

至四月底，兴化、濠州、宿州、邳州、安丰等相继失陷。

五月，朱元璋发布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

八月，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帅师二十万，伐张士诚。攻湖州。

九月，朱文忠攻杭州。

十一月，士诚将李伯升降，湖州陷。杭州守将、平章潘原明降，杭州失守。

二十七年（1367）正月，朱元璋军攻下松江。

五月，徐达围姑苏。朱元璋致书张士诚，要求他“畏天顺民，以全身保族，若汉之窦融、宋之钱俶”，并保证“尔能顺附，其福有余”，张士诚不予理睬。城被围日久，士诚组织突围，兵败。“有勇胜军号十条龙者，皆仓夫善为盗者也，士诚每厚赐之，令被银铠、锦衣，将其众出入阵中，人不能测，是日亦败，溺死万里桥下”。

降将李伯升遣人劝降。说谕百端，士诚抑首沉虑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突围不成，士信又为飞炮所中，碎其首而死。

九月八日，徐达取平江路。士诚驱家人骨肉登齐云楼，纵火焚之，而己独不死，曰：“吾救一城人命。”徐达命士诚降将李伯升谕士诚。“时日已暮，士诚拒户自经。伯升决户，令降将赵世雄抱解之，气未绝，复苏。达又令潘元绍以理晓之，反复数四，士诚瞑目不言。乃以旧盾舁之，出葑门，途中易以户扉，舁至舟中”。所俘官属、将校、家属凡二十余万，俱送往建康。士诚在舟中闭目不食，坚卧不起。至中书省，相国李善长问之，初不语，即而言不逊，被善长怒骂。九月十六日，自缢死⑰。

注 释

①《明史·张士诚传》。

②《草木子》，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③《元史·纳速剌丁传》。

④张士诚称王建号，《元史·顺帝纪》、《明史·张士诚传》记为至正三年五月。《明实录》为至正四年一月。

⑤史册《隆平纪事》，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⑥《元史·石普传》。

⑦⑧史册《隆平纪事》，参见《元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

⑨《元史·脱脱传》。

⑩《国初群雄事略》。

⑪《南村辍耕录》。

⑫《明太祖实录》、《皇明文衡》。

⑬姚桐寿《乐郊私语》。

⑭《明太祖实录》、《皇明文衡》。

⑮《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⑯长谷真逸《农田余话》。

⑰此据《明太祖实录》。另《国初群雄事略》载："上召见，士诚但瞑目，不言不食；赐之衣冠，亦不受。遂令卫士扛于竹桥，御杖四十而死。上命焚瘗于石头城。"

元

顺帝北归

至正四年脱脱辞去相位后，被丞相别儿怯不花所谮，处境甚危。宁宗乳母之子康里人哈麻屡在顺帝面前为他说解，故脱脱对哈麻颇怀感激之情。再相后，引哈麻为中书右丞。参议中书省事汝中柏为脱脱所信任，自平章以下，对其所议，皆唯命是从，而哈麻独敢与之争。因汝中柏之谮，脱脱使哈麻为宣政使，位居第三，哈麻因而忌恨脱脱。

渡过了接管政权初期的艰难岁月，元顺帝的地位巩固了。脱脱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元朝的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治河的成功和初期对红巾军镇压的初步胜利冲昏了元顺帝的头脑，他满足于表面上的承平景象，不再勤于政事，享乐的情绪开始滋长。

哈麻为投其所好，引西番僧人教顺帝运气术，称演揲儿法，汉译为“大喜乐”。哈麻妹婿、集贤学士秃鲁帖木儿又荐西番僧伽璘真于顺帝，教以秘密法。演揲儿法，秘密法，又称双修法，都是房中术。“於是帝日从事于其法，广取女妇，惟淫戏是乐。又选采女为十六天魔舞”①。导皇帝行此法的，宠

臣老的沙、八郎、答剌马吉的、波迪哇儿祃。等十人，号称十“依纳”。“八郎者，帝诸弟，与其所谓依纳者，皆在帝前，相与亵狎，甚至男女裸处，号所处室曰皆即兀该，华言事无碍也。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无所禁止，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虽市井之人，亦恶闻之。皇太子年日以长，尤深疾秃鲁帖木儿等所为，欲去之而未能也。”皇帝一心享乐，政事逐渐废弛。哈麻因而得宠。

至正十四年，脱脱率兵征高邮，哈麻乘间为中书平章政事。并在皇后面前，谮毁脱脱，引起皇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对脱脱的不满②。终使伯颜遭贬斥而死。

伯颜死后，哈麻为相，其弟雪雪为御史大夫，“国家事尽归其兄弟二人矣”③。哈麻既为相，颇以曾进西番僧导帝宣淫事为耻，于是寻找借口，杖所荐西番僧一百七十人，流放于甘州。十六年，与其父商量说：“我兄弟位居宰辅，宜导人主以正，今秃鲁帖木儿专媚上以淫亵，天下士大夫讥笑我，将何面目见人，我将除之。且上日趋于昏暗，何以治天下，今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而奉上为太上皇。”不意此事为其妹所知，乃告其夫。秃鲁帖木儿恐太子为帝已将被杀，于是向顺帝揭发了哈麻的计划。于是哈麻流放惠州（今属广东），雪雪流放肇州（今属广东）。不久，杖死。

哈麻兄弟死后，秃鲁帖木儿等十依纳更加肆无忌惮，“是时，天下多故日已甚，外则军旅烦兴，疆宇日蹙；内则帑藏空虚，用度不给；而帝方溺於娱乐，不恤政务”④。国事日非，丞相搠思监的属下和亲属甚至竟印造伪钞，扰乱国政。

而围绕着奇皇后与太子爱猷识里达腊谋内禅事，朝臣分成了帝党和太子党两派。御史大夫老的沙、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

儿党于顺帝；中书左丞相搠思监，资政院使、宦者朴不花党于皇后、太子。

二十年（1360），“帝在位久，而皇太子春秋日盛，军国之事，皆其所临决。皇后乃谋内禅皇太子，而使不花喻意于丞相太平（贺惟一，前上都留守贺胜子，因汉人不能为相，而顺帝欲任惟一为相，遂赐姓蒙古氏，改名太平），太平不答”⑤。皇后召太平至宫中，亲自喻意，太平仍不为所动。于是皇太子决心夺去太平政柄，幸知枢密院事纽的该左右回护，皇太子之志未能得逞。后纽的该死，皇太子令监察御史弹劾太平的亲信左丞成遵和参知政事赵忠，二人下狱死。太平遂辞职家居。二十三年，复为御史所劾，诏陕西安置，搠思监逼令自杀。

朝中的帝党和太子党又分别与在外的将领勾结，再一次造成了武装力量干预帝位争夺的形势。由于元朝官军战斗力下降，同红巾军作战时屡屡失利，至正后期，地方地主武装势力有所发展。于是在外的军事将领又形成了以答失八都鲁、孛罗帖木儿父子与察罕帖木儿、扩廓帖木儿父子两大武装力量的争夺。

答失八都鲁出身于蒙古功臣世家，在镇压荆湖一带红巾军和刘福通红巾军的战争中建有功绩，总制河南军马。

察罕帖木儿为内迁的畏吾儿人，靠组织地主武装镇压红巾军起家，为陕西行省平章政事，战功卓著，地位却在答失八都鲁之下。在镇压红巾军时，答失八都鲁常失利，而察罕帖木儿自陕西至河南，入晋、冀，侵占了他的势力范围。答失八都鲁死后，其子孛罗帖木儿领其父兵，与察罕帖木儿争夺晋、冀，遂至兵争，顺帝屡下诏和解，终不听。至正二十年八月，朝命孛罗帖木儿守石岭关（今山西忻县南）以北，察罕帖木儿守石

岭关以南。九月，孛罗帖木儿欲得冀宁（今山西太原），遣兵出石岭关南下直趋城下，双方交兵，朝廷遣使下诏讲和，二人分别退兵，各守关还镇。

二十二年，察罕帖木儿被红巾军田丰、王士诚杀死，其甥、养子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为太尉、中书平章政事、知枢密院事，总其父兵，孛罗帖木儿则又与扩廓帖木儿争晋、冀，双方仇怨日深。

二十三年，孛罗帖木儿南侵扩廓帖木儿所守地，据真定。御史大夫老的沙得罪于太子，安置东胜州，途中奔孛罗帖木儿，顺帝遣宦官密令孛罗帖木儿留老的沙于军中予以保护。皇太子屡遣官来索，孛罗帖木儿抗拒不交。

二十四年，孛罗帖木儿以藏匿老的沙获罪，皇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握兵跋扈，匿不轨之臣，又与秃坚帖木儿联结的罪名，与丞相搠思监议，请削其官。诏罢兵权，四川安置。孛罗帖木儿知此举非皇帝本意，抗旨不遵，杀使者，遣部将会秃坚帖木儿，提兵至京师，扬言索搠思监、朴不花。

四月，孛罗帖木儿兵入居庸，至清河，顺帝不得不虚应故事，遣使问进兵原因。然后按孛罗帖木儿报陈的理由和要求将搠思监流放岭北，朴不花流放甘肃，实则执之送交孛罗帖木儿。于是秃坚帖木儿入延春殿见皇帝，痛哭请罪，皇帝赐宴慰免，仍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兼知枢密院事，守大同；以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帝派暂居上风。

皇太子十分不满，也征扩廓帖木儿兵，令其保障京师。五月，诏扩廓帖木儿总兵，调诸道兵攻大同，并派兵守居庸，入卫京师。扩廓帖木儿亲往太原调督诸军。太子党开始反击。

七月，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和老的沙再以兵入京师，

皇太子亲统兵迎战于清河。太子兵败，出奔太原。孛罗帖木儿、秃坚帖木儿、老的沙入宣文阁见顺帝诉冤，君臣同泣。遂以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老的沙中书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御史大夫。部属将士，布列台省，于是帝党得以总揽国柄。

八月，加孛罗帖木儿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数月间，杀狎臣秃鲁帖木儿、波迪哇儿祃，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番僧作佛事。并多次遣使太原，请太子还朝。太子不回，扩廓帖木儿则拘留使者。

二十五年，皇太子在太原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及扩廓帖木儿等军，进讨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则出皇后于外，幽置百日。同时，遣秃坚帖木儿出讨上都的太子党，命也速南御扩廓帖木儿。也速至良乡，倒戈叛孛罗帖木儿而降扩廓帖木儿，西连太原，东结辽阳，又打败孛罗帖木儿骁将姚伯颜不花。孛罗帖木儿自将兵往讨，不利。回京后郁郁不乐，终日与老的沙宴饮，荒淫无度，喜怒无常。奇后乘机数次向他送献美女，由此得以还宫。孛罗帖木儿的行为激起了顺帝的不满，后为顺帝所遣的勇士杀死。顺帝再召太子还朝。

孛罗帖木儿被杀后，秃坚帖木儿与老的沙逃往汪古部驸马赵王处，被赵王缚送朝廷。一场由顺帝亲手策动的政变闹剧结束。

当孛罗帖木儿在京师被杀时，扩廓帖木儿乘机占领了大同，皇太子则联络了诸王，并准备进京清君侧。皇太子出逃期间，就计划效仿唐肃宗即位灵武的故事，扩廓帖木儿不从。至此，奇皇后命扩廓帖木儿以重兵拥太子入京师，意在胁迫顺帝退位。扩廓帖木儿不愿参与此事，兵行至距京师30里处，下

令分散，不入京师，太子之计不行，遂对扩廓帖木儿怀恨在心。

顺帝以老臣伯撒里为右丞相，扩廓帖木儿为左丞相。闰十月，以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总天下兵。扩廓请南还视师，离开京师，驻彰德（今河南安阳）。但诸路军不听扩廓帖木儿调遣，张良弼等又共推李思齐为盟主，合兵抗扩廓帖木儿，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互有胜负。

二十七年八月，顺帝派皇太子亲自总制诸路军马，调扩廓肃清江淮；李思齐进取川蜀；张良弼等取荆襄。诏书即下，皇太子不行，扩廓帖木儿也不受命。

顺帝因扩廓帖木儿不受调遣，乃免其太傅、中书左丞相官，令与其弟同居河南府，其军则分别委人统领，重新任命太原官属。

二十八年，扩廓帖木儿以兵攻太原，尽杀朝廷所置官。朝廷遣军讨伐，一场新的军阀混战开始。扩廓帖木儿势盛，又上疏申述起兵原由，顺帝又下诏复其官，准备令其领兵南讨。

元朝官僚将领用了八年的时间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耗尽了人力、物力。而朱元璋在江南却在稳步发展，逐渐消灭了各支反元势力和红巾军，开始北上伐元，以完成其统一全国的大业。

至正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率军二十五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他关照徐达："阃外之事，汝实任之。兹行必自山东，次第进取。山东古云十二山河之地，师行之际，须严部伍，明分数，一众心，审进退之机，适通变之宜，使战必胜，攻必取。"⑥

为了分化和争取蒙古贵族，朱元璋将被张士诚拘留的元宗

室送还大都。同时发表了一篇讨伐檄文——《谕中原檄》。在这篇由名儒宋濂起草的檄文中，虽然充满了大汉族主义思想，将广大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统治的斗争歪曲为民族斗争，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但它同时也提出了“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目标，而且宣布了对蒙古、色目人的政策，对大军顺利进军中原，分化元朝统治集团和争取广大蒙古、色目人民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

徐达进入山东，招降了元朝淮南淮北义兵都元帅王宣父子，连下莒、滕、益都、东平、兖、济南、济宁、密、登、莱、东昌等州郡。邓愈军也由襄阳进至南阳。

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二月，徐达军进至河南，下汴梁。接着，明军攻下河南、荥阳、钧州、许州、陈州、汝州等地，扼守潼关，阻止李思齐自陕西入援。

五月，朱元璋至汴梁。六月，亲自与诸将商讨进攻大都的战略。特别交待“若元主北弃，毋穷追，但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七月，朱元璋在返回应天之际，又再三叮咛“克城之日，毋虏掠，毋焚荡，毋妄杀人”⑦。

七月二日，徐达发汴梁，十一日会诸将于临清。直到这时，元朝的武装力量还在自相残杀，争夺陕西地盘。在明军大举北伐之际仍不能和衷共济，一致对敌。

闰七月，元顺帝部署扩廓帖木儿、李思齐等诸将赴河南，“四道进兵，犄角剿捕，毋分彼此”。知枢密院事俺普、平章锁住等“东西布列，乘机扫殄”。辽阳行省左丞相也先不花、知院孙厚等“捍御海口，藩蔽畿辅”。“皇太子爱猷识里达腊悉总天下兵马，裁决庶务”⑧。但为时已晚，诸将各为身计，内部分崩离析，勤王之师无法召集。兵力最强的扩廓帖木儿自晋宁

（今山西临汾）退往冀宁（今山西太原），在元朝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竟拥兵观望。

元顺帝本无心固守，在部署迎敌的同时，也安排退却。十九日，命太子总兵，二十六日，又命太常礼仪院使阿鲁浑奉太庙列室神主与皇太子一起北逃。二十七日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太子妃同议北行。群臣谏，不听，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中书左丞相庆童留守京师。至夜半，率后妃、太子等开健德门北走。

八月初二，明军入京城，帖木儿不花、庆童被明军俘虏后杀死。

顺帝出京后，用 17 天的时间赶到上都。上都宫殿、官署已被红巾军焚毁，顺帝一行只好再住毡帐。又担心明军尾随而至，终日惶惶不安。

逃出京师后，顺帝再次调整了中书人选。以原辽阳行省左丞相也速不花为中书左丞相，鼎住为中书平章政事，魏伯颜为参知政事，又封扩廓帖木儿为齐王、中书右丞相，并与群臣商议恢复大计。

时扩廓帖木儿尚有大军十万屯驻山西，李思齐、张良弼则盘距陕西，辽阳尚有元兵十万，梁王巴匝剌瓦尔密在云南仍为元朝守。

在元朝君臣商讨如何把元朝的统治继续下去时，明朝却在部署乘胜消灭以山西、陕西为主的元朝残余势力。八月，朱元璋命徐达、常遇春进取山西，并遣汤和、冯宗异率军增援。元顺帝则迫不及待地遣扩廓帖木儿出兵收复大都。扩廓帖木儿兵至保安，明军却乘虚谋取太原，扩廓帖木儿急回军救太原，双方相持三日，徐达夜袭，扩廓帖木儿兵败，与十八骑逃出，奔

大同。明军乘势占领山西。扩廓帖木儿撤至甘肃、宁夏。

至正二十九年（明洪武二年，1369），明军主力进攻陕甘。元顺帝仍不甘心大都失守，二月，派右丞相也速以精骑四万抵通州，明守将曹良臣虚张兵势，也速不明虚实，退走。四月，又遣晃火帖木儿、也速“分道讨贼，恢复京师”⑨。也速兵败，明军占领大宁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上都受到威胁，元顺帝北出应昌（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附近）。

四月，明军进兵陕西、甘肃。

六月，元顺帝至应昌，屡征扩廓帖木儿领兵入援，扩廓帖木儿则谏其北上和林。顺帝寄希望于甘肃军事形势的好转，迟迟不想离开应昌。扩廓帖木儿在甘肃，拼死与明军对抗，力图恢复。

三十年（明洪武三年，1370）三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官、兵大部被俘，扩廓帖木儿与其妻北遁和林。四月，元顺帝病死应昌。太子爱猷识里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史称北元。

注　释

①《元史·哈麻传》。

②顺帝皇后有答纳失里，燕帖木儿女，至元元年因其兄唐其势谋逆，被伯颜害死。再立皇后为弘吉剌氏伯颜忽都，生子夭折。二皇后为高丽人奇氏，性颖黠而家世低微，称完者忽都皇后。生子爱猷识里达腊，为太子。奇氏有宠，答纳失里死后，顺帝欲立奇氏，伯颜力争其不可。哈麻曾与脱脱商量授太子爱猷识里答腊册宝和举行册礼。脱脱则认为万一大皇后弘吉剌氏生子则不好处理。因而他答称“中宫有子将置之何处”？为讨得奇氏的欢心，哈麻将脱脱的意见告诉了奇氏。同时又使人在太子面前谗毁伯颜。致使伯颜贬死。

③《元史·哈麻传》。

④《元史·搠思监传》。

⑤《元史·完者忽都皇后奇氏传》。

⑥⑦《明太祖实录》。

⑧《元史·顺帝纪十》。

⑨刘佶《北巡日记》。

察合台汗国兴衰

大蒙古国初期，察合台的封地“自畏兀儿地起，至撒麻耳干和不花剌止”①。他领有自畏兀儿之边至河中的草原地带。成吉思汗曾命他掌管札撒和法律，他将蒙古习惯法强制推行到穆斯林地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统治者”。同时，作为大蒙古国镇守西域地区的地位最高的蒙古宗王，在畏兀儿以西也有着重要的作用和相当的影响。但是，终察合台之世，他的兀鲁思始终是作为大汗藩臣的封地存在的，不论是在其父成吉思汗时期，还是在其弟窝阔台时期，他的身份一直都是大蒙古国的藩臣。他也一直视蒙古国大汗为宗主。其弟窝阔台被推举为大汗时，在即位典礼上，是他率领诸王、大臣首先向大汗行了九叩跪拜之礼，再次确定与大汗的君臣关系。

成吉思汗占领撒麻耳干和不花剌地区后，任命最早归降的回回人牙剌瓦赤为地方长官，管理河中地区。当时，察合台只能管理草原地区自己的封地，对大蒙古国所有的由牙剌瓦赤管理的州郡、城镇，却没有行使行政管理的权力。到了窝阔台时期，随着他在这一地区势力的增长，影响的扩大，便开始试图

扩大封地范围，将势力伸展到国家控制的地区。一次，他越权擅自更换河中某些州郡的长官，被牙剌瓦赤告发，窝阔台发出圣旨质问了他，并责令他作出解释。他不得不承认错误。并回答说："我考虑不周，轻举妄动，我没有什么可回答的，既然合罕命令我写出来，我就把这件事写出（这）一些。"由于他道了歉，大汗原谅了他。为了缓和地方官与宗王的矛盾，窝阔台也同时将牙剌瓦赤调往汉地，同时将那些地方送给察合台作了他的封地。牙剌瓦赤与察合台的矛盾正是国家与藩王利益冲突的反映，个别人事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牙剌瓦赤的职务后来由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麻速忽）接替，他依然是把这一地区的税收，送往大汗的宝库。

窝阔台死后，情况有些变化。在察合台的干预下，六皇后乃马真氏取得了在新汗即位前执掌朝政的权力。窝阔台的老臣镇海、牙剌瓦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伯受到了打击，汗国在各地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诸宗王乘机乱下敕令和发放牌符，以扩大自己的领地和权限，汗国对他们的控制相对削弱。这就为察合台在河中地区扩张势力提供了条件。

1242年，察合台死。根据他生前的安排，由他的孙子哈剌旭烈兀（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的儿子）继为兀鲁思统治者。1246年贵由即大汗位，他与察合台的第五个儿子也速蒙哥关系密切，于是他用大汗的权力，以"儿子还在世上，孙子怎么能当继承人"的理由，改变了察合台的安排，让也速蒙哥掌管了察合台兀鲁思。1251年蒙哥继立为大汗，又改变了贵由的安排，重新让哈剌旭烈兀代替也速蒙哥。哈剌旭烈兀死于返回兀鲁思的途中，他的妻子兀鲁忽乃哈敦（斡亦剌部脱劣赤驸马之女）根据蒙哥的诏敕，杀了也速蒙哥。立其年幼的儿子木八

剌沙为汗，自己则代行对兀鲁思的统治权。

1260年，忽必烈与阿里不哥间因争夺汗位爆发了战争。忽必烈派遣拥戴自己的察合台后裔阿必失合（阿必失哈，察合台曾孙，他的长子木秃坚次子不里的儿子）去察合台兀鲁思夺权，途中被阿里不哥擒获。而在双方交战中，阿里不哥兵败，退回谦谦州。忽必烈切断了和林与中原汉地的联系，导致漠北粮食、物资供应紧张。失去汉地粮食、武器、物资供应，对阿里不哥是个致命的打击，为了摆脱困境，他只好把目光转向西方。察合台兀鲁思所在的地区有富饶的农业区，可以弥补因失去汉区带来的损失，解决漠北的实际困难，进一步控制察合台兀鲁思就显得更为重要。于是，阿里不哥派出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察合台第六个儿子拜答儿之子）取代木八剌沙管理察合台兀鲁思。与他结成联盟，要求他提供援兵和给养，并派兵驻守阿姆河，以防旭烈兀增援忽必烈。

阿里不哥为了取得察合台系的支持，将原属大蒙古国的察合台封地以外的河中州郡也划归阿鲁忽管辖，就使察合台兀鲁思汗取得了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察合台兀鲁思在这一地区的地位也因而发生了变化，为察合台汗国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阿鲁忽成功地夺取了对察合台兀鲁思的统治权。按照阿里不哥的意图，向河中地区发展势力，河中和别失八里的大蒙古国地方官和军事将领都降服了阿鲁忽，阿鲁忽也就掌握了原来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的管理权。后来，哈剌旭烈兀的妻子兀鲁忽乃也从阿里不哥处回到察合台汗国，阿鲁忽遂娶她为妻。“察合台汗国自阿鲁忽即汗位后，成了活动于中亚历史舞台的可观势力。究其原因，盖因阿里不哥欲与忽必烈争夺汗位，亟

待在察合台汗国里扶植一名傀儡，为他防守西境、征集给养，提供兵源。这等于拱手把原来属于大汗的管理河中和突厥斯坦的权力奉送给了阿鲁忽。蒙古亲贵之间的内讧使远离朝廷的大臣、异密们无所适从，不得不归降于阿鲁忽。阿鲁忽实际上是在占有了大汗河中、忻都之边的军队之后，才变得强大起来的。但是，他的强大的同时却播下了反抗阿里不哥的种子。阿里不哥为反对忽必烈才扶立阿鲁忽，现在他自食其果了”②。

阿鲁忽取得察合台汗国统治权的同时，也将属于大汗控制的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土地、人口、军队据为己有，他的力量顿时强大了，野心也随之膨胀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利益足以使他改变初衷，于是他同阿里不哥的矛盾也就随之产生了。

阿里不哥派遣他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争取察合台汗国的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他代表自己控制在河中和突厥斯坦的大蒙古国的辖地和属民，以支持他对忽必烈的战争。不意阿鲁忽看到阿里不哥无力控制河中地区，他也就不情愿将到手的财富、土地、人口、军队再交到阿里不哥手里。于是当阿里不哥的使者到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征集财物、武器和马匹时，双方的矛盾、冲突终于爆发了。阿鲁忽扣留了阿里不哥的使者，夺取了本属大汗的财富，背叛了当初自己为之效劳且承认其权力的蒙古国大汗阿里不哥。

表面看来，阿鲁忽的行为是对这次使臣征收财富产生的贪欲所致，实则它有更为深刻的原因。如果这批财物得以运往阿里不哥处，就等于阿鲁忽承认了大汗对河中和突厥斯坦地区的所有权，阿鲁忽占有这一地区的土地、财富、人口、军队就是非法的，这是一个涉及到察合台汗国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察合台汗国能否在中亚成为一个强大的势力的关键之一。他需要尽

可能地削弱大汗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加强自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使自己成为这一地区的真正主人。于是他采取了扣留阿里不哥使者的行动。

虽然夺取河中等地区是阿鲁忽的既定目标，但事情发生得如此突然还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于是与阿里不哥闹翻后下一步应如何安排也是他不能不立即作出决定的问题。于是，他召集大臣，商讨对策。大臣们说："在抓起使者之前，应当商议，而如今我们既然已经与阿里不哥成了敌人，（唯一的）出路就只能与他彻底决裂并效力于忽必烈合罕。"③于是，他向忽必烈遣使，表示了对他的拥护和支持。

阿鲁忽的投靠，对忽必烈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这样，他的势力就可以从东到西联成一线。此时，旭烈兀也有使臣到达。于是，忽必烈也分别向两人遣使，并根据情况作出了新的军事部署："从质浑河到密昔儿的大门，蒙古军队和大食人地区，应由你，旭烈兀掌管，你要好好防守，以博取我们祖先的美名。从阿勒台的彼方直到质浑河，可让阿鲁忽防守并掌管兀鲁思和各部落。而从阿勒台的这边直到海滨，则由我防守。"④同时，给了阿鲁忽一道圣旨和一个牌子。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作法不同，他没有再次申明河中和突厥斯坦为大汗所有，而是通过圣旨，承认阿鲁忽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权，一方面使自己得到了阿鲁忽的支持，进一步孤立了阿里不哥，一方面使阿鲁忽的权力正式得到了大汗的认可，此事大约发生在中统三年（1262）春。忽必烈的这一安排使察合台汗国得以发展、强大并取得了与钦察、伊利诸汗国相同的地位。但是，此时的察合台汗国依然不是独立的国家，它仍然是大蒙古国的藩国。

阿鲁忽向西与钦察汗国争夺，势力伸展到花剌子模和今阿富汗北部地区。1266年，阿鲁忽死。兀鲁忽乃再立木八剌沙为察合台汗国的君主。当阿里不哥战败投降后，忽必烈又派察合台的重孙八剌（又作八剌合，察合台之子木秃坚的次子也孙都哇之子）回到察合台汗国，让他辅佐木八剌沙管理汗国并配合大汗军队平定海都之乱。

八剌在聚集力量之后，曾按忽必烈的旨意进攻海都，双方各有胜负。后在窝阔台的另一孙子钦察斡忽勒的调解下，两人和解，八剌巩固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地位。于是，他公然与大汗分庭抗礼，“他驱走了大汗委任的统治东突厥斯坦地区的异密木古鲁克，代之以自己的属臣别克迷失。忽必烈派出一支六千人的骑兵援助木古鲁克复位，但在八剌合（即八剌）三万大军的优势兵力威胁下，不得不退兵罢战。这些事件荡涤了大汗在突厥斯坦势力的最后残迹，标志着独立自主的察合台汗国的崛起”⑤。

1269年，海都主持在塔剌思召开了一次忽里勒台，海都与八剌结为安答，并决定向阿姆河南发展势力，共同攻打伊利汗国的阿八哈汗。他们一度占领了呼罗珊的大部分和今阿富汗的一部分地区。但是，后来窝阔台方面的人中途撤走，八剌吃了败仗，1270年撤回。当他的势力削弱时，海都以援助为名匆匆赶来，并包围了八剌的营帐。虚弱的八剌惊惧而死。海都主持了他的葬礼，并操纵了他的国家。此后，察合台汗国在海都的控制下，先后立了尼克拜（捏古伯）、秃花帖木儿和都哇为汗。

都哇长期配合海都与元朝对抗，成为元朝西北的最大反叛势力。1301年，海都死。因为都哇由他所立，他自认为对都

哇有恩，遂将窝阔台汗国的事务交由都哇安排处理。都哇有意立了不孚众望的海都长子察八儿，引起了窝阔台汗国内部诸王的不合，都哇乘势控制了窝阔台汗国。同时主动向元廷请和，结束了数十年的战争。从而树立了自己在察合台汗国蒙古贵族中的威望。

1307年，都哇死，子宽彻即位。1309年，宽彻死，非都哇系的塔里忽（察合台五世孙）乘都哇诸子年幼之机做了察合台汗。但是，都哇的威望使得任何非其直系的察合台后裔继立的合法性受到责难。因此，塔里忽遭到了诸王和异密的反抗。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塔里忽阴谋除掉都哇的子孙。在危难之际，都哇的幼子怯别请求兀赞把阿秃儿予以支持、保护，他们密谋趁塔里忽举行宴会之机，突然袭击，杀死了塔里忽及其诸子、那可儿，收编了他的军队和官员，夺回了都哇家族对汗国的统治权。窝阔台系诸王也曾想乘察合台汗国内乱之机，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对中亚的控制权。他遣使向元武宗海山报告了一切，得到海山的赞许，察合台汗国使被废黜的察八儿复辟，被怯别击败。都哇的后裔保住了察合台汗国，继续保持了由都哇、宽彻与元廷建立的友好关系。

1309年，怯别召集忽里勒台，决定由其驻守在哥疾宁地区的兄长也先不花继承汗位。后来，也先不花迁往阿力麻里，怯别则驻守河中，汗国实际上分成东、西两部。怯别所统的中亚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阿富汗北部地区属西察合台汗国；也先不花控制的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亚的七河流域及伊赛克湖以东地区属东察合台汗国，也称作“蒙兀斯坦”。而东部的也先不花为宗主。

也先不花曾有意东进与元朝争夺，元仁宗皇庆三年(1313)在天山东部被元军击败，遂停止向东的军事行动。1315年，怯别统率大军转而向阿姆河以南的伊朗高原进兵。

也先不花和怯别死后，东、西部分别由他们的两个兄弟笃来帖木儿和塔尔麻什里管辖。并曾以大军侵入印度，取其北方诸州，围攻德里。这时的察合台汗国已达到了发展的巅峰。

笃来帖木儿之后，继立者先后为不赞（1334)、靖克失(1334—1338)、也速帖木儿（1338—?)、阿里算端(1340—?)、孛罗谟罕默德（1342—?)、哈赞（1343—1346或1347)、答失蛮察（1346?—1347)、明安忽里（1348—1358)、帖木儿沙诸汗。这时，察合台汗国进入衰微阶段。诸汗在位时间都很短暂，其中的阿里算端和答失蛮察则是窝阔台后裔。突厥贵族的势力逐渐控制了河中，察合台汗只是他们所立的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

1358年，突厥贵族发生内讧，察合台后裔秃黑鲁帖木儿（图黑鲁铁木儿）在蒙古朵豁剌惕（杜格拉特）氏贵族的支持下，进兵河中，击败了突厥贵族，迫使他们归顺，然后留下自己的儿子叶里牙思火者（又作伊里亚思）为河中总督，收回了察合台系对河中的统治权。但是，叶里牙思统治的时间并不长，当初追随秃黑鲁帖木儿进攻河中的蒙古巴尔拉斯家族的帖木儿（又被称为跛者帖木儿、瘸子帖木儿或帖木兰）打败了蒙古军队。驱逐了叶里牙思，另立察合台系宗王哈比勒沙为傀儡。1370年，帖木儿宣布自己为君主，正式登上王位，处死了哈比勒沙。察合台汗国被肢解。

叶里牙思逃到阿力麻里后，继其父秃黑鲁帖木儿为汗。并在蒙古朵豁剌惕家族的支持下，同跛者帖木儿争夺河中。他死

后，朵豁剌惕家族的卡玛鲁丁一度夺取了察合台后裔的王位，卡玛鲁丁死后，秃黑鲁帖木儿最小的儿子贺则尔霍卓（黑的火者）作了这个残存的察合台汗国的王。他不得不承认河中跛者帖木儿的地位，并通过和亲的方式，与他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这时的察合台汗国事实上已经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由黑的火者控制的残存的察合台汗国，在《明史》中被称为“别失八里”。

注　释

①《世界征服者史》第一部分Ⅳ。

②刘迎胜《阿里不哥之乱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③《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察合台传》。

④《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之子拖雷汗之子忽必烈合罕纪》。

⑤李一新《察合台汗国的历史分期》，载《贵州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参见（苏）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

元

科举废行

元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中书令耶律楚材建议以科举选士①，被采纳。八月，“下诏命断事官术忽斛与山西东路课税所长官刘中，历诸路考试”。诏书称：“其中选儒生，若有种田者纳地税，买卖者出纳商税，张开门面营运者依行例供差发除外，其余差发并行蠲免。……与各住达鲁噶齐管民官一同商量公事勾当着。宜后依照先降条例开辟举场，精选入仕，续听朝命。”②第二年（元太宗十年戊戌，1238），“历诸路考试。以论及经义、词赋分为三科，作三日程，专治一科，能兼者听，但以不失文义为中选。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路长官同署公事”。得士凡四千三十人，称戊戌选。按当初耶律楚材的设想，是以此为开端，逐渐恢复科举选士制度。戊戌选合格者便取得了进一步参加“精选”的资格，而再辟举场，则可取其中精英入仕。戊戌选是精选的初试或预试。但这次的选举安排并没有按计划进行，因“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③，由耶律楚材建议的恢复科举取士的尝试竟以失败告终。中选的四千余人中可考者约二十人。其中杨奂试于东平，赋、论

皆为第一名，授官河南路征收课税使，兼廉访使；赵良弼授赵州教授；许楫为中书省架阁库勾当，兼承发司事；雷膺被史天泽任为万户府掌书记。张文谦试于大名，中选后得复本户徭役。

此后，科举取士停废多年，不曾被提及。直至元世祖即位后，在积极推行汉法的同时，也曾反复多次议论恢复科举。

至元初年，丞相史天泽提出恢复科举，但未予施行④。

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科举取士为当时切务。世祖诏中书左三部与翰林学士议立程式，似有意恢复，后又因“有司难之，事遂寝”⑤。但有关恢复科举的问题看来一直是在议论和筹备中。

七至八年间（1270—1271），礼部拟定以词赋、经义二科取士，尚书省拟罢词赋，用经义、明经等科，举子需由品官保举方许入试。

八年，侍讲学士徒单公履请实行贡举。因知世祖对佛教的态度是重教而轻禅，为迎合帝意，竟将儒与佛教相提并论，称“科举类教，道学类禅”⑥。殊不知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国之术，对儒生“日为词赋空文”深怀不满。于是，他召宰臣廷辩，并对符宝郎董文忠说：“汝日诵《四书》，亦道学者。”董文忠素不善诗，也不必求通过科举入仕，故回答说：“陛下每言：士不治经讲孔孟之道而为诗赋，何关修身，何益治国！由是海内之士，稍知从事实学。臣今所诵，皆孔孟之言。焉知所谓道学！而俗儒守亡国之习，欲行其说，故以是上惑圣听，恐非陛下教人修身治国之意也。”⑦

参加这场廷辩的还有姚枢、许衡。因科举实行几代后，其本身的流弊也逐渐暴露，读书应试者死守章句，专心于场屋程文，不通世务，难成治国之才，科举选拔人才的实际作用已大大减弱。当时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时，甚至有人把金朝的亡国归咎于崇儒。故在当时拥有很高威望的许衡也并不热心科举而主张大兴学校以培养、造就人才。元世祖需要的是务实治国之才，也认为“科举虚诞”。对许衡、董文忠等的意见和倾向自然容易接受，因而对科举一直缺乏热情⑧。

蒙元时期有大量宗室、勋臣和怯薛子弟入仕为官，又接收了金朝的降臣、降将，汉人世侯也各自辟置了官属和幕僚，元廷没有通过科举选拔官员的迫切需要。但呼吁恢复科举者显然也大有人在，因而长期以来，关于恢复科举的议论和筹备工作也一直没有停止。

十年（1273），又有诏行科举，命翰林老臣等拟定程式。

十一年十一月，翰林院上奏所拟科举程式于太子真金。“奉令旨，蒙古进士科及汉人进士科，参酌时宜，以立制度”。

十二年正月，又议。参加者有窦默、姚枢和刚刚奉召入京的杨恭懿。恭懿言：“明诏有谓：士不治经学孔孟之道，日为赋诗空文。斯言诚万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敕有司，举有行检、通经史之士，使无投牒自售，试以经义、论策。夫既从事实学，则士风还淳，民俗趋厚，国家得才矣”⑨。看来，这次讨论的结果可能是确定了以经义、策论两科取士。苏天爵说，“条目之详，具载于策书”。科举的准备工作看来也已经完成，但最后还是未能付诸实行。

至元二十一年，中书右丞相和礼霍孙再一次建言设科举，再诏中书省议。不久，“和礼霍孙罢，事遂寝”⑪。

在官僚队伍的补充和更新方面，由于不能以科举选士，则不得不开辟新途径。而某些低级官员出现空缺时，也常常以吏员升职，久而久之，吏员出职逐渐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科举停废造成的人才短缺现象。灭宋后，又搜罗了一些南宋儒生，世祖后期，多以儒臣任监察和词苑职务，通过他们掌握舆情和整顿吏治，也能大体上维持元朝社会关系的平衡。元世祖时期这种用人政策的实施使科举选士的重要性降低，科举已不再是选士的重要途径。成宗、武宗的经历又是以领兵镇守漠北为主，与儒生接触甚少，对科举取士更形隔膜。因而，历世祖、成宗、武宗三朝，恢复科举虽然曾多次被提及，到仁宗即位前，却一直是议而不行⑪。

就最高统治者对科举的态度讲，仁宗的情况与前几位皇帝显然不同，他自幼生长于汉地，一直有儒臣相伴，特别是名儒李孟，"仁宗在宫中，孟日陈善言正道，多所进益"。在怀州四年间，他也始终随侍身边，"诚节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风"⑫。李孟依然坚持"汉、唐、宋、金，科目得人为盛"；柏铁木儿也特别提出"先朝尝欲举行而未果"。时故老凋零，吏员入仕制度的弊端也日益明显而且严重，仁宗在潜邸时已"深见吏弊，欲痛划除之"。久居汉地的蒙古、色目贵族的汉文化素养也有了一定提高，恢复科举的条件终于成熟。

皇庆二年（1313）十月，中书省臣奏："科举事，世祖、裕宗累尝命行，成宗、武宗寻亦有旨，今不以闻，恐或有沮其事者。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已治人之道，……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于是，十一月，下诏行科举，诏称："其以皇庆三年八月，天下郡县，兴其贤者能者，充赋有司，次年二月会试京

师，中选者朕将亲策焉。”议论了半个世纪的科举问题，终于有了结果。

元朝科场，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道。

乡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至正时减为三条，另增本经义一道。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也于四书内出题，并以己意结，限三百字以上；经义一道。第二场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古赋诏诰用古体，章表四六。第三场策一道，经史时务内出题，限一千字以上。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蒙古、色目人做一榜，汉人、南人做一榜。第一名赐进士及第，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以下，皆正八品，两榜并同。各行省、宣慰司、直隶省部按蒙古、色目人、汉人、南人分配名额。全国乡试中选合格者三百名，送大都会试。会试科目与乡试同，于三百人中录取一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二十五人。一月后，于翰林院参加殿试。

殿试蒙古、色目人试时务策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汉人、南人试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题目由儒臣草拟四首进呈，皇帝选定其二。监试官与读卷官以所对第其高下，分两榜公布。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由于右榜取数常不满，故元代每科所取多不满百人。

元统元年癸酉（1333）科，取士百人，“左、右榜各三人，皆赐进士及第，余赐出身有差。科举取士，于斯为盛”。

但是科举恢复后，进展并不顺利，英宗即位时，出现了一

些周折；泰定即位时，几乎又被停废。“周旋扶护而潜弥之，一、二人是赖。盖设科以来，列圣首诏，必有因而摇动者”⑬。到元顺帝元统三年（十一月改至元，1335）十一月，艰难推行的科举还是被权臣伯颜所废。

元统二年三月有诏称“科举取士，国子学积分、膳学钱粮，儒人免役，悉依累朝旧制”。重申旧制，看来正是旧制面临危机的反映，不过，可能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或争论，支持科举者取得了暂时的优势，旧制被重新确认，元统三年的乡试得以照常于八月举行。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由于台臣多由科举入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⑭。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史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去，科举实不可能恢

复。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年底，顺帝下诏恢复科举。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

有元一代，共开科试十六次。由科举入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占仕途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同时，由科举入仕者，只许有壬一人得进相位。"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把他们各自入相的年数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个年头，占同时期中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人数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⑮。

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队伍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入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故时人认为"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但是，有限的科举取士对元朝乃至后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

度化。"。"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的素质"。元代科举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僚队伍中涌入大量"缺乏正统儒家思想薰习教冶的胥吏令史"，"损害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所具有的某种调节作用，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而科举的有限保留，自然也就有限地发挥了它的调节作用。

科举的实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儒家思想文化在汉地得以继承和传播，同时，也带动和提高了边疆后进地区文化的发展和普及。全国各行省自岭北至海南、云南，从陕西、甘肃到辽东都按所定数额选举子入试，再辅以学校的建立，则使先进的汉文化得以向边疆地区推广，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尤其是西北地区，色目人中出现了不少汉文化修养很高的知识分子，这无疑是以各少数民族汉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基础的。

自元仁宗恢复科举，试题多以朱熹及其门人弟子对四书、五经的注疏为准，《春秋》许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仍用古注疏。这种专以理学取士的制度，自元朝开始，为明、清所袭，维持了近六百年，对理学，尤其是小学的普及与

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也给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政治、文化带入了更多的消极影响。

注 释

①《元史·耶律楚材传》载，丁酉年楚材向窝阔台建议兴学校，行科举。他说："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者成也。"

②《庙学典礼》卷一《选试儒人免差》。

③《元史·选举志一》。

④《元史·选举志》载，世祖至元初年，有旨命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尝及科举，而未果行。

⑤《元史·世祖纪三》、《元史·选举志》。

⑥《羽庭集》卷二，刘仁本《送大璞玘上人序》载："佛宗有三，曰禅、曰教、曰律。禅尚虚寂，……而教则通经释典。"徒单公履意欲将科举比附为教，以引起元世祖的重视。

⑦《元史·董文忠传》。

⑧《元文类》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载：庚申，上正位宸极，（许衡）应诏北行，至上都，入见，问所学，曰孔子；问所长，曰虚名无实，误达圣听；问所能，曰勤力农务，教授童蒙；问科举如何，曰不能；上曰："卿言务实，科举虚诞，朕所不取。"

⑨《元史·杨恭懿传》。

⑩《元史·世祖纪十》。

⑪《元典章》卷三一《科举程式条目》载：关于开科取士，"世祖皇帝、裕宗皇帝几遍教行的圣旨有来，成宗皇帝、武宗皇帝时分，贡举的法度也交行来上位根底合明白提说。"可见自世祖至武宗时，议论一直没停，但科举也一直没行。

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六期，1982年。

⑫《元史·李孟传》。

⑬ 许有壬《至正集》卷三二《送冯照磨序》。

⑭《元史·彻里帖木儿传》载：时罢科举诏已书而未用宝，参政许有壬入争之。太师伯颜怒曰："汝讽台臣言彻里帖木儿邪?"有壬曰："太师以彻里帖木儿宣力之故，擢置中书。御史三十人不畏太师而听有壬，岂有壬权重于太师耶?"伯颜意解。有壬乃曰："科举若罢，天下人才觖望。"伯颜曰："举子多以赃败，又有假蒙古、色目者。"有壬曰："科举未行之先，台中赃罚无算，岂尽出于举子？举子不可谓无过，较之于彼则少矣。"伯颜因曰："举子中可任用者唯参政耳。"有壬曰："若张梦臣、马伯庸、丁文苑皆可任大事。又如欧阳元功之文章，岂易及邪?"伯颜曰："科举虽罢，士之欲求美衣美食者，皆能自向学，岂有不至大官者邪?"有壬曰："所谓士者，初不以衣食为事，其事在治国平天下耳。"伯颜又曰："今科举取人，实妨选法。"有壬曰："古人有言，立贤无方。科举取士，岂不愈于通事、知印等出身者。今通事等天下凡三千三百二十五名，岁余四百五十六人。玉典赤、太医、控鹤，皆入流品。又路吏及任子其途非一。今岁自四月至九月，白身补官授官者七十二人，而科举一岁仅三十余人。太师试思之，科举于选法果相妨邪?"伯颜心然其言，然其议已定不可中辍，乃为温言慰解之。且谓有壬为能言。有壬闻之曰："能言何益于事。"彻里帖木儿时在座，曰："参政坐，无多言也。"有壬曰："太师谓我风人劾平章，可共坐邪?"彻里帖木笑曰："吾固未尝信此语也。"有壬曰："宜平章之不信也，设有壬果风人言平章，则言之必中矣，岂止如此而已。"众皆笑而罢。

翌日，崇天门宣诏，特令有壬为班首以折辱之。有壬惧及祸，勉从之。治书侍御史普化诮有壬曰："参政可谓过河拆桥者矣。"有壬以为大耻，遂移疾不出。

⑮ 详见《元代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

元

元杂剧之兴

元杂剧是继汉赋、唐诗、宋词之后中国文学、戏剧史上的又一枝奇葩。它是综合了初期的歌舞剧、滑稽剧和讲唱文艺两个重要因素而形成的一种综合性舞台艺术，是中国戏剧正式形成的标志。

早在唐朝时期，就有了包括乐、歌、舞、演、白五种形式的歌舞类和滑稽类的简单戏剧。继之而起的是宋代的杂剧。早期的杂剧，是指各种各类的戏、杂戏。宋杂剧以末泥（脚色名）为长，每四人或五人为一场。分四段演出：先做寻常熟事一段，称“艳段”。次做正杂剧，为杂剧的中心，即正戏，通名为“两段”；大抵以故事世务为滑稽、讽谏。最后为散段，叫做“杂扮”或“杂旺”；多半借装某些地方的“乡下人”，“以资笑谑”。金代也有杂剧，与宋代相同；至后期，又有别名称“院本”。因为它是行院人（妓女、乐人、伶人、乞者等）流动演唱所用的戏剧脚本，故称“院本”。它继承了宋杂剧的滑稽、歌舞的传统内容，以耍笑为主，注重发科调笑，也偶有加一二支曲子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短剧。

在说唱艺术方面，则有诸宫调和散曲。

诸宫调是宋、金时期民间非常流行的讲唱文艺中的一种艺术形式。它以唱辞和说白相间杂，配以音乐，叙述一个较长的完整的故事。在音乐曲调的选择和组成上，汲取唐、宋大曲、法曲、词、宋唱赚①和当时流行的俗曲小调，把它们按宫调声律的类别，组成一套。然后一套接联一套，组成规模宏伟的长篇叙事诗。每一宫或调所属的曲子都很多，把属于同一宫或调的曲子组合在一起，加上尾声或不加尾声，就构成一套。把若干套联接起来，就是“诸宫调”。唱奏时，以一人主唱，偶尔也有两人对话或和声的现象。伴奏的乐器主要是琵琶，辅助乐器有锣、鼓和板。

这种艺术形式，有故事情节，有人物，有说有唱，又有乐器伴奏，和戏剧已相当接近。所不同的是，诸宫调以一人说唱，以第三者的身份叙述故事，没有表演动作。

所谓散曲，指小令和散套两部分。

曲中的小令，其实就是词中小令的延续、扩大和发展。用以抒发个人感情和描写景物。其字数、用韵限制都不像词那样严格。

散套是以小令为单位，像诸宫调一样，将属于同一“宫”或“调”的几支小令按一定的次序排列而成的。也叫“套曲”或“套数”。它可以用来叙述较完整的情节、故事，描绘较复杂的心理、感情，有时也可用来发表议论，讲谈哲理。散套虽汲取了诸宫调联套的方式，但在诸宫调的基础上有所改进②。

元杂剧就是在吸收以往的歌唱、舞蹈、表演、戏弄等戏剧因素、唱辞和说白相间而以歌唱为主的讲唱文艺因素和以宫调为纲的音律联套方式的基础上，对以往的艺术成果加以提炼、

加工、改造和发展而形成的新的综合性舞台艺术。

唐、宋、金以来文艺形式的发展成果，为其后文艺形式的发展和创新打下了基础；元代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为戏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科举的时停时开影响了读书人的仕途，一些读书人将其精力投入文艺创作，为元代继承和发展以往的文艺形式准备了作家队伍；商业的发展、城市的繁荣扩大了市民阶层的队伍，他们对文化生活也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戏剧艺术有了更多的观众；元朝又是个相当开放的社会，对文艺创作及其形式并不过多地干预和限制，这一切，都为元代杂剧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可能。元代杂剧的发展既是戏剧本身发展的结果，也与元代这一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

元杂剧脚本主要由折（又作摺、出）、楔子、宾白和曲调几部分组成。

折，可能是因演出时备用的台本是写在折叠式的小本上得名的。元杂剧一般分为四折。可能是沿于宋杂剧的四段，个别杂剧则有五折或六折，则是戏剧情节发展的需要。一折相当于现代剧的一幕，是杂剧组成的一个单位。一折里又可分为几场。每折有一个套曲。

楔子是第一场之前或折与折之间用来交待人物、情节的，安排在戏前的楔子，起着“序幕”的作用，对剧情开端，作一必要简炼地交待；安排在戏中两折之间的楔子，起着“过场”的作用，用以埋伏线索或加强两折间的联系。一般都很短小，只用一支或两支单曲。

宾白是剧中人物的说白部分，它基本上是用经过提炼加工的元代口语，间或也用诗、词或长短不齐的顺口溜。宾白包括

对白、独白、旁白和带白。对白是剧中人物两人以上的对话；独白为一个人自叙或叙事；旁白，剧本上写作“背云”，即要背对其他演员，表示在另一处说话或叙述自己的内心活动，而不令剧中其他人物知道；带白，剧本上写作“带云”，即在唱辞中偶尔加入几句说白，只有主唱的演员才可能有带白。

此外，尚有“题目正名”。所谓题目正名，“就是用两句或者四句话，标明剧情提要，确定剧本名称”③。如：

《窦娥冤》

题目　后嫁婆婆忒心偏，守志烈女意自坚。

正名　荡风冒雨没头鬼，感天动地窦娥冤。

《博望烧屯》

题目　关云长提闸放水。

正名　诸葛亮博望烧屯。

题目正名，有的放在剧本开头，有的放在剧本末尾。关于它的作用，也就有“在正戏开演之前，作为报幕式的介绍剧情提要之用，还可以采用种种方式，作为宣传广告之用”和作为全剧结束，“念完了断词和题目正名之后，就收场”两种判断④。

元杂剧的角色约分为末、旦、净、杂四类，而以末、旦为主。

末是男角，相当于京剧里的“生”。男主角称“正末”，其余则有副末、冲末、大末、二末、三末、小末、外末和末泥等名目。

旦是女角，女主角称“正旦”，另外尚有副旦、贴旦、外旦、老旦、大旦、小旦、花旦、色旦等名目。

正末和正旦是元杂剧里两种主要角色，因而用这两种角色

扮演剧中的主要人物。由正末主唱的脚本称“末本”，由正旦主唱的脚本称“旦本”。

净用以扮演刚强狞猛的人物为主，多由男角扮演。有净、副净、二净、丑等名目。有时，净、末可以互易。

以上三类之外的或角色不明的统称为杂，如孤（官员）、祗从（侍从人员）、卒子（士兵）、细酸（书生、穷秀才）、孛老（老头儿）、卜儿（老妇）、倈儿（小孩儿）、邦老（盗贼）、曳剌（契丹语，剧中意为走卒、番兵）、杂当（杂色人）等，类似现代剧中的群众演员。

元杂剧中演员的面部化装已逐渐趋向定型。演员涂面化装的办法，在唐代的参军戏中已经采用。元杂剧中净角的面部化装即由参军演变而成。其他角色有红脸（如《单刀会》中有关羽）、黑脸（如《双献功》中的李逵）、粉白脸（如《伍员吹箫》中的费得雄）、杂色（用几种颜色涂面，如《酷寒亭》中的萧娥），也有黑白二色的（《遇上皇》中的“搽灰抹粉学搬唱”的角色）等。

杂剧演员的服装、道具有巾、帕、衫、裙、袄、鞋、袜、杖、髯等，这些服装当是以实际生活为依据，加以美化、戏剧化而成的。不同人物，根据他们的身份、地位、时代、行业、性别、年龄、民族等使用不同的服饰、道具，以体现角色的身份、性格特征。

宋代城市的娱乐场所称“瓦子”，供演戏用的剧场称“勾阑”，也叫“构肆”，以棚搭成，中间划出一个方场，围以栏杆。观众坐在栏杆四周。大的勾阑可容数千人。金、元时期，出现了砖砌瓦盖的固定戏台。从考古发掘和建筑遗址看，元杂剧的舞台与近代旧式砖木结构的戏台大致相似。戏台三面突

出，观众可由三面看戏；有前台和后台两部分，中部以一道墙隔开。前台是演出和乐队伴奏的地方。后台称“戏房”，是演员化装和休息的地方，有时后台还可以虚拟为内室或门外，通过后台“搭架子”的方式内外呼应，把观众的想象，引向视力所不及的地方。墙的左右两侧各有一门，即上、下场的门。演员自左门上，表示来路；自右门下，表示去路。剧场多为露天的，规模大的可容千人以上。

勾阑的观众坐在“腰棚”、“神楼”上，居高临下地观看表演，剧中人物会显得小；而戏台则是把表演者升高，观众平视表演，会使人感到既省力又亲切。除了固定的剧场外，演员们也可以冲州撞府，流动演出⑤。

演出前，先贴“招子”，写出主要演员的名字和演出地点。有的也贴出剧目，供观众选择（点戏）。

戏台的墙上挂布制横额，上写剧团名称、主要演员名字。悬挂巨幅绣花的故事画帷幕，作为舞台背景。另外，还挂有旗牌、帐额、神帧、靠背等物，现代剧团叫作“摆台”的习惯，元杂剧中也已经出现了。

现代剧中叫做“道具”的物件，元杂剧叫做“砌末”。砌末的范围很广，多指与剧情有关的小物件，如金钗、钿盒、金钱、刀、剑、笏、扇等。

乐队由三五人组成，安置在前台的后部，靠近上场门的地方。伴奏的乐器有打击乐锣、鼓和拍板，管乐器的笛子，后期加入弦乐器琵琶等。

开演前，先有参场。所谓参场，就是在开演前，剧团主要演员穿着行头，与场面人员排站在舞台上，向观众致意。同时，也是向观众展示剧团演出阵容。接着是“开呵”，也作开

和。即简单介绍剧情。

正式演出开始，一般由冲末（间或也用其他角色）先出场，称“冲场”。剧中角色上场，除主唱演员外，一般都先念四句上场诗。内容依角色的身份、行业、年龄和剧情而有所不同。

唱是杂剧的主要部分。一般是全剧由一个角色主唱。由正末主唱的称“末本”戏；正旦主唱的称“旦本”戏。一个末或旦角，在不同的折中，可以扮演不同的人物，但必须同是旦或末。也有的杂剧由正旦、正末分担主唱角色。

除唱、白外，演员还要表演情态、动作，称为“科”。表演滑稽动作或语言令人发笑叫做“插科打诨”，也称做“介”。

此外，元杂剧也有现代戏剧中称为“效果”的各种声响。如剧中人弹琴，后台需发出相应的琴声；剧情中的雷声、风声、雨声、鸟叫、莺啼、雁鸣等等，后台均能传出相应的声响与剧情配合。

全剧结束前，在第四折的最后一曲之后，由一地位较高的人出场，对剧情作最后处理，称为“断出”或“断了”，全剧结束。

元杂剧每一折的第一支曲子之上，必须标明属于何宫或何调。

中国古代音乐，以“十二律”为基础。所谓“律”，就是乐音的高度。又有五声，所谓“声”，就是现在的“音阶”。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再加入变宫和变征，便成为七声，相当于现代音乐的1、2、3、4、5、6、7。十二律轮流为宫就成十二宫，十二宫各有七声，可得八十四调。但在实际应用上，到隋唐时，只存燕乐二十八调：即宫、商、角、羽四

声，每声七调，计二十八调。其中宫声七调称宫，商、角、羽各七调称调。合起来即称“宫调”，实则宫与调的含义是一样的。到金、元时，则只有六宫十一调。北曲用的宫调，只有五宫四调⑥。

宫调就是限定管色的高低。管色，就是俗称的调门。所谓宫调，“犹如现在的工字调、尺字调或C调、D调之类。各个宫调，因其所用的管色，有高低之分，所以，表现出来的音律，就自然不同”⑦。根据燕南芝庵《论曲》的说法：

仙吕调——清新绵远　　南吕宫——感叹悲伤
中吕宫——高下闪赚　　黄钟宫——富贵缠绵
正宫——惆怅雄壮　　道宫——飘逸轻幽
大石调——风流蕴藉　　小石调——旖旎妩媚
高平调——条拗晃漾　　般涉调——拾掇坑堑
歇指调——急并虚歇　　商角调——悲伤婉转
双调——健捷激袅　　商调——凄怆怨慕
角调——呜咽悠扬　　宫调——典雅沉重
越调——陶写冷笑

每一宫调又各包括若干曲牌（章），如正宫包括《端正好》、《衮绣球》等二十五曲；黄钟宫包括《醉花阴》、《喜迁莺》等二十四曲；大石调包括《六国朝》、《归塞北》等二十一曲⑧。现存杂剧剧本所用的曲牌，大约有二百二十九个。

元杂剧一般是每本四折，每折有一个套曲，每个套曲各用一个宫调，不相重复⑨。所谓套曲，按北曲套数体制，一支正曲加一个尾声，就可组成一套，这是最基本的格式。每个套曲所联的曲数可多可少，一般可用十到十五支。

由于戏剧一般都具有联贯性，采用联套形式，就可以取得

音乐上的统一性。也就比较适合于表现主要人物的性格。对于歌唱演员和乐师伴奏，也比较方便。

元杂剧的唱辞，为曲牌体长短句。在用韵上，比宋词严格。而在用字上，限制放宽，可以加入“衬字”和“增句”。所用的唱词，为元代北方地区流行的口语，但又不如宾白那样与口语接近，因为它受格式、音律的制约。元杂剧的语言有“既俗且雅，活泼自然”、“曲重本色，情真语切”、“因人施辞，切合声口”、“情景交融，声情相谐”、“曲白相生，构思巧妙”、“俗语运用，丰富生动”等特点⑩。在口语、俗语、成语等的运用和修辞上也有其独到的特点，王国维、梁启超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⑪。

元杂剧这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它“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丰富了艺术形式，所以，才能提高反映生活的表现力。况且，它把当时群众喜爱的民间艺术的表现手段，多方面的吸收过来，也就可以进一步扩大群众基础”⑫。并为后来戏剧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杂剧就其内容而言，可分为十二科：

一曰神仙道化；二曰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

三曰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四曰忠臣烈士；

五曰孝义廉节；六曰叱奸骂谗；

七曰逐臣孤子；八曰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

九曰风花雪月；十曰悲欢离合；

十一曰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十二曰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⑬。

就形式分类，则有悲剧、喜剧和正剧等。

其悲剧有因黑暗势力的凶残造成悲剧的公案剧，有以家庭

不幸事件为主题的社会习俗剧，有各种人物悲惨遭遇的历史传说剧。

喜剧有表现劝戒和讽刺的社会习俗剧；有追求自由爱情和美满婚姻，反对封建势力和封建礼教的爱情婚姻剧；还有大量给人们进行历史知识和思想道德教育的历史传说剧。

正剧则有受封建势力干扰、间阻、破坏而历经波折，终于团圆的爱情婚姻剧；有人物命运和政治斗争结合的历史传说剧；有思想内容丰富，情节曲折的社会习俗剧；还有反映特殊社会习俗的水浒故事剧和神仙道化剧⑭。

元杂剧作家，据《录鬼簿》、《太和正音谱》和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等考察，大抵应在二百家左右。他们中有"隐居终身的老儒，也有飘泊不偶的穷书生；有才人、演员（他们就是为明代贵族作家朱权所不齿的所谓"倡夫"作家），也有医生、商贾；不仅有汉族作家，也还有不少兄弟民族作家"，此外，还有一些作过平章、参政、总管、学士等官员的统治阶级上层人士⑮。

自元太宗窝阔台灭金至至元十三年灭宋统一全国之初，即《录鬼簿》所说的"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时期，是元杂剧创作的黄金时代，著名作家有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高文秀、康进之、张国宾等。他们大都是北方（今河北、山西、山东）人，而以大都为其活动中心。

灭宋后到元顺帝后至元期间，即钟嗣成所谓"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或不相知者"时期，此时的杂剧作家有宫天挺、郑光祖、曾瑞、乔吉等，他们多是江浙人，或北方籍而流寓南方者。以杭州为活动中心。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都较前期为少，表现了元杂剧由盛转衰的情况。可能与全国统一后，北曲

杂剧逐渐为南戏所取代有关。

至正之后，即元朝末年，也就是《录鬼簿》所说的“方今才人”时期。作家有秦简夫、萧德祥、罗贯中等，作家和作品都更形寥落，成了元杂剧的尾声。

由于元杂剧的作家大都出身低微，戏剧创作又为正统派的文人学士所轻，故即使是著名的杂剧作家，其生平事迹也流传甚少。

其中成就卓著者当首推关汉卿。他是一位伟大、杰出的戏剧活动家，被称为“梨园领袖”、“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字一斋，晚年号已斋叟，大都人。原籍山西解州（今山西解县，又一说为河北祁州，即今河北安国县），太医院户。约生于金卫绍王大安年间，经历了金末战乱，对战争和蒙古统治中原初期生产的破坏、人民生活的苦难有着直接的深刻的体会。因而他的作品极富战斗性和反抗精神。妇孺皆知的《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蝴蝶梦》、《鲁斋郎》也是写得很成功的公案剧。《拜月亭》以蒙古军围攻燕京为背景，通过两对男女经历逃难生活，而双双结为夫妇的情节，描写了战争造成的凄惨景象，创造了两个不同性格的女性形象。

马致远则多以神仙道化为题材，作品有《西华山陈抟高卧》、《吕洞宾三醉岳阳楼》、《马丹阳三度任风子》等。

白朴的作品现存有《唐明皇秋夜梧桐雨》、《裴少俊墙头马上》和《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三种。

王实甫的《西厢记》在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的基础上，精心加工和再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都有所提高，并赋予崔莺莺、张生反抗封建婚姻、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斗争精神。

高文秀、康进之、李文蔚等以水浒人物为创作题材，写出了《黑旋风三献功》、《李逵负荆》和《燕青博鱼》等。

女真作家李直夫（本姓蒲察），作剧十二种，现存有《便宜行事虎头牌》。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是使人惊心动魄的好作品。

后期郑光祖的《倩女离魂》、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等，也都是元杂剧的优秀作品。

元代的杂剧作品大约有六百余种。现存的剧作约在一百六十种左右⑯。

注　释

①唐宋大曲是由同一宫调的若干遍组成的成套乐舞。唐大曲仍以流传的诗篇配乐叠唱；宋大曲系词体，为长篇叙事歌曲，歌舞结合。

法曲为道观所奏之曲。

赚词是由同一宫调中若干首不同牌子的乐曲，联成一套，有《引子》和《尾声》，前后一韵到底，平仄同叶。

宫调解释见下文。

②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 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③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

④参见《元代杂剧》、《元明杂剧》、《元代杂剧艺术》。

⑤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

⑥北曲即元杂剧、套曲、散曲所用的曲调。其五宫四调分别是：仙吕宫、南吕宫、中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越调。

⑦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年。

⑧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

⑨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⑩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⑪参见许金榜《元杂剧概论》、王国维《宋元戏剧考》，梁启超《小说丛话》。

⑫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艺术》，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

⑬钟嗣成等《录鬼簿》（外四种），朱权《太和正音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⑭商韬《论元代杂剧》，齐鲁出版社，1986年。

⑮参见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顾学颉《元明杂剧》，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⑯ 据《元杂剧概论》附录《现存元杂剧作品及其作者》。

元

三史编纂

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国史院，以金末状元王鹗为翰林学士承旨。王鹗请立史局，纂修先朝《实录》及《辽》、《金》二史，并推荐史天泽、耶律铸、王文统等监修《国史》和《辽》、《金》二史①，此为首次议修《国史》和《辽》、《金》史。但忽必烈即位后，百废待兴，修史工作未能立即进行。

至元元年（1264），商挺“入拜参知政事。建议史事，附修《辽》、《金》二史，宜令王鹗、李冶、徐世隆、高鸣、胡祗遹、周砥等为之，甚合帝意”②。王鹗也上奏称：“自古帝王得失兴废，班班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逸，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③建议置局纂修《实录》，附修《辽》、《金》二史。并荐李冶、李昶、王磐、徐世隆、高鸣、徒单公履、郝经、杨恕、孟攀鳞、王恽、雷膺、周砥、阎复、胡祗遹、孟

祺、刘光等入史馆。二月，敕选儒士编修《国史》。此为世祖时第二次议修《辽》、《金》史。

至元十三年（1276），翰林学士李槃奉诏召宋士至临安，董文炳对他说："国可灭，史不可没。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俱在史馆，宜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归国史院④。

灭宋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则《辽》、《金》二史已议至三次，并首次议及《宋史》。但因政事倥偬，议而未行。

仁宗、文宗时期，三史修纂一再议而不行。仁宗时，平章政事、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修国史李孟曾请修《宋史》；应奉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官袁桷也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于翰林国史院，指出："伏读先朝圣训，屡命史官纂修《辽》、《金》、《宋》史，因循未就。推原前代亡国之史，皆系一统之后，史官所成。"并详列纂修《宋史》所应采择的书目，分类条析。他说："凡所具遗书，散在东南，日就湮没。或得搜访，或得给笔札传录，庶能成书，以备一代之史。"时"文书阙略，辽、金为甚"。修史工作依然停留在议论和搜求三史遗文阶段。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右丞相拜住监修国史，锐欲撰修三史，并责成于袁桷。桷"亦奋然自任，条具凡例，及所当用典册"，并"请购求《辽》、《金》、《宋》三史遗书"⑤。后英宗被害，事不果行。

文宗天历（1328—1329）、至顺（1330—1332）年间，屡诏史馆纂修三史，又因"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依旧不能进行。

正统之争早在世祖时期即已开始。参与讨论和著书陈己见

者有杨奂，著《正统论》、《正统八例序》；姚燧，著《国统离合表》；倪士毅，著《历代帝王传授图说》；王理，著《三史正统论》；修端，著《宋辽金正统辨》；杨维桢，著《正统辨》；王袆著《正统论》等。

有关三史义例，有两种意见：

一主以《晋书》为例，自唐以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禅；以南宋比之为东晋，为正统；则辽、金犹刘渊的汉、石勒的赵、苻坚的前秦、姚苌的后秦例，入载记。

一主依《南北史》例，以五代为南史；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史。两派各持已见，争论不休。此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它牵涉到如何看待元朝对全国统治的问题，辽、金、宋三朝地位不能最后确定，三史便无法纂修，这是三史修纂长期议而不行的根本原因所在。此外、修史人才短缺，资料散失、经费不足也是元朝三史修纂岁月迁延的部分原因。

三史纂修的一再拖延，引起了不少儒臣的非议，泰定帝时，理学大师吴澄指出："辽、金、宋史，先朝累有圣旨纂修，旷日引年，未睹成效，使前代得失无闻，圣朝之著述不见，恐贻后悔，君子耻之。"⑥熟知三史掌故的谢端也"尝以不克纂述三史为憾"。

元顺帝即位后，翰林学士承旨、知经筵事、康里人巎巎首以修三史为言。"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恐致阙逸"⑦。至元六年(1340)，权臣伯颜被贬黜，脱脱为相，锐意改革，励精图治。于是，群臣也相继再议修史事。

至正二年（1342），经筵检讨官、临川人危素移书中书右

丞贺太平（惟一），他在《上贺相公论史书》中指出："三国上下数百年间，其事泯然不见于简策，岂非圣朝之阙典欤！"太平力赞其事。

三年（1343）三月，顺帝下诏纂修三史，诏书称："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⑧

于是起用宿彦，任命编修官，正式置局编修。

设都总裁一人，以右丞相脱脱担任。

总裁官六人：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铁睦尔达世）、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

纂修官四人：崇文太监廉惠山海牙、翰林直学士王沂、秘书著作左郎徐昺、国史院编修官陈绎曾。

提调官十三人：中书右丞伯颜，中书左丞姚庸，参议中书省事长仙、吕彬，中书右司郎中悟良哈台，中书左司郎中赵守礼，中书左司员外郎偰哲笃、何执礼，右司都事观音奴，左司都事乌古孙良桢，礼部尚书王守诚，工部尚书丁元，礼部侍郎老老、杜秉彝。

《修三史诏》对资料、经费问题也作了安排。命令各行省广泛搜集资料，诏称："这三国实录、野史、传记、碑文、行实，多散在四方，交行省及各处正官提调，多方购求，许诸人呈献，量给价值，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合用纸札、笔墨，一切供需物色，于江西、湖广、江浙、河南省所辖学院并贡士庄钱粮，除祭祀、廪膳、科举、修理存留外，都交

起解将来，以备史馆用度。”

初，经费不足，脱脱深以为忧，有人建议说“此易耳！江南三省南宋田，颇有‘贡士庄’钱粮者，各桩寄累年，仓库盈积，有司亦尝借用之，此项钱粮以为修史费，孰曰不然”⑨。于是经费得以解决。

争论已久的正统问题，再一次提上日程。时待诏王理主辽、金为《北史》，北宋为《宋史》，南宋为《南宋史》，王祎则主张以辽、宋、金依三国魏、蜀、吴例。他说：“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于是又绝矣。自辽并于金，金并于元，元又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复正其统。”⑩脱脱兼采二王之说，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至此，争论半个多世纪的义例问题得以解决。“议者遂息”。于是，乃立三史凡例。

一、帝纪：

三国各史书法，准《史记》、《西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等事，准《南史》、《北史》。

二、志：

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

三、表：

表与志同。

四、列传：

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

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

五、疑事存疑，信事传信，准《春秋》。

四月设局，开始纂修。

四年（1344）三月，《辽史》成，由都总裁脱脱上《进辽史表》，首尾不及一年。参与编修者有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廉惠山海牙、王沂、陈绎曾、徐昺等。

其材料则取自耶律俨的《辽实录》、陈大任的《辽史》、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及前朝各史的《契丹传》和志、状、碑石等。

其内容包括《本纪》30 卷、《志》32 卷、《表》8 卷、《列传》45 卷，附《国语解》1 卷，计 116 卷。《本纪》记述了辽朝九帝的历史事迹和一代重大事件，在《辽史》中占有首要地位；《志》的内容则涉及辽朝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民族、天文、地理、法制、音乐、礼仪等诸多方面，其内容颇有独到之处。《表》的种类之多，也在其他正史之上。《列传》颇嫌单薄。《国语解》则保存了一些契丹语词汇。

辽朝立国二百余年，元朝史臣以不足一年的时间为其撰修一代之史，时间仓促，资料缺乏，故缺失也就在所难免。其如纪年错误、译名混乱、记事前后矛盾等问题所在多有。

至正四年十一月，《金史》成。由于脱脱已于该年五月罢相，由新任丞相阿鲁图继续主持编修并奏上。

《金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后期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官铁睦尔达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纂修官有沙剌班、王理、伯颜、赵时敏、费著、商企翁等。

《金史》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金朝官修的《金朝实录》、《大金集礼》、刘祁的《归潜志》、王鹗的《汝南遗事》等。金

末元初人元好问，于史事颇为用心，曾有志参与修纂《金史》，因受到阻挠和元初修史工作并未进行而不得遂其志。但他仍以“国亡史作”为己任，潜心著述，多方搜求，自筑“野史亭”，采访搜集金朝君臣遗言往事，“有所得则以寸纸细字为记录，至百余万言”。《金史》编纂中，取自他的著作者为数不少。如《遗山先生文集》、《中州集》、《壬辰杂编》等。时“四方碑、板、铭、志，尽趋其门”①。其中的不少资料为《金史》所用。

《金史》包括《本纪》19卷、《志》39卷、《表》4卷、《列传》73卷，共135卷。其中《本纪》前有《世纪》1卷，后有《世纪补》1卷；《列传》后附《国语解》。

《金史》在《本纪》前著《世纪》，系仿《魏书》例。它记述了女真早期的历史，保存了女真建国前的资料，十分可贵。后附《世纪补》，是《金史》的独创，记述了后代追认的几位皇帝的事迹，处理得当，也为后世修史者所继承。

《金史》在史料的裁减增补和记述方式上，处理比较合理，详略得当，对重要的人物、事件、制度一般都记录得比较详细，能反映出某一历史现象的全貌。编纂态度比较严谨、客观、审慎，可信性较强。该书的《志》、《表》记述比较详细、系统、全面，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所述各项制度比较清晰，具有很高的史料参考和使用价值。因而后人对其评价也较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元人之于此书，经营已久，与宋、辽二史取办仓促者不同，故其首尾完密，条例整齐，约而不疏，赡而不芜，在三史中，独为最善。”

至正五年（1345）十月，《宋史》成。由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阿鲁图上奏。

《宋史》编修官除前期的都总裁脱脱外，还有领三史事阿鲁图和别儿怯不花，总裁帖睦尔灰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李好文、王沂、杨宗瑞。史官有斡玉伦徒、泰不华、杜秉彝、宋褧、王思诚、于文传、汪泽民、张瑾、麦文贵、贡师道、李齐、余阙、刘闻、贾鲁、冯福可、赵中、陈祖仁、王仪、余贞、谭慥、张翥、吴当、危素等 23 人。此外，主修《辽》、《金》二史的揭傒斯，也曾过问《宋史》编纂事，他“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之得失，人材之贤否，一切律以是非之公”[12]。金史垂成之际，他因劳累过度而身亡。中书左丞董守简参加了《宋史》后期的编纂工作，至正五年四月，受命“董修辽、金、宋三史”[13]，总裁三史约半年时间，参与了《金史》、《宋史》后期的编纂领导工作。两人因参与时间较短，故在修史人员名单中未被提及。

《宋史》包括本纪 47 卷，志 162 卷，表 32 卷和列传 255 卷，共 496 卷。是二十四史中篇帙最为浩繁的一部。

《宋史》依据的资料，主要是宋朝史馆收藏的“宋史及诸记注五千余册”，其中有宋太祖至宁宗的实录三千卷，国史六百卷，编年千余卷和宗藩、图谱、别集、小说等。

仁宗时，袁桷在《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例事状》中曾列出 140 余种书目，顺帝修史时，曾据以搜访，仅袁桷之孙所献家藏就有数千卷，也为《宋史》编纂提供了不少可供参考的资料。

《宋史》在编纂中有宋朝国史为稿本，可资参考使用的材料比较丰富；在编纂体例和方式上则是以道学为指导思想。

《本纪》兼采《宋国史·本纪》和《实录》；《志》大部分取自《宋国史》诸《志》；《宋国史》无《表》，元修《宋史》诸

《表》则依据《实录》、《纪》、《传》、《玉牒》等汇总而成；《列传》也多取自《宋国史》。记事依《新唐书》例，只记大事，不载诏令原文；间或有载诏令者，当是并未强求一律。

《宋史》诸《志》的份量在二十四史中最重。除继承历代各志的传统外，其《艺文志》比较系统地记载了宋朝藏书及著述情况，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宋史》有《宰辅表》和《宗室表》。其中《宰辅表》记北宋宰执 310 人，南宋宰执 305 人。因宋朝宰辅在政治上起着重要作用，读者可"即表之年观纪、传之事"，为研究提供了方便。

《列传》分 23 类。立传者 2711 人。其中《道学传》为《宋史》首创。元朝史臣认为，孔孟创立的道统，至汉以后语焉不详，而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继其绝"，至朱熹学术体系更加完备。"后之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⑭，故作《道学传》。

《宋史·世家列传》记述十国降宋的国君事迹，取法于《史记》、《新唐书》，又将两书中的《世家》降格于《列传》之下。而其《周三臣传》，形式上比之于《新唐书·唐六臣传》，用意却截然不同，彼意在讥，而此意则在于表彰忠义。

宋朝历时三百余年，国史等修纂完备，元朝修《宋史》时，可资参考的资料丰富。但由于"时日迫促，不暇致详"，因而在史料的使用上失于考证，有"是非失当"之弊；在记事上则详于北宋而略于南宋；在史料的剪裁、编次、修饰、检校方面，又有"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数人共事传各专功"等弊病。但元朝自世祖即位以来，史事议而不行者凡八十年，至顺帝时，在脱脱主持下，终于完成，其功实不可

没。

注 释

①《元史·世祖一》载，王鹗言："唐太宗置弘文馆，宋太宗设内外学士院。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乞以右丞相史天泽监修国史，左丞相耶律铸、平章政事王文统监修辽、金史，仍采访遗事。"并从之。

②《元史·商挺传》。

③《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二《内翰王文康公》。

④《元史·董文炳传》。

⑤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元史·袁桷传》。

⑥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四《临川吴先生行状》。

⑦《元史·董文炳传》

⑧《辽史》后附《修三史诏》。

⑨《庚申外史笺证》。

⑩ 王祎《王文忠公集》卷一。

⑪《金史·元好问传》。

⑫《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揭公神道碑》、《元史·揭傒斯传》。

⑬《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董公神道碑》。

⑭《宋史·道学传序》。

附录：元朝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162年	宋绍兴三十二年 金大定二年	铁木真诞生
1170年	宋乾道六年 大定十年	铁木真父也速该把阿秃儿被塔塔儿人毒死，部众离散。
1189年	宋淳熙十六年 大定二十九年	铁木真被推举为蒙古部可汗，号“成吉思”；“十三翼之战”爆发。
1195年	宋庆元元年 金明昌六年	合答斤、山只昆、翁吉剌等部犯金边，为金军击败，塔塔儿部截袭金军，夺其所获羊马，叛金。
1196年	庆元二年 金承安元年	成吉思汗与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助金军大败塔塔儿部于斡里札河，金封成吉思汗为“札兀惕忽里”，封脱斡邻勒罕为“王”，从此，他被称为王罕。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197 年	庆元三年 承安二年	成吉思汗与王罕征讨主儿乞部，执杀撒察别乞、泰出；成吉思汗击败篾儿乞部首领脱黑脱阿。
1198 年	庆元四年 承安三年	王罕败篾和乞部，脱黑脱阿逃巴儿忽真隘。
1199 年	庆元五年 承安四年	成吉思汗与王罕攻乃蛮部，盃禄汗败走谦谦州。
1200 年	庆元六年 承安五年	成吉思汗与王罕会于萨里川，联兵败泰赤乌部于斡难河；合答斤、山只昆与塔塔山、朵儿边、翁吉剌等部会于阿雷泉、袭成吉思汗和王罕，被击败。
1201 年	宋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札木合与合答斤、山只昆等 11 部首领于犍河会盟。共推札木合为“古儿罕”，合兵攻成吉思汗与王罕，被击败于海剌儿河。
1202 年	嘉泰二年 泰和二年	成吉思汗败察罕塔塔儿等部于兀鲁回失连真河。盃禄汗与篾儿乞、斡亦剌等部联合袭击蒙古部，成吉思汗联合王罕败之于阙亦坛。成吉思汗灭泰赤乌部。
1203 年	嘉泰三年 泰和三年	成吉思汗于合兰真沙陀之战败于王罕，退至班朱尼河，整军再战，攻灭克烈部。王罕逃入乃蛮界，被边将执杀。其子亦剌合辗转逃至曲先，亦被杀。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04年	嘉泰四年 泰和四年	乃蛮部太阳汗与蔑儿乞、斡亦剌、朵儿边、合答斤、泰赤乌等残部联合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于合勒合河整顿军队，设扯儿必官，建护卫军，迎战乃蛮。太阳汗败于纳忽山，被执杀。其子屈出律逃奔盃禄汗。汪古部归附成吉思汗。
1205年	宋开禧元年 泰和五年	札木合被随逃的部下执送成吉思汗，处死。蒙古军首次攻西夏，破力吉里寨。
1206年	元太祖元年 开禧二年 泰和六年	成吉思汗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建大蒙古国，行领户分封制，扩建护卫军，制定大札撒，设大断事官。成吉思汗遣者别追击乃蛮余部，执杀盃禄汗，屈出律与脱黑脱阿等西逃。
1207年	太祖二年 开禧三年 泰和七年	成吉思汗遣使招降吉利吉思等部，首次分封诸子诸弟。秋，蒙古军二次征西夏，破斡罗孩城。
1208年	太祖三年 宋嘉定元年 泰年八年	蒙古军征讨蔑儿乞和乃蛮残部，脱黑脱阿被射杀，屈出律奔西辽。
1209年	太祖四年 嘉定二年 金大安元年	春，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归附蒙古。是年，蒙古军三征西夏，夏襄宗李安全纳女请和。
1211年	太祖六年 嘉定四年 大安三年	正月，哈剌鲁阿儿思兰汗和斡匝儿归附蒙古。二月，成吉思汗督师伐金，继败金军于野狐岭、浍河堡，进围中都。是年，屈出律废西辽君主直鲁古，自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13 年	太祖八年 嘉定六年 金至宁元年 贞祐元年	秋，蒙古军分三路攻金，破河北、山东、山西诸路，抄掠而还。
1214 年	太祖九年 嘉定七年 贞祐二年	蒙古军进围中都，三月，金宣宗献岐国公主及金帛、马匹等，请和。五月，金迁都汴京。
1215 年	太祖十年 嘉定八年 贞祐三年	五月，蒙古军攻取金中都，改中都为燕京。
1216 年	太祖十一年 嘉定九年 贞祐四年	成吉思汗自中原还蒙古，遣速不台征篾儿乞残部。木华黎取锦州、灭张致，拔苏、复、海三州，斩完颜众家奴。十月，辽东蒲鲜万奴降蒙古，复叛，改号东夏。
1217 年	太祖十二年 嘉定十年 金兴定元年	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其经略金国。秃麻部起义，遣博尔忽等征讨之。冬，蒙古军第四次征西夏，包围中兴府，夏神宗出奔西凉，遣使请降。
1218 年	太祖十三年 嘉定十一年 兴定二年	成吉思汗遣术赤征服吉利吉思等“林木中百姓”。遣者别征服西辽，杀屈出律。速不台消灭篾儿乞残部于咸海之北。遣哈真、札剌等会同蒲鲜万奴军追灭契丹叛人于高丽，高丽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使团和商队至花剌子模，商队于讹答剌城被劫杀。木华黎攻入山西、下太原、平阳、绛州等 80 余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19 年	太祖十四年 嘉定十二年 兴定三年	五月，成吉思汗遣刘仲禄至东莱召邱处机。六月，成吉思汗率师征花剌子模。
1220 年	太祖十五年 嘉定十三年 兴定四年	正月，邱处机奉召率弟子自东莱启程，冬，留居德兴。是年，蒙古军攻取讹答剌、不花剌、撒麻尔干等城，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逃入宽田吉思海岛上，病死，生前传位于札兰丁。东平严实降蒙。金封王福，武仙等九人为公、兼经略使，在河北、河东与蒙古军对抗。
1221 年	太祖十六年 嘉定十四年 兴定五年	西征蒙古军下玉龙杰赤、呼罗珊诸城，札兰丁逃入印度。者别、速不台军攻取哈马丹、拜勒寒城。严实立行台于东平。木华黎军攻山西、陕西。南宋遣苟梦玉出使蒙古，至西域铁门关见成吉思汗。二月，邱处机自德兴启程西行，年底至撒麻尔干。
1222 年	太祖十七年 嘉定十五年 金元光元年	三月，邱处机自撒麻尔干出发，四月初，到达成吉思汗的行营。夏，成吉思汗避暑于八鲁湾。冬，返回撒麻尔干。是年，成吉思汗命八剌等追击札兰丁至印度。者别、速不台军攻入谷儿只，破其首府沙马哈，越太和岭入阿速、钦察部地。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23 年	太祖十八年 嘉定十六年 元光二年	三月，邱处机自西域东返，七月，邱处机至云中，后住德兴龙阳观。是年，南宋第二次遣苟梦玉出使蒙古。木华黎卒于闻喜，子孛鲁袭职。者别、速不台军于阿里吉河大败斡罗思、钦察联军。者别等与成吉思汗会师东归。
1224 年	太祖十九年 嘉定十七年 金正大元年	二月，邱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是年，札兰丁自印度返回波斯，复国。七月，蒙古军第五次征西夏。十一月，夏遣使请降。
1225 年	太祖二十年 宋宝庆元年 正大二年	成吉思汗回到蒙古。武仙杀史天倪叛蒙投金，史天泽袭兄职。彭义斌围攻东平严实。札兰丁进取桃里寺城，占领阿哲儿拜占。
1226 年	太祖二十一年 宝庆二年 正大三年	三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六征西夏。十一月，蒙古军攻取灵州。济南张荣降蒙。
1227 年	太祖二十二年 宝庆三年 正大四年	蒙古军进围中兴府。七月，成吉思汗病逝于军中，旋夏主李睍出降，处死，西夏亡。邱处机圆寂于长春宫。益都李全降蒙。拖雷监国。
1228 年	拖雷监国元年 宋绍定元年 正大五年	蒙古军入大昌原，败于金完颜陈和尚。
1229 年	元太宗元年 绍定二年 正大六年	八月，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是年，颁大札撒，定中原，西域税法，命耶律楚材和牙剌瓦赤分别主持。遣阔客歹，雪你台率军征钦察、撒克辛和不里阿耳。遣绰儿马罕攻打札兰丁。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30 年	太宗二年 绍定三年 正大七年	置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征收课税所，命耶律楚材主其事。窝阔台自将伐金，拖雷、蒙哥从征。绰儿马罕追击札兰丁至阿哲儿拜占。
1231 年	太宗三年 绍定四年 正大八年	窝阔台取金河中府。拖雷军入汉中，假道宋境攻金。札兰丁逃至迪牙别乞儿被杀。蒙古军侵入高丽，高丽王降。李全死，其子李璮袭益都行省。
1232 年	太宗四年 绍定五年 金开兴元年 天兴元年	正月，拖雷军败金兵于钧州南三峰山。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拖雷死于途中。速不台军围攻汴京。七月，金杀蒙古使者唐庆，和议绝。十二月，金哀宗逃归德。蒙古遣王楫出使南宋，约联兵攻金。
1233 年	太宗五年 绍定六年 天兴二年	正月，速不台军取汴京。六月，金哀宗自归德奔蔡州。八月，蒙宋和议成。九月，皇子贵由和诸王按赤带军攻破东夏都城南京，擒蒲鲜万奴，东夏国灭。十一月，蒙、宋兵进围蔡州。
1234 年	太宗六年 宋端平元年 天兴三年	正月，蔡州城将破。金哀宗传位于完颜承麟，自缢死，蒙宋联军破城，承麟死于乱军之中，金亡。
1235 年	太宗七年 端平二年	二月，始建哈剌和林城及宫阙。蒙古军分两路进攻南宋，皇子阔出统东路军入湖北，阔端统西路军进取四川。十月，金巩昌总帅汪世显降。蒙古诸王大会，决定以拔都为首西征钦察、斡罗思等国，各支宗室与那颜均以长子率军从征，窝阔台命选试僧道。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36 年	太宗八年 端平三年	春，西征主将速不台与诸王率师出发。秋，西征军抵不里阿耳，与拔都会合，破其城。冬，蒙哥军逼临钦察部，班都察率部归降。十月，阔端军取成都。是年，宋襄阳守将李伯渊以城降。阔出死。窝阔台以中原民户分赐诸王、贵戚、勋臣，定五户丝制，重新制定中原赋税制度。
1237	太宗九年 宋嘉熙元年	春，蒙哥军击败钦察军，其首领八赤蛮于宽田吉思海中岛上被擒杀。秋，拔都进兵斡罗思，征服莫尔多瓦。冬，攻取也烈赞城。是年，东路口温不花军取光、蕲、舒等州，略黄州，史天泽下复州。窝阔台采纳耶律楚材以科举选士的建议。
1238 年	太宗十年 嘉熙二年	是年，拔都分兵四出，连取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科泽里思哥诸城。钦察部长忽难逃入马札儿。阔端军陷隆庆。窝阔台派官历诸路考试，此称“戊戌选”。
1239 年	太宗十一年 嘉熙三年	是年，拔都军攻入斡罗思南部。蒙哥军进入阿速，国主杭忽思降。绰儿马罕攻入大阿美尼亚，取阿尼城。阔端军攻重庆，遣多尔答等率兵入西藏。
1240 年	太宗十二年 嘉熙四年	是年，蒙哥、贵由奉召东归，将阿塔赤及所部阿速军带回。拔都军破乞瓦、弗拉基米尔沃伦等城，征服斡罗思诸国。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41年	太宗十三年 宋淳祐元年	西征蒙古军分兵两路侵入马札儿、孛烈儿。绰儿马罕死，拜住继统其军。阔端军复入蜀，取成都，破叙、泸、资等州。蒙古遣月里麻思使宋议和，被囚禁于长沙。牙剌瓦赤自西域调任大札鲁忽赤。十一月，窝阔台汗死，乃马真氏脱列哥那皇后摄政。
1242年	乃马真后元年 淳祐二年	拔都等自马札儿班师。拜住率军侵入鲁迷、克额儿哲鲁木城。呼罗珊、杩桚答而长官阔里吉思被执杀，阿儿浑继任。察合台死。海云至漠北向忽必烈讲论佛法。
1243年	乃马真后二年 淳祐三年	拜住军于额儿赞章击溃鲁迷军。蒙古军侵入叙利亚。
1244年	乃马真后三年 淳祐四年	耶律楚材卒。
1246年	定宗元年 淳祐六年	八月，贵由即蒙古大汗位，是为定宗。萨班与八思巴至凉州。
1247年	定宗二年 淳祐七年	正月，萨班与阔端相见于凉州，萨班以乌思藏纳里地归附蒙古。是年，贵由汗命野里只吉带为征西军统帅，经略鲁迷和谷儿只等地。
1248年	定宗三年 淳祐八年	春，贵由汗在西巡途中猝死于横相乙儿，斡儿立海迷失皇后摄政。是年，拔都于驻地阿剌脱忽剌兀召集诸王贵族会议，推举蒙哥为大汗，窝阔台、察合台两系诸王不予承认。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51 年	元宪宗元年 淳祐十一年	六月，蒙哥即蒙古大汗位，是为宪宗。贵由后海迷失被处死，谪皮失列门、脑忽等，诛窝阔台、察合台两系党羽70余人。拔都处死野里只吉带。蒙哥汗命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军征南宋。命旭烈兀总领阿姆河以西诸地军国重事，统军西征木剌夷、报达。
1252 年	宪宗二年 淳祐十二年	是年，再括中原民户，以民户分赐诸王贵族。忽必烈在金莲川开设幕府。忽必烈发兵征云南，于邓州立屯田万户府。蒙哥遣兵侵高丽。旭烈兀军先锋怯的不花率军西征。
1253 年	宪宗三年 宋宝祐元年	是年，旭烈兀统兵西征。忽必烈军破大理城，国王段兴智逃往善阐。忽必烈在北还途中，于军营与八思巴会见。立京兆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
1254 年	宪宗四年 宝祐二年	兀良合台军攻取善阐，段兴智于昆泽被俘。
1255 年	宪宗五年 宝祐三年	段兴智至蒙古见蒙哥汗，赐其金符使归国。兀良合台于大理境内设置十九万户府，分管其地。旭烈兀西征军抵撒马尔干。蒙哥汗召集佛道两教代表至和林辩论教理。拔都死。
1256 年	宪宗六年 宝祐四年	忽必烈命刘秉忠于桓州始建开平府城，营建宫室、房舍。旭烈兀军攻灭木剌夷国。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57 年	宪宗七年 宝祐五年	蒙哥汗亲征南宋，自将右翼军取四川，塔察儿统左翼军攻荆襄、两淮。旭烈兀自可疾云移驻哈马丹，准备进兵极达。设常平仓。
1258 年	宪宗八年 宝祐六年	旭烈兀攻陷极达，灭黑衣大食。蒙哥右翼军入蜀，塔察儿军一城未克，改命忽必烈统其军。忽必烈在开平主持第二次佛道两教的辩论大会，佛胜道败。
1259 年	宪宗九年 宋开庆元年	七月，蒙哥汗死于合州钓鱼山军中。九月，忽必烈进围鄂州。旭烈兀进兵叙利亚，闻蒙哥死，东归。闰十一月，宋贾似道遣使请和，阿里不哥谋即汗位，忽必烈率师北还。
1260 年	元世祖中统元年 宋景定元年	夏，阿里不哥与忽必烈相继于和林和开平即蒙古大汗位。五月，忽必烈建元中统。立中书省、燕京行中书省，设十路宣抚司，造中统交钞、元宝钞。八月，忽必烈遣合丹等击败阿里不哥派往关陇的阿兰答儿，俘斩之于甘州。冬，忽必烈决定亲征和林。阿里不哥逃往谦谦州。忽必烈命移相哥留驻和林，自回开平。是年，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国师。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罢侵高丽兵。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61 年	中统二年 景定二年	七月，立翰林国史院。秋，阿里不哥以假降袭取和林，忽必烈再次亲征。十一月，败阿里不哥于昔木土脑儿。十二月，封皇子真金为燕王，领中书省事。是年，阿里不哥遣察合台之孙阿鲁忽往镇河中地区，阿鲁忽归附忽必烈。设劝农司，以姚燧为大司农。
1262 年	中统三年 景定三年	二月，李璮叛乱，占领益都、济南。忽必烈诛王文统、发兵讨李璮。七月，蒙古军破济南，史天泽杀璮。是年，金帐汗别儿哥与伊利汗旭烈兀为争夺高加索地区发生内讧，旭烈兀兵败。
1263 年	中统四年 景定四年	正月，立十路奥鲁总管。五月，升开平府为上都，立枢密院。
1264 年	中统五年 至元元年 景定五年	七月，阿里不哥归降忽必烈。八月，改号至元。十二月，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是年，李璮余党毛璋发动兵变，兵败被杀。忽必烈封旭烈兀为伊利汗。改燕京为中都。设总制院，以八思巴统领院事。
1265 年	元至元二年 宋咸淳元年	旭烈兀死，长子阿八哈继位。
1267 年	至元四年 咸淳三年	冬，忽必烈征诸路兵，命阿术、刘整攻襄樊。是年，于中都东北兴建新城。札马鲁丁在上都建成七件西域仪象。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68 年	至元五年 咸淳四年	九月，阿术等围樊城，屡败南宋援军。是年，立御史台。海都与八剌联兵反元，被忽必烈击败。
1269 年	至元六年 咸淳五年	二月，颁行八思巴字，即蒙古新字。七月，立国子学。
1270 年	至元七年 咸淳六年	正月，立尚书省。二月，立司农司，后改为大司农司，以孛罗领之。五月，括编户籍。闰十一月，申明劝课农桑赏罚之法。冬，蒙古军围襄樊。十二月，遣赵良弼使日本。是年，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帝师。
1271 年	至元八年 咸淳七年	二月，发中都、真定、顺天、河间等处民工筑宫城。大理等处宣慰都元帅宝合丁等协谋毒杀云南王忽哥赤，事觉伏诛。十一月，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罢诸路交钞提举司，颁布"户口条画"，整顿户籍。是年，始建大圣寿万安寺（今北京白塔寺）。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
1272 年	至元九年 咸淳八年	正月，尚书省并入中书省。二月，改中都为大都。十一月，亦思马因献巨石炮。是年，元军开始攻樊城。
1273 年	至元十年 咸淳九年	正月，元军破樊城。二月，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城降元。三月，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农桑辑要》成。闰六月，以翰林院纂修国史，令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74年	至元十一年 咸淳十年	三月，元遣军征日本。八月，命伯颜率军伐宋。刘秉忠卒。十月，伯颜军攻郢州。十二月，伯颜军破阳逻堡，随即与阿术会攻鄂州，鄂州降，以阿里海牙兵镇鄂汉，元军水陆东下。
1275年	至元十二年 宋德祐元年	正月，伯颜军取黄、蕲、江三州。二月，元军攻安庆，范文虎以城降。元、宋两军大战于丁家渡，贾似道兵败，奔扬州，旋罢贬循州。郝经被释，未几卒于燕。三月，阿里海牙军取荆湖，破岳州，宋将高世杰败降，被杀。元军连取建康、镇江、江阴、平江诸城。四月，阿术军攻真、扬二州。七月，诏伯颜还上都，命其率军直趋临安，阿术攻淮南，阿里海牙取湖南。十一月，贾似道为监押官郑虎臣杀于漳州。伯颜军破常州，分兵三路趋临安。十二月，元军迫近临安，宋遣使请和。是年，立阿力麻里行中书省、行枢密院。马可波罗至上都。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记
1276年	至元十三年 宋景炎元年	正月，阿里海牙军克潭州，宋湖南州郡相继降元。立回易库于诸路。宋陆秀夫等护送益王昰、广王昺出逃。谢太后与恭帝㬎奉传国玺降。宋文天祥与伯颜会于明因寺，被伯颜拘留。二月，伯颜命将入临安城。召伯颜偕宋君臣入朝。宋将夏贵以淮西诸郡降。益、广二王出走温州。三月，伯颜入临安，掳恭帝、全太后、福王与芮等北去。闰三月，宋帝等随元兵行至瓜州，宋将李庭芝等出兵夺两宫不果。五月，宋益王昰即帝位于福州，是为端宗，改元景炎，进封广王为卫王。伯颜偕恭帝等至上都。六月，重修《大明历》。七月，宋将朱焕以扬州降。元军俘李庭芝等于泰州，淮东入元。八月，李庭芝等于扬州被杀。九月，元军分道经略闽广。十一月，元军入闽，宋端宗及卫王等走潮州。十二月，蒲寿庚以泉州降元。元以合丹等领东川行枢密使，攻合州；不花等领西川行枢密使，攻重庆。阿里海牙兵破静江，继取郁林、浔、容、藤、梧等州。至是，广西州郡皆陷。宋遣使倪坚奉表请降。
1277年	至元十四年 景炎二年	四月，张德兴与刘源等起兵反元。七月，诸王昔里吉叛，劫持北平王于阿力麻里。九月，伯颜率军大败昔里吉于斡鲁欢河，昔里吉走死。是年，于泉州、庆元、上海、澉浦四地设市舶提举司。宋端宗等辗转逃至秀山、香山。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78年	至元十五年 宋祥兴元年	四月，宋端宗死于硇州，卫王昺即帝位。五月，卫王改元祥兴。六月，移往崖山。十一月，建宁政和县黄华及畲族民妇许夫人起兵抗元。闰十一月，文天祥于五坡岭兵败被俘。
1279年	至元十六年 祥兴二年	正月，元军攻崖山。二月，陆秀夫负宋幼帝赵昺投海死，宋亡。张世杰于南恩之海陵山投水死。太史令王恂等言："建司天台于大都，仪象圭表皆铜为之，宜增铜表高至四十尺，则景长而真。"又请于上都、洛阳等五处分置仪表。命郭守敬访求精天文历数者。三月，敕郭守敬由上都、大都，历河南抵南海测验晷景。遣监候官分道而出，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十月，文天祥被押送至大都，囚于兵马司。十二月，赛典赤瞻思丁卒。是年，关汉卿卒。
1280年	至元十七年	正月，定诸路差税课程。二月，元将纳速剌丁征缅国。五月，命江淮等处颁行钞法，废宋铜钱。十月，立营田提举司。十一月，帝师八思巴圆寂。颁行《授时历》。十二月，陈桂龙在福建漳州起事。置镇北庭都护府于畏兀儿境。
1281年	至元十八年	二月，元发兵征日本。六月，阿塔海统率马军征日本。八月，征日元军10余万至平湖岛遇飓风船毁，几乎全军覆没。十一月，陈吊眼在漳州起事，被诱杀。十二月，林天成于福州起事，战败被俘斩。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282 年	至元十九年	二月，修宫城、太庙、司天台，三月，阿合马被杀。四月，刊行畏兀儿体蒙古文所书《通鉴》。五月，阿合马党羽七百余人被革黜。七月，海都遣回北平王那木罕等。十月，整治钞法。罢屯田总管府。设南北两漕运司。十二月，文天祥被杀于大都柴市。造帝师八思巴舍利塔。是年，始以海道漕运。
1283 年	至元二十年	三月，新会林桂方、赵良钤等起事，国号罗平、建元延康，旋被擒杀。五月，立征东行中书省。立斡脱总管府。八月，济州新开河成，立都漕运司。十月，立和林平准库。建宁路管军总管黄华反，聚众数十万，号头陀军。孛罗等出使伊利汗国。十一月，立司农司。命各省印《授时历》。
1284 年	至元二十一年	正月，黄华兵败自杀。七月，元遣镇南王脱欢率兵侵占城。十二月，立常平盐局。集诸路医学教授增修《本草》。
1285 年	至元二十二年	正月，立市舶都转运司、上都等路群牧都转运使司、诸路常平盐铁坑冶都转运司。二月，立规措所。郭逢贵等抗元失败。五月，入安南元军退回。十一月，卢世荣被诛。十二月，皇太子真金死。
1286 年	至元二十三年	二月，太史院上《授时历经》、《历议》，藏于翰林国史院。六月，颁行《农桑辑要》。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87 年	至元二十四年	正月，大举攻安南、交趾。闰二月，复立尚书省，改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初设国子监。设江南各道儒学提举司。三月，颁行至元宝钞。四月，诸王乃颜叛乱。五月，忽必烈亲征乃颜。六月，乃颜于撒儿都鲁之地战败，逃至失列门林被执杀。十二月，元军下交趾城。元与缅国建立朝贡关系。
1288 年	至元二十五年	正月，毁中统钞板。宗王海都扰北边，遣术伯北征。三月，大圣寿万安建成。四月，宗王火鲁火孙、哈丹秃鲁干复叛，遣皇孙铁穆耳击败之。安南王遣使贡金人，元军自安南退回。钟民亮在循州起事。五月，浑天仪成。九月，诸王都哇犯边。新编《本草》成。十月，海都犯边，忽刺忽、阿塔海等战却之。十一月，总制院更名为宣政院。十二月，海都复扰边，遣拔都也孙脱迎击。
1289 年	至元二十六年	正月，开会通河。哈丹再入辽东。二月，籍江南户口。三月，杨镇龙于宁海起兵，称大兴国，建元安定。四月，置木绵都提举司。五月，设回回国子学。六月，诸王乃蛮带败哈丹于托吾儿河。会通河成。七月，海都犯漠北，败晋王军于杭海岭，忽必烈再次亲征，复和林。九月，置高丽国儒学提举司。十月，钟明亮复反。杨镇龙败死。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90年	至元二十七年	正月，哈丹余党自高丽犯辽东，攻海阳。六月，缮写金字《藏经》。八月，阔里铁木儿与哈丹战于瓦法，大破之。
1291年	至元二十八年	正月，罢桑哥官职。二月，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五月，颁行《至元新格》。罢尚书省、复改中书省。改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七月，桑哥被诛。是年，马可波罗离泉州返回。
1292年	至元二十九年	二月，以爪哇黥元使臣，遣亦黑迷失等统军征爪哇。三月，诛桑哥余党。八月，遣不敦等征八百媳妇国。浚通州至大都漕河。九月，诸王明理铁木儿附海都反，伯颜军大败之。是年，从乃颜反叛诸王、将领相继归降。
1293年	至元三十年	二月，王恽上陈时政十四事。四月，征爪哇元军退还。六月，以皇太子宝授与皇孙铁木耳，总兵北边。七月，通州至大都漕河成，赐名通惠河，是年，立真金第三子铁木耳为皇太孙。
1294年	至元三十一年	正月，世祖忽必烈病逝。四月，铁木耳于上都即帝位，是为成宗。十一月，诏改明年为元贞元年。十二月，意大利人孟特·戈维诺（亦译约翰·孟脱考儿维诺）抵达大都。是为罗马教廷派驻元朝的首位大主教。伯颜卒。
1295年	元贞元年	闰四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宋德柔主其役。
1296年	元贞二年	十一月，以洪泽、芍陂屯田军万人修大都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297年	元贞三年 大德元年	二月，改元大德。三月，五台山佛寺成。九月，八百媳妇国反抗，遣也先不花将兵讨之。十月，钦察都指挥使牀兀儿攻占八邻地，海都军败逃。
1298年	大德二年	四月，郭守敬造浑天漏仪。
1299年	大德三年	二月，广和林城。是年，以皇侄海山镇漠北。孟特·戈维诺在大都建天主教堂。
1300年	大德四年	八月，更定荫叙格，蒙古、色目人特优一级。海山败海都兵于阔别列。十二月，成宗发兵征八百媳妇国。
1301年	大德五年	五月，云南土官宋隆济、贵州蛇节相继起事，围攻元侵八百媳妇军。八月，海山与月赤察儿、牀兀儿军大败海都、都哇军，海都败死，都哇遁。
1302年	大德六年	十二月，衡州袁舜一起事，兵败伏诛。胡三省卒。
1303年	大德七年	三月，《大元大一统志》编成。四月，蛇节降，旋被杀。宋隆济败逃。七月，都哇及海都子察八儿等诸王遣使请息兵和好。
1304年	大德八年	是年，元朝与西北诸王约和，各遣使赴伊利汗处宣谕和好之意。伊利汗合赞死，其弟合儿班答袭位。
1305年	大德九年	六月，立皇子德寿为太子。十二月，皇太子死。
1306年	大德十年	冬，海山率兵逾金山击灭里铁木儿，降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07年	大德十一年	正月，成宗铁穆耳卒，无子。时阿忽台等谋奉皇后伯要真氏临朝，以阿难答摄政；哈剌哈孙则遣使迎顺宗次子爱育黎拔力八达于怀州。二月，爱育黎拔力八达至大都。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执杀阿忽台等，自称监国。并遣使迎其兄怀宁王海山于漠北。五月，海山于上都即帝位，是为武宗。废皇后伯要真氏，旋赐死，诛阿难答等。六月，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弟，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八月，赐诸王蒙古字《孝经》。十二月，诏改大德十二年为至大元年。是年，马端临《文献通考》成。王实甫卒。都哇死，其子宽彻继立。
1308年	武宗至大元年	五月，禁白莲社，毁其祠宇。十二月，月赤察儿攻海都子察八儿，降之。
1309年	至大二年	八月，立尚书省。九月，改各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颁行至大银钞，铸铜钱“至大通宝”、“大元通宝”。立平准行用库。立常平仓于各路、府、州、县。十月，以皇太子为尚书令。十一月，遣云南行省发兵攻八百媳妇国，为其所败。是年，察合台汗宽彻死。
1310年	至大三年	正月，定课税法。二月，浚会通河。六月，察八儿来朝。十一月，修中都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11年	至大四年	正月，武宗海山死。罢尚书省，复以行尚书省为行中书省。罢修中都城。三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是为仁宗。四月，罢行至大银钞、铜钱。六月，以蒙古语译《贞观政要》刊行。闰七月，吐番扰礼店、文州，命亦怜真等征讨。八月，以西番军务隶宣政院。九月，诏改明年为皇庆元年。
1312年	仁宗皇庆元年	二月，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九月，琼州黎族民众起义。是年，白朴卒。
1313年	皇庆二年	四月，封王焘为高丽国王。征东行中书省左丞相、上柱国。十一月，诏行科举。十二月，可里马丁进所编《万年历》。是年，王桢《农书》成。
1314年	延祐元年	正月，改元延祐。四月，立回回国子监。择译《资治通鉴》。十月，遣张驴等经理江南田粮。是年，《农桑衣食撮要》编成。
1315年	延祐二年	四月，赣州蔡五九等聚众起事，反对经理田粮。七月，铁木迭儿总宣政院事。八月，诏江浙行省印《农桑辑要》一万部。九月，蔡五九败死。
1316年	延祐三年	三月，郭守敬卒。十一月，武宗子和世㻋出镇云南，行至延安，与忽都鲁等发关中兵反抗，事败，奔金山。十二月，立皇子硕德八剌为太子。
1317年	延祐四年	六月，罢铁木迭儿中书右丞相职。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18年	延祐五年	十月，建帝师八思巴殿于大兴教寺。
1319年	延祐六年	闰八月，浚会通河。十月，浚通惠河。十二月，命皇太子硕德八剌参决国政。
1320年	延祐七年	正月，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死。三月，皇太子硕德八剌即帝位。是为英宗。罢徽政院。四月，罢回回国子监。六月，盩厔县僧圆明称帝，谋起事。八月，僧圆明被擒杀。十一月，命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是年，朱思本《舆地图》绘制成。
1321年	英宗至治元年	二月，修上都华严寺。三月，建帝师八思巴寺于京师。
1322年	至治二年	三月，于泉州、庆元、广东三路复置市舶提举司。闰五月，禁白莲佛事。六月，赵孟頫卒。八月，铁木迭儿死。十月，以拜住为右丞相。是年、迁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于琼州。
1323年	至治三年	二月，颁行《大元通制》。敕写金字《藏经》二部，以拜住等总其事。五月，追夺铁木迭儿官爵，籍没其家。八月，南坡之变。铁失等杀英宗和拜住。九月，晋王也孙铁木儿即帝位于龙居河，是为泰定帝。十月，诛也先铁木儿、完者等于行在所，又诛铁失等于大都。是年，马端临卒。
1324年	泰定帝泰定元年	三月，立皇子阿剌吉八为太子。八月，绘帝师八思巴像十一帧，颁各行省。是年，贯云石卒。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28 年	泰定五年 致和元年 天顺帝天顺元年 文宗天历元年	二月，改元致和。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八月，燕铁木儿等迎怀王图帖睦尔自中兴回大都。九月，倒刺沙等拥立皇太子阿刺吉八即帝位于上都，改元天顺。怀王图帖睦尔则即帝位于大都，是为文宗，改元天历。上都与大都两个政权并立。两都之战，上都兵败于白浮。十月，月鲁铁木儿和不花铁木儿以兵围上都，倒刺沙出降，天顺帝不知所终。十一月，文宗遣使漠北迎其兄周王和世㻋。上都诸王、将领倒刺沙等被诛。十二月，周王南还。
1329 年	天历二年	正月，周王和世㻋于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三月，云南诸王答失不花反。四月，明宗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八月，明宗与图帖睦尔会于旺忽察都，数日后明宗猝死。图帖睦尔复即帝位于上都。九月，修《经世大典》。
1330 年	天历三年 至顺元年	正月，命赵世延等纂修《经世大典》。云南诸王秃坚等反。二月，秃坚自称云南王，攻占仁德府，至马龙州。四月，以诸王云都思帖木儿与脱欢会兵征讨云南。五月，改元至顺。七月，分兵讨秃坚、伯忽等。闰七月，裁减内外佛寺。十二月，立燕王阿刺忒纳答刺为皇太子。是年，妥欢帖睦尔被放逐高丽，明宗皇后八不沙，为文宗后等所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31年	至顺二年	正月，元征云南兵首败伯忽兵于马龙州，继之，战于马金山，俘伯忽等。二月，立广教总管府，凡十六所。平定云南诸蛮。春，皇太子死。七月，海南黎族起义。九月，海南王周率黎族起义。
1332年	至顺三年	八月，文宗图帖睦尔死于上都。十月，明宗幼子懿璘质班即帝位，是为宁宗。十一月，宁宗死。文宗后遣使迎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于静江。
1333年	至顺四年 元统元年	六月，妥欢贴睦尔即帝位于上都，是为惠宗。后明加其号称顺帝。八月，立燕铁木儿女伯牙吾氏答纳失里为皇后。十月，改元元统。
1334年	元统二年	正月，遣使交趾，赐以《授时历》。二月，兴举学校。四月，汰减佛事布施。十二月，整治学校。是年，广西瑶族多次起义。
1335年	元统三年 （后）至元元年	六月，左丞相唐其势等谋废惠宗。七月，伯颜诛后党唐其势，塔剌海等，执皇后伯牙吾氏，鸩杀于开平民舍，罢其党羽。十一月，废科举。改元至元。
1337年	至元三年	正月，广州朱光卿等起事，号大金国，改元赤符。二月，陈州棒胡起事。七月，朱光卿等被执。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338 年	至元四年	三月，修《至正条格》。四月，棒胡被执，死于京师。六月，彭莹玉、周子旺起事，周子旺被执杀、彭莹玉奔淮西。十二月，立邦牙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并总管府。
1339 年	至元五年	是年，伯颜杀郯王彻彻秃。
1340 年	至元六年	二月，伯颜被贬。三月，伯颜在徙往南恩途中饮药而死。六月，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死于东安州。放太子燕帖古思于高丽，行至沈阳被害。十二月，复科举。
1343 年	至正三年	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七月，修大都城。九月，瑶族蒋丙自号顺天王，攻破连、桂二州。
1344 年	至正四年	正月，定守令黜陟法。三月，《辽史》成。七月，益都郭火你赤起事。十一月，《金史》成。
1345 年	至正五年	十月，《宋史》成。十一月，《至正条格》成。
1346 年	至正六年	四月，辽阳吾者野人及水达达因不堪捕海东青烦扰起事。颁《至正条格》。
1347 年	至正七年	三月，编《六条政类》。九月，八怜部内哈剌纳海、秃鲁和伯起义，断岭北驿道。
1348 年	至正八年	二月，贾鲁进治河二策。三月，《六条政类》成。十一月，方国珍起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49 年	至正九年	七月，命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学习汉人文书。是年，贾鲁建言漕运事。
1350 年	至正十年	十一月，更改钞法，铸至正通宝。十二月，修造大都城。方国珍攻掠温州。
1351 年	至正十一年	四月，以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征汴梁等十三路民工 15 万、军队 2 万，修治黄河。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以红巾为号，在颍州起义。六月，刘福通攻克罗山等地。七月，方国珍降元。八月，芝麻李等起义。徐寿辉、彭莹玉、邹普胜等以红巾为号，在蕲州起义。十月，徐寿辉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十一月，黄河堤修成。欧阳玄制河平碑。
1352 年	至正十二年	正月，孟海马起义。徐寿辉攻占汉阳、武昌等地。二月，郭子兴起义。马子昭起义。王权、张椿起义。三月，方国珍复入海反元。闰三月，朱元璋入郭子兴部。四月，涂佑、应必达等起义。邓忠起义。李太素起义。七月，徐寿辉部攻占杭州。八月，方国珍攻台州，为元军击退。九月，元军破徐州，芝麻李遁。赵君用等投奔郭子兴。是年，天完红巾军攻取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记
1353年	至正十三年	三月，方国珍复降元。五月，张士诚起兵反元。徐寿辉失饶、信等州。贾鲁卒。七月，徐寿辉失武昌、蕲州。朱元璋兵取滁阳。十月，方国珍复抗元。十一月，彭莹玉战死于瑞州。十二月，元军败徐寿辉于蕲水。冬，芝麻李余部彭早住自称鲁淮王，赵君用称永义王。
1354年	至正十四年	正月，张士诚据高邮，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五月，朱元璋克全椒，六月，张士诚攻扬州。彭早住、赵君用率军攻克盱眙。九月，脱脱率军征高邮。十一月，脱脱败张士诚于高邮。十二月，脱脱被削爵夺职。
1355年	至正十五年	正月，郭子兴取和州。徐寿辉将倪文俊占沔阳。二月，刘福通拥韩林儿称帝于亳州，国号宋，又号小明王，建元龙凤。三月，郭子兴死，长子天叙继为元帅。徐寿辉军破襄阳。五月，朱元璋应召归附韩林儿。倪文俊攻中兴。六月，朱元璋军取太平，元将纳哈出被俘。七月，倪文俊再下武昌、汉阳。八月，元于云南立平缅宣抚司。徐达克溧水、溧阳、芜湖。十二月，元军败刘福通于太康，进围亳州，韩林儿走安丰。脱脱被鸩杀于云南腾冲。张明鉴等起义，号青军，于扬州降元。刘福通杀杜遵道。自为小明王丞相。释纳哈出北归。是年，天完红巾军复起，连败元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56 年	至正十六年	正月，张士诚取常熟。徐寿辉移都汉阳。二月，张士德克平江等地。张士诚自称周王。三月，张士诚迁都隆平。刘福通进兵亳州，徐寿辉攻襄阳，取常德。方国珍复降元。朱元璋取集庆、镇江。四月，张士诚部将克湖州。五月，徐寿辉占沣州。六月，朱元璋克广德，遣杨宪通好于张士诚。七月，朱元璋称吴国公。徐达败张士诚于龙潭。十月，赵君用取淮安。十一月，刘福通遣军攻取河南、山东、河北诸地。十二月，徐寿辉克岳州。
1357 年	至正十七年	二月，毛贵率军克胶州。倪文俊取峡州。李武、崔德等占领商州等地。三月，徐达等取常州。毛贵克益都等地。四月，朱元璋部取宁国。五月，朱元璋军败张士诚，克泰兴。六月，朱元璋军取江阴。刘福能攻汴梁，分兵三路北伐。七月，朱元璋遣将取徽州。八月，张士诚降元。刘福通军攻克大名。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不果，陈友谅杀倪文俊。十月，朱元璋取扬州，青军元帅张明鉴败降。十二月，明玉珍克重庆。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58年	至正十八年	正月，朱元璋取婺源。陈友谅等克安庆。二月，毛贵攻取清、沧二州及济南路。三月，毛贵下蓟州等地，与元军战于柳林，败还济南。朱元璋取建德。四月，赵普胜取池州，拘执吴国公守将赵忠。陈友谅取龙兴、瑞州。五月，刘福通迎小明王至汴梁。陈友谅陷吉安、抚州。六月，关先生、破头潘等下辽州，克冀宁。八月，陈友谅克建昌。王信以滕州降毛贵。九月，关先生等破完州，攻大同、兴和等塞外诸郡。陈友谅克赣州。十月，朱元璋军取兰溪、克宜兴。十一月，陈友谅陷汀州。刘福通部将田丰取顺德。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攻陷上都。朱元璋克婺州。
1359年	至正十九年	正月，陈友谅取信州。方国珍归附朱元璋。关先生等陷辽阳。三月，陈友谅略衢州，克襄阳。四月，赵君用杀毛贵。徐达败赵普胜，复池州。六月，陈友德取信州。七月，续继祖杀赵君用。八月，元军破汴梁，刘福通奉韩林儿退据安丰。九月，朱元璋与徐寿辉两军战于潜山，徐达败赵普胜，破潜山城。陈友谅杀赵普胜，併其军。朱元璋陷衢州。十一月，朱元璋克宁越，下处州。关先生前锋军渡鸭绿江。十二月，入高丽红巾军毛居敬部攻占义州、西京等地。陈友谅于江州自称汉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记
1360年	至正二十年	正月，张士诚军破濠州等地。二月，陈友谅部将邓克明下延平等地。三月，刘福通部将田丰克保定。朱元璋于建康设礼贤馆。五月，陈友谅将罗忠显克辰州。闰五月，陈友谅破太平，杀徐寿辉，称帝，国号汉，改元大义。朱元璋置儒学提举司。胡大海取信州。陈友谅攻金陵，兵败还江州。康泰陷邵武。九月，刘福通克孟、赵二州，攻真定。十二月，刘福通取广平。是年，明玉珍自立为陇蜀王。元阳翟王拥兵犯京畿。
1361年	至正二十一年	二月，朱元璋始立盐法，置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五月，明玉珍破嘉定等路。七月，陈友谅复克安庆。朱元璋复取江州。八月，朱元璋破安庆，陈友谅败走武昌。元军攻取山东，红巾军将领田丰等战败降元。朱元璋遣使与元察罕帖木儿通好。九月，明玉珍攻取东川郡县。朱元璋克建昌、饶州。阳翟王阿鲁辉帖木儿被执杀。关先生、破头潘、沙刘二等率红巾军十余万渡鸭绿江攻朔州。十月，元军克济南，旋攻益都。十一月，关先生等取抚、安二州及高丽京城开京。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记
1362年	至正二十二年	正月，朱元璋攻取陈友谅所据龙兴诸路。关先生、沙刘二等战死于开京，破头潘败退辽阳。三月，明玉珍称帝，建都重庆，国号大夏，建元天统。四月，破头潘于辽阳被俘。元修上都宫阙。五月，明玉珍攻龙州、兴元、巩昌诸地。六月，元将察罕帖木儿被王士诚、田丰刺杀，其养子扩廓帖木儿袭职。九月，刘福通兵败于火星埠。十一月，扩廓帖木儿攻益都，城破，王士诚、田丰被杀。
1363年	至正二十三年	正月，明玉珍遣万胜率兵征云南。朱元璋致书扩廓帖木儿。二月，万胜攻占中庆。三月，吕珍破安丰，杀刘福通，朱元璋救出小明王，置于滁州。四月，陈友谅复围洪都。七月，朱元璋自将救洪都，败陈友谅。八月，陈友谅死于泾江口。其子理走武昌，立为帝，改元德寿。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朱元璋征陈理。十月，朱元璋围武昌。十二月，朱元璋还建康。令常遇春围武昌。
1364年	至正二十四年	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月，朱元璋下武昌，陈理出降。四月，孛罗帖木儿兵入居庸，至清河。五月，皇太子以扩廓帖木儿总兵攻大同，守居庸，入卫京师。七月，孛罗帖木儿复以兵入京师，皇太子统兵迎战于清河，兵败，奔太原。徐达等克庐州。九月，徐达、傅友德分取江陵、夷陵。十二月，徐达克辰州、衡州。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65年	至正二十五年	正月，徐达等克赣州，下宝庆，降韶州。二月，胡深取浦城。四月，胡深克松溪。六月，孛罗帖木儿征讨上都的太子党。七月，孛罗帖木儿被诛。九月，扩廓帖木儿扈从皇太子还大都。明玉珍与朱元璋通好。十月，徐达等攻取淮东泰州等地。闰十月，元封扩廓帖木儿为河南王。十一月，徐达败张士诚于宜兴。
1366年	至正二十六年	二月，明玉珍死。徐达攻取高邮、兴化、淮安。四月，明玉珍子明升即位，改元开熙。徐达取安丰。五月，朱元璋发《平周榜》。八月，徐达攻湖州。九月，朱文忠攻杭州。十一月，李伯升、潘原明降，湖、杭二州陷。十二月，小明王韩林儿溺死于瓜步，宋亡。
1367年	至正二十七年	正月，朱元璋改元，以是年称吴元年。五月，朱元璋致书张士诚。八月，以皇太子为中书令、枢密使、总兵马。朱亮祖征方国珍。九月，徐达克平江，张士诚被俘，旋于建康自缢死。十月，朱亮祖下温州。元罢扩廓帖木儿太傅、中书左丞相职。徐达等率军北取中原。十一月，汤和克庆元。方国珍败遁。徐达攻取山东诸地。十二月，方国珍归降朱元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68 年	至正二十八年 明洪武元年	正月，朱元璋称帝，国号明，建元洪武。汤和、廖永忠等克福州。陈友定被杀于应天。二月，徐达军下汴梁。五月，朱元璋至汴。闰七月，元复扩廓帖木儿职。顺帝妥欢贴睦尔离大都北逃，以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八月，徐达军入大都，帖木儿不花等被俘斩。顺帝至上都。自此，元朝的统治势力退出中原。十二月，明军取太原，占领山西。扩廓帖木儿退至甘肃、宁夏。
1369 年	洪武二年 至正二十九年	正月，明军取大同。四月，明军进兵陕甘。六月，明军攻克上都，顺帝北逃应昌。改大都为北平府。
1370 年	洪武三年 至正三十年	三月，扩廓帖木儿兵败沈儿峪，北遁和林。四月，顺帝病死应昌。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继位，称必力克图汗，改元宣光，史称北元。

明

明朝建立

元朝末年，顺帝妥欢帖睦尔统治时期，政治腐败，天灾频仍，社会矛盾进一步恶化，由此而引发了农民及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其中以红巾军的斗争最为重要。农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元朝的统治。在以红巾军为主体的元末农民战争中，最终推翻元朝统治，并取而代之的是朱元璋。

朱元璋（1328—1398），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太平乡孤庄村人，出身于贫苦农家。元至正四年（1344）春，淮水上游瘟疫蔓延，其父母、长兄及幼弟相继染病身亡。17岁时，朱元璋为生计所迫，入皇觉寺为僧。但此时寺庙中也已乏食，众僧无粮度日，朱元璋只好云游于江淮地区，沿路乞讨3年之久，其后又返回皇觉寺，这时，农民义军正声势浩大，定远（今属安徽）人郭子兴占据濠州（治今安徽凤阳），令元将彻里石花不敢贸然进兵。元至正十二年（1352）闰三月，朱元璋毅然出寺投奔郭子兴，被收为亲兵。之后，凡有攻伐战事，皆令朱元璋出战。朱元璋每战必胜，战功卓著，深得郭子兴的赏识，而将自己的养女嫁给他。九月，元丞相脱脱攻陷徐州

（今属江苏）。义军首领赵均用，彭早住等率残部逃至濠州。郭子兴一味谦让屈己，反为赵均用等人所制，彭早住，赵均用占据濠州后，遂自称王。朱元璋对此十分不满，认为大志难图，遂于至正十三年，返回乡里招募兵士，得同乡徐达、汤和等700余人。

至正十四年（1354）七月，朱元璋率所部活动于定远、滁阳（今安徽合肥东北）一带。不久，因彭早住、赵均用等人将朱元璋所隶700余兵改属他将，朱元璋因此脱离郭子兴，仅与徐达、汤和等24人南略定远。其后，朱元璋等以设计、招降、用兵等方法，得壮士二万三千余众。定远人冯国用与其弟冯国胜率众投附朱元璋，且献计以为据金陵（今江苏南京）"定鼎"，而后命将四出，即可夺得天下。朱元璋十分赞赏，令兄弟二人参预机密决断，又以李善长为掌书记，负责筹措粮饷。

未几，彭早住、赵均用挟郭子兴前往泗州，既而彭早住中流矢身亡，赵均用更自专无忌，欲治郭子兴于死地。朱元璋闻讯，忙贿赂赵之心腹，郭子兴方脱险，率所部返回滁州，自称滁阳王。朱元璋亦率部属数万人，归属郭子兴帐下，听其号令。此时，朱元璋名声日著，郭子兴二子不满，欲以毒酒害之。谋泄，不得逞。不久，虹县（今安徽泗县）人胡大海、邓愈，怀远（今属安徽）人常遇春前来投奔，朱元璋分别用为前锋、先锋等。朱元璋用兵，军纪严明，"搜军中所掠妇女纵还家，民大悦"①。

至正十五年（1355）三月，郭子兴卒，朱元璋统领其军。其时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拥立韩山童子韩林儿，建国号宋，改元龙凤，且传檄朱元璋，委任其为右副元帅。朱元璋认为："大丈夫安能受制于人耶？"②只是考虑到韩林儿势力强盛，可作

依靠，故仍用其年号，以令己军。

六月，朱元璋率所部渡江，攻下太平（治今安徽当涂）。十六年（1356）二月，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东北）大败元将、中丞蛮子海牙所部，朱元璋得以在江南立足。在老儒陶安的建议下，朱元璋领兵攻陷集庆（今江苏南京），并以此为中心，向外开拓，相继攻下镇江（今属江苏）、宁国（今安徽宣城）、江阴（今属江苏）、徽州（治今安徽歙县）、池州（治今安徽贵池）、扬州（今属江苏），逐渐开辟了以集庆为中心的根据地。韩林儿的宋政权因此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

朱元璋据有集庆及周围州县之后，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他一面分遣儒士赴所辖州县，劝课农桑；一面以康茂才为营田使，职掌垦田稼穑、水利修复诸事，以此保证军粮储备充盈。与此同时，他注意招揽人才，复兴学校，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等人相继入金陵，拜见朱元璋，被欣然接纳，且创置礼贤馆安置这些儒士名流。他采纳皖南儒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③的建议，认真备战，从而使其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加强。

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朱元璋谋取浙东行省未克之地。出兵前，朱元璋告诫诸将：“克城以武，勘乱以仁。吾此入集庆，秋毫无犯，故一举而定。每闻诸将得一城不妄杀，辄喜不自胜。夫师行如火，不戢将燎原。为将能以不杀为武，岂惟国家之利，子孙实受其福。”④严明的军纪，不仅使朱元璋的军队具有极强的战斗力，更以其秋毫无犯，深得百姓的拥护与欢迎。因而朱元璋军队所向披靡，“兵至皆下”⑤。其势力很快扩展到苏、浙、皖、赣。与篡夺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自立为“大汉”皇帝的陈友谅占据的地盘为邻。其时，陈

友谅占有江西、湖广之地，一度攻陷太平州，且与张士诚合谋，进攻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企图消灭朱元璋势力。

面对陈友谅的进攻，应天府为之大震。朱元璋部将或建议先收复太平，以牵制陈友谅对应天府的进攻；或请求领兵迎击，均遭到朱元璋的拒绝。他根据陈友谅篡权后，“其将士皆离心，且政令不一”⑥的局势，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设伏以待的战术，派胡大海直捣信州（治今江西上饶），以牵扯其后方。令康茂才致书陈友谅，约其速来金陵。同时令常遇春设伏于石灰山，徐达布阵于南门外，杨璟屯驻于大胜港，张德胜等率水军出龙江关，他自己则于卢龙山督军。

不久，陈友谅果然统领大军进击应天府。朱元璋部将纷纷请求迎战，被朱元璋制止，他告众将士，待降雨后再出击。须臾，果然大雨倾注，将士们奋力厮杀，水陆夹击。陈友谅大败逃回江州（治今江西九江）。朱元璋所部乘胜收复太平，进而攻占安庆（今属安徽）、信州。陈友谅的篡权已大失人心，及其战败，原徐寿辉旧部将领乘机纷纷叛离，投奔朱元璋。

至正二十一年（1361）八月，朱元璋于江州大败陈友谅军，陈友谅沿江逃至武昌（今属湖北）。朱元璋军占据抚州（治今江西抚州西）。二十二年（1362）正月，陈友谅部属、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献龙兴府（今江西南昌）投降。朱元璋接管此城，更名为洪都府，返回应天府时，留下邓愈领兵戍守。然而不久，降将反叛，洪都失陷，邓愈败逃应天府。四月，徐达领兵收复洪都，派朱文正、赵德胜、邓愈率兵镇守。朱元璋在江南的势力日趋壮大，令元朝政府坐卧不安。十二月，元帝遣尚书张昶经海上至庆元，授朱元璋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企图以此收买、招抚，但遭到朱元璋的断然拒绝。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遣其将吕珍攻安丰（今安徽寿县），杀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朱元璋统兵救援，击退吕珍，救出韩林儿，安置于滁州（今属安徽）。趁朱元璋北上救援之机，陈友谅赶制楼船数百艘，领兵号称60万，包围洪都府。一时间，吉安（今属江西）、无为（今属安徽）等州县相继陷落。洪都守将朱文正等率领兵士坚守城池长达85天，使朱元璋得以集结兵力，赶赴救援。陈友谅得知朱元璋亲自领兵，只得放弃围攻洪都，退至鄱阳湖迎战。双方出动水军，激烈交战，朱元璋募敢死之士，火攻陈友谅。

陈友谅中流矢身亡，其部将张定边护卫其子陈理逃奔武昌。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朱元璋称吴王，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俞通海为平章政事，立其子朱标为世子。二月，亲统大军征伐武昌，陈理投降，汉亡。随后，诸将分路征讨，平定割据南方的诸势力和红巾军。至二十五年，唯有张士诚一支势力最强的割据武装尚未剿灭。时张士诚据有南至绍兴（今属浙江），北达济宁的大片地域。朱元璋令徐达、常遇春先筹划攻取淮东。随后于高邮大战张士诚军。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为消灭张士诚制造舆论。张士诚高邮战役后，南下占据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并以此为都，据有富庶的长江三角州地区。朱元璋令将士先攻取张士诚外围据点，以孤立之，随即双方对峙于镇江。张士诚屡战屡败，投降元朝，封为太尉。此后，张士诚与另一支割据势力方国珍勾结，与红巾军为敌，八月，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20万大军征讨张士

诚。十一月，包围平江府。

在进攻和平定窃据江南的地方割据势力的同时，朱元璋亦加快政权的建设。自至正二十六年起，改筑应天城，修建新宫。设文武科取士，制定律令、礼仪、《大统历》等。吴政权已初具规模。

至元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所部攻克平江府，擒张士诚。随后，大军分兵两路进攻割据浙江台、温地区的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兵败投降。逾年，元福建行省平章、占据闽中八郡的陈友定势力亦遭覆灭，福建遂得以平定。江南地区大部为朱元璋势力所据。

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号大明，建元洪武。朱元璋即为明太祖。此时，元朝尚据有北方半壁江山，而两广、四川、云、贵及福建等地尚有割据势力。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大业。

朱元璋将重点放在北伐上，同时分兵平定南方诸割据势力。由徐达、常遇春率领的北伐军自正月出征，由淮水入黄河，仅用 3 个月的时间，平定河南、山东，进逼大都（今北京）。元顺帝仓惶逃奔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八月，北伐军攻占元大都。之后为扫除元朝残余势力，北伐军继续兵进上都，元顺帝北遁，于洪武三年（1371）四月病逝，残部北退至和林（今属蒙古）。自洪武元年至十四年，大明军先后平定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经过前后 20 年的南征北伐，明朝终于平定各地的割据势力，消灭了元朝政权，基本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注　释

①②③《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④《明史》卷一三六《朱升传》。

⑤《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⑥《明太祖实录》卷九。

明

明朝统治的强化

明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府（今江苏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太祖。明朝建立之初，官僚机构设置基本沿袭元朝，于中央设中书省，由左右丞相（初称相国）总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事务。地方则设行中书省，总理地方军政事务。另于中央设御史台，为监察机构。

朱元璋在认真总结元朝灭亡原因时，认为"委任权臣，上下蒙蔽"①是导致元朝统治衰败的重要根源。为此，他着手对所承袭元朝的现行官制进行重大的改革。

洪武九年（1376），强化明朝统治的改革首先从削弱地方权力开始。朱元璋下令撤销行中书省，罢免平章政事及左右丞，而将全国分为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以及南京直隶区，共计13个行政区划，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置云南布政使司（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原北平布政使司治所〕后，遂改北平布政使司为北京直隶区，寻复增置贵州布政使司，于是便为两直隶区、十三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于布

政司分置承宣布政使，职掌地方民、财两政；提刑按察使，职掌地方司法刑狱；都指挥使，职掌地方军事防务。三职互不统属，各自直属朝廷有关机构。三职合称“三司”，将原来无事不统的行省权限，分为军、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以此避免地方官长的事权专擅，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和集权。

布政使司区划之下，简化为府（或直隶州）、县（或属州）两级，分设知府、知州、知县为长官，均由朝廷任免。县以下划分为里甲，凡110户编为一里，设里长主管钱粮之事，里甲主管差役派征之事，里书主管税粮等事。里下设甲，一甲10户，轮流充任甲长。城镇都市中则分坊、厢，有坊长、厢长。里、甲、坊、厢长皆由官府指任或佥派。明朝由此形成了由中央到地方十分严密的统治网，有效地将臣民百姓控制在网中。

废置行中书省后，地方军、政、财及监察司法诸权悉收归朝廷，皆集中于中书省，于是作为总领中书省的丞相之权益发膨大，这与朱元璋的本意相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随之突出，且日趋尖锐。朱元璋认为丞相的设置弊端尤甚，“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②。出于这种考虑，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谋逆”之罪，将专肆威福，招权纳贿，生杀黜陟，不奏径行的左丞相胡惟庸处死。旋即下令罢废中书省，罢丞相一职不设，而将中书省及丞相之权分属于六部，而令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由此形成朝廷内外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人的统治格局，自秦朝以来千余年的宰相制度，自隋唐以来沿袭700余年的三省制度，终于结束于朱元璋之手。朱元璋还把废除丞相作为“祖训”，告诫子孙后代：“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③。宰相制

度的废止，标志着中央专制集权统治的高度强化。

丞相罢置之后，朱元璋又对监察机构——御史台进行改革。洪武十五年（1382），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④。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以及十三道（一布政使司为一道）监察御史，分掌十三道，监察、检举各级官吏的不法行为。朱元璋赋予都察院极大的权力，“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陟黜”⑤。尤其是监察御史，虽只是正七品官，却“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⑥，权力极大。朱元璋此举旨在以小制大，以内制乱。此外还专设六科给事中，以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成为专事六部的监察机构。理刑审狱时，都察院须和大理寺、刑部共同进行，合称“三法司”，避免“专于一司”的弊端。

军队建置。朱元璋于洪武初置大都督府，由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洪武十三年，又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然只掌兵籍、军政，不能直接统领军队。选授军官之权则由兵部掌管，而调遣、发兵指挥权则握于皇帝手中。军队的编制为卫所，“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⑦。大体每卫5600人，置指挥使统领。每卫下辖5个千户所，每千户所1120人，置千户为指挥官。每千户下辖10个百户所，每百户所112人，长官为百户。其下设二总旗，每总旗下辖5小旗，每小旗10人。府县各卫归各布政使司的都指挥使司管辖，其上归统于五军都督府。军士另立“军户”之籍，且世袭，不得随意脱籍。每逢征战，由皇帝下旨，兵部佥发调兵之令，都督

府长官则奉命统卫所兵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兵士返归卫所。军制上的改革，极大地加强了皇帝对军队的控制。

朱元璋分置行政、监察、军事机构，使之各自相对独立，不相统摄，却互为制约，其目的正在于“我朝罢丞相，置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⑧。由此将朝廷内外大权独操于皇帝一人手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因此得以空前强化。

与此同时，朱元璋还在其他方面采取了诸多的加强专制统治的措施。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行《大明律》。《大明律》前后经历20多年，其间朱元璋曾亲自裁酌，有过三次大的修订。律文计30卷，460条，分为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内含五刑、十恶、八议各款。《大明律》简赅，然严酷无比，充分维护了君主集权的利益和需要。在此之前的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曾亲自编撰并颁行《大诰》，之后又颁行《续篇》和《三篇》。洪武三十年，从中择重选出有关条例，附为《大明律》例。其中汇集有惩治官民贪赃受贿、侵吞税粮、偷逃赋役、流亡逃匿等案例和凌迟、枭示、族诛等重刑。这些法典的颁行，体现了朱元璋“治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术。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视为戒”⑨，甚至规定《大明律》和《大诰》要做为学校的必修课程，师生必须背诵。这从法律上确定了君主的绝对权威。

为了稽查臣僚及百姓中的违法行为，特别是威胁自己皇权地位的言谈举止，朱元璋更采取公开的恐怖措施。他于即位前后，曾派遣心腹或检校、佥事等下级官吏，侦察、打探臣僚暗

地的言行，及时上报。洪武十五年（1382），改而设立锦衣卫，置锦衣卫指挥使，下属南、北两个镇抚司，除负责侍卫、缉拿盗贼奸宄外，还“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太祖知之”⑪。锦衣卫镇抚司设有法庭和监狱，可随意捕人、审讯，所用酷刑，如刷洗、抽肠、剥皮、锡蛇游等，多达数十种。锦衣卫的设置，有效地起到了君主对臣僚、百姓的控制。

与设置特务机构一样，廷杖亦是朱元璋威慑公卿，维护皇权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滥用无度。凡朝臣有过失，或进谏触怒皇帝，即于殿上杖责大臣。据《明史·刑法志》所载，朱元璋之侄、大都督朱文正、工部尚书薛祥等人皆被廷杖致死。不仅如此，为巩固自己的皇权地位，朱元璋以各种罪名加害于开国功臣，胡惟庸、蓝玉两狱，受株者多达5万余人。翦除这些与自己同生死的功臣，“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⑪，但却为朱元璋的独裁彻底扫除了障碍。

朱元璋即位之初，十分重视兴办学校，自中央至地方分置国子学、州县学、民间社学3类。洪武十五年，改国子学为国子监，置祭酒、司业、博士、助教、学正等学官。监生分官生与民生两种。每年由州县学按规定名额保送入国子监，主要学习《大明律》、《大诰》、四书、五经等。结业后可直接为官。与此同时，朱元璋大兴尊孔，以此作为约束臣民思想言行的手段。

不仅如此，朱元璋大兴文字狱，望字生义，曲解文意，而后罗织罪名，加害于人。如浙江府学训导赵伯宁为海门卫撰《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被认为“则”近“贼”之音而遭诛杀。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

知”，亦因“生”“僧”谐音而被杀。凡此种种，知识分子稍有不慎，即于文字上惨遭横祸。

朱元璋在兴办学校的同时，也重视科举制。洪武四年(1371)，始设科取士。考试分3级：未入学的童生先参加州县级考试，合格者入州县学，称为生员；省级考试为“乡试”，每3年一试，中试者称“举人”；中央一级的考试为“会试”，于乡试的次年进行，中试者再参加“殿试”，及第者即为“进士”。进士分3等：一甲赐进士及第，取3人，分别称为状元、榜眼、探花；二甲赐进士出身，人数不等；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人数亦不等。所有进士皆可任官。“卿相皆由此出”⑫。然而科举又以“八股取士”，即规定考试专以四书、五经的文句命题，解题则以朱熹的注为依据，不允许擅自发挥。到明中叶以后，这种答题的格式便严格规定为排偶分股的文体，即“八股文”。“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⑬。自明初开始推行的科举取士之法，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头脑。

朱元璋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从他即位之始，逐步加强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统治，最终达到高度集中的皇权统治。

注　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②黄佐《南雍志》卷一〇《谟训考》。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一》。

④⑤⑥《明史》卷七三《职官志二》。

⑦《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⑧《明律汇编全集》卷一。

⑨《大诰·颁行大诰第四十七》。

⑩刘辰《国初事迹》。

⑪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⑫《明史》卷六九《选举志一》。

⑬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

明

刘基辅政

刘基，浙江青田县人。明代开国元勋，朝廷重臣。他也是江南的豪俊名贤，有满腹韬略可寄以兴邦治国大业的奇才。与宋濂、章溢、叶琛等合称江南四大名儒。“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今江西高安县）丞，有廉直声，行省辟之，谢去”①。刘基自幼聪颖过人，博通经史，广览群书，精于象纬之学。西蜀赵天泽论江左人物，首提刘基，认为他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当初，太祖占据金华，平定括苍，听说刘基与宋濂并名，曾重金招聘，而刘基未应。太祖部下的总制官孙炎，一再致书，执着邀请，刘基始出。刘基见朱元璋后条陈时务十八策，甚合太祖心意，筑集贤院款待刘基等，优礼，宠爱至厚。这时韩林儿建立政权，国号为宋。朱元璋拜韩林儿为宋王，奉行其正朔，又行君臣之礼。朝中文武在中书省设置宋王御座，行君臣四拜之礼，对宋王及其御座礼拜甚恭，独刘基不拜，认为韩林儿不过是个牧羊倌，尊奉他没有用！于是进见太祖，述说完成统一大业之策。刘基认为，张士诚自守长江下游，无长远之计，不足为虑；陈友谅奉徐寿辉为主，又把他谋害，还逼

迫徐寿辉部下归顺他。刘基认为陈友谅建立汉国，名号不正。陈友谅地处大江上游，没有一天不觊觎朱元璋，从不放弃其吞并的野心，应当首先消灭之，一旦陈友谅被消灭，张士诚就势单力孤，可以乘胜一举平定长江下游，然后北向中原，统一大业就能顺利完成。这可以说是刘基第一次辅助朱元璋作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战略决策，它与三国时期诸葛亮在隆中跟刘备纵谈天下大势，确定蜀汉联吴破曹，发展实力，逐步统一天下的战略决策，具有同等重大的意义。

陈友谅攻陷太平（今安徽当涂县），意欲东向，气势甚为嚣张，朱元璋帐下各位大将，有的劝朱元璋投降，有的认为必须先逃避其锋芒，再据守南京（当时称南京为钟山）。这又是个关键时刻，太祖意未决，刘基也沉默不言。太祖知其自有见地，召入内室与之决策，刘基抓住关键时刻，表白己见，他以为凡言降或议逃者，应尽诛之，以免扰乱军心。刘基说，陈友谅骄气横溢，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我们应利用其骄傲自满，听不进不同意见的时机，诱敌入伏，一举重创之，灭其锐气，这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事。刘基说："天道（指兵法规律）后举者胜，吾以逸待劳，何患不克，莫若倾府库，开至诚，以固士心，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在此举也。"②正是在吴国初创，百事待兴，又突临强敌，内部看法不一的危难紧急关头，刘基寥寥数语，点破形势，定议决策，团结人心，去为完成王业而进取，这是刘基第二次辅助朱元璋制定平汉的战略决策。

在与陈友谅交战中，太祖用了刘基之谋，以逸待劳，连战连捷。先是陈友谅遣赵普胜攻太平，程允、汪炳大败赵普胜。获粮万余石。赵普胜又攻打青阳（今安徽青阳县）、石埭（今

安徽石埭县）等县，太祖大将张德胜与普胜战于栅江口，大胜赵普胜军。不久，徐达、俞通海、赵德胜等击赵普胜于栅江营，大胜，敌弃舟逃窜。获汉军巨舰艨艟无算，很快占据池州（今安徽铜陵市）。太祖大喜，升徐达为同知枢密事，其他诸将亦各有升赏。元至正十九年（1359）秋八月，遣徐达攻安庆，自无为（今安徽无为县）登陆，夜至浮山砦，击败赵普胜部将胡总管兵，追至潜山界，陈友谅急遣参政郭泰领兵追至沙河迎战，徐达再次大破汉军，斩杀郭泰，获辎重无算，军威大振，并乘胜攻占潜山（今安徽潜山县）。

太祖兴兵平汉之所以初战连连告捷，正是因为采取了刘基"伏兵伺隙击之，取威制胜，以成王业"的战略决策所致。

太祖要重赏刘基，刘基以为王业初创，力辞不受。陈友谅不意连败，大怒，兴师攻安庆。太祖想亲征，问刘基以为如何，刘基力赞之。于是太祖将兵攻安庆，自旦及暮未能克捷，大将俞廷玉阵亡，诸将大患，士气稍挫。在此关键时刻，刘基请太祖悉主力直趋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捣陈友谅巢穴。时汉军精兵锐卒集于安庆，江州空虚，吴军悉西上直趋江州，出其不意，只得仓皇帅妻子逃奔武昌（今湖北武昌）。陈友谅大将、龙兴守将胡美，密遣其子与太祖商洽，如胡美投降，不要解散或整编他的部曲。太祖有难色，刘基从身后踹太祖所坐胡床，太祖顿悟，一口答应。胡美如约帅部来降，江西诸郡皆下，为朱元璋平汉打下坚实可靠之基础。

是时刘基丧母，军事紧急，基未敢言，江西诸郡平定后，请求还乡葬母。适值苗军反叛，以至金华、处州守将胡大海、耿再成等被杀，浙东军心摇荡，刘基于此急迫之时，赶到衢州（今浙江衢县地区）与守将夏毅共商安抚各属邑，又与平章邵

荣等共谋收复处州（今浙江丽水县地区），一场动乱始定。方国珍一贯敬服刘基，刘基服丧期间，致书吊唁，刘基在复书中力宣太祖威德，方国珍主动入贡太祖。刘基服丧期间，朱元璋亦几次投书叩问军机，刘基亦多次复书条陈，所言皆中机宜。不久，刘基回京，太祖正在增援安丰，刘基谏止说："汉（陈友谅）、吴（张士诚）伺隙，未可动也。"③太祖不听。陈友谅听说太祖增援安丰，乘机率师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太祖对刘基说："不听君言，几失计。"④于是亲自统兵救援洪都，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主力各不相让，一日激战几十次，太祖坐胡床督战，刘基守候在太祖身旁，突然刘基跃起呼唤太祖急速换船，太祖匆忙转徙到别的战船上，尚未坐定，巨炮击中原来太祖所坐胡床，太祖所乘指挥船立即被炸得粉碎。陈友谅在楼船高处，见此情景大喜。不料太祖仍挥舟急进，汉军上下俱惊，士气丧尽。当时太祖与陈友谅决战鄱阳湖，相持三日，未决胜负。这又是一个紧急存亡关头。刘基为太祖计，欲取主动，必急速移军湖口，誓死扼守，并于鄱阳湖出口处埋设巨木尖钉，使汉军舰艇无一能通过。决战之日，太祖军以逸待劳，陈友谅军瓦解崩溃，陈友谅本人亦于败逃中毙命。不久太祖大军临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至此太祖消除完成统一大业中的一大心腹之患。此后朱元璋又东攻张士诚，北向中原，推翻元廷，完成王业，他的战略步骤都不超出刘基初见太祖时所言之范畴。

江南略定后，朱元璋建立吴政权，命刘基为太史令。刘基上大统历，定正朔，接着又劝太祖下罪己诏，平反滞狱，这些措施对稳定政权都起到了良好作用。于是又奏请立法定制，以止滥杀。太祖想重刑一些囚犯，刘基问他是什么理由？太祖谈

了些莫须有的原因，刘基估计不久吴国又将得士得众，让太祖且稍待，三日以后，海宁投降，吴国扩土得众，太祖大喜。太祖把即将处以重刑的囚徒都交付刘基处理，刘基把囚徒全部释放。在江南统一、粮足兵精的情势下，朱元璋于戊申年，即元至正二十七年（1368）即皇帝位，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国号大明。中国封建史上又一个汉族地主阶级政权——明王朝正式建立。拜刘基为御史中丞兼太史令，于是刘基成了大明王朝的重臣。明朝建立，刘基便奏请太祖立军卫法即卫所兵制。同时又以处州为试点，初步确定税粮标准，在江南富庶之地，参考宋制亩加五合。太祖特敕，刘基家乡浙江省青田县税粮每亩免加五合，所谓“令伯温乡里，世世为美谈也”。可见太祖笃信重用刘基，也可以说，刘基因功高德懿，泽及乡里，名垂青史。

太祖出巡汴梁，刘基与左丞相李善长留守南京，刘基认为宋元由于法纪松弛，刑人宽纵而失去天下，现今于建国之初应当整肃纪纲，让御史察民情，大胆弹劾官吏，不要有顾虑，哪怕是宿卫宦侍内外廷重臣，犯法有罪者，都要即时举报。甚至连太子有罪也要绳之以法。人们都畏惧刘基执法严肃。适有中书省都事李彬，犯贪纵之罪被监禁，左丞相李善长平素与李彬十分亲密，请求减缓刑狱，刘基不听，驰奏报可，李彬正在行祈雨仪式，立即被拉出斩首。因此刘基为严格执法竟与李善长相忤而构怨。从此也不难看出其为人之一斑。太祖回京抱怨刘基不该在祈雨之时杀人于祭祀坛下，这是对鬼神大不敬的表现，平时怨恨刘基的人乘机交相攻击告讦，恰逢当时天旱无雨，刘基建议，认真处理一下死亡士卒的家属、伤亡工匠及吴降将吏卒的善后事宜。太祖从其言。朱元璋营建中都（今安徽

凤阳)，并锐意扫灭扩廓帖木耳，刘基进谏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之地。王保保（扩廓）未可轻也。"⑤太祖不听。不久，定西（今甘肃定西县）失利，扩廓北窜大漠，一直成为北部边患。这件事再次证实刘基对问题分析判断的准确。当年冬天，太祖论刘基功劳，追封其先祖文官职，又大加赏赐刘基，几次想晋刘基官爵，都被刘基坚决推辞掉。

先时太祖因事而谴责李善长，刘基进谏说，李善长是朝廷勋旧，能团结联络诸将，不宜苛责。太祖说，这个人几次想加害于你，你为何还要容忍他呢？我准备立你为宰相。刘基叩头推辞说，宰相是国之栋梁，这就像给房子抽换梁柱，一定要用大木支撑，如果用一些小木条去替换它，整座宫室就要马上倾覆坍塌，决不可疏忽大意，视如儿戏。他与善长有隙，但在对待朝廷大事上仍可做到不记前嫌，力保朝廷重臣，赤诚公心可见一斑。

及李善长终因"谋逆"之嫌被罢相后，在辅助太祖选相问题上，刘基又具体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最初太祖想任杨宪为相，刘基的看法是，因为杨宪与刘基为至交好友，彼此了解较多，所以他对朱元璋进言道："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已。无与者也，宪则不然。"⑥认为杨宪没有宰相器量。太祖又问到汪广洋为相何如？刘基说："此褊浅殆甚于宪。"⑦又问胡惟庸何如人？刘基说："譬之驾，惧其偾辕也。"⑧他打个比方说，驾车最怕惊辕，如用胡惟庸驾辕为相，大有翻车之险。最后太祖认为，做宰辅重臣，莫过于刘基其人了。不料刘基对自己的为人也作出了估价，他说："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⑨刘基认为天下之大，不怕没有人才，劝太祖一定要严格细致地挑选和考察

真正的人才，再授之宰辅重臣之位。在刘基看来太祖提到的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几个人，都不够条件。这种知人自知，公允论事的赤诚公心，实为难能可贵。果然后来杨宪，汪广洋做了宰相都失败了。胡惟庸好擅权，终不被太祖所容，酿成大狱，这也可以算是刘基辅佐太祖治国任贤的最后一件大事。

洪武三年授刘基弘文馆学士，又授刘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禄二百四十石。洪武四年赐归老于乡。退休后，太祖亦尝问事，刘基条陈甚悉，大略言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⑩。刘基辅佐太祖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刚嫉恶，多有触犯邪恶人物，退役归里，惟饮酒弈棋，终不复见韬迹。刘基因对胡惟庸多有得罪，归老于乡后，胡惟庸亦曾进谗言加害，太祖虽不降罪于刘基，然而亦颇为胡惟庸谗谄所动，以至削夺其俸禄。刘基入京谢罪，不复敢离京师，不久，胡惟庸为相，刘基愤懑疾发，被护送归里养疴。至家中，将天文书交复长子刘琏，令其速上缴国家图籍库，不许后人传习使用。又对次子刘璟说：“夫为政宽猛如循环，当今之务，在修德省刑。……诸形胜要害之地，宜与京师声势联络。”⑪又上遗表一封，但又怕胡惟庸中阻，令其子见胡惟庸败后，太祖一定思念刘基，可上密奏示意。居一月，病卒，年六十五岁。刘基在京居住发病时，胡惟庸曾派太医诊治，且服汤药，服后腹中如滞拳石，遂不起。后来中丞涂节，首先向胡惟庸发难，告其谋逆，同时揭露服药之事，说胡惟庸使刘基服药后致死。据《明史》本传所载：“基虬髯，貌修伟。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帝察其至诚，任以心膂。每召基辄屏人密语，时基亦自谓不世遇，知无不言。遇急难，勇气奋发，计画立定，人莫能测。暇则敷陈王

道，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也。'又曰：'数以孔子之言导予'。"⑫这段概括之语，描述了刘基的为人及与太祖间的君臣关系。这是比较合乎事实的记录。至于后世之人传说，刘基神乎其神，对其韬光智略，歪曲为阴阳风水之说，则荒谬不足据。刘基是江南四大名儒之一，为文气势磅礴，妙不可言，与宋濂同为一代宗师。著有《覆瓿集》、《犁眉公集传》等。

注 释

①《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汉》。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

明

禁冗文浮言

朱元璋出身贫苦农民，幼年“家贫亲老，无资求师以问业”①。《皇朝本纪》谓其游方“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可能其启蒙识字即在此期间。从军以后，有了权力、地位，由于事业的需要，大量吸收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在众多儒生的影响下，努力学习文化，经常谈古论今，因而知识大长，学问益进。从渡江到称帝，他和幕府中的儒生，如陶安、范常、夏煜、孙炎、杨宪、叶仪、戴良、刘基、宋濂等人，朝夕讨论，讲述经史，经过十几年封建文化的学习，中年以后，朱元璋不但了解一些儒家的经义，能写作通俗的文字，并且还能吟诗、作赋，评论文学作品的短长。初下徽州时，朱升请他题字，朱元璋亲写“梅花初月楼”匾额②。和陶安论学术，亲制“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门帖子送给他③。鄱阳湖之战打败了陈友谅，高兴之余，和夏煜等草檄赋诗④。宋濂不会饮酒，在朱元璋面前，勉强饮了几杯，不觉酩酊大醉，朱元璋送以白马，作《白马歌》⑤。

做了皇帝以后，更加喜欢文墨，毛骐、陶安死，朱元璋为

其亲撰祭文⑥。桂彦良出作晋王傅，特撰文送行⑦。张九韶告老还乡，又作文送行⑧。朱元璋为文质实，主张文章应该写得明白清楚，通道术，达时务，也就是要适应政治上的需要。他曾著文辩论韩愈讼风伯之失审，谓："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⑨即根据事实，不可随心所欲。

早在吴元年（1367）正月，朱元璋尚未称帝时，就曾对中书省官员说："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也。"⑩洪武二年（1369）三月，他对翰林儒臣说："古人为文章，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如《典》、《谟》（均《尚书》中之篇名）之言，皆明白易知，无深怪险僻之语。至如诸葛亮《出师表》，亦何尝雕刻为文，而诚意溢出，至今使人诵之，自然忠义感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达当世之务，立词虽艰深，而意实浅近。即使过于（司马）相如、扬雄，何裨实用？"故令："自今翰林为文，但取通道理，明世务者，无事浮藻。"⑪这是他关于整顿文风的第一次明令。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朱元璋审定翰林所撰武臣诰文有"佐朕武功，遂宁天下"之句，即提笔改为"辅朕戎行，克奋忠勇"。并召词臣指示："此言大过……自今措词，务在平实，毋事夸张。"⑫再次强调其关于文风的主张。

唐、宋以来的政府文字，无论从上而下的制诰，从下而上的表奏，照例使用骈俪四六文体，华而不实。唐代韩愈提倡的古文运动，虽然在民间起了作用，但是以后的政府公文依然是因循旧章。对于同时代使用两种文体，朱元璋很不以为然。洪

武六年（1373）九月，朱元璋从制度上采取措施，颁布《文书式》，“诏禁四六文词”。在此之前，他令翰林院儒臣选唐、宋名家所著“表”、“笺”中之可为法式者，作为标本。诸臣遵照选出唐柳宗元《代柳公绰谢上表》、韩愈《贺雨表》进上，朱元璋认为符合其宗旨，即“命中书省录二表，颁为天下式”，规定以后各衙门进表，皆仿此。并谕各部官员：“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章、表之类，仍蹈旧习。朕常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省）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⑬不但发布禁令，而且颁布样板，以供仿效，较前之仅为禁令者更进了一步。

洪武九年（1376）闰九月发生“五星紊度，日月相刑”的特殊天象，时称“星变”，封建时代人们认为这是上天示警。励精图治的朱元璋，对此非常重视，特“诏告臣民，许言朕过”⑭。为时一月，即有中、外臣民十五人应诏上书言事。继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书陈五事，全文一万七千字。朱元璋“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答办集。’又云：‘所任者多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睹五事实迹”。朱元璋不愿再听下去，以为“妄言”。遂召茹太素入，问：“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茹不能答。必欲令其分别，茹回说：“无法指实其人。”朱元璋大发脾气，命人施以杖责，以警“妄言”。次日深夜，元璋卧榻上，想起茹

太素上书事，又令人接着往下读，“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朱元璋认为其中所言四事可行，即于早朝时命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依茹太素所言施行。因而感叹：“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忠矣。”“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⑮

不久，朱元璋令朝臣会商，研究制定一套固定而可行的格式，使言事者有所遵循。最后于这年十二月以《建言格式》为名，“颁示中外”⑯。朱元璋亲撰序文冠于书首。《序》中记述了茹太素上书被杖之始末，明令：“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罪）之。”⑰又一次从制度上禁止冗文空言。

洪武十二年（1379），朱元璋于阅读送来的案卷时，深感内容重复繁冗，如果文字精简，数件即可。因想：长此下去，不仅皇帝浪费时间，全国上下起草、抄写、编订、报送和阅览这种案卷，又如何得了！从而联系到元朝以吏治国，案牍繁冗，小吏借以为奸，朝廷命官反受其摆布，以致危害蒙汉统治集团利益的教训，朱元璋痛感必须对此加以改革。因“命廷臣议减其繁文”，定为《案牍减繁式》，于这年八月颁示中外各衙，遵为定式，切实奉行⑱。此事既关乎文风，更涉及案牍的组成，尤为杜绝吏员借案牍繁冗、因缘为奸的重要手段，是朱元璋整顿文风的进一步深化。

朱元璋严禁冗文浮言，格之以禁令，导之以模式，且以政府的命令大力推行贯彻，确实开了一代新风，提倡当代人写时文（即所谓“古文”），不仅影响于民间，更重要的是使公文趋

于简明通俗，更是前所未有的善政。韩愈、柳宗元之后，朱元璋的提倡“古文”，成绩甚大，影响深远。他的提倡“古文”，决不仅是简单的文风问题，无论从出发点、针对性和结果来看，都集中在除弊图治上。所以他的严禁冗文浮言，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性，如果说他是以政治家来改革文风，并不为过。

注 释

①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卷十五《资世通训序》。

②黄瑜：《双槐岁抄》。

③《明史》卷一三六《陶安传》。

④《明史》卷一三五《宋思颜传附夏煜传》。

⑤《明史》卷一二八《宋濂传》。

⑥《明史》卷一三五《郭景祥传附毛骐传》。

⑦《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

⑧《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附张美和传》。

⑨朱元璋：《辩韩愈讼风伯文》。

⑩《明太祖实录》卷一七。

⑪《明太祖实录》卷三九。

⑫《明太祖实录》卷六三。

⑬《明太祖实录》卷八五。

⑭《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九。

⑮《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⑯《明太祖实录》卷一一〇。

⑰《高皇帝御制文集》卷一五《建言格式序》。

⑱《明太祖实录》卷一二六。

明

马皇后拒药

在朱元璋叱咤风云的一生中，马皇后始终是个重要人物。她以特殊的身份，卓越的才识，悉心辅佐丈夫的全部事业，在元末明初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马皇后生于公元1332年，比朱元璋小四岁，安徽宿州人。父马公，母郑媪。史书上未记马皇后之名，历史文献上记她嫁元璋后的称呼是马夫人，丈夫称帝后的名号是马皇后，死后被谥为孝慈高皇后。马公后来因为杀人避仇，逃往外地，临行时把爱女托付给生死之交的郭子兴。郑媪早卒，其后马公也客死外地。郭子兴夫妇对好友的遗孤十分怜惜，把马氏收为义女。由于马氏“善承人意，而知书，精女红”①，深得子兴夫妇的钟爱，育之如己女。

元朝末年，政治愈加腐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至正四年（1344），河南、江淮一带大旱，赤地千里，而黄河又接连决口，饥民遍野。到至正十一年（1351），河患已经连续六年，天灾人祸把广大农民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年五月，江淮流域终于爆发了以刘福通为首的大规模的红巾军起

义。次年，郭子兴率数千人在濠州起兵响应。不久，朱元璋就投身到郭子兴领导的队伍中，深受郭子兴的赏识和信任。就在这期间，朱元璋与元帅之女马氏成了婚，从此，朱元璋的职位不断上升，军中都称他为“朱公子”②。

郭子兴虽然器重朱元璋，但他性情暴躁，忌才护短，又好听谗言，迟疑寡断。在别人的挑唆下，也曾多次猜疑朱元璋，对他加以斥骂。一次，郭子兴发怒，将朱元璋禁闭在空室，不许进食。马氏得知后，亲自到厨房，“窃炊饼，怀以进，肉为焦”③。后来，马氏为了缓和朱元璋和郭子兴之间的嫌隙，就拿出自己平素的积蓄，献给义母，求她在义父面前为朱元璋分解、说情④。这样，朱元璋在红巾军中的地位才逐渐巩固下来。马氏习性节俭，“居常贮糗糒（干粮）脯脩（腌肉）供帝（指朱元璋），无所乏绝，而己不宿饱”⑤。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率领大军渡江，马氏和将士的家眷仍留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当时长江交通线被元军切断，和州孤立，马氏鼓励将士，抚慰眷属，稳定后方。攻下集庆（今南京市）以后，由于战争的需要，她又“亲缉甲士衣鞋佐军”⑥。元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率兵东下，直逼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郊），朱元璋亲自领兵抵御。强敌兵临城下，城中的官员、居民有的打算逃难，有的忙着窖藏金银，屯积粮食。马氏却镇静自若，“尽发宫中金帛犒士”⑦。

洪武元年（1368）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册封马氏为皇后。朱元璋回忆起早年马皇后跟随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⑧时，尝把她比之“芜蒌豆粥”，“滹沱麦饭”⑨。元璋每对群臣称说皇后的贤德，比之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马皇后听了说：“妾闻夫妇相保易，君臣相保难。陛下不忘妾同贫贱，

愿无忘群臣同艰难。且妾何敢比长孙皇后也!”⑩其贤德谦逊往往如此。朱元璋感到马皇后幼年失去亲人，故于建国后，曾多次提出要寻访皇后的宗族亲戚加以封赏爵禄。马皇后说：“国家官爵当与贤能之士。妾家亲属未必有可用之才，且闻前世外戚之家多骄淫奢纵，不守法度，有致覆败者。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赐予，使得保守，足矣。若其果贤，自当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宠致败，非妾之所愿也。”⑪朱元璋遂作罢。史家称明代“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⑫。这与马皇后的智鉴和表率作用是分不开的。

马皇后平时很注意对后宫的教育，她时常向宫人们讲述古代宫帏制度。为了教育后宫，她特令女史官辑录宋朝贤后事迹，作为楷模，朝夕省览。有人说宋朝过于仁厚，马皇后说：“过仁厚，不愈于刻薄乎?”一日，她问女史官：“黄老何教也，而窦太后好之?”女史回答说：“清净无为为本。若绝仁弃义，民复孝慈，是其教矣。”马后说：“孝慈即仁义也，讵有绝仁义而为孝慈者哉。”⑬有明一代，宫壸肃清，马皇后领导后宫，勤于内治，起了相当的作用。

洪武三年（1370），诸将击败残元势力，攻克元都，将元室珍宝贡献至京师，举朝祝贺。马后问：“得元府库何物?”元璋答：“宝货耳。”马氏道：“元氏（元朝）有是宝何以不能守而失之？盖货财非可宝，抑帝王自有宝也。”朱元璋会心地说：“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谓得贤为宝耳!”马后称谢说：“诚如圣言，妾每见人产业厚则骄至，时命顺则逸生。家、国不同，其理无二，人之常情，所当深戒。妾与陛下同处穷约，今富贵如此，恒恐骄纵生于奢侈，危亡起于忽微。故世传‘技巧

为丧国斧斤，珠玉为荡心酖毒'，诚哉是言。但得贤才朝夕启沃，共保天下，即大宝也，显名万世，即大宝也，而岂在乎物乎。"⑭

朱元璋称帝后，为防止大臣功高震主，树立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保证朱家子孙世代帝王之业，用极残酷的手段制造冤狱，株连大批功臣宿将。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谋反"一案，牵连被杀的功臣达三万余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马皇后对朱元璋的这一作法很不满意，她一向主张对下属不宜过于严苛，而"宜赦小过以全其人"。据《明史·孝慈高皇后传》记载："帝前殿决事，或震怒，后伺帝还宫，辄随事微谏。虽帝性严，然为缓刑戮者数矣。"李文忠守严州，杨宪诬告他有不法行为，元璋要立刻召回。马皇后说："严（州），敌境（与敌人接境）也，轻易将不宜。且文忠素贤，宪言讵可信?"⑮元璋乃罢。文忠后来果然立了大功。致仕学士宋濂之孙宋慎，被告参与丞相胡惟庸"谋反"，列为"胡党"，宋濂因此被连坐要处死刑。马皇后为他求情说："民家为子弟延师，尚以礼全终始，况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⑯元璋不许。到用餐时，发觉皇后既不饮酒，也不吃肉，元璋惊问其故。马后回答说："'妾为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恻然，投箸起。明日赦濂，安置茂州（今四川茂县）。"⑰吴兴富民沈秀（万三）多年在海外经商，为全国第一富户，被迫捐献家财助修都城城墙的三分之一，后又被迫出资犒劳军队。事情被朱元璋闻知，不料触犯了忌讳，大怒说："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⑱高皇后劝谏说："妾闻法者，诛不法也，非以诛不祥。民富敌国，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将灾之，陛下何诛焉。"⑲经马皇后劝说，沈万三才得免去死罪，遣戍云南。

朱元璋即位后，吸取元朝覆亡的教训，主张以猛治国，经常法外用刑，对臣民随意治罪。马后针对这种情况，谏朱元璋说："法屡更必弊，法弊则奸生；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⑳朱元璋誉为至理名言，命女史记录下来，以为鉴戒。一次，朱元璋怒责宫人，马皇后也假意发怒，令人把宫人执付宫正司（管理宫女的机构）议罪。朱元璋问为何这样做？马皇后说："帝王不以喜怒加刑赏。当陛下怒时，恐有畸重。付宫正，则酌其平矣。即陛下论人罪亦诏有司耳。"㉑朱元璋曾下令让犯了重罪的囚犯去筑城赎死。马皇后听说后，向元璋进言说："赎罪罚役，国家至恩。但疲囚加役，恐仍不免死亡。"㉒朱元璋因而赦免了这些重囚筑城的劳役。

马皇后无子，但对诸王却视同亲生，管教甚严㉓。诸王傅李希颜因一小王顽皮不听话，常用体罚惩治。一天，老师用笔管把一个小王的额角戳了一下，小王哭着到朱元璋处诉苦。元璋大怒，正要发作，马皇后急忙从旁劝解说："乌有以圣人之道训吾子，顾怒之耶！"㉔朱元璋觉得有理，不但没有惩办希颜，反而提升他做左春坊右赞善。硕妃所生幼子朱橚，行为放荡，后被封为周王（封地在开封）。就藩前，马皇后特派江贵妃随往，并"赐以己所御纰衣（镶边的衣服）一、杖一，曰：'王有过，则披衣杖之，即（如也）违，驰以闻。"㉕朱橚听了马后的话，到封地后果然未敢肆意胡为。

除领导后宫，勤于内治外，马皇后还运用她的特殊身份，对朱元璋的施政，不时有所规正。其关心民瘼臣隐的事迹，尤为人所称道。一次，马皇后问元璋："今天下民安乎？"元璋说："此非尔所宜问也。"马后回复说："陛下天下父，妾辱天下母，子之安否，何可不问。"㉖每逢遇到灾年，马后"辄率

宫人蔬食，助祈祷"；"岁凶，则设麦饭野羹"㉗。元璋对马后说：朝廷已经对百姓实行了赈恤。马后说："赈恤不如蓄积之先备也。"㉘马氏虽贵为皇后，却依然保持其昔日的俭朴生活。除悉心照料元璋的生活外，她"平居服大练浣濯之衣，虽敝不忍易"，并且"命取练织为衾裯，以赐高年茕独。余帛纇（lèi类，有疵）丝，缉成衣裳，赐诸王妃公主，使知蚕桑艰难"㉙。

洪武十五年（1382）八月，马皇后病逝，年五十一岁。病重时，她自知已疾难愈，怕连累医生得罪，不肯服药，对元璋说："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诸医乎。"㉚临终前，她嘱咐朱元璋："愿陛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子孙皆贤，臣民得所而已。"㉛朱元璋为之恸哭，以后未再立皇后。

马皇后不仅是朱元璋的贤内助，而且就其立言行事而言，可以称得起是一代贤后。《明史》赞曰："高皇后从太祖备历艰难，赞成大业，母仪天下，慈德昭彰。"是非常恰当的评论。

注　释

①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

②谈迁：《国榷》。

③《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④《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⑤⑥⑦⑧《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⑨《后汉书·冯异传》："光武自蓟东南驰，辰夜草舍（在草野宿营），至饶阳无蒌亭。时天寒烈，众皆饥疲，异上豆粥。……及至南宫，遇大风雨，光武引军入道傍空舍……异复进麦饭。"

⑪《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⑪《明太祖实录》卷二九。

⑫《明史》卷三〇〇《外戚传》。

⑬《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⑭《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七。

⑮⑯⑰⑱⑲⑳㉑㉒《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㉓见吴晗:《明成祖生母考》,载《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

㉔《明史》卷一三七《桂彦良传附李希颜传》。

㉕毛奇龄:《胜朝彤史拾遗记》。

㉖㉗㉘㉙㉚㉛《明史》卷一一三《孝慈高皇后传》。

明

胡蓝大狱

明初的统治集团，是由两方面地主组成的，一方面是原有的地主，如淮西和浙东地主集团，他们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地主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旧地主，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成为明初朱元璋加强集权发展专制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使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①；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②，来教育他

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③。原来，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规定武将在“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④，等等。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於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一天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褊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胡惟庸是朱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由于李善长的推荐，洪武三年任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他本人的品格，据明人诸书所记，是一个狡猾阴险、专权树党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与赋性猜嫌、自私惨刻的朱元璋必然不能相容。再则，他大权在握，不免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官吏升降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皇帝请示。因此各地想做官、升官的人和功臣、军人遭贬斥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

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秘密翻阅军队的档案，招勇夫为卫士，纳亡命作心腹。由于胡惟庸在中书省时间最久，权力最重，已使朱元璋感到大权旁落，而军事贵族陆仲亨等又和胡惟庸相勾结，更使元璋产生怀疑，君权与相权的矛盾更加严重。朱元璋决心消除这一心腹之患。于是终于在洪武十三年（1380），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

胡惟庸一案，使朱元璋对身边的功臣宿将，猜忌之心大起，遂着手开始了一场血腥的屠杀。洪武二十三年（1390），距胡惟庸案发已经十年之久，再兴大狱，又有一批人被杀，就连七十七岁的老丞相李善长也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⑤。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李善长死后的第二年，工部侍郎王国用上书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李善长的儿子李祺被朱元璋招为驸马），亲戚拜官，人臣之份极矣。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惟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李善长的侄儿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⑥朱元璋听后虽然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

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兴蓝党大狱。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定远人也。他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临敌勇敢，自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数总大军，多立功”。洪武

二十一年（1388），蓝玉率大军十五万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至捕鱼儿海，“虏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因其战功赫赫，被封为凉国公。功劳一大，就骄横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1393），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把他抓起来，砍了头，并抄斩三族。这个案件被“族诛者万五千人”⑦。

胡蓝之狱前后达十四年之久，共诛杀四万五千余人。在被诛连的人当中，连为朱元璋出生入死、功勋屡建的徐达，也未能幸免。徐达在胡案中是十分清白的。他早就对朱元璋说过，胡惟庸为人奸邪，蓄有异谋。为此，胡惟庸对他怀恨在心，设法收买徐达的看门福寿，唆使他诬告主人，不料福寿径直告之徐达，揭露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是，朱元璋对忠肝义胆的徐达仍然很不放心。他认为，徐达德高望重，誉满天下，而且年富力强，只有五十四岁，要是留下他来，可是个大祸患啊！洪武十八年（1385）初冬，徐达背上生了恶痈，连日无法入朝，朱元璋特派太监前来赐蒸鹅，徐达知道他的病不能吃蒸鹅，看到皇上赐的东西，知道是要他的命，便含着泪吃下了，没过几天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此外，据《明史》记载，还有著名功臣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傅友德、谢成、冯胜（即冯国胜）等。他们或是被赐死，或因小过而被鞭死、被砍头。朱元璋的亲侄儿朱文正，在与陈友谅大战中，曾孤军坚守南昌达八十五日，立有大功，因赏薄怨望，免官贬置桐城，不久死去。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南征北战，屡立战功，也被赐死。大批官僚被诛杀，一时间朝廷人人自危，当时的京官，在每天早晨入朝之前，总要与妻儿诀别，交待后事，乃至晚上平安归

来，便合家庆幸。功臣宿将得以善终者寥寥无几，汤和就是其中的一位。汤和与朱元璋是同村人，小时候是放牛的伙伴，他看到元勋宿将一个个被杀害，懂得是老伙伴对他们不放心，便主动交出兵权，告老还乡。朱元璋得知非常高兴，立即派人在凤阳给他修建府第，厚赐礼遇。

连续数年的诛杀，功臣宿将相继而亡，太子朱标劝父亲说："陛下杀人太滥，恐伤和气。"朱元璋听后，当时不作声。第二天，为了讽喻太子，表明隐衷，他故意丢一根棘杖于地下，让朱标拿起来。朱标面有难色。朱元璋语带双关地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替你把这些刺拔掉，然后再交给你，岂不更好！"一语道破了朱元璋大批诛杀功臣的目的。

在历代开国之初，如此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极为鲜见，正如赵翼所说的，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⑧。

注 释

①《明太祖实录》卷七四。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

③《明太祖实录》卷一七九。

④《明太祖实录》卷二四九。

⑤《明史》卷三〇八《奸臣列传》。

⑥《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⑦《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⑧《二十二史札记》卷三二《胡蓝之狱》。

明

靖难之役

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加强皇权的同时，为巩固朱氏的统治地位，实行分封诸藩王的政策。洪武三年（1370）四月，册封其子朱樉为秦王、朱棡为晋王、朱棣为燕王、朱橚为吴王、朱桢为楚王、朱榑为齐王、朱梓为潭王、朱杞为赵王、朱檀为鲁王，重孙朱守谦为靖江王。共计册封24个儿子，1个重孙，大多分封在北部边境和各个要地。且规定，一经封王即要出京城就藩，使之“外镇编圉，内控雄域”①，目的是要让这些分封在外的儿孙们“夹辅王室”②。因此朱元璋赋予这些子孙们以极高的地位和军事权力，规定诸王仅“下天子一等”③。诸王在各自的封地内，可以建立王府，设置官属，封地所在的卫所均受诸王的监视与控制，“凡朝廷调兵，必关白亲王乃发”④。诸王还可拥有供其指挥和调遣的护卫甲士，“少者三千，多者至万九千人”⑤。不仅如此，诸王还有权移文朝廷索取奸臣，甚至可以举兵“清君侧”。朱元璋分封诸王，使封国权力远远超过地方的行政权力。

朱元璋想以分封诸王的办法起到拱卫朝廷的作用，然而封

国权力过大，必将有碍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导曾为此上书，指出此举恐“尾大不掉”，“祸患立生”。但朱元璋却以“离间吾骨肉”⑥的罪名，将叶伯导囚死狱中。当然朱元璋也不是对此没有考虑，在分封之中，他曾规定凡受封诸王必须离开京城，到封地就藩。不允许各亲王之间相互往来，即使入朝，也不能同时前来，必须一王离京，另一王才可启程。朱元璋此举的目的在于避免诸王相互串联，与中央相对抗。所以，诸王就藩，可以说是“生离死别”。但朱元璋的用心良苦，却未能收到预期的后果。

洪武二十五年（1393）四月，皇太子朱标病故，朱元璋于九月，又立朱标次子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生性“颖慧好学，性至孝”，而深得朱元璋的喜爱，称赞他：“而诚纯孝，顾不忘我乎。”⑦不过，对于这位“仁柔少断”的皇太孙将来继任帝位，朱元璋并不十分满意，曾一度打算更换太子，后因翰林学士刘三吾的劝谏，才没有这样做。尽管如此，朱元璋对朱允炆的继位仍放心不下。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朱元璋病故，庙号太祖，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为帝。临终前，朱元璋立下遗诏，“皇太孙允炆仁明孝友，天下归心，宜登大位。内外文武臣僚同心辅政，以安吾民”。“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⑧。

朱允炆即位，是为明惠帝，改元建文。尽管有朱元璋的遗诏，不许诸王“入临、会葬”，但燕王朱棣仍直奔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朱允炆闻讯后，立刻派人持敕，令朱棣返回燕京（今北京），对此朱棣十分不悦。

其时，镇守北部边疆的诸王已有很大的权势，宁王朱权“带甲八万，革车六千”⑨。燕王朱棣更握有“节制沿边士

马”⑬的重权。朱允炆对这些皇叔们忧心忡忡。建文元年（1399）正月，朱允炆即位不久，燕王朱棣即遣长史葛诚入朝奏事。朱允炆遂向葛诚密问燕王府之事，葛诚如实秉告，且派他返回燕王府，作为内应。葛诚回到燕王府，朱棣见他神色不对，心中不免作疑。随即朱棣亲自入朝，他自恃皇叔身份，径直走皇道入宫，登陛不拜。监察御史曾凤韶弹劾其不敬，户部侍郎卓敬也密奏，以燕王“智虑绝人”，建议将他徙封至南昌，但都被朱允炆以“骨肉至亲”，婉言拒绝。朱棣察觉到朝廷对自己怀有贰心，回燕王府后，便托辞患病，以观事态的变化。

建文帝朱允炆以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卿黄子澄同参军国事。齐泰、黄子澄以诸王权势过大，恐难驾驭为由，力主削藩。“帝欲先图燕。子澄曰：‘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削燕手足也。’”⑪于是洪武三十一年八月，朱允炆下令废周王橚为庶人。建文元年（1399）四月，湘王柏惧罪自焚死，齐王榑、代王桂有罪，废为庶人。六月废岷王楩为庶人，徙漳州。朝廷削藩之举，引起诸王的恐慌与不安，燕王朱棣更是心神不定。

不久，燕王府护卫百户倪谅上奏朝廷，密告燕王府官校谋反。朱允炆为此下诏责问朱棣。朱棣闻讯，遂“佯狂称疾”，以此掩盖其野心。齐泰等人侦得朱棣有谋反之意，便请朱允炆下诏，逮捕燕王府官属。齐泰等人还密令北平左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占据燕王府，又约葛诚、指挥卢振为内应，且令北平都指挥张信捕捉朱棣。不料，张信将此事秉告朱棣，朱棣立刻令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等将领统800名壮士入卫燕王府。

七月，张昺、谢贵等指挥兵士围攻燕王府，索要官属，飞

矢直入府内。朱棣与张玉、朱能等人商议，决定设计除掉张昺、谢贵。未几，朱棣称病愈，登东殿，而令壮士设伏于左右及端礼门内。遂派官持官属名册前往张昺军中，约其入府。待张昺、谢贵入殿，乃持之斩杀。围攻王府的张昺、谢贵所部闻讯，溃散而去。次日，燕王朱棣誓师，以“朝无正臣，内有奸恶，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⑫的祖训为据，以“清君侧”为名，上书请诛齐泰、黄子澄。朱允炆见此上书，下诏削夺朱棣属籍。朱棣遂举兵，自置官属，其军号为“靖难”。

朱棣起兵后，以部将郭资戍守北平（今北京），乃举兵拔居庸关，破怀来，取密云，以稳定和巩固大本营。仅20天，朱棣所部已达数万人之多。在燕王“靖难”军的进攻下，北平附近州县纷纷倒戈，投降朱棣。

得知朱棣据北平反叛，朱允炆于八月任命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率大军北伐燕王。同时部署其他将领各统偏师步骑，数路并进，号称百万大军，约定行程日期，直捣北平。同时传檄山东、河南、山西三省供给军饷。不久，耿炳文所部与靖难军战于真定（今河北正定）。朱棣避实就虚，趁中秋之夜官军饮酒作乐之机，渡白沟河，破雄县，之后大败耿炳文所部。耿炳文逃入真定城中，闭门固守。靖难军攻城三日不克，还师北平。

官军败北，朱允炆大怒，又改命李景隆取代耿炳文，继续统兵平定燕王之叛。又令辽东江阴侯吴高等领兵围攻永平（今河北昌黎西北）。朱棣留下少量兵将坚守北平，自己亲统大军救援永平。吴高怯懦，不敢应战，退保山海关。李景隆自恃兵多将广，率部直攻北平丽正门。守城将士及城中百姓奋力拒

守，多次击退官军进攻。朱棣得知李景隆率兵攻北平，便回师以奇兵左右夹击，李景隆力不能支，被靖难军连破七垒，只得连夜逃遁。所部闻讯，纷纷丢弃兵甲、粮草，慌忙南逃。

李景隆兵败，黄子澄却藏匿不报。待朱允炆风闻察问，黄子澄仍借口天寒，士兵冻馁暂退德州（今属山东）。同时派人密告齐泰不得泄露失利之事。朱棣又上书陈述道理，并以诛齐泰、黄子澄传檄天下。迫于形势的压力，朱允炆只好罢免齐泰、黄子澄的官职，但仍旧依靠二人“筹画治兵”。朱棣得知李景隆虽然兵败，却于德州集结兵力，企图等明年春天，再攻北平，遂于建文二年（1400）正月，先发制人，率兵攻占蔚州（治今河北蔚县西南）。四月，于白沟河再度大败李景隆军。五月入德州，随后兵围济南（今属山东）。李景隆逃入济南后，据城固守，靖难军久攻不下，便引水灌城，亦不克。

九月，朱允炆再遣大将军盛庸总领平燕大军北伐。朱棣派兵袭击沧州（今属河北），俘都督徐凯。然而十二月，靖难军于东昌（今山东聊城）败于官军，张玉被斩，靖难军溃败而逃。张玉阵亡，令朱棣悲痛欲绝。而朱允炆以官军大捷，诏复齐泰、黄子澄官，仍领军国事。

建文三年（1401）二月，朱棣再次率军南下，于夹河击败盛庸所部。此战之后，朱允炆又坐立不安，下诏夺齐泰、黄子澄官，贬至外地，且没收其家产。靖难军夹河大捷，士气倍增，又连战三捷。朱允炆急令驸马都尉梅殷镇守淮安。

建文四年（1402），朱棣指挥靖难军攻陷沛县（今属江苏）、萧县（今属安徽）、泗州（治今安徽泗县）、盱眙（今属江苏），进至扬州（今属江苏）。五月，攻占仪征（今属江苏），进逼建康。朱允炆忙下诏，令天下诸路“勤王”，但这丝毫不

能阻挡靖难军的南下。六月，靖难军渡长江南进，一举击溃盛庸的设防，占领镇江（今属江苏)。一筹莫展的朱允炆见大势已去，提出割地请和的条件，请求朱棣退兵，朱棣坚决不允，众朝官见朱允炆已无回天之力，纷纷离朝而去，朱允炆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久，朱棣率军抵达建康城金川门，守城的谷王朱橞开城请降，朱棣进入城中，遂立为皇帝，建文帝朱允炆于混乱之中，不知所终。

注 释

①《续通考》卷二〇八。

②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四。

③④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五。

⑤《明史》卷一一六《诸王传序》。

⑥《明史》卷一三九《叶伯巨传》。

⑦《明史》卷四《恭闵帝纪》。

⑧《明史》卷三《太祖纪三》。

⑨《明史》卷一一七《宁王权传》。

⑩《明史》卷五《成祖纪一》。

⑪《明史》卷一四一《黄子澄传》。

⑫《皇明祖训·法律》。

明

迁都北京、营建北京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应天府为南京（今属江苏），称京师。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诏以北平为北京。十九年（1421），诏改京师为南京，以北京为京师，迁都北京。

初，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受封为燕王，十三年（1380），就藩于北平（今北京）。建文元年至四年（1399—1402），朱棣夺取皇位，改元永乐，是为成祖。明成祖以为夺位得天下，恐为建文朝大臣所不容。靖难军进入南京，建文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效死建文，或逃匿不仕，或指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遂大肆诛杀，株连甚众，以至于其内心颇为不安，曾微语尚书茹常："朕毋得罪天地祖宗乎？"茹常叩头大言曰："陛下应天顺人，克成先志，何罪！"①成祖这才放心。故虽定都南京，却经常往来于两京之间。

北平乃辽、金、元三朝古都，形势雄伟，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南控江淮，北连朔漠，足以"控四夷创天下"②，于当时抵御北元蒙古势力的威胁，在军事上指挥调度极为有利。亦

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北平又是明成祖龙兴之地，自封藩燕北，经营二十余年，有雄厚的政治、军事实力，及广泛的社会、经济基础。因此种种，明成祖早欲迁都北京。即位之初，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言："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由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跡之地皆有陞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王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明成祖认为："其可以北平为北京。"③永乐迁都北京的准备工作遂逐步展开。

二月，成祖下令改北平府为顺天府，设北京留守、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三月，成祖命舟师重开海运，往北京运粮，以后岁以为常。八月，发流罪以下犯人往北京垦荒，徙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民近4000户落籍北京。二年至三年（1404——1405），又徙太原等山西民20000户落籍北京。同时，成祖下令浚通南北大运河，以通北京漕运。四年（1406）闰七月，"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分遣大臣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④。同时命大臣督兵士、僧众、工匠造砖瓦；命工部征天下诸色匠作；在京诸卫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隶各卫选军士；河南、山东、陕西、山西等布政司、直隶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安庆、徐州、和州选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听役，"其征发军民之处，一应差役及闸办银课等项悉令停止"⑤。

各路军士、工匠、民丁，各地良材、巨木不久便汇聚北京。原定永乐五年动工营建之北京宫殿工程却未能如期开展。究其原因，约略有三。其一，永乐四年爆发明与安南之战争。成祖命成国公朱能"帅十八将军、兵八十万"分道进讨，六年（1408）"复命张辅帅师二十万征讨"⑥；其二，明与北方鞑

靼、瓦剌不断展开大规模战争。永乐八年（1410），成祖“自将五十万众出塞”亲征鞑靼，十二年（1414），又亲征瓦剌。⑦战争连年不断，需仰大量人力物力支持，从而影响营建北京宫殿计划如期进行，其三，永乐五年（1407），徐后去世。七年，明成祖车驾至北京，礼部尚书赵羾及廖均卿等得吉壤于北京昌平黄土山，车驾临视，遂封其山为天寿山，始营建山陵即成祖长陵工程。

营建北京宫殿工程虽停，迁都准备工作始终未断。永乐九年（1411），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废弃已久的运河重新畅通。十四年（1416）三月，长陵工程竣工。十一月，成祖复诏群臣商议营建北京事。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及在京都指挥等武官，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太常寺等衙门尚书、都御史等文官纷纷上疏，请求立即择日兴工，营建北京。上奏称：北京“诚天府之国，帝王之都也，皇上营建北京，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今日“引河道疏通，漕运日广，商贾辐辏，财货充盈，良材巨木，已集京师，天下军民，乐于趋事，揆之天时，察之人事，诚所当为而不可缓。伏乞上顺天心，下从民望，早敕所司兴工营建，天下幸甚”⑧。成祖欣然同意。

自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兴工，至永乐十八年（1420）十二月，北京宫殿、门阙、城池、郊庙、钟楼、鼓楼等京师必备建筑先后竣工，于是，成祖下诏迁都。十九年（1421）正月，明成祖御新建成之奉天殿，受百官朝贺，正式迁都北京。

新都北京“规划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朝廷以全国各地征调各色工匠数十万、民工上百万，及大量军士参与营

建工程。明代北京在元大都旧城基础上，进行了全面改建与重建。宫城及大城均向南推移，宫城（紫禁城）为营建北京的核心工程，位于全城南北中轴线上，四周建城墙，城墙外有护城河。宫城为长方形，占地72公顷，以午门——玄武门为中轴线，依次排列有前三殿：奉天殿（后改称皇极殿、太和殿）、华盖殿（后改称中极殿、中和殿）、谨身殿（后改称建极殿、保和殿）；后三宫：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前三殿主要用于举行国家大典以及重要朝会，后三宫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及生活起居之所。文华殿、武英殿、东六宫、西六宫等建筑配置于东西两侧，严格对称。宫城之外为皇城。宫城后方为由废土堆砌而成的万岁山，意在"席山建殿"，成为宫城之倚靠，又意在镇压前朝之风水，故又名镇山。万岁山亦为北京城的中心点及制高点，便于瞭望全城。宫城前方依"左祖右社"之制，左建太庙，右建社稷坛。皇城正门为承天门（今天安门），向南至大明门（今已不存）为一宽阔大道。道两侧筑有东、西千步廊。千步廊左侧为礼、户、吏、兵、工五部等中央机构。右侧为五军都督府衙署。皇城中心为优美多姿的太液池、琼华岛。皇城之外为大城。大城南部乃繁华商业区。钟楼、鼓楼位于大城中心。大城共开九门，前三门为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西有阜城门、西直门，东有朝阳门、东直门，北有德胜门、安定门。大城南郊建有皇帝祭祀天地的大祀殿及山川坛。嘉靖九年（1530），增筑圜丘，并于北郊筑方泽坛，东郊筑朝日坛，西郊筑夕月坛。明成祖营建北京，使北京城内建筑布局比元大都城更为匀称整齐，设计更为合理，巍峨壮观的建筑显示出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风格。嘉靖三十二年（1553），在外城南郊增修外罗城，开七门，因此，大城又称为内城。原计划

大城四周均筑外罗城，由于财力不济，终未能果，因此明北京城平面呈“凸”字形。

永乐迁都后，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既有自元朝至永乐时期从全国各地徙来的富户，也有营建北京过程中留京的大批工匠，又有入京参试的科场举子以及大小商人等，京城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文化事业都得到全面发展，迅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

北京地近边塞，北方蒙古鞑靼、瓦剌，东北女真等族相继对京都构成威胁。因此，自永乐迁都之时至明末均有回都南京之议。永乐十九年（1421）四月初八，新建成仅三月的紫禁城失火，三大殿烧成一片灰烬。廷臣中有议论迁都北京之非，主张重回南京，遭明成祖斥责。成祖以奉天门为临时听政之所坚持上朝，还都之议始止。但是，继续营建北京官署的工程却被搁置。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驾崩，永乐时期长期居守南京的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三月，仁宗宣布复都南京，“命诸司在北京者悉加‘行在’二字，并建北京行部及后军都督府”⑨。四月，仁宗崩，还都南京终未成事实。

宣宗朱瞻基即位，仍称北京为“行在”。直至英宗朱祁镇即位后，北京作为明朝都城的地位才得以确立。正统元年至四年（1136—1139），宣宗命军夫数万人修建京师九门城楼、月城、角楼、城濠、并各门石桥、闸，于是北京城“焕然金汤，巩固足以耸万国之瞻矣”。正统五年，重修已焚毁20年之久的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及乾清、坤宁二宫。六年（1441），英宗于新宫殿落成之日宣布上谕书，重申定都北京，“罢移行在，定为京师”。此后，正统七年，又造会同馆、观星台，建宗人府、

吏部、户部、兵部、工部、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五军都督府、太常寺、通政司、锦衣卫、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詹事府等文武官署，并于京师城垣内外砌以砖石。英宗正统时期的营造工程，使北京京师规模完整地体现出来，在明朝定都北京、营建北京的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后，直至明亡，北京一直是明朝京师。

注　释

①《罪惟录》。

②《明太宗实录》卷一〇四。

③《明太宗实录》卷一六。

④《明史》卷六《成祖本纪二》。

⑤《明太宗实录》卷五七。

⑥《明史》卷一五四。

⑦《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⑧《明太宗实录》卷一八二。

⑨《明仁宗实录》卷八七。

明

修《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明成祖永乐年间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文献汇编）。它保存了大量的我国十四世纪以前的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地理、宗教和应用科学等方面的丰富资料，比著名的《大英百科全书》要早三百多年。它不仅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珍品，而且在世界文化史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明实录》记载，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认为“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穰，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聚之”。于是命令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著名学者来负责编纂一部大型类书，并规定了编纂宗旨：“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修辑一书，毋厌浩繁！”

明成祖即位之初即提出编纂《大典》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病故，皇太子标早卒，依据封建帝王传位的惯例，由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改元建文。时太祖诸子第二子秦王樉、第三子晋王棡均先卒，四子燕王棣、五子周王橚及齐、湘、代、岷诸王均以尊属拥重

兵，多不法，朝廷孤危。诸王中燕王最雄杰，兵最强，尤为朝廷所嫉。惠帝用齐泰、黄子澄计谋削藩。七月，燕王起兵，以齐、黄为“奸臣”作借口，援引《祖训》：“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正式向南京朝廷进军，名曰“靖难”。燕王于建文四年（1402）率兵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自己做了皇帝，是为明成祖。这次事变，实际上是叔侄之间的帝位之争，依照封建正统观念，有些“大逆不道”，为此引起了方孝孺等士大夫的反抗。朱棣想利用纂修大型类书，炫耀文治，笼络当时的士大夫，消弭朝野间的不平之气，以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因此，他对此事异常重视。

解缙等奉命后，召集儒士一百四十七人，仅用一年时间，于次年（永乐二年）十一月匆匆编成《文献大成》，进呈朱棣。朱棣览后，认为“所纂尚多未备”，过于简单，不符合他原来的设想。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命太子少师姚广孝、礼部尚书郑赐、侍读解缙三人担任全书的监修，在原有基础上进行重修，主要是扩大收书范围，即把“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全部包罗在这一部大型类书中。为了做到这一点，于是在监修之外，又设有副监修三人，由刑部侍郎刘季篪、翰林院修撰兼右春坊右赞善梁潜、通政司右通政李至刚担任。监修以下设有都总裁、总裁、副总裁，其次为纂修、编写人、缮录及圈点生等。整个编辑机构由监修、总裁总其大成；都总裁由陈济担任，负责调节和沟通监修与总裁、副总裁之间的情况。副总裁除参与总的计划工作外，多兼管一个部门的实际任务，领导若干纂修人员。修纂人员按照所分工的范围搜集资料，然后将所有资料由编写人依韵目编排和连缀起来。此外，还设有

“催纂”五人，负责督促编辑工作的进度。由于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人员多而不杂乱，整个工作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永乐五年（1407），《大典》定稿后，又征召在国子监及外郡县学擅长书法的生员，进行清抄。此外，对编纂者在工作上、生活上也提供了不少便利条件。朱棣特命启用当时皇家图书馆——南京文渊阁的全部藏书，使修纂人员“尽读禁中之书”，还指派官员分赴各地收购遗书秘籍，并指示解缙等人说，买书可以不计价钱。由于明成祖的重视，《大典》收入的典籍总数达七八千种之多，超过了前代任何类书。在生活上，朝廷把所有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员都安置在距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居住，并由光禄寺负责伙食，“朝暮酒馔”，供以茗果。为了编纂工作夜以继日地进行，特发给“膏火之费”，诸如此等，都保证了修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参加这次编辑工作的前后多达三千人。永乐六年冬，全书正式完成，朱棣审阅后，十分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并定名为《永乐大典》。全书共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分装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多万字。

《永乐大典》修纂时，共拟定出凡例二十一条，对材料的分类、取舍、排列次序都有明确的规定。全书总的体例是依照《洪武正韵》的韵目，“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凡属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各种名物和奇闻异见之类，都随字收载。例如天文志列在“天”字下，地理志列在“地”字下。当时辑录的图书包括经、史、子、集，以及释藏、道经、医药、戏剧、平话、工技、农艺等著作，收辑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曾严格规定所辑入各书，不许任意删除涂改，必须一字不差地照原样整部、整编、

整段分别编入，从而保留了古籍的原来面貌，使许多极其珍贵的资料得到保存。现在我们见到的《旧唐书》、《旧五代史》、《宋会要》等重要历史文献，就是清代学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永乐大典》修成后，珍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大典》也随之北移，收藏在“文楼”之内。永乐和万历年间，虽然都曾有人提议过刊刻，都因“工费浩繁”未能实现。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宫中发生一次大火灾，三殿主要建筑都被烧毁。文楼在三殿附近，明世宗一夜下了三四道命令，督促抢救，《大典》才得保全。灾后，为了防止不测之虞，明世宗很想重录一部。嘉靖四十一年（1562）秋，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督饬儒士一百零九人，照原本摹写了一部做为副本。重录时订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晚出，每次领取《大典》必须登记，不许私自带出雇人代写；每人每日抄三页，如遇差错，发与另写，不拘一次二次，只算一页；发现有混报怠工者，要“罪坐各官”；每册重录完毕后，于册后注明总校官、分校官、写书官及圈点人员姓名。因此重录的《大典》几乎与原本没有多大区别。重录工作整整用了六年，直到穆宗隆庆元年（1567）四月才完成。从此《大典》有了两个抄本：永乐抄本（正本）和嘉靖抄本（副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永乐大典》由于卷帙浩繁，参加纂修人员众多，因此前后体例不一，前后错互舛误之处，亦在所难免，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巨大价值。《永乐大典》的最大贡献在于保存了我国明初以前各种学科的大量文献资料。在这方面，清代一些学者对《永乐 [illegible]》所作辑佚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清高宗乾隆年间

开《四库全书》馆时，安徽学政朱筠奏请“校《永乐大典》，择其中人不常见之书辑之”，得到清高宗的批准，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设立了《四库全书》馆“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先后参加者共三十九人，其中有著名学者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共辑出书籍：经部六十六种，史部四十一种，子部一百零三种，集部一百七十五种，总计三百八十五种，四千九百四十六卷。其中重要的文献如西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唐林宝的《元和姓纂》、北宋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南宋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宋代医学名著《苏沈良方》、《博济方》、《伤寒微旨》等都是亡佚已久的秘籍，全赖《永乐大典》才得保存下来。

《永乐大典》虽有正副本两部，但它的命运，仍然历受磨难和摧残，都没能完整地流传下来。首先是永乐正本下落不明，一般人认为明亡，文渊阁再次被焚，《大典》的正本，可能在这时被付之一炬。副本流传至清代，并没有受到重视。到雍正年间，《大典》才由皇史宬移藏到翰林院，一些学士和编修官才得有借阅机会。乾隆初年清代学者全祖望考中进士后，被分到庶常馆学习，曾有机会见到这部书，大加称赞，并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且写了一篇《抄永乐大典记》，详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此时《大典》已缺佚两千余卷，但仍从其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其保存文献资料的巨大价值，可见一斑。道光以后，清室日趋衰败，官吏乘机盗窃，《大典》逐渐流失损坏。但《永乐大典》最大的厄运，还在此后。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两次侵入北京，侵略者大肆焚烧劫掠，许多宝贵的文物丧失殆尽，《永乐大典》也同

样遭到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所余寥寥无几，言之令人痛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大典》等珍贵文化典籍制订了保护措施。国内许多公私收藏家纷纷把自己珍藏多年的《永乐大典》残本捐献给国家。散落在国外的，有一部分也回到了祖国。1959 年，中华书局将当时搜集到的《永乐大典》七百三十卷影印问世。自 1960 年至今三十年来，中华书局仍在继续访查，又陆续征集到六十七卷，其中除少数几卷外，多是流散在海外的。仍为线装套印，称为《永乐大典》续印本。连同以前影印的七百三十卷，共合七百九十七卷，印制成十六开精装本，并于其后附印《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对了解《永乐大典》全书内容很有参考价值。

明

郑和下西洋

明朝前期，国家强盛统一，财力物力充足。明成祖朱棣为宣扬国威，以“天朝上国”之尊，招徕海外诸国前来朝贡，派遣宦官郑和组建庞大船队，远航亚非各国，乃有郑和下西洋之盛举。

郑和本姓马，小名三保（或三宝），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祖、父曾先后赴天方（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自幼受家庭探险精神熏陶。洪武时被阉入宫。洪武十八年（1385），随军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靖难之役”中从燕王起兵，出入战阵，多有战功，被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历事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人称“三保太监”（或三宝太监）。郑和体貌丰伟，机敏善辩，“身长九尺，腰大十围，洪音虎步”，“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俦比”①。郑和自小信奉伊斯兰教，入宫后又皈依佛教。永乐二年（1404）奉命出使日本，其杰出的外交才能已经崭露头角。

自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二十八年间，郑

和七次下西洋，遍访亚非30余国，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及红海沿岸，所谓西洋，初无严格界说，大体指今文莱以西之南洋各地及印度洋沿岸一带。明朝时以婆罗洲为中心，以西称“西洋”，以东称“东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②郑和所到之处，大多在婆罗洲以西，故俗称“三保太监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三次为前期，足迹遍历东南亚及南亚一带，西达印度半岛西南部之古里国，主要任务是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为明王朝树立“声威”，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四次主要任务在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路，使更多海外国家接踵而来，“宾服”于中国，从而为明王朝在亚非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联系。

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分述如下。

第一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第一次奉命出使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有宝船62艘，各长44.4丈，宽18丈，可容千余人，乃当时海上最大的远洋船只。船上满载瓷器、丝绸、麝香、以及铁器、金银币等各色宝物，故称“宝船”。合其他类型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共208艘。

六月，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率领船队自太仓刘家港出海南下，至福建五虎门（在闽江口）稍作停留，待秋季东北风起，再扬帆顺风驶入南海。船队“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首达占城（今越南南部），以次遍历爪哇、旧港（今印尼旧港）、苏门答剌（今印尼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南浡利（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国。次年夏，西北信风起，

船队顺风返航。永乐五年（1407）九月还朝。爪哇、满剌加、阿鲁、苏门答剌、小葛兰、古里等国使节随行来朝。

郑和每至一国，先宣读明帝诏书，行封赏赐，以扬威海外，促进友好关系。继则进行贸易，或以朝贡、赏赐形式进行交换，或以民间物物交换形式。亦有不服者，则以兵慑之，后耀兵异域，必先礼后兵，用兵后仍予宣诏、行封、给赐，……以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

△与爪哇西王的交涉——郑和使团至爪哇时，正值西王兴兵，并灭东王。郑和部卒经东王地，部卒被西王国人杀死170人。郑和方将兴师致讨，西王畏惧，遣使谢罪，并认赔黄金万两。

△爪哇的三宝垄与三宝庙——郑和使团于永乐四年（1406）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中部三宝垄登陆。该地即以“三宝”名之。今三宝垄有三宝洞，洞有三宝庙，供奉郑和。至今每年六月三十日，居住爪哇的华侨扶老携幼，谒庙进香，以纪念郑和。

△访苏门答剌——明初，南洋群岛诸国中，以爪哇国最强。洪武末年，爪哇已吞并近邻三佛齐国，改称旧港，并进而将举兵吞苏门答剌国。郑和奉成祖命招徕苏门答剌，诏封其酋长为苏门答剌国王，赐以印诰，从此爪哇国不能不有所顾忌，收敛其霸占苏门答剌的野心。

△在古里国建碑庭——永乐五年（1407），郑和乘大䑸，赍（jī基）诏敕，赐古里国王诰命银印，给赐升赏各头目品级冠带，并建碑庭，刻石曰：“其国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③

△生擒海盗陈祖义——洪武年间，广东人陈祖义等逃至旧

港，充为头目，聚众抄掠过往客人船只。成为海上交通大患。郑和船队至此，遣人招谕之。祖义等诈降，而阴谋袭击官军。郑和等觉察，调兵备战。陈祖义率众来劫，郑和迎战，大败祖义，杀其众5000余人，烧船10艘，获船7艘，生擒祖义等3人返京伏诛。清除了为害当地及海域安全的障碍，“海道由是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第二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五年（1407）冬，郑和等统领船队，往爪哇、古里（今印度柯泽柯德）、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今泰国）等国。各国国王以珍宝及珍禽异兽贡献。至永乐七年（1409）夏回朝④。

△浡泥国王来华朝贡——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封浡泥国（今印度尼西亚之加里曼丹岛）王麻那惹加那乃为王。六年（1408），浡泥王率妃及子、弟妹、陪臣150余人来朝，献珍物。成祖隆重接待，赐宴奉天门。是年王死于会同馆（接待外宾宾馆）。成祖命以王礼葬于南京石子冈。明代以后，浡泥国王墓逐渐湮没，墓址竟不可考。直至1958年重又发现，石马、石羊、石虎、石文臣、石武将各一对，神道碑刻都基本完整。

第三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七年（1409）九月，郑和等先后出使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锡兰山、小呗喃（即小葛兰，今印度柯钦南）柯枝、古里等国。至永乐九年（1411）六月回京。不久，满剌加国王及古里、柯枝、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岛北岸）、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马来半岛东岸）、南巫里（即南浡利今苏门答腊岛西北端）、加异勒（今印度南端）、

爪哇等国使节先后来华朝贡。

△占城国王盛情欢迎——据随行远航的费信《星槎胜览》记载，永乐七年十二月，占城国王骑大象率领臣民击鼓奏乐迎接郑和使团的盛况记载："宝船到彼，其酋长头戴三山金花冠，身披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镯，足穿玳瑁履，腰束八宝方带，如装塑金刚状。乘象、前后拥随番兵五百余，或执锋刃短枪，或舞皮牌，搥善鼓，吹椰笛壳筒。其部领皆乘马出郊迎接。诏赏，下象，膝行，匍匐，感沐天恩，奏贡方物。"

△锡兰山王的废立——永乐七年（1409），郑和至锡兰山国，携金银供器、彩妆织锦纻丝宝，幡、香炉、灯烛等，布施佛寺。而锡兰山国王贪暴不睦邻，屡邀劫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郑和船队至，被诱至国中，强索金币，并发兵5万抢劫船队。郑和得悉，即拥众回船，路已阻断，郑和语其下说："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密令人由他道至船，亲率步卒2000人由间道攻其王城，一举擒获其王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头目。即归，献俘于朝。廷臣请诛之，成祖施行宽大政策，赦之遣归。命礼部议择其地贤者立为王。"自是海外诸国，益服天子威德"⑤。

△建立满剌加王国——明成祖原曾在满剌加封王，赐印信，然被暹罗抢走，受降于暹罗。第二次远航期间，暹罗王遣使谢罪，而满剌加国仍未得印信。永乐七年（1409），郑和受命敕封满剌加头目为王，赐以双台银印，冠带袍服，建碑封域，遂名满剌加国，从此暹罗不敢侵扰。

永乐九年（1411），满剌加国王率妻子陪臣540余人来朝贡。明朝廷亦以盛礼款待。后又赐以海船，遣使送归其国。

△九洲山上采香——与满剌加国接壤处有九洲山，盛产沉香、黄熟香。永乐七年（1409），郑和等官兵入山采香，获6株，其径八九尺，其长八九丈，黑花细纹，香味清远，人所罕见。

第四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郑和船队第四次通使西洋。其时，明朝泱泱大国的威德已远播东南亚及南亚沿海各国。自南洋群岛至南印度一带的海陆交通，均已畅通无阻。第四次远航船队自古里继续往西，越阿剌伯海，至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海滨，开通了中非航路。此次远航历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柯枝、古里、南浡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溜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孙剌等国，最远到达赤道以南东非沿岸诸国，如麻林国，在今肯尼亚之马林迪一带，木骨都束在今索马里之摩加迪沙一带，如比剌（卜剌哇或不剌哇的别译）在今索马里的布拉瓦一带。其郊区至今有一极大的村庄取名"中国村"或"郑和屯"。郑和等于十三年（1415）至忽鲁谟斯后回国，忽鲁谟斯使节随行。分䑸船队于十四年（1416）夏始返。溜山、木骨都束、不剌哇、麻林、阿丹、剌撒诸国使节随行至京师。

永乐十三年（1415），麻林遣使来贡麒麟（长颈鹿）。显示了郑和使团首次出使东非国家已取得圆满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1416）四月，成祖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

第五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至十七年（1419）七月，郑和率领船队第五次远航。此次远航除例行宣诏、封赏、贸易以

外，亦为护送古里、爪哇、满剌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浡利、卜剌哇、阿丹、苏门答剌、麻林、剌撒、忽鲁谟斯、柯枝、南巫里、沙里湾泥、彭亨诸国及旧港宣慰使使臣返回各国。

△在柯枝国封山勒铭——永乐十五年（1417），封来京朝贡的柯枝国亦可里为国王，赐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给碑文而刻之以石。

△西南诸国献珍禽——此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以充实内苑。于是忽鲁谟斯进献狮子、金钱豹、马匹，阿丹国进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驼鸟，爪哇国、古里国进縻里羔兽等。各国所进珍禽异兽象征了亚非各国与中国的真挚友谊。

△苏禄国王来华访问——苏禄国（今菲律宾苏禄岛）国王有三，东王、西王、峒王，其中以东王最尊。永乐十五年（1417），三王各率其妻子、头目来华朝贡。归国途中，东王病逝于山东德州。明成祖按王礼为其举行隆重葬礼，撰文立碑于墓道。留其妃从十余人守墓，三年，回国。明朝以来多次修护陵墓，表达了对菲律宾友好使者悼念之情。

第六次远航及大事纪要：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郑和等送忽鲁谟斯等十六国⑥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又进行友好访问，是为第六次远航。行至苏门答剌后，诸副使即分头前往各国。各队所到国家多寡不一，返国时间亦不一致。郑和一行于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还京，副使杨敏率领的船队直至永乐二十三年（1425）才回国。

△在阿丹国采办珍宝——船队于苏门答剌分别行动，内官周某领驾宝船数只到阿丹。“王闻其至，即率大小头目至海滨迎接诏敕赏赐。至王府行礼，甚恭敬感伏。开读（诏书）毕，国王即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卖易。在彼买得重二钱许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珊瑚树高二尺者数株，又买得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花福鹿、金钱豹、驼鸟、白鸠之类而归”⑦。

△与祖法儿国贸易——祖法儿位于阿拉伯半岛东南海岸，自古即为著名商埠，商贾云集，在马可波罗、托雷美、伊本白图泰等人著作中均有提及。“中国宝船到祖法尔，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交换纻丝、磁器等物”⑧。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死，八月仁宗朱高炽即位，由于廷臣大多反对，下西洋几乎告终，仁宗即位后即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⑨

第七次远航经过及大事纪要：

宣宗朱瞻基即位，宣德五年（1430），郑和等又有第七次远航。“帝以践祚岁久，而诸番国远者未贡”，于是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⑩。（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所历诸国为二十国，即：占城、爪哇、暹罗、旧港、哑噜、满剌加、苏门答剌、那姑儿、黎代、南浡利、溜山、榜葛剌、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祖法儿、忽鲁谟斯、阿丹、天方）。第七次远航的专业人员有：官校、旗军（将士）、火长（掌管罗盘）、舵工（掌舵）、班碇手（掌锚）、通事（翻译）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舱、搭材匠（各

色工匠)、水手（船工）及民梢（梢工）等，共27550人，乘坐船61艘，船名有清和、惠康、长宁、安济、清远之类，又有数序一二等号，船型则有大八橹、二八橹之类。

△刊立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及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碑”——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郑和等从南京龙湾开船，二十一日到太仓刘家港（按：每次皆自刘家港出发)，停留一月余修建天妃宫。六年春，宫成，郑和立石刻“通番事迹记”以为纪念。至二月始从刘家港出发，到达福建闽江口长乐港后，在此停留八、九月（按：每次在此停泊)，既为修建南山寺天妃宫，并在此添招水手，修造船舶，也为等候风信开洋。十一月立石刻“天妃灵应记”以留纪念，然后扬帆远行。“通番事迹记”及“天妃灵应记”为后世留下了郑和下西洋的珍贵资料。此两“记”，与远航随行人员马欢所著《瀛涯胜览》、费信所著《星槎胜览》、巩珍所著《西洋蕃国志》并为世人所珍视的第一手资料。

△在福建出航前铸造铜钟一口——第七次远航主要任务为遍访“诸番国远者”。远涉重洋，惊涛骇浪，路途多艰，将有过于以往，为祈保往返安全，郑和等又在福建铸铜钟一口。钟高84厘米，口径50厘米，重77公斤，钟面铸有铭文54字“永远长生供养，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发心铸造铜钟一口。”⑪

△在天方国贸易珍宝——宣德五年（1430），郑和使团副使洪保分䑸到古里国，适默伽国（麦加）有使者来，遂派通事等七人同往，来去一年。买到各色奇货异宝及麒麟、狮子、驼鸟等物，并画天堂（天方国之别称）图一幅，回京奏报。其国

王亦采方物，遣使随七人进贡中国。

△在满剌加会齐分䑸——宣德八年四月二十日到达满剌加，在此停留20多天，会聚分䑸，等候南风，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按：满剌加为往来要道。郑和在其地建有排栅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内又立重栅小城，盖造仓库。去时在此分使通往各国，返则亦在此会齐，准备回国，实为一中间转运站。）

△各国使节来京朝贡——宣德八年（1433）八月，郑和使团刚由西洋诸国返回北京，各国使节皆随同而到，计有：苏门答剌、古里、柯枝、锡兰山、祖法儿、阿丹、甘巴里、忽鲁谟斯、加异勒、天方等国来贡麒麟、象、马等物。

郑和七次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航海技术之高均属空前。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当时世界上航海事业的颠峰，而且对扫除海上交通障碍，畅通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亚非国家海上贸易，以及建立亚非国家间和平相处关系作出巨大贡献。郑和下西洋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上友好交流，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政府间及人民间的友谊。郑和是我国、以至世界上伟大的航海家，在15世纪初期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注 释

①《西洋朝贡典录》卷上《三佛齐国》。

②张燮《东西洋考》卷五《文莱》。

③《瀛海胜览·古里国》。

④郑和二次远航事见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而《明史·郑和传》、《明史·成祖本纪》及《明实录》俱失载。

⑤《明史》卷三二六《锡兰山传》。

⑥十六国：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剌撒、不剌哇、木骨都束、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浡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

⑦《瀛涯胜览·阿丹国》。

⑧《瀛涯胜览·祖法儿国》。

⑨《明仁宗实录》卷一上，永乐二十二年八月丁巳诏。

⑩《明史》卷三〇四《郑和传》。

⑪1981年发现于福建南平市，现存南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明

仁宣之治

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病死后，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做了10个月的皇帝就病死了，他在位时间虽短，但在永乐时代，成祖多次巡幸北京和亲征漠北，他以太子的身份长年在南京监国，主持朝政，因此，他在明史上还是有影响的。仁宗死后，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宣统治期间，是明王朝的鼎盛时期。在朱元璋创业的基础上，从政治到经济等各方面来求得社会的安定与统治的稳固。在皇室内部虽然爆发了争夺皇位的“高煦之叛”，但很快被平息。政治清明、周边形势安宁、内阁制度确立、百姓得到休养生息。史学家因此称这一时期为“仁宣之治”。谷应泰说：“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①

仁、宣时期，明朝的内阁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阁权已重于六部之权。史载：“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

耳。”②又称：“迨仁、宣朝，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少师、少傅、少保），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虽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时召见，得预各部事，然希阔不敌士奇等亲。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执持是非，辄以败。”③仁、宣时期阁权之重，可见一斑。它之所以如此，与当时的阁臣“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的特殊身份有关。他们都是仁宗居东宫时的旧臣，在朱棣在位时，为维护朱高炽皇太子的地位不被成祖子朱高煦所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在内阁任职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④。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仁、宣两朝均能重用大臣，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们所依靠的大臣主要是“蹇夏”（蹇义和夏原吉），他们掌握着六部中两个最主要的部门——吏部、户部。还有“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掌阁务。在他们的尽心辅佐下，政治比较稳定。在重用这批大臣的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则予以黜退，即使原来和皇帝关系比较密切的也不迁就。对宦官的控制也比较严厉。仁宗即位后就下令：“中官在外采办者悉召还，并罢所市物。”⑤宣宗于宣德元年（1426）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⑥。宣德六年（1431），宦官袁琦“自幼侍上，恃恩纵肆，擅遣内官内侍，以采办为名，虐取官民财物”；又有中官“裴可烈在苏松诸郡，贪暴尤甚”；“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纵恣贪酷”⑦，俱被捕杀。

永乐一朝，经常战争，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

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注意到百姓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他一即位就下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减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为了保证百姓的休养生息，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经常对司法机关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一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宣宗即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返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官员前去询问稼穑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他曾经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宫中，要人们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如此，所以才能注意到百姓的休养生息。宣宗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的作法。对灾荒地区，宣宗也实行减免田赋，开仓赈灾。宣德七年（1432）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赋二百四十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减苏州官田租七十二万余石"⑧。河南有一个知县，没经过请示就发放驿粮千石赈灾，宣宗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他不拘手续，并且说："如果要依照手续层层申报，那老百姓早就该饿死了。他总结出一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而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仁、宣二朝实施了一些与民休息的政策，目的是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弭患于未萌"，也就是不激化矛盾，避免人民的起义斗争。

在经济方面，还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宣德

四年（1429），"命户部申明栽种桑枣旧令"[9]。所以这时的生产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仁、宣二朝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们能够纳谏。仁宗曾对杨士奇说："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我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有一次，杨士奇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众卿以至诚，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宣宗也是这样，他能够听取正直大臣逆耳的劝谏，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他对杨溥说："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惓惓。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宜勉力辅朕。"杨溥顿首说："臣不敢忘报。"宣宗对他说："直接指出我的过错，就是对我的最大报答。"裁撤冗官的建议是宣德三年（1428）蹇义首先提出来的，宣宗采纳了。他经常召集"三杨"、"蹇夏"等大臣谈话，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凡是有利于国家并切实可行的意见，他都能接受并实行。

但是，纳谏，是有限度的，并非所有的逆耳之言都能听得进去。如仁宗对翰林侍读李时勉上疏言弊就惩治过，到临死还耿耿于怀，宣宗也同样对御史陈祚的上疏极为恼火。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进行了改革。仁宗在位时，曾与朝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原来由于文化水平高低不同，形成会试多取南士。改革后，分南卷

和北卷，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加以平衡。仁宗未及实行而死去，宣宗即位后，就是按照这一改革办法按名额录取的。“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余皆南卷”。会试取士这一改革，使北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亦感奋兴起”，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得“南北人才，皆入彀矣”⑩。

周边形势的安定，也是所谓“仁宣之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时，明朝政府对北方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政策是“脱扰塞下，驱之而已”，戍边将“毋贪功”⑪；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比较安宁；西北卫所，顺利地对当地人民进行着管理；自永乐十一年（1413）在西南地区开设贵州布政司以来，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治理。

仁、宣时期的政治与其他朝代相比是较清明的，出现了明朝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景象。但在这繁荣与安定的背后，也有潜在的社会危机，宣德以后，明王朝的统治已逐渐走向衰败的道路。

注 释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②《明史》卷一〇九《宰辅年表序》。

③《明史》卷七二《职官志》。

④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三。

⑤《明通鉴》卷一八。

⑥《明通鉴》卷一九。

⑦⑧《明通鉴》卷二一。

⑨《纪录汇编》卷二三《古穰杂录摘抄》。

⑩⑪《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八《仁宣致治》。

明

土木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即位初年，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

初，蒙古族自元顺帝率蒙古贵族逃出大都（今北京）后，继续统治塞北地区，史称北元。洪武后期（14世纪末），蒙古族分裂为鞑靼、瓦剌及兀良哈三部。鞑靼为明朝对东蒙古的称谓，游牧于贝加尔湖以南，大漠以北，东至鄂嫩河、克鲁伦河流域，西至杭爱山、色楞格河上游，南及漠南地区。瓦剌为明朝对西蒙古的称谓，游牧于阿尔泰山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之西北部一带。兀良哈乃古部名，明代聚居于漠北及辽东边外。

蒙古分裂后，东西蒙古互争雄长，征战不休，并不时出兵南下，骚扰明边。永乐初年，明成祖朱棣分别遣使与鞑靼、瓦剌“谕之通好”①。瓦剌首领马哈木、太平及把秃孛罗为借助明廷力量对付鞑靼，向明廷称臣纳贡，明成祖亦分别封之为王。经长期征战，鞑靼势力不断削弱，瓦剌逐渐强大。永乐十六年（1418），马哈木之子脱欢袭父爵为顺宁王。几年之间，脱欢攻破鞑靼，兼并其众，又统一内部，其势日张，雄视漠

北。脱欢立成吉思汗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太师（丞相），掌蒙古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继位后，不仅漠南诸部全被征服，且东胁朝鲜，西略哈密，环明之北边，尽为其所制。也先既强大，明边境从此多事。其后果以邀赏不遂，纠合诸部，大举攻明。

也先每年冬遣人贡马于明。初，所遣使者不过 50 人，后贪朝廷厚赏，岁增至 2000 余人，并屡屡索要贵重难得之物。稍不遂，即制造事端，明廷所赐财物，不得不岁有所增。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遣使 2000 余人进马，诈称 3000 人，司礼监②太监王振削减马价，并按实际人数给赏，也先大怒。七月，纠合各部，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属山西）、甘州（今甘肃张掖）发动进攻。也先亲率 2 万骑兵攻大同。“兵锋锐甚，塞外城堡，所至陷没”③。边报日至，明遣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兵万人御敌。井源等既行，王振贪图侥幸，冒领边功，为遂其私欲，不顾群臣反对，社稷安危，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命下即行，事出仓促，举朝震骇。

时英宗方宠信王振。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一说山西大同）人。明宣宗时自阉入内，侍皇太子朱祁镇读书于东宫。宣宗死，朱祁镇九岁即位，是为英宗。王振狡黠，得帝欢，命掌司礼监，倍受宠信。英宗称之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一日，英宗大宴百官。按明制：“宦者虽宠，不得予王庭宴。”④英宗惧王振不悦，派人观察慰藉。王振正大怒，自比为周公，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当即命大开东华门中门，使王振赴宴。至则与会百官，皆望风拜谒，王振始悦。

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病逝，元老三杨⑤或死或贬，

王振更加擅作威福，无所忌惮，竟盗走明太祖朱元璋所立禁内臣干预朝政所立之铁碑⑥。从此，大权独揽，广植私党，使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王林为锦衣卫佥事，其党羽个个升官进禄，飞黄腾达。又排斥异己，陷害忠良，侍讲刘球在奏疏中语讽王振，即逮捕入狱，杀害于狱中。御史李铎路遇王振不跪，被谪戍铁岭。一次王振会议东阁，众公卿见王振到，皆俯首揖拜。唯大理寺少卿薛瑄见王振不揖不拜，昂然挺立。王振怀恨在心，借故治其死罪，投入牢狱，最后虽未杀死，却被削职罢官。

王振大兴土木，"广置塌房、庄所、田园、马房，侵夺民利，不输国课"⑦。又役使军民广建府第于皇城之内，重堂深阁，宏丽不亚于皇宫。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州官入朝，无厚礼相赠，便横加迫害。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每次入京"未尝持一物交当路"，振"嗾言官劾之，罢为大理寺少卿"。家中金山银窟，财宝不计其数。后抄没其家时，有金银60余库，玉盘百面，珊瑚高达六、七尺者20余株，币帛珠宝无算……。

王振如此专横奸险，英宗却不以为奸，反褒以为忠孝。正统十一年（1446），英宗赏给王振白金、綵币等物，并特赐敕一道，称王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足见其臣奸，其君昏。也先大军压境，岂有不败之理！

英宗在王振蛊惑与挟持下，决意亲征。大小群臣，伏阙恳留，悉被斥责。七月十七日，英宗命其弟郕王朱祁钰居守北京，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yē 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官员虽有数

百人，然不使参与军政事务，一切行动悉由王振专断。行前既乏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无周密的军事部署，50万北伐大军在仓卒惊恐之中匆匆出发。大军出居庸关，过怀来，至宣府。连日风雨，人情汹汹，未至大同，军粮已不继，兵士死亡枕藉，僵尸满路。瓦剌军为诱敌深入，退避塞外。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抵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其时前方全军覆没之报接踵而至。王振同党，镇守大同太监郭敬密告王振前线惨败情况，告以"势决不可行"，"若行，正中虏计"⑧。至晚，忽有黑云如伞罩营，雷雨大作，王振始惧。次日，下令班师，于惊慌失措中挥军急退。也先闻讯，立即率瓦剌军突入长城，跟踪追击。王振为炫耀乡里，不听大同总兵郭登坚请英宗速入紫荆关的建议，欲邀英宗至蔚州"驾幸其第"。行40里后，忽又恐几十万大军过境，损坏家中庄稼，又勒军向东，改令军队转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时日，十三日始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南），而瓦剌大队骑兵已渐逼近。当时日尚未晡，离怀来仅20里，诸将计议入怀来城据守，而王振以辎重千余辆未至，不肯听从，邝埜上章请车驾疾驱入关，不报。邝埜又诣行殿力请，王振怒斥："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埜曰："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愈怒，令左右拉下。王振下令就地宿营，遂陷入瓦剌军重围。

土木地势高，旁无水泉，堡南15里有小河，已被瓦剌军占领。十四日明军欲行，敌军已紧紧围困，不得动。人马不饮水已二日，掘井深二丈仍不见水，将士饥渴，疲惫不堪，十五日，也先遣使议和，英宗许之，瓦剌军佯退。王振立即下令移营就水，明军越壕堑而出，周旋之间，阵势大乱。南行未及三四里，瓦剌军乘机发动进攻，劲骑呼啸而至，奋长矛以击明

半，明军争先奔逃，竟不能止。众裸袒相蹈而死，蔽野塞川，明军全线大溃。英宗突围不得出，下马盘膝坐地上，被瓦剌军俘虏北去。英国公张辅，尚书邝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等数百人皆死。明朝50万大军伤亡过半。骡马20余万，并衣甲器械辎重，尽为也先所得。经此一役，明朝近百年积蓄起来的国力遭受严重削弱。

战乱中，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曰："吾为天下诛此贼！"

注　释

①《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②司礼监乃明朝24监中"最贵重者"。掌皇城中一应礼仪、刑名及管理当差、听事等杂役，并代皇帝管理内外章奏，代皇帝批答各类奏折。皇帝口述命令，则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以朱笔记录，然后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

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三二《土木之变》。

⑤三杨：指杨士奇、杨荣、杨溥。宣宗崩，英宗幼年继位，元老三杨受命辅政。

⑥洪武年间，朱元璋鉴于前代宦官干政之失，置铁碑于宫门内。铁碑高3尺，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⑦⑧《明英宗实录》卷一八一。

明

于谦守北京

土木之败，使明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幸有于谦等大臣力挽狂澜，北京保卫战获胜，使明朝渡过难关。

于谦，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出任御史，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升任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兴修水利，整饬治安，赈济贫苦，锐意兴革，深得民心。在官九年，又升兵部左侍郎。巡抚山西、河南时，“每议事京师，空橐（tuó 佗），以入”①，“未尝以一物交当路”②，以此得罪太监王振，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大理寺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求留任于谦，当地诸王亦请留，明廷方命于谦出任巡抚。

正统十三年，于谦被召入京，复任兵部左侍郎。翌年秋，瓦剌也先率军大举南下，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与尚书邝埜极谏，英宗不听。及土木命败，英宗被俘，京师大震。八月十八日，皇太后命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系宣宗次子，英宗朱祁镇之异母弟。英宗即位时封郕王。英宗出征乃命居守京师监

国)。郕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之事。"群臣聚哭于朝"③，莫知所为。翰林侍讲徐珵鼓吹天命，惑乱人心，曰："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④公开鼓吹逃跑。于谦严词斥责，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⑤于谦力主抗战，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爱国官员的支持。徐珵不敢复言。郕王、皇太后采纳于谦建议，乃定据守北京之策，任命于谦为兵部尚书，部署保卫北京事宜。

于谦少年时即敬佩仰慕文天祥的气节。有僧奇之，曰："他日救时宰相也。"于谦悬文天祥像于座位之侧，几十年如一日，并撰词赞扬："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忘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宁正而毙，弗苟而全。……孤忠大节，万古攸传。我瞻遗像，清风凛然。"⑥又作《石灰吟》诗一首："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当时国君被俘，大军压境，人心震恐。于谦不愿明王朝重蹈南宋亡国之覆辙，毅然肩负起力撑危局的重任。

于谦自八月十八日受命，至十月初瓦剌军大举进犯，一月之间，断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整顿军备，改新内政，招募民兵，选拔文官武将，加强关隘防守……

其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⑦。于谦于受命第二日，即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浙军，急赴京师守卫。同日，接受应天巡抚周忱建议：通州"仓米数百万石，可充京军一岁饷，弃之可惜，不如令自取之"⑧。遂奏请郕王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通州仓粮进京，

并令文武京官自九月至次年五月的饷粮，一律于通州取给，军人则预支半年。于是，各地军队陆续到京，军粮有备，京师人心渐趋安定。

诛杀王振余党、打击宦官气焰一事尤为大快人心。八月二十三日，郕王登午门代理朝政。廷臣请族诛王振余党。右都御史陈镒奏言："王振倾危社稷，构陷乘舆，请族诛以安人心。"群臣满怀悲愤，伏地痛哭。王振余党锦衣指挥马顺叱骂群臣，更加激怒群臣。给事中王竑跃起，奋臂抓住马顺头发，呼曰："若曹奸党，罪当诛，今尚敢尔！"且骂且咬其脸。群臣一哄而起，当场将马顺揍死。群臣又怒揍王振亲信太监毛贵、王长随，一时"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郕王惊恐不已，起身欲退，群臣不知所措，盖马顺等奸党被打死，罪有应得，而臣下动武于大殿之上，也绝非正常。于谦罢众直前，掖住郕王衣襟，请郕王宣谕："顺等罪当死，"揍死马顺等大臣皆"不论"。郕王又令缚王振侄王山至刑场，凌迟处死。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且查抄其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树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币帛珠宝无算。此事件起于仓卒之间，群情激昂，事态发展难以预料。于谦当机立断，处理得当，使形势迅速平定，于谦功不可没。当日，于谦步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执于谦手，不胜敬佩，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从此，上下更敬重于谦，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

九月一日，群臣奏请皇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郕王不肯即位。于谦正色上言："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如此始能制瓦剌之要索，放回英宗。"朱祁钰乃受命。六日即位，是为景帝，遥尊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

于谦整顿内政，加强战备，尽心竭力，为时仅一月有余，防御力量迅速增强，一改军民官员惊慌混乱局面为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是时君臣也能同心协力。曾有人攻击“帝任谦太过”。太监兴安为之声辩曰：“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二人?”

与此同时，瓦剌军也正紧锣密鼓，作好了进犯北京的准备。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初一日，也先及脱脱不花率领瓦剌军、挟英宗大举南下，进逼大同，诡称“奉上皇还”。大同守将郭登遣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矣。”⑨也先知大同已有备，不敢攻，转而南进。初三日破紫荆关。也先挥军入关，直指北京城。

瓦剌军兵临城下，京师戒严。初五日，景帝诏诸王遣兵入卫。初八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兵马，将士皆受节制。是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惶，人无固志，有言逃离北京，主张迁都南京者（徐珵）；有言挑筑京师外城城濠，主张紧闭九城门，坚壁以避贼锋者（总兵官石亨）。于谦力主出城抗敌，曰：“贼张甚矣，而又示之弱，是愈张也。”⑩

于谦遣诸将分率22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总兵官石亨阵于德胜门；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于谦本人驻营德胜门，加强主攻部队。部署既定，初九日，于谦传令九门：“临阵，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⑪并身先士卒，披甲戴胄，巡视指挥，以激励将士。于是将士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准备迎战。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抵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置英宗

于德胜门外空房内[12]。也先因明军阵容严整，不敢贸然进攻，遣使让明廷派大臣前来迎接英宗。借议和以探明虚实。明景帝乃派通政使参议王复为右通政，中书舍人赵荣为太常少卿，带羊酒出城至也先营，也先令英宗带刀坐帐中。也先及伯颜帖木儿（也先弟）等皆全副武装，披甲胄，张弓矢，引王复、赵荣进见。也先不受羊酒，取看公文，并语于王复等："尔小官，可令于谦、王直等来，并索取大量金帛财物。"景帝及部分廷臣欲议和，征询于谦。于谦斩钉截铁地回答："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13]在于谦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未能得逞。

十三日，瓦剌军攻德胜门、西直门受挫后，翌日，转而攻彰义门。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往彰义门迎击。明军"俱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次之"，挫败瓦剌军前锋，然是时明军数百骑为争功，自后跃马冲击，阵营大乱。瓦剌军乘机反击，明军败退，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追到土城。土城附近居民纷纷"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14]，瓦剌军受阻，适王竑、毛福寿闻讯来援，瓦剌军遥见援军旗帜，仓皇退兵。

也先深入京畿，初以为明军不堪一击，北京旦夕可下。然经五天战斗，瓦剌军四面楚歌，连战皆败，士气低落；明军自迎战以来，军民一心，屡屡胜利，士气旺盛。也先又闻明朝各路援军将至，恐断其归路，遂于十五日夜拔营北遁。也先率瓦剌军挟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命石亨等发大炮轰其营，瓦剌军死者万余人。于谦率军乘胜追击，夺回瓦剌沿途掳掠的百姓及财物无数。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除戒严。北京保卫战以明军大获全胜告终。明王朝转危为安。

也先败退后，阴谋侥幸取胜，声言要送英宗回朝。明主和派大臣也意欲议和，主战派大臣则倾向于妥协。于谦力排众议，指出也先企图借此向明廷索取财物，并说："社稷为重，君为轻。"同时派人申诫各边镇将帅，切勿中敌人诡计，严密防御。又选派将领，镇守边防重地。因此景泰元年（1405），也先多次出兵南扰均未能得逞。

也先本以为俘获英宗，奇货可居，可用以敲诈金银财物，也可用以威胁明廷退兵投降，不料在于谦主持下，边镇有"瓦剌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之制约，也先派使"保驾"议和时，大臣有"社稷为重，君为轻"之劝告，奇货已不成为奇，留住英宗，已无作用。景泰元年（1450）八月，瓦剌与明议和，放回英宗。

景泰八年（1457），英宗复辟，改号天顺，史称"夺门之变"。

于谦在土木之变以后，力撑危局，在北京保卫战中功绩最著。及英宗复辟，景泰八年（1457）正月，英宗以莫须有罪名将其斩。于谦遇害当日，"行路嗟叹"，"天下无不怨之"。查抄于谦家产时，"家无余资。独正室鐍钥甚固，后视，则上（景帝）赐蟒衣剑器也"⑮。

于谦之婿朱骥将于谦灵柩归葬于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长为人们恁吊。明末抗清志士张苍水，在其绝命书中高歌："国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表达出对爱国志士于谦无限敬慕之意！

注　释

①《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九《王振用事》。

③《明英宗实录》卷一八[illegible]。

④刘定之《否泰录》。

⑤《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⑥明叶盛《水东日记》。

⑦《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⑧⑨《明通鉴》卷二四。

⑩《明英宗实录》卷一八四。

⑪《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⑫袁彬《北征事迹》。

⑬《明通鉴》卷八四。

⑭⑮《明史》卷一七〇《于谦传》。

明

曹石之乱

英宗正统六年（1441）正月，任蒋贵为征蛮将军，太监曹吉祥监军，讨思任发。曹吉祥，栾州（今河北滦县）人，过去是王振门下，现为监军。这是内臣（宦官）掌兵权的开端。

正统十二年（1447）二月，任石亨为左参将，守万全（今河北宣化）。石亨，渭南（陕西渭南县）人，伯父石岩，任宽河卫指挥佥事，无子，石亨继承伯父事业，做他的儿子。石亨擅长骑射，有胆略，臂力强，提大刀轮舞如飞。每从征，挺刀先登，辄立奇功，官至都指挥使。石亨之侄，石彪骁勇能挽强弓，善挥斧，因从石亨征讨有功，授大同卫镇抚。1447年石亨做都督佥事，石彪为指挥使，跟随石亨参谋。十四年（1449）八月，太后命郕王总管国家大事，逮捕宣府总兵杨洪、万全、左参将石亨下锦衣狱。九月，郕王即皇帝位，将杨洪、石亨释放，命石亨总京营兵。十月也先侵犯京城，于谦、石亨分别在城北安营。也先纵骑兵剽掠，石亨击败也先，功为第一，也先连夜逃窜，石亨追击至清风店。也先十分畏惧，即将逃出倒马关。石亨使部下传言，石将军没有赶至倒马关，追击

的明兵是假冒石将军的名义。也先信以为真，回马迎战。石亨、石彪奋力合击，大败也先，这时也先才发现是中了流言之计。纷纷弃羊马辎重，从紫荆关夺路逃走。论功封石亨为武清伯，不久又提升为武清侯。石彪升为都督佥事，任大同左参将。

景泰元年（1450）闰正月，命镇朔大将军石亨、都督范广率兵出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不久召还。八月石亨、杨洪率师分道出紫荆、居庸关。开始设团营，派曹吉祥、刘永诚节制诸军，这是内臣总管京营兵的开端。

天顺元年（1457）正月，景帝病危，石亨见景帝委顿之状，与张軏、张𫐄商议，想复英宗皇位。又暗地约徐有贞勾结太监曹吉祥、蒋冕秉告皇太后，于谦与王文想立襄世子为东宫、请允复立英宗为帝。当与石亨等共议迎英宗复辟事时，徐有贞恐中途生变，乃诡词激石亨："于谦、王文已遣人迎襄世子矣。"又说："上已知君谋，将于十七日早朝执君。"①石亨决定采取行动，率他的群从子弟家兵，与曹吉祥等夜叩南城，迎英宗复辟。其时，景帝病卧，听到钟声，问左右是怎么回事，左右以英宗复位事实告。景帝"既知为上皇，连声曰：'好！好！'踰月，……帝崩于西宫"②。英宗复辟时，曹、石等诬谄于谦，英宗不忍，曹、石等认为不杀于谦无以为名，乃杀死于谦。论夺门功，石亨、曹吉祥又第一。于是进封石亨忠国公，召石彪赴大同做都督同知，充游击将军。石亨家人石宁等数十人，都授指挥千户、百户。曹吉祥晋升司礼监太监。曹吉祥侄曹钦封昭武伯，曹铎、曹铉、曹镕等一并任都督，这又是内臣子弟封爵的开端。四月将大同巡抚都御史年富逮捕入狱。英宗同李贤有以下对话："'年富何如？'贤曰：'行事公

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惮富，不得遂其私耳。'贤曰：'陛下明见，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归田里"③。五月，石亨擅自调回守关军，徐有贞、李贤上奏英宗，英宗令另外调遣军队去守关。

御史杨瑄弹劾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夺民田，并且说曹、石怙宠擅权。英宗对徐有贞、李贤说，杨御史如此敢言直率，真是国家之福。曹吉祥在旁听后，非常惭愧，事过，非常生气想治杨瑄罪，英宗不许。等到石亨出征归来，听说此事大怒，上告御史杨瑄言语不实，并说示意杨瑄弹劾曹石的是李贤和徐有贞。于是以言语激曹吉祥说："今在内唯尔，在外惟我，贤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④当初曹吉祥见石亨冒滥恩赏，非常不平，也常向皇帝揭发他的短处。这时听了石亨的话，开始与他联合。六月，御史张鹏、周斌交章弹劾石亨所做许多不法之事，奏折未及上，给事中王铉得知，秘密告诉石亨，石亨与曹吉祥驰马上奏，说张鹏乃是恶霸张永之子，现在他勾结御史周斌陷害忠良为张永报仇。英宗听后大怒，亲临文华殿，把诸御史传至殿前亲自询问。周斌手执弹劾奏章，边读边核对事实，对石亨的弹劾都有验证。英宗说，既然事实属实，你们何不早言？将张鹏投入锦衣狱，问讯濒死。

初，徐有贞做首辅，想立功自异，与石亨不合，李贤入阁以后大力支持徐有贞，知无不言，曹吉祥不能忍。适逢御史张鹏等已经下诏狱，给事中王铉、锦衣卫指挥门达上奏英宗说，耿九畴阿附徐有贞和李贤，唆使御史排陷石亨。曹吉祥再次乘间向英宗叩头诉说道，臣万死一生，迎圣上复辟，内阁重臣一定要害死我。边说边伏地痛哭不起，英宗无奈依了他的请求，逮大学士徐有贞、学士李贤、都御史耿九畴下锦衣狱。第二天

降旨贬徐有贞、李贤为参政，耿九畴为右布政。张鹏、杨瑄戍边卫。不久，英宗又说，最近只有徐有贞一人为我办事，李贤不能走，诏命李贤回京。

英宗以岳正值文渊阁。岳正为吏部尚书王翱推荐，被英宗召见于文华殿，破格录用。岳正向内阁走去，至左顺门，石亨、张軏从外边进来，非常吃惊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岳正不敢答，当时石亨、张軏已经很不平，待入宫拜见英宗，英宗主动对他们说，今天他选中一人入内阁，石亨等问为何人？英宗指出就是岳正。石亨、张軏无奈只得假意祝贺。英宗又问他们岳正官卑如何？石亨等奏答，如果陛下想提拔岳正亦不难，可以让他办数事试验一下，如果很称职，再提升也不晚。英宗默然，知亨等与己意不合。七月，有匿名书指斥时政。石亨、曹吉祥请皇帝出榜募能捕告者悬赏，令内阁撰榜文，岳正对英宗说："为政自有体，盗贼责兵部，奸宄责法司，岂有天子自出榜募购之理！"⑤当时曹吉祥侍侧，力请英宗出榜，英宗考虑再三，明示岳正所言极是。岳正再次得罪石亨与曹吉祥等。

初，岳正入值文渊阁，英宗曾问岳正，何以辅佐朝廷？岳正明言，今日内臣武臣权力过重，英宗深有同感。岳正退朝后，主动找曹钦、石彪，令其谢兵归第。钦、彪走告曹吉祥，吉祥垂泣免冠请死。英宗执意否认有令其谢兵归里之意，并责岳正漏言。岳正申辩说，我看曹、石两家有背叛朝廷之心，只不过现在抓不住什么根据，我想成全君臣共椎之情，所以让他们早自为计。英宗不悦。恰逢承天门水灾，英宗责成岳正下罪己诏。岳正在罪己诏中历陈奸邪蒙蔽之状，石亨见而怒，上言岳正谤讪朝廷，故请英宗谪岳正为广东钦州（今广西钦州壮族

自治区）同知。从上述史实亦可见英宗与曹、石之流的微妙关系。

石亨、张軏怙宠，总是强迫英宗答应他们的请求。一日，石亨率千户卢旺、彦敬入侍文华殿，英宗不识，问是何人？石亨说，这是我的心腹之人，迎圣驾夺门复辟，多靠这两人之力。马上请提拔他们做锦衣指挥使。工部侍郎孙弘，是石亨同乡，因石亨推荐而得官，又请求让他做尚书。英宗不悦说，暂时让他做侍郎，再次升迁就是尚书了。石亨出宫对人说，一次提升尚书有何不可？还要再迁！石亨对皇帝骄横无礼竟如此！英宗也深知石亨有不敬之举，但念功勋，不忍苛责。有一次英宗与大学士李贤谈到石亨，李贤认为，权不可下移，惟独断乃可，英宗说到石亨有夺门之勋。李贤立即表态，石亨只能说是有迎驾之功，"夺门"二字岂可传之后世？皇帝顺天应人，以复大位，何必夺门？难道内府之门可以夺吗？又说，当时也有人约我助夺门之事，我固辞不参与。英宗惊问其因，李贤答道，景帝不能临朝听政，群臣可以表请陛下复位。这本名正言顺，何至于行夺门之举？假如此事景帝得知，又不同意，加以责罪，曹石辈死无足奇，将把陛下置于何地？曹石辈不过想藉陛下之名图富贵，哪有扶保社稷之念呢？英宗恍然大悟。十一月，高明等人交章弹劾陈汝言，告他仗势乱法，赃私狼藉。英宗下令逮捕陈汝言，并将所获赃物陈列大内庑下，令大臣入视。英宗说，景泰年间，籍没于谦，家无余物，非常清苦，现今陈汝言任职不足一年，竟得贿赂如此之多！当时英宗大怒色变，石亨等低头不敢言。从此英宗渐渐感到于谦蒙冤，而开始厌恶石亨等人。二年正月，石亨、曹钦等请除太仆养马，太仆程信谏：如撤太仆马，一旦变生肘腋，马不备给，孰任其咎？

兵部亦以其言极是，诏复其事归太仆。初，于谦之死，皇太后不知，后传言谦欲迎外藩入京，英宗疑此事，多次询问石亨、张轨、曹吉祥，石亨、曹吉祥辈推托不知，委罪于听徐有贞所言，从英宗深恨亨辈不实，排谄忠良，四月，石亨以为遣文官督军务，武臣不得逞，请罢文官都督军务。文官除，边徼骚然，军无纪律，英宗大忌，对李贤说："当初我刚复位，石亨请除文官都督军务，奉迎者亦多言不便，今天我方知此事大谬藏诈。初，定远侯石彪屡有功北边，尝奏请建城威宁海子。总兵官遂为流言，称彪有异志。上疑彪，屡有功，屡召还。彪阴使大同千户杨斌等 50 人，坚请留为镇守。上知彪诈，下彪诏狱，词连石亨，念其有功，宽宥不罪，惟罢其兵权，令归第。"

初，亨被英宗疏斥，怀恨于心。曾在大同看紫荆关形胜时对左右说，如果守此关，据大同，京师之兵无法及此。一天，退朝回府，对卢旺、彦敬说："我现在的官，你们想当否?"旺、敬不解其意，回答说："我们现在的官，都仰仗您才做成，怎敢有其他想法?"石亨大胆地说："陈桥兵变，史不敢言篡。如果你们肯帮我，我现任官职，岂不就是你们的吗?"旺、敬闻言，惶惧汗流，莫敢对。后来石党童先蛛其叛，石亨说，现在天下都司还没有撤换完，等撤换完毕，再反不迟。恰逢石彪下狱，罪及石亨，亨阴谋反叛日急，事情败露也渐多。石亨家人上告亨急欲反，逮投之狱，死狱中。斩石彪于市，其党童先等俱被牵连受死。

石亨败后，英宗下令凡由石亨冒功提拔者，可以自首革去职务。曹吉祥认为自己与石亨同功，石亨败后且不得独完，于是每天犒赏部下倚为腹心。部下也想自己也是冒功因曹吉祥而升晋，一旦不测，身且随后，于是与曹吉祥结为死党。曹吉祥

有位门客叫冯益，有一天曹钦问他："自古有宦官子弟做天子的吗？"冯益立即回答："魏武曹操不就是宦官曹节之后吗？"曹钦闻言，大喜，出其妻与冯先生行酒。从此暗地准备谋反。锦衣百户曹福来曾在曹钦家服役，常出外买东西。曹钦担心他走漏风声，先派曹福来妻告曹福来病狂出走，锦衣指挥逯杲上奏英宗，奏准抓捕曹福来。曹钦又差人追获曹福来。以棍棒箠楚濒死。廷臣上奏英宗弹劾曹钦残忍，英宗同意此奏，发表弹劾敕文给曹钦，令其速改过，否则罪无赦。同时下谕廷臣要守法，不能学曹钦那样专纵无礼！

初，石彪得罪，皇帝也是先告谕群臣，曹钦内心恐惧。再加上逯杲监视曹钦十分严密。适逢孛来入犯甘、凉二州，英宗命怀宁伯孙镗统领京军前往征讨，兵部尚书马昂做监军。即将择日启程，于是曹钦以为机会已到，与诸弟兄及其党羽都督伯颜也先等数十人相谋，曹钦说，现在朝廷正在追查我，如果不早反，我就要成石彪的接续人了。于是分别带领死士番汉军500人，约定当天早朝开门，就拥进宫去杀死孙镗、马昂，夺门而入。这时曹吉祥禁兵可为内应。决定后，当夜让部下降丁痛饮，并厚赠予。饮酒方半，正交二鼓，都指挥完者秃亮（又名马亮）从曹钦宴席上逃走，见恭顺侯瑾与广义伯琮，告曹钦谋变之事，瑾、琮急走告镗，孙镗急锁曹吉祥，报英宗知此事，英宗命闭宫门，孙镗将吉祥縋入宫中锁系。曹钦不知此事，与其弟曹铉、曹镕、曹铎率番将伯颜也先到东长安门，门闭，曹钦知事泄，立即召死士驰至逯杲门，杲方出，杀而碎其首。逯杲原是曹吉祥党，受恩最厚，后来为英宗监视曹钦，钦恨之入骨。都御史寇深也与曹钦有友情，后来与言官上疏弹劾他，曹钦也很恨他。与曹铎驰入西朝房搜索寇深，从肩膀把寇

深劈成两半。当时长安街中甲卒奔跑，入朝者以为是西征军，当打听到是叛兵，纷纷散去。大学士李贤待朝东朝房，曹钦跑来搜索他，门外喧闹声汹汹。李贤出门看，披甲士兵手执钢刀者数人，欲砍贤肩而伤其耳，又有人以刀触其背，不久，曹钦持逯杲人头来，喝斥部下放下刀。亲自拉住李贤的手说，今天激起兵变，是不得已而为之，请代我草疏进奏皇上。不久，又把尚书王翱抓来，李贤在王翱家找来纸笔写草疏。与王翱一起投进长安左门门缝中，长安左门仍坚闭不启。曹钦纵火烧门，守卫军拆御河的岸砖垒门死守。曹钦往来啸呼，几次欲杀贤，终不敢，舍之驰去。又去搜索马昂，不得。时间已经到了凌晨。怀宁伯孙镗对其子说，你沿街呼喊，有狱贼反，抓获者厚赏，西征军即可汇集到一起。不久集中了西征军两千人，甲兵俱全，孙镗大喊："你们看不到长安门起火了吗？这是曹钦反叛，兵很少，杀贼者重赏。"工部尚书赵荣被甲跃马奋呼市中，高喊杀贼者随我来，跟随者也有数百人。孙镗追至东安门，曹钦退屯东华门。曹铎迎战，孙镗军勇猛难敌，叛军披靡，战至辰时至午时，斩杀曹铎，曹钦也中流矢，策马逃走。恭顺侯吴瑾带五六骑出来看敌情，突然遇到叛兵，力战而死。曹钦回兵驻东大市街与朝廷抗拒到酉时，曹铉用百余骑往来驰突了三次，官军阻击包抄，他的兵马溃散，孙镗发神臂弓射叛军，终于追杀了曹铉。孙镗子孙軏遇钦奋战身亡。曹钦见大军渐至，惧，率骑攻朝阳门，未克，又走安定、东直、齐化诸门，门尽闭，大雨，夜窜归。孙镗督兵与曹钦战，马昂以精兵殿后。会昌侯孙继宗兵又集，鏖战。官军奋呼拥入钦宅，曹钦见情态迫急，投井而死，其弟曹铎被斩杀。孙镗等屠其家，亲党一时尽死。捷报上达英宗，英宗于当天下午在午门监刑，下曹吉祥都

察院狱，次日磔于市。并追磔钦、铎、鎔、铉、伯颜也先、冯益、汤序等。其余家属均流放于岭南。钦妻父贺三老，见钦势盛，绝不与交。钦曾为贺三老谋一官职，三老力辞不受，钦败，姻党株连，三老获免。八月，追加孙镗等爵，追封吴瑾、寇深等死难者谥号。以擒贼诏示天下，开言路。时李贤奏言："自古治朝，未有不开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恶其攻己，必欲塞之，以肆其非。"⑥英宗认为石亨、曹吉祥断言路，阴异变，罪不容诛，宜列之于诏，使天下闻知。曹、石辈冒功恃宠，欺凌天子，百僚侧目，终启肘腋之变，自取灭亡。

注　释

①《明通鉴》英宗天顺元年。

②《明通鉴》景帝景泰八年。

③④⑤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六《曹石之变》。

明

弘治君臣

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九月，皇太子朱祐樘即位，是为孝宗。弘治元年（1488），将妖僧继晓发原籍为民。妖人（专事宗教迷信的人）壹孜省伏诛。太常卿道人赵玉芝、邓常恩戍边，番僧国师领占竹等悉革职。斥佞竖梁芳、陈喜等往孝陵司香。先朝佞臣，放斥殆尽。十月，召兵部尚书王恕为吏部尚书。恕至京，庶吉士邹智对王恕说，过去，大臣见不到君王，所以事事苟且，你应该先求见皇帝，就时政之弊，历陈上前，也许对过去的失误有所补救。王恕很同意他的建议。当时王恕在家乡很负众望，他在家乡做官时，把弊政都一一釐正过来。十一月，宪宗时大学士万安被削职。先是万安勾结万贵妃进奸僧继晓，讨宪宗欢心，以巩固他的宠幸。又与李孜牧结纳，表里为奸。孝宗做太子时，多闻万安的恶迹，此时，孝宗在宫中找到一个箧子，都是密术，署名"臣安进"。孝宗遣人拿到万安跟前说："是大臣所为乎？"①万安惭愧流汗，不能出一语。不久，上下都交章议论抨击，于是罢免了万安。礼部右侍郎丘濬进所著《大学衍义补》，被提拔为礼部尚书。丘濬以

真西山《大学衍义》有资治道，而缺治国平天下的部分，丘濬就采取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内容，分类汇集，附以己意，名《大学衍义补》，书成，呈上，孝宗览后十分高兴，批答道："卿所纂书，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辅政治，朕甚嘉之。"②乃命礼部刊行。

孝宗弘治元年（1488）正月，召南京兵部尚书马文升为左都御史，孝宗为东宫太子时，素知其名，至是，文升感殊遇，奋励效命，知无不言。二月，孝宗行耕籍田礼完毕，与群臣飨宴，教坊以杂伎承应，有时说一些粗野语言。马文升厉色说："新登极的天子应知稼穑艰难，岂能用这些俚俗之物渎乱宸聪！"立即把他们斥退。御史因一般冒犯被下狱。马文升认为皇帝即位之初，不宜罪言官。于是御史得释。时论一致赞扬这件事。先是，张吉、王纯、丁玑、敖毓元、李文祥均以直言被远谪，南京吏部主事储瓘上言："这五人，即以直言获罪，必不变节辱身。现在五人都被抛弃到岭南，毒雾瘴气，与死为难，情实可悯。请皇上将五人置之于社会风气良好之地，那么他们的言论风采必有可观，与其现在寻求敢谏之人，不若先起用这五人。"孝宗皇帝命吏部一律起用。

吏部尚书王恕说："正统以来，每日只上朝一次，臣下进见，只不过片刻即止，皇帝再聪明，怎能把天下所有事都察清楚，只不过把真情寄托于左右近侍，左右之人与大臣相见不多，又怎能识大臣贤否。有的听到有毁誉之言，有的出于自己好恶之私，要想得知真情，必须陛下每天去便殿，宣召诸大臣详论治道，共同谋议政事，或者让他就某事专门发表看法，或者亲自看看他的奏章。这样做不但能知大臣贤否，还可以随材任用，也可以从他们那里受到启发，变得更加高明。"马文升

条陈时政十五事：选举廉洁有才能的人担任监察刑法之官；禁止占夺公物和惩戒贪官污吏；选择铁面无私之人掌审判量刑；申明立法意图来管理国之常务；驱逐术士妖人以防止迷信扇惑；要求效率以革除奸弊；选择好的地方郡守县令来巩固邦国社稷之根本，严格考核以示奖赏；禁示公罚以砥砺士风；广泛储备和积蓄以满足国用；抚恤士人以防止后患；清查僧道以杜绝游食之人；广布恩德以安定四裔；节制浪费以缓解人民负担；加强军备建设以抵御外侮。孝宗非常高兴，完全采纳，逐条责令施行。特别是节约用度一条，马文升特加上批注："一应供应之物，陛下量减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③言语尤其深切感人。六月，王恕建议皇帝禁止文人不合情理起用私人，孝宗听从。五月，以刑部侍郎彭韶为吏部左侍郎。王恕做尚书，得彭韶为辅佐，可以完全做到为政不避权贵，求情妄法的路子悉被杜绝。六月京城及通州久雨成灾，庐舍倒塌，死者甚众，诏求直言。马文升上疏请求禁奇巧、却珍贵、慎毁誉、重咨询、抑外戚、开言路。诏下所司议论执行。

弘治三年（1490）三月，内廷宦官求建鹰坊、牧马场，求拨地千顷。户部尚书李敏阻止说，牧马场、鹰坊至多二百顷，其余都是民田，怎可以夺耕种之地为飞走之所！孝宗听从谏议。十一月，诏大臣极言时政得失。吏部侍郎彭韶说，近侍要整顿，任官要慎重，发展农业生产，减轻苛捐杂税。孝宗认为很好。礼部尚书耿裕上时政七事疏，孝宗认为有防微杜渐之意。左侍郎仉岳认为，当今民日贫，财日匮，应把节俭作为头等大事抓。要节俭必须减少斋醮、停止对皇宫特殊供应、减少营缮工程。孝宗都采纳。

弘治五年（1492）三月，巡抚保定都御史史琳奏，宦官外

戚借宫廷供应之名夺占百姓园田，孝宗下诏立即退还民园。四月，大学士丘濬言时政之弊，拟为二十二条，极言朝廷应抑遏奸言，杜塞希求，节财用，重名器等，共万余言，孝宗览奏甚悦，以为切中时弊。太监李广认为城垣完工，功绩甚大，请求量加内官俸级，王恕力持不可，停止加内官俸级。五月，遣廷臣持内帑银，赈杭、嘉、湖水灾。十一月停止生员用钱买官的条例。王恕针对此条上奏说："永乐、宣德、正统间，天下亦有灾伤，各边亦有军马，当时未有开纳事例，粮不闻不足，军民不闻困弊。近年以来，遂以此例为长策。既以财进身，岂能以廉律己，欲他日不贪财害民，何由得乎?"④弘治六年(1493)八月，中官李广以左道受宠，谢迁，徐溥等力言其邪妄，引唐宪宗、宋徽宗为戒，劝止烧炼斋醮，孝宗纳谏俱止之。

弘治十年(1497)二月，孝宗屡游后苑，侍讲王鏊给皇上讲文王不敢盘于游畋。孝宗醒悟，并召中官李广说，今天讲官所指，就是你们这帮人。令其好自为之。停止了游览后苑。六月，兵部尚书马文升请修武备。八月，外戚张氏有河间赐地400顷，还想并吞近旁民田千余顷，同时请求每亩加税银二分。户部尚书周经认为，河间之地多低洼，因为久旱，农民就占用干涸河滩地去耕种，一旦雨涝就马上被淹没，如果对这种地加税，将会留下无穷的弊害。疏上三四次，孝宗听其言。后有雄县退滩地，献给东宫做庄田，孝宗根据周经前奏，把占民滩田者都判了罪。一时贵戚近倖类似的陈请，一律依法判罪；此后，贵戚近倖们稍有收敛，不再疯狂占夺民田。

弘治十一年(1498)十月，太监李广因左道见宠任，权倾中外。后来幼公主出痘死亡，太皇太后归罪于李广。李广畏罪

饮鸩而亡。孝宗下令搜查李广家，得到李广纳贿簿一本，其中有，某送黄米几百石，某送白米几千石。孝宗问左右，李广有多大肚子，能吃多少，为什么一送就如此之多？左右回答说，黄米是指金子，白米是指银子。孝宗大怒，下诏抄家治罪。十一月，议修清宁宫，兵部尚书马文升请求调拨宫廷银库钱，不要为此征派百姓，同时停止到四川采伐木材。孝宗同意。六月，刑部侍郎屠勋上告寿宁侯夺占河间地区民田，上奏中说，食禄之家不言利，况且河间又是太后诞毓之乡，而与小民争尺寸之地，很不妥。孝宗非常满意屠勋敢于直言切谏的精神，采纳了他的建议，清退所占民田。

弘治十四年（1501）正月，陕西延安、庆阳二府连日地震，有声如雷，压死人畜无算。于是兵部尚书马文升认为，陕西与敌为邻，延、庆二府又近河套，今地震不已，可能为外寇所乘。小王子部落，有精兵数万，他们的酋长和硕是狡黠枭雄，往往以诈计败官军，为患非小。他认为当时“海内民困财竭，兵衰将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正安内攘外之时，修德弭灾之日”。他请求朝廷要“行仁政以养民，讲武备以固圉，节财用，停斋醮，止传奉冗官，禁奏乞闲田，撤还陕西织造内臣，振恤被灾之家”⑤。孝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八月，小王子、和硕等在边境攻城陷堡袭击官军，形势十分紧张，孝宗认为军兴缺饷，屡次在朝廷与诸臣论议解决之法。大学士刘健等认为：“天下之财，其生有限。今光禄岁供增数十倍，诸方织作，务为新巧，斋醮日费数万，太仓所储不足饷战士，而内府取入动辄四五十万，宗藩、贵戚之求土田夺盐利者亦数千万计。土木日兴，科敛不已。传奉冗官之俸薪，内府工匠之饩廪，岁增月积，无有穷期，财安得不匮！愿陛下绝无益之费，

躬行节俭，为中外倡，天下幸甚!”⑥孝宗又一次虚心纳谏。兵部尚书马文升劝孝宗积金帛以备缓急，罢斋醮以省浪费。终止传奉官下各地索贡，严禁宗藩贵戚奏讨占地，撤回陕西织造内臣，以苏军民之困。孝宗对他的谏议大加表彰。十月，改马文升为吏部尚书。

弘治十五年（1502）正月，朝廷对全国官吏进行一次大考察。孝宗对马文升说：全国主管人事的官都集合到京城，你要用心对他们进行采访，既不能宽纵也不要枉罚，彰明朝廷赏罚升迁。马文升说，陛下图治如此，这是社稷宗庙的大福，他怎敢不尽心尽职！从此，淘汰了不称职者二千余人，都罚如其分，天下吏治为之整肃。先是，刘大夏在广东、广西掌军务。一岁后求解甲归田，不许。当刘大夏廷谢时，孝宗在帷殿召见，孝宗说，我素来重用你，而你却多次辞疾，原因如何？刘大夏答以老病，且民穷财尽，万一不虞，责在兵部。刘大夏认为自度力不足办，所以谢职。几日后，又问，朝廷征敛很有分寸，何至于民穷财尽？刘大夏认为光是宫廷常贡铎木，香药等，就已花费钜万：孝宗说，如果你早报，早已停止常贡了。其他征敛也都可以一一议革。一天孝宗又问，两广各卫所战士是否强勇可用？刘大夏回答，以往他只是说民穷，其实士卒也苦不堪言，如何谈锐勇！孝宗又问，士卒在卫有军粮，戍征有行粮，何以言穷？回答：江南漕粮运转困难，江北京城团练供应紧张，其他困难又何止于这几项？况且所谓月粮、行粮，一半由军队将帅共同消耗享用，所余能不穷吗？孝宗听后，大为感慨，说：“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⑦于是令九卿大臣，各以其职言军民弊政，有选择地进行改革。十月，孝宗想在近畿地方团操人马，做左右掖。问刘大夏，刘大夏认为京西

保定可团操人马。于是把保定两班军一万人，发回卫团操。于是有飞语帖在宫门，诬骂刘大夏。孝宗召刘大夏给他看。并说，宫门外人怎能到达？一定是内臣得不到私自役使军队的机会，因此帖飞语诬人。又问刘大夏，兵饷何以经常匮乏？刘大夏回答说，我在两广之时，大城的抚、按、总兵三司所费，不能敌一中贵人，兵饷如何不乏？孝宗认为中贵监军是祖制，不宜遽削，而必会廉如邓原，麦秀者充补，否则就暂且缺额。孝宗再次与大夏谈，诸司都已详尽说到所存弊政，恐怕哪一司也赶不上御马监、光禄寺。刘大夏说，皇上知弊详尽，很好，要想除弊兴利，唯在独断立行而已。最初，光禄供奉内府，自有常额。成化以来，内员渐多，常供不足，于是责成京城邸店操办，逼索甚苦。刘大夏此时揭露光禄寺每日操办用度烦费，杀牲数百，既损民财，又失爱物之仁。孝宗得悉，恻然怜悯小民之苦，立即敕兵部侍郎，同给事御史清理裁革。光禄卿艾璞赞扬刘大夏说："刘东山此奏岁省光禄金钱八十余万。古称仁人之言其利溥，此之谓与！"⑧然而中官愈侧目刘大夏。

弘治十五年（1503）五月，兵部尚书刘大夏因言兵政弊端，未能悉革。乞退，不准。令开陈所言弊端。刘大夏条陈十事，孝宗览后非常高兴，命所司一一付之施行。孝宗又召刘大夏入便殿，孝宗说，有些事当否施行，很想与你商议，又因为不是兵部事而后止。今后无论当行当罢，你可以用揭帖（从内阁直达皇帝的机密文件）告知。刘大夏以为揭帖是非常手段，易生弊端，不可为后世法。事之可否，可以外付府部，内咨阁臣，不宜以揭帖为常法。孝宗完全赞同。孝宗曾问刘大夏，何时天下太平？刘大夏以为，求治不宜太急。用人行政就召内阁和执政大臣面议后施行，但求顺理以致太平。当时刑部尚书闵

珪持法忤旨，孝宗与刘大夏谈及此事怒气不止。大夏说，人臣执法，贵在效忠朝廷，闵珪所作所为无须惊异。并以远古虞舜皋陶之事为喻。孝宗沉思片刻方言：闵珪执法过于严格，而老成之人不可轻弃。于是准行其所奏。一日，孝宗召见阁臣于便殿，论及理财，李东阳极言盐法大坏是由于乞请私贩者众。刘健说："太祖对茶法始行，驸马都尉欧阳伦以私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论事，谁敢为陛下言者！"⑨此时，孝宗在位久，更加明习政事，多次召见大臣面议。而刘健等人竭诚尽虑，知无不言。他们奏请之事，无不采纳。每次进见，孝宗辄斥退左右。有人在屏封后窃听，但听见孝宗连连称善。召大学士刘健等议日讲事。孝宗说："讲书须推明圣贤之旨，直言无讳。若恐伤时，过为隐覆不尽，虽日进讲，亦何益乎！"⑩刘健说："我们如果不敢言，其余百官没有一个是敢言的了。"孝宗称是。

弘治十八年（1505）正月，孝宗召兵部尚书刘大夏，左都御史戴珊等面议政事。戴珊乞退，孝宗不允。问，为什么急于离去？戴珊不敢言，刘大夏说，珊确实有病。孝宗说："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为朕留耶？且天下未平，何忍舍朕！"⑪孝宗说罢，泫然出涕。珊与大夏都叩首涕泣。戴珊出宫后对刘大夏说，我一定要尽忠朝政，殉于本职！

明弘治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民族和睦，政治较为清明，孝宗励精图治，有一班才德兼备的大臣竭诚辅佐，如王恕、彭韶之冰鉴，马文升、刘大夏之练达，刘健、谢迁之老成，王鏊、丘濬之文章，闵珪、戴珊之宪刑。弘治君臣之治，上已略述。十八年（1505）孝宗病重召刘健等十余人为顾命，托以东宫说："东宫聪明，但年幼，好逸乐，诸先生辅之以正

道，俾为令主。”⑫刘健等叩首应答：“臣等敢不尽力！”⑬翌日，孝宗死。

注　释

①②③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⑤⑥《明通鉴》卷三九，孝宗弘治十四年。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⑨《明通鉴》卷四○，孝宗弘治十六年。

⑩⑪⑫⑬《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二《弘治君臣》。

明

武宗嬉游

武宗于1506年，改年号为正德元年，即位之初，一仍旧例，顾命协和，天下晏安，四月，英国公张懋在上奏中开始提及："仰惟皇上嗣位以来，日御经筵，躬亲庶政，天下喁喁望治。迩者忽闻宴闲之际，留心骑射，甚至群小杂沓，经出掖门，游观园囿，纵情逸乐，臣等闻之，不胜惊惧。"①即位刚四个月，武宗就开始微服出宫，[illegible]

频幸监局（内官太监办事机构），泛舟海子（京郊游览胜地之一）；三、无事鹰犬弹射；四、无纳内侍进献饮膳。七月，宦官利用武宗擅权现象已很明显。南京御史陆崑上疏言：“自古宦竖欲擅主权，必先蛊其心志，……陛下嗣位以来，天下喁然望治，乃未几宠幸阉寺，颠覆典刑。太监马永成、魏彬、刘汉、傅兴、罗祥、谷大用辈，共为蒙蔽，日事宴游……廷臣屡谏，未蒙省纳。若辈必谓宫中行乐，何关治乱，此正奸人蒙君之故术也。”②从奏折文中可看出，正德元年七月，阉宦内臣已开始掌握皇帝。为劝武宗回心向治，陆崑更痛切地说：“陛下广殿细旃，岂知小民穷詹蔀屋风雨之不庇？锦衣玉食，岂知小民祁寒暑雨冻馁之弗堪！驰骋宴乐，岂知小民疾首蹙额赴诉之无路！……夏秋亢旱，江南米价翔贵，京城盗贼横行，可纵情恣欲，不一顾念乎？伏望侧身修行，屏永成辈以绝乱源，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③当月，司礼监传旨，以大婚礼需银四十万两。尚书韩文以户部库空虚，请先发十万两。监察御史赵佑言，皇帝大婚，左右必以此为口实，将肆无厌之欲，用如泥沙，坐致耗国。诏许减四分之一。立夏氏为皇后。自大婚后视朝更迟。刘健说，近两月来，或日高数丈才视朝，侍卫执役人等不能久立，俱纵横坐卧，弃杖满地，四方朝见官吏，外国朝贡使臣，疲于久候，不但精神困倦，而且过时误事。言官揭露宦官刘瑾的罪恶说：“内臣刘瑾等八人，奸险佞巧，诬罔恣肆，而瑾尤甚，日以荒纵导陛下。……引车骑供执鞭之役，列市肆而亲商贾之为。致陛下日高未朝，漏尽不寝。此数人者，方且窃弄威权，诈传诏旨；放逐大臣刑诛台谏……。”④可见武宗嗣位不及一年，则嬉游忘政，权倾阉宦，造成了政治腐败与危机。

正德二年（1507）八月，作“豹房”。武宗被宦官蛊惑，在西华门别构院落，筑宫殿。而造密室于两厢，勾连栉比，称做“豹房”。命建市场，身穿商人衣与群小贸易，一手持帐本，一手端算盘，与买主争利喧吵，还令市正调节。左右簇拥入“廊下家”，所谓廊下家，就是宦官在甬道上张设的酒肆。武宗坐在当垆妇女之中，武宗一到，娼妇妖艳，杂出蜂拥而入，醉后宿其处。到此时，“豹房”已成为武宗朝夕沉溺之所，堪称淫荡之宫，自呼为“新宅”，日召教坊乐工入“新宅”承应。武宗淫虐之行使内外廷臣侧目，民间谣诼四起，议论纷纷。

正德五年（1510）六月，武宗自称“大庆法王西天觉道圆明自在大定慧佛”，让有司铸印。内臣诱武宗事佛，故有是命。八月，刘瑾谋反事发。杨一清举发其事，旋籍刘瑾家。初，武宗不欲诛瑾，及抄其家，得金银累数百万，珠玉宝玩无算，并得衮衣、玉带、甲杖、弓弩诸违禁物，又见其常持扇内藏利匕，武宗大怒，厉声喊：“奴果反，趣付狱。”⑤六科给事中谢讷、十三道御史贺泰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请亟赐诛戮。武宗同意，令法司、锦衣卫会百官审讯于午门外。

正德七年（1512），武宗赐义子127人，皆姓朱。旋又增建豹房。工部上疏说，建造豹房，至今所费白金已达24万余两。今又令增修房屋200余间，现国乏民贫，何以为继？求量减其半。不允。武宗每岁张灯，费数万。至是宁王宸濠另作奇巧来献。令所遣人入宫悬挂，将灯附于柱上，再于庭轩间设毡篷，贮火药其中，偶不慎，延烧宫殿，乾清宫以内都成灰烬。武宗往豹房临视，回顾火焰烛天，笑语左右说，不过是一团大烟火。后武宗下诏罪己。户科给事中已经认为，乾清宫是陛下的正当寝宫，陛下舍乾清宫而远处豹房，忽视生太子而蓄养义

子，疏远儒臣而亲近番僧，轻朝政而创开酒店，信童竖而日事宴游，使得君臣隔阂，纪纲废弛。建议诏大臣研究恢复朝纲，退朝之暇，要端处寝宫，四时庙享要亲主其事，义子番僧，俱罢遣，豹房酒店，一并拆除。南京十三道御史汪正等上疏言："陛下嗣位九年，储位尚虚。请择宗室幼而贤者一人，置之左右，以代宗庙之礼，尽晨昏之职，俟皇子诞生，遣之归国。"⑥一时间建储问题成了满朝文武忧虑的焦点之一。

正德十年（1515），俗尚奢华，宴会丰腆，居室宏丽。当时大臣设宴，一席千金。这种风俗，多由武宗开其端，因此虽屡有禁令，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六月，武宗又常自西安门出京城，经宿而回，不知临幸何所。皇帝不在宫中，政位空虚，道路相传，众口藉藉，满朝文武心志惶忧，神魂飞越。十一月，左右言西域胡僧能知三世人，谓之"活佛"。武宗欲见，命太监刘允往迎。允行，带珠琲、黄金供具、金印袈裟，及其徒馈赐钜万。敕允往还十年为期，所携茶盐数以千万计。越两月入其地，番僧号"佛子"，恐中国人诱害，不肯出。允部下俱怒，想劫持前来，遭番人夜袭，尽夺宝货器械以去。死军官二人，士卒数百人，伤者一半，允乘马疾走仅免。

正德十一年（1516）二月，给事中潘埙上疏：传闻西安门外积庆、鸣玉二坊居民议论纷纷，认为朝廷有所兴作；又有人说要添教场；又有人说想创造私第。京城军民房屋都吞并于势家，两坊间帝居以为固，这次也不能幸免。想必是左右近幸，又出新奇之事蛊惑圣心，请说明实情，以安坊民之心。当时因四镇军操练，毁二坊居民，造皇店酒肆，建义子府。武宗为非作歹，殃及二坊居民，因此潘埙才有此请。

正德十一年（1516）三月，内旨授马昂为右都督。昂初为

延绥总兵官，以奸贪骄横被弹劾罢官，有妹，善歌能骑射，嫁指挥毕春，有娠。马昂依仗江彬之势夺回其妹，进于武宗，召入豹房，大宠。升马昂为右都督，其弟马炅、马杲并赐蟒衣、大珰，武宗及内臣都称之为舅。赐宅太平仓东，势震京师。都给事中吕经第认为，皇帝如为皇储打算，应选世族之女备嫔御，奈何溺卑污以自亵！京师到处传闻，马昂及其子弟，出入宫禁，肆无忌惮，又树立徒党为羽翼，小人之情无厌，如不早治，后悔莫及！请求诛戮马昂，斥逐所入孕妇，以息人言。

御史徐文华说，中人之家尚耻再醮之妇，令万乘之尊为此，反之于心则未安，宣之于口则不顺，传之于天下后世则可丑。他认为出此主意进淫妇者，当族。都给事中石天柱上疏言，以再醮淫妇之子为嗣，有违天地神祇，举朝文武天下臣民之意，“藉使以陛下威力成于一时，异日诸王宗室，肯坐视祖宗基业与他人乎？内外大臣，肯俛首立于其朝乎？望亟遣出，以清宫禁，消天下谤”⑦。武宗从数骑过马昂宅入饮，酒酣，召马昂，马昂以妾病辞，武宗大怒，马昂惧，与太监张忠勾结进其妾杜氏，立即宣旨升马昂弟马炅为都指挥，马杲为仪真守备。马昂大喜过望，又进四美女谢恩。时江彬得宠，多次诱导武宗远游。并说，宣府乐工多佳丽处子，还可以巡边，做到远游有名。第二年果然有宣府之幸。

正德十二年（1517）七月，武宗听取江彬之言，准备到宣府巡视居庸关。御史张钦认为，这次北巡，实欲亲征，岂知北寇猖獗，很易酿成英宗己巳之变。匹夫犹不自轻，奈何以宗社之重，身蹈不测之险？现今内无亲王监国，又无太子临朝，国家多事，灾潦频仍，若起不虞祸变，而陛下“观兵绝塞，臣窃危之”⑧。八月，武宗微服至昌平。大学士梁储等追及沙河，

上疏请还，不纳。旋至居庸关。时武清、东安等县，芦沟桥、清河店等处俱有盗贼。京城之内东直门诸坊，强贼白日剽杀。立春，武宗命迎春于宣府，备诸戏剧。又饰大车数十辆令僧与妇女数百杂载戏暱，观后大笑以为乐。

正德十三年（1518）正月，武宗自宣府还京，群臣迎驾于德胜门，武宗驰马自东华门入，宿豹房。不久又至京郊南海子，夜，宴文武群臣及四夷朝使，以“亲征”所获刀械衣器示群臣纵观。三月，至昌平。四月武宗在密云，民间竟传上欲括子女，敛财物以充进奉，所至逃匿。五月，车驾至喜峰口，旋回京师。七月，武宗又将北巡塞上，传旨特命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率六军往征。令内阁草敕，而“朱寿”者，武宗自命之名。武宗以敕命为儿戏，震动京师！内阁大臣、九卿及科、道官集于左顺门，泣谏不可。不纳。旋，复命兵部议加威武大将军“朱寿”为公爵。满朝文臣啼笑皆非。车驾度居庸关、历怀来、保安诸城堡、驻宣府。初，武宗以豹房为家，及江彬辈导入宣府，武宗命造行宫，运豹房子女珍玩充实其内，甚乐，每称“家里”，还京后亦念念不忘。八月，武宗自万全左卫历怀安、天城、阳和至大同。驻大同。在大同又降敕自封为镇国公，岁支禄米5000石，会吏部遵敕奉行。十月，车驾渡河入榆林。冬，又自榆林幸绥德州，幸总兵官戴钦宅，寻纳其女，都是江彬所诱。武宗自榆林，历米脂、绥德渡河至石州、文水。车驾至太原。先是，武宗在偏头关，索女乐于太原。晋府（太原）乐工杨腾妻刘氏，善讴，武宗载以俱归，大见宠幸。左右暗地调戏，刘氏一笑而解。江彬与近幸都事之以母，称“刘娘娘”。武宗自贱如此，威信日下。

正德十四年（1519）二月，大祀南郊，礼毕，仍出猎于京

郊南海子。三月，武宗决意南巡，群臣惶惧，计无所出。宁王宸濠反，武宗将亲征，兵部尚书王琼等谏止，不准。八月，亲征南巡，命草威武大将军制，又以江彬为威武副将军，并下内阁。车驾发京师，先至涿州，又至保定府，驻保定。宴于府堂，巡抚都御史伍符及巡按、御史，管粮立事俱侍宴行酒。武宗与伍符为藏阄之戏，符探得阄，武宗不悦，饮符至醉，乃大笑，天子之威丧尽。不久，车驾至临清。武宗南行时，刘姬病未从行，约以玉簪召。武宗过芦沟桥，驰马失簪，索而不得，至临清，遣使召姬，无信约，不肯出。于是武宗复自临清北上，乘单舸晨夜疾趋至张家湾，载刘姬与俱南，从官俱不知，往返踰月。武宗发临清，过济宁，至徐州。又乘龙舟自徐州顺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宿于太监张阳宅。当时武宗沿途捕得鱼鸟，分赐左右，凡得一鳞一毛者，各献金帛为谢。于是在清江浦钓鱼数日，十一月，至宝应，渔于氾光湖。旋至扬州。武宗行渔，得一巨鱼，戏言值五百金，江彬将鱼送知府蒋瑶，责令出五百金。蒋瑶持其妻簪珥及内衣进献，说，府库无钱，我就有这些，武宗大笑。扬州府有琼花观，诏取琼花，蒋瑶说，自宋徽宗被掳北上，此花已绝，今无以献。又传旨征异物，蒋瑶具对非扬州所产。武宗说，纻白布也非扬州土产吗？蒋瑶不得已，进布 500 疋。武宗对地方苛剥至此！“有吴经者，尤亲暱，帝南征经先至扬州，尝夜半燃炬通衢，遍入寡妇处女家，掠以出，号哭震远近，许以金赎，贫者多自经”⑨。张锐，“以捕妖言功，加禄至 120 石。每缉事，先令逻卒诱人为奸，乃捕之，得贿则释”。武宗所信用多奸黠不悛之徒。

正德十五年（1520）八月，武宗自南京返京。先自瓜州渡江，登金山至镇江，宿大学士杨一清宅，乐饮两昼夜，赋诗，

又遍览一清所藏书籍，取《册府元龟》202册以归。从镇江宿望江楼至扬州。又至宝应再次垂钓汜光湖。再进至淮安，到清江浦，再宿张阳宅。垂钓积水湖，渔舟过轻，武宗舟覆，溺于水，左右大惧，急争入水掖帝出，自此遂不豫。武宗经东昌，过天津而至通州。将欲西巡，会武宗身体疲惫已甚，左右力请还朝。越三日，乃返京师。

正德十六年（1521）二月，武宗疾甚，不视朝。又因疾，罢郊祀。三月，武宗死。武宗无嗣，遗诏迎兴世子朱厚熜入嗣皇帝位。武帝一生，嬉游荒政，纵宦为虐，淫荡恣肆，未能建储，常于豹房议事，又以敕命为儿戏，自名朱寿策封威武大将军、定国公，满朝文武为之侧目。至死无嗣，可谓荒淫无道之君。

注 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明通鉴》卷四一，武宗正德元年。

⑨《明史》卷三〇四《宦官谷大永传》及附注。

宸濠之叛

武宗正德二年（1507）四月，刘瑾受宁王宸濠重赂，假传圣旨恢复宁王护卫屯田。朱宸濠旧在大宁（明代北边地名，在今内蒙古宁城西，辖境相当于今内蒙古老哈河奈曼旗以南，辽河医巫闾山、大凌河以西，河北滦河以东，及长城线以北地），是北边三卫之地。太祖时，诸子藩王中，燕王善谋，宁王善战。靖难之役时，朱棣施巧计挟宁王迁北平，后徙江西。天顺间，宁王府因做不法之事，被革去护卫，改为南昌卫。武宗正德初，朱宸濠遣内官梁安载金银两万赂瑾，瑾朦胧奏请改南昌左卫为护卫。又奏准给予南昌河泊所一处，侵剥民利。后刘瑾事发被杀，兵部奏请革除宁王宸濠护卫，仍改为南昌左卫。正德六年（1511）宸濠又葬其母于先朝违禁之地西山青岚。后宁王竟敢建阳春书院，僭号离宫，宸濠怀不轨之心，术士李自然妄称得天命，谓宁王当为天子。宸濠又招术士李日芳，诈称城东南角有天子气，所以才构筑阳春书院以做离宫。朱宸濠还买通兵部尚书陆完，又勾结伶人臧贤，武宗左右近习钱宁、张锐、张雄等，预谋再复宁王护卫。大学士费宏说："今宁王以

金宝钜万复护卫，苟听其所为，吾江西无噍类矣。”①后陆完等施巧计，投宁王乞护卫疏，疏下阁议时，陆完又阴结杨廷和下制批准，费宏竟没有参与商讨的机会。朱宸濠再次朦胧得复护卫。朱宸濠恢复藩王地位后，自称国主，妄传护卫为侍卫，改令旨为圣旨。宸濠密令承奉刘吉等招盗匪杨清、李甫、王儒等百余人入藩王府，号称“把势”。不久，宸濠招鄱阳湖盗匪杨子乔，统其部下杨清等肆行劫掠，扰害民生。是时，宸濠“时时诇中朝事，闻谤言则喜，或言帝明圣、朝廷治即怒”②。

为加紧篡逆，宸濠招举人刘养正入府密谋。朱宸濠闻刘养正有才气，又精习兵法，故将其请入府中讲论当年宋太祖陈桥兵变事。刘养正见其有谋反意，甚称宸濠有拨乱之才，于是狼狈为奸，密约待机举事。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奏宁王宸濠谋逆不轨状，兵部移文宁王府，令其束缚部下。时宸濠谋叛踪迹已很明显，人们不敢议论。胡世宁发愤上疏说：“宁王自复护卫以来，骚扰闾阎，钤束官吏，礼乐政令，渐不出自朝廷，臣恐江西之患不止群盗也。”③胡世宁“请朝廷早裁抑之”④。要求朝廷派得力大臣兼任提督、巡抚之职，以消患于无形。疏上兵部移文后，朱宸濠很害怕，把罪过都推卸给下属以自我解脱。不久，“宸濠连奏世宁罪，世宁坐谪戍，自是无敢言者”⑤。后朝廷派河南左布政孙燧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西。初，宁王宸濠谋逆，巡抚王哲被杀。董杰代王哲为巡抚，仅八个月也遭害。此后任汉、俞谏都只做了一年多巡抚就被罢官归里。现在孙燧以廷臣身份巡抚江西，不待言风险更大。孙燧接到任命后，叹息道：“是当死生以之矣。”⑥先把妻儿遣送回乡，自己只身带僮仆二人前往。先是俞谏因抵忤朱宸濠被夺官闲居，朱宸濠更加得意；朘削百姓，运珍宝结禁近，

以遥相支援。同时还连结江西各洞寨盗匪，纵其流劫。藩国官吏，凡以正自持者，朱宸濠总是千方百计将其排挤掉，怕灾祸临头的官员只能一味迁就。孙燧到任后，了解到这种情势，深感大变将作，于是采取均征赋、饬戒备、实仓储、散盐利等措施，缓解百姓苦难，对敢于摧剥扰民的官吏，逐渐消除，侦破为奸谋逆的团伙，立即绳之以法，来翦除朱宸濠的羽翼。

先是，胡世宁已晋升福建按察使，准备离开江西，朱宸濠却诬告江西巡察副使胡世宁离间亲王，妖言诽谤，并贿赂内臣，矫旨逮捕。朱宸濠诬告不成，又在胡世宁临行前投毒谋害，胡吃后便血，几乎死亡。朱宸濠因胡世宁上奏弹劾他谋逆，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于死地。世宁既迁福建，顺路抵浙回家。朱宸濠又指使其党羽浙江巡御史潘鹏派士兵悬赏缉拿胡世宁。恰逢按察使李承勋见事不平，私匿世宁，变姓名，抄小路送他归京师告发。至京后，世宁被下锦衣狱，自辩无罪，当时两京言官陈启充、徐文华交章求救，经冬，经严刑讯拷，几乎至死。这是因为刑讯时，钱宁、萧敬、张雄、张锐、江彬等受朱宸濠重贿，这些人便威胁刑官，必坐以诬陷亲王罪至死。当时大理寺少卿胡瓒据理力争说："濠谋赖世宁以发，而置之极刑，何以服天下！"众人力为世宁争，当时江西巡抚孙燧等又力言其委曲，表明世宁为无辜，这才得减死谪戍辽东沈阳卫。同时还削夺大理寺少卿胡瓒等俸禄。朱宸濠上勾下连，在谋叛前横行乡里，诬告朝臣，险些酿成冤狱，其危害之大，可见一斑。

正德十二年（1517）三月，朱宸濠令王春、余钦等招募大盗凌十一、闵廿四等500余人，四集亡命，同杨清等藏于丁家山寺，劫掠官、军民、商财货。还厚结广西土官狼兵，并南

赣、汀、漳洞蛮以为响应。派人去广东买皮帐，制作皮甲，并私造枪炮盔甲及外域佛朗机铳等兵器，日夜制作不休。

正德十四年（1519）四月，李士宝、刘养正、王春、刘吉、万锐等，与朱宸濠筹谋叛乱，又怕事不成反受诛戮，想在武宗晏驾后乘机变乱。朱宸濠派奸党卢孔章等分布于水陆要道，与朝奸党万里传报，十日一传，踪迹大露。先是孙燧托名捕盗，加强进贤、南康、瑞州等地戒备。又请敕湖东道分巡兼理兵备，与之相犄角。九江当鄱阳湖要害之地，请求用重兵把守。同时还在南康、宁州、武宁、瑞昌及湖广、兴国、通城严密设防，便于控制。又怕朱宸濠一旦叛乱，劫掠兵器，孙燧又假借讨贼为名，把卫城兵器调出城外。孙燧曾笑谈说，朱宸濠要想叛乱，我不消灭他，他在我的严密包围下，处处挨打，也一定会迅速被消灭。适逢江西大水，凌十一、吴十三、闵廿四等出没于鄱阳湖为寇，孙燧就和许逵从江外掩杀追捕。当夜大风雨，不能渡江，三大贼逃匿于朱宸濠林墓地中，未被搜捕到。

朱宸濠致书陆完，让他设法紧急调走孙燧，让梁辰、汤沐接替，右佥都御史王守仁亦可，千万不能任用吴廷举。此时，王守仁也上疏揭露朱宸濠谋反。朱宸濠奸党路劫孙燧，未能得逞。孙燧又因朱宸濠是朝廷懿亲，不敢先下手，所以他自己上奏，请求归里，不准。东厂太监张锐、大学士杨廷和最初也想与朱宸濠结党，并帮助他恢复护卫。不久发现朱宸濠真要谋反，而且得悉皇帝已经注意到他和宁王的来往，在紧急中，他们就在一起商议，再次削夺朱宸濠的护卫，以免后患无穷。御史萧淮上疏说：宁王不遵祖训，包藏祸心，招纳亡命，反叛踪

义带着敕命到江西革除朱宸濠护卫。同时给事中徐之鸾、御史沈灼又分别上奏朱宸濠所行不法之事。武宗下诏，发兵搜索朱宸濠派进京城的侦探。当时朱宸濠的侦探林华藏在臧贤家，武宗下令搜查，臧贤家多复壁，表面看是锁好的木厨，打开厨门就是长巷，林华就侥幸靠了这条复壁巷道，得以逃脱，回到江西。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正式叛变。先是六月十三日，正值朱宸濠生日，设宴请镇巡三司同来祝寿。忽闻京城派太监擒拿宁王，又值林华归来，尽言武宗拟除护卫事，宸濠大惊，急召刘养正、刘吉等密谋。刘养正等以为情态紧急，应趁次日镇巡三司官贺寿之机，将他们一网打尽。对不附己者均杀掉，因而举事。于是连夜集合吴十三、凌十一、闵廿四等交给他们兵器守候府邸，又招李士实，告以举兵事，李士实答应与其一同叛乱。明日，各官入谢后，左右带甲露刃侍者数百人。"宸濠出立露台，大言曰：'太后有密旨，令我起兵入朝监国，汝等知之乎？'都御史孙燧毅然曰：'密旨安在？'濠曰：'不必多言，我今往南京，汝保驾否？'燧张目直视濠，厉声曰：'天无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谁则敢违？'濠大怒，命缚燧，众骇愕，相顾失色"⑧。按察司副使许逵大吼：孙御史是朝廷大臣，你们这些反贼，谁敢擅自加害？许逵又对孙燧说：我让你先发制人，你不听，今日反受制于人！宸濠下令把许逵捆绑起来，酷刑拷打，问他还有什么话可说？许逵厉声说：我只有赤心而已，岂能和你们一起反叛！宁王气急败坏地令校尉将孙、许二人推出惠民门问斩。许逵临终大骂：今日贼杀我，明日朝廷必杀贼！城中之人无不为之流涕鸣冤！又将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等一并械锁下狱。李士实、

季敩等持檄谕降诸郡县，革正德年号，指斥武宗罪行。宸濠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参政王纶为兵部尚书总督军务大元帅。分遣逆党娄伯、王春等四出收兵。不久闵廿四、吴十三夺船顺流攻打南康，知府陈霖逃走。再攻九江，兵备副使曹雷，知府汪颖等亦逃，城俱陷，宸濠使师夔据守。娄伯到达进贤，被知县刘源清杀死。

先是，王守仁提督江西，知李士实与宸濠谋逆，早有准备，及宸濠叛，王守仁先报京师宸濠反，又部署各郡县严守待命。王守仁传檄远近，暴露宸濠罪恶，起兵讨伐。朱宸濠出兵攻打南京，王守仁部署部分兵力将其阻击于安庆，然后率主力迅速攻占南昌、九江等要害之地，既断其归路，又端其老巢。正德十四年（1519）七月二十日，南昌城陷，赣州、奉新等县叛兵亦降。守仁安抚百姓，惩办叛军首恶，释放整编余众。整编军作战凌厉，但旧习不改，大肆劫掠，王守仁斩杀头目数人，军稍定。又将恶习不改者入狱惩治，取宁王府库兵甲资财充作军资，官军大盛。

时朱宸濠愤安庆不下，督兵填壕堑，决心攻占安庆，听到南昌失守，非常恐慌。李士实劝朱宸濠不要还兵，应驻扎于安庆，顺路夺占南京。既然已经称帝，江西自然降服。朱宸濠不听，竟解安庆之围，移师阮子江，先遣两万兵援救南昌，自率大军继后。七月二十二日，谍报至江西，王守仁集众议。有人认为宁王兵盛，凭其愤怒，倾巢而来，我援兵未至，势难支撑。不如坚壁自守，等待四方援兵，朱宸濠久顿坚城之下，兵孤援绝，必将自溃。王守仁认为，宁王兵虽强，单凭焚掠劫众建威，未曾逢强敌与其鏖战；他们对部下，只不过许愿封赏，今进取不成，巢穴又陷，众心已离，我用锐卒乘胜追击，彼将

不战自溃。当天抚州知府陈槐援兵到达。二十三日，宸濠先锋至樵舍，王守仁遣将迎击。令伍文定以正兵当前，余恩带兵继之，邢珣统兵绕其后，徐琏、戴德孺张两翼分击。二十四日，叛兵逼黄家渡，骄气盛。伍文定、余恩佯败，叛军争利。前后不及，邢珣自后急击，横贯其阵，叛军败退。伍文定、余恩回师追击，徐琏、戴德孺合兵夹击，叛军大败。官军追奔十余里，斩杀2000余，有万余人入水溺死。

王守仁又遣将攻九江、南康，断其归路。朱宸濠拚死挣扎合兵攻打官军，官兵败死者数百人。伍文定斩杀退却者，自立于炮铳之间，火烧须鬓不移足，将士大振，殊死战，一炮击中朱宸濠舟，叛军大败，斩杀2000余人，入水溺死者无算。叛军再退樵舍。伍文定紧急部署火攻，朱宸濠正在樵舍议论惩处不尽力之将，忽见火焰冲天，官兵四集，火烧到了朱宸濠的副舟，叛军再次大败。朱宸濠及地方叛将、中官入叛军者，贼枭吴十三、凌十一等全部就擒。时九江、南康亦光复，将士执朱宸濠回江西，军民聚观，欢呼之声动天地。朱宸濠见王守仁，大喊：王先生，我愿全削护卫，请把我降为庶民，可否？王守仁说：自有国法在。朱宸濠俯首默然。

初，宸濠谋叛，娄妃泣谏，宁王不听。至是朱宸濠在囚车中泣叫："昔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妇人言而亡其国，今悔恨何及!"⑧王守仁立即求娄妃之尸安葬。八月，武宗宣诏御驾亲征，自称"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边将江彬、许泰、刘晖，中贵张永、张忠俱称将军。武宗实欲乘机游南京。兵至江西、战事已毕，沿途无人与战。九月，武宗至南京。江彬、张忠想放走朱宸濠，王守仁极言不可放虎归山，将朱宸濠送至杭州，交给张永，自回江西。张永得囚，在武宗前

力赞王守仁之功，武宗更加相信张永，命王守仁巡抚江西。提拔吉安知府武文定为江西按察使，赣州知府邢珣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北军入江西时，谩骂王守仁，骄横不可一世。王守仁隐忍，以厚礼接迎犒赏，后来北方官军都说："王都堂待我有礼，我安得犯之？"旋，北军班师。北军驻省城五月，糜费浩烦，江西骚然，官民皆苦不堪言。十二月，朱宸濠至南京，武宗想专揽大功，与近侍戎装，整肃军容，出城数十里，列俘于前，作凯旋状。仪典后，将宁王等囚禁起来。

正德十五年（1520）九月，武宗让王守仁上详细告捷书，王守仁奏报实情，其中揭露了江彬、张忠合奸谋叛的罪行。武宗读后，始议北旋。十月武宗自南京班师回朝。十二月，武宗到达通州，赐朱宸濠死，又焚其尸，余党入京后磔诛之。至此，宸濠之叛全部结束。

注 释

①《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②《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

③《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④⑤《明史》卷一一八《诸王传》。

⑥《明通鉴》卷四六，武宗正德十年。

⑦⑧《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七《宸濠之叛》。

明

嘉靖崇信道教

嘉靖元年（1522）三月，礼部登记大能仁寺妖僧齐瑞竹资财及玄明宫佛像，毁像括金屑一千余两。齐瑞竹是武宗正德年间赐玉书金印的大法师，武宗赏赐他的财物，难以数计。至世宗嘉靖时，采纳工部侍郎赵璜的建议加以查封毁括。奉世宗之命，礼部郎中屠埙发布檄文，普遍查封禁毁京师诸谣祠（指佛寺），把它们完全拆毁。

七月，嘉靖皇帝开始崇奉道教，逐渐兴建寺观。

嘉靖二年（1523）四月，太监崔文祈祷，引诱世宗在乾清宫建祷仙道场，日夜不断祷祭。又让内监十几人研习道教经藏于宫中。大学士杨廷和、九卿乔宇等上疏请求“斥远僧道，停罢斋醮”①。给事中周鄚、张嵩、张汝、安磐等交章弹劾崔文以邪道诱帝之罪。闰四月，给事中郑一鹏说，正德十六年以来祷祀繁兴，制用渐广，乾清、坤宁诸宫，各建斋醮，西天厂、西番厂、汉经厂以至于五花宫、西暖阁、东次阁也都设斋醮。或昼夜斋醮，或隔天一斋，甚至一天斋醮两次。皇帝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几乎全废。他认为，破坏太平盛业，丧失天下人的期

望，莫过于此。他斥责说，挟皇帝行斋醮之徒，必然是魏彬、张锐之辈的余党。过去武宗受欺蒙，使得生民涂炭，海内虚耗。先帝已误，陛下怎能一误再误呢！他请求世宗立即疏远斩杀这些兴妖道之人。他还建议，改西天厂为宝训厂，贮藏列宗列祖遗给后世的各种书籍文献；改西番厂为古训厂，贮存五经四书及子、史诸书；改汉经厂为听纳厂，贮存诸臣奏议。委派正派谨慎的官员掌管锁钥，这样一来，皇帝攻读儒家经典之余，抽闲暇去三厂览读，自然可以成尧、舜之功业了。世宗览毕说："天时饥馑，斋祀暂且停止。"②嘉靖五年（1526）让道士邵元节做"真人"，吴尚礼做"左至灵"。十年（1531）十一月，帝信道教益深，召大学士张孚敬还朝，建祈嗣醮于钦安殿，命礼部尚书夏言充当醮坛监礼使，侍郎湛若水、顾鼎臣充当迎嗣导引官。文武大臣按日进香，皇帝亲自行初礼和终礼。十一年（1532）编修杨名上《修省疏》，斥责汪鋐、郭勋助帝斋醮之奸，请求停止祷祀斋醮。世宗大怒，下锦衣狱械讯，几乎被整死，后被谪戍远方。十三年（1534）五月，世宗于重华殿，召大学士张孚敬及武定侯郭勋等五人，入观拜祀天青爵，还作《纪乐同游诗》。

嘉靖十五年（1536）正月，加致一真人邵元节道号，赐玉带冠服。元节，兴安人。仙源范文泰授予《龙图龟范》，嘉靖初，召入京，对于便殿，元节以"立教主静"之说进，帝款待厚遇之。不久，因为祷雪灵验，命作致一真人，领金录醮事，给玉及金银象印各一。适逢嘉靖有事南郊，召邵元节分献风雷灵雨坛，宴于奉天殿，授二品官，并封其师为"真人"。敕令建真人府于城西，建成后，让夏言作记刻于庭。岁给禄100石，遣缇绮40人充扫除役，增田30顷，免其租徭。至此，宠

待益隆。五月，拆除禁中佛殿。建慈庆、慈宁二宫。当时，世宗想除掉佛教殿堂。召武定侯郭勋、礼部尚书夏言入禁中瞻视大服千善殿，有铜铸像神鬼淫亵的各种姿态。又有金匣藏佛首佛牙及支离傀儡等物约一万三千多斤。夏言退后上疏力请将其置诸郊野，不能再渎留大内宫禁之中。世宗认为，这些淫邪物状，智者不想看，百姓无知，必以奇异供奉，虽然弃之中野，必有暗自挖掘用来蛊惑百姓者，不如捣毁，永远清除。于是宫禁里的邪秽物像一律清除。十二月，皇帝命中使到邵元节家乡贵溪山中建仙源宫。建成后，邵元节请求暂时归山。不久，世宗派锦衣千户孙经往贵溪求邵元节归京师，船到潞河，命中使迎接，赐彩蟒衣及“阐教辅国”玉印。当时世宗因为祈求皇子降生设醮斋祭，早晚都有云气见于祈坛。世宗大喜，过了三天，皇子降生，遂录致一真人邵元节祷祀有功，加授礼部尚书，给一品服俸，赐白金、文绮、宝冠、法服、貂裘。授其徒邵启为等不同秩禄。嘉靖初年，张颜频入贺。皇帝赐以“清心寡欲”对。加封正一嗣教真人，赐金冠、玉带、蟒衣、银币，于是留在京城。不久请求归山。世宗差人持诏召还，不称名而称卿。住宅起火焚坏，又盖新宅。给事中黄臣劝谏说，过去大师栾巴、郭宪见火起以酒灭火，今张彦頨宅火坏，还用重新翻盖吗？世宗不从。张彦頨不久死，诏以列侯例封谥，并赐邺典。上尊号“天师永绪”。

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致一真人邵元节死。当时嘉靖亲自拜祭显陵，元节留京师。一日晨起，元节招其徒说，我快要死了，怎能再见皇上一面？话未了，死去。世宗正驻扎在裕州。听到邵元节死前之言，大恸。手诏敕命行在礼部赠谥号，命中官锦衣护丧还。敕命有司营葬邮典均依伯爵之例。方士陶

典真一名陶仲文，黄冈人。小时候作过县掾，好神仙方术，曾经授符术于罗田万玉山。邵元节未显名时，也往来过仲文家。嘉靖初年，陶仲文受辽东库大使，任满回到京城。当时邵元节贵幸，年老后曾请求告老还乡，未得应允。恰值宫中有黑气出现，邵元节治之不灵验，就推荐陶仲文代替自己除妖氛。试行于宫禁中，稍能祛除妖氛，世宗格外加宠。此时，护驾南巡至卫辉，白昼有旋风绕驾不散，世宗问陶仲文是何原因？仲文回答说，要身经一次大火。遣陶仲文斋醮禳除此灾，陶仲文说，身临大火之祸，终不得免，但仅可以一人庇护皇上龙体不受伤害。当天夜里，行宫果然大火被灾，宫中死伤人无算，锦衣卫中官陆炳冒火冲入寝殿，背世宗出焰火中，没有受到任何伤害，果如陶仲文所言。次日，敕命行在吏部授陶仲文“神霄保国宣教高士”爵衔，授予诰印，允许携眷入宫。九月，世宗谕辅臣说他想令东宫太子监国，静休一两年后再亲政。太仆卿杨最上疏说：“圣上之所以下此圣谕，不过笃信方士调动罢了。尧舜也曾修性养心，汤、武也曾亲身施行仙道，他们不是不懂得修养可以成仙，因为不易成仙，所以不去学习它。难道尧舜之世就没有仙人，尧舜的智慧不懂得学习？孔子说老子是‘龙’，龙就是仙。孔子不是不知道老子是仙人，不能学习，而是学成仙人不是那么容易。我听到您的上谕，开始很吃惊，接下来就感到非常悲伤。我忠心相劝，您端理政务，每日想一想如何治理好国家，不近声色，保住元阳之气，不想成仙自然就会成仙，不想长寿自然就会得到长寿，黄白之术，金丹之药，都会伤元气，不可信。”世宗看疏大怒。把杨最押赴镇抚司拷讯，最终死在狱中。八月，万寿圣节，建三昼夜醮，告玄极殿。郭勋领方士段朝用见世宗，说段朝用能化物为金银，然后

将所化的银器进献。世宗大喜说，今日得段朝用真是天之所授。因此授段朝用“紫府宣忠高士”爵号。将他所化银器荐于太庙，加郭勋禄米100石。十一月，进陶仲文为忠孝秉一真人，负责道教事宜。不久又加少保、礼部尚书，又加少傅，食一品俸。

嘉靖二十年（1541）正月，御史杨爵进言：为人君者要奉天安民，使民各得其所。现在饥民颠连无告，冻馁沟壑，可是土木之工十年不止。又委派部臣，构建雷坛，以一个方士原因而剥民膏血，百姓怎能得其所呢？用左道惑众，明智的君王一定要诛戮不赦。现在异言异服，列于廷苑；金紫赤绂，赏到了方术之士身上。保傅重臣，都在作法论道。保傅的人选，不是天下英才，不足以当此尊贵，而今却送给了迂怪诡诞之徒，名器之滥，到今天可算是混乱到了极点。您以天纵圣智，贵为上天元子。如能远循帝道，近守祖法，天灾会消弭，山川鬼神，也不会不安宁。如果以天威加之以危祸，像往年杨最，言出而身死，近日罗洪先等言毕罢黜，国体治道，所损实多。如此以往，深恐忠荩杜口，则谗谀交进，安危休戚，则难以逆料。世宗览疏，大怒，命镇抚司下狱刑讯。二十二年（1543）二月，段朝用下狱论死。

初，段朝用以黄白之术勾结武定侯郭勋，并靠郭勋举荐进入宫禁，久而久之，他的化物成金银之技穷，郭勋也因罪入狱，段朝用入勋家索赂殴死其家厮役张兰，又上疏亵渎皇帝，世宗大怒，收送法司论死。可见杨爵所言不谬。宫婢杨金英等阴谋杀死世宗，谋泄被杀。世宗说，我如果不是仰仗天地鸿恩，消除宫廷变乱，怎么还会有今天呢？我早晨起来就要到朝天宫去斋醮七天。开始斋醮之日，有白鹤40余只从天空中飞

过，群臣一致祝贺。此后世宗更加崇信道教。

嘉靖三十一年（1552）二月，太上道君诞辰，建醮永寿宫九日。三月，诏修太和山玄帝宫。三十三年（1554）四月，世宗举祀高玄大典，工部尚书赵文华请求归里养病，是日已止封停刑，世宗刚修玄，禁止奏疏，尤其讳言疾病，赵文华恰犯忌，疏止，世宗大怒，当即罢官。三十五年（1556）上睿皇帝道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都仙清主玄道德哲慧圣尊开真仁化大帝”。献皇后号“三天金阙无上玉堂总仙法主玄元道，德哲慧圣母天后”，孝烈皇后号“九天金阙玉堂辅圣天后掌仙妙化元君”，世宗自号“灵霄上清统雷元阳妙一飞玄真君”，后加号“九天弘教普济生灵掌阴阳功过大道思仁紫极仙翁一阳真人元虚玄应开化伏魔忠孝皇帝”，再加号“太上大罗天仙紫极长生圣智昭灵统三元证应玉虚总掌五雷大真人玄都境万寿帝君”。三十九年（1560）二月，浙江总督胡宗宪上奏汪直狱，世宗说，是玄天保佑。敕命告玄极殿，而论胡宗宪功。不久，胡宗宪献芝草五、白龟二。世宗很高兴，回赐金帛金彩鹤衣一身。礼部请谢玄极告祖庙，世宗允奏。不几天，白龟死。世宗则说，天降灵物，我怀疑我快要离开尘世不久了吧！四十一年（1562）三月，万寿宫建成。先是万寿宫于四十年十一月被火灾，不到三个月又重新盖成，其中寿源、万春、太玄、仙禧诸殿，极其宏丽。世宗大喜，加大学士徐阶等官爵。

四十一年（1562）五月，大学士严嵩免，子世恩下狱。初，方士蓝道行以觇箕得幸。上问蓝道行，今天下何以不能治？蓝道行说，贤者不用，不肖者不退。世宗问谁贤谁否？蓝道行说徐阶、杨博贤，严嵩不肖。世宗听后动心，恰巧此时世宗收到邹应龙弹劾严嵩父子上疏一件，其中说：“世恩凭借父

势，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贿遗。每一开选，则视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值，及遇升迁，则视缺之美恶而上下其价；以致选法大坏，市道公行，群丑竟趋，索价转钜。如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二千金而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而得知州；至于交通贓贿，为之关节者，不下百十余人……。”③想到了这些情节，世宗说，“人恶严嵩久矣。朕以其赞玄寿君，特优眷。乃纵逆子负朕，其令致仕”④。敕令下严嵩罢官，世恩下狱。不久，世宗念严嵩赞玄寿君之功，竟忽忽不乐。诏谕徐阶想传位太子，退居西内，专门祈祷长生。徐阶劝谏不要急于传位，世宗认为，这都是仰承上天之命，再有提及严嵩之事的，将严嵩与邹应龙一起处斩！严嵩明白了世宗的心意，秘密贿赂中官，揭发了蓝道行专权私假称玉诏的罪行。世宗听后知蓝道行有奸谋，震怒，以进妖言惑主罪论死。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五月，桃夜降于世宗帷帐之中，大喜，修迎恩典礼五天，不久，桃再次降下。当天夜里白兔生二子，世宗更加高兴，谢玄极宫，告祖庙。又几天后，寿鹿也生下两子，群臣上表贺喜。世宗认为奇祥三次由天锡，故亲手写答谢文。四十四年（1565）正月，世宗病重不能临朝，注意玄修之事。先是，王大任奉命在陕西、湖广等地招致王金等，能合成内养之药。姜儆奉命到江西、广东，也得到了能通符法的人回京。世宗诏命都授予翰林侍讲。姜儆不自安。求归里，王大任仍留在朝廷，为翰林所不齿。世宗虽然修玄西内，而擅权不放，常于夜里五更，还在看批奏章。自从王金等以修得宠幸，与陶仲文之子陶世恩希求恩泽，于是伪造五色灵龟，灵芝，以为天降瑞征。又与陶倣、刘文彬、申世文、高守中等伪造《诸品仙方》、《养老新书》以及金石药进献。他们的处方诡

诡秘不可辨认，性燥热，不是《神农百草》所载。世宗服用“仙药”后，稍稍火性发作，不能全愈。即使这样，陶倣竟迁为太医院使，陶世恩升为太常寺卿，王金授太医院御医，刘文彬晋升为太常寺博士。十月，海瑞上疏，极言修玄之事不为明智，谓天赐天桃、药丸，怪妄尤甚，由于皇上二十余年虔心修玄，朝政委于奸相严嵩，一时间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一切实情不得而知，如果说陛下有种种失误，大端在于玄修。而玄修之事有百害而无一利，徒使教爵禄、竦精神，求之终身而不可得。他认为现在必须急于纠正的大事是：“大臣持禄外为谀，小臣畏罪而为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⑤疏上，世宗大怒，敕命逮囚海瑞于镇抚。

嘉靖四十五年（1566）正月，世宗久病不愈，诏谕大学士徐阶，想到承天去拜祭显陵，取药补气。徐阶力谏阻止。当年冬，世宗死于乾清宫，遗诏说：“朕奉宗庙四十五年，享国长久，累朝未有。一念惓惓，惟敬天勤民是务。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诳惑。自今建言得罪诸臣，存者召用，没者邺录，见监者即释复职。”⑥穆宗即位后，释放户部主事海瑞于狱中，逮系方士王金、陶倣、申世恩、刘文彬、高守中、陶世恩等下诏狱，论死。世宗一生修玄习道，务求仙化，长生不死，以至二十余年荒怠朝政，致使奸臣当朝，忠良遭害，纲维颠倒，弊端丛生，终其生而不悟。直至穆宗践祚，方得拨乱反正。

注　释

①②《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③《明通鉴》卷六二，世宗嘉靖四十一年。

④⑤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二《世宗崇道教》。

明

安南叛服

安南国是远古交趾地区。唐、虞时代称南交，秦设象郡。汉初，南越王赵陀占据这个地区，武帝平南越，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设刺史。任延、锡光做郡守时，教民耕种，制冠履，渐立学校。后徵侧、徵贰反叛，马援平定了叛乱，立铜柱为界。建安时期，吴国分立广州。唐初，改安南都尉府，属岭南管辖。北宋初，安南内乱频仍，宋淳熙年间，封安南国王，安南作为国家从这时开始。元世祖时由于安南不服管辖，派大将脱懽讨伐，十七战都取胜，安南王陈日烜弃城入海，因粮尽而还，日烜死，子陈日燇继位，自称藩臣，入贡不绝，元复封为安南国王。洪武初，陈日煃遣使朝贡，朱元璋嘉礼接纳，封陈日煃为安南国王。其孙日炜被国相黎季犛所杀，立日焜为帝。后黎季犛大杀陈氏自立政权，国号大虞，纪元天圣，改名胡一元。不久立其子胡查为帝，自称太上皇。永乐二年(1404)六月，胡查遣使奉表献地。八月，老挝军民宣慰使习歹遣使护前安南王孙陈天平来朝，诉胡一元、胡查父子篡逆之罪，成祖怜而接纳，不久，安南故臣裴伯耆告急，请讨黎季

犛，愿为前驱效死。十二月，安南遣正旦使者至，成祖命礼部尚书带陈天平见安南正旦使，使者识陈天平为故王孙，皆下拜。

永乐三年（1405）六月，安南国遣使阮景真，请陈天平归国。十二月，敕命行人聂聪送陈天平归国，征南副将军黄中、吕毅、大理卿薛嵓将兵五千护行。四年（1406）三月，陈天平等度隘留、鸡陵二关，将至芹站，山路险峻，林木蒙密，军行不成列，会雨潦，安南胡奃所布伏兵突发，杀陈天平，薛嵓、聂聪遇害。黄中等急整兵击之，桥断不得前，中等引兵还，奏闻，永乐帝大怒，以胡奃欺君罪名遣成国公朱能率25将军，以两京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凭祥讨逆。五年（1407）九月，生擒黎季犛、黎苍等至京，安南平。诏以季犛及子苍下狱，赦其子澄孙芮等，后季犛出狱，戍广西。子苍及澄以善兵器，赦用之。八月，交趾简定反。简定是陈氏故臣，不肯事黎氏，曾随官军下安南为别将，颇有功。后知成祖不想复陈氏政权，就自己逃走，纠集旧部，自称日南王，改元兴庆，始扰边，而陈季扩、邓景隆尤为猖獗。命黔国公沐晟发云南、贵州、四川兵数万往征。命兵部尚书刘儁往赞军事。十二月，沐晟与简定战于生厥江，失败。简定益猖狂，攻陷许多郡县。是年（1409），简定自称上皇，立陈季扩为大越皇帝，改元重光。季扩自称是陈氏之后，安南民不忍弃陈氏，则相率归季扩。八月，邓景异攻盘滩，守将徐政战死。英国公张辅兵至交趾，于鹹子关、太平海口等处斩首数千，溺死无算，生擒潘柢等200余人，获船400余艘。首领阮世美、邓景异投奔陈季扩，安南陈季扩自称陈氏之后，请成祖封。张辅不允，进兵清化。当时陈季扩据地稍远，明军全力以赴，穷追简定于演州，

分沐晟兵从磊江而南，都督朱荣舟师抵牛鼻关，张辅自率骑至美良。简定弃马走吉利深山，经明军搜山终于擒获。同时擒其将相陈希葛、阮宴等槛送京师，惟陈季扩、邓镕、景异逃至义安。简定至京后处死。八年（1410）、九年（1411）明军继续追击陈季扩。十一年（1413）十二月，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合兵攻安南兵于爱子江。当时英国公张辅、黔国公沐晟等进兵顺州，陈季扩党人阮师桧屯爱子江，设象伏兵候官军。张辅侦知，告戒先驱。群象来冲，明军以矢石伤象鼻，群象奔还本阵，自相蹂践，明军乘机蜂拥而上，斩安南将阮山，生擒将军潘经等数十人，其众死伤者无算。十二年（1414）正月，明军至政和县罗蒙江，都是悬崖侧径，英国公张辅舍骑步行，大索，射中邓景异，俘获。并获阮师桧于南灵州。陈季扩遁走老挝，都指挥师祐追赶，进占老挝三关，蛮人溃散，弃陈季扩及其妾于南么，生擒以归。八月，交趾陈季扩被处斩。十三年（1415）四月，命英国公张辅镇守交趾，加陈洽兵部尚书，赞理军务。张辅下交趾，三擒其伪王，威镇西南，交趾人服从管制，安南初定。十四年（1416）十一月，召交趾总兵、英国公张辅还京，命丰城侯李彬代镇守。辅经营交趾前后十年，命监察御史黄宗载巡按交趾。交趾营房都覆盖茅草，多起火焚毁，黄宗载令三司募官伐木陶瓦，半年后，营房均覆瓦，火患遂息。

十六年（1418）正月，交趾清化府俄乐县土官巡检黎利反。黎利初随陈季扩做伪金吾将军，后降明，做巡检，然而心中总在谋图反侧。张辅还京，僭称平定王，让他弟弟黎石为相国，段莽为都督，啸聚范柳、范晏等四出剽掠。总兵丰城侯李彬遣都督朱广讨伐，擒斩数百人。黎利败走，擒范晏，李彬请

就交趾戮晏以徇。先是，李彬代张辅镇交趾，中官马骐为监军，定岁贡扇万柄，翠羽万个。交人不堪其苦，三年间叛者四五起，而黎利为最。十八年（1420）五月，敕命丰城侯李彬说："叛寇黎利，潘僚、车三农、文历等迄今未获，宜尽正画方略，早灭此贼。"①交趾左参政冯贵，右参政侯保讨黎利战死。侯保，河北真定人，由国子生知广城县，有善政。明设交趾郡县，择人抚治，升侯保为交州知府，迁参政。时黎利剽掠郡县，侯保率民兵筑堡垒于要害处抵抗，黎利率众攻打，侯保战死。冯贵，武陵人，举进士为给事中，旋升交趾参政，能抚辑流民，归附甚众。有士兵二万余人，劲勇习战，每出阵皆有功。后中官马骐疾之，尽夺其兵。及黎利反，众人强求冯贵剿捕，只予羸卒数百迎战黎利，贵力战而死。侯保为政清廉，冯贵有方略，对于他们的阵亡，大家十分痛惜，也为此后平定黎利，带来极大不利。九月，召李彬还，以荣昌伯陈智代替。十月，赦黎利为清化知府。遣内官山寿谕利，竟不赴。二十二年（1424）九月，掌交趾都司都督方政与黎利战于义安府、茶龙州，不利，昌江卫指挥伍云战死。都指挥陈忠与黎利战于清化，大胜。

宣宗宣德元年（1426）三月，总兵陈智、方政讨黎利，进至茶龙州兵败。十月，黎利弟黎善据广威州，拥众数十万，分道攻交趾。十一月，平州知州何忠怀奏潜请王师，夜步走出城200余里，为黎利得，大喜，认为何知州名闻远近，乃置酒劝忠："能从我，同享富贵。"②何忠大骂："贼奴！吾天朝朝臣，岂食汝犬彘食！"夺杯掷黎，流血盈面，遂遇害。事闻于朝廷，宣宗深悼惜，敕旌其门，赐谥忠节。二年（1427）二月，黎利攻交趾城，总兵王通猝击之，大败黎利军。斩其司空丁礼、司

徒黎豸以下万余人，利惶恐，不能军。诸将请乘胜急击，通犹豫不决，给黎利以喘息之机，四出剽掠，不久，势复张。四月黎利攻昌江。七月黎利攻隘留关，镇远侯顾兴祖拥兵南宁不动，隘留城陷，逮兴祖下狱。九月，安远侯柳升等率师至交趾隘留关，黎利等乞罢兵息民，立陈氏后主其地，不许。升与黎利战败绩，七万人皆没。王通知升败，决意与和。工部尚书黄福被俘，黎利等皆下马罗拜说："我父母也，公向不北归，我曹不至此。"③说罢都哭泣，黄福劝他们归顺朝廷。黎利等终不忍加害。他们的渠长送给黄福干粮，赠金币出境，到龙州，黄福把黎利所赠之物悉归之官。十月，王通与黎利立坛为盟，退师，遣指挥阚忠与黎利所遣人，奉表及物至朝廷。宣宗敕王通等即日班师。内外镇守、三司、卫、所、府、州、县文武吏士，携家来归。

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安南国王称灏侵占城。先是，黎利死，子黎麟立。麟死，子黎濬立。濬为庶兄琮所杀而自立。琮侵老挝败，黎寿域等杀琮而立濬弟灏为安南国王。中官钱能镇云南，复私与灏通，与之结为金兰。姦宄行于边境，危及云南，巡抚王恕发其姦，乱乃免。

世宗嘉靖元年（1522），莫登庸立黎廬，僭号统元，追谥黎明为襄翼帝。六年（1527），莫登庸酖杀黎廬，并其母而自立。时黎譓尚据清华、义安、顺化、广南四道，其旧臣不服登庸者，分据险阻，为之声援。后登庸率兵击譓，占清华。譓败走老挝。九年（1530）九月，黎譓愤悒死，众立譓子宁，号曰"世孙"，有兵三千。登庸阴结土帅郭辽鹤，使袭宁，大败之，擒宁妃淑宝沉于江，宁与郑绥，子惟墺走老挝，聚兵八千人，保漆马江。登庸以其子方瀛为大王，改国号大正。十六年

(1537)，议讨安南。二月，钦州知州林希元，上书陈讨安南策，广东廉州知府张岳上书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则诛，逆命则诛，未闻以不通贡劳问罪之师也。今用兵之声先已传布，诚恐往勘之使，生事乐祸，迎合附会，谋动干戈。"④力陈目前不可动兵者六事。四月，兵部议讨安南，兵部侍郎潘珍上谏说："陈暠、莫登庸皆弑逆之贼，黎宁与其父譓，不请封入贡亦二十年，揆以大义，皆所当讨，何独徇宁请为出师耶？且其地不足郡县，叛服无与中国。今北敌日番，联帐万里，烽警频闻，顾释门庭之防，劳师袭远，非计之得。宜遣大臣有文武才者，声言进讨，赦其胁从，且令黎宁合剿，使一国之人，借我天声，壮彼士气，可坐收其功也。"⑤户部侍郎唐胄认为："帝王之于荒服，以不治治之。自安南内难，两广遂少边警，不必疲中国为黎氏复仇。"⑥无奈世宗南伐之意甚锐，不可挠。十七年（1538）四月，命咸宁侯仇鸾为征彝副将军，兵部尚书毛伯温参军务，讨安南。二十年（1541），以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最初，毛伯温上疏说，莫登庸畏威，而黎宁称黎氏后，谱系不详，不能作证，请求收纳莫登庸，削去故爵，量授新职，使其安抚安南。廷议，同意毛伯温主张，乃降安南王莫登庸为安南都统司，任命莫登庸为都统使，从二品，子孙世及，别给印章。六月，毛伯温班师。

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四月，黎维潭来降。先是，毛伯温班师，莫登庸死，授其孙莫福海为安南都统使。莫福海不能揖众，为黎宁所逐，莫福海居南海上，朝廷亦置不问。后来莫福海子茂濬又势大，最后逐黎氏有其国。万历九年（1581），茂濬之子莫茂洽来贡。因为莫茂濬被部下黎伯骊所逐，死于海阳，至是，茂洽始得袭位。黎氏自宁死，其旧臣郑筒立宁子宠

于西都。简是郑惟憭的儿子。黎宠死无子，简等共立黎晖四世孙黎维邦为主。维邦死，次子维潭立。诏以维潭为都统使，安南复定。安南国中设十三道，道不过中国一县。自黎氏以来，虽奉贡称藩，然在其国中称帝，死后加谥称宗。黎瞷被杀，有人说是郑惟铲所为。郑氏势大，亡黎氏复黎氏都是郑氏所为。维潭死，子维新嗣，维新死，子维祺立。均对明纳贡。

注 释

①②③《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④⑤《明通鉴》卷五七，世宗嘉靖十六年。

⑥《明史纪事本末》卷二二《安南叛服》。

明

庚戌之变

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宣府谍报，寇（指俺答）移帐驻威宁海子，又报入犯朔州。兵部议："寇入宣府，则冲黄花、白马、古北等隘。今日庙谟所当先定者，惟亟备蓟镇，屏蔽京师。请发河间兵一支驻密云，保定兵一支驻通州，俱听蓟州抚镇节制。"①世宗下诏从兵部议。六月，俺答入犯大同。当时俺答移驻威宁海子，势将南下，由墩口溃墙而入，将精兵尽埋伏于密林之中，而以老弱之兵往来诱导明军。总兵官张达很轻视俺答老弱之兵，未能集中兵力，就急于率部追击，俺答伏兵顿发，围数重，张达马倒，被杀害。副总兵林椿，正在打杀余下的老弱残兵，在弥陀山地区忽闻张达被围，急引兵西救。适逢俺答精兵矢下如雨，林椿也中流矢死。张达、林椿骁勇善战，俺答得此二将首级，立即撤兵。

八月，俺答入蓟州塞。张达败没，以仇鸾为宣大总兵。俺答，狼台吉复拥众窥大同。初仇鸾坐废，往京师府邸，后因贿严世蕃得总兵宣大。时俺答入寇，仇鸾惶惧无策，其所厮养者时义、侯荣对仇鸾说，不要忧愁，他可为仇鸾解除忧患。于是

代表仇鸾持重赂贿俺答。令其转寇他塞，不要入犯大同。俺答受贿后，留给他箭囊以为信，与之盟，于是东去，谍报又传敌中传言说，打算入犯宣府以东，辽左以西地区。兵部尚书知道皇帝讨厌听警报，不细奏报，命令蓟州抚、镇、使严加戒备，不久警报渐甚，于是发诸边兵12000骑、京营兵24000骑，分布于宣、蓟关隘地区。而京兵悉市井佣保子，识者知其必败。

是月，俺答帅部下至古北口，以数千骑攻墙。都御史王汝孝带领全部人马出，以火炮矢石向下攻打，俺答于是伪装切断蓟州军，而另派精骑从间道黄榆沟冲垮城防出京师兵背后。京师兵大惊溃，弃甲马窜入山谷林莽中。俺答部众即于怀柔、顺义大加掠杀，吏士死伤无算，长驱入内地。巡按顺天御史王忬自度兵弱不能抵抗，连夜上草疏说："敌兵慓悍若风雨，而古北口距京师仅七舍，漫衍无卫戍瞭望。神京陵寝，万一荡摇，事系非小，请速集廷臣，议战守策。"②王忬本人出驻通州，召吏民发给兵械，让其做好准备。收漕运船只于潞河西，不让敌人使用。刚准备好，夜半敌兵果至，在河东20里孤山、汝口诸处扎营。王忬再次上疏告急，使使者缒城入京请援。京师震惊，急集诸营兵守城，少壮者全部到边塞戍守，已初经败丧，仅余四五万人，一半是老弱，一半到总兵、提督、太监家服役，不让他们参军。仓促从武库取甲仗，武库宦官又按条例收费，不能及时下发，很长时间不能组成军队。丁汝夔将情况报知皇上，世宗大惊，诏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提督九门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守一门。又别遣都御史商大节督科道官，招募民间青壮力大能武者及义军4万，及甲坊保伍，布于诸门之间。集在京天下应武试者千余人，分别随诸大臣调度。又传檄诸镇兵勤王。当时俺答骑兵逼通州数日，由于大河相

阻，不能渡。王忬日夜守城不能支，连连告急，诏遣都御史王仪往援。

是月，咸宁侯仇鸾得勤王檄，以大同兵两万入援。先是，俺答东行，时义等劝仇鸾因此而邀功。于是仇鸾假装上奏说："臣侦贼东犯蓟镇，诚恐京师震惊，请以便宜应援，或随贼搏战，或径趋居庸为防守。"③世宗非常感佩，诏命留驻居庸关，闻警入援。而俺答果从蓟镇攻古北口，入犯京城，世宗更加相信仇鸾所断，诏命入援。于是仇鸾与副总兵徐珏、游击张腾等率兵驰至，陈兵通州河西。世宗大喜。此时，保定都御史杨守谦，带五千骑兵赶到，延绥副将朱楫带三千兵赶到，人心稍安。不久，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将各带兵来到，共七镇五万多人云集京师。世宗看到守备稍强，各赐玺书褒奖，赐金帛，令奋力驱寇。拜咸宁侯仇鸾为平虏大将军，诸道兵全听仇鸾节制。又赐《封记》以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各路戎务，卫京师。都督陆炳提督皇城诸门，缉察不测之变。都御史商大节督巡五城，防止内衅。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徐阶上奏释放原参将戴伦、欧阳安，让他们从军戴罪立功。命京营兵于城内外各巷陌间扎营屯守。京城兵平日未曾与敌遇，驱之出城，多畏葸不敢前。城外及近地居民拥入，日夜不绝，多有被伤浓血淋漓者。都督陆炳请出太仓米，降价周济流徙老弱。世宗允准。当时变起仓促，诸务未备。勤王师各轻骑驰至，未备糗粮。世宗下令以牛酒诸费犒师，却不知所出。户部移文往复越二三日，军士始得数饼饵。开仓发粟，则府库皆空，所以士兵饥疲。都督陆炳说，户部之臣失预算，大军集聚，而粮饷不支，士卒多冻馁而死。世宗大怒，撤去尚书李士翱以下诸臣官职，戴罪办事。

俺答兵自白河东渡潞水西北行，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郊民扶伤集门下，门闭不得入，号痛之声彻于西内，世宗命启门纳难民入。当天，俺答掠妇女，于演武堂饮乐，骑兵往返六门外，仇鸾率勤王兵不敢击，时时遣时义、侯荣与之通，私许贡市以自安。不久俺答到东直门，俘御廐内八人以去。不杀，缚之见俺答，俺答在氈帐中，对他们说："你们回去，把书信给你们天子看。"八人回京面奏天子，打开书信，语言轻嫚，求入贡。世宗召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在西苑研究，严嵩推诿责任于徐阶。徐阶认为，俺答近在京畿，危及中枢，可以贡市为缓兵之计，又恐以后必有无厌之求。世宗说："苟利社稷，皮币珠玉皆非所爱。"④徐阶认为，如果止于皮币珠玉则可，万一有不能从者，将如何？有人认为，先让俺答退兵，然后双方遣使协议，同时也可为缓兵之计。国子司业赵贞吉抗言说："此不必问，问则奸邪之臣必有以和说进者。万一许贡，则彼必入城。三千之众，恐鸟蛮驿中莫之容也。且彼肆深入，内外夹攻，何以御之，不几震惊宫阙乎？不务驱逐，而畏其恐喝，迫而许之，何异城下盟！"⑤俺答书中曾要求通贡市，准其一次来三千人入贡。所以赵贞吉有此议论。赵贞吉还建议犒赏三军。激励斗志，开言路，重功赏，鼓励文武百官，共为城守。遣官宣谕诸营兵，使力战杀敌。世宗钦佩赵贞吉勇气，提拔贞吉为左春坊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以五万金，宣谕行营将士。当时通政使樊深上奏御寇七事，其中有一条说："仇鸾未闻一战。非士不用命，即主将养寇要功，乞密遣近侍诘状。"⑥可见有识之士，早已看破仇鸾所谓勤王御寇事中的蹊跷，不料世宗览奏后大怒，竟将樊深罢官，斥黜为民。

俺答自巩华城（今北京昌平一带），转掠西山、良乡以西，保定也为之震动。当时世宗久不视朝，吏部尚书夏邦谟力请世宗延见廷臣，以振威武。世宗视朝后，文武大臣具服，待命阙下。这时世宗才下诏逮系驻守通州都御使王仪，巡抚蓟辽都御史王汝孝、蓟州总兵罗希韩，到京审讯。初，王仪到通州上任，命令京营兵屯戍城外，而自己在城中馆阁晏卧。仇鸾兵至，俺答军稍却，鸾兵掠食村落，王仪发兵捕捉下狱，殴死数十几人。鸾兵大哗，巡按御史上其状，帝怒，方逮捕王仪下狱。不久任巡按御史王忬为佥都御史，代王仪守通州。当初，俺答初犯通州，丁汝夔闻警，束手无策。派侦察兵探虚实，出城不十数里，道遇扶伤者，立刻奔还，自称已见敌哨所，城中震惊。丁汝夔不信其言，再次探听，侦察结果相同，城中几次震惊。成国公朱希忠掌京营兵，恐兵不战获罪，乃东西调动为掩饰之计，士疲劳不得休息，多出怨言，语稍闻于世宗。当时宣府、延绥、辽阳、山西援兵集聚，粮饷不给，兵饥生怨，仇鸾大同军劫掠为食，村落荡然，被捕者，诈称辽阳军。先是，敌中传语说："辽阳实导我来者。"⑦所以京师讹传辽阳军叛变。时仇鸾方被宠，其部下有被捕获者，世宗也认为是出于饥疲，令交还仇鸾自己处理，鸾也不再追究。大同军更加放肆，民苦大同军甚于敌寇。大同军诈称辽阳军，民间无知，就说因为丁汝夔是山东人，以同乡之因庇护辽阳叛军。及俺答兵至城下，丁汝夔更加惶恐，怕军队损折，让诸将不要轻易出战，诸军怯懦不敢接战，都诿言丁汝夔禁不肯发，民间更怨恨汝夔。诸中贵园墅在城外又多所残毁，争泣诉帝前，认为杨守谦、丁汝夔怀二心，欲投敌。世宗从城高处望城外火光，心中已很恼火，又听中贵泣诉，更加暴怒，认为不杀一大臣无以惩后，于

是捕丁汝夔下狱。又差使者于前线逮捕杨守谦，下法司论罪。命王邦瑞摄兵部事，艾希谆代杨守谦指挥军队。于是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乔、大理寺卿沈良才等论丁汝夔、杨守谦罪当斩，一时又拿不出证据。世宗坐斋宫大怒，责彭黯等比周为党奸，欲免汝夔等罪，各廷杖有差，系狱。丁汝夔自裁，杨守谦弃市，流其妻三千里外，将其子远戍铁岭卫。

初，赵贞吉廷议后，负盛气到西苑直房求见严嵩，嵩不见，贞吉怒斥守门人。通政赵文华赶到，劝赵贞吉不要急于求见，国家大事应当慢慢商议。贞吉大骂赵文华：权门的一条狗，怎懂得天下大事！严嵩听了非常气愤，于是假装推荐赵贞吉带着银子出城慰问军队。诸军屯驻城外，贞吉用民车将赏银运到仇鸾住所，鸾不受。俺答骑兵已远离，赵贞吉无奈，带着敕命，巡查城外，把银子普遍发给各营将士而返回交命，严嵩说赵贞吉太荒唐，而追查他以前审理周尚文，沈束案件，将他抓进监狱。后来打了赵贞吉九十棍；谪遣他为荔浦县典史。可见真正为朝廷抗俺答的人，在奸相严嵩压抑下，不能如愿，反受其惩。明代政治之黑暗亦可见其一斑。

是月，俺答引众而西，掳掠大量人口牲畜金帛财物而去。想夺路白羊口出塞，而留余众在京城外做疑兵。俺答所过之境均属平房大将辖内，凡十余万骑，这些军队眼看着俺答抢掠而去，没有一人敢于上前发一矢。俺答到白羊口，守将防卫险要，不得奔出，不得不稍弃牛羊妇女等，复拥众东南行，到昌平北，突然与仇鸾兵相遇。仇鸾出于不意，仓皇奔逃几不成军。俺答纵骑兵蹂阵而入，杀伤千余人，险些生擒仇鸾。因为裨将戴伦、徐仁力救，仅以身免。于是斩杀平民首级献上，欲自立功。俺答骑兵长驱至天寿山，总兵赵国忠列阵红门前，不

敢入，俺答夺路沿潮河川由古北口故道逃去，京城解围。九月，俺答众部全体出塞，已成疲师，又顾恋辎重，不能列军戎阵，诸将怯惧，加上白羊之败，更加不敢包逼京师，至石匣城张家及古北等口外退还。仇鸾虚报御敌有功之人：大同游击王禄，战于怀来，斩 17 人，获马 12 匹；山西游击柴缙战于昌平，夺回男女 242 人；都督仇聚，战于海甸，生擒 4 人。不久仇鸾报杀敌功 80 余级。世宗优诏慰鸾，加太保，赐金币。仇鸾通敌，致使十万余骑，闻敌而避，不敢接战，使俺答得顺利掠获而归，罪当诛身灭族，但伪报战功，反而取得世宗宠幸，世宗昏聩，无以复加。嘉靖二十九年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庚戌之变”。

庚戌之变后，改京营十二团营兵为三大营。即五军营、神枢营和神机营。以仇鸾入理京城三大营，王邦瑞协理戎政，为副职。又设置蓟辽总督大臣，以蓟州、保定、辽东三镇隶属之。让兵部侍郎孙桧总督蓟辽。不久，又以何栋代替仇鸾，大大加强了京师的防卫，但仇鸾通敌罪状仍未被揭露。

注 释

①《明通鉴》卷五九，世宗嘉靖二十九年。

②③④⑤⑥⑦《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

明

俺答封贡

初，鞑靼小王子有三子：长子阿尔伦、次子阿著、三子满官嗔。阿尔伦死后，他的两个儿子还小，于是阿著自称小王子。不久阿著又死，各部立阿尔伦子卜赤。阿著有二子，一名吉囊，一名俺答，均强盛。小王子卜赤虽为君王，但难以号令吉囊及俺答。吉囊分地河套，处在关中，土地肥饶。俺答分地开源、上郡，土地贫瘠，所以经常在边疆扰害。以后俺答逐渐强盛，拥有骑兵十余万，称雄诸部。原满官嗔所部八营也都听其调遣。这时俺答进犯边疆益加频繁。

世宗嘉靖十年（1531）三月，俺答入犯大同。十月，再犯大同。不久出松潘（今四川松潘县），入寇西川（四川成都地区）西境。从这时开始无岁不入犯，前后杀略吏民剽劫人畜以亿万计。

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七月，俺答诸部大举入侵宣府。先是，大同归正人王九子说：北部哈剌嗔纠集俺答、几禄、吉囊、青台吉、赤台吉等共十余部，祭旗晾马，带十天干粮入犯边塞。紧接着就有探马飞报，俺答已过圣顺川抵达蔚州。他们

所过之处破关隘焚庐舍，杀人盈野。总兵白爵拚死抵抗，大战水儿亭，败阵。总兵云冒又在连云堡战败。俺答留驻宣府境内达两个月才退出塞外。大同遭俺答践踏之时，一部分叛卒逃出塞外，投俺答诸部。俺答挑选其中狡黠桀骜者，赐牛羊幕帐，让他们装扮成僧道乞丐侦察诸边，有的竟混入京城，把重要军情，都侦察到手并报告俺答。其中有才智的人李天章、高怀智等都做了俺答部众的头目。八月，俺答率诸部入塞，大同镇守军暗中派使者与俺答订立密约："勿掠我人畜，我亦不拦汝。"①俺答诸部非常高兴，与使者折箭为盟而去。于是就绕过大同，由井坪、朔州抵雁门入岢岚、兴县、交城、汾州、文水、清源诸处，杀掠人畜。路遇大同守卒，竟把所掠得辎重部分留给他们，借道退走。巡抚大同史道，总兵王陞任其退走，像没事一样。宣府总兵白爵调赴应援，也观望不战。巡抚山西都御史陈讲告急，事下兵部，尚书张瓒竟说："寇且退矣，何事张皇？"②任俺答吉囊纵掠而去！明代边塞镇卒与敌通谋，欺蒙朝廷，牺牲百姓。嘉靖二十年（1541）九月，吉囊入大同，杀掠人畜数万，京师戒严。不久，俺答再次入犯，大掠太原、石州。世宗命宣大总督樊继祖发兵应援，樊继祖竟不执行，让俺答纵掠而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俺答入犯大同，吉囊肆掠忻、代二州娼妓以纵淫乐。吉囊诸子内部不和，不相统属，分居于河套之地，这本是明军向吉囊大举反攻的良好机会，但由于大同镇卒与俺答有密约在前，对于如此腐败敌人也不去反击，以致坐失良机。而俺答势力日渐强盛，俺答之子黄台吉，短臂，善用兵器，也有一定调动军队及谋划布阵的才能，军令之残酷有过其父。俺答于是纠合青台吉、呪剌哈、哈剌汉及叛

人高怀智、李天章各自拥众数万入犯大同，然而又不轻易与明军作战，只用少数残兵就足以扼制镇卒。在这时，俺答经朔州破雁门关，掠太原而南，又造成对京城的严重威胁，京师戒严。七月，朝廷商量悬赏办法：斩俺答头者，赏千金，可越级提升。杀死偏裨将吏者赏三百金，连升三级。竟无一人应者。俺答拥众过太原列营汾水东西。剽掠潞安、平阳诸州县。世宗派翟鹏提督宣府、大同、偏头关、保定、山东、河南诸地军务，还没到达戍守地，各路军队就不相统摄，都观望不战，放纵敌寇深入。俺答大军驻平遥、介休间，他们遣散骑入山落中，杀掠人畜，押辎重掠获物迤逦回大营，明诸将没有一人乘险狙击俺答军。只有副总兵张世忠从候城村起营，相约与诸将追击敌之散骑，但得不到各营支援。他的这一行动，惹怒俺答，他们帅大军把张世忠团团围住，明军各部将领坐视不援，终因众寡悬殊，张世忠经苦战力穷，脑中二矢而亡。

嘉靖二十四年（1545），宁夏总兵仇鸾曾因吉囊入寇甘肃，与总督侍郎张珩、巡抚张锦打退吉囊进攻，而虚报战功、夸大事实。兵部也因他奏捷有假加以揭露，但世宗览奏后竟说："剿获既多，厥功可嘉，其加鸾宫保，任一子所镇抚。"③世宗奖罚不明，不能不促使边军混乱难以统辖。二十六年（1547）四月，俺答请求入贡，总督宣大侍郎翁万达上奏，请酌可否。世宗批覆："逆寇连岁为患，诡言求贡，勿得听从。其各严边兵防御，如有执异，处以极典。"④二十八年（1549）二月，俺答大举入寇，略大同，直抵怀来，指挥江瀚、董旸迎战，战绩颇佳，后因力竭无援战死疆场。总兵周尚文帅兵万人，追到曹家庄，与俺答兵大战，总督翁万达亲率精兵接援，俺答败走。这次战役，斩首55，缴获器杖铠甲无算。俺答士兵伤创

甚众，俺答因此败逃出塞外，这是二十年来少有的大胜利。捷闻，有功之臣皆得封赏。二十九年（1550）八月，俺答穿宣府到达蓟州边塞，入古北口，围顺义，驱马直入。后来又逼通州，大掠密云、三河、昌平诸处，进犯京师，京城震恐。俺答再求入贡，世宗命廷臣集议。俺答再扰犯诸陵，转掠西山、良乡以西，最后向东撤出，京城的严峻形势方得解除。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明朝与俺答通马市。四月，宣大马市成。命史道主市事，每一马偿币若干，俺答驱马至城下，计值取偿。遣官宣谕朝廷恩威，并敕命俺答严饬各部落，不得随意滋事，轻开边衅。七月，仇鸾遣时义以小利贿俺答，希望交还叛人萧芹等，俺答得利遂擒萧芹等 30 余人，械至大同塞下，交付总督史道。十二月，俺答入寇大同。初，史道主持宣府、大同马市，俺答以羸马多索钱，史道不允，俺答部众大哗，于是入寇。多者一月三入寇。甚至边市边寇。兵部尚书赵锦认为，自古以来御寇之道，战守为上，而羁縻终非长策。世宗命督臣加强侦察，并严防私通牟利。明年三月，罢马市。当时边防久废，言官屡谏，仇鸾害怕大祸临头，于是罢马市。召吕道回京。世宗敕命：有再敢言开马市者论死，著为法令。兵部请敕令边臣补修宣、大边垣烽堠。给事中李幼孜上言："敌垒卑小，宜于垣上增筑高台，营建房庐，以栖兵器。"⑤四月，大将军仇鸾帅师出塞，偷袭俺答于威宁海，大败而还。当时，俺答屡次入犯辽、蓟边塞，都由朵颜导引，为患极大。后蓟州警报愈急，仇鸾理当带兵抵御，恰逢仇鸾生病。兵部尚书赵锦上疏言仇鸾病不能行。世宗认为仇鸾不能主兵事，应收其大将军印绶，别遣将军带兵。赵锦夜驰至仇鸾宅第，收仇鸾印绶，鸾因此病情加剧，死去。当时世宗已经听说仇鸾有奸逆之

行，于是命都督陆炳密访，后陆炳揭发了仇鸾与俺答前后交通纳贿及其它乱政情状。世宗大怒，下令宣布仇鸾罪恶，剖棺戮尸，其父母妻子及时义、侯荣等都处斩，抄没其家。俺答得知，引众退去。赵锦也因当初随从仇鸾而被谪戍。世宗诏谕更改戎政，完全改变了仇鸾过去的措置与规定。三十二年（1553）七月，宣府、蓟镇守臣，各报俺答入寇，兵部议："蓟州密迩京师，备豫宜急，乞令提督时陈统入卫兵分布昌平、怀柔、顺义等处，遏其古北口入犯之路。仍简京营及入卫边兵，九门列营以备战守。"⑥

嘉靖三十七年（1558）四月，大同右卫围久不解，议者公推杨博前往，杨博征诸镇之兵，声言出塞北伐，羽檄日数十下，俺答听说杨博将到，引兵遁去。守将尚表拒守四月，誓师励众，死守不屈，杨博上书奏其功；王德战死，奏立祠加邮；参将周现暗通俺答，请求撤换其职务。从此，边防之兵人人砥砺，思自奋立功。杨博又陈善后二十余事，筑牛心诸堡，建烽堠 2800 余所，挖濠堑 1000 余里，共 50 天完工。世宗大喜，加杨博太子太保。

穆宗隆庆元年（1567）五月，俺答进犯大同，参将刘国引兵打退其进犯。九月，俺答子黄台吉拥众窥伺陵后南山。穆宗命总督刘焘率兵护陵寝。俺答入寇山西石州，攻陷石州杀知州王亮。驻重兵于石州，剽掠交、汾等处，山西骚动。恰逢蓟镇有警、京城戒严。当时俺答入边已二十余日，势甚横。不久，雨潦连旬，马多死，俺答军皆弃马步归，所剽获不能尽载，遗于道路者甚众，十余日方退出边塞，而官军无一人追击。大同总兵申维岳、孙吴等终不敢出战而还。不久，俺答始全部撤走。诸将才稍稍移出，俘获奸细明海等及其老弱疲幼，自以为

有功。诸将之中只有方振与俺答交战，尤月带兵驱逐俺答到岚县，属于稍稍敢于迎战者。事奏后，诏命将督、抚、镇诸臣官职罢去，听候处理。把诸将逮入京城审讯，议加罪赏罚各有区别。时边臣怠玩，掩罪冒功，积弊已久，因此才敢于纵恣俺答随意出入。至是议罚，诸将始知畏法。

隆庆三年（1569）改总理练兵都督戚继光为总兵官。先是，戚继光至镇，上疏说：蓟镇兵虽多也少，原因有七，边兵不练之失有六，虽练无益之弊有四。又说："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蓟之地有三：平原广陌，内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险半易，近边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边外之形也。寇入平原利车战，在近边利马战，在边外利步战，三者迭用，乃可制胜。今边兵惟习马耳，未娴山战、林战、谷战之道也。惟浙兵能之。愿更予臣浙东杀手、砲手各三千，益以西北马步军，专听臣训练"⑦。又说：他所创事业，诸将看作是累赘，无法发挥作用。兵部认为，蓟镇既有总兵，又设总理，权已分割，不便统一调度，诸将只能观望。应召回总兵郭琥，专任戚继光。穆宗同意兵部议，于是命令戚继光以总兵官名义镇守蓟州、永平、山海关等处。而止调浙兵北上。四年（1570）十月，俺答孙把汉那吉率其下属阿力哥等十人来降。初，俺答抢外孙妇为妻，又夺孙妇，触怒其孙把汉那吉。把汉那吉多智略，有口辩，至是与阿力哥及妻室比吉等十人南走，叩关请降。边将议应加优邮做人质，并以交换叛徒赵全为约。穆宗任命把汉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各赏大红纻丝衣一身。俺答妻恐明廷害其孙，日夜哭请俺答，俺答亦悔，拥十万众压境，得知明朝果优邮俺答孙，开始感到惭愧说："汉乃肯全吾孙，吾且誓臂盟，世服属无贰，奚有于叛人"⑧。

于是与明定盟，通贡马市。俺答诸部均贪明朝财物，喜而从之。十二月，俺答执叛臣赵全等九人来献，并求赐还把汉那吉。穆宗准其迎还。

隆庆五年，（1571）封俺答为顺义王，任其子弟部落为都督等官。在封贡互市问题上，朝中争议较大。首辅张居正在封贡、互市的决策中起作用极大。当郭乾在争论中彷徨时，张居正请求皇帝下诏廷议，以坚定其信心；当封俺答一事尚在争议时，张居正又找出成祖封和宁、太和、贤义三王的先例，促使皇帝下决心封俺答；穆宗决定封贡、互市后，张居正又拟旨敕行。同时还与总督王崇古计议具体实施内容。五月，总督王崇古为俺答陈请四事：一、请给王印；二、请许贡入京，贡马30匹；三、请给铁锅；四、请抚赏部中亲属布缎米豆，散所部穷丁。塞上仍许不时小市。这些内容的提出都与张居正授意密不可分。六月，顺义王俺答使恰台吉、打儿汉执赵全余党赵崇山、穆教清、张永保、孙大臣及妖人李梦阳等来献。穆宗嘉赏其诚顺，赏白金 30 两，彩币四表里（衣料）；恰台吉等各10两，一表里。六年（1572）九月，俺答贡马 250 匹，时穆宗已死，神宗即位。十二月释放俺答旧使火力赤奴谋赤北还。

神宗万历元年（1573）颁发顺义王俺答佛经，给镀金银印。三年（1575）十月，俺答请佛像蟒缎，同时筑成一城，求赐名。赐城名为福化，量给其请。当年，黄台吉改贡市于新平堡。五年（1577）二月，顺义王俺答执叛盟者献鹤等四人，帝赐俺答币，论叛者如法。三月，俺答请开茶马市，又求都督金印，不准。九月，俺答上书复求茶市。兵部认为俺答称迎佛，僧寺必须用茶，量给数十篦示恩。神宗批覆：量给数十篦示恩可以，开茶市，不可。七年（1579）秋，俺答请赐寺额，诏名

其寺为弘慈寺。八年（1580）八月，俺答次子不他失为骠骑将军，常汉我、不艮台吉等百户。九年（1581）十二月，顺义王俺答死，赐祭七坛，采币 12 双，布百匹。其妻三娘子率其子黄台吉上表谢贡马。黄台吉为俺答长子，俺答死，黄台吉想让三娘子（其母）做他的妻子。三娘子嫌黄台吉老，不愿从，后又想，如从黄台吉，可为王后，若不从，终为妇人，便从黄台吉为妻。十一年（1583）闰二月，黄台吉袭封顺义王，更名为乞庆哈黄台吉。十四年（1586）二月，黄台吉死，扯力克当嗣。督臣郑洛示意扯力克说："娘子（指三娘子）三世归顺，汝能与娘子聚，则封，不亟聚，封别有属也。"⑨于是扯力克尽逐诸妾，于十月入三娘子帐中，强与之合婚。其部下牙答汉盗掠助马堡，洪卖盗掠偏头关，因其擅自扰掠明朝边塞地区，三娘子俱罚治如法。

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神宗诏封扯力克为顺义王，三娘子为忠顺夫人。至此俺答扰边之祸始息。

注 释

①②③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六〇《俺答封贡》。

⑥《明通鉴》卷六〇《世宗嘉靖三十二年》。

⑦《明通鉴》卷六四《穆宗隆庆三年》。

⑧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六〇《俺答封贡》。

明

戚继光抗倭

明朝初年，日本正处于南北分裂混战的后期。在内战中因失败而丧失军职的武士，流亡海上，成为无业“浪人”。他们勾结本国的流氓、奸商，在日本封建主的支持下，成群结伙到我国沿海，大肆掳掠，明朝人称之为“倭寇”。倭寇除了日本海盗外，还有不少从倭的中国人。嘉靖二年（1523），明政府撤消市舶司（明初在浙江、福建设立的对外贸易机构）后，断绝了对外通商关系。沿海豪门势家、海盗魁首组织船队，冒禁阑出，有的竟同倭寇互相勾结，走私发财。而中枢秉政之人，利于贩卖番货，收受贿赂，包庇纵容，如“海盗汪直，通倭为乱，（郑）晓议置重典，而严嵩颇宽假之”①。兼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②，这就更加助长了倭寇的侵略气焰。由于明初社会比较安定，海防整饬，倭寇还未酿成大患。

明朝中叶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开始了统治危机，倭患也随之日趋严重。特别是明世宗嘉靖统治时期，政治更加腐朽。世宗崇信道教，妄求长生，二十余年不视朝，宫廷生活奢侈腐

腐化。首辅严嵩贪婪成性，“私藏充溢，半属军储”③，文武将吏，多出其门下。以至沿海军事设施大都荒废，因而给倭寇大举侵扰造成了可乘之机。而这时日本已进入群雄割据的战国时期，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诸侯为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力量，便支持并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到中国沿海冒险。倭寇所到之处，劫夺财物，焚烧庐舍，奸淫妇女，屠杀和掳掠大量人口，甚至对所掳婴儿“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④。倭寇惨无人道的暴行，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为了保家卫国，沿海地区人民展开了打击倭寇的斗争。戚继光就是在这一时代里锻炼出来的一位杰出的抗倭名将、民族英雄。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号南塘，山东登州（今蓬莱县）人。父景通，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历官都指挥，是一位精通军事的将领。戚继光幼年时“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⑤。嘉靖二十三年（1544），戚景通死去，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官职，担负起防御倭寇的重任。倭寇的不断侵扰，激起了这位青年将领歼敌卫国的怒火，就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了他的伟大抱负。

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十六岁的戚继光升任署都指挥佥事，统率三营二十五卫所⑥，督山东备倭事。当时山东的海防和其他沿海地区一样，工事残破，器械不全，兵员缺额，军伍不振。戚继光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他一面“振饬营伍，整刷卫所”；一面训练士卒，严肃纪律。于是山东沿海的防务，日渐巩固，倭寇为之敛迹。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七月，因御史雍焯的疏荐，戚继光

调转浙江都指挥使司佥事，司屯局事。明年，升任参将，镇守宁波、绍兴、台州三府。在对倭作战中，戚继光看到明朝军队腐败无能，临阵畏怯，一旦遇到敌人，则“数里以前，望贼奔溃，闻风丧胆”⑦的现实，认为有必要训练新军，彻底消灭倭寇，“遂条上《练兵议》，请练越人以从事”⑧。当时他的同僚和部下都蹙额认为不可，他们认为：“御倭事自有督抚主持，且从来未闻倭可杀（尽）者，须待其饱载归，浮海击之，庶可获功赎罪而渔利复不赀也。”⑨然而戚继光练新兵灭倭患的雄心并未因同僚和部下将领的反对而动摇。他在多年来与倭寇的斗争中，创造性地运用了许多传统战法，如“水陆兼司，陆战尤切”；声东击西，示假隐真；出敌不意，突然袭击；用寡击众，以正为奇；并力合势，先重后轻等，都体现在他的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中。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他根据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的积极进剿以求尽歼的作战方针。他针对僚属中存在的消极防守思想，明确指出：“凡司三军之上者必曰练兵，夫此练字，即练丝者将生练熟以织彩之谓也。”⑩他还认为：“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⑪意思是说，倭患能否真正解决，问题不在于是否能将其完全赶跑，而在于能否把他们彻底歼灭。他不顾僚属们的劝阻，将其练兵剿倭计划上给总督胡宗宪和巡抚阮鹗，胡宗宪和阮鹗迫于形势，原则上同意了他的建议，但并未能立即付诸实施。直至嘉靖三十八年（1559），戚继光才得招募了以勇敢著称的浙江金华、义乌地方的农民和矿工四千多人，进行训练，教以武艺，申明纪律；又根据江南地区山岭多、沼泽多、道路狭窄曲折，兵力不易展开的地形特点，并针对倭寇善设伏、猛冲锋、擅长短兵相接的惯技，创制了有名的“鸳鸯

阵”法。这种阵法是以火器、弓箭作掩护，对敌人进行短距离搏斗的一种战斗队形。它以十二人为一战斗单位，最前一人是队长，领导小队作战。其余的人依次是：二人并列，一持长牌，一持藤牌；二人持狼筅⑫；四人持长枪；二人持短兵；末一人是炊事兵。在战斗开始时，敌人进至一百步以内，放火器；敌人进至六十步以内，弓弩手放箭；再进，鸳鸯阵接着冲杀。以鸳鸯阵法进攻时，先是二牌手执牌并列前进，等到敌人长枪快及身时，牌手即投标枪击敌，接着取腰刀砍杀。狼筅手各跟一牌手身后，以保护牌手和掩护本队前进。长枪手每二支分别照顾一牌、一筅，如长枪进刺不中，短兵手即杀上救应。鸳鸯阵法不仅长短兵器互相为用，以充分发挥各种武器的效能；而且把十二个人紧紧地结成一个战斗整体，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因此就有可能战胜个人武艺较精的倭寇。经过认真的训练，新军掌握了熟练的战术和阵法，成为一支具有坚强战斗意志的队伍，被人们称为“戚家军”。在此以后的御倭战斗中，戚继光就依靠这支新军，贯彻执行他确定的“大创尽歼”、“以次剿除”的作战方针。台州之战，就是一个典型的战例。

台州之战是戚继光在台州附近的新河、花街、上风岭、长沙等地连挫倭寇的一系列作战，亦称台州大捷。

嘉靖四十年（1561），倭船五十艘，两千余人聚集于宁波、绍兴外海，伺机窜犯浙江沿海地区。一股倭寇首先进犯台州东南面的新河，在城外大肆劫掠，新河告急。戚继光以唐尧臣率军2千人救援新河，在新河城南重创倭军，歼敌约200人，保障了主力军的作战。另一路倭寇自桃渚（今浙江临海东北）登陆后，向精进寺（在桃渚以北）进发，戚继光此时已进抵宁海西南的梁王铺。他得知消息，立即亲率明军以急行军先敌到达

台州（府治在今浙江临海县）城外，由于连续行军，部队十分饥乏。此时，得知来犯之倭已进抵离城仅有2里的花街，戚继光立即决定主动进击窜犯之敌，要求部队为保卫台州人民的生命财产而战，“亟须灭贼而后会食”⑬。部队经过动员，个个“抵掌奋勇，莫不弃食以从”⑭。明军在战鼓声中进抵花街，戚继光命令前锋以火器队轮番齐射，顷刻间击毙敌寇多人。倭寇气馁，把队伍分成左右两队，从两侧攻击戚家军。戚家军摆鸳鸯阵冲杀，正面、侧翼一齐出动，倭寇渐渐抵挡不住。狡猾的倭寇抛出大量金银财物，企图利诱戚家军。但是有着铁一般纪律的“戚家军”，却置之不顾，继续奋勇冲杀，倭寇大败溃逃，大量淹死在水中。此战共击毙倭寇380人，俘敌酋2人，缴获武器650余件，夺回被掳男女5千余人⑮。

花街之战不久，一支两千多人的倭寇，再犯台州府城，在城东北的大田，大肆掠夺。戚继光率领1500人，在中途的上风岭设伏，以逸待劳，等敌人半数通过狭谷时，戚军鸟铳突发，居高临下，奋勇冲杀，倭寇仓皇应战，全部就歼。战后，原自宁海团前逃跑的倭寇，又聚众两千，联舻18艘，在长沙（今浙江温岭县东南）登岸，他们砍伐竹木，筑垒结巢，企图作长期的盘踞。戚继光当时驻军新河，他与僚属研究后，立即决定以水陆两军联合作战，突然进攻据守长沙之敌。行军中途遇雨，戚继光指挥士兵冒雨前进。明军分三路迫近倭巢，倭寇迎战不利，纷纷夺船遁逃，但船只早被明军焚毁，倭寇只得投海泅逃。因遇飓风，海浪滔天，泅海之倭全部淹死。畏缩于海滩的敌人，也被戚军歼灭。此次战斗戚军打得倭寇“只樯不返，而贼部中之枭雄悉绝”⑯。

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戚家军连战皆捷，共斩获倭寇1400

余名，敌人焚溺而死者4千多人，给侵台倭寇以歼灭性打击。与此同时，浙江总兵卢镗及温、处参将牛天锡等也歼灭了进犯宁波、温州一带的倭寇，取得重大胜利，浙东倭患基本平息。

台州之战所以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史上取得如此巨大的胜利，重要原因之一是在战略指导上，戚继光坚持了“并力合势，先讨其重大者，然后以次剿除”的务在尽歼的作战方针。

其后，在福建的御倭战争中，戚继光更加有意识地坚持这一作战指导方针，对分据各巢之敌，不是同时进剿，而是逐巢夺取，依次剿灭。如仙游之战即是一例。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由于战功卓著，晋升为都指挥使。嘉靖四十一年（1562）夏，福建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奉调援闽。在先后荡平横屿（在福建宁德东北）、牛田（在福建福清东南）、林墩（在福建莆田城南）三大倭巢歼倭近万人（包括胁从的明朝海盗流氓）后，戚继光率部回浙进行补充休整。于是倭酋相互庆贺说：“戚老虎去，吾又何惧？”⑰又收集残兵败卒，兴风作浪，并夺取了兴化城（今福建莆田），占领平海卫（在兴化东南）。兴化城的陷落，使“八闽俱震”，明廷再调戚继光和俞大猷迅速入闽驰援。戚继光接到命令后，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二月，又到义乌募兵万余人，边行军边练兵，于三月开拔入闽。他写信给福建巡抚谭纶，请其协调三军行动，制定战场纪律，以确保战斗的胜利。在平海卫的战斗中，戚继光与总兵俞大猷、刘显分兵三路协力作战，斩敌2200余人⑱，缴获兵器3900余件，解放被掳男女3千余人。次日又擒斩逃匿之敌170余人，达到速战全歼的目的。明军一举收复了平海卫，进入兴化府。

战后，谭纶同戚继光共商加强福建水陆防务事宜，并将议

定的《倭寇暂宁条陈善后事宜以图治安疏》上报朝廷。戚继光部署方毕，倭寇又聚合27000多人，大举入侵，福建形势复趋紧张。为迅速彻底消灭倭寇，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给其“统一浙、福之责，重以节制调度之权”⑲。是年十一月，朝廷任命戚继光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并浙江金、温二府，负责水陆军务。在这期间，戚继光在军事上的最重要贡献是解仙游（今福建今县）之围。

十一月初，真倭万余向仙游进犯，从四面将仙游城包围起来。当时城内守军兵力单薄，戚军尚未到达，戚继光决定先取守势，于敌外围据险设垒，进行牵制，候援军到来，再行进剿。十二月杪，戚继光的新军六千人回到福建，戚继光召集将领，商讨歼灭倭寇，解仙游之围的方略和部署。戚继光认为敌人兵力有一万多人，处于优势，不能同时进攻倭之四垒，宜逐一夺取。于是决定先以主力攻打南垒，然后再攻取东、西二垒，在城北之铁山设置疑兵以牵制北垒之倭。二十六日晨，大雾弥漫，咫尺不见人。戚军各部按计划从营地出发，直逼倭垒。当时倭寇正在结队攻城，戚军将至城下，倭寇始发觉。戚军首先猛冲倭寇南垒，火烧倭营，当即斩杀四五百人。余倭向东垒溃逃，戚军转攻东西垒，以“虎博鹰击”之势，迅速焚毁倭寇三垒，共杀死倭寇一千余人。余倭数千人向北垒奔逃，戚继光督军奋击，又大败之，敌人尸横遍野。仙游之围于是解除。

仙游之战，是戚继光在平海卫大捷之后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谭纶在评价这次作战时说：“用寡击众，一呼而辄解重围；以正为奇，三战而悉收全捷。……盖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也”⑳。对戚继光的军

事艺术才能评价是很高的，也是十分允当的。

嘉靖四十三年（1564）二月，戚继光又在同安王仓坪大败倭寇，斩首数百，余众奔漳浦，“继光督各哨兵入贼巢，擒斩略尽”㉑。少数残倭胆战心惊，流窜广东觅舟归国，“白昼辄相愕曰：“戚虎来矣，今而后始知犯华之不利也。”㉒东南沿海倭患至是平息。

戚继光领导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历时十余年，前后数十战，“飙发电举，屡摧大寇”㉓，建立了盖世奇功，在当时和后世受到中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纪念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御倭战争中行之有效的一些军事策略和战法，已成为留给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的宝贵财富。

注　释

①《明史》卷一九九《郑晓传》。

②《嘉靖东南平倭通录》。

③《明史》卷二一〇《张翀传》。

④采常吉《倭变事略》。

⑤《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⑥据胡宗宪《筹海图编》卷七。《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记为：“总督三营二十四卫。”

⑦《纪效新书》卷首《任临观请创立兵营公移》。

⑧⑨⑩⑪《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一。

⑫狼筅又名龙筅，是一种适应江南水田地带的御倭利器，用大毛竹做成（也有用铁做的），长约一丈五六尺，节密枝尖，梢加利刃，须力大的人，才能运用自如。

⑬⑭⑮⑯《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二。

⑰《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三。

⑱《嘉靖东南平倭通录》、《国榷》。

⑲《戚少保年谱耆编》卷四。

⑳《谭襄敏公奏议》卷二《请行赏罚以励人心疏》。

㉑《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五。

㉒《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五。

㉓《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明

严嵩擅权

严嵩是明世宗嘉靖年间委用最专，任用最久的内阁首辅。在位21年，贪而且奸，故《明史》列入《奸臣传》。

严嵩字惟中，分宜（今属江西省）人，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善于阿谀媚上，“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①，自翰林院一编修步步高升，直至内阁首辅，嘉靖七年（1528），严嵩任礼部右侍郎，奉明世宗朱厚熜之命，至湖广安陆祭告世宗生父②之陵。事毕，竟佞词连篇，献媚于帝曰：“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而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世宗大悦，命迁升礼部左侍郎，之后，世宗将其生父入位于明堂祭祀，“以配上帝”，并拟称“宗”入太庙。初，“严嵩与群臣议沮之”，世宗不悦，严嵩惶恐不已，“尽改前说，条划礼仪甚备。礼成”。世宗赐金帛。“自是，益务为佞悦”③。

其时夏言为内阁首辅，严嵩与夏言同乡，然嵩先中举而官阶低于夏言。开始时，严嵩谨慎恭敬以事夏言，曾置酒邀言，亲至其第，夏言推辞不见，严嵩便竭尽阿臾奉承之能势，奴颜

卑膝。夏言以为他是真诚相待，不以为疑。其实，严嵩欲夺其位而代之，惟恐夏言不去。不久夏言失宠，邀严嵩谋对策，而此时严嵩子正潜赴陶仲文（道士，为世宗所亲信）家，与之计谋排挤夏言之计。待夏言觉察严嵩所为，告之以亲近的巨僚弹劾严嵩，然而世宗已信任严嵩，不听。世宗对夏言愈益不满。世宗在西苑，许诸贵人得乘马，夏言"独用小腰舆以乘"；世宗信道教，爱戴香叶中，命尚方仿制沈水香为五冠，以赐夏言、严嵩等。夏言不知感恩，也"不奉诏"，推说"非人臣法服，不敢当"；而严嵩于召对时却欣然"冠之"，并"笼以轻纱"，令上见之。明世宗由此益恨夏言而爱严嵩。嘉靖二十一年（1542）六月，严嵩"每燕见，顿首而泣，愬言见凌状"，世宗遂手敕礼部，"历数言罪"。七月夏言被削职④。初，夏言与严嵩"俱以青词⑤得幸"，至是，"醮祀青词，非嵩无当帝意者"。

八月，世宗拜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入值文渊阁，仍掌礼部事。

严嵩之得以窃权弄奸，也在于世宗的昏愦。自十八年（1539）葬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一年（1542）宫婢之变⑥后，即深居西苑，专事斋醮祷祀，不入大内。廷臣长期不见天子面，惟严嵩"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当时严嵩已年过花甲，然"精爽溢发，不异少壮"。为表示勤于职守，并随时窥测世宗的意向，朝夕侍候于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世宗因对其嘉奖不已，曾赐银记，文曰"忠勤敏达"，并加太子太傅以褒之。

夏言削职后，翟銮以资序在严嵩之上，为首辅。严嵩虽权出其上，而"终恶銮，不能容"，使言官论其罪，翟銮被削职

为民，严嵩终于爬上首辅高位。吏部尚书许瓒、礼部尚书张壁与严嵩同时入阁，而严嵩事事独断，不相关白，更不与闻票拟事。于是政事一归严嵩。世宗益喜严嵩，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

久之，严嵩擅权自重，世宗亦有所觉察。自嘉靖二十四年（1545）十二月至二十七年（1548）正月，一度使夏言复出，二次为首辅。然而不久又恩宠他移。严嵩不失时机，借河套事攻击夏言，夏言被杀，严嵩乃得继任首辅。自此又连任十余年，成为嘉靖年间任期最长的首辅。

经过此反复世宗对严嵩更加倚重。“帝尝以嵩值庐隘，撤小殿材为营室，植花木其中，朝夕赐御膳、法酒。嵩年八十，听以肩舆入禁”⑦。然世宗虽厚待严嵩，亦不尽信其言。间或独断一事，或故示异同，以稍减其势。而严嵩更有其狡黠之手段以应对。据《明史·严嵩传》记载：严嵩父子独得帝意图，欲有所救解，严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美，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左右世宗喜怒，往往不失。于是士大夫纷纷趋向严嵩。当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详等为严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燿、许论之辈皆惴惴侍奉于严嵩。

严嵩警敏过人，善于揣测帝意。而世宗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世宗御札下问，往往瞠目不知对。然严嵩子严世蕃，奸滑机灵不下于乃父。严世蕃凭借严嵩权势，官至兵部侍郎。严世蕃晓达时务，颇通国典。尝谓天下才，惟己与陆炳、杨博为三。严嵩使其子入值，代为票拟办事。严世蕃读御札，“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严世蕃又以重贿交结世宗近侍。世宗之言谈举措，无论巨细俱能知悉。故世宗所欲办之事，均早为

准备，且能得世宗之意。严嵩耄昏，且旦夕当值西内，部府有事请裁决，亦往往答以“与小儿议之”，或曰：“以质东楼。东楼，世蕃别号也。”朝事一委严世蕃。故朝廷上下，颇有议论：明世宗不能一日无严嵩，而严嵩不能一日无其子。更有人以“大丞相、小丞相”称严嵩父子者。九卿以下官员登门求见严世蕃者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等候一天而仍不得见者。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送礼之筐篚相望于道。

严嵩父子倚仗权势，卖官鬻爵，招财进宝。朝中官员之升迁贬谪，悉凭对严嵩贿赂之多寡以定。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大将军仇鸾，因罪罢官，闲居已久，后贿赂严嵩，得任宣府大同总兵要职；工部主事赵文华，因贪赃获罪，被贬出京，贿赂严嵩后，重新入朝，与严嵩相结为父子，步步高升。严嵩党羽中，因罪被免职而又经贿赂重新复官者不乏其人。严嵩往往罗织门下，成为党羽核心。或有不愿投靠权奸之正直官员，严嵩父子施行打击迫害之同时，亦不忘敲诈勒索。抗倭名将俞大猷为人耿直，不得严嵩父子欢心。严嵩父子指使党徒将其陷害入狱。群臣不忍，拼凑白银三千两，送严世蕃，俞大猷始免于死，发至大同戍边。

严嵩父子之招财纳贿，已形成“制度”。“吏兵二部，每选请属二十人，人索数百金，任自择善地，致文武将吏尽出其门”⑧。嘉靖三十七年（1558），刑部主事张翀弹劾严嵩曰：“户部岁发边饷，本以赡军。自嵩辅政，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臣每过长安街，见嵩门下无非边镇使人。未见其父，先馈其子。未见其子，先馈家人。家人严年，富已逾数十万，嵩家（之富）可知。私藏充溢，半属

军储。”⑨

由于大肆敲诈勒索，招财纳贿，严嵩父子家财可与皇帝比富，在都城，有府第连跨三四坊，并有塘面积数十亩；在家乡，复有府第五处，皆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巍峨壮丽不亚于宫殿，金银珠宝更不胜算。后严世蕃事发被抄家时，尚有黄金三万余两（一说三十余万两），白金二百万余两，其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世蕃生活奢侈糜烂，“粉黛之女，列屋骈居，衣皆龙凤之文，饰尽珠玉之宝；张象床，围金幄；朝歌夜弦，宣淫无度”。严世蕃沉溺酒色，自诩“朝廷不如我乐”。

严嵩父子打击异已势力，手段狡黠，据《明史》载：世宗“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严嵩当政之时，前后弹劾严嵩父子者，谢瑜、叶经、童汉臣、赵锦、王宗茂、何维柏、王晔、陈垲、厉汝进、沈鍊、徐学诗、杨继盛、周铁、吴时来、张翀、董传策皆被遣。叶经、沈鍊借它过被处死。杨继盛则附其名于张经疏之尾以杀之。凡严氏父子所不悦，借迁除考察以斥逐者众，皆不露痕迹。而其中尤以杀害谏臣沈鍊、杨继盛两案最为天下人所不容。

锦衣卫沈鍊愤恨于严嵩奸贪误国，于嘉靖三十年（1551）弹劾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之岁例，阴制谏官，擅宠害政等十大罪，请世宗诛戮奸臣，以谢天下。疏上，沈鍊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谪保安。沈鍊至保安后，受当地人民尊重，聘之为师，教习乡中子弟。沈鍊缚稻草为人，指曰：是为李林甫，是为秦桧，是为严嵩。与众子弟以箭射之。严嵩获悉，恨之入骨。严世蕃使其党设计陷害。适白莲教徒阎

浩为官军所获，必死，且牵连极众。乃以沈链之名列于其中，斩沈链于宣府。

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主要有：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伺世宗之喜怒以恣威福，窃君上之大权；让严世蕃代为票拟，纵奸子僭窃权柄；子孙无功而官，冒滥朝廷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臣；戒守将勿击俺答，误国家军机；中伤天下善类，专黜陟之权……。疏上，严嵩唆使世宗廷杖一百，并投入大狱。又操纵刑部，判处绞刑。然世宗犹未欲杀之，下狱二年不执行。嘉靖三十四年（1555），严嵩搜索必能批准处决之案，附杨继盛之名并奏，乃被弃西市。

严嵩擅权久，最后仍不免失宠于世宗。其失宠有一过程。

初，严嵩握权，遍引私人居要地。世宗渐厌之，而渐亲徐阶。徐阶亦善于撰青词，故得世宗宠幸。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月，徐阶得以礼部尚书兼大学士参与机务。三十七年（1558），徐阶门生吴时来、门生张翀、同乡董传策同日弹劾严嵩。严嵩密请追究主使者，然无所得。世宗乃不问而慰留嵩。此后，世宗对严嵩的行为渐生怀疑。

其时严嵩妻病死，严世蕃当护葬归。严嵩不能一日离其子，请求世宗同意由其孙严鹄代行，严世蕃仍留京城。因能干预各司事如故，然已不能入直房代父票拟。有时遇情况紧急，文书飞至，而严世蕃正与诸姬狎客寻欢作乐，不能及时解决。严嵩无奈，每自己动手，则又往往不能合帝意。明世宗对严嵩之不满于是更为加深。

嘉靖四十年（1561），世宗所居永寿宫火灾，徙居玉熙殿，因住所狭窄，世宗欲另外营建。询问严嵩，嵩答以请暂居南

宫。南宫者，英宗为太上皇所居之地也，世宗深为不满。世宗转而讯之徐阶，徐阶建议重修永寿宫。及明年，工竣，改名万寿宫。从此世宗益亲徐阶而远严嵩。时有道行名方士兰，“以扶乩得幸”。帝密问“辅臣（指严嵩）行否”？道行诈为乩语。具言严嵩父子窃据朝政大权的罪行。世宗问：“尔果上仙，何不殛之？”兰道行又假乩言：“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迷信仙术。至此，不能不为之心动⑩。

四十一年（1562）五月，徐阶支持御史邹应龙上疏弹劾严氏父子。极言严氏父子不法。于是世宗令严嵩致仕。严世蕃被谪戍雷州卫。严世蕃未到雷州，半途逃归家乡，仍旧诽谤朝政，役使4000人大治园庭。

四十三年（1564）十一月，南京御史林润奏“江洋巨盗多入逃军罗龙文、严世蕃家。……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世宗诏令逮捕，论斩，皆伏诛。同时黜严嵩及诸孙为民。“又二年，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⑪。

严嵩窃政二十年，溺信恶子，流毒天下，人咸指目为奸臣。

注　释

①《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

②武宗朱厚照无嗣，死后由皇太后及首辅杨廷和定策，以武宗遗诏名义召兴献王朱祐杬之世子朱厚熜、武宗之堂弟入继帝位。即位后改元嘉靖，是为世宗。

③《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

④《明史》卷一九五《夏言传》。

⑤世宗崇道，在宫内设坛建醮，祈求长生。祷文谓之青词。

⑥宫婢之变：世宗酷待宫婢。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世宗正

熟睡。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密谋勒死世宗。据《万历野获编》卷一八载：“（宫女）用绳系上喉，翻布塞上口。以数人踞上腹绞之。已垂绝矣，幸诸婢不谙绾结之法，绳股缓不收。户外闻咯咯声，孝烈皇后率众入解之。立缚诸行弑者赴法……宁嫔王氏，首谋弑逆，端妃曹氏时虽不与，然始亦有谋。”十六宫女全部被擒，凌迟处死，史称“壬寅宫变”。自此，世宗从乾清宫移住西苑。

⑦《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

⑧《明史》卷二一〇《王宗茂传》。

⑨《明史》卷二一〇《张翀传》。

⑩《明史》卷三〇七《陶仲文传》附《兰道行传》。

⑪《明史》卷三〇八《严嵩传》。

明

海 瑞 上 疏

在我国历史上，海瑞是作为著名清官出现的。

海瑞，字汝贤，号刚峰，海南琼山（今海口市）人。生于明正德九年（1514），卒于万历十五年（1587），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个皇帝。海瑞的时代，是明王朝从全盛走向衰落的时代。明代中期以后，贵族、官僚、地主加紧掠夺和兼并土地，造成土地的高度集中。皇庄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占田“至三千八百余顷”，“占据膏腴，跨连郡邑”①。一般也都占地至几千亩几万亩。世宗时的权相严嵩更“广布良田，遍于江西数郡”②。大学士徐阶“有田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③。兼并之外，官吏贪污成为风气，从宫廷到地方，贿赂公行，横征勒索。由于土地兼并的继续发展和官吏的贪鄙残酷，农民破产流亡遍于大江南北，社会秩序因之动荡。

海瑞的父亲海瀚，是个廪生（享受政府膳食补助的在学生员），在海瑞四岁时就已死去，母亲谢氏，靠着仅有的十余亩祖田，加上自己做女红的一些收入，抚养海瑞成人。谢氏个性

坚强，对海瑞教育很是严格。海瑞读书时，正是王阳明学说盛行的时期，王学的要点除了主要方面是唯心主义以外，还有提倡知行合一、理论和行动一致的积极方面。王阳明还提倡“立诚”，反对伪君子式的“乡愿”作风。这些对海瑞日后的为人影响很大。

嘉靖二十八年（1549），海瑞以一篇《治黎策》中了乡举。嘉靖三十二年（1553），海瑞被任命为福建南平县学教谕（校长）。他教育学生道德和文章不可分割。他主张读书人应该尊重自己的身分，不该对上官随便下跪。有一次，延平府知府来南平视察，县学里的人都下跪迎接，只有海瑞站在中间，作揖为礼，这样，左右低中间高，很像个笔架，他以此得了个外号，叫“笔架博士”。后升任浙江淳安知县，他看到这里“富豪享三四百亩之产，而户无分厘之税，贫者户无一粒之收，虚出百十亩税差”的“不均之事”，决定重新清丈土地，规定赋税负担。这样，淳安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不少逃亡民户又回到故乡来。

海瑞生性耿直，素来反对贪污，反对官吏以权谋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他在任淳安知县时，有两件传诵一时、大快人心的事。一件事是拿办总督的公子。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仗着其父的权势，作威作福，嫌驿吏供应不够周到，竟命人把驿吏倒挂在树上。海瑞对此很是愤慨，便利用胡宗宪曾发布过总督出巡、地方不要铺张浪费的告示，没收了这个恶少所带的一千多两银子，上报胡宗宪，说此人冒充总督公子，胡作非为，败坏总督声誉。胡宗宪自知理屈，只得忍气吞声，不了了之。另一件事是挡了都御史的驾。严嵩的党羽鄢懋卿，以都御史的身分，出巡两浙、两淮盐政，一路上威风凛

澟，到处贪污勒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一日，他要路过淳安去严州（今浙江建德）巡查。淳安吏民为此十分焦急。海瑞思索良久，决定将计就计，亲自给鄢懋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牌告明示："素性简朴，不喜承迎……仰知台下为民为国，言出由中，非虚设也。"今番"台下奉命南下，浙之前路探听者皆云：'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供帐极华丽，虽溺器亦银为之，'……是毋乃官属承奉台下，乐为谀，不乐为直，误认台下之心欤"④？一番话义正词严，又极委婉，鄢懋卿虽然恼恨在心，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批示"照布告办"绕道而去，严州因得免除这场灾难。

这两件事，使海瑞的名声逐渐传开。加上海瑞办事认真细心，重视刑狱，多次明断疑案，平反冤狱，深得百姓的爱戴。上官因为海瑞明察秋毫，连邻县久审不决的案件也移到淳安来审理或调海瑞去会审。这些案件的判决书后来都收在文集里，小说家、戏剧家从中选取一些案例，加以渲染，《大红袍》、《小红袍》、《生死牌》、《五彩舆》等戏剧和一些公案弹词在民间广为流传。

海瑞在淳安任上做不了少好事，改革了许多弊政，几年后，他总结经验，编成了一部书，叫作《淳安政事》。其中兴革条例有一个判断和处理疑狱的条例："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⑤。海瑞所以如此主张，是因为乡宦谋夺小民田产，用假契侵界威逼，为富不仁，比比有之。这一条例，他在仕宦当中一直是身体力行的。

因为得罪了胡宗宪和鄢懋卿，海瑞虽然把淳安县治理得很好，最后还是被排挤离任。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调任

嘉兴府通判，鄢懋卿指使党羽弹劾，降职为江西兴国知县。在兴国一年半，海瑞又办了不少好事：清丈了田亩，均平赋役，减少了冗官，打击了豪强，大大地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嘉靖四十三年（1564），海瑞被调到京城，任户部云南司主事。海瑞在京任职期间，进一步了解到明王朝的黑暗和腐朽，对国家前途深感忧虑，认为非大声疾呼不可。

嘉靖四十五年（1566）二月，海瑞冒死向嘉靖皇帝上了一个《治安疏》⑥。他在疏中明确指出："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他说："陛下之误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长生也。"但像尧、舜、禹、汤、文王、武王那样的圣君，都未能久世不终。"陶仲文陛下以师呼之，仲文则既死矣。仲文不能长生，而陛下独何求之"？海瑞向嘉靖皇帝提出几项具体建议：一、停止玄修，日视正朝，与大臣们研究国计民生之大计，痛改几十年来君道之误。二、节约用度。他说："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节省而国有余用，民有盖藏，不知其几也。而陛下何不为之？"三、端正职守。他针对官吏职守之苟且因循，不认真、不尽法而自以为是的弊端，提出"举天下官之侵渔、将之怯懦、吏之为奸，刑之无少姑息焉"。

在奏疏中，海瑞在引用贾谊的《治安策》后说：像历史上汉文帝那样的贤君，尚多怠废之政，"陛下自视于汉文帝何如"？在历数嘉靖的过错后，海瑞直言无隐地说：陛下"不及汉文帝远甚。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内外臣工之所知也"。嘉靖帝常自比为尧，号尧斋，海瑞说他连汉文帝也不如，他怎能不冒火。海瑞批评嘉靖最尖锐的几句话是："今赋役增常，万方则效，陛下破产礼佛日甚，室如悬磬，十余年来极矣。天下因即陛下改元之号，而亿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

财用也。'" 这样大胆尖刻地批评皇帝，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难怪嘉靖看后大怒，要把他判处死刑。可是当他听左右的人说，海瑞素性刚直，居官清廉，并不怕死，早已准备好了后事，嘉靖又有些犹豫了。最后把海瑞下狱囚禁起来，直到嘉靖死去，才被释放出来。

海瑞不仅是一位著名清官、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经济学家。

隆庆三年（1569），海瑞调升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管辖江苏和安徽两省南部的大片地区。巡抚衙门设在苏州。海瑞任应天巡抚的时间虽然只有七个月，却是他一生中最有作为的一个时期，也是最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才能的一段时期。

应天十府历来号称鱼米之乡，但实际上百姓的生活异常困苦，江南粮差的繁重为全国之冠，加上土地集中的现象十分显著，特别是松江，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两京十二省无有。海瑞一上任，告乡官夺产者就有几万人。因此，海瑞说："其间可为百姓痛哭、可为百姓太息者，难以一言尽也。"⑦更兼那一年江南发生了严重水灾，粮食紧张，农民纷纷逃亡，甚至铤而走险。海瑞决心改变这种局面，拯斯民于水火，为此采取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措施。

首先是兴修水利。海瑞推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把赈灾和治水结合起来。经过调查研究，他了解到水灾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多年来水利失修，造成吴淞江淤塞，使太湖的水无法宣泄，一遇雨水过多，太湖便泛滥成灾。海瑞认为，太湖滨岸粮食的收成，不仅关系到当地千百万人民的生活，同时对整个国计民生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决定立即对太湖通海的主流吴淞江加以

疏浚。他亲自坐上小船，到处巡视督工。由于这件事符合两岸农民的愿望，广大人民热情很高，工程进展很快，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同时顺便把吴淞江北面常熟的白茆河也加以疏浚。吴淞江屡次疏浚，屡次淤塞，被认为是一项最艰巨的工作。海瑞以工代赈，所需费用又极节约，经费来源主要是各府、州、县的赃罚银两和请求留下苏、松、常三府漕粮改折现金后的差额，并未加重人民负担。既变水患为水利，也赈济了灾民，从而安定了社会秩序。海瑞是富有政治和经济头脑的。因此，就连一贯反对海瑞的淞江乡官大地主何良俊也不得不承认海瑞为民兴利的成绩，说："前年海刚峰来巡抚，遂一力开吴淞江。隆庆四年、五年皆有大水，不至病农，即开吴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担当，安能了此一大事哉！"⑧

海瑞巡视淞江府时，华亭县农民前来控告乡官侵夺民田的达万人之多。为了限制大地主的过分剥削，海瑞对于土地兼并问题采取了断然的行动，要大地主退还侵占农民的田地。当时江南最大的地主乡官（退休居乡的官僚）前宰相徐阶一家占田达二十四万亩。海瑞勒令徐阶和他的弟弟徐陟退田，还把徐府数千名家奴遣散了十之八九。徐阶三个作恶多端的儿子都被海瑞拘捕，依法制裁。徐阶退出的田地，估计在一半以上。其他乡官见此情状，有的逃走，有的不得不依法退田。海瑞的行动，大大打击了豪强地主的气焰。李贽赞扬说："公独卵翼穷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自是士大夫之名贪暴者，多窜迹远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⑨

海瑞在应天巡抚任上所做的最大的一件工作，也是对人民最有利的一件工作，是他大力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法，早在嘉靖年间，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曾在江南实行

过，但影响较小。这次，海瑞采用庞尚鹏的成法，在应天十府内普遍推行，成效显著。一条鞭法的内容主要是把过去明王朝对于各府、州、县的各项杂款、均徭、力差、银差、里甲等等都编在一起，通计一省丁粮，通派一省徭役，官收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收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条，把复杂的赋役简单化了。一条鞭法的贯彻实行，改变了当时江南极端混乱和严重不均、弊端百出的赋役制度。由于一条鞭法使大土地所有者也要按亩负担一部分赋役，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则可免去一些不合理的负担，这对一般百姓来说好处较多。同时，一条鞭法规定可以"雇役"代替"力役"，保证农民有较多的自由时间从事生产，初步扭转了百姓逃亡、田地荒芜的状况，也为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劳动力的来源。再有，一条鞭法规定，除秋粮外，力役一概折银交纳，这就使农民对封建统治者所负担的徭役基本上货币化了，从而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海瑞在应天十府推行一条鞭法是全面而普遍的，态度是严肃而认真的。因为他毫不顾忌乡官和大地主的反对，后来终于被罢官而去，但是一条鞭法还是贯彻执行了的，而且受到人民的拥戴。所以《江南通志》上说，海瑞"行条鞭法，遂为永利"。

海瑞被罢官后，回到家乡琼山闲居了十六年。万历十三年(1583)，他七十二岁，被起用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一到任就改革弊政，废除一些衙门向街道商户索取物品的陋规，用严刑制止官吏的贪污。不久，海瑞又迁升为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他在南京任上仅两年多，就于万历十五年十月病逝。海瑞死后，其下属佥都御史王用汲料理丧事，看到海瑞全部家当只有俸银十多两，绫、绸、葛各一匹，所用帏帐十分破旧，清苦

得连一介寒士都不如，忍不住哭出声来。消息传出，南京百姓为之罢市，丧船过江，两岸站满了穿白衣送葬的人群，奠祭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注　释

①《明嘉靖实录》卷二三。

②《明史》卷二一〇《王宗茂传》。

③伍志萃：《村居漫录》卷一。

④《禀鄢都院揭帖》，《海瑞集》上册第168页。中华书局版。

⑤《兴革条例》，《海瑞集》上册第117页。中华书局版。

⑥见《海瑞集》上册第217—222页。

⑦《启谭次川侍郎》，《海瑞集》下册，第423页。

⑧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一四。

⑨李贽《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海瑞集》下册，第547页。

明

张居正改革

十六世纪后半叶，日趋衰败的明王朝一度出现政治比较清明、国家转向富强的局面。在这场振弊起衰的转变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杰出的政治家、宰辅张居正。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古称南郡，今属湖北省）人。他童年时，家道小康，所以他说："正起自寒士，非阀阅衣冠之族。"①但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加上他的孜孜不倦，因此学业进展很快。他十二岁时补荆州府学生员②。第二年，他到湖广首府武昌参加乡试，湖广巡抚顾璘接见居正，"许以国士，呼为小友"③，但为了砥砺居正成为大器，虽然文章出众，并未录取。

嘉靖十九年（1540），张居正十六岁，通过乡试考中举人，顾璘解犀带相赠。居正二十岁赴京会试失利，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庶吉士是在翰林院学习的后备官员，人们目之为"储相"，即后备宰相。庶吉士读书翰林院，有条件阅读外面难得见到的文献典籍。一般的庶吉士多在文词上下功夫，张居正慨然以天

下为己任，每日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大计。后来他在《翰林院读书说》一文中写道："道不兼乎经济（经国济民），不可以利用，为学应该'敦本务实'。"三年后，他被授翰林院编修。嘉靖四十二年（1563），张居正任裕王朱载垕（古厚字）的日讲官，也就是裕王的老师，后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病死，裕王即位，是为穆宗。隆庆元年（1567）正月，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二月，又晋升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预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④，纠正了嘉靖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朝野上下的欢迎。

明朝中期，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式微的景象。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政治日益腐化；官吏贪污成风，弊端丛集；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农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边患丛生，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鞑靼逞威。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呈上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⑤，提出了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切中时弊。但穆宗毕竟不是英明之主，加上首辅李春芳宽和老成，不求兴革，但求朝廷安宁。张居正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得到实行。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由于明朝武备不修，鞑靼的俺答汗率众越过长城，打到北京城下，嘉靖帝和首辅严嵩、统帅仇鸾束手无策，听任俺答大掠三日后回归塞外，这一年是庚

戌年，史称“庚戌之变”。此后，俺答曾几次主动提出通贡互市，都为嘉靖帝拒绝，但又无力制止俺答南下，致使长城沿线地区人民深受祸难。面对鞑靼贵族的骚扰，张居正力主抵抗。隆庆时，在张居正的建议下，明政府调抗倭名将谭纶、戚继光等主持蓟辽防务，命总兵李成梁镇守辽东。戚继光创造了马、步、车相结合的战法，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防线上加修了“敌台”三个余座⑥，作为侦候守御之所。张居正对于戚继光等人的活动，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⑦。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明政府多次击退鞑靼贵族的进攻。隆庆五年（1571），明朝政府在兵部尚书王崇古的建议下，接受鞑靼的臣服，奉行了与蒙古俺答汗之间的茶马互市政策，此事得到张居正的极力支持。张居正认为：通贡后，朝廷给俺答所部的抚赏不过万余银两，而节省军费百余万，这样做不仅能使长城地区人民生命得以“全活”，北方的农业生产免于战争的破坏，更可以借此兴修屯田，加强边备。从此以后，约有二三十年间，北边无战争。

张居正的政治思想，主要是讲“综核名实”，就是“凡事务实，勿事虚文”⑧。他认为“天下之事，极则必变，变则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⑨，痛斥那些墨守成规的人是“腐儒不达时变”。他主张“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⑩，目的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因此，他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整顿吏治，讲求实效。张居正认为，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嘉靖、隆庆年间政局混乱，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名实不符。官僚们或“大言无当者，以虚声窃誉；倜傥伉直者，以忤时难合；而脂韦（圆滑阿谀之

意）逢迎者，以巧宦（善于钻营趋奉）取容”⑪。他还认为，造成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的原因是政治腐败，官吏贪残，所谓“吏不恤民，驱民为盗，此皆酿祸之根”。为此，张居正主张整顿吏治，裁汰一批因循苟且的官僚，奖励一些“急功进取”的官吏。他在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他在上给神宗的奏疏中说：“盖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若询事而不考其终，兴事而不加屡省，上无综核之明，人怀苟且之念，虽使尧舜为君，禹皋为佐，亦恐难以底绩而有成也。”⑫考成法规定，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都察院对于各项章奏，都应立即转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俱先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期，置立文簿存照，每月终注销”⑬。此外，另立两本文簿，一本送六科备案，由各科查核执行情况，任务已执行者在册上注销，未按规定执行者则纠举上奏；一册送内阁查考，如果发现六科所报有容隐欺蔽者，则加以举奏。这样，对于应办之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做到“月月考，岁有稽，不惟使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而参验综合之法严，即建言立法者，亦将虑其终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⑭。

按照明朝的祖制，一切行政事务，分属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部行政长官有尚书、左右侍郎。同时又有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各科有都给事中、左右给事中、给事中。尚书是二品，都给事中只有七品，但是对于六部有封驳、纠劾之权，六科实际上是六部的监察机关。内阁本来是皇帝的秘书处，事实上不负行政责任，更谈不上监察责任。实施考成法之后，居正以内阁控制六科，就从立法上扩大了内阁作

为中枢机构的权限，这不能不说是一创举。考成法实施后，对于贯彻朝廷政令，特别是在整理赋税方面，发生的影响最大。

与此同时，张居正对于用人行政方面，也针对当时存在的弊端，提出了一些改革意见。他提出今后用人，应当“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⑮，苟“非贪婪至无行者，尽可随才任使”⑯。万历二年（1574），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⑰的消极效应，张居正又推行了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⑱，努力尽心本职工作。他还主张慎选地方官吏。他说：“守令者，亲民之吏也。”⑲请求皇帝“勅下吏部，慎选良吏，牧养小民，其守令贤否殿最，惟以守己端洁，实心爱民，乃与上考称职，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干理簿书，而无实政及于百姓者，虽有才能干局，止于中考，其贪污显著者，严限追赃，押发各边，自行输纳，完日发遣发落”⑳。经过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情况大为好转，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㉑。

在职官方面，明朝在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南京仍保留六部诸寺，但多半形同虚设。嘉靖、隆庆年间曾开始裁革。万历三年（1575），在张居正的主持下，朝廷下令：此后南京官员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经过九年的裁革，除了有名望的大官和必须的属员以外，凡冗滥者皆裁汰之。这些都是居正任内的成绩。

二、严肃法纪，信赏必罚。张居正在奏疏中一再强调“刑

赏予夺，一归之公道"，"法所当加，虽贵近不宥，事有所枉，虽疏贱必申"㉒。又说："有功于国家，虽千金之赏，通侯之印，亦不宜吝；无功国家，虽嚬笑之微，敝袴之贱，亦勿轻予。"㉓张居正说到做到。世袭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朝弼作恶多端，擅杀无辜，兵部三法司会议认为法应处死。但其始祖三世，皆大有功于国家，朝廷曾送给铁券，子孙许免一死，非有反逆实迹，应稍从宽宥，待以不死。张居正根据上述情况，拟旨"沐朝弼屡抗明旨，作恶多年，擅杀无辜，情罪深重。本当依律处死，但念元勋世裔，姑从轻，著革去冠带为民，押发南京随住"㉔。万历七年（1579），神宗援引武宗和世宗朝的成例，命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进封他的岳父王伟为伯爵，吩咐内阁拟旨。居正无从拒绝，他说："既有正德以后事例，王伟中宫至亲，臣等不敢抗违"。但是他指出："臣等恭照圣祖定制，公侯伯爵，非有军功，不得滥封。"㉕他又提到嘉靖八年，世宗曾诏廷臣会议外戚封爵事理，诸臣议称："祖宗之制、非军功不封。夫爵赏者天下之爵赏，人主所恃以励世之具也。今使椒房之属（指外戚），与有大勋劳之人，并享茅土（指封爵），非所以昭有功，劝有德也。今除已封见任者，姑准终身外，此后凡皇帝、驸马、俱要查照祖宗旧制，不许夤缘请封。"㉖申明王伟的爵位只能终其身，子孙不得世袭。直到居正身后，这个限制才被撤消。

整顿驿递是张居正严肃法纪的又一项内容。明朝政府在从京师到各省的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的交通工具和民夫都由沿途百姓负担。民夫三年一轮，周而复始。这对于交通干线附近的人民，不能不说是一种虐政。明初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护照）

使用驿站。但到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官员甚至在驿站恣意滋扰，百般需索，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万历三年（1575），张居正提出整顿驿递的计划：“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非系军务，不许擅用金鼓旗号。虽系公差人员，若轿扛夫马过滥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抚、按有违明旨，不行清查，兵部该科指实参治。若部、科相率欺隐，一体治罪……凡内外各官丁忧、起复、给由、升转、改调、到任等项，俱不给勘合，不许驰驿。”㉗

张居正执法很严，而且从自身做起。他的儿子由京师回江陵应试，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过生日，吩咐仆人背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1580），居正次弟居敬病重回里，保定巡抚给以照顾，发给勘合，居正随即缴还，并附去一信说：“仆忝在执政，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㉘最难办的还是内监和衍圣公。内监是宫内的亲信，轻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们的上级去设法。衍圣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孙尚贤。他每年从曲阜入京朝贡，沿途骚扰，“百姓如避虏贼”㉙。山东布政使据实禀告居正。居正答书说：“夫圣人秉礼为教，志在从周，假令生今之时，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况其后裔乎？后若再行骚扰，亦宜一体参究，庶为持法之公也。”㉚后居正与山东巡抚重新商定，将衍圣公每年入朝，改为“如王府例，每岁只差人进马入贡，不必亲行；或当朝觐之年，预期奏请，得旨而后行，亦为简便”㉛。从而减少了交通干线附近居民不少的惊惶。经过张居正的一番整顿，驿递状况大有改观，以致万历八年（1580），神宗派皇亲上武当山祈神赐子，也不敢使用驿站乘传。

三、汉理河患，解决漕运。明代的黄河在今江苏滨海县境内出海，其中自徐州至清河（今淮阴西）的一段黄河又是运河河道，时称“借黄为运”。清河以东到出海口，黄河又与淮河共一河道，黄河水涨，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当时黄河经年泛滥，常使运河阻断，漕运不通，农田也大量被淹没，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一大问题。张居正对此极为忧虑。为了解决黄、淮水患，他认为必须统一事权，由一人兼任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根据他的建议，朝廷于万历六年（1578）正月，命吴桂芳兼理河漕。不久吴逝世，居正又推荐有治河经验的水利专家潘季驯以工部左侍郎兼右都御史衔，总理河漕，许以便宜行事。季驯从“民生运道两便”出发，采取“筑堤障河，束水归漕，筑堰障淮，逼淮注黄”㉜的治水方案，治理黄、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朝廷批准了他的计划，又给以充足的经费，潘季驯得以排除干扰，大胆地执行他的方案，改变了黄、淮两河经常决口，漕运不通的状况。“数年以来，居民既奠，河水安流”㉝，而“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㉞，漕船也可直达北京，对农业生产和南北经济交流起到一定的作用。

四、推行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的最主要内容是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他在任首辅后即曾尖锐指出：“自嘉靖以来，当国者（指严嵩）政以贿成，吏朘（juān 捐，剥削）民膏以媚权门，而继秉国者（指徐阶）又务一切姑息之政，为逋负（拖欠税赋）渊薮，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国匮民穷，病实在此。”㉟为了富国足民，他认为必须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为了均平赋役，必须首先清丈土地。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各种类型的土地，限三年完成，并且规定对破坏清丈者，要“下诏切责”㊱。这次清丈

正如他所说的，“在小民实被其惠，而于官豪之家殊为未便”[37]。经过三年的努力，共丈得天下土田七亿亩，比弘治十五年（1502）超出二亿八千万亩[38]。尽管这一田亩数额不免有所夸张，但毕竟使一些豪强地主受到了抑制。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又在丈量土地的基础上，把嘉靖初年已在福建、江浙等局部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实行。一条鞭法的内容比较复杂，各地施行也不一致。根据《明史·食货志》和其它史书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合并为一，不再区别银差、力差，一律折银征收，力差由官府雇人应役。原来按照户、丁派役的办法改为按照丁、粮派役。丁和粮各占多少比例，没有统一规定，各地实行不一，或丁六粮四，或粮六丁四，或丁粮各半。赋役数目，以县为单位计算，以原有税额为基准，不得减少。这种把田赋和名目繁多的力役，总编为一条的办法，称为“一条鞭法”（亦称“一条编”）。它的特点概括起来说，就是赋役合一，按亩计税，用银交纳，手续简便。

一条鞭法的实施，从实际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兼并和均平赋役的作用，减轻了一些地区农民的负担。《明史·食货志》说：“赖行条鞭法，无他科扰，民力不大绌（拮据）。”这种赋役制度，上承唐代的两税法，下启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反映了赋役逐渐趋向一元化的历史进程。它规定的赋役征银，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又反转过来促进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以银代役，相对松弛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客观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从万历十年至十五年（1582—1587）短短的五年间，太仓积粟达一千三百余万石，可支全国五六年之用[39]，国库积银也

有六七百万两之多，使明朝政府的财政支绌情况有所好转。诚如谈迁所说：张居正"洵经济之才也"㊵。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逝，神宗开始独自处理政务。由于居正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矛盾，竟招来身后的不测之祸。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神宗为了发泄他对张居正"威权震主"的积怨，加上新进者的参奏攻击，竟强加张居正以乱政不忠等罪名，下诏剥夺张居正生前官号，并下令查抄张居正在江陵的老家，因此，张居正的改革也随之半途而废。然而，历史并不能由万历定是非，张居正作为封建社会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功绩诚如崇祯朝吏部尚书李日宣等所言："故辅居正……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㊶这一评论还是公允的。

注 释

①《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谢病别徐存斋相公》。

②《明史·张居正传》称一五为诸生，与《首辅传》同，当系嘉靖十五年之误 。

③《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五《与南掌院赵麟阳》。

④《明史》卷二一三《郭朴传》。

⑤《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⑥《明史》卷二二二《谭纶传》。

⑦《明史》卷二一二《戚继光传》。

⑧《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七《谢召见疏》。

⑨《张文忠公全集》文集一一《杂著》。

⑩《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⑪《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⑫⑬⑭《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三《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

⑮《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一《江陵柄政》。

⑯《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⑰《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⑱《明通鉴》卷六六。

⑲《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二《论时政疏》。

⑳《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㉑《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㉒㉓《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一《陈六事疏》。

㉔《张文忠公全集》奏疏二《议处黔国公沐朝弼疏》。

㉕㉖《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八《论外戚封爵疏》。

㉗万历本《明会典》卷一四八。

㉘《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㉙㉚《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二《答藩伯徐中台》。

㉛《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㉜《明史·河渠志》。

㉝《明史》卷二二三《潘季驯传》。

㉞《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一《行实》。

㉟《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

㊱《国榷》卷七〇。

㊲《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一三《答山东巡抚何莱山》。

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㊴《张文忠公全集》书牍六《答河漕王敬所》。

㊵《国榷》卷七〇。

㊶《明史》卷二一三《张居正传》。

明

反矿税监使

明朝中叶，朝廷进一步加强对私营手工业的控制，尤其是采矿、制瓷、纺织、制盐、制茶等私营手工业倍受限制，且不断遭受盘剥和掠夺。明廷一再禁止民间开采煤、铁、铜等矿产。于制瓷业中实行“官搭民烧”，即将原由官窑烧制的瓷品，交民窑烧制，但出价极低，若烧不成，则由民窑赔偿，因此造成许多民窑破产。纺织业中则强制推行领织制度，官府出钱粮或丝料，交由机户织造，织毕交官取酬，不过“每发后期，且多扣克，以朘削之余，市腾涌之料”①，机户反因赔本而破产。明朝实行盐、铁专卖制度，商人未经许可，不得经销盐、铁。此外明廷严格执行海禁政策，禁止商人下海通商。而国内经商更是关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粟，饔飧也而税；鸡豚，肉食也而税；耕牛、驴、骡，一畜产也而税。搜刮于十五郡之中，遍及于一百十六州县之内”②。

政府对私营手工业的限制与盘剥，极大地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之嘉靖、万历

年间，统治集团的荒淫腐朽，府库日渐空虚，朝廷财政危机不断加剧。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起，神宗为了摆脱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陆续派遣大批宦官作为矿监税使，分赴各地课敛诛求。税使专事在重要城镇、关隘和水陆要道上设立关卡，课征商税。“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③。税使亦遣爪牙于长江上拦截过往船只，强行征税，以至于一舟扬帆三四百里，就要交五六次税。运河仅临清至济宁段，约400里长的河段上，“层关叠征”。而矿监更以开矿为名，见“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④。他们拆民房，掘良田，挖坟墓，无所不为。

矿监、税监使的“纵横绎骚，吸髓饮血”，极大地摧残了工商业的发展，使“天下萧然，生灵涂炭”⑤，大量的工商业者破产，店铺倒闭。如河西务原有布店160余家，倒闭多达130多家。山东临清原有绸缎店32家，倒闭21家；布店73家，倒闭45家；杂货店则关闭了41家⑥。由此可见，“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⑦。商贾裹足，商业萧条，政府的税收亦大为减少。万历二十五年（1597），仅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淮安等地税卡每年可收税407500余两，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减少到266800两。

矿监、税监的横征暴敛，极大地损害了工商业者及市民的利益，引起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的反抗。在一些地方出现工商业者武装开采矿产，武装贩运私盐、私茶的斗争，最终则导致

了更大规模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

万历二十四年（1596），宦官陈奉领命入湖广采矿征税。这位矿监使"恣行威虐"，奸淫劫掠，无恶不作。稍有不顺，即鞭笞官吏，甚至白昼剽劫，"惨毒备至"。仅二年间，他在湖广地区就搜刮到"金宝财物巨万计"⑧。湖广商民对其行径恨之入骨，先后爆发民变十余起。万历二十七年（1599），这位陈奉又赴荆州征税，依旧随意加税，"剽劫行旅"。数千市民相聚，向其投掷瓦石。陈奉狼狈逃窜武昌。次年，陈奉继续在武昌征税，再次借机敲诈，凌辱妇女，横行霸道。愤怒的武昌市民连续发动反对陈奉的"民变"。商民六万余人包围其公廨。陈奉被地方官府救出后，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正月，对武昌商民血腥报复，令官兵"举火箭焚民居"。再度被暴行激怒的群众奋起反抗，数万人又一次包围了他的公廨，吓得他躲藏至楚王府中。商民抓陈奉不得，遂将其爪牙"捆缚手足，投之于江"⑨。武昌商民的反抗斗争，终迫使明廷不得不于四月，下令撤回陈奉。

万历二十七年（1599），山东临清也爆发反对税使马堂的斗争。税使马堂及其爪牙，在临清胡作非为，"白昼锒铛通衢，睨良家子富有者，籍其业之半；佣夫里妇，负斗粟尺布贸易者，直搤夺之"。马堂原是天津税监，兼管临清税务。他在山东7年间，每年抽税不下十五六万两，而上缴朝廷不过7.8万两。其间隐瞒税额共达130余万两。他在临清网罗地痞流氓数百人充当其爪牙，白昼抢劫，"抗者辄为违禁罪之"。马堂一伙的行径，造成"中人之家，破者大半"⑩。忍无可忍的临清市民"远近罢市"，"匠织手"王朝佐率万余民众围攻马堂，放火焚毁税监衙署，杀死其爪牙37人。事后官府于临清搜捕要犯，

株连者甚众，王朝佐挺身而出，临刑前面不改色，英勇就义。

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也爆发反抗税监孙隆的斗争。孙隆和他的参随黄建节及地痞汤莘、徐成等12人，先于苏州设立“五关”，恣意征收商税，以至于“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以织造为业的织工更处于“岌岌乎无生路”的窘迫境地。孙隆一伙仍不满足，继而又议定，城内机户每张织机，收银3钱。又规定凡缯之出市者，每匹纳银2分。此法颁行之后，“机户皆杜门罢织”，机工则“自分饿死”⑪。六月初三日，愤怒的织染工2000余人在织工葛贤的率领之下，于苏州玄妙观宣誓，“欲为吴民剿乱”，表示“宁拼死救此一方”，提出“不杀（税）棍、不逐孙不休”⑫的斗争口号。反抗的市民制定了不取一钱一帛、不错杀一人的严明纪律。葛贤手持芭蕉扇指挥市民，先后殴杀孙隆的爪牙汤莘、徐成等人，捣毁税监行署，逼迫苏州府衙交出孙隆。他们还捶死税官多人，纵火焚烧豪富宅第等10余家，且于城郊遍贴榜文：“税官肆虐，民不堪命，我等倡义，为民除害。”⑬在市民的反抗斗争面前，孙隆吓得到处躲藏，最后在地方官府的保护之下，偷偷溜出苏州城，逃往杭州。明廷恐怕事态进一步扩大，只好将孙隆撤换掉。

湖广、临清、苏州等地工商业者及市民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此起彼伏，形成明后期反抗明廷横征暴敛、残暴统治的斗争高潮，而且很快向其它地区蔓延发展，形成一股规模宏大的反矿监、税监的斗争洪流。

明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江西景德镇爆发了瓷窑工人反对税监潘相的斗争。万余名瓷工奋起反抗税监的暴虐，放火烧毁御窑，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潘相本人也被儒童殴打致

伤。

万历三十一年（1603），太监王朝管督北京（今北京）西山煤矿，他恃矿监之权势，向民窑大肆勒索。民窑主王大京代表诸窑主与王朝等人交涉，却遭拘捕。这一行径激起窑主与窑工的联合反抗。窑工和运煤夫结队，浩浩荡荡开进北京内示威，“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⑭。这场斗争直接威胁到位于京城的朝廷，明帝不得不撤走王朝。

万历三十四年（1606），云南也爆发了反对矿税监杨荣的斗争。奋起反抗的百姓杀死杨荣，投尸于烈火之中。

此外，西安、新会、香河、福州等地的工商业者和市民也相继掀起反对矿监、税监的斗争。这场斗争始终不断，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它与农民反抗明朝腐朽黑暗统治的斗争相呼应，沉重地震撼了明朝的统治，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

注　释

①《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矿税之弊》。

③④《明史》卷八〇《食货志》。

⑤《明史》卷三〇五《陈增传》。

⑥《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⑦《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卷二三一《杂税》。

⑧⑨《明史》卷三〇五《陈奉传》。

⑩《明史》卷三〇五《陈增传·附》。

⑪《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⑫⑬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⑭《明神宗实录》卷三八〇。

明

李贽自刎

李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嘉靖六年（1527）诞生于福建泉州一个海商世家。幼年家境平平，7岁丧母，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读书识字。他自己曾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所以虽然读了不少经书，却都是勉为其难的，因为实在"无以消岁月"。

虽然李贽天生一副"反骨"，天生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反感，但作为封建时代的士子，他的唯一出路只能是通过科举入仕。嘉靖二十八年（1549），李贽考入泉州府学。三十一年（1552）中举，这一年他26岁。三年之后，开始了他的游宦生涯。从此以后，他做了20多年的地方官，从共城县教谕直到姚安知府。终因不忍"含垢忍耻，游戏仕路"，而于万历八年（1580）弃官到湖北黄安定居，不久迁居麻城龙湖，开始了后半生的读书、著述和讲学生活。

明代中晚期，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所倡导的主观唯心主义学说（人称"王学"或"心学"）特别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阳明学派流衍出许多流派。据《明儒学案》记载，当

时有所谓“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北方王门”等等。在各个流派中，有的是恪守师说，如以邹守益、罗洪先、聂豹等人为代表的江西“江右王门”；有的对王学思想加以发展，甚至走向王学的反面，如以颜山农、梁汝元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也有接受王学影响，最终自立门派的，如王艮的“泰州学派”，梁汝元、罗汝芳等人也是“泰州学派”的后学。

李贽在中年后接受了王阳明的学说，又曾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接受王畿、罗汝芳等人的影响。后来，他又曾潜心研究佛学，受到禅宗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但是，由于他的秉性、教养，尤其是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及时代对他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能突破王学及佛学思想的羁绊，在反对假道学，批判传统的封建思想的斗争中，提出并阐述自己的具有时代特色和启蒙色彩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

退出官场定居龙湖后，他“闭门下键，日以读书”，“寒不停，暑不辍，夜不休”，寻找批判假道学及传统思想的锐利武器，终于写出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当时的封建卫道士们以“异端之尤”视之，而李贽本人也以“异端”自居，并且说：“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虚名加我。”①为了表明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异端”分子，他写下了《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等著名的离经叛道的著作。

《焚书》和《续焚书》，是李贽和当时的道学先生们的论战集。《焚书》“将《论》、《孟》逐节发明”，也就是说，要将《论语》和《孟子》二书中的纰谬逐一加以揭发。自汉尊儒术至宋朱熹注四书，《论语》和《孟子》在一般人心目中不啻圣

物，何人动得！李贽此举确是使奉孔孟为圣人的封建卫道士们如祖坟被掘。李贽也深知自己的书中多“忿激话，不比寻常套语”，“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②，所以起名为《焚书》。

《藏书》是李贽对自战国至元朝灭亡期间八百多年重要历史人物作重新评价的历史著作，《续藏书》则是对明代历史人物的评论集。他在这两部著作中大作翻案文章，觉得历来为封建卫道士们称颂膜拜的圣贤只是“浮名传颂，而其实索然”，现在他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只因见解“与世不相入”，所以只能“藏之后世”，故而取名为《藏书》。

宋明以来，理学家们把孔子的言论奉为神圣的教条，统治者则以四书五经为行赏作罚的准则。李贽却大胆地指出：不可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昔三代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哉？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然则予之是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虽使孔子复生于今，又不知作何是非也，而遽可以定本行赏罚哉?”③他痛斥盲目的尊孔，鄙视对六经的迷信，认为六经不过是忠臣及臣子对统治者的溢美之词，而《论》、《孟》亦不过是孔孟门弟子残缺不全的笔记而已，不足为据，更不堪为“万世之至论”。

理学家们整天喋喋不休，强调要“去人欲，存天理”，以为“理”乃是凌驾于万事万物之上的。李贽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④如同穿衣吃饭都是禅一样，他主张应该去空洞之理，

复人之本欲，使人成为“童心”再现的“真人”。“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⑤。

李贽一生充满坎坷与不幸，二十余年官场经历使他对混迹官场的道学官僚认识得很透彻。他指斥道学家们“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嘲笑他们是一群无才、无学、无识的蠢人，除了因循守旧、打拱作揖，别无所能。

对于封建社会的一些传统观点，李贽也颇有不少惊世骇俗之论。理学家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说寡妇可以再嫁；卫道士说卓文君是“淫奔”，他盛赞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结合是“善择佳偶”，合乎自然之性；史学家说武则天是篡夺大权，他激赏武氏以女流而治天下，是了不起的女强人；统治者视百姓因无奈铤而走险是“大逆不道”，他却说官府的腐败“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传统的观念是“男尊女卑”，女人永远是女人，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人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⑥

在禁锢深重的封建时代晚期，李贽的呐喊给思想界带来一线光明。同时，他公然的离经叛道也使理学家们恼羞成怒，使统治者胆战心惊。他们围攻李贽，对他施加种种政治迫害，说他“狂诞不经，大逆不道”，加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万历三十六年（1602），皇帝亲颁圣旨，缉拿李贽治罪，76岁高龄的李贽愤而以剃刀切喉自尽，结束了他的一生。

李贽死后，他的“异端”思想仍为统治者所畏惧。从明到

清，统治者们总是设法禁毁他的著作。值得庆幸的是，李贽死后，其“名益重，而书亦传”，这大约是统治者和理学家始料未及的。

注 释

①《焚书》卷一《答焦漪园》。

②《焚书·自序》。

③《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④《焚书·答邓石阳书》。

⑤《焚书·童心说》。

⑥《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

明

魏忠贤乱政

明朝宦官之为祸，以熹宗时魏忠贤为最。

明初，设置宦官，仅为供奉内廷，备扫除之役而已。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前代之失，置宦官不及百人。后定为十二监及各司局。且定制宦官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穿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并铸铁牌于宫门曰："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①成祖以后，对宦官渐加委任，出使、专征、监守、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始。及英宗宠信王振，武宗宠信刘瑾，宦官专权跋扈已不可制。及熹宗时，魏忠贤"挑斥异己，树立党羽，专擅宫廷，荼毒正士，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②。

魏忠贤，肃宁（今河北肃宁县）人。少无赖，与群恶少赌博，不胜，为赌徒所逼，自阉，改姓名为李进忠。万历中，入宫为宦官。因与皇长孙朱由校之乳母客氏相好，深得皇长孙信任。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死，皇太子朱常洛嗣位，年号光宗。光宗即位不及一月而暴卒。乃由长孙朱由校继位，是

为熹宗。熹宗即位，魏忠贤、客氏并受宠。登位未逾月，封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亦自惜薪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并恢复其姓，赐名忠贤。忠贤目不识丁，本不该入司礼监，因客氏故得之。魏忠贤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与客氏狼狈为奸，清理内廷，排斥异己太监，分置心腹太监于内廷各衙门，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③。内廷实权乃为魏忠贤、客氏控制。

掌握内廷实权后，魏忠贤又阴谋染指朝政。其时熹宗年少，不爱过问朝政，乃"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熹宗尤好木工作业。"斧、锯、凿、削，巧匠不能及。日与亲近之臣涂文辅、葛九思辈朝夕营造。造成而喜，不久又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④。每当熹宗引绳削木，全神贯注于木工作业时，魏忠贤等往往上前奏事，熹宗厌之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于是魏忠贤辈乃得擅作威福，为所欲为。魏忠贤又"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⑤钲鼓之声，震撼宫禁，带甲出入，恣为威虐，魏忠贤气焰益盛。

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兼掌东厂，操生杀大权。至此，嘉靖以来一度衰微之明代宦官专权局面又以魏忠贤为首再度出现。

东林党人对宦官势力之卷土重来深有疑忌。侍郎陈邦瞻、御史周宗建、王心一等，于熹宗即位之初即上言力请抑制魏忠贤及客氏势力："请遣客氏外出。"结果非但不准，反而"俱被诘责"。刑部主事刘宗周弹劾魏忠贤误导熹宗不理朝政，终日嬉玩。熹宗大怒，幸有大学士叶向高力救，始免于难。魏忠贤、客氏有熹宗为后盾，东林党人抵制宦官之尝试均遭失败，而魏忠贤、客氏反设计奏驱逐内监王安出宫，加以杀害，以断

东林党人与内廷之联系；又攻讦奏逐客氏之大学士刘一燝，刘被迫辞官。

初，神宗在位时，东林党人不受重用。光宗暴卒后，杨涟、左光斗等扶立熹宗登位。自此，东林党人始受重视。天启初年，内阁、都院、吏部、兵部、礼部等要职皆为东林党人把持。叶向高、韩爌、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皆居高位；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控扼言路⑥，东林权势，盛极一时。但东林党人失之偏激，难以容人。凡与东林党忤者，一概视之为邪党、异党，加以排斥。非东林党诸臣人人自危。及魏忠贤势盛，被视为邪党者，争附魏忠贤，欲仰仗魏忠贤以报复东林。一股以宦者为主干的邪恶政治势力逐渐形成，时人称之为"阉党"。

外廷诸臣中，顾秉谦及魏广微率先谄附魏忠贤。霍维华、孙杰之徒，从而和之。魏忠贤得内阁为羽翼，权势益张。至此，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人的矛盾，与万历以来之党争相纠结，政治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态势。

魏忠贤之乱政，引起朝廷内外极大不满。东林党人以正人相标榜，尤为愤懑。天启四年（1624）初，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群起弹劾魏忠贤阉党的罪行："御史李应昇以内操谏；给事中霍守典以忠贤乞祠额谏；御史刘廷佐以忠贤滥荫谏；给事中沈惟以立枷谏。""忠贤皆矫旨诘责"⑦。于是，副都御史杨涟出阵，上疏痛斥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其中有：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重用私党；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腐化，穷奢极侈，……大胆揭发，切中要害。疏上，忠贤惧，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之辩解，王体乾等太监也极力申辩。熹宗昏暗，对魏忠贤偏信不疑，温谕相

慰，对揭发魏忠贤的杨涟反下旨严加切责，于是年十月下狱治罪。朝中魏大中及给事中陈良训、许誉卿，武宁侯朱国弼，南京兵部尚书陈道亨、侍郎岳元声等70余人又交章论魏忠贤不法。大学士叶向高与礼部尚书翁正春亦"请遣忠贤归私，第以塞谤"。皆不许。

为压制东林党人的攻击，王体乾倡言用廷杖，以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燝上疏讽魏忠贤，被杖死。御史林汝翥亦被杖。……一时罢斥者有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礼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后又逐韩爌及兵部侍郎李邦华。群臣之被杀被逐如秋风扫落叶，东林党人在朝中的权力地位丧失殆尽。

与此同时，魏忠贤加速安插亲信于内阁及六部各衙门。初，天启三年（1623），即引其党羽魏广微、顾秉谦入内阁为大学士。四年（1624），叶向高、韩爌罢后，顾秉谦即代为首辅，控制内阁大权。顾秉谦曾撰《缙绅便览》，列"邪人"百余人名单，密告魏忠贤，设计陷害，自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凡迫害忠良，皆顾秉谦所为。六部堂官，则有魏广微、顾秉谦、黄立极等掌礼部，崔呈秀掌兵部兼都察院，吴淳夫等掌工部……以上诸人均为阉党核心人物。及天启末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廷除王体乾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等30余人；外廷文臣则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另有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此外，更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是时，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而魏忠贤本人，更是"一手障天"，"进上公，加恩三

等”，前后受赐奖敕无算，诰命皆拟九锡文”⑧，举朝阿谀者，“俱拜为干父，行五拜三叩首礼，口呼九千九百岁爷爷”。其远近亲属及义子干孙，亦皆列位要津，以至“今日荫中书，明日荫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诰敕之馛，目不识丁”。

为把东林党赶尽杀绝，阉党又编造黑名单。崔呈秀著《天鉴录》、《同志录》，王绍徽著《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党魁，还列入不附忠贤者，亦冠以东林党人，献于魏忠贤。

当时，东厂番役横行于天下，“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魏忠贤自领东厂，义子田尔耕、许显纯掌锦衣卫，“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炼严酷，入狱者卒不得出”。天启五年（1625），魏阉党大兴冤狱。先，逮捕东林党著名领袖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诬以受贿，交锦衣卫拷打追赃，受尽酷刑。除一人自杀外，余皆被折磨死于狱中。杨涟“体无完肤”，“土囊压身，铁钉贯耳”⑨。惨不忍睹。明年，魏忠贤又令东厂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亦皆害死于狱中。史称这次大狱中之死难者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于是，东林党人或被杀，或自杀，或遭禁锢，或放逐罢免，几无幸免者。甚至已经罢官，虽已死，凡为魏忠贤所宿恨，亦必削其籍，破其家，以泄旧恨。

魏忠贤又修《三朝要典》。尽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定所谓三案是非。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阉党官僚争论是非者，悉遭迫害。

为钳制舆论，魏忠贤又以剿灭东林为名，拆毁全国书院，

禁止讲学，以此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之议论。

魏忠贤兴起大狱，血腥镇压东林党人之后，其权势之显赫，达到顶峰。其党羽对魏忠贤亦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吹捧他为"尧天帝德，至圣至神"，竟"佞词累牍，不顾羞耻"。每上疏，凡提到魏忠贤处，咸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草拟圣旨时，竟以"朕与厂臣"联名并书。魏广微为讨好魏忠贤，始以同姓尊之为兄，继而自贬辈份而称其为叔。魏忠贤每外出，"辄坐文轩（装饰华丽之车），羽幢青盖（羽盖、旌旗皆用青蓝），四马若飞，铙鼓鸣镝之声，轰隐黄埃中。锦衣玉带靴跨握刀者，夹左右驰，厨传优伶、百戏、舆隶（车夫）相随，属以万数"，朝中事无巨细，必派人持章奏，飞驰至魏忠贤面前，经其批复，方能办事。是则朝廷上下，"只知有魏阉，不知有皇帝矣"！魏忠贤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道拜伏，至呼九千岁，忠贤顾盼未尝及也"⑩。

天启六年（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之官吏竟相效尤，以至魏忠贤生祠遍天下，上至督抚大吏，下及武夫、贾竖、诸无赖子亦各立祠颂德。都城则数十里间，祠宇相望。每建一祠，多者费银几十万两，少者亦几万两，"穷极工巧，攘夺民田庐，斩伐墓木，莫敢控诉"。阉党为在开封建生祠，竟拆毁民房2000余间，建九楹大殿，形似皇宫。或有迎魏忠贤塑像进生祠时，至行五拜三叩首礼。而监生陆万龄竟无耻胡言："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建议以魏忠贤配享孔子。阉党还强迫百姓尊奉魏阉，凡入祠不拜者，均处以死刑。

魏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及客氏之弟侄亲朋，亦皆平步青云，高官厚禄。其侄魏良卿、魏良栋、侄孙魏鹏翼分别被封为公、侯、伯，而后又分别被加封为太师、太子太保、及少师。而“时鹏翼、良栋皆在襁褓中，未能行步也”。

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去世，无子，五弟信王朱由俭嗣位，以明年为崇祯元年，是为思宗，世称崇祯帝。信王未登位前，深知魏忠贤之恶，及登位，魏忠贤失去靠山，其党自危。十一月，崇祯帝安置魏忠贤于凤阳，不久命逮捕。魏忠贤行至阜城，自缢身亡。诏磔其尸，悬首河间，笞杀客氏于浣衣局。崇祯二年（1629），命大学士韩炉等审定逆案，凡党附魏忠贤者均列为逆党，处死、充军、罢官者共2000余人。

至此，“尽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

魏忠贤已死，而阉党与东林党的斗争仍在继续。

注　释

①《明史》卷三四〇《宦官一》。

②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

③《明史》卷三五〇《魏忠贤传》。

④《三朝野苑》卷三。

⑤⑥《明史》卷三五〇《魏忠贤传》。

⑦九锡文，古代帝王赐九锡予权臣时的诏书。内容皆谀颂权臣功德之词。

⑧《明朝小史》卷一三《天启录》。

⑨《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

⑩《明史》卷三五〇《魏忠贤传》。

明

东林朋党

明朝统治的后期，随着张居正改革遭扼杀，政治陷入更加黑暗之中。此时，明帝朱翊钧（明神宗）开始亲政，然而他长期深居宫中，纵情声色，挥霍浪费，甚至服食鸦片，不理朝政。朝中官员缺额不补，政事无人处理，就连奏疏也长期积压，无人过问。各官署衙门，“职业尽弛，上下解体”①。

随着政治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剧，而朝廷内外更是党派林立，进而演变为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党争。在诸多的党派中，有以内阁辅臣沈一贯、万从哲，以及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有以给事中亓（qí 其）诗教为首的齐党；有以给事中官应震为首的楚党；有以宣城汤宾尹为首的宣党；有以昆山顾天峻为首的昆党。党派之间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不惜相互倾轧、攻击。在诸多党派中，以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为首的东林党，以其改良社会的主张而于党争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东林党形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斗争之中。由于神宗皇后无子，而王贵妃生子常洛，郑贵妃生子常洵。神宗宠爱郑贵妃，欲立常洵为太子。于是明廷出现了“国本”之争，吏部郎

中顾宪成力主“无嫡立长”，而得罪神宗。之后，被罢官回故乡无锡。万历三十二年（1604），顾宪成与好友高攀龙等于无锡东林书院聚集友人讲学，由于他们“裁量人物，訾议国政”②，深得在野文人的响应，就连一些在朝官员也“遥相应和”③。因此而被时人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人以三吴士绅居多，故与城镇的工商业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工商及市民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东林党人针对民不聊生和腐败黑暗的统治，要求改革朝政，主张君主应“无所不统”，以加强集权统治。东林党人更猛烈抨击矿监税使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盘剥与欺凌，认为矿税监使四出聚敛，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④。他们还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官僚集团胡作非为，尤其反对宦官的专权，反对贵族勋戚侵占和掠夺土地。东林党人这些主张和要求，对挽救明朝统治的危机，缓和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而深得许多朝野人士的赞赏和支持。

万历二十九年（1601），虽在东林党人等的支持和倡导下，常洛被立为太子，但朝廷内外的斗争更加激烈。万历四十三年（1615），宫中发生梃击案，有人执木棒闯入慈宁宫，将常洛致伤。东林党人王之寀负责审理此案，审讯得知系受郑贵妃手下太监指使。然而有神宗的庇护，尽管东林党人指责是郑贵妃的阴谋，却终未有结果。

泰昌元年（1620），神宗死，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可几天后，又发生“红丸”、“移宫”两案。先是光宗腹泻，服用鸿胪寺丞李可灼所进“红丸”，气绝身亡，继而郑贵妃伙同李选侍挟太子朱由校起居于乾清宫，意在擅权。为此，东林党人杨

涟、左光斗等人上疏，请求李选侍移宫，离开太子。

尽管这三案都发生在宫廷内部，是皇权之争，但却由此导致了党派之间激烈争斗的政治事件。东林党人中一批有抱负的官僚和知识分子以此为契机，抨击朝政，同时也猛烈攻击非东林党的大官僚招权纳贿、渔肉百姓的罪恶行径。而以浙党为首的非东林党党徒则凭借郑贵妃的权势，诋毁东林党人。于是东林党与其他党派之争愈演愈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光宗朱常洛病故，其长子朱由校继立为帝，是为熹宗。东林党人，大受重用，分居首辅，以及吏部、兵部、礼部、都察院等官署长官要职，权极一时。“与东林忤者，众目之为邪党。天启初，废斥殆尽，识者已忧其过激变生”⑤。受到沉重打击和排斥的非东林党人不甘心自己的失利，不遗余力地寻找反扑的时机。

朱由校即位后，虽重用了东林党人，可他却不理朝政，以做木活为乐事，朝政再度荒废。非东林党人与宦官魏忠贤相勾结，而结成“阉党”，其势力迅速扩大，明朝政局陷入更深重的危机之中。

魏忠贤，万历年间选入宫中为太监。熹宗即位后，始得宠幸，迁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提督宝和三店。天启元年（1621），熹宗诏赐乳母客氏香火田，且叙魏忠贤治葺祖陵之功。御史王心一上谏反对。不久，熹宗大婚，趁此机会，御史毕佐周、刘兰，大学士刘一燝等相继请求遣客氏出宫。然而这些劝谏都被熹宗拒绝，相反，“帝深信任此两人，两人势益张，用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为羽翼，宫中人莫敢忤”⑥。于是，凡上疏力谏，请求逐客氏出宫者，竟相继遭贬谪出朝。

魏忠贤权势日盛，原遭东林党人打击、排挤的反对派官僚，纷纷倒向投靠魏忠贤势力。不过，熹宗即位之初，东林党人于朝中势力尚强，叶向高、韩炉任首辅、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等人位居高官要职，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则控制言路，这些东林党官僚皆“力持清议”，所以魏忠贤还一时难以得逞。但魏忠贤却积极培植党羽，令其党羽肆意攻击东林党官僚“党邪误国”。东林党人也群起反击阉党，两党之争不断升级。

阉党于朝中为所欲为，气焰嚣张。党徒肉麻地吹捧魏忠贤，为其建立生祠。朝政日渐腐败，东林党人遂再度发难。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参奏魏忠贤二十四“大罪”。一时间，群僚响应，魏大中等70余位臣僚，“交章”议论魏忠贤“不法”。魏忠贤对此深感恐惧，而阉党则对此举恨之入骨，阴谋策划反扑，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倡言用廷杖，威胁廷臣”⑦。

天启五年（1625），阉党借辽东经略使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之事，诬陷熊廷弼贿赂杨涟、左光斗等人祈求减罪，为此而大兴冤狱。熹宗不辨真伪，诏决熊廷弼，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先后被罢官。除杨涟外，左光斗、魏大中等人后被杖毙狱中。阉党仍不罢休，魏忠贤爪牙崔呈秀作《天鉴录》、《同志录》等，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开列了东林党人名单，凡不依附魏忠贤的官僚，一律列入东林党人名籍之中，以此大肆逮捕东林党人和政见不同者。魏忠贤还指使顾秉谦等人作《三朝要典》，掩盖“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真像。

魏忠贤及其阉党的倒行逆施，也激起朝野有识之士的反抗

和抵制，阉党赴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时，苏州市民“蜂拥大呼，势如山崩，旗尉东西窜，众纵横殴击，毙一人，余负重伤，逾垣走”⑧。事后，阉党、巡抚毛一鹭逮捕了带头反抗的市民颜佩韦等五人，将他们全部处死。而士人张溥为此写了《五人墓碑记》，以记述阉党的暴行。

在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疯狂迫害下，东林党人几乎被捕杀殆尽，于是魏忠贤总揽内外大权，人称其为“九千九百九十岁”。他为确保自己的权势，除提督特务机构“东厂”外，还于宫中建立万余人的“内标”，训练、武装太监，且带甲出入宫廷，一批官僚投附其门下，充当其义子、走卒。东林党人被翦除后，宦官专横跋扈，明朝政治更加黑暗、腐朽。

注　释

①《明史》卷二一八《方从哲传》。

②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八。

③《明史》卷二三一《顾宪成传》。

④《明史》卷二三二《李三才传》。

⑤⑥⑦《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

⑧《明史》卷二四五《周顺昌传》。

明

国本之争与三案始末

国本之争

国本之争，乃指明代万历朝争立太子一事。

明神宗朱翊钧之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生皇三子常洵①。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封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未加封，按明朝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之原则，皇位继承人首先应是嫡子，即皇后所生之子。皇后无生，则按长幼次序立储。今皇后无子，常洛为皇太子，例应册立为太子，而神宗一再拖延，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皇贵妃有夺嫡之意，皇帝有废长立幼之心。是则以幼凌长，有悖于伦常之道，于是廷臣屡屡上书上言，请建储封王。首先为立储上疏切论者为户科给事中姜应麟。疏中议论郑贵妃之晋封不当，请收回成命，先封恭妃为妥；进而请求“册立元嗣（即长子）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则臣民之长慰，宗社之庆长矣”。此疏一上，龙颜大怒，

姜应麟被废二十年。而此疏之上，引起朝廷极大震动，从此长达十余年的建储之争，拉开了序幕。

神宗对于群臣上疏，先是极力压制。最先上疏之沈璟、孙如法等皆被严旨切责，并以此获罪。压而不止，神宗又施拖延，以“元子婴弱，少俟二、三年举行”为由②。然而请求立储之疏仍接二连三，神宗坚持与群臣相抵，或不报，或答以“令候旨行”，甚者夺其俸，削其籍，降其职，罢其官……。拖又无效，神宗无奈，乃召首辅申时行申辩曰：“朕不喜激聒（吵吵嚷嚷之意）。近诸臣章奏概行留中，恶其离间朕父子。若明岁廷臣不再渎扰（打扰之意），当以后年册立，否则俟皇长子十五岁举行。”③后年即万历二十年，到时皇长子十一岁。若十五岁，则当在万历二十四年。申时行乃按旨告诫诸臣安心稍候。故万历十九年自春及秋，大臣中未曾有言及者。

十月，神宗承诺册立东宫之期限在即，工部主事张有德上疏以筹备东宫仪仗之预算报请批准，神宗见疏大怒，以大臣又来“渎扰”，乃下谕再延期一年。

其时廷臣纷纷以皇长子之“预教”请求神宗恩准。

按当时惯例，皇子如被立为太子，便要别居一宫，称为“东宫”，并配以东宫官属，称为“出阁”，太子应就读于翰林院诸学士，学习为君之道，称为东宫出阁讲学。皇长子常洛虽尚未立为太子，群臣乃以“预教”请，欲以之显示皇长子不同于诸皇子之特殊身份。

皇长子应受教育，事体重大，于是神宗又出“待嫡”一招，宣谕“三王并封”，谓诸臣曰：“皇位继承，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倘复有出，是二储也。今将三皇子（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皇五子常浩）并封王，数年后，皇后无出，

再择其善者为太子。”此说迅即为众议所驳倒。原因为立嗣虽应以嫡子居先，却无必授之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之所以不同于诸子，正由合乎“无嫡立长”。私下并有人议论，万历帝本人亦非嫡子。其时申时行已改仕归家，王锡爵位居首辅。神宗召王锡爵，令拟御旨，昭示三王并封之意。王锡爵不敢违旨，立即奉诏拟御旨。然在廷臣包围下，又外虑公议，遂又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妥协。王锡爵自劾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收回成命。神宗欲以“待嫡”及“三王并封”扰乱皇长子“预教”之实施既未能果，皇长子十三岁时（万历二十一年，1593），如议照办，且各项礼节仪式悉与东宫出阁无异。

立储东宫一拖再拖，皇长子已及冠婚年龄。是不待册立，先行冠婚？抑或先行册立，使皇长子以太子身份举行婚礼？对立双方又展开争论。郑贵妃一方主张先行冠婚，可使皇长子与诸子在婚礼上无所差异，而皇长子一方则认为冠婚乃大事，力主后者，先行册立。双方相持不下。直至二十九年（1601）皇长子年已二十（按明代宫廷惯例，无论太子及诸王，十五六岁便已达冠婚之年），不能再拖。神宗见立郑妃之子为太子事一再失败，立长之局难变，只得勉从众议。十月，册立长子常洛为太子④，不久加冠，并于次年二月举行婚礼。

皇太子乃未来之国君。册立东宫，确立皇太子地位，关系国之根本，故建储之争史称国本之争。

三案之一——梃击案

国本之争方告平息，明朝宫廷中又相继发生“梃击案”、

"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反映了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激烈斗争的情况。

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发生。

五月初四日酉时，有不知姓名男子，手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押送法司按问。慈庆宫者，皇太子朱常洛所居宫殿。当时，"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举朝震骇"⑤。次日，巡城御史刘廷元（浙党）审问后奏称：犯人名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迹似疯癫。又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浙党）会审，亦一如刘廷元所指，以张差犯有疯癫病具狱。而刑部提审王之寀（cǎi 采），心疑其非。十一日王之寀乘当值日提牢，私讯张差。差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汝。'遂与我枣木棍，导我由后载门直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王之寀备录其语，并将张差供词写成揭帖送交署印刑部侍郎张向达代为入奏，并在揭帖之末写道："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绑文华殿举行朝审⑥。

以内阁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攻击王之寀胡言。坚持张差为疯癫，要求立即处决张差。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后经刑部司官复审，张差进一步供认："不知姓名老公乃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也有，著也有。小爷者，内监所指皇太子也……。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⑦至此，真相大白，一时议论汹汹。中外皆疑

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神宗哭诉，神宗亦难以解决。郑贵妃向太子极力表白，太子命内侍王安起草，下令诸臣不必多加纠缠。诸臣坚持追查元凶。

其时，神宗早已倦于朝政，不见群臣达 25 年之久。为了结此事，破例亲自出马。神宗驾幸慈宁宫，召见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入内相见。神宗先责诸臣离间其父子，又令只把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死，余皆不论。又执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曰："彼从婴儿至今已成人矣。朕如别有他意，何不早就更换，且三皇子福王已出居其封地（河南），离此千里之遥，非朕宣召，彼能飞至乎?"皇太子曰："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也罢，不必株连。"又曰："我父子何等亲爱……"神宗连声问群臣："尔等听（到）皇太子语否?"既然神宗、皇太子均不愿追究此事，群臣唯有听命照办之一途。出慈宁宫后，立即传谕法司，磔张差于市。庞保、刘成暗中处决于内庭。梃击一案草草了结。

三案之二——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朱翊钧病死。八月初一日光宗即位。即位时已有病。数日后内医太监崔文昇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加重，腹泻不止，一日三四十次，不能临朝。首辅方从哲等赴宫门问安。光宗竟"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⑧。二十九日，光宗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至乾清宫，光宗复问："有鸿胪寺丞进药者安在?"方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命宣李可灼至，李可灼诊病后进一丸，药色红，即所谓红丸者。光宗用药后稍有好转，称其为忠

臣。诸臣出宫门外等候。下午，李可灼出，言复进一丸。方从哲等问病状，李可灼以如前对。九月初一日，在位方一月的光宗即驾崩。光宗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光宗之死，内外臣僚皆归咎于李可灼。惟首辅方从哲以光宗遗诏，拟赏李可灼银 50 两，群情大哗。纷纷上言，弹劾李可灼及方从哲。方从哲始改赏银 50 两为罚俸一年。而事尤未息，群臣继续弹劾崔文昇、李可灼及方从哲三人。崔文昇原为郑贵妃亲信，擅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有弑君之罪；李可灼连进二丸，致光宗于死地，未能寿终，弑君之罪不容恕；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其"十大罪、三可杀"，罪责难逃……先后上疏弹劾者主事王之宷、刘宗周等四十余人。红丸一案最后以李可灼充军，崔文昇贬放南京，方从哲仍无事而告终。

三案之三——移宫案

移宫案为三案最后一案。移宫所指宫殿为乾清宫。乾清宫地位之重要，左光斗曾有评说："内廷之有乾清宫，犹外庭之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⑨乾清宫实乃帝权之象征，为妃嫔所向往者。

当光宗即位后，原一再阻挠的郑贵妃惧帝忌恨，一改往日常态，极力讨好光宗，以珠玉及美女四人进献，选侍李氏最得帝宠。郑贵妃又献媚于李选侍，两人互相勾连，郑贵妃为其争封皇后，请其随光宗皇帝迁至乾清宫（按：当时新天子尚无皇后，即位前之太子妃郭氏已去世）；李选侍亦请晋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于是光宗命首辅方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方从哲命礼

部照办，经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后又召方从哲、刘一燝、韩爌等至乾清宫，光宗至东暖阁，仍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⑪。此后不久，光宗病死。光宗死后，按例李选侍当迁出乾清宫，由继承帝位之新天子入内居住。然李选侍坚持不迁。为此李选侍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争斗不已，由此生发很多变故，史称"移宫案。"

光宗皇帝死于即位第30天凌晨。由于死得突然，当时并无大臣守卫在侧。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即将登位的皇长子、年方十六岁的朱由校据乾清宫，以操纵朝政。移时，阁臣方从哲、刘一燝、韩爌，尚书周嘉谟以及张向达、杨涟、左光斗等前往哭临（即向遗体告别）。至乾清宫内，遭侍卫内监持梃拦阻。经杨涟怒喝，始入。哭临毕，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李选侍藏于暖阁不得出。廷臣问"皇储安在？"众内监不答。惟王安近前悄声告以实情，并拉皇长子出。廷臣一见皇长子，立即高呼"万岁"。左右挟住，出宫门登上御辇。此时宫内仍不断传出"哥儿回来"之声。李进忠等内侍几次追赶出来，企图夺下皇长子。刘一燝靠紧御辇疾行，护送皇储到文华殿。在此等候的群臣拜呼"万岁"，当即把皇储先行立为东宫，暂住慈庆宫内。至此群臣一方与李选侍一方的斗争已先胜一局。

群臣议定于初六日拥戴朱由校登极。登极则必先腾出乾清宫。于是诸臣纷纷上疏要李选侍从速离宫。其中，御史左光斗之疏曰："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

李选侍其时正与李进忠谋划对策。直拖至九月初五日即新

天子登基前一天，群臣愤怒已极，纷纷至乾清宫门外，高声呼喊，要李选侍迁出，声彻大内。李选侍慑于群情汹汹，不敢再拖，匆匆忙忙，于当日离开乾清宫，迁往仁寿殿暂住。次日，皇长子朱由校得以如期即位，且住进乾清宫。——移宫一事，至此似可了结，然由于搬迁时间太紧，竟又生出种种枝节，遂使移宫一事终又成为移宫一案。

由于搬迁时间过于紧迫，迁出时甚为混乱。当李选侍移宫之际，太监王安等从中恐吓。李选侍惶恐，未能等及侍从相助，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物，俱为群阉掠夺。"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乘机窃盗内帑①，据为己有。有人因怀藏金宝沉重，跌倒于乾清宫外，金宝撒满地上，暴露出偷盗之行为。当时被捉获者有内侍刘逊、刘朝、田诏等人，后陆续捉到者有王永福、姚进忠、姜升等多人，皆李选侍的近侍。

对乘乱盗取内府秘藏一事，新天子熹宗朱由校愤怒之极。传谕交刑部严办。被捕诸内侍到刑部，上下打点，非但无罪，而且散布流言，进行反击，曰：新皇帝待先朝妃嫔太薄。李选侍的宫人、内监，一旦失势，亦甚不满，对此着意煊染，沸沸扬扬，甚而传出李选侍投环自缢，皇八妹投井自杀的传闻。于是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责备阁臣于新帝即位伊始，即导之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结尾又曰："玉体未寒，爱妾莫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等迎头痛击痛骂贾继春为奸党。贾继春又上疏反击，疏中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等句，把外间传闻以骈句加以宣扬，传诵一时，成为名句。最后，才即位的熹宗不得已亲自出面，降敕谕说明移宫原委。杨涟亦有《敬述移宫始末疏》一

文。事实真相方得以大白。杨涟暂且回籍以避风；贾继春上疏认罪曰："凡疏上所言皆道听途说，实该万死。"最后仍不能免，被"除名永锢"。

"三案"均属宫廷案件。三案本末，已经有始有终，三案结局，元凶已获，罪人伏法，原可算已经了结。然明代末期，门户更多，党争更烈。及阉党魏忠贤当道，修《三朝要典》，三案全部翻倒：梃击案则祸首为王之宷，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之罪名受到围攻，先给以"除名"处分，然后将其抓入狱中，令其退赔"赃银"八千两。退赔不出便按期追比（按期用刑逼索），逼死狱中。红丸案则祸首孙慎行，先是受"削夺"处分（即削去其官籍，夺去其所有官阶、封号），继又被遣戍宁夏（尚未成行，崇祯继位，乃得赦免）。至于东林党人如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均受追论。邹与李已死，仍遭削夺，高攀龙曾要严治崔呈秀之贪污罪，而今崔呈秀派出缇骑，将其抓进京去论罪。高攀龙于缇骑将到之时自沉于池而死。移宫案则罪魁并指为杨涟及左光斗。均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被定罪追赃。追不出赃，乃五日一追比，用刑拷打，至体无完肤，惨死狱中。

及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先惩办罪大恶极的魏忠贤。魏忠贤得知要逮回京师自杀于行抵阜城途中。粉碎魏党后，乃为三案被冤诸人进行平反，冤死诸人均一一给以赠官赐恤；被遣戍者，召回复官任用。崇祯帝迅速而有效地扑灭魏党，消灭魏阉气焰，平反"三案"。

注　释

①皇次子生一岁而夭亡。

②《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

③《明史》卷二一八《申时行传》。

④明廷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封王后，福王长期逗留京师，廷臣不断请其就国，直至万历四十二年，福王就国后，群情始安。

⑤《明史》卷二四四《王之寀传》。

⑥⑦温功义《三案始末》。

⑧⑨《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八《三案》。

⑩光宗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而李选侍欲争封皇后：当时光宗语未毕，李选侍披帏立，呼长子朱由校入，与之语，又复出，皇长子对皇帝曰："要封皇后，（不要封皇贵妃）。"

⑪文秉《先拨志始》卷上。

明

萨尔浒之战

在现今辽宁省抚顺市东大伙房水库附近，有一座形势险要的山，名叫萨尔浒山，历史上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次战争以明军惨败、后金（即后来的清王朝）军大胜而告终。从此以后，明朝在对后金的战争中，一直处于防御地位。

明朝末年，朝政腐败，辽东守将李成梁贪污贿扈，国家的军费大部被他吞没，使辽东武备日益废弛。这时居住在今吉林东北部牡丹江、绥芬河地区的建州女真，一天天壮大。公元1613年，在其杰出领袖努尔哈赤（1559—1626）的领导下，基本上完成了女真族内部的统一，于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附近）建立了大金汗国，史称后金。为了向内地掠夺和扩张势力，努尔哈赤将进攻矛头指向明中央政权。

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宣称与明廷有“七大恨”，以此为口实，告天誓师，对明朝发动进攻。

“七大恨”的第一条，是说明朝杀害了他的祖父和父亲。原来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建州右卫首领王杲（gǎo 稿）带

兵进攻辽东，被明辽东总兵李成梁打败，王杲投奔海西女真（居住在今松花江流域）哈达部王台，王台把他缚送到李成梁那里，被李成梁磔死。1583 年，王杲的儿子阿台为父报仇，占据古勒山寨（在今辽宁新宾附近），反对明朝。李成梁利用明朝扶植的苏克素浒河部的图伦城主尼堪外兰，引明军攻打阿台，阿台困于古勒寨内，被部下杀死。明军攻入寨内，对战败者全部屠杀，连前来劝说阿台降明的努尔哈赤的祖父叫场和父亲塔失（都是王杲的部将），也被杀死。因此，这就成为努尔哈赤进攻明朝的一个主要借口。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是诉说明朝偏袒他的对手女真族的哈达、叶赫部（均为海西女真部落）。第三、五条，是说明朝窃踰疆场，肆其攘夺；拘捕后金使臣，挟杀金人；遣兵驱逐柴河、三岔、抚安三路耕民，不容刈获。

努尔哈赤在发布誓师词后，亲自率领大军二万人，分两路进攻抚顺。在进军前，他向全军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敌者勿妄杀”①。同时颁布《兵法之书》，规定了用兵作战的原则：“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②在夺取抚顺的战役中，努尔哈赤正是运用上述的用兵之道因而取胜的。

抚顺城濒临浑河，是建州女真同明朝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常来这里贸易，因此这里的山川地理形势，他了如指掌。当时明朝驻守这里的是游击李永芳，以前努尔哈赤也曾同他打过交道。努尔哈赤派出先遣部队假冒商人来抚顺扣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然后后金主力乘机突入城内，捉住守将李永芳，抚顺遂不战而下。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又攻占东州（今沈阳东南）、马根单（在赫图阿拉西南）两座城池。当后金军撤走时，明广宁（今辽宁北镇）总兵张承胤领兵万余人仓促来追。努尔哈赤派军环攻，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全歼明军，俘战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胜计。努尔哈赤在初战大胜后，又于同年七月，亲统八旗军，进鸦鹘（hú 胡）关，围清河城（今辽宁本溪东北），明朝守将闭门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守将及兵民万人皆战死。

抚顺败报传至京师，明廷举朝震惊。明神宗慌忙召集九卿科道会议，商讨"大举征剿"赫图阿拉的决策。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后金军转攻叶赫部，叶赫部向明告急。明神宗感到边事十分危急，立即从全国各地调集军丁十万人③齐集沈阳，派兵部尚书杨镐（hào 号）为辽东经略，向后金发动总攻击。杨镐的作战方针是：以赫图阿拉为目标，分进合击，四路会攻，企图一举围歼后金军，其部署如下：

西路：即抚顺路，以山海关总兵官杜松为主将，率领三万人担任主攻，由沈阳出抚顺关，沿浑河右岸（北岸），入苏子河谷，从西面进攻赫图阿拉。

南路：即清河路，以辽东总兵官李如柏为主将，率军二万

余人，从清河出鸦鹘关，从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北路：即开原路，以原任总兵官马林为主将，率领所部及叶赫兵共二万余人，由靖安堡出，经开原、铁岭，入浑河上游地区，从北面进攻赫图阿拉。

东路：即宽甸路，以总兵官刘綎为主将，率官兵一万余人，会合朝鲜军队共约二万余人，经宽甸沿董家江（今吉林浑江）北上，由南面进攻赫图阿拉。

辽阳和广宁为明朝辽东根本重地，派总兵官秉忠率兵一部驻守辽阳，为机动部队；总兵官李光荣率军一部戍守广宁，保障后方交通。并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督运各路粮草。

杨镐坐镇沈阳，指挥全局。此人既庸懦昏聩，又骄躁寡谋。原定二十一日出师，十六日天降大雪，跋涉不前，复改于二十五日进攻。杜松因大雪迷路，请缓师期。刘綎也以未谙地形，再请缓师。杨镐勃然大怒道："国家养士，正为今日，若复临机推阻，有军法从事耳！"④杨镐只图侥幸取胜，置天时、地利、人心、敌情于不顾，限令明军四路兵马于三月初二会攻赫图阿拉。但是，四路明军出动之前，"师期已泄"⑤，作战企图已为后金细作侦知，因而努尔哈赤深以从容作出对策。

努尔哈赤探知明军四路进击的军事部署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皆山险，且远敌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⑥，并决定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⑦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努尔哈赤率八旗精兵六万人，再加上其它兵力共约十万人，集结于赫图阿拉附近，准备迎击来势汹汹的明军。二月二十九日，后金军发现刘綎军先头部队从宽甸北上，后又侦知杜松军出抚顺关东进。努尔哈赤判断："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

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⑧因此，只派五百人防守自宽甸来攻的刘綎先头部队，集中主力迎战杜松军。杜松是一个刚愎自用、有勇无谋的将官，他悬军深入，轻敌冒进。为了抢头功，他命令军卒不待舟筏，策马渡河，浑河流急，明军淹死的不计其数。三月初一，他驰至萨尔浒。其时，北路马林军始由开原出铁岭，叶赫军尚未行动，后金军砍树塞道阻滞，尚在途中；南路李如柏军，虽由清河堡出发，但行动迟缓，二月二十九日则刚出鸦鹘关；东路刘綎军虽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宽甸，但因在凉马佃会朝鲜军，尚在马家口一带行进中。只有杜松所部“违期先时出口”⑨，已进至萨尔浒。杜松分兵为二，以主力驻萨尔浒山下；自率万人进抵吉林崖（在萨尔浒东北），攻打界凡（在赫图阿拉西北铁背山上）城。

努尔哈赤命代善、皇太极率少数兵力援界凡，亲统八旗铁军冲向萨尔浒。明军用战车列阵，放火铳，发巨炮，炸弹爆发，血肉横飞。后金铁甲骑兵奋力冲击，在呐喊声中，狂扑明军萨尔浒大营。铁骑集中一点，攻陷方阵，突破战线，纵横驰突，一鼓作气，攻下了萨尔浒明军大营。紧接着，后金军又驰赴界凡。当时进攻界凡的杜松军，听到萨尔浒大营失陷的败报，军心已动摇，又遇到从吉林崖山下压过来的后金军，士气更加低落。杜松率官兵奋战数十余阵，企图占据山头，忽然大风扬尘，对面不见人，明军打起火把，从明击暗，铳炮打入丛林，对后金军杀伤甚微；后金军从暗击明，发无不中。后金军以数倍于杜松军的兵力四面围攻，杜松左右冲杀，矢尽力竭，落马而死，他率领的军队全军覆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这次战斗说：“明总兵杜松、王宣、赵梦麟等皆没于阵，横尸亘山野，血流成渠，其旗帜、器械及士卒死者，蔽浑河而

下，如流澌焉。”杜松贪功冒进，轻骑深入，不谙地形，舍长取短，终于遭致惨败，是必然的。

明军主力杜松部被歼灭后，努尔哈赤又乘胜挥戈北上，急攻驻守在尚间崖（在萨尔浒东北三十余里）的马林军。马林见杜松兵败，所部军哗，急忙转攻为守，形成“牛头阵”：马林亲自率军驻尚间崖，依山结成方阵，环营挖三层壕堑，壕外排列骑兵，骑兵外布枪炮、火器、壕内布列精兵。参将龚念遂在斡珲鄂漠结营，潘宗颜在飞芬山扎营，两营相距数里，成犄角形。马林自以为“牛头阵”既能互相救援，又能以战车和壕堑阻遏后金骑兵的突袭。但他消极防御，兵力分散，恰好给努尔哈赤提供可乘之机。三月初三，努尔哈赤集中兵力进攻龚念遂营。后金骑兵猛冲龚营一隅，突破缺口后，接着以步兵正面冲击，攻破明军车阵，龚念遂营破战死。

努尔哈赤在攻破龚念遂后，又率主力进攻尚间崖，马林率军迎战。两军短兵相接，骑兵横驰，正在酣战之际，主将马林怯战，策马先奔，副将麻岩战死，余众大溃，后金军夺占尚间崖。接着率兵击破潘宗颜部，潘宗颜营溃战死。叶赫军至开原中固城，闻马林兵败，大惊而遁。北路明军，除主将马林率数骑逃回开原外，全军皆没。

努尔哈赤击败马林军后，立即移兵南下，进攻宽甸路的刘綎军。刘綎治军向称严整，行则成阵，止则成营。炮车火器齐备，装备精良。努尔哈赤为全歼刘綎军，乃采取诱其速进，设伏聚歼的战术，事先设伏于距赫图阿拉东南约五十里的阿布达里冈，以五百名精骑诈充明杜松军赚诱刘綎速进。阿布达里冈一带，重峦叠嶂，山路险隘，刘綎督令兵马单列行进。后金军弥山盈谷，伏兵四起，首尾齐击，四围厮杀。刘綎力战，中流

矢而死。朝鲜援兵被迫投降。

杨镐在沈阳，听到明军三路败报，急令清河路李如柏回军。李如柏怯懦蠢弱，出师晚，行动缓，仅进至虎拦冈（在清河堡东），还没有同后金军交锋，即接到回师命令。后金哨探二十人在巡逻中，发现李如柏退兵，发出冲击信号，明军以为后金主力发起进攻，惊恐溃逃，后金军乘势斩杀四十人，获马五十，明军自相践踏，死伤千余人。

萨尔浒之战，是明与后金争夺辽东的关键性一战。这次战斗前后不过五天，以明军溃败和后金军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明军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将帅不和、指挥失算而遭到惨败。后金汗努尔哈赤则正好利用明军上述弱点，再加上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指挥才干，终于取得辉煌战果。后金军此战的胜利，不但使其政权更趋稳固，而且从此夺取了辽东战场的主动权。而明军自遭此次惨败，完全陷入被动，辽东局势顿形危急。乾隆皇帝曾称颂这次战役说：清朝的“基业实肇乎此。”可见此役对后金的深远意义。

注　释

①《满洲实录》卷四。

②《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五。

③明军数字，各书记载不一。《三朝辽事实录》作八万八千五百五十人，《辽广实录》作九万人，《明史纪事本末补遗》作十万人，《光海君日记》作十四万人，《满文老档》和《清史稿》作二十万人，《清鉴辑览》作二十四万人，《清实录》作二十万人、号四十七万等。

④《明史纪事本末》卷四。

⑤《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

⑥《清鉴易知录》前编二，天命四年三月。

⑦夏允彝《幸存录·东彝大略》，《明季稗史初编》卷一五。

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

⑨《明神宗实录》卷五八〇。

明

袁督师蒙冤

袁崇焕，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为人慷慨有胆略。喜欢兵法，每遇老将退休士兵还乡，总要跟他们谈论边塞之事，通晓边塞守备形势，常以边塞将才自许。

天启二年（1622）正月，袁崇焕朝见在京御史侯恂，请求破格任用，于是被提升为兵部职方主事。不久，广宁（今辽宁北镇县）军队失败，朝廷议论扼守山海关，袁崇焕一人骑马趋出，亲自考察关内外形势，兵部发现袁崇焕丢失，很惊讶。家人也不知袁崇焕去向。不久还朝，述说山海关形势，自称只要给我军马钱谷，我一个人就足能守备。这时朝廷众臣更加称赞他的才能，就提升他做佥事，监督关外军务。经略王在晋让袁崇焕到前屯安置辽人失业者，袁崇焕连夜出行穿越荆棘虎豹生活之地，四更天就到达前屯城，将士赞佩他的胆量。王在晋对他非常器重，提升为宁远、前屯兵备佥事。然而袁崇焕看不起王在晋，认为他没有深谋远虑，因此也不完全听他的命令。王在晋议筑城八里铺，袁崇焕认为不合策略。十三山难民十余万人，久困不能出，大学士孙承宗巡行边塞，袁崇焕请带五千人

驻扎宁远城（今辽宁兴城），以壮十三山形势。再另遣勇将救十三山难民。宁远离十三山二百里，有利则进据锦州，不利则退守宁远，为什么要把十万难民置之度外？孙承宗与总督王象乾谋划此事，王象乾认为关外军刚刚失败，士气沮丧，建议调发守关将士三千人前往救援。孙承宗认为有理，就转告王在晋，王在晋终未能救援，十万难民皆陷敌手，脱逃而来的仅六千人而已。孙承宗驳斥王在晋关于修双重城防的建议，谋划加强诸将吏的守备。命闫鸣泰防守觉华岛，袁崇焕主持宁远守备。王在晋、张应吾、邢慎言认为不妥。孙承宗最后还是按袁崇焕意见办理。不久，孙承宗镇守山海关，更加依靠袁崇焕，袁崇焕对内安抚军民，对外整顿边防，成绩显著。袁崇焕曾经核查出有虚报兵额的事，立即杀一名将校，孙承宗大怒说，监军难道能主生杀大事吗？袁崇焕向孙承宗认罪。可见他在军中执法之严。

熹宗天启三年（1623）九月，孙承宗决定坚守宁远，佥事万有孚、刘诏劝阻，孙承宗不听。派满桂、袁崇焕前往。当初孙承宗曾派祖大寿修筑宁远城，祖大寿推测朝廷未必能远守宁远，筑城十分简陋，仅筑十分之一，又都不合坚守的要求。袁崇焕到宁远后，立即确定筑城的规模制度，即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命祖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别督造，次年竣工。于是宁远就成了关外重镇。满桂是良将，袁崇焕又勤于职守，誓与宁远城共存亡，又优抚将士，部下乐为尽力。于是商旅流民从四处聚集，远近军民都以宁远为乐土。天启四年（1624）九月，袁崇焕与大将马世龙、王世钦率水陆马步军 12000 人东巡广宁，亲自查看北镇，到北镇祠庙祭祀，观看十三山形势，到达右屯，就从水路沿三岔河返回。

不久晋升为后备副使，再进右参政。袁崇焕东巡期间，请求立即收复锦州、右屯诸城。但孙承宗认为时机未到。天启五年（1625）夏，孙承宗与袁崇焕商量遣将分别占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修缮诸处城防，派兵据守。从此，宁远又为内地开拓疆土二百里。

十月，孙承宗罢官，遣高第代替孙承宗。高第认为关外一定不能守，令诸军撤回锦右诸城的防守战具，把所有将士迁移到关内，督屯通判金启棕上书给袁崇焕说："锦右大凌三城皆前锋要地，倘收兵退既安之民庶复播迁，已得之封疆再沦没，关内外堪几次退守耶?"①袁崇焕也认为不可退兵移民，并力争说：兵法云有进无退，锦州等三城已经光复，怎么能轻易撤出？锦州、右屯一动摇，那么宁远和前屯必然震惊，山海关门户也失去保障，现在应选择良将守卫它，不能再有别的想法。高第很顽固，不能听取袁崇焕的建议，并且还要撤出宁远、前屯两城守备。袁崇焕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②高第无从再刁难他，于是撤出锦州、右屯、大小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备，把所有屯驻上述诸地的兵都撤入关内，丢弃米粟十几万石，而沿途死亡者更多，哭声震原野，百姓怨恨，军队士气越发不振。

天启六年（1626）正月，清军大举进犯，西渡辽河，二十三日到达宁远。袁崇焕立即同大将满桂，副将左辅、朱海、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刚等召集将士誓死守城。袁崇焕更刺血写书，从忠义相激励，部众都下拜，将士请效死命，于是把城外民宅全部烧毁，带着守城战具入城，坚壁清野以待军令。传檄前屯守将赵率教、山海关守将杨麒，如有逃兵到他们两处，一律斩首不赦。人心开始稳定。次日，清大军戴楯、穴城、矢石

不能退。袁崇焕命令闽卒罗立放西洋巨炮，伤城外清军。第二日清军再攻，再次被打败，宁远之围遂解。启倧也因燃炮炸死。启倧出身小吏，初为主赏功事，因勤敏有志，被孙承宗重用，提拔为通判，核实兵马钱粮，督造工程，疏理军民词讼，大得众心。战死后赐官光禄少卿，世荫锦衣试百户。其初，朝廷闻警，兵部尚书王永光，召集廷臣议战守之策，无一出良谋者。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关上而不救援。中外人士均谓宁远必不守，等到袁崇焕以捷报闻于朝廷时，举朝大喜。立即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熹宗并降金书奖励满桂等，进爵各不同。初，清兵解围后，分兵数万，进犯觉华岛。杀参将金冠等及军民数万人。袁崇焕刚刚守城，力竭不能救，高第退守山海关，违反了孙承宗的做法，折辱了诸将，他部下诸将因此而解体。杨麒也不被诸将尊重，以致见侮其部卒。因为高第、杨麒坐失援救，被罢官。而以王之臣代高第为经略，赵率教代杨麒为总兵赴任。

清兵所向，无不摧破，明朝诸将不敢议战守之事。诸将议战守，自袁崇焕始。三月，再次设置辽东巡抚，命袁崇焕任此职。袁崇焕因解围有功，逐渐骄傲，与良将满桂不和，请调任它镇，于是熹宗召还满桂。袁崇焕因王之臣曾上谏留满桂于任，又与王之臣不和。朝廷害怕两将不和贻误大事，命王之臣专督关内，把关外防务交袁崇焕全权处置。袁崇焕怕廷臣，中官忌己，上疏建议，以关内外分责二臣，用辽人守辽土，边守边战，边筑边屯，屯种收入，可减轻海运供给。大意是以坚壁清野为主，乘间击瑕为用，战虽不足，守则有余，守既有余，战无不足。他在《辽事治标治本疏》、《辽地屯田疏》等奏折中，对上述战略战术进行了系统精详的论述。袁崇焕顾虑失信

朝廷，自身难保，所以特意陈述自己的心情说："顾勇猛图敌众必仇，奋迅立功众必忌。任劳则必召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则劳不着，罪不大则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古已然，惟圣明与廷臣始终之。"③熹宗优旨褒答。冬，袁崇焕与刘应坤、纪用、赵率教巡视锦州、大小凌河形势，商议大兴屯田，逐渐恢复高第所弃旧土。袁崇焕认为，现在山海关第四城既已重新恢复，应当重新修缮守备，松山等诸城应调兵四万人驻守，缺一不可。熹宗答应照此办理。"八月，建州主殂（努尔哈赤死），子嗎竿（皇太极）立，改元。袁崇焕奏遣喇嘛僧往吊，力言建州有通款之意"④，袁崇焕想与后金议和，派使者致书。清太宗回报说，清兵将讨朝鲜，也想因此与崇焕罢兵，能够使他们一意南下。天启七年（1627），再次遣使说明此意。于是清兵大举渡鸭绿江南侵朝鲜。当时，朝廷认为袁崇焕与王之臣不相能，召王之臣还朝。罢经略不设，把关内外战守之事完全交给袁崇焕负责。中官刘应坤、纪用并便宜从事。袁崇焕锐意恢复，乘清军出击朝鲜，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再次使使持书议和。恰逢朝鲜和毛文龙一起告急，朝廷派袁崇焕发兵救援，袁崇焕以水师援救毛文龙，又派左辅、赵率教、朱梅等九将带精兵九千先后逼三岔河，为牵掣之势。可是朝鲜已被大清征服，于是明朝诸将乃不战而还。四月，"增设大帅，以杜文焕驻宁远，尤世禄驻锦州，侯世禄驻前屯，左辅驻大凌河，满桂驻关门，节制四门，仍赐剑以重事权"⑤。五月，熹宗命蓟辽总督闫鸣泰、分总兵孙祖寿移镇山海，满桂移镇前屯，赵率教、左辅及内监纪用领兵守锦州，袁崇焕移宁远，黑云龙移一片石。建州兵十五万攻锦州，平辽总督赵率教守锦城。赵率教遣使议和，皇太极盛气凌人地说，锦

州是我家的地方，你们为什么要在此地筑城？还泒两人随使者归城中。赵率教回答，若想得城，你们就打吧，不能狡辩得城！第二天早上建州兵分两路抬拉车梯等战具强攻城西北两面，马步轮流进攻。赵率教带领左辅、朱梅等奋力抵抗，炮火矢石交下如雨，直到午后，城下积满敌尸，到夜晚就向西南退兵 5 里扎营。第二天派骑兵环城而行。山海总兵满桂遣兵援救锦州，在爪篱山与建州兵相遇，由外夹击，大败建州兵。建州兵向东撤退，锦州之围遂缓解。

六月，建州兵攻宁远，总兵满桂等大战，将其打败。初，建州兵在锦州失败，进而攻打宁远。参将彭缵古用红夷大炮击碎其大帐营一座，长子召力兔贝勒中箭身亡。次子浪荡宁谷贝勒也阵亡，射杀固山 4 人，牛录 30 余人。第二天，增兵赴宁远，守兵出城迎战，连战数十回合，并发火炮矢石攻打，积尸遍野。四王子驻教场黄帐房，穿黄衣督兵攻城，到日暮时被杀死者更多，于是撤兵回，连夜东行；到五更天，在小凌河扎营，留精骑殿后。十多年来，没有谁敢与建州兵交战，袁崇焕宁远大捷，也只是依仗宁远城打退敌兵。这次与建州兵交战取胜，多凭满桂之力，随后又派诸军分路追击，建州兵全部退回沈阳。七月，辽东巡抚袁崇焕请假回籍。先是，建州遣使方金纳温台什渡河见纪用、袁崇焕议和谈条件，袁崇焕主议。不久，有事东江，又西攻宁远、锦州，王之臣认为都是讲和议款不当，与袁崇焕意见不合。而袁崇焕又素不被魏忠贤所喜，于是罢袁专任之职，加王之臣宫保，督师辽东，驻宁远，赐尚方剑，大帅以下听其节制，准袁崇焕回籍。世禄、祖大寿分别统领这五千降兵。熹宗诏命安置在塞外。

崇祯元年（1628），七月，袁崇焕至京师。崇祯在平台召

见，问其守战方略。袁崇焕先说，辽东防务很不容易，五年之内需户部转军饷，工部给器械，吏部用人，兵部调兵选将，须中外事事相应，才能成功。崇祯如其言向户、工、吏、兵四部下达圣旨。袁崇焕又说："以臣之力，守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肘，亦能以意见乱臣谋。"⑥皇帝起立倾听，加以安抚。大学士刘鸿训等复请赐袁崇焕尚方剑，允许便宜行事。崇祯完全听从刘鸿训之建议。袁崇焕又说明以前熊廷弼、孙承宗都因为权奸掣肘而不得竟其志。袁崇焕再次强调恢复辽东之计在于"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⑦。并重申恢复之计"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臣与诸臣所能为。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皆在至尊司钥，何以任而勿贰，信而无疑？盖驭边臣与廷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但当论成败之大局，不必摘一言一行之微瑕。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也，是以为边臣甚难。臣非过虑，但中有所危，不得不告"⑧。崇祯深以为然，优诏答对，使勿多虑。二月，罢督师王之臣官。命袁崇焕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督师蓟、辽、登、津，移驻关门。五月，建州兵攻河西高桥，塔山，又围大兴堡，总兵朱梅以炮击退其进攻。数日后，建州兵致书言议和条件，边吏不准，引兵还。六月，建州兵至锦州，攻陷骆驼、大兴等堡。七月，召廷臣及督师袁崇焕于平台，慰劳备至，至午门；兵科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五年能否平定辽东？袁崇焕说，因为庄烈帝急于求成，所以用五年之期安慰庄烈帝。誉卿说，如果皇上按期责效又该如何？袁崇焕无可回答。当时人们估计袁崇焕五年之期难以兑现。八月，建州兵攻黄泥窪，袁崇焕遣前锋祖大寿打退

其进攻。

庄烈帝崇祯二年（1629）六月，袁崇焕诱杀虚功冒饷的皮岛守将毛文龙。袁崇焕再次出关任督师，自料无法实现五年荡平辽东的诺言，于是想与清兵讲和议款争取时间。八月，束不的建州清兵自大镇堡分两路，一路从杏山高桥堡，一路自松山直逼锦州，进攻双台堡。不久又从大、小凌河毁右屯卫城而去。督师袁崇焕恐清兵西征，请求增戍关门，遣参将谢尚政等加强顺天防备。巡抚王元雅认为这是虚警，把他们调走。当时建州清兵想麻痹边将，果然不再出兵。大清兵越蓟州而西进，袁崇焕惧，急引兵护京师。于广渠门外扎营。大军鏖战，互有杀伤，当时所攻破的隘口，系蓟辽总理刘策所辖。崇焕闻变，千里援救，有功无罪，但京都人骤遭兵袭，怨谤纷起，认为袁崇焕纵敌拥兵，前又与其和议，诬其引敌，威胁朝廷议和，将为城下之盟，阉党残余分子交章弹劾。庄烈帝听说此事不能不惑。又值皇太极设间，散布说袁崇焕与建州清兵已有密约，并阴纵俘获宦官归朝传达这一消息，庄烈帝闻讯，信以为真，下袁崇焕诏狱，加之前被黜中官怀恨在心，多讪谤非议，后经法司审定袁崇焕谋叛，于崇祯三年（1630）八月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均流放三千里外，抄没其家。袁崇焕无子，家中也没有余钱。天下人都认为皇帝冤杀了袁督师。袁崇焕既被缚下狱，祖大寿溃奔而去，满桂急引兵与清兵交战，竟死于沙场。初，袁崇焕妄杀毛文龙，到此时崇祯皇帝又误杀袁崇焕，边事更无人支撑，加以内地农民起义纷起，明亡于清的大势已定。

袁崇焕这一冤案，直到清代撰修《明史》时，披露了皇太极设反间计一事之后，才算是真相大白。几百年来，人们怀念袁崇焕“横戈原不为封侯”的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北京龙潭湖

畔还有袁督师祠堂，供人们凭吊和瞻仰。

注 释

①②③《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

④⑤《明史纪事本末》卷五《锦宁战守》。

⑥⑦⑧《明通鉴》卷八一庄烈帝崇祯元年。

明

李时珍修《本草纲目》

李时珍，字东璧，又字可观，晚号濒湖山人。蕲州（今湖北省蕲春县西南）瓦硝坝人。出生于正德十三年（1518），逝世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他是我国卓越的药物学家，也是当时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

李时珍出身于世医家庭，父祖三代为医。祖父是一个走街串巷行医的“铃医”。父亲名言闻，字子郁，号月池，博通经史，以医为业，既具有丰富的诊病治病经验，又深通药学，曾充太医院吏目。著述有《四诊发明》八卷、《医学八脉注》①，《人参传》二卷、《蕲艾传》一卷，另有《痘疹证治》、《四言举要》等若干种。

李时珍幼受家庭影响，加之他自幼体弱多病，很早就对中医药学感兴趣，“好读医书”②，常随父兄进山采药，懂得不少药草知识。但在科举盛行的明代，由举业成名而步入仕途才是正道，所以在父亲的督促下，李时珍自幼诵习儒家经典，学习制艺。嘉靖十年（1531），在父亲陪同下赴黄州府试，中秀才。后来，又曾三次赴武昌乡试，三次落选。拜理学名家顾日

岩为师，发愤读书十年，同时钻研医学。嘉靖二十一年（1542），李时珍开始正式行医，致力于中医与中药的研究。他一边潜心研究前人的医学著作，一边诊病辨证，积累经验，几年后，已俨然成一时名医。嘉靖三十年（1551），楚王府聘他为奉祠正，掌管良医所事，不久被推荐到朝廷，任太医院判。楚王府与太医院丰富的医学典籍与一些秘而不传的药方，为李时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

经过近十年的钻研与实践，李时珍感到作为一个医生，识药、用药是一个大问题。医生对药物不熟，那无异于视人命为儿戏。明世宗嘉靖三十一年（1552），三十五岁的李时珍开始编写《本草纲目》。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懂得某些植物、动物、矿物可以用来防病治病，后来渐渐形成我国特有的“本草学”（即中药学）。“医家‘本草’，自神农所传，止三百六十五种，梁陶弘景所增亦如之。唐苏恭增一百一十四种，宋刘翰又增一百二十种。至掌禹锡、唐慎微辈，先后增补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种，时称大备。然品类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而析为二三，或二物而混为一品”③，或“玉石水土混同，诸虫鳞介不别”，或“图与说异，两不相应，或有图无说，或有物失图，或说是图非”。正因为前人的本草著作中“舛谬差伪遗漏不可枚数”，李时珍才决定撰写那本名垂不朽的《本草纲目》。

著述工作开始后不久，李时珍即辞去太医院的职务，得以全力“搜罗百氏”，“访采四方”，“穷搜博采，莫烦补阙，历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稿三易而成书”④。

《本草纲目》取汉代《神农本草经》（载药 367 种）、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载药 760 种）、宋《开宝本草》（载药

1082种）、苏颂《本草图经》（载药730种）、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载药1746种）等书中所记载的药物1518种，新增374种，总记载药物数达1892种，成为我国古代药学史上记载药物最多的一本书。此外，该书记载药方11096个，比前人增加4倍，并附有动植物插图1110幅，全书共分50卷，190多万字。

《本草纲目》在编纂体例上具有“振纲分目”、“纲目分明”的特点，分类法比较先进合理。全书分为16部，60类。传统本草学分类法有两大系统，一是《神农本草经》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上品主要包括无毒或毒性小的、属于滋养强壮之类的药物；中品有毒、无毒的都有，既可滋养强壮，又有攻治疾病的作用；下品药物一般有毒性，专门用来攻治疾病。这种以药物的作用，性质进行归纳的分类法比较原始、简略，容易混淆。另一个系统是按药物的自然属性来分类，这从南梁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开始，此后本草学著作多采用这一分类法，但也有许多是将两种方法结合，即每一类药中再分三品。《本草纲目》依药物自然属性进行分类，他把矿物药分水、火、土、金石4部，植物药分草、谷、菜、果、木5部，动物药分虫、鳞、介、禽、兽、人6部，另有服器部。部下分类，类下分种，以部为纲，以类为目，“物以类从，目随纲举”，“博而不繁，详而有要”，使众多药物的排列有条而不紊。这种严密的纲目分类法，是中药分类学上的一大进步。就生物学而言，这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

在药物的解说方面，《本草纲目》采取的方法是：每种药物标一个总名，作为这种药物的“纲”，下列各栏为“目”，包括“释名”（解释药物名称的来源及依据）、“集解”（说明产

地、形态、采集方法等)、“修治”(药物炮炙方法)、“气味”(说明药物性质)、“主治”(阐述药物的功用)、“发明”(记述前人及自己施用该药的临床经验及对药理的探讨”,有些药物下面还设有“辨疑”与“正误”,以纠正过去本草书中的舛误,最后是“附方”,且多系作者亲自实践收集或以往医书不载的。作者一方面把药物与方剂紧密结合,提倡实用性;另一方面又依药组方,以病附方。因此,这本书开拓并厘定了我国古代药物学著作的标准体例和结构。

《本草纲目》不仅是一部药物学巨著,而且也是一部详明的植物学、动物学和矿物学专著。该书记载植物1094种,对植物的品种、形态、气味及医疗功能等都有详细的描述,并附有精细的插图,为植物标本的采集、辨认以及分类、比较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该书记录动物性药物445种,其分类完全符合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他对环境对动物的影响、动物的遗传与变异等方面的问题都有一些观察和记述。另外,这本书记载矿物276种,其中对许多金属或化合物的产地、形色、鉴别、采掘方法等都有详细记述。

《本草纲目》修成之后,李时珍想将它进献朝廷。就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十六岁的李时珍辞世,书没有来得及献上。“未几,神宗诏修国史,购四方书籍。其子建元以父遗表及是书来献,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士大夫家有其书”⑤。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本草纲目》首版金陵版面世之后,这部190万字的巨著先后被翻刻印刷多达50多个版次。在这本书的影响与启发之下,又出现了一大批本草学著作,如清人汪昂的《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刘若金的《本草述》,沈李龙的

《食物本草会纂》，张璐的《本草逢源》。

《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世界影响也很大。早在成书不久的公元1607年，这本书就传入日本，并被多次翻刻，供人们学习、研究，以至于很快出现了不同的研究学术派别。这本书也很早就传入琉球、朝鲜和越南。十八、十九世纪，《本草纲目》又开始受到欧洲人的注目，被译成英文、德文、拉丁文、法文、俄文等文字出版。

李时珍一生著作甚丰，除了《本草纲目》之外，还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脉诀考证》、《五脏图论》、《三焦客难》、《命门考》等。他不仅是一位药学家，也是一位医学家。在医学上，从基础理论到临床，他都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他的《濒湖脉学》在晋人王叔和《脉经》24脉的基础上又新增述了3种脉，使中医脉象增至27种，并对每一种脉象作了形象的描述，大大普及了脉学知识，提高了医学临床学的质量。直至近代，这本书仍被视为中医学最重要的教科书。他的《奇经八脉考》揭示了奇经八脉病机辨证的基本情况及规律，从而使中医学的经络学说成为系统、完整的独特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在中医学术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五脏图论》、《命门考》、《命门三焦客难》是通过自己的长期研究，对中医脏象学上许多历来争议颇大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中医脏象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濒湖医案》与《濒湖集简方》是方书医案专著，是他临床实践的成功的记录，也是我国早期的著名医案专集、著作。

注　释

① 《明史·艺文志》。

②③④⑤《明史》本传。

明

徐光启修《农政全书》

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嘉靖四十一年（1562）出生于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今上海市）一个商人兼小地主的家庭。他家祖上经商，到父亲时归田务农。他出生时，家道中衰，所以自幼对农业、手工业及商业活动都不陌生。

徐光启少年颖悟，"章句、帖括、声律、书法均臻佳妙"。万历九年（1581）中秀才，便以天下为己任。但因家境关系，他中秀才后，便开始在乡间私塾课徒。多次应试不中，又到韶州、浔州等地任教。

万历二十五年（1597），三十五岁的徐光启由广西入京应试。本已落选，却被主考官焦竑从落第卷中捡出擢至第一名。又过了七年，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由此步入仕途。这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中进士后，徐光启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其间于国家军事经济大政多有建白。北方的后金（即后来的清）进攻明朝，徐光启奉诏选兵练兵。阉党魏忠贤擅权，曾援引徐光启，他不为所惑，引起阉党不满，被劾置闲住，回到老家上海。崇祯元年

(1628)，阉党被除，徐光启官复原职，旋即充经筵讲官。次年，升任礼部左侍郎；三年，升礼部尚书；五年（1632）六月，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要；十一月，加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八月，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同年十一月七日辞世。

作为明末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数学、农业、水利、军事诸方面都有建树，尤其是他的《农政全书》，更是广为人知，对我国乃至世界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由于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晚明之世，水旱虫灾连年不断，使得一直做着“富国强兵”梦的徐光启对国家大事和农业生产非常关注。他痛心于“唐宋以来，国不设农官，官不庀农政，士不言农学，民不专农业”的状况，极力鼓吹发展农业生产。他赞扬战国李悝、商鞅等人的“农本”思想，主张“富国必以本业（农业），强国必以正兵”。他不仅多次上疏建议垦荒屯田，兴修水利，更在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年（1613—1618）间在天津买荒地数百亩，开垦为农场，从事农事试验，研究如何在北方地区种植水稻。阉党专权，他回老家上海“闲住”，则致力于《农政全书》的写作。这项工作开始于天启五年（1625），但没有最后定稿。徐光启逝世后，《农政全书》初稿经由江南名士陈子龙会同谢廷桢、张密等人整理，“大约删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于崇祯十二年（1639）完工，定名为《农政全书》刻印出来。

《农政全书》共分60卷，约70万字。从篇幅上说，这本书是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的7倍，是元王祯《王祯农书》的6倍。全书分12门：农本（介绍经史典故、诸家重农杂

说）、四制（介绍井田、区田及土地利用等）、农事（研究营治、开垦、授时、占候及预测天气之变化和年成丰歉）、水利（介绍我国西北及东南地区的水利、灌溉、水力利用和泰西水法）、农器（介绍作物栽培及粮品加工等用具）、树艺（介绍谷类、蔬果的栽培）、蚕桑（介绍栽桑、养蚕）、蚕桑广类（介绍棉、麻、葛的栽培与加工）、种植（介绍竹木及药用植物的栽培技术）、牧养（谈禽、畜、鱼、蜂等的饲养方法）、制造（介绍食品加工和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常识）及荒政（谈如何防荒、救荒）。书中绝大部分材料是从220余种古代及当代文献中辑录来的，自己撰写的文字大约只有6万余字。所以，陈子龙称徐氏《农政全书》是“杂采众家，兼出独见”，而时人对徐氏的自著文字则极其推崇，以为“人间或一引先生独特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①。由此可见，《农政全书》是一部融前人经验与个人研究、实践的成果于一体的农业科学巨著。

从内容上看，《农政全书》包括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两大方面。他主张用垦荒和开发水利的办法来发展北方的农业生产，力图从根本上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从根本上革除漕运弊政。另外，他提出对灾荒“预弭为上，有备为中，赈济为下”，应以预防为主。，在农业技术方面，他破除了中国古代农学中的“唯风土论”思想，说明通过试验可以使过去在某地被看作是不适宜的作物得到推广种植。另外，他提高了南方的旱作技术，推广甘薯种植，总结栽培经验，总结蝗虫灾害的发生规律和治理蝗灾的办法。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除了《农政全书》以外，还有《吉贝疏》、《甘薯疏》、《农遗杂疏》等专业性论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长江下游大水，农业歉收。徐光启听说东南沿海有新

引进的甘薯可充饥，于是决定在上海试种，但难以藏种越冬。在《甘薯疏》中，他提出了好几种在长江流域甘薯藏种越冬的方法，并记述了用甘薯酿酒的方法。《吉贝疏》专门谈棉花在我国的传播和栽培。他写这些书，都是为了在中国推广这些作物。可惜这几种专著都已失传，所幸书中的基本要点都收集在《农政全书》中了。

徐光启除了是一位出色的农学家，还是一位重要的天文历法学家、数学家和军事家。万历二十一年（1593），在韶州任教的徐光启认识了郭居静，这是他第一次和传教士接触。万历三十一年（1603），徐光启在南京接受洗礼，加入天主教。时值西方耶稣会人士纷纷来华，经过长期试探，西方传教士们认为通过传播科学知识，可以达到更好宣传宗教的目的。徐光启则认为传教士的学问“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巫传其小者”②，又认为“其教必可以补儒易佛，而其绪余更有一种格物穷理之学”③，值得中国人借鉴。徐光启向传教士们学习科技知识，其中包括天文、历法、数学等。万历三十四年，徐光启与传教士利马窦合作翻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又译《测量法义》，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之先河。万历四十年（1612），又与传教士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介绍西洋各种水利机械及各种水利工程作法。除了翻译《几何原本》外，他在数学方面的成就还包括对中国数学在明代落后的原因的研究以及对数学应用的广泛性的论述。

作为天文历法学家，徐光启的主要成就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编译《崇祯历书》。

古代历法是用来“授民以时”的，计算精确与否关系重

大。明代先是实行《大统历》，实际上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天长日久，已有严重误差。崇祯二年（1629），礼部奏请开设历局，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当时协助的既有中国人如李之藻，也有传教士，如熊三拔、汤若望等。改历工作虽然因明王朝的很快覆亡而没有完成，但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仍可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及他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奏疏中窥见一二。

晚明积贫积弱，颇受倭寇及后金的侵扰，一贯视天下为己任的徐光启自然也会把部分精力放在军事科学技术的研究上。在"安边御虏"的思想指导下，他为国选兵、练兵，撰写了诸如《选练百字诀》、《选练条格》、《练艺条格》、《束伍条格》、《形名条格》、《火攻要略》、《制火药法》一系列条令和法典，供军队急用。

注 释

① 明刘献廷《广阳杂记》。

②《刻〈几何原本〉序》。

③《〈泰西水法〉序》。

明

汤显祖写“四梦”

中国古代的文学，每个时代各有其成就。先秦的历史、哲学散文、汉代的赋、六朝的骈文、唐代的诗、宋代的词，都能各领风骚。明代文学中，传统的诗、文方面成就远逊于前代。但由于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日趋扩大和繁荣，市民阶层不断增长，适应这种发展与变化的俗文学便蓬勃发展起来。这兴盛起来的俗文学包括小说、戏曲两大方面。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及“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戏曲方面，则以汤显祖最负盛名。

汤显祖，字义仍，号若士，又号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生于临川县文昌里，万历四十四年（1616）去世。他自幼好学，博览群书。隆庆五年（1571）乡试中举，他更进一步广泛研读。除古文诗词外，又精通乐府歌行，旁及诸子百家，举凡天文、地理、医药、卜筮，无不通晓。中举后曾四次进京考进士，后两次赴考时已是颇具文名了。万历年间，由于他谢绝了内阁大臣张居正、张四维、申时

行等人的延揽，屡试进士不第。万历十一年（1583），即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他才考中进士。先后任南京太常寺博士、詹事府主簿、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万历十九年（1591），因上书议朝政，被贬广东徐闻县任典史，两年后调任浙江遂昌县知县。他为人刚正，风骨遒劲，不肯腼颜事权贵。因而虽勤兢施政，有循吏之誉，却总因不善应酬被劾，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辞官还家，不复出仕。

汤显祖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高攀龙、邹元标等著名人物过从甚密，在政治上接受这些人的影响，与他们的立场一致。他的启蒙老师是王学左派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罗汝芳，所以哲学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此外，“异端”思想家李贽（卓吾）和从禅宗出发反对程朱理学的紫柏和尚对他的影响也相当大。他倡言“天下之生皆当贵重”，认为“愚夫愚妇皆有天性”①；他用“情”来反对道学家的“理”，说“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②。在文学上，他反对拟古，反对死守格律，而与徐渭、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持共同看法，主张写“情”，明确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③。

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汤显祖的传奇创作堪称明代的最高峰。他所作传奇《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四部，故事都以做梦为全剧关键，所以合称“临川四梦”。他的书斋叫玉茗堂，所以“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

《紫钗记》大约作于万历十五年（1587）前后，取材于唐人传奇小说《霍小玉传》。这部戏原先叫《紫箫记》（一本作《李十郎紫箫记》），分三十四出，后改成《紫钗记》（一本作《霍小玉紫钗记》，共五十三出。改写后的《紫钗记》虽比《紫箫记》稍嫌长，但各方面都有进步。剧中歌颂男女主人公李十

郎和霍小玉对爱情的忠贞，同时对以卢太尉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横与自私也作了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揭露。在道学家“存天理，去人欲”的叫喊声充塞天下的当时，他公然歌颂作为“人欲”的“情”。

《南柯记》（一本作《南柯梦记》）全剧四十四出，故事大抵依据唐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而略有增饰。故事以主人公几十年的宦途经历作为一场梦，写淳于棼梦入蚁穴大槐安国，和公主结婚后，出任南郡太守二十年，公主死后，又升为宰相。不久受人排挤，被罢职遣归。该戏作于作者辞官还乡之后，十余年官场生活，使他对官场的腐败与黑暗有较深刻的认识，对功名利禄也看得透了。看世人为名忙，为利忙，如“蚁子群”，所以开篇发问：“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

《邯郸记》（一本名作《邯郸梦记》）三十出，也作于退出官场之后。情节据唐人沈既济的《枕中记》编成，写卢生与吕翁遇于邯郸道上，吕翁将一磁枕交给卢生，卢生枕之入梦。历尽荣华富贵、迁谪、围捕之后，大梦方醒，旅店主人蒸黄粱尚未熟。汤显祖写这部戏，是要以此对官场的黑暗与相互倾轧加以揭露，同时也慨叹宦海的浮沉与人生的无常。

完成于弃官回家那一年的《牡丹亭还魂记》是汤显祖的代表作，也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座丰碑。全剧五十五出。主要取材于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描写官宦小姐杜丽娘和柳梦梅真诚相爱的故事。

剧中的杜家是官宦人家。小姐杜丽娘天生丽质，娇艳聪慧。她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天性受到压抑。作为一个年已及笄，情窦初开的少女，她深感生活的寂寞与苦闷，她读完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后，在婢女春香的引诱下观赏了后花园的大好春光，于是春心萌动，又因怀春苦闷而悠悠入梦。在梦中，她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梦中的少年书生媾合了。梦醒之后，被好梦难寻所苦，于是恹恹病起，终于因情而死。

广州书生柳梦梅赴临安应试，路经南安郡，拾得杜丽娘的自画像，被她娇艳秀媚的容貌所打动，终日把玩思慕，终得丽娘幽魂出现。二人一见钟情，朝夕欢会，订立婚约，后来发现丽娘是鬼魂再现，柳生仍然真诚爱她，并冒险掘墓，使丽娘获得新生。最后几经周折，二人喜获团圆。

作品歌颂青年男女在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爱情自由方面所进行的不屈斗争，表现了杜丽娘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大胆和柳梦梅对爱情的忠贞。在理学盛行的明代，作者热情讴歌年轻一代的反抗与叛逆精神，他笔下的主人公为情而死，又因情而生，情可以突破生死的界限而长存于天地人间。同时，作者也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压抑、对美好情感的摧残，嘲笑了维护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杜宝（杜丽娘之父）的无能与无情。在封建礼教最森严的时代，作者公然讴歌，赞美人性，以人性与封建礼教相对抗，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的进步倾向。

《牡丹亭》一剧一改往常爱情剧的俗套，用梦里钟情，死生离合的故事来展开情节，不仅使得剧作在反映现实方面比较深刻，同时也使剧作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剧中塑造的杜丽娘这一形象，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光彩照人的形象之一。

汤显祖是明代最具才情的剧作家。《牡丹亭》的语言优雅而不华靡，精美而富于情韵，实属难能可贵。

汤显祖“临川四梦”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崇高地位。明人

吕天成《曲品》把汤显祖所著五部传奇都列入“上上品”，并认为《紫箫》“琢调鲜美，练白骈丽”；《紫钗》“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还魂》“杜丽娘事甚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迭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南柯梦》“眼阔手高，字句超秀”。

张岱认为，“汤显祖初作《紫钗》，尚多痕迹；及作《还魂》，灵奇高妙，已到极处。蚁梦、《邯郸》比之前剧更能脱化一番，学问较前更进，而词学较前反为削色。盖《紫钗》则不及，而‘二梦’则太过，过犹不及，故总于《还魂》逊美也”④。

清王文治说，“玉茗堂四梦，不独词家之极则，抑亦文律总持。及被之管弦，又别有一种幽深体艳之致，为古今诸曲所不能到”⑤。

注 释

①《贵生书院说》。

②《寄达观》。

③《致吕姜山》。

④张岱《答袁箨庵》。

⑤王文治《纳书楹玉茗堂四梦曲谱序》。

明

小 说 盛 行

明代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繁盛时期，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其间有两次小说创作高潮，一为元末明初，一为明代中后期。

宋代时，由于市民阶层的扩大和商业的繁荣，“说话”伎艺得到相当的发展，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周密的《武林旧事》、罗烨的《醉翁谈录》等著作中，对于“说话人”都有很详细的记载。虽经宋末元初的社会大动乱，“说话”伎艺依然获得了发展，而记录“说话”底本的小说也随之得到了发展。经过宋元两代长期的孕育，元末明初章回小说已经初具规模，加之元末的战乱引起文人思想上的深刻反省，使得此时出现的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为代表的长篇白话章回小说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较深刻的思想性和高超的艺术技巧，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作用。

明王朝建立之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措施，将一切大权总揽于皇帝手

中。朱元璋还设立了特务机构锦衣卫，屡兴文字狱，加紧对官吏和文人的控制，对意识形态实行了严密的高压统治，一些文士遭到监禁、放逐甚至处决。明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对通俗文学采取鄙视甚至仇视的态度，加之印刷业的落后，使得明代小说在经历了初期的繁荣之后，出现了近两百年萧条沉寂的现象。

明代中叶以后，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一些地区和一些行业，尤其是在东南沿海一带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在这个时期，商品流通更加扩大，城市里市民人数不但众多，而且在政治、经济上的势力也不断地增长。与此同时，他们在文化上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思想领域里，出现了反对程朱理学的王守仁、李贽等人。以上这些因素，加上印刷业的发展，便促成了明代中晚期长篇白话小说和短篇小说的繁荣。

明代小说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小说以及“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

《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历史小说，是此后一切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作品，同时也是我国第一部描写战争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主要写三国时期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和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寄托了明君贤相的政治理想，塑造了曹操、诸葛亮、关羽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三国演义》是历史小说，它所刻画的人物大都是历史上为人所熟知的真实人物。在塑造这些人物时，作者基本上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做到了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相结

合。整个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历史发展的脉络基本符合，一些人物形象和历史人物基本吻合。与此同时，在刻画人物上，作者也进行了高度的艺术加工，使这部作品具有鲜明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

《三国演义》问世之后，立即对当时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对此后的小说创作、戏曲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思想、道德、军事谋略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水浒传》是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同时出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是在长期民间故事和戏曲流传的基础上，最后由作者加工完成的作品。《水浒传》是以北宋末年宋江起义为题材的英雄传奇小说，它艺术地概括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人民起义发生、发展，直到失败的全过程，它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歌颂了反抗封建压迫的英雄人物，揭示出人民起义的原因是"官逼民反。"作品塑造了林冲、武松、鲁智深等一批鲜明的人物形象。

《水浒传》在歌颂农民起义的同时，也宣扬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和受招安的思想，这是它的局限性。就人物性格的刻画来说，《水浒传》要比《三国演义》更生动、活泼、深刻，它不仅长于叙述，更长于描写，特别是长于细节的刻画。

《水浒传》一问世，立即被封建统治者查禁，足见这部作品思想性之强。数百年来，《水浒传》冲破封建统治阶级的查禁，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西游记》写的是唐僧取经的故事，但和历史上唐代僧人玄奘取经的故事几乎完全不同。《西游记》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内容，但它已被民间传说和作家创作的内容所突破，而主要具有神话寓言的性质。作者用游戏诙谐的笔调，通过神话故

事，寄托了他对现实的激愤。作品塑造出了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等成功的艺术形象。

“大闹天宫”是《西游记》中最精采的部分。它以神话的形式，投影式地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颂了反封建正统、反皇权尊严的反抗思想和叛逆性格。孙悟空代表了反对压迫的正义力量，体现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西天取经”故事的思想性虽然不及“大闹天宫”，但它仍富于教育意义。孙悟空在取经路上所表现出来的顽强不屈的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积极进取、克服困难的大无畏气概。《西游记》艺术上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成功地运用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把我国浪漫主义的实际应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家庭生活的小说，它从《水浒传》“武松杀嫂”一段推衍而成。全书以土豪恶霸西门庆为中心，记叙了他巧取豪夺、横行乡里的种种罪恶以及荒淫无耻的生活，深刻而具体地暴露了明代中叶封建社会黑暗的现实以及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金瓶梅》中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等人物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

《金瓶梅》所反映的社会面非常广阔，上至皇帝，下到市井佃民，无所不有。特别是市民社会下层的帮甬无赖、娼妓优伶、媒婆道姑等三教九流，作者都写得很逼真。《金瓶梅》的不朽价值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审丑。它把一个黑暗社会的真实内在形态描绘给我们看，写出了流氓市侩的本质和典型，写出了各种妇女在受侮辱受折磨中的不同心理状态，写出了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作品以传神逼真的细节描写、极为生动的语言，奠定了它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不朽地位。

由于《金瓶梅》中有较多的淫秽描写，这部作品长期以来

被视为“淫书”，其实它的基本内容是很有价值的，艺术上也很成功。它对《红楼梦》有重要影响。

“三言”指的是由冯梦龙编辑、改编的三部话本、拟话本集，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三言”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宋元话本，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在明代作品中，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而取材历史或宗教传说的故事也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三言”塑造了一批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二拍”是受“三言”影响而出现的两部短篇小说集，作者是凌濛初。“二拍”即《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二拍”和“三言”比较，它们在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上大致相同，但“二拍”比“三言”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和色情描写。“二拍”也同样塑造出了一些成功的艺术形象。

明代小说创作的繁荣直接推动了清代小说创作的繁荣，明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独树一帜的，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明

徐霞客漫游

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号霞客，以号著称于世。南京常州府江阴县（今江苏江阴）人。生于万历十四年（1587），去世于崇祯十四年（1641）。是我国著名的旅行家和杰出的地理学家。

徐霞客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到他父亲时，才无意仕宦，由有权势的官府之家变成一般地主家庭。虽说门第中落，但家境还算优裕。尤其是先世以科举成名，有很深的家学渊源，有丰富的藏书，加上他自己也无意功名利禄，使之有条件、有闲暇博览群书。他天资聪颖，“童时出就师塾，矢口即成诵，搦管即成章”①。成年之后，更是“博览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②，“搜古人逸事，及丹台石室之藏”③。书读得越多，他越是对书中描绘的壮丽山河心驰神往。同时，他也发现过去山经、地志书中舛误颇多，于是萌动周游天下名山大川，“穷九州内外，探奇测幽”，进行实地考察的决心。他母亲也鼓励他：“志在四方，男子事也。……岂令儿以藩中雉、辕下驹坐困为？”④万历三十五年（1607），徐

霞客第一次游览太湖，这一年他二十岁。从这一年起到崇祯九年（1636），他游览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北京、陕西、山西、江西、福建、广东、湖北等地。因老母在堂及家事牵累，他这段时期内的游览都是"定方而往，如期而还"。他去这些地方，也主要是因为向往名山胜迹，游览了泰山、天台山、雁荡山、白岳山、黄山、武夷山、九华山、庐山、嵩山、太华山、太和山、罗浮山、盘山、五台山、恒山等。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两个月，每次游览大都有游记。从这近三十年间徐霞客的行踪及存留下来的游记资料看，他侧重于搜奇览胜，对山川地貌及水道源流的考察探索较少，对地理学的贡献不如后来的西南之行大。尽管这段时期的游记数量很少（仅名山游记17篇），但已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敏锐的观察力及创造性的思维能力。

崇祯九年（1636）秋，徐霞客开始了他一生中历时最长、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旅行，这也是他后期唯一的一次旅行。此前，他曾说过："余志在蜀之峨嵋、粤之桂林及太华、恒岳诸山，"而"蜀、广、关中，母老道远，未能卒游。"在老母辞世，儿子完婚，自己也已年继五十，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时候，他自知"老病将至"，西游"必难再迟"。他的好友陈函辉说："昔人志星官舆地，多以承袭附会；即江河二经，山脉三条，自记载以来，俱囿于中国一方，未测浩衍，"所以徐霞客"遂欲为昆仑海外之游"。

从崇祯九年九月十九日（1636年10月17日）起至崇祯十三年（1640）止，前后历时四年，行经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贵州而到云南，终因"病足不良于行"，又途经湖北、安徽而回。通过这一次万里远征，他考察了我国的西南

地区，为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霞客的大西南之行，几乎用三分之二的时间考察我国的岩溶地区。他不仅观察了这些地区岩溶地貌的地表特征，而且研究岩溶地貌的构造及特征，创立了许多专有名词，并进行了分类。《徐霞客游记》中记载有357个溶洞，作者曾亲自入洞探察的有306个，在西南之行中亲自探查的有239个，占绝大多数。他不仅记录洞穴的方位、高度、宽度、深度，还对岩溶现象的成因作出正确的说明。如他指出，岩洞是由于水的长期侵蚀所造成的，钟乳石则是由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经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他所观察与记录过的岩溶地貌包括石芽、溶沟、孤峡、峰林、漏斗、落水洞、洼地、伏流、天生桥、地下河、溶洞、钟乳石、石笋、石柱、盲谷、穿山等等。同时，他对岩溶地貌的分布及其地区差异都有细致的观察和记录。

除岩溶地貌外，徐霞客对地貌的考察还包括山岳地貌、红层地貌、流水地貌、火山地貌、冰缘地貌及应用地貌。

徐霞客的考察对水道源流十分关注。除了大量记述水道源流之外，他还纠正了前人文献中记载的某些错误。如《禹贡》说“岷山导江”，他经过考察，肯定了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他晚年著有《江源考》，作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结论。除长江水系外，徐霞客对水道的考察还包括黄河水系、珠江（主要是西江）水系、澜沧江水系、怒江水系、大金沙江（伊洛瓦底江）水系、天台山水系等。他的考察工作涉及到河流的流域范围、河流的大小、河水的流速、河水的含沙量、流水量的变化、河水水质、分水岭、伏流、地形与水文的关系、河床的地区差异等诸多方面的问题。此外，他对湖泊、

沼泽、泉水都有考察与记录。

除了对地形地貌的考察外，徐霞客的旅行还包括了对生物资源的考察。《徐霞客游记》中记述的粮食、蔬菜以外的植物达150多种，尤以云南省所见为多（计60余种)。他观察和描写植物形态，采集各种植物标本，注意植被状况。他还注重植物与地理环境关系的考察，研究海拔、纬度、温度、风、地形诸因素对植物分布、植物生态的影响。

《徐霞客游记》在注重对自然地理进行考察和记述外，也注意考察人文地理。作者注意到人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观察人们进行改造、利用地理环境的各种活动，记录了手工业、矿业开采、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商业贸易、城镇村落的分布和兴衰变化，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风俗等方面的情况。他的这些记述，对于我们了解明代经济、历史地理的状况，都有极大的帮助。

以日记体裁写下的《徐霞客游记》，不仅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各地的地理景观，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先进的地理思想，也反映出作者掌握的先进的地理学方法。他博览群书，遍及古代舆地山经志，而又不满足于书本所见，于是他通过实地的考察来印证书本知识，并纠正舆地史籍承袭附会的各种错误。通过实地的勘察，他忠实地描述记载某一地域的各种地理现象，并且既有文字优美的形象描绘，又有定量化的数字描述。他的考察研究活动还注重分析比较，通过比较，找出被考察研究对象间的异同点，加以归纳总结。另外，他以又采集标本（包括岩石标本与植物标本）的做法补记叙之不足。

《徐霞客游记》是一部伟大的地理学著作，也可看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他对自然景观的描写让人觉得美不胜收。他写

山地、流水、气候、山林、植被、洞穴、阳光、月色，各种风景明艳如画。他对社会生活、各地风俗的描写也生动细致。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曾说《徐霞客游记》具有“真、大、奇”的特点⑤。所谓真，就是指真实，也就是“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然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⑥。所谓大，是指“游记之伙”，篇幅上“遂莫过于斯篇”⑦。所谓奇，是说“其笔意似子厚，其叙事类龙门，故其状山也，峰峦起伏，隐跃毫端；其状水也，源流曲折，轩腾纸上；其记遐陬僻壤，则计里分疆，了如指掌；其记空谷穷岩，则奇踪胜迹，灿若列星。凡在编者，无不搜奇抉怪，吐韵标新，自成一家言”⑧。

崇祯十三年（1640）初，徐霞客脚病严重，已无法继续旅行。他曾想由云南继续去缅甸，这时则不得不放弃原计划，中断旅行，在丽江纳西族土司木生白的资助下辗转还乡。虽是万里长行，他也没舍得丢下采集来的那些标本。友人陈函辉说他“既归，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榻前，摩娑相对，不问家事”。《梧塍徐氏宗谱》中也说：晚年“先生病足息游，憩榻上，日陈滇中所携大理石、奇树虬根等于前”。次年，徐霞客去世。

在我国历史上，在没有政府资助的条件下，没有任何政治、宗教的企图，而纯粹以地理考察为目的，不追求名利，毕生从事旅游，徐霞客亘古第一人。他足迹遍于今江苏、浙江、上海、安徽、江西、河北、河南、北京、天津、山东、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十九个省区，在交通不甚便利的当时，实属难能可贵。他考察范围如此之大，古今少有。他开创了实地考察自然、系统地描述自然的新方向。他的《徐霞客游记》不愧是我国科学文化宝库中的

瑰宝。

注　释

①②③④《梧塍徐氏宗谱》，第1184页。

⑤钱谦益《嘱徐仲昭刻游记书》。

⑥潘耒《徐霞客游记序文》。

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⑧奚又博《徐霞客游记序》。

明

宋应星与明代科技

宋应星，字长庚，江西奉新县人。生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出身书香世家。曾祖宋景是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历任山东参政、山西左布政使、南京工部尚书、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是明朝中期的重臣。祖父早逝，父亲不甚得志，家境逐渐地萧条了。

宋应星幼年颖悟，“数岁能韵语，及操制艺，矫拔惊长老”①。又有过目成诵的本领，自幼很受师长喜爱。“稍长即肆力十三经传，于关闽濂洛书，无不抉其精液脉胳之所存。故自周、秦、汉、唐及龙门、《左》、《国》，下至诸子百家，靡不淹贯，又能排宕渊邃以出之”②。万历四十三年（1615），宋应星与长兄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在一万多名考生中，宋应星名列第三，应升列第六，时人称“奉新二宋”。此后屡试不第，终于断绝仕进之想。崇祯八年（1635），宋应星任江西袁州府分宜县学教谕。十一年（1638），升任福建汀州府推官，崇祯十三年辞官回乡。十六年（1643），又出任南直隶风阳府亳州知州，次年辞官回奉新。这一年，李自成攻陷北

京，明亡。南明时，曾荐授宋应星官职，均推辞不就任。入清后拒不出仕，隐居读书课子，约于康熙（1662—1722）初年去世，年近八十。

明代的农业、手工业很发达，资本主义萌芽不断滋长，促进了我国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一方面，迅速聚积起来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经验有待作出总结；另一方面，比家庭手工业规模更大的手工业工场要求运用科学知识、先进的设备、低廉的消耗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来组织生产。社会的需要，加之客观的可能，使宋应星写出了一部足以使他永垂不朽的著作——《天工开物》。

《天工开物》是一部科学技术著作，最早刊刻于崇祯十年(1637)。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又细分乃粒、乃服、彰施、粹精、作咸、甘嗜、陶埏、冶铸、舟车、锤锻、燔石、膏液、杀青、五金、佳兵、丹青、曲蘖、珠玉十八章。以“贵五谷而贱金玉”为原则，把农业放在前面，次以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各章，而把与国计民生无大关系的珠玉放在最后。

上卷六章，多与农业生产相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及粱粟麻菽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以及有关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乃服》介绍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毛纺等的生产技术以及所用工具、设备及操作要领。《彰施》介绍各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对蓝靛的种植及蓝靛的提取和从红花中提取染料的过程叙述尤其详细，又涉及不同颜料及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讲稻、麦等的收割、脱粒、磨粉等用的工具及技术。《作咸》叙述海盐、池盐、井盐的产地以及制盐方法。《甘嗜》介绍甘蔗的种植、制糖的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与饴糖；中卷七章，多为工业技术。《陶埏》

介绍建筑用砖瓦及日常所用陶、瓷器制作技术及工具，如景德镇的制瓷技术。《冶铸》重点介绍铜钟、铁锅、铜钱的铸造方法及工具，包括失蜡法、实模法及无模铸造三种，是我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尽的记录。《舟车》介绍船舶、车辆的结构、用材、驾驶方法。《锤锻》叙述金属锻造工艺，大到万斤铁锚，小到绣花针，以及其他各种生产工具。《燔石》介绍石灰、硫磺、矾石的烧制及采煤技术。《膏液》介绍各种油料作物及其榨取方法、制蜡技术。《杀青》专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介绍造纸工艺及设备；下卷五章，《五金》论各种金属矿的开采、洗选、冶炼及分离技术。《佳兵》介绍各种冷兵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丹青》专论制墨技术及制颜料的方法。《曲蘖》记述酒母、红曲等的原料、配比、产品用途。《珠玉》专论珍珠、宝玉、宝石的采掘以及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等物。书中既有大量确切的数据，又绘制了123幅插图，展示各有关的生产过程。除个别部分属于引用他人的著述之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作者经过实地的观察研究所得，忠实地总结和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卓越成就。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它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宋应星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言前人之所未言，把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用技术数据作定量的解说，把生产技术中的诀窍、关键技术指出来。比如谈水稻种植技术，用浸种法育秧时，“秧生三十日即拔起分栽”，否则会导致减产。另外，“凡秧田一亩所生秧，供移栽二十五亩”，即秧苗田与本田的比例应是1:25。又如谈到采煤，“初见煤端时，毒气（瓦斯）灼人。有将巨竹凿去中节，尖锐其末，插入炭

中，其毒烟从竹中透上，人从其下施镬拾取者。或一井而下，炭纵横广有，则随其左右阔取。其上支板，以防压崩耳"。以竹筒将瓦斯引上地面和用支板支撑矿井顶部以防坍塌，都是采煤过程中既简便有效又经济的做法。

《天工开物》在崇祯十年（1637）正式刊行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很快传到日本、朝鲜。十九世纪，《天工开物》又被摘译成法文、意大利文、俄文、英文、德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英文全译本在美国出版，更使该书获得世界各方面的赞誉。

除《天工开物》之外，宋应星还著有《观象》、《乐律》、《原耗》、《卮言十种》及《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春秋戎狄解》、《思怜诗》、《美利笺》等。现存的仅《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及《卮言》中的《论气》和《谈天》，共五种。

《论气》是探讨自然科学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的著作。其中的《气声》篇专门讨论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各种条件、声速、声音的传播媒介、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他认为，声是气的运动，"两气相轧"或"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的形式破气便产生不同的声音。声音的大小、强弱取决于形和气间冲击的强度。同时，他还指出声音传播的介质是空气（这时的欧洲学者们还在为声音的传播介质到底是空气还是其他什么微粒子而争吵不休），声音的传播有一定的速度，而其传播的方式就如同石头击水产生的水波那样向四周扩散。可见，他已经有了"声波"的初步理论概念。

成书于崇祯九年（1936）的《野议》可以看作是宋应星的又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这是作者的一部政论集，计有《世

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乱萌》十二篇，集中反映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作者是想通过这本书来影响朝廷施行变革，以挽救晚期社会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使国家转危为安，由乱而治。书中不少议论击中时弊，革新方案切实可行。

《思怜诗》是作者的诗集，艺术性与思想性方面均有可观。

著名中国科技史研究者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曾盛赞宋应星为"中国的狄德罗"（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式人物），日本人三枝博音说宋应星《天工开物》是"中国有代表性的技术书"，看来都不是溢美之辞。

注　释

①②宋立权、宋育德《八修新吴雅溪宋氏宗谱》。

明

崇祯治乱

明季政治腐败，积弊难匡，权阉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残害臣民，荼毒天下。熹宗至死不能察其奸情，终生为之蒙蔽。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笃，召见阁、部、科、道官员于乾清宫，宣谕魏忠贤、王体乾都是老实听命、对皇室忠贞不渝之人，可以与之共商大事。“内阁黄立极等对曰：‘皇帝任贤勿贰，诸臣不敢仰体！’上悦”①。熹宗又下一道遗诏说：“以皇五弟信王由检嗣皇帝位。”②时魏忠贤势力猖炽，中外危慄。熹宗召信王入宫，对群臣说：“吾弟当为尧舜之君。”③信王惶恐不敢当，只说：“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④信王出，熹宗死于乾清宫，年23岁。魏忠贤亲迎信王入大内，朱由检万分惶恐，在袖中自带食物入宫，不敢用御膳，深惧食中投毒。时大臣亦不得见信王。朱由检是夜燃烛独坐。久之，见一太监持剑过门，信王取剑观赏，留于几上，允以有赏。旋又有值更者击梆而过，信王出门慰劳，问左右欲给酒食，何出？侍者以宜问光禄寺。传旨取给之，欢声如雷。次日，即皇帝位于中极殿。受百官朝拜，不准庆贺。是为庄烈帝。

朱由检即位之初，颇思有所振作，素知魏忠贤专权误国，蓄意除之。先是，杨所修、杨维垣弹劾崔呈秀，诚探朱由检是否能辨奸邪。崇祯帝览奏，令崔呈秀归里守制。接着，贾继春上疏弹劾崔呈秀，给事中许可征揭露崔呈秀子崔铎考试作弊，非法中举做官。经吏部核实后，罢崔呈秀官。又浙江巡抚潘汝祯为魏忠贤建祠作俑，被削籍。因崔呈秀案件事多涉魏忠贤，所以崇祯帝将魏忠贤调离大内，安置于凤阳。

先是，魏忠贤奸党颂其功德，请建生祠者络绎于道。此时杨邦宪上疏披露此事，朱由检刚刚继位，读此疏时，边读边笑。魏忠贤预感崇祯帝深恶此事，急忙辩解，硬说疏中颇有夸张不实之辞，朱由检权且作罢。后主事钱元悫又上疏揭露说：魏忠贤构党株连，阴养死士，陈兵自卫。员外史躬盛、主事陆澄源也都交章论其罪恶。嘉兴贡生钱嘉征，列魏忠贤十大罪状。其中，"掩边功：辽左用兵以来，堕名城、杀大将，而冒侯封伯。伤民财：郡县请祠遍天下，一祠所费不下五万金。敲骨剥髓，孰非国家之脂膏！亵名器：崔呈秀之子铎，目不识丁，贤书（因魏忠贤致书考官示意）遂登前列"⑤。读后令人发指。于是朱由检召见魏忠贤，使内侍宣读十大罪状疏，忠贤震恐丧魄，以重宝赂信王府太监徐应元求解难。徐应元曾是魏忠贤的赌友，朱由检得知此事，痛斥徐应元，立即下令收捕魏忠贤。诏谕说："逆恶魏忠贤，擅窃国柄，诬陷忠良，罪当死，姑从轻发凤阳。乃不思自惩，素蓄亡命之徒，环拥随护，势若叛然，令锦衣卫逮治。"⑥魏忠贤接旨从凤阳上路后，走到阜城，忽闻皇帝下谕逮治，知无生路，即与死党李朝钦一起自缢身亡。崔呈秀在家，听说魏忠贤已死，于是排列姬妾，罗列珍宝，呼酒痛饮，一杯毕则碎一杯，饮后自缢而亡。熹宗乳母客

氏亦被处死，其家属无少长皆被诛。人皆以为这是客氏一家过去荼毒天下臣民的报应。

初，魏忠贤用事，外廷文武大臣阿附魏忠贤者，有“五虎”、“五彪”之目。“五虎”是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五人，他们主要是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五彪”是武官许显纯、田尔耕、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人，他们主要是主管杀戮的。所以在诏书中特别标明这文武十人名姓。此外还有周应秋、曹钦程等号为“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不可胜数。总之，朱由检即位之日，也正是魏忠贤势力极为嚣张之时，然而崇祯帝能不动声色，惩办元凶，尽诛党羽，旁无一人相助，能做到“神明自运，宗社再安”⑦。史书谓“崇祯始政，天下翕然称之”⑧。在诛杀魏忠贤翦除阉党的同时，还罢苏、杭织造。并诏谕天下说：“封疆多事，征输重繁，朕甚悯焉。不忍以衣服组绣之工，重困一方民。其俟东西底定之日，方行开造，以称朕敬天恤民至意。”⑨

南京御史刘汉建议尊崇儒学，整顿吏治，慎加名号，重农节用。朱由检同意此议。下旨：吏部对现任官员严加清汰，正式编制之外的官员，要严加荐选，宁缺勿滥。文臣不是正卿，武臣不是勋爵，总兵不是实有战功之人，不得妄加保、傅之衔。朱由检在便殿批阅奏章，闻到一股香气，心意扰乱，他很怀疑，出外散步片刻才安定下来。他询问内官此为何香？内官回答说：这是内宫发春之香，两朝都照此点燃。崇祯帝怒斥内官，让他们立即毁掉，不准再燃。同时还长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也。”⑩

崇祯元年（1628）正月，禁止宫中穿文绣华丽衣饰，妇女

不准戴金冠等。这是听了御史梁天奇的谏议后，崇祯帝作出的决定。敕命司礼监典卖魏忠贤田宅。有人请求将魏忠贤宅院加赐功臣。崇祯帝说："俟东西底定，留赐策以待功臣。"①并榜示其宅第为"策勋府"。户部给事中黄承昊上疏说：太祖时，边饷银只有四十九万三千八十八两，神宗时就增到二百八十五万五千九百余两，熹宗时已达三百五十三万七千七百余两。其它京支杂项，万历年间岁收不过三十四万一千六百余两，而近年来竟增到六十八万二千五百余两。今户部开支共五百余万两，而岁入不过三百二十三万两，亏空近二百万两。这样边兵无法不荒疏，而农官也无法不愁怨。请求敕令各边都抚，清查历年增饷用度。至于京支杂项，也要切令各衙门自加严汰。还建议西北边塞，应督责当地官府开垦荒田，以定军饷。

户部给事中韩一良上言：以前皇上召大臣于平台，有"文臣不爱钱"之语，然而今天世上哪一个地方可以不用钱呢？又有哪一个官员不爱钱呢？韩一良认为，当时的官员，县官是行贿的首恶，各部给事是纳贿之魁。而当今说起蠹民之罪，没有一个不归罪于郡守县令的。然而守令的薪俸又多不到位，又怎能养廉呢？他说，自己上任不到两个月就辞退賂金 500 两。他说自己交友很少，还有贿赂者，其余官员贪赃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他建议严惩纳贿贪赃者，首恶重办，使所有官员视钱为污，惧钱如祸，这样文官不爱钱的风气才能树立。崇祯帝认为韩一良的建议很好，特将中外大臣召集于平台，让韩一良宣读他的建议，并予以褒奖，当即提升他做右佥都御史。

崇祯元年（1628）七月，宁远兵变。当时四川、湖广兵驻宁远的人，因为缺饷四个月，哗变。其于 13 营也都响应，变兵将巡抚毕自肃、总兵官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捆绑

于谯楼上。兵备副使郭广刚刚到任，收集了两万金颁发给部众，士兵仍不满足，于是又向商民借了钱共足5万两。士兵怨恨稍平，释放所缚官员。毕自肃引罪自缢。崇祯帝遣袁崇焕前去调解。袁崇焕八月抵山海关，与郭广商议，先诱首恶张正朝、张思顺，让他们先抓15人斩于市。再斩中军谋士吴国琦，杖责参将彭簪古，贬黜都司左良玉等人。然后让张正朝、张思顺为前锋戴罪立功。张世荣、苏涵淳以贪虐而引发兵变，也予以贬斥。只有都司程大乐所辖一个营没有附和哗变，特予以褒奖。于是宁远兵变始靖。十月，锦州又发生兵变，袁崇焕请增军饷。崇祯帝召廷臣议，阁臣求允发增饷。崇祯责成户部尚书毕自严全权办理。礼部尚书周延儒说："关门昔防敌，今且防兵。宁远哗饷之，锦州哗复饷之，各边且效尤。"帝曰："'卿谓何如?'延儒曰：'事迫不得不发，但需求经久之策。'帝颔之，降旨责群臣。居数日，复召问，延儒曰：'饷莫如粟，山海关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帝方疑边将要挟，闻延儒言大悦，由此属意延儒"⑫。崇祯此时暗问周延儒，并听信奸臣之言，对有功边臣，始生狐疑猜度之心，为后来冤杀袁崇焕种下夙因。

崇祯二年（1629）四月，山陕大饥，起义发生，朝臣捐俸助饷。崇祯帝认为诸臣捐俸助饷是兴利除弊，国家受益必多。顺天府尹刘宗周说：陛下励精图治，召廷臣于文华殿，亲理细务，朝令文考，急欲太平盛世速来。然而急功近利，就要见小利而慕近功。他说：朝廷汲汲所求者，边事也。然而"竭天下之力以养饥军，而军愈骄，聚天下之军以冀一战，而战无日，此计之左者矣"⑬。边塞防守，情况复杂，应从长计议，不应急求数年之效，这样必会引发相反效果。他又举例说："今日

所规规于小利者，理财也。民力已竭，司农告匮，而一时所讲求者皆聚敛之术，水旱灾伤，一切不问。有司以掊克为循吏，而抚字之政绝；大吏以催科为殿最，而黜陟之法亡，赤子无宁岁矣。顷者严赃吏之诛，自执政以下坐重典者十余人，可谓得救时之权。然贪风不尽息者，由于道之未尽善，而功利之见不泯也。”⑭崇祯帝不久又复故大学士张居正荫，赐故都督戚继光表忠祠堂。

八月，魏忠贤遗党王永光、高捷、史𡌴，阴谋兴大狱为魏忠贤及逆党报仇。就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⑮定袁崇焕罪名。还牵连到过去首辅钱龙锡，认为杀毛文龙，是钱龙锡首倡。史𡌴说：“袁崇焕离京时，以重金数万贿赂钱龙锡，钱龙锡巧为营干，转祸于毛文龙，置国法于不顾。”崇祯览奏后大怒，敕命刑部官五日内查明此案，案情查明后上报。崇祯帝召诸臣于平台，认为袁崇焕谋叛，当处以极典。群臣认为，斩帅虽钱龙锡开端，但有“处置慎重”等语，本意不在专杀；至于议和之事，首倡于袁崇焕，钱龙锡并未批准。然而军国大计，两臣私下商议就去执行，不上疏请示，造成恶果，罪责难逃。“遂磔崇焕于市，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⑯。刘宗周于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变，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竟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日造蜚语，次第去之。自此小人进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廷日隳，边防日坏，今日之祸，实己巳以来酿成之也。’”⑰可见崇祯自错杀袁崇焕后，对朝廷危害极大，奸臣竟进，朝政日暗，明王朝危亡之势已难挽回。

刑科给事中吴执御说：理财加派不得已而用之，这种事怎

可逾年而不废止？他认为，捐募和搜刮，两者很难取法。崇祯帝则认为，加派是向富人加派，连累不了穷人，捐募是凭人们的正义感，至于搜刮固然会滋养奸邪，但如果得到循吏，依法行事，难道还会给百姓带来不利吗？这时崇祯帝已经露出刚愎自用，不纳嘉言的本性。是年（1631），浙江海盗扰害沿海，湖广民变后树帜与朝廷对抗。宣大兵饷需数十万，责成两广解纳，实际只纳银七千两，远不及酬，崇祯帝责其玩忽职守。山、陕饥民起事，见官兵即散，官兵退则又聚。崇祯帝认为，“寇”也是朝廷子民，可抚就抚。广西靖江王府。因争继位内哄。四川乡绅裹挟御史事发生。云南、贵州亦生民变。朝廷面临多事之秋，吴执御上疏说：现在朝廷每年收入四百万两，今天又加到七百万两，但仍缺额一百六十万两，朝廷仍觉粮饷不裕。吴执御认为，加派则害民，不加派则害兵。过去宁远、锦

越职言事，痛加斥责。这时崇祯帝益加刚愎自用，不纳忠言，再也不像初登极时那样谦恭谨慎了。

崇祯后期，边关战事日紧，山陕农民起义日炽，全国灾荒频仍。在危难之中，崇祯帝还要经常游猎，性格也变得喜怒无常，苛责直言忠鲠之士，亲信重用佞倖之臣。为应付后金进攻，加强蓟辽边防，加派辽饷；为镇压农民起义，加派剿饷；为操练士马，再加派练饷。三饷负担已超过农民年入之半，再加上其它京用杂项催征，百姓苦不堪言。荒年饥岁则人相食。以致朝野臣民均斥崇祯帝为暴主昏君！终于在内外交困之下，陷大明王朝于覆亡之地。

崇祯十五年（1642）十一月，左都御史刘宗周上言六事：一、建道揆，他认为京城是首善之地，先臣冯从吾曾建“首善书院”，请求迅速恢复，以表明朝廷致治之本；二、贞法守，太祖读《老子》，深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之理，立即焚毁锦衣刑具，要求一切诉讼，听法司决断，不必下锦衣，今应恢复此事；三、崇国体，大臣三品以上获罪应该让九卿、科、道会审后，交付刑法部门，依法收系，不可滥系无辜。即使在刑戮之时，也不能忘记礼遇之意；四、清伏奸，凡是朝廷收到匿名文书，请求立即毁掉；五、惩官邪，京城士大夫与地方官员交际愈多，奸巧愈深，要求臣属听到消息后，就马上弹劾告发。再遇中外官勾结之事，皇上要严断；六、饬吏治，他认为当今吏治腐败，如催科火耗、词讼赎锾，已成定例。至于营升谢荐，贿赂之风就更加厉害。请求严惩贪赃枉法，以清吏治。不难看出，刘宗周所言六事，活生生勾勒出崇祯末年明朝官场腐败，弊端丛生、风教败坏的黑暗政治概貌。崇祯帝对这六条建议虽深感痛切，但已无力回天。

崇祯帝统治晚期举措失当之处更多。如不顾天下灾荒频仍，催科捐税，加派三饷日甚一日，把全国人民推入苦难深渊；为加强防边和镇压各地起义，督饬巡抚、总兵奋力剿讨，也不顾条件如何，敌我形势是否许可，凡边将失事败降者，非系即杀，从不与廷臣商讨。因此很多镇将遭敌围袭，只能战死疆场，以报效朝廷，致使名将越来越少。尤甚者，偏信中官，总以中官镇抚、监督各要害，以致边将镇卒难以独立运作，手脚被缚。如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明朝覆亡在即，清兵与李自成起义军都逼近京师，崇祯帝仍“遣内臣高起潜、杜勋等十人监视诸边及近畿要害”⑲。关键时刻京城守备至关重要，崇祯帝竟令“太监王承恩督察城守”⑳。然而太监并不完全忠心于崇祯帝，如李自成兵至宣府时，“太监杜勋降”㉑。当李自成兵临居庸关时，崇祯帝又遣他认为可靠的唐通“偕内臣杜之秩守居庸关”㉒。不料，起义军一到，“唐通、杜之秩降于自成”㉓。李自成入居庸关。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一向宠信的贴身太监王承恩，应在京城守卫战中大显身手。不料，李自成军刚到，未及交手，“京师京营兵溃”㉔。这时，只能把崇祯帝逼上煤山与王承恩同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京城面临危急时，左都御史李邦华、右庶子李明睿“请南迁，及太子抚军江南”㉕，皆不准。当李自成起义军兵临居庸关时，李建泰亦请南迁，崇祯帝却“召廷臣于平台，示建泰疏曰：‘国君死社稷，朕将焉往？’李邦华等复请太子抚军南京，不听”㉖。既无充足准备，又根本不具备必胜条件，不思采取灵活变通之计，死守京城。自己不思转机，又不肯放权于皇太子，那么京城的文武重臣、皇亲国眷就只能随这个糊涂皇帝一起殉葬了。在国家危亡，迫在眉睫之时，崇祯帝的措置之误，更是难以令

人理解！到崇祯帝缢死煤山前，在御书衣襟中还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㉗崇祯帝自信自用如此，至死不觉己非，将一切罪过都推给诸臣，其刚愎自用则可想而知！但，他毕竟不能算是个荒淫暴君。史论说：崇祯帝"端居深念，旰食宵衣，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驯致败亡，几与暴君昏主同失而均贬"㉘，其主要原因是"化导鲜术，贪浊之风成于下，股肱乏材，孤立之形见于上"㉙。倒还颇有些功过分明的两点论味道。比起崇祯帝的怨天尤人来要高明得多。《明史》的评论说："崇祯帝虽每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但十分可惜的是他"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㉚。这样的评论似乎更近乎公允。因此讲述崇祯帝，宜应区别前后两期，前期诛灭权阉，不近声色，不殖货利，宵衣旰食，力精图治，大有中兴气象，因此"天下翕然称是"。但到了后期，刚愎自信，不纳忠言，用匪其人，以至于达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的程度，最后落得个国破身死，求告无门的悲剧下场，也就不足为怪了。

注　释

①②③④⑤《明通鉴》卷八〇熹宗天启七年。

⑥⑦⑧⑨⑩《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⑪《明史》卷三〇八《奸臣传》。

⑫⑬《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⑭《明通鉴》卷八二，庄烈帝崇祯八年。

⑮《明史》卷二六〇《袁崇焕传》。

⑯《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

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㉗㉘《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二《崇祯治乱》。

㉙㉚《明史》卷二四《庄烈帝记》。

晚明民变

明朝后期，在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的同时，社会矛盾也愈发激化，明朝统治更加腐败。

土地兼并在明朝中后期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皇室宗族凭借特权疯狂掠夺土地，以“皇庄”为名的占田不断扩大。万历年间，神宗朱翊钧的皇庄占田竟达214万亩。其子福王朱常洵封藩河南，一次便得赐田200万亩，由于河南土地不足，又“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①。受封湖广的潞王朱翊镠，其庄田亦有400万亩。到明熹宗朱由校时，仅一次赐予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湖广田就多达300万亩，而此时湖广土地已被兼并殆尽，只凑得60万亩，于是熹宗便勒令向各州县百姓分摊租银，谓之“无地之租”。

皇室宗族强夺土地，官僚地主更是巧取豪夺。天启七年（1627），大官僚魏良栋一次便得熹宗赏田40万亩。而大宦官“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②，前后受赐田产竟逾百万亩。加之地方上豪强、庶族地主的抢掠霸占，百姓所有耕地少得可怜。山东地区“民间田土搜刮殆尽”③。四川成都地区州县土

地，“为王府者十之七，军屯十二，民间仅什一而已”④。大量的土地集中在少数权贵、地主手中，而多数农民则因丧失土地而沦为无地可耕，甚至无家可归的流民和饥民，出现了“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⑤的严重社会问题。

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大量破产，亦使朝廷收入急剧减少。然而明朝统治的腐败，尤其是明帝的恣意挥霍，更加剧了朝廷财政的危机。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财政危机，满足统治者穷奢极欲的需要，明朝政府极力将危机转嫁到百姓头上，变本加厉地盘剥和苛征。搜刮民脂民膏，侵占了大量土地的权贵豪强们，凭借手中的权势，或享有免税的特权，或减免赋税，于是出现了“富者种无粮之地，贫弱者输无地之粮”⑥的情景，富户大家产无赋，身无徭，田无粮，屋无税。明初全国有税田850多万顷，到弘治年间仅存420多万顷，减少近一半。嘉靖初年，湖广地区的税田已由220万顷减至23万顷，河南地区的税田也由144万顷减至41万顷，减少额竟占绝大比重。这些流失的税田多为官府侵占，或被地主强夺。

自万历末年起，明廷岁收1461万两，其中入内府供皇帝及宫廷开支的约600万两，余下的才归户部作为朝廷的开支。其时官僚机构庞大，官吏剧增。而东北地区女真族再度兴起，于辽东建立后金政权，举兵反明，造成明朝严重的边患。战争频繁，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为此明朝政权不断增加赋税，于正税之外，又有各种名目的“加派”，其中尤以辽饷、剿饷、练饷这3项加派最为扰民。

自神宗万历四十六年（1618）起，明廷借对后金作战之名，始征“辽饷”，每亩征银3厘5毫，两年后增至9厘。崇祯三年（1630），又于9厘之外再增收3厘。“剿饷”则是专为

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练饷"则是专为训练军队而置。一年辽饷可达900万两，剿饷330万两，练饷730万两，"三饷"之合，每年多达2000万两，超过正税一倍以上。

"三饷"之外，又巧立名目，加征商税、关税、盐税、矿税等，以至于"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⑦，"穷乡僻坞，米盐鸡豕，皆令输税"⑧，一时间，"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⑨。在土地兼并和沉重的赋税压榨下，广大农民处境更加危难，只得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以求得一条生路。自万历初年起，各地相继爆发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尽管这些反抗斗争先后遭受镇压，但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

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澄城县知县张斗耀于青黄不接之际向百姓催逼租税。以白水农民王二为首的数百农民冲入县城，处死张斗耀，开仓济饥，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此举立即得到广大的饥民、逃兵及驿卒的响应。崇祯元年（1628），陕西府谷县民王嘉胤率众起兵，与王二会合，众达五六千人。随后又有安塞高迎祥、宜川王左挂、延川王自用等人闻风而起。崇祯三年（1630），陕西米脂人张献忠亦于十八寨率众起义。米脂人、曾为驿卒的李自成也因裁减驿卒俸禄，而率驿卒起义，投靠王左挂所部。王左挂兵败投敌后，李自成率众转投张孟存的义军，张孟存牺牲后，他领部众冲出明军包围，继续与官军作战。

面对义军声势日益壮大的局面，明廷采取"恩威并济"、"招抚"为主的策略，企图分化瓦解义军。此时各路义军各自为战，也曾一度推举当时声势最强的王嘉胤为首领。王嘉胤遇害后，又推举王自用为首领。但实际上，各路义军仍不相统

摄，力量分散。崇祯四年（1631），各路义军因陕西地区连年饥荒，而转移山西，王自用联合老回回马守应、曹操罗汝才、闯王高迎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等路义军，组成32营，共有20余万众，分3路活动在山西平阳、泽、潞、太原等地。

义军自陕西转战山西，明廷大为震惊。明帝朱由检一改“招抚”为主的策略，转为以“剿灭”为主，以洪承畴为陕西巡抚，总督三边（延绥、甘肃、宁夏）军务，令其组织数十万官军围剿义军。分散作战的义军经过激烈战争，又转战河北。不久王自用阵亡，余部投奔李自成。此时，实力较强的高迎祥再与张献忠、李自成、马守应、罗汝才等首领联合，突破明军包围，南渡黄河。崇祯八年（1635），明廷令洪承畴领兵出陕西，另一位明将朱大典统军出山东，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妄图一举翦除农民义军。在十分危急的形势下，起义军13家72营会于河南荥阳，商讨作战方案。荥阳大会上，作为闯王高迎祥部将的李自成提出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策略，为众将领所采纳，遂分13家72营兵力为东、南、西、北四路，另有一路作为策应，主力突击明军兵力最为薄弱的东路。会后，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领东路军突破官军的包围，由河南转入安徽。仅10余天，即兵至凤阳城下，一举全歼凤阳守军6000余人，留守朱国相兵败自杀。义军在此焚毁朱元璋的祖坟——皇陵，又镇压了百余名抗拒的官吏、诸生及太监。张献忠且于城上竖起“古元真龙皇帝”的大旗。义军于凤阳的举动令崇祯皇帝如丧考妣，痛哭流涕。他一面下诏“罪己”，一面又慌忙调遣兵力，任命湖广巡抚卢象升为总理河北、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五省军务，与洪承畴分兵镇压义军，“承畴剿西北，

象升剿东南”⑩，对义军展开一系列的攻势。

高迎祥于凤阳大捷后，又率兵入河南，继而转入陕西。卢象升紧追不舍，双方大战于朱龙桥，高迎祥部失利，随后又一再受挫，被迫率部向汉中地区突围，高迎祥不幸被俘遇害。其余部在继为闯王的李自成率领下，继续与官军抗争。张献忠则率部南进，攻陷庐州、麻城，使明廷的镇压遭受挫败。

崇祯见此情景，顾不得对付东北地区的满洲反明斗争，将主力从辽东调往义军活动地区。崇祯十年（1637）三月，兵部尚书杨嗣昌上剿灭义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明廷随即增兵12万，增饷28万两，出动十省官军，扬言于3个月内彻底消灭义军，致使义军再度处于危急的形势之中。而此时的各路义军仍分散流动作战，既无根据地又无明确的纲领口号，因而相继失利。十一年十月，李自成于潼关战败，与刘宗敏等18人杀出重围，进入商雒山。张献忠亦于湖北受挫后伪降。其他义军或败或降，起义斗争陷入困境。

崇祯十一年（1638）冬，清军大举入关，以凌厉的攻势横扫山东、河北等地。明廷为抵御清军的进攻，不得不从镇压义军的前线抽调官军，急驰北上抗清。此时适逢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旱灾严重，蝗虫肆虐，饿殍遍野。这一形势对陷入低潮的起义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转机。十二年（1639）五月，张献忠于谷城再起，由湖北转入四川，连克官军，扭转被动的战局。李自成闻讯，立即出商雒山，招集旧部，重振旗鼓，转战于陕南地区。十三年（1640）九月，李自成突破杨嗣昌官军的包围，于冬天进入河南。受大旱之灾的河南形势对义军十分有利，数万饥民争相投奔李自成所部，出身地主的知识分子牛金星、李岩、宋献策等也先后加入义军队伍，义军声势

迅速壮大。

起义军针对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的弊政，鲜明地提出“均田免粮”①的纲领口号，且将缴获官府、地主的财物赈济给饥民。这一举动立刻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和欢迎，“均田免粮”的口号更是深得民心。在此基础上，起义军又制定了“平买平卖”、“公平交易”的政策，得到市民们的普遍欢迎。越来越多的百姓加入义军，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到50万人之多，实力迅速壮大。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明将杨嗣昌率领官军主力入川，追剿张献忠，趁中原地区空虚之际，李自成毅然率军攻入洛阳，处死了广占良田，侵夺民财的福王朱常洵。朱常洵及一批官吏被处决，令洛阳城内外的百姓拍手称快。攻占洛阳后，李自成继续转攻开封府，由于拒守开封的周王朱恭枵有所准备，义军未能攻下，然而在河南全歼了增援的官军。

二月，张献忠也率部复入湖广，一举攻陷襄阳，处死襄阳王朱翊铭。杨嗣昌见非但未能剿灭义军，反而义军连克重镇，处决皇亲贵戚，遂畏罪自杀。崇祯改以陕西总督丁启睿代替杨嗣昌，又令兵部尚书傅宗龙与保定总督杨文岳合兵攻李自成，却遭李自成所部全歼。

张献忠占据襄阳后，骄傲自满，罗汝才等义军将领与之不和，率部北投李自成，于是李自成的势力又得壮大。年底，李自成再度挥师攻开封，但因他于阵前中箭伤眼，被迫放弃攻城。崇祯十五年四月，义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采取围而不打的策略，于开封附近的朱仙镇大败官军援兵主力。在随后与前来镇压的官军交战中，李自成的义军又连连取胜，彻底扭转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年底，李自成挥师南下，进攻湖北重镇襄阳。

在攻占襄阳后，义军连续作战，迅速占据数十个州县，控制了澧州、常德以北，麻城、黄州以西，光化、均州以东的广大地区。而张献忠也率部转战于两湖及四川地区。两支主力义军南北呼应，使明朝的武力镇压政策几近破产，明朝的统治已是摇摇欲坠。

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义军各部推举李自成为盟主，号“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罗汝才为“代天抚民威德大将军”。五月，义军改襄阳为襄京，李自成称为“新顺王”，修宫室，设置文武官吏，建立“大顺”农民政权。同月，张献忠率部在攻占汉阳、武昌后，自称“大西王”，改武昌为天授府，建立政权。之后又经湘赣，进入四川，于十七年十一月称帝，国号“大西”，建元“大顺”，且以成都为西京。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后，九月率军北伐。十月，破潼关，占据西安。十七年正月，定西安为西京，建国号“大顺”，改元“永昌”。以牛金星为丞相，并在西安地区镇压地主豪强，抚慰流亡，募民垦田，流通商贾，铸造“大顺”钱币，制定“五年免征”、“追赃助饷”等政策。二月，李自成亲统大军进击北京，一举攻占太原，发布讨明檄文，历数明朝统治者的罪状，提出“不杀人、不爱财、不奸淫、不掠抢、平买平卖”的纲纪，再次重申“贵贱均田”⑫的政策，受到农民普遍的支持和拥护。

之后，李自成、刘宗敏等将领率大顺军主力经忻州、代州、大同、宣化，走居庸关，向北京进发。另分一路由左营制将军刘芳亮率领，东渡黄河，经河南、河北，北进北京。面对大顺军的迅猛攻势，崇祯皇帝慌忙下诏“罪己”，既而又向“大顺”政权提出“割地求和”⑬的请求。遭到断然拒绝。

三月十七日，大顺军包围北京城，城外官军三大营不战而降。十八日，攻破北京城。崇祯帝企图外逃，但已为时太晚。他急召文武百官，却无一人应召入宫，绝望之中，崇祯帝登煤山（今北京景山公园内）自尽。至此，明朝统治寿终正寝。

注　释

①吴传业《绥寇纪略》卷八。

②《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③《明世宗实录》卷一三〇。

④《明神宗实录》卷四二一。

⑤顾炎武《日知录》卷一〇。

⑥《皇明经世文献》卷三五九。

⑦郑廉《豫变纪略》卷一。

⑧《明史·食货志》。

⑨《明史·王宗沐传》附《王世昌传》。

⑩《明大司马卢公奏议》卷三《辞总理五省军务疏》。

⑪查继佐《罪惟录·李自成传》卷三一。

⑫《明季北略》卷二〇。

⑬赵士锦《甲申纪事》。

附录：明朝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68 年	元至正二十八年 明洪武元年	正月，朱元璋即帝位，建立明朝，年号洪武，是为明太祖，以应天为南京。汤和平福建、广东。四月，徐达克汴梁，八月，克大都。元顺帝出奔上都，元亡。
1369 年	洪武二年	平陕西、山西等地。定封建诸王之制。
1370 年	洪武三年	定科举法。命徐达、李文忠等分道北征。大封功臣。
1371 年	洪武四年	明朝出军四川，明升降，夏亡。元平章刘益以辽东降。
1372 年	洪武五年	命徐达带兵出雁门关，趋和林，北征蒙古。
1373 年	洪武六年	颁布《大明律》。
1376 年	洪武九年	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颁布《建言格式》。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377年	洪武十年	因吐蕃梗阻乌斯藏贡道，派将攻吐蕃，大破之。置通政使司。
1379年	洪武十二年	颁行《案牍减繁式》，命各衙门切实奉行。
1380年	洪武十三年	左丞相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同党受诛者甚众。废中书省，罢设丞相，提高六部官秩，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大赦天下。
1381年	洪武十四年	征云南，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兵败自杀。造黄册，编里甲，查田亩。
1382年	洪武十五年	平定云南。置殿阁大学士。设锦衣卫，掌侍卫、缉捕，专司诏狱。马皇后病逝。
1384年	洪武十七年	禁宦官预外事，并禁诸司与内官监文移往来。
1385年	洪武十八年	"郭桓案"发，事连各省官吏数万人，多为冤枉。颁《大诰于天下》。
1387年	洪武二十年	命冯胜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征元太尉纳哈出。纳哈出降，辽东平。命国子监生分行州县，查粮定区，编鱼鳞图册。
1390年	洪武二十三年	韩国公李善长以助胡惟庸谋逆罪被诛，同案牵连死者甚多。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
1392年	洪武二十五年	皇太子朱标死，立皇长孙朱允炆为皇太孙。
1393年	洪武二十六年	凉国公蓝玉被诛，同案受诛的功臣宿将及其他人达一万五千人。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395年	洪武二十八年	颁《皇明祖训条章》。汤和卒。
1398年	洪武三十一年	朱元璋病亡，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是为惠帝。开始削藩，周王朱橚被废为庶人，徙云南。
1399年	建文元年	废齐、代、岷三王，湘王自焚。燕王朱棣举兵反抗朝廷，"靖难之役"开始。耿炳文为征虏大将军，率兵伐燕，败绩；代之以李景隆，再败。
1400年	建文二年	都督盛庸、山东参政铁铉败燕兵于济南。罗贯中卒。
1401年	建文三年	燕兵与朝廷军大战于河北、山东等地，互有胜负。
1402年	建文四年	燕王率兵直趋南京。六月，南京破，建文帝不知所终。朱棣即位，是为成祖。杀齐泰、黄子澄、方孝孺及其他不附者甚众。大封靖难功臣。
1403年	永乐元年	复周、齐、代、岷旧封，继又开始削诸王护卫。明朝遣行人邢枢往谕奴儿干，海西、建州、野人等女真三部首长及部众归附。
1405年	永乐三年	六月，郑和率舟师首次出使西洋诸国，至永乐五年九月还。
1406年	永乐四年	讨安南。始议营建北京。
1407年	永乐五年	安南平，置交阯布政司。《永乐大典》修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408 年	永乐六年	九月，郑和第二次出使西洋，至永乐九年六月还。
1409 年	永乐七年	鞑靼可汗本雅失里杀明使郭骥，丘福率明军征讨，败于胪朐河。明朝派内官亦失哈到黑龙江出海口建奴儿干都司。
1410 年	永乐八年	明成祖率师首征漠北，于斡难河大败本雅失里。
1411 年	永乐九年	倭寇掠浙江盘石卫。因倭寇屡扰沿海，遣官告谕日本剿捕。
1412 年	永乐十年	郑和第三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三年七月还朝。
1413 年	永乐十一年	开设贵州布政司，改土归流。明宦官亦失哈第三次到奴儿干及库页岛巡视，并于这年秋建永宁寺。
1414 年	永乐十二年	明成祖第二次征漠北，在忽兰忽失温大败瓦剌马哈木。
1416 年	永乐十四年	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命郑和等偕往，此系郑和第四次出使西洋，至永乐十七年七月还朝。
1417 年	永乐十五年	四月，颁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于两京六部、国子监及府州县学。
1420 年	永乐十八年	唐赛儿起义于山东益都，为明军所镇压。始设东厂。
1421 年	永乐十九年	定北京为首都，改南京为陪都。郑和第五次出使西洋，至明年八月还。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422年	永乐二十年	明成祖第三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
1423年	永乐二十一年	明成祖第四次出征漠北，讨阿鲁台。
1424年	永乐二十二年	郑和第六次出使西洋，同年还。明成祖第五次出征漠北，归途中病死于榆木川。皇太子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
1425年	洪熙元年	仁宗卒，太子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始设巡抚。
1426年	宣德元年	明宗室汉王朱高煦反，宣宗亲征，朱高煦降。
1427年	宣德二年	罢交阯布政司。
1428年	宣德三年	宣宗巡边，击兀良哈部于宽河。
1430年	宣德五年	诏命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郑和于宣德六年正月在太仓刘家港天妃宫立《通番事迹碑》，十一月至福建长乐，于南山寺立《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明年始扬帆出海，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
1432年	宣德七年	亦失哈率官军第十次到奴儿干巡视，于第二年重修永宁寺。
1435年	宣德十年	正月，宣宗卒，太子朱祁镇继位，是为英宗。九月，王振入掌司礼监。王振招权纳贿，为明代宦官乱政之始。
1441年	正统六年	以兵部尚书王骥总督军务，宦官曹吉祥监军，发兵击麓川思任发。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442年	正统七年	太皇太后张氏卒，王振专权更甚。广西大藤峡地区瑶、壮族人民起义。
1447年	正统十二年	叶宗留于福建政和领导矿工起义。
1448年	正统十三年	邓茂七在福建沙县领导农民起义，称“铲平王”。尤溪炉主蒋福成响应邓茂七的起义，发动起义，与茂七军会合。明朝遣将镇压叶、邓起义军。叶宗留中流矢牺牲，余部由叶希八领导，继续斗争。
1449年	正统十四年	二月，邓茂七率众攻延平，中伏，茂七中流矢牺牲，侄邓伯孙率余部继续斗争至三月被俘牺牲，福建义军失败。五月，叶希八等受朝廷招安。湖广、贵州苗民起义。七月，也先率瓦剌兵扰大同，王振挟英宗亲征。八月，英宗还至土木堡被瓦剌所俘。郕王朱祁钰监国，九月即帝位，是为景帝。十月，也先率兵围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领导军民抗击瓦剌，保住北京城。
1450年	景泰元年	瓦剌数扰边镇，被明军击败。英宗回北京，幽居南宫。
1452年	景泰三年	废英宗长子、皇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景帝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始于京师立团营，以于谦总其事。
1453年	景泰四年	皇太子朱见济卒。瓦剌也先自立为可汗。
1454年	景泰五年	发生立太子之议，请复朱见深为太子的官员被下狱。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457年	景泰八年 天顺元年	石亨、徐有贞为首发动夺门之变，英宗复辟。景帝被废为郕王，死于西宫。于谦被害，其他被杀害、贬谪的所谓于谦同党甚多。
1461年	天顺五年	太监曹吉祥及其嗣子曹钦谋反，被镇压。
1462年	天顺六年	蒙古毛里孩等入据河套。
1464年	天顺八年	正月，英宗卒，太子朱见深即位，是为宪宗。始置皇庄。
1465年	成化元年	荆襄流民起义爆发。大藤峡瑶民起义被残酷镇压，改大藤峡为断藤峡。命将率兵镇压荆襄流民。
1466年	成化二年	荆襄流民领袖刘通、石龙先后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1470年	成化六年	李原领导荆襄流民再度起义，称为太平王。
1471年	成化七年	项忠残酷镇压荆襄流民，起义失败。
1473年	成化九年	明军在河套取胜，鞑靼渡河北去。
1476年	成化十二年	流民复屯聚荆襄山区，明政府设置郧阳府。，抚治荆襄流民。
1477年	成化十三年	置西厂，以太监汪直提督之。
1482年	成化十八年	罢西厂。
1487年	成化二十三年	宪宗卒，皇太子朱祐樘继位，是为孝宗。
1495年	弘治八年	蒙古复拥众入据河套。
1505年	弘治十八年	孝宗卒，皇太子朱厚照继位，是为武宗。
1506年	正德元年	太监刘瑾入掌司礼监，专权乱政。复置西厂。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508年	正德三年	立内行厂，刘瑾亲自掌领，其残暴更甚于东西二厂。
1509年	正德四年	两广、江西、湖广、陕西、四川等地爆发农民起义。
1510年	正德五年	明宗室安化王朱寘鐇反，被执至北京，叛乱平定。刘瑾被诛。西厂、内行厂同罢。
1511年	正德六年	朱寘鐇伏诛。杨虎、刘六、刘七领导河北农民起义。义军攻打畿南州县，京师曾因之戒严。十一月，杨虎战死。
1512年	正德七年	闰五月，刘六战死于湖广。七月，刘七牺牲于狼山，起义失败。
1514年	正德九年	葡萄牙商船首次到达中国，不得登陆，脱售商品而归。
1516年	正德十一年	葡萄牙驻满剌加总督遣使来华，此为官方之首次接触。
1517年	正德十二年	武宗以巡边为名，出游至宣府、大同，亲督军击蒙古小王子。王守仁提督南赣、汀、漳军务，镇压赣南农民起义。
1518年	正德十三年	武宗复出游至宣府、大同、榆林、太原等地。葡萄牙以国王名义遣使来华，要求通商，并进京见明朝皇帝。九月，葡舰队侵占我屯门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519 年	正德十四年	朝臣因谏阻武宗南巡被廷杖者 146 人，杖死者 11 人。明宗室宁王朱宸濠反，武宗借口讨宸濠，南游至扬州、南京。副都御史王守仁擒朱宸濠，叛乱平。
1521 年	正德十六年	武宗卒，无嗣，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帝位，是为世宗。武宗佞臣江彬、钱宁伏诛。“大礼议”之争开始。
1522 年	嘉靖元年	明军将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屯门岛。
1523 年	嘉靖二年	“争贡之役”发生。画家唐寅卒。
1524 年	嘉靖三年	因“大礼仪”之争，廷杖大臣 134 人，死者 16 人。大同五堡兵变，杀巡抚、参将。
1527 年	嘉靖六年	南京兵部尚书王守仁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镇压田州少数民族起义。兴“李福达之狱”，牵连四十几人，死者十余人，其余削籍、戍边。
1533 年	嘉靖十二年	大同戍卒叛，杀总兵李瑾。
1535 年	嘉靖十四年	葡萄牙商人买通明朝指挥黄庆，将原设在广州、后移至电白的通商市场移到壕镜（澳门），这是阴谋占据澳门的开始。
1542 年	嘉靖二十一年	鞑靼可汗俺答犯朔州、太原。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
1543 年	嘉靖二十二年	俺答屡入塞侵扰。
1546 年	嘉靖二十五年	俺答自河套进犯延安、庆阳等地，杀掠甚众。首辅夏言、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547年	嘉靖二十六年	曾铣率兵出塞击鞑靼，获胜。
1548年	嘉请二十七年	严嵩攻讦夏言、曾铣轻开边衅，误国家大计。夏言、曾铣被杀害。严嵩夺得首辅地位。
1550年	嘉靖二十九年	俺答大举入寇，围攻北京。北京戒严，召各镇勤王。俺答掳掠人畜金帛，满载而去，是为“庚戌之变”。兵部尚书丁汝夔被诛。
1552年	嘉靖三十一年	倭寇大举骚扰浙江，命山东巡抚都御史王忬巡视浙江，备倭。
1553年	嘉靖三十二年	俺答入寇。王直勾倭掠江浙。
1554年	嘉靖三十三年	倭寇骚扰江、浙等地，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军务讨倭。
1555年	嘉靖三十四年	张经、俞大猷大败倭寇于浙江王江泾。张经因严嵩党羽赵文华陷害，被逮下狱，遇害。
1556年	嘉靖三十五年	胡宗宪破倭于乍浦，擒杀徐海。
1557年	嘉靖三十六年	葡萄牙殖民者私自扩大在澳门的居住地，筑炮台，建城垣，设官管理。明朝仅向其收取租金。
1559年	嘉靖三十八年	倭寇犯通州、福州、淮安等地。清太祖努尔哈赤生。
1561年	嘉靖四十年	戚继光大破倭寇于台州。
1562年	嘉靖四十一年	浙东倭患平息。倭寇大举侵扰福建，戚继光入闽抗倭。严嵩败，子严世蕃谪戍。重录《永乐大典》。
1563年	嘉靖四十二年	俞大猷、戚继光大败倭寇于福建。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564 年	嘉靖四十三年	戚继光破倭于仙游，福建倭患平息。倭犯广东。
1565 年	嘉靖四十四年	戚继光、俞大猷合歼广东残倭，沿海倭乱基本平定。严世蕃伏诛。
1566 年	嘉靖四十五年	世宗卒，子裕王朱载垕继位，是为穆宗。海瑞上《治安疏》。
1567 年	隆庆元年	张居正入阁预机务。俺答犯大同，掠交城、文水。鞑靼土蛮部犯蓟镇，掠昌黎、卢龙、滦河，京师戒严。调谭纶、戚继光北上防边。
1570 年	隆庆四年	俺答孙把汉那吉降明。俺答遣使请封贡。
1571 年	隆庆五年	明朝封俺答为顺义王，开设贡市，北面及西北边境暂宁。
1572 年	隆庆六年	穆宗卒，皇太子朱翊钧继位，是为神宗。高拱罢，张居正晋升为内阁首辅。
1575 年	万历三年	黄河决高邮、砀山。西班牙殖民者自马尼拉来中国，袭用吕宋名号与中国通商。
1576 年	万历四年	黄河决崔镇。
1577 年	万历五年	张居正丁父忧，“夺情”留位，朝臣有纠劾者多被杖责、谪戍。
1578 年	万历六年	张居正起用潘季训治河。丈量天下田亩，限三载竣事。李时珍《本草纲目》修成。
1580 年	万历八年	黄、淮二河治理工程完成。耶苏会士、意大利人罗明坚到扬州。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581年	万历九年	裁各省冗官，核徭赋，汰诸司冒滥冗费。通令全国行“一条鞭法”。
1582年	万历十年	张居正卒。耶苏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中国。吴承恩卒。
1583年	万历十一年	追夺张居正官阶。凡张居正所举用的官员，斥削殆尽。努尔哈赤以父祖仇起兵攻尼堪外兰。明使努尔哈赤袭都指挥使。
1584年	万历十二年	籍没张居正家，榜其罪于天下，家属戍边。
1585年	万历十三年	四川建武所兵变。海瑞复官。
1588年	万历十六年	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
1589年	万历十七年	刘汝国在太湖等地起义，遭镇压，失败。自这年始，神宗不上朝。明朝晋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
1590年	万历十八年	群臣请立太子，“争国本”事起。
1592年	万历二十年	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反，讨平之。倭寇犯朝鲜，兵部右侍郎宋应昌经略备倭军务，李如松为总兵官，率兵援朝鲜。
1593年	万历二十一年	李如松战倭于朝鲜平壤，克之；进攻王京，败于碧蹄馆。倭弃王京遁。召宋应昌、李如松还。努尔哈赤击败叶赫等九部联军。李时珍卒。
1594年	万历二十二年	山东、河南、徐、淮等地遭灾，人民纷纷起义。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595 年	万历二十三年	明朝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明遣使往日本，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
1596 年	万历二十四年	遣宦官分赴各地开矿、榷税。平秀吉不受封，复侵朝鲜。
1597 年	万历二十五年	任麻贵为总兵、杨镐为经略、邢玠为总督，援朝抗倭。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杨应龙反，掠合江、綦江。
1598 年	万历二十六年	援朝诸将败倭，朝鲜平。
1599 年	万历二十七年	临清民变，焚税使马堂官署，杀其参随三十四人。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使陈奉。杨应龙陷綦江。
1600 年	万历二十八年	李化龙率师讨杨应龙。杨应龙自缢死，播州平。两畿各省灾伤、饥荒，人民起义。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至京献方物。
1601 年	万历二十九年	武昌民变，杀税监陈奉之参随多人，焚巡抚公署。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之参随数人。立朱常洛为太子。
1602 年	万历三十年	腾越民变，杀税监委官。思想家李贽自刎。
1603 年	万历三十一年	努尔哈赤统领部下自呼兰哈达移居赫图阿拉。
1605 年	万历三十三年	诏罢天下开矿，以税务归有司。
1606 年	万历三十四年	云南人民杀税监杨荣。
1610 年	万历三十八年	西方历法始入中国。《金瓶梅》问世。
1615 年	万历四十三年	“梃击案”发生。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616年	万历四十四年	努尔哈赤即汗位于赫图阿拉，建元天命，国号“大金”。戏曲家汤显祖卒。
1618年	万历四十六年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攻占抚顺、清河堡。明任杨镐为辽东经略。加派“辽饷”。
1619年	万历四十七年	发生萨尔浒战役，杜松、刘綎战死，明军大败。后金兵克太原，马林败没。熊廷弼经略辽东，杨镐下狱。再加天下田赋。
1620年	万历四十八年 泰昌元年	复加天下田赋。明神宗卒，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光宗。光宗即位二十九天而卒，“红丸案”起。皇长子朱由校继位，是为熹宗。“移宫案”起。封熹宗奶妈客氏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入司礼监为秉笔太监，客魏之祸自此始。罢熊廷弼，以袁应泰代之。
1621年	天启元年	后金兵克沈阳、辽阳，经略袁应泰死之。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为广宁巡抚。永宁宣抚使奢崇明反，据重庆，围成都，派将讨之。
1622年	天启二年	后金兵克西平堡、广宁。熊廷弼、王化贞被逮下狱。大学士孙承宗经略蓟辽，命袁崇焕筑宁远城。贵州水西土同知安邦彦反，陷毕节、安顺等城，围贵阳。山东白莲教徒徐鸿儒起义，失败。
1623年	天启三年	荷兰侵略者占据澎湖。奢崇明败走龙场，与安邦彦合。魏忠贤总督东厂。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624 年	天启四年	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南北诸臣劾魏忠贤者相继。杨涟、左光斗等被罢官。荷兰殖民者侵占台湾的南部。
1625 年	天启五年	后金兵克旅顺。阉党逮杨涟等“前六君子”下狱，皆死于狱中。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榜东林党人姓名，颁示天下。熊廷弼被诛。后金迁都沈阳，是为盛京。
1626 年	天启六年	袁崇焕败努尔哈赤于宁远，努尔哈赤受重伤，半年后病亡，子皇太极继位，是为清太宗，以明年为天聪元年。阉党逮周起元等“后七君子”，皆遭害死。修《三朝要典》各地建魏阉生祠。陕西农民起义爆发。苏州民变。西班牙殖民者侵占台湾基隆。
1627 年	天启七年	陕西澄城农民起义，杀知县张斗耀。后金兵围锦州，攻宁远，袁崇焕大败之。熹宗卒，其弟信王朱由检嗣位，是为思宗。谪魏忠贤于凤阳，魏阉自缢死。
1628 年	崇祯元年	毁《三朝要典》，诛许显纯。郑芝龙受抚。陕西饥民苦于加派，纷纷反抗，高迎祥、王嘉胤率众起义。
1629 年	崇祯二年	定逆案。斩奢崇明、安邦彦、水西叛乱平。后金兵入塞，围攻北京，皇太极使反间计，思宗逮袁崇焕下狱。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630 年	崇祯三年	东调勤王兵之延绥、甘肃兵士哗变。李自成投奔起义军。后金兵大掠畿辅后东归。张献忠于米脂县起义。加田赋充饷。袁崇焕被明政府杀害。
1631 年	崇祯四年	起义军领袖王嘉胤牺牲。后金兵围大凌河城。孔有德反，连陷陵县、临邑等城。
1632 年	崇祯五年	孔有德陷登州、黄县。陕西义军入山西，连陷大宁、泽州、寿阳。
1633 年	崇祯六年	命曹文诏、左良玉在山西、河南镇压义军。孔有德及耿仲明航海降于后金。后金兵克旅顺。义军渡河，陷渑池、伊阳、卢氏，逼湖广。科学家徐光启卒。
1634 年	崇祯七年	尚可喜降后金。设河南、山、陕、川、湖广五省总督负责镇压义军。义军在湖广、四川一带转战。高迎祥、李自成误入兴安县车箱峡，以伪降计脱险。后金兵进犯宣府等地。
1635 年	崇祯八年	起义军大会荥阳。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率义军克凤阳。
1636 年	崇祯九年	高迎祥被擒，牺牲。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大清，改元崇德。清兵入塞，连下近畿州县。清帝亲攻朝鲜。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637年	崇祯十年	杨嗣昌建"四正六隅"之策围攻农民军。张献忠、罗汝才自襄阳攻安庆。李自成入四川，连陷州县，逼成都。加派"剿饷"。宋应星《天工开物》刊行。清封朝鲜。
1638年	崇祯十一年	张献忠伪降于谷城。李自成在潼关南原中伏，大败。清兵入塞。明督师卢象升战死巨鹿，北京戒严。
1639年	崇祯十二年	清兵克济南，俘德王，凡深入二千里，下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三月，清兵出青山口，北归。五月，张献忠再起于谷城，败左良玉于罗猴山。杨嗣昌出任督师。加派"练饷"。
1640年	崇祯十三年	张献忠迁回四川。李自成入河南，饥民群起响应。清命亲王大臣带兵更番出抚明松、杏、宁、锦间。
1641年	崇祯十四年	李自成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两次攻打开封。张献忠入湖广，克襄阳，杀襄王。杨嗣昌自杀。清兵攻锦州，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师救援，败于松山。荷兰、西班牙两国殖民主义者为争夺对台湾的统治权发生战争。地理学家徐霞客卒。
1642年	崇祯十五年	清兵克松山，洪承畴投降。祖大寿献锦州城降清。清兵入蓟州，连下畿南、山东八十余州县。李自成三打开封，克襄阳。西班牙战败，荷兰侵占整个台湾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纪　　事
1643年	崇祯十六年	清兵北归。皇太极病亡，子福临继位，是为清世祖，以明年为顺治元年。张献忠转战湖广、江西，克武昌、长沙、抚州等城。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建百官，继而破潼关，入陕西，克西安。
1644年	崇祯十七年 清顺治元年	李自成克北京，明思宗自缢死，明亡。吴三桂降清，献山海关。李自成受吴三桂与清兵夹击，败于山海关。清摄政王多尔衮统兵入关。李自成退出北京，回师陕西。清兵进北京。福王朱由崧即位于南京，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张献忠入四川，克成都，建大西政权。

后　　　记

本卷的明史部分，除主要编写者外，北京师大古籍研究所的朱瑞平、李仲祥、樊善国同志也参加撰写了部分篇目。

清（前期）

努尔哈赤起兵

明万历初年（十六世纪末），清帝国的奠基人努尔哈赤崛起于苏子河流域（今辽宁省新宾县），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是时，女真各部群雄并立，各据一方，除建州、海西（亦称扈伦）外，尚有长白山、东海等部。各部之内，亦“各自雄长，不相归一”①，“皆称王争长，互相残杀，甚至骨肉相残”②。努尔哈赤所在的建州左卫即建州之一支。

复仇之役。

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在承袭建州左卫指挥使后，即以复仇为名，起兵讨伐居住在图伦城的建州苏克素护赫部首领尼堪外兰。不久前，尼堪外兰协助明军攻打建州右卫首领阿台。阿台之妻系努尔哈赤姑母，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去阿台所居城堡，拟将阿台之妻接回，未及出城，城堡陷落，觉昌安、塔克世均被明军杀害。

努尔哈赤拟讨伐尼堪外兰，为祖、父报仇，萨尔浒首领诺米讷欲出兵相助。努尔哈赤族人龙教等不愿同得到明军支持的尼堪外兰开战，力劝诺米讷放弃出兵之念，诺米讷遂食言背

约。努尔哈赤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向图伦城发起攻击，尼堪外兰不支，弃城而逃。努尔哈赤尾随其后追至甲班（亦称嘉班，今抚顺以东二十里处），尼堪外兰遂逃至鄂勒浑（甲班以东六十里处），筑城居之。

努尔哈赤愤“诺米讷背约，且泄师期”，致使“兵出无功”，遂“杀诺米讷及其弟奈喀达”③，取萨尔浒城。

万历十四年（1586），努尔哈赤在相继攻克栋鄂、浑河、哲陈等部后，再次讨伐尼堪外兰，向鄂勒浑发起进攻。时值尼堪外兰外出，鄂勒浑城群龙无首，城池旋即陷落。尼堪外兰得知鄂勒浑陷落后，仓皇逃往明界。努尔哈赤穷追不舍，派人同明边吏交涉，明方虽拒绝交出尼堪外兰，但却同意由努尔哈赤派人杀死尼堪外兰。

一统建州。

是时，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护赫部（今辽宁省苏子河流域）、浑河部（今辽宁省浑河以北）、完颜部（今吉林省通化以南）、栋鄂部（今辽宁省桓仁县）、哲陈部（今辽宁省浑河一带）等部。

万历十二年（1584）一月，努尔哈赤兵伐浑河部兆嘉城。兆嘉城主理岱曾派人行刺努尔哈赤不果，这一未遂事件即成为向兆嘉开战的导火线。时值大雪封山，山势陡峭，寸步难行，努尔哈赤令将士凿山为磴，飞越雪山，直抵兆嘉城下，一鼓作气攻克兆嘉城，生擒理岱。

该年九月，努尔哈赤乘栋鄂部内乱，攻其翁鄂洛城。双方展开激战，努尔哈赤两次被敌箭射中，箭头带钩，拔箭时“血肉迸落”④，以至昏迷，遂退兵。伤愈后，努尔哈赤即再次兵临翁鄂洛城，遂攻陷其城，并生擒曾射中努尔哈赤的鄂尔果

尼、罗科两名射手，努尔哈赤赏识彼等射技，授牛录额真职⑤。

万历十三年（1585）二月，努尔哈赤兵伐界藩寨，因寨内有备，不克。回师途中遭到栋嘉、巴尔达、界藩等寨四百余兵的袭击，努尔哈赤时带甲士二十五人、步卒五十，迭经苦战，人困马乏，不得脱。遂令将士下马步行，饮以盐水，饲以炒面，稍事休息后且战且退，终得全军而还。

慑于军威，苏完部的索尔果、雅尔古寨的扈拉瑚、栋鄂部的何和里纷纷携众来归，迨至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相继攻克哲陈部、完颜部城堡，生擒其首领，建州女真终得统一。

吞并海西。

海西女真分为四部：叶赫（今吉林省四平一带）、乌拉（今吉林省伊通县）、辉发（今吉林省桦甸县）、哈达（今辽宁省清河流域）。

建州女真的统一，引起海西四部的不安，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叶赫部首领纳林布禄联络哈达、乌拉、辉发以及长白山二部朱舍里（今吉林省临江县以北）、讷殷（今吉林省扶松县东南）、蒙古部落的科尔沁、锡伯、瓜尔佳组成三万之众的九部联军，兵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起进攻。

努尔哈赤督兵抢占地势险要的古勒山扎营，“诱彼来战”⑥，接战之后集中兵力攻击叶赫、乌拉一路，阵斩叶赫部首领布斋（纳林布禄堂弟），生擒乌拉首领满泰之弟布占泰。联军“并皆丧胆，各不顾其兵，四散而走”⑦。是役阵斩联军四千、获马匹三千、铠甲一千。

在击败九部联军后，努尔哈赤挥军北上，先后摧毁朱舍

里、讷殷二部。翌年科尔沁部及海西四部相继向努尔哈赤乞盟，“对上之天父宰杀白马，对下之地母宰杀乌牛，备置一碗烧酒、一碗肉、一碗土、一碗血、一碗骨头，对天地盟誓”⑧。

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灭哈达。自万历十年（1582），哈达部万汗（亦称王台）死后，该部屡遭叶赫侵掠。万历二十七年哈达再次受到叶赫攻击，该部首领孟格布禄向努尔哈赤求救，且遣三子入质，乞发兵。努尔哈赤遣费英东、噶盖率兵六千进驻哈达，叶赫首领复致函孟格布禄劝其不要引狼入室，以贻后患，为今之计莫如执费英东、噶盖以赎回质子。孟格布禄被其所惑，犹豫不决。努尔哈赤得悉哈达首领颇有反悔之意，即率兵突袭哈达，擒孟格布禄，哈达遂亡。

万历三十五年（1607），努尔哈赤灭辉发。辉发地处叶赫与建州两强之间，屡受左右两邻侵扰。辉发首领拜音达里不堪叶赫部诱其部民，遂以大臣之子为质，乞援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遂发兵千余驻兵辉发。叶赫首领纳林布禄以归还逃民为诱饵，拜音达里又以己子入质叶赫，且向努尔哈赤索回为质的大臣之子。然而叶赫并未履约归还辉发部民，拜音达里复与努尔哈赤修好，乞赐一女缔结婚姻，努尔哈赤许婚。凭藉与建州结盟，拜音达里索回入叶赫为质之子，筑城三层以自固，且毁婚建州。努尔哈赤以拜音达里背约，于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发兵讨之，诛拜音达里及其子嗣。

万历四十一年（1613），努尔哈赤灭乌拉。万历二十四年（1596）乌拉首领满泰及其子在属地淫村妇被杀，努尔哈赤遂派人护送被俘的布占泰回乌拉即位。万历三十五年（1607）因瓦尔喀部斐优城的归属问题，布占泰与努尔哈赤交恶，发兵万

人截击努尔哈赤派往斐优的军队千余人。该战，斩乌拉“主将博克多贝勒⑨父子及其弟胡里布贝勒三人，斩人三千，获马五十匹、甲三千副”⑩。翌年努尔哈赤发兵五千，“前往围攻乌拉宜罕山城，克之，斩千人，获甲三百副”⑪。

布占泰迭经重创，复向努尔哈赤乞盟，娶努尔哈赤之女为妻（在此之前已娶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赤之长女、次女为妻）。万历四十年（1612），布占泰侵伐已归属努尔哈赤的呼尔哈部。布占泰遣使叶赫，欲聘该部贝勒布斋之女为妻（此女已许努尔哈赤次子代善），并以己子及大臣之子十七人送叶赫为质，又用鸣镝射所娶努尔哈赤之女。该年九月，努尔哈赤统兵三万往征乌拉，“距乌拉大城西门二里外安营”，“略乌拉河北岸六城”，“尽焚其庐舍”⑫，“尽毁其在外之糗粮”⑬。翌年正月，努尔哈赤统兵三万再征乌拉，相继攻克孙扎塔、鄂谟。布占泰统兵三万，越富勒哈城前来迎战，“两军互射之箭，犹如风卷天雪”⑭。努尔哈赤“恐其残兵得隙入城，先遣精兵入城据门”，袭取布占泰所居大城。“是役，破敌三万，阵杀万人，获甲七千副”⑮，布占泰率残卒数十逃奔叶赫，乌拉遂亡。

至万历四十一年，海西四部仅存叶赫。该年九月努尔哈赤发兵四万，讨伐拒不交出布占泰的叶赫，“是役共取璋城、吉当阿城、乌苏城、雅哈城、赫尔苏城、喀布齐赖城、俄尔古岱城等大小寨十九处。尽焚其城寨、房舍、粮储，收降众编为三百户，携之而还”⑯。叶赫遣使于明告急，明遣边军千余助叶赫守东、西二城。

起兵反明。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发兵十万征明，临行以“七大恨”告天：

"我父、祖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明于边外。无故起衅，杀我父、祖，此其一也；"

"虽杀我父、祖，我仍欲修好，"然明军"出边驻戍，援助叶赫，其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边境，侵扰劫掳，""我遵前盟，杀其越界之人，""责我擅杀，执我前往广宁叩谒之刚古里、方吉纳，并缚以铁索，""其恨三也；"⑰

"援助叶赫，将我已聘之女，转嫁蒙古，其恨四也；"

"不准数世驻守帝边之柴河、法纳哈、三岔三处诸申⑱收获耕种之粮谷，""其恨五也；"

"以种种恶语辱我，其恨六也；"

偏袒哈达、叶赫，"倒置是非，""其恨七也。明欺我太甚，实不堪忍，因此七大恨之故，而兴师征伐。"⑲

四月十五日清晨，努尔哈赤兵临抚顺，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开城迎降，抚顺、东州、玛哈丹及其周围台堡五百余皆下，掠"人畜三十万，编千户"⑳。四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凯旋，在回师途中又击败截击的明军，"阵斩广宁总兵官张承荫、辽东副将颇廷相并海州参将及游击五名，并千总、把总等官五十余人。追杀明军万人四十里，仅三百人得脱。得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㉑；复攻陷抚安、花豹、三岔等十一个城堡。

萨尔浒之战。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明廷派兵部侍郎杨镐统兵十余万（其中有叶赫军一万五千，朝鲜军一万）征努尔哈赤。

杨镐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兵分四路，向努尔哈赤的统治中心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推进。努尔哈赤则以"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㉒的策略，最先迎战提前两天抵达萨尔浒

的杜松㉓一路。杜松留两万军驻守萨尔浒，自带兵一万攻界藩。努尔哈赤派兵一万五千守界藩，率兵四万五千攻萨尔浒。三月初二凌晨，天气阴霾，咫尺不辨，努尔哈赤向占领萨尔浒仅一天的明军发起攻击，明守军不支，弃城而逃，在得力阿哈（萨尔浒西南）全部被歼。努尔哈赤随即挥军赴界藩，与界藩守军夹击杜松。陷入重围的杜松全军覆没，明军"死者漫山遍野，血流成渠，军器与尸冲于浑河者，如解冰旋转而下"㉔。杜松亦殁于阵。

歼灭杜松部后，努尔哈赤率军北上百余里，在三月初三抵达尚间崖（抚顺以东约五十里），大败马林㉕所部明军；旋即急行一百五十里连夜赶回赫图阿拉，于三月初四击败刘綎㉖一路明军。杨镐得悉三路明军相继惨败，急令李如柏㉗一路撤军。

灭叶赫。

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相继攻克叶赫首领锦泰希（亦写作"金台什"）、布扬古㉘分守的东、西二城，叶赫遂亡。

该年六月，努尔哈赤攻占开原，一个月后夺取铁岭，接连大败明军。八月十九，往征叶赫。二十一日夜半，叶赫东、西二城俱"鸣锣报警"，"将妇孺尽撤入内山城中"，"弃外城"，"军士出城门外列阵"㉙。二十二日凌晨，努尔哈赤兵临叶赫，包围东、西二城，"分兵毁其外城，由大城之毁坏处运入盾梯"㉚。守西城的布扬古开城出降，守东城的锦泰希"纵火焚其所居台室"，锦泰希之妻、子"急趋而下"㉛，归降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自以十三副遗甲起兵复仇，至灭叶赫部，历经二

十六年，不仅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而且成为一支同明廷分庭抗礼的政治势力。

注 释

①《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三。

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

③④《清史稿·太祖纪》。

⑤牛录，本女真人狩猎组织，每十人为一队。努尔哈赤在创建旗制时，规定一牛录三百人，设牛录额真一人，管理牛录事务。

⑥⑦《满洲实录》卷二。

⑧《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二册，第189页。

⑨贝勒系女真贵族封爵。

⑩《满文老档》上，第2页。

⑪《满文老档》上，第3页。

⑫《满文老档》上，第12－13页。

⑬《满文老档》上，第16页

⑭《满文老档》上，第17页

⑮《满文老档》上，第18页

⑯《满文老档》上，第24－25页。

⑰汉民越境采参，是努尔哈赤与明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⑱诸申即满语百姓。

⑲《满文老档》上，第55－56页。

⑳《满文老档》上，第59页。

㉑《满文老档》上，第60页

㉒《辽事述》。

㉓杜松当时任山海关总兵。

㉔《满洲实录》卷五。

㉕马林当时任开原总兵。

㉖刘綎当时任辽东佥事。

㉗李如柏当时任辽东总兵。

㉘锦泰希系纳林布禄之弟，在纳林布禄死后继为叶赫首领。布扬古系纳林布禄堂弟。

㉙㉚《满文老档》上，第102页。

㉛《满文老档》上，第113页。

清（前期）

八旗制度

八旗是一种特有的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社会组织，兼有“备战”、“务农”①的职能，源于女真社会的狩猎组织牛录。在女真社会，“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②”③。

创建八旗。

万历二十九年（1601），努尔哈赤对原有牛录进行改建，三百丁编为一牛录，设牛录额真一人，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拨什库四人。每一牛录编成四个塔坦（即村落），由一名章京、一名拨什库管理。

五牛录编为一甲喇（一甲喇有一千五百丁），设甲喇额真一人。五甲喇编为一固山（一固山有七千五百丁），设固山额真一人、梅勒额真二人。每一固山有旗纛一面，固山又称为旗，固山额真亦称为旗主。该年共编四固山，四固山的旗纛分别为黄、白、红、蓝四色。

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

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④合为八旗。努尔哈赤自领两黄旗（黄旗、镶黄旗），代善及其子岳托分领两红旗，皇太极领镶白旗，杜度（努尔哈赤长孙）领正白旗，莽古尔泰领镶蓝旗，阿敏领正蓝旗。“凡有杂物收合之用、战斗力役之事”⑤，均由掌旗贝勒组织完成，财产以及战俘也由八旗均分，“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⑥。

皇太极即位之后，为了削弱掌旗贝勒的势力，设管旗大臣八人（亦称八大臣），“总理一切事务”。凡“出猎行师”，“各领本旗兵行”，“国中大小事，皆听稽察”；每旗设佐管旗务大臣二人”，“审断狱讼，不令出兵驻防”；另设调遣大臣二人，“出兵驻防，以时调遣”⑦。至此形成掌旗贝勒、管旗大臣、佐理旗务大臣、调遣大臣一整套管理旗务的制度。

计丁授田。

天命六年（1621）七月，努尔哈赤在占领辽、沈后，从“海州地方拨田十万垧（一垧五亩），辽东地方拨田二十万垧”，分给“驻扎此地之兵马”，“每丁给种粮田五垧，种棉地一垧”。“如不敷用，可取自松山堡以内至铁岭、懿路、蒲河、范河、珲托河、沈阳、抚顺、东州、玛根丹、清河、孤山等地之田耕种”⑧。

八旗兵丁，出则为兵，入则为民，出征所需马、鞍、甲胄均需自备，计丁授田保证了八旗将士的经济实力，这一作法一直延续到清军入关之后。

增设蒙八旗、汉八旗。

天命、天聪年间，归附的蒙古兵日多，遂将蒙古兵编为左、右二营。天聪九年（1635），察哈尔部归降后金，蒙古人丁剧增，遂于该年编蒙古八旗，察哈尔、喀喇沁等部的一万六

千八百四十人被编为蒙八旗。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在占领辽东后，谕汉人："著二十人抽一人从军。其从军之人驻于汗城"，"百人中选百长一人"⑨。天聪五年（1631）正月，皇太极把分散在八旗中的汉兵拨出，"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⑩，命佟养性为汉军"昂邦章京"⑪。天聪八年（1634），将孔有德所率"天祐兵"⑫、尚可喜所率"天助兵"⑬并入汉军。崇德二年（1637）分汉军为左、右两翼，任命石廷柱⑭为左翼管旗大臣，马光远⑮为右翼管旗大臣，"旗色皆用元青"⑯。崇德四年（1639）"分汉军为镶黄、镶白、镶红、正蓝四旗"⑰，马光远领镶黄旗，石廷柱领镶白旗，王世佐领镶红旗，巴延领正蓝旗。崇德七年（1642）又将汉军分为八旗，"旗制与满洲同"⑱，"八旗方位：镶黄、正白、镶白、正蓝为左翼，正黄、正红、镶红、镶蓝为右翼"⑲。孔有德及其所部隶汉军正红旗，尚可喜及其所部隶汉军镶黄旗。

迨至清军入中原之前，满八旗有三百一十九个牛录，六万三千人；蒙八旗有一百二十九个牛录，二万五千人；汉八旗有一百六十七个牛录，三万三千人。合计满、蒙、汉八旗共有六百零五个牛录，十二万一千人。

八旗兵制。

八旗在创建之初，原本是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伴随着努尔哈赤对辽东的开拓，对辽西的扫荡以及皇太极同明军在关内、关外所展开的旷日持久的战事，八旗已经演变成为单纯的军事组织。

天命七年（1623）对八旗驻防之地作出明确规定，"正黄旗收管之地：费阿拉、尚间崖、包窝赫、札克丹、洪阔、西章

嘉、德立石、奉集堡"；"镶黄旗收管之地：柴河、抚安、范河、懿路、三岔堡、铁岭、宋家泊、丁字泊、避荫、甲虎缠"；"正红旗收管之地：温德痕、札库穆、清河及一堵墙、盐厂、孤山、山羊峪、威宁营、东州、玛哈丹"；"镶红旗收管之地：沈阳、蒲河、平虏堡、十方寺、上榆林、静远堡、武靖营、长宁堡、会安堡、虎皮驿、长永堡、长胜堡"；"镶蓝旗收管之地：旅顺口、木城驿、金州及石河驿、黄骨岛、归服堡、望海埚、红嘴"；"正蓝旗收管之地：岫岩、青苔峪、马鬼寨及水长峪、伊兰博里库、镇东、镇彝、凤凰、汤站、险山、甜水站"；"正白旗收管之地：复州、栾古堡、杨官堡及永宁监、五十寨、盖州、盐厂堡、天城堡、青云堡"；"镶白旗收管之地：海州、东京堡、耀州、穆家堡、析木城、古城堡、长安堡、青山堡、鞍山"⑳。

天聪八年（1634）五月，在八旗内"分辨步、骑、守、哨等兵名色，以随固山额真马兵为骑兵；步兵为步兵；护军哨兵为前锋；驻守盛京炮兵为守兵；间助兵为援兵；外城守兵为守边兵"㉑，其兵种已有骑兵、步兵、前锋、守兵、援兵、守边兵、炮兵等。

顺治元年（1644）五月，清军在占领北京之后，令镶黄旗驻安定门内，正黄旗驻德胜门内；正白旗驻东直门内，镶白旗驻朝阳门内；正蓝旗驻崇文门内，镶蓝旗驻宣武门内；镶红旗驻阜成门内，正红旗驻西直门内。

满、蒙、汉八旗分驻京师及各省，其兵种有：

八旗骁骑营，驻守内城，负责城门警卫；

八旗前锋营，负责宿卫，清跸开道；

八旗步军营，城内巡营，维护治安；

京师还设有担负门禁的八旗护军营，负责皇宫㉒、王府㉓以及御前、乾清门、太和殿㉔等处警卫。

康熙以后增加的兵种有：

虎枪营，康熙二十三年（1684）设，皇帝行围时任前导；

火器营，康熙三十年（1691）设，有子母炮四十尊，所部将士以鸟枪装备，亦称为鸟枪护军；

健锐营，乾隆十四年（1749）设，攻城时负责架云梯。

驻防各省的八旗，主要驻扎在省会、军事重镇、交通要道等地。

八旗生计日艰。

清王朝系由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建立，为了镇压比满族多的汉族，清朝统治者视"八旗为国家根本"，清廷所实行的恩养旗人的政策，使得旗人成为一个不事农工的寄生集团。迨至康熙年间，由于人口的自然增殖以及奢靡之风的蔓延，朝廷所发放的粮饷根本不足维持生计，典当旗地屡有发生。清廷多次拨帑，赎回典当旗地，并向八旗兵丁颁发赈济银两。到乾隆时期，对旗人的恩养已经成为财政上的一大负担。乾隆七年（1742）下达允许汉军出旗为民的谕令，乾隆二十一年（1756）又下达允许八旗开户家奴出旗为民的谕令。上述命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旗人的数量，减轻清廷为解决旗人生计所承受的财政负担，对改善旗人生计不无小补。

注 释

①《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15页。

②满语"牛录"即"大箭"，"额真"即"首领"。

③《清太祖实录》卷二。

④黄旗、白旗、蓝旗均镶红边，称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红旗镶白边为镶红旗。

⑤《建州闻见录》。

⑥《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⑦《东华录》卷一。

⑧《满文老档》上，第219页。

⑨《满文老档》上，第267页

⑩“乌真超哈”满语“重”意。后金原无火炮，令境内汉人工匠试制，天聪五年铸成火炮，由汉军使用，故称汉军为“乌真超哈”，即重型炮队之意。

⑪天聪八年四月统一兵制，原明总兵称昂邦章京，副将称梅勒章京；参将为甲喇章京，备御为牛录章京。

⑫孔有德原系明参将，天聪六年率部哗变，攻陷登州，将登莱巡抚孙元化仿西洋大炮试制的新式火炮数百门全部夺取，并于翌年从登州突围降于后金，皇太极将孔有德部众、所携大炮编为“天祐兵”。

⑬尚可喜原为明广鹿岛副将，天聪七年降于后金，所部编为“天助兵”。

⑭石廷柱原为明广宁守备，天命七年努尔哈赤攻陷广宁，石廷柱率部归降。

⑮马光远原为明建昌参将，天聪四年皇太极克永平，马光远率部归降。

⑯《东华录》卷三。

⑰《东华录》卷三。另据《清史稿·兵志》所载，四旗颜色为：纯皂、皂镶黄、皂镶白、皂镶红。

⑱《清史稿·兵志》。

⑲《东华录》卷三。

⑳《满文老档》上，第379—380页。

㉑《清太宗实录》卷一八。

㉒由上三旗担任。上三旗系指皇帝自己率领的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自努尔哈赤以来，皇帝率两黄旗，顺治亲政以后治罪多尔衮，把多尔衮的正白旗收归皇帝。

㉓由下五旗担任。下五旗系指两红旗、两蓝旗、镶白旗，下五旗由亲王掌管。

㉔担任御前及宫内侍卫者，均从上三旗中选拔年轻力壮、武艺高强者。

清（前期）

建国辽左

万历四十四年正月初一（1616年2月17日）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年号“天命”，国号“金”，史称后金。

草创中的后金。

后金都城赫图阿拉，亦称兴京老城，位于苏子河与嘉哈河交汇处以东，“因山为城”①。该城始建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筑土为郭”，“周四里，南一门，东二门，北一门”②。两年后，又在该城外面加筑外城，“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豆，状若女墙③，门皆用木板”④，“城高六丈，作门八处”⑤。努尔哈赤等女真贵族居住内城，兵士及各色工匠居住城外。

后金汗国建立前一年，努尔哈赤任命额亦都、费英东、何和礼、安费扬古、扈尔汗为议政五大臣（亦称开国五大臣），“每五日集朝一次，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⑥。设“札尔固齐⑦十人，号为理事大臣。凡听断之事（即审理诉讼），先经札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

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⑧，还要上奏后金汗，由努尔哈赤“亲加鞫问”。确立贝勒大臣三级审理及以御审为最终判决的审理制度，废除女真社会传统的“诉于诸臣之家”的私断陋习，谕令国人“有事当诉于公所，毋得诉于诸臣之家”，“其私诉于家，不执送而私断者，治罪不贷”⑨。严禁理事大臣“食酒肴”、“贪金银”，受贿坏法⑩。

制定法制，“禁悖乱，戢盗贼”⑪，严厉制裁谋逆、逃亡、隐匿户口、通奸、违犯军纪、盗窃等罪。通奸者“男女皆死”⑫，伤人致死“抵罪”，“隐匿户口”处死，出兵打仗“擅自离队，私掠财物”，“杀之”⑬。上述法令“俱由额尔德尼⑭巴克什⑮录编成书”⑯。

后金百姓以劳役方式纳税，“令一牛录（每牛录三百丁）出男丁十人、牛四头，以充公役，垦荒屯田”。所收粮食，贮之粮库，“并委大臣十六名、巴克什八人，以掌记录库粮收发赈济事宜”⑰。

天命建元之始，努尔哈赤“命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子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⑱，四贝勒（亦称四大贝勒）协助汗处理国事。天命六年（1621）二月，“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即值班），掌理一切机务”⑲。

迁都辽阳、沈阳。

天命六年（明天启元年，1621）三月，努尔哈赤率军沿辽河而下，兵临沈阳。明沈阳总兵贺世贤被后金军诱杀，三月十三日沈阳陷落。五天后，努尔哈赤兵发辽阳。辽阳系明辽东首府，明辽东经略袁应泰拒城而守，激战两天，兵败自焚。三月二十日辽阳陷落，后金军队入城，“城内汉民皆自愿剃发”⑳。

辽河以东望风而归，海州（今海城）、镇江（今丹东）、宽甸、凤凰（今凤城）等七十余城、五十余寨俱被后金占领，隔辽河与明军对峙。

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谕令迁都辽阳，“命遣人往迎众妇人及诸子”来辽阳㉑。同年八月“于太子河北岸山岗建城池”㉒，此即后金东京，又称新城。东京城东西宽二百八十丈，南北长二百四十三丈，城高三丈六尺，用长方形砖砌成，共有八座城门。宫殿建在城西南的高岗上。天命十年（1625）三月，又将都城迁往沈阳，陆续建有大政殿、十王亭。

健全政权机构。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1626年10月20日），皇太极继立为汗，以明年为天聪元年㉓。

皇太极继立之初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俱南面坐”。天聪四年（1630）五月，皇太极以阿敏奉命驻守关内四城㉔，大败而归，将阿敏“幽禁”，“夺所属人口奴仆、财物、牲畜”㉕。翌年八月莽古尔泰因与皇太极口角，“手出佩刀五寸许”，而被“革大贝勒称号”㉖。该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议及元旦朝贺礼，对莽古尔泰“可否仍令并坐”其议不一。经代善建议：“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代善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㉗。自天聪六年（1632）元旦起，皇太极“始南面独坐”㉘，汗权得以提高。

天聪三年（1629）四月，参照明廷中枢机构——内阁，设置文馆，“命儒臣分为两直（两部分）”，“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得失”㉙。

天聪五年（1631）七月，仿照明中央官制——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设立六部”㉚。六部各设承

政四人（相当尚书），满承政二人，蒙古承政一人，汉承政一人；“其下设参政八员（相当侍郎）”，每部又设启心郎一人（相当侍郎）。后金六部实际由掌部务的贝勒把持。在六部建立的同时，皇太极即命“多尔衮管吏部事”、“德格类管户部事”、“萨哈廉管礼部事”、“岳托管兵部事”、“济尔哈朗管刑部事”、“阿巴泰管工部事”㉛。

三院八衙门官制的确立。

天聪十年四月十四日（1636年5月18日）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㉜，自称皇帝，改元崇德，从天聪十年五月，改为崇德元年。

天聪九年初（1635），皇太极在历经七年征战之后，征服漠南蒙古中实力最为雄厚的察哈尔部㉝，获得元代玉玺㉞，遂有改元称帝之念。

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在称帝前夕，“改文馆为内三院：一内国史院，一内秘书院，一内宏文院”㉟。“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内秘书院职掌撰写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及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内宏文院职掌历代行事善恶进讲御前，侍讲皇子并教诸亲王，颁行制度”㊱。内三院设大学士、学士，内秘书院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国史院、内宏文院均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

又设置专门的监察机构都察院㊲，满汉承政各一人，下设参政等官。都察院官员对诸贝勒六部官员的失职、不法，均可“指参”㊳。

崇德三年（1638）六月二十九日“更定蒙古衙门㊴为理藩院”㊵，处理清帝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事务。七月，将各衙门设置划一，“更定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八衙门官制，每衙门设满洲承政一员；以下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共五等”㊶。至此，三院八衙门的官僚体制已经确立。

历经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两代的努力，东起鸭绿江，西抵辽河，北起黑龙江流域，南至长城一线的清帝国巍然屹立于北陲。

注 释

①《兴京县小志》卷一一。

②《大清一统志》卷五八。

③城墙上的矮墙称女墙。

④《筹辽硕图》卷一。

⑤《春坡堂日月录》卷二七。

⑥《满洲秘档》。

⑦札尔固齐，蒙语“理事官”。

⑧⑨《清史稿》刑法志三。

⑩《满文老档》上，第36页。

⑪《清史稿》刑法志一。

⑫《满文老档》上，第133页。

⑬《满文老档》上，第160页。

⑭额尔德尼系满文的创制者之一，1599年奉努尔哈赤之命参照蒙文字头创制满文。

⑮“巴克什”系满语博士。

⑯⑰《满文老档》上，第37页。

⑱《清史稿·太祖纪》。

⑲《东华录》卷二。

⑳《满文老档》上，第180页。

㉑《满文老档》上，第186页。

㉒《满文老档》上，第238页。辽阳旧城年久失修，“城垣广大”，不便防守，故另建新城。

㉓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病逝。

㉔天聪三年十月底，皇太极假道蒙古，突破长城诸口，占领明关内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㉕《清太宗实录》卷六。

㉖㉗《清太宗实录》，卷一O。

㉘《清太宗实录》，卷一一。

㉙《东华录》卷二。

㉚㉛《清太宗实录》卷九。

㉜按照五行相克的观点：火克金，水灭火。朱明属火，故改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取水灭火之义。

㉝察哈尔部拥有部众四十万，称雄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系元室后裔。为遏制后金，明自天启年间竭力援助察哈尔部。天聪二年九月皇太极联合敖汉、奈曼等蒙古部落大败林丹汗，天聪六年再败林丹汗，两年后林丹汗死于大草滩。林丹汗之子额哲于天聪九年四月归降后金。

㉞元朝玉玺以汉文篆字刻“制诰之宝”。

㉟《东华录》卷三。

㊱《清太宗实录》卷四一。

㊲关于都察院建立时间记载不一，《清史稿·太宗纪》为崇德元年五月丁巳，而太宗朝实录在该年四月丁亥叙及太庙建成时已提到都察院。

㊳《清史稿·太宗纪》。

㊴蒙古衙门的成立时间不详。

㊵《清太宗实录》卷四二。

㊶《东华录》卷三。

清（前期）

鏖兵宁、锦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1622）正月，八旗劲旅突破明军的辽河防线①，席卷辽西，相继攻克广宁（今辽宁省北镇）、义州卫（今辽宁省义县）、锦州、中左所（宁远卫以北40余里，宁远即今辽宁省兴城）等辽西重镇。

明宁、锦防线的构筑。

面对努尔哈赤咄咄逼人的攻势，天启二年六月，明廷委任御前讲官、内阁大学士孙承宗出关督师。在孙承宗的主持下，明军抢修宁远、锦州、大凌河、小凌河、松山、塔山等城堡。从宁远至锦州“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并屯田五千顷”②，构筑了一条牢固的防线——宁锦防线。

为了加强防御能力，明廷派人去澳门购买西洋大炮，用以装备宁远、锦州等城。

宁远之战。

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努尔哈赤在得悉

明督师孙承宗被免职③后，立即率兵十三万大举进攻辽西。

继孙承宗主持关外战事的高第素不知兵，慑于八旗劲旅的攻势，令驻守宁远、锦州、松山、塔山、大凌河、小凌河、右屯的明军尽撤入山海关。仅十天的时间，努尔哈赤未经一战就占领了除宁远以外的所有辽西重镇。

宁远明军仅万余，驻守宁远的袁崇焕拒绝执行撤军的命令，“乃尽焚城外民居，携守具入城，清野以待”④，以一万迎战十三万之众。

该年一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兵临宁远，“越城五里，横截山海关大路驻营”⑤，以期截击山海关方面的增援明军，阻击宁远守军向山海关的败退。当时后金尚未拥有用以攻城的火炮，八旗将士“执楯薄城下，将毁城进攻”，用“铁裹车撞城，声轰然，久之，城为之撼且碎”。“又用状如云梯而高过于城者撞击，上以板遮蔽，兵藏于板下掘城，垣墉将堕”。“及攻既久，城基俱成凹龛，兵匿深处挖掘”。守城明军“以石掷之，又不能及，城将破”⑥。

袁崇焕令属下“急造火药，不置炮中，匀篩于芦花褥子及被单上卷之，号‘万人敌’”，“着一火星，即不得生”。“守者用此掷于城下”，八旗士兵“忽见被褥遍地，大喜，趋出争夺。城上望见，即以火箭、硝磺等物掷于被褥上，火大发，扑之愈炽。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延烧数千人”⑦。

努尔哈赤顿兵宁远城下两昼夜，其本人亦被明军炮火击伤。“计两日攻城，伤游击二人，备御官二人，兵五百人”⑧。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伐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不怿而归”⑨。

宁、锦之战。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五月十一日，皇太极率后金军兵临锦州，“距城一里筑营”⑩。是时距征朝大军凯旋仅二十五天。

宁远之战以后，袁崇焕利用努尔哈赤之死⑪以及皇太极对朝鲜征伐⑫的机会，“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⑬修筑因高第不战而撤并遭到破坏的宁锦防线。于是，皇太极不顾将士连续作战的疲劳及气候暑热，亲“率两黄旗、两白旗兵，直趋大凌河”，另派“大贝勒代善、阿敏，贝勒硕托率正红、镶红、镶蓝旗兵，直趋锦州”⑭。“大凌河修城未竣”，“明守城兵弃城遁”，逃至锦州，被围困锦州的后金兵“尽杀之”。

五月十二日，后金军“整理攻具，午刻攻锦州西隅。垂克，明三面守城兵来援，火炮矢石齐下”，久攻不下。有鉴于此，皇太极调整原定攻锦方案，以重兵围困锦州，切断宁、锦联系，迫明宁远守军援锦，在援锦明军失去城坚、炮利等有利条件的情况下，与之决战；在歼灭援锦明军后，再向孤立无援的锦州发起攻势。

五月十六日，后金军截获驻守宁远的袁崇焕写给锦州监军⑮的一封密札，内有“调集水师援兵六、七万将至，山海、蓟州、宣府兵亦至。前屯、沙河、中后所兵俱至宁远”，“我不时进兵”等语⑯。皇太极决定乘袁崇焕率师援锦之际，偷袭守备薄弱的宁远，进可威胁山海关，退可攻陷锦州。

五月二十七日，皇太极令一部分军队继续围困锦州，自“率三大贝勒、诸贝勒、每旗副将一员及护军并行营兵三千人，往宁远迎击敌兵”⑰。次日黎明“驰至宁远城北冈”。明军“沿城环列枪炮”，“以车为营，列火器为守御”⑱。尽管皇太

极“亲率贝勒阿济格⑲与诸将、侍卫、护军等疾驰进击”⑳仍未能攻克宁远。“是役也，贝勒济尔哈朗㉑、萨哈廉㉒及瓦克达㉓俱被创”㉔。

明锦州守军，乘皇太极分兵宁远，向围困锦州的后金军发起攻击，“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俱“殁于阵”。突袭宁远受挫的皇太极在得悉锦州战况后又匆匆杀回锦州，仅四天的时间就在宁远、锦州之间杀了一个来回，行程二百里。

五月三十日，皇太极重返锦州后，即“列八旗梯牌及一切攻具”，“为进攻计”。六月初四，“攻锦州城南隅，因城壕深阔，难以骤拔”㉕。皇太极喟然叹道：“昔皇考太祖攻宁远不克，今我攻锦州又未克，似此野战之兵，尚不能胜，其何以张我国威耶！”㉖

大凌河之战。

大凌河城堡在锦州东北方向四十里处，大凌河与小凌河（锦州以东二十里）、松山堡（锦州东南四十里）组成一道自北而南的防线，缓冲着锦州所受到的来自辽东的军事压力。位于锦州前哨的大凌河，在明清之际迭经战事，三次被摧毁，亦三次得到修葺。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八旗劲旅第一次扫荡辽西，王化贞十四万大军溃败，大凌河城被捣毁；孙承宗督师关外期间，大凌河又得到修复。孙承宗被罢免、努尔哈赤挥军第二次扫荡辽西时，由于高第不战而撤，大凌河城再次被拆毁；宁远之战后大凌河城再次得到修复。皇太极所发动的宁锦之战使得尚未完工的大凌河城第三次遭到破坏。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1631）初，孙承宗在第二次主持关外战事期间㉗，决定在大凌河旧址第三次构筑新城，该年七月破土，八月完工。

同年八月初二日，后金兵分两路直扑大凌河，“贝勒德格类㉘、岳托㉙、阿济格以兵两万，由义州入屯锦州、大凌河之间”，皇太极亲自率重兵取道“白土场入广宁”。八月初六，两路大军“会于大凌河，乘夜攻城”㉚。负责督修大凌河城工程的明总兵祖大寿部被后金军队团团包围。

鉴于宁远、锦州攻坚失利的教训，皇太极对大凌河采取“掘壕筑垒困之”的战略，谕令将士，被围明军“若出，与之战；外援至，迎击之”㉛。

八月初十日，“明马步兵五百人出城，达尔哈击败之”㉜。

八月十二日，“明兵出城诱战，图赖领先入，达尔哈继之”，“贝勒多尔衮㉝亦率兵入，城内炮矢俱发，图赖被创，副将孟坦屯布禄、备御多贝、侍卫戈里战殁”㉞。经此挫折，皇太极再次重申围城打援的方略。

八月十六日，击败明松山援兵二千；

八月二十六日，击败锦州援兵六千；

九月十六日，再次击败锦州援兵七千。

九月二十七日，在距大凌河城十五里处，皇太极与明太仆寺卿、监军道张春、总兵吴襄所率四万援军展开激战。皇太极“率两翼旗兵冲击”明军营垒，未能冲动；“右翼兵猝入张春营”，吴襄等“先奔”；“张春等复集溃兵立营，会乘大风”，明军“乘风纵火”，火势将及后金军，天忽降雨，遂大败张春部明军，“生擒张春及副将三十三人”㉟。

天聪五年初，后金已制造出火炮，名曰“红衣大将军”，“携载攻城”自大凌河之战始。八月十二日“以红衣炮击西南隅一台，穿其雉堞㊱”；“台兵惊惧，遂降”，后金军将大炮移至台上，“攻城之南面，坏其雉堞四，敌楼二”。八月十三日，

“以红衣大将军炮攻城东一台”，“台兵遂弃台夜遁”㊲。八月十五日，炮击一台，“焚近台房屋百余间”，“台上死于炮者三十人”。九月初八，炮轰大凌河城西“五里外一台，克之。”九月二十七日，在同张春、吴襄所率四万援军的激战中，皇太极“命佟养性部众，屯于敌营东，发大炮、火箭，毁其营”㊳。十月初九，“载红衣炮六位、将军炮五十四位，往攻于子章台”。于子章台“峙立边界，垣墙坚固”，连续三昼夜的炮击，“击坏台垛，中炮死者五十七人，台内明兵，惶扰不能支，乃出降。是台既下，其余各台闻风惴恐，近者归降，远者弃走，所遗粮糗充积”，足供后金围城将士“一月之饷”。清实录的编纂者曾对此评论道：

“若非用红衣大炮攻击，则于子章台，必不易克；此台不克，则其余各台，不逃不降，必且固守；各台固守，则粮无由得，即欲运自沈阳，又路远不易致。今因攻于子章台，而周围百余台闻之，或逃或降，得以资我粮糗，士马腾饱，以是久围大凌河。”㊴

大凌河城中粮储“不过百石，原马七千倒毙殆尽，尚余二百匹，其堪乘者止七十匹。夫役死者过半，其存者不过以马为食耳。柴薪已绝，至劈马鞍为爨（cuàn 窜，烧火煮饭之意）”㊵。自八月中旬，城内即已断炊。十月初十，“大凌河有王世龙者逾城来降”，据王世龙介绍：“城中粮绝，夫役商贾悉饥死，见（同“现”）存者人相食，马匹仆毙殆尽，止余三十骑而已”㊶。迨至十月中旬，“粮绝薪尽”的大凌河守军，“杀其修城夫役及商贾、平民为食，折骸为炊，又执军士之羸弱者杀而食之”㊷。

十月二十八日，祖大寿率众出降。大凌河原有“骑、步兵

及工役、商贾共三万余人，因相继阵亡，或饿死，或互相食，至是存者止一万一千六百二十八人，马三十二匹”㊸。

松锦之战。

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清军包围锦州。在城外“每面立八营，绕营浚壕，沿壕筑垛口；两旗之间，复浚以长壕，近城设逻卒哨探”㊹。驻守锦州外城的将领诺木齐（蒙古人㊺）暗中降清，里应外合，锦州外城陷落。诺木齐率蒙古兵丁、部众六千余口降清。

负责锦州城防的明将即祖大寿。祖大寿在归降皇太极后，以潜入锦州、“献城”自请。后金遂于该年十一月初一（大凌河陷落后第三天）纵祖大寿还㊻。祖大寿回到锦州后，并未履约，而是继续效忠明廷，与后金为敌。

崇德六年五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所率领的十三万援锦大军抵达宁远。洪承畴决定坐镇宁远，以重兵保住通往锦州的运粮要道，以守为战，步步为营。祖大寿亦派人致函洪承畴，切勿浪战，驻扎松山、杏山“以资转运”，“锦守颇坚，未易撼动”㊼。明廷以“兵多饷艰”㊽，敦促洪承畴“刻期进兵”㊾，洪承畴自率兵六万从宁远出发，在距锦州十八里的松山扎营。

该年八月，大病未愈的皇太极亲带援军“昼夜遄发”奔赴锦州。皇太极令清军插入松山、杏山之间，切断明军饷道，且于二十日袭取明军屯粮重地笔架山，“斩杀看守米粮之敌一千名”，笔架山所贮之粮，尽为清军所有。“松山之粮，不足三日”。清军“不但困锦，又复困松”㊿。松山明军遂于二十一日夜突围，“三分之一婴城，其二决围冲阵”[51]。皇太极令多尔衮，阿济格等移师松杏之间的尖山、石灰窑一带，截击向宁远撤退的明军，又设伏于高桥、大兴堡[52]。明军“且战且闯，

各兵散乱”，“自杏山迤南沿海至塔山一路，赴海死者，不可胜计”[53]，“所弃马匹甲胄，以数万计；海中浮尸漂荡，多如雁鹜”[54]。援锦明军“覆灭殆尽”[55]。

皇太极遂令清军在松山周围挖壕、筑夹城，对未能突围的明军，长困久围。迨至翌年二月，松山被围已经半年，城中粮尽，“人相食，将不能保”[56]。松山副将夏成德降清，二月十八日，松山陷落，洪承畴被生擒，明军总兵、副将以下官员百余人、兵丁三千余人皆被屠杀，火器三千余件俱被清军缴获。

崇德七年（明崇祯十五年，1642）三月，被围困一年的锦州“掘鼠而食”，在得悉“松山已失”的消息后，“战守计穷”的祖大寿，“乃率众官出城”，降于清军。

四月八日，清军移师塔山，炮击塔山，至次日午时，塔山城垣被轰毁二十余丈，清军遂从坍塌处冲入城内，与守城明军巷战，阵斩明军七千余人。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回师杏山，以大炮摧毁城北墩台，翌日炮轰杏山，城垣崩塌二十余丈，清军遂攻入杏山，守城副将“率众乞降”，屏藩山海关的宁锦防线不复存在。

注　释

①明广宁巡抚王化贞，不听经略熊廷弼节制，拒不采纳熊廷弼屯兵广宁的建议，把十四万军队驻扎在无险可守的辽河一线。在遭到后金军队突袭后，全军覆灭。

②《明史·孙承宗传》。

③天启五年十月（1625），孙承宗因欲弹劾祸国殃民的魏忠贤阉党而被罢黜。

④《明史·袁崇焕传》。

⑤《清太祖实录》卷一〇。

⑥⑦《明季北略》卷二。

⑧⑨《清太祖实录》卷一O。

⑩《清太祖实录》卷三。

⑪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努尔哈赤病逝。

⑫天聪元年正月初八，皇太极以朝鲜未祝贺后金新君即位为词，派阿敏统兵征朝。

⑬⑭《清太祖实录》卷三。

⑮太监监军始于明永乐年间，天启年间更为严重，仅宁远一城就有六位监军拥聚。

⑯⑰⑱《清太宗实录》卷三。

⑲阿济格系努尔哈赤第十二子。

⑳《清太宗实录》卷三。

㉑济尔哈朗系二贝勒阿敏之弟。

㉒萨哈廉系代善第三子。

㉓瓦克达系代善第四子。

㉔㉕㉖《清太宗实录》卷三。

㉗崇祯二年十一月，因皇太极假道蒙古喀喇沁部，突破长城防线，兵临京师，孙承宗被明廷以原官起用。

㉘德格类系努尔哈赤第十子。

㉙岳托系代善长子。

㉚㉛㉜《清史稿·太宗纪》。

㉝多尔衮系努尔哈赤第十四子。

㉞《清史稿·太宗纪》。

㉟《清史稿·太宗纪》；张春被俘后绝食而死。

㊱雉堞系城墙上齿状矮墙，守城兵士的掩体。

㊲㊳《清太宗实录》卷九。

㊴㊵㊶㊷㊸《清太宗实录》卷一O。

㊹《清太宗实录》卷五五。

㊺当时明军中有不少蒙古将领。

㊻皇太极考虑到祖大寿所献之策，可能有诈，但为了使祖大寿诚心归顺，仍采纳其建议，“纵还大寿”。

㊼《国榷》卷九七。

㊽《明史》卷一六O。

㊾㊿《国榷》卷九七。

51《明清史料》乙编，第327页。

52高桥在杏山堡西南二十里，大兴堡在杏山堡以西三十里。

53《东华录》卷三。

54《清太宗实录》卷五七。

55《国榷》卷九七。

56《沈阳状启》，第407页。

清（前期）

皇太极两征朝鲜

朝鲜介入明与后金的战争

朝鲜自十四世纪末建立李氏王朝以来，与明朝关系密切。万历年间，中朝联合作战，制止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自此两国更加友好。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三年，1619）明与后金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朝鲜遣其将姜弘立以兵助明军。结果，明军惨败，姜弘立以兵五千降后金。努尔哈赤归朝鲜部将十余名，以书谕朝鲜国王李晖曰："昔明以兵救尔倭难，故尔国亦以兵勤明，势不得已，非于我有怨也。今所擒将吏，以王之故，释令还国，王其自审去就。"①不久，朝鲜国王遣使致书努尔哈赤，曰："惟我两国俱是帝臣，同事天朝者二百年于兹。不图近者建州与明朝构衅，兵连祸结，以致生民涂炭，四邻多垒，岂但邻国之不幸，其在贵国，亦非好事，天朝之于我国，犹父母之于子也，父之有命，子敢不从乎？大义所在，不得不然。……自今以后，复怀好音，偕至大道，则天朝宠绥之典不日诞降。两国各守封疆，相修旧好，岂不美哉！"②与此同时，朝鲜允毛文龙率明军驻扎铁山、皮岛（皮岛当时号东江镇，今

朝鲜之椴岛），并于经济上给予援助。朝鲜国王李倧更向毛文龙表示："寡人与贵镇，事同一家，心肝相照，唇齿相须。"③后金伐明，毛文龙则遣兵骚扰其后，迫使后金不敢专意向前。另外，后金由于长期同明作战，无暇顾及经济，加之明又关闭了与后金的边境互市，使得后金当时的经济状况极为困窘，急需朝鲜成为一个能够供应其物资的基地。征服朝鲜，已成为后金对明作战总战略的一部分。

皇太极一征朝鲜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7）正月初八，皇太极命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等统大军征伐朝鲜，谕曰："朝鲜屡世获罪我国，理宜声讨，然此行非专伐朝鲜也。明毛文龙近彼海岛，倚恃披猖，纳我叛民，故整旅徂征。若朝鲜可取，则立取之。"④

正月十三日，后金大军至边境地带，夜袭明哨所，尽获哨卒。次日夜，临朝鲜，直抵义州城下，树梯攻城，巴图鲁⑤艾博率八旗精锐一举登城，诸军随后攻入，义州陷落。杀府尹李莞，判官崔鸣亮自尽。屠城中兵卒，俘其居民。是夜，分兵捣毛文龙所居铁山，毛文龙遁入皮岛。

十五日，留兵守义州，大军沿西朝鲜湾前进，攻陷定州，宣州府副使奇协"不屈而死"，俘州牧使金搢，尽降其民。

十八日，招郭山之汉山城不降，攻克之，郡守朴榷健被俘，杀其将卒。以上三城，"逃生者，只数十余人"。

十九日，自定州渡嘉山江。次日，向平壤进发。

后金兵进展迅速，势如破竹。阿敏遣人回沈阳汇报军情，并请求发兵守义州城，以抽出兵力补充前线急需。皇太极得报，大悦，传谕曰："蒙天眷佑，尔出师诸贝勒所至克捷，朕

闻之，不胜喜悦。前进事宜，尔等详加审酌，可行则行，慎勿如取广宁（今辽宁省北镇县）时，不进山海关，以致后悔。如不可行，亦勿强行。尔等在行间，宜仰承天眷，保惜声名，凡事相机图之。倘邀天佑，朝鲜事渐有定局，一切事宜，有当请命者，尔行间诸贝勒，公（共）同议定，遣使来奏，朕据所奏裁定。朕在都城何能遥度耶！”遂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并家属进驻义州。

于是阿敏率大军继续深入，渡青泉江，克安州。州牧使金浚、兵使南以兴，自焚而死；郡守张檄、副使全尚毅、县令宋图南等被杀。大军在安州休息四日，二十五日，起行。二十六日，进至平壤城，城中官民悉遁。后金兵唾手而得全城。当天，大军渡大同江，二十七日，驻军中和。

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致书，质问后金兴师之故。曰：“贵国无故兴兵，忽入我内地，我两国原无仇隙。自古以来，欺弱陵卑，谓之不义；无故戕害人民，是为逆天。若果有罪，义当遣使先问，然后声讨。今亟返兵，以议和好可也。”⑦大贝勒阿敏答朝鲜书曰：“向者，我军往取我属国瓦尔喀时，尔国无端出境与我军相拒，一也；乌喇贝勒布占泰之屡侵尔国也，尔以乌喇属我姻戚，求释于我，我为劝谕息兵，尔曾无一善言相报，二也；我两国原无仇怨，尔于己未年（1619），发兵助明，合谋图我，幸蒙天鉴，明兵败衄。尔之帅卒，为我阵擒，我不忘旧好，故不加诛戮，且豢养之，纵令返国，至于再三，尔不遣一介来谢，三也；天以辽东赐我，辽东之民，我民也，尔容毛文龙潜据海岛，致我辽东百姓，被其侵扰，听其引诱，我曾令尔缚毛文龙，复成两国之好，尔竟不从，四也；辛酉年（1621），我军攻剿毛文龙，惟明人是问，亦望尔惠顾前好，不

以一矢相加，尔国究无一善言相报，五也；毛文龙系明国之将，明且无粮饷给与，尔乃予以地土，导其耕种，资之粮糈，赡其军实，六也；……我皇考上宾，明方与我为敌，尚遣使来书，兼贺新君即位，我皇考素与尔朝鲜相和好，毫无嫌，何竟不遣一使弔问，七也。尔如此负恩构怨。难以悉数。我用是统率大军，声罪致讨。尔尚自以为是，与我为敌耶？抑将悔祸之延，抒诚引咎，申盟天地，重修和好耶？我且留师五日以待，惟好是图，果欲议和，速行遣使，如违约不至，我军即鼓行而前矣。”⑧

李倧对议和之事迟疑不决，左右大臣亦意见不一，李倧遂复书阿敏，再次表示不能同明朝断交，奉行与明、与后金都友好的政策，“并行而不相悖”⑨。

二月初五日，阿敏率大军至黄州城。朝鲜国中震恐，求援于明。明辽东巡抚袁崇焕遣舟师援皮岛，又遣精兵九千进逼三岔河，以图牵制。皇太极恐明乘后金国内兵力虚弱而进攻，亲自巡边，耀兵于辽河岸，使袁军不能援助朝鲜。李倧携妻子逃至江华岛，复遣使至阿敏处谢罪。阿敏派总兵官刘兴祚去江华岛，当面宣谕，以兵威恫吓，而自己驻军平山以待。李倧被迫接受议和条件，先派王弟原昌君李觉送去一份厚礼，以示诚意。

三月初三日，阿敏派刘兴祚、巴克什库尔缠等为代表，乘船到江华岛，与朝鲜国王李倧及其大臣正式举行会盟仪式，刑白马乌牛，誓告天地，结为兄弟之国。后金在盟誓中，要求朝鲜国王李倧应接受的议和条件是：“应进满洲国皇帝礼物，若违背不进；或不以待明国使臣之礼，待满洲国使臣，仍与满洲结怨，修筑城池，操练兵马；或满洲俘获编入户口之人，逃回

朝鲜容留，不行遣还；或违所言与其远交明国，毋宁近交满洲之语，当告诸天地征伐之。”⑩盟誓之后，阿敏认为：“朝鲜王虽已盟誓，吾等并未与盟，军还时，可仍纵兵掠之。”⑪贝勒岳托等止之，阿敏不听，令将士纵掠三日，财物人畜，悉行载还。皇太极下令分兵三千驻守义州，其余全部振旅而还，李倧弟原昌君李觉作为人质随清军入朝。

天聪元年（1627）五月，皇太极设宴为朝鲜国王弟李觉饯行，允其回国。七月，应朝鲜国王请求，下令撤回镇守义州之将士。

皇太极二征朝鲜

天聪元年（1627年）十二月，皇太极派遣参将英额尔岱、游击霸奇兰去朝鲜，传谕李倧卖给粮食，供应蒙古来降各部食用，李倧以遭乱世“残破”为由，仅拿出一千石粮食以平价卖给后金。李倧与后金议和不久，即向明朝作了报告，称其与后金议和不过是“羁縻之术”，深得崇祯皇帝谅解。朝鲜仍坚持与明朝结盟。天聪三年（1629）后金伐明，纵反间计杀明督师袁崇焕。五年（1631），准备乘虚征皮岛，征兵船于朝鲜，李倧三日才见来使，曰：“明国犹吾父也，助人攻吾父之国，可乎？”⑫天聪七年（1633）李倧写信向皇太极表示：“贵国既欲议和息兵，甚为美意，故孤亦喜而许之。但念敝邦之于明朝，君臣分义甚重，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毙，断不敢从！”⑬皇太极极为不满，复信于李倧，列举其亲明助明，停止互市、降低参价、越界盗参、修筑城防等罪，责其不守盟约。是年夏天，明毛文龙所部副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叛明归金。后金遣使征粮朝鲜曰：“尔国视明犹父，十输其粟；我今既为兄，独不可与一次乎？”⑭李倧不从。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大败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得元传国玺。十年（1636），八和硕贝勒及外藩蒙古四十九勒表请上尊号。皇太极表示："朝鲜兄弟之国，宜与共议。"⑮二月初，满汉贵族和外藩蒙古王公联名致书朝鲜国王李倧，请其派亲近子弟来沈阳，向皇太极"劝进"，上"皇帝"尊号。消息传来，朝鲜国内一片哗然，诸臣争言不可。掌令洪翼汉曰："臣自呱呱堕地之初，只知道有大明天子，我们尊他（指皇太极）为帝，还有什么脸面立于天下！"⑯太学生金寿弘等也上书国王请求："斩虏使，焚虏书，以明大义。"⑰

天聪十年（1636）四月，皇太极举行登基典礼，改元崇德，国号大清。朝鲜使臣李廓等来朝贺，但不参拜，不行大礼。临行时，皇太极修书一封，让其带给李倧。行至通远堡时，李廓给当地守臣写了一封信，并将皇太极给李倧之信留于宿处，径自回国。信上曰："我等奉主命出使，贵国忽生异心，以势逼迫。但吾首不能自断，一切羞辱，俱已受尽，此古今所无之事也。今幸得至我界，甘受国法而死，尚复何言！"⑱皇太极闻此大怒，决定倾全国之兵，亲征朝鲜。

十二月一日，奉召之蒙古各部率兵会于沈阳，加上八旗兵，号称十万。皇太极指令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豫亲王多铎、贝勒岳托、豪格、杜度等随其出征。九日，皇太极率大军抵达镇江，次日，挥军渡江，攻陷义州，进入朝鲜境内。自此，清军以破竹之势，连克郭山城、定州。另一路大军进入平壤，直抵王京城下，李倧逃至南汉山城，固守待援。三十日，都城汉城陷落。

开始，李倧遣使告急于明，时明廷自顾不暇，无力援助。登莱总兵陈洪范准备率船出海，被大风所阻。朝鲜国中东南诸

道援兵相继溃散，西北援兵逗留于海峡内不得进，南汉山城内粮食困乏。

崇德二年（1637）正月，皇太极对李倧发出通谍，责令投降。李倧智穷力竭，决计投降。清军一方拟定和议条款，要求朝鲜一方承认，作为“永定规则”如下：

一、“当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交往，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躬来朝谒。”

二、“尔（指李倧）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

三、“从此一应文移，奉大清国之正朔。”

四、“其万寿节及中宫千秋、皇子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俱行贡献之礼。并遣大臣及内宫奉表。其所进往来之表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之礼及尔陪臣谒见，并迎送馈使之礼，勿违明国旧例。”

五、“朕若征明国，降诏遣使，调尔步骑舟师或数万，或刻期会处，数目限期，不得有误。”

六、“军中俘获，过鸭绿江后，若有逃回者，执送本主。若欲赎还，听从两主之便。”

七、“尔与内外诸臣缔结婚媾，以固和好。”

八、“新旧城垣，不许擅筑。”

九、“尔国所有瓦尔喀，俱当刷送。”

十、“日本贸易，听尔如旧。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其东边瓦尔喀，有私自逃居于彼者，不得复与贸易往来。尔若见瓦尔喀人，便当执送。”

十一、“每年进贡一次，其方物数目：黄金百两，白银千两，水牛角二百对，豹皮百张，鹿皮百张，茶千包，水獭皮四

百张，青黍皮三百张，胡椒十斗，腰刀二十六口，顺刀二十口，苏木二百斤，大纸千卷，小纸千五百卷，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四十领，白苎布二百匹，各色绵绸二千匹，各色细麻布四百匹，各色细布万匹，布千四百匹，米万包。”⑲

朝鲜国王李倧上书皇太极，表示接受条款，并公开表示：“自（崇德二年）正月三十日以前则为明朝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⑳与此同时，皇太极谕告李倧：“江华岛已克，家室无恙，速遵前诏，出城来见。”㉑李倧闻听此信，不再徘徊城中，于三十日出南汉山城，到清军大营投降。皇太极在汉江东岸三田渡筑坛，架设黄幄，正式定盟，确立了清与李氏朝鲜的君臣关系。此役历时整两月。二月二日，皇太极下令班师，李倧率群臣出王京十里跪送。

崇德二年（1637）五月，清军攻皮岛，朝鲜调战船50艘助战，皮岛被攻陷。自此，朝鲜由明朝的属国变成了清朝的属国。

注　释

①《圣武记》卷六，第255—256页。

②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二一。

③《李朝实录》仁祖，卷一四，第351页。

④《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丙子。

⑤满语“勇士”。

⑥⑦⑧《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正月辛巳。

⑨《李朝实录》仁祖，卷一五，第366页。

⑩⑪《清太宗实录》卷二，天聪元年三月乙酉。

⑫《圣武记》卷六，第257页。

⑬《清太宗实录》卷一三，天聪七年二月甲申。

⑭⑮《圣武记》卷六，第257页。

⑯⑰《李朝实录》仁祖，卷三二，第163—164页。

⑱《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元年，辽大历史系印本。

⑲《清太宗实录》卷三三，崇德二年正月戊辰。

⑳（朝鲜）郑昌顺等编：《同文汇考》别编卷四，《陈民间讹传征兵奏》（崇德年九月二十日）。

㉑《圣武记》卷六，第259页。

清（前期）

袭掠明畿辅

在皇太极统治时期，八旗劲旅曾四次取道蒙古驻地，突破长城诸口，袭掠明畿辅重地。

首次内犯。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九月，皇太极亲率大军沿西辽河而上，进入其支流西喇木伦河及老哈河流域，再沿滦河南下，取道蒙古喀喇沁部，插入长城诸口——龙井关、大安口、洪山口。十月十六日，皇太极在突破长城诸口后，迅速攻克遵化、三河、顺义、通州（今通县），兵临北京城下。

明廷得悉皇太极突破长城防线，立即调大同总兵满桂、宣化府总兵侯世禄、保定总兵刘策等率部勤王，并起用罢官家居的孙承宗，令其火速进京。孙承宗抵京后，自请坐镇通州（当时皇太极的军队已从通州开拔，兵临京师），威慑敌后。蓟辽督师袁崇焕也于十一月初三率骑兵五千入关勤王，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外城①左安门、广渠门。

十一月二十日，皇太极命令代善、济尔哈朗率右翼军进攻德胜门，莽古尔泰、阿巴泰等率左翼军进攻广渠门。德胜门由

满桂、侯世禄等驻守，广渠门由袁崇焕部驻守。在右翼军向德胜门发起攻击时，侯世禄临战率部逃脱，满桂部伤亡惨重。左翼军在向广渠门发起攻击后，遇到顽强抵抗，激战四个时辰之后，败撤二十余里②。

十一月二十三日，皇太极把军队撤至南苑，密行反间，把袁崇焕同皇太极有密约的假情报泄露给被俘获的明牧马厂太监杨某，并纵其逃至京城。十二月初一，明崇祯帝在召见袁崇焕时，将其逮系入狱。十二月初四，袁崇焕所部将士在祖大寿的率领下从驻地开拔，杀出山海关。崇祯帝急令孙承宗出关招抚祖大寿等，通州遂因此失守。

从十二月起，皇太极率军转掠良乡、固安。该月十六日抵达卢沟桥，歼灭明军六千。次日在永定门与明军交战，"阵斩明总兵满桂、孙祖寿、副将、参将、游击等官"③。

翌年三月，皇太极在回师途中攻克永平、滦州、迁安。旋即从冷口出塞，留军五千驻守关内四城——遵化、永平、滦州、迁安。

天聪四年初（明崇祯三年，1630），被孙承宗招抚的祖大寿部重返关内，并于该年五月二十日向滦州发起进攻，历经四昼夜的激战攻克滦州。驻守永平的二贝勒阿敏在得悉滦州失陷后即下令撤军出塞，关内四城得而复失。

再次入犯。

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1636）六月，皇太极遣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统兵征明，于二十七日入边，七月初六，各路兵"会于延庆州"，翌日督兵"入长城"。此次入犯，历时近三个月，相继攻克雕鹗、长安岭、昌平、定县、安肃、安州、宝坻、东安、雄县、顺义、容城、文安十二城。在攻克

昌平时，“合二十旗兵攻之，火炮并发，毁其城楼，城上兵被焚”④，“遂克之”。此次用兵“五十六战皆捷”，“获人畜十八万有奇”⑤。

第三次内犯。

崇德三年（明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⑥、阿巴泰统左翼兵从青山关口以西“边墙缺处毁墙入”；贝勒岳托、杜度⑦统右翼兵从墙子岭、黑峪关、古北口、将军石“分四路入”⑧，大规模伐明。十月底，左、右两翼兵“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即北京）”⑨。左翼军“分兵八道，于山河中间纵兵前进，燕京迤西千里内六府俱已蹂躏”；右翼军“从明燕京，西至山西界，南至山东济南府”⑩。十一月初九，清军攻高阳，罢官家居的孙承宗⑪“率家人拒守”，“明日城破”，孙承宗阖门遇难。

明廷一方面起用原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卢象升率兵勤王，另一方面又派使者与清军秘密议和。勤王的精锐之师——山海关、宁远之兵，俱由监军太监高起潜掌握。卢象升麾下之兵不及两万，且被“闭闉（yīn 因，塞绝意）绝饷”，“食尽力穷”，仅以百姓所募集的“床头斗粟饷军”，总兵王朴“径引兵去”。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及其五千部众在巨鹿嵩水桥一带被清军包围，“环之三匝”。“象升麾兵疾战，呼声震天，自辰迄未（四个时辰，八小时），炮尽矢穷”⑫，徒手击杀，直至全军覆灭。拥兵数万的高起潜驻扎距嵩水桥五十里的鸡泽，却见死不救。

清军旋即移师山东，翌年（崇德四年，明崇祯十二年，1639）正月初二，攻入济南，“德王由枢被执，布政使张秉文死之”⑬。直至该年三月初十，清军才从青山口出塞。此次内

犯“深入二千里，阅五月，下畿内山东七十城”⑭。多尔衮的左翼军“克城三十四座，降者六城，败敌十七阵，俘获人口二十五万七千八百八十”⑮；岳托的右翼军，“共克十九城，降者二城，败敌十六阵，杀其二总督⑯及守备以上官共百余员。生擒一亲王、一郡王、一奉国将军，俘获人口二十万四千四百二十有三，金四千三十九两，银九十七万七千四百六两”⑰。

最后一次内犯。

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皇太极派贝勒阿巴泰、内大臣图尔格统满洲、蒙古、汉军八旗征明，亲送至郊外。

清军兵分两路，左翼军因行军路线“地阔路平，便于行兵”，于十一月初五“从界岭口毁边墙而入”。适值“大同兵二千五百人往守山海关，行粮缺乏，在抬头营驻扎”，双方展开激战，被清军击败，“获马四百三十三匹”。右翼军“前进地隘路险，俱单骑而行”。途中又遇石城关阻拦。该关“木栏三层，两层用石围砌，内有大炮四位，步兵五十人，三处伏藏地雷”。“遂遣前锋兵同汉军每旗兵五名、骁骑校一名、护军四十名，乘夜拆毁”，“取其地雷，守关敌兵不及施炮”，俱被清军所歼。十一月初八右翼兵抵达黄崖口，“从山路，攻克长城”，“击败长城上敌兵”⑱。初十兵临蓟州，时“蓟州各乡民俱窜入山”，“蓟州总兵白腾蛟”闻清军入边，“率马兵三百、步兵七百前往桃林关去。蓟州城内止有参将三员、招募新兵二千，俱不堪战”。蓟州总兵得悉清军逼临蓟州，又自桃林关返回，与马兰峪总兵白广恩等在蓟州城外与清军交战，被击败。清军生擒明“参将一员，阵斩游击三员，获马六百三十六匹。其余官员，或死或逃”⑲，遂克蓟州。

蓟州失守，明京师戒严，十一月十二日，“征诸镇入援”。闰十一月初六，清军南下，“畿南郡邑多不守”，十二月初，清兵“趋曹、濮，山东州县相继下，鲁王朱以派自杀”[20]。滋阳王、安丘郡王、阳信郡王以及乐陵郡王相继在藩府被清军俘获。翌年三月，清军回师，取道怀柔出塞。明军于螺山邀击之。明“总兵官张登科、和应荐败殁，八镇兵皆溃”[21]。

清军此次入犯，袭扰明畿辅地区达半年，“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共八十八城，归顺者六城，击败敌兵三十九处，所获黄金万有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银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有奇，珍珠四千四百四十两，各色缎共二万二千二百三十四，缎衣、裘衣共有三千八百四十领，貂、狐、豹、虎等皮五百有奇，整角及角面千有一百六十副，俘获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名口，驼、马、骡、牛、驴、羊共三十二万一千有奇。外有发窖银两，剖为三分，以一分给赏将士，其众兵私获财物，莫可算数”[22]。

在明军还占据山海关的情况下，入犯明畿辅的清军不可能保有所克城池，皇太极之所以四次大规模遣军入犯即在于消耗明廷的实力，用皇太极的话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砍之，则大树自仆。”[23]

注　释

①北京外城建于嘉靖三十二年，时值俺答入犯之后。外城与京城南垣相接建有七座城门，自东至西是东便门、广渠门、左安门、永定门、右安门、广安门、西便门。

②在袁崇焕部与左翼军交战时，孙承宗从通州派兵三千掩杀敌后，打乱其阵脚。

③《清太宗实录》卷六。

④《清太宗实录》卷三一。

⑤《东华录》卷三。

⑥豪格系皇太极长子。

⑦杜度系褚英长子。

⑧《东华录》卷三。

⑨⑩《清太宗实录》卷四五。

⑪崇祯四年（1631）大凌河失陷后，孙承宗再次被罢免。

⑫《明史·卢象升传》。

⑬⑭《明史·庄烈帝纪》。

⑮《清太宗实录》卷四五。

⑯明死难总督除卢象升外，还有吴阿衡。

⑰⑱⑲《清太宗实录》卷六三。

⑳㉑《明史·庄烈帝纪》。

㉒《清太宗实录》卷六四。

㉓《东华录》卷四。

清（前期）

明清鼎革

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 年 4 月 25 日），李自成所率领的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史称甲申之变。

吴三桂开关降清。

山海关位于辽西走廊与华北平原的交界处，北依燕山，南濒渤海，是东北进入华北的门户。山海关坐西朝东，建有四座城门，东门曰镇东，西门曰迎恩，南门曰望海，北门曰威远。东、西两座关门沟通关内与关外，南北两门连接着长城，东门以外即是关外。作为关门的第一道屏障，是东门外的瓮城以及瓮城之外的东罗城。明朝初年，大将徐达奉命在北齐长城故址的基础上督修东起山海关、西到嘉峪关的明长城，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偷袭，在长城入海处构筑宁海城。明中叶，戚继光又将长城向大海延伸。经有明一代的修缮、加固，山海关的攻防能力居九边②之首。

清帝国的创建者皇太极在所统治的十七年（1626 年 10 月至 1643 年 9 月）始终把夺取山海关作为当务之急。清军发动

的松、锦大战以及对松山、锦州、塔山、杏山的攻占即出于夺取关门的战略需要。诚如皇太极对臣下所言："今不取关外四城，岂能克山海关乎?!"③在占领锦州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皇太极曾两次令祖大寿给负责山海关、宁远城防的吴三桂修书，劝其举关归降。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十九日，皇太极亲自致函吴三桂，劝其审时度势，早作裁决，该信全文如下：

"大清国皇帝敕谕吴大将军：尔遣使遗尔舅祖总兵书，朕已洞悉。将军之心，犹豫未决，朕恐将军失此机会，殊可惜耳。

我国自兴师征明以来，攻城略地，历有年所，明之将士至今有能立功名、保身家、全忠义者乎？非阵亡于我军，即受戮于尔主。军机一失，峻法随之，良将劲兵，殆将尽失。将军知此，何为昧于从事，蹈覆车之辙哉！

祖总兵初不携其妻子来归，今悔之无及，料将军亦所知悉。当祖总兵被围锦州时，明以各省镇兵，倾国来援，一朝覆败，锦州、松山、杏山、塔山俱已失守。

今我军围困宁远，不知更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立功名，傥我国蒙天眷佑，南北两都，皆为我有，蕞（zuì 最）尔（蕞尔，小的）宁远岂能独立乎！逮至糗粮罄绝，阽（diàn 店，临近之意）危待毙之际，将军悔不可追矣。此非朕自为矜诩，实至论也。我国原以武力精强、言词谦逊者为贵，若徒为大言，又何益于胜负之数哉！将军试思之。"④

崇祯十七年三月初一，宁武陷落，李自成从晋北直逼京师。三月初五明廷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令其率关宁之师入卫。

在此期间祖大寿与养子祖可法以及洪承畴等纷纷致信吴三桂，劝其弃明降清，吴三桂仍“犹豫未决”。直至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得悉占领北京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拷掠其父吴襄、夺爱妾陈圆圆，才遣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持书乞师于清，“泣血求助”，建议清廷“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惟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⑤。

四月十五日，清摄政王多尔衮⑥接到吴三桂请兵书信，即刻复函，劝其“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⑦。在此同时，多尔衮遣人急赴锦州，传谕汉军携大炮奔赴山海关。

四月十九日，李自成率二十万大军抵达山海关，讨伐拥兵四万的吴三桂。大顺军将山海关包围，并发起猛攻，自辰时至午时，激战三个时辰。四月二十日清军抵连山（今辽宁锦西），吴三桂遣郭云龙等再赴清军营地乞师，请多尔衮“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攻”李自成部。多尔衮率清军日夜兼程，急行军二百四十里，于二十一日夜抵达距山海关十里的欢喜岭。翌日凌晨，吴三桂从山海关突围，驰入清营，剃发称臣，歃血为盟，多尔衮令其部“以白布系肩为号”，避免交战时被误杀，“语毕，令之先行”⑧。吴三桂重返山海关后，开关迎降，清军兵不血刃即占领这座“天下第一关”。

李自成一败再败。

大顺军列阵“自北山亘海”。“摄政王多尔衮”，惟恐吴三桂有诈，命吴三桂起兵再战，“以观三桂之诚伪，一以觇（chān 搀，俗读占，偷看之意）贼兵之强弱”⑨。

吴三桂自清营返回后，自简“锐卒搏击，杀贼数千人”，

"围开复合，战良久"⑩。待至午时"大风扬尘，咫尺不见"⑪"沙石飞走"，多尔衮遂传集诸王贝勒"对贼阵尾，鳞次布列"，"各对阵奋击"⑫。

清军"从吴三桂阵后突击，冲贼中坚，万马腾跃，飞矢雨集"⑬。李自成对于吴三桂与清结盟、剃发称臣一无所知，正在一寺旁的山冈上观战，经寺庙僧人介绍始知"此非三桂兵，乃东兵也"⑭，李自成"急策马下冈走"。

在吴三桂与清军的攻击下，李自成部败归京师。溃兵"自相践踏，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沟水尽赤"，"遗弃辎重不可胜计"⑮。四月二十二日，李自成返回北京，吴三桂所部亦尾随而至。"自成合一十八营兵拒战，三桂连拔其八，斩首二万"⑯。

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从北京撤退，出阜成门而西奔。"吴三桂知贼将西窜，先设疑兵于西山，密取酒罂（yīng英，大腹小口的瓶子）数千，实以石灰"，夜埋阜成门外大道上，"覆以浮土，贼万马并驰而践罂，皆穿马足，惊踣（buó搏，跌倒之意），后骑相压，石灰眯目不可视，疑兵远噪以惊之，贼阵大乱"，"尽弃其辎重、妇女，自卢沟桥至固安百里，盔甲衣服盈路，贼兵散去者又数万"⑰。李自成遂奔保定，走真定，"西逾故关，入山西"⑱。

迁都北京。

五月初二，多尔衮率清军由朝阳门入北京"时大内尽为贼焚，惟太庙及武英殿尚存"⑲，多尔衮居武英殿议事。

为了赢得前明官员及汉族士人对清政权的支持，摄政王多尔衮于五月初四传谕为崇祯帝发丧，"特令举国挂孝三日，以尽君父之情。仍令太常、礼部等衙门，尊以天子之礼，葬于原

拟之圹（kuàng矿，墓穴之意）”。“自初六日始，设先帝、后位于帝王庙，合京臣民哭临三日”⑳。旋又下达以原官录用前明内阁、六部、都察院官员的命令。

六月十一日，多尔衮“以燕京势踞形胜”、“有明建都之所”，决定“迁都于此，以定天下”，并派遣官员前往沈阳迎顺治帝进京。六月十八日，又传谕京城内外军民，重申建都燕京，“以计安民生”。摄政王在谕令中指出：“人民经乱离之后，警疑未定，传布讹言最可骇疑。闻有讹传七八月间东迁者。”“燕京乃定鼎之地，何故不建都于此，而又欲东移？”“故特遍行晓示，务使知我国家安邦抚民至意。”㉑所谓讹传，并非无稽之谈，随同多尔衮入关的英亲王阿济格就反对迁都北京，主张“乘此兵威，大肆屠戮，留置诸王以镇燕都，而大兵则或还守沈阳，或退保山海”㉒。多尔衮则以“先皇帝曾言，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为据，力主迁都。

八月二十日，年仅六岁的顺治帝在郑亲王济尔哈朗的护卫下从沈阳启程，九月十九日至北京，由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举行定鼎登极礼”，“告天即位”㉓。

摄政王多尔衮抓住甲申之变后的有利局势，大举入关，定鼎燕京，揭开清王朝历史上新的一页——继明而立、入主中原。

注　释

①按照干支纪年法，崇祯十七年为甲申年。

②明在北部设置的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榆林）、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简称九边。

③《东华录》卷四。

④《清太宗实录》卷六四。

⑤《清世祖实录》卷一七。

⑥皇太极于崇德八年八月初八去世，经诸王会议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即位，自明年起改元顺治，并以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辅弼幼主，暂行摄政。

⑦《清世祖实录》卷一七。

⑧《清世祖实录》卷四。

⑨⑩《爝火录》卷二。

⑪⑫《清世祖实录》卷四。

⑬《爝火录》卷二。

⑭关外亦称关东，故时人称清兵为东兵。

⑮⑯⑰《爝火录》卷二。

⑱⑲⑳《爝火录》卷三。

㉑《清世祖实录》卷五。

㉒《朝鲜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八。

㉓《清世祖实录》卷九。

清（前期）

郑氏经营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中叶以后因政治腐败、内忧外患频仍，遂无暇顾及海疆，致使台湾被荷兰、西班牙殖民者占领。面对殖民者的残暴统治，郑芝龙、郑成功、郑经祖孙三代经营台湾、收复台湾、治理并开发台湾，维护了祖国领土的统一，挫败了殖民者以台湾为据点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扩张的野心。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殖民侵略。

发生在1579年（明万历七年）的尼德兰①革命，使荷兰赢得独立并跨入资本主义阶段。掠夺亚洲的荷兰东印度公司②、掠夺美洲的荷兰西印度公司③相继成立，既垄断对外贸易，又拥有武装，有宣战及构和之权。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武装入侵澎湖列岛，被明军击退；明天启二年（1622）荷兰殖民者调集十七艘战船再次入侵澎湖，被明军击退后，又转往台湾，并在台湾登陆，建立殖民据点台湾城（今台南一带）；三年后（1625）向台湾城北面新港社一带蚕食，以十五匹粗布骗取赤嵌一带，

进而占领蚊港，控制台湾南部。明崇祯十五年（1642）荷兰殖民地击败占据台湾北部基隆、淡水的西班牙殖民者，占领整个台湾。

荷兰殖民者对台湾的高山族、汉族人民进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台湾土地不论已垦未垦，全部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所占有，向耕种者课以重租，每甲土地（约十一亩）每年上田交租十八石，中田交租十五石六斗，下田交租亦高达十二石二斗。除田租外，还要交纳人头税，凡七岁以上不论男女均要纳税。此外捕鱼、狩猎都要按月纳税，甚至连狩猎所需的网、陷阱都要交纳附加税④。

在荷兰殖民者入侵过程中，目加琉湾社人一再进行抵抗，清顺治九年（1652）爆发郭怀一⑤所领导的起义，此次起义坚持了半个月之久。

郑芝龙对台湾的经营。

郑芝龙系福建南安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其父郑绍祖任泉州库吏。因家境贫寒，郑芝龙十几岁时即去澳门为人佣工，入天主教，教名为尼古拉斯·加斯巴德⑥，未几又到台湾谋生，受雇于荷兰人。此后不久郑芝龙去日本经商，在平户（今日本长崎一带）娶妻生子，往来于台湾和日本之间。

明天启四年（1624）郑芝龙因经常受到海盗袭击，与海盗颜振泉结为兄弟，“流入海岛”，在荷兰殖民者统治的薄弱地区，拥众自保，“纵横海上”⑦。颜振泉死后，郑芝龙被推为首领。天启六年（1626）福建接连遭灾，郑芝龙将数万饥民运至台湾垦荒。

在明军与殖民者夹缝中的郑芝龙，于崇祯元年（1628）接受明廷招抚，受任游击。郑芝龙在为官后，依旧经营海外贸

易，同海盗保持联系。郑芝龙在原籍所构筑的城堡直达海上，“海梢直通卧内，可泊船”⑧。

郑成功同荷兰殖民者的交涉。

郑成功系郑芝龙长子，原名郑森，明天启四年（1624）生于日本平户，七岁回到福建南安，十五岁中禀生，清军占领南京之后，郑芝龙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皇帝位（清顺治二年闰六月，1645）年号隆武。隆武帝朱聿键赐郑森国姓，名成功⑨，“命提督禁旅，以驸马都尉体统行事”，未几又封郑成功为忠孝伯。清顺治三年（1646）八月，清军由浙入闽，郑芝龙降清，被清军挟至北京。郑成功在郑芝龙降清后，起兵南安（顺治三年十二月初一），以金门、厦门为基地坚持抗清，控制着闽、浙、粤海域。

顺治十二年（1655），郑成功“传示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⑩荷兰方面曾遣使广东清巡抚衙门以及平南王、靖南王，请“通贡贸易”⑪。在遭到清廷拒绝后⑫，新任驻台湾长官弗里德里克·揆一于顺治十四年（1657）遣使厦门，以每年“输饷五千两、箭杯十万支、硫磺千担”⑬作为同郑氏恢复贸易的条件，当时郑成功正拟大举北伐，遂暂时同荷兰殖民者恢复贸易。

顺治十七年春（1660）揆一遣使厦门，以“议贡”为词，窥测虚实⑭，郑成功“陈兵自镇南关至院东，依山布陈，凡十余里，甲兵数万”，“皆衣金龙甲，军威甚盛，夷人震慑”⑮。该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战船抵台湾，协助防务。翌年初，荷兰殖民者命令台湾居民迁入城堡居住，焚毁沿海地区的房屋、粮食，禁止渔民出海，“击毁或截捕”船只⑯，以期切

断台湾人民对郑成功的支持。

郑成功东渡台湾。

早在顺治十六年（1659）在台湾担任翻译的何斌就曾力劝郑成功收复台湾，并把标有荷兰在台湾的军力配备的地图献给郑成功。

顺治十七年（1660）初，北伐失利的郑成功拟派兵收复台湾。未几，清廷派大将军达素统兵进剿福建。该年四月，清、郑在漳州海门展开大战，因清军不谙水性，大败而归，海水为之一赤。郑成功依然有效地控制着从闽安到泉州的七百里海疆。

顺治十八年（1661）初，郑成功再次酝酿收复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士家眷”，“并可生聚教训也”⑰。

顺治十八年二月初，郑成功令长子郑经留守厦门，自率大军抵金门，候风讯横渡台湾海峡。三月二十二日，郑成功率战舰近千，将士二万五千从金门出师，次日抵澎湖列岛。三月十七日抵柑桔屿，突遇飓风，“阻风乏粮”，遂令“户部官就澎湖三十六屿微收行粮”，“索取二日，不足大师一餐之用”。“时风暴未息，风雨阴雾”，管中军船的蔡翼、陈广等请“暂候风雨”，郑成功谕以“冰坚可渡”，下令开船。

四月初一黎明，郑成功率船队至“鹿耳门线外”，“是日水涨数尺”，顺利登陆⑱。郑成功令“小哨”“登岸踏勘营地”，“午后，大鯮船齐进鹿耳门”，“登岸扎营”⑲。据《台湾外纪》所载，郑成功“密令何斌坐船头，按图迂回，教探水者点篙，徐徐照应”，仅一个时辰即完成登陆。

郑成功收复台湾。

当时荷兰在台湾城守军千余，停泊在台湾城附近的战船二

艘、快艇四艘、帆船两只。郑成功派战船六十艘将荷兰战船包围，击沉其主力舰一艘，焚烧一艘，余船逃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郑军水师控制台湾周围海面。

该年四月中旬，郑军包围台湾城。揆一以年输税若干万、土货若干以及“送劳师银十万两”诱郑成功退军。郑成功在给揆一的信中明确言道：“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⑳八月十九，郑军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派出的援军㉑，经过一个小时的激战，击碎战船一艘，火焚战船一艘，俘获快艇三艘，其余船只逃归巴达维亚。十一月，郑军在围困台湾城七个月期间内增建三座炮台，配备二十八门大炮，并于十二月初六发起炮击，殖民者所驻守的乌特利支堡陷落。

十二月十三日（1662 年 2 月 1 日）揆一代表荷兰殖民者在投降书上签字，台湾在沦为殖民地三十八年后，又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郑氏对台湾的治理与开发。

郑成功在台湾设一府二县，委任部将杨朝栋为承天府尹，庄文烈为天兴县事，祝敬知为万年县事，奉南明永历正朔。

郑成功抵达台湾后，除令一部分将士围困台湾城、封锁台湾海面外，其余士兵均令垦荒，按镇分配土地，自建茅屋草舍，“有警则荷戈以战，无警则负耒以耕”㉒。台湾北路的新港、竹仔堑，南路的凤山、观音山一带的荒地最先被开垦，既解决了数万将士的粮食供应，又促进台湾地区的开发。

为了确保高山族、汉族人民的耕地不被侵占，郑成功严禁各镇将士“搅扰土社”，“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不准纷争及混圈土民及百姓现耕田地”㉓。

在驱逐荷兰殖民者后，跟随郑成功东渡的数万士兵及其眷属全部投入屯垦，弥补了台湾劳动力的不足，大批沃土得到开发。从大陆所带去的铁制农具以及牛耕技术亦促进了高山族地区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郑成功、郑经的治理下，台湾经济迅速发展。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收复台湾时㉔，高山族所聚集的地区"勤稼穑，务蓄积，比户殷富"㉕，"嘉木阴森，屋宇完结，不减内地村落"㉖。

注 释

①尼德兰的版图包括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及法国北部，尼德兰一词为低地之意。

②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602年（明万历三十年）成立，先后占领爪哇、锡兰、马六甲、马鲁加群岛、台湾。1798年（清嘉庆三年）该公司因英、法的崛起而解散。

③荷兰西印度公司成立于1621年，1674年解体。

④一张网每月交纳荷币一里尔，一个陷阱每月交纳荷币十五里尔。

⑤郭怀一原为郑芝龙部下，清顺治三年（1646）郑芝龙降清后，郭怀一流亡台湾。

⑥天主教徒称郑芝龙为尼古拉斯·一官，一官系郑芝龙小名。

⑦《从征实录》。

⑧《爝火录》卷一二。

⑨郑成功亦名朱成功，时人称之"国姓爷"。

⑩《从征实录》。

⑪《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26页。

⑫顺治十三年八月（1656），清廷只准荷兰"八年一贡"，拒绝建立贸易关系。

⑬《从征实录》。

⑭顺治十六年七月的江宁之役，郑成功失利，败归厦门。

⑮《海上见闻录》卷二。

⑯《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上。西方殖民者称台湾为“福摩萨”，意为美丽之岛。

⑰《从征实录》。

⑱鹿耳门港“颇浅”，大船不能进港，故荷兰殖民者不曾设防。

⑲《从征实录》。

⑳《台湾通史》。

㉑援军由“法院副院长兼台湾司令官及海军统帅雅科布、考乌率领十二只战斗快艇和双桅货船”组成，“船上载有七百二十五名士兵”。(《巴达维亚城日志》1661年7月5日)

㉒《台湾外纪》卷一一。

㉓《从征实录》。

㉔清军收复台湾时，郑经已于两年前（1681）去世，其子郑克塽时年十一岁。康熙二十二年清军攻占澎湖列岛后，郑克塽不战而降。

㉕《稗海纪游》。

㉖《采硫日记》。

清（前期）

一 统 海 内

清王朝在定鼎燕京之后，面临的敌对势力有：相继建立的南明福王①政权、唐王②政权、鲁王③政权、桂王④政权；败撤中的李自成⑤、盘踞成都的张献忠⑥以及此伏彼起的各地抗清义军⑦。在经历近二十年的征战之后（1644—1662），清王朝才迎来海内一统。

攻陷扬州。

顺治元年（1644）十月，清廷任命豫亲王多铎⑧为定国大将军，率军南下，征讨在南京建立的南明福王政权，一举荡平江南。

时南明福王政权在江北设置四镇，以总兵刘泽清辖淮、海，驻淮北；高杰辖徐、泗，驻泗州；刘良佐辖凤、寿，驻临淮；黄得功辖滁、和，驻庐州；并以大学士史可法坐镇扬州，节制四镇。

是年十一月，清军渡过黄河，进逼归德、徐州，史可法调高杰率部北上，趋归德，牵制清军。翌年正月中旬，高杰在睢州被已与清军有秘约的南明睢州总兵许定国诱杀⑨。未几，驻

防湖北的南明宁南侯左良玉以“清君侧”为名，挥军顺流而下⑩，把持南明朝政的马士英⑪调黄得功、刘泽清、刘良佐三镇兵入卫。因而当清军四月十四日渡淮之时，南明以四镇为核心的江北防线已不复存在。

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四月十八日，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拒绝多铎的劝降，但其部下——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岐凤却于二十二日率所部降清，扬州防守益单。

四月二十三日清军把大炮从泗州运至扬州，并于次日轰击城垣。四月二十五日，在经历三天炮击后扬州陷落。扬州守兵坚持巷战，直至全部遇难。史可法自杀未遂，被清军抓获，不屈而死。清军攻入扬州后，大事屠戮十天，始宣布封刀，被杀百姓多达八十余万⑫。

占领南京。

五月初二多铎率清军从扬州出发，抵达瓜洲，“谋渡江”。多铎“令军中每人具案（即长形桌子）二张，火十把”，又令“众兵掠民间台儿及扫帚，将帚系缚台儿足上”。初八夜，大雾，清军以备好的几案、扫帚“沃油燃火”，“放入江中，”顺流而下，火光彻天”⑬，以为疑兵之计。清军主力已抵镇江，“从七里港渡江”，翌日清晨“尽抵南岸”⑭。南明军队“一时皆溃，武弁各卸甲鼠窜”⑮。

五月初十夜半，福王得悉清军渡江“从通济门出奔太平府”，投奔南明诚意伯刘孔昭，刘孔昭“闭门不纳”，朱由崧又逃至芜湖投奔黄得功。五月十一，福王政权的拥立者马士英“走浙江”，南京城一片混乱。

五月十五，多铎率清军开进南京，弘光朝廷的文臣武将数

百人，马步兵二十万俱投降。清军入城时，“正大雨淋漓”，南明官员“跪道旁”，“无一人敢稍后者”⑯。

五月二十五日清军在芜湖击败黄得功⑰，生擒福王朱由崧。

进军江阴。

南京陷落后，江阴生员聚于明伦堂⑱，倡言抗清，推举原典史阎应元主持其事。遂于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一，拘拿清廷派至江阴的县令，“四城内外响应者数万人”。

降将刘良佐引清兵十万包围江阴。阎应元“制火球、火箭之类”，“从城上投下”，“敌皆畏之”⑲。清军破松江后，以“马步二十万尽来江上”，“城下大炮日增，间五六尺地一，其弹飞如雹”。江阴在被围困的八十一天消灭清军七万五千。

八月二十一日夜，江阴城垣被轰坍，“城遂陷”。“清兵俱集城上，恐有伏”，至次日午后“见城中大沸，遂下，纵兵大杀”，“杀至夜始收兵，复上城。及天明，下城大杀，凡三日”，“尸骸满道，死者如市”⑳，有一条三十余丈的河沟，“积尸与桥齐”。阎应元在城破后自杀未遂，被清军杀害。

鲁王、唐王的相继败亡。

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五月，数百清兵渡过钱塘江，鲁王朝廷的拥立者方国安虽拥兵十万，不战自溃，急奔绍兴，挟鲁王南逃㉑。清征南大将军博洛㉒，不到一个月即破义乌、取金华、下衢州、陷严州，直奔由浙入闽的咽喉要道仙霞关。当时驻守仙霞关的系南明忠孝伯郑成功。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是唐王政权的拥立者，在清军压境的情况下，郑芝龙决意降清。为了表明降清之意，郑芝龙从接到洪承畴劝降信后，即断绝仙霞关驻军的粮饷，追至该年八月断饷已三个月的郑成功

部，从驻地开拔，回福州索饷，清军遂从容进入福建。

该年八月唐王朱聿键拟经江西进入湖北，投奔坚持抗清的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行至汀州（今福建省长汀）被清军抓获（八月二十九日）。

西充凤凰山之战。

顺治三年初（1646），清廷任命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军入川，讨伐张献忠。

该年七月，张献忠得悉清军由陕入川，即从成都开拔，拟由川入陕，绕到清军背后，避敌锋芒，十一月张献忠部已进抵西充凤凰山。

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献忠部下——驻守保宁（今四川省阆中）的刘进忠降清，引导清军直奔张献忠六十万军队的营地。豪格率部日夜兼程，于次日清晨抵达西充凤凰山。时值大雾迷茫，直至清军逼近营门，张献忠才仓皇应变，未及披甲，仅腰插三矢即冲出营门，旋即中箭身亡。张献忠养子孙可望、李定国等率残部退入川南，未几即由川入黔。豪格亦穷追不舍，尾随孙可望、李定国之后兵进贵州，直至翌年八月豪格才率部从遵义班师。

攻克南昌。

顺治五年正月二十七（1648年2月20日），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副将王得仁等举兵反清㉓，遣使向南明桂王政权称臣。九江、无为、庐江等地纷纷响应。同年四月初十，广东提督李成栋㉔叛应金声桓，改奉南明永历正朔。

金声桓等囿于“宁庶人起兵不破赣，卒贻后患”㉕的教训，派遣重兵南下赣州，拒不采纳顺江而下，或取江南、或取武昌、汉口的建议㉖。该年三月，清廷任命满洲正黄旗固山额

真谭泰为征南大将军，统兵征江西。同年五月，清军进抵九江、南康、饶州等地，直逼南昌。久攻赣州不下的金声桓立即撤军，返回南昌，南昌遂为孤城。

顺治五年八月，南明永历朝廷命李成栋率所部二十万赴南昌，援救被围困两个月的金声桓。李成栋部于十月底抵达赣州，在“城外结营”，遭城内清军夜袭，大败，“二十万士卒器械悉委弃赣州府城下”。翌年二月在信丰再次遭到清军突袭，“满营溃乱”[27]，李成栋在突围时溺水而死。

顺治六年（1649）正月，清军大炮运至南昌城下，粮尽援绝的南昌在被围困六个月后，被大炮攻陷，时为正月十九日午时。金声桓投水而死，麾下将士大多在巷战中阵亡。

围困大同。

顺治五年十二月初三（1649年1月15日）清大同总兵姜瓖[28]举兵叛变，兵进宁武、保德、榆林、雁门关、代州、五台等地，“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该年十一月，清廷因“喀尔喀部落二楚虎尔行猎”，逼临清边界，遣英亲王阿济格、端重郡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29]、贝子拜音图、公傅勒赫、岳乐等“统兵戍守大同”[30]。阿济格遂于十二月初四包围大同，“请发红衣炮以为攻城之用”。

翌年二月十四，摄政王多尔衮“统内外官兵往征大同”[31]。多尔衮遣人“薄城”劝降，姜瓖在给回启中写道：“臣自甲申年五月间，闻摄政王驾入燕京，不远千里，率领边塞兵民归顺清朝……五年以来殚心毕力，统众弹压，未有毫发罪过，臣可谓克尽厥职矣。但上不真诚以待，不惟臣一人未蒙升赏，而效忠归顺之民亦阽危已极。且选出各官又肆行凌虐，民益难堪。顷者英王师至，催办粮草，绅士军民苦不可当，动辄

欲行杀戮……王纵开诚肆赦，谁敢違信，是惟更降一谕，明指以全活之方。若不开恩，臣惟率众以俟，无他想望矣。”㉜

因豫亲王多铎出痘，多尔衮抵大同不久即班师回京㉝。七月初一多尔衮率师再征大同。多尔衮令巽亲王满达海㉞、谦郡王瓦克达㉟统兵征宁武、朔州等地。七月十四，多尔衮行至阿鲁席巴尔台，“罢大同之行”，回京后命英亲王阿济格、贝子巩阿岱等统兵往大同，在此期间进军山西的博洛捷报频传，先后克清原、文水、交城、平阳、汾州等地。姜瓖所据守的大同益发孤危。

顺治六年八月二十八，姜瓖部将杨振威等二十三人斩姜瓖及其兄弟姜琳、姜有光开城降清，被围困近九个月的大同陷落。除杨振威等二十三人的家属及下属兵丁六百余人外，其余军民“尽行诛之”㊱。

桂林战守。

顺治六年（南明永历三年，1649）六月，清廷“遣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㊲出鄱阳，逾梅岭入广东；而定南王孔有德则渡洞庭，溯湃河入广西，时称三王征广”㊳。翌年正月，“清兵陷南雄、韶州”，桂王朱由榔从肇庆逃往梧州。十月，清军攻大榕江，南明将领胡一青、赵印选“迎战失利，弃城走”㊴，严关失守。驻扎在桂林的南明各路兵马纷纷开拔，“城中竟为一空矣”㊵。

桂林留守、南明大学士瞿式耜、侍郎张同敞被孔有德杀害，时为顺治七年十一月十八日（1650年12月10日）。孔有德遂坐镇桂林，遣军追剿南明永历政权。

顺治九年（南明永历六年，1652）李定国兵进湖南㊶，克武岗，逼宝庆。驻守宝庆的清续顺公沈永忠退守湘潭。时孔有

德主力分守南宁、柳州、梧州、庆远，桂林兵力空弱。李定国遂趋全州，取严关，进逼桂林，并在大榕江击败率军截堵的孔有德，孔有德大败而归，退守桂林。该年七月初二李定国兵临桂林。李定国以象阵⑫攻城，两天后城破，孔有德自焚而死。

李定国乘胜兵进广西，广西所属十一个府，只有梧州府由孔有德部将马雄坚守。清廷遂于七月十五任命敬谨亲王尼堪⑬为定远大将军，率精兵十五万往征湖南、广西。十一月二十三日行至湖南衡山遇伏，尼堪被李定国部斩于阵。清军接连失利，至有弃滇、黔、粤、桂、川、湘、赣等省与南明朝廷议和之意。

底定云贵。

顺治十年（1653）十月，清廷任命洪承畴为经略，总督湖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军务，兼理粮饷，以对付李定国、孙可望及其所支持的永历政权，扭转因孔有德、尼堪败亡所酿成的不利局面。

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孙可望率军十四万袭击李定国，兵败后逃至长沙，向洪承畴投降，开列云贵地形图为进见之礼。清廷得悉南明在云贵的兵力部署后，立即任命信郡王多尼为安远靖寇大将军，远征云贵。翌年四月清军已相继攻陷贵阳、遵义。李定国因孙可望旧部王自奇、关有才等在滇西的永昌为叛，自率兵讨之，无暇东顾入黔的清军。

顺治十五年（1658）十月，清军在占领贵州后，兵分三路向云南挺进，多尼自贵阳出兵取道关岭至云南省会昆明；吴三桂自遵义出兵，经七星关入昆明；卓布泰自永顺出发经安隆、都匀趋昆明；洪承畴留守贵阳，为三路大军转运粮饷。李定国部将士在与三路清军交战中伤亡惨重，十余年所积精锐丧失殆

尽。

十二月十五日桂王朱由榔从昆明撤出，逃至永昌，翌年初又自永昌逃至腾越。二月十八日，清军占领永昌。二十一日“扎筏渡潞江㊹，江面不宽，水气甚恶”，“过江二十里有磨盘山㊺”。磨盘山系通过腾越的必经之路，“所入之路坎陡，箐深曲曲，仅容单马”。李定国“亲自督兵将”，“筑栅数道，左右设伏”㊻，俟敌军入伏后，发起攻击。

为追击桂王，吴三桂、卓布泰等在渡潞江后，即督军穿越磨盘山。当万余清军进入埋伏后，南明大理寺卿卢桂生降清。吴三桂得悉李定国设伏，急令后撤，炮击伏兵。李定国部也开炮还击，李定国所设伏兵六千以及来不及撤出的数千清兵全部在激战中丧生。此战是清军入黔、滇以来损失最为严重的一战。

二十二日夜，李定国率残部撤退。桂王朱由榔得悉败讯，也自腾越出奔，抵中缅边界的铜壁关，二十九日逾关入缅，南明永历政权名存实亡。

江宁之役。

为了减轻永历朝廷的军事压力，郑成功联络张煌言于顺治十六年（南明永历十三年，1659）五月大举北伐㊼。郑成功部从吴淞口入长江，溯江而上，连克瓜洲、镇江、兵临江宁（即南京）。张煌言部进军安徽，相继攻陷仪真、江浦、芜湖，大江南北有四府（太平、宁国、池州、徽州）、三州（广德、无为、和州）、二十四县望风迎降。

江宁系总督驻防之地，清两江总督郎廷佐㊽在郑军抵达江宁之前，“将城外房屋悉行烧拆，近城十里居民俱令入城”，城外木柴“卖不完者俱火之”。时江宁驻防八旗二千，从贵州回

京途经江宁的八旗兵丁有半个旗，不足一千，共计三千左右。七月二十二日，郑成功率水、陆军十余万、“拥战舰数千”㊾抵达江宁，且在城外连扎八十三营，“安设大炮地雷，密布云梯”。郎廷佐遣人与郑成功接洽，“乞宽三十日之限”而献城㊿，郑成功深信不疑，于是郑成功对江宁围而不攻。

在此期间，奉郎廷佐之命入援的苏松水师总兵梁化凤率兵三千破围入城，其他各路援军一千六百也相继冲入围城。七月二十三日为郑成功诞日，郑军设宴庆祝。郎廷佐乘郑军不备发起突袭，郑军仓皇应战，陆战失利，清军乘乱亦将泊江海舟焚毁，郑军战舰损失过千，遂顺江而下，退回厦门[51]。被清军切断退路的张煌言部，焚舟登岸，且战且退，在围追堵截下几乎全军覆灭[52]。

生擒桂王朱由榔。

桂王入缅后，即被缅甸国王软禁，南明将领白文选、李定国等相继率兵入缅迎桂王，均被阻。

顺治十八年正月，吴三桂遣使传檄缅甸，令缅甸国将桂王朱由榔献给清廷。该年九月，吴三桂“将五万人出南甸、陇川、猛卯，分二万余出姚关”，“十一月，会师木邦”。入缅接驾的白文选“方扼锡箔江”，清军前锋“疾驰三百里”击之，“白文选毁桥走茶山”，又遣军“分道追文选，俾不得窥木邦后路，而大军以筏渡趋缅，以降人为乡导。十二月，抵兰鸠江，缅人遂执永历（即桂王）及其母太后等，并从官各家口献军前”[53]。

翌年三月，吴三桂将桂王押回云南，四月十五日朱由榔及其子在昆明被害。李定国在得悉桂王遇害后忧愤而亡；时为康熙元年（1662）六月二十七日。

康熙元年三月十二日，清帝以“永历既获大勋克集”诏告天下，清王朝终于实现海内一统㉞。

注 释

①福王朱由崧于崇祯十七年五月初一在南京即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②唐王朱聿键于弘光元年（1645）闰六月在福州即位，以本年七月为隆武元年。

③鲁王朱以海于弘光元年闰六月监国绍兴。

④桂王朱由榔于隆武二年（1646）十一月即位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

⑤清顺治二年五月，李自成退入湖北，在通山县九宫山被乡兵所杀，时年三十九岁。

⑥张献忠，陕西米脂人，与李自成同乡。崇祯三年揭竿而起。崇祯十七年八月攻陷成都后建国称帝，以明蜀王府为皇宫，国号“大西”。

⑦顺治二年六月，清廷颁布剃头令后，昆山、江阴、嘉定等地民众纷纷起义，抗击清军。

⑧多铎系努尔哈赤第十五子。

⑨许定国邀高杰人睢州相见，“置酒享杰”，乘其酒醉杀之，降清，时为顺治二年三月。

⑩顺治二年三月初，一自称崇祯太子的少年抵南京，被弘光朝廷逮系，左良玉遂起兵。

⑪马士英原系凤阳总督，因拥立福王即位，总揽朝政。

⑫《扬州十日记》。

⑬⑭⑮《明季南略》卷三四。

⑯《爝火录》卷一O。

⑰黄得功在与左良玉部交战时“伤臂几堕”，带伤迎战清军，被暗箭射中咽喉，自刎而死。

⑱各府、州、县学均设明伦堂，新生入学须到明伦堂拜见学官，学官每月要召集生员到明伦堂诵《卧碑文》。

⑲⑳《明季南略》卷四。

㉑鲁王在张名振、张煌言的拥卫下逃亡海上，在顺治六年袭取舟山，顺治八年清军攻克舟山后，转依郑成功，并于顺治十年自去监国号，康熙元年十一月逝于台湾。

㉒博洛系阿巴泰之子，努尔哈赤之孙。

㉓金声桓、王得仁原系左良玉旧部，顺治二年五月降清。

㉔李成栋原系明徐州总兵，顺治二年四月降清。

㉕宁庶人即宁王朱宸濠。武宗无嗣，宁王欲以己子入承，遂于正德十四年（1519）起兵，一个月后兵败被擒。

㉖取江南可据南京，图谋北伐；取武昌、汉口可与湖北、湖南的何腾蛟互为犄角。

㉗《明季南略》卷一二。

㉘姜瓖原为明大同总兵，崇祯十七年三月投降李自成，五月降清。

㉙硕塞系皇太极第五子。

㉚《清世祖实录》卷四一。

㉛《清世祖实录》卷四二。

㉜《清世祖实录》卷四三。

㉝顺治六年春痘症（天花）流行，该年三月阿济格的两位福晋俱死于天花。

㉞满达海系代善第七子。

㉟瓦克达系代善第四子。

㊱《清世祖实录》卷四六。

㊲耿继茂之父耿仲明与孔有德一起从登州突围，投奔皇太极。

㊳《明季南略》卷一三。

㊴《永历实录》卷一。

㊵《明季南略》卷一三。

㊶张献忠阵亡后，李定国、孙可望率余部撤入云贵一带，休养生息，以云贵为基地坚持抗清。顺治八年十月，桂王朱由榔在清军的追击下逃至云南，投奔孙可望、李定国。

㊷李定国把驯化的大象用来作战。

㊸尼堪系褚英第三子。

㊹潞江即怒江。

㊺磨盘山系横断山支脉。

㊻《明季南略》卷一五。

㊼顺治十五年六月，郑成功率战舰三千、部众十万北伐，行抵羊山，突遇狂风暴雨，三昼夜不息，战舰损失近千，半途而废。

㊽郎廷佐，隶汉军镶黄旗，精通满语，曾任江西巡抚。

㊾《明季南略》卷一五。

㊿郎廷佐以清朝有规定守城三十日而降，罪不及妻子。要求在被围三十天后投降，此说实系缓兵之计。

51顺治十八年五月郑成功从厦门渡海，收复台湾。翌年五月在台湾病逝。

52张煌言只身返回浙江坚持抗清，在天台招募义师。

53《明季南略》卷一五。

54在桂王被俘、遇害后，张煌言即遣散部下，隐居南田悬岙，康熙三年被清廷抓获，遇害。

清（前期）

清 初 暴 政

清朝统治者在入主中原之初，实行了一系列厉民暴政。

圈地。

清初大规模的圈地有三次：第一次发生在顺治二年（1645），第二次发生在顺治四年（1647），第三次发生在康熙五年（1666），累计圈占畿辅一带耕地二十万顷左右。

圈地令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颁布，令清查无主荒地，将上述土地分配给从龙入关的满洲贵族、八旗兵丁。名为无主荒地，实际是“不论有主无主”一律圈占。原定只圈占近京三百里以内的土地，迨至顺治二年十一月已扩展到五百里之内的河间、滦州、遵化一带，此次圈地约十二万顷。

对于被圈土地的汉民，清廷虽于别处“兑补”，因所补之地均系久荒之地，徒有其名。

顺治四年（1647）初，为了安排陆续入关的八旗将士以及对第一次圈地中的瘠薄地予以调换，清廷决定再次圈占畿辅一带耕地，不论有主无主，悉行圈占。其中包括顺义、怀柔、密云、平谷、雄县、大城、新城、容城、任邱、昌平、良乡、房

山、易州、安肃、满城、完县、清苑、通州、三河、蓟州、遵化、霸州、武清、东安、高阳、庆都、固安、安州、永清、沧州、涿州、涞水、定兴、保定、文安、宝坻、香河、滦州、乐亭等州县。此次被圈占土地约五万顷左右。

清廷把圈占的土地拨给内务府建立皇庄（属于皇帝）、王庄，副都统以上各给园地八十亩、大田地六十亩，一般兵丁拨田三十亩。

顺治二年、四年的圈地酿成畿辅一带数十万汉民倾家荡产，流离失所，“出无可耕之田，入无可栖之室”，“孑遗之民”，“相率逃徙”①，五百里之内钱粮无人办纳，粟草料豆无人运搬②。清廷遂于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达“自今以后，民间房屋不得复行圈拨”的命令，“其先经被圈之家，著作速拨补”③。此后的二十年间未再大规模圈占土地、房屋，但零星圈占房地却时有发生。

康熙初年由于人口的增殖，满洲贵族内又在酝酿大规模的圈地之举。康熙三年（1664），辅政大臣鳌拜等以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蓝等旗地亩不堪，令户部在“顺天、保定、河间、永平等府州县圈出地亩十三万二千二百五十垧分给各旗，每壮丁一名给地五垧（一垧等于五亩）”④。

康熙五年（1666）鳌拜因第二次圈地时镶黄旗与正白旗错位⑤，以换圈为名，进行大规模的圈地，此即清初第三次圈地。主持此次圈地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均因反对圈地而被处死。此次圈地仅永平一带即有三十一万垧民地被圈⑥。

投充。

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清廷下达投充令，允许被俘汉民

的亲属及“无衣无食”、“不能资生”的贫民投到旗下为奴⑦，且明确规定“此等投充旗下人民，有逃走者，逃人及窝逃之人、两邻、十家长、百家俱照逃人定例治罪”⑧。

投充令颁布后，“被满洲恐吓逼勒投充”、“误听屠民讹言畏惧投充”以及带地投充⑨屡有发生，清廷遂于该年四月十一日谕令户部，重申“毋得逼勒”⑩。

畿辅一带汉民或畏于圈地，或畏于屠城，“不论贫富相率投充”，仅几年时间投充地已逾三万顷。而土地一经投充旗下，一应地丁钱粮俱免，直接影响到赋役的征收，故清廷于顺治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下达“自今以后，投充一事，著永行停止”的命令。顺治十年三月，清廷就投充一事令六部，都察院、科道等官会议，汉官主张“尽革投充”，满官则认为“尽革投充”“满兵难照汉兵存养”，经十天会议达成清查顺治四年禁令后的带地投充者，查出发还州县与民一体当差。

剃发令的颁行。

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集团始终把剃发与否，视为被征服部族、民族是否归顺的标志⑪。摄政王多尔衮在入关之初的十一天里（顺治元年五月初一至十一），六次谕令“官民俱遵制剃发”⑫。但由于以剃发“别顺逆”的做法“甚拂民愿”⑬，尚未在中原地区稳定统治秩序的清朝统治集团，才于顺治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又下达“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的谕令。

顺治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645年6月21日）多尔衮接到清军占领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的捷报，遂于次日再次就剃发问题同大学士等议道：“近览章奏，屡以剃头一事引礼乐制度为言，甚属不伦。本朝何尝无礼乐制度，今不遵本朝制度，

必欲从明朝制度，”“今既纷纷如此说，便该传旨，叫官民尽皆剃头！”⑭六月初五即遣使南京，赍（jī机，带给之意）敕（chì赤，帝王的命令、诏书）往谕豫亲王多铎，敕曰：“览王等奏捷，朕心不胜喜悦……至各郡邑投诚官员，或为福王所授，或为王所委，俱开明履历，分别注册。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傥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其郡邑有未下者，或宜移檄招抚，或宜统兵往剿。”⑮六月十五日，清廷下达剃发令，谕曰：“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听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此事无俟朕言，想天下臣民亦必自知也。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⑯未几陕西河西道官员圣裔孔闻謤以祭孔典礼“莫要于冠服，先圣之章甫缝掖⑰，子孙世守之，是以自汉暨明，制度虽各有，独臣家服制三千年未之有改，今一旦变更，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先世衣冠，统惟圣裁”。寻降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著革职，永不叙用。”⑱

于是湖州、嘉兴、昆山、江阴、嘉定等地纷纷揭竿而起，反对剃发令的实施。

从严修定逃人法。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刚刚完成向封建制的过渡，奴隶社会的残余相当严重，上百万的汉民在明清之际的军事冲突中被掠为奴。为了维护八旗将士战阵所得，清廷在入关之前即制定出

严惩被掠汉人逃亡的法令，明确规定：凡逃人、窝主一经查获即应论死。但因逃人是八旗将士家产的一部分，往往三次出逃才处以死刑。

清军入关之后，被掠汉人回到中原，逃亡之风益烈，甚至发生一百零八人集体逃亡[19]的严重事件。清廷于顺治三年（1646）五月对逃人法进行修改，从严惩处窝主：凡隐匿逃人者，一经查获，本人处死，家产籍没，妻子流徙，其邻佑、甲长、乡约等"各鞭一百，流徙边远"[20]，所在地方的州、县官吏均因失察"降级调用"。此后清廷又于顺治六年（1649）三月、顺治九年（1652）五月及七月、顺治十一年（1654）八月对逃人法进行修定、补充。在迭经修定后，窝主的范围愈发扩大，明确规定：船只如夹带逃人（包括商船、军船、漕船），船主按窝主论处，如系商船，船上货物充公；凡雇佣逃人佣工或把房屋租给逃人居住者，如有保人，以保人为窝主，如无保人则以雇主、房主为窝主；生员隐匿逃人，与平民一体治罪；现任文武官员、休致回籍官员以及进士、举人、监生、贡生等如隐匿逃人，"将本官及妻子流徙，家产入官"[21]。

顺治六年十一月，靖南王耿仲明，因属下隐匿逃人被劾，在江西吉安畏罪自杀[22]。

按照清代律例，只有大逆谋反才处以籍没，"强盗已无籍没之条"。清廷对逃人法的从严修定、对窝主的严惩及株连，"使海内无贫富、无良贱、无官民皆惴惴焉莫保其身家"[23]。顺治十二年（1655）三月初九，清顺治帝就逃人法一事严谕汉官："逃人一事，累经详议，立法不得不严。若仍执迷违抗，偏护汉人，欲令满洲困苦，谋国不忠，莫此为甚，朕虽欲宥之弗能矣！兹再行申饬，自此谕颁发之日始，凡奏章中再有干涉

逃人者。定置重罪，决不轻恕！”㉔

迁界。

迁界令于顺治十八年（1661）八月十三日颁发，令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山东等省濒海居民迁入内地；在距海三十里处构筑界墙，严禁一切人越过界墙，严禁一切船只违禁下海：各省在接到命令二十天完成迁界，界外房屋、耕地、盐厂皆抛弃，所有渔、盐之业一概停止。

清廷实行迁界，是为了遏制以台湾为基地、坚持抗清的郑成功集团，切断沿海居民同郑氏的联系，对台湾进行经济封锁。最先提出迁界之议的是原郑成功的部下黄梧。顺治十三年六月，驻守海澄的黄梧降清，向清廷密献迁界之策：在山东、江、浙、闽、粤设立边界，布置防守，断绝郑氏集团所急需的钉铁油麻等物。但由于清廷当时还不可能对东南沿海地区实行有效的统治，迁界之议只能暂时搁置。

清初大规模的迁界有两次，第一次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初年，第二次是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后㉕。迁界的标准先是三十里，后增至四十里、五十里不等。受迁界之害最深的是福建、浙江、广东三省。据《浙江通志》海防卷所云：“顺治十八年，以温、台、宁三府滨海居民迁内地。康熙二年（1663）奉命在沿海一带钉定界桩，仍筑堠台祭旗为号，设目兵若干名，昼夜巡探。”“温、台、宁三郡界外民田九十余顷，盐田七万四千七百亩有奇”㉖。福建“自迁界以来，民田废弃二万余顷”㉗，三藩之乱后再次迁界，“自福宁下至诏安，沿海筑寨置兵守之”，“滨海数千里，无复人烟”㉘，“福清二十八里，只剩八里，长乐二十四都只剩四都，火焚二个月”㉙。广东迁界“东起饶平大城，西迄钦州防城”，康熙元年（1662）

在潮州沿海四县“建墩台七十有三”，康熙三年（1664）“令再徙内地五十里；海阳迁去龙溪、上莆、东莆、南桂四都，秋溪、江东、水南三都之半；潮阳迁去之直浦、竹山、招收、沙浦、隆井五都，附部、峡山、举练三都之半；揭阳迁去地美一都、桃山半都；饶平迁去龙眼、宣化、信宁三都，惠来迁去上外、中外、下外、蓬州、鳄浦、鲍江六都，仅存苏湾一都，增设墩台八十有四，各设栅栏以严出入”㉚。康熙十三年（1674）“续迁番禺、新会、东莞、香山五县沿海之民，先画一界，而以绳直之”，“界以深沟，别为内外，稍逾跬步，死即随之。迁者委居捐产，流离失所”㉛。广东一省因迁界而抛弃耕地二万八千一百九十二顷。

迁界持续了二十余年，“五省沿海一带”，“庐舍畎亩尽为荒地，老弱妇子辗转沟壑，逃亡四方者不计其数，所余孑遗，无业可安，无生可求，颠沛流离”㉜。

康熙二十二年（1683）十月，清廷在收复台湾后，令对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展界，令民耕种采捕”㉝，广东“复业丁口三万一千三百”，福建“复业丁口四万八百”㉞。

注 释

①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

③④《清世祖实录》。

⑤按照八旗排列次序，京东蓟州、遵化应分配给镶黄旗，京南雄县、涿州应拨给正白旗。摄政王多尔衮把位于北京、沈阳交通要道上的京东一带分配给正白旗，把镶黄旗安置在京南。

⑥康熙三年圈地为六千六百余顷，康熙五年圈地为一万五千五百余顷，共二万二千余顷。

⑦此类贫民多系圈地所致。

⑧《清世祖实录》卷一五。

⑨带地投充者多系望族，除自身土地外尚带族人之地投充。

⑩《清世祖实录》卷一五。

⑪满族男子有剃发之俗，亦写作“薙发”。

⑫顺治元年五月初一，多尔衮在通州谕令迎降官员剃发；五月初三谕兵部对各处城堡发布檄文，令彼等剃发归顺，同一天向投诚官吏军民发布“皆著剃发，衣冠悉从本朝制度”的谕令；五月初六谕明官民在为崇祯服丧三日后俱遵制剃发，同日谕令三河县县令遵制剃发；五月十一谕故明官民即行剃发。

⑬三河、红西口因反对强行剃发先后发生武装抵抗。

⑭《多尔衮摄政日记》。

⑮⑯《清世祖实录》卷一七。

⑰章甫，古代礼帽；缝掖，原为宽袖单衣，泛指儒生所服。

⑱《清世祖实录》卷二一。

⑲镶黄旗在河间县比梁屯的庄园里有一百零八名耕田壮丁逃至平度州。

⑳《清世祖实录》卷二六。

㉑《清世祖实录》卷八六。

㉒时靖南王耿仲明奉命同平南王尚可喜率所部征广东，行至吉安被劾自杀，由其子耿继茂率部继续南下。

㉓《清世祖实录》卷八八。

㉔《清世祖实录》卷九O。

㉕福建的耿精忠（耿继茂之子）叛应吴三桂后，与占据台湾的郑经（郑成功之子）联络。

㉖《国朝耆献类征》《卿贰二》。

㉗《福建通志》卷八六。

㉘《海纪辑要》。

㉙《榕城纪闻》。

㉚《广东通志·海防》。

㉛《觚賸·粤觚》。

㉜《福建通志》卷八六。

㉝《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

㉞《碑传集·杜臻传》。

清（前期）

顺治改制

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1650 年 12 月 31 日），摄政王多尔衮病逝喀喇城猎所，顺治帝福临在粉碎英亲王阿济格继为摄政的阴谋活动后①，于顺治八年正月十二（1651 年 2 月 1 日）举行亲政大典。顺治帝在其执政期间，曾对关外旧制及摄政时期的弊政予以改革，缓和了满洲贵族同汉族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扩大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

倡兴文治。

满族以骑射崛起于辽左，尚武轻文由来已久。顺治亲政之后特令增开八旗乡试、会试，且于顺治十年（1653）设八旗宗学，“选满洲生员为师，凡未封宗室子弟十岁以下，俱入学，习清书（即满文）”②。该年一月二十八日，顺治针对满、蒙、汉八旗子弟“皆蹋石球为戏”，降谕礼部，令彼等于“骑射之暇，旁涉书史”③，并责成各牛录予以督察。

在顺治帝的倡导下编纂《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易经通注》、《孝经注》、《孝经衍义》、《内则衍义》、《人臣敬心录》、《道德经注》等书籍；且组织编辑《太祖圣

训》、《太宗圣训》；令满汉学士把《五经》、《三国》④译成满文，赐予满洲官员。

顺治在《资政要览》一书的序中写道："朕孜孜图治，学于古训，览四书、五经、通鉴等编，得其梗概，推之十三经、二十一史及诸子，""乃采集诸书中之关于政事者，为三十篇，""于每篇贯以大义，联其文词，于忠臣孝子、贤人廉吏，略举事迹；其奸贪不肖悖乱者亦载其内，使法戒迥然。"⑤

改革官制。

依照明官制建立内阁、翰林院。顺治十五年（1658）七月，谕令在内三院的基础上建立内阁，"除去内三院秘书、宏文、国史名色，大学士改加殿阁大学士"，"设立翰林院，设掌院学士一员"，"至各衙门满、汉启心郎原因诸王贝勒管理部院事务而设，今宗人府启心郎仍照旧，其余部院满汉启心郎俱著裁去"⑥。

将满、汉官员品级画一，亦是改革官制的重要一环。长期以来，担任同一官职的满官比汉官品级高，同为大学士，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同为学士满官为二品，汉官为三品；同为尚书，满官为一品，汉官为二品；侍郎、郎中等皆如是。顺治十五年七月将官职品级画一，大学士、各部尚书，不论满汉俱为正二品；侍郎俱为正三品；学士及郎中俱为正五品；员外郎俱为从五品；主事俱为正六品。

顺治十七年（1660）定八旗汉字官名，固山额真称都统，梅勒章京称副都统，甲喇章京称参领，牛录章京称佐领，昂邦章京称总管。

严禁杀掠。

顺治十七年（1660）七月，贝勒尚善⑦因出征云南时纵兵

掠民⑧降为贝子，罚俸两年；都统巴思汉、胡沙均被降革，罚俸一年；副都统傅喀解任；罚银百两；负责调查此事的学士麻勒吉、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能图均因徇庇尚善等人而受到革职、削世职的惩处。

满洲高级官员因纵兵掠民而受到较为严厉的惩处，在清初还是第一次。受尚武习俗熏陶的满洲贵族，在攻城略地时从不受军纪约束，杀掠成性⑨，对尚善的处理，表明清朝统治者对关外旧习的抛弃。

满汉联姻。

联姻是统治阶级为实现其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努尔哈赤起兵后先是把女真各部首领作为联姻目标⑩，一俟其内部统一后即将联姻的目标转向蒙古各部。

顺治一改满蒙联姻的传统，于顺治十年（1653）八月将幼妹和硕纯悋公主（皇太极十四女）下嫁平西王吴三桂之子吴应熊；顺治十二年（1655）六月将侄女（肃亲王豪格之女）下嫁靖南王耿继茂之子耿精忠；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将侄女（承泽亲王硕塞之女）下嫁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隆；顺治本人亦屡纳汉女为妃⑪。

限制圈地。

自顺治四年三月二十九日下达“民间田屋不得复行圈拨”的命令后，零星圈占土地房屋时有发生。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七日，面谕户部官员：“田野小民，全赖地土养生，朕闻各处圈占民地，以备畋猎放鹰往来下营之用，”“夺其耕耨之区，断其衣食之路，”“尔部速行文地方官，将前圈土地尽数退还原主，令其乘时耕种。”⑫几天后顺治批准兵科都给事中李运长免圈良乡、涿州十三州县“未圈田舍”的题本⑬，制止了一场数万

百姓流离失所的灾难。

顺治帝在亲政后即对已故摄政王多尔衮追夺封爵、“籍没所属家产人口入官”⑭，但对于顺治四年圈地中多尔衮偏袒所统辖的正白旗，把本应分给镶黄旗的京东一带拨给正白旗，并未予以纠正，一旦更换两旗圈地，就会酿成殃及周围民地的新的圈地之举。顺治九年在处理清苑县民路斯行等三百余人“控告房地被王仪夺带投充”一案时，念及该三百人房地，虽非“王仪等带投”，但户部在圈占后“未曾补还”，路斯行等屡次上告、屡受刑责，遂令将“王仪等所领八庄房地退还受责之三百余民，仍全免九年地租”，并令将“户部尚书车克等及原任知县周玮分别处讫”⑮。

顺治十年将八旗退圈地九万九百五十四垧⑯，“交付地方官，均摊给民耕种”，“照开垦荒田，三年起科之例”⑰。

以农为本，奖励垦荒芜。

满族在入关之前，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入关之后即处于农业文明的包围之中。

中原地区在明清之际迭经战乱，土地荒芜，人口流亡，农业凋敝，经济萧条。顺治帝在亲政后以屯田方式组织垦荒，通过兴屯道向难民提供耕牛、种子、农具；对于“自首投诚者，悉隶兴屯道，授以无主荒田，听其挈家耕种为业”⑱；亦令军队中的老弱兵丁在驻地附近开辟屯田，此为军屯，鉴于民屯“屯租数倍于民粮”，屯民“相率畏惧”⑲，从顺治十三年（1656）起取消民屯，把各省屯田荒地“归并有司，即照三年起科事例，广行招垦”⑳。顺治十四年（1657），把垦荒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一项内容，“督、抚、按，一年内垦至二千顷以上者纪录，六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道、府，垦至一千顷以

上者纪录，二千顷以上者加升一级；州、县，垦至一百顷以上者纪录，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分别治罪"㉗

顺治改制是在不触犯满洲贵族的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圈地、投充、逃人法等弊政所酿成的社会问题并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注　释

①英亲王阿济格在多尔衮逝世后派人游说两白旗大臣拥戴自己；密遣人召子劳亲率兵至猎所；敦促协助多尔衮处理政务的巽亲王满达海、端重亲王博洛、敬谨亲王尼堪速立一摄政之人。

②《清史稿·选举志一》。

③《清世祖实录》卷七一。

④《三国演义》一书在满族社会广为口头留传，以努尔哈赤、皇太极为首的满洲贵族把该书视作军事著作。

⑤《清世祖实录》卷八八。

⑥《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九。

⑦尚善系努尔哈赤之弟——庄亲王舒尔哈齐之孙。

⑧顺治十六年三月，洪承畴抵云南后向朝廷密奏：云南省会昆明及临安、大理、曲靖、永昌等地"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如衣粮财物头畜俱被抢尽自不待言，更将男妇大小人口概行掳掠"，"所存老弱残废，又被捉拿吊拷烧烙，勒要窖粮、窖银，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完口"。"永昌一带地方更为惨烈，被杀死、拷烙死者堆满道路，周围数百里杳无人烟"。（《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

⑨清军在平定金声桓、姜瓖之变后都进行大规模屠戮，江宁之役后亦对苏州、镇江、瓜洲等地大事抢掠。

⑩努尔哈赤曾纳哈达部首领扈尔干之女、叶赫部首领杨吉砮之女，

乌拉部首领满泰之女为妻。

⑪顺治格妃石氏、庶妃陈氏、唐氏均系汉女。

⑫《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67页。

⑬李运长题本内容如下："闻户部移文良、涿等州县拾叁处，将未圈田舍，尽行圈占，""思此畿内百姓，数年来方获粗安，守硗确余田以事耕凿。""计拾余处遗黎不下数万，其中贫乏居多，遽令迁徙远方，能更立生业者户谅无几。""且地圈民徙，州县有司竟同虚设，""兵马往来，粮草无出，""余地既圈，既甚病民，又多不便。"

⑭《清世祖实录》卷五三。

⑮《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72页。

⑯八旗退圈地中"好地甚少，薄洼地甚多"。

⑰《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80页。

⑱《清世祖实录》卷七六。

⑲《总督李公奏议》卷三。

⑳《清世祖实录》卷一二〇。

㉑《清世祖实录》卷一九〇。

清（前期）

康熙初政

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1661年2月5日），清帝顺治因生天花去世，享年二十四岁。遗命皇三子玄烨即皇帝位，自明年起改元康熙；并令满洲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弼年仅八岁的新君。四辅政大臣动辄以恢复关外旧制为施政宗旨，“必举太祖、太宗为辞”，尽“改世祖（顺治帝庙号）之政”①，诸如取缔内阁翰林院恢复内三院、以换圈为名进行大规模圈地、屡兴冤狱、钳制汉族士人等。

鳌拜专权。

康熙六年（1667）七月初七，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当时位列辅政大臣之首的索尼于该年六月二十三日病故，鳌拜则以辅臣之首自居。在长达七年的辅政期间，鳌拜利用索尼年老多病、遏必隆生性懦弱，网罗党羽，安插亲信，大权在握，诛杀异己②。康熙亲政后，鳌拜依旧“党比营私”，户部满尚书出缺，康熙已任命玛希纳出任，鳌拜却任命党羽玛尔赛，强行增设一名满尚书。

同年七月十九日鳌拜不顾康熙帝反对，将反对换圈的辅政

大臣苏克萨哈处死③。

苏克萨哈之母系努尔哈赤第六女，隶满洲正白旗。顺治八年（1651）二月因告发摄政王多尔衮殡服违制而受到顺治帝的器重，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遗命辅政。苏克萨哈与两黄旗大臣索尼、遏必隆、鳌拜同列辅政之列。因两黄旗与两白旗在继立问题上所存在的积怨④，苏克萨哈在换圈以及处置反对换圈的满汉三大臣等问题上均与鳌拜意见相左。为了遏制鳌拜专权，苏克萨哈一再"自行启奏"吁请皇帝亲政，并明确表示："夕归政于皇上，朝即具疏往陵寝居住（为顺治帝守陵），"绝无恋栈之意⑤。在康熙亲政后第六天（七月十七日），苏克萨哈疏请"往守先帝陵寝"。鳌拜遂假传圣旨，"著议政王大臣会议⑥具奏"。

七月十五日，鳌拜党羽、大学士班布尔善罗织苏克萨哈二十四大罪状（诸如"背负遗诏"、"欺藐皇上"、"背负先帝"等）⑦交议政王大臣会议。七月十七日在鳌拜的干预下，议政王大臣作出对苏克萨哈及其子查克旦凌迟处死⑧，对苏克萨哈子达器、德器，孙侉克札、侄海兰等斩立决、籍没家产的议处。康熙"知鳌拜等怨苏克萨哈数与争是非，积以成仇"，"坚持不允所请"。鳌拜竟"攘臂捋袖"，咆哮御前，君臣争辩一天，其结果只是将苏克萨哈从凌迟处死改为绞刑。

康熙智擒鳌拜。

鳌拜党羽遍及宫廷内外，朝廷上下，康熙御前侍卫都有鳌拜党羽⑨。如果明发谕旨逮系鳌拜，"不免激生事端"，变生肘腋。康熙遂从小太监中择强壮者练习"布库"之戏（满语摔跤）。

康熙八年（1669）五月初，康熙帝召皇后叔父索额图（索

尼次子）入宫对弈，安排逮系鳌拜细节。五月十六日，鳌拜入宫议事，演行布库的小太监十余人将鳌拜生擒。索额图持皇帝谕旨把鳌拜死党班尔布善等十余人捉拿。五月二十八日经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宣布鳌拜“欺君擅权”、“阻塞言路”、“偏护本旗”、“上违遗诏、下虐生民”等三十条罪状⑩，将其革职、拘禁⑪；鳌拜之弟穆里玛、侄塞本得以及心腹党羽班布尔善等共计七人被处死。对于曾经党附过鳌拜的官员，康熙“姑从宽免”，令彼等“务须洗心涤虑，痛改前非，遵守法度，恪其职业”⑫。

康熙在亲政后两年，始赢得朝纲独断。

平反昭雪冤案。

康熙八年六月十一日，令吏、兵二部对苏克萨哈一案内涉及的文武官员予以起复，“复故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原有二等精尼尼哈番世职，令其子苏常淑承袭”⑬。

该年七月十一日，颁布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昭雪的谕令：“朕阅处分原任户部尚书苏纳海等原案，”鳌拜等“以拨地迟延，遽行拿问，多端文致诬陷，不按律文，任意将其无辜处死，”“原任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于拨换地亩时，见民间旗下困苦，因有地方之责，具疏奏闻，辄以非其职掌，越行干预，亦不按律文，冤枉处死。伊等皆国家大臣，并无大罪冤死，深为可悯，理应昭雪，以示仁恩。”⑭八月二十四追谥苏纳海为“襄愍”，朱昌祚为“勤愍”，王登联为“悫愍”⑮。

同年八月十一日，为原钦天监监正汤若望⑯、原钦天监监副李祖白⑰平反昭雪：恢复汤若望“通微教师”⑱之号，“照伊原品赐恤，还给教堂基地”；李祖白以及其他被处死的钦天监官员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俱“照原官恩恤，流

徙子弟取回，有职者复职”[19]。

汤若望、李祖白一案亦系四大臣辅政时期一大冤案。康熙三年八月初七，因徽州新安官生杨光先上《请诛邪教疏》，指控汤若望“借历法以藏身，窥伺朝廷机密”，图谋不轨，传播邪教，所制历法有误等罪，辅政大臣令礼、吏二部会审此案。在历经三个多月的审讯后，此案移交刑部（十一月十九日），直至康熙四年三月初，经议政王大臣会议，作出汤若望、李祖白等八人凌迟处死的判决。该判决送抵御前时，适值北京发生强烈地震，在孝庄皇太后的干预下，对汤若望、杨弘量、杜如予“免死”，李祖白等五人“俱著即处斩”。

革除辅政时期弊政。

康熙七年，在鳌拜的把持下，颁布“查故明废藩田产，悉行变价，照民地纳粮”[20]的谕令，“以租种之人，即可为承买之人”[21]。明藩田共约十七八万顷，分布在直隶、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湖北等省。明清之际，上述土地已归农民占有、耕种，其中大多数人无“余资置买田业”[22]，变卖藩产加重承种之人的负担。清除鳌拜集团后，康熙撤销变卖藩产的命令，“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23]，“永为世业”[24]。又因“废藩自置之田，给民耕种者”，除“输粮之外，又纳租银”，自今以后“与民田一例输粮，免纳租银”[25]。

自汤若望等入狱后，清廷即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康熙四年），废除西洋历法，沿用传统的大统历[26]。康熙八年，因杨光先等在日蚀、月蚀、春分、秋分等推测上屡屡失误，自康熙九年恢复使用西洋新法制历，且任命传教士南怀仁[27]为钦天监监副。

康熙八年六月下达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其今年已圈者，悉令给还民间”，“至于旗人”，可从“古北等口边外空地拨给耕种”㉘。

康熙九年（1670）闰二月，谕令恢复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之制，照顺治十五年之例㉙；该年八月，改内三院为内阁，设立翰林院；同年十一月，改变辅政时期不准八旗官员子弟入学国子监的规定，恢复顺治时期之制，每牛录择子弟二人入国子监。

诏举博学鸿词特科㉚。

康熙十七年（1679），清帝为表明“崇儒重道”、“求贤右文”之意，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总督）、抚（巡抚）、布（布政使）、按（按察使）各举所知”，推荐“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㉛，翌年三月在京举行考试。名士严绳孙只作一首“省耕诗”即交卷，康熙帝以“史局不可无此人”㉜令阅卷官破格录取。此次特科录取五十人，被录取者，皆入史馆纂修明史。

注　释

①《清史稿》卷二四九。

②内大臣费扬古与鳌拜有嫌，康熙三年四月鳌拜以费扬古之子倭仁在御前当班时擅带康熙去瀛台而将倭仁及与倭仁当班的其他三名侍卫处死，旋又将费扬古及其另外两个儿子处死。康熙五年将反对圈地的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处死。

③同时被处死的尚有苏克萨哈兄弟子侄以及族人——前锋统领白尔黑图等共计十五人。

④皇太极死后，两黄旗大臣拥立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白旗大臣拥立多尔衮；多尔衮在被推为摄政王后，对豪格的拥立者索尼、鳌

拜、遏必隆、图赖等予以降革。

⑤鳌拜得悉苏克萨哈奏请“归政”后言道：“今日归政于皇上，明日即将苏克萨哈灭族！”

⑥议政王大臣会议系清开国时期的合议制的一种形式，入关后六部尚书、九卿、科道俱参与议政。

⑦详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三。

⑧凌迟处死即磔刑，俗称千刀万剐。

⑨侍卫阿南达“每进奏时称赞鳌拜为圣人”。

⑩详见《清圣祖实录》卷二九。

⑪议政王大臣会议拟处鳌拜斩立决，康熙“念鳌拜累朝效力年久”，“从宽免死，革职籍没，仍行拘禁”。

⑫⑬⑭《清圣祖实录》卷三O。

⑮《清史稿》卷二四九。

⑯汤若望系耶稣会传教士，生于德国科隆，1622年（明天启二年）来华传教。清军占领北京后，汤若望因准确推测该年八月初一发生的日蚀而受到清廷重任，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负责制定历书。

⑰李祖白，受天主教洗礼，精通天文历法。

⑱顺治十年，清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康熙统治时因避讳改为“通微教师”。

⑲《清圣祖实录》。

⑳《清圣祖实录》卷二七。

㉑《乾隆武清县志》卷一O，《藩产变价疏》。

㉒《郭华野先生疏稿》卷三，《三清均疏》。

㉓《清圣祖实录》卷二八。

㉔《清通典》，第2024页。

㉕《东华录》卷一O。

㉖明大统历基本沿用元郭守敬授时历。

㉗南怀仁，比利时人，顺治十六年来华传教，任汤若望助手。康熙

三年因汤若望之案被逮入狱，充当汤若望的代言人（汤若望在入狱前已因中风失去语言能力）。

㉘《清圣祖实录》卷三一。

㉙顺治十八年四大臣辅政后废除顺治十五年所定满汉官员品级划一之制。

㉚特科亦称制科，由皇帝下诏举行，不在按期举行的科举考试之列。康熙行此特科，系为拒绝入仕清廷的汉族名士所设，以期彼等同清权合作。名士李国笃、朱彝尊、潘耒、严绳孙均被录取，时人称之“四大布衣”。

㉛《清史稿·选举四》。

㉜《己未词科录》卷一〇。

清（前期）

平定三藩之乱

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执杀巡抚朱国治，叛据云南；康熙十三年（1674）四月，靖南王耿精忠执福建总督范承谟，据福建叛；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叛。自吴三桂发难，至清军平叛，历时八年。

三藩分镇。

顺治十六年（1659）二月，清军收复云贵后，"其实尚未据守"，李定国以及当地土司的军事抵抗时有发生。十六年三月敕令平西王吴三桂驻镇云南，一年后令靖南王耿继茂"率领全标官兵并家口移镇福建"，征讨以金门、厦门为基地的郑成功。平南王尚可喜仍留镇广东，协助耿继茂遏制郑成功。顺治在给吏、兵两部的谕令中指出，吴、耿、尚三藩对所在省份的"文武官员"有"甄别举劾"之权，"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内外衙门，不得掣肘"①。

国中之国。

三藩中以吴三桂实力为最。吴三桂降清时所携部众四万

余，且开山海关迎降，位在“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辈右”②。在底定云贵、击溃南明永历政权的过程中，吴三桂再立首功，顺治十七年（1660）五月，仿明初封黔国公沐英例，令吴三桂世镇云南，兼辖贵州，把前明黔国公的庄田七百顷赐为藩庄，云贵两省督抚均受平西王节制。

顺治十七年裁定兵制，三藩保留八十三个佐领（约十万人）③，其中吴三桂拥有佐领五十三个（五万人以上），所辖投诚兵万余。

吴三桂在云南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郡县吏得自辟署，谓之‘西选’渐乃题用朝臣”，“以别省不相干涉之处及见任京官公然坐缺定衔”，“天下之官，不分内外，不论远近，皆可择而取之”④。又择“诸将子弟，四方宾客，与肄武备”，且与西藏达赖喇嘛互市茶马，每年经西藏进入云南的蒙古良马千匹，充作战马。为扩充实力，吴三桂还“广征关市”，“垄断盐井、金铜矿山之利”；“招徕商旅”，“广通贸易殖货财”⑤；遣人至辽东、四川，“就地采运”人参、黄连、附子，“官为之鬻”⑥。

尚可喜、耿继茂各有十五个佐领的兵力，另有投诚兵万余。尚氏所把持的税收，“每岁获银两不下数百万，令藩属“私充盐商，据津口立总店”，且“牟利子母”，经营高利贷。耿继茂在福建亦“横征盐课”、“勒索银米”。在三藩的盘剥下，云南、广东、福建三省“数十年来，富室空虚，中产沦亡，穷民无所为赖”⑦。

三藩并撤。

康熙即位以后，“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⑧，“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

撤”⑨。

康熙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年已七旬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启程，并请以子尚之信袭爵，留镇广东。康熙遂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部、兵部以及吏部“确议具奏”。吏部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驳回袭爵之请；议政王大臣会议又以“尚之信仍带领官兵居住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离”⑩为由，作出“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议迁”的议处，康熙立即批准撤藩之议。

该年七月初三，平西王吴三桂为窥清廷意向，疏请撤藩，内有“今闻平南王尚可喜有陈情之疏，已蒙恩鉴，准撤全藩。仰恃鸿恩，冒干天听，请撤安插”等语。康熙对吴三桂之疏批道：“今云南已经底定，王下官兵家口作何搬移安插，著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⑪。

同年七月初九，靖南王耿精忠疏请撤藩，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作出“应将王本身并标下十五佐领官兵家口均行迁移”⑫的决定。八月初六，议政王大臣在对吴三桂疏请撤藩一事会议时，出现不同意见；一种认为“应将王本身并所属官兵家口均行迁移，在山海关外酬量安插。云南地方，有土司苗蛮杂处，不得稍疏防御，今既将王迁移，应暂遣满洲官兵戍守，俟满洲官兵到日，该藩起程”。另一种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平定，总无乱萌，今若将王迁移，不得不遣兵镇守。兵丁往返，与王之迁移，沿途地方民驿累”，“应仍令吴三桂镇守云南”⑭。两议俱上请旨，康熙作出“著王率领所属官兵家口，俱行迁移前来”⑮的决断。

八月十五日，清廷派遣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

理前往云南经理撤藩事宜，遣户部尚书梁清标前往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前往福建办理撤藩，于是三藩并撤。

吴三桂发难。

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执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扣留折尔肯等特使，据云南叛。吴三桂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国号“周”，以明年为周王昭武元年，蓄发易衣冠，铸“利用通宝”，旗帜易白，发布反清檄文，斥责清廷当年“逆天背盟”，“雄据燕京，窃我先朝神器，变我国衣裳”，“将欲反戈北伐，扫荡腥膻”⑯。

云南提督张国柱、贵州提督李本深、贵州巡抚曹申吉皆降。云贵总督甘文焜在贵阳陷落后率十余骑逃至镇远，拟扼守镇远，控制滇、黔险隘之地。镇远守将江义叛应吴三桂，甘文焜被叛军包围，十二月初八自尽，云贵两省皆陷。

十二月二十一日，清廷始接到吴三桂为叛的奏报。大学士索额图请诛主张撤藩的大臣⑰以平息战乱。康熙深知吴三桂蓄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拒绝索额图的建议，命前锋统领硕岱率军前往荆州，进驻常德，阻吴军北上；令都统朱满自武昌赴岳州，阻敌东犯；令西安将军瓦尔喀率部进川，扼守由滇入川之路。

十二月二十二日，下令停撤平南、靖南二藩，召梁清标、陈一炳还京；二十四日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⑱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军讨伐吴三桂；二十五日以兖州地近江南、江西、湖广，太原邻近川、陕，调军队驻防兖州、太原以便随时策应湖广、川陕。

康熙十三年（1674）三月，清廷以内大臣希尔根为定南将军，率军前往江西；该年六月任命贝勒尚善为安远靖寇大将

军，开赴岳州；未几又任命康亲王杰书⑲为奉命大将军前往浙江督师，任命贝勒董额为定西大将军前往四川督战；同年九月相继任命简亲王喇布⑳为扬威大将军驻江宁，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将军坐镇江西。

八省俱陷。

三藩所辖之兵，皆“百战之余，勇健善斗”，“莫有撄其锋者”㉑。清廷所任命诸将多畏敌避战，迁延不前。

康熙十二年年底，吴三桂军自贵州入湖南，攻陷沅州，提督崔世禄被擒，“澧辰路梗，楚疆危急”㉒，偏沅巡抚卢震弃长沙奔岳州。常德、长沙、岳州、澧州、衡阳相继陷落，湖南被吴三桂占领。

康熙十三年（1674）一月，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吴之茂等叛应吴三桂，四川陷落。

康熙十三年二月，驻广西将军孙延龄㉓叛应吴三桂，杀都统王永年、副都统孟一茂㉔，自称“安远大将军”，扼守大榕溪隘口，陷平乐；广西提督马雄、左江总兵郭义相继叛，广西陷。

康熙十三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执福建总督范承谟，据福州叛，自称“总统兵马大将军”，传檄福建州县，令蓄发易服。并令都统马九玉、总兵骆养性等分取延平、邵武、汀州、福宁等地，福建不复为清廷所有。

康熙十三年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发动兵变，在向四川进军途中，袭杀经略莫洛㉕。兴安、延绥、葭州、米脂叛应王辅臣，延安、绥德相继陷。王辅臣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遣兵陷兰州，固原、临洮等地相继为叛。

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尚之信叛应吴三桂，易服改

帜，派兵包围尚可喜住处，尚可喜自杀未遂，数日后病逝。

三藩并叛，云、贵、湘、川、闽、陕、粤、桂八省皆陷，甘肃、江西两省大部亦被叛军占领，以至达赖喇嘛竟建议清廷同吴三桂“裂土罢兵”㉖。蒙古察哈尔部首领布尔尼也乘机起兵，进逼张家口，京师震动㉗。

起用绿营。

为扭转战局，清帝决定起用绿营。绿营系清军入关后陆续收编的前明武装，以绿旗为标志，又称之绿旗兵。“天下绿旗兵，无如陕西强壮，而其数较各省部众”㉘，“若用绿旗步兵之力，于灭贼殊为有济”㉙。康熙十四年（1675）清廷授甘肃提督张勇为靖逆将军，令其率部平定王辅臣之乱。康熙特谕负责西部战事的贝勒董额，对于“劳绩甚茂”的张勇等汉将“慎勿轻侮，致滋嫌隙”，“事无大小，务期协和持平而行”㉚。康熙在给张勇的谕令中明白写道：“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况我绿旗兵较之贼兵甚强”㉛。

该年四月，张勇部将王进宝克临洮、金县、安定，总兵官孙思克收复靖远卫。宁夏驻军在王辅臣的煽动下杀提督陈福、发动兵变后，张勇立即前往安抚。未几孙思克在虎山墩大败王辅臣，断其饷道，陷入困境的王辅臣遂于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叛而复降，致使吴三桂急令西犯秦陇、欲与王辅臣会师的王屏藩、吴之茂部撤回汉中。旋封张勇为一等候（袭十次），授王进宝奋勇将军，加封一等伯（袭八次），授孙思克为凉州提督，并遣内阁学士禧佛等赍敕往陕西，谕令彼等立即“各率所属绿旗兵平定汉中、兴安，恢复四川”㉜。

除陕西外，“浙江及江西袁州、赣州等处绿营兵，奋勇剿贼，固守地方”㉝，为此康熙特谕令兵部“应即议叙，以旌其

劳"，"速议具奏"[34]。绿营在平定三藩之乱中战功卓著，安亲王岳乐在攻长沙时，请派绿旗兵两千助战；简亲王喇布则"以调绿旗兵为辞，因循日月"，大有无绿旗即不出战之势。

孤立吴三桂。

虽然三藩并叛，八省俱陷，康熙认定"今日事势，先灭吴逆为要"[35]，对其他叛应吴三桂的藩王、将领竭力争取。

在王辅臣袭杀莫洛后，康熙立即敕谕王辅臣，赞其"赋性忠义，才勇兼优"，"殚心抒忠，茂建功绩"，并以"莫洛于尔，心怀私隙，致有今日之事。则朕之知人未明，俾尔变遭意外，忠悫莫伸，咎在朕躬，于尔何罪"[36]等为其开脱。且遣王辅臣之子王继贞前往陕西颁谕，"晓以大义，发其悔悟之心"[37]，时为康熙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在接到王辅臣的疏奏后，再次遣使赍敕往抚[38]，重申"变起情形，皆由莫洛控驭失宜、军心不服所致"，"尔之心迹无他，朕已洞悉，往事一概不究"，"尔所属官兵，俱行宽宥，照旧归伍效用，尔即率领，仍回平凉汛地，照旧镇守。"[39]康熙十五年（1676）六月初一，康熙在得悉清军已断王辅臣饷道后，第三次颁诏，赦其罪，"招慰之"[40]。

康熙十三年六月，康熙遣工部郎中周襄绪及靖藩旧部陈嘉猷等赍敕前往福建招抚耿精忠，冀其"革心悔祸，投诚自归"。康熙十五年八月又遣其弟耿聚忠（安亲王岳乐之婿）赍敕赴军前招抚耿精忠。康熙帝在敕书中再次重申"朕犹念尔祖、父前功，终不忍绝，将尔在京诸昆弟及所属人员，概行宽宥，给还官职，恩礼如常"，"朕复念尔变乱，必有所由，或为逼迫所致，故复下敕书，遣尔弟耿聚忠赍至军前，明谕朕意。尔若即悔罪，率众归诚，当复尔王爵，仍旧镇守，所属人员职任俱各

如故"，"朕以诚心待天下，断不食言，尔勿听信煽惑之言，终怀疑惧，负朕始终保全至意"㊶。一年后杰书部清军在接连击败耿精忠部将曾养性、马九玉后，入仙霞关，攻陷浦城，江西清军又相继夺取建昌、饶州、广信等地。耿精忠不支，遂有降意。康熙帝得悉后，于康熙十五年九月十八日降谕杰书"以时事晓谕耿精忠速降，以副朕安辑生民至意"㊷。十月二十一日，耿精忠在福州开城迎降的疏奏送抵御前，康熙立即传谕"命耿精忠仍留靖南王爵，率伊所属官兵随大军征剿"㊸。

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清军自江西赣州入广东，尚之信遣使至简亲王喇布军前乞降，康熙敕谕尚之信："知尔父子不忘报国，念笃忠贞，因事出仓促，致成变异，朕心深为恻悯。今特降旨，将尔已往之罪并属下官兵，概行赦免，倘能相机剿贼。立功自效，仍加恩优叙，尔当益竭悃诚，勉图后效，以副朕始终曲全至意。"㊹

对参与三藩之乱的马雄、孙延龄等清廷也竭力招抚。康熙十五年九月，遣马雄之子马承先赴广西招抚。该年年底广西初定㊺。

王辅臣、耿精忠以及尚之信等人的相继反戈，使得清廷得以全力征讨吴三桂。

吴氏败亡。

吴三桂起兵之后，仍有裂土罢兵，割据一方之念㊻，"迫洞庭而不即渡"，"徘徊衡湘间"，期冀与清廷议和，保住即得利益。拒不采纳"疾行渡江、会师北向"、"下九江、扼长淮，以绝南北运道"以及"据关东、巴蜀，塞殽函以自固"㊼等建议，"以长子尚主留京为质故"㊽。

王辅臣、耿精忠、尚之信降清后，吴三桂为安定人心，于

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初一在衡州称帝㊾。自吴三桂举兵“滇蜀之间，屡岁不登，米一石价六两，盐一斤价三、四百钱”，且“加税田亩地丁”，“怨声四起，故所破州县旋得旋失”。“又于云南丽江等处凿山开矿，采取金银，日役苗夷万人，土司多忿怨”㊿。该年五月，清军水师入洞庭湖，分驻君山、九贵山，切断岳州吴军同衡州、长沙等地联系。同年八月十七，吴三桂得悉其婿胡国柱有降清之意，“大呼曰‘吾势去矣’，即气噎仆地”51而死，时年七十五。

吴三桂死后，其部将拥立吴应熊之子吴世璠柩前即位。吴世璠不敢留居衡州，遂退居贵阳，拟以湖南、四川、广西为屏障。清军乘势收复岳州、常德、长沙、汉中、保定、顺庆、成都、重庆。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清军由平越逼贵阳，吴世璠奔云南，清军迅速占领贵州全省。翌年二月清军由黔入滇，吴军列象阵迎战，自卯至午激战三个时辰，因象溃而败。吴世璠恃险固守，令诸将分守五华山宫门（平西王藩府）。康熙二十年（1681）九月，赵良栋率绿营兵至云南，连越三濠夺三桥，直逼城下，围之数重。该年十月城中粮尽，南门守将开门迎降，吴世璠服毒而死，时年十六岁。历时八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注 释

①《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

②《清史稿·吴三桂传》。

③时每佐领壮丁千名，甲士二百，共一千二百人。

④《清世祖实录》卷一四二。

⑤《四王合传·平西王吴三桂》。

⑥《清史稿·吴三桂传》。

⑦《潜书》下篇。

⑧《清圣祖实录》卷一五四。

⑨《清圣祖实录》卷九九。

⑩《清圣祖实录》卷四一。

⑪《清圣祖实录》卷四二。

⑫《清圣祖实录》卷四二。

⑬⑭⑮《清圣祖实录》卷四三。

⑯《清代通史》卷一，第413页。

⑰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刑部尚书莫洛均力主撤藩。

⑱勒尔锦系代善之孙，萨哈廉之子。

⑲杰书系代善之孙，满达海之子。

⑳喇布系济尔哈朗之孙，济度之子。

㉑《广阳杂记》卷二。

㉒《平定三逆方略》卷二。

㉓孙延龄系定南王孔有德之婿，康熙五年被封为广西将军，偕妻孔四贞（孝庄皇太后义女）到广西，统领定南王旧部，驻桂林。

㉔康熙十二年七月，王永年等疏劾孙延龄纵兵扰民，清廷派侍郎勒德洪赴广西审理，所劾属实。御史鞠珣等请撤孙延龄回京，未及实施，吴三桂起兵，孙延龄杀王永年及其部下。

㉕康熙十三年二月任命刑部尚书莫洛为陕西经略，驻西安。

㉖《清圣祖实录》卷五四。

㉗因察哈尔布尔尼之变，清廷任命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十四年三月），时京师八旗皆南征，清廷采纳图海建议，从八旗家奴中挑选勇健者为兵。

㉘㉙《清圣祖实录》卷八五。

㉚《平定三逆方略》卷一七。

㉛㉜《清圣祖实录》卷八五。

㉝㉞㉟《清圣祖实录》卷五二。

㊱《清圣祖实录》卷五一。

㊲《清圣祖实录》卷五二。

㊳王继贞抵陕西后，王辅臣即将其留下。

㊴《清圣祖实录》卷五二。

㊵王辅臣降清后惶恐不安，自杀未遂。康熙二十年，清帝令王辅臣进京，王辅臣在西安自尽而亡（八月二十九日）。

㊶㊷《清圣祖实录》卷五七。

㊸《清圣祖实录》卷六三。耿精忠在降清前先派人杀害被关押的范承谟。康熙十九年四月耿精忠赴京陛见，抵京后不久即逮入狱，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被凌迟处死。同时被处死的尚有其子及部将二十二人（其中七人凌迟处死）。

㊹《清圣祖实录》卷六四。

㊺吴三桂得悉孙延龄有反正意，派人袭杀孙延龄，马雄未几也死，马雄子马承胤降清。

㊻吴三桂授意达赖喇嘛建议清廷裂土罢兵。

㊼㊽《四王合传》《吴三桂传》。康熙十三年四月十二清廷杀吴三桂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

㊾时不及易黄瓦，"以漆黝之"。

㊿(51)《四王合传》《吴三桂传》。

清（前期）

两次雅克萨战争

长期以来，俄国的疆界在乌拉尔山以西，与中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下半叶（明嘉靖、隆庆时期）俄国军队在经历一系列军事征服后①，越过乌拉尔山，进抵叶尼塞河。十七世纪初，其势力已抵达鄂霍次克海，囊括西伯利亚，迨至清军入关前夕，其远征军穿越外兴安岭，南下黑龙江流域，窜入满族的发祥地②。伴随着俄国远征军的军事扩张，清、俄之间的军事冲突愈演愈烈③。

俄军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

俄国远征军利用康熙初年最高权力更迭无暇北顾之机，不仅依旧盘踞着黑龙江上游的尼布楚城、中游的雅克萨城，且构筑工事，建立殖民据点，屡屡向下游进犯。三藩之乱期间，俄远征军沿黑龙江支流分路推进：

康熙十五年（1676）在古里河（明代曾在此设古里河卫）上设侵略据点；

康熙十七年（1678）在精奇里江上游建结雅斯克堡；

康熙十八年（1679）在西林穆丹河畔建西林穆宾斯克据

点，在精奇里江口建多伦禅（俄人称为多伦斯克）据点；

康熙二十年（1681）在额尔古纳河附近建额尔古纳堡。

在此期间，俄军顺黑龙江而下，陆续在黑龙江下游构筑杜吉根斯克、乌第斯克、图古尔斯克、聂米伦斯克等军事据点，“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构乱不休”④，索伦、赫哲、斐雅喀等部族的“子女参貂”被侵略者“抢掳殆尽”⑤。

清廷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边界冲突的尝试⑥，并未得到俄国当权者的响应。在平定三藩后，清康熙帝即出关巡边（康熙二十一年，1682）由盛京北上，抵吉林乌喇（今吉林市），荡舟于松花江上，“连樯接舰屯江城，貔貅健甲皆锐精”⑦。同年九月，康熙派副都统郎谈等率数百人，装作捕鹿者，到雅克萨城附近侦察俄军的工事及兵力部署。探知俄军“恃雅克萨城为巢穴”⑧，只有夺回雅克萨，才可能使俄国政府接受和谈的建议⑨。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

从康熙二十二年起（1683），清廷即着手对沙俄入侵者予以反击：

筑黑龙江（即瑷珲城）、呼玛尔两城，以为屯兵之所；

从宁古城以及山东、山西、福建等地调军北上；

派达斡尔兵携眷前往黑龙江一带屯田；

在吉林造船，招募水手；

开辟一条从沈阳到瑷珲城的水上运输线，经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把征集的一万二千石粮食（可供三年之用）运往前线；

从吉林到瑷珲开辟一条一千三百四十里的驿路，设十九个驿站；

清军前锋部队进抵精奇里江口，攻克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所设置的据点多伦禅，西里姆宾斯克（康熙二十二年七月）。

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于康熙二十四年五月爆发（1685）。该年一月，康熙派都统彭春赴黑龙江，会商用兵事宜。与此同时，康熙致函俄国沙皇，要求俄国军队从雅克萨撤兵，“以雅库等地为居住界，朕即令征讨之大兵停止前进，如此则边界地方可得安宁，而无侵扰之忧，互相贸易遣使，和睦相处”⑩。

由于俄方拒不响应清廷所提出的“毋复入内地构乱”、“彼此晏居”的建议⑪，清军于五月二十二日进抵雅克萨，包围该城。清军从水、陆两路发起攻击，且将顺黑龙江而下企图开进雅克萨的一支俄军歼灭。二十四日晚清军大炮运抵城下，龟缩在雅克萨城的俄军首领托尔布津在炮火的猛烈攻击下，于二十五日挂出白旗乞降，清军遂收复雅克萨。

康熙在得悉雅克萨捷报后，传谕彭春等人：“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边远疆陲何能宁辑？朕亲政之后，即留意于此，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以故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今收复雅克萨地，得遂初心。至于抚绥外国，在使之心服，不在震之以威。”“朕以仁治天下，素不嗜杀；尔其严谕将士毋违朕旨，”“勿杀一人，俾还故土，宣朕柔远至意。”⑫

按照康熙的谕旨，清军在占领雅克萨后，释放了在城内的侵略者及其家属七百余人⑬，且允许彼等携带武器、财产出城。被侵略者作为人质关押在城内的索伦人、巴尔虎人共一百六十余名，得重见天日。清军在拆毁雅克萨城工事后，撤回瑷珲。

第二次雅克萨战争。

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康熙得悉俄军再次侵占雅克萨⑭，传谕议政王大臣会同彭春、郎谈等拟定进兵事宜。二月初十，清廷令将新炮、火药、炮弹等送往黑龙江军前；二月十三日传谕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速修战舰，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城”，“率所部兵二千人攻取雅克萨城”⑮。四月初六康熙派熟悉黑龙江地形的郎谈、班达尔沙等从京师赴军前。

该年五月二十八日，萨尔素、郎谈兵分两路逼近雅克萨城。时俄军在城内有守兵八百二十六人，储备大量弹药、粮食及其他用品；城上配备大炮十三门，致使清军不能逼临城下。六月初四，清军大炮四十门运至雅克萨，双方遂展开激烈的炮战，托尔布津及百余名俄军丧生。

农历八月，寒冬将至，清军掘壕筑垒，对城内俄军长困久围。城西临江，在江对岸驻扎一支军队，截击尼布楚方面派出的援军，距雅克萨城六七里上游之处有一港，清军战船暂藏于内，另派一军驻守，兼可拦击尼布楚援军。迨至该年年底，被围困在雅克萨城的俄军，因传染病流行，只剩八十七人，且粮食、弹药消耗殆尽，处于山穷水尽的状态。

沙俄政府得悉雅克萨被围困，即遣使前往北京，尼基弗尔·文纽科夫一行于九月二十五日抵京。俄使要求清廷停止进攻雅克萨，双方派使团谈判划界之事。沙俄的建议，当即得到清政府的响应。清廷在此之前两个月（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通过荷兰使团转致俄沙皇咨文，建议“迅速撤回雅克萨等地之俄罗斯人”，“以雅库等地为界，各于界内打牲，彼此和睦相处”⑯。清康熙帝在俄使者抵京后第三天，即传谕萨布素等

从雅克萨撤兵，在靠近停泊战船之处扎营，十月初七，康熙复函沙皇，明确写道："朕一面派人传令停围雅克萨城，一面等候来使议定边界、停止征战，共修和好。"⑰

康熙二十六年（1687）正月初九，萨布素遵旨撤退围城之兵，第二次雅克萨战争正式结束。

注 释

①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俄国吞并喀山汗国；1556年（嘉靖三十五年）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吞并伏尔加河流域。

②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瓦西里、波雅科夫率远征军入犯黑龙江流域，抢劫达斡尔人的村落，屠杀当地居民。在顺治七年、顺治八年俄国远征军先后两次窜入黑龙江流域，对达斡尔人、赫哲人的居住区进行惨绝人寰的屠掠。

③顺治九年宁古塔将军遣兵对驻扎在乌扎拉村的入侵者发起攻击；顺治十一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与入侵者大战于松花江口；顺治十五年沙尔虎达在松花江口全歼入侵者，击毙其首领斯捷潘诺夫。

④《平定罗刹方略》。

⑤《广阳杂记》卷二。

⑥康熙五年，俄国派使团抵达北京，清廷官员在谈判中，要求俄军停止入侵，"勿于边界地方侵扰"；康熙二十年派大理寺卿明爱前往卜魁（今齐齐哈尔），同驻在雅克萨城的俄军当局交涉，要求归还所侵占的多伦禅等地。

⑦《康熙御制诗》、《放船歌》。

⑧《平定罗刹方略》卷一。

⑨美国历史学家曼考尔所著《俄国与中国》一书中，有如下评述："康熙不想征服俄国，只是要向俄国表明，自己有力量和俄国进行谈判。"（哈佛大学1971年版）

⑩《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清称在

黑龙江一带的俄军为罗刹，称沙皇为察罕汗）。

⑪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康熙再次致函沙皇，该书由被俘俄兵经喀尔喀蒙古出境送往俄国。

⑫《康熙起居注》第二册。

⑬有四十五人不愿返回，留居中国。

⑭康熙二十四年七月，托尔布津率俄军近千人，武装、物资等从尼布楚出发重返雅克萨、再建侵略据点。

⑮《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五。

⑯⑰《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

清（前期）

尼布楚条约

清军在两次雅克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实力，终于使沙俄政府接受清廷所提出的和谈建议。

中俄外交使团的派出及各自谈判宗旨。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初二（1686年1月29日），沙皇派遣御前大臣兼布良斯克总督戈洛文为全权谈判特使，以尼布楚督军弗拉索夫为谈判副使，俄国使团还包括军官数人、火枪兵五百余、兵士一千四百人。沙皇政府为戈洛文使团所制定的谈判方案是：坚持以黑龙江、牛满河、精奇里江划界；拒绝从尼布楚、雅克萨撤兵；要求清廷赔偿雅克萨战争的损失；设法使喀尔喀蒙古在清、俄冲突中支持俄国。且训令戈洛文：如清廷"坚持原有主张，毫不让步，不愿根据上述条件缔结和约，大使必须依照沙皇陛下的命令和西伯利亚部的军事训令采取行动"①。

康熙二十六年（1687）八月，戈洛文使团行抵贝加尔湖以西的厄尔口城（今伊尔库茨克）。八月二十四日，戈洛文收到沙皇政府所发出的关于划界的第二个训令。俄国政府在该年春

与土耳其的战争中战败，无暇东顾，遂传令戈洛文等，如不能达成以黑龙江为界的协议，即以雅克萨为界，叮嘱使团“决不要发动战争和造成流血事件”②。

戈洛文得悉清军已从雅克萨撤退③，遂迟迟不同清廷联系，在贝加尔湖一带逗留，诱骗喀尔喀蒙古归顺俄国。戈洛文在扩张企图未能得逞后，便对该地的蒙古、索伦部落发起进攻，大肆劫掠④。在清廷的敦促下⑤，戈洛文的代表于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1688 年 3 月 24 日）到达北京，要求清政府派出对等的使团到位于边界的楚库柏兴（乌兰巴托以北约七百里）进行谈判。

康熙二十七年三月，清廷任命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一等公佟国纲，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都察院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等为中俄议定边界谈判团。都统郎谈等率八旗前锋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随同前往，任命传教士徐日升（葡萄牙人）、张诚（法国人）为随团翻译。五月初二，清方谈判使团离京。行前，康熙对索额图等谕道：“其黑龙江之地最为扼要，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喇、宁古塔、席北、科尔沁、索伦、达斡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喇所居之地。若不尽取之，边民终不获安。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如俄罗斯遵谕而行，”“与之划定疆界，准其通使贸易；否则尔等即还，不便更与彼议和矣。”⑥

索额图、佟国纲等一行离京后不久，蒙古厄鲁特部⑦便与

喀尔喀部⑧发生战事。该年五月，厄鲁特四卫拉特之一的准噶尔部，越过杭爱山，大举进攻喀尔喀部。喀尔喀各部不支，弃庐帐、马驼牛羊等南逃，清廷使团北上之路被阻。该年五月二十五日，康熙传谕索额图等暂驻喀伦，将迟滞原因通告俄国使团。未几俄使戈洛文致函清廷，建议另择地点进行谈判。有鉴于此，康熙遂召回索额图、佟国纲等一行。

戈洛文利用准噶尔部的进攻，胁迫喀尔喀臣服俄国，在遭到拒绝后，便派军队从乌丁斯克出发，袭击喀尔喀各部，在昔洛克河岸杀害蒙古人二百余，强迫一千二百余户蒙民改入俄国籍。戈洛文遣使至喀尔喀各部劝降，要求各部贵族“协同沙皇陛下军队作战”，“提供尽可能多的差马、骆驼”，“永远臣服沙皇陛下崇高的专制统治”⑨，每名贵族每年向俄国交纳牛五十头、羊五十只等。俄使团无暇顾及谈判，直至康熙二十八年闰三月（1689 年 5 月），才在清廷的敦促下达成在尼布楚举行中俄谈判的协议，索额图等于四月二十六日从北京出发。

中俄尼布楚谈判。

鉴于准噶尔部东犯所造成的北部边境危机⑩，康熙决定在中俄边界谈判中作出较大的让步，将原定“以尼布楚为界”改为“以额尔古纳河为界”⑪，让出尼布楚，收回雅克萨。

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索额图、佟国纲等抵达尼布楚，俄国使团尚未到达会谈地，索额图即遣人把一封敦促戈洛文的信交给俄驻尼布楚总督，据张诚在日记中回忆，该信内容如下：“我们业已按照他们的要求，尽一切可能赶到，奇怪的是他们却连到达的确讯都没有。如果他们再不赶到，我们将不得不渡过河去寻找一处比现在的营地更为宽敞的方便的扎营地点，我们目前扎营处地方太小，而且牧草不久即将告罄。”信

上还说："这边之所以尚未渡河，为的是避免给他们以怀疑我方缔结和约诚意的任何理由。"⑫清谈判使团的过河设想，促使在贝加尔湖一带对喀尔喀蒙古乘火打劫的戈洛文使团于七月初四到达尼布楚。

清朝政府在四月二十六日就已通知俄国方面："我驻防东北边界之将军萨布素等，系专管黑龙江等处之员，""勘界事宜完毕后，将交付伊等管理，因此该将军也循水陆由雅克萨至尼布楚，请尔等勿为疑虑。"⑬俄方仍把萨布素等率兵乘船来尼布楚，视为"不是为了讲和而是为了打仗和蹂躏地方"⑭，为此索额图"就命令统帅们把兵弁较远地撤离尼布楚城堡，不给俄国人以任何抱怨的口实"。

七月初五、初六，清钦差大臣与俄全权特使之间信使频繁往返，磋商"举行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最后达成一致协议：第一次会议定于七月初八（8月22日），清方"应率领四十名官员和七百六十名士兵过河，兵士中有五百名应排列在河岸上"，"列队之处至会议地点的距离，应与从尼布楚城堡至会议地点的距离相等；另外的二百六十名兵士应护卫钦差大臣进入会议地点，然后后退一定距离布岗列哨。俄国全权特使应率领同等数目的官兵，按同样的方式列队布岗。双方所带二百六十名兵士，除刀剑以外，不准携带任何其他武器"。"使节们应在他们的帐篷里会晤，帐篷应并列靠紧"⑮。

第一次谈判开始时，清俄双方议定"不谈已经过去的事"，"只确定两个帝国之间的边界"⑯。俄国方面提出以黑龙江（西方称之为萨哈连乌拉）"作为两帝国之间的疆界"，"河以北的土地归俄国，河以南的土地归中国"。清廷方面"无论如何不肯同意这一建议"，"猎取貂皮的山岭都在这条河的北面"，

"建议俄国人退到色楞格以上⑰，把该处地方连同尼布楚和雅克萨以及它们的附属地"⑱划归清帝国。双方便就尼布楚、雅克萨的归属展开激烈的争论，俄国特使以"尼布楚、雅克萨乃是伊等先去开拓居住之地"为词；索额图等则以"敖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部原来居住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彼皆"手无器械"，"因实难忍受尔等偷袭侵入及掠杀抢劫，皆内迁我嫩江等地，于是此地才被尔国长期占据"⑲等事实据理力争。

七月初九（八月二十三日），举行第二次会谈。为了打破僵局，索额图等提出"可以把尼布楚那个地方让给俄国人，以便他们得与中国进行贸易"。对于清廷的让步，俄全权大使"以哈哈一笑作为答复"，着实"激怒"清钦差大臣。在第二次会议将结束时，清廷钦差大臣要求把双方整理的会议记录加以汇总，以便向各朝廷汇报。当天会议结束后，清方"派人去拆除他们的一些帐篷"，清俄谈判濒于破裂。

七月十二，戈洛文派代表到清使团驻地，建议"再举行一次会议"。作为清使团翻译的传教士张诚、徐日升私下亦向索额图等分析"俄国人将放弃雅克萨、和那地方与尼布楚之间的一部分土地"的可能性，于是双方在七月十二日，举行第三次会谈。在第三次会谈中，清钦差大臣提出以格尔必齐河⑳、额尔古纳河㉑为界，但俄国特使不同意在清俄中段划界，理由是喀尔喀的土地已被厄鲁特占领。虽然清方未再坚持在中段划界，可俄全权大使在次日所提出的方案中仍然坚持把雅克萨以及雅克萨以西的全部土地都标在俄国方面，谈判再次陷入破裂的边缘。

清钦差大臣在返回驻地的当天，"立即召集会议"㉒决定清

军全部渡河，“对尼布楚建立封锁”，“当夜就把我们的士兵运到河那边”，“占领尼布楚上游的山岭”，把黑龙江与尼布楚之间的空地，全部占领，“把俄国人在那一面的往来交通完全切断”，清军“擐甲持械，都已排成作战行列”，“约距尼布楚城堡一里远近；并令一百人乘坐木船赶去雅克萨，会同留驻在那地方附近的四五百人，毁掉田里的一切庄稼，不许任何东西得以进入那个要塞”㉒。

俄方一方面把“家眷和牲畜移向尼布楚城堡附近，并布置前哨观察”，“在大街上安设了十五门铜炮”，“一门铜铸迫击炮”；另一方面连夜“派一名译员”到清钦差大臣驻地，“竭力要求重开谈判”。“这个译员暗示，他们的主子本来有意放弃雅克萨”，但因清方“要求太高”；该译员“竭力敦请”清方派张诚、徐日升到俄方斡旋。俄方的重开谈判以及派传教士进行斡旋的建议均遭拒绝，俄国译员在向戈洛文汇报后，“半夜里重又返回，并且声称他们的主子仍旧准备重开谈判”。第二天清晨（七月十四，8 月 28 日），俄方代表到清方驻地，“提出放弃雅克萨，他们也同意了以额尔古纳河作为两帝国之间的疆界”㉓。在经过七天的激烈谈判后，清俄双方终于进入草拟条约的阶段。

尼布楚条约的草拟与签定。

自七月十五（8 月 29 日）双方开始草拟划界条约，根据会议记录，以外兴安岭（现称斯塔诺夫山）为界，但该山脉在格尔必齐河发源处形成两支高峻的山岭，其北峰在乌第河北岸延绵东去直至鄂霍次克海，其南峰在接近东经 132 度时向南折约一纬度，两峰之间的面积约五万平方公里。该地出产“最上品的貂鼠、玄狐和其他毛皮”，濒海还有一种大鱼，“其牙齿比

象牙还要白硬”㉔，满族人用这种鱼牙“制作指环、拉弓时戴在手上保护拇指”，但由于俄国人在乌第河两岸“有些屯居地”，这一地区的归属又引起新的争议。

七月十九日（9月2日），戈洛文派人送来一封措词强硬的信，以清朝皇帝在给俄国沙皇的信件、清方使节的文书上从未明确提过这一地区，坚持对这一地区的归属“不作决定，留待奉到有关这事的正式谕旨和命令以后再来商定”，如清方不接受此建议，“唯有昭告天地，不对战争和一切流血牺牲的恶果承担责任”，谈判再次面临破裂的危险。索额图、佟国纲等钦差大臣担心“缔和的一切希望都将完全毁掉，皇上或许会责备他们把和谈搞绝裂”㉕，遂于次日通知戈洛文，接受俄方建议，“有关两条山脉之间土地的一款应不作决定”㉖。

七月二十四日（9月7日），尼布楚条约正式签定，正本两份，用拉丁文誊写，副本两份，分别由满文、俄文书写。正本分别盖有清、俄两国印玺，用满文、俄文书写的副本由清、俄各自保存，作为正本的译文。该条约共有八款：

一、绰尔纳河、格尔必齐河作为两帝国之边界；

二、俄国在雅克萨所筑城堡应完全拆毁，俄国居民连同所有财物均移至俄国辖境之内，两国居民不得私自越境；

三、所有既往之事，概应永远遗忘，不再追究；

四、自缔约之日起，彼此互不收容逃亡或叛逆之人；

五、现留清界内之俄国臣民或现留在俄国境内之清臣民，均各留居原地；

六、两国臣民凡获许可，俱准于互相往来，彼此贸易；

七、两国边界划定后，各守本约；

八、本条约正副文本，“钤用印信，彼此交换”，上述各款

应以满文、汉文、俄文、拉丁文铭刻碑石，“立于两国所定边界之处，垂诸久远，永资信守”㉗。

尼布楚条约是一个平等的条约，该条约明确划定两国东段边界，此后清廷在雍正五年（1727）同俄国就中段边界进行谈判，先后签定《连斯奇条约》（雍正五年八月）、《阿巴哈依图界约》（雍正五年十月）、《色楞额界约》㉘，确定恰克图与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鄂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清，以北归俄，对尼布楚条约中乌第河一带待议区，“仍保留原状”。

注　释

①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附录，第154页。

②《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

③康熙二十六年七月，康熙得悉俄使团已行抵伊尔楚次克，即令萨布素率军撤回瑷珲，并于要地设斥堠，休整待命。

④康熙二十六年九月，戈洛文以丢失牛羊马匹为借口，指挥俄军入侵楚库柏兴一带的牧场。

⑤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六，清理藩院向戈洛文使团发出咨文，询问其“延误”的原因。

⑥《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⑦厄鲁特分为四卫拉特，准噶尔、土尔扈特、杜尔伯特、和硕特。

⑧喀尔喀分为三大部：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札萨克图汗部。

⑨《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二卷 。

⑩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土谢图汗部二十八台吉及车臣汗部十万余部众先后奔入内蒙古界内，乞内附。为防止准噶尔内犯，康熙令安亲王岳乐、简亲王雅布率军驻苏尼特部汛界，命苏努统兵驻归化。

⑪《清圣祖实录》卷一四O。

⑫《张诚日记》，1689年8月1日，（六月十五日）。

⑬《清圣祖实录》卷一四O。

⑭《张诚日记》，1689年7月31日（六月十四日），萨布素等在六月初十抵达尼布楚。

⑮《张诚日记》，1689年8月20日（七月初六）。

⑯《张诚日记》，1689年8月22日（七月初八）。

⑰色楞格系河名，位于贝加尔湖以西，流经乌的柏兴、楚库柏兴。

⑱《张诚日记》，1689年8月22日（七月初八）。

⑲索额图：《题会同俄使戈洛文勘界本》。

⑳格尔必齐河，南北走向，流入黑龙江。

㉑额尔古纳河，发源于尼布楚东南，南北走向。

㉒该计划因俄方同意撤出雅克萨并未付诸实施。

㉓《张诚日记》，1689年8月28日（七月十四）。

㉔《张诚日记》，1689年9月1日（七月十八）。

㉕《张诚日记》，1689年8月27日（七月十三）

㉖《张诚日记》，1689年9月3日（七月二十）

㉗《张诚日记》，1689年9月7日（七月二十四）

㉘俄方参加谈判的全权特使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通过法传教士巴多明收买参与谈判的大学士马齐（萨瓦通过商队转给马齐一千卢布，转给巴多明一百卢布），窃取清政府的决策意图（急于求和），在谈判中处处主动，迫清代表团把恰克图以北的大片领土让给俄国。萨瓦在给沙皇的汇报中写道，通过条约“不仅使中国在边境上割让有利之地带，且从未属于俄者，亦获而领有之”（《中俄早期关系史》122页）。

清（前期）

满蒙结盟

元朝灭亡以后，蒙古贵族率部众退归塞外，雄居大沙漠南北，分裂成为漠北①、漠南②、漠西③三大部，互不相统。

漠南蒙古牧地东起吉林、黑龙江、西至贺兰山，北邻大沙漠，南接长城。漠南蒙古由科尔沁、喀喇沁、察哈尔、土默特、札鲁特、敖汉、奈曼、四子、阿噜科尔沁、翁牛特、浩齐特、苏尼特、鄂尔多斯、喀尔喀左翼等部组成。在蒙古三大部中，漠南蒙古同满洲各部地域相接，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等方面相互影响④，最先与满洲贵族结盟。

同科尔沁、札鲁特联姻、结盟。

科尔沁部自明中叶即游牧于嫩江一带，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该部曾出兵助叶赫、哈达、乌拉、辉发等部，组成九部联军，与努尔哈赤为敌（万历二十一年，1593）。努尔哈赤在击败九部联军后，科尔沁贝勒明安、莽古斯、翁果岱“遣使来通好，自是蒙古通使不绝（万历二十二年，1594)”。

万历四十年（1612）四月，科尔沁贝勒明安送女嫁努尔哈

赤。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科尔沁贝勒莽古斯送女与努尔哈赤之子四贝勒皇太极为妻，“四贝勒前往迎亲，会于辉发国呼尔奇山地方，遂大婚成礼”⑤。

后金天命八年（1623）五月，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之女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诸妃“迎于五里之外”；同年九月，科尔沁贝勒噶尔斋之女嫁努尔哈赤十四子多尔衮，“杀九畜，置四桌，汗与诸福晋（满语妃）、诸贝勒、大臣坐八角殿，演百戏而宴之”⑥。

后金天命十年（1625）二月，科尔沁贝勒斋桑之女（莽古斯孙女）嫁四贝勒皇太极；

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六月，科尔沁贝勒翁果岱之子奥巴因受察哈尔部威胁前往沈阳与后金结盟，“誓告天地”，努尔哈赤以侄女妻之。

札鲁特部驻牧在喜峰口外，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该部贝勒钟嫩送女同努尔哈赤次子“古英巴图鲁贝勒⑦为婚”；该部内齐汗以妹嫁努尔哈赤第五子莽古尔泰；迨至年底该部贝勒巴拜将女嫁努尔哈赤第十子德格类。天命八年九月，札鲁特贝勒劳萨之女嫁努尔哈赤之孙瓦克达，瓦克达“前往十方寺迎接”⑧。天命五年（1620）二月，后金遣使札鲁特，与钟嫩会盟，“刑白马、乌牛，对天盟誓”，其誓词曰：“蒙天眷祐，愿相盟好，同谋共处”，“我二国素与明国为仇，今将合谋征之”⑨。

征察哈尔。

在漠南各部中察哈尔实力最为雄厚，横行大漠南北。天命十年十一月，因“察哈尔之兵来围科尔沁”，努尔哈赤命莽古尔泰、皇太极、阿巴泰等“率精兵五千前往”，“出征贝勒至农

安，正值察哈尔兵将攻科尔沁之际，闻金兵至，即连夜退去”⑩。

后金天聪二年（1628）初，察哈尔侵扰喀喇沁、鄂尔多斯等部，皇太极应喀喇沁、鄂尔多斯等部之请，发兵援助，在敖木轮大败依附察哈尔的多罗特部。同年九月，皇太极再次发兵，讨伐察哈尔，敖汉、奈曼、札鲁特、喀喇沁、科尔沁等部皆派兵参加，察哈尔部不支，拔帐西逃，从西喇木伦河（又名潢河）、老哈河一带撤出。

天聪五年（1631）察哈尔部侵阿噜科尔沁。皇太极遣兵往援。该部首领林丹汗饱掠而去。翌年四月，皇太极约蒙古各部再征察哈尔，林丹汗率部众渡黄河西奔，窜至青海大草滩，部众散失十之七、八，所部解体。

天聪八年（1634）五月，皇太极率军西征，一路之上收编察哈尔部众数万，林丹汗之叔茂奇塔特率部众投奔后金。皇太极行抵尚方堡得悉林丹汗死于痘症始撤军。天聪九年（1635）四月，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子额哲归降，皇太极遂将次女嫁额哲为妻。林丹汗的败亡及察哈尔的臣服，标志着漠南蒙古同满洲贵族结盟的最后完成。

健全法制。

天聪三年（1630）皇太极派官员“颁敕于科尔沁、敖汉、奈曼、喀尔喀⑪、喀喇沁五部，令悉遵我朝制度”⑫。天聪八年（1635），“定外藩禁令，凡夺人妇配他人者罚驼五十”，“如部长不察治，亦罚驼五、马五十”⑬。

设立蒙古衙门。

在同漠南各部结盟的过程中，后金设立蒙古衙门，“专治蒙古诸部事”，“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

"正其刑罚"。

崇德三年（1638），清廷将蒙古衙门更名为理藩院。理藩院下设六个司，其中王会司、柔远司、旗籍司，负责朝贡、禄赐等事；典属司、来远司、理刑司，除负责蒙古各部封爵、会盟、喇嘛承袭外，还兼管西藏事务。

划定牧地。

争夺牧地是蒙古各部贵族长期混战的原因，为此清廷对漠南各部划定牧界。天聪八年（1635）"遣大臣赴硕翁科尔，定蒙古牧地疆界"，明确规定，"既定界，越者坐侵犯罪；往来驻牧，务令会齐移动"⑭。

编牛录，设旗、盟。

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派遣内宏文院大学士希福、蒙古衙门承政尼堪等"往察哈尔、喀尔喀、科尔沁诸部稽户口，编牛录"，把漠南各部编为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每旗设一札萨克（即旗长）。由清廷从蒙古王公中简派，札萨克一职世袭罔替。旗下设章京、参领、佐领数名，协助札萨克处理旗内事务。旗上设盟，盟长由蒙古衙门请旨简任，盟长对各旗札萨克有监督之权，但无权干预旗务、发布命令。

在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之外，还编有由清廷任命都统的蒙古八旗、土默特左、右二旗，此类旗直接隶属蒙古衙门，"官不得世袭，事不得自专，与各札萨克君国子民者不同"⑮。

调蒙古各部从征。

满蒙结盟补充了后金兵力之不足。科尔沁贝勒明安及其子昂洪、多尔济、绰尔济等"天命十一年从伐巴林、札鲁特⑯诸部，天聪五年从伐明，攻大凌河"⑰，"六年从上伐察哈尔"；

奥巴在天聪二年从征察哈尔，“三年从征明，克遵化州，围北京，五年围大凌河，降其将祖大寿，六年从略大同、宣府边，八年复从征明”⑱。顺治元年入关之战，“敖汉部长班第、巴林部长色布腾、阿噜科尔沁部长穆彰、土默特左翼善巴、奈曼部善丹、札鲁特部哲胃赫、四子部落多尔拜及札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科尔沁诸部皆从”⑲。

以蒙古为长城。

我国北部历来是游牧部族出没、繁聚之地，自战国以来，历代中原统治者均以构筑、修葺长城的方式，阻挡游牧部族南下。一些游牧部族在进入中原后，也以修筑长城防犯其他游牧部族⑳。满洲贵族通过与漠南各部结盟，挡住漠北各部的铁骑，至康熙年间又通过与漠北各部结盟，遏制准噶尔部东进的攻势。以蒙古各部“防御朔方”较土木所修长城“更坚”㉑。

在同蒙古各部结盟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始终坚持恩威并施，“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叛则讨之，遁则宥之，降则舍之”；“开诚布信”，“以求服其心”；“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㉒。

注　释

①漠北蒙古又称喀尔喀蒙古。

②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

③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

④在女真文字失传后，满族在很长一段时间使用蒙古文，额尔德尼、噶盖所创满文（即老满文）即参照蒙文字头。

⑤《满文老档》上册，第 27 页

⑥《满文老档》上册，第 567 页。

⑦“古英巴图鲁”系代善赐号，译为“无畏勇猛”。

⑧《满文老档》上册，第562页。

⑨《满文老档》上册，第131页。

⑩《满文老档》上册，第648—649页。

⑪当时喀尔喀有三：一曰"旧喀尔喀"编入蒙古八旗；一曰"喀尔喀左、右翼"，在喜峰口外一带游牧；一曰"外喀尔喀"即漠北各部。此处所言喀尔喀系指喀尔喀左右翼。

⑫《清太宗实录》卷五。

⑬⑭《皇朝藩部要略》卷一。

⑮《圣武记》卷三。

⑯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逝世后，札萨克部首领背盟，皇太极率兵讨之。

⑰《清史稿·明安传》。

⑱《清史稿·藩部一》。

⑲《皇朝藩部要略》卷一。

⑳南北朝时期，鲜卑拓拔部所建立的北魏为防备柔然就曾构筑长城。

㉑《清圣祖实录》。

㉒《皇朝藩部要略》序。

清（前期）

征噶尔丹

噶尔丹系准噶尔部①首领巴图尔珲台吉②第六子，少时被送往西藏拉萨出家③，在五世达赖门下当了一名喇嘛。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的同母兄僧格在嗣汗位十几年后④，被巴图尔珲台吉的庶出长子车臣所杀，噶尔丹闻讯即从拉萨返回准噶尔牧地，杀长兄车臣，自立为汗。

噶尔丹的崛起。

康熙十年十二月，噶尔丹遣使北京进贡，获得同清廷继续贸易的权力。

康熙十六年（1677）噶尔丹袭杀和硕特部一支——驻牧在套西的鄂尔齐图汗。"噶尔丹娶鄂尔齐图女，旋以兵袭杀鄂尔齐图，破其部"，"于是西套厄鲁特溃散，或投西藏，或被虏归伊犁"⑥。"青海和硕特诸台吉惧、挈帐数千避居大草滩"⑦

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噶尔丹起兵袭青海和硕特部，因内部意见不一，出发十一天后撤归，又恐与青海和硕特部结怨，遂以女嫁该部博硕克图济农之子根特尔。未几噶尔丹越过天山占领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城，势力扩张到维吾尔族所居住

的南疆地区。噶尔丹派官员去上述地区统治，将维吾尔族首领及其家属掳回伊犁关押。

康熙十八年（1679）噶尔丹袭取哈密、吐鲁番，控制天山以南，居住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全部沦为噶尔丹的奴隶。

噶尔丹"思北并喀尔喀，乃自伊犁东徙，帐阿尔泰山，并使杜尔伯特部众屯田，且耕且牧，以恃其食"⑧。在此期间喀尔喀土谢图汗部与札萨克图汗部因"互将人民隐占"，"蓄怒交恶"⑨。康熙二十五年四月（1686）清廷遣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前往喀尔喀，调解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的矛盾，噶尔丹亦派己弟多尔济札卜偕达赖五世所派代表西勒图前往。多尔济札卜以调解为名，大事挑拨离间，竭力拉拢札萨克图汗沙喇，盟誓会上又指责哲布尊巴丹活佛同达赖五世代表"抗礼踞坐"、对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肆行凌辱"，酿成土谢图汗怒杀多尔济札布、札萨克图汗沙喇的事件。噶尔丹遂以报仇为名，率精锐三万越过杭爱山，"分南北两路"，大举进攻土谢图汗部。时土谢图汗部主力集中在楚库柏兴防御俄议和团戈洛文军队的袭掠，猝不及防，时为康熙二十六年九月（1687）。

康熙二十七年（1688）六月，噶尔丹在击溃土谢图汗部后，对喀尔喀各部肆行杀掠。喀尔喀各部"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纷纷南窜"⑩，奔入清汛界，乞求保护。喀尔喀故地尽被噶尔丹占领。

乌兰布通之战。

噶尔丹既"兼有回部⑪、青海⑫、漠北，则益骄"，"踞喀尔喀王庭，征诸属国，控弦之士数十万"⑬。康熙二十九年初（1690），噶尔丹以追杀土谢图汗、哲布尊巴丹活佛为名，大举南下，向漠南（即内蒙古）逼近。三月初，康熙令调鄂尔多

斯、四子及归化等处兵六千，携三个月口粮，赴土拉⑤防备，且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坦赴军前，安排驿站，该年五月初，噶尔丹率军渡过乌尔伞河，康熙得报急调科尔沁、喀喇沁、翁牛特、巴林等部兵三千三百人，开赴土拉，听阿喇坦节制；又从京师抽调八旗前锋兵二百、汉军炮兵二百及每佐领护军一名（约千余人）开赴军前。旋即调乌珠穆沁、阿巴垓、苏尼特等部兵赴土拉，又从京师八旗兵中抽调前锋兵二百、每佐领抽调护军两名开赴军前。六月中旬，在得悉噶尔丹的军队沿喀尔喀抢掠，"所有牛羊尽为所掳"⑭，康熙令贝勒苏努统京城八旗起程，亦令科尔沁、敖汉、土默特等部兵全部开往土拉。

六月二十一日，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从蒙古各部中选精锐二百出击，噶尔丹采用"弓形阵"战术，利用火器掩护，大败阿喇尼。噶尔丹益发有恃无恐，攻入清帝国汛地——乌珠穆沁、克什克腾等部驻牧地，迨至六月底已兵临乌兰布通（昭乌达盟南端，毗邻直隶北部），距北京只有七百里，"京师戒严"⑮。

六月二十二日，康熙下诏亲征，从征诸王有裕亲王福全（顺治第二子，康熙帝之兄）、恭亲王常宁（顺治第五子，康熙之弟）、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札、康熙长子胤禔，从征诸臣有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索额图、明珠以及都统、副都统多人。旋即命康亲王杰书、恪慎郡王岳希率军出张家口，驻归化城。且调直隶等处火器营兵一千、京师火器营兵一千随同亲征，又从盛京调兵二千、吉林乌喇调兵二千开赴军前；传谕内蒙古四十九旗备兵分汛警戒，于险要之处驻兵。

七月初六，裕亲王福全率部先行。七月十四康熙从北京出发，出古北口，十八日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康熙因旅途劳累，病在军前，七月二十三日，从群臣吁请，即日回銮。行

前康熙令裕亲王福全节制诸军，又命“选择肥壮马匹分给随驾火器营兵、前锋护军”，令彼等“驰赴大军前”⑯听命。

八月初一晨，清军与噶尔丹军在乌兰布通展开激战。噶尔丹军队二万余“阵山下，依林阻水。以万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卒于垛隙发矢铳，备钩距，谓之驼城”⑰。清军“隔河⑱而阵，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坚，声震天地”，“驼毙于炮，颓且仆”，驼城“断为二”。清军“步骑争先陷阵，左翼兵又绕山⑲横击，遂破其垒”⑳，噶尔丹不支，乘夜率军败逃。

次日清晨，噶尔丹“遣西藏喇嘛济隆”到清军营地，会见裕亲王福全，“卑词乞和”，口称“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系大非理”，皆“因索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误”，“请求“休征罢战”。福全因所调“盛京、乌喇、科尔沁诸军”未至，便允济隆所请，“檄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暂止勿击”㉑，噶尔丹遂乘机北撤，渡潢河，穿过大碛山，“所过皆烧荒，以绝追骑”㉒。

噶尔丹在撤退中“尽失负驼”，“狂奔绝漠而北，沿途饥路死亡，得还科布多者仅数千人”㉓。

昭莫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在经过几年休整后，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遣兵侵掠喀尔喀益甚，屡书索土谢图汗及哲布尊巴丹大喇嘛”，“阴遣使诱内蒙古各部叛归己”㉔。一年后（康熙三十四年，1695），噶尔丹率骑兵三万，从科布多出发，再次大规模东犯。该年七月已抵克鲁伦河流域㉕，兵抵巴颜乌兰，“自秋徂冬，踞之不去”㉖。

康熙三十五年（1696）二月，康熙再次亲征噶尔丹。经议

政王大臣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率盛京兵二千、宁古塔兵一千、科尔沁兵四千，沿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归化将军费扬古率领共约二万四千，分别由归化（今呼和浩特）、宁夏启程；中路兵由驻京八旗及宣化绿营组成，约三万余，由皇帝自将。

该年四月初，中路军已至科图，东路军未能按期到达预定地点，西路军因噶尔丹东进时“尽焚草地”须“迂道秣马”及“粮运阻雨”亦不能如期到达。噶尔丹又大肆张扬“俄罗斯助兵之信”㉗。从征大臣佟国维、索额图、伊桑阿等力劝康熙回銮，仅以西路军迎敌。康熙断然拒绝道：“如中路军撤退，贼尽锐注西路，西路不其殆乎？遂率兵趋克鲁伦河。”㉘五月初七，康熙所率中路军已抵西巴尔台，逼近噶尔丹营地。

噶尔丹在得到康熙亲征至此的讯报后，殊为不信，亲“登北孟纳兰山，望山御营黄幄龙纛，环以幔城”，“军容山立，大惊，拔营宵遁”。初八中路军至克鲁伦河，“北岸已无一帐”。康熙令“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搜讨巴颜乌兰近地”，自率“前锋追之三日至施山不及而还，命内大臣明珠尽运中路粮以济西师”㉙。五月十四，康熙启程回京，令领侍卫内大臣马思哈往迎西路军，作好歼敌之备。

噶尔丹率部“奔驰五昼夜”，“沿途遗老弱辎重”，有万余之众在五月十三日抵达昭莫多（蒙语树林）。该地位于“肯特岭之南，土拉河之北”（乌兰巴托东南约七十里），“平旷饶水草。回望大岭，千仞如屏，为自古漠北战场”㉚。

费扬古所率西路军适行抵昭莫多，因长途跋涉“马僵其半，士多徒步”。费扬古以“马力不能驰击”，“以逸待劳”，“距敌三十里即止营。其地有小山，三面皆距河，林木茂荟，

可设伏”。西路清军“先遣前锋兵四百，且战且却”，诱敌至。费扬古率军“先据小山，阵于东，余沿土拉河阵于西，兼备林中伏贼”。孙思克率绿营居中而阵。

十三日晨，噶尔丹军被诱至，向孙思克部所扼守的山头发起猛攻，清军“据险俯击，弩迭发”。敌军“冒矢铳鏖斗，至暮不退，人人如怒虎，林木皆震”㉛。费扬古遥望敌阵后方，“人马不动，必其妇女、驼畜”，“乃麾沿河伏骑一横冲入阵，袭其后辎重”。孙思克部“奋呼夹击”，噶尔丹军“始溃败”。清军“乘夜追击三十余里，天明收军。斩三千级，降三千，获马、驼、牛、羊、庐帐、器械无算，并殪其可敦（可汗之妻）阿努”㉜。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

噶尔丹的败亡。

噶尔丹“自破喀尔喀后，恋漠北地，久不归伊犁，旧部尽为兄子策妄阿喇布坦所并，自阿尔泰山以西皆非已有”。又连年征战“精锐丧亡，牲畜皆尽”。“欲西归伊犁则畏策妄阿拉布坦之逼㉝，欲南投乌斯藏（即西藏）则道远不能至，欲北赴俄罗斯，而俄罗斯拒不受”㉞。

当噶尔丹听到屯集在翁金河的清军余粮“运回宁夏，乃遣兵数千山谷中，突出掠之”，被清军护粮兵“前后夹击所败”。“欲掠喀尔喀之出边游牧者，闻有备，亦不敢犯”；其遣赴藏之使”又被青海所擒。准噶尔部台吉“络绎”降清，噶尔丹“尽丧羽翼”，所剩“皆老羸”㉟，竟至掘草根为食。

昭莫多之战后四个月，康熙以试鹰、行围为名前往宣化、张家口一带，十月中旬抵达归化。此时噶尔丹部属仅千余，食用艰难，冻饿而死者甚众。策妄阿拉布坦联络土尔扈特部阿玉奇等集兵数千，于阿尔台之土鲁图地方阻击噶尔丹。

该年十一月，进退失据的噶尔丹遣格垒沽英等二十人前往归化行在请降。行前噶尔丹对格垒沽英等言道：“天下人果不相同，中国皇帝神灵奇异，闻其行军所至，泉涌于沙，草生于碛，冰泮于河，是天助彼也；今我所属之人皆往属之，是人助彼也。尔往其所，观其侍从大臣行止若何，归日议之，”㊱言毕泣之。该月二十五日，康熙在东斯垓召见格垒沽英，并对随驾诸臣谕道：“朕原无征噶尔丹之意，皆噶尔丹所自取。且噶尔丹凶暴，朕惟待以宽仁；噶尔丹奸狡，朕惟示以诚信”，“今噶尔丹穷迫已极，遣格垒沽英前来乞怜，朕意欲抚之。”㊲遂遣格垒沽英赍敕往召噶尔丹，“许以待喀尔喀恩例”，且对格垒沽英言道：“尔还语噶尔丹，令其亲身来降，否则朕必往讨。朕在此地行猎七十日待尔，限七十日内还报，如过期，朕即进兵矣。”㊳

因噶尔丹终不肯归降，康熙三十六年（1697）二月，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兵进宁夏。此时噶尔丹身边止有人丁三百余，“噶尔丹使子塞卜腾巴珠征粮哈密，为回人擒献㊴，所猎萨克呼里之地野兽已尽”，“策妄阿拉布坦劲兵伏阿尔泰山将擒以献功。噶尔丹进退无地，不知所为计，每夕或数惊”㊵。其亲信力劝噶尔丹当机立断，“如降圣上，则往近之；如不降当另图一策”。该年闰三月十三，走投无路的噶尔丹死于察阿穆塔台㊶。“于是自阿尔泰山以东，皆隶版图，拓喀尔喀西境千余里”㊷。

四月十五日，费扬古疏报送抵御前，康熙得悉“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饮药自尽”，其属下丹济拉等“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济海共率三百户来归㊸”㊹。

注释

①准噶尔部牧地在额尔齐斯河。在厄鲁特四部中，准噶尔与杜尔伯特均系瓦剌太师也先之后（也先长子为杜尔伯特始祖，次子为准噶尔部始祖）；土尔扈特为元臣翁罕之后；和硕特部为元太祖弟哈布图哈萨尔后裔。

②巴图尔珲台吉在位期间迫土尔扈特徙往伏尔加河流域，占据该部牧地塔尔巴哈台；和硕特部袭取青海后，原在乌鲁木齐的牧地亦被准部占领，其势力几乎囊括天山以北。巴图尔珲台吉与俄国交往频繁，购得大量火器。

③明万历年间，土默特部俺答汗入藏迎达赖三世至青海，建仰华寺奉之。此后蒙古王公均送一子出家为喇嘛。为了借助蒙古军事力量振兴喇嘛教，达赖向蒙古王公"广开喇嘛教万神殿之大门"，在蒙古出现比西藏本土还多的活佛。

④僧格约于顺治十年（1653）嗣位。

⑤套西指河套以西，其地东至宁夏，西到甘州，南抵凉州，北临瀚海，方圆七百余里。

⑥⑦⑧《圣武记》卷三。

⑨《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据记，札萨克图汗内部争权夺利，混战不已，部民多逃至土谢图汗部。

⑩《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五。

⑪回部即指居住在天山以南的维吾尔人。

⑫青海指在该处住牧的和硕特蒙古。

⑬《圣武记》卷三。

⑭《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六。

⑮《广阳杂杂记》卷一。

⑯《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

⑰《圣武记》卷三。

⑱此河系潢河的一条支流。

⑲此山即乌兰布通山。

⑳㉑㉒《圣武记》卷三。

㉓佟国纲在交战中阵亡。

㉔《圣武记》卷三。

㉕在当时内外蒙古从克鲁伦河划界。

㉖《圣武记》卷三。

㉗经外交交涉，俄政府已于1696年（康熙三十三年）颁令各边卡，严禁卖给噶尔丹军火。但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初二所获噶尔丹部人言俄罗斯拟于草青时助鸟枪一千及大炮，送至克鲁伦河。

㉘㉙㉚㉛㉜《圣武记》卷三。

㉝策妄阿拉布坦系僧格之子，因噶尔丹夺妻，逃往吐鲁番，"乘噶尔丹南侵败衄之际，潜回伊犁"，"遂有準部大半"。噶尔丹进攻策妄阿拉布坦失利，只得以科布多为游牧地。

㉞㉟㊱《圣武记》卷三。

㊲㊳《清圣祖实录》卷一七八。

㊴康熙三十六年三月初四，噶尔丹之子塞布腾巴尔珠被解至宁夏神木县，康熙问话战栗不能对，旋解京师，交理藩院拘禁。

㊵《圣武记》卷三。

㊶关于噶尔丹死因，《清圣祖实录》、《圣武记》均记载为"仰药自尽"；另据《康熙朝起居注》（该档现存台湾）所记系"早得病，至晚即死"。

㊷《圣武记》卷三。

㊸丹济拉等一行因"缺马无粮"，暂住巴雅恩都尔地方，几天后策妄阿拉布坦遣兵至，劫走噶尔丹骨骸及钟济海。

㊹《清圣祖实录》卷一八三。

清（前期）

抚绥漠北喀尔喀

漠北蒙古，系元顺帝第八子格埒森札后裔的牧地，号所部为“喀尔喀”，析部众为七旗，以七子分领之。格埒森札长子阿什海，长右翼，所部尊之为札萨克图汗；阿什海之四弟诺诺和长左翼，尊之为土谢图汗；阿什海之五弟阿敏都喇勒牧地在瀚海以北，被尊为车臣汗。诺诺和第四子图蒙肯，因尊奉喇嘛教为达赖青睐，授赛因诺颜号，于是从土谢图汗部分出赛因诺颜部。以其地在漠北，又称之为外喀尔喀、外蒙古。

时而通贡，时而为乱。

漠北各部“旧服属于察哈尔”，天聪九年（1635），清军臣服察哈尔部，“车臣汗硕垒偕乌珠穆沁、苏尼特部上书通好”，次年土谢图汗衮布，札萨克图汗素巴第等，赛因诺颜部长图蒙肯相继至”①，此为“喀尔喀部通好之始”。

漠北喀尔喀同清朝虽有交往，尚未称臣，且彼此之间时有冲突发生。崇德三年（1638）“札萨克图汗素巴第掠归化城”，侵掠臣服清廷的内蒙古土默特部，皇太极率军亲讨之，“所部遁，遣使谢罪，并贡马及独峰驼、无尾羊”②。顺治三年

(1646)“车臣汗硕垒诱苏尼特部长腾机思叛”。“硕垒遣子本巴等、土谢图汗衮布遣其属喇瑚里等合丹津喇嘛（赛因诺颜部长图蒙肯次子）兵五万援腾机思”。顺治五年（1648）“腾机思乞降。车臣汗硕垒遣使献驼百、马千入谢，土谢图汗衮布等并上表引罪”③。顺治七年（1650）札萨克图汗部“诡称行猎，私入归化城掠牧产”④。

沙俄的扩张与喀尔喀的抗击。

自十七世纪上半叶，沙俄的势力已向喀尔喀渗透。早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沙俄政府即遣使札萨克图部阿尔泰汗（素巴第叔父硕垒乌巴什一支）劝其臣服俄国，遭到拒绝；1647年（清顺治四年）沙俄的一支探险队，闯入车臣汗的牧地，极力劝诱车臣汗入籍俄国亦遭拒绝；1649年（清顺治六年）沙俄派出以札巴洛茨基为首的使团⑤，直抵车臣汗庭帐，竭力诱惑车臣汗硕垒的寡妻改入俄国籍，仍遭拒绝。

十七世纪下半叶，沙俄的势力已侵入土谢图汗部牧地，占领贝加尔湖一带的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厄尔口城（伊尔库茨克），建立殖民据点，为此土谢图汗多次遣使俄国进行交涉，要求俄军从楚库柏兴撤军⑥。喀尔喀各部民众亦对入侵者多次发动攻击⑦。当清俄决定举行边界谈判后，沙俄政府所派遣的带有武装的戈洛文使团于1687年（清康熙二十六年）行抵贝加尔湖，袭扰喀尔喀各部，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土谢图汗部的军队在鄂尔浑河一带大败戈洛文所率领的俄军，龟缩在楚库柏兴的戈洛文也被蒙古军民团团包围。

噶尔丹入侵及喀尔喀举部内迁。

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准噶尔汗噶尔丹利用土谢图

汗怒杀多尔济布向喀尔喀发动袭击。土谢图汗部主力正在楚库柏兴围困戈洛文，不及回防。土谢图汗率部众，奋起迎击噶尔丹，双方在鄂罗会诺尔“鏖战三日”，终因力量悬殊过大，被准噶尔部击败，“溃卒布满山谷”⑧，“其色惊惶”⑨。戈洛文遂乘机遣使劝喀尔喀臣服俄罗斯，并以助噶尔丹相要挟⑩。

喀尔喀部腹背受敌，一部分首领迫于沙俄的军事威胁，有北投俄罗斯之意，众意不决，商诸哲布尊巴丹活佛，哲布尊巴丹否决北投俄罗斯之议，断然言道：“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投诚大皇帝（指清帝康熙），可邀万年之福，”⑪“众欣然罗拜，议乃决”。

康熙得悉喀尔喀七旗全部内附，诏令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等发归化、张家口、独石口等地仓储赈济彼等，且赐茶、布、牲畜十余万，又将科尔沁牧地借给喀尔喀。

多伦诺尔会盟。

乌兰布通之战后的第二年——康熙三十年（1691）清廷在上都河与额尔屯河间的多伦诺尔⑫举行喀尔喀蒙古会盟阅兵。

该年四月十二日，清帝康熙率上三旗⑬离京，随同前往参加会盟的还有下五旗⑭、八旗前锋、护卫、火器营。四月三十日，清帝一行抵达位于承德西北的多伦诺尔，当即令尚书马齐对喀尔喀三部之汗、济农、台吉等分别叙赏。

会盟于次日举行，“上三旗亲军居中，八旗前锋营二、护军营十、火器营四，共十六营，分二十八汛，各环御营而峙”⑮。喀尔喀各部首领及漠南四十九旗王公、台吉“豫屯于会阅之地百里以外”，听候传唤。喀尔喀三部首领——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车臣汗乌默客、已故札萨克图汗沙喇之弟策妄

札卜，在理藩院、鸿胪寺官员的引导下进入御帐，朝见康熙。对于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之间的积怨，康熙进行调解。康熙批评土谢图汗不该拒不交还札萨克图汗部属民，更不该杀害札萨克图汗沙喇，“兄弟内相构怨”，致启外患“使喀尔喀百姓流离”，念其“率众来归”，“故不忍治罪”。在土谢图汗“具疏请罪”、彼此释怨后，康熙令策妄札卜袭札萨克图汗。

五月初二，康熙设宴招待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哲布尊巴丹活佛以及各部首领共三十五人。康熙在行宫升坐，三部汗及各部首领向御坐行三跪九叩礼后，依次就坐，鼓乐齐作，康熙亲赐酒。

五月初三，康熙赐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哲布尊巴丹活佛各银千两，及缎十五匹、银器、袍、帽、茶、布等物，又赐各部济农、诺颜⑯银物若干。因札萨克图汗策妄札卜年幼，赐之皇子所用衣帽、数珠。康熙再次赐宴，席间谕道：“朕好生之心，本于天性，不忍尔等之灭亡，给地安置，复屡予牲畜粮糗，以资赡养”。“会同⑰之时，见尔等倾心感戴，故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漠南蒙古）一例编设，其名号亦与四十九旗同”⑱，三汗名号依旧保留，取消蒙古原有的济农、诺颜等封号，改用满洲贵族所使用的封爵——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等称号。鉴于“札萨克图汗无辜被杀，且所属人民离散，困苦已极，深为可悯，著将伊亲弟策妄札卜封为和硕亲王”，又将土谢图汗长子噶尔旦、札萨克济农古禄西希、车臣汗之叔纳穆札罗⑲等封为郡王，土谢图汗之弟西第西里、车臣汗族叔车布登封为贝勒。

建汇宗寺。

多伦诺尔会盟之后，应喀尔喀王公之请，在多伦诺尔建立

一座规模宏大的喇嘛庙，“以彰盛典”，作为暂居内蒙牧地的喀尔喀宗教中心，由哲布尊丹巴活佛主持该寺，“以一众志”⑳。

编旗。

多伦诺尔会盟后，喀尔喀同漠南各部一样实行札萨克（旗长）制，共编三十四个旗，旗下设参领、佐领。

康熙三十六年，“殄噶尔丹，而返喀尔喀于漠北”，加封有功贵族，“增编为五十五旗，屯田于鄂尔昆河左右，并征其兵防讯于阿尔泰山”。雍正九年（1731）增至七十四旗，因赛因诺颜部部长额驸策楞在同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喇布坦的较量中屡建奇功，“增赛因诺颜部”，令其辖二十个旗，正式形成三汗四部的格局。“乾隆中，增至八十二旗，建城乌里雅苏台及科布多，驻定边左副将军及参赞大臣抚之”㉑，“喀尔喀四部之兵统于定边左副将军”㉒。

从康熙三十年多伦诺尔会盟时起，喀尔喀已经同漠南各部一样成为清帝国境内的臣民，迨至康熙三十六年彻底摧毁噶尔丹、喀尔喀三部重返漠北，大沙漠以北的广大地区已经成为清帝国版图中的一部分。

注 释

①②③④《皇朝藩部要略》卷三。

⑤札包洛茨基在掠夺布里亚特蒙古部落时被击毙，向车臣汗硕垒寡妻进行劝诱的系该使团译员潘菲尔·谢苗诺夫。

⑥土谢图汗曾于 1672 年（康熙十一年）、1675 年（康熙十四年），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遣使俄国。

⑦1668 年（康熙九年），蒙古民众攻打俄据点巴拉甘斯克，1671 年（康熙十年）包围尼布楚，俄侵略者“奄奄待毙”。

⑧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⑨钱良择：《出塞纪略》。

⑩在《戈洛文出使日记》中记道："有大批俄国军队，并有大量火营大炮协同他（指噶尔丹）作战，""战场相遇时，"噶尔丹就"以皇家部队（指俄军）的名义恫吓他们（指喀尔喀）。"

⑪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七。

⑫多伦诺尔又名七星潭，"多伦"汉语"七"，"诺尔"汉语"湖泊"。

⑬上三旗系指由清朝皇帝统领的正黄、镶黄、正白三旗。

⑭下五旗系指由亲王统领的镶白旗、两红旗、两蓝旗。

⑮《圣武记》卷三。

⑯据《皇朝藩部要略》所记："喀尔喀旧俗汗最贵，济农次之，诺颜又次之。"

⑰会同指诸侯会盟、朝见天子。

⑱《清圣祖实录》卷一三一。

⑲噶尔丹进犯时，纳穆札罗力劝车臣汗率部众十万归附清廷。

⑳乾隆御制《普宁寺碑文》。

㉑设参赞大臣二人，一驻移布多，一驻乌里雅苏台，其中一人以蒙古贵族出任。

㉒《圣武记》卷三。

清（前期）

定　西　藏

自宗喀巴①创立新教格鲁派（亦称黄教）以来，西藏喇嘛教内新教与旧教（亦称红教）之争便开始产生。明清之际，黄教与红教的矛盾日趋尖锐，掌握西藏政务的藏巴汗与信奉红教的青海却图汗②结成反对黄教的同盟。黄教三大寺（色拉、哲蚌、甘丹）遣使赴乌鲁木齐，与和硕特部顾实汗联络，请其出兵援助。1636年（清崇德元年，明崇祯九年）顾实汗进军青海③击败却图汗，占领青海。顾实汗应达赖第巴④之邀，于1641年（清崇德六年，明崇祯十四年）进军西藏，生擒藏巴汗⑤，建立由和硕特部蒙古贵族与黄教联合统治西藏的体系——达赖居前藏、班禅居后藏，庶务由顾实汗长子达延及达赖的第巴联合执掌。顾实汗成为青海、西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⑥。翌年（1642）顾实汗与达赖、班禅即遣使盛京，与清廷建立联系。

五世达赖圆寂所引起的风波。

康熙十八年（1679），达赖五世任命心腹桑结嘉错出任第巴⑦。在此之前，达赖喇嘛通过扩建布达拉宫、增建黄教寺

院，不断扩大实力，同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部贵族抗衡。康熙二十一年（1682）达赖五世圆寂，桑结嘉错匿丧不报，以达赖代言人自居，“伪言达赖入室，居高阁不见人”⑧。直至康熙三十五年（1696）六月，昭莫多之战后，清廷才从被俘获的西藏人处得知达赖已去世多年，桑结嘉错“阳奉宗喀巴之道法，阴与噶尔丹比欺”⑨。在受到清廷责问后，桑结嘉错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发丧，并宣布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仓洋嘉措已经坐床（喇嘛教活佛继承仪式，转世灵童升座后才成为合法继承人）。仓洋嘉措时年十五岁，并未得到顾实汗之子达赖汗（达延汗之弟）的认可，达赖汗之子拉藏汗屡将其“行为不端”⑩之处向清廷汇报，和硕特部贵族与西藏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公开化。

康熙四十三年（1704），拉藏汗统兵从西藏北部直逼拉萨，经色拉、哲蚌、甘丹三大寺调解，达成桑结嘉错退位（由桑结嘉错之子出任第巴）、拉藏汗退兵的协议。时过一年战事又起，藏兵战败，桑结嘉错被杀，拉藏汗将达赖六世仓洋嘉措废黜，解送北京⑪，并于西藏另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拉藏汗此举，激起青海蒙古王公的抵制，彼等拥立在里塘出生的噶桑嘉措为真达赖。为避免矛盾激化，清帝康熙令噶桑嘉措暂居西宁塔尔寺，并派侍郎赫寿入藏解决达赖灵童转世所引起的争端。

策妄阿喇布坦派兵入藏。

策妄阿喇布坦系僧格长子，在噶尔丹统治时期，因受逼迫“带领七人潜逃至吐鲁番”⑬，在噶尔丹东征喀尔喀后返回伊犁，“收其父旧属及噶尔丹余众，复成部落”⑭。策妄阿喇布坦把一部分维吾尔族人迁往伊犁，从事农业生产，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以及乌鲁木齐一带大片沃土得到开垦。在

他的统治下“历十余年，部众繁滋”，实力大增。

为了向青海、西藏扩张，策妄阿喇布坦一方面同拉藏汗联姻⑮，一方面同黄教三大寺的喇嘛来往频繁，暗中结成一个反对拉藏汗的同盟。康熙五十五年（1716）策妄阿喇布坦派其弟策凌敦多布领精兵六千，绕戈壁滩，越大雪山，“涉险冒瘴，昼伏夜行”⑯，从西藏北部腾格里山入藏，击败藏兵。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准兵攻入拉萨，拉藏汗逃往布达拉宫，布达拉宫驻军迎降，拉藏汗在突围时坠马被杀。准噶尔军遂“虏其妻子，搜各庙重器送伊犁”⑰，又将拉藏汗所立达赖六世伊喜嘉措囚禁。据一位在拉萨的外国传教士记载：“策凌敦多布一踏入王宫，就下令洗劫拉萨……他们拿着武器，闯入民房，”“还冲入寺庙，进行洗劫，抢掠庙宇积存和藏匿的财物，”“把一些人背绑着吊到梁上折磨，逼使他们讲出财富埋藏的地方，这种洗劫连续两昼夜，直至每件有价值的东西都被取走为止。”⑱

清军入藏。

在准噶尔部入侵西藏之后，拉藏汗恳请清廷“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⑲。康熙五十七年（1718）二月清政府令“西宁、松潘、打箭炉、噶斯等处各预备兵马”，令青海派兵六千，又令从“西宁满洲兵内选二百名，绿旗兵内选二百名及土司之兵一千带至青海地方，会同青海王、台吉等商酬行事”⑳。

康熙在得悉拉藏汗遇害、准噶尔部占领并洗劫西藏后，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前往西宁，指挥入藏作战。胤禵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十一日抵达西宁，从征诸军驻扎索诺木。为入藏作战，“自阿什罕至索诺木设驿十五站，自

索诺木之旁通柴旦之路设驿五站，每驿设兵二十，马十五”㉑。

暂居塔尔寺的“真达赖”噶桑嘉措活佛，在清军抵西宁后，发表告示，号召西藏人民配合入藏清军“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㉒。鉴于噶桑嘉措得到西藏、青海僧俗的拥戴㉓，康熙谕令胤禵在入藏作战的同时，护送噶桑嘉措入藏地，“令登达赖喇嘛之座”。为了牵制准噶尔的兵力，康熙命傅尔丹等从巴里坤、阿尔泰出兵。

根据康熙的部署，西征大军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六月兵分两路向西藏推进：北路由平逆将军延信率领从青海出兵，南路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从四川出师。噶尔弼采纳部将岳钟琪的建议，以土司兵为前驱，沿途招募藏兵七千，以皮船渡河，迅速切断准噶尔军的饷道。延信所率北路军在卜克河、齐嫩郭尔、绰马喇等地多次大败策凌敦多布，策凌敦多布“计穷力竭，狼狈而逃”仅带数名随从逃回伊犁。

清军在占领拉萨后，在各寺庙抓获准噶尔喇嘛一百零一人，把策凌敦多布所任命的五名总管喇嘛斩首，其余尽行监禁。该年九月十五日，平逆将军延信为噶桑嘉措活佛举行隆重的坐床大典，确立其作为西藏宗教领袖的地位㉔。同时把拉藏汗所立六世达赖伊喜嘉措，送至北京安置；封第巴阿尔巴布、康济鼐为贝子，封第巴隆布奈为辅国公，令彼等管理前藏，封颇罗鼐为一等台吉，令其管理后藏，此即四噶隆共治㉕。

鉴于“西藏屏藩青海、滇、蜀”，防务尤属重要，清廷采纳大将军胤禵的建议，从西征军中抽蒙古兵一千五百、绿旗兵二千、八旗兵五百驻守西藏，由公策旺诺尔布、将军延信统之，其余西征军从康熙五十九年年底陆续撤回。

驻藏大臣制度的确立。

雍正五年初（1727）副都统鄂齐从西藏归来，向清廷汇报前藏情况：达赖喇嘛偏袒其父索诺木达尔礼；索诺木达尔礼娶隆布奈二女，遂与隆布奈结为一党；阿尔巴布行事阴险；康济鼐居功自傲，为隆布奈等所仇。清廷遂于正月三十作出遣内阁学士僧格、副都统马喇携谕旨入藏的决定，令将隆布奈解任，谕达赖喇嘛、阿尔巴布、康济鼐和衷共济。

该年六月十八日，阿尔巴布、隆布奈发动叛乱，执杀康济鼐，是时钦差一行尚未抵藏，主持后藏事务的颇罗鼐一方面聚集后藏兵马同叛军作战，一方面疏报清廷，亟请发兵进藏，剿灭叛军。十一月初一，雍正帝令左都御史查郎安、副都统迈禄统兵一万五千于明春草青时入藏。

雍正六年（1728）八月初一，清军抵达西藏，在此之前阿尔巴布、隆布奈等所发动的叛乱已被颇罗鼐所平定，清廷晋封颇罗鼐为郡王，令其协助达赖处理全藏事务。诏令入藏兵两千留守，两位钦差分驻前藏、后藏，是为设置驻藏大臣之始。

《西藏善后章程》的制定。

乾隆十二年（1747），颇罗鼐病故，由其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实现大权独揽，派人暗杀在后藏的长兄策布登㉖，进攻策布登的军队，派人监视驻藏大臣，同达赖喇嘛屡屡发生冲突，“潜结准噶尔为外援”㉗。

乾隆十五年（1750）十一月，新任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抵藏后，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叛已迫在眉睫，二大臣遵照“相机擒戮”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密谕，以宣旨为名把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引至驻藏大臣衙门处死，其党羽遂发兵围困驻藏大臣衙门，“枪炮齐发，环攻之”，因“墙高而固，不能入，贼乃积薪

楼下，烈焰四起”㉘，两位驻藏大臣相继遇难。

在清军入藏之前，达赖喇嘛即已率领僧俗民众平定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党羽所发动的叛乱。

乾隆十六年（1751）清廷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明确规定：

地方政府的噶隆仍为四人，凡事要四人“公共办理”；

噶隆办理政务应在噶厦衙门，不得“于私宅办事”；

重大事务须“请示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办理”；

任命第巴以及革除治罪，均须“公同禀报达赖喇嘛并驻藏大臣酌定”；

各寺院之堪布喇嘛，“或遇缺出”，均由“达赖喇嘛酌行”，各噶隆不得“专擅办理”㉙。

《钦定西藏章程》的制定。

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军在驱逐侵入西藏的廓尔喀军队后㉚，命将军福康安会同达赖、班禅共同起草西藏善后章程，共拟定一百零二款，经清政府修改订为二十九款，归纳起来主要有驻藏大臣权限，达赖、班禅及活佛转世，建立西藏常规部队等方面内容。

根据钦定章程规定，“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遇有西藏地方官员缺出“统归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喇嘛拣选，分别奏补拣放”；对外交涉“俱由驻藏大臣主持”，境外写给达赖、班禅的信件，均须“报明驻藏大臣译出查验，并代为酬定回书”；西藏地方财政“统归驻藏臣稽查总核”。

达赖、班禅以及活佛的转世，均须在驻藏大臣的监督下，抽签决定，此即“金瓶掣签”（亦称金奔巴）制度。由驻藏大

臣将各地呈报的转世灵童的姓名、出生时辰等交驻藏大臣汇总，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牙签之上，放入清政府所赐金瓶之中，在大昭寺宗喀巴像前抽签抽中者即为新的转世活佛。新活佛长大后，须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举行坐床之典。“金瓶掣签”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吹忠”（巫师）对转世一事的把持㉛。

鉴于廓尔喀两次入侵所造成的混乱，《钦定西藏章程》规定在前藏、后藏各增设“番兵一千名”，并在“冲途要隘之定日，江孜地方安设番兵各五百名”，由清廷放发“钱粮口粮，加以训练”。

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以及《西藏善后章程》、《钦定西藏章程》的相继制定，加强了清王朝对西藏地区的统辖。

注 释

①宗喀巴生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得道于甘丹寺，以改革红教巫术流弊为己任。

②喀尔喀部却图汗在1634年占领青海，屠杀、囚禁黄教僧人。

③顾实汗在出兵青海之前，同准噶尔部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

④达赖喇嘛的执事及西藏地方官员均称作“第巴”。

⑤藏巴汗被装入牛皮囊投入雅鲁藏布江。

⑥顾实汗把从西藏征收的赋税用以供养达赖，余为黄教经费。

⑦一说：桑结嘉错系达赖五世私生子。

⑧《圣武记》卷五。

⑨桑结嘉错对喀尔喀有自己的大活佛极为不满，鼓动噶尔丹出兵喀尔喀，且派代表在噶尔丹军中出谋划策，择黄道吉日出师。

⑩仓洋嘉措是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倜傥风流，厌恶宗教生活。

⑪关于仓洋嘉措的下落有三种记载：一行至青海病死（《圣武记》），

二解送途中被拉藏汗派人杀害（《西藏纪事》），三行至青海，“决然遁去，周游印度、尼泊尔、康藏、甘青、蒙古等处”（《西藏民族政教史》）。

⑫顾实汗的子孙一支入藏，一支留青海。

⑬《东华录》卷一四。

⑭《西域图志》卷首《准噶尔全部纪略》。

⑮策妄阿喇布坦娶拉藏汗之姐为妻，又招拉藏汗之子丹衷为婿，丹衷去伊犁迎娶便被扣留，直至遇害。

⑯⑰《圣武记》卷五。

⑱德斯得利：《西藏纪事》第十章。

⑲⑳《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七。

㉑㉒《抚远大将军奏议》。

㉓仓洋嘉措在一首诗中说，有朝一日将去里塘，然后再回来，噶桑嘉措在仓洋嘉措死后两年出生，被认为是仓洋嘉措转世。

㉔清廷任命噶桑嘉措为六世达赖，但在康熙四十八年侍郎赫寿入藏时，已代表清廷承认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故后世均称噶桑嘉措为达赖七世。

㉕噶隆系西藏地方政府官员，协助达赖掌管全藏事务。

㉖珠尔墨特那木札勒闻清政府有调策布登到拉萨之意，即派人到阿里杀死策布登。

㉗㉘福康安：《双忠祠碑记》。

㉙《藏事辑要》卷六。

㉚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曾入犯西藏。三年后，已故六世班禅的兄弟沙玛尔巴（红教活佛）因班禅遗产全部被在黄教中担任活佛的兄弟仲巴所独占，便逃往廓尔喀诱其再度入侵西藏，占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所遗金银、法器劫掠一空。

㉛以前达赖、班禅及活佛转世“俱凭吹忠作法指定”，西藏及蒙古贵族通过收买、拉拢吹忠，使自己的子孙成为转世灵童，从而把持政治

大权，操纵政局，致使达赖、班禅及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皆以兄弟叔侄姻娅相传袭”，“几与世袭封爵无异”。

清（前期）

平定罗卜藏丹津之叛

青海在西宁府西三百余里，“环海居者皆番族”，其地西邻新疆，南接川藏，北连甘肃，东通西宁，“袤延二千余里”。青海在“唐以前为吐谷浑，唐末并入吐蕃，于是崇僧成俗”。明初“置西宁、河州诸卫，领以番酋，授以国师、禅师之号”，明中叶以后该地被土默特部所占领，迨至明末崇祯年间被喀尔喀却图汗袭取。却图汗占领青海不到十年，又被和硕特部顾实汗击败。顾实汗“入据青海，分部众二翼，子十人领之”①。

罗卜藏丹津之叛。

罗卜藏丹津系顾实汗嫡孙，康熙五十九年曾从抚远大将军胤禵入藏驱逐准噶尔军。平定西藏后，罗卜藏丹津“阴觊先人霸业，总长诸部，乃于雍正元年（1723）夏诱诸部盟于察罕托罗海，令各仍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公爵”，“欲胁诸台吉奉己，如鄂齐汗（即达延汗）据唐古特（即西藏）以遥制青海”。因“亲王察罕丹津、郡王额尔德尼等不从”，罗卜藏丹津遂向彼等发动突袭，察罕丹津“仓卒不能抗，秋八月挈众内奔河州关外”②。

住持塔尔寺的大喇嘛察罕诺门汗，系察罕丹津之侄。罗卜藏丹津“以术诱惑使从己，大喇嘛既从，于是远近风靡，游牧番子、喇嘛等二十余万同时骚动，犯西宁，掠牛马，抗官兵”③。青海各寺院（如塔尔寺、郭隆寺、石门寺等）喇嘛纷纷披甲执兵器率僧俗民众烧杀抢掠，青海局势急转直下。罗卜藏丹津所率叛军距西宁止有十余里，攻打南川、西川、北川、新城堡、布隆吉尔等地，抢掠财物，烧毁民间草谷，胁迫当地百姓助其攻城，一时间“遍地皆贼”。

清军入青海平叛。

雍正元年（1723）十月初二，清廷任命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领满洲、蒙古，绿旗大兵”，进军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年羹尧受命后，“分兵永昌、布隆吉尔，防叛军内犯”；“南守巴塘、里塘、黄胜关扼贼入藏之路；又请敕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噶斯口截其通准夷之路”，“并移察罕丹津所部于兰州”④。

经年羹尧部署，从西安、固原、宁夏、四川、甘州、大同、榆林、土默特、鄂尔多斯、吐鲁番等处抽调绿旗、蒙古兵一万九千名，由岳钟琪率领，兵分四路，从西宁、松潘、甘州、布隆吉尔推进，另派兵九千五百名驻守西宁各边口及永昌、甘州、松潘、里塘、巴塘、察木多、中甸等地。

平叛之战异常激烈，仅郭隆寺一战即歼叛军六千余名，据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折奏所言：章嘉活佛胡必尔汗原住西宁东北郭隆寺，该寺“属下喇嘛甚多”，胡必尔汗素与罗卜藏丹津相善。雍正二年（1724）正月，“郭隆寺众喇嘛忽聚兵操演”，“寺内喇嘛传令东山一带番人，约于是月十一日齐集拒战”，“反形已露”。“遂遣提督岳钟琪会同前锋统领苏丹、副都统觉

罗伊礼布等统兵进剿"，双方在叛军营地——哈拉直沟展开激战。清军"直前奋击，斩贼数千，据其三岭，毁其十寨"，追击途中又"毁其七寨，焚房屋七十余所"。一月十三日，清军逼近郭隆寺，叛匪在"寺外山谷间"设伏千余，未经接战，"皆逃入洞内"，清军"施放枪炮，复聚薪纵火，贼俱熏死"，"随毁郭隆寺"。章嘉活佛胡必尔汗已被众喇嘛"预先携往大通河西杂隆地方"⑤。

未几，清军又一举消灭"倚石门寺为巢穴，肆行劫掠"的叛军据点。清军"分为五路进发"，"奋勇齐击，杀死喇嘛番贼六百余人，搜夺得盔甲五十余副，刀枪撒袋等物甚多，因即将寺焚毁"⑥。

罗卜藏丹津接连遭受重创，和硕特部贵族"各杀贼来归"，"降其胁从部落十余万。罗卜藏丹津不支，遂通过达赖喇嘛噶桑嘉措的父亲索诺木达尔札⑦进行斡旋。雍正二年初，达赖喇嘛即遣使至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处，为罗卜藏丹津求和讲情。

奇袭罗卜藏丹津营地。

在清军的追击下，罗卜藏丹津撤至柴达木以东的敖拉木胡卢，距西宁千余里。时值残冬寸草未生，罗卜藏丹津拥众十万以上。年羹尧拟奏请朝廷调兵两万、待入春后分四路进剿。岳钟琪"以青海辽阔，番众尚不下二十余万，我军深入，贼若散而诱我，击此失彼，四面受敌；我军如俟青草出时进兵，则彼马已得草十余日"，建议年羹尧"不如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马倍之，兼程捣其不备"⑧。

雍正二年二月初八，岳钟琪率部追击罗卜藏丹津"蓐食衔枚宵进"，中途歼敌二千，使敌无哨探。"自出师至贼巢凡十五日"，"黎明抵其帐"，罗卜藏丹津"尚未起，马皆无衔勒，仓

皇大溃。罗卜藏丹津衣番妇衣，骑白驼遁”⑨。清军在追出三百里后，“至桑骆海（青海西藏交界处）”，“路尽而返”。

此役俘获罗卜藏丹津母、弟、妹，歼敌八万，“降男女数万，驼、马、牛、羊、器械、甲帐无算”⑩。雍正帝在御制平青海碑文中称赞此役：“军士无久役之劳，内地无转输之费，克奏肤功，永清西徼。”⑪

进剿余党。

从雍正二年四月起“岳钟琪等统率官兵进剿于山险林密之处，奋战五十余日”，先后在桌子山、棋子山、天王沟、镇羌、石门口、宽沟等地分路进剿。“岳钟琪夜募死士，以降番乡导，援萝跻壁”⑫，“直抵贼穴”。在“郭隆寺、郭莽寺逃出之喇嘛”煽惑下，纳朱公寺、加尔多寺的僧人“与贼串通”，而“先密寺番人顺逆无常，且与棋子山贼穴相连”，上述诸寺均被“焚毁”⑬。在平叛过程中“辟青海域千余里，分其地赐各蒙古”。

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年羹尧所拟定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经议政王大臣会议审议，于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颁行：

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宜分别功罪，以加赏罚”；

二、“青海部落宜分别游牧、居住”，请照内札萨克（即指内蒙四十九旗）编为佐领，“每百户编一佐领，其不满百户者为半佐领，将该管台吉俱授为札萨克”，“每札萨克俱设协领、副协领、参领各一员，每佐领俱设佐领骁骑校各一员、领催四名”，“每年会盟，奏选老成恭顺之人委充盟长，不准妄行私推”。

三、“朝贡交易宜按期定地”，“由边外赴京进贡青海诸王

贝勒"，"三年一次"，"其与内地之人互相交易之处，则定以每年二月、八月二次交易"，在"西宁、西川边外"的"那拉萨地方"进行，"不准擅移"；

四、"将不愿为青海属人之喀尔喀等照青海例编旗，分为佐领，添设札萨克等，分驻剿灭逆贼之旧地"；

五、"西番人等宜属内地管辖"，"陕西之甘州、凉州、庄浪、西宁、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炉、里塘、巴塘，云南之中甸等处，皆系西番人等居住牧养之地。自明以来，失其抚治之道，或为喇嘛耕地，或为青海属人"，"惟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营伍官员"，"应相度地方添设卫所，以便抚治，将番人心服之头目，给与土司、千百户、土司巡检等职衔"；

六、取缔达赖喇嘛在打箭炉向过往贸易人征收的"鞍租"；

七、对喇嘛寺庙定期稽察，"寺庙之房不得过二百间"，喇嘛不得超过三百，"每年稽察二次"[14]，"番民之粮俱交地方官管理，每年量各庙用度给发，再加给喇嘛衣服银两"；

八、加强陕西边防，"于西宁之北川边外、上下白塔之处，自巴尔托海至扁都口一带地方创修边墙，筑成城堡"，组织民人去肃州以西垦种（该地肥沃），"修城驻兵"；

九、甘州等处添设官弁；

十、里塘、打箭炉等处，添设官弁；

十一、边地弁兵归并裁汰；

十二、将直隶、山西、河南、山东、陕西军罪人犯"尽行发往大通、布隆吉尔等处令其开垦"；

十三、番人部落善加"抚绥"[15]。

根据善后十三条，青海共编二十九旗，其中和硕特二十一旗（乾隆时增一旗），土尔扈特四旗，喀尔喀一旗，辉特一旗，

准噶尔一旗。

年羹尧在十三条之外又提出禁约十二事，亦被清廷批准执行⑯。

注　释

①②③④《圣武记》卷三。

⑤《清世宗实录》卷一五。

⑥《清世宗实录》卷一六。

⑦索诺木达尔札系罗卜藏丹津岳父。

⑧《圣武记》卷三。

⑨罗卜藏丹津仅带二百人逃至噶尔逊河，横越戈壁，北投准噶尔。策妄阿喇布坦死后，罗卜藏丹津拟谋杀新继立的噶尔丹策零，事觉被执。

⑩《圣武记》卷三。

⑪《岳襄勤公行略》。

⑫《圣武记》卷三。

⑬《清世宗实录》卷二O。

⑭西宁寺庙，喇嘛多者达二三千，且私藏盔甲，"遂成藏污纳垢之地"，叛应罗卜藏丹津。

⑮《清世宗实录》卷二O。

⑯禁约十二事规定：朝见、进贡定有期限；不准自称盟长；不许扰累番民；不许和硕特将游牧青海的喀尔喀、辉特等部占为属下；编设佐领；贸易定地限时；背负恩泽必行剿灭；恪守所划牧界不得强占；不许抢掠往返官员、商贾；严禁父死妻继母、兄死妻嫂的旧俗；察罕诺门汗喇嘛庙内不可聚众议事；内地派遣官员，只要携带谕旨，不论原有品级大小，蒙古王公俱行跪接。

清（前期）

平定准噶尔

在厄鲁特四部中，“准噶尔最习战斗”，“于中国则惟准噶尔世寇塞”①，噶尔丹对喀尔喀的进攻、策妄阿喇布坦对西藏的突袭以及噶尔丹策零②向杭爱山的扩张③，都严重地威胁到清廷对北部及西北部边疆地区的统治。为此，清政府一次次大规模远征，先后糜饷七千余万。彻底解决准噶尔部的威胁，一直是康熙以来清朝统治者的当务之急，“准噶尔一日不定，其部曲一日不安”。

准噶尔部内乱迭起。

乾隆十年（1745），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死后，其次子“那木札尔即以母贵嗣汗位”。那木札尔即位以后“恣睢狂惑”，为所欲为，同母姐鄂兰巴雅尔“约束之”，那木札尔诬其“欲效俄罗斯自立为扣肯汗（即女皇），拘而系之”④，鄂兰巴雅尔之夫萨奇伯勒克“助其庶兄喇嘛达尔札，攻尔弑之”⑤，遂由噶尔丹策零长子喇嘛达尔札继承汗位。

喇嘛达尔札之母出身微贱，故其继立遭到相当一部分贵族的反对，巴图尔浑台吉的后裔达什达瓦、达瓦齐等谋立噶尔丹

策零的幼子策妄达什，但这一谋划很快被喇嘛达尔札察觉。乾隆十五年（1750），喇嘛达尔札逮杀策妄达什、达什达瓦，“达瓦齐与其党奔阿睦尔撒纳[6]”。达瓦齐遂与阿睦尔撒纳结成反对喇嘛达尔札的同盟。

乾隆十七年底（或1753年初），阿睦尔撒纳等“率精锐卒一千五百人，裹粮怀刀，于山岭僻境绕道入伊犁，乘其不备，贪夜突入其幕”。喇嘛达尔札“方围炉拥妾饮酒”，阿睦尔撒纳“趋而斩之”，“抚定其部落，迎达瓦齐入，立之”[7]。

达瓦齐在继立为汗之后，同阿睦尔撒纳的矛盾急剧激化。阿睦尔撒纳原本游牧于塔尔巴哈台一带，为了向东扩张，袭杀岳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徙至额尔齐斯河一带游牧，逼临准噶尔的辖区。乾隆十九年（1754）春夏之交，阿睦尔撒纳聚集六千精兵袭击达瓦齐，早有戒备的达瓦齐调集大量军队反击，双方在额尔齐斯河的发源地展开激战，阿睦尔撒纳被击败，率部兵五千、属民二万投奔清廷。

自噶尔丹策零死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准噶尔部三易其主，政变以及未遂政变三次，接连不断的征伐、仇杀使得属民饱尝战乱之苦，极大削弱了自身的实力。

降服达瓦齐。

达瓦齐是个贪婪残暴的统治者，为掠夺牧地、牲畜多次兴兵攻打其他部，乾隆十八年（1753），达瓦齐派兵洗劫杜尔伯特部，该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率领属下三千多户、一万余人离开原驻牧地额尔齐斯河，翻越阿尔泰山，到达乌里雅苏台，请求清廷保护[8]。翌年五月乾隆在避暑山庄接待杜尔伯特首领[9]，从车凌、车凌乌巴什处了解到准噶尔部“人心不一，甚属乖离”，决定“明年由阿尔泰、巴里坤二路进

兵”。该年年底，阿睦尔撒纳在避暑山庄朝见清帝时，力劝清廷出兵伊犁，攻打达瓦齐，进一步坚定清朝统治者西征的决心⑩。

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清军兵分两路讨伐达瓦齐，北路由乌里雅苏台出师，西路由巴里坤出师。北路军由定北将军班第、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率领，西路由定西将军永常、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⑪率领。清军“各携两月粮”，约定在博罗塔拉河（伊犁东北三百里处，该地山川险要，水草充足）会师。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皆准噶尔部贵族，遂“建其旧纛先进，各部落望风崩角”，准噶尔部贵族、属民“携酪献羊马络绎道左，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者”⑫。该年五月初一，“长驱至博罗搭拉河，距伊犁三百余里，两军皆会”。达瓦齐“不设备”，自率宿卫、亲兵万人撤至伊犁西北一百八十里的格登山，“阻淖为营”。清军乘胜追击，“争渡伊犁河，长驱追袭，将及格登山”。夜遣降兵阿玉锡等率二十余骑“往觇道路，阿玉锡即乘夜建大军纛，大呼入其营，万众瓦解，达瓦齐仅以二千余人宵遁，余皆不战而降”⑬。

达瓦齐“逾冰岭”，逃至南疆，属下多失散，投奔乌什⑭，旋被执献清军⑮，逃往准噶尔的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律亦被清军抓获⑯。“于是天山南北二路皆不血刃而定”。同年六月初九，清军大部撤回，只留五百兵驻伊犁。

阿睦尔撒纳之叛。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清帝以克伊犁、擒达瓦齐封阿睦尔撒纳双亲王（赐其两倍亲王俸），但阿睦尔撒纳“必欲为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驻扎伊犁的定北将军班第在给清帝的密奏中言道：阿睦尔撒纳公然声称“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

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又生变乱”。“隐以总汗自处，擅诛杀掳掠，擅调兵；不服赐衣翎顶，不用副将军印，自用珲台吉菊形篆印移檄各部；讳其降，言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此地”；“与其党晓夜聚谋，诡秘叵测”⑰。

鉴于阿睦尔撒纳“图占准噶尔确据”，于六月二十八降谕班第，令阿睦尔撒纳“即行入觐”，“定四部封汗之事”，如其拒绝入觐“即行擒拿”。

阿睦尔撒纳在七月初七起程，行前邀心腹“密商竟夜”，密派人前往札布堪河流域接妻子，令属下在其动身后分兵掠额林哈毕尔噶、业克明安、伊犁将军营盘以及回撤的清军。

七月十九日，阿睦尔撒纳行抵乌隆古，该地临近其昔日游牧之地，遂以“先到游牧束装，再行入觐”为词，将定边左副将军印信交给与之同行的土谢图部亲王额琳沁多尔济⑱，遂乘机逃脱，“由额尔齐斯河间道北逸”。

阿睦尔撒纳率部众围攻伊犁，“伊犁诸喇嘛、宰桑（管事官）劫掠军台”，叛应阿睦尔撒纳。时定西将军永常率军数千驻乌鲁木齐，闻变即仓皇撤回巴里坤，使班第孤立无援，兵败自杀，天山南北变乱迭起。该年十二月，屯聚在博罗塔拉河的阿睦尔撒纳已经入主伊犁。

撤台之变。

乾隆二十一年初（1756）额琳沁多尔济因阿睦尔撒纳逃脱为叛，而被清廷赐以自尽，此举引起喀尔喀部郡王青滚杂卜⑲的不满，“自军营私自逃回”，将“卡伦、台站兵丁尽行撤回”⑳。在青滚杂卜的煽动下，札萨克图汗部巴勒达尔等俱弃台站而归，北路台站从十台到二十九台全部瘫痪，联络中断。

喀尔喀四部谣言四起，或言青滚杂卜欲来抢掠，或言清廷

欲将喀尔喀王公尽行拿问治罪，已呈“溃乱”之势。哲布尊巴丹活佛遣人前往喀尔喀各部游牧地，晓谕众蒙古安分守法；章嘉活佛则亲往鄂尔坤、塔密尔等地，集喀尔喀众王公会盟，立即恢复擅弃的台站。

该年八月初九，清廷任命成衮札布为定边副将军㉑，带兵擒拿青滚杂卜，该年十一月底在与俄罗斯交界的杭哈奖噶斯处将青滚杂卜拿获，槛送京师。

准噶尔、辉特部相继叛。

乾隆二十年十月初六，乾隆在避暑山庄册封噶尔藏为准噶尔汗，沙克都为和硕特汗，巴雅尔为辉特汗，车凌为杜尔伯特汗（杜尔伯特汗原拟封阿睦尔撒纳，因其叛改封车凌）。十一月初四，乾隆任命策楞为定西将军统军西征，噶尔藏、巴雅尔等“皆愿归发所部兵从征”。

翌年初，清军长驱至特克勒河，距阿睦尔撒纳仅一日程，“急进可追及，忽有报台吉诺布尔已擒阿逆来献者”，“遂驻军待之，先以红旗报捷于策楞，亦即转递至京”。实际“报擒”“即贼所遣以缓师也”，“二月兵至伊犁，贼已遁入哈萨克”㉒。当清军追至哈萨克境内时，“阿逆易服潜遁”，清军急追，“相隔一谷，仅二、三里，贼仓卒不及驼载，忽有哈萨克人来言，即欲擒献，但需其汗至，乞暂缓师待时”。清军再一次停止追剿，等待“擒献”，“言欲擒阿逆者，又即阿逆所诡遣也”㉓。

从征的厄鲁特宰桑见清军将领两次被骗，“皆轻之，又适有喀尔喀撤台之事”，“于是各降夷亦皆叛”，准噶尔、辉特等相继叛。阿睦尔撒纳“闻四部构乱，亦自哈萨克归，会诸贼于博罗塔拉河，欲自立为汗，准部复大扰乱”。

定边右副将军兆惠㉔，“以千五百兵驻防伊犁，闻变自济

尔噶朗河转战而南"，只有五百兵士突出重围，"自十一月启行，战于鄂垒，战于图齐，战于达勒奇，前后杀贼数千"，且战且向乌鲁木齐撤退，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兆惠等抵达乌鲁木齐城下，该城已被包围十二天。兆惠等在乌鲁木齐"连日数百战"，继续向巴里坤方向撤，兵士皆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驼、疲马且将尽"，"不复能冲击，乃结营自固"㉕。直至二月二十三日，兆惠一行才在马里坤所派部队的接应下返回巴里坤。

平定北疆。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清廷在逮捕青滚杂卜、恢复北路台站后，令成衮札布、兆惠率军七千从巴里坤出发，进剿阿睦尔撒纳及叛乱的厄鲁特，"成衮札布出北路"，"兆惠出西路"。"会诸部落自相吞噬"，准噶尔汗噶尔藏被其侄噶尔布所篡，属下台吉达瓦旋杀噶尔布。"向不生痘"的厄鲁特"痘疫盛行，死亡相望"。

清军长驱至，"各乌合贼皆败走，逆酋先后授首"，阿睦尔撒纳再度逃往哈萨克，哈萨克汗阿布赍"先使人收其马，阿逆惊，携八人徒步夜走俄罗斯"㉖。

根据乾隆所下达的"必应尽行剿灭"㉗的谕旨，清军对于厄鲁特部众大事屠戮，"惟老幼羸弱之人或可酬量存留"。准噶尔等四部原有数十万户，"先痘死者十之三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就连"不从各酋之叛"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在率部众四千投奔巴里坤后，"复为都统雅尔沙善袭坑之"。保留下来的厄鲁特只有达什达瓦宰桑萨喇尔所率降户三千、达什达瓦之妻车臣默尔根哈屯所率部众数千㉘以及杜尔伯特车凌部众三千户。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征战，清朝统治者终于完成对蒙古各部的臣服，天山以北也入清帝国版图。

清廷对北疆的统治。

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政府在惠远城设置伊犁将军；在乌鲁木齐、巴里坤、吐鲁番、古城等地驻军（满洲八旗、绿旗、索伦、察哈尔）；在乌鲁木齐设都统；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在科布多、塔尔巴哈达、伊犁等地的交通线上设置台卡，每台卡设兵七八名至十余名不等。

屯田。

康雍之际为了遏制准噶尔对喀尔喀的入侵，清廷在巴里坤、额尔齐斯河一带驻有重兵，为解决军饷运输之难曾在上述地区开辟屯田。乾隆二十五年，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之后又在伊犁一带开辟屯田。伊犁屯田分兵屯（绿营屯田）、户屯（客居伊犁者）、回屯（从南疆迁维吾尔人屯种）、旗屯（驻防满蒙八旗屯田），共十万余丁，开辟屯田二十三万八千六百余亩。

注　释

①《圣武记》卷四。

②噶尔丹策零系策妄阿喇布坦之子，雍正五年（1727）嗣位。

③雍正九年（1731），准噶尔军在和通泊（科布多以西二百里处）歼清军二万余；雍正十年（1732），掠赛因诺颜部牧地（塔米尔河），与清军及喀尔喀部在鄂尔浑河边的额尔德尼昭展开激战。

④⑤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一二。

⑥阿睦尔撒纳系策妄阿喇布坦之外孙、拉藏汗之孙。其母博托洛克在拉藏汗之子丹衷被策妄阿喇布坦杀害后，改嫁辉特（隶属杜尔伯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生下遗腹子阿睦尔撒纳。

⑦昭梿：《啸亭杂录》卷三。

⑧清廷令拨给杜尔伯特部牛五百头，羊二万一千只，粮四千余石。

⑨乾隆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为贝勒。

⑩乾隆封阿睦尔撒纳为亲王，授其定边左副将军。

⑪萨喇尔原系达什达瓦属下，达什达瓦被杀后投奔清廷。

⑫⑬《圣武记》卷四。

⑭乌什城首领同达瓦齐关系密切。

⑮达瓦齐被押送至北京后被封为亲王。

⑯罗卜藏丹津受到清廷宽赦，免死。

⑰《圣武记》卷四。

⑱额琳沁多尔济，系察珲多尔济之曾孙、哲布尊丹巴活佛之兄。

⑲青滚杂卜随班第征伊犁，见阿睦尔撒纳"潜谋叛志，亦隐有二心"，将班第密奏阿睦尔撒纳之言泄密给阿睦尔撒纳。

⑳《平定准噶尔方略》，卷三O。

㉑成衮札布系赛因诺颜部部长策凌长子。

㉒㉓《圣武记》卷四。

㉔兆惠系孝恭皇后（雍正帝之母）侄孙。

㉕《圣武记》卷四。

㉖乾隆二十二年秋，阿睦尔撒纳死于天花，该年冬俄将其尸体移交清。

㉗乾隆认为对厄鲁特不得"稍示姑息"。"若仍照前办理，则大兵撤回，伊等复滋生事端"。

㉘达什达瓦之妻在乾隆二十年十月率部至巴里坤，向清军投诚。

清（前期）

统　一　南　疆

天山以南为回部（维吾尔人）居住地，多年来该部一直受准噶尔奴役，乾隆二十年清军在占领伊犁、俘获达瓦齐后，被噶尔丹策零掳至伊犁囚禁的回部玛罕木特和卓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才得释放①，清廷遣波罗尼都（即大和卓②）回叶尔羌统治部众，留霍集占（小和卓）在伊犁，掌伊斯兰教。未几，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小和卓霍集占“率众助逆”，乾隆二十二年秋阿睦尔撒纳败逃后，小和卓逃回叶尔羌。

大、小和卓之叛。

小和卓霍集占逃归叶尔羌后，极力鼓动其兄大和卓波罗尼都举兵为叛，小和卓认为，如果服从清廷，“你我二人中必有一人唤至北京以为质，当与禁锢何异？莫若与中国抗拒，地方险远，内地兵不能即来，来亦皆疲惫，粮运难继，料无奈我何。且准噶尔已灭，近地并无强邻，收罗各城，可以自立”③。在小和卓的煽动下，清廷派往南疆的官员副都统阿敏道于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遇害，大小和卓公开为叛。

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初三，乾隆责成雅尔哈善、额

敏和卓率绿营兵、索伦兵万余进剿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该年五月抵达库车。库车城依山而建，“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城池坚固，易于防守。库车是北疆进入南疆的门户，清军屡攻不下。

霍集占闻库车被围，集兵马三千，自沙雅尔来援，六月十五日抵库车城下。翌日与清军展开激战，自午至未，大战两个时辰，霍集占所率援军两千被歼，率残部遁入库车城。六月十八日霍集占在与清军对垒中，左肩中箭，叛军被歼千余。六月二十三日夜，霍集占乘清军不备，率精兵四百出库车西门，渡鄂根河，从戈壁逃走。

八月初六，库车在被清军围困三个月后，粮尽援绝，开城迎降④。

任命兆惠办理回部。

乾隆因雅尔哈善防务有疏致令霍集占从库车逃走以及对库车久攻不下，而于该年七月二十日将雅尔哈善革职，令兆惠从北疆赶往南疆，主持平叛。

兆惠在八月初九南下，途中得知库车已攻下即前往阿克苏，阿克苏于八月二十日迎降；遂率兵向乌什进发，八月二十九日乌什城首领霍集斯遣子赍文降。九月二十四，和田及其所属哈喇哈什、搭克、齐尔拉、玉陇哈什、克勒底雅等向清军投诚，并在伯克鄂对（随清军平叛的维吾尔族首领）的带领下⑤拜见兆惠，和田六城不战而降。

小和卓霍集占在从库车逃出后，前往阿克苏，阿克苏“闭城拒敌”；遂逃往乌什，乌什“闭城不纳”，走投无路的霍集占只得逃回叶尔羌，波罗尼都则返回喀什噶尔，各据守一城，负隅顽抗。

黑水营之围。

拒守叶尔羌的叛军约一万三千⑥，“叶尔羌地大城坚”，其城防在回部诸城中首屈一指。霍集占在逃回叶尔羌后，坚壁清野，挖壕筑垒，大肆构筑工事。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初三，兆惠率马步兵四千突抵距叶尔羌城四十里的辉齐阿里克，将大营扎在喀喇乌苏（汉意黑水）。时霍集占去喀什噶尔小住，布拉尼都则领兵万余前往当噶勒齐。霍集占得悉兆惠兵临，立即返回叶尔羌。

叶尔羌城共有十二座城门，兆惠所部兵力，不足以对叶尔羌进行包围。兆惠从被俘维吾尔人口中得知霍集占牧群皆在城南英峨奇盘山，遂率兵袭击其牧群。十月十三日，兆惠在英峨奇盘山与守护牧群的回部骑兵五千鏖兵。兆惠部清军入南疆后马不停蹄，此次从乌什往征叶尔羌，穿越戈壁滩，跋涉一千五百里，坐骑俱已疲惫，不能急驰。当兆惠发现叛军分兵袭击大营后，即撤军回救，在大营附近被截为数段，迭经血战不得突围。此后又经过五昼夜激战，仍不能打破被围困的局面，遂固守大营，相机剿杀。

参赞大臣富德得知兆惠在黑水营被围，立即率援军从乌鲁木齐启程，时为十一月十一日。三天后，兆惠被围困的奏报呈抵御前，乾隆帝任命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任命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择精锐骑师，兼程前往，“惟应援兆惠为要”，又传谕兆惠坚守待援，解围后与援军“回至阿克苏，整顿兵马，再图大举”⑦。

在兆惠被围后，波罗尼都率马步兵五千至黑水助霍集占。大小和卓令回兵决水淹清军营地，兆惠指挥将士挖渠引水下流，蓄之以供饮用；霍集占兄弟又组织劫营，也被清军击退；

双方对峙三十余日。

十一月三十日，布拉尼都因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城遭到布鲁特袭击，欲与兆惠议和，兆惠表示："尔兄弟果欲纳款，当入觐大皇帝，否则不允。"波罗尼都旋因喀尔噶尔告急，撤兵回防，兆惠乘机夺回两座营盘。

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初六富德所率援军抵达呼尔玛，霍集占，布尼拉都率五千骑迎战，从巳时至申时的四个时辰中接战十余次，布拉尼都肋间被鸟枪击中，抬入城中。

次日晨，富德部清军在挺进途中遇到戈壁，与叛军激战一昼夜。初八日，叛军得知清军人马无水，四面进攻。直至初九日夜，参赞大臣阿里衮率军送马到，兵分两路发起攻击，斩杀千余。

被围于黑水的兆惠隐约听到北面有枪炮之声，知援军已到，连夜派兵制备云梯，分两路出击，并派人与富德联络。富德在十三日抵叶尔羌河，距黑水营二十里。清军兵分三路，右翼放炮掩护，左翼、中军迅速与兆惠军会合。兆惠部清军在被围困三个月后，终得解围。

大小和卓的败亡。

清军在解黑水营之围后，即遣兵赶往和田，解和田之围。六月初二从和田起程前往叶尔羌，和田六城伯克派兵六百五十随军效力。大、小和卓的堂叔额尔克和卓、额色尹及弟帕尔萨等向清军投诚。

霍集占闻清军将至与波罗尼都弃城出逃，清军追至叶什勒库勒淖尔，该地山高石险，隘口数十里，一线通天。随军从征的鄂对伯克等树回纛大呼招降，归降者达一万二千，霍集占弟兄逃往巴达克山，被当地人抓获、杀死。

善后事宜。

乾隆二十四年先后制定喀什噶尔、叶尔羌善后事宜：

沿用伯克制，阿木奇伯克总管一城事务，伊沙罕伯克协助阿木奇伯克，商伯克负责租赋，哈子伯克负责刑名，密喇布伯克管理水利，讷克布伯克管理工匠，帕察沙布伯克负责治安，茂特色伯克掌管教务，木特斡里伯克管理田宅，都管伯克管理馆驿，巴济格尔伯克管理税课，巴克迈塔尔伯克专管园林。

废除伯克世袭制，阿奇木伯克等与各省官员一样由中央任命。

颁布赋额，每年所贡较噶尔丹策临时酌减⑨。

从逆回人田产充公。

改铸货币。

在叶尔羌、喀什噶尔驻满兵一千，英吉沙尔驻兵五百。

从阿克什、乌苏、赛里木、库车、沙雅尔等城拨派回人前往伊犁屯田。

注　释

①雍正年间回部和卓玛罕木特被噶尔丹策零掳到伊犁，玛罕木特在被囚禁期间生下二子，玛罕木特死后，其二子仍被关押。

②和卓系波斯文 khwaja 的音译，伊斯兰教上层的称呼。

③《回疆通志》卷一二。

④霍集占自六月十八日失利后即龟缩城中。随清军进剿的维吾尔人伯克鄂对雅尔哈善建议在鄂根河设兵，防止霍集占出逃，但该建议未被采纳。

⑤伯克系维吾尔族官名，阿木奇伯克为长，伊什罕伯克为副。

⑥据古朗所著《十七和十八世纪的中亚西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一书介绍：霍集占在叶尔羌城有四千骑兵、六千部队，另有

波罗尼都援军三千。

⑦《平定准噶尔方略》卷六七。

⑧清代称柯尔克兹族为布鲁特，布鲁特系准噶尔语，意为高原人。布鲁特人游牧在天山北麓及喀什噶尔一带。

⑨田赋低于十分之一，边界贸易征税十分之一，外来人贸易二十分之一。

清（前期）

土尔扈特回归

土尔扈特蒙古系厄鲁特四部之一，四部“分牧而居”①，“部自为长”②，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广大地区。十七世纪初③游牧在雅尔的额什尔努拉（今前苏联塔城西北以及前苏联境内的乌尔札）的土尔扈特部，因受到准噶尔部侵扰及沙俄扩张势力的威胁，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④，越过哈萨克草原，来到伏尔加河流域⑤。

土尔扈特部反抗沙俄奴役的斗争。

野草丛生的伏尔加河流域，适于游牧，和鄂尔勒克的牙帐设在伏尔加河流域支流的阿赫图巴河畔。土尔扈特西迁之后同祖国、同厄鲁特各部依旧保持密切的联系：

一六四〇年，土尔扈特部首领到塔尔巴哈台，参加厄鲁特四部首领会议，制定《蒙古厄鲁特法典》；

清顺治三年（1646）土尔扈特部首领同和硕特部首领向清廷进表朝贡；

顺治十四年（1657），土尔扈特部首领罗卜藏诺颜遣使清

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今呼和浩特）”⑥；

土尔扈特部在同准噶尔部的关系改善后，频频联姻，和鄂尔勒克的女儿嫁巴图尔浑台吉为妻，和鄂尔勒克之孙朋楚克娶巴图尔浑台吉之女；策妄阿喇布坦（马图尔浑台吉之孙）又娶阿玉奇汗（阿玉奇系朋楚克之子，自幼留在巴图尔浑台吉处抚养）之女；

土尔扈特部屡至青海、西藏“熬茶供佛”；

在平定噶尔丹的战事中，阿玉奇汗“遣宰桑以所部兵千”⑦，协助策妄阿喇布坦守阿尔泰山之土鲁图；

康熙晚年，由于策妄阿喇布坦切断通道，阿玉奇汗从西伯利亚经库伦“达京师表贡方物”，未几清廷派内阁侍读图理琛等前往伏尔加河下游访问土尔扈特部。

土尔扈特抵达伏尔加河流域不久，沙俄政府的势力亦扩张至此。为臣服土尔扈特部，沙俄屡屡向土尔扈特发动攻击⑧，和鄂尔勒克在反抗沙俄侵略的战役中阵亡。土尔扈特人从未屈服于沙俄的暴政，“不断袭击俄国人”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顿河流域爆发起义，土尔扈特人响应顿河起义，揭竿而起。十七世纪末，伏尔加河流域爆发巴什基尔人起义，土尔扈特人配合巴什基尔人作战，袭击沙俄的殖民据点奔萨斯卡亚、坦波夫斯亚等地。

沙俄在军事侵略的同时，亦利用宗教进行浸透，派遣会蒙古语的传教士，诱骗土尔扈特人改奉东正教⑩。且利用策妄阿喇布坦的崛起切断土尔扈特同祖国的联系，逼迫土尔扈特首领同沙俄签订一系列条约。沙俄不仅获得“优惠的商务特权”⑪，并在同瑞典、土尔其的战争中调土尔扈特参战。为了

维护独立性，土尔扈特颁布了自己的法令，对宗教、社会治安、司法、文教、抵御入侵都做出明确规定，凡遇外敌入侵不参战者罚三岁马一匹，凡不习蒙文者罚三岁绵羊一头。

沙俄奴役的进一步加深。

1761年，十七岁的渥巴锡继承汗位，时值叶卡德琳娜二世统治俄国时期，对土尔扈特的奴役进一步加深。沙俄在伏尔加河、乌拉尔河一带驻有重兵，“修筑工事，包围汗国”⑫。并向土尔扈特部派长驻大使，“既是监督，也是特务”。“监视土尔扈特人和他们的动向”⑬。一七六二年，沙俄强行改组土尔扈特的政权机构——“札尔固”。“札尔固”是由八名王公组成的议会（军事民主制残余的产物），“是汗手下的辅政大臣和助手”⑭，沙俄宣布“札尔固”的成员要领取俄国政府的津贴，并让“札尔固”成员与汗享有同等权力，钳制渥巴锡。沙俄政府试图发动政变，废黜渥巴锡，拟以长期居住彼得堡的杜尔伯特贵族敦杜克夫（此人已加入东正教）取代渥巴锡，使土尔扈特改变信仰，成为俄国的“一个新的行政区域”⑮。此项阴谋，因土尔扈特上上下下的强烈反对，未能得逞。

迨至第二次俄土战争时间（1768—1770）沙俄又强迫土尔扈特人入伍，“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⑯，数万土尔扈特人死于俄土之战。

武装起义。

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渥巴锡从土耳其战场归来、即秘密筹划率部众重返祖国之事。1770年11月20日，渥巴锡以防犯哥萨克入侵集合军队。因沙俄当局得悉土尔扈特欲东归故土的情报，采取严密的控制措施，强令渥巴锡把儿子送至彼得堡为人质，并要在土尔扈特部征兵一万。渥巴锡只得提前行

动，致使伏尔加河对岸的一万余户，因河水尚未封冻，不得渡河，被留在伏尔加河流域。

1771年1月5日土尔扈特人举行武装起义，渥巴锡点燃木制的宫殿，无数村落浓烟滚滚，土尔扈特人杀死数以千计的俄国官员、商人，击败前往镇压的俄军，便开始踏上重返祖国的东归之路。

充满艰难险阻的东归之路。

在土尔扈特人的东归之路上，前有哥萨克骑兵的拦击，后有俄军的尾追。渥巴锡派出一部分军队开路，驱逐哥萨克骑兵，自率二万兵士殿后。这支由三万余户、十七万人组成的人流，仅用八天时间即通过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把尾追的俄军甩在后边。

在进入哥萨克草原后，土尔扈特遭到哥萨克骑兵的突袭，由于土尔扈特人赶着牲畜前进，来不及集中兵力，九千兵士阵亡。二月初，行抵奥琴峡谷，此为东进必经峡口，该峡口已被哥萨克骑兵占据。为夺取山口，渥巴锡亲自组织五队骆驼兵正面猛攻，同时派出一支枪队包抄敌后，几乎全歼把守山口的敌兵。当土尔扈特人抵达奥尔斯克要塞时，俄奥伦堡总督率五千俄军进行拦截，且调动巴什基尔人的两万军队配合作战。时值六月，酷暑难熬，半年多的跋涉使不少人疾病缠身，渥巴锡鼓励部众："俄国是奴隶国土，中国是理想之邦，让我们奋勇前进，向东、再向东！"⑰土尔扈特再次摆脱俄军的追击。

当土尔扈特人抵达叶尔盖河时，努尔阿里率领的哈萨克骑兵及巴什基尔人组成的联军再次对土尔扈特进行拦截，双方再次展开激战，土尔扈特在付出重大牺牲后，摆脱俄军的围追堵截，于该年七月越过坑格尔图拉（前苏联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

克)，进入清帝国境内。土尔扈特部在受沙俄奴役一个半世纪后，终于重返祖国，十七万人仅剩其半。

清廷对土尔扈特部的安置。

乾隆帝在得悉土尔扈特回归后，立即遣人前往伊犁，办理土尔扈特部事务，并下达令土尔扈特部首领前往热河避暑山庄朝觐的命令。渥巴锡在抵达伊犁前，“先期遣使至伊犁，具书通款”，表达“向居俄罗斯地，久愿为大皇帝臣仆”之意，因“无机可乘，乃于去冬谋弃旧牧，挈属内附”。“行程万有余里”⑱。乾隆在得知渥巴锡遣人通款后，命参赞大臣舒赫德前往伊犁，命陕甘总督吴达善、陕西巡抚文绶等人拨库银，作为“备赏安插”费用，又令彼等准备马匹、牲畜以资使用。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1771)，乾隆在热河木兰围场的伊绵峪接见渥巴锡，特用蒙古语与渥巴锡等交谈，同渥巴锡行围射猎。随后又在避暑山庄的万树园多次赐宴，举行盛大的灯宴火戏，欢迎土尔扈特的回归。

鉴于土尔扈特在回归途中历经艰险，几乎丧失所有的牲畜，财产，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其穷困情况，实堪悯恻”⑲，乾隆责令舒赫德等“分拨善地安置”，“购运牛羊粮食，以资养赡，置办衣裘庐帐，俾得御寒”，“筹其久远资生之计”⑳。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内蒙等地拨给土尔扈特的马、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除此以外，还有大量毡庐，使得重返祖国的土尔扈特人“皆安居得所”。

乾隆帝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卓里克图是英勇无畏之意)，其他王公台吉均得封号。渥巴锡所统部众系和鄂尔勒克后裔，称旧土尔扈特，编为十旗，安置在准噶尔盆地南、北、

西部的牧场；另一支系和鄂尔勒克叔父卫衮察布的后裔，称新土尔扈特，编为二旗，在科布多一带游牧。旧、新土尔扈特分别由伊犁将军及科布多大臣管辖。

清、俄之间的交涉。

乾隆三十七年（1772）俄枢密院行文清政府，要求将土尔扈特交还俄方，甚至以兵戎相威胁。清理藩院在答复中明确指出："土尔扈特渥巴锡等，与尔别一部落，原非属人"，对于军事威胁则明确表示："或以兵戎，或守和好，我天朝惟视尔之自取而已"，"如尔等欲背前议，则亦听之"㉑，土尔扈特部众"断无给伊（指俄国）之理"㉒。

注 释

①邓廷桢：《蒙古诸部述略》。

②《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③关于土尔扈特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时间记载不一，一说明末清初，一说崇祯年间，一说1616年。

④迁往伏尔加河流域的除土尔扈特部外还有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的一部分，约有五万帐牧民。

⑤当时沙俄的势力尚未扩张到伏尔加河流域。

⑥《皇朝藩部要略》卷九。

⑦《朔方备乘》卷三八。

⑧沙俄邀准噶尔部共同攻击土尔扈特。

⑨《西部蒙古族及满洲族》（日译本）上卷，第292页。

⑩东正教系基督教的分支。1054年从基督教内部分裂出去。

⑪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中译本，第63页。

⑫捷连季耶夫：《征服中亚史》，第65页。

⑬《西部蒙古族及满洲族》，第35页。

⑭德昆西：《鞑靼人的反叛》，第7页。

⑮巴克曼：《土尔扈特族自俄返华记》。

⑯《西域总志》卷二。

⑰斯文、海丁：《热河·皇帝城》，第52页。

⑱《皇朝藩部要略》卷一四。

⑲⑳《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九。

㉑㉒《清高宗实录》卷九一四。

清（前期）

军机处的创建及演变

“军机处”是清代特有的政治机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军机处实际是皇帝的机要秘书班子及办事机构，是奉旨经办一切重大事务的中枢，“内而六部、各卿寺及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至奉天、吉林、黑龙江所属，西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于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①。

因军需而设。

雍正年间②因对厄鲁特用兵在乾清门外③设军机房，亦名军需房，“办理军机”。时值军报频传、军情紧急，既须迅速办理，又需慎密勿泄，故特设机关专办，指派亲王大臣主持。内阁在太和门外，地远人杂，易泄机要，故在靠近内殿的地方，另设军机处，既易于保密，又便于皇帝指挥。

军机处从临时机构变为常设机构。

军机处原本为办军需而设置的临时机构，由于它直接听命于皇帝，便被固定下来，从办军务到奉旨办一切重大政务。

军机处并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府衙门，军机处的军机大臣、

军机章京既非专职，亦无定员，均由皇帝在亲王、大学士、尚书、侍郎等人员中简派，称之为“在军机处行走”、“学习行走”（指初入军机处者）；如因故解任则称之为“开去军机处差使”，或称之为“免直”。军机大臣中虽有“首席”军机大臣（亦称“揆席”），但并非真正的长官，除奉旨办事之外，不能作出任何决定，也无权对各衙门下达指令。

军机处不是正式衙门，军机大臣、章京均有本职，如本职补放，即不再入直军机处，章京并非高官充任，但因接近机要，被称为“小军机”。

军机处的职能。

军机处的全部工作就是“承旨”办事，根据皇帝的谕旨，“奉命起草”。在雍正时期“承旨”是“独见”，即军机大臣单独朝见皇帝，迨至乾隆以后从“独见”变为“同见”，《军机处述》对此有详细介绍：

“军机大臣同进见，自傅文忠公（傅恒）始。上（乾隆）初年，惟讷公亲一人承旨。讷公能强记而不甚通文义，每传一旨，令汪文端（由敦）撰拟，讷公惟恐不得当，辄令再撰，有屡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传一旨，改易亦如之，文端颇苦之，然不敢较也。时傅文忠在旁，窃不平，迨平金川归，首揆席，则自陈不能多识（音记，记住），恐有遗忘，乞命诸军机大臣同进见，于是遂为例。”从“独见”至“同见”避免了首席军机大臣专擅萌芽的出现④。

起草谕旨原由军机大臣亲自动笔，为避专擅之嫌，自傅恒时起改用员司代拟。《军机处题目记》中对此记述道：“每被旨，各归舍缮拟，明日授所属进之。后大臣避专擅名，乃令所属具草，视定进呈。”

军机处设有《存记簿》，凡“奉旨存记”事务，一律登录，以便随时请示皇帝。“密存事件”，则记后密封存档，届时拆阅办理。乾隆十二年（1747）二月初六，特为此颁布上谕：“军机处系机密之地，所交密议间奏，本无宣泄。其应交该部密议者，嗣后俱交军机处存记档案，交发部议。其奏事处所奉密议事件，著亦交军机处记档转发。”⑤

军机处所领上谕不经内阁（防止泄密）直接廷寄（经内阁而发称“明发上谕”），“签发马上飞递，定限日行三百里，遇有最紧要事件，始以日行六百里字样加签”⑥。

君权的附庸。

明代的中枢机构是内阁⑦，清入关后虽然仿照明制改内三院为内阁，但在实际上清代内阁形同虚设，内阁所办只是一般例行公文，如“内阁、翰林院撰拟有弗当，又下军机处审定”，军机处有权复核内阁所办文件。

皇帝特简派的学差、试差均由军机大臣呈上名单，由皇帝钦定，一般官员的晋升亦由军机大臣“记名”。凡经“军机处记名”，遇缺出，即由军机大臣提名奏请，内阁对此绝不得染指。军机处虽无用人权，却有推荐权，又因其接近君王，得预机密，总揽机要，成为真正的权力中枢，这一中枢始终操之于君权，军机处则始终是秉承皇帝的旨意办事。军机处成立以后，内阁的权力进一步萎缩，正如《军机大臣年表》所言：“军机处名不师古，而丝纶出纳，职居密勿。”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

与军机处关系密切的机构。

“方略馆”、“内缮书房”均与军机处有密切的关系。清代每当重大征战结束，便开馆修方略，把有关此次战争的谕旨，

奏本等依次排列，汇编成书，或曰方略，或曰纪略。方略馆的总裁，由军机大臣担任，其纂修人员均由军机处人员承担。“内缮书房”负责把军机所收贮的文字材料进行满汉互译，此类事例由军机大臣主管。

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消亡。

体现了军事民主制残余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在清王朝入关后一度加强，直到军机处建立后议政王大臣会议日渐失去其作用，乾隆五十六年（1791），上谕明确指出：“国初以来，设立议政王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只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会该部亦毋庸奏请。”⑧至此议政王大臣会议这一清王朝所特有的议政形式寿终正寝。

注 释

①王旭：《军机处题名记》。

②军机处建立的时间记载不一，《清史稿·职官志》为雍正十年；梁章钜的《枢垣纪略·自序》为雍正八年；王旭的《军机处题名记》为雍正七年。雍正年间对厄鲁特用兵一是雍正元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一是雍正七年对噶尔丹策零的战争，战事延至雍正十年。

③军机处始设乾清门外，后移至乾清门内，再迁至隆宗门内。

④讷亲即因“领事过多，任事过锐”（刘统勋对讷亲的批评之语）而有专擅之嫌，在平定大小金川之战中因师久无功被杀。

⑤⑥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一。

⑦内阁的建立本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

⑧梁章钜：《枢垣纪略》卷一。

清（前期）

地丁合一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是把田赋①、丁役（或丁两）②作为税收的两种主要方式，清初亦沿用了这种赋、役双重征税的作法。康熙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晚期、人身依附关系的大为削弱，使得人口税的征收愈发困难。自康熙末年即出现将丁银摊入地亩的作法，地丁合一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清初的赋役征收制度。

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即沿用了明王朝的赋役制度，于顺治三年（1646年）制定《赋役全书》，《赋役全书》在顺治十四年（1657）编成，每州县发两本，“一存有司，一存学宫”，“详载上中下田则”，配有土地坐落方位、形状、大小的鱼鳞册（又称清丈册）及黄册（户口册）。

为防止地方官吏加派私征，由国家颁发“易知由单”（即通知单），“开列上、中、下则，正、杂、本、折钱粮”。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康熙五十一年（1712）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封建

社会开始进入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鉴于“海宇承平已久，户口日繁”，“人丁虽增，地亩并未加广”，康熙帝“令各直省督抚，将现今钱粮册内有名丁数，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自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加实数察明，另造清册奏报”。一再重申，“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③。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自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人丁户口数以康熙五十年所统计的数字为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实施，虽然并未取消人头税，但把其总额固定下来，减轻广大无地、少地农民的丁银负担，避免了因丁银过重而逃亡、酿成社会动荡的问题。

把丁银摊入地亩征收。

康熙五十二年（1713），御史董之燧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基础上提出“统计丁粮，按亩均派”的建议，因户部阻挠而未得实施。董之燧的建议得到康熙帝的赞许，康熙五十五年（1716），谕令“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广东所属丁银，就各州县地亩摊征。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不等”，“丁随地起，见于明文者，自广东始④。康熙末年，在四川推行摊丁入地，“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卖买”⑤。

雍正元年（1723），根据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议，雍正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摊丁入地，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广、实施，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全国各行省除奉天省“户籍无定”没有实施，其他各省基本完成这一赋役制度的改革，个别省份（如山西）直至道光二年，才在全省范围内实现“摊丁入地”。

摊丁入地的具体情况。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摊丁入地的时间不一，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亦不一：

广东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五年，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六厘四毫；

四川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康熙末年，摊入地亩的丁银不详；

直隶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雍正二年，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二钱六厘；

福建省实行摊丁入地的时间是雍正二年，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五钱二厘七毫至三钱一分二厘；

山东省在雍正三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一分五厘；

云南省在雍正四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不详；

河南省在雍正四年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一厘七毫至二钱七厘；

陕西省在雍正四年推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中的丁银一钱五分三厘（遇闰年加四厘）；

浙江省在雍正四年推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丁银一钱四厘至二钱四厘；

甘肃省于雍正四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银一钱五分九厘不等；

江苏省于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丁银六分二厘不等；

安徽省于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六分二厘不等；

江西省在雍正五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五

厘六毫；

湖南省在雍正六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八钱六分一厘不等；

广西省在雍正六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三分六厘不等；

湖北省在雍正七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一钱二分九厘；

山西省从乾隆元年（1736）开始在少数州县实施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二钱八分一厘；

贵州省在乾隆四十二年实行摊丁入地，摊入地亩的丁银不详。

摊丁入地的实施遭到官僚地主的抵制。

地丁合一的实施改变了税收上的双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少地、无地农民的负担，因之遭到相当一部分官僚地主的抵制。在地主看来，摊丁入地“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皆非所乐”⑥，“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二，无田者什八，乃欲专责富户之粮，包赔贫户之丁”⑦。

雍正元年，浙江“田多丁少之土棍”，“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阻拦摊丁”，以至该省巡抚法海有“暂缓均摊之议”。两年后钱塘、仁和两县在实行摊丁入地之后，地主强迫农民在交租时“每亩米加二升，银加二分，以助产主完丁之费”⑧，直隶省亦有不少县“业主借摊丁事端，每亩加租三分”⑨。

尽管地丁合一的实行遭到地主阶级的抵制，但清政府出于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克服了种种障碍，完成了赋役制度的变革。

注 释

①田赋是指土地所有者（包括地主、自耕农）按照土地的多少、土地的肥瘠向封建国家交纳的实物或银两（折银）。

②丁役（丁银），人头税的一种，十六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丁向政府提供一定的徭役。

③《东华录》卷八九。

④⑤《石渠余记》卷三。

⑥《雍正朱批谕旨》，第二函；第二册。

⑦陆耀：《切问斋文钞》卷一五。

⑧《乾隆浙江通志》卷七一。

⑨《乾隆肃宁县志》卷七。

清（前期）

改土归流

自元明以来，在西南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土司的官职①虽受封于皇帝，但其职务系世袭，实际是割据一方的土皇帝。

土司制度的弊端。

在经济不发达、交通梗阻的西南地区，实行土司制度仅仅是一时的“羁縻”之策。土司制度严重影响了西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土司对于百姓“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②。土司向清王朝交纳的钱粮“不过三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司娶子妇，土民三载不敢婚，土民被杀，亲族尚出垫刀钱数十两”，在土司的残酷剥削与压迫下，土民“终身不见天日”③。土司凭借其权势霸占土地，“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阻碍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故自明代起，就在濒临内地的一些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以流官代替土官。

改土归流的实施。

雍正四年（1726）三月，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请“改土归

流”。他在疏奏中指出：“前明流土之分，原因烟瘴新疆，未习风土，故因地制宜，使之响导弹压。今历数百载，以夷制夷，即以盗治盗”，“若不铲蔓塞源，纵兵刑财赋事事整理，皆非治本”，“欲安民”，“必改土归流”，“改流之法，计擒为止，兵剿次之”④。据鄂尔泰建议，首先在东川、乌蒙、镇雄⑤实行改土归流，以朝廷任命的官吏代替土司，废除土司在政治、经济方面所享有的特权。从雍正四年起至雍正十三年止，在云南、四川、贵州、广西、湖南等省革除的土司就有六十多个，在上述地区设立府、厅、州、县，由清廷任命有一定任期的官员进行统治。由于改土归流的实施取缔了土司世袭的政治特权与经济特权，因而在其实施过程中充满了激烈的斗争。至雍正九年，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省均完成“改土归流”。

平定云南土司的叛乱。

云南土司的势力根深蒂固，乌蒙土司禄万钟、镇雄土司陇庆侯发动叛乱，反对改土归流的实施。雍正五年（1727）初，镇沅土官刁西明聚众为叛，焚烧知府衙门，将知府刘洪度生擒，剖心祭旗。雍正帝在得悉此事后，传谕鄂尔泰办理平叛须“酌中料理，疏而不漏”，该年二月，鄂尔泰统兵进剿。据报：擒获二百五十余人，斩首三百八十四人，招回百姓三千余户。雍正六年初（1728），米贴土司禄永孝之妻陆氏举兵为叛，驻乌蒙副将率兵三百往捕中伏身亡；未几，总兵张耀祖率大军进剿，陆氏不支逃往井底屯，调兵数千，扼守沿途险要，且与四川土司德昌联络，彼此配合，直至该年五月二十一日才将陆氏生擒。

雍正八年（1730）八月，已经归降清廷的禄鼎坤（禄万钟之叔）“觊袭土职”，举兵为叛。时值场期，数千人携弓箭围困

府城乌蒙，一天后增至三万人，相继攻克府治及总兵衙门，文武官员被杀、衙门所存文书档案被毁，仓库积储被抢。总兵刘起元逃至荔枝河边被杀⑥。“江外凉山、下方、阿驴，江内巧家营、者家海诸营及东川禄民诸土司皆起而应之”，“杀塘兵，劫粮运，堵要隘，毁桥梁，所在屯聚为乱”⑦。九月间，东川土司禄万福起兵响应乌蒙，围攻东川。威宁、镇雄等地纷纷揭竿，杀塘兵，劫粮食，放炮弩，“贼势汹涌，民心惶惑”⑧。

鄂尔泰调兵九千进攻乌蒙，雍正立令四川、湖广方面派兵会剿。该年十月，安笼总兵哈元生率兵三千，几经鏖兵收复乌蒙，从十一月起，清军分路进剿，所获百姓格杀勿论，甚至刳肠截头，挂在岩石、树枝上，惨不忍睹。雍正九年（1731），禄万福等土司皆被擒获，生擒要犯四百七十余，各路斩杀者一万一千余；滚岩、落水而死者万余人，俘获赏军男妇八千余、从逆眷属千余。在此次平叛中受到清廷嘉奖的有“陇庆侯之庶民二禄氏”、“四川沙马土司沙氏”。据《清世宗实录》所载，二禄氏“矢死效忠，解散逆谋”，沙氏“立志不移，亲自赴边”。雍正特下谕令对二禄氏、沙氏予以嘉奖，“沙氏照其应得封典，加一等给与诰命；二禄氏给以六品安人诰命，并各赏银一千两，彩缎二十端”。至于“在军前效力及保境安分者”，令鄂尔泰“查明酬量赏给”。

在平定乌蒙之变后，清军沿澜仓江而下，“官兵各持斧锹开路，焚栅湮沟，连破险隘，直抵孟养”，“深入数千里”，“江内地全改流，升普洱为府，移沅江协副将驻之，于思茅、橄榄坝各设官戍兵”⑨。

在贵州推行改土归流。

贵州是苗族聚集地，特别是黔东的“生苗”地区“无君长

不相统属”。鄂尔泰在奏报中言道："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苗疆四周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踞其中，群寨环其外。左有清江可北达楚，右有都江可南通粤，蟠据梗隔，遂成化外。如欲开江路通黔、粤，非勒兵深入遍加剿抚不可。"⑩

从雍正四年起，鄂尔泰派兵攻下仲家苗及广顺府的长寨，乘胜招抚广顺、定番、镇宁、永宁、永丰、安顺等地苗寨千余处。雍正六年（1628），鄂尔泰任用熟悉贵州地形的张广泗率军赴“都匀、黎平、镇远、清平诸地化导群苗，相机剿抚”⑪。张广泗在黔东“扼吭控制”，设镇驻兵，平定不肯降服的苗寨，在黔东实现改土归流，开辟通向粤、湘的水陆交通。

平定贵州苗变。

雍正十二年（1734）清廷遣吏部侍郎吕耀曾、大理寺卿德福前往贵州化导“生苗”，并予颁赏。雍正在谕令中再次告诫苗民改变“罔知法度”、“视劫夺为固然”等恶习，“仰体朕心，只遵朕训，父教其子，兄勉其弟，族党亲朋，互相劝励，共敦善俗，永息刁风，以副朕育正群生之至意”⑫。雍正十三年（1735）正月，吕耀曾等抵古州，会同巡抚元展成、提督哈元生“颁赏”苗民。由于吕耀曾等一行所经之处，骚扰甚大⑬；颁赏时又凭书吏、通事（翻译）从中作弊，致使有人领赏二、三次，有人却空手而归，兼之书吏与头人勾结，把应开销的钱粮侵吞私分。于是颁赏尚未结束，苗民纷纷为变，“焚掠州县”。

雍正十三年二月，古州苗民聚众八寨妹，揭竿而起，台拱、清江、丹江等地同时为变，且迅速蔓及镇远、黎平、思州、石阡、铜仁、都匀等府。该年三月，连破黄平、清平、清

溪、余庆、凯里、重安等州县驿汛。起义苗民威胁贵阳，各处告急。

四月，贵州提督哈元生率兵进剿，屡与苗民交战，无法向前推进。清廷得讯，谕令云南，两广、湖广出兵增援。未几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贵州，张照反对“改土归流”，密奏“改流非策”，“致书诸将，首倡弃地之议”⑭，以致师久无功。乾隆即位（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罢免张照，任用张广泗，战事才现转机。张广泗“暂抚熟苗⑮，责令交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兵分三路进剿苗寨，在消灭退至牛皮大箐的生苗后，“复乘兵威，搜剿附逆熟苗，分首恶、次恶、胁从三等”，“先后扫荡，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⑯。直至乾隆元年（1736）十月，张广泗才以苗疆军务全竣上奏。

为了防止流官对“生苗”的勒索，乾隆在平定贵州苗变后将贵州新辟苗疆的钱粮全部豁免，永不征收，使苗民无输粮纳税之繁、无官吏需索之忧。

云、贵地区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及“改土归流”之后，之所以屡屡出现大规模的冲突，既同清廷所任用的官吏、将弁的贪婪有直接关系，也同云贵两省土司势力雄厚，不甘心失去世袭特权，利用民族情绪从中煽动密不可分。

注　释

①土司的官职有宣尉司、宣抚司、安抚司、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

②《清世宗实录》卷二O。

③《清史稿·鄂尔泰传》。

④雍正四年三月，鄂尔泰上任伊始即疏请朝廷“欲靖地方”，“须先制土司”。

⑤东川、乌蒙、镇雄原属四川，据鄂尔泰之请划归云南。

⑥刘起元在驻防乌蒙后，准其率兵屯垦，每兵给荒田三十亩。刘以查荒田为由，不论有主无主，拨与兵丁耕种，又强买马匹私派公费；客民被盗，刘未能抓拿盗犯，反将“头人拷比”，激起民愤。

⑦《清史稿·鄂尔泰传》。

⑧《宫中档雍正朝奏折》。

⑨《清史稿·土司三》。

⑩《清史稿·鄂尔泰传》。

⑪《清史稿·张广泗传》。

⑫《清世宗实录》卷一五三。

⑬哈元生用夫役千余名，元展成用夫役七百余。

⑭《清史稿·土司四》。

⑮熟苗系指濒临汉族居住区、受汉族影响较深的苗民。

⑯《清史稿·土司四》。

清（前期）

平定大、小金川

大金川、小金川系大渡河上游两个支流，因沿河山脉含有金矿而得名，向为藏族居住区。该地形势险峻，交通不便，"万山丛矗，中绕汹溪，皮船笮桥，曲折一线"①，居民皆住石碉中。清顺治七年（1650）任命小金川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雍正元年（1723年）大金川莎罗奔因随岳钟琪入藏平叛有功被封为安抚司。大、小金川分治。

莎罗奔谋并小金川。

莎罗奔担任安抚司后，势力益强，谋并小金川。莎罗奔以女阿扣嫁小金川土司泽旺，生性懦弱的泽旺遂受制于妻。乾隆十一年（1746）莎罗奔派人劫持泽旺及其印信，经四川总督干预，"始还泽旺于故地"。一年后，莎罗奔发动叛乱，四川巡抚纪山派兵弹压，被其击败，清廷遂调征苗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集军二万进剿莎罗奔。

张广泗兵分两路进剿，"一由川西入攻河东，一由川南入攻河西"②。因山路崎岖，碉卡林立，致使清军受阻，难以向前推进。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驻守马邦山梁的清军被大

金川番兵乘夜凿断通路，被困绝粮，又被夺去劈山炮三门。副将张兴在得不到增援的情况下同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议和，宰牛盟誓。莎罗奔等伪许送官军全营过河，而将张兴及其所率官兵六百余名，诱至沟底，全部杀害。经此大败“军中愤恚，上下益离，共无斗志”③，清廷又向金川增兵一万，并在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大臣，前往四川大、小金川督军。

讷亲、张广泗师久无功。

讷亲刚愎自用，抵前线后，“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极力攻击，多有损伤。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争笑之，故军威日损”。三千清军进攻碉堡“遇贼数十人哄然下击，其军即鸟兽散”④。

讷亲接连受挫，只得依赖张广泗，而张广泗又“轻讷不知兵而事权出己上，阳奉而阴忮之。诸将无所禀承，率观望不前”⑤。张广泗把莎罗奔派遣间谍作为向导，致使清军处处被动。十三年六月，讷亲拟大筑碉堡与大、小金川对抗，此议被乾隆帝驳回⑥。该年八月，驻守大金川马奈的清军遭到夜袭，大金川番兵二、三十人乘清军夜间稽查不严，乔装混入营中，杀伤兵丁多人，夺去所有炮位。乾隆接到奏报于九月初十召讷亲、张广泗驰驿来京，翌年初将彼等相继处死。

以大学士傅恒经略大、小金川战事。

傅恒抵前线后，采纳岳钟琪的建议，集精兵三万五千分两路进攻。岳钟琪在党坝一路连克战碉，逼临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该地坚碉林立，岳钟琪募勇士千余，乘夜攻克大小碉卡数十，得粮仓十二。十三年十一月，莎罗奔之侄朗卡遣人乞降。

岳钟琪乘胜进兵，十一月十八日遣兵一千二百佯攻木耳金冈，诱敌增援，遂派兵夺取塔高山梁土卡、平房三处、水卡一处，击毙大金川兵百余名。

十一月二十一日，傅恒在军前诛莎罗奔的奸细良尔吉，次日诛莎罗奔之女阿扣。十四年（1749）一月十二日，莎罗奔派人至傅恒军前乞降。傅恒坚持莎罗奔、朗卡必须“亲缚赴辕”，莎罗奔、朗卡惟恐被诛，又转向岳钟琪处乞降。二十五日莎罗奔遣人赴岳钟琪处，投送甘结六款：

自今以后，永不侵扰邻邦土司；

为清廷出兵供役，唯命是听；

退出所掠夺的邻番土地；

擒献杀害清军官兵的凶犯；

送还掠夺的内地汉民；

如数归还掠夺的枪炮。

大金川战事又起。

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大金川战事又起。此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年事日高，由其侄朗卡主持事务。朗卡时时侵掠周围土司，乾隆二十三年（1758），攻小金川及革布什札土司。虽经四川总督调解，仍“侵邻境不已”⑦。

乾隆三十一年（1766），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与时时遭受大金川侵掠的绰斯甲布、革布什札、巴旺、布拉克底、丹坝、鄂克什、工噶、梭磨、卓可采九土司协商进剿大金川之事。对攻剿有畏难情绪的阿尔泰，希图息事，允许朗卡与绰斯甲布土司联姻，又许朗卡以女嫁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使得小金川等土司反而同大金川结盟。

乾隆三十六年（1771），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札

土司，小金川僧格桑攻鄂克什、明正土司，不听清廷调解，公然向清军宣战。阿尔泰按兵打箭炉半载，不敢进剿，乾隆赐阿尔泰死，命大学士温福赴四川督师。清军接连夺取关隘，逼近小金川土司的驻地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与索诺木合兵一处。

温福兵败而死。

温福为人刚愎，“不广谘方略”，以碉对碉，建碉卡上千，二万士兵分散碉卡之中，兵力反而不足。乾隆三十八年（1773）屯兵木果木的温福被索诺木切断运粮之路，木果木大营及各碉卡的清军遭到攻击，温福战死，“师遂大溃”。清军“自相践踏”，在渡铁索桥时，因“人相拥挤，锁崩桥断，落水死者以千计”⑧。

清廷遂任命大学士阿桂为定西将军，征调健锐营、火器营、索伦兵出征。清军在阿桂的指挥下攻克小金川，随即向大金川进军。

大金川的防守较之小金川“严密十倍”，索诺木凭借碉卡拒险而守，“攻碉难于克一城”。官兵虽众，枪炮惟及于石，直至乾隆四十年（1775）才逼近勒乌围⑨。勒乌围“碉坚墙厚，西临大河；迤南有转经楼，与官寨相犄角，木栅石卡，长里许；其东负山麓，有崖八层，层各立碉，各路败回之敌，咸聚守之”⑩。清军先摧毁栅卡，断其犄角，用大炮轰击村寨、桥梁。该年八月十五，攻破勒乌围，索诺木已逃往刮耳崖。翌年初清军包围刮耳崖，索诺木与祖父莎罗奔及家人部众二千余出降。在第二次平定大、小金川之后，清廷设懋功厅进行管辖。

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历时两年，第二次历时五年。为了让清军练习仰攻，乾隆在第一次平定大、小金川期间在北京西郊

修筑碉堡多处，称之为团城演武厅。演武厅西南有御碑亭，碑上刻有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御制碑文，记述了平定大小金川之战的经过。

注 释

①②《圣武记》卷七。

③《金川纪略》。

④《啸亭杂录》卷一。

⑤《啸亭杂录》卷四。

⑥乾隆在军机大臣会上谕道："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饷运难继，少则单弱可虑。"

⑦《圣武记》卷七。

⑧《啸亭杂录》卷七。

⑨转引《清代通史》中册，第102页。

⑩索诺木鸩杀僧格桑向清军献尸求降，阿桂不允。

清（前期）

秘密立储

秘密立储，是清王朝在摆脱推举制①之后所形成的立储制度，同汉唐以来公开立储的作法迥然不同。

康熙对太子的两立、两废。

在汉族立储制度的影响下，康熙十四年（1676年初）十二月，康熙帝立皇后赫舍里氏之子胤礽为皇太子，太子时年两岁。胤礽"六岁就傅，令张英、李光地为之师，又命大学士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二十五年，上召江宁巡抚汤斌"，"辅导太子"。"太子通满、汉文字，娴骑射"，按照满洲贵族的观点，胤礽并非平庸之辈。在康熙三征噶尔丹期间，均由太子留守京师，处理国务。

康熙四十七年（1708）九月，胤礽在陪康熙行猎时被废，康熙为此所颁布的长谕中指责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专擅威权、鸠聚党羽，窥伺朕躬"、"邀截外藩入贡之人"、"十八阿哥（康熙第十八子胤祄）患病，众皆以朕年高，无不为朕忧虑，伊系亲兄，毫无友爱之心"、"恣取国帑，干预政事"以及"欲为索额图复仇②"等等③。

康熙对胤礽的不满，在十八年前第一次亲征噶尔丹（康熙二十九年）期间即已公开化。康熙在出征后，因受暑热病倒军前，“驻跸古鲁富尔坚嘉浑噶山”。“召太子及皇三子胤祉至行宫”，康熙因“太子侍疾无忧色”④，“以胤礽绝无忠爱君父之念，心甚不怿，令即先回京师”⑤。四年后（康熙三十三年）因制定太子祭奉先殿仪注⑥而将礼部尚书沙穆哈革职。

康熙三十六年（1697）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期间，又因听到“太子暱比匪人”的传言，“录太子左右用事者置于法”，将膳房人花喇、茶房人雅头、哈哈珠子（侍卫）德住处死。太子失宠遂成为公开的秘密。

康熙四十八年三月（1698），胤礽在被废黜半年之后，第二次被册立为太子。

胤礽被废不久，“相面人张明德曾相胤禩（康熙第八子）后必大贵”以及“张明德于皇太子未废之前谋欲行刺”⑦即被揭露。未几，胤祉告发皇长子胤禔对胤礽“咒诅”、“用术镇厌”（康熙四十七年十月）。而胤禩党羽⑧在康熙所召开的立储会议上（四十七年十一月）的大肆活动，愈发使康熙感到储位虚悬所酿成的危机，于是康熙复立胤礽为太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九月三十日，胤礽在被废复立为太子三年半后第二次被废。康熙为此召诸皇子谕道：“皇太子胤礽自复立以来”，“大失人心，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故将胤礽仍行废黜禁锢”。又曰：“胤礽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怙恶不悛，是以灰心，毫无可望”。“嗣后众等各当倾心向主，共享太平，后若有奏请皇太子已经改过从善，应当释放者，朕即诛之”⑨。

胤礽第二次被废的主要原因，即“与恶劣小人结党”。康

熙五十年（1711）十月底，就曾以“国家大臣为皇太子而援结朋党”的罪名而将都统鄂缮、兵部尚书耿额、刑部尚书齐世武等锁拿。翌年四月，又以步军统领托合齐“结党会饮，”公开降旨斥责胤礽：“此事俱因胤礽所致，胤礽行事，天下之人无分贵贱，莫不尽知”，“惟其行事不仁不孝，难于掩盖，徒以语言货财买嘱此等贪浊谄媚之人，潜通信息”⑩。

不立太子。

康熙自第二次废太子胤礽后，即不再立太子。只要册立皇太子就要有“附皇太子者”“逢迎结党”，高度集中的皇权已经不能允许储权的存在⑪。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1714），胤禩因谋为皇太子受到康熙的申斥，责其“系辛者库⑫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觅人谋杀二阿哥（指废太子胤礽）”，“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朕恐日后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者”，“特谕尔等众阿哥，俱当念朕慈恩，遵朕之旨”。“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伊之党羽亦皆如此。二阿哥悖逆，屡失人心，胤禩则屡结人心，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⑬

康熙五十四年（1715）被禁锢在咸安宫的胤礽得悉策妄阿喇布坦在西陲构兵，用矾水写信托御医贺孟頫带给公普奇，嘱普奇在皇帝面前保举废太子为西征大将军。事发贺孟頫被处死，普奇亦遭拘禁。

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翰林院检讨朱天保等奏请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其疏言“皇太子虽以疾废⑭，然其过失良由习

于骄抗，左右小人诱导之故。若遣硕儒名臣如赵申乔等羽翼之，将左右佞幸尽皆罢斥，则其潜德日彰"，"储位重大，未可移置如棋，恐有藩臣傍为觊觎，则天家骨肉之祸有不可胜言者"⑮。朱天保因此被处死，其父朱都纳以及朱都纳之婿常赉等皆受到株连。

康熙在第二次废太子后，身体每况愈下，"心神恍忽，身体虚惫"，"怔忡健忘"，"神不守舍，心失怡养，目不辨远近，耳不分是非"，"每一举发，愈觉迷晕"，"动转非人扶掖步履难行"⑯，及至右手麻痹"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⑰。即使身体如此，康熙仍坚持"天下大权当统于一"，"天无二日，民无二王"⑱，仍绝口不提立储。

康熙五十七年一月，大学士、九卿为立储事联名具奏，请尽快立皇太子，"即可命皇太子在皇上左右，禀承皇上指示，赞襄办理，候圣躬大安，再亲几务"。康熙却以"前胤礽为皇太子时，一切礼仪皆索额图所定，服用仪仗等物逾越礼制，竟与朕相等，致二阿哥心性改移，行事悖乱"，"今于未立皇太子之前，当预将礼仪议定"⑲。该月二十九日，大学士、九卿将皇太子仪仗冠服、一切应用之物及礼仪定议具奏，并得到康熙的批准，该年三月，当九卿等再次吁请立皇太子时，康熙又以皇太后之丧未满百日、举国服丧为辞，加以推脱。

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御史陶彝等十二人联名疏请"早定储位"。康熙怀疑系大学士王掞幕后指使，怒责王掞"欲放二阿哥出，伊等借此邀荣"，"二阿哥两次册立为皇太子，教训数十年不能成就，朕为宗社及朕身计，故严行禁锢"。且斥责"王掞以伊祖王锡爵请明神宗立泰昌（即明光宗）为太子，泰昌在位未及两月而亡，致天启即位（即明熹宗），魏忠贤擅

权，天下大乱，而明遂亡”。“王锡爵已灭明朝，王掞以朕为神宗，意欲动摇清朝”⑳。陶彝等十二位御史及王掞之子王奕清均发往西陲军台效力㉑。终康熙之朝，再无一人敢提及立储之事。

秘密立储。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病逝于畅春园。康熙第四子胤禛在步军统领隆科多（佟国维之子）的支持下登上皇帝的宝座，改元雍正。长达十年储位悬空，诱发康熙诸子——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禟、第十四子胤禵对储空的觊觎㉒，因而雍正即位以后就被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所困扰，雍正帝对胤禩、胤禟、胤禵的幽禁为雍正初政蒙上了骨肉相残的阴云。

雍正元年（1723）八月十七日，雍正帝定秘密立储之制，把所选定的皇储——第四子弘历的名子亲笔写好放在密封的锦匣之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章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㉓。秘密立储既避免公开立储所造成的储权对皇权的威胁，又避免不立太子所造成的储位之争及骨肉相残。从雍正创立秘密立储，直到咸丰即位之前，清廷在皇位继承上均沿用此制㉔。

注　释

①清王朝在开创之初并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皇太极及其子福临都是在诸王贝勒的推举下即位。

②索额图系胤礽之母——皇后赫舍里氏的叔父。康熙四十二年，康熙以索额图“议论国事，结党妄行”将其幽禁，旋即处死。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

④《清史稿·理密亲王允礽传》。

⑤《清圣祖实录》卷一四七。

⑥礼部所定仪注"太子拜褥置槛内，上谕尚书沙穆哈移设槛外，沙穆哈请旨记档，上命夺沙穆哈官"。

⑦据张明德言"有飞贼十六人，已招致二人在此"，又言"皇太子行事凶恶已极，彼有好汉，可谋行刺"（《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

⑧竭力为胤禩谋求皇储地位的有：康熙的舅父佟国维、内大臣马齐、阿灵阿以及工部尚书王鸿绪等。

⑨《清圣祖实录》二五一。

⑩《清圣祖实录》二五〇。

⑪到清代，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后妃预政、太监专权、相权的膨胀俱已解决。

⑫辛者库，满语，指犯罪籍没入官的处所。

⑬《清圣祖实录》。

⑭康熙在废太子时，为推脱预教储贰不当之责，称胤礽有"狂疾"。

⑮《啸亭杂录》卷四。

⑯《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⑰《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五。

⑱⑲《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

⑳《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三。

㉑王掞年逾七旬，故以其子代往。

㉒胤禟对人说："外面的人都说我和八爷、十四爷三个人里头有一个立皇太子。"

㉓《清世宗实录》卷一〇。

㉔咸丰只有一子，同治死后无子，光绪死后亦无子。故从咸丰后未再实行秘密立储。

清（前期）

解决人口问题

自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人口呈递增趋势，人口膨胀所造成的耕地、粮食供应等方面问题，都尖锐地摆到清朝统治者的面前。

人口爆炸的危机。

清入关后的第一次人丁统计数字是一千四百万（顺治八年），十年之后的统计数字是一千八百万，康熙五十一年（1712）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时，登记在册的人丁是二千四百六十万，上述统计数字，只是交纳钱粮的丁口数字，既非全部人丁数①，更非全部人口数。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地丁合一后，每五年进行一次的人丁编审已无意义。面对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压力，清朝统治者迫切需要掌握人口的实际数量，以便调剂粮食、储备赈荒。乾隆六年（1741）所进行的第一次人口统计（包括“大小男妇”）数字是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突破了以往任何官方统计数字。乾隆八年（1743）的统计数字是一亿六千四百四十五万。此后人口一直以接近百分之十三的增长率递增，到乾隆三十年（1765）人口突破二

亿②，至乾隆六十年（1795）已接近三亿③，人口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面对“每岁户口孳息”“民间谷价，有增无减”，清统治者“焦劳宵旰”。在粮价上涨的背后则是地价上涨、“诸物贵”以及地少人多而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奖励垦荒。

乾隆五年（1740），下达鼓励开垦边角畸零地亩的谕令，其谕曰：“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向闻边省山多田少之区，其山头地角，闲土尚多，或宜禾稼，或宜杂植”，“嗣后悉听该地民夷垦种，免其升科，并严禁豪强首告争夺，俾民有鼓舞之心，而野无荒芜之壤”④。

为保证“免其升科”的执行，经户部议复、乾隆批准，颁布征钱粮的标准：

直隶省（今河北省）二亩以下不成丘段的土地；山东，中等地一亩以下、下等地二亩以下及山头、滨河的零星地；河南，一亩以下的上等地、五亩以下的中等地；山西，十亩以下的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北旱田二亩以下，水田一亩以下；江苏，荒山硗瘠地及不成丘段田埂、沟畔地；安徽，一亩以下的水田及二亩以下的旱田；福建，一亩以下的零散地；浙江，不成丘段的瘠薄地；湖南，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两亩以下；四川，上等地五分以下，中等地一亩以下；陕西，山头荒地、地角不成丘段地；甘肃，山头地角荒地；广东，山梁瘠薄地；云南，硗薄地；贵州，山头地角奇零地；广西，水田一亩以下，旱田三亩以下。

边疆垦荒。

辽阔的边疆地区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栖身之所。尽管自

清初以来历代统治者对满族发祥地东北实行封禁之策，禁止汉人移居东北实际是禁而不止，山东、河北失去生计的农民或从海上或从陆上闯入关东（东北在山海关之东）。至乾隆时期，清廷迫于人口压力，进一步放松关禁，乾隆为此发布上谕："盛京（指辽宁）可耕之土甚多，畿辅山左，无业穷氓，挈侣至者，咸耕艺安居，久之悉成土著，日积日多。虽于本地淳朴古风有碍，然太平日久，户口繁孳，藉此以养无数穷黎，故向有禁之之例，而未曾严饬也"⑤。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再次重申："山海关、盛京等处，虽旗民杂处，而地广土肥，贫民携眷出口者，自可藉资口食，即人数较多，断不致滋生事端。"⑥至嘉庆十七年（1812）据官方统计数字，辽宁、吉林、黑龙江的耕地达二千二百九十万亩，较之清初增加二千万亩。

蒙古地区也有汉民大量涌入，"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⑦。蒙古王公"或招募民人为伊开垦，或雇觅佣工"；清政府将官有牧厂余地招民垦种，"每五顷为一分，各量资本，或一户认种一分，或数人合种一分"⑧，进一步刺激汉民到口外谋生。"或行商，或力田，致数十万人之多"⑨。至乾隆中叶，汉民增到五十万以上，到道光初年增到八十八万，内蒙成为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收复台湾之后，闽、广一带人民渡海私入台湾谋生者日多，乾隆九年（1744），清廷作出凡去台湾者一律编入保甲、凡在台湾有田产者可把在内地的祖父母、父母、子孙接去抚养。"漳、泉、粤之民趋之若鹜"，各地出现汉庄，"各庄佃丁山客，十居八九"，"呼类引朋，连千累百"⑩。

自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凡土司之新辟者，省民

挛挈孥入居，垦山为垄，列植相望”⑪。“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⑫，“携眷依山傍寨，开挖荒土”⑬，“报垦几无隙地”⑭。打箭炉，“为汉夷杂处，入藏必经之路，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千金，俗以小成都名之”⑮。大小金川平定后，该地有十三万亩土地招汉民垦种。

乾隆年间开拓天山南北之后，在清政府的鼓励下汉民去伊犁、乌鲁木齐、哈密一带屯垦者日多，按照规定“呈垦者每户给地三十亩，并给予农具、籽种、马匹，六年升科，如力能多垦者，取结给照，永为己业”。“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望，巷陌间牛马成群，皮、角、毡、褐之所出，商贾辐辏。至于绍兴之酒、昆腔之戏，莫不坌（bēn 奔，聚集）至”⑯。“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衢宽敞，人民杂辏”⑰。

内地居民向边疆地区的流动，不仅基本上解决了人口剧增所造成的土地压力，缓解了因土地兼并自耕农沦为流民所造成的危机，也加速边疆地区经济的发展，密切边疆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推广高产作物。

为解决近三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玉米、白薯这两种产于美洲的高产作物在乾隆时代得到推广⑱。

白薯生命力强，耐干旱，耐水涝，盐碱地也能存活，抗虫、抗灾，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⑲。乾隆初年，白薯从闽广传至北方，福建人陈世元去山东，见该地因旱歉收，遂“捐资运种及应用犁、锄、铁耙等器”，到山东胶州传播栽种技术，“秋间发掘，子母钩连，如拳如臂，乃各骇异，咸乐受种”⑳。未

几，陈世元之子陈云又把薯种运至河南朱仙镇及北京一带栽种。直隶无极县令黄可润从原籍福建带来薯种在当地试种，“结薯甚多”㉑。

山东布政使李渭，总结在北方栽种白薯的经验，撰写《种植红薯法则二十条》（乾隆十七年）；山东按察使陆耀刊印《甘薯录》详细介绍种值方法。乾隆在看到陆耀写的《甘薯录》后，令直隶总督刘峨、河南巡抚毕沅把此书广为传播，令彼等“当即转饬各属，劝谕民人，广为栽种，接济民食，亦属备荒之一法”㉒。在清政府的大力推广下，白薯在山东、直隶、河南、陕西等省得到广泛种植，“颇著成效”，“俾佐粒食”㉓。

适宜在山地种植的玉米，在鼓励开垦山头角地的谕令推动下，在大江南北得到广泛种植。四川、陕西、湖北、湖南、广西、安徽以及华北等地“蜒山漫谷，皆种玉米”㉔，“土人称为六谷”，“舂煮为粮，无异米谷”，“特此为终岁之粮”。迨至乾隆中叶以后，玉米、白薯成为主要食品，”穷山深谷，“全赖包谷、薯芋、杂粮为生”㉕。

输入洋米。

为解决人口剧增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平抑粮价（自康熙以来粮价居高不下），清政府鼓励从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进口大米。乾隆七年（1742），福建、广东商船在返回时带回大米六万六千余石。为了鼓励外洋货船贩米入境，乾隆特下谕令：“自乾隆八年为始，嗣后凡遇外洋货船来闽、粤等省贸易，带米一万石以上者，著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五，带米五千石以上者，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三。其米听照市价，公平发粜。若民间米多，不需粜买，即著官为收买，以补常社等仓，或散给沿海各标营兵粮之用，俾外洋商人得沾实惠，不致有粜

卖之艰。”㉕同时亦鼓励去暹罗打造船只的中国商人返回时购米装船，一举两得。乾隆在上谕中明示：“暹罗产米甚多，向例原准贸易，向来获利甚微，兴贩者少。今商人等探听暹罗木料甚贱，易于造船，自乾隆九年以来，买米造船运回者，源源接济。”㉖从乾隆十六年（1751）起，准许商人自备资本，购米入境，并规定“数在二千石以内者，循例由督抚分别奖励；如运米二千石以上者，按数分别生监、民人，奏请赏给顶带”㉗。在清政府的鼓励下，东南亚的大米源源输入闽、广。

尽管清王朝遇到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但由于边疆地区的开拓为剧增的人口提供新的谋生地区，不仅解决人口压力所酿发的危机，也使得清王朝避免土地兼并所造成的流民问题的冲击㉘。而高产作物的推广及对洋米入口的提倡，则使得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承受住人口膨胀的压力。

注 释

①地方豪张为减少赋役，串通胥吏，匿报人丁，“一户或有五、六丁，止一人交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止二、三人交纳钱粮”。

②乾隆三十年的统计数字：二亿零六百九十九万三千有余。

③乾隆六十年的统计数字：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有余。

④《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

⑤《御制诗四集》卷五十四，《盛京土产杂咏十二首》诗注。

⑥《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一七。

⑦《清高宗实录》卷六一二。

⑧《清高宗实录》卷七八五。

⑨《东华录》卷二O。

⑩连横：《台湾通史》。

⑪《乾隆芷江县志》卷五。

⑫《道光广南府志》。

⑬《道光普洱府志》。

⑭李心衡：《金川琐记》。

⑮徐珂：《清稗类钞》，第十七册。

⑯赵翼：《皇清武功纪盛》，卷二。

⑰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⑱白薯、玉米在明末传入中国。

⑲⑳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㉑黄可润：《畿辅见闻录》。

㉒《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三五。

㉓钟桐山：《武昌县志》。

㉔马步蟾：《道光徽州府志》。

㉕《陶文毅公全集》卷九。

㉖《上谕档》557（三），第133页。

㉗《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五。

㉘土地兼并所造成的流民问题，是自汉暨明一个个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

清（前期）

矿禁之争

清王朝在建立之初，鉴于明万历年间矿监四出扰民的历史教训①，除开采滇铜制钱以及在京西采煤供应京师使用外，严禁采矿。对于臣下建言开矿者，严旨切责，交部察议；对于私自开矿的旗人、民人，或解部枷责，或发边外充军。这样一种矿禁政策，持续了近百年。直到乾隆初年才有所改变。

吁请开矿。

乾隆二年（1737）三月，两江总督庆复（治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奏请在内地开矿，以剔除进口洋铜之弊。在此两年之前（雍正十二年），两广总督（治广东、广西）鄂弥达即提出在广东惠州、潮州、韶州、肇庆等地开矿，因阻挠者甚众未得实行。此次庆复奏请在两广开矿，以开采之铜用于铸钱。

乾隆三年（1738）二月，两广总督鄂弥达，请朝廷批准庆复之议，力陈开矿之事，只要经理得人，不难杜绝弊端，且再次强调广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开矿便于穷民谋生。此时乾隆帝尚未摆脱传统矿禁政策的禁锢，在广东巡抚王謩所奏矿徒滋事的奏折上批道："粤东现今又有开矿之议，此风断不

可长。”②否决了庆复、鄂弥达在两广开矿之议。

乾隆对传统矿禁的否定。

乾隆即位以后比他的父亲雍正、祖父康熙受到更为严重的人口压力，清政府要为那些无地可耕的人开辟新的谋生之路，开矿就是解决生计的一条重要途径。

乾隆所受到的另一个压力便是矿禁所造成的钱价上涨。自秦汉以来铜钱（亦称制钱）与白银就是通行的货币。朝廷发放的俸禄是白银，民间贸易通行的是铜钱，白银持有者必须将白银兑换成铜钱，才能购买到所需的物品。清初白银一两兑换铜钱一千文，到乾隆初年只能兑换八百文。尽管乾隆谕令钱铺不得囤积铜钱，仍不能改变钱价上涨的问题。

乾隆三年七月十一日，在两广总督鄂弥达参劾提督张天骏以安靖海疆、阻挠开矿的疏奏上，乾隆批道：“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

乾隆四年（1739）初，乾隆批准云南总督庆复所提出的自东川经昭通抵四川永宁开辟滇铜运道的建议。

同年二月，批准湖南巡抚张渠拟开铜矿的奏请（楚省钱价昂贵）。乾隆在批示中，嘱张渠“将此事悉告之后任（张渠任满，即将离任），令其极力料理，以期有资鼓铸”。又批准直隶提督永常所提出的在古北口外三道沟及热河八沟等处开挖煤窑的建议，乾隆在给工部的批示中，令彼等无须考虑对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有无妨碍。在乾隆的支持下，三道沟、八沟煤矿得到挖掘。

同年六月，新任两广总督马尔泰以河源县铜矿接近银山，英德县银矿出银过多，恐谋利滋事，请朝廷下令封闭。乾隆在

马尔泰的疏奏中批道："银亦系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

乾隆五年（1740）四月，清廷批准开采贵州绥阳县所属月亮岩铅矿。

矿禁之争。

乾隆八年（1743）七月，某御史③疏请：各省矿厂除金、银之外，允许民间开采，官给执照，所采铜由国家照市价收购。此议遭到大学士张廷玉等人的反对，张廷玉等人认为各省可采之山厂，如开采无效，即应封闭，不得听民滥行开采，以致滋事。

乾隆九年（1744）五月，藁城知县高㣧请自备工本，开采山东峄县、滕县、费县、临沂、泰安、平阴等地的银、铜、铅矿，因直隶总督高斌极力反对④，乾隆收回批准执行的谕令。

同年六月，御史卫廷璞对广东民间开矿提出非议，未几御史欧堪善力主停止广东的民间开矿，其理由如下：广东土著殷实之家甚少，流寓广东从事洋行、盐行的数十家中，财力雄厚的不过几家，本省不具备开采的经济实力；广东环山临海，黎瑶杂居，一经开矿，如若亏本，矿厂倒闭，矿丁难以遣返，若勾引瑶黎，恐难以防范；广东现有山场二百余处，聚集矿丁十万余，必导致米价腾贵。

乾隆命军机处将卫廷璞、欧堪善之折廷寄广东总督马尔泰、巡抚策楞，令彼等对奏折中所提出的问题"悉心定议，务期妥协无弊"。新任两广总督那苏图坚持在广东进行招商开采，并对卫廷璞、欧堪善之折予以驳斥，指出：开矿不仅可以解决钱价上涨；亦可为贫民提供谋生之路；矿工口粮可从进口洋米中得到补充；至于治安，只要弹压得方，不会有滋事之忧。根

据那苏图的建议，民间开采先自广州、肇庆二府做起。那苏图之议终获批准。

户部对招商开采规定如下：每县招一总商承允开采；若一县有矿山数十处，每山许招一商，抽课照二八例，全部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交给官府作为税收，余百分之八十，再抽出一半卖给官府，矿主所支配的只有百分之四十（如开采的系铜则须把百分之八十都卖给官府）。

·采矿的发展。

在摆脱传统的矿禁政策的禁锢后，清代矿业得到迅速发展，从乾隆十年至乾隆三十九年经皇帝批准开采的大矿就有四十多个。四川、云南、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陕西、山东、山西、直隶、蒙古、新疆、东北等地均有矿厂。

为了鼓励滇铜的开采及冶炼，乾隆采纳云南巡抚诺穆奏的建议，凡新开矿厂，“每年产铜二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三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两次，四十万斤以上者纪录三次，五十万斤以上者加升一级，八十万斤以上者奏请升用”⑤。雍正时期，滇铜年产四百万斤，至乾隆中叶增至一千三百万斤以上。

矿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仅在云南从事采矿、炼铜的工人达十万之多。其中汤丹、大禄矿厂各自拥有矿工就有二三万。

为了加强对矿工的控制，从乾隆十年起，“照保甲法，各设窑头，并遴员稽查弹压”，乾隆三十一年（1766），采纳云贵总督杨应琚的建议，将各矿厂的采掘范围限定在矿厂周围四十里之内。

注 释

①明代矿监之祸因聚敛而起，矿监收税根本不管该地是否有矿以及该矿是否开采。

②《清代的矿业》上册，第36—37页。

③《清代的矿业》一书收录此议，该御史姓名却已失载。

④高斌在给乾隆的密奏中，力陈：向来开矿俱在滇粤边省，泰安地近孔林，实属不宜，又言去冬彗星所指，佥称在齐鲁，今开矿适当其地，无利而有害。

⑤白新良：《乾隆传》，第150—151页。

清（前期）

治水始末

在清代屡屡酿成水患的有黄河、永定河、长江及浙江海塘。从顺治年间至乾隆年间，清政府拨巨帑对上述水患进行治理。

治理黄河。

清代治河，必兼治淮、治运。

淮河在历史上很少为患，自从南宋绍熙年间（十三世纪九十年代）黄河在阳武决口，即奔腾而南，汇入淮河，从淮河入海①。黄河入淮既造成水流量剧增、水位迅长，也造成大量泥沙淤积河床，河水倒灌洪泽湖，暴涨的洪泽湖水时刻威胁着扬州、泰州、淮安、高邮等富庶之地。

自元代开凿南北大运河以后，从清口以上漕船在黄河中行一百八十里后再入运河，漕运畅通与否又直接关系京师粮食的供应。

清初黄河屡屡决口同明末战乱有直接关系。在李自成围困开封时，明守军决朱家寨口淹义军，李自成亦遣人决马家口淹开封，两口并决，泛滥成灾。顺治元年七月，清廷任命杨方兴

为河道总督。杨方兴勤于职守，深入治河工地，指挥堵塞决口。继杨方兴出任河道总督的是朱之锡（顺治十五年上任），朱之锡上任不久河决山阳，朱之锡随即率河工堵塞决口，“疏浚堤渠”，“驰驱南北”，“及至积劳撄疾”，死于任。

康熙十六年（1677），黄、淮泛滥，从砀山至海口，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洪泽湖上的高堰大坝，决口三四十处，翟家坝被冲成四段，山阴、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等州县已被洪水淹没。沟口运河因河水四溢，反淤为陆地。

康熙任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在视察灾区后提出：“沟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二水无所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水之流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水派分无刷河之力”；“黄河南岸，不筑堤防，则高堰危险，北岸不加防闲，则山东必受冲击，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而无缓急。”②并提出利用疏浚河道的淤泥在两岸筑堤，修浚连接洪泽湖与黄河之间的运河，加固洪泽湖东岸高堰一带堤防，修复周桥闸至翟家坝被冲毁的堤岸，加深淮阴清口至高邮清水潭段运河等具体建议。

康熙十七年，靳辅的治河方案付诸实施，在十年的时间内高堰、王家冈、武家墩等处决口得到堵塞；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得到疏浚，且筑堤一万八千丈；在清水潭以西筑堤九百二十丈，以东筑堤六百余丈；在徐州、宿迁筑减水坝十三座，建毛家铺减水闸、王家山减水闸、大谷山减水闸，又在归仁堤、拦马河、清口建石闸。靳辅还组织挖掘一段运河，自骆马湖凿渠，经宿迁、桃源，至清河仲家庄山口，名曰中河，全长三百里，使得漕船不必再经黄河入运河。

在疏浚下游的过程中，因“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转高，浚

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为患”③，靳辅受到郭琇等人的弹劾，并因此被夺官。此后康熙在第二次南巡（康熙二十八年）、第三次南巡（康熙三十八年）、第四次南巡（康熙四十二年）途中，巡视高堰、洪泽湖、徐家湾、翟家坝等治河工地，实地考察，仍未能找出疏浚下游、使河水尽快入海的有效办法。

康熙年间的治河，虽未从根本上解决黄水水患，但在一定时间内还是减轻了水患的程度。乾隆即位后，黄水为患又日趋严重：乾隆七年（1742）黄河在丰县石林、黄村决口，“民田俱被淹没”；乾隆十八年（1753）黄河在铜山张家马路一带决口，江苏、安徽数十州县“数百里内，皆成巨浸”；乾隆三十九年（1774），黄河又在老坝口决口，板闸、淮安俱被淹；自乾隆四十三年以后更是连年决口，甚至一年数决。大规模治河再次提到清朝统治者的议事日程。

由于黄河屡屡决口，堵塞决口已成为经常性的事务，从乾隆四十三年（1778）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仅仅封决口就堵筑五次，耗帑五百六十万两。青龙冈决口，屡堵屡塌，只得另开引河一百七十里，导水下流，此次工程耗帑九百万两。

在砀山县毛城铺建减水坝，开凿引河，使一部分黄水流入睢水，经安徽宿州、泗川、流入洪泽湖，此段引河全长六百里。黄水分流减轻徐州段河道的压力（徐州段河道狭窄多弯），黄水在分流后在洪泽湖内可得到沉淀，再从清口流出汇入黄河。

屡次修筑、加固高堰，自武家墩至蒋坝的一万七千余丈全部改建为石堤。为了控制洪泽湖的水量，乾隆在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二十七年）“阅清口”，提出“大扩清口”，“于五坝设立木志，如增长一尺（指水位增长），即将清口之坝拆开十丈，

递长递拓，永成定式”④。自行此法，“十余年来，高、宝遂无水患”⑤。为防止黄水倒灌清口、淤塞清口，乾隆坚持开凿陶庄引河⑥。陶庄引河全长一千六十丈，宽三丈，深一丈余，“永免倒灌之患”，“为一劳永逸之计”⑦。

为解决黄河下游河道被泥沙堵塞，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疏浚河道。其中河南省疏浚干河四条——贾鲁河、惠济河、涡河、巴沟河，又疏浚支河三十四条。该省每州县“所开沟自十数道至一百数十道不等，长自里许至数十里不等，宽深自数尺至丈不等，皆足以资蓄泄”⑧。山东境内疏浚河道亦取得可观成就，鲁西南疏浚河六十余条，胶东疏浚河三十余条，江苏省疏浚石羊沟、董家沟、廖家沟、芒河；安徽省疏浚淝河、茨河、沙河、浍河、睢河。

在治理黄河的过程中，直隶总督孙嘉淦在乾隆十八年(1753)就曾提出引黄河北上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的建议，孙嘉淦认为“大清河东南皆泰山基脚，其道亘古不坏”，不会发生决堤、改道，所经“只东河、济阳、滨州、利津四、五个州县，即有漫堤，不过偏灾”。此后二十八年，河决青龙冈，经赵王河入大清河归海。然而乾隆认为大清河不能容纳黄河全部水量，又恐黄水北流运河受阻、影响漕运，驳回改道入海的建议。直到咸丰五年(1855)河决铜瓦厢，流入大清河，经山东入海，证明孙嘉淦等人建议的合理、可行。

治理永定河。

永定河又名无定河、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河水中所挟带的大量泥沙，淤积在下游的河床上，致使下游经常决堤、改道，正像乾隆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永定原无定，千古冲帝

京"。

康熙时期曾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对永定河进行治理。筑永定大堤，固定下游，并把河水引入三角淀，使河水中的泥沙得到沉淀。至雍正时期，因三角淀积沙过多，河水不能及时排泄入海，河患又日益严重，至乾隆中叶，永定河已"六改道"⑨。

为治理永定河，乾隆多次视察永定河，他认为"永定河之所以为患，独以上游曾无分泄，下口不得畅流，经行一路，中梗磅礴"⑩，提出在其上游蓄洪拦沙，中游疏浚分流，下游改移下口的综合治理方案。

乾隆初年，采纳治河名臣高斌的建议，在永定河上游的宣化黑龙湾、怀来和合堡等地修拦洪滞沙大坝，"就近取石，堆叠玲珑水坝，以勒其凶暴之势"，"层层拦顿，以杀其势"。

对中游的治理，则采纳鄂尔泰、方观承等人的建议，修建金门闸减水坝，改建其他草坝、土坝，疏浚河道，分流减水。

在对下游的治理上，意见最为纷纭：顾琮主张筑堤、散流、匀沙；鄂尔泰主张建闸坝、开引河；孙嘉淦主张引河南行，复其故道；方观承则主张改移下口，另寻沉积水中泥沙的处所。直至乾隆二十年（1765）乾隆才作出大规模改道的决策。当河水流经永清县贺尧营后，折向东流，挖引河二十里，把永定河引入凤河，再流入沙家淀，沙家淀方圆百余里，永定河水中的泥沙在淀中沉淀后流出，使得下游不致很快被淤塞。

治理长江。

在历史上，长江很少为患，迨至乾隆中叶由于人口的剧增，对上游森林的砍伐，使得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中游又由于围湖、沿堤造田，水道日益狭窄，致使长江自乾隆四十四年之

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三次决堤，其中尤以乾隆五十三年（1788）最为严重，决堤的江水冲入洪州城，衙门、兵营、民房、仓库俱被淹没，城内积水近二丈。此次决堤酿成湖北三十六个州县被淹，“死者以数十万计”⑪。酿成此次水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富户勾结官府在江中沙洲上种植芦苇，芦苇环洲而生，芦根固沙，使沙洲面积愈积愈大，侵占江道，阻塞江流。

乾隆在得悉长江三次决口的原因后，谕令地方官对沿湖、沿江围田者进行清查，以保证江水的畅流无阻，不得“狃于目前之利”，“与水争利”。并要求地方官员“间一二年，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⑫。

疏浚各省河道。

清统治者对疏浚河道非常重视，各省水利工程纷纷修建：

乾隆三年（1738），贵州总督张广泗开凿自都匀达常德、自独山至广西怀远的水道；

乾隆四年（1739），发帑修巢湖一带堤堰及六安、滁、泗一带溪壑；

乾隆六年（1741），在河南中牟开凿一条六丈五尺长的新河，以分贾鲁河水势；

乾隆九年（1744），在冀中开挖河道；

乾隆十一年（1746），疏浚直隶庆云、盐山一带的河道；

乾隆十四年（1749），利用万泉庄、云泉山水系，疏浚通惠河；

乾隆十八年（1753），用木槽引南山之水，灌溉巴里坤一带屯田地亩；

乾隆二十四年（1755），加固都江堰及大渡河、金沙江堤

坝；

乾隆二十八年（1759），疏浚吴淞江、东江娄江，清理河身，铲除河中所植芦苇；

乾隆三十一年（1762），筑子牙河堤；

乾隆三十三年（1764），筑正定新堤；

乾隆三十五年（1766），疏浚常熟白茆塘、徐六泾河；

乾隆三十六年（1767），在北运河筑减水坝，解除天津水患；

乾隆四十年（1771），在武昌筑濒江石岸；

乾隆四十一年（1772），修陕西四十七州县渠堰；

乾隆四十五年（1776），在长沙筑新堤以防止湘江泛滥；

乾隆四十七年（1778），治理云南弥苴河、龙川江、清水河、浑水河；

乾隆五十年（1781），在宁夏疏浚汉延、唐来、大清、惠农四渠；

乾隆五十三年（1784）浚漳水、卫水；

乾隆五十九年（1790）建沙市大坝。

治理浙江海塘。

为防海潮浸灌，江、浙沿海筑有五百里的堤塘，亦称之海塘。钱塘江出口处系海塘工程的重点。在钱塘江出口处原有供海潮出入的南大亹（靠近上虞）、北大亹（靠近海宁）以及在南北两大亹之间的中、小亹（mén门，山峡中两岸对峙如门）。康雍时期南大亹因沙滩淤涨被堵塞，乾隆初年中、小亹相继被堵。自乾隆二十年（1755）以后，潮水出入全靠北大亹，海宁一带塘堤被冲，“海塘之内，皆属寸土寸金之地，一有冲决，民命攸关。且卤水一入，数年之内，必致颗粒无收”⑬。

乾隆下令加固海宁一带海塘，从浦儿兜至尖山头鱼鳞，筑石塘六千丈。乾隆二十七年（1762）第三次南巡时，乾隆亲至海宁视察，因该地沙土浮活，决定修缮柴塘。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六次南巡时，乾隆拨款五百万两，“著将柴塘上土之后，顺坡斜做，并于其上种柳，俾根株盘结”。

海塘工程，历时久，耗资大，石料来自绍兴、武康及太湖的洞庭山，柴料来自富阳、建德，木材来自钱塘江上游及长江上游。

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清代，上述治水工程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水患，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水患造成的危害。

注 释

①咸丰初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再次改道，从河南考城折向东北，形成现在的黄河下游河道。

②引自《清代通史》卷上，第788页。

③转引自孟森：《清史讲义》，第426页。

④⑤《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九。

⑥陶庄引河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即动工，康、雍年间五次开工，屡挑屡淤，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历七十八年，始获成功。

⑦《御制陶庄河神庙碑记》。

⑧《清史列传·胡宝瑔传》。

⑨《清史稿·河渠志》

⑩《续行水金鉴》，《永定河篇》。

⑪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一。

⑫《清高宗实录》卷三四九。

⑬《清高宗实录》卷四一。

普免钱粮、漕粮

蠲免灾赋①、欠赋②是清朝统治者用以缓和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康熙统治时期又在此基础上实施普免钱粮，这一作法在乾隆时期进一步得到推广。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康熙四十九年（1710）十月，康熙以明年为皇太后七十寿辰、即皇帝位五十周年，决定普免康熙五十年的全国钱粮。为此颁谕户部："方朕八龄践祚之初，太皇太后（康熙祖母）问朕何欲，朕对'臣无他欲，惟愿天下治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迄今五十年矣，惓惓此心，未尝一日少释。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蠲免钱粮）为急，数十年以来，除水旱灾伤例应豁免外，其直省钱粮次第通蠲一年，屡经举行。更有一年蠲及数省，一省连蠲数年者。前后蠲除之数，据户部奏称，共计已逾万万，朕一无所顾惜。百姓足，君孰与不足。"鉴于"承平既久，户口日蕃，地不加增，产不加益，食用不给，理有必然。朕洞瞩此隐，时深轸念。""明年为康熙五十年，再沛大恩，""将天下钱粮一概蠲免。"③

具体作法如下，“自明年始，于三年以内通免一周”。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钱粮，除漕粮④外，于康熙五十年（1711）全免地丁钱粮八百三十七万七千一百两，“并免历年旧欠共一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两有奇”。其余省份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或康熙五十二年（1713）蠲免应交纳的钱粮。

普免钱粮的作法在中国封建社会系首创。

乾隆五次普免全国钱粮。

乾隆在其实行统治的六十三年⑤，五次普免全国钱粮，第一次系乾隆十一年（1747），第二次系乾隆三十五年（1770），第三次系乾隆四十三年（1778），第四次系乾隆五十五年（1790），第五次系嘉庆元年（1796）。

乾隆十年，清帝为普免钱粮颁谕："朕临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蒸同烝，众、多之意），民依念切，躬行俭约，薄赋轻徭。" "朕思海宇乂安，民气和乐，持盈保泰，莫先于足民。况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 "为是特颁谕旨，将丙寅年（十一年）直省应征钱粮，通行蠲免。" ⑥

当时清廷的库存仅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一十八两⑦，对一个人口已达一亿六千万人口的大国并不丰盈，乾隆七年（1744）的特大水灾用于赈灾的银两就超过一千万，尽管如此，乾隆仍坚持将有数之财散于下的作法，并将阻挠普免钱粮的御史赫泰交部严加议处，降两级调用。

按照规定，乾隆十一年免纳钱粮的省份有直隶、奉天、江苏、陕西、甘肃、福建、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共免白银一千零四十二万两；乾隆十二年免纳钱粮的省份有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广西等省，共免八百六十二万两；乾隆十三

年免交钱粮的省份有山东、湖北、江西、山西等省，共免白银九百一十九万余两。

第二次普免钱粮正值平定大小金川、平定准部、开拓新疆之后，适逢乾隆六旬大寿；乾隆中叶以来社会矛盾日益尖锐⑧，为缓和矛盾遂于乾隆四十三年第三次普免钱粮；乾隆五十五年，系乾隆八旬大寿，因之第四次普免钱粮；嘉庆即位、乾隆退居太上系千古难逢之盛典，故第五次普免天下钱粮。

普免钱粮的作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据记："诏下之日，万方忭舞。"⑨

蠲免漕粮。

在普免全国钱粮的基础上，乾隆三十一年（1765）、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五十九年（1794）三次普免全国漕粮，因此而受惠的省份是承担漕粮的山东、浙江、江苏、安徽、河南、湖南、湖北等省，三次共蠲免漕粮一千二百万石左右。

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三次普免漕粮，总计共免白银一亿四千万两，粮一千二百万石。

免粮不免租。

在蠲免钱粮中收到实惠的是"业户"（有土地的人），"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劳，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⑩。在乾隆十年下达普免钱粮的谕令后，福建上杭就发生要求四六减租的暴动。据福建提督武进升奏报："汀州府上杭县，因蠲免钱粮，乡民欲将所纳业户田租四六均分。有土棍罗日光、罗日照等，聚众械殴业主，及至地方官弁，拨差兵役拘摄，复敢聚众拒捕。"乾隆对此奏作如下批复："朕普免天下钱粮，原期损上益下，与民休息，""至佃户应交业户田租，""岂任佃户自减额数、抗不交租之理。""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

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⑪乾隆始终坚持“其减不与减，应听业主的酌量”，“有田之户，经营业产，纳粮供赋，亦图自赡身家，岂能迫以禁令”。“况佃民多属贫无聊赖，其中贤否不一，丰收之岁，尚不能免凌其业户，抗负租息”⑫，仅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彼刁顽佃户，藉此观望迁延，仍治以抗租之罪”⑬。

蠲免钱粮、漕粮只是缓和清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矛盾，业主与佃户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注 释

①免除受灾地区应纳钱粮。

②各地因天灾人祸拖欠的钱粮。

③《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四。

④漕粮系地丁钱粮之外，对部分省——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江西、湖北、湖南所征收的供应京师官兵的粮食，经运河运至北京。

⑤乾隆在位六十年，退归太上皇后又统治三年。

⑥《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二。

⑦乾隆九年收入银一千三百四十五万九千九百四十一两，支出银一千零六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七两，加上库存旧银二千九百一十二万一千一百零四两，实存三千一百九十万二千五百一十八两。

⑧乾隆中叶以后，由于秘密宗教的传播，社会日趋动荡，乾隆三十九年清水教主王伦在山东聚众为变，漕运一度中断。

⑨龚炜：《巢林笔谈》卷四。

⑩《清高宗实录》卷九。

⑪《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三。

⑫《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六。

⑬《清高宗实录》卷九。

清（前期）

乾隆惩贪与贪风日盛

乾隆元年正月，乾隆帝即位伊始就训谕百官："若视朕之宽而一任属员欺蒙、百弊丛生，激朕将来有不得不严之势，恐非汝大员及天下臣民之福，汝等可明知朕意。"①在整个统治期间，乾隆帝屡屡动用重典，严惩贪官。

惩治贪官

乾隆十八年南河亏空案。清政府专设河道总督管理黄河修浚事务，经办河务的官员长期以来玩忽职守，大肆贪污，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积年亏空已达十八万两。该年九月，黄河在铜山决口，黄河南岸的灵、虹、宿、盱等州县一片汪洋。对于这人为的灾祸，乾隆帝下令将管理该段河务的同知李惇、守备张宾处决，负责南河事务的高斌②则陪绑示法。同时，乾隆帝颁谕旨限其在一年内补齐亏空，若不能完纳仍予以正法。乾隆帝又将乾隆十年以来历任河道的姚廷栋、叶存仁、何烜、李宏等人一并革职，交部从严治罪。

杨灏、恒文、蒋洲贪污亏空案。乾隆二十一年（1756）九月，湖南布政使杨灏贪污案发。杨灏利用放银买补常平仓谷备

荒之便，贪污白银三千余两，被处以斩监候。次年秋审时，湖南巡抚蒋炳以杨灏限内完赃为由拟将其缓决。乾隆帝怒不可遏，一面将杨灏处死，一面又以蒋炳窃权包庇而将其革职治罪，查抄家产。与此有关的三法司、九卿、科道许多官员都分别受到惩处。

云贵总督恒文利用巡阅各地营伍之机，授意家人赵二勒索州县属员十五人财礼并以进贡为名压价勒买民间黄金。乾隆二十二年（1757）六月案发，恒文在一年多任期内，搜刮了数万两黄金、白银。为此，乾隆帝令恒文自尽。十五名地方官员未能举发其事，也分别交部议处，各降一级。

山西布政使蒋洲是雍正间大学士蒋廷锡之子，任内亏空库银两万余两，乾隆二十二年七月擢升山东巡抚离任之时，又勒派通省属官交银以补亏空。乾隆帝在澄清事实后，决定将蒋洲处死。因收受蒋洲贿赂的山西巡抚明德等官员也分别给予革职、降级的处分。

两淮盐引案。从乾隆十一年（1745）起，主持盐务的官员私自规定每张盐引加征税银三两，勒令盐商缴纳。乾隆三十三年（1768）六月，尤拔世任两淮盐政，因向盐商勒索而不得，遂将此事揭发。乾隆帝极为震惊，他粗略估算，两淮盐政等私征银当在千万两以上，扣除历次南巡及内廷采办物品花销四百七十六万两，尚有六百数十万两被盐务官员所侵蚀、中饱私囊。乾隆帝著令将前任两淮盐政高恒（乾隆帝孝贤皇贵妃之兄弟，高斌之子）、普福、盐运使卢见曾等概行解职交审，查封其任内资财和原籍家产，后三人皆被正法。前任两江总督尹继善及现任总督高恒之堂兄高晋，均因不据实参奏被严加议处。此案审理过程中，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昀、军机处行走章京王

昶、刑部司员黄骏昌、内阁候补中书徐步云因曾向卢见曾透漏抄家的消息，也分别受到了充军乌鲁木齐或革职的处分。

甘肃捐监冒赈案。陕甘总督勒尔谨与甘省布政使王亶望以及继任布政使王廷赞在推行纳粟捐监活动中，借口连年赈济灾民，大肆侵吞。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四十六年（1781）案发，搜刮白银六、七百万两以上，仅王亶望一人即贪污白银达三百万两。对于这起“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③，乾隆帝极为震怒，将勒尔谨、王亶望处死，子孙谪戍伊犁。此案是全省通同作弊，如依法处置，甘肃道府以上官员将为之一空。鉴于此，乾隆帝只将其中侵贪二万两以上者处死，其余从宽问拟斩监候，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

乾隆四十七（1782）年侵吞抄家物资案。甘省捐监冒赈案后，闽浙总督陈辉祖奉命查抄王亶望家产。陈辉祖趁机从中渔利，但抄家底册未加改动就上报了朝廷。乾隆帝看到底册载有金叶、金条、金锭四千七百四十八两，但内务府实收九两三钱。王亶望曾经进贡，被乾隆帝发还的玉瓶、玉山子也不翼而飞。对于如此敢于跟皇帝争利的臣子，乾隆帝将其革职下狱，后因其它案件，陈辉祖被谕令自尽。

乾隆四十七年国泰、于易简勒索属员侵亏国帑案。国泰在山东巡抚任内与布政使于易简相勾结，一方面贿赂朝中大学士于敏中（于易简之兄）、和珅等寻求政治庇护，一方面利用职权，对属员下官大行勒索，致使全省州县无不亏空，总计二百万两。乾隆帝赐国泰、于易简自尽，家产抄没。

闽省贪污亏空案。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内禅在即，闽省案发。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布政使伊辙布等相互串通，侵蚀库帑，致使全省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又侵吞

盐务经费十五万两。抄没家产时，仅如意一项，伍拉纳家有镶玉如意一百一十二柄。浦霖家有镶玉如意大小一百五十七柄。闽省大案最后定谳时，乾隆帝对伍拉纳、浦霖等十人予以正法外，将伍拉纳等人子嗣概行发往伊犁充当苦差。

乾隆时期，大的侵贪案件还有：乾隆三十二年（1767）湖南巡抚李因培指使属员弥补亏空案；乾隆三十四年（1769）贵州威宁州铅厂亏空案；乾隆三十七年（1772）云南布政使钱度贪污受贿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江西巡抚郝硕勒派属员受贿案；乾隆五十七年（1792）闽浙总督福崧贪污案；等等。

乾隆帝一再重申治乱之要，其本在吏："此等劣员，多留一日，则民多受一日之残，国多受一日之蠹。"④"国家设官分职，均宜洁己奉公，廉隅自励，"贪官"恣饱欲壑，置民瘼不问，此而不办，何以肃吏治而儆百官。"⑤

贪风不止

乾隆帝治理贪污煞费苦心，对侵贪官员大开杀戒，甚至到了穷山尽水的地步。而事实上乾隆一朝贪污案件不胜枚举，刑罚愈严、贪风愈炽，乾隆帝本人也承认："各省督抚中洁己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⑥"察吏非不严，而贪墨未息；锄恶非不力，而纵逸尚闻。"⑦特别是乾隆中后期，贪风蔓延日甚一日，"各省亏空之弊，起于乾隆四十年以后"⑧。吏治败坏已不可收拾。这不仅是乾隆帝，也是整个封建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

乾隆帝严于治人、宽于律己。他劝谕臣子："时时思物力之维艰、事事惟奢靡之是戒。"但实际上每逢年节、寿诞以及南巡、东巡，乾隆帝大开进献之门，甚至明文摊派。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八旬万寿"，庆典经费之筹集主要由官

员、商人和各省民人交纳。所有王公大臣、八旗、各部院官员应缴经费，行令户部在俸禄内扣除；各省督抚等应交之项按其养廉数目，量其多寡，酌量令其扣缴十分之二五。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引案中盐务官员额外增收盐税，主要是为筹办乾隆帝南巡之用。乾隆帝本人贪得无厌，凡官员被籍没之家产，一律归内务府所有，即被装入乾隆帝私囊之中。

乾隆帝惩贪虽严刑峻法，施之重辟，但终不能一视同仁。乾隆四十五年（1780），两广总督李侍尧收受贿银三万余两，甚至向属员变卖珠子贪赃。案发，乾隆帝认为此实从来所未有，九卿拟予斩决。乾隆帝却为李侍尧开脱，称其："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是以简用大学士，数十年来受朕倚用深恩。"⑨在乾隆帝的袒护下，李侍尧被定为斩监候。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因甘肃苏四十三回民起义，乾隆帝免李侍尧罪，令李赴甘肃平定起义，旋任其为陕甘总督。

乾隆帝在其统治中期以后，常有"不为已甚"之念，"因物付物，惟正斯中，以人治人，斯改而止"⑩，"有一线可生之路，无不量为宽贷，以体上天好生之意"⑪。

乾隆四十七年国泰、于易简案发。乾隆帝说："上年甘省一案，甫经严办未惩，而山东又复如此，朕实不忍似甘省之复兴大狱，"⑫因此定国泰、于易简为斩监候，只是后来呈报说各州县亏空库项二百万两之多，才令其自尽，而与此有关的官员，都得以留任，限期弥补亏空而已。同年陈辉祖案结案时，乾隆帝对贪利无耻的"盗臣"定斩监候。在处理闽浙总督富勒浑贪污案时，乾隆帝再次重申："朕实不愿屡兴大狱。"⑬

乾隆五十五年（1790），内阁学士尹壮图上疏揭露罚银代罪（即议罪银）之弊，指出各督抚借罚银为名，派累属员，以

致仓库多有亏缺，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请求永行停止罚银。刚刚度过八旬大寿的乾隆帝闻此大怒，自辩说："五十五年如一日，反躬自问实无失德，"⑭直逼尹图所指督抚亏空者为何人，尹壮图要求密往各省调查亏缺，乾隆帝降旨不予廪给，只给驿马，不允尹壮图微服密访，认为国家无此政体。尹壮图与户部侍郎庆成到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查访，庆成有意游山玩水拖延时日，给查访州县以补充仓廪亏空的机会。结果因查无实据，尹壮图被革职留任，旋以其母老，被逐出北京。

乾隆帝广开宽宥之门，助长了贪风。

和珅的飞黄腾达。

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帝七十寿庆。他以"适百里路半九十"自勉勤政。但此后，乾隆帝精力不逮、政治倦怠。和珅遂登上了政治舞台。

和珅，满洲正红旗人，生员出身，乾隆三十四年（1768）袭轻车都尉世职，授三等侍卫。和珅口齿伶俐，精明敏捷，办事干练，善体乾隆帝之意，遂受乾隆帝赏识重用，四十一年授户部侍郎，旋擢升军机大臣。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御史曹锡宝参劾和珅家人刘全仗势勒索，衣服等逾制，但乾隆帝宠护和珅，断曹锡宝为诬告，曹忧愤而死。两月后即闰七月，和珅升任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兼吏部尚书事务，仍兼步军统领。后和珅累封至一等公，成为权倾朝野之人，这一切都与乾隆帝对其宠遇分不开，早在乾隆四十五年，乾隆帝便将自己最为疼爱的幼女和孝公主指配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珅为了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也积极与皇室联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康熙帝的曾孙贝勒永鋆，将自己的侄女嫁与乾隆帝的孙子

质郡王绵庆。同时，和珅还将自己的亲信党羽安置于各级重要官缺，“内而公卿，外而藩阃，多出其门”⑮。

和珅对乾隆帝极尽奉承之能事，他利用户部尚书，崇文门税务监督等职务盘剥商民，供乾隆帝物质上挥霍奢靡。一方面又亲自主持备办乾隆帝七旬、八旬万寿庆典和千叟宴事宜，极为乾隆帝欣赏。

在乾隆四十五年左右，和珅创建了颇具特色的用以敛财的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制度是借事罚银，多为自议数额，多者数十万两，少数也千余两。乾隆五十八年（1793），两淮盐政全德以溺职被内务府议处革任，乾隆命其自行议赎，结果全德情愿缴银十万两而得以从宽留任，第二年八月，全德又自行议罪，奏明于两淮盐政任内收受商人供应银十九万二千两，情愿加一倍缴出，其缴银三十八万四千两分限五年完交。以银代罪，逃避制裁，这进一步助长了贪风。

乾隆帝信任、倚用和珅，多次派和珅调查贪污大案，事实上，乾隆后期贪污案几乎都与和珅有关联。《清鉴纲目》卷八云：

“时承平既久，帝年已高，习于骄侈，每疏忠直而喜逢迎，中外官吏又习于贪黩，类赂津要以固权位，而和珅遂乘此时机，揽权聚敛，以罔上而贱下。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事之，结为奥援，如国泰、王亶望、陈辉祖、福崧、伍拉纳，浦霖等辈皆以赃款起大狱，赃款之多往往至数千百万，为历代所未有。高宗执法未尝不严，然诛殛愈多，贪风愈炽，或且惕惕恐罹法网，盖图攘夺为行贿自全之地。其敢于行贿者，大率皆恃和珅为护符。”

和珅招权纳贿，大肆聚敛，卖官鬻爵，“擅弄威福，大开

赌门”，其府第“豪华奢丽，拟于皇室，有口皆言，举世侧目”⑯。在专权的二十余年间，和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如《清仁宗实录》载抄没和珅家产时：“家中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家中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十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另据档案记载，仅其在京房屋一项，即有两千三百四十三间之多。曾有人估算和珅家产总值不下白银八亿两，相当于清政府二十多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和珅成为贪污的代名词。

嘉庆四年（1799），乾隆死后，和珅被嘉庆帝治罪，和珅的飞黄腾达正是乾隆后期政治腐败、贪风盛行的产物。

注　释

①《清高宗实录》卷一一。

②高斌之女系乾隆之妃。

③《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四O。

④《清高宗实录》卷三五一。

⑤《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九。

⑥《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八四。

⑦《清高宗实录》卷八八三。

⑧《清史稿·王杰传》。

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O六。

⑩《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六。

⑪《清朝文献通考》卷二O八。

⑫《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〇。

⑬《满汉名臣集》。

⑭《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八。

⑮⑯《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一。

清（前期）

台湾民变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收复台湾后，把台湾隶属为福建省的一个府。台湾府下设四个县①。闽、广沿海居民纷纷偷渡台湾垦荒，推动了台湾经济的发展，但随着垦荒者的增多，不同地区移民在土地占有上的冲突、械斗日多，移民同清廷派往台湾官员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康熙三十五年（1696）吴球聚众反，康熙四十年（1701）刘却揭竿为变，台湾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动荡同步发生。

朱一贵之变。

朱一贵系福建漳州府长泰县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赴台湾，“充台厦道辕役，寻被革，居母顶草地，饲鸭为生”。“有黄殿者，居罗汉门，与朱一贵善”，“往来密洽”②。“辛丑春（康熙六十年系辛丑年），凤山县令缺”，知府王珍“委政次子”。王氏父子“征收粮税苛刻，以风闻捕治盟歃者数十人，违禁入山伐竹木者百余人”。该年三月，“李勇、吴外、郑定瑞等，相率之罗汉门，见一贵曰：‘今地方官长，但知沉湎摴蒲耳，种种不堪，兵民瓦解，欲举大事，此其时乎?’一贵曰：

'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后裔耸乡村，归者必众。'"③四月十九，李勇等五十二人在罗汉门"奉一贵焚表结盟，各结党羽，得数百人"，"夜出冈山，袭劫塘汛"④。杜君美等"在下淡水槟榔林，招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响应朱一贵，"掠台湾府库"。草潭、下埤头、小琉球等地纷纷起事。

五月二十三日，义军在赤山大败前来弹压的清军⑤，清游击周应龙狼狈逃走。清总兵欧阳凯率众一千五百扎营春牛埔，"军中夜惊，镇兵四散"，"人无战心"。"台协水师中营游击张彦贤、右营游击王鼎"等"率兵千人，战船四十余号，联艓扬航"，"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礼、台湾知县吴观域、县丞冯迪、典史王定国、诸罗知县朱夔、典史张青远，皆一时相率登舟"，"齐赴澎湖"⑥，"凡七日全台陷"⑦。

义军在占领台湾后，立朱一贵为中兴王，年号永和，杜君美却"欲立其子杜会三为王，众不服"，杜君美"每事骄蹇"，生活糜烂，"掠妇女七人闭营中"。朱一贵"整兵围攻杜君美，败之"，杜君美率万人"北走尾溪，至猫儿干屯札，剽掠村社，半线上下多被蹂躏，所未至者，惟南嵌以北尔"⑧。

浙闽总督觉罗满保在六月初三"自福州往厦门，办理军务"，"提督施世骠前赴澎湖"，率兵一万二千、水手六千，分乘船六百余艘渡海，六月十三日在鹿耳门登陆，攻克安平镇。康熙特传谕起事诸人："朕思尔等多为内地之民，非同贼寇，或因饥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员刻剥，遂致一二匪类倡诱，众人杀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其实与众何涉，""尔等若即就抚，朕自原谅尔等之罪；倘执迷不悟，则遣大兵围剿，俱成灰烬矣。"⑨

六月二十二日，清军攻克台湾府城，分兵两路进剿。朱一

贵率残部千余人退至诸罗县沟尾庄一带“索饭食，杨旭等椎牛饷之，许号召六庄乡壮相助”，“旭备馆舍，将一贵等分宿民家，传集六庄乡壮，佯为守护，潜以水灌贼炮。夜五鼓，大哗，称官兵至，金鼓火炮齐鸣，诸贼仓皇惊起，不知所措”。杨旭等“遂擒朱一贵”，“散其余众”。“旭缚一贵等，置牛车赴八掌溪，交游击林秀”。乃将朱一贵“槛送厦门”，遂又将其“解京正法”。“北路千余里地方，尽皆平复矣”⑩。

清军登陆后，杜君美逃至深山，“昼伏夜走”，行踪不定，该年十月到清军营中投降，旋即被押解北京，处死。

同年八月，康熙下令将“平日不爱民，但知图利苛索”⑪的台厦道梁文煊、同知王礼、知县吴观域、朱夔等押赴台湾正法，对已故知府王珍剖棺戮尸枭示。

康熙六十年（1721）十月，清廷制定台湾驻军之制：在台设水师营副将一，辖兵二千；设陆营副将一，辖兵二千；总兵驻澎湖，辖兵二千。驻台官兵均从内地派遣，三年一换，所有官兵不得携带妻、子。每年从北京派御史一名，前往台湾巡查。

林爽文之变。

林爽文，福建漳州平和县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随父渡海至台湾，在彰化县大里杙庄“赶车度日”。乾隆四十七年（1782）天地会首领、漳州人严烟渡海，到台湾彰化开布店，传播天地会，在“有事大家相帮，不怕人家欺侮，也不怕官役拘拿”的鼓舞下，林爽文与诸罗的杨光勋、张烈，淡水的林小文以及凤山的庄大田等人相继加入天地会。

乾隆中叶以后，“漳、泉、惠、潮之民日众，寄籍分党，蘖牙其间，守土官又日朘剥之，于是民益轻官”⑫。在朱一贵

之变后，台湾吏治曾得到整顿，但在几十年后，贪黩之风又起，官员“恣意婪赃”，“勒索馈赠”，甚至“放戍兵私回内地贸易，又听任漳、泉兵丁贩私滋事”，致使台湾治安无法维持。据《平定台湾述略》所记：“淡水同知潘凯者方在署，忽报城外有无名尸当验，甫出城，即为人所杀，并胥役歼焉。”台湾官署无法破案，则诿罪于“生番”（土著高山族人），“使人以酒肉诱番出，醉而掩杀之，奏罪人已伏法，而杀人者实脱然事外，于是民益轻视官吏，而番亦衔刺骨”。及至不同籍贯的移民“树帜械斗，动以万计，将士不能弹压，惟以虚声胁和，于是民益轻兵”⑬。

乾隆五十一年（1786）七月，天地会成员杨光勋与弟杨功宽争夺财产发生矛盾，杨功宽因兄加入天地会，有会党为后盾，遂另立“雷公会”，彼此械斗。台湾总兵派人将双方首领查拿，天地会成员聚众救出张烈，逃往林爽文所居住的彰化大里杙。

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彰化知县俞峻、北路营副将赫生额、游击耿世文等统兵前往大里杙，在距大里杙五里的大墩扎营，谕令村民将林爽文等人擒献，并“先焚数小村怵之”。十一月二十七日夜，“爽文遂因民之怨，集众夜攻营”，“赫、耿、俞皆死焉”。翌日，“乘势陷彰化，县守及都司王宗武、同知长庚、前同知刘亨基、典史冯启宗悉为所杀。十二月六日又陷诸罗，县令董户延死之，淡水同知程峻亦为群贼所害”。“凤山县有庄大田者”，“乘乱起，十三日陷县城，县令杨大奎自刎死”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林爽文等已占领彰化、诸罗、凤山三县。

十二月初，闽浙总督常青派水师提督黄仕简、陆军提督任

承恩统兵一万三千赴台，加上台湾额设官兵，二万有余。但黄仕简年事已高“卧病床榻”，任承恩又“素不知兵”，二提督拥兵坐守郡城⑮。直至翌年（乾隆五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台湾总兵才收复诸罗县城。

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浙闽总督常青奉命抵台湾。乾隆传谕常青“将各路官兵调集会合一处”，“断不可又蹈黄仕简、任承恩故辙，轻分兵力，观望迟延，俾贼匪得以四散牵制，蒇（chǎn 产，完成意）事致稽时日也”⑯。常青同黄仕简、任承恩一样“惟知结营自守”，“株守坐待，以致老师縻饷”，其扎营之地距庄大田屯驻的南潭仅五里，抵台数月对此“肘腋”之敌“竟不思乘势攻剿”，“任其逼处”⑰。

清军统帅的畏敌避战，使义军在短短几个月内发展到十余万。为夺回连络南北的诸罗，林爽文“自六月中攻围，连日朝夕不止”，“禁粒米不得入城”，士民“饥疲不能支”⑱。

林爽文所据的的大里杙、水沙连诸处存米甚多，“每石仅需八百”，清军所占据的鹿港“每石三千”，“仓库悉空，府仓谷亦无多”。“彰化县仅存鹿仔港一处尚在固守，各村庄男女老幼咸来避匿，不下十万余人，无处得食”，“至乡勇口粮，向系义民公捐，今为日已久，义民告匮，难令再捐”⑲。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清帝派陕甘总督福康安前往台湾督办军务。此时林爽文、庄大田的部众已近二十万，台湾全府除郡城、诸罗县城及鹿港等少数港口外全被义军占领。该年十月底福康安带五千援军在台湾登陆，十一月初，福康安扬言直捣大里杙，而阴趋诸罗县城，击败围困县城的林爽文部，被围困五个多月的诸罗终于解围，“城中官民”，“饥羸无人色”，“无不欷歔啜泣”⑳。

林爽文在从诸罗撤退后，退居县城北面的小半天山，该地四面陡壁，易守难攻。十一月十八日福康安乘胜督军仰攻，林爽文不支从小半天山退至六斗门。在六斗门的激战中，林爽文再次失利，遂退守大里杙，凭借构筑的土城以枪炮进行抵抗。十一月二十四日，福康安与林爽文秉烛夜战，林爽文再次失利。次日清晨清军分路进剿，林爽文携眷撤至集集埔。集集埔"前临大溪，溪之上就高岸垒石为陡墙，长数里，其所预营扼险处也。十二月五日，官兵腾而上杀千余人，于是贼党皆溃"㉑。

接连遭受重创的林爽文，既未南投庄大田，与庄大田合兵一处，又未撤至高山族居住的深山老林，以图再举，而是"匿其孥于番社，惟与死党数十人窜穹谷丛箐中"。"五十三年正月四日，林爽文潜出觅食"，被擒。

清军在擒获林爽文之后，大举南下，"庄大田仓卒出拒，败而走"。清军接连在大武陇、大目峰、南潭、中洲、大冈山、小冈山、水底寮击败庄大田部。"庄大田力不支"，逃至"负山临海"的郎峤，"与其党潜匿焉"。清军"遣水师由海道绕而截之于水，自此大兵环山围之，贼冲突不得出，阵杀者数千，溺海者数千，擒而戮者亦千余，庄大田亦就获"㉒。

被清廷凌迟处死的除林爽文㉓、庄大田外还有何有志、林领、林永返、陈梅、陈传、蔡福、刘升、陈秀英、谢桧、郑记、陈天送、庄大九等十二人。上述被凌迟处死者的子弟，年十六岁以上皆斩，其妻女及十五岁以下子、孙给功臣家为奴，且十五岁以下的男姓亲属全被阉割（被阉割的共有三十七人）。

注 释

①台湾、凤山、诸罗、彰化。

②③④蓝鼎元：《平台纪略》。

⑤周应龙领兵进剿，滥杀无辜，焚毁道旁庐舍，激起民变。

⑥蓝鼎元：《平台纪略》。

⑦龚柴：《台湾小纪》。

⑧蓝鼎元：《平台纪略》。

⑨王先谦：《东华续录》卷一○七。

⑩蓝鼎元：《平台纪略》。

⑪《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四。

⑫⑬《圣武记》卷八。

⑭赵翼：《平定台湾述略》。

⑮乾隆五十二年三月，黄仕简、任承恩先后被革职，交刑部治罪。

⑯《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七八。

⑰《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八五。

⑱赵翼：《平定台湾述略》。

⑲《军机处录副奏折》。

⑳《啸亭杂录》卷六。

㉑㉒赵翼：《平定台湾述略》。

㉓林爽文被押解北京后处死，首级割下“在市口枭示”。

清（前期）

乌什之变

乾隆时，清廷派往南疆的官员同维吾尔族上层人物——伯克，狼狈为奸，对维吾尔族人民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据那彦成披露："其各衙门服食日用所需，无一不取给于阿奇木，虽有发价之名，并不发价，""甚至各城于月给供应之外，尚有随时需索海龙、水獭、骨种、羊皮、珊瑚、黄金、绸缎、茶叶、金花布、塔连布等物。遇有差使过境，索取车价元宝二十三锭，红钱（即普尔钱）一、二百串。""各大臣自到任时，所属本城及各庄阿奇木均馈送回疆所产之金丝绸缎，回子棉、花布、玉玩、皮张等件。""节寿一律呈献，""任满回京，该阿奇木致送程仪元宝数十锭，亦系摊派。"①清廷所委任的各城伯克"凡所动用什物如绒毡、花毡、铜、锡、木、磁器等器皿"，"皆摊派于所属回庄"②。

揭竿而起。

乌什系南疆东四城之一，户口数万，原阿奇木伯克霍集斯奉命入京朝觐，留居京师③，遂以哈密郡王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为人残暴，"将乌什人鞭责凌

辱，日以为常，且贪纵之极，多方需索。而哈密随来之人，尤为不法，四出诈骗，乌什回人不堪其虐”④。

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既贪婪又生活糜烂“昏愦不治事，又酗酒宣淫”，“平日将回人种种科派、苦累，伊父子及笔帖式等任意奸淫回人妇女”⑤。清廷派往新疆的驻军，“每借战胜之威，凌虐所属”，“兵丁任意出入回庄不加禁约，以致奸淫回妇，欺凌回子，习以为常”⑥。

乾隆三十年二月十四日（1765），素诚征调乌什维民二百四十人运送沙枣木，其子及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负责押运。素诚之子及阿布都拉的行李，俱令维民背负，阿布都拉动辄毒打被征调的民夫，致“群回疑忿含冤”无处申诉。小和卓赖和木图拉亦被征调，其妻曾被素诚留宿衙署。在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被凌辱的民夫揭竿为变，擒阿奇木阿布都拉，旋即攻入乌什，包围素诚衙署，放火焚屋，素诚先杀子，后自杀。

清廷对策。

驻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闻变，率兵四百抵乌什，将乌什包围。卞塔海不问情由即用炮攻城，迫使城内并未参加起事的维民奋起抵抗，卞塔海仓皇败退。三座大炮落入乌什维民手中。驻伊犁将军明瑞于该年闰二月初五率兵一千一百自伊犁启程。乾隆传谕明瑞，此行“非专为剿贼，特令其详察起衅情由”⑦。

在明瑞抵达乌什之前，库车办事大臣柏琨、喀什噶尔参赞大臣纳世通相继统兵至乌什。明瑞在闰二月二十七抵乌什，旋即将乌什之变原因上奏：素诚派累回人、奸淫回人妇女；卞塔海不问情由放炮激变；纳世通、卞塔海妄自尊大，凌辱回人。乾隆在接到明瑞奏报后，传谕将纳世通、卞塔海于军前正法；

并下令查抄素诚、卞塔海、纳世通家产；命永贵前往喀什噶尔办事，阿桂前往乌什协助明瑞攻城。

围困乌什。

在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乌什“依恃城坚粮足”，“以死拒守”。赖和木图拉阵亡后，其父额色木图拉继续领导守城，在“口粮将绝”的情况下坚持抵抗，以至粮尽。乌什阿訇沙布勒锡拉卜设计缚献额色木图拉，清军在围困乌什七个月之后攻入该城。

明瑞攻入乌什后，关闭城门，收缴维民的枪炮、弓箭，杀剿丁壮千余，将剩余的万余人发往伊犁。

“勿留子遗”。

尽管乾隆在谕令中承认：“乌什回人一事，实由素诚等狂纵妄行，以致激成事变，及纳世通之妄自尊大，凌辱回众，卞塔海之轻率攻城，”但乾隆坚持“勿留子遗，尽数杀戮”，令明瑞在克城之后，“将丁男俱行剿杀，十三岁以下幼童及妇女送往伊犁。发往时，俱令自备资斧，不得给以口粮（乾隆已知乌什城内绝粮）”⑧。同年十月二十三日，被押往伊犁的乌什男妇万余人行至摩多，明瑞奉命将其中男丁二千三百五十余人全部屠杀（押送途中病毙及正法者三百六十余人），所余妇女押往伊犁配给无妻室的索伦、厄鲁特、察哈尔兵丁，老年妇女及幼童赏给官兵为奴。

乌什善后事宜。

一、消弱阿奇木伯克之权。阿奇木伯克日久权重，任用私人，诸弊丛生，嗣后遇所办之事阿奇木需与伊什罕伯克会商。

二、革除各城酌派差务的四、五千腾格（普尔钱的货币单位）。

三、按各城回人所承担的赋役造册，每隔一年查核一次。

四、选用都司伯克（总司各城差务）须伯克公同保举，阿奇木的族属俱令回避。

五、伯克所用亲随向有定额，不得额外增派。

六、回人所纳赋额，应张榜公布，加盖印信。

七、内地商民不得与回人杂处。

八、规定伯克与大臣、官员相见礼节。

防微杜渐。

乾隆四十三年（1778）驻乌什办事大臣永贵疏劾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⑨私役维民上山采玉，牟获暴利，乾隆令将高朴正法，并在谕令中强调："回疆办事大臣，经理该处事务，责任匪轻，当体朕意，抚绥回民，俾得安居乐业，不宜稍有派累滋扰，致蹈素诚覆辙，贻误国事。""高朴在彼，回人无不抱怨，""一、二年内，必致如昔年素诚在乌什激变之事，而叶尔羌地大城坚，较乌什尤甚，尚复成何事体……。"

注　释

①②那彦成：《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

③乾隆二十四年，清帝即密谕参赞大臣明瑞等体察霍集斯情形，如大局已定令其入觐，再将其妻子送京，又密谕兆惠：如擒获霍集占，"回酋无出其右者"，其"意在总统回部"。

④《回疆通志》卷一二。

⑤《圣武记》卷四。

⑥《那文毅公奏议》卷七七。

⑦《清高宗实录》卷七三〇。

⑧《清高宗实录》卷七四三。

⑨高朴系高斌之孙，孝慧皇贵妃之侄。

清（前期）

清水教王伦起事

清水教的前身系五荤道收元教，该教创始人为山东单县刘佐臣。康熙初年刘佐臣以“不开斋”的方式传教，以“把尘世间的芸芸众生度回天宫”①作为鼓动群众的教义。此后刘佐臣的子孙坚持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秘密传教，刘佐臣之子刘汉儒、孙刘恪、曾孙刘省过均因传播“邪教”被逮入狱，但刘氏家族的后裔及信徒依然传教如故。

秘密传教。

王伦系山东寿张县人（一说阳谷人）。自乾隆十六年（1751）起，从张继成入了邪教，不敢露名。王伦“尝为县役，因事责斥，无以为生，遂抄撮方书，为人治痈疡，颇验。择受病男妇之精悍者，不受值，均感其惠，愿为义儿、义女以报德。又诡称遇异人授符篆，能召鬼神诸邪法，以惑愚民，积十余年，而奸党遍诸各邑”。

王伦手下的骨干有：

僧人范伟。范伟与王伦同乡，“自幼犷悍无赖好博，负多不能尝”，“匿王伦家”。后出家，“所为多不法”，“妄谈天文谶

纬以惑众，尝语王伦曰：'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予为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字，毋自弃也（白加王即皇字）。'又尝劝王伦纠党千人，潜入京师为变，因事迁延不果"。

孟灿。兖州人，"尝因争博，以一掌毙其徒，亡命至楚。素与范伟善，闻逆谋，潜返，王伦倚如左右手，跬步不离"。

颜六。堂邑人，"家饶于资，招聚亡命，居积私盐，荷筐入市"，"范伟招之入党"。

李三。堂邑人，"身长八尺"，"一日夜能行八百里"，"王伦遣其入京侦探"。

杨累。王伦义子，"多力，贼中妄称万人敌"。

李旺。王伦义子，"桀黠善斗"，充衙役。

乌三娘。兖州人，王伦义女。原系江湖艺人，"有膂力，工技击"，"俗所称走马卖械者也"，"尝患疡，遇王伦治之而愈，不受值，且助以赀。三娘感其惠，愿为义女"②。

聚众起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王伦在堂邑、寿张一带"招众训练"，"教习枪棒"。寿张知县沈齐义得悉王伦聚众，"移文阳谷协擒"，被在县衙充当吏役的清水教徒泄露消息。王伦"遂倡说八月之后，有四十五天大劫，从了我，都可免"。"并云二十八日有风雨，是时正好动手"。"王伦在党家店已有数百人"，王伦之徒王经隆"在张四孤庄亦聚有五、六百人"。"此二日内适值风雨，所以人益信服"，"胁附者日多"，"遂作先发制人之举"③。

八月二十八日夜，王伦等"召优在衙前演戏，椎牛酿饮，至更余"，"数千人呼啸而入"，知县沈齐义被擒杀，遂占领寿张县城。九月初二，攻陷阳谷，初四占领堂邑，仅数日连克三

城。

王伦听从范伟之谋，“收人心，不杀掠，一切食物均易之以价”。王伦属下一人“食人梨而少与值，立斩之，而倍以偿”，从之者愈众，义军发展到二千余。

九月初，王伦在连克三城后抵达距临清四十里的柳林。临清位于南北大运河的东岸，临清的安危直接关系到漕运是否畅通。由于王伦等“在闸口搭桥渡河”，致使漕船“俱在临清以北，不敢前进”④，漕运中断。九月十六，临清旧城失陷，王伦等遂以旧城为据点，向临清新城发起攻击，“飞弹入城，声如饿鸱，人人慌恐”⑤。

清廷部署。

清廷在得悉漕运中断后，立即传谕河道总督姚立德、山东巡抚徐绩：“速将闸口贼众剿净，使河路早得肃清，漕船遄行无阻，”“其已过临清各帮，”“严饬地方河汛文武官员，尽力催儹南下勿稍稽误（九月十三日）。”

同时令大学士舒赫德统兵千余，前往临清。九月下旬，舒赫德兵临临清，分两路攻打旧城，颜六、杨累等相继中炮火而死。九月二十九日，清军攻入临清旧城，包围王伦所居住的汪氏大楼。乌三娘“率诸女巷战，短兵相接，诸女次第死，三娘独挥两刃，能捍蔽锋镝。忽于马上跃升屋，自屋而楼，即汪氏之三层楼也。高十余仞，官军围三匝，矢炮拟之若的，三娘扬袖作舞状，终莫能伤”。王伦之嫂，“年六十余，白发盈头，身高八尺，跨马挥双刀，巷战被擒⑥”⑦。

当清军侍卫英济图与把总仙鹤林等八人冲入王伦所在房屋时，“两厢突出十数贼，一拥至前，音济图猝不及备”⑧，“孟灿掣短矛刺济图，中其喉”，“贼竟将王伦夺去”，“从此不复见

矣”⑨。

清军在占领临清旧城后，大事屠戮，“旧城街巷，贼尸积塞路”，乾隆令舒赫德等，“择一离河稍远平敞地面，无碍田庐者，刨两大坑，分别男女尸身，投掷其中，即以烬余灰砾填拥成堆”，“以昭炯戒，亦可使人见而知儆”。

搜寻王伦。

清军在占领汪氏大楼后，既未能生擒王伦，又未能找到王伦的尸体。被俘获的王伦义子杨佩在口供中有“王伦说就在这里烧死，是不出去的”之语，但清廷认为“必系逆匪狡计，诡为此言，遣杨佩外出传说，冀官兵深信不疑”，“逆匪便思潜踪逃脱”。又据目击王伦自焚的王经隆供称：“二十九日，我同王伦及伊义子李士杰等数人，俱在楼上，见官兵跳在围墙上，欲入楼擒拿，我随劝王伦投降，王伦说‘我宁可烧死在楼上，断不肯投降’。随将堆积乱纸、坏木令人放火，众人不肯动手，王伦即自己放了火。我因烟起受不得，即由楼上山墙小窗内钻出，当即被官兵拿住了。”再据王经隆侄孙王峻爱供称：“火势炎烈时，王伦的衣服、胡须已经焦灼，而王伦仍坐在东北角上。”但因未找到王伦的遗骸⑩，直至十月十九日，舒赫德、徐绩等仍“每日督率官兵，自朝至暮分头搜捕，挨屋逐户严查，下及地窖、水沟，无不遍加寻觅”，“总无王伦踪迹”。于是“一面刨验尸骸，一面仍严加搜缉，总期得到匪酋实在下落”⑪。

因王伦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舒赫德等亲赴汪家楼下，查验死尸，其中有一具“只烧去下身，上身尚可认识”的尸体，“经王经隆、范伟认系李士杰之尸，其余各尸，俱已焚枯，竟不能辨别”。据范伟等言“李士杰甚骁勇”，“总随王伦，不离

左右"。在李士杰尸体旁边的一具遗骸上发现有王伦生前所带剑、镯（镯系范伟所赠）。舒赫德等遂据此推断："王伦尸骨既枯，诚难取证，惟该犯所带之剑、镯，""识认确凿，""是王伦之自焚身死，实属无疑。"⑫

注　释

①《军机处录副奏折》。

②俞蛟：《临清寇略》，《昭代丛书》，别编辛集卷一〇。

③俞蛟：《临清寇略》。

④《军机处录副奏折》。

⑤秦震钧：《守临城日记》。

⑥王王氏被擒后，清军"以铁绠贯项下骨，拟次日解京，一宿而毙"。

⑦《临清寇略》。

⑧《清高宗实录》卷九六七。

⑨《临清寇略》。

⑩在汪宅起火后，游击刚塔见楼内有数人，"中间一人正坐，穿紫色袍子，面有长须的系王伦"。

⑪《军机处录副奏折》。

⑫《朱批奏折》。

清（前期）

甘肃回民起义

回民是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根据伊斯兰教“天课制度”，凡有财产及收入者，均要向清真寺交纳一定数量的钱财，用以救济贫民。在我国西北地区，教民交纳的“天课”被清真寺的教长、阿訇等占有，他们利用侵吞的“天课”购置土地出租，又利用所把持的财富垄断教长的职务，世袭相传，成为既占有大量土地又把持教务的“门宦”集团。甘肃安定（今定西县）回民马明心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从中亚及叶尔羌回乡，“慨然欲革除门宦制度”①，“见西域回经皆朗诵，自谓得真传，遂授徒，号新教”②。新教“念经时则摇头，念毕则耍拳舞手”，“入其教者，皆有周济”③，在下层社会广为传播。于是老教与新教之间矛盾日益尖锐，乃至“互相仇杀”。

苏四十三起义。

乾隆二十七年（1762），在循化传教的马明心因与老教发生矛盾，“赴臬司控告”，甘肃地方官偏袒老教，将马明心逐出循化。马明心的助手苏四十三继续传教。

乾隆四十六年（1781）正月，旧教回民韩哈拉勿等“在总

督衙门控告”苏四十三等与老教“互相仇杀，共杀老教四十余人”。总督勒尔谨当即派“知府杨士玑、副将新柱前往查拿”，且将“马明心拿获解省”。清地方政府对新教的镇压，激起民变，“苏四十三约会新教之人，带鸟枪器械，将杨士玑、新柱戕害”。钦差大臣、大学士阿桂在向朝廷的奏报中写道：“旧教至省控告时，勒尔谨并不查明强弱众寡情形，即派副将带兵前往，激而生变，实勒尔谨办理不善所致。”④

为营救马明心，苏四十三率众二千通过“山僻小道”，日夜兼程，渡过洮河，直抵兰州城下。总督衙门令人将马明心押上城头，迫其劝说苏四十三撤军，马明心把头巾掷于城下，表明视砍头如掷巾的无畏气概，马明心被清军杀害。

勒尔谨急调固原、西宁、凉州等地军队，救援兰州。援军增至二万以上，苏四十三遂撤至兰州西南三十里的华林山，“所占山梁，虽不甚高，而坡崭陡险，路径一线可通，必须鱼贯而上”，且积蓄“民间财物粮食并马骡牛驴”，“足敷口食”。“所用火药，则已裁河州营旧贮原多”，“是以负固死守”⑤。“官军万余，皆营于城东”，“枪炮达旦”⑥。

该年五月，和珅率京兵抵兰州，进攻华林山，义军奋勇抵抗，击毙固原总兵图钦保，歼灭清军千余。清廷旋又任命阿桂为钦差大臣，并带来火器营兵二千以及从四川调来的善于在山地作战的藏兵。

阿桂指挥清军包围华林山，又派人把水磨沟处小河从上游引往他处，切断华林山的水源，被困在华林山上的回众，“断水数日，尚能死守”⑦，直至八月初清军才攻破义军防线，攻入华林山。苏四十三在激战中阵亡，义军撤入华林寺。六月二十三日清军进剿华林寺，义军在“卡内尚以枪石抵御”。“是日

适当雨后，抛掷火弹，不能延烧木卡"，清军只得退回。三天后，再次派兵至华林寺，"将沟卡尽行占据"，"将寺旁板棚、土屋、帐房全行烧毁，夺获器械无数"⑧；义军"俱尽力抗拒，不肯束手就缚"⑨。清军放火烧寺，寺内义军全部被烧死。

清廷在平定苏四十三起义后，对新教采取更为严厉的镇压，"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日后有复倡新教者，即行首告指拿"⑩。对于起义人员的家属、亲朋"密行查办远遣，断绝根株"⑪。

石峰堡起义。

石峰堡在甘肃通渭北部六十里处，"石峰在万山中，其高插天，石路甚险，惟北面一线可上"⑫。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月，田五等率新教徒众"修理石峰堡"，"筑垒开沟"，"立栅设卡"，"为负隅计"。且将"粮石、器械等物"运至堡内。田五等原定乾隆四十九年（1784）五月初五发动起义，因走漏风声，遂于四月十五在盐茶厅小山提前起义。旋即攻陷西安土堡（盐茶厅以西三十里），进入靖远县。

靖远"距兰州较近"，甘肃巡抚冯光熊、总督李侍尧恐省城有失，"将存城兵丁分派大城、郭城及各城门，设卡严密防御"。从靖远通往省城，"有两路可通：一由河北之北湾蔡家湖；一由河南之东冈奶子铺"，冯、李等派兵"在两处要隘防堵"。义军攻靖远、会宁等城皆不克。田五在攻城时中枪而亡，经此重创，义军折向东南，进抵通渭，与响应起义的新教徒众会师，攻克通渭城，击败西安都统明善所统援军，击毙明善。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十八，清帝"著传谕阿桂，于火器、健锐两营内，挑补精兵一千名预备，听候谕旨再行带领起程"，

"所有沿途应用车辆"，"饬密行妥备，勿致临时迟误"⑬。五月底阿桂以及福康安等抵达军前，义军乃退守静宁之底店山及通渭之石峰堡。义军在底店山失守后，全部撤至石峰堡。"时当三伏，七日无雨"，"勺水不得"，阿桂"乃掘濠断其水道"。"七月四日夜半"，"有佚围而去，夺路奔逃者，官兵四面截杀"，"截殪千计"，"生擒万余"⑭，石峰堡起义陷于失败。

"设法化导"。

在苏四十三起义时，乾隆曾谕军机大臣："至新旧教既自相仇杀，必非合伙，可赦一剿一，以分其力，未尝不可；而其相互仇杀之罪，俟事后再定。"由于地方官员对旧教的庇护、对新教的镇压，事隔三年新教再次起义。在平定石峰堡起义后，乾隆在地方官清查新教的疏奏中批道："回民同是一样经咒，初无新、旧之分。从前马明心亦不过因曾至叶尔羌、喀什噶尔地方学习回经，遂在甘肃设立新教，其实所念之教，与旧教无异。近闻旧教念经，须用羊只、布匹，所费较多；而新教念经，仅取忏钱五十六文，是以穷民愿归新教者较众。""若地方官留心劝导，使旧教舍多取少，新教自无从招集；或竟能使旧教所取念经钱文更少于新教，则小民希图省费，新教自必皆归旧教，""总在设法化导。"

注　释

①慕少堂：《甘宁青史略》卷一八。

②《圣武记》卷七。

③龚景翰：《循化志·回变》卷八。

④《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０。

⑤《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二九。

⑥《圣武记》卷七。

⑦《阿文成公年谱》卷二三。

⑧《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六。

⑨《阿文成公年谱》卷二四。

⑩《兰州纪略》卷一六。

⑪《石峰堡纪略》卷六。

⑫《朱批奏折》。

⑬《清高宗实录》卷一二〇七。

⑭《圣武记》卷七。

清（前期）

白莲教起义

以“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号召群众的白莲教在元、明、清三代均被视为异端，而加以取缔。

顺治十三年（1656）十一月初七，清帝谕礼部：“儒、释、道三教并垂，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化而免祸患。此外乃有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邀集结党，夜聚晓散，小者贪图财利，恣为奸淫，大者招纳亡命，阴谋不轨。”“向来屡行禁饬，不意余风未殄，”“若不立法严禁，必为治道大蠹。”“尔部大揭榜式，今后再有踵行邪教，仍前聚会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著五城御史及该地方官，在外著督、抚、按、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于定律外加等治罪。”①

查办邪教，官逼民反。

清廷在平定清水教王伦起事后，对秘密宗教进行更为严厉的镇压。乾隆四十年（1775），河南巡抚徐绩（王伦起事时为山东巡抚）破获混元教（白莲教一支），处死十四人，发边充军者三十一人。在被发配的教徒中，有一人名唤刘松，他在发

配地甘肃与前来探望的徒弟刘之协“商复旧教”，将混元教改名为三阳教（乾隆五十三年）。刘之协在原籍安徽以及湖北等地广为传教，并将从教徒处敛得的根基钱送往刘松处收藏。

乾隆五十九年（1794）刘松在发配所传教案发，刘之协及其所传徒弟宋之清、齐林等均在被通缉之列。刘之协因一起窃案牵连，前往河南扶沟②，得到被通缉的消息后，立即潜逃。

为了抓获刘之协，地方官株连无辜，“胥役衙书四处滋扰，闾阎无赖借事吹求”③。“因查办教匪，竟将斩头作教头，连逮数百人”④，甚至以查办教头“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捶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敛。聂杰人号首富，屡索不厌，村党连结拒捕”⑤，“以致人心逼反变生意外”⑥。

楚、川、陕三省并起。

面对血腥的镇压，白莲教首领决定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为丙辰年，三月为辰月，初十为辰日）发动起义。湖北荆州一带为准备起义，制造刀枪，屯积粮食，缝制衣帽，被当地政府觉察，只得在首领张正谟的率领下在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七据守灌脑湾，以三百多杆鸟枪、六个栗木炮、几百枝弩箭（箭头都抹了毒药）同前来搜捕的清军对抗。“进山的道路都埋了火弹地雷，四路扎了石卡，卡上都有滚木擂石，地下挖有土坑”⑦。参加起义的群众二万余人⑧，“头上带白布号帽，身上带有黄绫符”⑨。富户聂杰人因不堪胥吏敲诈而与张正谟共同举事。

张正谟、聂杰人倡义之后，湖北纷纷响应，“荆门则有熊道成、陈德本破当阳县，跨其城池；南则有杨子敖起来阳，谭

贵起旗鼓寨；郧阳则有曾士兴、曹海阳起竹山，破竹山，保康；汉阳则有楚金贵、鲁惟志起孝感；宜昌则有林之华、覃起耀起长阳”⑩。

该年九月，四川东乡、巴州及川东、川北各地亦相继举兵，“徐添德与弟添寿、王登廷、张泳、赵麻花起达州；王三槐、冷天禄与张子聪、庹向瑶、符曰明起东乡，破东乡；罗其清、苟文明、鲜大川起巴州；通江则有冉文俦、冉添元诸贼；太平则有龙绍周、唐大位、王国贤等”⑪，“大股数千人，小股千余人，下者亦数百人”，“扰四川”⑫。

同年十一月，陕西白莲教揭竿而起，“冯得仕踞安康之将军山；翁禄玉、林开泰起米溪；王可秀、成自智起安岭；胡知和、廖明万、李九万起汝河、洞河”⑬，于是三省白莲教并起。

王聪儿、姚之富转战楚、川、陕。

王聪儿，又称齐王氏，世称“齐二寡妇”，襄阳人，“襄阳县总差役齐林娶为第四妾，居黄龙垱”。齐林系刘之协之徒宋之清的弟子。宋之清原为三阳教徒，后因“徒众日多”，另立西天大乘教，其教义与三阳教无异。乾隆五十九年，刘松教案发，宋之清、齐林均被逮杀，同时被杀者，“凡一百余人，悬齐林首于小北门”。“齐林之徒曰刘启荣、王廷诏、张汉潮、高均德、曾大寿、樊学明之子樊人杰及张添伦、王光祖、姚之富谋为齐林发丧复仇”，“遂以齐林妾齐王氏为主而统属焉”⑭。

嘉庆元年二月初二，王聪儿、姚之富等“聚万人，屯黄龙垱”⑮，揭竿为变，“三月攻襄阳城不克，焚掠樊城而去”⑯。

王聪儿、姚之富部纪律严明，在所发布的告示中要求：“经管头目，务须严加管约弟子，毋许一人滋事”；“弟子住札

营房，各归各营，毋许乱营混杂”；“毋许酗酒撒泼，偷窃物件”；“出阵斗勇务须奋勉踊跃，争先上前，毋许一人退后”；“遇有妇女，毋许奸淫，违者立斩”⑰。

该部坚持流动作战，避敌锋芒，姚之富叮嘱部下：“断莫与官兵接仗，遇见时即四散奔走，总要官兵不知我们出没才好。”“俟官兵追逐疲乏之时，再拚死上前抗拒，若敌不住，再逃不迟。”⑱嘉庆二年（1797）正月，王聪儿、姚之富将所部分为三路，进入河南，袭南阳，攻嵩县，相继在裕州煤炭坡击败清军。该部流动范围从一省扩至楚、豫、陕三省，在行进中“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唯数百为群，忽合忽分，忽南忽北”，以牵制清军之势。而“陕、楚接壤一带大山，素习邪教之人，处处皆有”，此次各股义军“过郧西、商南、商州一带，随入逆伙者不下数千”。“山阳县属，山僻村庄，邪教尤多，竟有自焚其屋随去者”⑲，难怪清廷将领发出“贼愈杀而愈多”、“兵日添而日少”的惊叹⑳。同年五月三路军会师于镇安，在袁带铺大败清军，击毙护军统领阿尔萨瑚，旋又在王家坪设伏，重创尾随而至的清军。六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部强渡汉水后，兵分三路入川，穿越大巴山，抵达通江、达州，在东乡与四川义军会师，“延亘三十余里”㉑。

王聪儿、姚之富有与四川义军合并之意，但却遭到四川方面的拒绝，王三槐说：“我们四川地方犯不着教他们湖北的人糟踏”㉒，致使川、楚义军彼此防范，不能团结对敌。兼之川东人烟稀少，粮食供应困难，王聪儿、姚之富决定率主力返湖北，留李全、樊人杰等在四川转战。

嘉庆二年八月，王聪儿、姚之富所部二万人由兴山北上，再攻襄阳。清廷“诏发吉林、黑龙江索伦兵三千，令侍卫惠

伦、都统阿哈保以木兰进哨兵百余为先锋，并解察哈尔马八千匹赴河南、湖北”[23]。九月，义军在关庙河歼灭副都统丰绅所部二千清军，又在郧县草甸设伏，击毙护军统领、御前侍卫惠伦。但义军攻取襄阳的计划，却因清军防守严密未得实现，王聪儿、姚之富等遂率军西入陕西，与从四川北上的李全、樊人杰部在兴安会师。

为了对付义军分股流动作战，清统治者责成参加围剿的将领“各办各贼”，“其各自为战”[24]，令宜绵对付王三槐、徐天德、罗其清、冉文俦部义军；令额勒登保对付覃加耀部；令惠龄、恒瑞、庆成对付李全、樊人杰部；令德楞泰、明亮等追剿王聪儿、姚之富，而且“劲兵健马，俱在明亮、德楞泰一路”[25]。

为了打破清军以重兵围剿的局面，王聪儿、姚之富兵分四路出击：以王聪儿、姚之富为一路，以王廷诏、高均德为一路，以李全、樊人杰为一路，以张汉潮、刘永泰为一路。嘉庆三年初（1798），王聪儿、姚之富进抵汉中东部，吸引清军，高均德率一支偏师强渡汉水后穿越秦岭，直逼西安，“全陕震动”。明亮“遂舍齐王氏，率大兵八千驰赴汉中”[26]。王聪儿、姚之富乘机从西乡奔石泉，在黑石头渡汉水。该年三月，王聪儿等与高均德等会师，奔镇安、山阳、商州。李全、王廷诏等则从城固北上，出宝鸡、岐山，攻郿县、周至。

王聪儿、姚之富一路被清廷视为“贼中首逆”，清军集中优势兵力追剿。该部义军入陕后一直被围追堵截，在山阳县的石河、宽坪一带接连被创，退至湖北郧西的三岔河。三岔河两旁俱是高山峻岭，义军“从沟口窜出大路”，郧西知县孔继檊率乡勇数千堵住沟口，前有乡勇堵截，后有清军追击，义军只能攀上山梁，“奔突冲口”，冲击多时仍不得突围。王聪儿、姚

之富部八、九千人被困在左右两个山梁上。清军得知王聪儿、姚之富被困在名为卸花坡的左边山梁上，便集中全力攻击。王聪儿、姚之富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跳崖身死。

但张汉潮、高均德、王廷诏、樊人杰等依旧率部众转战川、楚、陕。嘉庆四年（1799），张汉潮在陕西阵亡，高均德在四川被歼；一年后齐国谟（齐林之侄）在仪陇战死；嘉庆六年（1801），王廷诏在川陕交界的鞍子沟兵败被杀。直至嘉庆七年（1802）樊人杰在竹山被歼，黄龙垱起事的义军才被彻底消灭。

罗其清拒守大鹏山。

嘉庆元年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等在方家坪起义，这支义军"占据大神山，连营数十里"。嘉庆三年七月，清军大举进攻，罗其清等率部转移到营山县的箕山，适值湖北义军王廷诏、高均德等率部至。两支义军在箕山"排栅三层山后寨卡林立"，湖北义军"左右立寨依之"㉒，无懈可击。该年九月清军诱罗其清等率部下山，罗其清中计战败。湖北义军北上，清军分兵追击北上的义军。罗其清乘机派兵六千攻打营山县，袭清军后路，徐天德部则东扼清军渠县饷道，夺取清兵粮草。罗其清旋即将营地移至大鹏山扎营。

大鹏山"宽广一百余里，半属悬崖"，山后"悬削数十余丈"㉓，山前"各隘皆垒石严守"，山寨周围分立卡隘，寨内屯积粮食。同年十一月，清军兵分四路围困大鹏寨，纵火焚寨。经过一个多月的激战，清军从南面、西面突破山寨防线，罗其清率部从大鹏山撤离，退守虚空寨，再次被围，在向方家坪突围的过程中罗其清被俘就义。

冉文俦、冉天元血战四川。

冉文俦及其侄冉天元、冉天泗等在王家寨起义后，一直活动在川北一带，一度曾与罗其清据守大神山。大神山失守后，冉文俦等率部投奔已在箕山扎营的罗其清，罗其清却“不许上山”㉙，冉文俦等只得“退据通江，在地势险峻的脂麻坝建造工事，分筑寨门，外设木城三座”。嘉庆三年腊月三十，清军逼近通江营寨，双方展开激战，义军击毙清守备何胜华等人，冉文俦在率部突围时，受伤被俘，旋即牺牲。

冉文俦死后，其部众由冉天元等指挥。嘉庆四年七月，冉天元与王登廷等转战东乡、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袭扰清军运输线，一改冉文俦拒险避战的作法，声势大震。该年年底冉天元率部向川西挺进，屯兵苍溪。经略额勒登保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苍溪。额勒登保令参将杨遇春、穆克登布从左右两翼合围攻击。冉天元率部自山巅往下冲，直压穆克登布后帐，同时派军攻击额勒登保的指挥营，彼此“短兵格战”，义军击毙副将以下军官二十四名，“诸帅远却，遇春亦退”㉚，入夜之后，义军点燃草团，四面出击，清军不支，只得从苍溪败逃，冉天元遂率部向巴州方向转移。

嘉庆五年初（1800），冉天元经定远县的石板沱渡嘉陵江进入川西，与东乡义军、达州义军会师。由于在深山老林中流民的大量加入㉛，义军从数千增至数万。冉天元率众攻蓬溪，行至高院场与前来堵截的清军遭遇，阵斩清总兵朱射斗。为接应进入甘肃的义军，冉天元率部北上梓橦、剑州（今剑阁）。清军德楞泰部自陕西回师，驻扎广元，阻截义军北上，双方在白家坝遭遇。义军且战且退，将清军引至主力所埋伏的新店子。义军“占据九座山包，排列整齐”，清军进入埋伏后被“三面环绕”，“刀矛交错，鏖战两时之久”，清军“箭支射尽，

持刀砍杀"，直至天黑才得突围。

清军突围后，很快得到增援，兵分四路向冉天元部发起攻击：赛冲阿等攻包家沟，阿哈保攻火石垭，温春攻龙子观，德楞泰攻马蹄冈。德楞泰在马蹄冈陷入埋伏，冉天元与德楞泰短兵相接，德楞泰率亲兵数人，下马占据山巅，冉天元率众登山仰攻，在此关键时刻当地地主团练头目罗思举率乡勇增援德楞泰，"急令兵多拾礧石"，纵乱石雨击，冉天元因坐骑中箭，跌入山涧，被俘遇害。

马蹄冈之战后，该部义军尚有万余，自剑州南下，转战川西及西充、盐亭、阆中一带，后又北上甘肃与阶州、岷州义军会合

王三槐、冷天禄的兴衰。

王三槐，东乡人，"向来学习巫师，与人禳灾治病"，乾隆五十七年拜冷天禄为师，"学习灵文经咒"。嘉庆元年二月，因被堂兄弟王元伯诬为白莲教，"逃往后河吴魁家躲藏"，王三槐母、妻均被抓拿。遂在嘉庆元年九月"约会同伙七百多人，在本地莲池沟起事"㉜。

王三槐、冷天禄被清廷视为"川匪最悍者"，彼等所居"川东数州县，皆界连汉南大小巴山，袤延千余里"㉝。嘉庆三年初，王三槐、冷天禄等与清军大战于云阳、开县之间，断清军粮道，致使清军"缺饷两月，乡勇四散"㉞。紧接着又在梓橦庙、九龙山、铁索桥、金盆池一带接连大败清军。

王三槐经不住清廷招降的诱惑，嘉庆三年八月，去清军大营谈判招抚事，被逮，解京处死。但东乡义军仍在冷天禄的指挥下在安乐坪与清军对抗。该年十一月，清军包围安平坪，因寨中粮、盐将尽，冷天禄诈称请降，以麻痹清军，乘夜突围。

直至冷天禄在　穆克登布、杨遇春的遭遇战中，“毙于箭”，东乡义军一直出没于巴山蜀水。

在低潮中转战。

白莲教起义后，清统治者号召地方官吏组织团练、乡勇配合清军作战，又在追剿义军的过程中实行“坚壁清野”，“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35]。使得“据险之贼，不能下山掠食”，“坐困月余，积粮既竭，终亦归于死亡逃散而已”[36]。自嘉庆六年（1801）下半年，义军被局限在川、楚、陕交界处转战，“自陕入川，由川折陕，皆在沿边一带万山之中，冰雪之间，非老林不走，非极险不屯，所窜之路，多系羊肠鸟道”[37]。

在这种极为艰难的流动作战中，一支支义军相继陷入失败：

嘉庆六年初，王廷诏在川陕边界的鞍子沟战败被俘，“槛送京师”[38]；该年四月义军首领马学礼、高天得在大宁二郎坝被俘；同年八月义军首领冉天士、王世虎在简池坝被杀。

嘉庆七年（1802）六月，樊人杰部在湖北房山县战败，撤退时误入马鹿坪绝地，该地峰高路险，前有大溪挡路，后有清军追击，该部义军（包括妇孺）五百余人全部跳入湍流的溪中，“俱行淹没”，樊人杰与三个企图生擒他的清兵“扭在一处，溜至急湍处所，均为巨浪搏击下滩，杳无踪影”[39]；该年七月苟文明在宁陕厅花石岩被围，无法突围，跳崖身亡。

嘉庆八年（1803）三月，冯天保等数十人在与清军交战中殁于阵。

嘉庆九年（1804）九月，苟文润所率领的最后一支义军被击溃，苟文润、苟朝九等被俘遇害。

历时九年的白莲教起义，被清军平定，清廷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靡饷二亿两；

出动军队“共计十一万七千六百六十二名”；

动用战马“共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三匹外，尚有各省购买者”；

转运粮食，截止嘉庆七年“陕、湖、川三省动拨米三百四十万五千六百二十九石有奇，山西协济谷七百八十石有奇，江西米二千四百石，安徽六万石，湖南北截留漕米三十三万五千五百石”㊵。

注　释

①《清世祖实录》。

②刘之协派刘起荣携银二百两前往甘肃送交刘松，行至扶沟因行迹可疑被捕，刘自认行窃，后又翻供，云银钱系表兄刘之协令其贩货所给。

③《清仁宗实录》卷七八。

④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⑤《清史稿·谷际岐传》。

⑥《勘靖教匪述编》。

⑦《军机处录副奏折》。

⑧据张正谟口供：“初上山时，计同教家眷并掳来人口共有二万以外，不习教的约有一半。”（军机处录副奏折）

⑨《军机处录副奏折》。

⑩⑪⑫⑬⑭周凯：《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⑮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续编》卷九。

⑯周凯：《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⑰《军机处录副奏折》。

⑱《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三一。

⑲《军机处录副奏折》，庆成奏。

⑳《戡靖教匪述编》附录。

㉑《圣武记》卷九。

㉒《军机处录副奏折》，王三槐口供。

㉓㉔《圣武记》卷九。

㉕《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正编，卷五九。

㉖《圣武记》卷九。

㉗《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㉘《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八一。

㉙《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七五。

㉚《戡靖教匪述编》卷四。

㉛清初，湖广（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广东等省无地农民流入四川，学习拳棒，聚居在州、县交界处所，土语号为“啯噜”，称之啯噜党。

㉜《军机处录副奏折》。

㉝㉞《圣武记》卷九。

㉟㊱龚景瀚：《坚壁清野并招抚议》。

㊲《钦定剿平三省邪匪纪略》续编。

㊳《圣武记》卷一O。

㊴《钦定剿平三省邪匪纪略》。

㊵《戡靖教匪述编》卷一二。

清（前期）

天理教起义

天理教原名龙华会（又名白阳教、荣华会），属白莲教的一个支派。因以八卦（离卦、震卦、坎卦、艮卦、巽卦、乾卦、兑卦、坤卦）作为分股名目，故又名为八卦教。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卦教在大名府暴动，企图把关押在狱的八卦教首领刘洪抢劫出狱。此次事变后清廷对八卦教严加取缔，震卦教中的李文成、坎卦教中的林清继续传教，并将八卦教改名为天理教。天理教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言，并以交纳“根基钱”即可在日后得到土地作为争取下层群众的主要手段。

筹备起义。

天理教的主要负责人李文成，系“河南滑县人”，“少孤，为木工佣保，人呼李四木匠，文成耻之，乃弃去，从塾师习书算”，“旁涉星家象纬，推演颇验”。当时山东、河南秘密流传着各种宗教、会党——“虎尾鞭”、“义和拳”、“红砖社”、“瓦刀社”等，“其最大者曰八卦教”。李文成在加入八卦教后，“众推服之”，“习教者，共听约束”，“统管八卦，众至数万”。

李文成“私买战马，蓄养士卒，铸造甲杖，颁发旗号”，“约期谋反”①。

林清是天理教中另一位负责人，居顺天府大兴县，曾“充黄村书吏，旋革去”，嘉庆十一年（1806）加入荣华会。林清对于“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林清“潜蓄逆谋，诡言己为金星下降”，“酉年秋月将举大事”，“又诡言前世系卯金刀，遂改姓刘，名安国，人称刘真空，又称刘林”。

嘉庆十七年（1812），林清去滑县会见李文成，“文成见清大悦，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约定“明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直隶、山东、河南同日起事”②。李文成、林清对起义作周密安排，规定起义口号，“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③；起义的标志是白旗，白布裹头系腰；并规定在发动起义的同时林清在北京城内举事，夺取北京城。

滑县暴动。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初，李文成在滑县筹备起义的消息被滑县知县强克捷探知，在九月初五派衙役将李文成、牛亮臣捉拿入狱，在审讯时李文成倍受酷刑，足胫被夹断。滑县义军在已走露风声的情况下，于九月初七提前发动起义，“径取滑县”，从狱中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等，杀知县强克捷、巡检刘斌。李文成在滑县署内“设羽帐”，“树大纛，书‘大明顺天李真主’七字”。

义军在占领滑县后，夺取滑县附近的军事据点及屯粮要地道口镇，并以重兵围困北上要道浚县。在滑县暴动的鼓舞下，长垣县“习教之人，杀死前往长垣与滑县交界——苇园村搜捕天理教教徒的知县赵纶，占领春亭集。未几山东定陶教民二三

干占据县城，杀死知县、典史"；山东曹县教民攻入县署，杀死知县，劫狱开库。

清廷得悉天理教在滑县、定陶、曹县相继暴动，立即令直隶总督温承惠带军会同河北总兵色克通阿从北面防御，令河南巡抚高杞控制河南，令山东巡抚同兴巡防山东边界，防止山东、河南连成一片。

浴血紫禁城。

林清在京畿一带传教多年，他所发展的教徒中除了农民、城市贫民、衙役胥吏外还有皇宫内的太监。林清通过信教太监刘得财、刘金、高广幅、张太、阎进喜、王福禄所提供情况，"自十六年夏季"即制定"揭竿而起，直入禁城"④的计划。坐镇黄村的林清对于滑县提前起义以及李文成部义军因清军堵截未能北上京畿等情况一无所知。按原定计划，在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派出教徒二百人混进京城，分别潜伏在东华门外、西华门外。东路在太监刘得财、刘金的接应下冲进东华门，西路在太监张太、高广幅的接应下冲入西华门。太监王福禄、阎进喜居中策应，林清在黄村等待河南义军。

守卫东华门的卫兵发现情况异常立即关闭城门，只有十几个人冲入皇宫，终因力量单薄、不熟习路径而被擒、被杀。西路义军在当天中午全部攻入西华门，为防止清军增援，将西华门关闭，并在城门上悬挂"奉天开道"、"顺天保民"的白旗。做内应的太监曾与尚衣监（缝制衣服的单位）有矛盾，便将义军引至尚衣监文颖馆泄愤，最后才来到隆宗门。隆宗门是通往皇后居处储秀宫的必经之处，西路义军在宫内的厮杀，惊动了侍卫，遂将隆宗门关闭。义军先是用棍撞门，后又用箭往里射，均无济于事，亦有少数义军翻墙而入。正在上书房学习的

皇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等，“用鸟枪拦打房上、地下之人”⑤。正当义军堆积桌椅、棉被拟纵火烧门时，留京诸王公、内务府大臣引兵入神武门，又将准备派往河南镇压李文成的键锐营、火器营调入宫内，义军不支只得从隆宗门后撤，退至西华门。

攻入紫禁城的义军三十一人战死，四十一人被俘。九月十九日，正在黄村等候河南义军的林清被清廷抓获⑥。

当时嘉庆皇帝不在北京，正在回京的路上，闻变即颁《罪已诏》，指出："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较之明季梃击一案，何啻倍蓰。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予唯返躬修省，改过正心，上答天慈，下释民怨。"⑦

道口之战。

清统治者在镇压林清所发动的起义后，即调兵遣将，集中全力镇压占领滑县、道口的李文成。嘉庆帝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为直隶总督，并令其节制山东、河南诸路清军；调健锐、火器二营清兵及镇压白莲教起义的将领杨遇春、杨芳、穆克登布等各率所部前往河南。

嘉庆十八年十月杨遇春等率军兵临道口，相继攻克道口附近的据点周潭村、连庄、罗家寨、丁栾集。十月二十一日义军设伏于中市，击败清军，"杨遇春所领千总李洪春、外委柯玉皆战死"⑧。此战之后，义军撤回道口"坚闭不出"。

清军兵分七路围攻道口，以炮轰城，击败滑县、桃源方面增援的义军数千人。未几道口城破，义军伤亡惨重，城内房屋"全行烧毁"，"尸骸枕藉，盈街满屋"⑨。道口失陷，使得滑县顿失屏障，那彦成迅速调兵至滑县县城，将三个城门围住，

只有正北门、西北门因兵力不足难以围困。那彦成惟恐义军弃滑县而走，流动作战，急请朝廷增兵。

司寨之役。

李文成片面地认为，白莲教起义失败的原因是“不据城池无所固守”，在攻陷滑县后，“高筑雉堞”，“以待他郡接援”[10]，使得清朝统治者可以调动兵力，各个击破义军的据点。

在清军攻克道口直扑滑县后，刘国明率桃源义军八百救援滑县，夜入县城，接李文成出城。李文成已意识到死守滑县毫无出路，遂调义军四千西进，夺取辉县山内的司寨。但李文成等占领司寨，不及布防，清总兵杨芳等已率兵追至，“进薄司寨，围之数重”。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内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堡十余座”[11]。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晨，清军向司寨发起攻击，义军据险而守，喋血苦战，“尸如山积”[12]。时至下午，寨墙一角被毁，清军攻入寨内，义军“据险掷石，枪炮齐发，官军死伤甚众”[13]。直至夜幕降临，战斗仍在继续，总兵杨芳下令焚寨，“须臾烟焰蔽天，贼尸塞路，有冒烟突火、焦头烂额而逸者，悉生缚之”[14]。

李文成、刘国明等被困在一碉楼内，杨芳“率众登楼”，刘国明“持刀跃出，击杀兵士数人，官军以长枪刺之，国明死”。当清军冲入碉楼时，双腿已残的李文成“举火自焚”。待火灭烟熄，清军冲入碉楼，只见“李文成头戴网巾，养长发，两股刑伤用膏药敷贴，两臂被焚，肩膊焦烂，左目有伤，面带枪箭伤痛。座帐皆毁，惟存方白旗伪书‘大明天顺李真主’七字。是役也，寨内之贼数千，无一人得脱者”[15]。

滑县陷落。

滑县为古滑州旧治，“城坚厚，外砖、内土、中沙，大炮攻之，遇沙而止”⑯，义军“运送口粮峙其中，足支一载”。清军在攻克司寨后，“齐集滑县，昼夜环攻”。清军在“城外连掘地隧十余”，皆为义军发觉，“或水灌之，或濠截之”。于是，杨芳令“佯筑他栅进攻，而潜挖旧隧满实火药”。十二月初十，清军退至三里以外，“城西南角雷轰地震，崩裂二十余丈”，义军被“烧、震死千百”⑰，入夜巷战仍在持续。李文成妻张氏“帅（率）兵夜捣官军，三入三出，官军被戕者甚众。滑城破，牛亮臣、徐安国劝张氏“诈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云：‘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乃挥刀巷战，击杀数人。阖户自缢，幼女年十二，亦自刎”⑱。

在此战中，有两万义军遇难，被俘老幼男女二万，牛亮臣等被生擒，“槛献京师”⑲，至此持续三个月的天理教起义陷于失败。

注　释

①兰簃外史纂：《靖逆记》卷五。

②《靖逆记》卷三。

③《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三三。

④《清仁宗实录》卷二八一。

⑤转引自林铁钧：《嘉庆皇帝传奇》，第110页。

⑥林清与被俘义军、教徒均被清廷凌迟处死（即磔刑，以三千六百刀的酷刑处死）。

⑦《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

⑧《靖逆记》卷三。

⑨《那文毅公奏议》卷一九。

⑩《啸亭杂录》卷六。

⑪⑫⑬⑭⑮《靖逆记》卷三。

⑯《靖逆记》卷三。

⑰《圣武记》卷一〇。

⑱⑲《靖逆记》卷三。

清（前期）

张格尔之叛

张格尔系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波罗尼都败亡之后，其子萨木克翻过巴达克山逃往浩罕汗国①。萨木克生有三子，长子名玉素普，次子即张格尔。张格尔“以诵经祈福，传食诸部”，以传播伊斯兰教（白山派②）扩大其影响，并时刻觑视天山南麓的局势，以求一逞。

张格尔乘机起兵。

自乌什之变后，清廷对于派往南疆的官员慎重选择，维民得以安居。迨至嘉庆年间以后吏治败坏日甚，派往天山南北的参赞大臣及其所属员司的“服食日用，无一不取于阿奇木伯克”，各城伯克亦藉以此苛敛“毡裘、金玉、缎布”③，大饱私囊。嘉庆末年，驻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荒淫无道，民怨沸腾。张格尔见有机可乘，便率数人从浩罕赴布鲁特，煽动数百布鲁特人袭喀什噶尔近边。

布鲁特头人苏兰奇入边告警，竟被斌静手下员司绥善驱逐，苏兰奇一气之下与张格尔合兵一处。斌静反以苏兰奇勾结逆裔张格尔扰边滋事上奏于朝。清廷遂令驻伊犁将军庆祥前往

喀什噶尔调查此事。未几庆祥便将斌静倚势婪索等罪状上闻朝廷，诏夺斌静职治罪，时为道光二年（1822）。

张格尔占据那林河源，招兵买马，又勾结白山派教民充当耳目，提供情况，屡屡骚扰，一旦清军出动则远遁。道光五年（1825）九月，清军追剿张格尔，出寨四百余里仍不见踪迹，掩杀布鲁特百余人而还，布鲁特首领统兵二千追击清军，袭杀殆尽。道光帝闻知此事，以大学士长龄代庆祥守伊犁，令庆祥前往喀什噶尔，筹划进兵之事。

西四城之陷。

张格尔欲侵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英吉沙尔，又恐伊犁援军，遂遣使浩罕赴乞师，“约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以酬其劳”④。

道光六年（1826）六月，张格尔率众五百穿越开齐山路，窜至距喀什噶尔百余里的阿尔图什拜谒祖陵。七月，浩罕国王穆罕默德·阿利汗率兵万余抵喀什噶尔。守城清军“尽力抵御”，浩罕军伤亡惨重，穆罕默德·阿利率军撤退，张格尔派人追之，复诱浩罕军三千归，“张格尔置为亲兵”⑤。喀什噶尔被围攻两个月，势穷力竭，城破，庆祥自缢身亡。张格尔在占领喀尔噶尔后自称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⑥。未几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三城相继陷落。

激战柯尔坪。

西四城陷落后，清廷任命长龄为扬威将军，调陕甘总督杨遇春统兵五千驰赴哈密，又发吉林、黑龙江、甘肃、四川等省军队从征，共计三万六千，会师阿克苏。此时张格尔军已抵距阿克苏仅八十里的浑巴什河。清军击退企图过浑巴什河的张格尔军，并在阿克苏西部的柯尔坪与叛军展开激战。柯尔坪“东

南通巴尔楚克，西南通喀什噶尔，为大兵进剿必经之路”⑦。柯尔坪之战的胜利，不仅保住了东四城（阿克苏、乌什、库车、辟展），也打通了收复西四城之路。

收复西四城。

道光七年（1827）二月，清军二万余自阿克苏出师西进，二十三日抵洋阿巴特，与叛军二万余遭遇，时清军已跋涉半月有余，且携粮将尽，以疲驼、羸马充饥。长龄、杨遇春等惟恐叛军远循，行坚壁清野之策，遂在洋阿巴特同叛军展开激战。清军兵分三路进击，擒斩过半，尽夺敌粮糗以济军。

二月二十五日清军进抵叛军重点设防的沙布都尔庄，该地“多树苇，决水如沮洳”⑧，泥泞难进，城后林中亦有伏兵。长龄令士兵冒险越渠，冲入敌阵，时值叛军营中火药爆炸，叛军大溃。清军乘胜追击，斩杀万余。

二月二十六日，清军抵达距喀什噶尔仅十余里的浑河北岸，张格尔集中城内兵民十余万阻河列阵，亘延二十余里，穴垒列铳，势甚嚣张。会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气晦霾。长龄欲待风过天明进军，杨遇春却以“雾晦中贼不辨多少”，“是天赞我也”，又以“客兵利速战”，“时不可失”⑨，力劝进兵。清军乘风沙蔽目渡河，占据上风位置，炮声与风声会合，令敌胆寒，张格尔率先出逃。三月初一，攻克喀什噶尔，擒叛军四千。

在收复喀什噶尔后，清军兵分两路夺取英吉沙尔、叶尔羌及和田。

生擒张格尔。

张格尔从喀什噶尔出逃后，自木吉出边，逃回浩罕。为擒获张格尔，长龄令杨遇春、杨芳率兵八千分道出塞搜寻。杨芳

一路在帕米尔高原以北的阿顿岭遭到浩罕军队的袭击，伤亡惨重。清廷遂下令撤军，留兵八千驻喀什噶尔，任命杨芳为该城参赞大臣。

道光七年九月，清廷任命直隶总督那彦成为钦差大臣，处理善后事宜。长龄因张格尔未获，建议清廷将在京为奴的波罗尼都后裔阿布都哈里赦归，令其总辖西四城，"回崇信和卓，犹西番崇信达赖喇嘛，已成不可移之锢习。即使张逆就擒，尚有兄弟之子在浩罕，终留后患"⑩。长龄的建议，并未被清廷所采纳。

张格尔在得悉清廷撤军后，又思大举。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率步骑五百入阿尔古城。杨芳率军迎击张格尔，张格尔逃至喀尔铁盖山，全军覆灭，只带残兵三十逃入布鲁特。布鲁特人遂执张格尔以献，张格尔被解往北京处死。

与浩罕议和。

张格尔被擒后，长龄等遣使浩罕，要求擒献张格尔家属，浩罕以伊斯兰经典从无献和卓子孙先例而加以拒绝，清廷遂令断绝同浩罕的贸易关系。浩罕国王穆罕默德·阿利为报复清廷，便将张格尔之兄玉素普抬出，为其拼凑一支流亡队伍（喀什噶尔人逃至浩罕者），并派将领协助彼等入犯。道光十年（1830）八月，和卓后裔的军队再次入犯，夺取喀尔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等城周围的村庄，为此清廷诏令杨遇春、长龄、杨芳等调兵赴援，待清军抵达喀尔噶尔时，浩罕及玉素普早已引军而还。

道光十一年（1831）七月，清廷派长龄去喀尔噶尔同浩罕议和，签定如下条款：

浩罕为清廷监管和卓家族；

清廷恢复同浩罕的贸易；

浩罕放回所掳维、汉民众；

清廷归还抄没的浩罕资产。

注 释

①浩罕，亦称霍罕，乌兹别克人在十八世纪初所建立的汗国，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商业、1876年被沙皇俄国吞并。

②十七世纪初伊斯兰教分裂为白山派、黑山派，俗称白帽回、黑帽回，大小和卓的先人即为白山派首领。

③《清代通史》卷中，第893页。

④《清史稿·属国传四》。

⑤《圣武记》卷四。

⑥包罗杰：《阿古柏伯克传》。

⑦《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三四。

⑧《清史稿·长龄传》。

⑨《清代通史》卷中，第896页。

⑩《清代通史》卷中，第897页。

清（前期）

天地会的发展

天地会又名"洪门"，是我国清代一个有影响的秘密结社。成员在入会时，必须立誓保守会内机密，对泄密者要施以严惩，在其创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内部情况一直鲜为人知。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在台湾爆发了一次由天地会领导的武装反抗斗争——林爽文起事，天地会的某些内情才渐渐为世人所知晓。

天地会的产生与宗旨。

清乾隆年间秘密结社组织发展迅速，在我国南方，尤其是闽、粤一带最为显著，这里人多田少，人口增长快，穷苦人民生活困难，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迫切要求把彼此分散的力量联合起来，以便于求生。乾隆年间已有人指出："福建地方辽阔，滨临大海，山谷深邃，最易藏奸。本年（指乾隆七年）福建、广东旱稻歉收，米价腾贵，而闽省人心又复犷悍，恃海刁蛮，以歃血谋逆为儿戏，视劫官抢掳为寻常。"①

加之，闽粤一带械斗之风甚盛，乾隆十九年福建按察使德舒在《收辑技勇疏》中指出：福建民人"习尚强悍，以好勇斗

狠为能，毋论秀顽，好学拳棒。往往创立会名，联合声势”。“其初意不过图御外侮，迨聚集日久，结交既广，或勇技过人，或逞机谋聚众，肆然无忌，遂刊伪印，散伪札，妄悖猖狂，蛊惑人心”②。广东也常常发生械斗案件，“大族凌小族，强宗欺弱宗，结党树援，好勇斗狠”，经常“百十为群，持械相斗，期于杀伤而后快”。这种械斗之风，也为秘密结社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环境。

清中叶，城乡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闽、粤等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处于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商品经济形态转化的过程之中。他们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内部也在不断发生分化，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到异地它乡去谋生，人口的激增又加速了这一过程。社会上涌现出大批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雇佣劳动者以及其他没有固定职业和固定生活来源的江湖流浪者。秘密结社便成了他们相互联络的最好的方式。乾隆二十六年(1761)，福建漳浦县僧人提喜（即洪二和尚），对原来的一个异姓结拜组织加以改造，创立天地会。经过会内首领、骨干的不断努力，天地会从最初一个人数不多，一般的异姓结拜团体，发展成为我国南方最重要的秘密结社之一。

天地会最初的口号是“顺天行道”。据乾隆五十二年(1787)在广东饶平县被捕的天地会成员许阿协等人供称，天地会传会时有一首歌诀，人人都要传诵：“日月车马三千里”，“顺天行道和合同”③。林爽文就是以“顺天行道”和“剿除贪官”为口号；福建漳浦县张妈求起事时，也以“顺天行道”为口号，张妈求自称“顺天将军”。乾隆五十七年，福建泉州陈苏老等人进行复兴天地会的活动，创“靝黰会”，以“顺国源分”为口号，暗含从林爽文那里派生之意。乾隆六十年，台

湾陈周全聚义，提出“争天夺国”，颇有夺取政权的政治色彩。嘉庆初年以后，在天地会《会簿》、盟书、诗歌中，逐渐出现了“反清复明”的字句。嘉庆五年（1800），广东仇大钦等结会时，盟书中提到“恢复明祚”④。嘉庆六年（1801），广东海康县林添申等结会时，结盟表文中有“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同掌江山，共掌社稷，一朝鸠集，万古名扬”⑤。嘉庆七年（1802），广东博罗陈烂屐四起事时，布旗上写有“木立斗世天下知，顺天兴明和合同”⑥。嘉庆十一年（1806），江西杜世明等人结会时，盟书内又出现了“转换江山归汉室，明臣公侯李朱洪”⑦。嘉庆十二年（1807），训蒙度日的尹之屏在《登记来修钱柬部（簿）》的空白处，写有强烈反满思想的诗句，如“单斩清朝反骨人”，“斩清绝北尽归明”等⑧。嘉庆十六年（1811），广西东兰州姚大羔等人结会时，在《会簿》里也有许多反清内容的诗句，如“天下知世清该绝，万里合同明在兴”，“扶明绝清登龙位，同心协力讨江山”⑨。

天地会的传播

天地会自成立后至嘉庆、道光年间，不但在数量上迅速增加，而且在地域上逐渐扩大。福建、广东两省的天地会几乎遍及全省，两省的移民还在海外及内地人口比较稀少的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及湖南等省传播天地会。

天地会在福建省的传播，乾隆年间已很兴盛，但主要是在漳州府的漳浦、天和、云霄、诏安等县。嘉道年间，天地会已发展到更多的府县，其中有建宁府的浦城、建安等县；门州府的长门、武平等县；延平府的南平等县；泉州府的南安等县；兴化府的莆田等县；以及台湾府的嘉义、凤山、彰化等县。

从现存的档案资料来看，乾隆五十年前后，广东与福建接

壤的潮州府饶平一带，已有人参加天地会，嘉道年间，广东省的许多府县都发现了天地会的活动。如广州府东莞、香山、顺德等县；肇庆府的阳江、鹤山等县；惠州府的博罗、永安、归善等县；潮州府的潮阳、饶平等县；廉州府的灵山、钦州等县；雷州府的海康等县。

江西省天地会的发展，同福建有着密切关系，其分布地区多是同福建相邻的各府。如赣州府的会昌、长宁、兴国等县；宁都州的宁都、石城等县；建昌府的广昌县；吉安府的龙泉、万安等县；南安府的南康、大庾等县。

清政府在广西发现天地会的结会活动，最早是在嘉庆十一年。道光初年两广总督阮元曾经提到，广西“民情本属淳朴”，并无天地会的活动，后来由于外省的“游民”大量涌入，广西方出现了天地会的结会活动。广西的天地会主要是由广东传入。嘉道年间已经遍及全省的十一个府，计有南宁府、思恩府、梧州府、柳州府、浔州府、平乐府、郁林州、镇安府、庆远府、泗城府及桂林府。

嘉庆十七年（1812）清廷在贵州荔波县发现天地会的结会活动。贵州省的天地会，由福建、广东的客民经广西传入，最初多出现在与广西邻近的一些府县。如都匀府荔波县；兴义府兴义县；黎平府的开泰县、永从县。

天地会传入云南的时间，与贵州相近，清政府于嘉庆十六年在师宗县发现了天地会的活动。云南与广西相邻，天地会是由广西人或移居广西的广东人传入，故天地会的组织，主要在与广西接壤的地方活动。主要有广南府的宝宁县，开化府的文山县，广西州的师宗县。

湖南的天地会，系由广东和广西的客民传入，嘉庆十八年

(1813) 首先在江华县出现天地会的结会活动。湖南的天地会，嘉道年间主要在靠近广东、广西的地区活动，有永州府的江华县和道州及桂阳府的兰山县。

随着华人移民到南洋、美洲，天地会在海外华人中也传播开来。

天地会的武装反抗。

林爽文起事，是鸦片战争前天地会领导的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武装反抗斗争。起事的直接导火线系清地方官吏、差役搜捕天地会成员。起事历时一年有余，一度控制了台湾岛上平原地带的大部分，使清统治者大为震惊。清政府为了平定这次起事，先后从福建、广东、湖南、广西、四川等省调集了大批军队，总数前后共计六万多人，耗费军饷、物资计白银一千余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最后，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林爽文、庄大田等天地会首领先后被以福康安为首的清军擒获，起事宣告失败。

乾隆五十二年 (1787)，福建漳浦县天地会首领张妈求纠一百余人，订于十二月十二日夜齐赴漳浦县城外关厢举事，漳浦知县罗泽坤得悉此事，下令严防城门，并派兵役在城内严密搜查，访拿会众。张妈求遂决定提前起事，初七日夜，率会众攻入户头水汛营地，夺得银钱与衣物，后又攻至漳浦县盐馆，张妈求等决定俟抢得较多物资，即夺船渡海赴台。行至云雷县八尺门汛，五都后林汛等处，被漳浦知县、署漳州镇左营游击许腾蛟、署提督常泰等擒捕。

乾隆五十七年 (1782) 四月，原天地会众苏叶、陈苏老先后纠得一百多人意欲在福建同安县“复兴天地会”。当时，官府查拿天地会风声日紧，陈苏老便将天地会改为“靝黰会”，

仍暗含天地会之意，令人镌刻“靝黓”二字印章及“顺国源分”印板，并将印章、印板用黄纸印刷，分给会众，作为入会凭证及互相识别之暗号。苏叶又编成四句歌诀：“天一成水水连天，地二成火共水连。此卦合成天地格，到时变化万千千。”令会众诵习，作为隐语，以便互相关照⑩。苏叶、陈苏老等商定于八月十五日聚齐，赴村镇抢劫，后泄漏提前举事。二十四日，往马巷地方，清政府闻讯后派兵役查拿，先后捕获二百余人。

嘉庆七年（1802年），广东博罗、归善、永安一带天地会起事。是年八月初八日，首领陈烂屐四首先在博罗县羊屎山罗溪营率领天地会会众公开竖旗起事，有众万余人，每人皆用红布包头，自八月十五日起，先后攻打该县境内之土瓜圩、刘家围等处村庄。嘉庆帝急调各地清军分路向羊屎山罗溪营进兵。九月十九日，陈烂屐四在博罗、增城交界之周山地方被清军擒获。

归善天地会在首领陈亚本、蔡步云等率领下，积极准备起事，拟于稔山、白茫花、平山等三处，抢夺当地牛头会村庄。牛头会系由当地富户建立的组织，入会者按照家中拥有耕牛之头数，交纳银钱，用来雇募乡勇，与天地会进行仇杀。陈亚本等定于八月十五日竖旗起事，攻打村庄，尚未动手，即遭官府查拿，陈亚本、蔡步云等乘机脱逃，旋亦被捕遇害⑪。

同年八月，永安曾清浩、温登元等结拜天地会，被该县青溪地方牛头会内蓝监生闻知，拿获了温登元，不久温病故监内，曾清浩遂率天地会众二三千人，于九月二十六日祭旗起事，在与清军接战后连连失利，首领曾清浩见难以抵敌，率数千人赴清营投降。

※ ※ ※

天地会在鸦片战争前主要处于秘密流传、发展组织和积蓄力量的阶段，天地会的存在和传播对清统治者造成了潜在威胁。鸦片战争后，由于自然经济的解体，加速了农民、手工业者的破产，他们纷纷加入天地会，使天地会这一互济互助的组织日益壮大。辛亥革命时期，天地会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依靠的重要力量，海外洪门（天地会）在为革命党人捐款筹饷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释

①《朱折》广东总兵谭行义折，乾隆七年九月二十日。

②《皇朝经世文编·兵政》卷七一。

③《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初五日孙士毅折

④《上谕档》，嘉庆五年七月初一日"上谕"。

⑤⑥《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五日伍拉纳折。

⑦《朱批奏折》，嘉庆十一年七月九日。

⑧《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⑨《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⑩《天地会》（五），第458－464页。

⑪《军机处录副奏折》，内阁学士那彦成折，嘉庆七年十二月初二日。

清（前期）

科　场　案

自从隋、唐创立科举取士以代替门阀制度，科场作弊也就随之发生，诸如挟带、贿赂考官、疏通关节等等。上述弊端能否酿成科场案，同当权者的施政意向、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有直接关系。

顺治丁酉顺天乡试案。

顺治十四年（1657，丁酉年）初，清帝顺治批评科考中所存在的陋习——“干谒于事先”，“酬谢于事后”①。同年七月告诫考官“当敬慎秉公，倘所行不正，独不见顾仁②之事乎”③。

顺天乡试又称北闱。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五发榜，该科应试者一千七百余人，中式举人二百零六人，落第者一千五百余人。丁酉科乡试放榜不久，揭露考官营私贿赂的匿名揭帖④就传遍京城。同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卖关节、徇私舞弊的丑闻⑤被公之于众。

同年十月十九日，刑科给事中任克博疏劾“中式举人陆其贤，用银三千两，同科臣陆贻吉送考官李振邺、张我朴贿买得

中”⑥。顺治帝立即传谕吏部、都察院，将李振鄴、张我朴、陆贻吉、陆其贤等人逮讯。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查出中式举人田耜、邬作霖通过进士项绍芳引荐考官“受贿、用贿、过付”的细节。十月二十五日，谕令将“李振鄴、张我朴、蔡元禧、陆贻吉、项绍芳，举人田耜、邬作霖俱著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⑦。不久主审此案的大学士王永吉又将李振鄴入闱（进入考场）之前亲笔书写的拟予以关照的二十五人名单查出（二十五人中得中的只有五人）⑧，王永吉之侄王树德、江南名士陆庆曾、孙旸以及张天植等都名列单中，被列名者不管已中未中、不管是否行贿⑨，均锒铛入狱，无一幸免。

顺治十五年（1658）四月二十二日，顺治在太和殿审问王树德、陆庆曾、张天植等二十余人。原定在御审之后，将上述人即押往刑场处斩。监生张天植慷慨自辩：“臣男已蒙荫，富贵自有，不必中式，况又能文，可以面试。”当张天植被施以夹刑后，仍辩道：“上恩赐死无敢辞，若欲屈招通关节，则必不承受。”⑩三天后，顺治颁谕刑部衙门：“王树德等交通李振鄴等，贿买关节，紊乱科场，大干法纪，命法司详加审拟。据奏：‘王树德、陆庆曾、潘隐如、唐彦曦、沈怡然、孙旸、张天植等俱应立斩，家产籍没，妻子、父母、兄弟流徙尚阳堡。’朕因人命至重，恐其中或有冤枉，特命提来亲行面审，王树德等俱供作弊情实，本当依拟正法，但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⑪

顺治丁酉江南乡试案。

江南乡试，又称南闱。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工科给事中阴应节疏劾“江南主考方犹等弊窦多端，榜发后士子忿其不

公，哭文庙，殴帘官（泛指考场员司），物议沸腾。其彰著者，如取中之方章钺系少詹事（正四品）方拱乾第五子，悬成、亨咸、膏茂之弟，与犹联宗有素，乃乘机滋弊"，"请皇上立赐提究严讯，以正国宪，重大典"⑫。顺治立即降旨将"方犹、钱开宗（副主考）并同考官俱著革职"，"刑部差员役向速拿来京，严行详审。本内所参事情及闱中一切弊窦，著郎廷佐（两江总督）速行严察明白，将人犯等拿解刑部"⑬。

翌年二月初三，御史上官铉参劾"江南省同考官舒城县知县龚勋出闱后，被诸生所辱，事涉可疑。又有中式举人程度渊者，啧有烦言，情弊昭著，应详加磨勘（中式者试卷送礼部复查），以厘夙奸"⑭。二月二十九日，清廷谕令丁酉科江南中式举人到京复试。州县官员派衙役"敦促上道"，甚至将中式举人锁拿，令彼等"就械登舟"⑮。江南新举人抵京后无处安身，店铺"畏同疫鬼"，"闭户不纳"，"流离冻馁，与诸保解、杂役偃息于破寺废观、颓垣倒屋之间"⑯。

三月十三日，顺治帝在瀛台复试江南举人，"每举人一名，命护军二员持刀夹两旁"，"试官罗列侦视，堂下列武士，锒铛而外，黄铜之夹棍、腰市之刀，悉森布焉"⑰，"与试者悉惴惴其栗，几不能下笔"⑱。迨至未刻（下午一点至三点）交卷时，江南一代才子吴兆骞竟然"曳白"（交白卷）。吴兆骞因曳白被逮入狱。

直至顺治十五年（1659）十一月，江南乡试案经过近一年的审理并未能审出考生行贿考官的细节。方拱乾在回奏中也断然否认同方犹联宗，且以"丁亥（顺治四年）、己丑（顺治六年）、甲午（顺治十一年）三科齿录⑲为证"。在顺治帝的敦促下，刑部参照对顺天乡试一案的处理作出如下判决："正主考

方犹拟斩，副主考钱开宗拟绞，同考官叶楚槐等拟责遣尚阳堡，举人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20]。顺治却认为刑部的拟处"甚轻"，遂下令将："方犹、钱开宗俱著立即正法，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叶楚槐、周霖、张晋、刘廷桂、田俊民、郝惟训、商显仁、朱祥光、文银灿、雷震声、李上林、朱建寅、王熙如、李大升、朱蕴、王国桢、龚勋俱著即处绞，妻子家产籍没入官。已死卢铸鼎，妻子家产亦籍入官。"[21]二位主考与十八位同考无一幸免。"方章钺、张明荐、伍成礼、姚其章、吴兰友、庄允堡、吴兆骞、钱威，俱著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妻子、兄弟俱流徙宁古塔。程度渊在逃，责令总督郎廷佐、亢得时等速行严缉获解"[22]。

康熙己卯科场案。

康熙三十八年（1699，己卯年）顺天乡试，"所中大臣子弟居多"[23]，落第者抨击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纳贿营私，逢迎权要"，遂将李蟠、姜宸英革职。翌年正月二十七，康熙对己卯科举人进行复试，亲自命题，并令诸皇子、重臣、御前侍卫等严加监视。"及阅各卷，俱能成文"，皇帝这才意识到"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24]。姜宸英此时已病死狱中，成为康熙己卯科场案的牺牲品。

康熙辛卯科场案。

康熙五十年（1711，辛卯年）九月九日，江南乡试发榜后，舆论大哗，所中多为扬州盐商子弟，其中句容知县王曰俞所荐吴泌、山阳知县方名所荐程光奎，俱不通文墨。九月二十四日，苏州生员千余人在玄妙观集会，将财神像抬入府学明伦堂，讥讽正副主考左必蕃、赵晋爱财不爱才，甚至将"贡院"之匾改为"卖完"。两江总督噶礼将苏州生员丁尔戬等拘禁，

拟治诬告之罪，江苏巡抚张伯行、主考左必蕃，亦将发榜后情况上奏朝廷㉕，康熙派户部汉尚书张鹏翮会同两江总督噶礼、江苏巡抚张伯行、安徽巡抚梁世勋在扬州审理此案。

在审讯中发生督、抚互参，张伯行参劾噶礼得银五十万两“卖官卖法，复卖举人，可谓恶贯满盈”，噶礼则参劾张伯行在进剿海贼时“违旨逗留”，“纵盗殃民”，“徇私作弊”㉖。张鹏翮之子张懋诚时为怀宁知县，系噶礼下属，故有所顾忌。康熙遂派户部满尚书穆和伦、工部汉尚书张廷枢前往审理，务将赵晋私收贿赂暗通关节之事查明。

经一年多的审讯，歙县贡生吴泌供认求余继祖贿买举人，定价八千。余先把黄金一百两、白银二千两带给安徽巡抚叶九思的门生员炳。员炳见叶九思，称吴泌系其表弟，求其提拔。叶九思遂与员炳、余继祖等约定，在首场第一篇破题内写上“其实有”三字。同考官泾县知县陈天立是赵晋亲戚，叶遂托陈天立转知赵晋，说吴泌系其友，中后许银五百两。吴泌卷分在句容知县王曰俞手中，陈天立往见王，称是赵晋所托，王遂将吴泌试卷推荐给主考。另据程光奎供认，素与山阳知县方名往来，是以得中，发榜后方名向程索取酬谢，程代方还借银八百两。

在此案结案时，除已病故的叶九思、自杀的陈天立之外，赵晋、王曰俞、方名均处斩立决，吴泌、余继祖、员炳、李奇(安徽布政使书办)、程光奎均处绞监候，左必蕃因失察被革职。互参的督、抚，总督噶礼被革职，巡抚张伯行被处以革职留任㉗。

科场风波。

咸丰年间，由于条子㉘之风盛行，酿成清代最后一起科场

案——咸丰戊午年顺天乡试案。在这起科场案中先后受到惩处的九十一人，斩立决者五人，遣戍新疆者三人，罚俸一年者三十八人，革除举人者十六人，死于狱者二人，主考官柏葰是历朝历代科场案中被处死的唯一一位一品官员㉓。

注 释

①《清世祖实录》卷一〇六。

②顾仁系巡方御史，因"悖旨婪赃"被处死（顺治十二年十一月初五）。

③《清世祖实录》卷一一〇。

④揭帖本系公文，明清之际私人启示亦称揭帖，私人揭帖有匿名、署名两种。

⑤发榜之后，张我朴向人炫耀："某某，我之力也；某某本不通，我以情，故得副车。"同考官郭浚则向考生蒋廷彦透露："兄卷已中，张我朴故不许，即张汉卷亦已中，李（振邺）故检而毁去也。"

⑥⑦《清世祖实录》卷一二。

⑧李振邺入闱前用蓝笔写了一张名单，交给带入闱内的书童灵秀，令灵秀帮助寻找上述人的试卷。事后李振邺未从灵秀处索回名单，该名单落入灵秀同伴冯元手中。冯元因对李有宿怨，而将名单收藏，拟报复李振邺。案发后，冯将此名单交出。

⑨陆庆曾因精通医道治愈李振邺之病，故被名列单内。

⑩信天翁：《丁酉北闱大狱纪略》。

⑪《清世祖实录》卷一一六。

⑫⑬《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三。

⑭《清世祖实录》卷一一五。

⑮⑯《研堂见闻杂记》。

⑰《鹤征录》。

⑱《柳南随笔》。

⑲齿录即同年录，凡同科得中进者，俱各书姓名、年龄、籍贯、三代人姓名，刻印存档。

⑳方拱乾次子、长子、三子分别中丁亥、己丑、甲午三科进士。

㉑㉒《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一。

㉓《清圣祖实录》卷二OO。

㉔《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七。

㉕康熙亦收到江宁织造曹寅的密奏，曹寅在密奏中，有今年文场秀才，中者甚是不公，显有情弊等语。

㉖八股文开头两句称为破题，将题目的意义剖析破开。

㉗辛卯科场案期间，适值皇太子胤礽第二次被废。在康熙的心目中噶礼系党附太子之人，故将其革职，并在两年后将噶礼处死（康熙五十三年四月十九日）。

㉘据薛福成《庸盦笔记》所记："条子者，截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文字，以为记验"，托人将条子带给考官"百无一失"。

㉙柏葰并不了解考生罗鸿绎与考官李鹤龄、浦安交通关节，只是循情让罗鸿绎考中，但因其与咸丰重用的大臣载垣等有隙，故载垣等"借此兴大狱以树威"。

清（前期）

文　字　狱

文字狱系指以语言、文字治罪于人。文字狱并非清代独有，但清代所发生的文字狱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①。

庄氏明史狱。

顺治十八年（1661）春，庄氏明史案发。庄氏系浙江湖州南浔富户，素以诗书传家，父子两代就出了九位才子，人称庄氏九龙。九龙中以庄廷鑨才华出众。庄廷鑨年纪尚轻即双目失明，遂立志效法失明而著《国语》的左丘明。故明大学士朱国桢（万历十七年进士，卒于崇祯五年）的子孙亦住南浔，朱国桢在世时曾著《皇明史概》，该书《列朝诸臣传》未刊行。清初朱氏家族已经败落②，便将先人手稿出售，庄廷鑨便以一千两银子的高价买下这部分未刊手稿，并延请名士茅元铭、吴炎、潘柽章等十几人对原稿进行修改，且增补天启、崇祯两朝，其书名曰《明史辑略》。

《明史辑略》一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刊行，庄廷鑨在此之前已去世③。经庄廷鑨之父庄允城、岳父朱佑明的全力支持，该书才得以刊行。庄廷鑨是站在故明的立场上来叙述明清

鼎革这一历史巨变的，故在述及清王朝在关外时期的历史时不用“天命”、“天聪”、“崇德”年号；明亡后仍以“弘光”、“隆武”、“永历”为正朔；在写到明军败于清军时则“拊髀捶胸，泣数行下”（该书杜松传附论）。《明史辑略》刊行不久，庄家就屡屡遭到好事之徒的敲诈勒索。

未几，名列该书参校的查继佐、陆圻、范骧向浙江按察使衙门递呈稿，声明并未参与《明史辑略》一书参校，庄允城未经本人许可即将姓名写上。在当时，许多书籍为扩大影响，在刻印时多将名士列入参校。查、陆、范都是海内名士，他们向衙门递呈稿一事愈发引起人们对该书的关注。

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风闻呈稿之事，特购一部《明史辑略》，从中摘出数十条犯忌之处，向庄家敲诈。庄允城遂通过疏通湖州分守道官员张武烈等将此事压下。赵君宋此举又引发起因贪入狱、援赦开释的原浙江粮道李廷枢的贪欲。李廷枢亦购买《明史辑略》一部，送给正担任湖州知府的门生陈永命，以求其分敲诈之银。庄允城风闻此事，立即把数千两白银送至陈永命处，陈将银两独吞，遂令人将该书书板劈毁。李廷枢未遂初愿，又与儿女亲家——因贪入狱援赦开释的前归安知县吴之荣商议，二人便向庄允城、朱佑明家敲诈，因庄、朱两家不肯就范，吴之荣便到省城向驻杭州将军柯奎告发庄氏私著逆书。庄允城很快就把巨额银两送至柯奎处，柯奎便以“武职衙门，不便与闻”为借口而将《明史辑略》退还吴之荣。吴之荣遂又前往北京，将此案告到刑部衙门。

康熙二年（1663）五月，刑部对庄氏明史案判决如下：对已故庄廷钺、董二酉（名列参校）、庄允城（死于刑部大狱）开棺戮尸；名列参校的茅元铭、吴炎、潘柽章、吴之镕、吴之

铭、吴楚、吴心一、李仍焘、严起云、唐元楼、蒋麟征、韦全佑、韦全祉及庄廷钺之弟庄廷钺、为该书署名作序的李令晰、出资刻书的朱佑明均被凌迟处死；庄、朱两家子弟十六岁以上者全部处死；该书的刊印者、出售者、收藏者全部处死；湖州原府学教授赵君宋因家中有一部《明史辑略》以私藏逆书论处；案发前三个月抵任的湖州知府谭希闵及上任不满半个月的训导王兆桢以渎职论绞；前任知府陈永命在案发后虽已自杀，仍被开棺戮尸；陈永命之弟陈永赖（时任江宁知县）、柯奎的幕僚程维崧均因明史案牵连被处死。在庄氏明史案中丧命者，共七十余人。吴之荣不仅得到庄、牛两家一半家产的奖赏，且被破格起复，任右佥都御史。

《南山集》狱。

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十二日《南山集》案发，都察院左都御史赵申乔疏劾翰林院编修戴名士"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叨列巅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板"，"仰祈敕部严加议处"③。

戴名士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中顺天乡试，四年后中进士，殿试名列第二（即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时年五十七。戴名士在出仕之前留心明代历史，著《南山集》。《南山集》中收录的方悬成（字孝标）所著《滇黔纪闻》，详细记述了南明永历时期的历史。方悬成在顺治丁酉科场案中流徙宁古塔，康熙改元后赦归，游历滇黔，三藩之乱发生后逃回家乡。康熙帝误以为方悬成与参与三藩之乱的方光琛同族，故对《南山集》一案格外关注。

康熙五十一年（1712）正月，刑部把对《南山集》案的拟处上奏："查戴名士书内，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大逆等

语。据此，戴名士立即凌迟。方孝标所著《滇黔纪闻》内也有大逆等语，应剉其尸骸。”戴名士、方孝标之“祖、父、子、孙、兄、弟及伯叔兄弟之年十六以上者俱拟立斩；十五岁以下者及母、女、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功臣家为奴，方氏族人拟发往乌喇、宁古塔”；为《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俱应立斩”；为该书刻版的方正玉、尤云鄂“闻拿自首，应将伊等妻子一并发往宁古塔安插”；“编修刘岩，虽不曾作序，然不将书出首，亦应革职，佥妻流三千里（佥音谦，佥妻意为携妻）”④。康熙对此议谕道：“案内方姓人，俱系恶乱之辈。方光琛投顺吴三桂，曾为伪相，方孝标亦为吴三桂大吏，伊等族人不可留本处也。”⑤

康熙五十二年（1713）二月，康熙对《南山集》一案作如下处理：“戴名士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方孝标子孙）俱从宽免死，并伊妻子充发黑龙江；此案内干连人犯，俱从宽免治罪，著入旗。”⑥受此案牵连的三百余人俱免死。

雍正朝文字狱

雍正三年（1725）十月十七日，汪景祺文安狱发。汪景祺系户部侍郎汪霖次子，康熙五十三年（1714）中举，雍正二年（1724）赴陕西，入年羹尧幕，著《读书堂西征笔记》，对时政多有抨击，揭露陕西地方官吏“唯以刻剥聚敛，恒舞酣歌之计而已”，“上官既无善类，俗吏朘民以奉之，加征杂派，苛政日增”⑦。在议及年号时对“正”字多有谤言，言“正”字有“一止”之象，如正德、正统、至正等年号，均有“正”字⑧。雍正三年九月，年羹尧被治罪，械系至京，在清查年氏府邸时，于乱纸堆中发现《读书堂西征笔记》手抄书两本，遂下令

将汪景祺逮系入狱。

该年十二月十八日，对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遣黑龙江为奴，其兄弟及五服之内族人俱著革职，流徙宁古塔。

雍正四年（1726）九月二十六日，查嗣庭文字狱发。查嗣庭，时为礼部左侍郎，出任该年江西省乡试主考。查嗣庭所出首场题目《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二场题目《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三场题目《有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认为，查嗣庭"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⑨，首场之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背谬"（时清廷实行荐举）；二场出题用"正"字，三场出题用"止"字，"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语相同"⑩；所出策论《君犹腹心，臣犹股肱"，"不称元首，不知君上之尊"⑪雍正遂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得日记二本"。查嗣庭在日记中对时政多有议论，"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戴名世之获罪为文字之祸"等等。

雍正五年（1727）五月，对查嗣庭一案作如下判决：对已死于狱的查嗣庭"著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子查澐"斩监候"，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瑮、查嗣庭之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著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⑫。

雍正六年（1728）十月吕留良文字狱发。吕留良，字用晦，号晚村，康熙二十二年（1683）卒。生前著述甚多，著有《吕用晦》文集，中心思想为"严华夷之辨"。湖南郴州永兴人曾静在应试途中见到吕留良的著作，遂遣其门生张熙（衡州人）到吕留良家乡购买此书。时吕留良已故去，吕留良之子吕毅中、吕留良之门生严鸿逵、沈在宽等，向张熙提供吕留良的

著作。雍正即位之初，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烈，康熙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禟、第十四子胤禵相继被治罪，曾静认为有机可乘，派遣张熙前往陕西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其举兵反清，并列举雍正有弑父篡位、杀兄屠弟之罪。岳钟琪遂将张熙逮系，严刑讯问，张熙宁死不招。岳钟琪假意与张熙盟誓，张熙中计，把曾静、严鸿逵等人的情况告之岳。雍正根据岳钟琪奏报所提供的线索，令各省将上述人一一逮系。

雍正认为，曾静、张熙之所以"犯弥天大罪"皆"因轻信吕留良邪说，被其蛊惑"，故在处理此案中，坚持严惩吕留良之子、吕留良之门生。雍正十年（1732）十二月，雍正令对吕留良、吕葆中父子"戮尸枭示"，对吕毅中"斩立决"，其家产"令浙江地方变价，充本省工程之用"。对死于狱中的严鸿逵"戮尸枭示"；对沈在宽"斩立决"；吕留良之门生房明畴、金子尚"杖一百，佥妻流三千里；陈祖陶、沈允怀、沈成之、董吕音、李天维、费定原、王立夫、施子由、沈斗山、沈惠侯、沈林友"杖一百"⑬。吕氏、严氏以及吕氏弟子黄补菴（本人已死）的家人俱发往宁古塔为奴；刻印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车鼎贲以及私藏吕留良著作的周敬舆等人俱处以斩监候。只有曾静、张熙师生被免罪开释⑭。

乾隆朝文字狱。

乾隆朝文字狱迭起，数量之多空前绝后，诗文中若不慎有"明"、"清"、"南"、"北"、"壶"（与胡谐音）均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乾隆二十年（1765）胡中藻诗狱发。胡中藻官至内阁学士，其所著《坚磨生诗钞》因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⑮、"斯文欲被蛮"、"老佛如今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

开”⑯等诗句而被处死，与胡中藻唱和的鄂昌（已故大学士鄂尔泰之侄）赐自尽。

乾隆二十二年（1767），彭家屏（曾任河南布政使）、段昌绪（生员）因收藏明季野史《潞河纪变》、《豫变纪略》、《南迁录》、《酌中志》等书被处死。

乾隆三十二年（1777），蔡显《闲闲录》诗狱发，其诗集中因有“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等犯忌字样被处斩立决。蔡显之子蔡必昭处斩监候，其妾朱氏、朱氏所生幼子以及蔡显门生闻人卓、刘朝栋、吴秋渔等二十四人均遭流徙。

乾隆四十二年（1787），王锡侯因所编《字贯》（即字典），凡例中直书圣祖、世宗庙讳被解京治罪，处斩立决，此狱之后，有清一代无人再敢编纂字典。

乾隆四十三年（1788），已故徐述夔因所著《一柱楼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致使其孙徐食田、徐食书以及该诗集的校对者徐首发、沈成濯均被处死，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被开棺戮尸。

乾隆四十四年（1789），冯王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相继发。

冯王孙所著《五经简泳》中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句，谓有复明削清之意，将冯王孙凌迟处死，冯王孙之子冯生梧、冯生桐处斩立决，冯王孙之妻、儿媳、孙给功臣家为奴。

沈大绶生前著《硕果录》、《介寿辞》。其子沈荣英谓书内有悖逆之语，持书自首。乾隆认为沈荣英自首并非出于真心，令将沈荣英及刻书之人陈湄、江苏斩立决；沈大绶的兄弟子侄

共九人一并处死；收藏书板的庄老满被处斩、沈大绶之妻、媳、孙俱给功臣家为奴；沈大绶本人被开棺戮尸。

石卓槐因所著《芥圃诗钞》中，因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衣冠都作金银气”等句，诏凌迟处死，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列名参校的蒋业晋、曹麟开发往乌鲁木齐。

祝廷铮生前所编《续三字经》有“发披左，衣冠更，虽华夏，遍地僧”之句，诏开棺戮尸，其孙祝浃等五人处斩。

乾隆四十五年（1790），戴移孝、戴昆父子因所著诗集内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等句，诏开棺戮尸，戴氏孙戴田霖、曾孙戴世道、戴世德、戴世法均被处死。

乾隆四十六年（1791），有卓长龄、尹嘉铨、程明禋之狱。

卓长龄生前所著《高樟阁诗集》中有“可知草莽偷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楚衽乃知原尚左，剃头轻卸一层毡”等句，被人告发，诏开棺戮尸，其孙及曾孙五人被处死。

尹嘉铨，官至大理寺卿，因自称古稀老人，与御制古稀说相同，按大不敬罪处死；程明禋则因给郑友清的寿文中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郑友清本湖北人，在河南发家）被人告发，程明禋被凌迟处死，其弟程明珠斩立决，妻子给功臣家为奴，其门生均杖八十。

乾隆四十八年（1793），李一、乔廷英之狱发。李一的《糊涂词》中有“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师相无非糊涂”之句，被乔廷英告官；乔廷英的诗中亦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壮士终当营大业”等句。二人均被凌迟处死，两家子孙五人被斩，二人之妻、媳均给功臣家为奴。

在乾隆的统治下，文网之密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历史时期。

注　释

①清代文字狱之多同当时所存在的满汉畛域、封建社会进入晚期思想钳制愈烈有一定关系。

②朱国祯一孙死于明末农民战争，一孙死于抗清，一孙死于清初战乱。

③《东华录》卷二一。

④⑤《清圣祖实录》卷二四九。

⑥《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

⑦引自《清史编年》雍正朝第159页。

⑧正德（明武宗）无嗣，正统（明英宗）遭木土之变被也先俘虏，至正（元顺帝）从大都撤回塞外。

⑨《清世宗实录》卷四八。

⑩⑪引自《清史编年》雍正朝第217页。

⑫《清世宗实录》卷五七。

⑬《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

⑭雍正十三年十月初八，乾隆令将曾静、张熙解京候审，十二月十九日凌迟处死。

⑮乾隆认为："加浊字于国号（清）之上"居心险恶。

⑯乾隆认为：此句诗"尤为奇诞。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乃有朝门不开之语!"

清（前期）

乾嘉汉学综述

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特别是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即乾隆、嘉庆两朝，达到了全盛阶段，产生了所谓“汉学”。这一时期，无论是经学、史学，还是金石考古、天文历算，乃至舆地诗文诸学，几乎整个知识界都为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之风所笼罩。高踞庙堂的程朱理学败象毕露；由空返实的乾嘉汉学蒸蒸日上。“家家许郑，人人贾马①”，拔宋旗，立汉帜，在中国学术史上形成了堪与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相媲美的清代汉学。“汉学”是相对于“宋学”——宋明理学而言，指研究经学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说。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汉学不同于以往其它思潮和学派，就其学术宗旨而言，称为“汉学”；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言，称为“朴学”或“考据学”；就其时代而言，又称为“乾嘉汉学”。

乾嘉汉学的形成

乾嘉汉学的勃兴并最终取代程朱理学成为百年间学术的主流，并非一个偶然的历史现象。汉宋学术在封建社会后期的更

迭，既是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体的学术思想内在逻辑发展演变的结果。

乾嘉之际，清朝的统治逐步稳定，经济恢复发展，满汉间的民族矛盾亦趋缓和，加之清王朝统治者对汉族知识分子安抚拉拢与压制扼杀，清初思想界生动活泼的气象被顺、康两朝迭兴的文字狱彻底摧毁。在尊崇孔子，提倡儒学，编纂古籍的政策引导下，士大夫逐渐转向对古代典籍的整理和诠释之上。

中国学术发展到清代，随着理学的衰微及动荡的社会更替所引起的巨大冲击波，学术思想界酝酿着新的思潮。这一思潮以考证经史为方法，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形成了具有鲜明批判理学色彩的实学思潮。一方面，这一思潮提倡经世济世之学，打破了宋明理学在几个世纪中对思想界的束缚；另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创立出反映新的经济因素的新的理论，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只能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这种浓厚的法古色彩，导致了清代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辨，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

乾嘉汉学的初兴

继明末清初经世之学大师黄宗羲、顾炎武后，胡渭、阎若璩、毛奇龄、万斯同、姚际恒、顾祖禹等人，作为清代汉学的先驱，开启了强调通经，重视实证，却拘守烦琐、法古色彩浓厚的乾嘉汉学的先河。

汉学发轫之初，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以“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②自励，“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③，且淹贯群山，博学多能，长于考证。阎若璩、胡渭对《河图洛书》的辨伪，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毛奇龄的《四书改错》都反映出这一时期学者开

始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趋势。

乾嘉汉学兴起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阎若璩。胡渭做《易图明辨》，消除了易经研究中的神秘色彩，证明了“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④皆由此出。《河图洛书》是道士的修炼术，对“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⑤的《河图洛书》给予无情的打击。“宋学已受致命之伤”⑥。阎若璩做《古文尚书疏证》，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中提出详实的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证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而“袪千古之大疑”，“古今之伪乃大明”⑦。胡、阎二人的著作，其价值不仅在考证方法和整理古文献方面为以后的汉学家提供了例证，更重要的是，他们这种敢于大胆怀疑权威的精神，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儒家经典的权威地位。胡、阎二人及其同时代的学者开启了一代汉学的风气，他们在治学上侧重于审音读字和具体的证据，既未打出“汉学”的旗帜，也没有完全摆脱宋明理学的影响，“虽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时糅杂宋明之谰言”⑧。

乾嘉汉学的鼎盛

乾嘉汉学“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其名，任裁断’⑨。“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⑩的局面的形成，标志着乾嘉汉学作为一代学术思潮已臻于鼎盛。

吴派代表惠栋（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在家庭浓厚的学术风气的影响下，惠栋“自幼笃志向学，家有藏书，日夜讲

诵。自经史诸子百家杂说及释道二藏，靡不穿穴”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风。惠栋的学术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主张治经从研究古文字入手。他提倡由古书的文字音训以求义理，这一点成为以后汉学家共同信奉的原则。惠栋针对魏晋以来对经书牵强附会，随意曲解，甚至篡改经籍，使经书的意义晦而不彰的浮夸玄虚的学风，强调治经、学经必须从声音训诂、校勘考证的基本功夫入手，以消除长期以来随意主观附加在古书中的误解和歪曲。在惠栋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影响下，清代汉学家对古籍进行了广泛、深入地重新注释校订，更正了大量错误，使原来附属于经学研究的“小学”在清代得到极大的发展。二是尊信和固守汉儒的说经。惠栋高举“汉学”的旗帜，“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完全抛弃了魏晋以后的经说，回复到汉代经学中去。从反宋走向复汉，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的主流。惠栋一生专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九经古义》、《古文尚书考》等书，使绝者“千有五百余年”的汉学“至是而粲然复章矣”⑫。惠栋在对汉学搜辑钩稽中，不免受汉代糟粕思想的影响，正如《四库提要》中对惠栋的评价，“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⑬。在惠栋的影响下，他的朋友、学生沈彤、余肖客、江声以及王鸣盛、钱大昕及大昕的弟侄钱大昭、钱塘、钱坫等都恪守其尊汉的学术路径，成为汉学中吴派的中坚力量。

皖派的代表戴震（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戴震学问渊博，识断精审，集清代考据学之大成，不仅是清中叶乾嘉学派中最突出的学者，而且多次著文，抨击程朱理学，阐发唯物主义思想，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戴震的学术特点主要表现在：一，重视

小学和考据，在音韵、训诂、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上做了突出的研究。由于戴震精通小学，从音韵、训诂的基本功夫入手，在治经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用他自己的话说，“仆之学，不外以字考经，以经考字”⑭。“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⑮。二，戴震作学问，强调“志存闻道”，不只是停留在对古籍字句的校勘证订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强调“君子务在闻道”⑯。对大多数汉学家墨守古经传注，绝口不谈义理的作法提出了批评。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不仅是一部对《孟子》进行考证注疏的著作，更是一部“正人心”⑰的哲学著作。戴震在“志存闻道”思想的影响下，继承了清初思想家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唯心主义理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通过理、气这一世界本原之辨，批判宋儒“理先气后”之说，阐发“理在事中”的唯物观，并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人性论和理欲说。

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多治《周易》、《尚书》，以戴震为首的皖派擅长三礼，尤精小学、天算。吴派完全遵循汉代经师所倡导的朴实考据学风，提倡“古训不可改，经师不可废”，主张复古，“治经求其古”，唯汉是好，唯古是信；皖派吸取了吴派的长处，融惠学为己有，将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与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主张“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导义理”，强调求实，“治经求其是”⑱，识断精审。两派以训诂入手治经，在学术渊源上，一脉相承，但在治学内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当然，吴、皖两派并不能概括整个乾嘉学派。同样治经学，顾栋高、秦蕙田各以《春秋》、《周礼》名家，非惠、戴所能比拟；同样治史学，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钱大昕皆独辟蹊径，非惠、戴所能拘囿；此外，乾嘉儒臣，朱筠、周永

年、纪昀、陆锡熊，阮元等博学多识，其学亦不在惠、戴范围之中。当然，“各派共同之点甚多”，这一根本点，是乾嘉汉学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独立学派的重要原因。

乾嘉汉学的余脉及成就

乾嘉汉学在戴震时达到顶峰后，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戴震的后继者分成两派：一派以段玉裁、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为代表，继承了音训考据之学，方法更加严密，成绩更加突出，但对戴震所注重的“义理”避而不谈；另一派以汪中、凌廷堪、焦循、阮元为代表，兼治音训考据及义理之学，在发挥戴震的哲学思想中，议论渐渐平和，走上汉宋合流的道路。

乾嘉汉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经学。乾嘉汉学之于经学，潜心整理，尤称专精。无论是本经的疏解，还是群经的通释，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二、文字、音韵学。由于汉学家治经、说经必由文字的音韵训诂入手，奉“读书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字始”为圭臬，音韵文字之学因之而昌盛。三、校勘辑佚。乾嘉学者视校勘辑佚为专门学问，竭毕生心力于其中，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经学方面对两汉经师、经说的表彰，史学方面对两晋六朝及宋元散佚著作的辑录，文学方面对先秦诸子特别是《荀子》、《墨子》、《管子》三书及有关古籍所取得的成就为历代学者所不及。四、史学。乾嘉学派治史犹如治经，注重总结整理。特别专注于古代史籍的整理。或校勘其讹误，或订正其史实，或补辑其遗阙，或整理其故事。在整理古籍中，崇尚求实考核而不主张议论、褒贬。

清代的汉学家们以极深厚的功力和极扎实的态度对古代文

献进行了细致的荜路蓝缕的工作，剔除了两千年来对古籍的歪曲和误解，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复古主义和烦琐主义，成为一个狭隘、偏枯的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历史转折再次到来之际，乾嘉汉学走过了它的全盛时期，趋于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面向现实、提倡经世的今文经学的兴起。道光以后，汉学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汉学博大精深、方法严密的优点，只有少数学者，如俞樾、孙诒让继承了乾嘉大师的遗续，保持朴实的学风，在专业领域中作出了贡献。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今疑义举例》；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等，作为乾嘉汉学的余脉，在学术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终究无法与已在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今文学派相抗衡，汉学已走完了全部的历史路程，走向了终点。

注　释

①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许即许慎，郑即郑玄，贾即贾逵，马即马融。他们都是东汉的著名经师。

②③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一。

④⑤⑥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⑦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经部、书类。

⑧⑨见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⑩见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

⑪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

⑫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九《惠先生栋传》。

⑬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五，经部、春秋类。

⑭见陈奂《说文段注跋》。

⑮⑯见《戴震集》卷九。

⑰见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⑱见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清（前期）

中西文化的冲融

1540 年，西班牙贵族罗耀拉·依纳爵创建耶稣会，得到罗马教皇的承认，该宗教团体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南欧地区影响很大①。由于麦哲伦、哥伦布的航海事业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在东、西之间海上通道开辟之后，耶稣会便成为首批向亚洲地区派遣传教士的宗教团体。

自利玛窦②在明万历初期来华传教③，耶稣会传教士陆续来华，其中留有著述者七十余人。在清代影响大的有汤若望④、南怀仁⑤、张诚⑥、徐日升⑦、戴进贤⑧等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西文化的冲融。

传教与禁教。

传教是耶稣会士来华的宗旨，自利玛窦以来，陆续开辟的传教地点有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上海、杭州、西安等地。至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康熙晚年）建立教堂三百余座，受洗教徒三十万；翻译、编写的关于基督教教义、基督教哲学的书籍，有《超性学要》⑨、《复活论》⑩、《西学凡》⑪、

《穷理学》⑫、《灵言蠡勺》⑬、《圣经直解》⑭、《灵魂道体说》⑮等等。

耶稣会传教士所宣扬的以西方基督教文明为中心的神学体系，同中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安文思、利类思在康熙三年（1664）所发表的《天学传概》，甚至断言伏羲系亚当子孙，中国最初也是信奉基督教的。这种把中国文明视为西方文明分支的观点，既与史实相悖，亦成为酿发教案的导火线。

自顺治十六年起（1659），徽州官生杨光先⑯相继撰写《摘谬论》、《辟邪论》、《正国体呈》等，对基督教教义、西洋历法进行抨击，指责传教士"呼朋引类"，是"国家莫大的危险"⑰，"如厝火于积薪之下"。《天学传概》刊行后，杨光先又对该书予以批驳，名曰《不得已》。杨光先在《不得已》一书中，指责"基督是一叛徒"，"传教士俱为捣乱分子"，"被由欧洲驱逐了出来，才到中国来的，他们在中国依然煽惑民众"⑰。同年七月二十六日，杨光先向礼部上《请诛邪教疏》，礼部遂将此疏呈四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四辅政下令传讯汤若望等人，并令将各省传教士押解来京一同受审。由此而引发的便是清代第一次教禁，至结案时所有传教士被押往广东，驱逐出境⑲。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为汤若望等昭雪，解除教禁。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罗马教廷强令在华传教士改变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所开创的允许入教中国人保留祭孔、祭祖的习俗，致使清廷同罗马教廷关系恶化。一向对耶稣会传教士优容的康熙帝已有禁止传教之意⑳。雍正即位后，把曾替胤禟㉑传递密信的传教士穆经远处死㉒，又于雍正元年十二月（1724 年初）批准闽浙总督觉罗满保之奏，"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外，

余俱安插澳门"，"天主堂改为公所，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23]。

清廷再行禁教后，"西洋神父之潜入内地者，陆续不绝"[24]，乾隆、嘉庆时期厉行禁教之策。乾隆十一年（1746年）在福建福安县秘密传教的白禄多被处斩立决，华若亚敬、费若若、施方济格、德方济格被处以斩监候。乾隆令地方官将关押在狱的四名传教士秘密处死，以"瘐毙"上报[25]。两年后（乾隆十三年）又令江苏巡抚安宁对在该省传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葡萄牙人黄安多秘密处死，以"瘐毙"奏闻[26]。乾隆在密谕中强调不得泄秘，"以致泄漏"，参与"监毙"传教士的官员，"免其议处"[27]。嘉庆十年（1805），江西查获传教士德天赐遣人去澳门送秘密地图，立即将德天赐逮捕"圈禁"。嘉庆十六年（1811），清廷又一次下达清查传教士的命令，除在钦天监供职者外，俱"遣令归国"[28]。

修定中西合璧的历书。

自从汉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董仲舒创建天人感应[29]的神学体系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天意与人事的合谐统一。为了表明受命于天，任何一位当权者都需要一份准确无误的历书[30]。一旦历书上所标明的日月交食[31]、星体运行等情况与实际不符，就不免产生"天象示警"的危机。自明代中叶以来，"交食往往不验，议改历者纷纷"，至万历年间"时差九刻"，"节气差一日"，"置闰差一月"，"闰差一月，则时差一季，时差一季，则岁差一年"[32]。为表明上天依旧眷佑明廷，修历的呼声愈高，利玛窦抵华不久，即向罗马教廷建议"火速派遣天文学家、懂得历算学的人到北京来"[33]。明崇祯二年（1629），诏开历局。在华传教士邓玉函、汤若望等均予修历。

崇祯十四年（1641）按照西洋推算的中西合璧的历书制成，上报明廷。两年后（崇祯十六年），崇祯帝诏令自明年起使用新历，但新历未及实行，明廷就已覆灭。

清顺治元年（崇祯十七年，1644），摄政王多尔衮在占领北京后，令汤若望制定顺治二年历书，“用新法正历，以敬迓天休（天赐福祐之意）”㉞。该年十月初一，新历颁行天下。新历采用西洋推算方法，引用了经纬度、球面三角学等新观念，以九十六度刻日（旧历以一百度刻日）；对节气的制定以太阳在黄道上实际运行的位置为标准，废除我国传统制历所采用的“平气”法㉟；新历依旧保留我国传统的阴阳合历的结构㊱。

顺治元年十一月，清廷任命汤若望担任钦天监监正（正五品），掌管钦天监印信及“一切进历、占候、选择等项”。从1644年至1837年（道光十七年）鸦片战争前夕，除杨光先发动教案的四年（康熙四年至康熙八年），钦天监监正、监副均由传教士担任㊲。

自清初以来，在华传教士均把“数理天算”“作为一种传教的手段”㊳，传教士之“得以在中国立足，唯一所依恃的是历算”㊴。雍正以来禁止传教的政策，难以彻底执行，即源于此。

西方自然科学的传播。

十六世纪末叶至十七世纪末叶的一百年间，正是以哥白尼、伽里略、牛顿所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确立、形成的时期，经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近代科技成果有：

伽里略发明的望远镜㊵；

伽里略的自由落体定律㊶；

那皮尔的《对数方法论》㊷；

惠更斯改良望远镜、发现木星卫星㊸；

托里拆里的大气压力学㊹；

哥白尼的日心说㊺；

刻普勒的行星运动规律㊻；

牛顿的见色现象㊼及万有引力学说㊽；

人体解剖学㊾及火炮制造新技术㊿。

西方音乐的传入。

自从利玛窦向万历皇帝进献钢琴以后，西方乐器以及乐理知识先后传入。

汤若望不仅精通天文、历法，对音乐亦有研究，明崇祯年间曾把利玛窦所献钢琴修好，且奉崇祯帝之命另造一架钢琴。清顺治九年（1652），汤若望在南堂（位于宣武门）安装自制的管风琴[51]。

康熙十年（1672）精通音乐的法国传教士徐日升从澳门来京，充任宫廷音乐教师。“徐日升用汉语编写了教材，并指导工匠制作各种各样的乐器”[52]。徐日升所编写的教材，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记谱、音阶、和声等乐理知识的著作[53]，康熙第三子胤祉所编纂的《律吕纂要》，即以徐日升的教材为蓝本。

康熙四十九年年底（1711年初），精通音律的意大利籍传教士德理格从澳门来北京，继任宫廷音乐教师[54]。德理格擅长演奏管风琴、铃鼓、羽管键琴、小提琴等多种西洋乐器。康熙令“德理格在皇三子、皇十五子、皇十六子殿下前，每日讲究其精微”[55]，且传旨德理格“用心好生教，必要教他们懂得音律要紧的根原”[56]。在德理格的指导下，皇三子胤祉把西洋音乐中的半音加入中国音乐。康熙六十岁寿辰之时，德理格把

"能自动演奏"的"一架小管琴"作为寿礼呈献。德理格参与编纂《律吕正义》，其在担任宫廷教师期间创作小提琴奏鸣曲[57]十二首[58]。

乾隆时期，在清廷服务的精通音律的传教士除德理格，还有魏继晋（德国人）、鲁仲贤（波西米亚人，今捷克）、钱德明（法国人）[59]等。魏继晋、鲁仲贤为乾隆训练了一支由十八名太监组成的合唱队，他们还合作创作十六首歌曲（作词、谱曲），以备宫中演出之用。

宫中所保留的西洋乐器有小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竖笛、吉他、响板、钢琴等共计几十件，均系传教士所奉献。

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京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为清帝演出意大利歌剧《切尼娜》。

参与绘制《皇舆全览图》。

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廷下令绘制《皇舆全览图》。耶稣会士雷孝思、杜德美、白晋等均参与实地勘测，历经十年的时间，足迹遍及十八个行省。《皇舆全览图》是我国运用近代科学方法[60]所绘制的第一份地图。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出兵伊犁，在生擒准噶尔部首领达瓦齐[61]、占领新疆北部之后，即派遣何国宗[62]与传教士傅作霖、高慎思等去北疆实地勘测，对《皇舆全览图》进行补充。他们在抵达巴里坤后，分两路勘测，一路由傅作霖率领走北路抵伊犁；一路由何国宗、高慎思率领走南路，经吐鲁番抵喀喇沙尔，再沿裕勒都斯河而上。何国宗等一行抵北疆后不久，准噶尔部前首领策妄阿喇布坦[63]的外孙阿睦尔撒纳发动反清叛乱，清廷召何国宗等回京（乾隆二十一年）。何国宗奉命回京，傅作霖、高慎思两位传教士仍留在天山南北继续进行勘

测，足迹远至塔什干、喀什米尔等地，直至乾隆二十四年（1759）才返回北京。在实地勘测的基础上，清廷组织绘制《皇舆西域图志》，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对《皇舆全览图》予以增补，增加新疆地区的地图。

耶稣会士来华所带来的不单是宗教，还包括西方的科学、文化、艺术等等，推动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耶稣会士杜赫德（法国人，1674－1743）在担任《海外传教士书信集》主编期间，利用在华耶稣会士书信中有关中国的情况介绍，编纂《中华帝国和中国鞑靼的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史和自然志》一书，该书四卷，1702年首次出版。传教士钱德明曾将乾隆的御制诗《盛京赋》、《清文汇书》译成法文，另著有《中国兵法考》、《孔子传》等著作。上述著述、译著，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架起一条彼此沟通的桥梁。

注　释

①耶稣会反对宗教改革，维护封建制度，在欧洲耶稣会士是“伪善者”的同义语。

②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

③利玛窦来华时间，记载不一，一说1580年（万历八年），一说1581年（万历九年），一说1582年（万历十年）。

④汤若望（1592－1666），德国人。

⑤南怀仁，比利时人，卒于1688年。生年说法不一，魏特：《汤若望》中记为1608年、恒慕义所编《清代名人传略》记为1623年。

⑥张诚（1654－1707），法国人。

⑦徐日升（1645－1708），葡萄牙人。

⑧戴进贤（1680－1707），德国人。

⑨《超性学要》节自《神学大全》第一部，译者为利类思（1602－

1682，意大利人）。

⑩《复活论》节自《神学大全》第三部，译者为安文思，安文思系葡萄牙人。

⑪《西学凡》著者为艾儒略（1582－1649）。

⑫《穷理学》著者为南怀仁.

⑬《灵言蠡勺》著者为意大利人毕方济。

⑭《圣经直解》著者为葡萄牙人阳玛诺。

⑮《灵魂道体说》著者为意大利人龙华民。

⑯杨光先（1597－1669），明崇祯十年（1637）因弹劾内阁首辅温体仁被流徙辽东，名声大震。

⑰⑱魏特：《汤若望传》，第472—473页。

⑲康熙四年四月初三所作的判决中规定：除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留京候审外，其余传教士俱押往广东，逐至澳门。

⑳据《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所载，康熙曾讲过："以后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

㉑胤禟系康熙第九子。

㉒托马斯：《北京教会史》，第361页。

㉓《东华录》卷二五。

㉔ 肖亚瑟：《天主教传行中国考》，第364页。

㉕《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第109页。

㉖㉗《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七。

㉘《清仁宗实录》卷二四三。

㉙董仲舒认为："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省改，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倘不知变，而败伤乃至。"

㉚中国古代历书包括朔望、节气，日月星辰在天体的位置及运动，日食、月食发生的时刻及五大行星的方位等等。

㉛日月交食即指日食、月食。

㉜《明史·历志》。

㉝恩斯特·斯托莫：《通悬教师汤若望》。

㉞《清世祖实录》卷六。

㉟把一年平均分为二十四分，每一分就是一个节气（相隔十五天）。

㊱阴历历月以月相盈亏为据，大月30日、小月29日，十二个月为一年，一年354或355日。阳历依据天象而定一年的长短，月的规定与月相盈亏无关。阳历一年为365日或366日，为调节阴历与阳历一年的时差，每隔三年置一次闰月，五年再闰。

㊲1837年，担任钦天监监正的传教士高守谦回国，监副毕学源病故，清廷不再任命传教士在钦天监任职。

㊳㊴魏特：《汤若望传》，第422页。

㊵汤若望在1626年著《远镜说》。

㊶南怀仁在《穷理学》一书中谈及落体的加速度现象。

㊷穆尼阁曾向薛凤祚讲授过对数法；戴进贤在《策算》中介绍对数表及使用方法。

㊸法国传教士蒋友仁介绍过发现木星卫星一事。

㊹南怀仁在《穷理学》中解释压力现象。

㊺蒋友仁在1744年（乾隆九年）介绍哥白尼的日心说。

㊻钦天监官员编纂的《历象考成后编》，采用了刻普勒所提出的行星运行为椭圆运动的理论及牛顿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的方法。

㊼《穷理学》中介绍了光分五色的说法。

㊽钦天监官员编纂的《历象考成后编》，采用了刻普勒所提出的行星运行为椭圆运动的理论及牛顿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的方法。

㊾汤若望曾进献人体图。

㊿三藩之乱期间，南怀仁曾给清廷铸炮一百二十尊，此后又铸炮近四百尊。

51谈迁所著《北游录·记邮》对此有记载。

52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信中所言。

53对五线谱、七音阶及多声部均有详论。

⑭在此三年前（1708）徐日升病逝。

⑮《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

⑯《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华书局影印本，中册，第351页。

⑰当时的奏鸣曲有两类，一类用于教堂，另一类用于宫廷。

⑱德理格所作奏鸣曲抄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其风格与同时代的德国作曲家巴赫相近。

⑲钱德明著有《中国古今音乐记》一书，并将中国乐器笙带回法国，笙的发音原理对风琴、手风琴、口琴的改进起了促进作用。

⑳采用传教士所介绍的经纬度测绘法、梯形投影法。

㉑达瓦齐系准噶尔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之后。

㉒何国宗，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参与编纂《律历渊源》（由《历象考成》、《律吕义》及《数理精蕴》组成）和《历象考成后编》。

㉓策妄阿喇布坦系巴图尔珲台吉之孙，噶尔丹之侄。

清（前期）

堂子祭天

昭梿在《啸亭杂录》中对满族的堂子祭天写道："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诸神祇于静室，名曰堂子，即古明堂会祀群神之义。"

女真传统的萨满教。

堂子祭天源于女真古老的萨满教①。萨满主持各种祭祀，以"天神"附体耸动视听。萨满祭祀时使用神鼓、神刀、神杖、神杆等物。故萨满住地的两则立有木杆数根，称之神杆，用于祭祀天神。萨满自称能占卜凶吉，能为人消灾治病，满人生病，均请萨满驱除病魔，俗称"跳大神"。

堂子祭祀制度的制定。

早在天命时期，后金统治者曾先后在兴京老城、东京辽阳、盛京沈阳的宫殿内设有堂子。崇德改元（1636）对堂子祭祀的时间、供品仪式、规模等规定如下：元旦拜天及出征、凯旋均为大祭，"皆帝所躬祭，其余月祭、杆祭、浴佛祭、马祭则率遣有司"②；民间不得设立堂子；皇后寝宫外东南角矗立着祭天用的神杆，长两丈，直径五寸；神杆顶部安着锡斗，里

面盛着供天神享用的碎肉、米谷。

堂子祭祀诸神。

主祀为天神。天神系指人们臆念中主宰日、月、星辰、风、雨、雷电之神，又称“昊天上帝”。立杆大祭即为祭天神而设。

从祀诸神有释伽牟尼、菩萨、关帝、邓将军、蒙古神穆哩罕、佛立佛多鄂谟锡玛玛、纽欢台吉、武笃本贝子以及万历妈妈③、锁头妈妈④两位女神。从祀诸神的神位供奉在皇后寝宫的西间⑤，“所祀曰元旦行礼、曰日祭、曰月祭及翼日祭、曰报祭、曰大祭、曰背灯祭”⑥。

从祀诸神有朝祭、夕祭之别。朝祭在清晨，夕祭在夜间，朝祭以三弦、琵琶为乐，夕祭以腰铃、鼓板为乐。

朝祭所祀之神为释迦牟尼、菩萨、关帝，祭祀时“司香预悬黄幔”，将佛祖、菩萨、关帝像移至“东向，左右炕上置低桌二，陈炉、盏各三，时果九，糕十，炕前置献案”。“司俎等进二豕，司香献香”，司祝献酒。

夕祭所祀之神为蒙古诸神、万历妈妈、锁头妈妈。因锁头妈妈是裸体女神⑦，祭礼时要撤掉灯火，又称之为“背灯祭”。乾隆十二年（1747）定“背灯供献”仪式，司俎奉献肉后，“司香敛毡，展青绸幕，掩灯火，众出，阖户留司祝及侍板鼓内监”，“司祝坐杌（音务，小凳）上，振铃杆”，四次致祷辞，“击鼓拍板以和”。祭毕“启扉明灯，司俎撤俎，司香卷幔”⑧。

建在长安街的堂子。

清王朝迁都北京后，在长安街御河桥东建立堂子，内有祭神殿五间，坐北朝南，房顶为黄色琉璃瓦。祭神殿前面建有拜

天圜殿，坐南朝北，“中设神杆石座，稍后两翼分设各六行，行各六重”⑨。东南方向有上神殿三间，祭祀土、谷诸神。堂子四周种植松树，祭天时可充作神杆。

清入关后允许满洲官员、八旗兵丁自设堂子，祭天所用神杆，取自建在长安街上的皇家堂子。但需呈报礼部，获允后方可任取一株，同时要补种幼树一株。

元旦拜天。

腊月二十六，内务府官员赴皇后寝宫，把神位移至“神舆”内，由“内监舁行”，神舆前有“御仗八，灯四，司俎官六人，掌仪司一人，侍卫十人，导至飨殿供奉，朝夕献香”。除夕之日，将堂子内原有神杆及所悬纸帛等焚烧，另将新神杆竖上，新纸帛挂好。

元旦之日清晨，“帝乘舆出宫，陪祀王公等随行至堂子内门降，入中门，诣圜殿，就拜位，南向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毕回銮”⑩。正月初二，内务府官员去堂子取回诸神牌位，送还坤宁宫西暖阁。清朝皇帝在此日于坤宁宫内赐蒙古王公、满汉大臣吃祭神肉，把祭堂子所用的白煮肉分赐诸臣。诸臣依次而入，先向供奉在神幔后面的神位叩首，再向坐北朝南的皇帝行跪拜之礼。司俎官将祭神肉呈上，君臣席地而坐，用刀割肉而食。

康熙十二年（1673），清帝令“罢汉官与祭堂子”；康熙二十九年（1680）“谕令皇子随行礼”。

出征、凯旋祭堂子。

凡较大的军事行动，在出师之前及凯旋之后，清朝皇帝都要亲祭堂子。“届期，兵部建大纛，具祀纛篇，帝御戎服”，“法驾卤簿为导”。“帝入堂子”，“诣圜殿就拜位，南向立，率

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角螺齐鸣，出内门，致礼纛神，礼成乐作，车驾启行”⑪。

追至大军凯旋，清帝“率大将军及从征将士诣堂子告成；若命重臣经略军务，以讨不庭，亦如之”。

乾隆十四年（1749），清帝再次重申：“兵戎，国之大事”应“先礼堂子”，“恪遵旧制”。

立杆大祭。

每年春秋二季举行。于二月、四月、八月、十月上旬择吉立神杆祭天神。按照崇德年间的规定，“亲王、郡王、贝勒祭三杆，贝子、镇国、辅国公二，镇国、辅国将军一”。所用神杆以三丈长、五寸直径的松木，在祭祀的前一天竖在石座上；“司香预悬神幔炕上，置漆案，陈碟三”；“司俎二人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帝像，舁至堂子”；“神杆间悬黄幡挂纸帛”；“飨殿北炕案上陈打糕、搓条饽饽盘九，酒盏三”；“圜殿高案则盘三，盏一”。“卒事，司香卷幔撤香，奉入宫”⑫。

如皇帝亲与立杆大祭，“殿内敷采席，覆红毡，甬道布棕荐。届时乘舆出宫，满大臣随扈至堂子”，“帝降舆入中门，诣飨殿前，东向坐，司祝献酒，举神刀祷祝，奏弦拍板，拊掌歌鄂啰罗”。皇帝在一跪三叩圜殿后“升座”，“赐王公等炕前坐。尚膳正、司俎官进胙糕，尚茶正献酒；帝受胙，分赐王公”⑬。

月祭。

每月初一举行，祀神为田苗神，祭祀地点在堂子上神殿，“神案上盘一盏”，一份“时食醴酒”。“司俎挂净纸杉柱上，诸王护卫依次挂之。内管领一人入，除冠服，解带，跪叩”，祈田苗神“贶以嘉祥”，“升以康宁”⑭。

浴佛祭。

每年四月初八佛祖释迦牟尼诞日祭堂子，称之浴佛祭。

祭祀之前，“赴坤宁宫请佛亭及菩萨、关帝圣像”。祭礼之日“不宰牲，不理刑名”；祭品有“椴叶饽饽、醴酒红蜜”⑮；祭祀地点在拜天圜殿。

马祭。

马祭在春、秋二季择吉举行，“为所乘马祀圜殿”。祭品“打糕一盘、醴酒一盏”，祭祀地点在拜天圜殿。司香上香后，牧长牵十匹白马“立甬道下”，“司祝六献酒”，祝辞曰：“抚肤以起兮，引鬣以兴兮，嘶风以奋兮，嘘雾以行兮，食草以壮兮，啮艾以腾兮，沟穴其弗逾兮，盗贼其无扰兮，神其覛我，神其佑我”⑯。祷毕，把拴在马鬃上的绸条取下，放到香炉附近熏少许，再将绸条交给牧长，“系之马尾”。

马祭除在堂子举行外，另在马神室举行朝祭、夕祭，由内务府大臣去坤宁宫请神位⑰。朝祭“陈香、酒、食品”，“司俎进二豕，熟而荐之”，夕祭仪式同朝祭，唯“别置神铃案东，展背灯布幕，振铃杆，摇腰铃”，祝辞为“牧群繁息”⑱之意。上驷院的官员以及各牧马厂的官员均在马神室参加马祭。

乾隆三十六年（1771）规定，萨满要参加马祭“叩头”，“致祭”。

拜天与郊天并重。

清王朝定鼎燕京后，在保持堂子拜天的前提下，承袭朱明王朝所有祭天盛殿——祈谷（亦称祈年）⑲、雩礼⑳、冬至郊天㉑。乾隆时期对天坛㉒中的祈年殿、皇乾殿、皇穹宇、圜丘坛先后进行改建、扩建㉓。清朝统治者把祭堂子作为维系本民族的手段，把承袭汉民族传统的祭天仪式，作为巩固在中原地

区统治的精神支柱。

注 释

①萨满教创建于金代。

②《清史稿·礼志四》。

③据传万历妈妈系明万历帝母，一年努尔哈赤到北京朝贡，万历帝听信谗言欲杀努尔哈赤，经万历之母讲情，努尔哈赤才得生还。

④传说锁头妈妈系明将李成梁侍妾梨花夫人。努尔哈赤在未发迹前，曾在李成梁帐下当差。李成梁恐努尔哈赤为患欲将其杀死，梨花夫人遂将努尔哈赤放走，自缢而死。

⑤沈阳清宁宫的西四间为神堂，北京坤宁宫的西暖阁供奉神位。

⑥《清史稿·礼志四》。

⑦据民间传说，李成梁得悉侍妾梨花夫人放走努尔哈赤，便将已经自缢身死的梨花夫人衣服剥光，重责四十，以示惩处，羞辱。

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清史稿·礼志四》。

⑰满族入关后仍以骑射为本，故对马祭极为重视。

⑱《清史稿·礼志四》。

⑲祈年，每年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在祈年殿“为民祈谷”。

⑳雩祀，农历六月择日举行，在天坛圜丘坛求雨。

㉑郊天大典，每年冬至在圜丘坛举行。

㉒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称为天地坛，明嘉靖九年（1530）另建地坛、天地分祀，建拜天台（即圜丘坛），皇穹宇。

㉓乾隆十七年（1752），清廷扩建圜丘坛，并将祈年殿、皇穹宇、皇乾殿等建筑的琉璃瓦全部换成蓝色，以表现蓝天在上，无边无垠。

清（前期）

满族汉化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要被那些他们所征服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①。在明清之际，满族文化、经济较汉族落后，伴随着清军入关、定鼎燕京，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均因受汉族的影响而发生变化，史称汉化。

语言文字及风俗的变化。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后，一直提倡满语、骑射，实际上自顺康以来满洲贵族及其子弟“日甚一日沉溺于汉族文学、书法、绘画”②，不仅精通四书五经及唐诗、宋词、元曲，长于琴棋书画，且对宋明理学、佛老之道有所探究。除皇室以外，从龙入关的八旗将士根本不会说满语，其姓氏也从原来的复姓变为单姓，有的甚至采用汉姓。

乾隆曾为此颁谕满洲八旗，“须以清语、骑射为常务”，“如与汉人互相唱和，较论同年行辈往来者，一经发现，决不宽贷”③。尽管乾隆强调满洲会试先试弓马，合格者方许入试，但由于承平日久骑射多被废弛，《清文鉴》、《满洲源流

考》、《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编纂也并未能唤起八旗子弟学习本民族语言的兴趣。

旗地经营方式的转变。

旗地是满族固有的土地占有方式、经营方式，其特点在于：严禁土地买卖、典当；以庄园的方式组织生产；剥削方式以劳役地租为主，是建立在土地国有制基础上的以超经济强制为前提的早期封建制的经营方式。

尽管旗地严禁典当买卖，但八旗兵丁"授田甚少"，"征役甚烦"，"时有急需，称贷无门"，只得"指地借钱"，或"支使长租"，"其实与卖无二"。迫于旗地典当买卖日盛，康熙九年（1670）颁布允许旗地在旗内买卖的谕令，以期遏制旗地外流入民。至乾隆初年，"旗地之在民者十之五六"，清统治者再次让步，同意旗地可以越旗买卖。

八旗兵丁在圈地之后，"虽分土地，每年并未收成"，为维持生计，把土地租给汉民，"民人自种其地，旗人坐食地租"。

真正按照庄园制进行经营的只有皇庄、王庄。而皇庄、王庄又分为投充庄（投充地所建）、老圈庄（圈地所建）。据《光绪会典》所载，"顺治初年，畿辅之民携地前来投者，各就其地而立庄，计庄百三十有二，不立庄者仍其户"，"每地一亩征银三分，草一束"，"系该投充等向佃户自行收取"。投充庄在建立之始即以汉族租佃方式组织生产。

只有老圈庄在较长的时间内保留了旗地的经营方式，在老圈庄内从事劳动的大多是被掠汉人的后裔。为保证皇室、王府的供应，一些庄头将庄园内的土地出租给庄园内的壮丁，只是在形式上保留庄园制。乾隆十年（1745），清统治者下达放丁为民，"听其自谋生路"的谕令，在汉族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

影响下，满洲贵族终于抛弃其原有的经营方式。

以孔孟程朱之学为治国之本。

清王朝在入关之前，尚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统治思想，因而入关后迅速吸收汉族地主阶级的治国安邦之道。顺治十四年（1657）二月，顺治在为位于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撰写的碑文中，赫然写道："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④

康熙即位以后，把程朱理学尊为正统，皇帝本人"潜心理学，旁阐六艺"⑤，并于康熙九年（1670）十一月颁布上谕十六条，提出"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⑥。康熙十六年（1678年初）十二月为《四书解义》作序："盖有四子（指孔子、曾子、子思、孟子）而后二帝三王之道传，""道统在是，治统也在是矣。历代贤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章，讲明斯道。朕绍祖宗丕基，孳孳求治，留心学问，命儒臣撰为讲义，务使阐发义理，裨益政治。"⑦

对汉族纲常伦理观念的皈依。

顺治初年，清政府不仅"为明帝（崇祯）发丧"，且对前明甲申死事诸臣"皆褒奖之"。顺治九年（1653）议修明史，理学名臣汤斌疏言："《宋史》修于元至正而不讳文天祥、谢枋得之忠；《元史》修于明洪武，而亦著丁好礼、巴颜布哈之义。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抗节不屈、临危受命者，不可概以叛书。"⑧乾隆时期开馆修史，特增设《贰臣传》，即使像李永

芳、孟乔芳、张存仁、洪承畴这些在清开国时期立有殊功的人物，也要被冠以贰臣之名。对于在明清之际坚持抗清的史可法、侯峒曾以及死于辽战的明廷官员，或建祠，或赐谥。

乾隆在披阅《明史》时，看到"忠于所事"的明蓟辽督师袁崇焕因"主暗政昏，不能罄其忱悃，以致身罹重辟"，特传谕军机大臣查明袁崇焕"有无子孙，曾否出仕"。在得悉"袁崇焕无嗣，系伊嫡堂弟文炳之子入继为嗣，现有五世孙袁炳，并未出仕"后，即传谕广东巡抚尚安："袁炳如果文理通顺，即照熊廷弼（明清交战时明经略，天启年间被阉党杀害）裔孙之例，以训导咨补，""如仅能粗晓字义，人尚明白，即以佐杂等官补用。"⑨

清王朝入关后对孝悌亦十分提倡。顺治亲政后，亲自主持修定《孝经注》、《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康熙即位以后，对于太皇太后（祖母）、皇太后（嫡母）"晨昏定省"，数十年如一日。每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出行，凡遇道路崎岖，必"下马扶辇而行"，偶遇浮桥，恐其不固，必"亲驰视验"。康熙五十六年（1717），康熙本人已年逾花甲。时值皇太后病危，"足背浮肿，不能转移"的康熙"用手帕缠足"，"诣宁寿宫请安"，"于苍震门内设立帷幄以居，衣不解带"⑩。

兴文治，编书籍。

清统治者在入关后日益重视文治，顺治时期御纂诸书有：《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内则衍义》、《孝经衍义》、《易经通注》、《孝经注》、《道德经注》。康熙即位以后编纂《易》、《书》、《诗》、《春秋》、《康熙字典》、《音韵阐微》、《皇舆表》、《皇朝全图》、《朱子全书》、《性理精义》、《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分类字绵》、《古今图书集成》、《通鉴辑览》、《子史精

华》、《骈字类编》及《全唐诗》、《明史》、《古文渊鉴》、《历代赋汇》、《唐宋元明四朝诗选》等。乾隆主持编纂的书籍有：《周易述易》、《诗义析中》、《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春秋直解》、《西域同文志》、《清文鉴》、《满洲、蒙古、汉字三合切音》、《同文韵统》、《叶韵汇辑》、《音韵述微》、《开国方略》、《续通志》⑪、《续通典》⑫、《续文献通考》⑬、《清朝通志》、《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国子监志》、《历代职官表》、《大清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通礼》、《国朝宫史》、《满洲祭神、祭天典礼》、《大清律例》、《天禄琳琅书目》、《经史讲义》、《大清一统志》、《满洲源流考》、《授时通考》、《医宗金鉴》、《仪象考成》、《秘殿珠林》、《石渠宝笈》、《西清古鉴》、《西清研谱》、《钱录》、《唐宋文醇》、《唐宋诗醇》、《四书文》、《皇清文颖》等。并在此基础上，编纂《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至乾隆四十六年），该书分"经"、"史"、"子"、"集"四大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共有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另有存目书六千七百六十六种，共九万三千五百五十一卷。

满族汉化持续了一个世纪，迨至乾隆末年，即使留居关外的满人，也开始使用汉语，风俗习惯"一一比皇畿"。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0页。

②《清史译文》1980年第一期。

③引自《清代通史》卷中，第23页。

④魏特：《汤若望传》第九章。

⑤《清史稿》卷二六二。

⑥⑦《清圣祖实录》。

⑧《清史稿》卷二六五。

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八一。

⑩《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

⑪《通志》系南宋郑樵所编。

⑫《通典》系唐代杜佑所编。

⑬《文献通考》系元代马端临所编。

清（前期）

尊崇喇嘛教

喇嘛教，即藏传佛教，流行于蒙、藏地区。喇嘛系藏语译音，意译为上师。喇嘛教分为格鲁派（黄教）、宁玛派（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等派别。自明朝末年顾实汗出兵青海、西藏，击败支持红教的却图汗、藏巴汗，即由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两大弟子达赖、班禅分治前藏与后藏。

喇嘛宝塔的建立。

天命年间，去蒙古传教的喇嘛斡禄打儿罕囊索应邀到后金，天命六年（1621）圆寂。天聪四年（1630）清廷为之修建宝塔，立碑撰文："法师斡禄打儿罕囊者，乌斯藏人（西藏），诞生于佛境，道演真净，既已演通大法，复急于普度众生，由是不惮跋涉，东历蒙古诸部，阐扬圣教，广散佛惠，蠢动含灵之类，咸占佛性。及至我国家（指后金），太祖皇帝（努尔哈赤）敬谨尊师，倍加供给。天命辛酉年八月七日，法师示寂归西，太祖敕令修建宝塔，敛藏舍利。缘累代征伐，未建寿域①。今天聪四年，法弟白喇嘛奏请，钦奉皇上敕旨，八王府敕旨，乃建宝塔，事竣刻石而志其胜。"②

西黄寺的兴建。

顺治九年（1652），达赖五世③应清朝统治者之邀前往北京，带随从三千。该年三月从西藏起程，顾实汗、班禅四世亲到藏北达木（今当雄）为之送行。清顺治帝特赐达赖五世金顶黄轿乘坐，又派承泽亲王硕塞前往代噶迎接。为接待达赖五世，清政府在安定门外修建西黄寺作为达赖喇嘛的下榻，故该庙又称为达赖庙。

该年十二月十五日，达赖一行抵达北京，顺治帝在南苑猎场接见达赖，赐银九万两。达赖五世也向清廷贡献马匹等礼物。翌年二月初二达赖因水土不适，提出回藏。十八日清帝在太和殿赐黄金五百五十两，白银一万一千两，大缎一千匹，并赐其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雍王府改为雍和宫。

雍王府建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系雍正帝的藩邸。雍正即位后，雍王府的一半改作喇嘛庙，另一半留作行宫。雍正三年（1725）行宫失火后，在原址上重建，遂改名为雍和宫。雍正帝死后，灵柩停在以前的寝宫永佑殿。乾隆九年（1744）将雍和宫改为喇嘛庙。

法轮殿是雍和宫内最大的殿宇，系喇嘛举行法会、诵经的场所，殿内正中供奉黄教创始人宗喀巴的铜像（三丈多高），殿内的五百罗汉均用紫檀木雕成。殿内保存着两部重要的藏文经典，一是藏经（一百零八部），一是续藏经（二百零七部）。

万佛阁（亦称大佛楼）供奉着木雕巨佛，佛身高五丈四尺（另有二丈四尺埋在地下），雕刻大佛的木料系达赖七世进贡的一棵大白檀香树，该树产于尼泊尔。大佛两旁还有两根一丈二

尺高的巨香，称为“凤眼香”，这两柱香实际是海底藻类化石，亦系西藏所进贡品。

永佑殿内供奉着无量寿佛（阿弥陀佛），永佑殿东侧为药师殿，系喇嘛习医之处，西侧为数学殿，系喇嘛学习天文、地理之处。

密宗殿，是喇嘛学习密宗经典的处所，讲经殿系探讨佛教哲理的处所。在清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之下，雍和宫已经成为北京最大的喇嘛庙。

兴建普宁寺。

普宁寺又称大佛寺，该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时值清廷出兵准噶尔、生擒达瓦齐之后。乾隆在避暑山庄宴赏厄鲁特四部首领，依照康熙“定喀尔喀”，“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之例，令在避暑山庄之北建普宁寺。普宁寺仿西藏三摩耶庙而建，寺内大乘阁高十一丈，阁内千眼千手观音像六丈七尺，该观音像用松、柏、榆、杉、椴五种木材雕成。寺内耸立着御制《普宁寺碑》。

建普陀宗乘之庙。

普陀宗乘系布达拉之汉译，梵语意为“佛教圣地”。布达拉宫建在西藏西北的玛布日山麓上，始建于唐初④。明清之际喇嘛教黄派取得统治地位后，布达拉宫即成为达赖喇嘛居住之地，成为西藏乃至蒙藏地区喇嘛教的圣地。

乾隆三十六年（1771）系皇太后八旬大寿之年，为招待前来祝寿的蒙古王公，从乾隆三十二年（1767）起，在清代第二政治中心——承德避暑山庄正北面的山麓上，仿照拉萨的布达拉宫建普陀宗乘，人称小布达拉宫。建成之时正值土尔扈特回归，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并在小布达拉

宫山门内建有三通石碑，一通刻有乾隆御笔题写的《普陀宗乘之庙碑记》，一通刻有《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一通刻有《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

建须弥福寿之庙。

须弥福寿系札什伦布之汉译，是喇嘛教又一圣地，位于日喀则南面的尼色日山下。始建于明正统十二年（1447），由宗喀巴的门徒根敦所创建。自班禅四世⑤以来，札什伦布寺一直是班禅一系活佛转世的母寺⑥。

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清帝七十大寿，班禅六世执意前来拜寿⑦，为接待班禅，清廷在避暑山庄之北的山麓上，依照日喀则的札什伦布寺建须弥福寿之庙。该寺自南而北，山门上悬挂着乾隆御书"须弥福寿"之匾。班禅六世在该年七月抵承德，住进须弥福寿之寺。

建昭庙。

为接待班禅六世，清廷在北京香山又建昭庙，全名为宗镜大昭之庙。

建清净化城塔院。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在祝寿活动结束后，班禅六世随乾隆到北京，住进西黄寺。乾隆多次赐宴、赏赐班禅六世、满蒙王公更是争先礼佛、布施，前往西黄寺拜佛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班禅六世在十一月初二因感染天花，在北京西黄寺圆寂，次年将其舍利金龛运回日喀则。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为纪念班禅六世，乾隆令在西黄寺的西侧建"清净化城塔院"。清净化城塔仿照印度佛陀迦耶式塔而建，中间主塔高五丈，塔座台基高一丈，因塔内埋有班禅六世的衣冠、经咒，故又称之班禅塔，塔院的碑亭里，竖着刻

有御制《清净化城塔记》及《班禅圣僧并赞》的石碑。

清廷对喇嘛教（黄教派）的提倡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对蒙、藏地区进行统治的需要。

注 释

①寿域，同寿穴、寿冢，指生前所建坟墓。

②引自《清代通史》卷上，第69—70页。

③达赖五世，名阿旺罗桑嘉措，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六岁时被认定为达赖四世的转世灵童。

④吐蕃赞普为迎娶文成公主而建。

⑤班禅四世（1567－1662），名罗桑却吉坚赞。

⑥在班禅四世之前的三世，均属死后追认，故班禅四世亦被称为班禅一世。

⑦班禅六世未生过天花，中原为天花流行区，未生过天花的蒙古、西藏上层人物均不到内地朝觐。

清（前期）

闭关锁国

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英、法、美等国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专政的建立以及产业革命的发生，既使得国际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也使得处于封建末世的清政府感受到殖民主义扩张的威胁。闭关锁国就成为清朝统治者对付外来挑战的一种本能性的对策。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则是实行闭关锁国的经济基础，用清朝统治者的话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①，“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货物哉”②。

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

清初，为了对在海上坚持抗清的郑成功实行经济封锁，清政府实行严厉的海禁，并于顺治十三年（1656）首次颁布海禁令，严禁渔船出海作业，“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③。康熙二十二年（1684），即清廷收复台湾后的第二年，宣布取消海禁，允许商民出海贸易，制定税收则例，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设置粤海

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

乾隆即位以后，虑及“洋商错处，必致滋事”④，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谕令外国商船只能到广州通商。一口通商的作法引起中外商人的不满，外商所需要的生丝、茶叶主要产于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全部运往广州，使运输费用剧增，长途运输又使得不耐贮存的茶叶易于变质。为此，英商洪任辉由海道去天津，请求清廷开放宁波等口岸，并控告粤海关敲诈勒索。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虽因此被革职，一口通商仍未改变，洪任辉本人还因“勾串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冀违例别通口岸”⑤的指控，而被清廷在澳门监禁三年。嘉庆年间，中国商人也屡屡要求在厦门就近出口茶叶，清政府“传旨申饬”，要求商民“虔受约束”，“必应永远遵行”⑥一口通商的规定。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英国先后派遣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个外交使团到北京，要求改变一口通商的现状，均遭清政府拒绝。

视通商为进贡。

清朝统治者视通商为进贡，把通商作为施恩外夷、羁縻外夷的手段，关税定得很低。清代关税的正额是固定的，每年征银四万三千两。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关锐的实际征收量超过正额，多余的部分称为“盈余”，乾隆末年“盈余”为八十五万五千两。到鸦片战争前夕，每年关税（正额加盈余）达一百五十万两，占进口货物的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一位外国人曾把中国与英国的关税作过比较，清政府规定茶的关税“是每担1．279两银子，而实际征收是六两银子”，相当于广州茶价格的20％－25％，“而在联合王国中，政府对茶征收一笔售价96％的进口税，约为广州发票价格的200％”。

清朝统治者在实行低关税的同时，顽固要求外国使团在拜见清帝时“遵天朝法度”。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乾隆就谕令接待官员，劝说使团在朝见皇帝时行叩拜礼，“向闻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但叩见时何妨暂时松解，俟行礼后再行扎缚”⑦。当使团拒绝行叩拜礼后，乾隆即令接待官员“全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一再强调“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以恩待，用示怀柔；若稍示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⑧。因而在鸦片战争之前，觐见皇帝的礼节成为中外交往中争执的焦点⑨。

限制出海贸易。

康熙年间开放海禁之初，火药、硝磺、枪、炮均属禁止出口的物品，迨至乾隆年间，大豆、米、麦、铁器（包括废铁）、马匹、绸缎等都被列入禁止出口之列。由于禁止粮食及铁器出口，对出海船只均规定往返时间。船上的人根据出海时间携带粮食（每人每日一升），如果遇上风暴不能按时返回，就会断粮，又由于规定每条船只能带一口锅、铁斧一把，使用不便，而一旦遇上海盗则毫无防御能力。

对于积极发展造船事业的商人，清政府不仅不支持，反而进行压制乃至陷害。康熙时期，上海商人张元隆“广置洋船”，“声名甚著”⑩，拟制造一百艘远洋帆船，发展海上贸易。张元隆竟因此而被江苏巡抚张伯行以交结海盗的罪名逮捕入狱，严刑逼供，夹毙船户十二人。案子一拖就是五年，张家资产几被耗尽，造船一事终成泡影。

清朝统治者亦极力限制闽广一带的人出海贸易，指责出海的人“多系不安本分之人”，不能“听其去来任意”，“嗣后应

定限期，若逾限不回，是其人甘心流移外方”，“如此则贸易欲归之人，不敢稽迟在外矣”⑪。正如一位有识之士所言：“南洋未禁之先，闽、广家给人足。游手无赖，亦为欲富所驱，尽入番岛，鲜有在家饥寒、窃劫为非之患。既禁以后，百货不通，民生日蹙。居者苦艺能之罔用，行者叹至远之无方，故有以四、五千金所造之洋艘，系维朽蠹于断港荒岸之间”，“沿海居民，萧索岑寂，穷困不聊之状，皆因洋禁”⑫。

限制生丝出口。

清王朝在对外贸易中始终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乾隆年间由于生丝出口日增，丝价上涨，清廷下令禁止生丝出口，致使“内地贩洋商船，亦多有停驾不开者。在外番因不能置买丝斤，运来之货日少，而内地所需洋货，价值亦甚见增昂”⑬。有鉴于此，清廷放宽禁令，但仍对生丝出口量进行限制，规定外国船只不得超过一万斤，中国船只不得超过两千斤。

限制外商。

为了防止洪任辉北上投诉一类事件的发生，两广总督李侍尧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制定《防夷五事》，规定外商不得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在清廷指定的商馆中经营；商、民不得向外商借贷，受雇于外商；商、民不得为外商探听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清兵“弹压稽察”。嘉庆十四年（1809）两广总督百龄制定《交易章程》六条，道光十一年（1831）两广总督李鸿宾制定章程八条，四年后继任两广总督的卢坤又增定八条。归纳起来有如下限制：外商不得长期居住澳门，不得乘轿，每月只有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可出商馆、每次不得超过十人，外国妇女不得到广州，外商不得直接向清官府投递文书等等。

行商垄断对外贸易。

办理对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洋商，其组织称为洋行，俗称十三行⑭。凡充任洋商，均需由洋行商人保举，清廷批准，行商如要退出亦需经官府批准。

清廷官员不同外商交往，外商来华贸易所纳关税不是直接向粤海关交纳，而是经由行商代纳，外商如果需向清廷交涉事务、递交呈文，均由行商代为转达。此外，凡进口货物的定价、承销及出口货物的代购、定价均由行商包办。“行商对户部（实为奥海关）负责出入口关锐，只有他们能与海关官员办事”。“行商是中国政府承认的唯一机构，从中国散商贩买的货物，只有经过行商才能运出中国，由行商抽一笔手续费，并以行商名义报关”⑮。

行商垄断着鸦片战争以前的对外贸易。凡行商均父子相承，攫取巨额财富，并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行贿各级官员。

清朝统治者把对外贸易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严禁中外商民接触、交往，以“与外界完全隔绝”作为巩固统治、抵御外来威胁的“首要条件”⑯。但在实际上，清王朝的统治能否巩固、古老的封建帝国能否抵御资本主义国家咄咄逼人的攻势，并不取决天朝大门的开与关，而是取决其自身的实力。闭关锁国所造成的闭塞、停滞，恰恰使得中国失去一次迎头赶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遇。

注 释

①梁廷楠：《粤海关志》卷二三，第8页，乾隆敕谕。

②《清代外交史料》嘉庆朝四，第29页，嘉庆上谕。

③《明清史料》丁编，第二本，第155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二八一。

⑤《清高宗圣训》卷一九九。

⑥《清仁宗实录》卷三六五。

⑦《掌故丛编》第五期，乾隆五十八年七月初八上谕。

⑧《掌故丛编》第七期，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六上谕。

⑨马戛尔尼最后以见英皇之礼——单膝下跪见乾隆帝，免去吻皇帝之手。

⑩《东华录》卷九四。

⑪《皇朝文献通考》卷三三，雍正五年上谕。

⑫兰鼎元：《鹿洲初集》卷三。

⑬《皇朝政典类纂》卷一一八，乾隆二十九年杨庭璋疏奏。

⑭十三行系沿用明代称呼，实际上并非十三家。洋行商人为避免竞争，订立条规，组织垄断性的组织。

⑮转引自《简明清史》，第二册，第520页。

⑯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清（前期）

清代档案简介

清代档案是清代历朝中央及地方各种机构在处理日常公务活动中形成的文书、图籍及档册等，是清代政务活动的原始记录。包括清宫内阁大库档案、国史馆（清史馆）、方略馆及宫中各处庋藏的“大内档案”以及宫外其它中央机构和地方机构的档案，还包括部分个人档案。

清代档案的内容极其丰富，涉及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宗教、教育、司法、民族、风俗、天文、地理、气象、水利、地震、灾异、外国侵华、农民战争以及宫廷生活、皇族事务、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

清代档案的发现。

清光绪二十四、五年（1898、1899）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雨水渗漏，需要加以修缮。为便于施工，将库内所存档案移出一部分，暂存于大库北面的文华殿中，其余仍露积于大库垣内，后醇亲王摄政需查阅清初多尔衮摄政典礼旧档，检之不得，遂认为库内所存档案无用者太多，奏请焚毁，并获批准。时张之洞以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奏请将大库所藏书籍拨

交学部，设立学部图书馆，学部参事罗振玉参与交接之事。罗振玉“见庭中堆积红本题本，高若丘阜，皆依年月顺序，结束整齐”①，偶抽阅其中两件，其中一件为乾隆时漕运总督管干珍督漕时之奏折，另一件为乾隆时军机大臣阿桂征金川时之奏折，两者次第衔接。罗振玉“询何以积庭中，始知即奏请焚毁物也，私意此皆重要史稿，不应毁弃”②，亟建议张之洞奏请停止焚毁，并将拟焚之件拨交学部，存于国子监南学和学部大堂两处。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接管了清学部所存档案。1913 年教育部在国子监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负责保管清代档案。1916 年该处迁往午门，将原存国子监及学部的档案搬至午门和端门门洞中。但这批珍贵的档案并未得到妥善保管，只是将其中较为完整的挑出，放在午门门楼上，其余的则装入麻袋置于端门门洞中。1921 年政府财政困难，教育部竟将存于端门门洞中的八千麻袋（约十五万斤）档案，以四千元价格卖给北京西单同懋增纸店作造纸原料。罗振玉得知此事，以三倍于原价的价钱，即一万二千元将档案购回，这批珍贵的清代档案才得以留存至今。这就是档案史上著名的“八千麻袋事件”。

清代档案的整理。

清代档案卷帙浩繁、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形式多样，杂乱堆积在一起，不利于保管和利用，必须进行系统整理。

首先将档案区分全宗。全宗是指一个独立的机关、组织或著名人物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全部档案。全宗原则是当今世界档案学界所公认的档案整理原则。整理档案必须以全宗为单位，同一全宗的档案不得分散，不同全宗的档案不得混杂在一起。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便于管理和提供

利用。

区分全宗后，还要对档案进行分类，即将每个全宗的档案按照不同的标准分成不同的类，每类之下再分成不同的项，每项之下再分目。常用的分类方法有：按文件名称（文种）分类、按问题分类、按机构分类、按年代分类、按朝年分类等。

全宗内档案分类后，还要根据档案的不同情况进行立卷，即按照档案文件的事由、名称、作者、收发文机关、时间、地区等特征，将单份文件组成案卷。案卷是档案最基本的保管、统计和检索单位。清代档案的立卷分为详细立卷和简单立卷两种。详细立卷需将卷内文件逐件摘由、排列、编号，并填写"卷内文件目录"和"卷末备考表"。简单立卷则不逐件摘由，仅排列顺序，并附上备考表。

经过上述整理后，还要编制案卷目录、人名卡片等检索工具，以做到有规可循、有目可查。

清代档案的收藏。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清代档案约九百余万件（册）。包括清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及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后居住在紫禁城和寄居天津张园、静园时期（1912－1934）的档案。包括内阁、军机处、宫中等七十三个全宗。除汉文档案外，还有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以及英、日、俄、拉丁等外国文字的档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清代档案几乎涉及清代历史的各个方面：内政方面，包括职官、官制、保警、礼仪、宫廷、陵寝、戊戌变法、预备立宪等内容；军务方面，包括营制、武职官员之升迁调补、军事训练、军事工程等内容；外交方面，包

括疆界订约、开埠通商、交聘往来等内容；镇压人民反抗方面，包括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及其它反清斗争和秘密结社等内容；民族事务方面包括清入关前直至宣统末年为止，瑶、黎、蒙、回、藏、维、傣、高山、哈萨克等三十多个民族的情况；财政方面，包括赋税、盐务、捐输、库储、仓储、漕粮、经费、货币金融等内容；文教方面，包括有关科举、国子监、修书各馆、清末举办的各种学堂、文字狱等情况的档案以及少量戏曲档案；工业交通方面，包括驿站、台站、清末修建铁路、开办邮电业务等内容；司法方面，包括土地房屋纠纷、钱财债务纠纷、盗窃诈骗案、家庭婚姻纠纷、贪污受贿等刑事、民事案件的档案材料；天文地理方面，包括编纂、公布历书（时宪书）、记载日月星辰的变化以及日蚀、月蚀、地震等内容。

位于台湾省台北市郊外双溪的台湾故宫博物院是清代档案的另一集中保存中心。该院藏有清代档案二百零四箱。其中，宫中档三十一箱，军机处档四十七箱，清史馆档六十一箱，起居注册五十箱，本纪九箱，实录二箱，诏书一箱，图书，旧满洲档一箱，杂项档二箱，共计四十多万件。宫中档的内容，主要是满、汉文朱批奏折及其附件；军机处档主要是月折包和档册两大类；国史馆档包括清代国史馆及民国初年清史馆的档案，主要是纪、志、表、传的各种稿本及其有关资料。

四川省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共计十一万五千余卷，包括巴县、重庆府、川东道、建昌道等九个全宗。其中，巴县档案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清代地方政府档案，共十一万三千余卷，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宣统三年（1911）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辽宁省档案馆存有清代档案二十余万卷。自天命、天聪（1616－1635）至光绪、宣统（1875－1911）的各朝文件都有保存，一部分为原存于沈阳故宫崇谟阁的玉牒、实录、满文老档、盛京内务府档和户口册等，一部分为伪满洲国时期“国立奉天图书馆”保存的奉天交涉总司、盛京将军和一些县的档案。

此外，山东省曲阜孔府藏有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六千五百二十七卷。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有大量的清代藏文档案。北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青海等地方档案馆都收藏有数量不等的清代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至今尚有不少珍贵的清代档案流散于国外，散落世界各地。这部分档案主要存在于以下机构：英国公共档案馆、大不列颠博物馆、伦敦大学；美国国家档案局、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斯坦弗大学、日本东洋文库；原苏联科学院以及法国、荷兰等国家的一些档案馆和图书馆。

清代档案的公布。

汇编公布档案史料是开放利用清代档案的重要方式。清代档案汇编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需要出发将档案史料编纂成书，出版发行。具有专题性强、内容集中、使用方便等优点，可使利用者不到档案馆即可阅读到所需档案史料，并有利于档案的长久、广泛流传。大多数档案文献汇编都经过编者的考证、加工、标点，有的还加有注释、按语、序言、插图、年表、凡例等，对读者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许多档案文献汇编陆续出版发行，如《筹办夷务始末》、《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清三藩史料》、《清代外交史料》、《中法战争》、《辛亥革命》、《天地会》、《义和团档案史料》、《洋务运动》、《康熙起居

注》、《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等以及台湾出版的《宫中档·康熙朝奏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等等。

自1981年起发行的《历史档案》(季刊)杂志，以公布明清档案为主的资料性、学术性刊物，主要公布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并辟有“档案史话”、“档案馆介绍”、“档案介绍”、“档案书刊评价”等栏目。

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自1969年起发行《故宫档案》(季刊)，定期公布清代档案史料。

清代档案的史料价值。

保存至今的这些清代档案，是十七世纪初至二十世纪初三百多年历史的真实记录，是我国保存下来的数量最多、最为集中的古代档案，是研究清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清代学者章学诚曾高度评价档案的史料价值。档案是最真实、可靠的第一手史料，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利用档案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通常存放档案之处即是编史修志之所。乾隆三十年十二月的起居注(汉文草本)就征引档案近二十种之多。清代学者龚自珍曾利用档案编纂《蒙古图志》，阮葵生每遇夜值之期，就“推长蜡三枝，竟夕披览(档案)不倦”，并借以写成《茶余客话》一书。

档案作为一种史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不完整性。就反映某一复杂的历史过程而言，对于某一具体过程，档案可能反映得很具体、细致、生动。但对于全过程，则常由于年代久远、天灾人祸以及自然损毁等原因，所反映的史实，或缺起

始，或无结果，或缺少其中某一过程或环节，不像系统的历史著作能系统地反映历史事件的本末和全貌。此外，就整体而言，档案是原始的历史记录，是真实可信的。但并非每一份档案都可信，或其本身为赝品，或虽为真品，但由于种种复杂因素，其记载已严重失实。“尽信档不如无档”，因此，有时也需要利用图书等其它文献来补充档案的不足。

注 释

①②参见罗振玉《集蓼编》。

清（后期）

禁　烟　运　动

禁烟运动，是由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走私鸦片引起的。

鸦片俗名大烟，是用罂粟的汁液制成的，自古充作药用，可使人忘忧多眠，安神止痛，而由于它含有大量使人麻醉的毒素，吸食上瘾，又会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如同废人，直至死亡。罂粟产于南欧和小亚细亚，中世纪时传入阿拉伯。我国之鸦片、鸦片、阿扁等名，即拉丁语 Opium 之译音；阿芙蓉、亚荣、合浦融等名，即阿拉伯语 Afyun 之译音。唐朝时，罂粟始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不过，迄明初，罂粟均为药剂或补品。自明朝中叶以后，随着西方殖民国家的侵入，作为其资本原始积累的一部分，鸦片这种毒品才在中国逐渐泛滥起来。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殖民者首先侵入中国，且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窃据澳门。从此，他们便由其在印度的侵占地卧亚（今果阿）、达曼贩运鸦片来华。明万历十七年(1589)，《陆饷货物税则例》中，已明文规定鸦片按进口药材纳税，“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①。荷兰人于

天启四年（1624）起强占台湾达四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将爪哇吸食鸦片之法传入台湾，复由台湾传入漳州、泉州、厦门。这就为鸦片大量输入创造了条件。清康熙帝统治后期，英国开始向中国输入鸦片。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英印当局鉴于鸦片贸易可获取高额利润，在乾隆三十八年确定了鸦片政策，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以鸦片专卖权；嘉庆二年（1797），又给予东印度公司以制造鸦片的特权。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些特权强迫和用贷款引诱印度农民种植罂粟，然后按预先规定的价格卖给官方专卖局。专卖局加工制成后，在市场上公开拍卖给商人，偷运进中国。从此，输华鸦片数量迅猛增长。据统计，雍正七年（1729）以前，每年输华鸦片不超过 200 箱。其后逐年增多，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增至 1000 箱。以后有加无已。从嘉庆五年至二十五年（1800－1820）二十年间，平均每年输入鸦片在 4000 箱以上。道光元年至四年（1821－1824），每年平均输入 7889 箱；道光五年至九年（1825－1829）每年平均输入 12576 箱；道光十年至十四年（1830－1834），每年平均输入 20331 箱；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每年平均输入 35445 箱；道光十八年至十九年（1838－1839），输入达 40200 箱。这时，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国家除英国外，还有美国和俄国。

面对鸦片的泛滥，清政府不得不采取对策。雍正七年（1729），清廷首次颁布禁烟诏令，规定对贩运鸦片烟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鸦片烟馆者，“拟绞监候”；对失察之文武各官，“均交部严加议处”②。但此次诏书，未涉及吸食者，也未禁止入口，海关则例在药材项下仍订有鸦片税银，因而为殖民者对华的鸦片输入留下一个大漏洞。乾隆年

间，又曾发布禁令，毫无效果。嘉庆元年（1796）再颁禁令，停止征收鸦片税，禁止鸦片输入。以后又三令五申，严禁鸦片的输入、贩卖、种植和吸食。鸦片贸易完全成为非法。但英国决不放弃鸦片贸易，不能公开售卖，就改为走私。他们通过卑鄙的贿赂手段，将鸦片的囤储地点改在澳门，然后用船载往黄浦，不再上岸，就在船边私售。而清政府的“缉私巡船”由于受到贿赂，对鸦片走私则予以包庇。道光元年（1821），清政府重申禁令，不许在澳门、黄浦囤放和售卖鸦片。英国鸦片贩子便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建立走私据点，在伶仃岛停泊固定的“趸船”，存放外洋运来的鸦片，并由兵船加以保护。他们又勾引广州的土棍，以开设其它店铺为名，暗中包售鸦片，称为“大窑口”。中国鸦片贩子到大窑口看过样品，然后交款，得到大窑口的提货单，到趸船提货。提出的鸦片专门有包办武装走私的快船运到各地，这种船名为“快蟹”或“扒龙”。鸦片运到内地以后，又有该地的衙门吏胥、军官、土棍等开设“小窑口”，售卖到各城乡市镇。道光十四年（1834）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而由英国外交部直接派出驻华商务监督，指挥对华“贸易”，鸦片走私愈益猖獗起来。

随着烟毒的泛滥，它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也日益严重。据道光十五年（1835）的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200万以上，流行地区已从沿海地区扩大到内地十几省。鸦片吸食者中有贵族、官僚、地主、商人、衙役、士兵、游民、乞丐等各种人，而绝大部分是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依附者。他们为吸食鸦片而消耗的大量钱财，完全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本已十分沉重的封建剥削，更加沉重。尤为严重的是，烟毒泛滥造成大量白银外流，引起银贵钱贱，又直接威胁到劳动人民的生

活。有些地区过去的银钱比价，白银一两换铜钱 1000 文左右，道光十年（1830）涨到 1300 多文，道光十六年（1838）竟涨到 1600 多文。同一时期内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并没有变动。农民和手工业者仅有的少量产品零星出售，只能换回铜钱。他们在缴纳各种捐税时却要折合成银两，从前交钱 1000 文可以抵银一两，而现在却要交 1600 多文。白银外流愈多，劳动人民生活愈益恶化。同时，鸦片泛滥也造成了清王朝的严重危机。白银外流，造成已十分困难的财政更加困难；本已十分腐朽的清王朝，经此黑色毒雾的腐蚀，贪风更盛，吏治更坏；兵丁吸食鸦片，使军队失去战斗力。总之，烟毒泛滥已造成深刻的民族灾难。

鸦片泛滥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不能不进一步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道光十三年（1833）以后，针对鸦片输入的迅猛增加，白银大量外流，广州一些劣绅即开始倡言鸦片弛禁。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上奏《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提出：严禁不仅产生不少流弊，并且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停止贸易，下令闭关，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弛禁。弛禁分三方面：第一，准令外商输入鸦片，照药材纳税，政府由此可增加收入；鸦片进口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可避免白银外流。第二，准许内地种植罂粟，则“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且内地种植“无碍于地方，而大有益于农夫”。第三，禁官不禁民。只禁止官员、士大夫和兵丁吸食鸦片，“愚贱无职事之流”则听其自便③。按照这套主张，对鸦片走私实际是开禁。因此，它立即遭到了多数大臣的反对。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十日（1838 年 6 月 2 日），鸿胪寺

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国家的财政观点着眼，详细申述了鸦片大量输入，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严重祸害，尖锐地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他提出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吸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过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处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为不使漏网，又提出五家邻右互保，举发者给奖，包庇者治罪。这篇奏折在统治阶级中引起强烈反响，道光帝将此折发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不久朝廷收到29份遵旨议复的奏折，其中除贵州巡抚贺长龄看法特殊外，其余督抚大员都认为当时"内地银价之昂贵，由于纹银之出洋，而纹银之出洋，由于鸦片之流毒"④。因此都同意严禁鸦片。但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在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又有不同。有的全力支持或基本同意黄爵滋的意见，有的主张塞漏培本，首应严惩贩烟和开烟馆人贩，有的主张应严禁烟船入口及查逐趸船，有的主张首应严海口之禁、次加商贩开馆之罪，有的主张必先重惩海口接引奸商，有的主张必须先严惩官吏中的吸烟人贩等等。这些不同意见，实际是对黄爵滋禁烟主张的补充和修正，均为清政府禁烟政策的确定提供了根据。

在各省督抚讨论的基础上，严厉禁烟开始付诸实践且逐渐成为一场运动。道光十八年七月至十九年一月（1838年9月至1839年3月），湖北、湖南、江苏、广西、贵州、浙江、河南、山西、盛京、直隶等省，纷纷上报查获烟土、吸食人犯和铲除罂粟秧苗。湖南、湖北短期内收缴烟枪4700余杆，大沽口一次即拿获烟土131000余两。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1838年12月12日)，广州地方当局决定在外国商人居住的洋馆附近广场处决一名中国贩烟罪犯。英、美等国暴徒竟横蛮干涉，捣毁刑场，气焰十分嚣张。群众闻讯立刻从四面八方赶来，顷刻间，上万人不约而集，占据广场，围住洋馆，用砖瓦石块还击外国暴徒的袭击。群众痛恨外国侵略者的海盗行为和要求严厉禁止鸦片的愤怒情绪积压已久，这时一齐爆发出来。在广泛禁烟斗争的推动下，道光皇帝坚定了禁烟的信心。道光十八年九月(1838年10月)，道光帝下令各省认真查禁鸦片，将首先奏请弛禁的许乃济降级、勒令休致，表示对鸦片流毒"深加痛恨，必欲净绝根株，毋贻远患"⑤，命湖广总督林则徐来京陛见，特赐紫禁城内骑马、乘肩舆；八天内连续召见八次，并于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任命林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办禁烟事宜。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曾任浙江道员、江苏巡抚。他为官清廉，办事认真，具有爱国思想。道光十七年一月十二日(1837年2月26日)任湖广总督。在此任上，他雷厉风行禁烟，在武昌、汉口等处设禁烟局，大张晓谕，严禁鸦片，并捐出自己的俸给配制断烟药丸，广为散发；督率部下收缴烟土、烟膏、烟枪、烟斗，短期内在武汉三镇拿获及收缴烟土烟膏12000余两，烟枪烟斗共2000余杆，在湖南收缴2300余杆，禁烟收到显著成效。他支持黄爵滋的主张，痛切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其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⑥。此番言论，对禁烟产生重大影响。

道光十九年一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

到达广州。他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的支持下，采取了有力的禁烟措施。首先，他明查暗访，掌握贩卖与吸食鸦片的内幕；并派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深入了解西方情况。第二，向外商发出通令：限三日内交出全部鸦片，并出具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他表示决心说：“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⑦第三，整顿防务。他下令加固海防工事，添置炮台炮位，购买西洋大炮，布防珠江口附近；在珠江口设置木排铁链，以防敌人入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加紧操练水陆官兵的同时，认为“民心可用”，把沿海居民、渔户分别组成乡勇、水勇，公开号召民众，如果英国兵船进入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广东禁烟进入高潮。

英国资产阶级不甘心利源被断绝。英国政府代表、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竭力破坏中国的禁烟。他指使英商拒绝交出鸦片和出具甘结，命英国商船驶离广州，策划大鸦片贩子颠地逃跑，甚至进行战争恫吓。林则徐针锋相对，果断地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断绝鸦片趸船与洋馆的交通，并派兵包围洋馆，撤出在洋馆的中国雇员。义律看到阻止缴烟的计划无法实现，便又玩弄新的阴谋，企图利用缴烟挑起中英冲突，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并劝美商一起缴烟，声称烟价统由英国政府赔偿。义律的目的，显然是为英国发动战争制造借口。在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压力下，四月上旬（5月下旬）英美鸦片贩子被迫缴出鸦片二万多箱（实为19187箱又2119袋）其中1500余箱是美国烟贩缴出的；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多斤。

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三日（6月3日—6月23日），林则徐将收缴的鸦片在虎门海滩全部销毁。销烟的办法是，在海滩高处，挖成两个十五丈见方的池子，周围树栅，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将海水灌入池中，然后投入鸦片，浸泡半日，再投入生石灰，顷刻汤沸，不炊自燃。至退潮时，启开涵洞，随潮冲入大海。各地群众怀着胜利和喜悦的心情，前来观看销烟壮举，有些外国人也前来参观，并"摘帽敛手"，对林则徐销烟的举动表示钦佩。

虎门销烟，是中国人民禁烟斗争的伟大胜利。它给英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

注 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第6册，第140页。

②《鸦片战争》第6册，第139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册，第1－5页。

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2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125页。

⑥《鸦片战争》第2册，第142页。

⑦《鸦片战争》第2册，第243页。

清（后期）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英国发动的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为打开中国的大门，英国资产阶级在向中国大量输出鸦片的同时，就已蓄谋发动侵华战争。道光十一年底（1832），英国即派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到中国沿海，刺探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测量沿海港湾河道，绘制航行地图。道光十六年（1836），英国 109 家与印度或中国贸易有关的大公司，在伦敦组成“印度和中国协会”，积极策动用武力侵略中国。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1839 年 8 月 5 日），林则徐命令外商呈缴鸦片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一片战争叫嚣，要求政府采取所谓“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利用这个机会，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的、稳固的、永久的基础之上”①。有些资产阶级分子更露骨地指出：中国的禁烟运动，“给了我们一个战争的机会，这对英国是很有利的，因为这可以使我们终于乘战胜之余威，提出我们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来，是不能轻易放过的”②。不久，应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请求，英印总督派遣“窝拉尼”、“海阿新”号军舰

先后抵达广东海面。七月二十七日（9月4日），义律率“窝拉尼”舰及武装船艇多艘，闯入九龙湾，炮击清军水师船只。清军水师奋勇还击，迫使侵略者匆忙逃走。八月二十四日（10月1日），英国政府正式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九月二十八日（11月13日），义律派舰在穿鼻湾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并率先开炮攻击前往查究的水师船只；清水师提督关天培指挥开炮还击，将英舰击退。接着，从九月二十九日（11月4日）至十月八日（11月13日），英军在官涌先后挑起六次武装冲突；但在林则徐主持下，清军俱获全胜。道光二十年一月十八日（1840年2月20日），英国政府正式任命好望角海军司令、海军少将乔治·懿律和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三月六日（4月7日），英国议会下院经过激烈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政府的对华政策。五月二十二日（6月21日），英国侵华远征军舰队司令伯麦率舰船30艘，载陆军4000人，由印度抵达广东海面，与先期到达的舰船会合；次日宣布自二十九日（28日）起，封锁广州。二十九日懿律率3艘军舰到达广东，战争正式开始。当时英国在华兵力，计有军舰16艘，武装轮船4艘，运兵舰1艘，运输舰27艘，陆军4000人。

战争从开始，到道光二十二年七月（1842年8月）结束，持续两年零三个月。这两年多的战争，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41年1月20日）义律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为止，历时7个月。

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已任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调邓廷桢任闽浙总督。他们认真筹备战守，组织军民抵抗英军的侵略。

英军到达广东海面，看到中国军民戒备森严，无隙可乘。懿律按其政府训令，留兵舰四艘、轮船一艘封锁珠江海口，亲率舰队于六月二日（6月30日）离广东北犯。四日（7月2日）英舰队驶经福建海域，其前队舰艇两艘抵达定江海面。懿律派舰一艘，闯入厦门港，强行投递《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副本，遭到厦门守军拒绝。翌日，英舰发炮击毁厦门炮台，击沉师船一只，打死打伤守军多人，然后遣人登岸，"系书竿头，树之于滩上而回"③。英军随即留兵船、输送船各一艘封锁厦门港口，大队则离厦门北驶。六日（4日）英兵舰驶入定海北港，照会知县姚怀祥，限"半个时辰"内投降，交出定海及所属各岛。姚怀祥与水师总兵张朝发予以拒绝，并布置抵抗。七日下午，英军发起进攻。清军"兵不习水，仓猝应变，闻炮声多畏缩"④，损失极重；张朝发受伤，向镇海退却。次日凌晨，英军攻破东门，姚怀祥出北门投水自尽，典史全福大骂英寇被杀，守城兵勇溃散，定海失陷。英军抵定海后，派陆军司令布尔利管理定海军务，以传教士、鸦片贩子郭士立治理定海民政。他们在定海地区大肆杀掠奸淫，以致城市为墟。三十日（28日）懿律与义律、伯麦率兵舰5艘、汽船、运输艇3艘继续北上。七月十二日（8月9日），英舰队到达天津海口。十四日（11日）义律乘汽船到大沽炮台下要求清廷派官员接受公文。十七日（14日），琦善派千总白含章携食物前往英舰，晤懿律。懿律递交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提出割地、赔款、自由贸易等无理要求，限10日答复。随后，英舰分赴渤海湾各地、辽东半岛及山东沿海一带，测绘地势，搜集情报；八月一日（8月27日）复折回大沽口。

定海失守和英舰船到达天津海口，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一片

惊慌，投降派乘机活动起来。直隶总督琦善将战争起因，归之于林则徐禁烟过激，诬告林则徐收受英国女王文书，私自销毁，图谋不轨。他恐吓道光帝，说英人“船坚炮利”，难于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⑤。虚骄自大的道光帝，在敌人武力威胁和投降派影响下，由坚持禁烟转而谋求妥协。七月九日（8月6日），他命历来反对禁烟的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前往浙江办理军务；十二日（9日），谕直隶总督琦善，如英船驶至天津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倘有投递禀帖，即行进呈⑥；二十三日（20日），下诏表示上年林则徐查禁鸦片，“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以为英人“代伸冤抑”⑦，又密谕琦善转告英人，另派钦差赴粤查办。秉承道光帝旨意，八月四日（8月30日），琦善与义律等在大沽口海滩帐棚中会谈，琦善公然“坦白地承认英国人是受虐待了”⑧，应允代申冤抑，惩办林则徐、邓廷桢；义律则坚持赔款、割海岛、双方官吏往来以平行礼等条款；琦善表示俟奏请皇帝后再复。八月十八日（9月13日），琦善照会懿律，劝其回粤，静候钦差大臣前往办理一切，必有解决之道。懿律感到英军兵力与供给均有很多困难，加以军中疾疫流行，气候又将转寒，舰船不宜在北方港口久留，遂同意南返广州谈判。二十日（15日），英军起碇南返，于十月二十七日（11月20日）抵澳门。对此，道光帝认为是外交上的一大胜利，得意地称其妥协伎俩，是“片言片纸，远胜十万之师”⑨。早在八月二十二日（9月17日），道光帝就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谕沿海督抚，勿向英船开放枪炮，令浙江、山东、江苏等沿海诸省裁撤兵勇，“以节糜费”⑩；九月八日（10月3日），以“办理不善”、“误国病

民”⑪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十一月六日（11月29日），琦善抵达广州。同日，懿律因病辞职回国，英国全权代表由义律接任，侵华远征军总司令由伯麦接替。琦善在赴粤途中就扬言：“现在办理夷务，在柔远不在威远”⑫，“英夷强横，非中国可能敌”⑬。他到广州后，为取得“外夷欢心”，力反林则徐所为：遣散水勇、拆除海防工事，裁减兵船，罢斥抗英有功将领，视广东人民为“奸逆”；与英谈判，则专用洋行买办鲍鹏和千总白含章往来传信。琦善的倒行逆施，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上午八时，英军向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两岸阵地同时发起进攻。英军右支队主攻沙角，由三艘军舰从正面对沙角炮台进行炮击，登陆部队则从川鼻湾登岸，抄袭炮台侧后。在敌人水陆夹击下，守军腹背受敌，力战不支，大部伤亡，守将陈连升父子也英勇牺牲，沙角炮台遂被英军占领。进攻大角炮台的英军左支队，由四艘军舰炮击岸上炮台，登陆部队从南北两侧登岸。在极端不利形势下，守军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即告失陷。在敌人军事压力下，琦善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重申议和；接着派人与义律在穿鼻洋谈判，表示愿“代为奏恳”给予英人“外洋寄居一所”⑭。然而，义律不待琦善“代为奏恳”，即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0日）单方面宣布《穿鼻草约》成立，主要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贸易；英军退出定海。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四日（1841年1月26日），英军即强行占领香港，作为继续侵华的重要基地。

第二阶段，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五日（1841年1月27日）起，到四月七日（5月27日）《广州和约》签订止，历时

四个月。

道光帝原以为惩办林则徐、邓廷桢，允许英人在广州照旧通商，英国就会罢兵息战。不料义律提出割地、赔款等无理要求，他感到天朝尊严受到损害，于是又转而主战。正月五日（1月27日），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报到北京，道光帝盛怒之下，当天发布对英宣战上谕，命钦差大臣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令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要沿海各省督抚加意巡查。接着，派遣皇侄、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遣湘鄂川黔八省防兵1.7万名赴广东对英作战。不久，道光以伊里布畏葸，命回两江总督任，授署江督裕谦为钦差大臣，专办攻剿事宜。二月六日（2月26日），怡良揭发琦善私割香港的奏报到京，道光下令将琦善革职锁拿，查抄家产。

英军获悉清政府调兵遣将，便乘奕山等人迟迟未到之前，先发制人，大举进攻虎门要塞。沙角、大角炮台失守并遭到破坏后，虎门失去第一重门户。这里有三个小岛呈三角形，横栏来路，分别名为上横档、下横档及饭箩排，此三岛与武山（亦称南山、亚娘鞋）之间是为主航道。时在武山一带筑有南山、镇远、威远和靖远（即定远）四座炮台，江中有横档和永安两座炮台，在武山与饭箩排、上横档之间又设两道木排铁链，横亘主航道上。由此再往北航五里，江两岸对峙着大虎山、小虎山，组成第三重门户，筑有大虎炮台、巩固炮台和蕉门炮台。然而，这样一个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在琦善妥协投降政策指导下，实际已陷于瘫痪状态。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驻镇远炮台，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和多隆武守定远炮台，各台守兵皆不过数百。关天培、李廷钰派专弁向琦善请

兵，仅许密添二百；李再亲到琦善处哭求增兵，琦坚拒所请。二月三日（2月23日），英军开始进攻虎门前沿阵地，扫除木排铁链。经侦察，英军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五日（25日）下午派兵占领该岛。六日（26日）清晨，英军从下横档炮轰上横档；横档、永安两炮台守军奋勇抗击。敌初未得势，及傍午潮涨，敌舰船蜂拥逼近，且英军乘势在西端的永安炮台附近登陆，经激战，守军阵亡三百余人，上横档岛遂被英军占领。随后，英舰向武山诸炮台发动轰击，62岁的老将关天培与游击麦廷章一起，奋勇登台，大声激励士卒，与敌殊死战斗，重创敌舰三艘。经半日激战，守兵死伤过半，关天培亦"身受数十创，血淋漓，衣甲尽湿"⑮。面对蜂拥而上的敌人，关天培毫无惧色，仍手刃数敌，但终因寡不敌众，伤重力竭，与400守军先后殉国，靖远炮台陷落。接着，镇远、威远等炮台相继失陷，虎门天险沦于敌手。大虎山、小虎山清军不战而退。第二天，英舰溯珠江而上，直攻珠江口内第二堡垒乌涌炮台；湖南提督祥福等500守军奋勇抗击，相继阵亡，炮台陷落。二月十日（3月2日），英军又西陷猎德炮台。此后，英军陆续攻占黄浦、大黄窖、凤凰冈等炮台，入据商馆，封锁广州。这时，贸易季节已经来临，为推销英商和其他外商轮船积压的商品。义律与先期到达广州的杨芳于二日二十八日（3月20日）订立广州休战和贸易协定，暂时恢复通商。

正当英军在和平烟幕下，加紧准备大规模进攻之际，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新任两广总督祁𡊺，于三月二十三日（4月14日）同时抵达广州。腐朽昏聩的奕山同琦善一样，不但不依靠人民抗战，反而污蔑广东军民为"贼党"、"汉奸"，认为"各商因夷而致富，细民籍夷以滋生"，军队"无不籍包

庇鸦片以为生理"，因此公然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⑯的战略方针。在战守方面，初奕山接受林则徐、杨芳建议，主张在未做好攻战准备之前，固守不战。但不久他又听信部属鼓惑，认为不战则军饷无由开销，功赏无由保奏，急欲侥幸一试。于是匆忙挑选熟悉水性的兵勇1700多人，夜袭停泊在白鹅潭的英舰，并围攻洋馆。四月一日（5月21日）夜间，都司胡俸伸率领水勇，暗携火箭、火弹、喷筒、钩帘等武器，乘坐小舟突袭英船，烧毁敌人杉板船数只，英三艘军舰遭到来自岸上炮火的袭击，蒙受一定损伤。次日黎明，英军反攻。英战舰三只进攻西炮台，清水勇溃散。同时英汽船一只进攻泥城港，守港清军闻风逃遁，港内师船、火艇被毁60余艘。三日（23日），英军又分攻西炮台、天字码头、东炮台等处，焚毁新墩石公祠、金利埠、河南洲嘴及城外临江民房多处。四日（24日）中午起，英军分左右两翼向广州大举进犯。左翼纵队在商馆区及城南省河两岸活动，任务是牵制清军，从侧翼配合主力登陆部队；下午3时，这支部队未遭抵抗即占领商馆区。左翼纵队于下午4时溯珠江支流起航北上，6时左右抵商馆5英里的缯步村；英军一部分先后在此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五日（25日）凌晨，英军全部登岸，经由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之拱极、保极、耆定、永康（即四方）和东西得胜六座炮台。防守四方炮台的清军，坚守阵地，顽强抵御，直至出垒冲击，经过短兵相接的肉搏，炮台始陷。其余炮台守军稍事抵抗即放弃阵地，相继退入城内。英军占领城北各炮台后，即用大炮向广州城内轰击。这时广州城内一片混乱，奕山"伏处一隅，半筹莫展"⑰。六日（26日）下午，奕山在广州城上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而

出，向敌人求降。七日（27 日），奕山接受英军提出的全部条件，与之签订《广州和约》，规定：清军于 6 日内退出离广州城 60 英里以外；一星期内缴纳“赎城费”600 万元；赔偿英商馆损失 30 万元；赎城费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会奏，讳败为胜，诡称英军“穷蹙乞抚”，“只求照前通商”，把赔款则说成归还商欠。道光于五月二十九日（6 月 8 日）下谕：“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⑱，实际批准了《广州和约》。

第三阶段，从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九日（1841 年 8 月 25 日）英军进攻厦门起，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 年 8 月 29 日）《南京条约》签订止，历时一年。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九日（1841 年 4 月 10 日），英国政府接到义律关于《穿鼻草约》的报告，认为攫取到的权益太少，决定撤换义律，改派侵略印度的殖民老手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以巴加代伯麦为侵华英军总司令兼海军司令，增调军队来华，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六月二十四日（8 月 10 日）璞鼎查抵达澳门，随即向清广东当局发出纲要一份，声称如中国政府不派全权代表接受纲要所列全部条款，他即率军北上。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前去谈判，遭到拒绝。七月五日（8 月 21 日），璞鼎查以军舰 6 艘、轮船 2 艘、陆军 1300 余人留守香港，亲率军舰 10 艘、轮船 4 艘、运输船 24 艘、陆军 2500 余人，沿海北犯。九日（25 日），英舰驶抵厦门南之青屿附近碇泊集结。次日，英军大举进犯；闽浙总督颜伯焘督同驻守金门之总兵江继芸，指挥白石头、屿仔尾、鼓浪屿清军，互相配合从三面抵御。下午 1 时，英军左分队集中攻击鼓浪屿，右分队进攻厦门沿岸各炮台。清军开炮还击，但由于火炮不能左右

转，只可直击，故英舰得以避开清军炮路，冲进内港，以舢板船登陆，鼓浪屿等遂先后失守。战斗中，总兵江继芸、副将凌志等牺牲，守军伤亡数百名；颜伯焘等于当晚从厦门退守同安。十一日（27日），英军侵入厦门，拆烧衙署庙宇，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七月十九日（9月4日），英军退出厦门。次日以军舰3艘、运输船3只、陆军500名继续盘踞鼓浪屿，其余舰船全部北驶侵犯定海。

自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四日（1841年2月24日）第一次侵入定海的英军撤出后，清廷即命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协力防守定海，守军总数逐渐增至5600余人。定海城三面环山，城东为青垒头；西北为晓峰岭，岭下为小竹山，滨海有竹山门；城东南为兰山；城南为道头，临海无蔽，其南约3里有孤悬海中的五奎山。为加强防御，葛云飞从小竹山到青垒头，横筑一道长约1400余丈的土城，并设久安门和长治门。八月十二日（9月26日）下午，英军抵舟山群岛洋面，巴加和郭富随即乘船闯入竹山门窥测形势，葛云飞自土城指挥清军发炮，英船头桅被击断，遂窜走。此后，英军连续向晓峰岭竹山门一带发动进攻，在清军反击下均被打退。八月十七日（10月1日）拂晓，英军乘守兵力疲，并利用大雾天气，在五奎山炮队掩护下，分左右两个纵队强行登陆。左纵队在道头港以西至竹山一带登陆，进攻竹山和晓峰岭。担任总援的王锡朋，一面分兵支援竹山门，一面亲自率清军往救晓峰岭。英军连续发起冲锋，清军用抬枪、鸟枪一次又一次将敌人击退，抬枪“至于红透不能装打”⑲，只得以短兵器进行格斗。王锡朋被敌炮打断一腿，仍坚持战斗，最后力竭牺牲。在竹山门一带，郑国鸿两次被炮击伤，但仍率部与敌人

搏杀，最后“手刃悍贼数人而死”⑳。右纵队在道头以东至兰山一带登陆，遭到葛云飞所率清军顽强抵抗。竹山门失守后，左队部分英军沿土城东进，占兰山炮台南端，与停泊东港之战船、五奎山上之炮队，三面夹攻兰山炮台。葛云飞手持大刀率先冲入敌阵，左突右杀，转辗战斗二里之遥，最后“铅丸洞公背，自胸出，穴巨如碗，公遂立竹山门崖石而卒”㉑。经六昼夜血战，定海失陷。英国侵略者在舟山岛及其属区内建立军事管制机构，进行殖民统治。

定海失陷后，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估计到英军定会进攻镇海。他集众宣誓，表示决不退却，决不议和，誓与镇海共存亡。八月二十六日（10 月 10 日）黎明，英军分 3 路攻镇海：中路英军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登岸，占领竺山，随即向金鸡山前进；左路英军乘舢板驶入小浃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在腹背受敌，并不断遭到敌舰炮击的形势下，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肉搏战，后因伤亡甚众，金鸡山遂为英军占领。与此同时，英军四艘军舰以优势火力，对招宝山实施猛烈炮击；在此指挥的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率先弃台逃往宁波；在招宝山西北麓登岸的右路英军，迅即占领招宝山炮台，居高临下，俯攻镇海，城遂陷。裕谦力战不支，投水自尽，为亲兵所救，次日至余姚服毒死。二十九日（13 日），英军至宁波，余步云先一日弃城走上虞，宁波不战而陷。接着英军至宁波、余姚、慈溪、奉化等地，大肆淫掠。

浙江连失三城，清政府不得不再次组织抵抗。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四日（1841 年 10 月 18 日），道光命满洲贵族、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正蓝旗蒙古都统哈良阿（八日改派蒙古副都统特依顺）、固原提督胡超（七日改派户部左

侍郎文蔚）为参赞大臣，统率大军，赴浙进剿。奕经和奕山，同是腐朽无能的贵族子弟，他携一帮随员，从北京前往浙江，一路游山玩水，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直至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一日（1842年2月10日）才抵杭州。然后留特依顺守抗，奕经与文蔚渡江往绍兴。英军得知清大军抵浙，特移镇海屯兵据城东北角招宝山炮台，留数百人守宁波城炮台，余则移兵入舟以待。奕经等以英军有放弃之意，遂决定先密派内应潜伏三城，然后三路进军，内外配合，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定海。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夜间，奕经下令总攻。在内应接济下，清军分别从南门、西门进入宁波；但在英军强大火力袭击下，伤亡惨重，在街巷中前后壅塞，立脚不住，又退出城外。从大宝山出发的清军前锋数百人向镇海西门发动冲击，遭到英军拼死抵拒，三次冲锋均受挫折，时天色已明，大队又未赶到，遂撤出战斗。水路进攻定海的计划，因风潮不顺，清军未出动。英军乘势反扑慈溪，负责前沿指挥的文蔚弃辎重而走，沿途赏轿夫舟子，惟恐英兵追及。文蔚既走，全军遂溃。二月十七日，浙江巡抚刘韵珂上《十可虑》奏折，以“外患未除，内讧又起”为由，力请皇上与英国侵略者议和。道光帝随即任尚书耆英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同伊里布赴浙江，向英军乞和。英国侵略者认为尚未予清政府以重大打击，拒绝议和。

三月二十七日（5月7日），英军撤出宁波，以少数兵力守镇海、定海，主力驶向长江口。四月八日（5月17日），英军进攻江浙两省海防重镇乍浦。次日英军分三纵队登陆，遭到清军顽强抵抗。佐领隆福率二、三百人守城郊天尊庙，在众寡悬殊、武器低劣的形势下，顽强击退敌人四次进攻。英军以火

焚烧，守军在烈火中坚持战斗，大部壮烈牺牲，乍浦遂沦陷。英军在乍浦休整10天后，于四月十九日（5月28日）全部登舰北驶。这时，英国从印度派来的援军万余人陆续抵达中国。五月五日（6月13日），英舰30余艘侵入长江口。八日（16日），英军海陆猛攻吴淞口。江南提督、年近70的老将陈化成率官兵5000人坚持抵抗。两江总督牛鉴陈列总督仪仗，从宝山领兵往援。敌舰发炮轰击，牛鉴下轿弃靴帽狂奔逃命，致使全军溃散。英军乘势由东炮台登陆，水陆夹攻西炮台。化成督士卒孤军死战，身受七处重伤，血流至胫，"犹秉旗促战曰：'尔毋畏，尔施枪炮！'未几，声渐微"㉒，壮烈牺牲，吴淞失陷。上海、宝山也相继失守。

英军攻陷上海后，决计溯长江西犯。六月十一日（7月17日），左队英舰进入镇江江面。时参赞大臣齐慎与湖北提督刘元孝率守军驻城外各要地，副都统海龄率驻防旗兵千人、青州兵百人固守城内。十四日（21日），英军集中近7000人的陆军，在海军战舰支援下进攻镇江。英军第一、三旅和炮兵旅在镇江西北金山附近未遭抵抗即顺利登陆，上岸后，第一旅直指西南山坡上的清军兵营，经激战，清军不支，齐慎、刘孝允率部退往新丰镇（今江苏丹阳北）；第三旅沿西城根直奔西门，遭到清军的顽强抗击。第二旅在北固山一带登岸，直奔城下，冒着清军炮火，蜂拥爬梯登城。守城旗兵誓死抵抗，有的用刀矛冲刺来敌，有的把敌人推下城墙，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同归于尽。英军入城后，守城清军节节抵抗，与敌展开肉搏战；海龄夫妇举火自焚。此役，清军伤亡600多人，英军伤亡160多人。恩格斯指出：如果英国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㉓。

六月二十七日（8月3日），英军主力离镇江向南京进犯，于七月四日（8月9日）抵达南京江面。在英军的武力威胁下，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与英方全权代表鼎查签订了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由于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遂以失败告终。

注　释

①《鸦片战争》第2册，第634页。

②《鸦片战争》第2册，第661页。

③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59页。

④《鸦片战争》第4册，第385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60页。

⑥《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68页。

⑦《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87页。

⑧《鸦片战争》第5册，第91页。

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513页。

⑩《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73页。

⑪《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483页。

⑫《鸦片战争》第1册，第483页。

⑬《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45页。

⑭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篇）》第61页。

⑮鲁一同：《关忠节公家传》，《通甫类稿》第4卷。

⑯《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94—995页。

⑰《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4页。

⑱《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1046页。

⑲《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3册，第1244页。

⑳《鸦片战争》第6册，第354页。

㉑《鸦片战争》第6册，第349页。

㉒朱翔清：《埋忧集》第8卷。

㉓恩格斯：《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0页。

清（后期）

群众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期间，面对英国的武装进攻，清朝统治者时战时和，动摇妥协，最后向侵略者投降。而东南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则从始至终进行了英勇的自发的反侵略斗争。

战争爆发前，广东人民即以实际行动支持林则徐与鸦片贩子作斗争，把禁烟运动推向高潮。禁烟取得重大胜利后，群众协助清水师粉碎了义律的多次武装挑衅。道光二十年五月（1840年6月），战争爆发，英舰封锁珠江海口，在林则徐组织下，水上有疍户、渔民五六千人编为水勇，陆上有乡勇、团练，水陆群众相互配合，打击侵略者，迫使英舰每日在海上“东飘西泊，莫定行踪”，敌人得不到粮食和淡水，只能“以布帆兜接雨水，几于不能救渴”①，处境极为困难。六月七日（7月5日），英军攻陷定海，对群众大肆屠杀淫掠。定海城内群众同仇敌忾，坚壁清野，相继内渡，以致敌军“初入定海时，简直一个人影也看不见，成千成万的人已经离城而去”②；尚留在城内的群众，目睹英军的残暴，也想方设法离城出走。英军坐困城中，只有利用汉奸、买办去采办当时军中

急需的新鲜食物。对此，群众开展了捕捉汉奸买办的斗争。英军前往定海附近地区测量、掠夺，又遭到当地群众的有力袭击。八月二十日（9月15日），英舰一艘侵入浙江慈溪县海面，并派兵登岸，乡民立即迎头痛击，用长矛戳毙英兵7名，生擒4名。当天傍晚，英汽船驶至余姚县近海，陷软沙之上沉没，渔户、灶丁及兵勇纷纷赶到，生擒英军22名；其中2人因伤重致死，余众乘小舟四散。八月二十一日（9月16日），英陆军上尉安突德携带印度随从到定海城郊山上测量地形，乡民用锄头击毙其随从，生擒安突德。八月三十日（9月25日），英舰三只到崇明岛抢掠粮食牲畜，乡民将其诱至稻田间，毙敌两名。由于缺乏新鲜食物和饮水，病疫在英军中日益蔓延，只五个多月，在定海登陆的3000名英军中，病亡即达400多人，入院治疗的1500多人，余下的也“完全消瘦到皮包骨”③。在群众的打击下，英军已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1841年5月），当奕山向英军投降，退出广州城之际，三元里人民掀起了抗英斗争的高潮。从四月二日至六日（5月22日至26日），英军在进攻广州城过程中，四处烧杀淫掠，“西则自新填地金利埠烧至西炮台，南则至天字码头烧至小东门，被火者不下千余家，难民提男携女号呼之声，遍于道路”。七日（27日）《广州和约》订立后，占据四方炮台和耆定炮台的英军，“于附近各乡，昼夜巡扰，抢夺耕牛，搜索衣物，淫辱妇女，发掘坟墓，祸及枯骨，种种贻害，不可胜言”④。英军的暴行，激起了爱国士绅和广大群众的强烈义愤。奕山未退出广州前，城郊各乡绅民便利用当地旧有的社学组织，“集众公盟”，准备联合抗英。四月九日（5月29日），一队英军窜到城北三元里一带，大肆淫掠，奸辱老妇，

村民奋起反击，当场打死英军数人。为防止英军报复，萧冈乡举人何玉成遂柬传南海、番禺、增城诸村，各出丁壮，共同对敌。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农民、渔民、手工工人等迅速集结，城郊东北六个社学的客家群众及打石工人，也在监生王韶光带领下，准备参加战斗，相约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四月十日（5月30日），清晨，三元里及各乡群众五六千人手持木棍、锄头、铁锹、刀矛、石锤、鸟枪，向英军盘踞的四方炮台发起佯攻；英陆军司令卧乌古亲率侵略军出击。群众按原定计划且战且退，将英军诱入牛栏冈伏击圈。英军一到牛栏冈，早已埋伏待命的群众勇猛地发起了进攻；此时以林福祥为首的水勇500余人闻声赶来，妇女儿童也上阵助威，送水送饭。中午，雷雨大作，英军困在泥泞里，行动困难，火枪淋湿，不能发射。各乡群众乘势将英军分割包围起来，进行肉搏，英军被打得"各弃其鸟枪，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⑤。这一仗打死打伤英军近50人，缴获许多战利品。直到傍晚，英军才陆续撤回四方炮台。四月十一日（5月31日），清晨，三元里人民乘胜包围了四方炮台，番禺、南海、花县、增城、从化等县400余乡群众也陆续赶来，围台群众增至数万。义律、卧乌古无计可施，只得派人向广州地方政府求救，扬言如不将围台群众解散，英军"立刻扯下休战旗帜，恢复敌对行动"⑥。秉承英军意旨，广州知府余保纯偕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急忙赶到围台群众中，一方面打恭作揖，诱劝群众撤离，一方面威吓士绅，称如不收兵，则600万元赎城费要由士绅负责。在清官员的威逼下，一些士绅首先动摇潜避，群众也逐渐退解，台围遂解。这次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的、规模较大的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它显

示了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决不屈服的英雄气概和巨大威力。

自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英军再次侵入闽浙地区以来，群众抗英斗争继续广泛展开。

英军侵占厦门后，晋江、惠安、南安、同安、马巷、厦门各厅县群众，纷纷自相团练，各保乡村，凡英军“水陆栖止处所，昼则寻杀无时，夜则乱石向掷”⑦，予以痛击。乡民陈氏组织群众500人，用抬枪同侵略者作战，杀伤大量敌人，使英军不敢久驻厦门，退屯鼓浪屿。

英国对台湾早已垂涎欲得。道光二十年六月十八日（1840年7月16日），英船即曾驶至台湾水域，被台湾镇总兵达洪阿、台湾道姚莹组织清军击退。后达洪阿、姚莹招募乡勇、水勇、屯丁6000多名，协同官军防台。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1841年9月30日），英舰一艘侵入台湾基隆口，攻击中国炮台。中国守军立即发炮还击，英舰桅折索断，慌忙退出口外，触礁击碎，英兵纷纷落水；屯丁乡勇和守军共同追捕，斩首32人，生擒133人，缴获大炮10门。同年九月十三日（10月27日），英舰又至基隆，声言要夺回前次被俘英人，被壮勇和守军击退。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三十日（1842年3月11日），英舰驶至大安港（今大甲溪北大甲街附近）洋面，当地渔民一面飞速通知守军，一面佯替英舰导航，将其引至暗礁使其搁浅，此时预先埋伏的兵勇突起猛攻，将英舰击破，毙敌数十，生擒49人，夺获枪炮无数。台湾军民的英勇斗争，粉碎了英军侵占台湾的阴谋。

在浙东，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后，四出骚扰。当地以徐保、张小火、钱大才为首组织黑水党，采取四散隐伏，神出鬼没方式，捕杀敌人。据载：英军于宁波夜巡街巷，两人先

后行，“方礴格语笑，后者忽无声，回视之，已失头而仆，前者大骇，僵立若槁木，俄顷又失其头”；有时群众着英军衣冠，行于路上，“洋人近与语，遽刺杀之”；或以布自后扣其颈，使其不得出声，俟拽至僻静处，再捆之以缒出城；有时群众数十名，以长藤为环，暗伏城外墙根下，俟英军巡视城上，则“为怪声惊之，洋人偶一倚堞俯视，遽以藤环钩其头而坠”，“城上洋人谓坠者误失足，且闻其颠蹶，皆伸头下视，思援之，又尽为藤所钩致”⑧。由是，黑水党在两月之中，擒斩英军数百，“英人大恐”⑨。道光二十二年五月（1842年6月），定海三十六岙群众齐集神庙，订立盟誓，并散发告白，号召群众打击英军，焚烧敌舰船，“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⑩，采用机动灵活方式坚持不懈地同英国侵略者战斗到底。

在江苏，英军窜入长江以后，遭到松江、无锡、江阴、瓜州、仪征等地的农民、渔民、盐民和船夫等的有力打击。当时，沿江各地和夹河各乡，绅民纷纷捐资团练义勇，计有九万余名，到处袭击敌人，焚烧船只。太仓、江阴的农民以竹竿、锄头袭击侵略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1842年7月），英军进攻镇江前后，习于战斗的瓜洲、仪征盐民一见夷船，即放抬枪，给敌人以极大威胁。七月九日（8月14日），英军闯入靖江骚扰，“民众哗然，齐声杀鬼，夷人惊走”⑪。次日，英兵百余人乘杉板再犯靖江，农民们“揭竿荷锄而来，约千余人列阵圩岸上，施放抬枪。持械士兵喊以助威，乡人和之，声振林谷”⑫。英军发炮轰击，靖江人民隐蔽在堤下和敌人相持，打死英兵十余名，又打中英船火药舱，侵略者纷纷跳水逃命，从此不敢复窥靖江。

鸦片战争期间，人民群众在东南沿海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有力说明：中国人民是富于反抗外来民族压迫的革命传统的。在伟大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侵略者妄图灭亡中国，都是徒劳的。

注　释

①《圣武记》。

②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鸦片战争》第5册，第120页。

③《鸦片战争》第3册，第498页。

④《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56页。

⑤梁廷楠《夷氛闻记》第75页。

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修订本）第344页。

⑦《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0页。

⑧《鸦片战争》第4册，第382页。

⑨《鸦片战争》第4册，第382页。

⑩佐佐木正哉编《鸦片战争の研究》（资料编）第300页。

⑪《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⑫《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第351页。

清（后期）

首批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鸦片战争的直接结果，是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目的在于打开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为其进一步侵略、掠夺中国奠定坚实的基础。道光二十年正月十八日（1840 年 2 月 20 日），英外交大臣巴麦尊在致派华全权代表懿律和义律的训令中，明确要他们必须通过武力压迫中国签订一项正式条约，其内容应包括：赔款；割让岛屿；增开通商口岸；规定固定的关税；在华英人应归英国在华领事按英国法律和所定规章管理，等等。训令指出，这些是条约中应包括的主要规定，“是在要求中国政府对过去的赔偿和对未来的保证”①。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1841 年 4 月），英国内阁接到义律单方面确定的《穿鼻草约》的报告，认为未能全面实现英国政府的要求，于是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代表，并增调军队来华，扩大战争。巴麦尊在给璞鼎查的训令中指出，只有清政府无条件地接受英国所提出的全部要求，才能停止军事行动。遵照政府的训令，璞鼎查率英军在攻占闽浙沿海一些

城市后，于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1842年7月6日）起，沿长江西犯，目标是侵占控扼长江、运河两大水道的南京，逼迫清政府完全屈服。

以“天朝”自居实则远落时代后面的清王朝，不仅对世界盲无所知，对英国发动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昏然不明。道光二十年七月（1840年8月），懿律率主力舰队到天津海口，照会清政府，宣称如果不能满足照会中提出的所有要求，“必相战不息”。清政府误认照会为“诉状”，要懿律等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道光帝以为将林则徐革职，在广州照旧恢复通商，即可了事。但不久，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义律单方面宣布的包括割香港、赔烟价的《穿鼻草约》传到北京，道光帝在盛怒之下，被迫对英宣战，然而清军迅速遭到失败，奕山与英军签订《广州和约》。道光二十一年七月（1841年8月），璞鼎查率英军再次北犯，清廷被迫应战，但又遭到惨败。此时，清政府内部妥协议论再次抬头，浙江巡抚刘韵珂向道光上“十可虑”奏折，警告道光帝：倘若战争再延长下去，“安保此外不另有不逞之徒乘机而起”②。道光采纳刘韵珂建议，命盛京将军耆英署杭州将军偕同已被革职的伊里布前往浙江议和。但英军却不急于谈判。当英军退出宁波，扬言要进犯乍浦时，耆英派伊里布驰往乍浦，设法“羁縻”。然而，伊里布刚到嘉兴，乍浦已经失陷。伊里布命家人张喜见英酋，提出清政府释放英俘，英军退出大洋，并开始和议。英军收下俘虏，但并未停止军事行动。伊里布又遣外委陈志刚持书前往英军营中，希望恢复和好。英方复书说，大兵已集，不得不战。伊里布再次派陈志刚持书前往，请英方择定镇海或定海，商议罢兵友好事宜。英方以耆英、伊里

布不具全权代表资格，拒绝与议。道光接到耆英、伊里布有关英方拒绝和议的报告后，六月二日（7月9日）谕令耆英等，要“专意剿办，无稍游移”③。对此，耆英等在奏折中，反复陈述清军无法取胜，只能“羁縻”。为了讨好侵略者，耆英又饬令“沿江各州县，馈送英军牛羊，勿与构怨”④。六月十四日（7月21日），英军攻陷镇江。六月二十九日（8月5日），璞鼎查率侵略军进抵南京城下；至七月四日（8月9日），英军80余艘舰船全部列在南京观音山至下关一带江面。七月三日（8月8日），伊里布抵南京；六日（11日），耆英也至。七日（8月12日），耆英遣佐领塔芬布等前往英船，通知钦差已到。英方却将早已准备好的议和条款，交塔芬布等带回。为压迫清政府就范，八日（8月13日），英军借口闻知清政府调兵来省，“以为议和乃谎言诡计”，随即命令各船“挂出红旗”作战斗准备，声称“次日（九日）开炮攻城”⑤。耆英一面向道光上奏，一面“连夜备文，允其所请”。耆英即遣侍卫咸龄、江宁布政使黄恩彤、宁绍台道鹿泽长偕伊里布家丁张喜等诣英舟，许将英方所提要求奏请皇上，俟批回即定约。耆英等在给道光的奏折中指出：“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大局”⑥。时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也公然向道光帝进言：“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相等，而劳逸已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⑦在内外压力下，道光决定妥协。七月十七日(8月22日)，耆英等请英方代表签订条约，并钤御玺，道光谕“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允所请⑧。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耆英、伊里布、牛鉴等前往英国军舰康沃利斯号，与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璞鼎查正式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八月二日（9

月6日），道光帝正式批准该条约。十一月二十七日（12月28日），英国批准南京条约。道光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1843年6月26日），双方批准书在香港正式交换。

《南京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为：

一、赔款2100万银元。其中鸦片烟价600万元，商欠300万元，军费1200万元；4年内交清，“倘按期未能交足，则酌定每年每百圆应加息五圆”。

二、割让香港。条约规定：“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管，任立法治理。”

三、五口通商。准英人携眷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5个港口，进行贸易通商；英国“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管商贸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事往来”。

四、协定关税。规定通商口岸进出口税饷须由双方“秉公议定则例，由部颁发晓示，以便英商按例交纳”。

五、废除行商（亦称公行）制度。规定今后英商赴五口贸易，“勿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不必经官方指定的行商承办。

六、释放被拘禁的英国人，宽免与英国人有来往的中国人。

七、公文平行往来。规定英国住中国之总管大员与清朝大臣，“有文书来往，用‘照会’字样；英国属员用‘申陈’字样；大臣批复用‘扎行’字样；两国属员往来必当平行照会，若两国商贾上达官宪不在议内，仍用奏明字样”。

八、俟清帝允准和约各条施行并按规定交清首次600万元赔款后，英军退出长江，但定海、鼓浪屿须俟赔款“全数交清”、各通商口岸开关后撤出。

《南京条约》有关通商贸易的内容，只提出了纲要，缺少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因此，根据英方要求，中英双方在广州和香港继续会谈，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和八月十五日(1843年7月22日和10月8日)，分别订立了《五口通商章程（附海关税则)》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

《五口通商章程》的主要内容为：

一、确定值百抽五税例。规定凡货船按吨输钞，计每吨输银五钱；所有纳钞旧例及出口、进口日月规各项费用，均行停止。

二、领事裁判权制度。规定凡英国人与中国人发生“交涉词讼”，或英国人在中国犯罪，“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

三、英国舰船停泊于通商口岸。规定所有通商五口，每口内准英国停泊官船一只，“其钞税等费均应豁免”。

《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的主要内容为：

一、五口开辟后，英商只准在五口贸易，不准赴他处及乡间、内地贸易、任意游行。

二、租界制度。《南京条约》允准英人携眷赴五口居住。《善后条款》又进一步规定“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理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英国管事官每年以英人或建屋若干间，或租屋若干所，通报地方官，转报立案”。

三、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⑨。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接踵而来，

相继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

美国与中国发生关系，始于英国承认其独立的第二年，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在这一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到广州贩取丝茶。此后，在美国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美国冒险家、海盗商人陆续到中国，开展掠夺性贸易。据记载，美国独立后，“每一个沿着海湾的小村落，只要有一只能容五个美国人的单桅帆船，都在计划到广州去”⑩。他们把土耳其鸦片以及从各地掠夺来的人参、皮货、檀香木等货物，运进中国，然后将中国的茶叶、南京布、瓷器等运回美国和其它地区，从而获取高额利润。这种贸易，不仅缓解了美国独立后面临的经济困难，而且为它积累了大量资本。尔后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它又更加迫切地要求扩大中国的市场。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抵广州查禁鸦片，这时美国“商人”以奉公守法的面目，乘机垄断鸦片贸易，猖狂进行鸦片走私；并替英商转销商品、代购原料；甚至把英国船插上美国旗，运货进口销售。道光二十年三月（1840年4月），美国两只军舰开到中国，为英国在广州的武装挑衅助威。道光二十二年春，美国海军少将劳伦斯·加尼率东印度分遣舰队到中国，一面为英军声援，一面进行讹诈，迫使清政府“赔偿美商损失”约25万美元。鸦片战争结束后，加尼立即向清政府声明：凡中国给予他国的利益，美国亦应一体均沾。得知《南京条约》订立的信息，美国总统泰雷即建议国会批拨专款，遣使前往中国，迫使清政府签订条约。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七日（1844年2月24日），大鸦片贩子约翰·顾盛的本家兄弟、国会议员加里布·顾盛作为美国特使及全权公使，率舰抵达澳门。顾盛到华后，一面派军舰驶越虎门，开进黄浦，并且扬言大批美国军舰正在陆

续开来，如清政府不按美国开列条件签订条约，战争就会重演；一面则宣称不与广州地方当局开议，要驱兵北上，直接进京面见清朝皇帝。在美国的威逼下，清政府派遣两广总督、钦差大臣耆英前往澳门附近的望厦村与顾盛进行谈判。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六日（1844 年 6 月 21 日），谈判正式开始，耆英首先请顾盛“以贵国合意之缔约方略允示”。顾盛立即提出一份约稿，作为谈判的基础。五月十八日（7 月 3 日），双方正式签订中美《五口通商章程》，即《中美望厦条约》。通过这个条约，美国未费一兵一卒，就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及其附约中所夺取的除割地、赔款以外的全部特权，而且还取得了英国尚未得到的一些新特权。其中主要有：

一、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这就是说，中国要变动海关税率，必须经过美国领事的批准；而由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规定，中国变更税率实际就须得到所有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准。

二、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条约规定，美国人与中国人、美国人之间以及美国人与任何其他外国人之间，在中国发生的刑事与民事的诉讼，“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三、攫取了进行思想文化侵略的权利。条约规定，美国人有权在 5 个通商口岸租地建楼，开设医院，建立教堂。

四、进一步侵犯了中国的领海权。条约规定，美国兵船可以任意到“中国各通商港口”“巡查贸易”；美国“贸易船只进中国五港口湾泊”，中国无权管理。

五、迫使清政府承担了保护侵略者利益的义务。条约规定，对于在华的美国人，清政府必须“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

全"，如果爆发中国人民反抗美国侵略者的斗争，清朝地方官员必须"派拨兵役弹压查拿"、"按例严办"。

六、为进一步攫取权益提供了根据。条约规定，"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⑪。

《望厦条约》订立后，顾盛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说："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它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⑫

紧随美国之后，法国也派舰队东来，对清政府进行讹诈。法国与中国发生直接关系始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一年，法王路易十四派张诚、白晋等六名传教士抵北京，受到康熙帝的接见。康熙三十七年（1698），法国第一艘商船抵广州。此后，法国在华贸易虽时有发展，但总量并不大。英国、美国先后逼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后，法国资产阶级也垂涎三尺。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一日（1844年8月14日），法国所派专使剌萼尼率八艘兵船到达澳门。清廷派两广总督耆英前往交涉。但是，剌萼尼玩弄外交手腕，既不急于与耆英接触，也不说明其来华真实意图，而故意抛出种种模棱两可的意见，以迷惑清朝政府。对此，耆英索性把中英、中美条约的副本送交剌萼尼，由其任选有利条款。因此，双方顺利达成协议。耆英与剌萼尼于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在黄埔"阿吉默特号"军舰上正式签订中法《黄埔条约》。通过条约，法国除攫得中英、中美条约的全部特权外，又特别规定法国人可在5个通商口岸建造教堂、医院、学校、坟地；如果中国人将法国的教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⑬。这

就迫使清政府承担了保护法国教堂和传教士的条约义务。十月二日（11月11日），剌萼尼又迫使清政府同意取消雍正二年（1724）宣布的天主教禁令，且迫使清政府于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1846年2月21日）正式布告天下官、军、民等周知："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尚存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至各省地方官，接奉谕旨后，如将实在习学天主教，而并不为匪者，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⑭从此之后，各国传教士纷纷到中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一支重要别动队。

美、法强迫中国定约后，比利时于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1845年7月25日）、瑞典、挪威于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四日（1847年3月20日）也分别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葡萄牙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吏，停付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

鸦片战争是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奴役的开始。《南京条约》及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中国的领土被侵占，关税、司法等主权被攫夺。从此以后，中国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榨取地，并逐渐丧失独立自主地位，从一个独立的封建社会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注　释

①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12－713页。

②《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4册，第1682页。

③《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七四。

④《鸦片战争》第3册，第163页。

⑤《鸦片战争》第6册，第196页。

⑥《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三七七。

⑦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55页。

⑧《清史稿·宣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36页。

⑩休斯：《两个海洋通广州》第25页转引自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27页。

⑪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51－57页。

⑫转自卿汝辑：《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79页。

⑬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页。

⑭《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6册，第2964、2975页。

清（后期）

英法联军之役

咸丰六年至十年（1856－1860），英、法在美、俄的支持下，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①战争。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所以又被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战争的发生，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19世纪40至50年代），是世界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美洲和澳洲金矿的发现，殖民地市场的扩大，生产技术的改革，促成了欧洲新的工业高涨。为推销日益增多的商品，摆脱随着工业高涨必然到来的经济危机，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极力要扩大旧有市场、夺取新的市场。因此，地大物博的中国就成了他们扩大掠夺的对象。经过鸦片战争，中国的大门已经被打开。但是直到这次战争前，外国商品的输入，并没有像侵略者们最初期待的那样大幅度增加。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有着顽强的抵抗作用；另一方面是英国大量倾销鸦片，削弱了中国购买正当商品的能力。然而，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却把商品滞销的原因归咎于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太少，中国的大门尚未

全部打开。为此，他们寻找一切机会加紧对中国的侵略。

最初，英、法、美企图乘太平天国蓬勃发展之机，利用外交途径，通过迫使清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来达到侵略目的。咸丰四年（1854），《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藉口《望厦条约》中有“各国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俟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②的规定，加以曲解，且援引最惠国条款，向清政府提出全国修改条约的要求。美国、法国也援引最惠国条款，要求与英国同时修改条约。三国要求修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全境开放通商；废除进出口货的内地税；外国公使驻北京；鸦片贸易合法化；准许华工出国等等。三国在广州、上海辗转交涉，未得结果。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及法国公使代表，乘兵舰三艘，直抵大沽口外，直接向清中央政府交涉，又遭拒绝。这些侵略者感到，如果不向清政府施行武力压迫，是达不到目的的。但是，此时英、法正与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无力东顾；美国一些官员见太平天国正在向上发展，清政府有可能垮台，也主张观望一段时间。咸丰六年（1856），《望厦条约》届满12年。美国在英、法的支持下，再次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仍被清政府拒绝。这年春，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英、法已有可能抽出较多的兵力，发动一场新的侵华战争；俄国因战败，则企图通过掠夺中国来弥补损失；美国积极支持英、法，从而乘机攫取新的侵略权益。于是，为压迫清政府屈服，他们决心对中国发动一场新的侵略战争。

首先挑起战争的是英国。咸丰六年九月十日（1856年10月8日），中国广东地方当局在中国船“亚罗号”上逮捕两名海盗和有嫌疑的10名水手。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闻讯后，

立即致函清两广总督叶名琛，以该船曾在香港登记（实际已经过期）为由，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且捏造情节，诬赖中国水师官兵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的尊严，因此，要求立即送回全部人犯，并向英国赔礼道歉。叶名琛最初对巴夏礼的无礼要求加以驳斥，后来怕事情扩大，采取妥协态度。九月二十四日（10月22日），叶名琛允释全部水手，但因未扯落英国国旗，不允道歉。巴夏礼为扩大事态，拒绝接受。二十五日（23日），英国驻香港舰队司令西马縻各厘率舰3艘、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约2千人，越过虎门，向广州发动进攻，战争正式爆发。由于叶名琛采取不抵抗立场，英军很快占据珠江沿岸各炮台，兵临广州城下，并接连向广州城内发炮轰击。十月一日（10月29日），英军百余名攻入广州内城，但因兵力不足，旋又退出。侵略者的疯狂挑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怒回击。广州城内外人民，到处阻击英国侵略军；部分爱国官兵深夜驾驶小艇，袭击英军所占炮台，使英军日夜不安。十二月十四日（1857年1月9日），广州人民放火烧毁英军驻地十三洋行，迫使侵略者全部逃回舰上。在广州军民的有力打击下，英军于十二月二十八日（1857年1月20日）退出珠江，等待援军。

为扩大侵华战争，英国政府于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五日（1857年3月20日）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侵略军来华；同时，又照会法、美、俄等国，约其联合出兵侵华。当时，法国正是拿破仑第三执政时代。他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政策，并企图通过对外战争，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稳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接到英国照会后，法国立即响应，并以“马神甫事件”作为发动侵华战争的

借口。马神甫即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于咸丰三年（1853）非法潜入中国内地广西西林县，以传教为掩护，勾结当地土豪、地痞行凶作恶，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咸丰六年正月二十四日（1856年2月29日），当地官厅将马赖处死。事件发生后，法国驻华官员多次要求赔偿、道歉，叶名琛或置之不理，或予以拒绝。咸丰七年三月二十六日（1857年4月20日），法国政府打起"为保卫圣教而战"的旗号，任命葛罗男爵为特命全权专使，率领一支侵略军开赴中国。美国和俄国虽没有正式出兵，但他们处心积虑地要乘英、法发动战争之机，攫得最大的利益。

英使额尔金于闰五月十一日（7月2日）③，法使葛罗于八月二十三日（10月10日），美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于九月十九日（11月5日），俄使普提雅廷于九月二十八日（11月14日），先后抵达香港。英、法以5600余人（其中法军1千人）组成联军，准备进攻广州。经四国使节密商，额尔金、葛罗于十月二十七日（12月12日）分别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广州城、修改条约和赔款，限十日内答复，并声明于2日后先占河南岛为质。二十九日（14日），叶名琛复照额尔金、葛罗，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三十日（15日），英法联军占领与广州隔江相望的河南。在完成进攻广州的部署之后，十一月九日（12月24日），英、法专使通知叶名琛，已将事务移交军事当局。同日，英法陆海军司令照会叶名琛，限2日内交出广州。次日，叶名琛复照拒绝。其时，清政府正以全力镇压国内的农民革命，对外不可能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但一则对外仍存疑忌，二则怕在人民中更加丧失威信，又不愿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完全屈服。因此，在外国侵略面前，清政府只能被动应付，时

战时和，希冀以较小的代价尽早了结兵端。两广总督叶名琛对英法联军的进攻，所持态度即是如此。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英法联军向广州发起进攻。叶名琛事先毫无准备，临战又不抵抗，采取“不战不和不守”的反动方针。次日，广州失守。叶名琛被俘后解往印度加尔各答，一年后病死于囚所。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纳无耻投降，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三人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下照旧担任原职，为侵略者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人民的反抗活动。这是近代历史上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它统治广州达3年之久。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英、法、美、俄四国照会清政府，要求派全权代表赴上海谈判，否则进军天津。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3月），英、法专使和美、俄公使先后抵沪，得知清廷拒绝在上海谈判的消息，决计北上。三月初（4月中旬），四国使节率舰陆续到达大沽口外，并于十一日（24日）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6日内派大员前往大沽谈判，否则采取必要手段；俄、美在照会中还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咸丰帝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与各国谈判；指示对四国所提要求除酌减关税外，均予拒绝，但又不得决裂开战。英、法两国专使故意在清政府代表是否具有全权的问题上多方挑剔，故意拖延时间以加紧战争准备。四月八日（5月20日）上午8时，英、法专使要求进入白河，前往天津，限谭廷襄于2小时内交出大沽炮台。10时，英法联军以炮舰12艘、登陆部队约1200人进攻大沽南北炮台；俄、美两国船舰也驶进白河，为英法联军助威壮胆。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守军不支而溃。十四日（26日），英法联军进抵天津城郊。十八日（30日），四国使节要求清政府派出“全权便宜行事”大臣，前往天津谈判，否则将进军北

京。四月二十日（6月1日），清廷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天津与侵略者谈判。在谈判中，英、法代表恃强要挟，气焰嚣张。俄、美公使继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帮助英、法，从中渔利。在俄、美公使的诱逼下，桂良等人于五月三日（6月13日）和八日（18日），先后与其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十二日（22日），英方发出照会，称若再不定议，即进军北京。接着，英方将自定条约56款提交桂良等，“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④，逼其全部应允。在英国武力压迫下，桂良等遂于五月十六日（6月26日）与英方签定了中英《天津条约》；次日又与法方签订中法《天津条约》。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主要内容有：1．外国公使常驻北京；2．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3、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4．外国商船可自由航行长江各口岸；5．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6．赔偿英国银400万两，赔偿法国银200万两。《天津条约》还确定条约批准后一年内在北京互换。条约签定后，英、法专使照会桂良等，称只有奉到“依议”硃批方肯撤兵。五月二十三日（7月3日），咸丰帝批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二十八日（8日），英法联军开始撤离天津；六月七日（7月17日），退出大沽口外。根据中英《天津条约》的规定，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在上海于十月三日（11月8日）同英、美，十九日（24日）同法签定《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鸦片贸易合法化；2．除丝、茶、鸦片等以外，进出口货物一律按值抽5%的关税，然后外商运洋货到内地，或从内

地运土货出口，均按值纳2.5%的子口税，各项内地税全免；3.各口税收划一办理，邀请英人帮办海关税务。

咸丰九年（1859）初，英、法、美、俄分别派出新任驻华公使，准备前往北京换约。因俄国新任驻北京东正教监护官、俄国全权代表彼罗夫斯基已于上年底至京，故三月二十二日（4月24日），俄国首先在北京与清政府交换了中俄《天津条约》。五月十七日（6月17日），英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首先抵大沽口外，要求守军于三日内撤去海口之木筏铁戗。五月二十、二十一日（6月20、21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舰队到达大沽口。直隶总督恒福遵照咸丰的谕令，两次照会各国公使，要他们从大沽以北30里的北塘登陆，由陆路经天津进京。英、法公使断然拒绝，声称"不惜用武力打开白河的大门，并继续向北京挺进"⑤。五月二十四（6月24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次日，英法联军向大沽炮台发动攻击。自咸丰八年英法舰队退去后，清廷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一万余人守御大沽一带，此时防卫工事已大大加强。面对侵略者的进攻，守卫炮台的爱国官兵，忍无可忍，奋起还击。经一日激战，清军击沉、击伤敌舰10艘，打死打伤侵略军470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受重伤。战斗激烈进行之际，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拿见英法军失利，以"血浓于水"（意即同族亲于异族）鼓惑美舰协助英法作战，但也未能挽救侵略者的失败。战后，清政府一再敦请英、法、美三国继续由北塘进京换约，英法公使不予理会，率舰队南下上海，准备调兵再战；美国公使华若翰则于七月十八日（8月16日）在北塘与清政府代表交换了中美《天津条约》。

英法联军在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资产阶级感到震惊和恼怒，立即发出一片战争叫嚣，公然提出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攻打中国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且狂妄地宣称要“成为中国的主人”⑥。咸丰十年(1860）春，英、法政府再度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率军开往中国。从三月（4月）起，英法联军陆续开抵中国沿海，其中英国军舰79艘，运输船126艘，军队约2万余人；法国军舰40艘，陆军约7600余人。三月二十四日（4月14日)，英、法公使及海陆军司令在上海举行会议，拟定军事行动计划，确定以上海、舟山为转运兵站，以大连、芝罘为前进据点，封锁渤海湾。闰三月一日（4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舟山。四月上中旬（5月底6月初)，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完成了进攻天津、北京的部署。五月八日（6月26日)，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邦，对中国宣战。五月二十五、二十六日（7月13、14日)，俄使伊格纳季耶夫和美使华若翰分别抵达北塘和大沽口外，再次以“调停人”身份，配合英、法行动。

六月十五日（8月1日)，根据伊格纳季耶夫提供的情报，英法联军在未设防的北塘登陆。二十六日（12日)，侵略军1万多人兵分两路，进攻新河与军粮城。僧格林沁所部蒙古骑兵与侵略者展开激战，但在敌人猛烈炮火袭击下大部牺牲，新河、军粮城失守。二十八日（14日)，联军进占大沽西侧的塘沽。咸丰闻报，大为惊恐，一面派大臣前往北塘，劝说英、法公使进京换约；一面谕令僧格林沁，告诫他要保住实力以护卫京师，“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⑦。七月五日（8月21日）上午5时，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北岸炮台，直隶提督乐善率守

军奋力抵御，相继殉国，晚上十时半炮台陷落。僧格林沁见北岸炮台失守，认为南岸炮台“万难抵御”，遂于当晚统兵向天津退却。直隶总督恒福随即挂起免战白旗，把南岸炮台拱手送给了敌人。英法联军占领大沽后，便溯白河长驱直入。这时僧格林沁又以天津较之大沽，不啻天渊，该夷水陆并进，仍是不能扼守”⑧为由，命令天津一带防军 1700 余人全部退至通州（今北京通县）。联军于七日（23 日）进占天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前往天津求和。此时，英、法侵略者并无意讲和，所以谈判很快宣告破裂。二十三日（9 月 8 日），英法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犯。咸丰帝一面命僧格林沁防堵，一面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与侵略者继续谈判。载恒等接连照会英、法公使，先则要求联军退回天津，然后开始和谈，继则请求侵略者止于河西务，在通州进行谈判。额尔金等考虑到联军在进军过程中，需要时间补充军需物资，故同意在通州举行会谈。七月二十九日（9 月 14 日），联军先头部队抵河西务，着手筹建兵站；同时额尔金派巴夏礼等到达通州，与载恒等开始和谈。八月二日（9 月 16 日），咸丰帝谕载恒等，对英、法方面的各项要求，均予允准。可是英、法代表却节外生枝，于三日（17 日）提出进京换约时须向咸丰帝亲递国书、清军从张家湾撤退两项要求。由此谈判彻底破裂。

八月四日（9 月 18 日），僧格林沁将巴夏礼等三十九人扣押送京。同日中午，联军向张家湾清军驻地发动进攻，清军 2 万余人退往通州八里桥。七日（21 日）凌晨 4 时，英法联军 5000 人进攻八里桥，清军 3 万人迎战，再次大败。经此两战，僧格林泌等部清军溃不成军，完全丧失战斗力。次日，咸丰帝

以“秋弥木兰”为名，率后妃、皇子及一些王公大臣仓皇逃往热河，命其弟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督办和局”。十二日（26日），联军进至北京朝阳门外。奕䜣照会英、法专使，要求停战议和，英、法专使则要求先释放巴夏礼等人；历经十日，双方交涉毫无结果。二十二日（10月6日），联军在德胜门外击败清军，随后闯入北京西北部的圆明园。侵略者在此大肆抢劫珍贵文物，金银珠宝被搜掠一空。二十四日（8日），巴夏礼等人被释放。二十九日（13日），北京留守当局交出安定门，英法联军控制了北京城。为要对清朝皇帝实行惩罚和消灭罪证，九月五日（10月18日），额尔金下令纵火焚烧圆明园，大火延烧三日，昼夜不息。历经150余年修建、耗银上亿两的东方名园和艺术宝殿，在侵略者的暴行下化为灰烬。在侵略者武力威胁下，奕䜣对英、法提出的条件，一概应允。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奕䜣和额尔金签订《中英续增条约》（又称《中英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次日，奕䜣又同葛罗签订《中法续增条约》（又称《中法北京条约》，互换了中法《天津条约》。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除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之外，又增加了新的条款，其影响较大的有：1. 增开天津为商埠；2. 准许华工出国；3. 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4. 将以前充公的天主教产发还。充当翻译的法国教士又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上加入“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5.《天津条约》中规定的对英、法的赔款，都增加至白银800万两。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咸丰帝批准《北京条约》。十九日（11月1日），英法联军开始从北京撤军。这时，沙俄公使乘火打劫，迫使奕䜣于十月二日（11月24日）与其签订中俄《北京条约》，除攫取英法所

得权益外，还为它霸占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提供了条约根据。

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外国侵略者攫取了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更多的特权，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扩大到中国的整个沿海和广大内地。此后，他们逐步控制了清朝中央政权，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地的交通事业，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一步。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 14 页。

②《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56 页。

③额尔金抵香港后又于闰五月二十五日（7 月 16 日）率军赶赴印度镇压当地人民起义，直到八月三日（9 月 20 日）才重返香港。

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3 册，第 966 页。

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6 册，第 191 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2－43 页。

⑦《第二次鸦片战争》第 4 册，第 469 页。

⑧《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 6 册，第 2138 页。

清（后期）

沙俄侵华领土

沙皇俄国是一个对外侵略扩张成性的国家。在中国近代，它不仅同英、法、美、德、日一起，通过各种方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从中国攫取大量侵略权益，而且还强占了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的大片领土。

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定，暂时遏制了沙俄向中国东北地区的扩张，但是，沙俄政府并未因此放弃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的野心，“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乘清朝内外交困这一有利时机，沙皇尼古拉一世（1825－1855）决心要“实现他的高祖父和祖母”（即彼得一世和叶卡特琳娜二世）吞并中国黑龙江地区，打开通向太平洋出海口的“遗志”。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47年9月6日），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为西伯利亚总督，授意他要放手侵占中国黑龙江地区。他上任后，立即着手建立一支庞大的“外贝加尔哥萨克军”，为入侵中国作积极准备。在他的支持下，道光

二十九年（1849），俄国海军上校涅维尔斯科伊率“贝加尔”号运输船，由海上绕路勘察了黑龙江口和库页岛，发现黑龙江可以直通太平洋，库页岛系脱离大陆之一岛，且海峡水深而不结冰，极便巨轮通过。次年，涅维尔斯科伊一伙强占黑龙江口的庙街，以沙皇的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到咸丰三年（1853），沙俄已把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黑龙江下游地区，置于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为全面侵占黑龙江北岸，从咸丰四年四月至七年五月（1854 年 5 月至 1857 年 6 月），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的抗议，先后四次派遣大批满载侵略军的船队，强行武装航行于我国内河黑龙江，并在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设立军人哨所和移民村屯。咸丰六年（1856），沙俄悍然宣布成立以庙街为中心的“东西伯利亚滨海省”。咸丰七年（1857）夏，沙俄又宣布在整个黑龙江左岸建立所谓“阿穆尔防线”，下设两个军分区，分别属贝加尔和滨海省驻军司令部管辖。至此，我国黑龙江以北地区，实际已被沙俄军事占领，只等恰当时机迫使清政府承认即成事实。

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沙俄趁火打劫，用各种极端卑鄙无耻的手段，对清政府进行威胁、欺骗和讹诈，逼迫清政府签定割地条约。咸丰七年（1857），穆拉维约夫向黑龙江一带和蒙古边境调集步兵 16000 人，骑兵 5000 人，炮兵 1000 人，配备各种大炮 40 门，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同时，俄国政府又派沙皇亲信、侍从将军普提雅廷为公使，前来中国与清政府谈判。七月（8 月），普提雅廷乘兵船到天津，提出中、俄两国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无理要求，遭到清政府的严正拒绝。随后，他即南下香港，和英、法、美三国公使勾结，共同侵华。咸丰八年四月八日（1858

年 5 月 20 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穆拉维约夫趁此时机，于四月十日（5 月 22 日）率领兵船迅速抵达瑷珲，以武力胁迫清黑龙江将军奕山重新签定边界条约。谈判开始后，穆拉维约夫拿出事先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为了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奕山据理驳斥，指出早在《尼布楚条约》中确定的中俄边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穆拉维约夫理屈词穷，恼羞成怒，“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又大声对翻译说：“告诉他们，我不能再等了”，“同意与否，我只能等到明天”②。接着，俄国军舰在黑龙江上示威，“夜间瞭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在沙俄武力威逼下，奕山以避免“夷酋愤激，立起衅端”③为由，向侵略者屈服。四月十六日（5 月 28 日），奕山与穆拉维约夫签定《中俄瑷珲条约》，规定：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 60 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只有精奇里江（今俄罗斯结雅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即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人，仍在原地“永远居住”，由中国官员管辖，俄国人“不得侵犯”，乌苏里江以东至海的中国领土作为中俄“共管”；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舶航行。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④。该条约使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蒙受重大损害，清政府未予批准。咸丰帝将奕山革职留任，并命其挽回《瑷珲条约》中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中俄共管的条款。

《瑷珲条约》签定不久，五月三日（6 月 13 日），俄使普提雅廷乘英法联军进占天津之机，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天津条约》，除攫取了同英、法《天津条约》一样的特权外，还特

别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⑤这为沙俄在所谓"秉公查勘"边界的名义下进一步侵吞我国大片领土埋下伏笔。

沙俄的贪欲是无止境的。《瑷珲条约》的墨迹未干，沙俄就迫不及待地把侵略魔爪伸向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它故伎重演，仍"以实际占领作为外交交涉的后盾"⑥。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二日（1958年6月3日），穆拉维约夫在东正教大主教英诺森陪同下，率大批人船顺黑龙江下驶，于五月二日（6月12日）抵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汇流处的伯力，擅自将该地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卡（光绪十九年改称哈巴罗夫斯克）。咸丰八年至九年（1858－1859）间，穆拉维约夫在我国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建立23个军人村镇，移民300多户，派兵3000多人驻守，并且"命令将所有中国官员和岗哨从乌苏里江右岸撵到左岸，对顽抗者予以逮捕，并用武力押解至瑷珲"⑦。咸丰十年五月十四日（1860年7月2日），沙俄占领中国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即"控制东方"。至此，沙俄已经完全把北起黑龙江口，南至图门江口的乌苏里江以东整个地区，包括库页岛，加以军事占领。为迫使清政府承认俄国侵占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沙俄先后派遣全权代表彼得罗夫斯基和伊格纳季耶夫公使前往北京，谈判重新勘定界址，遭到清政府代表肃顺的据理驳斥和严正拒绝。咸丰十年四月（1860年5月），伊格约季耶夫离京前往上海，一面向正准备大举进犯津、京地区的英法联军提供情报和出谋划策，一面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善为说合"。八月，伊格纳季耶夫随英法联军重返北京，再次以"调停人"的身份，帮助英、法压迫清政府妥协。英、

法订约后，伊格纳季耶夫以“调停有功”，立即提出续约草案15条，逼迫清政府接受。他骄横跋扈，声称必须按照他所开列的条款签字划押，“一字不能更易”⑧，并威胁说：“正是他不是别人说服了联军将军队撤回天津，而现在，要将他们召回北京，对他来说也是最容易不过的：只需致函两国特使，说他们和中国所签定的条约靠不住，需要修改，此事即可办到。”⑨在沙俄的威逼下，奕䜣与伊格纳季耶夫于九月二日（11月14日）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又名中俄《续增条约》）。该条约除迫使清政府承认《瑷珲条约》外，还规定：1. 将乌苏里江以东40余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归俄国；2. 中国西部将“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1728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南至浩罕边界为界”⑩；3. 增开喀什噶尔为商埠，并在喀什噶尔、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张家口等地设领事馆和享有领事裁判权。

《北京条约》签定后，沙俄援引条约中关于中俄西部边界走向的条款，逼迫清政府订约割地。同治元年七月八日（1862年8月3日），清政府派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与俄国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罗夫，在塔尔巴哈台举行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巴布科夫利用《北京条约》关于中俄西部边界含混不清、充满矛盾的规定，采取断章取义、歪曲篡改的手段，提出“不论中华边界，只以常驻卡伦为界”⑪的无理要求。明谊对此严加驳斥，明确指出：“常驻卡伦”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境线，即使按照《北京条约》第二款的规定，中、俄两国也“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划界，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

等地仍属中国。沙俄代表理屈词穷，蛮不讲理，于八月二十七日（9月20日）宣布中止谈判以示威胁。

同治二年（1863）春，俄国乘陕甘回民起义、新疆局势不稳之机，出兵进犯中国西北边疆。对此，清政府一面向俄国抗议，要求撤回入犯军队，一面令明谊迅赴塔城，早日与俄定界。但俄方以明谊照会中有“商办”字样，称其打算辩论，因而拒绝派员前来。同治三年（1864）春起，俄国加紧武装入侵，伊犁告急；而新疆少数民族亦相继举义。在此情势下，清政府完全屈服，于七月照会俄方，“准照议单，约派使臣，速来换约”⑫。八月十四日（9月14日），清政府代表与沙俄代表在塔城重开谈判。在这次谈判中，俄方根本不容清方代表争辩，扎哈罗夫扬言：中国代表只能“按照议单定界换约”，“若不照此办理，稍有更改，我们立即起程回国，只好派兵强占”⑬。明谊等人的活动只是在俄方绘制的分界图上，据俄文地名加注满文地名而已。就这样，双方于九月七日（10月7日）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根据这个勘界议定书，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中国领土，包括《北京条约》规定为界湖的斋桑湖、特穆尔图淖尔等地区，均划归俄国，总面积达44万多平方公里。

沙皇俄国的扩张野心，是没有止境的。同治四年（1865）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南疆，渐次占领天山南北大片中国领土，并悍然成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汗国”）。在此时期，沙俄一方面同英国争夺对阿古柏的控制，以便扩张自己在新疆的势力，一方面又趁阿古柏入侵南疆、中国军队东撤之机，出兵侵略我国新疆北部。同治十年三月下旬至五月中旬（1871年5月中旬至7月上旬），沙俄以帮助清政府“防

乱”和“安定边界秩序”为由，出兵占领了伊犁及附近地区。此后，清政府与沙俄一再谈判交还伊犁问题，均无结果。光绪二年（1876），左宗棠督军进兵新疆，收复失地。光绪三年十二月二日（1878年1月4日），清军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国土，俄英利用阿古柏吞并我国新疆的阴谋彻底破产。

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一日（1878年8月19日），清政府任命吏部侍郎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俄京谈判收复伊犁问题。崇厚于是年十二月八日（12月31日）抵彼得堡，月底（1879年1月下旬）呈递国书，随即开始与俄国代表谈判。在谈判中沙俄对崇厚竭力施加压力，进行讹诈。而崇厚又独断专行，不顾清政府一再强调的“未可因急于索还伊犁，转贻后患”的指示，在未经清政府允许的情况下，于光绪五年八月十七日（1879年10月2日），在俄国黑海之滨里瓦吉亚擅自与沙俄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有：1. 俄国归还伊犁城，中国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帖克斯河流域大片领土；2. 修改塔尔巴哈台附近边界，赔偿俄兵费500万卢布（合280万两白银）；3. 俄商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增辟由陆路至天津、汉口、西安通商线路；4. 俄国在嘉峪关、乌鲁木齐、哈密、吐鲁番、古城（今奇台）等地增设领事。通过该条约，伊犁虽然归还中国，但其西境、南境都被沙俄割去，使其陷于北、西、南三面被俄国包围的危险地位，而且南疆也因同伊犁失去联络而孤立。

崇厚所订条约的内容传到中国，引起全国朝野大哗，清政府拒绝承认这个条约，并把崇厚革职治罪。光绪六年一月十日（1880年2月19日），清廷出使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

国钦差大臣，到彼得堡交涉改约。七月（8月）中俄双方重开谈判。谈判开始，俄方先是拒绝对崇厚所订条约进行修改，继之则又恣意敲诈，声称倘若对原约进行修改，中国必须割让沿海地方和增加赔款作补偿。曾纪泽坚持改约的立场，严词驳斥了沙俄的无理要求。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光绪七年一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与俄国代表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在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当时称《改订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通过改订条约，中国索回了部分利权，主要有：1．中国收回伊犁，取消前约中割让特克斯河流域和松花江航船到伯都纳等条款；2．规定俄商只能到嘉峪关，免去到汉口、西安通商权；3．仅许沙俄在嘉峪关和吐鲁番设领事；4．俄商在新疆贸易“均不纳税”改为“暂不纳税”。但是，通过这个条约，沙俄仍割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赔款则增为九百卢布（合500万两）。之后，沙俄利用条约中关于中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的规定，在光绪八年至十年（1882至1884年）间，又强迫清政府签订5个勘界议定书。通过《伊犁条约》和这些勘界议定书，沙俄又吞并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

光绪十年五月十日（1884年6月30日）《中俄续勘喀代噶尔界约》规定：在帕米尔地区，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据此，帕米尔西北部被列入俄境。但是，沙俄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于光绪十五年（1889）、十七年（1891），连续派军队越界侵入帕米尔地区。光绪十八年（1892），俄军违约侵入帕米尔东部一带，进一步强占萨雷润勒岭以西2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通过上述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沙皇俄国共割去一百五十一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违约强占二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鸦片战争以来夺取中国土地最多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35页。

②《俄国远东军官在俄国远东的功勋》第354－355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3册，第911－91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页。

⑤《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88页。

⑥《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第1卷，第544页。

⑦《1860年〈北京条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9页。

⑧《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册，第2557页。

⑨《1860年〈北京条约〉》第142页。

⑩《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50页。

⑪⑫《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八，第3页。

⑬《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九，第21－23页。

清（后期）

辛 酉 政 变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帝奕詝病逝后，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奕䜣，在北京发动政变，夺取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这一年是夏历辛酉年，故称辛酉政变；因新皇帝建元年号初定“祺祥”，亦称祺祥政变；因事发于北京，又称北京政变。

政变的发生，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的产物。

咸丰帝即位之初，面对内忧外患，天下扰攘，本欲通过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力图改变因循不振的衰微局面，从而渡过难关。为此，他即位10个月后，即罢黜道光朝权奸穆彰阿，将对外采妥协态度的耆英降五级处分。之后，又逐渐起用一批心腹重臣，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和宗室肃顺等。其中又以肃顺为核心人物。肃顺（1816－1861），郑亲王端华之弟，道光时仅为三等辅国将军。咸丰帝即位后，官运日隆，历任内阁学士、护军统领、御前侍卫、工、礼、户部侍郎、左都御史、理藩院尚书兼都统、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署领侍卫内大臣。他们当政后，对内主张重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汉族地主官僚，全力镇压农民起义；

对外则疑虑甚深，不肯轻允侵略者的过高要求，但因其以主力用来对内，因而在侵略者武力进攻面前，又不可能进行有力的抵抗，故在战与和两方面，均屡遭挫折。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势，改变清廷内外臣僚因循苟安、废弛腐败的状况，他们秉承咸丰帝“猛以济宽”的谕旨，不惜屡兴大狱，弄得“部曹动辄获咎，入狱削官，累累不绝”①。结果不但“未能起积弊而振兴之”，反而“求之愈急，失之愈远”②，激起朝野上下的极度不安和不满，直接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分裂。

由于形势日益恶化，咸丰帝对前途失去信心，遂纵情声色以自遣，这就为那拉氏干政提供了可能。那拉氏（1835－1908），祖居叶赫，故称叶赫那拉。满州镶蓝旗人，后改隶镶黄旗，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员惠征之女。她自幼受封建教育，为人阴险机诈，极富权谋。咸丰二年（1852），被选入宫，得到咸丰帝宠幸，很快封兰贵人。咸丰四年，晋封懿嫔。咸丰六年（1856年）生皇长子载淳，晋封懿妃。次年，封懿贵妃，在宫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由于咸丰帝耽于声色，懒于理事，遂让那拉氏得以“时时批览各省章奏”③，代笔批答，随之政治野心日益增大，进而弄权宫掖，并逐渐与肃顺集团发生矛盾。

英、法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予清王朝以重大打击，且在清统治阶级内部，促成了奕䜣集团的形成。奕䜣（1832－1898），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詝异母弟。奕詝十岁丧母，由奕䜣生母抚养长大。道光三十年（1850），道光帝病死，奕詝继位。次年，封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五年（1855），奕䜣母病死，他不顾咸丰帝反对，强行为其母争皇太后封号，被咸丰帝斥责疏略礼仪，罢

去官职。后虽于咸丰七年（1857）复授以都统，咸丰九年（1859）授以内大臣等职，但这不仅与远支宗室肃顺的飞黄腾达不能同日而语，且在清廷中依然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授予奕䜣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留京同英、法议和，自己则率后妃、皇子及肃顺等王公大臣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避暑山庄。奕䜣受命之后，迅速与英、法签订和约，英法联军撤离京津南返，清廷统治危而复安。通过议和，奕䜣在统治集团中的声望、地位迅速上升，一批不满于肃顺擅政而留在京城的文武要员均聚集在他的周围，从而形成了一个上自部院大臣，下至章京主事等各类员弁的庞大政治集团。同时，通过议和，奕䜣又同外国侵略者建立了关系，博得了侵略者的好感和支持。

英法联军撤出北京后，在咸丰帝要否尽早回銮问题上，奕䜣集团与肃顺集团已经展开激烈斗争。咸丰的逝世，则使斗争公开化、白热化。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遂召见宗人府宗令、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等授以后事，宣布立六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著派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额驸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祐瀛八人赞襄一切政务，辅佐太子继承皇位；赐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皇太子“同道堂”印，今后所有谕旨，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缮拟后，呈递皇太后、皇上用印发下，上钤用“御赏”印，下钤用“同道堂”印。次日，咸丰帝故去，肃顺等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皇太子改称皇上，皇后钮祜禄氏晋封皇太后，后加徽号慈安，因恒居宫内东所绥履殿，又称东太后。十八日（23日），晋封载淳生母那拉氏为

皇太后，后加徽号慈禧，因恒居宫内西所平安宫，又称西太后，为区别见，称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七月三十日（9月4日），定明年改元祺祥。

野心勃勃的那拉氏对肃顺等独揽政权的局面，不能容忍，遂发起夺权斗争。首先是要求阅看奏报。肃顺等人主张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太后只钤印，不得更改谕旨内容，章疏则不呈内览。对此，那拉氏坚决反对；后肃顺等妥协，章疏呈览，谕旨由赞襄政务王大臣拟进，太后阅后，上用“御常”、下用“同道堂”二印以为凭信，从而争得干预政事、牵制肃顺的权力。接着，为彻底击败肃顺集团，那拉氏又通过醇亲王奕譞以及亲信太监、侍卫，加紧与留守北京的奕䜣勾结。

此时，奕䜣集团也正积极谋划控制政权。奕䜣集团原想，作为近支亲王又新建“议和之功”，理应参与辅政。但咸丰帝遗命竟无一字提及奕䜣；咸丰病死当天，肃顺等即传谕令奕䜣仍留京师，毋庸前赴热河恭理丧仪，实则把他完全排除在政权之外，于是奕䜣集团大失所望。两宫皇太后派侍卫恒起秘密至京，与奕䜣联合图谋肃顺等，奕䜣欣然同意。八月一日（9月5日），奕䜣以祭奠咸丰帝梓宫为由抵热河。两宫皇太后与奕䜣秘密会商一时许，决定诛除肃顺等，而肃顺集团势力布满热河避暑山庄，故只有回京才能动手。那拉氏对外国怀有疑虑，奕䜣回答：“外国无异议。如有难，唯奴才是问。”④政变计划就这样确定下来；奕䜣急速回京筹备一切。

正在此关键时刻，八月六日（9月10日），都察院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政务”。奏折中说，“虽我朝向无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以此通权达变之举”。次日，

两宫太后召见肃顺等八大臣，要他们照董折所奏传旨实行。肃顺等人则勃然抗论，以为不可。退下后，八大臣立即拟旨，以“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为由，斥责董折“甚属非是”，“所奏尤不可行”，且指出“以上两端，关系甚重，非臣下所得妄议”⑤。两宫太后阅旨后，决意将折旨均留中不发，并特召见八大臣再议董折，肃顺等人痛予驳斥，声言他们“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⑥，声震殿陛，太后为之震怒手颤，“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于太后衣”⑦。接着，八大臣又以“搁车”相抗，拒绝办理一切公事。两太后暂时退让，将董折和八大臣所拟诏旨发下照抄，作为上谕由内阁发布。此后，八大臣自以为获胜，掉以轻心。那拉氏和奕䜣等则加紧政变进程。首先是兵部侍郎胜保，乘前往热河叩谒咸丰帝梓宫之机，将所统军队布置在北京至热河沿线。奕䜣命步军统领、统神机营都统和前锋、护军统领，全面加强京城防卫。九月四日（10月7日），两太后故设圈套，上谕调端华补工部尚书，并补授步军统领。八大臣对两太后不经他们径自发布上谕，极为不满，决定抵制，自陈“职事殷繁，实难兼顾”⑧，请将管理处所恳恩酌量改派。两太后以“差务较繁”为由，立即准其所请，顺利地解除了载垣、端华、肃顺所兼步军统领、管理火器、健锐营等皇帝禁军以及扈从护卫等兵柄。

九月二十三日（10月26日），肃顺护送咸丰帝灵枢回京；两宫及载淳遵制在灵前祭奠后，由间道兼程返京。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太后抵京，迅即召见奕䜣，部署对策。次日，两宫与奕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下诏历数八大臣等罪状，称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为在事之王大臣

筹画乖方所致，且与外国谈判又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使皇帝避走热河，尤为不可饶恕的是竟然反对垂帘听政，阳奉阴违，跋扈不臣。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处。当日，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载垣、端华当即在宫廷内被捕，肃顺则由奕譞从密云逮送至京。十月一日（11月3日），任命奕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并授宗人府宗令；命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麟、户部右侍郎宝鋆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户部右侍郎文祥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以惇亲王奕誴为阅兵大臣，并管武备院事；以醇郡王奕譞为御前大臣。五日（7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六日（8日），宣布肃顺立斩；载垣、端华赐自尽；穆荫革职并发往军台效力；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职；景寿革御前大臣职，保留公爵及额驸品级。接着，又着手肃清八大臣党羽，吏部尚书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革职永不叙用，发往新疆充军，侍郎刘崐、成琦等革职；至于向肃顺等致函输诚之人，因为数太多，概不追究，以利稳定。十月九日（11月11日），新皇帝在太和殿举行登极大典。十一月一日（2月2日），两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举行“垂帘听政”仪式，两太后正式听政。但因钮祜禄氏秉性懦弱，清廷实际权力完全操在那拉氏之手。从此，那拉氏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47年之久。

注　释

①李慈铭：《越缦堂国事日记》，台北近代中国史资料丛编续辑第594辑，第103页。

②《郭松焘日记》第1册，第519页。

③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传》第7页。

④《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326页。

⑤《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91页、94页。

⑥《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1辑，第114页。

⑦《热河密札》，《近代史资料》1978年第1期，第3页。

⑧《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392页。

清（后期）

洪秀全创教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拜上帝后改名秀全，借“禾”为“我”，意即“我乃人中之王”。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1814年1月1日），生于广东花县福源水村，次年全家迁居官禄坳村。该村距县城约六十华里，离广州九十华里，背枕独秀山，西靠丫髻岭，是个有名的穷村庄。其父镜扬，长兄仁发，次兄仁达，均以种田为业。秀全7岁入本村书塾，几年间，熟读四书、五经、中国历史等多种古籍。十六岁时，因家计困穷辍学，从事农务。十八岁时，被聘为塾师。在“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支配下，他大约从道光八年（1828）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思想受极大刺激。道光十七年（1837）秀全第三次应试落第，在悲痛与失望中，大病四十余日，严重时神志昏迷，口说呓语。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天，洪秀全再去广州应试，仍然落选。个人的科场失意，同当时广大农民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削以及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动联系起来，激起了他对现实的强烈不满和改变现状的思想。

洪秀全最后一次应试失败后，仔细地阅读了十年前在广州得到的一本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这本书是中国教徒广东人梁发所编。书中宣传只有“上帝”是真神，其他为人所崇拜的偶像都是妖魔，一切人均为“上帝”子女，是平等的，人人都要拜“上帝”，敬耶稣，遵守十戒。它宣扬世人只有信仰上帝和耶稣基督，遵守神天上帝之命，安贫乐业，才能得到赦免和拯救，来世灵魂可在天堂永远享福。这种宗教思想，是企图麻醉中国人民，为西方资本主义征服中国开辟道路。然而，这种与中国传统观念大相径庭的新奇说教，却使正在徬徨探索新思想的洪秀全得到了相反的启示。他将书中内容和六年前大病中所出现之幻觉加以附会，说是幻觉中所见老者即上帝，自己则是天父上帝的次子，天兄耶稣之弟，称那次大病中昏迷，是上天受命，后来复苏是奉上帝命下凡诛妖救世。据此，洪秀全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六月在花县莲花塘按书中所言，祈祷上帝，自行施洗，并劝人“拜上帝不敬邪神”。在这里，他实际创立了一个名为“拜上帝者”的新宗教。冯云山和洪仁玕首先受洗礼，皈依上帝。冯云山（1822－1852），出身于家道殷实的家庭，自幼诵习经史，博览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书，但也屡试不第，在村塾中执教。他和洪秀全是表亲，又是同学，关系极为密切。洪仁玕（1822－1864），出身农民家庭，自幼读书，习经史、天文、历数，经考五科不售。拜上帝后，他们“将馆中所立孔子文昌，家中所立灶君、牛猪门户来龙之妖魔一概除去”①。这一行动违背了封建传统，引起当地豪绅的不满，从而使他们失掉了塾师的职位。为吸收信徒，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天，洪秀全与冯云山从广东长途跋涉到广西贵县赐谷村秀全表兄黄盛均家，进行传教。经三个多月，参加

拜上帝者超过百人，但因黄家生计艰难，冯云山首先离去，转入桂平县紫荆山区；洪秀全随后返回花县。

道光二十五、六年（1845、1846），洪秀全在家乡一面做塾师，一面埋头于理论撰述，先后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等重要著作。在这些文章里，洪秀全把基督教的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阐述了拜上帝教的教义，曲折地表达了农民群众反对封建压迫和剥削的愿望和要求。《原道救世歌》指出：天父上帝为古今中外独一真神，主宰万事万物，所有的人不论贵贱，均为上帝子女，而且人间的一衣一食也都是上帝所赐，因此，人人都得敬拜上帝，不得拜邪神。他明确提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自专，上帝当拜，人人所同，何分西北，何分南东"②。它谆谆告诫人们"勿拜邪神，须做正人"。要改邪归正，为善积福，就要反对淫、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为赌博以及鸦片、饮酒、看风水、相命等，实则是要人们通过加强个人道德修养来救世。《原道醒世训》首先揭露了中国的黑暗现实，指出：当时的世界，国与国之间，一国之中省与省、县与县、乡与乡、姓与姓之间，都彼此相憎，进而"相陵相夺、相斗相杀"，正处于"暗极""乱极"的时代。产生这种"凌夺斗杀之世"的根源，则在于"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文章进一步提出了理想社会的构想，指出：天下凡间即然皆由"皇上帝主宰化理"和"生养保佑"，因此，就国家来说，"分言之，则有万国，统言之，则实一家"；就社会成员来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既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也不应起

"尔吞我并之念"。文章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即是《礼记·礼运》篇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社会成员一律平等，"有无相恤，患难相救"，"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人人都过着太平幸福的生活。文章号召天下凡间的兄弟姐妹，跑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③。在这里，已隐含有要农民起来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思想。

正当洪秀全从事艰苦的理论创作期间，在广州传教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得到洪秀全的信息，遂由其助手邀约其前来"襄助宣教"。道光二十七年二月（1847年3月），洪秀全与洪仁玕应约到广州罗孝全教堂。在此，他们第一次读到《旧遗诏书》和《新遗诏书》（即《旧约》和《新约》），对基督教得到更深一步的认识。但由于罗孝全的另外两个中国助手忌妒洪秀全的才能，设计陷害，洪秀全"受洗礼"的请求未能实现。对此，洪秀全极感失望，遂愤然离开广州，径赴广西。七月（8月）洪秀全抵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与冯云山会面。

冯云山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夏，在广西贵县与洪秀全分手，前往桂平紫荆山区。该区方圆五百里，位于桂平县城西北部，北连平南、永安诸山，西通象州、武宣界。这里分散居住着汉、壮、瑶等各族人民，其中多数是从广东迁来的客家人。他们以种田耕山为主，以烧炭、种蓝为补，生计极为艰难。冯云山来到紫荆山后，以极大的坚韧力教人敬拜上帝。他通过做苦工、当塾师，联系当地的烧炭工人和贫苦农民，向他们宣传拜上帝的道理，号召会众共尊教主洪秀全。经过近三年

的努力，到道光二十七年（1847），拜上帝的信徒已达二千多人，且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于远近。洪秀全抵紫荆山后，看到拜上帝会组织已经建立起来，亲自感受到广西地区群众反抗斗争的激烈，因而增强了推翻清朝统治的信心和决心。于是，他撰写《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与冯云山共同建立拜上帝会总机关，制定“十款天条”和各种宗教仪式，以对会众加强思想和纪律教育。《原道觉世训》为拜上帝会指明了战斗目标。它把社会划分成两个根本对立的营垒，一面是正，是善，就是“皇上帝”和“皇上帝子女”；一方面是邪，是恶，就是“阎罗妖”和“妖徒鬼卒”。文章指出，“皇上帝”是“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人们的“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人人应当朝夕敬拜。“阎罗妖乃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世间人灵魂”；世人“所立一切木石泥团纸画各偶像”，清朝皇帝及各级官吏均属其类。文章指出，只有皇上帝才能称帝，人间君主不得僭越，靦然称帝。文章号召天下众兄弟姐妹，独拜真神皇上帝，击灭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④，实际就是号召农民奋起革命，推翻以道光帝为首的清朝统治。《太平天日》以洪秀全在道光十七年（1837）的异梦为素材，用神话的形式，讲述了洪秀全上天受命，战逐妖魔，下凡救世，以后两次到广西活动的故事。它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被封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是“真命天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⑤。这部书充分表达了洪秀全“奉天诛妖”、“斩邪留正”的革命思想。一切宗教必须依赖种种仪式戒律，才能维系其存在和表现其观念及情绪。洪秀全根据中国社会情况，对摩西“十诫”加以修改，制定十款天条，作为上帝教的戒律。“十款天条”的内容是：崇拜皇上帝，不

拜邪神，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不好起贪心⑥。前四条是宗教信仰，后六条在平时为信徒的生活准则，起义时则变为军事纪律。洪秀全还通过宗教仪式把人生日常活动与上帝联系起来，规定入会受洗有悔罪奏章，礼拜颂赞上帝，朝晚拜上帝，食饭谢上帝，灾病求上帝，凡生日、满月、迎亲嫁娶、丧事，以至作灶、作屋、堆石、动土等事，都得祭告上帝，宣读祈祷文。这种迷信琐碎的仪式，成为拜上帝会组织、鼓舞群众的重要方法。

为扩大组织，洪秀全、冯云山以紫荆山为中心，派人四出宣传拜上帝会教义，并领导会众开展破坏偶像、捣毁神庙的斗争。道光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1847年10月26日），洪秀全亲率拜上帝会众前往象州捣毁甘王庙。据传甘王是个杀母、贪暴、淫乱的凶神，当地群众怕它作祟降祸，祭祀非常虔敬。洪秀全等直入庙中，宣布甘王十大罪状，将神像推倒砸毁。这一举动以及拜上帝会到处捣毁神庙、社坛，很快在群众中扩大了影响，信徒迅速增加。然而这种捣毁偶像的斗争，却引起地主士绅们的极端恐惧和仇恨。地主豪绅凭借团练武装力量，极力压制拜上帝会的活动。宗教斗争由此转向政治斗争。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1847年12月），桂平生员客家富户王作新率团练逮捕冯云山，途中为拜上帝会众夺回。接着他向桂平县衙控告，捏称冯云山“迷惑乡民，结盟聚会”，“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要求“严拿正办，俾神明泄愤，士民安居”⑦。十二月十二日（1848年1月17日），王又以团练逮捕冯云山、卢六二人，经大湟江巡检司送往桂平县狱。卢六于羁押中被折磨致死。后由于冯云山在狱中坚持斗争和广大会众在

狱外积极营救，道光二十八年六、七月间，桂平知县被迫结案，以无业游荡之名将冯云山递解回籍。在递解途中，冯云山说服两名解差皈依上帝，与其同返紫荆山。

冯案前后历时半年多。该案发生后，在贵县赐谷村的洪秀全闻讯立即赶到紫荆山，随后又赴广州设法营救，未果。当洪秀全再返紫荆山时，已获释的冯云山却又动身前往广东寻洪秀全，两人于路途相左，直到洪秀全重返原籍，二人才得相见。在此期间，拜上帝会主持无人，会众发生混乱。处此紧要关头，以种山烧炭为业的会员杨秀清利用当地民间"降僮"习俗，于道光二十八年三月三日（1848 年 4 月 6 日）假托天父上帝下凡附体，传言群众，安定人心，巩固了拜上帝会组织。洪秀全在返回紫荆山后，确认了杨秀清代天父传言的资格。九月九日（10 月 5 日），在洪秀全的指使下，与杨秀清关系密切的萧朝贵又假托"天兄下凡"，证实洪秀全确是上天受命、下凡救世的"天下万国真主"；从而取得代天兄耶稣传言的资格。此后，杨、萧二人通过"天父"、"天兄"频频下凡，实际左右着拜上帝的活动。道光二十九年五月三十日（1849 年 7 月 19 日），洪秀全、冯云山从广东返回紫荆山。这时，拜上帝会在同地主团练斗争中得到迅速发展，以桂平县紫荆山区为中心，东到平南、藤县，西至贵县，北达武宣、象州，南抵博白、陆川，以及广东的信宜、高州、清远等地，都有拜上帝会的成员在活动。入会的包括汉、壮、瑶等各族群众，其中绝大多数是种地或烧炭的贫苦农民和部分矿工、小手工业者，也有少数家境富裕而社会地位较低的地方士绅。在斗争中，拜上帝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其成员有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肃朝贵，以及金田富户监生韦昌辉和贵县富户石达开。以均为

上帝子女，其核心成员在会内排行次序是：耶稣为长兄，洪为二兄，冯为三兄，杨为四兄，萧为妹婿（萧妻洪宣娇为洪秀全妹），韦为五弟，宣娇为六妹，达开为七弟。此后拜上帝会就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掀起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

教义、教规的确立，从宗教斗争向政治斗争的发展，以及领导核心的形成，标志拜上帝会已成为政教合一的代表广大农民利益的革命组织，从而为金田起义的发动奠定了基础。

注 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690页。

②《太平天国印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上册，第10页。

③《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4－16页。

④《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6－22页

⑤《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6－50页。

⑥《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1－33页。

⑦《太平天国资料丛编简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册，第82－83页。

清（后期）

金田起义

金田起义，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开始。它的爆发是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鸦片战争前，清朝封建统治，经过承平一百数十年，到乾隆（1736－1795）末年，已明显地由盛转衰。嘉庆（1796－1820）、道光（1821－1850）年间，土地兼并激烈，吏治腐败，军备废弛，阶级矛盾尖锐，整个封建制度已危机四伏。鸦片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加紧侵略中国。这不仅加深了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支出经费白银七千万两，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再加战争中间被英军掠去的现银和广州等地的赎城费，总计耗银不下一亿两千万元，相当于清政府国库两年多的全部收入。这批巨款，全部加在劳动人民身上。同时，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倾销的商品日益增加。以英国为例，从道光二十年到二十五年（1840－1845年）输华商品额增加4倍多，其中棉纺织品占输入总值的70%左右，这就迫使东南沿海地区大批农民、手工业者破产失业。五口通商后，外国来

华商船数增长极快，中国沿海旧式航运业遭到排挤；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原来自广州至九江、广州至湘潭的两条内地对外丝茶贸易交通线很快衰落，沿途大批运输工人成了无业游民。战后，鸦片贸易实际合法化，输入量增长更加迅速，至咸丰初年，每年鸦片入口多达6．8万箱。鸦片输入的激增，遂使白银进一步大量外流，社会上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因而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劳动人民“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①，赋税负担增加一倍以上。由于洋货、鸦片及奢侈品输入的增加，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因而大大加重。当时江苏稻谷亩产量最多不过三石，少者只一石余，而地主一般向农民收租一石三斗，地租率高达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八十。再加上高利贷的盘剥，就使“小户之脂膏已竭，苟有些恒产，悉售于大户”，农民破产卖田的趋势，“犹水之就下，急不可遏”。广大农民被搜刮得无以交租交债时，封建地主就“差遣悍仆豪奴分头四出，如虎如狼，逼取租债，举其室中所有搜攫一空，甚而掀瓦，搬门，拴妻缚子，又甚将本人锁押私家，百般吊打”②。农民抗捐、抗赋，官府则“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身肉狼藉”③。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了农民群众对地主阶级的无比仇恨。天地会万大洪起义告示痛斥封建统治阶级的罪行，说：“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酷吏，无异虎狼。富贵者纵恶不究，贫穷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④指出官吏衙门即封建政权是人民痛苦的根源。

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群众反封建斗争日益加剧。据清政府官方记载，从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九年（1841－1849），全国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就有一百多次。当时，白莲教、天理

教斗争于北方各省；捻党活动于河南、安徽、山东一带；斋教散布于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省；天地会（又称洪门、三合会、三点会）遍及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两广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最早侵入的地区，受到战争、赔款、鸦片、洋货之害最大，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尤其尖锐，人民反抗斗争也就更加激烈。在全国各地汹涌澎湃的群众斗争浪潮中，洪秀全领导的震撼全国的农民大起义正式爆发了。

经过数年艰苦努力，洪秀全、冯云山等创建的拜上帝会有了较大发展。道光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849－1850），参加拜上帝会的群众已达万余人。此时广西饥荒连年，民不聊生，天地会组织发动的多股分散反抗斗争，“延及七府一州”⑤，波及地区达广西全土十分之七。拜上帝会与地主武装团练的斗争也日趋激烈；为共同对付敌人，一些会众已经联合起来，实行公库共享制度。在起义时机趋于成熟的形势下，道光三十年（1850）六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会众到紫荆山前的金田村“团营”。各地会众接到命令后，纷纷变卖田产房屋，男女老幼成群结队，络绎不绝的向金田村进发。其中，金田地区一千余人，紫荆山地区三千余人首先集中入营。由秦日纲率领的贵县龙山银矿矿工一千多人，冲破地主武装的重重拦阻，奔赴金田。石达开率领贵县奇石地区会众一千余人，于七月十三日（8月20日）祭旗誓师，占领贵县与桂平交界的白沙圩，在此整顿队伍，开炉铸炮，附近各地会众踊跃参加；屯驻月余，队伍扩大到四千余人，然后，取道赵里、伯公坳，渡过黔江，经南木进入金田村。在平南鹏化岖，汉、壮、瑶各族会众一千多人，首先于九月十三日（10月17日）到花洲集中，然后在胡以晃主持下，分批开赴金田。在浔州地区，参加

团营的，除拜上帝会的基本群众外，还有苏十九为首的桂平饥民一千多人和在贵县耒土械斗中失败的二千多客家人。两广交界的陆川、博白、化州、廉江等县会众，在赖九、黄文金带领下群起响应。赖九是陆川拜上帝会首领，早在贵县打铁时就参加了拜上帝会。他回家乡后，一面打铁，一面以教徒练武的名义组织拜上帝会。接到团营令后，赖九立即集中会众，并很快攻占广东化州的平定圩和廉江的右角圩。同时博白拜上帝会首领黄文金，则在地跨两广的佛子岭设立大营，操练兵马，博白、廉江各地会众扶老携幼赶来参加。赖九与黄文金两支队伍，在博白、陆川、廉江三县交界的战略要地山猪浪，打败团总谢朝兴的团练队伍后，会师北上，胜利到达金田。除广东信宜凌十八率领的会众未能到达外，经过四个多月，汇聚于金田地区的拜上帝会众，总数已达两万多人；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从此正式兴起。

在拜上帝会众陆续向金田汇集期间，清军在广西正全力进攻各地天地会起义军。七月（8 月），天地会陈阿贵等连克修仁、荔浦两县，逼近桂林省城。广西巡抚郑祖琛飞章告急。八月八日（9 月 13 日），清廷命两广总督徐广缙赴广西剿办，又命前云南提督张必禄驰驿前往广西合剿。八月二十五日（9 月 30 日），调固原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令率楚兵入桂。九月十三日（10 月 17 日），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速赴广西督办军务；旋革郑祖琛职，以林则徐暂署广西巡抚。林则徐赴任途中，病死于广东潮州普宁县。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15 日），清廷得林则徐死讯，改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师，以前漕运总督周天爵署广西巡抚。张必禄率三千绿营兵抵浔州府城后即病死。贵州镇远镇总兵周凤歧接

统其军。此时陈阿贵已在贵平被俘，故清军矛头遂指向正在举义的拜上帝会。

在拜上帝会团营期间，洪秀全、冯云山始终隐蔽在平南鹏化山区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中，部署武装起义。清军抵浔州，侦知花洲有拜上帝会众聚集，便派浔州协副将李殿元到平南，会同知县倪涛率兵勇团练赶往思旺墟，防堵要隘，断绝交通，对会众实行围困。洪秀全一面组织花洲会众准备突围，一面派人至金田村与杨秀清取得联系，拟里外夹攻，粉碎敌军包围。十一月二十二日（12 月 25 日），杨秀清派蒙得恩率队前往花洲。二十四日（27 日）晨，拜上帝会众与李殿元军接仗，击溃清军及乡团，然后入山人村，迎洪秀全、冯云山及花洲会众归金田。此役即太平天国史上的“迎主之战”。驻守桂平的周凤歧闻思旺战败，遂于十一月二十六日（12 月 29 日），派贵州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署松桃协副将清长带贵州兵为中路，以候补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带壮勇团练为左右路，向金田进攻。杨秀清指挥拜上帝会众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伏击敌人。十一月二十九日（1851 年 1 月 1 日），战斗在金田村东南数里的鸡潭、望鳌岭、蔡村展开。清军经过蔡村江大桥后，中伏大败；此时，会众拆毁木桥，使敌人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伊克坦布败逃到蔡村江桥，堕马落水，被会众杀死。周凤歧亲率兵救援，又被击败，退师桂平。这一战，清方损兵 300 人，副将大员阵亡，是拜上帝会起义过程中所进行的最大战斗和所得到的最大胜利。

起义会众在两次战争全胜的基础上，迎来了洪秀全 38 岁寿辰。道光三十年腊月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拜上帝会众在金田村，“恭祝万寿起义”⑥，定国号为太平天国，秀全

称天王，立长子洪天贵为幼主，改明年为辛开元年，蓄发易服。在此前后，洪秀全把男女老幼共 2 万多人的拜上帝会群众，按武装斗争的需要组织起来，名曰太平军。其编组方式，首先是“别男行女行”，将团营群众分别编入男营女营，“虽夫妇不得相见”⑦。它的编制依照《周礼》，以军为单位：五人为伍，设伍长一人；五伍为两，设两司马一人；四两为卒，设卒长一人；五卒为旅，设旅帅一人；五旅为师，设师帅一人；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人。军帅之上，设有监军和总制。军帅主要负责平素的管理训练和行军结营扎寨的具体事务，监军则主要负责调度指挥；职同监军的各种典官及其属官，负责后勤军需供应。军事指挥和后勤供应两部分皆受制于一军的最高长官总制。为统一集中使用军队打击敌人，太平军一般把至少两个军以上的队伍联合编在一起，以将军、指挥、检点、丞相等作为统帅，丞相之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全军最高统帅为正副军师，以正军师操全军军政、军令大权，请命天王行事。建国伊始，洪秀全即命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在供给方面，太平军实行圣库制度，参加团营的群众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金，缴入圣库；在战争中缴获的一切财物，也统一归圣库；全体成员的生活必需品，都由圣库开支，官兵一律平等。洪秀全又颁布五条简明纪律，作为太平军的行动准则，其内容是：(1) 遵头条命；(2) 别男行、女行；(3) 秋毫莫犯；(4) 公心和傩（nuó 挪，即和睦），各遵头目约束；(5) 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这种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向更大范围发展，并招集未及团营的各地会众，金田起义后第三天，即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1851年1月13日），洪秀全从金田挥师东向，攻占位于浔江和大湟江交汇处的江口圩（今江口镇）。在这里，洪秀全以“同拜上帝”、“听从命令及遵守会规”⑧为条件，接受了天地会罗大纲、丘二嫂、苏三娘等部加入太平军，实力进一步加强。时钦差大臣李星沅急令广西提督向荣率军赴桂平，对太平军实行围剿。清咸丰元年正月十八日（1851年2月18日），向荣会同总兵李能臣、周凤岐，率部从东西两面向江口圩发动进攻。太平军决定利用有利地形，诱敌深入，伏击敌人。他们挑选精壮战士二千人，分为九路，秘密进入设伏阵地，并在石头脚、牛排岭一带村庄竹林内安下伏炮。向荣亲率东路军直扑牛排岭，妄图一举摧毁设在石头脚的太平军总指挥部。俟清军进入伏击圈后，太平军从四面八方杀将过来，清军全线溃败。浔州知府刘继祖带领的西路清军，由江口上游牛矢湾渡过浔江，偷涉屈甲江，被埋设在渡口的 地雷炸得血肉横飞。接着太平军伏兵四起，清军措手不及，正拟后退，又被太平军在上游决堤放水断了退路。太平军奋勇冲杀，清军遭到惨败。江口战役后，向荣军锐气大挫，匿不敢战，惟坚守东路壁垒，以阻太平军东出；清知府刘继祖率已降天地会首大头羊张钊统艇师扼守浔江。此时，太平军东出道路即难打开，军中又乏米盐硝磺，于是洪秀全等乃改变计划，欲由武宣、象州北上。二月八日（3月10日）夜，太平军秘密撤离江口，过新墟、金田、古林社，入紫金山，十日（12日）至武宣县东乡，十三日（15日），进占距武宣县城三十里的三里圩；东西连营三十余里，大本营设于东乡。十四日（16日），向荣统一万清军赶到武宣，设大营于天

马庄。十七日（19日），太平军趁清军部署未定，首先主动出击。驻扎在三里圩的前锋部队分兵三路，埋伏于台村、灵湖之间，先以小队人马向东岭佯攻。向荣不知是计，带领六百多清兵猛扑过来，太平军边打边退，把敌人引进埋伏圈，三路伏兵把敌人团团围住。署广西巡抚周天爵、闻讯，急忙带四百多清兵赶来救援，无奈清兵畏缩不前。经激战，清兵大部被歼，周天爵、向荣混出重围，狼狈逃命。三月二日（4月3日），周天爵与向荣督军六千余人，分四路向太平军驻地发动进攻，企图一举占领三里圩，进而打破太平军东乡大营。激战前夕，洪秀全、冯云山调太平军主力从东乡插向三里圩，进入伏击阵地。二日中午，知府刘继祖部清军首先向东岭发起进攻；太平军以小部兵力吸引住敌人，然后两翼突出奇兵，三面夹攻清军。进攻台村的候补知府张敬修部清军起来救援，被太平军切为三段。向荣催赶大队人马前来接应，也立即陷入重围。总兵秦定三部清军则在三里圩北面的大琳被太平军打得溃不成军。据载，在战斗中太平军"视死如归，赤身赴敌"，奋勇力战，敌军奔溃⑨。清军不敢再战，乃创"坐战"之法，实则只得坚守待援。

为扭转战局，清王朝再次调兵遣将。早在二月二十五日（3月24日），清廷即命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三月九日（4月10日），派大学士赛尚阿驰往湖南，办理防堵事宜，同时派蒙古都统巴清德、满州副都统达洪阿、天津镇总兵长瑞等随同协助；二十六日（27日），命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四月十二日（5月12日），李星源在武宣忧惧而死，由赛尚阿接任钦差大臣。此外，还特地由国库拨银三百万两，大米五千石作军饷，大有在武宣同太平军决一死战之势。

太平军在武宣东乡一带，滞留两月余，招集大批拜上帝会员投军。但此时，太平军给养遇到极大困难，食盐奇缺。为摆脱困境，四月十六日（5月16日），太平军撤离武宣，向北进入象州境，陆续占领象州东南部靠近桂平、平南的寺村、中坪、新寨等一片村庄。清军尾随赶到，乌兰泰部千余人驻中平西北的梁山村，向荣部驻中平东北的界岭，堵截太平军的北进道路。太平军马上出击，将乌兰泰部逼上梁山村北的独鳌岭。次日，洪秀全调精兵一千多人，渡过梁山河，在独鳌岭、梁山村一线与清军展开激烈战斗，予乌兰泰部以迎头痛击。太平军在象州月余，“招齐拜上帝会人马”⑩后，拟由此北出。但由于在北进的通道上，有清兵重兵拦截，西北、东北方向突进均未成功，洪秀全当机立断，于六月初（7月初），自象州经原路退回紫荆山根据地。

在太平军移营桂平的同时，赛尚阿到达桂林，随即部署：向荣和巴清德部从西北方向进攻紫荆山东南区；乌兰泰和达洪阿部沿黔江而下，绕至紫荆山，直扑莫村、新圩等地，企图就地围歼太平军。从六月底至七月底，太平军多次击退进犯之敌，但清军也相继占领了紫荆山区西北部要隘双髻岭、猪仔峡、风门坳等处，对太平军紫荆山根据地构成严重威胁。在严峻形势下，七月十九日（8月15日），洪秀全在茶地正饬军纪，命令“队伍宜正齐坚重，同心同力，千祈恪遵天令”。二十六日（22日），洪秀全在莫村为严申军纪，处斩了临阵脱逃的黄以镇。同时，洪秀全和冯云山、杨秀清等分析研究了敌军布局，周围地形，决定突围北上。八月十六日（9月11日）夜，太平军大队人马撤出新圩，向东北方向挺进，后转至平南县的思旺圩一带。向军率部尾追而至，抵思旺东南之官村。八

月二十日（9月15日），太平军乘向荣扎营未稳，突然进击，向军四处溃散，军械辎重尽失，向荣率残部逃入平南县城，托病不出。官村大捷后，太平军在思旺圩招集拜上帝会数百弟兄，即北上大旺，然后分水陆两路向永安州（今蒙山县）进发。闰八月一日（9月25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永安州城，从此开始了太平天国史上的新时期。

注　释

①《曾文正公全集·奏稿》传忠书局版，第1卷。

②《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81页。

③《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卷。

④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115页。

⑤《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3页。

⑥⑦《太平天国》第2册，第850页。

⑧《太平天国》第6册，第872页。

⑨《钦定剿平粤匪方略》第4卷，第6页。

⑩《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清（后期）

天京定都

咸丰元年闰八月一日（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克第一座州城——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此时清军虽尾随而来，但鉴于屡败的教训和复杂的内部矛盾，未敢轻举妄动，只是高垒自固，严密封锁。于是双方出现了暂时对峙的局面。洪秀全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加紧整顿队伍，进行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建设，首先是整饬军纪。洪秀全连续发布诏令，要求“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凡杀妖攻城时所得金银绸帛宝物，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他勉励全体官兵，“同心同力同向前，同顶天父天兄纲常”；坚耐威武“真忠报国到底”；要恪遵“十款天条”，特别是第七天条（即不好奸邪淫乱），如有违犯，“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无宽赦”。为了赏功罚罪，洪秀全通令全军建立功罪登记制度，“俟到小天堂，以定官职高低，小功有小赏，大功有大封”①。其次是健全领导体制。十月二十五日（12月27日），洪秀全发布封王诏令，封左辅正军师中军主将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前军主将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后军主将冯

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右军主将韦昌辉为北王、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俱受东王节制”②。此外，又封秦日纲为天官丞相，胡以晃为春官丞相，其余有功将士均晋升官职。同时洪秀全根据创立新朝的需要，开始“制礼作乐”。他任命卢贤拔为左掌朝仪，职同将军；颁布《太平礼制》，规定了一套尊卑严明的等级制度和繁琐的礼仪制度；颁行由冯云山创制的《天历》，从而否定了封建皇朝的正朔。在此期间，太平军领导集团还成功地粉碎了敌人的颠复阴谋，清除了暗通敌人的奸细周锡能。经过半年休整，革命队伍得以巩固，战斗力进一步加强。

咸丰二年二月（1852年4月，天历壬子二年二月），太平军在打退清军多次进攻后，决定突围北上。二月十二日（4月1日），先锋罗大纲率精兵二千，迅速攻下城东二十里敌军设有重防的要隘古苏冲。十六日（4月5日）深夜，太平军全军二万五千人，胜利突围。乌兰泰、向荣闻讯，立即统兵追赶截杀。后卫秦日纲部与敌军激战竟日，损失千余人。为摆脱被动，太平军决定利用龙寮岭大峒山谷地的有利地形，以重兵设伏，歼灭清军追兵。二月十九日（4月8日，三月五日）清晨，清军进入伏击圈，太平军乘大雾弥漫，从四面八方突然向清军发起攻击。经半日激战，阵斩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及兵弁五千人。接着，太平军取道山间小径，经荔浦、阳朔，疾趋省城桂林。向荣自大峒山败后，率清军千余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军固守。随后，乌兰泰等率军陆续赶来救援，清军总数达到几万人。太平军在桂林城外东西南三面扎营，于象鼻山及文昌门外张氏宗祠架炮日夜向城内轰击，并猛攻西、南、文昌

三门。三月一日（4月19日，三月十六日），太平军在南门外重创清军，乌兰泰重伤毙命。太平军围攻桂林月余，水陆24战，但因城坚，始终未能攻破。四月一日（5月19日），太平军主动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四月四日（5月22日）太平军攻破兴安。四月六日（5月24日），路过全州时，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受重伤。太平军大愤，乃回师攻城，首次使用“穴地攻城法”，克全州。四月十八日（6月5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经蓑衣渡时，遭湖南永州（今零陵）知州江忠源的阻扼，激战两昼夜，双方均有较大伤亡。冯云山伤势恶化，在此牺牲，太平天国失去一位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太平军乃尽弃船只，由东岸越山入湖南省境。为动员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战争，太平军在进军进程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相继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天生天养谕》三篇重要文告。这些文告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的罪恶统治，指出：在清朝的反动统治下，“贪官污吏，布满天下”，“饿莩流离，暴露如莽”，“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文告申明太平军起义的宗旨是：“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文告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③文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极大地激发了各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在战斗过程中，太平军又始终保持严明的纪律，不私入民房，不拿群众的财物；作战时缴获的金银、绸帛等物一律归公。太平军所到之处，杀逐官吏、地主、豪绅，捣毁衙门，焚烧地契、借卷，并没收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贫苦饥寒的人民，对封建统治秩序进

行了革命的扫荡。太平军的实际行动，完全证明自己是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利益的，因此，在进军过程中，群众争相欢迎，踊跃加入。太平军进入湖南后，于四月二十五日（6月12日）攻克道州（今道县)。随后太平军以道州为大本营，分兵四出，攻占附近江华、永明（今永江县)、嘉禾、兰山、桂阳等州县；七月三日（8月17日）克湘南重镇郴州。太平军在道州、郴州等地，进行修整，大力扩军。湘南天地会和斋教起义群众以及挖煤工人日以千计地涌向太平军，使太平军迅增五、六万新成员。其中挖煤工人擅长挖掘地道，太平军把他们组成土营，在日后的攻城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道州休整期间，太平军内部曾就整个战略发生争论。部分祖籍广西的将士主张“怀土重迁，欲由灌阳而归，仍扰广西”。杨秀清批驳了此种意见，指出：“已骑虎背，岂容复有顾恋？今日上策，莫如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据为根本，然后遣将四出，分扰南北，即不成事，黄河以南，我可有已。”④洪秀全同意杨秀清的主张，决定继续挥师北上。时太平军探知长沙清兵防守薄弱，西王萧朝贵自清率精兵二千袭取长沙。七月二十八日（9月11日)，太平军抵长沙城外，扎营南门外妙高峰、鳌山庙等处，昼夜攻城。西王萧朝贵勇毅不避艰险，亲临前线指挥，不幸中炮受伤，不久逝世。洪秀全等得知萧朝贵牺牲的消息，万分悲愤，遂率大军从郴州起程，于九月一日（10月13日)，抵长沙城下。此时敌人亦援兵四集，城防兵力已达三万余人，后增至五万人。故太平军虽奋力进攻数十日，都未能破城。十月十九日（11月30日）夜，太平军主动撤长沙之围，连克宁乡、益阳，接着在湘阴临资口得洞庭湖船数千，乃渡湖向岳州

(今岳阳)进军。十一月三日(12月13日),太平军攻占号称“楚北门户”的岳州。在益阳、岳州,太平军缴获大量武器船只,吸收大批渔民、船户、纤夫及其他贫苦群众参军。洪秀全封唐正才为典水匠职同监军,统率众船,正式建立水营。从此,太平军成为一支无坚不摧、无攻不克的水陆大军。

十一月七日(12月17日),太平军水陆两路“从岳州起程,千舡健将,两岸雄兵,鞭敲金镫响,沿路凯歌声,水流风顺”⑤,直趋武汉。十月十三日(12月23日),太平军攻克汉阳,十九日(12月29日)夺取汉口,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日)攻占武昌城。太平军进入武汉后,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⑥,在群众中不仅广为散发宣传革命的书籍,而且普遍开展“讲道理”的口头演讲,使革命道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千上万的群众踊跃参军,太平军迅速增加至五十万人。面对太平军的蓬勃发展,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急令将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革职拿问,以湖南巡抚张亮基署湖广总督;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云贵总督罗绕典专防荆襄;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进防苏皖,防太平军东下;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进防信阳、新野,防太平军北上。此时,就未来战略发展方向问题,太平军内部再次发生争论。石达开提出:“先行入川,再图四‘扰’。”但杨秀清“不从”⑦。女将卞三娘建议:“由襄樊一路直取河南,进据中原心腹。”杨秀清则“觊觎江浙财富之区,欲由长江迳取江宁为‘巢穴’”。彼此“争论不绝”,杨秀清便假托“天父降凡,令其直‘犯’江宁”⑧。这样,就确定了顺江东下,直取南京的方针。

咸丰三年正月二日(1853年2月9日,癸好三年正月七

日），太平军放弃武昌，分水陆两路顺长江东下，江面水营船只万余艘，连结数十里，蔽江而下；岸上陆军刀矛林立，雄壮威武，锐不可挡。一路上清朝官吏“文武弃城远避，兵勇闻风先散”，惊呼“几无御之之法”⑨。强大的农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地击溃沿江四省所有敌军，不到一个月，即进军一千二百里，直抵南京城下。正月二十九日（3月8日）太平军陆军扎营雨花台，水师布防于水西门外。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于二月十日（3月19日，癸好三年二月十四日），攻占南京外城，斩陆建瀛；第二天攻破内城，杀江宁将军祥厚。太平天国定南京为国都，改称天京。接着，太平军于二月十二日（3月31日）攻克镇江，二月二十三日（4月1日）克复扬州。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太平军克复南京后十天，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从秣陵关绕往南京城东，在孝陵卫一带设立江南大营；三月九日（4月16日），钦差大臣琦善率军到扬州城外，设江北大营，敌人从南北两面形成对天京包围的态势。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在军事上开始北伐和西征。同时，在自己管辖的地区内进行各方面的改革，进一步确立反映农民革命特点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

咸丰三年（1853，癸好三年），太平天国颁布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这个纲领对于太平天国的军事组织，地方政权建设，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文化教育以及国家的司法制度，官吏的保举、升贬、奖惩等方面，都作了明确规定。而它的核心，则是关于土地制度的规定，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

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根据这个原则，文件制定了均分田地的办法：凡田按收成多寡分成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关于农副业生产和分配，《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均由农村基层组织“两”来管理。分得土地的农民，都要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力农者有赏，惰农者有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分配问题上，规定每“两”生产的农副产品“除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二十五家中“婚娶弥月喜事”所需，由“两”所设的国库开支，“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废疾者，皆由“国库”供养。这些规定，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充分反映了农民长期以来渴望获得土地的强烈愿望和要求，表现了农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性。但是，它不仅主张废除封建土地私有制，而且要废除一切私有财产，规定“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⑩。这些主张，反映了农民阶级憎恶一切剥削和压迫，希望建立一个完全平等、平均的所有制社会的善良愿望。然而，要在个体劳动，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只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一种幻想。因此，《天朝田亩制度》前拟订的一

套社会改革方案，在实际上并没有能够实行。

《天朝田亩制度》所描述的空想的改革方案即然行不通，太平天国领袖们就不得不从理想的“天国”退回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⑪，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

在土地改革方面，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不久，就在江苏仪征等地，搜查钱粮征册，索收钱漕。咸丰四年（1854，甲寅四年），杨秀清、韦昌辉和石达开联名陈奏，经洪秀全批准，正式确定辖区人民“照旧交粮纳税”⑫，即依照旧制征收田赋。太平天国既然按照清制向地主征收田赋，就势必根据“赋由租出”的原则，保存原有的地权关系，维持地主的收租权利。前期，在江西、安徽、湖北等省，太平天国实行的实际就是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收租的政策。但是这并不是说，太平天国没有打击封建势力。在太平军经过的地区，很多地主被杀或逃亡，不少庵观寺院的田产被充公，原来耕种地主和庵观寺院土地的农民，不再向他们交租。在太平军支持下，不少佃农自发起来向地主作斗争，拒交或少交田租。大部分地区留下来的地主也失去昔日的威风，农民政权严格监督地主收租，限制他们对农民的剥削。这一切都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在政权建设方面，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君主制。它的中央政权，以天王为最高主宰者，以“军师”为掌实权的首脑；天王临朝而不理政，杨秀清的东王府实际为中央政府的最高国务管理机关。天王之下设王、侯两等爵位，设丞相、检点、指挥、将军、总制、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等十二级职官，爵位和职官一直不分文武，具有明显的军政合一的特点。从丞相到将军，称朝内官。地方政权采取“守土乡官制”：

省、郡、县三级组织，由总制、监军担任，称“守土官”；县以下设若干军，由军帅以下到两司马担任，以25家为一基层单位，政治、军事、财政、司法和劳动生产、教育等工作都统一在这个组织系统中进行。县以下各级负责人称乡官，名义上由民众公举，实际许多地方均为直接委派。这些地方政权，在联系群众、支援革命战争、镇压反革命势力和维持革命秩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曾试图推行在军队中所实行的一套原则和制度。在天京，一度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取消商业，居民的财物一概收归圣库，生活必需品由圣库按统一标准供给。家庭也被取消，城内居民虽夫妻不得同居，按性别分别编入男馆和女馆，除参加军队外，都要参加生产或在政府中服役，年老残疾者编入牌尾馆，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对各种手工业实行国营，将城市各种行业的手工业工人分配到有关的诸匠营和百工衙中，从事手工业生产；产品直接分配到有关使用单位。这种根据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所制定的管理城市的方案，显然违反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引起天京城内经济萧条和群众的广泛不满。咸丰五年（1855，乙荣五年）初，太平天国领导者正式下令解散女馆，允许天京居民恢复家庭生活，承认私营工商业，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原来状态。在天京以外各地，太平天国对民间商业始终采取保护的政策，要求商人领取“商凭”（即营业许可证），服从法令；太平军所到之处，即张贴告示，让百姓各安生业，照常贸易，政府则收极轻的商业税。因此，太平天国统治区，生产得到发展，商业也日益繁盛起来。

在妇女政策方面，太平天国主张男女平等，采取了一些解

放妇女的措施。在经济上，妇女同男子一样分田；在政治上，设立女营，建立女军和从事生产的女馆，保证妇女参加革命政权工作、革命战争和生产劳动的权力。太平天国还废除了封建的买卖婚姻制度，“凡天下婚姻不论财”，推行禁止娼妓，不准缠足等解放妇女的政策。但是，由于小农经济的制约和封建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没有能冲破封建夫权的束缚，把妇女彻底解放出来。洪秀全颁布的《幼学诗》公然宣扬“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自求家道苦”⑬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太平天国领导者也仍然沿袭着历代帝王的嫔妃制。这些事实说明，他们不可能摆脱封建社会的传统影响。

在思想文化领域，太平天国对孔丘和儒家经书的正统权威进行了一次有力冲击。金田起义前，洪秀全即在村塾中砸毁孔子牌位。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撰写的《太平天日》中，洪秀全进一一步发展了他们的反孔思想，指出：“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要把孔丘捆缚在“皇上帝”面前，接受审判、斥责和鞭挞⑭。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所到之处，广泛地开展捣毁庙宇、偶像的活动，“凡学宫正殿两庑木主亦俱毁弃殆尽”⑮。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宣布孔孟之书为“妖书”，规定“凡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⑯。这些举动无疑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意义。但是，这种不加区别的搜书、焚书的做法，既不能根除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利于批判地继承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事实上，农民们对四书、五经也只是删掉鬼神祭礼之类的字句，或作些枝节的文字改动，而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内容如等极制、三纲五常、天命论等，都完全保留了下来。

如何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是中国农民革命碰到的一

个新问题。在这方面，太平天国虽然没有经验，对侵略者也缺乏本质的认识，但他们从开始就表达了中国农民阶级所具有的朴素的反对外国侵略的鲜明立场。天京定都后一个月，英国公使到天京，蛮横地要求太平天国承认《南京条约》，妄图通过不平等条约控制太平天国，达到继续侵略中国的可耻目的。太平天国严正拒绝了侵略者的无理要求，表示外国人可以来中国通商，但不准把鸦片运到中国来，两国地位必须平等。他们严励警告英国侵略者：不要帮助清朝攻打太平军，“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⑰。后来，当英国军舰掩护清朝水师攻击镇江时，太平军立即用炮弹回击了这帮侵略者。不久，法国公使和美国公使也先后到天京刺探，他们得到的答复同英国公使所得到的完全一样。太平天国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同清政府对外屈辱投降的方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太平天国实行的内外政策，表现了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精神。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单纯的农民战争。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不能建立一个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社会。在太平天国控制区内，清朝统治势力虽然受到很大的打击，但远没有被彻底摧毁。农民阶级的一些弱点，在起义队伍，尤其领导集团中，也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出来。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高涨中已蕴含着走向衰败的危机。

注 释

①《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20、122、121页。

②《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22页。

③《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107－112页。

④《太平天国》第3册，第290－291页。

⑤《太平天国》第3册，第5页。

⑥⑦《太平天国》第4册，第458页。

⑧《太平天国》第4册，第367页。

⑨《太平天国》第7册，第46页。

⑩《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409－413页。

⑪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8页。

⑫《太平天国》第3册，第203－204页。

⑬《太平天国》第1册，第233页。

⑭《太平天国印书》上册，第38－39页。

⑮《太平天国》第3册，第326页。

⑯《太平天国》第2册，第313页。

⑰《太平天国》第6册，第903页。

清（后期）

太平军的北伐和西征

太平军在占领南京以前，采取流动作战方针，没有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都天京以后，为巩固革命政权，彻底推翻清朝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太平军以天京为基地，进行了北伐和西征。

一、北　伐

咸丰三年四月（1853 年 5 月，癸好三年四月），洪秀全、杨秀清命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春官副丞相吉文元为统帅，率战斗力最强的前一、前二、前三、前五、后一、后五、中五、左二、右一共九军二万余人北伐。北伐的目标是攻占北京，推翻清朝统治。北伐军出发前，洪秀全给林凤祥等人的指令是："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毋贪攻城夺地縻时日"①；如遇困难，则"到天津扎住"②，待援兵抵达，再攻北京。四月六日（5 月 13 日），林凤祥等率北伐军前队自扬州出发，乘船至浦口登陆，击溃堵截的清山东兵勇和黑龙江马队，相继攻克安徽之滁州，临淮关。后续部队在殿左三检点朱

锡琨、殿左十六指挥黄益芸率领下，于四月八日（5月15日）亦在浦口登陆，但误入浦口东北的六合县；夜宿营，不慎失火，弹药爆炸，黄益芸被焚牺牲，将士死伤过半，余众大部退回天京，小部在朱锡琨率领下赶往临淮关与林凤祥等会合。

四月二十一日（5月28日），北伐军克凤阳府。同日，杨秀清接到林、李、吉三人的禀报，当即指示："尔等奉命出师，官居极品，统握兵权，务宜身先士卒，格外放胆灵变，赶紧行事，共享太平。"并强调："谕到之日，尔等速急统兵起行，不必悬望。"③随后北伐军即在无后方依托的环境下，朝东北方向进军，连克怀远县、蒙城县、亳州。五月六日（6月21日）北伐军从亳州进入河南，在商邱宋家集击败河南巡抚陆应谷军。次日，归德府（今商丘）人民打开府门，迎北伐军入城。接着，林、李即率五军兵将前往归德城西北四十余里之黄河南岸埠头刘家口，准备渡河取道山东北上。不料清地方当局早已把船只尽收泊北岸，且俟北伐军到来之际，放火将船烧毁。林、李等见在此无法强渡，遂离归德，统兵西上，经睢州、杞县、陈留县，于五月十三日（6月19日），进抵开封城下。北伐军志在渡河，不在攻城，且开封城外有深沟两道，渡口亦无船只，遂撤开封围，自朱仙镇继续西进，经中牟、郑州、荥阳到达汜水、巩县。沿途捻军及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人员大增。由于挖煤工人协助，他们在巩县洛河口得到运煤船多只。大军遂于五月二十二日（6月28日），开始在汜水口北渡黄河。因船少人众，至二十八日（7月4日）北伐军尚未渡尽。清军赶到，余众数千人只得反旆南下，经湖北回到安徽，与西征军会合。

渡过黄河的四万余北伐军，急需补充军实，于是乘胜进围

盛产兵器火药的豫北重镇怀庆（今沁阳）。清廷急命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理藩院尚书恩华、绥远城将军托明阿为帮办军务，与内阁学士胜保、提督善禄、都统西凌阿等总计约六万多人，分五路援怀庆。经过五十六天的艰苦奋战，北伐军未能破城，乃于七月二十八日（9月1日），主动撤围，本拟从怀庆直趋天津，但遭清军阻击，遂改道经济源，入山西。自八月二日（9月4日）起，北伐军连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今临汾）、洪洞等府县；由此继续北进则可立克太原。但北伐军目标在直捣北京，故出敌不意，舍北而东，经潞城、黎城，越太行山，复入河南，连克涉县、武安，向直隶推进。清廷将山西巡抚哈芬革职拿问，以胜保代纳尔经额为钦差大臣。八月二十八日（9月30日），北伐军击溃纳尔经额、总兵经文岱所率万余清军，克直隶军事重镇临洺关，并乘胜北上，连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州等地。捷报传到天京，东王杨秀清奏请天王洪秀全，封林凤祥为靖胡侯，李开芳为定胡侯，吉文元为平胡侯，朱锡琨为剿胡侯。此时北京则误传北伐军已攻至定州，清廷大震，城内官僚地主外逃者不下三万家，咸丰帝急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部署京城防务。僧格林沁率京营兵四、五千人，赴京南涿州防堵，胜保则率军北上保定阻截。然而，北伐军并未向北进攻保定，而是兵锋东指，沿运河向天津进发。大军一路连克献县、交河、沧州，九月二十七日（10月29日）入据静海县城和独流镇。此时适值天津大水成灾，天津、静海一带积水成河，旱道断绝。次日，李开芳率军沿堤进抵杨柳青，水路前锋达天津郊外十里的稍直口，随即登岸扑城，为水所阻。十月一日（11月1日），北伐军与天

津官府所办团练武装战于城郊，不利，遂折回杨柳青，进而退返独流、静海。此后由于时届隆冬，棉衣、食粮供给又极其困难，加以胜保，僧格林沁率清军主力赶到，北伐军处境逆转，鏖战三月，未能取胜。咸丰四年正月九日（1854 年 2 月 6 日，甲寅四年正月三日），北伐军放弃静海、独流南撤。大军经大城、献县，于二月十二日（3 月 10 日）进占阜城。二十六日（24 日），平胡侯吉文元在阜城作战，英勇牺牲，朱锡琨大约亦在此后不久牺牲。

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在津南受挫后，决定派援军北上。咸丰四年正月七日（1854 年 2 月 4 日，甲寅四年正月一日），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夏官副丞相陈仕保及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统率十五军七千余人，从安庆出发增援北伐。援军经桐城、舒城、六安、蒙城、亳州、豫东永城、夏邑，然后进入江苏砀山、萧县（今属安徽），沿途群众相继加入，总兵力迅速增加到六万人。二月十六日（3 月 14 日），大军在萧县董家口至砀山包家楼，渡过黄河，于丰县刘家庄整顿队伍后，分三路向山东挺进，连下金乡、巨野、郓城，至东阿县张秋镇集中。曾立昌等本拟由此顺运河经东昌取道德州达直隶阜城，与北伐军会合，但侦知善禄驻军东昌，遂决定改道由阳谷、莘县、冠县而北。三月十五日（4 月 12 日），援军攻克扼南北漕运咽喉的临清；此地距阜城只二百余里。然而援军进城后，由于敌人退出前将火药存粮焚毁，加之城外胜保军的围困，给养出现困难，新附群众浮动不稳，其中数千人且于二十一日（18 日）在城内哗变，冲出城外。次日，北伐援军撤出临清，拟取道故城入直隶达阜城，但新附群众不听命令，相率南行。胜保率清军往追，援军在李官庄、清水镇相继失利。三月十九日（4 月

26日），曾立昌乘敌军连获胜仗、警备疏懈之机，于初更派精兵千人各持一种名为先锋包的火毬往攻，清营顷刻延烧，人马溃逃。立昌建议从此返辙往北，直抵阜城，但新附者坚欲南行。故援军休息一日后南退冠县，在此遭团练和胜保军夹击，新附者纷纷逃散。四月九日（5月5日），援军退至江苏丰县北之漫口支河，时河水陡涨，人马陷于泥淖，伤亡甚重；后转至黄河河岸，将士骑马或浮水渡河，敌骑大至，立昌跃马入河死难。余众经苏、豫入皖北，陈仕保于凤台县牺牲。部分援军旋南下，返回太平天国控制区；许宗扬被收入“东牢”。天京得知北伐援军败退消息后，于四月将顶天侯秦日纲自安庆调回，晋封燕王，命其统兵再次增援北伐军。秦日纲率兵至舒城杨家店败回，禀奏称：“北路妖兵甚多，兵单难往。”④奉旨仍赴安庆安民。此后，由于西征战事的需要，太平军已无力再派兵北援了。

正当曾立昌等率援军从临清南撤之际，北伐军也于四月九日（5月5日）从阜城突围南走，至东光县连镇坚守待援。不久，闻援军抵山东，李开芳又率骑兵两千余人离开连镇，南下接应。五月三日（5月29日），李开芳等到山东高唐州，得知援军已败，乃据州城守御。从此，北伐军被分割两地，军势更加孤危。林凤祥在连镇，立木栅，掘深壕，决计坚守。僧格林沁统清兵在连镇周围，挖三壕、筑三垒，对北伐军实行围困。两军交锋，北伐军连战皆捷，但终因弹尽粮绝，无法久守。咸丰五年正月十九日（1855年3月7日，乙荣五年正月三十一日），清军攻破连镇北伐军阵地，林凤祥被俘，槛送北京，英勇就义。时李开芳在高唐州与胜保所率清军相对抗，已历时九月。至连镇陷落，清帝因胜保师久无功逮京治罪，命僧格林沁

移军进攻高唐州。李开芳见僧格林沁兵到，始知林凤祥军已败，决定突围南归。二月一日（3月18日，二月十一日），李开芳率军行至茌平县冯官屯，为清军追及，遂据屯迎拒。北伐军在此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清军久攻不下。僧格林沁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粮草火药尽湿，而屡次突围又均未成功。四月十三日（5月28日），李开芳派将士百余人出城诈降，谋作内应；僧格林沁用小船将他们渡出。李开芳以为敌已中计，乃于十六日（31日），带领余众亲至清营，准备里应外合，突出重围。但僧格林沁并未中计，太平军百余人被杀害；李开芳等九人也槛送北京，英勇就义。至此，长驱六省，历时两年多的北伐，由于孤军深入而英勇悲壮地失败了。

二、西　征

北伐开始不久，太平天国又派军队西征，目的在于夺取长江中游沿岸各省，扩大根据地，并确保天京。咸丰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53年6月3日，癸好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等率近万名太平军，乘千艘战船离天京西上。西征军进占安徽和州后，以破竹之势，于五月四日（6月10日）占领安庆。胡以晃留安庆指挥西征战事，赖汉英等率军向江西挺进。大军经彭泽、湖口、南康（今星子县）、吴城镇，于五月十八日（6月24日）进围南昌。在此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一千三百人先期赶到南昌，与江西巡抚张芾共同据城防守。在南昌城下，太平军与清军展开多次激战，未分胜负。为加强军力，清廷从两湖、贵州和江南大营紧急调军增援；天京方面则派国宗石祥祯、韦志俊、石镇仑、石

凤魁等率军万人，船只近千艘抵南昌城外。由于强攻难于奏效，赖、石等乃采取先占附近州县，断其接济，然后再合力攻城的策略，于是丰城、瑞州（今高安）、饶州（今鄱阳）、乐平、景德镇、浮梁、都昌等地，都先后为太平军攻克，南昌也成为一座孤城。但正在此时，杨秀清以久攻不下，决定撤南昌之围，转攻皖、鄂。八月二十二日（9月24日），赖汉英、石祥祯等离南昌，北上渡鄱阳湖，出湖口，入长江，然后兵分两路：一路由曾天养率领，沿长江东下回安庆与胡以晃部会合，经略皖北；一路由赖汉英、石祥祯率领，沿长江上驶，进攻湖北。

西路军于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攻占九江，以殿右八指挥林启容率军镇守。赖汉英因久攻南昌不下，被召回京革职，部众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继续西征，挺进湖北。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太平军在广济田家镇半壁山，大败湖北防军和前来支援的江忠源所率楚勇。十八日（20日），太平军一举攻克汉口、汉阳。时天京以扬州方面军事紧张以及集中兵力经营安徽，决定调回西征军回援，故太平军于十月五日（11月5日），退出汉口、汉阳，以部分兵力留驻黄州、蕲州间，余众分别回天京、安徽。

安徽战场的主攻目标是进占临时省城庐州（今合肥市）。西征军占安庆以后，因主力转向江西，故一连四个月在皖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八月二十三日（9月25日），翼王石达开奉命从天京抵安庆，主持西线军政全局。他抵皖后，积极布置军事，组设地方行政机构和乡官组织，安定民生，征收赋税，“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⑤。九月中旬，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等率军经营皖北。大军于九月二十三日（10

月 25 日）克安庆北门外之集贤关，十月十四日（11 月 14 日）占桐城，二十九日（11 月 29 日）占舒城，进逼庐州；清督办安徽团练、工部侍朗吕贤基兵败自杀。时清廷命防守南昌之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回防庐州，又从河南陈州（今淮阳）、江苏徐州、安徽定远等地调兵万余增援。太平军从十一月十二日（12 月 12 日）开始攻城，至十二月十六日（1854 年 1 月 14 日），以地雷破城，清知府胡元炜投降，江忠源投水自尽，庐州为太平军占领；城守由胡以晃主持。接着，太平天国在安徽 20 余州县建立政权，成为天京的西部屏障，西征的后方根据地。稍后，石达开回京复命，顶天侯秦日纲驻安庆代其主持军政。

太平军取得庐州后，其主力再次沿江西上，国宗石祥祯、韦志俊、韦以德、石镇仑、石凤魁、秋官又正丞相曾天养、地官副丞相黄再兴、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丞相张子朋等齐集黄州前线，总兵力逾四万人。咸丰四年正月十五日（1854 年 2 月 12 日，甲寅四年正月九日），太平军大破驻黄州北二十里之堵城清军，湖广总督吴文镕兵败自杀。十九日（16 日，十三日），太平军第三次进占汉口、汉阳。在此，又兵分两支：一支由韦志俊、石凤魁等统率围攻武昌，分军攻取四周州县；一支由石祥祯等统率进攻湖南。南路军于二月一日（2 月 27 日，正月二十四日）克岳州，六日（3 月 4 日，正月二十九日）占湘阴，九日（7 月，二月一日）陷靖港，十三日（11 日，二月五日）据宁乡；此地距省会仅数十里，长沙大震。但在此太平军遇到曾国藩所建湘军的顽抗。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道光十八年进士，先后升任礼部右侍朗、兵部、吏部

左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二年），丁母忧回籍，年底奉命赴长沙帮办湖南团练。他以湘乡练勇和江忠源旧部楚勇为基础，扩充编练成湘军。咸丰四年二月（1854年3月，甲寅四年二月），湘军水陆两军23营练成，合计员弁、兵勇、夫役共一万七千余人，其中水师10营，陆师13营；水师以褚汝航为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先锋。其编制以将领为中心，一营士兵为其上司哨官、营官所属，营官又为统领私人所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湘军即组成，遂自长沙开赴靖港、乔口。太平军与湘军初战失利，因而从湖南撤回湖北。西征军闻征湘军北退，当即增兵，由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率三万余人，于二月二十九日（3月27日，二月二十一日）自汉口上驶，再入湖南。三月十日（4月7日，三月二日），征湘军克岳州，接着乘胜进至乔口、靖港；留石祥祯率部在此扼守，林绍璋率主力近二万人由陆路绕经宁乡，疾趋湘潭，准备南北夹击，夺取长沙。曾国藩一面派兵往救湘潭，一面亲率水路军出攻靖港。四月二日（4月28日，三月二十三日），靖港太平军痛击湘军，其水师战船丧失三分之一，陆师也被击溃，曾国藩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狼狈逃回长沙。但与此同时，在湘潭战役中，由于林绍璋指挥不当，内部新老将士相冲突以及双方力量对比湘军占优势等因素，太平军遭到重大损失；四月五日（5月1日，三月二十六日）湘潭失陷，林绍璋率部北返靖港，另一部由澧陵东走转入湖北。为等待援军，太平军自靖港退守岳州。面对湘潭失败的严峻形势，正在围攻武昌的韦志俊等为阻扼湘军长驱北上，立即将分散在鄂北各地的太平军调回，并进攻武昌城，而由石祥祯、林绍璋分军活动于通城、岳州、常德等地，以牵制湘军。六月二日（6月26日，五月二十日），太平军攻

克武昌。接着，曾天养、韦志俊率部先后进援湖南。六月中旬(7月上旬，五月下旬)，曾国藩统湘军两万余众，以水师为先导，陆师分三路自长沙北上，进攻岳州。太平军曾天养部迎战失利，于七月一日（7月25日，六月十九日）退守岳州以北二十余里之城陵矶。此后太平军接连反击，均未得手。七月十六日（8月9日，七月三日），登州镇总兵陈得龙、广东游击沙镇邦率广东水师向太平军发动进攻。曾天养令大队战船埋伏于城陵矶之旋湖港，另出小舢板诱敌，阵斩陈得龙、沙镇邦；湘军水师褚汝航、夏銮率船救援，也被击毙，敌船被毁30余艘。十八日（11日，六日），曾天养率兵三千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署提督塔齐布率兵猝至，曾天养单骑驰入敌阵，受伤落马牺牲。后太平军在韦志俊率领下，于城陵矶一带与湘军相持十余日，接战五次，败多胜少，遂于闰七月二日（8月25日，七月二十日）撤往武汉。八月中旬（10月初，八月下旬），湘军和湖北清军三路猛攻武汉。武昌守将国宗提督军务石凤魁，粗通文墨，不谙军务，面对湘军进攻，只是闭城行消极防御，致使武汉江面太平军水师船只千余只先后被湘军焚毁。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九月九日），石凤魁仓皇东撤。接着在田家镇战斗中，太平军水师船只四千余艘又被焚毁，江面防御体系遭到破坏。十月十四日(12月7日，十月二十八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不久又退宿松、太湖。湘军顺江东下，于十一月十四日（1855年1月2日，十一月二十八日）进抵九江城下。

在西线处于危急关头，石达开再次受命赴湖口主持西征战局；护天豫胡以晃、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等亦奉命分别从安庆和

饶州率军往救。十一月二十一日（1月9日，十二月四日），湘军统领塔齐布、罗泽南会同湖北按察使胡林翼率一万五千人进围九江，后屡攻不下，水师乃转攻湖口，企图先击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切断外援，尔后再攻九江。太平军先是采用疲敌战术，坚壁高垒，不与敌军决战，只以灵活机动的小船进行夜袭，待敌疲惫不堪，即佯撤湖口守军。十二月十二日（1月29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湘军一百余艘舢板快船冲入鄱阳湖内，太平军迅速堵死出口，湘军水师遂被分割为二：百余轻捷快船，陷于鄱阳湖内；笨重大船，留于长江江面。当晚，石达开令以小艇围攻湘军外江水师，一举焚毁其战船三十多艘，其余败退九江。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1日，乙荣五年一月七日）夜，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九江对岸之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再次袭击泊于江中的湘军水师，焚毁其战船多只；且缴获曾国藩座船。曾国藩乘小船狼狈逃入罗泽南陆营，复欲寻死，被罗等劝止，后率师转至南昌。湖口、九江的连续胜利，予湘军以沉重打击。从此太平军则开始全面反攻。十二月三十日（2月16日，一月十二日），秦日纲、韦志俊、陈玉成在湖北广济击溃湖广总督杨霈大营后，分兵两路：秦、陈进占汉口、汉阳，韦志俊部占兴国。同时罗大纲部则经江西饶州折返皖南，与范汝杰部会合，进占徽州府（今歙县）等地。二月十七日（4月3日，二月二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初步稳定了长江上游的战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太平军分别在湖北、江西、安徽同时与清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湘军兵力分散，战线较长，处于被动。

为挽救败局，曾国藩一面派悍将罗泽南率部自江西驰援湖北，进窥武昌，一面命塔齐布、周凤山等领兵继续进围九江；

不久塔齐布病死，周凤山接统其军。九月（10月，九月）湘军水陆三路进取武昌。时燕王秦日纲，已奉调回天京，翼王石达开率护天豫胡以晃、卫天侯黄玉崑、春官丞相张遂谋、检点赖裕新、傅忠信等，统大军二万余人西上援鄂。九月二十二日（11月1日，九月二十六日），石达开军在武昌县之樊口登岸，经金牛镇抵咸宁，以阻截罗泽南湘军。接着石军于二十五日（4日，二十九日）大败罗济南湘军，并于二十六日（5日，三十日）克复崇阳，迫使罗部退至蒲圻西南之羊楼峒。此时西路韦志俊率太平军万余人由纸坊开到蒲圻，随而进向羊楼峒。石、韦相约，以韦军攻羊楼峒，上袭岳州，石军则由通城入平江，从而共同抄袭湘军老巢。但石达开于十月五日（11月14日，十月八日）进占通城后，又改变了上述计划，以为湘军正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如进军曾国藩所在大营南昌，不仅可解九江之围，且必能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鉴此，石达开遂留韦志俊防守武昌，自率三万人于十月十五日（11月24日，十月十八日）从通城西进，转入江西。十一月一日（12月9日，十一月三日），石军克新昌（今宜丰），在此与自粤北上的天地会起义军数万人会合，兵力大增。接着，太平军分兵连占上高、瑞州新喻（今新余）、峡江、吉安等地，威逼南昌。曾国藩惊恐万状，急命周凤山撤九江之围回援南昌，在樟树镇（今清江）设防，调鄱阳湖内水师防守赣江。咸丰六年二月十八日（1856年3月24日，丙辰六年二月十七日），太平军四路围攻樟树镇，尽破湘军营垒，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这时，江西八府五十多州县，均为太平军所占有。正当南昌指日可下之时，杨秀清调石达开回天京往攻江南大营，从而使曾国藩得到喘息之机。

三、天京破围战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相继派军北伐、西征，东线太平军所据守之天京、镇江、扬州三城却始终处于清军江南、江北两大营围困之下。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853年12月26日，癸好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月），太平军主动撤离扬州。咸丰五年（1855年，乙荣五年），上海小刀会起义被镇压后，清廷命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移师西上，会同江南、江北大营围攻镇江、瓜洲，天京地区的形势趋于紧张。

为解镇江之围，并彻底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严重威胁，杨秀清先后调秦日纲、石达开等率部东援。咸丰五年十二月（1856年1月，乙荣五年十二月），燕王秦日纲、冬官正丞相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等从西征前线回师。十二月二十五日（2月1日，十二月二十六日），秦军自天京分两路进至栖霞和仙鹤门一带与围攻镇江的清军对峙。咸丰六年二月二十七日（4月2日，丙辰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秦军会同镇江守将吴如孝内外夹击，重创吉尔杭阿和总兵张国梁所部清军。当夜，太平军乘胜渡江，先入瓜洲，继趋仪征，踏破江北大营大小营盘一百二十余座，再克扬州。至此经营三年之久的清江北大营被摧毁。在取得军粮以后，秦部于三月十日（4月14日，三月八日）撤离扬州西进，拟渡江南返进攻江南大营。由于清军先后攻占浦口、江浦，致使由浦口南渡之路被阻，秦日纲等只得折而东返，经仪征、三汊河，至瓜洲渡江，屯驻金山。四月二十九日（6月1日，四月二十五日），秦日纲军在高资大败清军；吉尔杭阿率军往救被围，绝望自杀，清军营垒七八十座不战自溃；张国梁由六合来援，亦被击败。秦军乘胜

于五月十二日（6月14日，五月八日）回天京，屯营城东北燕子矶观音门。

当秦日纲等率军转战三汊河之际，石达开已率主力二三万人取道皖南芜湖、金柱关，进抵天京城北。五月十五日（6月17日，五月十一日），石、秦两路大军约五万人会攻江南大营。经四天激战，太平军于十八日（20日，十四日）攻破孝陵卫清中军大营，清军溃散，钦差大臣向荣等仓皇逃至淳化镇，复败走丹阳。秦日纲军乘胜追击，克句容，进抵丹阳；向荣绝望自尽。至此，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摧毁。随后杨秀清即命韦昌辉主持江西军政，石达开前往湖北解武汉之围。

自咸丰三年四月起至六年五月止，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斗争，除北伐因孤军深入而失败外，西征和天京破围战均取得重大胜利。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湖北东部，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土地，都为太平天国所控制；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先后被击溃，又解除了天京的肘腋之患。此时，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期。

注　释

①《清史稿》中华书局新版，第42册，第12872页。

②《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5辑，第167页。

③《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④《太平天国》第3册，第10页。

⑤《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8页。

清（后期）

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于咸丰三年（1853年，癸好三年）建都天京以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同清王朝展开了全面的斗争，并取得重大胜利。然而，与此同时，起义队伍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也随之潜滋暗长，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到咸丰六年（1856年，丙辰六年），终于爆发了关系到太平天国命运的天京事变。

太平天国仍然是旧式农民战争，它引导千百万农民对封建统治展开猛烈冲击，但没有也不可能在科学思想指导下彻底变革封建制度，这就使革命队伍内部的种种矛盾无法得到正确处理。事变正是起因于领导集团矛盾的激化。首先是洪秀全和杨秀清的矛盾。在宗教方面，洪秀全是拜上帝教的创建者，是天父上帝次子，耶稣之弟，上帝派到凡间的“太平真主”；在政治方面，洪秀全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王。而杨秀清早在金田起义前已取得代天父传言的权力，永安封王建制时又获军队统帅权，建都天京后，进一步控制了政权。这种二元体制就埋下了洪、杨矛盾的祸根。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全面继

承了封建的君主制、等级制和世袭制，原本“寝食必具，情同骨肉”①的兄弟关系，为名分各异的君臣关系所取代。从天王到普通士兵之间等级繁复，体制严格，不许逾越。例如乘轿一项，照规定：天王轿夫六十四人，东王轿夫四十八人，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高级官员出行，下级官员或兵士必须回避或跪在道旁，否则格杀勿论。在此体制下，领导集团成员追求权力、名位和贪图享乐的思想倾向日益滋长起来。太平天国在天京定都伊始，太平军尚在城外与清军鏖战，洪秀全即动用大批劳力，将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雕琢精巧、金碧辉煌”的天王府。他深居宫中，安享帝王之乐，同时又利用宗教神学来巩固自己的最高统治地位。他数日出一诏书，或作一诗发出贴于照壁，利用宗教神学，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是天下“万民之主”，理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可是，掌握军政大权的杨秀清，却“自恃功高，一切专擅”②，“威风张扬，不知自忌”③，天朝所有军政大事都是先在东府商妥，然后会奏天王批准；东王府实际成了天朝的最高主宰。他擅立威福，对韦昌辉、石达开等起义有功将领，设法予以压制苛责，甚至“每谎称天父下凡附体，令秀全跪其前”，“数其罪而杖责之”④，他如此飞扬跋扈，目的在于迫使天王和高级将领无条件的屈服，为夺取最高统治权铺平道路。这样作，不仅加剧了洪、杨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激化了杨秀清与韦昌辉、石达开之间尤其是杨、韦之间的矛盾。

韦昌辉是金田村富户，读书识字，小有才气。金田起义，他捐出全部家产，阖族从军，后统兵作战，对太平天国有重大贡献，成为仅次于洪、杨的第三号人物。杨秀清要扩大个人权势，不能不顾忌和打击韦昌辉。在东王压抑下，性情奸诈的韦

昌辉则采韬晦之计，明里百般谄媚，据载：杨秀清“舆至则扶以迎，论事不三四语，必跪谢曰：‘非四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几不知此。’‘肚肠嫩’，浔州乡语，犹言学问浅也。”其兄与东王妾兄争房产，东王大怒，欲杀其兄，特交韦昌辉议罪，韦为讨好杨，竟“请以五马分尸，谓非如此，不足以警众”⑤。但实际上则“心怒不息”⑥，等待时机，窃夺其权。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了天京事变的爆发。

咸丰六年七月十五日（1856年8月15日，丙辰六年七月九日），即清江南大营主帅钦差大臣向荣死后第六天，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附体，召洪秀全到东王府，谓曰：“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秀全答曰：“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杨又曰：“东世子岂止是千岁？”秀全答曰：“东王即万岁，世子即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⑦面对杨秀清的威逼。洪秀全一面以拖延来应付，佯允以八月二十五日（9月23日，八月十七日），杨秀清生日时举行正式封典，一面密召在江西督师的北王韦昌辉、湖北督师的翼王石达开、金坛督师的燕王秦日纲，速回天京诛杀杨秀清。秦日纲首先抵京，接着韦昌辉于八月三日（9月1日，七月二十六日）夜率兵三千人秘密赶回天京，并会同秦日纲指挥队伍迅速而严密地占据城内要津，然后对东王府发动突然袭击。杨秀清及其家属、扈从猝不及防，于四日（2日，二十七日）凌晨均被韦昌辉杀害。当日，洪秀全下诏，贬杨秀清为“东孽”，“宣布他窃据神器，妄称万岁，已遭天殛”⑧的罪状。为彻底肃清“东党余孽”，韦昌辉等人在洪秀全默许下，又“定下一条阴谋”：六日（4日，二十九日）上午，洪秀全下诏，“谴责”韦、秦

杀人太多，令受鞭刑四百；同时宣称东王逆谋是自天泄露，余党一概赦宥不问。东王部下五千余人不知是诈，遵命前往观刑时，全部被韦、秦预先部署的伏兵杀害。

八月中旬（9月中旬，八月上旬），石达开从武昌赶回天京，目睹城中惨象，深感问题严重，即婉言劝谏韦昌辉息兵止杀，指出："东孽罪当诛，其下何罪，何得尽戮？无乃自戕手足，倘官军万一知之，乘我之危，将何以御？"昌辉闻此大怒，反斥达开："汝将亦党东孽，共图报仇杀我乎？"⑨且顿起杀害达开之意。达开见状，连夜缒城逃往安庆。韦昌辉捕石不得，竟将其家人全行杀害。石达开飞檄皖、赣、鄂三省太平军，向芜湖、宁国一带集中，以回师靖难。十月十一日（11月8日、十月二日），石达开率军四万余人自安庆渡江至泾县，进向宁国，起兵讨韦，"上奏于天王，要求韦昌辉之头"，否则"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⑩。时韦昌辉独霸军政全权，一面派秦日纲率军抵御石达开的进攻，一面在天京继续扩大事态，"不分青白，乱杀文武大小男女"⑪。据说前后两个月，遭韦昌辉杀害的太平军将士达两万余人，老弱妇孺亦未能幸免。对此，天京军民极为愤慨。由于石达开大兵压境和朝内群起反韦，洪秀全下令诛除韦昌辉、秦日纲及其同伙二百余人。长达两月之久的天京变乱至此平息。

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于十一月一日（11月28日，十月二十二日）前后回到天京。石达开文武兼资，仁义素孚，深受太平天国军民的拥戴。这次起兵靖难归来，"众人欢悦"⑫，合朝文武同举他"提理政务"，推其为"义王"；洪秀全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达开在面临武昌失守，敌水师直逼九江的严峻形势下，在军事上采取攻守兼施的战略：东线坚

守句容、溧水；西线坚守九江以下各据点，确保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皖鄂边境大别山区，则以豫天侯陈玉成、地官副丞相李秀成为统帅，实行进攻。自咸丰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七年二月二十三日（1856年1月11日至1857年3月18日，丙辰六年十二月五日至丁巳七年二月十日），太平军在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下，先后攻克安徽的无为、庐江、桐城、舒城、六安、正阳关、霍邱。四月四日（4月27日，三月二十日），陈玉成率军攻占英山，进屯太湖。十九日（5月12日，四月四日），陈玉成部分道进入湖北，相继攻占鄂东黄梅、广济、蕲水、蕲州、罗田，威胁武昌。在坚守方面，除少数据点被清军攻占外，军事重镇如九江、瑞州、临江、抚州、吉安、句容、溧水等地，均为太平军所占有。

然而，正当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出现新气象之际，在政治上却又爆发了新危机。洪秀全经杨韦事件之后，对非洪姓重臣深怀戒心，尤惧石达开权力过大，于己不利。因此，他虽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提理政务”，却不予军师名号，且“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⑬。为牵制石达开，洪秀全又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此二人既无才干，又贪鄙固执，毫无威信。面对重重疑忌和挟制排斥，石达开从天京负气出走，于咸丰七年五月十一日（1857年6月2日，丁巳七年四月二十五日）自皖南铜陵渡江，十八日（9日，五月二日）经安徽无为州往安庆，沿途布告军民，将他与洪秀全的矛盾公诸于世。八月十八日（10月5日，八月二十八日），他率十余万太平军精锐，离开安庆，进入江西，走上同太平天国分裂的道路。此后，他统军转战浙江、福建、两湖、云、贵、四川等省，虽多次击败清军，对所经地区的群众

起义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终因孤军作战，力量日益削弱。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七日（1863 年 3 月 14 日，癸开十三年四月一日），石军进抵大渡河畔之紫打地（今安顺场），遭清军包围。在走投无路、粮草断绝的情况下，石达开致信清四川总督骆秉章，表示愿舍命以安三军。四月二十七日（6 月 13 日，五月一日），石达开与五岁的儿子石定忠自投清营。清军于起解石达开之夜，将其部下两千余人全部屠杀；石本人亦于五月十日（6 月 25 日，五月十三日）在成都殉难。

天京事变和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给太平天国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首先摘垮了领导核心。“东王升天，北王亦丧”，“翼王远征”⑭，前期领导核心只剩下天王洪秀全一人。其次，革命力量受到极大摧残。事变中被杀害的两万多太平军将士，石达开带走的十余万部众，多是久经锻炼的革命骨干力量。这种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原有态势。事变前，东线太平军正在向丹阳、金坛进军，准备攻取苏、常；西线太平军正在南昌外围和武昌与湘军激战；湘军处于被分割、包围在赣、鄂两地，往来隔绝，互相不能救援的困境中，事变发生后，在东线，扬州、镇江相继失守，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天京又被敌军包围；在西线，湘军摆脱困境，卷土重来，接连攻占武昌、九江，进窥安庆，太平军在江西所占有的城邑此时也都为湘军所夺取。这种急转直下的军事形势，使太平天国陷于左支右绌、难以应付的境地。第三，造成思想上的混乱和革命精神的锐减。太平天国前期，拜上帝会的教义曾经是发动和团结群众的精神支柱，广大太平军将士在人人都是兄弟，并力斩邪除妖，建立地上天国的号召下，进行英勇的战斗。这次事变竟是天父之子互相残杀，这就必然使广

大群众对上帝的信仰发生动摇，对能否建立人人平等的天国表示怀疑，对革命前途感到忧虑，从而使革命精神大为衰退。在变乱前，太平天国内部由于有共同的信仰，总体上是团结的，士气旺盛，战斗力强；变乱以后，原来的信仰在人们的心目中黯然失色，因而出现了"政涣人散，外合内离"的局面。

总之，天京事变成了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太平军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注 释

①《太平天国》第3册，第172页。

②《太平天国》第3册，第46页。

③《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④《太平天国》第3册，第45页。

⑤《太平天国》第4册，第669页。

⑥《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⑦《太平天国》第4册，第703页。

⑧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册，第1757页。

⑨⑩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香港简氏猛进书屋1962年版，第1380、1381、1383页。

⑪⑫《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⑬《太平天国》第4册，第704页。

⑭《太平天国》第2册，第851页。

清（后期）

天国后期的斗争

在领导集团发生分裂、敌人疯狂反扑的困难形势下，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军民，为扭转危局，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洪秀全首先致力于重建领导核心。石达开出走后，他宣布自任军师，总理国政。在朝臣据理力争下，洪秀全罢黜了洪仁发、洪仁达的王位，改封为天安、天福；设掌率官主持军政，以蒙得恩为正掌率，成天豫陈玉成为又正掌率，合天侯李秀成为副掌率，以陈、李主持军务。咸丰八年（1858年，戊午八年）夏秋间，洪秀全恢复前期五军主将制，任命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不久，因杨秀清被平反昭雪，国宗杨辅清脱离石达开率军归来，天王乃改杨为中军主将。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1859年4月22日，己未九年三月三十日），拜上帝教早期成员洪仁玕，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洪秀全大喜过望，立受仁玕福爵，不久晋封义爵，加主将，四月初九日（5月11日，四月初一日），又封为天朝

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理朝政，并“降诏天下，要人悉归其制”①。同月，陈玉成因战功卓著受封英王。接着在本年内，天王又陆续封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由于天王“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②。

在军事上，当时摆在太平军面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制止清军进攻天京。要解除天京之围，必须采取攻势防御，在西线击溃湘军，保住安庆，控制安徽；在东线消灭江南、江北大营。为此，李秀成在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8月，戊午八年六月）约集太平军各路守将大会于安徽枞阳，决定采取联合作战的方针，首先集中兵力攻击江北大营。会后，陈玉成率军由潜山过舒城，击溃安徽布政使李孟群部清军，攻占庐州，随即挥师东进；同时，李秀成军从全椒进抵滁州。八月十七日（9月23日，八月十五日），陈、李二军在滁州东南之乌衣镇会师，大败钦差大臣德兴阿所率江北大营清军和胜保所率骑兵，又在江浦境内击溃江南大营的援军。八月二十日（9月26日，八月十八日），陈、李两军直下浦口，一举攻破江北大营，歼敌万余，德兴阿急登船遁扬州。接着，太平军乘胜先后攻占江浦、天长、扬州、六合；从此，天京与江北一带交通得以恢复。

正当太平军集中兵力攻击江北大营之时，西线湘军乘机大举进攻安庆。八月十六日浙江布政使李续宾、江宁将军都兴阿督清军攻克太湖。然后兵分两路：南路由水师提督杨载福、陆师副都统多隆阿、总兵鲍超等率军进围安庆；北路由李续宾率湘军趋庐州。李续宾部连陷潜山、桐城、舒城，八月二十八日（10月4日，八月二十六日）进抵三河镇。该镇是庐州咽喉，其西南为金牛镇，东南有白石山；太平军守将吴定规在此镇筑

城一座，砖垒九座，凭险坚守多年。面对湘军的进攻，吴定规一面婴城固守，一面向天京告急求援。陈玉成在六合闻讯后，立即挥师西进，并启奏洪秀全调李秀成同往救援。针对湘军孤军深入的弱点，陈玉成率军经巢县直趋白石山、金牛镇，断绝敌人退路，且命庐州守将吴如孝会合捻军南下阻击清舒城方面救兵。李秀成随后也领兵屯扎白石山为后援。十月九日（11月14日，十月六日）清晨，陈玉成军发起进攻，直逼李续宾大营。翌日，湘军反扑，企图突围。时值大雾迷漫，湘军只闻喊杀声，不知太平军在何处，其时乱成一团。陈玉成部在金牛镇与湘军对阵，李秀成部从白石山赶来助战，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乘势出击，将敌军层层围困，战线绵亘二三十里。经激烈战斗，李续宾所部湘军精锐六千余人全部被歼，李续宾及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以及四百余文武官员被击毙。三河大捷后，陈玉成与李秀成乘胜收复舒城、桐城、潜山、太湖、使围攻安庆的清军狼狈退走。咸丰九年二月（1859年3月，己未九年二月），陈玉成等收复六安后，联合捻军在庐州城外击溃清军，擒斩署安徽巡抚李孟群，旋在庐州护城击败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军，歼其马队，使其从此不能复振。在皖南，咸丰八年十一月（1858年12月，戊午八年十一月），李世贤在安徽宁国湾沚镇大破清军，阵斩提督邓诏良。同时，杨辅清攻占江西景德镇，屡败湘军张运兰部。至此，天京上游局势暂时得到稳定。

当太平军集中兵力在安徽与湘军激战之际，天京又告危急。先是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1858年11月3日，戊午八年九月二十六日），捻首李昭寿以滁州降于胜保，改名李世忠。九年正月二十六日（1859年2月28日，己未九年正月二十一日），答天豫薛之元又以江浦降于李世忠。世忠乃率军进占浦

口。后虽经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于十月击败江南大营北进之军，斩湖北提督周天培，复占浦口、江浦，但天京之围并未得到缓解。咸丰十年正月九日（1860年1月31日，己未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江南大营清军连陷浦口沿江营垒八座，隘卡十余座。次日，清军又攻陷卫护天京与江北岸及水上交通的要塞九洑洲，添筑营垒，挖掘长壕，加紧围困天京。至此，天京水陆接济均被断绝。为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威胁，洪仁玕与李秀成商定，采用"围魏救赵"的方案，即以精兵间道奇袭敌人粮饷重地杭州，迫使江南大营分兵往救，然后迅速回师，摧毁江南大营。太平军各路将领在芜湖会议上取得一致意见后，正月十九日（2月10日，庚申十年正月二日），李秀成从芜湖出发，日夜兼程，疾趋浙江，于二月二十七日（3月19日，二月九日）攻克杭州。和春闻报，急派总兵张玉良统兵一万三千人前往救援，三月二日（3月23日，二月十三日）进抵杭州城下。秀成见敌人中计，遂于次日撤出杭州，经皖南于三月十八日（4月8日，二月二十九日）抵建平。各路大军将领即在此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分五路进援天京。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三月二十三日），太平军五路大军对江南大营发动总攻，城内部队也从各城门出击，内外夹攻，一举打破清军营垒五十多座，数万清军全部溃败。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三月二十七日），太平军直逼孝陵卫清军大营，钦差大臣和春、江南提督帮办军务大臣张国樑率残部败逃，江南大营被击溃，天京解围战获得全胜。

天京外围战斗结束后，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四月一日），诸王登朝庆贺，并筹划下一步军事行动。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庆，李世贤意在攻取闽、浙，洪仁玕主张乘胜下取

苏、杭、沪，然后“即取百万购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枝，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枝，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③。李秀成、洪秀全赞同洪仁玕的方案，遂确定先东进、后西上的战略。闰三月二十五日（5月15日，四月五日），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黄文金以及陈玉成部将刘玱琳等各路太平军一齐出动，向东南挺进。闰三月二十九日（5月19日，四月九日），太平军克丹阳，张国樑落水而亡，和春逃常州。四月六日（5月26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克常州，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往上海，和春逃至浒墅关自杀。四月十三日（6月2日，四月二十三日），在群众的支援下，太平军占领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绝望自杀。随后，太平军分头出击，先后攻克苏南各重镇。太平天国以苏州为首府，建立苏福省。

六月十五日（8月1日，六月二十二日），太平军从苏州出发，向上海进军，在此遭到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抵抗。在太平军攻克常州当天，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即联合宣布要保卫上海，并组织联合部队在上海近郊布防；苏松太道吴煦与买办杨坊出资雇佣美国流氓华尔组织洋枪队，与太平军相对抗。太平军进抵青浦，大败华尔洋枪队，重伤华尔，然兵顺流破松江。七月二日（8月18日，七月九日），太平军进抵上海徐家汇。英法侵略军和清军共同抗拒。太平军因猝不及防，遭到挫败，加之嘉兴告急，李秀成于五日撤后往救。在李秀成沿江东下的同时，陈玉成率军自天京经宜兴入浙江，连克临安、余杭等地，兵锋直指杭州城下。不久，因安庆告急，陈玉成回师援救。但太平军进攻浙江的计划并未放弃。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十一年），李世贤、李秀成先后进军浙江，

相继克复金华、严州、处州、宁波、绍兴、台州各府县。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十一月十九日），太平军攻克杭州，太平天国建立起以杭州为首府的浙江省。至此，江浙大部分地区都归入太平天国的领域，成为支撑后期太平天国政权的根据地。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力挽危局的同时，于政治上也力图刷新、整顿，重新振作起来。咸丰九年四月（1859年五月，己未九年四月），洪仁玕总理朝政后，向洪秀全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其主要内容：在政治方面，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分散、离心的倾向，主张"要自大至小，自下而上，权归于一"，以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官"和意见箱，尊重社会舆论和听取群众意见，以便"上下情通"；指出革新政治的关键是制定法律、制度、造就和使用官吏要得当。在经济方面，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设立银行、发行纸币，奖励发明创造，实行专利。在文化教育方面，主张设学馆、医院，禁止迷信和鸦片，提倡移风易俗，革除社会恶习。在外交方面：主张与外国自由通商、文化交流和平等往来，鼓励外国人在华投资，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④。这些建议和主张，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进步意义。但由于资本主义理想远远超出了农民迫切解决土地问题的直接要求，而当时的客观环境也无法使其见诸实行。因此，《资政新篇》的颁布，并没有在政治上创出一番新气象，打开一个新局面。

太平天国后期，内部的封建落后性进一步发展，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天王洪秀全陶醉于宗教迷信，信天不信人，不能妥善地处理军政事务。天京官府无不广蓄货财，腐化堕

落。军队将领拥兵自重，不顾大局。洪秀全为巩固天王的地位，使各级将领互相牵制，同时为满足文武官员追逐名利地位的愿望，不惜滥封王爵，到太平天国失败前夕，封王者竟达二千七百多人。由此搞得上下人心不服，各有他图。

江、浙根据地开辟以后，太平军在各地继续执行镇压地主武装、没收逃亡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农民的革命措施，加之农民对地主的自发斗争，在政治、经济上都打击了地主阶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江、浙的经济出现了某些繁荣的景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太平天国的地方政权中，混进了不少地主豪绅；地主团练武装也极为嚣张。他们或盘踞一方，依旧欺压人民，或与清军暗中勾结，"以图恢复"；或则拉拢勾结太平军中的蜕化变质分子，组成叛乱集团，阴谋与清军里应外合，从内部搞垮太平天国政权。可见，江、浙根据地并不是巩固的。

由于政治上日趋衰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也无力从根本上扭转战局。围困天京的江南大营被摧垮后，清廷原拟由湘军出力，江南、江北大营收功的设想完全破灭，咸丰帝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的湘军支撑危局。咸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九日），清廷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不久改为实授，委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令其带兵东援江浙。但曾国藩认为："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⑤因此，他舍下游不顾，集主力进攻安庆。咸丰十年（1860，庚申十年）春，正当各路太平军沿江东下之际，湘军曾国荃部已乘虚进犯集贤关，开始围攻安庆。为应付西线紧张局势，陈玉成放弃进克杭州，急于七月回师安徽。八月，洪秀全召集陈玉成、李秀成等回京，讨论西征战

略，确定陈、李两军沿长江北南两岸向西挺进，并于十一年三月会师武汉，从而迫使围攻安庆的湘军撤围回援。十年八月中旬，陈玉成率军自天京沿长江北岸西上，试图直接解安庆之围，与湘军在桐城、安庆激战，失利；遂于十一正月二十五日（1861年3月6日，辛酉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率军五万从桐城西进，连克霍山、英山，二月七日（3月17日，二月六日）进占湖北黄州，逼近武汉。经第二次鸦片战争，汉口已确定为通商口岸；此时英国驻沪海军司令何伯、参赞巴夏礼乘船抵武汉，十二日（3月22日，二月十一日），巴夏礼赶到黄州见陈玉成，以保护武汉商务为借口，阻止太平军进攻武汉。陈玉成担心英国干涉，又因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军未及时赶到，便决定暂停进攻武汉，令赖文光留守黄州，亲率大军围攻德安、随州等地，同时派人急速回京请示进止。三月，安庆告急，玉成分军留守湖北各城，自率精兵回援安庆。

太平军会攻武汉计划的失败，使湘军得以全力进攻安庆。为解安庆之围，陈玉成屯兵安庆外围据点集贤关，逼攻围城湘军，调驻守六合一带的吴定彩入安庆助守；洪秀全又派洪仁玕、林绍璋率军增援，进驻桐城。当时双方阵势犬牙交错，内线外线互相包围，但其基本态势是：湘军深沟高垒，围城打援；城内太平军进行阵地防御，城外太平军进行阵地攻坚；优势在湘军一边。陈玉成在形势不利于己的情况下，决意与敌决战。经一个多月的激战，太平军未取得进展。四月底，陈玉成部骁将刘玱琳坚守的集贤关赤岗岭营垒被敌攻破，四千多精锐将士阵亡。七月，陈玉成再次组织大军猛攻围城湘军，城内守军也列队四方接应，但由于敌军内攻外拒，拼死抵抗，双方未能会合。城外援军失利，城内弹尽粮绝。八月一日（9月5

日，七月二十六日），正当陈玉成军与围城湘军后队激战之际，湘军前队炸塌安庆北门城垣，乘势冲入，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等一万六千余将士英勇奋战，全部壮烈牺牲，安庆失陷。陈玉成率军退守庐州，准备反攻，后湘军扑向庐州，经三个月激战，陈玉成向北突围抵寿州。同治六年四月十九日（1862 年 5 月 17 日，壬戌十二年四月六日），陈玉成等被驻寿州团练头子苗沛霖所执，送解胜保军营。胜保诱逼他投降；陈玉成大义凛然的回答："大丈夫视死如归，你不要饶舌！"⑥五月八日（6 月 4 日，四月二十三日），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 26 岁。安庆失陷和陈玉成的牺牲，标志着太平天国西部防线彻底崩溃了。

安庆失守与李秀成未能及时应援有一定关系。江南大营被摧垮后，李秀成锐意经营江浙，对救援安庆抱消极态度。他先是未能如约与陈玉成会师武汉，后在安庆解围战正趋激烈时，又未前往救援。咸丰十一年四月底，李秀成军进克武昌以南各县，此时陈玉成正在安庆外围与湘军苦战，如李军再向武昌挺进则围安庆之敌必然回援。但由于李秀成在战略思想上重江浙，对力争上游认识不足，加之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出面干涉，所以他在鄂南招收大批群众入伍后，不仅未进攻武昌，反而率军退向江西。八月，在江西铅山，脱离石达开从广西归来的童容海、吉庆元等 20 余万人，归入李秀成部。于是，李率军顺势东下，十一月，克浙江杭州。十二月八日（1862 年 1 月 7 日，辛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部将谭绍光等从杭州出发，向上海进军。同时刘肇均所部从苏州出发，经嘉定进逼宝山、吴淞。二十一日（1 月 20 日，十二月十日），各路太平军分别占领青浦、奉贤（今上海市奉贤县奉城镇）、南

汇、川沙。西路前锋抵达宝山县、吴淞镇一带，东路前锋抵达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在这里，他们遭到了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抗拒。

西太后通过辛酉政变掌握清政府最高统治权力后，为维护其统治，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方面进一步重用汉族地主官僚，一方面明令各地方官要利用外国侵略势力"助剿"。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十月十日），清廷命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立即拟定分兵三路向太平军反扑的计划：一路由曾国荃率嫡系湘军沿江东下，主攻天京；一路由左宗棠配合外国侵略军，进攻浙江；另一路由李鸿章勾结外国侵略军专图苏、常。李鸿章未到上海之前，江苏地方官僚，即已勾结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策划防守上海的方案。这时，英法侵略军在上海增至数千人，华尔的洋枪队扩编至五千人，改称为"常胜军"。同治六年（1862年，壬戌十二年）初，英法侵略军，"常胜军"伙同清军，向太平军疯狂反扑。开始，由于敌人装备先进，太平军受到挫折，被迫退出嘉定和青浦。四月中旬（5月中旬，三月下旬），李秀成亲率万余人自苏州增援。四月十六日（5月14日，四月二日），太平军由太仓反攻，经两天激战，摧毁清军大营三十余座，歼敌五千余人，缴获大量洋枪洋炮；接着乘胜克复嘉定，英军司令士迪佛立率败兵逃走。同时，奉贤南桥镇太平军在与外国侵略军激战中，虽遭挫折，但杀伤不少敌人，且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五月一日（5月28日，四月十六日），太平军进攻青浦，占领泗泾；次日李秀成军大败华尔，进围松江。十三日（6月9日，四月二十八日），太平军克复青浦，活捉"常胜军"副

统领法尔思德。太平军乘胜进至虹桥、漕河镇、法华镇、徐家汇等地，直逼租界和上海县城。正当上海岌岌可危之时，天京又被湘军围困，天王一日三诏严命李秀成回援。二十三日（6月19日，五月八日），李秀成从上海撤军退回苏州。

湘军攻陷安庆后，实行"欲拔根本，先剪枝叶"战略，在半年多时间内，逐一攻占天京、安庆、庐州间太平天国重要据点，然后顺流东下。五月三日（5月30日，四月十八日），曾国藩胞弟曾国荃率军二万扎营雨花台，彭玉麟率湘军水师进泊护城河口，天京第三次被围。五月二十八日（6月22日，五月十一日）、七月十一日（8月6日，六月二十五日），李秀成在苏州两次召开军事会议；第二次会议决定，联合太平军各部分三路解天京之围：北路由忠王李秀成、侍王杨世贤率领主力十余万，进攻天京城外的敌军；中路以护王陈坤书为首，攻芜湖、金柱关，截断敌军粮道；南路由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等率领进攻宁国，牵制敌人增援部队。从闰八月二十一日（10月14日，十月三日）至十月五日（十一月二十六日，十月十五日），四十六天时间，在天京郊外东至方山，西至板桥镇约五六十里的阵地上，李秀成率太平军与曾国荃湘军展开激战，打得敌人难以招架。但是时已进入隆冬，中路军未能截断敌人粮道，而太平军棉衣、粮食却发生严重困难，李秀成被迫停止进攻。为最后解除湘军对天京的围困，洪秀全严令李秀成渡江，出军皖北，企图诱使敌军回援。从同治元年十月中旬（1862年12月上旬，壬戌十二年十月下旬）起历时7个月时间，李秀成率军在皖北转战，迭遭挫折。该地区在清军烧杀扰害下，赤地千里，太平军得不到给养，病死、饿死的很多，士气低落。同治二年五月（1863年6月，癸开十三年五月），湘

军攻占雨花台，李秀成奉命回军救援，在江浦南渡时，又遭湘军截杀，伤亡惨重。

这时，太平天国江浙地区的局势也日趋恶化。在江苏，同治元年三月十日（1862 年 4 月 8 日，壬戌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率首批湘淮军抵上海，不久出任江苏巡抚。他先是勾结外国侵略势力阻止李秀成对上海的进攻，随后又联合英国侵略分子戈登继任统领的“常胜军”进犯苏南，相继攻陷太仓、昆山、吴江，进犯苏州。太平军在慕王谭绍光的指挥下，决心坚守阵地，顽强拒敌。因久攻不下，敌人便收买叛徒从内部瓦解太平军。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1863 年 12 月 4 日，癸开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纳王部永宽等刺杀谭绍光降清，苏州失陷。在浙江，自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1862 年 5 月 10 日，壬戌十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太平军从宁波撤出后，一直受到来自浙西左宗棠所率湘军和来自浙东外国侵略势力的夹击。太平军英勇抵抗敌人的进攻，八月底（9 月下旬、八月上旬），在慈溪击毙“常胜军”统领华尔。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敌占优势，太平军阵地相继告失。浙东方面，法国侵略者指挥的“常捷军”和英国侵略者指挥的“常安军”，以及英、法侵略军，相继攻占余姚、上虞、绍兴。浙西方面，湘军连下严州、金华，接着常胜军与湘军联合攻占富阳，且于同治三年二月二十四日（1864 年 3 月 31 日，甲子十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克杭州。太平天国江浙根据地基本瓦解。

苏州失陷后，李秀成赶回天京，向天王指出：湘军已四面围困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唯一出路只有“让城别走”。洪秀全拒绝了这一正确建议，并斥责李秀成说：“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

者乎!”天京粮食紧张，天王下令“合朝俱食甜露”，并“将百草之类，制作一团，送出宫来，要合朝依行毋违”⑦。同治三年四月二十九日（1864年6月3日，甲子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洪秀全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六月六日），湘军从地道埋放炸药，轰塌城墙，冲入城内。太平军不少战士与湘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直到最后牺牲。天京陷落后，李秀成从城中逃出，被湘军俘获，在写完几万字的供词后被杀。分散在大江南北的太平军余部，继续战斗，直到同治七年（1868）才告结束。

由农民阶级发动的太平天国革命，前后长达十八年，势力波及十八省，攻克城市六百多座。它以暴风骤雨之势，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也给予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不可能提出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和革命纲领，因而最终导致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

注 释

①②《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③《太平天国》第2册，第852页。

④《太平天国》第2册，第523—539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

⑥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3册，第2009页。

⑦《忠王李秀成自述》影印本。

清（后期）

捻军始末

捻军，是太平天国时期，北方农民抗清武装。它的前身是捻党，又称捻子。淮北方言，“捻”即一股一伙的意思。捻党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本为民间穷苦群众的反清结社，成员有农民、手工业者、盐贩、饥民、游勇等，活动地域早期在皖北淝水和涡河流域，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江苏、湖北各地。嘉庆元年至九年（1796—1804）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失败后，捻党的活动日渐活跃起来。当时，在安徽、河南、山东交界地区，一些不堪封建压迫的贫苦农民和无业游民，临时结成一个个分散隐蔽的集团，“自号为捻”，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以及杀富济贫的斗争。不少盐贩也结伙成捻，保运私盐于各地，同清政府盐巡相对抗。初期，捻党实际是一种不定型的群众反抗组织，它聚则为捻，散则为民，无固定的组织和群众。各捻之间互不统属，人数也不一致，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捻党的首领，起初称“响老”，后来称“捻首”，多是地方上行侠仗义、打抱不平的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各地捻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全国各地农民反抗斗争的普遍展开，安徽、河南等地的穷苦群众也纷纷结捻。到咸丰元年（1851年），淮北一带已是村村有捻，庄庄有捻。同年，河南南阳和南召等地捻党在乔建德和李大、李二领导下，分别聚千人起义；凤阳、颍州等地捻党也揭竿而起。次年，安徽亳州一带捻党首领张乐行（即张洛行）、龚得树等人，在雉河集（今涡阳）聚众万人，起义抗清，并攻占河南永城等地。接着，永城马金标、亳州朱洪占、宿州李殿元等十八个捻首各自率众起义，号称"十八铺"（即十八股），拥立张乐行为总领袖，在蒙城、亳州等地从事抗清斗争。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北伐军路经安徽、河南，捻党闻风响应，遍地而起。从此，捻党脱离反清结社的状态，进入武装抗清的新阶段；其起义武装，即被称为"捻军"。

各路捻军在同清军和地主团练的斗争中，日益感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共御公敌。咸丰五年（1855）秋，各路捻军首领齐集安徽亳州雉河集，举行"会盟"。会上，公推张乐行为"大汉盟主"，决定建立五旗军制。按会议规定，盟主是捻军的最高统帅，"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①，但无人事任免权。盟主之下的五色总旗各设总目，称"大趟主"，确定以张乐行兼领黄旗，龚得树领白旗，韩奇峰领蓝旗，苏添福领黑旗，侯士伟领红旗；五旗之外，还有各种镶边旗、八卦旗、花旗、绿旗等。会议用大汉盟主张乐行的名义祭告天地，发布文告，颁发《行军条例》。文告痛斥清朝官吏"酷以济贪，视民如仇"和搜刮民脂民膏的暴行，阐明捻军"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的起义宗旨，宣布"禁止抢掠，严缉奸淫"②的军事纪律。通过这次会盟，捻军在组织上由分散趋于统一，在政治

上有了比较明确的反清目标。

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力量迅速扩大。他们以雉河集总部为基地，不断派兵四出，攻打清军。咸丰五年八月（1855年9月），张乐行、苏添福率众3万余人出击，首先在庙集击败颍州知府陆希湜部，接着又于泥秋集打败河南道员张维翰部。随后，捻军挥师北入河南，攻破夏邑，继而则东出江苏砀山，西扑商丘马牧集，南下包围亳州，占领蒙城，并分兵攻打鹿邑和颍上，捻军声势大振。当捻军以重兵围攻亳州之际，河南按察使余炳涛于十月二十八日（12月7日）乘虚袭占雉河集。张乐行等随即撤回亳州，率部沿涡河南下，旋又折向东北，围攻河南永城，迫使余炳涛撤出雉河集而驰援豫东。十一月九日（12月17日），捻军在永城附近麻种集，大败负责剿捻的湖南提督武隆额部，乘胜攻占夏邑，再围归德府城。后张乐行得悉清军援兵纷至，遂撤围返回雉河集。咸丰六年二月（1856年3月），张乐行等集中四、五万人，分兵五路再次进军河南。捻军在击败参将成龄、道员张维翰部后，进围归德城，但不久又撤回雉河集。

这时，捻军已有相当实力，其人数达十余万人，其控制区域“南至颍霍，北抵萧、砀，东接怀远，西连归德”。在军事上，它“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③。但它的弱点也是明显的。首先，雉河集会盟后，捻军在组织上并未达到完全的统一。各旗基本上是按宗族、亲戚、乡里关系结合起来的，彼此互不统属，各种集团林立，每旗内部也无固定编制，大旗之下的小旗，人数自几十人至数百人不等，成员在各旗之间可随意流动，组织极为松散。其次，各旗捻军并非全部脱产的专门武装。一般地说，在捻军控制区，农民即捻军，捻军即农

民。部队既无固定的军饷供给制度，也缺乏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更为简陋，因此其战斗力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在政治上缺乏远大目标。它不仅未能乘胜建立政权，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相反地，十几万大军只是在为解决眼前衣食问题而奔波，即所谓“于春秋二时，援旗麾众，焚掠自近及远，负载而归。饱食欢呼，粮尽再出，有如贸易者”④。这样，捻军即不可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一旦遇到主力清军则又必然遭到惨败。咸丰六年三月（1856 年 4 月），清廷严令河南巡抚英桂督师剿办捻军。英桂采取分进合击，稳步前进的作战方针，命给事中袁甲三、南阳总兵邱联恩等部为主力，从亳州以北向南进攻；以傅振邦、侍卫伊兴额部从永城、宿州向西南进攻，夹击雉河集。战斗开始后，捻军接连失利。清军乘胜推进，于五月十七日（6 月 19 日）攻占雉河集。为调动敌人，张乐行等率部南下，渡过颍河，击败乡勇王庭兰部，占领豫皖边界商业重镇三河尖，然后，乘敌向豫东南集中，蒙亳一带守备空虚之际，捻军又沿淮河东行，于七月二十四日（8 月 24 日）重返雉河集。清军大队随即扑来，张乐行不得已，率主力再次南下淮河流域，于咸丰七年一月（1857 年 2 月）重占三河尖。

此时，太平天国经天京事变后，力量大为削弱，淮南防务相当脆弱，迫切需要团结友军共同对敌。张乐行、龚得树等首领在淮北屡战失利，受到清军的巨大压力，也亟望得到太平军的支持和帮助。基于这种共同需要，二月九日（3 月 4 日），太平军与捻军会师于霍邱城外。经过协商，决定两军联合行动，捻军全体成员蓄发、受印信，使用太平军旗帜，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苏添福被封为“立天侯”，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但捻军“听封而不听

调”，不改变原有的领导系统和制度，不出境远征，联合并非合并。此后，捻军分别与陈玉成、李秀成部配合，在河南固始、安徽霍丘、颍上、正阳关、寿州等地作战。五月（6月），捻军被清军围困于正阳关，经几个月的鏖战，关内捻军粮食用尽，加之瘟疫流行，处境异常困难。后李秀成派援军赶到，于八月二十五日（10月12日），接应关内捻军冲出重围，撤至六安。不久，六安捻军内部发生分裂，以蓝旗旗主刘永敬（刘饿狼）及其侄刘天台（小白龙）为首，反对与太平天国联合，主张重返皖北，张乐行、龚得树反对他们的意见，并以阴谋叛变罪名将他们杀害。蓝旗部众大愤，擅自由六安返回淮北。从此，捻军分裂为淮北与淮南两部分，淮北捻军向山东和河南远征打粮，淮南捻军继续和太平天国联合作战。

咸丰八年四月十二日（1858年5月24日）夜，六安捻军正同清军激战时，被胜保收买的捻军头目偷开城门，清军蜂拥而入。六安失守后，捻军在张乐行、龚得树、孙葵心、姜台凌等率领下，沿淠河北上，渡过淮河，四月二十一日（6月2日）攻占淮河北岸怀远城。在此因政治主张不同，孙葵心、姜台凌率部北归颍州，从而不再与张乐行部合作。为配合太平军解除江北大营对天京围困的军事行动，捻军在龚得树的指挥下，沿淮河东进，先后攻克临淮关及凤阳府县两城。这样，捻军就控制了淮河中段，切断了清军的水上交通，把淮河北岸捻军的抗清和南岸太平天国的革命斗争联接了起来。与此同时，淮北捻军孙葵心等曾一度深入到鲁西南地区，攻占城武、单县、曹县三城，随后经河南退回皖北，给清朝山东、河南地方统治以重大打击。就在这一年，太平军打破了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围攻，接着又取得三河战役的胜利。从而使太平天国江北占

领区得到进一步巩固。

然而当捻军和太平军接连取得重大胜利之际，东战场发生了李昭寿和薛之元的叛变，北战场也发生了一系列捻军首领叛变的事件，因此，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又陷于被动。咸丰九年（1859年3月），陈玉成在庐州西面的官亭击溃李孟群部清军后，乘胜东进，于同年夏，先后攻占安徽天台、盱眙，进攻滁州、来安，迫使钦差大臣胜保所部退守盱眙东北的蒋坝，切断了驻定远的安徽巡抚翁同书与胜保部的联系。捻军龚得树部万余人遂由怀远南下，配合太平军吴如孝部再次围攻定远。翁同书在东西粮道均被切断的情况下，于六月十八日（7月17日），弃城逃往寿州。捻军占领定远后，进一步扩大了淮南的控制地区，与庐州太平军辖区联成一片，同时打击了捻军内部在李昭寿、薛之元叛变后出现的投降暗流，暂时稳定了内部。

捻军控制淮河中游，切断了安徽清军的粮饷通道，加上淮北捻军四出活动，引起清廷震惊。十月五日（10月30日），胜保丁忧，命署漕运总督袁甲三署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同时胜保趁淮军主力集中于淮南，淮河北岸的怀远守军力量减弱之机，督令副都统穆腾阿和总兵滕家胜等率清兵3千多人乘机进攻怀远。从定远、庐州派出的捻军和太平军援军被阻于淮河以南。张洛行在外援无望的情况下，于十月十四日（11月8日）退出怀远，退守临淮关和定远。十一月十一日（12月4日），袁甲三在离临淮关30里的张家沟接署钦差大臣职务后，迅速集结兵力，总兵力由3千余人猛增至一万余人。接着袁乘捻军配合陈玉成部在潜山、太湖一带与清军作战之机，于十二月十八日（1860年1月10日）攻占临淮关。咸丰十年一月四日（1860年1月26日），清廷以胜保剿捻无功，撤去其钦差

大臣职务，命往河南督办攻剿事宜，以副都统关保为其帮办；命云南提督傅振邦督办徐（州）、宿（州）一带攻剿事宜，以总兵田在田为帮办；袁甲三仍署理钦差大臣，督办皖省军务，除巡抚翁同书仍为帮办外，加派副都统穆滕阿帮办军务。袁甲三在占领苏临淮关后，又督军围攻凤阳，于咸丰十年一月二十二日（1860 年 2 月 13 日），诱擒守卫凤阳的捻军首领张隆；次日捻首邓政明献城投降。

清军攻占怀远、临淮、凤阳三城后，打通了淮河的航道，隔断了淮北捻军和淮南捻军及太平军的联系，张乐行、龚得树等在淮南只据有定远一个孤立据点。一月三十日（2 月 21 日），捻军东出苏北敌后，一举占领苏北重镇清江浦（今淮阴）。战后，太平天国将张乐行由征北主将晋封为沃王。从闰三月下旬（5 月中旬）至六月中旬（8 月上旬），经近 3 个月的激战，捻军击退清军对定远的围攻。然后，捻军和太平军转攻凤阳、寿州，未果。随后，捻首龚得树、孙葵心率数万人随陈玉成部南下，谋解安庆之围。十月二十八日（12 月 10 日），孙葵心在桐城西南桂车河战斗中牺牲。咸丰十一年二月四日（1861 年 3 月 14 日），龚得树在湖北罗田松子关中炮身亡。安庆于八月一日（9 月 5 日）失守后，陈玉成鉴于淮北捻军力量还相当强大，直隶、山东等省农民起义此伏彼起，为“广招兵马，早复皖城”，再援天京，先派太平军马融和部北上，继派捻军首领张乐行等率部北渡淮河，后又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祜王兰成春等率部向西北远征。张乐行和苏添福等将定远移交给太平军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11 月 25 日）率全部人马返回淮北颍上地区。至此，捻军和太平军在淮河沿岸的联合作战宣告结束。

张乐行进驻颍上后，于十二月中旬（1862 年 1 月中旬）开始，与太平军马融和部、原在颍州的捻军姜台凌部以及苗沛霖的团练共同围颍州城。不久，胜保奉命由豫入皖。捻军、太平军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于同治元年三月中旬（4 月中旬）撤离颍州，退入太和境内。时苗沛霖叛变，四月十七日（5 月 15 日），陈玉成率三千人北走寿州，被苗沛霖诱捕，解送颍州胜保军营。张乐行、马融和得讯，率部往救未能成功。五月八日（6 月 4 日），陈玉成牺牲后，马融和率部西走河南，投奔西北太平军；张乐行则率部返回雉河集，同其他捻军一起，与淮北的清军展开顽强战斗。

陈玉成牺牲后，太平军在皖南的根据地丧失殆尽，淮北捻军的处境更加困难。不久，僧格林沁率马步兵数千人南下，并于五月三十日（6 月 26 日）攻占河南商丘马牧集以南的金楼寨。此时，原来对付太平军的李续宜、袁甲三等部也转旗北上，协同僧军及豫、苏、鲁清军共同对付淮北的捻军。七月二十五日（8 月 20 日），清廷进一步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统辖山东、河南剿捻军务，在清军重兵围攻的形势下，张乐行等未能及时转移，而是集众 20 万于雉河集一带，进行防御战。经数月战斗，清军相继占领亳北和亳东地区。同治二年（1863 年）初，清军在苗沛霖团练配合下向雉河集挺进。这时，为分散敌人的兵力，张乐行命张宗禹率部突围，自己则率部东走宿州。但清军步步进逼，捻军接连失利，捻首韩四万、刘玉渊、苏添福、苏添才等被俘遇害。二月五日（3 月 23 日）夜，张乐行率 20 余人逃至蒙城、宿州交界的西洋集，为叛徒出卖。次日，张乐行及其子张喜、义子王琬儿等被清军杀害；姜台凌、孙葵心等向清军乞降，亦被处死。

张乐行牺牲后，捻军余部在张宗禹、任化邦率领下，离开淮北，转战于湖北、河南、山东，后进抵豫陕边界，拟与进入西北的太平军会合，太平天国封张宗禹为梁王，任化邦为鲁王，张禹爵（张乐行侄）为幼沃王。这时由扶王陈得才统率的西北太平军为解天京之围，正在东返途中。同治三年三月下旬（1864年4月下旬），西北太平军在河南西部的淅川、内乡等地先后与捻军会师，众达数十万，随即分四路向东南进发。在鄂东地区，联军遭到清军的阻击，未能抵天京外围。天京陷落后，太平军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减，在与清军战斗中，屡受挫折。十月十七日（11月5日），在安徽霍山黑石渡，扶王陈得才部与僧格林沁部激战，损失惨重，祜王兰成春被叛徒出卖牺牲，马融和等投降，陈得才见大势已去服毒自杀。

霍山战后，遵王赖文光和淮王邱远才等部太平军，与捻军张宗禹、任化邦部，在鄂北地区会合。接着，他们在鄂豫边境进行合并和改编，推赖文光为首领；确定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和封号；军队以太平军军制重新整编，但沿用捻军的编制，仍以五色旗区分，下设大旗小旗；根据捻军骑兵较多和北方地势平坦等特点，决定易步为骑，增加骑兵，减少步兵，在战术上采取流动作战方针。两军合并后，史称新捻军，逐渐形成一支约有十余万人的骑兵军团，奔驰于豫、鲁、苏之间，予清军以沉重打击。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1865年5月18日），联军在山东菏泽高楼寨一举歼灭清王朝在北方的主力军蒙古马队，击毙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

高楼寨战役后，清廷改派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命其率湘、淮军北上攻打捻军。曾国藩上任后，改变以往清军狂奔穷追的战略，提出“重点设防”、“布置河防”和“查圩”等战略方

案。“重点设防”就是在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和江苏徐州四个城市设置重兵防守；又在四省的十三个府州（江苏的淮安、徐州、海州；安徽的庐州、凤阳、颍州、泗州、河南的归德、陈州；山东的兖州、沂州、曹州、济宁）驻扎少量军队，作为第二道防线，图谋“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⑤。“布置河防”，就是东面以山东的运河，西面以河南沙河、贾鲁河，北面以黄河，南面以淮河，构成一个包围圈，在此四河的河岸上，驻扎军队，构筑长墙工事，以阻击捻军。“查圩”就是以地方团练在农村实行坚壁清野，进行登记和清查，实行连坐法，以切断捻军和群众的联系，肃清后方。他本人则坐镇徐州，以逸待劳地来对付捻军。

但是，捻军不顾曾国藩的围追堵截，继续采用流动作战的方针，到处打击敌人。捻军在高楼寨战役后，乘胜进军皖北，返回蒙亳地区。此后，捻军驰骋于皖北、河南、湖北之间，不断打击曾国藩的防堵军。同治五年八月十六日（1866 年 9 月 24 日）夜，捻军在汴南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胜利进入山东河套区。曾国藩因“剿捻无功”，退回两江总督原任；清廷改派李鸿章继任攻捻主将。

捻军虽屡败清军，但在政治上提不出新的号召，又没有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因而斗争形势日益艰险。赖文光深感“独立难持，孤军难立”⑥，为扩大势力，并拟在四川建立革命政权，遂于九月十二日（10 月 20 日）在河南许州将捻军分为东西两支：一支由遵王赖文光、鲁王任化邦率领，在中原地区继续坚持斗争，然后由湖北入川，是为东捻军；一支由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率领，挺进西北，往联回众，再由陕甘入川，是为西捻军。

东捻军三万余人在赖文光率领下，由许州出发，向东北越黄河故道入鲁西南，拟挺进山东腹地，以扩充兵员和筹集粮饷，但因清军阻截，未能突破运河防线，遂折而向西，经河南达鄂东北。不久，东捻军连克麻城、云梦、应城，在德安（今安陆）、安陆（今钟祥）等地区转战，准备西入川陕。李鸿章急调清军围剿：命湘军鲍超部进襄阳、樊城地区；淮军刘铭传部与豫军张曜部扼鄂豫交界；安徽巡抚英翰率皖军驻皖西；湖北巡抚曾国荃驻武胜关，以六千新湘勇为游击之师；妄图将东捻军消灭于尹隆河一带。东捻军采取流动战术，伺机打击疲惫之敌。十二月六日（1867 年 1 月 11 日），东捻军在安陆府臼口镇附近罗家集，全歼新湘勇四营二千余人，重伤清提督郭松林。十二月二十一日（1 月 26 日），东捻军在德安府杨家河，再击败清军，阵斩淮军总兵张树珊及副将刘登朝、郭有容等数百人。同治六年正月十五日（1867 年 2 月 19 日），东捻军在安陆府尹隆河附近，将淮军刘铭传部包围，杀其部将总兵唐殿魁、田履安及副将李锡曾、胡衡煦等；刘铭传失魂落魄，与其部将、幕僚“俱脱冠服坐地待死”。但正在此时，湘军鲍超部从东捻军侧背发动猛攻，捻军损失二万余人。于是，东捻军放弃进兵川陕计划，由湖北枣阳进入河南，于五月（6 月）攻入山东登、莱地区。从此，东捻军被李鸿章淮军围困于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两岸和六塘河北岸的地区内。在此严峻形势下，东捻军虽进行顽强战斗，但始终未能突破清军防线。十月二十四日（11 月 19 日），在江苏赣榆战斗中，东捻军受挫，鲁王任化邦被叛徒杀害。十一月二十九日（12 月 24 日），赖文光率军在山东寿光海滨洋河、弥河之间，与清军主力决战，死伤 3 万余人，太平天国首王范汝增、列王徐昌先殉难。

赖文光率千余人南下苏北，抵扬州东北湾头瓦窑铺。十二月十一日（1968年1月5日），淮军吴运兰部往攻，赖文光伤重被俘，于十六日（10日），在扬州英勇就义。

以梁王张宗禹为首的西捻军约六万余人，于同治五年九月十五日（1866年10月23日）从河南许州出发长驱入陕。十二月十八日（1867年1月23日），在西安近郊灞桥十里坡，西捻军大败清军，阵斩汉中镇总兵肖德扬、记名提督杨德胜、道员肖德纳等，击溃陕西巡抚刘蓉所部主力，进逼西安。清廷急派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在左宗棠未入陕前，先派提督刘松山率部分湘军入陕。刘部于年底到达西安。同治六年二月（1867年3月），西捻军与刘松山军在西安附近交战失利，遂沿渭水南岸西进，于二月十五日（3月20日），在陕西郿县渡过渭水进抵渭北。五月十三日（6月14日），左宗棠统军自湖北樊城起程，分三路入陕。左宗棠采取“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作战计划，派军先割断回民起义军和西捻军的联系，力图把西捻军围困在渭河北岸的泾、洛两水之间，予以歼灭，然后再向回民起义军进攻。西捻军见各路敌军日逼，便于九月二十七日（10月24日）由蒲城东南北上白水，突破包围圈后，经中部（今黄陵）、洛川，驰入陕北。十月十九日（11月14日），西捻军与回民起义军相配合，在中部大败湘军悍将刘松山部，随后乘胜连占绥德、安塞、延川等县城。就在这时，张宗禹接到东捻军救援书信。

为解除东捻军的危局，张宗禹率西捻军二万余人，于十一月中旬（12月上旬）由绥德急速南下。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7日），大军在陕西宜川东面壶口一带履冰抢渡黄河成功，然后以破竹之势经山西吉州、乡宁、临汾、垣曲，越太行、王

屋山入豫北济沅，再由怀庆、新乡等地入冀南，复沿直隶中部北上，经顺德、保定、易州，于同治七年一月（1868年2月）进抵北京近郊卢沟桥。西捻军突入京畿，清廷大震，急令各地勤王。时东捻军业已失败，西捻军已成深入敌后的孤军，在各路清军包围的困境中，西捻军突围南下，二月二十四日（3月16日）在冀中饶阳东北地区遭清军袭击，幼沃王张禹爵、淮王邱远才殉难。张宗禹率军继续南进，重返豫北。三月二十日（4月12日），西捻军在滑县击败清军。接着从东昌城南李海务渡口渡过运河，进入黄河以北、运河以东、天津减河以南的直隶、山东地区。在这里，西捻军曾几次沿运河东岸北上进攻天津，均为清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洋枪队击退，遂滞留渤海之滨地区休整。这时，清军各部十余万人，先后达直鲁地区，完成对西捻军的包围。西捻军在方圆六七百里地区内，继续流动作战，忽而北上，忽而南下，虽把清军拖得疲累不堪，但几次抢渡运河以突破重围却均未成功。五月二十七日（7月16日），西捻军在直隶吴桥遭清军伏击，伤亡千余人；六月七日（7月26日），与清军战于山东商河东北的沙河镇，又损员三四千人；六月十二日（7月31日）在洛阳玉林镇与清军激战，将士阵亡六七千人，梁王张宗禹负伤，率余部突围。六月十六日（8月4日）、二十七日（15日），西捻军两次抢渡运河失败后，退往茌平西南广平镇。二十八日（16日），西捻军在茌平南镇，与清军阻击部队激战，张宗禹之兄张宗道、弟张宗先、子张葵儿等数千将士壮烈牺牲；张宗禹突围而出，至徒骇河边，"穿秫凫水，不知所终"⑦。至此，捻军起义失败。

注　释

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册，第100页。

②《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1期，第26—27页。

③④江地：《捻军史论丛》，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⑤《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22卷，第68页。

⑥《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上册第281页。

⑦《捻军》第2册，第108页。

清（后期）

各族之抗清

鸦片战争之后，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对华侵略加深，使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太平天国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各地群众反清起义的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起义有：东南各省天地会各支派的起义；北方的捻军起义（见《捻军始末》）；西南各省的汉、苗、回各族人民起义；西北地区的陕甘回民起义。

一、东南各省天地会发动的起义

天地会是民间反清秘密团体，创始于康熙年间①。乾隆中期以后开始兴盛起来。它以建立山堂、结盟拜会等形式组织群众，最初活动于广东、福建、台湾沿海地区，后来逐步扩展到长江流域各省及广西一带。因地区不同，其支派名目也各异、东南沿海有小刀会、红钱会；两广和湘赣地区有三合会、三点会；长江流域有哥老会。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统属，无统一的纲领和旗号。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天地会众在两湖、两广地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太平天国兴起后，天地会纷起响应，其

中规模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一）桂北、湘南“升平天国”起义

桂北、湘南是天地会活跃的地区。咸丰二年八月（1852年9月），胡有禄、朱洪英在广西南宁领导会众起义。这支起义军转战于湘、桂边境地区，屡次攻陷各县城池，人数从数千发展到数万人。咸丰四年八月十八日（1854年10月9日），起义军攻克广西灌阳县，建立“升平天国”，胡称定南王，朱称镇南王，奉“太平天德”年号。翌年二月（1855年3、4月间），太平天国天官正丞相罗大纲，致信邀约胡有禄等与太平军会合。胡、朱接信后，下令蓄发，各率所部万余人进兵湘南东安。清湖南巡抚骆秉章调集湘军和各县团练前往进剿。八月，湘军王鑫部围攻东安，起义军战斗失利，主动撤出。胡有禄于湖南祁阳、邵阳交界之四明山，被湘军击败，部将何文秀战死，胡本人被俘牺牲。朱洪英率部退回广西，旋又挥戈入湘。咸丰六年正月（1856年2月），朱军在永明、江华一带被清军击败；朱洪英只身走脱，潜入瑶洞。同治十三年（1874），朱再度于湖南耒阳起义，兵败被俘牺牲。

（二）小刀会起义

太平天国时期，小刀会起义有两支：一是福建小刀会起义，一是上海小刀会起义。

咸丰三年四月（1853年5月），小刀会首领同安人黄德美、黄威，率会众于福建海澄县起义。从四月七日至十四日（5月14日至21日），七天内，起义军先后攻占海澄、龙溪、同安、厦门等九个城镇，队伍从千余人发展到万余人。黄德美自称“汉大明统兵大元帅”，遥奉“大明天德皇帝”，并以“天德”为年号。起义军“所到之地，军法甚严，出示安民。米谷

定价，不许贵卖，百姓秋毫无犯”②。清政府一面动员组织当地团练，一面调集广东、浙江两省军队入闽镇压。十月十一日(11 月 11 日)，在清军围攻下，厦门失守，黄德美突围后被执死，黄威等退居闽粤海面，坚持战斗。咸丰四年（1854 年），黄威曾率众攻晋江、厦门、香港、台湾不克，后避居印尼。

上海小刀会系刘丽川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所立。刘丽川（1820—1855)，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初在家务农，后赴香港，道光二十五年（1845）加入天地会，道光二十九年至上海，任外商洋行通事，不久辞去该职，以伤科医生为业。就在这一年，他联络各方人士，成立小刀会，对外以“义兴公司”为名号。咸丰三年（1853）春，太平军定都南京，上海小刀会策划响应。七月十三日（8 月 17 日)，小刀会首领徐耀领导嘉定县南翔农民起义，一度占领嘉定县城。八月三日（9 月 5 日)，徐耀与青浦县周立春联合，发动第二次嘉定起义，再度占领嘉定。八月五日（9 月 7 日)，乘上海城内举行祭孔大典之机，广东帮小刀会首领刘丽川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发动起义。起义军在守城清兵的内应下，从北门冲入城内，迅速占领全城，击毙上海知县袁祖德，生擒上海道台吴健彰（后在外国侵略者帮助下被释放)。起义军以文庙为总指挥部，依据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宗旨，建立“大明国”，改元“天运”，公推刘丽川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林阿福为右元帅。刘丽川发布告示，揭露清朝官吏的种种罪恶，宣布起义目的在于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申明军纪，严饬起义士兵“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③。起义军的主张和行动，得到群众的拥护。为扩大战果，起义军立即由上海、嘉定分兵出

击，于八月七日（9月9日）占宝山，八日（10日）破南汇，十一日（13日）克川沙，十五日（17日）占青浦。起义军拟乘胜占领太仓，挺进苏州，但为清军所阻，折回嘉定，转取守势。为取得太平天国的领导与支援，刘丽川上书洪秀全，要求天京当局速派大员至上海主持军政大事。同时，起义军将“大明国”改为“大明太平天国”，刘丽川自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东王杨秀清传檄刘丽川，欢迎他们率众来归；太平军镇江守将罗大纲也曾准备派军接应，但因当时太平军正紧张进行北伐、西征，无力实现这一设想。

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给予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以重大打击。清江南大营帮办、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统清军，立即向起义军发动反扑。八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9月22日至27日），起义军被迫从嘉定、青浦、宝山、南江、川沙撤离，退守上海。从九月初（10月初）开始，围城清军从水陆两方面连日向上海城内发炮轰击，并不断发起进攻，均被起义军击退。当时外国侵略者表面伪装“中立”，暗里却支持清军，镇压起义军。咸丰四年五月二十日（1854年6月15日），美国公使麦莲和英、法驻上海领事会议，决定强迫起义军退出上海城。不久，许乃钊被革职，按察使吉尔杭阿接任江苏巡抚。他与侵略者协议，加紧修筑界墙，断绝县城与租界的交通，使起义军无法得到粮食和军火的供应。十月十七日（12月6日），法军无理要求刘丽川拆除洋泾滨南岸炮台，起义军严词拒绝。十月二十五日（12月14日），法国侵略者正式向起义军宣战。十一月十八日（1855年1月6日），起义军打退了法国侵略军和清军的联合进攻，毙伤法军40余人，清军2000余人。十二月三十日（2月16日），法军配合清军再次向上海县城发动进攻，

又被起义军击退。这时，起义军在上海孤城浴血奋战已长达17个月，在敌人封锁下，内无粮弹，外无援兵，势难继续坚守。咸丰五年元月一日（1855年2月17日）夜，起义军分路突围，刘丽川不幸壮烈牺牲，以潘起亮为首的部分起义军抵镇江加入太平军，另一部分义军转到江西参加天地会起义。

（三）广东三合会起义

天地会系统响应太平天国的起义中，以陈开、李文茂领导的广东三合会起义，声势最大。陈开，广东佛山镇人，架船为业。李文茂，广东鹤山县人，原系粤剧艺人。咸丰四年（1854），太平天国遣使至广东，联络三合会起义。五月十三日（6月8日），三合会首何禄于东莞首先发难，揭开了广东省城附近三合会起义的序幕。六月十一日（7月5日），陈开在南海县佛山镇聚众起义，建国号大宁，自为军师，称大王。接着，李文茂等在广州北部佛岭市起义响应。义军蓄发易服，头裹红巾，自称“洪兵”，又称“红兵”。随后，各地三合会众接连起义，“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西至梧州，北至韶州，东至惠潮，南至高廉，贼垒相望，道路梗塞”，省城广州“势孤援绝”④。陈开、李文茂乘势分三路围攻广州。但由于各地起义军没有统一领导和缺乏作战经验，为时不久，多数被清军和地方团练各个击败。两广总督叶名琛急忙从各地调军往援省城，又求得英、法、美等国船只将援兵、军粮、武器偷运广州。红兵围攻广州半年后，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未能取胜。十二月十日（1855年1月27日）清军分13路同时进攻佛山镇，红兵首尾不能相顾，纷纷突围。叶名琛采取残酷的屠杀政策，先后有10多万起义者和无辜群众惨遭杀害。

突围的红兵，一部分相继转至湖南、江西，加入太平军，

此即为太平军中的“花旗”。陈开、李文茂等则率红兵主力沿西江撤退，于咸丰五年二月（1855年3、4月间）进占肇庆。经休整后，四月六日（5月21日），陈开、李文茂会同广西浔、梧一带天地会首领梁培友等，率军4万余人，乘船千余艘，从肇庆出发，沿江西征。起义军经梧州、滕县、平南，八月十七日（9月27日）攻克浔州府城（今桂平），改称秀京，即以此为都，建立“大成国”，建元“洪德”，开炉铸“洪德通宝”钱，陈开称镇南王，以李文茂为陆路总管，梁培友为水陆总管。此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起义军先后攻占贵县、武宣、象州、平南，初步开辟了以浔州为中心的根据地。咸丰六年九月（1856年10月），陈开召开起义军将领会议，决定陈开改称平浔王，李文茂为平靖王，梁培友为平东王，区润为平西王，梁昌为定北王；确定各王分别率本部从北、东、西三个方面发动进攻。咸丰七年二月二十日（1857年3月15日），李文茂部攻占柳州，接着乘胜控制了柳州、庆远二府所属各州、县。五月五日（5月27日），梁昌、区润所部不战而得南宁。八月十日（9月27日），梁培友部克梧州，将该城改名秀江府。此时，起义军占有府、州、县城40余座，控制大半个广西，队伍发展到数十万人。咸丰七年底（1858年初），陈开、李文茂分东、西两路会攻桂林。这时，应广西巡抚劳崇光之请，湘军陆续入桂；广东当局也正在积极进行收复梧州、浔州的准备，起义军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咸丰八年四月（1858年5月），李文茂统率的西路军在苏桥战败，遂弃柳州，改向贵州苗区进发，不久在贵州黎平再次受挫，旋又折回广西。十月（11月），李文茂在怀远（今融安北）山中病故，余部与陈开部会合。陈开部西路军在平乐得知梧州告急，遂率部南返。

四月十八日（5月30日），梧州为粤军占领。陈开乘柳州清军守备空虚之际，再占柳州，然后率主力南下浔州，继则东攻梧州。咸丰九年三月十二日至十四日（1859年4月14日至16日），起义军连续攻击梧州外围据点，均未得手，被迫退回浔州，转取守势。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年8月），在湘军进攻下，起义军主力大部丧失。七月十六日（8月21日），陈开率部撤离浔州城，向贵县退却。七月二十八日（9月2日）夜，陈开在横州东北大滩被团练俘获，后解回浔州，英勇就义。

二、西南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从咸丰中期到同治初年，西南各族人民反清起义，先后爆发。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支。

（一）贵州苗民与号军起义

在贵州各族人民起义中，声势最大的是以张秀眉为首的黔东南苗民起义和以刘仪顺为首的黔东北号军起义。

张秀眉，贵州东部台拱厅苗民，雇农出身。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1855年4月30日），张秀眉等不堪忍受封建压榨，率领苗民抗税起义，张被推为大元帅。他主动与各地起义军联合，积极向清军发动进攻。经过三年的征战，到咸丰八年（1858），苗军基本上控制了东起湘边黔、西至贵阳城下的黔东南大片地区。在这里，他们团结侗族、水族、布依族、回族人民，打击苗、汉地主豪绅，捣毁清军城堡，夺取清军"屯地"分给农民耕种。苗军同各族人民，在"重山复岭中，纵横盘踞七八百里，安居乐业以抗官兵"⑤。同治六年（1867），清政府陆续征调湘军席宝田部和川军唐炯部入黔，黔西北苗民起义和黔北号军起义相继失败，黔东南苗军处境亦日益困难。同治

九年十月二十五日（1870年11月17日），由于清军大举进犯和苗族地主的叛乱，苗族起义中心台拱失守。张秀眉退到雷公山，率众坚持战斗。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72年4月30日），援黔湘军攻苗军各寨，杀苗民2万余人。四月六日（5月12日），张秀眉兵败被俘，后在长沙就义。为时18年的苗民起义，在湘、川、黔军联合镇压下失败了。

号军是白莲教支派灯花教组织的起义武装，因头巾和旗帜的颜色不同，分红号、白号、黄号、青号等名称。咸丰五年十月二日（1855年11月11日），黔东北铜仁举人徐廷杰率抗征秋粮的农民起义，冲入铜仁府城，击毙知府葛景莱。江口、印江等地农民起义响应。这几支义军皆饰红色头巾，故称红号。起义不到一个月，红号连克桃厅、思南、玉屏等城，队伍迅速增至万人。不久，湘军入黔，攻陷铜仁，徐廷杰等牺牲，余众继续坚持斗争。咸丰七年冬（1858年初），年近八旬的灯花教主刘仪顺率众在思南府城北面的鹦鹉溪起义，称为白号。咸丰八年二月（1858年3月），杨和凤等在安化（今思南）一带起义，号称黄号。各路号军起义后，攻破不少城市，但均弃而不守，只占据一些险要的堡寨，往来游击。为统一各路号军的行动，刘仪顺推举冒充明代朱氏后裔（冒名朱明月，又作朱民悦）的遵义人张保山为秦王，刘自任大丞相。同治三年至四年（1864—1865），整个黔东北地区均为号军所控制。同治五年（1866），湘、川、黔军分三路进剿贵州各族起义军，但相继遭到失败。次年秋，清廷采纳太常寺卿石赞清建议，推行“川楚合力”，“先黔后滇”，“先号后苗”的方略，集中清军进攻号军。同治七年一月四日（1868年1月28日），湘军攻克思南府荆竹园黄号军根据地。六月二十八日（8月16日），川、黔

军攻陷平越尚大坪白号军最后据点，刘仪顺突围被俘，后在成都惨遭杀害。坚持14年之久的号军起义，最后失败。

（二）云南回民起义

云南回民起义导源于回、汉争矿事件。咸丰四年（1854），云南临安（今建水）回族与汉族 地主商人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发生械斗。冲突扩大后，清朝官府不问是非曲直，诬指回民作乱，大批屠杀无辜回民。咸丰六年（1856）春，各地回民相继起义，并逐渐汇合成两支强大的势力：一支在滇南，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首；一支在滇西，以杜文秀为首。

马复初（1791—1872），本名德新，原为伊斯兰教阿訇，早年曾往麦加朝圣，归而治宗教经典，讲经授徒，咸丰六年率众起义于新兴。马如龙（1832—1891），武秀才出身，也于六年率众起义于临安。二马联合后，成为云南东部和南部最大的起义力量。但他们自称起兵只在报仇，并非与朝廷为敌，故官府“一抚则顺”⑥。从咸丰七年至同治元年（1857—1862），起义军三次围攻昆明。第一次以讲和结束，第二次则围城十日即撤围，第三次则在高官厚禄引诱下投降；马复初被封为二品伯克滇南回回总掌教，马如龙被授予临沅镇总兵，成为清政府“以回攻回”的工具。

杜文秀（1828—1872），永昌府保山县人，廪生出身，村塾教师。道光二十五年（1845）永昌汉族地主勾结官府残杀回民，杜曾代表回民赴京控告。咸丰六年（1856），他在蒙化（今巍山）聚集回、彝等族人民起义，攻克大理，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建立平南国。大理政权“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⑦。他们推行“不分回汉，一体保护”⑧的民族联合政策，采取恢复社会生

产和减轻人民负担的措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因此，起义军力量迅速壮大，并相继攻占53个州县，几占云南全省的一半。马复初、马如龙降清后，在云南督抚的授意下，接二连三对杜文秀进行诱降，均遭严厉拒绝。从同治六年至八年（1867—1869），杜文秀调集十万大军东征，目标在于夺取昆明。但久攻未下，起义军精锐损失惨重。清军在攻占南安、楚雄、定远之后，即分三路向滇西大举进攻。同治十年（1871），起义军作战失利，杜文秀义子艾山（刘道衡）往英国伦敦献土称臣，背叛祖国，乞怜求援。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72年12月27日），清军攻陷大理，杜文秀服毒后自赴清营，以求保城中百姓。同治十二年五月四日（1873年5月29日），清军进占腾越厅，起义最后失败。

（三）云南彝族人民起义

咸丰六年四月（1856年5月），云南彝族雇农李文学（1826—1874），在太平军战士王泰阶（汉族）、李学东（彝族）协助下，率汉彝各族农民五千人，于弥渡县瓦卢村天生营誓师起义，被推为彝家兵马大元帅。李文学在密滴村设“彝家兵马大元帅府”，建立革命政权。他们采取“夷汉庶民，共襄义举”的方针，号召各族人民共同举义，“铲尽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在群众支持下，起义队伍迅速增至万余人，并逐步控制了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在根据地内，起义军采取耕战结合的措施，把18岁至40岁之间的男女组织起来，“练以战阵，战则集之，不战则耕；男任战，女任运，男女各有职”。根据群众要求，规定“庶民原耕庄主之地，悉归庶民所有，不纳租，薄赋二成，荒不纳”，并把“帅府督府近郊之庄主田亩，悉收为军耕”⑨，从而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

展。同治九年（1870），清军进犯，起义军失利，王泰阶战死。同治十一年（1872），李文学率军救援大理杜文秀起义军，遇伏兵败，为叛徒所执，献降清军，十三年（1874）被杀害于南涧牛街。起义军余部在李学东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光绪二年（1876）夏，李学东病故，起义失败。

（四）李永和、蓝朝鼎起义

李永和、蓝朝鼎同为川滇边哥老会首领。咸丰九年（1859）秋季，李永和、蓝朝鼎、蓝朝柱（大顺）在家乡云南昭通府牛皮寨，聚众起义，以“不交租，不纳粮”，“打富济贫”为口号。起义军以“大明顺天”相标榜，李永和称顺天王，蓝朝鼎任大元帅，蓝朝柱任副元帅。不久，李、蓝起义军从云南进入四川，攻克犍乐。翌年，义军克自贡盐场，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接着，起义军向西进发，渡岷江后北上，前锋逼近成都，活动地区扩大到四十余州县，全军人数超过三十万。李永和以铁山为根据地，遣蓝朝鼎、蓝朝柱出征川北，夺取绵阳。咸丰十一年（1861），督办四川军务的骆秉章率湘军入川，镇压李、蓝起义军；蓝军在绵阳作战失利，退据丹棱，与眉州李永和部成犄角之势。十一月十二日（12月13日），在清军进攻下，蓝朝鼎率众突围，不幸为清军刺中额部，壮烈牺牲，余部由朝柱率领，经蒲江北上。之后，骆秉章集全力进攻青神，李永和等率部撤退，几经转战，于同治元年八月十六日（1862年9月9日）抵达铁山地区龙窝场。清军对该场围攻月余，未能得手，派人诱降，又遭拒绝，遂将环龙河闸断，阻水灌场。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8日），李永和等突围受伤被俘，被解往成都英勇就义。蓝朝柱在四川难以立足，遂率余部进入陕南，被推为“大汉显王”。旋与太平军西北远征军

陈保才部会师汉中，被封为文王。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4月1日），清军攻陷关中重镇盩厔。蓝朝柱突围后，于三月六日（4月11日）在安康紫溪河遭地主武装袭击，牺牲。

三、陕、甘回民起义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是我国回民聚居最多的地区，他们久受清政府的歧视和汉族地主的欺凌，早已十分不满。同治元年（1862）春、夏间，太平军陈保才部和蓝朝柱起义军先后入陕，西安以东渭南地区的回族人民，在伊斯兰教阿訇洪兴、任武等领导下，迅即起义响应，号称十八营。起义军很快占领了渭南、华州、华阴、高陵、大荔等地，并屡次围攻省城西安。清政府先后派胜保、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统兵入陕，镇压回民起义军。同治二年（1863）春，多隆阿攻破大荔、渭南等地，西安、凤翔围解，回民军遭受重大损失，主力遂退往甘肃。

在陕西回民起义影响下，甘肃回民也在同治元年（1862）揭竿而起。俟陕西回民起义受到挫折时，甘肃、宁夏、青海地区回民的反清斗争正逐渐汇聚为四个中心：以甘肃南部河州（今临夏）为中心的马占鳌部；以甘肃西部肃州（今酒泉）为中心的马文禄部；以宁夏南部金积堡为中心的马化龙部；以青海东部西宁为中心的马文义部。各路回民起义军不断向清军进攻，使其文报梗塞，粮饷奇绌，省城兰州处于孤立地位。由于陕甘总督杨岳斌对回民起义束手无策，清廷于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1866年9月25日）将其免职，调左宗棠继任；同治六年一月十八日（1867年2月22日），清廷又命左宗棠为钦差

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回民起义。左宗棠一面纵兵烧杀抢掠，一面收买回军降将董福祥，施行“以回杀回”的反动政策。在清军的进攻下，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1871年1月6日），马化龙向清军献出金积堡投降。同治十一年（1872）初，据守河州的马占鳌开门迎降。同年八月（9月），青海西宁的回民军首领马永福（时马文义已死）亦投降。同治十二年（1873），左宗棠集中力量进攻甘肃西部的肃州，九月二十三日（11月12日）城破，马文禄投降，后被杀。白彦虎部逃往新疆。坚持十二年之久的西北回民起义遭到失败。

注 释

①天地会创立的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一说是创于康熙十三年，一说创于雍正十二年，一说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本书暂依第一说。

②《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第100页。

③《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页。

④同治《南海县读志》第26卷，第13页。

⑤《咸同贵州军事史》第6册，第131页。

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2册，第140页。

⑦《回民起义》第1册，第29页。

⑧《回民起义》第2册，第300页。

⑨《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2期。

清（后期）

洋 务 运 动

19 世纪 60 年代初，在外国入侵和国内人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当权官僚，在已经变化的形势面前，仍然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主张继续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反对任何变革，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技术尤为深恶痛绝。因此，这部分人被称为顽固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另一部分握有实权的官僚，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感到中国正面临着千古未曾有过的大变局。他们从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中，特别是在同外国侵略者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经历中，看到了西方船炮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必须与外国合作，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仿造西方的船炮，采取西法练兵。他们认为，要解除“内忧外患”的危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而“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①。由于他们主张取法于外洋，所以历史上称他们为洋务派，把他们所搞的活动称为洋务运动。这

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中央政府内有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桂良、文祥等，在地方上则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后起之张之洞等有实力的督抚。由于李鸿章经办的洋务最多，影响最大，因而成为洋务派最主要的代表。

当时，主持全国洋务活动的最高机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没有专门的、统一的外交机构，对外事务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兼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设立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领的五口通商大臣，负责对外交涉事务。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日益频繁的外交事务和公使驻京的新局面，为适应中外关系的转变，奕䜣等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三日（1861 年 1 月 13 日），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专责成。十二月十日（1 月 20 日），咸丰帝下诏批准。咸丰十一年二月一日（1861 年 3 月 11 日），该机构正式成立，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任命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为总理衙门大臣。总理衙门成立后，除逐步建立内部各种机构外，还下设同文馆、总税务司。同时，根据奕䜣的建议，清政府又命崇厚为牛庄、登州、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同治九年改称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领）；命署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薛焕兼办南方各口通商事务（同治五年改称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领）。总理衙门成立后，除办理外交、通商外，举凡一切与“洋务”有关的事务，诸如关税、学堂、铁路、电报、海防、矿务、传教等，亦均归其管理。因此，总理衙门实际成为同治、光绪两朝开展洋务活动的领导机构。

洋务派所搞的“洋务”，内容非常广泛，诸如对外交涉、订立条约、购买西方军火器械、以“洋法”练兵、兴办军用和

民用工业、办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都属于洋务运动的范围。但是，他们的主要事业则是兴办近代的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以及用“洋法”训练军队。随着洋务运动重点的变化，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年中，洋务运动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从60年代至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重点在建立军事工业；从70年代至90年代为第二阶段，重点转为办民用企业。

从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30多年里，洋务派在“求强”的口号下，先后在各地设立约二十座制造枪炮、火药、水雷和兵船的军工厂，其中较重要的有：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和湖北枪炮厂。

安庆内军械所，是洋务派创办的最早的兵工厂。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861年12月），曾国藩在安庆设立，主要生产子弹、火药、枪炮；产品供湘军使用；劳动力从水师中调配，未雇洋匠。它虽然仍以手工制造为主，但却集中了一批著名的科技人才，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为引进科学技术和从手工业制造向机器工业过渡创造了条件，是洋务派仿造西式船炮的开端。

江南制造总局，简称沪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委派英人马格里在松江城外开办“上海洋炮局”，次年发展为马格里、苏松太道丁日昌、副将韩殿甲分别主持的三个洋炮局。同年十月（1863年12月），李鸿章率军占领苏州，马格里主持的洋炮局随即迁至此地，称苏州洋炮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以购置的上海虹口一家美商旗记铁厂为基础，将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并入，

且把曾国藩委托容闳从美国购来的一批机器合在一起，建成江南制造总局。初期聘美国人科尔为总监工，雇美国工匠若干人，后更多地聘用英国技师。同治六年（1867），厂址从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以后基本建设、机器设备，逐年扩充，相继建成机器厂、铸钢铁厂、轮船厂、枪厂、炮厂、火药厂、炼钢厂等，拥有工人二千余名。其创办经费约54.3万两，以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平均每年约60余万两。该局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辅之以修造船舰。所制军火及军用物资，多调拨供应湘、淮军使用。

金陵制造局，简称宁局。同治四年（1865），李鸿章就任两江总督，遂将马格里主持的炮局从苏州移至南京并加以扩充，改称金陵制造局。宁局经费最初由淮军军饷调拨，光绪五年（1879）起由江海关等官署拨银。其机器设备主要购自英国；产品主要是枪、炮、火药和水雷等，大都供应淮军，小部分调拨分发南洋和沿江各省。

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船舶修造厂。同治五年（1866），闽浙总督左宗棠创设于福州马尾山；同年八月（9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举荐前江西巡抚沈葆桢为总理船政大臣接办该局。船政局机器设备购自法国；最初五年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后由中国技术人员接管。创办经费银四十七万两，常年经费由闽海关每月拨银五万两，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每月由茶税项下增拨银2万两。该局从建厂投产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30年时间，共造船三十六艘，分发南、北洋水师使用。

天津机器局，简称津局。奕䜣等见江南相继举办军火工厂，且大权均为汉族官僚所掌握，于是奏请命满洲贵族在天津

设局制造军械，以“拱卫神京”。同治六年（1867），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遵命创设“军火机器总局”于津，开办经费二十余万两。同治九年（1870），直隶总督李鸿章接办，改名“天津机器制造局”，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扩建。该局分为东西两局，东局设在城东贾家沽，主要制造火药、枪炮、子弹和水雷；西局设在城南海光寺，主要制造军需器具和开花子弹；其产品主要供应直隶、东北及江南各地淮系水陆军。

湖北枪炮厂，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建的较大的军火工厂。中法战争后，两广总督张之洞即拟在广州筹建一座大型枪炮厂。光绪十五年七月（1889年8月），张之洞改任湖广总督，遂于次年二月（1890年3月）奏准把枪炮厂改移鄂省汉阳大别山麓。二十年（1894），枪炮厂正式开工生产，不久遭火灾，修复后于次年继续生产。该厂创办经费七十余万两，常年经费四十余万两。枪炮厂下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五所，规模宏大，机器先进，所造枪炮弹药质量在沪、津两局之上，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较有成效的军工企业。

从上述军事工厂可以看出，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都是官办的，经费由官府拨充，总办由官府委派，管理机构是封建衙门式的官僚机构，产品由清政府直接调拨给军队，不参加市场交换。同时，这些军工企业从设计到施工、机器装备、生产技术，直到原料供应，又处处依赖外国；企业内任用的外国主持人和技术人员垄断专横。所有这些，表明洋务派举办的近代军事工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是，这些军事工厂已引进西方的机器和技艺，比较普遍地采用雇佣劳动，19世纪80年代以后，部分产品已由各省以协饷等名目调换或计价购买，因此，这类企业已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对中国社会发展具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派在举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一系列困难，如资金缺乏，原料、燃料的供应不能保证，交通运输落后等等。他们在实践中认识到："必先求富而后能强。"李鸿章说："夫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②于是，从 70 年代到 90 年代，洋务派在发展军事工业的同时，又在"求富"的口号下，兴办一系列民用工业，总数约有 20 多个，其中规模较大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

轮船招商局，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为开辟财源、抵制外国轮船公司对中国沿海和长江中下游航运的垄断，解决清政府漕粮运输危机，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筹备轮船招商事宜，十一月二十七日（12 月 27 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该局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即由官方给予扶植并派员监督，商务则由商董承办并自负盈亏；先后担任总办、会办的除朱其昂外，还有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马建忠等。初创时集股困难，其资金大部分来自清政府垫拨的官款，四五年后业务有所发展，官款以承包漕运的方式逐步抵还。该局成立伊始，便遭到外国资本的仇视，美国旗昌、英国太古、怡和轮船公司，采取大幅度降低运费等手段，企图将其搞垮。在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和排挤下，招商局开辟国外航线受到挫折，被迫停驶。在国内航运方面，招商局得到清政府的扶助，通过包揽漕运和承运官物以及获取免税、贷款、缓息等特权，在激烈竞争中仍能维持航运业务。光绪三年（1877），招商局以高价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

轮船和设备，加上自有的12艘轮船，成为一个拥有30多艘商船的大型近代航运企业。在此情况下，太古、怡和轮船公司与招商局相互采取妥协立场，三次订立“齐价合同”，以避免在角逐中两败俱伤。

开平矿务局，是中国最早用机器采掘的大型煤矿。为解决军工企业和轮船运输所需大量原料和燃料问题，李鸿章自同治十三年（1874）即派人在各地勘探矿产。光绪二年九月（1876年11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偕英国矿师勘查开平煤铁矿。次年，李鸿章批准唐廷枢所拟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规定该企业为官督商办。光绪四年（1878），开平矿务局在直隶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光绪七年（1881）该局开始产煤，年产3600余吨，以后逐年上升，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产达247，000余吨，除供应轮船招商局、天津机器局和北洋海军外，还大量在市场上出售，使洋煤在天津市场的销售量锐减。为运煤方便，该局于光绪六年（1880）修建了我国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并于光绪八年（1882）正式通车。

天津电报总局，是我国最早举办近代通讯事业的总机关。直隶总督李鸿章鉴于“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的优点，深感“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③，于是在光绪五年（1879）饬令架设天津至大沽间电报线路，试验发报，效果良好。次年，李鸿章奏请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线，遂后于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由盛宣怀任总办，并于紫竹林、大沽、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等地设7个分局。津沪线用费计库平银十七万八千余两，先于北洋军饷内筹垫。光绪七年十月（1881年

12月）全线竣工。光绪八年（1882），电报局仿照轮船招商局办法，招商承办，逐步归还官款，成为官督商办企业。这时，英、法、美、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添设上海至香港各口海底电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返函商，决定立即筹集商股先行接办由沪至粤沿海各口陆线，“以杜外人觊觎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④。光绪十年（1884），沪粤线竣工，电报局亦由天津迁往上海。此后，电报逐步扩展至全国各重要城市。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绵纺织工厂。光绪四年（1878），前四川候补道彭汝琮分别向南、北洋大臣呈递禀帖，请求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李鸿章鉴于“洋货行销中国，日增月盛，尤以洋布为大宗，是以特令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所以敌洋产而杜漏卮”⑤，即委派彭汝琮和浙江候补道戴景冯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然而因商股难招，他们在两年的筹建中毫无成效。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委派江苏候补道龚寿图、候选道郑观应等会同招商集股试办。光绪八年（1882），李鸿章为该局奏准减免税厘，织布局取得“十年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得另行设局”的专利权和“只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概免内地沿途税厘”⑥的优待。因此，光绪十六年（1890）织布局正式投产后，利润丰厚，发展较快，至十九年（1893）已有纱锭3.5万枚，布机530台。是年九月十日（10月19日），工厂失火，厂房设备几乎全被焚毁。李鸿章委派盛宣怀负责在原地重建，更名华盛机器纺织总厂，于二十年八月二十日（1894年9月19日）重新开工投产。

洋务派所办近代民用工业，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而以官督商办为主的方式，实权操在洋务派官僚手中。企业

中等级森严，经营管理腐败，生产效率低下。洋务派官僚又依仗政治和经济特权，实行封建垄断，压制民族工业的发展。但是，这些企业的资金主要是由官僚、买办、商人以私人入股的形式筹集的；在企业内部，雇佣大量工人，存在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企业产品不再实行调拨，而是作为商品在市场出售，目的在于获取利润。因此，洋务派所办的民用企业，基本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

加速清军的近代化，增强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是洋务运动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因此，在创办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同时，洋务派还开始训练新式陆海军，筹设海防。

在新训练的陆军中，以湘、淮军的力量最强。同治元年四月（1862 年 5 月），李鸿章抵上海，立即令淮军向洋兵学习新式枪炮、阵法。他利用上海的丰富饷源和便利条件，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聘请洋人担任各营教习；到同治三年（1864）秋冬间，淮军从 6 千余人扩充至 5.6 万人，洋枪 3.4 万支，炮队 6.7 营。在同一时期，湘军曾国藩、曾国荃所部也开始使用洋枪洋炮。左宗棠所部湘军，从同治三年（1863）秋开始同法国人合作，建立洋枪队，同治六年（1867）进兵西北后，军中所用洋枪的比例增加到 6 成。太平军和捻军起义失败后，清廷不得不进一步依靠湘、淮军维持其腐朽统治，派他们到较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代替八旗兵和绿营兵屯驻防守，故称为“防军”。与“防军”同时存在的新式武装是“练军”。同治元年（1862），奕䜣等奏准在天津成立洋枪队，聘用外国教官，选派京中绿营兵赴津训练。同治四年（1865），清廷着手从直隶额设经制兵内挑选部分绿营兵，以“简器械，勤训练”为标榜，以洋枪武装，按洋法训练，故定名为“练军”；次年，直隶练

就6军，共一万五千人。之后，各省效法直隶，在额设兵内抽选兵丁，“留强汰弱”，“化散为整”，以洋操洋枪洋炮、阵式变换为主要内容，轮流训练。其后绿营兵屡加裁汰，各省卫戍之责遂专属防练军。

编练新式海军，也开始于60年代初期。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委托回国休假的李泰国在英国订购兵船。他未经清廷允许，即擅自在英国组织“中英舰队”。次年，一支由英国海军军官任司令、包括八艘大小船只的舰队抵达上海，准备加入清军同太平军作战。这种践踏中国主权的行径，理所当然的遭到清政府的拒绝，清廷决定把舰队解散、舰只由自任司令的英国军官带回英国变卖。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犯我国台湾，清朝统治者大为震惊，筹办海防之议于是兴起。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清廷任命李鸿章和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事宜，总理衙门调拨粤、闽等海关收入及江浙等六省厘金，每年约四百万两白银作为海军经费，拟在十年内建成南洋、北洋和粤洋三支海军。海军舰船主要向英、德两国购买，部分船只由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造总局提供。光绪十年（1884)，南洋、福建两支海军初步建成。次年，在马尾海战中，福建水师遭法舰袭击，几乎全军覆灭；战后虽经修整，但已难以成军。中法战争以后，清政府提出“惩前毖后，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方针，于光绪十一年九月五日（1885年10月12日）成立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庆郡王奕劻和李鸿章为会办，实权则操在李鸿章手里。在李鸿章主持下，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舰队正式建成，拥有军舰22艘，以旅顺和威海卫两个军港为基地，以丁汝昌为提督。但自此年以后，北洋舰队不再添购船舰，每

年约四百万两的海防经费，先后约挪用一千万两修建颐和园去了。

为了办理洋务的需要，洋务派还通过多种方式，培养了一批通晓洋务的人才。首先是办学堂。洋务派在19世纪60至90年代前期，相继创办“西文”、“西艺”两类学堂约三十七所。最早建立的学习“西文”的新式学堂是京师同文馆。恭亲王奕䜣于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正式奏请培养翻译人才。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在总理衙门属下正式建立京师同文馆，初仅设英文馆，次年增设法文馆和俄文馆，同治十一年（1872年）添设德文馆，光绪二十二年（1896）添设东文馆；同治六年（1867）增设天文算学馆，讲习天文、算学。早期生员仅挑选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兼收年岁较长满汉科举出身人员。同文馆先后聘请洋教习四十余人，包括英、法、俄、德语言教师和算学、天文、化学、医学、物理等科教师，其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任总教习达三十年之久。继京师同文馆之后，李鸿章于同治二年（1863）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同治八年（1869）在江南制造总局内设立翻译局，并将广方言馆迁入作为附属机构。两广总督瑞麟也于同治三年（1864）设立广州同文馆。学习“西艺”的学堂，主要有：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在福州船政局附设前、后两学堂，分别学习法文和造船、英文和驾驶；李鸿章于光绪六年（1880）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和天津电报学堂，光绪十一年（1885）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张之洞于光绪十二、十三年（1886、1887）先后设立的广东陆师学堂和水师学堂；光绪十六年（1890）设立的南京水师学堂；光绪十九年（1893）设立的天津军医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设立的湖北武备学堂等。

这些学堂的建立，不仅培养了不少近代军事、技术和外语人才，而且促进了新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培养通晓西学的人才，除聘用西方教习兴办专业学堂外，派遣留学生出国也是重要途径。同治十年（1871），江督曾国藩与直督李鸿章联衔会奏准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拟定肄业章程十二条，并在上海开办“出洋肄业局”作为留学生预备学校。章程规定：挑选年十二至二十岁幼童，在沪局六个月肄业后，资送出洋；每年选送以三十名为准，四年计一百二十名；驻洋肄业十五年后，每年回国三十名，由委员胪列所长听候派用。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奏调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为正副委员，常川驻美经理一切。七月九日（8月12日），陈兰彬带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三十名启程赴美；后三批九十名幼童分别于同治十二年五月十八日（1873年6月12日）、十三年八月九日（1874年9月19日）、光绪元年九月十六日（1875年10月14日）前往美国。后因清政府不满意留学生的言行，这批赴美留学的幼童，于光绪七年（1881）按总理衙门指令提前回国，故后来虽出现了詹天佑那样的著名铁路工程师、唐绍仪和梁敦彦那样的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但总的来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然而此时赴欧的军事留学却在继续。光绪二年（1876），直督李鸿章乘洋员李勱协回国之便，派7名中下级军官赴德学习海军技术。光绪三年（1877），沈葆桢从福州船政学堂先后选取“艺童”和“艺徒”35人分赴英、法学习轮船驾驶和制造，取得显著成效；清末著名海军将领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都是福州船政局派出去的留英学生。后来，北洋水师学堂和福建船政局还陆续派遣两批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总计从同治十一年至光

绪十二年（1872—1886），洋务派共向外派遣7批留学生，总计200余人，为促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以“求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持续30多年。但因未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这场运动既没有使中国强，也未使中国富，反而在列强侵略面前一败再败，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愈益加深了。但是，这场运动引进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企业的利润，也吸引着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近代工业，因而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洋务派训练新式海陆军、举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扩张，也起过一定的抵制作用。

注　释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五，第1、10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九。

③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6册，第335、336页。

④《洋务运动》第6册，第339页。

⑤《洋务运动》第7册，第452页。

⑥《洋务运动》第7册，第484、485页。

清（后期）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从19世纪6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中国出现了属于商办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

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社会正常的发展进程，许多地区和不少部门中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大半被摧残。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不断加深和扩大，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日益扩大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可能。这样，由于洋人在中国设厂和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的刺激，一些拥有货币资金的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也开始投资于新式企业，少数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场和大作坊逐步使用机器生产，因而产生了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

现有材料说明，民族资本经营近代工业，是从同治八年(1869)发昌厂使用机器开始的。同治五年(1866)，广东人方举赞在上海与人合办发昌机器厂，主要业务是为船只打制修配零件，实际是个锻铁手工作坊。同治八年，开始使用车床，转化为近代企业。由于沿海和长江航运事业日益发达，发昌机器厂得到迅速发展，光绪二年(1876)起已能生产小火轮、车床和汽锤等，成为当时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家。自此以后，民族资本企业日渐增多，到光绪二十年(1894)，民族资本共创办了包括缫丝业、棉纺织业、面粉业、碾米业、火柴业、造纸业、印刷业、船舶业、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等一百多个企业。由于有些企业开办不久就停办歇业，所以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实际有七十六家。

机器缫丝业是中国产生较早也是较发达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广东珠江三角洲是这一产业发展的中心地区。同治十一年(1872)，华侨商人陈启源自海外归来。次年，他在其家乡广东南海简村创办继昌隆缫丝厂，以蒸汽机为动力，用机器煮茧，雇佣女工六七百人。该厂出丝精美，远销欧美两洲，遂很快获得厚利。此后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县缫丝厂纷纷建立，到九十年代，已有丝厂百余家，广东全省年出口丝达万担。与此同时，上海民族资本缫丝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光绪七年(1881)，商人黄佐卿在上海苏州河北岸首创公和永缫丝厂，资本银十万两，丝车百台，十三年(1887)增至九百台。光绪十年至二十年(1884—1894)，上海华商又相继创立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五家机器缫丝厂，资本每厂十万、二十万或二十四万两不等，每厂有丝车二三百台，雇佣工人少者四百，多者千人。但由于受到外资丝厂的压迫和竞争，上海民族资本

丝厂生产情况远不如广东。

机器轧花业，以光绪十三年（1887）买办商人严信厚在宁波创办的通久源轧花厂为最早。该厂创办资本五万两，从日本购置四十台踏板轧花机，雇工三四百人，全年日夜开工。在上海，光绪十七年（1891）相继成立两个机器轧花厂。一个是棉利公司，有资本一万五千多两，使用机器四十台，每天轧出棉花约五十六担。另一个是源记公司，有资本约二十万两，机器一百二十台，每天轧净棉一百七十担。光绪十九年（1893），名为礼和永的轧花厂在上海建立，资本五万两，轧花机四十台。

棉纺织业方面，由于洋务派控制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取得十年专利权，所以在多年中没有一个商办棉纺厂出现。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道台朱鸿度才在上海创办第一个商办的裕源纱厂，资本五十万两，机器设备通过上海瑞生洋行购自英国，有纱锭二万五千枚。

面粉业，以贻来牟机器磨坊建立最早。光绪四年（1878），轮船招商局会办、津海关道朱其昂创办于天津，设磨面机一座，雇工十余人，出面多且面色洁白，每年获利六七千两。光绪八年（1882），商人陈可良在上海创办裕泰恒火轮面局，用机器磨面和碾米。光绪十三年（1887），有福州机器面粉厂的建立。光绪十九年（1893），武举李福明联合天津商人，在北京东便门外成立北京机器磨坊，每日磨面二百担。

火柴业。光绪五年（1879），日本华侨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开办第一家火柴厂。八九十年代，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慈溪、太原等地都建立了火柴厂。其中较大的有：光绪十二年（1886），官绅杨宗濂和买办吴懋鼎合资兴办天津自来

火公司，开办资本一千八百两，聘请英、俄商人购置机器并帮同稽查帐目，所制火柴多运销河南一带。光绪十五年（1889），四川商人卢幹臣等在重庆创办森昌泰自来火厂，资本五十万两，专制硫磺火柴，年产量六万三千箱。光绪十六年（1890），商人叶澄衷、朱炜臣在上海创办燮昌火柴公司，资本二十万元，日产量达三十万盒。

造纸工业。光绪八年（1882），商人钟星溪等在广州集股创办宏远堂机器造纸公司，是中国机器造纸业的创始者。同年买办曹善谦、郑观应等在上海创办伦章造纸厂，名义资本为15万两，光绪十七年（1891）开工，有外籍技师1人，中国职工约100人，年产纸六百吨。光绪十五年（1889），商人钟锡良在广州设立造纸厂，资本十五万两，雇佣两名外国技师，一百名中国工人。

印刷业，以同文书局为最早。光绪八年（1882），徐润、徐鸿复在上海集股创办该局，购石印机20架，雇工五百人，专事翻印古籍，先后影印（石印）《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等书。同年，王韬在广州成立印刷局。光绪十年（1884），北京成立撷华书局，石印《谕折汇存》等。光绪十三年（1887），李盛铎在上海创办蜚英馆石印局，石印书籍，规模较大。到光绪二十年（1894），全国涌现出这种印刷厂约有二十余家，资本五十余万元。

此外，在豆饼制造、机器制茶、制糖、制玻璃、制水、制药、碾米等轻工业行业中，都有规模较小的企业，有的经营校成功，有的则很快夭折了。

在重工业方面，民族资本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机器制造业，除发昌机器厂外，七八十年代，上海又建几家钢铁机器

厂、造船厂、五金厂、轧钢公司之类的小型机器厂，能修造小汽船、熔钢和轧钢等，但规模都不大，其中资金最雄厚的是光绪九年（1883）创办的源昌机器五金厂，资本十万元，能制作某些机件；较小的如合昌机器厂，资本才三千元。广州和汉口的几家小厂则只能从事船舶的装配和修理。总体看，这些机器制造业实际上都是附属于其它近代工业的机器修理业，根本谈不上机器制造。

新式采矿业以煤矿开采业创办较早。八十年代前后，安徽、湖北、山东、直隶、广西等省先后兴办起一些使用部分机器开采的煤矿企业，如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煤矿、湖北荆门煤矿、山东峄县煤矿、广西富川、贺县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八十年代以后，在热河（今河北省东北部、辽宁省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直隶、福建、广东、湖北、广西等地，陆续兴办了十来个金、银、铜、铅等矿，其中规模大的是光绪九年（1883）由广东巨富李宗岱创办的山东平度招远金矿，前后投资额达八十万两，开采的区域达数县；除此之外大都规模较小，只使用少量的机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是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的，因而它不可能正常地、顺利地发展，具有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突出特点或弱点。第一，它没有经历一般资本主义从简单协作—手工工场—机器工业的发展过程，不是由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直接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已占领中国市场，封建经济在整个社会中仍占主要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通过购买外国机器创办起来的。因此，它既没有本国工厂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更没有经过工业革命阶段，所以呈现先天不足的特点。第二，民族资本经

营的企业投资少，规模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当时，最大企业的资本也不过二十多万两，小的只有几千两。光绪二十年（1894）以前，包括全部新式采矿业及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制造工业在内的五十四个商办企业，只有资本480.437万元，平均每个企业只有8.890万元。而十九个“官办”或官商合办企业却有资本1620.3098万元，平均每个企业有85.2794万元，为商办企业的九倍以上。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十分微弱，很难和外国资本以及官僚买办资本相竞争。第三，企业分布集中。从部门说，民族资本企业主要集中在投资少、利润高、资金周转快的缫丝、火柴、面粉等轻工业部门和小型采矿业，机器制造业微乎其微，工业结构严重失调。从地区说，民族资本企业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特别是集中于上海和广州。原因是：这些城市交通方便，利于购买原料和销售产品；利于从国外进口机器和技术，甚至便于得到外国的保护。有的资本家故意把工厂办在通商口岸的租界里，目的即在寻求外国在政治上的“保护”。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之间存在既依赖又矛盾的关系。当时，中国没有自己的重工业，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运业也控制在外国企业手中，因此民族企业在资金、机器、技术、燃料、原料以至商品的销售、运输等方面，都不得不依赖外国。民族资本企业不仅在开办、减少关税、厘金及专利权等方面，需要封建势力的支持和庇护，而且很多企业主还兼有封建官僚、地主的身份，在经济上、政治上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不希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成长起来，总是千方百计阻碍它的发展。他们向中国倾销商品，占领中国市场，利用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在中国开办企业，依仗其政治上的特权

地位和雄厚的资本力量，和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相竞争，使民族资本企业发展受到阻碍，生存受到威胁。清政府日益加重厘捐和其它杂税的征收，更增加了民族工业的沉重负担。这就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总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企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力量软弱，无法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伴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近代工业产生时，就有着洋务派创建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和民间的商办企业两种性质不同的企业，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部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最早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由一部分洋务派大官僚转化而来的。从经营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来看，他们是资产阶级；但他们又是封建大地主、大官僚或大买办，他们所经营的企业，有着很大的封建性和买办性。这个阶级与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主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了阻碍中国社会发展、阻碍中国资本主义成长的反动阶级。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商办企业的兴办人和投资者，以及一些因缺乏政治势力在官督商办的名义下经营企业的厂矿主，他们的一部分是由工商业者转化而来，一部分则是由地主、官僚、买办转化而来的。这些人在兴办和发展自己企业的过程中，处处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与它们有很大的矛盾，因而他们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要求，是革命的力量之一。但是，他们在经营企业的活动中，又对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有着一定程度的依赖，他们自己也往往在农村中保有土地，对农民依然进行封建剥削，因而他们又缺乏向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作斗争的

勇气。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后面，作为反革命的助手的危险。“因此，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①。

一般说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同时产生的。然而，“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资本家就在中国经营船舶修造和原料加工等类工业，以极其低廉的工资雇佣中国劳动人民做工，这就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起，清政府洋务派开始举办军用工业，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70年代起，洋务派陆续举办民用工业，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随之兴起，于是中国产业工人的队伍就逐步壮大起来。据估计，同治九年（1870）前后，中国产业工人大约不到一万人，到光绪二十年（1894）时，增至九万多人，其中：在外国资本经营的企业中的工人约3.4万人；在清政府经营的军用工业中的工人约9100至10810人；在清政府经营的民用企业中的工人约2.1万人至2.6万人；在民族资本主义的企业中的工人约2.75万人。这个数量虽还很小，但却表明，一种新型的雇佣工人——产业工人出现了。

中国无产阶级在其产生、成长过程中，有着自己独具的特点。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是在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出现的。他们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

还受外国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这三重压迫和剥削，其严重性和残酷性，在世界上是很少有的。工人的工资，多的不及外国工人的1/2或1/3，少的不及1/10，一般只有十分之一二。一般普通工厂工人的工资每日1角5分至2角，普通女工的工资每日1角至1角6分，在纱厂和火柴厂的女工最低工资只有5分甚至不足5分。劳动时间长，每天工作11小时，多的十二三个小时，甚至有多到18小时的。至于劳动条件，更是极其恶劣。机器陈旧，年久失修，又缺乏必要的安全设备，工伤事故经常发生，特别在采矿业中，工人生命时刻受着死亡的威胁。不仅如此，在这些厂矿中还保持着极落后的封建压迫制度。封建把头、工头可以任意克扣工资，任意打骂、处罚工人。有些官办、官督商办企业里，还设有刑庭，驻有军警，随意对工人进行拷打。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这种残酷压迫，使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

第二，中国无产阶级大多来自日益贫困破产的农村，他们同广大农民之间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少，但相当集中。从分布区域说，由于新型企业大都设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几个通商口岸，所以工人也就自然集中在这些地方。据统计，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汉口、广州三个城市工人人数即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76.7%（矿业工人除外），其中上海一地即占到46.4%。从各种企业雇佣工人的人数来说，光绪二十年时雇佣500人以上的工矿企业有39家，总计约有5.7万至6.2万工人在这39家企业中做工，占了当时全部近代产业工人总数的2/3。中国无产阶级人数的分布如此集中，对于他们加强本身

的组织和团结，充分发挥在革命中的作用，增强斗争力量和在工人中广泛传播革命思想，都是很有利的。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产生时起，就不断进行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斗争。光绪五年（1879年），上海发生英商耶松船厂中国工人反对工头克扣工资的罢工。同年，上海英商祥生船厂中国工人反对外国监工殴打工人的罢工。光绪八年（1882），开平煤矿直隶籍工人举行要求与广东籍工人同工同酬的罢工。次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为反对延长工作时间而发动罢工。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虽然还没有作为一个觉悟了的独立的阶级力量登上政治的舞台，但是，她一开始就表现出具有反抗压迫和剥削的斗争积极性，表明她是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阶级。

注　释

①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241、590页。

清（后期）

边 疆 危 机

正当清朝统治者依靠外国侵略势力把各族人民起义镇压下去，大肆宣扬“中外和好”、“同治中兴”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邻邦和边疆地区发动了全面的武装侵略，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普遍危机。

这一危机的出现，是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分不开的。19世纪最后30年，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时期。为了争夺市场、原料产地以及投资场所，资本主义列强在这个时期掀起了一个新的“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①。这时，非洲大陆和拉丁美洲已基本被分割完毕，对大洋洲的瓜分已接近尾声，因此，地处远东的中国及其邻邦便成了它们争夺的主要目标。

当时，在这个地区进行角逐的，除英、俄、法、美之外，又加入了后起的军国主义的日本和德国。它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妥协，形成复杂而又激烈的斗争形势。

一、美、日对台湾的侵略

美国对我国台湾早有野心。道光二十年到二十六年（1840—1846）的几年中，美国牧师赫普伯恩一直在台湾进行各方面的调查。道光二十七年（1847）及二十九年（1849），美国海军舰只一再侵入台湾海面，进入基隆湾，企图攫夺该地出产的煤，作为军舰和商船的燃料。咸丰四年（1854），美国海军副将彼里率两艘军舰在基隆港登陆，以访问为名，对台湾进行调查，为侵台作准备。他向美国政府建议，应将台湾据为己有。这时，美国商人开始组织公司，派船赴台经商，在两年（1855—1857）中从台湾运走七十八船的原料。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美国驻华专员伯驾建议，美国和英、法联合侵略中国和朝鲜，然后由英占舟山，法占朝鲜，美占台湾。但是，由于美国实力不足以及不久即忙于南北战争，伯驾的阴谋未能实现。同治六年（1867），美国“罗佛号”轮船在海上遇暴风，漂流到台湾南部七星岩，触礁沉没，仅七人乘小船逃到岸上，被当地群众认作海盗处死。美国以此为借口，立即派海军少将拜尔率军舰侵略台湾，在该岛南部的琅瑀（今恒春）登陆。高山族人民给予迎头痛击，美国侵略军遭到可耻失败。

美国直接侵台失败后，即转而怂恿、支持日本侵略台湾，企图利用日本实现其侵略阴谋。日本自同治七年（1868）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具有强烈向外扩张的要求，其第一步目标是要占领琉球、台湾和朝鲜。它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后，便伺机发动侵略战争。同治十年十月十五日（1871 年 11 月 27 日），琉球一只载有六十六人的渔船遇风漂流到台湾东岸，其中 54 人被当地牡丹社群众杀害。这本是清廷与琉球

之间的问题，与日本毫不相干。但日本却要借此制造事端。同治十一年（1872），日本封琉球国王为藩王，公然将琉球作为自己的属国。同治十三年（1874），在美国支持下，日本借口琉球船民在台湾遭难，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人侵略台湾。美国除供给日本军火和船只外，且以原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充日军参谋，派海军少将凯赛尔和陆军中尉华生参与指挥。三月二十一日（5月6日），日本侵略军在琅㤘陆续登陆，立即遭到高山族和汉族人民的有力阻击。为保卫台湾，清廷派福建船政大臣率海军赴台布防，军事力量超过日本。日本军事进攻难以取胜，转而采取外交讹诈，与清政府谈判。在美、英两国软硬兼施的"调停"下，清政府屈辱地向日本作了让步。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恭亲王奕䜣等与日本代表大久保利通签订《北京专条》，主要内容有：(1)"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2)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日军从台湾撤退②。接着，日本利用《北京专条》写有台湾高山族"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台湾是"保民义举"的文字为依据，于光绪五年（1879）以武力吞并琉球，改名为冲绳县。从此，琉球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军事基地。

二、俄、英对新疆的侵略

同治三年（1864），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库车回族、维吾尔族人民掀起抗清起义，占领库车城。不久，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各地人民纷起响应，起义烽火迅速燃遍天山南北。但是，各族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控制的这些起义，很快转向为争权夺利而彼此混战的局面；有些封建主甚至勾结外

国侵略者进行分裂祖国的罪恶活动。同年七月（8月），布鲁特头目思的克占据喀什噶尔回城疏附，为巩固其统治，竟向中亚的浩罕乞援。浩罕统治者立即派陆军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新疆。十二月（1865年1月），阿古柏侵占喀什噶尔回城。在此后的两年间，先后攻占英吉莎尔、疏勒（喀什噶尔汉城）、莎车、和田、阿克苏、库车和喀拉沙尔（今焉耆）等城，基本上控制了南疆。同治六年（1867），自立为汗。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意为"七城之国"，包括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莎车、叶尔羌、吐鲁番七城），自立为汗。同治九年（1870）。阿古柏占领乌鲁木齐，又占据北疆部分地区。

阿古柏为维持其在新疆的反动统治，力图取得英、俄两国的支持；英、俄则企图利用阿古柏达到侵占新疆的目的。从阿古柏入侵新疆起，英国就不断派遣官员到南疆活动，企图通过勾结阿古柏把南疆变成它的殖民地，借以阻止沙俄势力南下，从而保持英国在中亚的霸权。为此，英国向阿古柏提供大批武器弹药，并派出军事教官和工程技术人员帮助阿古柏政权。同治十二年（1873），英国派以弗赛斯上校为首的庞大代表团抵喀什噶尔。第二年，双方订立条约，英国承认阿古柏的"艾米尔"（意为统治者）的地位，阿古柏则给予英国在其统治区通商、驻使和领事裁判权等特权，规定英国货只纳2.5%的进口税，从印度进口的货物则免税。

俄国不甘心英国势力在新疆的扩张。为同英国对抗，侵占新疆，沙俄极力笼络、勾结阿古柏。同治五年（1866），沙俄与阿古柏达成协议，双方对于彼此的行动互不干涉，互给对方入境追捕逃犯的权利。同治七年（1868），由官方支持的俄国

商人克鲁道夫、俄国土尔其斯坦总督派遣的军官先后到喀什噶尔，企图使阿古柏完全投靠沙俄。同治十年五月（1871 年 7 月），沙俄派军侵占伊犁九城地区。次年，它与阿古柏订立“通商条约”，俄国承认阿古柏为“哲德沙尔首领”（独立国君主），阿古柏则给予俄国在南疆通商、设置专员等特权，并允俄货只纳 2.5%的进口税。从此，沙俄势力在新疆得到进一步扩张。

新疆危机，与美、日侵台所造成的东南沿海危机，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一场“海防”与“塞防”的争论。李鸿章借口“海防西征，力难兼顾”③，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④。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指出如果“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尺”，不仅新疆“已属堪虞”，而且连蒙古、陕西、甘肃、山西等地也“无晏眠之日”⑤。因此，他坚决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⑥。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一面加强海防，一面于光绪元年三月（1875 年 4 月）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出兵新疆。

光绪二年二月（1876 年 3 月），左宗棠统率一支几万人的大军，向新疆挺进。清军进入新疆后，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协助，所向披靡。清军于六月二十九日（8 月 11 日）收复乌鲁木齐，九月二十一日（11 月 6 日）占领玛纳斯。次年春，清军接连攻克天山要隘达坂城、托克逊和吐鲁番。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四月十日（5 月 22 日）在库尔勒服毒自杀。七月（8 月），清军向南疆进发，追击逃寇。阿克苏、和田、叶尔羌等地的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参加消灭入侵者的战斗。清

军于十一月十四日（12 月 18 日）克复喀什噶尔，十七日（21 日）克叶尔羌城，二十日（24 日）克英吉沙尔。二十四日（28 日），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和叛国分子白彦虎逃入俄境。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新疆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新疆的收复，为收回伊犁地区创造了条件。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二日（1878 年 6 月 22 日），清政府派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左侍郎崇厚前往俄国谈判，要求交还伊犁。在沙俄政府威逼诱骗之下，崇厚在未征得国内同意的情况下，于五年八月十五日（1879 年 9 月 30 日）与俄国订立了《里瓦吉亚条约》。其中主要内容有：赔偿沙俄兵费五百万卢布；割让伊犁以南、以北大片领土；允许沙俄商人经新疆到汉口陆路通商等。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清政府迫于人民的谴责和压力，于六年正月十日（1880 年 2 月 19 日）正式照会沙皇政府，拒绝承认和批准崇厚所议条约，并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去俄国谈判改订条约。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 年 2 月 24 日），曾纪泽与俄国代表签订《伊犁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收回伊犁及伊犁南境领土，但伊犁以西领土仍被沙俄侵占，赔款则增加到九百万卢布。尤为严重的是，条约规定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需要重新“勘改”。沙俄以此为借口，通过《伊犁条约》和以后七个勘界议定书，又割去我国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十八年（1892），沙俄又公然违背十年（1884）《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强占了帕米尔地区萨雷阔勒岭以西二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三、英国对云南和西藏的侵略

英国在同沙俄争夺我国新疆的同时，又将魔爪伸向我国的

云南和西藏。

英国占领印度后，即积极侵略缅甸，并企图通过缅甸侵入我国西南诸省。道光四年（1824）和咸丰二年（1852），英国通过两次侵缅战争，占领了下缅甸。接着，它就着手寻找一条从缅甸直入中国西南地区的道路。咸丰八年（1858），英国退伍军官斯普莱首先提出修建从仰光通云南思茅铁路的计划。同治二年（1863），英人又提出经八莫直通云南的路线，并组织"探路队"，对滇西地区进行探测。他们狂妄叫嚣：开辟滇缅铁路，一方面可以"控制云南"，一方面"又可以打通四川与扬子江上游英国商业之势力范围取得联络"⑦。同治十三年（1874），英国组成以上校军官柏郎为首的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从缅甸出发，北上探测从缅甸到云南的路线。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派翻译马嘉理经云南前往缅甸接应。十二月十日（1875 年 1 月 17 日），马嘉理在八莫与柏郎会合。光绪元年正月（1875 年 2 月），英国武装探路队不事先知会中国地方当局，就分路"遽行入境"。腾越（今腾冲）地区群众奋起阻击，探路队被迫退回缅甸。马嘉理等在曼允山寨受到景颇族人民的拦阻和质询。马嘉理竟开枪打死数名群众。中国军民激于义愤，将马嘉理击毙。这就是所谓"马嘉理案"。

英国政府决定乘机扩大事态。二月十二日（3 月 19 日），英驻华公使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提出派员观审、探路、偿款，以及公使"觐见"、免厘、开埠等广泛的侵略要求。在为时十八个月的谈判中，威妥玛用尽一切威逼恫吓手段，一再以撤使、绝交、用兵相要挟，并不断增加侵略条件。在英国的胁迫下，清政府步步退让，最后于光绪二年七月二十六日（1876 年 9 月 13 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签订丧权辱国的《烟台

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英国可派员到云南调查五年，察看通商情形，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2）英国可派员“观审”涉及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3）增辟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上下各货；（4）租界内免收洋货厘金，洋货入内地，不论洋商华商，免收各项内地税，只纳子口税。在《另议专条》中规定英国可以派“探路队”从北京经甘肃、青海赴西藏，或经四川入藏，或从印度入藏。《烟台条约》在许多方面扩大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所规定的特权，为英国进一步侵略中国西南诸省和西藏地区提供了便利。

英国自占领印度后，就已垂涎我国西藏地方，“以便东窥四川、云南，北窃西宁、青海”⑧。《烟台条约》签订前，英国曾多次派人潜入西藏进行侦察活动。《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利用《另议专条》中有允许英人入藏“探路”的规定，纷纷以“游历”为名，公开地或秘密地进入西藏，测绘地图，刺探情报，大搞间谍活动。光绪十二年（1886），英国修筑一条从哲孟雄（今锡金）直达西藏境内的道路。为阻止英国的入侵，西藏爱国军民在藏属境内热纳地方的隆吐山建卡设防，自守疆界。英国侵略者竟然反诬藏兵越界戍守，叫嚣要“调兵驱逐出境”，并胁迫清政府命令藏兵撤卡撤兵。光绪十四年二月八日（1888 年 3 月 20 日），英国侵略军在拉累诺的率领下，向隆吐山发动进攻。西藏军民英勇抵抗，用火炮、石块击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毙伤英兵百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隆吐山和纳汤等要隘相继失守。西藏地方政府一面请求清廷派兵进藏援助，一面下令征调前后藏及西康各地军队增援前线。但是，清政府在接到隆吐山失守的战报后，不仅不设法支持藏族

军民反抗侵略者，反而将主张抗敌的驻藏大臣文硕革职，任命升泰为驻藏帮办大臣进藏主持一切，同时派税务司英人赫政为其助手。升泰在赫政的操纵下，一意妥协求和，下令约束藏兵，不准妄动，西藏军民的抗英斗争遭到严重破坏。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1890 年 3 月 17 日），驻藏大臣升泰与英国印度总督兰士丹在加尔各答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8 款，主要内容是：（1）清政府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2）拟定了西藏地方同哲孟雄的边界；（3）其余通商、游牧等问题，“容后再议”。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1893 年 12 月 5 日），根据《藏印条约》，中、英双方在大吉岭又订立《中英会议藏印续约》9 款，规定：开亚东为商埠，印度可随意派员驻寓亚东查看英商贸易；中、哲边境贸易五年内进口货物概不征税；在此期间，印茶不得入藏，五年后印茶入藏；所纳税率不得超过中国内地茶叶入藏之数。至此，英国多年来入侵中国西藏的阴谋计划初步得逞。

注　释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 卷，第 798 页。

②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1 册，第 342—343 页。

③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 16，第 17 页。

④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 24，第 19 页

⑤ 《左文襄公奏稿》卷 54，第 41 页。

⑥ 《左文襄公文集·奏稿》卷 46，第 46 页。

⑦ 《永昌府文征》卷 36，第 1071 页。

⑧ 《中法战争》第 1 册，第 26 页。

清（后期）

中 法 战 争

中法战争，是法国发动的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

法国对越南的侵略由来已久。17 世纪初，法国第一批传教士即已抵达越南。乾隆二十一至二十八年（1756—1763），英法两国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七年战争，法国失去了它所征服的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北美辖地。此后，为求得补偿，法国就把越南作为它在东方掠夺中的主要目标。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协助镇压西山农民起义为诱饵，法国传教士百多禄代表越南封建势力首领阮福映与法国签订《越法凡尔赛条约》，规定：路易十六派兵援助阮福映。阮则把土伦港（今岘港）和昆伦岛割给法国。但这个条约尚未来得及批准，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嘉庆七年（1802），阮福映攻破西山，占领河内，统一越南，自称越南嘉隆王。他把全国分为三十省，广南、广义两省为右圻，广治、广平两省为左圻，河静以北十六省为北圻，平定以南十省为南圻，都城建在顺化。嘉庆二十二年（1817），法国要求越南履行《越南凡尔赛条约》，被阮福映拒绝。咸丰七年（1857），法国在与英国联合发动侵华

的同时，又派军侵入越南。接着它与西班牙组成联军，对越南发动战争。同治元年五月九日（1862年6月5日），越南被迫与法、西两国签订第一次《西贡条约》，规定：越南把边和、嘉定、定祥三省（南圻东三省）及昆仑岛割给法国；允许法、西两国在越南通商、传教；法国商船、军舰可在湄公河自由航行。同治二年（1863），法国迫使越南交出柬埔寨的宗主权，承认柬埔寨为法国的保护国。同治六年五月二十四日（1867年6月25日），法国宣布吞并永隆、昭笃、河仙三省（南圻西三省）。这样，法国就控制了湄公河三角洲。

法国控制湄公河，目的在于通过该河侵入中国。但是，经过几年的调查，他们发现，湄公河上游（中国境内称澜沧江），滩多流急，航行极为困难，而红河则为中越交通要道，且同湄公河一样直通大海。于是，法国便决定占领北圻，以便通过红河侵入中国西南地区。同治十二年九月（1873年11月），受法国驻西贡总督杜白蕾派遣，安邺率领一支侵略军侵占河内，接着又连陷海阳、宁平、南定等城。越南政府无力遏制法国对越南的侵略，遂邀请驻在中越边境保胜（今老街）地区的黑旗军协助抗法。

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广西天地会起义军的一支，其领袖为刘永福。同治四年（1865），在清军大举进攻下，黑旗军转移到越南境内，后以保胜为根据地，聚众耕牧，势力逐渐发展至二千余人。这时，刘永福接受越南政府的邀请，亲率千余名黑旗军战士，迅速抵达河内城外。十一月二日（12月21日），安邺率法军出城挑战。黑旗军与越南军民联合作战，大败法军，击毙法军头目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战后，越南阮氏王朝一方面授刘永福为“三宣副提督”，由他管理宣

光、兴化、山西三省，以便利用黑旗军阻止法军对红河上游的侵略；另一方面又怕黑旗军的胜利招致法国更大的报复，急忙与法议和。同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1874 年 3 月 15 日），越法签订第二次《西贡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法国不仅攫得越南大量主权，而且还把越南置于法国的"保护之下"。

为实现对越南的占领，并侵入中国的西南地区，光绪八年二月（1882 年 3 月），法国西贡殖民当局派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维业，率侵略军再次侵入越南北圻，三月（4 月）占领河内，次年二月（1883 年 3 月）侵占军事要地安定，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越南封建王朝再次邀请刘永福的黑旗军参战。光绪九年四月（1883 年 5 月），李维业率领侵略军准备进攻城外的黑旗军。刘永福根据越南人民的报告，作了周密的战斗部署。四月十三日（5 月 19 日），当侵略军抵达城西二里的纸桥时，黑旗军伏兵突起，打得法军大乱。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黑旗军战士"极力奋战，直前进攻，势如波涌涛翻，一齐奋臂大呼，枪弹射击，甚似飓风暴雨"①。这一仗从早上 9 点多打到下午 1 点，侵略军司令李维业和副司令卢眉以下 30 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黑旗军大获全胜。战后，越南政府任命刘永福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资产阶级利用李维业的被歼，竭力煽动扩大战争。法国政府继续增兵，分两路向越南进犯：一路沿红河北进，遭到黑旗军和越南军民的英勇阻击，伤亡累累。一路直扑越南都城顺化。光绪九年七月（1883 年 8 月），法国侵略军占领顺化，二十三日（25 日）迫使越南统治者订立了接受法国"保护"的《顺化条约》。

面对法国侵略越南的严重局势，清政府内部对法国出现了

主战与主和两派。主战派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要求援越抗法；主和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退让求和。在两派的影响下，清朝最高决策机关举棋不定，进退两难，既害怕法国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又不敢公开抵抗，得罪法国。其具体表现就是：一方面清政府应越南政府请求，于光绪八年（1882年）以“剿办土匪”为名，派广西军驻扎越南的北宁，云南军驻扎越南的山西，并派人联络刘永福，作出抉心抗法的姿态；但另一方面，又再三谕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同时授权李鸿章乞求英、美出面“调停”，设法与法国谈判。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

法国侵略者一面派人与李鸿章进行谈判，乘机要挟恫吓；一面增派大批海陆军，加快了发动侵华战争的步伐。光绪九年十一月（1883年12月），法国政府决定追加二千九百万法郎军费，增派一万五千名侵略军开赴越南战场。十一月十二日（12月11日），法军六千人在远征军总司令孤拔率领下，突然对驻守在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战争发生后，驻扎越南山西的清军统帅、新任云南巡抚唐炯不战自退，逃回云南。黑旗军奋力抵抗，因寡不敌众，被迫撤出山西，退至保胜。

法军占山西后，无力继续进攻，遂固守山西、河内一线，等待增援部队的到来。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法国援军陆续抵达北圻，使远征军总数达到一万八千余人，炮舰二十余艘。十六日（12日），米乐接替孤拔为远征军总司令。他将法军分为两个旅，分别由副总司令波里也和尼格里指挥，以莫列波约统北圻江防舰队。二月十日（3月7日），法军开始向

北宁发动进攻。此时驻守北宁的清军统帅、新任广西巡抚徐延旭躲在距北宁几百里的谅山，前线将领则遇敌即逃。二月十五日（3月12日），北宁失守；十九日（22日），太原失陷；三月十七日（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至此，除谅山一带尚驻有清军外，越南北部基本上被法军占领。

山西、北宁的失守，在北京引起一片惊慌。为掩饰败绩，清廷将唐炯、徐延旭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慈禧乘机将首席军机大臣奕䜣罢职，以她的妹夫礼亲王世铎领军机处，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实际大权掌握在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手中。然而，这些人当权后，执行的仍是妥协退让政策。法国看准清政府的虚弱本质，乘军事胜利加紧诱和。四月（5月），法国代表福禄诺到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散布投降论调，竟然说："与其兵连祸结，日久不解，待至饷源匮绝，兵心民心摇动，或更生他变，似不若随机应变，早图收束，有裨全局矣。"②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签订《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内容为：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将驻越清军撤回边界（未明确规定期限）。五月十三日（6月6日），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第二次《顺化条约》，再次确定了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

清政府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法国扩大侵略野心。闰五月一日（6月23日），法军向驻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进逼，执行所谓"接防任务"。清军代表严正申明，尚未接到撤防命令，请暂缓进兵。法军蛮横无理，公然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忍无可忍，被迫还击。在两天的战斗中，打死打伤法军近百人，击退了恃强进攻的法军。

事件发生后，法国政府照会清政府，要清军立即从北圻撤走，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同时，法国海军当局命令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强行驶入福州马尾军港和基隆海面，准备扩大战争。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舰队副司令利士比向守卫基隆要塞的清军投递劝降书，要守军交出防御工事。基隆守军拒绝答复。次日，法军向基隆炮台发动猛攻，强行登陆。台湾巡抚刘铭传率部众英勇抵御，毙伤敌军一百多人，击退侵略军的进攻。接着法军集中主力进攻福州。当闰五月下旬（7月中旬）法舰与福建水师同泊马尾军港之际，清军仍丝毫不做战斗准备。闽浙总督何璟"日惟蠖屈署中，拜佛念经，以冀退敌"，福建巡抚张朝栋"亦无御敌之策"；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坐待和局，毫无战志；船政大臣何如璋主管福建水师，竟对敌舰表示"殷切欢迎"，且"严谕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③。七月三日（8月23日），停泊马尾的法国军舰对中国船舰发动突然袭击。在海战中，福建水师官兵英勇奋战，打击侵略者。振威舰在被击沉之际，仍发出最后一弹，击中敌舰。但因清海军仓促应战，中国兵舰相继被击沉十一艘，伤亡将士七百多名，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接着，法国军舰又炸毁马尾造船厂，并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全部予以破坏。

七月六日（8月26日），马尾海战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下诏正式对法宣战，令滇、桂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加强防备，严防法军入侵。法国侵略军则在东南沿海及越南国土上，继续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

八月中旬（10月初），法军再次侵犯台湾。八月十三日

(10月1日)，法军攻占基隆。刘铭传率军退守淡水。清军在当地猎户武装和各阶层人民的支持配合下，奋勇迎击，给敌人以重创，粉碎了法国侵略军侵夺台北的计划。后来，法军又用军舰对台湾进行封锁，企图孤立台湾守军。大陆人民不断冲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向台湾运送物资和援军，大力支持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为打破敌军封锁，在新授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大臣左宗棠、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建议下，清廷遣南洋海军五艘舰艇，执行援台任务。经准备，援台舰艇于十二月三日(1885年1月18日)从上海南下。早已得知信息的孤拔，亲率法舰七艘进行拦击。双方在浙江石浦桧头山附近洋面遭遇后，三十日(2月14日)，法舰在浙江石浦港击沉清水师舰艇两艘。之后，法舰尾追另三艘清舰直至镇海。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28日)，孤拔率法舰四艘侵入镇海海面。清浙江提督欧阳利见下令沉船堵口，命各营严阵以待，援台三舰和原在港内的两艘军舰也均作好战斗准备。自正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3月1日至7日)，守军多次击退法舰的进攻，孤拔坐舰亦被击中，孤拔受重伤。二月十五日(3月31日)，法舰退踞澎湖，孤拔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11日)在此毙命。

在陆路战场上，遵照清廷沿海防御、陆路反攻的方针，驻越南北部的东线桂军在广西提督苏元春率领下，于光绪十年八月中旬(1884年10月初)曾攻占船头(今陆岸)；记名提督方友升及总兵周寿昌等部进占郎甲及其以北地区；广西巡抚潘鼎新则率军驻谅山，以备两路策应。与此同时，西线滇军和黑旗军也已进抵宣光城下。法军方面，波里也于七月十九日(9月8日)接替回国养病的米乐任远东军总司令。他在北圻采取西守东攻的作战方针，即西线坚守宣光、兴化，东线集中兵力

夺取谅山。十二月上旬（1885年1月下旬），法军第一、第二旅主力七千余人，在船头一带集结完毕；十二月二十日（2月4日）开始向清军营地大举进攻。十二月二十九日（2月13日）深夜，法军尚在谅山30里以外，潘鼎新即放弃阵地，狂奔入镇南关（今友谊关），直到离关140里的龙州，才停下脚步。法军在尼格里率领下，于光绪十一年正月九日（1885年2月23日）侵占镇南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法军在炸毁镇南关后，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积蓄力量，准备决战。法军临退时，特在镇南关废墟上竖立一块写着“广西的门户已不再存在了”的木牌，气焰极为嚣张。镇南关周围的中国人民针锋相对，也在关前插立木牌用同样的大字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④

在中越边界战局十分危急之际，年近70岁的老将冯子材来到镇南关。冯子材（1818—1903），广东钦州（今属广西钦县）人，早年曾参加天地会起义，后降清军，官至提督。光绪八年（1882）“称疾”退职。光绪十年（1884），当法军进犯滇桂边境时，他以广东高、雷、钦、廉四府团练督办身份，参加抗法。次年初，经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推荐，冯子材被委以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出任前敌统帅，主持镇南关军务。面对危殆战局，他团结各军将士，整顿部队；构筑工事，在关内十里关前隘，修筑一条三里多的长墙，在东、西两岭设置炮台；派王孝祺、王德榜、苏元春所部驻周围各要地，成纵深梯队防势，准备迎击来犯之敌。二月七日（3月23日），尼格里率法军一万多人，分三路进犯隘口，其中两路攻东岭炮台，一路猛扑长墙。不久，法军攻占东岭三座炮台，并据此向长墙轰击，掩护主力进攻。在此紧急形势下，冯子材激励官兵奋勇杀敌，誓与

长墙共存亡。王孝祺等从小路抄袭敌军背后；苏元春军赶到东岭据守余下的两座炮台；王德榜军攻文渊，切断敌人补给线。八日（24日），法军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时“炮声震天，山谷皆鸣”。敌人在“四山大雾”掩护下，竟抵长墙之下，有的已“越墙而入”⑤。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冯子材大呼一声，手持长矛，率先跃出墙外，杀进敌阵。全军将士异常感奋，也奋勇扑向敌军，展开肉搏，把敌军压下山谷。同时，王孝祺、王德榜和苏元春等联合夹攻东岭法军，将已失之三座炮台全部夺回。九日（25日），冯子材下令发起总攻击。在各路清军勇猛冲杀下，法军大败，一千多名士兵、几十名军官被击毙，尼格里受重伤。在越南人民的支持下，清军先后收复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

与镇南关大捷同时，西线黑旗军和云贵总督岑毓英率领的滇军同越南军民八千余人并肩作战，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也获得重大胜利。

二月十二日（3月28日），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引起法国统治集团极大的恐慌。十四日（30日），巴黎无产阶级和市民举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当天晚上，在议会的谴责声中，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前线的大捷，法国政府的倒台，整个局势对中、越两国人民极为有利。然而，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是利用有利形势扩大战果，反而向法国侵略者妥协了。

早在光绪十年十二月（1885年1月），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就已派其亲信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苏格兰人金登干前往巴黎，同茹费理建立联系，试探中法议和的办法。光绪十一年正月十三日（1885年2月27日），清朝政府正式授权金登

干与法国进行谈判，并签订初步条约。镇南关大捷后，清朝统治者不顾中、越人民取得的巨大胜利，主张“乘胜即收”。这正迎合了处境艰难的法国统治集团的意愿。二月十九日（4月4日），“不胜而胜”的法国和“不败而败”的中国，在巴黎签订停战协定，结束了中法战争。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和法国驻华大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和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法国取得在中国西南开埠通商的特权；以后中国修筑铁路时，应向法国人商办；法国撤走侵入基隆和澎湖的军队。这样，法国侵略者在战败的条件下反而达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从此，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者以越南为基地，将其侵略魔掌伸进了中国的云南和广西。

注　释

①《中法战争》第1册，第267页。

②《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三，第22页。

③《中法战争》第3册，第130—131页。

④《中法战争》第3册，第530页。

⑤《中法战争》第3册，第79页。

清（后期）

甲 午 战 争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这一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故历史上称这次战争为“中日甲午战争”。

19 世纪 90 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已接近于完成，因此，它们之间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也就更加激烈起来。为了夺取称霸远东的基地和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跳板，东北亚的朝鲜就成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的焦点。在英、俄、美、日等国为侵略朝鲜而进行的互相拼搏中，日本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

19 世纪中叶以前，日本还是一个军阀割据、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同治七年（1868），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近代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但是，日本资本主义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国内封建势力在改革后依然大量存在，广大农民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生活十分贫困，无力购买工业品；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工业原料供应困难。为寻求海外市场，掠夺原料，积累资本，日本明治政府从一开始就积

极推行对外扩张政策，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明治初年日本统治者制定的大陆政策，明确指出对外侵略的五个步骤：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为实现这个狂妄的扩张计划，19世纪70年代，日本就在美国支持下，侵略台湾，于光绪五年（1879）吞并琉球，同时积极图谋朝鲜，夺取“渡满洲的桥梁”。光绪二年（1876），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在朝的自由通商权和领事裁判权。光绪八年（1882），日本趁朝鲜发生兵变的机会，胁迫朝鲜签订《仁川条约》，取得在汉城的驻兵权。光绪十年（1884），日本在朝鲜策动开化党发动政变。驻朝清军与朝鲜军民一起攻入王宫，击败日军和开化党。政变被粉碎后，光绪十一年（1885），日本要挟清政府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规定从签约之日起的4个月内，中日两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将来朝鲜遇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必须先行互相知照。这个条约等于承认了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地位。

虽然日本侵略者野心勃勃，但它毕竟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财力、军力都有限，如果不作充分的准备，没有其他帝国主义的支持，要打败中国，侵占朝鲜，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从光绪十一年（1885）开始，日本政府即拟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到甲午战争前，日本建成了一支拥有六万名常备军和二十三万名预备军的近代化的陆军以及一支排水量七万吨的新式海军舰队。在国际上，日本除了得到美国的支持外，还得到了法国和德国的赞许。当时，列强在远东的角逐中，以英、俄矛盾最为尖锐。对此，日本采取了利用双方矛盾，争取两国采取“中立”的外交方针。光绪二十年（1894），

日英订立《通商航海条约》，日本得到英国的同情。俄国虽然不满日本在朝鲜的扩张，但又怕它倒向英国，只好采取“不与日本为敌”、“极力拉拢”的态度。这样，日本在外交方面也争取了发动对华战争的有利条件。

日本在做好战争准备后，于光绪十九年四月七日（1893年5月22日），成立了战时大本营，负责筹划和指挥日本侵略军作战。这样，战争的爆发只是时机问题了。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朝鲜封建统治者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日本政府认为有机可乘，一面怂恿清朝出兵；一面密下动员令，准备大规模武装侵朝，挑起对中国的战争。五月（6月）初，清军一千五百多人开抵牙山以后，日本即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陆续派一万多陆军和几乎全部海军侵入朝鲜，占领从仁川到汉城一带的战略要地。不久，东学党起义军和朝鲜官军达成协定，起义暂时平息。清政府为避免事态的扩大，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军。日本不仅拒绝中国的合理要求，还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实行改革的建议，并且训令其驻朝公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①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驻朝日军闯入朝鲜王宫，劫持国王，另立以大院君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二十三日（25日），大院君按日本意图，与中国断交，并给予日军驱逐中国军队的权力。

在日军步步进逼，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国内舆论和爱国官兵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朝鲜，以实力阻止日本的侵略。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则发生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从改善自身无权地位和维护封建统治阶级

的长远利益出发，顺应舆情，主张抵抗。掌握大清军政大权的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从保持眼前的腐朽统治出发，力求维持和局，苟且偷安。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实际负责军事、外交的李鸿章，为保全北洋陆海军实力和保持北洋地盘，避战求和，对全国各阶层备战拒敌的要求置之不理，而把制止日本的侵略寄托于英、俄、美、法、德等国的调停上，尤其幻想“以俄制日”。在调停的希望落空以后，他仍不积极备战，军事上处处陷于被动。只是由于战争即将爆发和全国主战舆论的压力，李鸿章才不得不作出某种抵抗的姿态，一方面从陆路派军队进入平壤，一方面以重金雇英国高升号等三艘商船从海路运兵增援牙山的中国驻军。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加速了战争的到来。

日本军部事先探知中国运兵船出发的情报，即命令日本舰队集结于牙山口外之丰岛，准备截击。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舰在丰岛海面突袭护送运兵赴朝的中国海军，护送舰广乙、济远两舰受重创，运兵船高升号被击沉，船上士兵七百余人死难。从此，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二十六日（28日），日本陆军向驻守牙山附近成欢驿的清军发动攻击。中国守将聂士成率军与日军展开激战。次日，日军攻陷成欢驿，清军主将叶志超在李鸿章“移扎平壤”的指令下，率军逃跑，牙山失守。七月一日（8月1日），清政府对日本宣战，派兵渡鸭绿江进驻平壤。

牙山战役后，在朝的清军二万多人驻守平壤，由不战而逃的叶志超任各军总指挥。大敌当前，叶志超不作任何战斗准备，终日“置酒高会”，寻欢作乐。日军进攻平壤的前一天，他就主张弃城逃走，被总兵左宝贵强力制止。八月十六日（9

月 15 日)，日军分四路进攻平壤。负责北门的左宝贵，亲自上城指挥，士兵奋勇抵抗，击杀大批日军。日军以排炮轰城，左宝贵不幸中弹阵亡。北门失守后，身为全军统帅的叶志超竟在城头树起白旗，乞求侵略者让路回国。当晚，叶志超率诸将趁夜而逃，“一夕狂驰三百里”，渡过鸭绿江，退至中国境内。中日两国在朝鲜境内的战事就此结束。

平壤战役两天后，日本海军在大东沟以南的黄海海面向北洋海军发起进攻，挑起了黄海海战。

八月十七日 (9 月 16 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大小舰船十八艘护送运兵轮到达鸭绿江口西岸的大东沟。十八日 (17 日) 上午，舰队准备返航旅顺港时，突见西南海面有黑烟一簇，测望来船，共十二艘。丁汝昌立即下令各舰升火起锚，准备迎敌。正午，当双方舰队相距约五千七八百米时，旗舰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首先发令开炮。战斗开始不久，丁汝昌从定远号的飞桥上跌落，负重伤；刘步蟾接替指挥。在激烈的海战中，中国舰队猛轰敌舰，日旗舰松岛以及主力吉野、赤城等舰先后中弹受伤。但日舰凭借其高速的优势，急驶横越中国主力舰定远、镇远两铁甲，绕攻中国舰队右翼，超勇、扬威相继中弹起火，致远、经远被隔在阵外。在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爱国官兵奋不顾身地英勇战斗。致远舰中炮受创，船身倾斜，管带邓世昌认为“倭舰专恃吉野”，即命开足马力冲撞吉野，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 250 人壮烈牺牲。经远在追击受伤敌舰时中鱼雷下沉，管带林永升和官兵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继续开炮击敌，最后全舰二百七十余人除十六人获救外，其余都为国殉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指挥官兵猛击敌旗舰松岛号，使该舰中弹起火，失去作战能力。这场激战历经五六个小时，傍晚，日舰首

先退出战场，北洋舰队也退返旅顺。

在这场海战中，中日参战的军舰数目大致相等，力量对比各有长短，日舰略占优势。交战结果，中国海军损失军舰五艘，日五艘主力舰受重创，中国海军损失较大。但北洋舰队主力尚存，仍可与日再战。而李鸿章经此一战后，为保存实力，故意夸大损失，命令舰队全部躲进威海卫港内，不准再巡海迎敌，造成坐守待毙的局面。

平壤溃败、黄海沉船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莫不义愤填膺，坚决要求抵抗日本的侵略。帝党乘机向后党发动攻势，要求：惩处李鸿章；起用恭亲王奕䜣；停办万寿庆典，分兵三路向朝鲜主动出击。在不利的形势下，后党除薄惩李鸿章、任命奕䜣管理总理衙门和海军事务外，依然采取妥协投降的方针。慈禧太后断然决定"万寿庆典"照常举行，后党官僚则散布妥协论调。同时，他们又施展"以夷制夷"的故伎，请求英国出面"调停"。日本当时在军事上接连胜利，野心勃勃，拒绝调停的条件，继续向中国东北大举进攻，又挑起了辽东半岛战役。

九月二十六日（10 月 24 日），日军分两路进犯辽东。一路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进攻辽东。沿江驻守的四万多清军，除聂士成部在虎山进行了抵抗外，其余皆闻风溃逃。日军接连占领九连城、安东、凤凰城、宽甸、岫岩等地。十一月十七日（12 月 13 日），日军进占海城，进逼辽河。但在各地群众的抗击下，日军妄图进占辽阳、"取奉天度岁"的计划未能得逞。另一路日军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向西侵犯金州，直扑旅顺和大连。旅顺口是北洋海军根据地，设有船坞、炮台，军储非常充足；大连港的防务也十分巩固。十月十日（11 月 7

日），日军分三路进攻大连湾炮台，守将则早在头一天即逃往旅顺，日军未费一枪一弹，轻取大连。二十一日（18日），日军进攻旅顺口。当时有六支清军驻守旅顺，其中五支清军的将领事先逃回天津，只有总兵徐邦道统领的一支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抵抗，给敌人极大挫伤。经三天激战，徐邦道终因没有后援，孤军作战而败，号称"北洋精华"的旅顺陷于敌手。野蛮的侵略军进入旅顺后，对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大肆杀戮，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市侥幸不死的仅有三十六人。

在日军的进攻面前，清政府不是组织军民实行有效的抵抗，反而积极进行求和活动。九月底（10月底），清廷即请美驻华公使田贝求美国出面调停。十月六日（11月3日），总理衙门又召请英、美、德、法、俄五国公使联合调停战事，但因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联合调停未能实现。于是，二十一日（18日），清廷派海关税务司德璀琳携李鸿章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书信，直接赴日本求和。但日本拒绝接纳。在美使田贝操纵下，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0日），清廷又派户部侍郎张荫桓、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使赴日谈判。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七日（1895年2月1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广岛会面，日本代表又以中国代表"全权不足"为由，拒绝谈判。

为迫使清政府完全就范，十二月二十五日（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成山角登陆，攻占荣城，包抄威海卫后路。同时，日本海军又封锁了威海卫。北洋舰队陷于港内，腹背受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五日（1896年1月30日），日军攻占威海卫南北两岸的炮台，之后猛攻港内的中国舰队。北洋将士奋力抗击，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但已无力挽回败局。这时，丁汝昌先命各舰冒死突围，继而下令炸舰沉船。但在舰上

的外国教习、顾问等洋员与一些无耻将领相勾结，拒绝执行丁汝昌的命令，并逼迫丁汝昌向日寇投降。丁汝昌坚贞不屈，最后以自杀殉国。正月十八日（2月12日），洋员浩威假托丁汝昌的名义起草降书，向日寇交出了威海卫以及停泊在此地的十一艘舰艇和各种军用物资。至此，李鸿章经营十几年北洋海军全军覆灭。

威海卫失守后，二月（3月）初，日军在辽河继续发动攻势，先后占领鞍山、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控制了整个辽东半岛。同时，日本海军又攻占澎湖。从此，清政府完全向日本屈服了。

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清政府推行妥协投降路线造成的。它在战前力图避战求和；战争开始以后，虽被迫对日宣战，但自始至终执行的是妥协求和的政策。因此，当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四日（1895年2月8日），日本通过美国传讯清廷同意举行谈判的时候，清政府便立即按照日本的意愿，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二月二十四日（3月20日），李鸿章偕同其子李经方、美国顾问科士达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进行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方态度蛮横，事先已拟好条款，只准李鸿章在“允”与“不允”之间表态。在日本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李鸿章无条件地接受了日本的要求，于二月二十三日（4月17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正约共十一款，其主要内容有：(1) 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实际上是默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2)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给日本；(3) 赔偿日本军费银二万万两；(4) 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工厂；(5) 开放

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因日本占领辽东半岛于己不利，纠合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结果中国以银三千万两向日本“赎回”辽东半岛。

《马关条约》是继中英《南京条约》后最严重的一个卖国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从以商品输出为主的资本主义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从而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也达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

第一，日本割占中国台湾等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南地区和南洋提供了军事基地，并且适应了帝国主义分割世界领土的要求，助长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

第二，允许日本在华投资设厂，反映了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迫切要求。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在中国开设工厂企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动力，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获取高额利润，而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遭到沉重打击，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巨额赔款和赔款利息，其数目超过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倍。清政府为偿付这笔赔款，不得不向列强大借外债，其结果既使清政府进一步受到列强的控制，又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而日本则利用中国的巨额赔款，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加速了它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进程，并逐渐成为侵略中国的最主要的国家之一。

第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这就等于把中国最富庶的长江流域和江浙地区全部开放给外国列强了，因而进一步满足了日本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扩大中国市场

的要求，使它们得以掠夺这一广阔地区丰富的资源，加深中国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

总之，《马关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是一个赤裸裸的卖国条约，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新的枷锁。

注 释

①陆奥宗光《蹇蹇录》中译本，第69页。

清（后期）

反割台斗争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人民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谴责清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拒和废约，抵抗侵略。当时正在北京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光绪，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四川农民起义军发布檄文，反对割台、赔款，要求讨伐外国侵略者。报刊相继发表反对割台，鼓吹抗战的言论，指出："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①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决不允许日本割占台湾的坚强决心。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在此设府，隶属于福建省。中法战争之后，鉴于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清廷又在台湾设省，先后以刘铭传、邵友濂为巡抚。甲午战争爆发后，为加强台湾防务，清政府命广东南澳镇总兵刘永福率兵两营、福建水师提督杨岐珍率兵十营，先后渡台。不久，邵友濂因惧怕日本进攻，设法内调署湖南巡抚，清廷则以布政使唐景崧署理台湾巡抚。唐率一万三千余人守台北，令道员林朝栋统一万二千余人守台中，令刘永福

统八千余人守台南。《马关条约》签订，割地消息传到台湾，当地人民极为愤慨，强烈抗议清廷丧权割地的卖国行径，坚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②清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抗议，竟丧心病狂地要履行割地协议。它复电唐景崧说：“台湾虽重，比之京师则台湾为轻。倘敌人乘胜直攻大沽，则京师危在旦夕。又台湾孤悬海外，终久不能据守。”③正是从维护腐朽统治出发，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八日（1895年5月2日）批准《马关条约》，于四月二十五日（5月19日）任命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于次日又下令唐景崧“著即开缺来京陛见，其合省大小文武官员，并著饬令陆续内渡”④。五月九日（6月1日），李经方偕同美国人科士达抵达基隆海面。次日，在日本军舰上，李经方与日本委任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在“让渡证书”上签字；清政府将“台湾全岛、澎湖全岛之各海口，并各府厅县所有堡垒军器工厂及属公物件”⑤，全部交给日本。中国神圣领土台湾和澎湖全岛就这样被清政府出卖了。

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广大人民决心用生命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五月二日（5月25日），在爱国绅士丘逢甲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台湾绅民千余人列队到巡抚衙门，要求唐景崧主持抗日大计。在绅民的逼迫下，唐一面表示留在台湾坚持抗日，一面又按清廷的命令，掩护大批军政官员包括福建提督杨岐珍及其所属十二营清军，陆续内渡。五月四日（5月27日），日本近卫师团在北白川能久亲王率领下，大举侵略台湾。六日（29日），日本从基隆以东的澳底登陆，旋即占领三貂角。十一日（6月3日），日军攻占基隆。唐景崧携库银乘轮逃回厦门。日军未费一枪一弹，于十五日（6月7日）占台北，于十

七日（6月9日）攻占淡水。驻守彰化的道员林朝栋得知台北危急，速发兵增援，行至新竹，闻台北已失，遂亦逃回大陆。

台北失陷后，台南、台中只有刘永福所部黑旗军和其他少数清军防守。台湾人民在徐骧、姜绍祖、吴汤兴等领导下，纷纷组织义军。经多次集会，台湾绅民共举刘永福任抗日的军政首脑。刘永福接受推举，自任军统，且庄严宣誓："自问年将六十，万死不辞"，"愿合众志成城，执挺胜敌"⑥。署台南镇总兵杨泗洪也表示："甘苦势必同尝，生死有所不计。"⑦决心留在台湾抗战。徐骧则决心，"执挺以为刘公助"，主张军民团结，共抗日寇。

二十日（6月12日），日军分两路进攻通往台中的战略要地新竹。徐骧率义军防守东路，同日军大战于龙潭坡，日军大佐樱井等六十余人被歼，其余逃向大湖口。西路日军于二十一日（13日），进犯大湖口，遭到吴汤兴、姜绍祖所率义军的阻击，因"吴军多山民，善阻击，弹无虚发，日军扑者相继，遂大败退"。第二天，日军得到增援后，向吴、姜义军猛扑，双方激战五昼夜，义军由于饷械不足，退往苗栗；东路义军亦撤至新竹附近的汾头。日军于二十七日（19日）占大湖口，闰五月一日（6月23日）占新竹。为夺取新竹，刘永福派副将杨紫云率新楚军两营与义军协同作战。闰五月十七日（7月9日）晚，杨紫云与徐骧、姜绍祖等分三路反攻新竹。因反攻计划被汉奸密泄日军，故义军进攻受挫。后双方在城东二三里之十八尖山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山头数次易手。姜绍祖率部前来支援，遭敌截击，不幸被俘，在狱中愤然自殉，年仅二十二岁。六月一日（7月22日），敌人调大军进犯，杨紫云力战牺牲，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后退。新竹保卫战经历大小二十余

次战斗，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且牵制日军达两月之久。

新竹失守后，义军退守大甲溪、台中、彰化一线。刘永福派吴彭年率黑旗军两营增援。七月（8月），日军增调两万人到台，向台中地区发动进攻。徐骧、吴彭年商定采取伏击战术，歼灭敌人。七月十一日（8月30日），日军涉水渡大甲溪，甫上岸，即遭吴彭年伏兵的袭击。大队日军纷纷下水往回逃命，又受到徐骧伏军的拦腰截击，被击毙及溺水死者无数。次日，日军集结主力，再度进犯，大甲溪失守，徐骧、吴彭年等退守彰化。七月二十八日（9月16日），日军进犯彰化东门外的八卦山，徐骧和吴彭年率军居高防守，重创敌军。日军在汉奸的指引下，乘夜抄袭徐、彭后路。清军与义军拚死抵抗，伤亡极大，吴汤兴中炮牺牲。吴彭年率黑旗军三百余人，奋力争夺山顶高地，不幸中炮牺牲。徐骧率少数义军突出重围，退往台南，彰化、云林等地相继失陷。这时，刘永福派副将杨泗洪率部开往前线，与当地义军共同阻止日军南犯。从八月初（9月下旬）起，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抗日军民多次打败敌军，杀伤日军近千人，击毙其少将山根信成，收复云林一带，并不断进攻彰化城。但是，由于清政府严禁沿海各省支援台湾人民的抗日战争，因此抗日军民的饷械均极匮乏，抗日斗争陷入困境。八月中旬（10月上旬），苗栗、云林等地再度失陷。

九月十三日（10月30日），日军大举进犯嘉义。守将王德标在城外敌军必经之路预埋地雷，然后派军四出，诱敌至雷区，日军被地雷炸死者达七百多人，其近卫师团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也被炸伤，不久毙命。在残敌仓皇逃命之际，林义成率义军截击，又予敌人以重大杀伤。次日，日军用大炮轰塌城墙，窜入城中，嘉义失陷。在进攻嘉义的同时，日军第二师团

从台南的打狗（今高雄）登陆，然后与从嘉义南进的日军夹攻台南。八月二十五日（10 月 13 日），日军进攻曾文溪。徐骧振臂疾呼："大丈夫为国捐躯，死而无憾!"然后率军与敌决死战，不幸中炮牺牲。二十七日（15 日），敌军南北两路进逼台南。九月一日（10 月 18 日），大批日军进攻刘永福驻守的安平口炮台；时守军饿极不能战。在此严重关头，刘永福抛弃了台湾的抗日军民，于九月二日（10 月 19 日）乘英国轮船返回厦门。九月四日（10 月 21 日），台南陷落。

从光绪二十一年五月至九月（1895 年 6 月至 10 月），台湾军民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抗击日本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前后接仗百余次，消灭日军侵台主力近卫师团将近半数，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也重伤毙命。台南失陷后，日寇虽暂时控制了台湾，但在此后五十年间，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从未止息，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顽强斗争精神和伟大力量。

注 释

①《申报》1895 年 7 月 15 日。

②《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203 页。

③《中日战争》第 6 册，第 385 页。

④《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 3229 页。

⑤《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 1980 年版，第 3 卷，第 47 页。

⑥《中日战争》第 1 册，第 204—205 页。

⑦《中日战争》第 6 册，第 457 页。

清（后期）

瓜分危机

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在侵华列强的营垒中引起普遍的震动，大大加速了它们激烈争夺中国的步骤。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强租港湾，划分势力范围，使中国迅速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机。

最早发出瓜分中国叫嚣的是沙俄。甲午战争尚未结束，俄国资产阶级的喉舌《新闻报》，就鼓吹利用中日战争的"大好时机"，"干净利落地解决中国问题，由欧洲几个主要国家加以瓜分"①。为争夺我国东北地区，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俄国政府向法、德两国建议，由三国联合迫使日本作出让步。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的"友谊劝告"，限15日内答复。接着，三国军舰相继出动，在中国沿海和日本海游弋，对日本进行威胁。日本经过8个月的对华战争，已无力同三国对抗；请英、美出面阻止三国的干涉，又遭拒绝。于是本着"对俄、德、法三国完全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

让”②的方针，在私下讲妥中国必须增加赔款后的条件下，四月十一日（5月5日），日本政府向三国声明：接受三国政府之“友好忠告，放弃永久占领辽东半岛”③。九月二日（10月19日），三国和日本在东京成立协定，确定中国向日本交纳赎辽费白银三千万两，俟中国支付此项赔款后三个月内日军退出辽东半岛。九月二十二日（11月8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董林签订《辽南条约》和《议订专条》，完全承认了三国与日本签订的协定。

三国干涉还辽，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开端。此次事件尚未结束，法国即首先向中国索取报酬。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十四日（1895年5月8日），法国外长向中国驻英法两国公使龚照瑗表示，法国屡次“帮助”中国，但是中越边界和边界通商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应立即磋商通融办法。清政府不敢拒绝，遂于五月二十八日（6月20日）与法国签订《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主要内容包括：（1）中国将云南边境上的猛乌、乌得、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各处划归越南；（2）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河口、思茅四处通商；（3）中国将来在云南、广东、广西三省开采矿产时，“可先向法国厂商及矿师人员商办”；（4）法国取得将越南铁路接至中国境内的权利④。从此，法国势力进一步侵入我国西南地区。

俄国是对日干涉的首领，因而它索取的报酬也就更多。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沙俄即以“还辽有功”相要挟，首先取得俄舰在胶州湾过冬的权利。时沙俄拟将正在修建的西伯利亚铁路赤塔以东一段，改经中国东北直达海参崴，因此迫切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达到借地筑路的目的。于是，它借沙皇尼古拉

二世举行加冕典礼之机，指名让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往贺。在沙俄的威胁利诱下，李鸿章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6月3日），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莫斯科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六条。其主要内容有：（1）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粮食和军火；（2）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地方官应协助供应；（3）中国允许俄国于黑龙江、吉林两省地方修建铁路以达海参崴，该路建筑、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4）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可使用该铁路运送军队、粮食及军需品。八月二日（9月8日），中国驻俄、德、奥、荷公使许景澄在柏林又与华俄道胜银行签订《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简称《中东铁路合同》），决定设立名为中俄合办、实由俄国独揽大权的“中国东省铁路公司”。通过该章程沙俄不仅取得通过中东铁路送运海陆军及军火的特权，而且还攫取了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区的行政权、警察权、采矿权和贸易减免税厘等特权，实际把铁路沿线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国的行动，加剧了列强对中国的争夺。从光绪二十三年（1897）开始，列强在中国进一步掀起了强租沿海港湾、划分势力范围、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为在远东攫取海军基地，德国在甲午战前就企图霸占胶州湾。光绪二十二年十一月（1896年12月），德国向清政府正式提出租借该地的要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1897年11月1日），德国两名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巨野被杀。德国以此为借口，于十月二十日（11月17日）派军舰驶入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强占胶州湾沿岸各地。在德国的胁迫下，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1898年3

月6日)，李鸿章、翁同龢代表清政府同德国驻华公使海靖在北京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 德国租借胶州湾及湾内各岛九十九年，租期内胶州湾归德国管辖；(2) 允许德国修筑由胶州经潍县到济南和由胶州经沂州、莱芜到济南两条铁路，并享有铁路沿线30里内地区的开矿权；(3) 胶州湾沿岸潮平一百里内，划为“中立”地区，德国官兵有权自由通行，清政府在该处“派驻兵营，筹办兵法”，须先与德国会商办理；(4) 山东省内任何工程需用外国人员、资本、器材时，应首先与德商商办⑤。这样，山东全省就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俄国乘德国占领胶州湾之机，决定趁火打劫。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97年12月15日)，沙俄以防止英、日、德等国侵略东北、“保护中国”为由，派军舰强占旅顺口、大连湾。在俄国武力威协下，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六日(1898年3月27日)，李鸿章、张荫桓与巴布罗福在北京签订《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5月7日)，双方在彼得堡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其主要内容有：(1) 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面租与俄国，租期二十五年，租地北界从辽东西岸亚当湾之北起，穿过亚当山脊(山脊也在俄国租地内)，至辽东东岸皮子窝湾北尽处止，在租期内租地完全由俄国管辖，中国不得在界内驻军；(2) 中国允准东省铁路公司由中东路干线某站(后确定为哈尔滨)起，筑一支线到大连湾，必要时可展至营口与鸭绿江口之海岸，并规定“所有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日中国政府与华俄银行所立合同内各例，宜于以上所续支路确切照行”；(3) 租地以北，划一“隙地”(即中立区)，隙地北界从辽东西岸盖州河口起，经岫岩城北至大洋河，沿河左岸至

河口（几乎包括了整个辽东半岛），非经俄国同意，中国不得将隙地内之铁路、开矿及其他工商利益让与他国⑥。从此，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继德、俄之后，法国也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1897年3月15日），在法国要挟下，总理衙门照会法国公使，同意不将海南岛割让与其他国家。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日（1898年4月10日），清政府又照会法国公使，承诺"无论永暂，无论租借或以其他名义"，均不将与越南毗邻的中国诸省地方全部或一部让与他国，即不把云南、广东、广西三省让与他国；允准法国修建自越南边界与昆明的铁路；中国将广州湾租与法国⑦。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四日（1899年11月6日），清政府与法国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规定广州湾租与法国，租期99年，租借期内广州湾"全归法国一国管辖"；法国有权修筑从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⑧。从此，法国在中国南部的侵略势力大为增长。

英国是鸦片战争以来在华攫得权益最多的国家。甲午战后，英国为保持和扩大它在华的侵略权益，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侵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及《西江通商专条》。《附款》主要内容是：（1）修改了光绪二十年（1894）拟定的中缅边界线，将昔马、北丹尼、科干等处划给英国，南坎地区"由中国永远租与英国"；尖高山作为未定界，为其日后侵占片马等地区埋下了伏笔；（2）规定中国事先未与英国议定，不得将湄公河西岸之洪江地区和孟连地区（与猛乌、乌得等地毗连）让与他国；（3）中国将来如在云南修筑铁路，允与缅甸铁路相接。《专条》规定，广西梧州、广东三水

县江根墟开为通商口岸；江门、甘竹滩、肇庆、德庆四处作为停泊船只，上下客货的码头⑨。这样，西江成为香港联系两广的大动脉，加强了英国对两广贸易的控制。在英国的胁迫下，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一日（1898 年 2 月 11 日），总理衙门照会英国公使，保证断不将长江沿岸地方“让予或租给他国”⑩。为在南方同法国相抗，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2 年 6 月 9 日），李鸿章、许应骙代表清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签订了《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将深圳河以南、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地区及深圳湾、大鹏湾水面租借给英国，租期九十九年⑪。为在北方对抗沙俄，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1898 年 7 月 1 日），庆亲王奕劻、刑部尚书廖寿恒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又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岛屿租借给英国二十五年⑫。这样，无论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还是在长江流域地区，英国的侵略势力都进一步得到扩大。

日本并不满足在甲午战争中从中国攫取的大量侵略权益，极力要将其侵略势力伸向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日（1898 年 4 月 22 日），日本迫使清廷“声明不将福建省内之地让与或租与别国”⑬。从此，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帝国主义在激烈争夺中国的过程中，为了缓和彼此间的矛盾，又通过谈判，达成暂时的妥协。光绪二十三年（1896），英法成立协议，规定在四川、云南两省已经取得和将来得到的一切权利，由英、法两国共同享受。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德订立协定，规定天津到山东南境的铁路，由德国建筑；山东南境到镇江对岸的铁路，由英国修建。光绪二十五年

(1899)，英俄又达成协议，互相承认长江流域各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长城以北地区为俄国势力范围，宣布彼此不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向清政府索取铁路修筑权，不直接间接妨碍对方的利益。这样，通过清政府对某一国家宣布某些特定地区不割让与他国，以及列强相互之间的协议，东北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山东成为德国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各省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福建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广东、广西、云南成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民族危机。

当列强在中国疯狂地分割势力范围的时候，美国正忙于准备和从事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因而没有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取得关岛和菲律宾，在西太平洋建立了侵略中国的基地。为扩大在华的侵略势力，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日（1899 年 9 月 6 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正式提出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训令美国驻英、俄、德、日、意、法六国使节分别向驻在国政府提出关于对华“门户开放”宣言的照会。其主要内容是：(1) 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投资和既得利益，其他国家不得干涉；(2) 各国对运往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货物，均由中国政府按照中国现行关税率征税；(3) 各国对于进入自己势力范围各口岸的他国船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之港口税；当他国使用自己所修或所经营控制的铁路运输货物时，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商品的铁路运费。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美国的这个政策，是在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的前提下，使美国享有均等的贸易机会，以便凭借自己经济上的实力，逐步排挤其他列强，最后达到独占中国

的目的。对其他帝国主义来说，因为当时谁也无力独吞中国，都需要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所以列强均相继接受了这一政策。因此，“门户开放”政策，既是美国加紧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步骤，又使帝国主义各国结成了侵略中国的同盟。

注 释

①鲍·亚·罗曼诺夫《日俄战争外交·史纲（1895—1907年）》第44页。

②陆奥宗光《蹇蹇录》第165页。

③《日本外交文书》卷二八，第787号文件。

④《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21—625页。

⑤《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38—740页。

⑥《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41—742页、754—755页。

⑦《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43—745页。

⑧《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929—930页。

⑨《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686—690页。

⑩《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31—732页。

⑪《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69页。

⑫《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82页。

⑬《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750—751页。

清（后期）

戊戌变法

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资产阶级维新派推动下，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运动在中国蓬勃开展起来。这一年是中国农历戊戌年，故称其为戊戌变法或戊戌维新。这场运动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维新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资产阶级的维新思想，是伴随着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而逐渐发生和发展起来的。70年代，一部分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面对严重的内忧外患，开始酝酿并提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现状的主张。但这时他们还没有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划清界限。中法战争失败后，随着外国列强侵略日益加深和洋务运动的开始破产，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显著增多。他们开始公开批评洋务运动，强烈要求抵御外国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积极主张发展民族工商业，并且认为只有学习西方进行社会改革，改变腐败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才能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

抵抗外国的侵略，中国才能有出路。这样，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就在社会中形成了。在七八十年代，代表这种思潮的主要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汤震、陈虬、陈炽、何启、胡礼垣等人。而康有为则进一步发展了这种维新思想，创立了系统的变法维新理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青少年时代，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博通经史。但是，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的动荡不安，他逐渐认识到那种脱离国计民生的封建文化已不能应付社会大变动的局面。光绪五年（1879），他游历香港，初步接触到资本主义文明。后来，他又从中国早期维新派和外国传教士的许多译著中接受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要优越，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衡量它们了。他认为中国要想摆脱民族危机，走向独立富强，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改变现状，变法维新。中法战争以后，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日渐成熟。光绪十四年（1888），他利用在北京参加乡试的机会，第一次给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主张，劝光绪帝及早变法图强，以挽救国家的危亡。这封上书由于封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送到皇帝手中，康有为也被主考官徐桐斥为"狂生"，被取消录取资格。但通过上书，维新思想得到进一步传播，康有为开始名扬海内。

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回到广东。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学馆，招生讲学，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骨干力量，著名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麦孟华等人。同时，他又着手研究理论并从事著述，为变法维新创立理论根

据。从光绪十六年至十九年（1890—1893），康有为在梁启超等弟子的协助下，先后完成《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部重要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理论根据。

《新学伪经考》，共十四卷，初刊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这部书中，康有为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用历史考证的方法，论定自东汉以来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神圣经典的古文经，都是王莽的国师刘歆为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制造理论根据而伪造出来的。因此，古文经典统统是伪经，是“新朝”之学。从学术上看，康有为把古文经一概说成是伪造，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但他的大胆议论在当时的政治思想领域却产生了犹如“飓风”一般的震动。首先，他公然宣布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社会上“无一人敢违者，亦无一人敢疑者”的古文经是伪造的，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清朝正统学派的根基，有助于知识分子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探求与接受新思想。第二，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顽固派“述而不作”、“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为维新派的“因时变革”的政治主张提供了理论依据。

《孔子改制考》，共二十一卷，写于光绪十八年（1892），初刊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这部书详尽论述了“托古改制”思想和历史进化论观点。康有为认为，包括孔子在内的先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他说，“六经”就是孔子为改变当时社会状况，按照自己的政治观点，假托古圣先王尧、舜的言论而制订的。在这里，康有为是在充分利用孔圣人的权威来论证自己的“布衣改制”权利，从而排除顽固派用“非圣无法”的旗号反对变法的阻力。在《孔子改制考》这部书中，康有为还依据今文学派的理论，充分发挥“通三统”、“张三世”的学

说。所谓“三统”，是说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变通因革；所谓“三世”，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经“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愈变愈进步，绝非人力所能阻止。他利用自己接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附会“三世”说，提出“据乱世”就是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就是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就是民主共和时代。康有为的这种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不变论和“治乱相循”的历史循环论，论证了变法和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总之，康有为在这两部著作中，以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和自由平等学说为武器，系统论述了变法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为行将到来的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甲午战争及中国在战争中的惨败，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为“救亡图存”，全国人民都积极行动起来了。光绪二十一年二月（1895 年 3 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时，甲午战争即将结束，李鸿章正在马关与日本议定投降条约。三月二十一日（4 月 15 日），《马关条约》的内容和即将签字的消息传到京师，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无比义愤。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纷纷上书都察院，要求清政府拒绝签订可耻的卖国条约。全国人民以及士子们的爱国热情，使康有为受到极大鼓舞。他决定联合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造成声势。经过广泛联络，一千三百多举人在康有为起草的上皇帝书（第二次向皇帝上书）上签了名，并于四月八日（5 月 2 日）递交都察院。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在痛陈民族危亡的严重局势后，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请求光绪皇帝当机立断，

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①四项大计。他认为，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之谋”，只有第四项即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这次上书，虽然因都察院拒绝接受，未能送到皇帝手里，但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上书，坚决要求抵抗帝国主主侵略，保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希望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让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分享一部分政治权力，这无疑是有利于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性质和进步意义的。这次事件，实际上是康有为领导下的知识分子的大请愿运动，它冲破了清政府规定的士人不许干政的禁令，标志着长期酝酿的维新思潮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群众性的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它成了变法维新运动的起点。康有为的万言书虽未上达，但它的全文已辗转传诵，风行一时。上海、广州等地还特地为此刊印《公车上书记》，广为宣传。这就有力的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发展，而康有为也因此成了全国瞩目的维新派领袖人物。

“公车上书”次日，会试榜发，康有为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同年五月六日（5 月 29 日）和闰五月八日（6 月 30 日），康有为又连续向皇帝上了第三书和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必须尽快变法维新的道理。并在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帝读到第三书，阅后“极嘉许”，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接着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亲自接见康有为，进行了长达五小时谈话，商讨变法事宜。其他帝党官僚如孙家鼐、文廷式、杨深秀等也开始与康、梁密切往还，时相过从。这样，维新派就取得了皇帝的支持，并与帝党结合起来，因而加速了维新运动的发展。

“公车上书”以后，维新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

面继续向皇帝上书，力促光绪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加紧对官僚和知识分子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广造舆论，厚集力量。这些宣传组织工作主要是成立学会、出版报刊和兴办学堂。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梁启超首先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十一月一日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编辑文稿，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经康有为的奔走联络，十月初（11月中旬），维新派联合帝党官僚文廷式等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讲演，介绍西学。不久，康有为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十一月二十八日（1896年1月12日），出版《强学报》。虽然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十二月六日（1896年1月20日）北京强学会被劾，遭封禁，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强学报》也于第三号终刊，但维新派却由此为议论时政的风气，打开了局面，已经兴起的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更加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上海，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一日（1896年8月9日），黄遵宪、汪康年等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负责撰稿与编辑。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少年时代即熟读经史，十四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后来，他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广泛阅读中外各种书籍，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成为康有为最得力的助手。梁启超在主持《时务报》期间，以充沛的爱国热情，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论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对维新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他所撰的《变法通议》一文，在《时务报》连续刊载，影响尤为巨大。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到一万七千份，创国内报纸发行数字的最高纪录，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的喉

舌。

在湖南，变法维新运动在谭嗣同、唐才常的积极活动下迅速开展起来。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少年时随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学习，钻研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后游历南北各省，既饱览大好河山，又目睹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逐渐产生了爱国思想。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使他走上爱国救亡的道路。光绪二十二年二月（1896年3月），他在北京结识梁启超等著名维新派，开始投身于变法维新活动。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谭嗣同写成《仁学》一书，以资产阶级的民权思想，阐述国家和阶级的起源，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以及纲常名教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号召“冲决”一切封建“网罗”。就在这一年，他与唐才常、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督学江标相结合，先后创办《湘学新报》（后改名《湘学报》）、长沙时务学堂，宣传变法，培养维新人才。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一日（1898年2月21日），谭嗣同与唐才常又在湖南建立南学会，创办《湘报》。在变法维新运动中，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在天津，光绪二十一年（1895），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就开始了变法维新的宣传鼓动工作。严复（1853—1921），字几道，号又陵，福建侯官人。同治五年（1866）考入福建船政学堂，光绪二年（1876）赴英国学习海军，光绪五年（1879）回国后，长期担任天津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和总办（校长）。甲午战争后，鉴于形势危迫，严复在天津《直报》上接连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重要论文，宣传维新，鼓吹改制。严复对翻译西书极为重视，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

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当时，影响最大的是他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天演论》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论文集《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它》中的前两篇。在译文中，严复特别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认为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同样是个生存大竞争的场面，弱国如不奋发图强，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弱肉强食”、“弱者先绝”的厄运。这种观点用生物进化论代替阶级斗争学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错误的。但严复是在中国面临被瓜分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呼吁人们不甘作“劣等民族”，而应学习西方，“与天争胜”、“自强保种”，挽救祖国的危亡。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变法图强的觉醒。所以，《天演论》出版后，立即风行全国，不仅成为维新派提倡变法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中国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扩大变法思想的传播，光绪二十三年(1897)，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并立即连续刊载《天演论》。《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成为维新派南北两大喉舌，居于舆论界的领导地位。

除北京、上海、湖南、天津以外，在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报刊、学会和学堂。据不完全的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1895—1897)，全国建立的学会33个，新式学堂十七所，报刊十九种。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以上。所有这些，都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扩大了变法维新思想的阵地，预示着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

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洋务派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但在维护封建君主专

制制度和纲常名教这一根本问题上和顽固派是一致的，他们结合起来，共同反对维新派。这样，就形成了维新思想同封建顽固思想、洋务思想的尖锐对立，并展开了激烈的思想论战。论战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洋务派为维护反动的封建生产关系和腐朽的封建统治，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坚决反对变法。荣禄气焰嚣张地说：“祖宗之法不能变。”大学士徐桐甚至喊出：“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只主张改变一些枝节问题，而根本反对改变封建制度。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不变论，维新派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们一致认为，不断变化和发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用梁启超的话来说就是：“变者，古今之公理”，如果停止变化，“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守旧不可，必须变法，“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②。针对洋务派的观点，康有为指出：清朝的统治已经是粪墙、朽木，千疮百孔，必须以开创的精神进行全面改革，洋务派徒事弥补，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顽固派和洋务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维新派提倡民权，设立议院，使民有权而君无权，不合君为臣纲的纲常伦理，是离经叛道，“用夷变夏”，其结果将使犯上作乱者日多，陷国家于大乱。维新派用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的思想，批驳了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他们指出：“人人皆为天所生，人人皆为天之子”，

“人人独立平等”。因此，国家亦不是“君相之私产”，而是“国民之公器”，只有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维新派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走向富强的根本原因，在于“兴民权”、“开议院”；中国衰弱的根源则在于实行君主专制，“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据此，他们得出结论：“能兴民权者，断无可亡之理。”中国只有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合举国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才能无敌于天下。

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提倡西学的问题。顽固派从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出发，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拚命反对新学、西学。洋务派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样把封建的纲常名教作为根本。他们都反对宣传和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针对顽固派、洋务派的谬论，维新派给予了有力地批驳。他们批评八股取士是“谬种流传”，有锢闭智慧、败坏心术、助长游手好闲等三大害，而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中国。维新派对旧学、中学也作了一些批判，认为宋学、汉学、词章之学，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都应束之高阁。他们批评洋务派仅袭西方资本主义的皮毛而排斥西学，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维新派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富强，“不在炮械军器，而在穷理劝学”。因此，他们主张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政治学说，希望通过这种办法，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

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这次论战，是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尽管在论战中，维新派本身存在着不少弱点，如他们所主张的变革只是“渐变”，不是“突变”；他们所说的“民权”，也只限于让资产阶

级和部分士绅参政；他们批判封建主义文化，却不敢批判封建文化的总代表孔子。但是，通过这场论战，维新派反复说明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为武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了君主立宪的要求，初步介绍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民主思想，使若干知识分子开始摆脱一些封建思想的束缚，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的高涨。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897 年 11 月），德国强占胶州湾。接着，帝国主义各国纷纷在中国强租海港，划分势力范围。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把变法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

为促使光绪皇帝决心变法，从光绪二十三年底到二十四年初（1897 年底到 1898 年初），康有为又连续三次上书光绪帝（即上皇帝第五、六、七书），同时把自己编写的《日本明治变政考》和《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两部书，一并递呈。在上皇帝第五书中，康有为痛切地陈述了当时国内外的严重形势。他指出，从国外来说，“日本议院日日会议，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瓜分中国为言”③。“譬犹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从国内来说，也已“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他警告光绪帝，面对这种局势，如果还不发愤变法，革旧图新，“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④。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八日（1898 年 1 月 29 日），康有为呈递上清帝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三项变法措施：“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

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⑤这便是维新派新变法的施政纲领。这次上书，未提开国会、立宪法，而强调“以君权变法”，表明维新派在顽固派的强大阻力面前，妥协、退让的软弱性。

康有为在不断向光绪帝上书的同时，仍继续在士大夫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他联络广东旅京人士成立粤学会。不久，关学会、闽学会、蜀学会等相继成立。三月二十七日（4月17日），在康有为的倡导下，由帝党官僚、御史李盛铎出面，联合各省学会及正在北京应试的举人，成立“保国会”，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在成立大会上，康有为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人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在听者当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保国会之后，保浙、保滇、保川等会相继在北京建立。维新派的力量和影响进一步扩大了。

民族危机的严重，全国沸腾的救亡热潮和日益发展的变法维新运动，对清廷产生了重大影响。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及顽固派，坚决反对变法，但在群情激愤的形势下，采取了表面暂时容忍，暗中加紧部署，俟机扼杀变法的策略。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张接受维新派的建议，实行变法。胶州湾事变后，光绪帝极为忧虑，表示“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作亡国之君”。他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感动，说是除非不顾生死的人，“不敢为此也”。有人攻击“保国会”是“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驳斥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至此，光绪帝决心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上谕，宣布开始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

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共进行了一百零三天，所以历史上称这次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在这期间，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按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愿望和要求，不断向光绪提出改革的建议，然后光绪有选择地采纳其中一些主要意见，通过颁布诏书的办法，命令各地施行。在一百零三天中，光绪帝共颁布一百多道变法诏令。主要内容有：

经济方面：中央设立铁路矿务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商办各种实业，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的发展；兴办商会、农会等民间团体；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政治方面：允许官民上书言事；改革律例，裁撤冗员，澄清吏治。

军事方面：裁汰绿营、练勇，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采用西洋兵制；筹办兵工厂，添练海军。

文化方面：普遍设立中小学堂，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设立翻译局，翻译外国书籍；准许创立报馆、学会；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派人出国游历、游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

这些新政措施，既未触及封建专制政体，也未触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是很不彻底的。但是，通过改革，在政治上给予人民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经济上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文化教育上也采取了一些打击封建旧学，提倡新学的措施。因此，这次改革，实质上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变法法令的颁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实上，在这一百零三天中，北京、上海和一些省会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士大夫上

书言事的多起来了，各地出现了许多新书、新报，各省陆续建立了一些中小学堂，工商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正因为如此，这次改革也就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疯狂反对。

变法维新运动的过程，始终是维新派联合帝党与顽固派和后党斗争的过程，这种斗争在百日维新期间尤为激烈。顽固势力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微小的社会变革，都会使他们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所以他们竭力破坏新政。掌握军政实权的中央部院大臣和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对新政诏令，一律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拒不执行。他们集结在慈禧太后的周围，暗中部署力量，伺机对维新派进行血腥镇压。光绪帝下诏变法的第五天，即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1898 年 6 月 15 日），慈禧太后即强迫光绪连下三道谕旨：一是免去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其驱逐回江苏原籍，用以孤立光绪帝；二是凡新授二品以上的官员，要到太后面前谢恩，以此控制用人大权，使光绪无法破格提拔维新人士；三是任命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几天后又实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由聂士成、董福祥、袁世凯分领的北洋三军，从而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兵权。同时，慈禧太后又派亲信控制了京师及颐和园的警卫权；派爪牙进入皇宫，严密监视光绪帝的言行。这些行动表明，新政刚开始，顽固派就已作好了政变的准备。

面对顽固势力的阴谋活动，维新派和帝党当然不能束手待毙。但他们一无兵，二无权，又脱离群众，所以只能采取极端软弱的对抗措施。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上不开罪于太后，在下不激怒守旧大臣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但是，即使这样，顽固派也仍然不能容忍。七月中旬（9 月初），双方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七月十九日（9 月 4 日），光绪下令将公

然破坏维新法令、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六堂官全部革职。二十日（5日），光绪又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以四品卿衔任军机处章京，负责起草新政诏书，批阅变法奏章。这些措施引起顽固派的更大仇恨，内务府官员数十人环跪太后面前失声痛哭，攻击光绪，恳求皇太后临朝“训政”；荣禄则加紧调兵，控制京津间的交通要道。在这万分紧急的形势下，光绪于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日（9月14日、17日）连续给康有为等发出两道密诏，要他们想办法挽救危局。八月三日（9月18日），康有为召集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商对策，决定由康有为求见英国公使，希望帝国主义出面干涉；由谭嗣同于当夜密访袁世凯，劝袁勤王，杀荣禄，除旧党。袁世凯（1859—1916），河南项城人。中日战争前曾随军驻朝鲜，光绪十一年（1885）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后曾参加强学会，进行投机。变法开始后，光绪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于八月一日、二日（9月16日、17日）两次接见袁世凯，赏他侍郎头衔，委以专办练兵事务。三日（18日）夜，谭嗣同把杀荣禄的计划告知袁世凯后，袁世凯一面假装答应，一面即向荣禄告密。此时，康有为等分头到英、美、日等驻华公使馆联系，幻想争取他们出面帮助，但均无结果，幻想终成泡影。

在帝后两派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八月四日（9月19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皇宫，密作政变准备。六日（21日），慈禧太后正式发动政变，将光绪囚禁于南海瀛台，宣布重新“训政”，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这时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帮助下逃往日本。谭嗣同在政变发生后，积极设

法营救光绪。很多人劝他逃往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⑥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一同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人士和支持变法的官吏数十人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以外，先后被全部废止，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戊戌变法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动的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第一，在运动中，维新派通过上书、著作和演说，反复向人们陈述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在维新派看来，救亡图存是变法维新的出发点，而变法维新的目的则在于争取中国的独立。因此，这场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性质，从而就大大提高了人们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觉悟。第二，在整个运动过程中，维新派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弊政，促进清政府第一次明令承认民族资本企业的合法性，并通过皇帝多次发布上谕，要求各级政府对这些企业加以鼓励和保护。应该说，光绪二十一年（1895）以后，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得到某种程度的发展，是与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分不开的，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权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且还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提供了更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三，在运动中，维新派冲破清政府的禁令，初步争得言论、出版、结社等民主权利，为民主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在批判封建思想的同时，比较广泛地介绍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以及自由、平等的思想，

开始在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过去，人们不敢议论时政、公开批评清政府，而在运动中，不少人大力鼓吹变法，在报纸上和学会、学堂里公开讨论和宣传民权、进化等学说，这就大大推动了人们从封建主义思想下解放出来的步伐，从而为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首先，维新派要改革封建制度，发展资本主义，但却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和少数封建官僚、军阀，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不仅未根本触动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且还处处向守旧势力妥协、退让。第二，维新派大力宣传救亡图存，争取中国的独立，但又幻想帝国主义帮助、支持中国的变法维新。第三，维新派本身力量弱小，又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甚至对群众斗争抱敌视态度。因此，当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反扑时，他们一触即溃，很快败下阵来。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确立的历史条件下，依靠清朝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是行不通的。

注　释

①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册，第133页。

②《戊戌变法》第2册，第197页。

③《戊戌变法》第2册，第189页。

④《戊戌变法》第2册，第190页。

⑤《杰士上书汇录》卷一。

⑥《戊戌变法》第4册，第53页。

清（后期）

教案之迭起

教案，即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或耶稣教及其它一些较小的教派）侵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而酿成的事件。

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是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时称景教，至唐武宗时被禁止流传。元朝建立，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但随着元朝被推翻，其活动亦随之销声匿迹。明末清初，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加紧向东方扩张，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至康熙末期、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采取禁教措施，教会势力遭严重打击。但教会活动并未因此而终止，只是从公开转入秘密活动，其势力也在继续发展。据统计，到道光十九年（1839），天主教欧籍传教士六十五人，活动在中国十三个省区，有中国教徒约三十人。俄国东正教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被赐在北京建“尼古拉教堂”，从康熙五十四年至咸丰十年（1715—1860），沙俄政府先后派十三批东正教传教士到北京活动。由于他们主要任务在为沙皇政府殖民政策效劳，而不在传教，故到咸丰十年止，东正教在华神职人员达一百五十

五人，中国教徒却只有三百多人。欧美耶稣教传教士于嘉庆十二年（1807）来到中国，在澳门、广州秘密传教，积极参与西方国家的侵略活动，鼓吹发动侵华战争。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侵略者迫使清政府承认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各种特权，于是大批传教士涌入中国内地和边疆、城市和乡村。随着列强政治、经济侵略的深入，外国教会在中国的侵略活动也日益猖獗。到19世纪末，天主教、耶稣教、东正教在中国的外籍传教士达三千三百多人，从北京到穷乡僻壤，建立起数千座教堂，招引中国入教者八十多万人。各地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俨然凌驾于地方官之上，“辄与各省大吏抗衡”；许多教堂私建武装，构筑堡垒，自定法律，暗设牢狱，“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①，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不但从事在精神上奴役中国人民的传教活动，而且还以宗教为掩护，搜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充当各自政府的间谍和谋士。他们在各地勾结土豪恶霸，霸占土地，收租放债，敲诈勒索，包揽词讼，鱼肉中国人民。外国教会的种种罪恶勾当，使中国人民受到奴役和迫害，这就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和反抗。从咸丰十一年（1861）贵州人民揭起反洋教斗争的义旗，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运动前夕，全国人民反教会侵略斗争大小达四百余起，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咸丰十一年（1861）贵州教案起，到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止，是反教会斗争的初期阶段。在这一时期，不仅广大群众，而且地主士绅、封建官吏都卷进了斗争的行列；贵州、湖南、江西、四川、天津等处教案，影响最大。

首先是贵州教案。早已潜入贵州的法国天主教主教胡缚理，于咸丰十一年二月（1861 年 3 月）收到法国驻华公使寄来的“传教士护照”后，竟然乘坐紫呢大轿，由一百多人组成的仪仗队前呼后拥去拜会巡抚和提督，以取得当局对其他位和权益的正式承认。这一举动，激起绅民公愤。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恕致函全省官吏，要求随时驱逐入境的传教的外国人。五月五日（6 月 2 日），贵阳附近青岩镇民众依民俗举行“游百病”活动，与当地教士发生冲突。民团首领赵畏三派团丁焚毁冕家关教会学堂，捕杀教民四人。同治元年（1862）春，法国教士文乃耳在开州（今开阳）唆使教民拒缴元宵捐款，开州知府戴鹿芝遂以“破坏礼俗”为理由，将文乃耳等四人处死。法国公使借机“肆意咆哮”，提出巡抚革职、提督处斩、总督赔礼等无理要求。双方经一年多的交涉，最后清政府在法国战争恫吓下，被迫于同治二年（1863）将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时何冠英、戴鹿芝已病故），提督衙门拨给胡缚理作教堂，赔银一万二千两，处死无辜百姓八人结案。

咸丰十一年（1861），法国传教士依据《北京条约》允许教士到内地自由传教的规定，相继前往总理衙门，请给护照，气焰嚣张地到各省“游历”。湖南的华籍教士顿时活跃起来。衡州天主教会扬言：拆毁城隍庙，建筑天主堂。撤去府县学孔子牌位，立十字架。湖南士绅见此，愤怒异常。长沙数千人集会，散发《湖南合省公檄》，指斥教会“伤风败俗”的种种劣迹，要求驱逐天主教侵略势力。同治元年三月（1862 年 4 月），湘潭应试考生和客商居民万余人，将十八总天主堂焚毁。四月初（5 月初），衡州考生聚集群众数万人，焚毁天主堂和教民房屋。

湖南反教会的檄文迅速传入江西，南昌等地群众纷起响应。此前法国传教士罗安当于咸丰十一年（1861）在江西南昌强行索地、要房，激起民愤。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湖南反教檄文传来，士绅和聚集省城的应试考生翻印数百万张，遍贴省城内外通衢，号召拆毁天主堂。各阶层群众万余人，将南昌、进贤等地育婴堂、教堂捣毁，罗安当狼狈逃走。次年，罗安当企图再次进入南昌，群众在河岸竖起：禁止“法夷入城”大旗。罗安当见势不妙，被迫转往九江。

在四川，传教士一直纵容教民恣意横行，制造事端，迫害良善，因而激起群众反抗。同治四年（1865），酉阳教民奸污妇女致死，当地富绅冯士银等率领数百人愤起捣毁教堂，杀死庇护教民的法国教士玛弼乐，打毁城乡教民多家，川东各属闻风响应。法国公使借机要挟，迫使四川总督以冉老五抵命、赔银八万两结案。但从此教士愈加凶横，“民”“教”矛盾进一步尖锐起来。同治七年（1868），法国传教士李国在酉阳组织教堂武装，修筑寨堡，奴役民众。次年初，在乡绅张佩超等支持下，民团首领何彩率众攻破酉阳天主堂，杀死李国，并分队攻打州属教民；后被地方官缴械解散。华籍教士覃辅臣乘机率教堂武装反攻，先后杀害民众一百四十五人，伤七百余人，焚毁民房八百余间，使一千四百余人无家可归。清政府以处死何彩等二人、流徙十人，惩办张佩超，赔银三万两结案。

这一时期规模最大的教案是天津教案。天津在英法联军两次侵入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群众对侵略者深怀仇恨。咸丰十年（1860）法军强占天津名胜望海楼为领事馆，又修建教堂、育婴堂数处；一些不法分子，拐骗幼婴卖给教堂，因而进一步引起公愤。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主教育婴堂

婴儿三四十人死亡，群众怀疑是被虏杀的。对此，群众怒不可遏。五月二十二日（6月20日），天津群众派出代表到育婴堂内检查。法国领事丰大业闻讯赶到育婴堂，把民众代表哄出堂外。二十三日（21日），群众自动聚集在望海楼教堂前举行抗议示威，然后向北洋通商衙门行进。天津知县刘杰赶赴现场劝阻，并尾随群众奔向通商衙门。此时丰大业正在通商衙门咆哮公堂，要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反教的群众。丰大业走出通商衙门，恰遇示威群众及刘杰。丰大业又向刘杰开枪行凶，击中知县随从高升。群众愤怒已极，立将丰大业及其随员西蒙殴毙。随后，万余群众冲入望海楼育婴堂，抢出幼童百余名，焚毁望海楼教堂及法国的仁慈堂、领事馆和英国的教堂，打死洋教士、商人和法国官员二十人。事件发生后，英、美、法、俄、普鲁士、比利时、西班牙七国一面联衔向清政府抗议，一面调集军舰于天津、烟台一带示威。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查办，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曾国藩虽明知丰大业是"激犯众怒，群殴毙命"，"曲在洋人"②，但为了"力全邻好"，竟然遵从侵略者的意志，决定"格外严办"，最后将无辜群众十六人处死，二十九人充军，天津知府、知县发配黑龙江，赔款银四十九万七千二百八十五两，派崇厚赴法国道歉，了结此案。

清政府的媚外投降，更加助长了外国侵略者的气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教会势力日益扩大，教士的罪恶活动更加猖獗，因此，中国人民反对教会侵略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和高涨。从天津教案结束到甲午战争前，群众反洋教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社会上层多数退出斗争，越来越多的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投入斗争行列，民间会党逐渐成

为核心力量。在此期间，反洋教斗争范围更加广泛，次数更为频繁，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方式除一般的暴动、拆毁教堂和驱逐教士外，有组织、有计划的武装斗争也先后出现，并逐渐形成了以四川大足、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今属辽宁）为中心的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

六十年代以来，四川一直是反教会斗争最激烈的地区之一。光绪二年三月（1876年4月），江北厅四十八场农民数千人，手持刀矛枪炮，炮打教堂，火烧教会医馆，驱杀教士教民，“顿时合邑教堂皆塌，各场医馆尽毁”。同年，涪陵农民数千，“头裹红布巾，扬旗鸣炮拥至叫城”③，焚毁教堂，驱逐教士教民。光绪十二年（1886），重庆数千人“集团四处打教”，各地纷起响应。四月（5月），大足县民众在余栋臣（绰号余蛮子）率领下，捣毁龙水镇教堂，后以赔偿银一千八百两结案。次年，法国传教士重建教堂，民众趁迎神赛会，再次毁之。十六年（1890），教会第三次修建教堂，并要挟地方官严防再度被毁，强迫，大足知县禁止灵官庙会。当群众提出质问时，地方官竟下令捕人，且将平民打伤。六月（7月）大足县煤窑、纸厂工人以及苦力、挑贩数百人，在余栋臣率领下，竖旗起义，第三次捣毁教堂；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借通商传教为名，“夺小民农桑衣食之计”的罪行，揭露清政府“纵海外之虎狼，戕国家之赤子”的卖国面目，申明“爰起义兵，誓雪国耻”的决心，号召群众起来“剪国仇”、“除民害”④。起义军转战于大足、铜梁之间，屡败清军。十八年七月（1892年8月），起义军在清军镇压下失败，余栋臣突围后避居他乡。

长江中下游一带群众的反教会斗争，从70年代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省的“同时并起”，到80年代江苏松江、娄

县、金陵等地的"闹教"，都为更大规模的斗争蓄积了力量。光绪十七年（1891）初，湖南人民编印大量反洋教宣传品，如《齐心拚命》、《鬼教该死》、《擎天柱》、《灭鬼歌》等书籍、揭帖、歌谣、图画，向各地传布，迅速推动了长江中下游反教会斗争的发展。从三月中旬（4月末）到八月初（9月初），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省的数十个城市，掀起了以会党为核心，有广大破产农民、手工业者、码头挑夫、水手、游勇、城市贫民参加的反教会斗争。三月（4月），江苏扬州会党聚集五千多人，打毁外国教堂。四月（5月），安徽芜湖人民群起围攻教堂、海关，"势如潮涌，声若山崩"。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下，他们仍"聚众而不散"，继续顽强战斗。与此同时，和州、六安、宣城、建德等州县，"人情汹汹，均思与教堂为难"；无为县"洋人设立义学被众焚坏"；广德则"众甚猖獗，恃众不退"；太湖县"又有匿名揭帖传播远近"⑤。上海租界及徐家汇一带，同样流传着痛斥教会的匿名揭帖。面对汹涌澎湃的群众反教会斗争的怒涛，帝国主义分子不得不哀叹：尽管"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但仍然"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⑥。

群众反教会斗争在华北和东北的迅速发展，导致了以热河为中心的大规模武装起义。光绪十七年（1891）初，天主教会在热河建昌（今辽宁凌源）向各铺户强行"借粮"，枪杀前往教堂说理的在理教首领徐荣，并"在堂铸炮"，拟以武力对付群众。被迫害的农民、矿工相继加入金丹道和在理教。十二月（1892年1月），金丹道首领杨悦春、李国珍率众起义。热河、奉天交界地区群众纷起响应，旬月之间，由数千聚至数万；起义军建号立营，声威大震。起义军占领朝阳后，在理教首领郭

万昌率众响应，势力更盛。起义队伍转战数百里，横扫朝阳、平泉、建昌、赤峰四州县，焚堂灭教，毁署劫狱，先后惩办八百多作恶多端的教士教民，也惩办了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吏和蒙古族反动王公。在热河起义影响下，直隶的开平、滦州（今滦县）、迁安、永平，奉天的锦州、盖平（今盖县）等处人民，吉林长春附近的金丹道，都闻风而起。清政府急调直隶、奉天、热河三省军队进行镇压。起义军以鸟枪刀矛为武器，坚持苦战两个多月，大小数十仗，最后失败。杨悦春、李国珍、郭万昌被捕杀，二万多起义群众惨遭杀害。

但是，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仍在继续发展。甲午战争后，由于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群众反教会的斗争，不仅参加的人数日益增多，规模越来越大，而且群众已把反教会斗争与反对列强瓜分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时，由于民族矛盾的突出和尖锐化，地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一些地方官吏和士绅对群众反教会斗争采取默许和同情的态度，企图利用人民的反帝斗争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据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1895—1899），反教会斗争遍及全国二十个省区，累计达三百七十个州县以上。其中四川成都教案，福建古田教案，山东巨野教案，四川余栋臣再次起义，影响最大。

光绪二十一年端午节（1895 年 5 月 28 日），成都民众在东教场举行掷果会，美道会四圣祠北街教堂建在其附近，教士何忠义等用糖果诱骗小孩入教堂，后又扣押 3 名交涉人员，遂激起公愤。民众于当晚焚毁英国教会医馆。次日，各阶层群众又将城内英、法、美三国教堂、医馆、住宅焚毁。省内乐山、屏山、宜宾、叙州、新津等三十多州县的群众纷起响应，惩治教民，捣毁教堂。清政府采取镇压政策，杀害民众六人，充军

十七人，并赔偿教会损失。但成都教案推动了沿江各省的反教会斗争。

古田斗争是由斋教发动的。光绪二十一年六月（1895年7月），福建古田斋教首领刘祥兴以抗税相号召，密谋率众起义。英、美教士得知，向官府告密。刘祥兴等遂于六月十一日（8月1日）率斋教会众三百余人向古田花山英、美传教士聚居地进攻，焚毁教堂及教士住所；英教士及其家属十一人被杀，英、美教士六人受伤。事件发生后，各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清政府“抗议”，英舰开到福建示威。结果，斋教成员百余人被捕，刘祥兴等二十六人被杀，六十六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和充军，赔款30万两。

山东是这一时期反教会斗争比较激烈的地区之一。光绪二十二年（1896），山东曹县大刀会首领彭桂林等率领二千余人，打毁单县、丰县、砀山等地教堂。二十三年（1897），平度州英雄会发动反洋教斗争；临清千余群众阻止天主教在庙地上建筑教堂；冠县梅花拳千余人攻打教民；济宁、菏泽、成武、单县、寿张等地，教民与非教民不断发生冲突。在此基础上爆发了巨野教案。时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治今菏泽）附近各县唆使教徒欺压平民，激起公愤。十月初七日（11月1日），巨野农民杀死夜宿张家庄教堂的德国天主教神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接着济宁、寿张、单县、武城各地群众纷起响应。德国即以此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胁迫清政府撤巡抚李秉衡职；逮捕民众九人，处死二人，徒刑三人；赔银二十二万五千两。但群众并没有被吓倒。此后，大刀会、义和拳、梅花拳成员，在山东地区展开了更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

余栋臣起义是这一时期反洋教斗争的高潮。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上旬（1898年3月底）余栋臣被清吏捕获，解送荣昌县监禁，被其旧部劫狱救出。余栋臣回到四川大足龙水镇，即于六月（7月，发动第二次起义，提出“顺清灭洋”口号，宣布起义军“誓雪国耻”，号召人民用武力驱逐洋人出境。义军以龙水镇为根据地，分路出击，势力迅速发展至三十余州县，最盛时达一万多人。湖北宜昌、施南等地的群众也声言入川与余栋臣会师，川鄂为之震动。是年十二月，清政府派重兵攻入龙水镇，余栋臣率部再次退入西山。不久，他在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剿抚兼施”策略的进攻下，向清营请降，起义遂归于失败。

从咸丰末年起，日益高涨的、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最终导致了震撼世界的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

注　释

①《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二，第16页。

②《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二，第31—32页。

③《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第30—32页。

④《余栋臣与四川农民反帝运动》，《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4期。

⑤光绪十七年安徽巡抚沈秉成折。

⑥《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601—602页。

清（后期）

义和团运动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两年，即光绪二十六年（1900），又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是甲午战后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峰，也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的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继续和发展。

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其组织成员主要活动在山东、直隶、豫东、苏、皖北部一带，以设坛练拳为形式，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口号，吸引群众参加。甲午战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义和拳斗争的矛头开始指向帝国主义。光绪二十四年八月（1898 年 10 月），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在山东冠县梨园屯（今属河北威县），首先率众起义。自光绪十二年（1886）德国传教士至冠县城北梨园屯传教以来，教民与村民争夺当地玉皇庙的斗争，始终未断。光绪二十四年（1898），新任山东巡抚张汝梅迫于外国教士压力，派员拆除玉皇庙，再次激起村民的反抗。村民阎书勤邀请直隶县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支援。赵三多将梅花拳改称义和

拳，在梨园屯亮拳设场。八月十八日（10月3日），赵三多等拳众在冠县蒋家庄祭旗举义，举起“助清灭洋”旗帜，从而揭开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随后，拳众分兵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活动在直鲁交界地区；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活动于直隶南部。与此同时，鲁西北的茌平、高唐、禹成、长清、平原等州县的义和拳，在朱红灯和心诚（本明）和尚的领导下，也积极展开了反洋教斗争。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地主李金榜仗势欺压拳民李长水。发生冲突后，知县蒋楷袒教抑民。朱红灯应平原县义和拳的邀请，率众支援当地的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九月（10月），在平原县与恩县交界处的森罗殿大败前来镇压的清军。从此，朱红灯成为鲁西北义和拳的旗手，以致出现了“济南至德州三百余里皆其党羽”的局面。面对义和拳反抗斗争的迅猛发展，山东巡抚毓贤一方面感到义和拳声势浩大，防不胜防，剿不胜剿，不如抚而用之；另一方面又目睹义和拳起事皆因“教民肆虐太甚，乡民积怨不平”而引起的事实，于是对义和拳从一味镇压转而采取剿抚兼施而以抚为主的方针，以便达到既控制义和拳又利用义和拳排外的目的。为此，他派济南知府卢昌诒亲往平原境内抚绥义和拳，并通令山东各地义和拳、大刀会一律改为“民团”。从此，山东、直隶等地的义和拳普遍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兴清灭洋”、“保清灭洋”一类口号，也在山东义和团队伍中进一步流行起来，义和团在山东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帝国主义强烈的恐惧和仇视，他们要挟清政府迅速撤换毓贤，并指名要袁世凯继任山东巡抚。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四日（1899

年12月6日)，清政府令毓贤赴北京，由袁世凯代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到山东后，立即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对义和团进行威胁恫吓；同时联合青岛德国军队和各地教堂武装，对义和团进行疯狂屠杀。广大人民对袁世凯的暴行恨之入骨，喊出了“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口号。有人还在巡抚衙门的照墙上，画了一个头戴红顶花翎的大乌龟，俯伏在洋人屁股后面，表示对袁世凯的愤恨。在袁世凯的血腥镇压下，山东义和团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一部分转移到直隶继续活动。

直隶南部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几乎与山东同时兴起。光绪二十六年（1990）春，山东一部分义和团成员流散到直隶后，进一步推动了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三、四月（4、5月）间，义和团的组织已遍及全省各个地区，并控制了直隶的省府保定城。接着，义和团从保定向北发展到新城、定兴、涞水、涿州一带，逼近北京；向东发展到雄县、霸县、静海等地，逼近天津，从而在津、京、保三角地带形成了一个新的斗争中心。义和团运动在直隶的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仇视，也遭到了清军的镇压。四月（5月）下旬，涞水县义和团全歼副将杨福同所率马队七十余人，杨本人也被击毙。义和团二三万人乘胜进占涿州城，继而直趋北上，捣毁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丰台等地的火车站，连慈禧太后的“龙车”也被烧毁。

义和团进抵北京、天津附近，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在这样一种局势面前，清政府中一部分顽固派官员主张暂时承认义和团合法，加以控制利用，使自己躲避开群众运动的打击。经过多次密议后，慈禧太后决定接受这部分人的建议，对义和团的策略再次由以剿为主转为以抚为主，默许京外义和团

入京。从此，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涌入北京和天津。到五月（6 月）下旬，北京城内的义和团已达到十余万人，许多宫内太监和清军士兵也纷纷加入。同时期进入天津的义和团也不下三万人，著名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张德成等相继在天津设立坛口，红灯照首领林黑儿也在天津城北建立起红灯照坛口。北京、天津实际已为义和团所控制。

义和团在直隶及京、津地区的迅猛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从黑龙江到两广，从江浙到陕甘、新疆的广大地区内，都出现了人民群众的反教会斗争，有的直接打出义和团的旗号，有的与义和团的反帝斗争遥相呼应，形成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反帝风暴。

义和团运动是一个广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的主要成分是农民。此外，城乡手工业者和水陆交通运输工人，也是义和团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运动高潮时期，一些守旧官绅、清军士兵也加入到义和团行列，从而使义和团的成分趋于复杂。

义和团起源于民间的秘密结社，因此，它从始至终在全国未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义和团的基层组织为“坛”，或称“坛厂”、“拳厂”。团民分别属于各个坛口，并围绕坛口进行各种活动，平时主要是操练武术气功，求神、喝符、念咒。一村一镇或一街一巷设一坛或数坛不等。有的地区，在几个或十几个坛口之上，还设有总坛口。总坛口的负责人称老师，坛的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男团员称“大众”，彼此互称“师兄”；女团员称“二众”，彼此互称“姊妹”，在团内地位一律平等。各总坛口之间没有统属关系，每当斗争需要联合行动时，则散发帖子邀请，由有声望的大坛口负责人统

一指挥战斗。由于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所以能够做到“传单一出，千人立聚”，虽远在千里之外，也能迅速前来参加战斗。

由于组织的分散，义和团在各地提出的口号不尽相同。但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山东冠县义和团打出“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的旗帜后，类似的口号就在各地义和团中迅速地流传开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扶清灭洋”同样是各地义和团的主要口号和旗帜。这个口号，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最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降到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这一客观现实，在农民群众中的朴素的反映。“灭洋”作为农民群众朴素的反帝口号，触及到了“救亡”这一时代的主题，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但它又是笼统排外的口号，反映了义和团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扶清”可以减少来自清朝官府的压力，集中力量反帝，但也模糊了人们对清政府反动本质的认识，给清政府对反帝运动的破坏，造成了可乘之机。总之，这个口号的提出，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阻力，有利于争取更广泛的群众参加到义和团运动当中来，促进了义和团运动高潮的到来。但是，这个口号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农民阶级对客观形势进行科学分析的结果，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把群众反帝斗争引向胜利。

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发展，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保持和扩大它们在华的侵略权益，进而实现瓜分中国的野心，决定联合出兵，发动一场空前残暴的对华战争。

早在光绪二十六年三月（1900年4月），列强就向清政府发出联合照会，限令“两月以内，悉将义和团‘匪’一律剿

除，否则将派水陆各军驰入山东、直隶两省，代为剿平”。①五月一日至三日（5月28日至30日），各国公使经反复磋商，决定联合出兵镇压义和团。他们一面调集在华武装组成特遣队前来北京“保护使馆”；一面电请各国政府增兵来华，并警告清政府说：“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结果。”②清政府屈服于各国的压力，竟同意侵略军进京。这样，于五月四日和六日（5月31日和6月2日），俄、英、美、日、德、法、意、奥八国侵略军四百余名，分两批乘火车进入北京。与此同时，各国舰队和侵略军迅速向渤海湾集结，到五月六日（6月2日），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外国军舰达到二十四艘，侵略军达八千人。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八国侵略军二千三百名，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侵略军悍然向大沽炮台发起猛烈攻击，经六小时激战，大沽炮台失守。至此，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正式爆发。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中旬，在清政府面前出现了极其复杂而又严重的局势：一方面，帝国主义联合发动了对华的侵略战争；另一方面，义和团的反帝斗争，因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而更加高涨。究竟如何办，清政府必须作出迅速的抉择。为此，从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6月16日至19日），慈禧太后连续召开四次御前会议进行研究。会上，对帝国主义是和还是战？对义和团是剿还是抚？发生了严重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主张剿杀义和团，使洋人不再派兵入京。光绪帝支持这一派人的主张。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刚毅等则主张利用义和团与列强对抗。双方互不相让，

会议无法作出决定。二十三日（19日），大沽炮台失守、联军大举入侵的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紧急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决定对各国宣战。五月二十五日（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表示对侵略者要“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同时，清政府发出正式招抚义和团的上谕，奖给义和团粳米十万石、白银十万两，并任命庄亲王载勋、协办大学士刚毅等统辖义和团，要义和团绝对听从他们的管理和指挥，违者处死。表面上看来，清政府似乎要与帝国主义决战了，其实不过是故作姿态罢了。二十九日（25日），即宣战后四天，慈禧太后在答李鸿章的谕旨中说：“此次之变，事机杂出，均非意料所及。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开衅。”三十日（26日），在答复各省督抚时又说：“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日之间，京城蔓延几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所在皆有。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生灵涂炭，只可因而用之，徐图挽救。”③六月三日（6月29日），清政府电令驻外使节，向各国解释对外宣战非出自朝廷本心，乞求各国谅解，并无耻表示对义和团这股“乱民”，一定“设法相机自行惩办”④。这一切，充分说明清政府对外宣战的根本原因，是借宣战躲过义和团的打击锋芒，并有效地控制义和团，最后借助帝国主义的力量消灭义和团。

清政府宣战后，东南各省督抚公开抗拒，宣称凡五月二十五日以后的“宣战”与“招抚”上谕都是“矫诏”，概不奉行。同时，他们又直接与帝国主义订立约章，实行所谓“东南互保”。五月三十日（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督办铁路事务的买办官僚盛宣怀指使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制订《东南互保约款》、《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

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⑤。不久，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等都参加了“东南互保”。这一举措，使帝国主义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在北方发动侵略战争，并且阻碍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发展，破坏了东南各省人民的反帝斗争。

八国联军的侵略战争，激起了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他们不顾清政府的阻挠破坏，顽强地战斗在反侵略战争的最前线，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

当五月十四日（6月10日）西摩率领的侵略军向北京进犯时，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首先拆毁部分铁路，并在沿途伏击敌人。在义和团的狙击下，侵略军进展极为缓慢，四天时间才前进60公里，到达廊房车站。五月十八日（6月14日）清晨，义和团约三百余人将廊房车站包围，他们“奋不顾身，直逼火车，持矛猛触”，狠狠地打击了侵略者。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二千人与董福祥部清军三千人向廊房车站发起猛烈攻击，经过两小时激战，杀死敌军五十多名。西摩看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只好退回杨村，沿北运河向天津逃命，直到三十日（26日）才狼狈地窜回天津租界。这次廊房大捷，打死打伤侵略军三百人，粉碎了八国联军进犯北京的计划，大大鼓舞了京、津人民抗敌的勇气。

在天津，义和团和侵略军的战斗，是从五月下旬（6月中旬）开始的。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晚上，攻陷大沽炮台的侵略军由大沽分乘火车开往天津，盘踞老龙头火车站。二十二日（18日），义和团向老龙头火车站发起攻击，杀伤大量敌人，其中二千名俄军竟死伤五百名之多。此后，义和团在天

津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与侵略军展开顽强的争夺战。在战斗中，义和团表现了义无反顾、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敢精神。据记载，他们“遇有战事，竞冲头阵，联军御以枪炮，死者如风驱草，乃后队存区区之数，尚不畏死”⑥。从六月十日（7月6日）起，战斗愈益激烈，义和团和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连续和敌人苦战三昼夜。六月十三日（7月9日），侵略军分两路向驻守在八里台的聂士成军发动攻击，聂士成率部英勇抵抗，最后身中七弹，壮烈牺牲。这时，清政府已决计投降，急调两广总督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调四川提督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遵照清廷的旨意，宋庆于六月十四日（7月10日）到达天津后，不是率军抵抗侵略军，却大肆屠杀义和团；由此部分团民被迫撤离天津。六月十八日（7月14日），侵略军炸开城墙拥进天津城内。义和团和部分清军临危不惧，与联军展开巷战和肉搏，许多人壮烈牺牲，后被迫撤离，天津失陷。

在北京，义和团也与侵略者展开了英勇的战斗。因为在北京的帝国主义分子分别集中在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天主教北堂内，因此，义和团攻击的目标也就在这两个地区。五月十九日（6月15日），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开始围攻西什库教堂；二十四日（20日），包围了东交民巷公使馆。在这两处的战斗中，义和团同样表现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尽管在机枪扫射下，遭到重大牺牲，但他们仍然前仆后继，奋勇向前，毫不退缩。然而，清政府在把义和团攻击的矛头引向公使馆后，又很快地出卖了义和团。自五月二十七日（6月25日）起，荣禄即遵照慈禧太后的旨意，对使馆明攻暗保，不断派人去使馆慰问，并送去粮食、蔬菜、水果等物。因此，义和团围攻使馆56天、

围攻西什库教堂63天，都未能攻下。

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兵力增至二万人。七月十日（8月4日），联军分两路，从天津沿运河两岸向北进犯。这时津、京地区尚有清军十万人，但清政府已一意主降，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清军则毫无斗志，遇敌退溃。只有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在北仓进行了英勇抵抗，打死打伤侵略军数百人。十二日（6日），直隶总督裕禄在杨村兵败自杀。十三日（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决心向侵略者乞和。十五日（9日），原任巡阅长江水师大臣李秉衡奉命统率各地赴京援军万余人在河西务迎战侵略军，结果也是一触即溃，李秉衡自尽。十九日（13日），八国联军攻占通州。当晚，日、俄军队进抵北京城下。在京的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奋起抵抗，激战一夜，有效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二十日（14日），侵略军攻入北京城内，清军大都溃逃，只有部分爱国官兵与义和团同联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当晚北京沦陷。二十一日（15日）凌晨，慈禧太后带领光绪帝及王公大臣仓惶出逃，先至太原，后转赴西安。

沙俄在参与八国联军侵华的同时，又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出兵侵占我国东北地区。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1900年7月9日），沙俄分兵六路向我国东北进犯。至九月九日（10月31日），仅两个多月的时间，俄国侵略军就占据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铁路交通线。在侵犯我东北过程中，俄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制造了血洗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和火烧瑷珲城等一系列惨案。面对俄军的暴行，东北义和团、各族人民和爱国清军一起，奋起抗击，予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八国联军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

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联军统帅瓦德西是闰八月二日（9 月 25 日）到天津，闰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17 日）到北京的。这时距八国联军从大沽登击已过 4 个月。他在日记中所记沿路的景况是：从大沽到天津之间，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址。原有五万居民的塘沽，“已无华人足迹”。从天津到北京，沿途房屋未被毁坏者极为罕见，“大都早已变成瓦砾之场”。据他估计，从大沽经天津直到北京沿线，至少五十万人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

另据记载，联军攻陷天津，“城门刚一打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有一点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⑦。

联军攻占北京后，这种烧杀抢掠更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们见人就杀，“以致尸横满地，弃物塞途，人皆踏尸而行”。联军从各级军官、教士到普通士兵，一无例外地参加了抢劫活动。皇宫和颐和园所藏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金银珠宝，包括《永乐大典》等数万册珍本图书，均被抢劫一空。

帝国主义者口口声声攻击谩骂义和团“野蛮”、“残暴”、“杀人放火”，但铁的历史事实证明：真正野蛮、残暴和杀人放火的恰恰是帝国主义强盗自己。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为继续扩大侵略战争，陆续增兵至十万七千人。他们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分兵数路向东、西、南、北四个方面，进行野蛮的攻掠。此时，清政府已完全撕去“宣战”的假面具，彻底暴露了卖国投降的真面目。慈禧太后一逃出北京，就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并加派庆亲王奕劻会同商办“议和”事项。八月二十四日（9 月 17 日），在山西崞县的慈禧太后又发布上谕，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

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通令清朝官兵对义和团要"实力剿办，以清乱源"⑧。从此以后，中外反动势力就公开联合起来，对义和团进行了血腥的镇压。

闰八月初（9月底），俄、德两国合兵攻占芦台。接着俄兵东下进犯山海关；英军从大沽乘舰径取山海关炮台和火车站；德军先占秦皇岛，然后又夺得北塘，津榆铁路沿线全被敌人占领。闰八月下旬（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侵略军一万多人沿芦保铁路向南推进，直至保定。面对帝国主义的攻掠，清军不仅不进行抵抗，反而用大肆杀戮义和团的行动来表示对侵略者的欢迎。联军统帅瓦德西写道："当联军（向保定）前进之际，常常发现中国军队与拳队相战之遗迹。各个城镇入口之处，多悬已斩拳队领袖之头，以欢迎联军。"因此，他得意忘形地说："现在余已居然自认为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矣。"⑨在清军的配合下，这年冬天，德、法军向西攻娘子关、固关，山西震动；德、意军向北攻居庸关，侵入宣化，占领张家口；另一支侵略军则向东，逼近山东边境。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剿杀下，各地义和团遭到残酷的镇压。

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1900年8月14日），联军侵占北京起，到《辛丑条约》签订，有关和约的谈判，整整拖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期间，谈判主要不是在帝国主义与清政府之间，而是在帝国主义之间进行的。

帝国主义各国在共同侵略中国的目标下暂时联合起来，但各个帝国主义在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利益的问题上，各有各的打算，彼此矛盾重重，一时难于调和。经过激烈争论，各国于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1900年10月）接受了美国在六月（7月）初提出的《第二次门户开放宣言》。这个宣言除重申第一

次“门户开放”政策原则外，又虚伪地提出“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的主张。依据这个原则，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基本政策达到了共同的结论：继续维持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统治，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完整”，实际上对中国建立帝国主义列强的共管。十一月三日（12月24日），它们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强迫清政府接受。慈禧太后见《议和大纲》上没有把自己作为祸首加以惩办的条款而感激涕零，立即命令奕劻、李鸿章“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由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俄、英、美、日、法、德、意、奥、西、比、荷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共十二款，其主要内容有：（1）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共九亿八千多万两，另有各省地方赔款二千多万两。（2）拆毁大沽炮台及北京至大沽沿途的各炮台，允许各国在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驻军；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外国可在界内驻军。（3）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处死；地方官对辖区内发生的“排外事件”，如不及时弹压惩办，“立即革职，永不叙用”。（4）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在六部之上⑪。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沉重的枷锁，它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首先，通过条约，帝国主义大大加强了在华的侵略势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完全控制了清政府，为它们对中国进行军事控制、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第二，清政府以条约的形式承担了保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利益的义务。从此，清政府不仅是中国封建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彻底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第三，巨额赔款极大地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全部被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社会经济陷于崩溃。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在中外反动派联合剿杀下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农民英雄们抛头颅、洒热血创造的历史功绩却是永垂不朽的。第一，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瓦德西在给德国皇帝威廉的报告中说：中国群众“含有无限蓬勃生气”，“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项拳民运动中见之”，因此，“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⑪。第二，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中国的封建买办势力，进一步暴露了清王朝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加速了这个反动王朝的崩溃。第三，义和团运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直接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对义和团运动前后的形势曾经作过一次鲜明的对比，他说：义和团运动以前，“举国舆论莫不目余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⑫。造成这种差别的，无疑应归功于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它仍然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义和团运动没有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不能

对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深刻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正确的纲领和斗争策略。

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历史再次证明：一方面农民阶级不但是反封建的主力军，而且是反帝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单纯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注　释

①《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册，第169页。

②《近代史资料》1959年第2期第15页。

③《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上册，第186—187页。

④《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202—203页。

⑤《义和团》第3册，第335页。

⑥《义和团》第1册，第149页。

⑦《八国联军在天津》，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05页。

⑧《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八月癸未谕。

⑨《义和团》第3册，第129页。

⑩《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002—1010页。

⑪《义和团》第3册，第83、244页。

⑫《辛亥革命》第1册，第9页。

清（后期）

自立军起义

自立军起义，肇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唐才常在日本接受康有为、梁启超之勤王任务。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逃亡国外，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以“忠君爱国”相号召，以排除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擅政，保救囚禁于瀛台的光绪皇帝，继续推行变法新政为目的。唐才常（1867—1900），号佛尘，湖南浏阳人，谭嗣同挚友。甲午战争后，他认识到非变法不足以自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回湖南，积极投入维新活动。政变发生后，唐才常誓继谭嗣同未竟之志，发愤举兵除奸，遂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日本。光绪二十四年（1898）冬，唐才常与康有为在日本相见，唐表示要“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康则认为要实现“勤王”的主张，“舍唐莫属”①。唐于是接受了起兵勤王的任务。同时，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同孙中山相识，唐所拟在湘、鄂、长江一带发动起义的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双方均愿合作进行。

光绪二十五年（1899）春，毕永年、唐才常从日本归国。

毕偕日人平山周到汉口邀林圭，遍访湘、湖哥老会各龙头，劝其与孙中山合作。唐才常则到上海编辑《亚东时报》，以倡导改革，团聚在沪志士。同年夏秋间，唐才常再赴日本，同时在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开展联络工作，“对唐、梁则曰勤王，对留学生则曰保国保种”②，企图得到各方面的支持。是时，林圭应梁启超之召，到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习。唐才常邀请林圭、秦力山、田邦璿、蔡钟浩等湘籍同学回国相助，湖北留日学生吴禄贞、傅慈祥、戢翼翚等也表示愿意参加。接着，唐才常与林圭、秦力山、吴禄贞等聚会于东京，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拟定利用会党发难，夺取武汉以为基地，并推派林圭回国负责与会党联络。十月（11月），唐才常、林圭束装归国，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翚等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孙中山、陈少白等也来参加，孙中山并将在汉口的兴中会员容星桥介绍给林圭，以期协助举事。这样，唐、林实际是肩负着两派的使命回国活动的。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唐才常、林圭等从日本归国。唐到上海，首先利用日人田野桔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以此为掩护，秘密建立正气会。该会会章提出了“合海内仁人志士，共讲忠君爱国之实，以济时艰”的宗旨。其序文中有“非我种族，其心必异”及“君臣之义，如何能废”③等自相矛盾的词句，遭到毕永年的强烈反对。毕永年劝唐断绝与康有为的关系，唐才常则因利用保皇会款密谋起义，坚不肯从。两人辩论一日夜，毕永年失望而去。随后，唐才常将正气会易名为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自立会刊布会章，“曰新造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④。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正值义和团处于高潮、八国联军入侵、清政府对外“宣战”之际，唐才常认为时机已到，为公开活动，号召全国，争取各方面人士参加，遂于七月一日（7月26日）在上海愚园召开“中国国会”，到会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八十余人。会议由叶瀚主持，宣布会议宗旨为：“一、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二、联络外交；三、平内乱；四、保全中国自主；五、推广中国未来之文明进化。”会议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⑤。七月四日（7月29日），国会举行第二次会议，选举叶瀚等三人为书记，唐才常等十人为干事。容闳为“国会”起草的对外宣言宣布：“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籍以驱除排外纂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害”⑥。但“国会”很快发生分裂。成立刚三天，已有革命倾向的章太炎不满唐才常醉心于“勤王”的口号，毅然剪去发辫，与“国会”继绝关系。“国会”内接近汪康年的一派人，不赞成暴烈行动。唐才常则坚持既定方针，“一面接受康、梁领导，一面遥戴中山先生，称之为‘极峰’”⑦。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唐才常遂重新打出自立会的旗号，积极筹划起事。

当唐才常以上海为中心展开政治活动的时候，林圭正以武汉为中心加紧军事方面的准备。他在汉口英租界设立机关部，负责全面指挥调度；在湘鄂两省的城镇广设会馆，作为联络会党的机关。为将分散的会党组成统一的战斗组织，自立会按会党设立的山堂、发放票布的传统，开设富有山堂，发放富有票，以富有山堂统一长江流域各会党的山堂。经过一段时间经

营，自立会与湘、鄂、皖、赣各省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发动了数以十万计的会党群众，形成了一支以会党为基干并包括张之洞所辖驻汉各军下级官佐和士兵在内的几万人的军事队伍，定名为自立军。为发动起义，自立军按地区分为七军：秦力山统前军，驻安徽大通；田邦璿统后军，驻安庆；陈犹龙统左军，驻湖南常德；沈荩统右军，驻湖南新堤；林圭统中军，驻汉口；另设总会亲军和先锋军，唐才常任诸军督办。

诸事大致就绪后，军饷却发生了困难。唐、林等所发富有票，借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甚多。各路待款发动，均派代表驻汉、沪两处坐催。按原约，起义所需款项，由康有为、梁启超接济，但康、梁财力有限，勤王运动除长江流域一带外，两广地区也在加紧进行，故无法以大量钱财接济自立军。一些会党头目投向自立会，本来是看中保皇派在经济上优于革命派，现发现并非如此，遂相率离去。为此，唐才常一直滞留上海，屡电康、梁汇款，以解军需之急。

但是，林圭从八国联军入侵后国内局势急剧变化考虑，认为机不可失，遂敦促唐才常迅到汉口发难。七月上旬（8月初），唐到达汉口。他以北方已处无政府状态为辞，通过日本告湖广总督张之洞，自立军将拥张宣布两湖独立。时在八国联军进攻下，清政府存亡未卜，所以张对自立军的活动暂采观望态度，对于唐的通款不置可否。在此情况下，自立军决定七月十五日（8月9日），各路同时大举；后因康有为从海外汇款未至而延期。可是，秦力山未得到延期通知，仍按原定时间起事。起义军迅速占领大通，张贴安民布告，申明宗旨，宣布军纪，号召群众加入自立会。时清水师参将张某率划艇四艘渡江

防堵，不料所部多与自立军相通，甫至岸即与义军联为一气，张参将投江而死。七月十七日（8月11日），清军援兵继至，秦力山挥兵力战，卒以寡不敌众，败退九龙山。十九日（13日），全军崩溃，秦力山仅以身免，后辗转逃往日本。

唐才常、林圭因等待接济，一再推迟发难日期，最后决定于七月二十九日（8月23日）在汉口起兵。但此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和光绪西逃，清王朝不仅没有在变乱中倒坍，反而在帝国主义首肯下趋向稳定。同时，由于《东南互保章程》达成协议，英国不能容忍在长江流域出现自立军的武装行动，故公开用公文向张之洞表示："南方有所谓大刀会、哥老会、维新党诸种，皆与北方团匪相仿佛，有为乱者，即速擒捕，敝国决不保护。"⑧这样，原对自立军持观望态度的张之洞，便转而施行残酷镇压。七月二十八日（8月22日）夜，张之洞在英国领事支持下，下令包围汉口英租界自立会机关，逮捕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田邦璿、黎科、李炳寰、蔡成煜等二十余人。审讯时，唐才常供称："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⑨其他人也齐呼速杀。次日清晨，唐才常、林圭等均被害。

唐才常等被捕就义后，沈荩急率新堤右军发动起义。湖北崇阳、监利等县纷起响应。但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很快遭到失败。湖南自立会员唐才中、蔡忠浩等人，先后被河南巡抚俞廉三捕杀。后清朝官吏又陆续捕杀起义者数百人。自立军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自立军起义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以武力改变清政府统治以实现君主立宪的一次尝试，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由于孙中山的

支持和部分兴中会员的参与，使这次起义超出了“保皇”的范围，而带有一定的革命色彩。起义的失败，使一批爱国志士开始认识到“保皇”与“革命”是两条不能相容的道路，促使他们脱离康、梁的影响而投向革命。这次事件，是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注　释

①《革命逸史》第6集，第18页。

②《革命逸史》第2集，第76页。

③《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页。

④《自立会史料集》第8页。

⑤《自立会史料集》第113页。

⑥《革命逸史》第6集，第25页。

⑦《自立会史料集》第105页。

⑧《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228页。

⑨《革命逸史》第6集，第27页。

清（后期）

清末“新政”

经过义和团反帝运动的冲击和八国联军的入侵，清王朝腐朽卖国的本质暴露得更加彻底。此后，帝国主义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以《辛丑条约》为依据，通过全面控制清政府，加紧和扩大对华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榨下，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继续深入发展，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兴起。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欺骗人民群众，增强反动统治的力量，尚在流亡西安的清中央政府即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急忙颁布“变法”上谕，要求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在不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各就当时形势，参酌中西政略，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向中央提出改革的建议。二十七年三月三日（1901年4月21日），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以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增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

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从此开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止，清政府依据内外臣僚特别是袁世凯提出的新政意见十条和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三折”的意见，陆续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新政”。

新政主要内容包括：一、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停止捐纳实官；改定律例，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

二、编练新军。鉴于原绿营、防勇已腐朽透顶，清廷便倾全力来加强武备。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1901 年 8 月 29 日），清廷命全国停止武科科举考试；二十九日（9 月 11 日）命各省仿北洋、两江例筹建武备学堂，次日下谕全国各省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军”。对此最看重并全力以赴者是袁世凯和张之洞。李鸿章死后，清廷命袁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一上任即奏准在直隶编练“北洋常备军”，光绪二十八年（1902）夏练成一镇约一万二千五百余名新军。同年张之洞在湖北也编练新军七千余人。清廷以直隶、湖广两处为“典型”，命就近各省派人分别前往参观效法。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清廷于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903 年 12 月 4 日）设立练兵处，任庆亲王奕劻总理全国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襄同办理，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接着又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负责各省的新军编练。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军队分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同时规定了招募应征条件、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一些规章制度，三十一

年（1905），为统一和扩充全国的军事编制。清廷计划在全国共编新军三十六镇（师），按各省的战略地位及人力物力状况进行分配，限期完成。在编练新军的同时，清政府还创办了巡警。光绪二十八年四月（1902年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七月袁世凯根据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议定的八国联军退出天津时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周围二十里以内驻扎的无理规定，将保定新军三千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三十一年（1905），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为左右侍郎。同时制定了各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全国大办警务。

三、筹饷。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十分拮据，自认"国内匮绌"；"罗掘已空"。但庚子赔款、练兵育才、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皆需大量开支。为筹措大量经费，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巧立各种名目，多方搜刮。第一是乱增税种。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膏捐，在吉林征收烧窑、车辆捐，在察哈尔征收牛马驼捐，在一些地方还有斗银、畜税、油酒缸课、盐商捐、绅富捐、糖捐、果捐、妇女首饰捐、僧尼巫道捐、赌捐、柴把捐、烟灯捐、学捐、亩捐、自治费、巡警捐、路捐、门牌捐、调查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第二是乱提税率。有的是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的，如盐行加增四文，土药、茶糖、烟、酒厘金加增三成。有的是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诸如粮捐加收，盐引加课等。有的是在全国加抽之外又一加再加，全无固定标准。第三是派员查库，严提中饱，官吏报效。清廷钦派大员到各地查明司库进出，将盈余款项强迫上缴；同时又

将各级官吏例行贪污的款项收归公有，且要求官吏不定期的向上奉献银物，这两者美其名“严提中饱”和“报效”，实际等于承认并鼓励官吏贪污。

四、兴学育才，即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生。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日（1901年9月14日），清廷下谕，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幼稚园）。规定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十月二十五日（12月5日），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二十八年二月二日（1902年3月11日），又命各省妥速筹划亟立学堂及武备学堂。关于科举，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1901年8月31日），清廷下谕以后科考要加试中外政治、史事、策论；废八股文体；停止武科考试。三十一年八月四日（1905年9月2日），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关于派留学生，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1901年9月21日）下谕，令各省仿照湖北、四川等省之例，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凡毕业留学生均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自备旅费出洋留学者，“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据统计，截止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共兴办学堂五万多所，留学生人数则从二十七年（1901）的几百人激增到上万人。

五、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1903年9月9日），清廷下令成立商部，将前路矿总局并入。接着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陆续设立商标局、劝工陈列所，并开始参加有关国际博览会。次年又公布《商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三十一年（1905），陆续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

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规章虽然对外资也采取同样保护的态度，但对民族工商业仍起到了促进发展的作用。这时一些著名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如翰林院修撰张謇被聘为商部头等顾问，并加三品衔；华侨巨商张振勋被命为考察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

总之，清末新政是在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政治措施。其中，奖励工商、兴学育才等项内容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并未能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

清（后期）

拒俄、反美运动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其中最突出的是“拒俄运动”和“反美爱国运动”。

一、拒俄运动

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在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同时，又乘机单独出兵十七万七千人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实现其“黄俄罗斯”的迷梦。此后，沙皇政府多次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出卖东北的条约。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1901 年 3 月 12 日），沙俄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约款，规定沙俄驻兵东北，有“保护”铁路、出兵帮助“剿抚”，以及革办中国官吏等特权，并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二十五日（15 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于张园，严正谴责沙俄的侵略野心，主张抗击沙俄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接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群众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集会；香港、澳门同胞和新加

坡、檀香山等地华侨，纷纷致电清政府，强烈要求拒绝签约。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二月五日（3 月 24 日）清政府电令驻俄公使杨儒，命其通知沙俄政府“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沙俄逼签条约失败，于是再变花招。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1902 年 4 月 8 日）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将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分三期在十八个月内全部撤走。二十九年三月十一日（1903 年 4 月 8 日），是俄军第二阶段撤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违约不撤，反而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从法律上确认其对东三省和外蒙古的占领。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四月初一（4 月 27 日），上海千余名群众在张园集会，决定致电外务部，声明“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分电各国外交部申明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指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①。会后由冯镜如等发起组织“以保国土、国权为目的”的“国民总会”②，一千多人签名入会。初三日（29 日）上午留日学生会馆召开干事及评议员四十余人会议，浙江学生汤槱建议分电南北洋大臣，要求他们主战。钮永建则主张自行组织义勇队抗俄，与会者均表赞成。下午全体留学生大会在锦辉馆举行，参加者五百余人，会上发言者十余人，临时议长汤槱演说表示：“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吗？”“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听了他的发言，“众皆愤发，涕泣不能仰”③。会上决定：（1）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两日内签名；（2）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3）致电

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将义勇队编其麾下；(4) 遣特派员至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5) 遣人至本国内地各殷富地方：南洋各埠及欧美各国发动拒俄。会后各省同乡会继续开会，留学生纷纷报名参加义勇队，报名者年龄最小的才十二岁；女留学生决定参加赤十字社，决心从军北征，任军中看护。初四 (30日)，报名从军者达一百三十余人，愿入本部办事以为后应者五十余人。初六 (5月2日)，参加签名的留学生集会于锦辉馆，通过《学生军规则》："第一、定名：学生军（义勇队改名)。第二、目的：拒俄。第三、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义务。第四、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④又将全军121人分成甲乙丙三个区队，每区队辖四个分队，以留日士官生蓝天蔚为队长，准备开赴前线，与沙俄决一死战。

在上海与东京拒俄浪潮的推动下，抗俄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四月初四 (4月30日)，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通电各省学堂，呼吁"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勿将东三省予俄"。湖北学生立即响应，"不期而集会于曾公祠省数百人"。安徽学生成立爱国会，江西大学堂组织义勇队，福州学生成立滨海公会，湖南学生要求领枪备战，广东人士联名抗俄，直隶四百举人上书要求"皇上坚忍力持，转亡为存"。在全国普遍反对下，清政府拒绝了沙俄的七项要求。

但是，沙俄亡我之心不死。四月二十四日 (5月20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废除交还中国东北的条约，增加在中国东北的兵力，设置处于俄国保护下的特别区域。九月初九 (10月28日)，沙俄马步兵、炮兵一千余人，强行闯入奉天，占领清行宫及将军衙门等各署地，升起沙俄旗帜。这时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抗俄团体，如上海有对俄同志会，对俄同志女会，北京

京师大学堂有抗俄铁血会，广东有助国拒俄同志议会，哈尔滨有商民自仇会，锦州有仇俄会等。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日报，揭露沙俄侵华罪恶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广泛报道各地拒俄消息，号召社会各界奋起拒俄。在各地拒俄团体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俄斗争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结束。

这场运动本来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爱国运动，它最初只采用请愿、游说的做法，学生军也明白规定“在政府统治之下”，并没有革命色彩。但清政府却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勾结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并要“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正是在这种“报国无路”的情况下，前一年春建立的青年会的发起人秦毓鎏、叶澜等即于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1903 年 5 月 19 日）将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标明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其进行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⑤随后这个组织就分派会员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建立组织，筹划反清起义。拒俄运动的重大意义就是促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

这场运动是由美国虐待华工而引起的。美国早期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劳动力十分缺乏。鸦片战争以后美国便大量招致华工入境，利用廉价劳动力在西部垦殖、采矿及修筑铁路。华工为美国的西部开发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严重，引起广泛的工人运动。美国资产阶级一方面血腥地镇压本国工人的罢

工斗争，一方面转移工人斗争视线，胡说美国工人之所以失业，是华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借以煽动排华。一时间华工财物被抢劫，华人房屋被烧毁，侨民生命遭到威胁，甚至入境华人亦经常遭到种种无理刁难、欺凌和侮辱。清政府迫于广大华工、侨商要求，曾就排华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但是，美国政府不仅不收敛，反而在光绪二十年（1894）迫使清政府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表面声称保护寓养华侨，实际是使美国行之已久的限禁华工、歧视虐待华人的做法具体化、合法化。对此中国人民表示强烈抗议。

光绪三十年（1904）“禁约”十年期满，国内舆论和各界民众均要求废约，旅美华侨十余万人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同美国交涉废约问题。清政府照会美国驻京公使，声明“禁约”期满即行废止，应另订新约。美国政府拒绝中国修约要求，执意继续保持原约，遂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在会上严厉谴责美国的排华政策，建议以两个月为期，若美国仍不允修改条约，则抵制美货。全体商董一致赞成此议，并立即以曾铸名义致电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⑥；同时又分电各省及香港二十一埠商会或商务局，请其协力进行。接着，国内各城市工商界以及海外华侨相继召开大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建议，并印发传单广泛宣传，国内和华侨所办报刊亦纷纷发表抵制美约，不用美货的言论，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采拒绝态度，上海各行业旋即采取行动，不买、不卖、不用美货，不到美国人所办学校读书，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等，缝纫工人不作美国布料衣服，刻字工人不刻美货商标，漆业工人公议不给美国公司作招

牌，不用美国材料和颜料，表现了下层群众的坚决态度。与此同时，广州、天津、北京、武汉、苏州、杭州、长沙等许多城市的商、学界和工人亦纷起响应，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会”、“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中国留日学生及海外侨胞也积极投入运动。

从抵制运动开始，美国即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予以镇压。七月二十一日（8月21日），清廷发布上谕，令各省对抵制美货者要“从严查究，以弭隐患”。接着各省督抚便相继查禁抵制运动。在内外压力下，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动摇、退缩了，经半年多的斗争，运动逐渐沉寂。

这次运动打击了美国对华的经济侵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注 释

①《苏报》1903年4月28日。

②《苏报》1903年5月1日。

③《浙江潮》1903年5月第5期。

④《革命逸史》初集，第105页。

⑤《革命逸史》初集，第109—112页。

⑥苏绍柄编《山钟集》第27页。

清（后期）

《苏报》案

经过光绪二十七、二十八（1901、1902）两年的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活动日益活跃起来，日本的东京和国内的上海是党人活动的两个中心。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教育会。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1890）中进士。甲午战争后，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同情维新派。戊戌政变后回乡任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七年（1901），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员。次年和上海一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蒋智由、黄宗仰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教育会“以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重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为名，“联络上海有志之士”，“隐然为东南各省之革命集团”①。恰在这一年，东京留日学生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一部分留学生被逐回国；同时上海南洋公学也发生学潮，二百多名学生退学，抗议校方压制言论自由。为安置这些学生，中国教育会特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章炳麟等任教员；“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②。

二十九年（1903）春，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继发表。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又名威丹，四川巴县人。二十八年（1902），自费留学日本，投身民主革命运动。次年春回到上海，参加爱国学社和拒俄运动。在《革命军》一书中他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民主革命，明确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首先全面地批判了康有为反对革命、主张保皇的谬论，从而使保皇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大大削弱。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上海的《苏报》对上述革命著作进行了大力鼓吹。

《苏报》原是二十二年（1896）由中国人胡璋的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创办并在日驻沪领事馆注册的一份平庸小报，二十六年（1900）由因教案牵累落职的原江西铅山知县陈范接办，时仍拥护康、梁的改良主张。二十八年（1902），学界风潮兴起后，陈范表示支持，且在该报专辟“学校风潮”栏，报道南洋公学等校斗争情况。二十九年（1903）春节前后，陈范聘蔡元培、吴稚晖等爱国学社教员每日为《苏报》撰写一篇社论，由报社每月提供一百元作为爱国学社经费，从此“排满革命”的言论便洋溢报端。五月初六（6月1日），《苏报》正式聘请学社教员章士钊（1881—1973）任主笔。章士钊字行严，湖南长沙人，光绪二十八年入南京陆师学堂，次年退学至爱国学社。此后《苏报》遂成为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机关报，发表了一系列引起社会震动的文章，如《驳〈革命驳议〉》、《〈革命军〉序》、《客民篇》、《杀人主义》等社论、来稿四十余篇，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残暴，批判了康有为等的保皇邪

说，号召人们“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从而使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对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清朝统治者切齿痛恨，作为“猖狂悖谬”的“革命邪说”，必欲铲除而后快。五月二十六日（6月21日），清政府以《苏报》及爱国学社“形同叛逆”，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密查拿，随时惩处”。两江总督魏光涛当即派候补道俞明震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处理此案。俞明震等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勾结，于闰五月初五（6月29日）由租界巡捕捕去《苏报》帐房程吉甫；初六（6月30日）从爱国学社捕去章太炎，从女学报馆捕去陈范之子陈仲彝及钱宝红，龙积之当晚投案；次日邹容亦自动投案。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苏报》及爱国学社被封。

《苏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曾设想将章炳麟、邹容等人“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但租界当局从维护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和租界的独特地位出发，拒绝引渡，坚持该案必须“在租界内执行”。于是章、邹等人先后由巡捕房移送会审公廨受审。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第一次开庭，由律师古柏代表清政府向会审公廨所组织之额外公堂起诉《苏报》“心怀叵测，谋为不轨”③；章、邹paid然应对，无所回避。清政府同本国老百姓在租界内诉讼，激起人民极大义愤，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对案件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因此审讯出现了“屡讯屡停，未能判决”的局面。后因陈仲彝、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在本案中无关重要，关押四个月后被释放。直至三十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才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自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邹因不堪狱中的虐待和凌辱，于刑满前不久即

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含冤而死，年仅二十一岁。章炳麟于三十二年五月初八（1906年6月29日）刑满出狱，赴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本部工作。

清政府本想通过《苏报》案扼杀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结果适得其反，它的发生不仅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更广泛的传播，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注　释

①《革命逸史》初集，第115—116页。

②《革命逸史》初集，第118页。

③《辛亥革命》第1册，第396页。

清（后期）

收回利权运动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即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铁路的建筑和矿山的开采方面，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因此，二十世纪初，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权的运动。

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是收回路权运动的开端。十九世纪末，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同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攫取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但合兴公司违背条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将大量股票私售给法、俄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又按《续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5年内修成，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秋，铁路仍未

动工。这种侵犯与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湘、鄂、粤三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斗争。从三十年（1904）开始，广东商务局决议力争废约；湖南省绅民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立废合同”；湖北绅民“亦群起力争”；三省留日学生组成铁路联合会，积极声援国内的斗争。当年底，美商摩根财团向比方收回被买去的股票，但仍拒绝废约。三省人民坚持斗争，并积极自筹款项，准备自办。美国迫于压力，于三十一年八月初八（1905年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中国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

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苏杭甬铁路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准许英商承修中国五条铁路中的一条，它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但合同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1905年7月24日），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接着江苏也组成了以官绅王青穆为总理、状元资本家张謇为协理的铁路公司。两公司不仅要求自办铁路，而且立即着手集股筑路，浙江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江苏则先修上海至嘉兴段。但在英国胁迫下，清政府竟于三十三年（1907），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议定借款一百五十万英镑，用英国总工程师筑路。“借款筑路”消息传来，江浙人民立即大哗。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相继成立国民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学校也分别聚众集议，一致要求“力拒借款，保全权力”。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死难，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路

事呕血而亡。清政府无视群众愤怒的呼声，竟然下令将领导争回路权斗争的浙路公司经理汤寿潜革职。由此浙江全省顿时沸腾起来，“茶寮酒肆以及街巷之间，所谈无非路事”，“甚至谓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云”①。鉴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争路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宣统三年（1911）与美国银行公司协议，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沪杭甬铁路的胜利。与此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互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而其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的斗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1898年5月21日）清廷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条，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转请福公司办理，限六十年为期。但因山西对外交通不便，采矿迟迟未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2月9日），山西巡抚张曾敭等支持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制定开办章程十四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并强调“不招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员”。然而福公司在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且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何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矿。这就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这年底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

等三百四十三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中等学堂学生一千多人也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次年二月初七（1906 年 3 月 1 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也先后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主持废约。山西省留日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而在该年八月二十六日（10 月 13 日）蹈海自杀，留日学生连续举行追悼会，随即派代表回国在太原、平定州等地举行悼念活动，从而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接着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当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司，并着手集股开采煤矿。经过反复交涉，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907 年 1 月 20 日），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西绅民以二百七十五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在这期间，安徽人民为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为收回德国霸占的五处矿权、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云南人民为收回澂江等七府矿权、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奉天锦西暖池塘煤矿、湖北人民为收回阳新炭山湾矿权、黑龙江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总之，收回路矿运动是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参加运动的有工人、农民、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以及部分官绅，而在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则是资产阶级上层即立宪派。因为有广大群众参加，所以运动具相当大的声势；因为起领导作用的是立宪派，又使运动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不仅表现在对清政府的依赖

上，而且还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路矿权利不是采取“夺回”而是“赎回”的方式上，据统计，仅九项主要矿权的“赎款”即达九百多万元。但是收回利权运动的意义是巨大的，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大大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并且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因而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注 释

①《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2册，第886页。

清（后期）

革命小团体之建立

一、孙中山与兴中会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是孙中山建立起来的。

十九世纪末期，在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础上，继太平天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中下层为挽救中国的危亡，相继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日本化名中山樵 从事革命，后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今中山市）翠亨村人。因家庭穷困六岁开始参加农业劳动，十岁入塾读书，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辄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光绪四年至十八年（1878—1892），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读书。由于深入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又痛感帝国主义的欺凌及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遂萌发爱国救亡思想。光绪十八年（1892），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以在澳

门和广州行医为业；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爱国志士，酝酿建立团体，并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这时孙中山尚未完全摆脱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二十年（1894），他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但未获得任何结果。从此他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再度到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开展革命组织活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 年 11 月 24 日），二十余名侨胞，在火奴鲁鲁埠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中集会，正式成立革命组织兴中会。会上孙中山宣读了他起草的章程九条，沉痛地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与会者推举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随后孙中山让会员填写盟书，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先后入会的计一百二十六人（一说一百三十余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占八十人，其余为工人、会党和知识分子。为了举行反清起义，孙中山一方面组织华侨兵操队，使会员接受一些军事训练，一方面积极在会员中募捐筹饷。

光绪二十年底，孙中山与部分会员回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 年 2 月 21 日），在香港，孙中山与杨衢云（1861—1901）领导的爱国组织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部，地址设于中环士丹顿路 13 号，为便于活动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与檀香山兴中会相比，在总部起主导作用的已是

具有爱国思想，并有初步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则是那些有着“反清复汉”思想的会党分子。修订的总部章程删去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一些温和词句，对清政府的残暴腐败，从正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兴中会成立后曾先后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相继在横滨、长崎、台湾、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洲等地建立分会。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有力地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二、黄兴与华兴会

《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午、竞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今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二十八年（1902）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

员即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咸为之动容”①；课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作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二十九年（1903），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②，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五月五日（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倓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任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课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等人，并与在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六日（1903年11月4日）是黄兴三十岁生日，这天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麟、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彭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十二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

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讲话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

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二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具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1904年11月17日）西太后七十寿辰，全省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并且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但是这个宏大的起义计划却因走漏了风声而夭折。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六日（1904年10月24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

捕，于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1905年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

三、科学补习所

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爱国志士发起创建的革命组织。湖北地处长江中游，武汉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较深的地区之一，也是清王朝统治的重心之一，而各种进步思潮与革命力量又常常在这里汇集，因此又成为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19世纪末期，相继前往日本留学的湖北学生戢元丞、傅慈祥、吴禄贞等人，“看到日本的维新，同时目睹清室政治的腐败，满人当道的昏聩，深深感觉国势的阽危，非改革政治，倾覆清室，不能反危为安，转弱为强”③，从而产生了朦胧的革命意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孙中山从欧美来到日本。吴禄贞等人主动求见，得到孙中山的启迪和指导，反清革命思想进一步加强。光绪二十六年（1900）自立军起义的失败，促使湖北的爱国志士与康、梁决裂，不少人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些革命志士，一方面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又把革命思想传入湖北地区，推动湖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光绪二十八年三月（1902年4月），湖北留日学生在原来“励志会的基础上，组织湖北同乡会”，并于年底（1903年1月）发刊《湖北学生界》月刊，“以世界知识及民族主义唤起内地学生觉悟”为宗旨，通过各种渠道寄往本省，在湖北军、学界中散发。在此前后，吴禄贞等留日学生先后回国，与一直在湖北省城活动的革命党人张难先、胡瑛、吕大森、刘静庵等人会合。

光绪三十年（1904）春，齐集武昌的革命者讨论革命进行方略，“众意以为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④。他们认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⑤于是一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相继投入新军。在军中，每当饭后或操练余暇，他们就对士兵讲述清朝统治的残酷暴虐和反清的历史故事，并暗中散发《猛回头》、《警世钟》、《孙逸仙》、《黄帝魂》、《湖北学生界》等书刊，用以提高士兵的觉悟，串联组织。与此同时，他们又与武汉各学堂的进步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形成了军、学两界声气相通的有利形势。

光绪三十年四月（1904年5月），张难先、胡瑛与工程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以及学界的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康建唐等发起组织机关，在武昌同庆酒楼召开筹备会，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五月二十日（7月3日），武汉军、学两界的革命者集会，正式建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所址设于武昌阅马厂附近的多宝寺街。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宋教仁任文书，康建唐任庶务，军营及各学堂均置干事。补习所对外以补习科学为名，招收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由教员轮流讲授史地、数学、外语、理化、卫生；但内部却是“以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⑥。科学补习所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介绍知识分子和会党成员加入新军，一般在未入伍之前，必须接受补习所密约，“谓吾汉人四万万，亡于满清之手，已二百数十年，受尽苦痛。诸君此次入伍，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即起而革命，光复汉族，为一定之宗

旨”⑦。在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下，补习所的成员迅速扩大。

这时，正值华兴会在湖南准备起义，并与湖北革命党人接洽，以求协同大举。补习所同人一致表示赞同，约定湖南一经发难，湖北马上响应，然后两省起义军会师武胜关，挥军北伐。接着，科学补习所立即开始做响应起义的准备，积极筹备饷械，并印就军用票三十万张，以备起义时两省之用，推曹亚伯为湘鄂两省联络员，派吕大森、康建唐赴施南，何季达赴荆、宜，联络会党；由张难先、刘静庵、欧阳瑞骅负责动员组织工程营、马队营和武昌文普通学堂、武高等学堂中的革命分子；由胡瑛、王汉赴湖口起运军械来鄂。正当湖北革命党人紧张地进行准备时，华兴会起义计划泄露，清湖北地方官吏得悉两湖革命组织间的联系，湖广总督张之洞于九月二十日（10月28日）派兵搜查科学补习所。幸好革命党人预先得到黄兴的密电，已提前疏散，并销毁文件册据，清军警未获任何证据。事后，湖北地方当局仅将欧阳瑞骅和已离校的宋教仁开除文普通学堂的学籍了事。但由于主要领导成员被通缉逃亡和多数同志的离散，科学补习所自此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科学补习所虽然仅仅存在数月，但它对湖北革命运动的影响却是巨大的。亲历辛亥革命的李春萱指出：科学补习所对湖北革命，“撒播了许多种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第一，提倡知识分子投军，为以后运动新军革命打下了基础。第二，联合湘、鄂两省，易使革命运动迅速展开，武昌、长沙交通便利，武昌又为两省文化中心；‘科学补习所’与湘省联合，为两省以后开辟了联合的道路。第三，会党不受约束，容易坏事，湖南‘华兴会’失败，给予革命党人以极大的警惕，以后湖北革命得到教训”⑧。总之，从科学补习所开始，直接投身新军下

层做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成了湖北革命党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四、光复会

义和团运动失败前后，随着清政府卖国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派的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并开始着手筹建组织的活动。光绪二十六年（1900），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势的小团体，名为“浙会”。后来浙会改为“浙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发生的“拒俄运动”与《苏报》案事件之后，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十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祎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的革命团体，目的不仅为了加强革命的宣传工作，更重要的是“要用暴力发动武装起义”⑨。在其后不久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归国，开展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他自幼读书，尤喜史学。青年时期即已萌种族革命之念。为此，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渡日本，初拟进成城军校，但遭清留日学生监督阻挠未果，遂愤然投入留学界的反清革命运动。二十九年（1903）底他和同省留日学生魏兰 一起回国，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十二月二十八日（1904 年 2 月 13 日）抵杭州。然后他同魏兰每天步行七八十里，历游浙东各地，遍访山堂林立的各会党头目，并在会党群众中广为散发《革命军》、《猛回头》、《浙江潮》等书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

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⑩。这样，陶成章就为光复会的建立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与此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的龚宝铨，在上海正积极筹建新的组织。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建立了“暗杀团”，准备先杀二三个满族大臣，以为武装起义的先声。不久，因“暗杀团”人数太少，力量薄弱，龚宝铨急想扩大组织。恰在此时陶成章从浙江来到上海，经与龚宝铨议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建立革命团体；推举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密议后，由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革命团体的创立工作。经过认真筹备，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904 年 11 月 19 日），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正式召开革命团体的成立会，确定团体名称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据其成员后来回忆，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⑪，其核心是“光复”二字。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来，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起革命”，“无论如何，皇位是永远不能霸占的”；在经济上则“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⑫。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

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光复会在组织上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

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作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但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二十九年（1903）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三十年底（1905 年初）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⑬。但又感到“会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⑭，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以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1905 年 9 月 23 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⑮。从此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移于绍兴，而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1907、1908)，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宣统二年（1910），章炳麟、陶成章因不满孙中山等人倾全力在华南发动起义，以后因经费问题发生误解，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民国元年（1912）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刺杀，光复会解体。

注　释

①②《黄克强先生荣衰录》，1918年长沙出版，第25、26页。
③《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27页。
④《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页。
⑤⑥《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
⑦《武昌革命真史》，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4页。
⑧《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第110页。
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32页。
⑩《辛亥革命》第3册，第25页。
⑪《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127页。
⑫《辛亥革命》第1册，第534—540页。
⑬《辛亥革命》第3册，第178页。
⑭《民报》第18号，第116页。
⑮《辛亥革命》第3册，第26—28页。

清（后期）

同盟会成立

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革命派的队伍也日益扩大。形势的发展，给孙中山以极大鼓舞。他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了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提出新的战斗任务，即“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①；“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②，发展革命力量；“联合大群，团集大力”③，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为此，他离开日本到达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书》两篇文章，着重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揭露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④；号召革命群众一定要认清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因天地会组织致公堂在华侨中有众多的成员，为同保皇派争夺群众，孙中山在檀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即元帅。接着他来到美国，在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协助下，举行了致公堂

全美会员总注册，并代为重订致公堂新章规程八十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⑤。但因美国华侨风气尚未开通，注册收效不大，于是孙中山应中国留欧学生邀请抵达欧洲。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他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相继建立革命组织，发展留欧学生六十余人。而在此之前一年，黄兴、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继兴中会之后，在国内先后建立起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十余个革命小团体，地区遍及江、浙、湘、鄂、皖、闽、赣、川、陕等各省；这些革命团体建立后，均投入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且都相继遭到挫折，其主要成员在三十一年春天前后陆续来到日本。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而孙中山则已成为革命者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被称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⑥。通过革命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把相继纷纷出现、而又分散各地、组织狭小、力量有限的革命小团体，联合起来，以便领导全国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继续前进。为此，孙中山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1905 年 7 月 19 日）从欧洲返抵日本，同在日本的革命团体领导人商组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小明王韩林儿）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⑦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多数人的支持。

六月二十八日（7 月 30 日），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 70 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址召开建立

统一组织的筹备会议。到会人员分属十七省籍，唯甘肃省没有赴日留学生而缺席。会上，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理由、形势、进行方法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成。在讨论团体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表示异议，主张叫“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还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反复讨论，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讨论组织纲领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有些人不同意把“平均地权”列为政纲。对此，孙中山作了详细说明，指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⑧。最后政纲获得通过。会议随即举行宣誓加盟仪式，并推举黄兴、陈天华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提交成立大会讨论。

七月十三日（8月13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一千三百多人举行集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中国文明悠久，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如果能“发愤为雄”，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国家，中国的建设将“有异常之速度”，“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他号召大家一定要“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⑨。孙中山这种明确的民主革命观点以及中国革命后必能赶

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到同盟会的行列中来。

七月二十日（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百余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已佚失。今见到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1906年5月16日〕改订的《总章》，共24条）；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除总理一职已于筹备会确定为孙中山外，又以投票方式选举了总部各部负责人，推选了各省主盟人。依照《总章》的规定，同盟会总部设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被任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居协理（副总理）地位，总理外出时，即代总理主持总部工作。章程规定在总部统一领导下，各地分设支部：国内按地区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以下各省设立分会，支部部长由总理指任，分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以下各国设立分会。当时设想，不但机关有组织，全体党员亦仿照军队，建立营、队、列、排等各级组织，以保证组织的坚固。同年十月三十日（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机关报《民报》。次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又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有些则作为文告供各地起义时发布。总部所委派之主盟人于同盟会成立后亦相继分赴国内外各地，吸收会员，建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武装起义作准备。

同盟会是一个具有比较明确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

大主义，对同盟会政纲进行了理论的概括。随后，他又通过《军政府宣言》和《民报》周年纪念演说，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作了具体的阐述。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时革命派以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一内容概括为“反满”。孙中山指出“反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异种残之”，即指窃据全国政权的满族贵族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各族人民所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这种压迫又是与地主阶级对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压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使全国人民摆脱国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孙中山特别强调必须把掌权的满洲贵族和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不能搞民族复仇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⑩。二是“外邦逼之”，即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野蛮掠夺。从兴中会开始，孙中山每到一处，总要沉痛地向人们揭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险处境，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但是在分析民族危机发生的原因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却片面地认为仅仅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尤其在于甘当帝国主义鹰犬的清政府。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⑪由此可见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紧紧抓住了二十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集中反映—革命人民和清政府的矛盾，具有明显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同盟会的民族主义，不但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幻想“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⑫。同盟会的《对外宣言》明确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承担”；“所有外

人之即得权利，一律保护”⑬。这充分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同盟会民族主义的不彻底性。

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也就是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孙中山认为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因此只搞“民族革命”是不行的，必须把它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在推翻清政府的同时，废除君主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主张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给国民以充分的“民权”，让国民选举总统、议员。由议会制订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宪法，人人共守。这样，孙中山就绘出了一幅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然而，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只注意了政体的变革，却忽略了国体的变革，即忽略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一整个地主阶级，尤其表现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幻想，因而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

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主张民国政府一经建立，先核定全国地价，承认初次核定的地价归地主所有，而以后随着社会经济飞跃发展所日益增涨的地价，则归国有。国家可按照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很明显，平均地权就是通过涨价归公和照价收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实现土地的国有化；国家还可利用全国地产收入来发展经济，做到“家给人足”。孙中山认为这就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实现了“社会革命”，即实现了“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完全是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要让租营国有土地的人拥有资本，相互竞争，实质上则仍是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平均地权”归根结底是一个

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土地纲领。然而即使如此，因为它根本反对贫苦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也决定了同盟会的土地纲领是无法实现的。

总之，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尽管它存在着根本性的弱点，无法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成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有力思想武器。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信心，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同盟会成立后，一面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派同改良派论战；一面联络会党、新军，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总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迁至南京，旋又迁回上海。1912 年 8 月改组为国民党。

注　释

①《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3 页。

②③④《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30、261、232 页。

⑤《孙中山全集》第 1 卷，第 262 页。

⑥《辛亥革命》第 1 册，第 90 页。

⑦《辛亥革命》第 2 册，第 210 页。

⑧《革命逸史》第2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2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7—282页。

⑩⑪《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4、234页。

⑫⑬《辛亥革命》第2册，第42、33页。

清（后期）

革命与保皇之争

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了一场大辩论。

革命派与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其上层的代表。早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派别就同时出现了。不过当时改良派因为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超过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1898年12月23日）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一百册；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创办《新民丛报》，历时近六年，共刊行九十六号。康有为则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这时他们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仍然寄希望于光绪帝，祈望光绪复辟，继续推行变法新政，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仍然反对通过革命办

法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因此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同他们谈判“联合”问题时，都被拒绝了。可是二十世纪初，在内忧外患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改良派从切身利益考虑，一方面加紧要求清政府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借以抵制革命；另一方面则开始直接将矛头指向革命派，正面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双方在光绪二十九年、三十年（1903、1904）已初步进行了交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从而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发出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①。为实现这一任务，继《民报》之后，革命派在国内外各地遍设宣传机关，出版书报杂志。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1905—1907），革命派主办的报纸、杂志达60余种，其它革命出版物“无虑百数十种”。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同盟会的主张，而《民报》则更为系统的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其文章论理透辟，脍炙人口，激动人心，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每期再版、三版以至五版，仍供不应求。对此康、梁十分恐惧，公然宣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②。于是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同盟会政纲。改良派的活动，成了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巨大障碍，孙中山站在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立即组织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进攻给以有力的回击。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国内外的二十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但归结起来，主要是围绕同盟会政纲进行的。

双方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说什么康熙的薄税政策不仅“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③；声称在清政府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④，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革命派针锋相对地驳斥了保皇派的攻击。他们指出，清政府是中国一切反动腐朽势力的罪恶渊薮。在清政府统治下，满洲贵族享有一切特权，而广大人民无丝毫权力之可言。士、农、工、商以至清军士兵，无一不受到清政府的残酷剥削和野蛮压迫，“奴叱娼畜”、“厘金赔款”、“重征浮收”、“滥刑苛法”，“敲骨吸髓，十室九空，来日方长，其曷堪此”⑤。对外，清政府则又奴颜卑膝，唯命是从，是帝国主义侵华的驯服工具；督抚仰外人鼻息，利权任外人索取，赔款代外人搜刮，教案听外人裁决，中国的利权、财权、兵权、交通权等全受外人控制。中国本似一完美之人，由于清政府的出卖，结果被帝国主义“东割一肺肠，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⑥。可见，以载湉为头子的清政府，“其君则盗魁也，其官吏则群贼也，其朝署则割地鬻权所也”⑦。这样反动卖国的政府，“实中国富强第一大障碍，欲救亡而思扶满直飏汤止沸，抱薪救火”⑧，实际是向操刀者摇尾乞怜，决不可能达到目地。因此，“为独立计，为求亡计”⑨，必须打倒清政府。改良派把推翻清政府的民族革命说成是“民族复仇主义”，这完全是歪曲和污蔑。

双方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提出种种理由，大肆攻击革命派所倡导的民权主义。一是贩卖“渐进论”，说是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二是污蔑“民智

未开”，胡说中国人民“即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⑩，而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有力地驳斥了改良派的谬论，他们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而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和民族在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需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革命派认为：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⑪，这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污蔑。因为“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是人人具有的。而“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⑫。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且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时代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十分迅速的。改良派污蔑中国“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只能行专制，实际是继续贩卖“君权神授”的反动思想，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万世不替之皇基”罢了。

双方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改良派从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出发，反对“平均地权”。他们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它一无贵族压制，二土地极为平均，三“赋税极轻”。在这种制度下，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他们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的；况且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

存在，不仅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不能“蔑弃”，而且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革命派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因此他们声言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改变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⑬。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并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但他们却以鲜明的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改良派的攻击。他们提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由此才造成人民极端贫困的惨况。他们认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否则就必然造成“地权之失平”以及“人权之失平”，所以“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⑭。同时他们进一步指出中国既然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一旦采取大机器生产，就一定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⑮的现象。为预防这种弊病的产生，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其具体办法就是清除私人对“天然生产力”即土地的占有，把土地收归国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从历史刚刚揭开二十世纪的帷幕就已开始交锋，至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得以全面展开，斗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广，都是空前的。经过这场大论战，一、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于是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二、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更广泛

的传播，从而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经过论战，“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⑯。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在驳斥革命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瓜分的问题上，革命派虽然表示即使干涉也不足惧的态度，但他们始终天真地认为帝国主义是遵守国际法的，是不会干涉中国革命的，更不致引起瓜分。在驳斥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因而产生“内乱”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说要对“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的长期动乱，又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意见，即所谓“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⑰。在驳斥关于“土地国有”就是“夺富予贫”的问题上，革命派不仅未能做出有力回答，反而明确声明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即“吾人之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是欲使富者“有益无损也”，且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⑱。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注　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8页。

②《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3页。

③④《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324、230页.

⑤《辛亥革命》第2册，第434—435页。

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43页。

⑦《醒狮》第1号第2页。

⑧⑨《辛亥革命》第2册，第433、261页。

⑩《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65、182页。

⑪⑫《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121、338页。
⑬《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582页。
⑭⑮《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753、436页。
⑯《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08、695页。
⑰《民报》第2号第7页。
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第608、695页。

清（后期）

革命党人之起义

坚持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更是前赴后继，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为最后推翻清朝创造了条件。

一、萍浏醴起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年（1904），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次年会党首领马福益又被捕死难，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然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李金奇、在安源矿工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龚春台、姜守旦、冯乃古在浏阳，李香阁在醴陵等县农民群众中尤有威信；他们愤激于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三十二年（1906）春，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蔡绍南回湖南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同龚春台等会党头目取得联

系。随后，刘道一等即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举行秘密会议，基本确定了在萍（乡）、浏（阳）、醴（陵）三地同时发动起义，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的计划。

会后，刘道一留长沙筹划全局，并负与同盟会总部联系的责任。蔡绍南赴萍乡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举行开山大典，公议将哥老会改称"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①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很快增到十多万人。正因人员庞杂，引起清廷注意，洪江会头目遭到逮捕杀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在此紧急情况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在萍乡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商议起义日期和办法。会上，会党首领一致主张乘官兵未到，立刻发难；蔡绍南等认为同盟会总部无信息，军械又不足，仍拟等待接济。大会经终宵争论，未能作出任何具体决定。十九日（4日）凌晨，洪江会首领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浏阳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旗发难。蔡、龚只得宣布动员令：以同盟会名义通知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各处会党同时发动。二十一日（6日），起义军占上栗市，并立即整编部队。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大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十大罪恶，宣布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

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②。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第一次以起义檄文的形式公诸于广大群众中，并且得到拥护。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旬日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万人，浏阳与醴陵以及江西萍乡、宜春、万载边境广阔农村地区也燃起了反抗烽火，其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蔡绍南等原拟分三路进兵：一路据浏阳、醴陵，进窥长沙；一路据萍乡安源矿区为根据地；一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州、南昌诸府，攻略沿江各省。但起事后，形势发展迅速，起义队伍每到一处，清军迅即溃退，人民热烈拥护，而领导者们却不知道如何巩固革命秩序，如何统一军事调度，至使前方各自为战，后方也步调混乱。

二十三日（8日）当龚春台部整军准备出击时，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在浏阳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一带也立刻集合了一万多人，起而响应。起义军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发布檄文称：“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③反映了单纯反满的意向。

这次大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同盟会员纷纷到总部机关请命回国，投身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和黄兴派多人到鄂、皖、苏、浙、赣、湘等省策应。

面对蓬勃发展的起义，清政府十分惊恐，急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及地方驻军、“义勇”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亦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起义军凭着手中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抵抗，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起义军互不统属，领导不力，奋战月余后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惨遭失

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然而这次起义的影响是重大的，它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增强了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信心。

二、华南六次起义

1. 潮州黄冈起义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1907年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赴安南(今越南)。抵河内后，他立即在甘必达街六十一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准备就近组织领导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起义。他认为这些省份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发动；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尤其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为此，孙中山决定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部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为此，他派胡汉民往香港从事策应，函召在东京的黄兴南来协助；委任广西三合会首领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负责领导钦、廉地区的起义；委任新加坡富商许雪秋为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负责潮州一带的起义工作。但正在积极筹备之际，潮州黄冈起义首先爆发了。

许雪秋受任后，即通过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在会党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但由于走漏风声，引起清潮州总兵黄金福、黄冈都司隆熙的警觉。四月十日（5月21日），黄金福派兵勇数十名进驻黄冈镇，并借故捕去会众2人。次日，余既成等聚集党众二百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十二日（23日）起义者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为

司令，余既成、张厌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或“大明都督府孙”名义布告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深受群众拥护。附近贫民纷纷参加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但这次起义事出仓猝，具体主持者不了解通盘计划，事发后才派人去香港请许雪秋来督率义军。适时黄金福部清军已抵离黄冈二十里的汫州。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直趋潮州、汕头，目标是乘黄金福带兵外出之时，攻占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接奔向汫州，攻击黄金福部。十四日（25日），两路军队同时出发。余部抵达汫州时，天已黎明，而清军早有准备，因此初战失利。进攻潮汕之义军，得知汫州失利，即改变计划，转援余部义军。两路会攻黄金福清军，敌势危急。恰于此时，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派援军到来，双方夹攻义军，因而汫州未能攻下。十八日（29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余决定解散队伍，转往香港，起义遂宣告失败。

2. 惠州七女湖起义

按孙中山原来设想，粤东的潮州、惠州应同时举义，所以他在委派许雪秋规划黄冈起义时，又先后派遣惠州地区的会党首领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三人从新加坡返香港，负责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工作。黄、余二人抵港后，分别领去活动经费千余元，却毫无动作，唯有邓子瑜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邓子瑜，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与归善、博罗、惠阳等地三合会众有广泛联系。他在香港一面委派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分别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聚集党众，一面在港购置械弹，准备亲自沿小道押解入惠州接济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八日（1907年5月29日），黄冈起义已宣告失败，但惠州

方面未得到消息，所以仍举旗响应。二十二日（6月2日），陈纯等在距惠州府城二十余里的圩镇七女湖集众百数十人，劫夺防营枪械，杀水陆兵勇多人，宣布起义，并发布反清讨满檄文。二十五日（6月5日），起义军进攻泰尾，该地清军闻风而逃；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6月7日），义军乘胜进攻柏塘、公庄各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队伍发展到三百余人，声势大震。然后义军分击八子爷、公庄、横刀、梁化，所向无敌。归善、博罗、龙门各处党众继起响应，惠州大震，归善、博罗二县城门均闭。惠州协统两次派兵往御，均被击回；继调横沥巡防营管带洪兆麟至柏塘，自二十九日（6月9日）至五月二日（6月12日），亦多次被义军所败。三日（13日），洪兆麟带队赴八子爷地方，为义军在山凹突击，洪中枪坠马，所部死伤极重。消息传出，广州震动。两广总督周馥电调李准由黄冈驰援惠州。李部由澳头登岸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坚持战斗10余日，多次击败清军。但终因黄冈起义已失败，他处亦未响应，惠州义军孤立无援，不能坚持战斗下去，遂将队伍移到梁化圩附近，将枪械埋于地下，队伍自行解散。

3．钦廉防城起义

三十三年（1907）春，广东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糖捐繁重，举绅耆数十人向府吏请求蠲减，府吏反将代表囚禁。于是乡民推当地富绅刘思裕为首领，组织“万人会”，举行抗捐起义。钦（州）廉（州）道王秉必派兵镇压无效，遂向省吏请兵。粤督周馥乃派统领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率兵一营，会同当地清军镇压，刘思裕及众多乡民惨遭杀害。于是三那乡民派代表到河内，请孙中山予以援救。孙中山

即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前往钦州主持起义事宜，复派黄兴前往钦州郭人漳营、胡毅生赴廉州赵声营策动清军响应。王和顺受命后即到三那地区，与当地起义群众会合，伺机进取。后得知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乃请示孙中山在防城发动起义。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王和顺率二百余人首先在钦州王光山举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宣示起义军"誓当与我国民披坚执锐，共冒矢石，以驱丑胡，以立新国"④。二十七日（4日）王率部攻防城，得清军刘辉廷、李耀堂两哨官内应，次日义军进入防城，杀知县宋鼎元等；军队在城内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居民皆燃爆竹庆贺，异常鼓舞，相继加入义军，革命队伍很快扩至三千人。在这里王和顺再发出《告海外同胞文》，号召海外同胞响应和支援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祖国的独立富强作出贡献。攻克防城的当天，王和顺命少数人留守防城，自率主力进攻钦州城。本来黄兴早已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不料至时郭人漳却借故变卦，且唆使义军转攻广西南宁，企图使这支仅有数百人的革命武装在驻有重兵的南宁城下自蹈危机。革命军进攻钦州受阻，八月一日（9月8日）开始进攻灵山城。因攻城器具缺乏，战至次日，城仍未攻下。清军乘势出城反扑，革命军只得且战且退；这时郭人漳又重新攻占防城，使革命军腹背受敌。八月七日（9月14日），王和顺被迫解散革命军，自率二十余人返越南境内，余部退往边界山洞和十万大山。

4．镇南关起义

光绪三十三年五、六月（1907年6、7月）间，孙中山先委任同盟会员关仁甫为"中华民国西军都督"，负责镇南关军事。关仁甫与镇南关清军管带黄瑞兴、边防统领总教练官易世

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人取得联系，并允俟起义时为内应。但不久事泄，易、陈二人被害；关仁甫以经营失败退回越南。是时王和顺从灵山败归，孙中山复命他继续经营镇南关军事。王于十月五日（11月10日）前往那模与早同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祐卿会合，议定于十三日（18日）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然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王属绿林出身，而祐卿所部游勇不听王调度。王只得退归河内。孙中山接着派同盟会员黄明堂、关仁甫继续到镇南关策动起义。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李祐卿事前又早与关上守兵联络成熟；故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黎明，明堂等率那模村乡勇80人，快枪42杆，循山背间道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镇南、镇中、镇北3座炮台陆续为义军所占领，附近游勇来投者，不绝于道。次日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镇南关右辅山炮台，亲临指挥。二十九日（12月4日），清参将陆荣廷率军来犯，义军奋勇抗击，孙中山亦亲自开炮轰击敌军；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夺回义军阵地。孙中山鉴于镇南关炮台难于进取，台上枪炮又陈旧不堪遂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他本人则偕黄兴等回河内筹款集械，俟械弹一到即进攻龙州。孙等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至，对革命军进行围攻。黄明堂率部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激战，肉搏相持七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于十一月五日（12月9日）撤离镇南关。

5. 钦廉上思起义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孙临行前命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胡汉民驻守河内机关部，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黄受命后，向法商购得匣

子枪数十支，又得香港革命党人冯自由等运到的一批枪械的接济，遂组织旅安南华侨二百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1908 年 3 月 27 日）向钦州进发。二十七日（29 日）下午义军抵小峰，遇清军一营依山堵击。黄兴佯败，引清军离山上阵地，然后分兵三路包抄，将清军一举击溃。次日再败清军一个营。二十九日(31 日)，义军在大桥击溃清军两个营。三月二日(4 月 2 日)，义军占据马笃山，清军管带龙某率兵三营来攻。义军居高临下，且顽强奋战；黄兴身当前敌，亲发枪将龙某击落马下，于是敌 3 营尽溃。义军自起义与清军计接仗四次，全部获胜，缴获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算。义军声势日盛，拟乘胜取道那楼、大录诸地向桂边进攻。清军统领郭人漳等部三千余人尾追不舍。黄兴机智地命部队夜间用炸弹突袭敌营，使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退。

此后，黄兴率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坚持战斗四十余日，数千清军疲于奔命，令钦廉道龚心湛“闻风而慄”，频向粤都告急。在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这次起义是战绩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⑤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同时黄兴亦未接受防城起义时受骗的教训，仍把接济弹药的希望寄于郭人漳身上，而郭则再次违背原已答应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且疯狂地向义军进攻。结果终因补给十分缺乏、军心涣散，无法坚持下去；于是黄兴被迫下令队伍解散，一部分退回安南，大部分仍退回十万大山。

6. 云南河口起义

孙中山在指示黄兴入钦、廉发动起义同时，令黄明堂会同王和顺、关仁甫策划云南河口军事，以应援黄兴的行动。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 年 4 月），关仁甫先入云南，游说清防营及铁路巡警等响应起义。四月一日（4 月 30 日）凌晨，黄明堂等率所部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袭攻河口，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经过两小时战斗，占领河口。旋进取半山四炮台，经激战，清军管带黄元祯率部先降，且反戈助战，至午后四时清河口副都办王镇邦被击毙，河口四炮台皆为义军所有，缴获快枪千余枝，子弹无算。黄明堂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义军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关仁甫于三日（5 月 2 日）率众四百人左趋蛮耗，拟上个旧，并合临安周文祥之兵，以攻蒙自；四日（3 日）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二百余人相遇，清军不战而走，降者数十人，驻霸西清管带李开美也率众反正，义军遂占领新街。五日（4 日），王和顺率起义军从河口出发沿铁路进攻，先有清军李兰亭部一营归诚，继又招降黄茂兰部两哨，遂占领南溪。时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奉云贵总督锡良命，带兵 4 营到八寨。王和顺闻报，乃分兵袭取古林菁，以牵制白军，而白军来降者百余人。义军本可乘胜进克蒙自，但因粮弹不济，只得暂驻原地停止进击。

为数众多的清兵反正，是起义迅速胜利的原因之一，但随之而来的也给起义的发展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听号令。孙中山见河口前线缺乏得力主将指挥，又适黄兴从钦州返安南，遂电委黄兴为云南革命军总司令，节制前线各军。黄六日（5 日）从海防乘晚车入河内，八日（7 日）即乘早车上老街，赴前敌督师。他至河口后，见军事状况“疲玩

不振"，力促黄明堂迅速增兵，沿滇越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以粮食缺乏，犹豫不决；黄兴不得已，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是"将士多不听号令"，行军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再行半里，兵士纷纷溃散。黄兴深感"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⑥,遂决计回河内，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敌。不料十二日（11日）黄兴自河口返安南，甫到老街即被法国当局扣押，旋被驱除出境，法当局且明令禁止起义人员及粮械从安南进入云南。

此后，义军进入困境。清云贵总督锡良乘机调集军队向义军反扑，委道员方宏纶为全军总统，白金柱督办全省军务，他本人则亲赴临安居中策应。白金柱由蒙自分兵两路沿铁路线进攻，进至蛮耗的义军左队关仁甫部原清降兵，闻清军到来，立即哗变；关部损失惨重，只得退守河口。四月（5月）下旬，清黔军二营、川军二营、桂军三营络绎而至，向王和顺大营进攻；王与清军在泥巴黑附近相持二十余日，义军渐处劣势。二十三日（22日），王和顺亲至河口与黄明堂相商，双方议定义军全数开赴普洱府，袭取思茅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昆明，并确定两部开至巴沙会合，再相机进取。但黄明堂部先到巴沙，未等王和顺兵来临即先自出发，在下田房与清军大队相遇，败后退回河口；王和顺闻讯也只好向河口退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义军诸首领经商议确定行动方针为"保全队伍，移师桂边，再作后图"⑦，故义军全数撤出河口；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清军占河口。黄明堂等率军六百余人撤至安南境内，拟再转进桂边，结果被法殖民当局强行缴械，被遣散到新加坡等地。历时一月的河口起义最后失败。

三、皖浙起义

当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在华南发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之时，光复会领导人在安徽、浙江也打响了反清的枪声。

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陶成章的协助下，徐锡麟在绍兴设立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招收金（州）、处（州）、绍（兴）三府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训，规定凡入校学员均属光复会员，卒业后仍归学堂领导人统辖和节制。为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权，徐锡麟又赴日学习军事，因眼近视而未果。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巡抚恩铭重用，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与陈伯平、马宗汉等密谋革命。这期间，徐锡麟还与归国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保持联络，期与浙江同时发动义举。

秋瑾（1875—1907）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今绍兴）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决心献身救国事业。光绪三十年（1904），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到日本留学，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年冬归国，加入光复会。三十一年（1905）春复去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同年冬，为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三十二年（1906），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发刊《中国女报》。三十三年（1907），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处州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约于六月上旬（7月中旬）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然后分兵进取南京，进而占领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要地，再图发展。

五月（6月）间，绍兴会党过早地暴露了形迹，清政府已有觉察，到处缉拿革命党人。徐锡麟见事机已败露，决定铤而走险。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甲班学员举行毕业典礼；该日上午八时巡抚恩铭以及省文武高级官吏前来祝贺。典礼开始后，陈伯平首先向文武官员坐席掷一炸弹，未爆炸。接着徐锡麟持双枪向恩铭射击；恩身中七弹，后经抢救不治死于抚署内；清吏遇变如鸟兽散。徐锡麟复拍案对众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⑧学生们愕然不知所措。徐遂率徐伯平、马宗汉等三十余人攻抚署，旋转至军械所取械，结果被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陈伯平战死，徐、马等二十余人被捕。受审时，徐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⑨，慷慨陈词，视死如归，当晚英勇就义。皖省起义的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通学堂。秋瑾得知安庆败讯后，即焚毁名册，掩埋枪弹，疏散党人；她本人则坚持不走，决计以身殉国。六月初五（7月14日），浙江巡抚张曾敭派清兵往大通学堂，捕去秋瑾等六人。次日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受皖浙起义的影响，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下旬（1908年11月中旬），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利用新军，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熊成基（1887—1910）一名承基，字味根，江苏甘泉（今江都）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安徽练军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参加革命团体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学堂学习。三十二年（1906）任江宁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三十三年（1907）由南京调回安庆，先任马营队官，继任炮营队官，参加光复会，并负责主持岳王会，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1908年11月14、15日），光

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消息传到安庆，熊成基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机会。二十六日（19日），他召集党人会议，众议决当晚举行起义。晚九时，熊成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起义，进攻安庆。经一昼夜激战，因城内已有防备，起义军未能破城。二十七日（20日），清水师提督陈从周率舰五艘，炮轰起义军；端方从太湖派兵七营向安庆进逼。起义军三面受敌，战至晚十时，被迫向集贤关、桐城方面突围出走。突围中，起义军又遭到清提督姜桂题部追击，义军退至庐州时，余部已不足百人，于是只好解散队伍。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革命派转化清朝新军用以反对清政府的开始，标志着新军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四、广州新军起义

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但当时党人依恃的主力仍为会党。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于是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广东番禺人。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多次为《民报》撰文，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改良主义，三十二年（1906）回广东，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之后，同盟会员葛谦等也深入广州防营中发展革命组织。三十四年十月（11月），朱执信、赵声等集会，拟乘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机，依靠葛谦等所能掌握的防营力量发动起义，但因计划泄漏而失败。这次事件前不久，倪映典来到广州。倪映典（1885—1910）一名瑞，字炳章，安徽合

肥人。光绪三十年（1904）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复入炮兵学堂，三十二年（1906）任江南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参加同盟会，后在军中的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只得离军南行，因赵声的关系得任新军炮兵二营右队二排排长。他以此为掩护，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向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统元年五六月（1909年6、7月）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醁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开会决定：由倪映典联系新军各营，张醁村联系巡防各营，胡毅生联系农村会党，而由赵声总其成。八月以后，倪映典因受到清方注意，便请假辞职，专门从事新军的发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盟会在广州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进展。当时广东新军计有：步兵第一、二两个标（团），炮兵第一、二两个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除第二标和学生营驻北校场外，余均驻在广州东北郊的燕塘；另有巡防新军七营。到这年冬，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不久，倪映典自广州至香港，报告运动新军情况，南方支部遂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来港，"共图大举"。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二十六日（2月5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

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三十日（2月9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应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寝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

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八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正月六日（2月15日）举义。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无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2月10日）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两广总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一面集合兵士训话，同时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于初二（11日）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初三（12日）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作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即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三千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士兵齐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后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起义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清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从清营走出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

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军被俘百余人。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它证明清朝统治的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确可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五、黄花岗之役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干部产生了悲观情绪。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孙中山洞察到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于是积极推动同盟会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举行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经过统一思想，会议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联络防营、警察与会党，并聚集同盟会的主要精干力量，在广州发动起义，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

十二月十八日（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关的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8课：一、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课长；二、交通课，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赵声兼课长；三、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为课长；四、编制课，负责草定规则，陈炯明为课长；五、秘书课，负责文件，胡汉民为课长；六、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李海云为课长；七、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罗炽扬为课长；八、总务科，负责其他杂物，洪承点为课长。接着各课均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是筹饷购械。槟

城会议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即分赴海外各地，向广大爱国华侨演说革命形势，募集起义经费，在侨胞的慷慨资助下，共收义捐 157213 元，超过了孙中山原计划募款 13 万元的设想。同时党人又分别到日本及南洋各国购置枪枝弹药，潜运到广州城内各秘密机关。二是组织起义力量。除分派革命党人去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起义外，重点派专人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以及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起义。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常不听指挥的教训，这次特精选一批青年党人及志士组成一支“先锋”队，充当敢死队，其任务是首先在城内发难，打乱清政府在广州的指挥机构，夺取军械库，打开城门，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这支先锋队初定为五百人，后增定为八百人。国内外志士得到要组织“先锋”的消息，抱定以身殉事业的决心，争相踊跃赴义。党人方声洞、林觉民等不少人写下了遗书，向亲人诀别。三是派人潜入广州，先后设立大小机关三十八处，作为党人活动及储存枪械的据点。各项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黄兴于宣统三年三月十日（1911 年 4 月 8 日）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决定十路进攻计划；因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着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故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定于十五日（3 月 13 日）发难。不料就在统筹部开会之际，广州城内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枪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的事件；且吴镜由香港运炸弹至广州又为清兵查出被捕，清广东当局因此加强了戒备；加之美洲华侨的捐款及由日本购进的部分枪弹也未送到，统筹部有鉴于此，乃将发难日期推至二十八日（4 月 26 日）。黄兴于二十五日（23 日）亲至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在两广总督署附近的小东营 5 号

建立起义指挥部。考虑到购置的枪械尚未运到，黄兴将起义日期改为二十九日（27 日）。但此时清广东当局对起义计划已有所闻，两广总督张鸣岐、水师提督李准加强了防范和戒备，有些储存枪支、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面对这种情况，党人对是否按期举义出现了分歧：陈炯明等主张缓期再举；林文等主张立即起义。在众说纷纭面前，黄兴考虑到这次起义经过党人精心准备，动员了党内的众多骨干力量，筹集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而当时改期实际等于取消，会造成消极的思想影响，黄兴和部分党人下决心拼个人的一死来酬答国人，决定如期发动。当晚黄兴电告总部要赵声速令先锋队员前来参加次日的起义。接着黄兴召集会议讨论发难事项，发难时间定在次日下午 5 时 30 分。鉴于人员已减少的实际情况，将原定十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队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率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方面于晚上 10 时接黄兴电，因三百多名选锋队员于次日无法到达广州，急电黄兴再展期一日；黄接电后决定不再延期。而第二天起义时，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 3 路又均未发动，最后只剩下黄兴一路。

三月二十九日（4 月 27 日）下午 5 时 30 分，黄兴率选锋队员一百二十余人，臂缠白布，手持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衙门。经过激战，起义军击毙卫队管带，打退了负隅顽抗的督署卫队，一举冲进署内。总督张鸣岐早由后壁逃至水师行台，与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起义军。黄兴下令焚烧总督衙门，随后转攻督练公所，途中遇李准的亲兵大队，双方展开激战，旋突围而出。这时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徐维

扬率花县党人攻小北门，接应新军；川、闽及南洋党人攻打督练公所；黄兴一路出大南门，接防营同志入城。攻小北门的一路在源盛米店、司后街等处与清军交战失利，转攻飞来庙又未成功，大部分壮烈牺牲。攻督练公所一路与防营发生激战，喻培伦胸前挂一筐炸弹，所向披靡，弹尽被捕，其余先锋也或死或伤。黄兴一路行至双门底，与同志温带雄部相遇，因温部未带白巾，致误会交火，温带雄及方声洞等牺牲。在战斗中，黄兴右手中、食二指被打伤，但他仍英勇奋战，率众且战且前，直到后来队伍被打散，他一人躲入一小店化装后出城到女同志徐宗汉所在机关，后返抵香港。起义军经过一夜激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八十余人。事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多方设法，收殓牺牲的烈士遗骸七十二具，合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其名为黄花岗。因此，后来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广大党人在起义中表现的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促进了辛亥革命的到来。

注 释

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第1277页。

②《辛亥革命》第2册，第477页。

③《辛亥革命》第2册，第479页。

④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

⑤《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240页。

⑥《革命逸史》第5集，第144页。

⑦《革命逸史》第5集，第146页。

⑧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篇，第40、46页。

清（后期）

立宪运动

二十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也积极行动起来，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的问题。他们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改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组织，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才能使本阶层参加政权，以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才能缓和阶级矛盾，消弭革命，才能抵御外侮，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只有这样才能“安上全下”①。因此，要求清王朝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就成了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及其活动的中心内容，故改良派也被称立宪派。为此，他们开展了一场延续八九年之久的立宪运动。由于活动地区的不同，立宪派又分为海外和国内两个部分。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他们受清政府通缉，成为“国事要犯”，在国内无立足之地，逃往国外，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这部分人也被称为保皇派。国内立宪派以较大的商办企业主、商办路、矿公司的主

持人以及与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有联系的知名人士为代表，如大生沙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主办人张謇、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倡首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等，都是立宪派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同身居国外的立宪派比较起来，他们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国内立宪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立宪运动的酝酿，起于光绪二十九年。这一年，广西会党举起了反清义旗，同时又先后发生了“拒俄”、“拒法”运动和《苏报》案事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此形势下，“而立宪之说以起”。接着，日俄战争和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俄国革命，又给立宪派的要求提供了最新的例证。从此“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在立宪派的鼓动下，一部分汉族官僚出于同满洲贵族争夺权力的目的，也先后向清廷奏请立宪；他们并不属于立宪派，但其活动却壮大了立宪运动的声势。从此，立宪运动也就从酝酿逐渐进入实行的阶段。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906 年 9 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对此，立宪派欢欣若狂，认为多年来倡导的宪政终于有了实现的征兆。为了准备参与政权，立宪派在各地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团体。在国外，康有为于三十三年二月（1907 年 3 月）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九月（10 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在国内，有江浙地区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清政府召开具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建立有实权的责任内阁。可是，通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他们很快发现，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只不过是“假

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于是为了迫使清政府实行真立宪，立宪派联合起来，采取“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方式，举行了轮番的国会请愿，从而把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

首先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所的实际主持人杨度。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宪政讲习所的主要成员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三十四年（1908），全国各省的立宪派陆续派代表入京请愿；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以至清廷的驻外使节、官僚也纷纷电请或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潮。对此清政府一方面以查禁政闻社的严厉措施，压制立宪派的请愿；另一方面则继续玩弄骗术，宣布定期九年召集国会，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此后各省立宪派都投入筹开谘议局的活动，请愿运动遂暂告沉寂。宣统元年九月（1909 年 10 月），各省谘议局同时开幕，立宪派取得了合法活动的讲坛。于是他们决定以谘议局为阵地，再度发起国会请愿。同年底，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召集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宣统元年十二月六日（1910 年 1 月 16 日），“请愿国会代表团”三十三人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即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理由，拒绝了提前召开国会的要求。第一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遵照“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立即部署第二次请愿。他们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各省召开大会、募集捐款、征集签名，推选入京代表。据说各省参加签名请愿的竟达三十万人之多。在此基础上，宣统二年五月十日（1912 年 6 月 16 日），请愿代表以全国各种社会团体名义向都察院递了十份请愿书，结果又遭到拒绝，清廷并警告立宪

派“毋得再行渎请”。第二次请愿失败，立宪派“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七月（8月），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决议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出要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八月（9月），资政院开会后，立宪派正式发动第三次请愿。在立宪派的敦请下，资政院通过请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各省督抚也联电军机处，提出速开国会和责任内阁的要求。在各方面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将九年改为五年，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这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上层分子决定奉命停止请愿，其它各省仍然要求再缩短预备期限，但步调已不一致，无法组织起统一的行动。十一月（12月），奉天省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天津学界群起响应。清政府感到形势紧迫，即下令将正在北京活动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接着又下达镇压学生请愿运动的命令，并将天津学界请愿运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至此各省立宪派代表纷纷失望而去，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

在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改良派反对革命，坚持立宪，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他们掀起的立宪运动在客观上也具有揭露清政府，启发人们的民主觉悟的作用，而立宪派在对清政府绝望后，也相继寻找新出路。

注　释

①张謇：《啬翁自订年谱》。

清（后期）

预备立宪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危统治，缓和阶级矛盾，曾推行“变法新政”，然而却事与愿违，其结果是在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起来。恰在此时，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而爆发了战争，最后竟然是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庞然大物的俄国；且日俄战争还引发出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良派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日所以胜，俄所以负，是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俄国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日胜俄败，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负。于是，原已发出的变君主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呼声更加高涨，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的奔走鼓动下，逐渐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立宪运动。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他们一方面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特别强调指出日俄之战实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惟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另一方面他们又多方结纳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力图依靠这些实权派人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受立

宪派影响和日俄战争的刺激，考虑到本身的利益，一部分官僚也打出了“立宪”的旗号。三十年和三十一年（1904、1905），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相继奏请清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并敦请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

清政府迫于形势和压力，于三十一年六月（1905年7月）初即召集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和派员出洋考察政治问题。六月十四日（7月16日），清廷发布上谕，简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四大臣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二十五日（27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往，组成五大臣出洋考察。八月二十七日（9月25日），五大臣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阻击。五大臣中绍英、载泽受轻伤，出国考察只好暂缓启程，后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绍英（因遇炸受伤未愈），合原已定载泽等三人仍为五人前往。十月二十二日（11月18日），清廷命政务处大臣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五大臣按原方案分两路：一路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主要访问日本、英国、比利时、法国，于十一月五日（12月1日）从北京出发；一路是戴鸿慈、端方，主要访问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国，于十一月十五日（12月11日）从北京出发。在分别访问过程中，他们广泛接触各国政府官员，悉心听取了对方介绍的“立宪要政”，专门同被访问国的专家“探讨立宪原理”，并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市政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实地了解，并由杨度、梁启超等代笔拟定考察报告，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夏，除李盛铎因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外，其他四大臣先后归国。接着他们便奏请朝廷"改行立宪政体"。他们指出：中国"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治理；言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①，而要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宪。载泽更在密折中针对反对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立宪对清政府的三大利益："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②。

西太后非常赏识载泽的建议，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开御前会议，予以讨论。经过反复筹商，西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1906 年 9 月 1 日）颁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宣布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行宪政，故需"预备"。预备期间的任务是改革官制、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巡警。"俟数年后，规模初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③。

七月十四日（9 月 2 日），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④的预定计划，下诏进行官制改革，著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学部尚书荣庆、户部尚书铁良、戴鸿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同时令各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协助，而由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孙家鼐总司核定。十八日（6 日），在朗润园设立了新官制编制馆。于是围绕官制改革，内外亲贵权臣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九月二十日（11 月 6 日），清廷公布了中央新官制上谕：

“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着照旧行”；中央共设十一个部，其中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刑部改为法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商二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前，事归陆军部代理；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线、邮政。次日清廷重新任命了各部院大臣。按清朝旧例，中央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以示名义上的对等，而这次京官改革在“择贤简用，不分满汉”的幌子下，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满洲权贵的势力。除军机处仍控制在皇族手中外，中央十一个部的尚书，汉官五人（外务、吏、法、民政、邮信），满官五人（度支、礼、陆军、农工商、理藩），蒙古一人（学部），如加上外务部的管部大臣及会办大臣满族官员二人计，则十三名大臣中满族亲贵占七名，汉族五名，蒙族一名；而满族亲贵又完全控制了陆军、度支、外务3个最重要的部，度支、陆军两部的尚书、侍郎则由清一色的满人把持（初仅汉官陈雨苍任度支部右侍郎，但不久亦由满人宝熙代理）；且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军队改为陆军部直接统辖。

对地方官制的改革，新官制编制馆曾定有两套方案：第一种方案是设立以督抚为首长的行省衙门，实行省级各大吏同署办公，另设专司审理案件的高等审判厅；此方案有削减督抚权限之意。第二种方案基本沿袭旧制，重在明定权限，以专责成。这两种方案电达各省后，督抚们相继复电表态，“大抵主第二层办法者，多于第一层；主第二层办法而请缓行者，多于速行，以编制局两层办法为是，而以财力不足，程度未及为言

者，尤居多数”⑤。因此地方官制改革迟迟无法进行，直到光绪三十三年六月（1907年7月），清廷才正式发出上谕，只规定：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两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等。但就这样一个改易官衔名目的改革，也遭到层层阻力，以至规定这个方案要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试行，其它各省则限十五年办齐。但是为了加强中央权力，清政府又特规定：陆军部直接委派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以收回各省督抚的军权，度支部派清理财政监督官，以收回各省督抚的财权。且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削其实权。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为了应付部分督抚和立宪派的请求，清廷改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再派达寿赴日、汪大燮赴英、于式枚赴德，考察宪政；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以立议会基础，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要求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鉴；又命各省筹设谘议局，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三十四年（1908），颁行《各省谘议局章程》、《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次年又颁布《资政院院章》。三十四年七月（8月），奕劻奏呈宪法大纲，议院选举各法以及逐年筹备事项；八月初一（8月27日），清廷正式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自本年起，以九年为期，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正式召开国会。《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有十四条，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关于人民义务的有九条，除了纳税，当兵等项义务外，还规定了一些在封建专制法

律许可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权利和自由。这个宪法大纲抄自日本宪法，而关于君主大权的规定又超过了日本天皇，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1908 年 11 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三岁的溥仪继承帝位，改元宣统（1909—1911），其父载沣（1883—1952）以摄政王监国。载沣一上台即下诏重申“预备立宪”的决心，可同时又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将其逐出政府，赶回河南老家“养疴”，然后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为掩饰皇族集权的真面目，宣统元年九月初一（1909 年 10 月 14 日），全国二十一省除新疆暂缓外，同时召开谘议局第一届常会。按规定各省谘议局以“采取舆论”，“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资政院储才”为宗旨；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以议员定额十分之二为常驻议员，均由议员中互选产生；议员用复选举法选出，任期三年；每年九月起开常年会一次，会期四十天，临时会期二十天。但各省谘议局只是各该省督抚控制下的谘询机关，而非真正的民意机关。清廷规定“各省督抚有监督谘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如谘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监督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若谘议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得奏请解散”。而谘议局只有议决本省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权利之存废等事件之权；而且议定后仍须要“呈请督抚批准”，才能执行。然而事与愿违，本年常会开始后，各地选出正副议长六十三人，不少立宪派的骨干取得了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等要职，如江苏的张謇、奉天（沈阳）的吴景濂、四川的蒲殿俊、

山西的梁善济、湖南的谭延闿等均当选为议长；湖北的汤化龙、福建的刘崇祐、四川的罗纶等当选为副议长。这样，谘议局就成了立宪派推进立宪运动的重要阵地；武昌起义后不少省份的谘议局又成了策动各该省督抚反正、宣布独立的重要机构。

宣统二年九月初一（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会。按规定资政院以钦遵谕旨，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设总裁二人，以王公大臣“著有勋劳通达治本者”特旨简充；副总裁二人或四人，以三品以上大员“著有才望学识者”特旨简充；议员分为“钦选”和“互选”（即“民选”）两种，各一百名，凡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以及纳税多额者为钦选议员，各省谘议局议员互选后经督抚复核咨送者，为互选议员，均任期三年，每年一次常年会，会期三个月，临时会期一个月。资政院有议决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或修订法典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件等权。但它议决的事项须“具奏请旨裁夺”方可生效，实际仍是清政府的御用工具。如本次常年会，开议三个月，除一些兴学、垦荒之类的议案得到清廷同意外，凡触及清统治利益的问题都是徒费唇舌。但立宪派却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把原定要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提前举行，迭向资政院和载沣上书，请求速开国会。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资政院一致议决将请愿书转奏上去，并通过了一个奏请朝廷允准国会请愿代表要求的专折。二十三日（25日），十七省督抚将军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于十月三日（11月4日）发出谕旨，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定宣统五年

(1913) 开设议院，在国会召开前两年成立责任内阁。

宣统三年四月十日（1911 年 5 月 8 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为大学士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十三个大臣中，满族九人，而其中皇族又占七人。在当时它就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使原来对清廷预备立宪寄予很大希望的立宪派大为失望，立宪骗局宣告彻底破产。

与清廷的愿望相反，"预备立宪"的结果，不仅未缓和任何矛盾，反而使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了；"皇位"不仅未能"永固"，相反地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清王朝彻底孤立了。

注 释

①②《辛亥革命》第 4 册，第 25、28—29 页。

③④《清德宗实录》第 8 册，第 5148—5149 页。

⑤《辛亥革命》第 4 册，第 21—22 页。

清（后期）

保 路 运 动

清宣统三年（1911），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人民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爱国运动。

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粤汉、川汉铁路已收回商办，铁路所经省份绅商以至人民群众已经筹集相当数量的股金，有的路段且正在修筑。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失去对中国铁路的控制权，千方百计要夺回已归商办的铁路，其主要方式就是迫使清政府借债筑路。而清王朝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以图苟延残喘，也只有以路作抵，举借外债。光绪三十四年（1908），英、德即分别要挟张之洞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次年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组成三国银行团，与张之洞签订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美国不甘落后，一方面与英、德交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参与借款；英、德在相互对抗中，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三国银行团变成四国银行团，并于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1910年5月23日）与清政府订立协定，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六百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宣统三年三月（1911

年 4 月），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俟各该国政府批准后正式签字。但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清廷必先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四月十一日（5 月 9 日），即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正式下达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规定“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①。二十四日（5 月 22 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劫夺了粤汉、川汉两大干线。清政府所谓“官办”即是官卖，“国有”实为帝国主义所有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因而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和反抗。

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②。此后，长沙各界连日集会，一致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湘抚杨文鼎代奏，望清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将“全力抵抗”。湖北咨议局紧接湖南之后，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路权丢失之利害关系，“大呼救国”。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发表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题的“时评”，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鼓吹革命。湖北境内数万名川汉铁路工人也群起响应保路斗争。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于五月十日（6 月 6 日）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股东大会，议决“万众一心力争商办”，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为抗议广东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市民采取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的办法，以示抗议。海外

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③。

争路斗争最为激烈，规模也最大的是四川。起初立宪派绅商还试图通过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清廷收回铁路“国有”成命，但清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于五月五日（6月1日）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声称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拟不退回现款，若川省表示异议则“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这不仅是剥夺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商办公司的股金也要加以吞并，因而深深地激怒了四川广大人民。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一千余人集会成都，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以“破约保路”为根本宗旨，并派员分赴各州县进行宣传鼓动，发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此后四川保路运动便蓬勃地发展起来。

当时全川一百四十二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运动之中。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已逾十万人，及至夏秋间，保路同志会已遍布全川。立宪派力图将斗争局限在集会请愿的“文明争路”范围内，规定了诸如“防止暴动”、“不可自由行动”、“不应怨望朝廷”、“不必集矢外人”等种种清规戒律。但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群众的广泛斗争很快冲破了这些禁令，不断将运动推向深入。闰六月（8月），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王人文被清廷革职，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他不顾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刚一上任即强行收回川汉铁路宜（昌）万（县）段路权。消息传开，群众异常激愤。七月一日（8月24日），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大

会，通过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传单一出，成都万众一心，百业停顿；接着，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与此同时，捣毁经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国教堂等事件也接连发生。初九（9月1日），四川人民开始宣布不纳正粮、不纳捐税、不负担外债。在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人发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的口号。在清廷一再严责下，赵尔丰以《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有“隐含独立”的思想，乃于七月十五日（9月7日）将蒲殿俊、罗纶等人诱捕。两天后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和鼓吹保路的报刊。赵尔丰的蛮横手段，激起了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蒲、罗等人被捕的同一天，数万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炷，潮水般涌向总督衙署，要求放人。面对手无寸铁的人民群众，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当场击毙群众三十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惨案”。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朝的残暴行径，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等裁制数百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④然后在木板上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置入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各地群众闻警，旋即纷纷揭竿而起。

本来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即积极投入运动，并乘机加速革命在四川的发展。六月十日（7月5日），同盟会员龙鸣剑等邀哥老会各路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改同志会为同志军。“水电报”传警之后，各地同志军相继响应，只有几天，逼近成都周围的起义军已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惊慌失措，连电中央求救；清廷急调鄂、

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命端方率鄂军迅速兼程西上，加派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但是已成燎原之势的烈火，再也无法扑灭了。同志军围攻成都十余日，因装备不足，缺乏统一的组织，最后决定从成都撤围，转而分兵攻略各州县。八月五日（9月26日），哥老会著名首领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回师，与反正倒戈的新军周鸿勋部在新津会合，在这里坚持战斗半个多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主力，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统帅的东路军从成都转向华阳中和场一带，有众二十余万，与新津遥相呼应。除这两支主力同志军外，整个四川几乎处处有同志军起义。从而汇成了推翻清廷在四川反动统治的巨流，其中同盟会员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

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留学，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同盟会和共进会，创办《四川》杂志。当荣县同志军向成都进军时，吴玉章在荣县发动群众，训练民团，筹集粮饷，为夺取荣县政权打下了基础。当同盟会员四川东路民军副统领王天杰从成都转战返回荣县后，吴玉章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建议。八月四日（9月25日），王天杰召集各界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告荣县独立，是为革命派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此后各州县纷纷效法，从而促进了全省的光复。保路运动最终导致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

保路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鄂军入川，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促成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注 释

①《辛亥革命》第4册，第340页。

②《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

③《满清野史》第3页。

④《辛亥革命》第6册，第5页。

清（后期）

武 昌 起 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国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遍及全国的各族人民反抗斗争，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连绵不断的反清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宣统三年，“皇族内阁”的建立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使清朝政府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孤立。这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及其失败，既鼓舞了革命党人，又坚定了两湖志士在长江中游地区发难的信念。接着，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相继爆发的保路风潮，为党人在武昌举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自咸丰十一年春汉口开埠后，帝国主义列强陆续侵入湖北及武汉地区。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一百八十余家，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张之洞督鄂，大兴“洋务新政”，先后创办汉阳兵工厂，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及造纸、制革等十余厂。为培养“洋务人才”，他大力兴办近代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北新式学堂已达一千九百

七十二所，在校生七万二千六百三十四人；湖北出国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仅在日本一地最多时即达一千多人。同时，张之洞还编练一镇（师）又一混成协（旅）新军，吸收大量小知识分子入伍。

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新政”刺激下，湖北民族工商业也得到较快发展。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1902—1910），武汉设立纺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民办企业二十四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二大工商业中心。湖北革命党人在此优越物质基础上，进行了艰苦踏实、深入持久的革命准备。从光绪二十九年（1903）开始，一批批革命小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身份，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传方面，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促使新军士兵迅速革命化。组织方面，他们以顽强不屈精神，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

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日（1904年7月3日），湖北党人在武昌建立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不久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科学补习所受株连，无形瓦解。接着，党人刘静庵、曹亚伯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武昌分会所附设阅报室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三十二年（1906），建立正式组织亦称日知会，尔后即为同盟会湖北分会。日知会遭破坏后，革命党人以新军为基地，又相继建立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振武工作进展顺利，成员很快发展至千人。其活动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但为避免事态扩大，他仅将其领导人杨王鹏、李六如开除出营了事。后蒋翊武代为主持社务，且决定暂停活动，静观待变，宣统二年底，在各标营党人催促下，蒋翊

武约集部分党人在阅马场集贤酒楼集会，考虑到“振武”二字易引起清廷注目，遂将团体名称更名为文学社。宣统三年正月初一（1911 年 1 月 30），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畔之风度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会后，文学社组织得到迅速发展。

与文学社同时在武汉开展革命活动的另一较大组织是共进会。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 年 8 月），为促进长江流域各省起义活动，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云南、安徽等省部分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集会，决定成立共进会；四川人张百祥、江西人邓文翚、湖北人刘公先后任会长，湖南人焦达峰、湖北人孙武分任各部负责人。次年秋，共进会主要成员分别从日本回归本省活动；孙武等人即在汉口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在湖北会党中积极吸收会员。但会党散漫难治，行动不易统一，因此，湖北共进会联络重点亦很快转向新军。到宣统三年（1911）夏秋间，武汉新军参加文学社者达二三千人，参加共进会者亦达一千五百多人。这两个组织均在新军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一旦举义，各级党人代表即为各级指挥官，具有较完备指挥系统。同时，他们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阶层，也争取到大量革命者和同情者。起义主观条件日趋成熟。

随着革命形势发展，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及广大成员普遍感到应当而且必须联合，认为“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①。起初只是少数人私下交换意见，继而正式开会商讨，但因双方互争雄长，未能达成具体协议。这时历经一年酝酿，同盟会中部总会于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1911 年 7 月 31 日）在上海成立。在中部总会促进下，双方于八月初三（9 月

24日）召开联合大会，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部总理；下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六个部；确定以刘公、孙武等二十人为政治筹备员，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十四号），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为军务筹备员，设军事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决定于中秋节（后延至八月二十日）起义。

会后，指挥部在对新军各标、营、队党人进行具体部署同时，分别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并联络邻省响应。不料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发生意外事件。这天，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置炸弹，失慎爆炸，受伤入院。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革命文告、名册符号、旗帜全部搜去，并转交清朝官府。湖广总督瑞澂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搜捕党人。是日上午，随新军移防岳州的蒋翊武刚好赶回武昌，与刘复基、王宪章、彭楚藩等在武昌小朝街总指挥部召集各标营代表会议，根据黄兴关于各省准备工作尚未完成，起义日期宜于推迟的意见，代表们同意将起义日期展延至九月底，与十余省同时并举。下午散会后，蒋、刘留下续议。这时，邓玉麟等来报宝善里出事消息，并转达孙武入院后希望立即起义意见。处于危急关头的革命者感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起义”，以图“死中求生”②。蒋翊武等遂决定当晚十二时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起事；起义部队以左臂系白布为标志，分别按计划行动。

命令拟定后，总部即派同志向各标营传递。晚十时，城内各营通知完毕，邓玉麟遂偕徐万年等各持炸弹一个，拟出文昌门至炮队八标，不料城门戒严，清军搜缉甚紧，待辗转抵达南

湖，夜十二时已过。南湖炮声未响，各标营不敢贸然行动。在此期间，党人杨宏胜再运炸弹至工程营时，被清军警追踪；杨掷弹受伤被执。临近夜十二时，清军警突入小朝街八十五号革命机关部，逮捕刘复基、彭楚藩等人；蒋翊武因是乡村学究打扮，未引起军警注意，乘隙逃脱。是夜清军在武昌城内大事搜捕查抄，党人被捕者达四十余人。各机关部成员连夜遁走避匿，指挥中枢陷于瓦解。清总督瑞澂立命组织军法会审。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临危不惧，视死如归，于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凌晨五时相继英勇就义。三烈士死难噩耗传出，全城震动。而当日上午清方继续搜捕革命党人，各处机关相继被抄，被捕人数不断增加。革命士兵即迫于激愤，又断绝退路，决心拼死一战。

十九日（10日）夜七时许，驻扎武昌城外西北塘角的混成协辎重队、工程队和炮队首先举火起义，向城内进发。接着，驻守在武昌中和门内、紫阳湖旁的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也打响了首义的枪声。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于十九日白天仍按总部计划在本营作了布置，并与其他标营党人相约同时发难。晚八时半，工八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巡棚查哨，见金兆龙、程正瀛等正持枪而待，即指为图谋不轨，且命护兵将金逮捕。金则大呼："众同志再不动手更待何时！"③程正瀛当即举枪猛击陶首，陶负痛急逃，程继开一枪将其击伤。全营士兵听到枪声，立即持枪出棚，并击毙前来镇压的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司务长张文涛。熊秉坤鸣笛集合，率队直扑楚望台军械库。此时守库革命士兵也开始行动。听到枪声，驻库监守纪堪颐、李克果等即集合士兵，分发子弹，命令抵御。守库工八营士兵领到子弹后，却鸣枪起义；李克果等官

佐越墙逃走。熊秉坤率队到来，双方会合，胜利占领楚望台，从而保证了起义部队的弹药供应。

接着，蔡济民率二十九标起义士兵、吴醒汉、徐达明率三十二标起义士兵、方兴、李翊东率测绘学堂学兵也相继来到楚望台。南湖炮八标对起义早有准备，当城内响起枪声后，党人徐万年、王鹤年、蔡汉卿等即一跃而起，燃炮响应，旋拖炮十余尊向中和门进发，在长虹桥击溃清军伏击，并与城内派来迎接的金兆龙部、绕城而来的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两队起义者汇合，一同进达楚望台。当时驻扎武昌城内外清军总兵力约二十个营，计九千人。各标营陆续参加起义者达三千人，集中在城东南角，占据有利地形，且有充足弹械。清方虽名义上仍控制五千兵力，但不少人同情革命且分散各处，已丧失战斗力，实际能调动者仅有守卫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的二千余人。因此，革命军要夺取武昌，必须全力攻占居于城西南角的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

起义士兵多数齐集楚望台，熊秉坤由于级别较低，已无力实施指挥。正当革命军处于混乱之际，巡哨士兵找到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他曾参加过日知会，军事知识丰富，平时威望较高，因而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吴兆麟接任后，即要求士兵服从指挥，下达进攻督署命令。熊秉坤、马荣、邝杰各率兵分三路进攻督署；程国真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部队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接近午夜，进攻督署战斗开始，革命军第一次进攻，由于兵力较弱，又未掌握敌方分布状况，一、三两路分别受阻，只有少数部队逼近督署。夜十二时，革命军发起第二次进攻时，炮队已按要求布好阵地，发炮助战，三路人马奋

勇向前，均取得进展。惟第三路任正面主攻，遭清军顽抗，在保安门一带受阻；革命军迅速组成敢死队，击退敌人。二十日（11日）凌晨二时，第三次进攻开始，时天气阴雨，炮队不能准确测定目标。为此，革命军决定于督署附近放火照明，居民得知后，主动引火助焚。火光指示下，炮弹准确击中目标。革命军乘势猛攻，一举夺占第八镇司令部。总督瑞澂命张彪固守，自己则令差弁将署后围墙穿凿一洞，带领卫队逃往"楚豫"兵舰。张彪亲自督队，从望山门城上窜下反扑，迫使革命军第三路退守保安门。但这时熊秉坤率敢死队已攻抵督署辕门。张彪见大势已去，下令教练队留下死守，自率卫士和辎重八营退往汉口刘家庙。守敌从辕门退往大堂，凭恃几挺机枪负隅顽抗。敢死队员王世龙、纪鸿钧等冒着密集弹雨，携带煤油冲进门房和钟鼓楼放火，壮烈牺牲。火势蔓延，顽敌无法存身，纷纷逃散。拂晓，革命军占领督署，武昌光复。

清军二十一混成协所属四十二标一营、二营驻守汉阳、汉口。该部党人事先未得任何消息，十九日没有采取行动。次日下午，文学社四十二标书记王缵承派人过江探讯，始知武昌已光复，遂决定当晚发难，汉口二营党代表赵承武相约响应。入夜，标党人代表胡玉珍鸣枪集队，宣布起义；管带汪炳山逃走，队官宋锡全被推为指挥。同时，赵承武在汉口亦率新军起义，标统赵永汉等人逃走。二十一日（12日），起义军与汉阳援军汇合后，迅速占领全城。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

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革命军才占领武昌，党人代表即齐集省谘议局，筹商组织军政府问题。当时，革命派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昌，起义具体组织者又均感资望太浅，不足以担当重任，于是与会者首先决定请省谘议局正副议长和驻

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会上，先有人提议推举谘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被汤婉言谢绝。接着有党人提议推黎元洪为都督，获多数赞同，遂决定派党人蔡济民、谘议局议员刘赓藻为代表前往寻迎。

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二十岁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到海军供职，甲午战役后，得张之洞赏识，在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事宜，先后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光绪三十二年夏，黎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他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湖北保路运动兴起，黎以军界代表资格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在进步分子里赢得好感。十九日夜工八营起义后，他坐镇第四十一标三营，阻止士兵响应；该营共进会员邓玉溪夺门欲出，党人周荣堂前来约三营会攻督署，均先后遭黎杀害。后见形势不妙，黎遂离营逃至参谋刘文吉家，随即转至黄土坡三营管带谢国超家。约于革命军攻克督署不久，党人马荣、程正瀛在巡查中得知黎的下落，吴兆麟即命马、程等将黎请出，拥至楚望台。蔡济民、刘赓藻遂由楚望台迎黎到谘议局与会。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黎任都督，汤化龙负责民事，众鼓掌赞成；但黎坚辞。争执中，党人李翊东持笔在已拟就的安民布告上代书一“黎”字，然后将布告贴遍全城。黎任都督的消息传出，军中士兵“鼓掌欢呼”，市民则“奔走相告”，起到了分化清廷反动营垒、扩大革命影响的作用。然而黎任都督后，开始两天不言不语，活像一个“泥（黎）菩萨”。于是党人即以军政府参谋部作为行使军政大权机关，并马上作出如下决议：1．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谘议局；2．称中国为中华民国；3．改纪元，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4．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5．定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这样，全国第一个地方共和政权就正式建立起来了。虽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政权内部夺权斗争日趋激烈起来，但武昌起义的成功和湖北军政府成立初期所施行的革命政策，对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注　释

①《辛亥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 辑第 73 页。

②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精华印书馆 1947 年版，第 75 页。

③熊秉坤《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上卷第 29 页。

清（后期）

阳夏战争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为保卫武汉三镇与清军展开一场重大战役，整个战役分为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两个阶段。汉口古称夏口，故这次战争又被称作“阳夏战争”。

武昌首义成功，予清王朝以致命一击。为挽救其垂危统治，扑灭革命烈火，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911年10月12日），清廷谕令瑞澂、张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令正参加永平秋操的混成第四镇统制官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驰援，命陆军大臣荫昌速至湖北，督率各军与革命军作战，又命萨镇冰率海军、程永和率长江水师溯江西上赴援；为解燃眉之急，又就近调河南第五十二标到汉口与张彪会合。二十三日（14日），清廷进一步调正军队配置，谕令将陆军第四镇暨第二镇混成第三协、第六镇混成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赴湖北由荫昌指挥；将第五镇暨第三镇混成第五协、第二十镇混成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军统冯国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用；将禁卫军、陆军第三镇，编为第三军，军统载涛，驻守京

畿，专司巡护。

与此同时，湖北军政府也加紧扩军备战，誓死保卫武汉。当时，武汉新军除瑞澂、张彪带走之少数营队外，余均归附革命，但因在战争中死伤和减员，所存兵员不过几千人。为同清军对抗并进行北伐，湖北军政府甫告成立即决定扩军四协。武汉地区学生、工人、农民闻讯，踊跃前来投军，不到五天，四协约两万人的新军即告足额。军政府将武汉分为汉阳、汉口、武昌城外和武昌城四个防区，由一、二、三、四协分别负责，另以第五协和炮、马队各二标、敢死队二大队为机动。革命军与清军集中在汉口刘家庙一线对峙。总体看，武昌起义初期，武汉三镇的军事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因为远在直隶的北洋军不可能迅速进入湖北，且北洋六镇始终是袁世凯控制下的一支军阀武装，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于八月二十三日（10 月 14 日）任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但袁认为清廷赋予权力过少，于次日即复奏，以“旧患足疾，迄今尚为大愈”为辞①，表示不能应命。袁世凯不出，北洋军就不肯卖力作战，革命军得以从容应敌。

武汉保卫战，首先从汉口战役开始。八月二十七日（10 月 18 日）凌晨三时，第二协统领何锡蕃指挥革命军，向盘踞汉口郊区刘家庙火车站的清军发动进攻。其时，清方仅有张彪残部、河南混成协、岳州巡防营共二千人应战；已抵刘家庙的北洋军不肯支援，战事甫起，即向滠口退去。但因清方海军发炮轰击，革命军不支退却；清军一部尾追至市区内大智门附近。下午三时，革命军再次发起攻势，又因清舰炮击而退却；清军乘火车追击，铁路工人预先毁路十余丈，致使火车倾覆，革命军和四周民众齐向前拼杀，一举消灭清军数百。二十八日

（19 日）晨，革命军步、炮、工、骑兵共三千余人，乘胜进攻刘家庙车站，清军乘火车仓皇逃往滠口，遗弃帐棚一百四十余顶，粮食六百余石及大量枪支子弹。革命军占领刘家庙后，本应继续前进，据三道桥，夺取滠口，握有利地形，以阻止清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汉口。但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对革命军力量估计不足，即不敢大胆进攻，也未在三道桥修筑坚固工事，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不敢贸然进攻。这样，每至夜间，清军就越过三道桥，攻击革命军。对此，党人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并自动组织敢死队，向清军发起攻势。但这时清军喘息已定，并据三道桥有利地形，以机枪多挺，堵塞隘路，革命军进攻遭到失败。指挥官何锡蕃自感指挥不力，遂引咎辞职。军政府于九月初三（10 月 24 日）任命原清军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

张景良到汉口后，即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采取拖延态度。这时清军大部南下，前锋抵达滠口。九月初五（10 月 26 日），清海陆军大举反扑，敌舰潜过武昌青山革命军炮兵阵地，未遇阻击即达造纸厂附近江面，接着便向革命军阵地猛烈炮击，使革命军牺牲五百多人。在炮舰掩护下，清步兵也向刘家庙发起攻势。在革命军苦战过程中，前敌总指挥张景良逃离前线，与张彪暗中勾结，被汉口军政分府领导人詹大悲处以死刑。经过三天激战，革命军伤亡二千余人，被迫退入市区。正当革命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关键时刻，九月初八（10 月 29 日）午后，革命党重要领导人黄兴自上海抵达武昌，并毅然承担起前线总指挥重任。革命元勋黄兴亲临前线，给革命军以极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

这时，清方也有所变化。九月初六（10 月 27 日），清政

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命冯国璋为第一军军统，段祺瑞为第二军军统。初八，冯国璋抵汉口前线；初九，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双方参战人员，清军总兵力达一万多人，革命军在汉口仅有五千人。为扭转不利局面，黄兴于初八日指挥革命军向清军大智门阵地发起攻击，经过激战，曾一度击溃清军；后清方大量援军赶到，革命军反攻未获成功。第二天，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市区展开激烈巷战。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在遭到革命军顽强阻击后，冯国璋竟丧心病狂地指使清军纵火焚烧。大火从歆生路花楼街烧到满春茶园，又从满春茶园烧至硚口，接连三昼夜不熄，十余里繁华街区被夷为一片焦土。革命军将士在烈火中坚持三天三夜可歌可泣战斗，于九月十一日（11月1日）夜退出汉口，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失陷，开始进入汉阳保卫战阶段。由于双方均需重新部署兵力，因此前半月战事暂时呈沉寂状态。九月十四日（11月4日），黄兴在汉阳伯牙台（后移昭忠祠）设立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为参谋长，正式接防备战。至九月二十一日（11月11日），于汉阳集结之革命军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五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部，总兵力约两万余人。清军占领汉口后，即以左翼扼长江沿岸，右翼由京汉铁路进至玉带门停车场之北，后方预备队屯于孝感，总兵力约三万余人。

面对稍居优势之敌，革命军在进攻抑或防守这个战略问题出现严重分歧。意见尚未统一，黄兴即决定于九月二十六日

（11 月 16 日）夜兵分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击清军后路以为牵制；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所部由汉阳东北岸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以为助攻；第三路为主攻部队，以湘军第一协为右翼，以湘军第二协为中军，以鄂军第五协为左翼，同在襄河琴塘口军桥渡河，向汉口玉带门地区推进。战事开始后，第三路右翼湘军王隆中部进展迅速，将清军打退至韩家墩；但左翼进展迟缓，进攻失利；居中之湘军指挥甘兴典更是临阵慌乱，首先率部退却，致使右翼部队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退至汉阳。至于其他两路则因指挥员贻误战机，根本未按时发动。革命军反攻汉口计划遭到挫折。汉阳保卫战完全处于被动。

十月初一（11 月 21 日），清军一路从孝感绕道至蔡甸，强渡汉水，革命军堵截未成，退守三眼桥；清军另一路从舵落琴断口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革命军右翼阵地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形成对汉阳的两翼包围形势。此后数日，双方对汉阳外围重要据点展开激烈争夺。美娘山失守后，革命军管带祁国钧率几十人，勇敢冲锋，一举将美娘山夺回，磨盘山被清军占领、革命军组织一百零八人敢死队，乘夜冲上磨盘山顶，奋勇肉搏，将清军全部消灭。初四（24 日），清军再占美娘山、仙女山。黄兴将主力集结在十里铺一线，先后组织两次反攻，均告失利。初六，清军夺得磨盘山、扁担山两处阵地后，以猛烈炮火轰击十里铺。黄兴速调各军阻击，但指挥失灵，湘军将领甘兴典擅自率部撤回湖南，湘军王隆中部苦战疲敝，也退至武昌。黄兴迫不得已决定撤离汉阳。十月初七（11 月 27 日），清军占龟山；下午，汉阳陷落。同日晚，黄兴从武昌乘船离鄂

赴上海。但这时全国总的形势对湖北军政府有利。海军已归向革命，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各省纷纷脱离清政府独立，清廷已土崩瓦解。鉴于此，袁世凯进一步施展一打一拉而以拉为主的策略，命占领汉阳的冯国璋暂不渡江，而是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加压力，逼其停战议和。这样，武汉保卫战在双方对峙中处于基本停顿状态。

武汉保卫战，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挥不统一，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新募、军事布置失误等原因，遭受重大挫折。但这场保卫战持续四十余天，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效地维护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广大革命军将士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顽强奋战精神，予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它将清军主力吸引至湖北长达一个半月，这对各省革命党人是最有力的支援，为革命最后胜利作出重大贡献。

注 释

①《辛亥革命》第5册，第333页。

清（后期）

各省光复

武昌首义，震动全国。各阶层人民纷起响应，各省相继脱离清政府并建立地方共和政权，革命运动达到高潮。

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湖南是革命风潮屡起的省份之一。自光绪三十年（1904）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经萍浏醴之役，湘省革命党人活动始终未断。共进会成立后，浏阳人焦达峰受命由日本回湘，在浏阳、醴陵一带发动会党，又由陈作新等联络新军和巡防营，革命准备逐渐成熟。黄花岗之役后，湘鄂两省革命党人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湖南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①从此湘省党人决定将全省分西、中、南三路加紧筹备工作，并在长沙设立各种名义的联络机关多处。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新军士兵均欲即刻响应。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911 年 10 月 22 日）晨，焦达峰、陈作新集合长沙城外新军，分两路进攻长沙。清军不战而溃，巡抚余诚格逃走，清军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击毙；革命军当天即占领长沙。

第二天，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

督，原湖南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任参议院议长。之后，焦达峰立即派出西、南两路招抚使，分赴全省各地，发动起义，成立革命政权；派湘军赴湖北支援首义地区。但旧官僚、立宪派不甘心让革命党人充任正副都督，他们首先利用参议院攫取军政府实权，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一切用人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②。接着又仿照湖北军政府办法，实行军民分治，在都督之下分设军政、民政两部，其部长及所属司、处负责人员，多为立宪派所掌握，正副都督则形同虚设。对此，有人提醒焦、陈要提高警觉，陈作新等人却天真地以为："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何戒备之有?"③在立宪派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而立宪派则进一步收买旧军官梅馨及部分士兵于九月初十（10月31日）发动暴乱，先后杀死陈作新和焦达峰，拥谭延闿为都督。湖南政权完全为立宪派所控制。

陕西与湖南同时起义。陕西同盟会员井勿幕等人在省内活动多年，许多新军士兵加入同盟会，势力遍及全省的哥老会也与革命党人联成一气。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新军排长党人钱鼎等以时机迫切，密议于九月初一（10月22日）起事，推协参谋兼三标一营管带同盟会员张凤翙任指挥。张认为"即已举事，当先发制人，不宜缓至天晚也"④。遂各回本营，先使人改换便装，散布城内要地。当天上午十一时，起义正式发动。新军党人党仲昭等带马步兵十余人以领子弹为名，由西安南门入城，分两路直趋军装局；钱鼎等由西门入城，至陆军中学堂，收其枪械；张凤翙率队入城，为夺取军装局各部之应援。起义军甫到军装局，守兵即逃散。接着起义军分头占领各官署和鼓楼，护理巡抚钱能训和其他官吏逃至市民家藏匿，西安将

军文瑞逃进满城。次日黎明，义军猛攻满城，下午三时城破，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光复。初一晚，革命军领导人集中军装局，选举张凤翙和钱鼎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和副统领（后改称军政府正、副都督），成立陕西军政府。陕西独立，使清政府背后受敌，因此，立即受到清军东西两路进攻。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与清军展开激战，直到南北议和开始，战斗才告结束。

九江独立是为江西起义先声。初，革命党人林森曾在此创办书报社，宣传革命，联络军、学界、商团和会党。武昌起义后，九江一夕数惊，革命党人积极运动九江驻军五十三标将士起义。标统马毓宝本无革命思想，但在形势促使和党人劝诱下，附和革命。九月初二（10月23日）晚，九江城内各营新军以发炮为号，进攻九江道衙门和知府衙门，各官员狼狈逃走。次日，九江军政分府成立，推马毓宝为都督。这时南昌革命党人也正加紧运动城内驻军二十七混成协官兵。武昌、九江独立消息传到南昌，各报刊纷纷报导，各界人士制备白旗，准备迎接革命军；新军和学生筹划响应。巡抚冯汝骙战守不定，一面调巡防营监视新军，一面收缴陆军小学枪弹，软禁协统吴介璋。但在党人鼓动下，新军下级军官集会决定起义。九月初十（10月31日）晚，城外新军在城内学生响应下，进入南昌城，迅速占领各衙门。除冯汝骙外，清吏均闻风逃避，城守、巡防和水师挂白旗归顺。次日南昌绅商学界在谘议局集会，决定江西独立，推吴介璋为都督。后因部分军官暗中倒阁，吴介璋上台两月即告辞职，党人彭程万被推为都督。彭本身无实力，不久便自动取消都督名义，率军北伐，并劝说各方拥护九江马毓宝任江西都督，统一军政。

同盟会成立后，山西留日学生一百余人入盟，组成同盟会山西支部。他们陆续回归省城，即深入新军开展革命工作。太原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共两标四千余人，八十六标驻城内，同盟会员阎锡山任标统；八十五标驻城外狄村，除标统外，中级军官多为革命分子。武昌起义和陕西独立后，革命党人准备响应。清山西巡抚陆钟琦即怕陕西革命军来攻，又耽心太原新军起义，于是以防止陕西革命军入晋为借口，调八十五标去扼守河东。新军党人乘机要求陆准予配备子弹，否则难于应命。陆被迫答应新军条件。得到子弹后，八十五标士兵在三营管带姚维藩率领下，于九月初八，（10 月 29 日）晨分三路进攻太原，一路进攻巡抚衙门，一路攻满城，一路夺取军装局。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八十六标部分官兵起而响应。第一路革命军，经激战，击溃抚署卫队，毙陆钟琦和协统谭振德，满城和军装局也速被革命军占领。不到半日太原即告光复。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省谘议局集会，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同盟会员温寿泉为副都督；姚维藩以起义首功被推为全省总司令，并立即率兵进驻娘子关，以防清军进攻。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极为振奋。九月初六（10 月 27 日），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张文光首先发动新军七十六标和当地防营，在腾越起义，战领腾越城。三天后省城昆明亦点燃革命烽火。自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 年 4 月）底河口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等相继回滇，深入新军发动革命。宣统三年（1911）新军大部分已倾向革命。武昌起义后，党人邀集一些军官在营管带唐继尧住宅集会，举梁启超的学生、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为总指挥。九月初九（10 月 30 日）晚，第七十三标第三营首先在驻地北校场发难，然后

进入昆明城，攻军械局，不克。清军据五华山顽抗，战斗异常激烈。次日，炮兵助战，革命军遂先后占领军械局和督署。当日，蔡锷被选为云南都督，各级军官分任要职，而多数同盟会员却以“不居功就大任”自慰。

上海起义，是同盟会和光复会两大团体党人共同发动的。宣统三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同盟会员陈其美等在上海租界设立革命军事总机关，积极联络商会、商团上层领导人，准备起义。在此期间，光复会员湘人李燮和来到上海，利用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官兵多为湘籍同乡关系，进行联络，并与陈其美约，双方携手合作。九月十三日（11 月 3 日）下午，起义军先后占领闸北巡警局和巡警总局，各处巡警、商团、防营随即响应，唯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在负隅顽抗。陈其美率部分商团围攻制造局，且只身入内劝说张投降，结果反被张扣押。李燮和等闻讯即组织起义军连夜进攻。次日黎明，驻局炮兵反正，制造局被起义军占领，上海光复。十五日（5 日）下午，在光复会员缺席情况下，召开都督选举会，陈其美亲信利用帮会势力，推陈为上海都督，光复会员在军政府中未得到任何职务，李燮和沪军总司令一职反被解除，因而使同盟会、光复会二者之间原有矛盾进一步加深。

上海独立在江苏省会苏州引起震动。早在阳夏战争期间，当地立宪派就曾多次酝酿江苏独立。上海脱离清政府，使江苏失去最大商埠、海口和军火供应地，于是苏州各界遂立即行动起来。九月十五日（11 月 5 日）苏州商务总会总理尤先甲等谒见江苏巡抚程德全，“请其保全地方治安，免致生灵涂炭”⑤。当天夜晚，上海民军五十余人抵苏，在城郊与驻苏新军士兵会合。次日，苏州绅商又同程德全密议；同时新军马、

步、辎重队也一律袖缠白布，直达巡院，要求程反正。程表示“值此无可如何之际，此举未始不赞成”⑥。于是在督署旗杆上升起“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旗，令人用竹竿将大堂之檐瓦挑去几片，以示除旧布新；巡抚程德全改称都督，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任民政总长。江苏和平光复。

贵州起义是自治学社发动的。自治学社是爱国知识分子张伯麟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1907 年 12 月）创立，初期以“赞助地方自治”为名，进行合法活动。宣统二年（1910），同盟会员平刚回到贵州，与张伯麟协商整顿革命力量，预备起事。从此自治学社积极在新军、省陆军小学堂和会党中发展革命力量。宣统三年（1911），它在全省建立分会达五十余个，会员人数十万多人，省谘议局及各府州县“自治”机构均为所控制。九月十三日（11 月 3 日），新军和陆小学生在贵阳城外发动起义。巡抚沈瑜庆闻讯命抚署卫队前往弹压，然卫队管带及其部下均已臂缠白布，表示赞同革命，沈见无可挽救，遂承认贵州独立。次日晨，党人黄泽霖等迎新军入城。当日贵州军政府成立，推陆军小学堂教练官杨尽诚为都督，新军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张伯麟为枢密院院长。

浙江是光复会主要活动场所，同盟会在此也经营多年，所以有很多会党群众和新军士兵参加这两个组织。武昌起义后，浙江党人决定响应。九月十四日（11 月 4 日）晚，驻杭州新军八十一标、八十二标，会党群众以及从上海派来支援之敢死队，共同攻打杭城，抚署、军械局均迅速被占领，巡抚增韫被俘。次日，革命军攻满城，清将军德济降。接着，起义领导者在省谘议局集会，同盟会员褚辅成提议推举立宪派首领、前省谘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获多数人同意。上海、江苏、浙江

独立后，革命党人即组织江浙联军向两江总督所在地、长江重镇南京发动进攻。此前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因对两江总督张人骏不满，又看到士兵群众革命情绪高涨，故于九月十八日（11 月 8 日）率部起义进攻南京，战不利，败退镇江。江浙联军组成后即与徐绍桢军会合，计一万余人，以徐为联军总司令。十月初三（11 月 23 日），联军分四路进攻南京，江防营提督张勋等率清军拼死抵抗，苦战数日，双方伤亡以百计。十一日（12 月 1 日），联军夺得紫金山，炮轰城内清军，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连夜潜逃，张勋带残兵出走徐州。十二日（2 日）城内清军投降，革命军占领南京。十三日（3 日），根据宋教仁提议，江苏都督府由苏州移驻南京，仍以程德全为都督。

广西革命党人在新军和绿林中活动多年。武昌起义后，即酝酿在各地分头起义。清巡抚沈秉堃、布政使王芝祥以及谘议局诸议员，深感广西独立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故决定抢在革命党发难之前，率先采取行动。九月十六日（11 月 6 日）夜间，王芝祥请人制作数百面黄旗，上书“大汉广西全省国民恭请沈都督独立，广西前途万岁”等字，天明前分别树立于各街巷及衙门。十七日（7 日），各界在谘议局开会，公推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和广西提督陆荣廷为副都督，原巡抚衙门改为军政府。谘议局改为议院，原有军队一律改为国民军，各行政机关及税制暂仍照旧。

安徽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徐锡麟起义和三十四年（1908）熊成基起义失败后，党人孙毓筠等在新军和农村中继续活动，革命影响日益扩大。武昌起义后，党人曾于九月初九（10 月 30 日）在省城安庆发动新军起义，遭到失败，新军也

被巡抚朱家宝解散。但鉴于省内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立宪派决定请朱家宝主动宣布独立并出任都督。朱初不肯答应，后接袁世凯嘱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之密电，遂于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宣布安徽独立，就任都督。但革命党人于二十一日（11日）选王天培为都督，遭立宪派坚决反对，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确定同盟会员孙毓筠为都督。

广东同安徽情况相近。黄花岗之役后，大部分革命党人离开广州。鉴于一时较难在省城发动大规模起义，党人决定先在广州外围地区举义。处于四面楚歌中的清广东当局内部发生分化：水师提督李准秘密同党人谈判，“立意反正”⑦；两广总督张鸣岐犹疑观望；清军统制龙济光无可奈何。于是立宪派和部分革命党人决定“和平独立”。九月十八日（11月8日），传闻各地革命军即将开到省城，上层人物急派代表与张鸣岐所委之代表会谈，决定广东独立，举张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但次日张鸣岐潜逃香港，龙亦不肯就任，广州绅商只好推清军协统蒋尊簋为临时都督。二十日（10日），顺德、佛山及广州近郊民军四五千人进入广州城，著名党人胡汉民同时从香港到达，即被选为都督，后又选陈炯明为副都督。

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福建支部建立，宣统三年（1911）党人又在福州成立军警特别同盟会，各地哥老会和军警不少人加盟。武昌起义后，党人决定响应。九月十九日（11月9日）黎明，以新军为主，民军为辅组成的革命军，在党人彭寿松、许崇智率领下，在福州起义，经半天激战，清军投降，闽浙总督松寿自杀。二十一日（11日），起义军代表推新军统制孙道仁为都督，许崇智为福建海陆军总司令。

四川独立过程较为复杂。武昌起义后，四川保路运动在党

人主持下，各地普遍转为夺权斗争。在邻近各县相继起义基础上，党人张培爵、杨庶堪与抵渝的夏之时起义军相结合，于十月初二（11月22日），迫重庆知府纽传善投降，成立中华民国蜀军政府，张培爵、夏之时任正副都督。此时在成都，四川总督赵尔丰正与立宪派蒲殿俊、罗纶联合，共同对付革命。十月初七（11月27日），他们宣布四川“独立”，蒲殿俊、朱庆澜分任“大汉军政府”正副都督。十月十八日（12月8日），赵尔丰策划兵变，蒲、朱被吓走，城内秩序大乱。于是部分军官和立宪派分子又举前陆军小学堂总办、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赵尔丰被逮捕处死。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和重庆的蜀军政府直到翌年二月才合并为一。

在各省相继独立过程中，海军船舰也大部起义。此外，山东于九月二十三日（11月13日）宣布“独立”，十月初四（11月24日）又自动取消“独立”。未独立各省，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或爆发局部性革命，或出现群众自发斗争，均处于动荡不安之中。

从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开始，至十月初七成都宣布独立，仅五十余天，全国二十四个省就有十四省和上海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表明清王朝已土崩瓦解，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但是，从总体看，革命党人事实上并没有在独立各省中占据支配地位，而不少省份却由立宪派、旧官僚掌握了实权，这又预伏着最终导致革命失败的内部因素。

注　释

①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35页。

②《中国革命记》第5册，辛亥年十月出版。

③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册，第1417页。

④《辛亥革命》第6册，第62页。

⑤《辛亥革命》第7册，第8页。

⑥《辛亥革命》第7册，第6页。

⑦《辛亥革命》第7册，第245页。

清（后期）

南 北 议 和

革命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引起中外反动势力极端恐惧和仇视。他们急切企望扑灭革命之火。但革命发展迅速，单靠武力已不可能达到其罪恶目的。于是他们改而采取在武力压迫基础上推行以政治诱和为主的方针。具体实施这一方针的是袁世凯。袁在未“出山”前，即令其幕僚且与黎元洪有乡谊的刘承恩接连致书黎，希望双方和平了结。“出山”以后，袁世凯一方面于宣统三年九月初九（1911 年 10 月 30 日）亲自南下督师，令冯国璋率军夺取汉口，另一方面则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向武昌军政府建议议和，又派刘承恩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直接会谈。由于革命党人的抵制，和谈未能实现，但袁从军政府方面却获得如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①的信息。

九月二十三日（11 月 13 日），袁世凯从武汉前线回到北京，立即与各国公使频繁会谈。经密商，英国公使朱尔典于十月初六（11 月 26 日）电戈飞，要他向武昌转达袁世凯之“停战议和”建议。当天，袁下令汉口清军猛攻汉阳。次日汉阳陷

落，湖北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首次吁请驻汉英、美领事“调停”，并经由戈飞正式向清方提出“停战条款”。袁世凯抓住有利时机，命汉阳清军在龟山架炮隔江猛轰武昌，同时则与朱尔典、戈飞等加紧策划停战议和。十月十一日（12月1日），第一次武汉地区停战协议宣告成立，确定从十三日（3日）八时起至十六日（6日）八时止，停战三天。十二日（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军士气高昂起来，北洋军士气顿挫。因此停战三日尚未届满，袁经与朱尔典磋商，于十四日再拟出“续停战条款”四条，经戈飞转至湖北军政府。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接到“条款后”，相继作出停战和同 北方议和的决议。十八日（8日），袁世凯命唐绍仪为北方全权代表，偕同随从人员迅即南下武汉议和。次日南方独立各省确定以伍廷芳为议和全权代表。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二十三日（13日）入武昌与黎元洪等晤谈。

立宪派为操纵和议，坚持谈判改在上海进行，此意得到帝国主义和袁氏之认可。二十七日（17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二十八日（18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者，南方代表伍廷芳、参赞温宗尧、王宠惠、汪兆铭；北方代表唐绍仪、参赞杨士琦；此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第一次会议双方主要讨论停战问题，确定在晋、陕、鄂、皖、鲁、苏、奉天七省一律停止军事行动。十一月初一（12月20日），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为使和谈按帝国主义意图进行，在此次会议上，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致送同文照会，公然要胁说：“目前在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因此，双方

"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②。实际是压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

这次会议双方主要讨论"国体"问题。伍廷芳提出要废除满洲政府，建立共和政府。对此，唐绍仪表示原则上赞成，但提出"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③。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在会外秘密谈判中，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原来袁世凯在任唐绍仪为正式和谈代表时，又通过段祺瑞秘派亲信廖宇春等以"个人身份"尾随唐前往上海，伍、唐开第一次会议次日，廖宇春即与黄兴委派之民军代表顾忠琛举行秘密会谈。十一月初一（12月20日），伍、唐第二次会议当天，廖、顾即达成五条协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实行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此后，廖宇春等离上海先后向段祺瑞、袁世凯汇报，而公开会谈则暂告停顿。

袁世凯经争得帝国主义同意，决定承认共和，但提出须经国民会议讨论确定。唐绍仪接到袁世凯指示，立刻加快谈判速度，十一月初十、十一日、十二日（12月29、30、31日），伍、唐连续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双方确定：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每省出代表三人，每人一票；独立各省由临时政府发电召集，未独立各省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各处代表到达四分之三以上，即可开议。伍廷芳提议开会地点在上海，时间定于十一月二十日（1912年1月8日）；对此，唐绍仪允以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

正当南北即将达成和议之时，十一月初十（12月29日），南方独立各省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深恐猎取最高统治权的希望落空，以唐绍仪逾越权限为借口，立即全部否定

双方代表业已达成的协议。十二日、十三日，唐绍仪两次电袁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十四日，袁世凯一面电准唐绍仪辞职，一面电告伍廷芳，以后南北和议事项由他直接电商。同时，他授意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将领连续发表通电，声称“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④。冯国璋等公然提出要“开战”，武汉前线清军则向武昌开炮轰击。袁世凯虽然撤销议和代表，制造战争气氛，但南北暗中谈判活动却在继续加紧进行。上海南阳路赵凤昌住宅“惜阴堂”，成为南北议和代表及立宪派昼夜密议的场所。

这时双方争执之中心问题是如何结束南北两个对立政权，由袁世凯建立统一中央政权问题。袁世凯要求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由他采用共和形式另建统一政府。南方代表坚决反对此种意见，主张清帝退位，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公选袁为临时大总统。在谈判过程中，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受到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政治上不承认，经济上封锁扼杀，军事上武力恫吓，舆论上恶毒攻击。而对袁世凯则予以全力支持。在南方，立宪派和旧官僚与袁世凯相勾结，极力迫使孙中山向袁让步；革命派内部妥协势力也逐渐居于优势地位。在此形势下，孙中山只得退让。民国元年一月二十五日，孙中山电伍廷芳，再次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袁世凯）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⑤。二月初，双方代表商定清退位优待条件；十二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袁世凯先一日致电南京，宣告“共和为最良国体”。十三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十五日，临时参议

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以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而告结束。

注 释

①《辛亥革命》第8册，第66页。

②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91页。

③《辛亥革命》第8册，第77页。

④《盛京时报》1912年1月9日。

⑤《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卷，第23页。

清（后期）

中华民国成立

武昌起义后，五十天内全国十四省和上海市先后响应，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为统一步调，把革命推向最后胜利，建立全国统一革命政权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现实基础。但是，在建立政权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同样存在着激烈斗争。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911 年 11 月 11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以处理内外关系。次日，程、汤即用苏、浙两省名义电请全国各省派代表来沪，商组临时政府。二十五日（15 日），依据"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的意见，上海、江苏、福建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建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然而早在上海方面发出通电前三日（十九日），武昌方面已由黎元洪署衔通电各省，请速派代表赴鄂商组临时政府。结果，湘、苏、闽、浙、直、鲁、豫、沪等省区都督府或谘议局（未独立省份）派代表至沪与会；赣、粤、桂等省都督府派代表径赴湖北。于是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沪举行；考虑到武昌为首义地区，三十日（20

日）又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昌方面立予反驳："即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①接着便派居正等到沪，力争各省代表会在湖北举行。上海方面审时度势，感觉不宜再坚持原议，于是在十月初五（11月25日）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有一人留沪；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

十月上旬，鄂、湘、闽、鲁、苏、皖、桂、直、豫、浙、川等十一省代表二十三人陆续到达武汉。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因此代表会只得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内举行。十月初十（11月30日），代表会正式开会，举谭人凤为议长。会议至十六日（12月6日）暂时休会，主要议决以下事项：（一）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二）同意与北方停战；接受南北方举行"议和谈判"，确定以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为议和条件。会议期间，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当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转到南京开会，俟十省以上代表出席，即开会选举大总统。可是，南京克复后第三天（十月十四日），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三位都督抢先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暂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实际是将大总统一职暂时虚位以待袁世凯。

汉口代表会议认为上海代表选举不合法定人数，对所选元帅、副元帅不予承认。十月二十二日（12月12日），十五省都督府代表抵南京开会，举汤尔和为议长。不料又出枝节，二十五日浙江代表陈毅向代表会报告：袁世凯代表到汉时，已表

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当天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通过胡瑛和王正廷从武汉也急电南京各省代表，说袁"极愿平和了结"，"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会外袁世凯插手，会内立宪派和投机政客响应附和，迫代表会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并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然而因为武昌方面本来就反对关于黄兴为正、黎元洪为副的决议，这时苏、浙军人又以汉阳败绩为借口反对黄兴当大元帅，故代表会又只好在二十七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暂驻武昌；黄兴副之，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此刻黄兴已得到孙中山即将归国之确讯，认为组织政府应待孙中山决定，固并未到职。

孙中山是革命派公认领袖，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他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成功消息后，为促成民国建立，即开始遍访美、英、法等国朝野人士，力争他们对新政权予以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十一月初六（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热烈欢迎。初十（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与会十七省代表，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二日，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定一九一二年为民国元年。三日各省代表会议增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通过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各部总长）名单：黄兴为陆军总长、王宠惠为外交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以上三人为同盟会员）、张謇为实业总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上二人为江浙立宪派首领）、程德全为内务总长（旧官僚）、黄钟英为海军总长（起义舰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以上二人均在清政府任过

职，又是受西方影响较深的法学和理财专家）。按照总统制组织原则以及同盟会所确定之“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直接任命的九部次长、三局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均为同盟会骨干。二十八日，由各省都督府各指派三名代表在南京组成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四十三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员占三十三人，自治学社一人，与革命派有过联系的绅士一人，立宪派八人；同盟会员林森、王正廷为正副议长。至此，与君主专制相对立的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组织机构基本确定。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仅颁布了一部具有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先后颁布一系列法律、法令，推行许多进步性措施。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胥属平等”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集会、信教等一切公民权利；取消法律中对各项所谓“贱民”的歧视和特别限制；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份；禁止“刑讯鞫狱”，焚毁不法刑具；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革除清朝官场中“大人”、“老爷”称谓，宣布职员为“人民公仆”，官厅人员咸以官职相称，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或君，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

在革除社会陋习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严禁种吸鸦片；禁止赌博、蓄辫、缠足等；提倡俭朴和廉洁奉公，上自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每月只发军用券三十元。在社会经济方面，宣布政府经营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和规章，废除一些苛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提倡垦殖事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

育方面，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科，重新编写“合乎共和民国宗旨”的教科书，并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政策和措施，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宣判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死刑，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希望。但是，以革命派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对内，它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也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真正民主权利，对旧政权机构未给予有力冲击。对外，它对帝国主义始终充满着畏惧和幻想，明确宣布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偿还革命前清政府所借一切外债。这些充分反映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联合进攻下，革命派只能步步退却，将政权让与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代表袁世凯。1912 年 2 月 13 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4 月 1 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 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南京临时政府夭折。此后，北洋军阀集团把中华民国变成了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工具。

注　释

①《辛亥革命》第 8 册，第 12 页。

清（后期）

清帝退位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1908年11月13日），光绪帝病情加剧，慈禧太后以其无子，命光绪帝载湉胞弟、醇亲王载沣之三岁幼子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进宫内教养，授载沣为摄政王。二十一日（14日），光绪帝逝于瀛台之涵元殿，慈禧太后正式确定溥仪承继帝位，命摄政王载沣监国。二十二日（15日），慈禧太后病逝。十一月九日（12月2日），举行登极大典，溥仪正式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宣统元年；尊光绪帝皇后叶赫那拉氏（1868—1913）为皇太后，上徽号隆裕，且袭慈禧以行“垂帘听政”；实际军政大权掌握在监国摄政王载沣之手。此时，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遍及全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立宪派掀起的立宪运动日益高涨。面对四面楚歌的严峻形势，以载沣为首的皇族亲贵继续采取对内集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的反动措施。宣统三年（1911），“皇族内阁”的建立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终于点燃了武昌起义的烽火。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打击下，清王朝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它的垮台已指日可待。

但是，中外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决不允许在中国建立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为剿杀革命，摄政王载沣在内外压力下，不得不重新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惯于玩弄两面派手法的袁世凯，一方面利用革命势力迫使清政府让出全部政权，另一方面则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手中掌握的北洋军，利用尚存的清朝廷，压迫革命派向他妥协。袁世凯在出任清内阁总理大臣、夺得清王朝的实权之后，他便立即命北洋军先后攻占汉口、汉阳，接着便派代表与南方革命势力举行"南北议和"。迫于多方压力，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于辛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12年1月13日）再次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①至此，摆在袁世凯面前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清帝退位。

十一月二十八日（1月16日），袁世凯接到孙中山保证电次日，立即率全体内阁成员上奏隆裕太后，指出：自武昌起义，旬月之间，民军响应几遍全国，清军"战地范围过于广阔，几于饷无可筹，兵不敷遣，度支艰难，计无所出"。而"民军之意，万众一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人心涣散，如决江河，已莫能御"。"若其久事争持，则难免（外国）不无干涉，而民军亦必因此对于朝廷感情益恶，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早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孑遗也"。"臣会同国务大臣，筹维再四，于国体改革，关系至重，不敢滥逞兵威，贻害生灵。又不敢妄事变更，以伤国体"，只得要求"皇太后，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以息兵祸而顺民心"②。在危言恫吓之后，他又代表内阁全体向隆裕辞职。就在这一天，当袁世凯从皇宫出来行至东华门外丁字街

拐角处时，突遭革命党人杨禹昌、黄之萌、张先培等投弹袭击，不幸未中，党人被捕牺牲。袁受此虚惊后，即乘机称病不再入朝，在幕后加紧指挥"逼宫"。

在内外威逼下，隆裕于十一月二十九日（1月17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会上，被袁世凯收买的贝子溥伦首先发言，提出清帝"自行逊位"，而由袁世凯任总统的主张。庆亲王奕劻则说：清帝除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别无其它安全办法。恭亲王溥伟、镇国公载泽等反对退位。双方驳诘甚久，无结果而散。次日再议，仍无结果。十二月一日（1月19日），袁世凯派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等为代表，邀集载泽、奕劻及满蒙王公亲贵至内阁会议。会上除溥伟重弹对南方革命势力要予"痛剿"外，其余群臣皆沉默无言。外务大臣胡惟德与赵、梁等联衔上奏："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③同日，隆裕召开第三次御前会议，又无结果而散。此时，为维护清王朝，部分王公亲贵逐渐结合在一起，组成所谓"宗社党"，强烈反对退位，反对共和。他们以"君主立宪维持会"名义，发表措词激烈的宣言，要求清廷"齐同振作，与革匪决战"，以巩固"圣清万万年邦基"④。他们又致书袁世凯，声言要与他"同归澌灭"，甚至公然创议"南北分立"⑤。有些蒙古封建王公且回归本旗，图谋武装反抗。在一片反对退位的声浪中，十二月四日（1月22日），隆裕召开第四次御前会议。会上，赵秉钧等提出内阁解决时局办法，拟将北京清政府与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此议遭到王公亲贵的一致反对。载泽、溥伟等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拒绝民主共和。隆裕左右为难，但又不愿自动退位，遂决定采纳溥伟的意见，仍由国民

会议解决国体问题。十二月六日（1月24日），清廷谕令袁世凯内阁，与南方筹商召集所谓“国民会议”问题，以最后确定国体。

袁世凯见清廷仍不同意退位，即向隆裕复奏：“如改为国会议决国体，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决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预决。”⑥实际以取消优待条件相威胁。接着，他又指使北洋军人和各省督抚通电要挟。十二月八日（1月26日），以段祺瑞为首的五十名北洋将领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及王公大臣，极言局势万分危急，如“政体仍待国会公决”而迁延时日，即“有兵溃民乱，盗贼蜂起之忧。寰宇糜烂，几无完土，瓜分惨祸，迫在目前”，因此强烈要求“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以现内阁及国务大臣等暂时代表政府”，否则将“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⑦。此后，直隶总督张镇芳、署两江总督张勋、署湖广总督段祺瑞、安徽巡抚张怀芝、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林、吉林巡抚陈昭常、署山东巡抚张广建等封疆大吏，也分别电奏清廷，要求“速降明谕，宣布共和”⑧。恰在北洋军将领通电清廷的当天，又发生了彭家珍炸毙良弼的事件。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认为除掉良弼这个“宗社党”骨干，即可导致共和，故于十二月八日乘良弼返归私宅时，在其红罗厂家门前投掷炸弹；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受重伤亦于两天后毙命。经此惊吓，皇族亲贵纷纷逃离北京，潜居青岛、大连、天津等地租界中。隆裕太后知大势已去，于十二月十六日（2月3日）授袁世凯全权与南京临时政府商酌退位条件。

经双方反复讨论，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转交三项文件：（一）《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之

优待条件》八款，主要内容为：(1) 大清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2) 民国每年拨四百万元供皇帝支出；(3) 皇帝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4) 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设卫兵，妥慎保护；(5)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民国支出；(6) 以前宫内所有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7) 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8) 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款，主要内容为：(1) 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2) 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其私权，与国民同等；(3) 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4) 清皇族免兵役之义务。(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七款，主要内容为：(1) 与汉人平等；(2) 保护其原有之私产；(3) 王公世爵，概仍其旧；(4) 王公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5) 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6) 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7) 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⑨。十二月二十四日(2月11日)，隆裕太后接受优待条件，决定退位。二十五日(12日)，隆裕携六岁的宣统皇帝溥仪在养心殿举行清王朝最后一次的朝见仪礼。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代表袁世凯入朝，向隆裕和溥仪行了首次改用的三鞠躬礼。随后由内监将三道诏书放在隆裕面前。隆裕将退位诏书交胡惟德，使布告全国。从此，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连同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正式宣告结束了。

注　释

①《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23页。

②《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70—272页。

③《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310页。

④《袁世凯传》第196页。

⑤《辛亥革命先著记》第273页。

⑥《辛亥革命史料》第304页。

⑦⑧《辛亥革命》第8册，第143—144、181页。

⑨《辛亥革命史料》第313—314页。

附录：清代大事年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16 年	天命元年 万历四十四年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辽宁省新宾县）称汗，国号金，史称后金。
1618 年	天命三年 万历四十六年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反明，占领抚顺、清河。
1619 年	天命四年 万历四十七年	三月，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一带歼灭明军四万五千余人，攻陷开原、铁岭。
1621 年	天命六年 天启元年	三月，努尔哈赤攻陷沈阳、辽阳后，迅速占领镇江（今丹东）、凤凰（今凤城）、海州（今海城）、盖州、复州、金州七十余城。迁都辽阳。七月，实行“计丁授田”，将辽阳、海州一带三十万日土地分配给八旗将士，每丁六日（一日等于五亩）。
1622 年	天命七年 天启二年	正月，努尔哈赤兵进辽西，攻陷西平堡、广宁、义州等地。
1625 年	天命十年 天启五年	三月，后金定都沈阳。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26 年	天命十一年 天启六年	一月，努尔哈赤大举进攻辽西。明辽东经略不战而撤，驱军入关。驻守宁远的袁崇焕拒绝撤退，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八月十一，努尔哈赤病逝，九月初一皇太极即汗位。
1627 年	天聪元年 天启七年	正月，皇太极派阿敏等突袭朝鲜，朝鲜李朝被迫与后金订城下之盟。五月，皇太极率军抵锦州、宁远，再次被袁崇焕打退。
1628 年	天聪二年 崇祯元年	九月，皇太极联合漠南蒙古敖汉、奈曼、札鲁特、喀喇沁等部讨伐察哈尔部，把察哈尔逐出西喇木伦河流域。
1629 年	天聪三年 崇祯二年	四月，设置文馆。十月，皇太极取道蒙古喀喇沁部，突破明长城防线，攻克遵化、三河、顺义，直逼北京。十一月二十日，入关勤王的袁崇焕，以五千之众击退向广渠门进犯的后金军。十二月初一，明帝崇祯因中皇太极的反间计，诏逮袁崇焕。三天后，袁崇焕所部将士哗变，从广渠门开拔，杀出山海关。后金首次举行科举。
1630 年	天聪四年 崇祯三年	二月，皇太极率军出关，回沈阳。
1631 年	天聪五年 崇祯四年	八月，皇太极率军直逼大凌河，驻守大凌河的明守军被围困三个月，终因粮绝而开城降。十一月，奉命援助大凌河的登州游击孔有德，率部行至吴桥因乏粮而哗变。后金设立六部。
1632 年	天聪六年 崇祯五年	四月，皇太极率军越兴安岭，远征察哈尔，该部首领林丹汗不支，率众西窜。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33年	天聪七年 崇祯六年	五月，从登州突围的孔有德、耿仲明携明制造的新式大炮数百门投降后金。七月，孔有德、耿仲明协助后金攻克旅顺。
1634年	天聪八年 崇祯七年	三月，明广禄岛副将尚可喜归降后金。
1635年	天聪九年 崇祯八年	林丹汗死于青海大草滩，其子额哲率部归降后金。林丹汗妻苏泰太后将元传国玉玺奉献给后金。后金编建蒙古八旗。
1636年	崇德元年 崇祯九年	四月，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改女真为满洲。五月，设立都察院。七月，皇太极遣军突破长城防线，大举袭扰明京畿重地，五十六战皆捷，俘获人口、牲畜十八万。十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十一月，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朝鲜，朝鲜国王李倧被迫出降。
1638年	崇德三年 崇祯十一年	六月，清改蒙古衙门为理藩院。九月，清军突破长城防线，进犯畿辅，俘明德王朱由枢，掠汉民四十六万，白银百万两。
1640年	崇德五年 崇祯十三年	九月，清军向明关外宁、锦防线发起攻击，轮番进攻杏山、松山、锦州、宁远等军事重镇。
1641年	崇德六年 崇祯十四年	三月，清军已完成对锦州的战略包围。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八总兵、十三万军集宁远，营救锦州。五月，洪承畴从宁远出发，率兵六万进抵距锦州只有十八里的松山。八月，清军插入松山、杏山之间，断明军饷道，围困松山。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42年	崇德七年 崇祯十五年	二月十九，清军攻占松山，生擒洪承畴。三月初十，锦州守将祖大寿开城降清。十一月，清军突破长城防线，入犯山东、河北，先后攻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八十八城，杀明鲁王朱以派及乐陵、阳信、东原、安邱、滋阳五郡王，俘获人口二十六万九千，掠牲畜五十五万。
1643年	崇德八年 崇祯十六年	八月初八，皇太极病逝于沈阳。经满洲权贵协商，拥立皇太极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位，由睿亲王多尔衮（皇太极之弟）、郑亲王济尔哈朗（皇太极之堂弟）共同辅政。
1644年	顺治元年 崇祯十七年	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三月二十七，驻守山海关的明宁远总兵吴三桂遣使清摄政王多尔衮，请兵报仇，四月二十二吴三桂同清军在山海关一片石大败李自成所率领的二十万军队。五月初一清军占领北京。旋颁“剃发令”。五月初二，福王朱由崧即监国位于南京，十五日即皇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七月十七，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取缔明季三饷加派。十月初一，清顺治帝在北京即皇帝位。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农民政权。十二月二十三日，清廷下达圈地令。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45 年	顺治二年 弘光元年 隆武元年	一月，清军攻陷潼关，李自成从陕西入湖北，该年五月在通山县九宫山被袭杀。三月，清廷颁布投充令。五月，豫亲王多铎率清军兵临南京，南明官员开城迎降。五月二十二日，出逃的弘光帝朱由崧被清军俘获，翌年五月处死。六月十五日，清廷重颁剃发令，以十日为限，逾期不剃，杀无赦。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以本年为隆武元年。
1646 年	顺治三年 隆武二年	五月，清廷颁布以严惩窝主为主要内容的逃人法。八月，清军逼近福建，唐王政权的拥立者郑芝龙与清江南招抚洪承畴相通。密谋降清。唐王朱聿键拟由闽入赣，行至汀州被俘。十月，桂王朱由榔即位于肇庆，以明年为永历元年。十一月，清军由陕入川，在西充击毙张献忠，其残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撤入滇、黔。
1647 年	顺治四年 永历元年	一月，清廷再次圈占近畿土地，从三百里扩至五百里，此次共圈占九十九万三千九百零七日（约合五万顷）。
1648 年	顺治五年 永历二年	一月，清江西提督金声桓起兵反清。四月，清广东提督李成栋据广东叛。十二月，大同总兵姜瓖叛应金声桓、李成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49年	顺治六年 永历三年	一月，金声桓据守的南昌被清军攻陷，金声桓投水死。二月二十六，奉永历朝廷之命援助南昌的李成栋，在江西信丰遭清军袭击，李成栋溺水死。八月二十八，姜瓖部将斩杀姜瓖，开城降清。十一月，靖南王耿仲明因部下隐匿逃人被劾，在江西吉安畏罪自杀。
1650年	顺治七年 永历四年	十二月初九，摄政王多尔衮病逝。
1651年	顺治八年 永历五年	一月，英亲王阿济格因谋求摄政而被幽禁。二月二十一，摄政王多尔衮被削爵论罪。
1652年	顺治九年 永历六年	一月，南明永历朝廷在清军的追击下投奔占据云贵的孙可望、李定国。七月四日，清定南王孔有德在桂林被李定国围困，城破后，孔有德举火自焚。十月，清廷谕令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中国军民在黑龙江乌札拉村，痛击沙俄入侵匪徒哈巴罗夫。十一月，奉命征讨李定国的清敬谨亲王尼堪在衡州遇伏，被李定国部斩于阵。
1653年	顺治十年 永历七年	五月，清廷封达赖五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清廷任命洪承畴为湖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总督军务，兼理粮饷。
1654年	顺治十一年 永历八年	设立督捕衙门。颁行“编审户口法”。九月从严更定窝逃律。十二月，达赖五世至京朝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55 年	顺治十二年 永历九年	一月，御编《资政要览》、《劝善要言》刊行。清军痛击沙俄匪徒斯捷潘诺夫。设馆编《顺治大训》、《太祖圣训》、《太宗圣训》。立铁碑，禁中官干政。
1656 年	顺治十三年 永历十年	一月，顺治帝令编《通鉴全书》、《孝经衍义》。六月，清廷颁敕浙江、福建、广东、江苏等省"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
1657 年	顺治十四年 永历十一年	二月，顺治帝谕令为崇祯帝立碑。四月，因郑成功拒绝降清，清廷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叔郑芝豹、弟郑世忠、郑世恩、郑世荫、郑世默等流徙宁古塔，籍没家产。八月，孙可望在袭击李定国失败后，降清。十一月，顺治帝借乡试中科场弊端发动顺天、江南科场案，共处死二十六人，五十九家流徙关外，籍没家产。改内三院为内阁，设殿阁大学士。
1658 年	顺治十五年 永历十二年	十月，清军兵分三路入黔。十一月，清军由黔入滇。
1659 年	顺治十六年 永历十三年	二月，李定国与吴三桂部清军激战于磨盘山，因磨盘山败绩，永历帝朱由榔逃入缅甸。三月，清廷任命吴三桂镇守云南，尚可喜镇守广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镇守四川。七月，清两江总督郎廷佐在南京击败大举北伐的郑成功部。
1660 年	顺治十七年 永历十四年	四月，清军大举进攻厦门，在漳州海面被郑成功击败。七月，诏令耿继茂移驻福建。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61年	顺治十八年 永历十五年	一月初七，顺治帝生天花，逝于养心殿，遗命令皇三子玄烨即皇帝位，以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政。四月初三，郑成功率军收复台湾，驱逐荷兰殖民者。七月，清廷按明季旧额加派练饷，从顺治十八年起，每亩加派一分，累计加派五百七十七万余两。八月，清廷下达迁界令，沿海房屋及船只全部烧毁，不许寸帆下海。十月，郑芝龙及其子郑世恩、郑世荫等被清廷处死。十二月，吴三桂兵进缅甸，擒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翌年四月十五，将朱由榔及其子处死。
1662年	康熙元年	五月初八，郑成功在台湾病逝。五月十一，吴三桂因擒永历，晋封为亲王。
1663年	康熙二年	五月，将《明史辑略》一书的编纂者、刻印者、校对者、销售者、收藏者以及受牵连的地方官吏共计八十八人全部处死。十月，清军攻陷金门、厦门。
1664年	康熙三年	九月，在清廷担任钦天监监正二十年的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因被指控以澳门为基地谋反、传播邪教及舛谬的天文学说被逮入狱。同时被逮的有钦天监监副李祖白、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等人。
1665年	康熙四年	三月初一，判处汤若望等八名钦天监官员凌迟处死，未及实施北京发生大地震。四月初三，对汤若望一案作出终审判决，汤若望等人免罪释放，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等钦天监官员俱被处死。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66 年	康熙五年	四月，辅政大臣鳌拜下达镶黄旗与正白旗换圈的命令，同时将遵化、永平、丰润、滦州一带夹空民地圈给镶黄旗，此为清初第三次大规模圈占土地。十二月，负责换圈的直隶三省总督朱昌祚、保定巡抚王登联因疏请停止换圈同反对圈地的户部尚书苏纳海被鳌拜处死。
1667 年	康熙六年	七月初七，康熙帝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七月十七，鳌拜不顾康熙反对将辅政大臣苏克萨哈及其子、侄、堂兄弟等共计十人处死。
1668 年	康熙七年	南怀仁疏劾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所修康熙八年历法有误，遂令大学士图海、李霨等同南怀仁、吴明烜等实地测验。
1669 年	康熙八年	三月二十七，康熙任命南怀仁为钦天监监副，按照南怀仁的推算修改康熙八年历法。五月十六，康熙智擒鳌拜。六月十一，为苏克萨哈昭雪。六月十七，下达永远停止圈占民间房地的命令。七月，为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昭雪。八月，为汤若望、李祖白等昭雪。
1670 年	康熙九年	五月，谕令纂修《大清会典》。
1671 年	康熙十年	二月，谕令纂修《孝经衍义》。八月，谕令设立起居注衙门，以翰林院、詹事府的官员兼任记注官。起居注衙门设在太和门外西廊。
1672 年	康熙十一年	七月，令刊行《大学衍义》，满文译本。因南怀仁之荐，聘耶稣会士要多（比利时人，1644 年生）在御前进讲几何。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73年	康熙十二年	三月，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养辽东，谕令将该藩所属十五佐领全部撤归辽东。七月，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耿继茂之子）疏请撤藩，有旨准允。七月十五，谕令重修《太宗文皇帝实录》。十一月二十一，吴三桂举兵叛，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国号周，铸"利用通宝"，部下皆蓄发易衣冠，旗帜为白。十二月二十一，大学士索额图以撤藩激变，请诛首倡撤藩之人，康熙帝不从。
1674年	康熙十三年	二月，升南怀仁为钦天监监正，令其监造大炮。二月二十七，孔有德之女婿孙延龄在广西叛应吴三桂。三月十六，靖南王耿精忠叛应吴三桂。四月十三，令将吴三桂之子——额驸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处死。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叛应吴三桂。
1675年	康熙十四年	三月，察哈尔部布尔尼举兵叛，奈曼部首领札木山叛应布尔尼，青海各蒙古部落拆毁关隘、袭杀清廷官员，围攻清驻军。
1676年	康熙十五年	二月二十一，尚之信（尚可喜之子）叛应吴三桂，尚可喜自杀未遂，八天后病逝。六月，王辅臣因饷道被清军切断，降清。九月，耿精忠降清。十二月，尚之信密疏请降。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77 年	康熙十六年	三月，将南怀仁新铸大炮二十门运往江西。五月，准噶尔汗噶尔丹袭杀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十月，设南书房，从翰林院内择二人常侍皇帝。十二月《四书解义》成书，康熙为该书作序。
1678 年	康熙十七年	三月初一，吴三桂在衡州（今衡阳）称帝，国号周，建元昭武。闰三月，清廷再颁迁界令。八月十七，吴三桂死于衡州，其孙吴世璠继立，改元洪化。
1679 年	康熙十八年	正月，清廷在漳州设“修来馆”，招降郑经（郑成功之子）部众。三月，在保和殿①举行博学鸿词制科考试，与试者一百四十三人，录取五十人，令彼等与修明史。五月，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明史》监修总裁官。七月二十八，北京发生大地震连震三天，八月初八、十二日、十三日再次大震，通州、良乡等地裂地成渠，喷出黑水及黑气。近京三百里内房屋倒塌，被压死者甚多，内阁学士王敷政、翰林院侍读庄冏生及工部尚书郭光裕全家四十三口均被压死，大学士勒德洪被砸伤。户部、工部议定，凡房屋倒塌者，旗人每间房屋给银四两，民人每间房屋给银二两，死亡人口每名拨银二两作为安葬费用。
1680 年	康熙十九年	八月十七，尚之信在广东被处死。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81 年	康熙二十年	二月，郑经病逝后，由其幼子郑克塽继立。二月，荷兰请在福建“不时互市”未允。三月，清军包围云南省城昆明，十月二十二破城，二十八日吴三桂孙吴世璠自杀，结束为时八年的三藩之乱。种痘预防天花得到推广，康熙令为诸皇子种痘，亦令在内蒙四十九旗广为接种。
1682 年	康熙二十一年	正月，耿精忠被凌迟处死，其子处斩，其党羽八人凌迟处死，十五人处斩。十月，重修《太祖实录》，纂修《三朝圣训》、《平定三逆方略》。
1683 年	康熙二十二年	六月，清军渡海进攻台湾，七月十五郑克塽遣使至澎湖请降。清廷收复台湾，开海禁。九月，因沙俄入侵者抢掠黑龙江流域，令清军在瑷珲建城永戍。
1684 年	康熙二十三年	四月，《日讲易经解义》刊行。五月，纂修《大清会典》。九月，康熙首次南巡。二十八日启程，途经河北、山东、视察黄河北岸工程及高邮、宝应等地。在南京谒明孝陵，作《过金陵论》，北还时至曲阜，在孔庙大成殿向孔子行三跪九叩礼，并亲书“万世师表”四字，悬挂在大成殿内。十一月二十九日回京。设台湾府，隶福建省。
1685 年	康熙二十四年	五月，清军攻克沙俄盘踞的雅克萨城，焚城而撤回瑷珲。九月十一，编《平定罗刹方略》。九月二十七，在墨尔根筑城（今嫩江市），由黑龙江将军率兵驻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86 年	康熙二十五年	三月，纂修《一统志》。五月，清军兵分两路向雅克萨发起攻击。九月，康熙因收到沙皇政府“请撤雅克萨之围”、遣使划定边界的信件，谕令清军从雅克萨后撤。
1687 年	康熙二十六年	九月，噶尔丹兵分两路进攻喀尔喀蒙古。十一月，参加边界谈判的俄国使团袭击喀尔喀土谢图汗部。
1688 年	康熙二十七年	五月初，清廷派遣使团前往楚库柏兴参加中俄边界谈判，行至喀尔喀汛界，因噶尔丹大举入犯，道路阻塞，而于五月底奉命还京。九月，喀尔喀蒙古举部内迁，请求清廷保护，被安置在近边牧场。
1689 年	康熙二十八年	正月，康熙第二次南巡，途经河北、山东、江苏抵杭州。六月十五日，参加中俄边界谈判的使团抵尼布楚，七月二十四日签定中俄尼布楚条约。
1690 年	康熙二十九年	七月十四，康熙亲征噶尔丹。八月初一，清军在乌兰布通击败噶尔丹。
1691 年	康熙三十年	三月，《通鉴纲目》译成满文，康熙亲为该译本作序。五月初一，康熙抵多伦诺尔，与喀尔喀各部会盟。五月，发杀虎口粮储，赈喀尔喀蒙古贫丁。
1695 年	康熙三十四年	五月，噶尔丹率骑兵三万从科布多出发，再次进犯喀尔喀。
1696 年	康熙三十五年	二月，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五月十三日清军在昭莫多大败噶尔丹。七月，命内阁、翰林院编《平定朔漠方略》。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697年	康熙三十六年	二月，康熙第三次亲征噶尔丹，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于科布多服毒自尽。
1699年	康熙三十八年	二月，康熙第三次南巡，视察高堰、归仁等处治河工地。十一月，顺天乡试科场案发，主考官李蟠遣戍，副主考姜宸英死于狱中。
1701年	康熙四十年	正月，《政治典训》、《御制文集》刊行全国。九月，策妄阿喇布坦遣人送噶尔丹之女钟济海至京，令与噶尔丹之子塞卜腾巴尔珠尔同住一处。授塞卜腾巴尔珠尔一等侍卫。诏令皇三子诚郡王胤祉主编《古今图书集成》。
1702年	康熙四十一年	五月，筑永定河石堤。
1703年	康熙四十二年	正月，康熙第四次南巡。钦定《全唐诗》编成，收录二千二百多位诗人的诗四万八千余首。在热河开始建造避暑山庄。
1704年	康熙四十三年	四月，康熙遣侍卫拉锡等往探黄河源头，拉锡一行五月至青海，六月至星宿海之东，周围群山，蒙古名为库尔滚，即昆仑山。据拉锡等考察，从昆仑山上涌出三泉，三泉流出三条河，三条河流入札陵泽，自札陵泽流出乃黄河。
1705年	康熙四十四年	二月，康熙第五次南巡。平定西藏桑结为首的叛乱势力。
1707年	康熙四十六年	二月，康熙第六次南巡。康熙主持编制《皇舆全览图》。《历代题画诗类》、《历代诗全》及《御批通鉴纲目》编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08 年	康熙四十七年	四月，山东巡抚赵世显拿获朱三太子。据其自供："原姓朱，今年七十五岁，是明朝后裔，名叫慈焕"，"从没有非分之念"。六月二十审结此案，将朱三太子及其子、孙解至京，问明正法。六月，《清文鉴》编成，康熙为该书作序。九月，康熙在围场行猎途中，废皇太子胤礽。钦定《佩文斋书画谱》、《广群芳谱》编成。
1709 年	康熙四十八年	三月初九，复立胤礽为皇太子。御选《四朝诗》编成。
1710 年	康熙四十九年	十月初三，宣布普免康熙五十年各省钱粮。
1711 年	康熙五十年	十一月初九，江南乡试科场案发。十一月十二，戴名世《南山集》案发。十一月二十七日都统鄂缮、尚书耿额、齐世武等因被指控同皇太子胤礽结党锒铛入狱。御定《全金诗》、《避暑山庄图咏》编成。
1712 年	康熙五十一年	二月二十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五月遣内阁侍读图理琛等携敕前往伏尔加河流域，探望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九月三十，再废皇太子胤礽。钦定《历代纪事年表》编成。
1713 年	康熙五十二年	六月，谕令在蒙养斋成立算学律吕馆。御史董之燧奏请将丁银"按亩均派"，经康熙允许，先在广东、四川试行。谕修《律吕正义》。
1715 年	康熙五十四年	谕修《律吕渊源》。
1716 年	康熙五十五年	《康熙字典》编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17年	康熙五十六年	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遣兵入侵西藏，十月进攻拉萨，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部拉萨汗兵败被杀，准噶尔兵洗劫拉萨布达拉宫及各寺庙。
1718年	康熙五十七年	三月十九，裁起居注衙门（储位久空，诸皇子争立，向记注官打听消息）。十月二十六，任命十四阿哥胤禵为抚远大将军领兵西征，"其纛用正黄旗之纛"，康熙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禟及胤禵本人都认为康熙有立胤禵为皇太子之意。
1720年	康熙五十九年	八月，清军攻入拉萨，全歼准噶尔军。
1721年	康熙六十年	四月，台湾爆发朱一贵起义，闰六月初平定此次起义，朱一贵被俘，械往京师。十一月，抚远大将军胤禵，为进兵准噶尔回京请旨，翌年四月仍令其返回军中。
1722年	康熙六十一年	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病逝于畅春园。十一月二十日，康熙第四子雍亲王胤禛即皇帝位于太和殿。十二月十九日，令纂修《圣祖实录》。御制《分类字锦》、《千叟宴诗》编成。
1723年	雍正元年	四月，恢复起居注衙门。六月，和硕特部亲王罗卜藏丹津据青海叛，八月遣兵讨伐罗卜藏丹津，翌年初平定此乱。八月十七，定秘密立储之制。将所择立储副的名子写好密封，藏于匣内，放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待老皇帝晏驾后，取出宣读。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24 年	雍正二年	四月，因允禵不肯前往蒙古在张家口逗留，革郡王爵，永远拘禁。闰四月，设八旗宗学；令各省设立广济堂，收养孤寡残疾老人，建育婴堂，收养弃婴；严禁白莲、罗门等秘密宗教。六月，召见在京传教士，严禁彼等传教，只许在京及边境贸易。九月，推行"摊丁入地"，将丁银摊入地亩中征收。十月，雍正下令，限制渔户多造船只，批有"海禁宁严毋宽"的朱谕。十二月十四日，废太子胤礽在幽所病故，追封和硕理亲王，谥"密"。
1725 年	雍正三年	六月十三，将雍王府改为雍和宫。九月二十八，诏逮年羹尧至京，十二月十一赐年羹尧自裁，其子年富处死，子孙十五岁以上者俱发广西、云贵充军，永不许赦回。九月三十日，《钦定大清律成》，颁行全国。十月十七，汪景祺文字狱发，十二月十八日将汪景祺枭首示众，妻子发配黑龙江为奴。《古今图书集成》撰成。
1726 年	雍正四年	正月初五，胤禩、胤禟等由宗人府除名，二月初四将胤禩囚禁于宗人府，三月初四将胤禩改名为"阿其那"，将胤禟改名为"塞黑思"，八月二十八，胤禟死于保定，九月初十胤禩死于幽所。三月十二，允鄂尔泰改土归流之奏。三月三十日，翰林院侍读钱名世因其赠年羹尧诗中有"鼎钟名勒山海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被革职，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发回原籍。雍正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造匾，悬挂钱名世所居之宅。五月初二，禁锢胤禵。七月二十五日，吏部议定保甲之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头立一甲长，十甲长立一保正，有能举首盗犯者，免其隐匿之罪。九月二十三日，严禁赌博，著京城各省收缴纸牌、骰子等赌具。九月二十六，查嗣庭文字狱发。
1727年	雍正五年	闰三月初二，禁止开矿，雍正在湖南巡抚请求开矿的疏奏上批道：“开采一事，目前不无小利，人聚众多，为害甚巨。”六月二十二，严禁沿海居民留居海外。七月十五日，中俄签定《布连斯奇界约》。九月初九签定《阿巴哈伊图界约》，九月二十四签定《色楞额界约》，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八月二十，从鄂尔泰奏请，在广西推行改土归流。十月初五，将隆科多，永远禁锢，翌年六月隆科多死于幽所。十一月二十八日，严行禁止拳棒一事。十二月初三，刊刻满、汉文《孝经》、《小学》。颁行钦定《子史精华》、《钦定诗经传说汇纂》。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28年	雍正六年	正月，与安南（今越南）定国界。五月十八，中俄签定《恰克图条约》，规定在恰克图及涅尔琴斯克建立常设贸易点，俄国商队三年一至北京，允许俄国在北京建馆舍及东正教堂等方面内容。八月，谕令推广北京官话，令各州县成立“正音学院”。九月二十八，张熙因奉曾静之命投书岳钟琪被逮。十月初二，制定船只出海例，出口船只于四月申报。入口船只在九月申报，入口之船如因帐目滞留可于来年五、六月回港；如遇飓风飘泊他省，准取具该地方官印结带回。十月初九，吕留良文字狱发。十一月初六，敕令各省严禁鸦片。十二月十一，将《四书》、《五经》译成蒙古文。十二月二十日，《大清律集解附例》修成。
1729年	雍正七年	七月，陆生楠因所著《通鉴论》十七篇被斩于军前。八月，清军入拉萨，平定阿尔布巴叛乱。九月，康熙《治河方略》编成，缮写三部发给河臣孔毓珣、嵇曾筠、尹继善。因西北用兵，设军机处。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30 年	雍正八年	十月初四，徐骏文字狱发。徐骏系徐乾学之子，官至翰林院庶吉士，因所著《坚蕉诗稿》、《戊戌文稿》、《杂录》，被处斩立决。十二月，清军兵分两路征讨准噶尔，西路清军遭到突袭，转战七昼夜，军队损失三分之一，驼马伤亡过半。将康熙御纂《性理精义》、《书、诗、春秋三经传说汇纂》分发各省，每省两部。
1731 年	雍正九年	二月，严禁民间制造、销售、私藏鸟枪、硝磺，防盗鸟枪不得超过一尺五寸，必须报官刊凿姓名。六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所率北路清军一万在博克托山谷中伏，被准噶尔军围困在和通泊，清军在突围过程中，有副都统四人丧生，侍郎永国、参赞觉罗海兰、公达福、公巴赛、副将军查弼纳均阵亡。七月初，傅尔丹率二千残兵逃回科布多，此为和通泊之败。十二月二十八日，台湾高山族因不堪淡水同知张弘章苛派，聚众起义，此次起义坚持近一年，自淡水至彰化，十四社俱响应，直至翌年十一月，此次起义才被平定。
1732 年	雍正十年	三月，铸军机处印信，上有“办理军机处印信”字样。八月，清军在光显寺大败准噶尔汗噶尔丹策棱所率三万军队。九月，禁止外国船只在黄埔停泊。外国船只向停澳门，康熙二十五年经清廷批准改停虎门，康熙五十年又因虎门口外风涛甚险，改停黄埔，此次仍改为澳门。贵州苗民起义，围台拱，十一月十六日清援军至，苗众溃散，台拱解围。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33 年	雍正十一年	正月，谕令各省建立书院，“择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四月初一，雍正集王公、大臣、僧道十四人研究佛教禅宗，编辑《御选语录》十九卷。四月初八，刊行御制《拣魔辨异录》，谕各省不许法藏（禅师）子孙开堂、说法，毁法藏所著《五宗原》，法藏弟子弘忍所著《五宗救》。五月，《大清会典》编成。九月十五，雍正在宫中举行法会，为《当今法令》一书撰写序文。
1734 年	雍正十二年	九月，雍正把新编成的《朱批谕旨》颁发各官。令庄亲王胤禄主持重刻《藏经》之事。
1735 年	雍正十三年	二月，贵州苗民起义。八月二十三日子刻，雍正帝病逝。大学士鄂尔泰、张玉书奉命取出雍正亲笔所书密旨，立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嗣皇帝位。九月初三，皇太子弘历即位于太和殿。九月二十三，谕令豁免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民欠钱粮。十月初三，命修《世宗宪皇帝实录》。十月初七，谕免雍正十二年以前民欠漕粮、芦课、学租、杂税。十月二十四，开释胤禵、胤禟。十一月二十八，恢复胤禩、胤禟子孙宗室身份。十二月初一，谕令编纂《八旗氏族通谱》。十二月十九，谕处死曾静、张熙。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36 年	乾隆元年	六月，谕编纂《三礼义疏》。七月，贵州苗民起义历经一年四个月被平定，据经略张广泗奏称：剿毁苗寨八百三十六，阵斩一万七千六百七十余名，生擒二万五千二百二十余名，军前枭示者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余，充赏为奴者一万三千六百余。清廷令永免古州等新辟苗疆钱粮。八月，谕减台湾丁银，从四钱七分减至二钱。八月二十八，在保和殿举行博学鸿词特科考试，与试者二百余人，取十五人（一等五人，二等十人），翌年七月在体仁阁对陆续抵京的二十六人补考，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
1737 年	乾隆二年	五月十三，将太祖、太宗、顺治、康熙、雍正五朝《圣训》交武英殿刊刻，颁赏。八月十一，命将国子监大成门、大成殿改用黄琉璃瓦。八月，向各官学颁发康熙御制文集、雍正朱批上谕及乾隆所著《乐善堂集》等书。十二月十五，在华北地区推广凿井灌溉。
1738 年	乾隆三年	十一月，在钦天监附近设八旗算学馆，招三十六名八旗子弟入学。
1739 年	乾隆四年	八月，仿《通鉴纲目》体例，编《明史纲目》。
1740 年	乾隆五年	七月二十八，谕令开垦零星土地，免其升科。八月十七日，荷兰殖民者屠杀居住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华侨一万余人。《大清律例》刊行。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41 年	乾隆六年	七月，户部宝泉局铸钱工匠因炉头克扣工钱全体罢工，乾隆令将为首者董光荣从重治罪。十一月，谕修《律吕正义》后编。清廷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共计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零一千五百五十九人。
1742 年	乾隆七年	四月，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将新刻成的《丹珠尔经》与《甘珠尔经》放置那塘寺，称之为那塘版《大藏经》。
1743 年	乾隆八年	九月，规定洋船带米，蠲免该商船入口关税。
1744 年	乾隆九年	一月，严禁兵民结盟。十月，清廷批准在广东开矿，放宽矿禁。雍和宫改建为喇嘛庙，达赖七世奉乾隆之命选派西藏喇嘛孔仓为雍和宫住持。
1745 年	乾隆十年	六月初六，宣布普免乾隆十一年钱粮。粤海关开始实行"保商制度"，每艘外国商船入港后，均需有一名行商作保，进出口关税由担保商人负责代纳，进出口货物也需由担保商人确定价格。七月，清廷发兵进剿瞻对土司。瞻对位于四川西部，打箭炉口外，为进藏必经之路。该土司恃地势险要，屡屡抢劫过往兵丁的行李、银两。此次用兵，历时近一年，调兵万余，动帑百万。
1746 年	乾隆十一年	六月，密饬各督抚查办天主教，十一月谕将在福建福安传教的西洋传教士白多禄处斩立决，传教士华若亚敬、费若望、施方济格、德方济处斩监候。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47 年	乾隆十二年	正月，令续修《大清会典》。正月十三，固原营兵因操练过严，迟发粮饷而哗变，大掠铺户，谋杀提督许仕盛未遂。乾隆令将为首重犯正法，未几亦将提督革职。三月十九，清军进剿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此战历时两年，前后调军七万，拨饷九百万两，而大金川，纵不过三百里，横只数十里，番民不及一万。
1748 年	乾隆十三年	三月，清廷下达严禁邪教的命令，"一有访闻，即行擒捕"。五月初六，从严制定聚众抗官条例：聚众殴官至四十人以上，为首斩立决，枭示；同谋者斩立决；胁从者绞监候；被迫同行者杖一百。七月初七，清廷令在江苏传教的传教士谈方济（意大利人）、黄安多（葡萄牙人）"瘐毙"，即在狱中秘密处死，以"在监病故"上报。九月初六，密谕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把华若亚敬、费若望、德方济格、施方济格在狱中秘密处死，以"瘐毙"奏闻。
1749 年	乾隆十四年	六月，乾隆《御制诗初集》刊行，该诗集辑录了从乾隆元年至十二年的诗作。为加强对澳门的管理，清廷颁布《澳门善后事宜》十二条，用中、葡两国文字立石刊刻，其内容有：驱逐匪类；稽查船只；严禁赊物收贷、私擅凌虐、擅兴土木、贩卖人口、行窃、窝娼藏匪、私出澳门等等。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51 年	乾隆十六年	正月，乾隆首次南巡。八月，云贵总督硕色密奏：伪《孙嘉淦奏稿》"抄录传播"，该奏稿以"五不解十大过"为名，历数乾隆即位以来施政的种种过失。乾隆谕令追查伪奏稿的作者及传播者，直至十八年三月经过一年零七个月的追查才得结案。该案波及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省。
1752 年	乾隆十七年	四月，马朝柱聚众罗田县山内，制造兵器欲起事，被清廷察觉，马朝柱远逃，抓获同犯二百余名。
1753 年	乾隆十八年	六月，精神失常的文人丁文彬（浙江上虞人）因所著《文武记》、《太公传》、《时宪书》有"大夏"、"大明"年号被凌迟处死。
1754 年	乾隆十九年	三月，宣布《水浒传》为禁书。七月，准噶尔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因被准部首领达瓦齐击败而降清。
1755 年	乾隆二十年	二月，清军兵分两路讨伐准噶尔达瓦齐，阿睦尔撒纳从征。四月，原内阁学士、学政胡中藻因所著《坚磨生诗钞》被处斩立决，曾与胡中藻唱和的原甘肃巡抚鄂昌亦被赐自尽。五月，清军克伊犁。六月十一，因准噶尔入版图，清廷令何国宗等同传教士傅作霖、高慎思前往该地勘测，绘制地图。八月，阿睦尔撒纳在清军主力撤后发动叛乱。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56年	乾隆二十一年	四月，“似类疯颠”的刘德照，因在所居墙洞内粘有“兴汉兴明”、“削发拧绳”等字帖被凌迟处死，乾隆特为此案颁布“不得坐以疯颠，曲为原解”的谕令。
1757年	乾隆二十二年	正月，乾隆第二次南巡。六月，阿睦尔撒纳一再被清军击败，逃往俄国，被安置在托博尔斯克，该年八月二十死于天花。十一月初十，乾隆降旨限定广州一口为对外通商口岸。
1758年	乾隆二十三年	八月，清军攻占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
1759年	乾隆二十四年	闰六月，占据叶尔羌的小和卓霍集占与占据喀什噶尔的大和卓布拉尼敦弃城出逃。彼等在逃往巴达克山后被当地人杀死。
1760年	乾隆二十五年	二月，清军开始在伊犁屯田。六月十二，传谕满洲、蒙古不可效法汉人弃用本姓。在洋行内设立专门对欧洲、西洋贸易的“公行”，设“本港行”专管对南洋贸易。
1761年	乾隆二十六年	福建漳浦和尚提喜（又名涂喜、洪二和尚）创建天地会，取“人生以天地为本”之意。甘肃疯颠之人王献璧将书词投入学政轿内，被凌迟处死。
1762年	乾隆二十七年	正月，乾隆第三次南巡，前往浙江海宁视察海塘工程。人口统计全国达二亿零四十七万二千四百六十一人，突破二亿。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63 年	乾隆二十八年	正月初二，谕令在伊犁重建喇嘛庙。准噶尔原在伊犁河北建有喇嘛寺，毁于阿睦尔撒纳之乱。新喇嘛庙建好后，从北京选派大喇嘛前往伊犁教训准噶尔喇嘛。十月，因接连发生疯汉文字狱，湖南按察使建议应将此类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防止其任意胡写。
1765 年	乾隆三十年	正月，乾隆第四次南巡。二月十四，因驻乌什大臣素诚科派扰民，乌什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暴虐激变。八月十五清军攻克乌什。五月十三，驻和田总兵和诚因勒索金钱衣物、重利盘剥维吾尔人被处决示众。
1766 年	乾隆三十一年	正月，下令普免全国漕粮。九月，清廷对屡次骚扰边界的缅甸宣战，此战持续五年。
1770 年	乾隆三十五年	正月，第二次普免全国钱粮。
1771 年	乾隆三十六年	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莎罗奔之孙）诱杀革布什札土司，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攻伐鄂克什、明正土司，并进攻清军，第二次金川之战爆发。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与索诺木合兵一处。九月，土尔扈特部在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冲破沙俄军队的围追堵截，重返祖国。
1773 年	乾隆三十八年	六月，清军攻克小金川，尽毁碉寨。设立四库馆。年底，乾隆密立皇十五子为皇太子，立储密旨两份，一份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之后，一份藏在皇帝随身携带的小匣内。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74 年	乾隆三十九年	八月，为修四库全书，谕令天下进献书籍。九月初，清水教教主王伦在山东寿张起事，仅二十余天，清廷即平定此次事变。
1775 年	乾隆四十年	清军进攻大金川，正月攻克康尔萨山梁，二月克甲尔纳、斯莫斯达等碉寨，五月克巴木通、茹寨、甲索等处碉寨，七月攻克昆色尔山梁及章噶、直古脑一带碉寨，八月攻克隆斯寨，索诺木等逃至刮耳崖。四月，清廷在河南破获“混元教”。
1776 年	乾隆四十一年	正月，清军在攻克喇乌喇碉堡及舍齐等寺后进攻喇噶伊。索诺木之母、姑及姐妹等出降，二月，索诺木降，持续五年的第二次金川之战结束。
1777 年	乾隆四十二年	十一月，甘肃河州王伏林自称弥勒转世，聚众二千，以白布为号，抗拒官府，一个月后被清军平定。
1778 年	乾隆四十三年	正月，恢复多尔衮睿亲王封爵。九月，驻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已故慧贤皇贵妃高佳氏之侄）因私役维民上山采玉，牟取暴利，被处死。第三次普免全国钱粮。
1780 年	乾隆四十五年	正月，乾隆第五次南巡。正月，第二次普免全国漕粮。八月十三，乾隆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颁布《御制古稀说》。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81 年	乾隆四十六年	三月，甘肃爆发苏四十三领导的回民起义。四月，乾隆从镇压苏四十三起义的奏报中得知清军在进入甘肃后遇雨受阻，遂以此为线索追查出该省官员通同作弊、假报旱灾、连续七年侵吞捐监银的特大贪污案，该省督抚布按以及州县官员共一百零二人均受到严惩，共有五十六名官员被处死，四十六名官员被发配。
1782 年	乾隆四十七年	正月十八，建盛京文渊阁。正月十九，《四库全书》修成。九月初二，建浙江文澜阁。
1784 年	乾隆四十九年	正月，乾隆第六次南巡。五月，甘肃爆发田五等所领导的石峰堡回民起义。
1785 年	乾隆五十年	四月，孙贵远在湖北枣阳复兴收元教被拿获。五月，河南柘城贫民因旱灾严重，借粮无门，抢劫当地富户。乾隆在对此案的批覆中令河南巡抚毕沅“密行剀切晓谕各地富户，令其稍存周恤，毋得囤积居奇，以致激而成事”。
1786 年	乾隆五十一年	七月，八卦教在直隶大名暴动，杀死大名道官员。十一月，林爽文领导天地会在台湾彰化起事，五十三年正月此次起义才被镇压下去。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88年	乾隆五十三年	六月，安南发生内乱，权臣阮惠推翻黎氏王朝。两广总督孙士毅、广西提督许世亨等在奉命率清军于十月二十八出镇南关，直捣黎城，击溃阮惠，帮助黎维祁复辟黎氏王朝。七月，廓尔喀（即今尼泊尔）派兵侵占西藏的聂拉木、宗噶、济陇等地。乾隆派御前侍卫、理藩院侍郎巴忠统兵入藏援助。巴忠擅自同意西藏地方政府以交纳银三百锭换取廓尔喀从聂拉木、宗噶、济咙等地撤军的做法。
1789年	乾隆五十四年	正月初一夜镇守黎城的孙士毅所率领的清军遭到阮惠军队的突袭，清军大败。为防阮军追袭，孙士毅在渡富良江后，即令兵士砍断浮桥，致使提督许世亨等所率万余清军无法渡江，被阮兵生擒、杀害。黎维祁等再次逃至民间。六月二十二日，乾隆在避暑山庄册封阮惠为安南王（阮惠三次派人向清廷乞降）。
1790年	乾隆五十五年	正月，乾隆第四次普免全国钱粮。
1791年	乾隆五十六年	七月，廓尔喀再次出兵占领聂拉木等地，八月兵进日喀则的扎布伦布，肆行劫掠扎布伦布寺内金银佛像、金塔顶及镶嵌在宝塔上的绿松石、珊瑚。九月，乾隆任命福康安为大将军，令其统兵入藏，抗击廓尔喀入侵军。
1792年	乾隆五十七年	五月，清军在收复聂拉木等地后，深入廓尔喀境追击逃窜的入侵者。八月廓尔喀国王拉特纳巴都尔向清军投降。八月制定金奔巴瓶抽签制。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93 年	乾隆五十八年	秋季，举行“归政”恩科乡试。八月，乾隆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马戛尔尼使团。马戛尔尼使团要求在广州之外开辟舟山、宁波、天津等地为通商口岸；要求清廷割让舟山、广州附近的小岛或土地给英国，作为英商贮存货物；要求清廷对英商减免关税；允许英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英使团的侵略要求，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1794 年	乾隆五十九年	正月，普免全国漕粮。春季，举行“归政”恩科会试。七月，四川拿获白莲教徒谢添绣、肖太和等，清廷遂以此为线索在湖北、陕西、河南等省缉拿白莲教徒。年底，蠲免各省历年拖欠在民的钱粮，共计白银一千七百万两，粮三百七十五万石。
1795 年	乾隆六十年	正月，贵州爆发苗民起义，起义坚持两年，为镇压此次起义，清廷调动军队六七万。九月十三，乾隆在勤政殿向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宣布建储密旨：立皇十五子永琰为皇太子，并决定在翌年元旦举行传位大典，追赠永琰生母为孝仪皇后。
1796 年	嘉庆元年	正月初一，在太和殿举行传位大典，乾隆帝把“皇帝之宝”授予皇太子，自称太上皇。正月十一，白莲教首先在湖北枝江县起事，湖北、四川、陕西等地纷纷响应。太上皇乾隆下达普免钱粮之令。六月，枝江起事的白莲教首领聂杰人、张正谟先后被清军拿获。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797 年	嘉庆二年	正月，在镇压贵州苗民起义之后，清廷令留两万军队驻守苗疆，其余军队开至湖北、四川镇压白莲教。清地方官员组织乡勇对付白莲教起义。
1798 年	嘉庆三年	三月，王聪儿、姚之富所率义军被清军歼灭。八月，义军首领王三槐在去清营谈判时被生擒。
1799 年	嘉庆四年	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因偶感风寒逝于养心殿，终年八十九岁。正月十一，诏逮和珅，公布和珅二十大罪状，十八日赐和珅自尽。二月，纂修《高宗纯皇帝实录》。二月二十四，谕令释放乾隆年间文字狱案中受株连的人（徐述夔、王锡侯等人子孙）。嘉庆帝令各地建立堡寨、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围剿白莲教。
1800 年	嘉庆五年	六月，白莲教首领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清地方官员抓获。
1801 年	嘉庆六年	正月，颁御制《邪教说》，明确提出对白莲教，“在朝政之所不禁”，“五年以来所办理者一叛逆大案也，非欲除邪教也”。二月，悬赏捉拿徐天德、王廷诏、樊人杰、冉学胜、苟文明等义军首领。五月初一，在海上谋生的蔡牵等攻下厦门海口。蔡牵等纵横浙、闽、粤三省海面，多次与清军交战，直至嘉庆十五年才被清军消灭。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1803年	嘉庆八年	正月，将嘉庆帝元年至八年的诗作汇成御制诗初集刊刻。闰二月二十日，嘉庆帝在神武门内遇一持刀刺客。此人名陈德，从神武门内西厢房南山墙后冲出，乾清门侍卫、公丹巴多尔济均被陈德扎伤。二十四日将陈德凌迟处死，陈德长子禄儿年十五，次子对儿年十三，均被处以绞刑（按照清律，十五岁以下者给功臣家为奴）。
1804年	嘉庆九年	九月，苟文润所领导的一支义军被清军击溃，持续九年的白莲教起义最终陷于失败。
1807年	嘉庆十二年	英国“海王星号”水手在广州酗酒行凶，打伤居民数人（一人伤重身亡）。
1808年	嘉庆十三年	七月，英军在澳门登陆，占据三巴寺、龙嵩庙、东西炮台。两广总督吴熊光要求英军撤出澳门，遭到拒绝，遂下令封舱，断绝同英贸易。英军船闯至黄埔，在广州登陆。因当时英正同法交战，无力远征，才于十一月从广州撤出兵船。
1809年	嘉庆十四年	广州工人黄亚胜被英国水手刺死，英拒绝交出凶手。
1813年	嘉庆十八年	七月，重申严禁贩运、吸食鸦片。九月初七，天理教首李文成在河南滑县发动暴动。九月十七，天理教徒在太监的接应下攻入东华门、西华门内。十二月，陕西岐山县三才峡木工因失业乏粮举行起义。
1816年	嘉庆二十一年	闰六月初八，英阿美士德使团抵京后，因礼节问题与清廷意见不一，被清廷逐出北京。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19年	嘉庆二十四年	七月，永定河决口三百余丈，宛平、大兴两县被淹。八月，黄河在仪封、兰阳决口。九月，黄河北岸决口。
1820年	嘉庆二十五年	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病逝。装有立储密旨的金匣，自嘉庆十八年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后，为防意外就由嘉庆帝携带身上，嘉庆帝突然去世，他人未能找到金匣。嘉庆皇后钮祜禄氏在二十七日下达由皇次子智亲王旻宁即位的懿令。皇后下令后，陪同嘉庆去避暑山庄的大臣亦从一小太监处找到金匣，当众砸开，取出嘉庆帝在嘉庆四年四月初十所书写的立皇二子旻宁为皇太子的密旨。
1821年	道光元年	重申禁止鸦片走私。英水手在广东新安县南蛇塘村开枪打死村民二人，打伤四人，凶手逃走。
1826年	道光六年	张格尔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和田等地发动叛乱。
1831年	道光十一年	该年底湖南、广东瑶民起义，持续七个月。
1832年	道光十二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阿美士德”号船，在中国沿海进行长达六个月的侦察，测量宁波、上海、登州一带的水道、海湾，绘制航海图。
1833年	道光十三年	英国国会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垄断权。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34 年	道光十四年	英国派遣律劳卑为驻广州商务监督，律劳卑于七月抵广州。两广总督卢坤令律劳卑回澳门，按以往惯例办事，律劳卑拒绝离开广州，清廷停止对英贸易。律劳卑召集两艘英国军舰闯入虎门、开至黄埔。清廷令将士把石块沉入河底阻止英国军舰。在清政府同意恢复贸易之后，英舰撤退。
1838 年	道光十八年	闰四月初十（6 月 2 日），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吸食鸦片。八月初二（9 月 20 日），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支持严禁主张。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31 日），清政府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1839 年	道光十九年	正月二十五日（3 月 10 日），林则徐抵广州。四月二十二日（6 月 3 日），林则徐开始在虎门海滩销毁收缴之鸦片，五月十五日（25 日）告竣。八月二十四日（10 月 1 日），英国内阁会议决定派兵侵略中国。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40年	道光二十年	十九年十二月一日（1月5日），林则徐奉旨在广州正式封港，断绝中英贸易。同日清廷命林则徐为两广总督，邓廷桢为两江总督。二十二日（26日）又调邓为闽浙总督。五月二十九日（6月28日），英舰封锁广州，鸦片战争开始。六月初二（6月30日），侵华英军总司令乔治·懿律率大部分舰队起航北犯。六月初七（7月5日），英军攻陷浙江定海。七月十四日（8月11日），英舰队抵白河口，投递英相巴麦尊致清政府照会，以武力要挟谈判。八月二十日（9月15日），懿律率舰队返粤。八月二十二日（9月7日），清廷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谈判。九月八日（10月3日），诏革林则徐、邓廷桢职。十一月六日（11月29日），琦善抵广州，撤除广州防务。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
1841年	道光二十一年	正月初五（1月27日），清廷对英宣战。八日派皇侄御前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赴粤督战。二月初六（2月26日），英军攻陷虎门炮台，水师提督关天培战死。四月初七（5月27日），奕山向英军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四月十日—十一日（5月30—31日），广州北郊三元里103村农民严惩英国侵略军。七月五日（8月21日），英侵华全权代表璞鼎查率舰队北犯，七月十日攻陷厦门，八月十七日再次陷定海，二十六日陷镇海，二十九日陷宁波。九月四日（10月18日）清廷命吏部尚书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江主持军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42年	道光二十二年	正月二十九日（3月10日），是夜奕经率军反攻定海、镇海、宁波失利，英军占慈溪。正月三十日（3月11日），台湾军民歼英船于大安港。四月九日（5月18日），英军攻陷乍浦，五月八日攻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力战牺牲。六月十四日（7月21日），英军大举进犯镇江，遭到清军的顽强抗击。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九月（10月），魏源《海国图志》五十卷完成；道光二十七年扩编为六十卷刊行，咸丰二年又增辑为一百卷。
1843年	道光二十三年	六月（7月），洪秀全在广东花县创立拜上帝会。六月二十五日（7月22日），《中英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八月十五日（10月8日），《虎门条约》签订。
1844年	道光二十四年	五月十八日（7月3日），中美《望厦条约》签订。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1845年	道光二十五年	十一月初一（11月29日），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订立《上海租地章程》，是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租界的开始。
1846年	道光二十六年	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1846年1月13日），广州人民捣毁广州府署，反对准许英人进广州城。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47 年	道光二十七年	七月（8 月），洪秀全到广西桂平紫荆山与冯云山会晤，设立拜上帝会机关，制定各种仪式及《十款天条》。
1848 年	道光二十八年	三月三日（4 月 6 日），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号令会众坚持斗争。九月九日（10 月 5 日），萧朝贵假托天兄救世主耶稣下凡。
1849 年	道光二十九年	一月（2 月），英国香港总督文翰带兵强入广州城，广州社学率众十万余人反对，文翰被迫放弃入城要求。四月三日（4 月 25 日），澳门葡萄牙官员驱逐澳门同知，封闭海关，停付自 16 世纪以来按年交纳的租金，并于是年霸占澳门。
1850 年	道光三十年	一月十四日（2 月 25 日），清宣宗道光帝旻宁死，四子奕詝立为皇太子。二十六日（3 月 9 日），奕詝继位，是为文宗显皇帝，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六月（7 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动员拜上帝会众齐集广西桂平县金田村。
1851 年	咸丰元年 太平天国辛亥元年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日（1851 年 1 月 11 日），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闰八月一日（9 月 25 日），太平军克永安州城（今蒙山县），太平天国在此封王建制。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52 年	咸丰二年 太平天国壬子二年	二月十六日（4 月 5 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四月十六日破全州，二十三日冯云山遇伏牺牲；二十五日占湖南道州；七月二十八日攻长沙不下，萧朝贵中炮牺牲。十月一日（11 月 12 日），捻党张洛行起义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十一月三日（12 月 13 日），太平军攻破岳州，十三日占汉阳。十一月二十九日（1853 年 1 月 8 日），清廷命湖南湘乡因母丧在籍侍郎曾国藩帮同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
1853 年	咸丰三年 太平天国癸丑三年	太平军于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1853 年 1 月 12 日）攻克武昌，三年一月十一日克九江，十七日克安庆，二月十日（3 月 19 日）占南京，二十日建都南京，改名天京。清军在天京城东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不久又在扬州建立江北大营，包围天京。三月二十日（4 月 27 日），英使文翰访问天京。四月一日（5 月 8 日），太平天国派地官丞相李开芳、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率军二万余人自扬州北伐；四月十二日（5 月 19 日）又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殿左一检点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等统帅战船千余艘，溯江西征。四月十日（5 月 17 日），福建小刀会起义，先后攻占海澄、漳州、厦门、同安。八月五日（9 月 7 日），上海小刀会刘丽川等起义，占领上海县城。九月（10 月），清帮办江北军务雷以诚在扬州仙女庙等处创行厘金，是为厘金制度之始。冬，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54年	咸丰四年 太平天国甲寅四年	正月七日（2月4日），太平天国派夏官正丞相黄生才、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等率北伐援军自安庆北上。正月十九日（2月16日），西征军三占汉阳、汉口、围攻武昌。正月二十八日（2月25日），曾国藩率湘军一万七千余人自衡州（今湖南衡阳）起程，会师湘潭，发布《讨粤匪檄》。六月二日（6月26日），西征军第二次攻克武昌。六月五日（6月29日），苏松太道吴健彰与驻沪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上海海关组织协定九款，据此英、美、法三国于六月十八日组成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共同控制上海海关。六月十一日（7月5日），广东天地会首领陈开在佛山起义，李文茂等起而响应。起义群众头裹红巾，自称红兵，世称红巾军。八月十八日（10月9日），广西天地会胡有禄、朱洪英起军攻占灌阳，建号“升平天国”。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军攻占武昌、汉阳。十二月二十五日（1855年2月11日），石达开、罗大纲等率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湘军水师，曾国藩遁走。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55 年	咸丰五年 太平天国乙卯五年	正月一日（2 月 17 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失败，刘丽川牺牲。正月十九日（3 月 7 日），僧格林沁督清军攻陷东光连镇，北伐军主将林凤祥在突围中受伤被俘，二十七日在北京英勇就义。二十九日李开芳率孤军 800 人从高唐州突围，占茌平冯官屯。二月十七日（4 月 3 日），西征军三占武昌。三月十五日（4 月 30 日），张秀眉等在贵州台拱领导苗民起义。四月十六日（5 月 31 日），冯官屯陷落，太平军北伐失败。六、七月（7、8 月），各路捻军会集安徽蒙城雉河集，推张乐行为盟主，建五旗军制。八月十七日（9 月 27 日），陈开、李文茂率部攻占广西浔州，改名秀京，建大成国。十月二日（11 月 11 日），贵州红号徐廷杰等起义。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56年	咸丰六年 太平天国丙辰六年	正月二十四日（2月29日），广西西林知县拿获于咸丰三年违约潜入之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予以正法。二月二十八日（4月3日），太平军攻破清江北大营。四月七日（5月10日），彝族雇农李文学于云南弥度县瓦卢村聚众起义，哀牢山一带彝、汉、苗、回等族群众咸起响应，声势大振。四月二十九（6月1日）太平军大破江苏巡抚吉尔抗阿所部，吉尔抗阿自杀。五月十八日（6月20日），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八月四日（9月2日），韦昌辉杀杨秀清，天京变乱由此开始。八月十八日（9月16日），云南杜文秀率领之回民起义军攻占大理，各地回民纷起响应。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派兵突入广东省河，相继占据沿江炮台，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9日），清军攻陷武昌、汉阳。
1857年	咸丰七年 太平天国丁巳七年	五月十一日（6月2日），石达开离天京，与洪秀全分裂。十一月十四日（12月29日），英法联军攻陷广州。二十五日在英法三人委员会监督下，成立以广东巡抚柏贵为头子的傀儡政权。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58 年	咸丰八年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	四月八日（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四月十六日（5月28日），沙俄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五月三日（6月13日），中俄《天津条约》签订。接着于八日、十六日、十七日相继签订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八月二十日（9月26日），陈玉成、李秀成率军再破江北大营，次年二月五日清政府正式撤销江北大营。十月三日（11月8日），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十九日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
1859 年	咸丰九年 太平天国己未九年	三月二十日（4月22日），洪秀全族弟洪仁玕自香港抵天京辅政，四月九日封干王。是年冬，太平天国颁布洪仁玕所著《资政新篇》。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英法联军再犯大沽，为清军击败。是年夏，李永和、蓝朝鼎于云南昭通起义。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60年	咸丰十年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	闰三月十六日（5月6日），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接着东占苏州、常州，建苏福省。六月十五日（8月1日），英法联军侵占北塘；七月五日占大沽炮台，八日占天津。六月三十日（8月16日），太平军进向上海，占泗泾，七月二日占徐家汇，进逼上海西、南两门。美国人华尔组织“洋枪队”协助清军阻止太平军进攻。七月五日李秀成从上海撤兵。八月四日（9月18日），英法联军侵占通州。七月清军败于八里桥，清廷命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求和，八日咸丰帝从圆明园逃往热河。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英法联军侵入北京，九月三日英使额尔金下令焚毁圆明园。九月十一日、十二日、十月二日，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先后签订。
1861年	咸丰十一年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	十年十二月十日（1月20日），天津开埠。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二月十一日（1月21日），总理衙门任命英人李泰国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二月十五日（3月25日），外国公使始驻节北京。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咸丰帝死于热河，子载淳嗣位。八月一日（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九月三十日（11月2日），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䜣合谋发动北京政变，夺取了最高统治权。本年底，曾国藩在安庆建中国第一所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十二月八日（1862年1月7日），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62 年	同治元年 太平天国壬戌 十二年	三月十日（4 月 8 日），李鸿章率淮军先头部队 2000 人到达上海。四月四日全军 7000 人抵沪。三月十九日（4 月 17 日），陕西任武率回民起义于渭南。五月八日（6 月 4 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就义。七月二十九日（8 月 24 日），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培养翻译人员。
1863 年	同治二年 太平天国癸亥 十三年	二月一日（3 月 19 日），清军攻陷雉河集。二月五日捻军首领张乐行被俘死难。四月二十七日（6 月 13 日），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兵败自投清营，五月十日在成都被杀。十月五日（11 月 15 日），英人赫德继李泰国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
1864 年	同治三年 太平天国甲子 十四年	四月二十七日（6 月 1 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病逝。六月十二日（7 月 15 日），新疆回民推妥明为大元帅，于乌桓举事反清。六月十六日（7 月 19 日），天京为清军攻陷，太平天国失败。九月七日（10 月 7 日），《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十月（11 月），捻军和赖文光部太平军结合，举赖文光为领袖，继续同清军作斗争。十二月初（1865 年 1 月初），中亚浩罕汗国阿古柏侵入新疆。
1865 年	同治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5 月 18 日），捻军在山东曹州（今菏泽）高楼寨全歼僧格林沁军。清廷于四月二十九日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督湘、淮军赴山东攻捻。八月一日（9 月 20 日），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总局。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1866年	同治五年	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2月7日），清军攻陷广东嘉应州，长江以南太平军余部最后失败。六月三日（7月14日），福州船政局设立。九月十二日（10月20日），捻军在河南陈留、杞县分为两支，赖文光、任化邦率军攻山东，是为东捻军；张宗禹等率部进军陕西，是为西捻军。十月六日（11月12日），孙中山诞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
1867年	同治六年	一月八日（2月22日），清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四月二十六日（5月29日），天津机器局开工。五月十八日（6月1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台湾琅玡登陆，被高山族人民击退。十月二十六日（11月21日），清政府派美国卸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出使大臣。本年，阿古柏建立“哲德沙尔国”，自称为汗。
1868年	同治七年	六年十二月十一日（1月5日），东捻军败于扬州瓦窑铺，遵王赖文光被俘，十六日英勇就义。六月九日（7月28日），蒲安臣与美国擅订《中美续增条约》。六月二十八日（8月16日），西捻军败于山东茌平徒骇河，全军覆没。
1869年	同治八年	八月十九日（9月24日），英、俄、德、美、法公使与清政府订立《上海公共租界土地章程》。本年，方举赞创办的上海发昌厂开始使用车床，转化为近代企业，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70年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6月21日），天津发生大规模反洋教斗争。
1871年	同治十年	五月十七日（7月4日），俄军侵占伊犁。
1872年	同治十一年	七月八日（8月11日），清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出洋。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23日），李鸿章奏设轮船招商局，次年正式成立。
1873年	同治十二年	十一月五日（12月24日），刘永福督黑旗军与法军战于河内，杀安邺。本年，侨商陈启源于广东南海开设继昌隆缫丝厂。
1874年	同治十三年	三月二十三日（5月8日），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琅玡登陆。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中日议定《台事专约三款》及凭单。
1875年	光绪元年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年1月12日），同治帝载淳死，立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继位，改元光绪。八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宣告中外。一月十六日（2月21日），英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带领英国武装探路队从缅甸侵入云南，在腾越厅被当地群众杀死。二月十二日英使威妥玛借端向总理衙门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三月二十八日（5月3日），清廷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1876年	光绪二年	闰五月二十九日（7月20日），清军克复乌鲁木齐。七月二十六日（9月13日），李鸿章与英使威妥玛订立《烟台条约》。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77 年	光绪三年	春，清军进入南疆，四月十日（5 月 22 日）阿古柏在库尔勒服毒自杀。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 年 1 月 2 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清军收复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国土。
1878 年	光绪四年	六月二十五日（7 月 24 日），开平矿务局在直隶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七月二十三日（8 月 21 日），左宗棠在兰州筹设织呢局。
1879 年	光绪五年	三月八日（3 月 30 日），日本侵占琉球，改置为冲绳县。八月十七日（10 月 2 日），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吉亚条约》。
1880 年	光绪六年	清政府允准李鸿章奏设南北洋电报，架设天津上海间电报线。
1881 年	光绪七年	正月二十六日（2 月 24 日），曾纪泽在彼得堡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即《中俄改订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五月十三日（6 月 9 日），唐山至胥各庄运煤铁路建成，是为中国自办最早的铁路。
1882 年	光绪八年	三月六日（4 月 23 日），李鸿章奏请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
1883 年	光绪九年	四月十三日（5 月 19 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距河内城西二里怀德府的纸桥，大败法军，击毙北圻法军司令李维业。七月二十三日（8 月 25 日），法越签订《顺化条约》。十一月十七日（12 月 16 日），孤拔率法军进攻由黑旗军和滇、桂军协防的越南山西，中法战争爆发。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84 年	光绪十年	二月十五日（3月12日），法军陷越南北宁。七月三日（8月23日），法舰突袭马尾军港的中国福建水师。九月三十日（11月17日），新疆改建行省。
1885 年	光绪十一年	正月九日（2月23日），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二月八日（3月24日），帮办广西军务冯子材率清军，大破法军于镇南关关前隘，乘胜于十一日收复文渊洲，十三日收复谅山。与镇南关大捷同时，刘永福等部收复临洮等地。三月四日（4月18日），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订立中日《天津会议专条》。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九月五日（10月12日），台湾改建行省。九月六日（10月13日），清政府设海军衙门。
1886 年	光绪十二年	三月二十二日（4月25日），中法订立《越南边界通商章程》。六月二十三日（7月24日），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英前署驻华公使欧格纳签订《中英缅甸条约》。
1887 年	光绪十三年	三月二日（3月26日），赫德派金登干在葡京里斯本与葡国议定《中葡草约》(《里斯本议定书》)，中国割澳门以及澳属之地与葡。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88 年	光绪十四年	二月八日——十日（3 月 20 日—22 日），英军进犯西藏隆吐山隘口，爱国军民奋起抵抗。十月二十七日（11 月 30 日），康有为第一次向光绪帝上书请求变法，未达。十一月十五日（12 月 17 日），北洋海军建成。
1889 年	光绪十五年	二月三日（3 月 4 日），光绪帝亲政。八月一日（8 月 26 日），清政府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筹办芦汉铁路。
1890 年	光绪十六年	二月二十七日（3 月 17 日），清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印度总督兰斯顿在加尔各答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六月二十三日（8 月 8 日），四川大足县余栋臣等反洋教，率众起义。
1891 年	光绪十七年	七月（8 月），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刊行。十月十日（11 月 11 日），热河金丹道起义。
1892 年	光绪十八年	二月十五日（3 月 13 日），杨衢云、谢缵泰在香港设立辅仁文社。闰六月（7 月），沙俄出兵帕米尔地区，违约强占我萨雷阔勒岭以西领土二万多平方公里。十月二日（11 月 20 日），张之洞创办之武昌湖北织布局开工。
1893 年	光绪十九年	九月二十日（10 月 29 日），张之洞奏报汉阳铁厂全厂告成。十月二十八日（12 月 5 日），《藏印续约》签订。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94年	光绪二十年	正月三日（2月8日），朝鲜东学党在全罗道古阜郡起义。二月十一日（3月17日），清驻美公使杨儒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在华盛顿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五月一日（6月4日），应朝鲜政府请求，李鸿章派淮军将领、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部二千余人赴朝。六日，日军先遣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日军不宣而战，日海军在牙山口外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同时出动陆军进攻驻牙山附近成欢驿的清军。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同时宣战。八月十六日（9月15日），日军进攻平壤，清军溃败，总兵左宝贵壮烈牺牲。八月十八日（9月17日），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在黄海激战，双方损失皆重，北洋舰队退往旅顺。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由安平河口渡鸭绿江侵入辽东，二十八日侵占九连城、安东。十月十日，日军侵占大连，二十五日侵占旅顺。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十一月十七日（12月13日），日军占海城，二十三日占复州，十二月十四日陷盖平。本年，唐山至山海关铁路建成。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事
1895年	光绪二十一年	正月十八日（2月12日），威海卫失守，北洋海军覆灭。正月二十七日（2月27日），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二月八日（3月4日），日军攻占牛庄，十一日占营口，十三日占田庄台。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俄、德、法驻日公使照会日本，“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九月十三日，三国和日本在东京成立协定。十月四日，李鸿章和林董签订交收辽南条约及专约。四月八日（5月2日），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签名上书，请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五月五日（5月28日），日军分两路进攻台湾，从此，台湾爱国军民掀起武装反抗斗争，直至九月四日台南陷落。闰五月十四日（7月6日），《中俄四厘借款合同》签订，该借款为俄、法合借，故称“俄法借款”。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自第四十六期起改名《中外纪闻》。随后强学会在北京成立。九月十日（10月27日），兴中会谋广州起义，事泄失败。十月二十二日（12月8日），温处道袁世凯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建陆军。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96 年	光绪二十二年	二月十日（3 月 23 日），《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签订。四月二十二日（6 月 3 日），《中俄密约》在莫斯科签订。七月一日（8 月 9 日），黄遵宪、梁启超等在上海所办《时务报》发刊。八月二日（9 月 8 日），《东省铁路公司合同》订立。
1897 年	光绪二十三年	正月三日（2 月 4 日），中英订立《西江通商专约》及《滇缅重定界约专条》。二月十三日（3 月 15 日），法国迫清政府声明永不将海南岛及对岸琼州（雷州半岛）割让予他国。三月二十一日（4 月 22 日），《湘学报》创刊。六月二十八日（7 月 27 日），《芦汉铁路借款合同》正式签订。十月一日（10 月 26 日），天津《国闻报》创刊。十月二十日（11 月 14 日），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湾。本月，长沙创立时务学堂。十一月二十二日（12 月 15 日），沙俄海军强占旅顺。冬，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刊行。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	正月八日（1月29日），康有为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正月十四日（2月4日），清政府对内发行“昭信股票”，预计发行一亿两，实际发行两千万两。正月二十一日（2月11日），英迫使清政府声明不将长江流域沿岸各省割让或租押他国。二月一日（2月21日），南学会于长沙成立。二月九日（3月1日），《英德续借款合同》订立。二月十四日（3月6日），《胶澳租界条约》订立。三月六日（3月27日），《旅大租地条约》订立。三月二十日（4月10日），法国迫使清政府应允两广、云南不割让给他国。三月二十二日（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闰三月四日（4月24日），日本迫使清政府声明福建不割让予他国。四月二十一日（6月9日），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变法。从这天开始，陆续颁布一系列变法命令，到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历时103天，史称“百日维新”。五月十三日（7月1日），四川大足余栋臣再次起义。同日，中英签订《订租威海卫专条》。八月六日（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重新“训政”。八月七日（9月22日），梁启超自塘沽起程逃往日本。八月十三日（9月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九月（10月），梅花拳首领赵三多与阎书勤在山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东冠县梨园屯首次公开以义和拳名义发动起义，树“扶清灭洋”旗帜，攻打教堂。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清议报》，鼓吹“斥后保皇”。
1899年	光绪二十五年	二月（3月），山东义和团朱红灯等在恩县、平原一带起义。六月十三日（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保皇会。八月二日（9月6日），美国国务卿海约翰训令驻英、俄、德大使分别向三国致送“门户开放”照会；十月十一日、十五日、十九日向日、意、法发出同样照会。九月五日（10月9日），朱红灯率义和团在平原森罗殿大败清军。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订立。十一月四日（12月6日），应帝国主义要求，清廷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由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二月十四日实授。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皇储），谋废光绪帝。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900 年	光绪二十六年	四月二十四日（5 月 22 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击毙清副将杨福同，接着占涿州，袭击长辛店、芦沟桥车站，五月二日烧毁丰台车站，切断芦保、京津间的铁路和电线。五月四日（5 月 31 日），英、法、美、意、日、俄派侵略军 360 名侵入北京；六日（6 月 2 日）德、奥侵略军 80 名侵入北京，进驻东交民巷各使馆。五月十四日（6 月 10 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八国侵略军二千七百多人，由天津进犯北京，二十二日（18 日）在廊坊车站遭到义和团和董福祥部清军袭击，伤亡惨重，被迫于三十日（26 日）逃回天津。五月二十一日（6 月 17 日），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接着向天津进犯。五月二十五日（6 月 21 日），清政府向各侵略国“宣战”；天津义和团在老龙头火车站和租界抗击八国联军，北京义和团围攻东交民巷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五月三十日（6 月 26 日），在英国等国策动下，上海道余联沅代表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东南各省督抚，与驻沪各国领事商定《中外互保章程》，即所谓“东南互保”。先后参加与附和“东南互保”的还有山东、两广、闽浙、四川等省督抚。六月七日（7 月 3 日），美国再次提出对华“门户开放”原则。六月十八日（7 月 14 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六月二十一日（7 月 17 日），俄军焚掠瑷珲城，制造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并派侵略军大举入侵我国东北，至闰八月八日（10 月 1 日）俄军占盛京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今沈阳)，东北主要城市均为沙俄军队所侵占。七月十五日(8月9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拟于本日起兵勤王，后改期，秦力山未得通知，仍按原计划在大通起义，旋失败。二十七日(8月21日)，湖广总督张之洞勾结英领事，破获自立军机关，次日唐才常等遇害。七月二十日(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次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闰八月十五日(10月8日)，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失败。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布"变法"上谕。
1901年	光绪二十七年	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等十一国公使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902 年	光绪二十八年	正月一日（2 月 8 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三月一日（4 月 8 日），中俄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沙俄军队在 18 个月内分三批撤出东三省。三月十六日（4 月 23 日），景廷宾率众在直隶巨鹿县厦头村率众起义，竖"扫清灭洋"大旗。三月十九日（4 月 26 日），章炳麟等在日本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周年纪念会"。十月十七日（11 月 16 日），中国教育会受南洋公学退学学生请求，在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开办爱国学社。十二月三十日（1903 年 1 月 28 日），洪全福、谢缵泰等预定是日在广州举事，事泄失败。
1903 年	光绪二十九年	正月一日（1 月 29 日），《湖北学生界》在日本东京创刊。各省留日学生旋相继创办《浙江潮》、《江苏》、《四川》、《新湖南》等杂志。四月一日（4 月 27 日），沙俄违约拒不从我国东北撤兵，寓沪各界绅商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三日（29 日）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五百余人集会于锦辉馆，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闰五月五日（6 月 29 日），清政府串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巡捕到《苏报》馆和爱国学社，于本日和次日捕走章炳麟等人，七日（7 月 1 日）邹容自动投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十月（12 月），英军大举入侵西藏。十二月三十日（1904 年 2 月 15 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904 年	光绪三十年	五月二十日（7 月 3 日），武昌科学补习所成立。七月二十八日（9 月 7 日），《拉萨条约》订立。十月十三日（11 月 19 日），光复会在上海成立。
1905 年	光绪三十一年	四月七日（5 月 10 日），上海工商界召开商务总会议决，两月内美国不改虐待华侨苛例，即行抵制美货，全国掀起广泛的反美爱国运动。七月二十日（8 月 20 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举孙中山为总理。八月二十六日（9 月 24 日），吴樾在北京前门车站炸出洋考察宪政之五大臣，炸伤载泽、绍英，吴樾死难。九月四日（10 月 2 日），我国第一条自建铁路——京（北京）张（张家口）铁路开工。十月三十日（11 月 26 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十一月二十六日（12 月 22 日），《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在北京签订。
1906 年	光绪三十二年	正月（2 月），革命团体日知会在武昌成立。四月四日（4 月 27 日），《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在北京签订。七月十三日（9 月 1 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十月十九日（12 月 4 日），萍（乡）、浏（阳）、醴（陵）起义爆发，不久失败。十一月一日（12 月 16 日），国内第一个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	正月一日（2月13日），康有为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四月十一日（5月22日），同盟会发动潮州黄冈起义，十六日失败。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同盟会发动惠州七女湖起义，坚持十余日失败。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光复会员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发动起义，战败被俘牺牲。秋瑾在绍兴准备响应安庆起义，事泄被捕，于六月六日在绍兴英勇就义。七月二十六日（9月3日），同盟会员王和顺等起义于广东钦州王光山，二十八日攻占防城，后败退两广交界处之十万大山。八月一日（9月8日），共进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同盟会发动镇南关起义，十一月五日撤离。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二月二十五日（3月27日），黄兴率越南华侨中同盟会员二百余人，在广西发动钦州马笃山起义，转战钦、廉、上思一带40余日，至四月四日退回安南。四月一日（4月30日），同盟会发动云南河口起义，二十七日失败。八月一日（8月27日），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期，并于二十七日颁布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钦定宪法大纲》。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光绪帝载湉死于瀛台，以溥仪为嗣皇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次日慈禧太后亦死。十一月九日（12月2日），溥仪即位，定明年为宣统元年。十月二十六日（11月19日），熊成基率新军士兵千余人在安庆起义，旋失败。十二月十一日（1909年1月2日），清廷以袁世凯现患"足疾"为名，命其"回籍养疴"。
1909年	宣统元年	九月一日（10月14日），各省谘议局（除新疆外）正式成立并宣告开议。旋16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请求清廷速开国会。十二月六日（11月16日），各省谘议局代表在北京组织"请愿国会代表团"，向清政府发动第一次请愿，遭拒绝。
1910年	宣统二年	正月三日（2月12日），同盟会领导广州新军起义，次日失败，倪映典等牺牲。三月四日—六日（4月13—15日），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四月十三日（5月21日），山东莱阳农民掀起大规模抗捐斗争。五月十日（6月16日），"各省请愿同志会"，发动第二次国会请愿，再遭拒绝。九月十日（10月3日），资政院开院。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国会请愿代表发动第三次请愿，十月三日清政府允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并勒令解散各省请愿代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911年	宣统三年	正月一日（1月30日），文学社在武昌成立。三月二十九日（4月27日），黄兴领导革命党人在广州起义，当日失败，革命志士潘达微将七十二具烈士遗体葬于城郊红花岗，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四月十日（5月8日），清政府组成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四月十一日（5月9日），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四月十六日（5月14日），湖南各界召开万人大会，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四月二十二日（5月20日），清政府与英、德、法、美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出卖已集股兴工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利，遂激起川、鄂、湘、粤四省人民的反对，保路运动蓬勃兴起。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闰六月六日（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七月一日（8月24日），成都召开保路大会，议决全省罢市、罢课、停缴捐税。十五日川督赵尔丰武装镇压保路群众，酝成“成都血案”。次日，保路同志军包围成都，接着各州、县相继起义，全川震动。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次日成立以黎元洪为都督的湖北军政府。九月一日（10月22日），湖南、陕西宣布光复。接着，二日陕西、八日山西、九日云南、十三日上海、十四日贵州、十五日江苏、浙江、十七日广西、十八日安徽、福建、十九日广东、十月二日四川相继光复，建立军政府。九月六日（10月27日），清政府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所有赴鄂海陆军及长江水师俱归其调遣。九月七日（10月28日），黄兴抵武昌，十三日任战时总司令，督师作战。九月十一日（11月1日），“皇族内阁”辞职，清廷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九月十三日（11月3日），清廷颁布《重大信条十九条》。九月十七日（11月7日），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谋划北方新军起义，于是日被袁世凯派人刺死于石家庄车站。九月二十五日（11月15日），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召开各省都督代表会议，商组中央政府问题。随后议定各省代表赴鄂开会，各省留一人在上海主持联络事宜。十月十一日（12月1日），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宣布独立。十月十二日（12月2日），江浙联军光复南京。十月十六日（12月6日），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辞职。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开始。十一月六日（12月25日），孙中山自国外归抵上海。十一月十日（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公元纪年	中国纪年	大　　事
1912年	中华民国元年	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通令改用阳历，定是日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1日。3月，17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通过孙中山提出之国务员名单。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成立。2月10日，临时参议院通过优待清室条件。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0日再举黎元洪为副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3月11日，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1日，孙中山解除临时大总统职。2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5日，参议院议决本院移于北京。

后　记

清前期《皇太极两征朝鲜》由孙喆撰写，《乾隆惩贪与贪风日盛》由董建忠撰写，《天地会的发展》由张萍撰写，《乾嘉汉学综述》由严彤云撰写，《清代档案简介》由李建宏撰写，其余均由李景屏撰稿。

编　者

1994年8月20日